企鹅兰登 豆瓣高分好书



·社科精选

（套装共8册）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企鹅兰登 豆瓣高分好书



·社科精选

（套装共8册）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目录

1.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2.魔术师时代
3.人类的演化
4.非凡抄本寻访录
5.政治的起源
6.最后的冰川
7.大脑的一天
8.基本收入



德国

Germany

一个国家的记忆

Memories of a Nation

[英]尼尔·麦格雷戈——著

博望——译　孟钟捷——审订

重庆大学出版社

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英]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著

博望/译

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

UK｜USA｜Canada｜Ireland｜Australia
New Zealand｜India｜South Africa｜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Allen Lane 2014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BBC, 2014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BC and the British Museum

The BBC logo is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is used under licence

BBC logo copyright © BBC, 2005

The British Museum logo is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s used under lic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兰登（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正文目录

导言 纪念性建筑与记忆
第一部分 德国在哪里？
第1章 从勃兰登堡门望去
第2章 分裂的天空
第3章 失落的都城
第4章 流动的城市
第5章 权力的碎片
第二部分 想象德国
第6章 德意志民族的语言
第7章 白雪公主对拿破仑
第8章 歌德影响下的民族
第9章 先贤群英殿
第10章 一个民族，多样香肠
第三部分 延续的历史
第11章 查理大帝之争
第12章 雕塑精神
第13章 波罗的海的兄弟
第14章 铁血邦国
第15章 源自1848年的两条道路
第四部分 德国制造
第16章 发端于印刷机
第17章 德意志民族的一位艺术家
第18章 萨克森的白金
第19章 金属匠作大师
第20章 现代的摇篮
第五部分 每况愈下
第21章 铁匠俾斯麦
第22章 苦难的见证者
第23章 危机中的货币
第24章 肃清堕落艺术
第25章 在布痕瓦尔德营区门口
第六部分 与历史同行
第26章 被驱逐的德意志人
第27章 重新开始
第28章 新的德国犹太人
第29章 巴拉赫的天使
第30章 德国复兴
尾声
致谢
图片来源

参考书目



献给巴里·库克（Barrie Cook）

大英博物馆策展人

博学之士、同事及顾问

不可或缺之人


丹麦王国
北 海
波罗的海
波兰王国
匈牙利王国
法兰西王国
威尼斯共和国
瑞 士 邦 联
波西米亚王国
西里西亚
摩拉维亚
奥地利
巴伐利亚
萨克森公国
萨克森选侯领地
勃兰登堡
梅克伦堡
荷尔斯泰因
石勒苏益格
不伦瑞克－吕讷堡
黑森
普鲁士（王室）
克拉科夫
华沙
米兰
威尼斯
萨伏伊
日内瓦
图1：神圣罗马帝国
约公元1500年
大主教教区
神圣罗马帝国边界
教会领地
霍亨索伦家族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普法尔茨支系）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
萨克森家族（阿尔伯特支系）
萨克森家族（恩斯特支系）
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
哈布斯堡家族（原先由勃艮第掌控的领地）
瑞士邦联自由行政区
瑞士邦联联盟行政区
帝国自由城市
小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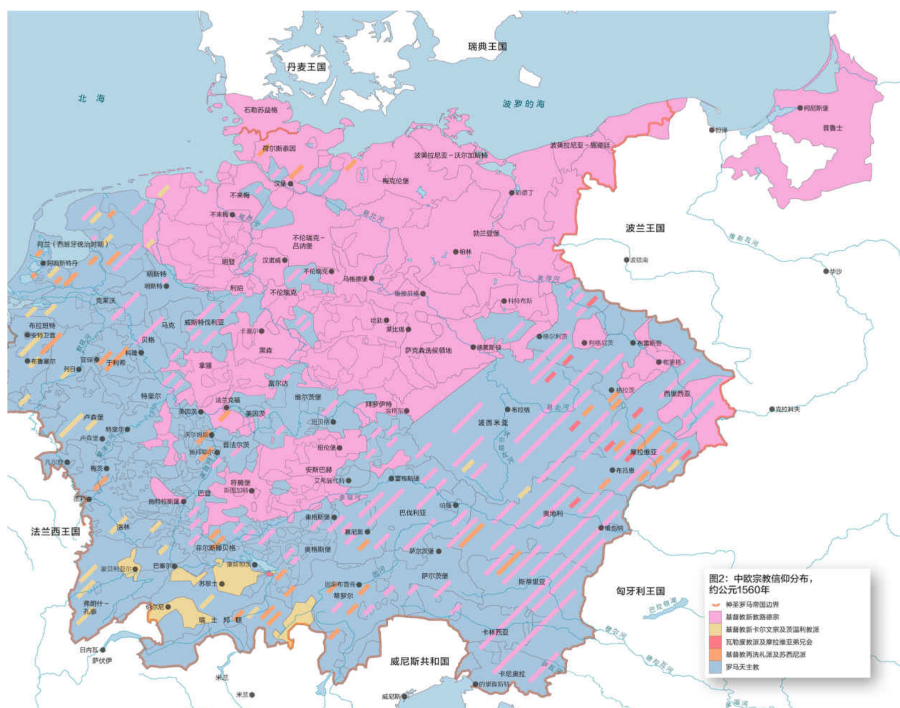

瑞典王国
丹麦王国
北 海
波罗的海
普鲁士
柯尼斯堡
波兰王国
匈牙利王国
法兰西王国
威尼斯共和国
瑞 士 邦 联
波西米亚
西里西亚
摩拉维亚
奥地利
巴伐利亚
萨克森选侯领地
勃兰登堡
梅克伦堡
荷尔斯泰因
石勒苏益格
波美拉尼亚－沃尔加斯特
波美拉尼亚－施德廷
不伦瑞克－吕讷堡
荷兰（西班牙统治时期）
黑森
克拉科夫
华沙
米兰
威尼斯
萨伏伊
日内瓦
图2：中欧宗教信仰分布，
约公元1560年
神圣罗马帝国边界
基督教新教路德宗
基督教新卡尔文宗及茨温利教派
瓦勒度教派及摩拉维亚弟兄会
基督教再洗礼派及苏西尼派
罗马天主教


图3：中欧，约公元1648年
大主教教区
神圣罗马帝国边界
教会领地
霍亨索伦家族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普法尔茨支系）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
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掌控的教会领地
萨克森家族（阿尔伯特支系）
萨克森家族（恩斯特支系）
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
由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掌控的教会领地
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支系）
瑞士邦联自由行政区
瑞士邦联联盟行政区
帝国自由城市
法国兼并地域，公元1552年至1648年
小邦国
瑞典王国
丹麦王国
北 海
波 罗 的 海
联省共和国
波兰王国
东普鲁士
瑞 士 邦 联
公元1648年独立
威尼斯共和国
奥斯曼帝国
波西米亚王国
奥地利
巴伐利亚
匈牙利王国


图4：中欧，约公元1786年
神圣罗马帝国边界
教会领地
勃兰登堡－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领地
韦廷家族（萨克森选侯）
由韦廷家族（萨克森选侯）掌控的教会领地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公元1777年合并
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掌控的教会领地
哈布斯堡家族（哈布斯堡奥地利支系消亡于公元1740年，由哈布斯堡－洛林支系延续）
由哈布斯堡家族掌控的教会领地
大不列颠及汉诺威，公元1714年合并
小邦国
瑞典王国
丹麦王国
北 海
波 罗 的 海
联省共和国
普鲁士王国
波兰王国
法兰西王国
瑞 士 邦 联
威尼斯共和国
萨丁尼亚王国
加里西亚与洛多梅里亚王国
萨克森
巴伐利亚
奥地利
匈牙利王国



图5：拿破仑占领下的德意志，公元18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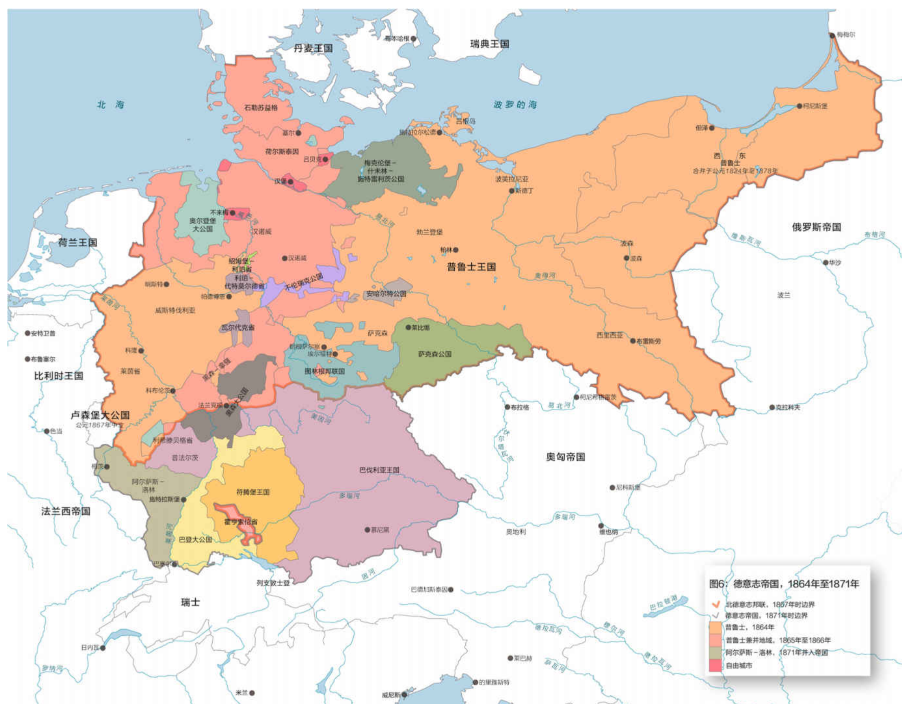


图6：德意志帝国，1864年至1871年



图7：欧洲，德意志帝国势力范围，1942年11月



图8：现代德国，联邦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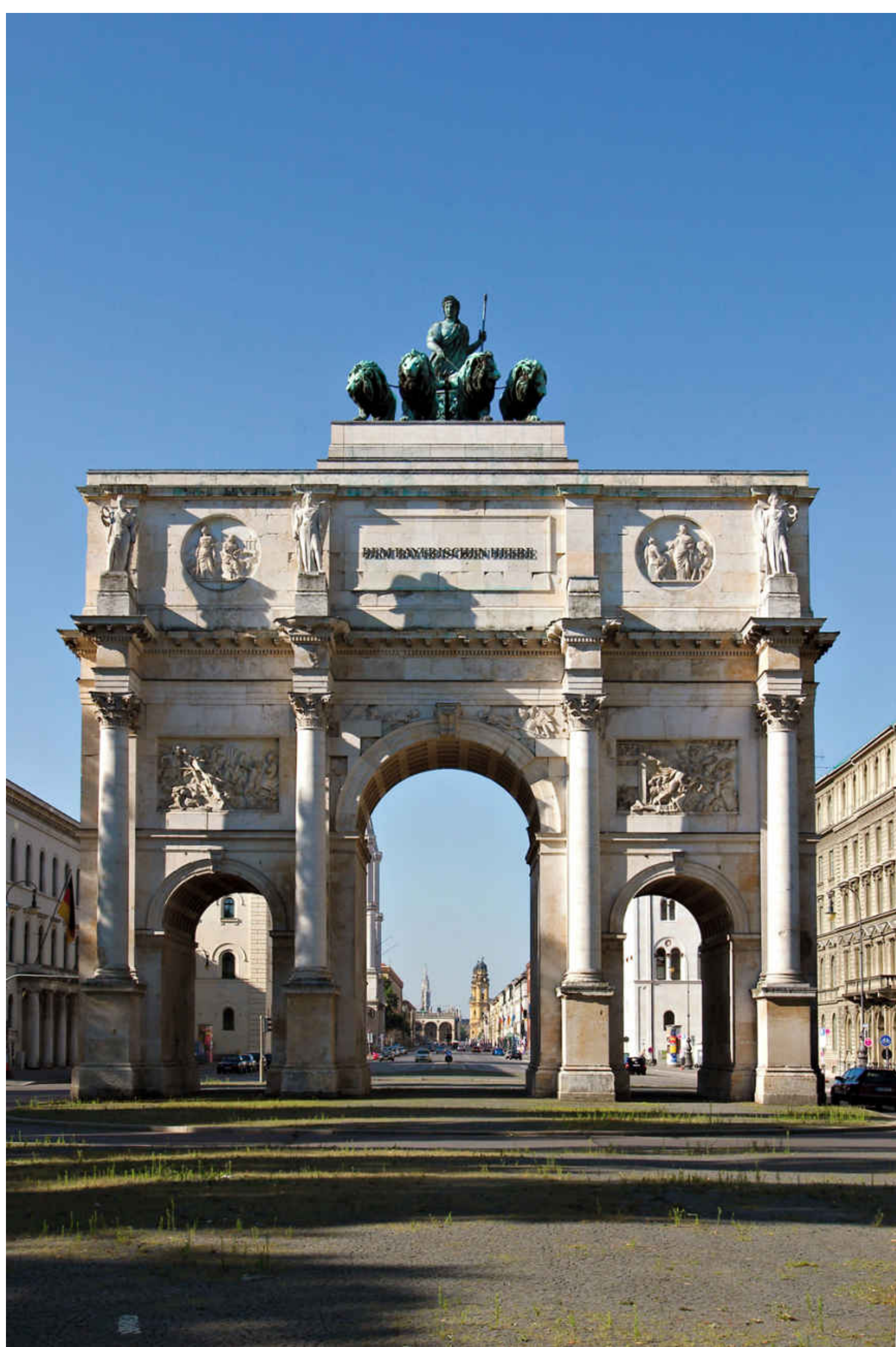
导言 纪念性建筑与记忆

德国的纪念性建筑与别国的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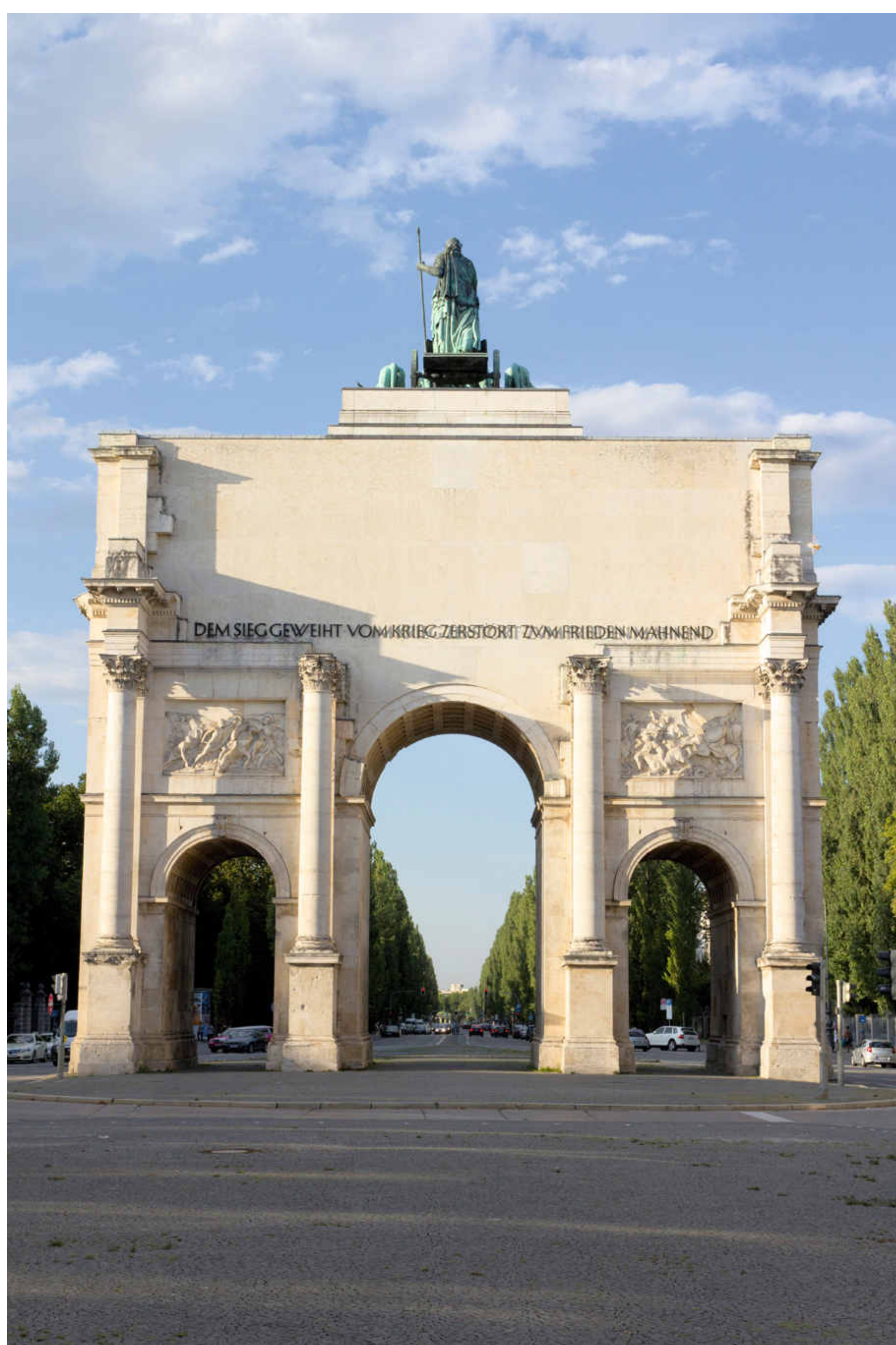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造访巴黎、伦敦及慕尼黑的游客在这些城市中都可以见到一座宏伟的古罗马风格的凯旋门。1792年至1815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凯旋门便是各国为了纪念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建。比如在伦敦的海德公园角，就有一座当年英国人为纪念威灵顿公

爵而建的凯旋门[1]1。约一个世纪之后，拱门顶部又加装了一座巨型的驷马双轮战车塑像。这座凯旋门坐落于当时伦敦城西的边缘地带，不过正好面对着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于伦敦的居所。宏伟壮观的巴黎凯旋门则处于数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交会处的星形广场的中心。凯旋门上的浮雕展现了开赴疆场的将士。而林荫大道中有三条是用拿破仑对普鲁士及奥地利所取得的胜利战役命名的。

慕尼黑也有一座凯旋门，它建于19世纪40年代，用以纪念巴伐利亚在国内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2]。与其参照的原型——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相似，慕尼黑凯旋门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北面上部东西两侧饰有浮雕，顶部立有一尊铜制雕像，象征着巴伐利亚的胜利女神驾驭着四头雄狮牵引的战车，傲然面向北方——大多数胜利者的入城方向。在雕像正下方有一行文字：“Dem Bayrischen Heere”，意思是“献予巴伐利亚军队”。兴建此座凯旋门，正是为了向其功绩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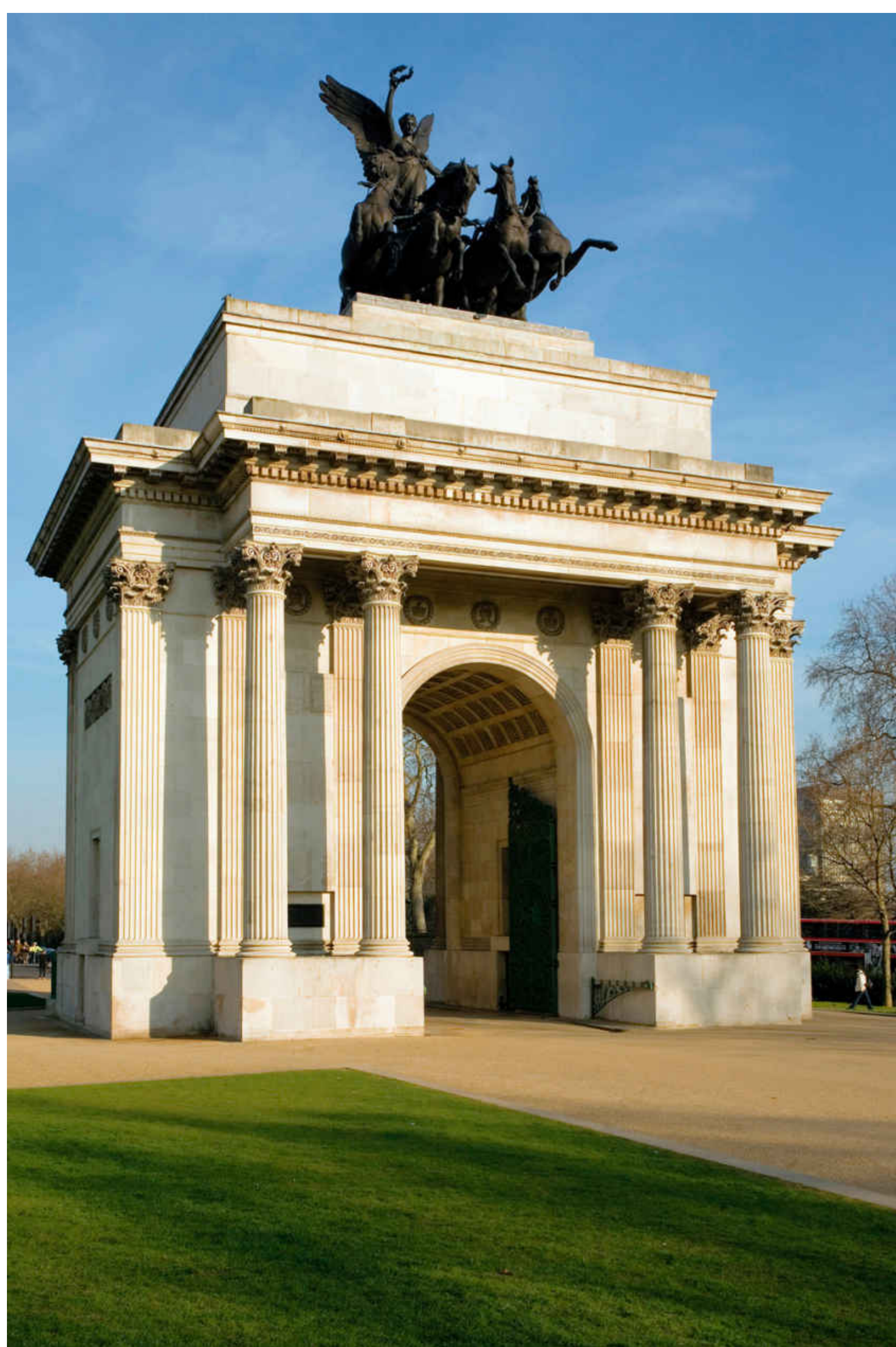
慕尼黑凯旋门，北面



慕尼黑凯旋门，南面



巴黎凯旋门



威灵顿凯旋门，伦敦海德公园

至此，它都是完全合乎传统的。第一眼看上去，你或许会认为威灵顿凯旋门、巴黎凯旋门和慕尼黑凯旋门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内涵。但令慕尼黑凯旋门别有意趣的，是它的另一面。它述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凯旋门受损严重。然而，复原

工作并没有试图去修复那些毁于轰炸中的经典雕饰细节。在其南面顶部，仅是一片空白的石壁。在这一片稍显突兀的空白下方，是一段文字：“Dem Sieg geweiht, vom Krieg zerstört, zum Frieden mahnend”，意即“献予胜利，毁于战争，警示和平”。

伦敦与巴黎的凯旋门只回顾那些重大的胜利时刻。它们虽然有所选择却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着国家的胜利。而慕尼黑的凯旋门不仅夸耀着促成其兴建的荣光，也述说着它后来被摧毁的境遇。与另两座凯旋门不同，这座凯旋门最初用以庆贺的目的被一种涉及失败与罪责而令人极不舒适的警示削弱了。它在向世人宣示一条格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在德国，历史功用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许是它不仅清晰地陈述着历史的观点，更是毅然决然而深怀劝戒地为过往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就像这座凯旋门一样。

若说德国的纪念性建筑不同于其他国家，那是因为德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几百年间，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均处于强大的中央权力的影响之下。所以，两国可以（或多或少地）用可信的方式来呈现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德国的政治版图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并分化为众多独立自治的邦国。这使得其历史进程不可能与英法相似。因此，德国的大部分历史所讲述的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故事。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覆盖了欧洲绝大多数通行德语的地区（见图1）。它为德意志的归属感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很少去协调组成帝国的诸多政体，更不用说对它们发号施令了。因此，德国的大部分历史往往是由不同区域的故事构成的，有时它们之间还相互矛盾。

这种矛盾最为鲜明的例子或许就是18世纪中叶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3]。若在其他国家，其军事成就可能早已确立了他民族英雄的地位。但是，弗里德里希当政期间开疆拓土的主要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德意志其他邦国为代价的。因此，他在柏林是位英雄，在德累斯顿却成了反面人物。在“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普鲁士完胜萨克森。1760年，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遭受到弗里德里希大军的巨大破坏。贝纳多·贝洛托[4]的许多画作都以巴洛克时期的德累斯顿为主题，描绘了这座欧洲最美的城市的风采（详见第23章），也记录了城内圣十字教堂因普军炮击而变为一片废墟的场景。作为七年战争中反法同盟的一支关键力量，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不列颠曾广受颂扬与尊崇。比如伍斯特工厂就曾生产了一套全系列的贡瓷；直到1914年，英国各地仍有许多取名为“普鲁士国王”的小酒馆。但对弗里德里希大王并不会存在泛德意志的看法。德累斯顿出产的瓷器自然不会去纪念他。而在萨克森，也没有哪家旅馆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类似的矛盾心理在慕尼黑的凯旋门上也有所体现。那上面谨慎地题写着“献予巴伐利亚军队”，却并未言明一个颇为难堪的史实——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支军队大多数时候是与法军并肩作战，去对抗其他德意志邦国。所以，这座凯旋门是一座有着双重内涵的纪念碑。它所承载的胜利并不亚于失败，可算是座没有胜利的凯旋门；同时它也彰显了一个令人烦扰的事实——敌人可以来自外部，同样也极有可能来自内部。

因此，德国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它极度丰富但又令人困惑。

如今，对归属同一大家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认知。但1871年德国统一以前，对于这一共通的目标，仅有一种时隐时现的意识。好在关于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及所经所感，还存在着大量而又普遍的共同记忆。而本书的目的，正是通过讲述其中的一些，使读者感同身受，进而引发共鸣。这倒不是说，本书会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成为一部德国史，实际上也不可能如此。本书只是试图通过各式物品与建筑，众多人物与场所，去探索德国现代国家认同在形成过程中的丝丝缕缕。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古滕堡于15世纪50年代印行的《圣经》。这或许是德国首次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刻，甚至是欧洲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时代最近的是近期刚刚完成复原修缮的德国国会大厦，即德国联邦议院所在地。所谓忆海无涯，我只是尝试去挑选那些在我看来特别有说服力且是大多数德国人共有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对别国人而言或许还不是很熟悉的内容。



1760年毁于普军炮火的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废墟。贝纳多·贝洛托作于1765年

当然，那其中也有一些与瑞士人及奥地利人共享的记忆。但本书所谈及的是二十五年[5]前形成的德国，以及现今正生活在那儿的那群人的记忆。早在很久以前，瑞士便已在政治上从德意志的余部[6]脱离出来。在上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中立性使该国有着彻底不同的历史。奥地利的历史与近邻德国的历史更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在许多重要方面也不相同。比如宗教改革未曾使奥地利永久地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去。其对拿破仑历次入侵的反应，也未清晰地表达出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以致未能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原先的领土。奥地利也未曾经历过长期冷战带来的国家分裂，抑或像德国那样出现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7]。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并没有以现代德国那样的严谨与诚实，对纳粹帝国时期的众多记忆和责任进行公开的、痛苦的审视。因此，涵盖奥地利记忆的一本书或许将会完全不同。



《倒转的雄鹰与德国国旗用色》，吉奥格·巴泽利茨作于**1977**年



《绞刑》，选自《战争的苦难与不幸》，雅克·卡洛作于**16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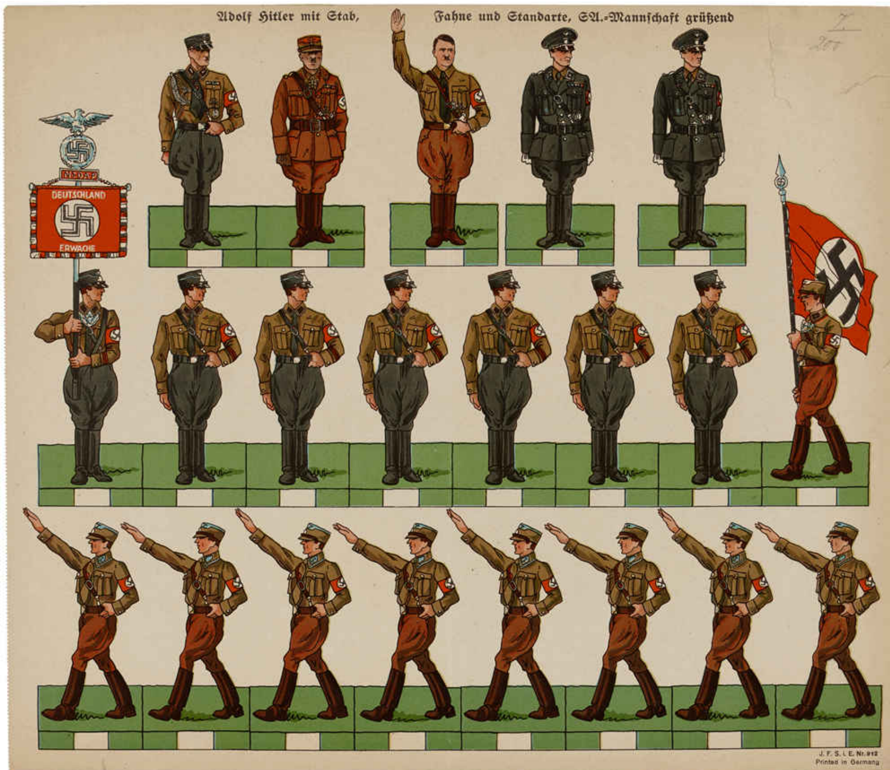
世界上所有主流国家都试图通过对各自历史的解读，心安无虞而又充满自信地反映出各自目前在世界舞台所处的位置。比如对自身作为“山巅之城”有明确认识的美国，早就可以确认其天定之命。不列颠与法兰西则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的政治演进视作对整个世界的一种示范，两国通过扩张传播了这种示范。俾斯麦[8]终于在1871年将众多分散的邦国统一为德意志帝国，继而使它拥有欧洲大陆领先的工业与经济实力。德国或许也是从那时起，有能力开创一些与之类似的国家传奇。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战败，继而魏玛共和国[9]夭折，紧接着第三帝国犯下的屠杀罪行，使得一以贯之的故事化作泡影。德国学者曾努力将历史拼图的不同部分重新拼合在一起，但却未能如愿。也没有谁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德国18世纪至19世纪在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与纳粹主义带来的道义深渊，置于一种易于理解的框架。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这是一段严重受损的历史，无法修复，但是却必须对其时常回顾。吉奥格·巴泽利茨[10]的一幅画作便将这一观点强烈而又形象地展示了出来。那是一面颠倒的德国国旗，破败而凌乱。



《日耳曼尼亚》，阿道夫·门策尔[11]作于**1846**年至**1857**年

尽管德意志各地区及邦国的过往各不相同，但永存于国家记忆中的四大创伤无一例外地为它们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不但各个德意志邦国被卷入其中，更引来所有欧洲强国的军队在德国的土地上厮杀。这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各路大军在那片土地上横冲直撞，散播着恐怖与瘟疫。雅克·卡洛[12]就曾记录了一支四处抢掠的军队进入洛林公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对当地村民进行的野蛮侵扰。类似的恐怖遍布德国全境，且从未被遗忘。此外，人们也普遍承认，战争导致的诸多经济后果，进入19世纪后依然有所显现。1945年5月初，希特勒的继任者海军元帅邓尼茨下令德国武装力量全部停火。而希特勒的建筑师及帝国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就曾以下述陈词对德国的投降进行文饰：

> 德国现今遭受的破坏唯有三十年战争时期可比。我们的人民正因饥饿和物资匮乏而大量死亡。绝不允许这一现状发展到那个时期的规模。



儿童剪纸模型，约1935年



1943年，盟军数轮空袭之后的汉堡

1792年，欧洲战事爆发。法国革命军侵入莱茵兰并占领了德国西部大片领土。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包括美因茨、亚琛及科隆，都被并入法兰西，并在此后约二十年时间一直归属于法国。1806年，耶拿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后，拿破仑统率法军一路追歼普鲁士军队，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柏林。至1812年，法军成功地占据了从莱茵兰至普俄边界的所有德国领土。这片土地上已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军事抵抗。德意志每一位有实力的统治者都被勒令派出军队，参与法军的俄罗斯战役[13]。这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但这种羞辱最终激发全体国民以崭新的方式审视自我，并在抗击入侵者的抵抗运动中团结起来。对1806年奇耻大辱的记忆已然融入全体德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持续至19世纪末期，乃至此后的岁月。



彼得·菲希特，因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第一人，时年十八岁，**1962年8月**

四大创伤中最具灾难性、也最为棘手的莫过于第三帝国。纳粹政权渗透进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造成巨大毒害。希特勒检阅纳粹冲锋队的儿童剪纸模型就是反映其危害程度的一个示例。第三帝国在德国和整个欧洲犯下的罪行，以及几乎来自每个德国家庭的成员在那些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普遍的共同记忆——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共同的沉默。时至今日，这种记忆充斥在民众的脑海中而远未清除。德国民众从帝国东部[14]逃离或是被驱逐，从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汉堡与德累斯顿

等众多城市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详见第27章），则是第三帝国遗留给几乎全体德国人的又一种记忆。

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导致四大同盟国进驻并占领整个德国，使其长期分裂为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裂造成的人员损伤代价目前仍在评估，这种代价集中体现为那些不顾一切试图穿越柏林墙而失去生命的德国人。

时至今日，柏林墙倒塌已有二十五年，距一个全新德国的诞生也已过去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勇敢而清醒地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那些罪行，长期以来被简单地归咎于“纳粹党”。伴随着对当年德国大多数民众在其间的胁从行为进行更为清晰的历史性考察，德国重归统一。随着柏林完成重建，人们有意识地试图将那些最为痛苦的记忆公之于众。其中最典型的范例便是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由此，也可以说德国的纪念性建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就我所知，世界范围内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在其首都的心脏地带兴建纪念物，用以展示自己极不光彩的过去。与慕尼黑的凯旋门一样，那些纪念性建筑的存在不仅是铭记历史，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鉴，确保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正如杰出的政治评论员米谢尔·施蒂默尔所述：“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的功用就是确保其永远不会重演。”



前面两页的照片展现了现代柏林中心地带的三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处于画面中景右侧的勃兰登堡门是本书第一章的主题。在其身后的是国会大厦，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前景则是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它所纪念的众多事件，将在本书后续篇幅中进行讨论。这三座纪念

性建筑及其意义，一并传达了现代德国的一种独特尝试，那就是与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复杂多变的记忆进行对抗。

[1] 此处为第一代威灵顿公爵，即阿瑟·韦尔斯利（1769—1852），英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联合普鲁士冯·布吕歇尔元帅（1742—1819）于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这座凯旋门建于1826年至1830年，起初曾是海德公园入口之一，后于1882年至1883年迁至现址海德公园角，即海德公园东南角一带。现今数条主要街道交会于此，是一个重要交通路口。——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译者注。

[2] “巴伐利亚”源自英文拼法，据德文则通常译作“拜仁”。19世纪40年代末，继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后，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最终未能完成“自由与统一”的历史使命。

[3] 旧译“腓特烈大帝”。

[4] 贝纳多·贝洛托（1721—1780），威尼斯画家，以其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诸多欧洲城市风景而闻名。笔下除众多意大利城市之外，首推德累斯顿、维也纳及华沙等名城。

[5] 英文版出版时间为2014年，全书均以此年份计算。

[6] 此处所谓“余部”涉及“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战后，法国夺取了欧洲霸权，瑞典成为欧洲强国。两国分别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土地与赔款。帝国已然分裂为大大小小的邦国及骑士国。荷兰与瑞士则脱离帝国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7] “二战”后，奥地利也曾被苏英美法四国分区占领。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与占领四国在维也纳签署条约，从而重获自由与独立。

[8]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于1862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任内逐步统一德国，并于1871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任帝国宰相。作为19世纪德国最为卓越的政治家，在民间及后世史学界，常被称为“铁血宰相”。

[9] 所谓“魏玛共和国”（1918—1933）实际上是后世史学界的通称。当时其正式国号就是“Deutsches Reich”（意为“德意志帝国”），即沿用了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后的国号。其宪法第一款虽明确“德意志帝国为共和政体”，但也是因多方力量相互抗衡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妥协。此后这一国号又被纳粹建立的政权所继承。因此，德国史学界为示区别和便于连贯叙述，通常也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称作“第一帝国”，用“第二帝国”指代由普鲁士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而将希特勒及纳粹党建立的帝国（1933—1945）称为“第三帝国”。

[10] 吉奥格·巴泽利茨，德裔奥地利画家及雕塑家，1938年生于德国萨克森。

[11] 阿道夫·门策尔（1815—1905），德国画家、版画及插图画家，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此画标

题“Germania”源自拉丁语，即画中那一象征着德意志帝国的女性形象。

[12] 雅克·卡洛（1592—1635），巴洛克时代洛林公国版画家、绘图员。

[13] 此次战役从1812年6月下旬持续至12月中旬。法国称之为“俄罗斯战役”，俄国则将其称作“1812年爱国战争”。汉译通常将后者表述为“卫国战争”，更一般地则称为“俄法战争”。

[14] 此处“东部”指曾属德意志帝国的东部疆土，自东向西包括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及西里西亚等一级行政区域（汉译通常作“省”）。可参考比对图6“德意志帝国（1864—1871）”与图8“现代德国”。其何时被纳入帝国版图，以及“二战”后的归属，在后续篇幅多少会有所介绍。

第一部分 德国在哪里？

“德意志兰？它在哪里？/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寻这样一个国家。”1796年，歌德和席勒如是写道。确实，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层面来看，德国总是缺乏稳定性。其疆域不断变更，历史处于持续变动的过程中。那些数百年间属于德国的市镇及行政区域，现在已然是他国的固有领土。凡此，对于那些地域意味着什么？对于德国人又意味着什么？本书所展现的内容，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德国实际上是由众多彼此独立的政体组成的；每一政体都有一段独特的历史。那是一种削弱自身的分裂性，还是丰富多元的复杂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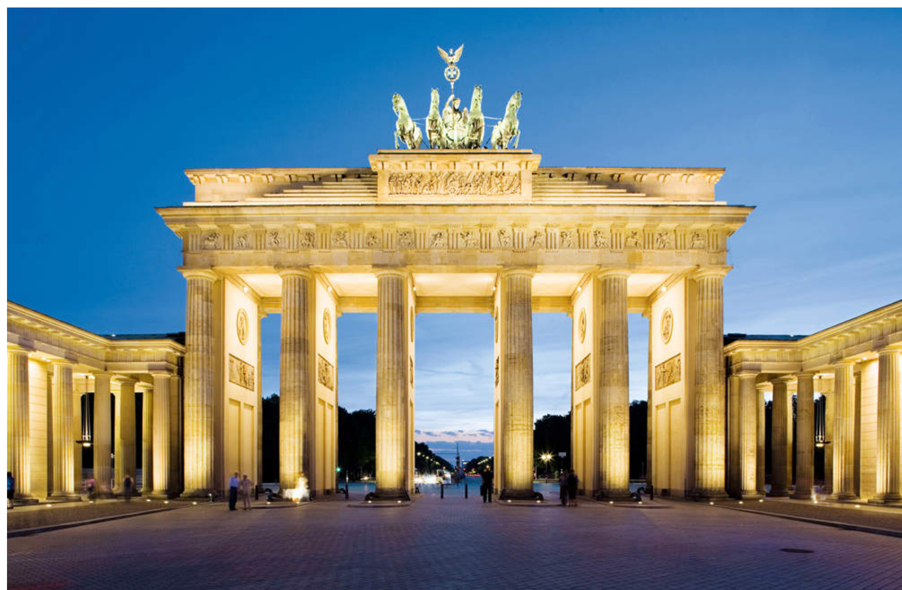
第1章 从勃兰登堡门望去

如果说现代德国有一处用来纪念或庆祝公共事务的“村落广场”，那一定是在勃兰登堡门周边区域。那里早已成为柏林举行各类城市集会的首选之地。自两德统一以来，那座朴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门，也已成为所有大型国务活动的天然幕景。

现任联邦文化部长莫妮卡·格瑞特斯教授说：

> 勃兰登堡门是一座国家纪念碑，而且再无别处可与它相提并论的了。毫无疑问，它是柏林墙的化身，是同一世界分隔为东西两部分的象征。它同时也是柏林墙倒塌后重获自由的标志。它向世人述说德国曾经的分裂，也是世界两大阵营分持两种不同社会理念而相互进行对抗的缩影。它不时提醒着我们，曾经失去自由；但同时其自身又是重获自由的伟大见证。因此，勃兰登堡门可说是一座象征着自由与统一的纪念碑，它是德国的，更属于全世界。

莫妮卡·格瑞特斯所谈及的是二十五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所认为的勃兰登堡门的意义。但勃兰登堡门自身的历史、过往的遭遇和它深层次的关联，却可以追溯到十倍于二十五年的更久远的年代。



勃兰登堡门，由卡尔·戈特哈德·郎汉斯设计，建于1788至1791年间，1945年战时受损严重，1990年后修复

起初，若干城门环绕柏林，用以向进城的货运车驾征缴关税。现今勃兰登堡门所在的位置即为其中一处。后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之令，于18世纪80年代重建，并由建筑师卡尔·戈特哈德·朗汉斯完成这一宏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设计。勃兰登堡门以雅典卫城的城门为范例，在当时被构想为一座和平纪念碑。它也是当时柏林首批地标性建筑之一。早在弗里德里希大王[1]时期，柏林已拥有一座宏伟的图书馆、一座华丽的歌剧院，以及其他一些相似功能的建筑（详见第30章）。此后，柏林更可自诩是一座保有雅典传统的文化与知识型城市。



霍亨索伦王室的都市宫，**1700—1950**

勃兰登堡门就矗立在那条长长的菩提树下大街的西端。正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一样，这条街道也从市区边缘一直延伸到市区的中心地带。在大道的尽头，街景的终点，曾有一座柏林都市宫，那里原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宫殿。勃兰登堡门建成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一组铜制塑像被安置在其顶部中央。塑像中胜利女神驾驭着一辆由四匹骏马牵引的战车，凸显出其凯旋门式的外观。



1806年，勃兰登堡门，拿破仑胜利进驻柏林

然而，首位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胜利入城仪式的却并非普鲁士国王，而是拿破仑·波拿巴。1805年12月，奥斯特利茨战役[2]中奥地利败北，其后仍在顽强抵抗法国入侵的德意志邦国，仅余普鲁士。次年的10月14日，拿破仑又统率法军，于耶拿与奥尔施泰特战役横扫普军。两周之后，即1806年10月27日，这位刚刚加冕登基的法兰西皇帝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柏林，率领他的军队通过勃兰登堡门，沿菩提树下大街直抵普鲁士王宫。而普鲁士王室早已远遁至东部城市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并在那里开始谋划普鲁士的生存与复兴大计。柏林被拱手让出，成为法军囊中之物。拿破仑迫不及待地宣扬自己的绝对权威，更要羞辱普鲁士国王在自己都城的软弱无能，于是便下令将勃兰登堡门上的整组铜制塑像拆下，作为战利品运回巴黎展出。自此，勃兰登堡门与其顶部的塑像分离达八年之久。

在柯尼斯堡，普鲁士国王与阁僚共同制定了完备的收复失地的方案，使普鲁士最终成为反击并驱逐法国势力的主导力量。1813年，普俄联军合力迫使拿破仑率法军退出柏林，而后对其一路追击，直至巴黎。1814年，胜利[3]庆典活动之一就是整组塑像重归勃兰登堡门。不过，塑像在复位之前，也经历了一番修复。今日见到的铜制战车上，胜利女神像配饰了普鲁士雄鹰，女神手持长矛，傲然托举着铁十字勋章（详见第14章）。此勋章由普鲁士国王授予，用以表彰那些与法国侵略者英勇作战的将士。整组塑像清晰地向世人述说着拿破仑败了，而且是被那个他曾近乎完全征服的德国所击败。至此，勃兰登堡门终于成为普鲁士的凯旋门。

勃兰登堡门不仅仅是一座经历史沉淀而被赋予了多重含义的纪念碑。它也是一处不同寻常的着眼点，可由此探究德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事实上，单从此处你不仅可以看到拿破仑战争的遗存，还能看到许多塑造了德意志国家记忆的伟大事件所留下的痕迹。

如果你向西顺着那条通往皇家宫殿夏洛滕堡的宽阔林荫道望去，就会看见另一座胜利纪念塑像。塑像通体镀金，独耸在一个高达200英尺[4]、被称为“胜利柱”的基座之上。胜利柱设计于1864年，原是为了庆祝普丹战争的胜利。此役更是开启了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塑像建成之时，普鲁士业已取得辉煌战绩：1866年完胜奥地利，1870年再次击败法国[5]。于是，柱基进行了相应的装饰用以纪念这三次大捷。这个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国家，拥有着当时欧洲大陆领先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在俾斯麦的主导下，普鲁士国王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元首。1873年，胜利柱的揭幕仪式宣示了柏林在欧洲及整个世界的新角色。到了1945年，在法国的坚持下，柱上那些展示法军败绩的雕饰被移除。好在除此之外，胜利柱大体保持了设计原样，至今仍在向世人述说着柏林在19世纪70年代的自信与荣光。



胜利柱，由海因里希·施特拉克设计，建于1864至1873年



宏伟的人民会堂模型，阿尔伯特·斯佩尔为第三帝国设计，前景为勃兰登堡门

你完全可以说，自勃兰登堡门以西的景致，实际上与1870年至1914年德国展现于世的景致并无二致。如果世事照着希特勒和阿尔伯特·斯佩尔所设计的那样发展，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勃兰登堡门向北望去，就会看到阿尔伯特·斯佩尔为第三帝国设计的人民会堂。它以勃兰登堡门为前景，凸显出那片区域在他们理念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斯佩尔，这位深得希特勒宠幸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座宏伟的大会堂，一座人民会堂。会堂的巨型穹顶有1000多英尺高[6]，覆盖整个会场。会场内可同时容纳18万民众，一齐聆听元首的训示。这样一座宏伟的建筑，必定会使附近的国会大厦相形见绌。对于勃兰登堡门来说，它是个不协调的，甚至过于张狂的近邻，但就纳粹党而言，那里却是他们中意的游行及集会场所。假如历史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你站在这个可以看到斯佩尔穹顶的地方，一定是种奇怪的体验。而今，你从这里转向南面，呈现在眼前的是通往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的道路。

然而，勃兰登堡门西向及南北向的景观，在过去的规划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柏林的都市景观规划中，炫目出彩的区域，其实是勃兰登堡门东向一侧，即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经过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兴建的图

书馆和歌剧院，径直延伸至街景尽头的柏林都市宫。这座完工于1700年前后的宏伟的巴洛克式宫殿，其实只是在发表一项伟大的宣言：尽管经历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还遭受过瑞典的入侵（17世纪70年代），但在七十年的动荡之后，勃兰登堡——这个定都柏林的不起眼的邦国，不仅存活了下来，更是逐渐成为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个邦国的求存图强之道颇为引人注目。据估算，在17世纪30年代，勃兰登堡邦国的城市人口从11.35万减至3.4万，农村人口从30万锐减至7.5万，相当于人口死亡或流失了近四分之三。战事结束后，城市与农村人口才趋于稳定，繁荣景象得以缓步复苏。17世纪70年代，北欧军事强国瑞典，联合法国再次入侵。那位史上以“大选侯”著称的勃兰登堡选侯[7]却更胜一筹，一举将瑞法联军击败。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8]，旋即驱离新教徒出境。此举却给柏林带来意外之喜——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打击之下，大批极富教养、身怀高超技能的胡格诺派教徒，先后来到柏林工作，从而促进了这座都市的繁荣。他们当中就有许多工匠参与了宫殿的兴建及装饰等工程。那座王宫告诉全世界：切莫轻视勃兰登堡。



霍亨索伦王宫故址上的民主德国共和宫，**1973年6月至2008年**

然而，今日你却无法在菩提树下大街觅得这座宫殿的身影。尽管宫殿建筑在柏林大轰炸时受损严重，但毕竟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原本可在战后得以修缮复原。但是，苏联当局视这座霍亨索伦王朝的宫殿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实物象征。眼下正是彻底清除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好时机，因此，占领当局非但未对王宫进行修复，反倒决意将其拆

毁。于是，宫殿中仅有一小处，即与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关的阳台得以留存。1918年11月9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里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但这次创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很快就被镇压了（详见第22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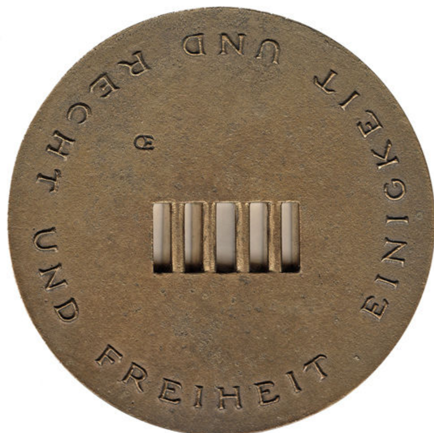
后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皇家宫殿的旧址上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共和国宫。那是一座覆盖着古铜色镜面玻璃的钢结构建筑。直至1990年民主德国政权终结为止，那里一直是人民议院的会场，也是一个文化和休闲活动中心。但是，如今你同样看不到这座建筑。两德统一后的数年间，人民代表已再次坐进泛德意志的国会大厦召开会议，于是坐落在合并后的新柏林的共和国宫应该何去何从，就曾引发激烈辩论。2008年，共和国宫终被拆除，据说是因为当初所用的石棉建材已不适合未来久用。随之逝去的还有许多东柏林过往的美好回忆。共和国宫的钢结构骨架则被出售，用以建造迪拜的哈里发塔。

因此，倘若今天你来到勃兰登堡门，既无法回溯大选侯的丰功伟绩，也欣赏不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就。历史长景就在这处建筑旧址戛然而止。旧址之上，重建中的王室故宫很快就初具形态（详见第30章）。不过在它后面，另一座东柏林的伟大的纪念建筑依然矗立着，那就是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高达1000英尺的高新技术通信塔——亚历山大电视塔。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人们无论身处西柏林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到这座电视塔，以便它可以全方位地宣扬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这座电视塔至今仍是德国最高的建筑之一，主宰着整个城市的天际。塔顶下方是球形的操控中心，当然还配有旋转餐厅。然而，这并不是亚历山大电视塔成为柏林记忆一部分的原因。由于空间构造和光线反射的共同作用，每当阳光普照，球体上总会出现一个巨大而明亮的十字架。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教皇的复仇”。时至今日，十字架依然可见，还会引发身处勃兰登堡门的观望者颇具讽刺意味的微笑——他们可记得，持无神论态度的民主德国当局，当时对出现十字架的情形是多么沮丧和尴尬。



亚历山大电视塔，由赫尔曼·何塞尔曼和盖尔哈德·考塞尔设计，1969年10月投入使用





统一奖章，由艾里希·奥特设计，**1989**年。背面上的铁窗在正面上变成了勃兰登堡门。监狱的一面刻有德国国歌：“统一、正义与自由”

勃兰登堡门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占领当局对其进行了修缮。恰好处在柏林东西两区（之后是东西两国）边界的勃兰登堡门，曾是官方的过境检查站点之一。正如18世纪那样，勃兰登堡门再次成为进出柏林的关卡。作为游行示威活动的场所，它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意义。1953年，那里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数以万计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自由选举的权利并撕扯下飘扬的红旗以示不满。苏联旋即出动坦克将动乱平息。1961年8月14日，即柏林墙动工后的第二天，大批西柏林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另一侧，抗议柏林墙的修建，抗议城市的分隔。东德当局以这些示威活动为借口，将检查站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自此，勃兰登堡充作路障关卡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1989年12月22日才重新开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步行通过此门，并受到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的欢迎。所以，对于德国人而言，再无任何其他建筑或场所，能像勃兰登堡门那样强有力地述说他们国家的分离与统一。



勃兰登堡门前的世界杯欢庆场面，**2014年6月**

两德统一后，勃兰登堡门被再次整修。现在，它处于一个步行区的中心，是各类集会及庆祝活动的首选聚集点。2014年夏，勃兰登堡门再次成为入城的凯旋之门。不过此番迎来的不是法国入侵者，而是从巴西世界杯夺冠归来的德国国家足球队。

下一章，我将沿着菩提树下大街一路向东，去探索发掘一批冷战时期两德分裂的遗存。当时分别生活在东柏林与西柏林的那些人，鲜有共同的记忆。这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且意义深远。众人都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往来于东西德间的重重困难，以及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许可而试图跨境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1] 前文提及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他的侄子，在他去世后继承了他的王位。

[2] 该地现属捷克，位于布尔诺以东。是役，俄奥联军会战法军，法军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

[3] 第六次反法同盟获胜。

[4] 约合60.96米。

[5] 法奥联军。

[6] 约合304.8米。

[7] 弗里德里希·威廉，普鲁士公爵。

[8] 由其四世祖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签署颁布。

第2章 分裂的天空

德国国会大厦坐落在柏林的心脏地带，经修复后成为德国联邦议院举行会议的场所。由于位置靠近当时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所以现今在其周边的建筑不多。大厦西侧是一大片草坪，东北面则紧邻施普瑞河。大多数日子里，河岸边总是有许多观光的游客，或是散步的行人，就像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边一样。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里既不可能是伦敦，也不可能是巴黎，这里只能是柏林。因为河边几处地方竖立着一排排白色的十字架。

> 君特·李特芬，1961年8月24日
>
> 乌多·杜李克，1961年10月5日
>
> 汉斯·瑞维尔，1963年1月1日
>
> 克劳斯·施吕特尔，1963年11月4日
>
> 海因兹·索克罗夫斯基，1965年11月25日
>
> 玛瑞奈塔·吉尔考夫斯基，1980年11月22日

名单上的逝者都很年轻，让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战争公墓。但事实并非如此。1961年8月，冷战最为显著的标志——柏林墙立了起来，之后曾有许多人因试图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而遭杀害。名单上记载的就是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施普瑞河岸边的白色十字架，背景是德国联邦总理府

CHRISTA WOLF

DER GETEILTE HIMMEL

克丽斯塔·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年出版

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柏林墙始建十天后，一直持续到柏林墙被拆除前的十个月。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后二十五年间，德国所有关于分裂的记忆中，最为清晰、最为痛苦，也最不易解释的，就是这个国家曾被野蛮地撕裂。许多家庭被迫分离，官僚机构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控制着两国间的人员往来，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每一个三十五岁以上的德国人，无论是来自东德还是西德，都对这些有所了解。

《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由东德小说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创作，出版于1963年，也就是柏林墙建成两年之后。这部小说为克丽斯塔·沃尔夫赢得了声誉。长久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从东德视角描述两德分裂的作品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一部之一。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的恋人——莉塔与曼弗瑞德的故事。在柏林墙建成之前，他们都生活在东柏林。那时候，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还很容易。后来，曼弗瑞德对东德不再抱有幻想。他去西柏林参加一个会议，之后便留了下来。他觉得，对他的职业生涯而言，那里有更多的机会。莉塔前去看望他，却对西柏林弥漫着的消费主义不感兴趣。她决定不再与曼弗瑞德交往，继续留在东柏林生活。她很清楚东部是有缺陷的，可是，在一个人们至少还向往携手共进的社会里，她感到更自在些。如同两德分裂一般，这对在各个方面都很般配的恋人就此分手了。

在小说高潮部分，莉塔最终选择了东德的共同理想，放弃了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柏林与她的恋人相伴一生。此时，曼弗瑞德说道："至少他们没法分隔天空。""天空？"莉塔想着，"这一交织着希望与欲望、爱情与悲伤的苍穹？""噢，是的，天空是最先被撕裂的。""Himmel"这个词在德语中兼有"天空"与"天堂"的意思。它贯穿于整部小说，代表着那些抱负与理想，也代表着一个社会力争达成的形态。分裂的天空：两个独立而彼此分离的政治架构，两种承载希望与欲望的不可调和的模式。本应在一起的一对恋人，却最终各奔东西。

作者克丽斯塔·沃尔夫如她心中的女英雄莉塔一样，选择留在东柏林。作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的境遇相对而言好一些，也获准自由旅行。尽管她批评政治体制，她的作品也被审查，然而对于国家理想，至少对她所希望实现的那些理想，她始终保持着不渝的忠诚。她对于政治体制的信念被拉扯着，但她始终不动摇，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信念。



1980年的柏林墙，它将位于西柏林的废弃不用的国会大厦同东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分隔开来

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地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数月之后的1949年10月7日，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见第501页的地图）。起初，两德间的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东德相较而言略微贫困些，部分原因是战败赔款。于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脱离东德，去往西德，毕竟那里的经济机会似乎更多，政治上也似乎更自由。1952年之后，民主德国政府便严密地监控着边境。尽管被逮捕囚禁的风险持续增加，但每年仍有近20万人想方设法地逃亡。至1961年，共有约350万东德民众离开，这相当于民主德国总人口的20%，因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为应对这种大规模逃亡，民主德国政府先是严密封锁了其内部边界，而后于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夜间，出动大批士兵，开始修建柏林墙，以防止任何人逃离。这一政策的实施从最开始就是野蛮的：在柏林墙施工期间，士兵奉命立于墙体之前，准备随时射杀任何企图叛逃的人。

民主德国当局称柏林墙是一道“反法西斯的防护壁垒”，以此义正词严地暗示，邻近的西德尚未完全去纳粹化。不管如何称呼它，柏林墙确实起到了作用。在1961年至1989年，它几乎阻止了所有自东向西的移民。它制止了技术工人大逃亡，民主德国经济从而暂时趋于稳定。大多数人接受了柏林墙不可逾越的现实，但在其存世期间，仍有约5000人试图以翻越墙体、挖掘地道或绕道等方式进行逃亡，仅柏林地区就有约100人因此丧生。



用于从东德经水路逃往西德的那件潜水服，**1987**年**11**月

柏林以北100英里左右，还有一条颇受人们青睐的逃往西德的路线，即经由波罗的海。下页图中这套无臂式潜水服是用明蓝色合成纤维制成的，正面及腿部配有白色拉链，适于约6英尺[1]高的成年男子。这件潜水服现藏于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尽管它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但看上去就像从未被穿过一样。博物馆负责人瑞格妮·法肯贝格博士介绍道：

> 1961年后，民主德国共有5609名公民试图经由波罗的海逃亡。其中仅有913人最终到达西德、丹麦或瑞典。174人因体力不支或体温过低而溺毙于海中。其余4522名企图逃离者则被判处了数月不等的刑罚。这件潜水服的主人就是其中之一。这件，还有另一件类似的潜水服，当时属于两个年轻人。他俩是好友，都来自莱比锡。1987年11月，他们打算划着充气橡皮艇，从吕贝克以东约30公里的一处海滨度假胜地博尔滕哈根出发，逃往西边。为了防止橡皮艇暴露，他们事先将它涂成了黑色。他俩希望紧身潜水服能有效防止体温过低。但两人甚至还没上艇，就被逮捕了。1988年3月，莱比锡地区法院以试图非法穿越边境的罪名对两人加重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十八个月。两人中年长的那个如今三十五岁，最近刚离了婚，正渴望在西德开始新的生活。

对于法肯贝格博士而言，像这样发掘众多实物背后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解读民主德国的官方档案。

> 展示或解读像民主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其困难在于，书面档案就在那儿，但它们都被刻意做过手脚，是想要掩盖什么，看起来没有任何重要信息，显得极为平常。对于历史学者而言，眼下一大难题就是透过看似温和无害的文字，去发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残忍与压迫。这正是困难所在。表面看来非常平静、清白，且极为正面。但那些文字本就是用来误导世人的。那么，我们如何借助当时的众多遗存与文字，重获这一专制极权主义国家的真相呢？

潜水服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证据。1987年时，那两个人必然是觉得民主德国的生活实在糟糕，所以才不惜冒死也要逃离。

这其中蕴含着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辛酸。不仅是因为潜水服还没来得及被使用，也不仅是因为它所述说的是希望的破灭。它的面料是那么简单廉价，根本无力抵御波罗的海11月份夜晚的寒冷。他们的逃亡计划太不专业了，人还在岸上就被捕了。但若非这样，他们一旦下海，或许就会被冻死或溺亡，甚至被枪杀。最终无非是让那些小小的白十字架上多两个名字。当然，最为辛酸的是，他们其实只要再等两年，便可平安

合法地通过勃兰登堡门前往西边。



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1956**年

在1961年至1989年，一些东德民众获得官方许可而前往西德，首先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士，还有那些家庭关系能确保他们回归的民众，再就是老年人（他们被视作经济上的负担，因此返回与否都无关紧要）。20世纪70年代，四国占领当局在柏林达成了一项协议，使西德人造访东德变得略微容易了一些。然而，整个流程从来都不简单。对于东柏林人来说，西边依然遥不可及。柏林墙令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城市的一边前往另一边。但是，一些联系依然不可避免，特别是自19世纪末以来，城市交通系统就是在一体空间的基础上规划的，而非两个分割的系统。地下交通网络与地面铁路系统互相交错，主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这一站交会。大多数德国人必须经由这座火车站在两边往来穿梭。而进出车站的整个过程受到严格管控，特别是在东德一侧，既要严防有人逃离，又要严密监视那些获准入境者。经由弗里德里希车站进出东柏林的经历，是整整一代德国人心中一段无法忘却的悲伤的情感体验。因此，弗里德里希车站以“泪宫”而闻名于整个德国。

要了解如何在这里穿越边境，又如何被管控，最好的方式是去看一看目前藏于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的一个车站模型。博物馆馆长萨碧娜·贝内克博士介绍了这座车站的运行方式。

> 我曾数次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当时，你要先换20马克的东德货币，即“东德马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强制兑换”，从西往东的人都得这么做。通常，我都是经由弗里德里希车站前往东柏林。借助这件模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车站被刻意修建得很复杂。高高的围墙

分隔出不同的空间区域，像是一座迷宫，根本分不清方向。你可以看到，不同行驶方向的铁轨被彻底地分隔开来。这样，那些铺设于东德一侧的铁轨，就与通往西德或更远方的铁轨保持了隔离。当你下了火车走向出口的时候，要不断地变换方向，上下楼层。你要先通过一些小门，到达宽敞的空间，然后再进入一些狭窄的空间。模型中随处可见高高的窗户，那里面设置着[2]制作出来用于员工培训的。当时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训练中心。把模型翻转过来，你会在背面看到一把钥匙和一些按钮。比如其中一组按钮，可以控制灯光来模拟警报。这样，史塔西便可指导受训人员，当有人试图非法逃离民主德国时，他们应该怎么做。



东西柏林间过境区域模型，弗里德里希大街站，1970年

铁路模型与玩偶之家的混合交错是挺有趣的，可这带来了双重的麻烦，毕竟它乍看起来像是一件玩具。人们得费些时间才能搞懂这件模型背后的非常成熟的目的——用以训练边境岗哨来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些悬挂在横梁间的电线非常醒目，线上固定着摄像头。这样，站台上发生的一切都能被监控到。那里就是由众多间隔物和围墙构建的一座复杂迷宫，里面不时变换着方向与空间区域，还配有小隔间用以个别讯问，高处还装有镜子。总之，行人随时随地都处于监视之中。他们搞不清正走向哪里，不确定接下来会到达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到目的地。如果是作为一种定向障碍的训练，它已经很难被超越了。而作为一种监控民众如何在压力与恐惧中行动的方式，恐怕再不会有比它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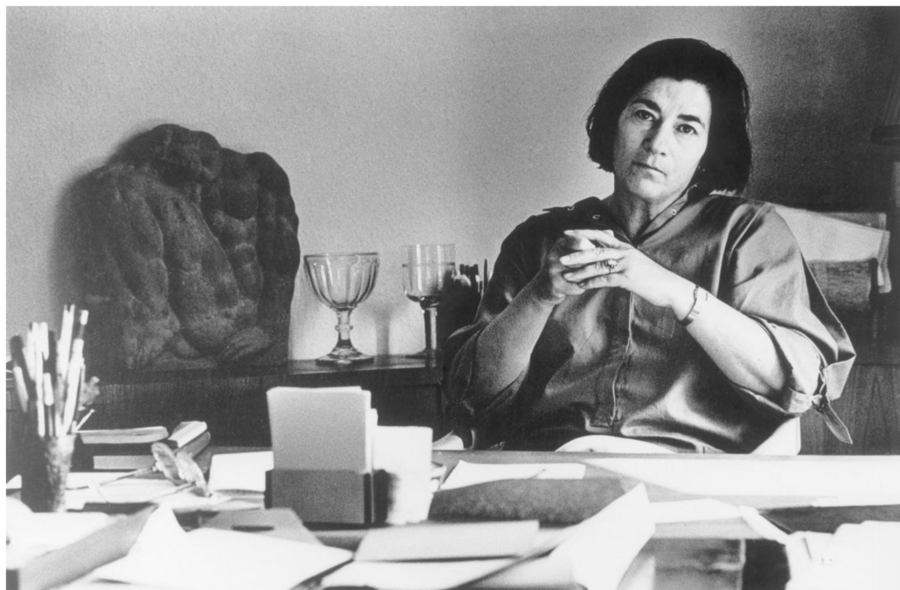
更好的了。它可谓将监控手段做到了极致。但凡走过这座车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种经历。

为了管控边界，只监视离境或准备逃亡的民众还不够。更为理想的情况是能够有效预测逃亡事件，并将其扼杀在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两德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也持续增加。瑞吉娜·法肯贝格博士介绍了当时史塔西所做的应对措施：

> 尝试越境的次数持续增加，从1985年的2200次上升到1986年的3700次。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强行穿越边界壁垒，或借助简易飞行器以及各种类型的船只。因此，史塔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用以应对这些逃离事件。在1987年至1988年，尝试逃亡的民众不断增多。史塔西开始加强对可疑对象的监管，特别是介于十八至三十五岁、未婚或离异的人群，或是曾申请移民却未获批准的那些人。史塔西的某个部门专门收集不同类型的飞行器。于是自1989年初，他们办了一个用于训练目的的长期展览，展示那些为非法越境而准备的物品器材。因此，我们今天才能见到那两件潜水服。它们连同那个用于逃离的橡皮艇都被移交给莱比锡当地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部门，继而再被转交给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
>
> 史塔西收集到这些物件后，首先是去弄明白它们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什么技术。目的就是确保他们的线人及同事了解当时的情况，人们都用什么方式尝试逃离，运用了哪些东西。这样，他们就能观察，有谁在买哪种材料，买了多少橡胶，买了哪一类航空学书籍等。像潜水服这类东西正可用来教学。它们让史塔西的线人明白，当其他公民准备非法逃离之时，他们该在哪些方面留心。

不论合法还是非法，为脱离民主德国而进行的每一次尝试，总伴有不幸和危险——潜水服与模型所述说的不止如此，它们更成为训练器材，用以提高史塔西对民众的监控能力，并且使由成千上万个告密者组成的监控网络变得更为敏锐。据估计，民主德国每三个公民中就有一位曾向史塔西密报过他们的同事、邻居，有时甚至是亲属。

克丽斯塔·沃尔夫197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余下者》的主题正是处于那个令人窒息的监控网络下的一段经历。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作家一生中的某一天。作家知道自己正在被监控：门外停靠的车辆里坐着人；她被跟踪、被监视；电话也被监听。由此而来的压力与悲痛，伴随着那些绝望与偏执的时刻，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最多的是沮丧，因为无从得知到底是谁在这么做，找不到任何人去交流，哪怕是敌人间的对质。取缔这一机构曾是两德统一后的首要成果之一，但相关的记忆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德国很多重要的方面。



书桌前的克丽斯塔·沃尔夫，20世纪80年代

先是纳粹时代的秘密监视，而后是史塔西无孔不入的监控，所有这些记忆使得无论是原东德还是原西德的民众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如没有议会的特别授权和监督，他们强烈拒绝国家监控他们的活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车站都是一处找不到方向的迷宫，被不间断地监控着，令人望而生畏。时至今日，那些都已不复存在。购物商场和咖啡厅里也找不到任何线索，能说明为何这里长久以来被称为“泪宫”。奔波忙碌的上班族拿着饮料和快餐，在熙熙攘攘的车站里来来往往，似乎又置身于伦敦或巴黎。但是，施普瑞河岸边出现的那些白色十字架能表明这是在柏林，而此处一件没有出现的东西也能确定这是在柏林。无论是站台、屋顶，还是公共电话亭或电缆塔架上，你在这里找不见任何监控镜头。这座车站肯定不在英国。



狂欢节大游行中一辆饰有斯诺登形象的花车“揭秘者号”，2014年3月于美因茨

监控行为留下了深刻记忆，其力量也在英德两国政府对爱德华·斯诺登事件迥异的反应中显现出来。2013年6月，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投入巨大资源用以大范围监控及情报搜集工作，甚至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也不例外。斯诺登声明说，他仅是想“告诉公众，哪些是以他们的名义在实施，又有哪些是针对他们的”。英国官方只是进行常规的反对，或者说不屑一顾。而这一声明在德国却引发密切关注，并得到许多公众的支持。比如在莱茵兰的美因茨市，玫瑰星期一狂欢节[3]的街道游行中就出现一辆花车，上面装饰着斯诺登英雄形象的人偶。狂欢节在大斋节之前，此时政治主题往往会成为公众谈论或调侃的对象。而对斯诺登的赞赏也是很明显的，当地群众对此毫不掩饰。2014年1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她向与会议员明确表示，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她说：

> 实施全数字监控的可能性已经触及我们生活的本质。因此，它远远超越了安全政策的范畴，而成为一项事关道德的任务。数百万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民众正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会如何应对所遭受的安全威胁：他们会以绝对自信的方式，谨慎行事，还是恰恰会破坏那数百万民众眼中令人向往的东西——自由与个体的尊严？

或许只有这样一位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德国政治领袖，才会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关于史塔西实施的监控，以及参与者的庞大人数，至今仍有激烈的

争论。这将我们带回到克丽斯塔·沃尔夫身边，回到本章开篇提及的她那部小说《分裂的天空》。这部书出版于1963年。它极其坦率地写出了民主德国的诸多不足，描述了崇高理想与日常妥协及逃避之间的巨大反差。沃尔夫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余下者》创作于1979年，描写了她身处监控之下的不安定的经历。然而，直至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她才将其出版。这部作品一经面世便掀起一场文坛风暴。主要是来自西德的评论家们指责她懦弱。更有甚者，指责她没在民主德国政权及史塔西仍掌握权力之时将小说出版，否则，或许会对限制政府滥用职权发挥些作用。他们断言是她自己选择了保持沉默，指控她是同谋者。他们认为，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她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应该对政治体制提出温和的批评。



2014年1月29日，默克尔总理在联邦议院大厦发表关于数字监控的演讲

更为糟糕的接踵而至。沃尔夫早已通过言谈甚至是文字表达了对民主德国国家监控系统的不喜欢与不赞同。20世纪90年代初，沃尔夫便开始研究与其本人相关的档案。这些档案由史塔西汇编成四十二卷，现今已经在国家档案馆中开放查阅。令她无比震惊和恐慌的是，她在其中发现了自己于1959年至1961年交给史塔西的一批报告。她曾是一名告密者，是公民向当局互相密告这一庞大网络中的一分子。她也曾和史塔西的密探多次会面，而她完全忘却了这些。

因再次被抨击虚伪以及曾与民主德国政权合谋，沃尔夫便在其所著的《天使之城》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一事件。这本书是她在洛杉矶盖蒂研究所访问期间完成的。她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与史塔西密探的接触都很短暂，且无关紧要。此外，她能看出，自己交给史塔西的少有的几份报告都太普通了，他们对自己必定早已失去了兴趣。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

后，他们之间便不再有来往了。



1992年**8**月，约阿希姆·高克在史塔西档案馆

然而，她并未使自己摆脱困境。她曾辩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她的那些举动，而在于她的遗忘。她何以压制了那段记忆而将其彻底遗忘？她又为何那样轻信而甘愿顺从威权？对此她得出的结论是，顺从，或者说希望以被要求的任何方式去支持国家，这是她在纳粹时代度过的童年给她留下的印记。正如她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她已经习惯服从。她的意念压制了这种可耻的记忆。对此她只能承认，而无法自我开脱。

评价沃尔夫的作品并不难：她以难得的洞察力与真诚的态度进行写作，没有理由怀疑她回忆往事的诚意。更为困难的是针对其他问题得出明确的观点。克丽斯塔·沃尔夫的故事以敏锐而令人惊恐的笔调，凸显了德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记忆太过痛苦和可耻，于是我们要将其抑制，而试图将这些记忆恢复，则会导致迷失与痛苦。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无异于老生常谈。直到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纳粹大屠杀以及如此之多的德国人在其中扮演的帮凶角色，存在许多重大问题。而这样一位作家的个案恰好表明了，为何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疑问不是仅仅没有答案，而是根本未被提出。这位作家的经历正是一个例证。这也使德国政府决定采取严苛的措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通过研究档案，开展生动的公共教育项目，建造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之类的纪念性建筑等方式来强制记忆。两德重新统一后，约阿希姆·高克曾领导一委员会来调查史塔西的档案记录。而今，他是联邦共和国总统，成为国家的首脑。这显然并非巧合。如今在德国，关于既有记忆的讨论与那些针对被遗忘的记忆的讨论一样多。许多国家在回顾其战争、失败和损失

时，总会选用“永志不忘”作为标题。这一表述今日在德国或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引发深层次的共鸣。



琥珀啤酒杯，柯尼斯堡，**1640**年至**1660**年

[1] 约1.83米。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3] 复活节首日前四十八天，尤其在莱茵地区是狂欢节活动中的高潮。

第3章 失落的都城

想要回顾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史，其最古老的大学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那里，社会最先组织开展思想层面的公共教育。

在法国，毋庸置疑是首都巴黎；对于苏格兰，则是大主教教区治署所在的圣安德鲁斯；而在英格兰，谁也不清楚，为何是无关紧要的牛津。

对于德语世界，则非布拉格莫属。134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在那里创建了德语世界的第一所大学。

数百年间，作为波希米亚王国的国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历代皇帝的临时居所，布拉格一直是德意志文化生活与精神家园的中心。

而查理大学更是开创了德国大学的伟大传统。

今天，它依然伫立在那儿，只是早已成了一所捷克的大学。而它所在的城市，已不再通行德语。

由此向北数百英里，坐落着另一座伟大的大学城。那里可谓是德国思想文化史的中心，但在那儿同样听不到德语了。

本章将要讲述的是布拉格与柯尼斯堡，即现今捷克的布拉格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这两座城市分别是卡夫卡和康德的故乡，尽管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再属于德国，但它们依然是德意志文化与思想意识的组成部分。

> ‘Deutschland? Aber, wo liegt es?’（“德意志兰？它在哪里？”）
>
> ‘Ich weiss das Land nicht zu finden.’（“我确实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寻这样一个国家。”）

发问者并不是一个正对着18世纪德国拼接地图犯愁而晕头转向的外国人，而是两位伟大的德国文学巨匠——歌德与席勒。上述言论收录于1796年出版的、由这两位文豪共同编纂的诗集《宾客礼物》。而这一疑问的答案却是在最近才变得相对明晰。之所以如此，不单单是由于德意志版图的政治疆界总是过于复杂而又游移不定，更是因为自中世纪初期，经历了彼此征服、相互妥协，乃至邀约移民，德语聚居区早已遍布中欧及东欧。与通行法语、英语或意大利语的地域不同，德语世界曾在欧洲范围内催生了众多分支聚居点及卫星市镇，最远延伸至伏尔加河流域。其中绝大多数在1945年遭遇粗暴清除，仅仅留存于德意志的文化记忆里，如同幻肢一般——曾是躯体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今却被截断而遭遗弃。可与之相比较的事件，或许唯有君士坦丁堡及亚历山大的那些长盛不衰的希腊精英阶层。他们同样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形象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但同样被20世纪的政治现实所消融。



布拉格大学



加里宁格勒大教堂，约1998年。大教堂一直处在周遭建筑的紧紧环抱之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摧毁

近现代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曾一度是座伟大的德国城市。对此，尚

可找寻的明证便是那座哥特式大教堂。那处建筑是德国波罗的海风格砖式结构的典型范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教堂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后于20世纪90年代得以修复重建。柯尼斯堡最为著名的城市之子——伊曼努埃尔·康德的墓地就在教堂的东北角。康德，1724年生于柯尼斯堡。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其一生都在此地，活动区域从未超出其周边10英里的范围，更不要说踏足今天的德国了。墓碑铭文摘录了他《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段名言："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这句话道出了对康德真正有启发而又使他深深敬畏的两大主题，引发了他无限的思考。没有康德，那么德国哲学，乃至欧洲哲学，都是不可想象的。

Critik der practischen Vernunft

von

Immanuel Kant.



Riga,
bey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178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初版的标题页，**1788**年出版于里加



加里宁格勒大教堂外的康德墓碑，上面德俄双语的铭文写道：“我

的精神意识里充斥着两样东西，我对二者的深思愈加频繁和持久，对它们的钦佩与敬畏就会时涨时新：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



柯尼斯堡的城堡，连同由条顿骑士团建于14世纪的塔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堡遭到严重破坏，其断壁残垣于20世纪60年代被铲平。前景处立有一尊俾斯麦的纪念塑像，约1905年

康德时代的柯尼斯堡处在世界的边缘，至少是德语世界的边缘。它是最东端的聚居区。早在1254年，柯尼斯堡就已经由条顿骑士团借助武力建立起来了。十字军中凶悍的日耳曼人正意欲征服那些被异教徒所占据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使其归化。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拉丁编年史

中惯用的“Borussia”变成了“Preussen”[1]，一个高度日耳曼化的行省。柯尼斯堡的日益富足，得益于小麦和木材贸易，但最负盛名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琥珀。当时在波罗的海沿岸可以大量采集到这种由湮没了千万年的森林转变而来的透明的、金色而神秘的树脂化石。它们被远销至里海、黑海、地中海，以及大西洋沿岸。普鲁士历代霍亨索伦公爵自1527年以来便是柯尼斯堡的统治者。他们充分利用了对这种材质几乎垄断的优势，在数百年间将其用作奢侈的外交礼物。这种远比银更为珍贵的材质所制成的礼物，在当时无与伦比，更无人能够拒绝。



柯尼斯堡全景，约**1740**年

于1650年前后制作于柯尼斯堡、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这只琥珀啤酒杯是个典型而又杰出的范例。这是一只精雕细刻的琥珀杯，可它的整体构思却荒诞可笑：当你很不方便地掀起杯盖，想要倒出杯中昂贵的进口葡萄酒或正式场合才能喝到的本地啤酒时，一定会感受到它是多么笨拙和不顺手。当然，它原本就不是为了喝酒而设计的，而是用来陈列欣赏的。要是桌上有这样一件东西，定会使你格调倍增：杯盖中心的圆盘上，竟用白琥珀（比金色琥珀更为罕见）雕饰了瑞典王冠上的盾徽。几乎可以确认，这只琥珀杯曾为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所拥有。它是勃兰登堡选侯赠送给女王的一件礼物。直到1650年，这位选侯还是普鲁士的公爵。作为柯尼斯堡的实际统治者，他当时正在寻求强大的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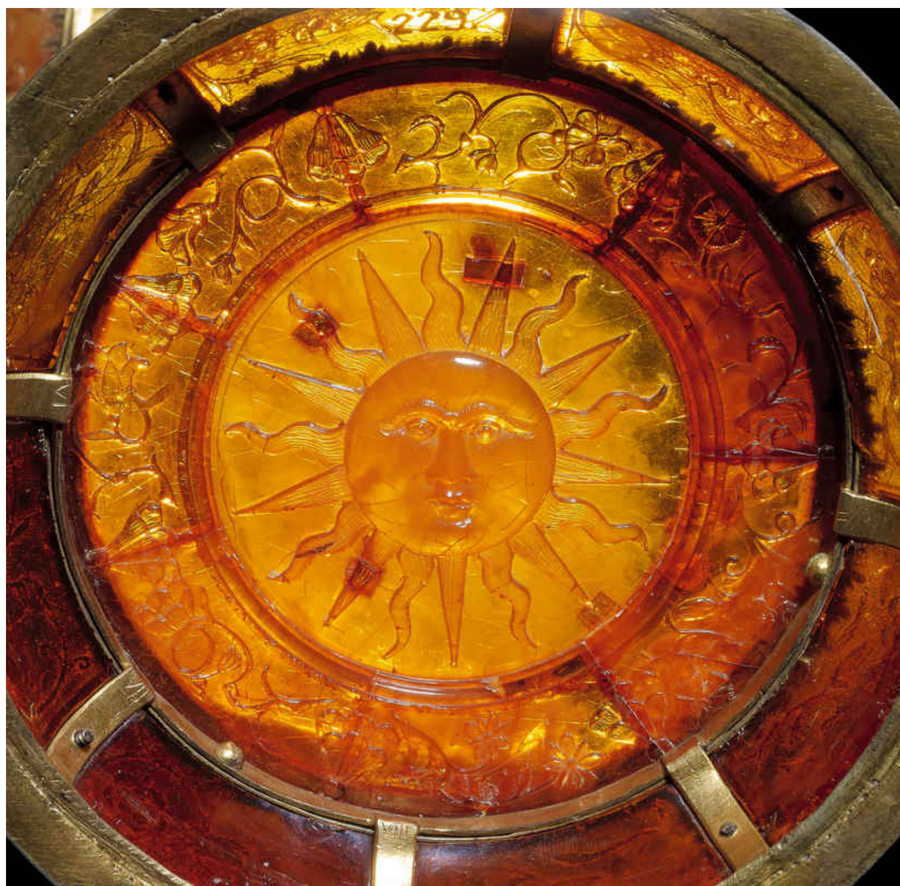


1761年，波罗的海海滨采集琥珀的场景。琥珀采集权由当地统治者所有：绞刑架旨在向意图不轨的窃贼们发出严峻警示

可见在自己的宫中异常节俭的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赠予他人礼物时竟是如此极尽奢华。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野心勃勃的王室家族。柯尼斯堡虽然地处外围，却反倒成了中心；偏于一隅成了这座城市最大的优势。研究普鲁士历史的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教授解释道：

> 柯尼斯堡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版图之外的一座城市（详见图1至图3）。所以，对历代勃兰登堡选侯索求一个王室头衔来说，该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他们无法在帝国内得到一个王室头衔，因为若如此，他们就不得不向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低头，请求皇帝陛下的恩准。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所以，他们就从柯尼斯堡索求王室头衔。而柯尼斯堡最终也成了普鲁士对王权提出要求的基地。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决定在他治下的普鲁士公国，自行加冕建号称王。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比如普鲁士这个名号也适用于后来波兰的一部分，所以他无法成为“普鲁士国王”，而只能被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但他还是将就着用了这个相当奇怪的称号，在不经意间首创了一种全新的君主身份。而勃兰登堡政体所用的名号却是来自普鲁士及柯尼斯堡。至17世纪时，这个邦国还总是被直接称作勃兰登堡。在夺取东普鲁士的过程中，它才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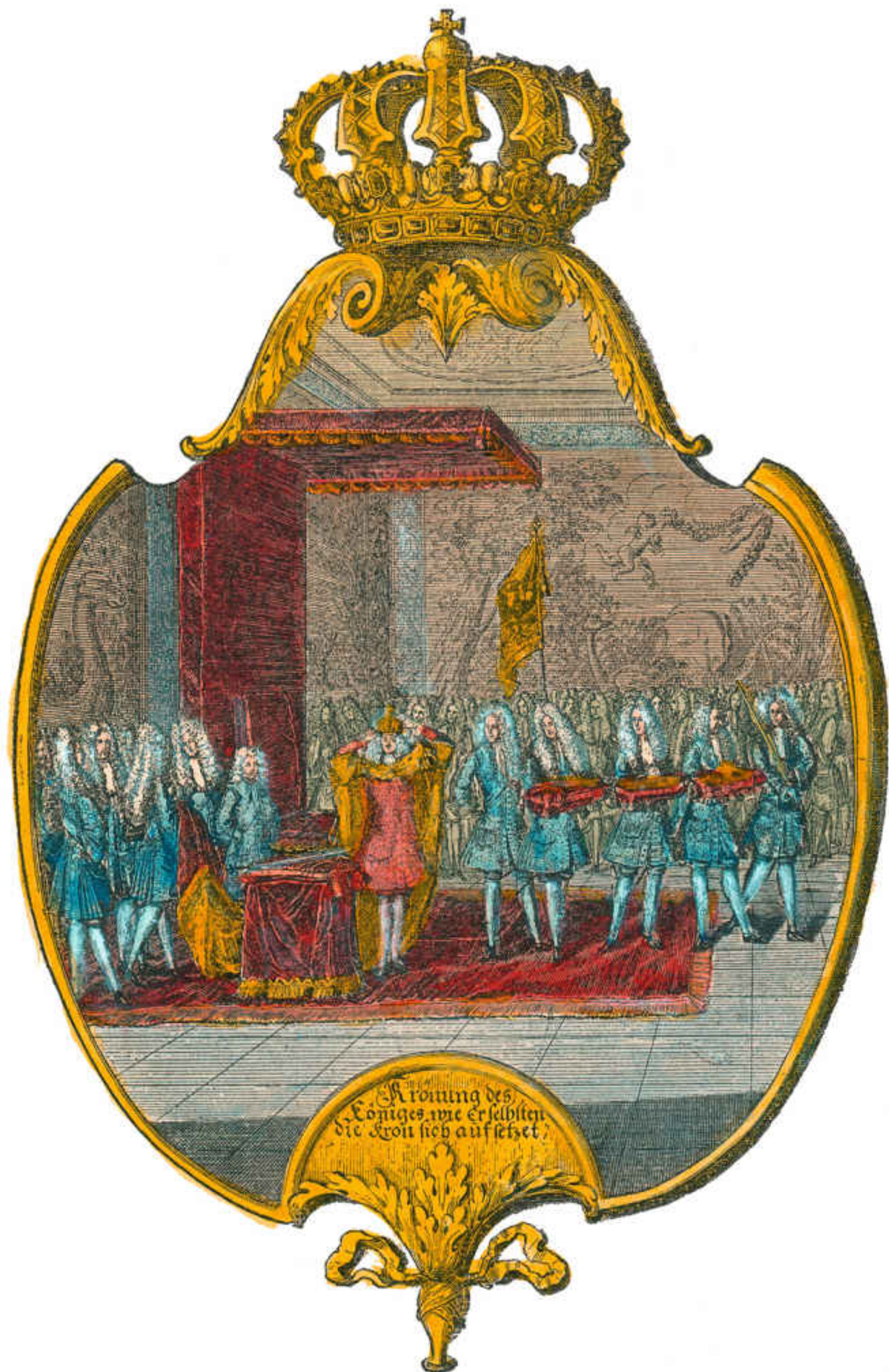
被称为“勃兰登堡-普鲁士”，而后以“普鲁士”名闻天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视作普鲁士的那个邦国，实际上是从其最东部的领土“窃取”了国号。



琥珀杯底座中心的太阳纹饰



琥珀杯杯盖所饰的瑞典王室盾徽



187. Krönungsszene in Königsberg

1701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柯尼斯堡大教堂将自己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



作为勃兰登堡选侯的弗里德里希



作为“普鲁士的国王”的弗里德里希

1701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柯尼斯堡大教堂为自己加冕。这是德国历史及欧洲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时，萨克森的那些选侯暂时是波兰的国王，但其王爵是自封的，而在适当的时候会传给其他家族。那位汉诺威的选侯即将成为大不列颠的国王，这就将他的利益关联导向了别处。但眼下这位“在普鲁士的国王”同丹麦及瑞典的国王一样，成了一个长久存在的王室，在德国北部还坐拥大片领土。然而，就某方面来说，这位新国王却并没有假装和其他君主一样。1701年1月18日，加冕典礼在柯尼斯堡哥特式砖结构大教堂举行。该典礼正是为了展现这一与众不同的君主政体。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解释说：

> 它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发展到那一时刻最为奢华

> 的单一事件。典礼场面宏大，像是一幕壮观的展演。但不同寻常的是，它并没有试图去寻求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权力继承。也就是说，王位头衔并非由哈布斯堡王朝授予，而是国王自己封授的。加冕典礼中有个有趣的环节，弗里德里希先为自己加冕，然后再给他的王后加冕。整个过程都不允许任何外人介入。这是个完全自创的君主政体。

自1701年至1914年，新兴国家普鲁士的国力不断壮大，其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偏处一隅的柯尼斯堡依然是一个特别的、近乎神奇的王廷之所在。王室成员或许已经入主柏林的宫殿，但这座东部的城市仍保有着其自身的地位。所以，在1806年，当拿破仑统率法军从耶拿一路追歼普军，既而攻占柏林之时，普鲁士王室就很自然地避难到了东普鲁士最偏远的柯尼斯堡。正是在那里，普鲁士国王与他的阁僚一起重构疆域版图，起草改革方案，令普鲁士军队与邦国能够领导它的德意志盟友，与奥地利、不列颠及俄罗斯组成的联军一起，一举击败拿破仑。而后在1871年，在他们的领导下又将奥地利以北的整个德意志统一起来。1701年，普鲁士在柯尼斯堡立国，而后1806年，又是以柯尼斯堡为中心，走向复兴。

然而，时光流逝，留下的仅是座琥珀之城。也许最能证明这个新兴王朝勃勃野心的是一件礼物。1716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这件礼物赠予其重要盟友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但是与他低调而有节制的祖父母不同，他送出的并非一件琥珀饮杯或珠宝匣，而是一整间琥珀屋。这间当时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屋重达数吨，位于察尔斯柯塞洛[2]的皇家胜地，即圣彼得堡郊外的罗曼诺夫夏宫，光芒耀世约二百年之久。1941年，列宁格勒围城战期间，琥珀屋落入德军之手，被运回到柯尼斯堡。1944年大轰炸开始时，它还在柯尼斯堡，但此后便不复存在了。



位于察尔斯柯塞洛的琥珀屋，屋内立有一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塑像，约**1930**年

很大程度上，柯尼斯堡也不复存在了。“二战”后期，先是英国空袭，后是苏联炮火，将这座城市蹂躏得满目疮痍。1945年，那些尚未逃离的德国民众或是被杀，或是被强行驱逐。随后，新的居民自苏联迁入。柯尼斯堡周边区域被划给波兰及立陶宛。这座城市本身则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成为苏联领土，一处驻有海军基地的飞地。在1945年至1989年苏联统治期间，大多数战时未被完全摧毁的建筑终被拆除，城中每一处地名、每一条街名都被变更。普鲁士王朝的发祥地最终被转变成了一座苏联的现代城市。康德时代的柯尼斯堡早已消亡，只有一样从未改变，作为德意志长久存在的延续象征留存至今，那就是城中那些井盖。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它们。在城中，随处可见的是苏联风格的建筑和塑像，以及用西里尔字母标示的市名“加里宁格勒”。而你脚下结实的铸铁上，仍可见到“L.STEINFURT.A-G-1937-KÖNIGSBERG.”的字样[3]。



现今加里宁格勒的一处井盖，上面“1937　柯尼斯堡”的字样仍清晰可见

随着几乎整座城市物质层面的消亡，普鲁士邦国也在法律上走向了终结。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说：

> 非同寻常的是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于1947年2月所做的决议，即通过一项法案将普鲁士邦国终结。与该委员会所签署的大多数法律文件不同，该决议的序言中还有一小段历史性的概述文字。这一段文字指出，普鲁士自往昔多年以来就是反动势力及军国主义的温床，故而特此声明将其终结。对该条法律文本的解读就在它的措辞之中。该邦国被看作德意志历史中军国主义及反动力量的源头。出于这一原因，它必须被逐出欧洲版图。它是一个必须被驱散的不安分的幽灵。在和平时期以这种方式，通过一次书面声明来终结一个国家，我印象中并没有先例。你若翻阅今天的欧洲地图，会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普鲁士确实消失了。

事实上，对于今天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普鲁士这个名字只会在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中偶尔出现。但在某一领域内，这一名称以其原有的拉丁语形式仍被广泛使用，不过可能很难识别出它到底是什么了。那支组建于1909年、取得过巨大成就的多特蒙德足球队仍旧自豪地保有着一份记忆——这座城市曾是普鲁士莱茵兰的一部分。因此，球队自称为“Borussia Dortmund”，意即“普鲁士的多特蒙得”。

1787年，康德正在柯尼斯堡撰写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其中那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一直流传至今。与此同时，莫扎特正在前往布拉格的途中，期望着《唐璜》的首演能受到那里民众的热烈欢迎。莫扎特确信布拉格是一座在许多方面像柯尼斯堡一样具有德意志风格的城市。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者罗伯特·埃文斯解释道：

> 如果回到18世纪的布拉格，你会强烈地感觉到，波希米亚王国的一切事务都与你在德国看到的相差无几。其外观是典型的德式风格，与你从萨克森或奥地利游历而来所途经的那些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这里广泛使用的语言就是德语。

不过，当然了，布拉格从来也不是一座完全德意志化的城市。那里曾是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的首都，也是捷克民族意识的中心。它与德语世界有着悠久而又复杂的关系。13世纪末，几乎是在武力夺取东普鲁士和柯尼斯堡的同一时间，日耳曼人受邀来到了布拉格。当时，中欧人口因蒙古人的入侵而急剧减少。波希米亚的那些国王迫切希望能重建他们的市镇，故而鼓励日耳曼人移民前来定居。到1300年，布拉格已经有了一个独特的日耳曼人聚居区。从一开始，日耳曼人群体就在城市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领军角色。当1348年创建大学时，大多数的教师与学生都讲德语。1600年前后，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设立了他的主要官邸，这座城市便再次成为德语世界的精神首都，吸引着整个欧洲范围内的艺术家与学者、科学家与天文学家不断前往。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将人文艺术引入波希米亚，荷兰雕塑家阿得瑞恩·德·弗瑞斯作于**1609**年

接下来的两百年中，布拉格城内德意志的影响力未曾受到实质性的挑战——莫扎特必曾见证过这一切。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的那些年为止。那时的波希米亚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民族主义倾向所带来的动荡。之后，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世事的确变化得非常快。捷克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虽然经历了长达五百年的混居及族群间的通婚，但布拉格和波希米亚的居民仍然坚定地要从德语世界分离出来。1848年至1880年，布拉格从一个主要通行德语的城市，逐渐转变为一个通行捷克语的城市。1882年，最后一批德裔公职人员从市政议会辞职，以此抗议新任市长在就职演说中的表述："我们心爱的百塔之城、金色之城、斯拉夫民族的布拉格"。次年，弗兰兹·卡夫卡降生。



布拉格老市镇广场，**1922**年。胡斯纪念馆（画面正中）的后面就是卡夫卡家族的照相馆

牛津大学研究近现代德国文学的卡恩·李德尔教授说：



卡夫卡，汉斯·弗望尼乌斯作于1937年

卡夫卡无疑是最有分量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大名甚至将一个新单词带入了英语，即“卡夫卡式”（Kafka-esque）。他在许多方面描述了现代人的不安与精神层面的孤独，以及局外人的境遇。在20世纪及往后的岁月，他成为异化的代名词，也代表着现代人的一种自我迷失。对于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而言，20世纪若没有卡夫卡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也许会说，他是一位捷克作家、一位奥地利作家或是一位犹太作家。但凡想以这种方式来界定卡夫卡，都会陷入那些围绕在他独特观点周围的问题当中去。他用德语写作，也曾在布拉格生活。德语与捷克语他都会说，但他只用德语写作。从这个意

> 义上来说，他的许多关注点都是德式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布拉格造就了卡夫卡。

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德意志布拉格的特定环境造就了他。1883年，卡夫卡降生在这座塑造了他的城市。当时，城内的德式氛围不仅仅是在衰退，而是渐近消散。在官方层面，布拉格已成为只通行一种语言的城市。随着他渐渐长大，街道上的标志全都换成了捷克语。1901年，他前往查理大学学习法律。那里已然被分为说捷克语和说德语的两个部分，不同的学生使用不同的出入口。因此，说着德语的卡夫卡长大后却成了所居城市的局外人。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座城市已经决定放弃它长久的德意志属性。汉斯·弗望尼乌斯曾为卡夫卡的一些故事配过插图。这幅卡夫卡的肖像画便出自他的手笔。此画将卡夫卡明显局促不安的、警觉的、犹疑的状态表现了出来。

然而，正如19世纪90年代布拉格大多数说德语的年轻人一样，卡夫卡在另一层意义上也是城市的局外人。在他所就读的那所用德语教学的中学里，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都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却置身于一片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已达三百年的土地上；作为一个说德语的人，却生活在一座眼下正决定放弃其德意志传承的城市。卡夫卡自出生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不得不去体验并理解那些现代政治架构下的压迫与异化。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与《审判》，以及他的短篇故事《变形记》（故事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甲虫的故事），都已跻身世界文学经典之列。它们是德意志布拉格最后的、永恒的绚烂绽放。卡恩·李德尔说：

> 在真实的布拉格，你可寻迹于那些角色走过的路径，沿着他们的足迹漫步街头。比如说，卡夫卡和家人的寓所就是他那部著名的小说《变形记》中所描写的场所，连房间平面图都完全相同。布拉格曾是一座非凡的熔炉，操着捷克语、德语、犹太语，甚至意第绪语[4]的人们在这里汇集而相互影响。卡夫卡就流连于这些不同族群的人汇聚的咖啡厅。

那是某种在奥匈帝国蓬勃发展的世界大同主义，但在1919年的民族国家却并不受欢迎。1924年，卡夫卡离尘而逝。当时，布拉格仅有百分之五的民众以德语为母语。与卡夫卡一样，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约二十年后，包括他三个妹妹在内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亡于种族大屠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德国人自己终结了布拉格的德语及德意志传统。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新成立的政权驱逐了境内所有幸存的说德语的居民。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苏台德区，总共约有三百万人。照官方的说法，“捷克国王曾邀请日耳曼殖民者至此”，而政府“是在纠正国王的过错”。被驱逐的人们避难于德国，这个他们大多数人从未到过的国家。七百年后，德意志布拉格的故事结束了，仅存活于卡夫卡小说的字里行间。

正如本章开篇所描述的，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通行俄语的加里宁格勒与通行捷克语的布拉格都不再是德国的了。第三帝国的那些暴行不仅屠杀了许许多多的俄国人与捷克人，也毁灭了德意志历史的那一段漫长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尽管无法遗忘，却也在慢慢平复。加里宁格勒的俄国大学现已更名为伊曼努埃尔·康德大学，而康德与俄国的关联更被广泛讨论。距德累斯顿仅80英里的布拉格与萨克森的联系再次被拉近，正如18世纪时那样。加里宁格勒和布拉格都在极力寻求德国游客与德国投资。现代德国及其东邻眼下正和睦相处，一并着手稳固它们的共同边界。但是，曾经的帝都、卡夫卡的故乡——布拉格，以及康德的故乡、普鲁士王朝的国都——柯尼斯堡，都将作为至关重要而又无比鲜活的记忆，永远留存于德意志的意识里。而今德国的政治边界是确定的，但对于文化史学者而言，其边界仍然游离在遥远的东方。

[1] 此处“Borussia”为近世拉丁语对普鲁士的称呼；而“Preussen”为中古高地德语，源自中世纪拉丁语对波罗的海沿岸一民族的称呼。

[2] 现今圣彼得堡市中心往南24公里处的一处小镇，曾是沙皇俄国皇族成员的离宫及来访贵宾下榻之所。

[3] L.STEINFURT指德国实业家利奥波特·施坦因福特（Leopold Steinfurt）。他于1804年生于柯尼斯堡，1864年亦卒于此。

[4] 一种犹太语言，有近千年历史，起初用于中欧及东欧；基于德语的一种形式发展而来，并结合了希伯来语词汇及其他一些语言的词汇。

第4章 流动的城市

没有哪条河流能像莱茵河那样，如此深沉地奔流在德意志的想象中，承载着诸多有关文化、历史或音乐的联想。哪怕是多瑙河也不能。当海涅笔下的罗蕾莱正梳理着她的金色秀发，引诱着那些水手们驶向沉覆的时候，静静流淌在夕阳余晖之下的正是这条莱茵河。也是在这条莱茵河上，瓦格纳笔下的齐格弗里德[1]开始了他史诗般的旅程。同样，在19世纪40年代，当卷入战局的法兰西炫耀着武力，并鼓噪将要再次侵犯德国领土时，久久传唱的是舒曼那首激荡人心的爱国歌曲“自由的德意志的莱茵河，是他们夺不去的”。

然而，莱茵河是属于德国的，还是只是德国的界河？数百年间，在经历了同友邻国家的交错重叠后，德意志语言及文化的历史版图远远超越了现代德国的疆域范围。在其西边，重叠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与法兰西的接壤之处，而且所有冲突始终聚焦在那座原属德国的历史古城——斯特拉斯堡。数个世纪以来，众多造访者都对城内那座哥特式大教堂赞赏不已，却都忽略了年轻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笔下狂想诗的力量。



莱茵河及码头风光，赫尔曼·萨夫特烈文绘于**1666**年

1770年，二十一岁的歌德前往斯特拉斯堡求学。他在大教堂前驻足流连时，发现了两件事：一是哥特式建筑所带来的变革力量；二是身为德国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与歌德同一天到访的那些游客正如你我一样，来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除了会在哥特式建筑前兴奋不已，更是为了

欣赏一件珍品。那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为著名的工艺成就。大教堂内有一座巨型天文钟，安放在一个三层高的石制框架内。每到正点，钟声响起，众多角色就跟着活动起来。表现救赎的剧目总是像这样短暂而又机械地上演着。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内的天文钟



歌德，**1765**年，即在造访斯特拉斯堡前不久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里的天文钟完工于1574年，是伊萨克·哈布莱希特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机械式精密仪器的制作正蓬勃发展，他便是该领域最为杰出的大师之一。歌德游览大教堂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杰作。不幸的是，天文钟在18世纪末因运转失灵而被拆除。因此，人们再也无法欣赏到它的精妙。现今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里的这座钟是一件19世纪的复制品。

但值得庆幸的是，1589年哈布莱希特参照他那件斯特拉斯堡的杰作，制作了一件室内缩小版。它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今天我们还能欣赏得到。这是件轻便可移动的钟塔，约3英尺高。四角的活动立柱优雅地

将配有黄铜雕饰的三层方形楼架支撑起来。它是一座时间屋，几个钟面上不同的刻度盘，度量着分钟与小时，从我们生活的当下直至审判日。一周七天随着转盘有规律地依次显现，各种月相变化也被标示了出来，黄道十二宫上则绘制了太阳的位置。每隔一小时，宇宙的时间主宰便会重现。一个个生命形象被刻饰于日历四周。一小时被划分为四刻钟，象征着人生的四个阶段，每刻钟由一个角色敲击一次，表现出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短暂，即便是古希腊与古罗马、亚述与波斯的伟大帝王也概莫能外。正如这些形象一样，人类会持续繁衍和消逝，直至时间的尽头。此时，位于最上层的基督形象便重返人间，将每逢正点敲钟的死神驱散。每当正点，基督的审判降临，我等凡夫俗子便应祈求上帝的怜悯。这座惊人的钟塔就会演奏起一段音乐，那是马丁·路德亲自为他那一版主祷文《我们的圣父》量身而作的。

哈布莱希特制作的这座钟塔结合了不同领域的诸多元素，神学、天文学、历史、数学，乃至精密工程以及路德的《圣经》译本（详见第6章），更有精美的银制雕塑配以路德融贯经文与音乐的天赋才情。钟塔有3英尺高，颇为轻巧，是件反映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纪念物。当时，这样的钟塔仅有极少数德国城市能够制造。其中之一便是现属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只是它当时的名字还是施特拉斯堡[2]。



轻便可移动式斯特拉斯堡钟塔



高耸在城市中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从15世纪至19世纪，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者乔基姆·惠利解释道：

> 施特拉斯堡曾是一座德国的城市。当时，它属于神圣罗

> 马帝国，也是帝国一位采邑主教掌管的教区。从语言上来说，该地域属于德语-阿勒曼尼语（一种发现于上莱茵和瑞士的德语形式）区。当地的精英阶层完全融入了德式的教育及政治体系。那时，这座城市与其西部区域并没有多少接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本质上的阿勒曼尼德意志身份认同。而施特拉斯堡大学在整个18世纪一直是一所德国大学，也是一处极受欢迎的求学之地。年轻的歌德与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都曾在那里求学。

正是在路德大学所在的施特拉斯堡市，哈布莱希特的钟塔体现出了德国精密工程制造的高超技艺，歌德发现了哥特式建筑的德意志属性。然而，这座城市却有着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特征：早在一百年前，它就被强行并入了法国。1681年，路易十四借成功入侵阿尔萨斯的余威，对施特拉斯堡不宣而战。法军未曾遭遇像样的抵抗，便一举将神圣罗马帝国的这座自由城市据为己有。

此城通行德语，且一直以来又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678年前后，即施特拉斯堡遭受入侵的三年前，曾有一幅宣传画展现了当时德国人是如何看待法国觊觎这片领土的。画面中，一只法国高卢鸡正在帝国版图上耀武扬威，其阴影笼罩着施特拉斯堡。此时，愤怒的雄鹰背负着皇室宝珠，在众多弱小盟友的环绕中挥动长剑，俯冲而下向高卢鸡发动攻击，并将其击退。此画的寓意非常明显，即帝国皇帝率其臣属很快就会将法国人逐出国境。但是，迅速收复失地的希望很快落空了。1697年，帝国皇帝勉强承认了法国对该城事实上的占有。于是，施特拉斯堡在武力胁迫之下成了斯特拉斯堡。

然而一百年间，法国并未强化在当地的统治。大多数市民仍然说着德语，那所德国大学也未关闭。因此，在1770年，歌德造访的这座城市实际上是个混合体。城市性格是德意志的，而城市治理却由法国掌管。



对路易十四世侵占阿尔萨斯进行猛烈抨击的德制宣传画，**1678**年

不过，在歌德眼中，那座大教堂却绝对不是一件混合体。它是德意志的，出自德国最优秀的建筑天才艾尔维·冯·施泰因巴赫之手。歌德彻底被它征服了。他这样写道：

> 它将千百个细节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它的同一性、完整性，以及它的伟大完全占据了我的灵魂。我可以品味和享受，却无法理解或阐释。他们说，这就如同天堂的快乐。而我多少次回味着此般天上人间的极乐幸福，在这杰作中领会先辈同胞们伟大的精神力量。又有多少次，从早到晚，由远及近，我从各个角度去凝望它的尊贵与荣耀。



1770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出自**1870**年的一幅印刷画

歌德曾就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写过一本小书《论德意志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这是他首部独立出版的作品，也是本颇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小册子。但其中有一处关键的错误。这个哥特式建筑外形上那些数不胜数、看似很混乱的细节，事实上经由一种流畅的动态美学被灵动地展现了出来。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他应该看得出来。但是歌德使自己确信（并非他一人如此），这座哥特式建筑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德式风格，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它其实起源于法国。他曾拨动天才与民族特性的浪漫双弦，吟诵道：

> 伟大的艾尔维啊！德意志艺术评论家，竟学着邻国那些人的嫉妒口吻，而认识不到自身优势，更用“哥特式”这个毫无意义的词将你的杰作变得无足轻重。他应感谢上帝继而大声宣布：那是德意志风格的建筑，我们的建筑，因为意大利人无可自夸，而法国人更无可炫耀。如若这样，我现在便没有理由感到激愤了。

至那时，大教堂所在的这座城市处于法国治下已近百年。对歌德而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就是在向所有德国人振臂高呼，以唤醒他们的民族传统，从而在众多欧洲文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正是在斯特拉斯堡，歌德遇见了年仅二十六岁的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创意导师，他也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之一。赫尔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师从康德。他在文学创作中对德语独特的激情与表现力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 学习母语是天经地义的，它与我们的天性最为接近，与我们的思想最为相称。我们根本无法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外的语言接受教育。很显然，在德国所谓的法式教育必将扭曲甚至误导德式的思想。

自文艺复兴以来，德意志的文化就深受古罗马及近代意大利与法兰西的影响。在18世纪70年代的斯特拉斯堡，对这两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而言，这种状况显然将有所改变。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安格丽卡·考夫曼作于1791年

数个世纪以来，德意志的知识、精神和文化边界与其政治疆界并不一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许多城市都可被拿来支持这一论述，不过斯特拉斯堡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说服力。若想书写一部德意志文化史，则不可能绕过这座城市，尽管现如今，无论语言、政治还是行政层面，它都属于法国。这里也是那部中世纪日耳曼文学杰作《特里斯坦》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的故乡。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座伟大的德国城市，施特拉斯堡为哈布莱希特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提供了经济土壤与知识储备，而众多的印刷机构和传教士则助力将路德的宗教改革传遍整个欧洲。正是在这里，赫尔德阐述了德语独特而充满生机的特性。而在歌德对大教堂热烈的情感表达中，施特拉斯堡激发了第一首颂扬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伟大赞歌。

法国早期宽松又宽容的统治并未使这个19世纪持续中央集权化的民

族国家挺过危机。在一个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世界格局下，斯特拉斯堡不可能再单单是德国或法国的。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对这座城市的掌控，从一国到另一国，几经变迁。这种更迭日趋压抑、暴力和彻底。



1871年的一件印刷宣传品，德意志诸邦国将士向刚刚加冕的帝国皇帝致敬

这是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另一件德国印刷品，主题为庆祝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及成功收复施特拉斯堡。画面中，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与科隆大教堂遥相呼应。科隆大教堂也是不久前才最终由普鲁士缔造完成的，堪为整个民族与国家自豪和团结的象征。如画中所描绘的，两座宏伟的德国教堂由德国伟大的河流——“自由的德意志的莱茵河”相连。这一称谓出自1840年的《莱茵河之歌》，由尼柯劳斯·贝克尔作词，舒曼谱曲。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终于复兴了。这件印刷品向世人宣示，斯特拉斯堡再次回归为施特拉斯堡，一座德意志帝国的城市。

另一方面，巴黎的那些政客们从未停止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

拿破仑的莱茵边界。这一边界于1815年后被放弃。1871年失去斯特拉斯堡则成了那个滔天大错的标志。协和广场上的城市塑像被蒙上了黑布，成为戴高乐家族出游时常光顾的著名场所。正是在那里，年轻的夏尔[3]接受教导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收复失地，恢复法兰西曾经的荣耀。斯特拉斯堡已然演变成法德敌对的图腾式标志物。1919年这座城市重属法国，1940被德国夺回，1944年11月23日再一次并入法国。每一次易手都致使文化民族主义及尖锐的融合同化随之升级。而今，这座在德意志文化史中如此重要的城市，最终归属法国。

对于历史学者乔基姆·惠利而言，这一问题现在得以明确解决了：

> 19世纪至20世纪漫长的法德历史，以德国自1940年展开的占领行动而告终。几乎每一处被反复争夺的土地都曾经历过血腥与野蛮。而归属问题最后取决于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人们常常说，德国用四年半的时间就将阿尔萨斯的居民转变为法国人，而法国在此前的二十年都未能实现这个目标。

而在1945年，那些“法国人”中的许多人仍保留着一个德式特征，那就是他们的语言。这是近两千年来德意志属性的最后一个明证。托米·翁格厄是位资深活动家，一直致力于维护阿尔萨斯人的语言权利，但他还是承认，这场战役失败了。



1871年，德国炮击后的斯特拉斯堡。普鲁士的旗帜飘扬在大教堂上

> 我花费了三十年大好时光，为阿尔萨斯的身份认同及我们的语言而战，因为语言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想，事实上这一切的现状正如我们当初战败的情况一样。在

> 我们身上得以留存的，实际上并非我们自己的语言，而只是一种口音，一种阿尔萨斯的腔调而已。眼下的阿尔萨斯已完全法国化。在我看来，现今的年轻人已完全没有了我曾有过的那种身份归属问题，毕竟他们现在都是法国人。雅可宾派已然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我们不必再去担忧，我们到底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我们是欧洲人。阿尔萨斯人是真正的欧洲人，因为我们发掘了一种全新的身份。

自1945年，法德两国通过一个进程解决了对莱茵河长期的拉锯式争夺。在这个进程中，戴高乐——那个曾驻足于协和广场斯特拉斯堡塑像前的男孩——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托米·翁格厄满怀希望的结论表明，德国的流动边界，以及围绕着这些边界而产生的诸多复杂问题与矛盾冲突，而今已被纳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以欧洲联盟为名的众多独立国家邦联。但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未来，它与早先的一段历史惊人地相似，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今天，斯特拉斯堡作为欧洲议会所在地，是欧洲全新构想的中枢。而欧盟或许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一种组织架构，使得阿尔萨斯方言那样的地区特性得以延续下去。若真能那样，则本质上就回到了那蓬勃发展了数个世纪的体系。斯特拉斯堡也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教堂的外观，歌德观察到千百个细节和流畅的结构，令他“可以品味和享受，却无法理解或阐释”。且不论其细节和多样性，那种结构令他感受到同一性、完整性和伟大之处。他或许也是在描述神圣罗马帝国，一个由不同类型的邦国及多种德意志属性融合而成的且持续了千年的庞大邦联。它将是下一章节的主题。



巴黎城中拟人化的斯特拉斯堡塑像，装饰着绶带与花环，1905年





塔勒银币，纪念汉诺威选侯夫人索菲娅，**1714**年





5坚尼金币，纪念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一世，**1716**年

[1] 《齐格弗里德》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三部分。

[2] 该城属于德国时，音译作“施特拉斯堡”，以示区分。

[3] 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夏尔·戴高乐。

第5章 权力的碎片

很少有人能像索菲娅这样对自己的死亡时间如此恼火了。这位汉诺威选侯夫人经由伦敦议会提名，以新教徒的身份成为不列颠王位的继承人。众所周知，索菲亚的远亲安妮女王的身体极为不好，索菲娅则身体硬朗、精神矍铄[1]。对女王的离世，索菲娅已经等待了十余年。然而，在一次庭园散步时，她自己却先倒下了。仅仅几周后，即1714年8月1日，女王也离开了人世。因此，大英博物馆中并没有为索菲娅加冕成为大不列颠女王而发行的纪念硬币，只藏有一枚铸造于汉诺威以纪念其离世的硬币，上面依然称她为大不列颠王位的继承人。

在这枚纪念索菲亚逝世的小小的银币旁边，是一枚大不列颠的5坚尼金币。索菲娅一直渴望能在有生之年出现在这种金币上。第78页那枚金币上是索菲娅之子乔治一世。他自豪地戴着桂冠，周遭环绕着多个头衔：大不列颠国王、法兰西国王（历代不列颠君主宣称的头衔，持续至1802年）、爱尔兰国王，以及信仰捍卫者。在金币的另一面，同一个乔治则被称作吉奥格·路德维希[2]，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与首席财务主管，此外还是不伦瑞克与吕讷堡的公爵。在不列颠流通的乔治货币是当时其境内唯一流通的货币。而在汉诺威流通的乔治货币则只是帝国内德意志不同领地所铸造的约二百种货币之一。这枚钱币向世人述说着这位曾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统治者。

如果在乔治新治下的不列颠王国与他已离开的那个德国之间，就货币体系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那么18世纪时两国政治史间的重要区别就会立刻显现出来。这种比较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国对待当代政治问题时迥异的立场。

对英格兰及后来的不列颠而言，统一——若有必要则强行统一——是国家数百年间的目标及宗旨，是秩序与繁荣的根本前提。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则不同，它是一个由诸多成员组成的政体，如同一个难以捉摸界定的整体，众多个体之所以联合在一起，并非因武力胁迫，而是由那些共同责任及惯常框架的合力所致。

历史学者乔基姆·惠利对这一常令外国人感到困惑的结构作出了阐释：

> 从外部看来，它确实比较混乱。特别是你若翻看着一本五颜六色的历史地图集，这一处、那一处，到处用小字体标注着不同的地名，一切看起来都很杂乱。但我认为，整体来看，它的运行方式就如同许多早期的现代国家一样。必须牢记的一点是，你所看到的由众多领地拼凑而成的版图，并不是一个诸多君主国家合并而成的帝国。那些王爵领地及帝国的自由城市并不是独立而享有主权的。它们从属于帝国，且都在共同的法律框架内运

> 作。而这套法律框架是在例行的帝国议会上，经由帝国皇帝与贵族们协商而联合通过的。我想，如此整合在一起，是由于同属于基督教世界最初的疆域版图，并担负着一个特别的共同使命。



塔勒银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700**年



古尔登银币，利珀-代特莫尔德[3]为利珀王朝所建邦国（伯爵，**1714**年

如果说帝国的组织架构是复杂的，那么它的钱币则提供了一种实物方式，让人们了解那个架构多样性的范围与界限。位于这一整套政治与货币体系顶端的当然是皇帝本人。正如这枚塔勒银币所示，1700年前后的皇帝为利奥波德一世。他有着一个典型的哈布斯堡式下巴，下唇也明显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数代大范围联姻的后代。这位皇帝曾是欧洲大陆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治下包括现今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大部、斯洛文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但与不列颠的统治者不同，帝国皇帝对于铸造货币并没有垄断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每位在帝国议会拥有一席之地的贵族，都有权去铸造他们各自的钱币，包括那些王爵贵族、各邦国选侯及各教区主教，甚至包括那些自由

城市以及众多的修道院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领主聚集在一起构成了帝国的执政全体。这是某种奇怪的贵族共和制，众多权力机构或多或少地处于皇帝开明的主导之下而共同运作。

在帝国这种架构的主导下，将近一百位世俗王爵贵族、五六十座自由城市，以及五六十位主教或大主教，都在各自领地铸造发行货币。因此，除了皇帝的塔勒制币以外，我们还找到了利珀[4]统治着一小片大约仅有一万至二万人口的领地。但伯爵在其铸造的钱币上，看起来却和皇帝一样伟岸。当时，他有自己的议会，可以召集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法庭，而且自己铸造钱币。简言之，在欧洲大多数地区，他所享有的这些都是主权国家才有的权利。

紧随世俗王爵贵族之后的，是帝国约五十座自由城市。当时许多非常精美的钱币就出自这些地方。这些城市常常抓住这个机会炫耀自己独特的景观。比如科隆就在钱币上展现了它那带有高高尖塔的大教堂。众所周知，大教堂经历了数个世纪都还没有完工。其顶端架设着一台起重机，使人不禁猜想，工程是否会于某一天又重新开始。在这些自由城市所铸造的钱币当中，最为奢华的无疑出自德国北部的商业化大都市——汉堡。它铸造了一种巨大的金币，币值10达克特，重约35克。金币上呈现着城市全景，还有它那聚集着各式帆船的港口。在桅杆和教堂尖顶的上方，用希伯来文书写着“耶和华”，提醒着你，这座贸易繁荣的城市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富足的汉堡，虔诚的新教徒，以及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区——这座城市的全部意识形态都在这一枚钱币上得以呈现。



塔勒银币，科隆，1705年至1711年





10达克特金币，汉堡，1689年





达克特金币，圣阿尔班，1744年





塔勒银币，奎德林堡，1704年

与世俗的王爵贵族及自由城市一样，当时的教会也铸造钱币。那些高高在上的采邑主教和大主教理所当然是最高等级的王爵贵族。但即便是很小的机构，比如那些教会修道院，同样也有铸币权。当时这些修道院并不是有实际职能的经济机构。所以，它们常常通过制作一枚钱币来显示它们拥有铸币权，以此作为它们管辖权或政治权威的某种象征，而

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经济需求。比如莱茵兰圣阿尔班修道院的院长，他或许仅统治着其修道院所辖的那片领地，所掌管的名目都不至以千计，竟也铸造了不少精美的达克特金币。

此外，人们或许想不到，只有在教会的领地，才有女性权贵铸造钱币这一颇为悠久的传统。一些女修道院院长就曾长期拥有铸币权。因此，在萨克森像奎德林堡等地，你可以看到一种罕见的或者说在欧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那就是众多女性继承人主导着钱币铸造。钱币上的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院长勾勒出了神圣罗马帝国实际运作中的另一关键元素。作为萨克森-魏玛公爵的女儿，她与那些统治周边领地的男性亲属们往往携手合作来维护王朝的诸多利益。若说德国这些钱币展现了权力与威望在多个政治中心极度分散的情况，那么它们同时也揭示了那些政治中心间的家族联系。而这种联系使得上述的分散情况看上去比实际更为明显。不同钱币上的那些人很有可能是堂表亲关系。同一人可以是不同地区的主教，因此也就有可能出现在多种不同的钱币上。比如，我们有一枚舍恩博恩家族洛塔·弗兰兹的塔勒银币，在那上面他是美因茨的大主教，而另一枚塔勒则显示他是班贝格的主教。





塔勒银币，班贝格，**1697**年，正面为舍恩博恩主教





塔勒银币，美因茨，**1696**年，正面为舍恩博恩大主教





达克特金币，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1723**年

当你查看一张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图时，你会发现它是如此支离破碎，几乎不可能弄清楚它是如何拼凑而成的。这些钱币可以为此提供一些帮助。另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历史到底是如何演变成那样的。对此，我们可以再次从钱币获得帮助。这枚钱币正面是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背面有七位家族成员的肖像，因为公爵共有七个儿子。他将自己的领地分给了这七个儿子，而他们在继承土地的同时也都拥有了铸币权。因此这枚钱币概括了一块领地依据当地的继承法规被重新划分为众多土地单元的复杂过程。家族的每一分支都会婚娶、亡故或与其他家族联姻。一些分配出去的领地仍有可能再次拼凑到一起，不过是在全新的格局之中。

你或许会猜想，一个如此分散的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混乱。对此，外国访客的确曾抱怨过。然而，这类困难在当时其实是相当表面的。无论是哪儿发行的金币或银币都遵循着标准化的重量体系，继而再细分为相对一致的更小的单位。所以，一枚欧洲最伟大的统治者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发行的塔勒银币，与较小的王爵邦国哈瑙-里希滕贝格王爵的塔勒银币是等值的。虽然价值与重量大体相当，但那些更大的钱币一面上通常会铸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帝国的雄鹰，以此显示它们是一个完整系统中的一部分，尽管这个系统不是统一的。这正像今天的欧洲，比如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欧元，看起来是法国制造的，但你或许会找到一枚出自意大利或德国的。同样，如果你身处当时的汉诺威，那么你的钱币多半会是汉诺威选侯铸造的，但你也可能发现一枚邻近帕德博恩主教所铸造的，或是一枚源自俄罗斯的。但两枚都是同一重量与面值。整个网络通行着一套基本的一致性规则，都要以帝国法律制定的标准为根本依据。这一体系或许复杂，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它行之有效，正如神圣罗马帝国自身一样。





古尔登银币，魏斯玛，**1673**年

帝国钱币的故事当然并不仅限于一个德国。我们不妨从不列颠的君主乔治一世开始说起。这位君主因天赐恩泽而成为最高统治者，当然会出现在其治下的不列颠货币中。此外，他作为汉诺威的选侯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爵贵族，同样也出现于德制铸币中。自1714年大不列颠的国王便在帝国议会占有一席之地，直至1806年帝国终结。正如那些钱币所展现给我们的，汉诺威选侯身兼多个角色。勃兰登堡选侯是普鲁士的国王，而萨克森的两位选侯继承人奥古斯特二世和奥古斯特三世则是波兰国王。其余那些完全处于外部的王朝同样曾在德国拥有帝国的领地。对此，罗伯特·埃文斯教授描述道：

> 大约在18世纪初期，几乎整个欧洲都以这样的方式与帝国产生着联系：不列颠、丹麦、普鲁士、瑞典、波兰、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统治者们都拥有帝国以外的王冠，但与帝国均保持着亲密的、职能上的联系。甚至连俄罗斯的统治家族也源自德国。因此，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星图的形式。帝国的安危也就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一方面，帝国的诸多问题可以被转嫁出去；而欧洲其他部分也会觉得维持德国的稳定秩序是必要的。

如此一来，德国便成了欧洲范围内安全体系的枢纽。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惊人的现代观点。德国有着巨大的区域性差异和犹疑不决的中央权力，这同样颇具现代视角。对于历史学者乔基姆·惠利而言，帝国的政治实践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 那是一种权力下放的体制，在其框架内，各地区及诸省份可以蓬勃发展而没有任何中央集权政府的介入或干预。我想，这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它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德国人乐意妥协，并且对今天欧洲政治体系内的谈判有着无穷的耐心。这在近代早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是非常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帝国皇帝、王爵贵族以及自由城

> 市会在帝国议会中相互磋商，制定决议的原则。那些未经所有与会者同意的就根本不会付诸实施。换句话说，那是一个通过达成妥协而运作的政治体制。

通过回顾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我们可以了解到德语地区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多么独特的历史。这使我们更加清楚，想对德国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讨论是多么困难。事实上，只能谈及德国的诸多历史。每一个铸造钱币的地域，即便是那些拥有行政自治地位的小领地，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其中许多至今依然非常活跃。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自治，以及汉堡和不来梅的自治，在那些钱币上都有所展现，也解释了为何时至今日它们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的独立自治州。

创造性破坏，这是常用来描述资本主义运作的著名悖论。借此，也可将神圣罗马帝国描述成富于创造性的碎片化政治形态的成功。那些碎片知道它们相互从属，是一个整体的众多组成部分。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应该结合得多紧密，以及由谁来担负结合的进程。这些并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擅长提出或解答的问题。因此要感谢神圣罗马帝国，使德国人拥有了一千年的实践。

[1] 索菲娅生于1630年，比生于1665年的安妮女王年长很多。

[2] 西语人名如“George”与“Georg”皆源自希腊语，前者为英文拼写，后者是德文形式；现依各自语言分别译作“乔治”与“吉奥格”。

[3] 代特莫尔德是地名，为利珀王朝所建邦国（后升为王国）的首府。

[4] 译称“威斯特伐利亚”源自英文拼法，据德文则通常译作“威斯特法伦”。

第二部分 想象德国

我们讲给彼此的故事，我们的饮食，组成了我们的国家。像德国这样一个异常多元化的国家，既可以说是由各级政府和各段疆域边界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由众多诗人、画家、先知甚至说书人汇聚而成的。歌德、弗里德里希、路德和格林兄弟等都为德国的国家文学宝库贡献良多。宝库中有源自宗教或世俗的传说故事，结合了历史与神话，更常常穿插着幻想与幽默。所有这些，连同啤酒与香肠，已成为构建德国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

第6章 德意志民族的语言

1945年5月29日，欧洲战事结束三周之后，那位在希特勒掌权后便离开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了一篇演说，来庆祝他的七十岁大寿。他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

> 尽管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但我仍然是德国作家。我忠于德语，对我来说，这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托马斯·曼用这番非常感人的言论表达着，即便在德国完全崩溃的那一时刻，尽管地理上他的祖国已是一片废墟，但德语作为他的精神家园却完整无缺地延续着。正是语言将托马斯·曼与“德国与德国人”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而那正是他1945年演说时的标题[1]。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同样的想法就曾启发了后来成为巴伐利亚国王的路德维希一世。他于1807年首次构想，为历史长河中德语世界的那些伟大人物修建一座纪念碑，这便是瓦尔哈拉神殿（详见第9章）。神圣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德国又受到拿破仑的羞辱。而后，路德维希着手差人修建瓦尔哈拉神殿。路德维希与托马斯·曼都在他们的国家彻底覆灭之时，转而将语言作为祖国的决定性象征。在这个稳固的基石上，一个关于何谓德国人的全新的、更妙的观点得以构建。



马丁·路德与妻子卡特琳娜·冯·博拉，克拉纳赫画派，**1529**年

从波罗的海沿岸至阿尔卑斯山脉，从莱茵兰到波兰，今天仍有许多种差别很大的德语口语。尽管这些方言中有一些已经几乎无法相互沟通，但它们都共享着同一种书面形式。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尤其在政治层面上非常重要。在这个事实背后是一个人的成就——马丁·路德。

位于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藏有两张肖像画，画的是一对夫妇。画中的那位妻子有许多明显的特征。她束发，内着一件整洁挺括的黑白相间的紧身胸衣，黑色衬带系于领口，外罩一件想必非常昂贵的毛皮衬里外套。丈夫则一身黑色衣帽，看起来更为富态些。他的夹克用料明显比较厚实，高高的领子挤出几层下巴。这便是神学家马丁·路德博士，还有他年轻的妻子卡特琳娜·冯·博拉。画作由他们的朋友卢卡斯·克拉纳赫带领助手们合力完成。博拉曾是位修女，而路德曾是位修道士。而今他们愉快地结合在一起，看起来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然而正是这位马丁·路德，在1517年之后那些岁月里，不仅将德国，更将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正是他，在将《圣经》翻译成德语的过程中，创制了近现代德语。本章要讲述的就是这部路德版的《圣经》。

很长一段时间，圣徒与圣人的传统形象都显得比较清瘦，苦苦修行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路德则不同。他显然并未远离尘世，且就在普通民众之中。1517年，他以维滕贝格大学神学家的身份，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此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这些论纲对当时教会的各种腐败行为发出了抗议。首先就是反对为了重新修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而向普通民众兜售赎罪券来募集资金。路德认为，出售赎罪券这种行径就是对穷人的敲诈。他坚信，赦免罪过是唯有上帝才能恩赐的一件厚礼，而不是什么可以随意买卖的东西。“九十五条论纲”起初只是小范围内的学术争论，却开启了一个影响西方基督教世界，继而将其瓦解的进程。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出版于**1517**年

正如我们在前三章所见，16世纪时，德国像是大小数百个邦国拼凑起来的一幅马赛克，由国王、选侯、采邑主教以及众多小贵族所共治。这些贵族臣服于帝国皇帝，却拥有各自的领地，或相互抗衡而形成割据，或通过更易盟友而达成间断性的联合。但宗教改革随即迫使每一位统治者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做出选择。这引发了诸多政治危机与法制冲突，以及宗教与文化的分歧。有些影响更是延续至今。路德可不会轻易地妥协。他在德国历史中常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分裂者（详见第9章）。他对反对者的攻击是无情的，言辞十分激烈，语气极其野蛮，尤其是他那些恶毒攻击犹太人的作品。一方面，对于宗教改革后出现的长期严重的宗教斗争，乃至在其亡故一个世纪后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他都负有责任。而另一方面，他的反犹太主义对于20世纪的那些事件也起到了可怕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如此，他无疑仍是一位伟大的统一者。他所创制的语言是在16世纪面对诸多争议与分歧时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继而成为将所有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



1521年**4**月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路德（右图长椅之上）出现在帝国皇帝及众多选侯面前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当时被斥责为异端，但他也不大可能与反对者公开论战。他那些论纲最初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若非他的一些好友将其译成德文并且付印，那场论战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生。虽然印刷术在15世纪50年代才问世，但据估计，当时已有超过三千家印刷机构遍布于德意志及中欧约三百个中心区域。可想而知，短短数周之内，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就已在整个德意志传阅开来。

“上帝”这个词是无价的，但将其付印却不贵。因此，路德那些观点扩散之快，远远超过了天主教会的反应能力。1521年，路德终被召至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出现在年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驾前，被责令放弃信仰。他以从未用过的言辞拒绝道：“我就站在这里。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所以，愿主佑助我。”这已成为路德传奇的一部分，在德国人尽皆知。他被教会宣判为异教徒，被帝国皇帝判定为罪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英格兰或法兰西，他的人生或许便会终结。在那些中央集权的王国，可供躲藏的地方实在不多。路德估计很快就会被抓去执行火刑，就像许多英国异教徒一样。但在德国的政治拼盘下，情况就复杂多了。即使教会的裁定书是经皇帝正式核准签署的，也只有在地方实际统治者选择去执行时方才有效。1521年，路德生活和工作所在的萨克森就决定拒不执行皇帝的诏令。那位萨克森选侯将路德从沃尔姆斯秘密转移出来，安置在位于艾森纳赫的瓦特堡中。



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1532**年

被强行从公开争论中摆脱出来的马丁·路德比以往更加确信自己的使命。于是，在瓦特堡的单独居室内，他开始翻译《圣经·新约》。其实在路德的译本之前，已有一些德文版的《圣经》存在。比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教父安东·考贝格尔就曾在纽伦堡出版了一部。其他版本则流传于斯特拉斯堡和奥格斯堡。但它们使用的都是当地的德语方言。在科隆也曾有两个不同的译本，是用科隆周边两种不同的德语方言译就的。

因此，这其中没有一部曾在各自方言以外的地域引起多少共鸣。所有这些版本都被天主教会所禁止。那位在自己的领地兜售赎罪券而分得一杯羹的美因茨大主教就曾声明，德语实在太下等、太粗鄙，根本不能用来传达圣言。路德便下定决心去寻求一种德语，既不有损于上帝的圣言，又能适于德国普通民众阅读。



位于艾森纳赫一处高地的瓦特堡

路德展示出无穷而惊人的精力，仅在十一周内就完成了这一任务。维滕伯格的出版商梅尔希奥·洛特尔也显示出莫大的积极性，在他的印厂内安排了两个班次轮流印刷。1522年9月底，路德的《圣经·新约》德语译本在莱比锡书展面世，继而行销全德。此一版本几乎是一经面市就销售一空。三个月内就出现了加印需求。一年之内，市面上就有十二种以上的授权版本以及超过十五种的盗版。自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以来的七十余年间（详见第16章），还没有哪种德语书籍如此畅销过。此时的路德将精力转向了翻译篇幅更长的《圣经·旧约》。1534年，全本《圣经》的路德德语译本出版了。

大英图书馆日耳曼文化研究的负责人苏珊·瑞德在谈及她所照管的一版路德《圣经》时说道：

> 他很快就翻译完了《圣经·新约》，却用了接下来的整个十年翻译《圣经·旧约》。后者耗费了他更多的时间。他参照希伯来语的版本翻译，而不是希腊语。那是一个他更加不熟悉的领域。当然，《圣经·旧约》的篇幅也更长。这是1541年的版本。它被称为“中号圣经”，因为它是一个轻奢版，比一些早期的版本要大些。它也是十种完整版《圣经》中的一版，印行于1534年和路德亡故的1546年之间。1539年至1541年间，路德及其合作者，主要是奥若伽洛斯和梅兰希通，一起对译本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修订。这些修订就首次出现在这一版本上。

封面内侧是一段马丁·路德署名的手写文字。苏珊·瑞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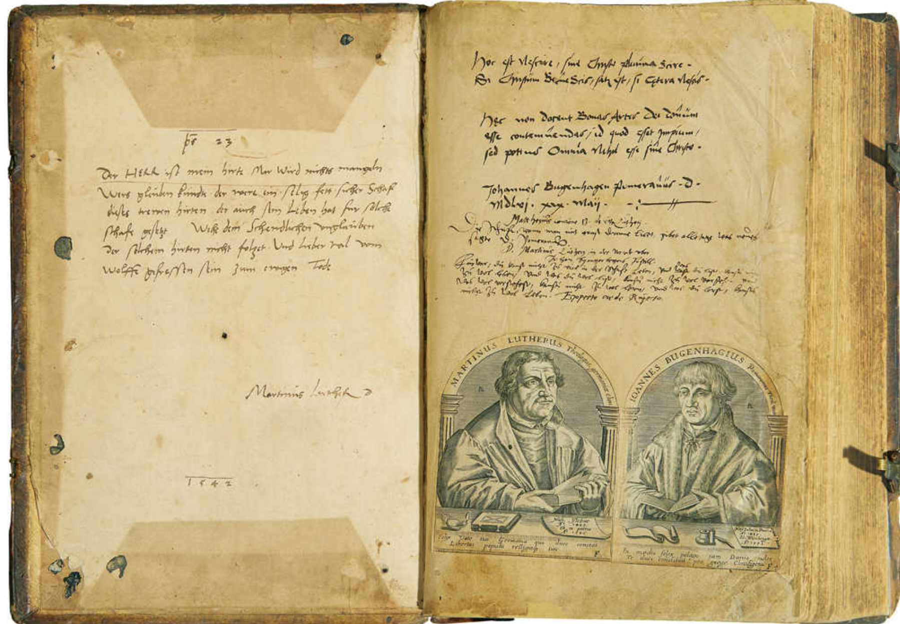
> 他引用了《圣经·旧约》诗篇第23篇的第一行文字：“耶

> 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接下来是他的署名及1542年的时间落款。旁边还有其他几位译者的题款。现存其他一些副本也用了类似的题款。这是一个豪华版本，所以他们或许是制作了一些签名本公开发售，或是赠予某些特定对象。比如这里还有一册，上面仅有路德的签名和同样引自《圣经·旧约》诗篇第23篇中的另一段落：“虽然行走在死亡笼罩的幽谷，但我无所畏惧（[2]。”有趣的是，他所引用的这一段与《圣经》上的译文并不一致。他是凭记忆写下了那一段话，可是他记错了。

这两本大英图书馆珍藏的《圣经》上都有路德的手写题款，可见他多么希望那些有影响力的读者可以读到它们。

亚历山大·韦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一位语言学家，他曾对路德在其译作中所用的语言做过研究：

> 他有惊人的学习能力，但更为杰出的是，他可以与普通民众沟通交流并习得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他的父亲是位矿工，他非常熟悉通俗语言的使用。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圣经》中的那些人物角色都说着像德国农民一样的语言，那会是非常滑稽的。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方式给《圣经》带来了生命力。因为其表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译本。那些译本都很学究、呆板，显得很博学，但只有了解拉丁语《圣经》[3]的人才能凭记忆理解。这个新形式无疑是路德的胜利。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一边应对天主教会对他的神学发动的猛烈攻击，另一边同时向普通民众宣教。他以德语口语为基础来构造其书面德语，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你打算开始写作，那么要首先遵循的准则之一就是用你说话的方式进行写作。当你写下一个语句时，想一想，一个正常人是否真的会这样来表述，如果他们不会这样说，那你就应该重新写过。路德的天才就在于，他编改得越多，听起来就越自然、越贴近生活。路德的译本可读性很强，很生动，既可信而又真实。



路德1541年版《圣经》前环衬上路德与约翰内斯·布根哈根的肖像，以及路德摘自《旧约》诗篇第23篇的引文与其手写签名

路德是如何做到的？在路德于1530年出版的《关于翻译的公开信》中，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他并未试图从拉丁文或希腊文一字一句地去翻译，而是尝试着用生动的德语去写作：

> 你显然不会向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讨教该如何讲德语。在家问母亲，去街道上问小朋友，去市场问那些普通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说的，然后照着翻译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们就能读懂你的译本，会觉得你确实是在对他们说德语。

很难说清这两种情况哪一个更具有革命意义：是一个学者放弃了原本的学院派语言而转用街头用语，还是给受众读者进行排序，先针对女人，然后是孩童，最后才是男人。这种语言有一个全新的目标：说给所有人。因此，路德不会像翻译神学那样翻译福音书，而是用你在大街小巷或是码头周围听到的谈话用语。耶稣听上去仿佛一位德国木匠，正对着一群德国渔夫讲话。

教会阶层对此可不太习惯，尽管它还没能把权力交给平民，却使福音书变得平民化。在路德有生之年，他的《圣经》版本售出了惊人的五十万册，在当时绝对是一部畅销书。然而，该版《圣经》是何以行销全德的呢？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可是个各式各样邦国的大集合，说着种类繁多的地域方言。德语被区分为高低两种，或者说是“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为了方便记忆，有时可以这样区分：山区就是高地，海域就是低地，因此，英语、荷兰语及德国北部的那些方言都归入低地德语，德国

南部及瑞士的方言则属于高地德语。

在路德所处的时代，比如萨尔茨堡的一个人说某种高地德语，那么来自法兰克福并说着当地方言的人则几乎听不懂，而来自汉堡、说低地德语的人就更不可能听得懂了。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差不多。只不过如今有了一种被称为“Hochdeutsch”的公用语言，即标准德语，也就是路德所创制的德语。对此，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韦伯解释道：

> 从路德的那些书信和对话集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以萨克森的法庭用语为参照来创制他的语言的。萨克森地处德国中部偏东，那里的方言不是那么极端难懂。那儿有一条主要的分割线，就像一条语言的边界，将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区分开来。路德小时候就随他的父母穿越过这些界线，所以他完全掌握了这两种语言。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对他来说都是母语。路德作为对宗教改革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关键人物，能够同时用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对受众讲话，继而在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这对德语的发展而言是一种运气。

经路德精心设计的折中的语言，在各处都或多或少能被理解。他选用的词汇都非常简单。路德刻意回避了那些高深的字眼，转而使用地方成语俗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谚语（不过1523年巴塞尔的一版《圣经·新约》中包含一个词汇表，用来解释一些奇怪的词），句法及词序也经过特别设计，以便大声诵读文本时更为明晰。寻求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这项任务的大部分工作已经由萨克森的大法官法庭完成了，其拼写模式、语法及句式结构均被路德所采用。路德虽然以这种官僚形式的高地德语作为基础，但他摒除了其中复杂费解的语法和拉丁式的华丽辞藻。在此过程中，这一语言经他之手，变得精练、生动且富于表现力，更伴有迷人的神韵与节奏。



首部路德版全本《圣经》中克拉纳赫所作的一幅插图

1534年版的《圣经》是一次翻译的胜利，同时也是一次杰出的营销。为了呈现复杂的神学观点，路德找到了一种能被最广泛民众理解的语言、一种能直接说出来也不会显得丢了身段的语气，以及一种严肃又不乏诗意的风格。除此之外，路德的那位老友，就是为他和妻子作画的

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还为《圣经》配了插图。所以，这部《圣经》能畅销就不足为奇了。

路德版《圣经》在早期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随后，至少有两种天主教的译本被很快推出，与其竞争。这两个译本中充斥着各种注释，用以针对路德那些所谓的错误和他语言方面及神学领域的“荒谬阐释”。然而，它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路德的译本，使用了路德开创的新式德语来挑战他的观点，批判他的著述。当时，宗教改革在全德引发了巨大的论战。这些论战被印成数以千计的小册子，而且使用的还是路德的德语。因此，他的观点得以传播之时，他所创制的特殊语言形式也流传开来。在南方，各种德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而那些针对路德的最坚定的天主教反对者也来自那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者也发现，他们不得不使用路德的语言来批驳他的论点。因此，由于当时宗教分歧极为严重且持续很长时间，路德的德语竟颇为反常地成了全德意志的语言，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到16世纪末，通行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书面德语便是路德版《圣经》所用的德语。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韦伯认为，路德的德语对坊间口语及文学沙龙产生了同等程度的影响：

> 宗教改革带来的革命就是在宣扬耶稣这一形象源自普通民众，你必须重新理解《圣经》，将《圣经》故事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今天德语中许多词汇和短语都可追溯到路德的《圣经》译本。整个德国文学史就建立在路德所创的语言之上。许多短语就是经他创造或因他流行的。如果你为路德版《圣经》做一张单词表，再看一看17世纪最伟大的诗歌和18世纪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相当大比例的词汇都能在《圣经》中觅得踪迹。那是他们所使用的参照基准，是他们唯一的范本。再没有其他德语样本可用来参考了。

五百年间，所有伟大的德国作家，如歌德、尼采、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等，都是以路德的德语为范本来锤炼他们自己的语言。

多亏了印刷技术，路德的观点得以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他的理念在维滕伯格发表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就像21世纪的政府无力掌控社交媒体一样，16世纪时的教会对于这种新技术的控制也无能为力。社会与政治变革相结合使路德的区域性宗教改革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对此，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韦伯解释道：

> 那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印刷机作为一种新媒介出现，德语的历史进程发展到这一阶段，宗教改革带来了神学及社会政治的革命，所有这些都同时发生。路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天才，像是催化剂一般，融合了所有这些力量，并将其思想观点传播至整个德国。倘若缺失其中任一要素，比如印刷机，宗教改革时激烈动荡的时局，或者德语所处的那一特殊发展阶段，那么这场革命都不会发生。路德笔下的风格和语言是真正有个性的。这一次也

> 说明个体在历史中是至关重要的。对路德更为重要的则是信仰，他目睹了周遭信仰的丧失。其他的一切，包括对德语的影响，只是他关注基督信仰而带来的意外收获。

此外，还有别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帝国中那些即将转变为新教的邦国给予路德以政治保护。这就意味着，在那儿他与那些印刷机都是安全的。权力的分裂阻止了一场有效的压制运动。与此情形相对，1526年，路德的书籍在英格兰被付之一炬。十年之后，路德的坚定推崇者之一威廉·廷代尔因为出版了一部大量借鉴路德版《圣经》的英译本，而被执行绞刑。

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文化素养。当时的德国人普遍比许多欧洲人更有文化修养。每个小邦国都有自己的文化主管机构。众多市场与集市构成了复杂的网络，促进了成百上千的贸易中心的发展，并培育了一个有文化的商业阶层。这一阶层的人都有能力支付一古尔登来购买一部路德版《圣经》。当时，那可相当于一位中学校长两个月的薪水，或市场上一头小牛的价钱。据估计，每五户中就有一户购买了路德版《圣经》。它也往往是这些人家中唯一的一本书。

作为路德最有力、最具辩才的对手之一，约翰内斯·考赫洛伊斯曾沮丧地评述道：

> 即便是裁缝与鞋匠，甚至妇女，以及只学着读过一点点德语的普通民众，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路德版《圣经》，好像那就是真理的源泉。有些人将其置于胸前，去用心背诵它。

今天，即便是从未见过或接触过路德版《圣经》的德国人，每天也都会不知不觉地使用那上面的词汇和短语。比如，路德当年所造的那些新词汇中就有“Sündenbock”（意为“替罪羊”）和“Herzenslust”（意为“如其所愿”），而今它们已归入标准德语。还有“Der Geist ist willig, aber das Fleisch ist schwach”，意思是“心灵固然顺从，但肉体却是虚弱的”[4]，“Richtet nicht, damit ihr nicht gerichtet werdet”意即“莫做评判，免得你们被评判”，“Ein Land, wo Milch und Honig fließen”意为“流出乳汁与蜂蜜的那片土地”[5]，类似的许多表述都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谚语。路德不仅把握了德国普通民众的说话方式，更塑造了他们未来的表达方式。在此后几个世纪的说书人的手里，在歌德著作的字里行间，路德的德语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伟大的文学语言。

此外，路德的德语也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全球性的存在，因为它不仅能用于阅读，而且可以用来歌唱。路德开创了众赞歌的伟大传统。音乐与公理教会的唱诵相互配合，并不需要一个专业唱诗班。像《圣经》的翻译一样，这些音乐也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那些特权阶层的专属。路德自己就是一位文字与音乐的天才创作者，路德的许多诗歌传唱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出自《旧约·诗篇》第46章的“我们的上帝是坚

固的堡垒”。路德独自翻译《新约》时所住的瓦特堡位于艾森纳赫，那里伫立着一座哥特式乔治教堂。来自同一所拉丁学校的两个唱诗班男孩——马丁·路德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都在这个地方唱响过诗篇。两人生活的时代相隔两个世纪，但他们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萨克森人了。就在那所教堂里，年轻的巴赫日复一日地品读着路德《圣经》的词汇与节奏，直至将它们完全融会贯通。日后，他获得了两套路德作品全集。若没有路德版《圣经》，许多伟大的文学著作便不会诞生，也不会有后来许多康塔塔[6]和清唱剧[7]，当然也不会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作的多部受难曲。

J. N. J.

Die Heilige Bibel

nach S. Herrn D. MARTINI LUTHERI
Deutscher Dolmetschung/ und Erklärung/
vermöge des Heil. Geistes/
im Grund-Text/
Richtiger Anleitung der Cohærentz,
Und der gantzen Handlung eines jeglichen Texts/
Auch Vergleichung der gleichlautenden Sprüche/ enthaltenen
eigenen Sinn und Meinung/
Nechst ordentlicher Eintheilung eines jeden Buches und Capitels/
und Erwegung der nachdrücklichen Wort/ und Redens-Art
in der Heil. Sprache/
sonderlich aber
Der Evangelischen allein seligmachenden Warheit/
gründ- und deutlich erörtert/
und mit Anführung
Herrn LUTHERI deutschen/ und verdeutschten Schrifften/
also abgefasset/
daß der eigentliche Buchstäbliche Verstand/
und gutes Theils auch
der heilsame Gebrauch der Heil. Schrifft
fürgestellet ist/
Mit grossem Fleiß/ und Kosten ausgearbeitet/
und verfasset/
von
D. ABRAHAM CALOVIO,
Im Jahr Christi cIↄ Iↄc XXCI.
welches ist das 1681
5681ste Jahr/ von Erschaffung der Welt.
Zu Wittenberg/
Nicht uns HERR/ nicht uns/ sondern deinem Namen gib Ehre/
umb deiner Gnade und Warheit!

Gedruckt in Wittenberg/ bey Christian Schrödtern/ der Univ. Buchdr.

27411

JSBach
1733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拥有的路德版《圣经》的扉页，右下角可见巴赫的签名及1733年的时间落款



《森林中的白雪公主》，路德维希·埃米尔·格林[8]雕刻于1825年

[1] 演讲稿初以英语成文，同年10月，德文版在德国《新观察》（*Neue Rundschau*）杂志发表。

[2] 此为同篇第4段。路德所题德语大意为“虽然我必是行走在死亡笼罩的幽谷，但我无所畏惧，因为你与我同在”。英文书稿对此已做出纠正，故而于后才说“有趣”之事。《旧约》中德语原文则是“Und ob ich schon wanderte im finstern Tal, fürchte ich kein Unglück; denn du bist

bei mir, dein Stecken und Stab trösten mich”，大意为“虽然行走在死亡笼罩的幽谷，但对于不幸我并无恐惧；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时刻安慰着我”。

[3] 此处所指的是4世纪末《圣经》的一个拉丁文译本，后逐渐得到普遍承认并被确认为权威译本。汉译一般音译作“武加大”译本。

[4] 意思类似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段。

[5] 意指“自由与极乐之土”，即“天堂”，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8段。

[6] 指较为短小的音乐作品，通常是宗教题材，由独唱歌手演唱，也常与唱诗班或乐队合作演唱。比如巴赫第80号康塔塔“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即为纪念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作。

[7] 指较长的音乐作品，由歌手与乐队合作演唱，通常取材于《圣经》故事。

[8] 路德维希·格林是德国画家、雕刻家，也是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世称“格林兄弟”）的弟弟。

第7章 白雪公主对拿破仑

> 长发姑娘[1]是世上最美的孩子。她十二岁时被女巫关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孤塔里。
>
> 小红帽走进了那片树林，一匹狼也尾随而来。但她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坏家伙，也不怕它。
>
> 大森林边上住着贫苦樵夫和他的妻子。他们育有一双儿女，男孩儿叫韩赛尔，女孩儿叫格蕾特[2]。
>
> 最后，女王唤来猎人并命令道：“去，将白雪公主带进森林，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你务必除掉她，然后把她的心带回来向我交差。”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些故事。还有“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吧”，“魔镜、魔镜，谁才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等等。这些文字都带着童谣般动人的韵律。长发姑娘、白雪公主、韩赛尔与格蕾特等，《格林童话》中的这些角色都曾出现在我们童年的岁月里。每当回想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故事和冒险奇遇，我们便觉欣喜和战栗。

但是，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必然发生在一片黑暗而幽秘的森林里。正是在那里，主人公形象脱颖而出，邪恶被战胜。虽然这些童话故事讲述的是众多虚构角色的不幸命运，但它们也涉及德国的宿命。《格林童话》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甚至反映了德国人对于宿命的恐惧与希望。而德国伟大的传统或者说传奇之一，就是其起源及命运都缔造于森林之中，正如同韩赛尔与格蕾特一样。

科隆东北约60英里的条顿堡森林便有着典型的日耳曼风格。这里常年覆盖着松柏、山毛榉和橡树，广袤无垠的绿色郁郁葱葱，恐怖而幽暗。里面有温馨舒适的小木屋，更有令人害怕的野兽。你若在其中迷了路，恐怕再也出不来了。这是一处对整个民族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因为据罗马历史学者塔西陀的记载，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爆发了一场战役，日耳曼大胜罗马。当时，一支极具规模的罗马军队大举来袭，意欲征服并殖民统治莱茵河东部日耳曼所辖区域。危难之际，勇士赫尔曼[3]统率日耳曼诸部组成的联军，一举歼灭罗马军团。这片森林依旧掌握在日耳曼手中。于是，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的边境，而日耳曼所辖其余领地也免遭征服。正是在条顿堡森林，日耳曼抵御了罗马帝国的入侵，并粉碎其占领意图，一个国家由此诞生，这一爱国传奇也得以流传。

时间跃至19世纪初期，作为对外族入侵的回应，那时的文学与绘画开始创立一种德意志属性的意识自觉，二者也常与那片森林联系在一起。但在19世纪头一个十年，侵略者并非罗马人，而是其高卢后继者法国人。这一次，法国人不仅向德国人发动了攻击，还将其征服，并拆解

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进而占据了他们从莱茵河沿岸直至普俄边界之间的广袤家园。



《森林中的猎人》，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作于1814年

几乎在每个德国家庭都可以找到一本书——由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兄弟俩所编撰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4]。格林兄弟毕尽其生搜集了

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并推出过许多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出现于1812年，正值抗击拿破仑的军事力量集聚之时。但格林兄弟并不仅是对童话故事感兴趣而已，他们真正痴迷的是德国人所共有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



《儿童与家庭故事集》的几种早期版本，格林兄弟编撰

文字存在于他们的基因中。他们是研究语言及其源流的先驱。雅各布·格林提出的规律，后来被称为“格林法则”。这是语言学中所发现的关于语音变化的第一条规则，它对不同语言中辅音字母的变化追根溯源。比如探究为何英语中管鱼叫作“fish”，父亲是“father”，在德语中是“Fisch”和“Vater”，而当时罗马人却管鱼叫作“pisces”，称父亲为“pater”。这在当时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新的方式。然而，更重要的是，格林兄弟特别醉心于德语的历史。他们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编纂一部德语词典。

柏林洪堡大学施代芬·马图斯教授曾发表过大量关于格林兄弟的研究成果。格林兄弟发现德语的运作方式与德国社会的最佳运转方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对此，马图斯教授解释道：

> 在格林兄弟对语言及文学史的研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曾尝试探寻哪些可以被归为“德语”，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基于国际化背景。比如，我们可以在他们研究德语语法的著作中发现有趣的一点，那就是雅各布·格林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弄明白，一种语言遵循它自己内部的运行法则，而这些法则并非由外力构造而成，语言是一套自主而有生命的有机体。
>
> 这一观点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格林兄弟是在说，正如

> 一种语言有其内在形态及逻辑一样，社会和社区也是如此。而法则不能由外部强加。从这一意义来说，政治的、社会的及语言的历史都是相通的。于是，只有当德国社会的变迁来自内部，遵循德国的行事方式，而非经由外部强力介入，此变迁才会发生。

换句话说，格林童话是德国政治与社会复兴的组成部分，是德国人在其语言和民间故事中拥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证据，而这种身份认同是任何外来入侵者都无法摧毁的。1812年，法兰西击败德国并占领其全境，进而控制了莱茵兰大片区域，使科隆成为法国境内的一座城市。然而格林兄弟却发现，德国有某件蕴含着巨大价值的东西是法国人无法攫取的，那就是可追溯至史前迷雾中的语言遗迹。据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艺术史学荣誉教授维尔·沃恩的观点，这便是语言文字学魅力背后的内涵。他说：

> 德国人保留了他们原来的语言，这一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德语以某种方式表现了整个德意志的性格与精神，因为它一直是他们通用的语言。格林兄弟在他们编撰的那部著名词典中曾说过，除了我们的语言，我们还有什么是共通的呢？拿破仑时代，法德间有过许多比较。据说，法国人没有保留他们原来的语言。他们现在所说的只是某一种拉丁语，而凯尔特人曾使用的那种原始语言早就已经丢弃了。因此，在法国人与其语言之间，并没有像德国人与德语间那样内在的自然联系。



《孤独的树》，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作于**1822**年

《韩赛尔与格蕾特》《白雪公主》及其他格林兄弟收集的民间传说并不仅仅是扣人心弦的故事。恰是在词汇、短语与句法规则中，德语自身的故事得以持久延续。

森林无论是在那一时代的绘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元素。对此，我们可在画作《孤独的树》中有所领略。此画由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作于1822年。画面中景，温和的绿色平原上是一处村落，远景则是绵延的山峦。前景正中，整幅画作的主体部分是一株孤立的橡树。树冠历经风吹雨打已然脱损，但树干仍枝繁叶茂，为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群提供了休憩之所。维尔·沃恩教授研究过这幅画作对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重要意义。它将我们带回到格林兄弟与森林之中：

> 对德国人而言，橡树是其意象的根源，如同一个历经种种磨难得以幸存的民族。橡树是原生态风景的组成部分。它始终在那儿。德国人觉得橡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以某种方式“定义”了他们。比如条顿堡森林一役，当赫尔曼率众击败罗马军团的时候，森林就好像在与日耳曼人并肩作战——他们埋伏于树后，伺机成功地突袭了罗马军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那些自由战士也曾利用过森林。关于此，有一幅名为《哨位》的精彩画作，由弗里德里希的好友G. F.凯尔斯汀完成。画中的三名战士正倚靠在橡树下，等候法国人的到来。在那段岁月里，任何人在看到橡树时都能感受到一种民族认同。弗里德里希曾在更早的时候，在拿破仑时代，将橡树用于其他类型的意象创作。一片古日耳曼风格的旧墓地，周围环绕着橡树林，这被看作一种英雄纪念碑。颇有意趣的是，现在只有一株橡树孤零零立在这幅画作中，比先前平添了更多的孤独感。也许画家只是在此表达个人的感受，他自己就是那株孤独的老橡树。也或许他在呼吁那些与他感同身受的民众，希望那株橡树的生命能延续下去。



《哨位》，吉奥格·弗里德里希·凯尔斯汀作于**1815**年

德国的统治者们曾不止一次地使用橡树作为幸存与复兴的象征。例如，橡树叶曾出现在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上（详见第14章），后来又出现在1945年战后的首批国家制币上。弗里德里希画笔下的孤独橡树，虽久经风雨却依然挺立，在晨曦中提供着荫蔽之所。它已熬过漫漫长夜，它已经受住暴风雨的洗礼。正如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德国，历经劫难而得以重生。





饰有橡树叶的1芬尼硬币，1949年西德制币

格林兄弟研究德语，在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中寻找德意志的内在属性。弗里德里希则用自然美景表达德意志的外部属性。与此同时，康斯特勃[5]也通过他那些反映英格兰的画作，如《干草车》《弗莱特福特的水磨坊》等，做着类似的事情。每一幅画作中都有一个创意元素，用于凸现极具感染力的民族印象，将美景与幻想融于一体。弗里德里希终其一生都在描绘野外的风景。在那些壮丽景观中，作为个体的他发现了自己的潜能，而一个民族同样如此。维尔·沃恩教授说：

> 弗里德里希至今在德国仍被视作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因为他在风景画中展现了德意志的魂魄。他是一位既表达内心世界又描绘外部天地的画家。展现在你面前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低起伏，更是蕴含着德意志之魂的壮美景致，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弗里德里希画作中的林木是壮美的，而格林童话中的森林却是恐怖的。二者都以各自的意图反映着德意志风格的景观。但正如施代芬·马图斯教授向我们介绍的，他们所做的远甚于此。可以说，他们是在开创德意志风格的景致。

>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德国森林，里面是巨大的冷杉树丛和其他典型的德国阔叶林木，它其实和童话故事一样，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德国现在的森林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再生林。这一林地项目颇具浪漫色彩，而成为文学作品、童话故事及类似领域的幕景。格林兄弟笔下的森林是把双刃剑。他们的童话故事中，森林里往往会发生相当可怕又残暴的事情，以此来吓唬小孩子。这样，在故事结尾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便会使他们得到安慰，恢复平静。

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会工程。童话故事里，善与恶针锋相对。孩子们与伪装良善的邪恶女巫和阴险的继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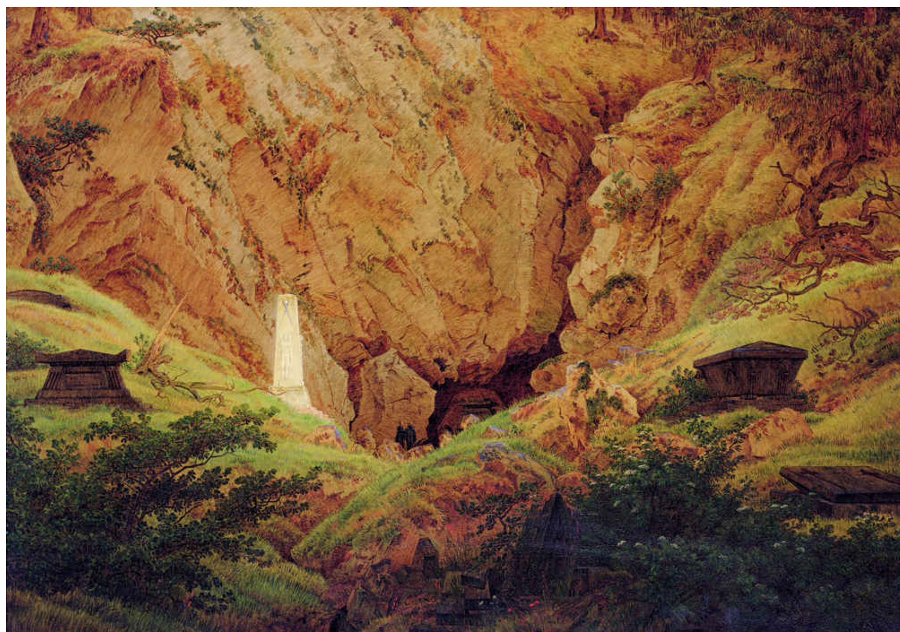
抗。但在故事的结尾，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母亲们总是带来抚慰人心的话语。可靠的德意志美德就如此这般地蕴含在语言和故事里，并最终沉淀于民众自身。施代芬·马图斯教授介绍到，《格林童话》里有一个要素，在诸多后续版本中经由德国持续发展的中产阶级推动，变得越来越符合道德规范。他说：

> 这些童话被记录下来，成为具有强烈诗意元素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同时，它们也是具有道德寓意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数次编订，以适合读者们的口味。那些读者熟悉浪漫的文学作品，并希望在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中养育他们的子女。这使得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某些变化。早期版本中，那些丑恶的妇女形象往往是亲生母亲，比如《白雪公主》。但在后续版本中，那些形象被设定成了继母。很显然，在正常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亲生母亲的形象不应该是邪恶的。再以另一则著名的故事《长发姑娘》为例。第一版中，邪恶的女巫推断长发姑娘那里必有男子到访。而女巫又何以得知呢？因为长发姑娘的衣裙变得太紧了——她怀孕了。在后来的版本中，威廉·格林将这一整段从故事中删除。他让长发姑娘在女巫面前自相矛盾，露出破绽，于是女巫意识到有男子到访。如此一来，长发姑娘的形象与性暗示脱离了关联，变得值得尊重了。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德意志的风格，也是这些故事同样吸引英国人的一个原因。

当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其政治架构被拿破仑一举摧毁时，说德语的民众便已错位迷失。而弗里德里希与格林兄弟正是在为这些民众重构一种身份认同。我们现在是谁？弗里德里希与格林兄弟正为这一问题提供解答。众多画家、历史学者和作家都开始回顾赫尔曼，将他作为民族形象的奠基人。1808年，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创作了戏剧《赫尔曼之役》，重现发生在条顿堡森林的那场击败罗马军团的伟大战役。作品十分糟糕，内容主要是乏味的反拿破仑宣传。尽管这部作品使弗里德里希深受感动，但实际上它却从未上演。然而，在塔西陀文字下复活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英雄赫尔曼，却从未失去其对德意志想象力的影响。



1857年间，格林兄弟《长发姑娘》版画



《阵亡自由战士之墓碑（赫尔曼之墓碑）》，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作于**1812**年

现今，每年有超过十万游客前往代特摩尔德市镇郊外，瞻仰条顿堡森林中那尊巨型赫尔曼铜像。这座铜像约有90英尺高，赫尔曼手持长剑，毋庸赘言，剑锋直指法兰西。为了庆祝德国解放，这座雕像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动工，于1875年完工。它是为纪念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而举行的一次夸张的庆典。这座赫尔曼纪念雕像以实物形式完美地展现了爱国主义在数次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如何发端的。正是这些脉动感染了弗里德里希和格林兄弟。然而，这种爱国主义萌芽自19世纪60年代便被当时的民族主义者盗用，并变得粗俗起来。



赫尔曼纪念碑，位于代特摩尔德郊外的条顿堡森林中

如今，大多数德国人都对赫尔曼雕像太过张扬的攻击性感到尴尬。而对后来——尤其是纳粹时代——那些滥用条顿堡森林大捷的行径，他们更觉焦虑与惭愧。因此，尽管该战役长久以来被视为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奠基时刻，但在2009年，当地并没有为这一事件的两千周年举行任何

纪念活动。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庆祝。在美国密苏里州，有一座由德国开拓者于19世纪30年代建立的小镇。那时，人们对赫尔曼的崇拜达到高潮，于是小镇就被命名为“赫尔曼”。2009年，小镇举行了此次战役两千周年的庆典。人们在市场大街立起一尊赫尔曼雕像，以此展现他作为罗马军团征服者的形象。

弗里德里希和格林兄弟在20世纪都经历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迪士尼将童话故事推广到全世界，特别是《白雪公主》。这是格林兄弟从未想到的。不过，他们也有一些不受欢迎的支持者。显然是由于民族认同的情绪不断加剧，纳粹党徒也钟爱格林兄弟。他们建议，每一个德国家庭都应有一部《儿童与家庭故事集》。结果，对于下一代而言，这些故事被玷污了。这不仅是因为官方的认可，更是由于人们担心故事中的暴力与残忍会成为民族性格中的持久特质。而这特质却并非传统的德意志美德能够挽救的。那一阶段看来已然成为历史。如今，《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在德国再次成为继《圣经》之后最受欢迎的图书。对此，施代芬·马图斯说道：

> 1945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避而不谈格林兄弟的作品。毕竟，经历了纳粹时代的恐怖，他们的故事显得过于阴森可怕。但眼下，又出现了一种回归，即重新找回纳粹掌权以前德国家庭的那种老式观念。这可说是种有意思的进步。非常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在柏林，我们现在看到新的年轻的中产阶级（我们称之为“普伦茨劳贝格[6]群体”，即成功的雅皮士[7]）家庭的父母已习惯了为子女朗读《格林童话》，就好像是要以此维持并保护资产阶级家庭的旧式理念。



华特·迪士尼版《白雪公主》的宣传海报，1937年

纳粹党徒和其他一些人称弗里德里希为德意志民族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这种赞美同样使他的声誉受到了损害。不过，正如维尔·沃恩教授所阐释的，眼下弗里德里希正逐渐从极端的爱国主义中解脱出来：

> 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人开始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弗里德里希。现在他几乎被看作一位保卫郊野乡村的原生态斗士。

德国人对森林的依恋仍旧存在，就像群山或至少像橡树那样古老，它已成为民族性格的核心。弗里德里希和格林兄弟应该感到欣慰。如今森林覆盖了德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并且得到有效的保护。比起欧洲其他地区，绿党在德国已更为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新国家的未来，将如其历史一般，在某种程度上存活于森林之中。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讲到对弗里德里希和格林兄弟都极为崇拜的一位作家。他自己业已成为一个全新的德意志属性的象征，也是民族伟人群像中最易辨识的形象。

[1] 因德语原称亦常译作“莴苣姑娘”。

[2] 出自童话《糖果屋》。

[3] 即阿尔米尼乌斯（公元前17年至公元21年）,日耳曼一部族首领，世称“赫尔曼”。该词本义指“军人”，首次出现于路德时代，而后广为流传。

[4] 即我们所说的《格林童话》。

[5] 约翰·康斯特勃（1776—1837），英国浪漫主义画家。

[6] 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曾是柏林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地处柏林城北偏东，后并入潘科（Pankow）区。

[7] 雅皮士为英语“yuppie”音译，本意是指生活于城市且有丰厚收入的年轻专业人士，他们热衷于昂贵及时尚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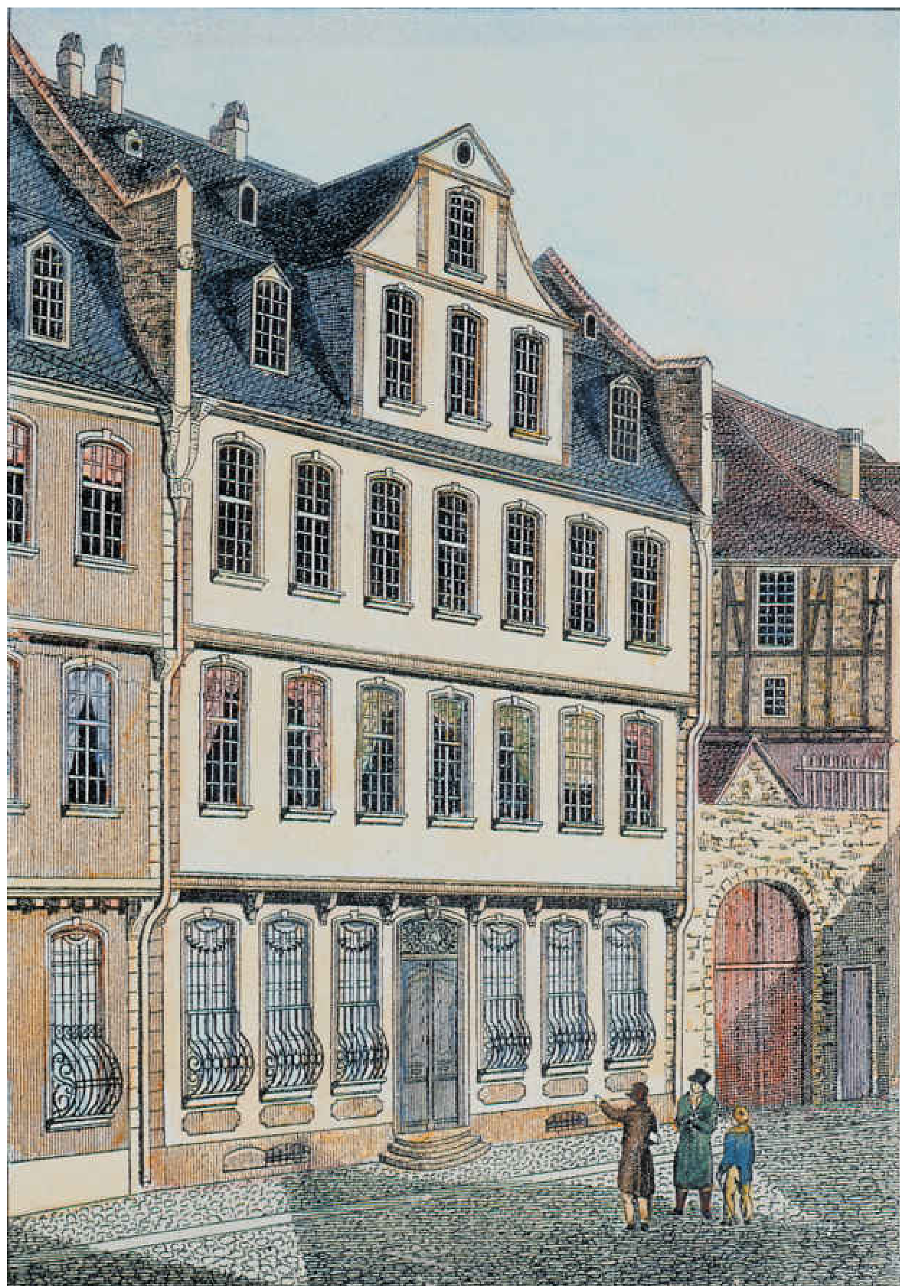
第8章 歌德影响下的民族

世存一幅艺术家约翰·缇士拜因[1]作于1787年的肖像画，大多数德国人一眼便能认出此画。事实上，说它是整个德国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一幅肖像画，亦不为过。这幅肖像画现藏于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所绘的恰是当时正游历于意大利的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画中，歌德戴着一顶宽边黑帽，潇洒地身披一件白色旅行风衣，倚坐在一片古罗马遗存之上，似有目标地望着前方不远处。若德国人对这一伟大民族诗人的形象有所了解的话，他们也一定知道歌德创作出了一部伟大的戏剧——《浮士德》。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诗体悲剧，也早已成为德意志民族传奇中的一个决定性元素。

将所有身处异地、说不同方言的德国人融合在一起的元素中，除了经由路德千锤百炼所得的书面德语，大家对童话故事的共同回忆，以及原野乡村美景之外，必须提及的还有这部被公认为德国诗歌中最伟大的作品——歌德终其一生创作并不断修改的《浮士德》。可惜因为太过庞杂繁复，这一鸿篇巨制没能上演。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说美国人信奉的是上帝，那么德国人信仰的就是歌德。毫无疑问，与其他任何人相比，歌德确实当之无愧。他使德语成为通行于文明欧洲的一种语言。今天，德国政府更是借助歌德学院，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语言及文化。



《歌德在罗马平原上》，约翰·缇士拜因作于1786年至1787年



法兰克福的歌德居所，1832年



歌德的玩偶剧院

歌德出生在法兰克福中心地带的一幢房子里。该处建筑因战时轰炸而受损严重，后经修复，今天依旧伫立在那儿。整幢建筑共有四层，每层都有五间不错的房间。繁盛的18世纪的舒适生活，于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房子里找到一个漂亮的玩偶剧院，这是1753年四岁的歌德收到的生日礼物。它是一个画有饰纹的大木盒，看起来更像是个玩具屋。正面切割成一个拱形舞台，后面则有许多空间，用以悬挂各式彩色布景，一切都取决于你的玩偶所出演的剧目。

歌德的父亲将这作为礼物送给儿子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将开启儿子怎样的未来。歌德后来写道，恰是这件玩偶剧院改变了他的一生，促使他在四岁时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在那里，真实与幻想交织，二者时常冲突，又总是彼此充实，相互转化。自此，歌德开始了写作。这一切与他父亲所预想的大相径庭。在他父亲眼中，歌德注定得成为律师。这份稳定的职业足以保证他衣食无忧，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父子之间的矛盾已初见端倪。后来，年轻的歌德虽被送去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对此却颇为反感。实际上他曾就读过不止一所大学（详见第4章）。他随意消遣，同一些不相称的人搅和在一起，更与一位不相称的女性坠入爱河。

歌德就这样在莱比锡大学待了三年，说是在学习法律，可实际上却修习了诗歌课程，并为他的初恋凯特馨·勋考普夫写起了诗歌。然而，他对自己所写的并不满意，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文字去述说自己的所思所感。在18世纪60年代，德语的文学样式深受法语文学风格的影响，虽经多般古典传统提炼而来，却也受其诸多约束，对于一个激情四溢的年轻人来说，显得古板而又沉闷。歌德所希望的是某种更为强健、更加直接、更显真诚的风格。一年前，他曾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发现了一种德意志风格的视觉传统。而今，他更于意想不到之处，即在莎士比亚那

里，为生动的德语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文学模式。

莎士比亚的作品使歌德意识到，语言可同时用来表达深邃的思想和自然真实的情感。这便解开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如何用其他年轻同胞易于接受的方式，清晰地表述何为德意志。

> 自第一次拜读莎士比亚起，我便终生难以释卷。我一跃而起，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手有脚。

1771年10月14日歌德《莎士比亚演讲》的手稿

上述言语出自歌德二十二岁时在父亲的居所为威廉·莎士比亚举办的一次庆祝活动。那是1771年10月14日，这一天在德国宗教历中是“威廉”这个名字的命名日。这个年轻人在完全拜服于心中偶像的状态下，仔

细起草而誊写的那篇讲演手稿被留存至今。歌德在莎翁庆祝日的讲演如同一首情歌："自然，自然，再也没有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自然的了！""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啊，您若仍在我们中间，那么除了伴您左右，我将无处容身。"如此沉浸在狂想中的歌德，将自己与莎翁比作欧里庇得斯所著的《伊菲珍妮娅》中的两位英雄，并不禁感慨道："若您能饰演俄瑞斯忒斯，而我出演毗拉得斯，该是何等之幸福。"[2]

安娜·博嫩坎普-莱肯是位了不起的学者，长期从事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言及歌德与莎士比亚时她说道：

> 这是德国首次关于莎士比亚的庆祝活动。对于歌德而言，莎士比亚意味着一种写作、思考以及生活的全新而自由的方式。那句名言"自然，自然"体现了他正在找寻的风格。这是一种宗教式的觉醒，当歌德遇到这种思考与写作方式时，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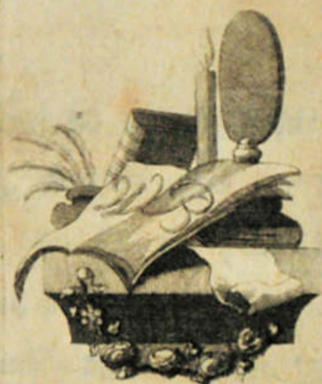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某些东西还让歌德直面自己的观点和理想。你若读到歌德那些涉及莎士比亚的想法，会发现他更多是在表达自己与莎士比亚不期而遇时的感受，而不是描述莎士比亚本身。在这位英国大文豪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他的首部重要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作品出版于1774年，它使歌德一跃成为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歌德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革新性；而这部小说也成为德国文学发展的分水岭。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青春期情感与激情的故事，它反映了作者自己与一位友人的未婚妻之间发生的一段灾难式的情感经历。故事以悲剧告终，主人公维特最终因不堪单相思的折磨而开枪自杀。18世纪70年代的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大致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条橙》。后者将暴力置于一个全新的、令人震撼的语境中，迫使人们去面对那些他们原本想避而不谈的人类行为。歌德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备受煎熬的年轻人。歌德正是通过主人公的双眼，描述了他所处的那个世界，以及他那爱恋与希望、失望与死亡彼此纠缠的情感。当时这部小说畅销整个欧洲。各处的年轻人都穿着像维特一样的蓝色外套和黄色背心，而像维特那样开枪自杀的也不罕见。除此之外，这部著作更是首次确立了德语作为一种欧洲文学语言的地位。歌德也和他心目中的英雄莎士比亚一样，成为被全世界读者广泛阅读的作家。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Erster Theil.



Leipzig,
in der Weygandschen Buchhandlung.
1774.

C. W. M. Bergmann:

1774年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扉页



绘有维特形象的迈森瓷杯，1790年前后

《少年维特之烦恼》受到一代人的狂热追捧，充满激情地证明了在人类的境遇中心灵的重要性。歌德向我们述说着，是我们情感的深度与力量真正定义了何以为人。这部作品以充满同情的笔触，细述了年轻的主人公跟随自己的感受，无视社会强加的令人窒息的诸多规范的故事。小说广受推崇的同时，也有反对的意见，认为它是一部极度危险的作品。因为书中主人公的自杀之举宣扬了他罔顾责任与义务的自我放纵和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年轻人却观而爱之。众所周知，拿破仑启程远征埃及时，就随身带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

歌德因维特而声名鹊起。这也引起了萨克森-魏玛的统治者卡尔·奥古斯特的关注。这个十几岁的小公爵是位自由而开明的知识分子。他是歌德的读者，继而又成为歌德的资助人。1775年，歌德应公爵之邀前往魏玛，被委任为其枢密院的一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理小公爵的银矿和铜矿。对这位新近成名的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个转折点。在小邦国的统治者身边工作，使歌德接触到了一系列的机会。巴黎或伦敦的作家可从未有过这样的机遇。他也被分派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故而能结交一些作家。总之，他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一个终身职业。更为便利的是，只要乐意，他可以随时从公务中解脱出来，去自由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创作。

尽管如此，歌德在魏玛的头十年却也遭遇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年危机”。他曾在斯特拉斯堡见识了哥特式建筑艺术的震撼力。歌德早前庆祝莎士比亚日以及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挖掘并善加运用了北欧文学中的自由与情感要素。但是，正如莎士比亚一样，歌德对每一种不同的经历体验，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探究欲望。而他的思绪也转向了南方的艺术与文学。三十七岁时，他决定务必亲自去罗马游历一番。正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艺术家缇士拜因。于是后者创作了那幅著名的、一眼可辨的肖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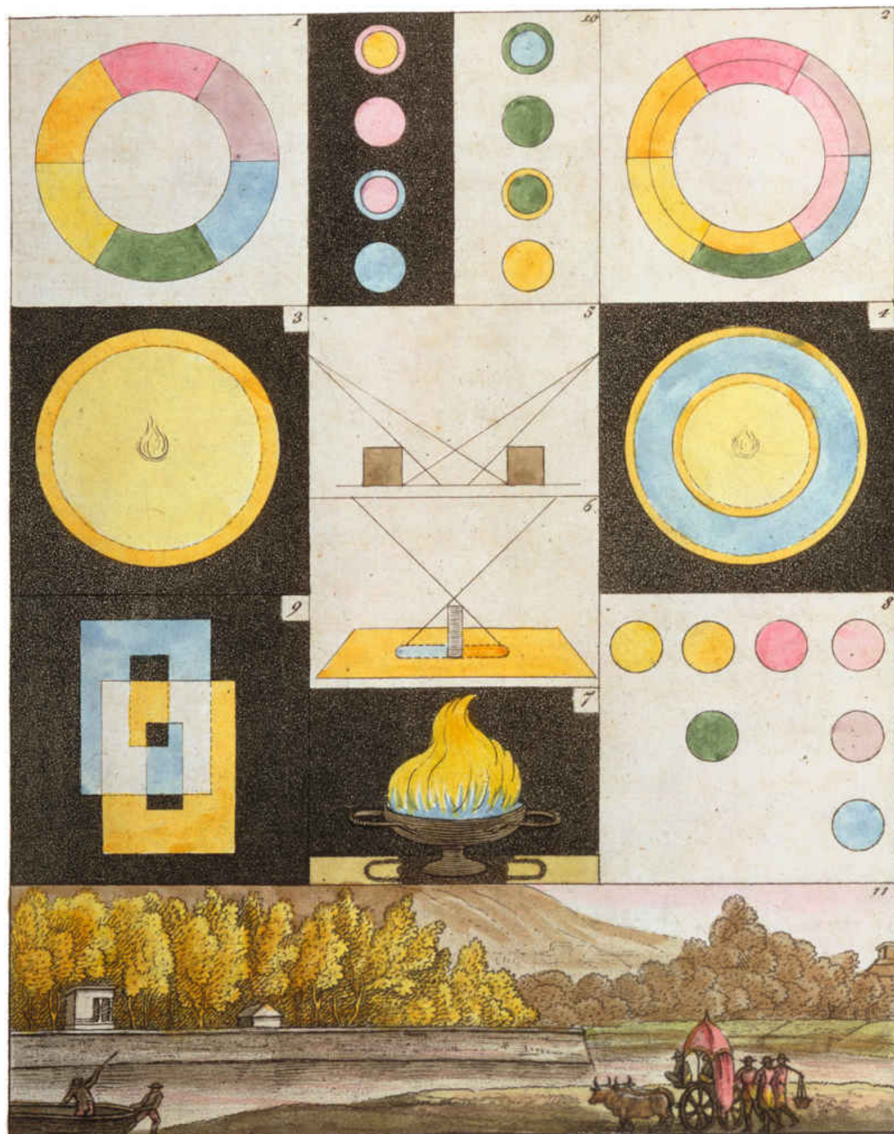
《从西北望魏玛城》，基于乔治·玫肖尔·克劳斯的画作，**1798**年

若说维特和莎士比亚日的庆祝活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沉浸于北欧传统中的歌德，那么缇士拜因所作肖像画中的他则正面对着地中海文明遗留下来的碎片。散落于地的是几块从一座宏伟的古罗马建筑上脱落的墙砖。歌德正懒洋洋地斜倚在上面，好像靠坐在一张躺椅上。背景处依稀可见一条荒废的水渠。在歌德身旁有一块爱奥尼亚式[3]立柱的顶部和一块石刻浮雕。领略了北欧的建筑与文学之后，我们再来一睹南欧的视觉艺术。然而，这幅画作并非简单地描绘古旧与腐朽。尽管藤蔓爬上了那些碎石，但在歌德肩旁，就有一株小树已然生根，那正是一株典型德意志风格的橡树。从一个已然消逝的文化的遗存中，歌德将创造出鲜活的事物。右侧的石刻浮雕上是古希腊公主伊菲珍妮娅，还有她的弟弟俄瑞斯忒斯与他的好友毗拉得斯。而在1771年莎翁庆祝日的演讲中，歌德就曾梦想着亲自为他心目中的英雄莎士比亚出演毗拉得斯这一角色。缇士拜因创作那幅肖像画的时候，歌德也在创作自己的一部戏剧。但这部以伊菲珍妮娅为主题的作品，并非受莎士比亚的启发，而是借鉴了欧里庇得斯的著作。它将古希腊的经典神话变成了一部用标准德语写就的戏剧。缇士拜因似乎在暗示，在这些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碎片之中，歌德正锻造一个全新的架构。那些地中海文明的伟大成就可在此架构中与北欧的文化传统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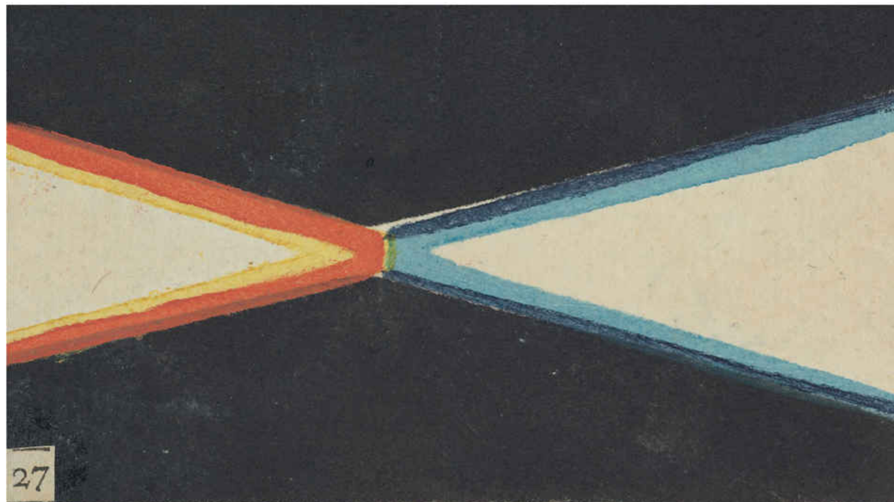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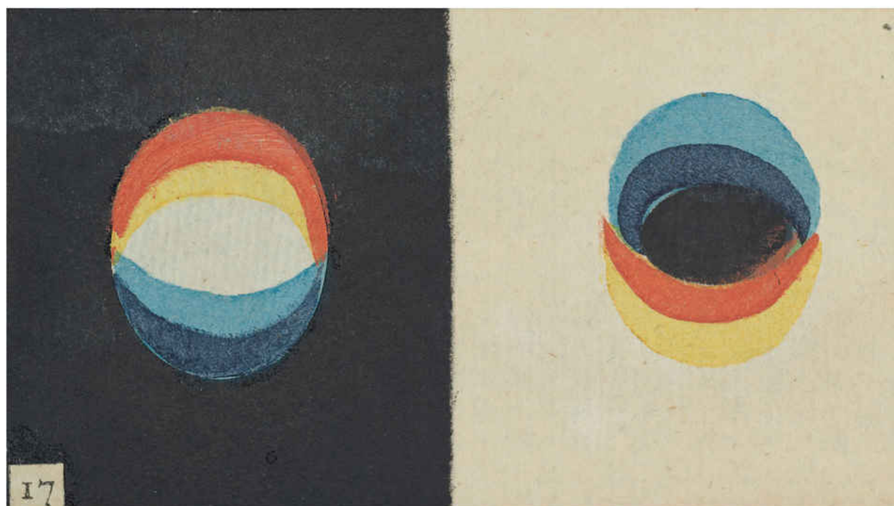
歌德收藏的乔治·斯蒂文森的“火箭号”模型

回到魏玛之后，歌德便以全新的活力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作之中。他回顾起自己的意大利之旅，将其视为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而他关于意大利的篇章也被所有德国人学来，用以咏叹南欧。德国人对于他笔下花蕾颤放的柠檬树的熟知程度，正如我们英国人熟知华兹华斯[4]笔下的水仙花一般。歌德诗中写道：“你知道那片柠檬树花蕾颤放的土地吗？”缇士拜因所绘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的肖像画，它更是德国与意大利长久恋情的至高意象。在魏玛的居所里，歌德被古希腊与古罗马雕塑的石膏模型所包围。虽说规模很小，但罗马城以这样的方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再现。而歌德的居所中远不止这些。在这个小公国面积不大的首府，歌德四处搜罗着世界各地的物产，只为进一步了解整个世界。如今前去参观，依然可以看到歌德的那些植物及矿物藏品。其中一株锦葵科植物以他的姓氏命名，其学名为“歌德木”（Goethea cauliflora）。还有一件铁矿样本，在西方也是以其姓氏命名的，称为“针铁矿”（Goethite）。他不断地搜罗，进行比较与研究，并记录下一切。比如他曾记述波斯的诗歌，以及牛顿的光学研究。他沉迷于天才的概念，为此还购买了凡·戴克[5]的颅骨（至少他相信那是凡·戴克的颅骨），并试图用颅骨的形状对天资程度进行解读。机械发明也使歌德着迷。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他还得到了一件伟大发明的小模型——乔治·斯蒂文森的“火箭号”。魏玛第一套铁路系统也以缩微样式陈设于歌德的案头。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事物都感兴趣，不论艺术的、科学的、古代的、现代的。歌德的居所是座启蒙运动的纪念馆，是一个人的大英博物馆。一层屋檐之下，涵盖广阔天地。世人得以在此研究并了解到，作为世界公民的歌德，远远不只是一位作家。



歌德所著《色彩论》中的整页插图，**1810**年


27


17


5

歌德的色彩理论卡片，**1791**年

歌德的魏玛也是众多作家与哲学家如席勒、维兰德、赫尔德等人的魏玛。当时，这里一度成为新兴德国的象征，呈现出深刻的国际化和祥和的人文性。历经“一战”的灾难，德意志帝国终于在1918年崩溃。此后，德国试图重构自我，在魏玛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并推行人道而又开明的准则。甚至在歌德活着的时代，他本人也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处吸引全欧洲游客的景致。在他们中间，就有那位早前崇拜维特，而今已征服四方的帝王——拿破仑。法兰西的军事力量与德意志的精神成就于1808年10月2日在埃尔福特相遇。很可惜，他们对谈的内容并没有被完好地记录下来，但我们知道拿破仑想要谈论的是维特。歌德儿时的玩偶剧院如今容纳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



《浮士德召唤灵魂》，卡尔·克瑞斯蒂安·渥格尔·冯·渥格尔施泰因作于**1840**年前后

歌德长久以来，甚至终其一生，都在创作《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与魔鬼立约，从而得以探索并拥有世界。他不停地奋斗，去了解生活，享受快乐。在这一过程中，他行善，但更多的是作恶。最终，他被自己无法抑制的去不断追求的欲望解救了出来——如果他算是被解救了的话。自1808年出版以来，《浮士德》就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与那个何谓德意志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对此，安娜·博嫩坎普-莱肯描述道：

> 19世纪末期，一个国家正逐渐壮大，而《浮士德》也被诠释为体现这一成长力量的某种象征。在之后的纳粹统治时期，人们将《浮士德》与不断奋斗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德国人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也将他视作某种符号，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愿景。如今对《浮士德》的解读往往突出他成就中的过失——他是有罪的，唯有神圣的爱方能使其解脱。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与国家关系破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浮士德作为一个极度撕裂的形象，总是在不停地奋斗，而那些过失与罪恶也如影随形。这是如今对这部作品非常典型的解读。眼下对德意志的历史并不存在某种统一或单一的印象。但是，人们对于德意志传统中精神层面的危害显然还是有所认知的。这便指向了浮士德式的要素：他没什么责任感，也不顾及某些想法导致的众多政治与社会后果。

如何以多种方式解读歌德的德意志属性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研究歌德的资深批评家与评论家古斯塔夫·塞布特，持有与安娜·博嫩坎普-莱肯略不同的看法。在塞布特看来，歌德的主要身份已不再是《浮士德》的作者，如今的他被赋予更多的含义。歌德已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的象征。



法兰克福机场咖啡厅内的歌德雕像，根据缇士拜因所作的肖像画创作

> 至今依然深爱并崇拜歌德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仰慕他极高的文化素养。历代不同语言的书籍，歌德几乎都阅读过。他还对中国、伊斯兰世界、塞尔维亚，以及许多地区都感兴趣。当然，对于我们穆斯林而言，歌德是极为重要的。他曾著有一部《西东诗集》，收录了他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启发而创作的一些诗歌。歌德曾在诗中坦承，安拉是万物之主，而穆罕默德则是主派来的先知。这便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穆斯林了。我们有一位杰出的德国穆斯林作家，纳威德·凯尔曼尼，他也是位神学家及诗人。他就说，歌德是穆斯林，是我们中的一员。

据塞布特的描述，不仅仅德国的穆斯林视歌德有如同胞一样：

> 我想，如果你今天向人们提问，他们会回答说，对于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歌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榜样。他曾萎靡不振，也曾心生恐惧而神经衰弱。那种对死亡、发疯，乃至对婚姻的恐惧，是如此剧烈地困扰着他。尽管如此，他最后仍以高寿善终，还完成了伟大的成就。

听着博嫩坎普-莱肯及塞布特的讲述，可以了解到今天的德国人，正像18世纪70年代《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那些年轻读者一样，依旧能在歌德的著作及人生中，探索他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尽管维特这一形象在文学史中渐行渐远，浮士德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也不再如上一代那般

显著，但对歌德其人的持续迷恋会依然存在。在歌德身上，他们辨认出今日德国的象征：以人道的方式去应对现代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或许也正因如此，藏于施泰德博物馆里的那张肖像画看起来依然亲切并备受珍视。

缇士拜因那幅肖像画中的歌德是一名年近四十的英俊男子。他已是欧洲名人，但缇士拜因笔意所及不止于此，而此画也不知怎么，竟有了些预言的意味。缇士拜因画笔下的歌德，已然超越了真人大小。画中的他拥抱着整个世界的文化。他的确处于基座之上。缇士拜因向世人展现的歌德犹如一座丰碑，而今也终于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首次踏入德国通常是经由法兰克福机场。当你抵达那里，欢迎你的便是一尊歌德塑像。这一石像是根据缇士拜因的画作创作的，象征着德国的过往与现今。



瓦尔哈拉先贤殿，由利奥·冯·克伦策主持设计与兴建，**1842**年

[1] 约翰·海因里希·威廉·缇士拜因（1751—1829），德国画家。他出自著名的艺术世家，初随其叔约翰·雅各布·缇士拜因（1725—1791，世称“吕贝克的缇士拜因”）在汉堡学习绘画；后游学荷兰，1777年在柏林专以肖像画师为业。1786年他在游历意大利时与歌德结为好友；1787年二人结伴前往那不勒斯，其间他创作完成该幅肖像画，此后便以“歌德-缇士拜因”闻名于世。

[2] 古希腊神话中，伊菲珍妮娅（Iphigenia）为阿伽门农（Agamemnon）与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之女。其弟即俄瑞

斯忒斯（Orestes），而他有一位好友毗拉得斯（Pylad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则是公元前5世纪活跃于古希腊雅典的一位悲剧大师。在其诸多著作中，有两部是以伊菲珍妮娅为主题。此处是指《在陶瑞斯的伊菲珍妮娅》（Iphigenia in Tauris）。歌德后来据此创作了一部同名戏剧。

[3] 用以描述古希腊时代的一种建筑风格，即由一种曲形装饰呈现出的涡旋形状。

[4] 威廉·华兹华斯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于1807年作有一首《我如浮云般四处飘零》（*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此诗后以“水仙花”闻名于世。

[5] 凡·戴克是17世纪上半叶比利时画家，后来成为英国首席宫廷画师。

第9章 先贤群英殿

1808年，从荷兰直至普俄边界，几乎所有通行德语的地域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而历次大规模抵御法国的军事行动也都失败了。1805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彻底击溃奥地利军队，随后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维也纳。1806年夏，延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终结。数月之后，拿破仑在耶拿与奥尔施泰特完胜普鲁士军队，并迫使其屈辱地投降。1806年10月27日，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勃兰登堡门进驻柏林（详见第1章）。1808年9月，在德国中部城市埃尔福特，即当时的侯国埃尔福特[1]，拿破仑召使德意志诸部的统治者们在俄国沙皇面前向他效忠。那些统治者中有许多已成为拿破仑的有力同盟（详见导言）。余者则被迫不情愿地默认这一现状。尚能有效自治的德意志政体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德国人本来意味着什么？又能够意味着什么呢？面对法国持续且有效的军事入侵，能做怎样的抵抗呢？

> 那是德国最为沉沦的岁月（耶拿战役已成耻辱，德意志帝国已然支离破碎）。于是，1807年初，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2]心中萌发了树立大理石塑像的念头，用以纪念五十位最为杰出的日耳曼人。他随后下令，立即实施这一工程。

这些文字源自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对自己的大胆梦想的宣言，他希望通过纪念德国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建一个不朽的德国。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它引发了19世纪欧洲对于民族认同最不寻常的表现方式之一——一座高耸于多瑙河岸边、象征德意志属性[3]的先贤殿——瓦尔哈拉。



《巴伐利亚王国路德维希王储》，安格丽卡·考夫曼[4]作于1807年



《诸神进入瓦尔哈拉》，理查德·瓦格纳《莱茵的黄金》最后一幕，版画，**1876**年

1807年，作为王储的路德维希尚无力兴建大型建筑。但正如上文所引用的他自己回忆录中的记述，当时他可委托他人去制作那些半身像。1807年至1812年，德意志各邦国相继被迫屈辱地加入拿破仑的联军，为进击俄罗斯做着相应准备。而路德维希则委派当时第一流的雕塑家们，去制作众多伟人的塑像，例如弗里德里希大王与玛丽亚·特蕾西亚[5]、格鲁克[6]与海顿[7]、莱布尼茨[8]与康德、席勒与歌德等。当时，除歌德尚在人世外，其余诸位已然作古。但他们伟大的精神力量将为挫败的德意志帝国带来尊严与希望。这是以消极抵抗的终极形式呈现的一段历史，也是迈向民族解放的一座国家肖像馆。神圣罗马帝国虽已不复存在，但德意志的精神帝国却可长存。1825年，路德维希登基成为巴伐利亚国王，可以发布任何政令。于是，他下决心兴建先贤殿。

在北欧神话中，瓦尔哈拉是座宏伟的神殿，其中安奉着英勇阵亡的将士之灵。他们由众位女武神[9]引领，与先辈及战友汇聚于神殿之中。19世纪初，北欧神话正风靡一时。当格林兄弟重新挖掘整理德意志民间故事之时（详见第12章），中世纪日耳曼叙事诗，如《尼伯龙根之歌》等，也作为民族遗产的组成部分被提炼出来。理查德·瓦格纳最终将维京人的古老传说和中世纪日耳曼的诗歌一并融入他的伟大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于是，女武神的形象与瓦尔哈拉便被戏剧界人士所熟知。而这或许也创立了德意志音乐剧作的最高成就。

路德维希最初想将瓦尔哈拉建于慕尼黑的英国花园中。不过他后来决定将瓦尔哈拉建在前帝国城市雷根斯堡附近（当时这座城市刚刚被并入巴伐利亚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曾在那里举行过数次议会会议，召集了整个德意志及更广泛地域的显要人物。瓦尔哈拉俨然将成为另一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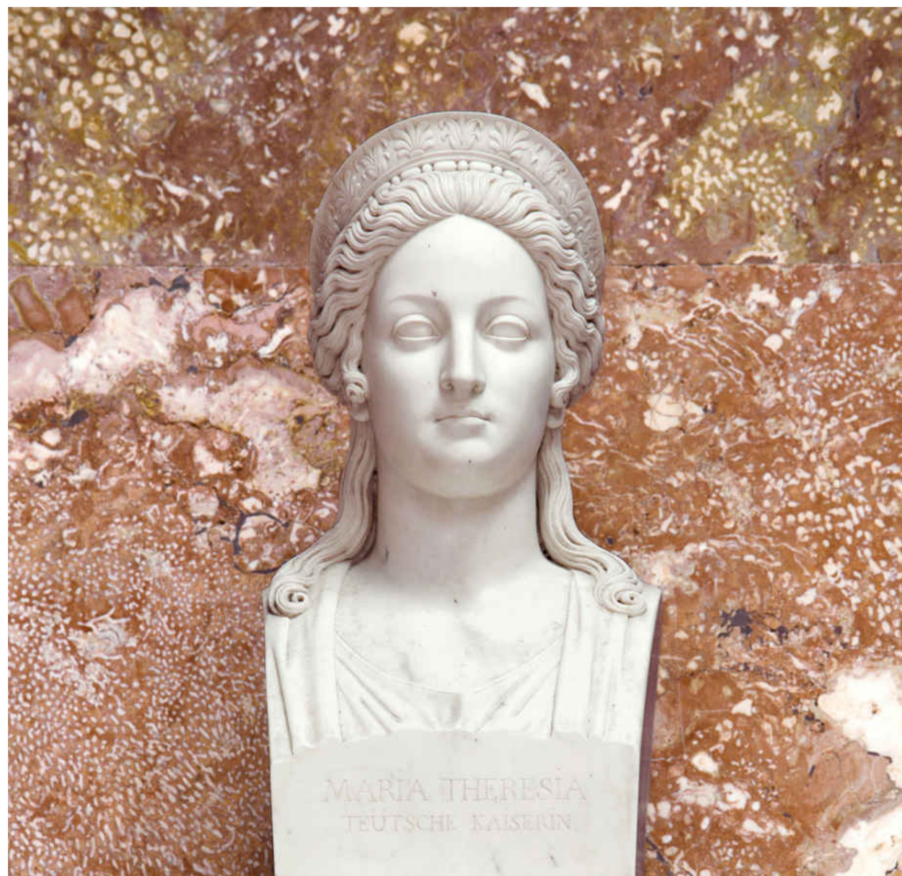
的德意志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曾传召各方代表与会。现如今，国王路德维希在这个汇聚了惊人成就的殿堂召唤那些德意志历史伟人的英灵。

路德维希及其建筑设计师利奥·冯·克伦策的选址十分引人注目。英格兰杰出的风景画家约瑟夫·特纳[10]曾出席1842年瓦尔哈拉的揭幕仪式。年近七旬的特纳被其折服，于是以此情景作画。这是他晚年最为复杂的风景画作之一，现藏于泰特美术馆。他还创作了一些可算是他最糟糕的韵诗：

> 然而和平回归，曙光重现，
>
> 一束束照进瓦尔哈拉，孕育着科学与艺术，
>
> 献予德意志祖国那些极具声望的人士。



弗里德里希大王半身像，沙多[11]作于1807年



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半身像，**1811**年

在多瑙河岸僻静处的一座300英尺高的小山上，瓦尔哈拉南向而立。国王路德维希与克伦策完成的并非是对北欧古老众神的哥特式重现，而是构建了另一个版本的帕特农神殿。从邻近河岸处，经由一处巨型阶梯便可来到殿堂入口。阶梯被赋予了特别的纪念意义，用以向雅典神殿的入口致敬——那里可以通往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殿。这样的设计令人感觉自己像一位谦逊的朝圣者，正步入一座伟大的神殿。拾级而上，整座建筑慢慢映入眼帘，门廊及两侧带有凹槽的多立克式立柱隐约可见。此情此景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于此，那些最伟大的日耳曼人正被引入古希腊人的群体之中。



南面山墙，呈现**1813**年间的民族解放战争



北面山墙，展现条顿堡森林战役中的赫尔曼

与帕特农神殿一样，瓦尔哈拉先贤殿那些山墙上也讲述着部族的创世传奇。其北面山墙上是一尊英勇的日耳曼部族首领赫尔曼的巨型塑像。他正和那些来自日耳曼不同部族的将士一起，合力抵御入寇的罗马人。这一幕反映的正是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战役，这是有记载的日耳曼首次成功抵御入侵者的历史性时刻（详见第7章）。南面山墙上是一千八百年后民族的化身——日耳曼尼亚的塑像，在她两侧是那些抗击拿破仑的勇士。他们曾为了将德意志再次从外来入侵与占领中解放出来而英勇奋战。前者是全民族抵御罗马人，后者是抗击法国人以争取民族解放。正如路德维希的这座建筑所展现的，德意志人民拥有的整部历史就在这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之间。

瓦尔哈拉高大庄严的内部空间约有50码长、20码宽[12]，色彩鲜艳而明快。地面铺设着白色和金色的地板，墙壁包有粉色大理石。成对的女性塑像托举着金色与蓝色相间的木制天花板。在雅典，用于支撑的立柱通常是女性立像。但在这里，却是女武神双手托举的造型。在古日耳曼神话传说中，这些少女将战场上阵亡的英雄引入天堂瓦尔哈拉。这些独特的女武神身着蓝白相间的裙装，那正是巴伐利亚的代表色。

这座宏伟建筑的中心完全空置。如此丰富的色彩呈现仅是为了充作那一百三十件白色大理石半身像的背景。这些塑像常驻瓦尔哈拉，我们若可以逐一与他们对话，那么对何谓德意志便会有所了解。入选标准由路德维希在首份指南的序言中亲自拟定：

> 凡入奉瓦尔哈拉，先决条件是有日耳曼血统，且说德

> 语。正如无论来自爱奥尼亚还是西西里岛，古希腊人始终是古希腊人。而无论来自波罗的海还是阿尔萨斯，或来自瑞士或荷兰，日耳曼人始终是日耳曼人。没错，荷兰。因为弗莱芒语及荷兰语只不过是低地德语的两种方言而已。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并不取决于居住地域，而只取决于语言。

历史上德意志疆域版图并不固定。对这一持久难题，路德维希已经有了对策：所有通行德语的区域都是德国，就这么简单。正如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四处散居一样，日耳曼人的定居点也遍布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文化世界。

民族解放战争之后，这成了一个普遍的观点。1813年，最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吟游诗人恩斯特·莫瑞茨·阿恩特[13]曾创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哪里才是德意志民族的祖国》（[14]。这一工作的基础与路德维希在瓦尔哈拉的设想完全一样，即共通的语言意味着不朽的凝聚力。

制定了关键的入选标准后，路德维希进而阐释了瓦尔哈拉的具体原则：

> 瓦尔哈拉只安奉卓越的日耳曼人，他们的半身像均由德意志艺术家设计制作。众所周知的首位日耳曼伟人、罗马军团征服者——赫尔曼的塑像位列第一。那些同时代的伟人，若塑像尚未树立，他们的姓名会被铸成铜字嵌于匾额之上。瓦尔哈拉是平等之地，没有特例，对性别也没有歧视。



瓦尔哈拉先贤殿内景，**1842**年

路德维希的瓦尔哈拉体现了对平等的坚持，而另一个用以聚集人民抗击入侵者的王室倡议，也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15]时期普鲁士设立的铁十字勋章和路易十字勋章（详见第14章）。可见，在巴伐利亚与普鲁士，女性获得最高荣誉的机会与男性是平等的。此时社会等级并不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其胜于雄辩的象征性在那两个王国得以维持，但明显与政治无关。

路德维希的取舍既古怪又兼容并包，这从入口上方的那些姓名牌匾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击败罗马军团的赫尔曼当然位列首位。他旁边的是艾因哈德[16]，一位学者与历史学家，曾供职于查理大帝的宫廷。这体现出，德国除具备英勇的品质外，还有着学术气质。因将自己的国家从丹麦人手中拯救出来而被视作解放者的艾尔弗雷德大王[17]，也位列于

此。他说撒克逊语，也属于庞大的日耳曼族群的分支。然而，瓦尔哈拉并不是一座仅容纳显赫人物的殿堂。在日耳曼人的首位皇帝查理大帝旁边，是来自纽伦堡的彼得·亨莱因[18]的牌匾。人们认为，是他在1510年前后发明了首只怀表（详见第19章）。这是一座非常个人化的万神殿。漫步于瓦尔哈拉，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看一看这里供奉了哪些名人，又有哪些名人未能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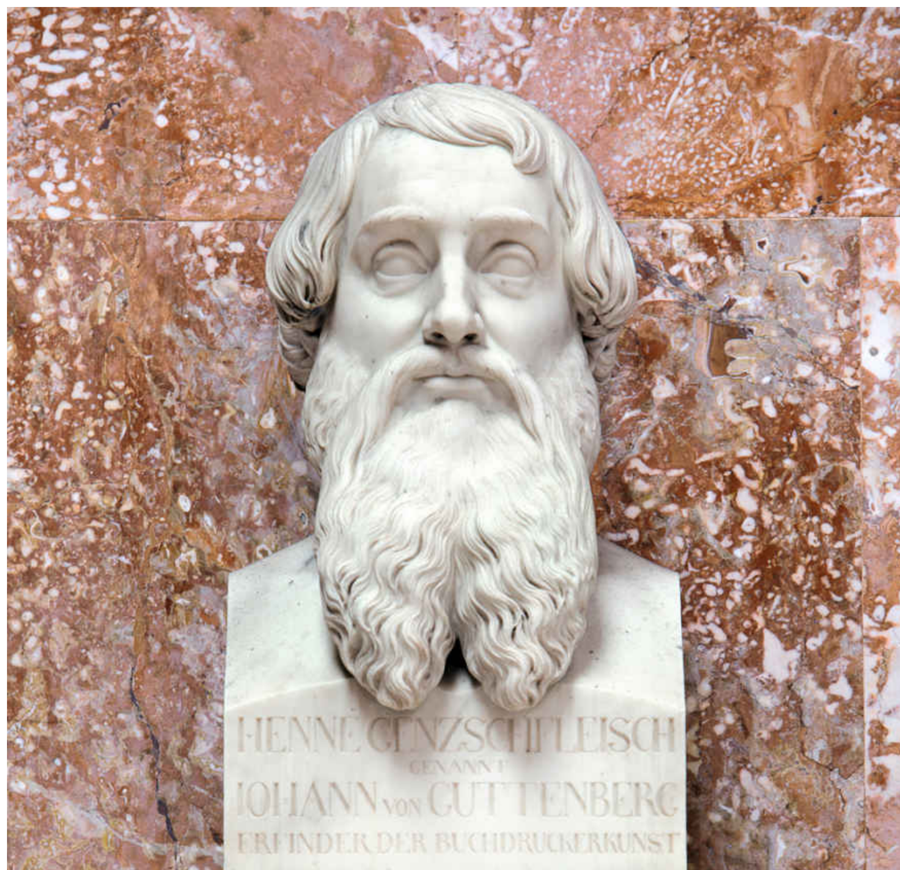


凯瑟琳大帝[19]半身像，**1831**年



威廉三世半身像（大不列颠威廉三世），1815年

路德维希对自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先辈自然很慷慨，对于那些君主也是如此。玛利亚·特雷西亚皇后的入选已经显示出了些许势利，而德国贵族公主出身的凯瑟琳女皇被归入其中更是激怒了俄国人。（法国人对于查理大帝入奉先贤殿也有种受到冒犯的感觉。）在那个时代，瓦尔哈拉实际上是唯一一座容纳如此之多重要女性的地方，同时还拥有一批强大的配角，包括日耳曼尼亚、众多女武神，以及作为装饰元素的胜利女神。所有这些，或许正符合一位君主沉溺女色的恶名。路德维希曾因与那位貌美的情妇罗拉·蒙特兹私通而传出丑闻。这也是他1848年被迫退位的原因之一。巴伐利亚王国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作为国王，路德维希自然会加入男女圣徒及传教士。但总的来说，起始位置那两块姓名牌匾——赫尔曼与艾因哈德已定下基调，最多的还是来自军事和文化领域的英雄人物。



古滕堡半身像，1835年



路德半身像，**1831**年完成，直至**1848**年方才树立

路德维希的历史构想如同不规则的棱镜，折射出这诸多人物形象。访客置身其间，与之邂逅，已然如同梦幻。而颇有意趣的是，那些塑像并非按照连贯的编年顺序排列，以致访客总是在时空变换中前后穿梭，梦幻的感觉愈加明显。

弗里德里希大王来自普鲁士，又是新教徒，但他仍在首批入选了这一巴伐利亚纪念神殿。他曾与众多德意志同胞进行对抗，甚至将他们击败。但他在七年战争中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并使它成为一个欧洲强国。

弗里德里希的旁边是他的普鲁士同胞布吕歇尔。他曾与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中并肩战斗。由于这里对日耳曼属性的定义十分宽泛，我们还能找到拥有苏格兰血统、同样曾与拿破仑对阵过的俄国将军巴克雷·德托利[20]。他以德语为母语，因而也被选入先贤殿。奥兰治的威廉，即后来的大不列颠国王威廉三世[21]，也毫无意外地出现在这里。因为对于路德维希而言，荷兰语只是另一个版本的德语。威廉本人就是出自德意志拿骚王朝的王爵贵族。一百年前，他曾领导欧洲联盟对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公元732年查理·马特[22]击败阿拉伯人的图尔战役，直至滑铁卢战役，路德维希选来纪念的那些伟人，都是说德语并在数世纪间为他们的国家英勇奋战的人。这一点已被反复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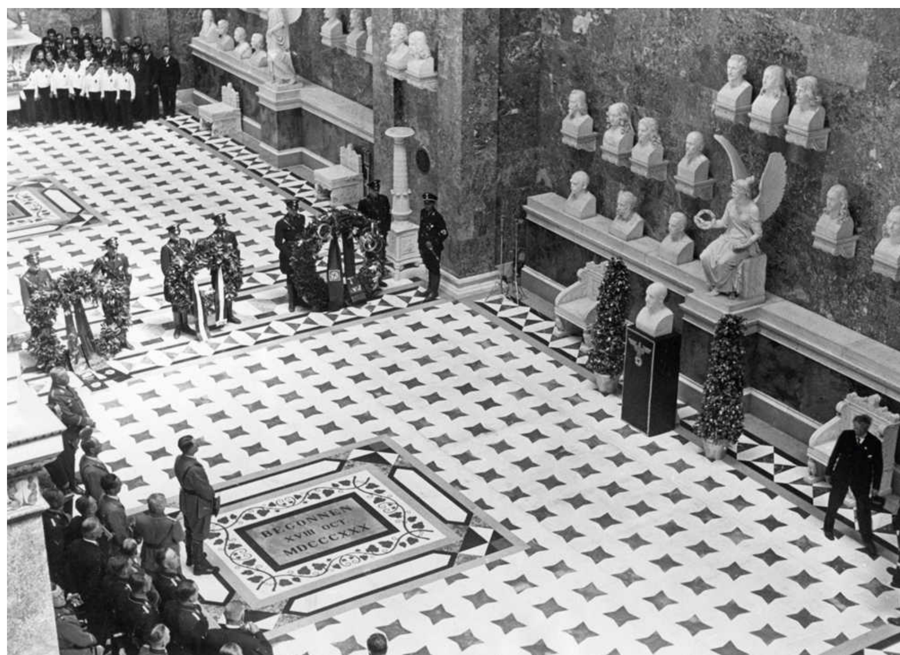
在文化领域，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得以入选，如贝多芬与莫扎特，海顿与亨德尔；伟大的作家与哲学家则有歌德与席勒，伊拉斯谟[23]与康德；伟大的发明家与科学家有古滕堡与哥白尼，还有亨莱因，以及奥托·冯·居里克，后者是真空泵和著名的马格德堡半球的发明者。众多入选的画家再一次清楚地体现出，路德维希关于日耳曼属性的概念是多么宽泛。在丢勒[24]与霍尔拜因[25]旁边的是鲁本斯[26]与凡·戴克。这两位都说德语（确切地说是弗莱芒语），因此完全符合入选瓦尔哈拉先贤殿的标准。

不过，对于谁该入选瓦尔哈拉，当时真正的争议并不在文学、哲学、科学、音乐或艺术这些领域，而在于宗教领域。1842年，瓦尔哈拉揭幕。一千八百年的日耳曼历史，由精选的一百六十尊人物塑像所代表。但马丁·路德竟然不在其中，这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评论。当然，没人会质疑他是位伟大的宗教人士。不过，巴伐利亚王国深受天主教影响。对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路德维希而言，路德在德意志历史上是位极有争议的人物，他对民族分立负有责任。而这一分立促发了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和德意志宗教同一性的瓦解。牛津的历史学者阿比盖尔·格林，对历史在锻造1815年后德意志诸邦国民族认同方面的功用做过研究。她解释说：

> 当神圣罗马帝国覆灭之时，宗教平衡也被打破。这并不是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人数发生了变化。但在神圣罗马帝国，曾有许多更倾向天主教的政体，尽管其中大多数比较弱小。神圣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出现了更多信奉新教的君主，而许多邦国的宗教信仰也变得不再单一。当关于德国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之时，宗教的因素就非常重要了。对于新教徒来说，路德无疑是最重要的德国人，是德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但如果你是天主教徒，那么路德和新教教义就是一股极具分裂性的力量。他们分裂了整个基督教社会，继而分裂了德意志民族。宗教分裂引发了一系列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而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极其痛苦的。

实际上，起初也委托了艺术家去雕刻路德的半身像，却在最后一刻将他排除在外。1848年，德国爆发了数次自由革命，巴伐利亚国王路德

维希也因越发不得人心而被迫退位。此前不久因为他做出让步，路德的塑像才得以进入瓦尔哈拉。这是自先贤殿揭幕后，首座被新添进去的人物塑像。如今，作为补偿，路德像被安置在歌德像旁的显著位置。但正如阿比盖尔·格林所指出的，当时宗教分歧远不止天主教与新教之别：



安东·布鲁克纳半身像的安放场景，**1937**年。图中左下角，希特勒正面向塑像站立

> 最初，路德维希只挑选信奉基督的德国人入奉瓦尔哈拉。指望路德维希会将摩西[27]置于其中是不现实的。但同时，门德尔松却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巨人，也是犹太现代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与作家、哲学家戈特霍尔德[28]是至交好友，后者入奉了先贤殿。他的缺席是值得关注的。时至今日，仍有一些著名的犹太人未得入列，比如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大多数后来入奉瓦尔哈拉的人都在意料之中。比如公共卫生领域的先驱马克斯·约瑟夫，X射线的发明者威廉·伦琴，他们二人的入选毫无争议。任何存有德意志记忆的场所一定会为音乐留有特殊的位置。《尼伯龙根之歌》的作者姓名不详，却也得以荣耀地高挂在姓名牌匾的墙上。如你所料，在这些半身像中，你可以找到瓦格纳。他后来创作的音乐领域的瓦尔哈拉在世界范围内远比路德维希的这座建筑更为有名。1913年，他的半身像得以安奉先贤殿。三年之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入选，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延迟。不过，后来入选的那些音乐家中，有一位或许值得商榷，那便是安东·布鲁克纳[29]。他的半身像是唯一在纳粹时期入奉瓦尔哈拉的。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他是位伟大的作曲

家，而是因为他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希特勒就是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元首亲自出席的庆典中，布鲁克纳的塑像被安奉于瓦尔哈拉先贤殿内。这种方式体现出路德维希的文化诉求将由第三帝国继承。然而，颇有意思又令人惊讶的是，这是那一时期得以入奉的唯一一尊塑像。或许人们本来期望希特勒会充分开拓路德维希对这座殿堂的全部构想，用以安奉那些改变了世界的日耳曼伟人。但事实上，他却使这一殿堂成为相对不可触碰的禁区。

几乎与视线持平的那些位置较低的半身像，现如今按其入奉瓦尔哈拉的顺序排列。继路德入奉之后，没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事件，直到1990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塑像入奉瓦尔哈拉。这是先贤殿内首位犹太人的塑像。此时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谁能得以入奉瓦尔哈拉，仍是有着重要意义且易引发公开争议的问题。在这座建筑里，德国——至少是德国的一部分（巴伐利亚），仍然决定着哪些历史值得书写，哪些记忆至关重要。极少有国家为塑造民族历史而提供这样一处可供讨论的场所。

爱因斯坦和康拉德·阿登纳[30]的塑像先后被安奉于瓦尔哈拉。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当时不得不离开纳粹德国而流亡他乡。阿登纳则在战后推动构建了一个民主的德国，堪称伟大的缔造者。但最后入选瓦尔哈拉的三尊塑像或许引发了最有意趣的问题。19世纪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文风尖锐而富于激情，擅长讽刺。他之所以长久缺席，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他的犹太人血统，但也是因为他对这样一座伟人纪念殿堂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瓦尔哈拉是荒唐的，甚至发表了一首讽刺诗来嘲弄路德维希，并称这一建筑为“头骨陈列场”。2010年7月28日，这位嘲弄者也得以入奉其中。但他的半身像却不同于旁人。大理石塑像上一条细缝自颧骨延至胸部正中。雕塑家尝试以此找寻一种方式，来表达将海涅这个瓦尔哈拉批判者安奉于此所隐含的无解的分歧。



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为海因里希·海涅[31]半身像揭幕，**2010年7月28日**

而近期所做决定中最为困难的，或许也是关于瓦尔哈拉容纳对象的所有决定中最为困难的，无疑涉及那些在第三帝国生活，继而死去的人们。其中包括哲学家埃迪特·施泰因。她是犹太裔，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她在奥斯威辛遇害，后来被罗马天主教会正式宣布为圣徒。对此，阿比盖尔·格林说：

> 现今，决定谁得以入奉瓦尔哈拉的是巴伐利亚州议会。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他们的选择在我看来是非常保守的。马克思显然是位在全球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缺席就极为引人注目。这些决定反映出巴伐利亚与众不同的特色，毕竟那里总是有非常强烈的天主教色彩。因此，埃迪特·施泰因的入选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很奇怪。你可以想见她为何会在那儿。她是犹太人，一位大屠杀遇难者，也是位有分量的哲学家。可是，显然更有国际影响力的汉娜·阿伦特[32]为何没有入选呢？这些都在讲述一个事实，即对于德国现今为何，过去又为何，以及何以构成德意志的历史等，仍存在相互矛盾的论述。所有这些，在没有定论以前，都受区域性的影响，在宗教方面也是一样。

瓦尔哈拉可谓是反映德语世界诸多成就的历史长编。当你漫步其间，最后的对话者便是索菲·绍尔。她因非暴力抵抗希特勒而被纳粹判处死刑。她的半身像就在最后一块与视线持平的牌匾上方。匾额上写道：

> Im Gedenken an alle, die gegen Unrecht, Gewalt und Terror des "Dritten Reichs" mutig widerstand leisten.
>
> 谨此纪念与“第三帝国”的不公、暴力与恐怖进行无畏斗争的勇士们。

正如德国的许多其他建筑一样，这座建筑令置身其中的游客体会到一个民族为构建一段连贯而完整的历史所做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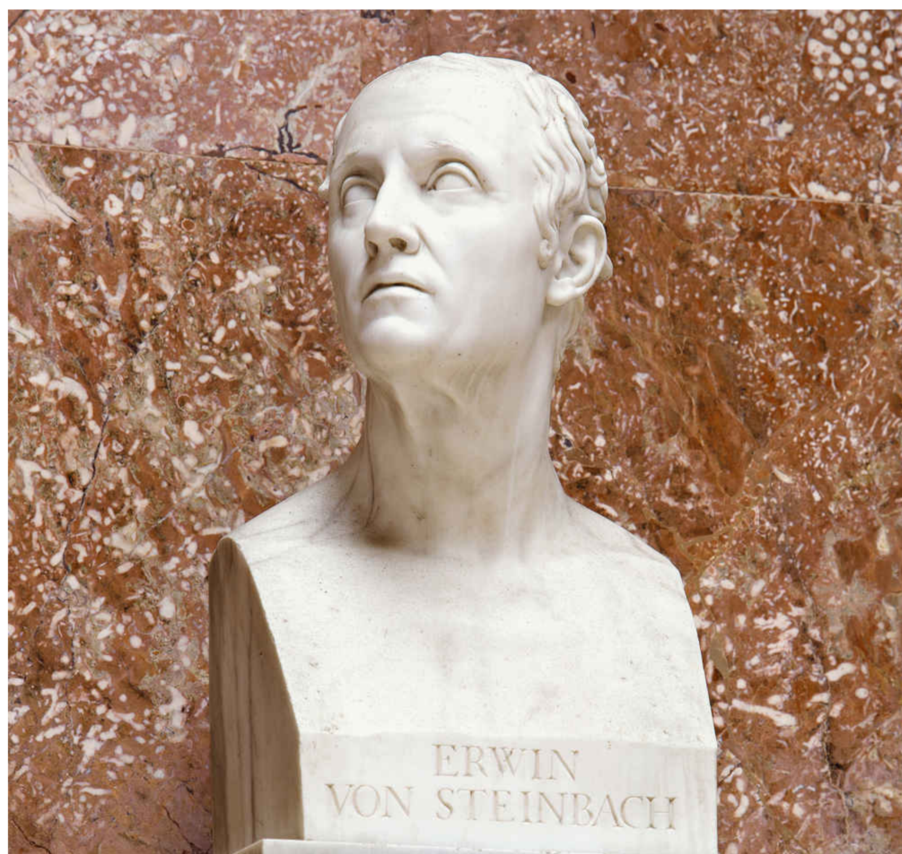


索菲·绍尔半身像，下方为纪念“抵抗运动”的牌匾，**2003**年

关于瓦尔哈拉，尚有许多看起来颇为反常或令人费解的事情，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所选用的建筑风格。墙壁之上高挂着一块姓名牌匾，

特为科隆大教堂那位不知姓名的建筑师而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设计师艾尔维·冯·施泰因巴赫的铭牌，后者被歌德称颂为德意志哥特式建筑的大师（详见第4章）。当路德维希正在多瑙河边兴建瓦尔哈拉时，普鲁士人正在莱茵河岸营造那座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科隆大教堂。作为德国那一时期的象征，它的重建势在必行。瓦尔哈拉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现德意志属性。然而，这座建筑却根本不是德意志哥特式的风格，而是希腊式的，还有可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古印度对话的兼容并蓄的装饰。对此，阿比盖尔·格林说：

> 古典建筑体现出一种地位。法国人过去总是认同罗马人，不管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而德国人却总是认同希腊人。他们认为，自己正如希腊人，即便在军事上不及罗马人或法国人那样强硬，可在文化上是优越的。他们也认同希腊的多元化。比如说，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希腊城邦，同样也曾有过许多德意志城邦。他们认为，希腊人对自由有种特别的依恋。他们同样将此视作典型的德意志特质。因此我想，为瓦尔哈拉选择希腊式建筑风格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意义重大。



艾尔维·冯·施泰因巴赫半身像，**1811**年

对巴伐利亚人而言，德国对希腊的这种认同曾有过一次非常特殊的共鸣。当路德维希一世正兴建瓦尔哈拉时，他的次子奥托经由不列颠、法兰西及俄罗斯共同推举，成为希腊的首位国王。当时，希腊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巴伐利亚的奥托在许多方面塑造了今天的希腊。他将首都迁至雅典，随后着手对卫城进行修复。现代雅典的许多公共建筑，明显与现代慕尼黑的极为相似，因为父子二人都在为19世纪创建理想中的希腊式或德意志风格的城市。19世纪30年代末，雅典的帕特农神殿与多瑙河边的万神殿都是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建筑工程。于此，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19世纪的德国人认为他们正体现着古希腊的美德。时至今日，德国的文理中学仍被称作“Gymnasium”，以此公开向希腊教育致敬。



Gruß aus München!

20世纪60年代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来自慕尼黑的问候”

[1]　埃尔福特邦国原属神圣罗马帝国美因茨选侯国。耶拿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后，即1806年至1814年间，与其周边区域以埃尔福特一级行政区的名义，直属法国皇帝拿破仑。

[2] 史称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825年登基成为巴伐利亚王国国王，1848年退位。

[3] 所谓“德意志属性”译自英语German-ness，在之前若干篇幅已有所涉及。此概念在该建筑中可泛称为“日耳曼属性”，这也是与英文词汇相对应的德语单词Germanentum的本义，它涵盖民族及文化层面。详见下文。

[4] 安格丽卡·考夫曼（1741—1807），瑞士裔奥地利女画家。其画作属古典主义风格。在其艺术生涯巅峰期，歌德与她结识并且对她颇为尊崇。她曾为歌德作过肖像画，也为歌德的《伊菲珍妮娅在陶瑞斯》《艾格蒙特》等剧作配过插图。

[5]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哈布斯堡王朝杰出的女政治家。

[6]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他一生共创作歌剧百部以上，被认为是18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歌剧作家之一。四幕歌剧《伊菲珍妮娅在陶瑞斯》（Iphigenia in Tauris）是其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7]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他与莫扎特并称为维也纳古典主义的两位音乐巨擘。

[8]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他曾作为外交官出使巴黎；在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被认为是17世纪至18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导师之一。

[9] 英语“Valkyrie”与德语“Walküre”皆源于古冰岛语（北日耳曼语支），音近“瓦尔秋瑞”，通常意译作“女武神”。在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传说中，奥丁神有多位婢女（不同版本人数不等），她们主司挑选阵亡将士（此一职责即该词本义），并将其英灵引入瓦尔哈拉神殿安奉，以备神域未来之决战。

[10] 约瑟夫·特纳（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画家、水彩画家、版画家。特纳以油画闻名，同时也是英国最伟大的水彩风景画大师之一。他的作品对印象派艺术家有相当的影响，因而他也被认为是这一流派的先驱。。

[11] 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1764—1850），普鲁士画家，德意志古典主义最重要的雕塑家，勃兰登堡门顶部塑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沙多终其一生致力于为弗里德里希大王创制一骑士立像。不过，瓦尔哈拉内这一半身像却是出自其学生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1777—1857）之手。对此，沙多曾诙谐地说道：“吾之名望始于劳赫。”

[12] 长约45.7米，宽约18.2米。

[13] 恩斯特·莫瑞茨·阿恩特（1769—1815），德国作家、历史学者。蒂罗尔这一地域属历史范畴，可参见附图1至附图5。现分属奥地利与意大利。

[14] 书名也有汉译作《英语国家史略》。

[15] 此处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出自霍亨索伦家族，1797年成为普鲁士国王。路易十字勋章为普鲁士王国授予女性的最高荣誉勋章。

[16] 艾因哈德（770—840），法兰克王国学者、史学家，“卡洛林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之一。《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是其流传下来的主要作品之一。

[17] 艾尔弗雷德（849—899），871年即位成为威塞克斯王国国王。该王国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于公元519年建立，位于不列颠岛南部。

[18] 彼得·亨莱因（1479/80或1485—1542），德国锁具大师。除怀表外，螺旋弹簧式钟表驱动装置的发展也被归于他的名下。

[19] 凯瑟琳二世（1729—1796），生于普鲁士，是一王爵贵族的女儿。1762年，她统率禁卫军发动政变，而后登基成为俄罗斯帝国女皇，直至逝世。汉译据俄语也常作“叶卡捷琳娜二世”。

[20] 巴克雷·德托利（1761—1818），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曾于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及第六次反法同盟时期，出任沙俄战争大臣。

[21] 威廉三世（1650—1702），出生即继承其父的贵族爵位，1689年登基成为英格兰、爱尔兰及苏格兰的国王，直至去世。

[22] 查理·马特（约688—741），法兰克王国政治家、军事统帅。公元732年10月，他率军在今法国图尔与普瓦捷间，完胜大举西进的阿拉伯人，由此成功阻挡了伊斯兰扩张。因此，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图尔战役拯救了欧洲基督教文明。

[23] 伊拉斯谟（1466—1536），欧洲人文主义重要学者，神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好用“纯正”拉丁语写作。其思想曾对马丁·路德产生巨大影响。

[2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741—1528），德国画家、图形艺术家、数学家、艺术理论家，除《启示录》《苦闷》等代表作品外，另著有《人体比例研究》。

[25] 汉斯·霍尔拜因（1497/98—1543），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曾为伊拉斯谟作画，也曾为路德的《圣经》译本配过插图。

[26]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弗兰德画家，巴洛克时期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

[27]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被认为是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倡导者。

[28] 戈特霍尔德·埃弗莱伊姆·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

[29] 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位卓越的管风琴演奏家。他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因而其音乐创作多是

宗教而非世俗的。

[30]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德国政治家，曾出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1949—1963）及外交部长（1951—1955）。

[31]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作家及新闻工作者。

[32] 汉娜·阿伦特（1906—1975），犹太裔美籍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为普林斯顿大学首位女性正教授。她一生著作丰富，尤以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而享誉西方。

第10章 一个民族，多样香肠

上一章我们介绍过，巴伐利亚王国的路德维希一世为了表现德意志身份认同而建造了一座殿堂。殿堂中纪念的那些历史伟人，无论男女，都说着某种形式的德语。路德维希的瓦尔哈拉，可说是对民族文化颇有意趣而又异乎寻常的全景展现。姑且不论这座建筑当时在德国境内外的知名度，单从长远来看，与后来的赫尔曼纪念塑像相比（详见第7章），它并未成为民族情感的强烈聚焦点。或许是它曲高和寡，仅使小众侧目，未能吸引大多数民众。

不过，路德维希还在无意之间开创了另一个习俗，将德意志属性以一种大众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任何人都能充分参与其中，就传播范围而言，它比瓦尔哈拉更为国际化。1810年10月12日，为庆祝路德维希的婚礼，他的都城慕尼黑首次举办了十月节[1]。庆典非常成功，从而得以年复一年地举行。现今，慕尼黑十月节成为全球最大的流行节日，其规模据称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庆典及美国新奥尔良的狂欢节还要大。德国啤酒不仅仅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喜爱，更享誉全球。如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慕尼黑，去参与啤酒节庆典。



来自德语世界的饮酒器具，有玻璃、银质嵌金、琥珀及石质等用材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饮具，其中德制藏品因数量众多而尤其引人注目，包括玻璃杯、马克杯、带握把的大啤酒杯，以及其他

专为饮用啤酒而制的盛具。这些不同材质的饮具，大多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制品。它们来自德语世界的各个地区，从比利时到俄罗斯边界，从阿尔卑斯山脉到波罗的海之滨。例如瑞士制玻璃高杯、科隆制石质大啤酒杯、奥地利制带盖饮杯、汉堡制银质嵌金马克杯，以及来自德语世界波罗的海沿岸自吕贝克至里加一带众多商业城市的制品。这其中最令人惊讶的要数那件完全用琥珀制成的酒杯。而琥珀这一既奇特又昂贵的独特材质，在东普鲁士却储量丰富（详见第3章）。看看这一陈列，我们便可了解，德国人随便在哪儿，并不仅是享用啤酒而已，更是在把盏开怀畅饮。

他们这种做派至少已延续了两千年。实际上，每当外国人提起他们，几乎首先都谈及此。公元100年前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其《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提到一些有着金发蓝眼相貌的部落，他们曾给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军团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中最远的一支在波罗的海的海滨，以采集琥珀为业。书中还提到这些部落有一个共通点：

> 他们用大麦或其他谷物酿造一种饮用酒，而这种酒经发酵便成了某种与葡萄酒类似的饮品。即便你不舍昼夜地饮酒，也无人指摘。

后来，考古学证实了塔西陀的记载，即在这些日耳曼部落中确实盛行畅饮啤酒作乐。后来啤酒成了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德国人的标准，这便是其中部分原因。对此，《法兰克福汇报》饮食专栏记者彼得·彼得说道：

> 有很多考古证据表明，那些与罗马帝国英勇作战的古日耳曼人消耗了大量的啤酒。许多19世纪的画家常以熊与啤酒为衬托来描绘古日耳曼人。画中，他们总是躺在熊皮上，用镀金牛角杯大口喝着啤酒。所以19世纪时，啤酒成了一个全民事业。回顾19世纪众多啤酒馆，尤其是在慕尼黑的那些，建筑设计师们定是受了瓦格纳笔下那些北欧英雄梦的启发。

19世纪的英国人发现了据称是波狄西亚喜爱的酒饮，并将其作为民族饮品。与此类似，19世纪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渴望发现真正的德意志传统。于是，他们便着手提高啤酒的象征地位。除了引用塔西陀的记载以外，他们还翻出了巴伐利亚的《纯正啤酒法》。这部法令首次问世是在1487年，由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四世颁布。它也成为后来一些非常成功的制造业传奇的基础。19世纪的那些民族主义者设想，制定这部法令就是为了确保仅用未受污染的洁净水来酿造啤酒。而事实也证明，数世纪以来，这一民族饮品的完整品质得到了坚决捍卫。这是一个至今仍被广泛接受并认为是真实的设想，但彼得对此却有其他看法：

> 当时，这部纯正法意味着，你只被允许用有限种类的食材来酿造啤酒，即大麦、啤酒花和水，而不允许再用其他食材。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事情。它并不涉及消费者权

> 益保护或是为了预防民众生病。它只是制止人们用小麦或黑麦酿造啤酒，因为这两种食材更适合用来做面包，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纯正法最初关系着德国的另一份持久记忆，即对食物紧缺的恐惧。彼得的同事哈拉尔德·绍尔供职于慕尼黑慢饮食协会，他接过话题谈起了啤酒纯正的观念是如何被政治化的。他介绍说：

> 非常有意思的是，涉及啤酒纯正的这些材料已被忽视了逾三百年。只是在19世纪，饮用啤酒成了代表德意志认同或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一种符号，这时这些材料才重新被提起。就这样，啤酒成了民族饮品。所以有人说，世界范围内除了我们德国人再无他人捍卫啤酒的纯正。

Der Vierdt tail.

pfarrern in vnserm lannde nit gestatt werden sol/außgenomen was die pfarrer vnd gaistlichen von aigen weinwachsen habñ/ vnd für sich/ir pfarrgesellen/priesterschafft vnnd haußgesindt/ auch in der not den kindlpetterin vnd kranncken leüttn/ vnuärlich geben/das mag jne gestatt werdẽ. Doch geuärlicher weiß/ von schenncken vnd gewins wegen/söllen sy kainen wein einlegen.

Wie das Pier Sümer vnd Wintter auf dem lannd sol geschennckt vnd praüen werden.

Item wir ordnen/setzen/vnd wöllen/mit Rate vnnser Lanndschafft/das füran allenthalben in dem Fürstenthumb bairn/ auff dem lannde/ auch in vnnsern Stetten vnd Märckten/ da deßhalb hieuor khain sonndere ordnung ist/ von Michaelis biß auff Georij/ain Maß oder Kopffpiers vber ainen pfenning münchner werung/vnd von sant Jörgen tag/biß auf Michaelis/die maß vber zwen pfenning derselben werung/ vnnd derenden der Kopff ist/vber drey haller/bey nachgesetzter peene/ nicht gegeben noch außgeschenckt sol werdñ. Wo auch ainer nit Mertzen/sonder ander Pier prawen/oder sonnst haben würde/ sol Er doch das/ kains wegs höher/dann die maß vmb ainen pfenning schencken/vnd verkauffen. Wir wöllen auch sonderlichen/das füran allenthalben in vnnsern Stetten/Märckten/ vnd auf dem lannde/zů kainem pier/merer stückh/dann allain Gersten/Hopffen/vnnd wasser/genomen vnd gepraucht söllen werden. Welher aber dise vnnsere ordnũg wissentlich vberfarn vnd nit halten wurde/dem sol von seiner gerichtzöbrigkait/dasselbig Vas pier/ zůstraff vnnachläßlich/so offt es geschicht/genomen werden. Yedoch wo ain Geüwirt von ainem Pierpreiwen in vnnsern Stetten/Märckten/oder aufm lannde/yezůzeiten ainen Emer piers/zwen oder drey/kauffen/vnd wider

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于1516年重新颁布的《纯正啤酒法》

尽管《纯正啤酒法》源自巴伐利亚，但很快就被德国的许多其他地域所采纳。那时，德国北部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三十年战争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致命饥荒，可用于制作面包的谷物频繁出现短缺，这使得纯正

法像是成了一种对保证食品供给颇有价值的调控方式。1871年，在协商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巴伐利亚将这一法令能否被采用作为其加入新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条件。对于啤酒与民族认同的传奇结合是多么成功，这无疑是个评判标准。

至少对外国人来说，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争议于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时再次出现。当时，所谓“勃兰登堡啤酒之战”遍及全德，甚至在法庭上展开唇枪舌剑，这一事件持续了十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原民主德国酿制的一种被纯正法明令禁止的、含有糖分的黑啤。

正如彼得所描述的，数百年间各个区域的啤酒已然“定义”了德国的村镇、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他说：

> 德国有着地方酿造啤酒的悠久传统。在法兰克尼亚，你可以找到真正手工酿制的啤酒，都是一些很小的啤酒厂用特殊的大麦芽酿造而成的。在班贝格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烟啤（Rauchbier），口味与众不同，会让你联想到出自艾莱岛带有麦芽味的威士忌。奥古斯丁啤酒是慕尼黑最好的啤酒之一，由当年奥古斯丁教会的教士们酿制。

这种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那些大啤酒杯上。它们一个个都展示了不同城市或不同王爵贵族的盾徽。工匠大师们通常选用珍贵的材料做成这些酒杯，显然是为了体现各地市民的自豪感。但它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功能。过去常常通过举杯祝酒的方式来缔结法律契约、贸易协定以及效忠誓言，以此表达一种诚信的承诺。人们喝着葡萄酒，或者更多时候喝着啤酒，就像握手那样来达成交易。盛大的礼仪场合使用这样的啤酒杯，缔约各方轮流饮用，即是以一种公开的、礼仪性的举动来相互认可。而已知一些大啤酒杯的容量，有些达到数升。这样看起来，塔西陀对日耳曼人偏爱饮酒乃至通宵达旦的描述，并非夸张。

除啤酒以外，德国民族饮食的另一个显著代表就是香肠。像啤酒一样，香肠也“定义”了德国的城市与地区，各式香肠都有着自己的用材配料和特别的制作传统。比如在慕尼黑，当地的特色食品便是白香肠，而且非常适合搭配当地奥古斯丁修道院酿制的啤酒。口味清淡的白香肠，是用小牛肉与腌熏猪肉的肉馅制成。烹饪时水煮加热比油煎更为常见，最好配以椒盐卷饼。而真正的巴伐利亚人可不会等到午后才吃这样的美味。当然，这是因为白香肠是用未曾加热过的生肉馅做成的，如果不冷藏，很快就会腐坏，所以得立即吃掉。这些约定俗成的禁忌往往抵制一切工艺技术。而这个禁忌，尽管忽视了现代低温技术，但即便在今天，依然像苏格兰人坚持在粥中加盐一样受到推崇。白香肠必然是听不到教堂正午的钟声了。



维尔默斯多夫一家肉铺的展示，2006年

若有一份关于德国香肠的地图，那会是一幅复杂到无法捉摸的马赛克。除了法兰克福香肠这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种，单单巴伐利亚便可推出许多其他的明星香肠，如纽伦堡香肠和雷根斯堡香肠。若放眼更广阔的地域，还有法兰克尼亚的煎肠、萨克森的脑肠、不来梅的熏制谷粒香肠、波美拉尼亚的午茶香肠，等等。据称总共有一千二百多种香肠。在德国，啤酒与香肠体现了数世纪以来民族的、区域的、地方的历史，它们是地方多样性的鲜活体现，这些美食可与蓬勃发展的地域方言相媲美。它们在区域的与地方的记忆中占有特殊席位，而在民族精神中也是如此。食品专家哈拉尔德·绍尔对此解释道：

> 德国香肠是你餐盘上的历史。从传统上来说，制作香肠是件繁琐的手艺活，对于如何剁肉馅、如何配香料以便贮存等，你需要积累很多经验。因此，这曾是众多德意志自由城市的骄傲与荣耀。而今，许多香肠依旧承载着它们的大名。比如我们这儿有一种小个儿的香肠，只有手指那么大，被称作“纽伦堡香肠”。那其中就有桂皮和其他作料。过去纽伦堡与威尼斯接触频繁，因此可以很便利地得到产自东方的香料。正因为那些香料很昂贵，所以这些香肠就做得很小。如今，“纽伦堡香肠”这一品牌在全欧洲受到法律保护。

外国人或许对纽伦堡香肠不是很熟悉，但所有人都知道法兰克福香肠。这种最普通的淡而无味的香肠，通常夹在面包里食用，几乎在德国的每一个街角都能买到，在欧洲和美国同样如此。熏制剁碎的肉馅，差不多成了糊状，人们通常还会再抹上些芥末或番茄酱。

但普普通通的法兰克福香肠原本却不是这样的。它可有着高贵的皇室出身。几百年间，法兰克福大教堂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场所。作为众多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会宰杀一头公牛，并用最为精细且昂贵的猪肉馅制成的香肠把它填满。人们以这样一件巨大的奢侈品来纪念一个伟大的事件。这种香肠的制作尤其费工费时，但用于一个隆重的公共场合倒也值得。香肠和人一样，也会走下坡路。于是，法兰克福香肠便跌下了神坛。

据哈拉尔德·绍尔介绍，所有地域的特色香肠中最为诱人的一种，也产自法兰克福，是一种用纯牛肉制成的香肠。这是为什么呢？牛肉的质地极有韧性，剁起来不太容易，需要花费很多工时。19世纪末，法兰克福还是座集镇，那里聚集着或许是当时全德最大的犹太族群（详见第28章）。犹太人当然不能吃像法兰克福香肠那种猪肉馅的香肠，于是他们特殊处理，用纯牛肉制成香肠来吃，而这一做法也逐渐在全体居民中流行起来。犹太传承仍旧保留在德国人的日常饮食中，这是很少见的一例。

19世纪末，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食品生产加工已日趋机械化。作为传统家庭手工业的香肠制作，便成了那一工业浪潮的牺牲品。新机械的出现，意味着可以把肉绞成精细的肉馅，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这一工艺流程最终也使法兰克福香肠平民化）。于是，工业制香肠逐渐成为无产阶级贫民的主食，特别是在当时欧洲增长最快的城市——柏林。但柏林香肠里到底有些什么，实在难以确定。而据（虽然可能是托名于）俾斯麦的名言，市民们并不想知道香肠和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



制作血肠，画作《十二月》的局部细节，汉斯·维尔廷格[2]作于**1525年至1526年**



柏林咖喱香肠博物馆，2010年

五十年后，柏林香肠的低劣质量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所有博物馆都致力于搜集实物证据，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那些香肠几乎没有任何实体留存。不像啤酒那样有着丰富的遗存，比如大量玻璃杯及大啤酒杯等，那些香肠没有多少与之关联的餐具，所以博物馆难以讲述关于香肠的故事。然而，颇为令人惊喜的是，就在几年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发现我们已然有了一个新成员，即柏林的咖喱香肠博物馆。它就坐落在当年的查理岗哨[3]旁边。它的存在，讲述着以香肠为主题的大舞台上姗姗来迟的惊人成功。它并不是在为一座帝国自由城市的众多传统进行加冕，而是1945年后柏林粮食短缺带来的后果。仿照凯恩斯，你或许会戏言，咖喱香肠是“和平的美食后果”之一。而它一直与我们同在，是柏林那一段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哈尔拉德·绍尔说道：

> 是一位不知名的英国士兵促成了咖喱香肠的问世，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柏林的黑市上兜售咖喱粉。那时只有非常廉价的香肠，所以他们决定在香肠上撒些咖喱粉来装点一下。那是我们狂热地发掘外国美食的一段时光，所以能有些印度或是外国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而柏林这座从未出产过优质香肠的市镇也拥有了标志物——咖喱香肠。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许多德国人探访柏林，咖喱香肠便成了一种标志，象征着年轻而时髦的柏林生活方式。不过咖喱香肠成为德国饮食的民族性符号，却是一个美食悲剧。



希特勒于1935年11月8日在慕尼黑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发表演说



慕尼黑十月啤酒节

香肠的传统可以被轻易贬低或是商业化，而啤酒饮用即便不像塔西陀描述的那样，却得以在民众的公共生活中保有一席之地。19世纪时，巴伐利亚出现的另一传统也变得非常流行，那便是啤酒馆。它们犹如一座座专为饮用啤酒而建的巨大寺庙，到处铺饰着大理石与木镶板，像是

民族饮品的夸张庆典。当时慕尼黑最为著名，也是最大的啤酒馆，便是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4]。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党正在发展之中，那里成了他们中意的集会场所。1923年，他就是在那座啤酒馆发动了臭名昭著且以失败告终的反市政府政变。同样是在那儿，已掌权十年的希特勒为他的那些老战友发表了纪念演说。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早已被拆毁，但在啤酒馆发表演说的传统则延续下来。不过后来在啤酒帐篷里进行演讲更为普遍，而这也是德国政客们至今仍需掌握的一项技巧。对此，彼得说道：

> 这些地方都是政治集会的理想场所。如今，巴伐利亚那些最大型的政治演说都安排在圣灰星期三[5]，在宽敞的大啤酒帐篷里举行。你得贴近民众。你可以有点慷慨激昂，但也得逗笑听众，否则演讲不会成功。



慕尼黑身着传统服饰的啤酒饮用者

饮用啤酒现今在德国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了，但德国仍是全球第三大啤酒消费国，各种地方产啤酒依然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就像本土香肠那样。二者在1945年后都曾受形象问题困扰，因为它们曾过于密切地与德国民族主义形象关联在一起，而战后的一代想要将这种形象抛弃。但正如彼得观察到的，诸事正在发生变化。他说：

> 现在新的一代对冷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问题并不了解。对他们而言，尝试这些旧时的东西是很炫酷的。比如去重新发现德国泡菜可以成为一道美味，这在某种

> 程度上也是很前卫的。我想，十月节就是现代德国一个非常不错的符号。二十年前，这里没有谁会穿戴巴伐利亚的传统服饰。而今所有人都会这么着装，这看起来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极端爱国主义。十月节，以及众多的啤酒消费者，将标志性的传统与开放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是现代德国一个极佳的样板。它将各民族的人们聚合在一起的能量，比足球还要大。这并非民族主义，而是现今德国好客的一个标志。

对英国观察者而言，德国是个包含着惊人多样性的国家。众多地方特产——如不同的啤酒及各地独特的香肠——代表了数世纪的区域历史，所有这些都由更广泛的规范来管理，而那些规范始于五百年前。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就曾经抱怨过，治理一个光奶酪就有二百四十六种的国家何其困难。其实他应该感到庆幸，没尝试去治理一个拥有更多种类香肠的国家。然而，这些在德国如此常见的巨大差异，都包含于一个总的民族框架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美食与第五章介绍的那些钱币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体政治运作颇为相似。尽管存在大量的地方性差异，但它们将大部分德国及中欧整合在一起近千年之久。

[1]　此处“十月节”即德文“Oktoberfest”一词本义，而“啤酒节”只是汉语俗称。

[2]　汉斯·维尔廷格（1465或1470—1533），后哥特时代及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绘图员、画家、玻璃器具画家。

[3]　该岗哨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南段，是1961年柏林墙修筑之后最为有名的岗哨之一，1990年6月被拆除。如今则是一处著名的景点。

[4]　实际是座酒店，于1885年开张，可同时容纳1830人，魏玛共和国时期常有政治集会在此举行。

[5]　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

第三部分 延续的历史

在政治上，德国长久以来都是松散联盟与疆域变迁的典型。在近千年的岁月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将方言各异、法律有别、宗教多样的民族与邦国联合在一起。汉莎就曾是一个既灵活又极其成功的贸易联盟或自由贸易区。与二者相关的记忆依然鲜活。人们每每提及，仍将其视为今日欧洲的样板。德国历史上许多事件，诸如宗教改革、拿破仑入侵、1848年革命等，都留下了众多遗产，延续至今。



神圣罗马帝国诸皇帝加冕所用皇冠暨“查理大帝之冠”的复制品，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制于1914年

第11章 查理大帝之争

几个世纪以来，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宝库收藏了许多名贵珍品，其中最为宝贵的或许要属那顶帝国皇冠了。它被称作“查理大帝之冠”，千余年间一直用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象征意义。不过，那顶皇冠并非本章的主题。图中的皇冠是1914年的一件复制品，为正与哈布斯堡王朝分庭抗礼的霍亨索伦王室而制，现藏于亚琛市立博物馆。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德国游移不定的疆界及其众多持续变化的版图形态，这些疆域变迁和诸多内部分歧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这一部分主要关注如今将德国人融合在一起的那些记忆。虽然这些集体记忆与阐释存在分歧对立，但它们承载着共有的经历与相同的愿望。我挑选出来用于体现这个共有观念的东西，尽管不是件赝品，但也是件复制品，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品或许比原件更有说服力。更何况，即使是原件也不是你看上去的那样。

公元400年前后，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皇帝的权威不复存在。罗马军团从不列颠、日耳曼及法兰西的土地上撤离，西欧大部分地区有序的公民社会继而崩溃。四百年之后，约公元800年，一位名叫查理的人开始重建逝去的罗马帝国。他就是法兰克人的君主，曾是今法德两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他以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及拉温纳的帝国教堂为原型，在他位于科隆以西的亚琛的宫殿内附建了一座教堂。他将耶路撒冷的基督圣迹及古罗马的斑岩立柱运至那里，从而在基督教化的日耳曼土地上，重建了一个包容异教徒的罗马。这是个挪借不同历史来构建全新故事的精彩范例。



亚琛大教堂，图中央即查理大帝的八边形建筑造型



亚琛大教堂，查理大帝八边形建筑造型的内景

查理的教堂是座八边形、三层高、带穹顶的宏伟建筑，至今仍伫立在那里。数百年间，它曾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最高的建筑。它由那些托起高大圆拱的古罗马立柱支撑。对一个全新的神圣的罗马帝国而言，其都城的这座教堂显然是恰如其分的。它的肇建者查理，被德国人称

作“Karl der Große”，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其为“Charlemagne”[1]。

查理大帝自公元770年掌权至公元814年亡故，四十余年间他几乎从未停止过战斗。这位法兰克人的君主（必定说某种日耳曼方言）所征服的疆域，西抵比利牛斯山脉，东至易北河及多瑙河，此外还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帝国皇帝。那一短暂瞬间看起来就像西罗马帝国已然复生，重归和平与繁荣的希望也随之而来。

但这一希望却于公元843年破灭。那一年，查理大帝三个暴躁的孙子继承了帝国。他们各自为王，将帝国一分为三。冲突随之而来，查理帝国疆域（与今天的法德两国大体相当）西部与东部的统治者为霸权展开了长期角逐，他们对介于二者间的中部地带争夺得尤为激烈。

日耳曼人与法兰西人各自主张查理大帝的政治遗产，即控制西欧的权力，二者间为此展开的斗争持续了上千年。而亚琛大教堂便是其间一个有着伟大象征意义的战利品。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安葬于此。在公元936年至1531年近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十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在这座建筑里接受加冕[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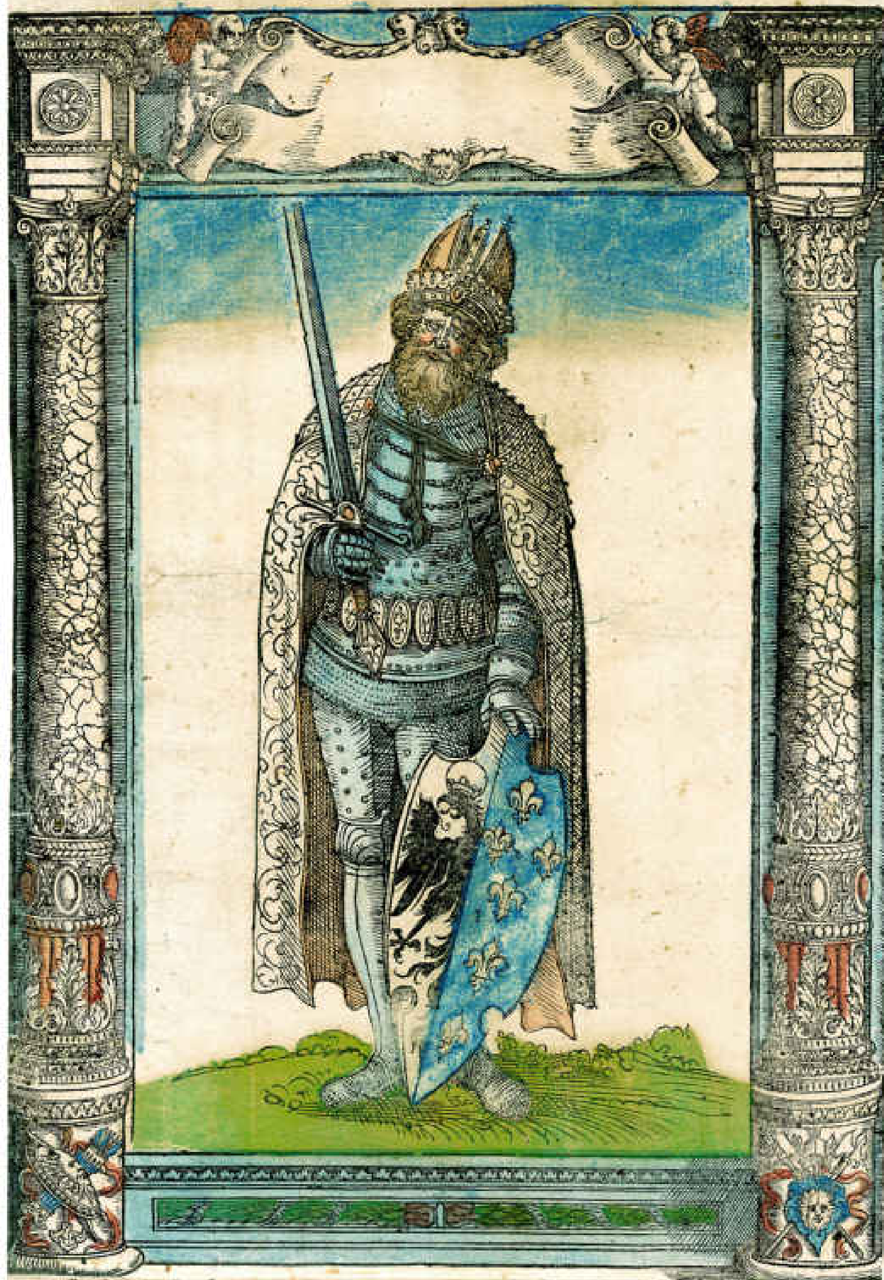


骑于马上的查理大帝，梅斯大教堂内一尊9世纪的小型塑像

我们于此关注的帝国皇帝是奥托一世。他先是在亚琛登基成为罗马人的君主，继而于962年，像查理大帝那样，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现存于维也纳的皇冠，或许就是奥托首次于962年加冕典礼上所戴的那一顶。尽管它出现得更晚，而且显然不是查理大帝的那一顶，但奥托自己却将其视作查理大帝之冠。这是一件集黄金、宝石、珐琅及珍珠于一身的非凡杰作，数世纪间被不断美化装饰，后来还添上了拱梁与十字架。这顶皇冠一直用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

礼，直至1806年帝国终结。

你可能想象它是一个环形的皇冠，但并非如此。它是由八块单件饰板拼接而成的八边形，其中四块嵌以珠宝，四块镶以珐琅；聚在一起的珠光宝气寓意着君权神授。其中四块珐琅饰板代表着四位君王，即《圣经·旧约》中预言了救世主的所罗门、大卫与希西家，三者均手捧得自加冕仪式的载有箴言的长卷；第四位即置身于两位炽天使中间而安坐于宝座上的耶稣。左右两块饰板各嵌有一组彩色宝石，诸如紫水晶与孔雀石、红宝石与石英、水晶与珍珠等。两块最高的饰板则各嵌十二枚大宝石，背面那一块上的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正面那一块上的则象征着十二使徒。正面饰板上立有一个镶有宝石的十字架，背面雕刻着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



查理大帝，选自《日耳曼人的十二位祖先和早期君主》，15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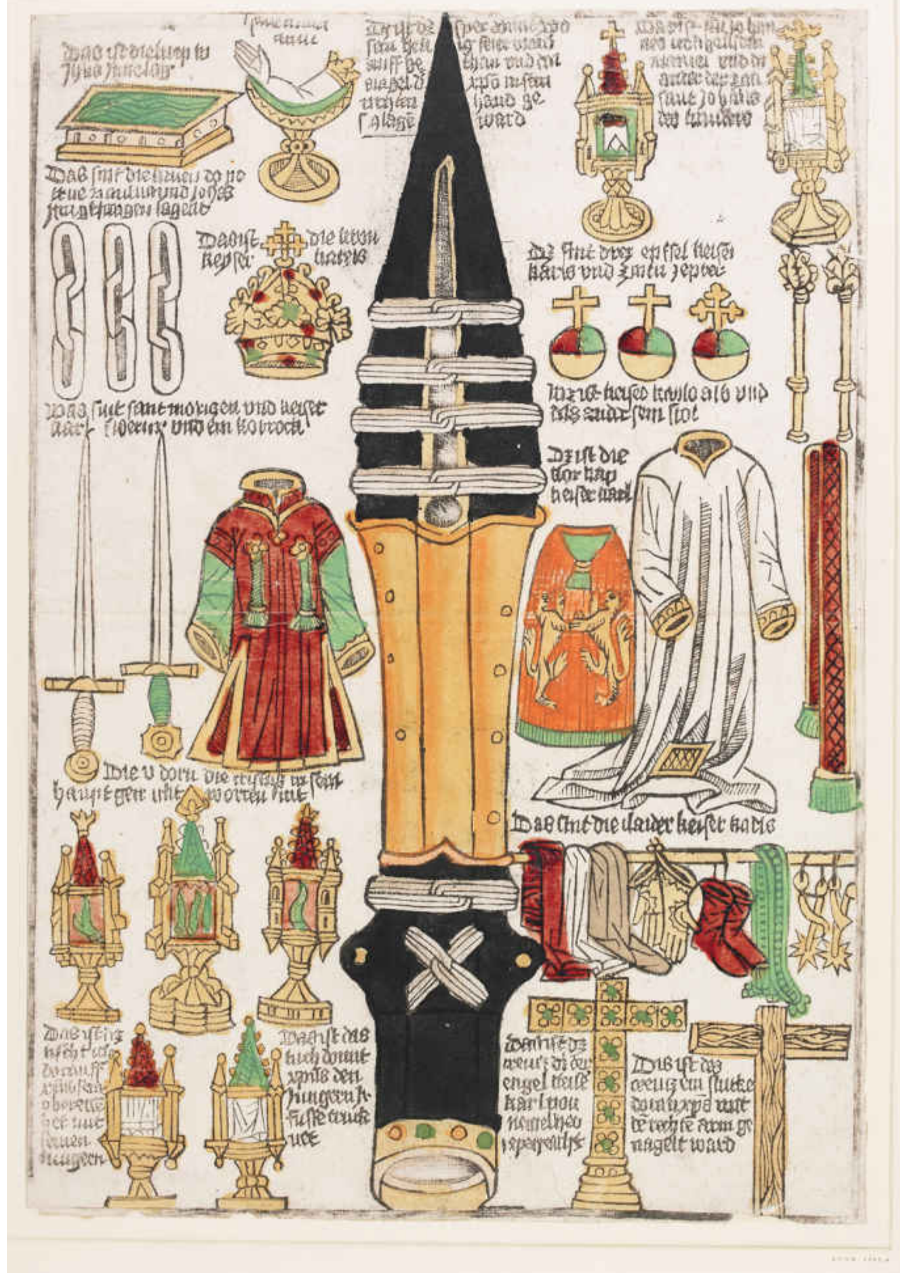
整个皇冠看上去神秘而耀眼，令人眼花缭乱。它将载于《圣经》之王权所代表的精神权威同中世纪早期纯粹的权力与财富融为一体。但不仅如此，这并非只是一顶皇冠。它是查理大帝于亚琛所建教堂的回响，也是对君士坦丁堡及拉温纳宏伟壮丽之帝国教堂的一份回忆。数世纪间，皇冠的足迹遍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但无论在哪儿，它总承载着那座亚琛教堂的共鸣，特别是被尊为帝国缔造者查理大帝的政治与精神权威。查理本人从未戴过这顶皇冠，但拥有这顶皇冠就意味着继承了他的遗产。

日耳曼文化史学者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对此解释道：

> 就德意志帝国而言，查理大帝及其宫殿所在的亚琛，曾被视作帝国自身及其对欧洲控制权的起源，或者说至少是对中欧的控制权。当然，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法兰西王国的开国元勋是“Charlemagne”，而非“Charles the Great”。这一冲突贯穿整个中世纪。18世纪时，伏尔泰就声称查理大帝是一位法兰西统治者。与之相反，19世纪的德国则将查理大帝视作一位伟大的日耳曼人。这一敌对局面一直持续到皇冠复制品的出现，也是其之所以会被复制的原因。查理大帝到底代表着什么？他究竟是德意志帝国还是法兰西王国的缔造者？

为支持各自的主张，从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法德两个君主政体都罔顾历史的真实性，将查理大帝的“遗物”用于各自的加冕仪式。法国人声称自己使用的是查理大帝之剑，而德国人则是用“查理大帝之冠”。

可是当皇帝的政权与军权衰落时，皇冠又意味着什么？对欧洲整体而言，皇冠曾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皇帝的宝座并非世袭，而是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任的。自查理大帝及奥托由罗马教皇亲自加冕以来，皇帝在基督教所有统治者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得以确立。在德意志范围内，皇冠曾代表着帝国那些彼此间差异显著的领土，也象征着德意志大地上共同的使命。特别是在增添了拱梁与十字架后，它简直成了一个首要的象征符号。它以平静、古老而又含混的口吻述说着一份共同的传承。



神圣罗马帝国的遗存、宗教礼仪服饰及徽章，纽伦堡，**1470**年至**1480**年

数世纪间，帝国皇帝选自不同的家族，皇冠也随之游走于德意志不同城市间。公元1500年前后，哈布斯堡王朝巩固了其对帝国的掌控。于是，皇冠终于得以安顿在纽伦堡。这使得那座富足而有实力的自由城市，有了非比寻常的帝国意义，也使其成为德意志和谐与统一的梦想世界的中心。这座城市所产生的共鸣令瓦格纳沉浸其间，后来也被希特勒

充分利用。随着时间推移，帝国的王爵贵族们在普鲁士、大不列颠以及波兰获得了他们各自的王冠。但那些仅是各王国的王冠。史上只有一个帝国，因而这顶皇冠仍是至高无上的。



贝特朗·安德里厄[3]制于**1806**年的币章，正面所示头像为拿破仑与查理大帝，背面分别是被二者击败的对手，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萨克森的维杜金德[4]

然而，随着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一切都变了。法军如今并不像路易十四惯常的那样只进攻莱茵兰，而是侵入意大利占领了罗马。1804年，拿破仑仿照查理大帝，在教皇的见证下，于巴黎圣母大教堂中自行加冕为“法国人的皇帝”。教皇为此被专门护送至巴黎。千余年间，西欧首次同时存在两位皇帝。那个举行加冕仪式的场所清晰无疑地展示了拿破仑的诸多意图。大教堂出入口处，专为这一场合立起一尊查理大帝的雕像。加冕典礼上，拿破仑配着“查理大帝之剑”。而“真正”的查理大帝之冠当然是在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室竭尽全力避免皇冠落于拿破仑之手，将皇冠从纽伦堡移至维也纳乃至更远的地方），因此拿破仑直接下令制作了一顶式样完全不同的查理大帝之冠。这顶皇冠制作于1804年，现今仍藏于卢浮宫。令人吃惊的是，它被标示为“La couronne dite de Charlemagne”，意即“据称是查理大帝的皇冠”。这是对纽伦堡那顶中世纪皇冠的神秘力量所给予的最大的敬意。或者如罗伯特·埃文斯所解释的，也是法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所发起的最明确的挑战。他说：

> 拿破仑击垮了神圣罗马帝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他自立为法国人的皇帝时，便显然是在宣告与神圣罗马帝国势不两立。奥地利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朗茨二世，但他却自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他明白，他必须以此获得回旋的余地。
>
> 1805年12月，法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获胜，很显然，此时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几乎任由拿破仑处置。当

然，他在德意志诸邦的王爵贵族中还有许多盟友，这促使他创立了一个莱茵联盟。此事件立即触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1806年夏，弗朗茨发布公告，将他的臣属们从对其效忠的联盟中解脱出来。弗朗茨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能预见到，接下来拿破仑要么以某种方式篡夺帝国，要么会另建一个包括他那些德意志臣属在内的帝国。而无论哪种情况，想要维持神圣罗马帝国都是不可能的了。



拿破仑版的查理大帝之冠，**1804**年



《拿破仑一世自行加冕图》，雅克-路易·大卫[5]作于**1805**年至**1807**年前后

若说皇冠曾是冲突的焦点，那么为争夺查理大帝遗产而展开的较量，则清晰地显示在亚琛教堂的那些石块上。1794年，入侵的法国革命军从这座建筑上卸下了古罗马的斑岩立柱，并将其运回巴黎。后来，仅有一些立柱被归还（其余大多数现今仍在卢浮宫）。因此，那些起初由查理大帝自己从罗马运回并一直置于亚琛的立柱，而今伫立在一堆19世纪的复制品中间。然而，被带去法兰西的并不只有那些立柱。1801年，依照《吕内维尔和约》，法国控制了整个亚琛地区，而后将其吞并。而今一个法国的城市，在拿破仑对查理大帝帝国衣钵的设想中扮演起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角色。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普英联军击败。此后，亚琛未能恢复其先前作为神圣罗马帝国自由城市的地位，因为那一帝国已不复存在。于是，它转而成为普鲁士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亚琛的帝国教堂，长久以来受哈布斯堡王朝掌控，后来又被拿破仑垂涎，而

今终落入霍亨索伦王室之手。查理大帝眼下则再次成为“Karl der Große”，一个日耳曼人，或许可戏谑地说是位普鲁士人。



彩色玻璃窗，展示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身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服饰，**1888**年



巴黎塞纳河西堤岛上的查理大帝巨型铜像，由查理·罗歇与路易·罗歇兄弟作于**1877**年

随着19世纪的历史发展，哈布斯堡贵族们——如今的奥地利皇帝，逐渐退守至其王朝领土的南部与东部。但普鲁士的力量正日益显现，因而德意志帝国的理念至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之后得以复活。法国人的皇

帝拿破仑三世被废黜，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你或许会以为，对查理大帝遗产的争夺终于尘埃落定。柏林与维也纳之间仍有各种激烈对抗，但大体上说，这已无疑成为一种德意志内部的争论（详见第21章）。然而，传奇拥有强大的力量。关乎欧洲霸权的这一传奇，对于法兰西而言实在强大到难以放弃。1882年，由查理·罗歇与路易·罗歇兄弟制作完成的一尊查理大帝及其侍从的铜制塑像，被立于西堤岛巴黎圣母大教堂的院门处。不远处就是当年为拿破仑一世加冕典礼而立的那尊查理大帝塑像。反教权、反帝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然驱逐流放了于1870年被击败的拿破仑三世，却希望那位来自亚琛的古代帝王能立于国都心脏地带的国家教堂之前。这位帝王面向德国，神态挑衅。而今游客可以看到，这一铜制塑像上的查理大帝，即便正骑于马背奔赴战场，仍戴着本章中间介绍的那一八边形皇冠。

2013年，大英博物馆曾试图从维也纳的皇家宝库中借出奥托的加冕皇冠。毕竟，它象征着查理大帝的权威。对方礼貌地拒绝了我们，并告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将不再挪动位置。但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与一群崇高的人士打交道。一个世纪以前，德皇威廉二世就曾提出同样的要求，想在亚琛举行一个关于帝国皇帝加冕典礼的展览。虽然那时柏林与维也纳之间有着紧密的军事与政治同盟关系，但威廉二世同样被拒绝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哈布斯堡王朝的诸位皇帝，显然不愿也不能分享帝国首位皇帝的精神与政治光环。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继续讲述着这段故事：

> 亚琛的那件帝国皇冠复制品，封存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即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为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而展开的那一段斗争史。德皇威廉二世曾试图借用那顶帝国皇冠，不过皇冠不能离开它的保存地维也纳被送去普鲁士，所以威廉所用的就是件复制品。这样一来，他有了件复制品，来宣扬霍亨索伦王室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整个传统真正的继承者。

那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复制品现藏于亚琛，其制作极为精良，每一细节都准确无误。由此可见，威廉二世对他筹划的帝国加冕典礼主题展览是非常重视的。展览项目却因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至战争结束时，哈布斯堡家族及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都已不复存在。所幸皇冠得以留存，但它所蕴含的故事却仍未终结。对此，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说：

> 奥地利曾声明，哈布斯堡王室自身便是帝国主权的体现。这件复制品就是用来向这一声明表达抗议的。
>
> 它当然始于奥托一世。正如大多数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位君主不仅开创了德意志帝国，还开创了一段皇冠重归查理大帝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查理大帝成了一个有

争议的对象：他到底是法国的，还是德国的？

不过，那些都已归于历史，而今查理大帝象征着法德两国的友谊。这也是为什么仅授予真正的欧洲人的亚琛奖[6]（查理奖），如今在德国公众对查理大帝的记忆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查理大帝——如果他在德意志意识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话——是个伟大的德国人。这一形象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推动了德国的利益，而是因为有所超越，将德国利益推向一个更高的、代表欧洲的水平。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今天将查理大帝置于一个特殊位置，我会将他置于1962年的兰斯主教教堂。正是在那里，阿登纳与夏尔·戴高乐一同庆祝法德两国全新的兄弟关系。那是一个查理大帝绝对在场的时刻。他以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欧洲方式，给予两位政治家正当性。



戴高乐与阿登纳正离开兰斯主教教堂，**1962**年

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时，所戴的很可能就是原来那顶“查理大

帝之冠”。整整一千年之后，阿登纳与戴高乐为了那个郑重的和解而会面。由查理大帝的皇冠而引发的诸多冲突，以及为他的遗产而进行的斗争始于亚琛，并已正式归于历史。德法两国之间全新的长期伙伴关系成为欧洲持久秩序的关键所在。

这段故事的最后，或说临近最后，还有一个别扭的转折。法德两国至今回顾起1962年的“欢乐终曲”都会感到温暖。但在终曲的二十年之前，发生过一段极不愉快的序曲。当然，可以理解，这段往事后来从两国共同的记忆里消失了。正如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一样，阿道夫·希特勒也曾对查理大帝的遗产颇感兴趣。他将帝国皇冠从维也纳取回并送还至纽伦堡，那里曾是拿破仑入侵以前皇冠长期存放的地方。现今，那里成了第三帝国大规模庆贺集会的场所。第三帝国可说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三版复现。



纪念查理帝国分裂一千一百周年的塞夫尔瓷盘，**1943**年制

20世纪40年代初，希特勒正尝试赢得法国右翼派别对俄国战事的支持，或者用他的话说，那是一次为反击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而捍卫欧洲价值观的十字军东征。彼时他将德法两国都推崇的查理大帝视作欧洲文明的缔造者。这里有一件1943年制于塞夫尔[7]的瓷盘，上面的小型塑像展示了骑在马上的查理大帝。盘底的拉丁铭文写道：

> 查理大帝的帝国，因其子孙分裂于843年；而今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所有欧洲人民共同捍卫之，时年1943年。

希特勒也确实找到了一些法国志愿者，他们在东方战线与德国一起战斗，被称作“查理大帝师”[8]。



《福音四使》中的路加，里门施奈德作于**1490**年至**1492**年

[1] 此处“Karl der Große”和“Charlemagne”均为“查理大帝”之意。下同。

[2] 在此并非直接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比如下文中的奥托一世，便是先在亚琛登基成为意大利国王，而后在罗马加冕成为帝国皇帝。不过，当时国号中尚无“神圣”之称。

[3] 贝特朗·安德里厄（1761—1822），法国币章雕刻师。在法国，他被视作路易十四时代后日益衰落之艺术的复兴者。

[4] 维杜金德，萨克森部族首领，出自威斯特法伦的一个世家，于公元777年至785年率军与查理大帝对抗。

[5]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对新古典主义风格颇具影响，被认为是那一时代的杰出画家。

[6] 该奖于1950年设立，是一年一度的荣誉奖项，旨在表彰为欧洲做出贡献并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人士，自1988年正式定名为“亚琛国际查理奖”。

[7] 巴黎市中心西南约10公里的一处小镇，以瓷器生产闻名。

[8] 该师属武装党卫军建制，于1944年投入战场，直至1945年5月2日德国投降方才终止战斗。

第12章 雕塑精神

伏尔泰曾于1756年发表过一段著名的嘲讽，嘲笑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这句戏言很有名，伏尔泰精于此道，但它却非实情。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在其存世千年的各个时期，显然是三者兼备的。通俗地说，神圣罗马帝国是名副其实的：它希望成为诸位罗马皇帝和历任教皇的传承者，而它以令人惊讶的程度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帝国币制（第5章）以及查理大帝的创基立业及政治遗产（第11章），我们已对这个帝国有所了解。在本章中，我想来关注它神圣性的一个特别方面。

从一开始，帝国虽是以莱茵兰为中心，但其军事野心和掌控广袤领地的梦想，却恰如古罗马帝国。查理大帝曾有选择性地将帝国时期的罗马遗存运至亚琛教堂。他确信，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和他的继任者都将成为帝国全域的最高统治者。这样一来，“Kaiser”将成为“Caesar”[1]，连带着许多相同的特征与权力。但帝国从一开始就是神圣的。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前往罗马，被教皇加冕为皇帝。在这个新的帝国中，世俗与宗教的权威是不可分的，教会里的上层神职人员也是帝国的王爵贵族。在七位有资格推选皇帝的选侯（全都是一方权贵）中，就有三位是大主教，他们分别来自美因茨、特里尔及科隆。

在涉及神圣罗马帝国的众多惊人事件中有这样一件：在宗教改革中，罗马天主教古老而又典型的政治结构适应得如此成功，以致它在任何意义上能包容新教信仰及天主教信仰，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保持二者对信仰的忠诚与热爱。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但也是一个付出巨大代价的适应过程。本章讨论1520年前后的痛苦转型。这次转变永久地割裂了教会与德意志帝国，同时也影响了欧洲最有分量也最为活跃的雕刻家之一——缇尔曼·里门施奈德的事业与人生。

里门施奈德在德国以外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但就其探究精神世界的热情态度与精巧水准而言，我相信可与多那太罗[2]相比。他偏爱使用德国传统的椴木做材料，其细致的纹理使他能实现同一材质惊人的多样表现。比如现藏于柏林博德博物馆的福音四使，是一件巨大的祭坛群雕的一部分。它完成于1492年，是为了坐落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明勒施塔特的圣马利亚教堂而作。这件高大且造型众多的群雕，是献给抹大拉的圣马利亚的。雕塑连同那些向天堂飞升（且非常贴近屋顶）的造像，占据了教堂东侧区域。福音四使的坐像，每尊约有两英尺半高，处于整座群雕的底层，下面便是祭台。



配以现代复制品的明勒施塔特教堂祭台，里门施奈德的《福音四使》便是为此教堂所作

神职人员举行弥撒，即在天主教神学中展现基督其人时，便会与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面对面。在他们的见证下，神职人员将大声诵读四使传录的福音。信众会跪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塑造这些雕像是为了使信众可以时常近距离观看，并让他们感到与造像人物同在。而每次弥撒被宣讲或是被传达时，这些雕像也参与对话之中。在这座飞升式样的祭台群雕中，里门施奈德提供了一个神圣的框架，使得凡间的角色可以上演他们永恒的精神盛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立在那儿或许是作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架构的一种象征。群雕本身就是个神圣的框架，加之

基督对苦难救赎与生命的指引，在此框架内，皇帝、王爵贵族、商人等众多转瞬即逝的角色，轮番登场演绎着他们神授的角色。

圣路加安坐于一张矮凳上，头侧向一边做深思状。他的右手放在《福音书》上，左手则轻抚着他那头忠诚的牛，而牛就在脚边静静地跪卧着。这尊塑像由一截椴木树干雕刻而成，体现了里门施奈德在技巧与用材方面的娴熟技艺。路加的手、书和衣衫，以及牛颈处层叠的垂肉，在纹理、质感、分量上都明显各不相同。



里门施奈德的《福音四使》，自左至右分别为马太、马可、路加与约翰，**1490**年至**1492**年

但表象之外，这些雕刻还有更多的内涵。那些褶皱暗示着，路加休息放松时并不平静。他肩头拢在一起的衣衫略显沉重，与锯齿状的褶袖一并显示出一种不安的负担。他从所坐之处望向祭台，祭台上，基督的献祭将会在弥撒中被象征性地再次展现。《路加福音》独自讲述着基督诞生的故事，而路加每天在这儿注视着他的死亡。他的脸庞呈现出冥想时忧郁的表情，但那头牛，就像一只殷勤的狗关心着主人一样，满怀期待和宽慰地转向他。这位圣徒真是太像我们了。

柏林博德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者朱利安·沙皮伊，是一位研究里门施奈德的著名学者。他说：

> 这便是他的天才之处，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你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完全忘了其实正看着一块木头。别忘了这些作品的制作年代，即1490年至1492年，那时德国大多数的雕塑是上色、镀金或彩绘的。作为一位雕刻家，你如果知道作品之后会被上色，那你可以依靠绘匠在脸颊上添些腮红，或是眼部着些红色，使得造型看起来像是哭过一样。相反，如果你得制作一件不上色的雕塑，那么作品的表情就完全依赖于你雕琢的能力了。里门施奈德的技艺是卓然不凡的。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绝对无人可及。
>
> 这截非常轻的椴木被覆上了一层蜜色釉光，你可以看到，双眼仅是点了一些颜色，嘴唇稍微偏红。仅此而已。其他所有的艺术表现，都是通过对椴木的雕刻来完

> 成的。如果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几乎处处都有刻痕。比如说，那些较大的平面褶皱有不同的凿痕。相比之下，头发的纹理则被钻出不同的方向，使一缕缕头发凸显出来。精深的雕刻创造了丰富的明暗对比。里门施奈德是一位擅长将光线作为一种创造元素加以运用的巨匠。你想象一下，在放置这些作品的教堂里，光线条件早晚变换，而且还与季节和天气有关，还经常有烛光，这样，雕像的表情会持续变化。
>
> 在我看来，圣路加造型的内省及冥想特质是非常突出的。内涵和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把已经完成的《福音书》放在膝盖上，而不是直接拿着它。褶皱的外衫将他的手和书隔开，这是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旧俗，以此表明你不可触碰那件圣物。脸上的忧郁表情、造型的姿态、褶皱还有手势，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表明他对他所完成的那部著作的内容是心存敬畏的。

虽然里门施奈德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家，但我们对他早期的生活却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确切出生日期都不清楚。与古腾堡一样，他周游于当时德意志南部众多大城市之间，其职业生涯也深受中世纪末期宗教经济的影响。他应该是在乌尔姆和斯特拉斯堡学会了手艺，而后来到维尔茨堡。那里是一位富有且具权势的采邑主教的治署所在。1483年，二十岁出头的他在那里定居下来。两年后，他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他后来还有过三次婚姻），也成了一位技艺娴熟的工匠。他大多数工作都是为了教会，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作坊，还培训来自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学徒。虽然像他那样雕塑，既费功夫又费时，但他的作坊很大，产量很多。教堂祭台群雕和其他宗教题材的雕塑，加上墓碑与塑像，共计约有一百五十件。其中很多现已散失，但至少还有十二件教堂祭台群雕得以留存在维尔茨堡地区，而许多作品则是来自更远的地方。至1492年，里门施奈德完成了福音四使。那时他在这一行业内已经出类拔萃，有了四十多位学徒，业务足够大，成了一位拥有葡萄庄园的富有地主。他也因此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一座重要的采邑治署所在城市的杰出市民。他是一位彻底融入了自己所处城市和世界的生活的艺术家，无论是宗教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



疑为缇尔曼·里门施奈德自塑像，出自克雷格林根教堂祭台群雕，**1505年至1510年**

里门施奈德的职业生涯蓬勃发展的时期，正是宗教与政治不稳定性日趋显著的一段岁月。后来导致宗教改革的那些观念，正在整个德意志不断集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并不了解，里门施奈德在宗教上同情哪一方，但朱利安·波皮伊认为，福音四使揭示了这位雕刻家本人正与这些新兴的、令人不安的观念进行着较量。他说：

> 照我看来，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上帝与人之间不再存在那些中间环节，你可以直接向上帝祈祷。每次举行弥撒——当然弥撒天天都有——就以这些雕像为背景来进行圣餐仪式。圣餐是上帝创造肉体的象征，是上帝创造人的象征。福音四使则说明上帝创造了语言文

> 字。里门施奈德把这些造像作为圣餐仪式的背景，由此便将上帝的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了一起。而这就是为何——如果你看着路加的脸——我不想说他是深感不安的，但很明显，他对书中的内容不会无动于衷。他无比悲伤地抚摸着牛的后颈。牛竖着耳朵，就好像在说，一切终归会好起来的。你会有种感觉，这是个快要崩溃的人，而这种极其个性化的形象，正是这些木雕作品如此引人注目又感人至深的原因。我们既能将其看作木雕作品，同时也可将其视为人类本身。
>
> 里门施奈德从不夸张。他的艺术毫不喧闹，总是以令人信服而又平静柔和的方式清晰地述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渴求；我们明白是什么使我们具有人性，又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更好。他的天才就在于使上帝在个人层面上是可亲近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愿意说他是一位宗教改革艺术家，也未尝不可，尽管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天主教会效力。

路加独自沉思着基督生与死的重要意义，其雕像的内在表现当然与公元1500年前后有关德意志精神的强烈思潮是一致的。这种个人的虔诚，则成为宗教改革后新教神学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当这件祭台群雕完工时，教会与帝国的架构是牢固的。不过，教会的一些行为，特别是与金钱的关系，正饱受攻击。皇帝统领着其下数以百计不同领地的统治者，其中一些是拥有王爵、公爵或伯爵头衔的贵族，但还有许多则是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各地的教堂都会为精神信仰提供一个框架，但除此以外，在许多地方，它也行使着政治权利。那些采邑主教实际上几乎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比如里门施奈德的保护者、资助人及领主——维尔茨堡主教。他们的世俗地位触犯了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而那些新教教徒开始相信，教会传教的中心使命，已被世俗的权力破坏腐蚀。于是，帝国一些世俗的公爵及王室贵族，出于道义及自身利益的综合考虑，便很自然地赞同并支持新教的主张。这一幕终为政治混乱埋下伏笔，而里门施奈德身处混乱的中心。对此，历史学者乔基姆·韦勒解释道：

> 像缇尔曼·里门施奈德这样的艺术家们，作为维尔茨堡的市民及市政议员，将会经历宗教改革以及数年极不稳定的时期。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及1519年之后的查理五世，都热衷于维护天主教。而一些王爵贵族及城市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期望。许多统治者愿意推动教会改革，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维持他们自己领地内的秩序。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宗教改革带来的那些问题，经由大规模起义凸显出来，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威胁到当时德国许多地方的政治平衡。

神圣罗马帝国经由罗马天主教信仰概念化地整合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即无论权力的日常现状如何，那些政治职能总是在一个神学框架内被制定并颁布出来。因此，当对基督的信仰随宗教改革出现一个全新而不同的理解时，帝国的整个理念受到怀疑。这确实是当时维尔茨堡的情况。16世纪20年代，缇尔曼·里门施奈德是市政议会的领导成员。而那位主教则是帝国基督教会中最为富有且最具权威的采邑主教之一，他与当地民众间的摩擦不断，是个不安分的角色。

1525年，欧洲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以前规模最大且波及最广的起义——德国农民战争。某种程度上，是那些王爵贵族及采邑主教过度征税激起了民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怨愤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是许多新教牧师站在了农民一边。对许多人来说，这成为一种对政治与经济压迫的反抗。当时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激进的平均主义，它威胁到各地的等级制度。统治阶层对这一反抗的极端镇压，与起义本身一样血腥。这次农民战争混杂了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与野蛮的行径，在德国右派与左派的记忆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也是年轻的凯绥·珂勒惠支（详见第22章）的主要关注点。公元1525年，是维尔茨堡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

这一年，遍及德意志的大规模起义爆发，倒霉的缇尔曼·里门施奈德此时是维尔茨堡市政议会的成员之一。他不得不和市政议会一起做出决定，是站在主教的势力一边，还是支持更为庞大的农民军队。最终，大教堂里所有教士和主教都撤往山上的一处城堡，议会（他们或许别无选择）则为反叛的农民军打开了城门。之后，起义一被镇压，主教又胜利地回到城市。于是，这位精神世界的贵族开始重新主张他的世俗权威。这时候里门施奈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笼罩在一片猜测的迷雾中。朱利安·沙皮伊认为，许多记述仅是一厢情愿的神话。他说：

> 这是一个仅存少数事实而夹杂许多浪漫故事的话题。我们知道，里门施奈德曾两度担任维尔茨堡的市长。他还担任了好几年的市政议会议员。议会受维尔茨堡采邑主教威权的打压，因此在起义中转而支持农民。这在当时也有一些实际的原因。维尔茨堡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它有一位采邑主教。它或许很想拥有帝国自由城市那种更自治的地位，就像纽伦堡或科隆那样。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议会的动机是否就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
> 众所周知，起义失败之后里门施奈德遭到逮捕。我们没有现存的来自他本人的陈述，来告诉我们他的观点。如果根据我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可能他确实明确支持了农民运动。不过，对此我们无法证明。传说他受到拷问，双手受伤，此后再也没有雕刻过任何东西。我们确知的是，在1525年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他还从事过一些修复工作，只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了。对他双手受伤一事，我们并不了解。

不管怎样，人们总期待，如果可以的话，一位享有盛名的大师能一直创作直至晚年。不过，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如果要持续接受创作委托，有一些行为准则是必须要遵守的，发表过多批判性的言论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毕竟连二百年后伟大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都在给他那些资助人的书信中，署名为“您最谦卑与顺从的仆人”。而在农民起义被采邑主教镇压之后，无论里门施奈德作为一位大师的能力如何，他显然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于那些潜在的资助者来说，他已成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他们可不想掺和到与采邑主教相关的麻烦中去。



士瓦本联盟的军队前来镇压维尔茨堡的农民，**1525**年

农民战争最终以血腥收场。路德，就是将福音译成民众的语言并声称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那个人，如今被民众愤而疾呼的那种平等吓坏了。他呼吁那些王爵贵族去无情地镇压造反行动。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无论里门施奈德卷入农民战争的真相如何，这场战争终结了他雕刻家的职业生涯。德意志艺术，乃至整个世界的艺术，都因此少了些精彩。但对他现存作品的影响，至少在最初并没有那么悲观。在法兰西、英格兰及苏格兰，宗教改革曾对宗教艺术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绘画、玻璃制品和雕塑遭到损毁和焚烧，修道院成了一片片废墟。但在德意志情况却不同。对艺术在宗教仪式中的作用，路德秉持积极的态度。神圣

罗马帝国权力下放的架构，连同拼合在一起的那些密切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邦国，意味着崇尚除旧布新的观念从未被广泛接受。有鉴于此，里门施奈德所创作的许多教堂祭台群雕与塑像，若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或许已遭毁坏，但在罗马帝国却得以幸存。

正如历史学者乔基姆·韦勒所指出的，帝国中央权力的虚弱，意味着在德意志，不像欧洲其他地方，比起意识形态的冷酷无情，终是妥协让步赢得了胜利。他说：

> 1526年便已达成共识，每一位统治者应照各自的意愿掌控自己的事务及自己的领地，直到主教议会[3]对所有事务做出决定的时候。这是一套相当含糊的准则。当然，主教议会最终也不曾决定所有事务，而这也导致了一个接一个的妥协。16世纪40年代，查理五世试图强制推行他的威权及他所偏好的天主教，但遭到王爵贵族的抵制，以失败告终。随着这最后一次尝试而来的，是1555年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奥格斯堡和约》。这便是承认了基督信仰的两种教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路德宗，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具有同等的正当性。但局面转而更为复杂，直至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方才告终，该和约进一步承认卡尔文教派为第三种被允许的教义。这份协议不仅承认了王爵贵族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认可了三种教义的背景下个体对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权。

历经激烈的冲突，农民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使一个能正式包容宗教差异的政体得以建立。这被一些历史学者视作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大成就。就宗教宽容而言，不列颠和法兰西都无法与之相比。

在宗教改革及农民战争中，里门施奈德（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他的大多数作品同样（以某种方式）得以留存，只是后来受到另一种不同势力的伤害，那就是审美偏好。明勒施塔特的教堂祭台群雕连同福音四使，在宗教改革中未受到损坏，但它精美的清漆被认为过于暗淡，另一位艺术家受委托为那些雕像上色。于是整件作品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原有风貌。巨大的群雕经拆解后被置于仓库之中。在混乱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它的各个组件被一一拆解，分别出售。但其主体被保留了下来，那些分离的部件如今收藏在不同的博物馆中。福音四使上面的颜色后来被小心翼翼地去除，它们现在被安放在柏林。

20世纪时，作为一位艺术家，里门施奈德的声誉稳步上升。藏有其雕塑的各座教堂成了游览胜景。各个博物馆也在特别的展览中重点展示他的作品。他被视为伟大的雕刻家，在德国独有的椴木材质上进行创作，却述说着整个欧洲大陆的丰富情感。最终，他在欧洲艺术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作为一个凡人，他的声誉自1945年以来却有着惊人的变化轨迹。在德意志民族记忆的构建中，缇尔曼·里门施奈德扮演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角色。



《东方三智者来朝》，里门施奈德作于**1505**年至**1510**年

1945年5月战事结束，德国人正疑虑，在一个被他们破坏得满目疮痍的欧洲，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此时，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20世纪德国伟人之一、早已逃离希特勒帝国的作家托马斯·曼站在国会图书馆内，向美国东道主发表“德国与德国人”的演说（详见第6章）。他提出，在“坏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之后，是时候来认定“好德国人”了，也就是“另一些德国人”。曼先生坦承路德虽有缺陷却不失伟大，特别对他在农民起义的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深感遗憾，之后他继续说道：

> 那时在德国生活着一个人，我对他抱有特殊的同情，他便是缇尔曼·里门施奈德。他是一位宗教艺术大师，一位雕刻家及木刻艺人。他因忠实且富于表现力的杰出作品而声名远扬，而他的作品装点着遍及全德的礼拜场所。他从未想要插手政治和世界事务。那些与他的谦逊本性以及他对自由和平的事业的热爱相去甚远。但他为贫民与受压迫者热情跳动的心，驱使他参与到农民的抗争之中。他认识到，农民反抗那些领主、主教及王爵贵族的动机，在上帝看来是合理而感欣悦的，虽然他很容易受到那些被反抗者的偏爱。有感于那一时代诸多根本性的巨大反差，他觉得有必要从纯粹的精神与审美的艺术生活氛围中走出来，成为一位为自由与正义而战的斗士。与艺术以及他个人独善其身相比，他把这份事业看得更高，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主要是在他的影响下，维尔茨堡拒绝为“城堡”（即采邑主教）服兵役，且大体上采取革命的态度来反抗主教。里门施奈德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曾与之抗争的那些威权力量，在镇压农民起义并取得胜利后，便对他施以残酷的报复，将他投入监狱并严刑拷问。而他有幸从折磨中脱身时已然遍体鳞伤，再无力重回木石雕刻的艺术世界。

在这番情真意切的颂扬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托马斯·曼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位知音：一位艺术家，他凭借道德信念，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了那一场为自由而战的伟大斗争（尽管一些不友善的观点或许会认为，置身于第三帝国之外的加利福尼亚，比身处维尔茨堡农民战争政局中心轻松多了）。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历史证据支持的观点。与缇尔曼·里门施奈德相比，它更多的是在说托马斯·曼。不过，它论及更多的是构建一部德意志历史，以及渴望恢复甚至创建那些可传承记忆的痛苦困境。其他国家的历史相对简单，对历史的态度也相对简单，这些国家就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为纪念里门施奈德逝世**450**周年而发行的东德**5**马克钱币和西德**60**芬尼邮票

将这位椴木雕刻家视作精神与政治英雄的，还不单是托马斯·曼，战后两个德国也都视他为楷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豪地将他的作品印在该国发行的邮票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待书面证据的方式像曼一样随性。对民主德国而言，里门施奈德本人更为重要。在无惧强权压迫而为贫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他将艺术家这一身份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将他印刻到钱币上。在民主德国构建的国家记忆中，这位雕刻家，同时作为艺术家、活动家以及殉道者，是所有人应该仿效的模范。对那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他是一位世俗的圣徒。

在托马斯·曼发表演说七十年后，涉及里门施奈德的政治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在某些圈子中还很活跃。里门施奈德艺术的内在特质，依然传递着平静的力量。数百年间，这种力量成为德意志精神性的显著特征，这在路德宗的虔敬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对谦逊含蓄根深蒂固的德式推崇中仍可得见。



《但泽的吉奥格·吉瑟》，小汉斯·霍尔拜因作于1532年

[1] 此处“Caesar”一词，汉译一般作“恺撒”，指公元前1世纪的那位古罗马统治者（Gaius Julius Caesar）。该称谓后来成为罗马及欧洲帝王的头衔，意即最高统治者，汉语通常译作“皇帝”。这里“Kaiser”为德文拼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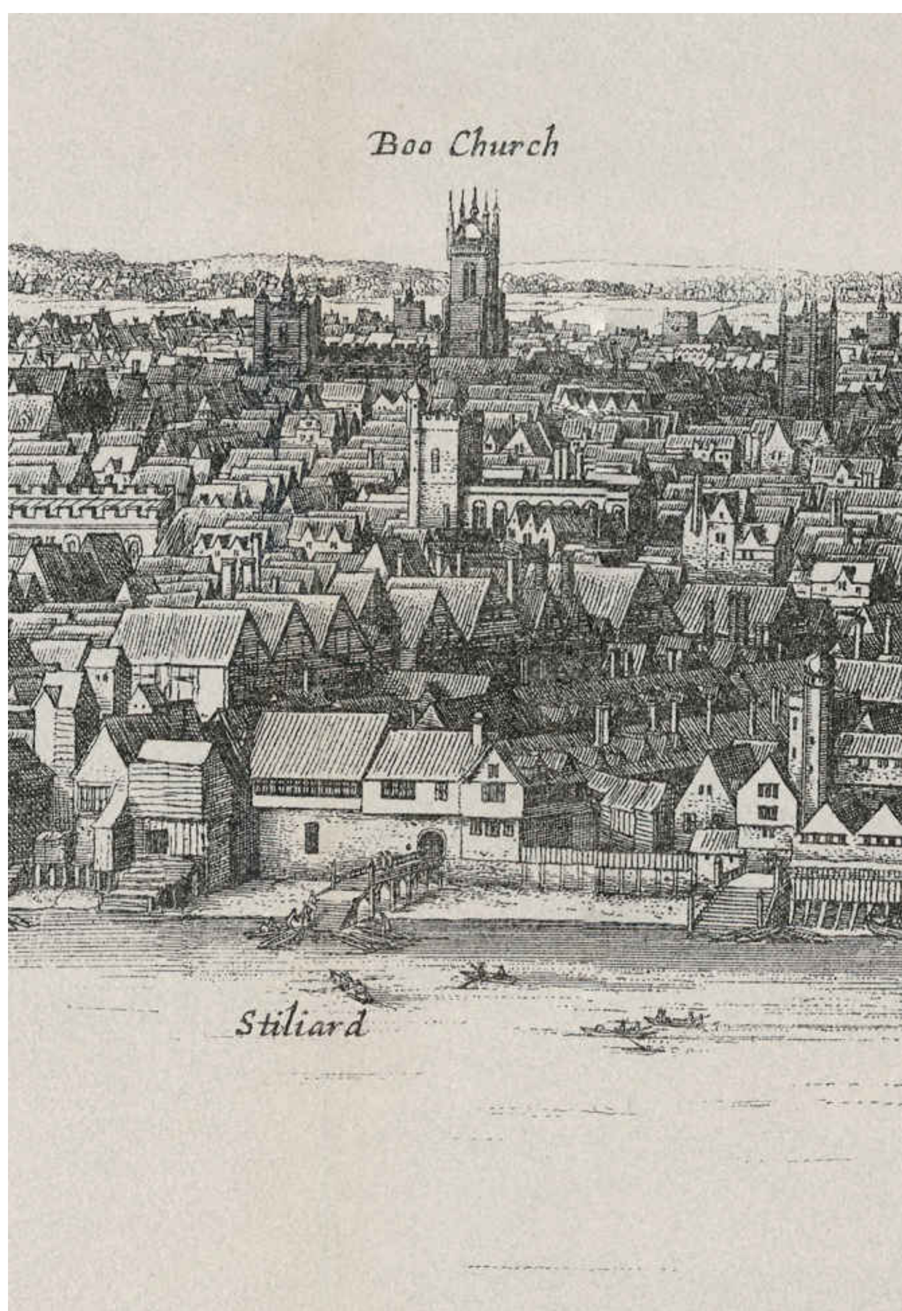
[2] 多那太罗（1386—1466），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雕塑家。

[3] 此处“主教议会”指主教及一些教会代表为商讨调整教义或准则之要点而召开的正式会议。

第13章 波罗的海的兄弟

汉堡与不来梅，这两座欧洲仅存的中世纪风格城邦，现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两个自治州，它们仍然保有各自的地方立法机构。它们不同于诸如巴伐利亚王国和萨克森王国那样的前邦国领地。政治联盟往往存在地域性变数，德式实践于此却获得显著成功，汉堡和不来梅便由此而来并延续至今。这种实践也创立了史上最为持久的商业网络之一——汉莎同盟。

在伦敦，你如果从坎农大街车站（Cannon Street Station）出来，左转沿道盖特山（Dowgate Hill）径直向泰晤士河边走去，便会来到铁路沿线下一处幽暗而不起眼的小巷——伦敦商站巷（Steelyard Passage）。穿过这一小巷，继而右转走上岸堤，你就会在铁路桥的墙壁上看到一方铭牌。这处铭牌于2005年揭幕，标示了当年伦敦商站（又被称为“钢院商站”）的位置。那是一个创建于13世纪末的生意兴隆的商贸机构，而今却完全隐没于坎农大街火车站了。该机构（德文为Stahlhof，英文为 Steelyard）曾经是德国在英国的一小块立足点，是一个庞大的德语区贸易联盟在英国的总部。这个联盟横跨北海与波罗的海，将莱茵兰至俄罗斯之间的广袤区域以及遍及北欧的诸多城市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汉莎同盟，或简称汉莎。如今，堤岸边的那一小径仍被称作“汉莎道”（Hanseatic Walk）。



霍拉[1]《伦敦风光》细节图，展现了当年的伦敦商站

坐落于泰晤士河边的这一规模宏大的围墙式建筑，实际上曾是一处巨大的仓库。它旁边是配有吊架的码头区，货船运来德制葡萄酒在此卸载，而后装载毛纺织物出口。那里有众多会议室和住宅，还有一个大厅，可以容下在此生活的四百个德国商人。从许多方面来说，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自我管理，奉行他们自己的一套法律。那方铭牌上

说这些商人“从13世纪至19世纪和平地定居于伦敦城”，这一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了。尽管中世纪时，汉莎同盟对英国羊毛贸易的控制，导致了一些暴力冲突，但英国人有充分理由留住汉莎的德国商人。希拉里·曼特尔[2]为了创作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3]的小说，曾研究过汉莎同盟在伦敦的活动。克伦威尔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即是经由伦敦商站完成的。对此，她解释道：

> 考虑到德国在那些岁月里并非一个完整的实体，而是众多自主的邦国，这才比较接近于正式表述。那时，贸易与外交之间并不像后来那样有明显的界线，因此可以说伦敦商站就是当时德国在英国的门面。经济上那绝对是处有实力的场所，因为经由伦敦商站运入的商品，以实用且质量上乘而著称。即使在那些岁月里，德国制造的商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一德式社区颇受青睐，部分是因为在战争岁月，若有汉莎同盟的商人站在你这边，那是有利的。毕竟他们掌控着一支庞大的舰队，而英格兰显然容易被封锁。在收成不好的时期，如果粮食供给被切断，国家就容易发生饥荒。这是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英国最大的弱点之一。英国曾是毛纺织物的生产与输出国，但她甚至不能养活自己。

16世纪30年代，有个人经常会从伦敦商站门前走过，他便是艺术家小汉斯·霍尔拜因。他从巴塞尔来到伦敦，随后便在伦敦的知识分子、宫廷侍臣及商人中建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客户群。他得到托马斯·克伦威尔和安妮·博林的资助，这两人均对改革后的宗教抱有同情。在伦敦的那些汉莎商人是最令人羡慕的外来定居者，他们是富裕而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能接触到欧洲大陆所有的奢侈品。只要他们负担得起，就能请同样讲着德语的同胞小汉斯·霍尔拜因为他们画一幅肖像画。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自画像》，作于1542年

如果由我来选一件反映汉莎同盟全盛时期的作品，那便是霍尔拜因于1532年为吉奥格·吉瑟所绘的肖像画。吉奥格·吉瑟来自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在伦敦商站从事贸易。吉瑟时年三十三岁，穿着体面，从那红色长袖便可见一斑。他迫切地想让观者一看便知道他是何许人。他和气地捏着一封信的角，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用低地德语）写着："请交给我的兄弟，诚实正直的吉奥格·吉瑟于英格兰伦敦"。他头顶上方的墙上，用封蜡粘着一张写有拉丁文的纸片。由此我们得知，这幅画精细描绘了三十四岁的"Georgii Gysenii"，他的双颊如我们在画中所见，而他的眼神也生动逼真。左侧墙面上还写着"G. Gisze"，谨防我们没有注意

到之前的两个线索。右侧支架上还有一些书信，上面是那些商人在巴塞尔的回邮地址。凡此种种，吉奥格·吉瑟已确使我们了解了他是什么人，而他显然也想让我们知晓，他在商务往来中勤勉的表现。他是位严谨、成功又有教养的年轻人，在伦敦城获得了极有价值的商业经验。

吉瑟家族最初来自汉莎同盟重要的商贸中心科隆，而后得以在但泽建立商团。但泽是一座通行德语，并效忠于波兰国王的城市。吉奥格面前的桌上有枚戒指，上面吉瑟家族的盾徽是由国王西吉斯蒙德授予的。这盾徽连同他兄弟的来信，都显示出汉莎同盟的商贸社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联系，特别是在远距离信贷方面。画面右侧完全与商务相关，诸如来自巴塞尔的书信、系有红色丝带的账簿、锡质墨水台架、多支羽毛笔、红色封蜡，还有一枚图章戒指和印章，尽是正式通信必备之物。画面另一侧，花瓶中的鲜花展示出一个不同的吉奥格。康乃馨是订婚的传统象征，迷迭香代表回忆，而海索草则象征纯洁。这便是吉奥格·吉瑟作为未婚夫的形象。这幅肖像画完成后的第三年，他娶了但泽另一位成功商人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克吕格尔。画面左侧墙上他的名字上面，是一句稍显谨小慎微的箴言——“快乐总是伴随着悲伤”（Nulla sine merore voluptas）。

希拉里·曼特尔对这幅画作及画中人非常熟悉。她说道：

> 吉奥格·吉瑟是但泽一个富裕家族的子弟，他在伦敦商站的那段时光，积累了国际贸易经验。吉奥格正直视着我们。你可将此画看作一封情书。这幅画曾被补色，因此他的目光已略微偏右，而右侧习惯上是女性的位置。那些康乃馨表明他已订婚，画上的他似乎正望向他业已归家的未婚妻。如果你认为贸易与尊贵无关，那你只需看看伦敦商站的那些肖像画。画中人都是汉莎同盟这一巨型国际商贸组织的商人。他们拥有财富与地位，但或许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力。吉奥格被认为是他们之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人。霍尔拜因其余的伦敦商站肖像画，则稍显平淡，在风格上颇为严肃。画中人通常都是正面面向我们，像是一个天才拍摄的面部照片。

汉莎起源于12世纪。该词本意是指一群人，并带有某些军事层面的潜在含义。但至12世纪时，它被用来描述中世纪的行业协会。15世纪处于巅峰时的汉莎同盟，是一个由约九十座通行德语且自治的城市组成的联盟。该联盟由吕贝克与汉堡主导，以相互协作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就那种方式来说，它的确是非常德式的。正如德国北部大部分区域的运行机制，都在帝国皇帝及众多帝国机构的掌控之外。一些成员城市，包括但泽与里加，斯德哥尔摩与卑尔根，完全在帝国版图之外。



1552年的吕贝克

伦敦德意志历史研究所的科妮莉亚·林德，对汉莎的历史做过特别研究。她说道：

> 汉莎是个非常奇怪的合体，它自身没有行政人员、没有印章、没有法规、没有武装、没有海军、没有船只。所有这些都各归那些商人独有。它极度依赖诚信经济。将大多数汉莎商人聚合起来的其中一个要素便是他们都说低地德语，其余则是家族纽带。你在东部城市见到的汉莎家族，许多都来自更远的西部，他们往往通过联姻与西部的那些城市保持联系。所以经常地，在吕贝克的某人认识在里加的某人，并正在跟他打着交道。他们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亲戚关系。



《科隆的赫尔曼·冯·威迪夏》，汉斯·霍尔拜因作于1532年



《科隆的德瑞克·伯克》，汉斯·霍尔拜因作于**1536**年

伦敦的那些汉莎商人，委托像霍尔拜因这样杰出但也酬劳不菲的艺术家来绘制肖像画，这让我们了解到，时至16世纪中叶，汉莎同盟已然何等重要而有实力。这一组织本身或许拥有的很少，但却掌控了很多。其势力基于一个复杂的商路网络，该网络涵盖了北海、波罗的海及北欧的大河，将自伏尔加河至泰晤士河的广袤区域连接在一起。但那些汉莎城市并不仅是寻求贸易，它们同时也捍卫商路。这就是它们自己增加武装船队来保卫其成员城市的原因，如有必要，它们会同挑衅其势力及商贸活动的人交战。它们发展了自己的商法系统，并且几乎每年都在吕贝克举行一次会议（Hansetag），来讨论重要事宜。汉莎的势力范围极广，从俄罗斯西北的诺夫哥罗德，横跨波罗的海与北海，直达伦敦与英

格兰东部。对其运作方式，科妮莉亚·林德解释道：

> 汉莎将众多成员城市聚在一起，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抱团寻求安全。这是个有着一致商业利益的共同体。不寻常的是，吕贝克与汉堡并不生产任何产品，它们只是商品交易的中心。商人持续提高的专业化程度，意味着他们不必为商贸活动亲自四处奔波。于是，这便使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比如很多汉莎商人都成为自己所在城市的市政议员。他们有专业团队从事商务旅行，也有自己的商贸伙伴，比如在另一处等待接收货物的表亲。以这样的方式，一个商人的商务旅行并不仅限于去一次卑尔根，他可同时将船发往伦敦、里加和卑尔根。汉莎商人确实将东欧及西欧连接在了一起。



位于吕贝克的盐仓，少有的几座至今仍伫立在那儿的汉莎原有建筑

霍尔拜因为吉奥格·吉瑟所作的肖像画所着力展现的便是这样的世界。吉瑟的父亲颇为典型，他是但泽市镇议会的议员；而吉瑟的书信，则将巴塞尔与但泽连接在一个涉及信贷与交易的和睦的家族网络之中。

但这一网络远远不止于此。吉瑟桌上那个插有不同象征意味的花朵的花瓶，是由最好、最薄的威尼斯玻璃制成的。它同时展示了吉瑟的富有，以及霍尔拜因捕捉反射光影的技艺。花瓶旁边有个小巧的黄铜圆钟，产地无疑是德国南部；桌上铺着从黎凡特进口的土耳其毛毯。挂在吉瑟身后顶架上的，是一个令人回忆起故乡的球形小挂件，它是用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制成的。可以说全世界的财富都被汉莎运到了伦敦商站。

但在1532年肖像画绘制之时，汉莎像进行商品贸易一样也在交换观

念。大多数大型的汉莎城市接受了改革后新的宗教信仰，这一事实造就了许多观念，而宗教也常常在商路上得以传播。对此，希拉里·曼特尔说道：

> 这幅画作中的每件东西都与交流沟通有关。还与那些被赋予多种内涵的文字有关，因为伦敦的德国商人正在进口违禁的《圣经》，即路德的那些作品。任何人若对用通俗的话语来阐释《圣经》感兴趣，那么它们就是中心。伦敦商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自给自足型社团，但他们也是备受质疑的焦点，而且遭遇过袭击。尽管处于困境，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进行有利可图的禁书贸易。其实你根本无法阻止观念的传播。到16世纪30年代，世事开始依照他们的方向发展。后起之秀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位福音派的同情者，他通过一系列法案促成了与罗马的割裂，将英国宗教改革引入进程。结果，霍尔拜因成了计划的一部分。安妮·博林被大部分欧洲人视作亨利的情妇。在安妮·博林加冕（1533年6月）之时，汉莎的那些德国商人委托霍尔拜因设计一座凯旋门，作为对加冕典礼这一严重犯禁事件的捐赠。在意识形态方面往往被排除在外的德国商人，如今却处于诸多事件的中心。此后，任何人，上至国王本人，只要是在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生活，都可找霍尔拜因作画。这位德国画家深受自己同胞的认同，并受到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他会向我们展现那一时代的诸多文化偶像，而这些偶像在我们看来，都是独特的英式风范。

15世纪时，汉莎是整个英格兰东海岸一支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在伦敦、波士顿和金斯林[4]，还是在赫尔、伊普斯威治与桑威治，汉莎均建有仓库。在德国，它的权力基地——汉堡与吕贝克被神圣罗马帝国赋予自由城市的地位。不过，随着英格兰与荷兰不断扩张它们与美洲及远东的贸易，其造船业、海上力量及金融中心也同步发展。此时，那些汉莎城市发现它们日益处于劣势。波罗的海无法与大西洋抗衡。汉莎的诸多特权也被逐渐收回，比如俄罗斯和伊丽莎白一世先后于1594年和1598年中止了其特权。至1604年，同盟仅存十四座成员城市。科妮莉亚·林德解释说，还有其他内部因素在起作用。

> 汉莎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没有适当的组织架构。因此，一段时间之后，那些个体商人离开了汉莎，而后它便趋于瓦解。解体过程非常缓慢，持续了几个世纪。我们甚至不清楚汉莎终结的确切日期。通常被提及的是1669年，那一年召开了最后一次年会，但他们并没有在1669年正式宣布汉莎解散。当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他们原以为还会再次召开会议，可是再没开过。

伦敦，或者不妨说是霍尔拜因，向我们提供了那些最好的肖像画，

使得我们可以了解汉莎商人。不过，英格兰总是处于汉莎的外围，其核心是波罗的海。

没有任何一幅画作能像吉奥格·吉瑟的肖像画那样，如此简练地概括出这个北德商人的世界极其复杂的运行方式。不过，有一组17世纪制的三件套大啤酒杯，你可以通过这套用于正式场合的饮具更进一步地领略其持久的世界性的富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通过在正式场合一起饮用啤酒，来达成一项贸易合约或确认一项商业交易。这是种惯例，比我们现今采用的握手更为通行。在吕贝克或汉堡，或是吉奥格·吉瑟的故乡但泽，你可以用惊人的方式来畅饮啤酒（详见第10章）。这三个大啤酒杯都是奢华的镀金银器，精雕细琢，价值连城。不过，但泽的那个大啤酒杯远胜于另外两个。

大约公元1700年前不久，但泽的金匠丹尼尔·弗里德里希·冯·米利乌斯制作了这个啤酒杯。杯身展现了巴比伦伯沙撒的盛宴之全景[5]。杯身上，长条桌斜置，伯沙撒王自己坐在上首位置，以微型深浮雕形态呈现出的众位客人都在把酒言欢。在他们上方的墙壁上，使用酒杯的饮者可见，而他们自己却看不到的是一行文字："Mene Mene Tekel Upharsin"，意即"你因被置于天平中而显出你的亏欠"。上帝谴责这场豪华盛宴是亵渎之举。对于富有的新教徒而言，这是件卓越的金器。权力与财富皆被允许，但只能在对主的敬畏与训诫中享用。而那句箴言也是典型的德式，现代德语中依然保留了"Mene Tekel"这一表述，意指不可接受的或错误的事情。[6]



嵌金银质啤酒执杯，吕贝克制，1601年至1625年



嵌金银质高脚杯，汉堡制，约1650年



嵌金银质啤酒执杯，但泽制，约1680年

另两个大啤酒杯是典型的汉莎风格。制于吕贝克的那一个，杯盖内侧刻有里加的城市徽标。里加后来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产自汉堡的高脚杯也是一件惊人的杰作，上面刻有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俄文题词，它可能会被误认为新艺术派的作品。它们一并成为汉莎——这个长达数世纪、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商贸社群的丰富佐证。

波罗的海沿岸德国商人组成的移民社区，即但泽、里加、塔林以及柯尼斯堡那些说德语的民众，生存繁衍至1945年。此后，整个族群或是被驱离，或是被杀害。由此，汉莎同盟的东部最终不复存在（详见第26章）。

在英国，我们仅有伦敦泰晤士河岸上的一方铭牌、金斯林的一处仓库，以及霍尔拜因的一些杰出画作，提醒着我们汉莎的过往。但在德国，可供追溯的痕迹更为明显。德国有十座城市至今仍旧自称是“汉莎城

市”，而它们的车牌也都自豪地以字母“H”开头，比如“HB”表示不来梅，“HH”即汉堡，“HL”则指吕贝克，等等。政治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介绍说：

> 你如果问来自汉堡或不来梅的人，他们的朋友与邻居在哪儿，谁是他们最亲近的邻居，他们总会说是不列颠与斯堪的那维亚。

直到19世纪80年代，即便汉莎同盟早已烟消云散，据说仍有童谣唱诵：“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没有人能羞辱它们，因为它们是自由的城市，哪怕俾斯麦也无能为力。”换言之，新兴德意志帝国的政令在那儿并无效力。但毫无疑问，当时这些城市的繁荣是依赖于它们的工业与大西洋航线的开拓，而不是靠传统的汉莎同盟式贸易活动。结果至1900年，飞速发展的汉堡和不来梅与吕贝克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整个19世纪，吕贝克的地位一直在衰落。



历史上吕贝克的中心地带

> 通常当衰退的进程开始的时候，那些体现欢乐与成功的外在可见的物质符号和标志才开始显现。外在表现的显露需要时间，正如天上星辰的光亮，在我们看来最为耀眼的时刻，实际上它或许已然湮灭。

汉莎同盟已成历史，对其繁荣景象最有分量、最知名的文学重现才姗姗来迟。托马斯·曼那部忧郁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

落》（1901年出版），描述了一个庞大的汉莎家族在其回光返照的晚景中表现出的诸多传统与富足。



汉堡市政厅门楣上的**“SPQH”**

托马斯·曼的故乡吕贝克，现今被并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不再自治。面向大西洋的汉堡与不来梅繁荣发展，如今依然是自由的汉莎城市，也是现代德国两个独立的自治州。[汉堡人对他们那座“自由的且是汉莎城市”（Freie und Hansestadt）的汉堡倍感自豪，而不来梅仅是一座“自由的汉莎城市”（Freie Hansestadt）。这一区别显然具有重大

意义，对于局外人却极为晦暗不明。]这两座城市始终自视为继高级的罗马模式之后的共和制城邦，由执政官与议员施政治理。它们都在公共建筑物上题写罗马字母“SPQR”，即“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今天，你仍可以在汉堡市政厅的门楣上看到“SPQH”（Senatus Populusque Hamburgensis），意指“议院与汉堡人民”；同样，在不来梅则是“SPQB”。德国汉莎航空（Lufthansa），意为“空中的汉莎”，为商务旅行提供议员等级服务。

铁幕落下的二十五年后，北欧的政治版图已然恢复至早前的格局。文化与语言的基础已经改变，然而横跨波罗的海与北海的贸易再一次成为常态。如今，塔林、里加、格但斯克与汉堡、不来梅、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便利。



铁十字勋章，**1813**年

[1] 瓦茨拉夫·霍拉（1607—1677），波希米亚饰版画师，生于布拉

格，逝于伦敦。

[2] 希拉里·曼特尔，英国小说家，曾二次荣获布克奖。

[3] 托马斯·克伦威尔（约1485—1540），英国律师、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首席大臣。

[4] 此处“金斯林”为“King’s Lynn”音译，是英格兰东部诺福克（Norfolk）下辖的一处海港与集镇。

[5] 文中“伯沙撒的盛宴”及下句引文，均出自《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伯沙撒，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巴比伦的共治君主。

[6] 现代德语继承了《圣经·旧约》中的这一表述而将其简化作“Menetekel”，转义为“宣告大难临头”及“严重警告”。这一箴言本是阿拉姆语，该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属闪米特语族。

第14章 铁血邦国

> 一千名女士穿着华丽，皆以羽毛饰物妆饰，有天蓝的，有浅红的；这儿一片紫黄，那儿一团青绿。阳光透过窗户，照得女士们身上的钻石佩饰闪闪放光，令人眼花缭乱。每一位女士像是要自珠光宝气中脱颖而出，这看起来犹如剧幕升起，即将上演另一场盛会。

这就是19世纪初的英国宫廷，出自美国驻英使节理查德·拉什的一番描述。在欧洲，千余年间权力与财富最明晰的标志，便是贵重金属与宝石。女士们的这些妆饰是财富的象征与权力的体现。她们自豪地以此装扮，令观者惊叹不已。伦敦的女士们热衷于此。不过，这位使节若是被派往普鲁士，那么他将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他在宫廷舞会中见到的首饰会更加含蓄内敛，比如像第252页附图上那样简约的项链。

这条项链的材质并非贵重金属（此处没有“珠光宝气”），也未镶饰耀眼的宝石，只是一条普通的黑色铁质项链。在普鲁士，特别是19世纪的普鲁士，铁这种毫不起眼且通常用于制造刀剑、头盔及工农业器具的金属，已经成为制作饰物的选材。这些铁质饰物并非用来展示财富，而是为了表现爱国主义，是抗击法国入侵者的一种象征。



© Antje Voigt-SMB-Skulpturensammlung

大选侯圣乔治造型的铁质塑像，**1680**年

将铁用于意想不到之处是柏林由来已久的特殊习俗。从这件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前身）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小型塑像便可见一斑。这位选侯于17世纪70年代英勇地抵御了瑞典的入侵，保卫了自己的国家，并一举将勃兰登堡-普鲁士改造成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尊塑像展现了他作为战争英雄与基督教圣乔治骑士的形象。选侯一身古罗马式戎装，正与邪魔化身的恶龙搏斗。恶龙倍受压制而扭动翻滚，他则立马横枪，尽显优势。这是标准的雕塑装饰，各方面都很合乎常规，只有一个方面例外：像这样的一尊塑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通常会选铜质原材铸

造，用以表现罗马帝国的庄重回响。但这是在柏林，宫廷以崇尚节俭而著称。因此，17世纪80年代的柏林，大选侯以铁质塑像呈现于世。若说萨克森后来以瓷器生产（详见第18章）闻名，那么普鲁士便是以铁来体现这个国家的特质，既没有流俗之物，也没有荒诞之言。这便是那一铁血邦国。

铁十字勋章稳固地立于普鲁士这一传统之中。全世界都知道铁十字勋章，它无疑是德意志尚武精神的标志。但它也代表着普鲁士邦国及其民众的理念，即团结、克制与果断。虽然本章故事以铁质饰物开篇，但这是典型的德式风格，它述说着一个弥足珍贵的德意志美德——质朴。这条项链含蓄内敛、朴实无华。椭圆形黑色铁质徽章重现了各式古罗马风格的浮雕，九枚徽章分别由三条精细的串链首尾相接，合成一件环形项链。它大约制于1805年前后，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是德意志最为暗淡的岁月，法国大军几乎征服并占据了其全境。一段中立期过后，普鲁士注定——也许是不自量力地——对其眼中拿破仑的挑衅做出反应而重整武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公开极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主张推行苛刻的节俭。在公主玛丽安娜的倡导下，普鲁士王室鼓励国中女性公民捐出她们的金银饰物，作为个人对战事的一份贡献。作为回馈，她们收到了像这条项链那样的铁质饰物。这些饰物上通常都刻有“Gold gab ich für Eisen”字样，意即“我为铁捐金”。这便是民众自我克制而体现忠诚与爱国主义的一份见证。普鲁士人，无论男女，均有铁一般的特质。

1806年，普军经耶拿与奥尔施泰特之役而遭受惨败，致使拿破仑顺利进占柏林（详见第9章）。王室撤至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即今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详见第3章）。这座城市在柏林以东数百英里处，再往东便是与俄罗斯交界的梅梅尔。柯尼斯堡看起来像是地处偏远的聚居区，但它曾是普鲁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是普鲁士王国兴起之地，也是其首位国王于1701年自行加冕之所。18世纪中，普鲁士是欧洲最成功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但避居于柯尼斯堡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已危如累卵。1806年时的普鲁士桀骜不驯、无畏而孤立，而今这一观念在公众记忆中依然存在。这或许与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人对其自身孤胆英雄的记忆并无二致。这个国家如今在国王统率之下正为生存而奋战。国王身边有英勇的路易丝王后，对大部分德意志人而言，她成了奉献与灵感的化身。



铁质项链，约1805年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与王后路易丝的半身像，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作于**1816**年

普鲁士对法国的反击即始于柯尼斯堡。这涉及反思国家、重组军队和重振民心。国王宣布“唯有铁血与坚毅”方能拯救这个国家。选择佩戴铁质饰物的普鲁士妇女就是表现之一。随后在1813年，军事态势开始向普鲁士及其盟友一边倾斜。于是，国王废止所有现行的军事勋章，下令制作一枚全新的勋章，用以表彰抗击拿破仑的将士，这便是铁十字勋章。它可被授予所有军阶，而不仅限于军官。这是普鲁士一次历史性革新，也是一招精彩的公关措施。自此，所有为争取国家自由而战的普鲁士人，都将平等地获得荣誉，而不论其财富与社会地位。（这一体系可上溯至拿破仑于1804年设立的荣誉军团勋章。在不列颠，直至1856年方才引入可授予所有军阶将士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据《铁血王国》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看法，铁十字勋章的设立，巧妙地融入了普鲁士留存的传说。他说：

> 弗里德里希·威廉宣布用铁制作勋章，是因为那是一段自我节制与物资匮乏的时期。与之相关也有些有意思的事，比如那种异常的简朴与普鲁士个性之间的关联，以及普鲁士是个只能如此将就的国家的想法。那些容克家族与勃兰登堡贵族的妻子们，自己裁制衣饰，这已然成为一种观念。在这些关于何为普鲁士的传说记忆中，有一种对基本秩序简单而质朴的坚持，对铁的偏好便融进了这一模式和情感氛围。
>
> 最吸引人之处当然在于铁不是一种贵重金属。它是一种普通的材料，用于制作日常器具。国王明确了这一点。当铁十字勋章设立之时，它便成为一种全新的军事奖章，用以表彰各军阶将士的无畏与英勇。换句话说，勋章的授予不限于将军与贵族，而是官兵平等，无论何种地位，只与他们如何履行各自职责相关。

于是，铁十字勋章成为普鲁士自身节制与韧性形象的一种表现。同样，也展示了弗里德里希·威廉誓将自己的王国从法国占领中解放出来的铁一般的坚定意志。他说，这是“当前战争期间一份特殊的功勋荣誉”。作为一枚奖章，它出奇的简洁，由生铁制成，通体黑色并镶有银边。勋章上既无铭文，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在其顶端有一顶王冠，王冠下面是国王名姓的首字母“FW”，正中有三片橡树叶，下端则是伟大反击的开始时间——1813年。铁，并非贵重金属；德国橡树，也不是罗马的桂树。铁十字勋章无疑是简练的，但与铜质、银质或金质的相比，一枚铁十字勋章的象征性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的象征意义过于复杂，远远超过了外国人的想象。普鲁士这一军功十字勋章对德国人而言，有着更为广泛的重要意义。对此，日耳曼文化史学者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解释道：

> 在我们看来，直觉上，铁象征着德意志的核心价值，即

> 坚毅。这种想法与德国橡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有人都知道后者是德国的标志物之一，与德意志品质的传统定义相关联（详见第7章）。此外，铁十字勋章上另有一种金属，那便是银质镶边。那代表着路易丝王后，以及她所代表的德意志品质的另一个方面。银代表着敏感与柔弱，此处柔弱是褒义而非贬义。敏感、感知、直觉，可发展成后来的德意志精神。因此，你在铁十字勋章上看到的不仅是力量与平等原则，也有德意志精神温和的一面。这一象征物为何有如此多的感情维系，这便是原因所在。正如我们所见，它被赋予了至少三个层面的意义，而不只是一个。

小镇提尔西特坐落于柯尼斯堡的东北边。1807年，在流经此地的尼曼河上的一只木筏中，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会面并签订了法俄同盟。同样是在这儿，与那一扩张条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鲁士被迫接受了拿破仑苛刻的和平条款。路易丝王后与拿破仑会面，做最后的尝试去说服他能做出让步，而拿破仑却未加理会。根据条约的诸项条款，拿破仑攫取了普鲁士近半数的领土与人口，这些随后都被俄罗斯、萨克森及拿破仑家族瓜分。巨额赔款接踵而至，诸多惩罚性的条件震撼了欧洲。普鲁士从未遗忘这些。1871年，战争态势发生逆转，普鲁士人便以牙还牙，使法国人倍受凌辱。然而，其间拿破仑自己塑造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敌人，那就是路易丝王后。她终其余生都在鼓励普鲁士人民坚持下去，直至他们重获尊严并收复家园。她因而深受爱戴与尊崇，被她的人民称作“民族美德之魂”。她于1810年离世时，拿破仑评述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失去了他最好的大臣”。虽然铁十字勋章融力量与精神为一体，上面所用银质就是王后的象征，但在她亡故四年之后，悲痛的国王为追思其功绩，又另行设立了路易丝勋章，以表彰那些为德意志做出贡献的普鲁士女性。这枚勋章最多仅授予一百位女性，并且与铁十字勋章一样，面向所有社会阶层。



普鲁士路易丝王后与拿破仑斡旋，**1807**年**7**月

路易丝勋章不大，总体为黑色镶珐琅十字形，正中天蓝色圆盘上七星环绕着字母“L”。路易丝王后，身兼妻子、母亲、爱国者、榜样等数个角色，在邦国的传说与记忆中处于正中位置。路易丝勋章的授予持续至1918年，其间从未间断。而铁十字勋章则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末期出现中断。1871年，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至此铁十字勋章才得以恢复（详见第21章）。



路易丝十字勋章，**1814**年设立

现今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藏品，显示出那枚标有1813年字样的铁十字勋章所承载的记忆和象征意义是多么强大。这枚勋章模样与其原型一样，只是要更大一些，长宽超过3英尺，饰有许多铁钉。这是铁再一次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这样的十字勋章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募款而出现的。自1915年起，民众可以买一枚钉子，嵌入铁十字勋章。钱款则充作军费。铁钉有不同的质量与价格，所以任何人，无论其收入高低，均可资助战事。可谓贫者与富人协力，工人与容克贵族齐心。就像一百年前佩戴铁质饰物一样，购买一枚铁钉即是公众的爱国之举。于是，铁十字勋章再次成为一个武装团结起来的国家的象征。

对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而言，设立于1813年的最初的铁十字勋章是普鲁士历史中一个罕见且强硬时刻的缩影；它集中体现了左右两派势力，即以社会知识阶层为主体的自由主义者和以专制主义者为代表的武装力量结成的联盟；它代表着这样一个时刻：平等享有荣誉的男女民众，为了实现抗击拿破仑这一共同目标，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这一社会大联合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其目的，但在随后的和平岁月却未能延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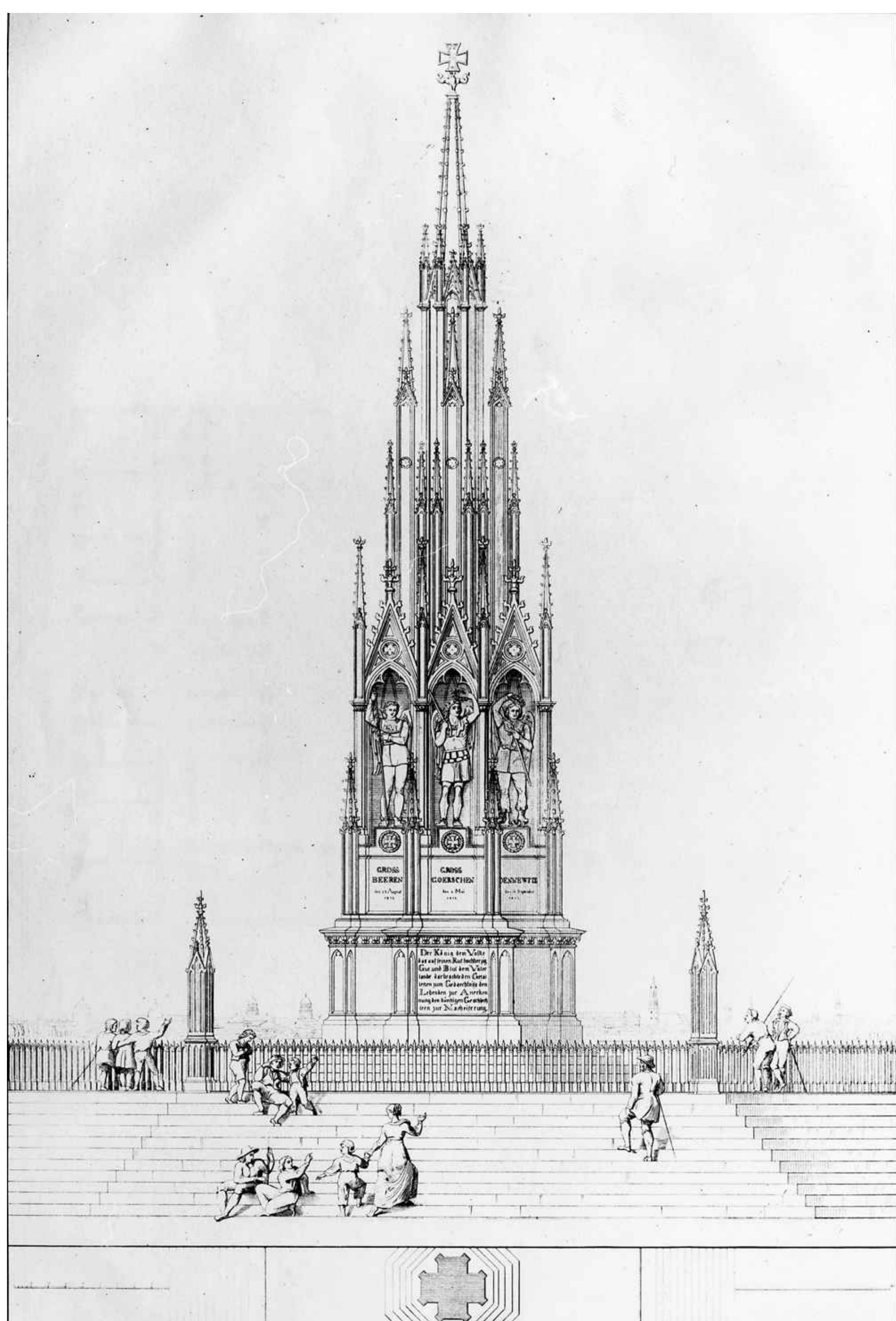
> 与设立铁十字勋章这一想法相似，普鲁士国王打出了代

表其权威及意愿的一张牌，希望将全体民众聚合成一个新的联盟。他们想要创建一个国家，但又总是想着避免创立一个民主国家。这显然是解放战争后民族运动被平息的原因：在这一运动中，民主与自由的层面变得过于危险。铁十字勋章恰是两派联合的象征，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左派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以及专制主义的一派。而这一联合必然会被打破。德意志统一进程中表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在1815年后被消灭，或者说遭到压制，也正因此导致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

滑铁卢战役之后，自由主义者期望会出现一个新型社会。在此社会中，公民权利由宪法保障，公众表达也以某种方式得到保证。国王则有其他想法，数年间普鲁士倒退回其旧有的专制王权体制。自此便少有变化，直至1848年发生剧变与革命。



嵌有钮钉的大铁十字勋章，**1915**年至**1918**年



克罗伊茨贝格普鲁士国家纪念碑的蚀刻版画，毛赫继申克尔之后作于**1823**年

铁十字勋章代表的联合理想，很快在保守与改革的激烈斗争中破灭。作为军事奖章，它已不复存在。但它却以另一种显要甚至惊人的方式，在当代柏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这座现代化城市最具活力、最为繁华的街区之一，要属克罗伊茨贝格，即“十字山”（Kreuzberg），它

的命名就源自这一勋章。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最终撤退。在市中心南部的山顶上，柏林人驻足观望之处，建筑设计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了一座纪念碑，以此致敬普鲁士，感谢其为了将德意志全境从法国数十年的入侵与占领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贡献。纪念碑哥特式教堂的尖塔外形，在英国人看来，很像阿尔伯特纪念亭。毫无疑问，纪念碑全部由铁铸成。十二个高高的壁龛中立有超大的铁质塑像。这些塑像代表了那些使拿破仑大军节节败退并最终撤出德意志的关键战役：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战役；而后1814年普鲁士占领巴黎；最终，1815年滑铁卢的终极绝胜。

尖塔顶端当然是铁十字勋章。它已成为一种标志，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力量与自由平等主义达成的历史性战时联盟。这一协作关系军事层面的意义，随着1945年德国的完败而彻底终结。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克罗伊茨贝格，其自由主义层面的价值仍清晰地存在着。这一街区已成为多文化、多族群的新柏林代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漫步于申克尔纪念碑附近的公园内，往往可以听到德语与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与俄语。戴着各式头巾面纱的穆斯林，吃着冰激凌与土耳其式肉夹馍，或是在瀑布边嬉戏，或是听着户外钢琴演奏。所有这些都在那个铁十字勋章的庇护之下。

1821年3月30日，那些自由主义者参加了克罗伊茨贝格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今日的欢乐结局，或许会使他们大吃一惊。外敌入侵导致的诸多危机已安然平息，于是德意志诸部的统治者很快就下定决心，他们可以很好地执政而无需那些平等与民主的理念。改革的希望旋即遭到彻底的压制。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那些自由主义者虽持续斗争却徒劳无功。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革命也历经数次难堪的失败，斗争就此告终。

第15章 源自1848年的两条道路

2014年夏，德国足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举国欢庆。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尽显黑、红、金三色。代表国家的颜色出现在那些助威响板、吉祥物、面部油彩和旗帜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国旗是基本的标志或识别物，它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仪式中。但对德国人而言，他们的国旗，以及上面的三种颜色，却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也承载着漫长的历史。

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旗帜，有些上面饰有不同的纹章标志或盾形徽章，有些上面则有单头鹰或双头鹰的纹饰，各式各样君主、邦国与城市的旗帜。不过，直到以1848年革命为主题的展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种德国国旗才首次出现。它与之前的那些旗帜相比，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因为这面旗帜并非来自某一个统治者或某个已存在的邦国，而是源自对一个崭新国家的构想，即创立一个统一而奉行法治的德国。这是一面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旗帜。而在1848年，这几乎成为现实。

1815年后，拿破仑先败于莱比锡，再败于滑铁卢，德意志不得不在政治层面完成自身的改造。法国的入侵致使某些地域被占据近二十年之久，由此带来的创伤造成德意志的动荡与分裂。拿破仑一举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并使普鲁士与奥地利受辱。那时，没有什么权威或统一的政权中心能得到起码的尊重。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由练达的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主持。与会的那些欧洲统治者，决定尽其所能恢复旧有的保守秩序。于是，之前的那些统治家族重新掌权。而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拼图也经重整，分化为数量更少，但各自面积更大的邦国。它们一并组建起德意志邦联，一个由众多君主制邦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并以奥地利皇帝作为国家元首。与其说它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不如说它更像是帝国的翻版。



一面宪制德国的三色旗，约1848年至1852年

然而，不选用某种议会模式，而是倒退回君主国及大公国的专制架构，对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言，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不仅是不公平的，更是不可接受的。法兰西人或许曾是侵略者与压迫者，但他们更带来了平等与自由的革命思想。许多德意志人热切地接受了这些观念，他们希望在彻底击败拿破仑后，能有一个全新而自由的宪政秩序。对这许多人而言，回到过去是无法容忍的。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学者乔纳森·施佩贝尔教授解释道：

> 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领土历经重新分划整合，由1789年前的三百个德意志邦国减至三十七个，随之出现了统治合法性的真空。民众中弥漫着当前统治者并不合法的情绪。他们不是传统王朝的统治者，且往往信奉不同的宗教。比如普法尔茨的大多数民众是新教徒，却被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国王统治着。于是，人们期盼着某种更为正统合法的新型政府。

1848年见证了遍及整个欧洲的动荡与革命。这片大陆在粮食作物歉收之后出现经济萧条，并引发一系列局部冲突，比如奥地利爆发的农奴起义，瑞士涌现的宗教冲突。新年之初，众多政治骚乱演变成大范围暴动，席卷了意大利、法兰西、低地国家[1]，以及奥地利。那些保守政权面对暴动纷纷崩溃。法兰西成为一个共和国，奥地利皇帝退位，甚至连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批准了宪法。最重要的是，在法兰克

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议会会议中，与会代表中的自由主义者首次占据优势。

正是这次议会首次宣布黑、红、金三色代表德国，一个统一的、宪法体制下的、自由的新德国。这三种颜色分别与三个词语相呼应，即“统一、正义与自由”（Einigkeit, Recht und Freiheit）。新国旗与新国歌——《德意志之歌》，承载了相同的信息。自由应由宪法保证，以防那些王爵贵族肆意专权。这面旗帜注定成为德意志人民的国旗，而非某个邦国的旗帜。对此，乔纳森·施佩贝尔说道：

> 1813年，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与法国的占领。当时，普鲁士的一群志愿者身着配有红色纽扣和金色镶边的黑色制服。人们惯常认为，德意志三色旗上的黑、红、金正源于此。1830年以后，这三种颜色作为民族的标志，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徽章。作为一面旗帜，它最有名的便是出现在1842年的汉巴赫节（一个寄托民族情感的公众节日）集会[2]。
>
> 这面旗帜不能被公开使用。那时它是非法的，是对德意志各邦政府的一种挑衅。因为它表明，无论国家还是人民主权，均高于君主个人。1848年革命爆发后首先发生的事件之一，便是民众取出了黑、红、金三色旗到处悬挂，街道上、政府建筑上随处可见。这对普鲁士当局是极大的羞辱。这一标志反映出，民众在1848年春所期望的是一场改变现世的根本性变革。这面旗帜体现了一个理念，即国家应由人民组成。这就是德意志民族。作为革命成果，他们最终将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一个包括所有三十七个不同君主政体在内的统一德国。



1848年3月18日至19日，平民与士兵混战于柏林法兰克福林登大街

因此，德国的1848年与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它不仅涉及摆脱因循避责的王权的束缚，更关键的是锻造了一个包容所有德意志民众的全新民族实体。这面旗帜看起来像是找到了归宿。它承载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引发变革的理念，即德国不应是普鲁士或巴伐利亚，也不应是萨克森或汉堡。德国（Deutschland）应高于所有这些，是一个全新的、较其构成部分之总和更高的实体与认同。对此，乔纳森·施佩贝尔说道：

> 他们用一首新国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来表达这种理想。其开篇就是“德国，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意指德国对人民而言，比他们的地方君主、他们的城市及他们的家园更为重要。它注定不会是一首区域性歌曲，而将首次成为一首国歌。这是它最初的用意。然而历史却扭曲了它对于外部世界的含义。问题在于，《德意志之歌》与纳粹党搅在了一起。但最初它只是一首民主国家的国歌。

这首国歌由奥古斯特·霍夫曼作词，其旋律源自海顿为赞美奥地利皇帝而谱写的曲式。但正如那面象征团结的旗帜一样，国歌与德意志的统治无关，而关乎德意志的联合。德语世界的不同部分应该联合统一，并

在法律之下享有自由。如今，被玷污的歌词“德国高于一切”已不再被传唱，因为它最初的浪漫主义民族情感无疑已被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歌词由霍夫曼的第三段歌词替代，即今天德国国歌中的歌词——“统一、正义与自由”。



《德意志之歌》词作者奥古斯特·霍夫曼，**184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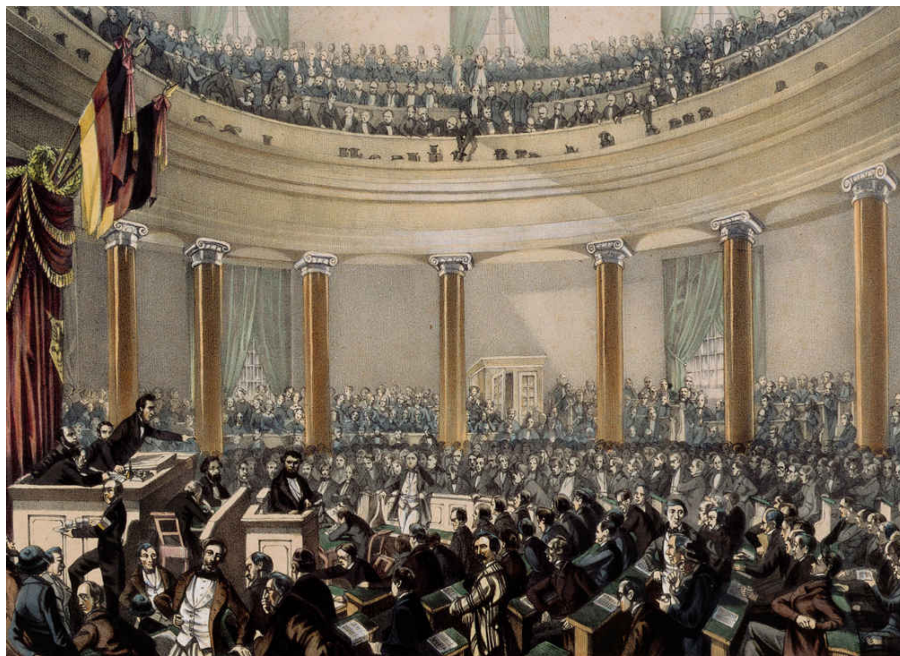
1848年后，德意志三色旗只飘扬了不到两年。因派系与争端而被削弱的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于1850年瓦解。德国的宪政实践就此失败。那些保守派君主的信心得以恢复，而自由主义者则被镇压。于是，统治者们在各自的邦国内重新主张他们的威权。奥地利再次取得邦联的主导权，并在德意志南部维持了大国地位。而普鲁士则掌控德意志北部。宪政体制在各地均被稀释，三色旗再次被禁止。现状已然占了上风。二十年后，德国在俾斯麦执政的普鲁士主导之下确实统一了，并拥有一部完全不同的宪法，以及一面属于全新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当

该帝国于1918年崩溃之时，1848年至1850年这两年的记忆却留存了下来。魏玛共和国继承了1848年的许多民主理想，那面黑、红、金三色旗也飘扬于国会大厦之上。后来，纳粹政权将其取缔并替换了。

1848年的另一事件，短期看来也是一种失败，但对德国长期的政治影响却同样深刻，乃至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一位富有的年轻商人与一位时年三十岁、律师出身的哲学家共同出版了一份仅二十三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以此鼓舞一个全新的尚属边缘团体的成员们。这一团体便是“德国共产主义联盟”。这份发表于德国社会剧变前夕的《共产党宣言》，使该组织的发展步入正轨。它的作者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二人皆因革命思想被迫离开普鲁士。所以这一宣言是以德语写就，首次出版于伦敦——在那儿他们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些语句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左翼政党的准则，甚至对少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也不陌生。比如“迄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最后的总是被反复提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最早印的那批小册子只有少数得以留存，大英图书馆就收藏了一册。没什么设计，哥特体德文简洁而紧凑地印在一起，显得很廉价，绿色的封面已经褪色，看起来薄薄的，很容易损坏。根本看不出它日后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大英图书馆德语图书部门的负责人苏珊·李德向我们介绍了最初的印量。她说：

> 据估计至少印了两千册，所以它们的传播范围不仅限于联盟成员，他们可能尝试将它散播得更远……就我们所知，有一千册在革命爆发后被发送至巴黎，余下的则被发往欧洲其他国家。



法兰克福议会，**1848**年

然而，马克思起草的宣言，与象征自由主义的三色旗一样，在德国并未引发如他与恩格斯所预测的那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对此，苏珊·李德说道：

> 说来奇怪，宣言中的那些理念，尽管与当时的革命诞生于同一片土壤，也预测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但1848年时在德国似乎流传得并不广泛。出版当年，宣言就被遗忘了。直到很久之后，大约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拾起而得以再版。至20世纪之初，《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一份权威的文本，几乎像祈祷书一样。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圣经》，那么《共产党宣言》便是公祷书。”
>
> 宣言谈及了剥夺地产并将地租作国家支出之用，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法，以及将信贷集中到国家银行手中等等。还说德国正处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共产党人将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先如此，他们才能起义，从而打倒资产阶级。

1848年的失败，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既困扰着自由主义者，也困扰着共产党人。两个完全不同的德国或已诞生，那一重要年份的记忆便被不停地一再检视。乔纳森·施佩贝尔对此说道：

> 你或许知道A.J.P.泰勒[3]的那句名言——1848年是德国

历史到达转折点却未能完成转变的一年。于此还有许多类似的表述。不过在我看来，近几十年，我们对1848年的认识有了很大的不同。例如并非仅将其视为政治失败的一个案例，而同样也将其看作是各类人群，比如女性，参与到政治中的一个全新机遇。德国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便是在1848年的革命中开始了她们的政治生涯。此外，1848年时德国人加入政党的比例，实际上比今天的还要高，大约是如今的三至四倍。因此我们看到，1848年标志着一次政治参与的爆发。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其痕迹。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一旦进入公众层面便不会消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完成自由主义革命者曾憧憬的国家统一的是普鲁士保守的俾斯麦与其头戴钉盔的将士。但最初正是他们的理念，使国家统一受到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认为，相较于过去，近来历史学者对1848年的看法更加正面了。1998年，革命爆发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德国也确实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纪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E.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首版《共产党宣言》扉页，**1848年2月**

德皇1918年退位之后，共产党人[4]与自由主义者都看到并抓住了完

成那个始于1848年的事业的机遇。两派于同一天行动。1918年1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在柏林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其宪法随后于魏玛制定。此声明发布两小时后，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都市宫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创立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在数月之内被镇压，李卜克内西本人被杀害（详见第22章）。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随后被纳粹党压垮。1848年的两条道路再次失败。

虽然1848年的诸多事件均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在德意志历史想象中的影响力，相当于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或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它们在每一个层面影响着全国性的讨论，并为政治参与设定了界线。自由主义或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便形成相互竞争的传统。二者间的敌对状态不仅削弱了魏玛共和国，后来还赋予了1949年出现的两个独立德国不同的特质。在西部，联邦共和国声称沿袭了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及其自由主义的宪法；在东部，民主共和国自视践行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全世界无产者终于联合起来了。工业城市开姆尼茨自豪地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城。



东柏林，1989年



在重新开启的勃兰登堡门前举行的庆祝活动，**1989**年**12**月**22**日

1949年，自由民主的西德与马克思主义的东德都将象征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作为各自的国旗。这面旗帜同时飘扬在波恩与柏林上空达十年之久。直至1959年，东德在三色旗上添饰了由锤子、圆规与谷穗组成的国徽，以此表明两地间深刻而永久的分隔。三十年后，柏林墙倒塌，在东柏林强烈呼吁团结的集会上，一位游行者举着一面呈现统一德国形状的黑、红、金三色旗，标语是“我们是同一民族”（Wir sind ein Volk）。再一次，一个国家即将诞生。这与1848年一般无二。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塑像，坐落于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背景为柏林大教堂

如今，德国再次统一于1848年革命的旗帜与国歌之下。卡尔·马克思城又改回原名开姆尼茨。世人或许会认为，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最终完胜那些王爵贵族，并且给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者以致命打击。但柏林对容纳不可调和者有诀窍，且精于与迥异而艰难的历史共存。那面黑、红、金三色旗现今就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大厦门额题有铭文“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但在修整后的柏林东部区域，卡尔·马克思大道仍旧是最宏伟的街道。柏林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中心，在其核心地带的上佳位置依然伫立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英雄——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壮观的铜质塑像。源自1848年的道路仍在继续。

[1] 所谓“低地国家”，指西欧沿海地区，包括荷兰、比利时等。

[2] 该活动始于1832年，以今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葡萄酒路之诺伊施塔特为中心。当年的参与者提出民族统一、自由、主权在民等主张，以对抗德意志邦联复辟。

[3]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906—1990），英国历史学者，尤以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欧洲外交而著称。

[4] 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方得以正式建立。此段据原文仍作“共产党”以便于表述及阅读。

第四部分 德国制造

金属加工、精密仪器技术、汽车、钟表、图书及最清晰的铜版印刷，足见德国人长久以来就擅长制造极度复杂的东西。技术训练与工艺技能，在德国的地位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为突出。从古腾堡到包豪斯再到甲壳虫汽车，“德国制造”一直是公认的品质保证。



印刷机，1520年

第16章 发端于印刷机

千余年间，要制作一本书，首先要宰杀牲畜以获取皮革，而后则需要一个抄写员漫长而仔细的书写。五个半世纪以前，这一切在德国发生了改变。当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一种新型活字印刷术，我们今天所见的书籍形制便由此诞生。对许多人而言，现代世界正是发端于这一时刻。毫无疑问，获取知识自此在欧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古腾堡的发明对在其六十年之后发生的宗教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走向。尽管出现了数字化革命，但它仍支配着我们组织思想的方式。如今，我们在iPad的屏幕上阅读时，仍会不耐烦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凶手到底是谁；还是会下意识地使用“书签”；而发送邮件时，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的“字体”。可以说，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时代，我们仍是古腾堡的孩子，这一点无可改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德国制造的那些物品，它们影响并改变的不仅是德国，更是全世界。现代印刷术无疑是其中最伟大的一项。本章我们来看一看，古腾堡是如何完成他的技术变革的，而且为什么说这一变革或许只能发生在德国。我们最好从15世纪50年代初古腾堡印行于美因茨的《圣经》开始讲起。第287页插图中的《圣经》最终由英国王室收藏。作为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它用乔治三世的徽盾图案镶边装订而成（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它的大小或许跟我们现今在教堂诵经台上看到的《圣经》尺寸差不多。翻开之后，它第一眼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泥金装饰的手抄本。两列醒目优美的黑色文字，似乎经一只灵活而稳健的手写就；文字周边是枝蔓与小鸟构成的彩绘纹饰，并以金色的枝叶与明亮的颜色绘制而成。这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物品，经过了巧妙的设计，既可供观赏，也便于阅读。

古腾堡印制了约一百八十部《圣经》，其中的四十八部保存完好，一直留存至今。其中两部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克里斯蒂安·詹森是位研究早期印刷制书的历史学者，也是大英图书馆收藏部门的主管。关于如何判断是印刷制书，而不是由一位异常稳定的抄写员誊录的手抄本，他给出了如下描述：

> 公元1455年前后，读者对书的想象基本就是古腾堡《圣经》的这个样子。如果你想售卖某件东西，得让你的用户能认出它是什么，并且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古腾堡制作的正是一本传统手抄书的样子。其中一个辨别印制书的方法，就是凑近了看墨水的表面是不是光亮。手写一本书时，用的是水性油墨，落笔的时候才会出墨水。但如果是印刷的话，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墨水会从印刷机里流出来，弄脏纸面。因此，古腾堡的发明之一，就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墨水的油墨。我们所说的印刷油墨，实际上是一种清漆，它会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不会流

> 溢，这也意味着它看起来有些不同。

古腾堡借用了油漆匠人的配方。找寻合适的清漆只是他从其他技艺门类发现并采用的众多实践之一。酿酒师与金属工匠，拉丁语学者与金匠商人，这些人都有各种秘诀与技巧。古腾堡从中汲取营养，而后一并应用于自己的首家印刷作坊。然后，他需要构建一种商业模式和一套分销系统。此人是位伟大的整合者，也是位了不起的商人。在15世纪50年代，除了美因茨，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他的运作那样成功。



古腾堡《圣经》中《创世记》的开篇，**1455**年

如今，一尊古腾堡的铜质塑像醒目地立在城市中心的大广场上。肖像是一个高大且留有胡须的造型，就算凭空想象，也伟岸非常。我们并不知道古腾堡到底长什么样，但其名声大噪，急需一个形象。于是在他亡故后，一个相似的造型便被虚构出来，继而通过印刷品传遍欧洲。这就是那尊塑像的参照模型。因地处莱茵河上的战略要地，美因茨在几个世纪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更遭到大规模轰炸。除大教堂以外，这座历史名城中心区域的大多数建筑均建于20世纪5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那座宏伟的大教堂在战时受损严重，后来又被巧妙地修复了。现今，大教堂仍是显要地标，古腾堡对那里或许非常了解。因为那曾是美因茨大主教教区的治署，而美因茨大主教在当时可是德意志最有权威的人士之一。古腾堡一家住在距大教堂不远的地方，步行只需要几分钟。他的教区教堂[1]——圣克里斯托弗的遗址至今依然伫立在那儿。

当时的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书籍印刷的早期形式，但它们都规模不大。木板雕刻被广泛用于制作单张印刷品，上面通常是一幅图画，比如

一位祈祷者的圣徒形象，有时还配上少许文字。而后将木板正面朝下，置于一张羊皮纸或普通纸上，接着用锤子反复敲打来进行印制。成品往往相当简陋粗糙，但也能接受。不过，对于文字而言，木刻却有些缺点，尤其是宗教类题材：哪怕出现一处错误，都无法修正，只能用另一块木板从头开始刻。因此，对于文字量浩大且内容复杂的图书而言，该印制技术有严重的缺陷。而使用金属活字的古腾堡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



古腾堡雕像，贝特尔·托瓦尔森[2]作于1837年，背景为美因茨大教堂

科妮莉亚·施奈德是古腾堡博物馆早期印刷业展部的主管，她描述了古腾堡可能使用的流程：

> 包括古腾堡的作坊在内，15世纪的任何一家印刷店铺都没留存下来。但我们在博物馆重构了印刷业初期的样子。首先，纸张被小钉子固定在一个框架内，一面印完后，整张便可翻面。再次使用相同的针孔，便可在纸张另一面的同一位置进行印刷。下一步就是用两块填充了马毛的皮毡给字印上油墨。将它们沾上油墨，然后在金属字块上薄薄地涂上一层。现在，那些涂了油墨的字母都被装在字盘内，固定在印刷机里的纸张上。印刷机本身约有六七英尺[3]高，中间装有一个巨型木质螺旋柱，就像一件特大号的螺丝锥。这个螺丝锥一拧紧，字便印到纸上了。这是件繁重的工作，但如果印得清楚，字迹会非常好辨认。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看见这些印出来的纸张时说："不戴眼镜你都能看清。"

这位教皇之所以会觉得那些文字如此清晰，原因之一是每个字母都由同等的压力印制而成，这就是古腾堡使用印刷机的绝妙主意所带来的结果。过去和现在，美因茨都一直处在葡萄酒的主要产区之内，所以他很自然地想到借用葡萄酒压榨机的技术。螺旋柱可以旋转，用以在纸面上产生非常强大但又均衡的压力，使他能够匀称、清晰地印制所有不同的字行。

这一流程真正困难之处，在于手工制作每一页所需要的金属字母。地理和历史再一次站在了古腾堡一边，因为摩泽尔河与萨尔河作为冶金术的中心已达千年之久。极度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是现成的，随时可以被用于其他领域。对此，克里斯蒂安·詹森解释道：

> 当时，欧洲一些地方的金属加工技术发展迅猛，德国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古腾堡是在一个有利的技术环境中工作的。为了印制一本书，你需要大量非常相似的和（在许多情况下）完全相同的字母式样，比如"A""E""O"等。仅一页就需要数百个"E"，所以你得多次复制这些字母。古腾堡发明了一个方法，可以用一个铸模铸造同一个字母的许多字块。这样你就有了数以百计的金属字位，可以组成不同的内容，但高度一定要保持一致，否则把它们排在一起，再旋转印刷机，会把纸张戳破。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方法，不仅要对每一个字母"E""I"进行标准化，同时也要对这些字块的框架进行规格化。这可不容易。



印刷机与印刷作坊的复原模型，美因茨古腾堡博物馆

有了制作大量可拆分的活字的办法，就解决了雕版印刷最大的缺陷之一。这样，可以在试印品中发现错误，而且很容易通过换入正确的字母来进行修正。然而，正如克里斯蒂安·詹森所指出的，这一改进也要付出代价。如果活字中每一个字块做不到等高，便会破坏纸张。为何古腾堡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用这种脆弱的材质呢？对此，科妮莉亚·施奈德解释道：

> 他是想用羊皮纸的，因为他想印制《圣经》。你如果打算印制上帝的教义，当然要使用你能找到的最昂贵的纸张，那便是羊皮纸。但在当时，要想有足够的羊皮纸来印制一百八十部《圣经》是不可能的。一部《圣经》就有二千页，而每八页羊皮纸就需要一只绵羊或山羊。那时没有那么多动物，所以他选用了普通纸张。



虚构的古腾堡肖像画，1584年

不过，事情可没有听上去这么简单。优质的印刷用纸在当时并不是随处就可买到的。最好的纸产自意大利，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昂贵的采购之旅才能获得。美因茨的地理位置于此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因河畔就是法兰克福，那里每年有两次大的商品展销会。古腾堡可以在那儿订购意大利的纸张。所订的纸张会被送到六个月之后的下一次展会上。因此，古腾堡在每个环节都能从本地获取资源，将现有工艺或材料用于制作这种新的印刷版本的《圣经》。

尽管教皇庇护二世不戴眼镜都能阅读古腾堡印制的《圣经》，但如

果有章节标题，在阅读一段文字时就会更加容易，特别是当大声朗读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些颜色来引导视线，就更加方便了。因此，古腾堡起初将章节标题印成红色，但他随后又放弃了这种方式。究其原因，克里斯蒂安·詹森解释说：

> 他或许意识到这样做又费时又昂贵，还不如他或别的什么人雇个抄写员稍后完成同样的工作，所以他放弃了。这挺有意思，因为它所反映出的更像是个财务方面的举措。而古腾堡也正在学习应该如何组织工作流程，以便从新工艺中盈利。同样，他最初每页印四十行，但为了节省纸张，不久便改为每页印四十二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为了给一部《圣经》铸造足够的字块，古腾堡和那些技术工人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大约有两年。不过，一旦活字投入使用，他便可以在一位抄写员抄录一部《圣经》的时间内印刷一百八十部《圣经》。克里斯蒂安·詹森说：

> 印书这一复杂流程所需的每个要素，当时都已存在了。古腾堡的天才在于，将各种不同的流程都整合到一项连贯的工作中来。压榨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用它来印刷文本无疑是新鲜的。他的另一项巧妙的举措就是使用清漆。将清漆用于印刷，这在15世纪完全是件新鲜事，而古腾堡却能看到这正是其新技术所需要的。我们可以从制作《圣经》的过程中看出，古腾堡雇用越来越多的人，分配在不同的环节，以此加快整个流程的速度。既需要雕刻技艺娴熟的人，也需要擅长金属铸模的人，还需要精于木工的人。同样，你需要能自如处理拉丁文的人来排字，将那些金属字母拼在一起组成单词、段落和页面。这种人不那么好找，因为将金属字块排在一起，把手指弄得很脏，这可能并不是你在15世纪的大学里学习拉丁文时所憧憬的。接下来还需要能给字块上油墨的人，这是件很重的活，因为清漆有黏性而且很难去掉。再由某人将其放入印刷机，操作机器完成印制。最后，还得有人校对页面，确保成书的字符排列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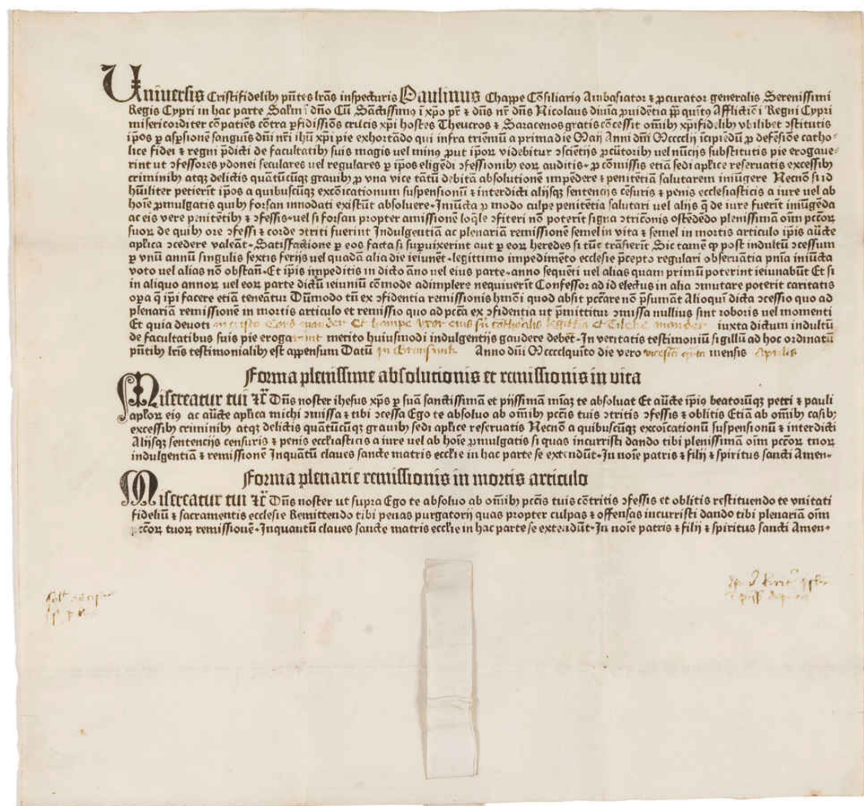
这些技能与技术此前从未像这样被整合在一起。

不过，古腾堡售卖的一直是半成品，就是未装订在一起的散页。买主得自行装订成册，再手工上色加以纹饰。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那部《圣经》就是这样操作的，而且非常漂亮。莱茵河使图书很容易被分销到更广泛的区域，而这种方式使得无论身处欧洲何处的任何买主，都能以他们及其读者熟悉的当地风格来装帧书籍。

尽管现在看来，这一商业模式及生产体系的经济可行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极具挑战性。古腾堡是个比较富有的人，但

他需要营运资金，用以购置原材料并支付工匠薪水，等等。在美因茨他能借到钱，也可以找到商业伙伴，尽管他并不是每次都无往不利。他还得在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经济体系中运作，宗教因素和财务因素对这个体系有着相同的影响。克里斯蒂安·詹森说：

> 所有现存的证据表明，15世纪时，民众会购买《圣经》并送去修道院，为自己的灵魂换取祈祷。倒不是说这些修道院还没有《圣经》，它们自己就有，而且还不少。但你若想为自己祈祷的话，《圣经》是一部非常适合送给修道院的书。所以在古腾堡印制《圣经》的另一端所连接的世界中，为逝去的人做祈祷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Universis Cristifidelibus presentes litteras inspecturis Paulinus Chappe Consiliarius Ambasiator et procurator generalis Serenissimi Regis Cypri in hac parte Salutem in domino ...

Forma plenissime absolutionis et remissionis in vita

Forma plenarie remissionis in mortis articulo

古腾堡印制的赎罪券：在页面下端填上你的名字。这个赎罪券上，买主保利努斯·沙普签上了他的姓名、日期及署名

克里斯蒂安·詹森概述了运作欧洲首个印刷业务的复杂性（当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业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他说：

> 古腾堡是个很精明的商人。但我们之所以对他如此了解，原因之一便是他经常因为资金短缺而惹上法律纠

> 纷。只要陷入法律纠纷，就会留下档案记录。悔婚，非法禁锢邻市高级公职人员，古腾堡总是以身试法。他借过钱，后来与某个能弄到钱的人合伙。我们之所以能知晓这一段，是因为后来两人合作破裂，在1455年对簿公堂。在印行《圣经》的同时，古腾堡需要现金来周转，所以他也印制其他东西，比如赎罪券——可以用来赦免你的罪孽。实际上，古腾堡生产的是预先定好的模板，然后留下空白处，以便赎罪券的购买者填写自己的名字和购买日期。这对教堂的日常事务管理是有用的，因为这意味着教堂不必雇人专门坐在那儿来填写这些内容了。这些赎罪券如今并不十分罕见，可见古腾堡当初一定印制了成千上万张。这样一来，既为购买赎罪券的忏悔者赎去了来世的罪孽，又给古腾堡带来了便利的现金流。

因此，无论是为逝者做祷告，还是为自己赎罪，中世纪晚期民众的虔诚贯穿于印制流程的每个阶段，在资金层面驱动了古腾堡的技术革新。同时，由于教会学校尤其注重讲授拉丁语，多纳图斯的《拉丁文法》便成了古腾堡另一本赚钱的畅销书。它是那时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受欢迎的教科书。

古腾堡发展壮大的生意因为1460年美因茨内乱而遭到严重破坏。但这促进了印刷版书籍在整个欧洲范围的传播。他的一些工匠离开美因茨，也将他们的技艺带至科隆和意大利。比如威廉·卡克斯顿，来科隆考察游历，然后于1470年前后将印刷术带回了英国。美因茨曾为印刷机的产生提供了诸多完美的条件，其理想的地理位置也保证了印刷版书籍无可阻挡的传播步伐。

埃利乌斯·多纳图斯《拉丁文法》中的一页，古腾堡印制于美因茨，1456年至1458年

用红色砂岩建造的宏伟的大教堂似乎在宣告着这座起初由罗马人兴建的城市的历史延续性。然而，在古腾堡所处的时代，美因茨不仅仅是一座由教会掌控的市镇，也是一个教会统治下且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的邦国。其统治者，即大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七位选侯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因茨大主教仅次于皇帝本人（详见第5章）。

美因茨坐落在美因河与莱茵河的交汇点附近，曾是众多采邑主教和自由城市的中心，它们都是帝国境内独立的邦国。紧邻的便是斯特拉斯堡，古腾堡曾在那里生活了很久并发展了他的那些想法；还有繁忙的贸易中心法兰克福；再往北则是科隆和荷兰的繁荣城市。这一片区域内曾有独立的王室、富庶的城市，以及国际化的市场。换句话说，文化消费群体异常密集，为印刷版书籍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能工巧匠便捷地从经济活动网络中的一个中心转到另一个中心。只有德语世界才能提供这样的网络。而当时德国的大河，如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以及内卡河等，则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分销体系。这些地方出产的商品能够被销往整个欧洲。



美因茨全景，1565年

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公众立刻接受了古腾堡特别的出版物，也基本接受了印刷版书籍。而且，关键是当时没有一个中央的政治权威来控制其发展。克里斯蒂安·詹森对此事的重要性给出了如下解释：

> 这意味着人们发现此前很难获取的文字信息，现在都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举个1485年的例子，一本弥撒书的评注本以德语手抄本的形式平安无事地存在了数个世纪，而后得以付印。但它刚被印出来，就遭禁止。美因茨大主教禁止的不仅仅是其中的评注，还包括译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所有通俗的表述。他的观点是，你怎能期望那些未经正规大学教育的民众，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除非你受过教导，知道该做何理解，否则你就会弄错。但这位大主教无法阻止人们在其领地之外印制这本书。所以降低价格并不是拓宽市场的唯一方式。这个问题还与那些现在拥有文本且可以自行解读的读者有关，当然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环境下。对印刷版书籍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活字本身成了一种商品。你可以售卖活字，

这意味着在1470年或1475年，成百上千的民众都可以开办印刷作坊。你根本无法控制这些。技术运作的方式与威权机构的掌控形成强有力的对抗。



1900年寄自美因茨的一张明信片，主题是纪念古腾堡诞辰五百周年（据推算）。

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上的松散状态为一种高度的自由提供了保证。所以六十年之后，当路德将其对兜售赎罪券（恰是那些使罗马教皇假公肥私的赎罪券滋养了古腾堡的生意）进行抨击的言论付印之时，他发现在德意志，印刷作坊不仅能将它们印制出来，而且与法兰西或英格兰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不同，根本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印刷。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自画像》，**1500**年

[1] 所谓“教区教堂”指基督教中作为某教区宗教中心的教堂。古腾堡就是在这座教堂受洗的。

[2] 贝特尔·托瓦尔森（1770—1844），丹麦雕刻家。

[3] 约1.82米至2.13米。

第17章 德意志民族的一位艺术家

大众汽车、阿迪达斯、彪马、梅赛德斯、汉莎航空，这些知名的德国企业都有知名的德式标识。比如说大众汽车上下叠在一起的字母“VW”，阿迪达斯的三道运动条纹，或者梅赛德斯的三叉星标。标识本身就是一项德国的发明。当时的印刷商制作出一套字标作为符号或图案，用以分隔或装饰页面。本章中，我们就来看看所有德式标识中第一个且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标识。它诞生于公元1500年前后，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仍被广泛认可，受到倾慕垂涎。大英博物馆版画馆内的许多藏品都有这个标识。这些藏品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些版画。它们上面均有一对设计优雅的姓名首字母，一个高高的平顶的字母A，中间一个横梁，两条支脚里面是一个字母D。它们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姓名首字母及标识。

丢勒是一位意义非凡的德国艺术家。他的那些画作及自画像，为所有德国人所熟知。他是位新型的艺术家，明显还挺自恋，可说是欧洲首位创作了如此之多自画像的伟大艺术家。他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艺术家是英雄，是明星，并全身心拥抱新的世界和新的技术。丢勒也是首位在全欧范围内出售自己作品的艺术家，为视觉艺术开拓了分销体系。早先，这个分销体系已经将印刷品传播到了遍及整个大陆的市场（详见第16章）。丢勒还是位全球性的艺术家。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当时许多德国人便是通过他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变化中的世界，以及这一时代正接触的那些全新领域不期而遇。他像莎士比亚一样，探索了生命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与博物学、宗教与哲学、性与风景。他像莎士比亚一样，也与宫廷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同时保持着独立的做派。丢勒的艺术创作不单是为了某一位资助者（有时资助者是皇帝本人），更是为了一个市场。他是位精明的商人（另一个与莎士比亚相似之处），也获得了不起的商业成就。基于所有这些缘由，丢勒成了一位伟大的德国艺术家。正如英国作家下意识地引述莎士比亚，德国艺术家时至今日也都在引用丢勒而几乎浑然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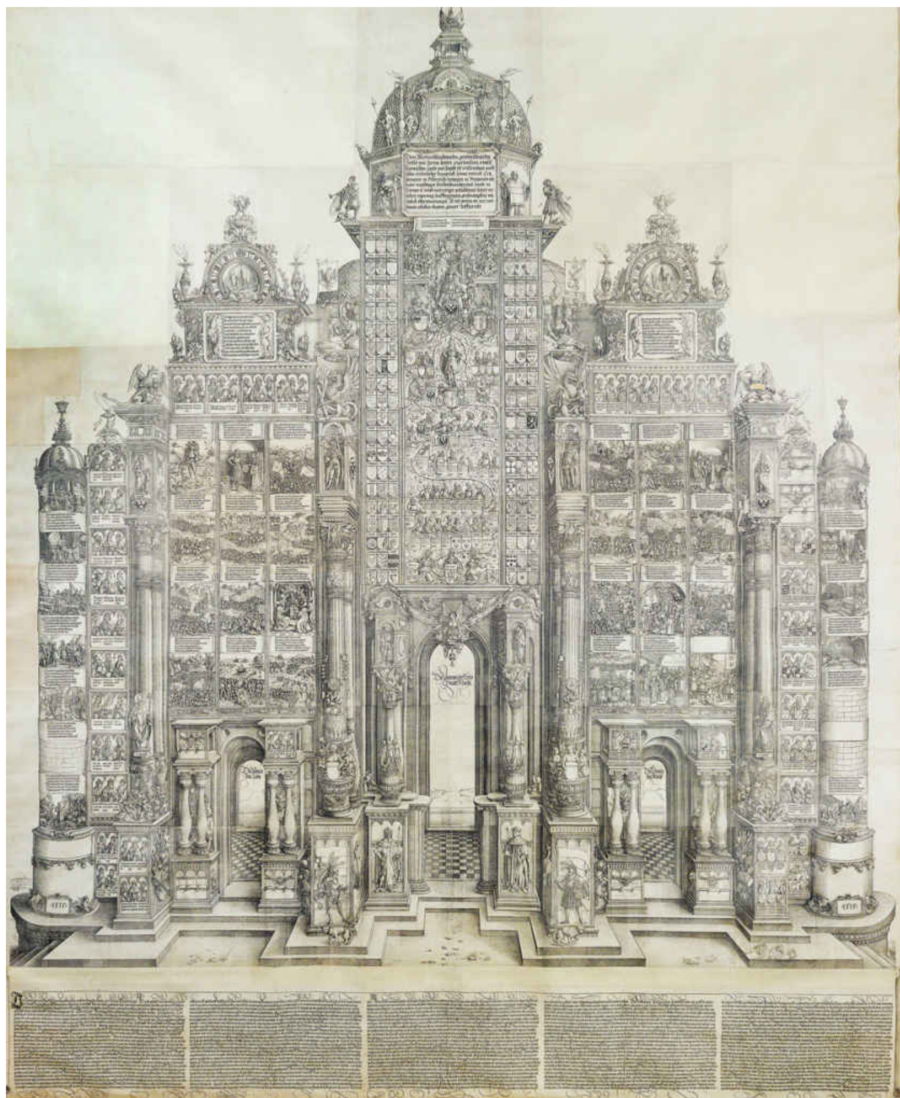
任何标识都不能被过度信任，专家们最近的一些发现还是挺尴尬的，他们认为目前大英博物馆一些带有“AD”字符的版画实际上都是赝品。朱利亚·巴特拉姆是大英博物馆德国绘画展部的主管。关于如何才能从那些仿作中辨别出真正的“AD”，他说道：

> 我不得不说，这有一定的难度。像丢勒的“AD”这样简单的设计，是非常容易复制的。很明显，丢勒去世后，到了16世纪末期，一旦原作真迹的供应已经枯竭，便有仿品出现以刺激版画的销售。每一位购买版画的人对“AD”组合标识都很熟悉，他们并不会真的太过担心所买的是否确是丢勒的真作。对他们来说，能有哪怕与丢勒有一点点关系的物件，就足够了。我们认为，丢勒

> 在1506年前往威尼斯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是为了找出那些正用他的名号来宣传兜售版画的人，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品牌标识。显然，这在纽伦堡也是个问题。在他非常著名的木刻组画《启示录》1511年版的背面，他加上了一段警告："所有剽窃与模仿我的作品的人都要小心"，以此告诫他们，这样做会受到惩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相较于画作本身被复制，他更关注组合标识"AD"未经授权被使用。看来，他并不反对其他艺术家复制他的画作。他真正在意的，是他们声称那些就是他本人的作品。

那些直接为某位资助人创作的版画，自然比较容易管理。在大英博物馆丢勒主题藏品中，有一件作品因其巨大的尺寸而引人注目。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版画之一，由一百九十五个单元（详见第306—307页插图）组成。这是一座用画纸拼成的巨型凯旋门，大约1515年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委托而制，图案上华丽地装饰着众多寓言形象及历史人物造型，宣扬着帝国统治的诸多益处。马克西米利安是首批认识到版画具有政治宣传潜力的统治者之一。版画中的这座凯旋门从未真实存在过，因为马克西米利安负担不起建造费用。不过他可以散播丢勒的纸质画作。首版印刷的时候，印量就不少于七百份。它们悬挂于帝国各地的市政厅及公爵贵族的府邸之内，（非常经济地）暗示着皇帝本人很快便可迎来胜利。

丢勒的故事始于纽伦堡，当时德意志南部一座富庶的帝国自由城市。中世纪帝王曾在那座哥特式城堡召见全德各地代表，查理大帝的皇冠也曾保存在那里（详见第11章）。城堡至今依旧守护着这座如画般的古城，正像1471年丢勒降生时一样。丢勒的父母生了十八个孩子。纽伦堡曾以金属加工业闻名（详见第19章），丢勒的父亲就是位成功的金匠商人。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首先受训成为一名金器匠人，而后才接受绘画方面的学习。他的教父安东·科贝格尔则专注于印刷术的新工艺。至15世纪90代初期，他已是德意志最成功的印刷商及出版商之一。正是那些印刷版画，经由遍及全德的分销网络实现了大批量的销售，使丢勒从一位本地艺术家成为一位欧洲名人，并且成就了他的声誉和财富。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凯旋门》，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于1515年至1517年

丢勒用以经营业务及创作杰作的居所至今仍伫立在那儿，作为商贸物流及艺术领域的大师，他在此生活工作长达二十年。现任丢勒故居负责人托马斯·绍尔特博士解释了当地的一些促使丢勒取得成功的条件。他说：



纽伦堡故城，**1945**年后重建，图左侧为城堡，右侧为丢勒的居所

> 丢勒可说是在一个恰当的时代出生于一个恰当的地方。公元1500年前后，纽伦堡正处在全盛期。当地有许多成功的商人，也有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学者，比如丢勒的好友、法学家兼学者维利巴德·皮克海默。城内还有大量的富人，他们同整个世界都有贸易联系，比如威尼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克拉科夫，以及奥斯陆等地，这些都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城市。这些联系都是非常紧密的，对丢勒很有好处，而且好处远比对一位传统的画家要多。他借助印刷来复制自己的艺术作品，因此他的那些木刻版画和金属版画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分发至欧洲各处。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集市、河流及商路将丢勒的画作广泛散播，就像当初高效地散播古腾堡印刷的书籍一样。

丢勒的那些版画是欧洲首次大批量生产的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丢勒则是首位掌握印刷术新工艺的伟大艺术家，他将木刻及铜版雕刻的地位提升至一个新水平。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信息技术，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这么叫。它们极大地提升了画作的数量，提升了一个人一生得见的各种有益的、令人惊奇的事物的数量。

丢勒与其贤能的妻子阿格内斯·弗莱一起在全德及更远的地方旅行。他们沿途售卖版画，拓宽那些画作的知名度及影响力。他的《启示录》出版于1498年，是西方艺术史上第一本由一位大艺术家绘制的印刷版书籍。《圣经》文本配上了十五幅木刻版画，包括《启示录》中著名的《四骑士》[1]。这个时机可正合适。那时许多民众相信，《启示录》所

反映的世界末日将于1500年降临，他们好奇地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而世界显然没有走向末日，即便如此，鉴赏家们仍继续称赞并购买那些具有强烈表现力的画作。丢勒的这部书是他自主出版的，为此他投入了大量资金雇用匠人技工制作木刻雕版。该书随后大卖，正如今天的《启示录》一样。他的版画如此畅销，让丢勒的后半生都衣食无忧了。



《启示录四骑士》，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于**1498**年

丢勒因其创作的铜版画而备受赞赏。制作铜版画是件极有难度且精细而辛苦的工作。不像木刻版画，它必须由艺术家本人在铜板上直接加工。丢勒的两幅铜版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制作精湛、内涵丰富的典范。《忧郁》中伟大的寓言形象静坐于众多物件及符号之间；《骑士、死神与魔鬼》中骑士骑着马勇敢地从死神与魔鬼身边经过。对于它们为何如此引人关注，朱利亚·巴特拉姆解释道：

> 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体现了相当惊人的技术成就，并且在主题上也相互补充。我们看到，骑士骑着马与魔鬼一起穿过岩石峡谷，忠诚的狗就跟在他身边。他的坐骑后面，也就是他的右侧，是死神。然而，他却无视死神，显得目标坚定而有生机。《忧郁》的主人公则身着厚厚的衣裙，上身前倾着静坐在那儿。她的狗是睡着的。她身边尽是些冰冷的几何形物件，画面背景是一派空旷的天启式景象。你能感觉到她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思索与创作的挑战中。不管怎样，她与骑士完全相对，后者骑在马上勇往直前，而她则安坐在那里。
>
> 丢勒于此展现了他技艺的极致。他对刻刀的使用驾轻就熟，点点线线交错呈现出光影明暗的过渡。能在黑白之间有这样的表现力是相当惊人的。这种精细水准的雕刻难度，是不可低估的。再也没有人完成过这样复杂的版画。那些线条刻画得是如此有层次。你得能用不同类型的刻刀表达这种明暗效果，比如忧郁者所穿丝质长袍的柔软纹理，还有骑士的那条狗身上软毛的效果，你都能从一缕缕狗毛的动态中看出毛皮下的骨骼形态。丢勒刻刀下的动物都是这样。曾有许多模仿者试图重现这两幅画作的风采，但在刻刀的运用上，没有人能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水平。戈雅[2]曾使用凹版腐蚀制版法，而伦勃朗[3]能用蚀刻工艺创作出类似效果，但丢勒是唯一能像这样制作铜版画的人。

这两幅版画并不单单以其精湛的制作技艺而著称。它们如此有名，以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已成为德国两个矛盾方面的孪生自画像，即骑士代表强而有力的行动，忧郁者则象征内省的沉思。很难设想，欧洲任何别的国家能在这些如此精巧与复杂的画作中构想自己。



《忧郁》，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于1514年



《骑士、死神与魔鬼》，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于**1513**年

在霍斯特·布雷德坎普看来，对这些版画及其重要意义的诸多阐释业已流传了数个世纪，并在德意志认同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他介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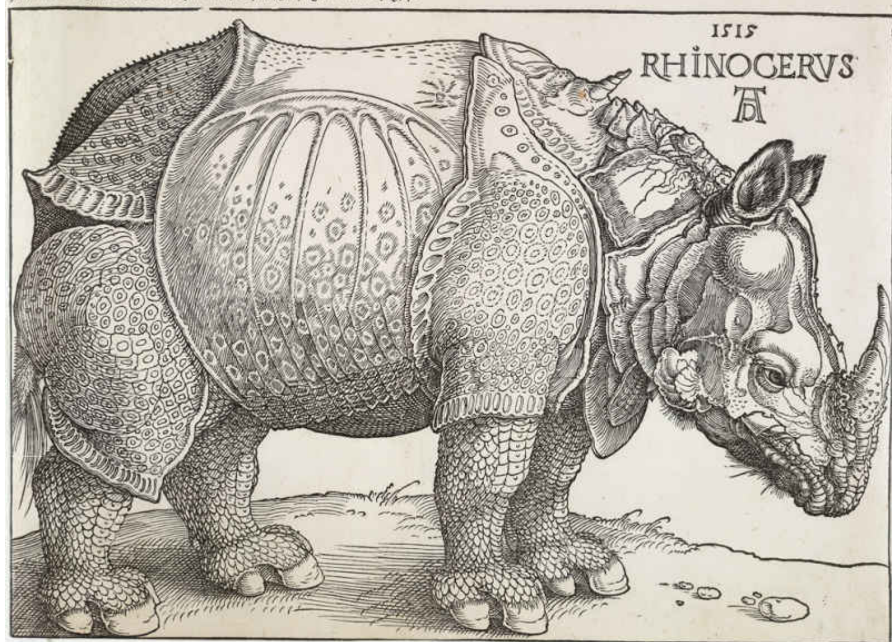
> 我想，人们不可能找到另外两件物品，能像它们那样在19世纪体现德意志精神的自我定义，获得我们所知的那些结果。骑士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局面中，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没有希望。他已经被魔鬼和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环境包围。这位骑士成了德国人自我定义的缩影，即无论时代变迁，始终拥有一颗铁一般的心，追随自己

> 选择的道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骑士成了坚定性的象征，也就是坚持自己的路线，无视前进道路上一切敌人或障碍。忧郁者则相反。她曾被视作德意志精神的象征，而这种精神与笛卡尔所代表的启蒙主义互补。也就是说，忧郁者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浪漫的替代选择。在这里，并非身心的机能决定一切，精神才是激励身体与思想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德意志精神被定义的方式，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深刻、更复杂。它也暗示着自我毁灭、行动无力及自我反省等元素，这些也可以导致疯狂。所以，这对于19世纪的德意志精神可说是个两极化的定义。除了这两幅作品，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如此清晰地（我是讽刺地说这话）展现德意志精神。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后的那些年月里，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力量，由于人们相信丢勒表达出了典型的德意志特质，大众再一次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1828年，丢勒在纽伦堡的居所成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此前，唯一一位有故居纪念馆的艺术家是米开朗基罗，那是在佛罗伦萨。艺术家中最具世界性且代表欧洲的丢勒，业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对此，托马斯·绍尔特说道：

> 人们得回想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也就是在数次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已四分五裂，对民族统一的渴望贯穿整个19世纪。1871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巧合，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赢得了对法国的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而在纽伦堡，人们庆祝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诞辰四百周年。人们不相信这些事件会偶然发生。那一刻，丢勒成了民族英雄。

德国民族英雄的身份（正如1871年胜利的缔造者俾斯麦所发现的那样，详见第21章），结果可能变成烫手的山芋。如果丢勒活在19世纪末期，并被告之他创作的《骑士、死神与魔鬼》是理查德·瓦格纳钟爱的版画，对于尼采而言象征着罕见的潜能，他或许会晃动卷曲的头发以示怀疑。他若得知自己的版画被用于戈培尔的宣传战，很可能将其视作自己20世纪的劫难。艺术史学者威廉·韦曹尔特在1936年写道："英勇的灵魂都热爱这幅铜版画，过去的尼采如此，而今的希特勒也一样。"和本书中谈论的许多其他成就和传统一样，当丢勒的作品被纳粹采用而遭玷污时，它承担着不受欢迎的险恶的污名。在1945年战后的人们的眼中，那位骑士不再是高贵而勇敢的斗士，而被看作与死神和魔鬼为伍的无法无天的强盗。毫不奇怪，现代德国的批评家已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另一幅伟大画作《忧郁》所呈现的那些创造性的挑战之上。



《犀牛》，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于**1515**年

但《忧郁》不是一个合适的终结。丢勒关乎丰富的人生和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与印刷和传播相关的新天地，而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他在安特卫普见到了科尔特斯[4]征服墨西哥后送回欧洲的阿兹特克宝藏。来自此前完全未知的文明的这些创造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道，对他而言，它们比神迹更珍贵。从世界的另一边出现了或许是丢勒最著名的一幅版画的主题——犀牛。1515年葡萄牙人将犀牛从印度带到里斯本，这是自古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在欧洲见到的第一头犀牛。丢勒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极为著名的木刻版画。此外，他还有以丑陋的巨猪和连体双胞胎为题材的画作，而这幅犀牛木刻版画便是他对以奇形怪物为主题的宽幅版画的流行做出的诸多贡献之一（迄今最为著名的一幅）。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这头犀牛的样子有点儿像来自侏罗纪公园的怪物。朱利亚·巴特拉姆对此解释说：

> 丢勒本人从未见过这种动物。他是参照一篇记者的报道来进行创作的。这篇报道对犀牛的外形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提到其鳞甲状外皮上类似于乌龟的斑点纹。显然在报道中的有些内容使它听起来像是套盔甲，因为丢勒让其表皮的各部分呈现出明显如盔甲一样的外观。它看起来非常凶猛，感觉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感觉与丢勒把这个巨型生物塞进一个小框有关，毕竟当时人们看到的犀牛都是这样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画的表现方式很聪明，犀牛的角顶着版画一侧的边缘，尾巴挤

> 在另一侧。而且丢勒还在犀牛嘴的下方添了些极普通的刺须，这是他的发明。这是他从所熟悉的那些动物身上借用的一个细节。于是，这头犀牛便有了一个如画中所呈现的完全可信的外观，也有了一种赋予它可怕的权威的力量。

这幅版画丢勒一生中印制了四千至五千张。木刻版画的优势之一是它们可在很长时间内反复翻印，即使细节往往已显粗糙。丢勒作为铜版雕刻师的自豪体现在他那无与伦比的技艺中，而版画《忧郁》中也有诸多令人称颂的细节。正因如此，丢勒很可能因为《犀牛》过于受欢迎而表示过些许懊恼——它确实是棵摇钱树，可也会成为他所有作品中最容易记住、最为出名的一个。

二百年后，德累斯顿的迈森瓷器厂决定在瓷器上呈现一头犀牛，以此作为展示。

那时候，人们早已经见过其他真的犀牛。但这家工厂并未参考真的犀牛，他们更喜欢丢勒的版画。就像之前及此后如此多的德意志人一样，他们通过丢勒的双眼看世界。





《萨克森奥古斯特二世与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路易·德西尔韦斯特[5]作于1720年前后

[1] 《四骑士》取材于《圣经·新约》最后一篇《启示录》的第6章。

[2]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版画家。

[3] 伦勃朗（1606—1669），巴洛克时期荷兰最重要、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

[4]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于1521年灭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并建立殖民统治。

[5] 路易·德西尔韦斯特（1675—1760），法国画家，曾担任奥古斯特二世的宫廷画师。

第18章 萨克森的白金

公元1717年，欧洲两位统治者间进行了一些异乎寻常的外事交易。其中一次交易的焦点是十八只约有四英尺高的中国青花瓷瓶。那一回，萨克森的统治者用他六百名最好的士兵，与普鲁士国王交换包括这些瓷瓶在内的一百五十一件中国瓷器。当时在柏林，那些士兵被冠以龙骑兵卫队的名号。而今，这些瓷瓶依然陈列在德累斯顿瓷器珍藏馆[1]，被称为“龙骑兵瓷瓶”。

强者奥古斯特，也就是那位萨克森选侯，是一位对所有门类的艺术品都充满激情，甚至是痴迷的收藏爱好者。不过，他对一种器物最狂热——瓷器，这在当时被称作“瓷器病”。他的六百名骑兵由德累斯顿一路向柏林行进，他们对那笔交易及自己作为瓷器转让费用的看法，未曾被记录下来。但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好地显示出当时被称为白金的中国瓷器的地位与价值了。它是舶来品，也很昂贵，因为它拥有欧洲瓷器所不具备的特质：坚硬、耐用、晶莹剔透、釉质细腻、不易损毁，而且相当美观。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欧洲无人能制作出在上述所有方面可与之匹敌的瓷器。



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于1717年换得的七只龙骑士瓷瓶

1728年，也就是那场极不寻常的礼物交换过去十一年后，萨克森与普鲁士之间发生了另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这一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造访了德累斯顿，款待他的是假面舞会和宴会。而后强者奥古斯特回访了柏林，并依照礼节给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多罗特娅带去了礼物。其中最贵重的是一套特制的瓷器，包括一只瓷碗和一只瓷盘，它

们现今都藏于大英博物馆中。看得出这套瓷器是专为普鲁士王后索菲娅设计制作的，因为瓷器中间的图案是普鲁士雄鹰，周围环绕的字符是她的名字。这套瓷器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它明显是中式瓷器——精致典雅、晶莹剔透，坚硬的陶瓷质地，但它并不是1717年龙骑士花瓶那样的白底蓝花。当然它也是以白色为底色，但这件艺术品展示了不同的风格，上面除红色、绿色、蓝色与黑色的图案之外，尤以金色纹饰最多，比如金色镶边、金色压花等。在这两次礼物交换所间隔的十一年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奥古斯特找到了在欧洲——更准确地说，是在他的故乡萨克森——制作中式瓷器的方法。他见证了德国现代化学史上首批伟大的成就之一——迈森瓷器。奥古斯特想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在柏林的对手与近邻，并以此炫耀一番。德国再一次（古腾堡是第一次）复制了一项中国的技术成就。



为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多罗特娅制作的迈森瓷器，**1730**年

在安德烈亚·曼特尼亚[2]于公元1500年前后创作的画作《东方三智者来朝》中，最年长的那位智者献给圣婴耶稣的礼物是黄金，就装在对欧洲人而言东方能够提供的最昂贵的容器——一件中国瓷杯中。曼特尼亚创作这幅画的时间是15世纪末，到了18世纪初期，瓷器的贵重程度丝毫未减。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人去探究它的制作方法。另一个原因是，将瓷器从中国和日本进口到欧洲是一项长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的暴利垄断贸易。该公司将瓷器运至阿姆斯特丹，其中的多数在那里很快流入奥兰治王室手中。荷兰共和国[3]世袭的掌权者都出自这个家族。

在18世纪德意志邦国之间竞争性的强权政治中，外交礼品不仅是个形式问题，它们同样是向其他公爵、王爵贵族或国王炫耀自身威望的一

种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得能拿出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今天唯有中国能将熊猫选作礼物。瓷器用于政治领域，科尔杜拉·比绍夫在此方面是位专家，她解释道：

> 外交礼品在近代早期相当于一种货币。对每一位王爵贵族来说，拥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诸如某种自己加工制作的产品，作为外交礼物，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每位王爵贵族都渴望找寻某种独特的东西，某种只有他自己能够送出的物件。可以是种天然物产，比如俄国沙皇赠送动物毛皮，汉诺威选侯则培育特种马匹，或者像法国一样，选用某种加工而得的奢侈品。勃兰登堡选侯实际上有两种独特的物品可作为贵重礼品送出，一是他们在波罗的海海滨采集到的琥珀（详见第3章），另一种是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选用的中国瓷器。他们通过与奥兰治王室的关系来获取那些瓷器。

很不幸，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没有什么特别之物，只好将他的骑兵充作礼物。然而身份地位的竞争愈演愈烈。公元1700年前后，神圣罗马帝国的三位选侯成为国王。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正式自封为“普鲁士的国王”（详见第3章）。汉诺威的乔治继承了大不列颠的王位，而奥古斯特自己则被选为波兰国王。比起那些选侯来，国王们更要有能力送出大礼。真正的王室需要有实力送出真正皇家的礼物。而奥古斯特手头长期拮据，这也是出了名的。

奥古斯特正处窘境时，为其解困之人十分偶然地落入他手中，更确切地说，是逃到了他那里。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都在找寻所谓的点金石，也就是可将普通金属点化成黄金的神奇公式。他们虽坚持不懈却屡屡受挫，约翰·伯特格尔便是其中一位炼金术士。公元1701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想检验一下伯特格尔自夸的炼金术，于是他匆忙地离开柏林，去萨克森寻求庇护。奥古斯特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向这位难民提供了保护。而后奥古斯特禁锢了伯特格尔，勒令他继续研究炼金术，用炼成的黄金填满自己的金库。乌尔里希·皮奇是德累斯顿瓷器珍藏馆的负责人，他继续讲述道：

> 奥古斯特将伯特格尔视作囚犯，并责令他炼制黄金。他当然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他的同伴埃恩弗里德·瓦尔特·冯·奇恩豪斯擅长发明创造，还是位数学家，也曾为研究制瓷的配方做过大量实验，却都未成功。他鼓励伯特格尔也去做类似的实验，而最后伯特格尔竟然成功了。他在1708年找到了正确的方法。秘密其实非常简单。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瓷器配方。他们就直接从大地取土，而中国那种白色黏土中含有长石、石英和高岭石等成分。伯特格尔必须分析出其中的不同成分。经过两年的实验，他成功地发现了坯料里必需的成分。他从萨克森和德意志其他地域获取白黏土，并将它们混合在一

> 起。他总是仔细地记录下曾用过的配料，以及所含矿物质的精确分量。就这样，很长时间后他终于成功了。

巫术已然让位于我们可辨识的实验研究。于是在萨克森，浮士德与魔鬼立约这一传奇故事的基础——玄之又玄的点金石，被合情合理的化学原理取代了。这一质变就发生在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普通泥土最终变成了白色的金子。



《从易北河右岸观望德累斯顿》，贝纳多·贝洛托作于1748年



伯特格尔红色陶瓷实验：（左图）中国茶壶，**1662**年至**1722**年；（右图）伯特格尔的仿制品，**1712**年制于迈森

这些瓷器当然不是真正的金子，但奥古斯特很快意识到他可将它们置换成黄金。最终，他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外交礼品及武器，同时也掌握了一种利润丰厚的潜在财源。对此，乌尔里希·皮奇解释道：

> 在确信伯特格尔制作出的瓷器的品质与日本或中国的别无二致之后，国王立刻决定在德累斯顿开办工厂。但几个月后，实验厂房还是太小。于是，他决定将工厂搬迁至迈森，也就是比较隐蔽的阿尔布雷希特堡，因为他想保有这个秘密，并维持垄断地位。一开始，奥古斯特责令仿制他自有的东方瓷器，这很快使迈森的工厂大获成功。所有人都想拥有这种装饰着中式及日式图案的瓷器。但几年之后，这家工厂变得更加自信，减少仿制，开始创制它自有风格的欧式造型及图饰的瓷器。真正的欧洲瓷器被首次生产出来。整个大陆都羡慕不已。

所有这些也就解释了奥古斯特于1728年赠予王后索菲娅·多罗特娅的那套欧式迈森瓷器的由来。那是他在首府德累斯顿周边烧制的他自己的瓷器。强者奥古斯特如今也成了富翁奥古斯特，或者说至少不再是窘迫的奥古斯特了。与发现并开发了大众图书市场潜能的古腾堡不同，奥古斯特对制作瓷器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想使瓷器保持其稀有性，只有富人或特权阶层才能买得起。这样，它高昂的价格便会给萨克森邦国的国库带来直接且持久的收益。这种情况的确持续了二百五十年之久。他大力推动迈森的发展，将瓷器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换来的不仅是现金，还有影响力。如果瓷器能替代欧洲餐桌上的金银器具，那将会带来丰厚的利益。于是萨克森的国宴上摆出了一系列精美的瓷器。其他王室家族也获赠礼品，希望以此鼓励他们也照此行事，来购买萨克森生产的瓷器。不过据科尔杜拉·比绍夫的观点，瓷器的普及也受到其他因素推动。她说：

> 17世纪时巧克力、咖啡和茶等饮品被引进欧洲，促进了对新式容器的需求。它们常常被做成热饮，与以往的饮品不同，这样一来金银或玻璃器具就不是很实用了。原本可以使用产自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杯具，但它们不太符合欧洲人的口味，而且尺寸太小。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它们也太昂贵了。饮用咖啡与茶正变得越来越时尚。而且很快，即便与宫廷没什么关系的人也能去得起咖啡馆了。起先是用陶质餐饮具，但它们很容易碎裂。随后很快就想到了萨克森新开发的瓷器。

同成套的瓷器餐具一样，成套的茶具和咖啡用具也出现了。

发明一种新媒介的乐趣之一就在于看看它有多大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展示萨克森瓷的非凡表现力方面，奥古斯特变得越来越雄心

勃勃，也越发别出心裁。瓷器的功用是如此强大，它不仅能与金银餐具一较高下，还可与用于雕塑的铜质材料相媲美。迈森开始制作一些小型塑像，渐渐地又烧制大一些的塑像，直至奥古斯特最终决定将所有王室奢华融于一体。

那时，所有强势的统治者都拥有私家鸟舍和兽园，以巨额开销豢养着从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珍禽异兽。这些珍禽异兽非常适合用于取悦外来访客，这会使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奥古斯特决定要造一间瓷器鸟舍和一座瓷器兽园。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而今你可以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看到它们。那些油彩鲜亮的形态较小的鸟儿，仿佛要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及矫健的身形，从高悬于墙壁的托架上腾飞、俯冲。地板上则是用白瓷制成的体态较大的禽鸟和走兽。这一切都令人惊叹不已。一只孔雀栖息在树上，尾巴垂挂下来。而另一只与活禽大小一样的孔雀则正骄傲地开屏。用一块巨大的无支撑的瓷片来表现微颤的竖起的尾羽，这无疑挑战着这一材料的物理极限。制瓷工艺已如此精湛，但不仅仅是在表现静态奇观。那些禽兽展示出了各种动态，正如自然界中的飞禽走兽一样，或自由飞翔，或哺育幼仔，或搏斗杀戮。两只狗嬉戏翻滚在一起，而一只狐狸正叼着一只鸡逃走。最凶险的是那些秃鹰。其中一只秃鹰的爪下正扣着一只长尾鹦鹉，而它的喙正啄着鹦鹉的心脏。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动物园，更是大自然的剧场，血色的尖牙利爪却通过耀眼的白瓷呈现出来。



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内的瓷器动物园

展馆中的明星是谁根本毋庸置疑。没错，是犀牛，或者说是那一对犀牛，一头棕色，一头白色。它们的原型是丢勒那幅著名的木刻版画（详见第17章）。那幅版画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德累斯顿的雕刻家决定不必再费事去观察一头真正的犀牛，而只需将那幅难忘的二维画面

直接以三维呈现即可。迈森的犀牛制瓷巧妙地融合了那些伟大的德意志成就，印刷机、丢勒的天才、瓷器的发明，所有这些都在18世纪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被整合在一起呈现出来。对此，乌尔里希·皮奇说道：

> 我想，奥古斯特是想向全世界展示他有能力制作出精美的瓷器。而且他希望人们会从那家工厂订购迈森的瓷器。这对工厂来说是一种公关活动。正因如此，他的儿子时常向其他王爵贵族赠送礼物，希望以此来促使他们将迈森瓷器引入各自的宫廷。这确实奏效了。比如，许多意大利的贵族就委托迈森制作带有他们徽盾图案的瓷质咖啡饮具，等等。



瓷质犀牛，约翰·戈特利布·基希纳作于1730年



将民主德国首任总统威廉·皮克的肖像画在迈森瓷器上，1955年

效果持续发酵。至18世纪中叶，瓷器很快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在德国如此。维也纳与巴黎，柏林与伦敦，德累斯顿的成功被遍及欧洲的瓷器工厂复制。迈森瓷厂一直是德国制造业最负盛名的一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它因斯大林所要求的巨额赔款而沦为牺牲品，用来补偿俄罗斯被纳粹摧毁的苏联工业。工厂的大部分设备被拆除，其中的收藏品也被运往东方。乌尔里希·皮奇解释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 1945年，那些瓷器藏品和其他来自德累斯顿的艺术品一样，都被运往苏联。它们在1957年才得以回归，或者说其中大约九成在这一年回归。1962年，瓷器藏品被安置在茨温格宫（德累斯顿城内的王宫）。工厂也重新开始生产，但只针对西方市场。你在民主德国是无法买到迈森瓷器的，完全不可能。你只能通过秘密渠道获得。走私出口瓷器或是携带瓷器离开民主德国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国家能从瓷器出口中赚很多钱。1990年两德统一后，迈森工厂真的非常成功，因为“迈森”仍被认为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当然现在情况已有所变化，它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作为奢侈品的定位也几乎被遗忘了。

在和谐发展的20世纪，瓷器作为统治者特权象征的这一旧时传统又意外复现，迈森瓷厂曾接受委托，为重新统一前东德的最后一任首脑埃里希·昂纳克制作官方用瓷。可以说，无论谁主政萨克森，都得和瓷器关联在一起。

经由古腾堡，德国证明了自己不仅能模仿中国的印刷术，还能有所超越，而迈森的制瓷也一样。今天，瓷器不再是王爵贵族的专享之物，而且很容易，或许是太容易被认为是种理所当然的器具。我们在任何主街道上的店铺里都能买到高品质的瓷器，并用来饮用热咖啡而不致烫伤手指或嘴唇。而三个世纪以前，要有多少个士兵作为转让费，才能换取这样一个价值一英镑的杯子呢？



银杯，纽伦堡出产的杰作，**16**世纪晚期

[1] 该馆位于德累斯顿茨温格宫（Dresdner Zwinger）。馆内藏品首推源自中国及日本的传统瓷器，尤以中国明清两朝青花瓷为重。此外便是展示萨克森当地的制瓷工艺，特别是迈森出产的制品。

[2]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画家、铜版雕刻家。

[3] 荷兰在16世纪初受西班牙统治。16世纪60年代中后期爆发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79年北部一些省份及城市成立乌得勒支联盟（地名“Utrecht”荷兰语音近“玉特莱希特”），以便相互支持一并抗击西班牙军队；1581年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君主并成立联省共和国（七省联合，亦称荷兰共和国）。后于1795年因法国入侵而终结。

第19章 金属匠作大师

代表德国的声音有哪些？大多数人的清单，若按音量由小到大、人数由少至多排列，或许会包括一首巴赫的康塔塔、一部贝多芬的交响乐、一部瓦格纳的歌剧，以及一个最为响亮的声音——德国赢得世界杯冠军时人群的欢呼。所有这些都是闻名于世的声音，所有这些都是所谓德意志的组成部分。但我认为，另一种声音也同样属于德意志属性的一部分，那就是金属间碰撞的声音，由精密工程仪器发出的轰隆声。

若要给这类声音列一份清单，人们或许会有如下建议：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上安全可靠的引擎转动声，甲壳虫是战后德国工程技术的标杆，全球共售出二千一百万辆（比福特T型车的销量还要多）；一组黄铜组件运转时的嘀嗒声，那是一座制作于16世纪的高精度天文装置，它既可用来计时，也能显示月相，此外还有很多功能；一架19世纪中叶的布谷鸟挂钟（尽管电影《第三人》中哈利·莱姆的言语略显轻蔑，但它几乎肯定是德国人造的，而不是瑞士人）；一块16世纪的怀表发出的嘀嗒声，那是一项出自纽伦堡且极受重视的德国发明，彼得·亨莱因被普遍认为是发明者，他的姓名业已铭刻在路德维希营建的瓦尔哈拉先贤殿（详见第9章）；而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便是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中嘎吱作响的木材声，这个早期德国精工技术的综合体将会改变世界（详见第16章）。此外还有许多备选项能被囊括进这部体现手工技艺的交响乐。

德国的设计与手工技艺、艺术性与创新性在金属制品与工程技术方面的表现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为突出。德国的工程技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德国人自己也清楚，他们一直都擅长制造各种精密的产品。而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包含艰苦训练过程的学徒养成体系正是实现这一切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是这一体系使这个国家得到复兴，而今它仍在发挥作用。

许多人，包括那些不太了解歌剧世界的人，都知道纽伦堡曾出过“名歌手”[1]，那是中世纪时期由诗歌与音乐方面的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行会，他们遵守严格的规则，竞相创作出最为美妙的歌曲。但正如德国其他城市一样，纽伦堡也出过很多别的艺术形式和工艺门类的大师。这些专业人士都经过了长年的训练，达到了他们技艺的巅峰。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纽伦堡的金属匠人。他们的训练与全欧洲各地一样，都以行会体系为基础。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各种行会，涵盖了需要熟练技能的制造业的方方面面，从蜡烛工人和毛皮加工者，到木匠及玻璃吹制工……此外还包括各种金属匠人，比如铁匠、铜匠、银匠和金匠。不用说，金匠的地位最高。

这些行会简直像是秘密社团，入会资格受到严格限制，以确保质量和行业标准，以及同等重要的——价格。各个行会的师傅通过学徒制度培训下一代工匠。你先是作为一名学徒入行，用四到六年时间在作坊里帮工，学徒期满后便成为一名熟练工匠，接着花数年时间在不同城市间

游历，为不同的匠作师傅帮工，直至你申请加入行会而成为一位独立的当家师傅。而要完成申请，你得提交三件能展示你已具备相应能力的“杰作”。这个词语如今倒变得有些贬值，已经宽松地适用于任何高品质的物件，却失去了挑战与竞争的意味。这些作品能体现出你是否适合做一名匠作师傅。而要成为一名金匠师傅，你得完成一枚印章、一枚宝石戒指以及一件杯具，而杯具的造型必须是耧斗花。在纽伦堡，这样造型的杯具是三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件。大英博物馆就有一件精美绝伦的藏品（详见第334页），一件制于16世纪末期的银杯杰作，它被认为是马丁·雷莱因的作品。但它完全不实用。耧斗花其实并不适合用作饮具的造型。它有六瓣深长的裂片，啜饮时哪怕再小心，也难免会漏洒出来。但在每瓣裂片上都精雕细刻着取自古典神话的场景，象征着一种美德或一种恶行并附有一句拉丁铭文。纹饰布满了每一处可加利用的空间，比如装点上一条蜥蜴或一只甲壳虫，或至少勾勒出一条美丽的波浪线。这杯子显然不适合用于饮酒，它只是用来展示制作者在他的行当里已然是一位师傅，具备高超的技艺、丰富的学识，享有相应的地位。它也意味着，你作为观众或客户，甚至你若自认是位饮者，那就会看重这些技艺，并支付他们不菲的酬劳。这件纽伦堡的耧斗花杯器杰作完美地述说着德国金属匠人长久以来所享有的重要地位。

现今人们尚不清楚，由轻巧的小型时钟演变而来的怀表首次是在哪儿出现的。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都极有可能。19世纪的德国人对此并没有疑问。得以入奉瓦尔哈拉先贤殿（详见第9章）的德意志伟人中，有一位来自纽伦堡的非常重要的锁匠兼钟表匠——彼得·亨莱因（1485—1542），他被认为是怀表的发明者。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首批怀表基本上是小型的便携式时钟，非常稀有而昂贵，可以作为挂坠佩戴或系在衣服上。真正的怀表在16世纪末期才有所发展。汉斯·施尼普来自莱茵兰的施拜耶尔，众所周知是当地金属匠艺行会的成员。他所制的一块怀表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表盖与背壳都精雕细刻，背壳上雕的是传统的壶形和花纹装饰，表盖上有镂空，可以看到下面银质珐琅表盘上的数字。那些时刻数字出现两次，分别以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显示。所有数字“2”都用字母“Z”来代替，这也是德式钟表的特征。这块怀表还有闹铃功能，也会正点响铃。



纽伦堡的城市风光，选自《纽伦堡编年史》[2]，**1493**年

德国的工艺技术能发展到如此高度，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处在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当时，欧洲许多主要的跨地域商路都要经过德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莱比锡和法兰克福这种大型贸易展会城市，还有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它们在金属加工领域至18世纪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德一流的金匠。西尔克·阿克曼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馆长，她说道：

> 16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地域广袤，境内众多王室为拥有最好的工匠而相互竞争。所以，德国与总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完全不同。在德国，纽伦堡是众多商路汇聚之地，因而在当时被称作“欧洲的准中心”（Quasi Centrum Europae）。各种贸易都经过纽伦堡，甚至包括象牙，你能想象的所有商货。

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律框架内，自治小邦国越来越多，这使得在地方层面实施各种高标准及各类限制性协议与规范成为可能，比如限制作坊规模等。在伦敦或巴黎，一家兴隆的作坊能不断扩张，承接由其成功带来的任何生意。而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等帝国自由城市，一桩大宗委托不得不分派给多家作坊。因此结果就是，他们首先要相互竞争，随后依据那些统一的高标准进行协作。



镀金黄铜怀表，汉斯·施尼普制作，1590年前后

这种协作的方式非常成功。这一模式帮助确立了德国的金银匠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地位。而德国工人在其他金属制造领域同样享有盛誉，足以制造各类科学仪器设备。他们的工作跨越各种领域，达到了最高水准，将学术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技能同数学及创造性艺术技巧融为一体。大英博物馆便藏有这样一件凸显复杂工艺的展品：它的外观呈矩形，尺寸如一个小钱夹，被称为天文组具。这个金属盒内有一套小型仪器，可让你完成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可用它以不同方式判读时间；它有多种精微且复杂的日晷，正中是一个极复杂的小星盘，相当于当时的计算器，可用来定位行星及其他星体，并通过月相计时，等等。它也能帮你找准方向，有点儿像现代卫星导航；它还有多种类型的小时系统，因为不同的城市使用不同的方式计时。特别是它可用来占星。对

此，西尔克·阿克曼说道：

> 这是来自海尔布隆的约翰·安东·林登在1596年制作的一套天文组具。它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智能手机。它是置于盒中的宇宙：你想要的那些功能，比如计时、在地球上定位自己，以及确定日期等，它都能满足。它甚至还设计了隔间来摆放你的制图工具。天文组具可以有不同的外形及尺寸。它们通常是圆的，看起来有点儿像你腰带上用链子系着的挂表。实际上它们能以你喜欢的任何式样呈现，而这一套却极不寻常，是一本书的形状。不妨想象一下，三部智能手机像三明治一样叠在一起，那就是它的大小及厚度。而它内置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示了其所有者的财富，像这样的主顾能吸引那些最优秀的工匠。可同时它也显示出其所有者参与了最新的科学讨论。这件物品来自16世纪末期，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那时哥白尼的革命刚刚发生。1543年，哥白尼论述宇宙日心说的著作出版，告诉世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1582年，就在这套组具制作出来前不久，教皇颁布了一套带有闰年规则的新历法。于是，各种天文及数学图表都需要重新刻印。拥有这样一件器物，就能显示出你参与了那些讨论。我们也许会想，其所有者是否真的清楚那套组具的全部功能呢？就像今天拥有最新款智能手机的那些人一样，他们只会用到手机全部功能的一小部分，因此这样一件物品的所有者虽然拥有全套器具，但日常也未必会使用那些功能。这其实就是一件用来炫耀的器具。

无论是不是件用来炫耀的器具，它都显示了在1600年前后，德国南部的精密仪器技术在知识及工艺层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促进德国手工技艺发展的行会体系一直运作良好，几乎毫无变动地持续至19世纪初期。随后，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兴起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给那些古老的手工艺传统带来了严峻的压力。那些行会为阻止众多工厂开业而竭力斗争，因为工厂生产制造的廉价产品会侵蚀行会的市场。但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历史学者伯恩哈德·里格尔对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史特别感兴趣。他说：

>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消除了行会所拥有的传统影响力，行会体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行会的衰落在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表现得最为强烈。1810年前后，普鲁士邦国开始大规模改革，以此作为对遭受拿破仑毁灭性打击的一种回应。普鲁士人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许多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废止行会的各项权力。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工业革命的众多基础之一。那

些行会被边缘化，结果就是几乎任何人都能开创自己的生意。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自主经营的自由，它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都在持续发展着。



天文组具，约翰·安东·林登制于**1596**年



黑森林布谷鸟挂钟，1860年至1880年

对消费者而言，那是一场影响一切的革命，波及范围从精密金属器具到布谷鸟挂钟。如此处插图所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架布谷鸟挂钟便讲述着德国工业制造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架挂钟产自黑森林，它的外观正是人们想象中的布谷鸟挂钟的样子。它有一个新哥特式建筑风

格的外壳和一个雕刻精美的圆形钟摆。在布谷鸟门和屋顶山墙上还有更为精细的雕饰。挂钟的基本结构虽然简单，但设计及装配的每个层面都是高质量的。对于19世纪时一些德国工业的发展方向，这是个不错的范例，即面向生活消费品进行低端生产，但始终保持足够高的技术品质，用以维持可靠的信誉（而“德国制造”一如既往都是机械制造品质的标签，比如当时一些美国产的布谷鸟挂钟就谎称是“德国制造”来进行促销）。投资精密金属制品的富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渴望以合理价位购得可靠产品的日常消费者所取代。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有一件德国产品以合理价位体现出可靠性能，并且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树立了德国工程技术的形象，那便是大众甲壳虫汽车。

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制造出首批内燃机，也是德国人，尤其是戈特利布·戴姆勒与卡尔·本茨，生产出了首批实用汽车。普通的德国人起初并不是这种全新工艺技术的受益者。戴姆勒-奔驰制造出了高级汽车，但它们却是针对富人的豪华汽车。像美国福特T型车那种大众用车的理念在德国正缓慢起步。而据伯恩哈德·里格尔的观点，这一现象与当时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诸多经济后果。他说道：

> 20世纪20年代，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德国民众刚够负担一周去看一两次电影的开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产阶级在战争债券上投资巨大，也损失惨重。“一战”和随即于1920年前后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事实上使作为消费者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绝大多数民众实在已经没有多少资金。于是，主要消费群体转向大众，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是德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在英国及法国，中产阶级比德国更为广泛。这从汽车保有量水平来看是很明显的。英国和法国有着远比德国强劲且更加发达的汽车保有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汽车制造业才成为德国人的强项。德国在之前当然也有汽车工业，但那首先且主要是豪华汽车工业。



坐在一辆早期款大众汽车中的希特勒，近旁俯身的即费迪南德·波尔舍，**1938年5月**

虽然魏玛政府曾一直着手做出改变，并且业已开始规划高速公路网络，但当希特勒1933年掌权时，他依然震惊于德国的汽车保有量竟是如此之低。纳粹党决定，对德国进行机动化改造应该成为一个关键政策。这将显示出专制政权的优势，当然同样会使民众满意，也能证明德国与美国实力相当。因此，希特勒下令费迪南德·波尔舍设计一款结实耐用、易于维护且性能可靠的汽车，而这款汽车还得便于一个仅有少量储备资金的国家大规模生产。它被称为“Volkswagen”，意即“大众汽车”。伯恩哈德·里格尔记述了它的历史：

> 波尔舍为这一设计项目筹备了几乎无限的资金，随即开始工作，最终结果便是我们如今熟知的甲壳虫汽车。那是一个高品质的设计。它采用风冷式发动机，非常稳固耐用，所以你可以把它停在户外。也就是说，你不必非得有一个车库，这对当时那些并不很富有的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稳固性同样很重要，那意味着汽车不会需要太多的保养，维护运转的花费也低。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款留有20世纪30年代物资匮乏痕迹的汽车。对一个本质上贫乏的国家进行大众机动化改造，这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款车一直没有投产。纳粹政府虽然在沃尔夫斯堡开办了一家大型工厂，但受战事爆发的影响，从来没有进行过生产。然而，如果真的生产了，那将会成为一场经济浩劫，因为希特勒曾经随意间坐下说道：“我们要让这款车的售价低于1000帝国马克。”这基本上就是个

> 象征性的价位，并没有谁曾做过预算合计。而一旦他们开始在第三帝国进行计算，所有经营管理人员都会神经崩溃，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在经济上将会是破坏性的。



大众汽车位于沃尔夫斯堡的生产线，**20**世纪**40**年代末

事实上是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量产了甲壳虫汽车，供其驻军使用。但那时没有哪家英国制造商有兴趣接手生产，1945年至1946年，英国汽车制造商对其所做的评价之一便是“这一交通工具并不满足一辆汽车基本的技术要求。它对普通买主毫无吸引力”。但当工厂被交还给德国人时，德国工程技术的各种表现元素便汇聚在了一起。纳粹帝国业已完败，从其经济、社会及政治废墟中新生的民主国家西德借助新发行的货币德国马克（详见第27章），艰辛地重建了在品质与创新方面的传统信誉，在汽车工业领域更是如此。这一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德政府对重建学徒培训体系的坚持，涉及不少于三百四十二种不同的行业门类，无论哪种产品，都确保尽可能最高的工业标准。对此，伯恩哈德·里格尔解释道：

> 甲壳虫汽车从来不是奢侈品，但它秉承了德国制造业持久信誉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它的品质。甚至当上世纪50年代这款汽车供不应求之时，该企业仍然全心专注于品质。甚至首席执行官在50年代中期都会亲自阅读技术检验报告，并曾给他的员工下发备忘通知，要求确保有人在某处发现的一个碰撞噪声不会再重现。而那条原则也很简单：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这种极高的品质；我们无法

> 接受任何缺陷。这种对于维持高品质的德式执着的成功还有某些心理上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那两次军事挫败，致使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失去了一切——这种执着实际上是对那些打击的一种补偿。



蔡司位于耶拿的工厂内的学徒，东德，**1949**年

高品质确保了全球性的巨大成功。我们如今将甲壳虫汽车视作典型的德国汽车，在许多方面它也确实如此。但它远远不止于此。它是战后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德国的崭新招牌；而这一国家是民主的、和平的，也是西方世界全新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伯恩哈德·里格尔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比曾经为摧毁旧德国贡献巨大的美国更能体现这一情况。他说：

> 一些发展变化促使德国成为我们所知的汽车大国。首先是经济奇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两番，大多数民众有了全新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能力。民众真正想要购买的首批商品之一就是汽车。其次是国际经济起飞，许多德国汽车制造商转变为出口企业，其中大众公司尤为突出。早在1955年，大众销往国外的汽车就比在本国出售的还要多。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成功传奇。对大众公司来说，最大且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就是美国，那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这是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美国人一想起西德，首先想到的不是曾经的敌国，而是冷战中的一个盟友。因此，大众甲壳虫汽车的出现，凸显了美国占领政策以及冷战初期举措的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最受重视的市场提升了国家知名度，而它基本上也为复兴“德国制造”这个特别

重要的标签做出了贡献。



从汉堡海运至美国的大众汽车，**1950**年**8**月

原先以简陋的低端技术起家的大众公司，现在拥有高技术含量的奥迪品牌，而它那句醒目的宣传语——“突破科技，启迪未来”（Vorsprung durch Technik），而今在德国国内外都闻名遐迩。但这句宣传语也阐述了重要的一点。21世纪的德国汽车工业已然重获16世纪德国金属精加工领域的良好声誉，回归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纽伦堡耧斗

花杯杰作以及技艺精湛的天文组具所反映出的优良传统。金属匠作大师仍是德国人。



一家人在他们的大众车旁野餐，20世纪50年代



沃尔夫斯堡，2011年



年轻的包豪斯同仁在魏玛，**1922**年前后

[1] 瓦格纳曾参考多部文学与戏剧作品，于1862年至1867间创作了著名的三幕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该剧于1868年6月首演。

[2] 这是哈特曼·舍得尔（Hartmann Schedel）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亦称作《舍得尔的世界编年史》，1493年于纽伦堡首次印行，分拉丁文和德文两种版本，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德国印刷工艺的重要标志。舍得尔1440年生于纽伦堡，是位医师、人文主义者及历史学者，1514年卒于此城。

第20章 现代的摇篮

在1919年战后的混乱中，柏林深陷于左翼与右翼众多派别间的激烈斗争。新近选出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并未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选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召开会议，而是将会址定在魏玛城的剧院。这是选择了一个更安全的场所，或许更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更安全的传统。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帝都柏林曾将德国引至战争与崩溃，新生的共和国讨论宪法的地点没有选在柏林，而是在德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歌德与席勒长期生活的城市，确切地说恰是在上演他们剧作的那座剧院。他们所倡导的追求世界性和人性化的“魏玛古典主义”[1]无疑是德国至高的文化成就，连同他们的思想及道德的权威，将共同塑造并激发新生的魏玛共和国。1919年，为德国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始于选择一种更妥当的过往：不是普鲁士，而是魏玛。

今天，在魏玛德意志民族剧院的墙上有一块铜质铭牌，上面记有“在这幢建筑里，德意志人民经由他们的国民议会，制定并于1919年8月11日签署通过了魏玛宪法”。那醒目而简洁的铸字是由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2]设计的。就在同一年，即1919年，格罗皮乌斯本人受诸多历史悠久的德意志价值观启发，在魏玛创立了另一新式机构，这就是那所在建筑、艺术及设计领域闻名全球的学校—— “包豪斯”。



德意志民族剧院墙上的铜质铭牌，铸字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设计

这个最为现代的运动却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包豪斯”（字面上由“Bau-Haus”组合而来，即“建筑-房屋”）这一名称本身指的是建筑师及石匠的工作间，它们曾是德国哥特式大教堂中常设的固定场所。在新的包豪斯，格罗皮乌斯希望将中世纪行会的协作传统与最严密的现代设计原则及工业生产的巨大潜力整合起来。那些传统价值观将为前所未有的广大公众带来高质量的新产品。正如魏玛共和国一样，位于魏玛的包豪斯将凭借德国过往的价值观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而实际上，包豪斯重塑了整个世界。若没有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首创的简洁实用风格，今天我们的城市与建筑、家具与字体排印等，都是无法想象的。



新当选的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于1919年2月11日在魏玛德意志民族剧院的露台上发表讲话，前景为歌德与席勒的塑像



彼得·克勒于1922年原创设计的摇篮，至今仍在量产

有一件器物完美地概述了这场运动的美学特质，那就是在1922年由时年二十四岁的学生彼得·克勒设计的一个摇篮。它现藏于包豪斯博物馆。正像众多包豪斯风格的器物一样，它仅由简单的材料制成——此次选用了木材，使用纯几何造型，并用三原色涂饰。摇篮本身呈三角形，约1米长，带有两个几乎是正方形的斜面。它的尖角朝下，两端三角造型的三个角被固定在一个大圆框上。轻推木制圆框，摇篮便晃动起来。但由于它的重心很低，尤其是里面有寝具和婴儿时，它并不会翻倒。这是一件美观、简洁而实用的器物，仅用到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又明快地饰以红、黄、蓝三色。这就是完美的包豪斯。任何一个睡在这摇篮里的幸运的婴儿都会将世界想象成有序、平稳且光明的样子。魏玛包豪斯博物馆的负责人乌尔丽克·贝斯特根博士将摇篮视作包豪斯教学的一个典型范例。她说：

> 彼得·克勒已经将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色彩理论用在实践中，于此可以看出包豪斯的原则。康定斯基对包豪斯的学生们讲授过，几何造型都有对应的颜色，比如三角形对应黄色，正方形对应红色，而圆形则对应蓝色。所有这些你在这里都能见到。你还可以看出，克勒已经缜密地考虑到摇篮的实用性。比如两侧各有一个柳条板，利于空气流通，这样婴儿躺在里面就会觉得很舒服。他仔细研究材料的特性，设法协调功能与形式，这里他选用的是弯曲的胶合板。这些都是包豪斯在魏玛教授的工业

> 设计的核心原则。在许多方面，它们都接近于古老的中世纪行会体系。《包豪斯宣言》读来就好像他们要修筑这样一种教堂，在那里，学生、教师与手艺匠人亲密地一起生活，一道工作，仿佛一个社区。

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版《包豪斯宣言》里这样写道：

> 建筑师们、雕刻家们、画师们，我们必须回归技艺！因为艺术不是一种“职业”。在艺术家与手艺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艺术家只是更高层次的手艺人。在灵感迸发的瞬间，超越了意识，天堂的恩惠会使他的作品绽放艺术之花。但对每位艺术家而言，娴熟地掌握一门技艺是最基本的。创造性想象的主要源泉即在于此。
>
> 那么让我们创建一个手艺人的新式行会，摒弃那些等级差别，破除手艺人与艺术家之间自大而傲慢的障碍。让我们一起期待、设想并创建未来的全新架构，它将融合建筑、雕塑与绘画于一体，有一天它将从百万工匠的手中飞升至天堂，象征着一种全新的信仰。



包豪斯的大师们在魏玛包豪斯楼舍的屋顶，**1926**年。从左至右：约瑟夫·阿尔贝斯、欣内尔克·舍佩尔、吉奥格·穆舍、拉斯洛·莫霍伊-纳吉、赫伯特·拜尔、约斯特·施密特、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马塞尔·布罗伊尔、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莱昂内尔·法宁格、龚塔·施特尔策、奥斯卡·施莱默



银质茶壶，玛丽安娜·勃兰特作于1924年至1929年



魏玛包豪斯的金属加工间，19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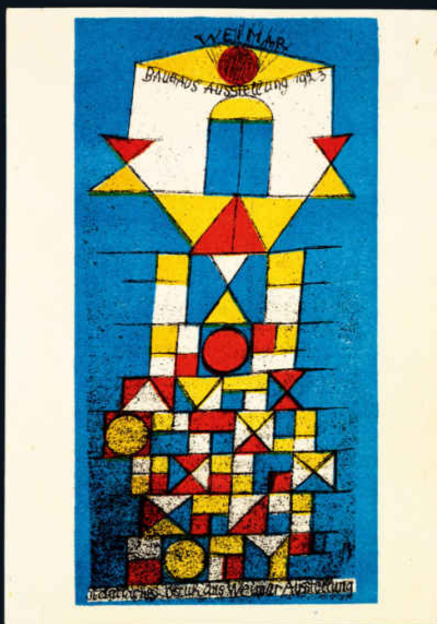
诚然，包豪斯明显从中世纪获得了灵感，但它也决意运行在工厂林立的现代世界。从一开始格罗皮乌斯就很清楚，纯粹的艺术与实用的工艺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必须合二为一。因此，格罗皮乌斯不仅邀请了执业艺人，也邀请了如约翰内斯·伊藤、保罗·克利、莱昂内尔·法宁格、瓦西里·康定斯基等艺术家来这所新式学校任教。那位战前在慕尼黑倡导抽象艺术的俄国画家康定斯基，就对学校教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精神与实践应该结合起来；实用性绝不是美的对立面；大规

模生产将承载着艺术家或手艺人的创造力，并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走向数量庞大的新公众。彼得·克勒的摇篮最初就是为工业化量产设计的。今天它仍然在生产，人们可以通过遍及全球的网络购买。为此，格罗皮乌斯一定会感到高兴。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在一所 “纯粹”艺术与“应用”艺术并存的学校里，那个摇篮的诸多特性确实与包豪斯的平面设计原则相符。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在之前的诸多德意志传统中，创新的甚至是革命的包豪斯怡然自得地占据了自己的位置。1923年包豪斯为宣传学校的作品而举办展览，师生们为此设计了几款请柬，这也成为包豪斯最为出色的创新范例（详见第364页）。甚至今天看来，它们都像是处于时尚前沿的抽象艺术品，并将康定斯基的理论提升到了一种令人愉悦的精致的新高度。但在尺寸、图案和效果等方面，它们显然参照了二百年前歌德在魏玛制作的一系列小卡片。歌德借用这些卡片来阐释他的色彩理论，而康定斯基当然了解并研究过它们（详见第147页）。安睡于克勒摇篮中的包豪斯宝宝，于无意之间继承了德国的行会传统、中世纪的建筑实践、康定斯基的色彩理念和令人赞叹的成就，同时还继承了启蒙运动中的科学探索，以及一百多年前歌德在这同一座城市中进行的多种研究。此前从没有哪种革命性的运动曾如此稳固地扎根于历史。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下定决心，包豪斯无论有怎样激进的原则，都应与政治无关。但这在魏玛共和国紧张的氛围中无疑是一个无望的乌托邦梦想。1924年，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在图林根的权力。他们从一开始就资助包豪斯，但接替他们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这些继任者将资助金削减了一半。









用于包豪斯展览的明信片，魏玛，**1923**年，由瓦西里·康定斯基（左上）、保罗·克利（右上）、拉斯洛·莫霍伊-纳吉（左下）及赫伯特·拜尔（右下）设计



艺术学校，魏玛，建于1904年至1911年，包豪斯首处校舍



包豪斯位于德骚的学校，由格罗皮乌斯于1926年设计，1945年损毁严重，1976年修复

因此，1925年包豪斯关闭在魏玛的校舍，迁往萨克森的德骚。而那里的政治辩论愈演愈烈。格罗皮乌斯于1928年辞职。他的继任者汉内斯·

迈耶将学校进一步导向左翼政治势力，他于1930年被解职，之后由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暂时负责了一段时间。然而，当纳粹赢得对德骚的控制权并且强迫学校又一次搬迁时，真正的危机来临了。学校这一次是迁往柏林，因被纳粹斥责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最终于1933年闭校。不过，若说纳粹痛恨包豪斯在政治上的立场，那么对于包豪斯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态度更为矛盾。乌尔丽克·贝斯特根继续讲述道：

> 纳粹一直都明白，现代化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新的工业设计来维护他们的权力。他们虽然痛恨民众与包豪斯有所接触，却需要包豪斯的作品和技术专长。有一张照片很出名，照片上的希特勒就坐在一张可能是由包豪斯设计的钢架椅上。而瓦根费尔德，这位包豪斯最为著名的设计师之一，便得以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正常工作，不受任何干扰。纳粹在意的问题并不是包豪斯设计了什么，而是它所代表的“自由与开放”。



希特勒倚坐在一张包豪斯风格的钢架椅上，**1928**年

1933年以后，尽管很多师生能继续工作，比如瓦根费尔德，但也有许多离开了德国，将包豪斯的理念与技艺传遍全球。“流放中的包豪斯”在耶鲁大学特别强大，正是在那里，概念派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与包豪斯不期而遇，并且敏锐地察觉到它的原则与宗旨。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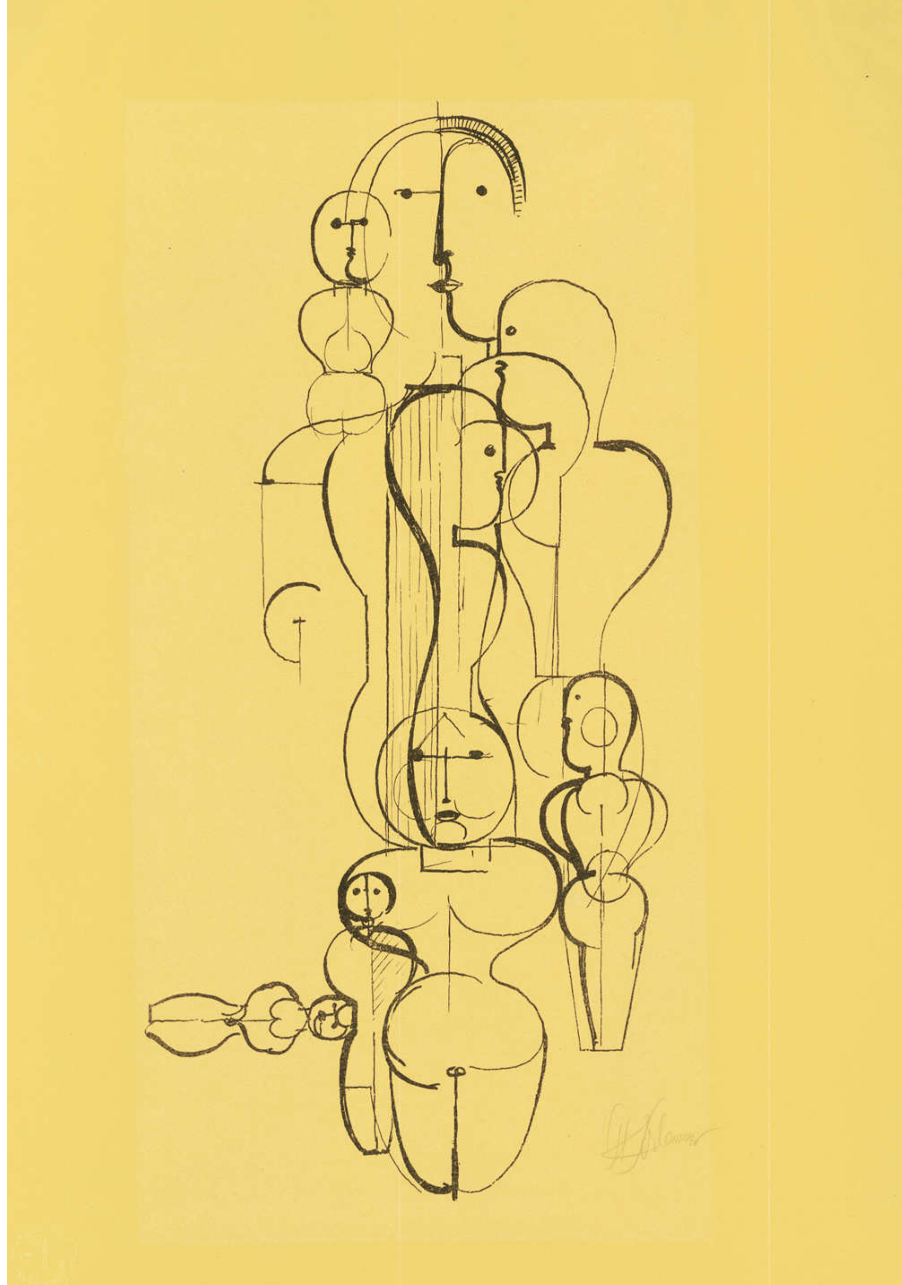
> 当时，他们正尝试找寻一种方式来整合视觉文化的所有方面，也就是将绘画教学与设计、家具设计与平面设

> 计、平面设计与字体排印、字体排印与建筑等统统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领域便得以相互配合。而后有一种将真诚和纯粹带给那些材料的渴望。你若仔细观察原材料的自然属性的话，材料本身就会告诉你该如何使用它。但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专享。而是尝试寻找一种方式，将美妙的事物带到普通民众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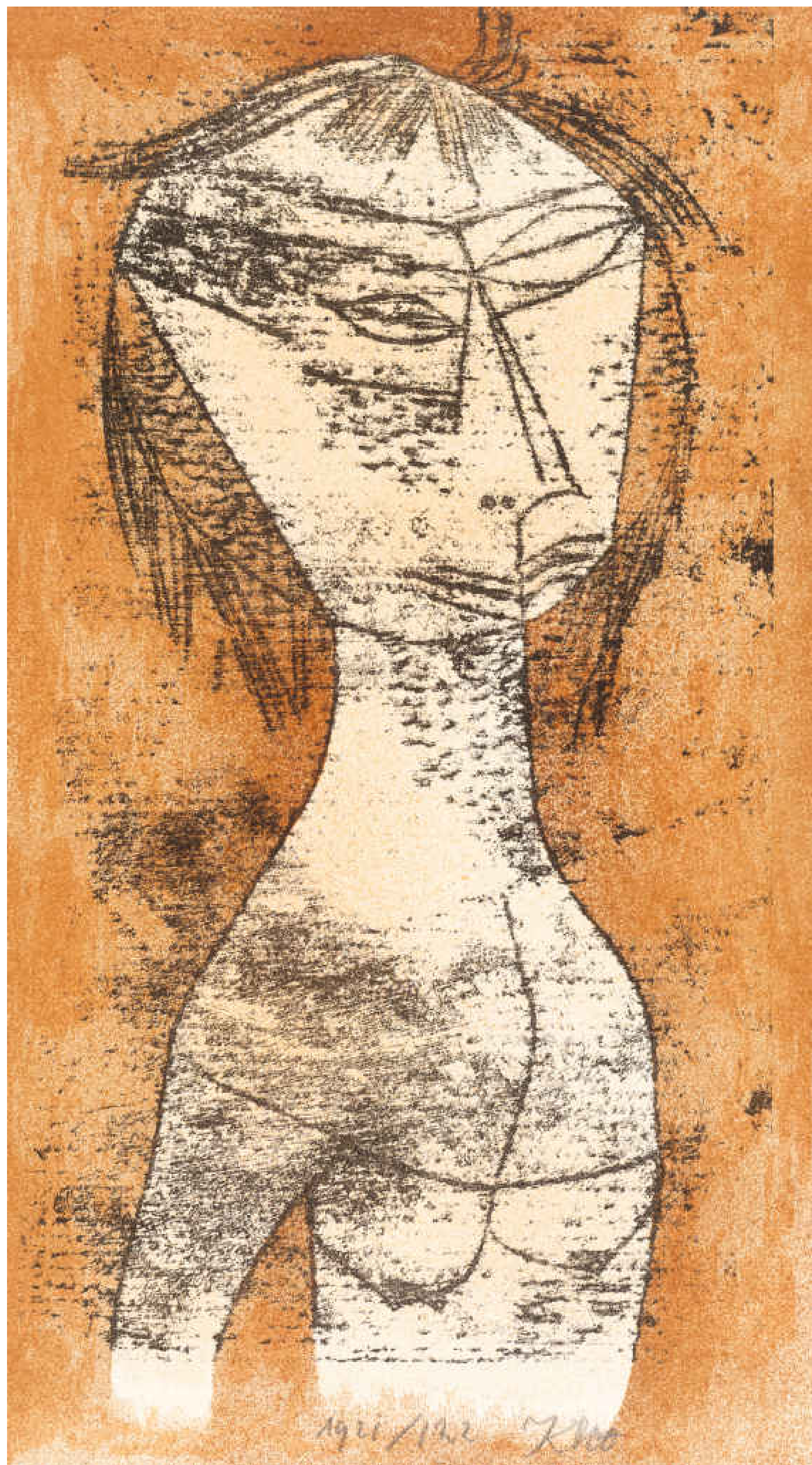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这些理念都在包豪斯首批出版物中以视觉形式表达了出来。那是1921年出版的一套合集，内含学校大师们创作的十四幅平版画，以《新式欧洲平面艺术》（*Neue Europäische Graphik*）为题。看一眼标题页（详见第368页），就足以让你明白是怎么回事。迈克尔·克雷格-马丁说道：

> 对世界的重新审视开始了。字体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处理。每个字母明显是手工雕刻、手工制作的。字母的大小不同，彼此间相互重叠，比例和线条粗细也有多种变化。它的表现力很丰富，体现出手工效果，图形化风格，还动感十足。

包豪斯首部合集《新式欧洲平面艺术》的书名页，由莱昂内尔·法宁格设计，19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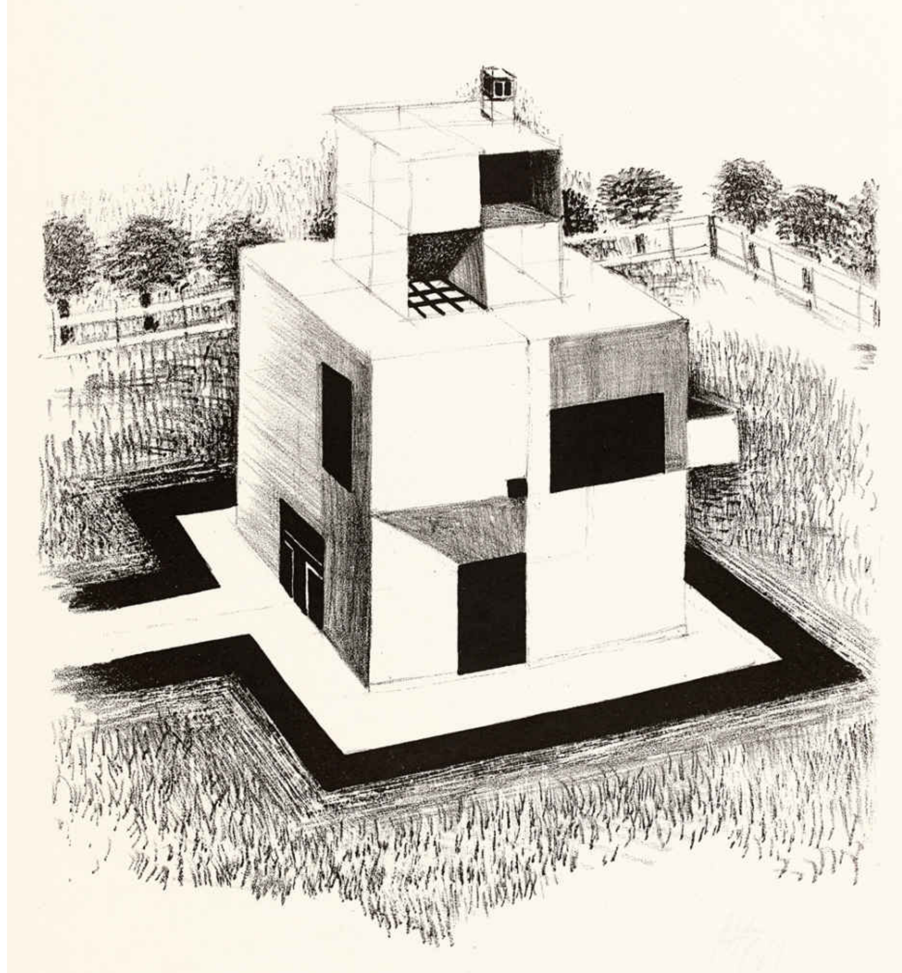
《形体设计》，奥斯卡·施莱默创作，摘自《新式欧洲平面艺术》，**1921**年


1921/112
Klee

《内在光明的圣徒》，保罗·克利创作，摘自《新式欧洲平面艺术》，**1921**年

书名页上的那些字母由莱昂内尔·法宁格精细生动地设计出来，为整部合集奠定了基调。这部作品自始至终找不到丝毫对这个世界长久以来的教条式的认识，这实在是不同寻常。在这部合集中，奥斯卡·施莱默创作的人体造型的系统化抽象草图（Figurenplan KI，详见第369页），与背面保罗·克利那幅带有强烈个性化宗教理解的《内在光明的圣徒》（*Die Heilige vom inneren Licht*）相映成趣。还有一页比其他页面更能集中体现包豪斯的设计理念，那就是约翰内斯·伊藤的平版画作《白人之家》。它既像是印刷形式的幻想，又像是一幅建筑设计（详见第372页）。对此，迈克尔·克雷格-马丁说道：

> 它像是一幅效果图，你可以展示给客户，介绍一幢房屋的样子。它是一幢几何造型的房屋，一个立方体上叠着一个立方体，再叠着一个立方体。窗户都呈严格的矩形，没有框架，也没有接合物，根本没有任何装饰元素，只是黑色和白色交替。很有意思的是，伊藤并不是一位建筑师。他最出名的是他的色彩理论，而这幅版画却是张黑白相间的建筑图纸。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现在看着它，可以想象出这幢房屋而今可以被建造出来。它符合与现代设计有关的所有特性。包豪斯的确创立了现代世界的形貌。这幢房屋的几何造型也极其引人注目，它缺乏对称性。纳粹的建筑风格几乎总是对称的，是一种权势的表现。在这儿，我们有了这件与之对立的作品。包豪斯因此被纳粹党视为一种左翼的冒险。它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愿景，表现出对普通民众来说，乌托邦是什么样子。



《白人之家》，约翰内斯·伊藤创作，摘自《新式欧洲平面艺术》，**1921**年

1933年后，在德国仅存在一种正当的乌托邦设想。对曾支持包豪斯诸多理念与理想的许多人而言，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购得那套合集的纺织品制造商埃里希·格里茨，于1934年作为一位犹太难民去了英国。1942年，他将合集连同其他珍贵的版画一并赠予大英博物馆，以此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但最重要的是为了确保早前那个不同却更高贵的德国所出品的这些杰作可以幸存于世。对迈克尔·克雷格-马丁而言，包豪斯不仅仅是幸存了下来。它在20世纪20年代以多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对此，他说道：

> 包豪斯真正的后继者是“宜家家居”（Ikea）。宜家就是包豪斯所梦想的一切，对简单而设计优良的器物进行规模量产，以低廉价格面向广大受众。包豪斯设计的所有了不起的家具今天都仍在售卖，而无论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在当今，它们看上去都极具现代感。包豪斯构

> 想的很多设计在当时实际上是无法制造的。你没法以那样一种方式拉弯金属，肯定也不能对它进行大规模生产。直到如今，我们才研发出了可以实现他们的设想的技术。

在德国，关于包豪斯的记忆依然强烈。不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1989年以前生活在德国什么地方。对此，乌尔丽克·贝斯特根解释说：

> 在东德和西德，包豪斯有着两派不同的传统。在西德，包豪斯一直是真正民主的标志。比如包豪斯的学生以及像格罗皮乌斯一样的老师曾前往美国或英国，而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或1968年回到了德国。他们代表着民主。年轻的联邦共和国想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他们接纳了包豪斯。毫无疑问，包豪斯代表着他们想要的东西。
>
> 在东德，他们尊崇汉内斯·迈耶的传统。迈耶曾在位于德骚的包豪斯学校任教，是位共产主义者。他的格言是“人民的需求重于奢侈的需求”（Volksbedarf anstatt Luxusbedarf）。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包豪斯的办公室，**1924**年

不难看出，民主德国为何会将迈耶的观点接纳为包豪斯的核心意旨与成就。他在民主德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众多受益人之一就是我们介绍的那个摇篮的制作者。包豪斯关闭后，彼得·克勒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纳粹政府严禁克勒向公众展出他自己的画作与设计，但像其他一些包豪斯学生一样，他得以作为一位自由建筑师及电影布景设计师来谋生，直至1945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　克勒在迈耶的支持下

返回魏玛，任教于建筑与视觉艺术学校，即现今的包豪斯大学，后于1963年以教授身份退休。他成功回归绘画创作，退休生活以此为主。他度过了稳定而专业的一生，于1982年逝世。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既非流亡者也不是殉道者，尽管他认识许多那样的人。今天，在互联网上，他与他的摇篮都举世闻名。

在重新统一的现代德国，包豪斯对哲学、技术、实践、精神、社会及美学议题的融合有着深刻的吸引力。对此，乌尔丽克·贝斯特根说道：

> 只将包豪斯简单地看作某种风格或是某些特定对象，比如预制构件的房屋或包豪斯出品的精美器物，这是不可能的。包豪斯意味着在设计领域的一种社会实践，至今在德国仍然是一个火热议题，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设计师都在借鉴包豪斯及包豪斯的理念。密斯·凡德罗告诉我们，包豪斯是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哲学，这一观念在德国非常盛行。

[1] 所谓“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实际上是后世对那一时期德国思想及文学领域发展历程的一种概括性表述。从时间上来说，广义主要指19世纪中受维兰德、歌德、赫尔德与席勒四人影响的历史时期，约至1832年歌德逝世为止，因而他们也被称为魏玛古典主义的“四大巨星”（Viergestirn）；狭义则指歌德与席勒交往共事的约十一年时间，即1794年二人相识至1805年席勒逝世。

[2] 瓦尔特·阿道夫·吉奥格·格罗皮乌斯（1883—1944），德裔美籍建筑师、包豪斯创始人。

第五部分 每况愈下

1871年，当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告诞生时，妄图扩展疆域的德国取代了法国的传统角色，成为欧洲近邻国家的麻烦源头。接下来的七十五年间，德国既制造又遭受了空前规模的大灾难。这些规模巨大的灾难很难理解。本书第五部分就聚焦了一些个体的经历和日常之物，就像透过棱镜来审视那些黑暗的年月，以及压在每一位德国人心上的沉重记忆。



俾斯麦向日耳曼尼亚递交“统一之剑”。木版画，**1895**年前后

第21章 铁匠俾斯麦

17世纪80年代的凡尔赛镜厅，惊人地展示了镜面玻璃的新技术。其中映射着看似无穷无尽的花园、耀眼夺目的枝形吊灯，天花板上还有一组夸张的油画，画中的路易十四世（也许是战神马尔斯？）耀武扬威地渡过莱茵河，进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继而战胜并羞辱了他。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高调宣言：法兰西取得了胜利，法兰西至高无上。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接受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之皇冠，成为皇帝威廉一世：

> 我们，蒙上帝恩泽的普鲁士国王，鉴于德意志诸选侯及众自由城市业已向我们发出一致呼声，通过建立德意志帝国来恢复并继承沉寂逾六十年的德意志之皇帝尊号，另据德意志联邦宪法之相应规定，谨此宣告，我们将此视作对共同祖国的一种责任，响应德意志诸选侯及众自由城市这一联合呼吁，并接受德意志的皇帝尊号。[1]



《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安东·冯·维尔纳[2]作于**1885**年。

画中以白色礼服凸显俾斯麦的重要性（当时他实际着蓝色礼服）。此画是皇室赠予俾斯麦的一件礼物



铁匠形象的奥托·冯·俾斯麦

这份强有力的声明不在柏林宣布，而是于普法战争正式结束以前，在凡尔赛宫同一间镜厅宣布，这并非巧合。数月前，普鲁士在梅茨[3]和色当对拿破仑三世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此后，这便是心理层面的最终胜利：它是对两个世纪间法国侵略的回应，是对丢失阿尔萨斯的回应，那里曾被路易十四世占领，而今复归德意志帝国；也是对耶拿战役后拿破仑侵占普鲁士以及普鲁士所受屈辱而做出的回应；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对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终结的回应。这就是新皇帝提到皇帝头衔空置六十余年时他所表达的意思。两个世纪后，命运与历史的车轮转向

了。在镜厅宣布的欧洲大陆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再是法兰西，而是德意志。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了；而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冉冉升起。

使所有这些得以实现的那个人，堪称这项外交与政治领域惊人成就的工程师，他便是奥托·冯·俾斯麦。外国人憎恶他、惧怕他，本国自由主义者也痛斥他的威权主义，但在许多德国民众眼中，俾斯麦是位英雄。他过世之后，公众捐款在全国各处兴建纪念碑，不过你也可以把俾斯麦带回自己的家中。在19世纪末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俾斯麦小型塑像，但那款用铜和陶制作的塑像最令人着迷，极少有可与之媲美的了。它大约1英尺高，展现了铁匠形象的俾斯麦。谢顶，挽着袖子，身着皮质围裙，手握铁锤，中年俾斯麦以可靠的乡村铁匠的形象站立在他的锻造台前。

砧台基座上挂着一个马蹄铁，但俾斯麦并非在打制马掌。他在锻造武器，如他所言，他打造的铁将与血一起重塑德意志。铁砧上是一柄剑，砧前靠着一面已锻造好的盾牌，上面饰有象征皇室的德意志雄鹰。这个认真的不辞辛劳之人的塑像立在家中的桌子或壁炉上，可时常提醒人们，德国历经一番斗争，才在欧洲诸国中占据适当的地位，最终从法国侵略中摆脱出来，变得强大而安全。这样的小型俾斯麦塑像被大量生产出来，广泛地分销至各处，正如英国斯塔福德所制维多利亚女王陶质造像一样受欢迎。它们承载并延续着俾斯麦作为“德意志荣誉捍卫者”与“国家安全坚定守护者”的传奇。

正如我们在第14章所见，自抗击拿破仑的战事爆发以来，铁就成为普鲁士认同的核心象征。俾斯麦之所以与“铁”产生密切关联，致使他在众多绘画与雕塑中常以铁匠形象出现，并且被称为“铁血宰相”，这一切都与他早在凡尔赛宫庆典近十年之前所做的一次演讲有关，当时的俾斯麦身兼普鲁士王国首相与外事机构国务秘书之职。当时有人认为，1848年的革命是德国错失的重大机遇。俾斯麦则在演讲中对那些持此类观点的人嗤之以鼻。绝对没有这种事，他说道，1848年（详见第15章）就是一个错误，而德国的未来将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 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位置并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取决于其实力。普鲁士必须聚合自身力量，并维持至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此前已错过多次。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划定的普鲁士疆界于国家正常生存不利。决定当代重大问题的并非空谈或多数人的决议——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铸成的大错——而是铁与血。

我们在英语中引用俾斯麦的言论时常常提到“血与铁”，但千万要记住，俾斯麦先提到的其实是铁。据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教授的观点，这其中的差别意义重大：

> 铁，这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原料，意味着战争或军事冲突，因为武器都是用铁制造的。当俾斯麦提及，未来德国的斗争不会靠议会的华丽演说与报纸文章来赢得，而只能通过铁与血，他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至俾斯麦

> 发表演说时，铁所意味的远不仅是武器，它也代表着工业强国的实力。这在俾斯麦说那番话时几乎是看不到的，那正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德国起步的工业革命初期。不过，它一旦发生，即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德国军事实力的极速扩张非常引人注目。德国人几乎赶超了其他所有人，而这与铁有莫大关系。毫无疑问，倘若没有普鲁士工业经济的先进与雄厚实力，1866年和1870年俾斯麦对抗奥地利及法国的战争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所以，铁已经不单单意味着武器，还包括高架桥梁、铁路网，以及以先进武器装备作战所必需的工业实力。

我们乡村小铁匠的微型砧台，却代表着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工业经济。

奥托·冯·俾斯麦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地主阶级、容克贵族，却被表现为体力劳动者，就算他不会因此感到震惊，恐怕也会觉得难以置信。他生于1815年，恰是在滑铁卢战役与维也纳会议之前[4]。维也纳会议创立了一个延续自神圣罗马帝国的、由自由城市和众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详见第15章）。19世纪30年代，自由派与激进派都首次认真提出了统一德意志的要求，当时俾斯麦正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后来，他放弃学业去当了一年的预备役军官[5]，接着回到勃兰登堡的家中打理家产。本来故事至此或许就结束了。然而在1847年，一个保守政治团体中的友人们安排他当选为柏林新一届普鲁士议会的议员。在那里，他赢得了保守派保皇主义者的名声。他的传记作者乔纳森·斯坦伯格[6]提及俾斯麦对1848年诸革命事件的反应时说道：

> 他很乐见革命走向终结，部分原因当然是他在政治上反对革命，但同时也因为他看到革命的失败为他创造了一些机会。1854年时他三十九岁，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虽然未受过外交培训，但他谋得了外交部门中最好的差事之一——被派往法兰克福出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的代表。在那里，他学习业务并发展了他的理论。如果革命成功了，俾斯麦永远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份差事。

正是在法兰克福，俾斯麦首次遇到并理解了更广泛的德国中产阶级（Bürgertum）的政治动态，也了解到他该如何引导这种力量。下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俾斯麦接连作为使节出使，从法兰克福起步，再到圣彼得堡及巴黎。套用他自己的名言[7]，他开始意识到“选择的艺术”。随着他的实用主义的发展以及对政治理解的加深，他逐渐认识到在欧洲列强中存在一些根本的弱点与矛盾，可以利用来实现德国统一而无须牺牲普鲁士的力量与地位。他于1862年8月访问伦敦时，向东道主本杰明·迪斯雷利[8]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乔纳森·斯坦伯格对俾斯麦的言辞描述如下：

> “很快我将不得不接掌普鲁士政府。无论有没有普鲁士议会（Landtag）的协助，我首先考虑的会是对军队进行改编。一旦军队进入一种令人敬畏的状态，我会抓住第一个绝佳借口向奥地利宣战，随后解散德意志邦联并吞并那些小邦国，进而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德国统一。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对女王的大臣们说这些。”他们听得目瞪口呆。返回的路上，迪斯雷利陪同奥地利大使抵达他的官邸，就要分别时，迪斯雷利对他说：“小心那个人，他说到做到。”迪斯雷利重视俾斯麦无疑是对的。俾斯麦确实想到说到做到。

俾斯麦制订了计划，翌年就着手将其付诸实施。当丹麦国王于1863年11月离世时，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把丹麦诱入两场激烈而短暂的战争，为普鲁士赢得了石勒苏益格公国。奥地利则取得次好利益，获得了较小的战果——荷尔斯泰因。

三年后的1866年，俾斯麦在确保法兰西中立并取得意大利支持后，突然向奥地利发难，且再次智胜对手。奥地利为赢回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与包括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内的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德意志诸邦国结成联盟，发起战争。那是一场灾难，一切在七周内结束。“闪电战”（Blitzkrieg）一词首次使用即在此役。如今俾斯麦建立起一个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北德意志邦联，并使普鲁士在德意志事务中占据主导角色，而他自己则是邦联首相——“铁血宰相”。

欧洲对这位政治“艺术家”做出的“选择”惊讶不已。彻底击败了整个德意志的传统主导者奥地利之后，俾斯麦如今可以处理法兰西这个历史上的头号宿敌了。当时，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针对由谁来接任国王的问题，法兰西与普鲁士双方进行了艰难的磋商。俾斯麦通过修改一份外交照会，暗示普鲁士国王与法国外交部长彼此侮辱，以此制造他所需的事端。数天之内法国人便如他所愿地宣战了。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写道：

> 我一直认为，与奥地利的战事结束后，自然将有一场与法兰西的较量。我毫不怀疑，在重组整个德意志之前，这是很有必要的。

对组织混乱的法国人取得的一系列迅捷而彻底的军事胜利，将这位“铁匠”同他的国王引领至凡尔赛。正如俾斯麦在1862年所预言的那样，新的德意志帝国历经铁与血的锻造而诞生。

虽然取得了所有这些外交及军事成就，但俾斯麦与他的国王（而今是他的皇帝）之间的关系却从来都不和顺。实际上他们都性情不定，有时头脑也不够清醒，会突然发怒打断对方。两人间有过许多激烈争执，其中之一恰于威廉在镜厅发表演说之前爆发。1701年，勃兰登堡选侯没法自称“普鲁士国王”（ King of Prussia），不得已便将就着用了“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这个头衔。而今威廉希望自己能被称为“全德意志皇帝”[9]。俾斯麦知道如此一来定会激怒邦联内的其他君

主，因此他坚持用“德意志皇帝”这个称号。威廉仅仅将成为那个统一的、采用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威廉大声喊叫着他正失去所有的一切，并对其子抱怨说他正“为了这顶污秽的皇冠”而放弃“荣耀的普鲁士王冠”。他有三周没有和俾斯麦讲话。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

> 我们接受皇帝尊号，希望德意志人民将会获得恩赐，在国家疆界内的持久和平中享受其通过热烈而自我牺牲之奋斗换来的回报；此疆界给予了我们祖国数百年来面对法国反复进犯所缺乏的安全屏障。[10]

现存许多威廉一世的肖像画描绘了他帝国皇帝的新形象（详见第205页），但没有一幅能比现今悬挂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内的那张真人尺寸的半胸肖像画更能强烈而细微地反映出他所处位置及阴谋和政治的复杂性，更能表现他与其宰相，以及同自己家族间的关系。在一张彩色油画中，这位皇帝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连鬓络腮胡，佩戴着多枚军功勋章和其他配饰，一双蓝色的眼睛沉着镇定，看起来严肃却又温和。不过，当你看到这幅肖像画时，你会发现画面被莫名其妙地分割了。每隔一段固定间距就出现一根两面着色的垂直木条，高出画面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正对画面时，你看到的只是皇帝威廉。但如果你移向左侧，俾斯麦就会出现；再移到右侧，威廉之子皇储弗里德里希便会映入眼中。

作为一件新奇之物，这幅三重肖像画，既是对王朝的一次庆贺，也是对俾斯麦的辛劳的一种致敬。不过，这幅画作也可以以一种更为有趣的方式来解读。你不妨站在左侧，那里有不少位置能使你同时看到俾斯麦与皇帝威廉。俾斯麦融入了皇帝的形象，而皇帝则成了俾斯麦的另一翻版。鉴于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关系中的那些紧张事端，这幅画作极其生动而又强烈地体现了两人以某种方式继续共事的事实。正如皇帝威廉的一句名言所说：“普鲁士人只畏惧上帝与俾斯麦。”

从右侧看过去，皇帝威廉与其子王储弗里德里希之间的关系便会显现出来，同样是游移不定且十分复杂的。弗里德里希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之女维多利亚为妻，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想将德国的俾斯麦集权专制架构转变为一种更接近于英国议会传统的模式。1888年，这幅肖像画完成时，弗里德里希刚刚登基，自由主义者期盼一个新德国即将诞生。不过画作还包含着另一个微妙的巧思。当你看到俾斯麦与皇帝威廉在一起时，王储弗里德里希是完全看不到的，显然，这恰恰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从1871年军事胜利直至1888年皇帝威廉离世的这段时间内，俾斯麦发挥了他的狡猾、坚韧和强硬的特性，确保王储弗里德里希始终处在视野之外，正如这幅肖像画中的他在特定视角下消失一样。艺术家匠心独具的把握正好与政治家权谋老到的掌控相称。



三重肖像画，约**1882**年。从左侧看：俾斯麦的形象；从右侧看：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形象；从正中看：皇帝威廉一世的形象

俾斯麦于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宰相，这是新帝国政治与经济领域最有权势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塑造了现代德国。他几乎是立即采取行动来对抗天主教会，在他看来，教会在德国政治中过于有权势、影响力过大了。他试图在著名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剪除教会的羽翼，这是一项不怀好意且具有破坏性的政策，最终遭到挫败。他引入进口关税来保护德国工业，通过推行医疗保险、意外伤残保险及养老金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使德国成为欧洲首个福利国家。这些政策也是双刃剑，同时用来打击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的要求。对今天许多德国人而言，俾斯麦依旧是一个具有破坏性并导致分裂的形象，就像他在世时那样，冷酷无情地阻挠着一系列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给20世纪带来诸多可怕的后果。但他统一德国而获得的历史地位却是无法撼动的。那尊小型铁匠塑像只是用以展现他享有的声望地位的一个示例。1871年，施特拉尔松德的一位鱼商为纪念他，将自己腌制的鲱鱼更名为“俾斯麦鲱鱼”（Bismarckhering）。作为低收入家庭的主食，这一名称由此进入了日常用语。



国会大厦前俾斯麦的塑像（现今已不存在），约**1900**年

同时，俾斯麦意识到新生的德国已然打破欧洲微妙的力量平衡。他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来促成一系列条约与协议的签订，以确保各方平衡得以恢复，欧洲不会爆发战争。比如1876年，一场危机席卷巴尔干地区。此时他告知帝国议会，德国的干预将是徒劳的："在冲突结束后，我们恐怕都不会明白我们到底为何而战。"于是，德国维持了和平与繁荣的状态。他于1887年同俄国缔结条约，使帝国摆脱了固有的强敌环伺的地理劣势，致使俄国的盟友法国遭受冷落。俾斯麦之所以能取得所有这些成就，不单单因为他是位精明的政客，也是由于皇帝威廉活了九十一岁。对此，乔纳森·斯坦伯格解释道：

> 威廉一世出生于1797年。如果按《圣经》里的说法只活到七十岁的话，那么他在1867年就已离开人世，也就是在德国统一之前。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希三世年纪轻轻便会即位，然后他可能会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在1867年登基，也不是在1877年或1887年即位，因为那位老人还没有离世。威廉一世是在1888年3月九十一岁高龄时过世的，而只要威廉一世还活着，俾斯麦就能保住差事。所以，俾斯麦的整个仕途完全是仰仗那位老人的长寿。

那幅三重肖像画融合了俾斯麦与他的君主，反映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历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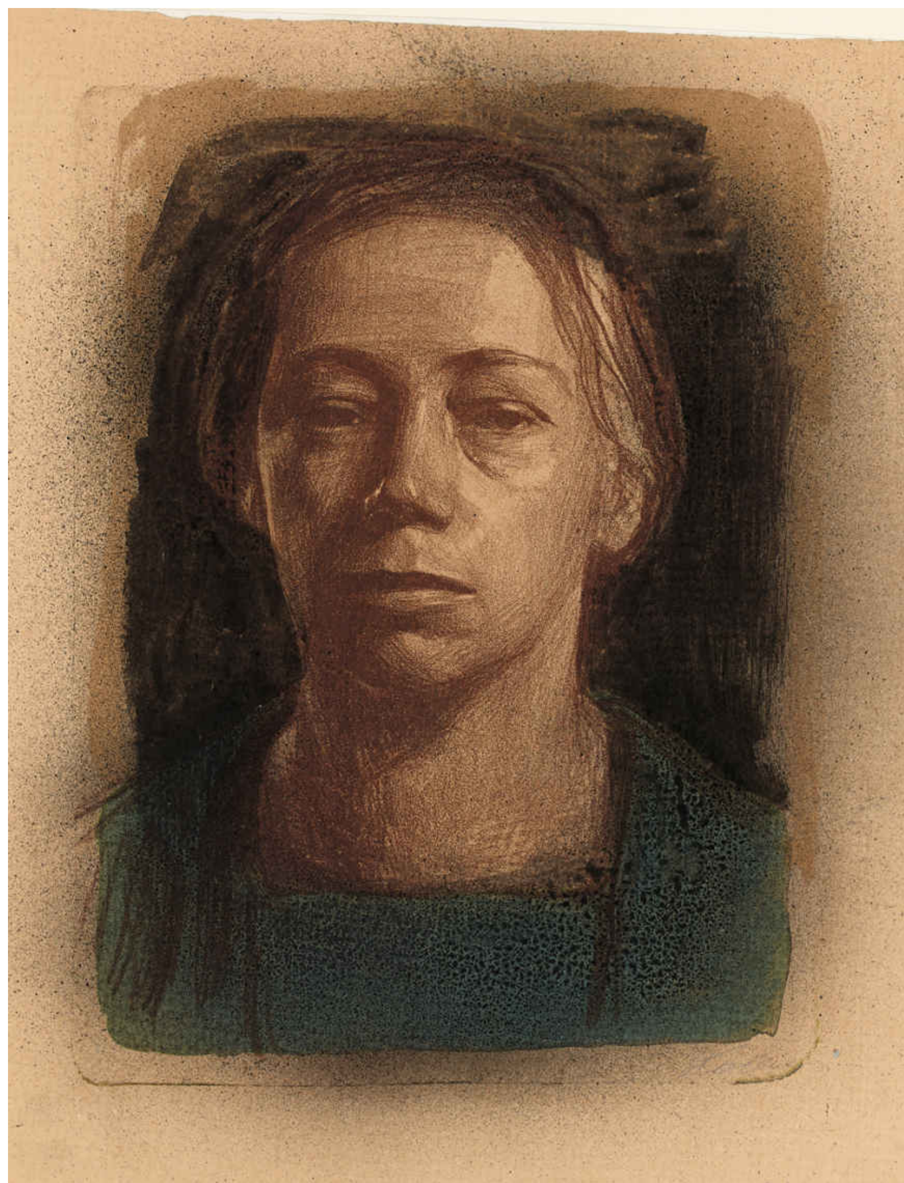
对德国自由主义者而言，1888年是寄托了巨大希望的一年，新皇弗里德里希三世登基掌权，一切皆可改变。但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仅仅九

十九天后，就因喉癌去世。甚至到今天，德国人都还将1888年称作“三帝之年”（Dreikaiserjahr）。弗里德里希的继任者是他任性而又固执的儿子，史称“威廉二世”。他是一位连俾斯麦都无法应付的皇帝。他与他的首相极难达成共识，这一情况很快就凸显出来。威廉不喜欢俾斯麦谨慎的外交政策，用他后来一位部长的名言来说，他认为德国需要“一处阳光下的地盘”。在俾斯麦试图颁布严格的《反社会党人法》[11]期间，他们的关系最终破裂。铁血宰相请辞退休后，回到他位于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鲁（Friedrichsruh）的庄园，在那里等待着被召回柏林，但召令从未到来。他的墓志铭上写道：“皇帝威廉一世的忠实的德意志臣仆”[12]。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离去是一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一次愚蠢举动所造成的。《笨拙》杂志[13]针对这一事件刊登了一幅经典的讽刺漫画，并用“领航员下船”（Dropping the Pilot）作为标题。新皇帝相信他不再需要一位领航员，他自己便能掌控整条大船。他的确这样做了，却驶上一条俾斯麦永远不会赞同的航线，而最终导致巨大灾难。



《领航员下船》，1890年3月刊登于《笨拙》杂志

1919年，历史恰恰又回到了凡尔赛。正是在那间镜厅，一项和平条约强加给了德国，那条约确保法国再一次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1815年，欧洲的和平举措是为了对法国扩张主义者的积习进行限制；而在1919年，它们的目的变成以相同方式控制德国。不过，维也纳会议后法国便受到欢迎而回到了欧洲大家庭。而1919年获胜的列强却坚持宣称德国犯有罪行，影响波及随后三十年间的时间。



凯绥·珂勒惠支自画像，**1904年**

[1]　本段英语引文对原德文版《皇帝即位诏告》有删节及调整，此处译自德语原文，为开篇首段。其中“德意志联邦”史称“北德意志联

邦”（Norddeutscher Bund，1867—1871），它成为德意志史中第一个按联邦制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时期也是历史性过渡阶段（所以汉译往往也作“北德意志邦联”），此后德意志帝国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构建得以实现。可参考图6及第15章中“德意志邦联”与相关译注。而“德意志之皇帝尊号”对应德文deutsche Kaiserwürde，意指当时权衡利弊后的折中选择。下文对此有所涉及。

[2] 安东·冯·维尔纳（1843—1915），德国画家。

[3] 此处地名按德语音转，该地即今法国梅斯，那一片地域曾作为一个教区长期从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请参考本书多幅地图及导言一章相关译注。

[4] 俾斯麦生于1815年4月1日；维也纳会议始于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结束；滑铁卢战役发生于1815年6月18日当天。

[5] 俾斯麦年轻时就身材魁梧，擅长游泳与剑术，不过却无意从军，甚至曾试图逃避兵役。后于1838年作为“一年期志愿兵”（Einjährig-Freiwilliger）服完兵役。这在当时属兵役义务，服役者基础军训结业后便可成为预备役军官。

[6] 乔纳森·斯坦伯格（1934— ），美国历史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以欧洲近现代史为主。

[7] 此处名言是指“Politik ist die Kunst des Möglichen”，可直译为“政治是选择的艺术”。也有汉译将此释为“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俾斯麦曾在不同场合谈论何为“政治”。比如他对这一概念与知识加以区分并同艺术相比较时说道：“Die Politik ist keine Wissenschaft, die man lernen kann. Sie ist eine Kunst, und wer sie nicht kann, der bleibt besser davon”，大意即“政治不是可以学习的知识，而是一种艺术，谁如果对它无能为力，最好便不要参与”。

[8]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于1868年及1874年至1880年两次出任首相。

[9] 当时，威廉对是否称帝并不很积极，他更看重“普鲁士国王”这个头衔。至于帝号，他倾向用“ Kaiser von Deutschland ”（见正文）。此处“ Deutschland ”的内涵是地理上的，即“通行德语的区域”。这也是其由语言发端的本义，（字面上）可理解为德意志全域。

[10] 本段引文为《皇帝即位诏告》倒数第二句，此处译自德语原文。

[11] 此处原文对应德语“antisozialistischen Gesetzen”，其全称为“das 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意即“防止社会民主党普遍危害行动之法”，汉译则通常作《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德文另有简称“Sozialistengesetz”，汉译据此也常作《社会党人法》。

[12] 原文是“Ein treuer deutscher Diener Kaiser Wilhelms I.”，为俾斯麦生前自定。

[13]　《笨拙》（*Punch*）杂志是英国一份周刊，创刊于1841年，2002年停刊。

第22章 苦难的见证者

一位母亲抱着她亡故的孩子，能代表一个大陆和一个世纪的苦难吗？这一问题曾引发激烈而痛苦的争论。1993年，德国统一不久，时任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决定在柏林中心地带竖起一座质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物“新岗哨”（Neue Wache），用以纪念“战争与暴政的牺牲者”。那个未经装饰的简朴的矩形空间内只有一件物品，即正中圆形天窗下的一尊塑像——一位母亲怀抱并护佑着她离世的儿子。它是凯绥·珂勒惠支创作的一尊塑像的放大版。这件作品如今静静地向新岗哨的所有访客述说着，20世纪曾有数千万人因战争及暴政而遇难。

版画家与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生平与死亡，既深受普鲁士历史的影响，也紧密地反映了普鲁士的历史。她的一生几乎与普鲁士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俾斯麦施政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它的领导下德国完成统一，普鲁士也曾遭受严重破坏，作为一个国家，它最终消亡，并在1945年后被从欧洲地图上抹去。1867年，珂勒惠支出生于德国最东端的边缘地带——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勃兰登堡选侯于1701年在此自行加冕建号称王，而伊曼努埃尔·康德则在此重塑了欧洲哲学（详见第3章）。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富有、政治立场激进的商人，外祖父则是一位同样激进的路德宗牧师。她自童年时代起就很关注（或许更为准确的是“十分着迷于”）社会公正议题。



新岗哨内《母亲与亡子》塑像，哈拉尔德·哈克依照凯绥·珂勒惠支原作制于**1993**年；地面上的文字意为“献予战争与暴政的牺牲者”

从政治和宗教继承而来的激进与虔诚，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表现得都很明显。在我看来，她是最伟大的德国艺术家之一。她的艺术探究了一个总体上不公平的社会所产生的后果，并用基督教传统的苦难形象加以表现。不过，她所进行的重现有着其特殊用意。珂勒惠支的艺术中或许有牺牲，但其中是否存在救赎却不清楚。

19世纪90年代，珂勒惠支的丈夫是一位在柏林为贫苦民众看病的医生，而她则任教于柏林女艺术家协会的女子学院。珂勒惠支夫妇的居所位于普伦茨劳贝格，那里当时是柏林的一处工人聚居区。居所并不大，所以她无法用大画布或油彩作画。然而，凯绥·珂勒惠支却尤以版画见长。她一生中创作了为数不多的几幅自画像。第396页那幅是她在1904年创作的，当时她三十七岁。这幅画是她最杰出的画作之一，可惜只有少数几幅复制品留存。画面中，一簇簇褐色线条勾勒出她的头部，自肌肤到深影的明暗过渡，展现了一位沉思中的优雅女性。她的双眼正注视着观者的右侧，显得平静而坚定。那时，她生活在工人阶级中，并已密切关注这些民众的生活与艰辛，特别是女性的角色与责任。正如她在1941年写道：

> 一些妇女来找我丈夫寻求帮助，顺便也来找我。当我与她们结识之后，我便深深地被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这个阶级所有的生活遭遇所触动……只是我想再强调一下，起初吸引我去展现无产阶级生活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

> 怜悯和同情，而是我就是发现了这种生活中的美。

她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的蚀刻系列版画《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令她首次在公众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工人阶级妇女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就在她这些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版画主题受她的朋友格哈特·豪普特曼[1]的一部剧作启发，该剧反映了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省的织工起义，那是一次遭当局残酷镇压的抗议活动。珂勒惠支在1893年的一次私密演出中观看了这部被禁的戏剧，并且深受感动。

年轻的德国作家丹尼尔·克尔曼一直十分推崇珂勒惠支的作品。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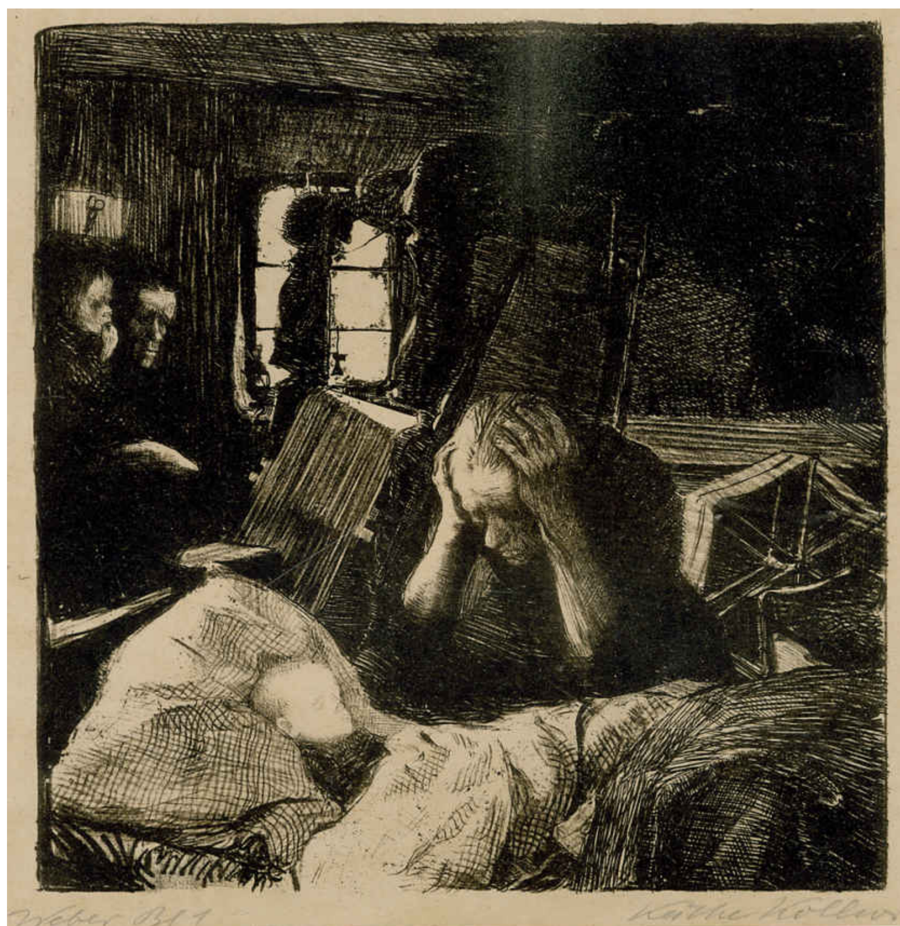
> 她深怀怜悯与同情，而且我认为，那不是煽情，而确实是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为了将这些以某种视觉形式表现出来，她借用了德意志潜意识中一些非常古老的意象。三十年战争、农民战争，在我看来，这些长期充斥着暴力和破坏的年月仍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铭刻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而且在20世纪那些巨大灾难发生之前，这种情况更甚。在她不得不对那些正发生的真实灾难作出反应以前，她已经对频受侵害与苦难的穷苦民众深怀怜悯与同情。

珂勒惠支的蚀刻组画并不是豪普特曼戏剧的配图，其中最有力的一幅所展示的便是一幕根本未在戏剧中出现的场景（详见第403页）。这幅作品表现的是男人们的斗争给妇女及儿童的生活带来的后果。边上的阴影里是织工本人，他静静地空坐在那里，就像他闲置的织机一样。但在前景处，吸引我们目光的是织工的妻子，她正用双手托着头。画作中的所有光亮都集中在床上躺着的她那生病挨饿的孩子身上。母亲盯着躺在光线明亮的床上而注定要离开人世的婴孩，后面的昏暗中依稀可辨认出父亲的模糊形象，构图中的这一切都会使观者联想到耶稣的诞生。珂勒惠支的部分实力就体现在此：她运用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却不是要展示童贞马利亚在面对为救赎而降临人世的新生儿时的喜悦，而是来表现这位母亲的绝望，以及对一个她无力挽救的生命所担负的责任。社会在个人层面已然明晰，珂勒惠支为她的政治与艺术找到了支配一切的隐喻：我们彼此间滋养与互助的责任，与母亲对子女施以保护的关爱是相似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失败的后果就是死亡。

1898年，珂勒惠支的版画在柏林展出。格哈特·豪普特曼看到那些画作时说道：“她那无声的线条就像痛苦时的呼号一样渗入骨髓，而这种呼号声在希腊人与罗马人中却未曾听到过。”这件作品给展览组织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提名珂勒惠支为金牌候选人，希望她的成就可以获得官方认可。但皇帝的咨政委员会将她否决了。“鉴于该作品的主题及其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完全缺乏任何使人缓解或得以安抚的元素”，因而帝国并不打算授予她荣誉。换句话说，这种艺术是有政治倾向的，它所展现的是真实的生活，令人无法接受。

曾着力描写过矛盾冲突与创造性的诗人鲁思·帕德尔，认为能从痛苦与苦难中创造美的艺术家并不多见，而凯绥·珂勒惠支便是其中之一。她说道：

> 她被苦难的意识所吸引，所以她的审美趣味几乎完全同她的情感和社会意识相吻合。她不去进行纪念，而是面对痛苦。她不是在美化痛苦，而是在审视它，这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她当然总是在个体身上发现痛苦，因为如果你打算去完成一件真正的好作品，一件有生命的作品，你就不能只是抓取一个像战争或革命这样抽象的主题。你得从特别的地方入手。这些来到她丈夫诊所的病患都是没有钱买药的贫苦民众，他们的子女正受死亡和饥饿的威胁，但她从中发现了美。而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种激愤。它是在说，这里的情形就是这样，苦难遍布人间，你无法逃避。你知道你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你无法回避的艺术。



《母亲与挨饿的孩子》，选自《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组画，凯绥·珂

勒惠支作，**1897**年

显然，这幅版画为当时实际正发生于柏林的事情提供了明证，就像佐证了五十年前西里西亚的那些事件一样。俾斯麦的社会改革措施为现代德式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也是以改善公共卫生与健康为目标的。可尽管如此，20世纪初柏林几十万人却依然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过度拥挤导致了健康方面不可避免的后果。各行业工会及他们的要求不为政府所接受，同样也遭到了雇主们反对。于是，遍及全德的罢工被暴力镇压，比如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探究现状而再次回顾历史后，珂勒惠支开始着手创作她又一杰出的版画系列，以此展现贫苦民众为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尝试。这一回她选择了16世纪20年代的“农民战争”（详见第12章）。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是占据特殊位置的事件。那次波及甚广的起义，在一些人看来是受路德著作的激励。但起义却被路德本人否定，并且遭到了镇压。而珂勒惠支感兴趣的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对单个家庭，特别是对妇女的影响。她以自己和儿子彼得作为原型，为版画《妇女与亡子》画了一张草图。结果它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预言。

珂勒惠支传记的作者伊冯娜·许姆阿继续讲述道：

> 1914年战争爆发时，珂勒惠支在柏林。她的长子汉斯那年二十二岁，她帮他在军队里找了份差事。她的幼子彼得正在挪威徒步旅行，8月6日那天，他带着成为志愿兵的愿望回来了。参军必须满二十一岁，可当时他不够岁数，需要有父亲的准许才能当上志愿兵。但他的父亲却不同意。是凯绥·珂勒惠支说服了丈夫允许儿子去当兵。因此，对于彼得离开柏林十天后就死于战场，她不仅是悲痛，还免不了会内疚。

彼得在1914年10月间死于比利时，这件事改变并决定了珂勒惠支的余生。“我们的生命中有一道创伤，”她写道，“它永远不会愈合，也不该愈合。”

珂勒惠支陷入深深的伤感之中，开始着手制作一件雕塑来纪念她的儿子及其战友。但她没勇气完成这件作品，终在1919年将它毁弃。在此期间，她对国家所奉行的无情的军国主义深恶痛绝，这种厌恶之情继而转变为对战争的无穷敌意，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随着战争进入尾声，政府竟又号召年老及未成年男子入伍。她便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抗诉：“濒临死亡的人已经够多了……不要再让其他人无谓牺牲!”



《牺牲》，选自《战争》系列组画，凯绥·珂勒惠支作，**1924**年

1924年她出版了另一套系列版画，所用标题就是“战争”（Krieg）。不同于其他艺术家，比如奥托·迪克斯的作品，它们所展示的并不是任何战斗或破坏场面，而只是家门口的一幕幕，表现的是母亲们和孩子们，以及贯穿在她称之为“这些难以形容的艰苦岁月”中的心碎与多般磨难。这组版画呈现出单调的黑与白，沉重地审视着那些受悲痛、忧惧与惊恐折磨着的脸庞。作为一位女性对战争的见证，它们是独一无二的。组画的第一幅名为《牺牲》，反映了她对儿子彼得的命运所怀的内疚与悲痛。画作中有一位赤裸的年轻母亲——这或许是一幅自画像——她双目紧闭，嘴唇忧伤地抿成一线，双臂如安稳的摇篮一般抱着睡梦中的婴儿，而同时又情愿被从他们身边拽走——我们是多么情愿而又盲目地走进了战争。另一幅标题为《母亲们》的作品描绘了围成一圈的妇女，她们的臂膀相互扣在一起，试图保护那些面带恐惧的孩子。



《母亲们》，选自《战争》系列组画，凯绥·珂勒惠支作，**1924**年

1919年后的德国，虽然有约一百八十万之巨的人口损失，但却没有多少场所来纪念战争死难者，也没有多少公祭仪式。你怎能公开地纪念一场以屈辱的失败为结局的战争，并接受一种强加的苦涩和平呢？你又该如何以那些无谓死去的人为荣呢？与那个时代其他艺术家不同，珂勒惠支通过她的《战争》组画为个体损失的意义发声，普通德国人对这种损失深有感触，他们失去了儿子、父亲、兄弟、爱人，他们损失了整整一代人，他们失去了政治稳定以及领土，此外他们也失去了个人的尊严。这就是一位女性对一场男性战争的回答，是对她自己原本可以避免而且也应该尽力去避免的死亡做出的反应。

在鲁思·帕德尔看来，这一反应最终使珂勒惠支能够完成为纪念亡子彼得而创作的作品。她最初的想法是呈现一位母亲同一位父亲，分别跪在儿子尸体的首足处。当她放弃这个想法时，便在1919年6月间的日记中写道："我会回来的。我将为你和其他人完成这件作品。"对此，鲁思·帕德尔说道：

> 这件作品总共耗费了她十八年的光阴，最终在1932年完成。但它并没有呈现彼得的形象，而只是表现了悲伤中的父母双亲。它被安放在比利时的一处公墓中，是完全开放的公共纪念物，被称为《悲伤的父母》。她将自己同丈夫的脸庞用在他们的形象上，但她后来意识到，她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哀悼。我想，对于她来说，创作之举与哀悼的行为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二者都包含一种补

偿，以及对丧子事实的接受。而这两样，正如她的审美和她的社会情感一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悲伤的父母》，凯绥·珂勒惠支作，**1925**年至**1932**年。**1932**年安放于比利时的罗格维尔德（**Roggevelde**）的公墓，**1956**年移至位于弗拉迪斯陆（**Vladslo**）的德国阵亡将士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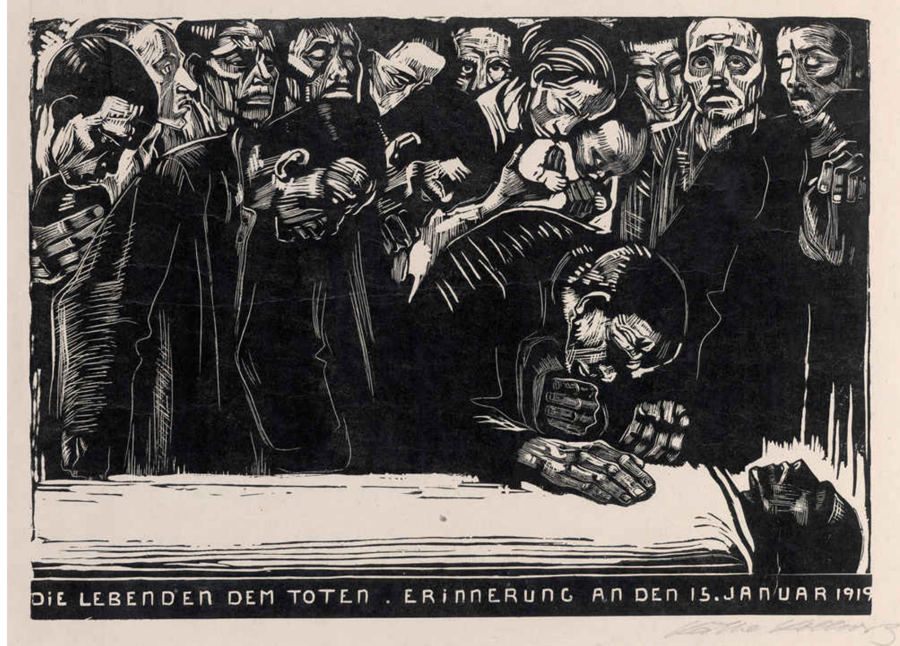
在涉及西方战线的那些伟大的纪念物中，珂勒惠支所作的悲伤父母跪像有着独特的凄婉悲情。苦楚使丈夫同妻子彼此间隔却无法相互安慰。他因过度悲痛而四肢僵硬，她则情绪失控以致战栗不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德国陷入政治与社会混乱。德皇已然下台，中央权威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席卷整个帝国并推翻了诸城市与各邦的旧式秩序，王公贵族或是逃亡，或是退位。帝国军队遭到解散。被称作“自由军团”的右翼准军事武装人员游荡在街上，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维持秩序。谁拥有武装，谁就可以发号施令。尤其是柏林，俨然成了彼此敌视的左翼与右翼派别相互角力的战场。对政客们而言，在首都集会与辩论已经过于危险。因此新近选出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只好汇集于魏玛，在那里他们为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拟定了一部宪法（详见第20章）。



“斯巴达克联盟”的一次游行中，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众议院的阳台上发表演说，柏林，**1918年11月**

1918年11月，“斯巴达克联盟”试图在柏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军团的联合行动中，同盟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遭到逮捕，而后遇害。李卜克内西被击中背部，以伪造他正试图逃脱拘禁的假象。罗莎·卢森堡迅速成为世界各地左翼党派开展斗争时所推崇的一位殉道偶像。而李卜克内西的周年忌日则一直是革命历法中的重要纪念日。对凯绥·珂勒惠支而言，这些事件是她人生中的另一个转折点。它们迫使她全面而深入地审视自己的左翼信仰，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她真正所希望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是和平主义的，还是行动主义的？



悼念**1919**年**1**月**15**日遇难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凯绥·珂勒惠支作

她前去拜祭了李卜克内西的遗体，然后创作了一幅引人注目的送葬者群像图，画作标题是《生者为死者尽哀·纪念1919年1月15日》。画中，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遗体上简单地覆盖着一袭白色裹尸布，他的追随者及支持者环立四周，他们黑色的面庞呈现出悲痛与难以置信的神情。

其中的视觉语言比珂勒惠支早期蚀刻版画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受到她的朋友、雕塑家与版画家同行恩斯特·巴拉赫（我们将在第29章再做介绍）的启发，珂勒惠支选用了木刻版画，运用更为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醒目简约的形式。黑色与耀眼的白色相对，令李卜克内西的头部看起来仿佛有光环围绕。前景中向前俯身的四位男士像是众门徒在哀悼死去的基督。在他们中间是珂勒惠支为整个社会塑造的图像：一位母亲抱着她的婴孩，正探身向死者致敬。再一次，基督教传统的画像布局被用于一个完全世俗的目的。

据伊冯娜·许姆阿的观点，珂勒惠支当时明确地表示，她对李卜克内西的同情是个人的，而非政治的。许姆阿说道：

>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凯绥·珂勒惠支便为国际工人救助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还为该组织制作了许多海报。他们将海报出售以换取活动经费。她制作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木刻版画，尽管她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喜欢他。不过，他的家人请求珂勒惠支制作一幅与他相关的版画，于是她就做了。而当她着手制作的时候，她并没有将他视为政敌，而只是看作一个人，一位对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来说重要的人士。她在这幅画作上花了很长时间，而

它至今仍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画作。

次年，珂勒惠支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位艺术家，她觉得自己有权用这种抱以同情的方式来呈现李卜克内西，并将木刻版画献给曾支持过他的那些工人，虽然她自己并不是他政治上的追随者。正如她日记中所显示的，珂勒惠支现在已经清楚她自己面对激进革命的共产主义问题时所持的立场：



《死亡的召唤》，选自《死亡》系列组画，凯绥·珂勒惠支作，**1934**年至**1937**年

> 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会是个共产主义者，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什么在把我朝那个方向拉。但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经历了大战，看到彼得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死去。我深感惊恐，也被战争中所有仇恨所震撼。我渴望着能让人得以生存的社会主义，但却觉得，如今这个世界一望而去有太多的谋杀、欺骗、苦难、扭曲，总之一切都是可怕的。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绥·珂勒惠支的许多作品持续反映着战争及其后果，还有魏玛共和国那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她公开反对希特勒，并同爱因斯坦及其他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一道，作为“紧急呼吁以求团结一致”（Dringender Appell für die Einheit）这一行动的签署人，鼓励选民在1932年的大选中拒选纳粹党。毫无意外，他们一上台便严禁她举办展览，并强迫她从艺术学院辞职。然而，她的作品却从未被官方归入“退化堕落”的一类（详见第24章），甚至还被不具名地用于纳粹宣传。她对此感到厌恶，但却不愿去抗议，因为那样可能会使她陷入困境，甚至更为严重的境遇，因为纳粹党也许会出于报复而添上她的名字，从而暗示她是支持他们那些观点的。

1935年，珂勒惠支创作了她最后一组称作《死亡》的系列版画，八幅均采用平版印刷方式制成。第411页所示便是其中最后一幅，标题为《死亡的召唤》。这幅画作描绘了她自己对死亡的想象，就像是她本人的一幅自画像。画中一位年老的妇人上身前倾，左前臂抬起，她的右手则移向一只不见肉身、由上方向她伸来的手臂。不难辨认，三十年前的那幅自画像中就是这同一个妇人，只是三十年黑暗岁月的经历致使她的外观发生变化而显得消瘦。这差不多可以作为德国在那些年月间的一幅自画像。



《母亲与亡子》，凯绥·珂勒惠支作于1937年至1938/39年间

这很难受到纳粹政权的欢迎。该政权宣称它致力于一个洁净而纯粹之国家的重生。于是，那个引发对集中营极度恐惧的组织“盖世太保”[2]拜访了她。不过，她的国际知名度意味着她还保有些自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送上最后一击：1942年，她的孙子死于“东方战线”[3]，次年她撤离柏林。珂勒惠支于1945年4月逝世，那是大战的最后几周。此时她的出生地柯尼斯堡已遭大规模破坏，并落入俄国人之手。在接下来的数月，那里尚未逃离的德国民众或遭驱逐，或是被杀，而那座城市则成为俄国领土（详见第26章）。时至今日，它仍是俄国的。七百年的普鲁士历史就此终结。

但20世纪30年代时，珂勒惠支仍在工作，而且一直处于1914年的悲痛之中。1937年10月22日是彼得的忌日，她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 我在制作那件小型的雕塑，它源于我对那位老人形象的一种创作尝试。现在它已经有些像“圣母怜子”（指马利亚与死去的基督）的造型了。那位母亲坐着，让死去的儿子躺在她的双膝间。那不再是悲痛，而是沉思。

珂勒惠支在1932年完成的纪念雕塑中没有把彼得包含在内，因为那件作品的中心是表现父母双亲各自的悲痛。

现在她创作了一件亡子与自己在一起的专属纪念塑像。

虽然该造型是源自宗教圣像，但在这件雕塑中却并没有什么与基督教相关。亡子不是如耶稣那样供观者沉思或崇拜。他也没有躺在母亲的膝盖上，就像米开朗基罗所作的圣母怜子造型中那样，而是蜷缩在她双腿之间。他的双膝曲合得那么紧，以至于他几乎完全被母亲的身体所包裹。她不是把他呈现给我们，而是试图庇护他免受进一步伤害，尽管他业已亡故。那徒劳的姿势所表现出的悲怆已然是极致。这画面中没有任何信息暗示为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就要有所牺牲，也没有获得拯救的提示，仅仅是对战争屠杀的一种回应。对此，鲁思·帕德尔说道：

> 我开始关注珂勒惠支的作品，是因为当时我在写一本书，内容是关于矛盾冲突与创造性，以及创伤激发创造力的可能性。一些艺术家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感受创伤，继而创作出非同寻常的、令他人能产生共鸣的艺术作品。诗人埃米莉·迪金森说：“巨大的悲痛过后，一种复杂的情感随之而来。”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总统，**1993年11月14日**

1993年11月14日，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冒着倾盆大雨前往新岗哨再次凭吊，从此那里就成为战争与暴政牺牲者国家纪念中心。那是一次低调的纪念仪式，没有正式发言。即使这处场所历经漫长岁月早已成为三场不同战争的纪念馆。那里曾是普鲁士纪念拿破仑战争的地方；而后魏玛共和国用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则是苏维埃政权的纪念馆，用来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而罹难的

人士。此后，这座建筑则用于纪念“战争与暴政的牺牲者”，而且是针对所有战争及一切暴政。在这里，迎接风霜雨雪与阳光的圆形天窗下方，简约质朴的石板地面上，安放着凯绥·珂勒惠支1937年创作的那件塑像的放大版。而珂勒惠支本人既是亲历者，又是受害者。

总统魏茨泽克宣读了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一篇声明，用以解释为何这件雕塑会被选中：“因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所遵循的原则，与在同样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国家理念密不可分。”珂勒惠支的作品中一位母亲在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国家则对保卫全体国民负有责任。我想，科尔声明的那一部分体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它看出上述二者间是相通的。

正如鲁思·帕德尔所说，科尔选择珂勒惠支雕塑的举动却并未受到普遍欢迎：

> 在重新统一的德国的首都柏林，赫尔穆特·科尔选择了这座塑像来纪念战争和独裁的牺牲者。他因此曾受到很多批评。那时人们说，一位妇女哀悼自己的儿子，对于遭纳粹屠杀的犹太受害者并不公正，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而这件作品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些遇难者。但我认为，科尔在坚持他的选择时表现得很出色，因为实际上人们只能认同每个人各自的观点。所以它得以立在那儿，象征着光明对抗黑暗。它就在露天里，光亮从上面照下来，四周是空空的墙壁。它概括了所有战争中每一位个体遭受的苦难。如果这件作品出现在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涉及一个成年人哀悼一个孩子。这种选择体现了科尔的政治天才，他能看出，当其他东西消失时，这件作品还会立在那里。那儿没有具体的语境，或是任何特别的服装或道具，只有死去的孩子那张年轻的面孔向上对着母亲。那位母亲的手挡住了眼睛，但她的双眼仍在注视着孩子，显得无能为力。它体现了悲伤与失落。

两德都继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它们各以接近凯绥·珂勒惠支作品与其人的方式，反映了对于苦涩遗产的不同态度。对此，伊冯娜·许姆阿说道：

> 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女艺术家。她体现了20世纪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所有的苦难。仅纪念凯绥·珂勒惠支的博物馆就有三处，还有数以百计的学校、街道和广场以她的名字命名。但再次审视她的作品却始于两德重新统一的时候。在那以前，如何对她的一生及艺术进行正确的阐释，这在东德与西德间就像竞争一样：她是一位社会主义艺术家（如东德所希望），或者她是一位全人类的艺术家（如西德所主张）？两德为此长期争执。但她

显然是二者兼备。



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银行纸钞，**1922**年至**1923**年

[1]　格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作家，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 德文“Geheime Staatspolizei”本意为“秘密国家警察”。汉译据其缩写形式“Gestapo”通常音译为“盖世太保”。

[3] 此处即指于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进行的“苏德战争”。德国将此战称作“东方战线”“东方战役”或“俄罗斯战役”，俄国则称之为“伟大的爱国战争”，汉译常作“伟大的卫国战争”。

第23章 危机中的货币

对德国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个特别的词语凸显出来，这就是“ersatz”。它的字面意思是“替代者”，但在大众心目中它的意思很快就变成了“虚假的物品”。距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德国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便已出现了短缺。协约国的海上封锁意味着有大量物资德国根本无从获得。那时，用石油替代橡胶，用树莓叶替代茶叶，用橡子替代咖啡，甚至还有用纸做的替代外套与内衣。这在21世纪听起来也极富创新性，甚至还有些色情，而当时这些却使柏林人感到恐怖。最重要的是没有足够的金属，任何种类的金属都短缺。于是在战争初期，小面额的帝国马克硬币开始迅速消失，金属都被充作他用。至1919年，低面值的硬币已经完全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替代马克与替代芬尼，它们通常不是由金属制成的，而是用纸。

它被称作“应急货币”（Notgeld），也是大英博物馆数量庞大的临时货币收藏中的一种。这种替代货币存世量之所以巨大，是由于当时没有一种通行的低面额国家货币，因此各城乡不得不自行印制。而帝国银行发行的高面额纸币则仍在流通。应急货币体现出日常生活的微妙变化，这便是它如此引人关注的地方。当中央的地位弱化致使效力不济时，各地方对自身的记忆及忠诚便复苏了。20世纪在本地认同与市民荣誉感方面进行的探索有着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与18世纪帝国制币体系（详见第5章）显示出的多样性极其相似。例如美因茨展示了包括古腾堡塑像在内的城市景观；不来梅则夸耀其所拥有的国际良港；波罗的海沿岸的度假胜地米里茨描绘了当地别致的海滨风情；而奥伊廷则纪念其城市之子、著名的作曲家韦伯，图案设计中还包括了一段乐谱。有些地方选择历史角度进行展现，比如博德斯霍尔姆宣传当地重要的宗教中心修道院；艾森纳赫以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新约》的形象来突出该城市的新教传统。



美因茨50芬尼应急纸钞，纸钞上右侧为古腾堡塑像，1921年



不来梅印有海港场景的75芬尼应急纸钞，1923年



米里茨50芬尼应急纸钞，1922年



奥伊廷50芬尼应急纸钞，版面主题除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外，另绘有歌剧《奥伯龙》中的音乐选段以纪念作曲家韦伯，1921年

浏览这些纸币就像是在翻阅一部关于德国的旅行游记，每座市镇都呈现出最有可能吸引游客好奇心并使当地居民感到骄傲的独特风貌。不过，这些纸钞的意趣并不仅仅在地形学上。它们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

概况，反映了1919年至1923年的公众情绪，而当时魏玛共和国正艰难地谋求生存。此外，它们也展示了那些使民众感到惊恐、着迷而又忧虑的问题。你可以看出其中向战争遇难者表达纪念的意愿一直都在。有一张出自汉堡和不来梅的纸钞，它以怀旧的方式展示了俾斯麦及德国在非洲失去的那些殖民地。另一张来自格拉姆，它地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是通行丹麦语的区域，在由丹麦要求、受英国及法国监督的全民公投中，那里正处于被分离出德国的危险境地。有些纸钞上印有下作的反犹太笑料，流行的偏见中带着令人不安的暗示，此外还有许多许多……这些纸币就是20世纪20年代关于德国人的记忆、希望与恐惧的一份合集。



博德斯霍尔姆印有修道士形象的**50**芬尼应急纸钞，**19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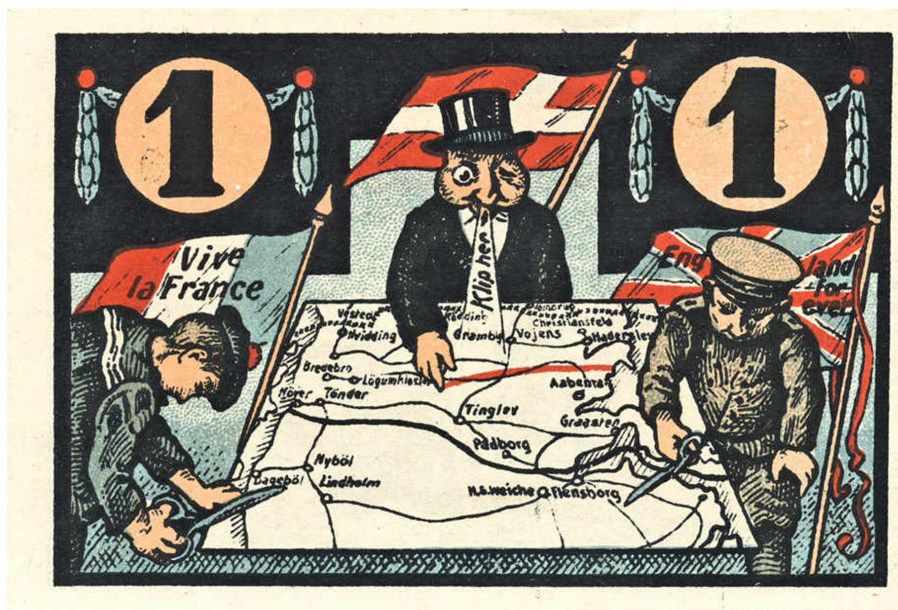


艾森纳赫印有路德画像的**50**芬尼应急纸钞，**1921**年


v. Bismarck
75 Pf.
75 Pf.
Gedenkt unserer Kolonien


AFRIKA
TOGO
KAMERUN
DEUTSCH-SÜDWEST
DEUTSCH-OSTAFRIKA
1884-1918
KIAUTSCHAU
DEUTSCH-HANSEATISCHER
KOLONIAL GEDENKTAG
HAMBURG BERLIN BREMEN
Dieser Kolonial = Gutschein verliert
mit dem 31. März 1922 seine Gültigkeit.
Serie B. 4. XI. 1921
VI
75 PF.
Die Geschäftsführung
Franz Grewe

不来梅75芬尼应急纸钞，一面印有失去的非洲殖民地，另一面印有俾斯麦头像，1921年



格拉姆1马克应急纸钞，纸钞上描绘了决定当地是归属丹麦还是德国而进行的地方公投，1920年



比勒费尔德亚麻质1000马克应急纸币，1922年



贝沃伦根印有反犹太卡通画的**75**芬尼应急纸钞，**1921**年

有意思的是，还有另一个体现地域多样性的事实——并不是所有应急货币都是用纸做的。比如在迈森与德累斯顿，应急货币是瓷质的（不用说，它很快就成为收藏家追捧的对象）；在重要的纺织品中心比勒费尔德，应急货币则是亚麻或丝质的；自然在某些地方，它的形态就成了一截香肠。这就是德国的地方观念，它在危机时代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再次得到彰显。据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信息——民众对其地方货币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国家制币：

> 德国的应急货币之所以使人着迷，是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允许民众自行印制钞票呢？回答通常是担心民众或许突然就发现他们的钱不值钱了。如果银行发行它们各自的钞票，你要住得离总部特别近，这样如果有关于银行的坏消息传来，你就好赶过去，把钱取出并兑换成金币。能快速地依据你的权利对银行资产提出要求，这是特别重要的。而应急货币便是一个例子，在国家无法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或者保证其价值的情况下，地方社群便决定自行供应实际上是借据的货币。大政治思想家哈耶克就主张任何人都应该被允许印制钞票，而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由国家对货币进行垄断。那种想法的缺陷是，民众想要感觉到他们用于度量物品的单位有个稳定而统一的价值。但它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显然，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全球不同国家置身其中，它们都有各自的货币，而这个经济整体目前运转得就非常好。

最著名的一些应急货币来自包豪斯艺术与设计运动的诞生地——魏

玛。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座城市中，审美与实用性的世界被彻底地重新构想（详见第20章）。魏玛的纸钞便是由包豪斯的赫伯特·拜尔设计的。那上面并没有什么历史或旅游观光的主题，只有纯粹的功能、清晰的表达、醒目的设计。拜尔使用强烈的色彩、简洁的语句与数字组成有特色的排印式样。形式坚决服从功能。这张应急纸钞堪称现代主义的美学宣言。1932年时，拜尔只有两天时间来设计这些纸币。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借此向没有选择而只能使用这种货币的大众来展现包豪斯的排印与设计风格。前卫的现代主义设计将会在数小时内进入千家万户。应急纸币给了包豪斯之前根本无从想象的公开展示的机会。



5000万马克应急纸钞，由赫伯特·拜尔设计于魏玛，**1923**年**7**月**25**日发行



博霍尔特印有市政厅的**25**芬尼应急纸钞，**1918**年



提福特**25**芬尼应急纸钞，印有选自歌德《浮士德》略经改动的语句，**1921**年

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克拉丽莎·冯·施佩是大英博物馆的展览策划人，她探究了藏品中关于应急货币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范例：

> 显然，应急货币的功用之一便是展现各地令人骄傲的地方名胜、建筑和风景。大英博物馆就有出自我家乡威斯特法伦的博霍尔特的应急货币。博霍尔特的地标是那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它是一幢带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建筑，那就是他们为印制货币所选择的景观。馆内还有一张来自提福特的纸钞。提福特正处魏玛的外围，萨克森-魏玛公爵夫人安娜·阿马利娅在此地有一处夏日居所。她就在那里宴请歌德，并与他一起漫步长聊。这张纸钞引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句话，稍微改动了一下："让每个想对此确知的人，知道这张纸钞的面值"（Zu wissen sei es jedem der's begehrt, der Zettel hier ist 25 pfennig wert）。在《浮士德》中原本是100克朗，但在这里是说这张纸钞面值25芬尼。

这张应急货币算作一则文学笑谈，它引用歌德的话语去质问这种应急纸质货币确切的价值。在这张应急钞票中，制作者借用歌德的话对金融的不稳定状态以及地方的记忆进行调侃。这是应对困境时一种自信而优雅且在文化上颇为活跃的方式。而哈默尔恩的货币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花衣魔笛手和老鼠，而不是歌德。对此，克拉丽莎·冯·施佩解释道：

> 那些老鼠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哈默尔恩的纸币上。在

1918年一张50芬尼的纸钞上，你能看到老鼠坐在那些数字上。在它的背面，你能看到花衣魔笛手正领着孩子们出城去。应急货币上反复出现一些主题，无论是身处魏玛的歌德，还是哈默尔恩关于花衣魔笛手的传说，这些都与当地文学有关。这种语言往往有点儿粗俗却又不失诙谐，表达了一种潜在的幽默或讽刺，以便从容地面对严峻的时代。但也并不总是这样。比如，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还有一张来自比勒费尔德的小面值纸钞。它的年代比较早，是1917年的，反映了所谓的“芜菁冬天”。当时民众的食物非常短缺，人们除了芜菁便没什么可吃的了。那上面的图案是一棵流泪的芜菁，旁边写着：“经受苦难并坚持下去，这是战争的法则”（Durchhalten den Not ist Kriegs Gebot）。



哈默尔恩**50**芬尼应急纸钞，纸钞上印有花衣魔笛手，**1918**年



哈默尔恩50芬尼应急纸钞，纸钞上印有花衣魔笛手，1918年



比勒费尔德印有芜菁图案的10芬尼应急纸币，1919年

这里完全没有幽默的成分。这使人回想起一个更为阴沉的基调，将人们的思绪引入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获胜的列强提出的那些赔款与要求。应急货币也涉及了这些问题。对此，克拉丽莎·冯·施佩说：

> 我们有出自比特费尔德的纸币，那里是靠近柏林的一处产煤区。那些纸钞的背面印有运煤的列车，它们首先开往科隆。你能看到画面背景中的科隆大教堂，还有左侧的埃菲尔铁塔。这是从德国运往法国的煤，这张纸钞非常精确地告诉我们，自1920年4月至1921年3月，共有

2810万吨煤出口。其中67.1%是作为战争赔款，而仅有11.5%被售往国际市场。



比特费尔德**50**芬尼应急纸钞，纸钞上印有向法国运煤的列车，**1921**年

这张应急纸钞正讲述着一个令许多人深感愤慨的事实——德国生产的煤无法为本国赚取外汇，反而有超过三分之二被用作支付赔款，其中主要是运往法国。

总计发行了超过十六万张应急货币。它们反映出魏玛共和国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不安与焦虑，当时可谓军国主义者、反战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及种族主义者并存。但它们没有显露出的却是巨大的金融威胁，这种威胁正隐约逼近，迫在眉睫。这些新奇的小面额应急货币即将被史上最具灾难性与毁灭性的一次通货膨胀淹没。战后德国经济衰落，在支付获胜协约国所要求的赔款时又遭遇种种困难，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引发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1921年4月，赔款金额确定，总计高达330亿美元。时至同年5月，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出任主管重建的部长，负责处理赔款事宜。他所担心的是，赔款会终结任何稳定马克的机会。拉特瑙写道：

> 大多数政客与投资者只想着与公文相关的事情。他们坐在各自的办公室里，看着摆在面前的文件，那些文案上罗列着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同样出自不同的公文……他们写下位数不等的零，而9个零就是10亿。10个亿从嘴里说出来既轻巧又容易，但没有人能想象出10亿是什么样。10个亿意味着什么？一块森林有10亿片树叶吗？一处草场有10亿根草叶吗？谁知道呢？如果把蒂尔加滕的

> 树木伐光，然后在那片场地种上小麦，会长出多少株来呢？20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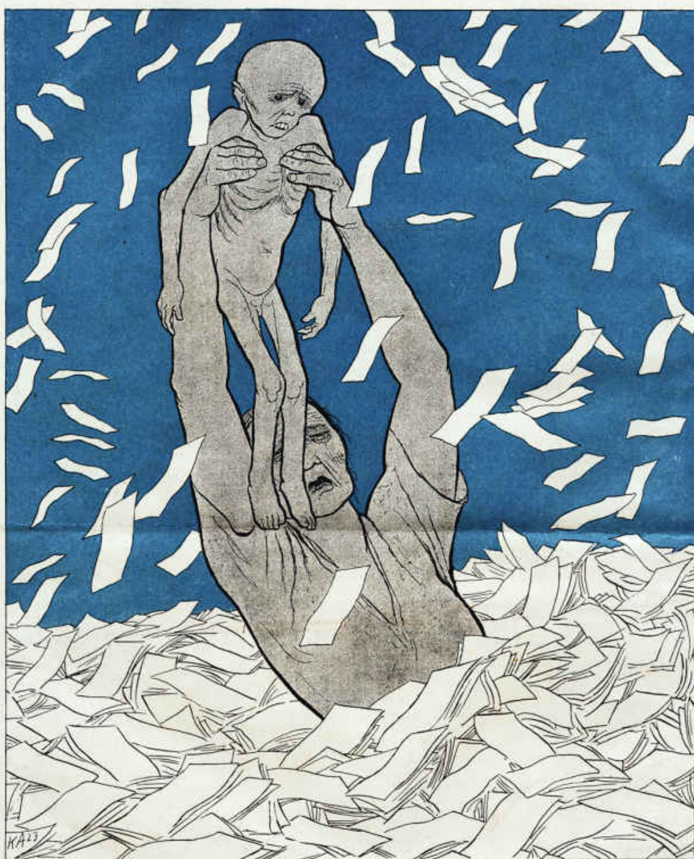
德文里“Milliarde”就相当于英文的“billion”，或者是一千个百万，这样的运算量是恐怖的。的确，整个形势变得恐怖起来。当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德国正经历一场集体的疯狂。1922年6月，拉特瑙被暗杀。这使马克与美元汇率突然下跌至300：1。一个月后，当第一笔赔款到期须支付时，汇率跌至500：1。至同年10月末，第二笔支付到期，汇率已缩水至4500马克兑1美元。时至1923年4月，恶性通货膨胀终于爆发。使用那些面值1000马克、1万马克、10万马克及100万马克的纸钞（见第418页），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种恐怖的经历。而紧接着只好直接用词语来表示数目，出现了一张“一万亿”马克（或作“一兆”）、一张“一千亿”马克的纸币。至1923年11月，12万亿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些人打趣说道，兑换1英镑的马克数目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码数[1]。至当年年底，一个鸡蛋的价格是1918年价格的五千亿倍。民众推着堆满钞票的手推车不是去购物，而是带着这些不值钱的现金去银行兑换面额更高却仍不值钱的纸币。1921年间有120万亿马克在流通，两年后便差不多有5亿兆马克，这实在不可思议。当时一张5亿马克的纸钞也许只能买一条面包。

今天，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怖情形都有一份家族记忆，比如高级公务员带着他的月薪赶回家，却只够妻子在所有这些钞票再次彻底变成废纸前买几克黄油。对于这样一场大灾难是如何发生的，默文·金解释道：

> 那时的情况是，出于某种原因，政府发现似乎唯一能填补自己预算赤字的方式就是印发钞票。而后，民众开始预计政府将要印发越来越多的货币。他们关于将要爆发通货膨胀的想法变得越发强烈。所以，他们钱一到手便去买东西，好把钱花掉。这样一来，钱转手的速度变快。这更加快了抬高物价的速度。政府印发更多的钞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物价以一种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飞快地上涨。现在我们考虑每年通胀率大约2%左右。这意味着，物价会在约四十年后翻倍。而在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每三天半就翻一倍。那些照片中的民众推着堆放纸币的推车，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政府不是用常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预算赤字问题，比如通过征税，或者通过借贷并承诺偿还等方式，而只是简单地印发钞票，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做法。



将恶性通胀时的钞票添入壁炉的妇女，约**1923**年



一位妇女将挨饿的孩子托举出纸币的海洋并喊着："面包！面包！"选自《**Simplicissimus**》杂志的一幅漫画，**1923**年**6**月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还不是史上最严重的。这项"荣誉"属于距今更近的津巴布韦经济危机，那次危机在2008年至2009年间爆发，当时物价每天都在翻倍。而恶性通胀比较奇怪的特点之一是它结束时可以像爆发时一样迅速。1923年11月，魏玛政府委任亚尔马·沙赫特为货币委员。他有一个简单的计划，即引入一种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2]），用作担保而抵兑政府在德国所拥有的地产价

值。刚引入时的兑换率是1万亿旧马克兑1单位新马克。沙赫特的政策很快奏效，他在数月内便稳定了货币。如默文·金所说，这正如你所料：

> 它是一种将预算纳入有序正轨的可靠的许诺；要削减开支，就有必要提高随便哪种税赋；并做出承诺，不会通过印发钞票来填补预算赤字。这样一来，从物价失控式上涨这一恶性循环中，一个良性循环被触发：因为民众相信预算赤字会得到控制，他们便又乐意持有手中的钞票了。恶性通胀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民众不愿意持有货币。因为这样毫无意义，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内钞票就贬得一钱不值。所有恶性通货膨胀往往有些共性，它们都始于政府失去对预算的控制，一旦政府有能力而决意妥善管控其预算，恶性通胀便会结束。然后很快地，甚至在他们降低增长率或货币供应量之前，通货膨胀便会极速下行。所有这些只需几个月。

这就是曾经在德国实际发生的事情。地产抵押马克带来了稳定与信任，经济也开始复苏。然而，恶性通货膨胀及那些过量印发的高面额钞票留下的记忆，至今仍令人感到痛苦，仍强烈而鲜活，它也是联邦银行及现在的欧洲央行数十年间的一种导向力量。对此，默文·金解释说：

> 德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稳定性”，就是那份记忆在发挥影响。稳定性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德国无疑非常清楚，你要不把它当回事，就得自担后果。要非常小心地维护“稳定性”，这就是成功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这一灾难性金融事件还导致了其他更直接的后果。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以及战争赔款导致的巨大灾难，当时许多德国人怀有仇外与不满的情绪。而恶性通货膨胀为右翼党派，特别是纳粹党，提供了得以充分利用这种情绪的理想环境。魏玛共和国引入的议会政体则被指责为背叛了德国军队，在德军尚未被击败时就迫使它投降，这就是著名的“背后一刀”。愤恨不满与遭受苛刻对待的情绪长期郁积在集体记忆中。恶性通胀则加剧了这种情绪。忧惧、缺乏安全感、仇外以及歧视成见，为纳粹党连同其躁动而不高明的解决方案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打开了大门。而恶性通货膨胀自然被纳粹党用来推行他们的思想观念，即所有的一切都是犹太人的过失与责任。曾试图履行德国那些赔偿承诺而遭遇不幸的拉特瑙就是犹太人；魏玛政府是一个“犹太政府”，数以百计的共和主义者及左翼党派的支持者，无论是否是犹太人，均受到攻击、殴打，或者像拉特瑙一样被暗杀。



面值**1**亿马克的纸币，**1923**年



Godd der Gerachte! Scho wieder ä naier Gometh!

Deutsche! Mit diesen Fetzen hat Euch der Jude um Euer ehrliches Geld betrogen! Gebt die Antwort:

☛ Wählt Völkisch=Sozial!

纸钞背面印有纳粹的宣传图文，**1927**年

地产抵押马克看起来是在这种谣言与暴力的可怕旋涡中提供了些许喘息之机，新的稳定局面或许预示一种政治常态的回归。一位英国外交官观察了1923年“慕尼黑政变”失败后对希特勒进行的审判，他报道说：“希特勒的最大敌人是地产抵押马克。我想，对巴伐利亚而言，甚至对整个德国的前景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过高估计货币稳定所产生的有利影响。”

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灾祸还没有结束。新货币一旦稳定，问题随之而来：该如何处理一文不值的通胀旧钞呢？当然可以烧掉它们来取暖（如第432页），但纳粹党却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出色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将它们用于宣传。于是，面值1亿马克的纸币被保存下来，成了1927年的竞选传单。它的背面又被印上了一幅反犹太主题的漫画。画面上，一个巨大的光芒四射的纳粹党“万”字图案[3]以彗星的形态悬在空中，下面是以讽刺手法描绘的一个犹太投资家，凸显出他高高的鹰钩鼻、硕大而贪婪的双手；他全身在图案下畏缩而颤抖，后仰时帽子也掉在了地上。下方的文字写着：“公正的上帝啊！又见一颗新彗星！”接下来的德文写道：“正告全体德意志人！那个犹太人就用这张纸骗走了你们清白的辛劳所得！是时候将你们的回答告诉他了：选举民族社会同盟！”这是一个与纳粹党紧密相关的政治团体。

这份耀眼却诡诈的物品是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一张纸上包含着两条简明的信息：印有币值的一面相当于一种持久的提示，使人回忆起魏玛政府在捍卫德国利益与繁荣方面遭受的挫败；在另一面，替罪羊已找好，一切都是它的责任，把它清除才是解决方案。1927年，当它被设计出来时，经济正在复苏，来自极端右翼党派的威胁看起来是在消退。下一场经济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将给予像这样的物件及其所包含的残忍观念以一种新生且具活力的潜力，而这种能量却过于强大，以至魏玛的地产抵押马克根本无力应对。



陶质花瓶，格蕾特·马克斯作，约1930年

[1] 英制一码约合0.91米。

[2] 德语“Rente”一词源自拉丁语，本意指“收益、利好”，在该合成词中的意思与“保险、资产”相关。因此，该货币汉译通常作“地产抵押马克”。

[3] 所谓“万”字，源于梵文“svastika”，寓意“福运”，原符号既可左旋也有右旋。1920年，右旋式经修饰成为纳粹党的标识。

第24章 肃清堕落艺术

> 她在众人面前被赶了出去。她带着二百五十件陶器和二百五十幅画作就来了，在抵达以前她还有过很多非常糟糕的经历。这些主宰着我的生活，虽然没有被谈及，却是关于她最重要的事情。

弗朗西丝·马克斯正说着她的母亲，那位于1936年离开德国而流寓英国的陶艺设计师格蕾特·马克斯。像许多人一样，格蕾特·马克斯之所以离去是因为她是犹太人，不过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她的陶艺制品在政治上过于危险。本章就来讲述纳粹主义下无生命的受害者，也就是第三帝国统治时期，那些在此新兴的德国没有立锥之地的艺术作品，此外还将讲述格蕾特·马克斯个人的命运。

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仅仅过了三个月后，纳粹学生团体中的一群学生在国民启蒙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的怂恿下，组织了一场焚书运动，遭焚毁的就是那些与纳粹理念不相容而被认为是“非德意志的”书籍。同一时间遍及全德的大学城引燃了同一把大火。这些书籍包括畅销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的作品，像赫·乔·韦尔斯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被视为国际主义者或左翼人士所创作的作品，诸如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思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犹太裔作家与学者的作品，甚至还包括儿童悬疑小说《埃米尔与侦探们》的作者埃里希·克斯特纳的作品——他的那些和平主义观念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克斯特纳是唯一目睹自己的书籍被焚毁的作者，当时他就在柏林现场的人群中。当年的焚书所在地就是今天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广场中央现有一处纪念场所：透过石铺路面上的一块大玻璃镜向下看去，人们可见一列列书架，这些未加装饰的白色书架空空荡荡，却足够容纳那一天遭焚毁的大约二万册图书。那把大火是场令人瞠目而难以忘怀的序幕，它开启了纳粹对“什么是德意志的、什么不是德意志的”进行重新定义的运动，并启动了一个净化所有德意志文化、将被视作危险的艺术（或他们所表述的“退化的、堕落的”艺术）清除出纳粹德国的进程，这次事件至今仍存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成为他们深以为耻的一刻。倍倍尔广场的纪念场所旁，刻着海涅作于1821年的先知名言：“这只是个前奏，他们在何处焚毁书籍，最终也会在那里焚毁世人。”



纳粹党徒焚书，柏林，1933年



格蕾特·吕本施泰因（后改为马克斯），约1925年

书籍之后很快轮到了其他艺术创作形式，如音乐与绘画、雕刻与陶艺。这就解释了为何格蕾特·马克斯所制的花瓶之一如今会藏于大英博物馆（见第438页）。那是件使人乐于拥有并把玩的器物，它约一英尺

高，整体呈葫芦形，近似球体的上下两部分由一瓣曲柄连接在一起。圆润的造型彼此柔和宁静地融为一体，看起来像是非洲陶器的外形，不过冷色的绿釉配上醒目的红棕色斑点则无疑是东方风格。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曾关注过世界陶器传统，并受这些传统启发创作了一件简洁精致的作品。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她选用了一家可靠的制陶工厂，使得陶器作品可由工坊进行量产。

格蕾特·马克斯（该姓来自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位英国人；在德国她则以格蕾特·吕本施泰因闻名）曾于1920年在魏玛的包豪斯设计学校接受培训（详见第20章）。她很快就成功地掌握了包豪斯设计创作的基本原则，好的设计可以工业化生产，价格也不贵。1923年，她在柏林以北的马尔维茨开办了自己的工厂。那里不久就声名鹊起，成为现代陶器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工厂的雇工超过一百人，产品销往全世界。1932年间，当时一份杂志描述其为“一家设计品位优良、令你物有所值的工坊”。两年后，“品味优良”被公开攻击贬斥，并被贴上了“堕落”的标签。1934年，格蕾特·马克斯只好将她的工厂卖给一位纳粹认可的人士。1936年，与许多犹太人一样，她离开了德国。

众所周知，纳粹的信条强调种族的纯洁性，以及雅利安或日耳曼的族属，突出被视作纯正日耳曼血统所拥有的那些体貌特征。正如希特勒于1937年所说：

> 一个绚丽优美的人种类型正在成长，如我们去年所见，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1936年举办于柏林），他们将其耀眼的、自豪的及体格上的美与健展现在世界面前。从未有人类在其外貌与情感方面比今天更接近古典风格。

人种如此，艺术亦然：二者所具备的真正的德意志特性要加以辨别，并被赞赏与效仿。政治领袖的极其简单的任务便是，在人与艺术的世界里，从不纯净中筛选出纯净，去净化传统，去创建一个全新且更加美好的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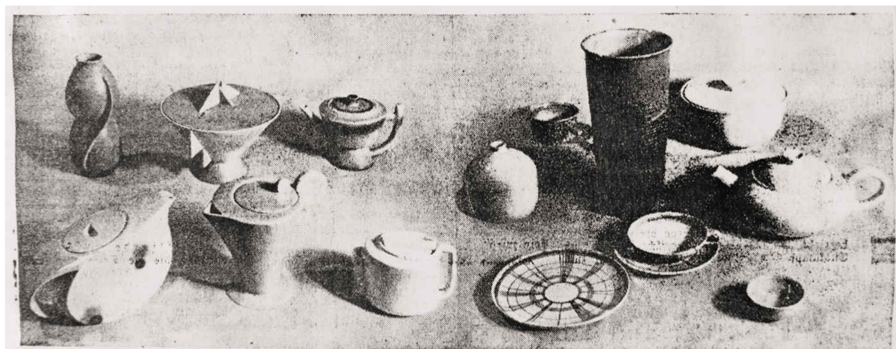
但无论对人，还是对艺术，这项任务执行起来都非常困难。正如纳粹党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像雅利安人，甚至都无法归入“一个绚丽优美的人种类型”。因而在德意志文化的万神殿中，很难信心十足地去辨别他们所渴望的那种德意志传统。于是，纳粹往往并不过于强调传统的哪些部分才是真正德意志的，就像当年拿破仑战争后正找寻一种全新的德意志认同那样（详见第7章），而是更频繁且更排外地将重点置于那些不属于德意志的特征上。这样一来，门德尔松与马勒由于是犹太人，很快就得以确认而被排除在外。而路德与丢勒均被判定为安全类型。歌德则有些问题。他无疑是位巨人，尽管如此他却表现出令人烦恼的世界性，他对亚洲的文化感兴趣，而他笔下有太多的英雄形象，既敏感又谨慎，却不能当机立断。虽然希特勒本人非常赞赏《浮士德》这部戏剧，但歌德的多数作品还是被客气地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席勒剧作中的那些主人公被解读为真正的德意志英雄，他们兼具果敢与自我牺牲的品质。海涅的诗歌则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多有讽刺意味，嘲

弄着诸多德式的自负与缺陷。当然，他也是犹太人。因此，著名诗歌《罗蕾莱》的作者海涅被从德意志文化史中抹去。《罗蕾莱》本身因太过流行而无法加以禁止。于是，它的作者直接成了“佚名”。

在纳粹构建的这个美好新世界里，理想中的艺术将颂扬理想中的美。所以，由于那些官方仲裁者的口味，希腊与罗马英雄式的雕塑就倍受推崇，而任何扭曲、弱化或重排人类形态的尝试，比如抽象表达或立体主义，便受到质疑。如果那种重排用到了非洲或其他地域的模式，则是不可接受的。除此之外，在作品或艺术家当中，若存在些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与犹太教相关的内容，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堕落的”，不适合向德国民众展现。战线已然划定。怪异的是，刚刚提及的那个葫芦造型的花瓶竟然出现在最前沿。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严重挤压了现代陶器制品在德国乃至全球的市场。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以及针对“堕落艺术”而进行的迫害，终于迫使格蕾特·马克斯于1934年将她的制陶工厂以低价出售给纳粹支持的国家手工业集团。这就给了纳粹分子大好机会来对她本人及其作品进行攻击。那件作品明显带有中国陶器的意趣及非洲式样的造型，它松散的泼溅式釉面使人想起现代主义的着色工艺（有些许康定斯基的风格？），而其制作者更与包豪斯及不为当局所容的左翼政治倾向有某种关联，像这样的陶器永远不会成为积极的纳粹分子用以摆放花朵的花瓶。于是，那些新业主便在工厂里开办了一间被他们称为“恐怖劣品陈列厅”（Schreckenskammer）的展室，专门用来展示堕落的陶器制品。

在戈培尔主办的宣传报纸《进攻》（*Der Angriff*）中的一篇报道里，他公布了一张格蕾特·马克斯所制花瓶的照片，以及她另外一些作品，并宣称这些陶器已“失去了属于德国乡间与德意志人民的简洁而带有本土传统的美”。另一方面，由她的继任者、纳粹认可的黑德维希·博尔哈根所开发的那些新式设计则被描述成“高雅的造型，展现出我们已经进步良多”。文章对比着两位女士的作品问道：“两个人种为相同的用途采用了不同的造型。哪种更美观呢？”当时的回答无须多言便已明了。


Zwei Rassen fanden für denselben Zweck verschiedene Formen. Welche ist schöner?

刊载于约瑟夫·戈培尔的《进攻》上的一篇报道，比较了分别由格蕾特·马克斯和纳粹认可的黑德维希·博尔哈根所制的陶器，**1934**年

戈培尔看来并未意识到，这些“更美观”“更德式”的造型中，有些实际上并不是黑德维希·博尔哈根设计的，而是接受包豪斯教育的犹太陶艺师格蕾特·马克斯本人的杰作，是在她掌管工厂时期完成的。在鉴别所谓“属于德意志人民的简洁而带有本土传统的美”的过程中，令人迷惑的欺骗性使得这个“堕落花瓶”的想法更显荒谬。

犹太人格蕾特·马克斯“堕落的”陶器同黑德维希·博尔哈根“符合道德规范的”作品，于1934年在恐怖劣品陈列厅以及《进攻》的报道中相互对峙。其间种族主义与仇外排外的声音只是一次预演，更大规模的运动即将来临。三年后，两个大型展览在慕尼黑的一个专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场景中举行。现今执掌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克里斯·德尔孔以前曾是“艺术殿堂”的馆长。该场馆当初被建来专门展出健康的德意志艺术，而今成为一座公共展馆。对此，德尔孔介绍说：

> 德意志艺术殿堂是希特勒提出的一个设想，它应该用来展现雅利安属性以及德意志文化的理想。所以，他们在1937年7月揭幕了“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展”。一天后，宣传性展览“堕落艺术”在距德意志艺术殿堂几百米开外的宫院花园开展。比起“伟大的德意志艺术展”，该展览的参观者要多得多。

“堕落艺术”展的大部分展品来自公众收藏，被挑选出来用于展示破坏真正美感的、扭曲而无序的混乱状态。纳粹当局组织了团体参观并鼓励自行前往，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对那些被视作现代艺术的变态式样望而却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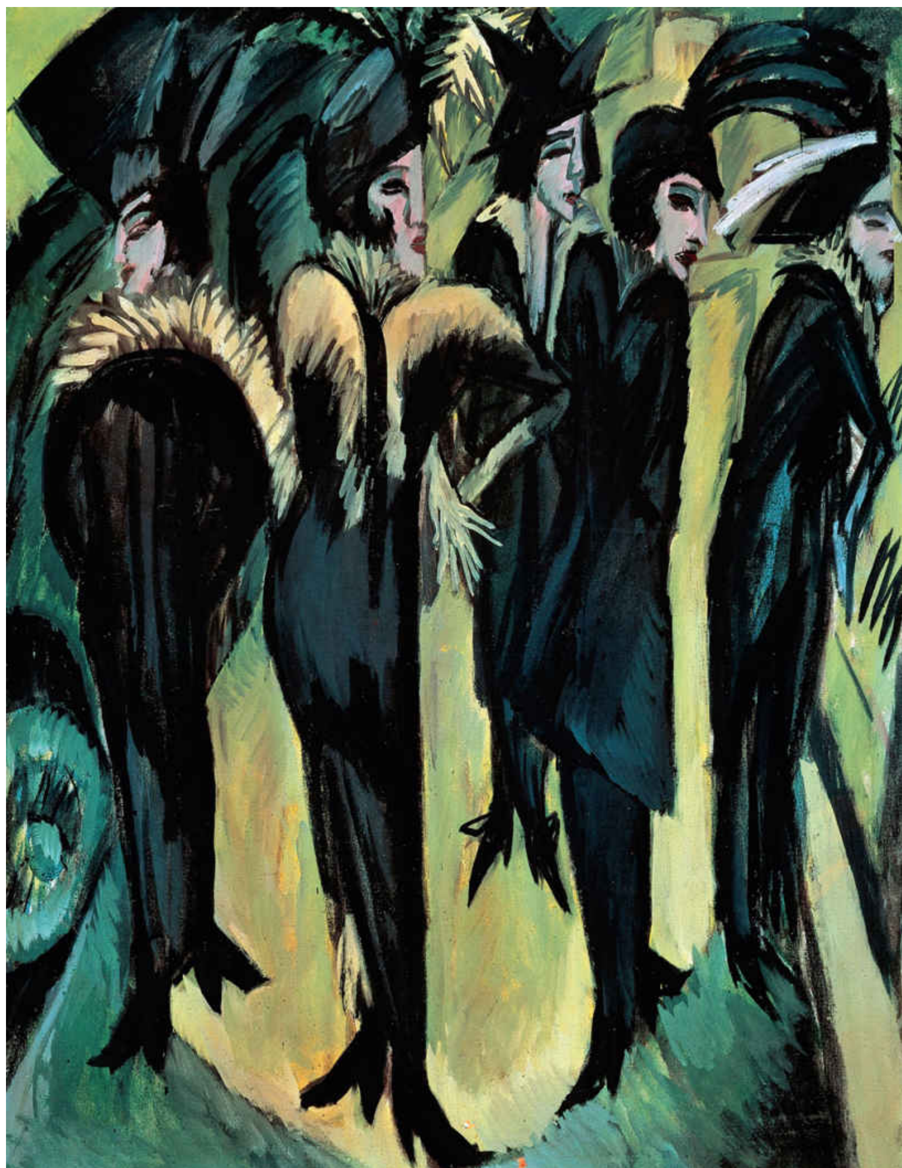
堕落艺术展，慕尼黑，1937年至1938年



堕落艺术展在柏林艺术厅巡展，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2月到场参观



“堕落艺术展”导览手册封面上展示的现代雕塑，奥托·弗罗因德利希作于1912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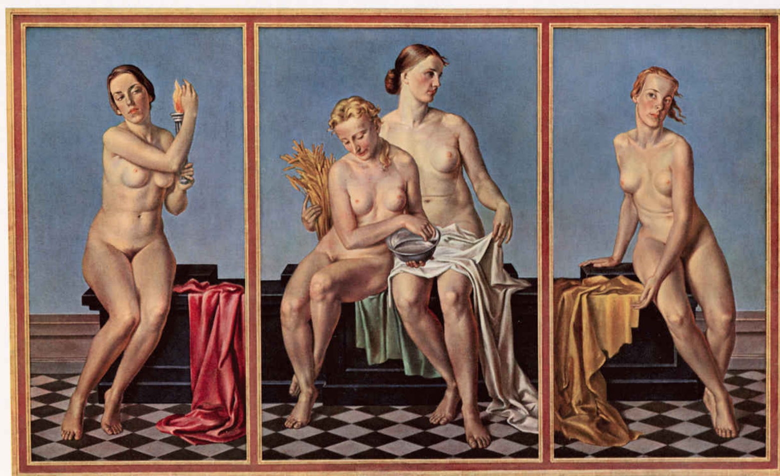
《五个女人》，恩斯特·基希纳作（1913年），1937年在“堕落艺术展”中展出



首届“德意志艺术日”游行，慕尼黑，1937年7月18日



受认可的艺术：阿道夫·维塞尔的《卡伦贝格农夫家庭》（1939年），由希特勒购得并置于帝国总理府



阿道夫·齐格勒笔下代表火、土、水、气的《四元素》（1937年），1937年选入“德意志艺术展”，后来希特勒将此画悬挂于壁炉上

共六百五十件画作被刻意杂乱无章地挤放在各间展厅。它们按不同的主题分组，诸如“诋毁宗教”“犹太艺术家”，还有“侮辱德国妇女、将士与农民”的作品。这些画作还被配上贬义的标语及标题，比如“羸病灵魂眼中的自然”“典型：白痴与婊子”“犹太人种族灵魂的启示”等。这些经筛选而列展的作品来自一百一十二位艺术家，其中仅有少数是犹太人。一些德国（实际上是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家是展览中的主要角色，如夏加尔、康定斯基、克利、奥托·迪克斯、马克斯·恩斯特及基希纳等。今天，他们的作品被视为20世纪欧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这些艺术家却作为堕落的典型被拉出来示众。

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使民众明白什么才是高贵的，是真正德意志的。于是，另一个展览便推出了那些官方认可的艺术家，比如奥斯卡·格拉夫、阿道夫·齐格勒，以及阿道夫·维塞尔等人。他们如今却只是历史的奇趣注脚。当时，希特勒亲自为展览揭幕并致辞：“我们从现在起，将进行一场无情的净化战争，以清除侵蚀我们文化的残渣余孽。”“堕落艺术展”一结束，净化战争便愈演愈烈。不过，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来处理公众收藏的绘画、素描以及版画呢？对此，克里斯·德尔孔解释说：

> 随着时间的推移，划为堕落艺术的作品越来越多，名录也越来越长。1937年“堕落艺术展”开展以前，大约有六千件。展览结束后不久，名录里有了一万六千件，到最后达到了二万至二万一千件。1938年，纳粹党还提出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说，从公共机构偷盗堕落艺术品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维京人》，埃米尔·诺尔德作，**1922**年。背面（插入小图）保留着吕贝克博物馆的印鉴

纳粹统帅部的成员便窃取过那些他们想要的作品，比如戈林就选择

对凡·高与塞尚的作品下手。余下的或是出售以充实纳粹国库，或是被销毁。其中大约四千件被柏林消防部门付之一炬。这对德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即使在今天，德国各处画廊展厅所收藏的20世纪早期的伟大艺术作品也出奇的少，因为它们不是遭偷窃，就是被卖掉或被销毁。也许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比如位于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损失了十五件埃贡·席勒的作品，以及包豪斯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的十二件作品，此外还有不少于五百一十八件德国-丹麦籍表现主义画家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经由纳粹的合法买卖，许多自德国博物馆中流出的“堕落”作品现今出现在其他国家的公共收藏中。巴塞尔的艺术博物馆便有大量收藏。大英博物馆则藏有一幅诺尔德的蚀刻版画，画的背面仍保留着吕贝克艺术画廊的印鉴，它就是从那里被归入堕落的作品而流落于世的。这一印鉴就是当年被迫流离所留下的辛酸见证，就像一位被剥夺身份的公民的失效护照一样。

然而，一个远比流亡更糟糕的命运降临在1937年慕尼黑会展的一些艺术家及民间参观者头上。即使在今天，“堕落艺术展”导览手册也使人在阅读时感到不安与厌恶。那只是一份简短的导览，但它却以满篇粗暴尖刻的言辞，鉴定了那些艺术上被划入变态而需清除的门类，比如文化上的无政府状态、艺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寥寥数行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抽象形式、对战争残酷性的和平主义再现、各式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扭曲、被描述为理想人种类型的黑人与南海岛民，以及将先天痴傻、呆笨与瘫痪病人选作范型等。你在阅读时会不寒而栗地发现，这里所谈论的对象，也正是第三帝国自1933年在达豪启用第一座集中营以来，一直监禁或预谋肉体消灭的人群类别，即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平主义者，还有精神或身体残疾者，以及在种族上受歧视的人。从艺术作品殃及世人本身只是一小步而已。

这种关联在后续的一次巡展中更为明晰。那是当年年底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主题是“贪得无厌的犹太人”。由戈培尔揭幕的此次展览将犹太的历史与宗教描述为一种长期的全球阴谋，并把高利贷的种种极端表现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各式恐怖并列。展览海报完美沿用了“堕落艺术”鉴别过程中的后续步骤。海报显示了一个高大的犹太人，他的面貌特征就是一幅怪诞的讽刺漫画。他一手托着金币，一手攥着鞭子，一身装束也与早已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人传统服饰完全不同。此人来自东欧，也许是波兰或是俄罗斯，换句话说他是个外国人。展览的标题以模仿希伯来字母的形式呈现，这同样是异域而非德国的。他的臂膀下夹着像是从一幅拼图中剪出的苏联版图，上面还印着锤子与镰刀。海报与展览宣传中的这个犹太人是个决意要恐吓勒索并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闯入者。最后的扭曲之处在于，举办展览的地点选在德意志博物馆。它本身并不是一处关于艺术或历史的展馆，而是一座科技馆。于是，种族偏见作为客观的、科学的真相被展示了出来。



“贪得无厌的犹太人”展览，慕尼黑，**1937**年



“贪得无厌的犹太人”展览海报，1937年

在大规模罪行的背景下，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代表着所有个体所经历的痛苦，这类痛苦无休无止地叠加并又重复着，却总是有特别之处。早前介绍了那只花瓶的创作者格蕾特·吕本施泰因女士，她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她先是来到英国，结婚后成了格蕾特·马克斯。她的这个姓氏而今倒更为知名。后来，她前往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去为明顿陶器厂工作，在那里她有自己的工作室。不过这一安排最后并未如愿，

六个月后她离开了明顿。弗朗西丝·马克斯继续讲述道：

> 她是位令人敬畏的女性。她希望能以艺术家的身份得到认可，这在当时的英国的确是不可能的。

她从德国带出来的数百件陶器从未被展出过：

> 我们曾有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教堂式窗户，那些陶器就一直存放在大约20英尺高的箱子里。直到她去世后，父亲拿出了几件，我才见到了那些陶器。

格蕾特逝世后，她的丈夫和家人将她的一部分作品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于是，那只戈培尔不喜欢的花瓶来到了布卢姆茨伯里。不过，被格蕾特·马克斯存放并藏起来的不仅仅是陶器：

> 她作为一位艺术家而活着。当然，从我十一岁起，她便同我一起不断地奋斗，虽然并不是很成功。要评判我母亲的行为举止中有多少是因为她难民的身份和在德国的遭遇，有多少是源于她的个性，这是非常困难的。最痛苦的就是一直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她的过去。我不敢去触碰它，那就是个火药桶，所以我学会了不去触碰这些。那对她来说太痛苦了。我从来，从来也没有问过她关于德国的事情，那是个禁忌区域。

格蕾特是幸运者之一，这点她也会承认。她幸存了下来，并在别处找到了生活。可是，那些从未清晰表露过的事件所留下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却一直在伤害她，而且使她的女儿至今仍感到痛苦。

纳粹党当年是如何操控文化与历史、如何摆布各处展览与博物馆的，这方面的记忆如今在德国仍很深刻。这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任何一种审查行径都怀有持久的敌意，并对艺术自由生出一种热烈的支持，其炽热程度在欧洲其他国家实在罕见。“他们在何处焚毁书籍，最终也会在那里焚毁世人。”



从集中营外看去的布痕瓦尔德营门

[1]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纳粹时代最有影响的政客之一，深受希特勒信任。

第25章 在布痕瓦尔德营区门口

今日的魏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深受游客钟爱。战争对当地建筑造成的损毁已得到精心修复。成群的游人来到歌德与席勒各自的居所向他们表达敬意，汲取在魏玛古典主义中体现出的启蒙运动之精神，或是来欣赏博物馆中包豪斯的重要藏品（详见第8章与第20章）。

城外大约10英里便是埃特斯山迷人的森林风景。歌德常常在宁静的林间与起伏的山野中漫步，他的情人夏洛特·冯·施泰因就住在附近。因此，对德国那些郊游散步者而言，这处美景早已经由文学遐思而变得更加赋有传统意趣，有点儿像英国人眼中华兹华斯时常流连的湖区景观。如今，远足者在此不是来寻求文学回忆，但它确是一种异样风格的观光景点。路的一边还保留着一段旧栅栏，一间看起来像门房的建筑，通往一大片庄园。此处的德文名字意为“山毛榉林”，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更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闻名。

森林中的这片迷人区域是一处令民族倍感耻辱并引发国际反思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诸如文学与法律、伦理与音乐等领域展现出的那些高尚且仁爱的德意志文化传统被扫荡一空。在自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一处处城市与社会的毁灭中，在奥斯威辛那样的死亡集中营里，在犹太人遭遇的系统性残害中，在对数百万人的杀戮中，一个过程结束。而发生于此地的残忍及不公曾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通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门房与岗楼

先后有五万六千名囚徒在布痕瓦尔德丧生，但这里原本并不是灭绝营，而是通往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及灭绝营的重要一步。布痕瓦尔德的出入大门值得密切关注。它述说着一种特殊的黑白颠倒与野蛮暴行，一种精神上的施虐，然而它也是一番对尊严的平静声明。这道大门

的两边正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两面的写照。

原址上复制的布痕瓦尔德营门，从营内向外看去

仅仅从外面看向这座集中营内部是不够的。人们必须经由这道大门走进营中，然后由内往外看，以便读一读门上铁铸的粗体字母所拼写的格言。每个来到布痕瓦尔德的囚徒，回身望向那个他们正被迫与之隔离的世界时，就会读到它：“各得其份”（Jedem das Seine）。曾在回望时读到这句格言的人中，有作家及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和凯尔泰斯·伊姆雷，有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有西班牙共产党员及抵抗战士豪尔赫·塞普伦，有两位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与保罗·雷诺，有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还有迪特里希·邦赫费尔，一位新教神学家，也是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中一位关键成员。所有这些人都看到了铁门上的文字：“各得其份”。





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达克特金币，上有铭文“各得其份”（**Suum Cuique**），**1707**年

这些文字表明了一种对正义的理想。它们是罗马法准则“Suum Cuique”的德语译文，这一准则不仅被吸收进德国法律，也融入欧洲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德国大学自19世纪中叶起引领世界的诸多领域之一便是对罗马法的研究。而这一表述在其他领域也曾引发共鸣。1701年，就在普鲁士首位国王加冕前夜（详见第3章），这些文字被他选作黑鹰勋章上的格言。黑鹰勋章是这个新王国刚刚创立的最高等级的骑士勋章。国王将“Suum　Cuique”刻在他的制币上，以此来概括普鲁士邦国所追求的高贵的贵族行为规范。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将这些文字以德文形式写进音乐，创作了那首为“圣三一主日”后第二十三个周日所作的康塔塔（BWV　163）。这部作品首演于1715年11月，地点正是距布痕瓦尔德几英里远的魏玛宫院教堂。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作康塔塔（**BWV 163**）的曲谱节选，**1715**

年。该作品以《各得其份》（**Jedem das Seine**）为题，这句短语出现在五线谱表第十行

有哪三个德文词语拥有更高贵的源流？或是在艺术、伦理、政治与知识等领域承载了更多的愿景及成就？然而，那些文字就在此处。距魏玛仅几英里之遥的布痕瓦尔德营门以一种尤为敏感的方式提出了现代德意志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德国历史中这些不同成分是如何拼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仁爱的传统又是如何崩塌的？

“各得其份”是一个有多种诠释的短语，其古典的本义是对公正的确认。而在囚徒眼中，它定是一种嘲弄，一盘无法破解的迷局，就是设计来对他们进行羞辱的。每一天，当他们离开营房，前往各处兵工厂房，并在党卫队看守的监视下工作，他们便会读到门上的“各得其份”。无论作何解释，党卫队显然想要确保这些文字不会被忽略。历史学者玛丽·富布鲁克是布痕瓦尔德纪念基金委员会的成员，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特别的问题。对此，她说道：

> 面朝囚徒的这一侧，也就是你实际能读出那行铸字的一面，每年都重新上漆。营区存在的八年间总共八次，字全被涂上红色，好让营内所有囚徒都能看到。而在外侧，也就是你走进营区时看到的铸字背面，只在它第一次安装时才上过漆，以后就再也没有重新粉刷过了。显然，确保囚徒们在门前操场列队时，时刻都能清楚地看到亮红字母组成的这句话，这对党卫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它是很独特的。当你走进奥斯威辛、达豪或是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时，营门上的标语“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都正对着你。它们都是为人们进入营区而立。而这一处却是为营区内的囚徒特别设计的，以便让他们天天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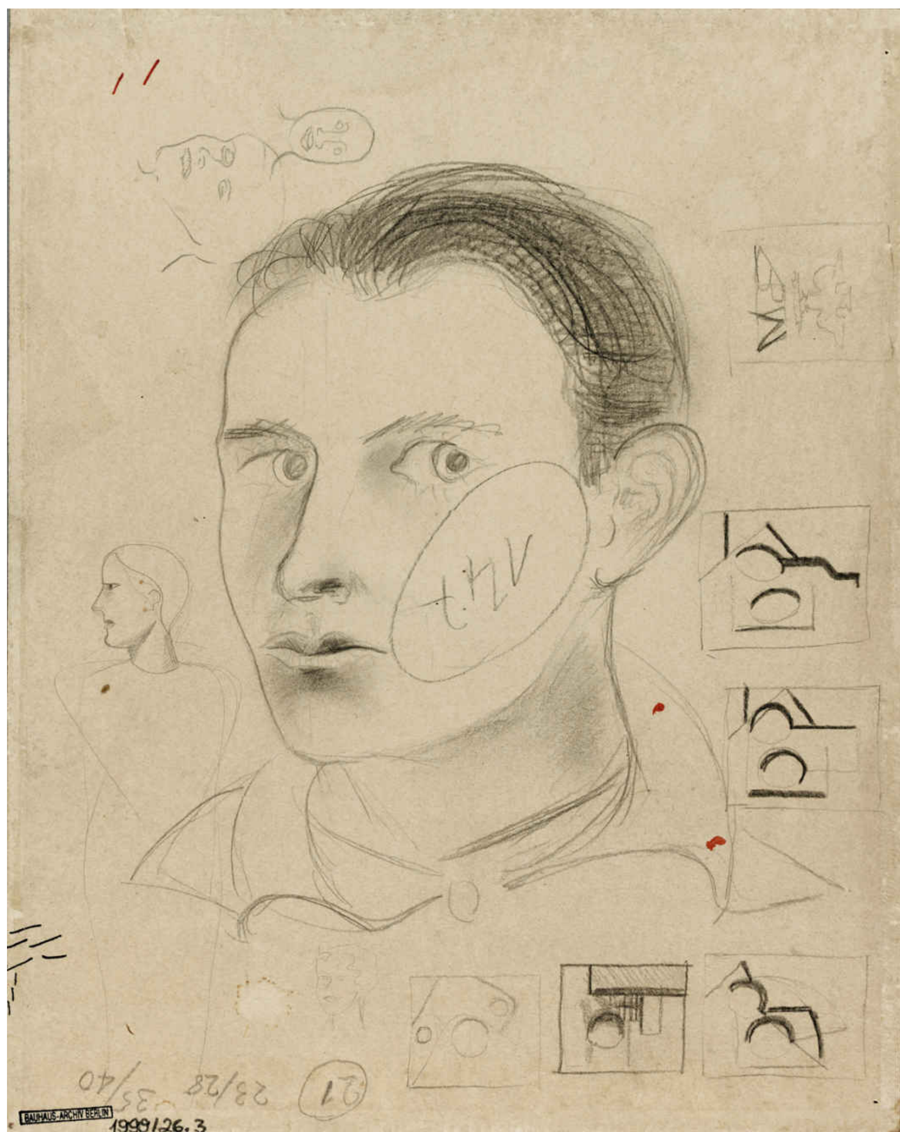


布痕瓦尔德被解放时营房内的囚徒，**1945**年

今天的布痕瓦尔德是一处纪念场所，既是在悼念营区内的遇难者，也是在哀悼纳粹德国各地集中营里所有的遇难者。布痕瓦尔德并不是首座集中营，也绝不是最恶劣的一座，但所有来自不同类别的遇难者正是经由这道大门进入了营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营监系统下或被监禁或遭杀害。其中有对帝国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即1939年德国疆界以内的德国人），也有帝国疆域外的德国人，有罗姆人、斯拉夫人，也有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精神病人，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尤其是最庞大的一个受害群体——犹太人。此处“Jedem das Seine”意味着奴役、折磨、谋杀、无法形容的医学实验以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丹尼尔·格德是营区纪念场馆的导游之一。对于当年哪些人因何被送往布痕瓦尔德，他解释说：

> 你可能会说，最初是不同德国人之间的一场冲突，一边是那些穿着党卫队制服的人，另一边是共产党员、耶和华见证人或者被迫佩戴标记的犹太人。最后，这里的人几乎是来自欧洲各地。因此，你可以把布痕瓦尔德的历史与欧洲大陆的一般历史进行对比。某个国家一旦被占领，那里的人便会来到布痕瓦尔德。所以，起先他们被从奥地利送来，然后是从波兰，再后来是从法国，从比利时、荷兰陆续送来。盟军进入法国后，在法国抓获的英国人和美军飞行员也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此外还有波兰人，以及来自其他被占领国家的人，比如捷克共和

国，还有很多人来自苏维埃地区。他们遭受的对待甚至比其他人更差，因为在纳粹党看来，这些人都没有同等的生存权利。这也意味着比如犹太囚徒或同性恋者等许多不同的族群都遭到了屠杀。不过，这处营区的主要功能是劳动，以此支持工业，例如军火工业。囚徒也在营区外的各处村庄及工厂劳动，所以和当地民众有许多接触。这和波兰占领区那些灭绝营完全不同。



弗朗茨·埃尔利希《自画像》，作于1934年至1937年

弗朗茨·埃尔利希为巴塞尔的包豪斯展览所作的海报，**1929**年

走过布痕瓦尔德营门的时候，你会感到困惑不安。它并不像一扇大门，更像是家里的一个带把手的房门。你难免会想，这么平常的门里面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它不会像监狱大门那样被砰的一声猛然关闭。它只是轻轻地开合。那句格言“各得其份”所用的字形既醒目又简洁，不得不说还很美观，但同样也使人感到不安。整行文字与视线齐平，字母的外形与间隔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无疑是件美学佳作。它其实是包豪斯

排版印刷的一件杰出范例（详见第20章）。这句格言意在言明党卫队对囚徒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纳粹党眼中，包豪斯被归入左翼阵营和世界主义派而受其排斥。但深受包豪斯影响的这一字形正是对那样荒谬的认定而发出的微妙而隐秘的抗议。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尊严的宣告，感人肺腑且强而有力，反抗着这处营区及所有集中营代表的一切。

它是由弗朗茨·埃尔利希设计的。他在包豪斯求学期间师从克利、康定斯基以及格罗皮乌斯等人，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早在1934年，他就因“预谋叛国”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布痕瓦尔德营区建成后不久，他便被转到这里。一年后，管辖营区的党卫队命令埃尔利希来设计营门上的文字。也许仅仅是出于手艺人的本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制作出令自己自豪的作品，或者可能是出于一种微妙的抗争精神，总之他选择以包豪斯特有的字体风格来展示那些字母。党卫队没能看出这一点，没理解它的全部内涵，但许多囚徒一定能看得懂。布痕瓦尔德纪念基金会的玛丽·富布鲁克对此解释说：

> 弗朗茨·埃尔利希出身于包豪斯，他特别为自己的设计选择了这种真正艺术的、美观的、灵动的字体，带有强烈的包豪斯风格。这在纳粹看来是堕落的艺术，是他们一直禁止的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埃尔利希把它用于字体中，也是在表明：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德国，还有另一种传统。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无论如何，我们的精神永存。因此，你可以把它解读为对营门本身意图的巧妙颠覆。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标志。如果你看到其他营区的标牌，会发现它们都只是非常基本的大写字母，做工粗糙，字母的间距都不合适。那些营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标牌都不是艺术品。但这一个却是。
>
> 不过，与形式一样，文字的意思也是可以颠覆的。一些囚徒所解读的方式就完全相反。比如一位叫卡尔·施诺格的囚徒在1943年创作了一首以“Jedem das Seine”为题的诗歌。他在诗中就把意思颠倒了过来：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得到应得的惩罚，有朝一日我们将重获自由，而后拥有正义，我们会向你们党卫队报仇。所以，囚徒们同样能以相反的方式来看待这句格言，也就是从长远来看，党卫队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而正义将会惩罚他们。



被美军宪兵带至布痕瓦尔德的德国平民，他们面前是一位被营区看守处决后悬在绞架上的囚徒，**1945**年**4**月

1945年4月，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后，将魏玛周边一千多平民带到营区，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纳粹以他们的名义都干了些什么，让他们亲自面对那作为证据的一堆堆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幸存者。美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决意让德国人看一看他同手下将士们曾经目睹的那些场面。在视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奥尔德鲁夫的一处分营时，他讲了一段名言：

> 我所看到的那些场面实在难以言表。与饥饿致死、残酷虐待以及野兽般暴行相关的目击证据和口头证言，都是如此充分有力。我特意来此地探查，为的就是假如将来发展出某种倾向去指责这些控诉只是为了宣传，我能提供这些事件的第一手证据。

人们或许会设想，解放将意味着布痕瓦尔德这处痛苦之所的终结。但就在五个月后的1945年8月，布痕瓦尔德又成了一座战俘营，这一次是由苏联人来管辖。在他们的占领区内有十处战俘营，这是其中之一。它在1948年正式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组成部分。此处曾关押了二万八千人，其中四分之一丧生，被埋葬在营区周边的墓地里。那些囚犯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其中一些是前纳粹党徒，但更多的人显然是因身份错判或遭任意拘捕而成为受害者，被抓进营区的。布痕瓦尔德纪念馆是在悼念这些人，正如它悼念纳粹时代的囚徒与遇难者一样。

“二战”致使出现了两个德国。1945年夏天，发生在布痕瓦尔德的事件的复杂性，则在各方对营区自身以及对分布于两个德国所有营区错综

复杂的反应中得以映照。什么样的记忆在美、英、法三国占领下的西德受到鼓励或被许可呢？与之相对的苏占区东德又如何？丹尼尔·格德通过多年来与东西德游客的接触，对此已能进行仔细深入的思考。他说：

> 我遇到过在东边（民主德国）长大的成年人，他们在学校里就被要求写关于集中营解放的文章。他们问家里那时发生了什么，得到的信息是巴顿将军的部队4月11日开到了这里，随后集中营就被解放了。于是，他们得意扬扬地在学校里做介绍，却都得了很差的分数，因为那是错误的说法。依据官方的说法，是营区内的共产主义者自己解放了自己，短短两天后美军开到了这里，却惊讶地发现营区已经掌握在囚徒们的手中了。那是在冷战时期，要说帝国主义势力解放了共产党人是有点困难的。
>
> 不过我们得记住，要在西德说共产主义者是反抗纳粹的战士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西德，共产党是非法的。曾被纳粹关押于布痕瓦尔德的那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西德又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他们仍作为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

比起上述那些，差异其实要更为深刻。20世纪50年代，一些集中营就被东德政府宣布为纳粹恐怖遇难者的纪念场所，布痕瓦尔德便是其中之一。正如丹尼尔·格德所指出的，西德对那些集中营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地处慕尼黑外围的达豪集中营实际上仍作为一座营区，用来安置被从东部领土驱离的德国难民（详见第26章）。他们不得不同十年前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居住在那些相同的木屋里。虽然恶名昭著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已经正式成为一处墓地，用以安葬成千上万在此丧生的人士，但并没有提及被埋在那里的都是谁，也没提到他们是纳粹的受害者。西德慢慢地才承认其纳粹历史造成的诸多影响，并开始纪念第三帝国的受害者。所以，东德当局为何那么早就决定将布痕瓦尔德作为一处纪念场所呢？对此，丹尼尔·格德谈了他的观点：

> 布痕瓦尔德正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丧命并被火化的地方，所以可以这样说，这里就是他的烈士墓。而掌控国家的那一小群共产党人很清楚，他们不是在统治一千七百万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知道，大多数民众要么积极支持过纳粹的社会工程，要么至少是部分地参与其中，所以对历史进行公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但要显示出这个新政府继承了与纳粹党斗争的遗产，那么有一些像布痕瓦尔德这样的纪念场所就很重要了。而在这座集中营的历史中，共产党人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成了国家纪念场馆。一代代人都应该来这里参观，从而明白他们必须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继续这场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等。在西

德，人们则声称：看东德人是怎么滥用历史的。同时，不少西德人试图去忘记、去隐藏战后他们自己在政府、军队及警局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延续的。他们有不错的理由给人一种“没有必要再谈论过去”的印象——因为他们不想提及自己的经历。

这个涉及个体经历与责任的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弗朗茨·埃尔利希的营门。“Jedem das Seine”——各得其份。然而，对于那些正面对一个恐怖政权的人们，我们能指望他们如何表现才算合情合理呢？布痕瓦尔德营门上格言的字形设计者后来的经历，足以表明1930年至1950年在德国幸存下来的每一位成年人不得不面对的那些困境。埃尔利希可能把营门设计成了一种抗议，而许多人也愿意相信，他是在维护另一种德国传统。1939年，埃尔利希从布痕瓦尔德被释放了出来。我们不清楚原因（那年希特勒生日当天，许多囚徒得到赦免），但我们知道，他在纳粹政权下继续从事着设计工作，职业生涯一直持续至战争结束。他做出了哪些妥协呢？1945年后，他继续在民主德国工作。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他此前就是一位积极的共产党人。但1990年后，史塔西的档案得以公开（详见第2章），暴露出弗朗茨·埃尔利希曾是一个监视自己同胞的活跃告密者。任何人，只要不是德国人，都应该深感庆幸，不必被迫去面对这种情况和抉择。



鸟瞰布痕瓦尔德营区，2010年。矩形区域标记着当年牢房的位置

今天，走进布痕瓦尔德，人们面对的是一处面积很大的空旷地带，像一处巨大的扇形阅兵场。场地尽头是树木，越过树梢，可见平缓起伏的山野。如今，山上的风电场发电机组正对着生长的农作物缓慢地旋转着。表面上根本看不到什么，仅是一处遗址，一份记忆。今天，布痕瓦尔德的作用已不仅是保存那份记忆，而是去探究它，并且去解释和发掘

它对德国乃至对全世界的重要意义。

布痕瓦尔德营门几乎就建在魏玛，就立在魏玛所代表的一切的眼前，在德国的这段往事中，它远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尚未回答且或许永远无解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一切？诸如丢勒、路德的《圣经》、巴赫、启蒙运动、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包豪斯等，所有这些德意志史中伟大的人性化传统，怎么就未能避免这种道德的彻底崩溃，而任其最终酿成数以百万计的杀戮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巨大灾难呢？这些都是今天每一位德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道营门及其设计者也给我们所有人留下另一个问题：换作你我，当时又会怎么做呢？

第六部分 与历史同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的功用就是确保它永远不会重演。”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如是说道。

一个国家如何从极端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加害者以及加害者的后人如何面对其责任？当一切都失去时，生者又何以重拾生活？德国人将1945年称为“零时”（Stunde Null）。自那一年至今，德国已经尝试在物质、经济、道德等领域重建自我。本书最后一部分就来审视一下这些年月。



来自东波美拉尼亚的难民所使用的手拖车，可能制于20世纪早期

第26章 被驱逐的德意志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在随后最初的几年和平岁月中，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这或许是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被迫流动，其规模超过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发生在苏联的历次人口迁移，甚至可以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印巴分治这一事件中的人口流动相比。总而言之，截至1950年，共约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四百万德意志人或逃离他们在中欧及东欧的家园，或从那里被强行驱离。其中大多数人无处可去。现今，在德国境外，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而在德国国内，这几乎是每个家庭自身历史的组成部分。

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辆小型手拖车。那些来自东波美拉尼亚（今属波兰）的难民中有一位，便是一路拖着它于1945年底来到德国的。这辆车有四个轮子，大小及形状同一张婴儿床差不多。它由随意处理过的粗糙木料简单制作而成，装有握把以方便拖拉。数百年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农业拖车来装载卷心菜和土豆，把它们从菜地拉到谷仓，再从那里拖到集市。

正如大多数传统的农业用具一样，极难确定这种拖车的年代。实际上，很可能在三百年前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恰恰在德意志帝国的同一片土地上，人们早已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比如装载蔬菜，或者用于逃避迫近的军队，而熟练使用这样的拖车了。车上高高地堆着寝具、衣服及食物，再也没有哪怕一点点空间来装运任何其他物品。难民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数百年之久的农庄及市镇。

1945年1月以前，在当时帝国东部的普鲁士及波美拉尼亚的民众一旦被纳粹当局发现使用这种拖车，就可能会被射杀。那时，西逃是懦弱的表现，而投降则是被绝对禁止的。不过，一旦德国国防军在苏军进攻下开始撤退，民众一旦察觉随之而来的将是抢劫、杀戮、大规模强奸等因德军在苏俄的暴行而招致的必然报复，他们便开始逃亡。他们仓促上路，撇下了带不走的或装不进拖车里的所有东西。数公里长的难民队伍拉着他们的拖车在雪中行进，于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混乱起来。由于大多数男子不是在战斗，就是已丧生，所以拖车主要都是由女人拉着前行。她们希望不要被东边来的那些意欲报复的士兵追上。

这只是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开始。在1945年夏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重新划定了欧洲版图。波兰边界西移数百英里；苏台德区重归捷克斯洛伐克；既是康德故乡也曾作为1807年普鲁士王室避难所的柯尼斯堡则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详见第3章）。各地说德语的民众，哪怕在当地定居已达数百年，也都成了仇恨与迫害的对象。为了避免爆发民族仇杀，占领当局看到了唯一的解决方案。《波茨坦协定》规定：

> 三国政府已充分考虑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确认将现

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德裔居民或相关人员迁至德国势在必行。三国政府一致同意，任何迁移行动均应以有序且人道的方式进行。



趴在堆满物品的拖车上休息的难民，滕珀尔霍夫，柏林，1945年



拉着手拖车行进的难民，东普鲁士，1945年春



离开柯尼斯堡的难民，1945年1月

平淡的文字背后却是一个简单粗暴的现实：说德语的民众将被迫迁

往当时认定的德国领土，如有必要，不惜强制推行。按丘吉尔的说法，这将是“最令人满意且长效”的解决方案，“导致无穷后患的族群混居局面将不复存在。隐患将被彻底清除”。然而，那种“彻底清除”却并不十分干净。据估计，由驱逐引发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了两百万。当时找不到货运卡车或汽车，马匹也很缺乏。对几乎所有人而言，搬运物品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手拖车。

任职于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的安德烈亚斯·科塞特是一位研究战后相关驱逐事件的历史学者。对于这样一件器物所代表的意义，他描述道：

> 手拖车成了一个普遍的实物表现形式，意味着被迫背井离乡。它很可能在19世纪便已出现，那是人口迁移的一个典型时期。这种手拖车的使用主要是在1945年春季和夏季，那时波兰和捷克当局已经将驱逐德裔平民合法化。在1945年8月《波茨坦协定》达成以前，波兰当局想要尽可能多地遣送德意志人出境，以便取得一个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一千四百万德意志人遭到驱逐，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这意味着战争结束时，所有幸存的德意志人中有四分之一成为驱逐行动的受害者。德国在1945年失去了总共四分之一的领土，而这些领土在此前数百年间都是属于德国的。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来自乡间。他们先是到达离自己家园最近的地域。所以，比如波美拉尼亚人或东普鲁士人来到北德，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则来到巴伐利亚或是萨克森。但同盟国随后把他们分散至德国各地。于是，多达一千万的难民在西德落户，大约四百万定居在苏占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

许多难民被强行分配至德国各地，被遣往那些他们此前从未到过甚至或许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大多数地方已成废墟，几乎无法安置返乡的当地民众，更别提容纳从东边和南边涌入的操着奇怪口音与方言的数百万人口了。若是打个粗略的比方，这就好像加拿大全部人口在1945年底被强行遣返英国一样。

这些难民的食宿问题要如何解决呢？在这种新处境下，手拖车能像以往一样发挥作用。安德烈亚斯·科塞特说：

> 大多数手拖车在战后仍在使用，因为那些以避难者和被驱逐者的面目来到西德的民众还得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自己种菜，也要找地方落脚，还得在西德境内四处奔波。所以，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唯一的运输工具。这种拖车一直用了好多好多年，也被那些家庭保存了几十年之久。

毫无疑问，这些移民根本不受欢迎。也许他们所有人都是德裔移民，但与故土长期分隔后，他们带有一些外来的稍显粗鄙的生活习惯，

而且他们正争夺着本就匮乏的资源，因此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早日返回家园。而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形势又格外加剧。对此，安德烈亚斯·科塞特解释道：

> 东边那些德裔难民的到来提醒着德国人，他们所有人都输掉了那场战争。在西德人和难民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西德人试图尽快地忘掉自己对战争的责任。难民却并没有返程票，他们待了下来，而且是永远地留在那里。他们提出了非常不讨好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们遭到驱逐，而你们却能待在自己的庄园和你们已经习惯的社会环境里呢？凭什么是我们为希特勒埋单，而不是你们？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被迫移民的情况看起来似乎仅是暂时的。那时，西德政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被驱逐者联盟”。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联盟都在敦促西德政府去向当事国要求归还战后被没收的土地与财产，特别是在波兰以及现今的捷克共和国。联盟的口号之一，比如“弗罗茨瓦夫就是布雷斯劳，而布雷斯劳是德国的”，指的便是西里西亚的首府。它长期是一座德国的城市，但在1945年后成了波兰的一部分。这些口号使西德同东德及波兰两国交恶，并且引发了漫长而艰巨的论战——即使这些论战仅仅是在国际法庭上。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试着通过发表声明来解决争端，宣称由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沿奥得河及尼斯河[1]划定的边界是德国最终的、无可争议的东段边界。众多的索赔与反索赔僵持不下，但勃兰特的立场却占了上风，并体现在《东方条约》中。这是一项解决了此问题的至高外交成就。这套和平的解决方案在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时受到充分认可。随着手拖车那一代人渐渐过世，为争取财产和领土归还而努力的那支政治力量也在慢慢减弱。同盟活动的焦点如今更多地转为保存苏台德、西里西亚或波美拉尼亚等地区德意志人的民俗文化。而德国东部疆界眼下则是欧盟内部和平的边界。

可以说，波茨坦会议关于迁移全部人口的决议，终于解决了“‘德国’在哪儿”这个持续了数个世纪的老问题。对19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受人青睐的答案呼应了阿恩特著名的歌曲：“只要能听到德语之处，那里就是德意志人的祖国”，无论是在汉堡或布雷斯劳，还是在科隆或但泽。

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瓦尔哈拉所遵从的入奉原则（详见第9章）。然而，鉴于说德语的人地理分布广阔，对于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而言，它便成了一个不能被平和容纳的回答。对东欧而言，1945年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完全颠覆了阿恩特的表述——说德语的人应该仅仅生活在国际议定的国家疆域内。德国的疆界不再游移不定。

若说手拖车体现了一个“旧争议”的完结，那么它同样处于一个“新讨论”的中心。牛津大学的阿比盖尔·格林回顾了过去十余年间德国历史学者关注焦点的转变，她评述道：

> 我认为近期最重要的议题是尝试处理“二战”期间德意志人同时作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经历，以及如何将这些引入国家叙述中。

正如在德国城市遭轰炸时丧生的大批遇难者一样，东欧数以百万的被驱逐者至今仍未得到纪念，相关研究也不够充分。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这些事件是罪有应得吗？然而，那些被驱逐者的痛苦是无法否认的。手拖车所表达出的悲怆，强烈、有力并且真实。被驱逐者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犯下如此之多的罪行时，我们该如何面对为其承担后果的国民所遭受的苦难？假如我们认定那是一种“公共罪责”，我们还能为个人表达同情吗？这些问题困扰着安德烈亚斯·科塞特：

> 现今，战争结束七十年后，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依然受到它的影响。不过，它在德国只是渐渐成为一个集体记忆的话题。许多家庭对此完全保持沉默，关于父辈或祖父辈的损失和悲痛，他们一言不发。可是现在它突然进入社会的中心。在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中，我们只有这辆手拖车作为展示，讲述着一千四百万德意志人的故事，这在当时占全部德意志人口的四分之一。我想，在对德国人集体记忆具有意义的事情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在柏林中心地带为被驱逐者建立纪念场所的提议，如今尚在讨论中。

安德烈亚斯·科塞特说的没错，在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只有这一架难民在大迁徙时用过的拖车在讲述那段往事。但仅在数码开外是另一辆车。它的设计同样是为了便于用手拖拉，它同样被置于近代战争及大规模迁移的场景中。不过，这辆手拖车却要小很多。它是一套舞台布景的模型。它所反映的是1949年在柏林首演20世纪最著名的德国戏剧之一——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时的情景。



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在德国首演时的舞台布景模型，1949年

布莱希特于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他正住在斯德哥尔摩。布莱希特回应战争爆发的方式便是去创作这部作品。这是他所有戏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当然也是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他没有将剧本设定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是置于三十年战争期间。自1618年持续至1648年的那场冲突将德意志帝国蹂躏得满目疮痍，也使民众饱受其苦，在民族的想象中挥之不去（详见导言）。布莱希特在数周内写就了剧本。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大军及战机在波兰境内已势不可当。他意在使这部作品成为一种对所有战争的谴责。于是，他精心地将三十年战争用作时代背景，因为它在三百年前近乎摧毁了德意志帝国这一概念。战争、饥荒以及瘟疫，致使一些地区超过半数的民众丧生。布莱希特是在回应自己1939年间的亲眼所见。然而，他创作的戏剧却有着令人不安的先见之明——在接下来的五年间，数百万人于现实中上演了剧中的内容。



《对一座村庄的烧杀抢掠》，选自组画《战争带来的苦难》，雅克·卡洛作，**1636**年



德式防瘟疫面具，**17**世纪中叶

大胆妈妈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形象。她拉着货车随军叫卖，向士兵兜售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基本上，她就是黑市商贩，是个想靠战争发财的人。她的货车支配着整个剧情，从一幕转到另一幕。与大胆妈妈的孩子们不同，它挺过了战争。至戏剧落幕，大胆妈妈历经战争而丧失了人性，她将孩子们的死亡看作是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经营成本。她自己几乎与货车融为一体，二者都仅是为求生存而继续转动的机器。布莱希特将她刻画成一个战争中罪恶交易的主动参与者，这个角色并不比那些战争贩子及掠夺者好多少。不过，戏剧于1949年在柏林首演时，观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层意思。让他生气的是，观众主要看到了主人公的痛苦与挫败，他们受到感动并心生怜悯与同情，正像今天大多数的戏迷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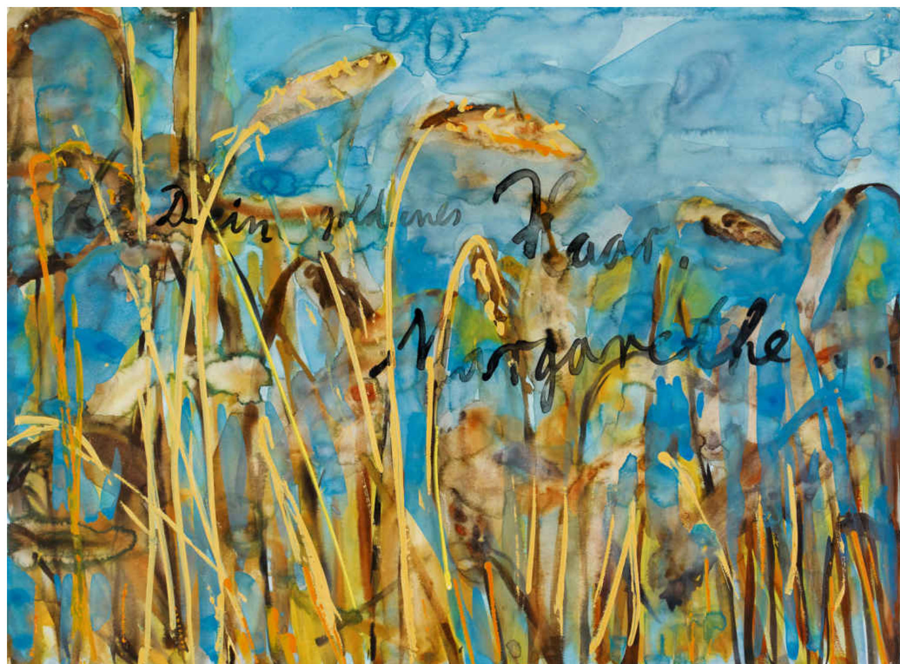


1949年，《大胆妈妈》演出中拖着货车的海伦妮·魏格尔

演员菲奥纳·肖是这个角色最有实力的表现者之一。她反省了我们为大胆妈妈深感遗憾、对其悲剧感同身受的问题：

> 传统法则下，女主角的道德准则通常是你想要追随的。而布莱希特却创作了一个削弱这条法则的女性形象。对这个女性来说，她个人的生存——表面上的生存——是她唯一在乎的事。但实际上，她在情感上显然无法存活下去。
>
> 大胆妈妈变得非常富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感到高兴，因为她一直干得不错。不过，变得富有的原因却是可怕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拖拉在拷问着我们对自己的感

> 受。在戏剧结尾，她出门去做些小买卖，回来时发现女儿卡特琳已中枪而亡。她最后一个孩子现在也死了，所以她变得孤苦伶仃，可能就支撑不下去了。对此，我们或许会为她伤感。然而，她并不为自己感到难过。她把自己绑在货车上，吃力地拖拽着，又再次随着军队离去。
>
> 但这并没有结束，这里还有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未来，没有情感未来，但她还是继续拖着货车前行。我很难相信，布莱希特对这个问题毫无怜悯之心。



《你的金发，玛格丽特》，安塞尔姆·基弗作于**1981**年

我们知道，对许多难民来说，应对生存困境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工作。正如安德烈亚斯·科塞特所指出的：

> 那些避难者和被驱逐者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比如他们带来了工程技能、专业技术，等等。而且人们也要记住，那时的大城市基本上都被摧毁了，难民提供了重建德国的劳动力，特别是西德的城市。

大众汽车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型工厂（详见第19章）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的至高标志。厂内的员工大部分都是难民。

德国占领东欧时的残酷暴行是1945年后数十年间散文、诗歌及绘画

里的反思主题。保罗·策兰曾作有一首诗歌《死亡赋格》，“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便是其中的名句。安塞尔姆·基弗为此诗歌创作的插画，以及他对该作品的沉思，正是对痛苦、失落与耻辱深切体味的缩影。策兰是个讲德语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他的家人都在犹太大屠杀中遇难。他对“大师”（Meister）一词的使用完全呼应了我们在第19章讨论过的精心掌握的技艺。

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及其东部疆界彻底划定以前，任何对驱逐事件深思熟虑的回顾都不可能出现。安德烈亚斯·科塞特认为，如果出现了这种回顾，便会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欧洲近邻的关系产生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影响：

> 我想，真正使德国人更加了解自己历史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冲突。我们在德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驱逐事件。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意识到并回忆起，这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想，这让民众连同政客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得采取行动，因为种族清洗不是，也不可能是正当的。



汉堡一位正在堆砖的建筑女工，**1946**年至**1947**年

[1]　德文作“Neiße”，音近“奈瑟”，为奥得河（die　Oder）西岸支流。

第27章 重新开始

1945年间，被杀或失踪的德意志人约有八百万，这超过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武装力量。德国的重要城市成了一片片废墟，不仅工业中心如此，许多中世纪及巴洛克时期的宝贵遗迹，比如纽伦堡与德累斯顿都成了瓦砾。未被炸弹直接摧毁的建筑物差不多也都被熊熊烈焰所吞噬。

全德境内八百万房屋遭到损毁，近半数街道、铁路被破坏，供水、供气、供电中断。整个经济近乎完全崩溃。类似的破坏及苦难，在此之前仅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时（详见第26章）。人们认为那次大灾难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影响长达几个世纪。不过，1945年之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西德的各城市就几乎完全得到重建，德国也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西德被誉为经济复兴的典范。而且，几十年来，全世界第一次学到了一个正面意义的德语词，那就是“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是民众，主要是妇女，创造了这个奇迹。

比如，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德累斯顿，2.5平方英里的中心地带几乎被完全摧毁，那里的一切就这么消失了。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居民不得不更加艰难地生存：食物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也没有燃料，没有交通运输，许多情况下没有住房、不见街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碎砖破瓦。当时，德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如何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尽管未来还不确定。然而这并不容易：德国四分之一的领土被划出，生活在当地的民众遭到驱逐而不得不向西迁移；濒临崩溃的基础设施因此越发混乱而压力重重。此外，盟国的想法也使德国的处境雪上加霜。那时，盟国本想肢解德国的工业基础，将其转变成一个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的国家。而这一目标在部分苏占区顺利实现。



德累斯顿城中的废墟，连同圣十字教堂被损毁的尖顶。贝洛托曾为二百年前毁于普鲁士炮火的同一座教堂作画。请见导言相关页

对普通的德国人而言，首要任务便是清理街道，并使各处残存的房屋尽可能地适合居住，在废墟上重建新的居所，以及恢复水电煤气的供应。但怎样进行呢？这个国家五分之一的成年男子丧生。还有许多人，或是肢体伤残，或是精神受到创伤，从而失去了工作能力。那么，在一望无边的废墟中清理断砖碎瓦，靠谁来做这繁重的工作呢？今天，你可以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见到当年的一些碎石瓦砾。不过，它们经由雕刻家马克斯·拉赫尼特改头换面，已组成了一尊引人注目的塑像。这件作品所展现的便是一位年轻女士的头部与肩部（见第496页）。它的尺寸比真人略大，由几百片抛光的大理石和玄武岩碎片镶嵌而成。她脖子上系一条红色头巾，平静得几乎没有表情，仿佛在思索什么。她是一位建筑女工，负责清理砖瓦，是数百万女工中的一员。这尊塑像正是由她们从一座座德国市镇街道上清理出的碎石瓦砾制作而成的。若没有这些建筑女工，德国的生活本将无法忍受。她们强大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使

这个国家重新站立了起来。

重建德国是一项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任务。在英国，人们具有“不惧德国空袭的精神”，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战争是他人发动的。尽管1945年许多德国人必定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当时这一问题很少公开讨论。那时，他们选择了沉默。这或许是因为德国人对纳粹以自己的名义犯下的种种罪行感到羞耻。在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对他们的城市所遭受的破坏无不感到愤懑。但面对汉堡及德累斯顿的遍地废墟，德国人的愤怒却并没有像欧洲各国民众那样公开地流露出来。在《空战与文学》一文中，温·吉·塞巴尔德论述说，战后的德国文学中，很少提到众多民房惨遭毁坏。这样的沉默犹如某种刻意的失忆。塞巴尔德对此思索过后，猜想德国民众之所以沉默，或许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市镇被夷为平地，正是惩罚他们国家犯下的暴行。



表现德累斯顿建筑女工的塑像，由陶瓷质地的碎片制成，马克斯·拉赫尼特作，**1945**年前后

无论什么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相关的讨论。建筑女工只能去工作。1945年至1946年，在西德及东德的盟国占领当局下令，所有十五至五十岁的妇女都要参与战后的清理工作。她们被分为小组，工具只有小镐和绞车。她们不辞辛劳地徒手将一块又一块砖从建筑物上拆下，再清理掉上面的砂浆，然后把砖块和石头堆入碎石车。只要是还能用的东西，她们都抢救出来——小至盥洗池，大到电缆，她们就是这样用双手重建起自己的家园与城市。当时，几乎每一位体格健全的女性都被雇来参与这项任务。

在德意志历史博物馆，距拉赫尼特的德累斯顿建筑女工塑像不远

处，我采访了她们中的一个姊妹。她叫黑尔佳·岑特-费尔登。苏军开进柏林并把她拉去劳动时，她十八岁。对此，她回忆说：

> 首先，我们被分成两组，然后被派到蒂尔加滕大街。那里的一切都遭到严重破坏，到处都是碎石瓦砾，还有士兵们遗弃的武器弹药。那个男主管站在一个巨大的弹坑旁边说，你们就从这里开始清理。还说，只要是不危险的东西，都扔到那个坑里去。他说，其他的东西（比如炮弹和巴祖卡火箭筒）都扔到河里，最后冲到蒂尔加滕湖去。
>
> 然后才真正开始清理砖瓦。他们把我带到波茨坦大街。我走向这幢受损而倒塌的建筑。部分建筑还立在那里，但其余部分都不见了，碎砖瓦堆得很高。一个妇女走到我跟前说："是这样，你已经被分派给我了，我们得把这片地方弄干净。这儿就是我过去工作的地方，原来是家商店。我们得把所有这些碎石砖瓦清理出去，才好重建商店。"但那里什么也没有，连个屋顶都没有。即便这样，商店也得重建起来。男人带着桶来装运碎砖瓦。我们大概花了九个月时间，把所有建筑垃圾清理出去。其中有些特别大，但也得把它们搬走。我都不记得有没有用过锤子或凿子，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给我们发工作手套时，我们太高兴了！



年轻的建筑女工们正清理着舍尔出版社的一处废墟，柏林，**1945**年

她还记得，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获得了更高的食物配给量，她们一家都很高兴。在讲述这段回忆时，她的声音里仍能听出某种激动的情绪。在德国，很少有公共纪念物纪念黑尔佳·岑特-费尔登等女性所做的贡献。拉赫尼特创作的建筑女工塑像，一定会立在那里，纪念所有这些女性。

建筑女工们将德国恢复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国家，速度实在惊人。20

世纪60年代，空敞的轰炸废墟在英国仍然常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在这些地方拍摄的电视剧。在德国，少数未遭完全摧毁的建筑，作为纪念象征而特意保留下来，比如位于西柏林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Gedächtniskirche）。它们提醒着人们第三帝国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广大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而这远远超过了建筑物本身所付出的代价。不过，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德国大部分（尤其是西德）已得到重建。德国人或许意识到，只要不去面对那些令人不安的现实，那么不间断的工作还是有益的。

然而，令人不安的现实却太多了，特别是经济方面。1945年，德国经济二十五年来第二次处于崩溃的境地：通胀肆虐，频繁地出现以物易物，没有人信任货币。在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帝国马克于1924年极为艰难地重新确立。如今，它再一次崩溃。德国虽然被占领，但帝国马克在理论上仍是该国的货币。然而，盟国不能容许饰有纳粹“万”字图案的旧式纸钞及钱币继续流通。于是，同盟国军事当局仓促地印制并铸造了新式马克及配给券，供民众购买面包及土豆等生活必需品。实际上，这种货币也难以为继。四国占领当局都看得出，需要一种新式货币。但就其形制，他们却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美、英、法三国决定先行一步。1948年6月20日，周日，刚刚于法兰克福成立的德意志州联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前身，推出了一种新货币。但它并非新式帝国马克，而是“德国马克”（详见第502页）。

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是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联邦银行董事会的主席。1948年，德国马克开始使用时，他恰好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对于使用德国马克之前的生活，他回忆说：

> 那时，我们的经济以两种面貌呈现出来。一种是固定物价的官方经济。你可以用配给券买面包或土豆，价格都稳定在1936年的水平。大学的费用可以用帝国马克支付，甚至乘坐出租车也可以用帝国马克付款。这就是经济的一面。另一面就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当然，作为学生，你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的。此外，还有一种黑色经济。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足够的东西用来交易。比如咖啡、茶叶、美国药品等，德国人就得用香烟去换，或者他们拿得出来的任何东西。

黑尔佳·岑特-费尔登对此记忆犹新，拿到正当的工作证和配给卡是多么难得、多么重要。对此，她说道：

> 那份工作确实很累。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个小时挣48芬尼。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干着重活，就可以拿那种重劳力食品配给卡，所以我们得的就比大多数人多得多。比如说，一张家庭主妇卡只容许她每天有1200卡路里的食物配给。作为建筑女工，我们得的差不多是她的两倍，有2200卡路里。如果你把自己这份加上家里其他人得的配给量，那我们一家人的日子就能过得不错了。



被分区占领时的德国地图，附有柏林分占图，1945年





自上而下：首版德国马克，面值1马克，1948年





10德国马克纸钞，正面设计受丢勒启发，1977年





100东德马克纸钞，正面是卡尔·马克思，背面展现了东柏林一处街景，1975年





5东德马克纸钞，正面绘有托马斯·闵采尔，背面是一台联合收割机，1975年





50东德马克纸钞，正面绘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背面是一处炼油厂，1971年

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三次使用叫“马克”的货币。首次是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那一版的马克在1921年至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崩溃。第二次是魏玛共和国起用的“帝国马克”，一直沿用到1945年战乱结束。基于这段历史，你也许会奇怪为何1948年决定再次用“马克”来命名货币。不过，它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无论历史上它遭受过多少挫败，自1871年统一以来，“马克”为奠定德国身份做出了贡献。也许由于现代德国具备以史为鉴的罕见能力，这个名称也带有某种警示意味，并作为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在联邦银行任职的德国经济及财政主管们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谨记这一教训。与此同时，他们也使新式德国马克成为经济史中最为成功的货币之一。

德国马克的出现是有争议的，不仅对普通人而言。当时，政治上的斗争加剧了经济方面的争议。替换帝国马克的计划是在秘密状态下执行的。于是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德国马克便毫无预兆地启用了。俄国人对此恼怒不已，拒不允许在他们管控的地域内使用这种货币。在西柏林引入德国马克，成了“柏林封锁”的导火索。一个月内，苏占区引入了另一种货币与之抗衡，习惯上称这种货币为“东德马克”。这一系列异常的事件，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两种新货币，即德国马克与东德马克，导致出现了两个新国家。毫无疑问，德国马克激发了西部诸占领区的经济奇迹，但它也一定程度上致使冷战期间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

从一开始，这两种货币明显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两种思想理念及两类不同历史观的产物。德国橡树的图案都出现在东、西德的钱币上。不过，西德的钱币还展示了德意志雄鹰，相继还配有战后政治领袖们的形象：康纳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及维利·勃兰特，是他们塑造并重建了西德。对常人而言，这几位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东德的钱币在分量上略轻，这些钱币上是苏维埃风格的劳动生产图案，比如麦穗、工具，等等。但在第502页所示的那些纸钞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差别。对于过往，西德好像找不到某种形态、某种可以接受的形象。它完全回避了近代的历史，纸钞上的图饰上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作品——这位德意志民族伟大艺术家所描绘的德意志人的形象。但东德在意识形态上非常迫切地想向公众传递引领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那番斗争。这些纸钞一面展示出教育、住房及工业等领域的当代图景；另一面则是社会主义的英雄们，诸如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期间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两种钞票反映出的是对德国的不同构想，在将近四十年中，两者隔着铁幕彼此相对：一边是代表欧洲文化的丢勒，连同一艘旧式帆船；另一边则是恩格斯和一座现代化炼油厂。

德国马克推动了西德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至此，它便成为西德及其经济上所获成功的不二象征。而许多东德人同样青睐它。直至1989年，它甚至比美元还要稳定，且未曾受到实质性的挑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重新统一突然之间不再是某种强烈的愿望，而是一个即将来临的现实。此时，正是货币联盟导致了自1948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柏林墙倒塌后，所有东德人只要前往西德便可领到100德国马克的“欢迎礼金”。赫尔穆特·施莱辛格说，单单这一项便花费了近40亿

马克。但这与合并两种货币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时，银行家及经济学家建议，东德马克与德国马克以2：1的汇率进行兑换。他们认为，考虑到双方的经济实力，这个汇率对东德相当慷慨。而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却有其他主张。他做出决定，以远超东德马克实际价值的汇率来进行兑换。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考虑。除此之外的任何举措大概会使东德民众所持有的资金严重缩水，并且可能会威胁到重新统一。他以过人的政治勇气，宣布薪酬、养老金和租金方面均以1：1的汇率兑换。





用以指引前往西德的东德公民领取“欢迎礼金”的海报，**1989年12月**

最为重要的是，科尔意识到他得迅速行动。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此时是联邦银行的副主席（后于1991年至1993年担任主席）。处理货币兑换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他的职责。对此，他说：

> 对我们在联邦银行工作的人来说，很明显，这个汇率太大方了。但决定已经做出，我们得采取行动防止我们国家出现恶性通胀，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利率以及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这是一种糟糕的财政状况，它连同建立某种银行系统一道还要能在西德的环境下运作。而所有这些都在为期六周的谈判中构建起来。六周一过，我们必须签署那份条约草案。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如果拖得太久，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政治上就会产生分歧。我们明白，我们得迅速行动，并且要冒犯错的风险。

那时，曾有过相互指责与争吵。而直接后果是战后的德国经济首次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不过，德国的经济实力的确靠得住：至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再一次上行。正是在此刻，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2002年1月1日，德国人告别了德国马克，这一战后民主而和平且又成功的德国的标志。它被欧元取代，这伴随着许多遗憾，但几乎没有牢骚。它终被放弃以换得持久的政治安定。据设想，新的货币将把德国永久纳入一种经济政治架构。这一架构旨在确保一个大陆的和平，而这个大陆在一个世纪内已两次遭受战争蹂躏，两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本质上来说，欧元是法国为赞同德国重新统一而开出的价码。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明白，放弃德国马克而改用欧元将使众邻国不那么担心德国新近扩大的国家优势。因此德国乐意对欧盟做出这种巨大承诺。

我在想，柏林那位建筑女工黑尔佳·岑特-费尔登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一切的呢？她对科尔总理达成的协定表示了赞成：

> 柏林墙倒下之后，很多事情并没有完全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但总的说来，我们有了一个异常稳定的德国。我觉得我们要感谢这个国家和欧洲，因为我们在中欧将不再有战争。这一点至关重要，现在我可以信任欧洲了。

关于1945年后的德国，或许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建立新身份的方式。它不是通过成为世界政治强国（国际上常常称它为政治上的侏儒）来实现身份转变，而是通过经济发展以及确立自身在新欧洲中的地位。它所协助缔造的新欧洲脱胎于自己曾亲手毁坏的旧欧洲。

自查理曼时代起，近千年之中，德意志的身份是在欧洲的大背景下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在帝国中的地位确立的。随着时光流逝，那是一个逐渐确立主导性的地位。帝国对整个欧洲及其中的德意志都充当了某种安全网络的角色（详见第5章）。时至18世纪，瑞典、丹麦、波兰、

普鲁士、匈牙利及不列颠诸国国王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里全都有代表。他们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稳定性的担保人。但面对拿破仑的入侵和军事化的普鲁士邦国的打击，这种稳定瓦解了。

因此，1952年，法国和德国着手建立欧盟的前身，从而重建这一安全网络，具有十分恰当的历史意义。历史绕了一个圈回到原点。某种意义上，欧盟是一个全新版本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就经济及世俗意义而言，不涉及宗教。这是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而不是罗马的帝国；它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区域，融进一个安全和共同协商的框架，其中法德两国互相争夺第一把交椅。这是一种古老的模式。某种程度上，是否因为德国有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对构建欧盟这样一个邦联式的超国家组织才极少有什么问题？而历史进程迥异的英国，对此为何有着如此之多的困扰呢？

第28章 新的德国犹太人

时至1945年，德国已在欧洲杀戮了超过一千一百万人，包括政治犯、罗姆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但就数量而言，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共约六百万。在德国人的所有记忆里，犹太人大屠杀是最突出，也最难面对的。犹太人数百年的存在与文化被消灭殆尽。诸如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和奥斯威辛的灭绝营的历史之后，犹太人在德国的历史看来一定会在战争结束后完全终结。又有哪个犹太人在1945年或1965年的德国能看到未来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德国的犹太人口增长速度在西欧是最快的，目前总数已达数十万。其中大多数都是移民。拉比门德尔·古尔维茨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从美国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定居。他介绍说：

> 你知道，在来这儿之前，我说我们怎么能生活在那样一个国家呢？我来这儿时，就决定不要想太多，因为如果你在这儿的大街上遇到年纪更大的人，马上就会开始有些想法。在德国，曾经有过一段犹太人的历史，一段非常独特的犹太人的历史。由于希特勒的主张，他们不想让犹太人再生活在这里了，于是就决定应该把这个国家的大门向犹太人关上，这让人很遗憾。我们如果那样干就会重蹈希特勒那样的覆辙。我想，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哈西迪教派运动。这一运动把民众送往世界各地，我们寻找最富挑战性的区域来定居。所以，这就是我同妻子来到这里的原因。如今，感谢上帝，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我的孩子都在这儿长大。我们在这里很幸福。



“律法书”卷轴抵达刚落成的慕尼黑犹太会堂，**2006**年

数百年间，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比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要宽容。例如，英国、法国及西班牙在不同时期都驱逐过各自境内全部的犹太居民。通行德语的区域也不例外。地方性危机经常让犹太族群成为替罪羊而遭到驱逐，比如14世纪50年代的纽伦堡及1513年的雷根斯堡。但政治上的极度分裂导致在德意志的某些区域总是会有一个犹太族群，而那些从各个地区被逐出的犹太人，在局势好转后，往往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中，德意志的土地上有个别犹太人颇有信誉与声望，在英国与法国也是如此。对于这些今天常被遗忘的事情，历史学者

乔基姆·韦勒说道：

> 近代以前犹太人在德意志的历史，如今经常是从20世纪犹太人悲惨历史的视角去书写的。而我认为，那样已经造成某种扭曲。通常，作为这段早期历史的典型标志，有三件事会被提及。首先是犹太人从德国城镇被驱逐，这发生在15世纪末期。其次是1543年路德著名的反犹太小册子，讲的是犹太人及他们的生活。第三便是那篇关于年轻的摩西·门德尔松在1743年抵达柏林的记述。柏林的守卫在官方记录里写道，今天在波森塔门见到六头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人。
>
> 这三件事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象征性的，考虑到后来在20世纪的德国所发生的历史，这三件事似乎是合理的历史背景。然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远不是这样。当时，多数王爵贵族完全不理会路德的那些观点。于是，我们看到自16世纪中叶以来，在神圣罗马帝国遍布稳步增长的小型犹太社区，很多统治者都鼓励这种趋势。犹太人作为手工艺人、买卖商人及进出口商人，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也欢迎放债的犹太人，否则那时这份职业就不会存在，而基督徒是被禁止从事这一行当的。犹太人大体上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有利于手工艺和贸易活动。



摩西·门德尔松，**1771**年

许多人仍认为路德的反犹太主义在数百年间对德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我们从大英博物馆现今所藏的一件精美织袋可以看出，至少有一些犹太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那是个小袋子，用来放置经匣，匣中装着写有律法书段落的小卷轴，而匣子则在犹太会堂晨祷时佩戴。织袋是代表财富与优雅的奢侈品，同时也象征效忠皇帝。它是用绿色天鹅绒做成的，一面还用金银线精细地绣着纹饰，中间正是神圣罗马国的双头鹰图案。我们并不清楚，织袋属于何人、产自哪座市镇，但它一定是在18世纪制作的。雄鹰表明物主声明自己为皇帝的臣民，而皇帝便是所有犹太社区的官方保护者。织袋非常公开地宣告了一种政治包容性。



18世纪用于存放经匣的织袋，饰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盾徽



与基督徒进行贸易的犹太人，纽伦堡，**1731**年

18世纪中，德意志当然存在对犹太人的歧视。不过，它的压迫性正不断弱化。一些王爵贵族积极鼓励犹太人定居下来，比如在曼海姆和柏林，弗里德里希大王允许在波茨坦（距他的无忧宫不远处）建立第一座犹太会堂，并且表示“压迫犹太人绝不会给任何政府带来繁荣”。那时在帝国的各个地方，犹太人理论上都享有法定权利，实际中也往往如此。而在欧洲许多其他地方，他们是享受不到这些权利的。他们可以向地方及帝国法庭呈递诉求，并向律法书而非《圣经》宣誓。许多犹太人与比邻而居的基督徒一样贫困。但那些“受庇护的犹太人”，即在帝国诸王廷中从事财政金融业务的犹太人，则拥有自中世纪历次遭驱逐和限制之后久违的经济实力。犹太人在知识生活方面同样活跃：曾有过一场向正统派拉比们所秉持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的犹太启蒙运动。其中一位领军人

物便是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祖父）。他将《圣经·旧约》中的《摩西五经》译成了德语。他也许是同六头牛和七口猪一同进入柏林城的，但他却以德国的苏格拉底而闻名，尊敬他、景仰他的人远不止犹太人。

犹太人的生活仍然受到种种限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犹太人最终将皈依基督教，这导致嫌隙不断。在许多城市与邦国，犹太人都被强迫缴纳额外的赋税。甚至连弗里德里希大王也要求柏林想要婚娶的犹太人来购买王室新厂出产的瓷器。

于是，出现了法兰克福犹太人隔离区，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隔离区，“犹太人巷”便被围在其中。周日晚上和基督教节日有宵禁。隔离区原先是为安置数百居民而建立起来的，但至18世纪中叶，它已容纳近三千人。歌德的出生地离该区不远，他很了解那里，并且记述道：

> 狭窄的空间、脏乱的环境、拥挤的人群，哪怕只是从门外朝里看，这些景象都给人留下不舒服的印象。但他们也是人，活生生的、讨人喜欢的人。他们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习俗，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还有，犹太姑娘们都很漂亮。

然而，与其他少数族群相比，德国的犹太人有时会明显受到优待，乔基姆·韦勒就强调了这一点：

> 比如在汉堡，局势一度紧张，但没有骚乱。实际上，18世纪初，汉堡曾出现过反天主教徒的暴动。但这整个时期却从未发生过反犹太的骚乱，虽然当时汉堡拥有整个帝国最为重要的犹太族群之一。大体上，犹太族群受到保护。他们被看作有用的群体。当然，不存在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的融合。不过，另一方面，犹太人在空间上与其他族群混合了（除法兰克福这类市镇的中心区域以外），并没有官方划定的犹太居民隔离区。因此我认为，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历史并不是发端于15世纪的驱逐事件，或16世纪40年代路德对犹太人的愤怒抨击，而是随着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而开始的。20世纪的那些悲剧不存在漫长的历史背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根源无法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的德国历史。



法兰克福犹太巷，19世纪



马托伊斯·梅里安绘制的一张1628年法兰克福地图的局部，展示了弯曲的犹太巷



小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

所有犹太家族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一个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事展示了犹太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走向兴旺的非凡能力。他们是住在法兰克福犹太巷里的犹太人。18世纪60年代，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那里创立了自己的银行，歌德差不多在同时期记述了隔离区的情况。他是一位“宫廷犹太人”，为邻近的黑森-卡塞尔侯爵提供资金。他的金融帝国则由他五个儿子建立。他派遣其中四人到西欧四处开办银行——在伦敦、巴黎、那不勒斯和维也纳。于是，他们不单单依赖德意志来开展他们的所有业务。他们编织了一张遍及欧洲的大网，将许多合作伙伴和代理人联系起来，从而在历次拿破仑战争期间资助政府，并且在欧洲大陆实现黄金转运，以免其落入歹人之手。1813年及1814

年，与拿破仑作战的德意志诸部的军队主要由来自伦敦的补助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款项便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理的。维也纳会议后，兄弟中的四人由奥地利皇帝提升为男爵，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在战争融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据称，他们的母亲、阿姆谢尔的遗孀古特勒·罗斯柴尔德在1848年（详见第15章）说道：“欧洲不会再有战争了，我的儿子们不会为战争提供资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狂热而不辞辛劳地收藏艺术品，令人惊叹。他们所购买的伟大画作中便有那幅缇士拜因为歌德创作的著名肖像画（详见第8章）。1887年，这幅名作问世一百年之际，所罗门·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将此画捐赠给了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



卡尔·罗斯柴尔德（那不勒斯）；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巴黎）；



纳坦·罗斯柴尔德（伦敦）；



萨洛蒙·罗斯柴尔德（维也纳）

犹太人在德国社会成功“落户”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便是建造他们的宗教场所——犹太会堂。在村镇或城市中，这公开彰显了犹太族群的存在。1916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法兰克福城郊奥芬巴赫的犹太人，新开了一所壮观的犹太会堂，这座建筑能容纳数百人，带有巨大穹顶。会堂坐落在市镇中心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位置上——歌德大街与皇帝大街的交角处。当时，犹太人自信而公开地在德国的政治及文化生活中占有突出位置。阿尔弗雷德·雅各比是位犹太建筑师，“二战”后生于奥芬巴赫。据他的观点，这座犹太会堂标志着犹太人与德国社会相处最融洽的时期。尽管有战争，但犹太人的未来看上去是安定的。雅各比介绍说：



1930年的奥芬巴赫犹太会堂，坐落在歌德大街与皇帝大街交会处

> 1916年会堂开幕时，拉比讲道："现在我们是这儿的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来到了天堂。"他说这番话时是在1916年。它显示出在当时，有多么大的一股压力迫使犹太人为那个社会所接受，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种压力超过了身陷战争的忧虑。我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你知道，这是非常奇怪的。

然而，时局并非如拉比所说的那样平和宁静。同年，即1916年，为回应民粹主义者（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意见——他们认为犹太人在逃避兵役，德国引入了臭名昭著的"清点犹太人"统计调查。而在1918年后的政治经济危机中，犹太人，特别是犹太政治领袖成了替罪羊（详见第23章），有些人（如瓦尔特·拉特瑙）遭到暗杀。



1920年，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犹太友人们在巴伐利亚度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芬巴赫兴建的首座犹太会堂模型，1955年

奥芬巴赫的犹太会堂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遭到亵渎并被焚毁，会堂的教众后来或被驱逐，或被谋杀。不过，犹太人及奥芬巴赫犹太会堂的故事并未完结。柏林德意志博物馆有一个部分展现了1945年后的战后岁月。展出的实物应有尽有，诸如报纸与杂志、衣服与机械、住房规划、学校及医院的模型。在那些建筑模型中，有一件特别突出。它既不精巧，也远未成形。这件模型完全用纸板做成，固定在比A4纸稍大的一张薄纸上。在矩形区域的边缘，纸板折叠立起，代表的是一堵围墙，墙里是一块划定区域。地面大部分区域稀疏地画着绿色及棕色的油彩，表现的是一个花园，花坛与灌木间有过道。划定区域的后部是两座连通的建筑，它们的模型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只有靠近观察才可能发现，在区域前部的墙上及前面那座建筑的门额上有大卫星的图饰。这个建筑模型展示的是奥斯威辛之后，为德国犹太族群建立的首批犹太会堂之一。它是由赫尔曼·茨威·古特曼于1950年前后为奥芬巴赫的犹太族群设计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族群的成员又是谁呢？拉比门德尔·古尔维茨介绍说：

> 那是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一群人，来自德国的并不多，大部分来自波兰。后来，他们来到了奥芬巴赫。如果你随便问其中哪一个，“你想没想过自己会留在这儿？”得到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基于一种想法：“我们留在这里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想去的地方”，去美国，或是去以色列。没有谁想要留在这里。不过，住在奥芬巴赫的人中，有些人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得建一座犹太会堂，至少要有一座临时性的。于是他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小会堂，虽然非常小，但对他们来说够大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谁会来这儿。

拉比古尔维茨提醒我们，战后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迁徙，其中许多人确实离开了欧洲，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然，还有以色列。但并非所有人都想离开，毕竟欧洲是他们的故乡，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离开的。阿尔弗雷德·雅各比的父亲便是典型的一例。对此，雅各比说道：

> 我父亲在战后入了学，成了一名工程师。父亲的兄弟在1948年去了纽约。而我父亲一直都想去那里，但他那时病了。1948年，他被确诊得了结核病，因此无法远行。美国人拍了张X光片，然后说："我们非常抱歉，但我们不能给你发签证。"

于是，阿尔弗雷德·雅各比的父亲继续留在奥芬巴赫，并成为当地犹太小族群的领袖成员。这个族群慢慢意识到，也许留下来终究也是一种选择。留下是一项重大决定。不过，既然做出了选择，就有其他重大的选择要做，比如如何处理那座旧的犹太会堂？1916年，会堂开办时场面十分隆重，却在纳粹时期遭到侵占。

最后，决定已经很清楚。虽然奥芬巴赫市政议会已将会堂返还给这个犹太族群，但这所老会堂却并不适合他们。它太大了，而他们的族群又太小，估计以后也不会扩大了。建筑本身也在纳粹时代遭到毁坏，很难重新投入使用，而它所处的地段也太过显眼，位于奥芬巴赫最著名的两条街道交会处。需要一所不那么显眼的新建筑。地方当局提供了一处场所，就在老会堂的街对面。而一座以我们的模型为蓝本的新建筑在1956年揭幕。阿尔弗雷德·雅各比继续讲述道：

> 这座新会堂十分朴素。会堂共有八十个座位。里面有一间多功能室，用于就餐或集会。还有一个套间是给战后唯一返回的一位族群老成员准备的，他成了会堂的看护人。仅此而已。它离街道远远的，仿佛建筑师竭力将它推到那片区域的最后面。你看，这样的建筑在好多德国城市都得隐蔽起来。那个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派了一个人到慕尼黑，向本-古里安建议发布一项禁止犹太人在德国生活的禁令。此类禁令在犹太历史中只出现过一次。1492年，犹太拉比们在西班牙宣称，犹太人不得在西班牙生活。我想，建筑一直是传达这类事件的一种表达媒介，它能反映一些问题，比如该如何行事，以及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等等。而在这里，建筑传达出的是突如其来的念头："我最好躲起来，掩盖我的意图"。你如果看看这一时期犹太族群内部起草的法律文件，许多都包含这样一个章节，说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方便移民。换句话说，传递的信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要关灯并交还钥匙"。

不过，奥芬巴赫的犹太族群延续了下来。而且，成千上万犹太人仍

被封锁在铁幕之后的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对他们而言，即使有可能移民到以色列，他们也不一定想去。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少数移民来说，德国比起中东似乎不那么陌生；而德国则想要向他们赎罪。到了1990年苏联解体时，大批移民涌向德国，拉比门德尔·古尔维茨回忆道：

> 我出生在纽约。过去我们不会买任何德国货，去德国更是禁忌。苏联的犹太人也是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呢？当铁门打开时，他们中很多人去了以色列。但那些人觉得，以色列的气候不合适，特别是老年人，他们无法在那种炎热下生活。所以，他们便寻找着其他欢迎他们的地方。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可能唯一欢迎他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了。德国人因为自己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想让犹太人重新在德国定居，所以他们准备好给犹太人一笔抚恤金和某些权利。于是，奥芬巴赫的犹太小族群突然间变大了，因为好多俄国犹太人来到了这里。



1998年扩建后的奥芬巴赫犹太会堂

1990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同意向犹太人给予紧急政治庇护，并提供经济资助，以及融入这个国家的各种便利。在此之后，二十万犹太人来到了德国。那些俄国的犹太人完全了解五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但他们选择了德国，这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犹太人感到困惑。20世纪50年代，奥芬巴赫的犹太人以为自己的族群将不再壮大，一直过着隐蔽的生活，而俄国人的到来完全打破了这种想法。1990年以来，这个族群大规模增长，而犹太会堂也不得不随之扩展。不仅需要新的场所用于祈祷，还要用于社交集会，特别是还要给孩子们留出空间。扩大的新建筑

是由建筑师阿尔弗雷德·雅各比设计的。他介绍说：

> 增加了一间多功能厅和一所幼儿园，还有一些其他设施。其实，我们的幼儿园很有意思，我们以犹太教为依托，同时接纳各种宗教背景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来自基督教家庭，还有三分之一是犹太小孩儿。不过，所有孩子都坐在一起，唱犹太节日歌曲，等等。这没什么问题。
>
> 不过，如今这座建筑主要是面向城市的。我应该把掩护我们的那道围栏拿掉，让会堂融入整座城市的大环境，成为全体市民的建筑——这相当重要。

以奥芬巴赫的犹太会堂为代表的许多会堂在实物上体现了犹太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历史关系。今天，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都存在令人不安的反犹事件。但奥芬巴赫的犹太人如今“回到了大街上”，重返寄居国的视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实施七十年之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选择离开他们已被解放的东欧家园，在曾试图灭绝他们的那个国家定居了下来。



悬挂在居斯特罗大教堂内的巴拉赫作品《飘悬的天使》

第29章 巴拉赫的天使

在英国，我们都清楚“和平纪念日”意味着什么。自1919年以来，每一年我们都在纪念牺牲的将士为之献身的东西——自由、民主和独立。每个市镇、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纪念仪式，包括奏响《最后的岗位》，并默哀两分钟。我们聚集在英国及英联邦境内各处的纪念碑四周，用一套经典仪式来铭记阵亡将士及为胜利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一年一度的纪念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加惨烈的冲突，也没有纪念活动。要设计怎样的一种仪式，才能够纪念这样一场德国战败且在战后和平谈判中被判定有罪的战争呢？不过，尽管如此，德国在1918年就有一百八十万人死于战争，那几乎是整个大英帝国死亡人数的两倍。但德国并不是没有纪念过往战争的建筑。德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拥有大量展现胜利君王与将军的塑像。例如，坐落于柏林蒂尔加滕的胜利柱，高达250英尺，便是纪念普鲁士于19世纪对丹麦、奥地利及法兰西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详见第1章）。这种用铜与石表现的骄傲毫无遮掩之意。不过，1918年却大不相同，德国战败，因发动战争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并被要求对此进行赔偿。而骚乱与暴动、未遂的政变以及“背后一刀”的消极言论（即德国军队从未被击败，而是被政客们出卖的）也使德国国内变得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该如何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巨大的人员损失呢？



居斯特罗大教堂

柏林以北100多英里处的居斯特罗小镇上的新教大教堂给出了一种答案。这儿没有首都高耸的圆形立柱或耀眼的陵墓。与之不同的是，这里有一尊真人大小的铜像，它悬挂于大教堂的屋顶，水平悬浮在空中，通常被叫作《飘悬的天使》。铜像悬在古老的圣洗池上方。在基督教传统中，圣洗池象征宽恕罪恶、赋予新生。下方是一圈熟铁制成的围栏，像一顶代表荣誉的桂冠，天使隔空飘悬在上方。天使紧抿双唇，沉默不语。在这里，战争被内化，它所带来的恐怖与惊惧因沉寂而更加突显。天使紧闭双眼，或许是因为战争的痛苦与煎熬令她不忍注目。这尊塑像是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的作品。人们说天使是“为了纪念而不是警告”。巴拉赫本人说，塑像所讨论的是我们对战争应该秉持的态度，即“回忆与内省”。

恩斯特·巴拉赫与居斯特罗联系如此紧密，该城如今将自己称作“巴拉赫城-居斯特罗”。然而，他是出生在德国偏远的北方，即荷尔斯泰因，那是在1870年，到1910年，他才在居斯特罗定居下来。巴拉赫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与诗人一样，起初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支持者。巴拉赫像他们一样，相信战火会锻造出一个新社会。他虽已年过四十，但还是于1915年加入了军队。对巴拉赫而言，那场战争的确是个

转折点，但却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因。前线的经历令他震惊，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巴拉赫与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相似，曾因“战争的怜悯”而不知所措，于是他像欧文一样，试图用自己的艺术表现战争的恐怖与无益。巴拉赫于1916年退伍。在余生中，和平主义主导着他的雕塑作品。他所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或许是德国最接近于英国战争诗人们悲悯情怀的作品。

巴拉赫第一次受托创作纪念战争的作品是在1921年。那是为基尔的尼古拉教堂进行创作，基尔就在他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将这件作品称为“悲痛的母亲”。一位披着披风的母亲孤身一人，双手紧紧捂着脸，下方配有一段北德方言铭文：“我的心在悲痛地流血，但你给了我力量”。她就是童贞女马利亚，是基尔城的一位女性。是城中每一个人的母亲，她对儿子的丧生无法理解，唯有忍受。这件雕塑曾引发争议，它被认为表现的是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唱反调。它关注的是生者的悲痛，而非死者的英勇。它挺过了纳粹时代，而毁于1944年间的盟军轰炸。不过，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在《纪念恩斯特·巴拉赫》中深情颂扬了这位母亲。巴拉赫仅用寥寥几句方言，诉说了对一位悲痛母亲的关注，希尔为此深受感动。


1914–1918

基尔尼古拉教堂中的巴拉赫作品《悲痛的母亲》（毁于1944年）

居斯特罗大教堂不远处是恩斯特·巴拉赫博物馆。他的工作室如今成了花园和展览室，摆满了他的画作与雕塑。这些是第三帝国统治时期后幸存下来的作品。一间展馆陈列着巴拉赫创作的纪念战争的作品，它们是从全德国的城镇与教堂搜集而来的。展品齐声吟唱着战争的代价，既是为了战争的参与者，也是为了幸存者。就我所知，英国或法国没有一间展室可与之相比。巴拉赫所有纪念战争的作品都不掺杂民族情感，也从不暗示战争中的死亡是高贵或令人钦佩的。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为了分担悲痛，呼吁人们忏悔。福尔克尔·普罗布斯特是巴拉赫基金会的主管，也是一位研究巴氏作品的学者。他说：

> 巴拉赫创造出了纪念战争的一种新形式。在他那里，没有英雄主义，也没有对死亡或战争的赞颂。相反，在他为马格德堡、居斯特罗、汉堡及基尔等地创作的纪念作品中，你会发现他探究的是痛苦、死亡、哀悼及悲痛。巴拉赫的天使是和平与非暴力的一种永恒象征。



在工作室里，恩斯特·巴拉赫靠在他的雕塑《母与子》旁，**1937**年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巴拉赫在全国已经相当有名，而他的反战观点也已广为人知。由于他生活在居斯特罗，该城便于1926年委托他创作一件纪念战争的作品，以此作为大教堂七百周年庆典的一部分。于是便有了《飘悬的天使》这件作品，它表达了一位母亲的召唤。她望向西方，目光投向位于佛兰德的杀戮战场，永远无声地悼念着死去的儿子。



凯绥·珂勒惠支《自画像》，1923年



巴拉赫所作《飘悬的天使》头部特写

居斯特罗大教堂内，《飘悬的天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面庞。学习德意志艺术的学生可以立刻辨认出另一位反战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特征。她是巴拉赫的密友，也是合适的模特：1914年10月，她失去了在西方战线参战的儿子彼得（详见第22章）。巴拉赫的和平主义与她的观念类似，于是他们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紧密联系。她在自己的作品中重现了他的简朴风格。（巴拉赫鼓励她用木刻技法进行创作，如第409页所示，在向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致敬的作品中，木刻技法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巴拉赫后来坦承，在制作天使的铸模时，他肯定想到了珂勒惠支——圆形的脸庞、深陷的眼窝、饱满的双唇以及微微向下的嘴角。天使就是珂勒惠支，同早前的“悲痛的母亲”一样，它以沉思式的伤感表情，体现了所有母亲悲痛中的共性。然而，巴拉赫的评论者们却不这样看。他们抨击天使长着斯拉夫人的面孔，表现出“堕落的”风格，认为雕塑传递出和平主义与失败主义的信息，完全没有表现出死者是为了正义或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牺牲的。



居斯特罗大教堂内巴拉赫《飘悬的天使》原铸件，约20世纪30年代

这件雕塑立即引来了当地爱国者及右翼分子的蔑视。纳粹党徒厌恶它，一掌权便明确表示，天使不可能留下。他们想要的作品与吉奥格·科尔贝为施特拉尔松德所创作的战争纪念塑像类似——一群健美而强壮的男性手按长剑，骄傲地面对敌人，下方的铭文写道：“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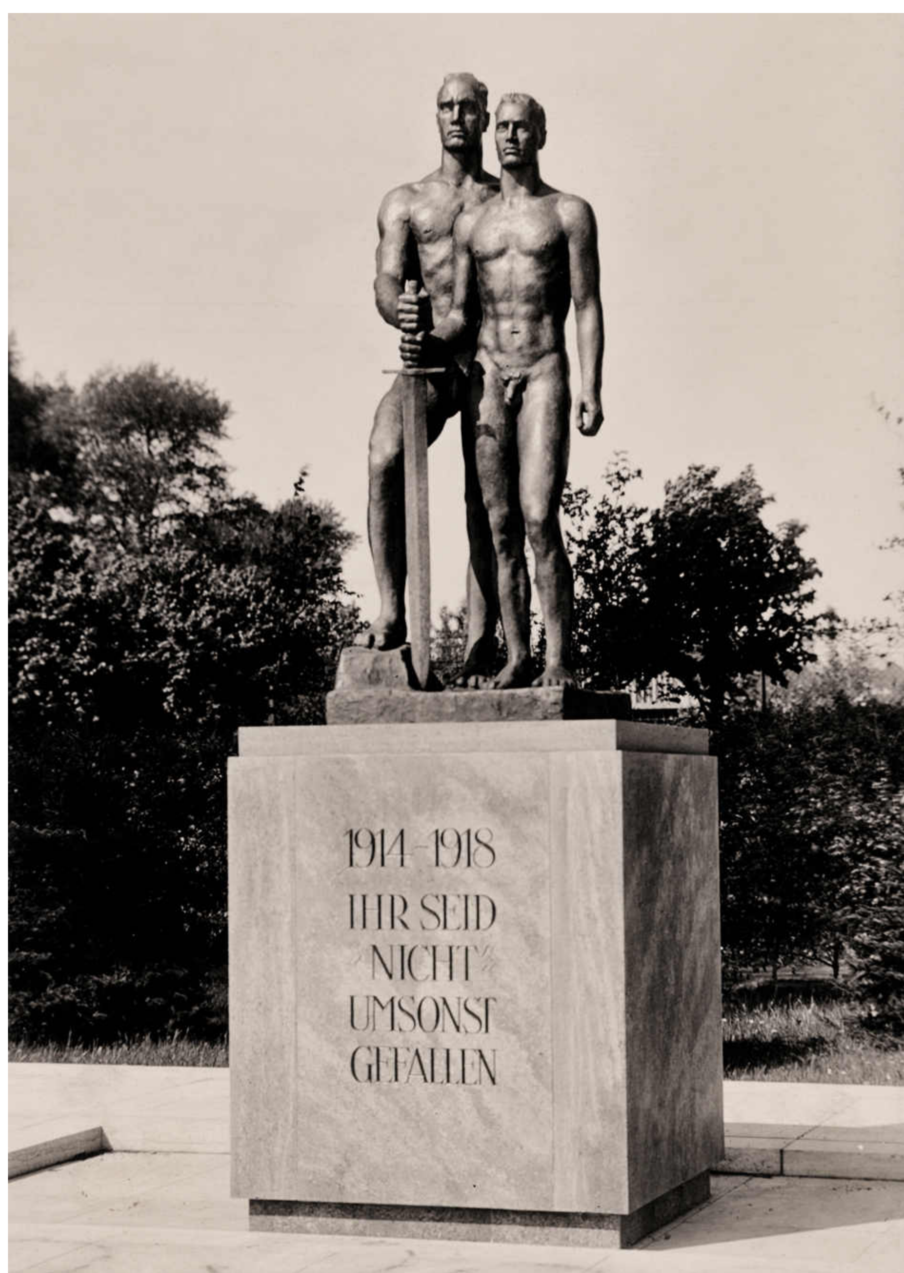
巴拉赫收到了当地纳粹分子的死亡威胁，展览也都被取消。1933年

后，他的雕塑及艺术作品被从公共场所拆除。1937年，纳粹党在慕尼黑举办了以“堕落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详见第24章），从而强化公众对戈培尔称之为“犹太人堕落的灵魂”的反感情绪。虽然巴拉赫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但他的风格、理念及作品却是当局不可接受的。他的两件作品就被列入慕尼黑的那次展览。同年，1937年8月23日，纳粹当局下令将居斯特罗大教堂的天使像拆除。

雕塑被取下时，留下了反思的空间，这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每年的那一天，大教堂会举行一个静默的仪式。对此，牧师克里斯蒂安·许瑟尔解释道：

> 我们聚在一起纪念天使塑像被移除的事件，并思考我们的人民曾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而深陷歧途。那个错误之严重无法用言语形容，但这样一件塑像却能帮助我们去正视它，并从中获益。通过上帝的帮助和自身的行动，我们力求找到方法，把这种负面的遗产转化成某种和解的方式。这就是这件雕塑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塑像先被运往了什未林，而后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拉赫创作的和平天使铜像被纳粹熔化用于战争。巴拉赫本人则在塑像移出大教堂一年后逝世。



吉奥格·科尔贝的《斗士纪念塑像》，施特拉尔松德，**1934**年至**1935**年

那么，如果天使塑像最终成了军事装备，那么现今悬在居斯特罗大教堂圣洗池上方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一段动人的故事。巴拉赫于1938年10月去世，塑像被移出两年之后，他的一些友人及支持者在一位疑似与纳粹当局有良好关系的商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巴拉赫最初用于浇铸塑像的石膏模具。当时，它仍存放在柏林的铸造厂里。他们知道居斯特罗的天使铜像有可能被销毁，便用模具浇铸了第二尊铜像。石膏铸模本身毁

于战争期间的某次轰炸，但与原件完全一样的第二尊铜像却得以幸免，藏在德国北部吕讷堡附近的一座村庄里。战后，巴拉赫的遗产管理方最终同意它继续展出。不过，还有些商业冲突需要解决，因为那时吕讷堡位于西德，而居斯特罗则在东德。于是在1951年，经反复磋商之后，天使像被送往科隆的安东尼特教堂。它仍然悬挂在那里，几乎照巴拉赫设想的那样，但多了件附属物。在塑像下方嵌入地面的石板上，人们在“1914—1918”的年份下添加了“1939—1945”的字样。那时科隆人相信，天使的象征性力量及其历史，将使它能够承载整个纳粹时期所有的损失与死亡所增加的负担。

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若天使的第二版现今在科隆，那么现在如此神秘而充满力量地飘悬在居斯特罗大教堂圣洗池上方的是什么呢？对此，克里斯蒂安·许瑟尔解释说：

> 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试探性的对话，内容是关于运往科隆的第二尊铸件是否有可能回到居斯特罗，并悬挂在巴拉赫所构想的位置上。但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正处在一个剑拔弩张的阶段。另外，民主德国根本不清楚，对于巴拉赫的艺术及理念，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官方态度，民主德国内部就有很大争论。



巴拉赫的《飘悬的天使》第二尊铸件，科隆安东尼特教堂

关于巴拉赫的理念之合理性及意义，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而冷战则在两个德国之间造成诸多障碍。尽管如此，人们仍依照科隆的那版铸件复制了一尊塑像，并于1953年将巴拉赫所创天使铜像的这第三版化身安放在了居斯特罗大教堂。这是对话所取得的一项非凡成就，在深度分裂的德国，它高调地承认了雕塑的象征意义对德国民众的

重要性。

1981年12月13日，天寒地冻，此时距天使回到居斯特罗差不多快有三十年了。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这一天正式出访东德。这是两德关系正常化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在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请求下，他与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一起参观了居斯特罗大教堂，并一同站在了天使的下方。在那里，他们受到梅克伦堡主教的接待。主教说，对两位领导人及两个国家而言，恩斯特·巴拉赫象征着一种共通的记忆、一段共有的过往。赫尔穆特·施密特向主教表示感谢，回答说：

> 我想对您的欢迎及您的致辞表示感谢。您刚刚提到，巴拉赫是我们共有的记忆和过往。我想讲的稍微有点不同，不妨说，巴拉赫一样可以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埃里希·昂纳克对这种观点的想法未被记载下来。但他与施密特可能都没有想到，两德会在十年之内重新统一。而巴拉赫创作的塑像确实将在同一个国家代表一段共享的过往和一种共同的未来。

自巴拉赫的天使回归后的六十年间，它已成为居斯特罗的标志，被画在高速公路的路牌上，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三十多年来，它从未离开这座城市。因此，2014年塑像临时外借给大英博物馆展览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福尔克尔·普罗布斯特是巴拉赫基金会的领导，是居斯特罗天使的法定所有人。他说：



赫尔穆特·施密特与埃里希·昂纳克一同站在居斯特罗大教堂内《飘悬的天使》下方，**1981年12月**

> 这尊天使塑像出借过两次。1970年，为庆祝巴拉赫百年诞辰，塑像外借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81年，它出现在柏林的巴拉赫作品大型展览中。不过，在2014年却正好有两个周年纪念日。这一年，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有一百年，而德国重新统一也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这些为巴拉赫的天使运往伦敦展出，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

关于塑像是否应该为2014年的展览被运往伦敦，最终的决定当然是由居斯特罗大教堂的教众做出的。对此，牧师许瑟尔说道：

> 当赫尔穆特·施密特同埃里希·昂纳克于1981年在此会晤时，德国历史中的一个全新时刻就由天使触发了。如今，重新统一后，东德和西德依旧可以在此相会，并且能在天使的帮助下对话。在我们国家总能找到和解的主题。但我们需要欧洲也将和解作为主题。所以我们对把天使运往伦敦十分重视。

很少能有什么物品可以像来自居斯特罗的这尊雕塑那样，涵盖如此之多的德国20世纪的历史：1914年的战争狂热；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主义；凯绥·珂勒惠支表现主义的艺术世界；纳粹对“堕落艺术”的破坏；商人们尽管能与第三帝国进行斗争却也达成了暧昧的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方战线，及“二战”中的柏林轰炸；战后德国的分裂，以及双方仍可进行的对话；在解决历史问题与相互和解的探索中，德国与世界之间持续痛苦而又艰难的对话。这一切造就了天使，并赋予它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同德国本身一样，它也曾遭受耻辱、被摧毁、四分五裂而又得以重塑。但它本身总是延续着某种理想，承载着复兴的希望。

在大英博物馆，为期几个月的另一系列讨论将涉及它，主题是德国的过去与未来。而最后的话语，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后的沉默，必定要留给牧师许瑟尔。他说道：

> 塑像外借时，我们决定不放任何替代品，而是留一个空位。那个空位，以及我们对它的回应，将成为伦敦展览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用塑像来解决它所留下的问题：我们准备好承担责任了吗？我们愿意为和平事业而献身吗？

第30章 德国复兴

我们这段德国历史之旅始于勃兰登堡门，那里是当今最受青睐的公众庆典场所。我想将这段旅程的终点设在国会大厦，这里如今是德国联邦议院所在地，也是德国进行国家审议的会场。两处建筑都经历了多次塑造和重塑，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二者均被赋予了持久的象征意义。这两座非同寻常的建筑于一砖一石中承载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史。

两座建筑的间距仅有数百码，今天不过是一段大众观光线路。但在过去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那却是一段艰险甚至不可能走通的路径，因为它们在1945年后被该城苏占区与英占区的边界所分隔，这条冷战的分裂线在1961年成为柏林墙（详见第2章）。现今，柏林墙已一去不返。不过，它在城中这一区域留下的痕迹太少，游客要费些心思去猜想柏林墙当时的所在。令人惊奇的是，尽管那份记忆依旧鲜活而苦涩，数十年来在这个标志性的位置上，实际上却没有实物遗存。



1992年后由诺曼·福斯特主持改建的国会大厦

然而，其他记忆却随处可见。勃兰登堡门向南仅一街之隔，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详见导言末页）便清晰可见。该处纪念场所由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设计并于2005年完工。这里没有塔楼或尖顶，它却完全支配着周围的城市环境。在街道的另一边，距勃兰登堡门及联邦议院都不远的地方，蒂尔加滕公园的树林中还有三处更新、更简朴的纪念建筑。这是为了纪念另一些人——残疾人或精神失常者、同性恋以及辛提人（或罗姆人），他们和犹太人一样，仅仅因为自己的身份便遭到纳粹的屠杀。

这些纪念建筑是有意安排在这里的。联邦议院在仔细审议之后决定修建这些建筑。于是，议员们前往国会大厦时，每天都会记起德国历史上那可怕的一页。人们希望，那份记忆将会影响他们的每一次辩论。这些纪念建筑不仅是为政客们修建的，修建的初衷也是为了塑造每一位公

民的思想认识，并且接待越来越多的游客，他们从世界各地来欣赏这座喧闹城市新的中心。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说，世界上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进行如此痛苦的自我反思。这种措施有效果吗？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教授认为有效果。他介绍说：

> 第三帝国犯下如此残暴的滔天罪行，是不可否认的，犯下罪行的不光是一个政体，还有成千上万作为共犯的德国公民。毋庸置疑，这些事件让德意志民族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不过在1945年后，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负担被普遍接受，负罪感已内化，成为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德国民众意识到一种道德负担，对第三帝国的恐怖暴行怀有负罪感，这样的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德国人的民族情感。我想，今天德国政治形态独一无二的特性，便是认识到道德层面已经被一个政权恶行所荼毒的自我批判意识。

通往国会大厦的道路并不十分庄严。国会大厦周边区域未曾经过多少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紧邻柏林墙的缘故。而今，国会大厦矗立在一片休闲的草地上，那里既可以踢足球，也是日光浴及假日快照的大好去处。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告诞生。帝国议会大厦随即于19世纪80年代破土兴建。这座夸张的宫殿修建于此，着实令人意想不到。大厦具有欧洲19世纪末期典型的建筑风格。其建筑样式与罗马帝国（早期带有更多装饰）的风格相仿；其恢宏的自信则与大英帝国接近；而大厦新颖的方形中央穹顶则赋予它一种德式独有的神气。显然，这样的议会出自一个重视自己的国家。

然而，在1871年后的岁月里，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新兴国家根本不愿重视自己的议会。俾斯麦并不喜欢那种缓慢而拖延的立法过程及其中必要的妥协，一贯阻挠议会行使实际权力。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对许多事情都颇不耐烦，对议会关于民主合法性的主张也是如此。当时，不断有琐碎的争吵。皇帝与帝国议会间的最后一次争吵是因为有人提议在大厦门额上放上如下文字："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皇帝强烈反对这样的表述，认为这暗示最高权威不属于他，便提议换成"为了德意志统一"（Der Deutschen Einigkeit）。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议员们最终占了上风。现代主义建筑师兼排印师彼得·贝伦斯设计了字体。此外，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缴获的法军加农炮熔化而得的铸铜给那行充满民主与现代思想的铭文平添了某种历史意味和战争气息。

两年后，皇帝退了位，而战争也临近结束。就在贝伦斯铜制铸字下的一处阳台，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于1918年11月9日宣告新的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这座建筑将容纳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在它上空飘扬的不是以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为主要代表的黑、白、红三色旗，而是法兰克福的自由议会于1848年宣布采用的黑、红、金三色旗（详见第15章）。帝国议会已然转变成一个"为了德意志人民"的真正而民主的议会，它不受君权约束，尽管它常常受到左翼与右翼

党派的攻击。

在过去长达一百四十年[1]的岁月里，国会大厦业已成为德国历史的中心建筑。它的使用、误用及废弃反映了德国的方方面面。它的建造资金出自1871年对法战争胜利后索取的巨额赔款。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掌权数周之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这场大火被纳粹党归咎于一位无业的荷兰共产党员。大火不仅严重破坏了大厦建筑，更标志着民主的德国走向终结，并为纳粹党提供了借口，去说服兴登堡总统批准“国会大火法令”。他们利用这些法律废除了由魏玛宪法确保的关键权利，进而监禁甚至铲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者。此后，大厦并未得到完全修复，因为纳粹党一直不喜欢它与自由主义的关联。希特勒统治期间，他的傀儡议会都是在邻近的克罗尔歌剧院集会。



大火中的国会大厦，**1933**年**2**月**27**日



国会大厦废墟上的苏联国旗，**1945**年

1933年大火所造成的破坏，很快被1940年后英美两国的炸弹所超越。尽管纳粹党并不喜欢这座建筑，但斯大林还是在战争结束之际将国会大厦选定为法西斯主义柏林的主要标志。在1945年5月1日前占领国会大厦成了苏维埃汲汲追求的目标。双方在血腥而旷日持久的肉搏战中均有大量伤亡，战斗以红军士兵将苏联国旗插在大厦炸毁的楼顶告终。而这张传遍世界的照片依旧深深留存在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最终胜利的标志。大厦同柏林本身和整个德国一样，遭受了可怕的重创。它幸存下来，要归功于其结构稳固。大厦历史中那段暴力的篇章，今天仍可得见，实际上这段历史很难略过。修复后的建筑，于公共区域保留了由胜利的红军士兵用西里尔字母随意进行的涂鸦。在可以

想见的言辞中，“希特勒完蛋了”或许是最适合写下的一句。游客们可以慢慢浏览其余的涂鸦。



1945年红军士兵的涂鸦，保留在修复后的国会大厦内

1945年后，大厦被冷落在城市西半部的边缘地带，它经整修虽已可用，但几乎未曾投入使用。那时，联邦议会并不在柏林，而是在波恩。建筑上大部分19世纪的雕刻装饰被认为既无表现力也缺乏生机，后于20世纪60年代重修时去除。正是在这座更为简朴实用，但实际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国会大厦中[2]，西德与东德于1990年签署了《统一条约》。当时决定，国会大厦应该像1871年后一样，作为新近重归统一之德国的议会（即如今的联邦议院）所在地。于是，针对该建筑的彻底改建，展开了一番国际竞争。1992年，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接受委托。乐意选择一位非本国人士来完成大厦的改造工作，本身就有力地宣告了这个重新统一的国家十足的国际风范。但国会大厦要成为泛德意志的新联邦议院名副其实的所在地，所需要的还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改观。这座建筑遭到皇帝贬低，为纳粹党所鄙视，又遭纵火阴谋的玷污，战后其地位更因受冷落而降低，因而它在人们心目中必须呈现新的形象。这座建筑和它荣耀与耻辱的创伤都必须得到重建，从而为自由人民的代表们缔造一个合适的讲坛。它必须重生，事实也的确如此。

艺术家赫里斯托与妻子让娜-克洛德的杰作“包裹国会大厦”，也许是该建筑的历史传奇中最意想不到的一段插曲。1995年6月24日至7月7日的两周间， 9万平方米的银色织物包裹住了整座建筑。古老的国会大厦连同其饱受争议或玷污的过往从视野中消失时，数百万人前来观看。这座建筑从银色巨茧中出现时，已改头换面，能够承担起德国需要它承担的角色。

现任联邦文化部部长的莫妮卡·格瑞特斯，当时是一位议员，与该项

目有过密切的关系。她说道：

> 赫里斯托包裹了国会大厦，建筑连同废墟都被覆盖住了。他使我们张开双目看到了这座大厦真正的形状。正是在此之后，我们才明白，它实际上是我们的殿堂，全体民众的殿堂，是一座象征民主的建筑，人民的代表们组成的议会就坐在这里面。而这一事件体现出的精神也留存至今。
>
> 最后，大厦受到欢迎，感动了过往的行人。突然间，它不再仅仅是一座履行某项职能的建筑。过去由于种种历史纠葛，它从未全心全意履行某项职能。它恢复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说来也稀奇——正是赫里斯托所做的包裹产生了那种效果，他的目标也就在于此。短短几周之内，“包裹国会大厦”帮助人们去正确看待多年的历史。



被包裹起来的国会大厦，由赫里斯托与让娜-克洛德设计，**1995**年**6**月

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能像这样由公众将一座建筑重新投入使用。随后，在诺曼·福斯特的精心管理之下，这种转变持续进行着。他说：

> 我强烈地感受到，随着建筑结构的显露，它应该保留种种创伤——战争导致的创伤，或者还有民众人为破坏所造成的创伤，以及历史造成的创伤；有形的博物馆记录的历史和历史所留下的痕迹，两者应该有条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而那些涂鸦，应该是织布不可分割的一部

> 分，并且将清晰地传递出大厦的过去和重生的信息。

莫妮卡·格瑞特斯相信，对在该建筑内工作的那些人而言，福斯特的方式完全成功了。对此，她说道：

> 我尤其能感受到那些俄文西里尔字母涂鸦的存在，它们是在大厦内部发现的，写于1945年4月底到5月初。这些涂鸦是红军士兵留下的，它以一种简单却又很有说服力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独裁统治之下，而且被卷入到可说是人性崩溃的灾难中。这些都发生在这座建筑恢复它的民主尊严以前。

重生的国会大厦与之前所有的状态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议员集会的议事大厅上方是一座明亮而高大的玻璃穹顶，其中还有盘旋的走道，游客可以在这里俯瞰议员们辩论。这是一种有说服力且以建筑形式呈现的隐喻，即每一天，公民可以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政治人物进行真正的监督。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民众，了解一些有关纳粹的民间记忆，或者仅仅只是经历过冷战时期联邦共和国警察部门的行动。对他们而言，这种对公民自由的宣告十分令人振奋。

正是在这座穹顶下，默克尔总理于2014年1月就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实施监控一事做出了回应。她强调，公民及议会有必要确保安全机构处于受控的状态下（详见第2章）。对此，莫妮卡·格瑞特斯说：

> 穹顶很有吸引力，在那里游客可以在议事大厅的上方行走，也就是公民在上面，我们这些议员坐在下面。所以，大厦门额上的文字“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终于开始体现出其真正的含义。



福斯特的穹顶内部

诺曼·福斯特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思后，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

> 它涉及公众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定义这种关系。它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它甚至超越了这座城市本身，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国会大厦在一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实际上已是多个德国的象征：19世纪80年代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1933年大火中消亡的魏玛共和国注定失败的自由民主制；同该建筑一样，由苏联及其西方盟友摧毁并占领的法西斯主义纳粹帝国；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的议会民主制德国。感谢福斯特的修复，每一份记忆都依然存在并活跃于该建筑之中。这些庄重的建筑式隐喻，对政治家的行为产生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当然是一个“为了德意志人民”的问题。



鸟瞰柏林博物馆岛

柏林城的梦想寓于建筑之中。柏林城不断建造和重建历史中心，从而表现出构建新认同或纪念几段不同历史的强大能力，在这方面，国会大厦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比如，勃兰登堡门是以雅典卫城的城门作为参照，并饰以与帕特农神殿的排档间饰相似的雕塑。普鲁士于18世纪80年代要将柏林打造成新雅典的决心在此表露无遗。而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东端，六十年后的19世纪40年代，同样是将柏林定位为一座学问与艺术之城的梦想，驱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把宫殿对面的小岛划定为“艺术圣殿”。博物馆岛犹如施普瑞河上的帕尔纳索斯山，而岛上的博物馆则呈现出古典主义神殿的风貌，它们由石柱廊道相连，将使游客能重新领略古代世界。勃兰登堡门与博物馆岛都在述说众多19世纪的德国人所秉持的信念，即他们与古希腊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彼此分离的部族，却珍爱相互间的不同身份而在一起劳作，他们都热衷于学问，并且遍布于广袤的地域（亚历山大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地中海移民经常被比作波罗的海沿岸及东欧的德国市镇居民）。这是普鲁士人与巴伐利亚人共有的一种幻想（详见第9章），也是一种全新的民族自我定义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定义是：热爱自由的德意志人/希腊人（与侵略性帝国的法兰西人/罗马人相对）。然而奇怪的是，即便在当时，与这种热爱自由的自我定义并存的是普鲁士的军事野心。在今天柏林对南欧具有经济主导权的背景下，这种从根本上宣扬德国具有希腊特质的建筑风格必定会使一些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游客感到惊奇与忧伤。



“弗里德里希广场”（**Forum Friedricianum**；现今的倍倍尔广场），由左至右：歌剧院、圣黑德维希大教堂、洪堡大学图书馆

博物馆岛以西数百码开外，坐落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众多建筑，展现了德国另一个更早的梦想，即普鲁士的启蒙，这是弗里德里希大王所构想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由弗里德里希大王实现）。漫长的修复过程眼下已接近完成。这些得到精心修复的建筑意味着什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此说道：

> 可以说，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将普鲁士王国构想的自身历史使命用建筑的方式予以重新表达。不过，普鲁士王国从未仅靠军事实力来定义自身。它也是普鲁士人所称的一个文化之邦，是一个追求文化目标的邦国。你可以在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广场”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看到这种追求，那里有三座非常精美的建筑，它们都是在弗里德里希大王主政期间建造的。一角的圣黑德维希大教堂是一座非凡的纪念性建筑，体现了在一个信奉新教的邦国教派之间的宽容，因为它允许天主教徒在市镇中心修建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一侧的图书馆曾是半开放的。过去，普通人也可以入馆借阅图书。另一边是歌剧院。这传递出宽容和对书籍、音乐的喜爱。这就是柏林丰富内涵的一个方面，某种意义上说，重建正是为了恢复普鲁士作为文化之邦的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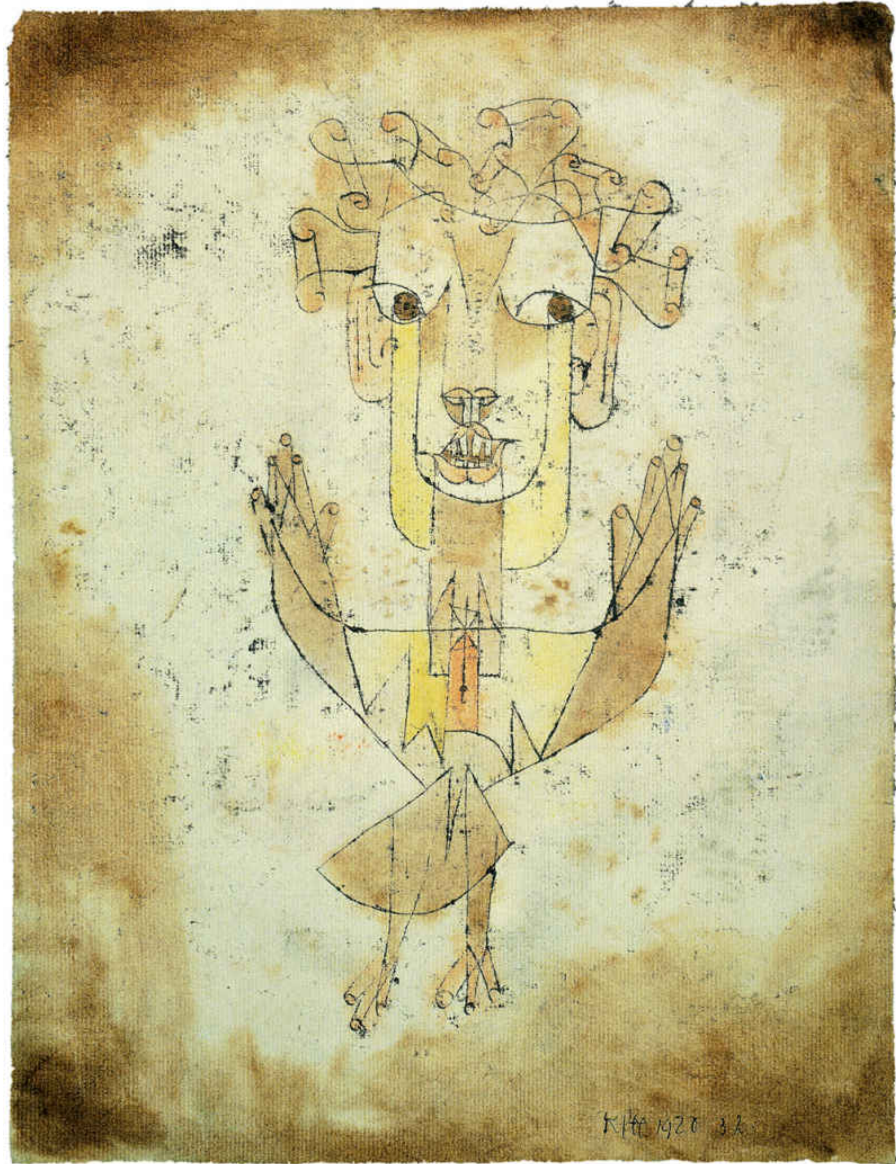
然而，美好身侧往往有丑恶相伴，这就是柏林的常态。在这个庄严的广场中心，人们透过嵌入石子路面的玻璃板向下看去，可见空空的书架。这是对另一个德国的纪念。1933年5月，就是在这里，纳粹的学生组织从那个“半开放”的图书馆中搬出了图书并付之一炬（详见第24章）。

弗里德里希广场与博物馆岛见证了普鲁士作为文化之邦的自信。然而，对许多德国人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而言，它主要是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在王宫对面一侧的菩提树下大街上，出自申克尔之手的新岗哨（详见第22章）及华丽的洛可可风格的军械库同样有力地述说着军队的核心地位。在许多人看来，早在纳粹党于1933年夺取权力以前，好战的普鲁士领导层便逐渐将德国引向一条侵略扩张的灾难性道路。的确，大多数德国人会马上指出，普鲁士永远无法代表整个德意志。

柏林所有的“历史记忆场所”中最富争议的地方在菩提树下大街东端的尽头。长久以来，游人从勃兰登堡门可以看到这里的景致，而这里的重建工作正火热地开展，关于重建的讨论则更加火热。这里曾经坐落着都市宫，它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及皇帝的宫殿，后于20世纪50年代被民主德国拆除。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共和国宫便立在宫殿原址上，它成了民主德国议会的所在地。共和国宫自身遭到拆除则是在2006年，虽然此举曾受到许多东柏林人的抗议。在这里，兴建于普鲁士旧时期及民主德国新时期的建筑，连同遥远的胜利与最近的经历，都已被抹去。但它们的痕迹与身影却留存了下来。联邦议院在长期的讨论之后，经过投票决定复建旧时的都市宫，而该建筑眼下正迅速地层层向上推进。菩提树下大街的沿途美景将再一次如勃兰登堡选侯们所设想的那样落幕。但这座“古老的”建筑希望表现一个非常现代的德国。它将陈列世界闻名的柏林艺术收藏，这些藏品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及美洲。这一次，它不会是由一个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朝所独享的王宫，而是一个新兴的德国的殿堂，并将展现其首都与欧洲以外世界的关系。柏林正再次构建一个梦想，让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和平而又互相充实的对话——在博物馆岛上可以体验欧洲与地中海的文化，在都市宫内可以领略世界其他地域的风情，而都市宫的意义，如今将像本书开篇所介绍的慕尼黑凯旋门一样仍然无法确定。复杂的德意志历史在这里再一次由纪念性建筑和诸多记忆重塑。



重建记忆，**2014**年**8**月：都市宫正在其原址及共和国宫旧址上重建



《新天使》，保罗·克利，**1920**年

[1] 该建筑始建于1884年，1894年完工。其历史距英文原书2014年出版时，尚不足一百四十年。

[2] 1990年8月31日两德签署《统一条约》，但地点并非国会大厦，而是太子宫。

尾声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历史在德国不仅涉及过往，更着眼于未来。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

因此，本书以两件对过往与未来进行深思的艺术作品来结尾。

1920年，保罗·克利在加入魏玛的包豪斯之前的几个月（详见第20章），用他自己发展的复杂的“油彩过渡法”创作了《新天使》。这成为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那时德国正在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并于魏玛共和国开启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二十年后，恰在法国于1940年夏落败以前，生于柏林而后流亡巴黎的犹太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写就了他的《历史哲学论纲》。其中一节现今很有名的段落便是受到克利作品的启发：

> 克利有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作，画中的天使看起来像是正要远离他所凝视的地方。他瞪着双眼，张着嘴，伸展着双翅。历史之天使一定是这个模样。他把脸转向过去。就在我们面前出现一系列不寻常事件的地方，他看见某个独一无二的灾难，这个灾难不断地堆集着一处处废墟，并把它们抛到他脚下。他想要停留，唤醒逝者，并把碎片拼合起来。但一场风暴从天堂刮来，困住了他的翅膀，而风暴是如此强劲，以致天使无法收起双翅。就在他面前的废墟朝着天空越堆越高之时，这场风暴把他不可阻挡地推向他正远离的未来。这场风暴便是我们称为“进步”的东西。

克利于1940年6月底逝于瑞士，此时法国正遭受着蹂躏。整整三个月后，瓦尔特·本雅明从法国逃了出来，但他认为自己会被遣返回德国，于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保罗·克利、缇尔曼·黎门施奈德及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等人一样，盖尔哈德·里希特是一位沉思默想的大师。在沉默之中，时间暂停了下来，过往与现在融合在一起。他像丢勒及克利一样，也是一位掌握了许多技术工艺的精湛艺人。1977年，他给女儿贝蒂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贝蒂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部，正看着挂在她身后墙上的一幅父亲的画作。那幅画本身是对一张旧新闻照片的不大精确的灰色调再现。1988年，他照着给贝蒂拍的那张照片创作了一幅画，后来他又以那幅画为基础制作了这幅平版画。因此多年以来，人们利用多种不同的媒介，一次次审视与重新审视，试图提炼出这幅人物肖像画的精粹，而人物的态度却是不可能被精确辨识或清晰展示的。在绘画的创作过程中，它是对诸多事件及其记录的复杂沉思。我想，如果将画作解读为“对德国与其过往之间微妙、游移而又无法摆脱的牵连关系的一种隐喻”，这不算是对里希特艺术的恶意曲解。

里希特与他的女儿体现了许多的过往。他在靠近现今波兰边境的地方长大。他的童年是在纳粹统治和战争侵扰下度过的。他后来在满目疮痍的德累斯顿读书。像克丽斯塔·沃尔夫《分裂的天空》里的主人公一样，里希特就在1961年柏林墙竖立起来的几个月前逃离了民主德国。转身背离自己父亲的贝蒂（出于羞怯？分心？冷漠？反感？）在西德长大。他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一个勇于挖掘自身可耻历史的国家，他们致力于去公布父辈及祖父辈的罪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惩罚，同时纪念那些受害者。

贝蒂居住的地方依然被父亲的作品装点着，尽管那些挂在她身后暗墙上的画作已经模糊不清。这正像所有德国人都生活在他们先辈作为的影响下一样，尽管这种影响越来越模糊，却依然起着支配作用。贝蒂对她父亲及他那一代作何理解，我们不清楚。不过，这位年轻的姑娘很快便会转过来面对我们，面向未来。



致谢

这本书是许多人围绕一个独立项目所进行的三方面工作的成果，这个项目便是“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第一部分工作是一场临时展览，于2014年10月16日至2015年1月25日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展览由贝齐和杰克·瑞恩赞助，并得到所罗门·奥本海默慈善基金会的支持。这次展览立足于柏林墙倒塌后建立的新德国，来回顾德国复杂多变的历史。那段历史的不同方面则在第二部分——一套系列广播节目中进行探索。广播节目由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四台（BBC Radio 4）联合制作。第三部分便是本书。

在大英博物馆，罗莎琳德·温顿在乔安娜·哈蒙德和萨姆·斯图尔德的支持下，对系列广播及图书制作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帮助。同时，马克斯·伊斯特曼与克里斯托弗·邦德则凭借他们天才的写作技巧，使节目剧本得以成形。我还要向克拉丽莎·冯·施佩和萨布里纳·本·阿维察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她们将策展的知识与专业应用到了这次展览中（由卡罗琳·马斯登·史密斯同阿拉斯代尔·胡德监制），以及整个项目的其他方面。我将最大的感激致以巴里·库克，我主要的对谈者，以及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他显然具备广博的学识，并以此在项目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了指导、鼓励，特别是有益的局面掌控。

英国广播公司四台的策划编辑简·埃利森，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副馆长乔安娜·麦克勒，引领她们各自的团队，用三年多的时间将“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打造成形。如果没有他们充满活力的明晰思维，广播节目连同附建的网站以及本书都不会顺利完成。

英国广播公司的总裁托尼·霍尔及四台的主管格温内思·威廉斯，为两家公共服务机构间这次愉快的合作送上了他们的祝福与鼓励。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台纪录片部门的音效专家保罗·科布拉克同我一道遍游了德国，并制作了节目。他缜密的好奇心对这套节目影响颇多。约翰·戈迭用他宝贵的编辑见解对我们进行了全程指导。克莱尔·沃克、安妮·史密斯和休·弗莱明也给予我们不可或缺的支持。节目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支持，为此，我要向瑞安·罗伯茨、格雷格·史密斯以及大英博物馆的网站负责人马修·科克表达谢意。

本书的出版要归功于企鹅出版社出版总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他高超的职业素养与不知疲倦的耐心，以及精神才智上的无限精力，令我的手稿终于变成了图书的章节。我也衷心地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团队，包括玛丽安·艾尔德、安德鲁·巴克、克萝伊·坎贝尔、唐纳德·富特斯、马克·汉兹勒、丽贝卡·李、塞西莉亚·麦克、莉塔·马托斯、迈克尔·佩奇及基特·谢波德等人。他们促使本书及时出版，来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

我最后要感谢所有专家学者，他们在本书及随附的系列广播节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学识指引了我们的研究，塑造了该项目的体系结构。伯恩哈德·里格尔教授对一期节目做出了贡献，并对本书后几章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最后，本书德国出版方贝克出版社（Verlag C. H. Beck）的德特勒夫·费尔肯博士以他对德国历史的了解，就我们的处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使我们免于讹误。

在“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项目的创意策划和开展推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参与者。我要向他们所有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尼尔·麦格雷戈

大英博物馆馆长

2014年10月

图片来源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contact all copyright holders. The publishers will be happy to make good in future editions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brought to their attention.

Frontispiece. Gerhard Richter, *Betty*, 1991 (*detail*). Offset print on lightweight cardboard, with a layer of nitrocellulose varnish, mounted on plastic, framed behind glass. Copyright © Gerhard Richter

p. xxiv. The north side of the Siegestor, Munich. Photo: ullstein bild – imagebroker/Siepmann

p. xxvi. The south side of the Siegestor, Munich. Photo: istockphoto.com

p. xxvii. (*left*) The Arc de Triomphe, Paris. Photo: akg-images/De Agostini Picture Lib./G. Dagli Orti

p. xxvii. (*right*) Constitution Arch,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Photo: Julie Woodhouse/Alamy

pp. xxx–xxxi. Bernardo Bellotto, *The Ruins of the Kreuzkirche in Dresden*, 1765. Oil on canvas.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Dresden. Photo: akg-images/Erich Lessing

p. xxxiii. Georg Baselitz, *Inverted eagle painted over with colours of the German flag*, 1977. Etching. Copyright © Georg Baselitz,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3,7043.16)

p. xxxiv. Jacques Callot, *The Hanging*, from the series *The Miseries and Misfortunes of War*, *c*. 1633. Etchin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61,0713.788)

p. xxxv. Adolph Menzel, *Allegorial Figure of Germania Sitting on a Rock*, 1846–57. Wood engravin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13,0404.10)

p. xxxvi. Children's cut-outs of Hitler and soldiers. Colour print, 1933–43.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2,7020.80)

p. xxxvii. Hamburg after an Allied air raid, summer 1943. Photo copyright © akg-images/ullstein-bild

p. xxxviii Peter Fechter's body beside the Berlin Wall, 1962. Photo: akg-images/picture-alliance/dpa

pp. xl–xli. View of the Reichstag and quadriga of the Brandenburg Gate from the Holocaust Memorial, Berlin. Photo: Herbert Knosowski/AP/PA Photos

pp. 4–5. The Brandenburg Gate, Berlin. Photo copyright © Massimo Ripani/SIME/4Corners

p. 6. The Stadtschloss, Berlin, 1896. Photo: akg-images

p. 7. Friedrich Jügel after Ludwig Wolf, *Napoleon's Entry through the Brandenburg Gate*, *c*. 1806. Coloured engraving.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1988/996.3)

p. 9. The Siegessäule (Victory Column), Berlin. Photo: Shutterstock

p. 10. Albert Speer, model of the proposed Congress Hall for Berlin, 1939.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

p. 12. The Palast der Republik, Berlin, 1976. Photo: akg-images/ Straube

p. 14. The Fernsehturm (Alexander Tower), Berlin. Photo: Shutterstock

p. 15. Erich Ott, Medal of Reunification, 1989–90. Cast bronze.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1,0412.1)

p. 16. World Cup fans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June 2014. Photo copyright © Corbis UK/Reuters

pp. 18–19. White crosses by the River Spree opposite the the Bundeskanzleramt (Federal Chancellery building), Berlin. Photo: DDP/ Camera Press

p. 20. Christa Wolf, *Der geteilte Himmel (Divided Heaven)*, 1963. Front cover of the first edition. Copyright ©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

pp. 22–3. Aerial view of the Berlin Wall, 1980. Photo copyright © Peter Marlow/Magnum Photos

p. 25. Wetsuit manufactured by VEB Solidor Heiligenstadt, 1987. Neoprene.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Kte 90/786). Photo copyright © The British Museum

p. 27. Friedrichstrasse Station, 1956. Photo: akg-images

p. 29. Model of the border crossing at Friedrichstrasse Station, East Berlin, 1970. Wood, metal, tin plate, enamel.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SI 90/384)

p. 32. Christa Wolf at her writing desk, 1980s.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Barbara Köppe

p. 33. Carnival float with figure of Edward Snowden at the Rosenmontag (Rose Monday) festival, Mainz, 2014. Photo: akg-images/picture-alliance/dpa/Fredrik Von Erichsen

p. 35. Angela Merkel's speech at the Bundestag, 29 January 2014. Photo: Hans Christian Plambeck/Laif/Camera Press

p. 36. Joachim Gauck, 1992. Photo: Waltraud Grubitzsch/DPA/ Press Association Images

p. 38. Tankard with cover, 1640–60. Carved amber with silver gilt mounts, manufactured in Königsberg. Photo copyright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B.229)

p. 40. Karolinum, Prague. Photo: Mariusz ´Switulski/Alamy

p. 41. The west façade of Kaliningrad Cathedral, *c*. 1998. Photo: akg-images/Volker Kreidler

p. 42. (*left*)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f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8. Title-page of the first edition. Photo: courtesy of the 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 42. (*right*) Plaque near Kant's tomb, Kaliningrad. Photo: Shutterstock

p. 43. Königsberg Castle, *c*. 1905. Photo: akg-images

pp. 44–5. Friedrich Probst after Friedrich Bernhard Werner, *View of Königsberg*, 1740. Coloured engraving. Photo copyright © Photo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46. *Amber Fisherman on the Amber Coast*. Illustration from Johann Wilhelm Meil, *Spectaculum Naturae* & *Artium [...]*, Berlin, 1761. Photo: akg-images/Imagno/Austrian Archives

p. 47. (*left*) Detail of the sun from the base of a tankard, 1640–60. Carved amber, manufactured in Königsberg. Photo copyright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B.229)

p. 47. (*right*) The coat of arms of the Swedish Royal House of Vasa, detail from the cover of a tankard, 1640–60. Carved red and white amber, manufactured in Königsberg. Photo copyright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B.229)

p. 48. *The Coronation of Frederick I King in Prussia, 1701*. Illustration from Johann von Besser, *Preuße Krönungsgeschichte*, 1712. Photo: akg-images

p. 49. (*left*) Samuel Theodor Gericke (attr.), portrait of Frederick I as Frederick III, Elector of Brandenburg, after 1701. Oil on canvas.

Märkisches Museum, Berlin. Photo: akg-images

p. 49. (*right*) Antoine Pesne, portrait of King Frederick I of Prussia, eighteenth century. Oil on canvas. Staatliche Schlösser und Gärten, Potsdam.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51. The Amber Room at Tsarskoye Selo, Russia, *c*. 1930. Photo: akg-images

p. 52. Manhole cover in Kaliningrad. Photo: Deposit Photos

p. 54. Adriaen de Vries, *Rudolf II Introducing the Liberal Arts to Bohemia*, 1609. Bronze relief. The Royal Collection, Windsor Castle. Photo: The Royal Collection Trust, copyright ©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2014/Bridgeman Images

p. 55. The Old Town Square, Prague, 1922. Photo: Mary Evans/ 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

p. 56. Hans Fronius, portrait of Franz Kafka, 1937. Woodcut. Copyright © Ch. Fronius, Vienna.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780121.309)

pp. 60–61. Herman Saftleven, *Rhine Landscape with Landing Stage*, 1666. Oil on board.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Photo: akg-images

p. 62. The astronomical clock, 1843, Strasbourg Cathedral. Photo: Bildarchiv Monheim GmbH/Alamy

p. 63. Anton Johann Kern, portrait of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65. Oil painting, formerly in the collection of Leipzig University, destroy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 65. Isaac Habrecht (manufacturer) and Conrad Dasypodius (designer), the Strasbourg Clock, 1589. Gilded-brass clock with automata.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88,1201.100)

p. 66. View of the cathedral and rooftops of Strasbourg. Photo: Shutterstock

p. 68. Anon., *Imachio Crisiverus französischer Calender-Spiegel, oder Prognostikon Trost und Begleitungs-Reymen*, broadside on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Alsace, *c*. 1678.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57,0214.406)

p. 69. Anon., after Ludwig Pietsch, *Goethe in Strasbourg: On the Platform*, 1870. Coloured print. Photo: akg-images

p. 71. Angelika Kauffmann, portrait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91. Oil on canvas. Goethe-Museum, Frankfurt. Photo copyright ©

David Hall – ARTOTHEK

p. 72. A. Matthis Elberfeld, *Deutschlands Einheit* (*Germany's Unity*), 1870. Lithograph.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71,1209.4543)

pp. 74–5. Anon., *Strasbourg after the Bombardment*, 1871. Lithograph.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77. Anon., *Vive l'Alsace!* Illustration of the statue of Strasbourg in the Place de la Concorde, Paris, from *Le Petit Journal*, 7 February 1904. Photo: Artmedia/Heritage Images/TopFoto

p. 78 (*top*) Half-thaler of Sophia, Electress of Hanover, 1714. Silver, minted in Hanover.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3595)

p. 78. (*bottom*) Five-guinea coin of George I, 1716. Gold, minted in Londo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1946,1004.657)

p. 81 (*top*) Thaler of Leopold I, 1700. Silver, minted in Tirol, Austria.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20,0907.318)

p. 81 (*bottom*) Gulden of Friedrich Adolf, Count of Lippe-Detmold, 1714. Silver, minted in Brake.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48,0804.22)

p. 83 (*top*) Thaler of Joseph I, 1705–11. Silver, minted in Cologne.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35,0401.15433)

p. 83 (*centre*) Ten-ducat coin of Hamburg, with view of the city, 1689. Gold, issued in Hambur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65,0218.1)

p. 83 (*bottom*) Ducat coin of St Alban, 1744. Gold, minted in Prioz of St Alba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19,0214.223)

p. 84. Thaler of the Abbess of Quedlinburg, 1704. Silver, minted in Berli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G3,Germ.1094)

p. 85. (*top*) Thaler of Lothar Franz von Schönborn, 1697. Silver, minted in Bamber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35,0401.5692)

p. 85. (*centre*) Half-thaler of Lothar Franz von Schönborn, 1696. Silver, minted in Mainz.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47,1117.192)

p. 85. (*bottom*) Twelve-ducat coin of Duke Friedrich II, 1723. Gold, issued in Altenbur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G3,Germ.1116)

p. 87. Thaler of Leopold I, 1673. Silver, minted in Wismar.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G3,GerC.2078)

p. 92.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ortrait of Martin Luther, 1529. Oil on woo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89/1547.1)

p. 93.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ortrait of Katharina von Bora, 1529. Oil on woo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89/1547.2)

p. 95. Martin Luther, *Disputation zur Erläuterung der Kraft des Ablasses* (*The Ninety-Five Theses*), 1517.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R63/685).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p. 96–7. Hans Sebald Beham, *Luther before the Emperors and Electors at the Diet of Worms*, 1521. Woodcut. Photo: akg-images

p. 98. Workshop of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portrait of the Elector Frederick III of Saxony, 1532. Oil on panel.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LPictures.271)

p. 99. View of the Wartburg Castle and Eisenach. Photo: akg-images/euroluftbild.de

pp. 102–3. Martin Luther, *Biblia, das ist, die gantze Heilige Schrift: Deudsch*, pub. Wittenberg, 1541. Front endpaper showing portraits of Martin Luther and Johann Bugenhagen, with facing page showing inscriptions by Luther from the 23rd Psalm. Photo copyright ©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679.i.15)

p. 106. Workshop of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illustration from Martin Luther, *Biblia, das ist die gantze Heilige Schrifft, Deudsch*, pub. Wittenberg, 1534. Woodcut with later hand-colouring.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Weimar. Photo copyright ©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p. 111. *Die deutsche Bibel*, edition with comments by Abraham Calov, published in Wittenberg, 1681. Title-page with autographed note of ownership by J. S. Bach. 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 Photo: akg-images

p. 112. Ludwig Emil Grimm, illustration for *Snow White*, from the Brothers Grimm,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Tales for Children and the Home*), pub. Berlin, 1825. Photo: Mary Evans/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

p. 115. Caspar David Friedrich, *The Chasseur in the Forest*, 1814. Oil on canvas.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akg-images

p. 116. The Brothers Grimm,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Tales for Children and the Home*), Berlin, 1815. Title-page and contents page.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R 92/963-1)

pp. 118–19. Caspar David Friedrich, *The Solitary Tree* (*Village Landscape in Morning Light*), 1822. Oil on canvas.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 121. Georg Friedrich Kersting, *At the Sentry Post* (*Theodor Körner, Karl Friedrich Friesen and Christian Ferdinand Hartmann*), 1815. Oil on canvas.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Jörg P. Anders, 2014

p. 122. One-Pfennig coin, 1949. Bronze,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5,1111.315)

p. 125. The Brothers Grimm, *Rapunzel*, 1857. Broadside with illustrated borders by Otto Speckter. Photo: akg-images

p. 126. Caspar David Friedrich, *Graves of Fallen Freedom Fighters*, 1812. Oil on canvas. Kunsthalle, Hamburg.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127. The Hermannsdenkmal (Hermann Memorial), Detmold. Photo: akg-images/Euroluftbild.de

p. 129. Poster for the Walt Disney film *Snow White*, 1937. Photo: akg-images/Album/Walt Disney Productions

pp. 132–3. Johann Tischbein, *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 1786–7. Oil on canvas. Städel Museum, Frankfurt am Main. Photo: Artothek/Bridgeman Images

p. 134. Anon., Goethe’s birthplace, Frankfurt am Main, 1832. Coloured engraving. Photo: akg-images

p. 135. Goethe’s puppet theatre. Photo copyright © Freies Deutsches Hochstift/Frankfurter Goethe-Museum, David Hall

p. 137.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peech made on Shakespearestag, 14 October 1771. Manuscript. Photo copyright © Freies Deutsches Hochstift/Frankfurter Goethe-Museum (Hs-2421)

p. 139.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pub. Leipzig, 1774. Title-page of first edition.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Antiquariat Dr. H.-P. Haack, Leipzig

p. 140. Johann David Schubert (probably decorator) for Meissen,

cup with illustration of Werther, from a set, *c*. 1790. Porcelain with enamel colours and gilt. Photo copyright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1328E-1871)

pp. 142–3. J. C. E. Müller after Georg Melchior Kraus, *Weimar from the North-West*, 1798. Coloured engraving.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Weimar. Photo: akg-images

p. 145. Jochen Ersfeld, replica of Stephenson's *Rocket*, *c*. 1992, similar to the one owned by Goethe, now lost. Goethehaus, Weimar. Photo copyright ©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Museen (Kat. 202 – KKg/00636/001)

p. 146.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Zur Farbenlehre* (*On the Theory of Colours*), 1810, plate 1.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New York. Photo copyright © Pierpont Morgan Library/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2014

p. 147. Christoph Erhard Sutor, three colour theory cards, from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Beiträge zur Optik* (*Contributions to Optics*), 1791. Goethehaus, Weimar. Photo copyright © Klassik Stiftung Weimar, Museen (GFz 035 – 037)

p. 148. Carl Vogel von Vogelstein, *Faust Conjuring the Spirits*, detail from *Scenes from Goethe's Faust*, 1840. Oil on canvas. Palazzo Pitti, Florence.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150. Statue of Goethe based on the portrait by Tischbein, at the Goethe Bar, Terminal 1, Frankfurt Airport. Photo: courtesy Frankfurt Airport press office

p. 152. The Walhalla viewed from the River Danube, copyright © epa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b.v./Alamy

p. 155. Angelika Kauffmann, *Crown Prince Ludwig, in the Costume of the Knights of St Hubert*, 1807. Oil on canvas. Neue Pinakothek, Munich. Photo: akg-images

pp. 156–7. Anon., after Ludwig Bechstein, *The gods entering Walhalla, the Final scene from Das Rheingold*, *c*. 1876. Engraving. Photo: akg-images

p. 159. (*left*) 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bust of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Frederick the Great), 1807.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59. (*right*) Konrad Eberhard, bust of the Empress Maria Theresa, 1811.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p. 160–61. (*top*) Ludwig Michael von Schwanthaler, southern

pediment frieze depicting Germania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1832–42.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p. 160–61. (*centre*). Ludwig Michael von Schwanthaler, northern pediment frieze depicting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1832–42.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63. Bernhard Grueber, *Interior View of the Walhalla*, 1842. Colour lithograph. Photo copyright © Deut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Gr 2004/189)

p. 164. (*left*) August Wredow, bust of Catherine the Great, 1831.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64. (*right*) Johann Nepomuk Haller, bust of King William III of England, 1816.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65. (*left*) Wilhelm Matthiä, bust of Johannes Gutenberg, 1835.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65. (*right*) Ernst Friedrich Rietschel, bust of Martin Luther, 1831.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68. The Nazis honour Adolf Rothenburger's bust of Anton Bruckner in the Walhalla, 1937. Photo: Interfoto/akg-images

p. 169. The Prime Minister, Horst Seehofer, unveiling Bert Gerresheim's bust of Heinrich Heine in the Walhalla, 2010. Photo: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dpa/Armin Weigel

p. 171. Wolfgang Eckert, bust of Sophie Scholl with plaque to the Resistance, 2003.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73. Landolin Ohmacht, bust of Erwin von Steinbach, 1811. Marble. Walhalla-Verwaltung, Donaustauf. Photo copyright © Herbert Stolz

p. 174. Anon., 'Gruß aus München!' ('Greetings from Munich!'), 1960s. Postcard.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Arkivi UG, All Rights Reserved/Bridgeman Images

pp. 176–7. German drinking vessels (*left to right*): Silver parcel-gilt tankard, 1601–25, manufactured by Engelbrecht II Becker in Lübeck (WB.128); stoneware 'pinte' tankard, *c.* 1530s, manufactured

in Cologne (1895,0116.8); amber tankard, 1640–60, manufactured in Königsberg (WB.229); stoneware jug with pewter lid, 1598, manufactured by Jan Baldems Mennicken in Raeren, Belgium (1887,0617.43); enamelled glass 'humpen' beaker, 1625, manufactured in Bohemia (1855,1201.133); enamelled 'Wiederkom' glass, *c.* 1650, manufactured in Switzerland (S.841).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 180. The *Reinheitsgebot* (Beer Purity Law) promulgated by Duke Wilhelm IV of Bavaria, 1516. Photo: akg-images

p. 183. Butcher's shop, Wilmersdorf. Photo: ullstein-bild/TopFoto

p. 185. Hans Wertinger, *The Month of December* (detail showing the making of blood sausages), *c.* 1525–6. Oil on panel.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186. The Currywurst Museum, Berlin.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Schöning

p. 187. Adolf Hitler making a speech in the Bürgerbräukeller, Munich, 8 November 1935.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

p. 188. Oktoberfest, Munich.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CARO/Kaiser

p. 189. Men in traditional costume drinking beer, Munich. Photo: ullstein bild/akg-images

p. 192. Bernhard Witte and Paul Beumers, replica of the Holy Roman Emperor's crown, 1914/15. Pearls, gold, enamel, gemstones. Rathaus, Aachen. Photo copyright © Anne Gold, Aachen, courtesy Städtische Museen, Aachen (Inv. CK3)

p. 194. Aachen Cathedral. Photo: Bildarchiv Monheim/akg-images

p. 195. Interior of the Palatine Chapel, Aachen Cathedral. Photo: Hemis/Alamy

p. 197. Anon., figurine of Charlemagne on horseback, ninth century, horse restor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onze with traces of gilding. Cathedral of Saint-Étienne, Metz. Photo copyright © RMN-Grand Palais (Musée du Louvre)/Droits réservés

p. 199. Peter Flötner, portrait of Charlemagne from *Ancestors and Early Kings of the Germans*, *c.* 1543. Broadside with hand-coloured woodcut and letterpress.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8.292)

p. 201. Anon., *The Relics, Vestments and Insignia of the Empire*, 1470–80. Prin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33,0102.1)

p. 202. Bertrand Andrieu, medal depicting Napoleon and Charlemagne, 1806. Bronze.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98,0102.76)

p. 203. (*left*) William Biennais after Charles Percier, the imperial crown of Napoleon, based on Charlemagne's, 1804. Copper, gold and silver, set with cameos. Musée du Louvre, Paris. Photo copyright © RMN-Grand Palais/Jean-Gilles Berizzi

p. 203. (*right*) Jacques-Louis David, *The Emperor Napoleon I Crowning Himself*, *c*. 1804–7. Pen and ink drawing. Photo copyright © RMN-Grand Palais (Musée du Louvre)/Thierry Le Mage

p. 205. Window for the arms room of Kiel Castle depicting Kaiser Wilhelm I, *c*. 1888. Stained glass and lea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KG 97/57)

p. 206. Charles and Louis Rochet, statue of Charlemagne with his paladins Roland and Olivier, 1877. Bronze. Île de la Cité, Paris. Photo: Yvan Travert/akg-images

p. 209. Konrad Adenauer and Charles de Gaulle at Reims Cathedral, 1962. Photo: Keystone France/Gamma/Camera Press

p. 210. Sèvres porcelain factory, plate bearing the image of Charlemagne, 1943. Porcelain. Musée de l'Armée, Paris. Photo copyright © Paris – Musée de l'Armée, Dist. RMN–Grand Palais/image Musée de l'Armée

p. 212.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aint Luke*, *c*. 1490–92. Limewood. Bode Museum, Berlin (Inv. 403). Copyright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photo: Antje Voigt

p. 215. The modern high altar with some of Riemenschneider's original elements, Church of Mary Magdalen, Münnerstadt. Photo by Bruce White, courtesy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p. 216. (*left*)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aint Matthew*, *c*. 1490–92. Limewood. Bode Museum, Berlin (Inv. 402). Copyright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photo: Antje Voigt

p. 216. (*right*)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aint Mark*, *c*. 1490–92. Limewood. Bode Museum, Berlin (Inv. 404). Copyright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photo: Antje Voigt

p. 217. (*right*)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aint John*, *c*. 1490–92.

Limewood. Bode Museum, Berlin (Inv. 405). Copyright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photo: Antje Voigt

p. 217. (*left*)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aint Luke*, *c*. 1490–92. Limewood. Bode Museum, Berlin (Inv. 403). Copyright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photo: Antje Voigt

p. 219. Tilman Riemenschneider, *Self-Portrait*, *c*. 1505–10, detail from the predella of the Marienaltar, Herrgottskirche, Creglingen. Photo copyright © Volker Schier

p. 223. *The Conquest of Würzburg by the Swabian League*, illustration from the *Bamberger Burgenbuch*, *c*. 1527. Coloured woodcut. Copyright © Staatsbibliothek Bamberg (RB.H.bell.f.1, fol. 68). Photo: Gerald Raab

p. 227. Tilman Riemenschneider, *The Adoration of the Magi*, relief for an altar-panel (?), 1505–10. Lime-wood.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52,0327.10)

p. 229. (*left*) Five-Mark coin designed by Heinz Rodewald, commemorating the 4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ilman Riemenschneider, 1981. Nickel-silver, minted East Germany, 1981. Photo: Matd13

p. 229 (*right*) Sixty-Pfennig stamp commemorating the 4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ilman Riemenschneider, 1981. Issued by the Deutsche Bundespost, West Germany. Photo: Kayatana Ltd

p. 230.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portrait of George Gisze of Danzig, 1532. Oil on panel. Copyright © Gemäldegalerie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Ident. Nr. 586)/photo: Jörg P. Anders

p. 232. The Steelyard (*Stahlhof*) in London, detail from Wenceslas Hollar’s *Long View of London*, 1647.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234.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Self-Portrait*, 1542. Pastel on paper. Galleria degli Uffizi, Florence.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p. 236–7. Elias Diebel, *Panoramic View of the Free City of Lübeck*, facsimile of the 1552 original, published by Johannes Geffcken in 1855. Colourized lithograph. Photo: Paulus Swaen Gallery, Indian Rocks, Fl.

p. 238. (*left*)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portrait of a member of the Wedigh family, probably Hermann Wedigh, 1532. Oil on wood. Bequest of Edward S. Harkness, 1940,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cc. no. 50.135.4). 165/8 × 12¾ in. (42.2 × 32.4 cm),

with added strip of ½ in. (1.3 cm) at bottom. Photo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2014

p. 238. (*right*)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portrait of Derick Berck, 1536. Oil on canvas, transferred from wood. The Jules Bache Collection, 1949,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cc. no. 49.7.29). 21 × 16¾ in. (53.3 × 42.5 cm). Image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2014

p. 239. Salt warehouses, Lübeck. Photo copyright © Guido Cozzi/4Corners

p. 243. (*top left*) Tankard with cover, 1601–25. Silver parcel-gilt, manufactured by Engelbrecht II Becker of Lübeck.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B.128)

p. 243. (*bottom*) Tankard with cover, *c*. 1670–1700. Silver-gilt, manufactured by Daniel Friedrich von Mylius of Danzig. Gift of Dr W. L. Hildburgh, FSA. Photo copyright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6-1964)

p. 243. (*top right*) Beaker, 1642–58. Silver, parcel-gilt, manufactured by Johann Berendt Brockner of Hamburg. Gift of Princess Louise, Duchess of Argyll. Photo copyright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M.98-1926)

p. 245. Aerial photograph of Lübeck. Photo copyright © SZ Photo/euroluftbild.de/Bridgeman Images

p. 246. SPQH sign on the door of the banqueting hall, Rathaus, Hamburg. Photo copyright © Tim Brüning/T. B. Photography

p. 248. The Iron Cross, 1813. Photo: Private collection

p. 250. Gottfried Leybebe, statue of the Great Elector as St George, 1680. Iron. Skulpturensammlung, Berlin (Ident. Nr. 856). Copyright © 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photo: Antje Voigt

p. 252. Necklace, *c*. 1805. Cast iro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78,1002.108.a)

p. 253. (*left*) Christian Daniel Rauch, bust of Frederick William III, King of Prussia, after 1816. Cast iron, painted black with gold-plating. Copyright © Stiftung Stadtmuseum Berlin (Inv. Nr. KGM 85/49)/photo: Michael Setzpfandt

p. 253. (*right*) Christian Daniel Rauch, bust of Luise, Queen of Prussia, after 1816. Cast iron, painted black with gold-plating. Copyright © Stiftung Stadtmuseum Berlin (Inv. Nr. KGM 85/50)/

photo: Michael Setzpfandt

p. 256. Jean-Charles Tardieu, *Napoleon I Receiving Queen Luise at Tilsit in 1807*, 1808. Oil on canvas. Châteaux de Versailles et de Trianon, Paris. Photo: akg-images/visioars

p. 257. The Order of Luise, *c*. 1866/1918. Silver and enamel.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O 262)

p. 259. Anon., metal cross with nails, 1915–18. Iron, wood and brass.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MK 73/195)

p. 260. J. M. Mauch after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architectural drawing for the Prussian National Monument, 1823. Etching. Photo: akg-images

pp. 264–5. The Imperial War Flag used by the German naval forces between 1849 and 1852. Linen and wool.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S. Ahlers (Fa 77/64)

pp. 268–9. *Battle between 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 the Frankfurter Linden Strasse in Berlin on 18 and 19 March 1848*, detail from a broadside, 1848. Coloured lithograph. Photo: akg-images

p. 271. C. Hoffmeister after E. Fröhlich, portrait of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1841. Coloured etching. Photo: akg-images

p. 273. Ludwig von Elliot, *View of the Interior of the Paulskirche during the Frankfurt Assembly*, 1848/49. Coloured lithograph. Photo: Horst Ziegenfusz, copyright © Historisches Museum Frankfurt (C 10472, K 349)

p. 27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itle-page of first edition, 1848. Photo copyright ©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C.194.b.289)

p. 277. Demonstrator with banner at a rally in East Berlin, 9 December 1989. Photo: Lutz Schmitt/AP/PA Photos

pp. 278–9. Crowds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Berlin, December 1989. Photo: dpa/Corbis

p. 280. Ludwig Engelhardt, monument to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86. Bronze. Karl-Marx-Forum, Berlin. Photo: akg-images/Pansegrau

p. 284. Charles de Bovelles, illustration of a printing press, from *Aetatum mundi septem supputatio*, 1520. Woodcut.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287. The opening of Genesis, from Johann Gutenberg's 42-line Bible, pub. Johann Gutenberg, Johann Fust and Peter Schoeffer, Mainz, 1455. Printed on paper, hand-illuminated in Erfurt. Photo copyright ©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C.9.d.4, f.5)

p. 289. Bertel Thorvaldsen, statue of Johann Gutenberg, 1837. Bronze. Gutenpbergplatz, Mainz. Photo: ullstein-bild – Dietmar Scherf/akg-images

p. 291. Reconstructed Gutenberg press and workshop. Gutenberg Museum, Mainz. Photo: akg-images/Erich Lessing

p. 292. André de Thevet, portrait of Gutenberg, 1584. Cabinet des Éstampes et des Dessins, Strasbourg. Photo: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M. Seemuller/Bridgeman Images

p. 295. Indulgence completed by hand in Braunschweig,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war against the Turks, printed by Johann Gutenberg, 1454. Parchment.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p. 297. Aelius Donatus, *Ars Minor*, *c*. 1456–8, folio salvaged from an early binding, printed by Johann Gutenberg in Mainz. Vellum. Photograph courtesy of Sotheby's, Inc., copyright © 2011

pp. 298–9. Franz Behem, *View of Mainz*, 1565. Kölnisches Stadtmuseum, Cologne (G 1209). Copyright © Rheinisches Bildarchiv Köln/photo: Wolfgang F. Meier (2009.03.18, rba_d012689)

p. 300. Carl Goebel, postcard issued to celebrate Gutenberg's 500th anniversary, 1900.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302. Albrecht Dürer, *Self-Portrait*, 1500. Oil on panel. Alte Pinakothek, Munich. Photo: akg-images

p. 307. Albrecht Dürer, *Triumphal Arch of Maximilian I*, 1515–17. Woodcu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5.1)

p. 308. View of Nuremberg showing Dürer's house. Photo copyright © Reinhard Schmid/4Corners.

p. 310. Albrecht Dürer,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497–8. Woodcu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3.121)

p. 312. Albrecht Dürer, *Melancholia*, 1514. Woodcu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2.107)

p. 313. Albrecht Dürer, *A Knight, the Devil and Death*, 1513. Woodcu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68,0822.198)

p. 316. Albrecht Dürer, *Rhinoceros*, 1515. Woodcu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2.358)

p. 318. Louis de Silvestre, portrait of Augustus II and 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 *c*. 1720s. Oil on canvas.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Dresden. Photo: akg-images

p. 320.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seven dragoon vases, *c*. 1662–1717. Porcelain with underglaze-blue decoration. Copyright © Porzellansammlung,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Inv. Nr. PO 1011, PO 1010, PO 9448/PO 1013, PO 9172, PO 1014/PO 2064, PO 1017, PO 9130). Photo: Jürgen Lösel

p. 321. Meissen porcelain factory, porcelain made for Queen Sophie Dorothea of Prussia, 1730.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Franks.67)

pp. 324–5. Bernardo Bellotto, *View of Dresden from the Right Bank of the Elbe*, 1748. Oil on canvas.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Dresden. Photo: akg-images/Erich Lessing

p. 326. Chinese stoneware teapot (*left*), Yixing, Kangxi Period (1662–1722), with imitation of it (*right*) by 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c*. 1712. Copyright © Porzellansammlung,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Inv. Nr. PO 3884, PE 6859 a/b). Photo: Klaus Tänzer

p. 329. The porcelain menagerie manufactured by Meissen for Augustus the Strong, early 1730s, installed in the Zwinger, Dresden. Copyright © Porzellansammlung,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p. 330–31. Gottlieb Kirchner, *Rhinoceros*, 1730. Whit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by Meissen. Copyright © Porzellansammlung,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PE 56). Photo: Herbert Jäger

p. 332. Meissen artisan decorating an urn with a copy of a portrait of President Wilhelm Pieck, 1955. Photo: Bundesarchiv, Koblenz/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 – Zentralbild (Bild 183-32361-0033)

p. 336. Masterpiece cup, late sixteenth century. Silver, manufactured in Nurember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WB.103)

pp. 338–9. Michael Wolgemut, *View of Nuremberg*, from the *Nuremberg Chronicle*, 1493.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

p. 341. Hans Schniep, clock-watch with alarm, *c*. 1590. Gilt-brass and steel.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8,1201.2213)

p. 343. Johann Anton Linden, astronomical compendium, 1596. Gilt and silvered brass.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57,1116.1)

p. 344. Johann Baptiste Beha, Black Forest cuckoo clock, 1860–80. Wooden-cased and weight-drive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5,0112.2)

p. 346. Adolf Hitler and Ferdinand Porsche at the Volkswagen factory at Fallersleben (later Wolfsburg), 26 May 1938.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

p. 347. VW Beetle production line, Wolfsburg, 1940s. Photo copyright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p. 349. Günther Paalzow, photograph of a group of apprentices at Zeiss, Jena, 1949. Photo: Bundesarchiv, Koblenz/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 – Zentralbild (Bild 183-S89614)

p. 350. VW Beetles for export to the USA, Hamburg, 1950. Photo: akg-images

p. 352. Jupp Darchinger, photograph of family picnicking beside a VW Beetle, 1950s. Photo: J. H. Darchinger/Friedrich-Ebert-Stiftung

p. 353. The new-style VW Beetle, Wolfsburg, 2011. Photo: DDP/Camera Press

p. 354. Anon., *Bauhaus Students and Their Guests, Weimar*, *c*. 1922. Gelatin silver print.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3844/4)

p. 356. Plaque with lettering designed by Walter Gropius, 1922. 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 Weimar. Copyright © DACS, 2014

p. 357. Reich President Ebert speaking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Weimar, 11 February 1919. Photo: akg-images

p. 358. The Bauhaus cradle, 2014, manufactured after an original design by Peter Keler, 1922. Wood, metal, wicker.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 360–361. Anon., *Masters on the Roof of the Bauhaus Building*, Dessau, 1926. Gelatin silver print.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Cent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Paris.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F2003/46)

p. 362. (*top*) Marianne Brandt, tea-infuser, 1924–9. Silver with ebony handle. Copyright © DACS, 2012.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79,1102.1)

p. 362. Anon., (*bottom*) *Metal Workshop at the Bauhaus, Weimar*, 1923. Photograph. Photo: akg-images

p. 364. (*top left*) Wassily Kandinsky, *Postcard No. 1 for the Bauhaus Exhibition in Weimar*, summer 1923. Colour lithograph on card. Copyright © 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4.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922)

p. 364. (*top right*) Paul Klee, *Postcard No. 4, for the Bauhaus Exhibition in Weimar*, summer 1923. Colour lithograph on card.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923)

p. 364. (*bottom left*) László Moholy-Nagy, *Postcard No. 4, for the Bauhaus Exhibition in Weimar*, summer 1923. Colour lithograph on card. Copyright © Hattula Moholy-Nagy/DACS, 2014.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2414)

p. 364. (*bottom right*) Herbert Bayer, *Postcard No. 11 for the Bauhaus Exhibition in Weimar*, summer 1923. Colour lithograph on card.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3586/4)/Markus Hawlik

p. 365. (*top*) The Kunstschule, Weimar. Photo: akg-images/Stefan Drechsel

p. 365. (*bottom*)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Bauhaus, Dessau. Photo: akg-images/Florian Profitlich

p. 366.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Sitting on a Steel-Frame Chair in Berchtesgaden, Summer 1928*.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Fotoarchiv Hoffmann. Photo: BSB München/Bildarchiv (Bild-Nr. hoff-6843)

p. 368. Lyonel Feininger, title-page of *Neue Europäische Graphik*, 1921. Print.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42,1010.30.+)

p. 369. Oskar Schlemmer, *Figure Design K 1*, from *Neue Europäische Graphik*, 1921. Lithograph.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42,1010.30.12)

p. 370. Paul Klee, *The Saint of Inner Light*, from *Neue Europäische Graphik*, 1921. Colour lithograph.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42,1010.30.6)

p. 372. Johannes Itten, *The House of the White Man*, 1920. Lithograph. Copyright © DACS, 2012.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42,1010.30.4)

p. 374. Lucia Moholy, *Walter Gropius's Director's Office*, 1924–5, reproduced in *Neue Arbeiten der Bauhauswerkstätten*, 1927.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akg-images

p. 378. Anon., after Guido Schmitt, *The Blacksmith of German Unity*, *c*. 1895. Engraving. Photo: akg-images

pp. 380–81. Anton von Werner,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in the Hall of Mirrors at Versailles in 1871*, 1885. Oil on canvas. Bismarck Museum, Friedrichsruh. Photo: akg-images

p. 382. Anon., figurine of Otto von Bismarck as a blacksmith, *c*. 1900. Terracotta and bronze.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PL 2009/3)

p. 390. Albin Förster, *Lamellenbild*, turned to show a portrait of Kaiser Wilhelm, *c*. 1882. Wood and boar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AK 99/318)

p. 391. (*left*) Albin Förster, *Lamellenbild*, turned to show a portrait of Otto von Bismarck, *c*. 1882. Wood and boar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AK 99/318)

p. 391. (*right*) Albin Förster, *Lamellenbild*, turned to show a portrait of Crown Prince Frederick, *c*. 1882. Wood and board.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AK 99/318)

pp. 392–3. View of Reinhold Begas's statue of the Bismarck monument in front of the Reichstag, Berlin, *c*. 1901. Photochrome. Photo: akg-images

p. 395. John Tenniel, 'Dropping the Pilot', caricature of Otto von Bismarck and Kaiser Wilhelm II from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29 March 1890

p. 396. Käthe Kollwitz, *Self-Portrait*, 1904. Lithograph.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1,0501.73)

pp. 398–9. Käthe Kollwitz, *Pietà*, cast made by Harald Haacke, 1993. Bronze. Neue Wache (New Guard House), Berlin. Photo: Dieter E. Hoppe/akg-images, copyright © DACS, 2014

p. 403. Käthe Kollwitz, *Mother and Dead Child*, from the series *The Silesian Weavers' Revolt*, 1897. Lithograph.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1,0501.74)

p. 405. Käthe Kollwitz, *The Sacrifice*, from the series *War*, 1923. Woodcut.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470.1992.1). Copyright © DACS, 2014. Digital image copyright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 2014

p. 406. Käthe Kollwitz, *The Mothers*, from the series *War*, 1923. Woodcut.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p. 407. Käthe Kollwitz, *The Grieving Parents*, 1925–32. Granite.

Vladslo German War Cemetery, Diksmuide, Belgium.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David Crossland/Alamy

p. 408. Karl Liebknecht giving a speech from a balcon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t a Spartacus League demonstration, Berlin, November 1918. Photo copyright © SZ Photo/Bridgeman Images

p. 409. Käthe Kollwitz, *In Remembrance of Karl Liebknecht, 15 January 1919*, 1919–20. Woodcut.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1006.2)

p. 411. Käthe Kollwitz, *The Call of Death*, from the series *Death*, 1934–7. Lithograph.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1,0501.80)

p. 413. Käthe Kollwitz, *Pietà*, 1937–38/39. Bronze. Käthe-Kollwitz-Museum, Berlin.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akg-images

p. 415. Dedication of the Neue Wache (New Guard House) by President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Berlin, 14 November 1993.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Weychardt

p. 418. Hyperinflation banknotes from the years 1922–3. Photo: akg-images

p. 420. (*top*) 50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Mainz.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5,1111.103)

p. 420. (*centre*) 75 Pfennig *Notgeld*, 1923, issued in Breme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414)

p. 420. (*bottom*) 50 Pfennig *Notgeld*, 1922 , issued in Müritz.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0605.4402)

p. 421. 50 *Notgeld*, 1921, issued in Euti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603.259)

p. 422. (*centre*) 50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Bordesholm.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0605.3903)

p. 422. (*bottom*) 50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Eisenach.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61,0609.108)

p. 423. 75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Breme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723)

p. 424. (*top*) One-Mark *Notgeld*, 1920, issued in Gramby, Denmark.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505)

p. 424. (*centre*) 1,000 Mark *Notgeld*, 1922, issued in Bielefeld. Line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426)

p. 424. (*bottom*) 75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Beverunge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0605.3890)

p. 426. (Top) 50 million Mark banknote, 1923, designed by Herbert Bayer, issued in Thuringia.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3,4146.1)

p. 426. (*centre*) 25 Pfennig *Notgeld*, 1918, issued in Bocholt.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25,0713.353)

p. 426. (*bottom*) 25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Tiefurt.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0605.4727)

p. 428. (*top and centre*) 50 Pfennig *Notgeld*, 1918, issued in Hamelin.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4,0605.4169)

p. 428. (*bottom*) 10 Pfennig *Notgeld*, 1919, issued in Bielefeld.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0701.100)

p. 430. 50 Pfennig *Notgeld*, 1921, issued in Bitterfeld.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61,0609.717)

p. 432. A woman using bank notes to fuel a stove, *c*. 1923. Photo: IAM/akg-images

p. 433. Karl Arnold, 'Papiergeld! Papiergeld!', cartoon from *Simplicissimus*, 11 June 1923. Coloured print.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Bildarchiv (Bild-Nr. port-010085)

p. 436. 100 million Mark banknote, 1923, overstamped on the reverse with a Nazi propaganda cartoon after 192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628)

p. 438. Grete Marks, ceramic vase, 1923–34. Earthenware.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Margarete Marks.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14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5,0504.6)

p. 440. Nazi supporters burning books in Berlin, 10 May 1933. Photo: akg-images/Imagno

p. 441. Anon., portrait of Margarete Heymann-Löbenstein (later

Heymann-Marks), *c*. 1925.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10716)

p. 444. Comparison of Grete Marks with Hedwig Bollhagen, photograph from the article 'Jewish Ceramics in the Chamber of Horrors', published by Joseph Goebbels in *Der Angriff*, May 1935

p. 446. (*top*) 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 Munich, 1938. Photo copyright © SZ Photo/Scherl/Bridgeman Images

p. 446. (*bottom*) Joseph Goebbels visiting 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 Berlin, 1938. Photo: akg-images

p. 447. Front cover of 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 guide, 1937, featuring Otto Freundlich's sculpture *Large Head (The New Man)*, 1912. Photo: akg-images

p. 448. Ernst Ludwig Kirchner, *Five Women*, 1913. Oil on canvas. Wallraf-Richartz-Museum, Cologne. Photo akg-images/De Agostini Picture Lib

p. 449. Parade on the first Day of German Art, Munich, 1937. Photo: akg-images/Imagno/Austrian Archives

p. 450. (*top*) Adolf Wissel, *Kahlenberg Farming Family*, 1939. Oil on canvas. Property of the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Photo: akg-images

p. 450. (*bottom*) Adolf Ziegler, *The Four Elements: Fire, Earth, Water, Air*, 1937. Reproduced in *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10 October 1937.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Abteilung Karten und Bilder (Inv. 15766). Copyright © Adolf Ziegler, EKS and Marco-VG, Bonn. Photo: BPK, Berlin /Scala, Florence

p. 452. Emil Nolde, *Vikings*, 1922. Etching. Copyright © Nolde Stiftung, Seebüll.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0,1108.1)

p. 454. *The Eternal Jew* exhibition, Munich, 1937. Photo: akg-images

p. 455. Hans Stalüter, poster for *The Eternal Jew* exhibition, 1937.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0/1104)

p. 458. The gate of Buchenwald, viewed from the exterior. Photo copyright © J. M. Pietsch, Spröda

pp. 460–61. The gatehouse and watchtower of Buchenwald. Photo: akg-images/ullstein-bild/Scherhaufer

p. 462. The replica gate at Buchenwald, viewed from the inside of the camp. Photo copyright © Sammlung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Weimar

p. 463. Ducat of King Frederick I of Prussia, 1707. Gold, issued in Berlin.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G3,Germ.c.183)

p. 464. Johann Sebastian Bach, *Nur jedem das Seine (To Each Only His Due)*, BWV 163, 1715. Manuscript.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Bl. 1r, T. 1-17).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466. Jewish prisoners inside a barrack at Buchenwald after its liberation, November 1945. Photo: akg-images/ullstein bild

p. 467. (*left*) Franz Ehrlich, *Self-Portrait*, 1935–6. Pencil drawing. Copyright © Stiftung Bauhaus Dessau.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1999/26.3v)/Markus Hawlik

p. 467. (*right*) Franz Ehrlich, poster for the Bauhaus exhibition at the Gewerbemuseum Basel, 1929. Colour lithograph. Copyright © Stiftung Bauhaus Dessau. Photo: Bauhaus-Archiv, Berlin (Inv. Nr. 7308)

p. 469. German civilians view Buchenwald after its liberation, 1944. Photo: Keystone/Getty Images

p. 473. Aerial view of Buchenwald camp, 2010. Photo: Euroluftbild.de/akg-images

p. 476. Refugee cart from East Pomerania,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ron, wood, wire, textile string.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AK 2009/113). Photo copyright © The British Museum

p. 479. (*top*) Gerhard Gronefeld, *German Refugees Resting against Their Wagon in Tempelhof, Berlin*, 1945.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Gerhard Gronefeld.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479. (*bottom*) Refugees with handcarts, East Prussia, spring 1945. Photo: akg-images

p. 480. Refugee trek in a town square near Königsberg, January 1945. Photo: Interfoto/akg-images

p. 485. Model of stage-set for the 1949 production of Bertolt Brecht's *Mother Courage* at the Deutsches Theater, Berlin. Replica, *c.* 1970. Glass, wood, canvas, metal.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SI 71/1)

pp. 486–7. Jacques Callot, *The Pillage and Burning of a Village*, from the series *Les Petites Misères de la guerre* (*The Little Miseries of*

War), 1632–5. Etching.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61,0713.754)

p. 488. Plague mask, seventeeth century. Leather, glass, velvet.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AK 2006/51)

p. 489. Helene Weigel as Mother Courage, Berlin, 1949. Photo: Willi Saeger.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490. Anselm Kiefer,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1981. Watercolour. Copyright © Anselm Kiefer/White Cube.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3,1001.19)

p. 492. Woman stacking bricks, Hamburg, 1946/7. Photo: akg-images

p. 494. Dresden after the Allied bombing, *c*. 1943. Photo: Corbis

p. 496. Max Lachnit, *Trümmerfrau*, *c*. 1945–56. Plaster, tesserae.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Max Lachnit.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Pl 96/3)

p. 498. Women clear away the ruins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Scherl, Berlin, 1944. Photo copyright © SZ Photo/Scherl/Bridgeman Images

p. 501. Atlanta Service, *Map of Occupied Germany Showing the Four Allied Areas*, *c*. 1945.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Do2 90/2544)

p. 502. (*1st row*) One Deutschmark bank note, 1948, issued in West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630)

p. 502. (*2nd row*) 10 Deutschmark bank note, 1977, issued by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West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79,1128.1)

p. 502. (*3rd row*) 100 Ostmark bank note, 1975, issued by the Staatsbank, East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79,1128.1)

p. 502. (*4th row*) 5 Ostmark banknote, 1975, issued by the Staatsbank, East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6,1227.9)

p. 502. (*5th row*) 50 Ostmark bank note, 1971, issued by the Staatsbank, East German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6,0405.1636)

p. 505. Poster promoting *Begrüßungsgeld* (welcome money), 1989, issued by the Finanzamt für Körperschaften.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Do2 96/1622)

p. 510. The arrival of the Torah at the new synagogue, Munich, 2006. Photo: Corbis/Reuters

p. 512. Anton Graff (after), portrait of Moses Mendelssohn, 1771. Jewish Museum, Berlin. Photo: akg-images/Erich Lessing

p. 513. Tefillin bag with arms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eighteenth century. Green velvet with embroidery. Photo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93,0522.1)

p. 514. Jews trading with Europeans, detail from the frontispiece of Johannes Jodocus Beck, *Tractatus de juribus Judaeorum*, pub. Nuremberg, 1731.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516. (*top*) Houses on the *Judengasse*, Frankfur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oto: akg-images

p. 516. (*bottom*) Detail of the Judengasse, from Matthäus Merian's plan of Frankfurt, 1628.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517. Anon., after Moritz Daniel Oppenheim, portrait of Amschel Rothschild, *c*. 1836. Oil on canvas.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akg-images

p. 518. (*top left*) Moritz Daniel Oppenheim (attr.), portrait of Carl (Kalman) Rothschild, nineteenth century. Oil on canvas. Photo: akg-images

p. 518. (*top right*) Anon., portrait of James (Jakob) Rothschild, *c*. 1824. Oil on canvas. Photo: akg-images

p. 518. (*bottom left*) Moritz Daniel Oppenheim (attr.), portrait of Nathan Rothschild, 1830. N. M. Rothschild & Sons Ltd, London. Photo: akg-images

p. 518. (*bottom right*) Moritz Daniel Oppenheim (attr.), portrait of Salomon Rothschild, 1850. Oil on canvas. Photo: akg-images

p. 520. The synagogue, Offenbach, 1930. Photo: akg-images

p. 521. Sally Israel and three friends in Bavarian costumes at Bad Reichenall, Bavaria, *c*. 1920. Postcard. Photo copyright © Jewish Museum Berlin. Donation by Monica Peiser (2005/153/5)

p. 522. Hermann Zwi Guttmann, model of the first synagogue built in Offenbach/Hessen, *c*. 1955. Cardboard, wood, paint. Photo copyright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LD 2002/60)

p. 526. Entrance to the extended Synagogue, Offenbach. Original building, 1956, by Hermann Zvi Guttmann. Extension, 1998, by Prof. Alfred Jacoby. Photo: Werner Huthmacher Photography

p. 528. Ernst Barlach, *Hovering Angel*, Güstrow Cathedral. Bronze. Copyright © Archiv Ernst Barlach Stiftung Güstrow. Photo: Uwe Seemann

p. 530. Exterior view of Güstrow Cathedral. Photo: Bildarchiv Monheim/akg-images

p. 532. Ernst Barlach, *Schmerzensmutter* (*The Mother of Sorrows*), 1921. Bronze relief. Nikolaikirche, Kiel, destroyed 1944. Copyright © Archiv Ernst Barlach Stiftung Güstrow

p. 533. Ernst Barlach in his studio, 1937. Photo copyright © Scala, Florence/BPK, Berlin, 2014

p. 534. (*left*) Käthe Kollwitz, *Self-Portrait*, 1923. Woodcut. Copyright © DACS, 2014.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Christie's Images/ Bridgeman Images

p. 534. (*right*) Ernst Barlach, head of *Hovering Angel*, *c*. 1980. Bronze. Copyright © Archiv Ernst Barlach Stiftung Güstrow. Photo: Uwe Seemann

p. 535. Ernst Barlach, *Hovering Angel*, after 1927, hanging in Güstrow Cathedral. Photo: SLUB Dresden/Deutsche Fotothek/Berthold Kegebein

p. 537. Georg Kolbe, *Warrior Memorial*, Stralsund, 1934–5. Bronze. Copyright © DACS, 2014. Photo: Margrit Schwartzkopff/ Georg Kolbe Museum, Berlin

p. 539. Ernst Barlach, *Hovering Angel*, Antonienkirche, Cologne. Photo: Bildarchiv Monheim/akg-images

p. 541. Erich Honecker and Helmut Schmidt meeting at Güstrow Cathedral, 13 December 1981. Photo: Bundesregierung/Engelbert Reineke/Bundesarchiv, Koblenz (B 145 Bild-00005047)

pp. 544–5. The Reichstag, Berlin. Photo copyright © Reinhard Schmid/4Corners

p. 548. The Reichstag on fire, 1933 (hand-coloured photograph). Photo: akg-images

p. 549. Russian soldiers flying the Soviet flag over the ruins of the Reichstag, 1945. Photo: Yevgeny Khaldei/akg-images

p. 550. Russian graffiti inside the Reichstag. Photo: STR News/ Reuters/Corbis

p. 552. The Reichstag building, wrapped by Christo and his wife, Jeanne-Claude, June 1995. Photo: Wolfgang Kumm/AFP/Getty Images

p. 554. The glass cupola of the Reichstag, designed by Norman

Foster. Photo: Fabrizio Bensch/Reuters/Corbis

p. 555. Aerial view of Museum Island, Berlin, 2013. Photo: akg-images/euroluftbild.de/Robert Grahn

pp. 556–7. The ‘Forum Friedricianum’ (Bebelplatz), Berlin. Photo: QuidProQuo

p. 559. Construction of the Stadtschloss at Humboldtforum, Berlin, 2013. Photo: Fabrizio Bensch/Reuters/Corbis

p. 560. Paul Klee, *Angelus Novus*, 1920. Ink, chalk and wash on paper. The Israel Museum, Jerusalem. Photo: Bridgeman Images

p. 563. Gerhard Richter, *Betty*, 1991. Offset print on lightweight cardboard, with a layer of nitrocellulose varnish, mounted on plastic, framed behind glass. Copyright © Gerhard Richter

Picture research: Cecilia Mackay

参考书目

综合

Applebaum, Anne,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2012)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several vols.

Craig, Gordon A., *Germany 1866–1945* (1981)

Evans, Richard J.,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003),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2005), *The Third Reich at War* (2008)

Howard, Michael *The Franco-Prussian War 1870–71* (1961)

Kehlmann, Daniel, *Measuring the World* (2007)

MacCulloch, Diarmaid,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2003)

Roberts, Andrew, *Napoleon the Great* (2014)

Schama, Simon, *Landscape and Memory* (1995)

Scruton, Roger, *German Philosophers: Kant, Hegel, Schopenhauer, Nietzsche* (2001)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2 vols. (2012)

Wilson, Peter H., *Europ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2009)

第**2**章 分裂的天空

Fulbrook, M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Germanies, 1945–1990* (2000)

Garton Ash, Timothy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1997)

Hertle, Hans-Hermann, *The Berlin Wall* (2007)

Miller, Roger Gene, *To Save a 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 (2000)

Schulte, Bennet, *The Berlin Wall: Remains of a Lost Border* (2011)

Wolf, Christa, *Divided Heaven* (1965)

第**3**章 失落的都城

Davies, Norman, *Vanished Kingdoms: the history of half-forgotten Europe* (2011)

Egremont, Max, *Forgotten Land: Journeys among the Ghosts of East Prussia* (2012)

Evans, R. J. W.,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 (1973)

Kafka, Franz, *The Metamorphosis and Other Stories* (2000)

第**4**章 流动的城市

Fischer, Christopher J., *Alsace to the Alsatians?* (2012)

第**5**章 权力的碎片

Ebert, Robert R., '"Thalers", patrons and commerce: a glimpse at the economy in the times of J. S. Bach', *Bach* 16 (1985), 37–54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2011)

Wines, Roger, 'The Imperial Circles, princely diplomacy and imperial reform 1681–17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9 (1967), 1–25

第**6**章 德意志民族的语言

Bainton, Ronald H., *Here I Stand: A 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2009)

Brady, Thomas, Jr, *German Histories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s, 1400–1650* (2009)

Edwards, Mark U.,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 (2005)

Gardiner, John Eliot, *Music in the Castle of Heaven: A Portrait of Johann Sebastian* Bach (2013)

Sanders, Ruth H., *German: Biography of a Language* (2010)

第**7**章 白雪公主对拿破仑

Koerner, Joseph Leo, *Caspar David Friedrich and the Subject of Landscape* (1990)

Pullman, Philip, *Grimm Tales: For Young and Old* (2013)

Vaughan, William, *Friedrich* (2004),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1994)

Zipes, Jack, *The Brothers Grimm: From Enchanted Forests to the Modern World* (2002)

第**8**章 歌德影响下的民族

Bisanz, Rudolf M., 'The birth of a myth: Tischbein's "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 *Monatshefte* 80 (1986), 187–99

Boyle, Nicholas,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I (1991), Vol II (2000)

Gage, John, *Goethe on Art* (1980)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2012)

Moffitt, John F., 'The poet and painter: J. H. W. Tischbein's "Perfect Portrait" of Goethe in the Campagna (1786–87)', *The Art Bulletin* 65 (1983), 440–55

Robson-Scott, W. D., *The Younger Goethe and the Visual Arts* (2012)

Williams, John R., *The Life of Goethe* (1998)

第**9**章 先贤群英殿

Bouwers, Eveline G., *Public Pantheons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Comparing Cultures of Remembrance, c. 1790–1840* (2012)

Green, Abigail, *Fatherlands: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Cambridge, 2001)

第**10**章 一个民族，多样香肠

Dornbusch, Horst D., *Prost! The Story of German Beer* (1997)

Tlusty, B. Ann, *Bacchus and Civic Order: The Culture of Drink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2001)

第**11**章 查理大帝之争

Brose, Eric Dorn, *German History 1789–1871: From the Holy Roman Empire to the Bismarckian Reich* (1997)

Coy, Jason Philip, Benjamin Marschke and David Warren Sabean (eds.), *The Holy Roman Empire Reconsidered* (2010)

Forrest, Alan, and Peter H. Wilson, *The Bee and the Eagle: Napoleon, France and the End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1806* (2009)

第12章 雕塑精神

Chapuis, Julien (ed.), *Tilman Riemenschneider, c. 1460–1531* (2004)

Mann, Thomas, *Death in Venice, Tonio Kröger, and Other Writings* (1999)

第13章 波罗的海的兄弟

Holman, Thomas S., 'Holbein's portraits of the Steelyard merchants: an investigation',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14 (1979), 139–58

Lindberg, Erik, 'The rise of Hamburg as a global marketpl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0 (2008), 641–62

Lloyd, T. H., *England and the German Hansa 1157–1611* (1991)

Tate Gallery, *Holbein in England* (2006)

第14章 铁血邦国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2007)

Dwyer, Philip G., (ed.), *The Rise of Prussia, 1700–1830* (2000)

Friedrich, Karin, *Brandenburg–Prussia, 1466–1806* (2012)

Gayle, Margot, and Riva Peskoe, 'Restoration of the Kreuzberg monument: a memorial to Prussian soldiers', *APT Bulletin* 27 (1996), 43–5

Haffner, Sebastian, *The Rise and Fall of Prussia* (1998)

Koch, H. W., *History of Prussia* (1987)

Paret, Peter,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Prussia 1806* (2009)

第15章 源自1848年的两条道路

Hewitson, Mark, *Nationalism in Germany, 1848–1866: revolutionary nation* (2010)

Levin, Michae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6–1848: Burke to Marx* (2011)

Namier, L. B.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1944)

Rapport, Mike,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2014)

Sperber, Jonathan,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2005)

第16章 发端于印刷机

Füssel, Stephan, *Gutenberg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 (2005)

Jensen, Kristian, *Incunabula and Their Readers: Printing, Selling and Using Book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2003)

Weidhaas, Peter,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2007)

第17章 德意志民族的一位艺术家

Bartrum, Giulia, *Albrecht Dürer and His Legacy* (2002)

第19章 金属匠作大师

Rieger, Bernhard, *The People's Ca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Volkswagen Beetle* (2013)

Seelig, Lorenz, *Silver and Gold: Courtly Splendour from Augsburg* (1995)

Thompson, David, *Watches* (2008)

第20章 现代的摇篮

Bergdoll, Barry, and Leah Dickerman, *Bauhaus 1919–1933: Workshops for Modernity* (2009)

第21章 铁匠俾斯麦

Augstein, Rudolf, *Otto von Bismarck* (1990)

Darmstaedter, Friedrich, *Bismarck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econd Reich* (2008)

Röhl, John C. G, *Wilhelm II* (3 vols 1998–2014)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2012)

第22章 苦难的见证者

Prelinger, Elizabeth, *Käthe Kollwitz* (1992)

第23章 危机中的货币

Coffing, Courtney L., *A Guide and Checklist of World Notgeld 1914–1947 and Other Local Issue Emergency Monies* (2003)

Fergusson, Adam, *When Money Dies: The Nightmare of the Weimar Hyper-Inflation* (2010)

第24章 肃清堕落艺术

Fischer-Defoy Christine, and Paul Crossley, 'Artists and art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1933–1945', *Oxford Art Journal* 9 (1986), 16–29

Goggin, Mary-Margaret, '"Decent" vs "Degenerate" art: the National Socialist case', *Art Journal* 50 (1991), 84–92

Hudson-Wiedenmann, Ursula, and Judy Rudoe, 'Grete Marks, artist potter', *Journal of the Decorative Arts Society 1850–the Present* 26 (2002), 100–119

Levi, Neil, '"Judge for yourselves!": 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 as political spectacle, *October* 85 (1996), 41–64

第25章 在布痕瓦尔德营区门口

Browning, Christopher, *Ordinary Men* (1992)

Goldhagen, Daniel Jonah,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1997)

Kershaw, Ian, *Hitler* (2009)

第26章 被驱逐的德意志人

R. M.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2012)

第27章 重新开始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Occup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wo States (1945–1961): 3. Reconstituting German Society*,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page.cfm?subpage_id=163

第28章 新的德国犹太人

Elon, Amos,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Jews in Germany 1743–1933*

Gilbert, Martin,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1989

第29章 巴拉赫的天使

Paret, Peter,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2007)

第30章 德国复兴

Beevor, Antony,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2007)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CASSIRER

BENJAMIN





WOLFRAM
EILENBERGER



»Zeit der Zauberer«

DAS GROSSE JAHRZEHNT DER PHILOSOPHIE

魔术师时代

哲学的黄金十年

1919—1929





[德]
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
著

林灵娜
译

WITTGENSTEIN

上海文艺出版社

HEIDEGGER

魔术师时代

哲学的黄金十年
1919—1929

[德] 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著

林灵娜/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Magic Tree Hous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ary Pope Osborne, used under licens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in association with Xiro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nd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兰登（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目录

I 序言 魔术师
- 上帝到了
- 勇攀顶峰者
- 保持姿态
- 达沃斯传奇
- 人的问题
- 失去根基
- 两种图景
- 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 本雅明何在？
- 更好地失败
- 我的生活需要一个目标吗？
- 单人共和国

II 跳跃 1919
- 该做些什么？
- 他的避难所
- 危急的日子
- 浪漫派论点
- 新的自我意识
- 逃离至某处
- 变形
- 伦理行为
- 心满意足的不幸
- 其他情况
- 两侧无掩护
- 没有观点的世界
- 原科学家
- 没有不在场证明
- 新的王国
- 对本有的忠诚
- 德式美德
- 不被喜欢的人
- 触电般的激奋

III 语言 1919—1920
- 形象地表达
- 维也纳之桥
- 诗意精准
- 对抗世界
- 海牙的三个点
- 事实的图像
- 理发师

梯子上的罗素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风暴之下
模糊的目光
共同孤单
两个怪人
周围世界优先
真实性突破而出
和媒体相关的一些职业
刚刚学会飞的小鸟
任务
彻底翻译
狂热崇拜与音色
汉堡的歌德
基本现象
以多样性为目标的意志
前进
这种语言存在吗？
IV 形成 1922—1923
愿小屋安宁
极其重要的聘任
生存的预防性检查
迎向风暴的勇气
职位之战
坏邻居
好邻居
书架里的乌托邦
神话的起点
新的启蒙
越过河流
身陷旋涡
联盟中的第三人？
歌德在魏玛共和国
更多的光
自由抑或命运
选择抑或决定
离异共和国
救赎之跃
拯救性的超越
毫无仁慈
理解了四分之三
在治疗中
从上往下
IV 你 1923—1925

那个笨蛋
情况有些复杂
热情好客
从汉堡到贝尔维格
关于蛇的重要实验
隧道与光
魏玛蹒跚
坚固的堡垒
本有
你这个魔鬼
于存在之中
最艰难的思考
爱世界
饥饿疗法
再见德国
葡萄酒和杏仁
觉醒
VI 自由 1925—1927
红星
批判的序言
一个亚当的案例
丧恸
知觉在回忆
悲伤的比喻
批判的纪念册
巴勒斯坦还是共产主义
在身边
投身写作
揭示问题
此在的时间
这就是锤子：用具分析法
狂风与畏
某些确定的东西：先行赴死
汉堡学派
被遮盖住的始源
以多数性为出发点
通过开发世界塑造自我
星中之物
儿童的口吻
言说之工程师
理性的名单
责任原则
昏厥过去
VII 拱廊街 1926—1928

技术天赋
只为众神
没有大师的学派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处于危急状态
终点站莫斯科？
他人的地狱
没有支架的男人
一个人的派对
身在远洋
在风暴之眼
法兰克福危急时刻
个体与共和国
在建造中
魔鬼的时间
存在之后
根据和离基
回到源头
回归家园
高速运转
VIII 时间 1929
自由的跳跃
在人群中
慕尼黑前夜
放松你们自己！
在雷雨般的雄辩中——达沃斯之辩
舔舐伤口
春天的感觉
“三十块钱歌剧”
多扇门
屏息，穿过夜晚
煤气灯
自我解构的性格
关于香肠
漫游者
不属于什么学派
内部难题
回到日常
剑桥的那不勒斯
为了某个目的而回忆
语词之城
撞向四壁
结语
著作目录

参考文献摘选
后记

献给Eva

“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格言和感想集》

I
序言
魔术师

上帝到了

1929年6月18日，英国剑桥。“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无法明白我在说些什么。”随着答辩人话音落下，哲学历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划上句号。参加这次答辩会的准博士是一个40岁的奥地利人，他曾是亿万富翁，在答辩会之前的十年时间里主要从事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1]主持评审本次博士答辩会的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乔治·爱德华·摩尔。答辩人名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这回并不是初到剑桥，事实上，在1911年至一战爆发前夕，他作为罗素的学生就曾在剑桥学习。在一战前的这段学习期间，他由于拥有出类拔萃的天赋以及特立独行的性格，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同学们的崇拜对象。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多年后重返剑桥。在返回英国的第一天，他就在火车上偶遇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唔，上帝到了。我今天在五点一刻的火车上碰到他了。”凯恩斯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929年1月1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维特根斯坦的老朋友、也是他以前的老师摩尔，当时也在这趟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上。学术圈内几个大人物碰巧同时在这趟火车上，使得这趟火车充满了剑桥式的浓厚的学术氛围。

然而，人们也不用把车厢内的气氛想象得过于热烈，因为维特根斯坦并不惯于与他人寒暄或是发自内心地拥抱。相反，这位来自维也纳的天才容易突然暴怒；此外，他还特别记仇。就算只是随口说出的一个词，或仅仅是一句打趣的政治言论，都足以让他恼怒多年，甚至不惜与他人绝交——比如他就多次宣布和凯恩斯还有摩尔绝交。不过，无论如何，上帝回来了！这是件多么令人欣喜的事。

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的第二天，凯恩斯就在自己的住所召集举办了一次“剑桥使徒社”[2]的特别晚餐会，庆祝剑桥昔日的学子——维特根斯坦归来。[3]在这次晚餐会上，维特根斯坦被选为使徒社的荣誉会员，成

为一名“天使”（使徒们称荣誉会员为“天使”）。对于大部分当时在场的人来说，上次见到维特根斯坦已是15年前的事了。这么多年过去，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然而，大家眼前的维特根斯坦却好像没怎么变。例如衣着方面，维特根斯坦穿着一贯的服装搭配来参加这次晚餐会：身着无领纽扣衬衫、灰色法兰绒裤子，脚上穿着乡土气息很浓的笨重皮鞋。除了不变的着装风格，岁月也没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因此，维特根斯坦看上去和受邀到场的大学生差不多。这些大学生之前只能从教授们口中认识这位来自奥地利的不同寻常的人物。当然，大学生们认识的维特根斯坦是传奇著作《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过去几年里，就剑桥的哲学讨论而言，《逻辑哲学论》就算不是处于统领地位，也深具决定性影响。晚餐会上，当然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大致理解了这部大作。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们难以透彻理解《逻辑哲学论》，它对于读者来说才更具魅力。

维特根斯坦于1918年在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最终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他深信自己已经“从本质上最终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他决定从此以后放弃哲学。维特根斯坦出身欧洲大陆最富有的工业巨头家庭之一，他本可继承父亲留给他的巨额遗产，然而，在完成《逻辑哲学论》的数月之后，他宣布放弃继承所有遗产，将自己应得的庞大家产分给了他的哥哥保罗和两个姐姐。当时，维特根斯坦正深受重度抑郁症的折磨，不断产生自杀念头。正如他写信告诉罗素的那样，从今往后，他想“以诚实的劳动”来谋生。而这诚实的劳动，具体指的是在乡下以小学老师身份教书。

曾经的乡村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从事哲学，他回来了。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于不惑之年回到剑桥时，没有学位，经济上还落魄到不名一文的地步。他近年来攒下的一些钱，在到达英国数周之后就花光了。有人小心翼翼地找维特根斯坦打听，他那些富有的兄弟姐妹难道一点儿都不愿意接济他，帮他摆脱经济困境吗？维特根斯坦每次听到有人这么问，都会严辞驳回：“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好好读读：是，我是有些富有的亲属，而且如果我开口的话，他们会非常乐意给我钱。但是，我是一分钱也不会向他们要的！”[4]维特根斯坦在他博士论文答辩的前一天，把这些话也说给摩尔听了。

维特根斯坦生活拮据，该怎么办？在剑桥，没人会质疑维特根斯坦

无与伦比的天赋，所有人包括大学里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想留住维特根斯坦并帮助他。但是，维特根斯坦之前中断了在剑桥的学业，没有取得学位就离开，就算是在氛围不拘的剑桥，如今要给一个曾经辍学的回归学生提供研究奖学金，甚至给他提供一个固定职位，那也是办不到的。

最终人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学校。此前，在1921年到1922年间，罗素为了促成《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付出了努力，还特地为书写了前言。罗素在哲学、逻辑学、数学和语言学方面创作了不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但他却认为，他的高徒维特根斯坦写出的《逻辑哲学论》，比他自己那些大作都要优秀得多。

因此，也难怪罗素在进入考试大厅时骂道："这辈子真是从未经历过这么荒唐的事情。"[5]将《逻辑哲学论》这么一部天才著作置于一场考试之中，这真是荒唐。不过，考试终归是考试。所以，摩尔和罗素在进行了几分钟友好的询问之后，就决定开始提出一些批判性的问题了。《逻辑哲学论》中不乏晦涩的箴言和难以理解的"一行诗"，全文是作者精心思考之后，在形式上采用十进制数字体系编写的，其中内容含有不少难以理解之谜。摩尔和罗素提出的批判性问题涉及的是论文中心谜题之一：维特根斯坦自己认为《逻辑哲学论》完全是由无意义的命题组成的，可这样一部著作却又偏偏向人们传达了唯一清晰的世界观。对此，论文首句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1.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6]

不光是上面这第一句话，底下这些从《逻辑哲学论》中摘录的句子，也给维特根斯坦的爱好者们抛出了诸多难解之谜（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6.432　对于高超者来说，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点是完全不重要的。上帝不在世界之内显露自身。

6.44　神秘的事项不是世界是如何的，而是如下之点：它存在。

虽然《逻辑哲学论》充满了神秘感，但是创作这篇论文的动机还是很清晰的。从斯宾诺莎的《按几何方法阐述的伦理学》（1677年在斯宾

诺莎去世之后才出版）到大卫·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1748年出版），以及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出版），这些现代哲学著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悠久的传统，即所有这些著作都致力于在人类语言中如下两种类型的命题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一种命题在其实质上是确有意义的，因此是可以表达出真理的；而另外一种命题则只是看上去有意义，实则不然，此般语言的虚假性会使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正是处在现代哲学著作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中。这里涉及到人类语言的一个难题：我们作为人对什么可以有意义地言说，对什么则不能？换句话说，《逻辑哲学论》所做出的贡献，其实就是给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对策。于是，《逻辑哲学论》以如下这句定理作为全书结尾，就不是什么偶然了：

> 7.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另外，在末句的前一部分，也就是第6部分的最后一个条目6.54处，维特根斯坦清楚详细地叙述了他自己的“疗法”：

> 6.54　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着说明的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于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梯子之后，他必须将梯子弃置一边。）
>
> 他必须放弃这些命题，然后他便正确地看待世界了。

在答辩中，罗素正是针对上面这一条一再追问维特根斯坦。这种命题起作用的“方式”具体来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通过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命题，却能帮助他人获得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维特根斯坦不是在论文的前言部分强调过了吗：“在此所传达的思想的真理性”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确定的”。如果真的如维特根斯坦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部著作中仅仅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命题，那又如何谈得上是“无可置疑的、确定的”“真理性”呢？

这个问题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出自罗素之口就更不新鲜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持续了很多年，两人还为此通信讨论。在两人充满紧张关系的友谊中，这个问题也成了其中一个经典话题。于是，看在往日的交情上，罗素在答辩时又一次提出了他的经典问题。

可惜如今我们已无法知晓，维特根斯坦当时具体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过我们可以猜测，他会如往常一样，眼中闪烁着光芒，轻微结巴着，用他自己极其独特的语调进行回答。他的英语带有外国人口音，而且，我们能从这种语调中听出一种特殊的含义和乐感。维特根斯坦总是在寻找能够清晰表达出来的解释，其中也带有他个人独有的表达特色。在进行了几分钟吞吞吐吐的独白之后，他又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已经说够了，已经解释够了。他在《逻辑哲学论》前言中也这么记录道："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理解这本书：他自己已经想到过表达于其中的思想——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思想。"

问题在于（而且维特根斯坦知道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可能就没有人，想到过或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起码维特根斯坦过去非常尊敬的老师、《数学原理》的作者伯特兰·罗素，就肯定没有想到过类似的思想。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在哲学方面最终还是有局限性的。此外，甚至连乔治·爱德华·摩尔也没想到过类似的思想。摩尔在他的时代属于哲学界最卓越的思想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可维特根斯坦却坚定地评论道："想知道一个毫无才智的人可以创造出多少成就，那就看看摩尔，他正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逻辑哲学论》中提到的梯子即为维特根斯坦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命题，读者必须先登上这些梯子，然后为了正确地看待世界，又必须将这些梯子推开。维特根斯坦该如何给罗素和摩尔解释清楚梯子的事情呢？维特根斯坦就如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那位智者：他来到洞穴之外见到了阳光，他再回到洞穴中，想要告诉其他洞穴里的囚徒自己所见到的真相，可是其他囚徒根本不相信他，也无法理解他所叙述的真相，依旧只相信眼前墙上看到的影子。

今天就到这吧，已经解释够了。于是，维特根斯坦站起身来，缓步走到桌子的另一侧，友好地拍了拍摩尔和罗素的肩膀，说："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无法明白我在说些什么。"直到今天，每个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在答辩前夜肯定都能梦见这句话。

博士论文答辩会就此落下帷幕。摩尔在答辩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先生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天才佳作，本论文完全达到了剑桥哲学博士学位的要求。"[7]

维特根斯坦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颁发给他的研究奖学金很快也获

得批准。维特根斯坦回归哲学圈了。

勇攀顶峰者

1929年3月17日，瑞士小镇达沃斯，斯特根伯格贝维德大酒店。当马丁·海德格尔步入酒店礼堂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他到了，站在了眼前的哲学大舞台前，毫无疑问，他命中注定必须得去占领这个舞台。海德格尔来自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地区，此时他39岁。从年少时起，他就认定自己是被选中的杰出人物，能在哲学方面做出一番事业。因此，他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登上哲学大舞台，人们不应视此为偶然。在场的贵宾身着传统燕尾礼服，海德格尔却穿着运动款紧身西服，在现场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透着乡土气质的面庞被高原阳光晒成了古铜色。海德格尔姗姗来迟，并没有坐到专门为他准备好的前排座位，而是毫不犹豫地混进了礼堂中部，与许多到场的大学生和年轻学者坐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亦非偶然。屈从于主流规则而不打破禁忌，那就不是海德格尔了。因为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来说，只要是在真正地从事哲学，这些逾矩的行为都不算什么错，比如不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可众多学者齐聚瑞士一家高级酒店，这种形式的哲学活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怎么看都不大对。

一年前，也就是1928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发表了开幕演讲。如今，1929年，马丁·海德格尔作为课程主讲人之一受邀到场。他将在未来三周举办三场讲座，在课程尾声时还要同本次活动的二号人物恩斯特·卡西尔开展一场公开辩论。就算这次学术活动的框架安排无法令人满意，但由于本次活动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海德格尔内心最深处的渴望还是激荡了起来，他要站到这个哲学舞台的中央。[8]

就在两年前，即1927年春天，海德格尔出版了《存在与时间》，这本著作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成为了人们公认的思想史上一座新里程碑。海德格尔来自巴登地区小城市梅斯基希，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堂司事。出身平凡的他如今凭着一部成功之作，证明了自己在此之前几年就已经享有的盛誉并非虚名。用他过去的学生（也是情人）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他是德语哲学界的“无冕之王”，《存在与时间》印证了这“无冕之王”的说法。1926年，海德格尔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写出了《存在与时间》——事实上他只写完了一半。凭着这部世纪巨著，他为自己从并不喜欢的马尔堡大学回到母校弗莱堡大学任教创造了形式上的前提条件。1928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接任了以前帮助过自己的老师——现象学家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荣誉教席。

对于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选择了一个具有超验意味的表达：“上帝”到了。而形容海德格尔，阿伦特选择的概念是“王”，这个概念显示的是掌握权力的意志以及由此主导社会的意志。但凡仔细观察，海德格尔这种明显的意志在几秒之内就会展露无遗。不管他参加什么活动、出现在哪里，海德格尔从来都不会泯于众人，他一直出类拔萃。在达沃斯的会场上，海德格尔就用充满象征意味的行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拒绝同其他哲学教授一道坐在指定的位置上，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会场上，人们低声私语，专门转回头去看：海德格尔来了，他在那边坐着。看来，现在活动可以开始了。

保持姿态

海德格尔的到场引发了众人的喃喃低语，不过，恩斯特·卡西尔肯定不会跟着小声议论。他只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要保持原有的样子——首先就是要保持姿态。保持姿态，这是卡西尔的人生信条，也是他的哲学核心。要是没有这样的人生信条，当聚光灯打到他身上时，他可能会害怕些什么呢？此时的卡西尔54岁，身为汉堡大学的教授，他对眼前这种大型学术活动的庆典氛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拥有教授席位已经整整十年。到1929—1930年冬季学期，他就将成为汉堡大学校长——这是德国大学史上第四位犹太人大学校长。卡西尔出生在布雷斯劳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作为富家子，想必他从小就对瑞士高级酒店的礼仪习以为常了。他和妻子托妮·卡西尔每年夏天都会去瑞士的山里度过几个月的疗养时光，他圈子里的那些人也都习惯于这么做。1929年春天，疗养时光还没开始，卡西尔就来到瑞士参加“国际大学课程”学术活动。这年他处于荣誉的顶点，也是创作的巅峰。在过去十年间他已经写下了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并在来达沃斯前的几周刚刚出版了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这本著作百科全书般的广度和系统的独创性奠定了卡西尔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新康德主义毫无争议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也引领了德国哲学的学术潮流。

与海德格尔不同，卡西尔成为大思想家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他的声誉是在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哲学史和出版业相关工作中不断增长的。作为出版人，他负责出版了歌德全集以及康德文集，他在柏林担任私人讲师的那几年，还出版了关于近代哲学史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卡西尔身上令人难忘的特点不是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语言的求新求异，而是学识广博和有时表现出来的非凡记忆力。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凭着记忆力整页整页地直接引用哲学和文学经典中的重要内容。卡西尔个性平和，总是以居中协调和适度中庸作为目标，这种个性有时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一种恶名，尤其是在哲学之中。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在达沃斯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从事哲学的中庸形式，他还代表着学术权贵阶层的适度与稳健。多亏了主办方慷慨赞助旅费，几乎所有受邀者，不管是学生还是在大学任教的老师，都如突击队队员一般齐齐来到达沃斯参加学术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海德格尔，他们都致力于一定要融入到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中去。在开幕庆典的照片上，卡西尔坐在第二排左侧，和他的夫人托妮坐在一起。他已满头白发，显得很庄严，聚精会神地将目光

投向讲台处。他左手边的座位是空着的，座位靠背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有名字，证明这个座位是预订好给特定的人坐的。这正是海德格尔的座位。

达沃斯传奇

后来的记载证明，海德格尔有意打破达沃斯会场上的座位礼仪，多少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海德格尔这样的行为令托妮·卡西尔有些心烦意乱。1948年，托妮仍流亡纽约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9]，这其中就提到了达沃斯往事。不过由于托妮当时在达沃斯心烦意乱，她把相关日期写错了，与正确日期差了整整两年。在回忆录中，她这么描写海德格尔："一位个子小小、毫不起眼的男士，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目光锐利"。托妮出身维也纳上流社会商人家庭，当她见到面前的海德格尔时，立刻就联想到了"来自奥地利南部或者巴伐利亚州的工匠"形象，在后来的盛大宴会上，"海德格尔的方言口音很快就印证了"托妮对他的工匠印象。早在那时，托妮就清楚地预料到，他的丈夫卡西尔将会与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海德格尔身上某种反犹主义的倾向"——她联系了一下在达沃斯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直至今天，恩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辩论"仍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用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弗里德曼的话来说，这次辩论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20世纪哲学岔路口"。[10]想到会成为时代转变的见证人，当时在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备受鼓舞。海德格尔当时的学生奥托·弗里德里希·博尔诺夫（他在1933年后成了最有影响力的纳粹哲学家之一）在他的日记中以庆祝的笔触记录了此种"振奋人心的感觉……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如歌德在《法国的政治运动》中说到的那样：'今天在这里，世界历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这里指的是哲学历史开启了新时代——而且你们都可以说，你们参与了其中，是其中的一份子"。[11]

确实如此，哲学历史开启了新时代。假设"达沃斯辩论"事实上没有发生过，思想史学家也必定会在过后杜撰出这样的一个新时代开端。20世纪整个20年代，不同群体之间对比鲜明，这恰恰体现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达沃斯辩论"上。来自柏林犹太工业家庭的贵子，遭遇了来自巴登地区天主教教堂司事之子；汉萨同盟工业贵族的仪态面貌与毫无遮掩的乡土气息不期而遇。卡西尔是高级酒店，而海德格尔则只是茅屋。在熠熠发光的高原太阳下，他们在某处与彼此相遇，他们各自主张的不同世界就这样以一种非现实的虚幻方式互相交叠在一起。

达沃斯疗养酒店梦幻般的孤岛氛围赋予了托马斯·曼写作灵感，他由此写出了长篇小说《魔山》，并于1924年出版。托马斯·曼的小说为这整个时代构建起了一个意识形态状况的模板。1929年的“达沃斯辩论”在当时在场的人看来，有些像是虚构的《魔山》转化成了现实。现实中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进行辩论，小说虚构人物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休无止地辩论，现实和小说之间形成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匹配。

人的问题

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举办者选择了一个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讨主题：“人是什么？”这个主题已经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中心思想。康德所有批判思想的出发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简单观察：人类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们给自己提出问题，最后却又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答不上来的问题尤其涉及上帝的存在、人类自由和灵魂不死等难解之谜。在康德的首要定义中，人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

然而，这些无法解答的形而上问题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康德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形而上的难解之谜无法最终得到解答，它们才给人类带来了新机会，使人类可以达到可能存在的完善境界。这些难解之谜引导我们努力将尽可能多的东西化为经验（认识），尽可能自由和自主地行事（伦理），用尽可能有尊严的方式去证明灵魂不朽的可能性（宗教）。由此，康德把如上这些称为形而上问题的调节作用或引导作用。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康德设定的理论框架对于德语哲学还是起着决定作用，甚至也决定着整个现代哲学。从事哲学意味着——特别是对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来说——在康德哲学问题框架的路径中进行思考。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亦是如此。就如之前已经提到过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尝试以逻辑为导向，以理智之人为主体，在可以言说之物和必须保持沉默之物中间画上一条明确的界线。这也是落在康德的思路之内。不过，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给出的“疗法”尝试，多少还是越出了康德的范围。人类会提出形而上问题，并由此从事哲学，这被维特根斯坦视为人类的本能使然和基本冲动。不过，维特根斯坦看上去认为这种冲动可以通过哲学手段加以治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这么写道：

> 6.5　相对于一个不能说出的答案而言，人们也不能将（与其相应的）那个问题说出来。
>
> （与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谜是不存在的。
>
> 如果一个问题终究是可以问出来的，那么它也是可以回答的。
>
> 6.51　……因为只有在存在着问题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怀疑；只有在存在着答案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问题，而只有在存在着某种

可以言说的东西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答案。

6.53　哲学的正当方法真正说来是这样的：除可以言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命题——因而也就是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说；然后，无论如何，如果另一个人想就形而上的事项说些什么，你就向他指出他没有给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符号以任何所指。……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最终可以放下那些本着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精神提出的形而上问题，这充满了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个希望同样鼓舞了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众多参与者，其中也包括当时38岁的私人讲师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是《世界的逻辑构造》和《哲学中的假问题》的作者（两本著作都是1928年出版），其中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其代表作，标题颇具纲领性意味。1936年卡尔普纳前往美国后，成为了所谓的“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分析哲学”又是建立在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基础之上。

失去根基

来到达沃斯的哲学家，不管认为自己是受什么学说的影响抑或是属于什么学派——唯心主义、人文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还是逻辑主义——都在一个实质点上达成了一致：康德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体系，他当时所立足的世界观根基尤其是科学根基如今却已被凿空，或者起码急需改革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明显建立在18世纪物理学基础上，著作中关于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观点特别体现了这一点。可是，牛顿的世界观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彻底变革了。空间和时间不再是彼此独立、互不关联，它们也不再是先天的。所谓先天，就是先于所有经验、不依赖于经验。在此之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令那种不受时间变化、永恒确定的人性观失去了关键性的可信度。达尔文提升了偶然性对于地球上所有物种发展的价值——尼采又把这种偶然性推广到文化领域——历史发展的目标导向和理性发展的前景受到关键性的弱化。康德先验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人类意识可以完全洞悉自我，至晚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里，这个观点看上去就说不通了。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科学和技术手段取得文明进步，这是一种自我启蒙。可是最令人担忧的是，在一战中那些匿名的、数以百万计的杀人暴行，狠狠地剥夺了这种文明进步的可信度。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和经济危机笼罩之下，追问人的定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迫切。最终，对于“人是什么？”的回答，以往答案的根基已变得不可靠了。

1928年意外离世的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年出版）的作者——在他最后一批演讲中，曾这么描述时代危机：“大约一万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处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完完全全地、彻底地变得问题重重；人类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自己不知道。”[12]

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视野下，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哲学峰会”上相遇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背景给这两位思想家都带来了创作灵感，促使他们写下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卡西尔和海德格尔都不再试图对康德的问题“人是什么？”给出直接和本质的答案——在答案中肯定也会包含着他们各自思想的独创性——而是聚焦于问题背后的无声发问。

人类是一种必须自问却又无力自答的存在物。这很好。但是，一个

主体若要有能力对自己提出问题，必须存在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提问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对问题本身刨根究底，这种能力的基础是什么？推动力又是什么？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已经在各自主要著作的标题中给出了答案：卡西尔的答案是《符号形式的哲学》，海德格尔的答案是《存在与时间》。

两种图景

根据卡西尔的观点，人首先是一种应用符号和创造符号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换句话说，人类通过应用符号赋予自身和所处的世界以意义、支撑和方向。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就是自己的母语。但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符号系统——用卡西尔的概念来说叫做符号形式——例如神话、艺术、数学或者音乐，这些都是符号形式。不管这些符号的形式是什么，语言的、图像的、声音的或者动作的，它们的意义一般来说都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需要其他人对这些符号进行意义解析。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就是符号不断被创造和应用、被他人解析和发生变化的过程。人类应用符号的能力使得人类可以提出形而上的问题，即那些关于自己和关于世界的问题。对于卡西尔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成了一个研究符号形式系统的工程，通过这些形式系统，我们赋予了自身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以意义。卡西尔的理性批判走向了一种全方面多层次的文化批判，这些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又必定是彼此充满矛盾的。

海德格尔同样也强调语言媒介对于人类此在的重要性。关于什么是人类形而上本质的根本基础，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是普遍可分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极为个体化的感受——畏。更确切地说，是当个体充分意识到其存在有终时，内心产生的那种充满焦虑的害怕。知道自己的有限性，进而将人标明为在世界中“被抛的此在”，这种知道——在畏的居间促成下——会使被抛的此在致力于这项使命，即去把握和认识它自己当时全部的存在可能性。海德格尔将这个目标称为本真状态。更进一步说，人类存在方式的特点是对时间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是无可欺骗的。人类的存在方式如何指向时间呢？一方面，是通过各自独一无二的历史情境，也就是先前的所有经历；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是未经询问便被抛进这历史情境之中的。另一方面，是通过了解自己这种历史存在状态以及存在的时间有限性。

因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这一由卡西尔所证明了的文化和普遍符号使用的领域，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使人摆脱畏、摆脱有限性，反之，哲学运思的作用恰在于，使人直面畏的真正深渊，进而如此这般在真正意义上解放人。

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康德问人的定义是什么，对此，卡西尔和海德格尔都努力给出了答案。顺着两人不同的回答思路，人们可以感觉到，同样的问题导向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理想：一人主张所有使用符号的存在物皆平等的博爱人性，另一人主张以本真状态为目标的精英勇气；一人希望通过文明手段来克制人类最深层的那些畏，与其针锋相对的是，另一人主动要求尽可能彻底地去承受这些畏；一人的理想是坚持文化形式多元化，而另一人则认为在多对多的文化范围中会必然导致的自我丧失；以及，一人主张有节制的延续性，而另一人主张彻底与过往决裂和全新开始的意志。

于是，当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于1929年3月26日上午10点碰面时，他们有充分理由要求用各自的哲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全部世界观。一个现代人的发展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达沃斯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必须在两种基本相背离的理解方案中做出选择，选择一个必然失去另外一个。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彼此相悖，又都有着各自的吸引力，这两股相抗衡的吸引力直到今天还从内而外地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文化。

参与达沃斯学术活动的大学生和年轻学者在“达沃斯辩论”期间，慢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达沃斯辩论”在整个会议期间持续了十天。就如同在代际矛盾中经常出现的结果那样，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的选择倾向于相对较年轻的海德格尔一方。这其中的原因有可能在于，卡西尔在学术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发烧一直躺在酒店房间，而海德格尔则一有空就拿起滑雪板，和年轻的大学生一块儿在达沃斯所在的瑞士格劳宾登州阿尔卑斯山上，沿着黑色雪道[13]向下飞快滑去。卡西尔没有取得优势，就如同他想通过自身经历来证明公民教育的理想，倡议这种理想应该传承下去的愿望也没有希望实现。

本雅明何在？

1929年是充满魔力的一年，这年春天恩斯特·卡西尔教授和马丁·海德格尔教授都来到了小镇达沃斯，描画人类未来的图景。同一时间，作为自由记者和作家的瓦尔特·本雅明却在大城市柏林深受其他烦恼的折磨。本雅明刚刚被他的情人——来自拉脱维亚的戏剧导演阿西娅·拉希斯——从他们刚在杜塞尔多夫大街上租的爱巢里踢了出来。这下子，本雅明又一次感到不得不回到仅在几公里之外德尔布吕克街上的父母家里。家里的母亲病重，所剩日子不多了，本雅明的妻子朵拉和他们11岁的儿子斯特凡也在等着他。这种看上去荒诞不经的事儿已不新鲜。近几年来，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爱情跌跌撞撞地开始，然后是接踵而来的财务难题，最终这场婚外恋情顺利结束。所有当事人对这一“流程”已再熟悉不过。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此番情况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加剧了：本雅明告知他的妻子朵拉，他已下定决心要离婚，这个决定不可更改——而且离婚的目的是，他要娶他那位拉脱维亚情人拉希斯。拉希斯不久前刚刚与他分手。

让我们把本雅明想象为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另一位参加者，这种想象蕴含着自身的魅力。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法兰克福报》或者《文学世界》的特派代表参加了达沃斯的活动，因为他要定期为这些媒体写评论。我们想象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偏僻的角落里，取出黑色便条本（“紧紧地攥住你的笔记本，好好记录，就好像政府机构仔细记录外来人口一样”），挪正了他的圆框眼镜，我们能看到眼镜镜片特别厚，跟密封瓶的玻璃一样。然后，他用极小的字迹记下了他对眼前事物的初次观察。简短写完对海德格尔运动西装的批评之后，他抱怨了当下精神贫瘠的基本状况，哲学家们都在庆祝一种“简单的生活”，习惯于讲“乡土风格的语言”，尤其是海德格尔。这种语言风格深受其“喜用复古词句”的影响，他“相信这样做才能保障语言生命的源泉不断”。本雅明有可能看向了扶手沙发椅的方向，卡西尔整个人舒适地陷进沙发椅里，他正在参加一场沙龙。本雅明觉得，沙发椅这种资产阶级家具代表着一门完全过时的哲学，散发出霉味，这种哲学蕴含着小市民意味，还相信能把多元的现代世界装进一个统一的系统，就像把人硬塞进紧身衣里一样。仅仅看外表，本雅明看着就像是海德格尔和卡西尔的一个完美混合。他很容易会突然干出些头脑发热的事儿，身上没有运动气质甚至有些可笑的样子，尽管他的存在感很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也不世故精明，可还是

给别人留下了一些印象。

实际上，达沃斯会场上讨论的那些主题恰恰也正是本雅明写作的核心：在技术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的康德哲学转变、日常语言的形而上本质、学院哲学的危机、现代思想意识的内部支离、时间感知的内部分裂、城市与日俱增的商品形态、寻找拯救社会彻底衰落的办法……若不是本雅明，又有谁在过去几年中出版了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著作呢？那为什么没有人派本雅明去达沃斯呢？或者还可以这么开玩笑地问：为什么没有人邀请本雅明去达沃斯发表演说呢？

答案是：从学院哲学的视角来看，1929年的本雅明还没进入公众视野。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很多大学（伯尔尼、海德堡、法兰克福、科隆、哥廷根、汉堡和耶路撒冷）努力尝试想要获得教授教席，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部分原因是他时运不佳，另外还有他在反犹主义方面的偏见，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犹豫不决。

1919年，当他在伯尔尼大学凭着题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的论文以最优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时，所有大门看上去都还是为他敞开着的。他的博士导师——日耳曼学学者理查德·赫尔伯尔茨——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大学任教的带薪岗位。本雅明当时却犹豫了，他在同一时间还跟自己的父亲闹翻了，家里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持，使他在生活成本昂贵的瑞士看不到什么未来的希望。于是，他很快就决定作为一名自由评论家来谋生。这后来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获得大学教授资格而努力，首先是由于他越发明白，仅仅通过写作来谋生，同时还要保持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会有多么困难。在那个年代，按照本雅明的方式来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这不仅因为本雅明难以控制自己的某些喜好——频繁出入餐馆、夜生活娱乐场所、赌场和妓院，还因为本雅明有收藏爱好，比如收藏古旧的儿童书籍。他有着极大的收藏热情，可以苦苦寻遍整个欧洲并以近乎强迫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古旧童书藏品。

本雅明是名不错的政论家——20世纪20年代德语报纸市场和副刊需求呈爆炸性上升趋势，副刊需求的抬升和他的文章息息相关。但是当本雅明和父母最终断绝关系后，生活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经济烦恼时时涌上心头。当生活特别拮据的时候，本雅明就对大学职位垂涎欲滴。一个学术职位终究可以给本雅明刚建立不久、四处迁徙的家庭提供基本经济保障，此外还能成为他长期的生存依靠。经济保障和生存依

靠这两样东西令内心分裂的思想家本雅明又盼又怕。

更好地失败

1925年，本雅明的学术抱负在法兰克福大学遭遇了灾难性的转折，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传奇。他尝试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结果失败。社会学家戈特弗里德·所罗门-德拉图尔（后来也是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当时唯一支持本雅明的人，经他穿针引线，本雅明提交了一篇名为《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论文。一眼读去，这篇论文力图将巴洛克悲剧的传统归入德国文学的分类中。尤其是凭借着其中的《认识论批判序言》部分，这篇论文在今天被普遍视为20世纪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一座里程碑。可是当时这篇论文都没有熬到教授资格评审的正式程序，法兰克福大学请来的专家可能是被这篇论文的实际冲击力震撼到了，感到完全无力进行评论，他们浏览一遍之后就急切请求作者自愿收回申请教授资格。在评审委员会面前，这篇论文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失败。

就算是狠狠遭受了这样的屈辱，本雅明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对在大学任教的向往。于是，在1927—1928年冬天，他通过他的朋友也是资助人——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想要进入瓦尔堡学派的汉堡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是欧文·潘诺夫斯基和恩斯特·卡西尔。本雅明的这次尝试还是以惨败告终。潘诺夫斯基的回复很不留情面，他觉得本雅明应该向为他说情的霍夫曼斯塔尔道歉，因为是本雅明使他卷进了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断定，卡西尔也对本雅明的这次接触尝试做出了相似回应。对本雅明来说特别苦涩的是，早在1912—1913年柏林学习期间他曾经是卡西尔讲座课的热情听众，那时候卡西尔还是编外教师。大学圈子很小，能获得支持者就是决定因素，本雅明却是一个在哪儿都毫无希望进入大学圈子的例外：因为他过于独立的社交方式、过于不同寻常的语言和行为风格、过于小品文特色的学术文章、独成一派的理论以及晦涩难懂的作品。

事实上，本雅明没有出现在达沃斯的会场大厅里，恰恰折射出了他所有的学术羞耻感，作为记者的本雅明肯定不会忽略这点。这种羞耻感还来源于本雅明心里恨着的那位马丁·海德格尔却身在达沃斯现场。1913—1914年，本雅明和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一起上过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他后来成为了海德格尔的博士导师）的讨论课。从那以后，本雅明就怀着全然妒忌的心情密切关注着海德格尔的一路上

升。1929年，本雅明再次计划创立一本杂志（杂志名为《危机和批评》），并计划让他近来最好的朋友贝尔托·布莱希特担任杂志的联合创办人。这本杂志的唯一使命是“摧毁海德格尔”，而且本雅明把这个使命委托给布莱希特去完成。但是，办杂志的事情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这又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计划。

本雅明此时才37岁，不过他的失败事例已经有一大箩筐了。在过去十年里，他作为自由创作的哲学家、政论家和批评家，首先只做成了一件事情：源源不断地制造了一系列失败的大工程。不管是办杂志、创建出版社、写学术著作，还是工程浩大的翻译任务（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全集）、侦探长篇小说系列，以及野心勃勃的舞台剧本……一般来说，这些事儿都只停留在夸夸其谈的预告和草案阶段。当然也有极少数工程达到了概略和部分完成的程度。此外，本雅明还是得挣钱，他主要通过日常写作讽刺性杂文短评、专栏和书评影评剧评这类评论来谋生。截止1929年春天，本雅明已经在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百篇文章。他的文章主题形形色色，从犹太人的数字神秘主义到“作为写信人的列宁”再到儿童玩具。写完食品博览会或缝纫类小商品的报道之后，他接着写关于超现实主义主题或关于卢瓦尔河河谷城堡的大篇幅杂文。

有能力什么都写的话，为什么不写呢？尤其当作者的写作方法是把每次选择的写作对象阐释成一种“单子”，也就是一种不可分的东西，其存在状态是由其现在、过去和未来组成的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本雅明独特的写作方法和魔力就体现在此。他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度符号化的世界观：每个人、每件艺术品、每个日常对象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亟待破译的符号。每个符号又都与其他所有符号处在高度动态的关联之中。他怎样才能找到破译符号的正确方向呢？只能这么办：把每个符号都纳入持续变化的广大符号集合中，并仔细设想纳入的全过程。这便是他的哲学思路。

我的生活需要一个目标吗？

本雅明的文章主题严重发散，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合情理，实际上这却是出于本雅明自身的认识。本雅明越发坚信，恰恰是那些看上去不合情理的、往往被忽略掉的语言表达、具体对象和人物身上蕴藏了整个社会的真正精髓。这些看似发散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本雅明提出的“思维图像”概念直到今天还受到人们的称颂，在他的作品《单行道》（1928年出版）或《柏林童年》（在他死后出版）中都能读出“思维图像”的意味。漫游人波德莱尔的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畸零人形象或者普鲁斯特为了回忆进行的斗争，都明显影响了“思维图像”这个概念。思维图像倾向于暂时性和迷宫般错综复杂的趋势，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出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秘传阐释技巧。这所有一切，又有选择性地涂上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底色，抑或是配上了费希特和谢林自然哲学唯心主义的伴奏。本雅明的文章证实了一种新认知模式的诞生，这种新认知模式出自那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在意识形态上迷失了方向的精神。就这样，本雅明的自传体作品《柏林童年》最开头的内容读上去就像是“本雅明方法导论”：

> 对一座城市不熟，说明不了什么。但在一座城市中迷失方向，就像在森林中迷失那样，则与训练有关。在此，街巷名称听上去对那位迷失者来说必须像林中干枯嫩枝发出的响声那样清脆，市中心的小巷必须像峡谷那样清楚地映现每天的时辰。这样的艺术我后来才学会，它实现了我的那种梦想，该梦想的最初印迹是我涂在练习簿吸墨纸上的迷宫。[14]

本雅明正是在长久以来的作品未完成状态中，在主题选择极度多样化和充满现实矛盾的写作中，找到了他认识真实世界以及由此认识自我的唯一可行道路。用他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长序《认识论——批评序言》中的话来说：从事哲学的人必须这么做，“要从不寻常的极端现象中，从看上去过度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使整体观念的轮廓”显现出来，“在整体当中各种矛盾又有可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并列相处在一起”。本雅明还说道，“只要那些可能的极端现象看上去还存在，并没有消失”，那人们“无论如何都会觉得”观念的这种表现形式都是“不成功的”。[15]

显而易见，本雅明的这些想法已远不只是一种独特的认识理论了。这也是一种生存方案，它把康德的原始问题“人是什么？”直接转换为“我应该怎样生活？”。因为对于本雅明来说，观念表现的哲学艺术和生活的艺术同理，凡是对前者适用的，同样适用于后者。一个渴望认知的自由人类怀着极度的热情“研究不寻常的极端现象”，若他“无法视自己的存在为成功”，那他就没有仔细检阅过所有可能的存在与思维的极端现象，或者起码还没有大致察验过。

在具有本雅明时代特色的紧张局面中，他的认识途径和生存方案由此构成了又一个极端现象。20世纪20年代的紧张局面也推动着维特根斯坦、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推进他们的哲学事业。本雅明的思考方式是考察充满矛盾的同时性，而不是去设立一个理想，澄清世界的逻辑构造。当卡西尔站在科学符号系统的基础上追求多元系统的统一时，本雅明的意志却体现在构建一个反差鲜明、永远置于动态中的认识状况。在死亡观方面，本雅明视死亡为值得当下庆贺的陶醉时刻和无需节制的时刻，亦是真正的感知时刻，他用这种陶醉和无需节制的理想来取代海德格尔对死亡之畏。所有这些想法，本雅明又为其配上了充满宗教意味的历史哲学底色。历史哲学永远可能通向救赎之路，但是又不能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把救赎的具体时刻专门表达出来，连预言救赎时刻也是办不到的。

单人共和国

本雅明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一直沿着巴黎—柏林—莫斯科这根轴线来回奔波，他可能面临着彻底崩溃、近乎抑郁；本雅明努力达到思想和行动的协调，避免自己分裂。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20世纪20年代。他的生活方式一贯是自我毁灭式的——妓女、赌场、毒品——在几个月甚或几天时间内，就会出现特别高产和天赋爆发的创作阶段。正如魏玛共和国本身一样，本雅明寻找的也不是一条平衡的中间路线。他认为，可以找到的真理——包括一个真实的自己——总是存在于此在和思考的边缘地带，这样的边缘地带充满了紧张氛围。

在此种意义上，1929年春天代表着本雅明生活的总体状况，这种状况也决定着过去十年以来本雅明的生活。161929年春天，生活一切照旧，多出来的一点儿新情况是，本雅明正经历着一种两者之间的撕裂感：他起码处于两位女性之间——朵拉和阿西娅，两座城市之间——柏林和莫斯科，两种职业之间——记者和哲学家，两个最好的朋友之间——犹太学家格尔绍·肖勒姆和共产主义者贝尔托·布莱希特，两个大工程之间——创立杂志和开始写一部新的主要著作，也就是后来的《拱廊街计划》。当然他还需要通过工作偿还提前预付给他的一些报酬。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紧张的时代状况，那么这个知识分子肯定就是1929年春天的瓦尔特·本雅明。他是一个单人魏玛共和国。这对于他来说当然不好过，也没法过。最终，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本雅明是一个自称连“煮一杯茶的能力”都没有的人（当然他会把生活能力差的责任推到他母亲身上）。

直到今日，本雅明唯一可以无条件指望得上的人就是他的妻子朵拉。本雅明决定要诽谤和离开朵拉，这是他人生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一点朵拉比本雅明清楚得多。朵拉·本雅明感到很烦恼，1929年5月，她给格尔绍（原名格尔哈德）·肖勒姆写信，肖勒姆是本雅明家里长年熟识的共同朋友。信里这么说道：

> 亲爱的格尔哈德，瓦尔特现在情况很糟糕，我对你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心情特别沉重。他完全受阿西娅的影响，他干出的事情连我手上的笔都不愿意描写。他让我这辈子都不能和他再说一句话。他整个人只剩下头和生殖器，你知道，或者你可以想象，在这

> 种情况下他的头过不了多久也就不顶用了。他这种状况一直是个很大的危险，谁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瓦尔特控告了我，认为我有过错——最开始的离婚谈判谈崩了，因为他既不用他的遗产（12万马克，妈妈当时已经病重了）来偿还从我这里借走的钱，也不给斯特凡支付生活费……我把所有的书都给了他，第二天他还要求取走童书收藏品；冬天时，他在我这一住就是几个月之久，一分钱费用也不分担……我们给了彼此八年的自由，最终他还是把我告上法庭。他一直都很轻视德国法律，可这突然之间，他却觉得德国法律好极了。[16]

朵拉了解本雅明的性情。仅仅五个月后，几乎是和纽约华尔街股市“黑色星期五”行情暴跌同一时间，1929年深秋，本雅明精神崩溃。他无法读书、说话，更不用说写作了，只好住进疗养院。随着生活巨变，人类迈过了新时代的门槛，进入一个带来死亡的黑暗年代，亦是本雅明迄今都无法想象的一个年代。

II
跳跃
1919

本雅明博士从他父亲身边逃开，

维特根斯坦少尉在金钱上自杀，

编外教师海德格尔背弃信仰，

而卡西尔先生则在有轨电车里寻找灵感。

该做些什么？

“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和反应方式在所有细节上都已知，另一方面，性格所处的上下文领域中所有事件也已知，那么，会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以及他会完成的一切都可以得到精确预测。也就是说，他的命运也将是已知的。”[17]这种说法对吗？生活道路真的就以这样的方式被确定了？生活道路是可以预测的吗？包括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会是这样吗？一个人若想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轨迹，还有多少余地？1919年9月，27岁的本雅明写了一篇题为《命运与性格》的随笔来探讨这些问题。就如上面他文章中第一句话提到的那样，他想要预测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命运。这对于处在一战结束后的欧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代表性。这些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战后重新审视自己文化基础和生存基础的要求，写作就成了他们自我阐明的途径。

一战后的首个夏天，本雅明出于个人原因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他已经过了进入所谓成年生活的过渡阶段。他成了家（1917年），当了爸爸（1918年），并于1919年6月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一战全球战火的恐怖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本雅明的生存状态。1915年，本雅明逃过了他的第一次入伍征召。在入伍体检前一夜，他和他最好的朋友格尔哈德·肖勒姆待在一起，一整夜未合眼还喝了无数杯咖啡，这样到第二天早晨体检的时候，本雅明的脉搏极其不规律，体检结果为无法服兵役。这是一种在当时惯用的逃避兵役办法。1916年，本雅明用更有想象力和复杂得多的办法成功逃过了第二次服兵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他让后来的妻子朵拉对他进行为期几周的催眠，使他自己深信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从结果看，这次的办法实在是太成功了！根据军医的检查结果，病症很明显。虽然这些病症还无法完全免除本雅明的前线勤务，但起码使他获得了官方准许，让他在瑞士的一家专门医院进一步检查复杂的病痛状况。只要能去瑞士并待在那里，今后就不用再担心被强制入伍。于是，朵拉和本雅明于1917年秋天决定，就在瑞士待着。

他的避难所

人们到了苏黎世之后往往先在临时寄宿处住下，因为在战争年代，这些临时寄宿处成了年轻德国人或者说整个欧洲知识阶层的一个聚集地。于是，雨果·巴尔和特里斯坦·查拉就于1916年在苏黎世宣告达达主义的诞生。在离他们几米之遥的“伏尔泰酒馆”里，当时住着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他化名为列宁，计划着发动俄国革命。本雅明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并没有成功融入这些人的圈子，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想着要融入。本雅明夫妇在共同的朋友肖勒姆陪同下，很快就从苏黎世搬到了伯尔尼，来到了瑞士中心地带。在伯尔尼，瓦尔特在伯尔尼大学的哲学专业登记注册，目标是要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本雅明和妻子二人——更确切地说是加上肖勒姆三人——他们是来自柏林的流亡者，在苏黎世这个迄今以慢节奏而闻名的城市里过着与当地文化活动隔绝的生活。本雅明和肖勒姆被大学低估了，后者认为他们无法跟上大学的课程。他们明显能感觉到，老师对他们的要求过低。于是，他们不光虚构了一所想象中的大学，名叫“穆里大学”[18]，而且还构想出很多荒唐的课程，比如有“小酒店——论其优点和危险性”（神学），“侮辱的理论和实践”（法学），或者是“自由落体理论（附有配套练习）”（哲学）[19]。在伯尔尼的这段时间，本雅明和肖勒姆还一起自行阅读和研究了一些著作，比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赫尔曼·柯亨的著作，他们晚上开长时间的读书会，一句一句把著作读透。[20]

在苏黎世的生活状况基本上充满着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性爱的矛盾心理，这些都完全吻合本雅明的性格。最迟到1918年春天本雅明的儿子斯特凡出生时，本雅明的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可以预见到战争马上要结束了，这也意味着，本雅明必须确定好战争结束后未来职业的具体方向。尤其是本雅明的父亲——他的财产状况遭遇了战争的重创——迫使本雅明必须自食其力。

危急的日子

1919年夏天，本雅明全家隐退到布里恩茨湖边的一个膳宿公寓休养，之前忙忙碌碌的几个月总算是过去了。“朵拉和我都是筋疲力尽。”本雅明在1919年6月8日写给肖勒姆的信中这么说道。这种筋疲力尽的状况尤其和小斯特凡的健康状况有关，孩子几个月来都在“持续发烧”，所以家长“根本没办法消停下来”。[21]特别是朵拉，她“几个月以来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还得了“贫血，而且体重严重下降”。那时候本雅明自己还得和催眠带来的坐骨神经痛恶果苦苦斗争。此外，他还告诉肖勒姆，“半年以来都在遭受噪音带来的折磨”。对于本雅明夫妇这种情况，今天人们会说，这是接近全线崩溃了。

本雅明家在这个美名为“蒙雷波斯”的膳宿公寓度过了苦涩的暑期。公寓有湖景，提供全天膳食，还有专程一起过来照顾孩子的保姆——情况虽然还是严峻，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本雅明家也并不是全无希望——他们本可以在休养中好好吃饭，享受充分的睡眠，读点儿书，本雅明还可以在某个时候把他喜欢的诗人波德莱尔的某首诗译成德语。这一切其实是可以这般美好。

不过，就像本雅明的其他计划一样，在膳宿公寓的美好计划也落空了。原因主要还是在本雅明身上。本雅明为了继续得到父亲的经济资助，决定先不告诉柏林家里自己已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他觉得这么做会更明智些。

本雅明的父亲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能把来瑞士探访的路线说清楚，于是便决定携夫人一起来到瑞士，给本雅明一个惊喜。本雅明父母到达疗养地的具体时间是1919年7月31日。

只要了解本雅明和他父亲的性格，以及父子见面的具体场景，都不需要专门动用什么理论，就能预测到这对父子当时见面的过程怎样。本雅明在1919年8月14日写给肖勒姆的信中提到了“那些糟糕的日子现在总算是过去了”，后来又轻描淡写地补充道，“我博士学位的事情也已经说了”。

现在，本雅明的父亲已经清楚了解了情况，他给本雅明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得在这艰难的时局中尽快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最好是份稳

定工作，最重要的是一份可以支付报酬的工作。这对本雅明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对于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将来打算找什么工作、怎样谋生，如果让本雅明说老实话，那么他只能给出一个答案：批评家。父亲，我想成为一名批评家。

本雅明将自己的理想职业定位为批评家，这个自我描述具体是什么意思，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的就是与此相关的内容。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22]，足有300页之厚。1919年8月中上旬，在本雅明父子相处的日子里，本雅明想要给他那远未受到哲学熏陶、还伴有慢性抑郁的商人父亲解释明白，批评家这个职业和批评这个概念有什么关系，批评的概念对于自己的文化和自我本身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值得去从事的职业。但是解释明白这些不容易。

不过尝试去解释一下总是值得的。尤其是在这篇以取得博士学位为目标的论文背后，在这难以处理的标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无关于学位的独立想法，也就是作者关切的是，把个体自身的发展过程和整个文化的演化过程放到一个新理论基础之上；而无论是个体发展还是文化发展，其过程都是坦承公开的。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这种核心活动直截了当地称为：批评。批评使这种坦承公开成为可能，也能不断地带来新事物。本雅明深信，紧接着康德之后其他作者的作品，例如费希特、诺瓦利斯和谢林的作品，开始在思考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人们迄今还未发现这种特殊形式对自己生活和文化的真正重要性。

浪漫派论点

对于本雅明来说，早期浪漫派思想家的决定性推动力在于，批评活动——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了这个概念——使得批评的主体（也就是艺术批评家）和批评客体（即艺术作品）都不是不可变的。这两者在批评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而且在理想状态下会朝着真理的方向发展。本雅明认为，通过批评家的活动可以促使艺术作品的本质不断得到丰富充实，他的这个观点建立在德国浪漫派如下两个基本思路之上。这两个思路分别是：

> 1.所有存在的事物，不光是和其他事物处在一种动态关系中，和自己也处在一种动态关系中（这个论点说的是事物的自我关联）。
>
> 2.当一个主体批评一个客体时，主体和客体由此就会和他者以及自身产生关联（这个论点说的是，通过批评可以激发出所有关联）。

顺着这样的基础思路，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推导出结论，这些结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形象，随之也改变了20世纪和21世纪艺术批评的自我认知。首先，本雅明认为，艺术批评的功能“并不在于评价，而是一方面在于终结、补充和系统化”。[23]其次，艺术批评家多了一重身份，他成了艺术作品的共同缔造者。第三，一个艺术作品在本质上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艺术作品可能包含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本质和含义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理解这种动态性，才能理解批评。最后，第四，对某个艺术作品的每种批评——根据之前讲到的关于事物自我关联的论点——也可以看成是这件艺术作品针对自身的自我批评。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批评家和艺术家都是站在同一个创造层面上。一件作品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持续不断发生变化。对的，事实上，是艺术作品自身持续不断地在进行自我批评。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像本雅明父亲那样的人，听到了本雅明提出的这些论点，会错乱和无法理解到什么程度。

新的自我意识

实际上，本雅明论述的说服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浪漫派那两个基本思路的看法。那两个基本思路涉及到的是普遍存在的所有事物与自身和与他者的关联，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这两个思路是合理的，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本雅明的观点。其实这两个基本思路也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不合理。瓦尔特·本雅明起码可以给他的父亲指出全人类身上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人类具有自我意识。这个事实无可争议，每个人都能具体地感受到自我意识，根本无需对此存在任何理性怀疑。最终，每个人都拥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神奇能力。所谓自我意识，指的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来思考自己的想法。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独立地“思考”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不但批评的客体（也就是我们思考的对象——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批评的主体（正在进行思考的思维）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变化，并感受到批评的客体和主体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正是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省的这种基本状况，成为了批评活动与他者产生关联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例子对于每种形式的关联都适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例子，它可以用来说明，当“一个存在物被另一存在物所认识，并与被认识者的自我认识叠合”[24]时，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处于变化中的这种事物的自我关联在持续产生着奇迹。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本雅明能够给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包括他的父亲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当一个人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联基础、自己与世界的关联基础时，这种奇迹就以一种特别明显和有效的方式发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就是这么一种自省过程的结果。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在自我关联和与他者关联方面，内容特别丰富多元，并且具有启发性和自身特色，因此也可以促进人们的认知：

> 批评就如同在一个艺术作品身上进行实验，通过实验，艺术作品的反思被唤醒了，艺术作品被带入了意识领域，以及对其自身的认识。只要批评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认识，那么批评便也是艺术作品的一种自我认识；只要批评指的是评价一个艺术作品，那么这种评价也是在艺术作品的自我评价中进行的。[25]

对于本雅明来说，艺术批评概念的哲学核心存在于浪漫主义之中，就算浪漫主义者自己也有可能对此理解得不够清楚。要清楚理解这个哲学核心，需要观察一个持续较长的时间维度（整整150年），还得进行尖锐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进行批评。本雅明正是想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批评这个任务当中。尤其是因为，批评活动也会对他以及在他自身内部产生作用，他批评的“作品”会不断发生变化，他也会由此认知自我。事实上，每个可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件作品。每个人都可以练习以批评的眼光检验自己和认知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以批评的方式成长和塑造自我。每个人都能成为真正的那个自己。这种成长方式，就是一种批评。或者也可以简单说成：从事哲学。

逃离至某处

这么说来，或者说类似的情况是，其实在本雅明父亲待在布里恩茨湖畔的那两周时间里，本雅明是可以给他解释清楚，自己将来的人生道路就是要当个自由批评家的。他有可能也真的这么做了。只是他没有符合父亲的期待，没有成功说服父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真正关键的生计问题无法解决：成为一个自由批评家，那将来该怎样谋生，从谁那里能得到资助？

怎样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屈从于比如由父母预先设定好的“命运”？该做些什么呢？

根据本雅明的性格，当他实在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时，他首先会做的并且将来也一直会这样做的，就是仓促逃离。他会不断地挪地方，同时投入到许多新的大工程、大计划中去。

1919年秋天，本雅明一家又走在了路上，途经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克洛斯特斯和最南端的城市卢加诺，来到了奥地利的布雷滕斯泰因，在全家耗尽所有力气和资源之后，最终在那里的一所疗养院落脚。这家疗养院由朵拉在奥地利的姨妈经营。“我们到了这里，完全是囊空如洗了。”本雅明在1919年11月16日写给好友肖勒姆的信中这么说道。无论如何，还是从伯尔尼本雅明的博导那里传来了好消息：“赫尔伯尔茨特别友好地为我敞开大门，他让我有可能去申请教授席位，我甚至可以得到一个编外教师的岗位。我父母肯定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完全不反对我去申请教授席位，只不过他们不会再义务资助我了。”[26]

好在本雅明也不算一无所有。只有这讨厌的经济问题未来亟待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同样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还有维特根斯坦，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虽然他遭遇经济困难的具体方式和本雅明的不一样。

变形

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家里留给他的遗产，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他有没有跟哥哥姐姐们商量过这个事儿？要不要最好再深思熟虑一下？不，他不打算再考虑了。“这下好了，”维特根斯坦家的公证人叹息道，“您真是下定了决心要在金钱上自杀。”[27]确是如此。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不会动摇。他还是身着白色少尉制服，没有丝毫犹豫，几次打断公证人的问话，强调自己的决定不会改变，哪怕他今后再无经济方面的避难所，哪怕条约中没有任何特殊的附加条款，哪怕他再无退路不可反悔，哪怕他签字之后真的要永远和绝对放弃他所有财产，无可挽回。金钱上的自杀，说得好。

维特根斯坦刚回到维也纳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是从意大利战俘营归来的最后一批军官。此刻，1919年8月31日，他坐在维也纳一家气派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的全部财产——换算成今天价值相当于几亿欧元——转让给他的姐姐赫尔梅娜、海伦娜和哥哥保罗。维也纳，这个曾经骄傲的帝国首都，如今只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破产迷你共和国的首都。在一战后的第一个夏天，维也纳最终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战后灾难，大多数奥地利国民主张与同样陷入瓦解状态的德国结盟，但是遭到了战胜国的禁止。96%的奥地利儿童在1919年夏天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爆炸式地飞涨，货币处于一种自由落体状态——城市风气也是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旧等级秩序完全崩溃，而新秩序也仍未全部运作起来。一切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变形了。当时30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经过几年的战争岁月也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仅仅几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根本改变生活的希望自愿报名入伍，成为一名下士。他出身维也纳最上流的社会，欧洲最富有的工业家庭之一，剑桥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哲学界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老师伯特兰·罗素和戈特洛布·弗雷格都期待着他完成“下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观察得没错，那么其实战争已经完全实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个人愿望：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他在加利西亚、俄国和意大利的前线地带多次目睹了生死，他开枪杀人，他通过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找到了基督信仰。尤其是他在前线漫长的暗夜等待中完成了哲学著作。他自己坚信，这本著作不光是哲学中的下一个巨大进步，

甚至也是最后和终结性的进步。

但是，这本著作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什么都没有达到。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是达不到什么目的的，这种无意义性每天都在折磨着他。1918年夏天，他最后一次上前线前回到家里度假，期间他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了最后润色。正如他在著作的前言部分中写道的：

> 因此，我认为，本质上来说，我已经最终解决了诸问题。如果我在此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价值就在于：它表明了，当这些问题获得解决时，我们由此所完成的事情是何其的少。

换句话说，在构成人类生活条件、给予人类生活意义、价值和日常希望方面，哲学没什么可以说的，也没什么可以争论的。为什么基本上会是如此——为什么没有逻辑方面的结论、论据，也没有站得住脚的意义理论能够涉及生活实质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著作正好永久展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伦理行为

事实上，在从战场回来将近两个月后，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出版人路德维希·冯·费克尔，他觉得《逻辑哲学论》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方面的意义……”，因为这部著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我并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正是这没有写出来的第二个部分，才是重要的。因为伦理学的范围好像被我的书由内而外做了限制。”[28]

维特根斯坦的作品通过逻辑语言分析的办法，由“由内而外”对可以言说的空间做了范围限定。这个可以言说的范围仅仅涉及客观世界以及实际上可以有意义地进行言说的领域。自然科学的任务终究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情况做尽可能精确的理解。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自然科学的任务对象就是“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逻辑哲学论》6.53）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难题，或者说更多的是真正的哲学解决办法，就存在于下面的这个观点里，更恰当地说，是在下面的这个感觉里：

> 6.52　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悉数获得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完全没有被触及到。自然，这时恰恰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恰恰这就是答案。

只有那些人们可以有意义地言说以及在其现实状态中可以毫无疑问地去证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事实，才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来说是有意义的。当时充满积极基调的时代精神正是从上述这点出发的。而维特根斯坦应用了纯粹从科学角度来理解世界的一种基础方法——逻辑分析来告诉大家，恰恰相反，并不是事实才对生活有意义。能给生活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正赋予意义的所有一切，都在直接可以言说的界线之外。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方法是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的，但是他的道德观却是一种存在主义道德观。良好生活并不是建立在客观原因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极端主观的决定的基础上。良好生活存在于什么之内，这没法有意义地言说出来，而只能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显示出来。维特根斯坦在1919年做出的决定，正是要过一种良好的生活。

回到维也纳、回到原来生活的世界——如果这个原来的世界还存在，维特根斯坦无法想象这种回归。战争和哲学都没有把他从原来的哲

学难解之谜和不幸中解救出来。他经历了战争，整个人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还没想明白所有问题。为了能够克服内心的混乱感，他在意大利“坎波卡西诺”战俘营的漫长时光里酝酿着非常极端的计划。第一，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让给哥哥姐姐们；第二，不再研究哲学；第三，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谋生——长久过着贫穷生活。

心满意足的不幸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战场回来几天之后，就坚定不移地实施了他的计划。这让他的哥哥姐姐们很担心，尤其是他的大姐赫尔梅娜。路德维希是在八月下旬回来的，在这几天，赫尔梅娜肯定害怕路德维希会像其他几个兄弟那样自杀，她又要失去一个弟弟。之前，赫尔梅娜已经有三个弟弟自杀身亡了，他们是约翰内斯（逝于1902年）、鲁道夫（逝于1904年）和库尔特（逝于1918年）。

自杀的三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是约翰内斯，他当时为了躲避家长制的父亲逃去了美洲，在一次情况不明的沉船事故中“溺亡”于佛罗里达。鲁道夫生于1888年，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22岁时在柏林的一家餐馆用氰化钾服毒自杀。在他的绝命书中，他说是因为一个朋友的死而悲痛自绝。关于他自杀的原因还有另外的说法：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撰写了一篇个案研究，详述了一个未披露姓名的“同性恋大学生”，鲁道夫觉得这篇个案研究把自己确认为对象，自己已经被揭穿，他惧怕自己暴露身份并因此出丑。[29]还有康拉德，也叫库尔特，他的自杀充满了特别英雄式的悲剧色彩，他在1918年10月从意大利撤军的途中，也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开枪自杀——因为他不想当意军的俘虏。

根据维特根斯坦家的标准，家中五个兄弟中排行第四的保罗情况还是不错的。就如家中所有孩子一样，保罗也拥有极高的音乐素养，他在一战爆发前很久就开始致力于成为一名音乐会钢琴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父亲在维特根斯坦家宫殿式的府邸里举办的音乐晚会，是当时维也纳上流社会生活的高潮之一。年轻的保罗拥有着过人的天赋。可是，在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保罗就受了重伤，以致于必须要把右臂的大部分截肢。另外，他还落入了俄国战俘营，直到1916年才重获自由。他在回到家乡之后同样也在酝酿着具体的自杀计划，后来他通过无数练习研究出了自己特有的踩钢琴踏板技巧，即使独臂也能进行最高水平的钢琴演奏。这样他实际上就能够继续其作为音乐会钢琴家的事业，接着还取得了全球性成功。由此，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放弃了自杀念头。

如今，维特根斯坦兄弟中年纪最小的弟弟“鲁奇”（Luki）——家里人这么称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情况危急。鉴于以往的经验，大家

都觉得更明智的办法就是要顺着路德维希的心意，不要去阻止他。尤其是因为，路德维希认为从军奔赴战场是唯一一种能够实施的慢性自杀。他在军队中顺利晋升，对军队统帅部反复强调自己的坚持，要尽可能去往最前线和最危险的地区作战。

路德维希在他的战争日记中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这样的想法：只有在直接濒近死亡的边界状态下，也就是在完全感知到自己存在的状态下，自我的真面目才会显现出来，尤其是自己（哪怕不属于任何宗教教派）是否相信上帝——以及由此是否具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只有在这种边界状态下才能看得清楚。例如，1916年夏天，路德维希在加利西亚前线的记录就清晰表明了，在一战的战争岁月中，在路德维希的思想中，逻辑语言分析方面的想法和克尔凯郭尔以及托尔斯泰意义上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伦理学是多么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 为了幸福地生活，我必须和世界达成协调。这就叫做，“幸福着”。
>
> 我和来自外界的他者意志达成了所谓的一致，我看上去依赖于这种意志。也就是说，“我践行着上帝的意志”。[30]
>
> 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是虚假生活——即恶劣生活的最好证明。[31]
>
> 好与坏只有通过主体才会显现。而主体并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边界……
>
> 好和坏实质上只是自我，不是世界。而自我，自我是深度神秘的。[32]

1919年8月，路德维希肯定不再畏惧死亡了。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能否过上一种良好的、充满意义的，也就是幸福的生活？光是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始终折磨着路德维希，使他内心充满怀疑。早在1919年9月5日，路德维希就着手实施他生活计划的下一个步骤，现在他变成了个赤贫的男人，开始在维也纳昆德曼巷的教师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小学教师培训。也就是说，再不从事哲学研究了。再不！

当时，马丁·海德格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新生活方式或者说存在方案毫不知情，否则维特根斯坦的选择有可能会动摇海德格尔新的生活根基。

因为那时海德格尔刚从战场归来，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只想做一件事情：从事哲学。

其他情况

“作为一个哲学家，生活不易。”1919年1月9日，刚从战场归来的海德格尔在写给他慈父般的朋友和支持者恩格尔贝特·克雷布斯的信中曾这么说道。因为“哲学家得面对内在真理，当教师也跟追求内在真理有关，为的也是追求真理，这要求哲学家牺牲、放弃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从事技术行业的工匠无需面对的。”[33]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海德格尔这么说是认真的。哲学家的职业对象是自己、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道路。“我相信，”海德格尔继续写道，“从事哲学是我的内在使命。”

一战爆发的最初几年，海德格尔由于心脏病（自我诊断：“年轻时过度的体育锻炼！”）暂时免除兵役，在1918年8月到11月，也就是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海德格尔在414气象站服兵役，他的身份是气象工作者。在马恩河—香槟战役中，海德格尔在一个地势稍高的瞭望岗哨工作，为德军使用毒气进行预测支持。海德格尔并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他最多只是用望远镜仔细查看着，数千德国士兵从战壕中冲出来，奔赴无可避免的死亡。在海德格尔的私人记录和信件中，我们读不到他对战争的厌恶之情。在这段服兵役期间，如果海德格尔谈到了“牺牲”、“放弃”和“斗争”等内容，那他主要指的是他自己、他的学术状况和个人生活状况。

从1917年冬天起，海德格尔真正的前线并不在欧洲阿登山脉的战场上，而是在他自己家里。这条真正的前线并不是国家间的，也不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而是宗教上的。作为一个精神动力来自宗教的天主教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现实中“生活”很是“不易”——也就是说，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尤其不易的还有，海德格尔的妻子是个新教徒，此事还处在保密状态。他的妻子不愿遵守早前天主教的婚姻传统，不愿意改信天主教，也不愿腹中正怀着的孩子将来受洗天主教。

两侧无掩护

今天人们很难去衡量，不同宗教信仰间的联姻在1919年、在海德格尔狭小的生活圈和职业圈里是怎样一桩丑闻，更不用说在海德格尔那对信仰特别严格的父母眼里了。几个月来，海德格尔一次又一次在信中动情地向父母保证，作为儿子，还有将来的孙子，他们会更加仔细地观察自己的灵魂救赎，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放弃灵魂救赎。

海德格尔的婚姻绝对是个问题——很快就会变成难题。在这段婚姻中，教堂司事的儿子海德格尔看上去还是找到了非常理想的结婚对象，起码从纯经济角度来看是这样。海德格尔的妻子叫特亚·埃尔福丽德·佩特里，出身普鲁士上层军官家庭，经济条件优渥，于1915年来到弗莱堡学习国民经济学。由于她家庭经济实力雄厚，埃尔福丽德的父母可以在一战的最后几年里一直资助女儿女婿。战争结束后，佩特里家——如同其他几百万德国人一样将财产投资到战时公债上——也遭受了严重经济损失，他们感觉接下来无力再继续支持身在弗莱堡的女儿女婿了。[34]

因此，当海德格尔1918年11月从前线归来时，他感到经济方面的深渊近在眼前。如果他还想继续以哲学家作为谋生职业，就急需一份稳定收入，也就是一个职位。这意味着，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如今，他还想在弗莱堡大学神学系借助一个教会奖学金申请私人讲师的教学资格，看来是再不可能了。早在1916年，海德格尔在教会圈子里就被视作尚不成熟，此外还靠不住。在当时的聘任程序中，尽管神学系主任克雷布斯极力支持海德格尔，最终海德格尔还是被明显忽视了。如今，他与弗莱堡大学神学系最后的联系也被砍断了。

因此，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学术希望就完全建立在获得哲学教席的基础上了，也就是寄托在现象学专业的实际建立者和领导者——埃德蒙德·胡塞尔身上。胡塞尔是一个以纯科学为导向的哲学家，他对具有宗教背景的思想家持高度怀疑态度。这样，海德格尔在求职最初阶段遇到了不少困难。1916年至1917年间，一个是功成名就的大师，一个是具有魅力的年轻学徒，胡塞尔还根本不想把海德格尔当回事儿。直到1917年至1918年冬天，胡塞尔对海德格尔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之后，很快就愿意直接支持他。1919年1月9日，海德格尔给他的教会好友恩格尔贝特·克雷布斯写信，信的开头感情激昂。他这么写道：“认识论的那些洞见使

天主教的体系对我来说问题多多，不可接受。”年轻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写下这些话，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的人生可能经历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向。冷静些来看，这封信其实体现了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想要取得事业成功的哲学家在认识论方面目标准确地耍了个手段。他在详细考察了当时的整体情况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确表态放弃天主教信仰，才能抓住他当时最后的学术机会。就在海德格尔给克雷布斯写这封信的前两天，胡塞尔自己去找位于卡尔斯鲁尔的教育部门进行沟通，要为海德格尔争取一份拥有全年固定工资的助教职位。因为如果不给海德格尔提供这么个职位的话，他就会“去找一份能赚到钱的职业”了，哲学界就会流失一个非同寻常的天才。[35]

在本雅明对“性格”与“命运”、“内在气质”与“外在条件”关系的论述中，海德格尔对“天主教体系”的背弃看上去首先说明了一点：这种背弃是极度合乎逻辑的。人们几乎可以说，富有体系逻辑性。

胡塞尔在卡尔斯鲁尔的活动还是如愿成功了。虽然教育部门最开始扭扭捏捏拒绝，最终还是同意过后给海德格尔安排一个全职助手的职位（到1920年秋季才能保证提供这个岗位），另外现在就批准了一个带薪讲师的合同。由此，海德格尔的哲学职业暂时获救。从今往后，海德格尔可以不再带有天主教的固有背景进行思考。弗莱堡的战时研究班从1919年1月25日就开始了。海德格尔有整整三周时间可以为新学期课程做准备。在讲座课开始前的仅仅四天，海德格尔的长子约尔格出生了。

没有观点的世界

与诸如慕尼黑和柏林这些大城市比起来，人们在弗莱堡的生活还算是好的。弗莱堡的郊区都是农村，食物紧缺情况不太严重，在近几个月以来的市民革命和街道战斗中，弗莱堡也没有受到波及。不过，1919年海德格尔在讲台边第一次给学生上讲座课的样子，应该也不是振奋人心的。在他面前分散坐着的主要是一些遭遇了打击的男士们，其中许多早已过了大学生的年纪，他们还来求学，是希望从中看到未来的希望。他们怎样才能到达自己向往的未来呢？去与未来主动对话？唤醒未来的希望？还是逃到充满抽象和冷僻问题的象牙塔中？抑或是给当下时刻和身处此地一个吻合实际经验的解释？年轻的讲师海德格尔决定双管齐下。由此，他给哲学献上了最伟大的一堂课。[36]

按照之前公布的讲座课表，海德格尔本应该讲授康德的相关内容。但是在上课前最后一刻，他决定要换一下主题。新的讲演稿题为《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问题》[37]。换句话说，这个讲演稿的主题是，作为独立知识学科的哲学有着怎样的自我认识：在以经验为依据的自然科学方法和解释之外，且首先在各种世界观著作流派之外——这些流派在这段时间占有特别的统领地位。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文明做出的重大阐发。哲学的目标和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目标和方法，这点看上去已经足够清楚了。那自然科学和粘附有价值观念的世界观结构之间，区别又在哪里？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本质区别？

如果人们跟随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路，那么答案就是明确的“是”。因为现象学的出众之处正是在阐明世界时严格的方法论程序。这种程序和自然科学的区别首先在于，现象学并不是致力于解释或者预言现象的发生过程，而是根据现象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客观和不带价值判断地去理解这些现象。在“回到事情本身！”的助威声中，现象学寻求成为一门“前理论的原初科学”，就如海德格尔称呼它的那样。所谓前理论的原初科学，就是在所有自然科学之前的精确经验基础，特别是在所有被偏见所扭曲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之前。

原科学家

作为胡塞尔的新助手，海德格尔在他第一堂讲座课中就找到并开始走上了这样的哲学道路。从海德格尔的思路来看，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有东西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的？它如何体现出来？大学讲师海德格尔把这个针对“有”的原初问题称作哲学方面“问题体验”，这种叫法也不是没有言外之意，它暗示着1914年一战开始时那段跌跌撞撞的“八月体验”。我们来听听海德格尔自己是怎么说的：

> §13.问题体验：有东西吗？
>
> 在问句“有……吗？”中，就已经有着某个东西了。我们的整个难题已经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地方，这个地方因其贫瘠而根本没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贫瘠”的意义，并且停留在这种贫瘠的状况中……我们正站在方法论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根本上决定着哲学的生与死：我们正站在深渊边上，要么步入虚无，也就是步入绝对的客观事实性中，要么成功跳入另一个世界，更确切地说，终于首次进入了世界。……若我们假定，我们根本就不在此。要是这样，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38]

这之后没多久，海德格尔再次更准确仔细地说明了问题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决定了一切：

> 什么叫做：“有”？
>
> 有数字，有三角形，有伦勃朗的画，有潜水艇；我说，今天还有雨，明天有煎小牛肉。多样的“有”，而且每每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在每一个“有”中又总可以看到同一的含义要素。……继续这么说：问题问的是，有东西吗？并不是在问，是否有椅子或者桌子，是否有房屋和树木，是否有莫扎特的奏鸣曲或者宗教力量；而是在问，是否确实有着一般东西。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一般东西，它的意思是什么？人们想说的是，这是一般对象具有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最普遍的东西。关于它，可以说，它是东西——当我那么说时，我说出的是对象的可说出的最小值。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

情况下，我无条件地面对着它。[39]

29岁的海德格尔站在那儿，他作为学院哲学家正在上他的第一堂讲座课。他由于内心十分坚定而声音颤抖，他用这颤抖的声音要求他的学生们用德语中看上去最蹩脚的表达之一来认识哲学的命运问题。是谁正站在那里讲话呢：是个小丑？魔术师？还是预言家？

在此，值得在海德格尔战后第一堂讲座课中给出的这个关键段落多停留一会儿，这个关键段落可说是海德格尔整个此在哲学的原细胞。如果人们根据海德格尔的要求，在“有”这个表述上多停留一会儿——同时以沉思的方式埋头思考“有”的可能应用和含义——那么就会发现这个“有”的表述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深度的谜：“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真实含义何在？最终这个“有”在它的最普遍形式上适用于所有和每个对象。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适用于存在的所有对象。

刚好十年之后，海德格尔将在同样的地方声称，他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研究“存在”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他也将站在当年弗莱堡大学的同一个讲台边上宣布，他是2500年来重新发现和唤醒“存在”意义的第一人，尤其是“存在”对于所有人具体生活和思想的含义。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说法，其实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时海德格尔说，关于“有”的问题是一个决定了“哲学生死”的“真正的十字路口”。

如果人们决定要在“实事性”上做个分叉，把关于“有”的问题完全交给自然科学，那么哲学就会面临一个危险的命运，就像维特根斯坦断定的那样：哲学会变得多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仆人。最差的情况则是哲学堕落成一门毫无根据的学问，其价值观基础是错误的、带有偏见的。海德格尔把这种价值观基础和世界观的哲学概念联系到一起。哲学的命运如何，这全部取决于是否可以成功地“跳”入另一个世界，“跳”入另一种哲学思考，也由此“跳”入对存在的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走上第三条道路。

没有不在场证明

海德格尔选择的概念“跳跃”是索伦·克尔凯郭尔宗教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表明，“跳跃”是拯救哲学的可能性之一，它在海德格尔这里并不是一个纯逻辑性、论证性或者理性驱动的选择。“跳跃”更多的是一种渴望更多东西和渴望他者的决定。也就是说，这种决定的基础首先不是理由，而是意志和勇气，但主要是具体的自我经验。这有些像是宗教信仰转变的经历：一种使命。

在上述海德格尔的论述中，还出现了对于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具有绝对决定性作用的第二个要素“问题体验”。海德格尔关于“问题体验”的思路隐藏在这样一个推想之后：作为人类的“我们”是根本不“在此”的。也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那然后会怎样呢？

然后，海德格尔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有东西吗？”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是唯一可以对自己提出如下这些问题的存在物：有东西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存在的所有一切，因为其存在，所以才“在此”——正因为如此，所有存在的东西才成为问题。只有对我们来说，才谈得上“有”一个世界。因此，很快海德格尔就用“此在”的概念取代了“人”的概念。

新的王国

坐在海德格尔面前的听众饱受战争带来的创伤。在第一堂讲座课上，海德格尔就已经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听众，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可能——一个真正进行哲学提问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因为他尤其在关于“跳跃”的讲话中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听众了。要跳入新世界，占领新王国，只能由每个个体自身亲力亲为地去做。在通向哲学的道路上谁都没法不在场。要引导跳跃、使跳跃成为可能，靠的不是抽象的传授，或者纯粹站在讲台边上讲授，而必须由每个个体自己从内心而发，去经历、去领会，跳跃的引导方式和实现的可能性必然会显现在具体生活中。

海德格尔想通过问题体验来开辟“前理论原初科学”的道路。这种前理论的原初科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描述给定的对象，也就是说它要用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给定对象的存在方式，也由此来理解自我的状况。人们早在1919年春天就能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如何受到“存在问题”（存在论）和“此在问题”（存在主义）的交叉影响，这种交叉又是密不可分的。海德格尔讲座课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

> 哲学只有通过全然专注于生命本身才能取得进步……哲学没有半点儿自欺，是一门绝对诚实的科学。哲学中没有废话空话，只有可以理解的步伐；哲学中没有彼此争吵的理论，只有真实洞察和虚假洞察之间的争论。而真实的洞察如何获得？只能通过诚实和毫无保留地专心致志于自在生命的真实性中，终归只能通过个人生命本身的真实性，才能获得真实的洞察。[40]

存在论和存在主义交叉在一起，这种交叉同时在战争经历丰富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也能找到。不管是在海德格尔身上，还是在维特根斯坦身上，这种存在论和存在主义的交叉具有同样的极端性和不妥协性。

对本有的忠诚

1919年，年轻的哲学家们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人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此种特殊挑战：有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超越了“命运与性格”的决定性“框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现在正需要人们为自己和为自己那代人给出理由。放到具体的人生经历上，这首先意味着要敢于冒着失败的危险，从迄今为止具有引领作用的结构（家庭、宗教、民族和资本主义）中突围出来。第二，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找到一种存在模式，这种存在模式可以对战争经历带来的紧张力进行加工，将其转化到思考和日常此在的领域中。

本雅明想通过浪漫的手段——通过对所有一切进行批评从而推进一切——来实现生活方式的更新。维特根斯坦则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在面临最强烈死亡恐惧的时候感受到了全然神秘的平静和与世界的和解，他希望能够把这些短暂的感受延长到日常生活中去。海德格尔在1919年的自我境遇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人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任务：海德格尔目前已经存在的自我形象是一个“狂野思想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寻找一种方式，可以将战争经历带来的紧张感和平凡的日常进行和解，使两者可以和平共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战争带来的紧张感和思考的紧张感具有基本相似性。一方面是一种处在思考风暴中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所谓和解指的是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和解。而早在1919年，海德格尔的任务就对（紧张和日常之间的）边界特点提出了所有要求：于是，海德格尔在1919年5月1日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她是海德格尔夫人长年最好的朋友）信中这么写道：

> 我们得对有意义生活的高度紧张感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我们必须在这种紧张感中持续生活——我们并非要尽情享受这种紧张感，而是更多地要把它构造成生活的一部分——
>
> 在生活的推进中带着这种紧张感一起生活，并将其纳入未来生活的律动中去。[41]

一个有稳定恋爱对象的男士如果用更为哲学的方式，就很少会这么解释：恋爱关系之外的桃色事件只限于少数几次拥有“高度紧张感”的碰面。但是，海德格尔如同迷恋于情欲一样迷恋着思考：他要给自己留有机会，让自己拥有伟大的瞬间，让自己可以真正体验到洞察的发生，以

所谓忠诚于伟大的本有的方式来度过此在的余生。对于这种忠诚来说——在他此在中唯一令他感兴趣的忠诚——他想要必须做到一点：自由。在思考中、在行为中、在恋爱中，都得自由。1919年春天，他终于开始从锁链中挣脱出来：从天主教义体系、从父母家、从他的婚姻，以及——如果人们仔细观察的话——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挣脱出来。

德式美德

恩斯特·卡西尔在战后第一个学期也面临着挑战，他当时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今天的洪堡大学）担任私人讲师已经是第十三个年头。根据他夫人的回忆，在1919年1月最开始的几周里，“柏林街上能听到很多枪声，恩斯特经常得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机关枪的枪林弹雨中去往学校，教授讲座课。有一次发生在街上的战斗把学校教学楼的电线给打断了，当时恩斯特正在上课。他过后很喜欢给别人讲述，他当时是怎样询问学生意见，是要结束上课，还是继续往下读呢，学生们又是怎样异口同声回答说‘接着读’……因此恩斯特最后是在漆黑的大教室里结束了这次讲座课，此时还能听到外面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射击声”。[42]

这里，一个人在最危急情况下所展现的，不正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所称赞的，他们思想期望的完美结果吗？——对自己行为的价值产生一种深度的内化信任，一种不可辩驳的姿态和自决，简而言之，真实的、真正的、适合于命运的那种性格。毫无疑问，是的。然而，卡西尔的行为是最不符合上述说法的一个例子。因为在当时以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奥托·魏宁格或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等流行哲学家为核心的圈子里，世界观是保守的，他们的中心概念是“性格”，但是卡西尔仅仅出于政治原因，尽量不想和“性格”这个概念扯上关系。卡西尔坚信，将性格概念加之于哲学——特别是以民族性格的形式——就悄悄地将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修辞学以及一种归根结底远离自由的、对“本真性”和“真正的本质特点”的狂热崇拜交给了哲学。恰是这种哲学由此激发出了欧洲那些精神—政治力量，这些力量使世界大战进入蓄势待发的准备阶段，无可避免；也使世界大战看上去像是欧洲不同文化之间一种命中注定的幸存之战。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或者“一个民族的本质特点”是那种从内心的最深处来决定所有行为的东西——或者也许是那种在极限情况下显示出来并且始终证明自己可靠的东西——对于卡西尔来说，这些人首先表现出了极端的糊涂，没弄清楚情况。在卡西尔的世界中，这也特别叫做：非常不像德国人。

1916年，在一战肆虐、战争接近高潮时，卡西尔正是持这样的抨击立场完成了一部名为《自由与形式——德国精神史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的关键地方是这么写的：

> 因为人们自然应该清楚地知道，只要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固有特点？那么，其实这就已经涉及形而上学与一般认识批判中最深、最难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如歌德在其《颜色论》前言中谈到的那样，“我们正在徒劳地想要表达出一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觉察到一个东西产生的效果，这些效果的完整历史充其量可以包含这个东西的本质。我们徒劳地努力，想要去描绘一个人的性格；与此相反，当我们把一个人的行为、做过的事情排列到一起，那么一幅性格的画面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43]

带着价值观色彩去探寻一个人的“真实性格”和“内在”，这最终都会宿命般指向形而上学方面的基本设想。但是卡西尔的思想——他在思考过程中追随着两位永恒的哲学指路星康德和歌德——宁愿拒绝实质性的内在本质特点。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感性的、有限的理智生物，那么卡西尔给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我们在进行判断时得更加明智地面对显而易见的事情：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人是谁，这显示在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中，以及对其他东西和对其他人的作用中。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或者人的本质并不是一开始就抽象地确定好了，最后再颁布出这个确定好的规则使其执行，或者用魔法召唤出这种本质，而是一直在各个给定的情境中不断显示出来，并证明是可靠的。

卡西尔坚信，特别是因为糟糕的形而上学，还有对人类本质问题的一种很“不德式”的错误回答，导致了这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由此，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为什么战后卡西尔要在大学讲堂上做到最好，将最好的东西传达给学生。从他的观点来看，人应当具备这样的基本能力：在最危急的状况中忠诚于自己的哲学理想，要把自己的哲学理想尽可能清晰可见地展现给他人。而对于卡西尔来说，这个哲学理想就是：要尽可能独立自主地显示自身。也就是说，要为了自己和其他人去培养这样的方法和能力，可以让自己成为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而不是一个纯粹消极的生活伙伴。用自己的创造消除对他者的依赖。用客观原因而不是内心最深处的本真性。卡西尔坚定认为这是德国文化对人类普遍观念做出的实际贡献。熠熠发光地体现出这种哲学理想的，正是卡西尔的哲学指路星：康德和歌德。

不被喜欢的人

1919年冬天，还看不到德国文化向学者卡西尔显示出特别慷慨仁慈的一面。这年是卡西尔在柏林大学担任教师的第十三年，虽说此时他已经是受到国际认可的学者，可他依旧还只是所谓的“编外教授”，没有被正式录用为公职人员，没有给学生进行考试的权利，哲学家只是第二职业。在柏林的电话本中，他登记的信息还是实事求是的“私人讲师”。[44]一次又一次，每当出现评选教授的机会时，卡西尔总是被忽视，他也习惯于这么给他的妻子解释：“我总不能强迫他们喜欢我吧，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我啊”。在过去几年中，卡西尔已经写出了好几本高水准的著作，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1911年出版）[45]；在卡西尔的哲学老师和支持者赫尔曼·柯亨逝世后，1918年卡西尔就成为了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毫无争议的领军人物，而且他就算不是当时最具引领作用的康德专家，那起码也是其中之一。在学术职业前景方面，战争岁月打下的烙印对于卡西尔来说自然更多地成了障碍，而不是好处。在民族主义的保守圈子里，以柯亨和卡西尔为核心的马尔堡学派学者越来越明显地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们作为“犹太学者”正在将康德真正的学说和影响与其“真正的”也就是说“德国的根源”疏远，并将后者清除。早在一战时期，民族主义讨论中的收缩倾向已经继续加重了国内的反犹太主义——例如1916年在德国军队中进行的“清点犹太人”活动。这种反犹氛围随着美国参战变得更加浓厚，还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卡西尔”是一个来自富裕市民阶层的德国—犹太家族典型姓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柏林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占据着中心位置：工厂主、工业家、工程师、出版商、医生、艺术收藏家，以及哲学家。[46]卡西尔家族是被“同化和吸收”入德国社会的典范，而正因为如此，出于德意志民族本质逻辑的特殊“内部原因”，卡西尔家族特别令人怀疑。[47]

触电般的激奋

那么战争呢？卡西尔患有牛皮癣，牛皮癣病人在身穿军队制服时必定会出现极度痛苦的皮肤瘙痒症状。因此，卡西尔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被确定为长久不适合服兵役。但是，1916年他在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法国部”服务。他的工作职责除了要写作短文和传单之外，还得阅读和搜集法语报纸上的报道，接着还要根据是否适合德国战争宣传，对这些报道根据需要进行缩写或者改写。这份工作的难度不大，要求不高，但是在精神上却是一份令人觉得受辱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像恩斯特·卡西尔这样一个信念坚定的欧洲公民来说。

不过这份工作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它起码能够给卡西尔足够的自由空间，把每天下午的时间用在自己的工作和项目上面，用写文章的方式来反击这份说谎的差事。作为他反击武器的文章有之前已经提到过的著作《自由与形式》，还有论文《论欧洲对于德国文化的反应》。无论如何，康德和歌德都应该可以为卡西尔感到骄傲。让康德和歌德可以为他骄傲，这也是卡西尔在所有情境之下的座右铭。任何情况下，卡西尔都会竭尽全力一步也不偏离自己的座右铭。就算是在从柏林西郊家中开往市中心那总是很拥挤的有轨电车中，早晨去往市中心耗时一个半小时，傍晚回家亦是，在这整个路途过程中，卡西尔一次也没有偏离自己的座右铭。他的妻子这么回忆道：

> 我偶尔几次和卡西尔一起坐有轨电车，我观察到，他在电车这种很夸张的场景里依旧能够工作。他从来就没想着要找个座位坐下，因为他很确定，就算他找到了座位，很快就又得把座位让给女士、老人和因战争致残的人士。他会挤过人群去到车厢的最末端，在一个最为狭小的地方站着，一只手抓住扶手避免摔倒，另一只手拿着书读。嘈杂的声音、拥挤的人群、刺眼的灯光，难闻的空气——这些都妨碍不了卡西尔读书。[48]

这便是卡西尔在电车中的积极形象。事实上，他写作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的大致计划就是在电车中构想出来的，还写出了大概的提纲。后来，从1919年开始，卡西尔花了十年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写作，完成了写作计划。《符号形式的哲学》这部著作的第一版提纲写在八张窄窄的纸上，落款日期是1917年6月13日，这些提纲见证了一个天才想法

的诞生，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天才想法肯定是在卡西尔坐着电车穿越柏林的途中突然产生的——这些提纲亦见证了卡西尔几乎算得上超人的阅读量，这些阅读量是他在接下来两年中在电车中完成的。[49]1919年冬天，卡西尔不用再去新闻办公室上班了，而是又得冒着斯巴达克同盟起义机关枪的枪林弹雨去大学授课。这个时候，他已经着手写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第一稿，内容是人类语言现象作为所有符号形式的真正基础。在这段时间，卡西尔确信自己是在写作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在加工创作他生命中真正的想法。并且，就如命运的召唤一样，在1919年5月——当年一月份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的尸体，那几天被人从施普雷河中捞出来——一封来自刚建立的汉堡大学的信件也寄到了卡西尔手中。卡西尔是这么回复这封信的：

致威廉·施特恩的信，1919年5月30日

尊敬的施特恩先生！

衷心感谢您于5月22日写给我的信。我于几天前从大学收到您的这封信，收到信时，我正染流感卧病在床，所以延迟了几天才写这封回信。对于您的好意，我当然非常感谢，您也不用担心您由于期待我的到来、我还无法给出确定的答复，会让我感到不安。从根本上来说——也根据我最近的经验来说——我在这个方面会超出大家的希望，也会超出大家的失望。不过我也不想否认，在眼前不确定的未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学术职位是现的在我特别希望的。我将非常感谢您在这件事情上为我推进的每一步。[50]

卡西尔终于等到了一个内心呼唤已久的、属于自己的教授职位。从信件这种文体的规则来看，卡西尔寄往汉堡的回信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意思：我当然会来汉堡啦！而且，对了，在此期间我是急用钱的！令人担忧的是，战争让卡西尔家财产严重缩水。卡西尔家族来自布雷斯劳，他们在布雷斯劳的大型工厂现在已经位于原来的帝国边界之外，落入了波兰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卡西尔在哲学上早已准备跳槽。他在给发展心理学家威廉·施特恩——也是当时汉堡大学聘任委员会的领导——的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施特恩，他最近加强了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双方的协商顺利完成。早在1919年8月，卡西尔就在汉堡市舒适的温特胡德区购买了房屋。同年10月，卡西尔携妻子和三个孩子出发前往汉堡，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III
语言
1919—1920

维特根斯坦置身于风暴中，

海德格尔获悉了完全真理，

卡西尔寻找着他的形式，

而本雅明在翻译上帝

形象地表达

“人不能规定一个符号可能被用来表达什么。一个符号能表达的所有东西，它都可以表达。”[51]1919年8月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给他的朋友、也是他以前的老师伯特兰·罗素写信时这么说道。在维特根斯坦眼中，罗素是当时这人世间剩下的唯一可能读懂他作品的人了。

维特根斯坦试图清楚回答的具体语言哲学问题，涉及罗素提出的一个异议。罗素在“彻底读了两遍”维特根斯坦著作手稿之后，在符号使用的规则方面提出了和维特根斯坦不同的看法。这些规则确定了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符号系统中，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个符号。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个符号系统是每个有意义表达的基础。当然，人们容易想到，维特根斯坦写下的这些句子也可以解读成是他对自己生活境况的一种倔强辩护。这些天里，维特根斯坦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他为了做自己，成为自己的符号，选择了远离常规、远离期待和远离原本人生轨迹的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赋予了他迄今为止存在的意义。他和自己的财产做了分离，通过自我贫化才能自由地开展一个极端的新开始，这对于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来说可能还是尚可理解的。但是维特根斯坦下一步的职业新选择，故意要否定和放弃自己的天赋，这令他的哥哥姐姐感到诧异。维特根斯坦的大姐、也是他最亲密的姐姐赫尔梅娜回忆道：

> 我自己最开始根本无法理解他做出的第二个决定，即他选择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职业，可能就是去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因为我们姐弟之间聊天时很经常用比喻来彼此沟通，于是我当时就在一次长谈中跟他说：他拥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当我想象他这样一个人，要去做小学教师，就如一件精密工具被用来撬开木质货箱一样。路德维希同样是用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他的比喻令我无言以对。他是这么说的：“你让我想到一个从紧闭的窗户向外看的人，他解释不了看到的某个过路人做出的奇怪动作，因为他意识不到一场风暴正在窗外肆虐，而那名路人其实只是在竭力使自己站稳脚跟而已。”[52]

在以上这幅思想图像中，人们看到了一幅姐姐对天才弟弟的速写。实际上，对路德维希的存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全部问题和全部解决之道，都集中在这段回忆里了。

维特根斯坦从青春时代开始就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同周围其他人之间像是被一堵看不见的墙或是一面玻璃给隔开了。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随着战争年代的经历再次得到了加强和加深。当这种感觉发展到巅峰阶段时，就强化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被排除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闭锁综合症），使自己整个生活置于一种无意义的嫌疑之中，这种嫌疑几乎无法消除。最终就会导致于外在表现上完全失去行动能力，而在内心层面就如一场场冰风暴在怒吼呼啸。

在较新的研究中曾经有人考虑到，维特根斯坦有可能患有某种形式的自闭症，[53]从1992年开始，此形式的自闭症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症”：这是一种幼儿时期的发育障碍，伴随“阿斯伯格综合症”出现学者症候群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在分析数学领域或者音乐领域拥有过人的天赋；另外，在日常生活中，“阿斯伯格综合症”表现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和严重受限的社交能力。对，维特根斯坦有可能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无论如何，当有人说出这种隐喻的话语，说有“墙”、“窗户”或甚至是“高墙”之类的东西把自己的体验和其他人的世界隔开了，那么这些隐喻的表达就属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最典型的自我描述了。维特根斯坦在1919年至1921年的记录和信件中总是提到想要通过自杀得以解脱，对此，人们毫无疑问可以得出结论：维特根斯坦在这些年月中经历了严重的抑郁阶段。

自己想要进入所谓的外界、融入“外面”的所有其他人当中，但是进入外界的入口有可能已经从根本上被干扰和堵住了，这种猜测简直就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性怀疑，而且这种猜测表面上好像和临床诊断的怀疑没有关系：有没有什么把我们和事物的真实特征隔开了呢？有没有什么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和他人的感受隔开了呢？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什么”会是谁或是什么东西呢？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就已是源自这样的设想：我们日常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由真实世界的影子组成的一个虚假世界。或者，为了更加具体地理解维特根斯坦所比喻的站在“紧闭的窗户”之后向外看的那个人，让我们联想一下现代认识论和主体哲学真正的奠基之作——勒内·笛卡尔发表于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

在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笛卡尔开始进行他的哲学怀疑实验：他站在自家的壁炉房间里往街上看去，他一开始眼神无辜，他怀

疑，那些雨中在街上奔跑而过的人们真的就是人吗——或者那些“人”是否有可能只是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机器”呢？[54]一个作为思考主体的人，就如同被隔绝在自己大脑的“玻璃窗”之后，他能看到其他人，但是能知道其他人内心发生了些什么吗？此时其他人内心正在肆虐着什么样的风暴？还是说其他人内心没有任何活动——实际上他们内心充满着全然持续的平静呢？

维也纳之桥

维特根斯坦回答赫尔梅娜的话，使认识论基本问题中最令人敬畏的一个哲学画面活跃了起来。这指的是，人可能被自己的主观经验完全锁闭在一个自身的内部空间内，这样的一个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对外部世界和对其他人内在的可靠认知呢？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这个质疑，是他自己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即在他与世界的整体关系中——一直存在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对于一个从战场归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维特根斯坦在过去七年中几乎把他所有精神能量都奉献出来，努力给自己的思考——包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赋予一个尽可能清晰和不令人误解的形式：也就是使他的思考以《逻辑哲学论》的形态出现了。

1919年秋天，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最终承认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给关系最好，也是学识最渊博的几位朋友——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和建筑师保罗·恩格尔曼——寄了《逻辑哲学论》手稿，但是这几位朋友也都完全读不懂他的著作。

另一方面，赫尔梅娜回忆的那场对话不仅显示出了维特根斯坦内心生活中长期纠缠的一个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也显示了这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找到了成功的疗法。因为维特根斯坦用语言特别精确地形容出了一个站在“紧闭的窗户”之后的人，他内心正肆虐着风暴；通过给他人描绘这种语言图像，维特根斯坦成功地“打开了窗户”，这意思是，他成功地在自己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直接架设了桥梁，这样他就找到了一条走出自己精神孤岛的出路，进入了被他人理解的自由。

就算是今天的读者同样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回答中确切知道，他当时内心生活情况如何。我们了解他内心状况的准确度和清晰度，就和维特根斯坦在1919年了解自己的准确度和清晰度是一样的。在主体和外界之间——多亏了语言的奇迹——不再有隔绝彼此的玻璃窗了。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亦是如此。

当人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著作，尤其是他后期哲学著作中充满了关于解放、指明出路和突围的隐喻和托寓。比如在他后来著名的关于使命的表达中：“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55]当然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

从事哲学的活动打开了通向自由的窗户，这是一种直接富含意义的此在状态，人们在行为过程中与其他存在的个体不再隔绝，也就是说，这扇窗户通向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到的“幸福”。通向幸福，这是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愿望。从事哲学由此也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因为“由幸福所构成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它不同于由不幸福所构成的世界”。（《逻辑哲学论》§6.43）

从事哲学活动凭着某种媒介可以指明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但如果没有进行澄清思想的哲学活动，那么恰恰就是这种媒介可能会挡住、损害，甚至是完全封锁这条道路。这种媒介指的就是——语言媒介本身。

诗意精准

是什么令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于它的第一批读者来说（但事实上不仅仅是这第一批读者，而是几十年来都如此）极难读懂？是维特根斯坦决定用两种语言运用方式来最终阐明他的思想，而这两种语言运用方式看上去貌似是互相排斥的：一种是数学逻辑语言及其完全抽象的符号，这种语言建立在绝对的明确无二和毫无歧义的基础上；另一种是思维图像的、托寓的以及似是而非的格言警句语言，这种语言图像丰富，充满诗意。维特根斯坦在语言风格方面有着这般执拗，正解释了精密工具的独有特色，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解正是这件精密工具。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作为作者在逻辑计算结构和抽象的符号关联方面受过深度训练——通过他在柏林和曼彻斯特的工程科学学习，以及尤其在剑桥跟随罗素学习。但同样，他“通过比喻”，也就是通过隐喻、语言图像和托寓的诗意方法来与他人进行互相沟通的精神特点也一览无遗，赫尔梅娜的回忆录就充分展示了这点，这凸显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的特点。

恰恰这第二种语言使用并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家族内部的特点。如果说在一战前的欧洲存在着这么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一方面致力于逻辑分析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语言使用的诗化象征，这两方面的特色各有各的不同，但又互为对方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被理解成是追求清晰的同一种生活美学。那么，这种文化氛围就是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现代派”。[56]很明显，“维也纳现代派”的基本观点是，在每个个体语言应用的清晰度、每个个体自身的存在状况和自己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在“维也纳现代派”中有一个静默的括号，这个括号将如此不同方向的作品一个挨着一个地绑到了一起。这些在“维也纳现代派”中紧密相连的作品有马勒的音乐，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罗伯特·穆齐尔和卡尔·克劳斯的文学作品，恩斯特·马赫和弗里茨·毛特纳的哲学，特别还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并非偶然，当时奥匈帝国内部政治空间正在向外扩张，而在这个多民族国家日常生活的外部环境中每天都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与这种扩张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真的已经到了悬崖边上，马上就要掉入荒诞的深渊。维特根斯坦生命最初的十四年是在家里宫殿式的建筑中成长的，私人教师过来上门授课。维特根斯坦家的宫殿里会定期举办社交晚会，有艺术家到访，也会举行基金会会议，是彼时“维也纳现代派”文

化氛围的中心之一。小维特根斯坦仿佛吸收母乳一般吸收着这种文化氛围中的营养。

对抗世界

除了维特根斯坦的论文之外，诗人、记者卡尔·克劳斯那尖刻的格言警句直至今天仍是当时“维也纳现代派”思想特色的典型例子。克劳斯当时已是无可争议的“维也纳现代派之王”，例如他抱怨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事实上是把自己当作治疗的心灵之疾”，这正是他尖刻风格的体现。当时的精神分析有一种新疗法，就是借助语言来达到清晰地表达，获得自我洞察，之前在这方面只有堵住生活去路的精神错乱和毫无出路（在病人的思想中是这样的），而克劳斯用荒唐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这种新疗法的质疑。当然，克劳斯同时也质疑语言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来说具有的附加价值，他觉得这种附加值是靠不住的：语言本身最终是不是人们需要去战胜的疾病呢？抑或是唯一可以想象得来的疗法？语言是否堵住了通往认知真实世界和自我的道路？还是反过来使认识真实世界和自我成为可能？

当维特根斯坦于1918年给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写前言时，“在此所传达的思想的真理性”对于他来说是“无可置疑的、确定的”，因此他认为，“本质上说来，已经最终解决了诸问题”。如此，对于那些罗素和弗雷格都还尚未解决的难题，他完全——而且首先不止一次——通过毫无矛盾的逻辑计算构造列入了研究计划并进行了研究。不仅这些问题，对于维也纳现代派中那些核心艺术家们所提出的关于语言怀疑的中心问题，也是一样的情况。维也纳现代派的世界随着世界大战战败，如其帝国一般一同走向最终的没落，而帝国的精神中心正是由维也纳现代派构成的。1919年，维也纳现代派还剩下的人，对待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光是抱着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态度，而且更糟糕的是，抱着一种完完全全的冷漠态度。

回到家乡的维特根斯坦向不同的出版社寻求投稿出版自己的著作，但是直到1919年深秋为止，他收到的出版社拒绝清单读上去就像是当时维也纳先锋派作品《谁是谁》那么长。一开始维特根斯坦找到了卡尔·克劳斯作品的出版人恩斯特·贾赫达；接着是威廉·布劳米勒，他出版过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维特根斯坦曾经对此作品充分赞许；最后维特根斯坦又去找了路德维希·冯·费克尔，他是先锋派杂志《燃烧者》的出版人，维特根斯坦一战前曾给《燃烧者》捐助过钱，受过维特根斯坦捐助的还有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在里尔克的支持下，费克尔最终将受理

出版维特根斯坦著作事宜转交给了英塞尔出版社——但英塞尔出版社还是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这几个月以来，维特根斯坦收到了唯一一个愿意出版他作品的肯定答复，不过前提要求是，他得自己承担印刷和交付书本的费用。维特根斯坦严辞拒绝了这个条件。首先他自己已经身无分文。其次，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用这样的方式强迫世界接受这么一个作品，是小市民的、不正派的行为”，就像他在1919年10月写给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信中说道的那样：“写作是我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必须以一种正常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作品。”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反正在维也纳不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不行。难怪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秋天心中卷起了绝望的风暴，这段时间，他日复一日在库尔曼街的师范学校学习，与他一起学习的同学起码比他小十岁，也都没有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现实生活背景。

和维特根斯坦1919年秋天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段直到今天都是他生平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片段。因为明显有某些（或者以前有过）他在这段时间的日记片段，里面讲到他在一个和同性恋者聚会相关的维也纳普拉特绿地边公园里寻找认识伙伴的机遇，并且找到了。[57]这些经历的可信度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虽然有一个传记作家直接看到了这个日记片段，但是这些片段始终没有公开。不过没有争议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遗产管理人几十多年来为他的同性恋倾向保密。后来的日记片段明确表示了，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和自己的性取向处在一种道德上极端紧张的关系中，最终他将和性相关的事情都视作是道德败坏和肮脏的。这种状况也特别适用于他去普拉特公园的那段时期，在他自己的眼中亦是如此。这样，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段有可能存在的公园经历也吻合当时维特根斯坦的心情状态：1919年秋天，他跌入了一个毁灭性的人生新低谷。

在这几个月中，起码作为哲学家来说，维特根斯坦被他人所理解的巨大希望就寄托在伯特兰·罗素身上了。因此，维特根斯坦在他诸多信中一次又一次要求要尽快同罗素见一次面，以便能够在谈话中详细解释清楚他作品中的重要洞见。在此期间欧洲大陆仍是一片废墟。维特根斯坦没有钱，而罗素——他作为和平主义者在一战期间甚至进了监狱——没有有效护照。不过，两人最终还是成功地于1919年12月中旬见上了。他们是在位于奥地利和英国距离线中点处见面的，也就是在荷兰。那个时候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在荷兰，他逃到荷兰后日日受怕，担心荷兰政

府要把他引渡给协约国。

海牙的三个点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在海牙共同度过的四天是这样的：他们住在海牙的一个宾馆里，维特根斯坦一早会去敲罗素的房门，然后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都会和罗素展开对话，向罗素详细解释他的著作。当罗素——他想要努力理解“言说”和“显示”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完全决定了对其著作的理解——拿来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点时，他们的学术争辩可能达到了一个高潮。罗素拿着这张纸走向维特根斯坦，要求他让步承认，在这张纸上毫无疑问存在三个点，所以下面这个表述“世界上起码存在着三个东西”是真实和有意义的。[58]但是维特根斯坦万分确信地对此进行了争论！因为根据维特根斯坦最深的哲学信念，关于世界整体的状况，并不存在什么有意义的表述。

维特根斯坦认为，画在纸上的那三个点，就其所处具体的上下文关联来看，只能有意义地做出这样的表述：“在这张纸上有三个点”。因为这个命题涉及的是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件事情。这个命题不仅有意义，而且是真实的，明确所指就是罗素手中的那张纸。

事实的图像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论著，有意义的——有时候也许也是真的——命题最好可以理解成是事实的图像，人们从语言的角度把这些图像/命题的内容看成是对世界上某种事实存在形式的精确描画，如此，这些命题/图像才可能是真的。

2.221　一幅图像所表现的东西是其意义。

2.222　它之为真的或者假的，这点取决于它的意义与实际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

4.016　为了理解命题的本质，我们考虑一下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描画它所描述的事实的。

一个命题是真的，这体现在人们认为某些事实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这些事实的图像也确实真实地存在。或者换句话说：当命题所论述的内容同时在事实上也确是实际情况。根据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最开头的两个命题阐述：

1.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

1.1　世界是事实而非物的总和。

理发师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命题“世界上存在着三个点”会有什么问题呢？当时罗素在宾馆房间里，大概是一边用手晃动着那张画了三个点的纸，一边追问着。现在可以这么解释这个命题的问题所在：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命题1.1已经明确了，“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本身并不是一个事实，而只能是“事实的总和”。

关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物的总和之命题，维特根斯坦拒绝承认这些命题的有意义性，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世界本身真的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只是诸多事实之中的一个——世界必然也得同时包含作为事实之一的自己。也就是说，世界一方面被定义为是某些元素的集合（这里指的是事实的总和），同时本身又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元素（这里指的是一个事实）。那这就构成了一个逻辑上的形式主义，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个集合包含了同时只作为集合中元素之一的自己，那么这就会导致——根据维特根斯坦坚信的那样，不是别人，就是罗素自己一次又一次展示的那样——逻辑上的错综复杂，最终就会产生不可控制的诸多矛盾。

关于集合论的悖论，罗素本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理发师悖论，这是他在1918年想出来的。罗素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叫做奇西克的村子里，只有唯一一个理发师，他给且只给村子里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问题当然就来了：谁来给这个理发师理发呢？

要毫不矛盾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如果理发师不给自己理发，他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人”，那么根据规则，这是理发师理发的对象范围，结果就是他得给自己理发。一旦他给自己理发，他就又违反了之前定下来的规则“只给村子里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希望奇西克的理发师是个光头，问题就能解决了，只不过这是个回避问题的玩笑说法，无法解决集合论里无法避免的难题和矛盾。

而在语言哲学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理发师悖论”，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一旦世界被定义为是“事实的总和”，那么世界本身就不能再是一个事实的原因。如果世界本身不再是一个事实了，根据《逻辑哲学论》里的观点，那么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状况，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命题了，也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命题如“世上存在着三个东

西”。例如也不会有这样的命题：“这个世界存在”或者“这个世界不存在”。

所以，不管罗素在宾馆房间里如何用手晃动着那张纸，认为世界上起码存在三个东西的观点，都不能有意义地言说。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跳跃点在于——这个观点同时也显示了，上述命题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在当时那个情境中是很清楚的、没有问题的、真实的。因为事实情况确实是，纸上是真有三个点的。那么，亲爱的伯特兰，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呢？是否就仅是你自己感到了限制？毕竟可以说出来的一切，都清楚和毫无矛盾地显示出来了。

梯子上的罗素

身在海牙的罗素不满足的恰恰就是意义的界线。这尤其体现在他在自己的不满意中还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驳维特根斯坦的论据，这个论据看似有说服力：《逻辑哲学论》在有意义的命题和仅是看上去有意义的命题之间划定了边界，根据这种边界划分的情况，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文《逻辑哲学论》大篇幅上肯定都仅是由无意义的命题构成的。

我亲爱的路德维希，我来问你，像这样一个命题“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和另一个关于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两者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对此，维特根斯坦可能会平静地答道：“亲爱的伯特兰，你要是这么看，当然也是对的，关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我恰在我著作的最后两个命题中明确提到了。”你拿来看看：

> 6.54　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着说明的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于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梯子之后，他必须将梯子弃置一边。）
>
> 他必须放弃这些命题，然后他便正确地看待世界了。
>
> 7.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理解了吗？亲爱的伯特兰，你是否理解了？显而易见，我的书根本就没言说什么有意义的内容，但是，它倒是显示了些东西。作为一部著作本身，它做的事情仅仅就是“显示”，而且是显示了“另一个世界”，就是说，这部著作显示了另一种世界观：更清晰、更诚实、少些伪装，同时也是一种惊奇的、更谦虚的、更没理由的、更有意义的世界观。最重要的是，我的著作显示的首先是一种更为自由的世界观；更为自由在于，人们在这种新世界观中不必再用论证的方式来思考某些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因为人们觉得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体验到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它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世界，正如这个作为整体的世界“实际上”存在或者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它也是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怀疑的世界。

我的书要求读者采纳这种自由的世界观。这就有些像，亲爱的伯特兰，像是我现在用手指指向外面天上的那朵云，然后问你，你是不是也觉得看到的那朵云像一只狮子，还有，你看那里，现在它看上去更像狮子张大的嘴巴。那儿是嘴巴，后面是尾巴……你看，你也看到了吗？还有那儿，是一对翅膀，还有两个眼窝，它们正在风中移动着……当然会在某个时候达到某个点，这个时候所有解释和指示都必须结束，这时候你自己就会看到，你必须能够看到，它也会显示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在前言里面写道：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理解这本书，他“自己已经想到过表达于其中的思想——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给罗素说了这么多都是徒劳的。罗素并没有看到云朵那么丰富的形状，没有洞察到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他看到的东西和维特根斯坦看到的在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有一把梯子可以通向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可罗素自己有着充分的理由，于是当他刚刚扶着梯子往上爬了第一根横木之后就停下来，无论如何不想再继续往上爬了。对于和维特根斯坦在海牙的讨论，罗素在一封信中这么总结道：“维特根斯坦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59]此话不假，甚至还点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维特根斯坦于1919年圣诞节再次回到维也纳，他感觉起码已经对罗素把书中一些内容点阐明过了。而罗素作为在全世界享有声望的哲学著作畅销作者，准备要给自己过去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写一篇简短前言。这样看来，就算维特根斯坦没有成功地给罗素解释清楚“言说”和“显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语言哲学意义何在，起码维特根斯坦找到了新希望。他立即给出版商费克尔写信说，有了罗素的前言，他这部著作的销售机会就可以得到飞跃性提升，那么出版机会自然也就大增。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愿望还是落空了。费克尔依旧认为，这本书无论如何都不会畅销。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

维特根斯坦的书就算出版了也无法畅销，可能尤其也因为，出版商费克尔质疑书中内容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度：那些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命题是否有意义？除了少数逻辑学家和集合论学家对此还有特殊的阅读兴趣之外，谁还会关心这个问题呢？又有什么是依赖于这个问题的呢？这最终难道不是件无所谓的事情吗？这恐怕只是关于纯粹话语表达的一种无用争论吧？如果从我们具体日常生活的视角来看，实际上这些猜测可能看上去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起码对于现代哲学的自我理解来说——还有其众多具有核心意义的难题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现代哲学的所有一切都得依赖于这个问题。光是想想笛卡尔和他提出的怀疑，这个怀疑影响了整个现代哲学：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吗？它的存在方式真的是我们平常体验到的那样吗？它的特点就是我们所描绘的那样吗？还是说，这个世界有没可能是一个万能的魔鬼创造出来的幻觉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究竟是否存在？

这听上去是个重要问题，也是个绝对存在的问题。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论文揭示出，这个认识论方面的根本怀疑，“这个世界究竟是否存在”纯粹只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里面提出的难题实际上是个毫无意义的经典难题——作为一个能够清晰思考的人最好就不要去管这个问题了。因为：

> 6.5　相对于一个不能说出的答案而言，人们也不能将（与其相应的）那个问题说出来。
>
> （与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谜是不存在的。
>
> 如果一个问题终究是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它也是可以回答的。
>
> 6.51　如果怀疑论欲在不可提问的地方提出疑问，那么怀疑论并非是不可反驳的，而是明显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只有存在着问题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怀疑；只有在存在着答案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问题，而只有在存在着某种可以言说的东西的地方才可能存在着答案。

就这样，这个难题随着维特根斯坦的解答得到了完结。没有得到解

决，也没有被反驳。不，完结，就是完成了，其实意思就是搁置，因为人们已经认定这个提问本身是错误的。或者来举个时间上更接近些的另一个例子，想想马丁·海德格尔，他在1919年冬天是如何用那些最无条件的问题来让他的学生听众受到激情鼓舞。他的问题说的并不是“有东西吗”（比如说一张纸上的三个点），而是“是否有一般东西”。这种表达方式，最开始听上去是有意义的，但是最后却又可能不是如此。但这一切肯定不是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对于改变世界的力量完全麻木，这种力量又隐藏在海德格尔的问题驱动之后。相反，维特根斯坦不正是在他的著作中这么写道吗：

> 6.522　的确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它们就是神秘的事项。

> 6.44　神秘的事项不是世界是如何的，而是如下之点：它存在。

同海德格尔一样，维特根斯坦也是从那种最初的惊奇中无法自拔，他们都惊奇于，有一般东西。特别是惊奇于，只要我们睁开眼睛，这些“东西”在我们面前就直接显示为是充满意义的，甚至是可以展现真理的。和海德格尔想法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一般东西”到底是什么状况，更别说再进一步问世界是什么，这些问题完全没有任何伪装，其中隐藏着一个极度深奥的哲学之谜，这个谜的实际含义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他还坚信，在语言表达方向上的每次尝试，不管尝试时间长短，都必然终结于语言的胡说八道——如果不是终结于更糟糕的东西的话。

风暴之下

正是在1919年9月的那些日子里，维特根斯坦心中刮着无意义的风暴，他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就如同被一扇“紧闭的窗户”所隔绝。与此同时，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全程经历他创作能力的真实井喷：“面孔，问题的视野——富有成果的解决方案的真实步伐——原则上的新审视，最令人惊讶的表述和特色的可能性，真正的配方组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是溢出的，就像水漫出来一样，你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时间上都要能够抓住，控制住这一洪流还要让它系统化地完全流淌出来。”海德格尔在1919年9月9日从康斯坦茨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写信给身在弗莱堡的妻子，信中曾这么说道。

海德格尔隐居到这个农庄几周时间以便专心写作。可是，个人生活中的严重困扰还是在折磨着这位来自黑森林的思想家。他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就在几天之前，他的妻子埃尔福丽德给他写信，承认和她以前的大学同学之间保持着男女关系。她这个曾经的大学同学名叫弗里德·凯撒，是个医生，在弗莱堡大学的校医院工作。在妻子做出坦白之后，海德格尔一开始在给妻子的回信中表现出了极度的信心十足和想要和解，后来，他指出这样的一种状况就像是生命哲学的挑战，他必须要化解这种挑战，且必须独自解决：“今天早上你的信到了，信里面写了什么，我已经知晓了。对此说太多的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很细，其实对于事情没有益处。你用你那简单和确切的话语给我说过了，这就已经够了……弗里德爱你，我早就知道了……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如果我对此有一点点感到生气的话，那么这对我来说就太幼稚了，而且也是在浪费我的精力……我已经研究了好多天的交通互动问题，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新的人。我发现，他们从根本上对我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就如同在窗户外边路过的那些人——你看向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重新回忆起来……接受伟大的召唤去从事一个超越时间的任务，这总是必然要被判处承受孤单，并且其必然本质就是旁人会对此一无所知——相反，要把孤单的人看成是富有的、值得尊敬的、大家争相谈论的——受到尊重和被议论的人，然后再感到惊讶，当孤单的人从他那方面遭到了巨大的轻视（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搁置在一边）。”[60]

又是他们，那些“像是从窗户前面”走过的人！所有那些平凡的其他

人，和海德格尔无法建立起真正联系的太多人，可能他连建立联系的意愿都没有。这些人对海德格尔心中充满创造性的思想风暴毫不知情，在这种精神方面的根本不对称中，海德格尔拒绝了这些人，因此也必定伤害到这些人。如同命中注定般他被判处了孤独，这种孤独有着浪漫的图景，有着超人的难题，这些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得独立解决的难题，而且肯定无法得到他人的理解：一个孤僻的天才。这是海德格尔对自己的理解，而且他一辈子都会这样。

模糊的目光

海德格尔在给埃尔福丽德的回信中提到了哲学家站在窗户后边进行怀疑思考的画面，对于这样的画面，海德格尔在思考过程中最终甚至必定产生了这样的怀疑：他周围的人是不是作为人类而存在的？海德格尔提到这样一个怀疑的画面也并非只是一个偶然的隐喻。笛卡尔对现代哲学的影响是彻底而灾难性的，海德格尔在1919这一年对这种影响越发感到清晰：笛卡尔和他的怀疑思想实验，笛卡尔和他建立的论点“思考着、最终是在盘算着的主体是所有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把哲学缩小到了纯粹认识论，笛卡尔和他一如既往的二分法，也就是将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两个部分……笛卡尔是他自己的哲学敌人。他的思想标志着西方哲学最终不成功的转折点。

在1919年9月初的创作兴奋期，海德格尔已经看到了那个“超时间任务”轮廓——“原则上新的视角”艺术和驱逐到全新“问题视域”的艺术——这个任务不在其他，而在于将他的国家、文化，还有整个传统从主体哲学和认识论的现代邪恶魔法中解救出来，从纯粹盘算的理性和囿于自然科学的限定中解放出来。他觉得他周围那些处于西方世界的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都困在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一种根本错误的理解中。因为不经审视接受了错误概念，他们看待现实的目光投错了地方。因此，他们顶多只能模糊地感知自我、世界和彼此，这种模糊感就像隔着一片乳白色的玻璃去看东西。

现在再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目光的越发模糊了，但是这并不够。不，这种看待现实的目光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如此深入地侵入了我们在文化方面的自我理解，以至于在此期间，这种目光本身已经被当成是对世界最高和唯一真实的认识形式。回望过去，这种目光甚至被看成是冲破黑暗到达启蒙的一束光亮而值得庆祝。这真是恶梦成真啊！

不过，如果这是个恶梦，那也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中醒来。1919年秋天，起码海德格尔感到自己最终醒过来了：他开始十足坚定地在笛卡尔现代主体哲学理论和认识论框架之外独立进行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继续推进思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盒子之外”进行思考。在此，他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洞察实际上就是：并没有盒子！并没有分割好的经验的内部空间，也谈不上好像通过一片玻璃与所谓的实在隔开的思维主体的

内部空间。笛卡尔针对外部世界的怀疑论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现实“在实际上”可能是什么样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绝对隔绝，海德格尔通过更为确切的、毫无偏见的现象学观察方式逐渐展示出，所有这些怀疑论和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都纯粹只是伪问题，是不成规定的规定。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在这个哲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夏天给埃尔福丽德写信这么说道：“就像你早前有一次正确地觉察到的那样，我已经非常确信，我在很多问题上都超出了他（胡塞尔），比他拥有广阔得多的视野。”[61]这个时候海德格尔和他的妻子正处在婚姻矛盾的高峰，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妻子当成是哲学研究新道路上的尊贵知情者，与她主动进行沟通。不过紧接着的几行信，海德格尔又重新把自己描绘成是一个孤独的智者和观察者。海德格尔在1919年9月间写的信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对他的妻子进行信仰方面的表白，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再肯定能从内心深处真正去爱他的妻子。如果她已经选择站到另一边去，那怎么办呢？弗里德·凯撒作为富裕市民，经济状况要比海德格尔好得多，如果他把埃尔福丽德拉回一段纯粹常规的——也就是说肯定带着金钱吸引力的恋爱关系中，那该怎么办呢？海德格尔不再自信了。

这些天里，海德格尔寻找并找到了唯一确信的东西，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一种确信：即对于他的工作、创作和思考的一种确信。在这些领域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被分隔开的，也不会再撕开怀疑的裂缝。这里所有一切都化为一体，化成了创造的极度兴奋！唯一遗憾的是，人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绝对亢奋的魔法地带——在某个时候，海德格尔必须又回到那个弗里德也在其中的世界：“……这种绝对的生产力也同样有其可怕的地方：它看起来是在创造，并且你在创造时体验了绝对的自己——特别是当这种状态慢慢消退，疲劳与松弛来临，你又会重新寻求回到环境中来——然后我就知道了，我又完全和绝对地在我自己这里，首先是在问题和精神的客观世界这里——这里没有陌生性，这里的外面没有任何东西经过，只有你自己跟着走——在创造性的生活中所有陌生性都消失了——那样在自然环境中站在对岸边上就愈发分裂和凌乱……”[62]

这几天里“它”一直在海德格尔身边环绕，在他体内激发了极大的创造力，简直是和他一起穿行奔跑。这里说的“它”指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尚新的无意识理论中的“本我”，本我是弗洛

伊德人类人格构成三个基本概念“超我——自我——本我”中最低的那个层次，在每个主体受到本能控制的深处，负责实际上的创造活力。海德格尔的“它”不是这个“本我”，他的“它”在其思想的早期就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方式和范畴的作用。“它”是一种同样可怕的——或者我们可以更好地用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进行表达——神秘的“它”，在“有什么”的问题中“它”才能真的显示出自己。“它”超然于主体和客体二元论（“绝对的在我自己这里和在客观世界这里”），也超然于主动和被动的二元论（“你自己跟着走，并拿着一起走”），还有内和外的二元论（“这里的外面没有任何东西经过”）……“它”在概念上根本就不容易理解。就算是对于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来说也是不易理解的。但是去体验作为所有意义和存在的创造性根源的“它”，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从今往后都是无法拒绝的。他将会终其一生来为“它”寻找一门适合的语言。

共同孤单

海德格尔在1919年9月份写的信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证明了，思想家海德格尔在多深程度上把他的哲学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而且已经紧密到，海德格尔完全把他在婚姻里遇到的挑战和哲学研究平行化了。他把他那位摩登的妻子埃尔福丽德所走过的婚姻弯路视为和现代哲学本身走的弯路是一样的，也许再没有别的哲学家这么做过了。在这个思想的黄金之秋，这平行的两个方面都将极度令人不悦的事加在海德格尔身上。这些令他难受的事情却也令他更加坚强和高产，因为这些痛苦使他可以在分析思考的绝对强度中去完成他认定的真正任务：无情和绝对客观地向本质挺进，摆脱所有不真实、纯属杜撰和虚假之物。海德格尔1919年9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对于你的认识，我并没有生气——我怎么能生气呢，我每天都要在绝对客观的态度中去体验认识的无情和辛辣……与认识相较而言，生命的原始力量更为深沉和完满，而我们整个哲学的毛病就在于，把认识放在了哲学的其余问题之前——以至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丑化，且还受到了悖论的牵连。"[63]

看透表面，摒弃传统，与虚假斗争，无情地向事物核心挺进，让真实在各处突破出来。1919年后，肯定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绝对不光是哲学家这么说。所有这些概念（表面、传统、虚假、伪装）也特别被用于在文化方面已经站稳脚跟的、一战之后在德国继续加剧的反犹主义。

但是海德格尔这段时间的任务还不是明确的政治任务，其极端性是有限的，例如在"问题体验"方面首先仅限于哲学想象的内部空间。在"问题体验"的情况中，极端性表达为一个关于"有"之实际意义的普遍问题，此问题不受所有内容方面预先规定的限制。

在更简单、更不受传统约束、更普遍，尤其是更不带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简直看上去就无法自问。而且也无法回答。是的，有东西在"此"，这点有目共睹。甚至有一整个世界。不过，坚持惊叹于世界的纯粹此在或者被给予状态，肯定不是一种对待世界的自然态度和毫无前提的态度，而是要求——就像海德格尔自己特别强调的那样——一种加深或专注沉思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与日常的和远未反思的此在方式毫无关系，而我们一般就是以日常的、未反思的此在方式穿行于生活和世界中。

两个怪人

让我们试图想象有两位男士，他们一起在城里溜达——然后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 “这世上总有东西，这是多么特别啊！真是令人惊叹：那儿！还有那儿！那儿！你也看到了吧！”

> 另一个人点了点头说：“是的，我看到了。它也向我显示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总是在想，真正神秘的事项不是世界是如何的，而是它存在。”

这是多奇怪的两个人啊！但是，这场对话在1919年绝对有可能发生在马丁·海德格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哲学方面人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两个怪人完全可以明白对方说的话。只是海德格尔会乐意继续谈一下“有”的意义，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不会特别继续探讨。因为其中一个人（海德格尔）猜测的具有开拓意义的问题，即突破到对存在进行没有错位的真正认识，恰是另一个人（维特根斯坦）认为的仅仅是可以预见的瞎折腾，是由于语言产生的伪问题。

周围世界优先

从1919年起，海德格尔认识到哲学——最迟从笛卡尔算起的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纯理论思考的方式当成是最原始和真正的哲学方式。正是这一点把实际情况弄得乱七八糟，并且还不可避免地编织出认识论伪问题的一整张网，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笛卡尔的怀疑论：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实在性？因为这个问题的产生本身仅是源于一个理论上的态度，根据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坚信的观点，把这样一个问题放到哲学领域里面压根儿就是错的：

> 对周围世界的实在性进行追问（与此相对的是，全部实在性都已是一种经过多重变形、脱弃—含义的推导），意味着把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搞乱到一塌糊涂。周围世界的东西在其自身有它真正的自行证明。真正解决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难题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它根本就不是个难题，而是一种荒谬。[64]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最初并不是当下这种实在性，而是一个环境周围世界。而这个“世界化”的周围世界总已经是一种源始的、带有意义的指引整体。只要人们继续追随这些指引，最终这些指引就会指向整个意义世界。按照海德格尔的信念，从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特殊的世界被给予状态终于再次得到了我们的一瞥。因为在真实情况中，我们已经荒废和忘记了这样一瞥以及和这样一瞥关联在一起的那种对生存的洞察——这荒废和遗忘给主体自身和文化整体带来了严重后果。作为人类此在的主体，要是只把派生出来的理论通道当成是源始的，那么他就由此在理解整个世界通道方面远离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世界化力量。1919年，海德格尔把这种对本真和源始的整体文化性的背离称为一种“意蕴的褪色”：世界的褪色、他人的褪色、自我的褪色。再次借用笛卡尔的窗户比喻来形容，人们仅仅通过理论来感知世界、他人和自我，这就如同隔着乳白色的玻璃来感知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伪造的世界中，以及一种被错误奠基的相处中的错误生活。

这样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重新赢得世界的现象学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带有存在主义的特性：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早期阶段，就已经产生了对当下技术时代及其包罗万象的物化逻辑和利用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此批判始自海德格尔，持续影响着20世纪和21

世纪的批判理论。用狄奥多·维森伦德·阿多诺最著名的格言来说，就是“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无论如何也没人比1919年起的海德格尔更加坚信这句话。因此，在海德格尔存在理想的意义上，要求达到的是完完全全源始的、不伪装的、真正的“此之在”！（阿多诺自然是没有提出此疗法方面的要求。）从我们的时代回望过去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海德格尔与他的哲学纲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一战后德国环保运动：整体性、环保意识、对技术的批判、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早在1919年，所有这些都是海德格尔相关思想的核心主题，他呼吁在所有生活状况中的真实性和不加伪装，当然同样也呼吁在本来的周围世界中有组织性地生根和固定下来，即：各自的故乡、自然风貌、风俗、习惯、方言和属于家乡的所有一切。人类只有在他的故乡，也就是在他自己的周围世界中才能真正达到内心的完全真实。对于海德格尔自己来说，众所周知他的故乡就是黑森林。

在民族真实性和坚强意志的本质性中，已经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了。而且，与此相伴出现的还有些黑暗之处。

真实性突破而出

整整一年之后的1920年9月，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依旧处在（或者说已经重新处在）满满的创作兴奋期——而且他又和家里人分开了。这次他是隐退到了家乡小镇梅斯基尔西的哥哥弗里茨家里，并从那里给家里寄回食品包裹，因为那时候食品危机也笼罩着弗莱堡：

> ……令我挺高兴的是，我工作很好，也充满自信……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一鼓作气，劲头十足地“勇往直前”，“穿越障碍”。早晨我从7点工作到12点，接着“小憩”一下，然后下午从2点到7点绝不受任何上课或者访客事务的干扰——一直处在精神抖擞的工作状态中……要是晚上我觉得累，我就——可别惊讶——和爸爸还有弗里茨一起玩纸牌游戏“66”，我会玩得很投入……到了睡前我会分心——不然就是过分沉迷在哲学中。——
>
> 我亲爱的小心肝，我衷心地吻你，一次又一次——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和咱们的小宝贝一起都高高兴兴的。我亲亲你们俩。
>
> 你的小黑人[65]

他们一家几个人坐在一块儿——马丁、弗里茨和他们的爸爸——正打着牌。以他们的方式来看，这是一个黑森林地区真正和谐的家庭。但是在这个9月，海德格尔的思想兴奋也有一种消极因素。在这几天里，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在井井有条中带着压抑。因为埃尔福丽德这几天还是一直卧床，她由于生育次子身体大为受损。次子名叫赫尔曼，于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弗莱堡。海德格尔在妻子生产期间，包括整个八月，都待在梅斯基尔西。在这几周里，埃尔福丽德和小约尔格都得靠一个女性好友照料。直到2005年才曝光了一个秘密，埃尔福丽德和海德格尔在1920年初就已经分开了。海德格尔并不是埃尔福丽德次子的亲生父亲。赫尔曼是埃尔福丽德和弗里德·凯撒的非婚生子。海德格尔当时觉得没有离婚的理由，亦没有不信任的理由，恰恰相反，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通向真正婚姻的一次机会——只要不去考虑他所深深厌恶的市民阶层那些错误和虚伪的社会规约。埃尔福丽德生产三天之后，海德格尔就已经找到了支撑他信念的合适话语：“我经常在想，关于婚姻的那些大多数说法是多么苍白、不真实和多愁善感。难道我们不可以在生活中构造一种新形态——不带计划，没有目的——我们只需要让真实性在各处突破而

出。”[66]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来自大城市柏林的瓦尔特·本雅明博士肯定会对海德格尔追求自由婚姻之爱的意志感到自豪，不过他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并不知道这种意志是怎么回事，他有的只是别的烦恼。

和媒体相关的一些职业

在本雅明取得博士学位一年后，本雅明家还是一直处在和以前一样糟糕的生活旋涡中，受到不安全的生存威胁。当本雅明的父亲于1919年8月不告而来时，这个旋涡也开始侵袭他们。在1920年春天，刚刚为人父母的年轻本雅明夫妇——住所、工作和金钱他们一样也没有——除了搬回到柏林德尔布吕克街上的父母家里之外，最终也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在父母家里矛盾如期升级。

本雅明原则上拒绝长时间住在他父母宽敞的别墅里。对此，他的父亲用经济制裁进行了回击：最终不再发给本雅明固定的生活费用，这样就把本雅明逼入了窘迫困境。于是，本雅明坚持要让他父亲提前支付起码一部分遗产给他。当时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提出这个要求并不聪明。不过不管别人怎么建议，本雅明都坚持要这么做。1920年5月，双方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1920年5月26日，本雅明给他的朋友肖勒姆写信介绍了相关情况，信是这么写的：

> 事情的结束方式就是彼此彻底反目……我拿到了提前支付的部分遗产3万马克，另外还有1万马克，家具一件也没有拿，我获准离开我父母的家，也就是说，我是自己离开的，不是他们把我丢出来的……当然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暂时已经闹翻天了，后面还将会发生什么，没法预料。能肯定的是，我们现在必须得有个住处，在哪儿都成，有了住处我们才能去谋生……你那边有关于住房的任何信息吗？……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什么信息能提供给我的话，我感激不尽。城里和乡下的住房都行，尽量不带家具，要尽可能便宜，可以供两个家庭居住的乡下住房，等等……然后——但是我得先在差不多人道的环境中生活——我就必须得着手写“大学授课资格论文”了，……虽然在伯尔尼成为一名大学讲师的希望已经泡汤了。出于形式方面的原因，最多也就只能拿到大学任教资格。我的岳父岳母虽然无法给我们提供非常强有力的物质依靠，但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了，而且他们愿意为我们做最大程度的牺牲。他们坚持我得成为书商或者出版商。如今我自己的资本家父亲也否定了这条路。不过，很有可能我必须得放弃实现原先的工作目标了，无法成为大学老师，无论如何可以在从事市民阶层某种职业的同时，在晚上私下进行我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我还不知道我要去从事市民阶层的

什么职业。（这个月我靠着自己的三篇笔迹学研究挣了110马克）……我非常努力地想要找到一份教师的职业。

布洛赫把我推荐给费舍尔，他正需要一名教师，但是他最后找的不是我。你知道不，我有一个很宏大的出版计划。

致以诚挚的问候，我期待你很快就给我回信。

你的瓦尔特[67]

如果人们忽略这封信中卓越的谈话口吻，那么这些文字内容也完全可能是出自1997年、2007年或者2017年柏林的一位年轻博士毕业生：住房市场遭遇了灾难性的冲击，为人父母者彻底紧张了，大学财政投入持续缩减（该死的资本主义！），日托中心的儿童名额都很紧张，当什么都行不通时，在乡村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公社里生活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可能的选择……至于职业前景？本雅明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跟媒体相关的一些职业吧，最好是在出版行业。

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位28岁天才的形象，他行事不按计划，经济上受着家庭的溺爱；他无疑自视为天才，但他渐渐明确地认识到，世界并不期待天才。在这段时间，本雅明唯一具体的经济来源就是做笔迹分析。这跟今天的生物指数咨询师或者风水先生差不多。

1920年，本雅明踏上了直接通向学术的道路，这条路过于雄心壮志，他成了不受保护的失业者。他把拿到的3万马克用于快速开始新生活，但是三年之后，剩下的钱就已经不够给他自己和家里人买一个夹心小面包片了。如果说本雅明从此以后生活还有什么稳定模式的话，那便是他保准会根据自己确信的直觉恰在不对的时间做出不对的决定。在这封信里，很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本雅明生活中一个鲜明的稳定特点，它涉及本雅明和他称之为朋友之间的交往方式。因为从1920年开始，我们很难从本雅明的亲笔信中找到他不向朋友开口请求特殊经济援助的例子，不管他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的口——这些经济求助还连带有各式的抱歉、借口和解释，但他给别人许下的暂时约定或者回报可惜都没能兑现。因此，本雅明和肖勒姆之间的友谊——直到1920年秋天，他俩才开始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对方——是本雅明友谊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因为这段友谊笼罩在持续的请求和利用的阴影之下。另外，本雅明比肖勒姆年长几岁，因此从一开始本雅明就在成熟度和学识方面占有一

定优势。还有，本雅明最喜欢在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知识等级中去维护一段友谊，这也是本雅明交朋友的一个典型模式。

刚刚学会飞的小鸟

本雅明在结束学业后的经历是痛苦的，也是全然坦诚的——为了应对那种被认为是痛苦的、全然影响人生道路的大学毕业后的生存选择，人们要么集中精力在一件宏大的工作上，要么选择全新的职业道路——因为这一生存阶段充满令人不安的无助感，今天的社会学称之为“比目鱼阶段”。不出所料，本雅明这两个策略都没选。虽然在伯尔尼找到一份带薪岗位的希望已经落空了——他的妻子也是努力在生活昂贵的瑞士寻找一个固定职位，但结果依旧是徒劳的——本雅明还是坚持计划，写获得在大学任教资格所需的论文。不管未来他获得大学任教资格的希望有多么渺茫，在这些年里，大学始终是他向往的职业归宿。追随着学术趋势，尤其是哲学趋势，他脑海中浮现出的论文是关于“认识论的特别主题”，具体来说“落入了语言和逻格斯问题的大范围中……”。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本雅明打算用自己革新的方式来开发这个在当时已经研究得极其深入的领域，也就是要回溯借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语言哲学。本雅明认为，尤其是在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的著作中暗含有一些思想主题，这些思想主题接近于本雅明自己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直觉——就如本雅明在他1916年的早期著作《论语言，尤其是人类语言》[68]中已经写到过的，语言哲学直觉方面的内容那样。本雅明的研究方式在于，通过回溯借用一个人们久已遗忘的传统，来使自己的论点合理化；在拥有逻辑分析性质的现代语言哲学和中世纪通过神学符号表达出来的语言推想看似并不存在的关联中，去碰撞出火花。这个计划本身看上去是个出色的计划。只是有另外一个人在本雅明之前已经想到了这个计划，并且在1915年到1916年通过写获取教授席位论文的方式独立执行了这个计划。这个人就是本雅明早已记恨的、以前在弗莱堡的大学同学——马丁·海德格尔。本雅明于1920年2月通过肖勒姆知道了海德格尔相关著作的存在。“我先前并不知道海德格尔的书，”本雅明在他的回信中袒露道。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他于1920年12月将如下评价转告给肖勒姆：

> 我读了海德格尔关于邓斯·司各脱的书。撰写这么一本著作，只需多做些劳累活儿和掌握经院哲学的拉丁语，其他都不需要。尽管有哲学来装点门面，但从根本上说这仅仅是一本好译著。真是难以置信，有人竟然能够凭着这样一本书取得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本书作者对李凯尔特和胡塞尔进行了无耻地阿谀奉承，这并没有让阅读变得愉快。从哲学角度来看，本书对邓斯·司各脱的语言哲学实质

一直未有探讨，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任务。[69]

“无耻地阿谀奉承”、“劳累活儿”、“对实质未有探讨”……人们认得这种措辞风格，就来自海德格尔的笔下。海德格尔一旦在私人信件中开始对某位备受推崇的同事的某部作品进行评价，那就是上面这种措辞风格。对待海德格尔的学术追求和为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写作的论文，乃至到选词方面，本雅明表现出来的态度，恰恰就是海德格尔对待他人的态度：同样攻击性十足的傲慢，同样的无情，同样想要完全摧毁对方的意志。这两位同时代的人彼此水火不容，却在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上体现出了最高的亲缘性，相似程度就像异卵双胞胎一样。双方都感觉到了他们受到相似的影响，有着相似的兴趣，可是作为两位成年人，他们的内心又可能特别真切地恨着对方。

海德格尔凭借1916年题为《邓斯·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70]的论文获得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事实上，本雅明计划中同样是为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写的论文，构成其系统框架的那些思想内容，也正位于海德格尔论文的中心。两位思想家要论述的内容——他们把邓斯·司各脱当成理论支撑的来源——都是在说人类语言（还有凭借语言进行的思考）与上帝语言的关系。上帝思考、描述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人类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有的话，那么怎样更准确地去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语言和上帝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相似之处，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人类究竟怎样在某个时候真正地认识上帝创造的世界呢？

海德格尔受天主教会奖学金的资助，在他的论文中详细探究了上述问题。本雅明原本要彻底研究的卡巴拉和妥拉的犹太传统问题，也恰恰是这类问题——就像他1916年在第一篇语言哲学论文《论语言，尤其是人类语言》中已经做过的那样。尽管本雅明在初次读完海德格尔的论文之后作了评论，但他后来仔细阅读之后慢慢有了新的想法，他越发怀疑，自己的研究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成功。就在他写信评论海德格尔的论文以期彻底摧毁海德格尔的几周之后，他再次给肖勒姆写了封信，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 迄今为止，我……在研究之后变得小心谨慎，也产生了疑虑，不知道追求经院哲学的相似之处并将其当作主导思想对不对，不知道这是不是条弯路。因为对于我的研究问题来说，海德格尔的论文可能确是给出了经院哲学思想中最本质的内容——顺便一说，他是

以未经仔细审察的方式给出的——但他的论文也已经用某种方式简述了经院哲学的真正问题。所以我或许会先再看看语言哲学家们……[71]

看看语言哲学家们——在1920年前后，这就意味着要好好调查一番：具体看看谁？卡西尔？维特根斯坦？罗素？摩尔？胡塞尔？弗雷格？皮尔士……？或许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全面熟悉当时各个方向上创造力爆发的研究状况，不仅超出了本雅明的能力，也超出了他的兴趣，他的能力和兴趣促使他随即放弃了整个计划。从1920年11月起，本雅明又回到了德尔布吕克街的父母家里生活。最近几周，本雅明深受严重抑郁症的折磨，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精神上处于瘫痪状态。他最终放弃了写作一篇关于语言哲学的论文来取得大学任教资格的计划。不过在他的人生中还有别的计划，例如翻译夏尔·波德莱尔的诗歌《巴黎风貌》[72]。他在1920年秋天，用非常本雅明的方式宣布他已经完全搞定了出版事宜，能够让海德堡出版商理查德·魏斯巴赫给他出版译著，甚至还可能由此赚些钱。1920年12月4日，本雅明对此时已经有些失去耐心的出版人说："我很难使我在翻译波德莱尔问题上的长时间沉默看起来可以理解。波德莱尔的基本愿望肯定也是给您交上一份尽可能完整的终稿。翻译工作要持续进行好几周，因为我前段时间经常生病……我想要补充的是，我——如果您在出版方面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倾向于给我自己的译著写上一篇序言，在其中用理论大致阐述一下'论译者的任务'。"[73]

本雅明之前在思想上已经为关于"语言和逻格斯"主题的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做了准备，那为什么不把这篇论文的写作放到自己的翻译工作之前呢？本雅明译著的序言其实和波德莱尔的诗歌还有自己的翻译工作都毫无关系，但也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工作就是徒劳的。本雅明给自己译著所写的序言——也就是题为《译者的任务》的文章，直到今天都还属于他最受夸赞和体系上最为清晰的作品。这篇文章事实上包含了一种独立的语言哲学的核心。

任务

试图在本雅明的波德莱尔译文和《译者的任务》之间建立一种系统的内在联系，注定只能失败，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联系。尽管当时第一版译著那寥寥无几的读者必定会这样猜测，因为《译者的任务》毕竟是这部译著的“序言”。根据其非常原则性的、归根结底形而上的结构看，这篇序言还可以被放到其余译著之前，但最好还是不要放在任何译著之前。此外，如果不看这篇序言的标题，它根本就不包含任何独立的翻译实践建议，而且连一个具体的翻译实践例子也没给出。这篇序言和后面翻译波德莱尔的译文之间唯一的关联在于，本雅明在诗歌中阐述了语言的真实本质，与此同时也讲到了译者的真正任务。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失去了其日常功能，即具体的信息传达。根据本雅明的观点，由此对于译者的任务来说产生了一个严肃的悖论：

> 一部文学作品到底“说”了什么？它传达了些什么呢？对那些领会了作品的人来说，它几乎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文学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然而任何想要执行传达功能的译文所能传达的也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说，它传达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74]

如果说语言的本质在诗歌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但是这种本质又不存在于一个人向其他人传达信息的能力之中——比如说让另一个人了解到一件事情（“你把雨伞落在我这里啦！”，“猎犬在客厅里睡觉”），那么一个译者的真正任务就不可能是将待译作品的内容尽可能忠实地从一门语言译入另一门。而译者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译者的任务令作为哲学译者的本雅明感兴趣。换句话说，本雅明作为一位哲学译者的范围条件是，在翻译行为中可以揭示出一种最终具有语言哲学意义的现象。

> 把握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真实关联需要一种权衡斟酌，权衡斟酌的目的完全类似于这种思路，即认识批判得要证明反映论的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在认识中根本没有客观性可言，甚至连要求客观性的可能都没有，因为我们在此面对的只是现实的影像。同样，我们也可以表明，如果译文的终极本质仅仅是努力向原文看齐，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译作。[75]

就像本雅明在其1919年写成的博士论文中揭示的那样，现代批评家的真正任务是，他自己必须成为一个作品具有创造性的共同创作者。译者的工作与此有相似之处：要以合适的方式来翻译一部著作，第一步要进行论证：不是要去翻译原作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不是在译入语中对译出文进行尽可能忠实的复制。

如果用比较直白的方式表达，那么本雅明的观点看上去也可以和翻译课程中一句关于翻译原则的常用格言联系起来：“尽可能的忠实，必不可少的自由”。那么现在认识的实际收获是什么？来自哲学的新推动力又是什么？

这个新推动力的根基是一个于中世纪就已存在的语言哲学的区分。后来此区分借力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戈特洛布·弗雷格的数理逻辑语言哲学而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弗雷格把此区分称为“指称”和“意义”之间的区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中这叫做“意指对象的意向”和“意指的方式”之间的区分。

如上区别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启明星”和“长庚星”之间的区别。这两个不同的称呼方式指的都是星空中的同一个对象，也就是金星。在弗雷格的术语中，这两个称呼方式有着同样的指称，但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叫法强调的是不同方面：一个强调的是太阳升起之前，另一个强调的是太阳落山之后。“意指对象的意向”——也就是一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是同一个，但是“意指的方式”却是不同的。

同一语言内两个不同的词以轻微差异的方式指向同一对象，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关系对于不同民族语言诸如德语和法语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具有范例作用的，尤其是不同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 相反，各种语言之间超越历史的亲缘关系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中。不过这种意指并不是任何语言单独能够实现的，而只有通过各种语言意向的总体互补才能体现出来：这种意向互补之总和即纯语言。既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比如词汇、句子、上下文关联是彼此排斥的，这些语言仍在意向本身中互补。我们只有区分开意指的对象和意指的方式，才能牢牢把握住语言哲学的基本法则。Brot[76]和pain[77]说的是同一对象，但它们的意指方式却不同。意指方式的不同在于，这两个词让德国人和法国人联想到同

一对象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这两个词不能互换……但是在意指的对象方面，两者指称的绝对是同一对象。[78]

本雅明借用赫尔德和威廉·冯·洪堡的思想阐述道，各种不同的语言并不仅仅是由于“发音和符号”而不同，而是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我们也可以说，用自己的方式让同一个对象（比如上文说到的面包）获得稍有不同或全新的方面。这些方面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涉及的方式并不是同一种意指的方式。在这个地方，语言哲学家本雅明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于1916年在他的文章《论语言，尤其是人类语言》中深深困扰过他。一方面，我们尽可以认为来自不同语言的两个词汇以不同的方式指称了同一对象——比如说我们讲“一个面包”——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到，他们指称的对象仅仅是从语言上真实地进行了界定：也就是最终通过“面包”概念确定了面包这个对象。在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情况中，两个名称都是用来称呼金星的，这里的金星依旧还是通过“金星”这个名字来确定其身份。换句话说，两个不同的词汇以及包括本雅明说到的两个不同语言系统涉及的对象，其真正的身份是建立在一个无声的前提条件之上，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作为所有语言基础的一种唯一真实的语言，即“真实名字”的语言。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真实的理想语言就是旧约中上帝的语言。

一种原始而基础的统一语言可以作为所有语言和所有意义的基础，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种想法也以各自的方式在思想上困扰着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那么现在本雅明对此的建议是什么？维特根斯坦指出，世界和语言有着同样的逻辑形式；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在我们之前（在语言上）就已经存在，这种先在性可以穿透意义。本雅明给出的解释和这二人都不同，他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用他自己的概念来说，“纯语言”或者“真语言”是上帝的语言。所以，人类作为能进行语言表达和研究的物种，其真正目标和任务必须是，使命名和交谈的直接统一尽可能接近上帝领会事物本质的方式（上帝总是能够找到确切的表达方式，不会疏漏任何一个东西的任何方面）。而且人类得通过创造一种语言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种语言尽可能准确地领会和指称世界尽可能多的方面。

诗人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所努力的恰是这点——这里就仿佛降下了理论的帷幕：在事物的本真中去命名事物的本质，使其本质彰显出来。在此目标上，译者的神圣工作就拥有了合法性；原作者在自己的语言中

选择了某种意指的方式，译者要在自己的语言中为其找到一个尽可能精确匹配的位置。译者的任务一直就是，通过译出语中的意指方式来丰富译入语，继续使自己的译入语得到发展和深化。换句话说，译者的任务在于，起码要使自己的语言在浓度上更加趋近于真正的译入语——上帝的真语言，即纯语言。因为实质上，一个伟大作家的优秀译作总是丰富了译者本族语言中“异”的力量，对其而言是有益的。一篇译作为译入语开发出新的意指方式，看待“同一对象”时有了用语言传达出来的新方法。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 译者的任务……在于发现被翻译的语言中的意向，从这种意向出发，原作的回声得以唤醒……翻译……呼唤进来……原作（在自己语言的森林中），进入那唯一的地点，在那里原作固有的回声每次能发出外语的某个作品的回声……因为将多种语言融汇为一种真语言的伟大动机完成了译者的工作。[79]

真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所有语言表达的理想目标：在真语言表达中，每个事物自体都以完全清晰、各自不同和确定的方式向我们显示自身。如本雅明在1916年的著作中认为的那样，在真语言的状态中，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可以为其找到相应的词或者名字，这是上帝给所有东西的命名。译者的任务就是人类自己的任务。

> 人类是命名者，由此我们认识到，纯语言出自人类。整个大自然，只要在倾诉，就是在用语言倾诉，因此最终是在通过人类倾诉。[80]

> 也就是说，如何寻找作为所有人类语言表达基础的一门语言（在同一时间段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也开始寻找这样一门基础语言），本雅明给出的解决建议就是如上说到的纯语言。纯语言是上帝的语言，是真语言。每个饱有含义的语言行为都在真语言的轨迹中移动，也都处在通向真语言的路途中。人们无法在自己的语言中直接说出或推导出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可以在某些语言应用的情境中特别清楚地显示出来，尤其是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

彻底翻译

译者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如果人们第一次思考到这么远的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随着本雅明的思考扩展到人类言说的整体以及每个言说行为上。在一种很轻松就可以说得出的意义上，每个人最终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因此也会有其他语言。我们每个人听到“面包”这个词都会产生一些完全个体化的和个人的联想：不仅言说是一种翻译，而且首先，理解的每种形式也是一种翻译。根据本雅明的想法，每个人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法国诗人”，其言说和命名行为都是那个自在的伟大目的的一部分，这个伟大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人，就是使人成为文化存在物。其目标在于，将世界带到它最大程度的语言限定中。“真语言”是一种理想语言，它通过无数“听觉敏锐”的翻译成果得以丰富。对于本雅明来说，真语言是一种单子，世界每个可能的方面都能够以最大的凝聚度和精确度在此单子中映照自身。正如我们想象上帝的言说和思维一样，真语言终归会同世界真实的样子无法区分开。

当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诗学领域被“驱赶”至逻辑学领域，并且最终找到了对这两个领域都适用的统一形式时，本雅明则是从文学经由逻辑学之后，深深滑入神学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领域。是的，这几天来本雅明被严重孤立，他不被理解，陷入重度抑郁，坐在德尔布吕克街家中的房间里。有一个世界可以激发出他作为哲学家最为敏锐的奔放想象力，可他几乎没有可能在自己具体的生存状态和这个可以激发他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段有意义的关系。在这点上，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堪称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把美学思想、文学思想和神学思想、认识论思想联系起来的范例。这篇文章也体现了本雅明思想中受到较少关注的另一种性格特色。那就是，他具备了相应的能力或渴望，总是将自身具体现实生活中那些完全普通的待解决问题或经验变成一个出发点，由此发展出一种自己的颇为讲究的理论草案。1920年到1921年也是这种情况：本雅明翻译了波德莱尔，同时中断了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写作计划，即写作获得大学任教资格的论文，他把酝酿论文中产生的思想直接发展出一个翻译理论。这个翻译理论的目标别无其他，就是要将翻译行为确立为在哲学意义上决定一切的重要行为。本雅明一直以来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他身上一直发生着的事情：他由此马上发展出了一个（迷你）理论，此理论的效果很有魅力，它将本雅明此时正在做的事情崇高化为具有重要实质意义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拯救世界的经验方式。这看

上去——不光是第一眼看上去——有些极端自恋，但同时也特别清醒、精力饱满和存在感十足。这要求他付出所有的创造性思想能量，直至达到理解的绝对极限，也由此达到可译性的极限。恩斯特·卡西尔刚刚抵达汉堡，此时他正着手研究一模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和进行意指的。

狂热崇拜与音色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清醒的哲学家来说，“我能知道什么？”和“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的。那些重要人物的持续影响力和魅力，他们作为整个时代的圣像和主要人物的潜在地位，正基于此。

将自己的思想应用于生活世界的理想——其最纯粹的形式当以苏格拉底树立的那种形象为代表——进一步区分了哲学和其余认知世界的途径，如自然科学或艺术。做一名哲学家是过有意识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它可以通过持续的审视式发问来确定自己生活的面貌、形式和方向。这个特点将这种哲学思考和另外一种作为纯粹学院专业的哲学的目标置于一个可以察觉得到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哲学伴有制度条件下的一些规定、成绩证明和职业飞黄腾达之路。不是别人，正是海德格尔把这种哲学称为“学院式哲学思考”。对学院式哲学思考的公开质疑、甚至还有反叛和轻视，因此成为哲学领域中少有的几个基本常数之一。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期，哲学界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斯宾诺莎、笛卡尔、密尔、休谟、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不在大学的哲学专业里。一般来说，他们也会尽量跟学院式哲学思考保持尽可能大的内在距离，比如叔本华，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本雅明。他们自我描述中的一个本质元素是都明确表达了拒绝成为学院哲学家。他们在自我描述中小心谨慎地创造出一种紧张的场景氛围，人们乐于用“狂热崇拜”这个概念来描绘此种氛围。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本雅明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就已经是那种真正受到狂热崇拜的人物。

恩斯特·卡西尔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这种人物。他早在20年代初就被同时代人归入了完全不同的行列。例如被说成充满距离感的“奥林匹斯山众神”式的人物，或者在言行举止、教育和学识方面“无一不擅长的人物”，“最后一位通才”或起码“博学的学者”。如果用相对不那么中听的方式来描述，也可以表达成是学院的“哲学教师”和拥有公职的思想家这种模板人物。用卡西尔的同事马克斯·舍勒的话来说，也就是写作了“漂亮的、部分也是真实和深刻的普及教育书籍”的那些人。[81]这是一个勇敢的人和思想家，但还无法跻身真正伟大的人物之列。

事实上，卡西尔从来没把他深深扎根于大学哲学文化这件事儿看成

是一种限制或甚至一种疏远他者的扭曲。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尤其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作品符合当时学术出版界的主流规范。在这方面，他和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形成了对比，后面三人为了给他们的思想赋予表现力，都在各自寻找极端独立的（或者说仅是固执己见的）语言形式。因为这三人深信，适用于思想和生活之间哲学关系的相同框架，也适用于思想和语言、思想和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表达自己思想的具体形式相对于内容来说从来就不是表面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对内容进行组织、从内在为内容打上了烙印而且表达了出来。在具有个人特色的意义上，卡西尔的作品没有表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音色”。

事实也是，卡西尔生活在富裕市民阶级居住的汉堡市温特胡德区，就如之前在柏林住在格吕内瓦尔德区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和他那些同住一区的邻居们——医生、银行经理、商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卡西尔的儿子们去上寄宿学校（去上寄宿学校表现出人们是乐于革新的，当时他们去的学校是已经成为传奇的奥登瓦尔德寄宿学校），卡西尔早晨会像执行固定仪式一般读报纸（总是先读体育部分！），和他的夫人讲一讲一天的行程安排，之后他就会回房间或者去大学开始思考工作。从学校回到家，便开始吃饭。饭后他喜欢和家人一起演奏音乐或者听音乐，上床之后习惯阅读一会儿，也有可能会读侦探小说。可以追述出来的是，卡西尔夫妇过着十分充实的婚姻生活，并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海因茨、格奥尔格和安妮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家庭”：发生的事情刚刚好，不会过多。

在本书讲到的四个哲学家中，卡西尔是唯一一位在性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的人，唯一一位从来没有经受过精神崩溃折磨的人。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也没有过任何持续的创作危机或严重抑郁症。充其量是他的妻子在婚后的前几年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晨型忧郁症”。在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卡西尔容易着凉发烧。就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卡西尔可以一直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思考，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的妻子托妮回忆道，他不要求“身边的任何人去参与他的工作。如果他没有主动告知对方的话，对方很有可能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就在我们的圈子里活动，却不知道卡西尔实际上是个哲学家，从早到晚在研究哲学问题”。[82]卡西尔身上唯一显得确为极端的特点就是他在追求平衡方面的意志。因此，在这政治极为混乱喧嚣的十年里，在这四位思想家当中，只有他明确表达了对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的支持。是的，他是唯一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汉堡的歌德

卡西尔接受了汉堡大学的教职，刚刚荣升为哲学教授，持续进入了一段精神最高产的时期。1919年秋季学期，卡西尔列出了讲座课程，名为《康德和德意志精神生活》。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人迎来了最佳阶段：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可以发挥自身作用的地方。换句话说，在卡西尔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的私生活形象、思想风格以及作品语言，都在努力简明地体现出他自己的东西。只是卡西尔努力向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是摔角和斗争，像永远在进行竞技一般，而是以富有成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展现出来。卡西尔以他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表现他的哲学生活。他是个在实际上会兑现承诺的思想家，他的承诺给予了他自己的哲学。

要衡量卡西尔取得了多大成绩，我们可以看看，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卡西尔的整个哲学在于，在深深扎根于其思想的二元论中高效地调和了看似存在的对立面，例如：内在和外在、肉体和灵魂、感觉和理智、精神和物质、思想和单词、神话和科学、经验和形而上学、统一和多样、人类和上帝、语言和宇宙。

在这样一种创造性的调和中，原则上也有这样的可能：当卡西尔乘坐有轨电车穿越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柏林时，核心灵感击中了车厢中的他。从1919年开始，他把所有精神力和好奇心都用于加工这些核心灵感。在他一步步加工出整个写作项目的轮廓后，他在结语部分写到了他的见解：

> 我们认识这种“生活”的方式，仅是通过它的“表达”，不过这也是我们先前所有观察的精髓。我们观察到，这些“表达”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非本质或“表面”的，生活的表现是其“内在”和本质本身必要的、真实的也是唯一的表露形式。从最简单的姿势、语音到最高精神活动，以至于到纯粹“形而上学”，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事实证明确是如此。[83]

1919年秋天，卡西尔眼前展现出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将精神涉及的所有空间都理解成是人类表达不断发展的一种连续性。用什么手段和办法可以实现这个计划呢？在实现计划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更为仔细和批判地观察“精神活动”的哪种形式呢？让我们根据下面几个主导性的

主题来追踪卡西尔研究计划头几年的情况。

基本现象

卡西尔研究计划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在于，我们称之为“人类精神”的东西。“只有在其表达中才能达到它完全的真正内在。内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具有反作用，它会反过来决定其本质和内容。”[84]

从这个视角来看，幼儿最开始牙牙学语时模糊不清的话，以及后来他们能表达的单字句子（“哒哒哒”，“球！”）是一种内部体验的符号化表达。这种表达不光是简单地复刻或者反映出体验到的东西，而且还赋予体验一种具体的（此处是语音的）形式和形态。语音形式又在初次可重复的稳定性中反过来在结构上影响着自己的内在生活。

通过以物质形式表达的外在符号，人类不断努力要给自己的感性经验赋予一种有意义的表达。由此产生了一种活力，这种活力不光给人类自己，也给世界塑造了一种具体的形态或者形状。

不管人们看向哪里，都能发现，根据卡西尔的观点，“有种基本现象会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的意识不会仅满足于接受对外部产生的印象，而是会把每个印象同一个自由的表达行为联系起来，穿透每个印象”。[85]

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塑形中，（形式和内容）接续不断、彼此互为条件的这个过程整体——从最简单的姿势到最纯粹的形而上学——卡西尔称其为：文化。虽然事实上人们不能忽略这个过程中的内在多样性和繁多形式，卡西尔还是认为，可以将由此打开的空间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空间，也就是符号化的空间或者是由符号形成的空间。

以多样性为目标的意志

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的精神不光是简单描画或者反映现实，而是独立地为现实编排形式。这已经成为康德批判哲学和他所谓“哥白尼式转变”的核心思想：并不是我们的精神要按照事物的规则，而是事物要按照我们精神的规则。卡西尔的研究项目就是建立在康德批判哲学以及唯心论基础之上。不过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强化了康德的一个思想，那就是，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赋予结构、形态和意义的方式不是唯一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创造世界的基本范畴实质上是以牛顿物理的自然科学世界图景为导向的。在这个世界，其“可能性条件”是首先需要加以理解和说明的。

卡西尔将其研究项目拓展至了解世界的合理多样形式，他从威廉·冯·洪堡的语言学中获取了认识论方面的决定性推动力（从威廉·冯·洪堡的语言学那里，卡西尔得到了对他来说在认识论方面的决定性推动，这促使他以一种多样化的方式开启其研究项目，这种多样化主张通往世界之路的各种形式自在地就具有平等的地位）。因为洪堡的作品在康德“哥白尼式转变”的意义上研究了各民族不同的自然语言（德语、法语、芬兰语、梵语……），认为这些语言给经验世界赋予了符号形式结构的不同方式。卡西尔是这么解释他把洪堡研究作为出发点的：

> 根据洪堡的观点，所有形成语词和语言的基础形式明显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形式，一种特殊的领会和理解方式。因此，各种语言的相异之处并非在于发音和符号，而是在于世界观的不同。比如在希腊语中月亮有丈量的意思，而在拉丁语中表示发光体之意；在同一门语言中，比如在梵语中，大象时而是喝两次水，时而是长着两颗牙，时而又是用一只手完成动作。这些就表明了：语言从来不是简单地标示客体，标示被感知到的对象本身，而是标示由精神独立构成的那些概念，在这件事上，这些概念的种类总是取决于理智观察的方向。[86]

卡西尔现在把自然语言多样性的思想扩延展到了其他主要文化形式上，这些文化形式以特殊的方式让世界变得可见，给世界赋予了一个以行为为导向的形态。在他看来，相比自然科学的世界，自然语言的世界、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数学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逻辑世

界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根据卡西尔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是“符号形式”，它们有着自己的总体结构，也有决定各自形态的结构规则。卡西尔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关键点就在他如下的理解中：

> 没有任何的形态（也就是说符号形式）是从其他的形态中成长出来的，或者说推导出来的，每种符号形式都标示着一种特定的精神理解方式，并且同时在这种理解方式中、也通过这种理解方式来构建出“现实”自身的那一面。[87]

同样地，如果问拉丁语的“luna”是否比希腊语的“μήν”更加恰当地描绘了“月亮”本身，那这个问题就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提问应该是，以哪种形式来理解“现实本身”会更加合适？以神话的形式，还是以艺术或者自然科学的形式呢？就如拉丁语的“luna”特别强调和突出月亮的某个方面（发光），而希腊语中的月亮则把重点放在了用月亮测量时间的功能上。

换句话说，用符号构造形态的过程如果是基于纯粹复刻或者复制感官经验，那么这些过程就并不仅仅总是具有创造性的，而是会以各种富有创造性的形式来遵从特殊的兴趣和重点。作为这个世界上具有行为能力和感受痛苦能力的存在物，这些特殊的兴趣和重点会给我们指出方向、引导我们。

神话、宗教、艺术的符号形式和自然科学的符号形式所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兴趣方向：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让世界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并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意义。

> 然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在精神功能总体之外的绝对现实可能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自在之物”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自然再也得不到答案了……实在的真正概念不能硬套到完全抽象的存在形式上，而是会化为精神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88]

关于存在一些什么东西、怎样存在的问题，由此就不能独立于所有符号形式而提出，而只有在符号形式中、以符号形式才能有意义地提出。并且，根据人们着眼于什么样的符号形式来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根据决定和限制这种符号形式结构的内部规则——也会得出不同结果。例如在物理世界中就不会出现“生命”概念，同样“仁慈”和“命运”也不会出现。相反，对于生物学来说，“生命”是个绝对中心的概念，

正如仁慈和命运概念对于绝大多数宗教来说也是中心概念。人们提出了理智、科学的异议，“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仁慈，因为物理学中的“现实”最终可以缩减为虚无、不存在。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并没有理解宗教的符号形式——以及它所承载的生活形式——到底讲的是什么。这样的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了。但是人们还是不应该把自己的局限性和偏见以令人误解的方式作为所有“现实”的标准，正如直到今天在著名的“-ismen”（主义）的限制之下都会一再发生的情况，常见的主义形式有物理主义、经济主义、唯物主义、生物学主义……根据卡西尔的观点，所有这些主义的用法都被一个基本错误决定了。这是一个人类认识能力以及归根结底，自恋的争夺霸权的基本错误。其错误在于，把自己的认识视角和理解现实的能力宣布成——或者更过分的是，美化成——唯一真实和富有成果的视角和能力。

前进

在卡西尔看来，被信以为真的认识论中心问题——自在之“现实”的特性是什么，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没有方向和弄错的方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问，某款椅子外形或者某个墙纸图样是否“合适”。现在人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合适”明显就是一个相互搭配的关系：是否合适，这只能在具体的总体情况中进行评价，得看某个特定的东西要搭配什么样的总体情况或者安排。而就算是某个东西相对于总体情况已经合适了，这个总体情况又会被放到一个更大的关联之中去：一个沙龙、一间书房、一个诊所……

在卡西尔研究符号形式哲学的最开始几年，他不仅勾画了一种新的独立哲学，而且最重要的是也勾画了一种新的从事哲学的方式。因为根据他的见解，一个哲学家必须首先要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符号形式及其特殊的构造逻辑。而由于一个哲学家作为研究者无法在所有这些领域都马上熟悉和活跃起来——作为哲学家的角色，而不是指他的任务——所以哲学家就必须把耳朵打开去找科学家求助。科学家可以告诉哲学家，这些符号世界各自是怎样建构起来的，有哪些构成规则和建构原则是其基础，是必须遵循的。也就是说，拿语言的情况来说，哲学家应该去求教经验语言学；举神话为例，哲学家应该去找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还有物理学，去找理论物理学家……因为：

> 如果所有文化在特定精神图像世界和特定符号形式的创造结果中被证实是有影响力的，那么哲学的目标就不在于要回溯到所有这些创造的背后，而是更多地要在创造形态的基本原则中去理解创造，使创造成为有意识的行为。[89]

核心概念以其整个多样性给予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支撑，哲学作为一种要持续检验这些核心概念的工作，因此就成了文化哲学。由此，哲学成了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如果不想衰败为在卡西尔看来必然无意义的那种尝试，就要“回到所有这种创造背后”，以便把握那种可能的“纯粹、不虚伪的生活”或者“纯粹、不伪装的现实性”——只有与其他科学和知识领域主动对话才能被理解并证明自己。在卡西尔入住温特胡德区房子的前几年，那里就已经成为——像人们今天说的那样——一个跨学科论坛。例如，1921年冬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在卡西尔的家里举办了

一场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卡西尔不光是当时相对论的听众，他还——如他自己所说——于1920年“纯粹根据自己的理解”针对相对论写了一本小书；顺便提一下，这本小书受到了爱因斯坦本人的高度肯定）。

这种语言存在吗？

这就是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之纲要。在通往它的路上，卡西尔以符号哲学的视角去理解前文中的科学领域的个别研究结果，然而如果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使人对他自己的全部思考产生明确质疑，那他也必须以怀疑的态度接受并承认这些结果。

这样，根据卡西尔的想法，人类语言——这也是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的研究对象——就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形式。因为存在着极多的人类语言，所以卡西尔就必须从这样一个设想出发：从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人类语言的语法和发音构造原则都具有一个相同的深层结构，拥有相同的构造原则。卡西尔把这种作为所有语言基础的设想形式称为“纯语言形式”。顺便提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形态就是诺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这一理论从1960年起的几十年间一直支配着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直到1919年秋天，当卡西尔越发深入地进行语言学研究时——他的阅读书单上有超过200本专著——他就对自己研究项目的这一具有支撑作用的基本假设抱有怀疑态度了。他必须承认，这种作为所有语言根基的统一基础结构可能并不存在，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纯语言形式”，根本上有的只是许多各种各样、彼此完全不相兼容的深层结构。（这是目前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学中越来越得到支持的一个假设。）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因此也就没有这种语言的符号形式了。那究竟有什么呢？在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语言》中，他公开讲到了这个在研究早期就出现的危机：

> 必须努力去获得尽可能远的鸟瞰，不光要鸟瞰单个语言的现象，也要概貌性地了解，各个彼此不同的语言它们各自的结构以及思想的基本类型。还有语言学文献的范围……通过尽可能广的了解，文献范围自然可以得到极大的拓宽，这样就可以一直向远处推进本领域研究从一开始就隐含着的目标了……[90]

卡西尔越是深入地探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他脚下哲学根基的裂缝就越多。然而——或者说也恰是因此——他才可能一直往前挺进。他这么做，是希望作为所有语言基础的统一结构可以在未来语言学研究中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1919年，一个哲学家如果对语言在人类认知和生活方式中所扮演的

角色没有说过什么，那他确实就是对此无话可说。这点卡西尔也是很清楚的。如果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在这个（以及在任何其他）思想阶段不厌其烦和无条件接受的信念，那这个信念便是：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一种言说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并不仅仅是符号形式之一，而是所有符号形式中最为重要和本质的。语言是理解自我和理解世界的真正基础。尤其地，哲学思考作为不可后退的“推理活动”本身，就是在语言这种形式中发生和出现的。用卡西尔1919年的话来说：

> 它（语言）处于精神存在的中心位置，各个不同来源的光线汇聚于此，各种不同领域的路线也由此出发。神话般的时刻和逻辑的时刻，美学直觉的方向和推理思考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完结于语言中，而语言却并非产生于它们中任何一个。[91]

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这四位哲学家来说，在系统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都是，是否存在唯一一个具有统摄性的统一语言来作为各种不同自然语言的基础？如果是的话，那是如何根据其形式来创造这种语言？尤其是，这种语言的意义最终是如何建立的？每种语言和我们的关联是什么？我们是在给我们的话语赋予指称和意义吗？还是说其实是话语和符号本身那建构世界的力量使我们——具备提问能力的我们——拥有了生命、思考和提问的可能？是谁构成了谁呢？以哪种形式？最重要的是，有哪些目标？

IV
形成
1922—1923

海德格尔做好了战斗准备，

卡西尔失去自制力，

本雅明与歌德共舞，

而维特根斯坦在寻找一个人

愿小屋安宁

1922年秋天，海德格尔家现实生活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布赖斯高的农村，海德格尔家已经算是条件最好的家庭了，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受到了食物供给危机的威胁。如同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物资而斗争。由于人们逃脱不了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时间便成了决定性因素。冬天即将来临，他们得找到聪明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要提前准备好柴火和生活必需的食品。“妈妈问我是否需要在10月1日之前寄些土豆过来。我回答她说：是的，同时把钱寄给了她。要是土豆到时候还到不了，我该怎么办。”海德格尔于1922年9月27日给埃尔福丽德写信时这么说道。[92]当时埃尔福丽德正和两个儿子待在巴符州托特瑙堡刚建好的小屋里，而海德格尔则身处弗莱堡，处在写作一篇新手稿的高压下。

土豆到了之后该怎么处理：存起来——如果这么办的话，存在哪里？自己吃掉？和胡塞尔家分享土豆？还是干脆卖掉算了？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一辈子都是由埃尔福丽德负责解决的。尤其是为了让她的思想家丈夫可以持久地从日常单调乏味的琐事中解放出来，她在1922年2月的一次冬季漫游之后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在南黑森林地区的一面斜坡上买一块地皮，找人在上面建一座木屋。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在当年冬天动用了他们遗产的一部分（整整6万马克）。埃尔福丽德制定了木屋的建造计划，组织和监督了木屋施工。因为建造木屋这个事儿也是时间紧迫。为了能够得到有价值的外汇，从1922年8月1日起的几周时间，他们将弗莱堡的住宅出租给了一对美国夫妇。到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得搬进木屋居住。实际上木屋几乎就快完工了。

1922年8月9日，海德格尔夫妇牵着大儿子、背着小儿子，如今是一家四口的他们第一次来到了那间位于海拔1200米处的庇护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哲学史上一个传奇地点。直到生命尽头，海德格尔在这里度过的每分钟几乎都是自由的。在这个荒凉的与世隔绝的南黑森林地区，海德格尔作为一个人、一个哲学家真正找到了自己，进入了思考状态。在这个木屋里发生的就是这些。至少，当人们和海德格尔一样如此看待和理解世界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极其重要的聘任

8月，海德格尔住在黑森林地区山上木屋的头几周就已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我必须得说，看到自己在小木屋里面写出来的那些手稿，我觉得它们不能不算成功。”这是1922年9月2日海德格尔从海德堡给他妻子写信时提到的。当时，海德格尔到海德堡找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那里待了一周时间以便进行思想交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毕业于医科，是精神科医生。1919年，他凭借《世界观的心理学》成为哲学畅销书作者，他在学术和公众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力又保证了他能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哲学教授职位。

在《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的性格研究中推导出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设计出了人类存在形式的一幅图景，而人类存在的真正本质恰恰是在极端状况中展现出来的，比如濒死状况。这也总是和解放、解脱相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这些内容，其实是哲学探讨中一种接近生活的治疗方法，它特别重视通过极限经历和危急时刻来真正发现自我。这本书就像是为那一代精神受到创伤的战后返乡者和战争失败者量身定做的一般。

海德格尔也感觉自己受到了雅斯贝尔斯这部成功大作的触动。1920年的一个周日，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胡塞尔家喝咖啡时第一次碰面，两人从1921年开始定期通信。他们对当时学院的标准哲学现状同样感到失望，很快他们就达成共识，觉得有必要在“对抗荒芜的战斗”（海德格尔语）中一起做点儿什么。

因此，1922年9月，海德格尔很快就下定决心接受雅斯贝尔斯的再一次邀请，和他进行对话并进一步发展之前已经意识到的共同点，“在合适的时间里待上几天”研究哲学。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那儿待了将近一周，雅斯贝尔斯考虑到“双方的生活现状”，坚持要支付海德格尔的旅费（1000马克）。雅斯贝尔斯是有着稳定收入和积蓄的大学教授；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职位只发很少的薪水，而且十个月之后工作合同就到期了。海德格尔受聘为大学教授就成了当务之急。如果到时候还无法如期受到聘任，那么这一棘手状况就会导致海德格尔的年轻家庭无法维持生活。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福丽德也担心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尽管她长期在生活的重压下筋疲力尽，可还是在1922年初捡起了她国民经济学的

学业。家里总得有人去挣钱。目前看来，埃尔福丽德那位在哲学方面激情饱满的丈夫恐怕是难担此任。

从友谊带来的幸福来看，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觉得在海德堡的那几天收获非常大。在后来的十年中，雅斯贝尔斯不光是海德格尔亲密无间的极少数对话伙伴之一，也是他真诚尊敬的哲学家。不过，职位聘任的某种悖论也给这次见面投下了阴影。正是在两人共同要为反对学院哲学而献身努力的时期，海德格尔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够在分崩离析的魏玛共和国某处成为一位拥有国家公职的终身思想家。在这方面，胡塞尔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支持者。而雅斯贝尔斯只能排到胡塞尔之后。

1922年11月19日，海德格尔在给新朋友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在您那里待的八天会始终伴随着我。"他还写道："那几天里突然发生的事——但是对外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语言风格'的确定性，一天很自然地过渡到另一天，友谊以一种并不多愁善感的苦涩的步伐朝咱们走来，'双方'都更加确定可信赖的战斗共同体在增强——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悚然无亲的，就如同世界和生命对于哲学家来说是悚然无亲的。"[93]在何种意义上，世界对于一个从事哲学的人来说必定一直是悚然无亲的，对此，海德格尔在1922年秋天最终找到了他自己的语言。

生存的预防性检查

为了能够在马尔堡得到一个自由的教授职位，海德格尔得以书面形式把最新研究递交上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在去海德堡拜访雅斯贝尔斯后的三周里、在山上新建成的小屋里，继续迎来了又一次思想突破。胡塞尔的夫人仔细对着手稿快速灵活地打字。在10月初海德格尔就已经把应聘马尔堡大学（还有哥廷根大学）职位的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情境的显示》提交上去了。其实这篇论文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就如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和波德莱尔的关系一样——没有太多关系。在论文中，海德格尔再次以迄今为止唯一尖锐和清楚的方式更多地讲了这个问题：哲学的真正任务可能是什么？根据手稿，他的问答可以用很简短的关键句来总结：

> 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就其存在特征而被追问的人的此在。[94]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当中，这是第一次出现“此在”概念，它被理解为人的特殊样式和方式，这个世界一直以有意义的方式吁求和要求人去找到它。

> 世界与我们相遇的特定方式总是吁求我们、要求我们。[95]

在此意义上，哲学思考是持续不断的自我阐明所构成的一个发问过程。但是“此在”这个概念的革新也明确地连带意指着这一任务的不可委派性：每个人都得自己完成这个任务、在自己的所在之处、所处之时。在生存中没有不在场的借口。至少在哲学存在中没有。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 实际的此在，不管它是什么，总得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此在，而不是某种普遍人性意义上的“总体来看的存在”。[96]

当然，每个此在的过程，尤其是无法保证一定会有什么结果的过程，也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和转移的。假如人此在的可能性并不是开放的，那么人的此在就不是人性化的，也就是不自由的。为描述对这种可能性多多少少有意识的忽略，海德格尔选择了——顺便一提，写了《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亦是这么做的——那个具有神学色彩的概念Fall（堕落），但意为“沉沦”。沉沦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景象，但根据

海德格尔的想法，沉沦也是常见景象：

> 实际的生命，它本来都是这样的个别者，但大多数情况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原因在于沉沦的倾向性。[97]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倾向可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能力，而更多是得归责到一种追求生存舒适性的偏好。简单来说：大多数人一辈子更喜欢避开自己，而不是认真寻找自己。这种自觉回避自我的形式肯定既不会特别痛苦，也不会不舒服。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更为安全、在某种乏味的意义上亦是一条能保障幸福的道路。但这条路通向的终点只能是，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成为自己、或者成为本可能成为的人。人们过的是一种自己选择的、持续错过自我的生活，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这种生活令人担忧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所专注的东西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无法承载生活的意义：在物质生活领域就是专注于流行的消费品；在社会生活领域就是专注于职业平步青云；在人际交往领域就是专注于友谊而不关注真正的对话，专注于按部就班的婚姻而不专注于爱情；在宗教领域就是专注于学会一种信仰，却没去真正感受上帝的存在；在语言领域体现为，人们持续不经思考地应用提前准备好的句子和空话套话，这些内容人人都会说并认为其是对的；最后，在研究领域，人们枯燥乏味地重复一些自认为已经肯定知道答案的问题。

海德格尔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他从周围世界中听到了另一种要求。在过去两千五百年年中——大致从亚里士多德那时算起，有些概念、范畴和规定指引着人类对自己的独特此在进行思考；海德格尔的要求指的是，起码能够对这些概念、范畴和规定进行基本批判。他想要最终严肃地“就其存在特征追问此在”。因而，他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中得出了这样的洞见：这个关于“人的此在特征”的开启性问题，其最终目标必须是，对那些概念和范畴进行一种完全的解构和替代。

海德格尔在这第一篇真正独立的论文中已经体现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篇论文就如一种要拆除概念大楼的重锤球一般。追问此在的田野已经被遮蔽和毁坏了，变得毫无希望。这篇论文的目标是重新获得一个看待这片田野的自由视角。

迎向风暴的勇气

战后的德国在凡尔赛政策之下产生了离心力，面临着被这些离心力最终撕碎的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海德格尔决定要成为一名思想家，他也要思考存在策略，反思可能的基础要素。针对在海德格尔时代中那些看上去毫无指望的离心力，他集中关注的是这些离心力的此在根源是什么。纯粹从哲学来看，具体做法是以看上去尽可能清晰的方式来揭示实质性问题。从概念来说，就是一种更新和奠定基础的意志：即想要适时更新那些被理所应当接受了的传统清单，这个旧清单已经被扭曲了；还要在具体的此在经验中给所有这些传统奠定基础。海德格尔呼吁进行发问式的内省，这种呼吁其实每个存在者都能在自己身上感觉和获知，在此意义上，人们从哲学方面对自我进行阐明，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阐明方式是个性化的。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具体的生活实践，他最终郑重地退隐到思想者的木屋中。木屋位于家乡黑森林地区的山上，秋天在屋里可以感受到外面四处都在刮着大风。

在随后几年中，海德格尔总是把木屋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那里的风暴，等同于思考经历本身。在被误认为是安全的木屋中，人们可以越发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完全暴露在大自然原始力量中的那种悚然无亲和根本性的听凭摆布。对此，海德格尔在11月份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到过，这种与哲学思考本质相符的悚然无亲，恰在哲学思考感到深深扎根的地方以全部力量和强度向此在显示出来。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思考的目标一定不是持续的安抚此在或者灵魂平静。相反，它展现为这种持久的意志，即要将自己置于极端问题的风暴中；展现为这种探寻的勇气，即在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并且希冀拥有安全根基的地方，去察觉那里其实是个无底深渊。这样一条思考之路绝不好走。这条路最为喜欢的就是极端焦虑和危险的时刻。

转到政治领域来看，这样一种姿态导致对那些例外状况——如极端危机和危险——持特别肯定的态度。而实际上，当出现例外状况时，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只能要求针对例外状况进行真正的决定和冷静考虑。

1922年和1923年，不管这所谓的“灾难年份”可能会使现实生活多么艰难，就当时的社会气候状况而言，它在海德格尔那里还是受到了无条件欢迎。作为一种开启性的时刻，它许诺了一个根本上的新开始和一种

彻底的思想转变。这样，他在1922—1923年冬天就已经觉察到了一个极具爆炸力的极端时代的到来。而在十年之后，那时，海德格尔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稳定的位置上。

职位之战

1922年秋天，此时此地，海德格尔终于算得上是第一次可以占有一个稳定的学术岗位了。海德格尔只想知道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具有多大的哲学爆炸力。“在马尔堡，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海德格尔在1922年11月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以士兵的语言风格报告了情况。他在信件结尾说的话，肯定是能读出多重含义的：“我能干地为冬天搜集了柴火，入库备用。”[98]

我们可以体会到，海德格尔等待着、期盼着，也抱怨着那“令人讨厌的状况”，是这“一半前景、一半阿谀奉承等等的纠缠撕扯”将一个人“带进了”这“令人讨厌的状况”中。1923年3月，海德格尔终于间接得到了马尔堡那边的消息。马尔堡并不想要他。起码目前还不想要，或者很有可能就是不要。埃尔福丽德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生活负担极限，只能在1923年1月最终放弃学业。现在生活就面临着严峻的状况了。“我们不会马上就饿肚子的。”海德格尔在这年3月的一封信中劝慰妻子，想给她打打气。一个月后，海德格尔对生活的期待已急剧降到最低值：“够了，只要我们还养得起孩子们，我还有很多比追求飞黄腾达的事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99]现在，就算没有学术职位，也得以其他办法继续生活。不然海德格尔9月时也不会这么写了：“陷入困境的现实生活是迂回的。”

当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海德格尔给自己开发了一个新的收入渠道，就是给一个日本贵族——“九鬼伯爵”（九鬼周造）当私人哲学教师。尽管如此，海德格尔还是有很多忧虑。1923年6月18日，天空放晴，传来了好消息，他受聘于马尔堡了，是一个“额外的大学教授岗位，拥有跟正式大学教授一样的职位和权利”。“终于不再被排除在外了，”雅斯贝尔斯马上就从海德堡发出祝贺，并且他还像父亲一般，给了海德格尔乐观的保证，“关于收入，你几乎不可能要求更多了。”这没关系！反正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按照自己的本性，也并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高雅的、行事小心谨慎的教授，‘不斤斤计较’他的收入。”他在1923年7月14日的回信中坦白说道：往后要“以我目前的方式……吓唬吓唬”马尔堡的同事——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同伴保罗·纳托普（他为了海德格尔的聘任事宜付出了巨大努力）；“一个16人的突击队也一起来了，这16人中有些不可避免是随大流者，还有几个是特别认真和能干的。”

海德格尔打算接受风暴中的马尔堡。接受了马尔堡也意味着接受了整个思考着的世界。

坏邻居

就如之前说过的那样，想要让卡西尔不再冷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即便是在1922年到1923年的危机年份，他的工作精力和工作效率也丝毫没有受到干扰。卡西尔完成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部分，并直接投入了第二部分的准备工作。第二部的内容是神话思维的现象：因为从原始时代开始，神话以及与其联系在一起的礼仪和禁忌也给人类提供了在世上找到方向的行为导向形式，而且也构成了符号成型的实际源头。“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不光可以如常忍受孤单，而且我恰恰要寻找孤单，因为对于我最近过度紧张的神经来说，孤单就是最好的也是绝对有效的良药。”卡西尔这么写道。[100]1922年7月5日，他在位于汉堡的别墅书房里，淹没在一堆关于宗教史和民族学的书中，给妻子写信。这段时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待在维也纳的亲戚那儿。上个月与邻居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抹去痕迹，但在卡西尔身上并没有过去。卡西尔的孩子们，尤其是他当时14岁的女儿安妮，在上下学路上已经时不时“被邻居家喊出来的话语”骚扰，而且上个月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更是升级到了一个新的越界层面。就算是脾气沉稳的恩斯特·卡西尔也已无法再忍了。

汉堡，1922年6月10日

尊敬的先生：

> 昨天下午，您趁我不在家时接近我的妻子和岳父，和他们说话，最后还向他们抛出了一些骂人的难听话。对一位您根本就不认识的女士，还有一位76岁的老先生做出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无需再给您的性格做多余的评价。自从成为您的邻居后，我已经在咱们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明确的界线。我必须提醒您，不能再有下次的越界行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努力阻止了其他人对您动手，而且考虑到我孩子们的教育，我坚持让邻里的这些父亲们不要去对您的儿子怎么样……[101]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住在汉堡阿尔斯特河支流另一侧的一户人家的花园与卡西尔家相邻，邻居先生名叫哈赫曼。夏日里的一天，卡西尔夫人非常有礼貌地询问哈赫曼先生，哈赫曼家7岁的儿子在他自家花园里玩耍时能否声音小一些，或者去别的地方玩耍。因为卡西尔夫人此时

正在她的花园里面阅读，她的父亲也来到汉堡，待在女儿这里，而哈赫曼家孩子极具穿透性的吵嚷声很是要命，这让父女俩觉得深受打扰。听到卡西尔夫人的询问，哈赫曼先生怒火中烧，他对着卡西尔夫人叫嚷："您觉得您就没有打扰到我们吗？您那纯种的外貌就已经是在打扰我们了——你们所有人肯定全都是巴勒斯坦来的。"[102]

卡西尔的夫人托妮·卡西尔在流亡美国时回忆到这次栅栏边上的争吵，感到这是一件令人记忆深刻的大事儿："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与德国的分离。"对这件事儿起决定作用的，不光是哈赫曼肆无忌惮直接表达出来的仇恨，托妮还明确感受到，在魏玛共和国这段早期的危机岁月中，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爆炸似地混合在一起，共同发酵。这种混合在最高的教育圈子里都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也获得了公众的支持。

关于栅栏争吵这件事儿，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可以通过明确划定私人边界、践行市民礼仪和学者自觉的退让风度——退回到自己的圈子里——来摆脱这种变得越发日常的令人讨厌的事情。在这段夏日时光里，他丝毫没有和家乡德国做内心告别的想法，他尤其无法和汉堡告别。他始终只有在这里才能感觉到，在此时、在某地受到了完全的承认和接受。这尤其是因为，卡西尔在这个生活阶段发现了他真正的思考场所。这里所说的思考场所，不是黑森林山坡上一座孤单的小木屋，而是一位文化科学学者（不任固定职位）的个人图书馆。这位学者出身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家族之一，是家里的长子。他三十多年以来搜集了数万册书籍放到自己家里，内容涉及人文学科和科学史方面稀少独特的研究，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这些书籍进行了整理排列。这里说的图书馆，指的是亚伯拉罕（昵称阿比）·莫里茨·瓦尔堡的个人图书馆。卡西尔在1920年冬天第一次来到这座图书馆。在后来的十年里，这座图书馆实际成为了卡西尔的创作灵感之地。

好邻居

阿比·瓦尔堡图书馆的首席管理员、助理馆长弗里茨·萨克斯尔博士领着卡西尔，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走过那些书籍排列整齐的——也是按照极度任性的规则排列的——书柜和书架。这之后，卡西尔感到震惊，喃喃自语道：“我不能再回到这个地方，否则我就会在这个迷宫里永远找不到方向。”[103]这个图书馆的神奇之处一方面在于它的馆藏极其丰富，另一方面在于还有那些从全世界仔细搜集而来的珍贵稀有文献。对于卡西尔来说，这个图书馆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其本身的理念，显而易见，它的目标在于服务于人类精神，不管是这个图书馆的建立，还是其中图书的排列方式都带有此目标。

这里的图书的分类排列依据既不是字母表也不是年份，而是瓦尔堡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系统，即所谓的“好邻居”规则。这“好邻居”排列系统又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一个研究体系之上，这个研究体系讲的是人类文化到底是什么，人类文化的特点又是什么，有哪些动力决定了人类文化在近几千年来的发展。

这样，所有馆藏图书被分成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的基础是四个哲学基本概念。（直到今天）这四个概念叫做：[104]

导向（Orientierung）图像（Bild）词语（Wort）行动（Handlung）

瓦尔堡的“导向”概念指的是图书馆的“头部”。这个概念的前提是，世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有生命之物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就可以理解的。人类不仅是几乎不受保护、没有理性地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首先是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人类就产生了这样的核心需求：要在思考和行为中、在自己和世界的总体关系中首先找到方向；由此核心需求就产生了人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这曾是康德哲学的实际出发点。卡西尔不仅强烈赞同这个出发点，而且这个出发点还是卡西尔主要著作的实际根基。当时，他的主要著作还处在创作的开始阶段。瓦尔堡图书馆把如下类别的书归到“导向”概念之下：迷信、魔法、宗教、科学——作为人类寻找方向的基本需求之重要文化成果。

通过哪些形式和媒介可以长久提供导向成果呢？在瓦尔堡系统中

的“图像”、“词语”和“行动”部分里，已经暗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卡西尔在他哲学里提到的、将其称之为“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东西。

瓦尔堡把关于图案装饰、书画刻印艺术或者绘画的书籍归类到“图像”部分。归到“词语”部分的书籍有咒语、祷告、叙事诗和艺术文学。最后，在“行动”概念之下，人们可以找到将人类身体本身作为符号形式的媒介来研究的书籍——也就是关于节日文化、舞蹈文化、戏剧和性爱方面的书籍。

所以，当卡西尔第一次拜访图书馆时，肯定就已被一种恐惧、但简直也是难以置信的奇妙感觉所击中。从1917年在轻轨电车上获得灵感起，卡西尔就以他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重点来指引自己的创作。卡西尔觉得，这座图书馆完全就是按照他那些研究计划和重点来设计和排布的啊：瓦尔堡图书馆的基础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精确吻合了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基础！

这还不够，在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灵感步骤上，瓦尔堡图书馆还超越了卡西尔著作设计出的系统建筑。因为，在这个已经高度独创的系统中，也就是在上述讲到的每个部分当中，瓦尔堡图书馆并不是按照一贯的时间顺序进行图书排列。拿文化的发展来说，它不是以从起始端的图腾迷信、宗教仪式和神话再到现代自然科学这样一个持续上升、不断接近真正认知世界来作为图书排列的系统，而是以瓦尔堡图书馆的书架中的“好邻居”内部组织编排原则排列。根据“好邻居”原则，学科差异很大和时代差异很大的图书都有可能会摆放在一起，这给寻找这些图书的研究者以启发，使他们考虑到之前几乎没有想到过的图书关系。因为其实在这些图书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亲缘关系、准入相似性和具有创造性的影响作用。这样，化学基础著作的直接邻居是炼金术著作；研究古代宰杀动物占卜的书籍放在了占星术论文和现代代数学论文的旁边。

书架里的乌托邦

共时性之中持续存在的文化非共时性，瓦尔堡图书馆的藏书正是建立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在这种非共时性中，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地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碰撞。除此之外，图书馆的分类编排系统还承载着这样的信念：存在着无意识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不易被看透，默默无声，如同处在每个时代和其研究重点的背后，但却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以隐秘的方式造成了实质性的变化。瓦尔堡图书馆的核心思想是符号和人，这两者持续地教育彼此。在此，人们使用符号思考、说话、咒骂、祈祷、预言、发问和研究——简而言之，人们用符号的方式寻找方向——人们在自己的时代应用符号，根据自己的利益将符号变成自己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号比人要古老得多，在一定意义上也比人智慧。还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去揭示，这么多沉默的联系和状况必须得表达出来。因此，瓦尔堡把他的图书馆一直置于希腊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的保护之下。

从卡西尔踏入图书馆那天起，他的思想就开始持续靠近图书馆的文化景象秩序。最开始是一步步靠近，但是步伐从不间断，并且强度不断提高。在瓦尔堡图书馆的书架中，在单个学科、研究领域或者边缘固定的文化圈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划界。这些书架是完全没有禁忌的地方，图书的归属规则用以鼓励图书馆的访客富有兴趣地去开发尚未开发之处——不管开发对象是未来、现在还是过去。

假设存在这样的场景：卡西尔夫人和哈赫曼先生超越了所有固定的界线、习得的反感和彼此的区别，挨着站在一起，就如瓦尔堡图书馆里摆在一起的书那样，那么这样的世界看上去会有多美好？如果人们真的理解了这个图书馆，那么它不亚于体现了一个世界大同、万物皆有联系的乌托邦。要注意到和承认这个乌托邦，有时候只需要迈开一小步或者轻轻一跃，跨过遗忘的水面。

1920年，来到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是卡西尔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当卡西尔接受了汉堡的教职，从柏林来到汉堡时，他完全不知道瓦尔堡图书馆的存在。对于图书馆的相关人员来说，他们同样不知道卡西尔。当卡西尔第一次来到图书馆时，图书管理员萨克斯尔博士确切知道了他面前的人是谁。他在这里等候着卡西尔，然后就带着卡西尔有针对

性地熟悉了图书馆。萨克斯尔给瓦尔堡汇报卡西尔第一次到访图书馆的情况时，是这么说的：

> 我是从第二个房间里“符号”那个书柜开始的，因为我猜想，卡西尔从那儿开始最容易找到他想要的。他马上就愣住了，给我解释道，这就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接触的问题，也是他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关于符号概念的馆藏文献中，他只认得其中一小部分。您的视觉观点（符号在表情和艺术中的可视化），他就完全不知道。我马上给他讲解了一下，然后他让我给他展示，一个书柜是如何被安排摆放到另一个书柜边上的，一个思想是怎样成为另一个思想的邻居的，展示时长超过一小时。能够带着这样一位高品质的先生参观图书馆，实属美事一桩。[105]

卡西尔对瓦尔堡图书馆留下了敬畏的第一印象，他觉得那儿就像一座迷宫，他不能再回到那里。不过就在初次拜访图书馆的几个月后，卡西尔就明确表达了最好要在这座迷宫里度过好几年的强烈愿望。[106]他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卡西尔发现了发挥自己的学识理想之地。图书馆也遇到了它真正被设想去服务的研究者。这便产生了一个完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也涵盖了图书馆管理人员。卡西尔准确的阅读书单扩充了图书馆的馆藏，而不管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新研究问题，萨克斯尔博士都会为他及时找来相关的书，并以图书馆所代表的精神鼓励卡西尔写作论文。这种极富成效的合作带来的首个成果是卡西尔在1922年7月发表的《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

神话的起点

《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对卡西尔的思维历程起着决定作用，在这本著作里他研究了神话概念的特点和神话世界的结构特点（和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对照）。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海德格尔如同一位考古学家或爆破工人，细致探讨了某些概念的基础区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性地影响了——或者也扭曲了——我们直到今天的整个思维。和海德格尔一样，卡西尔着手对神话的概念形式进行研究，同样也是在探寻一个我们文化历史的可能开端，揭示了思维任性的原始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直至今天对世界的理解，并给我们的理解打上了烙印。

当远离纯粹非理性和任意状态时，卡西尔认识到，神话思维深受最大程度的严格性、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影响。神话思维的概念性最终确定了所有事物以及宇宙中每个固定不变的地点；确定过程是通过区分绝对的基本核心来进行，而这种区分又遵循了图腾逻辑。一般来说，最开始都是由一个社会群体——通常是同宗同源的——分裂成两个彼此严格区别的群体。分裂标志是稳定确立下来的不同属性、特点，尤其是越界的禁忌。从基本区分出发，可以组成群体之下的子群体，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拥有一个特定图腾标志的群体中的男子……只能和来自以某个特殊图腾为标志的某氏族女子结婚。"这样，就形成第一个秩序。不过这个秩序永远不够：

> 事实上，各个氏族按照其图腾而与原先的社会圈产生了区别，这种区别暂时适用这个圈子，但会越扩越大，以便最终转移到此在的所有圈子，不管是自然此在还是精神此在。不光是部落成员，还有涵盖所有的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所有，都通过图腾的思维方式联结成各自的组群。[107]

这种巨大的转移效果可以把一个固定地点和固定价值归入到所有总的来说存在的东西中！也可以在神话思维中通过相似关系可以达到更远的范围。在此，神话思维具有决定作用的特色体现在：

> 这里说到的相似性决不能理解为大致源出于我们主观思维的一种"单纯的"关系，而是立刻回指向一个真实的个体身份：事物如果在其本质上不能以某种方式成为一个独自个体，那诸多事物就无法以相似的形态显现出来。[108]

当人们现在认识到，图腾信仰的价值区分自在地需要强烈地承载价值，并由此促进两种逻辑，即绝对排除和绝对限定（价值区分的首个秩序行为就在此），那么人们就能够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政治道德爆炸力成了我们文化发展的根基。直到今天，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依旧体现为骂人话语，例如这句话，某人是个“阴险虚伪的人”（linker Hund）[109]。在这里有好几个隐蔽的价值强调。字面上来看，相较于“右边”（recht），“左边”（link）的价值更低，具有贬义。这样的价值强调作为一种基本区分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另外，“狗”身上也被赋予不神圣和肮脏（或者“猪”也是同样情况）的价值含义，这样的赋值出自于亚伯拉罕诸教和其图腾信仰的基本差异。神话概念形式的赋值力量以语言形式存在于我们之中。是的，这种赋值力量可以说话，不管我们现在强调自己想不想要这种力量，它都存在于每个词语中，朝着我们过来了，并且首先还是来自于我们自身。

新的启蒙

对于卡西尔来说，以分析的形式揭示出上述背景，意味着以最吻合康德理念的方式推动了启蒙。也就是说，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成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不成熟状态首先指的是：概念的真正背景指引着我们进行思维活动和对世界做整体理解，而当我们面对这些概念背景时，却情愿保持着不清楚和未经省察的状态。

这种舒适感，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种漠不关心，也是海德格尔1922年在其解释学情境的显示中斗争的对象。在论文中，海德格尔强调道，有必要对现存的、尤其是哲学的概念进行一次“解构”。与此相对，卡西尔的分析目标恰不是对现存基础概念进行解构——解构除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神话语言彻底全新的开始之外，还能通向哪里？——而是说，概念承载着一种彻底的启蒙动力，这种动力会让各个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形成自己的意识。不管是神话的、宗教的还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形式，每个概念形式都必然带来意识的形成。

每个现代文化在其任何一个发展时间段里都面临着主要危险。卡西尔认为首先有两种危险。第一，每个文化明显都具有倒退性，它的每个发展步伐都是可逆的。第二，正是在极端危机、极端紧张和极端迷茫的时代中——例如在1922年和1923年——文化会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文化以减负的形式倒退到一个最大程度上黑白分明的解释模板中，例如尤其由神话思维提供的那种解释模板。

在此背景下，卡西尔夫人和哈赫曼先生之间的栅栏争吵就是当时文化倒退回神话思维的明显例子。当哈赫曼先生从一个终究是图腾式的基本区别“德国人”和“犹太人”出发，单是卡西尔夫人的外表以及住在隔壁这个事儿就让他感觉到是一种侮辱、干扰还有不洁；同时，哈赫曼先生觉得理所当然的出发点还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族群特征，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固定和指定的居留之地：他绝对属于这个地方，也仅属于这个地方。在犹太人的具体例子中，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由此，哈赫曼完完全全受到了神话思维的控制性影响。

卡西尔夫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当哈赫曼先生朝我喊叫道，我们所有人都属于巴勒斯坦时，就相当于在说，我们都应该待在粪堆里。当时，巴勒斯坦在这些人的脑袋里就是个骂人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巴勒斯坦是一个和犹太人传统关系紧密的地方；也是俄国和波兰难民逃亡的目的地，他们来到巴勒斯坦，是想要找到一个新的祖国。”[110]

卡西尔夫妇现在明确不想用传统方式或说用顽固不化的方式来感受和思考——也绝对不会让野蛮的人们来强迫自己改变想法。哲学上的蒙昧标准，看的不是人们当下感觉自己无条件地从属于哪个概念形式，而在于追随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应该有一个可对全部存在物做绝对详细阐明的形式，这个形式是唯一的、也是统一的。如何从哲学意义上判断一个对象是否蒙昧，这是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实质精髓。

然而没有哪个概念形式可以丰富到足以充分利用现实空间。另一方面，每个概念形式——从其自身来看——都有一定程度的侵犯性特点。每个概念形式都在努力追求彻底的秩序感和占有他物，由此也是在追求着接受所有他物，虽说这种接受还带有敌意。对于卡西尔来说，在我们的文化存在中之所以总是可能发生灾祸，正是由于上述讲到的侵犯动力：

> 有个特定的思想区分，它形象直观并且根据感觉发生，它并不是停留在初次产生之处，而是会趋向于从产生之处继续发展，延伸到越来越远的范围圈，最终包拢整个存在，并以某种方式“进行组织”。[111]

这对于神话、现代科学及其彻底化的内部流派（生物主义、物理主义和经济主义）来说都同等适用。这也适用于宗教和其精神病原教旨主义。在对整个艺术作品进行片面理解的意义上，同样适用上述所讲内容的还有某些艺术的美学全景。要指明各个符号形式之间隐藏着的亲缘关系和显而易见的描写界限，有时候会很费劲儿，但这种指明的行为总是极其富有澄明效果。之前讲到的那些基础区分的对外侵犯的需求无法消除，这些基础区分恰是人对自己讲得最多。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基础区分的侵犯需求可以通过指明行为得到治疗。治疗过程没有尽头且错综复杂——就如文化创造的空间本身那般没有尽头和错综复杂。

1922年至1923年，卡西尔在文化创造的空间里马力全开。在他身后不仅有他的家庭、妻子，他的自由汉萨城市[112]及其大学哲学系，还有他梦想中的图书馆。就算是经济方面的困难，他也感觉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此时，他的妻子正在担忧家庭生计的未来，担心孩子们是否有足够的食物。1923年4月，卡西尔告诉他那心中充满忧虑的妻子：

> 今天布鲁诺（卡西尔的出版人）给我把1923年第一季度的账结了。他在这3个月里卖出了1240册我的书，我由此得到的报酬超过一百万马克。这样，现在我不光可以还清之前的账，还能剩下50万马克。[113]

故乡找到了，房子付清了，查阅书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还攒下了50万！不过，瓦尔特·本雅明如今的日子可真没这么好过。

身陷旋涡

1922年本应——又一次——意味着本雅明的真正突破。海德堡出版商理查德·魏斯巴赫之前给本雅明承诺过要给他出版波德莱尔译著，现在在魏斯巴赫的启发下，本雅明计划在1921年秋天创办一本名为《新天使》的杂志，他怀抱希望，踌躇满志。杂志的供稿作者应该来自本雅明最紧密的熟人圈，总编辑就是瓦尔特·本雅明博士本人，他让好朋友格尔绍·肖勒姆也来当供稿作者。本雅明给肖勒姆这么解释创办杂志的目标：

> 我的计划是要尝试创办一本杂志，丝毫不去考虑杂志受众是否有支付能力，这样杂志才能果断地服务于精神。[114]

这本杂志是根据保罗·克利的一幅画作来命名的（本雅明1921年在慕尼黑获得此画作）。1922年初，原则上《新天使》创刊号就应该准备好交付印刷了。虽然本雅明不断催促，但魏斯巴赫还是阻断了出版进程。作为出版商，他觉得经济方面的风险还是太大。令人痛苦的是，波德莱尔译作的出版（包括本雅明为此所著的序言《译者的任务》）战线也贯穿全年，魏斯巴赫始终都没有承诺一个明确的出版日期。已经开始的通货膨胀狠狠抬高了纸张价格，迫使整个图书出版行业都得特别谨慎。对于一个本雅明般的门外汉——他现在是、首先也一定想要成为门外汉——来说，经济的发展状况已经阻断了差不多所有出版计划的入口。在图书出版方面，本雅明能有些什么？1922年，对于这个问题他只能给出一个诚实的答案，这也包括他那最终一直没引起什么反响的博士论文：什么都没有。

可以想象，本雅明在传播自己思想方面的愿景与现实之间的裂缝继续扩大。与此紧密关联的是，本雅明的学术抱负也遭遇了同样状况。1922年，他变成不知疲倦的旅行推销员，来到萨克森推销他的论文以获得大学任教资格。在德国的主要大学里，很少有哪所是本雅明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前去敲门的。他觉得尤其在海德堡大学会有机会，虽然他都还没具体确定好是要去哪个专业、去找谁。哲学、德语语言文学抑或是社会学……雅斯贝尔斯、莱德勒还是阿尔弗雷德·韦伯？本雅明寻找机会与他们所有人取得进一步接触。

> 1922年深秋，形势对他来说变得更加严峻了。他和父母的关系似乎要彻底断了。本雅明的父亲坚持认为，他儿子应该成为一名银

行职员，而瓦尔特坦率同意，原则上任何一种谋生方式都可接受，只要不会让他取得大学任教资格一事泡汤就行。但是取得大学任教资格还没有明确的前景，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就悬而未决。本雅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悠闲来好好创造出一个靠谱的前提条件，他只能面临着要么去当一名银行职员，要么就再也拿不到父母对他的资助了。1922年，本雅明没有任何自己的收入。

要知道人在这样一种时间段里能落魄到什么程度，就让他注意下10月份本雅明的朋友厄利希·古特钦德的例子（本雅明在1921年曾经考虑过，在南德的一个农庄里和他一起建立一个田园公社）：

> 我们的境况不好。古特钦德家的境况看上去就是灾难。因为厄利希的妈妈年纪大了，所以他几天前决定……成为人造黄油的本市代理人……可是如果他想取得成功，那亲爱的上帝就得来帮他一起卖黄油。[115]

紧接着这段，本雅明记下了这样的话：

> 古特钦德的……公司吧，失败得一塌糊涂——4天里赚了150马克——这就是说，扣除掉路费，基本是亏损的。我倒是有个相似的挣钱办法，容易一些：收购和售卖图书。方法是，我在城北买来图书，在城西售卖，由于我对旧书以及旧书市场还是有一定了解，这有利于我开展工作……当然，在旧货市场或者小古玩店寻宝也是件有趣的事情……这个工作也面临随时垮塌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坚持下去。[116]

本雅明一辈子都认为，他的正经“工作”是要以笔头形式发展自己的思想，别无其他。不管境况看起来多么糟糕，甚至全无希望，对他来说，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没有妥协，也没有别的选择。获得大学任教资格——最好是能够以当时才出现的带薪大学讲师形式——看上去是拯救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唯一可靠途径。为了达到目标，本雅明已经做好了牺牲和受屈辱的准备。

在本雅明的情况中，他面临的相关障碍其实特别难以克服。一方面，在德国教授圈里有一个潜规则，顶多只能让一位犹太人来指导获得大学任教资格的论文。另一方面，从本雅明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曾经用装病的方法逃避服兵役。这在哪里都对他没有帮助。对于许多教授来

说，这就是一个被排除的标准了。这样一个逃兵役的人，根本就不会被列入考虑范围。

联盟中的第三人？

因此，1922年12月本雅明重新来到海德堡寻求机会，这次的情况当然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在目前的预算安排下，要在海德堡找到一处舒适的安身之所越来越困难了。这样，整个12月他给自己租了一间简陋而温暖的房间。

> 房间最大的缺点就是挨着一个无产者家庭的厨房。这家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不过，我是以一种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斯多葛主义来面对这件事的——虽说这个孩子（1）晚上也睡在我边上（2）是个怀孕七个月就生下的孩子，所以他哭叫得特别凶，就好像在对生活抗议一样。今天周日，所有人都在家里，这如同敞开了地狱的大门。[117]

跟卡西尔一样，本雅明和邻居孩子相处也有困难。对于本雅明的境况来说，想要和邻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线太难了，这好比呼吁这家邻居要遵守市民阶级的礼仪规范。不过就算是在这么艰难的时期，也不能说本雅明真的到了经济上无家可归的地步。首先朵拉在维也纳的娘家一直在给他们提供依靠和支持。1922年，作为总编辑、大批评家、旧书商和大学任教资格申请人的本雅明在全国到处跑，特别忙碌，他毫无讽刺之意地抱怨自己陷入了“各种事情的不同寻常的旋涡”。与此同时，朵拉则和儿子斯特凡几个月都待在她姨妈位于奥地利塞默灵的疗养院里——这里和托妮·卡西尔父母的度假地离得特别近。

不是，还不是所有安全网都已撕破。1922年9月，雅斯贝尔斯坚持要负担海德格尔去海德堡的1000马克旅费，因为这笔支出已经超出了一个弗莱堡讲师家庭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本雅明在柏林、哥廷根、法兰克福和海德堡逛旧书店时，为了丰富自己的私人藏书，他会毫不犹豫地花同样多的一笔钱来购得这样或那样的稀有书籍。

总之，雅斯贝尔斯，他是本雅明1922年12月逗留在海德堡的一个实质原因。“大学的事情会怎样，我还不知道，”本雅明在1922年12月6日告诉他的朋友肖勒姆，“……我会竭尽全力争取见到雅斯贝尔斯，在他面前介绍我自己。”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本雅明也不大可能知道当时雅斯贝尔斯已经刚刚和海德格尔成立了一个“战斗共同体”。如果他知道的话，这事儿真会阻碍得了他吗？还是他只会觉得受到了干扰？

其实在1921年本雅明就已经去大学听过雅斯贝尔斯讲课（那时候本雅明觉得“挺喜欢”雅斯贝尔斯的）。[118]本雅明在过去几个月遭到拒绝之后，不久前刚成为哲学教授的雅斯贝尔斯成了他真正的最后的希望之一。雅斯贝尔斯和一个犹太人结了婚，他代表着一种相对更加不带偏见、更为自由的哲学理解，远离学校的传统狭隘和共同性最少的主要敌人的束缚。这个主要敌人，这几年来所有自认为具有革新精神的年轻思想家可能会一致同意就是新康德主义。就如海德格尔在1922年于绝望中寻找大学职位一样，本雅明在这个冬天也怀揣着一篇充满极致抱负的手稿找工作。这篇文章非常强大，论点丰富，方法论精细，正如他明确感受到并公开说的那样，简直就“勾勒出了他将来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文章指的是一篇将近100页的批评论文，研究对象是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合力》。

歌德在魏玛共和国

本雅明在他这篇哲学论文中如常讨论了几乎一切，尤其解释了他自己的生活境况。因为这些年来的离心力将他和朵拉的婚姻拉到了破裂边缘。海德堡大学在当时无疑是欧洲大陆人文科学的灯塔之一——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兄弟为现代社会学打下了真正的基础；法学家、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勃鲁赫在海德堡大学是一位令人赞叹的自带光环型人物；年轻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在海德堡大学写下了他的长篇小说理论；弗里德里希·贡多夫主导了德语语言文学领域；诗人、翻译家斯特凡·格奥尔格在1921年夏天沉思着走过城堡废墟，这些城堡废墟当年激发了荷尔德林和黑格尔去实现最高的思想飞翔。在哲学家方面，雅斯贝尔斯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璀璨新星。

1921年起，有好几周时间，本雅明规律地在海德堡老城的小巷中走动，实际上是因为一个人——女雕塑家尤拉·科恩。本雅明在柏林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首次见到尤拉时，就对她一见钟情。当然这段爱情并不幸福，本雅明未能如愿得到回应。不过，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同一时间段，尤拉·科恩爱上了本雅明的老同学埃里希·舍恩。故事太过老套，不像是真的，或者也可以说很有趣。埃里希·舍恩又和本雅明的妻子朵拉从1921年起保持着一段公开的婚外关系。这便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四角关系。说到四角关系，实际上当时在德国，连孩童都能说得出的四角关系经典代表作就是歌德所写的，深刻又复杂的长篇小说《亲合力》。

1921年最后几天，当本雅明坐到柏林的书桌前，再次尝试写一篇论文以取得大学任教资格时，他自己的情感关系状况决定性地推动了他。他把长年对歌德作品和歌德世界观的研究——依据由博士论文所确立的对文学批评的真正任务和方法的坚定信念——打包成一篇将近100页的论文。

这篇饱受赞誉的文本题为《论歌德的〈亲合力〉》[119]，厚厚一沓，直到今天都还是本雅明的代表作之一。它看上去像是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阐释，但实际上是本雅明对歌德这部小说进行的深入研究，是一篇内容包罗万象的评论。可能歌德的小说本身在内容丰富度方面也是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市民婚姻制度以及由此对整个市民社会的可能基础的沉思。换句话说，本雅明的论文主题是以发掘的方式揭示出

隐藏着的力量和动力，这些力量和动力实际上把现代市民社会与其根本的自由和自我的纠缠、承诺集合到了一起。对于处在“亲合力”中的本雅明来说，这些力量最终是神话力量、神话思维模式和神话动力——因此也必然是不祥的，它剥夺人类行为能力，使人类处在未成年状态，使人的思维变窄。在此基础上，一个可以做到自由和自决的主体怎样能够把自己从这些力量的作用中——大多数时候这种作用是隐藏着的——解放出来，过上一种如意的生活——在生活中不光有真爱，甚至可能还有真正的完满婚姻。

本雅明的文章融合了——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两篇同时产生的文章——两篇论文的中心思想：卡西尔关于神话概念形式的论文和海德格尔的作为独立理论形态的《解释学情境的显示》。本雅明的文章另外还融合了形成真正婚姻可能性的条件理论，理解得更远些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实质的生活形式。和卡西尔一样，本雅明觉得有必要在形成自由意识的过程中，揭示出我们文化中神话思维模式的隐藏性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存在。和雅斯贝尔斯的朋友海德格尔一样，本雅明同一年的目标也是在一个极端尖锐化的情境中找到出口，可以勇敢地跃入另一种更具实质性的此在形式。三位作者（还有康德）都深信：一个人、一个主体、一种此在，只要对自己了解世界的真正条件还不清楚，那就无法真的做出自由的决定，就不算真正成年。而只有成年的人类——本雅明还补充道——才应该跟彼此结婚，才能在实质意义上与彼此形成婚姻关系。

更多的光

这三位作者在此时间段都认识到，在哲学上有必要让现代的理性主体经受一个概念上“去教化”的持续过程，这样才能把主体内在的真实语言力量——也是靠着主体才能产生作用的语言力量——带到它确实可见之处，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对其进行处理之处：带到光亮处。

在歌德小说中，那四位主角在市民阶层教育的意义上，统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雅明在论文开头就把目光投向了这四位主角：

> 从教育程度看来，他们都受制于一些力量：某个人会声称自己已经掌握这些力量，尽管他也证明了自己其实并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些力量。[120]

由此，本雅明说出了一个怀疑，卡西尔、海德格尔，当然还有维特根斯坦也都抱有此种怀疑：我们总是在强调的主体的现代自由意识，其形成是不是恰恰要归功于一些曲折的过程？自由意识在努力自决的过程中错误地自认为是自由和把握十足的；还有要感谢那些压抑排挤和变得黯淡无光的过程，这些过程尽管不是耗尽所有，也还不会导致整个社会沉沦，但最终也会带来糟糕的情况。一个自由的现代市民主体做出了自由自决的选择，对此具有说服力的准确例子就是：婚姻。在婚姻里，正如歌德小说的标题所建议的那样，成年了的主体还可以跃过自然的最后边界，甚至可以选择将完全陌生的人毫不受限制地变成自己的亲合对象。

自由抑或命运

本雅明认为，每个现代的此在都处于两个核心概念之间，即“自由”和“命运”。如果存在真正的自由，那么命运力量在人类意志面前最终就是无力的。而如果是命运格局占据了优势，那每种自由和选择就都仅是表面现象——特别是包含道德含义的概念“罪责”在其应用中就变得空洞了。命运不识罪责，只识赎罪。自由不识赎罪，只识责任。

根据本雅明的观点，歌德的亲合力展示了一种存在形式的必然失败——就算这是一种现代市民阶层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不能够完全从天命的神话思维形式中挣脱出来。处于这种存在形式中的个体也没能力为自己做出的选择，以及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上全部责任。

所有这些，整个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影响着全部现代生活的矛盾感情，如今特别清楚地体现在浪漫爱情和其必然的社会道德结局，也就是婚姻上面。因为在一般的理解中，这样的爱情一方面肯定总是带有些宿命的特点，模糊中已经命定了一些事情，无法解释得明白（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神话得到美化，例如在回望过去时觉得相爱之人的第一次碰面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另一方面，这种命定的爱情又得根据有意识的选择变成婚姻，也就是将关系合法化，完全进入理性和自决的空间。是的，我愿意！但是，当人们以此将上述两个方面都看清楚时，就会发现，这两方面彼此是矛盾的，由此在存在上也是无法都得到弥补的。

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这种“无法决定”的必然后果是形成了一种存在方式，它的特点是“既有罪又无罪地停留在命运空间里”。正如歌德在《亲合力》中示范性阐述的那样，这种存在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既有罪又无罪地停留在命运空间里”无法得到理性解释，是一种无法决定的悲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必然会导致“在婚姻崩坏时就是暴力取胜。因为这也是一种命运”。[121]根据本雅明对歌德小说的解读，这里的暴力指的是自然和自然力（环境、水域、预兆、占星学、诅咒……）意义上的神话暴力，超出了人类意志，在此意义上使得人类生存失去行为能力。

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婚姻的失败——也正是在失败的过程中——最终归咎于“更高的力量”。在本雅明看来，这是个有力的例证，证明了人们

追求生存舒适和不严肃的漠不关心。海德格尔在他《解释学情境的显示》中把舒适和漠不关心看成了所有现代人自我过失的源头。用卡西尔的话来说，舒适和漠不关心其实是一种退却——退却到神话思维形式中，人们对这种退却负有责任。在神话形式的思维中，人们再也不能真正做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不能负担起责任。

让我们再次全神贯注地来看看神话形式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自然界里的每个状况都会成为命定计划或者命运的可能先兆或象征。这样，人作为一种自由生物就失去了自我——按照本雅明的想法，其实是人太乐意失去自我了，因为人想要尽可能回避这件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真正的责任。即便是歌德自己，他也会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回避责任的倾向，他太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倾向了。本雅明是这么描述这种状态的：

> 他（即歌德）僵化在了“象征”的混乱中，失去了古人们所不知道的自由。他在行为上受征兆和占卜所左右。歌德的生活从不缺两者……是的，歌德在《诗与真》中曾讲过，他在漫步途中是如何通过占卜来决定是该听从文学的召唤，还是绘画的召唤。在歌德由于其本质而产生的恐惧中，对责任的恐惧是最具有精神性的。这种恐惧是他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大概晚年对文学问题持保守看法的缘由。这种恐惧亦是他情爱生活中的疏忽的根源。[122]

本雅明用歌德在婚姻危机方面的例子揭示了一种剥夺行为能力的形式：倒退回对世界的描绘和世界观，去研究对剥夺自我行为能力的愉悦渴望。这便是倒退回神话思维形式的例子。在本雅明（还有卡西尔的分析）那里，神话思维形式包含了迷信决定论的每种形式，特别是占星术。

不过刚才讲到的歌德的疏忽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里不幸爱上别人的已婚男子本雅明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人们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勇气抓住放纵的机会，而从机会的本质看来，这也是进入一段新爱情——一段新生活——的不可挽回的机会。

选择抑或决定

然而这样岂非是把一切想得太过一成不变，特别是想得太过暗了？夫妻绝对自愿地说出“我愿意”，这难道不就是成年人进行承诺的一个贴切例子吗？夫妻承诺要长久地进行自我约束，要准备好不光是对自己的生活，也对选中配偶的生活终身负责。

对于上面提到的问题，本雅明式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说婚姻真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了，而真爱本应是婚姻的基础。因为根据本雅明的想法，只要“选择”在这里意味着从一些确定好了的选项里有意识地挑出其中一个（就类似于从两双鞋中挑出其中一双），那么真爱并不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命运的要素完全从爱情中淡出，这看上去肯定也意味着爱情本身被抹杀了。形容这样一种关系的一个常用概念是：理性的婚姻。可能有这种东西，甚至有可能直到今天它都是最常出现的婚姻形态。但是理性的婚姻无法在定义上符合真正婚姻的理想。光从这一面看来，市民阶层浪漫的婚姻理想就被毁了，最终想要自由地摆脱神话思维框架是不可能实现了。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太过于理性和自主。谁想要真的被爱神之箭射中，也无法找爱神订购这么一支箭。

根据本雅明坚信的观点，当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说完“我愿意”进入一段市民婚姻后，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种由责任思维和牺牲思维构成的关系中。婚姻中的“我愿意”除了意味着承诺之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人们承诺要在未来和余生断念，放弃唯一一次能够开启存在的事件，而这事件构成了给出的承诺的真正根基。人们还会期望这里有理性的、真正的生活幸福？就算是人们真的可能与这种自己选中的持续自我断念状态取得和解！歌德正是不相信这一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然物种，歌德对此的体验基本上是不同的！就如本雅明记录下来的：

> 对神话力量的惊人的基本经验是，与神话力量取得和解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持续牺牲。基于这种经验，歌德起身反对这些力量。[123]

由此，对于本雅明来说，歌德的小说是一个极其充满艺术感的冷静证人，见证了对两股势均力敌力量的反叛：希腊神话中小爱神厄洛斯的

神奇力量（人类作为热情的自然物种）和具有吸引力的希望，即可以通过理性、权利和自由意志的道德自我教化，在自然力量面前成为一位受过教化的人（人类作为具有语言和教化能力的理性物种）。在歌德的时代，这是“狂飙突进”与“启蒙”之间的一个经典局面。现在，婚姻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最终不可能在这两股不同力量之间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和解。只要在市民阶层设计生存方案的前提下，就不可能会有一种真正达到自己愿望的、真正自决的生活。市民阶层对自由的承诺必然是一种欺骗的、扭曲的、受困于命运的承诺。承诺的自由也是纯属幻觉：

> 因为作家百倍沉默不语的，却可以足够简单地从小说整体发展中看出来：根据道德法则，只要激情寻求与市民阶层稳定富裕的生活订立契约，就会丧失其所有权利和幸福。[124]

在市民阶层的条件下不存在真正的婚姻，在虚假的爱中不会有真正的爱。市民阶层的稳定婚姻会走向某种状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态无法自行决定，是一种“既有罪又无罪地停留在命运空间里”的状态。按照歌德和本雅明的想法，婚姻的稳定性可能会越发变成表面现象，萧条的每种形式其实都只是沉沦的隐蔽形式，它最后只能激发出其内在破坏力中的神话力量，将选中的婚姻关系引向衰亡。

离异共和国

对那时具备阅读能力——远不只是能够从歌德小说里天才式地分析和破译出哲学内容——的每个人来说，这就是1922年的状况。如果人们有意愿阐明，本雅明指定婚姻制度作为每个市民社会可能的基础或者细胞，作为市民民主状态即魏玛共和国的代号，那么随之而来，他对这个共和国可以预见的命运所作的预言式哲学判决也就清楚地写下来了。如果魏玛共和国继续在支付战争赔款和拒绝赔款之间犹犹豫豫、无法做出决定，依旧魏玛式地“既无罪又有罪地停留在命运空间里”，那它必然就会倒退回神话形式的思维，最终也将被其毁灭。

救赎之跃

这样的过程真的无法避免吗？真的找不到从这些既定的选项中逃脱出来的出路？没有可能债务全免、一身轻松吗？没有可能跃入自由、跃进一个幸福的“婚姻”吗？有，在本雅明看来，完全有这种出路。起码在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合力》中，更准确地说，是在位于长篇小说中心位置的、和整体情节看上去完全脱离的中短篇小说《离奇的邻家儿女的故事》[125]中，这种出路得到了细微地暗示。因为这里面“邻家儿女”的婚姻是小说中唯一真正成功的婚姻，在本雅明的解释中，这段婚姻的基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选择，相反，是存在意义上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在具体生活困境和生活威胁的特殊情况下做出的。

在由市民传统力量造成的最严重窘境中，邻家女儿决定跃出正在行驶着的小船，跃入有可能夺走她生命的水里，最终被邻家儿子——就是她后来的新郎——救了上来，而邻家儿子同样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最终下定决心去救邻居女儿。本雅明——也许特别直接地估摸着雅斯贝尔斯就是他这篇申请书的理想读者——把这紧急情况修辞学的整幕场景当作是真正找到自己的前提条件：

> 不过，这个中短篇小说充满着明亮的光。所有一切从一开始就轮廓清晰地处于顶点位置。这是审判之日，它的光芒照进了这部长篇小说昏暗朦胧的地府……因为这些人（邻家儿女）并不会为了一种被错误理解的自由而什么都敢做，在他们当中并没有出现牺牲者，有的只是他们做出的决定……而对于长篇小说的人物，正是这种空想式的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了这种命运。中篇小说中相爱的人超然于这两者，而他们所做出的勇敢决定，就足以粉碎即将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就足以看清想把他们拉入选择的虚无中的自由。[126]

“勇气”、“审判之日”、“空想式的对自由的追求”、“命运的粉碎”、“选择的虚无”……本雅明强加给歌德摆脱其时代必然困境的出路看起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海德格尔在1922年读到这段文字，他肯定会在下面立刻无条件签上自己的名字。而雅斯贝尔斯若是读了必会考虑要让刚建立的战斗联盟再加一名成员进来，成为联盟中的第三人。这名成员候选人正用所有的力气和魅力向他展示自己。也就是说，要是当时雅斯贝

尔斯拿出一天时间来读一读本雅明的论文，或者哪怕是拿出一小时，让本雅明过去拜访他。

拯救性的超越

本雅明完全有意识寻找的跃入，与生存论上的跃入、真正自由的跃入，大概存在概念上的亲缘关系，但也存在一种本质区别。海德格尔的跃入果断地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彼岸、超越，由此，也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宗教。有限的此在只有从自己本身出发才能摆脱错误的（市民式的）存在框架，摆脱现代主体的错误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的）基础。关于哲学，海德格尔在1922年明确断定：“哲学在原则上是无神论的。”对自身实际性进行的自我澄明，发生在完全意识到了自己有限性——海德格尔称之为“即将会死亡（对死亡的悬临着的拥有）”——的状态下。在自己的苦恼中，自我澄明可以直接进入这种有限性的彼岸领域。与此相反，本雅明指出了相爱的邻家儿女的跃入——与存在主义大思想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跃入概念完全一致——明确是跃入了对上帝的信仰，即相信有可能从最终错误的选择当中解脱出来、获得救赎。这些错误选择必定导致每种纯粹的此岸存在，并最终会破坏此岸存在。

> 歌德在这篇中短篇小说中表达了这一点，在这对恋人一起甘愿去死的那个瞬间，上帝的意志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对此，那些旧的法律已失去了干涉的权利。这里，他从婚姻为虔诚者保存生命的角度，展示了这对恋人的生命得以获救的原因：在这对爱人身上，他描绘了真爱的力量。对这种力量，他禁止自己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127]

是的，本雅明在论文中甚至认为每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都指向彼岸和超越：因为“选择是自然的，可能甚至具备彼岸和超越的成分；而决定是超越的”。[128]决定比人们想要和能够做到的更能发挥作用。1922年，这点也能很具体地转移到本雅明的政治神学上。正如歌德描写的那对邻家儿女一样，他看到魏玛共和国也处在巨大的旋涡之中。想要获得拯救、从棘手的困境中真正解脱出来，光靠选择已经无济于事了。持续和越发不抱希望地走向灭亡并不受欢迎，更受欢迎的是鼓起勇气以类似宗教的形式跃入一个新系统，是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新形式，通过救世主得到解脱，共同生活在一起。

纯粹从私人生活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在尤拉·科恩身上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她根本就没有接受本雅明。1922年，本雅明既没有必需的实力，

也没有必需的金钱，用以从学术事业的市民抱负框架中勇敢地自我解脱出来。在永久从漩涡中挣脱出来的意义上，应该服从什么样的魏玛共和国政体形式，对于这个问题，本雅明当时同样还不知道怎么去准确表达。顺便提一下，海德格尔亦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卡西尔牢牢坚持着他模范市民阶层婚姻的决心——尽管他和托妮·卡西尔之间的婚姻可能已经毫无激情——赢得了其特有的、清楚的政治特点：千万不要有极度混乱的革命冒险或内战冒险，特别是不要在这个极度危险和极度充满危机的时代发生。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那维特根斯坦呢？现在，就如之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他沿着克尔凯郭尔和托尔斯泰的足迹，冒险进行了完全独特的跳跃，跃入了一种新生活，现在带着这个决定的后果继续生活下去。

毫无仁慈

“咱们祷告吧。”老师把他的怀表虔诚地放到讲台上面，把拐杖靠到讲台边上。他双手交叉，闭上眼睛，用低沉的声音给教室里的40个学生朗诵每天早晨必会祷告的诗行：

神圣的主啊，

请赐予我们您的仁慈之光，

好让我们继续前行，

学习我们的义务。

我们要记住我们之所学，

和平地不使其消退。[129]

这些宗教仪式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是神圣的。这周，他照旧又一次给学生尽力讲了最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为宗教信念而进行的斗争把人们带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130]然后，他眼里开始闪着激动的光芒，其余时候他的目光都是羞怯的。他用手来遮挡自己的目光，指甲在额头上抠出了深深的刻痕。每个学生都了解，维特根斯坦和学校里的其他人都不一样。昨天他还用一本本子砸学生的脑袋，本子都砸得松散开来了，一页页纸掉到教室地上。而被砸脑袋学生的过错在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耶稣是在哪里出生的？”给了这个回答：“在耶路撒冷。”[131]

维特根斯坦每一天都带着这样的任务重新开始斗争：就他而言首先是记住哲学上已认识的东西，然后是记住宗教上已做的选择，同时不在善良上失去热情，不失去自我控制，此外不要失去每种可能的生活意义。

> 我本应让我的生活变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我本应成为一颗明星。但现在我坐在尘土之上，慢慢死去。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我的生活只由多余的插曲构成。我周围的人当然没有注意到这些，也理解不了这些；但是我知道，我缺少一些基本

的东西……[132]

上面是1921年1月他从位于小山村特拉滕巴赫的首个教师生涯驻留点写给朋友保罗·恩格尔曼的。到1922年11月，他已经换过两次工作，希望——或者说仅仅是以希望为借口——在普赫贝格的乡村小学起码能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的条件。

维特根斯坦对自身意义的怀疑，尤其是对生活价值的怀疑越来越严重地蔓延到了他身边的人甚至朋友身上。“我必须很羞耻地承认，我可以谈话的对象数量越来越少了。”他在1922年8月对恩格尔曼提到。在这个阶段，维特根斯坦选择交谈对象的决定性标准是，这个人要坚定地表明对天主教的信仰：如果谁——首先就是伯特兰·罗素，他后来写了一部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维特根斯坦就会担心这个人能否理解他了。因此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友谊隐藏着一个严重危机。维特根斯坦刚开始在特拉滕巴赫当乡村小学教师时，给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罗素讲述了对他人的那种可怕的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还在增长。但他的不信任越发波及最紧密的朋友圈：“在平均程度上人并没有什么价值，这是真的；但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更一无是处和没有责任感……特拉滕巴赫是奥地利一个尤为劣等的地方，而奥地利人——自从战争以来——已跌入了无底深渊。”[133]在维特根斯坦任教的前两年，他被下沉的力量拽进了无法挣脱的厌世情绪中。在这种下沉的力量中，恨自己和恨他人的情绪越发彼此强化。

理解了四分之三

当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秋天把工作从特拉滕巴赫调动到偏僻的小地方哈斯巴赫时，他在那儿也仅能坚持待上几周，当地居民对他来说“简直就谈不上是人，只是令人恶心的幼虫”。直到1922年11月他来到下奥地利州的普赫贝格，情况才稍微有所好转。但这并非因为普赫贝格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令他觉得更舒服。在普赫贝格，他也是觉得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最多算“四分之三的人，还有四分之一是动物”。不过维特根斯坦迄今为止名义上还算是教育师资，这个月他就参加了“最后的教师能力”考试。之后他在课堂组织上会拥有更多自由。他在同事圈中的地位也确定下来了。但是首先，普赫贝格时期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或许跟他的某些发展有关，这些发展提示我们注意他过去放弃的生活。虽说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在纯私人层面上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但是罗素1921年8月从中国回来时，还是如之前的承诺那样，加倍努力促成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出版，并且最后成功了。1922年11月15日左右，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德英对照版本第一版样书寄到了普赫贝格。这本书的标题最终确定采用拉丁文名称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维特根斯坦对收到的第一版《逻辑哲学论》表示十分满意。哪怕他没有从凯根·保罗出版社那里得到一分钱、没有任何出版报酬，哪怕仍存在这样的事实：他依旧在等待第一个能够读懂他论文的人类灵魂出现。无论如何，他的论文在英国出版了，其中没有错误，翻译得也不差。最终这本著作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一部分世界，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实际情况：事实。而这肯定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有朝一日可能某个人会理解这篇完完全全从伦理角度进行阐释的论文之真正的治疗生活的目的。

在治疗中

《逻辑哲学论》的实质目标在于，“正确地看待世界”，从这个完全得到澄清的视角出发去过一种得到澄清的生活。而这个视角又是以一个清楚的划界为基础：什么是可以有意义地言说的，什么不能。也正是这个想法促使维特根斯坦——基于乔治·爱德华·摩尔的启发——同意了这个标题：*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这个标题明显地受到了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之一《神学政治论》标题的启发（其标题亦是拉丁文，叫*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这本写于17世纪的《神学政治论》，其完全明确的目的是，将其读者从有关人类精神自然的错误想法中解放出来，而这些错误想法最终又是由思维错误和概念错误所产生。尤其是，人们把和上帝启示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理解伦理和政治行为方式的基础。斯宾诺莎已经认为，哲学研究首先意味着根据实际情况指出现存错误，通过逻辑澄清的分析来揭示那些起主导作用的错误想法。由此，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最终有可能“正确地看待”世界。斯宾诺莎的想法最开始在如下意义上也是具有破坏性的——从以语言为发生条件的、日常习得的错误想法和困惑中以语言的方式解放出来。这些错误想法和困惑会持续扭曲我们自己的视线。

就维特根斯坦而言，此类错误想法在1922年时当然绝对不只是、甚至不首先是宗教信念，而首要是在现代自然科学自以为已完全得到澄清的世界图像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基本想法。恰恰是这样的世界观——它并不知道，首先也不愿意承认——深受极端原始的以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没有明确依据的信念束缚，这些信念最终会再次落回到每种已得到澄清的宗教信仰背后。恰恰是这种经过科学启蒙的现代性和它所相信的必然的自然规律不可改变的观点，建立在概念持续的自我欺骗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规律可以解释已经发生的所有一切，最终也认为可以预测未来的一切。自欺的原因在于，它没有把“逻辑的必然性”概念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概念清清楚楚地分开。

海德格尔、卡西尔和本雅明这几年里研究的正是上面的难题。在此难题背景下，人们也可以简单说，作为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首先做的就是以解释性的方式揭示如下几对关系：“罪责”和“命运”、“自由”和“必然性”、“信仰”和“知识”、“此在”和“如此—在”——这些是任何真正成年生活的决定性主导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现在可以拿在手中的这本第一次印

刷出版的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

6.36311　明天太阳会升起来，这是一个假设；这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升起来。

6.37　不存在这样的强制性：按照它，一个事件发生了，另一个事件就必然发生。只存在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6.371　整个近（现）代世界观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幻觉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自然律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6.372　因此，正如前人在上帝和命运面前止步不前一样，他们在自然律面前就如同在某种不可触犯的东西面前一样止步不前了。

事实上，他们都既是错误的，又是正确的。古代的人们承认有一个清楚的重点，就此而言他们的确更为明白，而在新的系统那里，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得到了解释，尤其是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描述这个世界的规律性——而不是相反地，一无所有？而且这个问题以后也不可能被解释清楚，因为每个解释都得回溯到处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些东西上面，解释就会由此最终必然变成胡扯。一个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正是会按上述步骤进行解释，就像维特根斯坦表现出来的那样，目前他也坚持认为自己决定性地超越了每个信仰现代科学的人。

但这样也并不意味着，在可以言说的界限之外将不能感觉到真正的意义中心，而只是意味着，人们过去在这种界限之外以百分百确定的方式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给这个世界提出的理由或对这个世界做出解释——不管这些给出的理由会具有事实属性还是伦理属性。

6.41　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着；在其内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存在着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存在着一种具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位于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是之外。……

从上往下

根据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标准，上面这些话严格看来就是无意义的。但其中正包含了他在去概念形态方面的真正天才诀窍。除了语言本身的手段之外，人们还能怎样去澄清一个由语言引起的困惑呢？

这样，最终就只剩下一把梯子，一把促进认识的“命题梯”。人们凭着《逻辑哲学论》，顺着梯子努力往上爬，把自己从自身内部解放出来。

但是，到达一个新要求的高度，没了梯子，该怎么办呢？现在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回到地面的保障？实际上只有一点：决定跃下来！决定跃入信仰！跃入一个真实的伦理存在，跃入自由！而且，作为一种跳跃，它的特点是完全知晓跳跃的外部条件：基本上是无可依靠和坠入无底！也就是说，只要“东西”在这里意为一个内心世界的真相，一个基础或者一个事实，那么这就是跃出虚无。只有名副其实的无底之跃才能带来真正的信仰支撑，因为只有这种奋不顾身的跳跃才能从一开始就让自己对一些合理期待断念：断绝对获得回报、公平、灵魂治愈、不死的期待，或者断绝对任何一种看上去是典型宗教形式结果的期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逻辑哲学论》中逐字读到：

> 6.422　在建立一个具有“你应当……”形式的伦理学规律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显然，伦理学与通常意义上的惩罚和奖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有关行动的后果的问题必然是不重要的。——至少这样的后果不应该是发生于世界中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提问方式中的确必然含有某种正确的成分。尽管必然存在着某种伦理学的奖赏和伦理学的惩罚，但是它们必然是存在于行动本身之中的……

决定过一种自由的生活，这种决定的价值如何为自己辩护呢？通过真的去实现这种生活（而不是这种生活的外部结果）。那么行动指的就是跃入这个具体的生活，而不是另外的生活、后来的生活或甚至永久的生活：

> 6.4312　人的灵魂的时间上的不死——因此也即它在（他）死后的无穷的生命延续——不仅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获得保证，而且这

个假定首先根本就不能实现人们一直想要通过它所达到的目标。通过我的永恒的生命延续的方式，某个谜题获得了解决吗？这时，这种永恒的生命难道不是和现在的生命一样令人迷惑不解吗？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答位于时空之外。

这种跃入信仰的决定，更宽泛地理解，这种跃入一个真正的伦理存在的决定，需要寻找的保障和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去实现生活本身。首先海德格尔、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就用所有修辞力量和概念强度要求他们的读者做出跃入动作。谁现在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决定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一种更加轻松、舒服、悠闲、没有烦恼的生活吗？——只能证明，他还没有理解这种“跃入”的可能的精妙在哪里。是的，提出问题的他或者她，最终什么都没有理解。既没有理解自己，也没有理解世界。维特根斯坦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不止他是这么认为的。

维特根斯坦解释过的动机状况和期待状况尤其说明了“选择”和“决定”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本雅明、海德格尔和卡西尔自己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著作中肯定也非常重要：一个选择在可以预见的结果中寻找它的合理性，一个决定却偏偏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总是有条件的，而决定是无条件的——由此实际上是自由的。选择保持着神话式的纠缠状态，而决定是以解放的方式突破了——在理想情况下——理性逻辑，即原因和结果、命运和必然性、罪责和赎罪之间可能主导着生存的理性逻辑。正是突破理性逻辑这点给决定赋予了神圣性。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教育学解放理论或解放神学在20世纪20年代走到了这么远的程度。

然而，恰恰是在维特根斯坦完全意识到他执行了1919年那次跃入新生活成为小学老师的行为时，他再不可能否认这点：这种生存的可能意义无法在日常的生活中向他显示出来。无论如何这种生活都不能充实他，而是让他几天几周地留在麻木的空洞中，他其实希望自己有决心逃离这种空洞。他自己在普赫贝格的忧愁程度不是一点点，而是深受折磨。他这个时期的信件千篇一律地诉说着，他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可能逃离性格中的黑暗力量，也摆脱不了他自己的本性。普赫贝格的生活总是全力把他拉回到更深更暗的自我层面中。

当然，他非常努力地建立社交关系，和同事一起在饭店里吃午饭。他甚至还发现了同事鲁道夫·科德足够符合他对音乐的要求，很快他就每

天下午和科德以钢琴和单簧管二重奏的形式演奏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作品。但是最后，科德和其他维特根斯坦身边的人都明显感觉到，在维特根斯坦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一面玻璃，这玻璃好似看不见，但也因此无法穿透。关于隔着玻璃这事，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曾经跟姐姐赫尔梅娜非常坦诚地谈到过。在1922年冬天和1923年春天，维特根斯坦首先体验到的一点就是：悲惨的孤单。

维特根斯坦的书出版了，但这根本就没有改变他的状态。相反，著作出版还加深了这种命运般的持续孤立感。他每天都在布置简陋的小房间里重复看着自己的著作，这无非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通过具有解放作用的哲学思考来摆脱自己的苦恼，这个办法有其明确的、作用可期的限度。要是身边连一个可以分享的人都没有，那么“正确地看待”了世界又能带来些什么呢？

IV
你
1923—1925

维特根斯坦咒骂，卡西尔痊愈，

海德格尔有魔力，而本雅明是多孔性的

那个笨蛋

在普赫贝格，维特根斯坦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觉得找到了渴望的内心安宁，更不用说生活的幸福之类。在狭窄的学校圈子或乡村生活圈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是个局外人。这里流传着关于这个局外人最为特别的传说。众所周知，乡村圣人距离乡村笨蛋只有一步之遥。有些人把维特根斯坦当成是“男爵”或者“富有的男爵”，另一些人则讲述着“他自愿放弃了所有财富”的故事。最后，还有些人说道，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是军官，头部受过伤，是的，“子弹还在他的脑袋里面，给他带来了极大痛苦”。[134]这里没有一个说法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在这样的标签解读下，一个人是无法感到自己受到真正认可的。维特根斯坦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也确实曾经想要成为苦行僧，他住在一间未曾粉刷过的简陋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他非常重视的是，他的住处应该要远离舒适，远离所谓现代文明的成果。他这个时期的服装也完美地吻合了这样的追求：皮革上衣、带有绑腿的皮革裤子、笨重的登山鞋。他从来不会根据天气情况来穿衣穿鞋，也从来不换衣服和鞋子，这令他的同事们感到不舒服。人们窃窃私语道，他身上发出霉味了。

在越发频繁的失眠之夜，当维特根斯坦透过房间窗户盯着普赫贝格的星空想起人生中少有的幸福阶段时，所有记忆都带着他回到了战前英国的学生时代。在英国，他不仅拥有真正的精神快乐，还在大卫·平森特身上找到了人生之爱。平森特在战时的一次飞机试飞失事中身亡，维特根斯坦甚至把《逻辑哲学论》献给他以示纪念。[135]维特根斯坦曾经和平森特一起骑着小马穿越冰岛，还一起去了挪威，住在一间偏僻的小屋里。和平森特在一起时，维特根斯坦感受到了人生可能存在的意义。

早在1920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就开始讲到他因为痛失所爱而感到了绵绵无尽的悲伤：“我再没有能力去获得新朋友，而我又已经失去了老朋友。这真是可怕的悲伤。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可怜的大卫·平森特……他带走了我的半条命。还有半条命就只等魔鬼来取了。”[136]三年之后，就连他和罗素的友谊也在慢慢枯萎，正如这两人在去年夏天就已经明明白白承认的那样。去年夏天他们原本约着在因斯布鲁克见面，但最后没有见成。友谊枯萎的原因首先是罗素的离婚，另外还有，在他儿子出生之前他才将和朵拉·布莱克长期的“野合”关系合法化。这段婚外关系挑战了

维特根斯坦的道德感受。而罗素则是越来越不想去理解他这位天才学生的过分虔诚和偏执的神秘主义。

情况有些复杂

维特根斯坦清楚地看到，他有可能会失去与生活的最终联系。他用尽所有力量下定决心走上了一条极端的新道路，但是未来并不乐观，这样的前景刺痛了他。当他与别人交流这些内心感受时，此种失去的恐慌感令他感到更加复杂和敏感。就像他在1923年春天写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封信中表现出来的那样：

亲爱的凯恩斯！

您给我寄来了《欧洲重建计划》，对此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不过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您最近怎么样了，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可以。还是说，您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写信？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您见到约翰逊[137]本人了吗？如果见到了，请您为我向他转达诚挚的问候。我也希望可以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不是想听他对我的书进行评论，而是想听他说说他自己的情况）。

那么，如果您愿意屈尊的话，请给我回信。

您真诚的朋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38]

可以想象，这封信的语气使得对方没什么回信的兴趣。尤其是因为，实际上凯恩斯在这段时间事情非常多：就如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一样，凯恩斯也好像拥有预言能力，他预言了即将来临的灾难，在一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作为参加凡尔赛和约协商签订的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警告过即将来临的灾难，同时也于1919年在他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预言了，如今的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把德国和奥地利带到政治崩溃的边缘。欧洲大陆的命运再次岌岌可危。法国和德国之间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冲突。列宁久病缠身，他的革命苏维埃同样面临着内战的可能性，其后果无人可以预见。凯恩斯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他作为全球知名的政治评论家积极投身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在剑桥国王学院教授经济学则像是他的兼职一样。当维特根斯坦在普赫贝格教他的学生们数学基本运算法时，凯恩斯正坐在权势人物的咨询室里，为他们解释被严重忽视的经济学基本动力。维特根斯坦为了保持理

智，每天都得进行艰苦的斗争。凯恩斯也同样在斗争，不过为的是将欧洲大陆置于一个新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之上。维特根斯坦和同事鲁道夫·科德在普赫贝格的房间后室里演奏莫扎特，而凯恩斯周末与剑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老朋友们共同采摘草莓，同时滔滔不绝地讨论经验世界的可能形态——这些老朋友中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莱纳德、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和里顿·斯特拉奇。

1923年春天，维特根斯坦生活的死胡同越变越窄。如果他不想失去最后仅存的、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关系，那必须得发生点儿什么。多少还是有些好消息的。当时有位思维非常敏捷的年轻数学家可堪典范地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从德语翻译成了英语，出版人查尔斯·凯·奥格登认为这个译本是最好的。那么这位数学家叫什么名字呢？

亲爱的拉姆齐先生！

> 最近我收到了奥格登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您在未来几个月中的某个时候有可能会来维也纳。现在，因为您已经把《逻辑哲学论》很好地译成了英语，那么您毫无疑问也肯定能翻译一封信，所以我就用德语来写这封信剩下的部分了……[139]

这封写于1923年春天的信，剩余用德语写作的部分并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维特根斯坦肯定在这封信中邀请拉姆齐在方便的时候过来施内贝格山麓的普赫贝格拜访他。对于当时刚刚20岁的拉姆齐来说——他生于剑桥最优秀的学者家庭——这是他一辈子难得的机会。他有机会和维特根斯坦一起仔细研读《逻辑哲学论》，更何况这还是一本在出版短短几周之后就使剑桥大学年轻的思想精英着迷和心烦意乱的著作。1923年9月，拉姆齐抓住了这次机会。他来到了普赫贝格，每天维特根斯坦一放学，俩人就会花四到五个小时逐句研读《逻辑哲学论》，中途没有休息。这样的研读工作持续了足足两周。很容易理解拉姆齐为什么要过来找维特根斯坦一起研读著作。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本质动机就比较令人费解。拉姆齐这么给他的母亲报告拜访进展状况：

> 当他问我“清楚了吗”，而我却说“不”时，他就说“该死的，又得再审阅一遍，够讨厌的”。这种情况令人害怕。有时候他说，我无法理解某些地方，那我们必须让这些地方保持原状。他时常会忘记自己刚刚写下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仅仅五分钟之后，他又能想起来。有些句子他要故意制造出双关语义，这些句子既有惯常含义，又有

隐藏含义，他同样相信这些隐藏含义的存在。

几天之后，拉姆齐给《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人奥格登写明信片，表达出来的基本观点跟他对母亲说的版本几乎相反：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每天从2点到7点给我讲解他的著作。通过讲解，我感觉到特别豁然开朗。他看上去很享受讲解的过程，我们大概每小时能讲一页……讲解过程中他全神贯注，虽然他的精神，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已经不再灵活敏捷，而且没办法再写任何一本书了……他非常贫穷，苦熬着一种悲伤的此在，在这里他只有一个朋友——他大多数同事都觉得他已轻微发疯了。[140]

拉姆齐，这位轻微超重、脸色略微苍白的年轻人胖胖的圆脸上戴着圆框眼镜，身上有着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气质，充满了好奇心，特别还闪耀着理智的光芒。在维特根斯坦眼中，实际上他是能够读懂《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读者。因此，1923年9月的这两个星期，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也是唯一的机会和经历，可以让两人共同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最终，这本著作在尤以形式和逻辑为导向的哲学圈子内部里完全流传开来，并且是以全然曲折的方式进行的，不过维特根斯坦宁愿忽视这种方式。

因此，除了维特根斯坦的出版人——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外，没有人会在1923年春天出版一本反响巨大的书《意义之意义》。这本书试图承袭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力图解释语言意义的基础。1923年2月，奥格登满怀骄傲地将这本书寄往普赫贝格——同年3月，他收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如下反馈：

> ……我现在已经读过了您的书，我不得不完全坦率地承认，我觉得您对于那些实质问题，那些——比如——我阐述过的问题，并没有正确地理解（这和我对那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正确没有关系）。[141]

奥格登（直到今天都还是语言哲学领域的畅销作者）建议，可以通过因果范畴，还可以通过建立说话人与指称对象之间有意识的联系，来解开语言意义之谜。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建议从一开始就已经走偏了，没法严肃地作为一种可能的答案。难道维特根斯坦没有明明白白地展示给读者，关于句子逻辑结构和世界逻辑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

系可以给出意义之理由——并不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也没法进行探究，而只能简单地接受其是预先设定好的，最多也只能对这种关系表示惊叹？

4.12　命题可以表现全部的实际，但是它们不能表现它们为了能够表现实际而必须与实际共同具有的东西——逻辑形式。

为了能够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必须能够将我们自己和命题一起摆在逻辑之外，也即世界之外。

4.121　命题不能表现逻辑形式，它映现自身于它们之中。

语言不能表现映现自身于它之中的东西。我们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表达自身于它之中的东西。

奥格登正是想要通过他的意义的因果理论来尝试做到上面第二个条目中的内容。他想通过语言来表达那些表达自身于它之中的东西。尤其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坚信，最终适用于解释我们与世界关联范畴的因果关系或者因果律之类的，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出发点。

6.36　如果真的存在着一条因果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存在着自然律"。

但是，人们当然不能说出这点：它显示自身。

直到1923年8月他在维也纳休假逗留为止，维特根斯坦已经得知，他的《逻辑哲学论》如今在维也纳的大学也已经开始鼓励着讨论课课堂和科学对话圈子（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维也纳学派"），不过他对此依旧抱有怀疑，类似于他在上文中表现出来的怀疑。维也纳学派想要通过对严格自然科学世界观的信仰来拯救和治疗社会。可这恰恰不符合当时维特根斯坦希望选择的突击方向。维特根斯坦认为，纯粹自然科学世界观是他所在时代的又一条歧途。这条歧途看似清晰，处于不带任何价值评定的澄明状态，但实则建立在特别固执的误解之上。

要把这本该死的《逻辑哲学论》再次逐句研读一遍，这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来说有多么痛苦——但他还是得去解释一些东西。1923年，真正折磨着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难题并不在于，成为一名不受人理解的哲学家并且必须一直保持如此，而在于他那与日俱增的隔离感和孤单感，

他没有朋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首先把拉姆齐来到普赫贝格当成一次机会，好试探一下自己将来回英国的可能性。当然他总在掩饰自己想要回英国的想法。很明显，维特根斯坦如果要回英国，就得付出在他看来极大的代价，重新融入当地的学术生活。无论如何，他得靠剑桥所有领袖人物——摩尔、罗素、凯恩斯——同样还有神童弗兰克·拉姆齐才能成功融入。剑桥的大人物们对他一向极力支持和关怀备至，1923年10月起拉姆齐就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英国“密使”。作为“密使”，拉姆齐的首个任务是去打听一下，剑桥曾经的学子和《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维特根斯坦是否还有机会在剑桥取得学位。“我还没碰到凯恩斯，还没法问问您关心的毕业和学位问题。”拉姆齐在1923年10月用电报般的简短风格往普赫贝格发去这样的讯息。一个月后，这事儿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答案。

亲爱的维特根斯坦！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

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如果您想访问一次英国，那么有50英镑（1600万克朗）的垫款可供您使用。所以就请您过来吧……关于您的学位问题，我问过凯恩斯了。这件事看来是这样的，由于相关规定已经更改，人们无法凭借为期两年的学习和提交一篇博士毕业论文来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不过，您可以在完成三年学习和通过博士毕业论文之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如果您能到剑桥继续进行一年学习，那么您将可能获得准许，将您之前在剑桥学习的那两年时间也计算进去，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42]

提供给维特根斯坦使用的那50英镑，换算成克朗就是1600万克朗，来自于凯恩斯。他作为资助者并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提及，还担心维特根斯坦会立刻拒绝这样一笔金钱。维特根斯坦并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施舍和资助，他也越发清楚地让拉姆齐明白了这个想法。维特根斯坦最在乎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位，不是任何一种对他哲学能力的证书认证。凯恩斯现在也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他在沉默了超过12个月之后坐到书桌跟前，动手写信邀请他那位性格极其复杂的朋友维特根斯坦到英国来找他。两人之间的这种通信交往值得我们去援引几乎全部原文：

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

1924年3月29日

我亲爱的维特根斯坦！

一整年已经过去了，我一直还没有给您回信，这令我感到羞愧。但是迟迟没写回信并不是因为我没想起您，我也一直感到必须得重新证明我的友情。拖着没写回信的原因是，我在回信之前想要试着彻底读懂您的书……对于您的书，我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有一种感觉，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天才著作。不管现在书里的内容对不对，自从成书之后它就主导了剑桥的所有基础讨论。

我把我从一战以来写的书用一个单独的包裹给您一道寄过去……我非常乐意再见到您，与您交谈。您有没有可能来英国访问一趟呢？

致以我的忠诚和友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我将竭尽全力帮助您减轻之后工作的负担。

然而，由于凯恩斯想要特别礼貌和谨慎地进行沟通，他没有回应维特根斯坦的询问语气，没有击中维特根斯坦最为关心的东西。1924年7月，维特根斯坦这么给凯恩斯回信：

我亲爱的凯恩斯：

您在3月29日给我寄来了您的书和回信，对此我非常感谢。我推迟这么久才给您写信，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决定用英语还是德语给您写信……因此，我首先再次感谢您的书和您友好的回信。我特别忙，我的大脑接收不了任何科学内容了，所以我只读了读您其中的一本书（《和平的经济后果》）。

这本书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虽说我对书中主题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您在信中写道，不知道您能否做些什么，使我重新可以从事科学工作：不，在这件事情上您没法做些什么，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之前该说的也都已经说过了，由此我的思想之源已枯竭。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我乐意，非常乐意再见到您。而且我知道，您人真的很好，要资助我钱财以便我在英国能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当我想

到，如果我真要利用好您对我的好意，那么各种各样的考虑就涌入脑海：我应该在英国做些什么呢？我仅仅是过去跟您见面，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去散心？还是说，我应该单纯地为了表示我的友好而去英国？现在我不认为表达友好是不值得的——如果我也只能做到表达真正的友好——同样我不认为去经历一些友好的事情是不值得的，如果说有些事情事实上确实非常友好的。

但如果我就只是待在房间里，每两天跟您喝一次茶或者诸如此类，这并不是足够友好的事情。为了这些小小的友好，我得忍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即我得看着我那短暂的假期如幻影一般消失……去英国拜访您一段时间当然要比孤零零身处维也纳好得多。不过在维也纳我倒是可以集中精神，虽说我的那些思想也还不值得集中精神好好搜集，但总比完全的思想涣散要强一些……

咱们有十一年没见过面了。我不知道您在这十一年里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我肯定是变化非常大。可惜我必须得说，我并没有变得比以前好，我只是变得不一样了。因此当咱们再度见面时，您可能会觉得，过来拜访您的我并不是那个您想邀请的我。就算是咱们还能够彼此很好地沟通，但毫无疑问，仅仅一两个小时的聊天也达不到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话，咱们见面的结果对于您来说变成了失望和厌恶，对于我来说变成了厌恶和绝望。——要是我在英国有份工作——例如街道清洁工或者给人擦靴子——那我就会非常开心地到英国去，友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产生……

致以我衷心的问候！

您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另外，如果您见到了约翰逊，请代我向他问个好。[143]

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立刻回剑桥。不过，这次通信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接下来几年中直到维特根斯坦真的回到剑桥——事实上往后还是如此——一直困扰着双方对于彼此的期待：维特根斯坦想要他的朋友们归来，而剑桥大学希望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世纪天才归来。剑桥大学已经准备好尽力迎接维特根斯坦归来。维特根斯坦也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灵活性，他甚至可以忍受回归到哲学圈。毕

竟，这终究胜过待在普赫贝格的小房间里等着他那越发孤独的理解力最终离他而去，或者无情地背叛他。

热情好客

卡西尔亲自领着他的客人参观瓦尔堡图书馆，这对他来说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这位客人来自马尔堡，刚刚在那里晋升为教授。头一天晚上，也就是1923年12月17日晚上，海德格尔受汉堡康德协会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现象学研究的任务和道路”的报告。而汉堡康德协会就是由卡西尔领导的。海德格尔看向了瓦尔堡图书馆书柜和书架上那些珍贵的馆藏。参观图书馆时，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可以深化前一天晚上的对话。卡西尔赞同海德格尔的一个核心论点，即人们当然不能把“人与世界产生关联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完全交由经验科学去回答，例如心理学、人类学或生物学。举个例子，神话的概念形式作为世界锁闭的文化先行方式，其身上的烙印并不是由科学世界图像的范畴和观点打下的，而是由其余范畴和观点。

当然，海德格尔点头道，此在的自我解释中出现了一些误解，正是“原始现象”可能会帮助阐明这些误解。另外，当人们集中于神话形式的思维形式时，存在着混淆“原始”和“源始”的危险。难道神话中的符号使用本身不正是建立在一种世界开启形式的基础上吗？符号使用并不能自我开启，而是更多地以特别的方式解释开启。如果是这样，那么获得一个真正源始的世界概念不就意味着，从日常概念出发去描述世界概念？也就是说日常性是一个基本方向，对于此在来说，此基本方向必须要在所有符号形式之前存在和被推导出来？原始此在难道不具备一种日常性吗？正如现代科学的此在是具有日常性的一样。

当两人参观完毕，再次站在主题为“符号”的书柜前时，卡西尔答道：“确实，只是并不是在所有的符号化之前，而是独立于所有的符号化。否则，又该如何思考和解释在日常性中显现出来的方向指引呢？”“我问自己的，”海德格尔笑着回应道，“正是这一点。”

从汉堡到贝尔维格

当时在汉堡瓦尔特图书馆里，海德格尔和卡西尔首次长时间的私人讨论应该就是如上所说的样子，或者起码是差不多的场景。无论如何，这就是海德格尔在他后来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回忆1923年冬天与卡西尔会面场景的上下文。[144]

海德格尔在参观图书馆时很有可能也打听了图书馆的实际建立者和背后的主人阿比·瓦尔堡。他还活着吗？如果是，他在哪儿？过着怎样的生活？

就算对于卡西尔这样一个善于交际的世故之人来说，要回答明白这些问题也非容易的事儿。图书馆的主人和建立者阿比·瓦尔堡患有严重神经疾病，1918年病情突然恶化，因此他已经在精神病院接受了多年治疗。1921年春天起，他被安置在博登湖畔克罗伊茨林根的一家瑞士治疗机构——贝尔维格疗养院，这是欧洲大陆最著名、也是最先进的神经疾病治疗机构之一，由医生世家宾斯旺格运营。1857年，老路德维希·宾斯旺格在一片废弃的修道院场地上建立了贝尔维格疗养院，1910年起由路德维希·宾斯旺格，也就是罗伯特·宾斯旺格的长子、老路德维希·宾斯旺格的孙子负责疗养院的领导工作。贝尔维格疗养院并不是一家封闭医院，而更像是一个森林社区，其中有单栋房子，也有公寓住房，使病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大程度地感受到自由和尊严。每位病人都可以享受宽敞的居住空间，还配有私人护理师。阿比·瓦尔堡也是如此，他独立居住在一个套房里，内有卧房、书房和浴室。独立居住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主要表现症状是受迫害妄想症和强迫症。如果病情深入发展，还会爆发严重的愤怒和暴力行为。可以由此确诊的，特别明显的表现是瓦尔堡持续紧张的状况，他总是担心自己被下毒，尤其怀疑别人其实是拿他妻儿的内脏喂他，或者很快就会把他连带他家人全部杀害。瓦尔堡的紧张症状阵发时，人们会看到他强迫自己不停地洗澡洗手，重复同样的话语表达，还往往会不停整理和打扫他房间的某些地方。在1918年他承认自己患有强迫症之前，他的强迫症其实就已经主导了他的日常生活。

阿比·瓦尔堡住在克罗伊茨林根期间，时而完全失控，时而神志清醒、充满活力，但他住院期间还是——主要通过与萨克斯尔博士保持联

系——持续关注着瓦尔堡图书馆的发展情况。恩斯特·卡西尔来到汉堡，这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

关于蛇的重要实验

瓦尔堡身上的症状是一种遭受神经疾病折磨的罕见的、尤其在医学上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病例。他患有妄想症和强迫症，时时被畏惧感笼罩，而这些病症几十年之前也构成了他文化科学研究的核心。瓦尔堡的文化理论特别建立在图像媒介和图像表达的基础上。根据他的文化理论，所有文化和教化的实际源泉其实是人们渴求给自己最深层的生存之畏冠以符号表达，也就是给这些畏惧感赋予一个固定形态，并以这种方式使其变得可以处理或者变得可以被驱除。人类精神本身从未能够凭借其最为敏锐和抽象的能力——比如艺术或者科学——完全克服或者否定此种来自于感受的文化源泉：生存之畏的感受、遭受外界自然力量侵袭的感受，不管这些感受是真实的抑或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文化源泉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正是借由宗教仪式的主导符号或者原始——或如今天人们所说的土著——民族和文化的礼俗，这种克服畏惧的动力才能够特别清晰地显现出来。由此，这些主导符号能够超越地域界限和时间界限，体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和重叠性。例如，瓦尔堡在关于“北美贝勃罗印第安人的蛇礼俗”报告中就提到了人们通过主导符号来克服畏惧。这篇报告是瓦尔堡在他的主治医生路德维希·宾斯旺格启发下，于克罗伊茨林根住院期间草拟出来的。最终，瓦尔堡于1923年4月21日为疗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脱稿作了这场报告。

在报告中，瓦尔堡（联系了圣经中提到的原罪）这么描述具有神话意味的蛇：“针对这个问题：实质的破坏、死亡和痛苦是从哪里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蛇便是一个国际化的答案符号。”[145]

根据瓦尔堡的观点，正是畏惧、魔鬼和强迫症位于我们所有文化存在的根基之处，并在文化早期发展阶段实施了魔法般的礼俗专制统治。在统治的病态形式中——就如瓦尔堡有意识提到清晰的统治发展阶段——人类精神占据了一席之地。畏惧、魔鬼和强迫症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感受和整个日常。

对瓦尔堡的治疗具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是，能否通过对这些强迫症作科学反思和分析来使自己成功得到解脱？他，或者说他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能否与这些狭隘的魔法与图腾式符号意识的原始阶段再次保持距

离，通过保持距离使自己得以解放？还是说，他只能一直不断旧病复发？

隧道与光

1923年，瓦尔堡成功地作了关于蛇礼俗的报告，这标志着瓦尔堡个人神话学中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具有解放作用的启蒙精神多年以来第一次战胜了畏惧和强迫的神话魔力。卡西尔是当时少数关注瓦尔堡笔头报告的人之一。这也使萨克斯尔博士更加相信，卡西尔和瓦尔堡的私人会面可能是瓦尔堡康复的最后一步，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样就可以帮助瓦尔堡回到汉堡了。

1924年春天卡西尔受邀去瑞士做报告，他打算借此机会去贝尔维格亲自拜访那位神奇的研究界同事和资助者——瓦尔堡。[146]这次会面需要做审慎的准备和安排。萨克斯尔和瓦尔堡的夫人玛丽·赫尔茨在卡西尔到达的前几天就已经出发，去往克罗伊茨林根陪伴瓦尔堡。此时的瓦尔堡正处于期待与卡西尔会面的极度欢乐之中，当然也有些紧张。对于瓦尔堡来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与一位陌生人会面并开展较长时间的研讨，而且还是跟卡西尔这样一位思想家。瓦尔堡对卡西尔充满了最深的崇敬之情，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卡西尔是世上极少能够深度理解他图像历史学说及其可能影响的人之一。

瓦尔堡连续数日为和卡西尔的会面做深入准备，他把对他来说特别重要的疑问和难题都记录在纸条上并做整理。在卡西尔到达克罗伊茨林根的几分钟前，瓦尔堡突然觉得他桌上那些小心翼翼整理好的纸条全是禁忌之物，不管身旁的人怎么劝，他都坚持要把这些纸条和其余不祥之物全部都清理出去。必须得这么做。此时卡西尔正在走廊里等着，看看什么时候可以跨过书房门槛，进去见瓦尔堡。

虽说会面开头出现了这样的麻烦，不过两人在自由的谈话中很快就相处融洽了。卡西尔将人类的符号化视作一种持续的解放行为，这种行为的出发点在于主导神话思维的那些概念形式。瓦尔堡肯定赞同这种设想，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在此持续的进步过程中，如何证明神话图像世界不可磨灭的能量和启迪作用。在见面第一天，瓦尔堡这么总结那种使他获得解脱的印象：“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听到了隧道的另一端有人在敲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

瓦尔堡和卡西尔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阶段，这是一个欧洲思想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神话与魔法思维

方式同时存在，例如星相学思维方式和相对具有逻辑数学特征的天文学。在公园散步时，他们主要谈论开普勒（重新）发现了天文学的椭圆定律。瓦尔堡规律地打断谈话，紧张地补充解释和说明道，这段时间有人把他的妻子抓起来，关押在了疗养院诸多楼房中的某一栋，他还告诉了卡西尔具体是哪一栋。而实际上，此时此刻瓦尔堡的妻子正与他并肩走在一起。[147]瓦尔堡认为，椭圆形这样一种具有双焦点的几何图形，最为清晰地表达出了所有此在的完美两极性。在这个值得纪念的1924年4月10日下午，此两极性也体现在瓦尔堡身上：他完全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生动混合体，身上既有天才式的科学直觉，亦有疯癫的观念浓缩。不过现在他再次抓住了希望：他看到了进入一个研究者新团体的希望，看到了继续进行他终身科学项目的希望，还有在卡西尔身上找到自我的希望。这个自我追随着本身的思想动力，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自我、阐明自我。

回到汉堡后，卡西尔马上就往克罗伊茨林根寄去了关于椭圆问题的新书目。而瓦尔堡在卡西尔动身离开克罗伊茨林根的前一晚上，就已坐到书桌前给“贝尔维格疗养院的领导”写信，解释了自己的现状，并请求道：“就像我的医生先生们确认的那样，我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将在主观上有利于我的康复……您可能不是很清楚——或许卡西尔已经和您谈过此事了——我还可以概略地给您叙述一下，文化心理学的历史方法是站得住脚的。”[148]

瓦尔堡现在只想回到他的图书馆，别无所求。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足够力量可以回去。1924年8月，医生已经认同了瓦尔堡对自己的判断。宾斯旺格医生在瓦尔堡的出院日1924年8月12日这么记录道：“今天上午，瓦尔堡在负责人的陪同下出发去往法兰克福，由埃姆登博士在法兰克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又继续前往汉堡……我们为这趟旅途做了平静客观的准备工作，瓦尔堡启程时状态也很平静。前往法兰克福的旅途井井有条、周到友好、充满平静的氛围……”[149]

瓦尔堡在与自己的魔鬼斗争中，重新找到了支柱和安全感。虽说他还没有完全从对死亡的深度恐惧中解脱出来，但也不再是其奴隶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一种真实分析结果。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安抚都是错误和糟糕的。1924年秋天，马丁·海德格尔也是持同样看法。在这之前不久，他的生存被一种迄今还不认识的新魔鬼抓住了。

魏玛蹒跚

海德格尔在马尔堡担任教授的第一个秋天是和家人分居的。当时，要在马尔堡找到一套合适的房子极其困难，尤其是因为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后，从鲁尔区涌出了难民潮。这也使得马尔堡在住宅业已短缺的情况下，还是被强制将住宅分配给无家可归的家庭。同时，货币危机继续恶化。仅在短短几分钟内，同样的钱就只能购买到原先一半的东西——要是大学财务处目前还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教职工工资的话。1923年10月底，海德格尔最终还是给家里汇去了“3个200亿”。汇完款后，他很快就问埃尔福丽德，这笔钱实际到达弗莱堡了没。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好像是现在才输掉战争了一样。城中各处，人们饥肠辘辘，这导致了暴动和抢劫的恶果。魏玛共和国在这个秋天已经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巴伐利亚州在9月独立，宣告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保守派人士古斯塔夫·冯·卡尔的领导下实质上进入了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阶段。魏玛共和国的其他部分，例如尚年轻的联邦州图林根或萨克森，也有可能会效仿巴伐利亚州的做法。在大一些的城市里，共产主义小组和民族主义志愿军之间在街道上展开了数日战斗。魏玛共和国事实上已身陷内战。对此，国家几乎无能为力，它丧失了暴力机关的垄断力量。

时任魏玛共和国总理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来自宣称国民自由的“德意志人民党”，他在1923年9月末宣告共和国进入军事紧急状态。灾难就好像是预先设定好了一般。问题仅仅在于，灾难具体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

巴伐利亚州首先酝酿着革命的潜流。1923年11月8日，在慕尼黑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型啤酒馆里，革命潜力尖锐化：阿道夫·希特勒在一队人数众多的冲锋队民兵和突击队保护下朝着天花板开枪，打断了当时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的演讲。卡尔只能逃出啤酒馆。希特勒呼吁在场的人参加第二天“向首都进军”的活动，追随呼应墨索里尼的光辉事例和其在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几千人回应了希特勒的呼吁。不过这次啤酒馆政变在慕尼黑市中心宣告终结，参加活动的游行队伍在进发短短几公里之后，卡尔就下令巴伐利亚州警察朝游行队伍开枪，导致20人丧命，希特勒则开着一辆救护车成功逃离了现场。

身在柏林的施特雷泽曼还没有被现状击倒。为了抑制住通货膨胀，施特雷泽曼政府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仅一周之后，便发行了地租马克。令所有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发行地租马克的手段是成功的，地租马克明显稳住了整个局面。1923年底至1924年初，法国人宣布从鲁尔区撤军。魏玛共和国再次活过来了。但是，政治界有不少人恰恰从中看到了真正的灾难。

坚固的堡垒

1924年初，海德格尔一家的情况也明显稳定下来了。最后，他们在海德格尔的同事尼古拉·哈特曼教授家附近找到了一套房子。虽然房子并不理想，也不带花园，但起码海德格尔一家于1924年1月在马尔堡高兴地团聚了。马尔堡总能让人想起弗莱堡的调子。只是马尔堡的山并没有那么高，山坡也不陡，教堂看上去不是那么令人心生敬畏，还有巷子也没有那么惬意。虽然对马尔堡无法产生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对于海德格尔一家来说，马尔堡显得足够熟悉，也足够有小城市的情调。

在马尔堡大学——之前几十年间由于赫尔曼·柯亨、保罗·纳托普、恩斯特·卡西尔这些大人物的存在，马尔堡大学成为了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堡垒——的第一年，海德格尔连同他的“突击队”已获得了良好反响。海德格尔凭借自己的思想在马尔堡大学赢得了许多学生的亲睐：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格尔哈德·克吕格、卡尔·洛维特、瓦尔特·布勒克、汉斯·约纳斯和列奥·施特劳斯。这个名单读上去就像是德国战后哲学和哲学新闻学的名人录。

在初到马尔堡那手忙脚乱的几个月里，伽达默尔给予了海德格尔特殊的支持，因为伽达默尔就是马尔堡人，他的父母在马尔堡享有很高的声望，也非常乐于在解决一些大小问题方面提供热情帮助。在哲学方面，海德格尔首先在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身上找到了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布尔特曼可以丰富海德格尔的思想。布尔特曼受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在创作中涉及的主题是重新赢得基督教中真实存在的力量——远离所有神话和错误学说，也远离所有制度方面的强迫和束缚。布尔特曼研究的也是一种基督教的神话解除法。他想要在人类存在的全然荒谬和赤裸中揭示人类存在本身，使得人类存在首先变得敏感起来，能够听到基督教解放福音的力量。[150]而当时的教会思想家海德格尔想要的也正是这个——只是他并不把基督教的解脱承诺与此关联起来。

本有

在马尔堡的头几个月，海德格尔作为一个个体越发看清了自身存在是基本无根据的，尤其是通过在存在状态中同时对必死性发生的认识。不过人类无法从外界、从别的地方使自身得以解脱和救赎，也没有谁能以承诺或完全启示的方式救赎自己。人类只能坦然而又畏惧地望向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人类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但只有通过这样的目光，人类才能获得解脱和救赎。最终，对于人类此在来说，只存在这么一个无法避免的确凿事实：死亡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而且死亡在任何瞬间都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基督教信仰承诺让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受苛求的状态中得以永恒解脱。正是因为这样，海德格尔才觉得基督教信仰特别值得怀疑。

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在马尔堡时期的学说都在于，要为每个人开辟出一条具有卓越意义的决断之路——这是走向自由的、真正生存方式的第一步。人人都知道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的亲近关系，当然也了解这两人之间的不同。这种哲学—神学局面恰恰可以激发哲学系和神学系的年轻学子。1924年在马尔堡发生了某种精神运动。这件事情在学生间很快也流传开来，不光在附近流传，还流传到了柏林以及更远的地方。

海德格尔在思维中寻找的那种强度，也是他作为老师确定要去产生的那种强度，绝对无法容忍任何敷衍和调和。在海德格尔这里，每个妥协都是懒惰的借口。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海德格尔要调动起“畏惧感”、调动自己“作为此在要跑在过往的前面”——就如他在1924年夏天对学生表达的那样——此般调动可能也是一种补偿的因素。海德格尔当时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正处于他生命和创作的中间点。他太确切地知道，自己从未亲身体验过濒临死亡的临界经验，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相比并没有具体地奔向死亡。不管怎样，他身着为其量身定做的紧身马裤和长款大衣——半民族服饰半西装的搭配穿法——走进讲座课大厅，开始轻声说话，轻到几乎就是耳语，眼睛看向窗外；他脱稿表达，看上去好像也没有特别备课，他越发有力和深入地陷入哲学思考，这个时候他身上就好像迸发出了火花，有某种东西在闪闪发光。这位男士成为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本有。

你这个魔鬼[151]

直到1924年至1925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才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他迄今为止如此具有说服力地说过和写过的东西：“在我身上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925年2月27日他承认道——而且不只是对自己承认，“我碰到了魔鬼般的东西。”[152]海德格尔说的并不是他在讲座课中提到的畏惧体验或濒死体验，也并非纯粹与“我自己”相关的例外状态。相反，这是关于另一个人的体验——是爱情的体验：“别人的存在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克服不了这种情绪”，因为“我们无从知道，我们通过自己的存在会变成另外的什么。”在这样一种例外状态中，深陷爱情的海德格尔提笔写信，他也只能做这么一件事情：“人类的命运屈服于人类的命运，爱的职责是要让这种屈服保持如第一天般的清醒”。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1925年2月10日

亲爱的阿伦特小姐！

> 我们之间的所有一切应该是纯朴、明确和纯洁的。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配得上与对方相遇。您成了我的学生，而我是您的老师，这只是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起因。
>
> 我将永远无法获允占有您，但是此后您将继续属于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它应该会随着您一起成长……[153]

这里说到的“小姐”——海德格尔面对这位“小姐”如此不加自我保护地进行坦白的表达——指的是当时年仅18岁的汉娜·阿伦特，她来自柯尼斯堡，在马尔堡大学学习古希腊语言文化、哲学和新教神学。在1924年秋天来到马尔堡不久之后，她便被看作学生圈中的一种本有和独特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得特别漂亮，着装风格夸张、色彩斑斓。就如海德格尔在1923年把一整个“突击队”——如他自己所称那样——的大学生，包括博士生一起从弗莱堡带到了马尔堡，阿伦特这位学识出众的女大学生身边簇拥的很多朋友和大学同学，也跟着她一起从柏林转来了马尔堡。她就像是众人的领导和精神首脑。他们来到马尔堡是为了亲眼亲耳感受一下在整个魏玛共和国哲学专业学生中窃窃私语流传的消息：马尔堡大学新来了个卓越非凡的人，人们从他那里可以“学到新的思维”。

这个人正是此在预言家马丁·海德格尔。

于存在之中

此时，海德格尔“此在”的根本标志是，“此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复数形式。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一直是一种单个存在，是单独的，或者像他说过的，“总是我的”。如果此在想要解放和理解自己，就必须凭其自身的意志。而如今却突然出现另一个此在，一个“你”。1924年11月的一次答疑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在这第一次见面时，另一个此在带着一见钟情的力量深深闯入海德格尔的此在。海德格尔也进入了这另一个此在中。难怪这位年轻的思想大师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件事情。这可能尤其因为，就如海德格尔在写给他新欢的信中坚持的那样，人们无法知晓，一个陷入爱恋中、闯入他人此在的“你”会在“我”当中发挥什么作用，造成什么结果。“你”是否有可能从内部分裂“我”，由此造成异化的效果？是否会将其它此在的闯入当成是与“我”敌对的事情？或者甚至，在哲学意义上更为根本的：会给自己带来永恒无疑的安全？

突然间，所有这一切一下子看起来变得具体、可能了。因为马丁爱着汉娜，他此生还从未像这样爱着一个对象。他几乎每天都给汉娜写信，向她袒露心中的春天：我身上出现了些新的东西，这便是一个大大的“你”，你就存在于我的自我中、存在于我的存在中。

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找到了纯粹实际的经典解决方案：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安排着两个人的会面，当然主要是要保护好汉娜。两人的联系方式是窗前的灯光信号，还有公园里最喜欢的那张长凳上画的粉笔记号。阿伦特紧跟海德格尔之后出发去听报告，有时候会在电车再开两站之后的站点等着他，或是在城外几公里处的乡村旅店门口等他。[154]人们经常会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这么做。

两人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他们“从来无法完全占有”彼此——起码在市民婚姻的意义上是如此。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考虑过或提到过要和妻子埃尔福丽德分开的可能性。然而他也没有考虑过要结束和汉娜的关系。这段关系的吸引力太强了，两性关系中的心醉神迷太令人无法自拔了。爱情的诱惑力首先把年轻的阿伦特拖到了失去自我的边缘。她写了一封题为“影子”的长信，用比喻的方式坦诚了自己的感情，确定地表达出，面对海德格尔时她的状态就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四分五裂感。一方

面，她通过这段爱恋感受到自己从黑暗的孤独和非本真中解脱出来，她的此在犹如最终从一个洞穴中走出来，走到日间的阳光下。另一方面，她也表达了严肃的怀疑：爱情魔鬼令她产生迷醉之感，在此影响下，她还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吗？

最艰难的思考

这个春天，海德格尔的哲学感受也一直在解脱和困扰之间来回摇摆："你知道一个人必须得承受的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吗？"1925年3月13日，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写信时这么说道。"对所有其他事情来说，都有出路、帮助、界限、理解——而在这里，一切只意味着：处于爱恋之中就等于被挤入生存之中。"[155]这是些值得注意的话，尤其是当人们把这些话和海德格尔前些年写给妻子的信做对比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海德格尔一直把哲学思考称作是他生存中最艰难和最具深度的挑战。但现在这挑战却不再是哲学思考了，而是爱情本身。通过和阿伦特的关系，海德格尔无法抗拒地进入了一种新的本真性的对话形式。如果他的哲学还想继续存在，那就不能是这种情况。

因此，短短数周之后他就在信件中给自己发明了一种说明性的调解方式，并把这种调解方式从哲学角度也推荐给了阿伦特：正是目前经历的这种四分五裂感才能够保障一个人找到真正自我。正是别人的闯入成为了最本真的一种解放。正是恋爱中典型的无助感——人们无法阻止事情发生——是最坚决的证明。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并不是要承认别人的闯入带来的那种全然分裂力量，而是要在高压之下寻找辩证法出路，在他极端个体化的哲学框架内给分裂此在的力量以一席之地。以一种英雄式的本真性的生存理想之名，他拒绝给闯入自己生活的那个"你"以最终承认。只有这样他才得以满足。而深爱着他的年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却非如此。她没有提前告知海德格尔，便于1926年夏天离开了马尔堡，前往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门下开始写博士论文。她选择的论文题目是《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令阿伦特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爱情经历对于存在者来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爱情经历的此在总是无休无止地与其他人的存在保持着一种关联。这事实上颠倒了海德格尔的出发点。[156]

爱世界

阿伦特于192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这段时间她其实还是会时不时地跟海德格尔秘密见面）。她的论文思路始终和海德格尔的工作有关联，但这并没有影响论文的独特性和意义，因为阿伦特的哲学思考继续以其独特能力著称：她能够发现和“你”之本有相关联的生存方面，能够澄清和完善这些方面，而海德格尔在其思想的住处却必定对此视而不见，他也不会拿完全被赶出家门和无家可归来冒险。而阿伦特觉得自己此生一直处于这样的角色中：就如她在二战后给海德格尔写信时说到的那样，作为一个“来自异乡的小姑娘”，她的思想以一种解放他者的方式闯入了别人的房子和躯壳，将其从内部打开。正如海德格尔的传记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那颇为贴切的记录：“对于奔向死亡这个问题，阿伦特将会以一种出生性的哲学来回答；对于向来我属性的存在唯我论，阿伦特的回应是一种多元的哲学；对于沉沦至常人世界中的批评，她会回答说‘爱世界’。对于海德格尔的澄明，她会使公开性显示出哲学上的高贵，以此来进行回应。”[157]

和马丁·海德格尔相反，汉娜·阿伦特显示出能以哲学的方式克服自己那拥有复杂爱情的本有。而对于“你”之魔鬼式的闯入，海德格尔在其思想中从未为这种闯入找到一个实质位置。他在写给汉娜的信中起誓将这种闯入看成是一种存在的解放。缺失对话成分给他的哲学——也给与他关联在一起的存在主义——加上了沉重的负担，严重限制了他的哲学与存在主义。

作为恋爱中的人，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放下过阿伦特。但是对于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顺便一提，就如他在早期信件中提到的希望一样——从1925年起就成了阿伦特走上自己道路的根源。

饥饿疗法

在德国1923年的危机之秋，正在申请教授资格的瓦尔特·本雅明宣布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写一篇手稿，也就是说，我宁愿背负骂名和受到羞辱，也不能再退缩了。”[158]他在1923年9月底写给佛罗伦斯·克里斯蒂安·朗的信中这么说道。在两年多到处寻找的游牧式生活之后，本雅明至少找到了一个固定主题，另外还找到了一个起码可以想象会给他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的院系。有几个人大力倡议他在大学找工作：他的叔公、法兰克福大学的数学教授阿图尔·莫里茨·舍恩弗利斯，还有家里的好朋友——社会学家戈特弗里德·萨洛蒙-德拉图。最终，本雅明为了找到进入大学生活的机会在法兰克福度过了1923年的整个春天。虽说本雅明看到了希望，可以把他关于歌德《亲合力》的文章直接当成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提交上去，但很快这个希望就破灭了。不过起码他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功，他找到了文学历史学家和德语语言文学专家弗兰兹·舒尔茨作为他的支持者和导师：舒尔茨建议他写一篇关于“巴洛克悲剧形式”的论文，特别要写一下所谓的西里西亚学派。对于本雅明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理想主题，但他对与此主题相关的时代——17世纪末期——并不熟悉，也不熟悉与此主题相关的作品和作者。因此，要写作这个主题就必须进入一个全新的话题领域，还得起码阅读大量作品。这并不是本雅明希望的可以快速推进的方式。

那本雅明还剩下什么？但凡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其代表科尼利尔斯教授就会将本雅明的所有想法和合作可能性都坚决排除掉。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的那几个月里和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博士生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成为了朋友。就算是阿多诺的支持也无法改变本雅明当下的现状。本雅明本人和舒尔茨教授并不熟，他也不是本雅明心中崇敬的学者，而这时候他成了本雅明唯一的希望。“我现在正在忙您之前给我推荐的关于悲苦剧形式的论文题目。”1923年10月，本雅明从柏林给他的新庇护人舒尔茨教授写信说明情况。此时的柏林正经受着街道巷战、停电和由饥饿引发暴动的折磨。在这个深秋，财政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朵拉在美国传媒集团赫斯特公司的外国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外汇秘书的工作，但在仅仅几周之后就又失去了这份工作。本雅明一度憎恨的德尔布吕克大街现在又一次成了全家人最后的退居之地。此时，本雅明的父亲刚刚做完右腿截肢手术，正与死神进行抗争。本雅明回到了德尔布吕克大街，从那里给他的朋友朗写信：“谁想在德国正儿八经地从事脑

力工作，那么就会以最严峻的形式遭到饥饿的威胁……当然挨饿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是没有一种比活在一个挨饿的民族中更加糟糕。这里所有一切都在憔悴等死，这里食物匮乏。我的任务，如果还有任务的话，在这里是完成不了了。目前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待我移居国外的问题。要是有上帝在就好了，他能帮我解答这个问题。”[159]

本雅明一家在德国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了。朵拉希望能去美国，但是本雅明没有考虑过去美国。他连一个英语词都不会说。巴勒斯坦也无法成为选择。肖勒姆和他的妻子于1923年秋天移民去了巴勒斯坦，并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可是本雅明就算想去巴勒斯坦的话，也不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就算不需要好几年深入的大学学习，他还是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学习希伯来语。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再学习希伯来语了，而是希望把精力都投入到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中去，成功写完这篇论文。这篇论文给本雅明带来了很大压力，萨洛蒙-德拉图建议他要快些交稿，如果可能的话要在未来一年之内交稿。因为舒尔茨教授只在这个时间段内继续担任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系主任，并且拥有很大的决定权。尤其还因为在今年秋天流传着这样的传言，由于出现了财政困境，在一战后才建立的尚年轻的法兰克福大学有可能要面临破产清理或者合并到马尔堡大学的命运。

尽管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也被多次拒绝驳回，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申请教授资格仍是他通往目标的唯一路径。他还抱着起码能够“借到一笔私人贷款”的希望。1923年至1924年之交，本雅明感觉自己就如一只掉进陷阱中的狐狸一般，他决定要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了。陷阱中的狐狸必须得自断一条腿，跛行着从陷阱中离开，走得尽可能远。这也就是说，在不到四个月之后，他要在柏林完成关于巴洛克悲剧的论文，从中摘录出整整600处可以被引用的地方，并将其整理成目录形式。这样他就能做成一个基础材料，这份材料“会出奇地——是的，特别地——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提供了很少一点戏剧知识，当然还远远不是全部知识”。[160]包括这个基础资料在内，本雅明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僧侣般与世隔绝的某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急速地写出论文，特别是可以考虑去位于南边的某国，花销也比较合理：远离他不喜欢的家庭争端，远离令人感到陌生的德国，远离所有日常的琐碎事件和大都市的诱惑。为此，他已经着手变卖自己的部分藏书——这比什么都能证明他此时决心。

再见德国

本雅明咨询了旅游经验丰富的朋友古特金德和朗的意见，最后决定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4月1日，本雅明在柏林闲逛时——这有可能也只是一个根据现实编出来的笑话——在一个售报亭读到了一个消息，为了防止由于富裕市民出境造成的资本外流，有可能马上要发布出境限制令了。读完这个消息后他慌慌张张就决定要出发。1924年4月9日，他已经带着他那600处摘录材料到了卡普里岛。

卡普里岛的春日风光和自然盛景令人陶醉不已，所以一开始就想要集中精神投入工作自然是做不到的。再加上古特金德夫妇和朗夫妇此时也到了卡普里岛，本雅明想专心工作就更不可能了。他们一起住在一栋夏日别墅的同一层，这座别墅拥有岛上最高的阳台。本雅明觉得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和最特别的时光”。三周后，朗夫妇就已经要启程回去，古特金德夫妇也打算往北走，而本雅明则是一行字也没写，钱袋就已经空荡荡的。对，他缺钱。这个时候给他的海德堡出版人魏斯巴赫写封信或许能帮上点儿忙：

非常尊敬的魏斯巴赫先生！

> ……有一些之前未预见到的情况，使我花掉了一部分旅费，因此我现在身处最窘迫的经济困境中。我请您不要怪罪我的问题或提出的请求，我请求您可以友好地用外汇汇给我相当于60马克的一笔钱，汇到费尔马，可以以预付款的形式，也可以以借钱给我的形式（我到1924年7月1日可以还钱）。[161]

但是信中没有清楚说明“未预见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假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的话。不过本雅明第一次跨过海湾到那不勒斯去旅行的时候，“钱和证件在眨眼之间就全被偷光了”。这就不难想象，他指的情况到底是什么。[162]奇迹如常发生了。魏斯巴赫真的把钱汇过来了，而本雅明此时越发沉醉在卡普里岛的魔力中。他每天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漫步和郊游，还越发频繁地前往那不勒斯，那里对本雅明产生了一种特别病态的致命吸引。5月份，那不勒斯大学庆祝成立700周年，借由这个契机召开了一个大型国际哲学会议，吸引着本雅明前去。大会的流程和内容最后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家的收入是最差的，因为他们成了国际资产阶级最多余的奴仆；而哲学家们要用如此可怜巴巴的方式到处向人

展示自己的从属性，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63]

本雅明在这个哲学会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

葡萄酒和杏仁

在本雅明的理想之岛——卡普里岛上充满了十分活跃的对话氛围。进入20世纪以来，卡普里岛已经成为左派知识阶层向往的疗养地。人们宁愿把自己描绘成知识阶层，而不是国际资产阶级。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革命文学的偶像——甚至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学院，尽管这个学院的存在时间很短暂。1924年夏天，由于卡普里岛上生活费用低廉，地租马克也得到了稳定，这里尤其成了德国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避难所。本雅明绝非思想家处于潦倒生存状况的唯一例子，他希望在四季如春的卡普里岛过上品质更高的生活，也希望能够在这里与其他人聚到一起进行思想交流。由一对德国夫妇开的名为“公猫希迪盖盖”的咖啡馆成了大家的碰头地点。在本雅明的朋友们离开之后，人们越发频繁地看到他下午来到咖啡馆，津津有味地慢品咖啡。他一边吃着披萨，一边搜集着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他会读报，一遍遍地祈愿能在这个偏远的梦想之岛、在最舒适的五月暖阳中，见证某种程度上正步步逼近的西方国家之衰落。

不过在卡普里岛也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本雅明还没动笔写的论文就给他的精神和心情带来了很大影响。他总是处于高压之下，因此患上了噪音敏感症，这在意大利乡村地区是个特别顽固的难题。在这个月内他急切地四处寻找可以付得起租金的新住处。由于那时白天特别炎热，本雅明就选择在漫长的夜晚写作。只可惜“家禽在夜里还是很兴奋”。几周以来，本雅明在咖啡馆的座位上默默观察着一位年轻女士，观察她和她年幼的女儿怎么一起买东西，或者看她晒着日光浴做短暂的休息，而她女儿手里拿着冰淇淋围着广场上的一口井跳舞。这位女士肯定不是德国人，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她那高高的颧骨、偏窄的圆脸表明她不是德国人。还有她每次大笑的时候，大眼睛就会眯成一条极小的缝，看上去几乎像是亚洲人。这是五月底，本雅明着迷地看着，这位美丽的陌生人想从街边商贩那里买一袋子杏仁，但他们无法用意大利语顺利地沟通。这个时候本雅明把握住了机会。

“尊贵的女士，需要我的帮忙吗？”

“是的，请您帮我一下。”

站在这位女士面前的本雅明有着浓密的深色头发，戴眼镜，“眼镜镜

片就像小探照灯一样投射出光芒”。[164]窄窄的鼻子，没有干过什么体力劳动的双手。她认得这种类型的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许是很有钱的那种”。除去经济状况，她还是猜得很准的，事实马上就能证明她的猜测。本雅明自愿效劳帮她提袋子，但马上就笨手笨脚地把袋子掉到地上，袋子里的东西散落出来在广场上滚动着。“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瓦尔特·本雅明博士。”

本雅明陪着这位年轻女士和她女儿回到家里，并马上邀请她们第二天晚上一起品尝意大利面和红酒。6月开始，正如他给身处遥远的巴勒斯坦的肖勒姆的信中说的那样，他的工作时间变得更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古特金德他们离开之后，我在希迪盖盖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只有名字令人不舒服，其余都很舒服）认识了一个又一个人……一位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女士来自其首都里加，她是基督教徒，也是剧院演员、导演，她最引人注意……今天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第三天，我和这位布尔什维克女士聊到了夜里12点半，然后我工作到4点半。现在是上午，天空阴沉，我正坐在阳台上——卡普里岛的最高处之一——吹着海风。”[165]

有可能本雅明会在一两个晚上工作到更晚。谈话肯定不是他和这位年轻女士的全部。本雅明人生第一次深深地陷入恋爱，他爱上了阿西娅·拉希斯。他在写给肖勒姆的信中赞美道，“这位来自里加的俄国革命家”或者说“一位出色的共产主义者，自从杜马革命之后她就在党内工作”，是“我认识的最为出色的女士之一”。

拉希斯那时32岁，比本雅明年长一岁。她与当时的生活伴侣——德国戏剧导演伯恩哈德·莱西——也是于4月份从柏林来到了卡普里岛，主要是想在这里治疗她三岁女儿达加的一种呼吸道疾病。莱西在5月份时已经回德国了。阿西娅和达加单独留在岛上继续接受治疗。在阿西娅去到柏林之前，她是俄国先锋派演员和导演，20世纪20年代初她在俄国中部城市奥廖尔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青年剧场。

对于一位身处南方异乡的德国人本雅明来说，与拉希斯的这段关系开辟了他新的体验范围。既有精神方面的，也有肉体方面的。他向朋友肖勒姆介绍道，爱情飘荡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明亮夏天；他还讲到了岛上葡萄园晚上的神奇景象：“你肯定熟悉这种感受：当果实和叶子沉入夜的黑暗，而你——为了不被发现动静，不被逮住——摸索着寻找饱满的葡萄。”为了让肖勒姆能够理解他究竟想说什么，本雅明还补充道：“但是

这里面更多的东西，或许就是《圣经·雅歌》的注释会讲到的那种情况。”[166]拉希斯后来打趣地回忆那段与本雅明共度的时光：“你一天24小时都躺在我身上。”

觉醒

与拉希斯的这段关系对本雅明与世界的整体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容低估。他曾说过好几次，自己好像被改变了。自从成年之后，一次早期的巴黎之行开始，他就成了妓院的常客。与朵拉的婚姻多年来早已成为一种兄弟姐妹般的关系，对尤拉·科恩的爱慕则没有得到回应和满足。因此不必多说便能明白，和拉希斯的这段关系——一位在身体上极度吸引他，才学上也令他非常敬佩的女士——使他在男女之事上苏醒过来，就如触发了他的感官一样：一种全感官式的爱情。当然，和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活动积极分子展开谈话也在精神上为本雅明开辟了新眼界和新天地。拉希斯在理论和实践、艺术和政治、投身行动和分析的关系上与本雅明迄今为止的相关观点都恰恰相反。可能这位俄国活动家无法理解，在遍布革命浪潮的欧洲，为什么有人恰恰要研究德国17世纪的巴洛克戏剧。对她来说，这是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强有力的例子，而本雅明在那不勒斯哲学大会也正是这么谴责他同行的。通过拉希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用的重要理论选择闯入了本雅明的思考。他将余生致力于在精神上驾驭这种闯入。虽说最终结果是徒劳的。

很快，人们在卡普里岛上就能看到两个外地人带着一个孩子在规律的时间于田间散步，开着玩笑，彼此讨论着，两人彼此倾慕的感情也必然体现在肢体动作上。他们越发频繁地到海湾另一端的城市去郊游，这座城市对本雅明和拉希斯都产生了一种催眠式的吸引力。这就是那不勒斯。当拉希斯在日常生活过剩的感情中认识到自己革命潜力的时候，本雅明看到的是一部作品中原始符号的力量。拉希斯在广场上看到喜剧角色表演时，就想起了多个舞台上的先锋表演场景，而同样的场景本雅明则觉得是寓言式的巴洛克神秘剧得到了自由的展现。当拉希斯最终分析具体物质性和即兴作品艺术时，本雅明看到的是永恒的物质状况在当下得到了体现。就如热恋中的情侣习惯做的那样，两人都太过于渴望用对方的眼睛来看世界，太过于渴望将对方的视角接收到自己的中心位置来。

1924年夏天，由两人共同创作的城市印象文《那不勒斯》[167]成为了他们当时生活的见证。这是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唯一的记录文件，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向彼此敞开了：一种是先锋共产主义坚定有力的文化实践，另一种是理想主义意识秘教对构造做出的超越时间的分析。因此，

在《那不勒斯》中总是会出现多孔性现象，[168]这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易碎式多孔性，克服了当时固定的二元论，成为了开拓城市精神的引导概念。多孔性是那不勒斯真实的生活原则：

在石谷那里人们凿出了一个洞穴，到了洞穴就到岸边了。就像14世纪的隐士图中一样，岩石间的某处会出现一扇门。门开着，人们往里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地下室，这里既是睡觉的地方，又是仓库。台阶通向大海，通向建在天然岩洞里的渔夫小酒馆。晚上，小酒馆昏暗的灯光和微弱的音乐声渗透出来，从下往上飘去。

跟这些岩石一样具有多孔特性的是这些建筑。建筑物和人们的行为在院子里、在拱廊中、在楼梯上互相融合。在所有地方，人们都保留了活动空间，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建造起无法预见其结构的观景场地。人们避开了明确的风格。没有任何情境看上去像是为永恒而设计的，没有任何造型声称“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169]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完成状态。多孔性不仅仅跟南方手工业者的懒惰和冷淡相关，还特别与即兴的热情相关。无论如何，必须要为即兴留出空间和机会。建筑物被用作了民众的舞台。所有东西分成了无数同时活跃的舞台台面。阳台、建筑物前场地、窗户、大门通道、楼梯、屋顶都同时既是舞台又是包厢座位。即便是最不幸的生存，在这种模糊的双重知识中也拥有主权，即：以他所有的腐败，一起塑造那不勒斯街道不会再现的画面之一，并在其优美中享受悠闲，欣赏着开阔的全貌。楼梯的形态是高级导演的杰作。这些楼梯从未完全暴露出来，也并没有封闭于模糊的北方建筑风格的房子中，而是从房子中逐个展露出来，突然出现个拐角的转向，然后就消失了，为的是再次冲出来。[170]

毫无疑问，上面我们读到的语言就是本雅明的语言。但是引导这种语言的观感来自于拉希斯。[171]对此在的纯粹兴趣、永恒的多余和变化的快乐，这些元素在本雅明之前的文章中都是找不到的。在这种新观感的辩证法中，不可融合的矛盾持续地互相渗透：好与坏、外与内、工作与玩乐、死与生、理论与实践。本雅明没有一层层剥蚀挺进到本真之处，而是将不同的地点重叠到一起，这些素材由此获得了全新的角度和品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液化趋势和蒸汽趋势构成了资本主义，而且最终必定导致所有引导生活的传统关系走向一种毁灭和消亡。而在这个新的思维图像里，液化趋势与蒸汽趋势则经历了一种乌托邦的重新解释：“那不勒斯”作为一个图像象征着另一种具有生命价值的持续革命化

的现代主义。而就如同在一场秘密对话中，只有说情话的人自己才能懂得其含义那样，在这个城市图像中，每一个自然段也都布满了彼此最喜爱的那些概念。从前有一对幸福的爱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异乡写下了他们的文字。

1924年夏天，本雅明成功突破自我，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风格和视角。这种新的写作风格和视角一直伴随着本雅明。与几乎同一时期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状况做一对比，人们就会发现，思想家本雅明在他的爱情中表现出足够的多孔性和立体性特点。他的爱人以惊人的方式闯入了他自己之内，他也以哲学的方式把这体验成是一种根本的更新。

本雅明开发了一种新思维方式，从写作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看来，这种新思维方式的开发自然导致了进一步的紧张和时间压力。在这一时间段，本雅明主要对迄今为止的想法以尽可能清楚和合理的方法进行整理，准备进入一个之前只是碎片化认知的主题领域。9月底，拉希斯带着她的女儿从卡普里岛返回柏林，去找她的生活伴侣伯恩哈德·莱西。这时候本雅明几乎还没有完成论文的三分之一，并且已经严重拖延了之前接的一个翻译任务：翻译普鲁斯特的一部长篇小说。本雅明给出版人魏斯巴赫写信，继续希望得到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这次他没有如愿。他之所以再次请求经济援助，首先是因为他患了败血症（但他并不确定患病原因到底是虫子叮咬，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不过到了八九月份，他就康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去游览意大利帕埃斯图姆的古希腊神庙。另外他还给这个时候刚过来岛上的恩斯特·布洛赫当向导。到了深夜，他回到为了减少开支于7月份新选择的住处，坐到书桌前。这个住处原来是个废物间，四面都是白墙，大小就如一间供僧侣居住的小房间，不过在房间里总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卡普里岛上最美的花园”。

秋风刮进窗子，越来越冷。是时候该回去了，从梦境中走出来。10月10日，本雅明离开了卡普里岛。他先去仔细游览了罗马和佛罗伦萨，然后于1924年11月中旬再次回到柏林，回到了朵拉身边——现在也是回到了阿西娅身边。当然最重要的是回到关于德意志悲苦剧的论文工作上来，他一直还没有完成这篇论文。没有这篇论文，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出口就还是堵着的。

VI
自由
1925—1927

本雅明哀悼，海德格尔产出，

卡西尔变成明星，而维特根斯坦成了孩子

红星

四个德国人坐在一家街边咖啡馆里——前一年，本雅明曾频繁地出入其间，很难说他们对广场上经过的那不勒斯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可敬的德国男士身着市民阶层的夏款西装，尽管他们互相调侃取笑时说的是意大利语而非德语，可当地人面对这个热闹的场面，肯定还是几乎一个词也听不明白。他们讨论时的语言风格听着像是那不勒斯当地的，但谈论的内容还是德国人关心的典型主题。譬如，“异化”、“物化”这样的概念扮演着核心角色，还有“内在性”和“本质认识”。他们还一直说着“源始”、“启示”或者“蒙蔽”这些概念。当然还有“阶级意识”！[172]

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是这场讨论的参与者之一，他在一封给他的作曲老师阿尔班·贝尔格的信中描述了那段回忆：“这是一场哲学战役，我们声称要占领这片领地，但很快就发现，我们必须得重新分配我们的力量。”[173]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阿多诺自己和年长他14岁的朋友兼生活伴侣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阿多诺当时22岁，在法兰克福获准申请取得哲学专业教授席位；克拉考尔是《法兰克福报》副刊的主编。在意大利逗留的三周时间里，他们之间总是显得困难的关系达到了最终的临界多孔性阶段；鉴于咖啡桌上敌人的实力，他们还是展示出了最高度的团结。因为咖啡桌并不在别人心里，而是在内心其实是那不勒斯人的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老熟人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心里。索恩-雷特尔已在多年前离开德国，来到意大利阿尔马菲海岸边一个名为索伦蒂诺的村子里深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红色议会党团有着主场比赛的明显优势，另外——望向广场一眼就够了——他们那边还有具体的视觉优势。

克拉考尔由于说话结巴，战斗力有限，因此艺术先锋态度的防守重担——它要以一种不太容易弄懂的方式实现与克尔凯郭尔的“内在性”和“个体性”[174]理想相一致的目标——就落到了年轻的优秀学生阿多诺身上。不到一年前，他在导师科尼利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凭借题为《胡塞尔现象学中事物的东西与意识相关项的东西之超越》的文章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周围圈子里的人都打趣称阿多诺为维森格兰德，人们想把很多重担都放到年轻的维森格兰德身上，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当年在法兰克福上学时也并没有因为过度理论化的自

我满足而引起别人注意。阿多诺朋友圈里的人在法兰克福上学时代已经彼此熟识，与那不勒斯相似的咖啡馆讨论也是当时大学生活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确切来说，甚至是当时激进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核心体现。现在说来就是，这像是天才班的全班旅行。

根据人们的回忆，本雅明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讨论中表现特别激烈，从不肯退让，他根本就不愿与他人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这也就难怪，本雅明在两个半月以前，也就是1925年7月，提交到法兰克福大学的申请教授席位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得到了这样的专家意见：哲学家汉斯·科尼利尔斯，也就是阿多诺的博士导师认为，本雅明凭借这篇论文还不够格获得教授席位。为了不留下文献记录方面的拒绝痕迹而让本雅明觉得不光彩，哲学系在8月初的一封信中建议本雅明自己撤回对教授席位的申请。经过一整天的灵魂斗争后，本雅明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典型的本雅明事件。又一次发生了。

批判的序言

事情是怎样发展到这个状况的？同年2月，也就是本雅明提交论文第一部分的前一个月，他还给身处遥远的耶路撒冷的朋友肖勒姆写信："事情目前看来并不是处于不利的状况：舒尔茨是系主任；其他方面亦是如此，一些事情的实际情况良好。"在论文提交上去之前，实际情况确是如此。本雅明在2月和3月还一直在写论文和辛勤工作，所以论文在春天被陆陆续续地交到舒尔茨教授那里。直到1925年5月，本雅明才提交了论文全稿。这个时候，文学史家舒尔茨[175]或许只是在浏览了一下本雅明论文的前言《认识论批判序言》之后，就已经给出了评判。作为论文导师和主题提供者，他宣布自己对本雅明论文的内容并不负责，并把论文的鉴定工作转交给了他的同事——哲学和美学教授科尼利尔斯。这样，这篇论文的主题就不再是落在文学史范围里，而是美学。科尼利尔斯在读完本雅明的前言之后也同样丧失了信心，不再花力气去读懂这篇论文，而且非常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这篇大作一个合理的内容评价。舒尔茨当时的助手马克斯·霍克海默博士和阿德玛尔·戈尔贝博士也有相同感受。科尼利尔斯在交给系里的评价意见中这么写道："虽然我好意地觉得本论文作者具有洞察力、思想丰富，但是我不得不考虑，本文作者的表达方式无法让人理解，这实际上必然表示作者本身对于一些内容还看不清楚，因此他也无法在本领域引导大学生。"[176]

就本雅明论文的前言部分来说，以上这个评价绝对可以理解，就算是本雅明本人也会给出相同评价。他告诉过肖勒姆，前言是"整篇论文中最伤脑筋的一部分"。事实上，本雅明构造文章毫无策略的笨拙程度，让人怀疑他这是故意要制造出一种阻碍。无论如何，本雅明文章极端复杂，措辞深奥，比他自己的波德莱尔译文前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读者不禁猜测作者的态度，他是不是因为害怕遭到拒绝而选择干脆由自己来主宰这篇文章可预见的命运，他自己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做出消极评价的最佳理由。还有另外一种严肃的考虑也有一定价值：如果论文鉴定者从前言部分就能推测出他论文的价值，那么这对于他未来申请教授席位的前景来说，就能减少些困难。本雅明对肖勒姆描述道，他觉得自己论文的前言部分是"毫无限度的厚颜无耻——恰恰是作为认识论的前言，这是我较早期语言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好的阶段。你知道的，我的语言工作被美化成了（柏拉图的）理念论。"[177]

一个亚当的案例

“较早期的语言工作”，本雅明在这里指的是他于1916年写作、去世之后才发表的文章《论语言，尤其是人类语言》。[178]这篇浸泡于犹太神学主题中的文章，分析了现代哲学时代，特别是语言哲学时代。他认为后者是远离真理的沉沦时代。沉沦的结果是深深的悲伤，这种悲伤笼罩着整个自然和现代人类。这些思维主题如今又深刻影响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论批判序言》。

1925年时，人们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现代哲学，把它看成是认识论，而《认识论批判序言》标题中使用的概念“认识论批判”明显与此有着清晰的关联。这恰涉及康德的首要和核心问题：“我能知道什么？”康德并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觉得最重要的是——正是在此体现出了他思想的时代天才性——要先彻底检查一下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条件和界限。也就是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出版）框架内进行检验。

但是现在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恰恰不是在康德框架内继续演绎，而更多的是对那种广为人们接受的想法——未来哲学的任务必定或可能首先取决于一种具有康德特征的认识论——所进行的一种诗意分析式的正面进攻。或者换句话说，本雅明批判的是，现代哲学现在已经被狭义化成了认识论本身。这样的一种狭义化对于本雅明来说就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发展，从整个文化角度来看具有可怕的毁灭性。

由此，本雅明申请教授席位的论文首先并不是分析“巴洛克悲苦剧的形式”以及它的可能始源，而是以文学分析的形态来对“悲苦剧”进行基础批判，而在本雅明眼中悲剧已经变成了现代哲学。因此，与此相吻合的是，这篇前言所谈的并非是揭示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相反，是以可以想象的集中方式阐述真实的认识的不可能性条件，这些不可能性条件具有现代性，目前继续占据支配地位。

这些不可能性条件在巴洛克悲剧的现象中以绝无仅有的集中方式得到了艺术地描绘。它们以堪称榜样的清晰性显现于巴洛克悲苦剧真实存在的作品中，并在其中得到一种有示范作用的艺术的体现。艺术作品内部具有真理，通过对这些隐藏了几个世纪的真理的发掘，本雅明确实已经在他1919年的博士论文中认识到批判的真正功能。

如果说本雅明论文的目的正如上所述，那么实际上就还有三个实质性问题需要重视，这些问题和本雅明悲苦剧作品的结构最终完全吻合。这三个实质性问题是：把现代哲学当成认识论，这样做的严重灾难体现在哪里，其核心错误想法是什么？（《认识论批判序言》）把现代哲学当成认识论，这种理解方式会产生怎样的悲哀方式？（第一部分：《悲剧和喜剧》）另外，认识论的特殊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于本分析中的寓言的语言艺术手段？（第二部分：《寓言和悲剧》）

就如艺术家工作室中的速写页远多于实际产品一样，本雅明的基本论点范围远远超出了《认识论批判序言》的地界。因此，《认识论批判序言》是当时用德语写作的最不清楚、也是最丰富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重于分析并追随着作者的指示，它本身集中于认识论语言角色问题，可以被视作本雅明所有哲学核心信念的一部诗集。这些核心信念从1916年开始影响和引导本雅明的思维道路。对于每个读者来说，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就如同斯芬克斯式的谜语，读者想要解开谜语，在本雅明的思维空间里自由活动。这样的尝试可能是值得的。

丧恸

本雅明认为，现代语言哲学的真正原罪首先在于其语言符号的根本的专断性或任意性。根据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例如“桌子”这个词和其所指之物并非处在一种实质关系中，而更多是一种完全随意的关系。实际上几乎不会有人探究现代思维中的这种基本观点，也就是将语言符号和一个所指对象任意联系在一起。而本雅明则将一种亚当的或天堂的语言构想置于这种现代思维的基本假设之对立面。本雅明的“纯语言”是一种源始性的、能够赋予意义的语言。在纯语言中，事物的符号/名字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然的、本质上决定性的。亚当的命名远非游戏和任意，甚至可以说，恰是在这种命名中，这种天堂的状况得以证明自己，证明它不用跟话语传达的意义进行搏斗。[179]

因此，现代语言哲学的第二个基本错误假设是，交流中的真正任务就是去认识语言本质。根据本雅明的想法，语言很明确不是向其他人传达可利用信息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媒介，在这种媒介中人们可以觉察到自我和其身旁环境中的事物，并且用命名的方式去认识它们和自我。不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出了自我，而是语言在人类中表达出了自我：

> 人们必须了解这个基本常识：这种精神的本质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传达了自我。如果人们认为有人通过语言传达了自我，那么就不会存在语言的表达者。精神的本质在一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传达了自我……[180]

本雅明在1916年还将其称作“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到了《认识论批判序言》中就将其称作“理念”，以便能够“将整体都美化成理念论”。本雅明的论点是，语言绝非服务于人世间的信息传达，而是服务于存在之启示。如果正确理解的话，语言是一种启示事件，而不是一种传达事件。顺便提一下，这也跟《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以及海德格尔在1925年左右慢慢形成的关于语言本质的想法所见略同。

但是启示并不能由渴望认知的主体自行产生。明敞事件想要被觉察到，就得要求人类用某种偏向被动的静听态度来面对存在。这种静听态度的对立面就是如下这种现代主动性：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方式询问自然（大概表现为科学实验的形式）以及现代主体积累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在现代时期，历史哲学的符号表现是所有领域中逐步发生的社会进步——并且最终将会到达真理、自由和公平。这样的历史哲学走到了启示事件或者明敞事件的位置上。启示或明敞事件在某些特定的瞬间具有救赎作用，只不过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这种事件很清楚地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无法在这个世界中主动产生出来。人类处于持续进步中，这种景象鼓舞了整个启蒙运动，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与之相对，本雅明提出了具有破坏性的转折的逻辑学，后来他称之为“震惊”。对于这种具有扭转和创造整个世界图像作用的“震惊”事件来说，如今最好的例子就是起—源（Ur-Sprung）（大概例如《悲苦剧的起源》）。因为：

> 起源所指的并不是已生成者的变化，而是指正在生成者的变化和流逝。起源作为变化之流中的旋涡，把形成生成者的材料卷进了它的节奏中。[181]

对于本雅明来说，起源并非位于历史时间中的事件，而是新历史纪元和世界状况的开端。[182]在此，哲学现代性的起源和所有先前知识的起源，是本雅明变化发展的思维，在整体上的实质对象。起源的旋涡吞噬了先前的知识，吞噬的目的是为了让起源自身凸显出来。

知觉在回忆

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从文章开头和文章提交方式来看，本雅明的论文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要求上都与一篇以学术为目的的论文相去甚远。难怪论文鉴定者们深感震惊和惊讶。他们有充分理由要求和期待看到一篇质量上乘的论文，但拿到的却是一篇哲学誓言。而且这篇誓言并不是要表现作者的思想贫瘠，而是哲学家所处时代全部哲学思考的贫瘠。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本身想要成为一个事件——还要成为一种起源，能够吞噬所有、打开所有的起源，由着这个起源开始了一种新思维，以便能够克服现代哲学。确确实实，太厚颜无耻了。

首先人们清楚地看到，本雅明给现代哲学推荐了怎样一种具有彻底反动色彩的起源选择。最终如本雅明所说，只有上帝——一种神圣的本有——才能保证真正的救赎。语言现象本身也是那样一种神圣的东西。就如语言——它是了解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的基础——对于本雅明来说并不是人类起源，那么觉察真理（真理存在于“纯语言”中）的神圣本有也不可能是起源，这种神圣本有令人震惊。和维特根斯坦完全一样，本雅明也一再坚持不能用一门语言来解释这门语言本身的奇迹。充其量最多只能通过特别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显示语言和语言奇迹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

本雅明将如下行为命名为哲学：从事实上知觉不到的某个具体时间范围出发，给出对“知觉起源”真正原因的集中指示。而且是以回忆形式进行的：

> 理念在词的符号性质中可以认知自我，这种认知自我是与所有的向外传达行为相对立的。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通过阐述再次赋予词的符号性质以优先权。因为哲学不能妄称可以敞开地言说自我，所以只能通过一种回溯到未知觉状态的回忆来实现上述之事。[183]

回忆行为的发生方式首先在于，要沉入为了回忆而创造出来的艺术思维图像中。确切来说在这点上，回忆所具有的是一种知觉的被动的特点，而不是那种积极主动的认知特点。关于这一点，本雅明谈到了一种“富有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强调在这点上他关心的仅仅是洞悉一种不可能性。要落实这种怀疑，那么就要在所有可能的经验库中刻意使自己

的感官对全部现象的明显特点变得敏锐，并要深思熟虑地重复进行这种敏锐化。这就有点儿像是佛教的曼陀罗[184]，搜寻着的精神主体在曼陀罗的花纹绘饰中必须进入沉静状态，内心澄明、抹去所有杂念图像。用本雅明的话来说：

> 这种怀疑可以比作思想的深度喘息。在这喘息之后，思想可以悠然忘我于最细微处，而毫无任何忧愁之迹。因为在观察深入艺术的作品与形式以探测其内涵时，往往都是在谈论最细微处。以消耗他人财物的那种草率手法来对待艺术品，这种急切是因袭成法者固有的，与庸俗之辈的热情相差无几。而真正的冥思则与之相反，对于这种冥思，对演绎方法的拒斥则伴以一种不断扩充的，日益热切的对现象的回溯。这些现象绝不会陷入始终是某种阴郁惊诧的对象这一困境，只要对这些现象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理念的表现，而且现象的个体也在表现中得到了拯救。[185]

对本雅明的沉沦诊断具有决定作用的乃是这种洞见：一种天堂式的“回归到现象”、回归到“事物本身”的理念，是否无论如何都无法导向哪种评判形式呢——答案是，无法导向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评判。

所谓非常具有判断力的现代主体提出了无理要求，鉴于世界的需要，将自己提升成法官，对善恶进行评价，并宣传这样的观点：人类伦理学可以建立在现象学——语言现象本身——的基础上。[186]这种无理要求对于本雅明来说意味着现时代真正严重的、扭曲了所有东西的原罪。根据他论文的主旨，他把这种原罪和德国的巴洛克悲苦剧起源连接在一起，将其作为一种衰落的典型，也就是说：

> 巴洛克所含有的这种可怕的、与艺术相悖的主观性在这一点上与神学的主观化实质相汇合。《圣经》以知识的概念引入了邪恶。蛇预言说，第一个人将会“认识善与恶”。但是上帝在创世之后说的是：“上帝看到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此，关于邪恶的知识根本是没有对象的。邪恶并不存在于世间……关于善和恶的知识因而也就是所有实际知识的对立面。在牵涉主观化的深度时，这知识基本上就只是关于邪恶的知识。按照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深刻词义，这知识就是“无稽之谈”。作为主观性的胜利和对实物的专制统治之肇始，这知识是所有寓言式观察的起源……因为善和恶是无法命名的，是无名者，是外在于命名语言的，而天堂中的人正是用这种语言来给实物命名的，在质疑的深渊中他离弃了这种语言。

主观性的胜利、本着内在固有精神而产生的对事物的独断统治、尤其是对符号之下自行物化的自然界的统治，这些最终也会导致人类无可救药的物化。一句话说，真正的现代悲剧正是在此之上建立起来，本雅明在他著作中讲的就是现代悲剧的不幸始源。特别是围绕着善和恶的知识事实上并“没有对象”，“不存在于世界间”的问题。用本雅明自己特有的命名存在论来说就是：善和恶的知识“外在于命名语言”。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保持沉默。而现代主体在其彻底自我授权的意志中却不是这么做的，而是要去“胡扯闲聊”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麻木的无知觉中。其最终效果就是悲伤，虽然悲伤的效果自然总是以隐晦的方式被觉察到的。

如今，以上这些就是本雅明对自己所处文化状态的诊断，也是对号称学术学科的哲学状态的诊断。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也都完全同意这些诊断结果。英雄所见略同之处还尤其在于，他们都坚信，并不存在哲学伦理学。任何一种想要本着内在固有精神来论证哲学伦理学存在的尝试无非是一种最清楚的症状，表明作为命名者的人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深深陷入了废话之中。

在这三位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一人曾写过传统的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著作，连起码的尝试都没有。卡西尔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家对于自己的舍弃都是具有洞见的。

悲伤的比喻

这种特殊的悲伤和现代起源越发给整个世界现状蒙上一层阴影，抑制了世界发展。对本雅明来说，这种特殊的悲伤并不仅仅涉及那些误以为自己是决定他物之主体的人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涉及了可能是缄默的所谓自然客体。现代人类认为自己已如此自由和随意地支配了自然，就如支配那些任意的符号一般——通过这些符号，人们对自然进行命名。但是从自然的本质看来，自然对于本雅明来说绝对不是缄默无声的，它只是在“沉沦之后”的时代变得越发沉寂，即为了我们才沉寂的。

自然用“真正的语言”对我们说话，就如我们用真正的语言对它说话那样。在此，没有一方给另一方赋予意义，而是意义自己产生出来了。

自然和人彼此偷偷地知觉对方，但此关系在现代完全被扭曲的认知前提下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产生互动关系的双方——自然和人——都得承受相互之间加剧的共鸣丧失。彻底的意义丧失或者更准确地说语言丧失导致的令人近乎抑郁的现象（“再没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话了”），本雅明确切地称之为悲伤：

> ……自然的悲伤性令它自己沉默。所有悲伤中最令人伤心的是失语的趋势，这比没有能力传达或者不乐意传达还要强无数倍……但是在人类的语言中它们[自然之物]被过度命名……过度命名乃是所有悲伤和（从物的角度看来）所有沉默的最深层语言根基。[187]

从现时代由好奇而生的“过度命名”[188]中产生了沉默无声，正是这种沉默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来弥补巴洛克时代。也即，当德意志悲苦剧在舞台上将所有这一切都呈现为语言时，可以想象德意志悲苦剧是无助的，还受到了形式上的苛求；当它使所有这一切——哪怕这一切其实是最为偏远和遥远的东西——都成为需要传达给观众的戏剧对象时，一样可以想象德意志悲苦剧的无助和被苛求状态。就好像是，以始源性意义丧失的自由落体方式盲目飞奔。这是认知方面的一个真实悲剧，对于本雅明来说，随着十年的开始，出于可以看到的沉沦原因，这种悲剧必须在表现主义的语言无节制中不断重演，本雅明明确把这种无节制等同于巴洛克无节制。

在此背景下，作为艺术表达中典型的巴洛克手段；起着决定作用的

寓言角色也明朗起来。首先这里说到的寓言（比如一位女士手中拿着秤寓意着公平公正，或者较近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寓意着哥伦比亚的殖民命运）指的是一种间接表达形式。人们不是直接说出什么，而是进行了间接象征。作为巴洛克悲剧偏爱的表现手段，寓言对于本雅明来说首先能够达成一种效果：寓言可以一目了然地表现出毫无希望的不属同类、互不相适的情况。由此，在沉沦之后也是最适合通过寓言将世界的真实特点展现给受众。恰恰寓言作为“魔鬼式的凶暴认识方法”，是一个从属于完全任意的（语义）规则世界中的一种杰出的艺术认识手段。用本雅明的话来说：

> 寓言的意图是如此对立于追求真理的意图，以至于一种只为获取知识的纯粹好奇与人类不可一世的独立姿态之间的统一在寓言这里体现得最为清楚。[189]

只要哲学的真正任务在于“回忆，一种全然回归到无知觉状态的回忆”，那么在现代“沉沦”之后的时代中，哲学就必然只能存于这种揭示，即揭示出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真正地进行认识。那么揭示的条件是什么？在此就没有任何一种认识方法比下面的做法更加适用于揭示：以尽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将完全任意性和矛盾性展现出来。而我们当下的时代就是在任意性和矛盾性上与众不同。也就是说，这种认识方法如此清楚和确定地对立于探寻真理的实际研究意图，以至于在这种方法中，人们可以特别清楚地了解到丧失的深渊在哪里，它就如同摄影中的负片（其明暗和被摄体相反）一般自己显现出来。

在沉沦至现代之后，就再也没有直接表达真理的方式了。在这方面，语言本身早已被消耗殆尽。幸而在这种复杂纠结的联系中还有些办法，可以将出现的无知觉度变得可视和可忆，也就是寓言。在思维图像的书写方式和认知方式中，寓言决定了本雅明1924年到1925年的创作，并由此将其创作带到了一个新形式的高潮。

批判的纪念册

想要从整体上理解本雅明系统思考和实践的哲学方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对于本雅明来说，他的寓言表达方式指的是一种杰出意义上的反认知手段。其余的手段目前无法使用（而且可能也不会再被使用），就如事物处在其语言整体之中。这就像维特根斯坦为了“正确地看待”世界，一开始还是得借助没有意义的梯子——即他写下的那些远离真理的命题——向上攀爬。本雅明借助着寓言和寓言阅读方式手段以达到以真理为导向的批判，批判他所身处的现代状况。在本雅明这里，真理无法在语言和文化状态中被表达出来，却可以显现或显示出来。而本雅明自己最终就身处这种文化状态。

因此，在寓言性思维图像的符号中，纪念册逻辑就取代了严谨论证的逻辑。纪念册逻辑指的是，将一个完全交错分布的思想领域——交叉的、直穿的、跨越楼层和岩石的，如同没有目的地漫步走向任何方向的，相同的点或者几近相同的点——重新导向各个方向，构成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向观察者打开了一幅清晰的视野画面。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本身含有高度分散的论据，拥有纪念册或者速写特点。谁要是不能自己把这些碎片重新组合为拼图，那么谁就无法了解自己当下时代的这些符号。因此，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可以作为一种检验方式：谁要是不能理解这篇序言，就最好保持沉默，绝对不要去做什么判断，或者评价。

这么看来，并不是本雅明和他的论文在法兰克福失败了，而是法兰克福在他的论文中失败了。而且，不仅仅是法兰克福人，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本雅明狂热崇拜者——他们直到今天都还很活跃——一直更喜欢把他们的英雄本雅明抬高到富于吸引力的特异功能者的讲台上，而不是去接受他非常系统化的建议和启发，这些建议和启发持久存在，拥有着面向未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悲伤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巴勒斯坦还是共产主义

本雅明由于经济方面捉襟见肘，一直在强化自己从事学术职业并取得成功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清醒的一些瞬间“别无其他，仅是空虚无望”——这种想法也意味着他人生悲剧的起源。尽管他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还是遭到了非常明确的拒绝。这样的拒绝从根本上否定了他在学术领域和机构工作的可能性。本雅明意识到，自己在受到拒绝的同时，也从他迄今为止成年生活的重心中解脱了出来。尽管拒绝必然带来各种负面情绪，他还是把法兰克福的判定结果当成是一种解脱。就如他于1925年8月写信告知他的“经理”、也是他在法兰克福唯一真正的支持者戈特弗里德·萨洛蒙-德拉图的那样：“在我的自我评价中，如果我有一丁点儿依赖于他人的表态，那么他们与具有决定权的有关当局以一种不负责任和草率的方式来处理我的事情，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惊。我的写作产出也由于这样的震惊无法马上得到恢复。但事实上——就算是相反的——并非如此，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190]

由此，1925年年中，本雅明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人——当然也包含了挨饿的自由。他未来的创作方向，当然还有与此相关的未来如何糊口的问题，都要求他做出一个明智决定。在他关于悲苦剧起源的著作中，在他迄今为止的重要作品——也就是《论语言，尤其是人类语言》、《性格与命运》、波德莱尔译文的序言以及关于《亲合力》的随笔——的所有核心洞见以一种独特的密度彼此关联和交织在一起。1925年，本雅明拥有了整全独特的哲学视角和声音，这些都在第一批思维图像那里，比如关于那不勒斯的文章，开始越发自由和快乐地表达出来。系统看来，《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分析给他带来了两条不同的研究之路和生活之路，这两条道路几乎拥有同等的联系能力，但彼此却又是无法统一的。简单说来，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可以总结为巴勒斯坦之路和莫斯科之路，他必须要在其间做出选择。

巴勒斯坦之路，在持续寻找已遗失的亚当语言，保留犹太弥赛亚主义具有超越性的真正神圣领域的意义上，意味着通过其著作最大程度地沉浸到犹太教神学中。本雅明最好、最信任的朋友肖勒姆已经在1923年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一直努力吸引本雅明也一起来到这片福地。不过如果要走上这条路，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希伯来语，迄今为止本雅明既不会说也不会读希伯来语。

另一方面，就如本雅明1924年夏天在卡普里岛上经历的梦幻般“枕头共产主义”阶段一样，他的许多洞见都指向了对时代的一个诊断结果，就像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其近期作品中，尤其在1923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对时代做出的诊断那样。本雅明和阿多诺、克拉考尔还有索恩-雷特尔都很重视这部著作，并且曾深入讨论过这部著作。

本雅明关于《亲合力》的随笔中隐藏着对市民意识起支配作用的神秘力量，毫无疑问这些力量可以破译或改写成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本雅明毫无保留地对整个现代悲剧和现代哲学进行了批判，批判的核心对象是“物化”——自然的物化，尤其是人类的物化。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原罪在于其异化力，也就是将工人身上具备的人类个体化品质特点同人本身分离开来。[191]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将无产阶级进行物化式的异化，这种批判角度非常契合本雅明设计的去异化图景，也契合所有事物之间本着语言哲学精神的随意可交换性。语言哲学宣称每个符号都具有任意独断性，不想再承认命名行为具有神圣意味、命名时具有始源性的意义联系。根据本雅明的分析，巴洛克寓言艺术的特点在于其遵循了由此产生的混乱，这种混乱遗忘了事物的个性：

> 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种关系都可能表示任意一个其他的意义。这种可能性对世俗世界来说是一个具有毁灭性但却公正的判决：世俗世界会被刻画成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完全是细节。[192]

由此，就像人们可以明确补充的是，这里讲的并不是作为个人的人类个体。那么它到底指向哪里呢？1925年5月，在本雅明申请教授席位明确失败后，他非常清楚地写道：“对于我来说，所有一切取决于我和出版人的关系怎样。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成功，那么我可能将会加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进行的研究——我还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起码暂时去趟莫斯科——去入党。这一步不管时间长短，我都会走的。我的工作视野不再是之前的旧视野，我也不能人为地把我的视野变狭隘。当然这首先是一种（我个人）力量的巨大冲突，在冲突中必然会出现的要素就是学习希伯来语。我也无法预见到一个根本性的决定，但是我得去实验，从这里或那里，反正得从某个地方开始。我发现我的视野不管是明是暗，我都只能从这两种经验、两条道路中去获取我视野的完整性……”

作为强调紧要关头、决定和始—源的理论家，本雅明在所谓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个踌躇犹豫的人。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跳蚤，它每跳一次的距离只有到达目标距离的一半，因此它就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只做半程跳跃。本雅明在1925年秋天也是如此。

当本雅明和罗沃尔特出版社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罗沃尔特想要在下一年出版本雅明关于《亲合力》的随笔、《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和另外一部著作（也就是后来的《单行道》），由此也可以保证本雅明每月有固定收入，哪怕这笔收入还几乎不能保证本雅明的基本生活。另外，本雅明还跟罗沃尔特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翻译出版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后续卷本。

本雅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二者择其一的真正决定。1925年11月，强烈的第六感把本雅明吸引到了拉脱维亚的里加，在那里待了好几周，这也象征着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他来到里加是为了阿西娅·拉希斯，她彼时正在里加忙于几个演出工作。肉体的欢愉击败了与肖勒姆之间的友情。本雅明良心上过不去，便从里加给肖勒姆写信，告诉他自己现在正勤奋地学习着希伯来语（未来几年，他还是会一直假装自己在学习希伯来语），而且，他甚至在里加——这座波罗的海海湾边冬日阴郁的城市——看到了好几个形单影只的“东欧犹太人”。[193]这毫无疑问是个符号。只不过，这是代表什么的符号？

在身边

当瓦尔特·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等待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评价结果时，马丁·海德格尔在1925年初夏体验着两性关系的亢奋。就算是马尔堡小城乏味的雾天和在大学授课的厌烦日常都无法影响海德格尔的这种情绪状态。“我现在非常生气，因为有人拿他完成了的博士论文突然来找我。我必须要把这篇论文仔细看一遍——哪怕我只是为了最终否决这篇论文，我还是得把它看一遍。这样，在最美妙的工作过程中，我失去了半个星期。希望我在你到来之前就能完成这项工作。起码我是非常希望这样的。因为我喜欢从工作中走出来，待在你身边……请你在周五傍晚过来，就像上次一样。”这是海德格尔在1925年7月1日给他的汉娜写信的内容。当时的情况对他们见面特别有利，因为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福丽德带着儿子约尔格去威斯巴登找她的父母——两天之后就是她的生日。因此海德格尔也给埃尔福丽德写了封信。他看破了如今越发功能性质的婚姻的相处特色：“我最真挚地祝福你生日快乐。在此我想要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和支持。这种支持——除了现象学批评之外——还在于最难的几个方面：放弃、等待和信仰。如果我从你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样的一个学期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在义务要求和善意的尽力付出之间总还是有些差别的。即使我没有向你提到这些，你肯定也能够明白我之所想。可惜你今天不在我身边，我不能当面对你说出这些感谢的话语，写得再多也是白搭。不过你去看望你爸妈，给你自己和他们带来快乐，对此我当然感到高兴。”[194]

几十年后，汉娜·阿伦特评价海德格尔的为人时，认为他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好的性格，甚至根本就没有。现在人们读到的这两封信很有可能写于同一天，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其中的含义。男女激情和婚姻在海德格尔的生活里、在其市民生活方式中始终是明确分开的两个领域。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和这两位女性并不是站在独立人格的平等平台上进行对话，而是将她们放到一个从属位置来提出表扬——也就是把她们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海德格尔的神圣目的就是思维的任务。是他自己的思维。海德格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认可他身边的人呢？他把身边的人当成他达到自己思维目的的手段。1925年夏天，正是这样的思维任务迫使他尽快将思维具体化到一部专著中。因为目前为止，海德格尔这位德语哲学的“无冕之王”写出来的著作，除去他的博士论文和申请获得教授席位的论文之外，充其量最多也只是一些断

简残编和试图证明自己能力的尝试。他还没有成熟的著作，没有完结了的著作。他还没有一部分量十足的大作。

投身写作

1925年7月，马尔堡大学教授尼古拉·哈特曼收到了科隆大学的聘任邀请。尤其是因为感受到了海德格尔身处马尔堡给他带来的明显压力，哈特曼马上就接受了科隆大学的聘任。当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通过写信达成一致，认为恩斯特·卡西尔“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应该接替马尔堡空出来的教授席位时，哈特曼领导下的哲学系便已宣布，海德格尔应成为1924年保罗·纳托普去世之后的理想接班人。当然这个决定也急迫要求海德格尔最终提交一部专著。否则无论学校怎么支持他，都无法在柏林的任命部门通过，最终只得一场空。像海德格尔这样的老狐狸也最终掉到了体制的陷阱里。他想要符合自己的形象和学术水准，就必须最终按照规定交出自己的作品。

仅仅11个月之后的1926年6月18日，马尔堡大学哲学系就将《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版打印稿寄往了柏林。海德格尔一再抱怨，他必须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完成所谓的主要著作（事实上这也是他所有出版作品中唯一一部具有专著篇幅的独立著作）。实际上，这部作品算是哲学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创造性突破。扣除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上课必须花掉的工作时间——在这些工作时间里海德格尔几乎无法连续进行写作——那么海德格尔就是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总篇幅达到450页之多的著作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他每周必须写出30页内容，这30页还需达到已经可以出版的程度。

在此之前，海德格尔算是进行了详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过去六年中的演讲和讲座课内容都可以当作写作的素材。《存在和时间》构成了他持续的思考和开拓活动的一个暂时终结，其时间跨度从1919年战时学期的讲座课，历经《解释学情境的显示》、在马尔堡大学关于柏拉图《智者》的讲座课，以及《时间概念的历史》。最后一个《时间概念的历史》是他在1925年夏季学期开设的讲座课（每周两次，早上7点到8点上课）。

揭示问题

海德格尔本阶段思想道路的中心内容在于揭示一个独一无二的问题的意义。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在人们（再次）研究这个思维的终极问题之前，更别说探寻到一个接近的答案之前，必须要揭示每个存在者的独特存在方式。只有针对每个存在者提出问题，这个问题才可能是唯一和有意义的。这里的存在者指的是人类的存在。

存在的意义只有对人类来说才可能成为追问的对象。只有人类能够惊奇于“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尤其是只有人类作为可以进行语言表达的生命形式能够提出问题，在发问的行为中蕴含着其特殊的此在意义。为了使他所称的“基础存在论”式的研究方式同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研究——这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或者说本身就是先验研究——有意识地形成鲜明对照，海德格尔将人类的存在称之为“此在”：

> 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那么，此在的这一存在建构中就包含有：此在在它的存在中对这个存在具有存在关系。而这又是在说：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性对自身有所领会。[195]

就如海德格尔坚持的那样，每个此在都以某种方式并在某种明确性中对自身有所领会，这也意味着，每种对存在的理解并不是从自身而发，或者也不是对自身的适应。基于错误的分析和有选择的概念性，这种关系对于此在来说也可能是蒙昧和扭曲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如上情况——联系到他所身处的整个文化状况——在其地区范围内就是事件。

在持续的沉沦演历进程中，不仅对“存在的意义”发问所包含的可能意义会被完全遗忘，或者被视作是禁忌，而且此在本身面对存在状况的实际基础和源泉时就如同眼盲一般，因此存在状况的基础和源泉就尤其变成了生活意义的基础和源泉。在1925年的海德格尔看来，沉沦演历最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此后随着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经历了一种进一步的，决定性的晦暗化。关于这点，海德格尔诊断为现代文化，尤其

是作为认识论的现代哲学的一种广泛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

因此在这件事上，海德格尔的分析所追求的目标恰恰就是本雅明在他《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所投身的目标。两部作品共同的出发点是：立足于自己文化所处的状态，不管是为时尚早还是错过了时机，都想给出回答。这里唯一可能涉及的是，以概念上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记录处于被遗忘状态的损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到的是一开始纯粹为提问而进行准备的揭示行为，因此他把自己的行为称作是一种“具有准备性质的对此在的基础分析”。

这里，分析这个概念不仅仅得从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还得从治疗意义上来理解。理智的此在应该通过一种新的描述方式——这种新的描述方式应尽可能接近现象本身、不带任何评价，由此在对出现的晦暗化进行描述时普遍具有洞见性——回归到澄明之中，即此在自身真正基本情况的光明，它可以保证此在的自由。尽可能准确描述自身情况（最广义的自身情况）、揭示自身结构的目标，这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或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相似。与这个目标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种相关联的目标：对自己生活实施根本性的、更自主的转变。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改造工程带来了如下必然性：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要么完全省去事实上业已存在，然而是完全错误的概念性，人们借由这些根本错误的概念性来描述现代世界的状况（主体、客体、现实、个体性、价值、生活、物质、物体）；要么通过新的概念创造（此在、周围世界、在世界之中存在、向来我属性）来取代这些错误的概念性。在错误的概念性中不可能有正确的言说。因此海德格尔给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

此在的时间

努力接近经验、尽可能确保对体验不作任何评价，这是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具有现象学特征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尤其涉及对时间和实践性的理解。在时间概念上，他的出发点不是一个可以分解的分钟秒钟“流俗时间概念”——也就是一个数学方面的清晰中性概念，人们借此可以来测量时间——而是要去寻找另一种对时间的理解，这种时间理解以特殊的方式阐明自我，此在就是以这种特殊方式经历着他的时间性。这一基础想法也将时间的框架严格限制在可经历的固有空间内，海德格尔在他对此在的分析中讲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时间。换句话说，这种意义上的时间能够帮助阐明可能身处扭曲中的此在，这种时间区别于最终可以被领悟的时间。真正赋予这种时间意义的地平线正是死亡。与超越产生的任何关联，不管是以（人死后在后代记忆中的）长存形式，还是以本雅明意义上的弥赛亚开启的形式，都是扭曲或伪装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揭示的一部分。在这点上，跟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一样，海德格尔也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本有。和维特根斯坦跃入信仰直接相反的是，海德格尔觉得，正是预先知晓了绝对界限，才能真正保证在有限的时间视野内对“生命之谜”[196]的含义进行有意义的发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了解“生命之谜”的含义。

在《存在与时间》中，标志着海德格尔哲学特点的直接临近经验尤其通过如下方式显现自我：海德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分析直观化，总是动用关联、心理状态和临界情况这些方法，它们都是和海德格尔自身直接相关的，并且使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直观化。这尤其适用于三个关键概念，通过这三个关键概念，组织了海德格尔从哲学上对此在进行阐明：用具、畏和死亡。

这就是锤子：用具分析法

根据非常明确的记载，海德格尔真正的写作兴奋点是在1925年8月8日。他为了能够专心写作，退隐到了托特瑙堡的小屋里，他全家也准备在此度过整个夏天。“我在8月1日启程去小屋，很期待山中的大风。山脚下，一个又软又轻的工具就可以持续毁掉一个人。八天的木工，然后又得写作。”海德格尔还在马尔堡时就这么告诉雅斯贝尔斯。只有在高山的空气中才能清醒地呼吸和思考。海德格尔在这个片段里几乎同时提到了紧接着等待处理的木工活儿和写作，这并非偶然。他在小屋这里总是扮演着一个男人的角色，虽说他是个教授，但他还是在强调他出身农民（并不是无产阶级！），并因此总是具有明显的进取心，这些都在他身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当涉及要用描述的方式揭示此在与世界的始源关系时，他对自己的描述就直接转移到了他的哲学分析上。因为对于一个日常干农活儿的普通乡下青年来说，无论如何无法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思考着的主体如何能够以认知的方式到达一个声称自在地没有意义的客体世界。因为乡下青年作为总在进行劳动的创造者，如海德格尔所说，他本身已然总是“在世界之中”。而且不是在空间关系的意义上（例如装在食品罐头里的死鱼），而是在意义浸透的始源关联方面，关联到其具体经历的周围世界。海德格尔在其此在分析的最开始处就提出了笛卡尔的（无身体形态的）主体“安乐椅状况”，这个主体想要纯粹以反思方式保证其所处世界的真实性，与之相反的是一个高高兴兴干着木工活儿的黑森林农民，这个农民为了出神地流汗进行创作，便离开了小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

> 从现象学角度把切近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展示出来，这一任务是循着日常在世的线索来进行的。日常在世的存在我们也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识”……我们无须再去投入这种操劳打交道的存在方式。日常的此在总已经在这种方式中了。譬如，在开门之际，我已经利用着门把。[197]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一些所谓的“物”，而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虽是审慎的，但却经常是鲜有意识的。海德格尔为这些物带来了一个来自于黑森林日常语言的框架概念。他把这些物称为：用具。

我们把这种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在打交道之际发现的是书写用具、缝纫用具、加工用具、交通工具、测量用具。用具的存在方式还有待摸索……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用具就其作为用具的本性而言就出自对其他用具的依附关系。书写用具、钢笔、墨水、纸张、垫板、桌子……这些“物件”绝非首先独自显现出来，然后作为实在之物的总和塞满一间房间……用具的整体性一向先于个别用具就被揭示了。[198]

从海德格尔接地气的实用主义意义上来说，就如他将可纯粹观察的认识论出发点从头上放回到脚上，他通过揭示用具的特点从而调转回到了属于用具整体性的典型认识论解释方向上。这种认识论带有笛卡尔的影响。它从单个的、可以分裂成原子的物体出发，对自己发问：事物是如何从原来单个分离的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对于现象学实用主义者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分离无论如何都是世界经验的一种独特的衰落方式。在此种世界经验中，人们获知对象的方式是始源性的、在所有理论反射之前的，是在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中经历这些事物对象的。在使用用具的操劳活动中，正是动手操作让用具融入了一个整体。因为在真正指引研究的、关于“存在”的问题框架中，海德格尔以明白无误的方式澄清了用具的存在起码显现在哪里——由此也澄清了所有物体的存在显现在哪里，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同这些物体打交道，有了这些物体我们才能够适应和熟悉这个世界。由此，作为小屋建造工和木工的海德格尔选择了锤子的例子来进行阐释：

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始源，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199]

因为这个用具的真正本质在于它的上手操作性，所以它对于此在来说并不仅仅是现成在手的（就如同它还是一个可以被开发的“物体”），而且还是上手的。在认识论动机下的聚精会神地瞠目凝视（和描绘）中，人们看到有某个东西是纯粹现成在手的，这个东西也就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真正方法论基础。海德格尔的著作由此尤其成为了对他老师和支持者——胡塞尔哲学的正面攻击。这也是胡塞尔在第一遍读完印刷出

来的海德格尔著作时明白过来的事情。而且，海德格尔略带骄傲地告诉雅斯贝尔斯："除了我已经从这部著作所获得的东西外，这部著作[《存在与时间》]不会再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走进了自由的境地，可以带着一种自信和方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说这篇论文是为了'反对'谁而作，那么就是反对胡塞尔，他也马上就看出来了，但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件积极的事情。"[200]

狂风与畏

不管和用具操劳地打交道的农民的此在日常是如何幸运，对于追寻哲学意义的海德格尔来说，他身上还是存在决定性的缺点。正是与周围世界始源性地扎根到一起时，亦即正是在不受干扰地完成即将到来的任务时，这样的一种此在才会对自身保持一种无问题状态。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始源、直接和充满意义，以至于对他来说这种关系永远不会成问题。谁完全彻底地投身于他的世界，都不会提出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也不会提出关于自己生活存在的问题。正是首先要面对这种意义丧失的具体经验，继而是要面对不管以哪种形式总是受到干扰的世界关系的具体经验，向操劳着的此在提出了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尤其提出自身存在意义的问题：所有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我究竟为什么在这里？

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生活丝毫不受生存的干扰、不带有意义问题，不管这种生活是多么有安全感，多么像受到家里照顾一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只要经历过某种特殊感受，或者，就如他想准确命名的那样，经历过某种特殊的“此在情绪状态”，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不可否认。这里的“此在情绪状态”说的就是畏的经验，海德格尔把畏和害怕——也就是对于某个东西具体的害怕——明确区分开来了：

> 畏所为而畏者，就是在世本身。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畏把在此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为而畏者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出来，其实就是把此在开展为只能从此在本身方面来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其个别化中存在的东西。[201]

在海德格尔这里，畏典型地代表着对一种广泛的意义丧失的体验，在由此产生的虚空和无关联性中，这种意义丧失揭示了如何看待每个此在的真实基础。揭示的结果就是，此在的基础本身并不存在，没有产生，没有被事先限定，也不能通过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得到保障！在畏的模式中，此在经历了事实上的无根基状态和自身存在中一种可能的“虚

无”，是的，所有存在者都是如此。不可否认，在某空间中存在的意义问题无法委派给第二个或第三个人去解决，也无法推卸给超越状态，无法通过习俗、传统和家乡得以自我安慰。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更多关系到，为了保存自身生存紧张性而使这些问题保持彻底和尽可能持续的开放状态：

> 沉沦着的逃入公众意见之在家状态就是在不在家状态之前逃避，也就是在茫然失所之前逃避。这种茫然失所寓于此在中，即寓于被抛而在其存在中交托给了它自己的在世的存在中。[202]

有一些环境给予了此在实质上最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特别是在自己家的四面墙之内。在这样的环境中，充满畏的不在家状态和茫然失所达到了特别的强度和紧迫感。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环境的典型例子就是他在托特瑙堡的小木屋。正是在小屋里，畏打开此在和激发哲学研究的效果展开了。如此，在1926年4月，当《存在与时间》后续部分全部完成之后，海德格尔告诉雅斯贝尔斯：“就如您看到的那样，我们还在山上的小木屋这里。我在4月1日开始了《存在与时间》后续的印刷工作，它包含了大概34个印张。我正在顺利开展工作，只是生气于下个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另外也气这儿周边的小市民氛围。系里要继续推荐我，并附上我已经印刷好的印张……两个小家伙在木屋这里都战胜了猩红热。现在已是深夜，山上刮着狂风，小木屋的梁嘎嘎作响，生活如此纯粹、简单，与灵魂一般伟大。”[203]

海德格尔觉得，山间木屋在狂风中的极度舒适惬意最贴切地对应了他灵魂的极度安定状态。而这种强烈的安定感本身就是他进行哲学探讨的体验。这便是一个正在紧张思考着的此在最理想的境况了。

某些确定的东西：先行赴死

但是黑森林的狂风也不会就这么永远地刮着。最伟大的思想家终究也得在某个时候再次回归到日常操劳的小市民气息中。为了预防与此事实同时出现的此在松缓现象，海德格尔指出了一个通行的、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人类生命基本特点：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与其余所有生命形式相较之下生而为人的特点，对于它此在是了解的。而且此在非常确定地知道，有限性以一种具体的可能性持续伴随着自己生活之实行的过程，并存在于这个过程中。是的，如果人们正确观察的话，所有可能性中——这些可能性可以决定一种根据这个世界而进行自由设计的此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将来必然会实现，那就是：不再在此的可能性。

死亡是一种可能性，它对于此在而言，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却终究必然会出现，因此海德格尔以语义双关的方式称之为“必然可能”的死亡。与畏相反，死亡是确定可知的，是在此在中永恒存在的——这并不是一种可以产生又可以消逝的心情。死亡作为一种可以具体体验的确定性，是一种稳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此在可以在各自具体的生活关联中抓住所有机会。换言之，死亡是通向自由的大门。

死亡只有在保持自身完全未受确定的状态下，才能实现通向自由的功能：在海德格尔力求揭示意义问题的框架内，他可以驳回关于死后生活的假设和推测，或者仅仅是对死后生活的希望。它们挡住了此在看向其真正存在可能性的视线。正是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聚精会神的真正存在，此在一直处在先行奔向死亡的过程中。

> 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此在在这种可能性中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旨。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在如此悬临自身之际，此在之中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都解除了。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同时就是最极端的可能性。此在这种能在逾越不过死亡这种可能性。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204]

在这里，作者并没有从死亡的确定性出发，去回顾和抱怨所有存在者，特别是自己的虚无——就如本雅明在他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中分析到的巴洛克时代所做的那样——这里随着自身的虚无确定性出现的是一种呼吁，呼吁人们要以自决的方式抓住自己此在的可能性。也不同于一些基督教或者古代生活学说那样固守于思考自己的有限性，在此海德格尔认为，生活恰恰在于要决绝地走向有限性。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先行奔向死亡是一种不可迎接的碰撞，为的恰是去迎接最本己的此在可能性，而不是自我安慰道，世界在自己逝去之后，就如人们说的那样，还会继续运转。

每个人都会自己孤单地死去。自己的死亡就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是无法委派给他人的。海德格尔此在思想体系中关于先行至死亡的部分，最受误解的地方在于，被误当成是要呼吁人们自杀。因为谁能够自己动手结束生命，那么就貌似以自己的行为最终抓住了先行的可能性。下定决心抓住此在可能性的持续过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要适用于一个还未被足够理解的问题（同样也是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之开放度——现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谁在这种意义上生存，像此在应该生活的样子生活：那就是本真地生活。只有很少的人做到了。太多人做不到。

因此，也就难怪海德格尔在黑森林地区由所谓单纯的人们构成的社会中，更容易找到本真，而不是在常见的被教坏的学术环境中。“我并不渴望教授的陪伴。农民会令人感到舒服得多，他们甚至还更有趣。”他这么吐露给雅斯贝尔斯教授。而且“我经常希望，您现在也能够和我一起待在山上小屋这里。有时我无法理解，人们在山下的世界里，居然能扮演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205]

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创造高峰期唯一有关联的学术圈人物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了，海德格尔将他视为自己的知音，愿意向他吐露心声。吐露心声的内容尤其涉及与死亡打交道这个具体问题。因为在死亡和畏惧死亡的问题上，在1924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海德格尔由于新的生活经历也打开了新的经验视野，这些新视野与他产生了深刻关联。海德格尔的父亲在中风后的几周与死神展开了搏斗，生命渐渐黯淡并最终于1924年5月去世。在这段时间，给海德格尔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父亲虽然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在面对死亡时还是心生本能的畏，这种畏已经嵌入死亡本身，他还对地狱和最终审判也产生了畏。三年后的几乎同一天，海德格尔的母亲在经受了几个月的痛苦之后死于肠癌。她对于儿子背弃天主教信仰感到内心特别沉重，并

且在垂危的卧榻上清楚地把这些告诉了儿子。1927年2月5日，海德格尔给妻子埃尔福丽德叙述了已时日不多的母亲和他之间的对话："我当然非常担心我可怜的妈妈，但她总是认为她得对我负责，得照顾我。虽然我安慰了她，可她还是觉得身负重任。恰是这种时候，她的力量格外强大。妈妈非常严肃，甚至几乎是严厉——她原本的性格这个时候像是被掩盖住了一样：'我是不能再为你祈祷了，'她说道，'因为我现在得为自己祈祷。'我必须得承受这些，而且我的哲学也不能仅是纸上谈兵。"[206]

1927年5月3日，海德格尔要把第一版印刷出版的《存在与时间》放到他母亲的卧榻上。临终的母亲有意识要与儿子的灵魂救赎尝试隔离开，她已经望向了死亡——"现在我只能为自己操心了"——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在他的哲学中，畏之情绪和此在死亡的必然可能性首先产生了一种极端个别化的效果。不过他的目光还是投向了死亡之前的生活。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必须要达到本真状态，而本真状态只有从这种极端个别化的经历和实行中才能获得。其他人的共在虽然也在操心，但是却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海德格尔对达到本真状态和找到自我的呼吁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此在的穿透性特点上：独善其身。只有脱离他人，成为唯一和个别化的单独自我，此在才能够洞见到其真实的可能性。

1926年夏天，汉娜已火速转投更为社会化的生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门下学习，海德格尔由此感觉自己被遗弃和迷失在小雾城马尔堡。不过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家最终找到了一套带花园的明亮新居室。另外，执拗的柏林教育部门现在也不能再违背马尔堡大学明确强调的意愿，因为《存在与时间》现在已开始在德国哲学界发挥着彗星般的影响力了。正教授职位正在召唤着海德格尔。这是一种安慰，但还不是一个根基。海德格尔在马尔堡曾经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海德格尔以死亡般的清醒理解到了这一点。卡西尔在他的第二故乡汉堡以同样的确信度错误地认为自己处在一个新精神时代的开端。

汉堡学派

要说这是一个官方庆典活动倒是有些夸张了。这更多的是由最亲密的朋友和研究伙伴们组成的圈子，这个圈子于1926年5月1日在汉堡黑尔维希路大街116号举办了庆祝瓦尔堡图书馆新楼落成典礼。阿比·瓦尔堡在1924年秋天回到汉堡之后不久，就开始计划建造图书馆新楼。他的藏书如今超过三万册，在图书馆旧址里已经无法整理和容纳得下了。建造新楼并不缺钱，也不缺设计方案和干劲。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在瓦尔堡住所边上的空地上就新建起了一座阅读和研究楼，世界上再找不到相同的楼房了。图书馆新楼内配备有“26条电话线路、（信件、电报等的）管道风动传送装置、传送带以及一部专门运书的货梯、一部客梯”。[207]由此，新的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缩写是KBW——仅仅凭借它出色的技术装备已经为行业设下了新标准。另外，充分利用自由空间的新建筑也是建筑技术方面的一个杰作，尤其是图书馆的大型椭圆形阅览室。在这里，卡西尔站到讲台上给大家做了关于“文艺复兴哲学中的自由和必然性”主题报告。

瓦尔堡力排工程师众议，在他丰富的思想王国里给图书馆的每个几何物体都赋予了世界观方面的特殊象征含义，而图书馆最大的核心空间就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建成椭圆形状。卡西尔也不是与此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当时卡西尔和瓦尔堡在克罗伊茨林根共同讨论椭圆形对于开普勒天文计算的意义，这场讨论让瓦尔堡重拾他拥有足够精神负荷力的信心。

开普勒当时计算的火星运动轨迹是椭圆形的——而不是正圆形的！——阿比·瓦尔堡认为这个计算结果意味着从中世纪神话思维中真正突破出来，进入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自由中。因为作为圆形的一种，拥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并不是几何图形的理想模型。柏拉图在其对话体著作《蒂迈欧篇》里提出来的理想几何模型一直到开普勒时代都还是标准图形规则，是进行自然推算的前提条件。在瓦尔堡眼中，开普勒在天文—数学方面的开拓挣脱了遵循天然形式规范的古代神话精神，成为人类精神中最有意义的解放运动。这种开拓模范性地代表着从神话概念形式前进到科学概念形式的转变，也由此代表着一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自由步伐：突破并进入到了现代宇宙观。

瓦尔堡如今带着清醒的意识开展研究项目，其主要目标是要标记椭

圆形的始源何在，另外也要从文化科学的角度开发实现椭圆形的条件。这个研究项目以纯粹的问题方向为导向，追随的不光是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主要著作——它们也是现时代独立的既往病史——当然还有哲学家和哲学历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主导研究兴趣。卡西尔也是新落成的瓦尔堡图书馆椭圆形建筑中汉堡学派位居第二的精神首脑。

被遮盖住的始源

现代宇宙观是怎样发展来的？1926年春天，卡西尔在一部专著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将此著作献给阿比·瓦尔堡的60岁生日。这部著作的标题叫做《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208]在图书馆新楼落成典礼上，卡西尔为大家朗读了这本刚刚完成的四个章节的书中的第三章。卡西尔那直到今天都还被称道的文艺复兴研究绝不“仅仅”只是哲学历史方面的一个整理工作，而更多地是要从对文艺复兴思想根源的揭示中，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哲学思考获取具有复活他者之功能的启迪和灵感。

卡西尔这部从容不迫的主要著作同样有着深刻展示丧失和分析危机的特点。但其目标并不是要指明现代是一条走向世界悲伤或存在之遗忘状态的歧途——这种悲伤又对文化产生了影响。对于卡西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清晰地进行自白，将文艺复兴始源的哲学庆祝当成是一种非常广泛的自我解放和构造世界事件。自我解放和构造世界的实质动力从17世纪起就被勒内·笛卡尔的现代和其方法论上的接班人所遮蔽。[209]现代固定在抽象化上面，对肉身持有敌对态度，并纯粹聚焦在意识方面——它对乃至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带来了严重后果。即便主要是被汉萨同盟所遮蔽，卡西尔的《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呼吁：呼吁对现代哲学思考进行一种彻底的更新。在此，这个呼吁指的是必须要回归其真实的始源源头：文艺复兴。这同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执行和起草中所践行的哲学研究精神完全吻合。用卡西尔的语言风格，即直接表述论点和直白表达来说，就是：文艺复兴是我们现代的实质始源，也是直到今天仍在指明着方向的始源——本着文艺复兴的精神来更新哲学，这种更新必须要接受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形态！

以多数性为出发点

卡西尔强调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事实特征：哲学在信仰复兴的事件框架内并没有扮演什么实质角色。这看上去好像有些自相矛盾。由于受到教会制度的限制，哲学僵化在经院哲学的学校教育中，表现为从理解能力方面赶不上14世纪和15世纪的飞快革新速度——不管在艺术还是科学方面——或者连对其作出足够的反应也做不到。就如同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哲学一样，当时的经院哲学宁愿在明确区分出来的物神崇拜中闲心散步，貌似是建立在一个有保障的问题基础之上，而不是要把自己置于冒险之中，好让自己在从根基上发生变化的时代中提升理解力。用卡西尔的话来说："如此，正是在哲学中出现了时代的精神性基础力量。那种进行明确的限制和构形、分类和个人化的渴望还没有发挥作用，或者只是在最初始阶段松弛下来了。"[210]

在《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前几页，卡西尔就已经明确反对一种有影响力的基本观点，其典型代表是海德格尔的沉沦分析。人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作"从文明角度对哲学的过高评价"[211]观点。谁要是只在哲学中寻找一个时代——特别是现代——的可能始源，就既不能真正领悟这个时代的特点，也不能真正领悟这个时代的哲学。卡西尔在他对文艺复兴的分析中更多地把哲学看成是诸多革新声音中的一种，此外，这种声音还拥有关联各个学科的功能。20世纪20年代，一个在艺术、科学、技术方面都充满剧烈变革的年代，正是这种理解方式引导了这一时代——符号形式的哲学。20世纪20年代也有充分理由自视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充满着改变整个世界的变革，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变革。汽车作为一种大批生产的产品开始决定城市风貌，广播变成了全球性的公共交流媒介，电话应用到了私人生活空间，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诞生了，最早的一批商业航线开始运营，不光是蒸汽船，很快还有齐柏林飞艇甚至飞机可以横跨大洋，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就实现了示范性的跨大洋飞行。人们本着快速革新技术的精神促成了全球交流时代的诞生。这样的时代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单靠个人和单个学科是没办法迈出这么具有意义的一步的。哲学本身也不行。在德语区内，哲学自视为一个进步的主变速器或者主传动装置，一般在最好的情况下顶多也只是作为进步的批判性制动板，无论如何都无法行使发动机的职能。

当卡西尔将《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献给阿比·瓦尔堡时，他强调指出，人们必须得把这部著作看成是一部由彼此交流密切的跨学科研究者小组创作的集体著作，而瓦尔堡图书馆成了这个研究者小组工作的智慧中心。既然如此，卡西尔的强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善意的感谢细节了。1926年，研究者小组的核心圈子有如下成员：格特鲁德·宾、恩斯特·卡西尔、埃德加·文德、欧文·潘诺夫斯基、约阿希姆·里特尔和弗里茨·萨克斯尔——在此仅列举后来影响最大的几个人。卡西尔表示致谢后继续说道，图书馆的结构和精神构造体现着精神史上所有研究领域和流派的统一方法论理念。

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哲学的实质任务在于抛开单个形式的所有区别，得出每个时代具有统摄作用的类似于主导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好比一场音乐会，很多方面参与了音乐演奏，哲学要为各个方面提供一种整体目光，让它们既看到彼此之间的界线，也要看到音乐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由此构成的一个大整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显现，那么在音乐会的高度灵活阶段，各不同部门共同形成的复调音乐就会变成一堆混乱的声音。那么最终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感到不舒服。

通过开发世界塑造自我

对于卡西尔来说，文艺复兴的统摄性中心主题在于，重新确定人类在被其新开发的宇宙中的位置。因此他著作标题的关键字眼是“个人与宇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首先尤其将自己理解成是一个个体，其个体性体现在积极地、不教条独断地塑造自我，这也是保存个体性的方式。宇宙给文艺复兴中的个体打开了一个无尽广大的空间，人们通过积极探索和自我塑造的实践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宇宙的规则性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在卡西尔上述演讲中，自由概念代表了人类探索和塑造自我的能力。而必然性概念则代表了认识世界的过程，并由此代表了总在进行的推断自然规律的过程。

对于卡西尔来说，这里蕴含了文艺复兴的一种特殊魅力（也是他自己符号形式哲学的一种特殊魅力）。因为如此看来，自由和必然这对概念的关系不再是彼此排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看上去有说服力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被自然规律所控制，那么如何能有自由或者自由意志呢？”就失去了其现存的观看者。现在自由和必然是一对互补概念，它们在始源处成为彼此的条件：只有在自由地进行自我塑造的作品中——这除了自然科学实验外，还包括艺术、工程学或者医学方面的作品——才能推断出那些表达因果必然关系的规律性。卡西尔认为现代自由和因果必然性是属于同一始源的。当然，这并不是在悲剧的始源意义上说的——悲剧让所有一切又聋又哑——而是在为所有的创造财富举行的一场认知性庆祝会的意义上说的，创造使所有的一切可以共同说话和发声。就像集艺术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对情爱和肉体等多方面都感兴趣的个体于一身的达芬奇所能感觉到和做到的那样。

对于文艺复兴来说，也对于卡西尔自己的哲学来说，赋予所有这种自我开发和世界开发活动以真正基础的，是给自己的经验赋予一种用符号表达的能力。也就是让各自眼中的世界图景以作品（哪怕只是一声口哨、一种姿势、一幅画或者一次计算）的形式呈现出来。当作品变成符号并由此被置于公共空间内时，一个作品对于他者或者后继者来说就变成了自我和世界开发的出发点：文化成为了被符号所引导的方向或者持

续进行开发的过程，而开发的形式有词语、图像、计算或者自己的身体。卡西尔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研究逻辑”正是在此。具有无与伦比创造性的文艺复兴世界结构和瓦尔堡图书馆的内容结构确切吻合，这并非偶然。

星中之物

卡西尔认为，文艺复兴是进入对世界新理解阶段的过渡时期和突破时期，文艺复兴的特殊个性在于，“神话理解”和“现代科学”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产生了同时性。这尤其能够体现在当时占星术和天文学之间尚为模糊的界线上。从占星术角度看来，人类处在神秘的力量和命运格局之下，人类最多只能去解读，无法自己决定如何引导和改变这些力量与命格。占星术的天性恰恰是要严格遵守规则，自然规律在占星术这里发挥着作用。但是占星术发挥作用的方式首先是神话式的，不能通过数学计算推测和理解。正是在这点上占星术和天文学恰恰相反。在文艺复兴这个过渡阶段出现了重要的人物如开普勒和哥白尼，是他们在文艺复兴进程中完成了突破，从对他们本身来说尚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占星术中突破出来，迈向天文学的新思维方式。这样的突破式巨变对人类自我形象及其在宇宙中赢得的新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卡西尔是这样来描述这种影响的：

> 假设人类无论如何都得在某个星球上出生，并在这个星球的统治下生活：对于人类来说重要的是，人类想要让哪些可以驾驭的可能性和力量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并将这些可能性和力量带入完全的成熟。是的，人类让某些精神倾向和渴望在自身内部起支配作用并促进它们进一步发展，人类可以根据这些精神倾向和渴望，让自己一会儿处于这个星座、一会儿处于那个星座的影响之下。[212]

这便出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翻转。人们的视线方向不再是从宇宙的自然力由上而下达乎个体，而是从个体的微观宇宙出发往上进入宏观宇宙，人类这时候将自己视为宏观宇宙的一部分。然而不可否定的是，要将个体很自然地关联到巨大的宇宙整体中，不得不迫使个体自我塑造的渴求接受一定的界线范围和条件。个体的自决能力在文艺复兴的理解中并非无条件的、完全自治的。没有一个地球人可以完全任由自己来发布那些决定他之所以为他的规则。完全的自治是脱离世界的一个幻想。伴随着文艺复兴进程，人们没有了这种幻想，而是拥有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有条件的自由意识，以及在特定活动余地内的自我可塑性。一个个体对自己生存条件的洞见越深刻，那么他也就能够在认识到的条件结构内部开发出越大的活动余地。

在此举个技术方面的例子：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会飞，哪怕是达芬奇也不行。不过人类一旦推测出重力、惯性和空气阻力的规律，那么就可以借助特定的计算和技术开发出新的可能性，更改和回避号称人类不容更改的无法飞行之命运。人类在自己走向世界的通路上是具有创造性的塑造者，由此也可以说是人类让一种命运（即规律）和另一种命运（也是规律）进行对抗。这样便发生了人类的飞行事件。

文艺复兴并不是以无条件的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因此，当涉及每个此在时，文艺复兴也不是从“自然规律”的无条件必然性出发的。在此意义上，人类通过对自然力进行研究推测，还是有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这些自然力在其进程中是某个个体成其所是的条件。这点再次成立：卡西尔所揭示的这种“文艺复兴中自由和必然”的现代关系无非就是他自己“符号形式的哲学”中的思想。

是的，卡西尔在“个人与宇宙”中探寻现代性的始源，这和本雅明与海德格尔的著作有相似之处，这种探寻带有一种挂失声明的特点。但是从卡西尔的视角来看，他以不同的方式尤其清晰地呈现了现代后期的丧失大概是在哪里：人类沉醉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然科学的支配力和预测力，由此发展出了对物理自然规律的理解，这些自然规律可以决定宇宙中所有事件的力量，包括作为纯粹物质性生命的人类在内。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只能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解决，而这代价就是要在其真正本质上把人绝对异世界化。也就是说，以笛卡尔意识哲学的形式，把人类看成纯粹思考着的实体，就必须将其完全同身体脱离开来理解。

自然现象完全受盲目的因果链条支配，在这样一种自然现象中，人类只有对自己进行异世界化、把自己定义为某种小上帝形式，才能自视为是自由的。而只要是上帝，就必定总会被授予某种神秘能力，能通过精神的力量本身，可以说是从虚无中激发出自己的因果链条。

在卡西尔的术语中，他对现代晚期还有特别是启蒙运动时代的诊断看上去似乎既清楚又矛盾：它再次代表着文化倒退到了神话思维范畴——当然它还是处在一个明显更高的层次上。但是同时，因果律取代了神话的必然铁律，人类被神话为“自主”的意识生物，则取代了喜怒无常的命运主宰或仁慈的上帝。

这正是卡西尔命名和抱怨的启蒙运动真正的辩证法。并不是因为启蒙运动蕴含在文艺复兴中的基本动力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而是因为这个

基本动力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被遮蔽和扭曲了。恰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一个时间段，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致力于要撤销这一遮蔽事件。当时尤其自由与必然、确定和模糊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人们非常彻底的质疑——就如它们在经典物理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1927年，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发表了他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论点；同年，卡西尔发表了《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

抓住自由！从一个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明确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界限、误解和被解释所侵犯的现实。这也是《逻辑哲学论》及其作者的使命。这位作者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同时也是迈入“更好”时代的精神领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儿童的口吻

> 在我过着田园生活的奥特尔塔尔，当地人也热烈庆祝我的生日，虽然我觉得我生日最好保密。从上奥地利沃德马克的各个区涌来了数千人；他们过来给他们喜爱的老师庆祝生日、表达祝福，这位老师还要为祖国的青少年继续工作很多年，成为青少年——比如你——在自我牺牲和忠于职责方面的榜样和鞭策。我自己在生日这天也谈到了八小时工作日、民族和平与对失业者的支持。[213]

在上面文字的末尾只剩下些冷嘲热讽了。乡村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在他36岁生日之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明确感觉到，当下生活的终结近在眼前。给最好的朋友们寄去上述那样故意写出来的傻话，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并不算什么不寻常的事儿。谁想像他那样给意义划界，那么就表明这个人也特别熟悉怎样用多种方式开玩笑。1925年春天，有人严肃地问过维特根斯坦，在多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的文化驶向了一个新的最低点？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是，如今出现了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爆炸式混合体，构成这个混合体的要素有政治方面的领袖崇拜、在媒体引导下变得迟钝的大众、糊涂的民族主义、尤其还有对社会民主进步的信仰，后者在维特根斯坦1925年4月29日给鲁道夫·科特寄去的明信片中也成了讽刺挖苦的对象。1925年这一年，希特勒《我的奋斗》出版，斯大林最终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西班牙年轻将军在战地呼喊着“死亡万岁！”，并和他的部队一起征服了摩洛哥；也是在这一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重建，保守党人保罗·冯·兴登堡接替了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魏玛共和国总统之位；卡夫卡的《审判》出版；同样是这一年，维特根斯坦认定奥特尔塔尔是他任教生涯的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一年后事实就证明确是如此。但这位“深受爱戴的老师”目前还不想最终表现出被教师职业打击过的样子。当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在同一时间段分析着现代沉沦时，维特根斯坦在当地完成了反抗性的基础工作。

言说之工程师

就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给出的那些治疗建议而言，他不抱任何幻想。这种幻想只会长久地保留在少数人那里。他所说的“正确地看待”世界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教会我们什么。原因尤其在于，恰是在决定一切的开端阶段，《逻辑哲学论》顺着梯子往上爬的路径同一些特定的经验和洞见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经验和知觉的实体远远超出了可以用语言表达、用谈话方式传递的范围。因此，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也这么明确地说道：“它绝不是一本教程。”是一种不可支配的礼物式经验构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始源，而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清晰论据。

另一方面，恰是在涉及日常语言的领域，作为教师的维特根斯坦——完全与其他维也纳现代派的大人物们，如恩斯特·马赫、卡尔·克劳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位居同列——看到了疗法上完全的干预潜力。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文化危机首先也是一种公共语言应用的危机。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抓住这个弊端的根源，人们不仅仅必须仔细研究广泛存在于历史过往中的畸形发展，就如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所做的研究那样。在上帝赐予的每一天中，最终都会有新生命降生在人类集体中，这些新生命最开始还完全不受任何文化的影响，因此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侵蚀和错乱的干扰：每个被唤醒的孩子难道不正是原则上可以进行教育的活生生例证吗？通过接受教育，孩子们可以掌握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进行更为清楚的和自主要求的言说。启蒙是人类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出发点，人类得为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负责。在此意义上，“错在自身”的动力也可以带有教育方面的指向。康德痛斥错在自身，人们可以看到错在自身其实是一种代际关系，也是一种灾难：我们教会和提供给孩子我们语言的和概念的用法，并让它们成为孩子在世界中找到整体方向的基础。可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搞清楚这些语言和概念的用法是怎么回事，我们便由此把孩子教育成了不成熟状态。这并不是命运，通过合适的训练，这是可以改变的。就算不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那起码在学校里是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

在任何时间点和文化状态中，语言自其内部逻辑出发，都在自身中蕴含着治愈错误理解和错误解释的力量，语言自身可以持续产生这种力量。这样一种被深信的观点已经构成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里治疗方案的基础。另外，这种观点也是维特根斯坦从1929年起的后期哲学

的主导观点，尤其成了他第二部主要著作《哲学研究》的基础。《哲学研究》的内容持续不断以对话形式展现出来，主导全书的是一个任性孩子追问的口吻。这部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想象出来的内心的）孩子在进行问答游戏，几乎每一页都展现了指引着我们生活形式的一些示例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一个哲学家以父亲的声音试图给孩子解释语言是什么，语言的基础是什么（以及什么不是语言的基础），尤其还有某些中心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意义。

在《哲学研究》这部各个论述条目松散拼接在一起的著作中，其开篇第一条就记录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场景。这样做的目标在于，明确反驳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描绘的人类语言本质：

> §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第八节："当成年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会对此有所觉察，并明了当他们要指向这个对象的时候，他们就发出声音，通过这声音来指称它……就这样，我一再听到人们在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说出这语词，从而渐渐学会了去理解这些语词指涉的是哪些对象。后来我的口舌也会自如地吐出这些音符，我也就通过这些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214]

维特根斯坦紧接着对上述场景评论道：

>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
>
> 奥古斯丁没有讲到此类的区别。我以为，这样来描述语言学习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之类的名词，其次才会想到某些活动和属性的名称以及其他词类，仿佛其他词类自会各就各位。[215]

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努力所追求的目标在于，将在这些记忆场景中附带的虚假图画和错误图画与其余可能的记忆与思维图像形成比照，以便可以"正确地看待"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与童年的关联——童年

作为我们与世界产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启发阶段——在此扮演了绝对核心的角色。例如条目5里已经明确提到的那样：

> §5.看看第1节的例子，也许就想得到，语词含义的通常概念形成了多浓的一团雾气，使我们无法看清楚语言是怎么起作用的。而在某些运用语言的原始方式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综观语词的目的以及语词是怎么起作用的；因此，从这些原始方式来研究语言现象有助于驱散迷雾。
>
> 孩子学说话时用的就是这一类原始形式。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解释或定义，而是训练。[216]

要将上述所说付诸具体的教育学—哲学行动中，那么可以看看例如《哲学研究》条目11里面说到的内容：

> §11.想一下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盆、胶、钉子、螺丝。——这些东西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样，语词的功能也各不相同（它们的功能在这一点那一点上会有相似之处）……[217]

实际上，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能理解上面所说。维特根斯坦明确的治疗口号叫做“回到根源”，也就是回到语言表达的真正开端，回到学习语言的具体情境中。而且并不是通过历史或形而上学的方式——比如尤其是本雅明和海德格尔那里的情况——而是以生活的方式回到本源，并且和教授孩子学习的活动联系起来。

从1920年开始，他最熟悉的事就是教儿童学习。他转向了正在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这个转向对他后期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个人生活经历和哲学洞见相遇了，这种相遇直接指向了他做乡村小学教师的那段时光，特别是1924年起在奥特尔塔尔的时光。因为维特根斯坦是在奥特尔塔尔——与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在同一时间段——写下了一部新著作，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明确研究了语言根源问题。这部著作的主导性问题——除去《逻辑哲学论》，这是维特根斯坦在世时唯一以他名字出版的著作——简单说来就是：哪三千个词对于1925年奥特尔塔尔的小学生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这部著作的名字叫做：《小学生词典》，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理性的名单

《小学生词典》的诞生基础并不是要解决一个哲学难题，而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奥地利缺乏一本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也负担得起的词典。维特根斯坦看到了这个不足，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便于1924年秋天首次和维也纳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社进行接触。出版社马上对这样一个项目表示感兴趣。维特根斯坦必须要按照字母顺序编写出收录入词典的词语名单，这些词对于乡村地区的小学生词汇来说应须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另外他还得保证正字法正确。有了这本词典，小学生就能够在产生疑问时进行查阅，以便可以自己改进正字法了。这本身看上去倒也不是件什么大事儿。词典中收录的词条有比如“晚餐”（abendmahl），还有“晚饭”（abendbrot）。但是要把“长庚星”（abendstern）或者“西方国家”（abendland）也收录进去吗？“孔雀”（pfau）和“箭”（pfeil）肯定得编进去，但“林荫道”[218]（promenade）需要吗？或者说，随着某个概念进入到青少年的乡村生活，文化悲观主义或文化沉沦也就开始了？

如果说语言界限真的就是世界界限的话，那么尽可能谨慎地确定和守护语言界限就不再是一个好教育者的职责了？这是个关于问题的问题，而且是关于所有最终价值类型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测试直到今天都还适用：请给我说出三千个你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然后我就能告诉你，你是谁。于是，在内容和规格上，《小学生词典》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教育事业来说都是一个典型范例。

维特根斯坦在安静的小房间里独自选择词条，没有询问他的学生，也没有与学生们进行协调。他把方言词汇也收录进词典，因为这些方言词汇是他的学生们天然语言应用的一部分。另外，他还让这本词典在奥特尔塔尔成为一个项目，孩子们在学年学习中一步步实施这个项目：从亲自动手几个小时抄写词条，到再次誊抄成工整的字体，以及最后的装订成书。（材料费是维特根斯坦自费负担的，这些钱他是从维也纳得来的。）对于他的许多学生来说，手工制作版本的《小学生词典》是他们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属于自己的书，而且还是自己制作出来的！

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一个出色的项目教学教师。他总是致力于在实物上进行直观教学。在此教学法中，他特别偏爱的教学内容便是

动物骨骼，他和学生们一起把动物制作成骨骼标本并将骨骼拼接起来。而制作标本所需要的动物尸体，比如被车撞倒的猫或者狐狸，是他在乡村道路上搜集的。捡到动物尸体之后，他亲自动手取出动物内脏，花好几天的时间彻底煮净骨头。早在特拉滕巴赫时，由于制作标本产生了动物尸体的恶臭味，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受到过邻居的强烈抗议。不过这并没有阻碍维特根斯坦在后来教学生涯的所有地方都接着这么干。他终究不是为了自己这么做的，而是为了上课。再加上维特根斯坦内心地丝毫不在意村里周围人是怎么看他的——与此相反他倒是在意学生们是怎么看待他的。不管什么时候有村民去找他提出申诉，他都会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门几乎可以撞上村民的鼻尖——还会建议他们，如果真是忍受不了这些恶臭味的话，他们尽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最好是永远离开！

责任原则

就算维特根斯坦是个怪人，但他作为乡村教育者有着清晰的想法和教育理想：去认识，自己是谁；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去经历，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尽可能避免明摆着的瞎折腾和逻辑错误。只要是能够说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清楚地说出来。实践超越理论。在此，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去拯救和治愈的话，那就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整个世界。

这些教育理想是从与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日常相处中受启发而来的，这样的教育定位既不是特别复杂，也并非精英主义——当然也不是错误的。然而维特根斯坦在奥特尔塔尔还是感受到他的想法被孤立了。虽然维特根斯坦经常公开宣称，要追随托尔斯泰的足迹专心于“普通人民”，本着十分善良的心意去过非常简朴的生活，但他的课堂还是牢牢带有社会精英阶层的顽固印迹。他作为“年轻人的引路人”，首要的就是培养和创造那些有能力了解自己的有道德个体。他特殊的教育好意只受到少数人，而不是很多人的承认。当海德格尔在同一时间赞美黑森林地区农民的始源智慧和本真时，乡村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他在周围那些成年人身上只看到了牲口、幼虫或者最多是“四分之三的人类”。维特根斯坦虽然热爱“普通人民”的理念，但并不喜欢这个理念在实存中的化身；他热爱当教师的理念，却不喜欢在奥地利社会民主教育改革之下迅猛变化的教学工作。他对于现行的教学方法有多厌恶，也在《小学生词典》的序言中进行了明确表达：

> 一个小学生能够自己修改自己的作文，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必要的。他应该要感受到自己是文章的唯一作者，要对自己的文章独自负责。也只有这种独立修改文章的工作能够让老师正确地看到学生的知识和智力状况。要是让学生交换作业本、互相修改文章，那么老师对班级能力的判断就会变得模糊。从学生甲的文章里我无法立刻就知道，学生乙的能力是怎样的，我只有从学生乙自己的文章里才能看出来。就如人们有时候说的那样，互相修改文章无法呈现出班级平均水平的正确画面（如果想要呈现出正确画面，那么每个学生就必须修改其他所有同学的文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219]

想要知道维特根斯坦在奥特尔塔尔的受欢迎度，人们就得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他和同事们总是在名为“金鹿”的饭馆一起吃午饭，

席间他给同事们讲述道，某些教育改革措施犯了纯粹的逻辑错误。单从论据来看的话，他说的完全有道理。但这自然不是生活的全部，常常也起不了决定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个走上教育弯路的哲学家来说。官方表达了对他词典的强烈保留意见。当地学校教育部门专门指定了相关专家对维特根斯坦的《小学生词典》进行鉴定评价，这个专家叫布克斯·鲍姆先生，他的鉴定结论如下：

> 从方法论的立场来看，这本词典有些令人觉得不习惯，因为作者在序言里面说过，他给学生口授了这本词典。那么我就只能理解为，学生已经掌握了的那些词，那些在提示教学法意义上已处理过的，常常是已写下来过的词，为了控制正字法的正确性，这些已掌握的词汇学生还是得做听写……从教育当局看来，几乎无法认定本词典是值得推荐的。[220]

又是无法获得理解。又是无法成为教材。就算是在词典这个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对于出版界来说也是一个难相处的作者。最终这本词典还是未经大的改动就出版了，不过是到1926年秋天，也就是词典编写完毕18个月后才出版。对于作为教师的维特根斯坦来说太迟了。对于作为个人的他来说，也是太迟。和之前的《逻辑哲学论》相似，这本词典也创造了一个存在，而词典作者在词典出版之际，已经最终将词典这个存在或者词典的时代抛在自己后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将其抛在后面。

昏厥过去

维特根斯坦当时的学生其实并不愿把他称作“暴力教书匠”。维特根斯坦的情绪有一定波动，但情绪爆发倒是非常少见。他对学生的责罚，也绝不是频繁出现的。他比较喜欢做的是快步穿过教室走到学生跟前，给学生头上弹几个栗暴，或者是拿教棍敲打学生。班里没有一个同学可以确信地回顾，当时11岁的约瑟夫·海德鲍尔在1926年4月10日早晨做了或者不做什么惹怒了老师。约瑟夫并不属于那些最蛮横无理的小子，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母亲在名叫皮里鲍尔的当地地主那里当女佣。人们对约瑟夫的印象大多是体格高大、性格安静，不是特别聪明伶俐，而且脸颊总有些苍白。直到今天这件事还被称作“海德鲍尔事件”，据说约瑟夫·海德鲍尔在事件发生三年之后死于白血病。有可能他的病在几年前就已经致命地使他变得虚弱，这也没法下定论。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当时在课堂上用力扇了约瑟夫一两个耳光，也不算特别严重，但是事情的结果非常严重。扇耳光的直接后果是约瑟夫昏厥过去，长达好几分钟他都像死了一般躺在教室的地上。维特根斯坦马上就解散课堂，让学生去叫医生来，并把还昏迷着的约瑟夫背到教学楼二楼一间休息室里，然后在那里等着。当医生从远在四公里之外的基希贝格最终赶过来时，约瑟夫已经自己苏醒过来了。他的妈妈和皮里鲍尔——当地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另外还是家长代表——都来学校了。走廊里传来了皮里鲍尔猛烈咒骂维特根斯坦的声音，称他“不是人、不人道”，是“驯兽师”，要去“告发”他，让他以后再也当不成老师。那么维特根斯坦呢？他把约瑟夫交给他母亲和医生照管，然后就从另外一个出口离开教学楼，回去收拾了一下行李（他反正也没有自己的家具和书），乘坐当时最近的一班公交车离开了田园般的奥特尔塔尔。也就是说他逃跑了。[221]

第二天早晨，当皮里鲍尔跑到宪兵队对维特根斯坦提出申诉时，维特根斯坦早已远走高飞到维也纳了。最终维特根斯坦没有被定罪。当地教育部门内部程序方面，也是希望对维特根斯坦做一个内部调查，而并不认定这是学校教师的一次严重错误行为。不过，1926年4月10日成了维特根斯坦乡村小学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天。就如同他在事件发生几年之前给朋友们写去的许多信中都预感到的那样，乡村小学教师生涯的结果是“最糟糕的”。

“我已经失去了和班级的团结一心。”在和地方视察员进行私人谈话

时，维特根斯坦这么解释道。虽然视察员固执地请维特根斯坦再考虑一下，但他还是希望学校立刻就开除他。最终，校方在1926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37岁生日后的两天——同意了他的请求。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前往乡村小学教书从来不在于祖国的青少年、八小时工作日和改善穷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而首先是和他的学生还有自己取得一种有益的新接触。结果是徒劳的。在他从一战归来正好七年之后，他不得不认识到，乡村小学教师的人生规划在所有层面上都是失败的。如今，只有羞耻心是让他继续活着的动力了。

VII
拱廊街
1926—1928

维特根斯坦建造，本雅明突破，

卡西尔受到吸引，而海德格尔回到家园

技术天赋

“我知道，自杀总归是一种卑鄙行为，因为人们不能想要自我毁灭，而且每个曾经想象过自杀过程的人都知道，自杀总是对自己的一种突袭。不得不要对自己突袭，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生气了。所有这一切的结果自然就是，我没有了信仰。”[222]一战结束18个月后，维特根斯坦内心极度绝望，他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向他的朋友保罗·恩格尔曼求助。他们俩人是在捷克奥洛穆茨的前线进修中认识的，在战后依旧保持着紧密联系。后来维特根斯坦当了乡村小学教师，而恩格尔曼这个年轻人当了卡尔·克劳斯的私人秘书，接着又成为了建筑师阿道夫·路斯的学生，最后恩格尔曼在维也纳开了家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作为朋友的恩格尔曼也无法忽略，维特根斯坦从奥特尔塔尔逃走后再次处在了怎样灾难的精神状态中。

1926年6月3日，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市郊胡特尔朵夫的仁慈兄弟修道院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隐退到修道院是为了请求加入修会。如果当时修道院院长真的答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请求，那么几乎无法想象这会对20世纪的哲学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在维特根斯坦和修道院院长的对话中肯定能读出当时这位哲学家有多么失落和迷惘。修道院终究还是给他提供了住处——修道院里的一间园中小屋，维特根斯坦在这间小屋中捱过了整个夏天，并且用自己的方法分散注意力，不再去多想自己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他觉得这个方法还真是很管用的：通过充当园丁助理、干强体力劳动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就像七年前那样，“鲁奇”内心的崩溃状态在蔓延，这种状态让家人非常担心，尤其是他的两个姐姐赫尔梅娜（“敏娜”）和玛格丽塔（“格蕾特”）。母亲去世后，姐妹俩成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实际家长，并且要负责照管与家长身份权责相应的数量可观的家族财富。现在赫尔梅娜是家中最年长的成员了。玛格丽塔比她小8岁，1905年同美国企业家、银行家杰罗姆·斯通博罗结婚，在瑞士和美国度过了战争岁月，到战后一段时间才回到维也纳。玛格丽塔现在和丈夫分开居住，重拾了艺术资助者和社会名媛的身份。1914年之前她作为艺术资助者和社会名媛已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911年为年轻的玛格丽塔·斯通博罗-维特根斯坦创作了著名的肖像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扮演好艺术资助人和社会名媛的角色，“格蕾特”在维也纳还缺一座自己的房子，并且得带有维特根斯坦家老宫殿府邸的风格。为此，恩格尔曼被挑中作为设计新府邸的建筑师。由于恩格尔曼和路德维希长年保持密切联系，所以他也成了维特根斯坦家族信任的朋友，已经为赫尔梅娜设计并实施过多个改建工程。现在，他要为玛格丽塔设计一座位于市区的新房子。在设计方面，钱、现行传统或者时尚潮流都不必成为限制条件。在1925年至1926年寒假期间，恩格尔曼也已经和维特根斯坦交流过关于建造新房的工程的想法。鉴于维特根斯坦的阴郁状态，恩格尔曼正在酝酿一个计划，格蕾特也对这个计划直接表达了兴奋之情。1926年6月，她给身在美国的儿子托马斯·斯通博罗写信：

> 恩格尔曼想出了一个简直堪称天才的点子，就是提议鲁奇当他的搭档。你能想象这会带来多大好处吗，而且是对所有参与者都大有好处。鲁奇作为道德审核者和逻辑原则创立者的极大天赋最终已经被发掘得差不多了。而对于恩格尔曼来说，维特根斯坦凭借其技术天赋足以取代一名咨询工程师。而且恩格尔曼可以在再次从事建筑工作的同时，不必放弃一个道德行为。[223]

朋友忙碌起来，委托人高兴起来，费用也省下来了。事实上，将路德维希纳入建筑工程组造就了一种双赢局面。这时候地皮也已找到并拿下了。根据玛格丽塔明确表达的愿望，这块地皮不在维也纳传统的别墅区，比如第一区和第二区，而是位于当时偏小市民甚至无产阶级城区的兰德街区。府邸选址本身已经是一种声明表态。根据工程委托人玛格丽塔的意愿，在此块地皮上建造起来的房子应该要表达出更多态度。

位于昆德曼街19号三层别墅的设计方案终稿于1926年11月13日完成递交。在建筑权意义上，具有责任意味的设计方案署名如下：“保罗·恩格尔曼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筑师，维也纳第三区公园巷18号”。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从一名被开除的乡村小学教师华丽转身为明星建筑师，这在1926年的奥地利还是可以办到的。至少作为维特根斯坦家族成员并拥有真正的朋友时，这是可以办到的。

这位有自杀倾向的弟弟现在有了一份正式职业，甚至可以获得相应报酬。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投身于这个新项目，那是说得有些轻了。他更多的是献身沉浸于这个新任务。工程动工一个月后，他就让参与工程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毫不妥协的强势性格所带来的压迫感。在维特根斯

坦加入之前，其实恩格尔曼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设计方案，也打算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后来恩格尔曼回忆，至工程完成的总共24个月“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最终他坦承道，“跟一个意志如此强势的人合作”根本就是把他“置于一个深深的内心危机中”。恩格尔曼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友谊在这次合作中受损，并且后来也从未恢复过。无论如何，总是维特根斯坦在发号施令，他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集执行建筑师、建造工程师，甚至室内建筑师等不同角色于一身。“路德维希精确地画出了每扇窗户、每个门、每个窗户插销、每个取暖设备，就如同这些东西都是精密仪器一般，其尺寸比例是最为高贵神圣的。然后，他带着毫不妥协的能量，要求这些东西必须以与图画上同样的精确度严格制造。我曾经听到有位锁匠就一个钥匙孔这么问他：‘工程师先生，请您告诉我，真的有必要精确到毫米吗？’，而没等锁匠完全说完，维特根斯坦就激动地大声说‘是’，差点儿吓到这位锁匠。”[224]

作为建筑师，维特根斯坦推动实现了精确到毫米的确凿性理想。平地而起设计和建造一座房子——难道这不正是哲学家们也在做的事情吗？康德在他的作品中强调了理性建筑术，这难道是偶然吗？歌德的浮士德在第二部分也就是真正哲学的部分化身为建筑师，是偶然吗？人们努力达到的新“基础”和“基础命题”不正支配了维特根斯坦时代的维也纳思想吗？维特根斯坦的所有天赋和渴望好像在他的新角色中找到了一种有实际行动的综合：精确的数学设计、美学的要求、忠于细节的原则、对纯想象物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并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所有这一切的最低目标是，给人类——被以毫无根基的方式带到世界的存在者——提供一个安全的住所。在这次的建造工程中，这样的目标甚至和物质限制尤其是经济限制无关，而这些限制其实总是伴随着建筑师职业的！恩格尔曼在多年的自由创作中必须痛苦地认识到这些限制。

不管怎样，格蕾特在整个建造过程中对她弟弟始终完全放手。房子里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除了时间和金钱。最终，根据格蕾特的愿望，这个房子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住所，它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对这个世界的特殊的道德感受和美学感受。

如果路德维希有机会坦承心迹的话，他大概会说赫尔梅娜是他真正最喜爱的姐姐和信赖的人，就那种公开的标新立异和自我导演人生的意愿而言，路德维希和姐姐格蕾特无疑有更多的相通点。从这个角度看来，维特根斯坦公开表露的想要过修士般生活的意愿绝不是在反对姐姐

格蕾特。格蕾特从年少时就要求“她身边的所有一切都必须是新颖和雄伟的”。

只为众神

格蕾特的府邸到今天基本外貌都没有改变，人们只要看一眼这座房子，不由得就会将之和《逻辑哲学论》独到的形式结构进行对比。这座别墅完全没有任何纹饰图案，在昆德曼街上就像是——用赫尔梅娜的话来说——“化身为房子的逻辑学”。房子外部的方石排布渗出一种冷感，配合瘦长的窗户，表达了一种神秘的无言，而不是开放的邀约。

房子巨大前厅的门非常高，让人不禁产生敬畏之感；前厅的内部布置让人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家旧府邸宫殿的风格。四周不是从天花板吊下来的卷帘式百叶窗，而是铁墙，打消了人们从外面看进房子的念头。虽说房子从内部观察是完全透明的，还能看到些暴露在外的机械装置如升降索，这可以博得人们的好感；但是从外面看来这个房子就像是一个深深的谜团，人们觉得感受到了这个谜团的含义，却又表达不出这谜团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座房子都以非现实的方式从其周边环境中醒目地突显出来，有些像是卡夫卡描绘的城堡里的那些无名当局之一，他苦苦努力想进入城堡却最终无果。如果说“居住”意味着在一座建筑里面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在家里，那么昆德曼大街这座房子的特点恰恰是反居住的。在赫尔梅娜越发确切的话语中，这座房子“更像是建给众神住的……而不是给我这样一个终有一死的渺小血肉之躯”。

众神的居所——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事实上文字作品和建筑物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具有无法阻挡的吸引力。这座房子始终依循着《逻辑哲学论》的建筑术：没有可承力的根基，也没有保障安全的接地，却似乎具有魔力，在没有可视支撑物和地基的情况下却一样无可指摘地非常坚固，像是悬浮在地面以上15米的高度中。物理规律与形而上学规律并不相符，因为并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规律。类比被赋予了清晰的尘世界限。维特根斯坦只有在作为思想家时才能真正发挥魔力，而不是建筑师。

直到今天，对昆德曼街这座房子的风格归类都尚未有定论——经典的路斯派风格？已经算是包豪斯？抑或是立体主义？还是如罗素所写的是勒·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风格？与此相似，《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归类也仍是个争议：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人们从来无法结束争议，给出定论。这就如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特点和其美学世界

观一样，是一种天才式的融合：融合了极端现代主义与和石头一样硬的保守主义、完美的几何图案与错乱的比例失调、可证明的严格性与格言式的多义性，尤其还有完全的透明和神话般的隐匿。这样一个人并不适合归入任何一个学派，不适合成为一名教师，也不适合当建造者。

没有大师的学派

在这段时间，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莫里茨·石里克教授肯定领教到了，要理解维特根斯坦现象有多么困难。石里克教授花了两年时间逐句研读《逻辑哲学论》，在经历了一系列最终失败的联系维特根斯坦的尝试后，直到1926年4月中旬，他悬着一颗心和几个学生一同启程前往奥特尔塔尔，打算到当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进行了新的创作——去探访这位避世隐居的天才。到达目的地后，朝圣者石里克才获悉，他们晚到了几天。维特根斯坦已经不在这里教书了，不知道搬去了哪里。

和在剑桥一样，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亦正是由于不在场而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他的作品由内而外渗入和决定了那些最具变革精神的学术领袖的思想和研究。维也纳的哲学先驱者们每周四都在石里克的别墅碰面，共同本着以逻辑学和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精神探讨哲学的深刻改革以及作为整体的欧洲文化。这应该是对佯攻形而上学的终结，亦是世界观沉沦之歌和充满宗教意味的呼吁本真的终结。在理性的新道路上，重要的并非论点，而是论据；并非教条，而是事实；并非不可靠的预言，而是可重复进行的实验。

“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很快就有了这样的战斗之名。维也纳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除了莫里茨·石里克之外，还有鲁道夫·卡尔纳普、弗里德里希·魏斯曼、赫尔伯特·菲格尔和奥图·纽拉特。而维也纳学派想要达到真正的完整性，始终还缺他们心中的大师和灵感赋予者：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又过了整整一年，维特根斯坦才答应与石里克见面。石里克小心周到地请格蕾特牵线筹划，终于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与维特根斯坦进行了私人会面。两人一起吃午餐。维特根斯坦精神饱满，正忙于昆德曼街府邸的建筑工作，他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还适合当一名哲学对话伙伴。午餐之后，维特根斯坦觉得会谈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我们都认为对方一定是完全疯了”。[225]不过两人从一开始就对彼此产生了基本好感，这可能主要是出于习惯方面的原因。和维特根斯坦一样，石里克也出身极其富裕的家族，甚至是贵族家族。信仰新教的石里克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消亡的捷克王国属于最重要的贵族家族之一。[226]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交往的形式就这么定型了。维特根斯坦在对话风格方面是最为坚定和易怒的，在其他方面都没有这样。石里克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点。1927年夏天，他说动了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核心成员也见见面，他向维特根斯坦发誓，这次见面“不会发起维也纳学派里习惯的那种讨论”。[227]大家会非常虔诚地静听大师维特根斯坦的讲述，接下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只会小心地请教几个问题，请维特根斯坦详细解释一下。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中有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但是此时大家都还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接受学派首脑的角色，也不想和成员们谈论他的著作或者谈论狭义上的哲学提问。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约定周一见面，这就是后来成为传奇的周一定期会面。第一次会面时，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定下了会面的基调。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和介绍，便在房间正中背对着他的听众，开始读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作为20世纪20年代备受追捧的人物，泰戈尔的抒情诗和散文当时曾在某些圈子里非常受欢迎，不过现在被淡忘了。如果只是将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出场方式看作是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才的恼人行径，那就低估了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戏剧化的表现力。事实上，在东方智慧学说里，在大师接纳新会员入社的自相矛盾的仪式中，这种举动由来已久。背对受众读诗就好比来自山中的智者会要求渴望知识的年轻人仅用一只手来拍手，或去思考佛性和一根搅屎棍有何相同点。无论如何，在此维特根斯坦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我不是你们的大师。我没有什么方法。也不存在什么问题，自然也根本没什么答案。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已经理解了，那只能说明，你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理解。

一开始在场的维也纳学派成员们完全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但恰是大师角色这种无礼的拒绝姿势被当成了大师真实不可否认的标记，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交际场景中算是可以预见的。在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也是如此。会面的泛音已经被定下了，维特根斯坦在后来的会面中表现出愿意探讨哲学问题了，虽说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探讨。鲁道夫·卡尔纳普仅在十年之后，就成为建立所谓美国“分析哲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回忆道：

他极度敏感和易怒。他不管说什么，都特别有趣而且能予人灵感，他表达自我的方式常常具有吸引力。他看待人和问题的视角——看待理论问题也是如此——更像是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人们几乎也可以说，像是一个宗教先知或预言家的视角。他一旦开始就某个哲学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时，人们简直可以感觉到那一刻他内心的斗争：他斗争着，要在最为集中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处——尤其在他富于表情的脸上就能读出他的内心斗争。最后，当他常常在漫长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得出答案时，他将答案陈述给我们听，就像在给我们展示一件刚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或者传达给我们一种神圣的启示……他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洞见就好像是多亏了神启才降临到他身上，以致于我们只留下这种感觉，对它的任何一种理性评论或者异议都是一种亵渎。[228]

人们希望实现的作为客观研究方法之理想的东西，最终证明了是最为异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看上去都和维也纳学派的文化方向恰恰相反。这样的印象后来得到了加强，最终无可辩驳：是有个大师在此说话，但肯定不是逻辑经验主义大师。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形式化的技术远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认知需求打下基础，而仅仅只是有助于避免最普遍和最平淡的错误想法的一种手段。被维特根斯坦尤其认定为错误想法的是，只有从经验—实验角度能回答的问题才值得探究。就如康德曾经认为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对有意义语言的限制首先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将那些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从客观方法的苛求中抽出来。是的，维特根斯坦坚信，现代文化中必须得到治疗的不成熟状态存在于这样的设想中，即关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会有可以证实的方法、学术专业性，特别是可以测量出来的认知进步。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正字法，也不是以精神为主题的工程学，哲学根本就不是可以教授的科学或可以限定主题的科学。而恰是这种相反的观点赋予了维也纳学派核心灵魂。

事实上，作为学生的维也纳学派和大师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的唯一共同点在于，形而上学和宗教方面的观点必须要跳出可证实的意义界限。但是维也纳学派认为，这些界限对于哲学来说是多余的，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这些界限对于哲学其实是决定性的。维也纳学派的观点是，逻辑学是所有思维基础的必要结构理由，维特根斯坦却说正是这种有决定意义的基础永远神秘莫测地漂浮在空中，持续不断地创造奇迹。对此人们最好虔诚地表示惊奇就可以，而不是通过分析去理解它。形而上学

对于维也纳学派来说不是其他，而是一种对自己的文化持续发动的意识形态突袭，并且这种突袭会带来致命后果。相反，维特根斯坦则持这样的观点：坚定不移地要排除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并宣称这些问题没任何意义。这是一种无理要求，与在文化方面自杀的意志一样。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双方都认为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做进一步澄清说明。双方共同努力想要达成的真正目标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

决定双方这些年来周一会面状况的力量是一股类似拔河比赛的力量。在这场拔河比赛中，石里克队想要把他们心中的大师——当然还有大师的老师弗雷格和罗素——往自己这方拉，拉过所谓实证标准的分界线（石里克："一个论点的意义在于其实证方法"）；与此相反，位于粗绳另一端的维特根斯坦有着不可思议的耐力，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叔本华、托尔斯泰和克尔凯郭尔，他们都在和维也纳学派对抗着，希望对面的实证主义队很快就被绳索翻倒在地。人们在比赛中甚至还听到了海德格尔的名字。海德格尔想不想给维也纳小组予最后的致命一击？维特根斯坦在后来一个会议上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 我大概可以想象，海德格尔用存在和畏想表达什么。人类有一股碰撞语言界限的冲动。比如请您想想对有东西存在的那种惊奇。这种惊奇根本就无法用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也根本不存在答案。一切我们想说的东西可能先天就是无意义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撞向了语言的界限。[229]

为海德格尔辩护！这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维也纳的周一会面受到一种简直算得上怪诞的消息隔绝的影响，消息隔绝促使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和那些喜欢自吹自擂的实证主义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哲学史上最罕见的关系之一，尤其还是一种最幽默的误解之一。双方的这场戏并没有本着开诚布公的情景喜剧精神和解，而是从此几乎每天都以令人不悦的方式在世界哲学讨论课和哲学系中重复演出着，在演出过程中发展出了两种主干学说，也就是所谓的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在完整的对垒格局图中，双方彼此谴责对方没有从一开始就去理解自己，而理解又是哲学探讨中真正要紧的东西。

在近一百年之后，这出戏当然还在重复上演，只是成了一场笑剧。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坚信，这种情况和活生生的哲学思考几乎没什么

关系。而在学术部落主义的框架内，正是他的作品和影响力构成了直到今天还很重要的争议之处和核心支点。几十年来，人们正是在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竭力争取每一寸的阐释。这就好像丝毫不差地实施一位天才大师坚定不可动摇的建筑计划，而不是在尽可能澄清的世界关系中独立自由地继续思考。也好像哲学家是灵魂工程师，而不是有创造性的探索者——这样的探索者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没有最终的根基或提供安全的掩护物。

从维特根斯坦1927年至1928年的建筑师过渡阶段中，起码有这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的：他在思考中寻找着的那种完全精确的理想，不是可以用纯数学或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同样的，这种理想要求对空间和自身的定位有着极主观的一种感觉。人们无法放弃对自己进行定位，并且想要在这个合适的定位上找到那个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无论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工程师，维特根斯坦都同样坚定不移地怀抱着这个信念。并且就是因为这样，他强迫维也纳学派的信徒再次彻底思考他们“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大楼，虽说主流声音都认为这座大楼此时是绝对可以入住的，而且还能抵挡寒冬。在昆德曼街上的建筑工程中，维特根斯坦作为施工负责人也坚信自己的主观感觉：1928年11月，房子可能已经基本完工，现在要开始进行清洁工作。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让人把房子里一个大得几近是礼堂的房间的天花板抬高了三厘米”，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抬高之后的感觉才是对的。至于为什么是对的，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可以令人理解的客观理由。这还能是个什么样的理由呢？

在这个维也纳的冬天，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是维特根斯坦越发确信地感受到的：事实上他的哲学使命还远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有可能才刚刚开始。

处于危急状态

“我经历了一次（就如人们所说的）精神崩溃。更确切地说，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其间出现的好转阶段最终只导致了更糟的结果……”[230]1926年9月14日，身处马赛的本雅明这么写道。他从巴黎来到马赛，打算归隐一段时间，“笔几乎就拿不到手里”。整个社会在这个秋天也显现出了危急状况：精神、社会和财政各方面。人们努力达到或至少是希望达到的稳定状况并没有出现征兆。这年整个春天本雅明都是在柏林和巴黎之间的“椭圆形生活轨迹”中来回奔波。在本雅明完成他所谓“格言之书”的同时，他的父亲于6月中旬去世。在过去两年里，本雅明或多或少持续地写着这部著作，它原来的标题叫做《街道封锁了！》。现在这部著作的名字是《单行道》。[231]联系他在1926年秋天的生活境况，把这本书叫做《死胡同》其实也是合理的。

根据本雅明的估计，这部新著作——这是一部像杂志那样编排的集子，包含有60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速写意象文——无论如何指向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和思维形式。他把对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推动因素归结为1924年在卡普里岛度过的那个夏天，因此他将下面的题词写在了全书最前面：

这条路叫做

阿西娅·拉希斯街，

是她据此

作为工程师

在作者心中打通了这条路。

是拉希斯打通了这条路，这种打通行为在于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对象，将其当成是哲学反应的出发点。想要传达自己时代的实质精髓，就不用再走理论的弯路或经典艺术作品的弯路，而是直接借助于同时代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本书的主导目标是，阐明那些“运作机制……就是物体（以及事情）和大众彼此发挥影响的运作机制”。

《单行道》的第一篇就已明确宣布了新形式方向的结果。第一篇的

标题叫做《加油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 具有意义的文学效应只会在行动与写作的严格交替中产生，它必须在传单、宣传小册子、杂志文章和广告中培育出一些不显眼的形式。与书籍精致而千篇一律的姿态不同，这些形式更能在活生生的社群里发生影响。只有这种即时的语言才是应那一刻而生的。[232]

也就是说，在被描绘场景的形式中，这些场景一旦写到纸上，根据其类型就更像是传单、宣传小册子或者广告宣传语。就像本雅明给他的新作设计的广告牌一样。《单行道》，这个标题包含了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让每个思维图像，甚至是书中每个句子在更近的观察中被看成是文学珍宝。这些珍宝承载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在理想情况下甚至是彼此排除的解释。《单行道》，这个标题一方面听上去具有直线性和明确方向，没有双向交通；却也联想到了具有典型年代特征的生活，人们联想到一条没有足够出路和掉头可能性的歧途，走上歧途的后果很严重。“迷惘的一代”的生活感受，就如生活在巴黎的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在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一次谈话中用相关概念形容的那样：迷惘，总是无法做出决定，以及恰因如此而出现极端倾向。

本雅明有意识地将思维图像当作一种文学对应物，它对应的是当时格式塔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中特别流行的翻转图，也就是对着同一张图，从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东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眼前却会出现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例如用黑白颜色呈现出来的同一张图，从某个角度看是鸭子的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兔子的头了，更换角度就可以更换看到的内容，人们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图一定是在呈现哪种画面。只有在同一张图中同时看到这两个画面，认为这两个不同的画面都包含在其中，可能才算“正确”地看明白了这张图。“身份”的活力“仅在充满悖论的反转动作——也就是从一个视角换成另外一个视角——中就已经证明了自己”，[233]本雅明脑海当中也呈现出他那以客体为核心的新写作方式的关键效果。是的，如果时代没有欺骗他的话，在两种互相排除的状态之间“自由更换角度”的闪烁活力，甚至吻合了物理学最小粒子的那种悖论式基本规律——所有存在的物质都是由这个最小粒子构成的，即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提出的“量子”。

1923年，以沃纳·海森堡、尼尔斯·玻尔和马克斯·玻恩为核心的研究小组也宣布初步建立量子理论。并没有什么可以观察得到的固定身份适

用于量子。量子难以把握的本质恰恰在于，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量子有时候显现为波的形式，有时候显现为微粒的形式，但是绝对不可能同时显现为这两种形式。依赖于观察者视角的“从一端反转到另一端的”规律是正在形成中的宇宙自身的基本运动。海森堡和那些已经证明海森堡学说的人也认为，这个基本运动并不遵守严格的决定论的规律，而最多只是遵守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规律。在社会存在的根基处以及物理存在的根基处都存在着一种不可消除的矛盾和不确定性。

通过对身边商品世界做尽可能精确和深入到内部结构的描写，本雅明的思维图像正是要试图展现出万物在存在论上的模糊之处。把转向具体日常事物作为反应的出发点，代表着本雅明在哲学上转向唯物主义，但并不是马克思或列宁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对于本雅明来说，要紧的明显不是要展现在客体中可以感受到的矛盾。恰是相反，重要的是，要洞见到展现矛盾是不可能的。

1926年，本雅明通过《单行道》那些微观逻辑证章想要表达并将其置于文学放大镜下的实质之“物”，不是别的，最终正是历史世界整体。本雅明“不可思议的”唯物主义魅力，甚至是魔力，在于通过训练加强过的描写艺术手段“越发深入到对象的内在”，直到“最后只于内在中描写一个宇宙”。正是在这样的密度下，使对一个历史进程做忠诚的单子写照成为可能；而整体历史进程又总是处在短时救赎和永久诅咒之间的危急状况中。

在沉浸式研究现在和此地完全的内在固有性时，应该打开一扇通向超越救赎的窗子。在本雅明这里，和认识论（反对）纲领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命令是：

> 任务……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在每个瞬间自己做出决定。但是去做决定……总是极端的，无法前后一致地对待最重要的事物，如果有一天我加入了共产党（这是我依赖于偶然事件的最终推动而做出来的事儿），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的情况。[234]

后来没有如期望发生的事情，自然是对这样一种决定的经验。尤其是在本雅明的生活中。从1926年4月起，本雅明就已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如今，在完成了《单行道》的同时失去了一直处于他生活中心的父亲之后，他在酒店房间里看向地中海，考虑着具体的自杀细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最开始也是一起从巴黎来到马赛，他回忆道，本雅明

用多么坦承的态度在思考人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行动。自尽，最后的决定！正是因为一个人无法真正“选择”自尽，所以本雅明坚信，自尽是以无条件的自决形式作为前提的，而自决的极端性就在于，它排除掉了所有的理性的前后一致。

不过还没有到时候。本雅明并没有提前给自己的生命划下句号，而是把自己锁在宾馆房间里三周时间，阅读劳伦斯·斯特恩的幽默长篇小说《项狄传》。作品中持续出现的自讽口吻以及间或出现的荒谬口吻有可能在1926年9月下旬的那些日子里拯救了本雅明的性命。起码文学是能够做到的。

在这期间，本雅明的情绪状态依旧很糟糕。10月初，我们发现本雅明又回到了柏林。要是本雅明也有一位关心他的年长的朋友，委托他一份作为建筑师的“合作关系”，那么——《单行道》的创作者——本雅明有可能马上就能进入新角色。但他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叫不出一个相应的名字。反正在柏林是没有。在巴黎也没有——之前几个月，他待在巴黎，力求能够进入法国文学圈内部，但最终徒劳无功，他没找到进入圈子的门路。

迄今为止，本雅明还没有以书的形式出版任何一本相对重要的著作。虽说排版文件已齐备，出版合同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把所有一切定下来了，但罗沃尔特出版社还是迟迟没有出版《论歌德的〈亲合力〉》，《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亦是如此。《单行道》照理说也应该由这家出版社出版。不过，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还能不能出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本雅明生活中唯一持续进行的事情便是他对普鲁斯特诸长篇小说的翻译工作，可这些长篇小说在他身上——他觉得普鲁斯特的艺术目的和他自己的艺术目的是有相近性的——越来越引发了一种“类似于内部中毒现象的东西”。[235]

终点站莫斯科？

1926年11月初，本雅明得到消息，阿西娅·拉希斯——她一直是他此生挚爱——也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她变得非常虚弱，正在莫斯科一家疗养院住院治疗。

莫斯科。冬天。精神病疗养院。本雅明错误地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可以找到一条走出自己困境的出路。还有什么能比关心自己的爱人——这个爱人的情况明显比自己还要糟糕得多——更有效地把一个人从无意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呢？除此之外，本雅明还面临着一个生存决定，他希望能够通过在莫斯科的逗留进一步找到这个决定的最终解决办法。当时的莫斯科还是共产主义革命摇摇晃晃的实验室，在莫斯科他将会亲眼看透，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在不久的未来会发展成怎样的状况。

本雅明同苏联首都的联系或关系当然很少，和他会说的俄语一样少。除了阿西娅之外，他在莫斯科能信任的人就只有戏剧批评家伯恩哈德·莱西，也就是阿西娅的生活伴侣。这些年来，莱西在莫斯科上升为一位享有盛誉的戏剧界人物，并且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官方组成部分，正是本雅明一直向往的可能的生存方式。

本雅明和莱西这两位男人达成了一致，在本雅明初到莫斯科的那几天里，每天下午他们都坐在阿西娅的床沿陪伴她。他们轮流给阿西娅——她当时情绪喜怒无常——带来蛋糕或茶、围巾或肥皂、杂志或书。根据莱西的提议，三人在一起时主要用多米诺骨牌来打发时光。虽说本雅明一开始与阿西娅几乎连一分钟的独处时间都没有，他还是首先控制好了自己的表情。尤其还因为，莱西对他很慷慨大方，在共处的时光里带着他去熟悉莫斯科的中心地带、剧院和文化机构。

有眼力的本雅明首先必须在莫斯科这座大都市调整他的视觉技巧。不仅因为“未供暖的电车”的窗户在零下20摄氏度时总是结着一层冰，还因为走在“完全结冰的路上”，同时人行道还非常窄。这要求本雅明走路时得高度集中注意力，他无法像一个闲适漫游的人那样抬起头来欣赏周围的一切。尽管如此，从第一天到莫斯科起，这里还是给人留下了超乎寻常的深刻印象，本雅明只能在连续的日记[236]中留住这些深刻印象：

是雪橇而不是汽车，是古旧的夏季别墅而不是多层高楼，不同人种、各种肤色的人，例如忙碌着的一大群街边商贩和乞丐，身穿褴褛毛皮大衣的蒙古人、售卖人造纸花的中国人，在每个街角咀嚼着烟草的鞑靼人，他们头上是巨幅海报，上面写着革命口号或画着列宁肖像；在莫斯科河左岸一座教堂和一个建筑工地之间的练兵场上，红军战士在反复操练，孩子们在操练队伍中踢足球，他们脚上只穿着破烂的毡鞋……

以思维图像的方式压缩知觉到的内容，这种压缩技巧必须等待迟些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莫斯科“所有一切都在建造或者改建中，几乎每看一眼都会提出批判性问题。公共生活中的一种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大部分恰是拥有神学的性格特点——是如此之剧烈，以至于它以无法想象的程度封锁了所有私有之物……而且人们无法预见到，这首先会给未来的苏俄带来什么。或许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团体，或许是别的。决定这个结果的斗争正在进行着，从未中断”。[237]

在列宁去世近三年后，斯大林最终在这年冬天战胜托洛茨基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实验由此出现了彻底转变。在仅仅十年之内，几百万苏联国民因为他沦为了牺牲品：移民、清洗、专断的驱逐、刑讯、在古拉格的强制劳动。这些是一种充满伤痛的狂怒，在后世看来依旧和神学范畴有着相通之处。

而当时的游客本雅明，还有莱西都还不知道这一切。虽然莱西在和本雅明共处的第一个晚上就已说到过，“党刚刚在文化事务方面的反动转变”有多么令他担忧。在1926年的莫斯科，眼下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具体可能性是一种生活感受，这种感受主宰和威胁着所有领域和环境，直至党内的最高领导小组和圈子。这种局势状况滋养的不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坚决性和极端性，而是极端的不可支配性。本雅明尤其在自己身上观察到，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带着虔诚的宿命论倾向：“没有什么东西是以它最开始的方式和人们期待的方式到达的，在每个个例中，对生活纠葛的乏味表达以如此坚定不渝和如此深入的方式据有其理，这样，苏联的宿命论很快就会被理解了。”[238]

不过，如果从积极面看的话，目前所有一切都还是开放性的、新的、处在革命运动中的。本雅明在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就觉得过度疲劳，心中毫无希望。阿西娅因为一件住房的事情和莱西吵架了，本雅明搬回了宾馆：“我在房间里读普鲁斯特，一边大口吃着拌糖杏仁泥。”

本雅明感觉，莫斯科是当时“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莫斯科的住房问题成为了决定整个生活的首要问题。他作为一个宾馆住客很快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点。国家给莱西博士分配的同室居住人明显是个精神病患者，因此莱西就在后面几周的大多数时间里一同住在了本雅明的房间里。莱西晚上睡在床上鼾声大作。而本雅明则睡在一张靠背椅上，这是阿西娅为了让莱西和本雅明同住而专门置办的一张靠背椅。但这有可能也只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不过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作为莱西情敌的本雅明是没法再妄想拥有和阿西娅独处的时光了。正是在三角关系中，独处权成了强权政治的一种手段。

他人的地狱

本雅明在逗留莫斯科的这八周里写下的日记成为了一种关系状况的见证。这种关系看上去如此荒唐，其过程如此痛苦，直到今天还能在读者身上引发瓦解灵魂的效果。《莫斯科日记》一直是一堂课，这堂课讲到，哪怕是那些心地善良的人们在与别人分享爱的时候，也有互相贬损的能力。阿西娅和莱西、本雅明和阿西娅、莱西和本雅明、本雅明和莱西、阿西娅和本雅明，他们彼此之间都吵过架，吵架的原因从女衬衫的裁剪纸样到滴着水的水龙头，从缺乏现金、对事业成功的渴望到阿西娅的女儿达加——她如果到市郊上一家公立幼儿园的话，就要面临着无人照管的境地，这些都能成为吵架的原因。吵得最凶的事情是关于共产主义中的作家角色、苏联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的最新剧目、布尔加科夫的戏剧艺术、《大都会》的结尾场景或者还有这个问题：“阶级斗争”的概念以多高的频率被收录到一本苏联百科全书的词条中？起码会比歌德的出现频率更高。有时候大家一整天都不讲话，多次出现心脏病发作的感觉，到第二天晚上才又联合成一个三人小组，一起坐到第一排观看戏剧。本雅明虽然听不懂戏剧中的任何一个词，但他通过耳边咕哝着的同声口译还是可以跟上戏剧的节奏。在相处特别融洽的夜晚他还可以得到轻轻一吻。当然只有在阿西娅觉得必须得这么做时才这样，并且她还得在另外方面履行她作为莱西女伴的义务。一切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人们只有从尽可能多的维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算熟悉了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人们必须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也必须得从所有的方向离开这个广场。”[239]本雅明在1926年12月15日这么记录道，而此时此刻莱西也在宾馆房间里，正坐在本雅明旁边。这样的一种观察方法也适用于人际关系领域。到12月20日，本雅明就已在日记中明明白白给出了一个城市和人际之间的寓言：“对我而言，莫斯科现在是一座堡垒；恶劣的天气令我苦不堪言，尽管这对我来说是健康的；语言不通、莱西一直在边上、阿西娅备受限制的生活方式，这些形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堡垒。继续向前挺进毫无希望。阿西娅的病，至少她的虚弱状态，令一切与她有关的私人话题都只能退居其次，也使得我并没有被这一切压垮。至于我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此趟旅行的另外一个目的，即避开圣诞节那要命的愁绪，还不得而知。”[240]

12月30日，这个问题已经显示出了答案。当本雅明和阿西娅一起站

在剧院一张招贴布告前时，他承认道：“如果我今天晚上必须独自坐在某个地方，出于痛苦悲伤，我宁愿上吊自杀。”

没有支架的男人

随着新年的到来，莫斯科的温度达到了新低点，阿西娅又开始一阵阵发烧，疗养院给她分配了一个又聒噪、精力又旺盛的粗俗室友。不幸的是，这位室友讲德语，她马上就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阿西娅的每次谈话。莱西还是继续一同住在宾馆里，现在他把宾馆房间也当成了办公室和工作间。争吵发生了不止一次。场景太熟悉，主角太疲惫不堪。[241]月8日，莱西心脏病严重发作，阿西娅的身体状况也再次恶化。本雅明在宾馆房间里总是小心翼翼地谨慎设防，有一个瞬间他以痛苦的方式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洞见。

>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接下来一段时间，我的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支架。翻译显然不能充当这个支架。我的立场再度成为了构建这一支架的先决条件。阻止我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仅仅是外在的顾虑。现在也许正是入党良机，一旦错过这个良机就可能有危险。正因为入党对我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插曲，一再拖延并不妥。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顾虑迫使我问自己，是否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实用且经济地在我身上涂上左翼局外人的透明底色，以确保我有可能继续在迄今为止的工作领域中进行广泛的创作。只是，这一创作能否毫无裂痕地过渡到一个新阶段，这恰是问题之所在。就算是那样的话，这一“支架”还必须由外部条件，比如说一个编辑的职位，来加以支撑。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即将来临的时期与过往的区别在于，情爱之事对我的影响将会不断减弱。我对莱西和阿西娅之间关系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使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注意到，面对阿西娅的喜怒无常时，莱西总是很镇定，面对她那些令我心烦难受的行为方式时，莱西总是很少受其影响，或者起码他是装成这样的。而他装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这都是因为他在这里为他的工作找到了“支架”。[242]

这是本雅明20世纪20年代晚期生活状况的唯一记录片段。修道院之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正如共产党之于本雅明的意义。在毫无保留的开诚布公中，一方面是洞见到自己的成熟过程还未出现，另一方面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明显在对未来进行权衡和选择——这个个人主义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不如从前了——这两方面配成了一对。如果说做出的决定并不存在最终原因，那么这些决定起码可以证明是有用的！极端的实用主

义变成了行动，“编辑职位”的市民梦想在意识中鬼火般地忽闪着。只要现状不再这么继续下去！三十几岁的本雅明必须认识到，他的生命没有支撑物，甚至都没有一个自己的生活。连阿西娅和莱西在这方面都比他好，他们起码拥有彼此。除此之外，阿西娅还有她的共产主义使命，国家干部莱西则日常忙于开会：

> 进一步考虑：要入党吗？入党有重大好处。一个稳定的职位，一个即便只是虚拟的席位。有组织、有保障地与人接触。与此相反的是，在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度里，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说，把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任务交付给了党。……只要我仍在旅途，自然就基本无法考虑入党的事情。[243]

继续旅行。这一直是本雅明最喜欢的选择。1927年冬天和后来，他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党派。想要处于独立状态的意志最终总是占据上风，众所周知，这是使自由思考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1927年1月30日，本雅明离开了莫斯科。他和阿西娅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如同日戈瓦医生式的翻转图一样：“对她的不满和爱意在我体内如同疾风般来回翻腾，忽是不满，忽是爱意。最后我们互道再见，她已经站上了电车的平台，我则原地不动，更确切地说是在犹豫着，我要不要随她一起跳上电车。”

一个人的派对

深深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本雅明来到巴黎。还是说，是他自己在主动追随这种失落感？在巴黎，他在“简陋、漏风和维护很差的”宾馆房间里度过了整个春天，房间里的配备“几乎就只是个铁床架子”和一张小桌子。“要适应这样的生活很困难，好多难题，工作，还需做很多准备，挣来的钱又太少。”1927年4月9日，他在给尤拉·科恩——这些年来他排名第二的爱人——写信时这么说道。他始终对尤拉深深地献着殷勤。

那些年，巴黎是安德烈·布勒东、特里斯坦·查拉和路易斯·布努埃尔所在的城市，是让·季洛杜、路易·阿拉贡、詹姆斯·乔伊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城市，是格特鲁德·斯坦因和毕加索、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奈丝·宁和可可·香奈儿的城市。巴黎是超现实主义的摇篮，是《尤利西斯》（1923年出版）、《嘉年华》（1925年出版）的诞生地，《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出版）也有一部分是在巴黎写成的。巴黎是一个洋溢着创造力的先锋派实验室。这里不仅是文学世界精神的家园，巴黎的先锋派也告诉我们，文学世界精神在巴黎彻夜欢庆和舞蹈，从特里亚农古堡或者丽兹酒店出发穿越整个蒙帕纳斯区，不知不觉直到每个清新的早晨。每周六，格特鲁德·斯坦因在弗勒吕斯街召开她的“开放参观日”，并给想倾听的受众（或者不想倾听的受众）解释，是她自己而不是乔伊斯之类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天才。有少部分人到夜里将近2点才要离开，他们在回家路上偶然会碰见许多朋友和熟人，这样他们的聚会又不可避免地延续到第二天中午。不过这些朋友和熟人里面不会有本雅明。由于兑换法郎的价格有利，光是美国就有20万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搬到巴黎居住。[244]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对艺术感兴趣，自愿来到巴黎。他们远离家乡，不过有美金兑换法郎疯狂有利的汇率保障，他们由此也就高枕无忧了。

当然，本雅明在巴黎同样过着放荡堕落的生活，在城里某个“低级舞厅”里来回逛荡。本雅明这辈子都是只喝适度的白葡萄酒，而他在舞厅里喝得太多，甚至在笨蛋般的肢体扭曲中开始跳舞。这招来了他的文学家同伴弗朗兹·黑塞尔和桑克玛·冯·明希豪森的嘲笑——这两位文学家在逛妓院方面特别内行。本雅明最近并不热衷于上妓院，这真是例外，因为本雅明本可以在这方面宣泄感情，可他如今意愿如此之弱，就连法郎都

没有这么弱。本雅明身上有着花钱去妓院找乐子的弱点，也喜欢赌博，这使他成为一个雄性动物，或者差不多是魅力男士的反面。谁把他1926年和1927年的巴黎春天想象成一出童话剧——这出童话剧受海明威的影响，布景华丽，充满了香槟酒、沙龙和性爱冒险——那他就错了。在状态好的日子里，本雅明会在起床后立刻就投入到工作中，不洗脸刷牙、不吃不喝。他好几个小时都专注于做普鲁斯特作品的翻译，或者给《法兰克福报》或《文学世界》写有偿书评。在达到一定数额工作量后，也就是有了基本保障后，本雅明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会以尽量不增加自己生活成本的方式在城里闲逛，穿过拱廊街和小巷，就像在找新娘一样寻找着站在小街上他还不认得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手里拿着餐馆菜单，上面写有省钱套餐组合，价格尚可接受。

虽然本雅明法语很流利，基本上不出什么错误，但当他用法语进行表达时，依旧觉得这门外语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供他实现高要求的表达意愿。如果他请求约见当地文学家进行对话，一般都能得到一个开门见山的肯定答复，当然他得亮出自己是记者的辅助身份。而他的作家身份与当地文学家的现存关联或有益关联他一点儿也找不到。对英国和美国作家笔下的场景，本雅明看上去从没感兴趣过。他不读也不说英语。尽管如此，他兴趣场里的这个空白位置总是很显眼，而且已经含了一些强烈拒绝的意思。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朵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来负担自己以及儿子的生活开支。1927年6月，朵拉带着他们的儿子斯特凡一起来找本雅明。这对本雅明的生活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打断。在此之外，本雅明觉得20年代的两座黄金世界之都，巴黎和柏林，都同样不体面地把他的天赋遗弃了（“柏林是个神奇的仪器，前提条件是，人们对它发嘘声起哄”）。

“目前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14天后我将完全孑然地坐在这里。”本雅明7月份给肖勒姆写信时这么说道。肖勒姆在建于1925年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他现在正前往伦敦和巴黎进行科研旅行。分离四年之后，这对好朋友在1927年8月第一次重聚，可以在一起待上好几周时间。本雅明因为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而感到羞愧，并因为肖勒姆“明显的自信”而紧张，所以他一开始是害怕见面的，但最终整个见面是积极的。他们俩主要在晚上到蒙帕纳斯大道附近的咖啡厅见面，比如“在罗姆咖啡厅和穹顶餐厅”，本雅明最喜欢的地方。肖勒姆这几年来找到了自己的支架，而本雅明继续酝酿着未来。现在他开始写一本新著作，内容是关于巴黎的购物拱廊街，作为在柏林《单行道》中思维图像的一种补充。他

说着话，肖勒姆回忆道，“他当时说到了，要在未来几个月里完成这部新作”。本雅明在咖啡厅里给肖勒姆读了将近50页文稿中的一部分，而这将近50页的文稿形成了那部《拱廊计划》的雏形，本雅明在接下来十年将继续写作这部著作。而这部著作最终一直是一部宏伟的、未完成的断简残编。

本雅明讲述着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肖勒姆明确意识到了本雅明现在生活处境困难，他讲述着耶路撒冷，讲述一个为了犹太民族而建设的新国家，以及刚刚建立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在犹太人身份认同方面所应扮演的角色。巧的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校长朱达·莱昂·马格内斯当时也在巴黎，他能讲流利的德语。肖勒姆便安排了一次会面。“这样，”他回忆道，“我们三人之间就进行了一次两小时的谈话。本雅明明显对这次碰面做了充分准备，他以宏大的表达方式介绍了他现在的精神状态，还具体介绍了他的愿望：他希望能通过希伯来语媒介走进犹太文学的伟大篇章，而且不是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而是形而上学家。他还解释道，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做好了前往耶路撒冷的准备，短期逗留一段时间可以，长期停留也是可以的……他想要将自己创造性的劳动贡献给犹太民族……”[245]

这又是从一个极端，充满矛盾地突然转变到另一个极端的时刻：总是很极端，从来没有连续性！肖勒姆以官方外交的方式结束了这个会谈片段：“本雅明以一种特定和积极的形式表达了他的这些想法——对于这些想法，当然之前他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早都说得够多了，而且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到了他的这些想法中——我自己对他这些特定和积极的表达形式感到惊喜。”

在三人见面的那天晚上，本雅明向马格内斯校长保证——当然这需要以经济支持作为前提条件——要去耶路撒冷待上一年，以便全职学习希伯来语。整个晚上最神奇的转变在于，马格内斯相信本雅明的每句话，并且承诺要从他这方面促成此事。作为唯一条件，马格内斯请求本雅明提交他著作的专家鉴定笔头意见，最好是由等级高的权威专家来写这个鉴定意见。突然间，具体的生活前景之类的东西在本雅明眼前打开了。如果不在莫斯科，那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不是一年前自己给肖勒姆写信，说他想要根据偶然事件做出一个最终决定吗？

在柏林，事情也突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本雅明的书，终于，即将在第二年1月份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了！1927年11月，本雅明为了

在旁处理著作出版事宜回到了柏林。然而他却因为黄疸病先在床上躺了漫长的三周。这让他有足够的闲心，可以考虑找哪些可能的高等级专家来给他写著作鉴定意见。为了耶路撒冷。为了一个有支架的新生活！

雨果·冯·霍夫曼史塔尔，长年来唯一一个惊叹本雅明作品的人，肯定是鉴定专家的首选了。至于第二名鉴定专家，如果要安排好的话，那就得请恩斯特·卡西尔了。请专家来写鉴定意见的困难不小。到1928年3月，本雅明在此事上还是未有任何进展。而且在他本雅明式的典型办事风格中，他错误地觉得别人对他的作品筹划了一场盛大阴谋，就如他告诉肖勒姆的那样："卡西尔投票的重要性对我来说显而易见，不过你和我表兄弟威廉姆·施特恩一样，都觉得明显看到了汉堡那边闪着敌意。迄今为止，在瓦尔堡旁边围绕着云层，没有人能够看明白，从云层中将会冲出什么。如果我获悉卡西尔是怎么看我的，我就告诉你。"[246]

卡西尔是怎么看本雅明的？好问题。

身在远洋

1927年10月30日，恩斯特·卡西尔更多像是顺便对自己进行了一次观察，这次观察也适用于他整个哲学的特点。“我可以将我需要的东西毫无困难地表达出来。”他从伦敦给夫人写信时这么说道。人们可以翻遍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日记与书信，却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一句话。涉及语言的界限、世界的界限时，卡西尔总是一位持可能观点的思想家，而不认为这些界限是不可能突破的。

这具体指的是，卡西尔来到大英帝国首都时惊讶地感到自己什么都应付得过来，对此卡西尔大为愉悦地惊叹。在收到国王学院的邀请后，卡西尔在出发之前的几周内请私人教师过来教了几个小时的英语，除此之外，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英语词。几天之后，11月3日，他就充满自豪地告诉他的夫人，特别是对“学者的语言”，他“完全毫不费力地”就理解了。这位哲学家真是符号使用方面的天才。

1927年秋天，事实上全世界没有谁在最广的意义上比卡西尔能更流利表达和理解更多语言。因为卡西尔认为，他的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学会尽可能多的“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进行相互阐明。不光是英语、法语、梵语或者汉语，而且首先还有神话、宗教、艺术、数学，甚至技术和法律，这些对卡西尔而言都是具有各自内在形式和塑造世界能力的语言。因此，他“符号形式的哲学”目标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将目光“投向理解世界的所有方向上”，目的是为每种不同的世界构造：

> 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特定的折射率；这个折射率以特有的方式适用于各种世界构造。它[符号形式的哲学]想要认识各种各样具有折射功能的媒介本性；它想要看穿每种媒介的内在特点和结构规律。[247]

1927年秋天，卡西尔完成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第一版，就此暂时给整部著作划上了句号。每个所谓的普通人在完成这么一部人生大作之后都会精神崩溃或者至少大病一场，可是卡西尔的生活就这么继续下去了。这个夏天，他给自己完成一部大作的唯一赏赐就是之前讲过的去英国和荷兰进行为期两周的演讲旅行。他独自一人启程，没有带着妻儿一起。托妮在9月份被一辆汽车撞倒了，这之后的几个月她都需要进行强化康复，尤其需要在理疗医师指导下进行康复。

卡西尔乘坐“纽约号”客轮从汉堡出发前往英国南安普敦，他多次在客轮上给妻子托妮报告他的旅程情况。[248]卡西尔在坐进他那“出奇奢侈和舒适的客舱”几分钟后，就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诱惑，想从南开普敦马上“一直坐船去纽约”。在卡西尔哲学研究的形式和乘坐远洋轮船旅行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类比性的几近完美的协调一致，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卡西尔会忽略这种一致性。就在几天前，他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导言部分最后一段是这么表达自己的，他将自己强调成是一名在符号形式的大洋上充满好奇心的发现者：“人们只能要求，这种‘环球旅行’涵盖了全球人类心智的真实整体。”

在哲学研究趋势中出现的航海隐喻也并非仅始于尼采的呼吁“请登船吧，你们这些哲学家！”，永恒运动着的大海合抱了全球全部的暂时性空间，大海完美地象征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生产活力——这种活力几乎看不穿，更别说去驾驭了。尤其是因为与此相关的一种感觉确定了文化基调——人们觉得脚下再没有坚实的土地——并且这种感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同样的力道冲击了经济、艺术、政治和科学等领域。就连物理学和逻辑学也遭遇了一个基础危机，也就是人们试图要给人类知识大楼建造一个不带任何矛盾的坚固根基，人们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有可能面临着失败的命运。奥托·纽拉特，维也纳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已经给当下的哲学境况——或许是跟维特根斯坦式的降神会一同出现的幻灭后果——做出了如下描绘：“有一群船夫必须要在开阔的海面上改建翻修他们的船，但是却无法在一个船坞中拆卸这艘船，也无法用最好的新部件来重新建造这艘船；而我们就如同这样一群船夫。”[249]

在风暴之眼

“暂时、易逝、定额”，波德莱尔在仅仅几十年前就对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做了这样的描绘，而这些特征也同样完全可以用描述哲学的情况。对于所有先驱者来说，要对新的此在感受表示全然欢迎，并不是件人人都觉得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持续享受上述说到的那种船夫此在，并且可以安心驾船穿过每个风暴，那么无论如何，就如卡西尔身在一艘现代远洋轮船上一样，他立刻对这艘轮船的内在构造和运行方式凭着恰如孩童般的好奇心开始探究起来，好似这轮船本身只是另外一种符号形式和存在于世界的方式。

卡西尔在登上轮船6小时之后就已经“从上到下把所有一切都观察过一遍了——包括三等舱我也去过了，在那儿我很快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给我详细展示和介绍了一切。三等舱虽然和头等舱难以置信的奢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但三等舱这里的一切还是舒适和正常的”。卡西尔在三等舱并没有看到船上提供的所有睡眠环境，不过他对此没有太多意识，就如他可能在轮船上的厨房里打听乘客之中有没有盲人、厨房里有没有老鼠。对于其他观察者来说，比如同时代的贝尔托·布莱希特，远洋轮船像是一种完美的布景，在此布景中人们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这个时代“顶层甲板”和“下甲板”之间戏剧化的社会差别。[250]而同样是远洋轮船，卡西尔让一个“朋友”给他展示了三等舱，并最终得到一个令人慰藉的普遍判断：原则上所有一切都很正常，如人所愿！

卡西尔自己呢，则是睡在“船上几乎是最顶层的部分”，有“一部电梯”把他“送上去”。他描述说上面的旅行感受“完全不真实”，特别是轮船行驶“很平稳”，这种平稳“有时候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其实是在移动中”。

就算是到了夜晚，北海上刮起风暴，风暴如此狂烈有力，以至于“所有亲朋好友都带着哭声打电话过来”向待在家里的托妮·卡西尔询问情况，她的丈夫面对风暴时也给出了耐生存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 ……夜里将近3点时（我被）刮风的声音吵醒了……我上面的夜风暴刮起来是什么声音，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无法马上再入睡，就读了会儿书，之后觉得累了，便一直睡到了早上8点——这样的睡眠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晕船的感

觉……虽说波浪起伏得厉害，但轮船的航行美妙平稳。[251]

这些文字再次证明了，卡西尔像远洋哲学家中一艘毫无争议的豪华客轮。就算是如此强烈的风暴都没有让卡西尔惊慌失措，更谈不上让他偏离航线了。

法兰克福危急时刻

如果说我们在卡西尔人生中能找到什么波动或起伏的话，那是直到1928年6月，这个时候卡西尔才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越发接近他的人生最高峰。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和汉堡大学一样，都是仍在建设中的新大学。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强调了其愿望和要求：“要重新建立整个哲学系”，并向卡西尔明确表达了聘任和邀请之意。[252]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充满前景的机会，而且报酬非常丰厚。卡西尔马上就把法兰克福方面给出的报价也告知了汉堡大学负责人。卡西尔想要在7月份就做出去向决定，并且想要完成和两个大学都得进行的协商工作。

关于卡西尔的去向，许多方面处于危险之中。首先对于汉萨城市汉堡来说是这样，对于阿比·瓦尔堡和他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亦是如此。特别是为了自己研究工作的永生长存，瓦尔堡决定在《汉堡旅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他给这封公开信取了个标题《恩斯特·卡西尔：为什么汉堡市不能失去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同时，瓦尔堡还把这封公开信当成是一篇单行本寄到了《全德国70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253]一书的选编部门。直到这封公开信发表时，这场争夺当时德国最负声望哲学家的角力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甚至是一个政治事件。没过多久，汉堡市和法兰克福市的市长都发表了招募信，参与到这场角力中来（“请您到法兰克福来帮助我们，给法兰克福大学赋予地位和意义；这样的地位和意义理应归于法兰克福市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精神活力和民众的内心自由”）。[254]

瓦尔堡也在角力的每条前线积极努力，比如，他请求法兰克福政府委派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监库尔特·里兹勒——他正在招募卡西尔到法兰克福去——考虑一下，“卡西尔能在北海岸边的坚硬土地上扎根下来是多么不容易”，[255]如果卡西尔离开了汉堡，那这肯定意味着会“暴力地伤害了好不容易才扎下来的根”。汉堡在经济方面决意彻底地支持卡西尔，并有能力回击法兰克福的报价，瓦尔堡在这个方向上亦是非常卖力。不过这是否足够把卡西尔留在汉堡——一座当时（和今天）在许多方面负有盛名，但偏是在学术卓越方面并非如此的城市？

这个时期，卡西尔就好似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实现历程，他已经不仅仅是个学院哲学家了。他是自由共和姿态的代表符号，影响力十足；自

由共和的姿态无论如何在当时德国思想大家里并非理所当然。尤其是卡西尔作为在世的最重要新康德主义者，还是赫尔曼·柯亨的学生，在康德作品以及歌德作品诠释方面在全世界也都享有权威，是德国—犹太爱国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与此几乎形成了讽刺性对比：瓦尔特·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申请教授席位惨遭失败，他又转而去汉堡试试运气，结果依旧令人失望。通过雨果·冯·霍夫曼史塔尔的介绍，本雅明让人把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寄给了身在汉堡的潘诺夫斯基本人。可是潘诺夫斯基请霍夫曼史塔尔转达的答复很不友好，导致本雅明甚至认为，自己有必要向中介人霍夫曼史塔尔详细地道歉，不应该让他卷入这件本来就毫无希望的事情里。

不管本雅明的人生道路有着怎样的形式，他想要加入瓦尔堡学术圈子的心愿是否被听到了？就像瓦尔堡圈子的其他成员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本雅明本不应该去往巴黎，可能性大得多的流亡方向应该是伦敦或者美国才对。后来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建立了社会研究圈子，本雅明几乎没有陷入对它的经济依赖——经济毕竟对本雅明的作品创作很有影响——也没有受到资助。

对于未来德语哲学的发展进程来说，有趣得多的是这样一个推想：如果卡西尔真的接受了法兰克福的任聘邀约，在法兰克福大学完全根据自己的理想彻底重新建立哲学专业，那么将会发生些什么呢？卡西尔在法兰克福是否会成为所谓“批判理论”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人物？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作品的风格，有没有可能正是瓦尔特·本雅明会被封为法兰克福学派神圣的创建人物？

无论如何，远洋上的领航员卡西尔还是留在了原来的船只上，对汉堡、瓦尔堡，尤其还对他自己近乎连续的本质保持了忠诚。1928年7月底，他将留在汉堡的决定告知所有相关人士。与这个决定相关的代价——或者说是礼物——自然在于，对于汉萨城市汉堡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来说，卡西尔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就在卡西尔开始和汉堡市协商继续留下来的事宜时，有可能是汉堡市有意识要为这次协商事宜保驾护航，他被要求在汉堡市政府前为魏玛宪法颁布十周年庆典发表演讲。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只有卡西尔的夫人托妮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他们期盼已久的去瑞士恩嘎丁的夏日度假计划恐怕要往后推迟整整两周了。另外，尤其还因为托

妮，她因患有慢性病，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她和她丈夫不一样，她对存在的危险有着特别清醒的意识。她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觉得每个过于明确的表态都是不聪明的，甚至是危险的。特别因为卡西尔作为德国犹太人，更是如此。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获悉这场风暴的强度，但是托妮已经感受到了这场风暴，他们正在被逐渐卷进其中。可她的丈夫并不认同她的担忧。就算风暴真的来临，卡西尔认为自己也有足够的力量站稳脚跟，可以用他最喜爱的那些人物的拯救性力量再次抵御风暴。

个体与共和国

演讲事务安排得很狡猾，也必须得狡猾。这位演讲者留着带有教授特色的蓬乱全白长发，身穿具有学术意义的长礼服，和其他受邀到来的客人一样唱了《德国之歌》的第三段。演讲者的最终目标是起码在45分钟之内对受众完全串讲明白，关于共和法治国家的起源与诞生，在整个欧洲占主流的说法是什么。

如果想要避免丑闻，那么就得用多种声音和多种路径的方式来演讲，尤其只讲那些最高贵的大人物。对于卡西尔来说，这一天和他整个精神生活的其他日子是一样的：莱布尼茨——康德——歌德。他深深相信，没有什么文化还需要比这数量更多的大人物了，德国文化也是。有了这些大人物，文化就可以持续地恢复元气。如果这些文化遗产在某处受到排斥和歧视，那么此处定是开启了野蛮的深渊。

许多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提出的首要质疑并不在于充满问题的共和国功能性。诚然，魏玛共和国成立将近十年以来，直到1928年8月已经令十任总理筋疲力尽。不过在过去两到三年间，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毫无疑问有所好转。作为一战的惨败国，德国与共和国制度的真正相悖之处在其文化记忆中：根据大众普遍认同的说法，民主共和国的统治形式最终只是一种进口的东西，这个东西扎根于一战战胜国美国（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法国（法国大革命），如果带着历史的许多善意，还有英国（大宪章），甚至连瑞士也有它的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言。在民主创造神话方面，德国差不多是空白的。这么看来，魏玛宪法并不是一个礼物，而是自身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事故。这是一种一直存在的战争附带损坏，除了凡尔赛和约中要求的战争赔款外，魏玛宪法的设计和实施都被战争压上了沉重的负担。一个真正自决的德国——从它本身历史出发——可能以许多形式出现，但实际上不会是个共和国。尤其是当时在位的共和国总统、前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也是这么认为的。魏玛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与历史相匹配的自我形象问题。这也是卡西尔在汉堡市政府前讲话开头部分就已提到的一个“伤口”。一个哲学家最终会怎么看待这个受伤的地方？他不会同意如下说法：

> 那些掌握和推动了我们当下状况的历史政治大问题——它们涉及精神的基本问题——是系统哲学对自身提出的，而且系统哲学在

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竭力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历史政治大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256]

由此，策略的第一个重要部分就完成了。历史在暗地里变成了哲学史，而且它作为政治历史最终总在围绕着相同的系统问题：个体和他所属集体之间的合理关系是怎样的？怎样从真正的自决到自由的公共理智应用？每个理性生命理应完全拥有的、不带任何限制的可能权利有哪些？对于自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国民的卡西尔来说，这些都是天然的德国问题，起码那些涉及现代哲学的问题都是天然的德国问题。如果人们把事情首先限定在此框架中，那么在更加确切地了解源头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清晰状况：实际上，正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他是一位系统哲学家，迄今为止都并没有被强加上特别的民主思想——“在伟大的欧洲思想家中，他是第一位在其确定的伦理学、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中坚定地强调了个体基本权利的原则。这些基本权利不可被剥夺、不可转让他人”。[257]

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怎么偏巧是他！要是以同样的可信度，人们甚至可以从魏玛共和国总理、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记忆大礼帽中变出一只巨大的德国兔子呢！

引用名言的魔术师卡西尔不单单只是顺带提到，莱布尼茨这个关于奴隶和奴仆权利状况的段落来自于一本宣传小册子，可以想象这个段落里讲到的内容和实践相去甚远，即给奴隶奴仆赋予某些无条件的基本权利的实践。另外，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个莱布尼茨研究者认为这个段落值得一提。

从这些基本权利到现代法治国家里具有完全选举权的主体，这之间还需要迈过许多大步。卡西尔认为，迈步子这个动作也确实正在发生着。莱布尼茨通过沃尔夫的中介，影响着欧洲大陆的整个政治哲学，而且通过英国法哲学家、沃尔夫的读者威廉·布莱克斯通还影响了美国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而众所周知，独立宣言又成了法国国民大会的模板！

卡西尔并没有单独从哲学历史角度来证明上述影响，但这无论如何总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简洁反驳，令人信服。1928年8月15日，这个反驳在伊曼努尔·康德那里达到了真正鼓舞人心的高潮：

康德在1784年，也就是大革命爆发前的5年，写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在此著作中，人类政治历史的目的在于制定一个内在的——为了达到此目的，同样也是外在的——完整的国家宪法。“尽管这一国家共同体”，康德补充道，“现在只是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设计阶段，但如今四肢好像已经逐渐产生了在共同维持着身体整体的感觉，而这给予了人们希望：在一些改造性的革命之后，最终可以实现以自然为最高目的的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在此状态中人类所有始源动机得以发展，并有朝一日可以实现。”由此，这只是在重复康德本身的始源要求，而不是外部世界发生事件的影响。康德于十多年之后，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确定了永久和平的首要明确条款，即每个国家的公民宪法应是共和性质的。因为康德认为，这样的宪法本身吻合了“原始契约”的观念，而所有民族的立法都必须最终建立在本观念的基础之上。[258]

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魏玛共和国，它们都是以最德国的新方式建立其基础的。不光是它们，还有在德国充满争议的国际联盟——德国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才在两年前加入国际联盟——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哲学史上小小的神奇一幕，这一幕有着好斗的结构，但是卡西尔在这个节日上以如此令人感到舒服和优雅的方式讲述了这个主题，以至于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更确切地说，卡西尔讲述的内容可能是最为不言而喻的，观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当卡西尔在演讲中说到他真正历史道德的部分时：

我的观察应该帮您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共和政体的宪法观念在德国思想史的整体中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异乡人，更不必说是一个外来入侵者；相反，这种宪法观念是在德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并通过自己的力量和理念主义哲学的力量获得了成长的养料……“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歌德说过，“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如此，专心致志于共和政体的宪法观念历史并非只是往后回望，而是应该要加强我们的信仰和信心；那些使得宪法观念成长起来的始源力量也能够为其指明未来的道路，并一同帮助其开创未来。[259]

卡西尔的演讲到此结束，然后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了讲台。阿比·瓦尔堡天生容易激动，此时他当然也在场，他认为卡西尔的这场演讲就是“德意志共和国大宪章的序言”，而这正是“目前这个可怜的德国——

它总是还无法做好准备，去实现对自由的渴望——”当下所需要的。瓦尔堡再次请求允许他把卡西尔这次演讲的内容做成一个单行本。[260]

在这样一个庆典节日上，只有托妮·卡西尔依旧对这一切持怀疑的保留态度。“许多‘相关的人’，”她后来回忆道，“在汉堡市政厅的庆典之后，我就再也没找到过；而深信此道的人依旧是那些希望自己被说服打动的人。为了唤醒当时的德国，总还有别的办法，而不是非要习惯和希望恩斯特在场。”[261]

相信当时的瓦尔特·本雅明和马丁·海德格尔也会赞同这样的判断。卡西尔夫妇在演讲的当晚就搭乘夜间火车去往瑞士高海拔山脉度假。这次仍是他们应得的假期。

在建造中

1927年10月，海德格尔还在一直等待着柏林教育部的明确答复。虽然《存在与时间》在出版之后短短数月之内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各地都作为一件真正的大事被庆祝着，但正式聘任海德格尔为马尔堡大学正教授之事仍需等待。这个教授职位是由于纳托普离开才空出来的。10月19日，令人松一口气的答复信件终于寄到了。海德格尔这几天正在梅斯基希他弟弟那里——这年春天海德格尔的母亲去世，家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而埃尔福丽德则独自和儿子们住在山间小屋里。从此时起的三年间，海德格尔一家在马尔堡的住宅和托特瑙堡的小屋之间来回奔波。但这并不是一直会持续下去的状况，尤其是因为孩子们在这期间到上学年龄了。

随着海德格尔正式取得正教授职位，他的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前景。“前天从电话上听到你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你是多么高兴。部长的决定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客观性信号。教育部自己肯定也感到如释重负……胡塞尔现在因为我是纳托普的继任者，他手上又有了另一张王牌……海德格尔式的幸福看来还存在得好好的……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去享受一些快乐了。但是首先别只是把‘房子’列入计划，而是要考虑到其实施的具体可能性……”[262]这是1927年10月21日“小黑人”海德格尔写给小心肝埃尔福丽德的信。按照海德格尔夫妇的愿望，马尔堡只是跳回弗莱堡的一个必要跳板。在弗莱堡，胡塞尔确定会在第二年退休。[263]尽管胡塞尔明确感觉到他最优秀的学生海德格尔身上有一种离经叛道的特质，但胡塞尔希望他的接班人就是海德格尔，而不是别人。

魔鬼的时间

生了孩子写了书……根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也具有约束力的三合一作品形态，他还缺一件事儿，那就是建造房子，并通过建造房子来实现此在应该达到的状态。尤其是因为他到38岁这年才感觉到自己是真的成年了。这样，海德格尔认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只能位于家乡，建在家乡。最终，居住在建造之前，和家乡的关系在自己所持世界观之前，思考行为在所有其他行为之前！在思考领域，随着令人沉醉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完成，1927年至1928年冬天新的推动力被激发出来了。“在‘出版书’这件事情的过度压力后，我可以休息一阵了。我发觉这些都过去后，一股不可抗拒的压力如魔鬼般又开始狠狠地搅动和催促我的生活。”这是1928年1月21日海德格尔从马尔堡给他夫人写信时说的。[264]这段时间，埃尔福丽德和孩子们住在小屋附近一家农户的转租房里。海德格尔夫妇决定让孩子们在马尔堡上学，虽然这不值得。

每当思想的魔鬼开始在海德格尔身上起支配作用时，魔鬼也会催促他去进行新的两性冒险，或者相反。厄洛斯和思想，这两个东西对于海德格尔这位“精神上的希腊人”来说不仅在哲学历史方面是一体的，而且于存在上也是完全同源的。这样一来，在没有取代阿伦特事件的情况下，海德格尔这个时期又将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当成启发他灵感的来源。这时，教育学家布洛赫曼在柏林生活和教书，但经常到小屋来拜访海德格尔一家（马丁独自对她进行了回访）。通信来往也深入了。

尽管房屋建造者海德格尔将家庭带来的安全感看成是他存在的稳固根基，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本真地打破市民婚姻的框架。这是确定和突破、某种找到和仍在寻找之间彼此互为条件的活力，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这种活力中也认识到了真正自由的此在的实际基础状况。在此意义上，人们通过《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分析论打下了根基。当然，《存在与时间》在其已出版的形式中依旧只是断简残编。本著分为两篇，其中第一篇都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未经修改，所以人们一直都还不特别清楚，本书标题中提到的存在与时间之间的实质关联何在。在核心方面，本书已经出版的部分并没有超出对每个生命主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进行描绘和揭示的范围，而每个生命主体终究可以对存在提出问题，也就是对人类的存在提出问题。但是任何情况下，这种此在的分析只具有准备性的性质。由此，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是哈姆雷特，但不是王子。只

有舞台准备好了，而作为主角的问题本身却还没有出场。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而是什么是“存在”？

因此用术语来说，海德格尔自己的“此在形而上学”需要遵循“此在的分析”，这个分析和“展露对存在之领会的内在可能性”有关联。

此在形而上学的中心位置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类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类似于“存在”这样的对象？以及此种理解和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1927年和1928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以魔鬼的后续激发为前提条件，“以存在问题为目的和引导，证明时间性是此在的基本建构”。

在此，基础存在论（什么是“存在”？）也必须走一条看上去貌似是弯路的道路，就如同在本阶段海德格尔式的所有考察中一样，这条道路经由对发问的此在的存在状态进行具体领会。这种此在最终不是从存在的天性中引导出来的，恰恰相反，存在是从发问此在的天性中引导出来的。而且，更进一步观察，此在是深受时间性影响的。

存在之后

伴随对此在的存在之领会——不管此在具体是怎样被确定的——此在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在现实中，此在总是先行地存在着！此在总在那儿，它存在着；在整体上，此在显现为是已被开展出来的，不依赖于此在是以哪种具体的存在者形式进入某种特定的视野中（房子、冷杉、椅子、蘑菇、锤子、钉子、细菌、量子……）。和具体的存在者相反，有一点起码适用于存在本身：这便是需要再进一步考察的先时性。在康德的措辞中便叫做先天的特点："在对存在者的所有把握中，存在已经事先被领会了，对存在的先行领会好像为对存在者的所有把握投来了光明"。[265]

这种先时性的经验曾是一种重要的存在论轨迹，起码对于一个发问者来说是如此——这个发问者需要更进一步去理解存在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因为实际上有一点必须从最开始就给每个人甚至每个孩子阐释清楚：存在者与存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存在，是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展示出来的确定的具体东西（房子、狗、椅子、锤子、钉子、量子……），最终也就是：所有一切！不过好像在此背后存在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所有这些存在者的存在是在何处、通过什么凸显出来的？同样，作为所有哲学探讨永恒之母的存在论问题是：这种"存在"本身是什么？存在就"是"存在者吗？如果是，存在和所有存在者的方式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称为关于"存在论上的区别"的问题。而在区别方面能够唯一真正清晰展示出来的又是：在任何情况下，存在对于存在者来说总是先时的，也就是说，在一种从时间性的角度进行论证的关系中，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有着基础区别。由此，海德格尔在以此在为研究中心的基础存在论者的角色中，可以继续具体地问道：对于此在来说，存在与存在者的时间性区别在哪些经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地显现了自我？

翻转个角度来看，令此在据其本质而成为其自身的东西，最终是对存在论上的区别进行提问本身，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形而上学提问。也就是，进行哲学思考。海德格尔在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只要存在着就会进行哲学思考，这属于人类此在的本质。生而为人意思指的已经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活动，而且因为如此，所以要恢复真正、明确的哲学的自由是如此困难。"[266]

正是因为人们根本上总以开展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来自于存在的先时性天性本身——大多数人便不会或者不再提出关于展开状态真正原因的问题。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毫无疑问和对于他们来说未开展的展开状态中，例如以一种接受了的世界观或世界图像的形式，比如一个宗教的、神话的、科学的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是首先，大多数人强烈地受到了所谓正确理解中的日常世界图像的影响，在此世界图像中一般存在着类似于主体和客体的东西、自然之物和文化之物、可食用之物和不可食用之物、有用之物和不重要之物、神圣之物和世俗之物……

一般来说，从来未被列为询问对象的一些背景想法——各种世界图像（也可以叫做各种“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之上——现在却不仅变隐含的想法为进行明确的发问（例如像恩斯特·卡西尔做的那样），而且更确切地说，海德格尔的做法更为极端，在最终毫无保留的必然性中，他提出了关于这些不同的内在背景的背景问题，也就是：存在着类似于先时性展开状态之类的东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在展开状态的基础上终究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科学、世界图像、语言和符号形式。具体说来：是否存在一个终极根据，而所有其余的根据都是源于这个终极根据？出于其余所有根据，我们让彼此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某种活动、认知和行为、问和答。这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的核心部分是由存在论构成的，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

因此，根据概念在《存在与时间》后的阶段中主导了海德格尔的所有讲座课和著作，例如在1928年马尔堡大学的夏季学期讲座课《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1929年的演讲如《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至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或者还有1929年出版的分析康德作品的著作《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本著作的四章内容全都在围绕着“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

根据和离基

在哲学中对于形而上学原基础来说，自然可以给出许多可能的候选：例如上帝、柏拉图的理念、永恒的实体、纯逻辑基本规律如关于同一性的命题（A＝A）。或者还有从真命题结构中概括出来的某些别的思维基本范畴，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例子。所有这些候选项都应具有永恒性或甚至是超越时间性的特点：只能用在人类之前或甚至不依赖人类的视角去理解这些候选项。另外，这些候选项统统都指出——不光是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两个问题之中的起码一个：它们或者指出了，其存在绝对无法通过有限的人类理智和人类经验来证明（上帝、实体）；抑或指出，目前肯定还无法弄清楚，那些可能的原基础和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一个活着的此在正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表现为具有行为能力。推动伊曼努尔·康德的前进动力其实可能最终在于，通过经典形而上学，特别是它的存在论来改进此在，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去研究人类理解范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范畴使世界成为了这样一个世界（客体取决于理解范畴，而不是反过来）。从康德的角度看，这个研究必须以一种分离作为绝对前提条件，也就是有意识的主体和待认知的客体之间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分离需要在其貌似的绝对性和给定性中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难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不是以每种原—展开状态经验为前提吗？而这种原—展开状态在康德研究的过程中以明确的界限作为假托，来证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

回到源头

就如海德格尔在1922年写作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情境的显示》那样——该文是此在分析论的一种准备——海德格尔1928年关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狭义存在论研究最终目的是，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因为传统存在论提问的出发点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前提条件：此提问要么无法回答，最终得以具备时间性的某个认识主体是如何能够被确定下来，或者如何得到关于对象或根据的知识，而这些对象和根据并没有与有限性和与此相关的时间性联系在一起；要么，在未调查清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就进行提问，人们应该对这些前提条件本身进行开放式的质疑和考察（主体—客体—分离、认识论）。人们应再次回到存在论问题本身的源头去，回到巴门尼德就已提出的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每个此在的好问题最终都是建立在对此在来说变得成问题的干扰性存在经验之上。

为了回到哲学思考的真正源头，不必在身体上或文化上穿越历史回到大概2500年以前（对于像我们这样一种如此深入历史的物种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人们必须制造出特殊的干扰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发问的真正根据！在海德格尔那里，从概念的（或实体的、或逻辑学的、或范畴的）形而上学中首先出现了一种经验形而上学，更确切地说是有限此在和知道自己有限的此在的经验！

对于清醒的此在来说，建立在存在论问题基础上的特殊干扰经验现在拥有了一切，但也和形成中的时间性特殊形式产生了所有关联，人类正是处在这种时间性中。干扰经验产生关联的对象还有人类的时间性经验，恰当描述的话，就是人类有限性的一种经验。

这种经验取决于具体情形，和存在凸显的特别瞬间有关联；而关于存在的问题以特殊的方式显现、提出和不由得产生在这些瞬间里。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并不是我们提出了问题，而是真正的问题向我们展露了自己！

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经验更多是一种存在的深度无根据或者甚至深不可测的卓越经验。特别是濒死的经验、畏的经验和良知呼唤的经验。

位于我们形而上学提问和形而上学本身根基处的真正根据，并不是一个根据，而是一个离基；它并不是一个能提供保障的东西，而是虚无。根据我们的本质，我们形而上学方面的存在就是建立在根本的无根据之中！正因为如此，这种无根据是真实自由的、可能的，也是可以被获悉的。无根据在存在论上是深不可测的，正如每个此在的各自存在一样。

在此意义上，世界观支架和哲学支架——人类通过这些支架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物种，可以在此在中抓住这些支架——正是从存在的本质中转移开来，以便以某种方式将此在建构成尽可能可以忍受的形态。这些支架是假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存在的一部分。只有望向深渊才能得到真相。

具体的虚无经验是所有此在意义可能性的真正条件。这个“虚无”现在在真正意义上“是”和“存在”一样少。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和存在这二者都不是“是”，而是“存在”着；它们作为有限的、时间性的存在者经验存在着。

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谁自然肯定是在与“语言的界限”进行碰撞。而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承认这么做的人。当然，此在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产出了人们通常称之为意义的东西，也就是一个自由建立和决定的完整生活经验。

维特根斯坦在此是否与海德格尔有异议之处？在维也纳学派里他无论如何肯定没有这么做过。此外，同一时间的本雅明不也是在别有含义的偶然情况下唱过大都市的赞歌吗？进入一种解脱了的其他存在方式的拯救性机会并没有根据，而这种偶然情况正处于此无根据的根基之处，仍在等待着它的时刻。

回归家园

海德格尔正在进步。无论如何他都在继续向前迈步，尤其是在职业方面。1928年春天，在弗莱堡教授席位一事上，海德格尔也攻下了最后的体制堡垒。1928年4月16日，在收到弗莱堡正式聘任仅几天之后，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查林根略特布克23号的一块地皮，用以建造房子。到1928年至1929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接任胡塞尔时，房子就应该建好并可以入住。如同1921年建造小木屋一样，埃尔福丽德·海德格尔负责设计房子、领导施工还有室内设计。海德格尔完全充满了期待的欢乐，并且心存感激，即便他形而上学彻底去围墙化的研究计划和他同时间自身存在的完全资产者化之间的鲜明对比令他这几天陷入思考。“这些天来，我总在想着‘我们的房子’——而我们在心中也让我们爱的老建筑历久弥新、愈发丰富。我衷心地感谢你，感谢你给我带来了你信任的全部力量。我知道，我只有以缓慢的速度才能真正学习生活，并按照我内心时时刻刻明确发出的声音来生活。虽然我们从来不能够只依靠外界的帮助，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房子将成为我们和孩子们共同的新栖息地——因为我们的房子完全而且根本不只是外表形式上的，特别是因为它作为一个作品是来自于你母性的愿望。我们的旅途现在才刚刚开始……”[267]这是1928年9月27日，海德格尔从小屋写给新房房主埃尔福丽德的信。起码根据海德格尔全家的内部标准，房子建造的结果还是成功的：有点儿像是小木屋，又有点儿像双户住宅。半是黑森林，半是郊区，内部墙板是木头做的，外部是用木瓦盖出来的。房子里最大的房间自然就是马丁的书房了。

高速运转

正是在弗莱堡扎下了根，海德格尔觉得弗莱堡会是一个出发点，也是突破到新高度和新深度的真正基础。建造弗莱堡新房的这个夏天，海德格尔是在小木屋里度过的。他面对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时表达得甚至更为具体：“现在我正在慢慢地适应弗莱堡，但是就如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到的那样，这种适应是对任务的深化，或者是慢慢地敢于去做一些我刚到弗莱堡时还做不了的事情。……今年夏天马尔堡的讲课就是一条新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描述那些我相信长久以来只能隐约感知到他们存在着的小路。……它[房子]在没有滴入任何一滴雨的情况下就顺利完工了。”[268]

如果从纯粹的教学支架出发，“新路”指的是“哲学的解放”，那么现在海德格尔选择的新方向就不仅仅是新的路径，而是另外一种前行的方式了。因为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不可能把自己仅局限于纯范例式的顺利进展，而是必须要变成他的听众的一个真正此在向导，向其他人介绍，并且让其他人真的也可以亲身经历确保一个人成为人类的绝对本质经验。海德格尔承认自己在离基和虚无方面的本真，他认为这是可能进行真正哲学思考的唯一真实条件，换句话说，这也迫使他必须重新理解哲学教学活动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哲学教学活动必须最终由教导转变为一种语言应用行为，从教授调整为转变。学术教师必须变成大师，讨论课的指导老师必须变成此在向导，并着迷于虚无。如何前进？通过对表象进行推理解答，通过调整传达的方式，告诉人们有太多人掉入了本真的极端深渊。所有一切，唯独就是不能进行纯教学活动，不能拘泥于僵化的课堂谈话。

对于天生具有独特魅力的海德格尔来说，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练习了，但同时也是最冒险的练习。1928年夏天，和宪法爱国者恩斯特·卡西尔截然不同，海德格尔作为具有解救坠落能力的预言家拥有了他需要的一切来“唤醒德国”。大展拳脚的舞台已经准备好，职位已经争取到，新房也入住了——此时的机遇真是无比有利。“明年三月份，”1928年圣诞节前的两天，海德格尔已经在新房子里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写信，“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邀请我去参加，并且我已经答应了，我答应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到时候可以去高山旅游。”

VIII
时间
1929

海德格尔和卡西尔站在顶峰，

本雅明望向深渊，而维特根斯坦发现新道路

自由的跳跃

在到达高山目的地后，海德格尔“却有些担忧事情会怎样继续发展”。海拔2700米，他还从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高海拔的空气，稀薄的空气。他的体能是否真的够用？从弗莱堡带来的装备是否能够胜任当地的要求？此时此地他必须得证明自己。这个时候再自我怀疑和犹豫不决无论如何都已经太迟了。这里就是达沃斯！就在这里跳吧！

事情发展得出奇顺利。海德格尔在做了几个自由跳跃之后，就清楚地知道，他比其他所有参加者——甚至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丰富滑雪经验的人——实际上都“远远更占优势”。达沃斯帕森地区的滑雪斜坡往下直冲800米到山谷中，就如海德格尔在1929年3月21日——正当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进行时——给他的妻子埃尔福丽德写信说的那样，顺着这个斜坡往下滑去是他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期间迄今为止的高潮。卡西尔没办法一起参加高山旅行。海德格尔记录道，卡西尔“在第二场报告之后就病倒了，他来的时候就已经着凉了”。这样，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监库尔特·里兹勒和海德格尔一起爬到了高山上。同样是这位里兹勒，在不到12个月之前想把恩斯特·卡西尔从汉堡招揽到法兰克福大学，请他重新建立哲学系，并且卡西尔可以提出任意要求。原本允诺给卡西尔的教授席位在卡西尔拒绝去法兰克福之后交给了马克斯·舍勒，他的主要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于1928年出版，这个出版时间比卡西尔的《文艺复兴中的个人与宇宙》晚了不到12个月，并早于其《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出版。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舍勒于1928年5月去世了。

在人群中

当卡西尔裹着温暖的骆驼毛被子，和夫人托妮一起坐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期待着马上康复时——就如同《魔山》里的汉斯·卡斯托普那样——海德格尔则与他的新登山伙伴里兹勒一起度过了自由自在的每一分钟。在一起登山的过程中，里兹勒顺带给海德格尔送来了学术方面的好处。“我和里兹勒经常待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直到现在才真切地希望我能够得到法兰克福大学的聘任邀请——我只是需要些时间。”至于在达沃斯的其余事情，海德格尔目前为止起码觉得很失望，特别是达沃斯本身，“糟透了，建筑物出奇地俗气，遍地都是杂乱无章的小旅馆和宾馆。然后还有过来疗养的病人……”[269]

当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同汉娜·阿伦特一起读《魔山》时，他眼前呈现出的画面明显比现在在达沃斯看到的要好。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内容流程和参加者迄今为止都令海德格尔感到失望。不过他还是评价自己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场报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两场报告他在“没有任何稿子的情况下都讲了超过一个半小时”。尤其是因为他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年轻人觉得，我工作的根之所在正是今天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不再拥有的，并且也是他们不再能理解的。”

海德格尔最终可怕地发觉：“可是年轻人是多么地狡猾、没有坚定的意志、缺乏天性的直觉。再也找不回此在之中的简单朴素了。”[270]他在3月23日的信中补充道：“卡西尔今天试图起床赶过来，以便‘工作团体’周一或周二能够进行。”

在那些来达沃斯听海德格尔和卡西尔讲座的严重迷失自我的“年轻人”中，有不少是未来全球战后哲学的大人物，例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诺贝特·埃利亚斯、约阿希姆·里特尔和其实已并不那么年轻的鲁道夫·卡尔纳普。与来到达沃斯的德语和法语哲学界后辈一样，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出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国际大学课程。卡西尔讲得很好，但是有些庄重徐缓。……海德格尔则是严肃客观，人格上非常吸引人。”卡尔纳普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这么记录道。接着是3月30日的日记：“和海德格尔一起散步。讨论。他的立场是：反对唯心论，特别是在民众教育中。关于‘存在’的新‘问题’。得到解脱的需要。”[271]

卡尔纳普也和当时正在康复中的卡西尔一起围着召开会议的酒店散

步。他们首先谈论的是，接下来会建立哪些学术机构。卡西尔和卡尔纳普的维也纳导师莫里茨·石里克保持着长期深入的通信交往，他们写信探讨与研究相关的事情：建立网络、互相取悦、建立和保持结组关系、彼此搜集信息和留下印象。当时和现在一样，和别人打好交道对于一个学院哲学家的事业来说和思考本身一样重要。所幸，卡西尔在这方面，也是长袖善舞。海德格尔尤其也这么认为："虽然实质上对我来说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但我还是很高兴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灵活机敏、善于和人打交道，并拥有一定的外在自信。"[272]

海德格尔在达沃斯期间住在富丽堂皇的酒店里，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住顶级大酒店。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度注重礼仪的环境中，只有完全理解了群体的行为准则，才能够真正有效打破禁忌。在此，海德格尔很快就学会了："我特别疲乏，但仍沉浸在山间的阳光和自由中，还有在长长的滑雪道上做出带有声响的跳跃动作。晚上，我们总是穿戴着滑雪装备回到酒店，混入那些身着晚礼服打扮雅致的人群中。"[273]

托妮·卡西尔表现得有些烦躁。尤其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享有了一个"特权"——当然她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特权——即在宴会大厅的座次里，她的座位被安排到马丁·海德格尔的身旁。"问题是，"她回忆道，"我成了这个明显是我敌人的邻居，应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14天，只要我还认定他是敌人。"因为托妮的丈夫恩斯特在达沃斯的第一周实际上一直生病卧床，所以托妮"每天两次和那位特别的怪人"坐在"一起，这个怪人打算使柯亨一辈子的功绩都屈服于他，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要毁掉恩斯特"。[274]

托妮·卡西尔对达沃斯的回忆是唯一真实可靠地提到那种可以感觉得到的"敌对关系"和明确表现出来的"毁灭意志"的材料（当然她是直到1948年流亡纽约时才写下的回忆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己的某些主观价值判断）。其他可以找到的证词，特别是那些活跃的课程参加者提供的证词，恰恰相反地都一致提到了当时极为友好和善意的开放气氛。不过，当时每个参加者也都知道，活动从一开始就笼罩着阴影，特别是活动通知说在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即将进行一场辩论。

慕尼黑前夜

仅在一个月前的1929年2月23日，在“德意志青年战斗联盟”举办的活动框架内，维也纳社会学家奥特马尔·施潘在慕尼黑大学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发表了一场以“当代文化危机”为主题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他表达了对如下事情的悲伤：“德意志民族在回忆自己的康德哲学时，必须回忆起来的是外来人士的康德哲学。”他在这里说的“外来人士”指的是赫尔曼·柯亨和恩斯特·卡西尔等哲学家……在施潘的话语里，“柯亨、卡西尔和其他人对康德哲学的解释……充满瑕疵”，因为“如此就不是在向德意志民族介绍真正的康德，那位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者的康德”。[275]

“施潘教授的演讲，”《法兰克福报》记者在1929年2月25日的活动报道中详述道，“在其核心上是一场论战……一场反对民主的论战……他语速仓促，明确暗示了普鲁士文化部长压制德国大学生、学者和艺术家的思想自由，以及他关于个人主义民主和阶级斗争的空话。”[276]

出于不止一个原因，施潘在慕尼黑的活动成了一桩丑闻。首先，“德意志青年战斗联盟”是由后来的纳粹首席意识形态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的组织，非常明确地代表和传播了纳粹党的政治目标。当下，在慕尼黑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学的指导方针就是不能举办带有政治动机的活动。在施潘登上讲台前，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在“喧闹的热烈欢迎”中，在他众多“佩戴有纳粹党十字标记的追随者”簇拥之下，走进大学教室，并且在演讲结束后还和施潘互相“握手和深深地鞠躬”。[277]

由此，施潘的演讲明显违反了大学举行活动的指导方针。施潘首先早在一战时就已明确位列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康德研究者之席，特别还有布鲁诺·鲍赫，他带着天然德意志和犹太传统路线对康德进行阐析，早于1916年就已表示尤其反对柯亨和马尔堡新康德主义。当时哲学圈中产生的动荡已很严重。此时，卡西尔有可能会从内部离开康德协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鲍赫倒不会立刻辞去协会主席的职位，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如今，在慕尼黑大学的容忍之下，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掌声之中，在距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活动开始仅四周之时——此活动的主导问题就是康德的“人是什么？”，具有煽动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氛围重新抬头了。在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的进展过程中，发表演讲的海德格尔将会介绍他如何从自己独具特色的形而上学视角对康德主要作品进行解读。

当时这样的场景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不管这对在场的人们来说是否合适。

放松你们自己！

因此，不仅是托妮·卡西尔一个人在和海德格尔共处时试图尽量缓和气氛：

>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念头，对待那只老狐狸需要智取，因为他这只老狐狸在我这儿是声名狼藉的。我开始天真地与他聊天，装作对他的哲学和他个人都丝毫不反感。我询问他关于我们共同的熟人的事情，首先问了他怎么看待柯亨这个人，我在发问时已经先告诉他我对柯亨理所当然的承认态度。他没问我，我就主动描述了恩斯特和柯亨的关系；我讲到了柯亨这位卓越的学者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可耻对待；我给他叙述，柏林的哲学系是如何一个人都没去给柯亨的棺木送行。我闲聊着，我敢肯定他对我的赞同只是表面上的。我甚至给他讲恩斯特生活里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我感到了一种乐趣，就好像看到一块像硬块小面包一样硬的面团软化了——人们吃这种硬块小面包时会把它浸泡到热牛奶里。当恩斯特从病床上起来时，海德格尔——他现在了解了很多关于恩斯特的私人情况——就很难把对恩斯特预先设定好的敌对态度坚持到底。当然，恩斯特为人亲切和蔼，他尊重海德格尔，所以他也不会轻易对海德格尔发动正面攻击。[278]

海德格尔也已受到一些担忧的烦扰，害怕整件事情可能会演变成“轰动性事件”，担心“我成为事件的中心，我表现出来的样子比我私下里的样子还要讨喜”。尤其是因为卡西尔表现出了决心，为了避免直接讨论康德，要把演讲首先对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反，海德格尔恰是出于担忧，决定要在他基础存在论的兴趣背景下只讨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远在实际争辩开始之前，战术演练就已经启动了。现在看来是海德格尔处于领先地位：将康德作为主题，海德格尔进入了卡西尔最熟悉的领地，他有可能反而会在这里最终赢得更多或者甚至所有。就算两人间并不是公开的敌对关系，当1929年3月26日上午10点俩人碰面时，气氛还是极度紧张。就如当时在场的雷蒙德·克里班斯基回忆的那样，两人碰面是为了在两个民族的哲学界后起之秀面前开展一场辩论，而这场辩论“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德国哲学的未来”。[279]

在雷雨般的雄辩中——达沃斯之辩

卡西尔率先发言，他很果决，想首先把爆炸性主题新康德主义清除出争辩范围。“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新康德主义到底是什么？……新康德主义是新近哲学的替罪羊，但我却找不到现存的新康德主义者。”[280]

这样，卡西尔就已经给辩论打下了一个印记。尤其是因为新康德主义还从来不是“一个作为教条的原理体系哲学种类，而是关系到某个提问的方向”。然后，卡西尔继续说道：“我必须承认，我在海德格尔身上找到了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这是我之前没能料到的。”作为争辩的序幕，这些话并不笨拙。首先，我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其次，如果说我是的话，那么海德格尔也算一个！

现在轮到海德格尔了，他开始点名：“柯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很明显，海德格尔并没有完成和解。另一方面，柯亨是卡西尔的博导，而李凯尔特是海德格尔的博导。事实上，两人受到的学术影响是完全一样的。而这种影响何在呢？海德格尔补充道，新康德主义的起源更多是一种哲学的困境，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1850年左右这种困境是：“如果说全体存在者都划给了科学，那么哲学还剩下什么呢？就只剩下对科学的知识，而不是对存在者的知识了。”此话击中了要害，并引出一个反击：哲学纯粹只是科学的女仆吗？卡西尔通过其“符号形式的哲学”想要达到的目的不正是：根据知识系统的内在结构认知知识系统？用认知论取代存在论？再进一步，在进攻模式上康德成了主要证人：“康德并不想要给出任何自然科学理论，而是想要说明形而上学的难题，更确切地说，存在论的难题。”简而言之，康德自己并不是新康德主义者，而是一个基础存在论者，就如我海德格尔一样。

现在，卡西尔明显处于防守状态了。离开柯亨的话题？在目前情况下绝不可能。那么，最好就用康德来还击海德格尔！突破口就是伦理学了。伦理学是康德的中心，而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毫无掩护。卡西尔：“当人们着手纵览康德工作的整体时，大量严重的问题涌现出来。其中一个问题是自由问题。这对于我来说总是真正的主要问题：自由是如何可能呢？康德说，这个问题无法被理解，我们理解的只是自由的不可理解性。”

道德：康德是形而上学者，但并不服务于存在论，而是服务于伦理

学！他所考虑的是行动着的有限的人类，并不是关系到存在。正是在伦理学方面卡西尔现在在辩论中向前迈了很大步子，在康德这里取得了一个突破，做出了一个进攻动作，而且是具有创造性的、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进攻："绝对命令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所设立的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人，而是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物。在这里，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过渡……道德性的东西本身超出了现象的世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这个点上实现了某种突破。"

很清楚，突破出有限性的范围到达无限性，从内在到超越。正是对此，海德格尔最终无话可说！并且，这指向了海德格尔整个"存在与时间"研究工作的真正问题、他整个此在分析和基础存在论的问题。卡西尔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海德格尔明确强调，我们的认知力是有限的，它是相对的和受约束的。随即便产生了这个问题：如此一种有限的存在物究竟如何获得认知、理性和真理呢？……这种有限的存在物如何规定那些本身不与有限性相关的对象呢？……"

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真正难题！是康德提出的真正问题，亦是卡西尔提出的真正问题。但是，这同样也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吗？卡西尔现在讲到了整体："海德格尔想要将这完全的客观性……放弃吗？他要退回到有限的存在物上吗？或者，如果不是的话，对于他来说，哪里是进入这个领域的突破口呢？"

好问题。真是命中要害。海德格尔现在被逼到了一个小角落里。他必须得借助康德来应对了，或者起码得借助他自己。伦理学，这实际上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擅长的，但是现在也必须得讲一讲伦理学了："那么，卡西尔想要表明，有限性在伦理著作中变得具有超越性。在绝对命令中有着某种超出有限存在物的东西。但恰正是命令这个概念本身表明了和有限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

真是如此！每个孩童都能理解：上帝不需要命令，只有有限的理智存在者需要命令。除此之外，上帝不需要存在论。海德格尔补充道，存在论据其本质是"有限性的标志"。这并不是个突破，恰恰相反。海德格尔开始讲康德了："走向某种更高的东西总是在走出有限存在，走向完善之物（天使）。"

1929年，达沃斯，现代最重要的两位德国哲学家在公开舞台上争论针对天使的绝对命令？情况就是如此。不过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在走向

完善之物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超越也还是保持处在创造性和有限性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康德的超越只是有限的，它往回屈服于有限性，保持被有限性所局限，是的，也正是因为有限性才可能实现超越！现在海德格尔占了上风：如果人们想要理解康德、形而上学，也就是理解哲学思考，那么提问的方向因此就得极端地颠倒过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人们如何从有限性进入到无限性，而应理解为，人们如何从存在者的超越中，以及对于我们人类先前的展开状态中偶然发现此在的有限性，而此在的有限性是所有一切的真正始源！这自然会直接导致此在存在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此在本身的内在结构是怎样的？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会场上每个人都听到了海德格尔对此的回答：此在的内在结构是极端有限的，而且在其可能性上由内而外受时间性的规定。这就是《存在与时间》的核心。

在卡西尔这里还什么都没能看到。海德格尔继续说道：“现在回答卡西尔关于普遍有效的永恒真理问题。当我说，真理是相对于此在而言的，这样……此在（……）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只有当此在存活之时，真理才能终究作为真理而存在并根本上具有某种意义。当此在不存在了，也就没有真理了，到那时终究仅剩虚无。而只有存在此在一类的东西的情况下，真理才能在此在本身中到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是，并不是单个命题的真理相对于某个人可能的思考内容而存在，而是概念、真理的理念本身据其本质与此在有限性产生关联，在此在有限性中找到了真理理念的真正始源。对于上帝来说不存在真理问题，就如同对于大象或者狗而言也谈不上什么真理。只有对于此在，才产生了关于真理的问题。形而上学，是从此在之中发展出来的！

对此，人们很难辩驳。那么现在如何解释人们认为的知识永恒性？海德格尔继续绞尽脑汁：“我提出反问：……我们究竟从何处了解到这种永恒性？……这种永恒性不就是在时间本身的内在超越基础上才得以成为可能的东西吗？”时间本身的内在超越？海德格尔想表达的是什么？很简单：时间，流动着，持续指向超越它自身的东西，此在的真正本质正体现在这点上面：“在时间的本质中[有着]一种内在超越，时间不仅能够使超越成为可能，而且它本身具有视域特性，我在期望和回忆行为中总是能够通观当前、未来和已在的视域，这时就……产生了一种时间规定，在其中，首先组建自身的是像实体的持存性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说来并不是太过于复杂，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或容器，而是一个过程，它是所有经验的基础。只是因为这个过程——根据其本质——否认了构成其自身的全部动力。此过程恒定地处于流动状态，那么人作为此在最终有了这个想法：存在着类似于恒久的持存性的东西，甚至于是永恒的东西。这样，永恒的实体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象，是来自于此在精神领域的一种错觉！事实上，只有时间过程本身是真实的。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东西，不是永恒之物，而是“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又“给出了一个东西”，给出了所有在其过程中存在着的、正形成着的和已经流逝了的东西。存在和时间。

顺便提一下，柏格森和普鲁斯特对时间持有相似看法。还有本雅明、胡塞尔，以及威廉·詹姆斯和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除此之外，持相似看法的还有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萨尔瓦多·达利、查理·卓别林……这个关于时间的想法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精神。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时间的孩子！（不然还能是什么呢？）同样，只有从此想法出发才能在极度的极端性中得出正确的形而上学结论。海德格尔此时正如鱼得水，关于康德的话他一句都不再说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要紧的是：“着眼于领会存在的可能性而强调指出此在的时间性，而且所有问题也都以时间性为方向。对死亡的分析有着这样的作用：在某种方向上突出此在极端的时间性……对畏的分析具有的唯一作用……就是准备追问：在此在本身的哪个形而上学意义的基础上，人类通常得以可能被置于类似于虚无的某种东西面前？……只有我领会了虚无或产生了畏惧，我才有可能领会存在……并且，只有统一领会了存在和虚无，才会展现出‘为什么’的始源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能够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人类必然会追问？”

形而上学中讲到的就是上述内容。存在和虚无两者的经验是联系在一起的。虚无的经验给了所有追问无底的根据，将人教育为真正的人，使其真正进入存在状态！存在的根基是虚无的经验，只有人类这个物种有此情况。这就是永恒追问的始源，最终仅在无根据的追问中存在干涉性，但从不是在人类获取的认知中。

卡西尔还是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那么就继续吧，一直继续往下辩论。现在在自由的事情上，海德格尔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反击：“卡西尔说：我们没有把握自由，而只把握着自由的不可把握性……但由此不能推断说，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不合理的问题，毋宁说，因为自由

并不是理论把握的对象，而是哲学思考的对象，自由无非只能意味着，它只有在恢复自由的活动中才能存在和可能存在。在人中唯一合适于自由的关联，是自由在人中的自我恢复。”

那么，自由是一个事实真理。据其本质，自由并不是和一个给定的永恒规则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当下最终无根据的决定相关联，和将自由本身当作恣意的态度有关！这还是康德吗？又是康德？原汁原味德式的形而上学者康德？作为真正康德主义者的康德？

有一位始终不具名的学生产生了同情，他将卡西尔带回到争辩的博弈中。这位学生的问题很简单，直接击中中心。

给卡西尔的问题：

人类走哪条路可以达到无限性？人类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分有无限性？

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具有通过畏而变得自由的任务？或者说，哲学的任务难道不恰是彻底把人类交给畏吗？

会场上的每个人包括卡西尔在内都感到，时候到了，卡西尔现在无论如何必须从防守位置中走出来。他一秒都没有犹豫，将心中所有全部表述出来。人类走哪条路可以达到无限性？“无非是通过形式的媒介。人将他的此在转变为形式，也就是说，人现在必然地将所有在人中经历的一切移置到某种客观形态中，在此客观形态中人将自身客观化，以至于自己虽然无法彻底从出发点的有限性中获得自由（因为这还总是和人自己的有限性相关），但是以人类从有限性中成长出来的方式，有限性就会引出某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便是固有的无限性。由此，形式的功能就是可以使人类达到无限性。”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形而上学核心是，将自己的经历表现为符号的形式，创造出一个独立自我的王国，此王国超越了自身有限性的界限，甚至是超越了有限性本身的界限。例如逻辑的王国、数学的王国……符号的形式系统是由作为文化物种的人类所创造出来，但系统的规则和规则有效性可能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身上。因此，“[人类]他只以这种形式享有其无限性：‘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281]。而精神王国并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王国：真正的精神王国恰恰是由他[人类]本身创造的精神世界。人类能够创造精神世

界，这就是人类无限性的印记。”

再一次，总是处于极端危急状态中的组合：康德——歌德、席勒、歌德——康德。这就够了吗？可这种组合的效果无论如何也都不是特别极端。在1929年，这甚至有些单调乏味。但不管怎样，这总是实体化的唯心主义，并且带有“原始德式的”特征（只要这个概念还享有某种意义）。这是真的。卡西尔相信是如此，并为此把头伸了出去。他就站在这里，不能够是别的样子了。

现在讲到了畏——还有哲学：卡西尔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他积攒了力量，直起身子来说道：“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人们只能用某种忏悔的方式来回答。哲学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人获得了充分自由，只因他能够变得这样自由。我认为，哲学通过使人获得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使人彻底从作为纯粹处身状态的畏之中解放出来。但我也认为，按照海德格尔前面所阐述的……自由其实只能在行进着的自由之路上被找到，这条自由之路本身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我希望，实际目标是在此意义上恢复自由：‘抛出你们那里的尘世之畏！’这是我一直声明信奉的唯心主义立场！”

吸了口气，有些忧虑，紧张的期待。海德格尔对此是什么反应呢？对于他来说，哲学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名副其实的恢复自由何在？突破又在哪里？每个人可能都清楚，长久以来这些问题没有给他带来或者保证任何东西。包括追问本身也没给他带来任何东西。而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某种终极意义上……是如此偶然，以至于此在生存的最高形式只能归结为此在介于生死之间存续阶段极少数和珍贵的瞬间，以至于人只能在非常短暂的眼下超越自己的所有可能性而生存，但通常人又活动于他的存在者中间”。

这些眼下的瞬间实际指的也正是进行哲学思考活动的时刻。因此，海德格尔继续阐述道：“关于人类本质的问题……具有一个唯一的意义和权利，即此问题被出自于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所发动。它返回到超出自己本身的人，返回存在者的整体中，以便在此借助它的全部自由，使得他的此在不之状态得以对他展开。这种不之状态并不是引发悲观主义和意气消沉的动因，而是能够促人领会到，真正的创造只发生在有阻力的地方，并且领会到哲学的任务是：超出某种人仅仅利用精神的劳作所获得的可疑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将人抛回到其命运的艰辛之中。”

论点如拳头一般打了出来。会场安静。人们如何把这些内容整合到一起？评价又倒向了哪里？

哲学家卡西尔要的是：人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文化物种，要将自己的畏抛出去，参与始源性狭隘和限制的符号交换，在符号交换过程中恢复你们自身的自由！

而哲学家海德格尔要的是：将你们本质中可疑的文化抛出去，你们是没有根据的被抛者，请你们每个人都要沉浸到真正令你们恢复自由的生存始源中去，也就是虚无和畏！

达沃斯，世纪之辩，一个年代的单子。从内部的紧张局势酝酿到爆裂出来，从1929年3月26日的这场辩论生出了关于同一永恒问题的两种极端不同答案：哲学思考的本质在哪里？或者同样也可以说成：人是什么？

就算是善良的慢性子卡西尔现在也看不到任何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了："我们站在某个立足点上，仅仅通过逻辑辩论是成效甚微的。"而海德格尔正是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在始源方面，要紧的也不是通过论据进行辩论，而是敢于纵身一跃的勇气本身！在这种勇气中，无非是不紧不慢的权衡和寻求达成共识成了阻碍："纯粹的居间调解绝不会带来任何生产性的成果。"海德格尔把目光从卡西尔身上移开，对在场的大学生们发表了结束语："这取决于，你们从我们的辩论出发，利用了这个点：不要遵循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们立场的多样性，你们并不是在忙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事情，而是你们走得如此之远并感觉到了，我们正走在实践形而上学核心问题的道路上"。

就算大学生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希望他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感受到海德格尔的这些话，感受到他，感受到离基——作为通向彻底本真之路上的必要第一步！是这样的吗？

是的，大学生们是感受到了。他们迈出了离基的第一步，深入到自身内部。不管怎样，大部分大学生是这样的。人们感到海德格尔像是胜利者，他就这么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会场大厅。

舔舐伤口

埃尔福丽德应该是第一个获知如下消息的人："我和卡西尔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辩论。辩论进展顺利，从内容上看来，这场辩论给大学生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82]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德格尔很容易就改变了他的判断，如他在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报告里说到的那样："卡西尔在讨论中表现得极其高雅，几乎就是太过于友好殷勤。这样，我得到的反抗太少，这就让我在表述问题时没法带上必要的尖锐。基本上，我们辩论的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公开讨论来说真的太难了。实质上还保留的是，单单通过例子就可以使讨论的形式和组织奏效。"[283]这再次显现了，引领辩论的是海德格尔的新论证形式。这是达沃斯活动的一个核心洞见。起码对于他来说是这样。

这场辩论实际上并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战役，连一次名副其实的战斗也都算不上，虽然手套是还戴着，还有头盔。《新苏黎世报》的记者以些许无聊的调调撰写报道，他也觉得失望："人们没看见两个世界彼此激烈碰撞，最多只是享受了一出表演。在这出表演里，人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友好的人和一个非常愤怒的人在各自讲着独白，但这个愤怒的人也在极其努力地友好待人。尽管如此，全体听众还是深受感动，彼此祝贺有幸到场。"[284]

对于大学生年轻的中坚力量来说，这场辩论总还是显得足够振奋人心。在达沃斯峰会的闭幕之夜，大学生再次观看了关于辩论的演出——一场以讽刺形式模仿辩论的演出。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头上发白，扮演卡西尔的角色。为了能够给卡西尔理想主义教育理念赋予戏剧表达并使其完全流传下来，列维纳斯在重演过程中一直让白灰从他裤兜里缓慢地飘落下来，同时一边结巴地喊道："洪堡、教化、教化、洪堡……"（如果说列维纳斯有一件令其终生都感到羞愧的事情，那么他在舞台上的这次表演当属其中之一了。）仅在两个月之后的1929年6月就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285]，这是以书的形式整理了他之前阐述过的论点。1932年，卡西尔以书面形式再次探讨了海德格尔这部关于康德的著作。除此之外，卡西尔就再没有关于辩论的任何其他信息流传下来。或许卡西尔就是简单觉得达沃斯辩论这个事情不够重要。或者说，数年之后，令人感到痛苦的是，此事太重要了。无论如何，卡西尔一生都对此保持缄默。在辩论之后，卡西尔从达沃斯出发，和一组大学生一

起启程去了一个名叫锡尔斯玛利亚的村庄，前去拜访当时的尼采居所。海德格尔没有一起去，他宁愿继续在被雪覆盖的山坡上飞速向下滑去。

春天的感觉

1929年3月的最后几天，当马丁·海德格尔在达沃斯高级大酒店发表他关于康德的第二个演讲时，当由于感冒而虚弱卧床的恩斯特·卡西尔第一次从病榻上起来时，瓦尔特·本雅明正顶着巨大压力寻找一个能教他希伯来语的老师。“每天一开始，我就给马格内斯博士写信。”这是本雅明在1929年3月23日给肖勒姆的承诺。肖勒姆已经在耶路撒冷等本雅明的消息等得不耐烦了。这年春天还是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过问题明显比以往要少得多。鉴于本雅明经受许多失败历练的事业发展道路，刚刚过去的12个月遥遥领先地成了他成年以来最成功的时光。1928年1月，《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和《单行道》都顺利成书出版，评论界对这两部著作都给予了深切关注，甚至大部分反响都是积极的。首先是《文学世界》和《法兰克福报》——这恰是本雅明一直从事的批评领域——发表了对他著作的赞歌。在《福斯日报》上，甚至在奥地利和瑞士，本雅明的著作也是好评如潮。连诸如赫尔曼·黑塞之类的大人物都会告诉罗沃尔特出版社，自己在读完《单行道》之后不由自主心生激动。位于波茨坦桥附近的一家柏林书店在它橱窗里摆满了本雅明的书，还有一个由尤拉·科恩制作的本雅明半身塑像。就算全国图书销售量在可以统计的范围内几乎没有超过一千本，但本雅明在一年之内还是跻身受到广泛认可的独具一格的作家之列。

“三十块钱歌剧”[286]

本雅明明显感受到了自己批评家角色的确定性。不论是由威利·哈斯主管的《文学世界》，还是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法兰克福报》文艺副刊，都将本雅明视为固定讨论对象。是的，只要人们更细致地观察，就会发现本雅明现在哪怕还不是文艺副刊团体的灵感核心，也算是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了。文艺副刊团体的成员们绝对有着在相关媒体上为彼此作品打广告的自由。克拉考尔给本雅明写评论，本雅明也给克拉考尔写评论，互写评论的还有布洛赫和本雅明……阿多诺——人们总还叫他“维森格兰德”——也属于这个圈子的固定成员。

本雅明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了类似于行业关系网之类的东西，这样的关系网为他保障了经济收入的稳定性。另外，他现在也开始给黑森广播电台写稿件。他如今不再只是绝望地投稿，而是时不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他人了；不必一再乞求他人给他写评论稿，而是别人主动给他写评论了。在这些日子里，他甚至感觉到已经足够稳住脚跟了，可以帮忙把那些忍饥挨饿的朋友们，比如把阿尔弗莱德·科恩（就是尤拉·科恩的兄弟）引荐给编辑部，并且同时要告诫朋友们，这种生存方式无疑特别艰难：“通过文学每个月只挣得300马克，这无法支撑人们等待多年，而且就连这个最低收入从来都无法得到保障”。[287]

本雅明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不过现在，好像所有一切终于都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罗沃尔特出版社打算将本雅明最优秀的评论集成一册出版。关于《亲合力》的随笔也要出版。克拉考尔很快就会成为柏林的一名通讯记者。阿多诺和布洛赫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柏林。而本雅明在柏林则进入了以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海伦娜·瓦伊格尔为核心的由极少人组成的高级圈子。

1928年秋天，随着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在柏林剧团首演，布莱希特阶级斗争的戏剧艺术终于取得了突破。剧作天才布莱希特当时31岁，德国最大的希望都落到了他身上，尤其是社会革命形式的最大希望。政治方面，在1928年的议会选举中左派力量得到了加强；相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得票率一度跌到了2.59%。此外，人们明显感觉到在共产主义阵营里——实质上是在革命临近的期望中——正发生着些什么。

最近这几个月，本雅明也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自己是社会运动的一份子。在他身上也激起了伟大的信念，创造性的魔鬼越发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被煽动起来。一开始，本雅明只是计划对“巴黎拱廊街”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研究并写出相关著作，而现在这部著作赢得了自己的独立生命；这种独立的生命形式主导了本雅明整个文学创作。“关于巴黎拱廊街的工作显露出越来越神秘和紧迫的样子。这工作就像一只小野兽，要是我白天没有带它到最偏远的水源处饮水，它就会在我的夜晚嚎叫。上帝知道，如果有一天我把这只小野兽放出来，它会闯出什么祸。”[288]1928年5月，本雅明已经做出了如上判断。一年之后，此事也没有任何改变。《巴黎拱廊街》写作工程在时间上几乎花了本雅明所有的功夫。他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进行了数量非常可观的调查工作。这段时间他的其他作品和有偿写作的东西都被置于《巴黎拱廊街》之后，最多也只能算原创性的副产品罢了。

1929年3月，本雅明埋头为《文学世界》写作两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一篇是讨论普鲁斯特作品全集的《普鲁斯特的形象》[289]，另一篇是以1919年以来当代法国超现实主义发展为主题的《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之最后一景》[290]。人们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本雅明的思想（以及他所涉及的作家的思想）是如何一贯地在大都市持续变快的生活经验里找到其出发点；而一个来自乡村地区的人是根本没有体验过也无法理解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的。

这年春天，上述这两篇文章都绽放成了本雅明的经典作品。这意味着，其中由本雅明选择为讨论主题的相关作者这次也进入了本雅明生活洞见和研究兴趣的光圈中，持续受到了关注。

本雅明1929年的研究兴趣是以哪些问题为导向的？是关于时间本质的问题，关于与时间本质相关的可能从有限性到永恒性的突破问题；是关于从市民颓废到隐蔽存在式的洞见时刻和决定时刻问题；关于自由的问题，关于在当时大城市真实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自我）认知的可能性问题，此问题也与自由息息相关。

多扇门

正是在达沃斯“国际大学课程”上讨论的系列主题渗透了法国文学媒介，也通过它传播开来。这些主题使一个德国批评家——比如本雅明——有可能产生特别的洞见，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保持着较远的文化距离。因为，当涉及普鲁斯特，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时，“德国观察者……并不是站在源头。这是德国观察者的机会，他站在了山谷中，有可能评估运动的能量。他作为德国人早就熟悉了知识分子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人文自由概念的危机。他知道在危机内部生发出了怎样猛烈的意志，从永恒讨论的阶段出发不惜任何代价做出决定；他肯定亲身经历过在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和革命阵线之间做二者择一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处于完全暴露在外、不受任何掩体保护的危险位置。对于他来说，如果他最表面地将此运动视为一个‘艺术的’、‘诗意的’运动，那也并不为过。”

本雅明在上段文字里首先进行了自我谴责，因为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初他对超现实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的看法。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阴影中，他将他们看成是一个迷失堕落年代——也就是他所处的年代——的艺术衰退现象。现在本雅明睁开了双眼。事实上，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圈子里这些文章讲的并不是文学，而是别的东西：宣言、标语、文档、恫吓、伪造。”超现实主义讲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而且是日常经验，这些经验向我们显露了，资本主义大都市主体的物质化和疏离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意义和无意义、真实和梦幻、醉态和清醒、醒着和睡着、艺术和吹嘘之间的界限简直无法再清晰地划定出来了。

换句话说：真正可以带来自由的、真正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现实主义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只能是超现实主义的！本雅明认为，只有先成功地通过最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日常迷醉状态，打开多扇通向“日常顿悟”[291]之门，才能达成超现实主义的内容。本雅明从1928年开始就尝试吸食大麻和其他毒品，而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大麻等毒品从其开宗先祖兰波开始就一直扮演着某种特定角色，可以帮助人们“预备性地训练”突然醒悟的能力。然而那种真正可以恢复人们自由的迷醉状态，还有那种通向“日常顿悟”并决定革命实践的道路无非在于，把错觉加速的大都市生活全情投入到吸毒经验中。本雅明以宣言式的笔触写道：“要赢得革命迷醉状态的力量，这是超现实主义在所有书本和研究中聚焦的主题……这

种力量使得隐藏在……事物中的‘声音’的强大力量爆发出来。您认为如何组织一种生活形式，使得它最终在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瞬间被最后最受欢迎的流行小调所决定？”[292]

屏息，穿过夜晚

本雅明抑制住了对于宣言式阐述来说必要的感叹号，暂时没有表露出来。就如他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也还不想达到提出此论点的程度：普鲁斯特在创作中的最终目的在于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但是当然对于本雅明来说，普鲁斯特的作品无非是以永恒追忆的形式在期待地等候“日常顿悟”的时刻：

> 他[普鲁斯特]如此狂热地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些无尽的追求努力是建立在什么东西的基础上？我们是否能够说，一切生命、作品和行为不过是存在中最普通、最无常、最多愁善感、最晦暗的时光毫不动摇地在人们眼前展露无余？……在普鲁斯特那里，我们也像客人一样跨过门槛。在我们头上悬挂着的招牌在风中摇曳；在门槛后，等待我们的是永恒与狂喜……不过这种永恒并不是柏拉图式或乌托邦式的，这种永恒充满了狂喜……普鲁斯特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时间，而是交错的时间。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时间流逝最真实、却是交错的形式。时间流逝从来不是不加伪装，而是内在地表现为回忆、外在地表现为老去。[293]

并且，正是因为普鲁斯特的宇宙持续地停留在最深记忆层和现实当下之间的门槛上，他的整个宇宙显现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梦境和现实、事实和杜撰、意识和无意识、现存和影响、已完成的伪装和最不受保护的可信之间不再能够有把握地进行准确区分，就算是最真实的体验时刻和获得自由都受到了怀疑。它们只是懒惰的作品，在创造的基础上追求着意义；而对意义的追求又与外在和内在符号相关。日与夜、醒着与梦着、存在与假象……这些东西彼此之间的界限变得含糊不清，人们抓不到这个界限。

煤气灯

如果从本雅明1929年3月这个形而上学的革命创作阶段引用一些文章节选，那么人们可以将其想象为直接在达沃斯辩论里听到的文章。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拼贴画技术把本雅明的文章节选一同编纂到达沃斯辩论的记录中。1929年春天，本雅明的文章开始作为他“拱廊街”著作的建筑基本原则显露出来。对于这个情况，人们看到，海德格尔将其此在解脱的信心放到了最自然的畏之中，而本雅明则是把信心交托给艺术天堂的狂喜；在本雅明那里，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工具的嘟嘟哒哒声取代了黑森林高山地区的风暴经历，没有目标的闲逛取代了从通向深谷的雪道上滑下，升入外界事物取代了回归内在，没得选择的散落取代了深思熟虑的集会，无根无权的国际无产阶级大众取代了扎根于故乡的人民……然而本雅明和海德格尔两人都渴望一种革命的回归，带上他们所是和所有的一切一起回归。只要冲出去，从现代的单行道上冲出去！回到通往错误方向的岔路口。在这努力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无条件避开哪些根源和传统呢？关于这个问题，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市民教化、所谓的自由基本秩序、道德原则、德国的精神—观念论；学院式哲学思考；康德、歌德、洪堡……

如果始源思想家海德格尔在1929年进行一次诊断式的回顾，那么他就会将哲学研究的起始本身视为一种总可能苏醒的神圣“地方”。这个地方位于此在内部的深处，通过时间性的本质获得了不受时间限制的保障。这样的选择并没有对本雅明变得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打开可能性。他的历史概念必须指明产生严重后果的始源，指明进入历史虚伪假象的真正入口本身，并且使其变得可以尽可能具体地被人们体验到。

1929年，本雅明再一次认为自己可以很准确地指出，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进入非现实时代精神的突破，而他所处年代的时代精神歪曲了所有。会在哪里？其实就是在巴黎——19世纪的世界之都。并且，不是以一个人或者一本书的形态，而是以一种钢铁楼房的新形式，即巴黎拱廊街。它作为正在来临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里奇迹般的小房子，永远在昏暗的天色中闪着人造的光。在拱廊街的橱窗里，商品、形式和象征这些原本完全不同类的世界被直接摆放到了一起，接受人们检验的目光，最终是希望能够被买走。拱廊街的空间状况既不是完全的内部空间，也不是街景的一部分，其目标是要与其他建筑

物之间形成基本区别，做成水平的门槛地带。半是洞穴，半是房子，半是走廊，半是房间。

拱廊街通过总是摆得满满的、总在更换新货的玻璃陈列柜，在有限的个体——这些个体没目标地在拱廊街里漫步闲逛——身上创造出了一种商品多到可以无限使用的假象。这种假象从内而外马上就穿透了对世界的感受，也麻木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如果未来总应一直有扇通向救赎的窗子，那便是可以穿透所有深度和锐度的拱廊街构造，并且是在此问题的意义上：拱廊街构造可能性的具体物质条件如今是什么？以前是什么？作为拱廊街项目的开端：

> 巴黎大部分拱廊街是在1822年之后的15年内诞生的。拱廊街诞生的首要条件是纺织贸易高度繁荣。时尚精品店、第一批商店、在房子内部建造的较大商品仓库都开始出现了。拱廊街是百货商店的鼻祖……是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在拱廊街的设计装潢中，艺术是为商人服务的。与拱廊街同时代的人们一直不知疲倦地惊叹于拱廊街的设计装潢。对于外乡人来说，拱廊街长久以来一直是吸引人之处。有本《巴黎导游画报》说道："这些拱廊街是工业奢侈产品的较新发明，由玻璃覆盖着，大理石铺就的走廊穿过房屋丛林，而房屋所有人在这些商业投机方面的想法达成了一致。走廊从顶上采光，在走廊两侧则排布着最为时尚高雅的商店，这样看上去，拱廊街就像是一座城市、一个缩小版的世界。"拱廊街是第一批使用煤气灯照明的场所。
>
> 拱廊街诞生的第二个条件是钢结构建筑开始形成。法兰西帝国认为钢结构建筑在古希腊意义上对更新建筑艺术做出了贡献。[294]

这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第一个结构草案的开头。关于支撑起这部作品的拼贴技术在此谈到许多，本雅明随意从一部出版的著作中引用了一处地方（这里即旅游手册），这便在开头处打上了具有决定作用的哲学标志。就算本雅明引用的这本巴黎旅游手册的作者并没有亲自去观察拱廊街的概貌，而且他们非常有可能并不是有意要这么描写，但在这些描写中还是反映出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在这里，形而上学就好似用杂志语言表现了出来，鬼使神差般地实现了一种永恒的长存。这就好像在柏拉图洞穴中墙上的影子游戏一样，这些商品游戏在拱廊街深深的走廊中采到了"来自上面的光"，并且是以人工之火的形式（"煤气灯光"）。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一样，这些没有窗户的拱廊街本身显现

为一个“缩小版的世界”。像康德的思路那样（当然还有马克思），是房屋所有者“投机倒把的意志”把穿透整个房屋丛林——就算只是看上去像是房屋——的突破集合到了一起。而房屋所有者如果再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他们在这种表面目的方面“达成了一致”。

这是一个位于文章单子中的文章单子，被设定的目标无非是难以探究的方式。在这种难以探究的方式中，时间本身使各种事物交错在一起，以便在一个明亮的瞬间将这些事物变成可视状态。这是本雅明看到的现实图像、写作图像和作为认知的回忆图像。

自我解构的性格

1929年春天，本雅明不管是作为思想家还是政论家都处在创作高峰期。不过这也不一定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他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此时间段不会恰处在形而上学真正的深度困境中。他的困境不止一个，这些困境多次彼此交错深入。肖勒姆1928年8月初收到本雅明从柏林寄来的信，肖勒姆或许是第一个在精神想象中清清楚楚了解到本雅明困境灾祸的出现和发展状况的人。本雅明在信中说道：“我即将去巴勒斯坦，包括考虑到了尊敬的校长阁下规定的教学任务，这已经是确定了的事情……现在就只剩一些细节事务需要处理。首先是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间，我可能要推迟到12月中旬才能到了。这主要取决于我能否推进拱廊街著作的写作工作，并在离开欧洲之前写完这部著作。其次，出发日期还取决于我秋天在柏林能否见到我的俄罗斯女朋友。这两件事情目前都还没有确定下来。”[295]

到1928年秋天，本雅明当然还没完成拱廊街的写作。此时，本书的写作才开始真正步入正轨。此外，直到1929年3月，本雅明在希伯来语学习方面都未有任何进展，他启程前往巴勒斯坦的日子也未确定。此时，本雅明的日程安排主要受到了阿西娅·拉希斯的影响。她自1928年9月起就在柏林安置下来，而且是以公派性质过来的，最好是说成“被派遣”过来的，派到苏维埃贸易代表处电影部驻柏林办事处。另外，组织还强调授权了阿西娅“无产阶级戏剧”小组成员的身份，“……需要和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取得联系”。[296]阿西娅的生活伴侣莱西也同样到了德国，不过他是第一次在慕尼黑开展他的职业。

当本雅明知晓阿西娅要来柏林的消息时，他已经得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希伯来大学校长马格内斯博士在没有得到卡西尔（或者某个在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第二份专家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就已经批准了希伯来大学提供给本雅明全日制学习一年希伯来语的费用，另外还有路费和在耶路撒冷的生活费。起初这笔钱应该取决于学习课程的情况，以逐月的形式发放。肖勒姆也支持这个做法。肖勒姆终究还是非常了解本雅明的生活习惯，而且起初他也是本雅明的担保人。最后，非常出乎本雅明和肖勒姆的意料，1928年10月——当时阿西娅刚刚到柏林三周后——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1928年10月18日

亲爱的格尔哈德：

我一收到马格内斯博士寄来的价值为3042马克的支票（70/100），就立刻满怀感激地向你证实这一情况。请代我向他转达诚挚的谢意。他过后还会直接收到我的信件。其余事宜咱们几天之后再说。

致以诚挚的问候

你的瓦尔特[297]

马格内斯事先没有和肖勒姆商议此事，甚至都没有告知他，就直接把全部奖学金——对于本雅明来说是一整年的收入——通过支票一次性寄给了本雅明。

两周以后，本雅明就在杜塞尔多夫街上给拉希斯和自己租了一套宽敞的住宅。两人在这套住宅里相处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本雅明就搬了出来。虽然他们三天两头就要反目争吵，但是在良好和相当慷慨大方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他们还是保持紧密联系。拉希斯继续待在这套住宅里，而本雅明则搬回了德尔布吕克街的父母家里，回到他现在又再次失业的夫人朵拉那里，回到他儿子和他那被中风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母亲身边。起码现在不用发愁钱的事情了。

这期间，是拉希斯帮助本雅明和布莱希特保持联系，而本雅明则给拉希斯打开了柏林精神生活和夜生活的眼界。拉希斯带着本雅明走近一个职业女革命家在文化领域的生活和工作，而本雅明则让拉希斯熟悉了他目前强有力的文化社交圈：皮斯卡托和克拉考尔、克列姆佩勒和列奥·斯特劳斯、布莱希特和阿多诺。人们聚会、聊天、讨论、计划着新项目，一起穿行于20世纪20年代真正的世界之都柏林那分裂的夜生活，很快莱西博士也加入了。

关于香肠

每晚都会有足够多的事情让人们去经历和赞叹。例如，一个叫做约瑟芬·贝克的名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出场了。“半夜之后来到巴黎广场边上的福尔默勒，是为了见到贝克。巴黎广场这里有个特别的社交圈子，没人知道到来的其他人是什么情况……这里能看到各种裸露程度的女士，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份是‘女朋友们’、妓女还是女士……留声机不停地播放怀旧歌曲，贝克没有跳舞，而是坐在长沙发上吃着东西，她吃了一根又一根瘦肉香肠（‘热狗’）。人们在期待利赫诺夫斯基公主的到来，还有马克斯·莱因哈特和哈尔登，但他们都没有出现。就这样直到夜里三点，我才和大家告别。”[298]恰在1928年10月末，埃尔文·皮斯卡托邀请大家去他那里参加一次聚会：“明亮好看的住宅，由格罗皮乌斯布置，风格‘实事求是’，不过很吸引人，人们在里面的感觉看上去很好。规模挺大的一组人，四十到五十人，男士和女士，一直到半夜人数还在增加。这个活动看样子是为了向俄国犹太导演格兰诺斯基致敬而举办的……我还认识了布莱希特。”[299]这些文字是本雅明写下的吗？不是。但若真是本雅明写出来的，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哈利·格拉夫·凯斯勒的日记节选，他总是活跃地出现在这些活动中。

爵士乐到处都流行起来了，现在还有了由六人合唱组合“红唇别恋”演唱的德语爵士乐。这几天，本雅明和维森格兰德对于爵士乐这种“原始森林和摩天大楼”（凯斯勒）之间的音乐中间产品的看法，总是无法达成持续一致。[300]而相反，涉及俄国电影艺术，那就充满了完全统一的声音：俄国电影艺术无疑是所有东西的尺度。

本雅明引荐拉希斯和克拉考尔取得了联系。这在党组织上层也是件好事儿。拉希斯很快在法兰克福就相关主题进行了讲话。不过她一开始是在柏林发表演讲，主题是关于当时的苏联戏剧：

> 我建议，在一个大型会场给失业者们再重复一次演讲。那是一个巨大的厅，坐满了人。失业者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在演讲中间有人干扰了我。在讲台的对面大厅入口处有人喊道：“红色莫斯科的鼓动宣传家，赶紧滚开！”管理会场秩序的人员赶紧朝这些闯入者——冲锋队队员——冲过去。然后双方之间演变成一场斗殴事件。

斗殴中，他们手上戴的指节连环铜套发出了劈啪声。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年轻人就好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朝我走过来。他们对我喊道：同志，别害怕，但你必须马上离开！贝歇尔抓住我的手臂，拉着我从台上离开。他带着我上台阶、下台阶，穿过一个院子、一条小巷，又是一个院子。我们最后到了一个街角，进到一家啤酒馆里。我们坐到一张桌前，贝歇尔点了香肠和啤酒。他觉得这种情况是常事。哪里有共产主义活动，哪里就马上出现冲锋队的身影。但是红色阵线会好好揍他们一顿的。[301]

这些场景看上去本身不像是本雅明的世界，首先也不是他的风格。但是“总体来说，”拉希斯对她的记忆直接补充道，“本雅明现在更加聚焦于实践，他更加脚踏实地了……这段时间他跟布莱希特的碰面也更为频繁。本雅明几乎每次都陪着我去工人大厅参加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活动……”

爱情带来了真正的奇迹和突破。无论如何，对于一些瞬间或者某些阶段是这样的。不用多说人们也知道，希伯来语本雅明可不是这么学的。另外，原本用来供本雅明学习希伯来语的那笔钱，在5月中旬就已经被挥霍掉一大部分了。

1929年5月22日，本雅明满怀自豪地告诉肖勒姆，现在他已经会写“第一批希伯来语斜体符号”了。自他收到奖学金支票到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本雅明现在是真的在上希伯来语课，也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亲自对马格内斯博士表示感谢。然而，希伯来语课只持续了短短两周时间。好不容易找到的日间上课的老师现在必须离开了，因为他的母亲得了重病。本雅明又能对此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母亲重病带来的难题。

本雅明再次觉得自己又被丢回德尔布吕克大街的家里一般。1929年6月6日，他写信给现在真心很生气的肖勒姆：“可惜，我一点儿都不想反驳你对我的指责。这些指责绝对有道理，在这件事情上我遭遇了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这在我身上来来回回总会发生。我秋天过来巴勒斯坦这个事情仅仅取决于我的物质状况，再无其他了。”[302]

尽管奖学金是持久的，但本雅明的物质状况又回到了棘手的常态中。本雅明这年春天只在一个方面战胜了他“病态的犹豫不决”。这年秋天，阿西娅就将被“派遣”回莫斯科，只有婚姻可能使她继续留在柏林。

本雅明是否有跟阿西娅进行协商或者只是通知了阿西娅，这不大清楚，但无论如何，本雅明在1929年春末就已经递交了和朵拉的离婚协议书。离婚理由是不利于婚姻的行为。

到了同年8月，本雅明就已最终搬出了德尔布吕克大街的宅子，这次他把所有东西都一起搬走了。他把藏书存放到木箱子里，暂时到他的好友兼笔译同事弗朗茨·亨塞尔那里落脚。现在正当秋季，如果按照本雅明之前作出的承诺，那他本应该在耶路撒冷已经待了起码八个月时间。现在是时候该给肖勒姆再写一封信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差不多一年以来，有个女性朋友，拉希斯女士[！]一直在德国待着。她马上就要返回莫斯科，但她前天再次——起码看上去是这样——患上了急性脑炎，昨天在她身体状况尚允许的情况下，我把她送到了法兰克福的火车上，治疗过她的熟人戈德斯坦已经在那里等她。我同样……很快就会过来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工作量非常大，只不过我不是忙于学习希伯来语……"[303]

神经科医生库尔特·戈德斯坦是恩斯特·卡西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这也不是特别重要了。本雅明现在有了别的忧虑，还是他的写作事宜。1929年秋天，他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来回奔波。在德国黑森州的疗养地柯尼施泰因，本雅明与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及其夫人格蕾特·卡普拉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阿西娅·拉希斯多次在一座度假房里聚会。在那里，本雅明给其他人朗读拱廊街著作已经写好的构思草稿。他们在柯尼施泰因进行对话的这些周末在今天看来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的诞生时刻。而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主导了德国精神生活长达近50年时间。

漫游者

身着法兰绒短裤，脚上是农夫穿的笨重鞋子，背上背着漫游者背包，这位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士马上就在参会人员中突显出来了。他有可能是个大学生，在诺丁汉追寻罗宾汉的足迹，而且并不知道这个酒店的房间只为发表演讲者预留。“恐怕这儿正在举行一次哲学大会”，牛津教授约翰·马博特试图用一句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对此，这位外地来的年轻男士答道：“这也正是我担心的。”[304]

直到最后一秒，维特根斯坦还在跟自己做思想斗争，无法决定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英国职业哲学家最重要的联合会“亚里士多德学会”的年会。他虽然之前给年会提交过了演讲主题（“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说明”），但实际上他并不会去做本主题的演讲。即便他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论文，这是他第一次为了会议写论文，但他在和弗兰克·拉姆齐彻夜聊过关于本主题的一些问题后，他觉得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清晰了。最好是自由地思考一下关于“数学中的无限性概念”，然后看看能出现什么新点子。此外，本次大会的其余参加者从一开始都没有听得懂《逻辑哲学论》作者维特根斯坦讲话的希望——这是他人在理解维特根斯坦时一如既往会出现的事儿。“我担忧的是，不管维特根斯坦说了什么，他们要么听不懂，要么产生一些无关紧要的混乱。”[305]

这是维特根斯坦重修于好的朋友伯特兰·罗素——现在是维特根斯坦的正式博导——在几天前以久经验证的语气写到的。另外，罗素还急切地恳请维特根斯坦到场出席会议。

不属于什么学派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7月14日的演讲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席学术会议，而他为本会写作的论文也是他在世时唯一一篇“科学出版物”。和海德格尔一样，维特根斯坦根本就没把这种学术会议的论文当回事儿。他同样跟思想或政治领域的宣言、自封的运动或学派关联甚少。在维也纳，人们在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的主笔下，以致敬莫里茨·石里克的名义起草一部名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的纪念文集。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维特根斯坦也会给这部纪念文集贡献自己的文章。魏斯曼小心翼翼地就此事询问维特根斯坦，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正因为石里克并不是什么寻常人，所以这是他应得的：人们提防着通过本是好意的自夸把石里克和以他为代表人物的维也纳学派变成笑话。当我说‘自夸’时，我想表达的是所有令自己感到满足的自我陶醉。‘对形而上学说不’！就好像这是什么新的东西一样。维也纳学派想要引领什么东西，就必须显示，而不是言说……作品必须要赞美大师。”[306]

显示，而不是言说。1919年维特根斯坦的杰作就讲到了这样的核心区别，他始终觉得这个区别的重要性无可辩驳。不过，他的《逻辑哲学论》其余大量的支柱内容在他返回剑桥仅仅六个月内就变得大有问题。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实质上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也非其他人可以办到。

内部难题

有一个观点特别对于《逻辑哲学论》来说曾经具有支撑作用：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就是实在的图象。而维特根斯坦现在觉得这个观点越来越有问题。所有有意义的命题都毫无例外地描摹了一种可能的世界状态？那例如像这样一个命题“自然数的序列是无穷的”是什么情况？这明显是有意义的非日常真理。可是，是否有一种可以想象的世界状态真的展示了这个命题中的真理呢？是的，如此一种无限性状态对于有限的物种来说，是普遍可以做出具体想象的吗？而且，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语境下是什么意思？自然数存在无限长的序列和例如存在一根无限长的绳索是同样可以想象得来的情况吗？或者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可以想象的”？还是说，这是“无限的”另外一种意义？这些严肃的问题使得维特根斯坦在到达剑桥的前几个月几乎无法入眠。另一个东西也没少折磨他，那就是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在应用类似于“无限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这类说法时把握其中的区别呢？在有意义地应用概念的视角上，所有一切都与此区别相关。在这些命题可能的基础上揭示唯一和统一的逻辑主谓形式，真的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握此区别吗？不是的，还不是这么简单。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夏天最后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弄清楚这些问题了。在这个阶段，他背离了最后的唯一信仰，这个信仰可能真正承载了《逻辑哲学论》的世界图像：逻辑语言是作为我们生活形式基础的第一语言。

回到日常

维特根斯坦思想方面的这个核心急转弯是他在1929年刚回剑桥那几个月的实质事件，他马上就把这个思想转变也告知了石里克和魏斯曼。对于这二人来说，这并非无关紧要的新事件。他们作为如今正式存在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实质上比维特根思斯坦更为持续地将哲学的希望放到了这对相互影响上：逻辑基本语言和由实验控制的经验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对相互影响创造了所有有意义的研究。不过，维特根斯坦在半路上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也让石里克和魏斯曼毫无误解地了解到他的走向：

> 我以前相信存在口头语言，我们所有人可以通过口语进行惯常表达；另外还存在第一语言，它可以表达出我们真正知道的东西，也就是现象……我现在想要详尽解释，为什么我不再认同上述观点了。我认为，我们实质上只有一种语言，就是惯常意义上的语言。我们不需要去发明一门新语言或构建一个符号系统，而是说，口语就已经是这门惯常语言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口语从不清楚性中解放出来，而这些不清楚性就位于口语本身之中。只要人们能够明晰地知道我们的语言象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语言就已经完全处于正常秩序中了。除了日常语言，其余的语言也是有价值的……例如想要展示清楚推理关系，那么一个人造的符号体系就非常有用……可人们一旦真的开始去观察诸基本事态，那么就会看到，和我们真正的语言相比较，这个符号体系非常劣势。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讨论一个主谓形式。事实上，不是只有一个主谓形式，而是有非常多的主谓形式。[307]

就算是石里克本人也明显对上述方向转变感到讶异。他很直接地问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与作为根基的纯粹符号形式告别了，这难道不是直接掉回到那些极端充满矛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这些基本问题已经使得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劳累过度。

通过怎样的基础可以把握进入无限性和永恒性的突破呢？通过经验或者形式、决定或者规则？在这个突破的过程中，人类语言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且真的只涉及一门语言吗？如何去描写立于所有意义根基之处的经验结构？用什么方法描写，物理实验的、现象学多变的、还是日

常的方法？要明确区分存在和假象、意义和无意义，有哪些标准？时间在此又扮演什么角色？这里的时间在物理上是可以测量的吗？是能够具体体验到的吗？抑或说时间是靠回忆的方式去追赶的东西？1929年，维特根斯坦就如同进入创造力井喷的迷醉期一般，在好几本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围绕的主题正是在达沃斯讨论到的那些问题。这些想法同样主导了维特根斯坦和他在思维方面的“拳击训练搭档”拉姆齐和摩尔、石里克和魏斯曼之间的对话。这些朋友们在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中展现出了极大活力，但也被每天变化产生的新论点烦扰着，并由此感受到在思考方面的过重负担。

剑桥的那不勒斯

回到剑桥的上帝维特根斯坦首先通过参加剑桥使徒社，还有以弗吉尼亚和莱纳德·伍尔夫夫妇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活动，制造出了深深的社交疏离感。当然，他在1912年时就可能已经有些“特别”了。不过，1929年回到剑桥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当时的环境中，最终是一个固执己见毫不妥协、主导话语权的人，或是一个坏脾气的“不高兴”。尤其是和女性对话伙伴的交往就算还没成为痛苦，也给他带来了明显的问题。当维特根斯坦挨着女士坐在桌前时，他显露出了社交方面的笨拙感，会讲无聊的笑话。并不是那么好笑。

虽然多次在凯恩斯家里聚会，但维特根斯坦从没跟弗吉尼亚·伍尔夫交谈过。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件可惜的事情。不过，起码在共产主义和具体社会现实这些事情上，有一位新朋友进入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给他带来了灵感。这位新朋友就是来自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身边亲密的经济界权威人士，斯拉法必须于1928年逃亡离开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通过凯恩斯的支持，斯拉法在剑桥找到了一处新的科学家园。斯拉法对争辩的喜爱和他的好奇心在这个阶段富有成果地挑战了维特根斯坦。当维特根斯坦在谈话中再次固执地坚持认为，一个富有含义的命题和将此命题描绘为世界状态的东西，这二者肯定有着相同的逻辑形式。斯拉法对此的反应是一个来自他家乡的姿势——他的手指在下巴摩挲着，问道：“那这里说到的逻辑形式是什么？”[308]

在哲学影响方面，斯拉法就如同是那不勒斯的维特根斯坦与布莱希特的合体。斯拉法通过语言表达的基础将其思想接地，把思想引到更靠近具体上下文的地方，为思想打开了人类符号处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受到了多重限制，不过仍是多角的。维特根斯坦在第二部主要著作《哲学研究》的前言中明确强调了对斯拉法的感谢。“本书中那些最具成果的观点”乃是得益于这种刺激：斯拉法先生多年来一直不断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进行批评。

为了某个目的而回忆

对于人类来说只存在一种真正的第一符号系统，也就是日常的自然语言。从这个认识出发，《哲学研究》的突破点在于进行澄清调查的意志：澄清调查内在多样性、各自的上下文关联性和日常自然语言。因为，至少从哲学角度来看，万物通过日常自然语言可以达到井井有条的最佳状态，不会产生疑问。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能够尽可能综观地看清自然语言进行意指象征的所有方式。

根据上述视角，存在像真正的哲学难题那样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无非是一种混乱的结果。如维特根斯坦也会说：“通过语言来蛊惑我们的理智。”[309]因此，澄清或者治疗的哲学过程必须接受的形式是：持续耐心地整理、阐明和判断出现的混乱。这种哲学过程的主要方法在于，在回忆中唤醒自己，想想人们是在哪些上下文中真正有意义地使用了哪些语词。哲学思考是[310]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真正角色和拥有的意义，而这种清楚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获得自由。这些语词的真实含义只能被发现于或者自己显现于具体的应用中，也就是能够确保意义表达的应用中：“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311]

语词之城

维特根斯坦的新写作计划也渗透了其哲学思考的形式。他不再享受将自己的思想放到逻辑哲学论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僵化呆板、具有等级结构、笨重、简要。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适应了思维日记流派，或者像是一个对细节感兴趣的游手好闲者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所记录下的东西。1929年期间，维特根斯坦走上了这条新路。并且，他持续沿着这条路前进，在1945年写成了他的《哲学研究》。如他自己在前言部分说到的，这是一部论述的合集，“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风景速写”。旅途图像和思维图像，这些图像产生于穿过人类语言多样性的探索之路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维特根斯坦就像本着本雅明闲逛的精神继续阐述道，“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画出新的图画……以使它们能够为观察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312]

因为最终如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述的那样，有个哲学难题类似于这样的感受：“我迷路了，我再也找不着北。”因此他把语言本身和一座布满狭小巷子的地形复杂的城市进行对比，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人们太容易（或者甚至太喜欢）迷路了。所以，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有个任务便是描绘出一张这座城市的地图。这样，辨不清方向的人（维特根斯坦本身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况）就会弄明白，他实际上处于什么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可以走哪些路径，最终能够尽可能确信和具有方向感地在这座城市里行走。道路应该赞美大师！剩下的就是些吹嘘宣传了，或者是命运。

为了能够获得与城市实在相应的图像，人们当然必须为了自己非常彻底细致地对城市进行调查，而且是从自己在城中所处位置出发进行调查。没有人能够先验地在头脑中形成地图。另外，这种先验形成的地图也没什么用，因为这座（语词的）城市本身最终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中。生活在城中、并与这座城市一起活着的人们，在城中走动并发挥着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语词之城便处在恒定的运动和变化中。城中总会出现新的拱廊街、单行道和死胡同，当然人们可能会到很迟或是太迟的时候，才能看清它们是拱廊街、单行道和死胡同。从笛卡尔开始的现代哲学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是一种重要改建措施的有力实例，当然对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来说亦是如此。当时这个改建措施从

内而外决定了整个“城市景观”，并让城市景观闪耀着人造的光芒，像汽车和电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城市中做到的那样。无论如何，进步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的。

撞向四壁

维特根斯坦认为，进步——就是这个主题词，比其他任何词都更为严重地蒙蔽和误导我们的文化。所以，进步也正是在哲学中不能存在，也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不过由此看来，哲学应该也有自己真正的问题，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独到办法。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恰是既没有问题，也没有解决办法。哲学有语言，同时也有着语言的混乱。哲学还总有着这样的可能性：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以回忆的方式从语言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由。这就是所有。对于我们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隐藏起来的。这便是维特根斯坦思想在1929年夏天走上的澄明新路。在这条新道路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仍体现出和《逻辑哲学论》时期一样的绝对严谨和诗意精准。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理解随着回到剑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那么他对于哲学思考和界限的看法则与《逻辑哲学论》时期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哲学问题。实质上重要的认识是无法说出来的，也是无法公布和命令的，而必须在独立的实施过程中显示和被显示出来。伦理学、价值、宗教和真正生活意义的整个领域是一个假象领域，它无法得到证实，所以与此相关的论点都无意义。恰是因此，人们必须对其保持缄默，这也是因为相关论点涉及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内容。

1929年11月，维特根斯坦带着上述这些思考直接面对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应剑桥“异教徒协会”——就像这个名称已经显示的那样，这是剑桥大学除了使徒社之外的第二大精英组织——的邀请，维特根斯坦在协会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关于伦理学的通俗哲学演讲。他是这么对在场的年轻听众说的：

> 我急迫地想要冲撞语言的界限，而我认为这是所有那些试图写作或者谈论关于伦理学或宗教的人们身上都具有的一种倾向。向我们所在牢笼的四壁勇往直前地冲撞去，这是完全和绝对没有希望的。只要伦理学还是由愿望而产生，是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是要表达绝对的善和绝对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伦理学就不可能是一门科学。通过伦理学表达出来的内容，我们的知识无论如何都不会增加。不过，伦理学的内容是人类意识中某种倾向的证明，我非常尊

敬并高度重视它，绝对不会将它变成可笑的东西……[313]

最容易推动这种倾向——冲撞语言界限的倾向——的经验是哪些，他非常熟悉，这些经验是他人生的财富：

> 我想要描述这个经历是为了尽量启发你们，唤起你们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回忆，这样咱们就有了研究的共同基础。我认为，这个经历最容易通过话语进行描述，那就是我惊叹于这个世界的存在。然后我就倾向于使用下面这种方式进行表达："多么神奇，终究是存在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多么非同寻常，这个世界存在着"。在此我要马上接着提及另一经历，我同样对它很熟悉，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也了解这个经历。人们可以把这个经历称之为绝对安全感的经历。我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意识状态，人们在此意识状态中倾向于说："我身处安全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到我。"[314]

在最好的时光，维特根斯坦可能不仅自己感受到此在令人惊叹的高光时刻的状态，这种感受令他觉得获得了自由，而且他也要将这种作为主导形式的状态以思考的方式传达给他人。不管这在当天晚上是怎么发生的，都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作为哲学教师传道授业的真正起点。

结语

马丁·海德格尔

1929年7月24日，马丁·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教授席位的继任者，在获得教席之后进行的首次讲座课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在这次讲座课中，他将人类称为是“虚无的占位者”。在这年和第二年的新旧年交替之际，他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写信道：“必须去上课的强制性、歪曲的科学性以及与此配套的一切，都从我的肩上放下了。当然我现在责任更大了，可是伴随着那些我觉得必须去做的事情，我时常感到非常孤单。”

三年半后的1933年5月1日，刚刚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发表了一场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讲。如今他是纳粹党成员，在一篇报纸文章——这篇文章还附带了关于他被任命为校长的消息——中对德国大学生起誓：“你们存在的规律并不是定理和‘理念’。元首本人才是现在和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则，并且只能是他。”[315]

恩斯特·卡西尔

1929年7月6日，恩斯特·卡西尔以绝对票数当选为汉堡大学校长。1929年11月7日，他发表的就职演说题为《哲学真理概念的形式和形式演变》。演说遭到了民族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干扰。阿比·瓦尔堡没能经历这场就职典礼，他于1929年10月26日意外离世了。

基于希特勒颁布的《国家文职人员法》，卡西尔实际上必须被迫完成教学方面的某些任务。这样，恩斯特·卡西尔携夫人于1933年5月2日离开汉堡，前往瑞士。卡西尔夫妇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德国。卡西尔当时最近的一部著作是他在流亡美国作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时期完成的，这部著作名叫《国家的神话》。

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被离婚流程在经济方面可以预见的“无情”结果折磨得身心交瘁，于1929年10月中旬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10月24日，他在阿西娅身边经历了纽约股市的崩盘。1929年至1930年跨年之际，他一

个人在巴黎一家宾馆中孤独地度过。他再也无法拥有一个固定居所，再也完成不了拱廊街著作，再也见不到阿西娅·拉希斯，再也不会上希伯来语课了。他主要在巴黎度过了未来的十年。随着希特勒开始掌权，本雅明作品出版的可能性越发受到限制。

瓦尔特·本雅明面临着被纳粹驱逐出境的境况，逃亡来到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布港的一家宾馆里，这里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百米远。1940年9月26日至27日夜里，本雅明服用了大量吗啡自杀。他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装有一块表、一个烟斗、两件衬衫、一张X光照片以及一部手稿，手稿标题是《论历史的概念》。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度过了1929年圣诞节，后来几年的圣诞节他也是这么度过的，直到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1930年1月，他接受了剑桥大学的教职。在他即将动身去休假时，有个剑桥的同事问他，在剑桥大学讲座课目录中应该给他的课程写上什么名字。[316]维特根斯坦思考了很久。

最终，他的回答是："《哲学》。不然还能是什么呢？"

著作目录[317]

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文集》，7卷，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和赫尔曼·施韦彭霍伊泽（Hermann Schweppenhäuser）编，Suhrkamp, Frankfurt a.M.，1974年—1989年。

《本雅明全集》第1卷第1本包含《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论歌德的亲合力》、《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2本包含《论历史的概念》等。

《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包含《文学和美学随笔（待续）》、《美学残篇》、《演讲和报告》、《百科全书条目》、《文化政治篇章》。

《本雅明文集》第3卷《批评和评论》。

《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包含《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恶之花〉其余部分》、《单行道》、《德意志人》、《柏林童年》、《思维图像》、《讽刺、论战和短评》、《报道》。

《本雅明文集》第5卷《拱廊街计划》。

《本雅明书信集》：

第2卷（1919—1924），克里斯托夫·格德（Christoph Gödde）和亨利·洛尼茨（Henri Lonitz）编，Frankfurt a.M.，1996年。

第3卷（1925—1930），克里斯托夫·格德（Christoph Gödde）和亨利·洛尼茨（Henri Lonitz）编，Frankfurt a.M.，1997年。

恩斯特·卡西尔

《卡西尔文集》，比尔吉特·瑞克（Birgit Recki）编，Meiner, Hamburg，1998年—2009年。

《卡西尔文集》第6卷《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赖诺尔德·施米克尔（Reinold Schmucker）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0年。

《卡西尔文集》第7卷《自由和形式》，赖诺尔德·施米克尔（Reinold Schmucker）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1年。

《卡西尔文集》第10卷《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识论观察》，赖诺尔德·施米克尔（Reinold Schmucker）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1年。

《卡西尔文集》第11卷《符号形式的哲学》第1部分《语言》，克劳斯·罗森克兰茨（Claus Rosenkranz）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2年。

《卡西尔文集》第12卷《符号形式的哲学》第2部分《神话思维》，克劳斯·罗森克兰茨（Claus Rosenkranz）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2年。

《卡西尔文集》第13卷《符号形式的哲学》第3部分《现象学和认识》，朱丽叶·克雷门斯（Julia Clemens）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2年。

《卡西尔文集》第14卷《文艺复兴中的个人与宇宙——英国的柏拉图文艺复兴和剑桥学派》，弗里德里克·普拉噶（Friederike Plaga）和克劳斯·罗森克兰茨（Claus Rosenkranz）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2年。

《卡西尔文集》第16卷《论文和短文1922—1926》，朱丽叶·克雷门斯（Julia Clemens）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3年。

《卡西尔文集》第17卷《论文和短文1927—1931》，托比亚斯·波尔本（Tobias Berben）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4年。

《卡西尔文集》第18卷《论文和短文1932—1935》，拉尔夫·贝克（Ralf Becker）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4年。

《卡西尔文集》第23卷《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莫琳·卢凯（Maureen Lukay）编辑和注释，Hamburg，2006年。

《符号概念的本质和影响》，Darmstadt，1956年。

以及卡西尔相关遗作。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全集》，102卷，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海德格尔全集》第1卷《早期作品1912—1916》。

《海德格尔全集》第2卷《存在与时间》（初版为1927年，全集收录的是第17版，Max Niemeyer Verlag, Tubingen，1993年）。

《海德格尔全集》第3卷《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2010年，本书也包含《恩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辩论》（第274—296页）。

《海德格尔全集》第19卷《柏拉图的〈智者〉》（1924—1925年冬季学期）。

《海德格尔全集》第20卷《时间概念史导论》绪论（1925年夏季学期）。

《存在与时间》，Max Niemeyer Verlag, Tubingen，1993年。

《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1928年夏季学期）。

《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1929—1930年冬季学期）。

《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关于哲学的规定》。其中包含1.《哲学的理念和世界观问题》（1919年战时学期）；2.《现象学和超越价值哲学》（1919年夏季学期）；3.《附录：关于大学和学术学业的本质》。

《海德格尔全集》第62卷《关于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和逻辑学的现象学分析选论》（1922年夏季学期），附录《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分析》（诠释情境的显现）。

《海德格尔全集》第94卷《思考录II至VI》（黑色笔记本1931—1938）。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Suhrkamp, Frankfurt a.M.。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包含《逻辑哲学论》、《1914—1916年日记》、《哲学研究》，1984年。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2卷《哲学评论》，拉什·里斯（Rush Rhees）编，1984年。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3卷《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话由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记录，1984年。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4卷《哲学语法》，1984年。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5卷《蓝皮书——哲学观察》，1984年。

《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以及其他》，约阿希姆·舒尔特（Joachim Schulte）编，1989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小学生词典》，öbv, Wien，1977年。

参考文献摘选[318]

德语文献[319]

A.格鲁嫩贝格（A.Grunenberg），2016年：《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

A.萨尼茨（A.Sarnitz），2011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建筑——理念的重构》。

A.舒伯巴赫（A.Schubbach），2016年：《符号的形成——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开端》。

A.雅尼克（A.Janik）和S.托尔明（S.Toulmin），1984年：《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B.F.麦克奎尼斯（B.F.McGuinness）和H.赖特（H.Wright）编，1980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通信集》。

C.马拉齐亚（C.Marazia）和D.斯蒂米利（D.Stimilli）编，2007年：《路德维希·宾斯旺格和阿比·瓦尔堡——无尽的疗愈——阿比·瓦尔堡的疾病史》。

D.克吉（D.Kaegi）和E.鲁道夫（E.Rudolph）编，2002年：《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达沃斯辩论70年》。

H.U.贡布雷希特（H.U.Gumbrecht），2001年：《1926年——处在时代边缘的一年》。

H.奥特（H.Ott），1988年：《马丁·海德格尔传》。

H.布雷登坎普（H.Bredekamp）和C.韦德波尔（C.Wedepohl），2015年：《瓦尔堡、卡西尔和爱因斯坦对话录》。

H.布鲁门伯格（H.Blumenberg），1979年：《目睹沉船》。

J.M.克罗伊斯（J.M.Krois），2002年：《为什么没有举行达沃斯辩

论？》。载D.克吉和E.鲁道夫编，2002年：《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达沃斯辩论70年》。

J.W.施托尔克（J.W.Storck）编，1990年：《马丁·海德格尔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通信集1918—1969》。

J.斯贝特（J.Später），2016年：《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传》。

K.温舍（K.Wunsche），1985年：《乡村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

K.西格蒙德（K.Sigmund），2015年：《他们自称为维也纳学派——没落边缘的精准思考》。

L.耶格尔（L.Jäger），2017年：《瓦尔特·本雅明——一种未完结的生活》。

M.米特尔迈尔（M.Mittelmeier），2013年：《阿多诺在那不勒斯——渴望的风景如何化为哲学》。

O.施韦默尔（O.Schwemmer），1997年：《恩斯特·卡西尔——欧洲现代哲学家》。

P.布洛姆（P.Blom），2014年：《撕裂的年代1918—1928》。

P.莱奥（P.Leo），2013年：《通向本质的意志——德国的世界观文化、性格逻辑思考和仇视犹太人1890—1940》。

P.威特科普（P.Witkop）编，1922年：《德意志生活》。

S.鲍辛格（S.Bauschinger），2015年：《卡西尔家族传——企业家、艺术品商人和哲学家》。

T.N.特梅尔（T.N.Tömmel），2013年：《意志与热情——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爱之概念》。

W.W.巴特利（W.W.Bartley），1983年：《维特根斯坦——一种生活》。

W.比梅尔（W.Biemel）和H.扎纳（H.Saner）（编），1990年：《马丁·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斯通信集1920—1963年》。

阿比·莫里茨·瓦尔堡（Aby Moritz Warburg），1995年：《蛇的礼俗》。

阿西娅·拉希斯（Asja Lacis），1976年：《职业革命者》。

奥利弗·卢伯里希（Oliver Lubrich），2016年：《本雅明在伯尔尼》。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2017年（1927年首版）：《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格尔绍·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975年：《瓦尔特·本雅明——一段友谊的历史》。

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Gertrud Heidegger），2005年：《海德格尔与妻书》。

哈利·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1961年：《1918—1937年日记》。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98年：《1925—1927年的通信》，乌尔苏拉·卢德茨（Ursula Ludz）编。

汉斯·普特尼斯（Hans Puttnies）和加里·史密斯（Gary Smith）编，1991年：《本雅明现象》。

赫尔梅娜·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2015年：《家族回忆》，伊尔泽·索玛维拉（Ilse Somavilla）编。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965年：《第一哲学沉思录——附全部非议和回应》。

鲁道夫·科特（Rudolf Koder）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2000年：《维特根斯坦与音乐》。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969年：《写给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信》。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udiger Safranski），2001年：《来自德国

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

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2004年：《分道而行：卡尔纳普、海德格尔和卡西尔》。

君特·内斯克（Gunther Neske），1977年：《回忆海德格尔》。

托马斯·梅尔（Thomas Meyer），2006年：《恩斯特·卡西尔》。

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2003年：《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

亚历山大·沃（Alexander Waugh），2010年：《维特根斯坦之家》。

伊尔泽·索玛维拉（Ilse Somavilla）编，2006年：《维特根斯坦和恩格尔曼：通信、碰撞和回忆》。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91年：《对话伦理学》。

英语文献

M.菲茨杰拉德（M.Fitzgerald），2000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否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载《欧洲青少年儿童精神病学》2000年3月期，第61—65页。

P.席尔普（P.Schilpp）编，1963年：《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哲学》。

格奥尔格·亨利克·冯·赖特（George Henrik von Wright），1975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写给C.K.奥格登的信》。

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和W.詹宁斯（W.Jennings），2014年：《瓦尔特·本雅明评传》。

基思·黑尔（Keith Hale），1998年：《朋友与使徒——鲁珀特·布鲁克与詹姆斯·斯特拉奇通信集1905—1914》。

瑞·蒙克（Ray Monk），1991年：《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网址

1.http：//www.warburg-haus.de/kulturwissenschaftliche-bibliothek-warburg/

2.P.齐博霍夫，1995年：http：//www.zeit.de/1995/17/Das_Labor_des_Seelen-archivars

后记

没有人能够独自写出一本书。在此，我要表达特别的感谢：

感谢米歇尔·盖博和汤姆·克劳斯哈尔在本书写作全程中提供帮助。感谢克里斯多夫·塞尔泽、叶雷娜·弗拉姆、多罗特拉·索尔和克里斯蒂娜·布劳恩为本书进行校审和修改。

感谢米歇尔·汉普和弗里茨·布赖特豪普特与我进行谈话，并给我提示。

感谢法布里斯·格尔舍以及《哲学杂志》给我的自由空间和宽容。

感谢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哲学和文学”工作小组的组织者和成员，让我可以将一部分手稿提交给他们进行讨论。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德语系在2017年春天接收我作为受马克斯·卡德基金资助的访问教授，并为我写作本书稿提供了能够想象的最好条件。谢谢！我还要感谢参与到该系研究生课程“对思考的探索”的学生向我提问、予我宽容。

我写作书中四位“魔术师”时，受到了一些伟大传记家的启发，他们是：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瑞·蒙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托马斯·梅尔（《恩斯特·卡西尔》）、霍华德·艾兰和米歇尔·W.詹宁斯（《瓦尔特·本雅明评传》）。他们的作品陪伴了我整个写作过程，持续给我带来灵感。

最后我还要谢谢皮娅、文拉和凯萨，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忍耐与承担。

[1]本处关于博士论文答辩会情况的描写依据瑞·蒙克于1991年出版的著作第255页及其后几页的内容。（本书中凡未标明“译注。”的注释，皆为作者原注。）

[2]所谓剑桥使徒社，是一个非官方的超级精英学生社团，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最优秀的12名成员组成，这些人是精英中的精英，既有在校本科生，也有已经毕业的前剑桥学生。不过使徒社也因为其成员存在同性恋的暧昧关系而饱受非议。——译注。

[3]基思·黑尔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了对使徒社氛围的良好印象。

[4]B.麦克奎尼斯和H.赖特编，1980年，《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76页。

[5]转引自瑞·蒙克于1991年出版的著作第271页。

[6]《逻辑哲学论》中原话的中文译文，本书采用的都是韩林合的译文（维特根斯坦著，韩林合译，2013年，《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译注。

[7]转引自瑞·蒙克于1991年出版的著作第272页，由本书作者从英语翻译成德语。

[8]想要了解达沃斯辩论及其所处语境的诸多相关细节，可以参阅D.克吉和E.鲁道夫2002年出版的著作。

[9]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86页及其后几页。
作者后面的年份表示相关著作的出版年份，下同。——译注。

[10]迈克尔·弗里德曼，2004年。

[11]君特·内斯克编，1977年，第28页。

[12]转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2001年，第231页。

[13]高级雪道，黑色菱形标识，也叫黑钻石，难度大，坡度比大于40%（坡度大于22°），适合有一定经验的滑雪者。——译注。

[14]《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237页。——原注
此处中文译文参照本雅明著，王涌译《柏林童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译注。

[15]《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227页。

[16]关于这一时期本雅明生活细节的描写，请参阅H.艾兰和W.詹宁斯，2014年，第314页及其后几页。

[17]转引自汉斯·普特尼斯和加里·史密斯编，1991年，第145页及其后几页。

[18]《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71页。

[19]穆里（Muri）实际上是伯尔尼附近的一座城镇。——译注。

[20]参阅奥利弗·卢伯里希，2016年，第29页。

[21]参看H.艾兰和M.詹宁斯，2014年，第102页。

[22]《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29页。

[23]《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7—122页。

[24]同上，第78页。

[25]同上，第58页。

[26]同上，第65—66页。

[27]《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51页。

[28]转引自瑞·蒙克，1991年，第171页。

[29]维特根斯坦，《写给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信》，第96页。

[30]参看亚历山大·沃，2010年，第38页及其后几页。

[31]《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第169页，1916年7月8日日记。

[32]同上。

[33]同上，第174页，1916年8月2日日记。

[34]转引自H.奥特，1988年，第107页。

[35]同上，第106页及其后几页。

[36]同上，第114页。

[37]特别是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在其2001年出版的著作第112页及其后几页中强调了本次讲座课对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意义。此处阐述根据的是萨弗兰斯基分析的实质内容。

[38]《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3—117页。

[39]同上，第63—64页。

[40]同上，第67—68页。

[41]同上，第220页。

[42]J.W.施托尔克，1990年，第14页。

[43]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20—121页。

[44]《卡西尔文集》第7卷，第389页。

[45]参看T.梅尔，2006年，第81页。

[46]《卡西尔文集》第6卷。

[47]若要了解卡西尔家族史，可参阅S.鲍辛格，2015年。

[48]相关情况，推荐参阅P.莱奥，2013年。

[49]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20页。

[50]相关的证明可参阅A.舒伯巴赫，2016年，第33页及其后几页上的研究。

[51]《卡西尔文集》第18卷，第36页。

[52]《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90页。

[53]赫尔梅娜·维特根斯坦，2015年，第158页。

[54]M.菲茨杰拉德，2000年。

[55]勒内·笛卡尔，1965年，第29页。

[56]《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第378页。

[57]相关内容，可特别参阅A.雅尼克和S.托尔明，1984年。

[58]相关信息，也可参阅W.W.巴特利，1983年，第24—25页。

[59]对于两人这次会面的描写，本书根据的是瑞·蒙克，1991年，第182页及其后几页。

[60]参看瑞·蒙克，1991年，第182页。

[61]同上，第96页及其后几页。

[62]同上，第95页。

[63]同上，第99页。

[64]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01页。

[65]《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91—92页。

[66]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16页。

[67]同上，第112页。

[68]《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87页及其后几页。

[69]《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40—157页。

[70]《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108页。

[71]收于《海德格尔全集》第1卷。

[72]《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127页。

[73]《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7—65页。

[74]同上，第112—113页。

[75]《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7页。

[76]同上，第12页。

[77]德语，意为面包。——译注。

[78]法语，意为面包。——译注。

[79]《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13—14页。

[80]同上，第16页。

[81]《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44页。

[82]马克斯·舍勒的话见，P.维特克普，1922年，第164页。

[83]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11页。

[84]转引自A.舒伯巴赫，2016年，第433页。

[85]《卡西尔文集》第12卷，第231页。

[86]《符号概念的本质和影响》，第175—176页。

[87]同上，第101页。

[88]《卡西尔文集》第2卷。

[89]同上，第48页。

[90]同上，第49页。

[91]同上，第X（10）页。

[92]转引自A.舒伯巴赫，2016年，第355—356页。

[93]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24页。

[94]W.比梅尔和H.扎纳（编），1990年，第33页。

[95]《海德格尔全集》第62卷，第348页。

[96]同上，第354页。

[97]同上，第350页。

[98]同上，第358页。

[99]W.比梅尔和H.扎纳（编），1990年，第122页。

[100]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27页。

[101]转引自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38页。

[102]同上，第132页。

[103]同上，第131页。

[104]参看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26页。

[105]参阅http：//www.warburg-haus.de/kulturwissenschaftliche-bibliothek-warburg/。

[106]转引自T.梅尔，2006年，第102页。

[107]同上，第103页。

[108]《符号概念的本质和影响》，第21页。

[109]同上，第24页。

[110]德语原词linker Hund，字面意思为“左边的狗”。——译注。

[111]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33页。

[112]《符号概念的本质和影响》，第38页。

[113]指的是汉堡。——译注。

[114]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46页。

[115]《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182页。

[116]同上，第270页。

[117]同上，第274页。

[118]同上，第290页。

[119]同上，第173页。

[120]《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123—201页。

[121]同上，第134页。

[122]同上，第139页。

[123]同上，第154页。

[124]同上，第164—165页。

[125]同上，第185页。

[126]这是长篇小说《亲合力》中英国游客讲的故事。——译注。

[127]《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169—170页。

[128]同上，第188页。

[129]同上，第189页。

[130]K.温舍，1985年，第202页。

[131]同上。

[132]同上，第140页。

[133]这是维特根斯坦1921年1月2日写给恩格尔曼的信，收录于I.索玛维拉，2006年，第32页。

[134]《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23页。

[135]K.温舍，1985年，第180—181页。

[136]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朋友大卫·平森特"。——译注。

[137]《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09和115页。

[138]William Ernest Johnson，威廉·欧内斯特·约翰逊，逻辑学家。——译注。

[139]《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26页。

[140]同上。

[141]转引自K.温舍，1985年，第195页。

[142]格奥尔格·冯·赖特，1975年，第69页。

[143]《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29页。

[144]同上，第142页。

[145]参看《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50—51页。

[146]阿比·莫里茨·瓦尔堡，1995年，第55页。

[147]双方见面的上下文和具体情况请参看H.布雷登坎普和C.韦德波尔，2015年。本书此处根据此文献进行描写。

[148]参看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50页。

[149]C.马拉齐亚和D.斯蒂米利（编），2007年，第112页。

[150]同上。

[151]参看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2001年，第156页及其后几页。

[152]本章内容，之前曾有一个旧版本发表于《哲学杂志》，第5/17期。

[153]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1998年，第14页。

[154]同上，第2页。

[155]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情人关系的具体描写，可参阅A.格鲁嫩伯格，2016年。

[156]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1998年，第31页。

[157]想进一步了解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爱”的哲学概念，可参阅T.N.特梅尔2013年出版的研究《意志与热情》。

[158]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2001年，第163页。

[159]《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351页。

[160]同上，第370页。

[161]同上，第406页。

[162]同上，第445页。

[163]参看《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308页。

[164]《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448页。

[165]阿西娅·拉希斯，1976年，第46页。

[166]《本雅明书信集》第2卷，第466页及其后面几页。

[167]同上，第486页。

[168]《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307—316页。

[169]此处可参阅M.米特尔迈尔内容丰富的研究，2013年。

[170]《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309页。

[171]同上，第310页。

[172]M.米特尔迈尔也持此观点，2013年，第44—45页。

[173]此处也可参看M.米特尔迈尔，2013年，第52页及其后几页。

[174]J.斯贝特，2016年，第177页。

[175]参看M.米特尔迈尔，2013年，第52页。

[176]关于舒尔茨固执的评价和反犹主义的偏见，可参阅L.耶戈尔，2017年，第151页起事实充分和令人信服的论证。

[177]转引自L.耶戈尔，2017年，第153页。

[178]《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14页。

[179]《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40—157页。

[180]《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217页。

[181]《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42页。

[182]《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226页。

[183]此处可参看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收录于《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第1—74页。

[184]《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217页。

[185]曼陀罗，意译为坛场，是为修行需要创建的一个小土台，后来也用绘图方式制作。——译注。

[186]译文参照《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瓦尔特·本雅明著，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后文不再另注。——译注。

[187]此处有影响力的例子可以参看尤尔根·哈贝马斯，1991年。

[188]《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155页。

[189]参看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收录于《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9—21页。

[190]《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403页。

[191]《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73页。

[192]根据M.米特尔迈尔，2013年，第36—37页。

[193]《本雅明文集》第1卷第1本，第350页。

[194]《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102页。

[195]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40页。

[196]《存在与时间》第四节，第12页。
本书的《存在与时间》译文采用陈嘉映、王庆节译本。——译注。

[197]参看《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逻辑哲学论》，条目6.4312。

[198]《存在与时间》第十五节，第66—67页。

[199]同上，第68—69页。

[200]同上，第69页。

[201]W.比梅尔和H.扎纳（编），1990年，第71页，1926年12月26日的信件。

[202]《存在与时间》第四十节，第187—188页。

[203]同上，第189页。

[204]W.比梅尔和H.扎纳（编），1990年，第47页。

[205]《存在与时间》第五十节，第250页。

[206]W.比梅尔和H.扎纳（编），1990年，第54页。

[207]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47页。

[208]P.齐博霍夫，1995年，http：//www.zeit.de/1995/17/Das_Labor_des_Seelen-archivars。

[209]《卡西尔文集》第14卷。

[210]关于卡西尔对文艺复兴的理解，例如可参阅O.施韦默尔，1997年，第221—242页。

[211]《卡西尔文集》第14卷，第3页。

[212]本书作者在此采用了迈克尔·汉佩的概念。

[213]《卡西尔文集》第14卷，第131—132页。

[214]鲁道夫·科特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2000年，第12页。

[215]《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第237页。
《哲学研究》，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页。以下出自《哲学研究》的引文，均采用该译本译文。——译注。

[216]同上，第237—238页。

[217]同上，第239页。

[218]同上，第243页。

[219]此处可特别参阅K.温舍，1985年，第92页及其后几页。

[220]同上，第106页。

[221]同上，第100—101页。

[222]此处相关描写根据的是K.温舍，1995年，第272页及其后几页。

[223]《维特根斯坦通信集》，第113页。

[224]转引自A.萨尼茨，2011年，第57页。

[225]赫尔梅娜·维特根斯坦，2015年，第163页。

[226]参看瑞·蒙克，1991年，第162页。

[227]参看A.雅尼克和S.托尔明，1984年，第248页。

[228]转引自K.西格蒙德，2015年，第121页。

[229]P.席尔普，1963年，第25页及其后几页，由本书作者从英语译为德语。

[230]《维特根斯坦全集》第3卷，第68页。

[231]《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188—189页。

[232]《本雅明文集》第4卷第1本，第83—148页。

[233]同上，第85页。

[234]《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158页（出自本雅明1926年5月29日写给肖勒姆的信）。

[235]同上，第158—159页。

[236]同上，第195页。

[237]《莫斯科日记》，收录于《本雅明文集》第6卷，第292—409页。

[238]《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221—222页。

[239]《本雅明文集》第6卷，第312页。

[240]同上，第306页。

[241]同上，第317页。

[242]同上，第318页。

[243]同上，第359页。

[244]参看P.布洛姆，2014年，第94页。

[245]转引自《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305页。从肖勒姆的视角看待此事可参阅格尔绍·肖勒姆，1975年，第172—175页。

[246]《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346页。

[247]《卡西尔文集》第13卷，第1页。

[248]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63页及其后几页。

[249]转引自H.布鲁门伯格，1979年，第73页。

[250]参阅H.U.贡布雷希特，2001年，第187页。

[251]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65页。

[252]参看T.梅尔，2006年，第109页。

[253]同上。

[254]S.鲍辛格，2015年，第159页。

[255]同上，第3页。

[256]《卡西尔文集》第17卷，第291页。

[257]同上，第295—296页。

[258]同上，第302页。

[259]同上，第307—308页。

[260]T.梅尔，2006年，第152页。

[261]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81页。

[262]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48—149页。

[263]退休在这里指的是大学教授到达退休年龄后的一种特别制度，不再担任教学任

务，但还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保留教授称号。——译注。

[264]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53页。

[265]《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185页。

[266]J.W.施托尔克（编），1990年，第25页。

[267]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57页。

[268]J.W.施托尔克，1990年，第25—26页。

[269]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60—161页。

[270]同上，第161—162页。

[271]转引自迈克尔·弗里德曼，2004年，第22页。

[272]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61页。

[273]J.W.施托尔克，1990年，第30页。

[274]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88页。

[275]转引自J.M.克罗伊斯，2002年，载D.克吉和E.鲁道夫（编），2002年，第239页。

[276]同上，第244页。

[277]同上，第239页。

[278]托妮·卡西尔，2003年，第188页。

[279]转引自D.克吉和E.鲁道夫（编），2002年，第5页。

[280]完整原话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3卷，第274—296页的辩论记录。

[281]来自席勒的诗《友谊》。——译注。

[282]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2005年，第162页。

[283]J.W.施托尔克，1990年，第30页。

[284]转引自J.M.克罗伊斯，载D.克吉和E.鲁道夫（编），2002年，第234页。

[285]收录于《海德格尔全集》第3卷。

[286]《三毛钱歌剧》为布莱希特作品，这里的标题中金钱单位变成“三毛钱”的一百倍，即“三十块钱”。——译注。

[287]《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449页。

[288]同上，第378页。

[289]《本雅明文集》第2卷第1本，第310—324页。

[290]同上，第295—310页。

[291]同上，第298页。

[292]同上，第307和300页。

[293]同上，第312和319—320页。

[294]《本雅明文集》第5卷第1本，第45页。

[295]《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403—404页。

[296]阿西娅·拉希斯，1976年，第62页。

[297]《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417页。

[298]哈利·格拉夫·凯斯勒，1961年，第462页。

[299]同上，第376—377页。

[300]参看P.布洛姆，2014年，第286—287页。

[301]阿西娅·拉希斯，1976年，第59页。

[302]《本雅明书信集》第3卷，第463页。

[303]同上，第483页。

[304]转引自瑞·蒙克，1991年，第275页。

[305]同上。

[306]《维特根斯坦全集》第3卷，第18页。

[307]同上，第44—45页。

[308]转引自瑞·蒙克，1991年，第261页。

[309]《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第299页。

[310]同上，见第127条目处。

[311]同上，第262页。

[312]同上，序言处，第231—232页。

[31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89年，第18—19页。

[314]同上，第14—15页。

[315]《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第184页。

[316]转引自瑞·蒙克，1991年，第289页。

[317]本处涉及书中四位主角哲学家的相关著作，只对作品标题等信息进行翻译，并不代表这些作品本身一定已经有汉语译本。——译注。

[318]本处仅摘选在正文中被引用过、在脚注中出现过的那些参考文献。在此，也是只对作品标题等信息进行翻译，并不代表这些作品本身一定已经有汉语译本。——译注。

[319]德语和英语文献都是根据翻译成汉语之后的信息进行排序。——译注。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A PELICAN
INTRODUCTION 鹈鹕丛书



Human Evolution

人类的演化

［英］罗宾·邓巴 著　　余彬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2.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3.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4.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5.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6.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7.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8.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9.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人类的演化

企鹅经典：

[英]罗宾·邓巴/著

余彬/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Human evolution
Copyright © Robin Dunbar, 2014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enguin(企鹅),Pelican(鹈鹕),the Pelican and Penguin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企鹅” 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正文内容

致谢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参考文献

献给

扎伊拉、贾里德和亚伦

致谢

本书中所采用的研究结果，很大部分来自于英国科学院的世纪研究项目“从露西到语言：社会大脑考古学”。而我们这个故事中很多重要情节的形成，得益于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出资、社会网络（SocialNets）和ICTe-Collective两大欧盟科研巨头联手、并由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高等研究计划（Advaned Grant）赞助的研究项目。我对所有参与这些项目的同行们无比感激，没有他们的投入和奉献，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艾利·皮尔斯（Ellie Pearce）为本书绘制了地图以及图1.1、图1.2和图6.5，线条画都出自亚伦·邓巴（Arran Dunbar）之手。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人类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让我们着迷。我们的好奇心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叩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一直以来，一说起这个故事，总离不开考古学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头和骨头。这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只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给我们提供了确定性，给了我们可以依循的凭据。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轻易不敢绕过这些“铁证”，因为他们可不想被说成是在凭空编故事。可是，单凭这些骨头和化石，也许并不能完整地讲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这里所说的进化，指的是社会和认知的进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步履缓慢而犹疑，但是，它是人类进化到现代人的真实路径。其实，我们真正想探寻的答案，就隐藏于这段进程之中，它会告诉我们，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相对猿类而言）？人类何以走到今天？

我们人类属于类人猿（great apes），因为我们身上所携带的生物学、基因学和生态学上的特质，大体上和类人猿共享。如今，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与我们属于同科的还有两种黑猩猩（genus Pan，黑猩猩属）、两种（抑或四种）大猩猩（genus Gorilla，大猩猩属）和两种（或三种）红猩猩（genus Pongo，猩猩属）。在它们中，只有红猩猩不是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现在，只有在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才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而在一万多年前的上一个冰河纪结束时，它们还广泛分布于印度支那和中国大陆的南部。

直到1980年前后，关于人和类人猿关系的传统观念还认为，人和类人猿无疑同属一科，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构成了有别于其他猿类的亚科（subfamily）。因为和猿类相比，我们有着一系列很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直立行走，类人猿四肢着地行走；类人猿的脑容量以灵长类的标准来衡量已经算很大，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更要大得多；我们有文化，而类人猿只有行为。这些区别显示了在早期猿类即有不同的分支，一条通向现代人类，另一条通向现代的其他猿类。红猩猩的这条分支能通过化石追溯到大约一千六百万年前，如果由此类推，我们和猿类的共同祖先应该至少也有那么久远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故事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从这时起，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从基因上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度（相对于仅仅依赖解剖学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发现，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类和黑猩猩的相似度明显高于其他猿类，大猩猩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但是，从一千六百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东南亚的红猩猩和我们的相似度却并不高。而在非洲生活的几种猿类（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形成了一条共同的支线，这条支线的分叉点离现在要近得多，大约是在六百万到八百万年前（图1.1）。我们并不是类人猿科之下一个独立的亚科，而是从属于非洲猿类亚科。由于我们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黑猩猩（而不是第三纪中新世（［Miocene］的随便某种猿类）就成了人类支线十分恰当的类比参照物，从很多角度来讲，黑猩猩是早期的人类支线，也就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及其前辈中最好的模板。

为了把故事讲清楚，让我来简单重复一下非洲猿科的进化过程，以

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再进一步描述我们人类的支线从非洲猿亚科分离出来之后的五个重要演化阶段。这些阶段，或可称为转变过程，构成了我所要讲述的这个人类演化故事的框架。

非洲猿猴的故事

现存的类人猿（其中包括红猩猩），其祖先是生活在中新世时期的猿类。那是大约在两千万年前，各种猿类突然大量繁衍，这种现象起初发生在非洲，而后又蔓延到欧洲和亚洲（图1.1）。到了大约一千万年前，由于气候日益干燥，湿润温暖的热带森林面积大大减少，而这些森林就是当时种类繁多的中新世时期猿类的家园。数十种活跃于当时的猿类因此灭绝，取而代之的是生存能力更强的猿猴，这些猿猴在之前的亚非大陆灵长类中并不起眼。随后，非洲猿类中的一条支线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现存非洲猿类的共同祖先。之后，大约在八百万年前，成为大猩猩的那条支线分离了出来。又过了大约两百万年，最终诞生现代人类的支线开始形成，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同属于这条支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简称为LCA）。这条支线，之后走上了它独自的进化轨道。又过了很久，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差不多就是在人属（genus Homo）现身于东非的时候，黑猩猩的支线开始一分为二，演化成普通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bonobo，也就是pygmy chimpanzee）。按照惯例，分类学学者现在把猿科动物（包括人类）称为人科（hominids），在LCA后分离出来的最后成为人类的支线中所有动物称为人亚科（hominins）。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是“homininoids”和“hominids”这两个相应的词，不过，我使用的是目前学界通用的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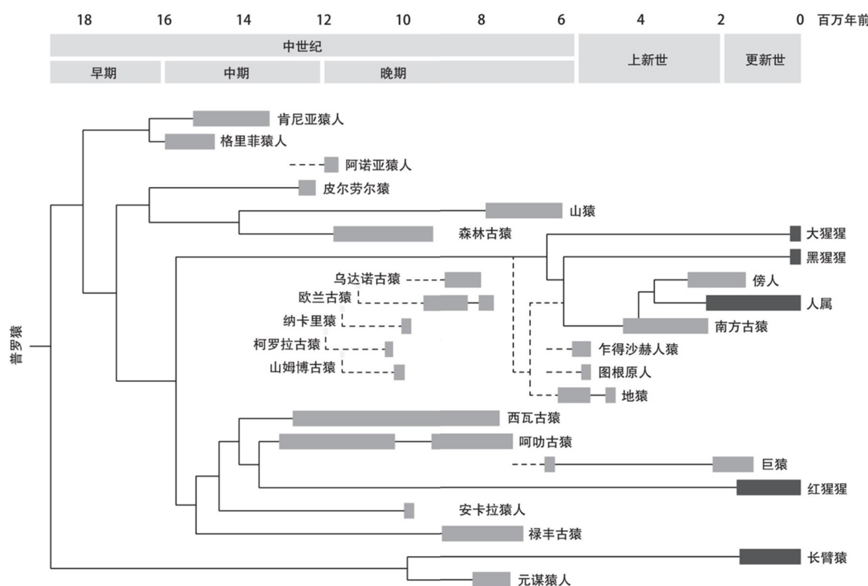


图1.1

根据地质年代画的猿科图谱，中新世的非洲和欧亚有很多猿（普罗猿及其后代），但大部分在中新世末期热带森林收缩时灭绝了。深色长方形表示仍存活，浅色表示已灭绝。

虚线表示尚未确定的关系（比如最早期的人亚科、乍得沙赫人猿、图根原人以及地猿和人科的关系）。

参考Harrison（2010）。

而人类的祖先，当时还毫不起眼地混迹于各种猿类之中，在大约六百万年前，默默地开始了进化历程。在非洲中部，残留着大片中新世的大森林，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这片森林边缘更为开阔的平地。虽然猿类有时候也能在平地上活动，但是，按它们的天性，它们是生活在树上的动物，习惯于手脚并用地窜上参天大树，或者在林地上的树枝间攀爬和悠荡。而我们这条支线的决定性特点，也就是双足行走（bipedalism）的特点，在和黑猩猩分开后不久就形成了，据推测，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在没有大树的广阔平地上行走。

人类的祖先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古人类学家就是利用了这个物种在解剖学上的特征，来寻找我们最早的祖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最早的人亚科化石属于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但也有人怀疑，它们并不属于人亚科，而“仅仅是另一种猿类”。这只几乎完整的头骨是在德乍腊（Djurab）沙漠发现的，那里是西非乍得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这个头骨的发现有两大重要性，一是在于它的年代（距今约七百万年前，所以非常接近于LCA），二是在于它的发现地距离其他

早期人亚科发现地的东非有数千公里，且距离现代猿类在西非居住区域的北方也有数千公里（这表明森林和林地一度向更北面的方向延伸，切入了当今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域）。虽然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只头骨属于某一种猿类，但更多人则依据它的枕骨大孔（头骨中脊柱穿过的孔）的位置，确认了头骨主人双足行走的姿式，以此推断应该把它归入人亚科。越是接近猿类和人亚科分开的时期，其化石标本的界限越是模糊，难以区分，所以很难将那个时期的化石精确归类。

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古老的人亚科化石，距今大约六百万年，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的图根山。这个发现不同于沙赫人的头骨化石，原人的化石主要包括四肢骨骼、颌骨以及数颗牙齿。从原人的大腿骨和髋关节的角度来看，[1]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判断出原人是双足行走的，虽然同时也表现出非常善于攀爬的特征。从这点说，原人好像和一百万年后在东非和南非大量出现的南方古猿有很多共同点，可以确认它是人亚科中最早期的一员。接着，来到了距今大约四百五十万年前，这个时期的化石被大量发掘，证明了人亚科支线在这个时期又衍生了更多不同的种类，于是南方古猿的时代来临了。在当时，很有可能同时出现了多达六种南方古猿，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散居在非洲的不同区域（图1.2）。

南方古猿的繁衍非常成功，一时间，它们的生活空间覆盖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大部分区域。虽然在它们被发现之初曾经引发了考古界的轰动，在当时被确认为人类支线的祖先成员；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它们无非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就大脑容量来说和现代的黑猩猩几无差别。和黑猩猩一样，它们很可能也属于食果类动物（frugivore），在能弄到肉的时候也吃一点儿。它们后来很有可能也开始使用石头工具，在这一点上可以关联到能人（Homo habilis），后者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期的南方古猿。但是，这些工具充其量就是原始粗陋的趁手石块，拿这些石块做工具，类似于现在西非的黑猩猩也会拿着石头当锤子用。

从一百八十万年前再向后数一百五十万年，称雄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这是一个人亚科物种，在所有人亚科类动物中，这个物种很可能生存了最长的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物种属于生物学家口中的年代种（chronospecies），意思是一种随时间的推进而变化的种。考虑到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超长的生存时间，这种提法倒是合情合理。在它的早期，也就是匠人（Homo ergaster）期前后，这个物种基本上在非洲生活，而到了后期（也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直立人时期），这个物种已经遍布欧亚大陆。这个阶段（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前或更早）演化的意义在于人亚科物种第一次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加工过的工具（1859年，在法国北部圣阿舍尔，出土了属于阿舍利文化的手持斧头）。这一时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稳定性。在将近一百五十万年中，直立人脑容量的增加相当有限，而他们所使用的石头工具，在形状的变化上更是乏善可陈。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在人亚科演化的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而后，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某个时段里，一个新的物种从非洲匠人和直立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它们成为了第一批古人类（archaic

humans），也就是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大脑容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物质文化多样化的起点。当然，从匠人到海德堡人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过渡性物种，但是从细节上来看，其中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匠人群体渐渐淡出非洲和欧洲，被古人所替代，但是在东亚，直立人群体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直到六万年前仍然在这个区域生存着。被称为霍比特人的弗洛勒斯人（Homofloresiensis）就是它在形体上较为矮小的变种，直到一万两千年前，这个群体仍然生活在印尼群岛上，以地质学的时间概念来讲，那就像发生在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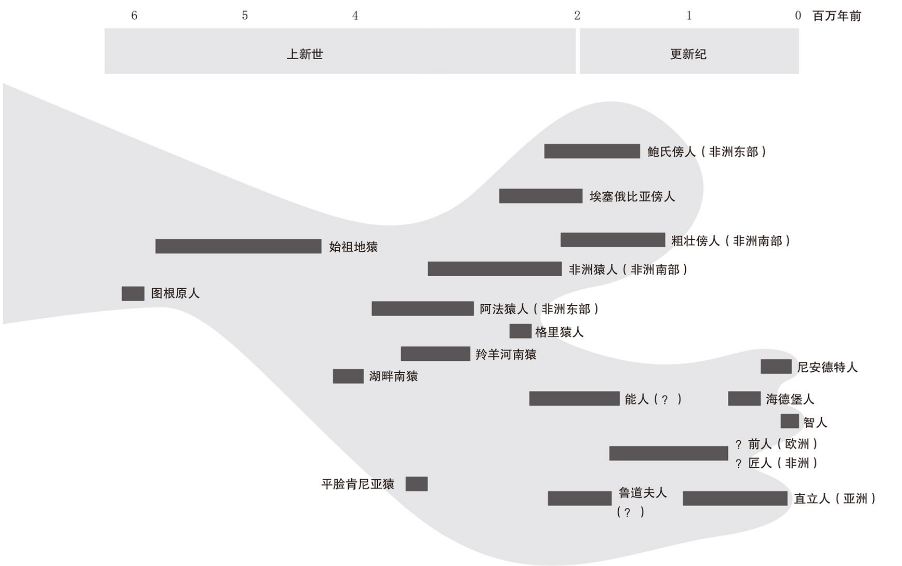


图1.2

这是六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几种主要的物种及其时点。在大部分的历史阶段中，出现了数个人亚科物种同时存在的现象。最早的物种都是属于南方古猿属，然后在大约两百万年前（MYA），分离出一支粗壮型南方古猿，这条支线最终进化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个阶段的演化还有另一层重大的意义——这批古人的迁徙，推动了第二波向欧洲和西亚进发的行程，从而最终造就了欧洲人的原型尼安德特人（或称尼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长了一副特别适应高纬度生存环境的身板，在欧洲和北亚的冰河纪寒冷气候中，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四肢短小，身体结实，这种体征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从四肢手脚散失热量，这一点和生活在北极圈的现代因纽特人（或称为爱斯基摩人）很像。不同的是，因纽特人和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同胞是近期才来到这样的生存环境的，而尼安德特人将此特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在冰河纪的欧亚大陆生存了大约二十五万年。

与此同时，在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在更南面的非洲，古人正在经历

着另一种演化，这种演化的结果最终造就了我们自身的物种，被称为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现代人，或可简称为现代人），更科学的命名是智人（Homo sapiens）。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相比，身材变得纤细，而且，大脑容量在持续增加。现代基因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利用俗称的分子时钟（molecular clock）来测算某条支线进化的时间。分子时钟的原理是利用两个物种之间DNA的不同数量及自然变异的速率，来计算两条支线分开了多少时间。观测的重点是自然选择范围之外的基因组，也就是说，分子时钟测算的只是DNA中自然变异部分的稳定速率，这一点很重要。决定我们的身体特征的那部分DNA会在自然选择的过滤下，发生急速的变化。通过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2] 有基因证据显示，AMH现代人的起源来自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族群，那是生活在距今二十万年前后的大约五千名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族群的总数只有五千名女性，它只是表明，现代人类的基因都是由那五千名女性贡献的。

至于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全新的演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气候的变化是导致新物种形成的重要原因，智人的形成很可能也不例外。不管怎样，我们的物种迅速地在非洲各地繁衍开来，取代了古人的位置。至于古人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地被智人取代，仍然是个谜。要知道，在被智人取代之前，古人在非洲还有欧洲至少已经生存了三十万年。

之后，在距今约十万年前，AMH现代人在非洲东北部的一条支线迅速在地域上扩展，到距今七万年前，已经跨过红海，占据了亚洲的南部海岸，最终在距今约四万年前到达了澳洲。[3]抵达澳洲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因为这个旅程必须跨越从巽他陆架（Sunda Shelf，现代印尼和婆罗洲）到莎湖陆架（Sahul Shelf，新几内亚，再连接到澳洲大陆）[4]之间九十公里的深海海沟，这说明他们应该已经拥有了较大的船只。在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阶段，因为伴随着他们的出现而来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距今约五万年前的这段时期里，武器、工具、首饰及工艺品等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相比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要说在那个时期还出现了诸如帐篷、灯具等一系列实用性的物件以及大型的船只。

现代人离开非洲向亚洲进发，在途中的黎凡特（Levant）第一次遭遇尼安德特人。在这次的正面交锋中，现代人很有可能遭到了尼安德特人的抵制而不能进入欧洲，迫使他们沿着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岸，往东进入了亚洲。在东亚，他们很有可能与直立人的残余相遇，更为确定的是，在亚洲，他们和另一种叫作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古人相遇，因为有与之杂交的迹象。关于丹尼索瓦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能凭借几根骨头化石，那是在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的一处洞穴中发现的几根骨头，距今约有四万一千年。这个洞穴，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居住过。通过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洞穴的所在之处，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前的早期古人往东扩张的一个终点。

让我们再回到欧洲，此时，古人族群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适应北方寒

冷的气候，进而演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在距今约二十五万年前到四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的主宰，直到现代人的出现。和后来历史上其他的入侵族群一样，现代人也是从俄罗斯草原进入欧洲的东部，抵达西欧不过在三万两千年前后。这两个族群共同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大约两万八千年前，尼安德特人最终在伊比利亚半岛消亡。尼安德特人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谜团，在时间上和基因上他们都和我们最接近，消亡的时点离现在也不远，这一切都让我们费解又着迷。何况，他们已经适应了北方的气候，比起我们的祖先AMH——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他们在欧洲生存的时间更长，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消失了踪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按下不表，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展开深入的探究。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类人猿

首先，让我回到本书的主题：我们和其他猿类共享一段漫长的演化历史，我们有着相似程度极高的遗传基因以及相似的体型外貌，我们都有发达的认知能力，这使得我们能够学习和交流，我们也共同拥有群居狩猎的生活方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我们就是类人猿，我们和类人猿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生理解剖的差异之上，也就是我们双足行走的站姿，这当然是最一目了然的差异，但同时也是最无趣的差异。中新世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热带森林的退行和消失，为了避免物种消亡，行走方式的改变是必须的，这些早期的细小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形成了人类在形体上的种种特征。其余的争论纠缠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事实上，这些只是认知上不值一提之处，即使脑容量只是黑猩猩一个零头的乌鸦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认知，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所能够产生的意识，是这些意识赋予了我们独特的人类文化，而文化才是人类文学和艺术的根源。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类对动物文化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尤其是针对猿类的文化，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学科，被命名为猿类学（panthropology），也就是关于类人猿的人类学。[5]在近亲中找到类似于人类的某些行为和认知能力，这并不奇怪，人类的特征不可能毫无来由地从天而降，相反，这些特征是不断适应和进化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有的一些特征因为选择压力的加重而逐渐演变为新的特征。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是目前我需要明确的重点是：是的，人和猩猩都具备通过学习，社会性地传递行为方式的能力；而且，是的，我们也确实可以说黑猩猩和其他猿类拥有它们自己的文化，但事实上，和人类相比，猿类的文化能力简直太微不足道了。这样说不是要贬低猿类的能力，而是为了点明一个在混乱和激动中几乎被忽视的重点——是人类把这种文化能力提高了一大截，从猿类的文化到人类的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不是缓步向前。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化中有两个关键的特性，显然为人类所独有。这两个特性一个是

宗教，另一个是讲故事。其他任何生物，无论是猿类还是乌鸦，它们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文化特性。这两种特性，完完全全属于人类，而且只属于人类。我们说这两种特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因为这两种特性都需要用语言来执行和传递，而只有人类的语言拥有这种作为媒介的质地。对于这两种特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要求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的虚拟世界，它并不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凭借想象在头脑中幻化出另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和我们每一天都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上和眼前的现实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去思考它的缘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或者，去想象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那是属于虚拟甚或是超虚拟（para-fictional）[6]的精神世界。这些特殊的认知行为不是无关紧要的进化副产品，相反，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些行为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解释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所在。

此外，人类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特性，也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是作为社会活动的音乐演奏，诚然，很多其他物种也会表现出乐感，比如鸟和鲸鱼。但是，只有人类是把音乐表演当作一种社交性的活动，对于鸟类来说，制造音乐主要是为了引起异性的关注，是出自于交配的本能。因而，在人类社会中，音乐在社会关系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如今的现代社会，我们时常端坐在音乐厅里，温文尔雅地欣赏音乐。但是在传统社会里，音乐的制作和歌唱以及舞蹈几乎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人类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的起点当然就是我们发达的大脑，说到底这里就是我们和其他猿类产生根本性区别的所在。在图1.3[7]中，列出了所有人亚科物种的大脑容量，这张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过去的六百万年为时间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人亚科的大脑容量在不断地稳步增加，今天的现代人类，脑容量已经是当初南方古猿的三倍。这个数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承受着不断长大的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选择的压力使大脑稳步加大，这种和地理时间的推移相伴的增长，其实只是一个由不同物种样本拼起来后呈现出的假象。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更加明显的是间断性平衡的特点，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脑容量的增加会有一个跳跃，产生类似于爆发性增长的现象，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脑容量又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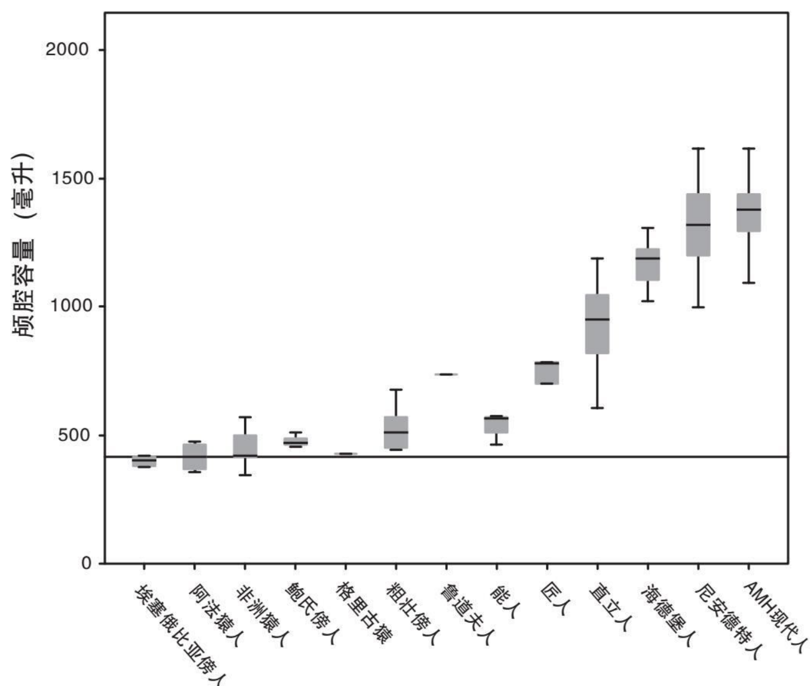


图1.3

几个主要人亚科物种的平均颅腔容量。灰色方块代表该物种50%的数值范围，直线代表该物种95%的数值范围，水平线是现代黑猩猩的等同数值。数据来源：De Miguel和Heneberg（2001）。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一一描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或称为五个演化阶段。把这五个阶段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人们要描绘的人类演化路径图，而每一次转变都是由于大脑容量或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第一次转变是从猿类到南方古猿，主要是外部生态和解剖生理上的变化，并无大脑容量或认知上重大变化的证据；此后，从距今约两百万年前开始，经历了三次大脑进化。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人属物种伴随大脑容量的跃升而出现，虽然在此之前，伴随着能人的出现，预告了一次微弱的增长，或许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第二次伴随着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海德堡人的出现。最后一次是脑容量更为急速的飞跃，这个发生于距今约二十万年前的巨变，直接催生了我们的物种，也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就是智人）的出现。与此同时，尼安德特人在大脑容量方面也有着平行的进化，相比它们在古时候的基准线，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增加，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里再次展开探讨。每一次的转变，都会带来与相关物种有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偿付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因为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大脑活动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二是如何把越来越大的

社会群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庞大的社会群体伴随着脑容量的增加而来，脑容量越大，越能组成更大的社会群体。在每一个时间都已经被占用的日子里，能否找到更好更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更大的脑容量的支持，在每个阶段，群体的最大数量就会遇到瓶颈。

在上述的四个最根本的转变之外，我还要增添一个和脑容量无任何关系的转变，也就是本书要讲述的第五次转变。那就是发生在近东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距今大约有八千到一万两千年。关于新石器时代，尤为让人疑惑又好奇的一点是，它几乎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颠覆。两大主要的更新是这个时期的标志，首先，由游牧过渡到定居，然后，逐步实现了农耕。虽然农业革命总是更加令人感兴趣，但事实上农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类能够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游荡。不管群体以什么原因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处所，必然会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只有在化解了这些矛盾之后，才有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一旦这些问题被解决，人类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有能力拥有更大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城邦以及小王国才会次第出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诞生了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此次行旅，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试图去寻觅和理解人类祖先是如何渡过这一系列的转变。

前方的道路

我在本章一开始就说过，考古学家们是靠着石器工具和化石遗骨吃饭的，佐以那么一点点区域地质学。但是，这些传统上被人们聚焦的石器和遗骨有其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反映不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层面，至于人类的认知这一进化中更为重要的依托，更是不可避免地被疏忽了。当然，考古学家们的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们总觉得，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并不完整，也不够直接，试图从中推断出任何你想要证明的社会行为，是否过于轻率了。但是，正是我们这个生物物种的社会和认知行为，标刻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在六百到八百万年前，由最后共同祖先（LCA）走向我们自己现在所代表的现代人类。这条道路曲折迂回，经常看不清前方。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迷雾中摸清这条道路，就必须紧紧贴住这个模糊不清的、隐藏着的社会性世界，无论这样做将要面临多么艰巨的困难。

在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社会中，每个群体都是高度结构性的网络，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亲情、友情和责任维系着。这种由亲情和非亲情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它们的分布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是否能容易地得到帮助，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

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来面对这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生存环境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强化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因此能够轻巧地绕过一个难关，在重塑化石人行为的尝试中，避开一个长期的困扰。迄今为止，标准的研究方式是，找到一

种和化石人共享某些关键特性的现存动物，然后再假设化石古人类和这些动物有着相似的生态和社会组织。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期，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狮子和鬣狗都做过早期人类的模板，甚至连非洲的野狗都享有过这种殊荣。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伟大的化石专家及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派出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和戴安·福西（Dian Fossey），深入中非的森林去近距离研究黑猩猩和大猩猩，他希望通过这样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寻觅和发现化石人在行为方面的蛛丝马迹。这类“模拟”方式[8]有其硬伤，它们总是着眼于现存物种和化石物种之间共享的某一种特性，但这种特性说不定和现存物种的社会组织没有必然的关系。此外，这类方式还假设了每个物种有自己“标志性”的行为，虽然大体上来说，这种假设基本没有大的差池，但是，根据过去五十年对灵长类动物的野外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物种在行为上和生态上具有很强的适应弹性。

而我在这里所采用的方式，和上述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方法是基于我们对灵长类在时间分配上的进一步了解，掌握灵长类在各类核心活动（如进食、走动、休息、社交等）上的时间分配，以判断对特定周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关键所在。这种研究方式建立在一系列的时间分配模板之上，那是我们根据一些猴子和猩猩的行为推算制作出来的。利用这些模板，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出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个动物能够分配到各项核心活动上的时间。这种方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天的时间是固定有限的（晚上都要睡觉），因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在对象物种醒着的时间段之内完成。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在一个生物体系之内，这种有利条件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为，在一个特定生物体系中，每一个局部发生的变化，不可能不对整体中的其他部分产生连带的影响。因此，一个物种，如果发生了脑容量或者体量上的变化，它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分配在行走和社交等其他核心活动的时间。总而言之，这些时间都必须累加在一起，它们的总数就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长度。正是这一事实给了我们研究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的坚实基础。

我们这种研究方式的第二个基础是社会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这个假说是时间分配分析方法的支点。社会大脑假说最初由心理学家安迪·怀腾（Andy 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提出，起先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有着和身体体量不成比例的超容量大脑。后来，这个理论也逐渐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各灵长类物种之间在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相关性差异。这个假说的关键点在于，它给出了大脑容量和社会团体大小之间的量化等式关系。这个关系的确非常管用，因为它避免了任何一种生态环境的直接干扰，我们因此可以根据对象物种的化石，推算出这个对象所在的社会团体的规模。这在时间分配方面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其一是，因为根据大脑容量能推算团体的大小，我们就能由此推算出，如果想要建立更加庞大的团体社会关系，需要付出多少额外的时间；另一个是，脑容量增加的前提必须是觅食时间的增加。我们给每个物种提出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它们是如何在时间上满足额外需求的？如果时间分配已经饱和，它们找

到了怎样的解决方法，以保证所需的时间？

需要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首先，非洲猿类的一条支线，是从何处启程，继而走上独特的进化之路的？其次，早期的人亚科，又是如何从南方古猿中脱颖而出，占据了旧大陆，挺过更新世晚期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分支？更进一步，在更新世中期，人属一度昌盛，衍生出多条支线，为何只有我们这一条得以延续，一直生存到现在？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条标志了我们过去六百到八百万年间行程的轨迹，折射了我们大脑容量和组织结构上的戏剧性巨变。我们的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由物种变化、迁徙、灭绝和文化特性构成，细节散落在人类进化的时间长河里。而伴随着脑容量发生变化的，是一系列其他的相关特性。这些特性，有的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另外还有些，从现代人的行为中，就可以很明确地获知。在表1.1中，我分列了四大类特性，其中有的是解剖学上的，也有的是行为或认知学上的。不过，所有这些特性，必须和大脑容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群体规模）以及时间限制的变化保持一致，能够做到无缝对接，同时也必须和考古记录相吻合。正是这个利用不同信息的三点测量法，使我们的任务得以完成，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大大减少了推测和臆断成分的一次研究。我们决不会操纵表1.1中的各种特性，任性排列拼凑，就为了让我们的故事能自圆其说。相反，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使得我们能为这种特定的排列组合提供原则性的理由，或者，至少能够提供理由充分的有限选择。

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表1.1中所列的部分特性很眼熟，在传统的人类演化故事中，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向双足行走的过渡、骨盆结构的变化、适合行走的足底[9]的形成以及犬牙的消失，还有体态的逐渐轻盈纤细、大脑容量的缓步增加、现代人类成熟期的延缓（延缓生长的臼齿是个例子）和婴儿的早熟，以及复杂程度不一的各种工具、狩猎活动和艺术品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性（比如时分时合的社会性、劳动的分工、婴儿的隔代照顾、雌性成员的更年期、烹饪、宗教和伴侣结对等）在人类社会进化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缺乏考古学的有力佐证，没有化石依据让我们做出明确的断定。还有一些特性，可以说非常的另类奇异，从未被置于人类演化的历程之中，比如音乐、舞蹈、讲故事、宗教、心智理论能力（theory of mind）或心智化能力的社会认知以及欢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会阐述这些特性对人类进化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生？

表1.1

解剖学特征	考古学特征
双足行走	用火
步态	火塘
平坦足底	工具的变化
骨盆再造	装饰艺术/首饰
脑容量增加	定居点
犬齿消失	
延迟的牙齿发育	
现代人类生命史	
左右撇子	
身材纤细	
停经期	
早熟的婴儿	

行为特征	认知特征
时分时合的社会性	心智理论能力
欢笑	高度意向性
食物的变化 （特别是地下根茎）	
食肉	
烹煮	
狩猎	
祖母照顾	
语言	
情侣关系	
紧密双亲照顾	
劳动分工	
讲故事	
音乐和舞蹈	
宗教	

这些是将现代人类和猿类区分开来的特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这些特性的形成先后排序。

这将是一个侦查的过程，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由考古学记录组成的犯罪现场。和通常的犯罪现场一样，证据很不完善，这让人激动，又让人抓狂。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推理出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动机。社会大脑假说和时间分配模板是我们的侦破工具，在故事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会在每一个阶段把它们都充分运用起来。我们会像最敏锐的侦探一样，把散落的碎片细细地拼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侦破手段是量化的（也就是说，数量的汇合必须和时间分配相吻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随意拼接，只为了迎合我们预想的某种结论。我们会一步一步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拼接这幅演化的图像。把每个

物种面临的新的危机和困扰，放在它们前辈的处理方式之中来研究。以这样的研究方式，逐渐积累深入，我们将会描绘出一幅比之前更加合理完整的画面。

在这里，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很多古人类学家会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可怕的灾难，对于他们来讲，化石太神圣，是他们所有思维方式的依据。长久以来，任何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技术，只会招致质疑和反对。就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分子基因学颠覆了人亚科（即猿和人）解剖学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正确的态度是，对待新的方式方法，与其怀疑抵制，不如扪心自问这种新的方法是否对我们有益，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缺不全的考古学记录。科学的进步，不是凭借轻易而得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地叩问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我对人类演化的故事提出了全新的疑问，也给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式和答案。我毫不怀疑随着新的化石被发掘，新兴技术的出现，我的故事中的细节也将会随之改变。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里是常有的事，一块新的化石会改变人类演化故事的走向。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依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去质疑以往的考古记录。

第二个提醒是关于各类人亚科化石确切的解剖学现状。在过去一百年里，解剖学是人类演化研究中的明星，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已经挥洒了大量的笔墨。在此，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笔墨，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我的这种态度很傲慢，感觉受到了侮辱。其实，我不是说解剖学不重要，我只想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忽略它，是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细节证据，能让我进行更精确更全面的分析，相反，我要做的是，舍弃细节，着眼于更宏大的画面，那就是这些物种是如何在它们生存的地方生存的？为什么最终大部分走向了灭绝？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将为我们提供深入研究的可靠基础，我们可以在每个物种各自的层面再加探究，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解剖学的细节必定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切掌握每个物种的特性。

不过，我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些主要观点和概念，它们是我们这个故事形成的基础。在下一章里，我会总结几条灵长类社会演化的主要原理，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方式的基本框架。事实上，这些原理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理论根据。人亚科在这个框架内，就因为它们是灵长类动物。但是，如果它们走出了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说明它们为什么走出，如何走出，以及何时走出的。所以，下一章会更详细地探讨两个关键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为本书的后续提供模本，而我们对人类演化整体的探讨就是基于这两个理论。

注释：

[1] 猿的大腿骨是直接挂在和骨盆相连的关节上的，这种生理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当猿直立行走时，必须以膝盖为支点晃动身体以保持平衡，因此走路时会摇摇摆摆。而对于双足行走的人科物种来说，因为大腿骨和髋关节之间的角度，形成了双膝内向弯曲的状态，因此不管哪只脚着地，身体重心都会落在膝盖上方。

[2] 线粒体是传统细胞内部的小型发电站，为细胞提供能量，使之不断运行。和定义了我们身体的传统核心DNA不同，线粒体有着自己的DNA。因为线粒体是细胞核（定义了我们身体的

传统核心DNA就藏在这里）外围细胞质的一部分，精子只有细胞核而没有细胞质，所以它们只通过雌性遗传。最初的线粒体是自由生长的细菌，在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早期就进入了多核组织的细胞内，在那里建立起一种极为成功的共栖关系。因为宿主细胞的包容，它们得以高效地生存和繁衍。

[3] 人类很晚才到达美洲（大约在一万六千年前），当时，他们很可能穿过裸露于陆地之上的白令海峡，然后，很快地由北向南遍布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期间，可能经过连续的三波迁徙（爱斯基摩人就是第三波，也就是最后一波迁徙过来的）。最近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认为北美洲在更早的时期就被梭鲁特人（Solutrean）入侵了。他们从欧洲西南部出发，搭着北极的冰块渡过大西洋，在大约两万年前到达北美洲，成为美国东南部神秘的克洛维斯人（Clovis Folk）（《梭鲁特大西洋假设》，Stanford和Bradley，2002年）。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克洛维斯人最终因为后期西伯利亚人的入侵而灭绝了，也有可能是完全被他们同化了（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基因痕迹）。不出意料，这个梭鲁特假设成为了引发众多争论的话题。

[4] 海沟在生物学上非常重要，在海沟的两侧，只有几种相同的鸟类，这条海沟成了澳洲和亚洲（包括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这两大主要动物区的分割线。它也被称作华莱士线，以现代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名字命名。

[5]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人类学家自然是“研究人类”的。但是，大部分人类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研究文化以及不同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的。猿类学这个称呼，也套用了这层含义，意思是研究猿类文化的。

[6] 我在这里用了“超虚拟”这个词，意在表达一个确实是出于假想的世界，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依然坚信它的存在。

[7] 本图以及其他以此为基础的图采用了De Miguel和Heneberg（2001）估算的数据。古人类学家在关于哪组数据最好且更加准确的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组数据。

[8] 之所以说是“模拟”，是基于一种假设，在生态或分类学相近的前提下，现存物种能够为化石提供合理的模拟。

[9] 足底（plantar）指的是在走路时和地面接触的脚底部分，人类脚趾的一半隐藏在脚掌内，这在灵长类中是很独特的。其他灵长类的脚都像手一样，这种设计便于抓握树枝。而人类的足底，是为步行的需要而特别设计的。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灵长类动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的社会化，个体之间特殊的纽带关系使得这个物种能够组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稳定团体。灵长类动物群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防御，抵抗外侵。通常来说，当某一种动物的居住地迁往更加开放的陆地，失去了森林的保护，它们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天敌的攻击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群居团体的成员数量开始增加，为了维护这样的社会关系，它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想而知，这样的关系，是为了保证个体之间更加团结，以备必要之时能互相帮助。

群体成员的近距离居住或许有其优点，但同时也有缺点——有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有三块，它们分别是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由搭便车带来的成本。直接成本源自团体内部因矛盾而起的冲突，如为了抢占食物或最安全的栖息地而互相争吵，这些矛盾会随着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间接成本的产生，是因为随着团体成员的增加，食物和营养的供应量也随之增加。为了保证每个团体成员都能得到足够的供给以满足营养需要，必须去获得额外的食物，这就增加了在醒着的时间范围里行走的时间，其结果是导致花在其他活动上的时间会相应地减少。同时，行走不仅消耗了更多体能，还增加了觅食和进食所花的时间，而且行走还会增加团体遭遇天敌的危险。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灵长类动物群体是一个默认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一个用以对付天敌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但只要是社会性的契约，总是有可能被那些坐享其成者打破。它们只想获得由契约带来的利益，而不愿付出努力。于是，由于这个契约的存在，它们得到了集体的保护，不受天敌之害。但是，那些剥削其他成员的个体给团体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最终的结果是，其他成员不愿意继续被剥削下去。和另外两个成本一样，因为被剥削而增加的成本也是随着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直接成本承担者主要是群体中的雌性成员。各种由于群居而导致的压力，比如在拥挤环境下的碰撞、偶尔因为食物或安全居所而引发的争吵等，都会给雌性成员的内分泌系统带来影响，造成经期的紊乱，进而增加生育的难度。通常来说，地位越低，受到骚扰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承受的压力会随着地位优势的降低而增加。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干扰正常的经期荷尔蒙，影响到正常的排卵周期。每少排一次卵，意味着丧失一次怀孕的机会。这样的情况每发生一次，一生的生育产出和健康体能就会减少一部分。这种随着地位优势的降低，而增加的少育或不育，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在某些物种中，排在第十位的雌性成员可能完全不育。由于压力的增加和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成正比，雌性个体就会希望生活在较小的团体中。因此，对雌性生育能力的维护，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关键因素，阻遏了群体成员数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来自于天敌的威胁增大，大到有必要增加团体成员数量来对抗这种威胁时，灵长类动物就必须采取行动减轻这种压力。否则的话，大规模的群体的解体将不可避免，大范围的群居生活也难以为继。在下一节中，我们来看看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缓解群居的压力

为了减轻因为群居带来的压力，猿猴会在大群体中结成小同盟，以保护同盟成员免受骚扰。作为同盟基础的紧密相连关系，通过两种渠道建立，然后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将成员们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渠道之一是通过相互梳理毛发而建立的感情机制，这种感情非常亲密。相互梳理显然对感情的建立很有作用，因为这种行为会激发大脑分泌内啡肽。正如数年前剑桥大学的脑神经专家巴里·克韦恩（Barry Keverne）的研究成果所示，他和他的团队用一个成功的实验证明，相互梳理毛发的两个动物能够非常默契地长时间待在一起。如果这个时间长到一定程度，在这两个有着肌肤之亲的动物之间就会建立起互相信任和负责的关系，进而形成第二个认知要素。虽然像催产素（oxytocin，即所谓爱情荷尔蒙）这类其他神经传递素和神经分泌素也会在亲密的互动中产生，而且在哺乳动物的社会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有实验证明，内啡肽在类人猿对亲密关系的维护中起到独特的作用。毛发梳理和其他形式的相互轻触（比如抚摸和搂抱）能激活一种特殊的神经元（无髓传入C形纤维），这些神经元只对皮肤上的轻柔触摸有反应，并把感应传递给大脑。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灵长类的这些神经元是在毛发梳理的刺激下调节内啡肽的分泌，不过，近期的一个PET扫描显示，人类情侣在轻抚中会激发内啡肽的分泌。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分泌内啡肽给人的感觉很像温和地过一次鸦片瘾，给人带来轻柔的镇静、愉悦和安宁。在类人猿中，当然也包括在我们人类中，这种感觉对形成亲密关系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鉴于相互梳理对建立和维护同盟的重要性，不难想象的是，对于旧大陆（Old World）的猿猴来说，花在相互梳理上的时间和群体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虽然据我们所知，在新大陆（New World）的猿猴或猿猴亚目的丛猴或狐猴中并非如此（图2.1）。[1]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处的群体规模越大，梳理的对象越多，恰恰相反的是，在大部分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中，群体的大小和梳理对象的数量成反比，但是和梳理的时间成正比。无论在不同物种之间，还是在同物种之内，互相梳理的小团体（整个团体会被分成半独立的小团体，互相梳理多数在小团体中发生）数量随着团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这似乎是因为个体压力随着团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个体联盟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动物会更加专注地为它们的社交同伴梳理，同时会减少随意的梳理。哺乳期的猴子妈妈们因为要喂奶，闲暇时间因此而减少，所以也会减少随意的梳理，而把时间集中花在核心社交同伴身上，它们才是要紧的。

关于灵长类的社会性，有一个方面至今存疑，那就是这些社会纽带究竟有哪些组成成分。对于人类来说，看起来主要是情感成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难以界定。我们没有能力完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受（如果学究气地用神经学概念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因为左脑控制的语言功能和右脑控制的情感功能没有很好的连接），我们尚且无法用任何量化的方式来测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美程度，更不要说去测量猿猴之间的关系了。这样看来，深入研究纽带关系的本质几乎无从谈起。虽然如此，至少我们仍然可以凭着直觉去观察和体验，辨别相对来说紧密的或者不那

么紧密的关系。也许我们说不出很确切的理由，但是我们心里会知道，某些关系就是比其他关系更亲密、更强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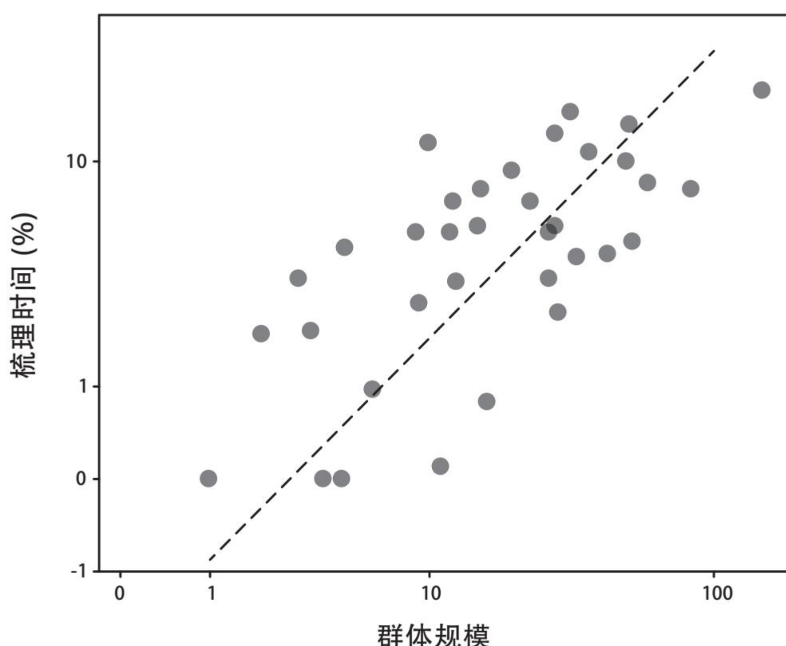


图2.1

每天花在社交性梳理上的时间百分比的中间值，对应的是每个物种群体规模的平均值。数据来源：Lehmann等人的论文（2007）。

无论是对于猿猴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类，一个比较粗放的亲密度衡量指标是在朋友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做过一个实验，结果显示，面对面的互动时间对维护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我们把关系的亲密度分成从1到10的十个等级（1代表“呃，就是个普通朋友”，10代表“呀，很爱很爱的”），让人们对自己和不同朋友的关系打分。我们发现，出来的分数和他们与朋友的互动频率有着很强的正比关系。事实上，友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除外）的情感质量会随着不在一起活动或者不再见面而急剧下降。

这个结论，和罗伯特·斯坦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爱情三角理论是吻合的。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情感关系层面，爱情三角理论可以说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心理学理论。斯坦伯格用三个独立的维度来定义爱情，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爱情三元素：亲密、激情和承诺。如果忽略只出现于浪漫关系中的激情元素，另外的两个元素说明了情感关系有两个关键点，那就是实际的亲密和感受的亲密。这两个要点，在灵长类紧密关系

的模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实际的亲密反应在相互梳理上（身体上的近距离亲密接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情依恋），而作为一个更模糊的概念，感受的亲密则反映在认知上（这是一种愿意为伙伴做任何事的感受，愿意向困境中的伙伴伸出援手，愿意为同伴负责，给同伴一种有依靠、值得信任的感受，所有这些感受，正是形成社会性联盟的基础）。

认知如何成为社会化的基础

关于感受的亲密，我们虽然对它在认知上的依托所知甚少，但是，得到比较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共同认可的是，它是某种形态的“社会性认知”。最贴近的猜测，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心智理论能力，也就是心灵的感应或者说意念化。心智理论能力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明确地定义了个体在某种状态下，“会产生一种关于心智的理论”。也就是说，在有心智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他们会有一种非正式的理论或信念。说得明白点，也就是他们会认识到，别人也有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心智。理论上来说，意念化指的是有能力运用如下词汇：相信、假设、想象、需要、理解、思想和意向。心智哲学家把这些词汇统称为意向性词汇，就是说，这些词汇的使用者有能力表达一个意向性的立场或者观点。

在这种意义上的意向性，形成了一个自然循环的心智状态层次，被称为意向性的度。所有有意识的有机体都知道自己的心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达到了第一度的层次。形成心智理论能力（也就是对于别人心里有什么看法，能形成自己的看法的能力）是第二度的层次，这里涉及到两种心智状态，一种是你自己的，一种是别人的。接下去，有三度、四度、五度等无限多的循环层次，这些层次可以是我反映在你的心智里，或者也可以是我反映在你对另外一个人的心智里（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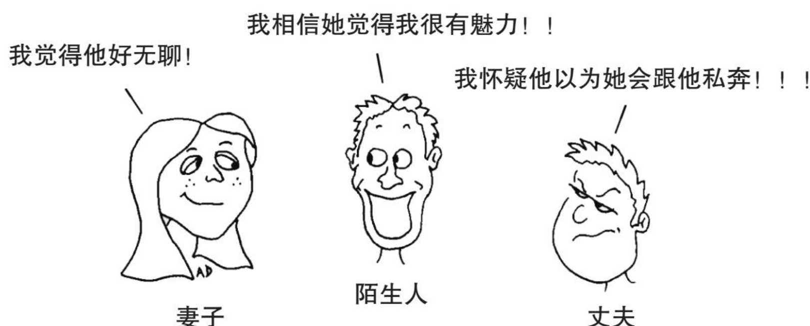


图2.2

读心术（心智化能力）涉及一系列反射性的思维状态，它是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

信任/欲望/企图（企图状态）的理解。从左到右，三个人分别呈现出一度、二度和三度意向性。© Arran Dunbar，2014

虽然，在出生不久，婴孩就会有自我意识（也就是第一度的意向层次），但是，人类并非天生就有心智理论能力。大约在五岁左右，儿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心智理论能力，然后逐层加强，一般是在长到成人时达到第五度的层次，也有人在十几岁时就能达到这个层次。到了第五度这个阶段，人就能够说出这样的句子："我觉得你在假设彼得想要苏珊相信爱德华（要做某某事）。"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普通的成人身上，这个度数稍有出入，大部分人集中在四度到六度之间，平均值稳定在五度，大约只有20%的成年人能够超过五度。

大脑造影显示，意念产生的位置局限于大脑某些特定的区域，这些特定区域就是所谓的心智理论能力（或简称为ToM）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部分额前皮层（至于具体哪些点位是关键之处现在仍有分歧）和颞叶中的两个主要区域（尤其是额极和颞顶结点，也就是颞叶和顶叶连接的地方）（图2.3）。利用反应时间测试和神经影像，我们能够证明的是，相比同等的记忆活动，意念活动对大脑的要求高得多。我们还能证明，核心意念区域的神经活动量和心智活动的度数存在正比关系，心智活动的度数越高，需要的神经元就越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能够做到高度心智活动的人，往往在额前皮层有着更大的眶额区（也就是眼睛正后方的上部）。社会化的大脑必然消耗更多的能量，高度数的意向性需要更多的神经物质参与，从而完成高度数的意念活动，能够完成高度数意念活动的物种就需要更大容量的大脑。而类人猿灵长类的大脑额叶区域恰恰是在进化的后期快速增大，在最为社会化的物种中，它们的这部分区域是最大的。这也是大脑中有髓鞘（神经元在髓鞘中工作更加有效）的最后一个区域，反映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中，更多的社会学习和神经适应是生存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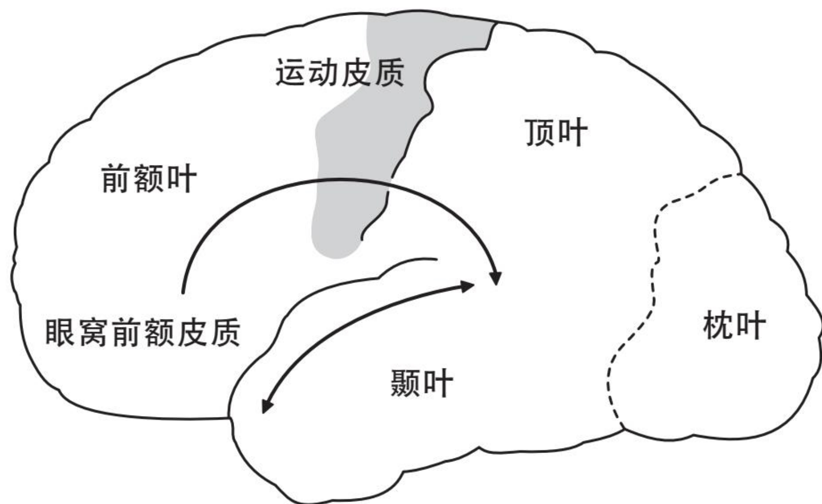


图2.3

人类大脑的主要区域。箭头指向是眼窝前额皮质和颞叶间的心智线路，枕叶的功能几乎都和视觉有关。启动、计划、控制和执行主动动作的运动区（阴影部分）位于分隔额叶上部和顶叶的中央沟的前面。

意向性的度数，在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度数，现代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区别就被量化了。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否能用认知学的术语来解释意念化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认知的复杂性因此多了一个简单可靠的线性衡量标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即使有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哺乳动物（这当然包括了绝大部分的猴子）都是一度意向性。猴子有自己的心思，也拥有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有一些实验还发现，类人猿（特别是黑猩猩和红猩猩）差不多能够到二度（也就是有正式的心智理论能力的度数）。这说明，虽然它们的成熟程度略逊于五岁的儿童（五岁小儿能轻易通过二度的测试），但是，跟刚刚靠近二度的四岁小孩相差无几了。而在另一端，我们的数据显示，正常的成人处于五度意向性。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和额叶的容量重叠在同一张图表中，我们将得到一个惊人的正比关系（图2.4）。这就表明了，在这些大脑的区域中，神经元的数量和意念化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结果也跟我们对成人神经影像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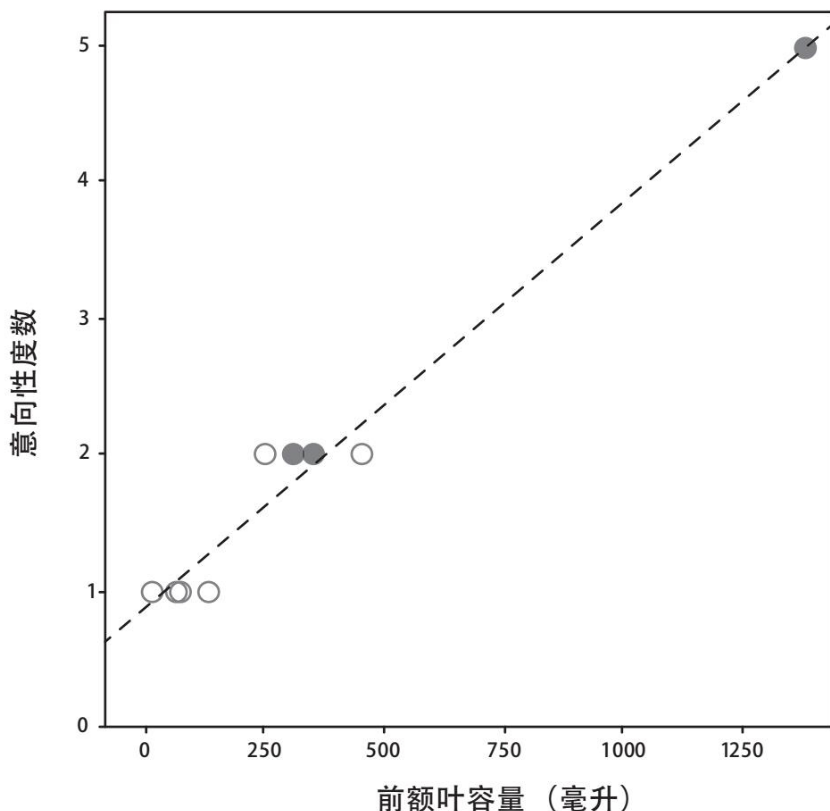


图2.4

旧世界猿猴的心智能力（以最高可及意向性度数为标识）和前额叶容量的关系图。猴子基本上只有基础的一度意向性，有实验证据显示黑猩猩和红猩猩能达到二度意向性（已经到此为止了），成年现代人普遍能够达到五度意向性。

● 通过实验可以测算意向性的物种（从左到右是：黑猩猩、红猩猩和人类）

○ 意向性未知的物种，假设它们和同属物种有着相同—的意向性。请注意，已知和未知数值都趋向于集中在同一区域。

根据Dunbar（2009）重绘。

灵长类社会进化

最后，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从灵长类的社会演化中找到有助于我们研究的蛛丝马迹。直到不久之前，对灵长类社会演化进程的重塑基本上是建立于臆测之上。大家都比较认同的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是体型较

小的夜行动物，居住在分散的、半封闭的群体中，雌性和幼崽只在不和别人冲突的小范围内觅食，雄性则各据一方，拥有更大的空间。雄性的生活范围里可以有数个雌性。雄性对生活在它的领地上的雌性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也独拥和这些雌性的交配权。这种形式的社会系统至今仍能在很多小型的夜行原猴亚目中找到，比如丛猴和鼠狐猴。

长期以来，人们假设社会进化的程序是由个体逐步加入更大的永久性的群体，而群体的大小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显而易见的途径是，一个雄性开始和它重合领地内的某一个雌性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形成一种单配偶的关系。之后，如果有其他雌性受吸引加入这个关系，就形成了类似后宫的单雄群体（一个雄性和数个雌性）。雌性也会吸引其他雄性的加入，最终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多雄多雌群体。这是你在大部分教科书中所能看到的社会演化标准模型，也就是社会生态学模型：一个物种的社会体系源自个体数量的组成结构，而个体数量是由觅食生态决定的。

然而，近期由苏珊·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基特·奥佩（Kit Opie）主导的两项研究发现，这种假设错得离谱。他们的分析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新的结论，完全得益于最新研发的异常复杂的统计方法。借助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推测出原始状态，还能测试有关社会组织与各种选择压力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关联的假设。[2]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从个体分散、封闭觅食区域的原始状态，进入多雄多雌的群体组合形态，最有可能性的转化方式是直接进入，而不是先过渡到单配偶的组合形态。换句话说，原来单独觅食的动物，改变各种生活习性，开始聚集在一起，可能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天敌的威胁（生活习性的改变，在从夜行变成了昼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从多雄多雌的状态开始，有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进一步成为后宫形态，其二是成为单配偶形态，当然也有另一条可能路径是从后宫形态继而进入单配偶形态。物种在形成群体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先前的半封闭状态，但会在后宫和多雄形态之间来回转换（这也是社会生态学所假设的）。

然而，真正重要的发现是，单配偶形态没有回头路。也就是说，一个物种进入这个状态，似乎就不会再退而进入别的状态。这样一来，单配偶的形态似乎是人口学和认知学中的一个单向通道概念，很可能是因为单配偶对认知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大脑一旦进化到这个状态，就不会轻易退化回去了。单配偶要求雄性和雌性相互之间非常包容，而同时对其他同性又非常不包容。正因如此，单配偶的灵长类最终都非常看重领土的主权，每一对都要占据它们自己的领地。这种对同性的不包容，在单配偶物种之外的哺乳动物中非常罕见，它使得同性的个体很难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当它们都达到青春期，开始生育之后。跟其他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一样，完全形态的单配偶制（也就是所有个体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单配偶形态）是一种很特别的进化状态，它要求在行为和认知上有很大的改变。一旦形成了就很难再回到过去，因为这样的变化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的。记住这一点，在以后我们讨论人类配偶关系（或可称为单配偶）的进化时，会显出它的重要性。

鉴于单配偶制有着非常特殊的进化历史，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

下，为什么说单配偶的形态是社会和交配体系进化的结果。关于哺乳动物的单配偶制，历来有三个不同的假设性解释，其一是对双亲共同抚养的需求（抚养脑容量大的后代，往往需要两个家长）；其二是雄性要保证有交配对象（当雌性居住得太分散时，雄性无法保证同时保护到数个雌性，因此他会专注于一个雌性，以保证在她发情时能让她受孕，也保证她不会被其他雄性占有）；其三是婴儿被杀的风险（雌性会依赖于某一个雄性的保护，有点像雇佣一个枪手或者保镖，以防止其他雄性的骚扰或伤害她的婴儿）。一直以来，杀婴风险都被认为是存在于灵长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大容量的大脑使得灵长类的生育率降低（因为大容量的大脑需要更长的发育时间）。一个雄性，如果从另一个雄性那里接手一个雌性，至少要等一年才可能有自己的后代。但是，如果他杀死雌性的婴儿，雌性很快就会回到能怀孕生产的状态（顺便带一句，人类女性如果失去未断奶的婴儿，也是如此），[3] 雄性就能马上开始生育他自己的后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雄性灵长类有杀婴现象，是因为有着巨大的进化选择压力。杀婴行为在灵长类中异常普遍（虽然很多人还是会坚持声称这只是偶然现象），反过来，为了降低这种风险的抵抗策略也承受着巨大的进化选择压力。

苏珊·舒尔茨和基特·奥佩的第二个课题，专注于研究在各条灵长类支线中，向单配偶形态的进化究竟是出现在代表上述三个假设的行为发生变化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有证据显示，单配偶形态和雌性散居于各处的形态同时存在，共同进化（这两种形态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但是，雌性的生活范围并未在单配偶形态出现之前增加，这就意味着配偶保护这个重大的假设（即假设因为雌性居所太过分散，导致雄性不能同时占有几个雌性）并不能成立。事实上，单配偶的灵长类物种中，雄性并非不能同时保护多个雌性，如果他们想去保护的话，雄性的活动范围依然大到足以保护多个雌性。在雌性生活范围太过分散的情形下，配偶保护的确是大多数哺乳动物走向单配偶的原因，但是，灵长类显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也有证据显示，单配偶和双亲抚养同样是共同进化的。但是，单配偶形态的出现，无论在是否双亲抚养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这就说明了双亲抚养是单配偶形态的结果，而不是促成单配偶形态产生的起因。一旦单配偶形态成立，雄性就能从抚养婴儿中得到更多好处，因为这能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后代。但是，雄性抚养婴儿的能力，似乎不足证明它是单配偶形态产生的原因，至少在灵长类中是这样的。最后，单配偶和杀婴风险这两个不同的指标，显示出紧密的共同进化关系。如果没有杀婴的风险，多配偶形态不可能进化到单配偶形态，至少在灵长类中是这样。看来，杀婴风险似乎是进化到单配偶这种配偶制度的最关键因素。

在单配偶的配偶制度中，虽然雄性为雌性提供了保护，但这种形态并不是应对杀婴风险的唯一方式。桑迪·哈考特（Sandy Harcourt）和乔纳森·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的研究显示，大猩猩会用雇佣军的形式来降低杀婴风险，但是同时结合了后宫式的多配偶制，也就是几个雌性依赖同一个雄性的保护。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物种的雄性和雌性体型上存在的巨大二态性（dimorphism）[4]，使得体型庞大、体力强健

的雄性比体型较小的更受欢迎，这在同时也形成一种反馈机制，促使雄性变得越来越强壮。相反，传统上单配偶制的灵长类，比如长臂猿，以及体量更小的新大陆猿猴，雄性和雌性在体型上相差不多（事实上，雌性可能还比雄性稍微更大一些）。大猩猩群体中的社会形态和更加社会化的猿猴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雌性经常以互相梳理为基础组成不同的联盟。大猩猩的社会架构是星形的，雄性在中心，雌性围在他的周边。每个雌性会和雄性一起梳理，但雌性之间很少互相梳理。哈考特—格林伯格模型解释了大猩猩中的后宫模式，它也解释了黑猩猩的杀婴风险还没有高到让雌性黑猩猩采用雇佣军的策略。

以后在研究智人的社会演化时，依然需要记住这些通用的规则，我们相信，和其他所有灵长类一样，智人的生活也要服从这些社会和生育进化选择压力的作用。而最基本的要点是，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雌性将面临更多的压力，而雄性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如果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它们就无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也无法进化成有更大脑容量的物种。一旦因为气候的变化，进而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时，它们必将走上灭绝之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事实上生存了下来，那么，它们一定是找到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类演化故事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原则，那就是大脑容量和时间分配。大脑容量决定了应对环境变化而生成的群体大小，群体大小和环境因素决定了时间的分配，这些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新的进化就不会产生。在下一章里，我会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描述这些因素对人类演化的五部曲有什么具体作用。

注释：

[1] 最近， Grueter 等人（2013）提出梳理时间是由灵长类的陆地性决定的，和群体规模无关，因此，梳理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卫生，而不是社交。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基于一系列的谬误之上，因此无碍于我们的理论。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所采用的旧大陆猿猴数据，却明确地证明了我们在图2.1中表述的关系，也就是和陆地性无关（参见Dunbar和Lehmann的论述，2013）。无可争议的是，梳理确实能去除杂物和寄生虫，从而保持皮毛的清洁，但是，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梳理是否也有额外功能，有益于社交关系的发展。

[2] 通过重新构建灵长类发展史中相关变量的祖先状态（基于基因相关性的家庭族谱，能够把所有现存物种追溯到距今约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共同祖先），然后再研究在进化到现代物种的过程中从一个状态通向另一个状态的次序。要成为一个行为或社会组织变化的诱因，一个选择性压力的变化必须先于它所影响的行为变化本身。这里所运用的统计方法基于贝叶斯统计学，它代表了旧的解决方法的重大革新。要了解更多有关贝叶斯的新方法，请参考Huelsenbeck 等人的论述（2001）。

[3] 这是由于婴儿吮吸乳头，导致月经荷尔蒙系统受到抑制的结果。但是，当婴儿断奶后，吮吸的频率降低到一定数值以下时，月经荷尔蒙系统又会恢复正常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雌性在婴儿死去或被杀之后会立刻回到正常的月经周期，人类也是如此。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样的机制。

[4] 成年雄性大猩猩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在第一章里我说过，在探索人类演化的架构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关键要素，那就是大脑容量假设和时间分配模型。在这两个要素之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搭起一个梯架，把在化石记录中出现的各个人亚科物种有序地置放在这个架子上，从而分析出他们是如何应对所处的环境的。同时，他们也给我们设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以分辨他们在行为和认知上不同寻常的部分，从而证明时间的安排必须满足大脑容量变化所带来的需求。

社会大脑假说

一个大致公认的看法是所谓灵长类（或许也包括所有哺乳类和鸟类）大脑的进化，其实就是更为复杂形式的社会性的进化。虽说其他方面的行为（比较明显的是生态上的创造力）也和大脑容量有关，但这些是脑容量加大后的结果，而不是脑容量加大的进化起因。在大多数的哺乳类和鸟类中，社会大脑假说体现在大脑容量和配偶制度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单配偶制的物种比起多配偶制或滥交型的物种，大脑容量明显更大，这一点在那种终生维持单配偶形态的物种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对于这种结果，我们的看法是，能够拥有长期伴侣的，在认知程度上比随便滥交的更高。因为厮守的伴侣在做任何决定时都必须能够考虑到另一半的利益，必须能够权衡双方的需求，从而做出恰当的妥协和折中。事实上，这就是意念化的早期表现，虽然还算不上是完整的心智理论能力。巧合的是，社会大脑假说在某些昆虫中也成立，比如黄蜂和隧蜂，社会性物种（如几个蜂皇共享一个蜂窝的）的大脑容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蕈形体，也就是大脑中主管认知，特别是社会性功能的部分）比独居物种的要大很多。更进一步的发现是，即使在同一物种中，更加社会化的个体（如蜂皇），比起其他普通个体（如工蜂），大脑的容量要更大一些，类似的情形在鱼类中也同样存在。

在灵长类中，或许还包括其他一小部分哺乳类（比较明显的是大象和马），社会大脑的影响表现在该物种的大脑容量和它们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所有这些物种都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在感情上有亲密的成分，但是和交配及生育无关，也就是我们说的友情。这种友情关系和麋鹿及羚羊等群集哺乳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是那种今天来明天走的松散随性的关系。相反，灵长类之间的友情和伴侣关系类似，就像其他哺乳类或鸟类中因生育而建立的伴侣关系一样，它们需要大脑的力量来管理。而作为一个个体，有能力同时管理多少这样的关系，就在于它的大脑有多大的容量。

群体规模取决于认知能力这种现象在灵长类身上得到了体现，社会群体的大小和大脑容量的大小之间这种正相关的关系证实了社会大脑关系（图3.1）。社会大脑假说在近期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有神经影像研究表明，大脑关键部位的大小和个人社会网络大小（包括脸书［Facebook］好友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人类和猴子身上同样存在，这个发现对于社会大脑假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且，很

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神经影像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物种，如此一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表明了社会大脑假说不仅适用于不同物种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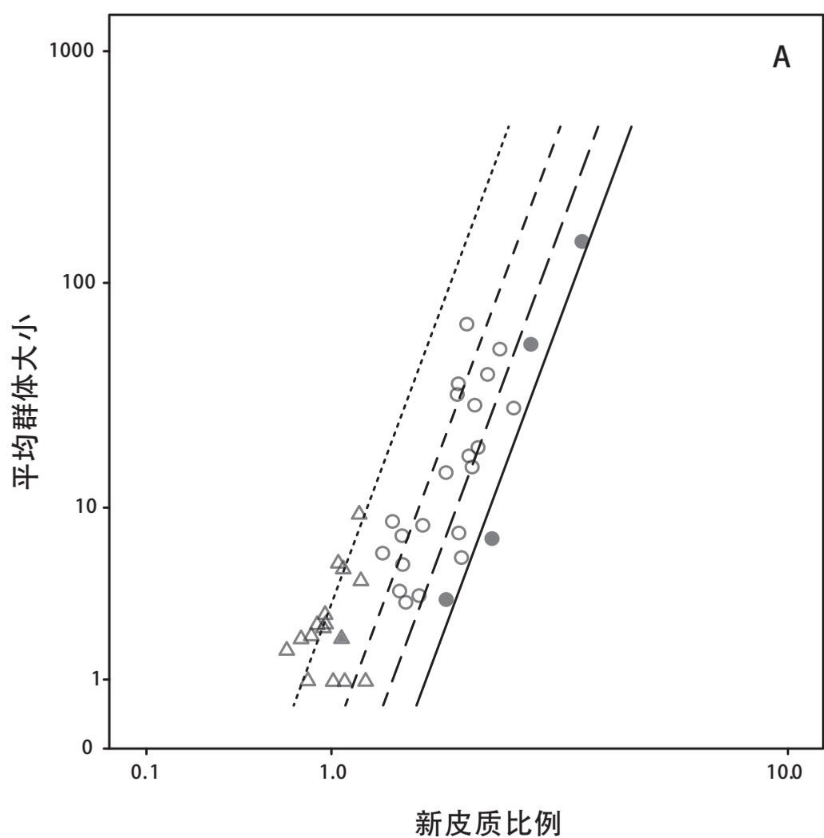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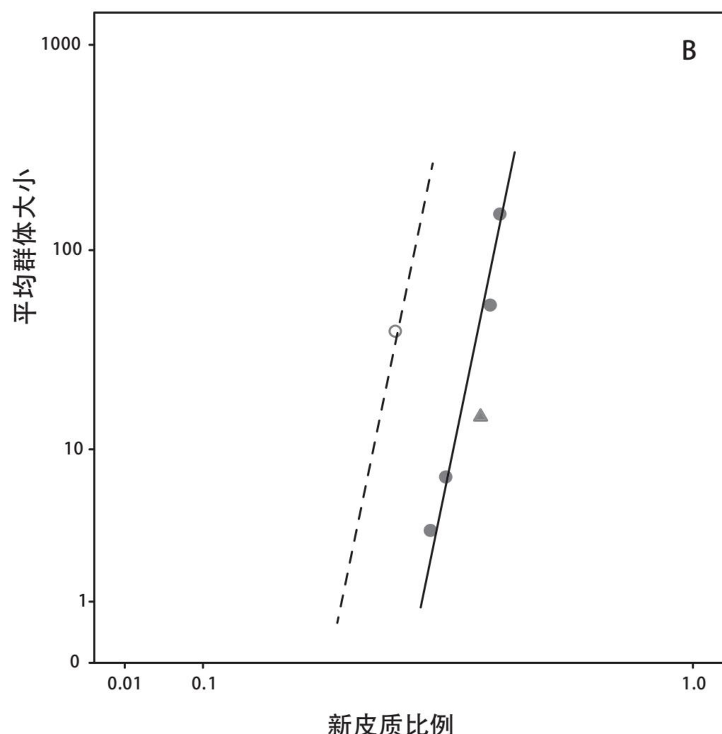


图3.1

社会大脑关系，物种群体规模平均值和（a）新皮质比例、（b）额叶比例，两者都是相对皮层下大脑的比例。



● 猿：灰圆圈和直线

○ 猴：白圆圈和虚线（代表猴子中不同的社会认知程度）

△ 原猴：白三角和虚线

▲ 在（b）中，黑三角代表红猩猩，猴子是猕猴。

根据：Dunbar（2010）重新制作。

在这本书的大多数篇幅中，我在大脑容量这个概念的运用上是相当宽泛的，而事实上，这个关联只和大脑新皮层（neocortex）的容量有关，比较研究和神经影像研究的结果表明，尤其关键的是额叶部分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关联实际上就是行为复杂度和大脑（具体来讲就是大脑新皮层）容量之间的关系，而群体的大小是个辐射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个体所能够管理的关系数量基于它的社会行为的复杂度，而社会行为的复杂度则基于它的认知能力（这就和大脑容量有关了）。这一点我们能在灵长类身上看得很清楚，灵长类的数个行为指标都和新皮层的容量相关，这些指标包括了梳理群体的大小、联盟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计谋的策划和利用、雄性擅长的交配策略以及用面部表情和声音表演的复杂程度等。大群体比小群体的社会关系更复杂，因为在其中会有

更多的伴侣亲友关系需要管理，因此，社会群体大小规模是一个衡量社会复杂度的便利标准。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群体大小是个体行为和认知能力跟外界环境的接口（也因此是动物解决它们的生态问题的界面）。

虽然看起来社会性是大脑进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动物生态和生存经历[1]的其他方面也和大脑容量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几乎恰恰都是大脑成长的制约因素。在生长的过程中，脑组织发育速度是固定的，因此，大容量的大脑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生长发育，没有捷径可走。这就意味着至少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必须要有更长的怀孕期和哺乳期才能生成更大的大脑。而且，正如一台没有软件的计算机就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还必须有更长的社会化时期（主要是在从断奶到开始生育这段时间里）来让大脑适应大千世界里的不断变化和各种微妙繁杂之处。通过对神经影像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人类大脑的生长发育时间长得令人吃惊，大约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段漫长的时间就是为了让大脑适应社会的复杂性。

大脑的生长和维护成本都非常高昂。一个成年人的大脑，从重量上来说，只占了体重的2%，可是这2%却要消耗人体每日摄入总能量的20%。所以，以重量计，大脑消耗了十倍于它应该消耗的能量（而这些能量，还仅仅是维持大脑存活的那部分，并不包括在忙碌工作运转时所需要的能量）。因此，拥有高效率的觅食策略从而获得足够的额外能量，就成为大容量大脑物种的头等大事。有些食物（明显的比如树叶）吃起来太花时间，营养成分也不够高，所以，改变食物是物种进化到大容量大脑的前提。我们可以把食物看成一个灰色的屋顶（有这样的联想，主要是因为大脑里的灰质是最要紧的部分），它给物种在认知和社会性的能力上设置了一个限制。

和所有其他哺乳类（包括猿亚目的灵长类）不同，猿猴（类人猿灵长类）有自己独特的大脑进化轨迹，主要是在前额叶部位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大脑区域。在他们关于灵长类大脑进化的重要著作中，神经心理学家迪克·帕辛厄姆（Dick Passingham）和史蒂文·怀斯（Steven Wise）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肯定了前额叶区域对类人猿灵长类的独特意义。类人猿灵长类因此拥有了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包括了通过不经意的学习而掌握的一定的推理能力，以及对未发生的行为结果做出判断和比较的能力。通过神经影像研究，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关联，那就是眶额皮质的大小决定了意念化的能力，而意念化能力又决定了社会网络的大小。这种情况下，图2.4所列出的猴、猿和人类在意念化能力上的不同，会对这些物种（化石人亚科也介于这些物种之中）在社会性和文化性方面的表现产生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会在第八章中再次展开讨论。

前额叶似乎也和抑制冲动反应（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强势反应的抑制）的能力相关，它使动物忍住冲动，对没有立即到手的奖赏保持耐心，而不是一有可能就要把奖赏抢到手。相对来说，人类尤其擅长这一点。生活在大型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体中，能够忍耐延迟得到的奖赏非常重要，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个体才能抑制某些自私的欲望，从而

能够和其他成员共享成果。额叶越大的物种，越能更好地控制自身冲动的本能，比如在面对其他个体的行为时，能保持冷静，压抑愤怒，避免冲突。

人类和社会大脑

我们的故事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肯定社会大脑假说能给出一个精确的等式，由这个等式，我们能从大脑的容量推断出社会群体的大小。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关于现代人类——我们这个演化故事的终点，社会大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图3.1中的数据很清楚地组成几条平行斜线，最明显的是图中有关猿的数据，出现于图的一侧。从左到右排列，这些斜线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认知复杂程度的增加。因为人类归在猿科之中，所以，我们在计算人类群体大小时，要用到猿类的等式，而不是用整体灵长类的等式。代入现代人类的新皮质比例，用猿类的等式推算出来的群体大小是150人左右，人类真的就生活在这么小的群体中吗？

事实上似乎的确如此。寻求答案的方式之一是研究狩猎—采集社会（hunter-gatherer society）的人口调查报告，这样的社会折射了我们在大部分进化历史中生活过的小型社会。在过去的二十万年间，人类大脑容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社会形态特别适合于测试我们的公式。这样的研究如同从高处往下俯视，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分布情况，并描述出社区的空间结构。跟大部分灵长类一样，狩猎—采集者们居住在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团体中，这些层次相互交叉，其中包括了家庭、营地小组（小队）、社区（宗族）、同族社区（大队）和同族同语言社区（部落）等。图3.2描述的是狩猎—采集社会在家庭（对于社会大脑的故事来说，家庭这个层次显然低得不足以说明问题）以上的各个层次大小的分布。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只有一个团体层次的大小是典型的150，也就是我所说的社区层次。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中，这个层次的人是共享狩猎—采集区域的，也共享一些特殊资源，比如永久水源或者圣地，他们通常会以一年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举办诸如成人礼等比较隆重的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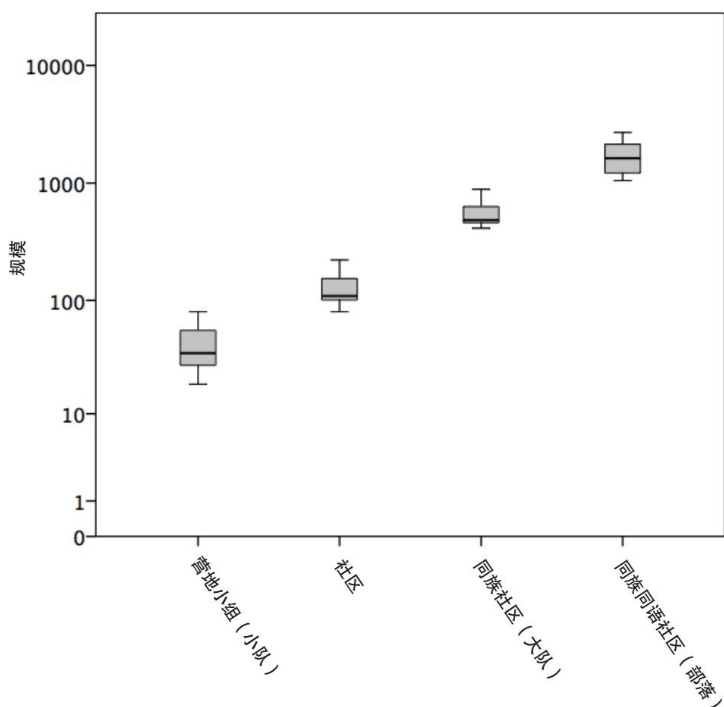


图3.2

小型狩猎—采集和园耕社会中主要群体层次的中间值（50%和95%的范围）。

表3.1中列出了典型的150人规模的社会团体通常有哪些，列举的包括古老村落的规模、基督教不同分支教区的规模以及商业和军事组织的规模等。比如在现代军队中，能自主行动的最小单位是连，而连队大小规模的平均数几乎刚好就是150（范围大致在120到180之间）。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让人们列出他们身处的整张社会关系网，而这实际上相当于以个人的角度从下往上仰视世界。我们做过几个测试，有时是请人们列出他们邮寄圣诞卡的完整名单，有时是请人们从他们的通讯录中挑出所有他们在乎的人。在一个圣诞卡研究项目中，得出了154这个平均值，和150相当接近。在另一个大数目的样本研究项目中，请妇女们列出她们社交圈里的人数，结果也给出了接近150的上限。另有一批研究者曾经致力于分析推特社区的大小规模（也就是在推特上互相关注的用户，基于大约一百七十万人数的样本）和电子邮件社区的大小规模（有电子邮件来往的人们，样本规模约一千万人）。结果，他们发现典型的互动社区的规模也是在100到200人之间。最近一项

面向一百万名脸书用户的调查显示，朋友圈的大小是有差别的，确实有为数不多的用户朋友数量可达到五千左右，但是，朋友数量超过五百的用户总数其实非常之小，大多数人的朋友数量在150到250之间（其实，用户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朋友到底是谁！）。

	典型规模
新石器时代村落 （中东，公元前6500–5500）	150—200
小队（“双世纪”） （罗马军队，公元前350–100）	120—130
英国土地志（公元1085） 平均村庄大小	150
18 世纪英国村庄 （郡平均值）	160
部落社会 （平均值和社区范围；N=9）	148 （90—222）
狩猎社会 （平均人数；N=213）	165
哈特派农庄 （加拿大）（平均值；N=51）	107
内布拉斯加阿米什人教区 （平均值，N=8）	113

	典型规模
英国教会会众 （建议的最佳大小）	200
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山区社区	197
社会关系网的大小 （平均值，N=2 “小世界”实验）	134
Gore-Tex公司工厂人数	150
连队（二战平均值和范围；N=10）	180 （124—223）
圣诞卡邮寄名单 （平均总人数；N=43）	154
研究专业 （科学和人文学）（mode，N=13）	100—200

表3.1

社会大脑关系，物种群体规模平均值和（a）新皮质比例，（b）额叶比例，两者都是相对皮层下大脑的比例。

数据来源：Dunbar（2010）。

据社会大脑假说预计，现代人类“自然”的社区大小是150人，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系统和非系统的证据所肯定。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还需要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确定这个社会大脑等式对广义的化石人亚科能做出什么预测。这将会搭建起一个关键的框架，在此框架之内，我们得以分析评估人亚科在人类演化每一个阶段的行为。我们会着眼于头盖骨的大小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脑并非充满整个头盖骨，所以

我们会对头盖骨的大小做些相应的调整。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各物种生态压力的差异，不同物种的大脑在各个区域会有不同的进化速度。例如大猩猩和红猩猩，它们有硕大的脑袋，但你一定想不到它们的新皮质相对来说其实很小。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小脑比较大，[2]所以它们能更好地在树枝间平衡身体。如果单纯地使用头盖骨大小的数据，那很可能会夸大它们新皮质的大小（或者，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夸大它们额叶的大小），继而因此夸大它们社会群体的大小。维持身体的平衡是小脑诸多功能中的一项，所以双足行走的人类的小脑比四足行走的灵长类要大，因为直立行走难度更大，更需要保持平衡。所以，当我们利用头盖骨的大小去预测直立行走的化石人亚科的社会群体规模时，很有可能会夸大了。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来看看头盖骨大小和化石人亚科社区大小规模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套用类人猿的社会大脑等式，用头盖骨大小来预测化石人亚科群体大小时，我们得出图3.3中的图形。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只显示了头盖骨大小的变化（图1.3），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每个人亚科群体的社区规模的特定数值以及它的可变程度。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每个物种必须能够保持住作为完整社会存在应有的群体规模，并且能够解决相应的时间安排问题。可想而知的是，古人类学家会说图3.3中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化石智人和现代人的行为可能非常不同，所以它们的大脑也是非常不同的。实际上这种解释也不是很切实际，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亚科两端的现代人和黑猩猩的确切群体规模数值，除非我们能够确认黑猩猩和现代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灵长类）都适用社会大脑假设，而在这两者中间的数百万年间化石智人神秘的有一套完全不同于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大脑和社会化规律，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人亚科在这两极的中间是如何分布的。最谨慎的假设是它们的群体规模也和大脑容量有关，除非我们有原则性的理由来推翻这一点，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原则性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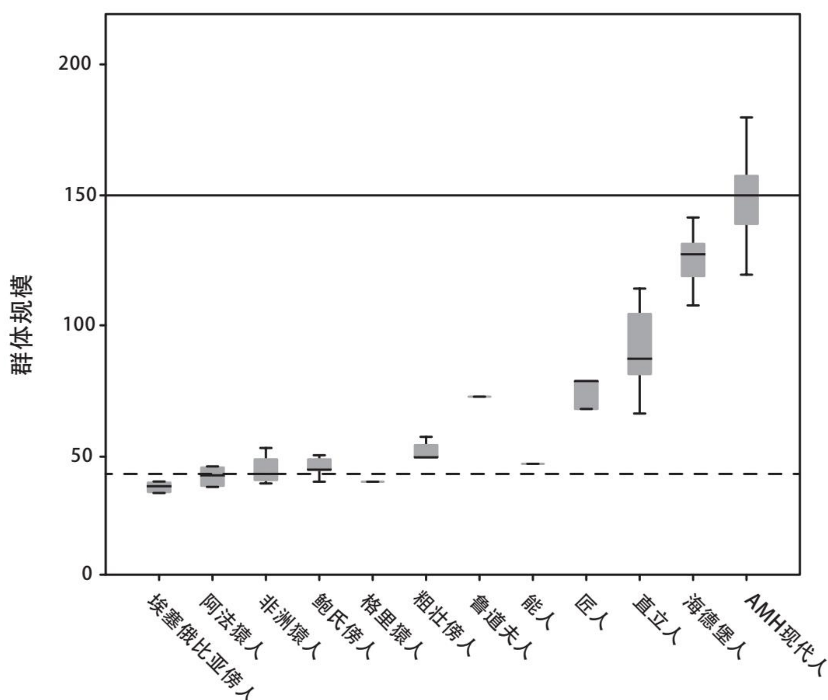


图3.3

主要亚人科物种的群体规模中间值（50%和95%范围），通过转换颅腔容量（图1.3）和新皮质的比例，再将之代入图3.1的猿类公式中而得出。水平直线是现代人类的群体规模（150），虚线是黑猩猩群体的平均规模。请注意，尼安德特人没有包含在内，其原因我们会在第六章中再讨论。

假如一个社区并不是一个社区

在这里，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解决另一个困扰了我们很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类社会大脑的故事。或许，现在你觉得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是150这个结论已经盖棺论定，被广泛接受了。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相当多的证据能够证明，社会大脑等式确实能预测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但是，仅仅有了这些证据并不能阻止对现代人类真正群体大小的争论。

考古学家通常会指出，从考古记录来分析，他们所能看到的典型社区是猎人们过夜的营地。社会人类学也一直有此传统，把这些营地（也就是小组）看成是现代狩猎—采集人群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根据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上的差异，这些营地通常有30到50人。而有些社会学家则倾向于另一极端，认为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远远高于150人。他们有两个依据，一是传统社会部落中的同族人，一是某些声称自己朋友众多的社交达人，按这个观点来看，自然群体的规模将远超200，大约

在500到1,000之间。

这些不同的观点听上去虽然都很有趣，似乎也有点道理，却给我们出了个难题。除非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否则的话，我们无从获知智人进化的路径最终指向何方。如果说，考古学家的观点是对的，人类群体的大小是50人左右，那么，自从我们和黑猩猩分开之后，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进化了（因为黑猩猩的群体大小是55）。那就是说，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也没必要费劲写这本书了。相反，如果社会学家的观点是对的，人类的自然群体非常大（或根本就没有自然群体大小这件事），那么，社会大脑的故事对150这个数量的强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误导。

其实，要想冲出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也很简单。人种学的证据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营地（小组）并不是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组织单位。因为这样的小组结构很不稳定，个人或家庭的加入和离去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它们的成员甚至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有较大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一个家庭加入一个新的营地时，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同一个150人的群体（社区或者宗族）。加入一个全新群体的可能性毕竟很小，除非受到很大的环境压力或是遭到了驱逐。同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包括现代的狩猎—采集人，认识的人的确有可能会超过150个。但是，以150人为界，这个层次之内还是之外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通常会把层次之外的称为熟人，他们算不上是朋友或者是让我们在乎的那种关系，而只是你看到会认得的人。我们在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在150人这个范围，形成了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线内的人是你的朋友，你们有着交往的历史，相互信任，是你有担当有互惠关系的朋友，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你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线外的人只是你的熟人，你们的关系松散随意，没有互惠的来往，交往的历史也不长。对这些线外的人，我们明显没有那么慷慨。是的，我们在脸书上的好友越加越多，但是，我们并非和他们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友谊。我们只是把脸书网络延伸到了熟人的层次（500人的层次），这些熟人其实已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简而言之，其他研究者定义的不同群体层次固然存在，如图3.2（以及图3.4）所示，它们是群体层次重叠交叉的一部分。社会大脑关系特别定义这150人层次为现代人类的群体，就像其他猿猴的自然群体一样。和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们也总是可以找到别的重要的群体层次。但那并不是一回事，不同的群体分层方式揭示的是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质量。而且，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它们起到的作用也非常不同。在第八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个150人分层法之所以重要，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原因：它是我们判断亲属关系的一个界限（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会把亲属关系正式定义到超过150人的层次）。正因为这个层次对应了社会大脑关系中的灵长类社会群体，所以也正是这个层次的规模才是我们最为在意的。

灵长类社会体系的结构复杂性

我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将社会群体想象成同类人的群体（也就是说，在群体中大家相互都是朋友）。虽然从广义上来讲，这个假设对于大多数物种是成立的，但是，大型灵长类群体和人类社区一样，呈现出高度结构化的形态（图3.2）。大概正因为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成因在于个体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它的梳理伙伴，它们成为群体中的核心联盟），才使得灵长类能够生活在这样大型的群体之中。如第二章所述，这样的联盟化解了生活在大群体中的风险。同时，这种结构也制造出了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对类人猿灵长类提出了认知上的更高要求，这一结果最终成为了这个物种的特征。

从图3.2中明显可以看出，在环环相套的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狩猎—采集社区是其中的一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典型（我们都生活在这种交叉重叠的社会层次中），也是大多数猿猴社会的典型。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分析了图3.2显示的宗族数据中的群体大小，运用分形数学来寻找数据中重复出现的模式。结果，我们发现了这些社会层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比例系数，每一层的大小都是它内层大小的三倍。以狩猎—采集社会的数据为例，显示出的层次大小依次为50、150、500和1,500：三个由50人组成的营地组成一个关联的社区（clan），三个关联的社区组成一个同宗社区（mega-band），三个同宗社区组成一个宗族（部落）。而圣诞卡数据中的联络密度（专注于150人以内的群体关系）也显示出完全一样的模式，增加的比例几乎刚刚好就是3，而内部层次的大小依次是5、15、50和150。因此，在这两组数据之间，显示出一个自然群体层次的大小，从最里面的5到最外面的1,500，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模式，大致上就是5-15-50-150-500-1,500。可喜的是，之后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从不同的狩猎—采集群体数据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3]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其他生活于复杂社会群体的哺乳动物中（黑猩猩、狒狒、大象、鲸鱼等），也发现了同样的层次结构大小比例，这个结果可能说明了在具有复杂社会体系的哺乳动物中，这是一个最具特征的普遍存在的模式。

图3.4显示了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你在图的最中间，周围是一圈圈人数渐多的层次。就人类而言，我们可以将这些层次按照关系的远近分为亲密朋友（最里层的5人圈）、最要好的朋友（15人圈）、好朋友（50人圈）、朋友（150人圈）、认识的人（500人圈），以及脸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1,500人圈）。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最为内部的四个层次（到150人圈）里，大概一半是家人一半是朋友。而150人往外的层次里，基本上都是些平时随机认识的人，很少有家人。一个明显的假说是，智人社会的进化是由黑猩猩社区的50人核心圈往外延伸，依次达到150、500和1,500人层次。虽然我们在灵长类、大象和鲸鱼食人鲸的群体中都发现了同样的增长系数，然而，我们仍然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个系数几乎总是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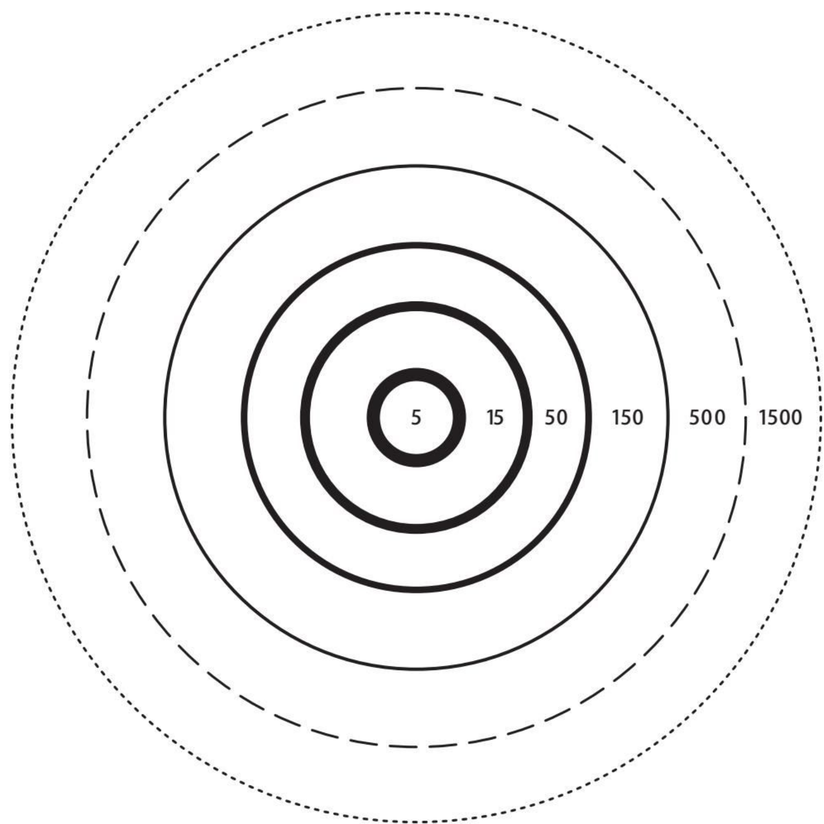


图3.4

熟人的圈子。我们的社交网络由一系列层层包含的圈子组成，每个层次都比它紧邻的内部层次大三倍。在我们的150人社交圈的层次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500人层次（熟人），另一个是1500人层次（名字和脸对得上的人）。

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不同物种的社会体系的复杂程度主要在于层次的数量，而不是在于层次本身的大小。比如说，人类有六个层次，黑猩猩和狒狒只有三层，而智商更低的髯猴只有一层（或者最多两层）。维持这种多层次社会体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物种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所以需要有进化到容量足够的大脑来完成这些意念化的能力（图2.4）。有些间接的证据来自比较分析的结果，就像博古斯瓦夫·帕夫洛夫斯基（Boguslaw Pawlowski）和我的研究都发现，在灵长类中，拥有更大新皮质的物种能更好地整合运用两种不同的社会策略（个体优势vs社会联盟）。在一次完美的田野实验中，托尔·伯格曼（Thore Bergman）和雅辛塔·贝纳（Jacinta Beehner）展示了狒狒的能力，实验证明狒狒能把个体的血缘关系和它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优势联系起来，但又能够把这两种关系分得很清楚。而智商较低的物种比如髯猴就做不到

这一点，它们的群体结构相对简单，只是基于个体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髯猴的群体较小。

这种架构确实反映出了个体和群体中其他个体交流的程度（对猿猴来讲，就是互相梳理）。就我们人类社会来说，我们每个人大约40%的社会精力，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是给予最亲近的5人圈的，也就是5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或者说，60%是给予最亲密的两个层次中的15人，剩下的40%给了再往外两个层次中的135人（图3.5）。正如山姆·罗贝斯（Sam Roberts）和我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交流的频率和感情上亲密的程度密切相关。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变化展开了为期18个月的研究，结果发现当朋友间的交流频率下降时，相互间感受到的亲密度也随之下降。在随后的分析中，亚里·萨拉迈基（Jari Saramäki）运用同组数据发现了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他发现我们每个人在分配社会精力时都有一种类似指纹的独特特征，即使在我们的社交圈成员发生重大变化时（比如某人离开家乡，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这种方式也依然不变。

和猿猴一样，我们也把社会精力集中地放在对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上，也就是那些紧密关系中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我们获得感情上或者其他方面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同时也会保持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从中获得各种不同形式的发散型支持。在社会学论著中，这两种关系通常被称为是强关系和弱关系，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措辞。请注意，社会学的论著中只区分了两种关系，而图3.4明显地列出了四种。

这些数据再次强调了社交互动对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猿猴来说，都具有同样的分量（图2.1）。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对所有灵长类来说，梳理时间的管理和分配有多么重要。由此，我们就自然地进入架构的另一半，也就是时间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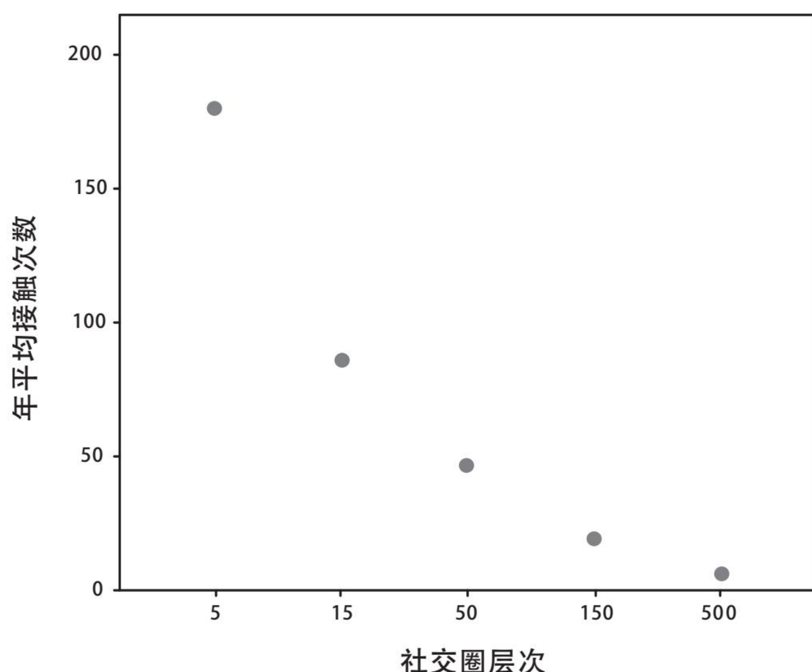


图3.5

我们和社交网络中不同层次内的人接触的年平均次数。数据基于对英国和比利时251个女性全部社交网络的研究。本图根据Sutcliffe等人的图表重绘（2012），数据来源：Roberts等人的论述（2007）。

为什么时间如此重要

时间分配模型，是我们这项任务的第二个关键性基础。这些模型，是我、朱莉亚·莱曼（Julia Lehmann）以及曼迪·科斯特斯（Mandy Korstjens）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这些模型在接下来的几章中将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将会向我们展示，化石智人是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的。这些模型，结合社会大脑关系假说以及考古数据，将成为帮助我们认识智人社会进化的支点。

时间分配模型在概念上非常简单，源于对动物生活习性的观察。动物为了能够在某个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要保证的是维持摄入的营养和付出的能量相对平衡，其次还要保证它和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保证营养的摄入必须安排足够的时间来觅食（这个时间包括了行走和进食所需要的时间）。社会凝聚力的保障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有利于凝聚的行为，对灵长类来说，这种行为就是相互梳理。这样一来，剩余的时间只需要再安排一种主要的活动，也就是休息。这种休息不是那种无所事事

的意义上的休息，而是被动地保持安静的状态。比如在中午时分，因为天气过热而必须停止活动，或是为了获得充足的消化时间，对于以树叶为食的物种（folivore）来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4]

利用对野生猿猴研究得出的数据，基于不同的食物结构、当地气候、社会群体大小等变量，我们总结出一条公式，计算出各物种在进食、行走、休息等项目上所花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计算出正常的一个白天（对热带地区的猿猴来说是12个小时）中还剩下多少醒着的时间。然后，根据这个时间（图2.1给出了梳理时间和群体大小的关系），计算出社会群体的规模有多大。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果，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物种只能形成三到四个个体的群体，那它们就很难在那里生存下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么小的群体，根本无法抵御来自于天敌的威胁。

图3.6展示了时间分配模型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首先，出发点是某一特定地区的气候，气候是直接或间接（如对植被的影响）决定时间分配安排的核心元素。之后，在这个出发点之上，我们可以计算出在这一地区所能够形成的群体的最大规模。我们研发了多个模型，这些模型分别属于六个非洲猴属，一个南美洲猴属[5]以及所有四个猿属（即长臂猿、红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每个属的公式略有不同，因为不同属的动物的体型和身体构造（尤其是消化系统）略有不同。比如猴子能消化未成熟的水果，而猿（当然还包括我们人类）却不能，这就意味着它们觅食的方式因此会有很大不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主要会用黑猩猩的公式[6]，因为黑猩猩标志着古代智人从类人猿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自然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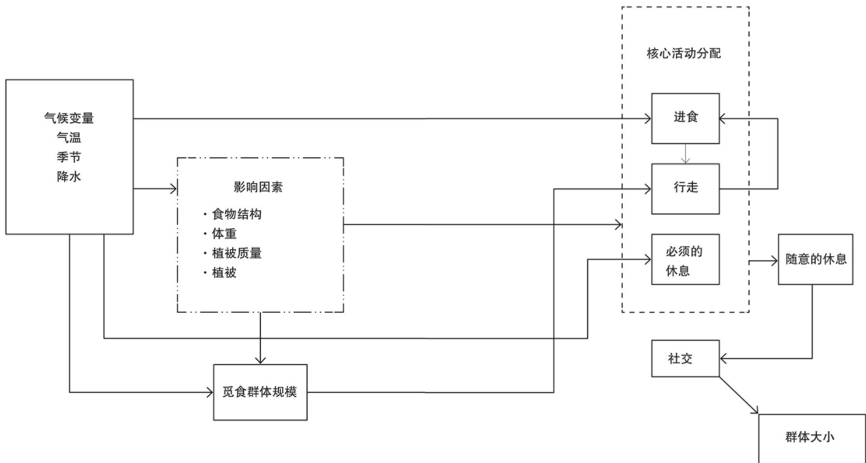


图3.6

时间分配模型的基本架构。气候和物种的生理适应性决定了在进食、行走以及必须的休息（动物为了避开高温或为了消化而必须休息的时间）之间的核心时间分配，剩下来的时间（可随意休息的时间）可分配一部分给社交，而这个时间决定了动物在

栖息地所能维持的最大群体规模。

对灵长类来说，觅食群体的规模是对付天敌的主要防御手段。大部分物种的觅食群体和生活群体是同一个，但是，在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中（比如黑猩猩的群体），群体会在觅食时分成小群体。猿类的觅食群体规模对行走所需要的时间有着巨大影响。

参见Dunbar等人的论述（2009）。

从这组公式中，浮现出一个尤其令人欣慰的发现，我们只需要得知三个气候的变量，就能预测出各灵长类物种在时间分配上的构成，这三个变量就是降雨量、气温和一定的季节指数。这一发现真是我们的幸运，这样一来，首先，我们只要掌握相当之少的情况，就能准确地预测整个大陆上各物种的分布情况。其次，正因为我们不需要很详尽复杂的气候和环境数据，所以就很容易将这个模型运用到更古远的时期，而相对简单的气候指数通常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测算的。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模型非常直接。其规模未必最大，但其中的社交时间等式是它们最为重要的元素，因为这个元素直接决定了一个物种所能维持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灵长类以互相梳理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群体，相对应的结果是，社交性梳理时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图2.1）。既然社会交往时间和群体的大小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准则，如果它们明确了自己希望生活在什么规模的群体中，就能够确定在梳理上应该分配多少时间了。一旦群体的规模开始逾越它们能安排在梳理上的时间，考虑到在时间分配上的别的需求，那就意味着时间会短缺，因而不能保持应该保持的梳理密度，以维系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的结果是群体就会分裂，并最终分成两个或更多个各顾各的小群体。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分配模型并不是用来确定某个物种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的群体大小，而只是明确了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可能形成的群体最大规模。它们并非一定要形成这样规模的群体（考虑到这样做的成本，见第二章），不过，确定的一点是，它们所处的群体肯定不可能超越这个规模。

虽然这些模型只是基于几个气候变量，但是结果出人意料，用这些模型来预测物种适合与不适合生存的地区，效果非常好。我们把这些模型放在一整片大陆的范围里加以测试，用以预判已知的不同物种的生物地理分布。我们的做法是选取一个大陆，比如非洲大陆，先把这片大陆分割成一度纬度乘以一度经度的方块矩阵，确定这些方块的气候概况（数据通常来自大型的气候模型）。然后，再把这些数据放入相应模型的等式之中，来算出这个各方块中群体的大小。最后，把我们预测的数据和实际生活在那里的物种相比较，答案吻合得出乎意料。实际上，即使和生物学中最好的传统生物地理模型相比，我们的答案还是要准确一点（其中的缘由，很可能是因为时间分配模型给出的是更精微的量化结果，而生物地理模型只给出存在或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判断）。

通过对这些猿类模型的研究，有几个重要的发现对于我们这本书来

说很关键，所以让我把它们详细地列出来。首先，制约类人猿生物地理分布的主因就是行走（或者搬迁）的时间（图3.7）。就类人猿来说，影响它们行走时间的有两个因素，其一是生存环境的富饶程度（由图中的降水量来决定），其二是觅食群体的大小。后者也非常重要，部分原因来自于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竞争，也有部分原因是类人猿只吃成熟的水果，所以它们的食物通常会消耗得更快。当猿类走出湿润的赤道森林地带，尤其是当整个群体始终在一起觅食时（图3.7），行走所花费的时间很快就会成为关键的制约因素。正因为如此，猿类的生活区域被限制在赤道周围一片狭长的地带之内。与之相反的是，狒狒（Papio属）则受限于它们进食的时间成本（比如，每分钟能摄取多少食物），但相对来说对行走时间不敏感（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吃不熟的水果）。这样一来的结果是狒狒的分布地比猿类要广阔得多，它们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生存，除了沙漠或者密林之外。既然早期人亚科比现代猿类生存的范围要大得多，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是如何应对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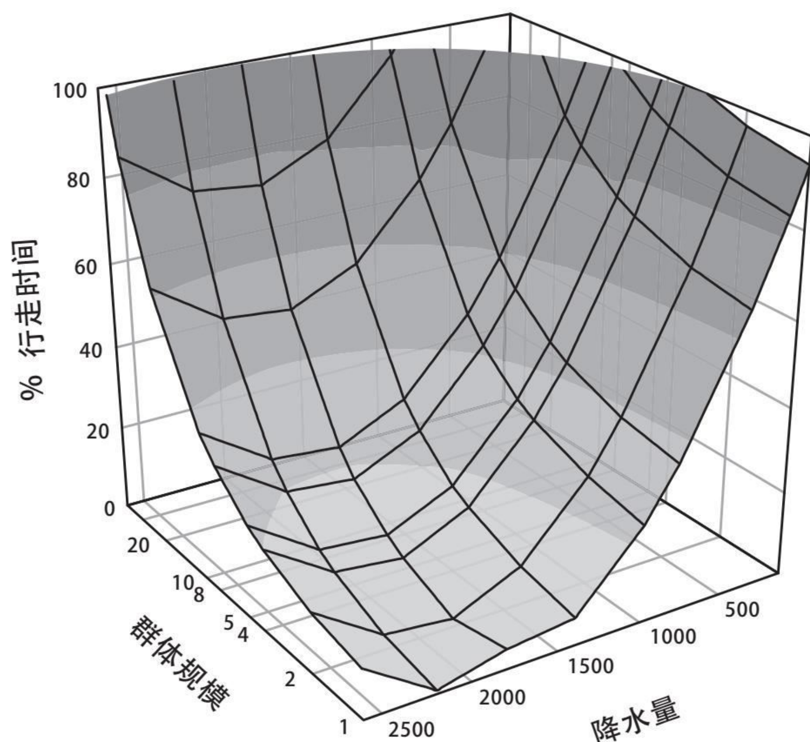


图3.7

猿类每天在不同进食点之间行走所花费时间的百分比。本图在黑猩猩模型的基础上，预测了在一个特定的栖息地内，分配给行走的时间、进食群体的规模以及栖息地

质量（这里用年平均降水量来标识，因为一般来说，降水较多的栖息地比较富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行走时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和栖息地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变得更像草原）而成指数级增加。如果以典型的50到80只黑猩猩群体作为一个觅食群体一起行动，那么，一天里光是花在行走上的时间就要超过100%。而事实上，很少猿猴物种会花费高于20%的时间在行走上，为了将行走时间降到最低可行范围之内，黑猩猩群体必须打散，形成更小的群体分头觅食（通常以3到5只为单位）。

参考Lehmann等人的论述（2007）。

其次，黑猩猩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就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时分时合的社会性（fission-fusion sociality），这种社会性抵消了大量行走带来的高成本。所谓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就是一个群体能在白天分裂成几个小的觅食群体，这样它们行走的时间就会大大降低（图3.7）。如果黑猩猩必须以一个大群体为单位来觅食，那么，不管它们生活在哪里，时间都会不够。狒狒生活在更为干燥的环境中，它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行走，用以进食或休息的时间很少，更不要说用来社交互动了。事实上，即使在黑猩猩现在生存的环境中，它们最多也只能维持10到15的群体规模，而这个规模的黑猩猩群体其实是无法生存的。既然黑猩猩在相对比较富饶的环境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人亚科在进入不那么富饶的大草原时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了。

第三，如果用我们的模型来预测将来，假设在下个世纪的过程中气候逐渐变暖的话，那就意味着猿类和旧大陆食叶的猴子，比如非洲叶猴（African colobine）和亚洲叶猴（Asian leaf monkey），都将灭绝。因为它们在对食物的要求上缺乏弹性，无法适应气温的升高。而事实上，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食物上，非洲猿类已经抵达它们所能适应的气候变化的极限了。红猩猩就是游走于极限边缘的代表，在后冰河纪的大约一万年中，随着气候的变暖，它们的觅食群体大小已经不断缩小到了极限点（也就是趋于单独觅食）。它们的生存区域也被逼得越来越靠近赤道，接近生存的极限，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即使在没有人类不断破坏森林的情况下）。在上新世（Pliocene）气候不断变得干燥的过程中，智人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被迫搬迁到更开放的环境中去。

第四，把黑猩猩分布图和它们的天敌（主要是狮子和猎豹）分布图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黑猩猩的生物地理分布受制于它们的天敌。它们能对付一只非洲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同时来两个就难以招架了。虽然从时间分配模型上来看，黑猩猩在安哥拉和南部刚果生存下去应该毫无压力，但是，这些非洲大猫阻止了黑猩猩占有那里的大片地盘。这对我们是个提醒，即使对于体型庞大的灵长类物种来说，天敌的威胁依然不可小觑。同样道理，早期智人很可能也会面临这些困境。

我把这些要点着重列在这里，以此来说明时间对于动物的重要性。如果因为当地气候的原因而必须在某一种活动上多花时间的话，动物们很快就会发现，白天就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赖以生存的活动上了。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不能从别的地方省出这些时间，那么它们就不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这些都是不能小看的问题，它们是一个物种存活还是灭绝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的两章里，我大致勾勒了一个无论是化石人亚科还是现代人类都能适用的架构，同时，我也提供了一些工具，以评估物种因时间分配而带来的进化压力。只有首先意识到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假设它们在解决时间分配这个难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途径，以及它们最有可能选择哪个途径。接下来的每一章，我们将依次讨论在第一章中列出的过渡阶段。首先我们会用社会大脑关系假说测定相关物种的群体规模，然后用时间分配模型来揭示这个物种为了生存所必须做出的改变。

注释：

[1] 生存经历指的是决定个人贡献后代能力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生殖能力、孕期和哺乳期的长度、发育的年龄以及寿命），再通过后代来影响整个人口的动态性以及进化。

[2] 小脑是长在大脑后侧下方的一个像大脑的小球体。这是大脑很古老的一个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大脑各部分的认知处理，以保证每一步骤都按照应有的顺序得到及时的处理。因此，它能保证四肢活动的平衡协调，对身体的运动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支线的小脑相比其他灵长类要更大一些，部分原因在于双足行走需要更复杂的协调。不过，它的功能不仅限于运动，似乎对思维处理程序的协调也有作用。

[3] 这个研究（参见Hamilton等人的论述，2007）得到的缩放比例是3.8，结论中实际缩放比例是4。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用的群体大小是以个体为基础（即群体大小为1），而不是用第一层次的群体大小（5的层次）。如果我们忽略个体，按他们自己的数据得出的缩放比例是3.3，和我们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参见Zhou等人的论述，2005），起点是5，而层次大小和我们数据发现的一样（参见Hill等人的论述，2008；Lehmann等人的论述，2014）。

[4] 树叶细胞受到纤维素的保护，哺乳动物吃树叶不易消化。和反刍动物一样，食叶性灵长类也是依靠细菌的发酵打破细胞壁而释放营养，这个发酵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在这期间动物需要保持静态，否则细菌发酵就会被抑制。

[5] 属（genus）是一组关联性极强的物种，通常有着相同饮食和体型结构。

[6] 这个模型的全部细节可以在Lemann等人的论述（2008b）中找到，对那些现在就想知道的，等式如下：

进食时间%＝0.96＋1.04*（干旱月份数［降雨量＞100毫米］）＋0.21*（群体规模）

行走时间%＝102.14-0.11*（年度降雨量，毫米）＋0.00003*（年度降雨量，毫米）2＋2.597*（觅食组规模）

觅食组规模%＝21.49＋0.07*（森林覆盖率，%）-0.33*（月平均降雨量，毫米）＋0.001*（月平均降雨量，毫米）^{2}

强制休息时间%＝-29.47＋1.28*(年平均气温，摄氏度）＋0.34*（食物中树叶%）＋5.95*TmoSD

社交时间%＝1.55＋0.23*（群体规模）

最大可容忍的群体规模可以这样计算：（100-（进食＋行走＋休息）-1.55）/0.23

休息时间和社交时间是灵长类的通用公式，进食和行走时间公式是黑猩猩特有的。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1978年，化石专家玛丽·利基（Mary Leakey）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利特里（Laetoli）发现了一条绵延35米的足迹化石带，在人类进化的故事中，这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标志性时刻。化石形成于三百六十万年前，共有两行成人足迹和一行小孩足迹。这些脚印印在一层薄薄的火山灰上，附近的莎迪曼火山（Mount Sadiman）当时刚喷发了一次。随后的一场小雨使得脚印变硬成型，当更多的火山灰飘落，这些印记就被封存了。这两个成人一前一后地行走着，他们的脚印多多少少有点重叠，而那个小孩则在他们之间穿插着，小脚印忽左忽右。这些足迹几乎和现在人类的足迹一模一样，和猿类的很不一样。他们的步伐不大，全足落地，说明他们是在悠闲地散步。当中一段，在他们的足迹间，还留下了一串早期非洲马的脚印。这些印记简直就是一幅在时光中凝固的家庭场景图，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其实，到这些足迹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琢磨了近半世纪的南方古猿化石。大约五十四年前，1924年的一天，南非解剖学家雷蒙·达特（Raymond Dart）打开了一箱在汤恩（Taung）采石场发现并收集的化石。第一眼看见那片有一点残损的头骨时，他以为这只不过是狒狒的头骨化石残片。经过更细致的研究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手里捧着一个重大的新发现：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猴或猿的头骨，而是原始智人的头骨。这片头骨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被命名为“汤恩幼儿”的那片著名的化石，也就是最早被发现的更新纪灵长类“猿人”（ape-man）。随后的几十年中，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猿人化石被大量发掘。这些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完整而复杂的先祖传承树图，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这段进化史上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在南非的这一连串发现最主要的连锁反应是扭转了人们原先的看法，不再认定人类的祖先来自于亚洲，而是把人类进化的中心移到了非洲。自此，没有任何一个后续的考古发现能够说服我们改变看法。

从最后共同祖先（LCA）到南方古猿的过渡延续了大约数百万年才最终实现。但是，最晚在四百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双足行走猿类的分支，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有着它们相当成熟的集中生活区域（图4.1）。事实证明，这条支线兴旺发达，以至于在之后的两百万年间，经常出现几个物种同时共存的局面（图1.2）。当其他猿类仍然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时候，南方古猿已经适应了热带森林之外有着丰富水源的林地以及林地边缘地带，南方古猿因此成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



图4.1

大致上南猿分布的主要区域

▲ 鲍氏傍人和埃塞俄比亚傍人

▲ 粗壮傍人

□ 湖畔南方古猿

● 阿法猿人

● 非洲猿人

★ 格里猿人

参见Klein（2000）。

谁是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的阵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属，这个属中的一部分在进一步进化之后，成为后来的南方古猿属（也就是最终成为了我们人类的那部分）。另一部分是粗壮型的傍人属，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分支，在纤细型的南方古猿灭绝之后，傍人属灵长类仍然生存了很长时间，大概直到一百四十万年前才消失（图1.2）。这两部分的灵长类在体量上的差别远远小于脸部构造上的差异，后者有着强壮的咬肌和臼齿，以及和大猩猩一样硕大无比的头盖骨，那是它们强大咬肌的支撑。对应这种生理结构差别的，是它们不同的食物结构。纤细型南方古猿因其生态学角度的灵活性，能适应更多不同种类的食物，而强壮型灵长类似乎倾向于进食更加粗糙的食物。

关于南方古猿这个种类，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它们和其他猿类有什么不同，而是在于它们和猿类没有什么不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们的脑容量并没有比黑猩猩大多少（图1.3）。除了有较大的臼齿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唯一实质性的进化就是能够双足行走。当然，几乎所有猿类都能够双足行走（当然，有些走得更好些），而且，也确实会时不时地走几步。

和现存的猿类相比，南方古猿在骨骼结构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从猿类典型的手长腿短变成了更接近于人类的腿长手短。猿的体型是为它们攀爬树枝设计的，有双腿支撑身体，长臂可以够到稳固的枝桠，身体就可以晃悠到更高的树干上去。而南方古猿的体型更像人类，虽然没有后来的智人属那种特征性的修长下肢，但是它们的体型是为了在平地上直立行走而设计的。它们的身体于是呈现出很多双足行走的特点，比如骨盆是更接近于人类的碗型，因此可以在直立行走时兜住腹腔内的大肠，这种结构就和猿类更加长方形骨盆有很大的不同。还有，腿骨在臀部连接处形成了一定的角度，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的直立姿势。它们的胸腔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后来的人类相仿，呈现出桶状的特征，但又不完全一样，胸骨下部还有点像猿类那样外翻。还有一个可能是重要的一个特征，它们的枕骨大孔处于头骨的下方，所以头颅能够平衡在直立的脊椎之上。所有四肢行走的猿猴的枕骨大孔都在头骨的后部，即使在四肢着地爬行时头也可以往前看。但是以我们人类的这种结构，如果手脚并用地爬行，只能低头看地了，做任何其他动作都会很费劲。和直立行走相关的证据，最强大的证据就是利特里的那串伟大的足迹。虽然南方古猿显然还是很善于爬树（身手肯定比现代人类要敏捷得多），但是，它们的双足已经开始向人类靠近了，明显的特征就是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长成了一排，而其他猿猴的大脚趾长在边上，能灵巧地勾住枝桠。

因为粗壮型的南方古猿走自己的路，和走向现代人类的那条支线分道扬镳了，所以，我的侧重点将会放在早期纤细型的那条支线上。和生活在森林里的表亲相比，这条支线的进化之路可谓绝顶成功。随着气候变化，非洲热带森林逐渐消失，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表亲们最终灭绝了。可是，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又是怎么应对这一切，并且成功进化的呢？关于这一点，卡洛琳·贝特里奇（Carolin Bettridge）作了深入的研究，利用时间分配模型进行推演。以下的论述，主要就是基于她的研究结果。

为了更好地运用时间分配模型，我们必须了解知道南方古猿在哪些地方生存了下来，以及在哪些地方没有生存下来。我们必须明确这些不同地方的气候，并把相关的参数代入我们的模型，然后再来看，这个模型推测出来的各个地方南方古猿群体是什么规模。如果这个模型能准确推测出适合以及不适合南方古猿生存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化石物种和现在生存于此处的参照物物种有着哪些相同的饮食生理及运动限制。当然，如果我们的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很令人欣慰。但事实上，在科学领域里，最有意思的案例却往往出自那些错误的预测，或者，至少不完全正确的预测。正是这些案例，让我们再去潜心探究需要调整的地方以及调整的程度，从而得到一个模型，能让大家都心服口服。接下来的第二步很关键，它让我们得以研究南方古猿真正生存过的生理和解剖学空间，就此，我们才能够确定，为了进入并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它们身上究竟发生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使用某一特定时间分配模型的目的，比如说，当我们使用黑猩猩模型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去证明某一化石人亚科（或化石猿类）就和黑猩猩一样。相反，我们是用这个模型作为基准，来测试有关这个化石物种基于其一系列生理特征之上的行为的各种假设。实际上，我们是以我们的理论为工具，拨开遮蔽于表面的各种芜杂繁乱，从而直抵事物的本质。所以，一个模型所做出的预测越准确，这个过程越有效。在进化生物学中，这种方法就是人们所说的逆向工程，它已经被证实是解析适应性进化的有效途径。科学哲学家有时把它称作“强推理”，它能够让我们对结论更加确定，这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定性，而且还要定量，这就使得整个过程比纯粹的推理更加缜密严格。

走到现在这一步，还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社会大脑关系。图3.3告诉我们，南方古猿的群体规模并没有比现在的黑猩猩群体大多少，所以，和黑猩猩相比，它们也不需要更多的额外社交时间。和黑猩猩在时间分配上的唯一不同，可能就在于觅食和休息的时间，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有望简化了。

关于时间分配模型，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南方古猿到底是生态上的猿还是生态上的狒狒，猿和狒狒这两种模型都曾经被提议用在早期古人类上。猿和狒狒在时间分配上所受的限制是不同的（猿主要受限于花费在行走上的时间，而狒狒主要受限于花费在进食上的时间），这给了我们清晰明了的比较，也部分地折射出这两类[1]在生理上的不同之处，和所有旧大陆的猴类一样，狒狒也能食用未成熟的水果，而猿类却不能。如图3.7所示，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恶化，猿类为了寻找成熟的水果，行走时间大大增加。相反，狒狒因为能够食用未成熟的水果，食物来源比猿类多得多，所以就不必将大量时间花在到处行走寻找食物之上。另外，狒狒的体型特征也使得它们没有像猿类那么受限，狒狒的长腿大脚让它们能够适合在陆地上的快速行走。就是这

些区别造成了这两个物种在地理分布上的巨大差异，这在非洲猿类身上尤其明显，它们被限制在赤道周围有热带森林和成熟水果的低纬度狭长地带之内。

花粉颗粒化石等等植被记录能让我们对该化石区的气候形成一个大致的概念，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数据，还不足以为我们的时间分配模型提供准确的气候数值。传统上确定细节化气候情况的方式是，根据该化石区的哺乳动物化石特征，在该化石区所在的大陆上找到一个相似的现代区域，然后对这个现代区域的气候数据加以采用。这种方式背后的逻辑是，不同动物物种有着非常独特的生态位，也就是小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位对植被有特殊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气候有特殊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不太可能随着地质化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种对生态位的要求基本上是维持不变的）。关于这一点，牛科反刍动物（长角羚属）通常能提供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因为不同的物种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态要求，而很多物种中的科属至今还在该物种的化石区好好地生活着。

贝特里奇把相应的气候数据用在了所有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地区，以及几个没有发现化石的控制位点（不过，这些位点也生活着其他灵长类，主要是狒狒等，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控制位点也并非完全不适合灵长类居住的）。将这些数值代入黑猩猩的模型，结果相当惊人，如果南方古猿就是普通的黑猩猩的话，那么，在所有南部非洲地区的位点上，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群体规模小得可怜（大多数远远低于10）（图4.2）。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结果属实的话，那么它们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它们在这些地区活得很好。即使在两百五十万年前，气候变得凉爽，它们承受的压力也减轻的时候，群体大小依然没有超过15，大大低于现代黑猩猩的群体大小（最低要求是40）。这些位点上的时间分配模型显示，对于通常居住在相对干燥的环境中的南方古猿来说，行走的时间成本倒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起码知道，不管它们的前身是什么，它们绝对不是生态上的黑猩猩。相反，若是采用狒狒的模型，依照南方古猿体型调整其体重，我们会发现，它们应该适合于生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从来没有发现南方古猿的踪迹，所以它们也不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狒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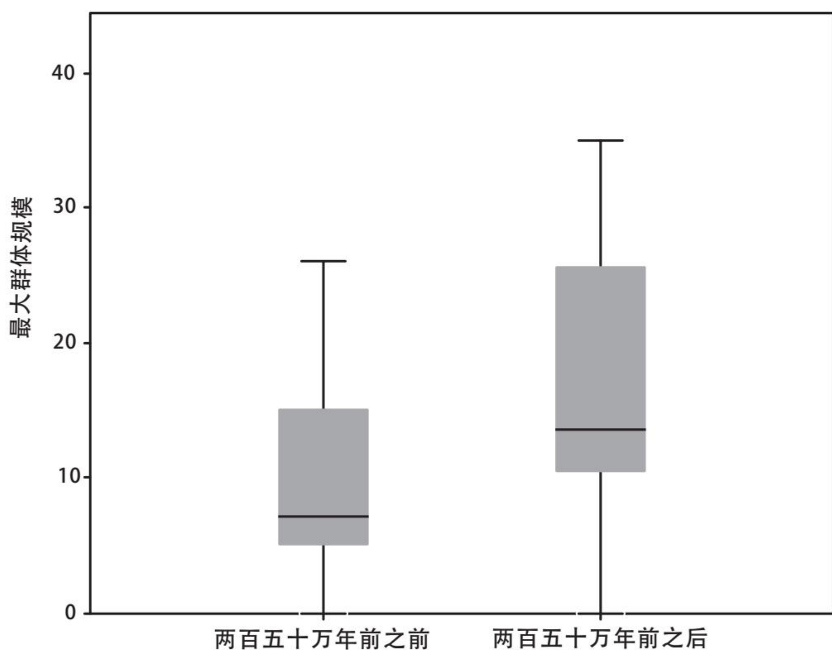


图4.2

早期（两百五十万年前之前）和晚期（两百五十万前之后）南猿的群体大小最大值的中间值（50%和95%的范围），是用黑猩猩时间分配模型测算的。数据来源：Bettridegge（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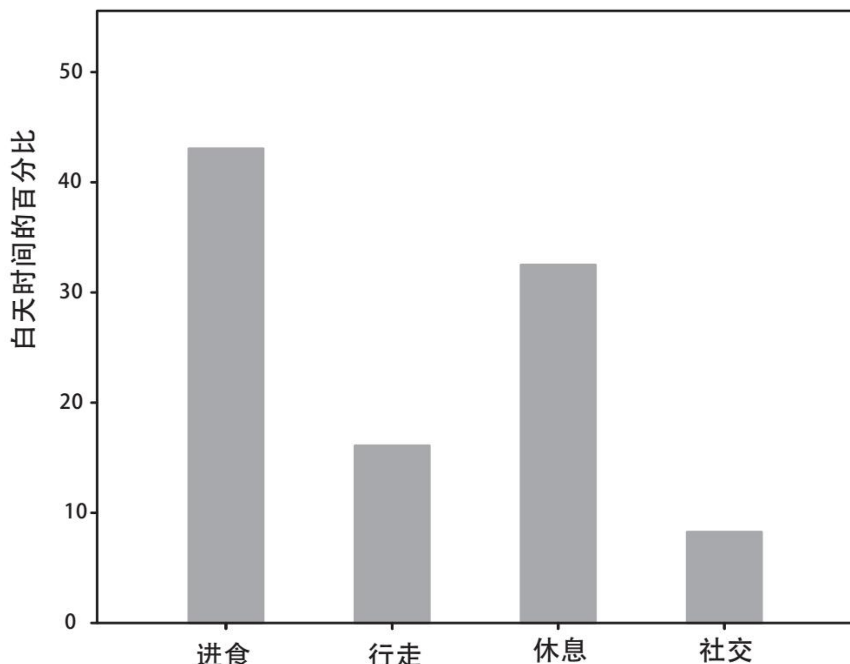


图4.3

南猿的时间分配。根据Bettidge（2010）的模型测算。

虽然用猿类的模型预测出来的大部分南方古猿的群体大小为零，但是，实际上，在南方古猿生活过的位点上，用这些模型预测出来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太过偏离平衡点。图4.3是四组关键行为的平均预估值，把这些平均值相加，得出的结果是107%。恰恰是这多出来的7%使得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互相梳理，以保持和它们的大脑容量相符的群体大小。想要在别的行为中省出这7%的时间是有难度的，不过这个数量级的过度花费还是可控的，在不牺牲群体规模的前提下还是有可能弥补的。它们也显然做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确在这些地方生存过。那么，南方古猿是如何解决它们在时间分配上面临的问题呢？

双足行走会是一个答案吗？

一个可能性是双足行走的确给了灵长类一些优势，它们显然在很早以前就拥有了这种不寻常的适应性进化方式，因此，可以说，双足行走在很多方面定义了南方古猿。早期古人类因为腿比猿类更长，所以每一步都迈得更大，如此一来，行走同样的距离，它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比猿类少，也可以说，花费相同的时间，能走得更远。

运动的生理学告诉我们，从耗氧量的角度来说，由于要弯曲膝盖，

双足行走比起猿类的四足行走略微低效。这主要是因为在双足行走的时候，长方形的坐骨（也就是盆骨两侧连接大腿肌肉的部分）会碍手碍脚。而智人骨盆形状经过变化，成为现代人这样的碗状，使得我们的大腿能够无障碍地迈动，走路时不再需要弯曲膝盖，可以大踏步直腿行走。另外，现代人在臀部和足部有着解剖学意义上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给了我们富有弹性的前推力，使得我们在行走时比黑猩猩节省75%的能量。例如，我们的足弓有软骨组织联接骨头，这些软骨组织的作用就像弹簧一样，在每一步的行走中释放能量，给我们额外的前推力。但是，南方古猿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双足直立行走，和我们现代人类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只能推断说，到目前为止，双足行走对它们来说仅仅是拥有步幅更大这点优势。当然，这个优势至少让它们站了起来，并为后来的进化开启了臀部和足部的适应性演变。罗伯特·富力（Robert Foley）和莎拉·埃尔顿（Sarah Elton）把双足和四足行走于地面以及攀行于林间的能量消耗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如果有超过65%的时间是在平地上活动，双足行走就比四足行走更有优势。因此，更多的平地生活似乎就成了转变的关键。

南方古猿的雌性腿长估计约52厘米，而黑猩猩雌性腿长只有44厘米。这个长度虽然不能和雌性匠人（腿长近80厘米，比黑猩猩长出81%）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将根据黑猩猩模型推测出的16.4%行走时间，压缩到14%的实际行走时间，这里节省了将近2.5%，也就是所需要弥补的三分之一。而行走时间的减少意味着为补充行走能量而进食的时间也相应减少，所以总共大约减少了3%。（我会假设在这里省下来的时间，并不会消耗在因为追求更大生活空间而产生的行走之上，没有证据显示，南方古猿并不像后来的智人那样四处漫游。）就凭着这个节省下来的百分比，这点收获可能足以让灵长类站起身来迈开腿。但是，即使在最佳生存环境中，灵长类还差四个百分点的时间短缺，如果环境不那么好的话，时间上的短缺就会更多一些。

双足行走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身体的散热。在相对开阔无遮蔽的环境中，四足行走的躯干要比双足行走吸收更多的阳光，因为站起来后，被晒到的体表面积就缩小了，尤其是在中午最燥热的时候，烈日当空，只有头顶和肩膀会被阳光暴晒。因此，四足行走比双足行走体温会升得更快，而大脑对温度很敏感，如果大脑的温度比正常的升高1摄氏度，就很可能中暑。一旦中暑，那么在短短的时间里，脑细胞就会开始死亡。如果能够将吸收的热量减到最低，即使在最热的正午时分，双足行走的动物也能维持更长的活动时间。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休息的时间，如果天气太热，所有哺乳动物都会找个阴凉的地方，避暑休息，而不是继续觅食。但是，如果能够在最热的正午时间依然保持活跃，减少4%的休息时间，那么，这多出来的4%就足以弥补图4.3中所示的短缺时间，解决了时间分配上的难题。

现代人类身上有两大特征，不仅仅在所有灵长类中独一无二，而且也和体温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征之一是身体表面大部分的皮毛都退化了（除了头顶以及极少部分的胸背部位，而这两个部位恰恰最容易在正午受到直晒）。特征之二是大幅增加的出汗能力（我们的汗腺比其他灵长

类要多好几倍，除了也在开阔地带生活的狒狒）。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研发的生理模型显示，减少日光的直接曝晒，再配合由出汗带来的体温下降，能让裸体的直立智人比四足行走动物有更多的活动时间，而且，能够以一升水的供给走两倍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汗水从毛发上蒸发只能冷却毛发的发梢，要想使得毛发之下的皮肤受益，那只有裸露的皮肤才能从出汗中感受到降温的效果。

惠勒的这个热负荷模型近来受到不少挑战，生物学家格雷姆·洛克斯顿（Graeme Ruxton）和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就指出，走路本身也会产生热量，这个由身体内部产生的热量，必须被加到由日晒所产生的热量之上。他们提出，既然有这个来自体内的额外热量，双足行走带来的优势就相当有限，而主要的优势则来自于毛发蜕化和出汗。一个长有毛发的南方古猿（不管它是双足行走还是四足行走），因为接受的叠加热量超过它散热的能力，那就不能在开阔地带生存下来。即使是没有毛发的动物，在中午时分的燥热中，也难以快速散热，以抵消过度的热量，如图4.4所示。实心的圈圈代表热负荷，水平的线条显示能够通过皮肤散去的热量（大约每小时100瓦）。在这个洛克斯顿—威尔金森模型中，从大约上午7点半直到下午6点，热负荷都会超过热散发。所以，这就意味着热负荷的理论并不足以解释双足行走的进化。但是，即使双足行走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产生的进化结果，那么毛发的蜕化仍然会因为散热的需要而发生。虽然他们没有就双足行走的进化原因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纠偏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这个理论可能颠覆了对双足行走优势的普遍认同。

巧的是，无论是惠勒的原始模型，还是后来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版本，都做了一个并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似乎至今还没有被人发觉。那就是，他们都假设地表的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当然，这个温度值对于海平面的高度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南方古猿事实上居住在海拔高于1,000米的高原，对于这个高度来说，40摄氏度就太高了，实际最高气温应该是低得多。气温的降低会大幅度降低热负荷，尤其是在正午的时候。在东部非洲35个南方古猿的居住地，年平均气温是25摄氏度。还有5个南部非洲的南方古猿居住地，年平均气温只有20.4摄氏度[2]，而在惠勒和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模型中，假设的平均气温是32.5摄氏度。这些降下来的温度，会使午间的热负荷降低200瓦，也就是说，南方古猿因此每天能多活动2.5个小时（见图4.4中空心圆圈部分）。换句话说，它们每天早上和傍晚可以活动四个小时而不超过热负荷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再回来深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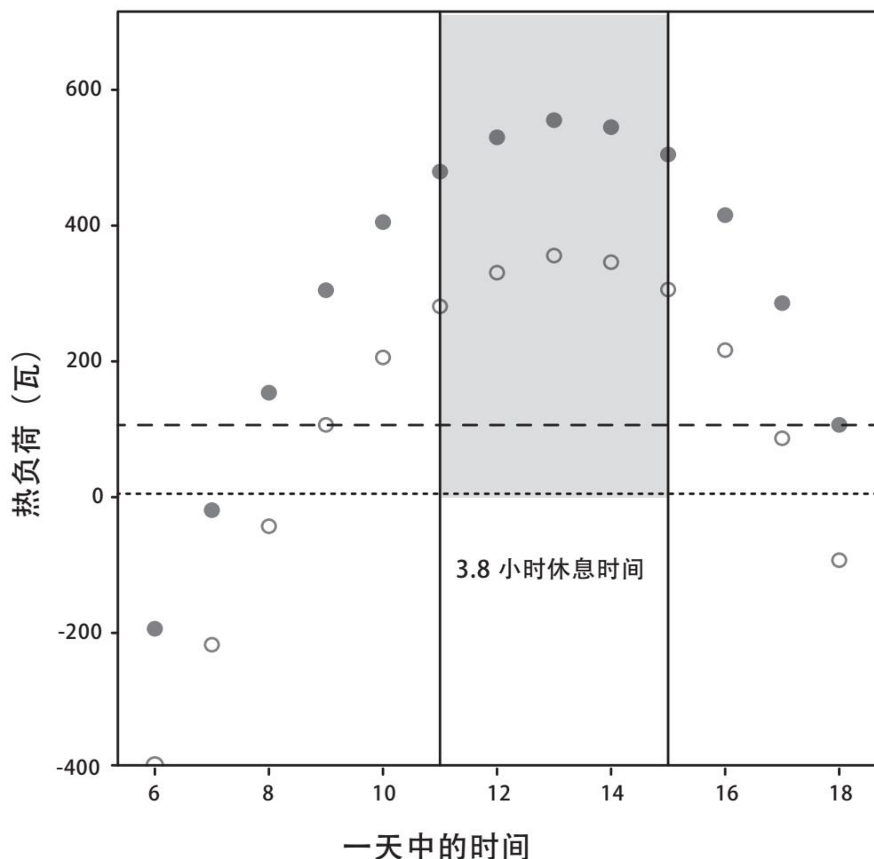


图4.4

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热负荷模型，假设了早期亚人科整天都在行走。黑色圆圈是他们预测的无毛发双足行走的热负荷，数据显示在大部分时间内，南猿产生的热量比他们所能散发（100瓦的水平虚线）的要多。白色圆圈代表南猿在实际栖息地较低气温的环境下所产生的热负荷，他们在早上和傍晚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贝特里奇模型预测南猿每天需要休息3.8小时，和所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猿猴一样，它们会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休息（阴影部分）。

近年来，出现了另一种假设，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这种假设认为，直立行走使得早期古人能够搬运食物，移到没有天敌风险的地方再慢慢享用。最近，对刚果北部湿地中涉水行走的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观察，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双足行走是为了更好地在湿地中觅食这个观点的兴趣。虽然偶然的双足行走可能在这些方面会给灵长类带来便利，但是，长期的习惯性双足行走会有什么优势还是不完全确定。偶尔，黑猩猩的确会在一些必要的情势下双足行走，用上肢搬运食物，这通常发生在抢夺食物的时候。但是，难以设想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必须长期（相对于偶尔为之）双足行走，用双手搬运食物到底能给它们带来什么

好处。就算真的有好处的话，搬运食物也更有可能是双足行走带来的结果，而并非起因。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搬运食物并没有使得进食和行走的时间有所减少，如此一来，这对解决早期古人时间分配问题有何助益就很难断定了。

如果说，双足行走带来的最大优势来自于散热效果，因为裸露的皮肤能出汗挥发，那么这个问题就集中在南方古猿有没有毛发。惠勒认为它们没有，但是，有其他学者认为，毛发的蜕化在一百八十万年前的智人身上开始，而我们知道，向双足行走的进化发生在更早的时期（最晚也是在五百万年前）。无论这第二种观点是否正确，有无毛发只影响到行走的距离和具体时间，并未影响到行走所花费的时间，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的是南方古猿时间分配问题中的遗留部分。假如出汗能让它们行走双倍的距离，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方古猿是否能够承担这双倍的行走时间，根据时间分配模型的推测，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毛发的退化发生在更晚的时候，与游牧性匠人的出现同步。

食物解决时间分配的危机

现存的黑猩猩有其解决时间分配问题的途径，那就是缩小觅食群体的规模（而不是社会群体的规模），从而大幅减少行走时间（图3.7），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进食和社交互动。但是，黑猩猩的觅食群体已经缩减至3到5，相比同样生活在开阔林地上的南方古猿，这样的群体规模已经处于觅食群体的低端，再缩减也省不出多少时间了。即使觅食群体缩小到1（也就是单独觅食），以行走时间计，这里的节省也是极为有限。图3.7显示，觅食群体从5缩小到1，只能节省1.4%的行走时间，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而且，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还另有一层担忧，还有天敌需要应对。红猩猩之所以能够单独觅食，是因为在它们的生活环境里，天敌不多，而且还可以躲进足够浓密的树林里。黑猩猩就不会像红猩猩这样走极端，单独出行觅食，因为它们时刻都要提防危险的天敌的侵犯。而对于南方古猿来说，它们很可能需要面对更多更危险的天敌，也没有树林可以作为藏身之处。所以，红猩猩的单独觅食策略对于南方古猿来说是不现实的，就算能够节省一些行走时间，结果却很可能得不偿失。

一种可能性是，南方古猿找到了一些更加高效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营养方面更加丰富全面，或者是更密集地大量出现，不必在行走上花很多时间，这样，它们花费在觅食上的时间就能相应地减少。化石在这些方面能为我们透露大量的信息，从牙齿化石的形状和大小，以及牙齿被食物磨损的痕迹和程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化石主人食物结构的状态。南方古猿有着大大的臼齿（其中强壮型南方古猿的臼齿更大），这说明了它们的食物相对粗糙坚硬，需要反复地咬啮咀嚼。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化石牙齿表面研磨留下的痕迹，这可能是硬脆的食物（比如坚果）留下的，也可能是地上的沙砾，或者两者都有，有沙砾表明它们有可能食用了从地下挖出来植物（如根茎类植物等等）。

近几年里，化学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碳原子有两种同位素，碳13（C 13）和碳14（C 14），因此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分解途径，也就是所谓的C3和C4途径。C4途径只存在于热带的青草、莎草、多肉植物[3]和某些甜菜属植物之中。而C3途径的典型代表是灌木和树木（猿猴类因此显示出以水果和坚果为主要食物的特征），食物中的碳元素是被身体吸收，并储存于身体之内的，因此，通过测量化石物种骨骼中碳同位素的比例，就能知道它们的食物结构。

经过对晚期南方古猿碳牙齿化石的同位素分析，我们发现，它们的食物比我们设想的旧大陆猿猴更多地基于C4。约三百二十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C4途径显示出折中的特征，和生活于同一地区的动物相比较，它们居于食草动物（grazer，如马科动物[4]、河马和疣猪等）和食叶动物（browser，如长颈鹿）之间，显示出它们的食物是部分而不是完全的C4食物。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它们的C4食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季节性和偶发性的特点。相反，黑猩猩和早期南方古猿（包括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和湖畔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的食物中却几乎没有C4的痕迹，虽然它们显然生活在以C4植物为主的林地上。所以，阿法南方古猿对C4植物代表了一个新的食物趋势，这个趋势被后期强壮型南方古猿特别是东非鲍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带向极致，它们的食物几乎完全倾向于C4植物。这种趋势似乎表明，晚期的南方古猿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非洲猿类有了很大的差异。

动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较强的C4特征，其一是直接食用C4植物，其二是食用吃C4植物的动物。至少在晚期南方古猿时期，骨头上有了切割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判断为南方古猿开始猎食动物，当然也可能是捡拾别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狮子和猎豹，也有可能是猎狗）的剩余。但是，猿类（包括我们人类）并不容易消化生的哺乳动物肉，食物中如果肉类过多，甚至可能导致蛋白质中毒，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这样的。当然，烧熟的肉类就不同了，烧熟后的肉类可消化率增加了50%。但是，这时的南方古猿多半还不会用火（见第五章），它们食物中的肉类，几乎没有可能会比黑猩猩的食肉量多出很多。

不过，它们把骨头敲碎倒是有很可能的，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吃到大骨头里的骨髓，甚至于头骨中的大脑脑髓，那就更好了，这两样食物都比红肉更容易消化。大部分大型食肉动物在吃完肉以后，对骨头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南方古猿在捡拾的时候受到的威胁就会小很多。粗糙原始的石头工具，大概出现在两百五十万年前，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奥杜韦石器（Olduwan toolkit），最初就是在东非的奥杜韦峡谷发现的。这些石器基本上就是有一些简单的边缘切割的石锤，具体派什么用场，我们仍然不清楚，但是，以它们的重量和形状，却是敲骨取髓的最佳工具。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迪基卡发现的三百四十万年前的蹄类动物骨头上，就留下了石锤敲击骨头痕迹，这些痕迹被视为敲骨取髓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也许就是它们制造这些工具的原因。黑猩猩正是用这类工具敲开好几种果实，包括几内亚椰果和可乐果（Coula edulis）等外

壳坚硬的果实。虽然这些结出坚硬果实树木并不长在开阔的东非草原和林地之上，但是，从用这种工具敲开坚果到敲开大骨和头骨，其实只是小小的一步之遥。当年，从湿润的森林进入更加开阔的领地，尤其是在大约两百万年前，非洲大陆的气候忽然急剧变冷变干燥，南方古猿很可能靠着这一招活了下来。作为食物的骨髓和脑髓，是否能让南方古猿减少足够的进食时间以解决时间分配问题呢？答案是可能的，可是，问题在于，即使这些工具能够证明南方古猿曾经敲骨取髓，但那也是在三百四十万年前，已经属于转变的晚期了，仍然不能为早期南方古猿解决时间分配的难题。

另一个解释是，白蚁很有可能是南方古猿的C4来源。白蚁是生活在巨大蚁穴之中的食草动物，是个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由泥土做成的蚁穴，硬得像混凝土一样，如果没有锤子这样的工具，很难把蚁穴凿开。只要有机会，黑猩猩当然也会吃白蚁，而且非常喜欢吃。但是，它们获取白蚁用的是很花时间的钓鱼方式，把草茎从蚁穴口探入，白蚁以为进来的是攻击它们的敌人，就会爬到草茎上开始反击驱赶，黑猩猩吃的就是草茎上带出来的白蚁。这种方法很不错，但是效率低下，几乎不可能节省下来大量的时间。和黑猩猩一样，南方古猿肯定也会在每年白蚁搬家筑新巢的时候吃它们。但是，我很不看好它们的技术，估计也跟黑猩猩一样，并没能有效地利用蚁穴中大量的昆虫，来大幅度地补充它们的食物来源。

第四种解释是，南方古猿开始食用一些草本植物的地下储存器官（根和茎），其中的很大部分具有C4分解途径。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来支持这个解释，因为植物食物不会成为化石。但是，很多有C4途径的地下根茎和南方古猿的化石经常在相同地点被发现，这也至少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对牙齿化石磨痕的分析，也为食用根茎食物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总而言之，摆在台面上的这几个解释都说得通，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时间分配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到底哪一种解释真正成为了它们选择。

时间分配告诉了我们什么

为了解释南方古猿之所以能够在它们生活的地方生存下来的原因，卡洛琳·贝特里奇首先对黑猩猩模型中的进食、休息和行走时间等式进行了敏感度测试。她用逐步变化这些公式的斜率的方法，来观察这些变化对模型在预测的准确性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进食等式和休息等式的变化对结果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然而，行走时间公式的变化却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能将预测的错误率从30%降低到8%。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假设：和所有猿类一样，行走时间（由此也涉及了从一个觅食点转移到另一个觅食点的距离）也是南方古猿面临的问题。

贝特里奇又用狒狒的行走时间公式代入黑猩猩模型，以验证类似狒狒的资源分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采用狒狒的行走等式时，贝特里奇根

据南方古猿的较大体型，做了些相应的修正，并将群体规模的最低值设为10（这是通过对黑猩猩的观察得到的绝对最小规模）。由此，用黑猩猩模型预测位点是否有过南方古猿的准确率从26%（用基础版的黑猩猩模型）提升到了可观的76%。更为重要的是，它准确预测了所有我们已知的南方古猿居住地，这是黑猩猩模型基础版所无法做到的。看起来，无论南方古猿是怎么觅食的，它们都不像猿类，而更像狒狒。

其实在模型中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似乎是降水量的不同带来的影响，而这一点，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南方古猿曾经居住地的线索。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古猿的食物呈现明显的C4特征，一种解释是因为它们食物中包含很多植物的根茎。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不在湖边就是在河边，而这些栖息地也正是狒狒之所以能够在更开阔的大草原上生存下来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水源，草原对它们来说太干燥了。现在，让我们再从时间分配模型的角度来看，靠近大片的水体和降雨量的增加有着完全相同的效果，两者都能让土地更加湿润，让植物在生长中吸收到更多的水分。结果在草原环境的水体周边，会出现在其他干旱地带无法生长的小片树林。这样的生态环境也常常会出现在洪水容易泛滥的区域，比如在大河或者大湖边上的大片平坦土地上，雨季充沛的水分储备为多肉植物和其他在根茎中储存营养和水分的植物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小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方古猿如果改而进食植物的地下储存器官，肯定就能在这种地区生存下来，无需改变太多的消化生理，就和狒狒在这种地区的生存状态完全一样。而且，在这样的栖息地上，物产一般都是很丰饶的，可以同时维持很多动物的生存。因而，它们不必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四处觅食，甚至有可能让南方古猿的整个社会群体一起觅食，不必形成时分时合的社会结构，但同时也能应付因为远离森林而要面临的更多的天敌威胁。

在刚果的西部湾区，栖息着大猩猩的群落，在它们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所谓湾区指的是大片的湿地森林，通常与水体相连，因为这些地区富饶的食物对多数大猩猩群体都很有吸引力。大猩猩的栖息地和南方古猿的栖息地非常不同，但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相似的。如果环境足够开阔，食物足够丰饶，就能维持很多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进食，连平时分散觅食的群体，也会改变习惯共同觅食。狮尾狒狒（gelada baboon）就有这种情况，在水草丰美的草地上，它们可以组合成很大的群体（最大可达到500），即使在旱季，草叶干枯粗劣时它们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群体规模，因为它们可以一起挖根茎吃。狮尾狒狒是灵长类中的特例，它们生活在很特殊的环境中（它们只生活在海拔1,700米到4,000米的东部非洲高原草地上），但是，它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还有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虽然这一片片与大河江湖相

邻的森林能够提供遮阴，但是，离得更远一些的开阔林地和冲积平原上却不能。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南方古猿必须找个地方休息，这一点和居住在开阔平地上的狒狒是一样的。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它们不管在哪里找到遮阴之处，然后都要休息几个小时。根据黑猩猩模型的预测，它们必须花一天的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休息（准确地讲是3.8个小

时）。而花在行走上的时间很有限，大约是1.9个小时，它们会在属于自己的栖息地界内行走。如果洛克斯顿—威尔金森关于早期古人类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行走时间被限制在早上和傍晚的凉爽的时段里，那么，南方古猿就可以无缝嵌入它们的模型，把这两小时的行走安排在早上和傍晚，同时还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在午间休息4个小时（图4.4）。也就是说，早期古人类有必要把大部分的行走时间花在大清早，从而找到一个好的觅食点。一旦到达之后，它们就可以整天都待在那里，直到傍晚时分，再回到附近的水边密林里安全过夜。狒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以这样的活动模式生活着的。虽然改变到进食肉类会有一点帮助，就像黑猩猩经历过的那样，但是，食物结构的巨大变化看起来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然而，一个和水域接壤的独特的栖息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它们也开始食用地下根茎类的食物以后。在减少热负荷方面，双足行走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但是，更重要的也许在于让它们能行走得更快速更有效。这样一来，一个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南方古猿群体会分解成更小的组合，散居于和水域相连的狭长林带，彼此间相隔着相当远的距离。

大多数南部非洲的南方古猿化石发现地点都和河谷边的石灰石洞穴有关联。虽然，至少有一个地点的化石经证实是被猎杀的猎豹或大鸟的残余，从树根处的缝隙掉落到洞内的，但是，洞穴还是很有可能为这些物种提供夜晚的安身之处。洞穴有两大特点，使得它们成为重要的动物过夜之处，首先是洞穴提供安全的藏身之处，这一点在没有大树的开放环境中尤其重要。不过，另外更重要的是，洞穴中的温度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这些南纬地区，夜间的气温可能骤然下降，即使在赤道上，海拔1,000米高处的夜间气温也可能降到10摄氏度之低（对此我有亲身体会，因为在那里野外挖掘时体验过）。在研究苏格兰野山羊时，我们发现，动物栖身的洞穴中的温度比外面要高4—5摄氏度。在研究南部非洲狒狒居住的洞穴时，同样发现洞内温度比外面高4摄氏度。

当外界气温低于动物的体温时，它就必须要依靠消耗能量来维持体温，而能量的摄取需要额外的进食时间。这里就又产生了时间分配上的问题，而且，气温越低，这个问题就越严重。根据我在苏格兰西北部对山羊的研究，寄身洞穴很可能是早期古人在非洲南部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猿类（而不是狒狒）的时间分配模型在地域选择上是基于赤道附近的地点，而没有根据南部非洲更低的气候做出调整。虽然我们不能断言的是，洞穴的使用到底是抵消了在南部地区较高的热量消耗，还是节省了更多进食时间。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南方古猿之所以能够在南部非洲成功地生存下来，洞穴无论如何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南方古猿的社交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南方古猿应该生活在和现代黑猩猩差不多规模的群体中（这是根据社会大脑假说推论出来的）。不过，它们并不需要像黑猩猩那样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虽然它们庞大的体型对天敌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但是在冲积平原的开阔地带，较大规

模的社会群体依然是抵抗天敌的主要手段。那么，它们的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单配偶制在人亚科的早期已经存在，早在1981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就最先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抚养后代的需要，因为晚成雏的大脑容量大的后代需要来自双亲的照顾。洛夫乔伊最初认为，单配偶制肯定是所有人属动物的共同特点，而且，在大约两百万年前的晚期智人中普遍存在。这个观点听上去有点道理，因为这个时间点和智人大脑容量的第一次突飞猛进式的增加是相吻合的（图1.3），于是在这个时候需要由双亲来共同抚养后代就成为了一个自然的节点。但是，洛夫乔伊后来又把他的这一观点在时间上向前延伸，直到用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南方古猿身上，这种南方古猿也就是生活在距今大约四五百万年前的始祖地猿。以他的观点，和双足行走一样，单配偶制是所有智人的普遍特性。

在利特里发现的那串脚印，两个成年猿类和一个孩童并行的足迹化石，不可避免地会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一对有着亲密关系的成年猿类和它们后代走在一起，有点像黑猩猩离开它们的群体，这样的离群单独行动看上去不是很自然吗？但是，我们对这种解释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被挖掘过的区域范围很小，我们并不清楚附近还有多少其他同类。也许，走在一起的这三个其实离群体中别的成员并不远。在这样的环境中，狒狒群体经常会分散到足足有半公里之远的区域。另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理由使得我们对这个观点产生怀疑。首先，当雌性黑猩猩发情时，经常会和雄性组成临时的一对，离开群体一两天，这样可以免受打扰。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偶尔的配对，而把明显乱交的黑猩猩视为单配偶制的动物。其次，既然在第一次过渡中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那么它们的后代还有什么必要由双亲来照顾呢？如果黑猩猩能够愉快胜任单亲抚养后代的任务，并不需要来自双亲的照料，那么，拥有相同脑容量的南方古猿为什么突然就抓狂了呢？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单配偶形式的出现，首先是对杀婴现象的反应，至于双亲照顾婴孩的需要，则是后来才形成的。如果南方古猿真是单配偶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它们面临着比黑猩猩更高的杀婴风险，这样才逼得雌性选择一个依靠雄性保镖来保住婴儿的策略。但是，哈考特—格林伯格的杀婴模型（见第二章）显示，黑猩猩的杀婴风险还没有高到它的雌性需要雄性保镖的保护。但是，大猩猩的情形就不同了，杀婴风险要高的多。雄性大猩猩的体型远远大于雌性（因此在雄性之间，力量的差距也相对比较悬殊），雌性于是才会采用保镖策略。因为大脑容量决定了群体规模（也因此决定了群体内雄性的数量）以及生育特性（比如生育周期的长度），因此南方古猿和黑猩猩在这些关键特性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单配偶制时曾提到，单配偶制是个单向通道，一旦形成，就不会再退回到多配偶制。单配偶制也导致了形成配偶的一对对离开群体，进入属于它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从而大大降低群体的规模，而南方古猿的大脑容量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在灵长类中，单配偶物种的脑容量总是小于多

配偶物种的脑容量。

在这里，解剖学的确为我们解了围，关于南方古猿的社交生活，解剖学提供了三个间接的信息来源，它们是：1）多配偶制在解剖学上的数据是有限的；2）有关不同性别间的体量差异则有更多的数据；3）牙齿中金属含量的残留透露了它们的分布形式。

第二指和第四指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2D：4D食无比，D代表digit，手指的意思），是胎儿在子宫中受睾丸激素水平影响的结果。在乱交的灵长类物种中，雄性为了得到雌性，必须不停地互相争斗，结果是雄性和雌性体内睾丸激素的含量都会高于典型的单配偶制的物种。乱交物种雄性的食无比例较低（它们的食指比较短），而在单配偶物种中，这两根手指几乎一样长。在现存猿类中，只有长臂猿（gibbon，也就是所谓的次级猿种）是固性的单配偶制，所有十多个种类的长臂猿都以一雄一雌的配对形式，带着它们的未成年后代一起生活。相反，所有的其他猿类，或乱交（比如黑猩猩和红猩猩），或多配偶（比如大猩猩）。

艾玛·尼尔森（Emma Nelson）和苏珊·舒尔茨将这个发现套用在两种中新世的猿类（Hispanopithecus和Pierolapithecus）以及一些能够找到手指骨的化石智人身上，结果，他们发现，除了一个物种之外，所有其他的都跟黑猩猩和红猩猩一样是乱交的（图4.5）。拉密达地南方古猿的交配体系显然和黑猩猩相类似，而样品中的五种尼安德特人和一种古人类（海德堡人）的食无比都处于现代人类范围的下限。这些物种的交配体系，大致上和大猩猩的后宫式交配体系相仿（雄性可以乱交，但相互之间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冲突）。唯一的例外是南方古猿，比现代人类的高，但还是比纯粹单配偶制的长臂猿低很多。所以，南方古猿的配偶体系，最多也就是和现代人类的单配偶制相近。而我们在第九章里会看到，现代人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多配偶才是现代人类真实的本性，一夫一妻只是在社会道德的规范之下才会出现。鉴于单配偶制是灵长类认知学和人口统计学的一个单向通道（见第二章），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南方古猿确实是单配偶制的，那么它就可能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因为在它之后的所有其他智人都是多配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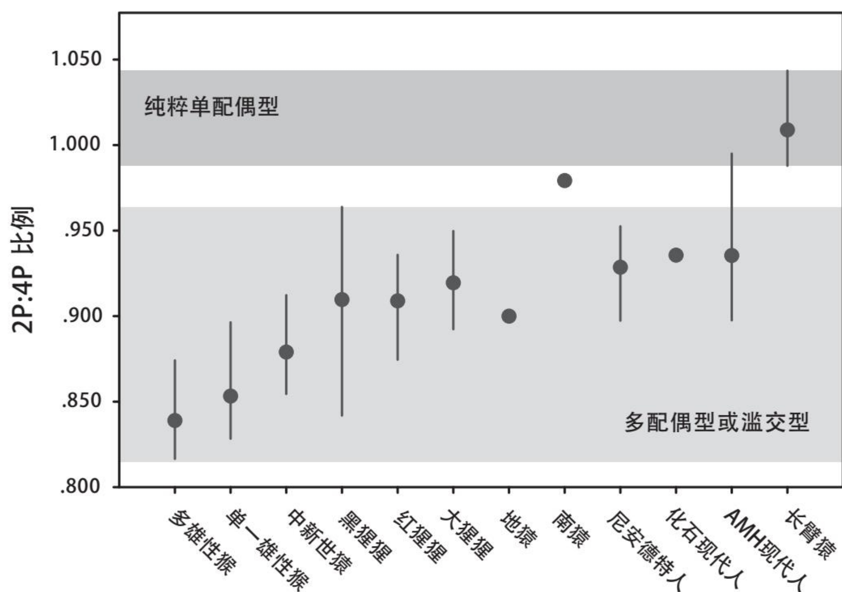


图4.5

不同人亚科、猿类（包括两种中新世猿）和旧大陆猕猴（生活在单一雄性群体中的长尾猴和生活在多雄性/多雌性群体中的猕猴和狒狒）的手指比例（化石物种2P:4P的比例，指骨化石的实际长度；以及2D:4D比例，现存物种的实际长度）。圆点是每个物种的平均值，直线是数据的范围。单配偶和多配偶区域分别是长臂猿（唯一纯粹单配制）和其它现存猿猴（都是多配偶制或滥交型）。

数据来源：Nelson等人（2011），Nelson和Shultz（2010）。

解剖学还提供了第二条线索。对于灵长类来说，不同性别在体量上的差别和交配体系密切相关。单配偶灵长类的雄性和雌性，体量不相上下，而乱交和多配偶的灵长类，雄性的体量要比雌性大得多，甚至有可能大出一倍。固性单配偶如长臂猿，雄性和雌性体型一样大（或者甚至有轻微的倒挂，雌性体型有时候会比雄性大5%）。在智人（包括所有的南方古猿）中，找不出雄性和雌性一样大的物种，所以它们中没有固性的单配偶物种。在雄性和雌性体量的比例上，阿法南方古猿的数值是1.56，非洲南方古猿的数值是1.35。和黑猩猩（平均比例为1.27）相比，南方古猿更具二态性，也就是雌雄间的差异更大一些，但不及狒狒（比例为1.8）或大猩猩及红猩猩（比例高达2.0）。虽然非洲南方古猿显然更接近于现代人类（我们人类的体量比例是1.2），但它们还是更为二态性，所以，它们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单偶制是很难想象的。

行为方面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两性的分布状态。在多配偶的交配体系中，通常来说，雌性或雄性中的一方会一直待在它们的出生地，而另一方则会在青春期离开出生地，迁入附近别的群体中去。在单配偶制的

物种中，不同性别的双方都会在长大之后移居别处，因为双亲中无论哪一种性别，都特别不能容纳同性别的小辈，无法在小辈成熟之后，依然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在南非的斯托克方丹地区，发现了非洲南方古猿和强壮型傍人（Paranthropus robustus）的化石，其中牙齿化石中的锶含量资料，为我们探索不同性别的分布提供了意外的直接证据。和氧以及碳一样，锶也有两种同位素，其频率随着某一区域泥土的变化而不同。植物通过泥土摄入的这些同位素，和当地土壤中的含量相应，之后，进食这些植物的动物由牙齿釉面吸收同位素。所以，通过分析牙齿中锶的含量，就可以推测该动物成年之后是否仍然生活在它的出生地。

针对斯托克方丹地区两种南方古猿的锶含量分析结果显示，雌性比雄性移居的距离更远，至少移居了3—5公里（以有相同锶含量植物的最近处来计算）。这样的分布状态（雄性停留在出生地，雌性移居别处）和黑猩猩及大猩猩相类似（但是和猕猴正好相反）。而南方古猿的交配体系大概和黑猩猩相类似，单配偶或固定配偶的可能性极小。

总而言之，如果南方古猿是单配偶的话，这个结论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假如它们的觅食方式和黑猩猩一样，以小群体形式出外分散觅食，那么它们的交配体系最有可能性的就是乱交，因为雌性过于分散，雄性无法同时保护数个雌性。但是，假如它们符合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在富饶的湖边或者冲积平原上群体觅食，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后宫式的多配偶，就像长鬃狒狒、狮尾狒狒甚至大猩猩那样。数个由同一雄性保护的小型后宫或者数个雄性的后宫在一起觅食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刚果西部湾区栖息地的大猩猩就是那样，这种假设有其合理之处。既要在开阔的冲积平原上觅食，又要避免天敌的攻击，那么雄性之间必须要有强大的相互包容之心，以保持较大的觅食群体的融洽和谐。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南方古猿雄性犬齿的显著缩小就可能得到了解释。

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成功的岁月之后，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一场气候的巨变使得南方古猿渐渐地消失了。那时候，气候逐渐变冷，空气中的水汽逐渐凝成了极地冰层，南方古猿的栖息地因此变得更加干燥。从约两百万年前开始，一度占据大部分非洲大陆的纤细型南方古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壮型南方古猿，也就是东部非洲的鲍氏傍人和南部非洲的强壮傍人。这些物种拥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有着强大的后牙，由类似大猩猩大头盖骨支撑的强壮额肌，还有就是以C4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多地食用了地下植物根茎和肉质植物。实际上，面对着气候环境的恶化，它们所做的调整，和之后很久的大猩猩的策略是一样的。据戴安·福西的研究发现，居住在比如维龙加山区这种自然环境恶劣地带的大猩猩，在饮食结构上调整为以叶子和木本枝干为主食。强壮型南方古猿也非常成功地生存到了大约一百四十万年前，可惜，最终也是因为气候环境的恶化而灭绝。它们的消失，标志着智人进化史上一个尤其成功的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在最后一只强壮型南方古猿消失前的五十万年间，第二次过渡已经悄然开始。接下来，我们就

要讲述第二次过渡的故事。

注释：

[1]　类别（taxon）是生物学家对同一类的动物的泛指。根据上下文，它可以是指一个物种（如普通黑猩猩，Pan　troglodytes）、一个属（一组黑猩猩，Pan属）或一个科（如猿的总称，包括大猩猩、黑猩猩和红猩猩）。

[2] 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下降1℃。纬度每偏离热带一度，气温也会有相同的下降。

[3] 多肉植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植物科，它们通常有多肉的叶、干和根，能让它们在干旱地区储存水分。属于该科植物的有鸢尾植物、兰科植物、天门冬属和仙人掌。

[4] 马科成员，包括斑马和驴。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1962年，著名的化石专家路易斯·利基在东部非洲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化石，那是一块纤细型智人的化石。他将之命名为能人（很能干的人），因为能人是同时期出现的原始石头工具的制作者。这些工具，是它们和我们站在分水岭同一边的显著标志。时间上溯到大约两百三十万年前，这个新物种的出现，在早先的南方古猿和后来的亚欧直立人之间搭起了一道天然的桥梁。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部非洲，更多的相关物种化石陆续出土。随着诸如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和匠人的化石相继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发现，能人似乎还只能算是一种南方古猿，所以，现在能人被归入南方古猿。

尽管如此，能人显然还是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新一代的智人，代表就是出现于非洲的新物种匠人。匠人出现后不到几十万年间，它们就占据了整个非洲，并在多次走出非洲的尝试中率先进入了欧亚大陆。匠人有几个特征显示出它在进化上的飞越，脑容量有明显增大，骨骼的进化使之第一次出现了与现代人类相仿的身材，并且拥有便于双足行走的长腿，生活方式更加游牧化，还有就是它那具有象征意义的阿舍利手斧（Acheulian handaxe），作为一件毋庸置疑的工具，在第一次出现于东部非洲之后的一百多万年中，手斧及其创造者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变化，直到大约五十万年前才出现了更现代化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人类制造者。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第二次过渡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最早的样本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主要是一些头骨碎片和零散的肢骨。但是，得到这些化石的荷兰解剖学家欧仁·迪布瓦（Eugène Dubois）将之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之后，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在中国发现了一系列很完整的头骨和其他部位的骨化石，这就是中国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纷乱中，这些“北京人”的原始样本在美国人设法抢救的过程中还是弄丢了。幸运的是，化石的发现者，德国解剖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发表了对全部样本所做的详细解剖学记录，还制作了完美的石膏模型。其中的一套石膏模型早在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就被送到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是这套石膏复制品，在半个多世纪里，让我们对这个物种的认识有所依托。最终，所有这些不同的亚洲样本（以及后来在欧洲发现的更多化石）都被归入同一个物种，也就是直立人。再往后，直立人和非洲匠人被归入同一个年代种，这主要因为，从匠人到直立人的过渡，这些后期的亚洲物种除了大脑容量有少许增加以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从很多方面来讲，我们这里要讲的伟大故事，就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图5.1）。我们知道，匠人在很早就开始走出非洲了，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它们到了黑海北面的格鲁吉亚。就是在格鲁吉亚发现了那个时期的化石，这个脑容量较小的衍生物种就是格鲁吉亚直立人。如果对这些化石的时间鉴定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匠人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后不久就进入了欧亚大陆。而俄罗斯南部说起来离非洲并不近，要花上点时间才能到达。它们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以至于欧亚大陆被这些脑容量更大的物种占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年代种除了头骨的空间稍微增大之外，物质文化和脑容量上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而它们的手斧这种标志性的工具，在长达近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形状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这就意味着，关于这个分类群，我们只需要关注的是，它们在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图1.3）首次现身非洲时出现了脑容量的急剧增大，之后，脑容量的微弱增加定义了这个亚洲直立人物种。任何脑容量的增加，前提都在于这个物种能否依靠进食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额外能量以补充大量的消耗。既然南方古猿的时间分配已经到了极限，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可想而知的是，这个初生的物种面临着极大的时间分配上的压力。那么，匠人是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度过这个瓶颈，迎来下一个进化阶段的曙光的呢？



图5.1

主要早期人类遗址分布图

● 匠人

● 直立人

▲ 鲁道夫人

★ 能人

数据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大阪城市大学（2011）

在这个章节中，我将着重讲述早期人科的两个分类物种：匠人和直立人。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弗洛勒斯人，也就是十来年前刚刚在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体型小、大脑小的霍比特人。我也不会在这里讨论介于南方古猿和匠人之间，或者是介于在晚期直立人和古人类之间的任何一种短暂生存的过渡物种。虽然有关霍比特人的发现被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但是，到头来它也只不过是一种侏儒型的直立人，在整个人类演化的宏伟长卷中，它没有改变一点点事实。霍比特人的存在只是提醒了我们，匠人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就离开了非洲，有时候，它们能够长时间地生存下来。以霍比特人为例，它们惊人地一直生存到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但这很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所以受到了保护。至于霍比特人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得矮小，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2]但不足以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人类演化的宏大故事。

大容量大脑的成本

图1.3以时间为线索，列出了不同时期人亚科物种的大脑容量（按照颅腔的可容量）。在联接匠人和直立人之间的时间线上，显示着脑容量缓慢但是显著地增加。但是，最能吸引我们关注的是大脑容量增加的两个关键点，之一是从南方古猿的480毫升（略微高于现存的黑猩猩）增加到最早期东部非洲五个匠人样本的平均值760毫升，这多出来的280毫升是高达58.2%的惊人增幅；之二是后来的晚期直立人又比匠人增加了170毫升到930毫升（22%的增幅）。

这个脑容量的增加幅度，需要充足的能量来维持，这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觅食时间来摄取这部分的能量。只要做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推测出究竟需要多少额外的觅食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能量采集的任务。现代成人的大脑容量是1,250毫升，消耗了人体20%的总能量，如果增加280毫升就是增加了280/1,250＝22.4%的能量消耗。而身体总能量的20%的22.4%就是4.5%，也就是说，22.4%的额外大脑能量消耗需要4.5%的额外总能量。如果我们假设能量需求量直接和觅食时间成正比关系，那么，维持匠人大脑运转的燃料就要比南方古猿所需要的能量多4.5%。而直立人大脑容量的增幅，就再需要2.7%额外的能量，也就是总的额外觅食时间合计需要比南方古猿多7%。

按照卡洛琳·贝特里奇的模型所示，如果南方古猿将一天中44%的时间花在觅食上，就能满足它们对能量的总体需求（图4.3）。假设摄入的能量大致上和进食时间成正比（当然这个和摄入的食物有关，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个合情合理的假设），那么，匠人增加的脑容量就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花44＋4.5＝49%的时间来进食，而直立人需要花51%的时间来进食。应该说，五个百分点的增幅并不算太多，通过对其他行为做一些微调，就能化解这个5%的压力。而直立人对进食时间又有更多的需求，或许稍微难以满足一点。总的来说，早期人类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

面临的挑战，并没有像人类演化研究学者想象中的那么艰巨，成本的增加相当有限。但是，和南方古猿需要节省7%的时间分配一样，匠人和直立人也必须分别省出5%和7%的时间，为它们的脑容量的增加留出空间。

然而，脑容量并不是进化过程中体现在解剖学上的唯一变化，其他的重大变化结合了体型和体量的改变。匠人变得更高，腿也更长了，适合于大踏步走路（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进化是为了奔跑着追逐猎物）。体重方面也略有变化，在南方古猿的所有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平均体重分别是55公斤和30公斤，而直立人的雄性和雌性体重分别是68公斤和51公斤。从平均体重来看，早期古人的平均体重比南方古猿的平均体重要多40%，这些额外的体重必然需要额外的能量来供养。如果把供养大脑和体重这两方面的需要放在一起考虑的话，匠人需要将62.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才能满足身体上的消耗，这个数字比南方古猿的要高出21.5个百分点[3]。直立人的大脑虽然略大，但它的体型略小，这可能是为了适应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更有压力、更寒冷、更有四季变换的环境，所以，它的进食时间几乎和匠人是一样的。大部分研究者在推测人属动物进化时面临的困境时，把额外的成本过多地算在了大容量大脑所需的能耗之上，殊不知，真正可观的成本来自体量的增加，接近额外能耗的四分之三的能量和时间都用来应对体型的变化。

在第四章中我们讲过，南方古猿标准的日常活动分配时间已经到了极限，再增加22%用于进食是完全不可能的。图5.2显示了这个问题的分量，这张图以因为体型和大脑的变化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为考虑因素，列出了各个人亚科物种的进食（注意是进食而不是觅食，觅食过程中行走的时间是要分开来另外计算的）时间在每个白天里面所占的百分比。作为参照基准的南方古猿数值，就是那条水平线（按照贝特里奇的模型，测定为44%），不同的南方古猿物种（其中也包括能人）都紧紧地贴近这条线。但是，匠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令人炫目的明显变化，上升到古人类的62%，尼安德特人的78%（反映出体量和大脑的增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72%（反映出比尼安德特人略小的体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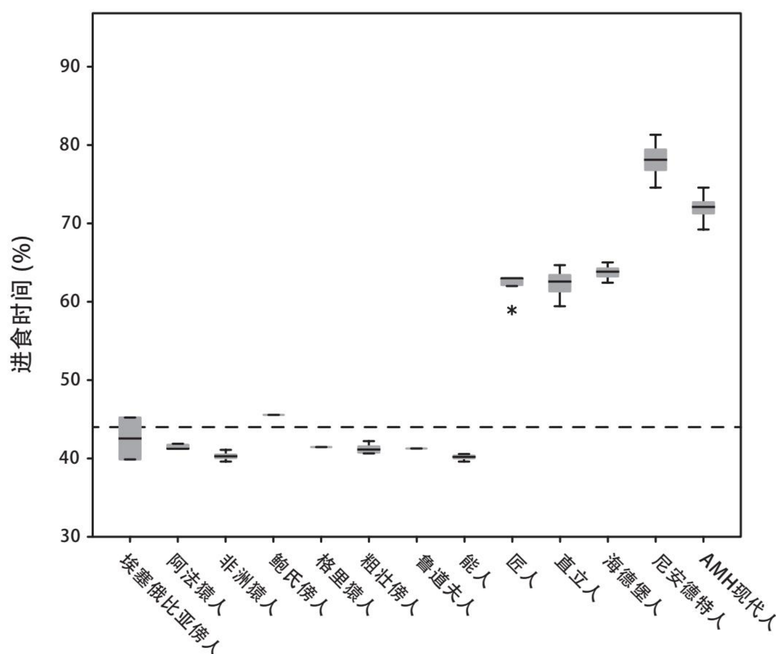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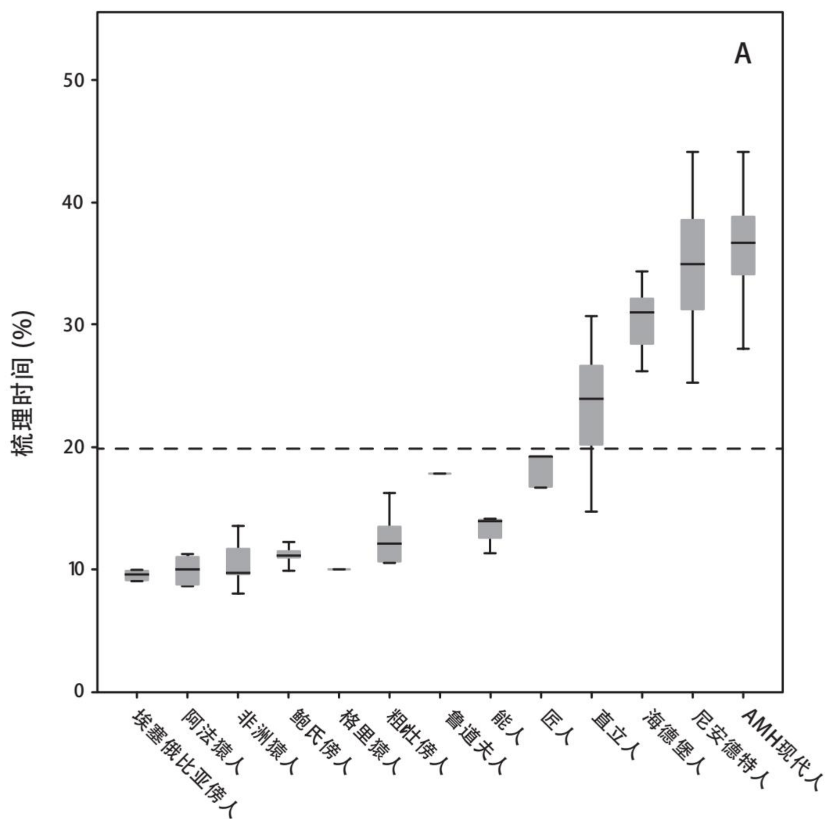


图5.2

主要人亚科进食时间的中间值（50%和95%范围）。基数是南猿的时间分配平均值（参考线为44%这条虚线），其它物种是根据它们的代谢体重和南猿的代谢体重比例所得出的。代谢体重按能量高耗能大脑（占总能量的20%）和体重（占80%）而差异分配的。

而且，这还不是匠人面临的唯一问题，脑容量增加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因此，它还要应付因群体规模增加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图5.3a画出了智人物种所需要的社交时间（基于图2.1中所示的群体大小和相互梳理时间之间的关系），图5.3b画出了用南方古猿模型中的固定比例所预测的混合型时间成本，混合了行走时间和休息时间（分别是16%和32%）。很明显，早期古人的时间分配已大大超过了可维持的时间成本区（缺口大约有30%），对于古人类来说，这个缺口还要大，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都是要超过成本区高达50%。

简单来说，摆在匠人面前的任务是，它们必须从别的活动中节省出30%的时间，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二要花在进食上。直立人时间的分配已经超过成本区达34%，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群体规模的相应增加。所以，这里的底线就在于，所有这些物种，如果它们还是南方古猿的话，那么它们就无法生存下来。但是，明摆着它们还是找到了解决时间分配瓶颈的方法，成功地生存了下来。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A
梳理时间 (%)
50
40
30
20
10
0
埃塞俄比亚傍人
阿法猿人
非洲猿人
鲍氏傍人
格里猿人
粗壮傍人
鲁道夫人
能人
匠人
直立人
海德堡人
尼安德特人
AMH现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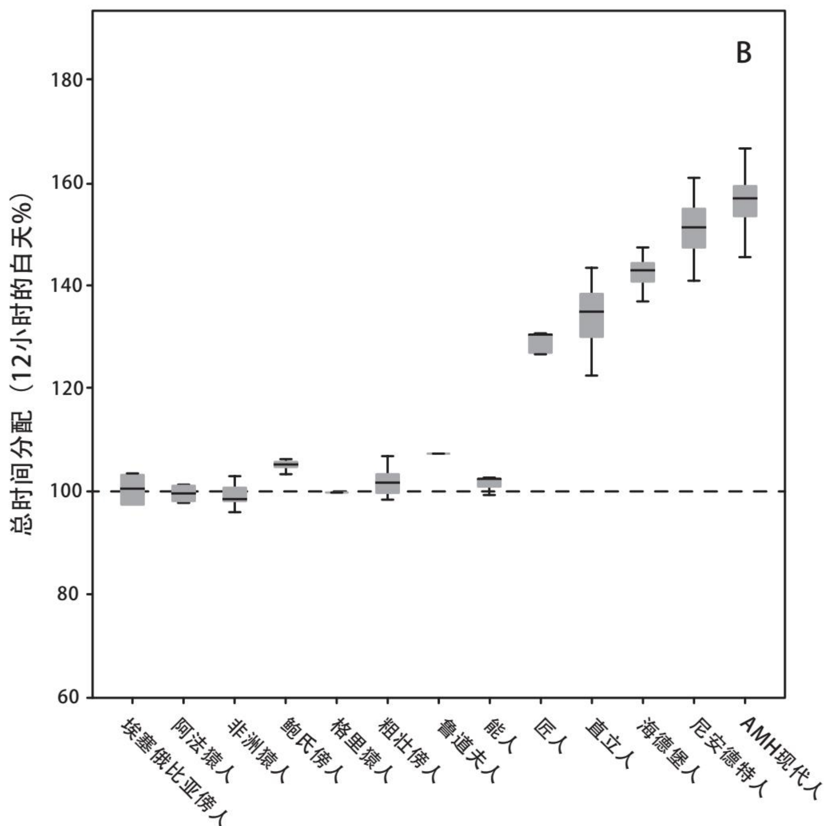


图5.3

（a）主要人亚科物种的平均社交（梳理）时间（50%和95%范围），将图3.3中的群体规模值代入图2.1中的回归公式得出。这条20%的虚线是灵长类在自由分配时间内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最大值。

（b）主要人亚科物种的总时间分配的平均值（50%和95%范围），把进食时间（图5.2）、社交时间（图5.3a）和贝特里奇（2010）的南猿模型（图4.3）中的必须休息时间（32.5%）以及行走时间（16.2%）相加所得。

几个可能的答案

双足行走和失去毛发后的南方古猿在休息时间上已经省不出更多时间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能让匠人省出一点休息的时间，那就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阶段，气温能够降下来。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伴随着匠人的出现（也可能是在之后），全球的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气温开始一路向下逐步变冷，很难说，这两者刚好是巧合。和气温变化同步的是大批物种的灭绝，南方古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同时

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灵长类以及其他哺乳类动物。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气候转变中，整个热带非洲的平均气温下降了2摄氏度。根据猿猴的时间分配模型，这能使匠人需要的休息时间减少2.5%。当然，2.5%的节省算不了很多，但也是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来自行走时间。早期古人类比南方古猿要高得多，因此跨出的步伐也大得多，从行走时间的角度来说，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早期古人类两性的平均腿长是0.88米，相比南方古猿的0.62米，增加了41%，也就是多了41%的优势。这样一来，分配于行走时间上的只需要占总时间的11.5%，节省了5%。但是，有关早期古人类的一切特征，包括它们的大长腿，都显示出它们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人科动物更加具有游牧性，因此它们在广阔的草原上行走的范围也更广。所以，节省下来的这部分时间或许只是花在了走更多的路上，而并没有真正地减少有效的时间成本。不过，我们眼下暂且把这部分也视为一个有可能的小小节省，所以到目前为止一共节省了7.5%的时间。

在早期古人的时间分配上，进食时间一直是个主导性的部分（两个物种的进食时间几乎都占到总时间的62%），所以，在进食时间上的节省，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尚未考虑到，那就是身体各部位因维持体能需要而进行的能量再分配。不过彼得·惠勒和莱斯莉·艾洛（Leslie　Aiello）在1995年提出高耗能组织假说时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注意到，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说，大脑和肠子同样都是高耗能的，主要是因为这两者都分布着大量的神经。神经元时时刻刻都处于蓄势而发的状态，而正是维持这种状态所消耗的能量，使得大脑成了高耗能组织。他们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一节点上，智人把能量消耗的主场从一种组织（肠子）转移到了另一种组织（大脑）上，所以，脑容量增加的结果并没有消耗更多的能量。这种转换的实现，得益于通过提高饮食质量，强化吸收营养的效率，从而对冲了肠子长度的缩短[4]。在做智人时间分配的图5.3b时，除了相应的脑容量增加外，我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对体重在各主要器官上的分配的假设，还是和做南方古猿模型时一样。但是，如果大脑消耗的额外能量的确是来自于相应的肠子的缩短，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进一步来说，这样的结果，对进食时间又能节省多少呢？

如果我们不考虑大脑容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只调整体量的增加，假设脑容量的增加能够和肠子的缩短直接相互抵消），重新计算智人对进食时间的要求，那么，早期古人能节省下区区5%，而晚期古人略微多些（图5.4）。这样的节省幅度，虽然远不及大部分研究者们所期待的那么多，但是，即使5%的节省，也能把匠人和直立人的时间分配缺口分别从30%和34%降低到25%和29%。加上前面所分析的因为气候变冷和双腿加长等因素得到的7.5%，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为匠人找到17.5个百分点，为直立人找到21.5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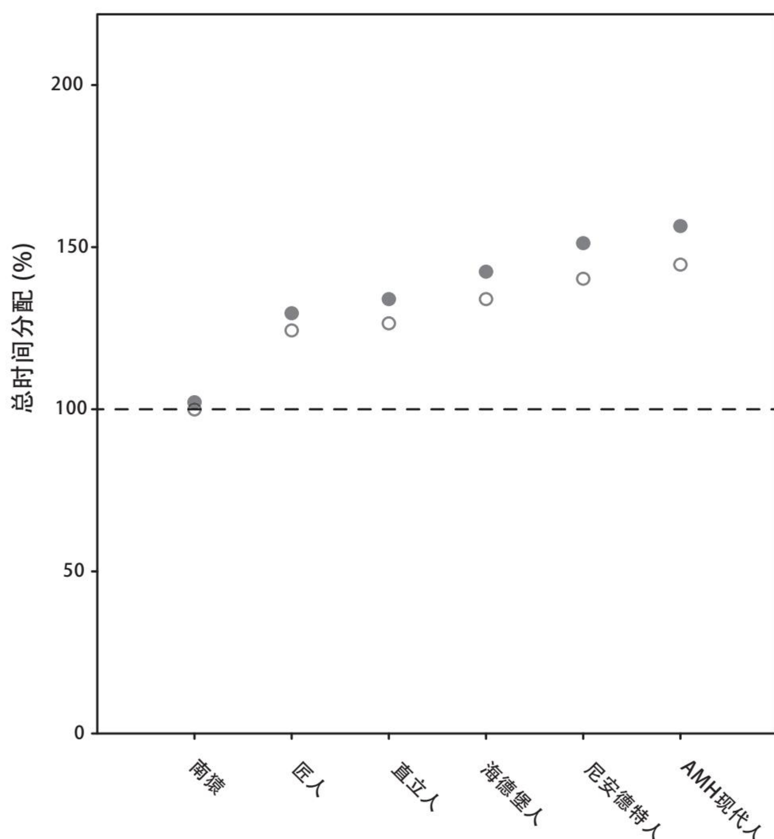


图5.4

高能耗组织效应下所节省的总时间分配。时间分配基础线（各物种数值由图5.3b中的南猿基础线按比例得出）经高能耗组织效应调整，高能耗组织所调整的数值是假设更大容量大脑所消耗的能量直接被肠子（体细胞组织）缩小的效应抵消了，所以只有体重（体细胞组织的代谢消耗降低后的）影响到进食时间。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呢？肉类是一个答案，理由是肉类比大部分的植物营养更丰富，同时也含有大量对大脑的发育非常关键的烟酸（维生素B3）等微量营养素。这就是高耗能组织假说的基础，肠子的缩短由更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弥补，而这个更容易消化的食物被认定为肉类。但是，把肉类直接作为答案是有缺陷的，因为灵长类的肠胃不容易消化生的肉食。哈佛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认为，提高肉食的可消化率，从而解决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能量缺口，关键就在于烹饪。烹饪是弥补人类进化中能量消耗的答案，煮熟的肉类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可以把营养摄入率提高50%。他认同的烹饪（以及由此而来的食用肉类）出现的时点，就是在匠人出现的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他认为有三个考古学

发现支持这个观点：其一是人科的出现伴随着牙齿和下巴的缩小（因为咬碎粗糙的植物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必要了，[5]图5.5），其二是首次用火的迹象（火对烹饪是最重要的），其三是脑容量的突然增加。

为了验证匠人和直立人的主食是肉类，研究者们做过很多尝试，力图证明它们已经开始用执矛来狩猎了。当我们挥臂投掷执矛时，肩关节和髋关节就像一根设计精良的弹簧，在收放之间将能量传导到手臂上，然后以迸发的力量将标枪一样的执矛投掷出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元素，到底是什么时候汇聚在一起，然后赋予了这种能力的。事实上，这些都是逐步积累的，有的元素早在南方古猿时期就有了，但是很多元素是在又过了很久才出现的（不过，在二十万年前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的很久时间里，这些元素都没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投掷者一气呵成的能力）。根据对纳里奥克托米男孩[6]肩胛带（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投掷能力的重要部位）的重塑，发现它已经处于现代人类的范畴之内了，这个发现一下子把投掷的进化（也就意味着狩猎的开始）提前到一百五十万年前。但是，直立人的肩胛带和现代人类相似是一回事，具不具备现代人类这样的投掷能力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毕竟，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奥运会标枪冠军或职业棒球投手，我们实际能力的高下，对我们投掷时的表现有重大的影响（至于能得几块金牌，那就先别提了）。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根据现有的证据，就断言早期古人经常用执矛狩猎是很牵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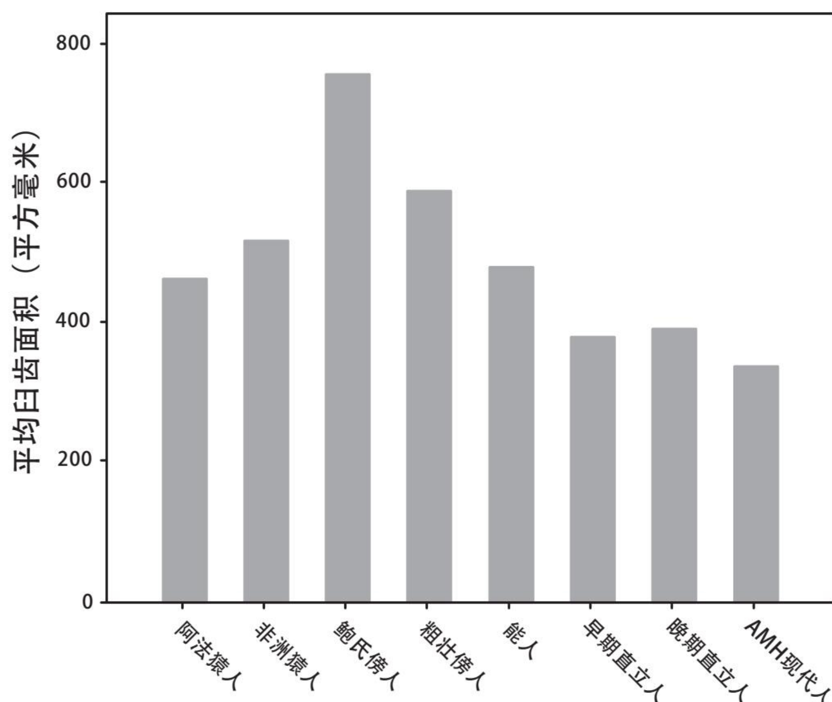


图5.5

早期人亚科和AMH现代人的平均臼齿面积。

数据来源：Leonard等人的论述（2003）。

话说回来，至于认为直立人偶尔也能扔几块石头（或者甚至是木制的矛或者叉等物），恰好击中了猎物，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也是很有可能的。到了纳里奥克托米男孩生活的时期，智人已经有近一百万年的时间来练习使用简单的石器（比如奥杜韦石器，基本上就是石块），如果说它们从来不曾拿起石块砸向猎物或者敌人，偶尔也能砸中个把目标物的话，那也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但是，执矛或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身体的构造已经让它们具备了投掷东西的能力，但要，是否具备脑力和躯体上精细的控制能力，将一根执矛在林间准确地投向目标物，那完全是两码事。另一个可商榷之处是，一根头上没有削得很尖的矛（早期古人肯定没有这样的工具），算不算是有威力的投掷武器（和刺扎相比）。虽然我们可以承认它们偶尔能用这种方式斩获猎物，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那么早的时期，就能经常性地使用武器，那是不现实的，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发现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

把有关狩猎的议题先搁一边，可以肯定的是，烹饪确实能够增加对

肉类等食物中营养成分的摄取率。这一来是因为烹饪能够打破细胞壁（因此能促进营养的吸收消化），另外也是因为烹饪可以化解植株中的有害物质，植物含有碱和其他毒素是为了对抗食草动物的侵犯。但是，烹饪也不一定有助于对所有食物的消化，真正有用的主要是烹饪红肉和地下根茎类，根茎内丰富而不易消化的淀粉质在烹饪的过程中被软化，煮熟后更适合于食用。但是，即使是现代的狩猎—采集民族也不是只吃肉类，典型的饮食结构是肉类加上根茎类占食物总量的45%（表5.1）。

所以，就让我们来看看烹饪对早期古人有怎样的帮助吧。如果用现代人类的模型作为基准，45%的食物的消化率得到了50%的提高，那么，总消化率的提高是22.5%。[7]也就是说，每100个百分点的进食时间，能产生122.5个百分点的营养摄入。既然匠人和直立人需要将57%和58.5%的时间分配在进食上，以供养它们增大的体型和大脑，那么烹饪能分别把它们对进食时间的需求降低57×（100/122.5）＝46.5%和58.5×（100/122.5）＝47.8%（匠人和直立人分别降低了12%和9%）。确实，进食熟的食物，对时间分配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填补了一定的缺口，但是，我们仍然还缺5.5%和13.5%的时间。当然，它们也许可以通过吃更多的肉食或者根茎类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这就意味着，对匠人来说，它们需要增加50%的肉食和根茎，达到总食物的67.5%；对直立人来说，要增加130%，达到总食物的105%。从有限的考古记录上来看，这两个数值显然偏高了，有关直立人的数字明显是不可能的，它们必须完全依靠肉食，或者完全就是肉食加根茎，这样的饮食结构即使是现代人也达不到。

<table>
<tr><th>食物来源(%)</th><th>世界各地</th><th>热带</th><th>温带</th></tr>
<tr><td>植物</td><td>26.7</td><td rowspan="2">40</td><td rowspan="2">40</td></tr>
<tr><td>根茎</td><td>8.3</td></tr>
<tr><td>肉类</td><td>36</td><td>34</td><td>40</td></tr>
<tr><td>鱼类</td><td>29</td><td>26</td><td>20</td></tr>
</table>

表5.1

现代狩猎—采集群体的食物

数据来源：人种图谱中63个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样本。（Cordain等，2000）

兰厄姆提到的第二个证据是，到了早期古人这里，臼齿变得小了。无可怀疑，匠人的臼齿确实比强壮型南方古猿的臼齿小了很多，但是，如果和纤细型南方古猿相比，那就并没有小多少（图5.5）。我很怀疑的是，关于匠人的臼齿比较小这样的印象，多半把这种数据和体量的大小联系在了一起。遗憾的是，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内，自动地把所有数据和体量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趋势。但是，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生物学上的可靠依据，错误就会难以避免了。比如，这就是个例子，咀嚼面积的大小以及由此而来的咀嚼效率，并非由臼齿的相对大小决定，而是由臼齿的绝对大小决定的，所以，它带来的益处并没有我们假设的那么大。第三个证据是伴随着人科出现的脑容量的增加，但事实是，在智人历史上，这一阶段脑容量的增加和之后的增加相比是非常有限的（图1.3）。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现在就用烹饪来解释早期古人类脑容量有限的增加，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后期古人类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脑容量大幅度的增加呢？

所以，不管烹饪带来了多少好处，但是它肯定还不足以解答所有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与人科同步出现的脑容量增加的原因，是否需要从进食大量的肉类或烹饪中寻找答案。毕竟生肉也不是完全不能被消化，只是生食所摄取的营养没有煮熟后那么多而已。黑猩猩也会吃一点未经烹煮的生肉，而且还很喜欢吃，所以早期古人没有理由不多吃点没有煮熟的生肉。问题仅仅在于，它们在吃生肉时浪费的近三分之一的营养，从时间分配角度来看是否重要。为供给高耗能组织而吃肉所增加的五个百分点，对黑猩猩来说相当于微弱增加了不到2%的进食时间，对早期古人来说相当于5—7%。烹饪能把这个百分比降低到大约3.5—4.5%，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节省，有限到我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为它费力气烧火。

我认为很明确的一点是，早期古人不可能依靠偏重于肉食来冲出时间分配的困局。关键就在于，如果兰厄姆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煮熟的肉食和根茎的确是它们的答案，我们就一定会在考古发现中找到很多用火的痕迹，因为没有火就无法烹饪。那么，关于用火，考古记录究竟都揭示了些什么呢？

用火的证据

火能提供光和热，毫无疑问，它对于人类最先进入高纬度的欧洲，之后进入亚洲，直到最终抵达美洲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我们眼下最关心的，却是要了解，早在匠人和直立人时期，火是否就已经出现，并被它们用于烹饪。如果它们的食物中熟食占到了一半的比例，那么可以

肯定它们多多少少在持续用火。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很多火塘遗留下来的痕迹。

迄今发现的最早痕迹，当属位于肯尼亚的库彼福勒（Koobi Fora）和切苏旺加（Chesowanja）的用火遗址，烧焦的泥土令人信服地成为智人用火的证据。这两处遗址距今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万年，也就是匠人出现之后的不久。然而，从这以后，当中出现了一大段的空白，直到大约一百万年前，才又出现了零星的用火痕迹。第二阶段最早的用火证据是在南非斯沃特克兰斯（Swartkrans）发现的六十块烧焦的骨头，这些骨头经受过高温烧烤，再加上骨头上切割的痕迹，所以被用来证明这些骨头不是偶然掉入火堆里，而是被人为烧过的。发现于黑海北部博加特里（Bogatyri）的焦骨，被鉴定为距今大约一百一十万年前。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Gesher Benot Ya'aqov），发现了大约七十万年前烧焦的木头和种子。在差不多时期的南非旺德沃克（Wonderwerk）遗址，发现了和阿舍利文化相关的用火痕迹，近一半的骨头呈现出被火烧烤过后的颜色，还有很多的植物灰烬。然而，在这以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用火痕迹。[8]

但是，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火的痕迹不断被发现，遍布三个旧大陆的很多地方。在以色列的塔崩（Tabun）、格什姆（Qesem）和乌姆盖塔法（Umm Qatafa），英国的比奇斯皮特（Beeches Pit）和德国的舍宁根（Schöningen）都发现了距今大约四十万年的火塘。在舍宁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烧焦了的木板。在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克拉克顿（Clacton），发现了一支木制执矛，显然被火烤过，变得坚硬。在萨福克的比奇斯皮特遗址，两片手斧碎片掉进了火炉，烧得焦黑，这一幕，仿佛将时光凝固，古人坐在火塘边，制作石斧工具的情景就定格在眼前。在西班牙的阿布瑞罗马尼（Abric Romani）、法国南部的阿玛达（Terra Amata）、英国的梅内兹得雷甘（Menez Dregan）石洞以及法国地中海岸的拉扎瑞特洞穴都发现了无可争议的火塘遗址，事实上，在距今四十万年前之后，火塘遗迹，遍布各地。

在西班牙的布罗墨（Bolomor），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烧烤小型哺乳动物（主要是兔子）的火塘。在非洲赞比亚的卡兰博瀑布遗址（距今约十八到三十万年前），发现了烧焦的圆木和用于挖掘的棍棒。另外，在南非的弗洛里斯巴德（lorisbad）遗址（时间上可追溯到上一个间冰期）和皮纳克顶（Pinnacle Point）遗址（距今四万到十七万年前）都发现了火塘。在距今十万年前之后，各地又发掘了众多的火塘遗迹，比如西班牙的洛卡波斯（La Roca dels Bous）遗址，摩尔多瓦的多个莫斯特人（Mousterian）文化遗址（其中包括了著名的猛犸象骨小屋）和德国的瓦勒特海姆（Wallertheim）遗址。

以四五十万年前为时间坐标，在之前的时期里，无论在非洲、欧洲还是在亚洲，火塘都很少见，这一现象或许在告诉我们，那个时段，标志着在火的利用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智人大概只会偶然地随机利用一下天然火（比如由闪电引起的森林着火），但是，它们没有能力保持火塘一直有火。能够有控制地用火，大概就是从四十万年前开

始的，在掌握了用火技巧之后，它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点火用火，并能长久地保持火苗不灭。用火的这个转折点，似乎和常住地（包括洞穴以及小木屋）的出现相吻合。大型火塘一天需要超过30公斤的木材，而且对时间、精力和协调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必须有人负责一直添加柴火。如果把这项任务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对已经紧张的时间分配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更加重要的是，没有多人的协同行动，维持一个大型火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行动不仅对交流沟通的语言有要求，也对认知能力以及轮流合作能力有要求。而所有这些能力，都有赖于大容量的大脑。在第八章中，我会详尽论述，支持这类认知能力的大脑，是不大可能形成于五十万年前古人出现之前的。总而言之，虽然公认的用火迹象出现很早，通常是以烧焦的骨头或者种子为标志，但是，表明煮熟的食物成为主食的强有力证据，直到四十万年前才真正开始出现。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下结论说烹饪还没有常规化到对早期智人的食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它们解决时间分配难题的主要答案。和很多其他的人类进化现象一样，关于用火的研究，多半着眼于发现最早的使用例子。但是，仅仅展示偶尔一次的用火甚至烹饪远远不够，要判断烹饪是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还必须确定用火现象是否在有规律地发生，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所以，随性的烹煮肉食很有可能经常发生，但它还是没有规律化到对早期智人的时间分配产生影响。

笑声是如何解决结合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时间分配中有一个部分，还没有被我们考虑进去，那就是社交的时间。对社交时间的要求和群规模有直接的关联，和南方古猿相比，早期古人的群体要大得多，所以，它们需要的相互梳理时间是南方古猿的两倍。在计算对社交时间的要求时，我们假设早期古人也和猿猴一样，也是通过互相梳理来建立亲密关系的。在灵长类动物之间，梳理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同时为几个同伴梳理在技术上也不现实，更何况还有情感上的问题。其实，我们现代人类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同时和几个人保持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是难以忍受的（如果这样做的话，至少会让其中的一人感到不适）。当然，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因为各部分活动项目对时间分配的需求，猿猴如果一天中花20%的时间在梳理上就已经抵达极限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又把能保持亲密关系的群体规模限制在50左右。当早期古人需要增加群体规模，超越50的界限时，它们有两个选择，或者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相互梳理，或者找到一个更高效的黏合方式，在同一时间里和更多的人建立亲密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能同时为几个人梳理。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说到，社交性的梳理给灵长类带来生理上的刺激，从而促使大脑激活内啡肽，内啡肽的激活对增进成员间的相互黏合至关重要。有一个行为，带来身心上的愉悦，恰恰起到了同时为多个同伴“梳理”的效果，这个行为就是欢笑。和人类一样，猿类也分享欢乐，同声欢笑。所不同的是，猿类的笑通常是伴随着嬉闹玩耍，它们的笑是

一连串的呼气和吸气，而人类的笑是一连串的呼气，而没有吸气。在笑的时候，猿类每次呼气之后，都要吸气，所以并没有把肺排空，这样对横膈膜和胸腔肌肉几乎没有产生压力。而人类的笑却不一样，一直呼气的笑会把肺排空，会让我们累到大口喘气。我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这种作用于胸腔肌肉的压力，会刺激产生内啡肽。所以，笑声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带有一定身体距离的“梳理”，可以同时激活多个同伴的内啡肽。

欢笑于是成为最佳选择，不仅仅因能激活大脑中的内啡肽，而且欢笑也是人类行为中少有的极具感染性的行为之一。和一群人一起看喜剧，发出大声欢笑的可能性，比一个人独自观赏时要高三十倍。实际上，欢笑这种行为是非常本能的，有时候，即使我们听不懂笑话，但是如果其他人都在笑，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简而言之，笑声是典型的社交合唱。笑是一种本能，因此有着原始的根源；笑不需要语言的激发，因此它大概远远早于语言。

我们研究的关键点在于，笑声比梳理能够多感染几个人。也就是说，在通常典型的社交性大笑中，有多少人会同时参与其中？为了找到答案，纪尧姆·德兹切克（Guillaume Dezecache）去酒吧做了调研。他记录了社交群体的大小（大致上就是围坐在一起，显然看上去是一伙的人们）、谈话群体的大小（社交群体中在活跃地说话或认真地聆听的人数）以及大笑爆发时即刻欢笑的人数（也就是欢笑群体）。在这个案例中，社交群体的平均规模大约是七个人，但是，谈话群体和欢笑群体的规模要小得多。我们之前所做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谈话群体的上限是四个人，如果四个人以上同时参与交谈，很快会分成两个不同谈话群体。而结果真正出乎意料的是欢笑群体（也就是在社交场合因为同一原因同时大笑的群体人数）的规模更小，它的上限只有三个人。这个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得多，尤其是现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被用语言表达的笑话逗乐的。

因为这个欢笑群体中的三个人（讲笑话的和听笑话的）都笑了，他们也就都感受到了内啡肽的释放。而在相互梳理的时候，只有那个被梳理的才能感受到愉悦。所以，作为一种成员间的黏合方式，欢笑的效率是梳理的三倍。如果早期的人科动物在梳理的同时也利用笑声来维持亲密关系，它们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我们的旧大陆灵长类社交梳理和群体规模关系等式显示，匠人群体规模是75，它们每天必须花18.5%的时间用于社交，直立人群体规模大约是95，它们要花23.5%的时间。如果欢笑能作为社交性梳理的补充，而且本身有三倍于梳理的效率，那么就能把这些时间缩短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匠人一天中的6.2%和直立人一天中的7.8%。这样一来，两个物种就可以分别省下12%和15.5%的时间，再结合前面阐述过的因为气候变化、双足行走和高耗能组织假说所省下的12.5%，它们分别可以省下总共24.5%和28%的时间成本。

现在，即使没有烹饪的加入，两个物种的时间分配离我们所需要的30%和34%也只差5—6个百分点了（图5.6）。这个相对较小的差距，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偶尔的烹饪中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只要将5%的食物煮熟，早期古人就没必要依赖火塘和狩猎了。如果它们的时间分配得到

平衡，这两项优势就能留给后来的物种，给予它们更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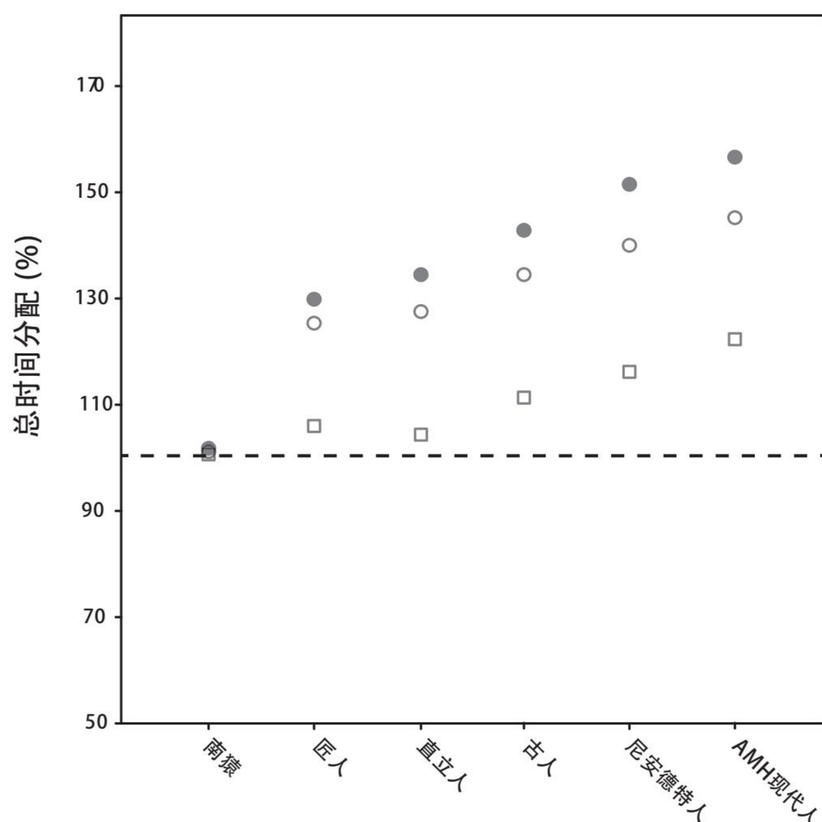


图5.6

主要人亚科物种中总时间分配的欢笑效应。总时间分配基础线（黑圆圈）和经高能耗组织调整后的总时间（白圆圈）和图5.4中的一样，因为欢笑而节省的社交时间需求用（白方块）来表示。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简单地把直立人群体的规模和大脑容量的数值挂钩。在第六章中，我会阐述一些特例，比如，尼安德特人的群体规模相对于它们的大脑容量来说要小，这是因为它们住在高纬度地区，光照水平明显偏低，从而造成了它们的视觉系统更大。所有的直立人都住在欧亚大陆和尼安德特人差不多纬度的区域之中，所以它们同样承受着提高视力的选择压力，其结果是，它们进化出了更大的枕区（也就是位于大脑后部，负责主要视觉处理的部位）。虽然证据有限，但是，有迹象表明，和尼安德特人一样，直立人的眼眶和枕叶都比它们的匠人表亲要大。如果这个属实，那么直立人的额叶和匠人的就差不多大。如果我们用调整尼安德特人群体规模的方法（见第六章），等比调整直立人的群

体规模，那么，这两个早期人类物种之间的差别大多可以弥合。这样一来，直立人面临着的明显更严重的时间分配危机也就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能够解决匠人时间分配难题的答案，同样也解答了直立人的难题。

早期古人的大脑容量为什么会增加？

伴随着人科的出现，大脑容量也出现了快速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如此戏剧性的激增呢？也许，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科物种，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气候变化模型”（climate variability model）。这种解释指出，在人类进化史上，大脑容量的增加，主要发生在气候的不稳定期，尤其是处于在湿润和干燥之间来回变化的时期。在气候变得特别不稳定时，智人需要更大的大脑来应对更具有挑战性的觅食环境。这种假说有一些不同版本，有的把这些认知上的变化归结为对制作更高质量工具的需要。这种解释得到了一些实证上的支持，比如，一直居住在欧洲高纬度区域的鸟类，因为必须面对因为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引起的食物供给量的急剧变化，大脑明显要比飞到热带温暖地区过冬的候鸟大。大脑容量越大，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当然更加从容。

过去四百万年间大脑容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智人大脑假说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这个关系只是把各个物种的样本安插在地理时间轴上，却忽略了这些样本属于不同物种的这一事实。如果我们按单个物种的样本再做一次梳理，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尤其是在早期古人时期。脑容量的各种变化，完全是因为物种的不同而不同，和气候没什么关系。或许，我们不必吃惊的是，其实并没有凭据证明生态对整体上的灵长类脑容量有任何的影响，这样说来，如果突然之间，像变魔术一般，同样属于灵长类的智人独自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倒是很不合情理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工具的复杂性和大脑容量之间有什么关系，确实，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些变化总是跟在脑容量的变化之后，也就是说，工具的变化是脑容量变化后的结果。总之，虽然气候的变化是产生这些变化的重要诱因，但是，气候变化模型还是不能成为我们的答案。

有证据显示，早期古人大脑容量的显著增加，正好和一段湿润气候同步出现。当时，东非大裂谷造成了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莫（Omo）山谷到肯尼亚中部巴林戈（Baringo）湖的巨大深水湖，在它的南面，肯定还有更大的湖泊。这些湖泊，极大地拓展了一些智人群落的居住区域，生活范围扩大到以前不曾抵达的土地。但是，生态环境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们需要更大的大脑，只是给了它们一个有利于进化的环境。事实上，这些裂谷巨湖经常会干涸（而且经常会干得很快），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当然会对在此生存的动物形成很大的适应性压力，它们必须很快地适应突然变得干旱的环境，否则就会灭绝。

这就给了我们两个可能，一个是灵长类普遍面临的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天敌的威胁；二是来自于其他人亚科群体的威胁，这样的对手可谓

是另一种天敌。来自天敌的威胁是一个说得通的原因，因为搬迁到更开阔的地区之后，失去密林的掩护，早期古人自然就会暴露在天敌的觊觎之下，这时候，大规模群体的安全性就能凸显了。比如，狒狒之所以能离开它们原先藏身的森林，进入有更多天敌的林地，甚至于平坦开阔的草地，是因为它们有着猿猴中最大最稳定的群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是在更为开阔的草原上生活的群体，其规模就越大。极端的例子是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地上的狮尾狒狒，这种食草性狒狒物种有着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其基础是小型多配偶的家庭单位。同一觅食群体中家庭单位的数量，取决于当地天敌威胁的程度。当它们在高原草地上觅食时，群体中就会聚集了最多数量的家庭单位，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树木的遮蔽和保护。[9]

但是，这种看法还是有一个问题。人类和黑猩猩面临同等程度的天敌威胁，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个物种的群落级别和天敌威胁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两个物种都生活在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之中，即使是高级别群落中的成员，因为彼此间的物理距离，也难以对天敌形成统一的抵御防线。黑猩猩为抵御天敌而组合成的觅食群体规模是3—5，人类狩猎时形成的觅食群体规模按性别有所不同，男性狩猎群体规模为5人，而女性狩猎群体规模为10—15人，或者，还可能形成30—50人的露营群体。露营群体的较大规模可能反映了现代人类的弱点，在晚上更易暴露在天敌的威胁之下。猿猴通常夜宿于树上或者悬崖的侧壁，但是，人类受爬行能力的限制，难以找到安全的营地，通常来说只能睡在平地上，再加上灵长类夜视能力差这一通病，因此夜里遭到攻击的风险非常高。所以，无论如何，高级别的群体组织（黑猩猩群体大约为50，人类群体大约为150）都因为成员彼此间过于分散而难以起到共同御敌的作用。

无论黑猩猩群体组织的级别有什么功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古人几乎也差不多，据推测，早期古人的群体规模比黑猩猩的大不了多少，两个物种都差不多是75—80。对于这种黑猩猩群体规模，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既是为了占有领地内的食物资源，也是为了占有领地内的繁殖资源，也就是在领地上生活的雌性猩猩。为了占有食物是有可能的，虽然这种做法在灵长类中比较少见。虽然很多灵长类都有强烈的地域占有性，但一般来说，雄性保卫领地是为了占有领地内能够生育的雌性。所以，为了雌性而选择领地在灵长类动物中是很常见的，这一点可以从雄性黑猩猩群起攻击其他雄性这种行为中得到证实。在极端的情形下，它们甚至会把相邻群体里的雄性赶尽杀绝。黑猩猩群体看起来简直像一个自卫联盟，雄性黑猩猩会像黑帮成员一样团结起来，捍卫它们自己的生命，捍卫它们对领地上的雌性的独占权。

如果说早期古人只是把黑猩猩的行为延伸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这种观点从逻辑上似乎能说得通。但是，如果说这一切因为争夺配偶而起，那又是说不通的。在群体合作的前提下，它们原本是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地的，既然如此，它们为什么会突然需要扩大自己的领地。要知道，更大的领地需要更大的群体去捍卫，而更大的群体意味着更高的大脑成本。对于这些疑点，似乎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可以作为解释。更重

要的是，即使雄性黑猩猩联合起来保护同一个交配领地，它们之间也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完全没有底线的。在乱交的体系中，比如像黑猩猩和狒狒的群体，如果群体中有五个以上雄性，那么，即使是雄性里的老大也无法阻止其他雄性和“它的”雌性交配。老大独霸雌性的能力，随着群体中雄性个数的增加而递减，这跟群体中雌性的个数无关。雄性并没有能力守住多个雌性，所以，它只能把精力放在正在发情的雌性身上。如果有两个雌性同时发情，那也只能把其中的一个雌性让给其他雄性。这种行为，我们在黑猩猩、狒狒和猕猴的群体里都能看到，所以这和它们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取决于老大的对手的多寡。如果让一个高级别的雄性容忍群体里的其他雄性，并且心甘情愿地和它们分享自己的雌性，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不得不为之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的根源一定是来自于群体的外部。如果不是为对付天敌，那么就可能是为了防范和它属于同类物种的其他群体（conspecifics），黑猩猩就有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为了占有更大领地里的觅食资源。现在仍然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早期古人对更大群体需求，进而转化成对更大容量的大脑的需求。我会在

第七章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就眼下来说，还是让答案再飞一会儿吧。

不过，眼下我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早期古人是多配偶制的。早期古人的二态性的程度比大部分南方古猿要低一点（比值大约为1.25），但仍然比现代人类要高，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的多配偶或乱交。我们无法确认的是，这究竟是个体的雄性争抢进入生育期的雌性（像黑猩猩和狒狒那样），还是雌性被群体中地位高的雄性以后宫形式独霸（像狮尾狒狒、阿拉伯狒狒和大猩猩那样）。和南方古猿一样，这可能取决于它们的觅食群体有多大的规模，彼此间有多分散。但是，既然它们的群体稍大于南方古猿和黑猩猩的群体，那么，某种形式的多配偶制度应该就是最合理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故事还是相当的简单明了。时间分配在进化的过渡阶段中起了变化，首先发生在南方古猿身上，然后是发生在早期古人身上。这些变化相对较小，我们应付起来也比较从容，只需通过食物结构的微小变化以及生理结构的进化带来的行动优势等等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还有像第二个过渡阶段里的欢笑那样，也可以成为奇妙的个体黏合方式，从而成为我们的理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两个过渡阶段中，大脑容量和体量上的增加并不像我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些改变，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并非微不足道。每一个变化，都不仅仅是将原有的猿类特性进一步放大而已。正是这些变化的积累，使得我们顺利地让早期古人走上进化之路，而不必过早地引入用火和烹饪。这意味着我们给自己留了余地，在脑容量进一步增大的关键时点，我们还有备用的烹饪手段作为杀手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从早期古人进入古人的第三次过渡时期，大脑容量将有一个跳跃性的增加，而我们的故事也因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注释：

[1] 事实上，亚洲的直立人从来没有制作过手斧。大量的手斧在莫韦士线（以最先发现该线的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命名）的西面和南面出现，也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到孟加拉湾。这条线的东部只发现了粗糙的斧头，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合适的石材。很有可能的是，亚洲的直立人用竹子或其他硬木做成了更复杂的工具，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2] 岛屿上的物种通常会变得矮小，尤其是生活在没有自然天敌的环境中。

[3] 对进食时间的要求是经过人科和南方古猿的代谢体重比率调整的，代谢体重（是体重的0.75次方，即M0.75）是身体组织的相对能量消耗，代谢体重也经过大脑和躯体的不同能量消耗调整过，我在这里用的是两性的平均体重。

[4] 针对高能耗组织，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南美洲的猴子（参见Allen和Kay的论述，2012）和整个哺乳动物（参见Navarette等人的论述，2011）中并没有大脑容量和肠子长短之间的平衡，所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结论，因为高能耗组织假设是特别用来解释人类进化中的问题的，即人类是如何跨过这个关键的能量约束的。这只是一个最高限度，所以这个约束只有在大脑容量超过猿类时才会体现出来，这个假设即使在鸟类或大脑容量较小的南美猴子中不成立，也无碍于我们的结论。尽管如此，一个对古比鱼的巧妙实验显示，当通过人工繁殖加大它的脑容量时（此时它的认知能力有了提高，只是在雌性中有如此表现），这种鱼会通过缩短肠子尺寸和减少产子数量来平衡（这就是所谓的繁殖平衡，参见Kotrschal等人的论述，2013版）。第二种意见更加严肃，Isler和van Schaik（2012）提出，因为生存经历的过程为了大容量大脑必须减速，繁殖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到以至于物种数量不足以延续下去，形成了比猿类脑容量略大的一个灰色上限，一旦超过这个上限，猿类的繁殖率将不足以补充自然死亡率。他们提出人科物种能越过这个上限是因为他们开始集体繁殖，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生育的时间间隔（在旁人的帮助下，母亲可以在哺乳第一个孩子开始怀上第二个孩子，这样可以使繁殖率超过死亡率）。但是，他们引证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生率会低于维持的水平，脑容量和繁殖率的关系不像他们所述是线性的，而是渐近的（接近但并不会低于死亡率）。即使我们用回归线来预测人类自然生育间隔而不是用现在人类的生育间隔，人类依然是在这个界限之上。他们的错误是混淆了双对数图表的线性关系（即一个指数［渐近］关系）和原始数据的线性关系。

[5] 过去，古人类学家经常会宣称，南猿失去和猿一样的大型犬齿，以及早期古人失去大型臼齿，都是因为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些物种能通过使用工具，来完成这些牙齿原来的咀嚼进食功能。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物种特性并不会仅仅因为不再被需要而消失；它们只会在被选择消失时或是和另一个选择需要的特性相抵触时才会消失。和很多人的认识相反，大型犬齿并没有在灵长类的进食中起到作用（这一点和肉食动物不同），它们只是雄性互相争斗的武器。大型犬齿的消失，显然意味着雄性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可能是为了让多个雄性能在觅食群体中共存；另一个解释是，大型犬齿妨碍了咀嚼时下巴的自如活动，这可能对南猿的觅食造成不利。早期古人臼齿牙排的缩小，可能是为了缩小下巴，以增强对发声区的控制能力，便于进行语音上的交流（比如大笑），但也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变化。如果食物的变化的确是其中的驱动因素，那我们必须有依据地分别罗列大臼齿的优势和劣势，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因为不需要而让它消失。问题是，从食物处理的角度来看，大臼齿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

[6] 也被称作图尔卡纳（Turkana）男孩，因为化石是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边发现的，化石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登录号为WT 15000。

[7] 55%的食物按标准比例提供营养，剩下的45%能提供1.5倍的营养，营养提高的总量为：55%＋（45%x1.5）＝122.5%。

[8] 据称，中国北部著名的周口店发现了烧焦的残留物，这意味着这里曾经有过火塘，七十五万年到二十万年前，那里居住着直立人。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些残留物其实只是变色的土壤。

[9] 和狮尾狒狒同期出现的天敌主要是金钱豹和鬣狗（曾经也有狮子），虽然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高地上已经看不大到金钱豹了，但鬣狗还是很常见的（埃塞俄比亚的鬣狗异常大而且凶猛）。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虽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全球气候从来就没有稳定过。但是，过去的一百万年间，尤其变幻莫测，前所未有。从格陵兰岛冰层核心部分氧同位素以及非洲大西洋深海原生生物壳内尘土和氧同位素比例这两项指标来看，冷热气候的此消彼长伴随着极地周围区域巨型冰层的生长和消退。[1] 在最寒冷的世纪，冰层曾经覆盖全球陆地三分之一的面积。

冰河效应对气温震荡变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跟现在相比，热带地区的平均气温最多曾经降低了3摄氏度，欧洲的平均气温曾经最多降低了16摄氏度。地表的大部分水都结成了冰，海平面比现在要低150米，因而水下部分的大陆架都浮出了海面，像英国这种向外延伸的岛屿结果也和相邻的大陆连在了一起。在降温最厉害的时期，多达五千万立方公里的水都结成了冰，使得降水量大大减少，结果是冰川期的气候比现在要干燥得多。森林变成了草地，草地又变成了沙漠。在冰川时期，因为陆地被严重侵蚀，狂风刮起松散的沙尘，洒落到临近的大海里，深海中心的尘土量急剧增加。

在过去的七十五万年里，地球上经历了八个冰川周期。每一个为时大约十万年的周期中，都有着一个伴随着气温的逐级下降，而冰层不断累积增厚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被骤然上升的气温阻断，预示着一个最短大约只有一万年左右的间冰期的到来。实际上，冰川周期的特征并非持续不断的严寒，在这些周期之内，也会夹杂着寒冷和温暖的小周期，气温处于反复升降的动荡之中。

离我们最近的上一个完整周期（这个周期包括了上一个间冰期、上一个冰川期和当前这个温暖的间冰期）是从十二万七千年前开始的。大约十一万五千年前，上一个间冰期结束，气温开始逐步下降。在欧洲，森林退行，变成了林地。然后，从大约七万年前，气温开始急剧下降，于是，上一个冰川期报复性地席卷而至。欧洲大陆上最后一点森林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开阔裸露的冻土地带，冻土上的典型植被是在冰层到来之前就有的生草丛（tussock grasses）和莎草（sedges）。随着冻土地带的延伸，以前生存在更北面的驯鹿、高鼻羚羊、长毛犀牛、野牛、麝牛和猛犸象都随之迁徙而来。而一起南迁的天敌，包括了巨大的穴熊、穴狮和穴鬣狗，它们的体型，都比现在的熊、狮和鬣狗庞大得多。

到了距今四万年前，整个欧洲和西亚完全进入了冰川期。这个冰川期在大约一万八千年前达到极限，欧洲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埋在了厚厚的冰层之下。然后，在大约一万四千年前，气候开始再一次逐渐变暖，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2] 结束时，气温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上升了令人咋舌的7摄氏度，突然就结束了冰川期。大幅升降的气温带来的生态变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匠人和直立人有着漫长的进化枝（clade），从一百八十万年前到五十万年前的一百多万年中，在解剖学和物质文化上变化都很小。[3]这就说明了当环境因素没有施加任何选择性适应压力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后，在大约六十万年前，一个新的物种突然就出现在非洲。古人

（通常被定义为海德堡人）来了。[4]

很显然，海德堡人在很久以前就占据了欧洲和西亚，根据博克斯格拉夫（Boxgrove）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个时间可以上溯到大约五十万年前。而且，在此之后的二十万年间，它们一直在那里生存（图6.1），不过，在大约三十万年前，欧洲的海德堡人开始进化成早期的尼安德特人。而往东去，它们似乎进化成了另一个古人物种丹尼索瓦人。到目前为止，关于丹尼索瓦人，只有几根在一个距今大约四万年前的洞穴中发现的骨头，那个洞穴隐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脉之中。但是，它的DNA和尼安德特人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都非常不同，这表明了这些物种的最近共同祖先（LCA）可追溯到大约八十万年前。最大的可能性是，它们是海德堡人进入欧亚大陆，向东延伸的一个早期分支。

古人体型强壮结实，在这一点上和早期古人很相似，这种特征，在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身上也得到了继承。不过，尼安德特人在这一段时期里也展示了非常明显的进化痕迹，它们的颅腔容量在不断增加，它们的身体为了适应欧亚大陆南部更寒冷的气候而变得更加强壮。它们身躯粗壮结实，四肢短小，这些特征和现在的爱斯基摩人很像，这两个群体都是因为要减少身体热量的消耗，而各自形成了这些身体上相应的特征。有些专家认为，这一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在工具设计的复杂度和美学价值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5] 不过，这个观点常常遭到质疑。

大脑容量的大幅增长，从匠人的760毫升和直立人的930毫升，到海德堡人的1,170毫升（比匠人多了55%）和尼安德特人的1,320毫升平均值，再到我们这个物种（也就是AMH，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化石成员的1,370毫升，这一切，发生在大约三十万年不到的时间里，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令人眼花缭乱（图1.3）。这一现象表明，整个这一段时期，对大脑容量都有很大的选择性适应压力，这种压力，在我们考古发现的工具类型以及其他物质文化类型上都留下了烙印。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依循惯例，将海德堡人及同期伙伴之后的物种称为人类，它们确实和早期古人不属于同类。

第一个家庭

在靠近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有一座阿塔普尔卡山，山中有一系列被称为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的骨穴，在骨穴里挖掘的化石，是人类进化史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这个洞穴最早被发现是在20世纪初，在修建一条通过这座山脉的铁路时被发现，并做了首次初步勘探。接着，经过重新发掘，发现在一段长得不可思议的时期里，这个洞穴中居住过不同的人科物种，这个发现使得这个洞穴的重要性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获得了高度的肯定。1983年，发掘者在一个高达13米的烟囱底部发现一间屋顶低垂的穴室，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骨穴。这个骨穴里的化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发现，总共有一千多根人科骨头化石，分属于至少32个个体。这些化石包括了身体各部位的骨骼，这32个个体也覆盖了不同的年龄段和性别。这个遗址被鉴定为距

今三十五万年之前，至于他们究竟属于海德堡人还是早期尼安德特人（这是更新的观点）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批可代表所有古人的独一无二的家族类化石。



图6.1

主要古人遗址分布图

▲ 古人（海德堡人、古尼安德特人、古现代人、丹尼索瓦人）

● 尼安德特人

参见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和其他古人一样，这些洞穴人也呈现出现代人和原始人的混合特征。他们眉骨突出，额头很低，没有明显的下颌。然而，他们的大脑容量达到了可观的1,125到1,390毫升，以现代人类的标准，处于下限，但是，已经明显大于任何匠人或直立人样本。他们身躯粗壮，骨骼强劲，例如，他们的腿骨皮层极厚，几乎等同于骨质的厚度（现代人类的骨质皮层厚度只有薄薄的几毫米），这表明他们在生活中需要负重或者承受别的压力。他们的身高和现代人类差不多，雄性约1.75米，雌性约1.70米，有些甚至高达1.80米。对照他们眉骨粗大、额头倾斜、没有下巴的特征，再加上第三颗臼齿后方标志性的空隙，可见这些阿塔普尔卡人很

像后来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这些化石代表了当时人口的随机样本，那么，成年之前的死亡率显然是很高的，在样本中，半数死于18岁前。这些样本的门牙磨损特别严重，加上下颚和头骨关节处的关节炎（几乎所有样本都有），可以推断出它们的门牙经常被用来啃咬食物或者非食物（比如兽皮或者工具）。牙齿的生长线显示出很多个体在一生中经历了生理上的压力期（可能是伴随着病痛，或者是食物短缺），很多个体的压力期很可能从四岁断奶时就开始了。除此之外，他们的牙齿状况好得出奇，几乎没有龋齿，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常使用牙签，臼齿外沿釉质上有垂直的槽纹，看上去是类似于用作牙签的尖细物品造成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得病率很高。5号阿塔普尔卡人头骨显示头骨主人死于败血病（看上去病症先是从牙齿开始，然后向上扩散感染到眼眶，病人一定承受了剧痛）。另一个样本提供了最早的耳聋证据（因为他的耳道被发炎后增生的骨质堵住了）。这些样本都没有骨折的痕迹，但是，数只头骨上留下了被撞击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摔倒，也可能是被坚硬物体砸到过。5号阿塔普尔卡人的头骨上就共有十三处这样被撞击的痕迹，这说明他要么非常不小心，经常摔倒，要么经常跟别人打架。

至于这些阿塔普尔卡化石为何最终会聚集在这个骨穴中，仍然是个未曾解开的谜。骨头之所以会堆积在冲击洞里，通常会有两个理由，一是捕食者把猎物的骨架拖回洞穴内，二是动物死后留在地面上的骨头被暗流冲到了一处。但是，这两个理由在这里似乎都说不通，至少有几具骨架还非常完整，不大像被捕猎者啃食过，也不像被长时间的水流冲过来的，而且，没有一块骨头上留有被咬过的痕迹。那么，这些尸体很有可能是被故意扔在这里的，这样做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招致别的动物，也有可能是为了防止腐烂后的尸体污染了处于洞口位置的生活区域。或者，这个穴室被看作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是原始萨满教的共识，我们在第八章中会讲到），所以这代表了一种埋葬方式。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相当随意，尸体杂乱无章地横陈在地上，好像是从烟囱的通道里被扔进来的。

洞穴人的生活

在第五章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海德堡人的进食时间必须占到一天里的64%（图5.2），这个百分比，比匠人因高能耗组织调整后的56%略为高了一点（图5.4）。当然，海德堡人更大容量的大脑，表示他们的群体规模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所以，除了进食时间之外，他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社交时间来维持更大的群体。用我们的公式，可测算出海德堡人群体的平均规模是125，比匠人的74.5要大出非常可观的68%（图3.3）。而需要花费在梳理上的时间是30.5%，比匠人几乎高出12%（图5.3a）。那么，在调整了高能耗组织的影响后，他们总的时间分配需求是134.5%，几乎比匠人高出10%（图5.3b）。当然，这段时期气候的持

续变冷会缩短他们的休息时间，但是，最多也就减少一两个百分点，他们还是面临着化解重大超标的难题。

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物种的平均值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约三十万年前，海德堡人的大脑容量有过一次快速的急剧增加（图6.2）。虽然，在样本数量比较少的时候，很难确定。但是，关于图6.2，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解释是，起点是匠人的脑容量增加，从那时之后到五十万年前，脑容量开始减少，然后，又在大约三十万年前开始了一段急速的增加。请注意，早期的热带样本数据点（空心标记）普遍高于欧洲样本数据点（实心标记），这暗示了高纬度地区的生活给这些北方人口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平衡时间和能量的分配，只好做出牺牲，迫使脑容量缩小（在直立人中也看到类似体型的缩小）。但是，在三十万年这个分水岭之后，脑容量有了急剧的增加，同时，高纬度和低纬度人群之间的差别也开始消失，看来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时期（大约四十万年前，见第五章），正好是用火技术得到掌握的关键点，这两者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或许，在这段时期，对用火技术的掌握，烹煮肉食的能力，终于让古人冲破了之前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大脑容量的瓶颈。

不管是什么因素激发了后期的大脑容量的增加，这对我们预测社交群体规模和总体时间分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按照时期和纬度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三十万年前，低纬度人口的平均总体时间分配是142.2%，高纬度人口是139.4%。而在三十万年时间分水岭之后的对应数值分别是146.7%和142.4%。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匠人和直立人时间分配缺口的答案，那么，我们只需要再解决海德堡人和后匠人/直立人的129.5%之间的缺口即可。这也就意味着，早期海德堡人只差了11个百分点的缺口，后期低纬度海德堡人尚缺13个百分点的缺口，后期高纬度海德堡人尚缺12.5个百分点的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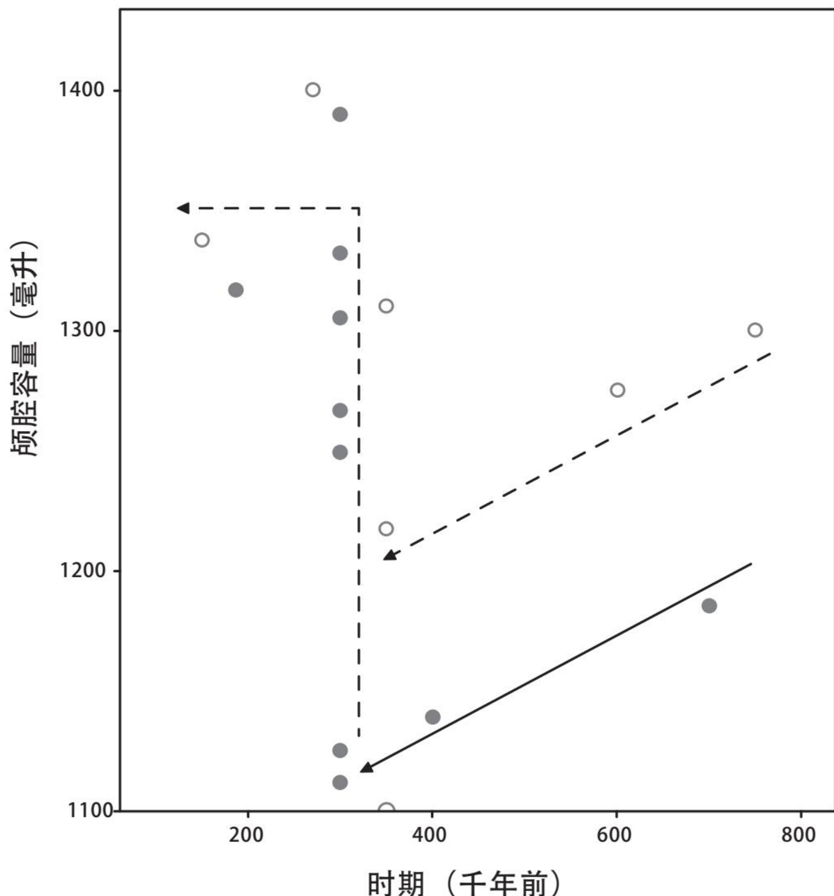


图6.2

● 高纬度地区（欧洲）

○ 低纬度地区（非洲）

按时间排列的海德堡人个体样本颅腔容量。

数据显示，在三十万年前的脑容量是逐渐减少的，这是因为气温降低加上纬度的影响。之后，这些限制因素随着用火烹煮、气候变暖、尤其是活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影响。来源：De Miguel和Heneberg（2001）。

这个明显的答案当然就是烹饪，完全煮熟的肉类加根茎类饮食结构能提升50%的营养摄取量，单凭这一项就能把后期海德堡人的进食时间减少14.7%（图6.3）。[6] 这就能轻易地弥补了低纬度人口的差距，至于高纬度人口，还能有5%的盈余。因为有了盈余，他们可以有一个烹饪的过渡期，不必从一开始就煮熟所有的食物。最初可能是偶尔的烹煮

（像直立人一样），后来到了早期海德堡人那里是经常性地烹煮，再到后期海德堡人就煮得更多。如果能腾出点盈余的时间，让早期海德堡人可以花些时间来学习操练用火烹煮，那么整个假设就更加令人信服了。早期海德堡人所拥有的这点时间分配上的盈余，对于三十万年前开始的脑容量的再度增加来说意义重大。图6.3中的三角形，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高度依赖肉食的饮食结构，加上能让高耗能组织受益的烹饪方式，会对整体的时间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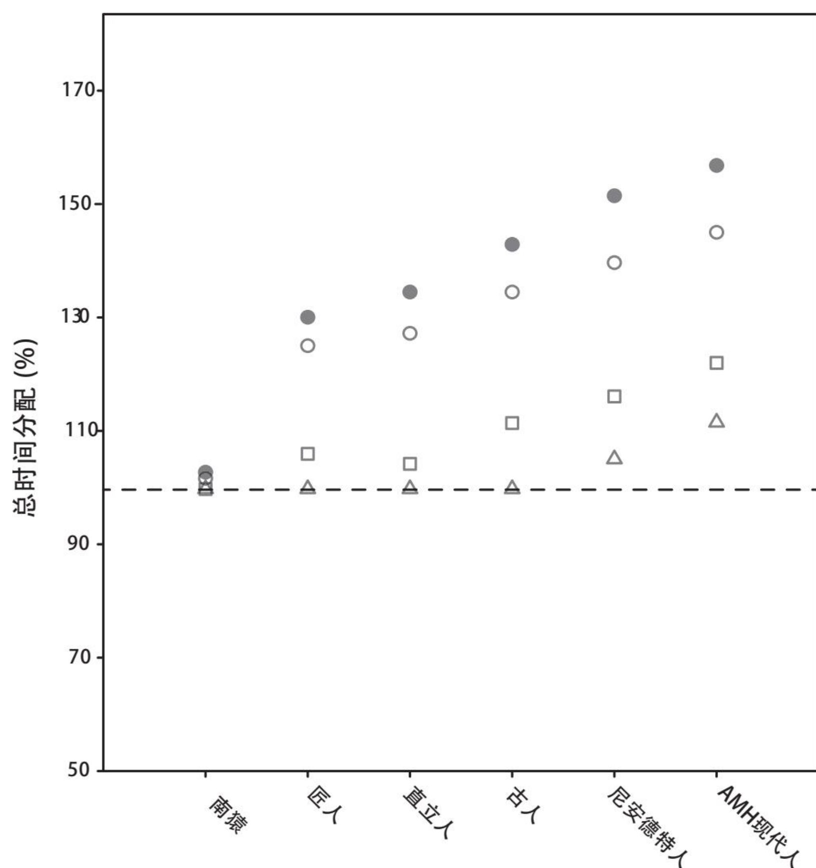


图6.3

大量肉食对主要人亚科物种总时间分配的影响。如图5.6，图中（●）所示是总时间分配基础线，（○）是因高能耗组织效应所产生的递减，（□）是欢笑，（△）是大量烹煮肉食的影响。

烹饪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处。在近期一项有关老鼠进食行为控制机制的研究中发现，进食的过程能够激活内啡肽系统，也许这就是我们

在饱餐一顿之后，感到满足和放松的原因吧。如果说聚在一起，比如在一个特别的节日里，吃一顿大餐，能够激活内啡肽。那么，烹饪自然而然地会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做准备工作，然后一起用餐，欢声笑语中，相互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融洽。一起吃过饭的伙伴，会尤其感到亲切友好，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社交性的进餐那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一起吃饭是了解陌生人的最好机会，尤其是那些我们并不熟但是希望能加深了解的人。社交性的聚餐让人乐此不疲，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人好好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社会人类学家会关注菜单的社交意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会对狂欢聚餐的证据很感兴趣（见第九章），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发问，我们为什么要费老大的劲来做这事，我们觉得人类天生就该这么做的。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社交联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举两得的聚餐或许能让古人再减少一些在时间分配上的压力，从而在大脑容量的增加上再添加一些盈余。

所以，这样看起来，烹饪的发明，很可能成为海德堡人关键性的创新，为他们所面临的时间分配难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另外，因为烹饪这件事本身就需要来自于很多人的参与，所以无意中增加了群体间的情感联络和合作互助，与此同时，社交时间自然而然地就增加了。虽然这种观点还不足以解释海德堡人的群体急速膨胀的现象，但是，一起做饭进餐的确为大型的群体提供了额外的社交时间。海德堡人群体增长的原因可能还需要别的解释，但欢笑大概不能作为解释。因为我们曾经分析过，欢笑同时最多只能影响到三个人，而且，欢笑的优势在匠人/直立人时期的最后阶段已经将情感联络的作用发挥到极限了，所以，不可能再从笑声中寻找答案。我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回头来讨论这个关键点，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种古人尼安德特人是如何应对时间分配问题的。

神秘的尼安德特人

在人类进化故事中，没有哪个物种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受到世人的关注，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在普通人的眼里，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远古时期的象征，他们是步履蹒跚而头脑迟钝的穴居人，他们是应该被聪明睿智的现代人类取代的进化失败者。事实上，尼安德特人绝不是演化历程中的一潭死水，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愚钝。在比现代人类存在的历史更长的二十五万年间，他们称雄欧洲大陆，疆域广阔，西自大西洋，东到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北到英伦南部，南到黎凡特，都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能应对冰河纪的气候，他们是史上最彪悍的大型动物狩猎者。

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他们的骨胶原蛋白中氮和碳同位素的测定，[7] 发现他们的氮同位素的水平明显高于同区域的食草动物，但是接近于现代肉食动物（比如寒带的狐狸和狼）骨头中的氮同位素级别。他们的碳同位素含量显示，他们主要是靠捕杀陆地哺乳动物为生，而不是以水域里的鱼或水鸟为主食（图6.4）。从黎凡特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尼安德特人善于使用有分量的执矛，执

矛的顶端安装了三角形的勒瓦娄瓦石制矛头。[8] 这些证据说明他们很可能采用埋伏式狩猎法，猎者近距离地用执矛刺杀猎物。和后来现代人类用的长矛不同，他们的执矛不是像标枪那样用来投掷远距离的动物的，而是用来刺扎近距离的猎物。他们的手臂比现代人略短，投掷标枪式长矛时，发力不如现代人，距离也不如现代人，因此狩猎效果不佳。但是，尼安德特人硕壮的躯干和强劲的上身给了他们特有的优势，使他们特别擅长于近距离狩猎。

尼安德特人能够在不同的地点猎杀不同的猎物，这说明他们会根据环境的不同，相应地调整狩猎策略。在克罗地亚克拉皮纳的尼安德特石洞（时间上距今约十三万年，最后一个间冰期开始的时候）遗址里，发现的大部分骨头，都是属于幼年的犀牛和其他动物，而且很可能把整只动物都搬进了洞里。但是，在另一个离现在更近的生活层，距今大约十二万年前，发现了大量头骨和角的化石，躯干骨骼不多，而且多数属于老年动物。而在有些地方，尼安德特人专门猎杀成年动物，在最北面的一个遗址中，也就是位于德国的萨尔茨吉特莱本施泰特的遗址，发现的化石，除了成年驯鹿，几乎没有别的动物。再往后，到大约四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尼安德特人几乎都在猎取中型的食草动物，比如马鹿和黇鹿。在西班牙的波罗莫遗址，留下了经常烹煮兔子的痕迹。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了他们是多面手猎者，适应力很强，能根据居住地周边的动物情况，随机改变狩猎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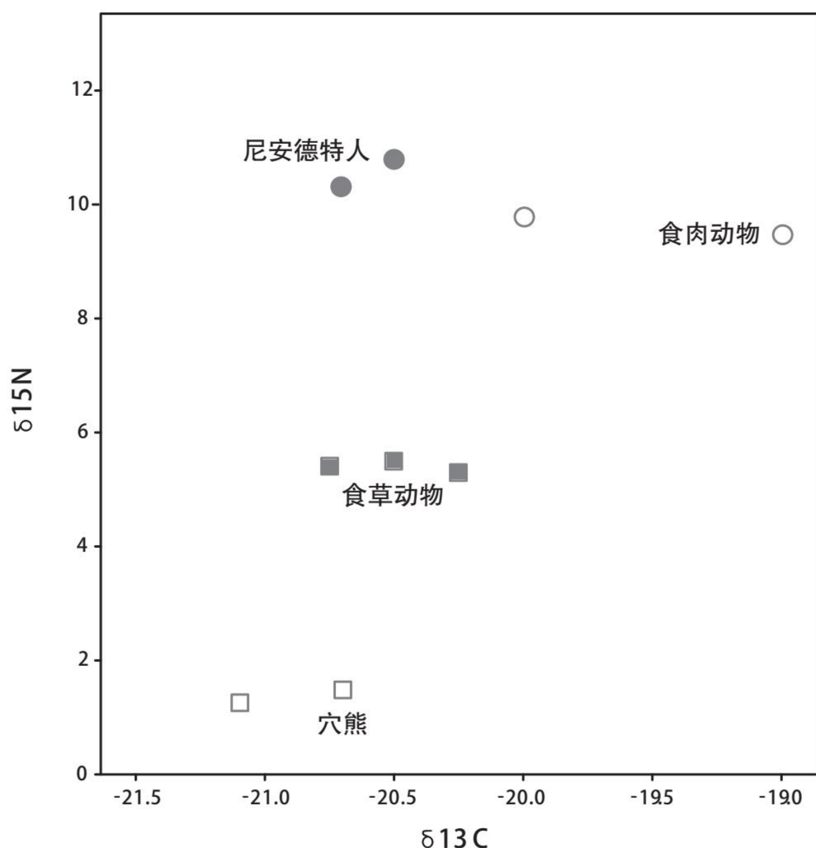


图6.4

碳（13C）和氮（15N）同位素在以下动物骨骼中的含量：（●）尼安德特人，（○）食肉动物（北极狐和狼），（■）食草动物（野牛和鹿），（□）在克罗地亚凡迪亚洞穴中的穴熊（距今约两万八千五百年前）。

根据Richards等人的图表重绘（2000）。

从一些遗址里发现的化石来看，这些地方的尼安德特人偏向于猎杀年老的动物，这说明他们主要食用自然死亡或者被别的肉食动物杀死的动物（年老或行动不便的动物更可能成为目标）。但是，这些骨头上并没有留下其他肉食动物的牙齿印记，所以，更有可能的还是他们自己猎杀的。很多大型动物，比如猛犸象，没有几个猎者的协同作战，是很难制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安德特人会形成一个包围圈，近距离合作，一起刺死这只不走运的猎物。显然，这样狩猎方式十分危险，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些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上有很多受到撞击的痕迹，传统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头骨的主人在用执矛围攻猎物时，大型困兽暴跳如

雷，伤到了狩猎者。

尼安德特人所采用的埋伏式狩猎法，证明了他们的合作程度。我们可以断言，他们具有完全现代的认知和预测能力，因为这样的狩猎方式需要相互间密切的配合。而这一切又证明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忠实于社会规范准则，个体无私地服从于群体，这些都是现代人类行为的核心。在伊朗的沙尼达尔（Shanidar）和法国拉夏贝尔（La Chapelle）遗址都发现了老年人的骨头化石，这些老人都已经严重残疾，丧失了狩猎的能力。这些间接的证据，证明了尼安德特人会照顾他们群体中的老弱病残者，而不是将他们遗弃了事。

毫无疑问，在所有古代及现代智人中脑袋最大的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智力低下。可是，他们低矮的额头和后脑勺的凸起（这个特征性的凸起被称为尼安德特“鼓包”）总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通过对大脑在头骨内留下的浅纹做出的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大脑结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当然，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不对称的脑回（这些不对称的大脑表面沟回，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语言能力），但是，他们的脑壳不像我们这样呈球状，而是更长一些，颞叶和嗅球较小，额叶也较小。是什么造成这些不同呢？这些不同又对他们的社交和认知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切都在眼里

脑容量不代表一切，根据社会大脑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其实是大脑的某些特定部分（主要是新皮层，尤其是额叶部分）才是决定该物种社交世界大小的关键。另外，大脑是由几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分工不同，各自有特殊的任务。比如，视觉处理就是后脑枕叶的专职工作，虽然视觉输入是逐步地经过一系列的大脑区域，最终，不断积累的细节性的分析信息才被传到额叶部分（这里才是我们最终把视觉图像和它的含义联系起来的地方），尽管如此，大部分的后脑区域除了处理从视网膜传来的影像信息流之外，就没有多少其他的功能了。

这种认识或许提供了一些探索尼安德特人大脑的线索，我们会不由地联想到他们凸出的后脑勺，或许，那个别具一格的鼓包意味着他们的视觉系统发育得异常完美。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的确，事实上，他们的视力比我们好很多，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有点“偏左”，容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

尼安德特人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生活在热带的前辈们可没遇到过。在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地方，冬天的日子比较短，光线也比较弱，即使是在夏天，光线也比较弱。在热带，一年四季白天的长短都差不多，除了偶尔的阴天之外，绝大多数日子都是阳光灿烂，红日高照。但是，离开热带，无论是往南或者往北，白天的长度都会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变化（这要归功于地球相对太阳的那个倾斜度，使得冬日短夏日长），而且日照也逐渐变弱（这是因为光线要穿过更多的大气层，强度变弱，这当然也是为什么高纬度地区更加冷的原因）。对于尼安德特人来说，冬天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季节，不仅仅是因为寒冷，也因为他

们只能在变得很短的白天里抓紧时间觅食（可以想象的是，其他社交活动的时间也缩短了）。在北纬三十度的地区（比如地中海的北岸地区）十二月中旬的白天是十个小时，可是在北纬四十五度的地区（即使在间冰期，这也是尼安德特人能够抵达的最北面了），白天的时间只剩下了八小时。在高纬度地区，他们一天要损失的时间多达四小时（这可是一天里的三分之一啊），但是，他们依然需要按照时间分配原则在每项活动上花一定的时间，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野山羊这种至少在欧洲北部属于完全昼行的动物[9]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根据我们的野山羊时间分配模型以及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越是往北，它们在欧洲北部高纬度区域的生存能力越是受到白昼长度缩短的影响。

此外，尼安德特人还会面临另一个和光照有关的问题，在高纬度地区，光线质量会大幅度减弱，这就意味着对远距离的物体，他们也可能看不太清楚。对于狩猎者来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比如说在试图猎杀小犀牛时，要是没看到犀牛妈妈正躲在附近林子的暗处，那就惨了。在光线暗的环境中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比大多数研究者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

进化对低亮度的反应就是扩展视觉处理系统，传统的观星望远镜也是这个原理，当夜空中光线不足时，一个更大的镜面能聚集更多目标处的光线。同样道理，一个更大的视网膜能收集更多的光线，以补偿光线的不足。而视网膜更大，也必定意味着会有更大的眼球提供依附体，所以，夜行性灵长类的眼球比昼行性灵长类的眼球要大得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当然，如果后面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计算机来综合处理接收到的信息，那么，光是有一个超大的光线接收机制（也就是眼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视觉系统是一个层次性很强的架构，从视网膜到视神经，到视神经交叉，到外侧膝状体核，到枕叶最后面的初级视觉皮层（v1），再通过层层的视觉系统（v2到v5），最终到达额叶和顶叶。层次和层次之间，紧密相连，协调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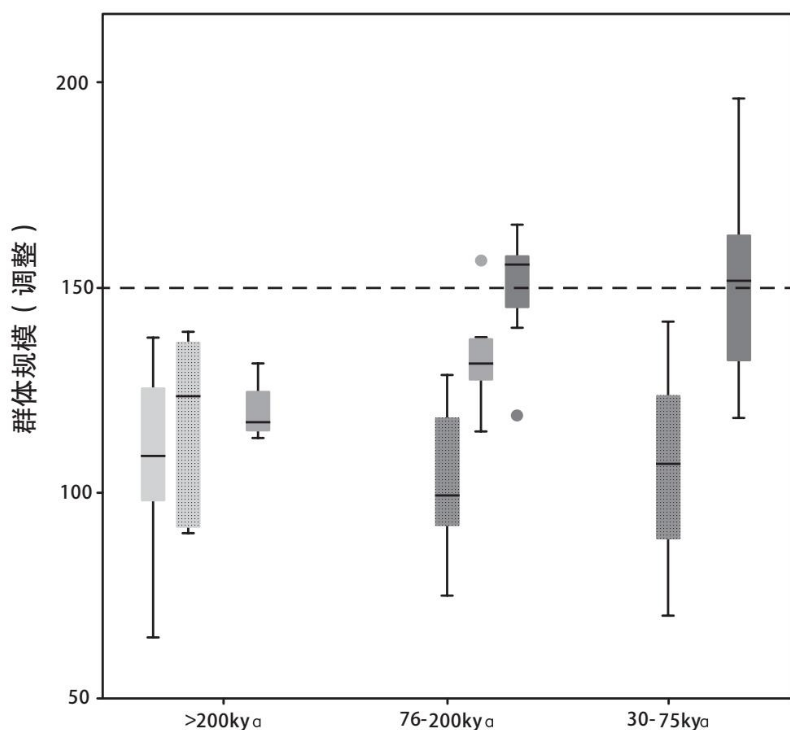
我们掌握的确切的证据是，尼安德特人的眼眶比生活在同区域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20%。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适应高纬度区的低光线，从而进化出了特别强大的视觉系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大脑中用于视觉的部分超过了应有的比例，所以造成了大脑前部社会认知部分的能力相对较弱呢？

答案显示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结论却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把几块不同的拼图巧妙地衔接在一起才能推断得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其中的一块拼图，显示出我们现代人类也有同样的情况。我当时的一个学生，埃莉·皮尔斯（Ellie Pearce），曾经测量了博物馆馆藏的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史上现代人类的头骨样本。她发现，在所有这些人种中，眼眶的大小和颅腔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两者都和纬度有关。生活在高纬度区域的人群，颅腔和眼眶都要大于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群。在后续的研究中，她继而发现，利用不同区域人群的大脑影像扫描图，可以看到枕叶中的视觉区域也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在不同纬度的地区出生并长大的人群，在自然光下（相对于室内的人造灯光）的视觉敏锐度（也就是看清小字的能力）却是相同的。这样看来，生活在不同维度的

人群，视觉敏锐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生活在越是靠近两极地区的人群，越是需要更大的视觉系统来达到这种敏锐度。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人类，也会因为高纬度区光线较弱的原因，调整大脑视觉区的大小，从而保证差不多相同的视觉敏锐度。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牺牲大脑前部，也就是主管智力和社交能力的那一部分。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眼眶大小和视觉系统大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能让我们估算出化石样本中分管视觉部分的大脑体积，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从大脑总容量中减去，从而更准确地估算出对群体规模起到决定性意义的那部分大脑的大小。在第三章中我们讲到，灵长类的数据告诉我们，事实上，额叶是群体大小的最佳指标。但是，我们无法根据化石头骨推测额叶的大小，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除去视觉系统，那么，我们至少能够除去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和群体规模并没有什么关联，这样一来，我们预测的准确性，就会有一个可观的提升。

如果我们将归纳出的眼眶大小和视觉系统大小之间的关系，用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其他古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化石上，先算出它们主要的视觉皮层区域的大小，然后把这个区域从整个大脑容量中减去，于是我们就能得到有关这些物种社会大脑的更精确的估算。将重新估算出的这几个物种的大脑容量，代入猿类社会大脑的公式中，就得到了图6.5。结果发现，尼安德特人的群体规模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MH）的群体规模要小得多（也比没有考虑视觉系统的因素时要小得多）。事实上，正如图中所显示的那样，尼安德特人的群体大小和海德堡人是一样的（大约为110人，是AMH的三分之二）。[10]也就是说，当尼安德特人的视觉系统逐渐适应了高纬度的环境时，他们的额叶却并没有增大。起先，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群体大小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的前辈）的群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在他们进化的早期，还生活在热带非洲，尚未经历高纬度区域光照不足的问题之前，他们就已经经历了群体规模的逐渐增长（以及相应的大脑进化）。



海德堡人

古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

古现代人

AMH现代人

图6.5

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人亚科的群体规模中间值（50%和95%范围）。通过把个体的颅腔容量值代入图3.1中猿的回归公式得出。古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样本经过纬度对视觉系统影响的调整（根据Pearce等人的论述，2013），请注意，直立人的颅腔容量值未经纬度的调整。

尼安德特人和AMH在群体规模上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也对尼安德特人的社交时间分配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为进食时间和整个大脑以及体量有关，所以，进食的时间分配并没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和现代人类在群体规模上有着40个人的差异，这意味着他们能省下11%的社交时间，这大大减少了对他们的压力。然而，他们每天仍然需要将67.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图5.2），但他们的时间缺口从39%（经过高能耗组织效应调整之后）降低到28%，和海德堡人的时间缺口持平（图5.3b）。这就意味着海德堡人用于解决这个时间分配问题的方法，同样也符合尼安德特人的要求。烹饪带来的额外的时间节省，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让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得到一定的进化，至少进化到比他们的海德堡祖先略微大一些（也就是141毫升，或者是12%）。

会歌唱的尼安德特人？

关于会唱歌的尼安德特人，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曾经有过著名的长篇论述，肯定了尼安德特人（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声音和语言方面的进化，认为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已经达到可以帮助他们渡过冰川期的程度。虽然尼安德特人（以及海德堡人）的群体规模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规模要小一些，但是，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凭靠梳理和笑声作为关系黏合剂，已经不足以有效地维持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了。这么说来，他们一定找到了别的策略，来弥补这个不足。

一种可能性就是音乐，唱歌作为笑声的一个自然延伸，这是很明显的。唱歌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程，和欢笑完全一样。这两者都需要控制呼吸，都对横膈膜和胸腔肌肉都有高要求，也因此都可能有效地刺激内啡肽的分泌。无词的哼唱和大笑和说话都有一些共同点，包括分段、重音、措词以及和音等等，因此唱歌就很自然地成为笑声和讲话之间的完美过渡。在第八章中，我还会回到音乐上，再做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想重点提几个和音乐相关的身体行为：哼唱（没有歌词）、舞蹈以及表演有节奏感的音乐（比如打鼓、鼓掌、演奏几种不同的简单乐器）。

在灵长类物种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个这方面的先兆。狮尾狒狒生活在规模适中的生育群体中（这种群体的通常组合形式是，一个有生育能力的雄性狒狒，有时候也可能还会有一个雄性跟班，三到六个生育期的雌性，以及它们的后代）。这些群体会结合在一起，组成规模更大的小队，平均个数在100到120（这样的规模，比起任何其他灵长类物种，

都要大很多）。这么多来自不同生育群体的狒狒生活在一个大群体里，这肯定对生育小群里中的狒狒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在相互梳理之上（比任何有记录的已知灵长类都要多）。但是，就梳理时间关系（见图2.1）而言，它们又并没有花费和这样的自然群体规模相匹配的梳理时间。根据我们的梳理时间等式，平均规模为110的群体，应该在相互梳理上花费36%的时间。可是，实际上它们平均只花费了17%的时间，这样看起来，它们应对时间瓶颈的困局的方式，似乎是形成了一种口头上的梳理。

狮尾狒狒是所有灵长类物种中声音最丰富多变的，它们的声音，比其他各种猴子（或猿类）都要更响亮，也更复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叫声尤其复杂，和别的狒狒以及猕猴相比尤其如此。它们不光是在梳理时会不断地发出这种呼唤声，更重要的是，在进食的时候也同样会这样。狮尾狒狒的呼唤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梳理中的伙伴之间的一呼一应，有点像人类的对话；另一种是生育群中的雄性一带头，所有的狒狒都会一起呼唤，开始大合唱。这种阵发性的呼唤，相互间的呼应拿捏得非常精准。当它们轮流呼叫时，当中间隔的停顿时间很短，短到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不大可能是在问答。这种呼应，更像是准备呼唤的狒狒，非常熟悉同伴的呼叫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同伴的短促停顿，因而在最恰当的时间无缝间入。这些呼唤声，似乎起到了远程梳理的作用，忙碌的白天，在行走和进食之际，即使不能在一起有身体上的物理接触，同伴间仍然可以有交流互动。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狮尾狒狒之间呼叫声，在现在看来肯定含有音乐的元素。正是这些富有歌唱特质的元素，使得它们在灵长类中别具一格。或许，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狮尾狒狒能够生活在规模大到非同寻常的群体之中。制造这些不同的呼叫声，要求狮尾狒狒能够整体地控制声腔（包括了嘴唇、舌头和口腔等部位），运用这种控制能力的方式，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却和人类用于说话的技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如此，这就为我们研究智人支线是如何学会合唱的提供了完美的模型。

如果说，音乐是梳理和笑声的延伸，那么，它肯定也同样具有激活内啡肽的能力。像测试笑声一样（见第五章），我们就不同的音乐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我们用痛阈的变化来测量内啡肽的分泌，把一个进行着音乐活动（一项带有歌唱、围圈敲鼓和舞蹈的宗教活动）的小组和另一个没有音乐活动的控制小组做比较。结果显示，任何形式的音乐活动都会促进内啡肽的飙升，但是，更为静态的活动，或者被动地听音乐，则不会激发内啡肽的分泌。所以，这样看来，音乐好像也能被用做一种药理学机制，维持着社交上的亲密关系。

同样是维持社交亲密关系的机制，相比欢笑声，音乐制作有两大优势。一是它能覆盖更多的个体，因而能够快速地扩大梳理圈。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音乐表演有效性的上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上限一定比欢笑所能影响的三个要多得多。而只要有效影响范围大于三，那么它就有可能将更大的群体黏合在一起。第二个优势是，音乐制作（无论是唱歌、演奏乐器还是舞蹈）是个需要非常同步的行为，这种

同步当然主要是依靠节奏，节奏能让所有人步调一致。

同步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的存在，能够让身体在运动中产生的内啡肽再增加一倍。我们用一次相当优雅的实验验证了这个结论，这项实验由罗宾·艾斯蒙—福瑞（Robin Ejsmond-Frey，牛津大学划船俱乐部前主席，三度蓝船队员）和埃玛·科恩（Emma Cohen）与牛津大学划船队合作完成。到了这个级别的划船比赛，已经超越了身体素质，所有队员都是一样的强壮，一样的技能娴熟。那么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是他们对划桨频率和时点掌控究竟能够保持多久的同步性，八个划船队员中，即使有一人的节拍稍有一点点不一致，船只立马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划水前冲的动力。正因为这些原因，划桨比赛成为观察行为同步性的最理想的试验台。

在队员们的早间健身房划船机训练过程中，我们用痛阈来测试他们身体中内啡肽水平的变化。首先，我们只是测试他们在划船机上的练习，然后，在不同的日子，我们再次测试他们在虚拟船上的练习。当机器和虚拟船连上时，队友们必须同步划船，这种状态和他们在河面上划船完全一样。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惊人，在虚拟船上练习时，内啡肽的分泌（随痛阈指数的变化而变化）比队员独自在划船机上练习时要多出一倍，虽然在这两种状态下，力量的输出是完全一样的。总之，采取紧密的同步行动，似乎会激发内啡肽的大量分泌。

如果群体规模一旦达到75，这也是典型的匠人/直立人群体规模，音乐（最初或许只是类似欢笑的无词哼唱，后来才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和舞蹈的表演形式）就能够起到隔空梳理的作用，同时涵盖更多层次的社交网络，那么，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和原来都进行一对一交流所需要的时间相比，就变得非常有限了。

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社交网络，就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类的关系网中，我们在每个个体身上所花费的时间，随着对方所处的社交网络层次的外展，而急剧下降（见图3.5）。最外面150人圈中的那100人，我们每年大概只见两面。而最核心部分的5人，我们可能平均每隔一天就会见次面。在这5个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身上，花费了我们40%的社交精力和情感投入，而对最外圈的人们，我们只投入不到20%的社交精力。但是，即使我们和外圈的人们见面时间很短，但是每年仍有近200次的个人之间的交流，加起来的时间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如果见这些人还需要我们再花费旅行和路上的时间，那么时间成本就更高了。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还是现在，最外圈中的大部分人，都住在距离我们一天旅程之外的地方，图3.5中的欧洲的个人社交网络样本显示，我们和这些人的平均距离是17.8个小时，也就是说，和他们见面，几乎要花去两天的旅行时间。

当然大多数的人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次旅程，大概能一下子见到5个人。但是，即使每次旅行只花一天的时间，那么，每年还是需要花费38天的时间，才能每年两次见到这150人中的100位不是那么亲密的亲友。这还不算上内圈更亲密的那50人，这个圈中的有些人，几乎是需要每天见面的。如果音乐表演这种形

式能够让你在一个一年举办一次的舞会中把这些人都见到了，那也就意味着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足够把他们都“梳理”个遍，这里省下的是十分惊人的。就算一年只有一次为时三天的狂欢节，有这三天在一起唱歌跳舞，那么一年也能省下35天的时间，而在最外圈的100人身上，可以说几乎就没花什么时间。以海德堡人的更大的群体规模，他们所需要的6%额外社交时间，其实就是一年之内的22个整天。如果能把这个所需天数减少到3天，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出，省下的时间是非常可观的。这样一来，他们的额外的社交时间需求就只比匠人高出1%，海德堡人的时间分配就绰绰有余了。

然而，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举办这种规模的年度狂欢节目，肯定需要语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人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或者，退一步说，是否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来安排这样的群体活动。我会把有关语言在何时开始进化的问题放到下一章去讨论，但是，现在就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先做个记号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怎样，音乐仍然很可能在古人时期就有了，虽然不一定在黏合比较大的群体时起到作用，但是作为小型群体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它是对欢笑的很好补充。

古人面临的时间分配问题主要被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烹饪解决了，当然，音乐也帮了一些忙。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大约三十万年前是个关键的分水岭，这个时间和尼安德特人开始进入欧洲的时间相吻合，这个时期解决了脑容量增加的一个主要的瓶颈，我认为这和用火以及和开始烹饪的时间是吻合的。下面，就该轮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了，我们的第四次过渡即将开始。

注释：

[1] 氧有两种同位素（16O和18O），一种稍重。因为稍重的同位素更有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冷而随着降雪沉淀下来，因此，这两种同位素在冰层核心中（或浮游生物的骨骼）的比例，能够提供一个气温的指数（也就是18O指数）。

[2]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三起仙女木事件都伴随着短暂然而剧烈的降温期，不同程度地受到因为大火山的爆发而形成的冬季核效应的影响（德国的拉荷西火山在这段时期里非常活跃），北美洲受到一颗巨大陨石的影响，或是受到北大西洋洋流运送带（把热带的温水带入北半球的洋流）的影响。

[3] 一条进化枝（clade）是一组有着共同祖先的物种。

[4] 这个脱离出来的群体之前还有几个物种，主要是非洲的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和西班牙的先驱人（Homo antecessor），但是，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分类学上的细节，集中地把海德堡人作为古人的典型。

[5] 后期的尼安德特人通常和查特隆尼文化(Châtelperronian)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以更高阶的工艺为标志，以它的发现地法国南部查特佩戎(Châtelperron)的菲斯溶洞遗址（Grotte des Fees）命名。这种工艺运用新的勒瓦娄瓦（Levallois）技术敲打石块以制作工具。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查特隆尼工具制作者中包含了尼安德特人。

[6] 和前面一样，经计算，最多有45%的食物是来自于根茎和肉类（根据现代狩猎—采集群体的数据），营养增量达到50%，这部分的进食时间会从45%减少到45/1.5＝30%，所以一共节省了44-30＝14%。

[7] 胶原蛋白中的氮和碳的同位素直接来自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因为动物骨骼中化学元素的摄入方式，动物体内的氮含量总是会比食物中的高出一个固定的数量，据此我们能够推测出在它死之前的几年内吃了什么。根据它们栖息地是海洋、陆地还是淡水环境，碳同位素的含量

可以让我们分辨出它们捕食的是什么物种。

[8] 勒瓦娄瓦技术（以法国勒瓦卢瓦—佩雷遗址命名，此处现为巴黎郊区）是一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独特技术。它是石器制作的一种复杂方法，在打下石片之前，先修理出一个击打平面，然后从预制的石核击落石片。当平面被敲击时，石片从石核脱落，形成一个独特的凸面，而它的边缘在修理时被削尖。这个技术在控制石片的大小和形状方面更进了一步。制作完成的石片有时会安装在执矛或箭的顶端，又被称为勒瓦卢瓦石镞。

[9] 野山羊基本上属于热带动物，在高纬度区域内，会寻找山洞过夜以抵挡夜间的寒冷（参见Dunbar和Shi的论述， 2013）。

[10] Pearce等人（2013）给出的数值稍微偏大，因为在论文评审的要求下，他们重新计算了社会大脑和颅腔容量的关系，而不是和新皮质大小的关系。虽然这种计算方式也能推演出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出错机会，因为它将大脑中无关的部分（脑干、中脑、小脑等）也计算在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斜率更加趋于平缓，减少了物种之间的区别。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距今约二十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一种身材更加纤细的古人类，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MH，简称为现代人，或者智人）终于到来了。有断断续续的化石证据显示，这个新物种很快地取代了生活在非洲的古人。到距今十万年前的时候，非洲已经没有古人这个物种的踪迹了，至于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定论。不过，在非洲之外的欧亚大陆上，古人仍然是唯一的人亚科物种，其代表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在远东地区残留的一些直立人。最晚到距今大约七万年前，这个新的古人类物种开始跨过连接非洲和欧亚的黎凡特大陆桥，一波接着一波地越过红海的北部和南部，往东面迁徙（图7.1）。现在的学者把发生在七万年前的这次大规模迁徙称为“走出非洲”之行。

经过黎凡特往北方迁徙的现代人，半路上肯定会遇到尼安德特人，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占据了黎凡特的尼安德特人，阻碍了现代人最早沿这条北线走出非洲。结果，最早的走出非洲很可能是先经过红海南端没有尼安德特人的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这些迁徙者们经由阿拉伯海岸线进入南亚。



图7.1

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化石遗址的分布图。箭头所示是经霍尔木兹海峡走出非洲进入亚洲的早期途径，以及经黎凡特进入中亚、最终到达欧洲的晚期途径。

数据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跟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一样，这个新的人亚科物种也从海德堡人进化而来，不过他们是从非洲的海德堡人而来。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他们很可能来自于非洲西南部（大约在南纬14度东经12度的地区），不是来自于非洲北部海德堡人，后者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前辈（所以AMH和欧亚古人有着一致的最后共同基因祖先）。这个新物种的特征是骨骼明显更加细长，大脑容量也有显著的增加。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个分成先后两个部分的过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骨骼的变细变长发生在大约二十万年前，而后才有了脑容量的增加，这一步最晚有可能到十万年前才发生。

人类大脑容量的增加，和我们所观察到的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增加是同步的，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是紧随其后。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现代人脑容量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前脑和额叶部位的增加，而尼安德特人脑容量的增加主要是后脑部位的视觉系统和枕叶部位的增加。具体到实际效果，现代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增加，而且，能够维系的群体规模也发生了显著的增加，现代人的群体有了36个百分点的跨越式增长。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现代人脑容量如此戏剧化的猛增，现在仍然是个谜。但是，有意思的是，距今约十万年前发生的这一次脑容量剧增，在时间上再一次和东部非洲裂谷大湖的巨变发生了巧合。这一次，和脑容量的增长相呼应的，是这些大湖开始变得干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早期的现代人沿着干旱地区向北进发，寻求更加适合于生存的栖息地。至于更大的大脑容量是否成为了改进觅食技能或者维持更大群体的必要条件，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

现代人的出现，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影响，一是这个物种很快在地球可居住地上蔓延开来，到距今四万年前（这个时间距离第一次走出非洲仅仅三万年），现代人已经出现在澳洲。而最晚到一万六千年前，现代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北起阿拉斯加南抵美洲大陆最南边的大片疆土。现代人占据美洲大陆的速度简直就是个奇迹，他们靠的就是一双脚，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开始豢养任何用作交通工具的动物。[1] 影响之二是，现代人进入欧洲大陆，发生在四万年前，从时间上看，和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刚好吻合。在现代人从俄罗斯草原往东进发前（这条路径成了历史上后来者的必由之路），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和西亚生存了近二十万年。可是，在现代人出现后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他们突然就彻底消失了。尼安德特人的消亡成了一个千古之谜，至今还引人无限遐想，而他们的消亡，其实上溯不到一千代人，说起来仿佛近在眼前。那么，他们是被非洲来的现代人杀死了？还是因为运气差，没能挺过最后一个冰河期的严酷？

我会在结束本章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仔细研究一下现代人这个新物种，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

基因中的历史

在过去二十年中，分子基因学为人类历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篇章，

通过详细比较现在人口DNA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重塑现代人迁徙的历史细节。或许，最让人吃惊的发现是，所有现代的欧洲人、亚洲人、太平洋岛人、澳洲土著和美洲土著互相之间的关联，都要比他们跟任何一种非洲人之间的关联要更加紧密。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人种，都同属于非洲某一小部分物种的后裔。正是这个发现，让我们第一次把注意力聚焦在了大约发生在七万年前的走出非洲之行。所有这些非洲人后代身上微小的基因差异，在距今大约七到十万年前的某个节点上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上，这些散落在地球不同地方的现代人人种，他们各自的变异最终都可以追踪交汇到同一个共同祖先。

大多数有关这方面的基因分析都落在了线粒体DNA（mtDNA）上，这种DNA只通过女性遗传（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继承了母亲的mtDNA）。这就是说，当你看着某一个人的mtDNA时，其实你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不间断的直线，沿着这条线，你看到了这个人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女性祖先。Y染色体也有同样的性质，这种染色体只能由男性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但是，它能上溯的时间比较短，最早大概能看到六万年前，反映了多配偶制的结果（不同寻常的是，相比单配偶制，多配偶制导致更少的雄性能够留下后代）。

在非洲，共有四种主要的mtDNA单倍型（基因谱系，或称基因组），它们反映了现代人在非洲的悠久历史，以及表现于基因差异上的地域分布。这四种mtDNA基因组分别被称为L0、L1、L2和L3单倍型，每个单倍型之下又有很多个亚组。这些基因组分布在非洲的不同地区，L0主要在非洲南部和东部（拥有这种基因的主要是几个说话语音嘀嗒嘀嗒的狩猎族，比如克瓦桑人和哈扎人[2]）；L1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最典型的是俾格米小矮人）；L2是最普遍的单倍型，分布于非洲的西部和东南部；L3是最年轻的基因组，离现代最近，携带者主要是班图人（这个人种起于非洲东部，后来经历了历史性的大扩张，进入了非洲西部，再后来，在大约三千年前的第二次大扩张中来到了非洲南部）、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和半闪米特人（碰巧也包括了犹太人）。在非洲以外只有两种mtDNA单倍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M和N宏谱系，涵盖了所有的欧洲人、亚洲人、澳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它们都来自于L3中的一个亚组，历来分布在非洲东部。

基因数据显示，当三个最古老的单倍型谱系在过去十五万年间缓慢而稳步地增长时，L3在大约九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了变异，不久就从大约七万年前开始了人口爆发性的持续增长。与之相反，唯一的另一个有爆发性增长的单倍型，也就是L2，直到两万年前才开始了人口的增长。至于L3的人口爆发增长究竟发生在走出非洲之前（那么这可能就是走出非洲的原因，因为爆发的人口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还是之后（那就可能是因为走出非洲之后，生存资源的限制减少了，于是人口辐射到更多地方），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证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不管怎样，L3的快速爆发和现代人的第一次走出非洲同时发生，两者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关于一个难题的聪明解答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相同，但是，和尼安德特人不同的是，现代人类还有额外的社交时间需要应对。因为，就像上一章的最后部分所提到的那样，依据社会大脑理论，他们的群体规模要比古人类大三分之一。光是这一项，已经将他们的社交时间分配超出了12个百分点，把总的时间缺口扩大到几乎不可能填补的150%。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时间分配危机的呢？

我在第六章里说过，在尼安德特人的食物中，起码要有一半是熟食，才有可能平衡他们的时间分配，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肉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食物。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现代人吃的熟食比尼安德特人还要多，也就意味着肉食的比例更高，这样才能把更多的时间省出来增加社交活动。要想在进食的时间里再挤出12个百分点的时间，现代人必须从食物的烹煮中获得18个百分点的额外优势，这就相当于在尼安德特人42.5%的熟食基础上再增加20%。[3] 也就是说，他们的食物中，煮熟的肉类和根茎要占比42.5＋20＝62.5个百分点。要知道，现代狩猎人群的食物中，也只有45%是煮熟的（图5.1），所以，62.5%这个数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无论是生活在什么纬度的现代狩猎人，食物的煮熟比例都在35—50%之间。只有在特别高纬度的区域（60度以上的区域），他们才会更加依赖肉食，而且，这些地方的肉食主要是鱼类（吃过日本菜的人都知道，鱼类即使是生食也是比较容易消化的）。不过，现代人类踏上如此高纬度的区域，也就是在最近一万年前才开始的，这已经是大脑进化完成之后的事了。再加上现代人也不是纯粹进食红肉的肉食动物，所以，这个可能性基本就被否决了。

如果说，现代人并不能从食物的烹煮中省下更多的时间成本，那么，这些时间到底从何而来呢？在上一章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歌舞假说，探讨他们是否能够通过集体性的唱歌跳舞，来增加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社交的人数。我说过，他们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将早期古人社交群体的75人，增加到古人社交群体的100人。虽然音乐和舞蹈确实能在黏合社交群体（宗族或营地）上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以巩固强化欢笑的功效。但是，在语言尚未诞生的情况下，或者知道语言的复杂程度还不足以安排事项的情况下，组织筹划集体性的跳舞唱歌活动，可能并不具备在大群体范围内开展的条件。

因为有了语言的辅助，定期举办集体性舞蹈歌唱之类的活动就有了可能，这些活动能够把现代人为了黏合150人的大群体（相比于匠人的群体而言）所需要的额外时间大幅降低，降到大约是一个活动日之中的1%。但是请记住，灵长类互相梳理的时间是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的（见第二章），因为群体越大，个体承受的压力越大，需要的梳理时间就越多，集体舞蹈可能会减少对外围成员所花的时间，但并不一定能减少在亲密成员身上需要多花的时间，以保证这些亲密伙伴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会出现。

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黏合剂的语言允许更有效率的交流和沟通，和梳理相比，其优势是不可比拟的。语言的效率，体现在能让我们做到以下几点：1.同时和数人交流；[4]2.和别的活动同时进行，时间上没有冲突（我们可以在走路、煮饭、吃饭的同时说话，而这些活动显然都不

能和梳理同时进行）；3.可以了解社交网络的情况（比如像猿猴这样规模的群体，如果只是依靠观察，是很难掌握有关其他成员的更多情况的）；4.提升自我的利益（比如夸大自己，贬低别人）。这些都是有效利用语言的手段，能省下大量的时间。但是，这些也许只是在语言出现之后才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是语言产生之后可以加以利用的特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交谈本身并不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而内啡肽对于形成亲密关系至关重要。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我们讨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几乎被完全忽略，具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就是当语言和用火行为结合在一起时，继而产生的结果。通常来说，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对火的讨论只注重它的两个重要功用，一为煮食，二为取暖。毫无疑问，用火对人类在煮食烹饪方面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早在匠人和直立人时期，用火的历史已经很悠长，虽然可能表现得断断续续，后来，在海德堡人手里，火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尤其是在四十万年前之后的时期，得到了集中的利用。在高纬度地区，火的利用对缓解高寒恶劣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气温比热带要低很多。可以肯定的是，在四万年前之后的那段时期，当冰川推进，气温骤降时，如果没能不断更新掌握用火技术，古人和现代人在欧洲及西亚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但是，火还有另外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元素，它是一个能延长白昼的人造光源。冬天，当高纬度区域的白昼只有八小时，显然这时元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即使在热带地区，能够延长原本十二小时的白昼，也能缓冲时间分配的压力。对猿猴来说，黑夜是死寂的，相比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所有灵长类的夜间视觉都很弱。一旦夜幕降临，它们所能做的事就是睡觉，至少，睡觉于隐蔽之处，能够躲避夜行天敌的伤害。但是，如果火的利用能让它们从事一些相对静态的活动，比如坐着制作工具之类的活计，或者，如果能进行一些社交活动，那么这些夜晚的时间就能被更加充分地加以利用，真正的白天时间就能省出来，去从事诸如觅食这样维持生存的活动。

按照我们现代人类的习性，每天大约睡眠八小时，如果把八小时视为睡眠的最低需求，那么，围在篝火旁还能增加四个小时的活动时间。这样一来，本来只有十二小时活动时间的一天，又多出了四个小时，这就相当于拥有了133%的时间分配，而不只限于100%。这多出的部分，已经解决了预测的现代人额外时间分配需求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甚至不需要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倚重煮熟的食物。图5.4显示，现代人的时间分配大约超额45%（已经按高能耗组织进行调整）。将一天的活动时间增加三分之一后，所需要的额外时间仅剩145-133＝12%，这部分的时间有待于继续在其他方面寻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几乎已经完全解决了现代人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图5.3a的预测是35%）。图7.2中，实心三角形显示的是延长的白昼对三个人类物种在时间分配上的影响。

看起来，这一切似乎在告诉我们，现代人不需要语言，就已经能够解决相互间亲密粘合的问题。但是，还有两件事不得不考虑，一是整段增加出来的夜晚时间都能被用来从事社交活动，二是把这些原本花在以往的灵长类一对一互相梳理上的时间，是否足以照顾得到增大了的群

体。而其他的活动，主要是烹饪煮食，还有特别是进食，也会发生在傍晚的这段时间。这些活动，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做，或者至少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就会特别有效率。当然，虽然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但是，这样的时间共享活动，还不能完全算是时间的双倍利用。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是，并非所有成员都会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地参与社交活动。以狮尾狒狒为例，每天早上，在开始觅食之前，都会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专门用于社交的时间。但是，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大约只有40%的这种动物会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也就是主动去梳理伙伴，或是接受伙伴的梳理。而剩下的成员基本上都干坐着，有些在休息，有些在打瞌睡，偶尔吃一口食物，基本上就是在等着别的狒狒过来，然后才和它们一起相互梳理。如果这种社交密度也适用于围坐在篝火边的现代人，那么，在夜幕降临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即使有了火光的照耀，但实际上还是只能解决14%的社交时间分配缺口。剩下的21%，还是要来自于白天的活动分配。或者，可以利用欢笑和音乐来压缩实际需要的社交时间，但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所有成员的社交紧凑度相当于两个人对谈那样热烈，也就是像一对一的相互梳理那样亲密，但是，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景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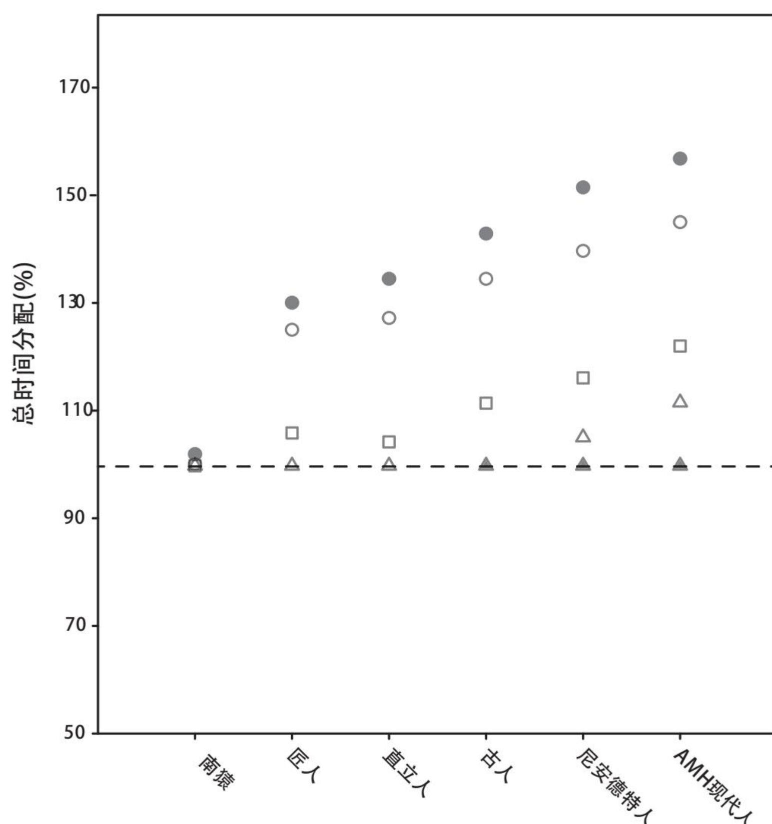


图7.2

因为用火而延长的白天时间对三个人类物种在总时间分配上的影响。图标和图6.3一样，还包括了（▲）标识的古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延长后的白天时间。

即使我们先来假设一下，他们的火边夜谈能够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程度，但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又来了，这样的交谈，能够容纳多少人的参与？我们关于小组交谈的数据，始终显示出人类交谈的人数上限是四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说话，三个人听着，而交谈群体的平均值更接近三个人。如果语言和梳理有着同样的黏合效果，那么，从所能够影响到的人数来说，交谈比一对一梳理能高出两到三倍的效率。如果梳理的效率增加一倍，就等同于现代人的社交分配增加一倍到了28%，那么，在白天的活动安排中，只需要解决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大约7%的时间。这个解决方案的好处在于，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考虑利用更多的煮食来节省进食的时间分配，古人已有的煮食比例已经足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利用了最大化的煮食比例（按现代狩猎—采集族的标准），来解决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时间分配缺口。

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交谈和梳理在建立社交关系方面，是否具备同样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在交谈的过程中，内啡肽会从哪里被激发出来？在第五章中，我提到匠人和直立人会利用欢笑来增加社交时间的效率。在第六章中，我又说古人用唱歌和舞蹈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受影响的社交圈。可以想象的是，这些活动都可以放在夜晚的时段里进行。事实上，传统的社交舞蹈也确实都放在夜晚的时间里，这几乎在哪里都是一个惯例。即使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白天的舞蹈和晚上的舞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大白天跳舞，没有在夜晚跳舞的那种魔力。确实，即使是讲故事，在晚上讲，也会在心理上产生某种特殊的反应。

但是跳舞不是每天都会进行的活动，而且舞蹈的亲密程度稍弱，这个特性决定了它也许只对外围较弱的社交关系圈有作用。灵长类的社交模式有其特殊性，当群体的规模增加时，它们的核心团体的亲密度就会进一步增强（见第二章）。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我们确实还需要一点额外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这些亲密的关系上花更多的时间。晚上能围坐在篝火旁，一边梳理，一边聊天，欢声笑语对增进成员间的融洽程度显然是很重要的。

篝火旁半明半暗的环境，把活动范围限制在了对视力没有要求的项目上，对这段时间的利用，并且达到最好的效果，有声交流方式就有了明显的优势。笑声的确是很管用的，但是，日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看着别人在远处笑，并不能有效地感染他人。比如说，听到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的笑声，只是让我们感到好奇而疑惑，而不会让我们爆发出笑声。如果要让这个声音渠道承担起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产生效果，那么肯定不能仅仅是依靠观察别人的行为。于是，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对语言的选择性压力，当视觉渠道不是那么畅通的时候，作为有声交流方式的语言就能交换更可观的信息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拥有两个潜在的特性，能够对社交关系产生

推进的作用。首先，语言能够通过讲笑话来操控欢笑，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欢笑只是针对某一事件而发生的一阵和声，就像我们现在看滑稽表演一样。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完全依赖于视觉的帮助，所以，它们一般都只发生在白天。而有了语言，情形就不同了，通过讲笑话的方式，欢笑发生的间隔时间和缘由得到控制，因此欢笑发生的次数及其效果是可控的。其次，篝火边的对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火光跳跃中，人们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于是就有可能开始讲故事。讲故事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它对维系外围群体的关系起到两个关键的作用，一是它能让我们编造一个社交历史，我们会因此而注重于一段共同的历史，也是因为这段历史才会组成这个社交群体；二是它能让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未曾见到的世界，也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因此小说和宗教才有可能出现。

在下一章中，我会用更多的篇幅阐述这两个要点，但现在我只想集中精力讨论语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因为语言产生的时间跨度，也和人类进化的历史跨度一样众说纷纭。在一个极端，神经生物学家特里·迪肯（Terry Deacon）认为，语言的出现，与匠人物种的出现在时间上相吻合，那是大约一百八十万年以前。而在另一个极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语言的出现不过是在五万年前（在时间上，同步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涌现了大量的小型工具、手工艺品、岩洞艺术和雕像）。请注意，这两种观点，也包括其他大部分的考古学观点，都只注重语言作为符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用语言，能够通过声音符号来表述日常所用的概念）。在我看来，语言的这些复杂应用，确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很有可能如考古学家所言，直到大约五万年前才出现），其发展的基础是不断的日常社交互动和讲述故事。

如果有确凿的凭据证明，语言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比如说，出现在早期人类的时代），那么，我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或者，如果语言很晚才出现（比如说，就在五万年前出现），那么，语言在那个时期的出现，对于现代人面临的黏合相互关系的瓶颈，也已经为时过晚。总之，要让我的假设成立，那么，语言的出现，必须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同步，甚或可能略早于现代人。

语言的进化发生在什么时点？

一直以来，确定语言进化的确切时点都是个难点，考古学家们的关注点有两个，一是符号学的证据（其推理基础是，如果没有语言的描述，诸如神或者祖先等符号就没有任何意义），二是大脑偏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的证据。现代人类的语言功能区位于大脑的左侧，恰巧，现代人类大脑的左侧也比右侧要大一些。至于这种解剖学现象是否和语言功能有任何关联，那完全是另一个话题。不过，古人类学家于是假设大脑的偏侧化（也就是大脑左侧大于右侧）就是产生语言的证据，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努力在头骨化石中寻找偏侧化的迹象。

事实上，符号学和偏侧化理论都存在着问题。在考古学的研究中，

能令人信服的符号证据（主要是一些岩洞壁画和雕像，被解释为象征性地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或者概念）只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基本上处于三万年前之后。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可能的最晚时间，在人们想到把这些符号投射于具体物件之前，可能已经用象征性的语言符号对话了很久了。而在另一方面，偏侧化的现象，可能和对投掷手臂的控制有更强的关联。[5]事实上，偏侧化的历史可能更久远，这种现象也更普遍。很早以前的脊椎动物就有偏侧化的现象（比如，史前的鲨鱼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在古人类身上，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我们不禁会问，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基因学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如果我们能确定和语言相关的基因，那么，或许我们能够通过复杂的进化基因数据来测算这些变异最初是何时发生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有两种基因，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是FoxP2基因（这是和现代人的说话以及语言能力相关的变异性同位基因）和肌球蛋白基因MYH16（这种基因和猿类强壮的颚肌相关，在颚肌弱小的现代人类身上，该基因已处于休眠状态）。

最初的测算显示，FoxP2的起源可回溯到大约六万年前，这个结果，一定能让一些考古学家很高兴，因为这个时期正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符号艺术出现之前。但是，后来又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中，也发现了FoxP2。这个发现，被认为是这个物种已经开始使用语言的证据。这表明，FoxP2的出现早在八十万年以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两条线开始分支的时候。这当然就意味着所有古人和现代人（或许还包括晚期的直立人）就已经有语言了。但是，紧接着又有了新发现，在鸟类身上，找到了一种类似的基因。这就意味着，这个基因的真正作用可能是控制发声，而不是语言。换句话说，FoxP2这个基因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有关发声（或者是哼唱），而不是有关语言。

人类物种中的肌球蛋白基因的起源，被测定在两百四十万年前，这个数据，似乎支持语言在早期人类时期就有的观点，甚至有可能还可以继续往上追溯，直抵南方古猿阶段的晚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肌球蛋白基因能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很难确认肌球蛋白基因和语言有任何关系，或许，语言的使用（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包括了欢笑）需要较小的颚肌是有道理的。但是，光有较小的颚肌显然是不够的，而饮食的变化或许会产生更强的关联度。至少，我们可以确切地认定的是，就在那时，早期人类开始更多地食用肉类（见第五章）。如果说，语言需要较小的颚肌（至于这一点，现在还尚未被证实），那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只是语言所需要的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再经过很长时期的进化，才产生了语言。[6] 所以说，不是较小的颚肌产生了语言，相反，它只是语言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

不过，还有三种途径，可以让我们来探索语言的起源，一是控制发声器官的神经解剖学证据，二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社交时间需求的预算，三是意识技能的进化模式。单独来看，这三种途径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但是，结合起来看，它们确实都聚集到同一个焦点。

基于对现代人类和猿类及其他灵长类之间差异的观察，来自于神经解剖学的证据有两种。一个是胸腔部分脊髓（也就是控制横膈膜和胸腔肌肉神经分离出脊柱的地方）的大小，另一个是颅骨底部舌下神经管（这里是支配舌头和嘴巴的第十二对脑神经通过的地方）的大小。按体型来看，和猿猴相比，人类的这两个部位都有明显的扩大，而这个扩大很可能和说话有关（第一个部位对横膈膜产生控制，以维持说话时所需要的长久而稳定的呼气，第二个部位控制发声的空间）。如果我们能通过化石来确定这些部位的扩大所发生的时期，那么，虽然不能确认语言的起源，但是至少我们能确认控制发声空间的起源。虽然化石数据相当零散，并不完整，但是，拼凑在一起，还是能看出南方古猿和早期人类的这两组神经都和猿类相近，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这两组神经的数值则和现代人类差不多。[7]

最近几年，又有两个解剖学上的证据浮出水面。一是舌骨的位置，这是块非常脆弱纤巧的骨头，在喉咙的上部和舌根之间，起到了联接的作用。在黑猩猩的喉咙中，舌骨所处位置较高，而在人类喉咙中所处的位置较低。正是这个偏低的位置，对人类某些特定声音（主要是元音）的发声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因为这块骨头又细小又脆弱，几乎不可能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下来。不过，在以色列的卡巴拉洞穴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根尼安德特人的舌骨，这根依然处于原位的舌骨，从它的位置来看，和现代人类是一样的低位。自此，在后续的考古发现中，又陆续成功地定位了数个其他的化石舌骨，那些从早期人类化石中发现的舌骨，其位置似乎和猿类一样处于高位。另一个解剖学证据和耳道有关，这是一条骨质的管道，呈半圆形，位于颅腔之内，它让我们能够听到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人和黑猩猩的耳道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听闻人声的能力。最近，对西班牙北部胡瑟裂谷的古人（距今约五十万年前）化石所做的CT扫描结果，显示出它们的耳道和人类非常相似。

看来，把这四个解剖学证据放在一起，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说话的能力（但并不一定是语言的能力）在大约五十万年前的古人时期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图7.3把这些数据和不同人类物种的社交时间需求预测做了比较。请注意，解剖学证据指向的嗓音控制出现的时期，恰好和社交时间需求第一次突破20%瓶颈的时期相吻合。如果说有哪一个时期在维系社交关系方面最具挑战性，那么这个时期正是这样，因为没有其他的哪个灵长类物种把一天中超过20%的时间用于社交之上。这样看来，就在那个时期，在对嗓音的控制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显然也就没那么令人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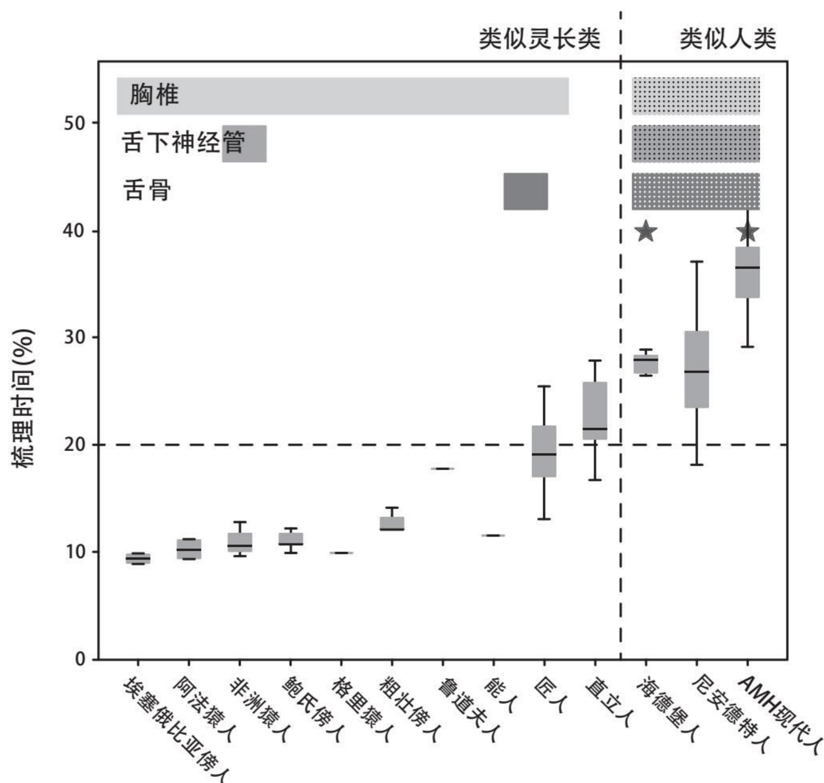


图7.3

说话进化以后的测算，主要亚人科物种梳理时间的中间值（50%和95%范围），根据图2.1的回归公式和图3.3的群体大小数据测算。图的上方显示了灵长类（阴影）和人类（加线条阴影）的胸椎、舌下神经管、舌骨的分布。（★）表示能听到人说话声音的耳道。这些和人类相似形式的发声和感受话音的解剖学特征最初在五十万年前的古人（海德堡人）中出现。（注意本图中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数值和图5.3a中的不同，已根据纬度对视神经系统、即额叶新皮质容量的影响做了调整。）数据来源：Pearce等人的论文，2013。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发声（发出一种噪音）和语言（说出有语法结构的话语）是不同的。上述的解剖学证据只能告诉我们，古人和现代人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自己的发声器官，从而能发出复杂的声音。但是，至于这里是否涉及语言，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在第六章中提到，无词的哼唱很可能早在古人时期就有了，哼唱在对噪音的控制方面是和说话一样的，但是，即使我们常常唱出了词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语言的能力有要求。

简而言之，解剖学证据能告诉我们何时出现了对噪音的控制，但不能告诉我们何时产生了语言。当然，增加对噪音的控制力以及更为复杂的声部都是语言进化的重要前提，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在人类进化的

早期，因为要应对更大的群体规模，声部就已经开始进化得复杂起来了。其实，这样因为群体的增大而产生的应对方式，在鸟类和猴子中都普遍存在。托德·弗里伯格（Todd Freeberg）在一个特定系列的田野实验和实验室研究中发现，随着群体的逐渐扩大，无冠山雀（chickadee，山雀属的一种北美洲小鸟）的叫声也会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复杂。更有意思的是，据美国人类学家塞思·多布森（Seth Dobson）发现，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灵长类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会而变得更复杂（与之相对应，大脑区域也会变得更大）。与此同时，英国生物学家凯伦·麦库姆（Karen McComb）和斯图尔特·森普尔（Stuart Semple）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灵长类的发声状态中也一样存在。由此可见，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控制嗓音（和手势）复杂程度的能力也随之增加，这种规律自古就有，而且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和语言更是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个数据来源是关于思维的能力。思维能力对于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说话的人还是倾听的人，都需要集中精力设法去理解对方的想法。说话的人当然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他所要传递的信息，而倾听的人也会对接收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反应（图2.2）。两个人的交流过程中，即使在还没有谈到第三者的情况下，倾听的人或许只需要二度意向性，但是说话的人很可能就已经需要具备三度意向性。思维能力对语言来说还有第二个重要性，那就是思维的反身结构和句子语法结构的嵌入从句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而且两者的最高意向限度差不多都是在五度左右，因此，要想解码我们所定义的语言的内在真实含义，必须首先要具备思维能力的五度意向性。

通过神经影像实验，我们发现了思维能力和大脑思维网络的大小有关，其中，尤其是和眶额皮质的大小相关（见第二章），这个重大发现为灵长类思维能力和前额叶区域大小有正相关这个论点提供了重要支持（图2.4）。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用图2.4中的等式来测算化石古人的思维能力，因为根据定义，它们的思维能力必须处在南方古猿和现代人类之间。图7.4画出了答案，南方古猿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和其他猿类一样，非常整齐地环绕于二度意向性的周边，所有早期古人群体都处于三度意向性的周边，古人和尼安德特人刚刚能到四度，只有化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能够达到五度意向性（在这点上，和他们现存的后代已经趋于一致）。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即使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语言（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明确地推断，他们语言的复杂程度绝对难以与现代人的语言相提并论。由于思维能力在语言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考虑到这两个物种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异，这就说明从语言质量的角度来说，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简单地说，尼安德特人语言的概念和语法结构都是比较原始的。

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握了完整形态的语言（也就是说其复杂程度达到我们现在所使用语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模式是合作型的（在这种狩猎模式中，几个成年男子将大型凶猛猎物围困，继而刺杀）。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们必定具备了语言能力。狼和鬣狗（也有人会提到黑猩猩）在没有语言能力

的情况下，照样能很好地配合围攻猎物。再则，即使他们需要语言来配合合作，但是又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需要五度意向性的复杂语言呢？简单的合作，不太可能需要超过三度意向性的语言，在围猎过程中，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我想你知道我要你从另一边攻击猎物，三度意向性的语言已经足够了。三度意向性的语言不能做到的是讲述复杂的故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八章中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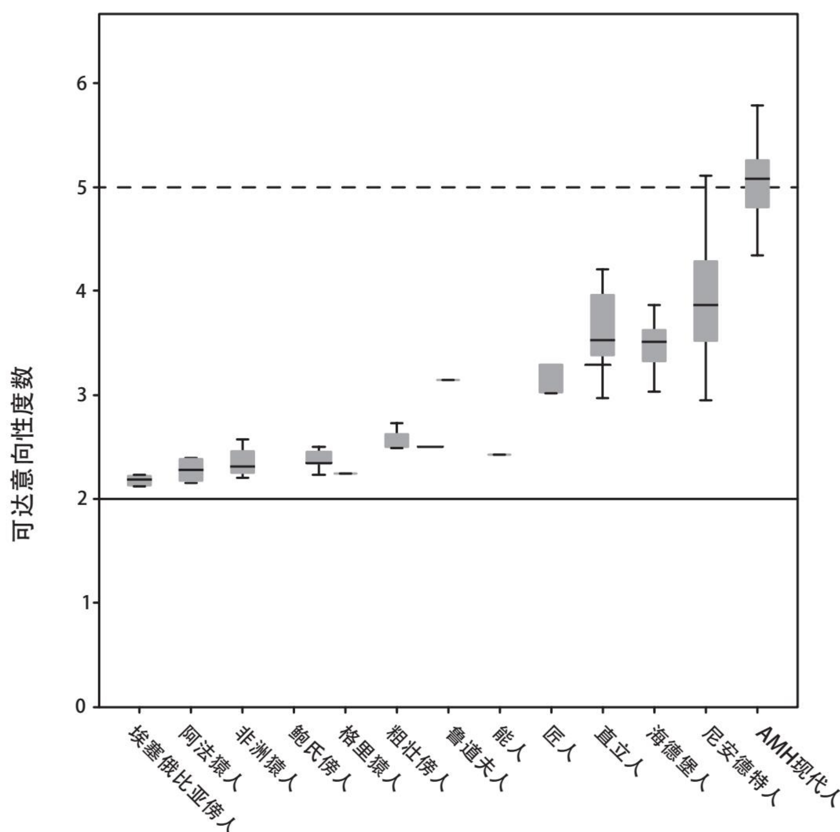


图7.4

主要人亚科物种所能够达到的意向性度数。显示的数值是化石样本的平均值（50%和95%范围），通过把颅腔容量（转换成相等的前额叶容量）代入图2.4的公式中得出。虚线是成年人类的标准值（五度），古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容量经纬度视觉系统影响调整，直立人颅腔容量未经调整。数据来源：Pearce等人的论文，2013。

一个有关繁殖的小问题

在这个大容量大脑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哺乳动物来说，一旦大脑发育基本成熟，可以独立生存时就进入生育期了。

但是，因为神经组织的生长速度有其自身的规律，缓慢而固定，任何一个有着大容量大脑的物种，只能依靠相应延长的孕期以保证大脑的充分发育。所以，为了应对这种规律，像灵长类这样有着大容量大脑的物种，就会减少婴儿的数量，降低生育的频率，同时，它们还需要更长的寿命来保证有足够的后代以延续这个物种。

出于大脑容量的原因，需要为人类配备一些很独特的便利条件。依据哺乳动物的标准，现代人的孕期应该是21个月，只有达到这个长度，才能让人类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拥有和灵长类婴儿同等发育程度的大脑。[8] 然而，不巧的是，由于哺乳动物之前的脊椎动物在进化历史中的一个意外结果，在哺乳类动物的分娩过程中，婴儿必须要通过由两片骶骨所形成的骨盆中间的一个洞，这个洞的大小，制约了所能通过的头颅的大小。而这个问题，又因为直立行走变得更加恶化，因为骨盆为了要支撑内脏和上身而变成碗型，这就导致骨盆入口和产道愈发变窄，这就是所谓的分娩困境。[9] 当然，通过进化，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把女性的臀部进化，使之大到可以生出21个月大的有着完全发育成熟大脑的胎儿即可。这一点，自然选择就可以做到，结果就会和有着超长孕期的大象一样。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远在人科动物在拥有超大大脑之前，它们的身体已经进化成适合游牧生活方式的模样，一米多宽的臀部显然很不适合行走，更别提奔跑了。那么，这样一来，匠人在游牧中获得的优势又将不复存在。

于是，我们的祖先拿出的妥协方案是：在生育出一个能够存活的婴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短孕期。然后，在子宫之外继续大脑的发育，这有点像袋鼠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猿猴的婴儿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够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而人类的婴儿出生后要经过大约12个月才能尝试行走。这也是为什么早产的婴儿（孕期少于7个月的婴儿）面临的风险极大，需要借助现代医学的技术和能力，才能存活下来。而在过去，大多数的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就会夭折。

即使这样，比起任何种类的猿猴，现代人类生产的过程，依然要痛苦得多。大自然用一种令人落泪的方式，才使得大头婴儿艰难地穿过一个小小的洞口，呱呱落地。在分娩的过程中，连接母亲骶骨的软骨组织会变软，随着婴儿向外冲撞，骨盆向两侧扩展外移。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生育之后，臀部不再会完全回到生育前的形状的原因。还有，婴儿头颅的骨板在出生时是分开的（直到孩子长到5—7岁，大脑停止发育时，才会合上形成封闭的头顶），在产道的压力下，骨板的边缘会有些许挤压和重叠，正是这点弹性，使得受到压缩的婴儿头颅能够顺利地穿过产道。

我们知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伴随着延长的儿童期的繁殖方式出现得较晚。通过对头骨化石中牙齿釉面横纹[10]的计算和鉴定，可以推断经过多长时间的发育才能进入成人期。纳里奥克托米男孩死去那年才8岁，但是他已经完全成年了（虽然也有人推测他是12岁）。当时，以他的年龄，他已经有一米五的身高。而现代人类的儿童，还要经过很多年的成长，才能达到他的发育程度。

总体来看，现代人类出生过早、成熟过迟的成长方式，形成的时间不太可能会远远早于古人（海德堡人）的出现。这有可能是因为海德堡人的脑袋依然足够小，不太费劲就挤出来了，但是，到了尼安德特人，情形肯定不一样了。在尼安德特人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已经和我们的一样大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和我们一样陷入分娩困境。所以，从最低的限度来说，在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身上，各自进化成类似于现代人类的缩短了的孕期。或者，也有可能在他们的共同祖先时期就进化了，但是肯定不会比这更早。

不过，似乎只有现代人才有特别漫长的儿童期。最近，在一项对尼安德特人牙齿釉面横纹的研究中发现，在出生之后，尼安德特人比现代人快熟得多，抵达青春期和成年期只要早七年。这个发现一点也不奇怪，对于灵长类物种来说，测量非视觉性大脑皮层大小的最好指标就是它的社会化时期（从断奶后到青春期）的长度。当大脑停止生长后，越大的皮层相应地需要越长的社会化时间。在这个阶段里，少儿将会学到未来独立生存所需要的社会技能。在上一章中，我们说过，尼安德特人的额叶和颞叶都比现代人小，所以他们的社会性也没有我们那么复杂，那么，他们只需要较短的社会化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所能够学到的有限的社会技能，当然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发展深奥复杂的文化的能力。

维持一个大容量大脑的任务非常艰巨，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很可能借助了外力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则是以肺结核病菌的形式出现。虽然肺结核通常都被看作是可怕的疾病，但事实上，只有5%的带菌者会有显性的病症，而其中死亡的比例很小（通常情况下，是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加重了病情）。结核病菌更像是共生体而非病原体，虽然很多共生体在极端情况下会变成病原体。[11]然而，重要的是结核病菌会分泌烟碱维生素（也就是维生素B3），这种维生素对大脑的正常发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体内长期缺少维生素B3，会导致类似于佩格拉症这样的大脑退行性疾病。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维生素B3的主要来源是肉类食物，所以，当肉类成为主要的食物之后，维生素B3的补充就能得到保证。然而，不同于采集，狩猎是要有点运气的，因此肉类食物的来源难免不是那么可靠稳定。尤其在新石器时代，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当人类转向农耕之后，占据饮食结构中很大比例的是谷物。但是，谷物中维生素B3的含量非常低，因此，一个额外的来源就变得异常重要。虽然我们曾经认为，人类的肺结核菌源自于八千年前开始驯养的牛科动物，但是，现在的基因证据显示，人和牛的结核菌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的结核菌可以追溯到至少七万年前，如果结核菌真的出现于那个时候的话，那么，它的出现，在时间上呼应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脑容量在十万年前的突然增加，一个多么神奇的巧合。

尼安德特人究竟怎么了？

在欧洲和西亚成功地生存了三十万年后，尼安德特人在大约两万八

千年前（这是他们的化石给出的最后的时间）神秘地消失了。那么，这个成功得不可思议的物种，为什么会拱手把欧洲让给了他们的非洲表亲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而自己却走向了灭绝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人类进化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多得多，它们包括：无法适应最后冰河纪的严寒；高加索山脉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形成了核冬天的状态；[12] 因为冰川推进或是火山爆发，把大量的动物群逼向南面，尼安德特人无法跟上它们的步伐，因此没有猎物可以食用；来自现代人类的生态竞争；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无法创造或者维持文化创新；被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非洲或亚洲携带过来的疾病消灭了；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杂交后，被同化并吸收了；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种族清洗中，他们都被杀死了。或许，所有这些解释或多或少都有点对，但是，毫无疑问，真正的答案是他们遭受了一系列不幸的事件。

和当今的现代人类一样，尼安德特人被不断推进的冰川逼得步步南下，逼进了欧洲的下腹部地带（西班牙、意大利、巴尔干）。环保生物学的经典发现之一是，当一个物种被逼到残存的栖息地时，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彼此间隔绝，于是很容易发生局部灭绝，而这样的灭绝，很难再次用迁徙来避免。这个效应，或许因为尼安德特人较小的群体（见第六章）而更为显著。

如果他们只需要面对一种状况，尼安德特人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但是，同时应付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如果说他们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有任何可能的接触，这种接触并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帮助。相反，接触的后果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所携带的病原体没有任何免疫力。这个情形，和三万年之后发生的一幕非常相似。当时，来自旧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病害，虽然没那么厉害，但是放倒了美洲印第安人。

尼安德特人的物质文化，比如他们制作的工具和衣服，也很成问题。近年来，很多人试图证明尼安德特人的物质文化和任何现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相当，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在他们灭绝之前，是朝着现代人类的方向发展的。[13] 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它们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尼安德特人的工具缺乏多样性、创造性和精致性，而这些特性都是现代人类物质文化的标识。总的来说，他们的工具带有更明确的功能性，而缺少后来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艺术品中体现出来的无用性。由于两者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些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异。他们在思维能力上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整整相差了一度意向性，这种思维能力上的缺陷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面对一块原石或一根象牙，他们没有能力展开想象，从而创作出代表其他物件的艺术品。这种思维能力上的缺陷，同样也限制了他们在技术上的创造力。

有一种看法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面对同样恶劣的气候环境，却能躲避尼安德特人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更大容量的大脑，这样高度发达的大脑使得他们拥有更广阔的交易网络和更多样性的文化创新。在第六章中，我们说过，尼安德特人不仅在群体规模上比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要小得多（大约只有后者规模的三分之二，见图

6.5），而且他们交易或交换原材料的距离也要相差一个数量级：在尼安德特人遗址里所发现的工具中，70%的原材料来自于25公里之内的范围，而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遗址里所发现的工具中，60%原材料来自于25公里之外的范围，有的甚至有200公里之远。在更辽阔的地理区域之中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这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层保护膜，缓冲了局部灭绝的危机，在危急时刻，他们可以寻求朋友的帮助，找到一处避风港，但所有这些尼安德特人却无法做到。如果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有了最外层的网络（即图3.4中500到1,500的层次），而且看起来这个假设也是很有可能性的，那么，尼安德特人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除了思维能力上的差异之外，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在大脑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对文化的复杂性也会产生影响。在灵长类物种中，除了思维能力之外，还有一种能力也同样取决于大脑皮质（也就是大脑最前端的部分），这就是设想未来行为并且为此安排事先计划的能力。从类人猿进化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历史，也就是大脑前部区域逐渐增大的历史。[14] 较小的大脑前部皮质决定了尼安德特人较弱的计划性，这不仅影响到他们在设计工具和制作物件方面的能力，也影响到他们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进而影响到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文化适应性方面，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表现出的显著差异之一就是他们的衣着。根据旧石器时代第三阶段后期的气候模型所推测的气温条件，莱斯莉·艾洛和彼得·惠勒对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衣着保暖性进行了估算，足够的保暖性是他们在最后冰川期的欧洲得以生存下来的必要前提。在任何一段时期，尼安德特人的居住地区都比现代人更加趋于南方，因此他们对衣着的保暖性的要求，没有现代人那么严格。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严寒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显示出他们的身体对寒冷的适应性方面强于现代人，或许事实也的确如此。

依我的猜测，这体现了缝制的衣服（缝制的衣服比较合身，手脚更加保暖）和简单的包裹之间的区别。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欧洲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化石遗址里，陆续出土带针眼的骨针，这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发现。事实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使用钻孔的工具由来已久，这段历史至少可回溯到十万年前，在非洲南部，开始用锥子在贝壳上钻孔做项链。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尼安德特人拥有能做这样精细活的工具，这个结果几乎确定无疑地反映出这两个物种在思维能力（或者，至少是思维能力所依赖的认知能力）上的差异。

有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衣着上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来自于后旧石器时代的出土葬品。在莫斯科东北部伏尔加河上游的松希尔（Sungir），发现了一个距今两万两千年的墓穴遗址。墓穴中，有一个双人墓，两个小孩头对头地埋葬在一起。令人吃惊的是，在墓穴中发现了大量钻了孔的珠子，制作这些珠子，需要数千个小时的打磨和钻孔。在一个小孩（可能是男孩）的身上，发现了4903颗珠子，那些珠子覆盖在孩子身上的样子，看着像是缀缝在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上。在他的腰间，有250颗钻了孔的北极狐牙齿，它们很可能曾经是腰带的一部分。

在他的喉部，还有一根象牙别针，似乎是用来别住披风的领口。另一具骨骸（有可能是一位女孩）上，总共有5374颗像是缝在她的衣服上的珠子，她的喉部位置上，也有一根象牙别针。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开始穿衣服的历史可能还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因为在三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很多欧洲遗址里，都发现了用象牙、兽骨、琥珀、贝壳和石头做的珠子和纽扣。而在非洲发现的衣饰还要更早，可以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很早就开始穿上了缝制的衣服。

现代的分子基因学，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衣着证据。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身上有两种虱子，这两种虱子分属于不同的亚物种，一种是头上的虱子（Pediculus humanus capitis），一种是身上的虱子（Pediculus humanus corporis）。这两种虱子寄生在人体的不同部位，一种藏身于头发中，一种在衣缝间穿行，也就是位于人体的躯干部位。这些虱子相安无事，也不会杂交。身上的虱子只能生存在人类的衣缝里，所以，这种虱子的出现，意味着它们的进化只能是在人类常规性地穿上衣服之后。科学家对来自于全世界十二个地区的虱子展开研究，比较了这两个虱子亚物种的DNA线粒体，他们发现，寄生于身上的虱子是从寄生于头发里的虱子进化而来的，而且，这两个亚物种有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早在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开始经常地穿衣服了。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个时点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走出非洲进入欧洲还要早，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四万年前进入欧洲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非洲穿了几万年的衣服了，而这个时期，也恰恰和大脑进化的最末端时期相吻合。

有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如魅影般时隐时现，那就是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是不是因为在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交锋中，被彻底消灭了。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肯定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留在尼安德特人骨骸上的某些伤痕，应该不是在狩猎中因失误而造成的那样简单。通过对三万六千年前法国圣塞赛尔（St Césaire）遗址的年轻人伤痕的仔细分析发现，某些伤痕是被利器造成的，很可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源于尼安德特人相互之间的争斗，还是源于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间的争斗，那就永远是个谜了。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杂交，曾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很大兴趣。有关这个说法，最初的证据是一只来自于直布罗陀的头骨，这只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婴儿头骨，兼具了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某些特征。但事实上，任何基于婴儿头骨特征的假设，充其量只能是猜想。更为严肃的证据来自于基因学上的发现，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和尼安德特人（而不是和现代非洲人）有2—4%的相似。更有意思的看法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远东的丹尼索瓦人有过杂交。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分析显示，约4—6%的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的基因可能源自于丹尼索瓦人。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状况，都不足以证明这些物种之间的杂交普遍存在。事实上，也有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仅仅反映了当这些物种居住在相似的栖息地时，会面临相似的选择性压力，因而会发生基因的趋同现象。

当然，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类之间的杂交，并不意味着是这两个物种之间友善的交换新娘。现代人类殖民者就经常偷拐土著妇女，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尤其是在美洲和印度。但是，基因学提供了更确切的证据，明示这类事件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在英国南部，女性主要有凯尔特人的DNA线粒体，但男性的Y染色体呈现一个明显的阶梯变化，从东部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到西部主要是凯尔特人。这个现象说明了在五到六世纪间，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大陆攻占进来时霸占了当地的妇女，使得当地英国男子无法传宗接代。类似的故事还在冰岛发生，80%的冰岛男性的Y染色体来自挪威人，但63%的女性的DNA线粒体是凯尔特人的，这说明很有可能的事实是，在去往冰岛的途中，海盗抓了不少凯尔特女性，这些女性可能被迫随着他们进入了冰岛。[15] 同样，亚洲和欧洲东部边缘的男性染色体的7%来自于蒙古人，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宗族在十三世纪对这一区域有过极为短暂的统治。[16]

换句话说，根据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件来推断，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基因组中之所以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的成分，很可能反映出他们中的部分交配期男性对尼安德特人的掠夺。如果说，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他们灭绝的过程中的确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发生过杂交，那这个结果也很可能并不是出于古人的愿望，甚至，这样的掠夺很可能会引起古人的反抗。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看似不起眼的两个物种间的群体规模的差异，在这个关键性时候，就会对胜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前面说到的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优势都会体现出来，他们可以从社会关系更广泛而紧密的群体中纠集到更多的男性，而且，他们还能跑到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帮手。而这一切，古人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1] 不论是好是坏，在这个过程中，美洲的巨型动物一个个地消失了，其中包括了长毛象、乳齿象、剑齿虎、马、大树獭以及其他很多物种。

[2] 他们靠舌尖与口腔唇齿摩擦而发出不同的嘀嗒声作为辅音，这种语言被认为是很古老的，这种嘀嗒声的发音方式在其他语言中都已经消失了。

[3] 烹煮使可消化度增加了50%，12%的进食就等于12×1.5＝18%的进食时间。根据对大脑容量和体型大小的预测，现代人类需要把88.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18%就是18/88.5＝20%的总进食时间（或者是等同于摄入的食物量，进食的时间和食物量是大致上成正比的）。

[4] 虽然交谈小群体的有效上限是4人，但是利用语言可以面向更广大的听众，前提是听众必须要遵从一定的规矩，不去打断发言的人。显然，我们必须要先有语言，才能谈得上同意遵守这些规矩。

[5] 现代人类中，绝大部分是右撇子（根据考古学记录，也证实情况一直如此，一百五十万年前的纳里奥克托米男孩似乎也是右撇子）。根据制作工具时击打石块的角度，可以判断化石人亚科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参见Cashmore等人的论述，2008）。

[6] Aiello（1996）指出，在这段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还必须经历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类似于猿的平坦胸腔；双足行走的移动方式，能够释放胸腔的肌肉，使之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受困；对控制呼吸和发声区的控制，降低的喉头位置。所有这些都有古老的根源，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按部就班地到位，才能在最后水到渠成地迎接语言的进化。

[7] 这个舌下神经管的解释已经遭到过质疑，因为有些南猿个体的数值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而这样的交叉意味着这部分南猿已经有了语言（参见DaGusta等人的论述，1999）。显然，这是个非常可疑的结论，原因有以下几点：（1）它混淆了方差和平均值，代表物种能力的

是平均值；（2）它忽略了即使某个个体具备了控制发声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整个群体有了语言，语言毕竟是个社会现象（必须在很多人都具备说话的能力时才会产生）；（3）它无视这一事实：所有胸神经、舌骨和耳道的数据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佐证，并指向同一个答案。

[8] 至少像类人猿灵长类这样的早熟哺乳动物是这样的。而晚熟的哺乳动物（比如鼠类以及多种肉食动物），在生出早产儿之后，需要在窝巢中完成功能性的发育。

[9] Dunsworth等人（2012）最近提出，其实并没有生育上的限制，而问题可能在于母体的能量消耗。他们认为，人类达到可生产的时间就是母亲无法再承受因为胎儿长大而带来的体能消耗的极限时间。但是，这个解释完全忽略了在孩子出生之后，母亲给子宫外的婴儿喂奶所消耗的体能，是孩子在子宫里生长时的1.7倍。因为虽然喂奶相当于有效地延长了胎儿的生长期，但是，它的能量转换效率非常低，把体内能量和蛋白质转化成奶水时损失了大约40%的能量。如果确实有能量限制，那么还不如在母体内完成21个月的孕期，然后再去寻找一个解决臀部过大问题的方案。

[10] 釉面横纹就是牙齿釉面的生长线，在牙齿的生长过程中，釉面会一层层生长，就像树木生长时有年轮一样，每一层大概对应一周的生长。这些层次，在牙根的表面形成一系列纹理（又称勒兹纹理线），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

[11] 共生体是建立了一种共生互惠关系的有机体，它们可能是以某种方式共同生存的两个物种，或者是一种在主体中生存、为主体提供服务的微生物（比如我们肠内的很多细菌）。相反，病原体是一种对主体有害甚至致命的微生物（比如很多能够导致麻疹、伤寒、疟疾等疾病的细菌和病毒）。

[12] 在高加索山脉确实有过一系列的大爆发，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中部，但它发生在距今约四万年前，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到达欧洲之前，而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更是在一万年以后。根据事件发生时间的推算，更可能的是这些火山的爆发迫使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俄罗斯草原往西迁徙到欧洲。

[13] 或许，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有人会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尼安德特人到底拿他们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差不多容量的大脑派了什么用场，要知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可是用他们的大脑引爆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革命。但是，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述，尼安德特人大脑的功能性部分并没有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那么大。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用于视觉处理。至于在认知能力方面，他们依然还是古人类。所以，这点其实并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4] 有争议说，人类的前额叶相比之下并没有比猿猴的大多少，如果用前额叶对大脑总容量回归，那么人类的回归线无异于普通灵长类（参见Semendeferi等人的论述，1997；Barton和Venditti的论述，2013）。但是，这条回归线是一条斜率约为1.2的双对数线，也就是说，前额叶大小会随着大脑容量的增加而按指数级增加。无论如何，决定神经元数量（也就是认知能力）的是绝对大脑容量而不是相对大脑容量，斜率不变并没有关系，人类前额叶的绝对大小依然比猿猴要大。

[15] 很多早期移民到冰岛的男人，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被驱逐出去的，因此很可能没有同行的女人。从基因证据上来看，他们在途中停下来，抓了女人一起上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16] 从历史的记录中，我们能够确定地了解到当时的事实情况：当蒙古人占领了一个曾经抵抗过他们的城市之后，会杀死所有的男人，至于女人，比较文明的说法是，暂时将她们吸收为蒙军的随行人员。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大约四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他们的出现是以一系列崭新而独特的工具和艺术品为标志的，因此人们通常把这段时期称为后新石器时代。从此，更有杀伤力的新式武器开始普及，其中包括类似于标枪的长矛以及长矛投掷器[1]，还有弓箭等技术创新的产物。同时出现的，还有做衣服用的精细的锥子和针、油灯和铺着石子地面的小木屋。这种文化活动的大爆发也蔓延到了装饰艺术上，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品，诸如洞穴岩画，用象牙和石头雕刻的维纳斯像（图8.1），投掷器的马头形把手，还有骨笛和象牙板上刻的日历等等。从这时起，也开始出现刻意墓葬，死者的尸体和丰富的陪葬品被埋在一起。这种现象说明了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已经具有了来世的意识，觉得死者也需要日常生活的用品。就这样，现代思维终于到来了。



图8.1

法国南部列斯普格的维纳斯，距今两万五千年。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某一天某个人突然开窍了，于是开始创造这些新鲜的物品。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在非洲，有考古记录可循的历史就至少有十万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时期主要是从四万年前开始，然后，经过接下来两万年的蓄势，突然在质量、数量和种类上发生了戏剧性的爆发。这种爆发在欧洲特别明显，但绝不是仅限于欧洲。

虽然，更为精良的工具占据了这时期文化发展中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依然是围绕着觅食的需要展开的，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与觅食无关的内容，比如洞穴艺术和维纳斯的雕像，就很难从觅食的角度去理解。相反，这些艺术品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为了解决一个困扰了它们很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人类进化的最早期就出现了，到了智人时代后，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更是达到了顶点。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在分布于广阔区域的大型社会化群体中维持凝聚力。因为所有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发展，那么，语言就必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语言为什么会产生

历史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交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真实描述。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促进社会性的联系，至少对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来说。这两种观点的一致之处是都认同语言语法结构的设计出于交换信息的目的。而它们的分歧在于鉴定哪一方面的事实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更加重要，是功能性还是社会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看法的不同点在于对语言主要功能的看法不同，语言的次要功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副产品，是拥有了语言的主要功能之后免费附带的。

问题在于，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理由让我们在两个观点之中做出选择。而且，在没有可比较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任何测试（毕竟我们是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考古学证据（哎，对话可不会变成化石）。一个可以用于区分这两种假设的方式是，测试提问对象更容易记住哪一类信息，这个方式的前提是认为人类大脑被设计成特别关注某类信息（语言就是为了这类信息而产生的），而不那么关注另外一些信息。这个方式背后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即使一种特征在经过后期改造后拥有了其他功能，但是，为它而生的主要功能总是最自然最直接的。显然，这并不是测试这些特征主次顺序的最好方法，但是也许已经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了。

有关语言的社会性假说，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版本：为交换社会关

系信息的语言（也就是我最初的八卦假说）、为正式约定和公开宣言的语言（也就是社会契约假说，最初由特里·迪肯提出）和为吸引和挽留异性伴侣的语言（这是最早由进化生物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提出的谢赫拉沙德［Scheherazade］假说）。

八卦假说非常简单，按照这种假说，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交换可以用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信息，让个人都能对其他所有的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种信息和了解，如果都要靠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八卦，了解有关他人相互之间关系的信息，表达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获取的。

在提出社会契约假说时，迪肯考虑的是关于婚姻关系的契约。他指出，在狩猎时代，按照性别的分工，男性出门打猎，一去数日，而他们的伴侣则留守家中，无人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伴侣受到对手性侵的风险非常高。于是，一些相互间的语言承诺就变得很重要，以明确对性伴侣的所有权，明确后代的生身父亲。所以，迪肯认为这些承诺就是比如婚姻这种象征性契约的基础。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因为父亲身份的确定，对于男性来说，是进化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女性总是知道她们的孩子是谁的，但是男性就不同了，他们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他们可不愿意做冤大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的孩子身上，而且，从自然的选择来说，也是不会选择这样无私的举动的。但是，诸如此类的契约是语言的起因还是结果呢？婚姻契约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分工，而按照性别的分工，可能是男性在开始大规模的狩猎之后才形成的。

和迪肯的观点不同，米勒则提出，语言的产生始于寻找潜在的伴侣，以及在配对后继续保持伴侣关系。他指出，这就是为何语言（尤其是男性的语言）经常显得华丽而冗长，因为把语言运用得娴熟自如，能显示机智和聪明，也就是显示了良好的基因（大脑）。异性选择是进化中的一个尤其强有力的推动力，而且，它总能利用自然选择提供的所有优势，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异性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用语言来推销自己，很可能就是在异性选择中使用语言的结果，而并非是语言产生的主因。

为此，我们做了两组系列实验，以测试语言的各种功能。根据对讲述过的故事内容记忆的多少，来测试人类大脑究竟最适合接收哪一类的信息。两组实验得出的同样结果是，人们都更加记得社会信息，而不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些事实性信息。同样，对网络上微博内容的记忆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社会信息的交换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至少说明这类信息更加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也最容易被记住。

我们的第二项研究，由吉娜·雷德黑德（Gina Redhead）策划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对四种假说（其中三个为社会性，一个为功能性）进行直接的测试。在这项实验中，每个假说由不同的故事来展示，另外还增加一个社会性的版本，侧重于伴侣间的亲密关系（这个版本纯粹是社会信息交换假说的八卦版）。这项实验在设计上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是，米

勒的谢赫拉沙德假说由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故事来展示，并且用华丽的语言来表达。结果显示，人们对三个社会性故事的记忆明显比两个功能性故事的记忆来得深刻（图8.2），至于对三个不同的社会性故事的记忆，并没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用华丽版的功能性故事（一个关于蜜蜂产蜜的故事）所产生的结果，和基本版所产生的结果几乎一样，这说明了巧舌如簧的口头表述本身也许并不是语言功能的核心，虽然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着异性选择而进化成了语言的特性之一。

语言的分布为这个议题提供了更多有用的线索，若干年前，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就发现，一个语言群体的规模（讲某种现代语言的总人数）以及这种语言所覆盖的区域，都和纬度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植物生长季的长度有关（纬度越高，季节性越分明，因此适合植物生长的季节越短）。他认为，在季节分明的区域，气候多变而且生长季很短，因此需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建立交换或贸易关系。辽阔的地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原先的居住地状况恶化，至少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从邻居处寻求帮助，就要和他们进行对话交流，这就意味着大家需要共享一种相同的语言。同样重要是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比如道德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有了共同的语言，就能分享世界观。在我们对友情的研究中发现，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世界观，对加深和巩固友人间的情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第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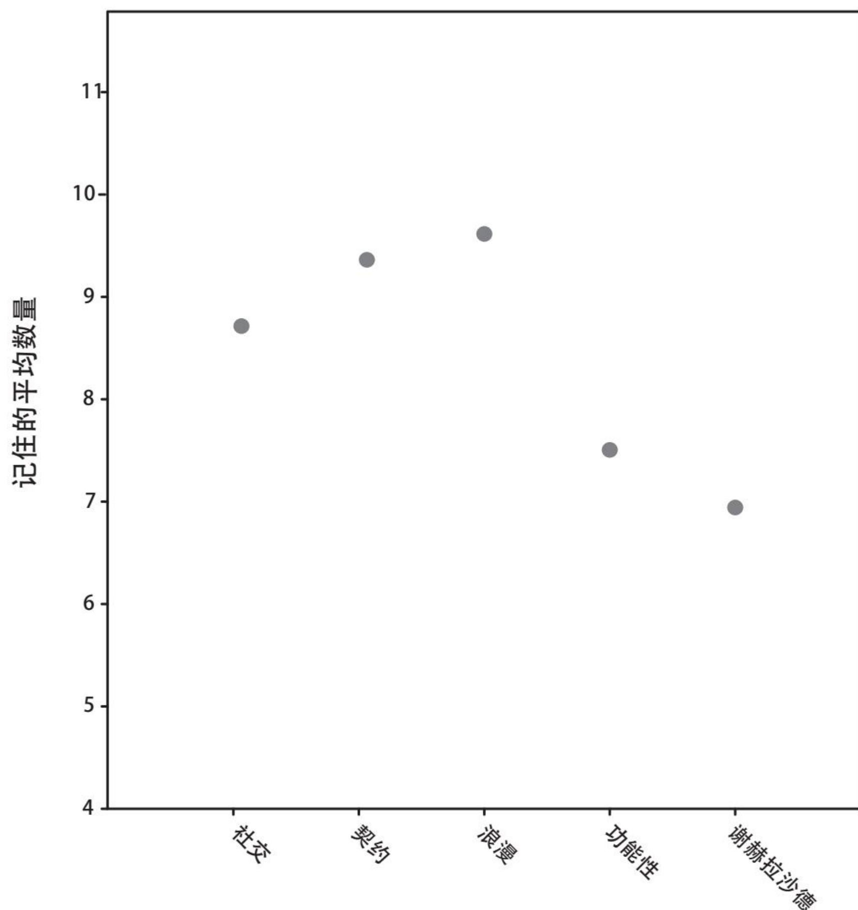


图8.2

对短暂图案记忆的平均数，体现了不同的语言功能假说。从左到右，是这些不同的版本：八卦假说（普通社交八卦和情侣关系八卦）、迪肯康的社会契约假说、功能性假说（用来交换事实信息）以及米勒的谢赫拉沙德假设（支持功能性假说的华丽版）。

根据Redhead和Dunbar（2013）的图表重绘。

我们的实验结果除了显示人类记忆不能很好地折射非社会性世界之外，也不是那么热衷于交流关于物质世界的信息，除非这些信息能够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获益。美国东北缅因州龙虾渔夫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在海岸边捕捉龙虾的渔夫用无线电交流有关龙虾出没的信息，但是，克雷格·帕尔默（Craig Palmer）发现，如果在一个有着众多陌生人的大型群体里，这些渔夫显然不是那么愿意广播龙虾讯息。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小型的群体里，成员基本上来自于同样的圈子，而且大家相互认识，大家就比较乐意交换这类的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换只

能发生在我们用语言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

语言有个显著的优势，它改变了建立社会关系的渠道，从一对一的物理渠道（相互梳理）改变成一对多的声音渠道，从而实现同时给多个人同时“梳理”的效果，有助于建立规模更大的群体。语言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达到这些效果，一是通过相互交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二是通过讲述故事（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自何方的故事），三是通过讲笑话让大家欢笑。我会在下一章中针对第一种方式做深入的探讨，所以，在这里我着重讨论后面的两种方式。语言的进化永远地改变了欢笑的性质，之前，欢笑只是和声的一种形式，因为某一突发的事件（或许是表演，或许是别人的尴尬事）而同时爆发出来的笑声。这种笑声也是对该事件的简单注解，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会经常性地发生，而且也不可预测，所以，欢笑的间隔毫无规律可循。然而，语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让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欢笑。于是，我们可以随时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触发欢笑，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笑话总是针对别人的心理状态，需要更高度的意向性才能理解，尤其是在用到隐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心智理论能力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说，欢笑作为一种社会联系工具，因为有了语言的介入，它的效率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笑话只是有了语言之后出现的一个副产品，而并非促使语言产生的原因。编造笑话有个前提，要求我们首先要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智状态，才能用笑话的形式去取笑别人。

讲述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甚至可能是关于一个没有人真正经历过的灵性世界，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重要的是，故事还能让我们明白，生活在旁边那条峡谷里的人们是否属于自己人，是否可以和我们同属一个群体。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创造出150人以外的另一个社交层次的潜力，否则的话，我们的群体中的成员只能局限于那些我们真正认识的个体。

不管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围坐在火塘边，伴着跳跃的火光讲述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总能创造出温馨的氛围，在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联接，也许，是因为被激发的情感会促使内啡肽的分泌，有益于群体感的建立。在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里，成人礼经常是很可怕的经历，然而，共同体验这种经历的人们，却会有永远的兄弟情感和互相承诺。讲故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安排。人们对黑夜有天然的恐惧，有经验的讲故事的人会利用这种情绪，从而加强刺激人们的感情反应。黑夜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却能让人们产生更加亲密的感觉。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应该稍作停留，思考一下，语言这个作为交换信息的实用工具，却有着一个很奇怪的特性，那就是它们会不断地形成不同的方言，而方言又会很快转变成互不相通的新语言。比如说英语，现在就有六种不同的官方版本。[2] 这些版本都是在过去一千多年里

产生的，有些甚至就在数百年前产生。如果语言是用来合作的工具，那么它又为什么会如此的低效，以致相邻的群体都不能互相听懂对方？简单的说，为什么方言会如此明显地标记出你的来历？

看来，答案在于方言能够识别来自同一地方的小群体，至少在小范围内，群体成员之间很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即使在当代世界，方言的变化依然非常快速（如果不能说是几十年一变的话，至少也是一代人会有一变）。所以，方言不仅透露出人们来自于哪里，甚至也透露出他们属于哪一代人。如果说，语言的存在只是为了交换功能性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些特性就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说语言也参与了创造和维系小群体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些特性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确定血缘关系

语言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于被很多人认为和语言的起源相关，这就是语言在称呼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起到的作用。虽然，给人起名字很可能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可以证明，称呼亲属也有这么古老。从另一方面来说，血缘关系的分类（比如兄弟、姐妹、祖父、姨妈和表兄妹等等称谓）实在太复杂，它不仅需要归纳的能力，还需要有语言上分类的能力。而且，由于血缘家谱是个自然嵌入的结构，它还需要理解嵌入结构的能力。

给血缘关系贴上标签，这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用单一的词语就能准确地描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家中，普遍认同的是，一共有六大血缘关系命名体系，它们分别是夏威夷、爱斯基摩、苏丹、克罗、奥马哈和易洛魁。六个体系的名称，取自于六个采用不同命名体系的部落名称。这些不同体系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区分并行的和交叉的表亲[3]，后代是按单边还是按双边计算。[4] 这些命名体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总之，因为亲属命名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确定两个人能否婚配，所以，这些体系很可能是反映了这些不同地区在婚配和继承方式上的不同。例如，克罗体系和奥马哈体系互为镜像，看起来很可能是由于父系确定性（paternity certainty）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其结果是，一个是父系社会，一个是母系社会，[5]）。有些体系可能有文化和历史上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些或许是出于当地的资源短缺和生态危机，比如，如果像土地这种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资源能够被占有的话，血缘关系立刻就会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决定了谁可以获得继承权。

人类学家有时会认为，生物学并不能解释人类血缘关系的命名体系，因为，在很多社会里，没有生理关系的人们也会被确定为亲属。有两个不同的理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理由之一是，这个结论只是基于对生理血缘关系过于简单的理解，我们对待姻亲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一点，在英语中，我们称呼姻亲亲戚（即和我们没有生理关系的亲戚），用上了和称呼有生理关系的亲戚同样的词，比如岳父（father-in-law）和嫂子（sister-in-law）等等。在这点上，我和马克斯·

波顿—彻里欧（Max Burton-Chellew）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在感情上把他们当作和自己有血缘关系一般的亲人，有一个很好的生物学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和我们共享下一代的基因。我们习惯于认为遗传关系反映了过去的历史（也就是说，两个算是亲戚的人，在族谱中是如何有一个共同祖先的）。虽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方便。但实际上，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奥斯登·休斯（Austen Hughes）有一本非常有见地、但是不被广泛接受的著作（主要是因为书中有太多的数学知识），休斯在书中指出，血缘关系的关键所在不是去回溯过去的联系，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后代。姻亲对婚姻中后代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所以，也应该得到其他亲戚同样的对待。休斯的这种观点，是对血缘关系更为成熟的阐述，从而巧妙地解答了人种学中大量有关亲戚关系的确定和共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人类学家看来是无法从生理角度去解释的。

理由之二是，在传统小型群体中，每个人之间都是亲戚关系，无论是属于通过生养的血亲还是通过婚配的姻亲。而那些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少数人，也很快就会通过婚姻、领养或者认干亲等等方式，和群体中的别人形成某种关系。即使有些人是被误解为有亲戚关系，或者，某些人之间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干亲关系，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整个命名体系不遵循生理原则，少数的几个例外是不会对生理血缘关系的进化过程造成干扰的，[6] 再说，生理学中的一切都是基于统计上的概率，而不是绝对的。要推翻这一点，需要足够的案例来证明命名体系确实逾越了生理关系，而事实上，它们从来不曾被逾越。被领养的孩子会把养父母当作他们亲生父母，但领养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比较小概率的事。而且，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有领养发生，也经常是由亲戚来领养的（这个结论有人类学的研究来证实）。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只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领养才会发生（即使这样，孩子的感受比父母要强烈得多，因为，父母毕竟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由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体系在总体上趋同于生理关系，那么，一个自然的假设就是它们产生于生理血缘选择理论（biological kin selection theory）。[7] 从这个角度看，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系，我们和其他学者都做过很多研究，来比较人们在对待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家人和朋友时，体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的程度。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人们更愿意为家人做出无私的举动，即使他们和朋友处于同一个距离层次中（也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交网络层次）。这似乎说明，偏向我们的家人，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也许这就是血缘关系选择的结果。

但是，血缘关系中的某些现象，确实很令人费解。我们可能会觉得血缘关系中的亲密感来自于从小一起长大，从幼儿时期开始就非常了解亲近。在这种程度上，血缘关系或许等同于某种非常亲密的友情。但是，即使是一些远亲（比如，远房表兄妹，还有曾祖或曾曾祖辈的亲人们），对我们产生的亲密感并不亚于近亲。然而，这些远房亲戚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名词分类（比如说，杰克是你的远亲，这仅仅意味着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曾祖母）。但是，在你被告知某人和你有亲

戚关系的这一刻，虽然只是远亲，也未曾谋面，你也马上会把他放到一个和朋友不同的圈子中。这是很不寻常的，仅仅一个语言标签，就能激发出强烈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按理说只存在于有深度情感和生理联系的近亲之间。

这就带出了一个可能性，有可能血缘关系是一条捷径，当面对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血缘关系省了我们很多时间，让我们快速地做出决定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确定他们和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也许还可以加上这种关系的亲密程度）。相反，在对待朋友时，我们需要根据过去的交往，以决定在不同的情形下该做出怎样的应对。正因为和血亲相关的信息处理过程简洁得多，所以，和血亲相关的决定会做得更快，认知成本也更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血缘关系是一个隐性的过程（也就是自动的过程），而朋友关系是一个显性的过程（必须经过考虑）。在一个成员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小型群体中，血缘关系的确定，能帮助你为每个成员提供一个短平快的认定方法。

在一个异族通婚（夫妻中的一方来自族群外，而另一方终生生活在族群内）的社会中，一对夫妻可以追溯两代的亲戚，也就是有着共同的曾曾祖辈的亲戚（即现在的三代，祖辈、父辈和子辈）差不多正好是150人。或许，这并不是巧合，在一个族群中，这些就是差不多任何人能够数得清的亲戚关系。令人吃惊的是，在所有的血缘关系确定体系中，都没有逾越这个自然界定的150人家谱成员数目。[8] 所以，这些体系似乎都是为了维持这些人类自然群体成员的关系而设计的。

宗教的位置

讲述故事是所有宗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故事里，有那些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死去的祖先，有充溢着心灵世界的存在，也有富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徒，这些都是宗教故事常见的主题。在传统得小型社会中，宗教是一种你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体验，通常来说，这种体验和和萨满巫师以及迷幻的状态有关（图8.3）。音乐和舞蹈在巫师的法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被用来（有时还会配合以药物）对信徒施展法术，直到他们彻底丧失理智，进入出神迷离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他们会进入超越自然的世界，在祖先或是精灵的带领下漫游世界，或许还会面对恶魔的挑战，就像霍比特人在《指环王》中那样。显然这种超越现世的漫游只在他们的意识中呈现，但是，他们的感觉会强烈到似乎身临其境。

说到这里为止，语言对于宗教还不是重要，因为宗教只是你的体验，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对认知能力有要求。或许你也想告诉别人你在精神世界里的漫游，并且和他人达成某种可以交流的共识。但是，你不需要复杂的神学知识，你在精神世界里遇到的大部分动物，其实也就是你平时所熟悉的，虽然有时会出现半人半兽的怪物（图8.3a）。迷幻的状态以及如何进入这种状态由来已久，最初很有可能是偶然发现的，或许，在海德堡人时期，当音乐和舞蹈在维持社会关系中

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有些人如此忘我地投入歌舞之中，直到虚脱昏迷，然后就进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一旦知道了如何才能进入这个状态，再次复制就不难了。所以，在第一次的偶然发现之后，很可能有意识地去反复尝试再次进入这种状态。



图8.3

史前宗教，（a）跳舞的兽人（鹿头“巫师”），来源：Les TroisFrères画廊，River Volp洞穴组，法国，距今一万两千年前。（b）桑族迷幻舞蹈，非洲南部桑族岩画艺术。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世界各地的萨满教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穿过一个洞穴或隧道，然后进入精神世界，在那里，有光芒的照耀，一个明亮的天地。比如，进入那个世界的旅途充满危险，于是需要一个好心的向导（可以是一位慈祥的祖先，或者是一个图腾性的动物）。还有，到了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担心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洞口，这大概也反映出疯魔的舞蹈会耗尽体力，有人会因此倒地而亡。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这种情形解释为他们是找不到回来的洞口，于是就留在那边了。

这类令人神志恍惚的迷幻舞蹈似乎在维系群体内的社会平衡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中，当群体中开始有矛盾、成员有互相争吵的现象时，很可能就会开始跳迷幻舞蹈。这种时候，这种舞蹈起到了抚慰人心恢复平静的作用。在癫狂的起舞中，所有不和谐的记忆似乎被抹去了，所有恶化的关系似乎得到了修复。一场迷幻舞蹈跳下来，似乎能够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重启到默认状态，让群体作为一个互助的关系网再次投入正常的运行。直到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积累，那些小小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加深，然后需要又一次迷幻舞蹈将一切困扰驱散。这种情况很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因为迷幻舞蹈（或是说就是迷幻状态本身）和内啡肽的大量分泌相关，所以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治愈方式，用来维系成员之间的联系，修复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内啡肽对我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都很有好处，所以迷幻舞蹈对整个群体的健康和社会凝聚力都是有益的。[9]

所以，宗教的诞生似乎是为了增强小型群体中的社会凝聚力和责任感的结果。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不可避免划分了自己人和别人的界线，形成了一种组内针对组外的思维方式。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拥有同样的宗教体验以及拥有相同的行为准则，这些共性就像是一道分割线，把我们这个群体和山谷另一边的那些人区分开来，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做坏事的坏人。

美国生物学家科里·芬彻（Cory Fincher）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在他们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指出，一个传统宗教的支持者数量、同一语言群体的规模以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度都和纬度有关。在赤道附近的人类群体规模较小，呈内敛型状态，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靠近极地的群体规模较大，呈发散型状态，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同时论证了这种现象的内在驱动力，决定因素是病原体的数量。热带是出了名的多病地区，即使在现在，那里也是很多新病害的发源地。他们的论点是，在这种多病原体肆虐的地区，健康地生存下来的策略就是要避免和其他群体混合（尤其是要避免交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自己的群体，自己管好自己的疾病，因为经过时间的洗礼，他们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这个观点和我前面提到的丹尼尔·内特尔的观点衔接得天衣无缝。内特尔的假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高纬度区域的语言群体比较大，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热带地区的语言群体会比较小。相反，芬彻和桑希尔给出了为什么热带群体比较小的原因，而没有给出高纬度群体为什么需要加大的原因。像芬彻和桑希尔那样，只是说在高纬度区域，因为病原体较少，群体就可以比较大，这样的看法并没有解决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

大群体中社会和生理的额外成本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假设合并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热带群体因为病原体的原因规模比较小，但是，在高纬度地区，因为没有了这种选择性压力的制约，出于大型贸易关系的需要，群体也会随之扩展，变得越来越大。

在高纬度地区，我们需要更大的群体，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机制以缓解大型群体不可避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仪式似乎能为维持群体凝聚力起到关键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一个宗教的承诺，会增强一种群体的归属感，会使人们互相之间更加慷慨（有时候，对完全不认识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慷慨，但是不可能始终保持下去）。可是，这里的要点在于，宗教不能让人更加社会化（那只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副产品），宗教只能让人对特定的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有更多的承诺。我会在下一章中再回来讨论这个议题，因为它对最后一个过渡至关重要。

考古学和来世

通常来说，考古学家只有在发现刻意墓葬的痕迹，才会认作是相信来世的证据。他们将刻意墓葬定义为有殉葬品的墓葬，因为殉葬品的存在，说明相信死者在来世需要这些日常必需品。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有来世，很难理解在埋葬死者时为什么还要花费这多心思和精力。为什么不直接把尸体扔在树林里，或者，像在胡瑟裂谷的骨穴遗址里发现的那样，把众多的尸体扔进洞穴后面的天坑里？

刻意墓葬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很普遍，在欧洲和非洲西部，已经被发现的遗址多达一百余个。然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类墓葬遗址却少得多，不超过三十多个，虽然这段时期覆盖的时间段要长得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和所有之前的墓葬有明显的不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尸体都是双腿伸直，朝天仰卧的（当然也发现了两具呈俯卧状态的尸体，还有几具腿是弯着的）。但是，几乎所有新石器时代中期包括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址里，发现的尸体都摆放得毫无章法，更像是随意扔在那里的。

在很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遗址里，都会发现红色的赭石粉末，在有些遗址里，赭石多到甚至于染红了尸骨和周边的土壤。在有些墓葬里，比如意大利的封曲力诺石窟遗址（Grotta dei Fanciulli），放置于头部和骨盆部位的赭石粉末特别多。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里，为什么会用到大量的赭石，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是，这种习惯很可能是和身体装饰的仪式有关，因为赭石经常被传统族群用作涂抹身体的颜料。

很多这样的墓葬做得非常气派华美，而且，通常都会有大量的精致殉葬物品。我们在第七章中提到，在俄罗斯大草原上，有一处距今两万两千年的松希尔遗址，这个墓穴是在永久冻土层里挖出来的（当初人们做这个墓穴，一定花费了很多功夫）。墓穴里，和两个孩子尸体埋葬在一起的还有品种繁多的珠宝、工具、象牙雕刻和装饰性鹿角，还有一根人的股骨，骨腔里塞满了赭石粉末。另外，还有十一支标枪和2.4米长的

象牙长矛，放在他们的身边。在两万一千年前的西伯利亚玛尔塔（Mal’ta）遗址里，一个小孩的殉葬品有一个头冠、一个带坠子的项链、一个手链、一个雕像、纽扣、骨尖和其他工具。在法国西南部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洞穴遗址里，陪伴着尸体的是一堆打过洞的贝壳以及动物牙齿，在意大利的格里马迪（Grimaldi）洞穴遗址也发现了同类的殉葬品。在意大利的康迪德（Arene Candide），“年轻王子”之墓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华丽的墓葬代表之一。死者的身体上洒满了大量的红色赭石粉，佩戴着用猛犸象牙制作的垂饰，原本可能是手链的贝壳，他的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把23公分长的燧石刀。在葡萄牙，一个安眠于两万五千年前的拉皮尔多五岁幼童，他脖子上的坠子，是用穿孔的贝壳做的，他头上的发冠，是用四匹不同的马鹿的牙齿做的。事实上，项链和发冠尤其普遍，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三分之二墓葬中都有发现。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经常以集体墓葬的形式出现。在松希尔遗址，两个儿童的尸体头对头埋在一起，边上还有一个成人。在黎凡特的卡夫泽（Qafzeh）遗址，一个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妇女（标号Qafzeh IX）和她的婴儿埋在一起。在法国的克罗马农岩石洞穴，五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个婴儿）被埋在一起。在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i Vestonice），三具成人尸体（大概是两个男性一个女性）被埋在一起。最大的集体墓葬出现在捷克的普拉德莫提（Predmosti）遗址，一共发现了在不同时间里埋进去的十八具尸体。这样的集体墓葬形式，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之前是没有的，这样的集体墓葬似乎在暗示，这些埋在一起的死者，将要一同前往另一个精神世界。或者，像普拉德莫提那样的形式，隐含着后来的死者要追随先行者，一同前往。

这些发现告诉了我们，至少在两万五千年到三万年之前，有关来世的信仰已经形成，相信人死后将要去往一个精神世界，或者，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迷幻状态而进入这个精神世界。这是我们所能够确认的最晚时期，很有可能的是，这样的信仰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些信仰，及其相关的活动，只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中存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海德堡人或尼安德特人也有这种复杂程度的活动，这个结论似乎能够辅佐我们的观点，那就是这种复杂程度的宗教，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条支线上开始的。而且，宗教的发展，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得以维系更大群体的关键所在。

图7.4所示的心智能力发展方式也暗合了我的结论，个人宗教信仰的复杂程度是基于个人心智的意向性程度（表8.1）。虽然在三度或四度意向性层面上，也可能有某种宗教，但是，当意向性达到五度时，在信仰的质量上会真正上一个台阶。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似乎没有超过四度意向性的（图7.4），因此，他们就可能不会有很复杂的宗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有限的考古证据，我们得知古人虽然宗教活动频繁，但是其复杂程度显然是很低的。

意向度	可能的信仰陈述	宗教形式
一度	我相信神[... 存在]	存在信仰
二度	我相信神会[... 出面，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律法]	超自然事实
三度	我想要你相信神会[... 出面]	个人宗教
四度	我想要你相信我们要神会[... 出面]	社交宗教
五度	我想要你相信神知道我们要神会[... 出面]	公共宗教

表8.1

心智化能力（以意向性度数表示）和宗教信仰的复杂程度。

来源：Dunbar（2008）

另一个宗教信仰的证据，是在史前的洞穴中发现的岩画。自从第一次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岩洞（Altamira）里发现了岩画（图8.4），之后的大约一百年间，已经发现了一百五十多个有着新石器时代后期岩画的洞穴，艺术家们用动物、人体和抽象物体的图案，装饰着洞穴的墙面和顶部。有些图案是用天然颜色画上去的，也有些是以蚀刻的方式，用手指在较软的墙面上进行白描和涂鸦。

这些有岩画的洞穴大部分集中在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图8.5），但也有一部分远在德国南部，甚至英国。一些岩洞因为洞顶坍塌，已经很难进入，也有一些岩洞的洞口，已经没入海底。比如在法国

地中海海岸的科斯奎岩洞（Cosquer Cave），只有潜入海底才能到达洞口，因为在一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纪结束时，海平面升高了一百二十米，把原本在海平面之上的洞口淹没了。史前的岩画艺术非常丰富，比如在南非的布须曼人以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新石器印第安人都有大量的创作。这样看来，那些在欧洲和非洲开放区域的很多岩画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而保存至今的欧洲岩画，很可能是因为洞穴较深，躲过了岁月的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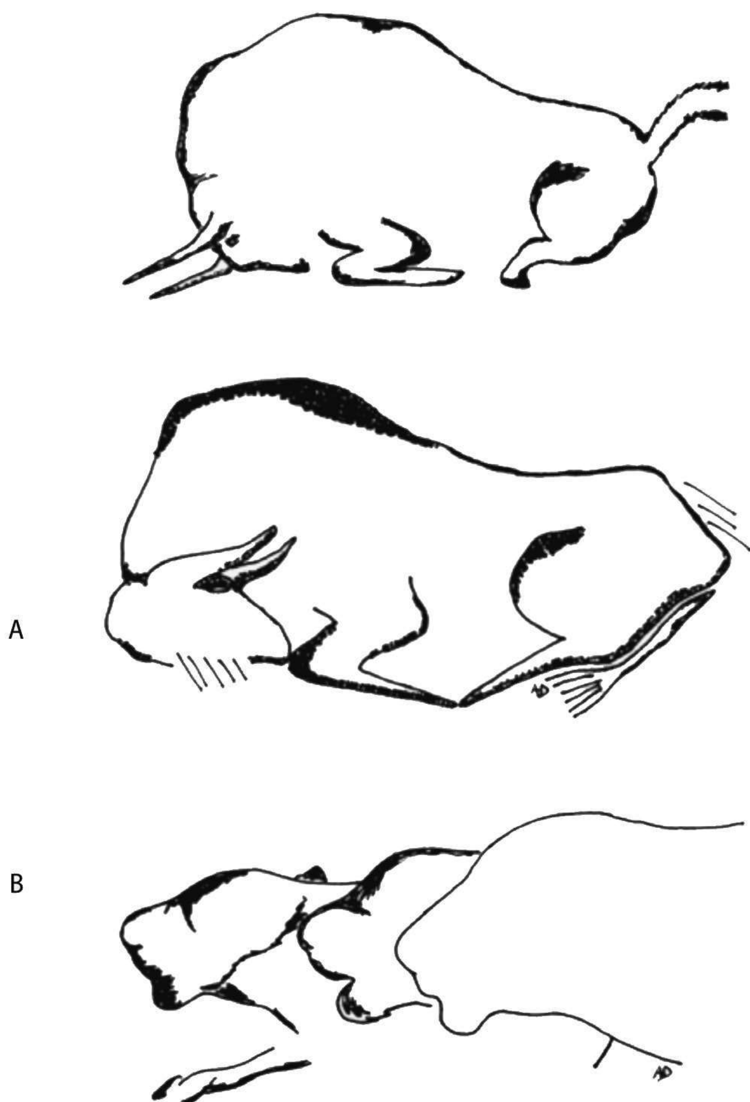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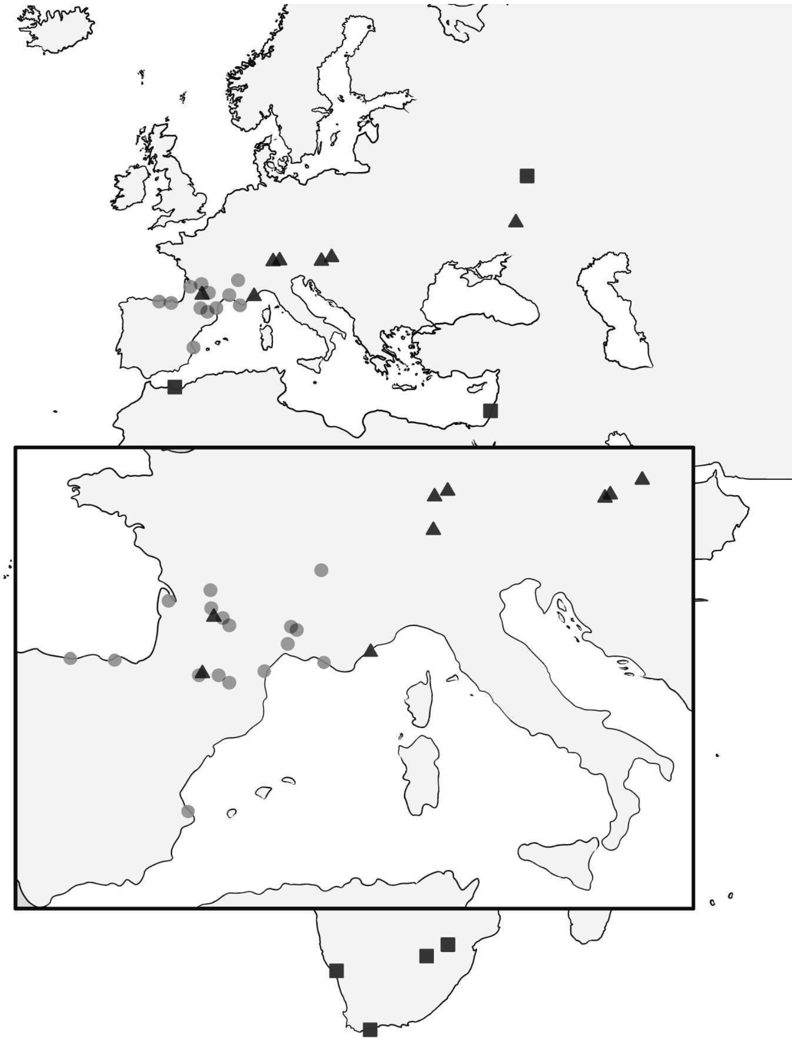


图8.4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a）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岩洞中的野牛（距今一万两千年前）。（b）法国南部肖维岩洞中的三只雌狮（距今三万年前）。

来源：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图说8.5

发现了抽象和象征性图画的主要考古遗址。

● 装饰洞穴

■ 个人装饰

▲ 维纳斯雕像

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一直以来，判断岩画的准确时间都是个难题，直到近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取用极少量的颜料样品，进行分析研究。虽然有些岩画的年代并不久远（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Lascaux］距今大约一万五千年，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和沃尔普［Volpe］洞穴距今只有一万两千年）。另一些岩洞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在法国，肖维岩洞、列斯普格岩洞（Lespugue）和科斯奎岩洞分别距今有三万年、两万五千年和两万七千年之久。

大部分岩画的内容都是成群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猛犸象和犀牛，偶尔也会出现狮子、鱼和水鸟等动物，画中的这些动物常常是挤在一起，图像相互重叠，呈现密集繁杂的状态。有时候，艺术家会利用岩石的自然形状来表现一只动物，赋予作品惊人的动感。在有些作品中，动物的形象必须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才能看见。抽象的几何图形以及点和线也经常出现，但是，描绘人物的图案却少得出奇（虽然人物主题在南非狩猎族的史前岩画中经常出现）。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岩画作品中，最让人惊奇欣喜的是看到那些留在洞壁上的手印图（图8.6）。手印在很多洞穴里都非常普遍，比如法国的科斯奎岩洞和佩斯梅尔岩洞（PechMerle）、西班牙的圣维森特洞穴（San Vincente）和普恩特维斯戈洞穴（Puente Viesgo）都有手印作品。在一共发现的507个手印中，大多数是把手放在岩石上然后再喷上颜料的“负片”。但是，在肖维洞穴中，有两组手印，一组48个，一组92个，都是用手沾上颜料之后，再按到岩石上的“正片”。



图8.6

西班牙北部方廷西林洞穴手模的局部拓印，距今两万年前。手模画的制作过程可能是将颜料含于口中，然后喷向按于岩壁的手上。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为什么会创作这些岩画，我们至今仍然不太清楚。不过，画中出现的大量动物，以及看似从动物侧面穿出来的箭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创作这些岩画是一种仪式，为了祈求狩猎平安有成。很多岩画中的确出现了众多通常被捕杀的动物，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捕食动物，比如肖维洞穴中那些画风夸张的母狮们（图8.4）。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些画作和成年礼或者其他仪式有关，有些手印太小，不像是成年人的，有些画的地方很低，也不是成人容易够到的（当然也不是不可能），这些迹象都显示小孩也会被带到洞穴里。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些岩画描述的是巫师在迷幻神游时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情景，这个观点的证据是图8.3a中那些半人半兽的图案。但是，这些图案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俱乐部和组织的图腾或象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正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中展开讨论的那样，这些图案和男人俱乐部的特殊仪式或迷幻舞蹈有关。

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交层次？

我曾经说过，宗教信仰和讲述故事对维系灵长类的大型群体很重要，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型群体是按照原始社会的标准，那么，再让我们来深入地探讨一下，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这些活动又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在第三章中指出，150人的自然群体在社交意义上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按照不同的情感和社交质量，分成一系列不同的社交层次。在这150人中，我们会和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多很多。我们把社交圈分为四个层次，分别含有5人、15人、50人和150人。当然，这些层次还可以再延伸，达到500人和1,500人（图3.4）。其实，这种分层结构的体系本来就是灵长类社会的特性，所以这种层次结构本身对人类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人类社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层次的数量，那么，这些不同的层次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我们下一章即将开始讨论的第五次过渡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框架。

灵长类群体的分层结构的缘起，是为了形成联盟或者互助体系，以对冲个体在大型群体中生存的代价。因此，每一层的架构都是为了支撑上一层，上一层是底下层的特性显现，两个层次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的分层架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每一个层次上，内层较小的群体是其外层较大群体存在的基础。

从某种角度来说，最容易解释的是15人层次，依照梳理小群体的规模和灵长类新皮质大小，这个结果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在猿猴群体中，梳理小群体（也就是经常性在一起互相梳理的伙伴）的存在，是对大型群体生存压力的缓冲（见第二章）。所以，这个梳理小群体的规模会随着整个大型群体的规模的增加而同步增加。事实上，梳理小群体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别人来骚扰你，从而减小身处大型群体之中的压力。身处的群体越大，生活的压力也越大，作为联合防御体系的梳理小群体的规模也要相应扩大，才能有效地抵挡外来干预。用猿类等式来预测的人类亲密小群体的规模正好就是15，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种规模群体的存在，其真正作用可能就是减少生存压力。事实上，这个社交层是我们的依靠，是为我们提供社会和经济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支持的基础，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个层次里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

在15人层次内部的核心5人层次或许是提供更亲密的情感支撑，这个层次的存在，表明了人类拥有更复杂的心智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同时也让人类在心理上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我们和其他灵长类远亲的不同之处。心智理论能力和高度的思维能力能使我们预见到现在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未来的后果，因此我们会对将来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可怕事情心怀恐惧，这些心理活动都是其他动物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个可以伏在上面大哭一场的有力臂膀，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就非常重要，也对我们鼓起勇气面对比其他灵长类复杂得多的社会非常重要。

在狩猎—采集族群中，50人层次最明显的特征是，这是一个集体过

夜的理想规模。也许，这就是这个层次最原始的作用。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灵长类在夜间的视力不好，部分也因为我们睡在平地上，晚上是人类最容易遭到天敌攻击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来抵御夜间来自于天敌的侵犯。小型的树生灵长类只需要对付在白天出现的鹰类（主要是老鹰，在南美洲，角雕也会对小型灵长类形成威胁），但是，体型更大的陆生灵长类更容易受到夜行动物的侵害。对于狒狒而言，最危险的天敌是豹子（夜行动物）、狮子（主要在夜间觅食）和鬣狗（夜行动物）。虽然50人的群体也为女性提供觅食的环境（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结伴集体觅食），但是，如果只是挖些根茎，采些莓子，没有必要组成这个规模的群体。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层次的功能主要是为抵御夜间捕食者的侵害，同时也能为白天觅食创造安全环境。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50人层次和150人层次六大功能：一，保护成员不受捕食动物的威胁；二，保护生存区域或食物来源；三，保护生育期的配偶；四，为降低环境威胁的贸易协定；五，交换有关资源产地的信息；六，防御邻近同类群体的侵犯（这就是所谓的战争假说）。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战争假说（也就是为了抵御入侵者而形成50人和150人层次）是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表8.2）。根据社会大脑等式的推测，150人层次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显示在考古记录中（图3.3），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也就是大约在十万年前，人口突然开始了一个爆发期。

当然，一旦有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做靠山，自然就可以在更多的方面依托它。比如贸易协定可以给你更多的机会，在你自己所处的环境不适合生存的情况下，去寻找贸易伙伴的帮助，到别处谋生，这也是大群体的另一个优势。同样有优势的是，大型群体中的成员分布广泛，有关食物资源的信息也就相应的更加丰富。在多个狩猎社会中，交换贸易网络都是值得一提的。比如在非洲西南部的朱/霍安西部落（Ju/'hoansi），象征性的礼物被称为“hxaro”，通过hxaro的交换，在部落中建立起一个分布式的互相支持的网络。hxaro伙伴在居住地情况恶化时，会互相之间提供留宿避难等方面的帮助。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Polly　Wiessner）记录了一个案例，在一个食物短缺的饥荒期，一个桑族部落将半数成员迁往远方的hxaro伙伴那里，如果没有采取这样的策略，肯定会有人饿死。类似的交换网络在其他狩猎社会中也存在，也有迹象表明，这样的网络在欧洲新石器时代后期依然存在。

关于hxaro伙伴，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他们并不属于住在一起的50人层次群体，相反，是住在别处的人。据维斯纳描述，在桑族里，hxaro伙伴通常都居住在四十公里以内。这个距离，按照人类学家鲍勃·莱顿（Bob　Layton）和西昂·欧哈拉（Sean　O'Hara）的研究发现，正好是热带狩猎—采集族群生活的平均半径。也就是说，hxaro交换关系主要发生在同一个150人层次的社区之中，这就再次证明了社区是交易行为依托的主体，而不是营地小组（band，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误判，见第三章）。

组织层次	大小	抵抗天敌	保护资源
家庭	~5	否	否
支线	~15	（也许）*	否
小队	~50	是	否
社区	~150	否	否
大队	~500	否	否
部落	~1500	否	否

（也许）*表示这个功能可能成为一个自然出现的特性（即当这个层次成立后可能出现，但并非选择这个层次出现的因素）。

资源交换	保护配偶	信息交换	袭击同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也许）	是
是	否	（也许）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表8.2

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六个群体层次的可能性功能分析。

资料来源：Lehmann等人的论述（2014）。

接下来，还需要分析的是我们所知道的150人之外的层次，根据对人种社会的分析，这些层次是当代社会群体一系列层次的自然延伸（图3.2和3.4）。有观点认为，500人层次是保证了基因交换的同时又避免近亲繁殖的最小值。在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会避免和同一群体（150人层次）中的成员结婚，而是会寻找邻近群体中的人结婚（也就是500人层次中的伙伴）。这样来解释的话，这个层次的存在就非常合理了，里面大部分成员是我们可称之为熟人关系的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半随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基于互助互惠的个人关系，而是基于更加正式，也是更加类型明确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确立的前提完全就在于语言）。这点从择偶的角度来说很重要，因为两个群体之间的足够了解，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可以和另一群体中的成员成婚的基础。

现在，就剩下1,500人层次有待分析了。从民族学的习惯上，这个

层次一般被定义为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民族语言社区。这个定义，基于这个层次中的成员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一事实。对这个层次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层次代表了一个贸易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更大更宽阔的区域，能够在环境恶化的时候带来更多的缓冲。由莱顿和欧哈拉收集的热带狩猎群体样本，平均人数为150上下，覆盖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所以，在一个贸易网络中，如果有9到10个这样的群体，覆盖的面积就有50,00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大约225公里×225公里的区域）。在生态环境变得恶化时，或者遭受其他族群的入侵时，这个广大的区域就可以作为缓冲。这个面积也足以用来抵御灾难，因为，毕竟灾难很少同步降临到这么大的范围内。

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可以推断，部落层次的群体很可能是由数个150人群体通过贸易协定建立的。大约十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纪时期生存环境的加速恶化，促进了群体通过贸易关系向外延展，这在时间上正好和最后一次脑容量的激增相吻合。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层次的出现，对现代人类能在四万年前以后成功地征服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维护这样庞大的延展性群体，必须依靠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以保证真诚相待和可靠互助），而这一切，正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不同于之前物种的地方，是人类进化到发展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一阶段的结果。所以，迪肯的象征性社区（Deacon’s symbolic community）的根源可能就产生在这里，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有能力共同商讨协定。有了这样庞大群体的支持，在和尼安德特人发生冲突时，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也能占尽优势。面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大概是完全没有办法对付的，他们不具备召之即来的有力后援。

本章描述的是人类文化的最终绽放，这是经历了六百万年漫长的生物演化之后，人类才站到这个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演化的最后一次过渡，也就是第五次过渡开始萌芽了。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重点在于文化，文化是后天行为，是好奇和创新的产物。第五次过渡，也是最后一次过渡，是从迈进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步标志着文化创新取代了生物进化，下一章的主题，就将围绕着这段重要的旅程展开。

注释：

[1] 长矛投掷器实际上就是一根一头开槽的棍子，矛的尾端可以插入其中，起到了增加投掷手臂长度的效果。这样，在投掷的时候能产生更大的角动力，比仅仅依靠手臂力量投掷的矛飞得更快更远。

[2] 这六种是：英语（在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语言）、莱兰语（或称为低地英语）、苏格兰英语（苏格兰南部非盖尔语的传统语言）、加勒比海英语、城市黑人切口（美国城市黑人语言）、塞拉利昂克里奥尔语和新几内亚混杂语。这些语言在语法结构和用词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3] 并行（ Parallel）表亲是父母的同性兄弟姐妹的孩子，交叉（cross）表亲是父母的异性兄弟姐妹的孩子。

[4] 单边血缘关系是只计算父母中单方的血亲，双边血缘关系是计算父母双方的血亲。英语的习惯是算双边血亲的（我们用同样的cousin、aunt、uncle等词语来称呼父母双方的亲戚），

但有些语言（如盖尔语）则用不同的词汇称呼父亲或母亲的亲戚。

[5] 只通过女性的后代确认血缘关系的母系继嗣体系，似乎主要存在于父系确定性低下的文化中（也就是男性不能确认他妻子所生的孩子是否的确是他的骨血）（请参照Hughes的论述，1988）。

[6] 原因是如果沿着家谱往回追溯，基因关联性很快就会衰退，尤其是在小型群体中，只要倒回去六代以上，所有人之间的关联性就都一样了，多多少少都有点沾亲带故。
Hughes（1988）认为家谱的引入是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我和你想要找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找正值青春期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很难找到一个属于我们之间关系的稳定支点。Hughes发现，而从前的某个远祖，就能成为定义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不变的支点。更重要的是，这个祖先是否真的存在过也无关紧要，只要在家谱中的位置足够高，对于定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无任何区别。

[7] Hamilton（1964）将生理血缘选择定义为一个重要的进化动力，如果我帮助我的兄弟姐妹更成功地生育了后代，那么，无论我和他们共享的基因是什么，这个基因都会传给下一代，就像我自己生育了后代一样。Hamilton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利他主义对血亲的进化，但从此以后这个概念就现代进化生物学中扮演着基础的角色。大致上来说，帮助亲戚的意愿，和亲戚跟自己的亲情程度成正比，而这种亲情程度，可以准确地通过了解他们的长辈而计算出来。

[8] 皇室和贵族通常能追溯到更早的祖先，但这是个特例。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特权通常是通过世袭继承而来的，他们那些长长的家谱，就是为了证明这些权利都是合法继承的。

[9] 有些学者（如Boyer，2001）认为，宗教并没有带来健康方面的益处，但这个结论似乎和事实相去甚远。有证据显示，积极参与宗教活动能带来广泛的优势（参照Koenig和Cohen的论述，2002）。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着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所谓宗教的益处，到底是宗教本身（也就是相信神）带来的，还是积极参与宗教仪式和活动带来的。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仅仅是声称相信某种宗教，并不能带来什么益处，如果Boyer的着重点在这个方面，那么难怪发现不了任何益处。宗教的认知科学似乎只关注那些和教义宗教相关的复杂概念，而忽略了宗教体验中核心的高度情感体验。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在最后一个冰河纪的末期，也就是大约一万两千年前，黎凡特的人们开始在村庄里住了下来，他们用泥砖和其他材料造了很多固定的房子。这一天，距离他们“发明”农耕，进入后来定义的“新石器时代”还有好几千年。确实，最初开始种植植物，肯定是为了保证更多的食物资源，喂饱定居地越来越多的人口。可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定居下来，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一个比较明显的可能性是，定居有助于防御邻近群体的侵犯。即使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群体间的侵犯骚扰确实存在，并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接下来的五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人群的数量急剧增长，而防御入侵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定居地最终成为城邦和小王国的雏形。

到公元前8000年，位于土耳其的居住地，比如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和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以及后来在黎凡特的居住地杰里科（Jericho），都成为很有规模的城镇。城墙内的面积达到十五公顷，有上千座房屋，五千多居民居住其中。短短数千年后，这样规模的居住地已经遍布欧亚大陆的南部了（图9.1），而这种结构是后来铁器时代北欧山丘堡垒的前奏。在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城墙的修建和防御目的无关，因为这些城墙的确没有那么坚固。但是，实在又找不到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如果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修建这些城墙，而且，有城墙总比没有好。即使是村子中的房屋，在结构上也呈现出防御的特性。这些房屋几乎都没有靠近地面的门窗（进出口是平顶上的一个洞），而且，这些房屋都团团簇簇地聚集在一起，出口非常之少。难道这只是很差劲的城市规划和房屋设计？抑或是为了防御入侵者？要知道，从技术上来讲，在房顶上装门，可比在墙上装门要困难得多。

实际上，根据近年来对大量狩猎族群和考古数据样本的分析发现，平均15%的人是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或至少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暴力行为而死亡），这个比例，从新石器时代到人种学意义上的现在，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图9.2）。在一项研究中，学者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的83个遗址中总共387个墓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遗址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900到1700年，散布于丹麦和瑞典的南部。他们发现，9%的瑞典头颅和17%的丹麦头颅都有明显的创伤痕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武器从正面袭击的。男性头颅有更多愈合的伤口，但致命伤在男性和女性中没有差别，这表明了虽然男性会更多地受到不至于丧命的暴力伤害（骨头的再生长显示了伤口的愈合），但是，男女死于暴力的几率却是一样的。

有证据显示，这些人居住在一起时食用的食物，质量上不如分散居住的时候，或许，这能够最直接地证明了他们并非完全是主动要求居住在一起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地居民的体型比现代狩猎人要矮小（体型矮小通常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而且，在他们的骨质中，显示出更多的饮食缺口。对营养摄取的分析显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通过手工农业的方式，所能获得的能量要明显低于通过觅食方式获得的。所以，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原因，促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族群从自由觅食转变成定居。[1]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生活在这么大型的集中区域会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压力。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即使生活在规模适中的群体中，对灵长类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不容易。群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成本，如果这个成本不能得到很好的对冲，那么群体很快就会瓦解。狩猎—采集族群以时聚时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实际上，大型群体会主动分散到一个较大的区域中，从而减轻生活在一起的压力。但是，时聚时散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狩猎—采集的族群成为一个介于群居（可以防御天敌和外族的侵害）和散居压力之间的折中方案。在过去的三章中，我提出几种能够缓解这些压力的工具，它们是音乐，包括吟唱和舞蹈，还有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故事讲述，当然还有宗教，它们能够帮助维持中型社区成员间的社会联系。



图9.1

新石器时代主要聚居地（▲），灰圆圈代表在这些地方有家养的动物和植物。

参见Diamond（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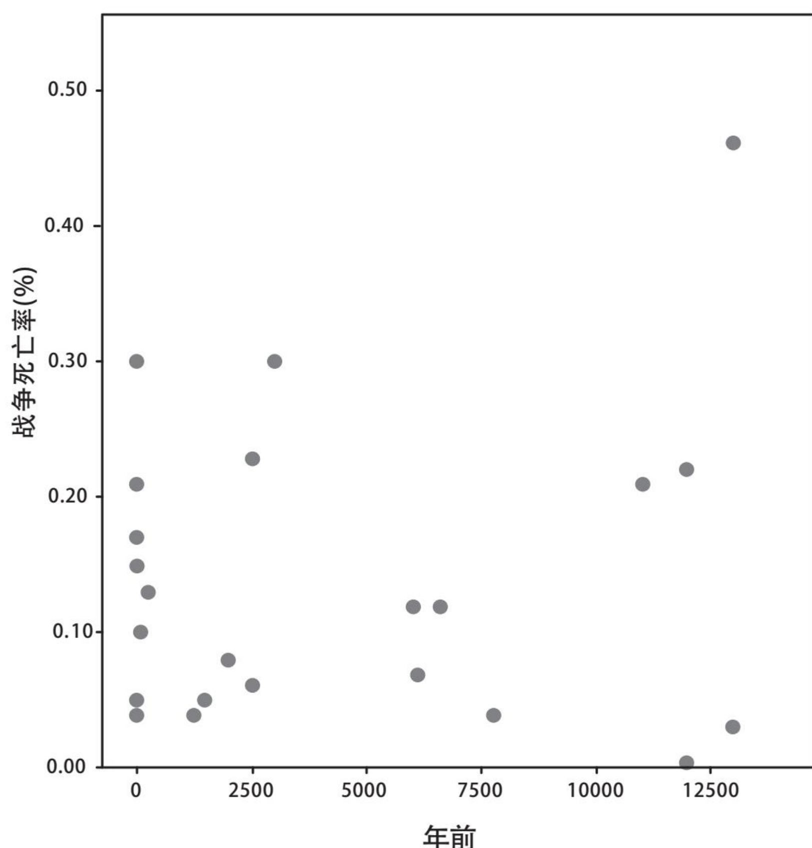


图9.2

在一系列史前部落和史前社会中，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成人人数百分比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数据来自于墓葬中的遗骨样本。

来源：Bowles（2009）。

新石器时代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在于人类如何发明了农业，或是发现了怎样储存食物，或是学会了盖房子。相对来说，这些都是人类取得的小小成就，而且很容易就解决了。但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是由共同生活在规模庞大、空间密集的居住地所带来的。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后来城镇化的发展和城邦的出现至关重要，否则这些都不会发生。能让我们成为现代人类的第五次伟大过渡是新石器时代的定居，重点就在于“定居”，而不是“新石器”。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我在第二章中说过，灵长类社会是一个有隐形约定的社会，这个隐形约定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分摊成本，解决生存和繁殖的问题。生活在稳定群体中的猴子，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能够依托群体，有效地防御天敌。防御并不一定是积极的行动，有时候，大型群体的威慑力，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隐形社会协定的难点在于，经常会有不肯出力的投机者，搭便车享受协约的成果，却不愿意付出。一有危险，就退缩在后面，或者，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对群体有益的活动上（比如轮流守望站岗，或为同伴梳理）。

为了遏制搭便车的行为，也有过很多惩罚的方式作为对策，[2] 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惩罚是有问题的。惩罚者的行为是无私的，根据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所述，站出来的惩罚者和躲在后面没有站出来的群体成员相比，在进化上是处于劣势的。实际上，没有站出来的成员是利用了惩罚者大公无私行为的投机者，这些只是把我们的问题又往后倒退了一步。群体选择（这个特性会因为有利于群体而不利于个人而进化）并不是答案，因为在所有传统的选择环境中，无私的总是会遭到选择的淘汰。如果群体中都是血亲的话，血缘选择可能会成功。但是实际上，血缘选择只有在有利于近亲时才会成功，因为血缘的亲密度在第一代表亲之后，就会快速降低。

惩罚当然有用，但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被抓住的几率很小、群体又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感到对别人不负有任何责任），那么，不管惩罚多么严厉，都不会真正起到效果。在传统的生物学中，这就是所谓的“偷猎者困境”（poacher’s dilemma）。也就是说，被抓住后，受到的惩罚会非常严厉，但是，如果被抓住的几率很小，偷猎（或者是在禁渔区捕鱼、在热带雨林中砍树等等行为）还是划算的，即使我们心里知道，从长远来讲还是守规矩的好。在被经济学家称为“未来贴现”（future discounting）的这个方面，人类的表现差强人意。我们总是希望即刻得到奖励，而不愿意等待，即使等待的结果是未来的奖励会更丰厚。我们在第三章中说过，灵长类抑制冲动反应（或可称为强势反应）的能力，和大脑额叶部分的大小有关。

还有一个能够让人们遵守群体规则的方法，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个方法可能更加有效，那就是自己首先建立一种使命感，对群体有所承诺，恪守群体规则，就会对其他成员产生一种责任感。显然，血缘关系是维护这种承诺的一种可靠形式。另一种形式是，让人们在加入这个团体时支付一定的代价。图9.3显示的是19世纪美国的那些乌托邦公社的状况，一个公社能够生存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个人在加入公社时，公社对个人施加的条件。如果想成为公社的一员，个人在加入公社时必须放弃一定的权利。越想加入，意味着放弃得越多，那么就越愿意忽视其他社员间那些无谓的争吵和脾气，于是公社生存的时间就更长。但是，这种形式，只对宗教型的团体起到作用，没有信仰背景的团体生存的时间没有那么长，而且也没有这种保守承诺的效果。这样看来，团体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对团体的持久性起到很不一般的效果，对团体成员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使得成员能够更加克制住不和谐以及自私自利的行为，也使得成员更愿意遵守团体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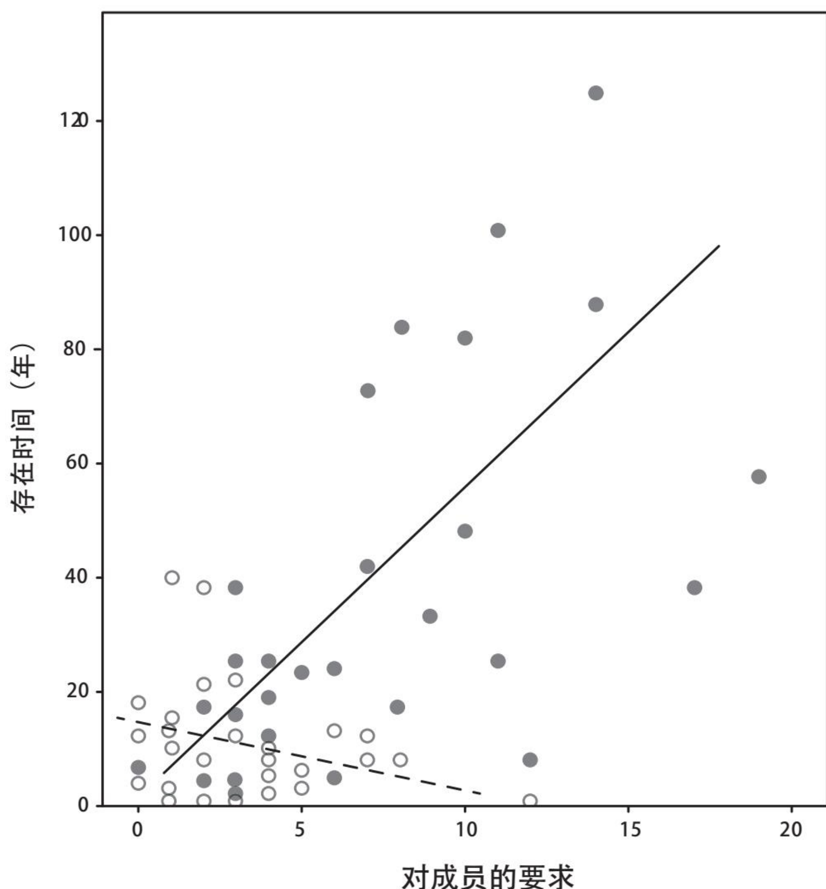


图9.3

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公社成立后存在的时间长度，以及它们对成员要求的强度（以它们要求成员放弃的事物的数量来衡量）。一般而言，有宗教背景的公社（●，实线）存在的时间比没有宗教背景的（○，虚线）长，而它们存在的时间，也随着要求强度的增加而加长。

根据Sosis和Alcorta（2003）的图表重绘。

我们会采用一系列方式，来营造一种具有团体意识的氛围。在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共享的世界观。如果你我的世界观一致，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我们遵守着相同的道德准则，我们相信对世上万物的同样解释，那么，这就表示我们很可能在同一个小群体中长大，这样我们就更容易互相信任。在小群体中，比较容易互相信任的原因是，我们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另外还有很多文化层面的标志，比如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制作什么风格的陶器，说着什么样的方言，

等等，都表明了我们属于同一个团体。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类行为，几乎被以往的学者完全忽视，那就是宴庆活动。现在，在黎凡特的考古发现中，纳土夫时期（Natufian period，13,000年到9,800年前）和PPNA时期（Pre-Pottery Neolithic A，陶器前的新石器时代，8,000年到7,000年前）的宴会证据越来越多。在这些证据中，有很多大型动物（比如野牛）的遗骨，但是，这样的食物对于家庭晚餐来说显然是过量了，应该是在更大场面的聚会中食用。另外的证据还有在土耳其南部哥贝克力石阵发现的超大石缸，这些酒缸中，有些容量达到160升，沉重得难以搬动，只能解释为用来酿酒的。的确，有些容器中甚至还有残留物，是酿酒的直接证据。所以说，酒和人类的渊源由来已久，事实上，最早期种植的大麦并不适合做面包（一来产量很低，二来麦粒上的颖苞也降低了它的价值）。但是，这种麦子做成泥糊状时，营养价值很高，虽然不是美味佳肴，但是用来酿啤酒却堪称完美。所以，最初种植大麦和原始单粒小麦，可能并不是为了用来做面包，而是用来酿制啤酒的。

巧的是，酒精能够极大地促进内啡肽的分泌。事实上，酗酒人不是对酒精上瘾，而是对内啡肽上瘾，这就是为什么纳曲酮（naltrexone，一种抗β内啡肽的药物）[3]会被用来治疗酗酒。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普遍地认为在一起喝酒能够建立感情，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方式。我在第六章里也说过，一起吃饭也有强大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效果。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交性的饭局和宴会在我们的生活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起，宴会就起到了既能维系群体团结融洽，又能欢迎远方客人（尤其是陌生人）的作用。邀请他人共进晚餐（不管是否喝酒）依然是现代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没有人会对这种行为感到很奇怪，或者去探究一下它的缘由。而答案可能就是宴会能够激发内啡肽的分泌，从而促进社交关系的发展。

稳定的家庭、脆弱的朋友

毫无疑问，血缘关系对于改善社会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因为自家人总是更加互相包容，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更加愿意相互帮助（这就是所谓的“血缘溢价”，来自于血缘性选择的进化过程）。但是，当群体的规模超过150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碰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在上一章中说过，150人的层次差不多就是到有血缘关系人群的极限了。当一个定居点的居民超过这个层次时，或者最终有完全陌生的人加入其中时，我们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维系我们群体的完整性了。

透过观察现代人交结朋友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在新石器时代，大型群体是如何建立的。我们是通过社交活动来维持和朋友之间的友谊的，传统上，这种社交活动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就友情和距离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我们想了解的是，当相聚会面的时间由于距离的拉开而减少时，会对朋友之间的关系产生什

么影响。在调研过程中，我和山姆·罗贝斯要求参与实验的人以离开家乡十八个月为期，评估与亲戚以及朋友之间的感情亲密度。结果发现，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在分开之后，感情亲密度保持着持续性的稳定（甚至有可能还变得更加亲密）。但是，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则呈现相反的态势，随着见面机会的减少而逐渐减弱（图9.4）。也就是说，维护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友谊，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否则的话，友情的质量就会急剧衰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说明为了维持超过150人的大型群体，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维持血缘关系以外的朋友关系，而这无疑会给时间分配带来巨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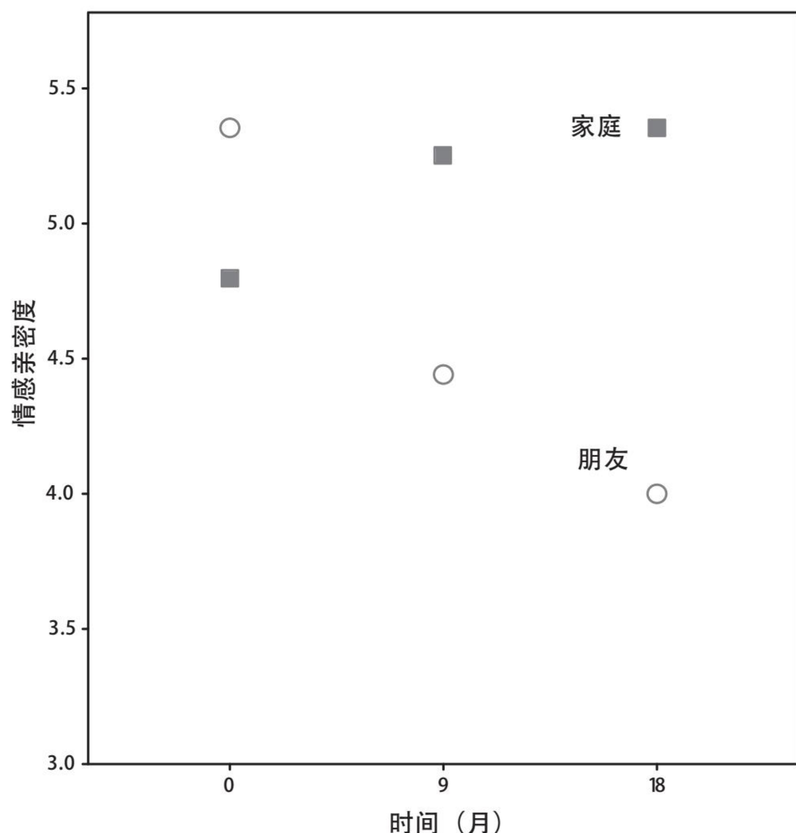


图9.4

这是研究对象在十八个月的时间段里，对所有个人社交网络中成员的情感亲密度的评分（按照从1到10来表示）。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大部分研究对象搬离了原来的家，地理距离的产生使得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方便与原来的社交圈成员保持联系。这张图表给出的数据是研究对象在最初（第零个月）对家庭成员和初始朋友圈的平均评分。

在当代的个人社交网络中，50人层次中有超比例的朋友，而150人层次中有超比例的亲戚。因为对待亲戚，不用像对待朋友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社交资本的投入更少，所以外层次的要求明显少于内层次的要求。如果我们像对待外层次亲戚那样对待朋友，在他们身上花费少量的时间，那么，朋友就会逐渐变得跟熟人差不多，也就是所谓的点头之交，只有这点交情的朋友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是不会来帮我们的。如果把内外层的朋友亲戚比例倒过来，那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维护代价，最终会减弱社交群体成员相互间的承诺和凝聚力。事实上，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朋友都集中在50人层次之中，因为我们和外层次的人们的交往频率都太低了，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友谊。如果有朋友落入150人层次，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再次滑出去，落入500人的熟人层次之中。

我们不能选择亲戚，无论是否喜欢他们，他们还是我们的亲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朋友，选择和喜欢的人相处。那么，我们会选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我们询问了大量的实验对象，让他们在三个社交层次（15、50和150）中各选一个朋友，然后根据问卷中罗列的个人特性，比较这三个朋友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显示，友情有六个主要的维度，它们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出生地、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共同的世界观（比如相似的政治观点，以及相通的宗教和道德态度）和共同的幽默感。如果有两个以上相同的维度，就能结成一定亲密度的友谊，当然，相同点越多，友谊的牢固度就越强。这六个维度似乎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说，任意三个相同的维度就能形成三星级的友情，至于具体是哪三个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朋友无私奉献的程度，以及你愿意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的程度，也是基于这些相同维度的数量。这样看来，友情似乎是生来就安排好的，而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后天发生的。所以，我们能遇到什么样的朋友只能靠缘分，至于友谊的质量，以及能够维持的时间长度，还是和我们共享维度的多少有关。

需要注意的重点是，所有这些这些保障友情的特性，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文化特性，没有一种是生理上的或者固定不变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文化特性定义了我们生长的社区，因此，拥有同样的文化特性，能够追溯到我们出生的同一个社区。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成员的标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因为文化是会变化的，因此它能帮助辨别这个社区成员的会员身份是否也相应地更新了。它还能对搭顺风车的投机分子形成一定的控制作用，这是丹尼尔·内特尔和我从一个计算机模型中发现的。如果你对一个社区的风格了然于心，生活在其中毫无违和感，那肯定是因为你是在那儿长大的。换成一个陌生人，融入一个社区，并学会当地的那种风格，还是很困难的。亮出你的社区成员的身份，你的诚信度就得到了肯定，因为社区本身就成了你的行为的担保人。

奥利佛·科瑞（Oliver Curry）和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要求参加测试的人评估一下他们和八位朋友（也就是在15人层次里的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并评估一下为这八位朋友提供无私帮助的意愿度。那些

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关系，朋友圈有更多交集的朋友（他们之间见面更频繁，经常结伴出行）更愿意相互间提供无私的帮助。从某种层面来看，这只是个和名声有关的问题。有了一个社交关系网，成员的行为就会受到关注和监控，如果一个成员不去帮助他人，或者不去回报他人的好意，这个成员就会引起别人的侧目和议论。有时候，我们愿意对朋友提供无私帮助，是因为担心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而在朋友之间，确实也会躲避那些名声不好的人。不过，关系网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朋友经常见面，欢聚在一起，相互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融洽。这种良好的感觉，有助于相互间正能量的传递，个人的社会化倾向更加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无私地对待他人就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了。

在研究友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的性别，对待社交圈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有两个不同之处特别重要。不同之一是女性通常在她们的亲密伴侣（通常是男性）之外还会有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这个朋友通常是女性，但也不一定，这个朋友就是所谓的BFF（Best Friend Forever）。但是，男性就没有这样的朋友。男性的友情似乎更加随意，因此常常是同时拥有数位朋友，相互间的关系都处于相对疏散的程度上。这个特性，对于友情的稳定性来说，会带来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女性之间亲密的友谊对情感的支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友谊同时也更加脆弱，女性朋友之间一旦反目，其后果就是毁灭性的，很难再重归于好。而男性之间的关系，因为相对更随意，破裂之后也就更容易被修复。女性会花费很多的精力来维持相互间的亲密关系，而男性一旦感觉不爽就会扭头离开，眼不见为净，走出这段友谊之后，遇见的新朋友就会迅速取代老朋友。

所以，通常来说，女性的朋友数量不多，但亲密度很高。男性则相反，数量不少，但亲密度不高，男性这种随意性的交友方式会让他们对俱乐部的形式感到很舒服。俱乐部的形式深受男性的喜爱，无论是那种氛围还是那种建立关系的规矩（而女性会对这些心存疑虑），这种现象似乎证明了男性之间比较容易形成团体或者帮派。虽然这种特性或许起源于小型群体的狩猎活动（或者，更有可能是源自于打仗和战争）。这里面牵涉到的心理机制，也普遍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比如成员人数众多的教堂和军队。

两性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表现为维持友情的方式。在我们关于友谊的十八月调研中，探讨了为友谊保鲜的各种方式。我们对调研对象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他们和朋友联系的频率，无论是见面聚会，还是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以及和朋友一起活动的频率，比如购物、度假、喝酒、帮助搬家，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女性防止关系变坏的方式是聊天谈心，而男性防止关系变坏的方式是一起活动，聊天交谈对维持男性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帮助。

通过这个对友谊的本质所做的简短调研，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对于超大规模的群体，也就是规模超过传统150人狩猎群体的大型群体，想要维持这种群体的社会凝聚力，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个时候，必须有外力的辅助，而这种额外的力量，似乎自从人类之间产生友谊，就已经自然而然地萌芽了。那就是俱乐部的形成，尤其是男性俱

乐部。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基于单一主题的俱乐部，这些单一主题俱乐部的起源通常出自血缘关系，因为血缘关系的外层网络都是纯粹单一以语言为基础的。宗教大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早期案例。

文明边缘的网络

考古学家菲奥娜·科沃德（Fiona Coward）研究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黎凡特不同部落群体的艺术品（比如罐子、石像、石器、饰品等等），利用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获取这些早期部落之中和部落之间的网络特性。她发现，群体规模变得越大，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就会相应地变得更小，表现为它们的艺术品看上去越来越不同。但是，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群体的内部有任何分裂，之所以没有发生分裂，很可能是因为物质文化（表现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个性化的装饰）复杂程度的增加。由更为复杂的文化来代表整个群体，或许减缓了群体规模变大之后走向分裂的自然趋势。也就是说，物质文化复杂程度的增加，是群体变大之后抵消群体分裂的特定反应，而并非群体变大的意外副产品。从这个角度看，物质文化的发展，在时间上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爆发是并行的，都是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的确，在黎凡特，很多变化发生在PPNB（Pre-Pottery Neolithic B，距今大约8,000年到6,000年前）中晚期，这也正是新石器时代蓄势爆发的前夜。

新石器时代的宗教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所在。一直以来，宗教历史学家把今天的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数千种宗教分为迥然不同的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萨满宗教和教义宗教。我们在第八章中曾经详细讨论过第一种，它是体验型的宗教。而第二种宗教则是和神圣空间（例如寺庙或者教堂）、祭师架构、神学、神（有时候，会有一个最高的神主宰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能够取悦神并带来好运的正规仪式等有关。这个第二种宗教，在形式和表现上都和萨满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人类固定居所的形成，似乎是这两种宗教的分界点。即使在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游牧或半游牧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放牧族群依然信仰萨满宗教，而有固定居所的社会群体则毫无例外地信奉教义宗教。

当然，有了固定的村落作为定居点，才有举行仪式的场所，如果这样来解释由萨满宗教向教义宗教的转变，理由就很简单。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原因使得居住在村落里的居民必须修建一个寺庙，而且，即使住在村子里，也不是不能继续信奉萨满类型的宗教。其实，有些已经定居的农耕户，依然信奉萨满教，比如像美国西南部的霍皮部落（Hopi）。既然萨满宗教通常和伴随着音乐的舞蹈有关，那么，真正需要的条件无非是一块可供跳舞的空地。反之亦然，游牧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块中心神圣地，很多狩猎—采集族群都有自己的圣地，比如澳洲土著就有被他们奉为神祉的乌鲁鲁艾尔斯岩石（Uluru/Ayers Rock）。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哥贝克力山丘，甚至有考古证据显示早就有类似于寺庙的建筑，它们的出现甚至早于固定的居所。有可能

的是，很多人就住在围绕着这些宗教仪式场所搭建的临时住宿处，这些人或许都没能生存下来。至于这个临时居住的时期究竟延续了多久，取决于这种社区所面临的入侵风险。一般来说，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目标更容易被锁定，所以，当他们集中地住在同一地点时，更容易受到攻击，由此推断这个过渡时期是较短的。

完全出于仪式的需要而建造了特殊用途的建筑，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有意识地转向一种集体性的仪式，而这种集体性仪式和以随意性为标志的萨满宗教仪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了正规的仪式建筑，就需要有专业的祭师以社区的名义举行特殊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普通的社区成员只能作为旁观者。半世纪前，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对一系列小型群体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当群体人数超过500人时，就会有专业人员（比如那些制作陶罐的、制作手工艺品的、开店铺的、被雇佣的以及祭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等）出现在群体里。这或许明示了一个自然的危机点，在临近或超越这个危机点时，如果依然要维持社区凝聚力以及和谐度，就必须有组织上的变化。

至少以现代宗教的角度来看，从萨满宗教到仪式宗教的转变，标志着另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宗教仪式在强度和密度上的变化。在萨满宗教中，迷幻舞蹈或者与之等同的仪式是不定期发生的（通常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仪式间隔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左右。而教义宗教则不同，仪式的情绪感没有那么激烈，但仪式发生的频率更高（通常是每周一次）。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迷幻的状态对释放压力非常有效，但是，这种体验由于强度太大，情绪太过激烈而不可能经常发生，否则反而会增加压力。那么，如果在大型群体中生活压力急剧增加，那么就会需要次数更加频繁，间隔时间更短的宗教活动。为了让宗教仪式在情绪和强度上更加平缓，仪式的间隔更加缩短，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举行仪式的专业人员（受过专门训练，能够承受压力的人员）和只是参与仪式的普通教徒区分开来，在仪式过程中，普通教徒相当于旁观者。

事实上，大部分的参与者无法体验到进入迷幻入神的状态之后的癫狂，这意味着宗教的社区维系效果还需要改善，外力的引入成为了必要。显然，在教义宗教中出现万能之神（High Gods）并不是偶然的，这位万能之神直接参与了人类活动，要求人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并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监督，这位万能之神只是在教义宗教中承担着一个非凡的角色。[4]事实上，在现代的部落社会中，万能之神（或者多神）的存在，和群体的规模成正比（也就是说，群体规模越大，出现拥有万能之神的宗教的可能性也越大）。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在这种社会中，相信万能之神的人比不相信的人在行为上更具社会化，也更加遵守社会规则。即使在当代美国，参加教会活动程度高的州（也就是信教的人口比例更高的州），遵守社会契约的程度更高，而犯罪率则更低。关于这种现象，罗伯特·帕特南（Rober Putnam）在他的重要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做过很有说服力的描述。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因为拥有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归属感和群体存在感，以及和宗教信仰并存的错综复杂的世界观、宗教起源的故事和道德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似乎直接建立在定义友谊的那些基

本的维度之上。看来，支撑着友谊的基础心理过程，在教义宗教的历史进化中，已经被完全地利用。于是，在一个有着大量陌生人的虚拟社区里，每个成员都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而血缘关系的重要作用在此也被同样利用，几乎在所有教义宗教中，都会用到体现血缘关系的语言（如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等称呼）。很显然，这是为了制造一种家庭关系的幻觉。

在我看来，新石器革命，其实就是一场宗教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较为随意的萨满宗教到更有组织的教义宗教的转变。在教义宗教的领域中，自称为精神世界代言人宗教人员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分层组织，教义和纪律由上而下传达，精神世界的定义也更加清晰，特殊的个体（比如上帝或者圣徒）被支持者们广泛接受。

然而，从萨满宗教到教义宗教的转变过程，并没有走得那么完美。所有的教义宗教都同样有着难以维持凝聚力的苦恼，或许，这也折射了它们的起源。虽然有着层层等级结构的管理，以及今生或来世的惩罚的威胁，但是，所有的教义宗教都经历着不断分裂出去的异教和宗派。这种形式，类似于语言中方言的形成，我们在第八章中说到，方言的出现，呼应了区分和确定群体身份，从而加强小型群体忠诚度的需要。这样看来，教义宗教似乎也从来未能完全撇清和萨满宗教之间的渊源。因为那些异教宗派看起来总是更加神秘，令人迷醉，它们是基于情绪上的感召，而不是理性的认同。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了祭师在神学和政治上的控制，结果是历史上绝大部分教义宗教（印度教大概是唯一的例外）都会积极采取措施，排挤压制它们眼中的异端邪教。

某些成功脱离出来的异教，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主流宗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有以下几个：从犹太教脱离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罗马脱离出来的新教和东正教，什叶派、逊尼派和苏菲派等等从伊斯兰教出来的各个分支，以及佛教的不同派别。教义宗教似乎永远都不能摆脱这些古老的动力：小型的、个人的、体验式的类萨满宗教团体层出不穷，常常从深处冒出来。异教的核心，似乎总是伴随着极具魅力的领袖人物（通常是男性）的出现，这位领袖于是成为一个小型的支持者团体（通常是女性，不过也有例外）的精神象征和功能性领导。正因为如此，比起这位领袖所倡导的教义，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处事方式更为重要，对异教最初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近知名的典型案例有玛哈里息（Maharishi）、戴维·科里什（David Kores）和吉姆·琼斯牧师（Jim Jones，琼斯镇惨案的主角）。

迪肯的困境

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事项需要说明。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定居点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随之放大，这个方面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之中，我们拥有了一种结成亲密伴侣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无论对物种繁殖还是对社交安排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特里·迪肯在他的《象征性物

种》（*The Symbolic Species*）一书中所述，当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工形成后，这个关系就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如果男性常常离开居住地，他们就无法看守自己的伴侣，这时竞争对手很可能趁虚而入。这种偷偷摸摸的不正当交配或许对女性是有益的（她们可能为后代获得更好的基因，或者能获得更多资源），但是，对于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抚养别人后代的男性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这种形式的无私奉献对进化也是一种伤害。我把这个问题称作“迪康的困境”，在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地，社区规模更加大型化，个人行为更加隐秘化，这个问题的渗透性和危害性因此也会更加严重。

在第八章中我们提到，迪肯的解决方案是人类逐渐形成了正式的婚姻协议，当然是基于语言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协议，明示了个人的归属，不应该再被打搅。至于诸如婚姻协议或者结婚戒指等公众信号是否具备预防通奸的功效，依然值得商榷（答案是：多半不能）。但是，事实上人类通常都会用这种方式来打出已婚的信号，这种信号固然不够完美，但多少还是会有点作用。不过，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重要的迪康中心论点：性别竞争和嫉妒不仅伤害伴侣之间的关系，而且，当伴侣分手或者有第三者介入时，还会影响到整个社区，尤其是规模较小的社区。虽然通过某些文化方式，能够减低嫉妒的程度，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团绿雾，终究会透过文化之网的空隙，紧随其后的，就是红雾。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很多乌托邦组织（比如震撼者联盟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并非仅仅是因为假正经而颁布禁欲令，相反，他们直觉地感受到了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那么，我们现在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这个古老问题之上，人类究竟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的？在此，我不想再重复那些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云里雾里的争执，因为这些争执基本上都是无的放矢。人类的交配关系是伴侣式的，无论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或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也就是说，亲密关系本身和婚姻制度无关，婚姻制度无法左右伴侣的浪漫关系。[5] 婚姻制度相当有弹性，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传统。

虽然如此，纵观所有区分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灵长类的解剖学指标，人类指标不偏不倚地恰好落在两者的中间，这对于争执的双方来说，谁也没有占到上风。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多配偶或是滥交的猿类有较低的2D：4D比例（这反映出雌性猿类在孕期有较高的睾丸素）；单配偶的猿类，比如长臂猿，这个比例几乎均等；而现代人类的比例正好处在这两种猿类的中间（见图4.5）。从体重上来观察性别的二态性，结果也是如此，我们的性别二态性相对适中（男性比女性在身高上多出8%，在体重上多出20%），也是居于像长臂猿这种单态单配偶物种和像狒狒和大猿这种极度二态多配偶物种（雄性体重比雌性体重多出50—100%）的中间。雄性睾丸的相对大小，也是灵长类交配制度的一个解剖学指标。像黑猩猩这样多配偶物种，雄性的睾丸相对于它们的体型来说就比较大；而像长臂猿这样单配偶物种以及像大猩猩这种严格后宫式物种，其睾丸相对于体型来说就很小。[6]再一次，现代人类的指标含含糊糊地落在了这两者之间，显示出人类具有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倾向。

简单地说，对于现代人类，需要解释的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浪漫的伴侣关系。不同于某些社会人类学家们的看法，我认为这种关系是无所不在的，跨越人类所有的文化。[7]

那么，伴侣关系为什么会进化呢？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关于灵长类单配偶制（也就是伴侣关系）进化的三种解释，其中只有一种（杀婴的风险）解释得到了真正的支持。雌性需要单配偶制，是为了免受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也就是所谓的“雇佣军（或者保镖）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像大猩猩那样，几个雌性同时寻求一个雄性的保护，于是产生了一夫多妻制。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雌性只寻求一个雄性的保护，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在考虑人科的情况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加以简化，只需要对比双亲照顾和杀婴风险这两种假设。至于第三种假设（由于雌性比较分散，雄性无法同时保护多个雌性，所以被迫产生一夫一妻制），其实和人科物种无关。因为人科中的雌性从来就不是在个人的领地里单独生活，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人科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8]人科中的雌性总是非常社会化，而且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一致认为，现代人类的伴侣关系是出于双亲共同照顾后代的需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大部分的现代社会中，父亲也都会给孩子一定的照顾。或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父亲用自己的能力（比如狩猎），为配偶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有些事物是选择的原因，而有些则是选择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灵长类的双亲照顾（或者，表述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来自于父亲的照顾）是在伴侣关系出现以后才有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论证人类的状况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正如人类学家克里斯顿·霍克斯（Kristen Hawkes）所指出的那样，在狩猎—采集群体中，雄性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照顾家庭的证据根本就不明显。他们有时的确会这样做，但有时就不会，至少，某些看似可以解读为间接家庭抚育的行为（比如狩猎大型动物），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雄性在向异性展示自我。[9] 虽然她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人类能够提供的雄性参与家庭抚育的证据的确不多，而且相当牵强，根本达不到令人心服口服的程度。如果雄性能够躲避家庭抚育的义务，那他们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即使在狩猎—采集群体之中，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非洲巴卡俾格米人族群（Baka pygmies）中，善于狩猎的男人对小孩的照顾就很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在女人眼里还是充满吸引力的。在单配偶的猿猴中，父亲参与家庭抚育，很可能是在伴侣关系形成之后才有的。因为有了伴侣关系，雄性才会觉得值得参与抚养义务，从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共同抚养能培育出更好的后代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有意义的。

归根到底，如果现代人抚养小孩确实需要两个成人的共同努力，那么，克里斯顿·霍克斯提出了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祖辈的参与。在所有文化中，外祖母都会积极参与抚养孙辈，帮她的女儿带孩子，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是如此。虽然在形式上会有些许不同，但总的来说，母亲的母亲显然会比父亲的母亲甚至父亲本人更多地参与抚

养，当然，前提是她住得不是很远。即使在当代的工业化社会中，四五十岁的女性，会自然而然地把精力从丈夫身上转移到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儿身上，我们对电话通话方式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化石证据显示，只有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时代，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活到看得见孙辈的年龄。由此可见，祖辈的抚养进化得很晚，从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女性很少能活到成为外祖母的年龄。

有人认为，祖辈抚养解释了人类女性为什么会经历绝经期（女性通常在45到50岁开始丧失生育的能力），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很独特的。尽管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其他长寿物种（比如大象和黑猩猩）也有绝经期，但是，在成年生命的中途，基本上完全丧失生育能力却是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10]如果说，女性不是通过绝经而把精力从自己的生育转移到帮助女儿生育之上，那么，她们这么做肯定是为了要看到她们最后一个后代长大成人。这就折射出一个事实，人类在抚育后代上的投入不仅是昂贵的，而且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父母过早离世，脆弱的后代生存很不容易。

所以，伴侣关系对两性都有益处，一方面降低了雌性受到骚扰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雄性至少拥有一个可以与之交配的雌性。当然，前提是难以同时垄断多个雌性，这不是因为雌性住得很分散，而是因为更容易遭到对手的侵犯，更不要提一直存在的杀婴风险。在大部分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得了他人配偶（她的丈夫可能死了或者离开了群体）的男人，会杀死女人的未成年孩子。即使在我们的社会中，继子也比亲生孩子更容易受到歧视，而且，遭到虐待和杀害的风险巨大，尤其是来自于继父的风险。

伴侣关系是何时进化的？

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伴侣关系是在智人支线的哪个时点上开始进化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观点都试图证明单配偶制（或者应该称为对偶结合？）很早就进化了，甚至早在南方古猿时期。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下的结论，南方古猿是极度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单配偶配对制度的。

既然我们判断一夫一妻制（以及对偶结合）的根源在于对杀婴风险的防范，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继而判断具体是在哪个时点上，杀婴风险大到必须放弃一夫多妻制呢？通过分析人科物种觅食群体的规模，我们大致找到了一个估测杀婴风险程度的切入口，因为多个雄性的存在会加剧这个风险。在我为野山羊和猿类的交配策略开发的一系列数学模型中可以发现，一起觅食的雌性的数量是决定雄性觅食方式的关键因素，雄性以此决定是融入群体（合群型，也就是找到一个雌性群体之后，就和她们待在一起），还是继续四处游荡（游荡型，在和一个群体中的雌性交配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群体）。这个关系也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雌性的生育周期（即两次生育中间的相隔时间），生活范围内雌性群体的密度以及雄性的搜寻方式（这个生活范围指的是雄性每天觅食的

区域），最重要的还是雌性分布的状态。

图9.5显示了用交配策略模型测算出的合群型雄性的比例（也就是和雌性群体待在一起），以及这两种策略（合群或者游荡）分别所能获得的利益的比例，数据包含了数个猿类群体和一个人类狩猎—采集群体。在某些物种中，比如黑猩猩和红猩猩，雌性经常以小群体的形式觅食，或者单独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采取合群型的策略就没有什么好处（当然更不用说单配偶制了），于是，大多数雄性更喜欢以游荡的方式寻找可以交配的雌性。但是，当雌性群体的规模增加，雄性找到雌性群体的几率就会下降（比如大猩猩和人类狩猎—采集群体就是如此），这时雄性采取合群型的策略肯定益处更大。一旦雄性选择了合群型策略，而雌性群体又大到足以吸引多个雄性时，迪康的困境就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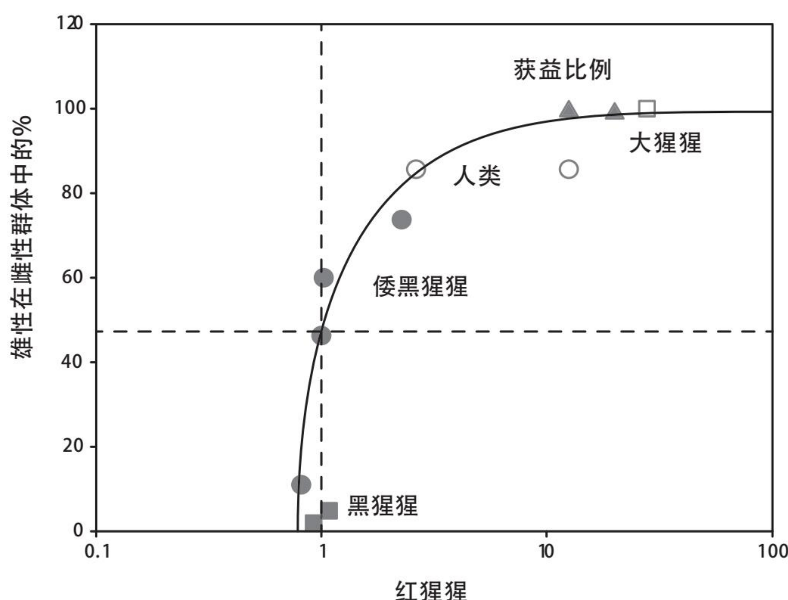


图9.5

雄性猿类的两种交配策略（和一群雌性合群地长久住在一起，或者是四处游荡）。本图显示了和雌性群体住在一起的雄性比例和两种策略获益比例之间的关系。合群型雄性的获益就是它那个群体中的雌性数量（实际上是雌性群体的平均数）；游荡型雄性的获益取决于它每天能搜寻的区域、雌性群体的大小及密度、以及当它找到一个雌性群体时正好有雌性发情的可能性。当获益比例是1时，两种策略无优劣之别；当比例大于1时，合群型策略更好；当比例小于1时，游荡型策略更佳。请注意，曲线会穿过中间点（这时的雄性徘徊在合群还是游荡的矛盾之中），这和最佳觅食模型是一样的。人类的数据来自!Kung桑族部落。本模型的详细数据参见Dunbar的论述（1998）。

根据Dunbar（2000）重绘。

南方古猿的大脑不比黑猩猩的大多少（因此它们会有类似的孕期和哺乳期模式），假设它们觅食群体的规模也差不多，那么，南方古猿的杀婴风险也不会比黑猩猩的高很多。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南方古猿很可能更加社会化，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它们离开森林之后，需要面对更大的天敌风险，另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栖息在丰饶的湖畔河边，有利于形成更大的觅食群体，以防御天敌的侵犯。如果这一切的结果是它们的雌性群体比现在的黑猩猩雌性群体大十倍，[11]那么，雄性南方古猿肯定是合群型的，并且和雌性群体居住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倭黑猩猩中看到的那样，很多雌性在一起觅食（图9.5）。这种结构，毫无疑问会增加骚扰和杀婴的风险。然而，合群型和单配偶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基于南方古猿的性别二态性（见第四章），滥交式或者后宫式的交配体系是最有可能的，后者在杀婴风险升高时更加有可能成为一种权宜之策。

早期古人出现后，社区规模略有扩大，生活方式更为游牧化，因此，觅食群体即使只是为了抵御天敌也需要增大。不过，这种增大的幅度可能不会很惊人，即使脑容量的增加导致孕期的略微延长，杀婴风险并不会由此急剧增加。相比之下，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伴随着海德堡人的出现而发生，当时，群体规模增加了50%（雄性数量也相应增加），对雌性的骚扰和杀婴的风险也急剧增加。而且，因为脑容量的急剧增加导致了生育周期的急剧增长，这个风险更是加速发酵。在这个时点上，雌性采取雇佣保镖的策略，凭借着依靠一个雄性，以获得自身的安全，对于雌性来说显然有着明显的益处。即使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单身女性如果有男性相伴（起到了保镖的作用），在公共场合被其他男性骚扰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述，无论是解剖学还是基因学的数据都显示出古人是一夫多妻的，或许是类似于大猩猩的后宫式。[12]既然雄性不能参与抚育后代（前面已经提到，没有解剖学的证据能证明），那么，雌性也不会介意和别人共享同一雄性的保护。

这个问题会随着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而更加恶化，因为群体规模的增长又有了一个飞跃。更多的雄性相互竞争，以期得到独占雌性的权利，这给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我和博古斯瓦夫·帕夫洛夫斯基在数年前就已发现，在滥交的灵长类中，如果群体中还有另外四个雄性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就不可能独占雌性，当他忙于和其中的一个雌性交配时，对手就会钻空子和其他雌性交配。在这种情况下，雄性只能放弃对所有雌性的独占，而转向一次一个配偶的滥交模式。[13]也就是说，随着周边区域雄性对手数量的增加，临时性的对偶（像狒狒和黑猩猩那种形式的“配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情势逼着雄性去守护好一个雌性。如果雌性和一个雄性以更持久的方式相伴，至少这就提供了一个向永久伴侣转变的可能性。雄性相应地也会越来越愿意把所有的社交兴趣都集中在一个雌性身上，即使在她从发情期进入孕期之后，也会一直陪伴左右，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后代。人类女性在经期内性行为的减弱（在灵长类中，只有倭黑猩猩和狨猴也有类似情况，

不过程度更轻微一些），或许是为孕期更少的性行为做准备，只有这样，伴侣间的性行为才可能得以持续发生。

图4.5列出了一系列人科物种的2D:4D比例，将之与现存猿类和人类的数据作比较。我们没有早期古人类的数据，但是，五个尼安德特人和一个古人的手指比例都在现代人类的下方。这和有着后宫式交配方式的大猩猩并无不同，但是，没有一个物种（包括人类）的手指比例和终生单配偶的长臂猿相同。综合而言，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亚人科的交配体系是一夫多妻的（也就是滥交或者后宫式），大概只有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后，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惠的伴侣关系。

从西班牙北部西德罗洞穴（El Sidron）遗址里，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关多配偶制的考古证据。证据来自于12个尼安德特人，这些人被认为是同时被埋葬的。通过mtDNA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三个男性同属一个mtDNA支线，而三个成年女性属于完全不同的支线，这就揭示了尼安德特人随夫居住的体系，这种体系和所有猿类是一样的。周边群体中的雌性受到吸引，加入到另一群体，和一群有血缘关系的雄性居住在一起。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时代，随夫居住对应的是一夫多妻制，而在一夫一妻制中，居住地总是双边分布的。尼安德特人一夫多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一推测有2D:4D的证据辅佐。尼安德特人的比例，落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一夫多妻制的那一端，和大猩猩的平均值差不多。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所有解剖学指标上的不确定性，或许意味着人类的交配体系实际上就是多态性的，也就是说，人类并不遵从某一种体系。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态性就是进化心理学家所谓的“浪子和父亲”（cads vs. dads）的区别。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有些男性相对来说对伴侣更专一，在孩子身上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人就是有责任心的好父亲；而另外一些男人更花心，喜欢有不同的性伴侣，也不管孩子，这些人就是拈花惹草的浪子。这两种男人的区别，在数年前丹尼尔·裴罗思（Daniel Pérusse）的一项研究中分析得很透彻。他针对魁北克的男人展开了调研，发现男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相对来说更专一于一个伴侣（至少表现在长期的关系之中），另一类则比较风流博爱，他们之间的比例大概是2：1。[14] 最近在瑞典也开展了两项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通过研究男人的加压素接收器基因和他们的对偶结合方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发现，大约25%的男人有这个等位基因，结果是使他们的行为更加随意任性。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我和拉斐尔·沃达尔斯基（Rafael Wlodarski）的实验之中，通过分析2D:4D比例和社会群体内性关系取向的心理衡量，[15]

我们发现，在男性中，专一的和花心的比例大约是45:55，女性差不多也是这个人数划分但比例正好相反。虽然在不同的样本中，这两种人群的表现形态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些数据在总体上显示了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可分为两种社会群体内性关系取向的形态：一种人会投入到长期关系中，而另一种人不会（虽然他们都会拥有浪漫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项研究和2D:4D数据都显示了这两种表现形态有一个遗传基础，虽然它们表现出来的程度会因为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人科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着和猿类相似的一夫多妻交配体系。如果说一夫一妻制确实得到了进化，那么大概也只能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即使如此，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一夫一妻也不会是绝对纯粹的，而且，也不会成为可以代表整个物种的特性。在人科物种中，两种性别都表现出性关系取向的多态性，一夫一妻和滥交的两种表现形态大致均分。如果我们拿大猩猩和黑猩猩（加上红猩猩）之间的区别作为对偶结合和滥交之间不同点的基本参照，我们得到的数据将会显示，至少从古人开始（或许甚至从早期古人开始），就形成了某种类似大猩猩的伪单配偶形式，直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在一定程度上更明确的对偶结合交配体系（当然，和固性的一夫一妻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在这段关于人类演化故事的旅程中，我们把侧重点放在了认知和社会方面，而不是传统上更受青睐的化石和遗骨。这是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关于我们是如何从远古洪荒走到今天的这个终极问题，其实就是关于那些真正把我们和其他猿类区分开来的认知和社会方面的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阶段出现的南方古猿，无非是过渡到双足行走的猿。现代人类从这个古老的猿类进化而来的过程曲折而漫长，仅仅是早期古人的出现就等待了整整两百万年。虽然双足行走在现代人类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实现了双足行走，才有可能对呼吸以一定的方式加以控制，继而成为欢笑和语言出现的关键），但是，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们将南方古猿排除出猿类。和所有生态辐射一样，猿类的进化是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不断的精彩实验，有些非常成功（其中的一个，最终成就了我们），有些却令人扼腕。

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个故事，真正的开篇是第一个人类物种的出现。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个物种是匠人，但也有人认为是他们如流星般短暂存在的先驱（鲁道夫人和豪登人）。从那时起，这个故事就开始了斗争主题，一个在时间分配压力和环境选择下群体不断变大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的对抗天敌肉搏战，到后来的稀缺资源保卫战，到最后是和外族较量的迂回战。

人类演化的故事是一个不断寻找适应压力的新方案的过程，一个解决因为大脑和体型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营养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候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跳跃，惊涛拍岸中，推送着人类异常快速的进化；有时候却是朝着某个方向的静水深流，缓慢而坚定，雕刻着人类的面孔。最终造就了我们的是对基础人科物种的一系列精致入微的复杂调整，从生理角度，从社会角度，从认知角度。当然，是认知上的变化带给了我们现代世界的科学和艺术，但是，只有当这三个角度融合在一起，才拉开了现代人类关系的浩瀚场面。

注释：

[1] 旧石器时代晚期指的是最后一个冰河纪之后的第一个一千年。

[2] 这样的惩罚也被称作第二度的无私，对不劳而获者的惩罚是社会中无私者愿意为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付出。

[3] 纳曲酮固定在β内啡肽μ接收器上，不让内啡肽接近这些区域而使其失效，纳曲酮是中性的，它阻断了内啡肽通常分泌的鸦片剂的止痛效果，只剩下酒精的负面作用。

[4] 有人可能会拿出佛教这种没有一个万能之神的宗教作为反面例子，但其实佛教并没有不同。它也有一系列的行为准则（通常是公认的圣人的教导），个人必须自律地遵守这些准则（因果轮回，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无处可藏）。

[5]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在同时，以同样的程度爱上几个人。只是说，即使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浪漫的亲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男女之间，亲密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先来后到的。

[6] 这是精子竞争的结果，如果很多雄性和一个雌性交配，留下最多精子的那个雄性，也就最有可能成为父亲。所以，在滥交的体系中，选择性压力会倾向精子多的雄性，于是就有了相对来说更大的睾丸（参照Harcourt等人的论述，1981）。虽然雄性大猩猩在争取对后宫的控制权时会发生争斗，但一旦安顿下来，它们就能获得和所有雌性交配的专有权利，所以不必再担心要有更大的、相对成本更高的睾丸了。

[7] 即使在同一文化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坠入爱河”的感觉，爱的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何况还有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以上这些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古往今来，爱情存在于所有不同的文化之中（参见Jankowiak和Fischer的论述，1992；以及Fisher和Marcus的论述，2006；Dunbar的论述，2012），爱情是人类的普遍存在。

[8] 这是Lukas和Clutton-Brock（2013）在最近提出来的，但是，声称雌性人亚科曾经单独在大面积个体区域内觅食显然是无稽之谈。他们对灵长类数据的粗陋分析，相比Shultz等学者（2012）以及Opie等学者（2013）的精深研究，高下立判。

[9] 大型猎物固然能提供大量的肉食，但是，捕获它们比捕获小型猎物难度大得多。而且，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回报甚至低于采集素食。狩猎的真正优势在于，正因为非常危险，所以是对男性体质和勇气（所以也就是他的基因）无可隐瞒的测试。

[10] 有人认为，直到上世纪之前，人类女性通常还活不过35岁。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要点。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重要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也就是那些能活过青春期之后的女性）的死亡年龄，而不是所有人的死亡年龄（毫无疑问，在旧石器时代和史上的一些族群中，最低死亡年龄只有30岁）。但是，在狩猎族群和史上族群中，能活过青春期的女性通常能活到60岁。关于这一点，去古老的教堂墓地看看就知道了。

[11] 或者说它们一天的行程只有黑猩猩（每天5公里的行程）的十分之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南猿来说，每天行程不到0.5公里，那是完全不合理的，即使生活在河畔栖息地的狒狒一天的行程也有1—2公里。

[12] 也就是说，后宫中的雌性对雄性产生了非常个体化的伴侣关系，但是，对于雄性而言，并没有和雌性产生不一般的伴侣关系。

[13] 如果雄性能够守住自己的领地，并把对手全部从雌性身边赶走，那它就能够持续独占这些雌性。但是，它们这样做也是有限度的，当雌性的数量超过12，而被驱赶在外的雄性数量多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很难抵挡那些雄性的进攻了（参见Andelman的论述，1986，以及Dunbar的论述，1988）。

[14] 遗憾的是，Pérusse（1993）所定义的一夫一妻男性是在婚姻状态之中的男性。这种计算方式，肯定会高估了纯粹一夫一妻男性的数量。因为在任何时候，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婚姻状态之中的男性，也包括了那些其实处于暂时性婚姻状态的滥交男性。

[15] 性取向指数（或简称为SOI，Sexual Orientation Index）（参见Penke和Asendorpf的论述，2008）。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Balter, V., Braga, J., Télouk, P., and Thackeray, J. F. Evidence for dietary change but not landscape use in South African early hominins. Nature 489: 558–60.

Brunet, M., Guy, F., Pilbeam, D., Mackaye, H. et al. (2002). A new hominid p;from the Upper Miocene of Chad, Central Africa. Nature 418: 145–51.

De Miguel, C., and Heneberg, M. (2001). Variation in hominin brain size: how much is due to method? Homo 52: 3–58.

Dunbar, R. I. M. (1993). Coevolution of 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p;language in huma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681–735.

Dunbar, R. I. M. (2004). The Human Sto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Dunbar, R. I. M. (2008). Mind the gap: or why humans aren't just great ap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54: 403–23.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07). Understanding primate brain p;evolu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2B: p;649–58.

Gowlett, J. A. J., Gamble, C., and Dunbar, R. I. M. (2012).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cial brain. Current Anthropology 53: 693–722.

Harrison, T. (2010). Apes among the tangled branches of human origins. p;Science 327: 532–4.

Haslam, M., Hernandez-Aguílar, A., Ling, V. et al. (2009). Primate p;archaeology. Nature 460: 339–444.

Ingman, M., Kaessmann, H., Pääbo, S., and Gyllensten, U. (2000). p;Mitochondrial genome variation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Nature 408: 708–13.

Klein, R. (1999). The Human Career,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p;Chicago Press.

Krause, J., Fu, Q., Good, J. et al. (2010).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DNA genome of an unknown hominin from southern Siberia. Nature 464: 894–97.

Lahr, M. M., and Foley, R. (1994). Multiple dispersals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3: 48–60.

Lockwood, C. A., Kimbel, W. H., and Lynch, J. M. (2004). Morphometrics and hominoid phylogeny: support for a chimpanzee–human clade and p;differentiation among great ape subspeci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p;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1: 4356–60.

McGrew, W. C. (1992). Chimpanzee Material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Human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ethford, J. H. (1995). Genetics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4: 53–63.

Reno, P., Meindl, R., McCollum, M., and Lovejoy, O. (2003). Sexual p;dimorphism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p;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0: 9404–9.

Ruvolo, M. (1997). Molecular phylogeny of the hominoids: inferences from p;multiple independent DNA sequence data sets. Molecular Biology and p;Evolution 14: 248–65.

Satta, Y., Klein, J., and Takahata, N. (2000). DNA archives and our nearest relative: the trichotomy problem revisited.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p;Evolution 14: 259–75.

Senut, B., Pickford, M., Gommery, D., Mein, P., Cheboi, K., and Coppens, Y. (2001). First hominid from the Miocene (Lukeino Formation, Kenya). p;Comptes Rendus 332: 137–44.

Shultz, S., Nelson, E., and Dunbar, R. I. M. (2012). Hominin cognitive p;evolution: identifying patterns and processes in the fossil 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7B: 2130–40.

Steudel-Numbers, K. L. (2006). Energetics in Homo erectus and other early hominins: the consequences of increased lower-limb length. Journal of p;Human Evolution 51: 445–53.

Stoneking, M. (1993). DNA and recent human evolution. Evolutionary p;Anthropology 2: 60–73.

Swedell, L., and Plummer, T. (2012). Papionin multilevel society as a p;model for hominin social 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p;33: 1165–93.

Tooby, J., and DeVore, I. (1987).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behavioural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ling. In: W. G. Kinzey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rimate Models, pp. 183–238.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hiten, A., and Byrne, R. W. (eds) (1988).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n, A., Horner, V., and Marshall-Pescini, S. (2003). Cultural p;panthropology.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12: 92–105.

Wynn, T., and Coolidge, F. L. (2004). The expert Neanderthal mind.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6: 467–87.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Abbott, D. H., Keverne, E. B., Moore, G. F., and Yodyinguad, U. (1986). Social suppression of reproduction in subordinate talapoin monkeys, Miopithecus p;talapoin. In: J. Else and P. C. Lee (eds) Primate Ontogeny, pp. 32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tmann, J. (1980). Baboon Mothers and Infa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p;University Press.

Apperly, I. A. (2012). What is ‘theory of mind’? Concept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5: 825–39.

Aron, A., Aron, E. N., and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p;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96–612.

Berscheid, E. (1994).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5: 79–129.

Berscheid, E., Snyder, M., and Omoto, A. M. (1989). The relationship p;closeness inventory: assessing the closenes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792–807.

Bettridge, C., and Dunbar, R. I. M. (2012). Perceived risk and predation in p;primates: predicting minimum permissible group size. Folia Primatologica 83: 332–52.

Bowman, L. A., Dilley, S. R., and Keverne, E. B. (1978). Suppression of p;oestrogen-induced LH surges by social subordination in talapoin monkeys. Nature 275: 56–8.

Broad, K. D., Curley, J. P., and Keverne, E. B. (2006). Mother–infant p;bond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social relationship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1B: 2199–214.

Carrington, S. J., and Bailey, A. J. (2009). Are there Theory of Mind regions in the brain? A review of the neuroimaging literature. Human Brain Mapping 30: 2313–35.

Cartmill, E. A., and Byrne, R. B. (2007). Orangutans modify their gestural p;signaling according to their audience's comprehension. Current Biology p;17: 1–4.

Cowlishaw, G. (1994). Vulnerability to predation in baboon populations.Behaviour 131: 293–304.

Crockford, C., Wittig, R. M., Mundry, R., and Zuberbühler, K. (2012). Wild chimpanzees inform ignorant group members of danger. Current Biology p;22: 142–6.

Curly, J. P., and Keverne, E. B. (2005). Genes, brains and mammal social p;bond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 561–7.

Depue, R. A., and Morrone-Strupinsky, J. V. (2005). A neurobehavioral model of affiliative bonding: im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izing a human trait of p;affiliation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313–95.

Dunbar, R. I. M. (1980). Determinants and evolutionary consequences p;of dominance among female gelada baboons. Behavioral Ecology and p;Sociobiology 7: 253–65.

Dunbar, R. I. M. (1988). Primate Social Systems. London: Chapman & Hall.

Dunbar, R. I. M. (1988). Habitat quality,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group p;composition in colobus monkeys (Colobus guerez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9: 299–329.

Dunbar, R. I. M. (1989).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of female gelada baboons. In: A. Rasa, C. Vogel and E. Voland (eds) Sociobiology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pp. 74–92. London: Chapman & Hall.

Dunbar, R. I. M. (1991).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grooming in p;primates. Folia Primatologica 57: 121–31.

Dunbar, R. I. M. (1995). The mating system of Callitrichid primates. I. p;Conditions for the coevolution of pairbonding and twinning. Animal p;Behaviour 50: 1057–70.

Dunbar, R. I. M. (2010). Brain and behaviour in primate

evolution. In: P. M. Kappeler and J. Silk (eds) Mind the Gap: Tracing the Origins of Human p;Universals, pp. 315–30. Berlin: Springer.

Dunbar, R. I. M. (2010). The social role of touch in humans and primates: behavioural function and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Neuroscience and p;Biobehavioral Reviews 34: 260–68.

Dunbar, R. I. M., and Dunbar, P. (1988). Maternal time budgets of gelada p;baboons. Animal Behaviour 36: 970–80.

Dunbar, R. I. M., and Lehmann, J. (2013) Grooming and cohesion in primates: a comment on Grueter et al.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453–455.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10). Bondedness and sociality. Behaviour 147: 775–803.

Fedurek, P., and Dunbar, R. I. M. (2009). What does mutual grooming tell us about why chimpanzees groom? Ethology 115: 566–75.

Gallagher, H. L., and Frith, C. D. (2003). Functional imaging of 'theory of mind'.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77–83.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ociology 78: 1360–80.

Granovetter, M.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33.

Grueter, C. C., Bissonnette, A., Isler, K., and van Schaik, C. P. (2013).

Grooming and group cohesion in primates: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61–8.

Harcourt, A. H. (1992). Coalitions and alliances: are primates more complex than non-primates? In: A. H. Harcourt and F. B. M. de Waal (eds.) Coalitions and Alliances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pp. 445–72. Oxford: Oxford p;University Press.

Harcourt, A. H., and Greenberg, J. (2001). Do gorilla females join males to p;avoid infanticide? A quantitative model. Animal Behaviour 62: 905–15.

Hare, B., Call, J., Agnetta, B., and Tomasello, M. (2000). Chimpanzees know what conspecifics do and do not see.Animal Behaviour 59: 771–85.

Hare, B., Call, J., and Tomasello, M. (2001). Do chimpanzees know what p;conspecifics know?Animal Behaviour 61: 139–51.

Hill, R. A., and Dunbar, R. I. M. (1998). An evaluation of the roles

of p;predation rate and predation risk as selective pressures on primate grouping behaviour. Behaviour 135: 411–30.

Hill, R. A., and Lee, P. C. (1998). Predation pressure as an influence on group size in Cercopithecoid primat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Zoology 245: 447–56.

Hill, R. A., Lycett, J., and Dunbar, R. I. M. (2000). Ec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birth intervals in baboons. Behavioral Ecolology 11: 560–64.

Huelsenbeck, J. P., Ronquist, F., Nielsen, R., and Bollback, J. P. (2001).

Bayesian inference of phylogeny and its impact on evolutionary biology. p;Science 294: 2310–14.

Isler, K., and van Schaik, C. P. (2006). Metabolic costs of brain size evolution. Biology Letters 2: 557–60.

Karbowski, J. (2007). Global and regional brain metabolic scaling and its p;functional consequences. BMC Biology 5: 18–46.

Keverne, E. B., Martensz, N., and Tuite, B. (1989). Beta-endorphin p;concentration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monkeys are influenced by groomin relationship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14: 155–61.

Kinderman, P., Dunbar, R. I. M., and Bentall, R. P. (1998). Theory-of-mind p;deficits and causal attribution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9: 191–204.

Komers, P. E., and Brotherton, P. N. M. (1997). Female space use is the best predictor of monogamy in mammal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64B: 1261–70.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Group size, p;grooming and social cohesion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74: 1617–29.

Lewis, P. A., Birch, A., Hall, A., and Dunbar, R. I. M. (2013). Higher order p;intentionality tasks are cognitively more demanding: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

Lewis, P. A., Rezaie, R., Browne, R., Roberts, N., and Dunbar, R. I. M. (2011).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volume predicts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NeuroImage 57: 1624–9.

Machin, A., and Dunbar, R. I. M. (2011). The brain opioid theory of social p;attachment: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ehaviour 148: 985–1025.

O’Connell, S., and Dunbar, R. I. M. (2003). A test for

comprehension of false belief in chimpanzees.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9: 131–9.

Opie, C., Atkinson, Q.,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13). Male p;infanticide leads to social monogamy in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0: 13328–32.

van Overwalle, F. (2009).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brain: a meta-analysis. p;Human Brain Mapping 30: 829–58.

Powell, J., Lewis, P. A., Dunbar, R. I. M., García-Fiñana, M., and Roberts, N. (2010).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volume correlates with social cognitive p;competence. Neuropsychologia 48: 3554–62.

Roberts, S. B. G., and Dunbar, R. I. M. (2011). The costs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 18-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decay. p;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2: 186–97.

Roberts, S. B. G., Arrow, H.,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14). 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R. I. M. Dunbar, C. p;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Lucy to Language: The Benchmark Papers,pp. 151–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Schaik, C. P., and Dunbar, R. I. M. (1990). The evolution of monogamy in large primates: a new hypothesis and some crucial tests. Behaviour 115: 30–61. p;

van Schaik, C. P., and Kappeler, P. M. (2003).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p;monogamy in primates. In: Reichard, U. H., and Boesch, C. (eds) Monogamy: Mating Strategies and Partnerships in Birds, Humans and Other Mammals, p;pp. 5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ultz, S., Opie, C., and Atkinson, Q. D. (2011). Stepwise evolution of stable sociality in primates. Nature 479: 219–222.

Silk, J. B., Alberts, S. C., and Altmann, J. (2003). Social bonds of female p;baboons enhance infant survival. Science 302: 1232–4.

Silk, J. B., Beehner, J. C., Bergman, T. J., et al. (2009). The benefits of social p;capital: close social bonds among female baboons enhance offspring surviv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6B: 3099–104.

Stiller, J., and Dunbar, R. I. M. (2007). Perspective-taking and memory p;capacity predict social network size. Social Networks 29: 93–104.

Sutcliffe, A., Dunbar, R. I. M., Binder, J., and Arrow, H. (2012). Relationships and the social brain: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 149–68.

Vrontou, S., Wong, A., Rau, K., Koerber, H., and Anderson, D. (2013). Genetic identification of C fibres that detect massage-like stroking of hairy skin i vivo. Nature 493: 669–73.

Wittig, R. M., Crockford, C., Lehmann, J. et al. (2008). Focused grooming p;networks and stress alleviation in wild female baboons. Hormones and p;Behavior 54: 170–77.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Barrickman, N. L., Bastian, M. L., Isler, K., and van Schaik, C. P. (2007). Life history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cephalization: a comparative test using data from long-term studies of primates in the wild.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4: 568–90.

Barton, R. A., and Dunbar, R. I. M. (1997).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brain. p;In: A. Whiten and R. Byrne (eds)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II, pp. 240–63. p;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gman, T. J., Beehner, J. C., Cheney, D. L., and Seyfarth, R. M. (2003).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by rank and kinship in baboons.Science 302: 1234–6. Bettridge, C., and Dunbar, R. I. M. (2013). Perceived risk and predation in p;primates: predicting minimum permissible group size. Folia Primatologica

Bettridge, C.,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10). Trade-offs between time, predation risk and life histo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biogeography: a systems modelling approach with a primate case study. Ecological Modelling 221: 777–90.

Byrne, R. W., and Corp, N. (2004). Neocortex size predicts deception rate in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1B: 1693–9.

Curry, O., Roberts, S. B. G., and Dunbar, R. I. M. (2013). Altruism in social p;networks: evidence for a ‘kinship premium’.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4: p;283–95.

Deeley, Q., Daly, E., Asuma, R. et al. (2008). Changes in male brain responses to emotional faces from adolescence to middle age. NeuroImage 40: 389–97.

Dunbar, R. I. M. (1988). Primate Social Systems. London: Chapman & Hall.

Dunbar, R. I. M. (1992a). 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primat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2: 469–93.

Dunbar, R. I. M. (1992b). A model of the gelada socio-ecological

system. Primates 33: 69–83.

Dunbar, R. I. M. (1993). Coevolution of 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language in huma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681–735.

Dunbar, R. I. M. (1998). 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 Evolutionary p;Anthropology 6: 178–90.

Dunbar, R. I. M. (2008). Mind the gap: or why humans aren't just great ap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54: 403–23.

Dunbar, R. I. M. (2011). Evolutionary basis of the social brain. In: J. Decety and J. Caciopp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Neuroscience, pp. 28–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2011). Constraints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p;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flow.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7: 345–71.

Dunbar, R. I. M. (2014). What's so social about 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

Frontiers of Human Neuroscience {to come}

Dunbar, R. I. M., and Shi, J. (2013). Time as a constrai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eral goats at high latitudes. Oikos 122: 403–10.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07). Understanding primate brain p;evolu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2B: p;649–58.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10). Bondedness and sociality. Behaviour 147: 775–803.

Dunbar, R. I. M., Korstjens, A. H., and Lehmann, J. (2009). Time as an p;ecological constraint. Biological Review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84: 413–29.

Elton, S. (2006). Forty years on and still going strong: the use of hominin–cercopithecid comparisons in palaeoanthropology. Journal of the Royal p;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2: 19–38.

Fay, J. M., Carroll, R., Peterhans, J. C. K., and Harris, D. (1995). Leopard p;attack on and consumption of gorillas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9: 93–9.

Hamilton, M. J., Milne, B. T., Walker, R. S., Burger, O., and Brown, J.H. (2007).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hunter-gatherer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4B: 2195–203.

Hill, R. A., and Dunbar, R. I. M. (2003). Social network size in humans. p;Human Nature 14: 53–72.

Hill, R. A., Bentley, A., and Dunbar, R. I. M. (2008). Network scaling reveals consistent fractal pattern in hierarchical mammalian societies. Biology Letters 4: 748–51.

Joffe, T. H. (1997). Social pressures have selected for an extended juvenile p;period in primat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2: 593–605.

Joffe, T. H., and Dunbar, R. I. M. (1997). Visual and socio-cognitive p;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primate brai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64B: 1303–7.

Kanai, R., Bahrami, B., Roylance, R., and Rees, G. (2012). Online social p;network size is reflected in human brain structur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9: 1327–34.

Kelley, J. L., Morrell, L. J., Inskip, C., Krause, J., and Croft, D. P. (2011).

Predation risk shapes social networks in fission-fusion populations. p;PLoS-One 6: e24280.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Time constraints limit p;group sizes and distribution in red and black-and-white colobus monkeys. p;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28: 551–75.

Korstjens, A. H.,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10). Resting time as an ecological constraint on primate biogeography. Animal Behaviour 79: 361–74. p;

Korstjens, A. H., Verhoeckx, I., and Dunbar, R. I. M. (2006). Time as p;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spider monkey. Behavioural Ecology and p;Sociobiology 60: 683–94.

Kudo, H., and Dunbar, R. I. M. (2001). Neocortex size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62: 711–22.

Layton, R., O'Hara, S., and Bilsborough, A. (2012). Antiquity and social p;functions of multi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human hunter-gather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33: 1215–45.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09). Network cohesion, group size p;and neocortex size in female-bonded Old World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6B: 4417–22.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09). Implications of body mass and p;predation for ape social system and bi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ikos 118: p;379–90.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Group size, p;grooming and social cohesion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74: 1617–29.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Fission–fusion p;social systems as a strategy for coping with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 primate case. Evolutionary Ecology 21: 613–34.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8a). Time p;management in great apes: implications for gorilla biogeography. p;Evolutionary Ecology Research 10: 517–36.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8b). Time and p;distribution: a model of ape biogeography. Ecology, Evolution and Ethology 20: p;337–59.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10). Apes in a changing world – th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on the behaviour and distribution of p;African ape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7: 2217–31.

Lehmann, J., Lee, P. C., and Dunbar, R. I. M. (2014). Unravelling the p;evolutionary function of communities. In: R. I. M. Dunbar, C. S. 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Lucy to Language: The Benchmark Papers, pp. 245–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P. A., Rezaie, R., Browne, R., Roberts, N., and Dunbar, R. I. M. (2011).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volume predicts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NeuroImage 57: 1624–9.

Marlowe, F. G. (2005). Hunter-gatherers and human evolutio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14: 54–67.

Mink, J. W., Blumenschine, R. J., and Adams, D. B. (1981). Ratio of central p;nervous system to body metabolism in vertebrates – its constancy and p;functional ba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241: R203–12.

O'Donnell, S., Clifford, M., and Molina, Y. (201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straints and caste differences in brain investment among social paper p;was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8: 7107–12.

Palombit, R. A. (1999). Infanticide and the evolution of pairbonds in p;nonhuman primate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7: 117–29.

Passingham, R. E., and Wise, S. P. (2012). The Neurobiology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włowski, B. P., Lowen, C. B., and Dunbar, R. I. M. (1998). Neocortex size, social skills and mating success in primates. Behaviour 135: 357–68.

Pérez-Barbería, J.,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07). Evidence for p;intense coevolution of sociality and brain size in three

orders of mammals. Evolution 61: 2811–21.

Powell, J., Lewis, P. A., Roberts, N., García-Fiñana, M., and Dunbar, R. I. M. (2012).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volume predicts social network size: an p;imaging stud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uman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9B: 2157–62.

de Ruiter, J., Weston, G., and Lyon, S. M. (2011). Dunbar's number: group size and brain physiology in humans reexamine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p;113: 557–68

Roberts, S. B. G., and Dunbar, R. I. M. (2011). The costs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 18-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decay. p;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2: 186–97.

Roberts, S. B. G., Dunbar, R. I. M., Pollet, T., and Kuppens, T. (2009).

Exploring variations in active network size: constraints and ego p;characteristics. Social Networks 31: 138–46.

Sallet, J., Mars, R. B., Noonan, M. P., et al. (2011). Social network size affects neural circuits in macaques. Science 334: 697–700.

Saramäki, J., Leicht, E., López, E., Roberts, S., Reed-Tsochas, F., and p;Dunbar, R. I. M. (2014):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 signatures in human p;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Sayers, K., and Lovejoy, C. O. (2008). The chimpanzee has no clothes: p;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an troglodytes in models of human evolution. p;Current Anthropology 49: 87–114.

van Schaik, C. P. (1983). Why are diurnal primates living in groups? Behaviour 87: 91–117.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06). Chimpanzee and felid diet p;composition is influenced by prey brain size.Biology Letters 2: 505–8.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07).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brain: p;Anthropoid primates contrast with other vertebrat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4B: 2429–36.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10). Encephalisation is not a universal p;macroevolutionary phenomenon in mammals but is associated with soci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7: 21582–6.

Shultz, S., and Finlayson, L. V. (2010). Large body and small brain and p;group sizes are associated with predator preferences for mammalian prey. p;Behavioral Ecology 21: 1073–9.

Shultz, S., Noe, R., McGraw, S., and Dunbar, R. I. M. (2004). A community p;level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prey behavioural and ecological p;characteristics on predator diet compos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London 271B: 725–32.

Smith, A. R., Seid, M. A., Jimenez, L., and Wcislo, W. T. (2010). Socially p;induced brain development in a facultatively eusocial sweat bee Megalopta genalis (Halictida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7B: 2157–63.

Smuts, B. B., and Nicholson, N. (1989). Dominance rank and reproduction in female babo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19: 229–46.

Tsukahara, T. (1993). Lions eat chimpanzees: the first evidence of predation by lions on wild chimpanze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29: 1–11.

Wellman, B. (2012). Is Dunbar's number up?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p;103: 174–6.

Willems, E., and Hill, R. A. (2009).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wo species p;distribution models taking vervet monkeys (Cercopithecus aethiops)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6: 2300–312.

Zhou, W.-X., Sornette, D., Hill, R. A., and Dunbar, R. I. M. (2005). Discrete p;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group siz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p;Society, London 272B: 439–44.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Barrett, L., Gaynor, D., Rendall, D., Mitchell, D., and Henzi, S. P. (2004).

Habitual cave use and thermoregulation in chacma baboons (Papio p;hamadryas ursinu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6: 215–22.

Boesch-Achermann, H., and Boesch, C. (1993). Tool use in wild chimpanzees: new light from dark fores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18–22.

Boesch, C., and Boesch, H. (1983). Optimization of nut-cracking with natural hammers by wild chimpanzess. Behaviour 83: 265–86.

Berger, L. (2007). Further evidence for eagle predation of, and feeding p;damage on, the Taung chil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103: 496–8.

Bettridge, C. M. (2010). Reconstructing Australopithecine Socioecology Using p;Strategic Modelling Based on Modern Primates.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Brain, C. K. (1970). New finds at the Swartkrans australopithecine site. p;Nature 225: 1112–19.

Carvalho, S., Biro, D., Cunha, E. et al. (2012). Chimpanzee carrying behaviour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bipedality. Current Biology 22: R180–81.

Cerling, T., Mbua, E., Kirera, F. et al. (2011). Diet of Paranthropus boisei in p;the early Pleistocene of East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Sciences, USA 108: 9337–41.

Copeland, S., Sponheimer, M., de Ruiter, J. et al. (2011). Strontium isotope evidence for landscape use by early hominins. Nature 474: 76–9.

Dezecache, G., and Dunbar, R. I. M. (2012). Sharing the joke: the size of p;natural laughter group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3: 775–9.

Dunbar, R. I. M. (2010). Deacon's dilemma: the problem of pairbonding in human evolution.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J. A. G. Gowlett (eds) p;Social Brain, Distributed Mind, pp. 159–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ley, R. A., and Elton, S. (1995). Time and energy: the ecological context for the evolution of bipedalism. In: E. Strasser, J. Fleagle, A. Rosenberger and H. p;McHenry (eds) Primate Locomotion: Recent Advances, pp. 419–33. New York: Plenum Press.

Hunt, K. D. (1994).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ipedality: ecology and p;functional morphology.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6: 183–202.

Klein, R. G. (2000).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p;Origins, 3r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K. T., Sosdian, S., White, H. E., and Rosenthal, Y. (2010). North Atlantic climate evolution through the Plio-Pleistocene climate transitions. p;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300: 329–42.

Lehmann, J., and Dunbar, R. I. M. (2009). Implications of body mass and predation for ape social system and bi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ikos 118: p;379–90.

Lovejoy, C. O. (1981). The origin of man. Science 211: 341–50.

Lovejoy, C. O. (2009). Reexamining human origins in light of Ardipithecus ramidus. Science 326: 74e1–8.

McGraw, W. S., Cooke, C., and Shultz, S. (2006). Primate remains from p;African crowned eagle (Stephanoaetus coronatus) nests in

Ivory Coast's Tai Forest: Implications for primate predation and early hominid taphonomy in South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31: 151–65.

McPherron, S., Alemseged, Z., Marean, C. et al. (2010). Evidence for stone p;tool-assisted consumption of animal tissues before 3.39 million years ago p;at Dikika, Ethiopia. Nature 466: 857–60.

Marlowe, F., and Berbesque, J. (2009). Tubers as fallback foods and their p;impact on Hadza hunter-gather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40: 751–58.

Nelson, E., and Shultz, S. (2010). Finger length ratios (2D:4D) in anthropoids implicate reduced prenatal androgens in social bo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41: 395–405.

Nelson, E., Rolian, C., Cashmore, L., and Shultz, S. (2011). Digit ratios predict polygyny in early apes, Ardipithecus, Neanderthals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but not in Australopithecu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8B: p;1556–63.

Pawłowski, B. P., Lowen, C. B., and Dunbar, R. I. M. (1998). Neocortex size, p;social skills and mating success in primates. Behaviour 135: 357–68.

Platt, J. R. (1964). Strong inference. Science 146: 347–53.

Pontzer, H., Raichlen, D. A., Sockol, M. D. (2009). The metabolic costs of walking in humans, chimpanzees and early hominins. Journal of Human p;Evolution 56: 43–54.

Reno, P. L., McCollum, M. A., Meindl, R. S., and Lovejoy, C. O. (2010). An p;enlarged postcranial sample confirms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dimorphism was similar to modern huma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65B: 3355–63.

Reno, P. L., Meindl, R. S., McCollum, M. A., and Lovejoy, C. O. (2003). Sexual dimorphism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p;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0: 9404–9.

Richmond, B. G., Aiello, L. C., and Wood, B. (2002). Early hominin limb p;proportio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3: 529–48.

Richmond, B. G., Strait, D. S., and Begun, D. R. (2001). Origin of human p;bipedalism: the knuckle-walking hypothesis revisited. Yearbook of Physical p;Anthropology 44: 70–105.

Ruxton, G. D., and Wilkinson, D. M. (2011). Thermoregulation and endurance running in extinct hominins: Wheeler's models revisited.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61: 169–75.

Ruxton, G. D., and Wilkinson, D. M. (2011). Avoidance of overheating and p;selection for both hair loss and bipedality in hominins. Proceedings of the p;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8: 20965–9.

Schmid, P., Churchill, S. E., Nalla, S. et al. (2013). Mosaic morphology in the thorax of Australopithecus sediba. Science 340.

Sockol, M. D., Raichlen, D. A., and Pontzer, H. (2007). Chimpanzee p;locomotor energetics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biped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4: 12265–9.

Sponheimer, M., and Lee-Thorpe, J. (2003). Differential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extant great apes and australopithecines: towards solving the C4 p;conundrum.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136A: 27–34.

Sponheimer, M., Lee-Thorpe, J., de Ruiter, D. et al. (2005). Hominins, sedges,and termites: new carbon isotope data from the Sterkfontein valley and p;Kruger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8: 301–12.

Tsukahara, T. (1993). Lions eat chimpanzees: the first evidence of predation by lions on wild chimpanze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29: 1–11.

Ungar, P. S., and Sponheimer, M. (2011). The diets of early hominins. Science 334: 190–93.

Ungar, P. S., Grine, F. E., and Teaford, M. F. (2006). Diet in early Homo: p;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 new model of adaptive versatility. Annual p;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209–28.

Wheeler, P. E. (1984). The evolution of bipedality and loss of functional body hair in homin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3: 91–8.

Wheeler, P. E. (1985). The loss of functional body hair in man: the influence of thermal environment, body form and bipedality. Journal of Human p;Evolution 14: 23–8.

Wheeler, P. E. (1991). The thermoregulatory advantages of hominid p;bipedalism in open equatorial environments: the contribution of increased p;convective heat loss and cutaneous evaporative cooling.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1: 107–15.

Wheeler, P. E. (1991). The influence of bipedalism on the energy and water budgets of early homin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1: 117–36.

Wheeler, P. E. (1992). The thermoregulatory advantages of large body size for hominids foraging in savannah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p;23: 351–62.

Wheeler, P. E. (1992). The influence of the loss of functional hair on the p;water budgets of early homin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3: 379–88.

Wheeler, P. E. (1993). The influence of stature and body form on hominid p;energy and water budgets: a comparison of Australopithecus and early Homo physiqu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4: 13–28.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Aiello, L. C., and Wells, J. (2002). Energe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us p;Homo.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 323–38.

Aiello, L. C., and Wheeler, P. (1995). The expensive tissue hypothesis: the brain and the digestive system in human ev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6: 199–221.

Allen, K. L., and Kay, R. F. (2012). Dietary quality and encephalization in p;platyrrhine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London 279B: 715–21.

Alperson-Afil, N. (2008). Continual fire-making by hominins at Gesher Beno Ya‘aqov, Israel.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7: 1733–9.

Bailey, D., and Geary, D. (2009).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Human Nature p;20: 67–79.

Barbetti, M., Clark, J. D., Williams, F. M., and Williams, M. A. J. (1980).

Palaeomagnetism and the search for very ancient fireplaces in Africa. Results from a million-year-old Acheulian site in Ethiopia. Anthropologie 18: 299–304. Behrensmeyer, A. K., Todd, N. E., Potts, R., and McBrinn, G. E. (1997). Late p;Pliocene faunal turnover in the Turkana Basin, Kenya and Ethiopia. Science p;278: 1589–94.

Bellomo, R. V. (1994). Methods of determining early hominid behavioural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rolled use of fire at FxJj20 Main, Koobi p;Fora, Keny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7: 173–95.

Berna, F., Goldberg, P., Horwitz, L. K. et al. (2012). Microstratigraphic p;evidence of in situ fire in the Acheulean strata of Wonderwerk Cave, p;North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9: E1215–20.

Binford, L. R., and Ho, C. K. (1985). Taphonomy at a distance: Zhoukoudian,‘the cave home of Beijing man’? Current Anthropology 26: 413–42.

Brain, C. K., and Sillen, A. (1988). Evidence from the Swartkrans cave for the earliest use of fire.Nature 336: 464–6.

Brown, K. S., Marean, C. W., Herries, A. I. R. et al. (2009). Fire as an p;engineering tool of early modern humans. Science 325: 859–62.

Carmody, R. N., and Wrangham, R. W. (2009). The energetic significance of cooking.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7: 379–91.

Clark, J. D., and Harris, J. W. K. (1985). Fire and its roles in early hominid p;lifeways.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3: 3–27.

Coqueugniot, H., Hublin, J.-J., Veillon, F., Houët, F., and Jacob, T. (2004).

Early brain growth in Homo erectu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ability. Nature 431: 299–302.

Cordain, L., Miller, J. B., Eaton, S. B., Mann, N., Holt, S. H. A., and Speth, p;J. D. (2000). Plant-animal subsistence ratios and macronutrient energy p;estimations in worldwide hunter-gatherer diet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71: 682–92.

Davila Ross, M., Allcock, B., Thomas, C., and Bard, K. A. (2011). Aping p;expressions? Chimpanzees produce distinct laugh types when responding to laughter of others. Emotion 11: 1013–20.

Davila Ross, M., Owren, M. J., and Zimmermann, E. (2009).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 of laughter in great apes and humans. Current Biology, 19, 1–6. p;

deMenocal, P. B. (2004). African climate change and faunal evolution during the Pliocene/Pleistocen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20: 3–24.

De Miguel, C., and Heneberg, M. (2001). Variation in hominin brain size: how much is due to method? Homo 52: 3–58.

Dezecache, G., and Dunbar, R. I. M. (2012). Sharing the joke: the size of p;natural laughter group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3: 775–9.

Dunbar, R. I. M. (2000). Male mating strategies: a modelling approach. p;In: P. Kappeler (ed.) Primate Males, pp. 259–68. Cambridge: Cambridge p;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2012). Bridging the bonding gap: the transition from p;primates to huma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7B: 1837–46.

Dunbar, R. I. M., and Gowlett, J. A. J. (2013). Fireside chat: the impact of fire on hominin socioecology.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J. A. J. Gowlett(eds) The Lucy Project: The Benchmark Papers, pp. 277–96. Oxford: Oxford p;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07). Understanding primate brain p;evolu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2B: 649–58.

Dunbar, R. I. M., Baron, R., Frangou, A. et al. (2012). Social laughter is p;correlated with an elevated pain threshol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9B: 1161–7.

Dunbar, R. I. M., Marriot, A., and Duncan, N. (1997). Human conversational behaviour. Human Nature 8: 231–46.

Gonzalez-Voyer, A., Winberg, S., and Kolm, N. (2009). Social fishes and p;single mothers: brain evolution in African cichlid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6B: 161–7.

Goren-Inbar N., Alperson N., Kislev, M. E. et al. (2004). Evidence of p;hominin control of fire at Gesher Benot Ya'aqov, Israel.Science p;304: 725–7.

Goudsbloom, J. (1995). Fire and Civilis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Gowlett, J. A. J. (2006). The early settlement of northern Europe: fire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ocial brain. Comptes Rendus Palevol 5: 299–310

Gowlett, J. A. J. (2010). Firing up the social brain.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Social Brain and Distributed Mind, pp. 345–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wlett, J. A. J., and Wrangham, R. W. (2013). Earliest fire in Africa: towards convergence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cooking hypothesis. Azania 48: 5–30.

Gowlett, J. A. J., Hallos, J., Hounsell, S., Brant, V., and Debenham, N. C. p;(2005). Beeches Pit – archaeology, assemblage dynamics and early fire p;history of a Middle Pleistocene site in East Anglia, UK. Eurasian Prehistory 3: 3–38.

Gowlett, J. A. J., Harris, J. W. K., Walton, D., and Wood, B. A. (1981). Early p;archaeological sites, hominid remains and traces of fire from Chesowanja, Kenya. Nature 294: 125–9.

Hallos J. (2005). '15 Minutes of Fame': exploring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Middle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y.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9: 155–79. p;

Hartwig, W., Rosenberger, A., Norconk, M., and Owl, M. (2011). Relative p;brain size, gut size, and evolution in New World Monkeys. Anatomical Record 294: 2207–21.

Isler, K., and van Schaik, C. P. (2009). The expensive brain: a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evolutionary changes in brain siz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7: 392–400.

Isler, K., and van Schaik, C. P. (2012). How our ancestors broke through the gray ceiling. Current Anthropology 53: S453–65.

Klein, R. G. (2000).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p;Origins, 3r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otrschal, A., Rogell, B., Bundsen, A. et al. (2013). Artificial selection on p;relative brain size in the guppy reveals costs and benefits of evolving a larger brain. Current Biology 23: 1–4.

Larson, S. G. (2007). 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inin shoulde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16: 172–87.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Group size, p;grooming and social cohesion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74: 1617–29.

Leonard, W. R., Robertson, M. L., Snodgrass, J. J., and Kuzawa, C. W. (2003). Metabolic correlates of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p;and Physiology 136A: 5–15.

Ludwig, B. (2000). New evidence for the possible use of controlled fire from ESA sites in the Olduvai and Turkana basi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p;38: A17.

de Lumley, H. (2006). Il y a 400,000 ans: la domestication du feu, un p;formidable moteur d'hominisation. In: H. de Lumley (ed.) Climats, Cultures et Sociétés aux Temps Préhistoriques, de l'Apparition des Hominidés Jusqu'au p;Néolithique. Comptes Rendus Palevol 5: 149–54.

McKinney, C. (2001). The uranium-series age of wood from Kalambo Falls. Appendix D in: J. D. Clark (ed.) 2001. Kalambo Falls, Vol. 3, pp. 665–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lin, M. A., and Trauth, M. H. (2009). Plio-Pleistocene East African p;pulsed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arly human evolution. In: F. E. Grine, J. G. Fleagle and R. E. Leakey (eds.) The

First Humans: p;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the Genus Homo, pp. 151–8. Berlin: Springer.

Morwood, M., Soejono, R., Roberts, R. et al. Archaeology and age of a new p;hominin from Flores in eastern Indonesia. Nature 431: 1087–91. http://www. nature.com/nature/journal/v431/n7012/abs/ nature02956.html – a8(2004).

Navarette, A., van Schailk, C. P., and Isler, K. (2011). Energetics and the p;evolution of human brain size. Nature 480: 91–3.

Niven, J. E., and Laughlin, S. B. (2008). Energy limitation as a selective p;pressure on the evolution of sensory syste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211: 1792–804.

Osaka City University (2011). Catalogue of Fossil Hominids Database. http://gbs.ur-plaza.osaka-cu.ac.jp/kaseki/index.html

Pawtowski, B. P., Lowen, C. B., and Dunbar, R. I. M. (1998). Neocortex size, p;social skills and mating success in primates. Behaviour 135: 357–68.

Plavcan, J. M. (2012). Body size, size variation, and sexual size dimorphism in early Homo. Current Anthropology 53: S409–23.

Preece, R. C., Gowlett, J. A. J., Parfitt, S. A., Bridgland, D. R., and Lewis, S. G. p;(2006). Humans in the Hoxnian: habitat, context and fire use at Beeches Pit, West Stow, Suffolk,UK.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p;21: 485–96.

Provine, R. (2000). Laugh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Richmond, B. G., Aiello, L. C., and Wood, B. (2002). Early hominin limb p;proportio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3: 529–48.

Roach, N. T., Venkadesan, M., Rainbow, M. J., and Lieberman, D. E. (2013). Elastic energy storage in the shoulder and the evolution of high-speed p;throwing in Homo. Nature 498: 483–7.

Roebroeks, W., and Villa, P. (2011). On the earliest evidence for habitual use of fire in Europ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8: 5209–14.

Rolland, N. (2004). Was the emergence of home bases and domestic fire p;a punctuated event? A review of the Middle Pleistocene record in Eurasia. p;Asian Perspectives 43: 248–80.

Shipman, P., and Walker, A. (1989). The costs of becoming a predator.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8: 373–92.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10). Social bonds in birds are associated p;with brain size and contingent on the correlated

evolution of life-history and increased parental investment.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00: 111–23.

Shultz, S., and Dunbar, R. I. M. (2010). Encephalisation is not a universal p;macroevolutionary phenomenon in mammals but is associated with soci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7: 21582–6.

Shultz, A., and Maslin, M. (2013). Early human speciation, brain expansion p;and dispersal influenced by African climate pulses.PLoS One 8: e76750.

Simpson, S. W., Quade, J., Levin, N. E. et al. (2008). A female Homo erectus pelvis from Gona, Ethiopia. Science 322: 1089–92.

Speth, J. D. (1991). Protein selection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of p;contemporary and ancestral foragers: unresolved issues. Philosophical p;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34: 265–70.

Ungar, P. S. (2012). Dental evid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et in African early Homo. Current Anthropology 53: S318–29.

Weiner S., Xu Q., Goldberg P., Lui J., and Bar-Yosef, O. (1998).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fire at Zhoukoudian, China.Science 281: 251–3.

Williams, D. F., Peck, J., Karabanov, E. B. et al. (1997). Lake Baikal record of continental climate response to orbital insolation during the past 5 million years. Science 278: 1114–17.

Wood, B., and Collard, M. (1999).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284: 65–71.

Wrangham, R. W. (2010).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Wrangham, R. W., and Conklin-Brittain, N. (2003). Cooking as a biological trait.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A, 136: 35–46.

Wrangham, R. W., and Peterson, D. (1996). 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p;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Wrangham, R. W., Jones, J. H., Laden, G., Pilbeam, D., and Conklin-Brittain,N. (1999). The raw and the stolen: cooking and the ecology of human origins. Current Anthropology 40: 567–94.

Wrangham, R. W., Wilson, M. L., and Muller, M. N. (2006). Comparative p;rates of violence in chimpanzees and humans. Primates 47: 14–26.

Wu, X., Schepartz, L. A., Falk, D., and Liu, W. (2006). Endocranial cast p;of Hexian Homo erectus from South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p;Anthropology 130: 445–54.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Bailey, D., and Geary, D. (2009).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Human Nature p;20: 67–79.

Beals, K. L., Courtland, L. S., Dodd, S. M. et al.(1984). Brain size, cranial p;morphology, climate, and time mach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5: 301–30.

Bergman (2013). Speech-like vocalized lip-smacking in geladas. Current p;Biology 23: R268–9.

Arsuaga, J. L., Bermúdez de Castro, J. M., and Carbonell, E. (eds.) (1997). The Sima de los Huesos hominid sit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3: 105–421.

Balzeau, A., Holloway, R. L., and Grimaud-Hervé, D. (2012). Variations and p;asymmetries in regional brain surface in the genus Homo.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62: 696–706.

Bruner, E., Manzi, G., and Arsuaga, J. L. (2003). Encephalization and p;allometric trajectories in the genus Homo: evidence from the Neandertal and modern lineag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0: p;15335–40.

Carbonell, E., and Mosquera, A. (2006). The emergence of a symbolic p;behaviour: the sepulchral pit of Sima de los Huesos, Sierra de Atapuerca, p;Burgos, Spain. Comptes Rendus Palevol 5: 155–60.

Churchill, S. E. (1998). Cold adaptation, heterochrony, and Neandertals. p;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7: 46–61.

Cohen, E., Ejsmond-Frey, R., Knight, N., and Dunbar, R. I. M. (2010). Rowers' p;high: behavioural synchrony is correlated with elevated pain thresholds. p;Biology Letters 6: 106–8.

Dunbar, R. I. M. (2011). On the evolutionary function of song and dance. In: N. Bannan (ed.) Music, Language and Human Evolution, pp. 201–14. Oxford: p;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and Shi, J. (2013). Time as a constrai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eral goats at high latitudes. Oikos 122: 403–10.

Dunbar, R. I. M., Kaskatis, K., MacDonald, I., and Barra, V. (2012). p;Performance of music elevates pain threshold and positive affect. p;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0: 688–702.

Foley, R. A., and Lee, P. C. (1989). Finite social space,

evolutionary pathways,and reconstructing hominid behavior. Science 243: 901–6.

Gunz, P., Neubauer, S., Golovanova, L. et al. (2012). A uniquely modern p;human pattern of endocranial development. Insights from a new cranial p;reconstruction of the Neandertal newborn from Mezmaiskaya. Journal of p;Human Evolution 62: 300–13.

Gustison, M. L., le Roux, A., and Bergman, T. J. (2012). Derived vocalizations of geladas (Theropithecus gelada) and the evolution of vocal complexity in p;primat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B 367B: p;1847–59.

Holmes, J. A., Atkinson, T., Darbyshire, D. P. F. et al. (2010). Middle p;Pleistocene climate and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Boxgrove hominin site (West Sussex, UK) from ostracod record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9: 1515–27.

Joffe, T., and Dunbar, R. I. M. (1997). Visual and socio-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primate brai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p;London 264B: 1303–7.

Kirk, E. C. (2006). Effects of activity pattern on eye size and orbital aperture size in primat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1: 159–70.

Klein, R. G. (2000).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p;Origins, 3r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rings, M., Stone, A., Schmitz, R. W., Krainitzki, H., Stoneking, M., and p;Pääbo, S. (1997). Neandertal 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p;humans. Cell 90: 19–30.

Lalueza-Fox, C., Rosas, A., Estalrrich, A. et al. (2010). Genetic evidence for patrilocal mating behaviour among Neandertal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p;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8: 250–53.

McNeill, W. H. (1995). Keeping in Time Together: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lin, M. A., and Trauth, M. H. (2009). Plio-Pleistocene East African pulsed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arly human evolution. In: F. E. Grine,J. G. Fleagle and R. E. Leakey (eds) The First Humans: Origin and Early p;Evolution of the Genus Homo, pp. 151–8. Berlin: Springer.

Mithen, S. (2005). The Singing Neanderthals: The Origins of Music, Language,Mind and Bo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ven, L., Steele, T., Rendu, W. et al. (2012). Neandertal mobility

and large p;game hunting: the exploitation of reindeer during the Quina Mousterian p;at Chez-Pinaud Jonzac (Charente-Maritime, France). Journal of Human p;Evolution 63: 624–35.

Noonan, J. P., Coop, G., Kudaravalli, S. et al. (2006).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Neanderthal genomic DNA. Science 314: 1113–18.

Osaka City University (2011). Catalogue of Fossil Hominids Database. http://gbs.ur-plaza.osaka-cu.ac.jp/kaseki/index.html.

Pearce, E., and Dunbar, R. I. M. (2012). Latitudinal variation in light levels p;drives human visual system size. Biology Letters 8: 90–93.

Pearce, E., Stringer, C., and Dunbar, R. I. M. (2013). New insights into p;differences in brain organisation between Neanderthals and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80B.

Reed, K. E. (1997). Early hominid evolut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through the African Plio-Pleistocen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2: 289–322.

Reed, K. E., and Russak, S. M. (2009). Tracking ecological change in rel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Homo near the Plio-Pleistocene boundary. In: F. E.Grine, J. G. Fleagle and R. E. Leakey (eds) The First Humans: Origin and p;Early Evolution of the Genus Homo, pp. 159-71. Berlin: Springer.

Reich, R., Green, R., Kircher, M. et al. (2010). Genetic history of an archaic p;hominin group from Denisova cave in Siberia. Nature 468: 1053–60.

Rhodes, J. A., and Churchill, S. E. (2009). Throwing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Paleolithic: inferences from an analysis of humeral retroversio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6: 1–10.

Richards, M. P., and Trinkaus, E. (2009). Isotopic evidence for the diets p;of European Neanderthals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p;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6: 16034–9.

Richards, M. P., Pettitt, P. B., Trinkaus, E., Smith, F. H., Paunović, M., and p;Karavanić, I. (2000). Neanderthal diet at Vindija and Neanderthal predation: the evidence from stable isotop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Sciences, USA 97: 7663–6.

Richards, M. P., Jacobi R., Cook, J., Pettitt, P. B., and Stringer, C. B. (2005). p;Isotope evidence for the intensive use of marine foods by Late Upper p;Palaeolithic huma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9: 390–94.

Roach, N. T., Venkadesan, M., Rainbow, M. J., and Lieberman, D. E. (2013). Elastic energy storage in the shoulder and the evolution of high-speed p;throwing in Homo. Nature 498: 483–7.

Roberts, M. B., Stringer, C. B., and Parfitt, S. A. (1994). A hominid tibia from Middle Pleistocene sediments at Boxgrove, UK. Nature 369: 311–13.

Roberts, S. B. G., Dunbar, R. I. M., Pollet, T., and Kuppens, T. (2009).

Exploring variations in active network size: constraints and ego p;characteristics. Social Networks 31: 138–46.

Saladié, P., Huguet, R., Rodríguez-Hidalgo, A. et al. (2012). Intergroup cannibalism in the European Early Pleistocene: the range expansion p;and imbalance of power hypothes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p;63: 682–95.

Schmitt, D., Churchill, S. E., and Hylander, W. L. (2003). Experimental p;evidence concerning spear use in Neandertals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p;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0: 103–14.

Sutcliffe, A., Dunbar, R. I. M., Binder, J., and Arrow, H. (2012). Relationships and the social brain: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 149–68.

Thieme, H. (1998). The oldest spears in the world: Lower Palaeolithic p;hunting weapons from Schöningen, Germany. In: E. Carbonell, J. M. p;Bermudez de Castro, J. L. Arsuaga and X. P. Rodriguez (eds) Los Primeros Pobladores de Europa [The First Europeans: Recent Discoveries and Current p;Debate], pp. 169–93. Aldecoa: Burgos.

Thieme, H. (2005). The Lower Palaeolithic art of hunting: the case of p;Schöningen 13 II–4, Lower Saxony, Germany. In: C. S. Gamble and M. Porr p;(eds) The Hominid Individual in Context: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Lower and Middle Palaeolithic Landscapes, Locales and Artefacts, pp. 115–32. London: p;Routledge.

Vallverdú, J., Allué, E., Bischoff, J. L. et al. (2005). Short human occupations in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level I of the Abric Romaní rock-shelter p;(Capellades, Barcelona, Spa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8: 157–74.

Vaquero, M., and Pastó, I. (2001). The definition of spatial units in Middle Palaeolithic sites: the hearth related assemblag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p;Science 28: 1209–20.

Vaquero, M., Vallverdú, J., Rosell, J., Pastó, I., and Allué, E.

(2001).

Neandertal behavior at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site of Abric Romani, p;Capellades, Spai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8: 93–114.

Weaver, T. D., and Hublin, J.-J. (2009). Neandertal birth canal shape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hildbir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Sciences, USA 106: 8151–6.

Wilkins, J., Schoville, B. J., Brown, K. S., and Chazan, M. (2012). Evidence for early hafted hunting technology. Science 338: 942–6.

Zollikofer, C. P. E., Ponce de León, M. S., Vandermeersch, B., and Lévêque, F. p;(2002). Evidence for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e St Césaire Neanderthal. p;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9: 6444–8.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Aiello, L. C. (1996). Terrestriality, bipedalism,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p;In: G. Runciman, J. Maynard-Smith and R. I. M. Dunbar (eds) Evolution of p;Social Behaviour Patterns in Primates and Man, pp. 26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iello, L. C., and Dunbar, R. I. M. (1993). 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urrent Anthropology 34: 184–93.

Aiello, L. C., and Wheeler, P. (2003). Neanderthal thermoregulation and p;the glacial climate. In: T. H. van Andel and W. Davies (eds.) Neanderthals p;and Modern Humans in the European Landscape During the Late Glac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ensburg, B., Tillier, A. M., Vandermeersch, B., Duday, H., Schepartz, L. A.,and Rak, Y. (1989). A Middle Palaeolithic human hyoid bone. Nature 338, p;758–60.

Atkinson, Q. D., Gray, R. D., and Drummond, A. J. (2009). Bayesian p;coalescent inference of major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 p;expansions i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6B: 367–73.

Bailey, D., and Geary, D. (2009).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Human Nature p;20: 67–79.

Balzeau, A., Holloway, R. L., and Grimaud-Hervé, D. (2012). Variations and asymmetries in regional brain surface in the genus Homo.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62: 696–706.

Barton, R. A., and Venditti, C. (2013). Human frontal lobes are

not relatively lar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to come p;Bruner, E., Manzi, G., and Arsuaga, J. L. (2003). Encephalization and p;allometric trajectories in the genus Homo: Evidence from the Neandertal and modern lineag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0: p;15335–40.

Burke, A. (2012). Spatial abilities, cogn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Neanderthal and modern human dispersal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47: 230–35.

Caspari, R., and Lee, S.-H. (2004). Older age becomes common late in p;huma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1: 10895–900.

Comas, I., Coscolla, M., Luo, T. et al. (2013). Out-of-Africa migration and Neolithic coexpans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ith modern humans. p;Nature Genetics 45: 1176–82.

Cowlishaw, C., and : Dunbar, R. I. M. (2000). Primate Conservation Biology.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aGusta, D., Gilbert, W. H., and Turner, S. P. (1999). Hypoglossal canal size and hominid spee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6: 1800–804.

Deacon, T. W. (1995).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rain.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Dean, C., Leakey, M. G., Reid, D. et al. (2001). Growth processes in teeth p;distinguish modern humans from Homo erectus and earlier hominins. Nature 414: 628–31.

Dobson, S. D. (2009). Socio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facial mobility in p;nonhuman anthropoid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39: p;413–20.

Dobson, S. D. (2012). Face to face with the social brain. Philosophical p;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67B: 1901–8.

Dobson, S. D., and Sherwood, C. C. (2011). Correlated evolution of p;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producing and processing facial expressions in anthropoid primates. Biology Letters 7: 86–8.

Dunbar, R. I. M. (2012). Bridging the bonding gap: the transition from p;primates to huma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7B: 1837–46.

Dunbar, R. I. M., and Shi, J. (2013). Time as a constrai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eral goats at high latitudes. Oikos 122: 403–10.

Dunsworth, H. M., Warrener, A. G., Deacon, T., Ellison, P. T., and Pontzer, H. (2012). Metabolic hypothesis for human altrici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p;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9: 15212–16.

Enard, W., Przeworski, M., Fisher, S. E. et al. (2002). Molecular evolution of FOXP2, a gene involved in speech and language. Nature 418: 869–72.

Féblot-Augustins, J. (1993). Mobility strategies in the Late Middle p;Palaeolithic of central Europe and western Europe: elements of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2: 211–65.

Finlay, B. L., Darlington, R. B., and Nicastro, N. (2001). Developmental p;structure in brain ev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4: 263–308.

Finlayson, C. (2010). The Humans Who Went Extinct: Why Neanderthals Died Out and We Surviv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her, S. E., and Marcus, G. F. (2006). The eloquent ape: genes, brains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7: 9–20.

Freeberg, T. M. (2006). Social complexity can drive vocal complexity. p;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557–61.

Goebel, T., Waters, M. R., and O'Rourke, D. H. (2008). The late Pleistocene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in the Americas. Science 319: 1497–502.

Haesler, S., Rochefort, C., Georgi, B., Licznerski, P., Osten, P., and Scharff, C. (2007). Incomplete and inaccurate vocal imitation after knockdown of FoxP2 in songbird basal ganglia nucleus Area X. PLoS Biology 5: e321.

Helgason, A., Hickey, E., Goodacre, S. et al. (2001). mtDNA and the islands of the North Atlantic: estimating the proportions of Norse and Gaelic p;ance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8: 723–37.

Helgason, A., Sigurðardóttir, S., Gulcher, J. R., Ward, R., and Stefánsson, p;K. (2000). mtDNA and the origin of the Icelanders: deciphering signals of recent population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6: 999–1016.

Henn, B., Gignoux, C., Jobin, M. et al. (2011). Hunter-gatherer genomic p;diversity suggests a southern African origin for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8: 5154–62.

Horan, R. D., Bulte, E., and Shogren, J. F. (2005). How trade saved humanity from biological exclusion: an economic theory of Neanderthal extinction. p;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8: 1–29.

Ingman, M., Kaessmann, H., Pääbo, S., and Gyllensten, U. (2000). p;Mitochondrial genome variation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Nature,London 408: 708–13.

Joffe, T. H. (1997). Social pressures have selected for an extended juvenile period in primat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2: 593–605.

Jungers, W. L., Pokempner, A., Kay, R. F., and Cartmill, M. (2003). p;Hypoglossal canal size in living hominoid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p;speech. Human Biology 75: 473–84.

Kay, R. F., Cartmill, M., and Balow, M. (1998). The hypoglossal canal and p;the origin of human vocal behaviou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5: 5417–19.

Klein, R. G. (2000).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p;Origins, 3r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rause, J., Lalueza-Fox, C., Orlando, L. et al. (2007). The derived FoxP2 variant of modern humans was shared with Neanderthals. Current Biology 17: 1908–12. Lahr, M. M., and Foley, R. (1994). Multiple dispersals and modern human p;origin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3: 48–60.

Lewis, P. A., Rezaie, R., Browne, R., Roberts, N., and Dunbar, R. I. M. (2011). p;Ventromedial prefrontal volume predicts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NeuroImage 57: 1624–9.

McComb, K., and Semple, S. (2005). Coevolution of voc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ity in primates. Biology Letters 1: 381–5.

MacLarnon, A., and Hewitt, G. (1999).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peech: p;the role of enhanced breathing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p;Anthropology 109: 341–63.

Martín-González, J., Mateos, A., Goikoetxea, I., Leonard, W., and Rodríguez,J. (2012). Differences between Neandertal and modern human infant and child growth model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63: 140–49.

Martinez, I., Rosa, M., Jarabo, P. et al. (2004). Auditory capacities in Middle Pleistocene humans from the Sierra de Atapuerca in Spa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1: 9976–81.

Noble, W., and Davidson, I. (1991). The evolutionary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ur. I. Language and its archaeology. Man

26: 222–53.

Osaka City University (2011). Catalogue of Fossil Hominids Database. http://gbs.ur-plaza.osaka-cu.ac.jp/kaseki/index.html

Powell, J., Lewis, P. A., Dunbar, R. I. M., García-Fiñana, M., and Roberts, N. (2010).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volume correlates with social cognitive p;competence. Neuropsychologia 48: 3554–62.

Richards, M. P., and Trinkaus, E. (2009). Isotopic evidence for the diets p;of European Neanderthals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38: 16034–9.

Semendeferi, K., Damasio, H., Frank, R., and Van Hoesen, G. W. (1997). p;The evolution of the frontal lobes: a volu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p;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s of magnetic resonance scans of human and ape brai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2: 375–88.

Slimak, L., and Giraud, Y. (2007). Circulations sur plusieurs centaines de p;kilomètres durant le Paléolithique moyen. Contribution à la connaissance p;des sociétés néandertaliennes. Comptes Rendus Palevol 6: 359–68.

Smith, T. M., Tafforeau, P., Reid, D. J. et al. (2007). Earliest evidence of p;modern human life history in North African early Homo sapie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4: 6128–33.

Stedman, H. H., Kozyak, B. W., Nelson, A. et al. (2004). Myosin gene mutation correlates with anatomical changes in the human lineage. Nature 428: 415–18.

Stoneking, M. (1993). DNA and recent human evolution. Evolutionary p;Anthropology 2: 60–73.

Shultz, A., and Maslin, M. (2013). Early human speciation, brain expansion and dispersal influenced by African climate pulses.PLoS One 8: e76750.

Thomas, M. G., Stumpf, M. P. H., and Härke, H. (2006). Evidence for an p;apartheid-lik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3B: 2651–7.

Toups, M. A., Kitchen, A., Light, J. E., and Reed, D. L. (2011). Origin of p;clothing lice indicates early clothing use by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n Africa.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8: 29–32.

Uomini, N. T. (2009). The prehistory of handedness: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comparative ethology.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7: 411–19.

Uomini, N., and Meyer, G. (2013). Shared brain lateralization patterns in p;language and Acheulean stone tool production: a functional transcranial p;Doppler ultrasound study. PLoS One 8: e72693.

Williams, A., and Dunbar, R. I. M. (2013). Big brains, meat, tuberculosis, p;and the nicotinamide switches: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with modern repercu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yptophan Research 3: 73–88.

Zerjal, T., Xue, Y., Bertorelle, G. et al.(2003). 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p;Mongol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72: 717–21.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Bader, N. O., and Lavrushin Y. A. (eds) (1998). Upper Palaeolithic Site p;Sungir (graves and environment) (Posdnepaleolitischeskoje posselenije Sungir). p;Moscow: Scientific World.

Bailey, D., and Geary, D. (2009).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Human Nature 20: 67–9.

Boyer, P. (2001). Religion Explained: The Human Instincts That Fashion Gods,Spirits and Ancesto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Burton-Chellew, M., and Dunbar, R. I. M. (2011). Are affines treated a p;biological kin? A test of Hughes' hypothesis.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741–6.

Cashmore, L., Uomini, N., and Chapelain, A. (2008). The evolution of p;handedness in humans and great apes: a review and current issu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86: 7–35.

Conard, N. J. (2003). Palaeolithic ivory sculptures from southwestern p;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figurative art.Nature 426: 830–83.

Curry, O., and Dunbar, R. I. M. (2013).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milarity and altruism in social networks. Human Nature 24: 336–47.

Curry, O., Roberts, S., and Dunbar, R. I. M. (2013). Altruism in social networks: evidence for a 'kinship premium'.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4: 283–95.

D'Errico, F., Henshilwood, C., Vanhaeren, M., and van Niekerk, K. (2005). p;Nassarius kraussianus shell beads from Blombos Cave: evidence for symbolic behaviour in the Middle Stone Ag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8: 3–24.

Deacon, T. W. (1995).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rain.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Dunbar, R. I. M. (1993). Coevolution of 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p;language in humans. Behavioral Brain Sciences 16: 681–735.

Dunbar, R. I. M. (1995).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kinship. In: J. p;Steele and S. Shenn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Ancestry: Power, Sex and Tradition, pp. 380–96. London: Routledge.

Dunbar, R. I. M. (1996).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London: Faber & Faber.

Dunbar, R. I. M. (2008). Mind the gap: or why humans aren't just great ap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54: 403–23.

Dunbar, R. I. M. (2009). Why only humans have language. In: R. Botha p;and C. Knight (eds)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 pp. 12–35. Oxford: Oxford p;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2013). The origin of religion as a small scale phenomenon. In: S. Clark and R. Powell (eds) Religion, Intolerance and Conflict: A Scientifi and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pp. 48–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cher, C. L., and Thornhill, R. (2008). Assortative sociality, limited p;dispersal, 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global pattern of religion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5B: 2587–94.

Fincher, C. L., Thornhill, R., Murray, D. R., and Schaller, M. (2008).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5B: 1279–85.

Frankel, B. G., and Hewitt, W. E. (1994). Religion and well-being among p;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ole of faith groups on campus. Journal of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 33: 62–73.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 II. p;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52.

Henshilwood, C. S., d'Errico, F., van Niekerk, K. L. et al. (2011). A p;100,000-Year-Old Ochre-Processing Workshop at Blombos Cave, South p;Africa. Science 334: 219–22.

Henshilwood, C. S., d'Errico, F., Yates, R. et al. (2002).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Middle Stone Age engravings from South Africa. Science p;295: 1278–80.

Hughes, A. (1988). Kinship and Human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p;University Press.

Klein, R. G. (2000).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p;Origins, 3r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oenig, H. G., and Cohen, H. J. (eds) (2002). The Link Between Religion and Health: Psychoneuroimmunology and the Faith Factor. Oxford University p;Press: Oxford.

Kudo, H., and Dunbar, R. I. M. (2001). Neocortex size and social network size in primates. Animal Behaviour 62: 711–22.

Layton, R., O'Hara, S., and Bilsborough, A. (2012). Antiquity and social p;functions of multi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human hunter-gather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33: 1215–45.

Lehmann, J., Lee, P. C., and Dunbar, R. I. M. (2013). Unravelling the p;evolutionary function of communities.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p;J. A. J. Gowlett (eds) Lucy to Language: The Benchmark Papers, pp. 245–76. p;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Williams, D. (2002). The Mind in the Cave. London: Thames & Hudson. Mesoudi, A., Whiten, A., and Dunbar, R. I. M. (2006). A bias for social p;information in hum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7: 405–23.

Mickes, L., Darby, R. S., Hwe, V. et al. (2013). Major memory for microblogs. Memory and Cognition 41: 481–89.

Miller, G. (1999). Sexual selection for cultural displays. In R. I. M. Dunbar, C. Knight and C. Power (eds)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pp. 71–91. Edinburgh: p;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ttle, D. (1999). Linguistic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ttle, D., and Dunbar, R. I. M. (1997). Social mark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93–9.481–89.

Osaka City University (2011). Catalogue of Fossil Hominids Database. p;http://gbs.ur-plaza.osaka-cu.ac.jp/kaseki/index.html

Palmer, C. T. (1991). Kin selection, reciprocal altruism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Maine lobsterme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2: 221–35.

Redhead, G., and Dunbar, R. I. M. (2013).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an p;experimental stud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1: 845–54.

Rouget, G. (1985). Music and Trance: A The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usic and Poss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k, J. B. (1980). Adoption and kinship in Ocean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2: 799–820.

Silk, J. B. (1990). Which humans adopt adaptively and why does it matter? p;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1: 425–6.

Thornhill, R., Fincher, C. L., and Aran, D. (2009). Parasites, democratization, p;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values across contemporary countries. Biology p;Reviews 84: 113–31.

Wiessner, P. (2002). Hunting, healing, and hxaro exchange: a long-term p;perspective on !Kung (Ju/'hoansi) large-game hunting.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 1–30.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Andelman, S. (1986). Ecological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cercopithecine mating patterns. In: D. I. Rubenstein and R. W. Wrangham (eds) p;Ecological Aspects of Social Evolution, pp. 201–1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p;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Q. D., and Bourrat, P. (2011). Beliefs about God, the afterlife and morality support the role of supernatural policing in human cooper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2: 41–9.

Bourrat, P., Atkinson, Q. D., and Dunbar, R. I. M. (2011). Supernatural p;punishment and individual social compliance across cultures. Religion, Brain and Behavior 1: 119–34.

Bowles, S. (2009). Did warfare among ancestral hunter-gatherers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s? Science 324: 1293–8.

Bowles, S. (2011). Cultivation of cereals by the first farmers was not more p;productive than forag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USA 108: 4760–65.

Bugos, P., and McCarthy, L. (1984). Ayoreo infanticide: a case study. In: p;G. Hausfater and S. B. Hrdy (eds) Infanticide: Compa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pp. 503–20. Hawthorne: Aldine de Gruyter.

Caspari, R., and Lee, S.-H. (2004). Older age becomes common late in p;huma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p;101: 10895–900.

Cohen, M. N., and Crane-Kramer, G. (2007). Ancient Health: Skeletal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Intensificatio. Gainesville, FL: p;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Coward, F., and Dunbar , R. I. M. (2013). Communities on the edge of civilisation.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p;Lucy to Language: The Benchmark Papers, pp. 380–405. Oxford: Oxford p;University Press.

Curry, O., and Dunbar, R. I. M. (2011). Altruism in networks: the effect of connections. Biology Letters 7: 651–3.

Curry, O., and Dunbar, R. I. M. (2013).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milarity and altruism in social networks. Human Nature 24: 336–47.

Curry, O., and Dunbar, R. I. M. (2013). Sharing a joke: the effects of a similar sense of humor on affiliation and altruism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p;34: 125–9.

Daly, M., and Wilson, M. (1981). Abuse and neglect of children in p;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R. D. Alexander and D. W. Tinkle (eds)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Behavior, pp. 405–16. New York: Chiron Press.

Daly, M., and Wilson, M. (1984). A sociobiological analysis of human p;infanticide. In: G. Hausfater and S. B. Hrdy (eds) Infanticide: Comparative p;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pp. 487–502.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Daly, M., and Wilson, M. (1985). Child abuse and other risks of not living with both parents.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6: 197–210.

Daly, M., and Wilson, M. (1988).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family p;homicide. Science 242: 519–24.

Diamond, J. (2002). Evolution, consequences and future of plant and animal domestication. Nature 418: 700–707.

Dietrich, O., Heun, M., Notroff, J., Schmidt, K., and Zarnkow, M. (2012). The role of cult and feas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Neolithic communities. New p;evidence from Göbekli Tepe, south-eastern Turkey. Antiquity 86: 674–95.

Dunbar, R. I. M. (2000). Male mating strategies: a modelling approach. p;In: P. Kappeler (ed.) Primate Males, pp. 259–68. Cambridge: Cambridge p;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2010). Deacon's dilemma: the problem of pairbonding in human evolution. In: R. I. M. Dunbar, C. 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p;Social Brain, Distributed Mind, pp. 159–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2012). The Science of Love and Betrayal. London: Faber p;& Faber.

Dunbar, R. I. M. (2012). Social cognition on the internet: testing

constraints on social network siz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7B: 2192–2201.

Dunbar, R. I. M. (2013). The origin of religion as a small scale phenomenon. In: S. Clark and R. Powell (eds) Religion, Intolerance and Conflict: A Scientifi and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pp. 48–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R. I. M.,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Gowlett, J. A. J. (2014). p;The road to modern humans: time budgets, fission-fusion sociality, kinship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hominin evolution. In: R. I. M. Dunbar, C. p;Gamble and J. A. J. Gowlett (eds) Lucy to Language: The Benchmark Papers,pp. 333–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mber, C. R., Adem, T. A., and Skoggard, I. (2013). Risk, uncertainty, and p;violence in Eastern Africa: a regional comparison. Human Nature 24: 33–58.

Fehr, E., and Gächter, S. (2002).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 Nature p;415: 137–40.

Fibiger, L., Ahlström, T., Bennike, P., and Schulting, R. J. (2013). Patterns of violence-related skull trauma in Neolithic southern Scandinavia. American p;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50: 190–202.

Fisher, H. E., Aron, A., and Brown, L. L. (2006). Romantic love: a mammalian brain system for mate choi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61B: 2173–86.

Harcourt, A. H., Harvey, P. H., Larson, S. G., and Short, R. V. (1981). Testis p;weight, body weight and breeding system in primates. Nature 293: 55–7.

Henrich, J., Ensminger, J., McElreath, R. et al. (2010). Markets, religion, p;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 Science 327: 1480–84.

Hewlett, B. S. (1988). Sexual selection and paternal investment among Aka pygmies. In: L. Betzig, M. Borgerhoff-Mulder and P. Turke (eds)Human p;Reproductive Behaviour, pp. 263–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Press.

Jankowiak, W. R., and Fischer, E. F. (1992).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omantic love. Ethnology 31: 149–55.

Johnson, A. W., and Earle, T. K. (2001).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p;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2nd edi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D. D. P. (2005). God's punishment and public goods: a test of the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hypothesis in 186 world cultures. Human Nature p;16: 410–46.

Johnson, D. D. P., and Bering, J. (2009). Hand of God, mind of man. In: J. p;Schloss and M. J. Murray (eds), The Believing Primate: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Religio, pp. 26–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nott, C. D., and Kahlenberg, S. M. (2007). Orangutans in perspective: p;forced copulations and female mating resistance. In: C. J. Campbell, p;A. Fuentes, K. C. MacKinnon, M. Panger and S. K. Bearder (2007). Primates p;in Perspective, pp. 290–30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hmann, J., Korstjens, A. H., and Dunbar, R. I. M. (2007). Fission–fusion p;social systems as a strategy for coping with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 primate case. Evolutionary Ecology 21: 613–34.

Lukas, D., and Clutton-Brock, T. H. (2013).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p;monogamy in mammals. Science 341: 526–30.

Manning, J. T. (2002). Digit Ratio: A Pointer to Fertility, Health, and Behavior.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Mesnick, S. L. (1997). Sexual alliances: evidence and evolutionary p;implications. In: P. A. Gowaty (ed.) Feminism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p;pp. 207–60. London: Chapman & Hall.

Munro, N. D., and Grosman L. (2010). Early evidence (ca. 12,000 B.P.) for feasting at a burial cave in Israe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Sciences, USA 107: 15362–6.

Naroll, R. (1956). A preliminary index of so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Anthropologist 58: 687–715.

Nelson, E., Rolian, C., Cashmore, L., and Shultz, S. (2011). Digit ratios predict polygyny in early apes, Ardipithecus, Neanderthals and early modern humans but not in Australopithecu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78B: p;1556–63.

Nettle, D., and Dunbar, R. I. M. (1997). Social mark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eciprocal exchange.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93–9.

Norenzayan, A., and Shariff, A. F. (2008).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religious prosociality. Science 322: 58–62.

Opie, C., Atkinson, Q. D., Dunbar, R. I. M., and Shultz, S. (2013). Male p;infanticide leads to social monogamy in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0: 13328–32.

Palchykov, V., Kaski, K., Kertész, J., Barabási, A.-L., and Dunbar,

R. I. M. p;(2012). Sex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Scientific Report 2: 320.

Palchykov, V., Kertész, J., Dunbar, R. I. M., and Kaski, K. (2013). Close p;relationships: a study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record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hysics 151: 735–44.

Pérusse, D. (1993). Cultural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at the proximate and ultimate level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267–322.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p;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eno, P. L., Meindl, R. S, McCollum, M. A., and Lovejoy, C. O. (2003). Sexual dimorphism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p;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0: 9404–9

Roberts, S. B. G., and Dunbar, R. I. M. (2011). The costs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 18-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decay. p;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2: 186–97.

Roberts, S. B. G., and Dunbar, R. I. M. (2011).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p;networks: effects of kinship, network size and emotional closeness.Personal Relationships 18: 439–52.

Roes, F. L., and Raymond, M. (2003). Belief in moralizing god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4: 126–35.

van Schaik, C. P., and Dunbar, R. I. M. (1991). The evolution of monogamy p;in large primates: a new hypothesis and some critical tests. Behaviour p;115: 30–62.

Sosis, R., and Alcorta, C. (2003). Signaling,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the p;evolu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12: 264–74.

Stanford, D., and Bradley, B. (2002). Ocean trails and prairie paths? p;Thoughts about Clovis origins. In: N. G. Jablonski (ed.) The First Americans: The Pleistocene Colonization of the New World, pp. 255–71. San Francisco: p;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Sutcliffe, A., Dunbar, R. I. M., Binder, J., and Arrow, H. (2012). Relationships and the social brain: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 149–68.

Ulijaszek, S. J. (1991). Human dietary chang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p;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334B: 271–9.

Voland, E., and Engel, C. (1989). Women's reproduction and longevity in a premodern population (Ostfriesland, Germany, 18th

century). In: A. E. Rasa,C. Vogel and E. Voland (eds.) The Sociobiology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p;Strategies, pp. 194–205. London: Chapman & Hall.

Walker, R. S., and Bailey, D. H. (2013). 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p;American viole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29–34.

Watts, D. P. (1989). Infanticide in mountain gorillas: new cases and a p;reconsideration of the evidence. Ethology 81: 1–18.

Wilson, M., and Mesnick, S. L. (1997).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bodyguard hypothesis. In: P. A. Gowaty (ed.) Feminism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p;London: Chapman & Hall.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非凡抄本寻访录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英〕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
（Christopher de Hamel）
著

林国荣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非凡抄本寻访录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英]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著

林国荣 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版权页信息

非凡抄本寻访录/（英）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著；林国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

书名原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ISBN 978-7-5201-3736-2

I. ①非… II. ①克… ②林… III. ①欧洲 - 历史 - 研究 IV. ①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37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9-386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2016.
Copyright © Christopher de Hamel, 2016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in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正文内容

导言

第一章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第二章 阿米提奴抄本

第三章 凯尔经

第四章 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

第五章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

第六章 画师雨果

第七章 哥本哈根圣咏

第八章 《布兰诗歌》

第九章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第十章 《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

第十一章 维斯孔蒂《半神》抄本

第十二章 斯皮诺拉时祷书

后记

水石书店版后记

参考文献与注释

插图列表

抄本索引

人名索引

让我们 一起追寻


Ci commencent les heures monseigneur
saint loys roy de france. A matines.
Domine labia mea aperies.
Et os meum annuncia
bit laudem tuam.
Deus in adiutorium

导言

写这么一本书，是为了领略欧洲中世纪的一批重要手抄本。这实际上是一场访谈，且让我们看看它们说了什么，为什么在历史中占了这么重的分量。最初，这本书的名字是“抄本访谈录”（Interviews With Manuscripts）。本书内容实际上颇有名人访谈的风格。真实的访谈，也就是最终刊发出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名人访谈，通常都要介绍访谈场所并交代一下这场访谈是缘何而起的。访谈中通常会涉及同受访人相遇或结识的经历的话题。也许你已经预先了解了一些受访人的相关信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当那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前来敲门，与你握手，同你一起落座的时候，他或者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受访人的体格、穿着、举止以及谈话风格，这些方面也需要交代一番。你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名人也是人，跟普通人没什么实质差别，但在真正跟拥有世界名望的人会面并交谈的时候，你的内心难免会有兴奋感和期许。他或者她，究竟会是怎样的人，是魅力十足，还是枯燥无味？你在内心当然会好奇，想知道他或者她是怎么赢得此等名声的，更想知道是不是名副其实。倾听他们谈话，并且诱导他们谈话。一个好的采访人是要让受访人说出那些先前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毕竟总会有些秘密是受访人希望保留给自己的。甚至可以说，当受访人将内心的隐秘之处袒露出来时，读者会有一种偷听的快感。

这个世界之上最有名的抄本，就如同名人一样，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接近的。不妨说得更直白一些，任何人，只要有一些毅力，再加上一笔盘缠，是能够亲眼见到伟大画作和建筑，可以让自己置身于中国的长城之上或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面前的。不过，且设想一下，你亲手将《凯尔经》（Book of Kells）从都柏林的玻璃展柜里拿出来，然后抚摸并翻动那书页；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最有名的中世纪抄本，如今大多不再供世人观瞻了，即便有些会出现在光线暗淡的展柜当中，你也只能看看其封皮而已。它们已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都太过珍贵。说白了，见教皇或者美国总统容易，要摸一摸《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Très Riches Heures* of the Duc de Berry）可难比登天。春去秋来，岁月流转，要接近这些抄本，已经越来越难了。也正因此，本书要邀请读者陪伴笔者来上那么一趟私人之旅，跟这些最有名的中世纪抄本会面，去看看它们，摸摸它们，当然，还要跟它们畅谈一番。

古文书家，人们通常这么称呼我们这些古老抄本的研究者，其生活就是在善本图书室里面日复一日地劳作。善本室如同圣所，非常人能够触及，就像麦地那的“先知墓”之于我那样。现代世界的国家图书馆，大多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为昂贵的公共建筑之列，但是，绝少有人能够穿过那重重幽暗，进抵这善本秘境。有些抄本室的氛围极为威严，给人极强的压迫感，另一些地方则要随和很多。接触抄本的方式是内行人之间的

秘密，接纳及处理抄本的方式也是有固定程式的，且各个地方的程式截然不同。这是学术史中的一个往往会被人完全忽略的方面。中世纪的顶级泥金装饰手抄本是我们文化的基石，不过，绝少有人会去造访并研究它们的栖身之地。

一些伟大的抄本已经有了影印本或电子版，就如同名人传记一样，大家都可以阅读，但那跟原本显然不是一回事。若是能跟原本相遇，那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影印本是没有根的，可以在任何地方现身，但跟任何地方都没有联系。若非亲眼见到原本并将其捧在手心，则不算了解这份抄本，也不能围绕这份抄本写点什么。任何影印技术都不可能复制原本的重量、质地、凹凸不平的纸面、厚度、味道、触感，当然，还有那时光在中世纪抄本上留下的印记。当一份顶级抄本终于被摆放在你的桌上时，兴奋之情会从你的心间陡然涌现，那样的体验将是顶级的。这跟隔着玻璃展柜观赏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真的可以触摸它了，可以见证此前无人能够见证的诸多细节了。如此一来，你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做工、擦痕、刮痕、重绘痕迹、印痕、补片、针孔、封皮以及颜色和质地的细微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影印本上无法见到的。抄本会面对面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些答案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关涉抄本自身以及抄本诞生的时代。本书的每个章节都会有新的观察、评论和假设，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只是因为我仔细翻阅了原本。且仔细观瞧。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上一个放大镜。坐下来，翻动书页，在一片宁静当中倾听它们讲述的故事。就这样，任由它们说。别的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享受。中世纪抄本有自己的传记。它们穿越数个世纪的光阴而来，其主人和所在时代不断更迭，它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跟主人和时代互动，在世事潮流当中载沉载浮。我们将破解它们不为人知的渊源。很多时候，它们的故事是极具戏剧性的，发生在欧洲社会的最顶层；从中世纪圣徒和君王的起居室到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的隐秘之所，它们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书本自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有些抄本自诞生之日起便被尘封书柜；有些抄本则在世界上四处游荡，藏身木箱或行囊当中，随着马匹或小船或飞机，翻山越岭，跨越大洋；毕竟，它们都是非常便于携带的。很多抄本有过拍卖行或者交易厅的经历，它们的价格不断变化，这本身也揭示了人们的品位和社会潮流的变迁。抄本的命运就如同人的命运一样，各不相同，但每份抄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本书选择了十二份这样的抄本作为访谈对象。究竟有多少中世纪抄本存留下来，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也许有上百万份，也许更多，我们的选择范围是非常广的。所有抄本都是令人着迷的；即便是最为浅白、最缺章法的抄本，也足以让我开辟专章予以阐述，只不过对读者来说，它们也许不能带来那么非凡的体验。我们现在就要跟随一些伟大的同伴，开启我们的旅程了。坐在图书室里面，翻动着令人目眩神迷的泥金装饰抄本，很可能会引来旁边俯首阅读那些更为朴素的书册的学者的敬意，而我希望能分享这份因与抄本做伴而起的静谧的满足感，因此它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成为我们的亲密伙伴。我们会陶醉于讲述与这些抄本届“大牌”相遇的故事。它们都是巨人，我将从中选择不同类型的代

表，不仅仅是福音书和时祷书抄本，也包括天文学、文献评注、音乐、文学以及文艺复兴政治学方面的抄本；当然，仪典、医学、法律、历史、传奇、纹章、哲学、游记以及另外许多主题的抄本，也都是可以选择的，中世纪抄本的涵盖范围就是这么广泛。我甄选的这些抄本，在我看来，是能够代表它们各自所属的时代的，其时间跨度从6世纪一直延伸到16世纪。这些抄本会讲述一些造就了它们的时代和社会的事情。

为了写就这本书，我亲眼见到了我选择的所有抄本。应该说，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跟其中一些抄本有过接触，不过这次我并没有事先设想它们能告诉我的内容，任何新的启示——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启示——都是在我与它们相遇之后自然而然浮现的。本书便讲述了这一过程。

这些抄本的大小各不一样。彩饰师的技艺通常展现在小型画像中，这也是中世纪抄本的魅力之一，不过，有些抄本的体积是相当大的。艺术史的研究者，若是单单依靠微缩在教材里或放大在显示屏上的抄本复制品来展开研究，便会对抄本原本的相对大小毫无概念。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等级观念十分强烈，无论是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且人这一情感通常是借助事物的体积大小来表达的。本书中，体积最大者当属《阿米提奴抄本》（The Codex Amiatinus），这是一份完整的《圣经》抄本，也是一份“大全”抄本（pandect），是为了公共展示而作的。体积最小的抄本当属极为精致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Book of Hours of Jeanne de Navarre），此书是专供这位女王用的袖珍手册。当一份抄本就这么在图书馆的书桌上被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通常在翻开它之前，你就能真正意识到它的大小。本书为此也采用了一个小小的手段，每章的开篇都会将闭合状态下的相关抄本呈现出来。《阿米提奴抄本》在本书开本大小允许的范围之内，被尽可能大地呈现出来了；其他章节涉及的抄本则以该抄本为基准，按照实际的相对比例，被呈现在相应章节的开篇。

一些问题会在行文过程中趋于明朗。第一章的主角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Gospel Book of Saint Augustine），这份抄本将引领我们进入那个基督徒在古罗马的废墟之上开始识文断字的时代。第二章以《阿米提奴抄本》为主角，这份抄本是存留于世的最古老的拉丁文《圣经》抄本，抄本的献词宣示说，这是由一些对自己的罗马学问颇为自豪的人从世界的幽远之地送往意大利的。无与伦比的《凯尔经》是第三章的主角，这份抄本则是类型全然不同的福音书抄本，它将令我们沉浸在遥远的凯尔特世界，那是魔法和信仰密不可分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最终成为爱尔兰人现代民族认同的元素之一。第四章是关于抄本抄写和抄写文化的。向着千禧年迈进和期待天启是10世纪的主旋律，这正是第五章的内容。1066年的诺曼征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第六章探访的抄本当中真真切切地体验一番。12世纪标志着一场大转折，从隐修文献制作向世俗书册制作的转变是阅读史和艺术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同时也是我们文明脉流中被低估的转折点之一。第七章将解密一位君王，此人拥有当时最为精美的圣咏抄本之一。第八章将以慕尼黑的一份小抄本为主角，探索13世纪早期的学生和游方学者的情爱世界。第九章介绍的是一本精美的时祷书，这本时祷书是为一个公主而作的，但公

主如同抄本一样，都成了政治抵押品。据信，这份抄本自诞生之后，便再也不曾隐没，就这么从多灾多难的圣路易的王朝一直被传递到赫尔曼·戈林手中。第十章讲述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这份抄本带我们回到英格兰文学可以辨识的开端之处，那也是英格兰出版业的开端，同时，它的潜文本（Sub-text）为我们呈现了文学作品担当的责任和承受的危险。《半神》抄本是第十一章的主角，它讲述的是战争、武器和近代俄国。第十二章是我们的结束曲，讲述的是奢侈和金钱。这十二场“访谈”串联起来，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有关智识文化和艺术的故事；从罗马帝国的最后时刻到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再到随后的各个时期，这些抄本就是这样穿越时光，被传递到我们所处的时代。

所有这些书册都名扬四海，不过，除了这个共同点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抄本。所谓“抄本”，顾名思义，就是“手抄写下来的东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欧洲，印刷术直到15世纪中叶才问世，在此之前，所有的书册都必须用手抄写。差不多所有的中世纪抄本都是有装饰的，最起码，书页上会有彩色的首字母，而且通常会贴金和配有插图。大多数抄本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标题页。中世纪的书册也绝少有标注页码的。对于这样的书册的页数，现代的做法是以张数计，而不是以页码计，在具体的书页上记上右页（recto）或者左页（verso），分别以字母“r”和“v”来代表。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抄本是以兽皮为书写材料的（对于大多数书册来说羊皮纸和牛皮纸是可以互换的），本书涉及的这些抄本都是如此。将八张，也就是十六页长方形的羊皮纸对折后叠在一起，并将其沿着中折线缝在一起，缝定之后，便是“一折”或者“一刀”，就如同现代精装书册里面的“书帖”一样。一系列“折”按照顺序排布起来，便构成了整部抄本。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解释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这对抄本的“校勘”环节是相当重要的，校勘也是本书各章的关键内容之一。古文书家对此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表达程式，这些表达程式看起来极其神秘，就如同编织花样或基因序列那般令人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非常精确且简单的程式而已。不妨用小写体的罗马数字来表示“折”，每一折的张数则用上标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份八十六张的抄本由十折组成，每折八张，第十一折则由剩下的六张组成，对此古文书家的表达程式就是：$i\text{-}x^{8}$，xi^{6}。许多中世纪抄本已经残缺了，实际上应该说，大多数抄本是残缺的。比如说，八十六张的抄本只需要前后各丢失一张，然后中间某个地方再随便丢失一张，就会残缺三张。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校勘程式：i^{7}（意思就是共有八张，但是缺了i这一张，也就是第一对开页前的一张），$ii\text{-}v^{8}$，vi^{7}（共有八张，缺了iii这一张，也就是第四十一对开页后面的一张），$vii\text{-}x^{8}$，xi^{5}（共有六张，缺vi这一张，也就是第八十三对开页后面的那一张）。

我们在展读一份又一份的抄本后，便会逐渐意识到，校勘是何等重要的环节。有了校勘，时常就能够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发现文本或者插图的错位或者疏漏。要认知一份抄本，就必须对这样的错位或者缺损有意识。更重要的是，校勘程序可以引领人们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熟悉抄本最初的成书过程。抄写员和抄本装饰师很显然是以折为单位进行劳动分

工的，因此，两类人员很可能就会在各个折间进行交接；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在从7世纪晚期的《阿米提奴抄本》一直到那八百年后的《斯皮诺拉时祷书》（Spinola Hours）上，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我得承认，我是热爱校勘抄本的。就这么一折一折地将抄本校勘出来，最终发现得出的结果正好能对上抄本的页码，这是令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答案是确定无疑的。你需要观察中折页，不断寻找缝合线，在这个过程中，就能逐渐建构出一系列的抄本"V"形结构图。影印本或者微缩胶卷是根本无法提供这些信息的，这些信息几乎就是一把魔力钥匙，可以解决所有的书页错位或者缺损问题。有时候我不免会暗自思量，要是有一天我退休了，也许我的退休屋应该叫作"校勘屋"（Duncollatin）才是。

抄本的另一个特点在本书中也反复出现：印刷本是一次性的印刷程序就能搞定的，但是抄本需要历经时光打磨。甚至有些抄本的制作工程在某个时代开启后，需要穿越几个世代的时光，才能最终完工。手抄这样的工作，有点像盖房子或者手工打造大件家具，在完工之前，是可以中断的，抄写员也可以将已经完工的东西部分地拆解而后重组，并在这个过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一些东西，这都取决于抄本历代主人的心思和需求。本书涉及的抄本都有诸多明显的谜团，不过，一旦意识到抄本经历了时光打磨的过程，其中的许多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趟访谈之旅，倘若我们真的要一起走过，倘若它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那肯定就是欣赏这些抄本能够带来怎样的快乐。我希望我们能享受同这些抄本相遇的过程。我承认我有很多偏见，不过我确实觉得，中世纪抄本是非常迷人的，而且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这么说。我想知道有关这些抄本的一切；我想知道是谁、为何、何时以及在哪里制作了这些抄本，抄本里面都是什么，那样的内容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有必要制作那样一份抄本，他们是如何制作的，当时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到抄本的样式和大小的，他们用了什么材料，用了多长时间，为何以及如何绘制抄本的装饰，是谁绘制的（当然，如果有装饰的话，若是没有装饰，又是为何），成本是多少，抄本是如何装订起来的，有谁用过这些抄本，是怎么用的，它们后来经历了怎样的变动，被存放在哪里，存放之时是如何归类的，它们经历了怎样的买卖过程，价格如何（毕竟，它们都价值不菲），最终又是如何传递到当前主人的手中的；我很想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与很久以前的男男女女共享了一件艺术品，共享了该艺术品能带来的愉悦感，并借此鲁莽地偷窥了他们的生活，还乐在其中。

本书源自我跟卡洛琳·唐娜（Caroline Dawnay）的一次谈话。我曾建议她去剑桥大学的帕克图书馆走走看看；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把各种各样的人往那个方向引，并不预期会有什么结果。有那么一天，卡洛琳突然来访，忙完后还剩下半个小时。此前，卡洛琳从未接触过任何中世纪抄本。我们便从图书馆借出了伯里《圣经》（Bury Bible），这是英格兰最早的书册之一，出自职业彩饰师之手，成书时间大约是1130年。此番接触令我们都大开眼界，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挑战：倘若能引领更多的有智识但并非此方面专家的人同这样的中世纪抄本亲密接触，那

将是多么令人兴奋战栗的事情。

因此这本书不会使用只有专业史学家才会懂的术语。本书实际上会引领我们去各个图书馆游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倘若遇到不清楚或者太过复杂的事情，我倒是建议各位读者暂时停下来，耐心一点。书当然是书，不过，同此等非凡抄本相遇，实质上也是一场谈话、一次拜访。也正因如此，我不会在行文过程中插入注释之类的东西。就我来说，我极其不愿意让我的书到处都是脚注，因为脚注会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只能近乎麻木地用手指摁住书页，以免发生阅读错位，如此一来，原本平顺流畅的叙事也会变得崎岖不平，令非专业读者厌倦不已。当然还有一些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对于这个群体，我会给每章提供单独的参考文献。不过，这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毕竟我跟这些抄本已经是老相识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因此，我无法记起我读过的部分文献的来源。更糟糕的是，在我写作过程中，很多人对我有所提点、有所建议，但我很可能记不全了，当然，我会尽力在致谢或者注释里提起这些事。我拜访了很多图书馆管理员乃至馆长，他们都盛情接待了我，并且通常令我满载而归，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们这些从事古文书研究的人，都很清楚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由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组成的研究网络，也都很乐于尽最大可能帮助彼此。我们会在图书馆的门厅里或学术会议上不断交流，也会借助电子邮件交换意见。有时候，我们也会相互走动、拜访。很显然，我的这本书之所以能问世，完全是靠着朋友和同僚的倾情襄助。

在此，有两个人是我要特别感谢的。第一个当然是我的妻子梅特，她陪伴我多年，对于本书中出现的几处笑料，她都欣然应允成为主角（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诡计，她要读完全书才能找到这些情节）。另一个就是我的老友斯科特·施瓦茨（Scott　Schwartz），他住在纽约，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讨论本书的规划，并帮我确定了本书的内容范围。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但他的善意和帮助不曾减少，他审读了各章的初稿，他的智慧和敏锐令我获益良多。所以，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第一章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6世纪晚期

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MS 286

本章结束的时候，我会讲述教皇本笃十六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西敏寺高高的圣坛前面向我弯腰致谢的场景，当时是有电视转播的。不过，在转向这个非同寻常的场景之前，我们应当先追随一份抄本，一起去穿越那段历时一千五百年之久的英格兰历史进程，在这趟悠长的旅程中，我们将遇到多个教皇，当然还有多个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 1504~1575）就曾身居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大位，也曾是这份抄本的主人。帕克曾在剑桥大学求学，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不久后获得圣职，成为神父。机运不错，帕克很快便借助诺福克的家族关系，成为安妮·博林的家庭牧师，安妮·博林从1533年开始成为亨利八世的王后，一直到1536年因叛国罪被处决。路德宗的改革浪潮，正是借由安妮的圈子，渗透到英格兰宫廷当中的。这个于宗教大复兴时代涌动而起的思想浪潮势头猛烈，帕克显然是沉浸其中了。1544年，在亨利八世举荐之下，帕克获得任命，成为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的院长。随后，帕克结婚了，这在当时的英格兰教会圈子里面可是相当激进的事情。1553年到1558年是玛丽女王的统治期，这位女王秉持反改革立场，帕克遂失去了自己在剑桥的职位。1559年，新王伊丽莎白登基，伊丽莎白是安妮·博林之女，帕克遂蒙伊丽莎白传召，前往伦敦，成为女王驾前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受命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坐实。

帕克最终用《伊丽莎白宗教法案》（Elizabethan Settlement）给英格兰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画上句号，新的英格兰教会起初在路线上就跟欧洲大陆的新教相去甚远。马丁·路德回望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时代，并据此反对教皇制度，从这个方向对罗马教会实施打击，摧毁其制度和权威。为此，路德提供了新的《圣经》译本。这个译本所依托的原本，要比诞生于4世纪的圣哲罗姆拉丁通行本更为古老，也更贴近圣言。马修·帕克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他所倚重的是早期教皇序列以及以圣彼得为开端的正统使徒序列。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于590年到604年居教皇大位，教皇是帕克最为倚重的人物，是他的英雄，而这主要是因为这位教皇于596年向英格兰派出了第一个正式的传教团。这是一批意大利僧侣，以一个名叫奥古斯丁的人为首，奥古斯丁是罗马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后来被人称作“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于597年率团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登陆，尔后归化了当时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约560~616）。这个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团在坎特伯雷附近修建了一座教堂，并在城外建了一座修道院；这座教堂最初是作葬礼之用的，也是用来供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他们是罗马的护佑圣徒。奥古斯丁自己则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座修道院后来被更名为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以纪念奥古斯丁。就这样，它在坎特伯雷郊区存续了近千年之久，直到1538年被亨利八世取缔，那也是帕克生平当中的大事件。





马修·帕克（1504~1574），雷米吉乌斯·霍根贝格（Remigius Hogenberg）于1573年为帕克制作的刻版画，图中七十高龄的大主教正阅读《圣经》，窗沿上的沙漏在计算时间，显然，时间快用完了

马修·帕克是第七十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以奥古斯丁为这个大主教

序列的始祖。帕克相信，最初的传教团有意创建一个完全独立的英格兰教会，所谓完全独立，意思就是不受罗马管控。就帕克而言，自597年起，欧洲大陆的宗教发展历程便跟英格兰无关了。由此观之，也难怪帕克会给出论断说，放眼整个欧洲，唯有英格兰保存了基督教会的初始纯真，并且帕克认为，这也正是格里高利和奥古斯丁两位圣徒当年的心愿。如此看来，帕克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纯净的英格兰教会是因1066年的诺曼征服以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开启的天主教集权进程而遭到腐化，并归于毁灭的。伊丽莎白时代有一批心怀乡愁之人，他们不免要回望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且将之视为英格兰民族认同和英格兰独立性的黄金时代。帕克更是认定，16世纪的改革实践，比如，宗教仪式使用地方语言，再比如将王权置于教会的轴心，在16世纪的欧洲人眼中是相当激进的，但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1568年，帕克从枢密院获得许可，可以将英格兰地界的一切宗教抄本查收并予以看管，只要这些抄本能证明这场“安立甘宗改革运动”的正确性，并最终为伊丽莎白的改革议程提供实实在在的先例支持。帕克最终斩获了大约六百份这样的早期抄本，这些抄本中的大多数来自新近重建的教堂图书馆或者先前的修道院，且有很多是当时英格兰拥有的年代最久远的文献。这令帕克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收藏家，远远早于罗伯特·科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 1571~1631），后者收藏的抄本如今成了大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早于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博德利爵士的收藏成就了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我们将在第六章走访这家图书馆。坎特伯雷附近那座存续千年但已遭废弃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为帕克提供了大约三十份这样的早期抄本，其中最古老者当属那所谓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它是中世纪英格兰存留下来的最为古老的书册。这份抄本就是本章的主角。



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的马修·帕克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楼上的房间，由建筑师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 1778~1839）设计而成

1574年，大主教帕克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他安排人将这些藏品从兰伯特宫，也就是他在伦敦的官邸，转移到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后者算是他精神上的老家。捐赠契约开出了两大条件。其一是向公众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圣体学院做得很糟糕；其二就是每年的8月对学院图书馆实施一次核查，只要这些抄本有残损或者丢失的情况，不管是否严重，学院图书馆都将失去全部获赠藏品，这些抄本也将随之被转送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这个学院跟圣体学院在剑桥镇的同一条街上，拥有帕克捐赠的一批都铎时代的餐桌银器，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物件。这样的惩罚条款实在有点吓人，令圣体学院不敢轻易让外人参观这些抄本。四百多年来，帕克图书馆的藏品的借阅难度之大一直是出了名的，甚至成了一桩丑闻，即便能够借到手，也完全是靠着奇怪的运气。说起来也不知道该不该骄傲，我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前往这座图书馆，希望能借阅一份抄本，就遭到了拒绝，如今我遍历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帕克图书馆仍然是唯一一个曾将我拒之门外的图书馆。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读者，倒也不能完全说是坏事，毕竟如此一来，帕克图书馆的藏书就可以非常安全地待在高阁之上，完好如初，跟宗教改革时期的状况几乎没有差别。这些抄本在目前所藏之处的时间之长是本书涉及的其他抄本所不能比拟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圣体学院领导层决定改变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将这笔伟大财富开放，供人们研究。为此，他们从各个渠道筹钱以便支付专职馆长的薪水，这中间，芝加哥唐纳利基金的贡献最大。二十五年前被拒之门外的那个人便在这个时候提出应聘申请，并于2000年获得任命。很快，帕克图书馆便成为借阅率和开放率最高的图书馆之一，

无论是在实体借阅还是图书电子化方面都是如此，作为馆长，我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有不小的贡献，不过主要功劳并不在我，而在于时代。时代变了，人们当然都希望帕克图书馆能顺应时代变迁，找到新的定位。

剑桥大学共有二十九个学院，圣体学院是其中的一个。该学院通常有两百六十名本科生。学院最古老的建筑恐怕要追溯到14世纪中叶。读者若是想借阅帕克图书馆的抄本，便可以穿过特兰平顿大道那处超大的中世纪风格门厅，在门廊左手边的登记处登记一下，让图书馆工作人员知晓情况，之后就可以进入学院了。再往前走便到了所谓的“新院”，这是一片人工修建的四方形草坪，面积相当大，一直有人负责维护，四周有灰白色仿哥特风格的石头建筑将草坪围拢起来，这些建筑建造于19世纪20年代，建筑师是威廉·威尔金斯。（“新”在英格兰总是相对而言的；比如说，“新森林”的历史要溯源至11世纪。）游客来此，通常会聚集在拱道之上，做一些自拍或者偷看之类的事情，好奇心会让他们瞥一眼楼梯近旁房间里面的本科生和学院工作人员。继续往前就是学院教堂的大门，大门两边是尼古拉斯·培根和马修·帕克的雕像，前者是学院的捐款人，身上挂着钱袋，而帕克则两手放在书册之上。库房在教堂的左边，也就是培根雕像的那一边，院长办公室则在教堂的右边。在新院北边可以看见一排高高的尖顶窗，尖顶窗的后面就是学院食堂。草坪南侧建筑的一层以上空间大部分归属帕克图书馆。按响新院角落处高高的哥特式大门的门铃，你就能进入一条昏暗的走廊，走廊正前方是一道石头台阶，走廊右侧则是一道大门。游客通常会拾级而上。在台阶的尽头就是相当宽敞的帕克图书馆，它的屋顶非常高，四周墙壁上布满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抄本和后来印刷版的书册，更有灯光明亮的玻璃书柜，从厅堂的一端伸展到另一端，里面陈列的都是极为精美的抄本。有心研读珍本的读者，则会被领到底层安保措施更好的阅览室。

底层的厅堂不如楼上那么大，曾是本科生图书馆的一个角落。这里的墙壁是浅绿色的，地毯则是灰色的。南面墙上装有配备了遮光窗帘的竖框窗户，从此处可以俯瞰圣巴托尔福教堂的庭院；北面的窗户则可以看到新院。阅览室里配备了20世纪30年代的橡木书柜，后来还增添了灰白色的橡木桌子和十四张扶手椅，椅子则都配备了鲜红色的皮革坐垫，这是抄本收藏家季福德·康布斯（Gifford Combs）的赠礼。墙壁上还有一块玻璃饰板，是由利达·金德斯利（Lida Kindersley）设计的，上面呈现的是2010年6月21日菲利普亲王亲临阅览室开馆仪式的场面，菲利普亲王当时还是爱丁堡公爵。

现在是时候看看这里的第286号抄本了，这份抄本是帕克图书馆最古老，且最珍贵的藏书。阅览这份抄本的读者因此也会享受图书管理员随时陪同的特权，且一般读者或者只是出于好奇心前来观瞻的读者是无缘展读这样的抄本的。这份抄本已经极为脆弱了，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其价值和意义是神圣的。大主教帕克不正是在597年以此为依托展开了追寻英格兰基督教之渊源的历程吗？这份抄本存放在带有报警器和空调设施的圆罩里面，一个坚实的橡木盒子就是它相当合身的住所，该橡木盒子是学院建筑师罗杰·米尔斯出资制作的，米尔斯是学院的老人了，如今他的名字就刻在一块皮革名签上面。您需要稍等片刻，待我双手捧出

这橡木盒子，将其轻轻放在桌子上面，然后我们揭开铜扣环，将厚重的盒盖掀开，借此将那精妙的压力释放出来，这盒盖的压力是为了确保抄本在没人使用的时候保持密闭状态。压力释放之后，便可以听到抄本在那舒适且坚实的灰色热塑性塑料泡沫床上沙沙作响。我们将小心翼翼地捧出抄本，此时，桌面之上已经备好了一块橙色书垫，那里将是放置抄本的地方。



这是打开后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这一页呈现的是福音书作者圣路加的画像，照片拍摄于帕克图书馆

人们在同名人会面之后，经常会评论说，太出人意料了，此等名人，身材竟然是那么矮小。就其在英格兰历史当中的分量而言，这份抄本的体型当然不算大，第一次见到它的人，甚至不免会有些失望。抄本大约10.5英寸长、8.5英寸宽、3英寸厚，很轻，一只手就能轻轻松松地将其托起来。抄本被装订在橡木板里面，这些橡木板的内侧边缘都经过轻微打磨，形成斜边，书脊由用明矾鞣制过的奶油色山羊皮制成，正是英格兰“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所推崇的风格——装订工道格拉斯·科克雷尔（Douglas Cockerell, 1870～1945）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书脊本身已经因为年岁久远而失去了亮色，它被分成六个长方块，其中一块上刻着金色的“MS 286”字样，另一个长方块上刻着一个马耳他十字架；底端是“C.C.C.C.”四个字母，这是“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的首字母缩写。除此之外封皮上便没有别的字样了。1948～1949年，抄本被送往大英博物馆重新装订，并于1949年7月被送还。抄本的这趟旅行当然还有别的结果。封底里之上多了一张标准的大英博物馆记录单，显示1948年7月时该抄本的总页数，出自时任大英博物馆抄本管理员埃里克·米勒（Eric Millar, 1887～1966）之手。当时的助理管理员是弗朗西斯·沃莫

尔德（Francis Wormald，1904～1972），他非常珍惜同抄本的此次接触机会。不久后，沃莫尔德在剑桥大学举办了著名的桑达斯讲座（Sandars Lecture），这个系列讲座开始于1949年11月29日，它极大提升了这份抄本在20世纪的世界知名度。

大英博物馆的装订工将各折跟独立且突出的护纸末端缝合在一起，令各折向外散开，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在不折到原有羊皮纸的情况下以九十度角将抄本打开。这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保护方法，现在已经不用这样的方法了，因为这会人为地改变原本的完整性，而且在书页被翻动的时候，各折之间会因此发生摩擦。此番重装工作添加了封底里，同时非常好地保留了18世纪中叶那次重新装订留下来的衬页，以及中世纪时候留下来的那些衬页。这些衬页当中，前两页是空白的，有可能来自中世纪晚期。至少有一张衬页很明显最初是封底里，是用来衬垫抄本最初的封底的。这张衬页和当前的封底衬页拥有能相互匹配的长方形凹口，顶端也都有微小的带有锈迹的孔洞，这些孔洞很可能是中世纪装订工艺所需要的底板上端链搭扣留下来的。显然该抄本曾被用链固定，并以封面朝上的形式被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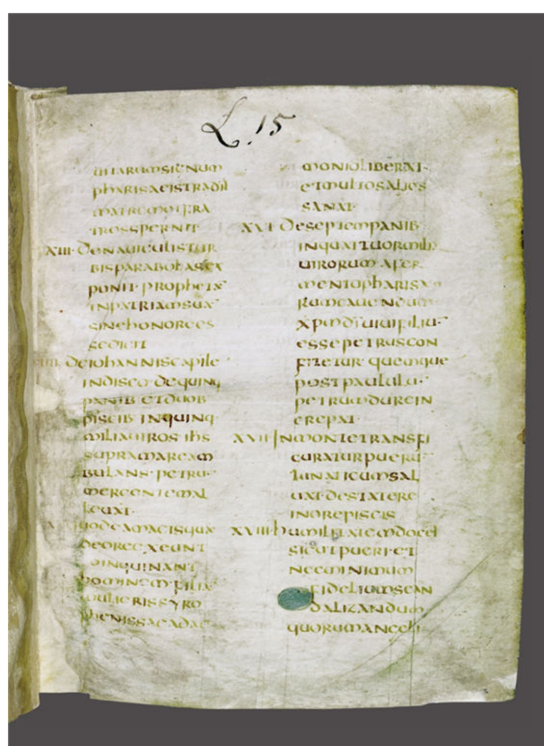
后文会对这份编号为“MS 286”的抄本进行更详细的呈现，现在我们先大致浏览一下抄本内部的情况，想必很多人已经急不可耐，毕竟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抄本的内容是《新约》的四福音书，均来自圣哲罗姆的拉丁通行本，这个拉丁译本是从最初的希腊原本翻译而来的，拉丁语是当时西欧的日常语言。“通行”一词自宗教改革之后便有了批判意味，在新教群体看来，代表了神秘的且普通民众无从理解的东西，但其最初的意思是说这是译本出现之时的日常语言。抄本创制之时，拉丁语仍然是西欧的通用语言，哲罗姆于420年谢世，其谢世到这份抄本问世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或者埃米利·勃朗特（Emily Brontë）距今的时间。抄本问世之时，罗马帝国刚刚解体。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东哥特人则于546年再次洗劫罗马，相关记忆仍然留存在人们心中。基督教帝国的概念于此时出现，拯救了从罗马帝国传递下来的身份认同。圣奥古斯丁的英格兰传教使命，是罗马教皇之帝国情感和观念的最早的有意识表达。

《马太福音》正文内容的前面是“章节”（*capitula*）目录，现存抄本以目录的中间部分开篇。这些目录是由标题或者章节内容摘要组成的列表（当然，中世纪早期的章节划分模式跟现代不一样，现代模式直到13世纪才开始出现）。现存抄本开篇的几个词是“[nine]vitarum signum pharisaesis tradit”，指的应该是基督向法利赛人传递来自尼尼微人的消息（按照今天的章节排列，这部分内容应该出自《马太福音》12:41）。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文字都丢失了。《马太福音》的正文则是从第3对开页开始的，“*Liber generationis* ih[es]u xp[ist]i filii david…”（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1:1）。抄本当中，这句话的前两个词是红色的，我在这里用斜体予以标示，后面的词逐渐淡化成浅橙色，差不多接近褐色，而且最前面的字母“L”要比后面的字母稍稍高一些。显然，福音书开篇的风格是相当克制且拘谨的，没有非同一般的装饰或者着色，这跟后期的抄本，特别是《凯尔经》，完全

不是一种风格。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正文以两栏并列的形式排布，且以小小的安色尔拉丁字体（uncial script）写就，非常工整。“安色尔”这个称谓的来历仍有争议，最早是哲罗姆使用的，但哲罗姆并不待见这个称谓，认为有些轻浮。讽刺的是，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拉丁译本的通行，安色尔字体也被大范围地使用。有时候，人们会将“安色尔”一词同“*uncia*”联系起来，后者的意思是“一寸”（其副词形式是“*uncialis*”），人们经常相当夸张地认为大字体会有一寸那么高，这当然是错觉。安色尔体很快成为早期基督教文本抄本的通用字体，就如同俗大写体是世俗抄本的通用字体一样（参见第四章）。安色尔体是由曲线构成的大写字体，个别字母有点类似于其现代的小写体版本，比如说，字母“h”会有一个高出字母“x”高度的部分，字母“f”会有向下伸展的部分，字母“d”则会有一个优雅的圆背。写这种字体的书写工具通常是宽宽的羽毛管，也可能是芦苇秆，这样的话，笔画的宽窄就能够判然有别，而且不会形成密密麻麻的文字，抄本阅读起来也不会那么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使用这种字体的抄本的年龄。在中世纪，安色尔体成了古老和权威的象征。《语词汇编》（*Corpus Glossary*）是一本按字母顺序编排的词典，大概诞生于800年，同样出自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如今也藏于帕克图书馆。据这本词典，“antiquarius”一词的意思是“qui grandes litteras scribit”，翻译过来就是“写大字体的人”，意思就是古物研究者都会使用安色尔字体。

“MS 286”号抄本的抄写模式是所谓的“*per cola et commata*”，翻译过来就是“从句和短句分行法”，也就是每句话的第一行覆盖一栏的整行长度，下面的所有行则都要短一些。哲罗姆拉丁本的原始抄本应该用的就是这种模式，早期抄本都奉行这种模式。一个人能够一次性阅读的内容或者能够一口气大声诵读出来的内容形成一个单元。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第一行，尔后便是断句或者停顿，这个时候，读者应该换口气并自然而然地寻找下面一行的文字，“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再换口气往下读，“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等等，如此往复。温斯顿·丘吉尔的伟大演说就是遵循这样的模式写就的，因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在眼光一闪之间获取所需表达。他那著名的修辞停顿也是在演说稿里面预先安排好了的。这样的模式主要是为大声诵读而设计的，这个情况恰好也令我们对《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份抄本的文本来自一个口传文化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通常不识字，因此，面对《圣经》经文，他们只能是听众而非读者。



现存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开篇页，内容为该福音书的章节目录，顶端还有“L. 15”的字样，这是早先该抄本在帕克图书馆的书架编号

第二部福音书，也就是《马可福音》，其内容是从第75对开页的右页开始的，也有引言和章节目录的部分，正文则是在六页之后开始的。第三部福音书是《路加福音》，正文前面也有引言和章节目录，不过，在这些页面之前还有一整页的图画（第125对开页的右页），呈现的是耶稣受难的十二个场景，这十二个场景被圈定在一个方格子里面。正文开始之页的对页也是一整页的图画（第129对开页左页），呈现的是这部福音书的作者本人路加，他坐在一处拱门下面，他的上方是象征他的那头牛，两侧则是他的福音书中的一些场景。在公开展示这份抄本时，人们通常是将这一页呈现出来的，因为这是唯一有彼此呼应的文字和配图的开篇页。要找到这一页实际上并不难，因为经年累月被人们反复翻看的这份抄本，会很自然地在此页处打开。最后的《约翰福音》则是从第208对开页的右页开始的，同样有引言和章节目录。该抄本以如下词句结束：“ D[E]O GRATIAS”（严格来说，第一个词应当是这么拼写的：D[OMIN]O），最后是“SEMPER AMEN”的字样。可能是因为在弥撒仪式上，在结束福音书宣读环节之后，人们按照规矩总要说上一句“感谢上帝”的，这也很可能表达了抄写员自己的情感，因为独自完成五百三十页之巨的文本的抄写工作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实在是应该感恩一番。此处的字体采用俗大写体而非安色尔体，因为此处文字并非经文，这就如同我们会使用斜体将其他语言的文字同正文区别开来一样。抄本的最后设置了一些空白页，用来展示特许状以及相关的修道院记录，这其中

还包括了一份很有意思的12世纪遗迹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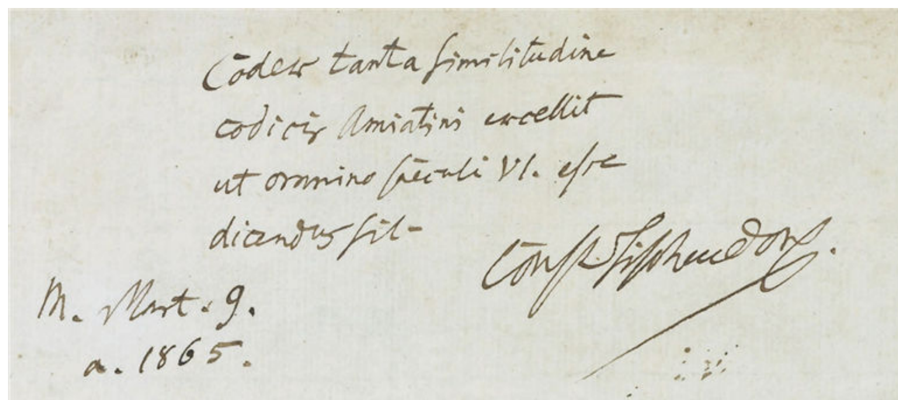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插图页，呈现的是从“受难”到“进入耶路撒冷”再到“十字架事件”的连环画面

抄本最后的衬页之上是昔日访客留下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印记——一句以拉丁语写成的话，这句话颇为傲慢地告诉世人，这份抄本像极了《阿米提奴抄本》，因此定然是6世纪的东西。它的落款是“Const. Tischendorf”（康斯坦丁·蒂申多夫）。《阿米提奴抄本》是下一章的主角，它比《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晚了百年之久，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似度并不高，除了都使用了拉丁安色尔字体外。康斯坦丁·蒂申多夫（Constantin Tischenforf, 1815~1874）是莱比锡人，于1844年发现了《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希腊语《圣经》的原始抄本，蒂申多夫也因此得以在19世纪圣经学界“肆意行走”。1865年3月9日，星期四，他在《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上面留下了那句话并给出了签名，这一天他是来剑桥大学领取自己的法学博士学位的。最初浏览这份抄本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曾留意他留下的这个细小的印记；是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图书馆馆长兼修道院院长尤斯丁·西奈特斯（Justin Sinaites）后来提醒我注意它的，对此尤斯丁颇为恼怒。今天，西奈山方面仍然记得蒂申多夫，不过不是把他当作英雄——而是当作盗贼，他盗走了修道院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4世纪的希腊语《西乃抄本》。

见到这份抄本的人的态度往往是截然两分的，要么是恭敬崇拜，要么就是嘲笑讥讽，对其真实性倍加怀疑，通常还带有那种清教徒式的蔑视，也就是清教徒在面对圣徒遗骸或者遗物之时的典型态度。（很奇

怪，人们能够很轻易地接受中世纪抄本归属世俗名人的情况，比如秃头查理的那本《圣经》，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圣徒，人们就会嘲讽他人盲信盲从。）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奉为极具属灵价值的宗教遗物。亚利桑那州圣公会主教就写了本新书谈论这份抄本，立意是这份抄本对今日基督徒的意义。2005年，这份抄本在菲茨威廉博物馆展出，当时，博物馆的抄本管理人斯黛拉·潘娜约图瓦看到一个访客一边啜泣一边亲吻玻璃展柜前的地面。这类物件是有其意义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客观地对这份抄本的所有权问题进行考据。



康斯坦丁·蒂申多夫（1815~1874）在抄本书页上添加的评注，蒂申多夫于1865年研读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并将之同《阿米提奴抄本》进行了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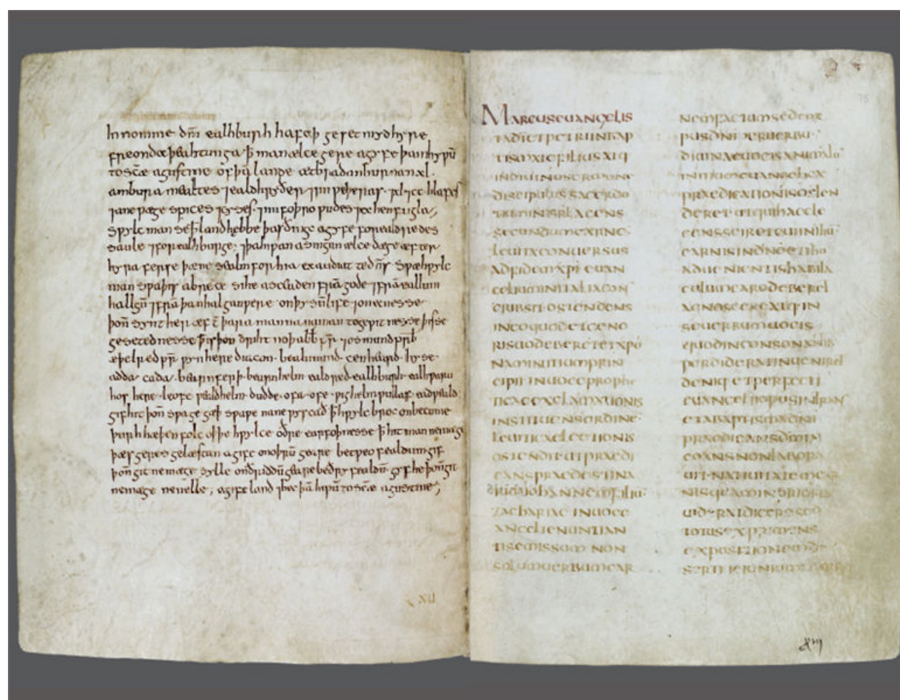
汉弗雷·万利（Humfrey Wanley, 1672~1726）是一位古文物研究者，也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而且肯定不是那种盲从盲信的天主教徒）。在后宗教改革时代，他是第一个将帕克图书馆中的这份藏品同坎特伯雷的那位圣徒联系起来的人。早期的学者中仅有寥寥几人可以自由接触圣体学院的那笔帕克遗产，万利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699年拜访了帕克图书馆。1705年，万利在牛津出版了一部讲述北欧古代文学的著作，并在书中对这份抄本进行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在这本书中，万利着重提醒人们注意比德（Bede）的格里高利纪事当中谈到的那个情况：格里高利在派遣奥古斯丁从罗马奔赴英格兰后，又于601年为其准备了在英格兰创立教会所需的物品，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书册”（codices plurimos）。万利征引了一段出自15世纪早期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文字，文中提及格里高利的遗物中有两份福音书抄本。万利认为，这两份抄本中有一份就是帕克图书馆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另一份福音书抄本与之类似但没有装饰，目前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早期的古文物家都接纳了这一看法，认为这两份抄本都是由圣奥古斯丁引入英格兰的。这些古文物家中就包括托马斯·阿斯特尔（Thomas Astle, 1735~1803）。1784年，阿斯特尔出版了印刷版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很快，这个版本便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中的路加画像，图中，路加的两侧是福音书中的一系列叙事场景，路加的头顶则是一头长有双翼的小牛，那是圣路加的象征物

收藏在博德利的抄本很显然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便已经在英格兰现身了，不过，并无明确证据表明这份抄本同中世纪时期的坎特伯雷有什么关联。1603年，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将这份抄本捐献给博德利图书馆，在此之前，这份抄本的历史一直隐没在黑暗当中。在该抄本当中，某一书页的页底空白处有一个早期注释，注释内容是说，在圣徒查德（Saint Chad）的节日之时，人们应该诵读《约翰福音》第九章，而这章的内容就在这则注释的附近；由此便可知，麦西亚古国（Mercia）的人是用过这份抄本的，抄本具体的出现地点很可能就在利希菲尔德，那里是圣徒查德的埋葬地。自万利之后，抄本研究工作在不断进展，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博德利抄本由奥古斯丁引入英格兰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MS 286”抄本由奥古斯丁引入英格兰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这份抄本确实曾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内，并且可以肯定，在7世纪晚期它已经置身于英格兰了，因为其文本当中有一些修订，绘图旁也增加了一些说明，它们很显然都是用那个时代的南方英语字体写就的。抄本空白页后来被用于记录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特许状及修道院所有的财产。这其中最早的是10世纪时留下的文字，就在写有《马可福音》引言开篇的那张书页的对页上。它是用古英文写就的一份遗赠令，记录了一个名叫厄尔博格（Ealhburg）的妇女于9世纪中叶赠给修道院的财物，这些物品包括一头小牛、四只羊、几只母鸡、面包、奶酪和木料，都是她在肯特郡布拉伯恩的财产，作为交换，修士们将为她和她的

丈夫厄尔德雷德吟唱圣咏，为期二十天。另一处出现在正对着《马可福音》正文开篇页的页面的上端空白处；这是以伍尔弗里克（Wulfric）的名义写下的一份土地许可状，伍尔弗里克于989~1005年担任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封底前的衬页之上也有提到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土地赠送状，字体优美，是在如今的伦敦东南部的普拉姆斯特德（Plumstead）立下的，具体时间可以追溯到1100年，因为里面有文字指出，地产赠送之事发生在国王亨利的女儿玛蒂尔达同皇帝亨利五世订婚那一年的大斋节。帕克图书馆编号为“MS 270”的抄本——一份同样来自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弥撒书——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土地赠送状下一页的顶端是一份12世纪的圣物名录，这些圣物被保存在修道院的一个小小的黑盒子里面，包括真十字架的碎屑、圣母袍服的碎片、圣塞西莉亚的头发，还有圣徒格里高利的一根手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份抄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已经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财产了，而且很可能就在圣物管理人的看护之下。依据14世纪的一份修道院章程，圣物的管理权在教堂圣物管理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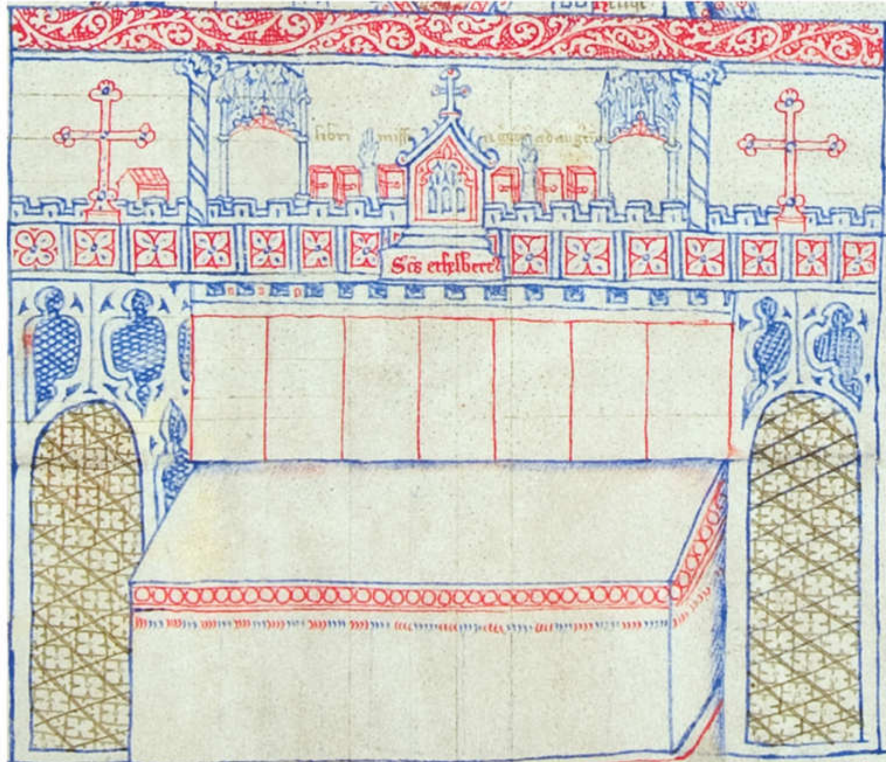
第28~29页：《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的引言的开篇，这一页的对页先前是空白页，后来有人在该页上用古英语记录厄尔博格的遗赠令

Hec sunt reliquie in uno paruo nigro scrinio flore uno signato. De ligno dni plures particule. De Sepulchro dni. De Scapula Sci Nicomedis mart. De Capill Sce Cecilie uirg 7 m. De S Margareta. De S Januario. De vest S Marie. De ossib 7 uest S Clementis m. De uest S Cecilie. De S Antonio epo. De S Laurentio m. De S Johe Bapt o sui. De S pancratio m. Costa de S Mathia aplo. De S Wandregesilo. De Sco martino. De S Medardo atq; Gildardo. De S odulfo epo. De S Audoeno. De uis S Vedasti. De S Wlgano. De S paulino. De S affre . De S Geruasio. De S Ambrosio. De cruce S Andree apli. De S Aldretha. De S Wilfrido. De S Cadgutha. De S Folquino. De Sca Walburga. De S Amato epo. De S petrocio. De S Bartholomeo aplo. De S Tecla. Uigin S Gregorii. De S Jacobo aplo frr S Johis. De S Nicholao. De S leonardo. De S Benedicto. 7 alie plures reliquie sine scriptis. 7 de S fide 4.

hollord. Ketil. Ozor. Yun. Andreus. Aslache.

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圣物名录，其中包括真十字架的残片以及圣格里高利的一根手指，这份名录是后来被添加到《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当中的

有两份重要的中世纪文献足以表明，修士们收藏并看护的这些宝贝是由教皇格里高利在归化英格兰之时赠送给修道院的。第一份文献是修道院的编年史，为托马斯·斯普罗特（Thomas Sprott）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所作。这份编年史的原件被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其中，斯普罗特在提及圣格里高利的《圣经》的同时，也提到了“福音书”（“et evangelia euisdem”），以及另外一批圣物，包括格里高利派人从罗马送来的法衣。第二份文献则是修士托马斯·埃尔姆罕（Thomas Elmham）于1414年写就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镜鉴》（*Speculum Augustianum*），这是一份修道院院志性质的文献，对修道院的历史进行了追溯，但较之上一份文献，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原件收藏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埃尔姆罕在其中详细介绍了一批珍贵书册，它们被他称为英格兰教会的“第一批果实”。他还展示了一幅绘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那高高的圣坛的画作，画中还绘有埃塞尔伯特国王的圣物箱，圣物箱的两边斜靠着六本闭合的书册，其封面都是红色的。这幅图的上方配有说明文字“libri missi a gregorio ad augustinum”（“格里高利赠奥古斯丁”）。埃尔姆罕逐一描述了被赠的书册，当然，其中有一些没有出现在圣坛上。如今那两份福音书也可以厕身其中了。1705年，汉弗雷·万利就是以此为证的。据汉弗雷的描述，这其中有一份抄本就保存在帕克图书馆，并且是同圣格里高利的那两卷《圣经》保存在一起的（后来那两卷《圣经》散佚了）。埃尔姆罕指出，福音书抄本是以“十大福音正典表”（ten canon tables）和引言为开篇的，引言的开篇词是“Prologus canonum...”很明显，修道院图书馆的格里高利《圣经》和福音书抄本，正是斯普罗特于一个世纪之前提到的那些抄本。埃尔姆罕于1414年谈到的“第一批果实”当中的第二份福音书抄本，收藏于修道院的小礼拜堂，它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圣米尔德雷德福音书》（Gospels of Saint Mildred）。关于这份福音书抄本，有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塔内特的农夫因为在其面前立了假誓而失去了双眼。



托马斯·埃尔姆罕1414年的画作，呈现的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圣坛，画中，国王埃塞尔伯特的圣物箱两侧都放置着圣格里高利的赠书

米尔德雷德·布德尼（Mildred Budny，注意米尔德雷德这个名字）一直在准备详细讲述帕克图书馆的这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抄本，并最终于1997年出版了自己的相关著作。她在书中谈到了“MS 286”号藏品，认为它应该就是《圣米尔德雷德福音书》。圣徒米尔德雷德于700年前后谢世，是肯特郡一个公主的女儿；她的母亲在肯特郡的塔内特的明斯特（Minster-in-Thanet）创建了一座女修院，米尔德雷德遂成为这座女修院的院长。这座女修院在坎特伯雷东北方向，距离坎特伯雷大约十二英里。圣米尔德雷德据说是埃塞尔伯特国王的玄孙女，而奥古斯丁予以归化的就是这个肯特的埃塞尔伯特，这就为由奥古斯丁传教团引入英格兰的意大利抄本建立了一条合情合理的传承脉络。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圣米尔德雷德的这份福音书抄本显然曾在塔内特，毕竟有一个农夫因为在其面前立了假誓而遭到严厉惩罚，若真相如此，那么这份抄本应该就是在1030年前后来到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圣米尔德雷德的所有遗物都被转交给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这份抄本也应该就在其中；然而，修道院方面有证据显示，这份抄本最迟在10世纪便已经是修道院的财产了。简言之，倘若“MS 286”号抄本是埃尔姆罕提到的两份福音书抄本之一，那么它肯定是他提到的第一份，也就是收藏在帕克图书馆的那份。如此一来，也就能够解释前文提到的链搭扣留下的痕迹了，原因很简单，图书馆藏书都是有链搭扣的，修道院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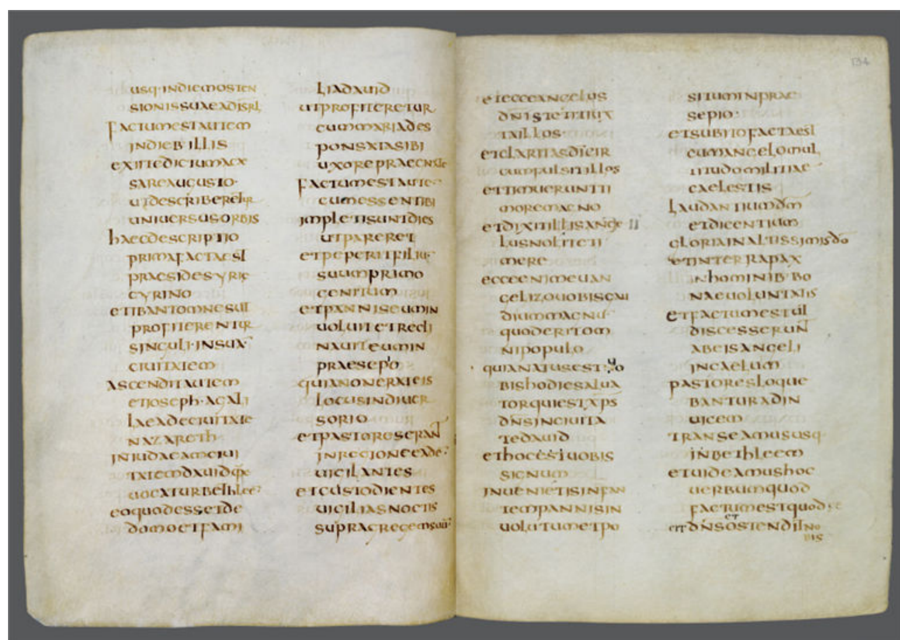
堂的祈祷书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而《圣米尔德雷德福音书》当时就已经是一份残损的抄本了，如今则被拆分开来，由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和剑桥大学的帕克图书馆分别收藏。人们有时候也会将两份藏品统称为“伦敦——剑桥福音书”，两个收藏机构则将各自收藏的部分标示为格里高利给予奥古斯丁的赠礼，但实际上这份抄本是于700年前后在英格兰创制的，否则圣米尔德雷德就没有可能成为这份抄本的主人。

现在不妨归总一下，“MS 286”号藏品应该就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理据有四个：其一，比德的记载，比德曾谈到格里高利赠予奥古斯丁一批抄本，让奥古斯丁带往英格兰，奥古斯丁极有可能完成了此一使命，而且赠礼中必定包括了一份福音书抄本；其二，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中世纪档案当中有两处证据显示，格里高利的赠礼当中的确包括了一份福音书抄本，并且是同一份《圣经》抄本一起保存的，这份《圣经》抄本据信也是圣奥古斯丁的遗物；其三，帕克图书馆的“MS 286”号藏品最晚在7世纪晚期便已经出现在英格兰了，并且最晚在10世纪时肯定已经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财产了；其四，既然如此，这份抄本肯定以某种方式来到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由6世纪晚期那个意大利传教团直接传递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这就是我们能从已有证据中得出的结论，且大体上情况应该就是这样，但我们无法给出最终定论。反对者当然也会提出自己的说法，认为这份抄本很可能是在问世一个世纪之后，借由什么中间渠道，从南欧来到英格兰的。

不过，还有一项证据是可以提起的。1933年，法兰克福的汉斯·赫尔曼·戈伦茨（Hans Hermann Glunz, 1907~1944）出版著作，对这份抄本给出了很有意思的分析。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恰好关系到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戈伦茨的这个结论一直以来被人们忽略。哲罗姆的拉丁通行本逐渐成为中世纪的标准版本，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那么顺畅，因为这需要取代先前的“旧拉丁译本”（*Vetus Laina*），尽管这个旧译本的语言不太流畅，但已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当中流行了很长时间。哲罗姆译本虽然更为精准，但其被接受的过程一开始进展得相当缓慢，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众多信徒秉持保守态度，仍然沿用他们更为熟悉的旧译本，因此留存下来的旧译本抄本是非常多的。帕克图书馆这份“MS 286”号藏品通常被视为哲罗姆新译本当中最为古老的四福音书完整抄本，当然这是就现存的抄本而言的。此一看法实在事关重大。在抄本家族谱系当中，我们的这份抄本享有“X”标记，足见其《圣经》文本的主要证人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万利也不免注意到，我们的这份抄本出人意料地同哲罗姆拉丁通行本存在许多出入。戈伦茨颇为系统地辑录并归总了这方面的情况，举证了将近七百个这样的分歧之处。其中大多数是不足称道的微小差异，基本上是词语顺序或者拼写方面的。也有一些是因为抄写员选用了旧译本的拼写，根本就没有参考哲罗姆的译本。现在各位可要听好了，因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向奥古斯丁赠送了这份福音书抄本的教皇格里高利（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圣物箱里面保存了圣奥古斯丁的一根手指，这也一度为教皇格里高利所拥有），也是著名的《圣经》评注人。《道德论丛》（*Moralia*）是他对《约伯书》的评注和阐释，在这本评注当中，格里高利给出了如下结

论：哲罗姆译本和旧译本在他那个时代的教皇宫里都在被使用，并且从他自己的评注当中也不难见出，他虽然使用的是新译本，但若是旧译本的某些词句更能契合他的具体思路，他也会予以采纳。中世纪的圣格里高利画像通常呈现的是他写作的场景，在那样的场景当中，圣鸽会在他耳边低语，由此表现他在做评注之时会得到超自然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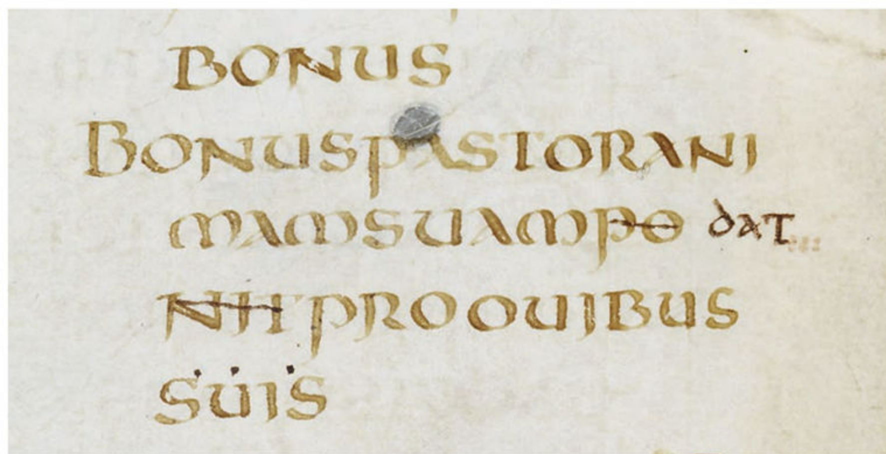
格里高利还为四福音书编写了布道词，这份布道词于593年发布，四年之后，他便派遣传教团开赴英格兰了。记录了这份布道词的最古老抄本之一如今也收藏在帕克图书馆，编号为“MS 69”，是一份8世纪晚期的抄本。以下情况便是问题的关键：但凡“MS 286”当中出现旧译本词句的时候，格里高利的福音书布道词当中也会出现相应的词句。尽管戈伦茨并没有就此给出自己的结论，但结论是很明显的：“MS 286”号藏品的确曾经是圣格里高利在罗马的家中的藏品。



第36～37页：这幅插图呈现的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当中旷野里的牧羊人的故事，其中旧拉丁译本的“natus est nobis”在拉丁通行本当中被改成了“natus est vobis”

在此，不妨从抄本当中摘引一些具体例证。第134对开页的右页讲述了一个著名场景，也就是天使在伯利恒附近旷野中的牧群面前显现的场景。此页第一栏第16行的文字是，“natus est nobis hodie salvator”（“今天，我们的救主诞生了”）。后来这句话被用更深一些颜色的字迹修订为“natus est *vobis*…”（“为你们生了人子”，《路加福音》2:11）。很显然，这抄本最初用的是格里高利使用的词句，而这样的词句显然出自旧译本，格里高利自己也说过，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时代的神学圈仍在沿用旧译本，据旧译本，救主之诞生，并不仅仅是为着当年的牧群，也为着今天的我们。还有一个例证。第235对开页的左页

的第二栏为《约翰福音》10:11的内容，其中，基督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好牧羊人，将为自己的牧群舍命。此处，抄写人采用了旧译本的表述："animam suam *ponit* pro ovibus suis"（这句话出现在这一栏的第20～21行；不过，后来依据哲罗姆译本被修订为"animam suam *dat*"）。格里高利在福音书布道词中，用的是旧译本中的"ponit"一词，意思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而非新译本中的"dat"一词，意思是"舍弃"自己的生命，对此，格里高利解释说，"献出"要比"舍弃"更具有自我牺牲的意蕴。第三个例证出现在第262对开页的右页以及第262对开页的左页的顶端一行。此处讲述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初次撞见复活的基督，将之错认成看园之人（《约翰福音》20:15）。哲罗姆译本的措辞如下："illa estimans quia hortulanus *esset*"（此处"esset"一词用的是虚拟语气，句子意为"她觉得那人应该是看园的"）。在帕克图书馆的抄本和格里高利布道词中，这句话都使用了现在时，显然都采自旧译本，即"quia hortulanus *est*"，意思是"那人是看园的"，格里高利显然是在属灵意义上予以解释的，将之视为实际情况，而非虚拟语态下的一种可能性。



此处呈现的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中《约翰福音》10:11的经文，拉丁旧译本讲的是好牧羊人为自己的羊群"献出"生命，拉丁通行本中则是"舍弃"自己的生命

据戈伦茨推测，格里高利手边很可能既准备了一份哲罗姆的新译本，又准备了一些旧译本，以便他在进行评注之时对照阅读。即便不是为了特意进行对比，格里高利也完全有可能使用一份混编抄本。无论是哪种情况，两份抄本之间的重合度可以说是高得惊人。很显然，"MS 286"号抄本就出自格里高利在罗马的书房。仅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在谈论这部抄本之时去掉"所谓的"这个前缀，也足以让我们论定，这份抄本就是当年格里高利为传教团带往英格兰的圣物之一。

眼下，我们的抄本正躺在帕克图书馆长桌的书垫之上。跟古代晚期的许多抄本一样，这份抄本的羊皮纸也很薄，甚至会给人根本就没有重

量的感觉。书页的尺寸并非现代书册那般统一齐整，这恰恰说明，这份抄本与其原始形态相差不大。我们的这份抄本通常是被密闭在圆顶展柜里的，且一直享受着最佳的温度和湿度，一旦它被从展柜里面捧出，进入一个对人体来说温度非常舒适的房间，羊皮纸就会开始迅速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若我们不及时阻止，纸张就会开始卷曲，书页就如同有了生命，引领我们回到童年，令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从玩具店里面买的纸鱼。童年的我们把纸鱼捧在温暖的手心里，看着它弯曲起来，若它有弯曲，则表明我们有心上人，当然，它是一定会弯曲的，那令十岁的我感到何等快乐啊。奇怪的是，我们的这份抄本的羊皮纸是向着纸面颜色更深的一面弯曲的，那最初是羊皮有毛的一面，这跟羊皮还在羊身上之时的自然弯曲情形恰恰相反。管理员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兽皮外侧的纤维更为稠密，同时也更为坚硬，相反，兽皮内侧的纤维则更为柔韧，一旦吸入水分，就会伸展得更为迅速，因此就会出现羊皮纸向外弯曲的情形。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一旦我们翻看下一页，这一页就自然而然地再次变得平展了。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羊皮纸专家伊日·维诺契克（Jiří Vnouček）曾告诉我说，这份抄本的大部分纸张甚至全部纸张，很可能是用绵羊皮制作而成的，这恰好十分适合格里高利，因为他的教皇称谓“格里高利”当中包含了“greges”一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羊群”——这位写了《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的教皇，从来都把自己定位成“牧羊人”。这份抄本的书页上都刻有辅助线，以便抄写人将文字以每页两栏二十五行的格式呈现。差不多所有的抄本都是这样，抄本制作人在划线之时，会同时刺穿多张羊皮纸，以便保持格式一致；就和这份抄本的情况一样，纵向排列的孔通常位于每张纸的中央而非边缘。每张纸上只有一列孔，表明纸张必定是在被对折之前就已经被刺上辅助线了，因为对开页上的孔必须能够重合起来。

该抄本的校勘情况可见下方脚注[1]，具体程式则已经在导言里面解释过了。抄本由以对开页为单位构成的“折”组成，通常是八页，也就是四个开页为一折，每一折当中往往有多处书页佚失的情况，这一点从下方注释提供的校勘情况当中一看便知。在第ii~x开页上，每一页的右上角都有抄写人给出的原始标记，以标示抄本内容的正确次序。比如说，这几页上的标记是字母“Q”（“quaternum”一词的首字母，通常意思就是这部分内容覆盖了四个对开页），这个字母后面则是以罗马数字IV~XII中的一个。这意味着“I~III”折的大部分书页从一开始就丢失了，若以每一折为四个开页，也就是八页来计算，佚失的部分加总起来很可能是二十二页。丢失的内容可能涵括了总引言以及埃尔姆罕前面提到的十大福音正典表，正典表中通常会有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致卡皮亚努斯（Carpianus）的那封解释性质的信，以及《马太福音》的引言和《马太福音》章节目录的前几页。很显然，抄本原有一幅整页插图来呈现《马太福音》的作者。在画中，就跟路加一样，马太也应当坐在一处拱门下，因为正对着这张插图页的页面之上，有很明显的红色印迹。至于该部分会不会像《路加福音》那部分一样，留有连环画式的插图页，以呈现《马太福音》当中的诸多场景，这一点我们就无从确定了，不过，这

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在正对着第78对开页的右页的那个页面上肯定有马克的肖像，因为对面书页之上同样有微弱的红色印迹，不过这一页也已经丢失了。第130对开页右页后面的那一页丢失了，这一页应当是《路加福音》1:17～33的内容。约翰的肖像插图页也丢失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张插图页很明显并没有出现在《约翰福音》开篇页的对面书页之上，因为开篇页上没有残留的印迹，根据校勘情况此处也没有缺漏，这张插图页其实在正对着引言页的地方，引言页上倒是留有轻微的印迹。此外还有一张绘有多幅插画的书页丢失了，它原在抄本的最后部分，且在第215对开页左页上留下了微弱的印迹。除这些外，校勘情况表明抄本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缺损的。

抄本当中出现了整页插图，虽然只有两幅这样的插图存留下来，但这本身已经是相当重要的情况，因为这佐证了抄本最初的主人就是教皇格里高利——这位教皇曾经对宗教插图的价值进行了著名辩护，具体可见他给时任马赛主教的塞勒奴斯（Serenus）的信。宗教插图，这位教皇说，是特别有助于向非信徒传递信仰的，同时也非常有助于将宗教故事传递给不识字的信众。而这恰恰是奉命前往英格兰的奥古斯丁最需要的。据比德说，奥古斯丁在最初引领肯特郡的埃塞尔伯特国王入会的时候，就是依托基督画像实施布道的。

现在不妨仔细看看这两幅存留下来的整页插图。第一幅以十二个方格的形式呈现了十二个宗教故事中的场景，其画框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是用红色纹理的大理石制成的。这幅图出现在第125对开页的右页。方格图呈四行排列，每一行为三个故事场景，都取材于基督受难的故事。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表现形式说成是连环画，不过，它们确实是以一连串图片的形式讲述故事的。简言之，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花园里的苦恼、拉撒路的复活（很显然，此处的顺序错了，其原因何在，我实在是琢磨不出来）、基督为门徒洗脚、犹大之吻、受捕、该亚法审讯基督、嘲讽基督、彼拉多为基督洗手、基督走向刑场以及基督背负十字架。不难注意到，基督受难记的核心事件，也就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以及其复活，并没有出现。我猜想应该是有后续插图将这个故事讲述完整，不过这些插图后来丢失了。据此推理，《马太福音》部分应该也有类似的整页插图讲述基督从出生到成年的故事。

第二幅整页插图是路加的大幅画像，距离第一幅整页插图九个页码。画中的路加以白胡子罗马元老的形象出现，双腿交叉坐在王座之上，一只手托着下巴，腿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这样的姿态显然不是在写作的姿态，这跟希腊译本的福音书中他的形象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路加是在倾心聆听启示。这样的构图显然具有古代晚期的特色，因为画中人更像哲学家而非创作者。路加的两侧是一红一绿大理石廊柱，白色的大理石柱顶支撑着过梁和巨大的拱门，此等情形像极了在罗马帝国威严的宫殿中。门楣中心是一幅长着双翼的公牛的半身像，它是圣路加的艺术象征。过梁上则是给这头公牛配的文字，出自5世纪诗人塞杜利乌斯（Sedulius）的《卡门·帕斯卡勒》（*Carmen Paschale*）；这些文字回应了与另外几个福音书作者的象征（马太的是人的形象，马克是一头狮子，约翰是一只鹰），或与这些象征本身有关的引文，这些象征的草图

分别出现在第2对开页的左页、第78对开页的右页以及第207对开页的左页，它们足以证明，这份抄本中的福音书最初是有对应插图的。这可算是对图像式象征符号的早期运用，它们源于以西结见证的上帝宝座的异象（《以西结书》1:10和《启示录》4:7）。人、狮子、牛和鹰的形象在《凯尔经》（这是第三章的内容）当中会重现，并且能与第十二章的《斯皮诺拉时祷书》中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联系起来。圣路加两侧的两排柱子之间是几排小图，每边各有六幅，都取材于《路加福音》，从“报喜”（《路加福音》1:11）到桑树上的撒该（《路加福音》19:4）。页面两边的空白处均有8世纪的英语文字说明，它们对这些插图进行了仔细确认。鉴于这些插图本身难以辨识，文字作者应该接触并浏览过以木板画或者壁画形式呈现的类似画作，否则就只能说，此人完全是在主题不明确的情况下，自行对这些插图可能呈现的场景进行了确认。

关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中的这些插图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不做过多关注。这些插图完全是古典风格，几乎都是立体的，是用那种我们在罗曼风格壁画当中已然熟悉了的地中海暖色颜料绘制的，诸如浅蓝色、乳白色、土红色和雅致的橙色。如今，差不多已经找不到6世纪的彩饰抄本了，但就算这些抄本真的全部散佚了，我们也仍然可以参考教堂的镶嵌画以及壁画。抄本画像中的圣路加本身就是位于一个建筑里的。连环画式的插图很可能就是仿照教堂壁画创制而成的。那样的呈现形式，给人的观感就是在看大理石框架当中的一幅巨大的古典风格的画作。我曾带领圣体学院的一批同僚造访埃塞俄比亚，当时我吃惊不已，因为那里的巨幅木板画虽然以粗朴的形式呈现宗教故事，但同样用了一连串方格画来展现复杂场景，这些木板画今天在埃塞俄比亚的很多教堂里都可以看到，跟我们这份抄本里的插图实在是像极了。自《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时代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宗教生活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那里的人一直运用这类木板画向没有阅读能力的信众讲述基督教的故事，于是我不免想知道，格里高利一世时的罗马教堂是否也拥有类似的带边框的画作，而且我也禁不住怀疑，抄本中插图的表现形式是否就取材于罗马的教堂，甚至那些木板是否就是奥古斯丁从格里高利那里接受的赠品之一。



埃塞俄比亚的宗教木板画，在构图上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面的连环画式插图极为相像，很可能源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就在我写作这章的时候，达勒姆大学的安德鲁·比庇（Andrew Beeby）教授和理查德·贾默森（Richard Gameson）教授带着便携式拉曼光谱仪来到了帕克图书馆。这套设备可以对从色块上反射回来的激光束的波长展开分析，由此对颜料进行化学确认。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拿出来接受检测。结果不错，他们告诉我说，该抄本当中出现了三种红色颜料，分别是红棕色赤铁（也可能是赭色赤铁）、亮橙红色铅和朱红，朱红是抄本中红色字迹的颜色。这些颜料的成分当然都是天然矿石。至于蓝色，他们说是来自靛蓝染料，是从植物花瓣当中提取的。这种植物叫作木蓝（*Indigofera tinctoria*），在意大利等地颇为常见，不过，其原始生长地很可能如其拉丁语名所示，是在印度。拉曼光谱仪无从确定黄色颜料的来源，只能确定它并非雌黄。贾默森还指出，抄本当中的这些颜料都是经过明显的淡化处理的，跟早期希腊文抄本不一样，早期希腊文抄本的颜料通常很浓，因此经常发生颜料剥落现象。我们的这份抄本中的颜料则淡如水彩，能够很好地附着在书页上，完全经得起长年累月的摩擦以及气候的变化。

这份抄本并没有用黄金进行装饰，可能是因为对于这样一本要辗转于欧洲大陆，最终前往英格兰的书来说，黄金被认为太过脆弱和容易受损了。严格来说，“泥金装饰”（illuminated）一词对抄本而言就是用黄金进行装饰，这样抄本就既能够反射光线，也能够捕捉光线。从技术上

来讲，本书涉及的这些抄本，大约有半数是没有任何泥金装饰的，包括《凯尔经》在内。这倒不是因为6世纪时黄金太过珍稀，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很多抄本装饰有地中海珠宝和镶嵌画，那里面富含黄金。不过，我们的这份抄本非常低调。那两幅得以存留下来的整页插图是稀世珍品，但抄本文本页并没有装饰，甚至连首字母都很普通。不过，抄本最初的装帧可能用到了黄金，其古老扉页之上留有两处淡淡的菱形绿色锈迹，应该是黄铜或者紫铜留下的痕迹，当初抄本制作人应当是用这样的金属钉来穿透那厚厚的封皮的，以固定抄本的装饰物的。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就有一些镶嵌画，展现了6世纪的有珠宝装饰的抄本的装帧工艺，画中呈现的是众神父簇拥之下的查士丁尼皇帝，其中一名神父手中捧着的肯定是一份福音书抄本，该抄本以镶金的硬板装订起来，这些黄金是随同绿色和白色的装饰物一起被嵌入硬板当中的。米兰附近蒙扎的圣乔瓦尼巴蒂斯塔大教堂仍然珍藏了一张装饰有珠宝的封皮，应该是6世纪末期或者7世纪初期的东西，是来自伦巴第王后特奥德琳达（Theodelinda, 约570～628）的赠品。从这位王后的书信中我们得知，格里高利一世曾赠予她一份福音书抄本。这份抄本并没有存留下来，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大教堂的这件藏品就是该抄本的封皮，若真是这样，我们就有了线索，可以据此探明帕克图书馆“MS 286”号藏品的装帧工艺，因为这份抄本也出自格里高利。蒙扎这份藏品的装帧采用的是木料，其边框是用黄金装饰的，正面则饰有工艺精美的黄金十字、古典风格的小浮雕以及彩色宝石和珍珠。此等装帧工艺有可能被运用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而该抄本的封皮可能在宗教改革的大混乱和大劫掠时期之前都是完好的，到了这个时期，抄本上的黄金和珠宝对人们的吸引力变得非同寻常，因此封皮完全有可能就是在该暴乱时期被人撕去的，抄本前面的二十二页也可能就是这样佚失的。



蒙扎的镶嵌有珠宝的抄本封皮，很可能是圣格里高利赠予伦巴第王后特奥德琳达的。它的装帧风格可能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类似

帕克图书馆的这份抄本，很可能是在英格兰存留下来的最为古老的、暂且没有沦落成考古对象的工艺品，毕竟，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古旧的东西，在这么长的岁月里一直在更换主人并且一直在被使用。甚至也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插图本拉丁语福音书抄本。基督教东方王国中也许会有为数寥寥的福音书抄本存留下来，不过很难说它们会比我们的这份抄本更为古老，此处，我无意论定我们的这份抄本比基督教东方王国的抄本更为古老。后者当中最为神秘者当属两份抄本，它们是用吉兹字母（Ge'ez）写就的，因埃塞俄比亚北方阿巴该（Abba Garima）修道院最近的发掘工作而进入人们视野。这座修道院是可追溯至古代晚期的神秘文化宝藏。这批阿巴该抄本当中，有一些非常古老，依据碳元素日期测定技术，可以确定其诞生时间在5世纪和7世纪之间，若非这项测定技术，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抄本中也有福音书作者的正面画像——作者在方形画格里向外盯着世人。著名的《拉布喇福音书》（Rabbula Gospels）乃以叙利亚文写就，这份抄本在日期上更为明确，且拥有更为丰富的相关记录，其上有抄写人拉布喇本人的签名，签名时间是586年。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拉布喇福音书》抄本拥有丰富的插图，而且这些插图极为生动，不过很显然都被重新着色了（我见过原本，那样的色彩太过艳丽了）。还有两份令人惊叹的希腊语福音书抄本，同样配有非常逼真的叙事性插图，大约问世于600年或者那之前不久。这两份抄本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我们仍然可见其当年的

奢华，看看那被染成紫色并以金银装饰的羊皮纸就知道了，更不用说那些流光溢彩的插图了。其中一份抄本如今收藏在意大利东南部卡拉布里亚的罗萨诺教区博物馆，另一份抄本则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定名为《锡诺普福音书》（*Codex Sinopensis*）——因为人们是于1899年在土耳其北部的黑海海岸地区的锡诺普发现这部抄本的。上述这些抄本，连同我们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组成了一个集合，那就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彩绘本福音书抄本，这样一个集合世所罕见。

这样一个来自6世纪的彩绘抄本集合的确罕见，不过关于它们，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要予以说明。《罗萨诺福音书》（Rossano Gospels）完全是因为偶然因素才未能被收藏在帕克图书馆的。萨缪尔·萨维奇·刘易斯（Samuel Savage Lewis, 1836~1891）精力充沛，蓄着黑胡子，是个收藏家，也是古典主义者，算是我的前辈，曾任圣体学院图书馆馆长。他的妻子艾格尼丝·史密斯·刘易斯（Agnes Smith Lewis）是著名的“西奈两姐妹”之一，是积极探索黎凡特基督教世界的非同寻常的旅行者和探险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旅行和探险通常是男性才会做的事情。丈夫死后，做妻子的给丈夫立了传，在这份传记中，艾格尼丝·刘易斯谈到了1889年12月二人携手展开的那趟罗萨诺之旅，这趟行程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著名的《罗萨诺福音书》。但是没人能告诉他们这份抄本在哪里，最终，他们来到了一个教堂会吏长的家中，所寻抄本就在此人卧室抽屉里的一个硬纸板盒子中。这位会吏长和刘易斯开始低声交谈，谈到了这份抄本的价值，当然也谈到了会吏长所在的教堂正需要钱添置教堂物件。刘易斯夫人还听到了“立刻”这个词。在二人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谈判仍然在热烈进行。最后他们达成的协议是一千英镑。刘易斯夫人接着给出了如下记述：“他即刻发电报回家筹备款项，尔后有了一个疯狂计划，即乘火车返回罗萨诺，于午夜抵达，在站台上约见神父，当场买下那份抄本，乘坐下一趟火车返回。”此一计划显然引发了巨大的家庭内部分歧，不过这类争执在家庭度假中倒也常见，刘易斯女士那长老会信徒式的强烈正义感遂即爆发出来，令她最终否决了这项交易。刘易斯先生的其余私人藏品，包括藏书在内，如今依然是圣体学院的财产。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在抵达英格兰的时候，最开始应当只是日常手册，还不至于成为圣物。这份抄本当然会出现在宗教仪式上或者庆典场合中。它可能也被用作新抄本的范本。不过，要确定这一点，需要在创制于英格兰的抄本当中寻找证据，可惜能够存留下来的英格兰福音书抄本很少，根本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据比德说，670年到709年，哈德利安担任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当然，当时该修道院还不叫这个名字），在这个时期，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里掀起了一股新的《圣经》研究热潮。哈德利安出生在北非，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此前曾在意大利南方担任修道院院长。7世纪晚期，英格兰人对“MS 286”号抄本实施了大范围的修订，这恰好就是在哈德利安任职院长的时期，此番修订令抄本内容同哲罗姆译本更为贴近，前文提及的那些旧译本词句都在修订之列。其中一些词句干脆被抹去或者重写，抑或是被抄写员以打叉或者做红点标记的方式删除，抄写员用颜色更深的黑墨水将修订内容以及更为

准确的词句插入原文。自此往后，再也没有其他明确证据证明这份抄本仍被用作其他英格兰抄本的范本，但考虑到这份抄本的渊源以及其由此享有的巨大权威，它被用作范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圣马太的画像，出自8世纪的《奥里斯抄本》，该抄本目前收藏在斯德哥尔摩。这幅画像应该是根据《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中的一幅现已丢失的画像仿制而来的

不过，抄本当中的插图毫无疑问拥有漫长的“来世”。特别是其中的福音书作者画像被《奥里斯抄本》（Codex Aureus）[2]仿制，《奥里斯抄本》是诞生于8世纪中叶的一份相当华美的福音书抄本，如今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令人遗憾的是，瑞典的这份抄本当中，路加的画像已经遗失了。但路加的画像是“MS 286”号抄本唯一存留下来的福音书作者画像，因此我们无法就两份抄本当中的福音书作者画像进行直接比较。不过，《奥里斯抄本》为我们留下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当中遗失了的马太画像和约翰画像的仿制品，而且它们毫无疑问是相当可靠的仿制品。一看即知，这些仿制品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画像同宗同源。画像当中，福音书作者都端坐在拱门之下，头顶都是各自的象征物。在斯德哥尔摩的抄本的马太画像当中，福音书作者的座椅两边各有一小束植物，这一点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当中的路加画像完全一致。《奥里斯抄本》具体是在何地创制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9世纪时它被一批维京人劫掠了，后来由坎特伯雷的一对夫妇用黄金赎回，该夫妇中的丈夫名叫阿尔多曼·埃尔弗雷德（Aldorman Ælfred），妻子名叫韦尔贝格（Werberg）。因此，《奥里斯抄本》最初的诞生地有可能是坎特伯雷。“MS 286”号抄本当中，路加画像当中的那头牛很显然被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份福音书抄本仿制

过，这一福音书抄本的内容也是以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于8世纪晚期创制的一份完整的《圣经》抄本为依托的。两幅插图当中牛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都那么疲态尽显地横卧着，牛身横跨了整个页面。这就更加证明，“MS 286”号抄本在第一份特许状于10世纪出现在抄本后衬页上之前很久就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财产了。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中“最后的晚餐”的场景（左图），将近五百年后，贝叶挂毯复制了这幅图，只不过对画面内容有所调整，贝叶挂毯之上呈现的是贝叶的奥多宴请达官贵人的场景（右图）

该抄本插图中类似埃塞俄比亚教堂的木板画的那种多图并置的图片排列方式，对英格兰艺术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该插图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处于顶端中央位置的“最后的晚餐”的图，这幅图于11世纪晚期被仿制在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上，画面内容仅有细微变动。挂毯上的画面呈现的是诺曼人于1066年9月在佩文西登陆之后，贝叶主教奥多在圆桌之上为圣餐杯祝圣的场景。由此，我们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佐证了这么一个情况：贝叶挂毯实际上是在坎特伯雷制作的。用多图并置的方式排列图片，以构成一个叙事序列，这样的设计和做法一直延续到12世纪，这一点从《埃德温圣咏抄本》（Eadwine Psalter）的前言当中不难看出，这份抄本是1160年前后在坎特伯雷基督教堂小修道院中创制出来的。尽管抄本的风格和主题已经跟随时代变化了，但格式没有变，仍是坎特伯雷的专属格式。所谓的《盎格鲁-卡塔兰圣咏》抄本（Anglo-Catalan Psalter）的引言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插图，据我们所知，这是这种插图形式最后一次出现，该抄本如今收藏在巴黎，是公元1200年前不久在坎特伯雷创制的，此时距离《圣奥古斯丁福音书》进入英格兰已有六百年之久。一些艺术史学家认为，这种插图形式仍可以在现存于坎特伯雷的源自12世纪晚期的花窗玻璃上看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三一礼拜堂的建筑样式也跟抄本中的插图有关联，这个礼拜堂建造于1179～1184年，位于高高的圣坛后面，后来被改造为圣徒托马斯·贝克特的礼拜堂，是欧洲最著名的朝圣地之一。礼拜堂四周是成双排列的廊柱，其白色的柱顶将拱门支撑起来；每一对柱子都是一根为红色一根为绿色，且均由带有斑点的大理石制成，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福音书作者画像中的柱子一样。

我们的这份抄本一直被存放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而非坎特伯雷大教堂，不过在时间进入现代之后，它又同坎特伯雷大教堂产生了联系。生活在坎特伯雷的人时常会将之称为“坎特伯雷福音书”。如今，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履行誓言之时，都会用到这份抄本。自圣奥古斯丁之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便以继承人直接继承的方式从6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源远流长，包括英格兰国王在内的一切职位在时间跨度上都无法与之比拟。马修·帕克若是见证了此等连续性，想必会觉得它是得到神意嘉许的。今天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是第一百零六任了，在这之前共有十八位大主教是获得了封圣的。当然会有人怀疑我们的这份抄本同圣奥古斯丁没有任何关联，这些人在造访帕克图书馆的时候总是会嘲讽说：“要说坎特伯雷大主教也会使用这抄本，我觉得这又是发明于19世纪的一个传统。”不，这既不是传统，也不是19世纪的发明。直到乔弗里·费雪（Geoffrey Fisher）于1945年接手大主教职位之时，这份抄本才第一次被纳入誓言仪式。坎特伯雷大教堂档案馆里如今保存有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打印文稿，作者是威廉·乌尔里（William Urry），它描述了1961年6月27日米克尔·拉姆塞登临大主教职位时，警车于中午十二点半准时将抄本从剑桥运抵仪式现场的情景。威廉·乌尔里时任坎特伯雷大教堂档案管理员，这是抄本第二次现身此类仪式现场。那天的情形颇有点类似于旧喜剧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的情形：圣体学院院长乔治·汤普森、学院资深教授米克尔·麦克格鲁姆，还有几名警员，紧紧跟随抄本，在大教堂里四处奔跑。影片最终在乌尔里的钢琴声中结束，随之还有端上来的茶水和点心。

我本人曾两次随同抄本前往坎特伯雷，分别是为了2003年2月27日罗万·威廉斯的大主教就职仪式和2013年3月21日尤斯丁·威尔比的大主教就职仪式。这样的日子的确值得纪念，不过我不想对此着墨太多（如果各位读者想知道具体情况的话，我还是能够说道说道的），因为我接下来就会说到一个与之相关的事件。不过，确实有一个情况出现在威廉斯大主教的就职仪式之上，它也许能为早期抄本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仪式当天，我必须从西门进入大教堂，并且必须在仪式队伍开始吟唱第一首圣咏之时加入仪式队伍，那圣咏吟唱的是“不朽的上帝、不可见的上帝，智慧全备的上帝”，用的是威尔士的调子，以此凸显新任大主教的民族背景。当时我捧着《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是打开的，下面有衬垫保护，两条透明的绶带将抄本保护起来。当时，在这个关上了门的石头建筑里，有两千五百多人在高声吟唱那熟悉的圣咏，歌声令空气震动不已——声波的性质就是如此。前文我已经谈过，抄本的羊皮纸书页是极其精细的，非常之薄，这样的羊皮纸会吸收声波，结果便是这些书页跟音乐产生了共鸣和共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这份来自6世纪的抄本就仿佛有了生命并且也在参加仪式一样。于是我想到，基督教的古老抄本也许都有这样的功能，毕竟，此类抄本所用的羊皮纸通常要比后来的纸张精细得多，因此但凡在有音乐和演唱的场合，抄本都是打开着的，以产生如此强有力且动人的效果。不过，我还是要从纯科学的角度补充一下，类似的事情在2013年的仪式之上就没有再出现了。

最后，我还是要回归本章开篇之时提到的那件事情。此事源自2010

年6月来自乔纳森·古达尔牧师的一个试探性电话，当时，古达尔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派驻兰伯特宫的牧师，他在电话里说，他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他解释说，他和几个同僚正在安排教皇本笃十六世当年9月访问英格兰的事情。此事若能成行，就会是历史上第二次有一位在任教皇访问英格兰。他说，他希望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能有机会在西敏寺共同主持一次圣礼。之所以选择西敏寺而非坎特伯雷大教堂（安立甘宗大教堂）或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天主教教堂），是因为西敏寺享有“皇家特权”（royal peculiar），这也就意味着，这座修道院是直接从属于女王的，是独立于坎特伯雷的管辖的。由此，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便可以平等身份出现在西敏寺，这能省去外交上的繁文缛节。当然，西敏寺一度是本笃会的修道院，并且也是敬奉圣彼得的（就此事而论，这一点特别重要）。古达尔牧师于是想知道，我们是否能让《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也加入仪式，在当天的福音书布道结束之后，由教皇和大主教共同为这份抄本祝圣。

正式的请求在圣体学院的行政管理体系当中被层层推进。最终，保险和运输方面的事宜都准备就绪了。2010年9月17日，星期五，这天一大早，还没到六点，我便已经来到学院。抄本已经在前一天的晚上完成打包，被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防弹盒子里面。运输工具是一辆安全车，并非警车。我陪护抄本到伦敦，并沿着泰晤士河岸一直将其送到西敏寺。八点，抄本便已被存放在修道院东侧走廊的图书馆下方的保险箱里了，由西敏寺的图书管理员托尼·特罗勒斯看护。从十一点半开始，整个仪式彩排都在极为精细、准确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都按照规定的步调行进，连大主教本人也参加了彩排，教皇并没有到场。最后时刻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以便能够进行适当的电视转播。彩排之时，我用的是另外一本书，没有用抄本原本。

下午三点前后，整个西敏寺已经完全由警力保护起来了。安全措施的确非常严密。在四点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要重新进入修道院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入场队伍当中恰好有一个神父认识我，于是我提前进入修道院，并急忙赶往东面的走廊。在那里，我们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红色垫子来放置抄本，那衬垫的形状有点像病人专用的早餐托盘。人们希望将抄本打开，翻到插图页，从管理员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于是，我将书页翻到跟布道词对应的部分，也就是《马可福音》10:35～45，以便教皇为刚刚宣读过的布道词祝圣。

我穿上了得当的学院礼服，这也是我第一次穿戴剑桥大学的博士服。接着，我连同抄本一起被护送到修道院西门边上的耶路撒冷礼拜堂，这里是当年亨利四世驾崩的地方。和蔼可亲的大主教阿尔马格已经等在那里了。我选择一处角落坐下，并把抄本放在我的腿上。不列颠各个教会的头面人物陆续到达，一些人已经在外袍里面穿戴好中世纪风格的精美服饰，另一些人则随身带着漂亮的小衣箱，时刻一到，衣箱里面就会蹦出来各种神秘衣物和饰品。我就在旁边，偷偷地看着这些人在装扮自己，那情形就如同在观赏一棵又一棵行走的圣诞树，所有人都有各自的风格，这一天的情景实在是令人愉快且难忘。英格兰各个新教教会的领袖，比如长老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独立教会（Free Church）以及

联合归正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的领袖，都在跟主教和大主教们低声攀谈；卫理公会理事会以及联合王国东正教会教会会议的领袖也到场了（两者对比十分鲜明），其中包括迪亚提拉和大不列颠大主教；此外，卫理公会、路德宗、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等组织的成员也都聚集一堂。

数千名贵宾如约而来，齐聚西敏寺，场面相当安静，但外面街道上的人群在吟唱和呼叫，令修道院内部的安静场景显得有些无趣。我和枢机主教大人走到窗前向外观看。街道之上旗帜和标语四处飘扬，一半是在抗议教皇造访英格兰，另一半则是在表示欢迎。597年奥古斯丁登陆英格兰时，很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场面。一名教堂牧师在耶路撒冷礼拜堂打开电视，以便我们观看教皇在西敏寺大厅的演讲，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提前知道教皇代表团会在哪个时间点上穿过街道前来修道院，若是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就要走出耶路撒冷礼拜堂，前往修道院本堂的西侧，盛装等待教皇的驾临。我手捧抄本，来到我的指定位置——大卫·劳合·乔治的纪念石上方的一根廊柱旁。“您是否也想过，自己究竟是在这里做什么啊？”我跟旁边一个身穿盛装的教堂管理人低声嘟囔了一句，他手里正捧着金光闪闪的西敏寺十字架，那是专供游行之用的。这个问题令他一脸茫然。他说：“没，从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西敏寺朝拜《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场景，图中手捧《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人是克里斯托弗·德·哈默尔，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万·威廉斯则侧立一旁

此时，外面街道上一片喧闹，无数相机同时响起的快门声就如同万千只飞鸟腾空掠起，这预示着教皇将要从西门进入修道院本堂了。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教皇穿上长袍，我们则列队穿过宽阔的哥特式本堂，经

过唱诗班所在的地方，并且在1268年专门为亨利三世铺设的马赛克甬道上穿行而过。我将手中的珍贵抄本置于高高的圣坛之上，这是在复制中世纪早期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里的情形，然后便鞠躬并（有点不自然地）走向圣坛旁边的祭司席，那里是我的座位。那长长的仪式队伍仍在行进，高潮部分是西敏寺的主任牧师、坎特伯雷大主教、教皇及其随行牧师的出现。随后，苏格兰教会长老会主席用英语宣读了福音书，这个程序完结之后，便是我的简短任务。我用垫子托着抄本，走到教皇面前，教皇躬身亲吻书页，然后我又转向大主教，大主教同样躬身亲吻书页。这个过程中，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在从高高圣坛之上铺展下来的光滑台阶上摔倒，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安全地折返回来。拾级而上的这个过程很耗时间，虽然这为电视转播提供了极好的场景，但对抄本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尔后，唱诗班吟唱《圣母颂》；主任牧师同时在圣坛燃香，并拿着香炉在抄本上方不断地绕来绕去。我的天啊，要是香灰落在羊皮纸上，我该怎么办啊。

还好，熏香的味道不久后就从抄本上消散了。大主教在致辞之时说，英格兰的教会都要追根溯源至罗马教皇制度，眼前的这份《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当初就是罗马的教皇格里高利命人送往英格兰的。于是，在预定的时刻，我再次将抄本捧出来，然后再次返回我在劳合·乔治纪念石上方的座位，看着教皇从我身边走过且在一片掌声当中消失在外面的暮色里面。集会的人群散去，西敏寺附近的街道重新开放，安全车遂驶入主任牧师的庭院，我们将抄本重新打包并带回剑桥。夜深之时，抄本在经历了那么一场“中世纪盛况”之后，总算安全回到了它在剑桥的家，回归了原来的安身之所，在黑暗中归于静寂，并恢复了它平时的身份：马修·帕克图书馆的“MS 286”号藏品。

注释：

[1] 4 flyleaves（衬页）+i^{2}（很可能共八页，缺了第i~v页及viii页，即第1对开页前面的五页和第2对开页后面的一页）、ii~x^{8}，xi^{9}（共十页，缺了第iv页，即第77开页后面的一页）、xii~xvi^{8}（共八页，缺了第viii页，即第130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viii~xxi^{8}，$xxvii^{3}$（共四页，缺了第iv页，即第205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xviii~$xxxiv^{8}$，$xxxv^{4}$+4 flyleaves（原均为空白页，后附有中世纪文件）。

[2] 也被称作“黄金福音书”或“金典”。——译者注

第二章
阿米提奴抄本

约700年

佛罗伦萨，洛伦佐图书馆，

Cod.Amiat.1

7世纪英格兰的物件绝少有留存下来并重见天日的。在蒙克维尔茅斯的圣彼得教区教堂的西端还能看到那个时期的建筑的残迹，这座教堂坐落在今天英格兰东北地区的泰恩-威尔郡，这里曾是古诺森布里亚的地界。尽管这一7世纪建筑的残迹已被列为世界遗产，但其所在环境在今天看来还是颇让人失望的，它就那么孤零零地伫立在同为港口和工业城镇的桑德兰的远郊，湮没在四周的公寓楼里面，跟维多利亚时代整洁的城市公园里面的教区教堂没什么两样。教区教堂南面的草坪之上有工整的指示牌，大致标示出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掘成果。此等情形之下，我们需要非同一般的想象力才能见到中世纪时此地的狂野风景，当时宽广的威尔河就是从此地注入北海的（如今，无论是威尔河还是北海，都已经不在教堂的视野之内了），674年，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格里菲斯（Ecgfrith）发布令状，命人仿照古代晚期的罗马风格，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的修道院。

于是，英格兰北方便崛起了一座新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兼创建人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约628~690）是当地的贵族，一生当中曾至少五次前往罗马朝拜。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文化视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决心当一名修士。669年，他在第三次朝拜罗马之后，陪伴第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返回英格兰（该大主教序列是从圣奥古斯丁算起的）。这位大主教就是西奥多·塔尔苏斯（Theodore of Tarsus, 602~690），他身负在英格兰南部传播希腊学问的职责。来到英格兰之后，西奥多任命身边的本尼迪克特为坎特伯雷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的临时院长，这座修道院就是后来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因此，比斯科普一度掌管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就像我今天这样，当时关于这份抄本的记忆应该就已经被珍藏在这位未来的诺森布里亚修道院创建人的心中了。几年之后，也就是674年，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格里菲斯提供了威尔河附近的一块土地，用于修建修道院，本尼迪克特成为该修道院院长的不二人选，奉派返回诺森布里亚。我是从出类拔萃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比德那无与伦比的历史撰述当中了解到其中详情的。



在维尔茅斯的新家中安顿下来之后，本尼迪克特于679年再次动身陪伴年轻修士塞奥尔夫利特（Ceolfrith，约642~716）前往罗马。两个旅人在罗马购买或者用别的什么手段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各类书册”（这是比德的原话），这些书册将在随后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德认识这两个旅人，他暗示说，是塞奥尔夫利特而非本尼迪克特在罗马斩获了三份《圣经》新译本，也就是哲罗姆的通行本抄本，以及一份规模庞大的《圣经》全本抄本，比德称后者为《圣经》的“旧”译本抄本。这些抄本，连同另外一批书册，加上诸多圣物，被全部装船，跟随本尼迪克特和塞奥尔夫利特返回维尔茅斯。这两位英格兰修士还设法让罗马方面来人，包括一个来讲授罗马的吟唱方法的名叫约翰的领唱人，以及一些手艺人。蒙克维尔茅斯教堂外面的景点介绍中记录了遗址的发掘情况，其中提到了罗马的玻璃和砂浆，这两方面的技术在当时的北欧暂且是不为人知的。从罗马带回的那批抄本在比德在世的时候是珍宝，但是在距今很久之前就已经差不多全部丢失了，只有一小张出自6世纪意大利的残页得以存留下来，其内容来自哲罗姆《马卡比书》拉丁译本。这张残页是因为被一份中世纪抄本用作衬页才得以存留下来的，这完全是机缘之事，如今这份中世纪抄本收藏在达勒姆教堂图书馆里。

682年，埃克格里菲斯国王在亚罗划拨了更多的土地供修道院使用，新土地位于诺森布里亚另一条大河泰恩河的河口附近，在原址西北方向约七英里处。修士们决定在此地再建一座教堂。修道院院长本尼迪克特将这项任务交给塞奥尔夫利特，后者率领二十名修士进驻新址，其

中就有比德，当时的比德是一个年轻的修士。这两处被视为一体，距离并不远，行走起来也并不困难。现代史学家在谈到这两座修道院的时候，通常将之称为“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仿佛那就是一座修道院，他们也将两座修道院的图书馆称为“维尔茅斯-亚罗图书馆”或者“维尔茅斯-亚罗缮写室”，仿佛那也是一体的。维尔茅斯修道院是敬奉圣彼得的，亚罗修道院则是敬奉圣保罗的，这两位乃共同守护罗马的圣徒。塞奥尔夫利特很可能将自己从罗马带回的抄本转移到了亚罗修道院，因为比德很显然跟这些抄本有长时间的接触，当然，这么做只是换个抄本收藏地而已，两座修道院仍然是共享这些抄本的所有权的。686年，塞奥尔夫利特被任命为两座修道院的院长，此后他在亚罗修道院待了三十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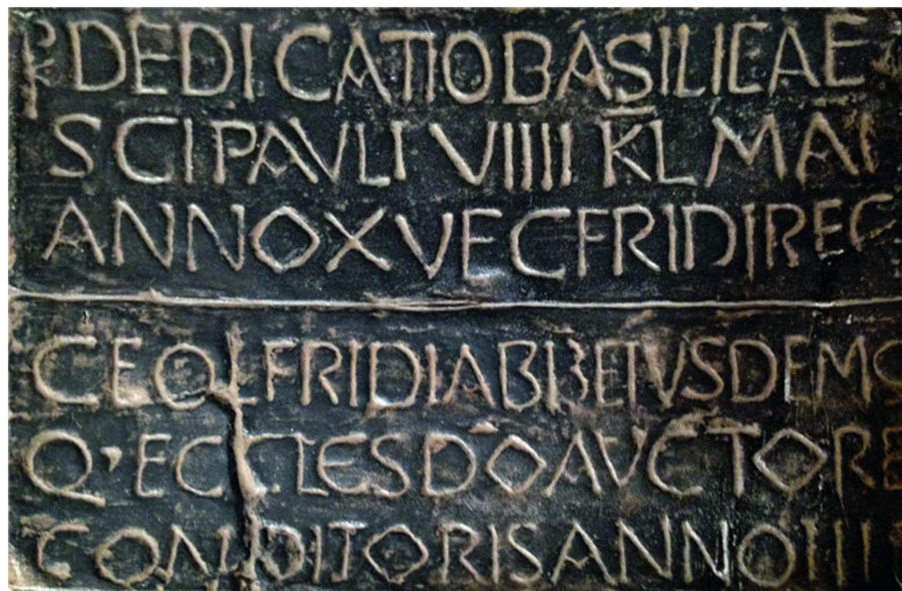
今天亚罗的圣保罗教堂显然要比其南面的那座姊妹教堂更能唤起人们的回忆。圣保罗教堂在如今的亚罗市区之外的一片绿树成荫、曲径通幽的美妙园林之中，这一园林中四处都有长凳供人休憩，阳光透过那绿荫斑斑点点地洒落下来，而我就曾在那绿荫下做了不少的笔记。教堂的南侧是一座12世纪修道院的废墟，这座修道院是在塞奥尔夫利特的修道院的原址之上重建的，跟维尔茅斯修道院一样，它如今也被发掘出来，并且被很清晰地呈现在草地上。此地一度是梯田状的，地形相当陡峭，且一直伸展到缓缓流动着的唐河的松软河岸地带，唐河在这里同泰恩河汇流，并随同泰恩河一起汇入北海。教堂东面是一处被称为“亚罗风化地”（Jarrow Slake）的荒地，从此处可以看见不远处泰恩港船坞的繁忙景象。这片土地在海岸地带，这对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供应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不过，对修道院本身来说则是危险的，794年修道院就因此遭遇了维京人的第一次洗劫。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坐在这里的一张长椅上。随后，一个老人过来与我同坐。我询问他教堂开门的时间。他说，早祷时间是十一点，我说我非常希望能参加。老人还跟我讲述了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全部听懂，毕竟，老人那浓重的纽卡斯尔口音对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当年塞奥尔夫利特和来访的罗马领唱人毫无疑问是用拉丁语交流的，这会容易得多。进入教堂之后，我在本堂的木椅上坐了下来，这些木椅已经取代了先前的长椅（刚才的那位老人是不太赞同这样的革新的）。在这个座位上，我能够透过塔楼的基座看到东侧的那个古老圣坛，那圣坛很小，是塞奥尔夫利特时期的遗物。教堂南侧的墙壁之上，有三个很小的古旧窗户，那是从7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中一扇窗户已经被人们用发掘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彩绘玻璃镶嵌起来了，这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彩绘玻璃。朝向南面的窗户在早期爱尔兰教堂中是很典型的，因为南面是迎着阳光的一面。北面墙上也都有与之对应的窗户，但那些窗户是现代的，设计者是约翰·派珀（John Piper）；1985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主持了这些窗户的启用仪式。圣坛拱顶上方的墙壁之上镶嵌了两块彼此相切的石板，从本堂就能看到它们，石板上面就是著名的源自685年的拉丁铭文，表明这座教堂是敬奉圣保罗的，铭文的日期是艾克格弗里特国王统治期的第十五年的4月23日（IX Kal. May），这也是修道院创建人塞奥尔夫利特院长在任的第四年，铭文当中是有这位创建人的名字的。我坐在赛奥尔利特和比德曾经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这些铭

文下祈祷，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我在思考当年的修士们是否认可安立甘宗的主日祈祷仪式，不过，那又另外一回事了。这座教堂的唱诗班以及零散会众中女性的比例相当大。不过，福音书是由两名神父予以宣读的，在宣读之前，两名神父分别身着绿色和白色长袍，以庄重仪态进入本堂，手中高高捧着封面精美的圣书，那圣书是闭合着的，毕竟，它是于680年从罗马带回来的。



亚罗的圣保罗教堂，这是从北面取的景；图中的那座塔楼以及教堂建筑的最东边部分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遗产



石碑铭文，是685年亚罗教堂馈赠之物，纪念的是埃克格里菲斯登基十五周年以及塞奥尔夫利特在任四周年

塞奥尔夫利特看护的这些《圣经》抄本随后成了大量抄本的范本，关于这一情况的记载在8世纪早期的文献中出现了两次。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抄本制作工作，存留下来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因此，这两处相关记载都是值得仔细研读的。第一处出现在一部有关塞奥尔夫利特的匿名传记当中，这一传记很显然出自该修道院的修士之手。传记中说，塞奥尔夫利特极大地丰富了亚罗修道院的室内陈设，并且在他和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从罗马带回来的抄本之上增添了许多藏书。这份传记的作者解释说，塞奥尔夫利特创制了三份《圣经》抄本（很可能都是前文提到的全本抄本），这样一来，两座修道院就可以各自存留一份，方便大家阅读。此事的具体日期我们无从确定，只知道这是塞奥尔夫利特还是修道院院长时期的事情，不过，这些抄本的抄写工作很可能在7世纪末期便已经开启了，且这项工作极有可能持续到了8世纪初。

比德对亚罗修道院的这些抄本非常熟悉，因此他的《修道院院长列传》（*Historia abbatum*）能为有关这些抄本的记载补充信息。据列传记载，塞奥尔夫利特曾从罗马带回了全本的《圣经》拉丁“旧”译本，之后便扩展了这神圣馈赠，创制了三份抄本，不过，他是依据“新”译本创制这三份抄本的。关键就是后面这个情况。比德总是能够发现并记录下抄本所用的译本。塞奥尔夫利特手下的抄写员是以从意大利传来的全本的形式创制这些抄本的，不过，旧瓶装新酒，抄本的内容则是以哲罗姆的“新”译本为准的。此一情况在随后的故事里面将变得极具分量。

新译本的抄本由维尔茅斯修道院和亚罗修道院各自保存一份，这种做法尽管颇令人吃惊，但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第三份抄本的用途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猜测了。也许，在诺森布里亚这个地方还有再建一座修道院的计划，由此形成独特且不可被分割的三一体

的格局（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当时肯定会受到欢迎的）；或者塞奥尔夫利特也许暗怀大志，希望有一天能够更上一层楼，接替塔尔苏斯入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位，甚至有一天登临教皇大位，若果真如此，多出来的一份抄本也就不难解释了——那是供他异地晋升之时用的。无论是那本匿名的《塞奥尔夫利特传》，还是比德的《修道院院长列传》，都谈到了事情的终局。七十四岁高龄之时，塞奥尔夫利特决定再访罗马，此行，这位修道院院长带上了多出来的那份《圣经》全本，作为给众使徒之王圣彼得的赠礼。（中世纪的惯例就是如此，通常用护佑圣徒的名字来指代对应的教堂，就仿佛那圣徒仍然活着；此处的这个圣彼得当然是指教皇宫。）院长的此番决定令维尔茅斯-亚罗圈子大为震惊。我们不知道塞奥尔夫利特的动机何在，实际上，比德对此也困惑不已。是不是已经七旬高龄的塞奥尔夫利特仍然希望能在罗马求得一官半职？若如此，这份多出来的抄本则显然是可以用作敲门砖的。时任教皇康斯坦丁于715年4月9日谢世，塞奥尔夫利特很可能是在消息传到英格兰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或者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可能： 679年他将那批抄本从罗马带回诺森布里亚的时候，是接受了一定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将依托该抄本制作的新抄本送回罗马。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塞奥尔夫利特传》在开篇精确记录了塞奥尔夫利特在圣彼得进献这份赠礼之时的献词，内容大概是说，英格兰的修道院院长塞奥尔夫利特从“地极带一国”（extremis de finibus）进献此物。据这份传记记载，716年6月，已经被写上献词的这份抄本被人携着沿亚罗教堂所在的斜坡而下，登上已经在唐河上等待着的一艘船；那船顺流而下进入泰恩河，然后驶向大海。塞奥尔夫利特和一干修士随行陪护着这份抄本。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向外输出抄本。可惜的是，我们的这位修道院院长在这一年9月抵达法国中部的朗格勒后，客死他乡了，这便是这个故事的终局。

意大利藏有一份著名的《圣经》抄本，名叫《阿米提奴抄本》。这是藏于坐落在阿米亚塔山（Monte Amiata）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的一件古老珍宝。阿米亚塔山位于托斯卡纳的南部，这份抄本就是因为这座山而得名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有一份1036年的圣物名录，上面就记载了这份抄本。据相关的说明文字，这份抄本涵括了《新约》和《旧约》，“是教皇格里高利那经过祝圣的手抄录而成的”。将这个抄本归于圣徒格里高利一世（约540~604），倒也不是不合情理，毕竟，抄本的字体是典型的意大利式安色尔体（Italianate uncial），像极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字体。不管怎么说，这份抄本是在意大利创制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抄本的开篇是一份整页的献词，大意是：本书是一个“地极带一国”的名叫彼得的伦巴第修道院院长，敬献给救主（也就是萨尔瓦托雷）修道院的。这样的词句颇有《申命记》28:49的意味。即便是在今天，在托斯卡纳人眼中，伦巴第人仍然是异域群体，也就是远居化外之地的人（也许，伦巴第人也是这么看待托斯卡纳人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心满意足地接纳了这份颇为怪异的献词。《阿米提奴抄本》乃现存的最为古老的哲罗姆通行本完整抄本，而且见证了拉丁语《圣经》的编修过程。

康斯坦丁·蒂申多夫曾在前文中短暂露面，但是那次登场不是很体面。正是此人于1854年依托《阿米提奴抄本》编修了拉丁语《新约》。他注意到抄本的献词部分是有细微改动的，确切地说，在作为进献方的伦巴第修道院院长彼得以及作为收受方的修道院的名字上，都有涂抹的痕迹。三十年之后，铭文家乔万尼·巴蒂斯塔·德罗西（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 1822~1894）最终解码了更早期的名字，并由此揭示出，这份抄本最初是一个名叫塞奥尔夫利特的“英格兰的修道院院长”进献给圣彼得的。很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授F.J.A.霍尔特（F. J. A. Hort, 1828~1892）也因此回忆起一件事情：这样的献词跟《塞奥尔夫利特传》当中出现的那份献词是一模一样的。霍尔特意识到，《阿米提奴抄本》定然就是来自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的那份《圣经》全本，这份抄本在716年离开英格兰后便不知所踪了。1887年2月，此消息散布开来，遂引发了一场震动，特别是在不列颠。当时近东地区以及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地区（Oxyrhynchus）正处于《圣经》发掘热潮中，不过，还没有什么发现能比这个发现更让人震惊，因为这就等于说，目前最为古老的拉丁语《圣经》全本实际上是在英格兰创制的。1890年，H.J.怀特（H. J. White），也就是后来的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在谈到《阿米提奴抄本》之时说，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之上最美妙的书”，当然，此话不是没有爱国和夸张的成分的。

在拜访亚罗四天之后，我动身前往翁布里亚的西南地区，与尼古拉斯·巴克尔（Nicolas Barker）以及他的妻子乔安娜（Joanna）会面，巴克尔是《藏书家》杂志的编辑，他们夫妻二人在博赛纳湖区（Lago di Bolsena）有一处度假房。那是在一个夏日，阳光十分刺眼，他们驱车赶往奥尔维耶托车站迎候我。当天我们的目的就是去看一看《阿米提奴抄本》的收藏之地。尼古拉斯负责驾驶，乔安娜在后座为她指路。很快，我们便驱车进入托斯卡纳的最南部，阿米亚塔山遂映入眼帘，它在那一列火山中属最高的一座，如同“大洪水”里面的阿勒山（Ararat）一样耸立着。我们沿着E35号山路向上行驶，这是昔日的南北A1干道，跟前往罗马的古老朝圣之路弗兰西格纳古道有部分重合。之后，我们向左驶入岔路，沿着山间小路蜿蜒而上，路边的路标就指向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周围是一片贫瘠荒凉之地，颇有《圣经》里面的风格，完全不像托斯卡纳北方那样温婉宜居，令人多多少少有些吃惊。



阿米亚塔山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位于托斯卡纳南部，这是从西面取的景，可以看到喷泉和栗子树

修道院并不在山顶，山顶是一处滑雪胜地，修道院位于东面坡地的一片平地之上。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市镇将修道院环绕起来，修道院则连同这座市镇一并被称为阿巴迪亚圣萨尔瓦托雷（Abbadia San Salvatore），实际上，这座中世纪市镇已然是修道院生活的附属品了，修道院藏于市镇当中，令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修道院的具体位置。于是，我们在市镇广场上问路。那个路人非常友善，且当时应该也不是很忙，听完便跳进他自己的车里为我们领路。他带着我们穿过镇中小巷，沿着加富尔路向北而行，最后来到米开朗琪罗广场，那座古老的教堂随即出现在了我们眼前。我们的向导指向教堂，神态非常骄傲。这座教堂确实非常壮观，拥有两座中世纪塔楼，一座高一些，另一座则要矮胖一些，分别位于一条低调的罗马式甬道的两侧。教堂里面很高，不过光线不好，仅设有圆拱形的小窗，跟亚罗修道院的教堂窗户完全不同。教堂内部有现代翻修或者重建的痕迹，中央楼梯的顶端是圣坛和一个精美的12世纪的木十字架。中央楼梯的两侧是向下伸展的台阶，一直通向一个神奇的由柱子支撑的密室，据说这间密室是从8世纪留下来的。教堂的北面是一处回廊，曾经是修道院图书馆所在地。回廊南侧的上方是一个小小的修道院博物馆。此博物馆要到下午四点才开放，我们再三央求一个满脸倦容的神父以及几名修士，但都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回到镇中，享用了一顿美妙的午餐，然后闲逛了一番，最终在规定的开门时间获得许可进入了博物馆。令人惊奇的中世纪物件和抄本随即出现在我们眼前，还有《阿米提奴抄本》的很多照片。

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座修道院有记载的历史可以回溯至742年。1228年，这座修道院加入了西笃会（Cistercian Order）。据说，800年，查理曼曾于前往罗马接受加冕的途中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1462年

的夏天，教皇庇护二世，或者说人文主义学者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也曾在这里盘桓数月，对此教堂外面的一棵栗子树下面有拉丁铭文为证，尼古拉斯用英文大声朗读了那份铭文。可以想见，这位教皇肯定是见过《阿米提奴抄本》的，查理曼也极有可能见过。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以及如今），《阿米提奴抄本》是拉丁通行本的首要参考文本，因此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它拥有极大的分量。16世纪备受围困的天主教徒感受到了新教《圣经》译本的威胁，因为新教的诸多译本都是直接从《圣经》原文的语言翻译而来的，天主教方面则只有拉丁译本。然而，有了《阿米提奴抄本》，天主教方面便可以完美地回应此等威胁。确切地说，这份著名的6世纪拉丁语“圣格里高利《圣经》”，要比已知的所有希伯来语《圣经》抄本都更古老，而且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梵蒂冈收藏的一份希腊语抄本能够在年龄上跟“圣格里高利《圣经》”相提并论。因此，在那场围绕时间轴展开的《圣经》文本战中，《阿米提奴抄本》是重头宣传品。1572年，西笃会总会长曾派人前来借阅这份抄本；格里高利十三世身边的顾问人员也这么做过。但是修道院一概拒绝。最终是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强烈要求借用这份抄本，以创制新的教皇版《圣经》，修道院才做出了让步。1587年7月12日，抄本离开修道院，奔赴罗马；1590年1月19日，抄本回归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以《阿米提奴抄本》为范本创制的西斯廷通行本也于1590年问世，并于1592年被修订为里程碑式的克雷芒版《圣经》，作为天主教方面对路德译本做出的回应，至今这个版本仍在发行。

18世纪晚期，现代进程中的世俗政治旋涡将神圣罗马帝国吞没，许多意大利修道院被卷入其中，阿巴迪亚圣萨尔瓦托雷也不例外——它于1782年6月遭到这股潮流的彻底压制。在接下来数年时间里，《阿米提奴抄本》的处境相当危险，只要是有点胆量的盗贼都可以将之盗取。1789年，托斯卡纳大公彼得·利奥波德（Peter Leopold, 1747～1792，也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得知这份抄本躲藏在“黑暗和灰尘当中，就仿佛已经散佚了一样”，便命人将抄本从阿米亚塔山转移到佛罗伦萨，它先是被交付一个神学院看管，不过很快就被转移到了洛伦佐图书馆。该抄本一直在洛伦佐图书馆中被保存至今，编号是“Cod. Amiat. 1”，很可能是那里最有名的藏品。

我第一次提出来要看一看这份抄本的时候遭到了拒绝。那种深感遗憾的表情恐怕只有意大利人能做出来了，他们告诉我说，抄本太脆弱了，经不起移动，且太珍贵了，经不起触摸。不过，在意大利，“不”这个词不一定意味着否决，只不过是谈判的开端。于是我前往劳拉·诺沃罗尼（Laura Nuvoloni）处寻求建议，同时也去拜会了乔万尼·拉奥（Giovanna Rao），希望他能听从我的恳求。

半个世纪之前，英国考古学家鲁伯特·布鲁斯-米特福德（Rupert Bruce - Mitford）成为描述拜望《阿米提奴抄本》的经历的第一人，他说：



洛伦佐·美第奇图书馆老阅览室，由米开朗琪罗设计，位于佛罗伦萨洛伦佐大教堂回廊的上方

在等了很长时间后，抄本在两人的陪护下出现了，还有第三个人专门负责开门，那情形令人敬畏，一行人捧着抄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厚厚的六大卷，必须将其安放在桌子上后才能解开上面的搭扣，再之后才能翻开封面。因为米开朗琪罗的八角阅览室光线不足，于是我用提前预备好的自行车灯照亮抄本，细细观瞧那装帧，浑身不免因为紧张而发抖。

这是很久之前的一幅研究古物画面，这样的情景是很难令当今时代的人们相信的。但实际上，我本人跟《阿米提奴抄本》接触时的情形也与之差不多。

洛伦佐·美第奇图书馆坐落在佛罗伦萨这个极其美丽的城市中。洛伦佐图书馆的核心藏品最初是由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 1389～1464）搜集的人文主义书册，后来得到了他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49～1492）的收藏品的补充。洛伦佐死后，藏书遭到洗劫和变卖，后由生活在罗马的美第奇家族的后裔重新收回。最终，由教皇克雷芒七世（即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iuliano de'Medici, 1478～1534）送还佛罗伦萨，这位教皇还委托米开朗琪罗在圣洛伦佐教堂回廊上方设计并修建了一座极为典雅的图书馆，圣洛伦佐教堂自1419年之后便一直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堂。图书馆于1517年在教皇的旁系亲戚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Cosimo I de' Medici, 1519～1574）手中完工，科西莫也曾是托斯卡纳大公，当时收藏有大约三千份抄本。当彼得·利奥波德于18世纪80年代派人将《阿米提奴抄本》从“地极带一国”送至洛伦佐图书馆的时候，这座图书馆还没有褪去昔日的王族气派。

圣洛伦佐广场西南角的一处入口可以带领你进入图书馆，此处的广场正对着圣洛伦佐教堂未完工的砖墙墙体。入口处悬挂着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各国的国旗，还有另外一些当时在举办的展会的横幅。穿过售票大厅便可以进入建于1462年的回廊。回廊四周的墙体上布置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物件。回廊的中心是一个精美的花园。我敢肯定花园里的果树是橘子树，尽管游览手册上说是石榴树。通往图书馆的楼梯在正前方，楼梯旁就是保罗·乔维奥（Paulo Giovio, 1483～1552，著名的抄本收藏家；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他）的墓。楼梯向上伸展，越过已经褪色的壁画，升至回廊东侧区域的上方。第一道门是公共入口，可以进抵通往图书馆的楼梯，此图书馆就是由米开朗琪罗设计并建造的，里面放置着一排又一排表面倾斜的藏书柜。第二道门的旁边放置了一个赤陶土花盆，穿过这道门，你就可以进入图书馆办公室了。

在我进入图书馆办公室的时候，两位女士正在聊天。我告诉她们，我预约了见一份中世纪抄本。她们遂打电话询问。很快，一位穿牛仔裤的男士出现了，问我是不是会说意大利语。我先用英语回答，后用法语，再后用德语，最终我甚至用了拉丁语，我希望他能听懂；他耸耸肩，用意大利人特有的方式说看来我此行肯定是要看一看《阿米提奴抄本》，甚至都没有容我自我介绍。我表示赞同，如释重负。他引领我穿过一间墙上布满了带框印刷品的低矮房间、员工储物柜，以及右手边的藏书保险库——它在米开朗琪罗图书馆的下方。最后我们来到了回廊远角处的一个小房间，这里很显然是用于拍摄的，因为里面摆放了照相设备、胶卷和影印机。此时，另一位男士出现了。这位男士手指一辆手推车，手推车上的毛毯盖着一个大物件。“那就是阿米提奴！”他们告诉我说。两位男士合力将手推车里面的东西放在摄像用的高桌之上，那情形令人不禁回想起布鲁斯-米特福德当年的经历，然后便准备离开。我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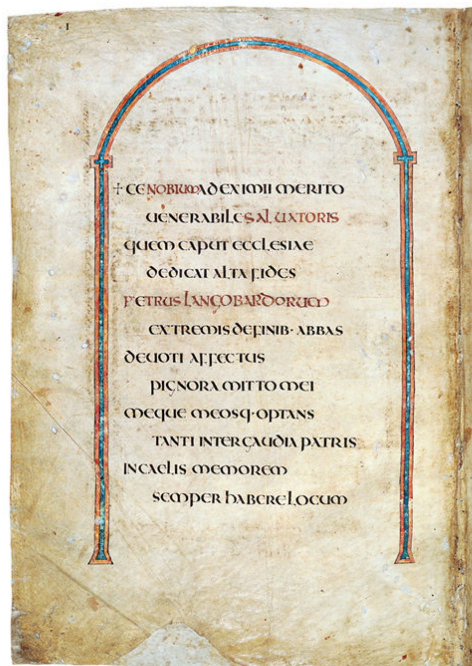
找到可以安全支撑打开的抄本的相关设备，便恳请他们提供合适的物件，并在我捧起抄本之时，将之放在封皮的下面。两位男士遂带着布里奎特（Briquet）的四卷本《论水印》（*Les Filigranes*）折返回来，显然，这部已有百年历史的参考书并不是第一次付诸如此可怜的用途。之后，整个房间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且在我的整个拜访时间里该房间都无人监管，只是偶尔会有人前来使用影印机。

正如阿米亚塔山是一座大山，《阿米提奴抄本》也无可否认地是个庞然大物。这一抄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大”，毕竟很多中世纪晚期的唱诗班手册都比它更大；不过，它的厚度是超乎想象的。其页面的长度大约20英寸，书脊的厚度——不妨想象一下——达到了约11.5英寸，全书朝着书口的方向略略收窄。其书页被用非常现代的包裹着黄褐色牛皮的木板装订起来，封底板之上附有皮革带子，这些带子由黄线缝在一起，并配备了现代的黄铜扣环，扣环则是跟封皮边缘的一组金属饰针搭配使用的。坦白地说，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意大利皮革衣箱，而且是颇为昂贵的那种。我翻开封面，确切地说是举起封面，发现那封面对于下面垫着的布里奎特四卷本大书还是太高了。抄本中有一张长条的书架标签，上书“Amiatino 1”的字样，另有一张打印出来的纸条松松地塞在书页里，上书“文化遗产和文化活动事务部”（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字样，这显然是授权文物保护的部门，其保护范围也涵括了2001年对抄本进行的重新装订，纸条上写明了萨比纳·玛格里尼和塞尔吉奥·乔万尼为文物保护人。这份抄本实在是太过厚重，所以它能维持单一全本的状态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此一情状当年也令比德本人以及塞奥尔夫利特的传记作者印象深刻；而且如今的这份抄本并没有像《凯尔经》（本书第三章的主角）或者《贝亚图斯抄本》（本书第五章的主角）那样，只是因为图书管理的需要就依据现代的卷册体系被人为划分。抄本底页的边缘上依稀可见锈迹，这表明封皮上曾钉有金属配饰。



《阿米提奴抄本》，体积巨大，单卷本，在2001年被用棕褐色小牛皮重新装订，并被配上了黄铜搭扣和抓钩

出于好奇，我试图将整个抄本拿起来。我也有能力这么做，把两条手臂都用上就可以，不过，在抄本打开着的时候可不能这么干，否则抄本的中间部分必然会发生沉陷，这将会是无法控制的。布鲁斯-米特福德估计裸书的重量是75.5磅，加上装饰物、封皮以及装运箱，大约为90磅。米特福德先生对此给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对比：这份抄本在重量上相当于一头成年大丹犬（当然是母犬）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的体重跟这也差不多。


+ CENOBIUMADEXIMII MERITO
UENERABILE SALUATORIS
QUEM CAPUT ECCLESIAE
DEDICAT ALTA FIDES
PETRUS LANGOBARDORUM
EXTREMIS DEFINIB· ABBAS
DEUOTI AFFECTUS
PIGNORA MITTO MEI
MEQUE MEOSQ· OPTANS
TANTI INTER GAUDIA PATRIS
IN CAELIS MEMOREM
SEMPER HABERE LOCUM

第72页：《阿米提奴抄本》的题词页，其中的人名有改动的痕迹



第73页：以斯拉在书橱旁边进行抄写的场景



基督圣像，四周是四福音书作者及其象征物，在《阿米提奴抄本》当中，《新约》文本由此幅整页插图开启。页面左侧的缺口由动物脖颈处皮的自然形状造成

不妨稍微花点时间，仔细打量一下抄本的前八页，这八页比其余的书页要约略小了一些，装饰却是相当华美。第一页的左页有一个圆拱图案，圆拱下面就是极为珍贵的献词，献词的签名是深褐色的，显然有修改痕迹，不如没有修改过的文字那么工整。正对着这一页的页面上就是那极为有名的以斯拉画像——英格兰最为古老的肖像画，其创作日期为716年之前。佛罗伦萨有大量艺术品为人们熟知，然而，当我们真的跟这样的原本面对面时，仍然会感受到一番战栗。在此番相遇中，令我吃惊不已的就是画像上闪烁着金光，这金光出现在以斯拉头部周围的光晕中、书柜后的背景墙壁上、凳子的四围和凳面，以及画像边框四个角落的方块中。此前我看过复制品，从那上面我了解到当初的创制人的确使用了黄金（这样的事情通常发生在早期希腊语抄本上，在拉丁语抄本上比较少见）；不过，我的确没有想到原本的图竟然如此生动且闪亮。可能在人们创制这份抄本的时期里黄金并不是很难得到，毕竟，它跟萨顿胡古墓（Sutton Hoo）出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珠宝以及斯特拉福德郡宝藏（Staffordshire Hoard），差不多是同时期的。

这份巨大抄本除了这八页外，还有差不多两千多页，其中大部分是极为简约但也不失优雅的文字页面，正文以两栏格式写就，基本上没什么装饰；这同前八页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部分抄本保存得相当好，给人感觉就如新本一样，着实令人震惊。通常来说，早期抄本会有

用旧的痕迹，而且还会有从各个时代以不同字体留下的批注、修订以及参引的内容。《阿米提奴抄本》则不一样，除了最初诺森布里亚的缮写室中的人们留下的一些修订内容和仪式标记而外，整部抄本中几乎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看这情形，就仿佛抄本在诞生之后便一直被封存着，不曾被人翻看过一样。这很可能也是实际情况，因为圣萨尔瓦托雷的修士从来都是将之视为圣物的，不可能真的使用这本书。《诗篇》部分的页码显然是在后中世纪时期编排的，同时该部分文本中还被加上了现代的章节序号，我认为后者很可能就是1587~1590年抄本在罗马的通行本编修部流浪期间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当然令人惋惜，不过想想也是，你若是极不情愿地将珍贵物件借出，通常也就别指望这物件能完璧归赵。

总体而言，《阿米提奴抄本》是以八个对开页为一“组”创制而成的。[1]抄本的研究者们甚至一度觉得这极为怪异的第一折也许是从其他抄本上直接挪过来的，并且很可能来自一份意大利抄本，因为这一折的样式和形态跟原本的其余部分或者已知的中世纪《圣经》抄本都完全不一样。这一折里面有一页是紫色的，还有一页是黄色的，完全符合古典样式。不过，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这几页是原本的组成部分，尽管不是那么合拍，但校勘显示，它们与抄本中第796对开页左页呈现的新约基督圣像（Christ in Majesty for the New Testament）出自同一批英格兰抄写员和装饰人之手，用的也都是同样的颜料，而画有圣像的这一页毫无疑问是原本就有的。

这极为怪异的最初几页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且非同寻常的证据，佐证了有关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和塞奥尔夫利特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二人于679年造访罗马的时候确实获取了“无数的书册”，其中就包括了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约485~580）收藏的一批抄本。卡西奥多罗斯是罗马帝国晚期的一名元老，也是哲学家，相当多产，后皈依基督教并且成为《圣经》研究史上的巨人。此人在退隐之后，在意大利东南角落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创建了一个修道院式的研究机构，叫作“Vivarium”（玻璃池），这个名字源自其院子里的鱼塘。卡西奥多罗斯将自己的收藏都赠给了这个研究机构。他写了一本名为《制度》（*Institutiones*）的指南，论述圣俗学问，这本书不仅阐述了划分并解读《圣经》的方法，同时也详细讲解了他是如何运用这独特的方法来解读自己收藏的一些抄本的。他给出的抄本细节跟《阿米提奴抄本》开篇几页的内容可谓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认定，这些细节是直接从《阿米提奴抄本》抄录而来的，或者不妨这么说，比斯科普和塞奥尔夫利特在罗马获取的“无数的书册”当中，必定就包含了卡西奥多罗斯先前收藏在卡拉布里亚的一些抄本，这些抄本后来进入流通并被转手。卡西奥多罗斯的“玻璃池”图书馆很小而且资金也少得可怜，这样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在创建人谢世之后通常不会维持太久，因此，这些藏品很显然在卡西奥多罗斯谢世之后流散四方。如果塞奥尔夫利特购进这些藏品中的部分抄本，那么这些抄本当然就会在诺森布里亚成为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修士们的抄写范本。古典学问如此广博的比德，很有可能有缘得见这些传承

自罗马帝国晚期的极具价值的私人藏品，虽然他那个时候未必能意识到，眼前的这些抄本曾经的主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西奥多罗斯。

卡西奥多罗斯在《制度》一书中提到一个情况，说他自己拥有一份巨大的拉丁《圣经》全本，他将之称为“大抄本”（Codex Grandior）。卡西奥多罗斯还谈到，“大抄本”的《旧约》部分取自哲罗姆的希腊语译本第一修订版，而不是后来从希伯来语翻译而来的通行本。这部分内容显然涵括了三百八十页的篇幅。在那个时代，单卷本的拉丁《圣经》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这份抄本完全有可能就是塞奥尔夫利特从意大利带回的那份“旧”译全本。卡西奥多罗斯还说，他曾在“大抄本”里面插入了一张耶路撒冷圣殿的结构图，这张图是以《出埃及记》26中的描述为依据的。《阿米提奴抄本》最初几页当中恰恰有一组跨页（也就是第6对开页的左页和第7对开页的右页）呈现了这样的一张图，展现的是圣殿内殿也就是“帐幕”（Tabernacle）的结构。帐幕的中心就是“至圣所”（Holy of Holies），当然，还有约柜。卡西奥多罗斯还记录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在《制度》一书第一卷的第十四章），他将圣希勒里、圣哲罗姆和圣奥古斯丁的《圣经》文本划分方式分别以图示方式嵌入“大抄本”当中。这些恰恰也都出现在了《阿米提奴抄本》当中，分别在第3对开页的右页、第4对开页的右页和第8对开页的右页。



第78~79页：《阿米提奴抄本》中的耶路撒冷圣殿结构图，跟卡西奥多罗斯的描述颇为近似，卡西奥多罗斯曾将一幅相应的绘图插入自己收藏的“大抄本”当中

《阿米提奴抄本》第一折当中，最有名也最为怪异的一页就是以斯拉画像插图页，这一页如今已经成为抄本的卷首页了。画面呈现的是一个头戴光环、身穿犹太祭司袍服之人的侧面像，此人端坐在凳子上面，

正在腿上放着的一本半开的书上写着什么。他的双脚放在一个低矮的架子上面。四周散落着各种各样的缮写用具，尖笔、分规、笔、墨水瓶等，旁边桌子上很可能还放置了一碟颜料。他身后是书橱，绘制有方格镶嵌图案的书橱门打开着，里面略带坡度的五层书阁便映入眼帘，书橱里面有九本书，都有着暗红色的封皮。拉文纳（Ravenna）的迦拉普拉西狄亚陵寝（Mausoleum of Galla Placidia）中有一幅圣劳伦斯的镶嵌画像，画面当中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书橱，里面放置了四福音书，该画像可以溯源至5世纪的后期，差不多就是卡西奥多罗斯所在的时代。《阿米提奴抄本》的这幅插图当中，书橱四周的家具和装饰物展示出来的木工技艺是极为精巧的。该图还尝试了透视技法。墨水瓶在地面之上制造了一团暗影，之所以提及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暗影技法直到15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当中。虽然这只是一幅由7世纪晚期的一个英格兰抄写员所作的插图，但是它提供了相当有意思的信息：画中人并没有书桌，他是直接将书册放在腿上展开工作的，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抄写员仍然是这么做的。就在我记录这些情状，并据此想象这样的缮写室跟中世纪缮写室的日常环境有着怎样的差异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也正是在自己腿上的硬板笔记本上写下这点点滴滴的吗？眼前的《阿米提奴抄本》已经将整个的桌面都占据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空间。此时在洛伦佐图书馆的微缩胶卷柜和复印设备旁、运笔写些什么的我，不就像是一个安坐在书橱前的抄写员吗？

这幅插图的确很奇怪，所呈现的显然不是抄写员的工作场景，而是写书人的工作场景。书册之上的字迹非常潦草且散乱。有人说那其实是“提洛速记体”（Tironian notes）——中世纪早期的一种速记体，不过，那其实只是插图创制人为呈现一些无具体含义的文字而采用的艺术手法。画框之外的页面顶端是一组俗体对句：“Codicibus sacris hostili clade perustis/Esdra deo fervens hoc reparavit opus”（大致意思是“圣书被毁，以斯拉受命于天，恢复圣书”）。这一题词指的是在公元前457年前后巴比伦之囚结束的时候，作为祭司兼抄写员的以斯拉被送回耶路撒冷，发现希伯来《圣经》已经丢失并且被人们遗忘了，于是在上帝的引领之下，凭借记忆再现神圣经文。这幅插图的配图文字以及画中人的《旧约》中的祭司服饰，表明此人就是以斯拉。

卷首的作者画像插图页是自古典时期开始希腊文本中就有的一个特点。本书第一章我们谈到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画像就是如此。不过，《阿米提奴抄本》里面的以斯拉显然不是作者。以斯拉的贡献，在于将《旧约》第一部分的经文保存了下来，这当然不是基督教《圣经》的全本，因为全本的大部分文本是以斯拉死后很久才出现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样一份通行本的全本的卷首插图人物也许选择正在写作的圣哲罗姆更为合适，实际上，后来的许多中世纪《圣经》抄本就是这么做的。《阿米提奴抄本》的插图风格完全是地中海式的，因此肯定是以从意大利输入的范本为依托的，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它就是以“大抄本”为依托的，尽管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提及这幅插图。对于这幅画像，人们普遍认为，那里面的人实际上就是卡西奥多罗斯自己。跟哲罗姆（当然还有以斯拉和塞奥尔夫利特）一样，卡西奥多罗斯也是在

经历了一段混乱期之后，成了坚定的《圣经》看护者和传播者。他见证了546年东哥特人对罗马实施的大洗劫，他自己的在卡拉布里亚的研究基地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就成了沙漠里的小小绿洲，因此，他献身于经文的保护工作，令其免遭野蛮人和叛教者的毁灭性打击。在《制度》中，他不仅仅描述了“大抄本”，也谈到了一个“新抄本”（novem codices），即他在按照自己的方法将《圣经》划分后，抄写而成的九个独立文本。画像中以斯拉身后的书橱里恰恰就展示了这九个独立文本，而且其各自的标题也都被呈现在书脊上。在这一画像的复制品中这些标题基本上是无法辨识的，不过，在原本中，书脊上的标题是可以反射光线的，由此我们便可以在无光泽的书脊的衬托之下，将标题辨识出来，它们分别是：《旧约前八卷》（Octateuch）、《列王记和约伯记》、《历代志八卷》、《诗篇》、《所罗门书》、《先知书》、《福音书》、《书信》以及《行传和启示》。这其中，顶多也只有第一层书阁之上的书册能匹配以斯拉所在的历史时期，但这九个文本在卡西奥多罗斯的卡拉布里亚图书馆都有收藏。说这幅画像是以卡西奥多罗斯为原型创制而成的，也许更为合适一些。当然，卡西奥多罗斯是否会找人给自己画像，这一点是存疑的，不过，他谢世之后的图书管理员以及他的继承者们是有可能将这样一幅圣徒传记式的卷首插图嵌入他们的已故院长最为喜爱的“大抄本”当中的。

画中人拥有多种身份，可能是卡西奥多罗斯，也可能是以斯拉，这一现象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前半叶得到了延续：在诺森布里亚北部海岸这幅画像再次被精确复制，这一次画中人物被换成了福音书作者圣马太，涉及的抄本正是如今由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在此抄本中，原来的“以斯拉”画像得到精确的仿制：两人姿态是完全一样的，手都放在翻开的书册之上，两人穿有同样的草带鞋，画中都有两张凳子——一张用来坐，另一张用来放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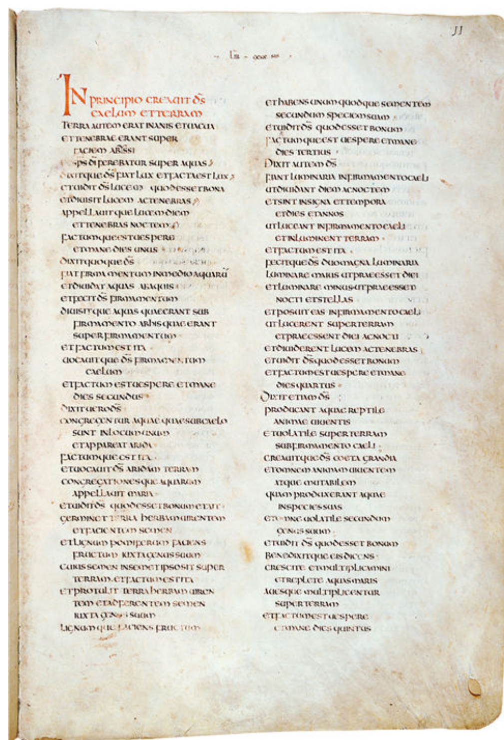
7世纪晚期或者8世纪早期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抄本中的圣马太画像，跟《阿米提奴抄本》中的以斯拉画像一样，也是在诺森布里亚创制完成的，并且用的是同样的范本

现在我们要离开抄书员，转而看看抄本字体。《阿米提奴抄本》是用安色尔体写就的，也就是典型的“罗马书写体”（romana scriptura）；并且跟传自罗马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一样，它是以长句分行的两栏格式写就的，也就是所谓的“从句和短句分行法”，方便大声诵读。安色尔体跟爱尔兰抄本运用的本土的大写和小写字体完全不一样，抄本研究者通常将后者称为“岛屿”体（Insular Style），其覆盖范围包括了英伦诸岛上所有的凯尔特人居住区。《阿米提奴抄本》运用的安色尔字体同地中海安色尔字体形成鲜明对照，这也进一步表明，维尔茅斯-亚罗的抄写员圈子是有意识地远离爱尔兰风格并且特意效仿罗马的书写习惯的。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和塞奥尔夫利特有可能从意大利带回了一批相当熟练的抄写员，让他们前来英格兰传授安色尔体抄写技艺。《阿米提奴抄本》第86对开页的左页上记录的是《利未记》的引言内容，在这个页面上可以看到书写着多个相当笨拙的希腊语词，表明这份抄本的制作人是某个塞尔万多大人（Lord Servandos）。这显然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而且，这些词定然是某个懂得拉丁语但并不懂得希腊语的人，在不理解文本内容的情况下，从范本当中抄录而来的。尽管抄写员严格按照意大利范本进行了抄录和仿制，但可以看出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英格兰人。缩写格式以及一些诺森布里亚安色尔体抄本独有的特征，都足以让我们得出这一结论。

人们常说，仅凭字体就能够看出维尔茅斯-亚罗抄写员圈子和林迪斯法恩圈子在文化观念和视野上的巨大差异，前者是以罗马字体为模板

的，后者则惯用爱尔兰的岛屿体，虽然后者也只是位于前者北面大约五十英里的地方。不过，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常识上，两个圈子之间都是互相吸引且互相影响的。《阿米提奴抄本》虽然是以罗马字体写就的，但一些文本的开篇词也会展示出明显的岛屿体风格，例如“渐弱”风格（diminuendo）——一开始字母很大，之后逐次缩小。《创世记》的开篇就是一个例子。开篇的前两个词“In Principio”，也就是“起初”（第11对开页右页），其首字母“I”很大，比常规文本的字母要高出很多倍，第二个字母“n”则要小一些，字母“p”就更小一些，依次递减，直到最后的字母同正常字体的大小无异。这是典型的爱尔兰抄本风格，本书第三章将要讲述的《凯尔经》有多处比这更夸张的例子。《阿米提奴抄本》的抄写员肯定在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见识过这样的风格。如实情所示，林迪斯法恩的修士也从亚罗“大抄本”中借鉴了圣马太的画像，并将小小的安色尔字体运用于他们所钟爱的8世纪早期的《圣库斯伯特福音书抄本》（“Saint Cuthbert Gospel”）中。如今，后者被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同巨大且厚重的《阿米提奴抄本》比较起来，它显得很是小巧，也没什么重量，很显然是698年葬于林迪斯法恩的圣徒库斯伯特早期随葬品之一。

应该有不下七个（甚至可能有九个）抄写员参与了《阿米提奴抄本》的抄写工作，由此便也不难感受到其所属缮写室的大小以及组织严密程度。一些人的字体要比其他人大一些，在各个《圣经》文本之间的隔断处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抄写员的工作量是以文本集来划定的。据校勘情况显示，有多折包含的书页数量不同于常规，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相关卷册的结尾之处：比如，xlviii（拥有9个对开页，《历代志》的结尾，第378对开页左页）、lxviii（拥有5个对开页，《以赛亚书》的结尾，第535对开页左页），以及xc（拥有5个对开页，《托比书》的结尾，第708对开页左页）。所有这些中断处都代表了抄写员的轮换，因为除非是接下来的文本的抄写工作已经开始了，否则的话是不会出现总页数为奇数的折的。由此便也可以让多个抄写员同步展开工作。



《阿米提奴抄本》的《创世记》开篇页，首行的前几个字母字号逐渐缩小，呈现出典型的岛屿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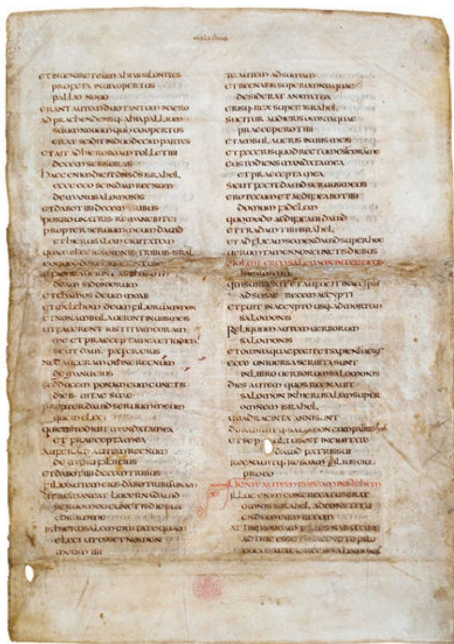
抄本所用羊皮纸是很宽大的，因此一份全本抄本需要大量羊皮或小牛皮。通常来说，一张皮只能被制成一个对开页。《阿米提奴抄本》用掉了一千零三十张纸，这么算下来也就有五百一十五头小牛为此遭殃了。塞奥尔夫利特从意大利带回的是三份全本抄本，因此要将这个数量乘以三。虽然没有证据，但有人认为，692年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获得的那块地产就是为了开辟牧场，以便为创制《圣经》抄本提供更多牲畜用的。实际上，在塞奥尔夫利特超过三十年的院长任期当中，对一个大型且组织良好的乡间社区来说，同时饲养几千头牲畜倒也并不是什么超常之事，更何况，畜群除了提供兽皮而外还能有很多别的产出，这些也都是修道院的生活必需品。比如众多修士日常所需的肉食，还有羊角、羊胶、骨头等，以及大量农用血肥。羊皮纸尽管质量通常很好而且极其柔软，但还是会有家庭作坊制品的触感，那样的触感是我们在本书第十一章的维斯孔蒂《半神》或者第十二章的《斯皮诺拉时祷书》上不会遇到的，当然后两份抄本都是15世纪的物件了。有些书页上会留有斑点；还有些书页则留有羊皮本身的缺口以及抄写员留下的印迹；有些羊皮纸非常精细，几乎是透明的（比如第810对开页），使得部分字迹有些模糊不清；有些书页稍微短一些，或者少了边角，这种情况就需要抄写员予以适应了（比如第613、第735对开页等）。抄本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人，若非专家，很可能会怀疑我将要说的话，而且一些考古学家也可能

会秉持这种态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事先不知道《阿米提奴抄本》是英格兰人的作品，我仅凭纸张的触感及其味道上也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即英格兰人用的羊皮纸有一种奇怪且温软的皮革味道，相形之下，意大利的皮革味道则更刺鼻一些，也没那么温软。这也许是因为英格兰抄写员使用了不同类型的动物的皮，比如用小牛皮取代绵羊皮，或者是这些动物的生长环境不同。与今天的家畜饲养相比，中世纪时期的家畜饲养应该更容易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未来，DNA技术也许会改变这个领域的研究。

7世纪到8世纪的档案材料和抄本是极为稀少的，因此得以存留下来的材料之间若是能形成互证，将会对本章产生极大帮助，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抄本的存留率几乎到了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比德记载过的抄本竟然留存到了今天，的确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即便是15世纪的抄本也要靠着非凡机缘才能够存留到今天。然而，以下的事件则更是一个奇迹：迄今为止，整个欧洲唯有一份有关私人图书馆之情况的详细描述存留下来，这座私人图书馆距离诺森布里亚1500多英里，正是它提供了用于制作那份存留下来的抄本的范本。而且接下来，我们还将见证一个更大的奇迹。

此一发现始于1908年9月初，这一天，牛津大学的教会史学家库斯伯特·特纳（Cuthbert Turner, 1860～1930）正在达勒姆教堂图书馆询问有关早期《圣经》抄本的事情。同为教堂图书管理员、考古学家和收藏家的威廉·格林韦尔（William Greenwell, 1820～1918）邀请特纳到家中用晚餐。特纳注意到格林韦尔家的客厅里裱有一张书页，这书页显然是来自一份巨大的抄本，上面的文字是用安色尔体写就的，特纳遂在言谈间提到，这张书页看起来很像是《阿米提奴抄本》里面丢失的书页。此话引起了主人出人意料的反应。格林韦尔断言说，这张书页来自塞奥尔夫利特创制的另外两份《圣经》抄本。但在接续的考察到来之前，而且也在特纳将这张书页刊印之前，格林韦尔就将书页捐献给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也得以在1909年初收到了这张书页。如今，这份藏品以一个令人喜爱且“绿意盎然”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格林韦尔（绿泉）书页”（Greenwell Leaf）——有点像《罗宾汉》的故事里面的名字。书页之上是用拉丁文语写的《列王记》III 9:29～12:18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格林韦尔为这张书页提供了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细节上有诸多差异：有时他说他是于1890年在纽卡斯尔的一家书店里发现的这张书页，有时又说那是一家“古玩店”。纽卡斯尔距离亚罗只有六英里，因此这个说法看来是有可能的，尽管我很难相信，像格林韦尔这样一位并不低调的古物家，竟然在有了如此令人震惊的发现后的二十载的时间里，忘记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威廉·格林韦尔，英国古物收藏家（左图），也是达勒姆大教堂的图书馆馆长，右边是一份7世纪晚期《圣经》抄本的书页（右图），这张书页是1908年9月库斯伯特·特纳在格林韦尔家中发现的

1911年，W.H.斯蒂文森（W. H. Stevenson, 1858~1924，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兼图书馆馆长），发布了他为历史抄本委员会关于米德尔顿勋爵的契据编制的一份目录，这些契据都收藏于诺丁汉的沃拉顿庄园（Wollaton Hall）——建于16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的一批大庄园之一。斯蒂文森在目录中提到了十页用同样的安色尔字体写就的抄本书页，以及三张很小的类似的残页，它们所属抄本的装帧工艺是威洛比家族（Willoughby family,其成员后获封米德尔顿男爵）于16世纪使用的那种工艺。这些书页的内容同样出自《列王记》III~IV。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些幸存的书页都来自《阿米提奴抄本》的孪生抄本，也就是来自塞奥尔夫利特当年交给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的两份全本抄本之一。1938年，这些“威洛比书页”以一千镑的价格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1982年，尼古拉斯·匹克沃德（Nicholas Pickwoad）在肯斯顿-拉西的班克斯家族地产文件当中，又发现了一张来自《便西拉智训》的书页，当时，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英国托管协会（National Trust）。如今，这张残页被交由大英图书馆长期保管。我去往阿米亚塔山之旅的司机尼古拉斯·巴克尔（Nicolas Barker）曾负责大英图书馆的书稿保护工作，他当时也参与了这张残页的认定工作，并在那之后将藏品转交给了抄本部门的同僚詹内特·拜克豪斯（Janet Backhouse）。詹内特注意到，这张残页跟沃拉顿庄园也是有关联的，因为书页本身曾被用作多塞特一处地产的转让契约的包装纸，此处地产是于1585年11月从沃拉顿的弗朗西斯·威洛比爵士那里购得的。请相信我，我曾不辞辛劳，在诺丁汉的威洛比家族档案室的书柜里面竭力搜索，希望能找到更多的

书页，但是一无所获。我只在斯蒂文森发现那些书页的资料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特许状登记文书和其他契据的副本，其中几张书页上面仍然有用7世纪晚期安色尔体写就的文字的反像印迹。因此，我就不免要猜测，格林韦尔手中的那张书页很可能也来自米德尔顿勋爵的契据室，而且，斯蒂文森很有可能将自己的发现送交格林韦尔，寻求确认，斯蒂文森则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不算合理的请求，希望能留下一张书页，尽管这只是私人请求，但斯蒂文森为了表示感谢，予以应允。

这些书页极有可能来自沃切斯特大教堂曾经藏有的一份《圣经》抄本。证据就在于，人们在威洛比档案室里面也发现了跟11世纪的沃切斯特大教堂的特许状副本差不多大小的纸张。我们都知道，麦西亚国王奥法（Offa，757～790年在任）据说曾赠送沃切斯特大教堂一份巨大的《圣经》抄本，而且，于1062～1095年任沃切斯特主教的沃尔夫斯坦（Wulfstan）曾命人将教堂特许状文件抄录到“神圣教堂的经书”里面。在12世纪时，人们曾确认奥法的这份《圣经》抄本是在罗马创制的，那就意味着这部经书应当是用安色尔字体写就的。792年，奥法的女儿嫁给诺森布里亚国王，而塞奥尔夫利特的《圣经》全本之一很有可能作为这桩政治婚姻的交易品，于8世纪晚期来到奥法的王国（这也许正是794年亚罗修道院遭受维京人洗劫时发生的事情）。

于是，我拍下了“格林韦尔书页”和“威洛比书页”的照片，前往佛罗伦萨，将其跟《阿米提奴抄本》进行对比。当然，这样的事情此前应当已经有人做过了，比如说1909年的库斯伯特·特纳，他在跟教堂牧师格林韦尔共进晚餐之后肯定会有奔赴佛罗伦萨的念头；还有理查德·马斯顿（Richard Marsden），此人于1995年的时候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格兰的〈旧约〉文本》（*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Anglo-Saxon England*）一书，这本书对本章来说是一份重要的参考文献。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能逐字逐句地对照两份抄本，那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两份抄本的内容总体上是完全一样的，当然这两份抄本应该出自同一个范本（或者其中一份以另一份为范本），并且是在同一间缮写室里创制而成的，所以我们对此也不会感到惊讶，甚至能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具体用词方面偶尔会有细微的差异，比如说肯斯顿-拉西抄本上的“oblectavit”（意为“使其幸福”，《便西拉智训》35:25），在《阿米提奴抄本》里面被呈现为“oblectabit”，但这丝毫不影响句子的意思。不过，还是存在两点重大差异。大英图书馆的“威洛比书页”在《列王记》III的结尾和《列王记》IV的开篇处并没有停顿，只是在页边空白处写有一个由希腊字母X和P组成的凯乐符号以及一个被放大的首字母“P”，属于“Praevaricatus”一词（意为“背叛”，依据现代版《圣经》的排版序列，此处应该是《列王记下》1:1）。但是《阿米提奴抄本》的文本在此处是明确中断了的。《列王记》III的内容在第303对开页左页结束，结尾被标注了“FINIT”（意为“完”）一词，留有十行的空白，《列王记》IV则在下一页开篇，第一行用了红色字体，首字母拥有三行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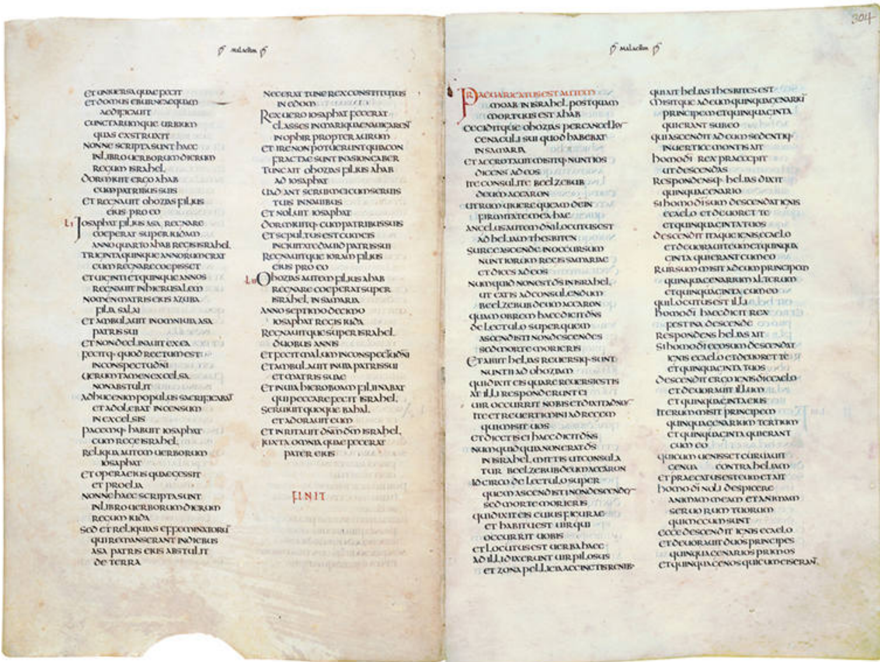
经文本身是不支持第三卷和第四卷之间的这种中断的，因为这两卷的叙事是一体的，而且它们在希伯来经文当中更是一个单一叙事文本。在《旧约》的希腊语译本中，此一单一叙事文本才被分成各自独立的卷

册，这个希腊语译本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应该说，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所用的范本也是没有中断的，否则的话，抄写人是不会注意不到的。在创制《阿米提奴抄本》时，编排抄本的人做出决定让拉丁语译本同希腊语译本保持一致，便划分出了单独的卷册。此一改变为抄写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于是自《阿米提奴抄本》开始，所有的拉丁语《圣经》都沿用了这样的编排方式，而且所有的现代版《圣经》也都如法炮制。这样一条线索有可能表明，《阿米提奴抄本》是在“威洛比书页”之后创制的，而且抄本编排上的这项变动在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创制这些全本抄本的时候仍然存在。

另一处重大差异出现在“威洛比书页”的第11对开页左页上。为了更有效地说明这一点，且容许我征引相关的拉丁语文本（相应的译文会在后文给出）。以下是这一页第一栏的第6～18行：

Et constituerunt sibi regem Iosiam filium eius pro eo. *Reliqua autem sermonum Amon quae fecit, nonne haec scripta sunt in libro sermonum dierum regum Iuda. Sepelieruntque eum in sepulchro suo in horto Aza, et regnavit Iosias filius eius pro eo.* Octo annorum erat Iosias cum regnare coepisset et triginta et uno anno regnavit in Hierusal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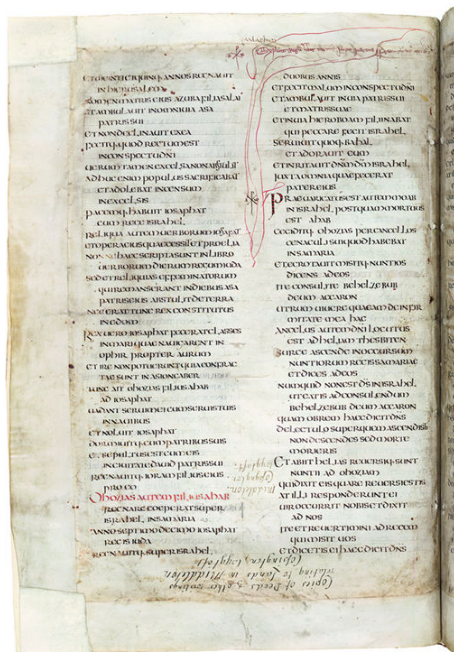
这是《列王记》IV 21:24～22:1的内容（对应于现代版《圣经》的《列王记下》21:24～22:1）。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这一文本的斜体部分在“威洛比书页”里面是存在的，但是在《阿米提奴抄本》里面则完全不见踪影（见《阿米提奴抄本》第325对开页左页）。对此，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抄写错误，也就是所谓的“homeoteleuton”（跳读）——抄写人在将第一行的“eius pro eo”抄写完毕之后，停顿了一下，然后再回看范本的时候，眼睛跳到了几行之后的“eius pro eo”上面，于是便从“Octo annorum...”开始接着抄写了。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很容易出现的，其结果便是抄本中丢失了经文的两节内容，而且正是因为《阿米提奴抄本》的这个错误，反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出现的天主教修订本同样缺失了这两节的内容。目前我用的以1592年的克雷芒版为依托的拉丁通行本（马德里1965年版）也缺失了这两节的内容。这件事情本身是相当有意思的，而其源头显然就在那个时代的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



第92～93页：分别是《阿米提奴抄本》当中《列王记》III的结尾和《列王记》IV的开篇，从中可清晰地看出两份文本之间是存在中断处的。页面底端的缺口同样是兽皮本身的缺口

不过，这两节内容的缺失是十分可疑的。其大致内容是，“亚们（Amon）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们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尽管用今天的标尺来看这些文字的确有经文风格，但是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像是伪作，因为这些文字差不多就是在逐字重复《列王记》III15:7～8的内容，后者的开篇和结束文

字分别是：“Reliqua autem sermonum …”和“…filius eius pro eo”。但凡有经验的文本编辑都不免会怀疑，这些文字只是偶然插入的一段针对“eius pro eo”的评注文字，由此便成了逆向的“跳读”。换言之，《阿米提奴抄本》的范本当中定然是有这两节内容的，但是我们无从确定《阿米提奴抄本》之所以遗漏了这两节，究竟是因为抄写员看错了行，还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聪明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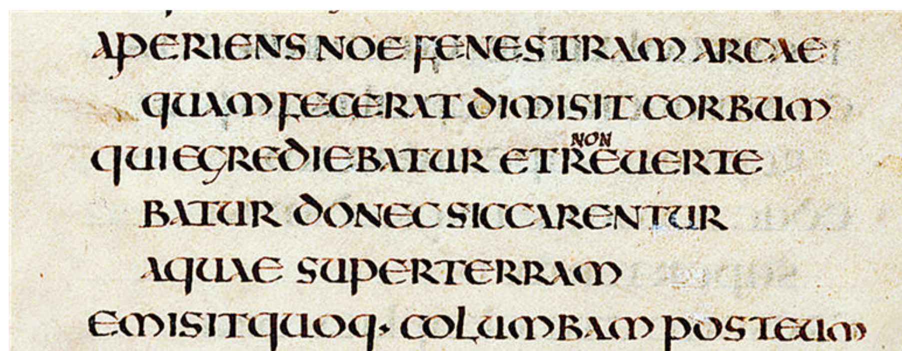


“米德尔顿书页”当中《列王记》III的结尾和《列王记》IV的开篇，这两个文本的叙事是连贯的，并无中断

倘若是后面这种情况（毕竟《阿米提奴抄本》中的其他内容不曾出现此等错误），那我们就可以推测当时的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的确有这样一位抄写员，此人有信心也有能力根据文本的合理性，对既有文字实施删节，而且，此人还应当有足够的知识将拉丁语《列王记》中合并在一起的III和IV部分编排成希腊语译本的格式。同时，这个非同一般的《圣经》学者和评注人还应当在全本的整个创制期都居住在亚罗修道院。如此推断，则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标准，那就是比德。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正是比德说服了塞奥尔夫利特，令新的全本抄本依从哲罗姆新译本，不过，比德也是应当有参照文本的，那就是卡西奥多罗斯的“大抄本”，特别是“大抄本”里摘引自希腊语译本的古旧文本。

还有一处相当有意思的差异出现在《创世记》8:7。这段文字讲述的是诺亚派出飞鸟去查探洪水是否退去。在现代经文中，诺亚派出的飞鸟是渡鸦，渡鸦数次飞去又飞回，直到洪水完全退去、大地回归干燥。这正是希伯来原本中的说法。但是希腊语译本添加了一个否定性的说法，

其意思就有所改变：渡鸦飞离方舟，一直等到洪水退去、大地回归干燥才返回。两种说法都说得通。比德在评注《创世记》之时，还详细讨论了这两种说法，他本人是倾向于采纳希腊语译本里面的说法的。将《阿米提奴抄本》中《列王记》的III和IV拆分开来的那个抄写员，也秉持这样的看法。在有关渡鸦的那个段落当中，《阿米提奴抄本》的抄写员在相应的地方写下了既有拉丁语译本中的词句“qui egrediebatur et revertebatur ...”（它飞去又飞回），但这段文字在同一时期被修改了，而且看字体，这样的修改并非出自职业抄写员之手；其修改方式是在“revertebatur”（飞回）一词的前面插入了用安色尔字体写下的“non”（没有）一词，使经文同希腊语译本保持一致。这个情况出现在《阿米提奴抄本》第15对开页右页第二栏倒数第17行处。“Non”这个词是否就是比德的手笔呢？极有可能。当我在洛伦佐图书馆的影印室里时，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触摸的这一页，也许正是7世纪晚期比德本人读过而且亲笔修正过的书页，这样的想法给我带来的兴奋之感实在是莫可名状。



此处为《阿米提奴抄本》当中《创世记》8:7的内容，其中第三行被增补了“NON”（没有）一词，由此同希腊语译本的意思保持一致，很可能是比德所为

现在，该回到阿米亚塔山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了。我们不知道《阿米提奴抄本》是何时以及如何来到这座修道院的。“伦巴第修道院院长彼得”这个捐赠献词本身应该是伪造的，不过捐赠一事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此番伪造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尴尬的情况：这份抄本当时并不在塞奥尔夫利特为其计划的目的地。如前文所见，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俯临弗兰西格纳大道——意大利北方前往罗马的朝圣之路，因此此处肯定也是朝圣客的歇息之处。这条古道一直向南延伸，经过洛桑穿越勃艮第地区，在翻越大伯纳德隘口之后，从奥斯塔进入意大利，穿越帕维亚、卢卡、锡耶纳和维泰博，最终抵达罗马。塞奥尔夫利特客死朗格勒之后，理论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这条路线上得到这份抄本，包括查理曼在内，而且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南去或者北归途中将抄本留给圣萨尔瓦托雷的修士们。



7世纪晚期或者8世纪岛屿风格的圣物箱，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阿米亚塔山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

前文也曾提及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的博物馆。几个月前，我在伦敦与尼古拉斯·巴克尔共进了午餐，他跟我谈到了这座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令我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我们便计划一起前往阿米亚塔山亲眼看一看。这件展品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座修道院发现的。据载，人们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允准下重建修道院教堂时，发现它被藏在圣坛下面的密室里面。这一发现于1974年第一次发布于世。它是一只精美且便携的小圣物箱，形状类似一间住房，有山墙有屋顶，嵌有暗红色的方框图案，且装饰了彼此交错的金属工艺品，包括鸟头顶饰，跟《杜若经》（Book of Durrow）以及《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的装饰物非常相像，后面这两份抄本很可能都是7世纪晚期的物件。除了镶嵌在上面的石榴石而外，这一圣物箱应该来自爱尔兰（这些石榴石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是有记载的，很明显不是爱尔兰当地之物）。它还装饰有一些彩绘玻璃，我们在本章开篇所附的插图里面也见过这样的彩绘玻璃，那应该是亚罗修道院的独有之物。箱子上面还附有金属标牌，用来系挂绳索，以便搬运或者携带。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此一圣物箱是与塞奥尔夫利特同时代的物品。

同样的，位于朝圣路之上的修道院随时都有可能接收过往旅人或者朝圣客的异域赠礼。此一圣物箱跟《阿米提奴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已知的联系，唯有一个巧合情况值得注意：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距离诺森布里亚如此遥远，却拥有两件同一时期且同一产地的伟大艺术品。对此，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两件艺术品是同时抵达这座修道院的。尼古拉斯和我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精力，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推进对

这一猜测的思考。其实，个中情形倒也不难想见：为了维持旅途当中的宗教生活，塞奥尔夫利特一行人势必会带上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里的便携的圣坛、圣杯以及圣物等。据《塞奥尔夫利特传》记载，716年9月，塞奥尔夫利特去世，那之后随行的一些修士返回诺森布里亚，另一些人则携带着《圣经》抄本继续前往罗马，后者的路线应该就是沿着弗兰西格纳大道向南。意大利北方的乡间都开垦得相当好，很适合旅行。但是，一旦进入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之间的蛮荒区域，环境就陡然变得凶险起来：这片区域人口稀少而且山路崎岖，匪帮和狼群四处出没，有时候还会出现野熊。不难想见，此时的这个失去了首领的旅行团肯定会暂时停留下来，等待更好的时节，结果他们便不再前行了。当时阿米亚塔山的坡地上应该已经有了一些宗教场所，这些英格兰修士在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亡故。742年，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第一次见诸记载，此时塞奥尔夫利特的随行人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修士虽然顶多只有四十五岁，但也应该开始向往安宁的生活了，而且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无法再次成团。于是，他们很有可能带着那份《圣经》抄本和圣物箱，在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落地生根了。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不过，这样的猜测倒也可以填补《阿米提奴抄本》的历史中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空白期，在此期间，它完成了从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到佛罗伦萨图书馆影印室的旅程。

注释：

[1]　具体校勘情况如下：i^{8}（一个双开页＋四个对开页＋两张单页），$ii \sim xxi^{8}$，$xxii^{4+1}$（第173对开页为单页），$xxiii \sim xxiv^{8}$，xxv^{4}，$xxvi \sim xlvii^{8}$，$xlviii^{8+1}$（第378对开页为单页），$xlix \sim lxvii^{8}$，$lxviii^{4+1}$（第535对开页为单页），$lxix \sim lxxxix^{8}$，xc^{4+1}（第708对开页为单页），$xci \sim cxviii^{8}$，$cxix \sim cxx^{8+1}$（第941对开页和第950对开页为单页），$cxxi \sim cxxx^{8}$。抄本当中，每一“组”的底页的下端内角处都会有罗马数字标记，注明其最初所在的“折”的序列，有时候会用字母“Q”起首（这是quaternion一词的大写首字母），有时候则没有这样的情况。麻烦的是，第一折并没有进入序列（这里指的是第1～8对开页，也就是最前面的几页），而且在抄写员给出的折的序列标记当中，标记“XXIV”是发生了重复的，这显然是疏忽所致，这个标记出现在实际上的第二十五组的底页（即第193对开页的左页）之上，后来又出现在第二十六组的底页（即第201对开页的左页）之上。抄写员在抄本上标记的第CXXVIII折，也就是抄本的最后一折，实际上应当是第130组。

第三章
凯尔经

8世纪晚期

都柏林，三一学院，

MS 58

《凯尔经》据报道被盗过两次。第二次发生在1874年。这一年11月5日的《伯明翰每日电讯》（*Birmingham Daily Post and Journal*）报道说："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陷入一片绝望。他们最珍贵的一件藏品丢了——圣科伦基尔（Saint Columbkil）于475年所书的《凯尔经》。这本世界上最古老的书是爱尔兰艺术最完美的标本，拥有最华丽的装饰，价值一万两千镑……"那个星期英国和爱尔兰的媒体中充满了大量类似的报道。报道中的估价很有意思：就在前一年，用上等牛皮纸制作的《古腾堡圣经》在伦敦附近地处汉沃斯公园的佩尔金斯拍卖行被拍出了三千四百镑的价格，那已经是书册拍卖史上的最高价了，而且要比第二价位高出很多，另有一份普通纸张抄本以两千六百九十镑的价格成交。然而，三一学院对丢失的《凯尔经》所做的四倍于世界已知最为昂贵的书册的估价并不离谱。据说当时是三一学院的院长在打算将这份抄本展示给几个来访的女士看时，才发现抄本已经不见了。没有人能回忆起这份抄本上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何时，图书管理员不在，也无法询问。于是，流言四起，不过暂且仅限于大学校园里通常会有的那些流言。《伯明翰每日电讯》则接触到了更深一层的秘密："借阅签名单上是一个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名叫邦德（Bond）的先生的名字，三一学院院长目前已经收到了这份借阅单。"不出一个星期，抄本便被找到了，是三一学院的图书管理员J.A.马莱特亲自将抄本送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为了询问重新装订抄本之事。报纸以大写字体刊印的嫌疑人名"邦德先生"，实际上是指爱德华·奥古斯都·邦德爵士（Sir Edward Augustus Bond, 1815～1898）。邦德从1867年起担任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管理员，并且于1873年升任大英博物馆的首席管理员。他曾劝马莱特不要轻易动重装抄本的念头，因为这份抄本实在是太过珍贵了。不过，邦德先生还是希望征得马莱特的同意，将抄本留在大英博物馆几天，以便他进行研究。此时三一学院已经派出了自己的律师摩尔先生前往伦敦，要求邦德先生归还抄本，《凯尔经》便被火速送回爱尔兰，对此双方都心有怨愤。那些日子正值爱尔兰民族主义浪潮翻滚涌动的时期。1874年，爱尔兰自治同盟（Home Rule League）成立。1886年，格莱斯顿提出的"爱尔兰统治法案"以微弱之差遭遇挫败。1888年，在伦敦奥林匹亚会展中心举办的政治色彩浓厚的爱尔兰会展中，展方要求将《凯尔经》也放在展览名录当中。"相信双方会就这个问题达成满意安排的。"这是都柏林的报纸《自由人和商业广告人报》（*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于当年4月5日给出的委婉说法。伦敦方面则大肆宣传《凯尔经》会来伦敦的消息。此番预期显然未能考虑政治因素。三一学院理事会对此严词拒绝，"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这件独一无二、价值无量的国宝"暴露在英格兰。



《凯尔经》上一次被盗则是八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确切地说是1007年的事情。关于此次事件，我们只发现了一处文献记载，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相当模糊的。这一文献就是所谓的《乌尔斯特志略》（*Annals of Ulster*），这份部分以古爱尔兰语写就的年代记一直更新到16世纪初。该抄本也收藏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其中一个关于1007年的条目记述得非常粗略，大意是说："科伦·基尔（Colum Cille）的伟大福音书被渎神之徒趁夜从肯纳纳斯教堂（Church Cennanas）西侧的圣物室盗走了。这是西方世界最为珍贵之物——那样的封皮和里面的画像实在是太珍贵了！两个月零二十天后，这本福音书回归了教堂，上面的黄金已经被取走，还出现了一处缺损。"这里的"Colum Cille"就是指圣徒科伦巴，字面意思是"教会的科伦巴"。肯纳纳斯是米斯郡凯尔城的旧称，该城也被叫作肯利斯城，在都柏林西北方大约四十英里处。圣物室位于"西侧"，对于这一位置原文的表述是"*airdom iartharach*"，意思就是教堂的西端，也可能是指教堂西侧独立于主体建筑的一个宝库。文中明示的失窃原因是抄本的装帧或者装抄本的箱子的装饰物极为昂贵——爱尔兰人制作的福音书抄本通常会配备可便携的圣物箱。这份年代记中表达"圣物箱"之意的词是"*comdaigh*"；而在其他文本中这个词通常被写作"*cumdach*"。凯尔的这个圣物箱是用黄金制造的，并且装饰有福音书作者的人像。盗贼只对上面的贵重金属感兴趣，而这些盗贼很可能是维京人。在这个时代，抄本失窃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1012年卢森堡的圣于贝尔修道院中一份饰有珠宝的圣咏抄本就遭到了维京人的劫掠，英格兰东南部的坎特伯雷的《斯德哥尔摩奥里斯抄本》也被维京人偷走，英格兰人很快将之赎回，不过维京人在归还抄本之前已经将上面的装饰物劫掠一空了（本书第一章谈到过这件事）。盗走《凯尔经》的人很可能在取走抄本和箱子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后，将他们认为没

有任何价值的抄本抛弃或者掩埋在某个地方。这两个月零二十天的炼狱之旅，恰恰是福音书里基督在旷野中度过的那段时日的两倍，也是基督教大斋节时长的两倍。而且，抄本和基督的结局是一样的：在被埋葬之后重获新生。

“西方世界最为珍贵之物”如今已经成了爱尔兰头号的民族瑰宝。《凯尔经》可能是所有中世纪抄本当中最有名的和最能激发人们情感的。它已然是爱尔兰文化的象征，并且已经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修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1971～2000年爱尔兰的两便士硬币和2012年面值二十欧元的纪念币上都使用了《凯尔经》中的图案。爱尔兰发行过一张面值五镑的纸币，其背面印有《凯尔经》里面的首字母图案。爱尔兰当然也发行过《凯尔经》主题的邮票。世界上所有的爱尔兰酒吧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凯尔经》的印记。爱尔兰制作的数以万计的亚麻茶巾上大多有《凯尔经》中的文字或装饰，更不用说那些用来表达爱国情怀的纪念品上了，比如纪念围巾、丝带、饰针、啤酒瓶、袖扣以及杯垫等。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一个专门调暗了光线的“圣龛”里面，那就是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东端的“Treasury”（国宝展厅），此处每年大概要接待超过五十二万的访客——他们都要购买带有编号的彩色门票才能“觐见”正在展出的《凯尔经》。从1992年这个展览中心开张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一千多万人排队从《凯尔经》的玻璃展柜面前走过。对于这样一份拉丁语抄本来说，其每天的访客数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都柏林，到处可见路标标示出前往《凯尔经》所在之处的方向和路线。三一学院校门附近新立的电车站也是以这份抄本命名的。其他的中世纪抄本都不曾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即便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凯尔经》究竟是什么。我自己就经常遭遇这样的问题：《凯尔经》差不多就是“时祷书”之类的东西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凯尔经》有何特别之处呢？

《凯尔经》这个名字取自最初拥有这份抄本的市镇，但在1007年，有人将这份抄本从这座市镇盗走了。它实际上是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的合集，文本本身采用的是哲罗姆的拉丁通行本，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变更（后文将会看到），同时它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添加了一些传统的引言。在这几点上（而非整体上），源自8世纪末的《凯尔经》有点类似本书第一章讲述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我搭乘一趟早晨的航班从伦敦抵达都柏林，前去拜望这份抄本。这趟旅程几乎在通勤距离之内，机场大巴直接将我送到了都柏林城南部中心地段。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天高云淡。穿过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摄政院（Regent House）——的拱门，我进入了三一学院。学院实际上是一座微缩城市，拥有宏伟建筑和雅致广场。拱门下方的路的正前方设置有路牌，指向《凯尔经》的所在；我跟随上面的标识，在路牌处右拐，绕行到那座长长的18世纪图书馆建筑的南侧。此时国宝展厅外面的鹅卵石路上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觐见”国宝；我则（稍微有些不好意思地）穿过了这些队伍。进入或者离开这座建筑，都要经过一间书店，毕竟《凯尔经》可不普通，见这样的抄本跟中世纪的朝圣之

旅实质上没什么区别。除了忙碌的收银员外，我没有看到问询台之类的设置。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个身着公务服装的人，于是便上前询问在哪里能见到抄本部管理员伯纳德·米汉（Bernard Meehan）。“哦，跟我来吧。”他用爱尔兰人特有的轻快语调说道。我不禁怀疑此人是专门奉派来迎候我的。他引领我直奔写着“仅供出口之用”的主楼梯，进入了“长厅”（Long Room）的正中央。所谓“长厅”，就是三一学院图书馆的昵称，这是一个辉煌且精美的木制藏书室，由建筑师托马斯·伯夫（Thomas Burgh）于1712～1732年设计。他最初设计的容量是十万册书稿，不过，在19世纪中期时人们为其增设了多个夹层回廊，用于放置镀金且皮革装帧的书稿，从而将藏书量提升了一倍之多，并且将藏书空间从底层一直扩展到了穹顶。这样的场景实在壮观。连我的向导都停了下来，以确保这震撼效果有充分的时间透入我的心灵。“我猜你来过这里，是吗？”我的向导问道。我表示同意。倘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真的存在，那它大概就是三一学院长厅的样子吧。我们沿着长厅前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大理石半身像以及书柜，并穿过用绿色绳子设置的一系列障碍，走向左手远端角落的一道相当陡峭的木楼梯，此处的楼梯颇有点像航船上的梯子。“小心脑袋。”向导提醒我，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布里安。他带我走上楼梯来到一个阳台，（阳台上有两个图书保护员正在一张桌子上办公），经过这个阳台，我们便进入了图书馆西端的珍本阅览室，它就和用于存放《凯尔经》的圣物室一样。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伏案工作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几个人还戴了手套。不过，向导领着我先向右拐，然后向左拐，进入了格局开阔的图书馆办公室，伯纳德·米汉就在这里极为和善地接待了我。米汉留着修剪得相当整齐的灰色胡子，有点像戴了眼镜的雪纳瑞犬。他与每个人都很亲近，人们都很喜欢他。



都柏林三一学院的“长厅”阅览室，始建于18世纪早期，并于19世纪时扩建

《凯尔经》太过珍贵，而且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此，伯纳德解释说，这样的珍本是不适合放在阅览室的。此等待遇是其他抄本都不曾享受的，即便是保存在法国尚蒂伊的《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抄本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凯尔经》很容易引发众人骚动，就如同明星或者国家领袖一样。因此，《凯尔经》的安保措施就跟大国元首的安保措施一样复杂且缜密。后来，米汉先生在阅读了本章的初稿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之后，恳请我不要太过详细地描述我见到这份抄本的地方。我无意保持神秘，但也要遵从他的谨慎意见。因此，我只能说我们一行三人离开办公室进入了图书馆的一个保密的房间——那里是不可能有外人不小心闯入的。当天一早，伯纳德先生就已经将一个巨大的加湿器运进这个房间了，以便将这个中央供暖的房间的湿度维持在最佳标准。这个程序显然是很有效的，因为房间的小窗上面已经笼罩了一层水汽。他们带我走到一张圆桌前面，圆桌之上盖有绿色的罩布，且放置了泡沫衬垫、温度计和白手套。“准备好了。”伯纳德先生向布里安点头示意，于是两人便一起去取第一卷抄本。不能否认的是，在等待抄本的这段时间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莫名兴奋。十三岁的时候，我在新西兰的达尼丁公共图书馆（Dunedin Public Library）第一次接触到了中世纪抄本，如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倘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来到都柏林，等待着同这份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抄本约会，又会有何感想呢？

大英博物馆曾于1874年建议不要轻易重装《凯尔经》，虽然这份抄本的装订状况并不够好；然而在1953年，当时最著名的英国装订工匠罗

杰·鲍威尔（Roger Powell，1896~1990）还是对其进行了重新装订。鲍威尔将《凯尔经》分成四卷以便四部福音书可以被同步展出，当然也是为了方便轮换，不让每卷都长时间地暴露在外。此行，我事先就跟米汉先生约定好，只需要见到当天没有展出任务的两卷就可以了。伯纳德和布里安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只很是精巧的小盒子，很像一只小小的木质衣箱，盒子上面有一条皮革带子。这盒子显然太小了，根本装不下《凯尔经》，不过我很快意识到，里面肯定装着第一卷。这个盒子是木匠爱德华·巴恩斯利（Edward Barnsley，1900~1987）制作的，他当时制作了四个这样的盒子，它们可以被叠放进一个书箱，就如同玩偶屋里面的抽屉柜一样，而这一书箱就是三一学院为抄本提供的现代圣物箱。盒子的形状像木制文件盒，盒子上安有大小合适的盖子，盖子被长长的铜质弹簧固定在盒子上面，只需扭动弹簧就可以打开。这个装置形成的压力可以令各卷保持合拢状态，因此每卷抄本也就不需要搭扣了。



爱德华·巴恩斯利和罗杰·鲍威尔为拆分为四卷本的《凯尔经》专门制作的木盒，每个盒子放置一卷，辅以铜弹簧，弹簧的压力可令抄本在盒子里面保持被压紧的状态

伯纳德·米汉先生将第一卷搬出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就那么凝视了片刻，并没有急着打开。抄本长度约为13.75英寸，宽度大约是10.5英寸。虽然经过了1953年的重装，但它看起来仍然十分古旧，而且也是“工艺美术运动”风格，跟在同一时期接受了重装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样式有点类似。《凯尔经》的两面是径面刨切的橡木板，很朴素，如今已经有大量的触摸痕迹。书脊则由白色矾鞣革制成，有螺丝钉将其由内而外地同橡木板接合起来。曾需要修补的书页已经由很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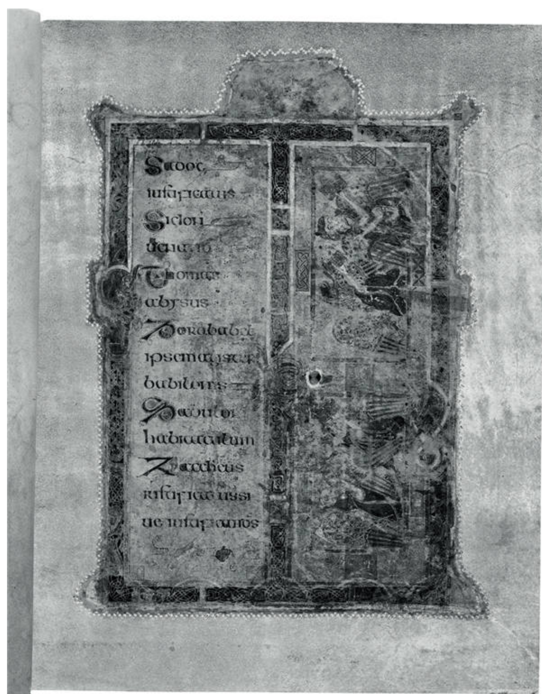
白线缝合完整了，缝合的原则就是：痕迹可以明显，但必须是传统工艺。衬页以及重要的修补页使用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白色羊皮纸，十分显眼。我觉得若是换作今天的装订工，就很可能用上一些遮掩之术。罗杰·鲍威尔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经书当中大约有一百四十张纸已经相当松软了，急需他从书页内侧入手实施加固。要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将书页内侧粘在新的羊皮纸纸根上。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纸张的内侧部分的厚度将会加倍，变成书口部分厚度的两倍。面对此种情况，装订工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内侧部分的羊皮纸进行打磨，使之变得特别薄，以此抵消新纸的厚度。三一学院理事会坚决拒绝这样的做法，他们的态度是：原本上面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污渍，都不得清除。在这个问题上，鲍威尔和学院方面几乎谈崩。鲍威尔说那些理事“偏执到了荒谬的地步”。我倒是觉得应当赞扬学院的这种审慎态度。最终，鲍威尔还是找到了另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将新的空白羊皮纸插入各折之间，并将这些新纸张的内侧部分打磨到极薄的程度，其他地方则维持正常厚度。这样一来整卷都保持了正常形态，不过抄本的厚度被很不自然地提升了，翻动书页会带来的那种愉悦感也彻底消失了——总会有新插入的纸张突然出现，打断平顺的翻阅过程。这的确太令人遗憾了。当然，隔着玻璃欣赏抄本或者靠着影印本或电子版进行研究的人对此倒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观察不到这一情况。

伯纳德在我到来之前提出了另外一些规则，希望我能接受。他们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跟两卷没有展出任务的抄本会面，会面时长由我自己决定，但是，每次只能同一卷会面，而且需要伯纳德先生本人来翻动书页。为此，伯纳德先生刻意腾出了一整个白天的时间，而且也很乐意让我遍览每一张书页，他展现出的无尽耐心令我感动且钦佩：他会时不时地评说一番，并在我记笔记时小心翼翼地暂时退避到一旁；翻动书页之时，伯纳德先生极为小心，用的都是指尖，并且是将页顶和页底同时翻起。

这份抄本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顺滑，有时候甚至有透明流体的触感，书页本身是完全平展的，跟印刷书页没有差别。大型抄本通常会有书页不平整的情况，在这份抄本里是见不到的。此番平整工作是罗杰·鲍威尔完成的，目的当然是压紧书页以防灰尘进入。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首先极为小心地将书页打湿，然后在用长尾夹将书页四周同时夹起的情况下将书页悬空晾干。书页的边缘在此之前就已经被裁切得非常干净整齐了，那是一个名叫乔治·穆伦（George Mullen）的书稿修订人的遗产，此人在19世纪20年代对抄本实施了重新装订。不管怎么说，如今的《凯尔经》已然极为整洁，肯定不是中世纪时候的样子了。

这一卷的第一页令人略微有些失望。原来的长方形书页已经是黄褐色的了，并且有大量的磨损痕迹，书页的边缘并不齐整（之所以是这样的形状，是因为这一页是照着左页上的图案进行裁剪的，在伯纳德先生翻页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重装之时，鲍威尔采取了大胆手法，将之缝在一个干净的现代羊皮纸框里面。这一页显然曾经满是褶皱，鲍威尔将之平展开来，并放回了原来的位置。页面中的内容被分隔成了纵向的两栏，其四边都被以有装饰的边框围拢起来。这一页的文字

内容是以大号的圆体字开启的：“Sadoc iustificatus, Sidon venatio, Thomas abysus …”这是现已丢失的、作为原始抄本开篇文字的名录里最后一栏的内容，这份名录应该就是圣哲罗姆编排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希伯来人名的缩编目录，其中的人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按照字母顺序的编排方式，这的确令人吃惊），并且都被同相应的拉丁人名对应起来了。《圣经》里面的人名和地名在希伯来语当中还有其他的含义，而这些含义是只懂拉丁文的读者无法了解的，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在解读经文的时候错失另外的含义，这令哲罗姆感到非常焦虑。有人认为名录对于《凯尔经》这种大型展示性抄本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这一看法有些奇怪，因为《凯尔经》并不是用来为《圣经》评注学者做参考的。此处出现的第一个名字是“Sadoc”（Zadock，也就是扎多克），哲罗姆对其的解释是“称义”。据我所知，祭司扎多克在福音书里面根本就不曾出现，叫这个名字的祭司出自《列王记》和《历代志》，并且最后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所引述。接下来是地名“Sidon”（西顿），对其哲罗姆给出的意思是“狩猎”；福音书里面的确出现过西顿城，是跟推罗（Tyre）一起出现的（《马太福音》11:21～2等）。第三个名字是指使徒托马斯（Thomas），对其哲罗姆给出的意思是“坑”（或者“深海”），福音书中这个名字当然出现过很多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0:3处。名录最后出现的名字是“Zacchaeus”（撒该），也就是指那个出现在《路加福音》19中的税吏。它跟扎多克这个名字一样，在希伯来语中都有“称义或者正直”的意思。



如今的《凯尔经》的首页，以《福音书》的希伯来人名名录的结尾处为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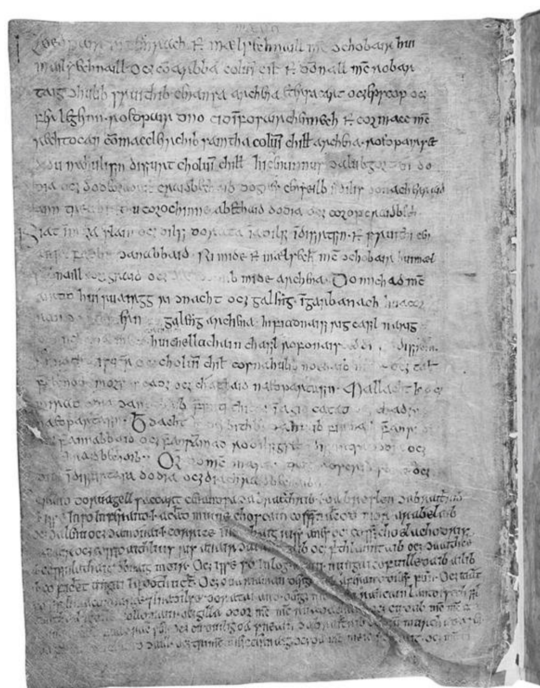


《凯尔经》的福音正典表，其背景很显然是古典建筑，列示了福音书中各对应段落的编码。该页右侧明显可见罗杰·鲍威尔的缝合痕迹

抄本第一页的第二栏呈现了《凯尔经》的第一张插图，不过这张图现在已经变成黄褐色，看起来相当陈旧了，令人很难辨识其内容。插图是卧排的，似乎历来人们都是从右侧欣赏的。抄本当中有许多小画像似乎朝着错误的方向，这是其中第一幅。不难想象，在8世纪，人们蜂拥而来，群集在抄本周围，从各个方向凝视这份抄本；或者，这是为上帝提供的视角。这张褪色的插图所展示的是四福音书作者的象征物，《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面也有这样的画像：马太的象征物是手持书册的天使，一头有翼且长舌的狮子代表马可，路加的象征物必定是一头牛（尽管在这份抄本里已经很难辨识清楚了），约翰的象征物则是一只鹰。这是这份抄本当中最常见的一类画像，它们在这里成了福音正典表前面的卷首插画的一部分。

福音正典表是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40）的首创，它是四福音书中的平行经文的索引。《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也有过这类正典表，只是这份抄本后来丢失了前面的22页。在很多早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圣经》抄本中福音正典表都会被置于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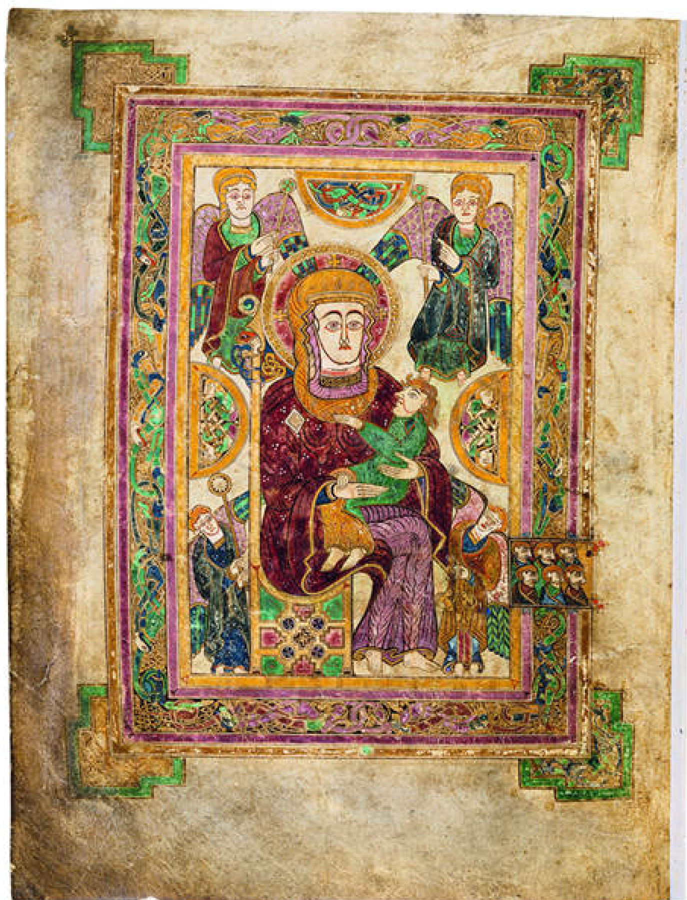
列廊柱之间，廊柱顶端由雅致的圆拱连接起来，就像教堂回廊的拱顶一样。读者尽可以用手指滑过书页，对两列廊柱之间的章节序号进行横向对照。实际上，大多数抄本是可以被比作古典建筑的。倘若你凝视希腊语或者加洛林时期的抄本里的福音正典表，你就会感觉自己如同置身于洒满阳光的庭院，或是拜占庭宫殿里色彩斑斓的走廊，抑或是地中海地区的修道院里。但是在这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8世纪的爱尔兰，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廊柱的，更没有廊柱上面那如同彩虹般的圆拱。这里的教堂通常相当低矮而且光线暗淡，只有方形过梁横跨在小小的门窗上。就《凯尔经》里面的这张福音正典表来说，其传统的仿建筑式设计差不多已经被爱尔兰式的装饰湮没了。廊柱看起来是空心的，并被彼此交织缠绕着的生物填满了。廊柱基座的结构因此被消解得无影无踪。柱顶的圆拱也被各种装饰和福音书作者的正脸画像以及其象征物挤得满满当当——的确是太拥挤了，这样的风格应该说是爱尔兰抄本或岛屿风格抄本所独有的。实际上，到了《凯尔经》的福音正典表的最后两页，设计者差不多已经放弃了，或者他可能效仿的是一份有缺页的范本，因此开始自由发挥了。因为在最后几页上他只是简单地将页面用方框分隔开来，廊柱和圆拱都消失不见了，使得这些书页有点像现代的图版游戏。（如果三一学院的商店的工作人员在读了我的这段文字后决定设计并出售这款游戏，可不要忘记这是我的创意。）



以古爱尔兰语写就的特许状，此页原为空白页。这些后来添加进抄本的文件当中包括了一份签有凯尔教堂神父乌亚·布莱斯伦之名的文件

在正典表的最后几页以及之后几页的原为空白的书页上，其底端空

白处都抄有以中世纪爱尔兰语写就的各种契据。抄本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类文字。这些契据都与11世纪晚期到1161年凯尔修道院周围的地产有关，且就是在当时或者稍晚一些被抄入抄本的。立约双方很可能就是在这本福音书面前立誓的，之后便将契据文字抄入抄本当中，希望借助这神圣文本来确保契约得到尊奉和履行。早期欧洲各地的福音书抄本（如《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都会被这样使用。此类契据的内容通常是这样的：凯尔教堂的牧师乌亚·布莱斯伦（Ua Breslén）及其亲族以18盎司白银的价格购入穆恩·考斯凯恩（Muine Choscáin）地产，随附地产范围内的草地和泥煤（拥有泥煤的开采权），此范围的西部边界为多纳夫摩尔沼泽地的边缘，立此为据，多人见证（由此便不难想见立约之时许多人乱糟糟地围拢在《凯尔经》周围的场景），见证人包括希尔·图亚泰尔族（Sil Tuathail）族长兰坎（Rancan）之孙安格斯（Oengus），科伦·基尔的继承人费尔多姆纳赫·乌亚·克鲁凯恩（Ferdomnach Ua Clucáin，卒于1114）以及科伦基尔教堂全体成员，爱尔兰北方的高级牧师乌亚·杜南（Ua Dúnán，卒于1117），塔拉国王弗兰·乌亚·马尔塞克奈尔（Flann Ua Maelsechnaill, 1087～1094）之子唐纳尔（Domnall），以及凯尔教堂看门人埃赫特加尔（Echtgal）之子奥辛（Ossín）。这份契据出现在《凯尔经》第6对开页的左页。这些人的名字听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仿佛他们来自一个极为古老的世界，从中我们也完全可以确定《凯尔经》当时的所在地。实际上，这也是唯一一份早期证据，证明《凯尔经》在11世纪时的确归属凯尔教堂，而这一点恰恰也同《凯尔经》于1007年失窃的情况形成互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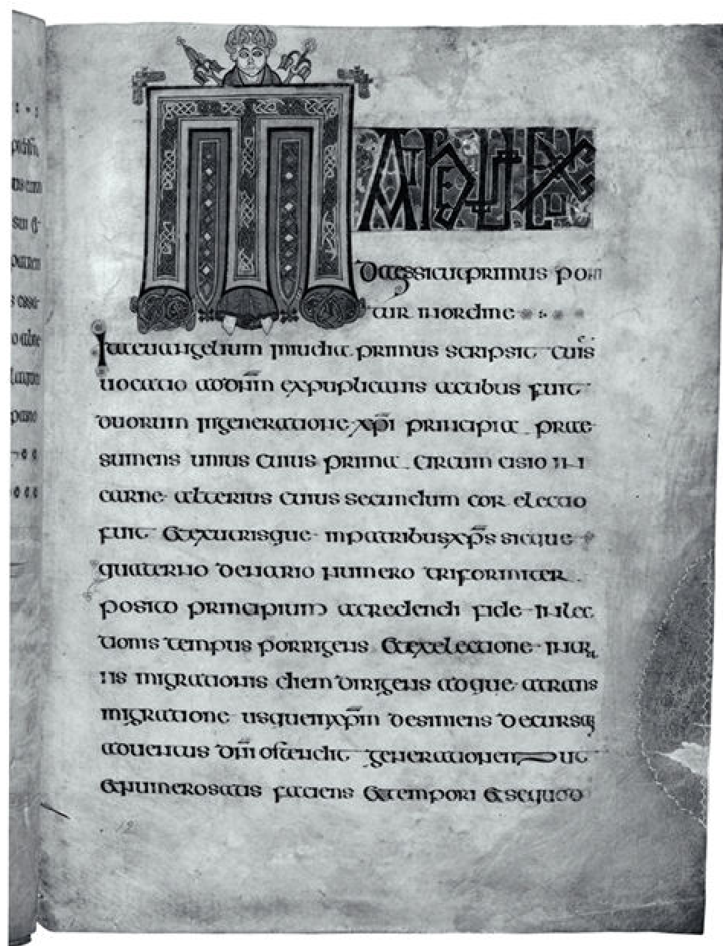


“圣母和圣子”画像，据说是欧洲艺术史上最早的“圣母和圣子”图，四周有天使环绕

伯纳德继续翻动书页，我们便见到了《凯尔经》的第一幅整页插图。这幅插图出现在第7对开页的左页。插图呈现的是四天使围绕着圣母和圣子的场景。1972年，帕特里克·司各特（Patrick Scott）设计了一组爱尔兰邮票，再现了这幅插图里面的一个细节场景。似乎是在这幅插图中，圣母和圣子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艺术作品里。我要说的是，这幅画实在是太丑陋了，尽管这话很可能会令我再也无法进入爱尔兰共和国。圣母的脑袋显然太大了，跟身体完全不相称，她的嘴极小，用红色线条描绘出来的眼睛却瞪得硕大，鼻子又那么长，仿佛要从脸上滴下来了；透过她紫色的外袍，还能看见圣母那低垂塌陷的乳房，以及两条

扭向同一边的小了一号的腿——这简直就是一幅儿童画。圣子则以侧面示人，同样被画得如同鬼怪，令人心生厌恶：他的红头发呈现出狂野之态，如同横生的杂草，鼻子和下巴都向前突出且向上翘起，更有一条红线从鼻子一直延伸到耳朵处，也太吓人了，看这意思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位基督日后会在红线区域内长胡子；更可怕的是，婴孩的两只脚竟然都是左脚。四天使的形象也不敢恭维，至于是不是逼真，我当然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四天使是绝对承受不住那么沉重的外套的。当然，有一点是我必须承认的：在艺术史上，“内在美”是一个太过艰深的概念，尤其是对于一千两百年前的画作来说。插图制作人的手艺是无须怀疑的，看一看极其精美的边框装饰就知道了。也许，画中的几个核心人物的形象取自更为古老的画作，而那个时候人们对此种形象是有特殊崇拜的，或者认为画中人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因此这种怪异风格只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不是技艺水准的问题。据说路加就绘制过一幅圣母画像，后来（甚至今天）的很多希腊圣像是以那幅画像为范本的。早期的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Coptic）抄本中也出现了畸形的圣母和圣子画像。此等画像手法是如何传播到西方岛屿的，我们无法了解，就如同我们今天仍然不能解释鸟类的大迁徙一样。8世纪的圣徒奥兰（Saint Oran）石质十字架碑的架柄上面也出现了跟这幅插图的上半部分极其相像的画面，这座十字架碑是在爱奥那岛出土的，最近刚刚被修复并在当地的博物馆展出。

抄本中的这幅插图当然是指“圣子降生”事件，因为它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章节概要部分的开篇页的对页，《马太福音》则正是以“圣子降生”开篇的。页面中有几行字采用了装饰体，彩绘图案极为密集，几乎无法辨识字母本身，多亏17世纪的一个抄书员将这些开篇文字转录到了页面下方的空白处：“Nativitas xpisti in bethlehem…”（“基督降生伯利恒”）。《马太福音》的确以此事件为开篇。到了下一页，我们便遇见了那优雅的岛屿大写体（insular majuscule script），《凯尔经》正是以这样的字体著名的。（此处的“大写体”有时候也被称为“半安色尔体”，是横向书写且带有装饰的大写字母的字体，为英国和爱尔兰的岛屿所特有。）不过，福音书正文是在二十一页之后才开始的。非经文内容的引言部分显然太长了，可能结合了多份早期抄本的完整引言，以便人们的日常使用，尽管这些内容对抄本的第一批主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这就如同圣诞午餐的“装饰品”会年复一年地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精美，此等福音书抄本也会在历史进程当中被添加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且这些添加的内容会随着新抄本的创制被不断承续下来，成为抄本本身的组成部分，即便它们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了。实际上，福音正典表以及概要部分多多少少已经无法使用了，原因很简单：《凯尔经》正文中已经没有了对应的章节划分。



《马太福音》引言开篇，“Matheus ex iudaeis sicut primus ponitur ...”（马太，犹太人，被置于第一位……）

这之后的内容是《马太福音》的传统引言，引言以一个巨大的方形首字母开篇，字母上方绘有一个吃惊不已的人正向外窥视的场景，就如同海边的沐浴者躲在毛巾后面窥探海滩上的情形一样。再往后便是《马可福音》的章节概要和引言，之后是《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引言，然后又跳回《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章节概要——这个部分采用了红色和紫色的文字，装饰得相当华美；最后则是《马太福音》的引言插图，这里再次出现了四个福音书作者的象征物（都在各自的华美的方框里面手舞足蹈），以及一整页的圣马太站立画像（第28对开页的

左页）。图里的圣马太就那么直直地盯着读者，左手持书册，右手则伸入罩袍当中，就像拿破仑一样。其罩袍是紫色的，上面点缀着黄色斑点。尽可以将这样一个人物想象成幽灵，就在一堆抖动着的饰品以及眼露凶光的野兽中间幻化而出。他仿佛飘浮在空中，因为他的脚是朝外的，罩袍的褶边也在抖动。这一页已经很暗淡了，必然是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被展览并且触摸过无数次了。



第120～121页：《马太福音》的开篇页，这是一幅整页插图，呈现的是福音书作者马太的画像，该图对页上绘有《马太福音》的开篇文字“Liber generationis …”（……的家谱）

最终，在我翻到这一卷四分之一处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正文内容才开始现身，此处是在第29对开页的右页。开篇这一页上的文字实际上是无法阅读的，那是一堆旋转着的曲线以及圆形和方形的几何图案，其间填充着极为精巧的装饰。一个小人在页面顶端向外窥探，那神态就像是一个刚刚穿过无数的装饰品攀爬到楼顶的建筑勘察员，正在观察着下面的一团乱象。这个小人当然就是圣马太，因为他有光晕而且手持书册，还有一个天使在页面上端空白处的角落里，那是马太的艺术象征。该页左下角绘有一个站立着的人，手持一本闭合着的书册。这可能也是马太，虽然其头顶没有光晕；或者可能是一个神父或者牧师，他现身这里的目的是要将手中的福音书打开，解锁那里面的所有预言。尽管这近乎疯狂的装饰令人基本上无从辨识书页上的文字，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确是以“liber”一词开篇的——“Liber generationis …”（……的家谱）。后来的两个读者，很可能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这一页的乱象，已经将这两个词抄录在页面下方的空白处了。

几页之后又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多页开篇。首先是一幅整页的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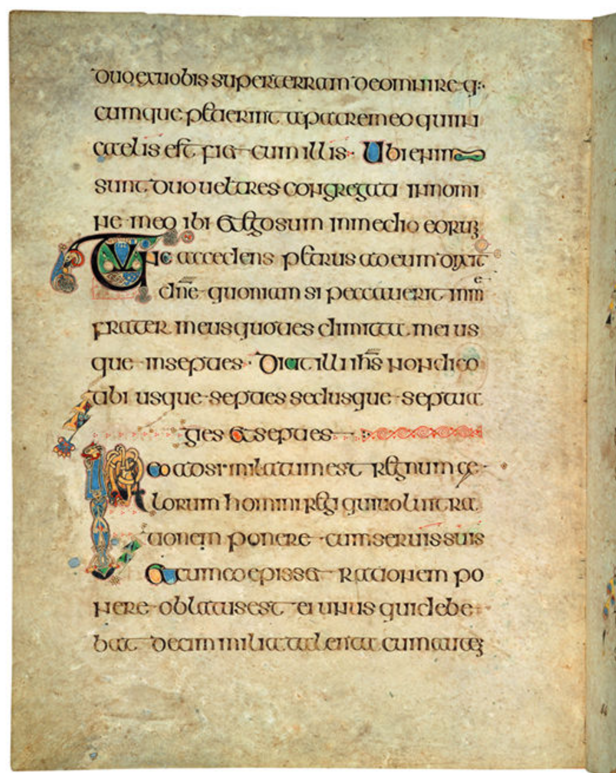
督画像，这里的基督端坐在王座之上（第32对开页左页）；与插图页相对的是所谓的“地毯页”（carpet page），这一页没有文字，全部是装饰。“地毯页”这个术语艺术史家们使用得实在是恰如其分，因为这样的书页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织工极为精巧的东方地毯。有些人希望在科普特人所在的北非地区找寻爱尔兰基督教之起源，那么这些人完全可以这样的“地毯页”为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它们像极了科普特人的织物。下一个开篇出现在第34对开页的右页，这一页又是无法阅读的。该页上其实就只有一个词——“Christi”（基督），因为基督降生这个情节就是从《马太福音》1:18开始的。这个词是以传统的中世纪缩写方式书写的，取自其对应的希腊语词的前几个字母“XPI”，具体呈现出的效果如万花筒一般。后来无数的抄本都采用了这样的设计，因此见多识广的我们也就很难想象，8世纪的会众在第一次见到此等书页的时候有着怎样的感受。



《马太福音》1:18的开头文字“XPI autem generatio”（耶稣基督降主的事），几乎已经无从辨认的凯乐符号将基督的名字装饰了起来

后面的几部福音书都设置有大幅的整页插图。福音书正文前总有呈现福音书作者象征物的插图页，以及装饰极其复杂的开篇词页。对经文不熟的读者是根本无法看明白这几页的，例如第130对开页右页的《马

可福音》开篇、第188对开页右页的《路加福音》开篇，以及第292对开页右页的《约翰福音》开篇。



《凯尔经》的文本页，呈现的是《马太福音》18:19～24的内容，抄本制作人用狮子脑袋的图案装饰首字母

在这么一整个白天中，《凯尔经》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被翻过，我的一个内心感受是：尽管这些插图名扬四海，但它们打断了正常的叙事脉络，因此要想享受阅读的过程实在是件很难的事情。我甚至都不能确定它们算不算美观。它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商业价值当然也是无可估量的（我曾是苏富比拍卖行的雇员），但它们过于混乱，令人难以阅读。插图中的人物造型都相当原始，甚至有些粗俗。画面本身也装饰过多，几乎让人无处着眼。而且，书页已经陈旧发黑，在人们过于热忱的抚摸甚至是虔诚的亲吻后，它们的表面就像涂了一层清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抄本修复人乔治·穆伦会在19世纪20年代对纸张边缘实施清洗并做增白处理。插图页和文本页的保存状况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在影印本上表现得不太明显。在影印本里，所有书页在被渲染后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些插图页在抄本创制完成后的初期应该更令人印象

深刻。

然而，《凯尔经》的文本页比我预想的要美观得多，也精致得多。文本是以字号相当大的岛屿大写体写就的，文字本身的风格正常且克制，无可挑剔，令人不得不对抄写员的书法技艺啧啧称奇。它们虽然是手写的，却如同印刷体一样精准；与此同时，较之印刷技术，手写显然更为灵活，且能更为充分地利用空间。有时字体也会略略膨胀一些，看来就像是在每一行的结尾缓口气。页面装饰的覆盖范围之大，超乎想象，且美不胜收。每一行都带有彩绘或者装饰。每一句的首字母都展示出抄写员相当精湛的书法技艺以及彩绘技艺，如同上了釉彩的宝石。彩饰经常由动物以及怪物的图案组成。但凡是大写字母，都会被以鲜亮色彩标示出来。页面的主色调也变幻多端，如同烟火大会，有时候是鲜艳的黄色，有时候又是红色或者浅绿色，并且时而会闪现金属光泽；整体效果非常流畅且充满动感，如同海面一样随着潮起潮落而变化，令我不禁想起潮水涌入岩石，回旋，退去，留下阵阵泡沫（这泡沫又幻化成数不清的红点和旋涡，有时候甚至留下一些大鱼或者深海怪物）的场景。书页上的图案包含了人脸、狮子、豹子以及野兔等。伯纳德·米汉先生特意将第40对开页右页上的手绘狮子指给我看，这一图案被印在爱尔兰的五镑面额纸币上。当然还有著名的猫的图案（在我敲下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的猫正躺在我身后的椅子上，好像是在提醒我圣哲罗姆在抄写的时候，就有一头狮子在他脚下；依我的经验，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可能真的发生，因为狮子通常会抢在哲罗姆前面，把那椅子舒舒服服地据为己有）。这些图案中最厉害的就是极为精细的手工卷轴以及精巧和繁复的凯尔特花饰。伯纳德给了我一副放大镜，我并不十分情愿用这样的物件，因为这份抄本本身就已经很大了，而且我觉得我的视力还是不错的。不过，放大镜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令人称奇的细微之处。休·马克迪亚米德（Hugh MacDiarmid, 1892~1978）曾有一首题为《诗才》（*The Poetic Faculty*）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说唯有用显微镜才能研究《凯尔经》。现代的抄写员曾经做了实验，他们想知道这卷轴和花饰是如何创制出来的，然而，实验很快便让人意识到，即便只是将羽毛管削到极细的程度，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工艺成就。



爱尔兰于1976年发行的五镑纸币，上面的图案是从《凯尔经》第40对开页右页复制而来的

岛屿艺术史的教材中都会提到一份跟《凯尔经》很像的抄本，并引用一段中世纪对它的描述。虽然这一描述已经被引用了太多次，但我在这里还是要重提一番。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 of Wales，约1146~1223）是旅行家和编年史家，他曾于1185年在基尔代尔（Kildare）见过一份抄本，这份抄本应该不是《凯尔经》，因为我们可以确定12世纪时《凯尔经》不在基尔代尔，但它跟《凯尔经》定然极为相像。杰拉德记述说，这份珍贵的抄本中充满了插图和装饰，简直令人无所适从。“不过，若是仔细观瞧，”他写道，“用你的眼睛去探察工艺背后的奥秘，你就会注意到那是何等精巧复杂的东西，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着色是如此新鲜，令你毫不犹豫地认定，这并非出自人类，而是天使的作品。”



《路加福音》概要，描述了天使在祭司撒迦利亚面前显现的情形，爱德华·苏利文爵士在于1914年出版的《凯尔之书》当中复制了这一页

威尔士的杰拉德见证的这份跟《凯尔经》极其相像的抄本现已丢失，但此一情状提醒我们，《凯尔经》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一系列曾经存在于世的爱尔兰福音书抄本当中的一份。不过人们也许会因此认为类似的抄本很常见。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此类抄本在今天已然是稀世珍品，也是一切中世纪艺术品当中的瑰宝。只是《凯尔经》的巨大声望很容易令人们忘记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另外珍藏的不下五份的爱尔兰福音书抄本，这些抄本比《凯尔经》更为古老。它们的装饰也许不如《凯尔经》那般丰富华丽，但它们的确都算得上岛屿文明一等一的珍贵遗物。而且也可以说，这半打的抄本加总起来，差不多就是爱尔兰中世纪早期的全部抄本遗产。其中最为古老的抄本已经严重残损，大约有一百八十对开页，它的名字并不十分雅致，不过也十分响亮，这就是《乌塞尔第一抄本》（Codex Usserianus Primus），这份抄本很可能是于7世纪早期在爱尔兰创制的。抄本的装饰非常朴素，其中以红点串联而成的边框后来成了岛屿风格抄本的典型特征。它的同伴《乌塞尔第二抄本》（Codex Usserianus Secundus）有一个更富诗意的名字，“Garland of Howth”（霍斯的花环）。这份抄本拥有两幅整页插图，不过，用古文书家E. A. 罗威（E.A.Lowe）的话来说，这样的插图“实在是野蛮”——罗威将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定位在8世纪到9世纪。《杜若经》的品质是没有人怀疑的。这一抄本应当是7世纪后半叶的物件。跟《凯尔经》一样，它据传也是由圣徒科伦基尔创制的，属于杜若教堂——此教堂在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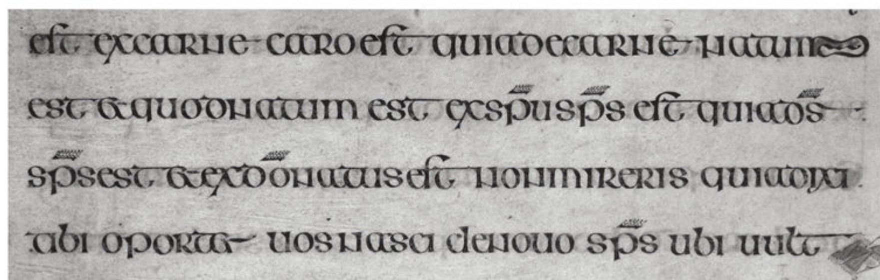
尔教堂的西南方向六十五英里处，并且是圣徒科伦基尔本人创建的。这份抄本同样有福音正典表，还有六张相当精巧的“地毯页”，以及五幅展现福音书作者象征物的整页画像（第2对开页右页同时呈现了四位作者的象征物，另外四页则分别位于每部福音书的开篇处），此外就是五个巨大的首字母，填满了整个页面，和许多更小一些的首字母。《杜若经》并没有《凯尔经》那般精美，也没那么大，但依然展现出了凯尔特螺旋状花饰和内饰的早期特征。最后则是《穆林书》（Book of Mulling）和《迪马书》（Book of Dimma），这两份抄本应当都来自8世纪后半叶，它们也都有福音书作者画像和象征物，以及巨大的且令人惊叹的首字母。若不是它们最年轻和体格最为巨大的姐妹《凯尔经》令它们黯然失色的话，它们显然也都会是一等一的民族瑰宝。

初识这些抄本的人不免会发出疑问：这些抄本是否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创造了它们的人所处时代的信息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福音书抄本本身是不会讲述这些事情的，毕竟，福音书并不是地方志，而是标准的宗教文本的拉丁语译本，而且这些宗教文本来自异国他乡。不过，若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这些抄本本身是能为我们展现当时的爱尔兰社会的。爱尔兰人很可能就是凭借从北非传来的这些文献，第一次学会了识文断字并且也第一次接触了基督教，至于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则无人知晓。正因如此，爱尔兰不再是原始的蛮荒之地，而是成了能够阅读拉丁语文本的文明之地，尽管它从来没有被罗马人征服过；而且，爱尔兰人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可以在科普特教会和希腊教会的抄本中见到的文本以及艺术风格，比如“地毯页”和“福音正典表”等。《凯尔经》本身当然是爱尔兰的独特产物，里面的文本却来自地中海，使用的颜料当中也包括了雌黄，这种颜料是从源自意大利的火山地区雄黄提炼而来的。因此，当时肯定存在我们不知道的贸易路线和交通路线。

这样的交流应当是双向的。爱尔兰的僧侣不知停歇地游走四方。各个教团于6世纪晚期越过爱尔兰海进入苏格兰和英格兰，由此便同奉派从罗马而来的意大利传教团不期而遇（参见第一章的相关叙述）。也会有一些精美的8世纪福音书抄本是在现代爱尔兰地界之外用爱尔兰风格或者说是岛屿风格创制的，不过会受到在英格兰的罗马抄本的影响。在遗传学上，纯粹的族裔基本上是不存在，抄本风格也一样。《林迪斯法恩抄本》是唯一能够同《凯尔经》一争高下的爱尔兰抄本，也是除《凯尔经》外最精美的爱尔兰抄本。它很可能是于8世纪早期在诺森布里亚创制的，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份抄本的字体和装饰完全是爱尔兰风格的，而且也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说，其中的圣马太画像是从《阿米提奴抄本》的以斯拉画像那里照搬而来的，而《阿米提奴抄本》的渊源毫无疑问是在意大利。可见这些教团从英格兰出发，穿越欧洲大陆，将自己的抄本创作传统同德意志、奥地利以及意大利北方这些遥远之地的传统融合起来。会有一批在英伦诸岛创制的福音书抄本跟随他们来到欧洲大陆，比如巴黎的《埃希特纳赫福音书抄本》（Echternach Gospels）和罗马的《巴尔贝里尼福音书抄本》（Barberini Gospels）；还有一些抄本有可能是在旅途当中创制完成的，比如维也纳就有一份抄本是在萨尔斯堡完成装饰的，抄写人是库特卜希特（Cutbercht）——听

名字就是爱尔兰人。

所有这些抄本，以及其他的一些抄本（它们也都是宝物），都包含了令土生土长的《凯尔经》名扬四海的一些特征，例如巨大的岛屿风格的大写字母、精美的地毯页、福音书作者及其象征物画像、以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纹饰装饰起来的首字母，当然还有令人震惊的工艺水准。这些抄本组成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系列，《凯尔经》在这其中最为年轻，也最为精美——她就是歌剧中那个高贵的歌手。歌剧结束时，她要站到舞台最前面接受观众的掌声并向观众鞠躬致谢；她就是这岛屿抄本里的女主角，知道自己是无与伦比的。在她谢幕之后舞台上的灯光渐渐熄灭，维京人、瘟疫、饥荒以及生存斗争轮番上阵，占据了这个空间。《凯尔经》之后的重要抄本几乎无一幸免。当欧洲其他地方开始在抄本装饰艺术领域觉醒的时候，爱尔兰却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段增补经文，“quia deus spiritus est et ex deo natus est”（上帝就是灵，上帝就是从上帝生的），用来增补《凯尔经》当中《约翰福音》3:5~6部分的经文

19世纪早期，重生的《凯尔经》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此时人们仍然认为它来自6世纪，因为圣徒科伦基尔是于597年谢世的。前文引述的1874年的媒体报道颇为自信地称之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书”。也正是因为《凯尔经》，人们相信爱尔兰的基督教历史极为悠久，只是后来脱离了欧洲的主流发展脉流，就如同传说里仍生活着恐龙的失落山谷一样。且看一看埃塞俄比亚，那里的基督教因为地理上的隔绝，仍然保留了许多久远的风俗，同样的，人们一开始也期望《凯尔经》能够提供更古老的版本的福音书，因为这样一来这个版本肯定要比其他版本更接近原文。对《凯尔经》的最早研究出自约翰·奥巴迪亚·维斯特伍德（John Obadiah Westwood），此人于1843~1845年出版了《古〈圣经〉抄本插图集》（*Palaeographica Sacra Pictoria*）。在该作品里，维斯特伍德写道：“这份抄本的经文同样重要，其分量并不逊色于那些彩绘体的首字母。”维斯特伍德提醒人们注意《约翰福音》3:5~6处的一段话。此处，尼哥底母询问耶稣，人何以寻求属灵的重生，耶稣回答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凯尔经》对此给出了如下增补：“上帝就是灵，上帝就是从上帝生的”（quia deus spiritus est et ex deo natus est）。这句话出现在第297对开页左页的第5~6行。最早一批教父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5）就引述过这段增补文字，但它们在现代经文里面已然消失不见了。维斯特伍德着重指出，圣安波罗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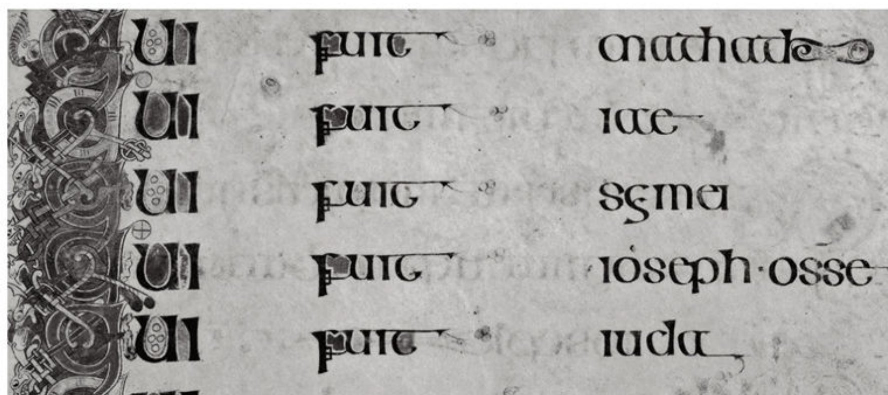
（Saint Ambrose，约339~397）记述说，这句话是被阿里乌斯派教徒（Arians）从经文当中删除的，因为他们并不接受三位一体信仰。如果只以此为例，我们就可以说《凯尔经》代表了极为久远的未删节的真实经文。

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即便跟今天的爱尔兰相比，古老的爱尔兰也没有这么偏远。《凯尔经》——正如同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抄本一样——其经文也来自圣哲罗姆的拉丁通行本，这个新译本是于384年完工的。跟第一章讲述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一样，《凯尔经》也借鉴了更早的有缺陷的“旧拉丁”译本，只不过这一次，由此形成的文本差异并非抄写员刻意为之。在当时的爱尔兰已经出现了旧译本，实际上，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三份福音书抄本，《乌塞尔第一抄本》、“霍斯的花环”以及《迪马书》，都是以旧译本为依托的。许多爱尔兰抄写员是先从旧译本中接触经文的，而且将旧经文烂熟于心了。因此，《凯尔经》里的很多字句很可能就是因为抄写员于无意识之中将孩童时代就已经烙印在心中的文句插入了文本当中。前面提到的“上帝就是灵”就是其中一例，德尔图良使用的旧译本中当然有这句话，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凯尔经》的经文更接近原文。已有足够多的例子能证实这一点：《凯尔经》应当属于哲罗姆新译本的一个爱尔兰分支，跟《杜若经》的情况类似，经文中存在许多由抄写员模糊的记忆或者疏忽造成的细小的怪异之处。《路加福音》3:26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小小例证，此处经文回溯了基督的家谱，从马利亚的丈夫约瑟一直到亚当。经文原文是“玛押是玛他提亚（mattathias）的儿子，玛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拉丁通行本对此给出的译文是“Maath, qui fuit Matthathiae, qui fuit Semei”。然而在抄本的范本中，“Mattathias”这个长长的且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可能被分成了两行。很显然，抄写员因此将之误认为是两个人，并将经文处理为“Maath qui fuit Mathath, qui fuit Iae, qui fuit Semei”，由此基督便凭空多出来一个名叫“Iaus”的先祖。这个情况出现在第200对开页的左页。这并不是多么严重的教义错误，但的确是不正确的。

说实在的，《凯尔经》的经文质量不高，经常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甚至存在令人根本无法理解之处。它有点像是初期准备材料，根本就不是用于研究或者解读目的的。仅仅是此一情况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这份抄本的创制初衷。一份岛屿福音书抄本实质上是一件艺术作品。它本身就是神圣的，而且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神性象征物；它会被闭锁在圣物箱里，等待着为某座教堂祝圣，等待着参加宗教仪典或者作为誓愿的见证物之用，当然也等待着世人的敬拜。这样一份福音书抄本是宗教的催化剂，也是宗教仪式的核心工具，但肯定不是用来供人们做文本研究或阅读的。今天人们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前去观瞻这部圣书，这跟先前并没有多大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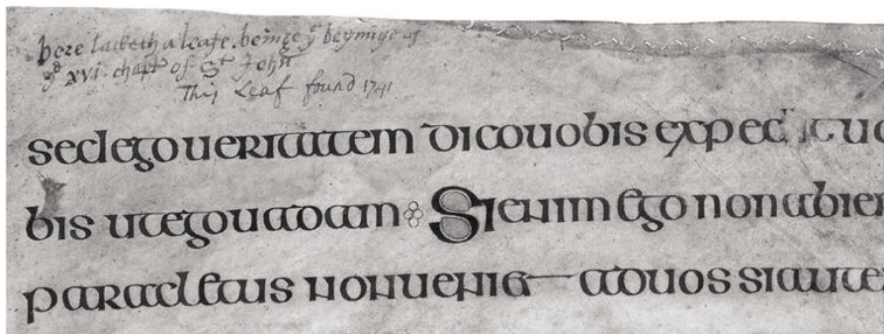
《凯尔经》已然是残缺的。如前文所述，这部经书的开篇就已经是希伯来人名名录的尾声了，如此算来，前面应该丢失了大约十二页。最后几张书页也非常陈旧，而且都经过了修补，最后一页根本就无法辨认。经文在《约翰福音》17:13处结束。据我的计算（当然，各方的算

法是不同的），抄本中这部福音书部分最后应该缺了十页以上。正文的校勘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毕竟，罗杰·鲍威尔插入的纸张已经非常清楚地标示出各折之间的分隔处。[1]问题出在张数上，有些对开页已经沦为单页，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这样的单页是否得到了正确识别并被置于其原来的位置上。还有一些理应会有插图的地方并没有插图出现，比如第129对开页后没有出现马克的画像，可能的情况是原来就没有这幅插图。



基督的先祖Matthathias在《凯尔经》当中被错误地当作两个人，“Mathath”和“Iaus”

在此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全页插图都是在单页上面的，主要分布在第7、27、28、32、33、34、129、188、291对开页；而填满整个页面的大写首字母插图，例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的开篇，通常是同文本页连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插图创制应当是单独的工作。事实上，《凯尔经》里面的插图页和文本页不一定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创制的，理论上讲，插图页完全是可以在文本页之后绘制的，甚至也可以是从其他抄本上借用而来的。第二，抄写员通常是在折与折之间轮换的。《阿米提奴抄本》也是这样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凯尔经》是由四个抄写员创制完成的，都以折为单元进行工作分配，有时，抄写员会被分配到多折的工作量。将未装订起来的折分配给不同抄写员的工作方式表明缮写室的劳动组织化程度已经相当高，而且也已经相当精细了。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我们推断抄本的创制地点和创制环境。



该页的上端空白处被加了旁注，讲述了这一页曾经丢失后又寻获，并于1741年被重新插入抄本的经历

《凯尔经》曾数次出现书页松散的情况。第337对开页右页顶端就有一个17世纪的标注，“here lacketh a leafe, beinge y^e begini[n]ge of y^e xvi chapt[er]of St John”（此处有一页缺失，为《约翰福音》第16章的开篇），对此，又有人给出如下标注作为回应，“This Leaf found 1741”（此页于1741年找回）。1621年8月，詹姆斯·乌塞尔（James Ussher）仔细清点了书页，得出的总数为三百四十四，因此，他也就在第334对开页左页的底端空白处做了标识。如今，这份抄本的总页数是三百四十。应该是自17世纪以来丢失或被取走了四页，这倒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有理由设想，丢失的这四页当中就包括了整页的马克和路加的画像插图，也就是在第130对开页的前面和第188对开页的前面的那两页。还有六张文本页也丢失了。倘若有幸运之人发现自己竟然拥有其中一页，那么（如果愿意的话），出售这份财产就可以得到能尽享一辈子富贵的收入。这些书页的上边缘甚至也有可能存活下来了。1825~1826年对《凯尔经》进行重装的时候，乔治·穆伦对页边实施了大幅度的剪裁，甚至有时裁去了一点原本的装饰。“无知且恶劣的装订工。”爱德华·苏利文爵士在1914年就是这么称呼乔治·穆伦的，在穆伦的时代，《凯尔经》已经是名扬四海的古物了。另一件民族圣物《末日审判册》（Domesday Book）于19世纪在伦敦接受重装之时，装订人也对其修剪了页边，并且得到允许将修剪下来的残片收为私人财物。倘若您姓“穆伦”，那就不妨找一找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装着碎羊皮纸条或者纸屑的信封，要是有的话，请让我知道，我们来一起决定是否通知都柏林三一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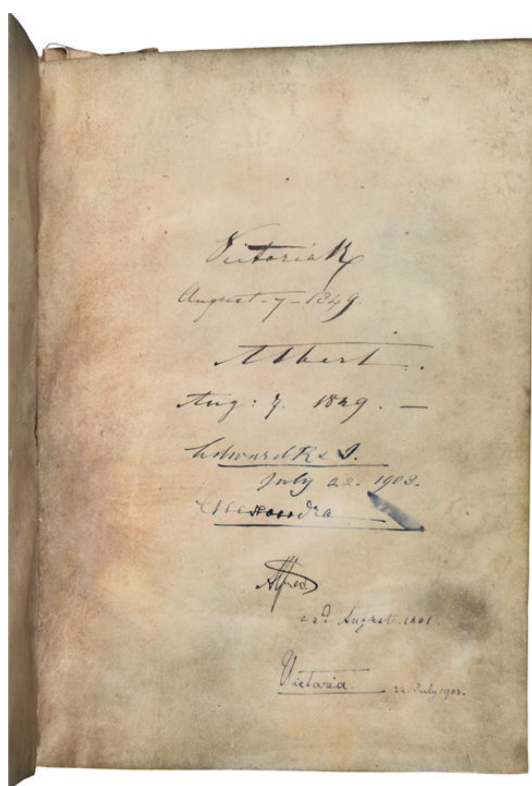
詹姆斯·乌塞尔（1581~1656），阿马格大主教，最先研究提出“凯尔经”这个名字并研究这份抄本的人

前文已述，《凯尔经》在12世纪早期就已经藏于凯尔教堂了。到了15世纪时，它仍然在那里，因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路加福音》结尾处的空白页上被人添加了几行相当潦草的小字，那是一首表达对米斯的教堂地产税的不满的打油诗。这首诗召请这部圣书的帮助，它在圣书的上方加上了“科伦基尔”这个名字，并说，“它被供奉在教堂圣坛之上，各圣物之间”（qui inter reliquias templi venerat[ur]ad aras）。显然，这份抄本此时仍是拥有相当魔力的圣物。倘若今天的爱尔兰人仍然能够用这样的办法避税，那么毫无疑问，这份抄本还会被这么用的。在漫长历史当中，偶尔也会有人在前往凯尔教堂欣赏圣书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上面。我就见到这样一个签名，来自都柏林的“George Plunkett”（乔治·普伦基特），此人还用显然是16世纪的笔法留下一些俏皮说辞以及一首很糟糕的诗。那首诗就那么硬生生地被嵌入抄本第4对开页左页的正典表上方的圆拱里：“此书流转世间；而今不知停泊何方。我不怀疑世间一切；唯不信作者得圣恩。”（This work doth pass all mens conyng/that now doth live in any place./I doubt not therefore in anything/but that the writer hath obtayned god's grace.）此人在抄本里面留下旁注的时间被标为1568年。前文提到有人在第337对开页右页留下文字说抄本丢了一页，根据字迹那人正是普伦基特。此人身份无从考证，看起来应当是一个落魄诗人，然而，也正是这个落魄书生，标志了《凯尔经》身份的第一个转变——从教会圣物转变为艺术瑰宝。

詹姆斯·乌塞尔（1581~1656）也仔细研究过《凯尔经》，他是出

类拔萃的《圣经》学者，最终还成了阿马大主教和全爱尔兰大主教。最让他出名的是他所做的一项运算（对此今天的人们当然是不以为然的）：这个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星期六）和23日（星期天）之间的那个夜晚被创造出来的。乌塞尔也在《凯尔经》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包括他于1621年也就是他成为米斯主教的那一年，留下的那个总页数标注。他还安排人用爱尔兰语抄录了不少的特许状，如今这些文件都收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其中“凯尔经”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1639年，乌塞尔出版了有关不列颠古物的作品，其中就提到了《凯尔经》，并指出米斯郡的人相信那是圣徒科伦基尔的作品，且将之奉为圣物（“eidem… sacrum habent”）。

有人说是这位大主教自己收藏了《凯尔经》。乌塞尔的确是一位很厉害的抄本收藏家，但《凯尔经》并未落到他的手里。（还好，倘若真落到乌塞尔手里，那《凯尔经》岂不就成了“乌塞尔第三抄本”。）实际情况是，这本圣书一直就待在凯尔镇；在1641年的叛乱当中，该镇遭到严重破坏，但直到1653年，凯尔地区的总督卡文伯爵才出于安全考虑，将《凯尔经》送往都柏林。后来，乌塞尔的侄子亨利·琼斯成为米斯主教，也获得了对凯尔教堂的司法管辖权，琼斯遂借此机会将《凯尔经》转到三一学院，一并转交的还有《杜若经》。这两份抄本究竟是在哪一年抵达三一学院的，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琼斯主教的任期是从1661年到1682年。令人震惊的是，它们最初是可以被人们借阅的，和三一学院图书馆的其他藏书一样。1686～1687年，三一学院副院长理查德·阿克顿就曾以三镑十先令的保证金借阅了“一份通常被称为《圣科伦基尔福音书》的抄本”，这份抄本很可能就是《凯尔经》，因为在1688年《凯尔经》正式进入三一学院的借阅书单时，它仍然被认为出自圣科伦基尔之手。



王室访客在《凯尔经》衬页上面的签名，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还有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亚历桑德拉以及阿尔弗雷德亲王

我们都知道，《凯尔经》是在19世纪初开始成为国际明星的，这一转变中有部分政治因素的功劳。古老的看法是将圣徒科伦基尔视为该抄本的创制者，这位圣徒死于597年，这也就意味着抄本是6世纪的物件。597年这一年在历史上是有着极大分量的，因为圣奥古斯丁也是在这一年从罗马抵达坎特伯雷，将文明和基督教带到了英格兰的，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过了。圣徒科伦基尔是在597年谢世的这一点，令《凯尔经》在围绕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权威等级问题的论战当中，获得了无可辩驳的优先地位；至少在爱尔兰人的记忆当中，这一点自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否决了爱尔兰代表团的权利起，便不曾被淡忘。

1821年，英王乔治四世造访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的时候，想必是见了《凯尔经》的。1849年，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前来访问的时候，则肯定见过《凯尔经》。女王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图书管理员J.H.托德“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古代抄本和遗物，其中就包括圣科伦基尔抄本（我们在抄本上签了各自的名字）”。抄本同圣科伦基尔的这种关联，很显然是展出方特别向前来访问的王室成员强调的，因为凭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爱尔兰的基督教的历史要比英格兰更悠久。事实上，维多利亚后来对此事的记忆也就只剩下这个细节了。她

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亲王于1861年见到了这份抄本。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则是在1903年见到了这份抄本。三一学院邀请了所有这些王室来访者在《凯尔经》上签名，当然是签在一张现代衬页，而非古老的书页之上。这些用来签名的衬页如今被单独装订了起来。《凯尔经》已经成为爱尔兰文化之优越性的象征，看这情形，仿佛一旦在上面签名，英格兰女王就承认了这一点。1877年，也就是在《凯尔经》于争议声中出访大英博物馆并返回之后不久，这一抄本又来到威廉·格莱斯顿（W.E.Gladstone）面前，先后四次担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是爱尔兰独立的坚定倡导者（据记载，格莱斯顿是在"内室"里见到《凯尔经》的）。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坎特伯雷大主教阿奇博尔德·泰特（Archibald Tait）、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Pedro II）以及来自中国的大使也都得见《凯尔经》，其中大使是在都柏林市长的陪同之下前来拜见《凯尔经》的，对此，《自由人杂志》（*Freeman's Journal*）和《每日商业广告》（*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报道说："《凯尔经》令这个中国人仰慕不已。"两年之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也见到了《凯尔经》，他于1869~1877年担任美国总统。

《凯尔经》那无与伦比且风格独特的艺术风格激发了凯尔特复兴运动中的人们的想象力。前文提到过的牛津大学教授、昆虫学家约翰·奥巴迪亚·维斯特伍德（1805~1893），在1843~1845年出版的《古〈圣经〉抄本插图集》当中，刊印了自己动手绘制的《凯尔经》插图页。令人震惊的是，1853年，也正是这个维斯特伍德在《凯尔经》的一张内页（第339对开页右页）的边缘空白处大胆地留下了自己的首字母签名并且标注了日期。这一页是《凯尔经》的最后一页，如今已经破旧不堪。有没有可能这一页当时已经散落下来并且实际上在维斯特伍德手中，只是后来才被放回的呢？19世纪诞生的所有有分量的中世纪抄本插图册都收录了《凯尔经》，比如H.N.汉弗雷（H. N. Humphreys）和欧文·琼斯（Owen Jones）于1849年出版的《中世纪彩饰抄本》（*The Illuminated Books of the Middle Ages*）、欧文·琼斯（Owen Jones）于1856年出版的《装饰原理》（*The Grammar of Ornament*）、亨利·肖（Henry Shaw）于1866年出版的《彩饰工艺手册》（*A Handbook of the Art of Illumination*）、W.J.罗夫提埃（W. J. Loftie）于1885出版的《彩饰工艺教程》（*Lessons in the Art of Illuminating*）等。这些书则又相应地成为彩饰图案样式书，催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无数抄本和改编本。此一潮流当中，《凯尔经》便成为那一时期颇为时髦的彩饰信的取材来源（如1880年红衣主教纽曼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同时，金属工艺（如1858年，爱尔兰妇女取材于《凯尔经》，制作了一个盒子并将其作为纪念品送给当时的爱尔兰总督卡里斯莱勋爵）、刺绣工艺（1886年，一场巡回刺绣展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举办）、家具、服饰、书稿装订工艺、雕刻、陶艺等领域的设计也都开始取材于《凯尔经》。1890年，爱尔兰的几家大百货商店，主要是罗伯特逊百货店、莱德利百货店和弗格森百货店，联合宣传一种叫作"科伦基尔"的绸缎，显然是从《凯尔经》中得到了灵感。都柏林的霍普金斯和霍普金斯（Hopkins & Hopkins）珠宝行于1896年圣诞节期间推出了一批黄金饰针，其设计也取材于《凯尔经》里面的首字母，单价是二十一先令。



海伦·坎贝尔·德·多利埃用水彩绘制的清晰版《凯尔经》彩绘首字母，沙利文爵士将其复制在了1914年的《凯尔之书》中

维多利亚时代的抄本装饰人是能够将他们的颜料盒和水桶放在《凯尔经》旁边，直接对其进行复制工作的，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海伦·坎贝尔·德·多利埃（Helen Campbell D'Olier, 1829~1887）女士是都柏林人，她花费多年时间来复制《凯尔经》里面的彩绘首字母。1884年，这位女士在亚历山大学院展出了自己的精美画作，这些取材于《凯尔经》的画作在“魔灯”以及石灰灯的映衬之下，实在是美轮美奂，俘获了大批观众。其中一些复制品目前收藏在三一学院图书馆。芝加哥的书稿装饰人兼收藏家C.林赛·里克特斯（C. Lindsay Ricketts, 1859~1941）于1908年7月来到都柏林，据他讲述，他是最后一个获得允许直接依照《凯尔经》原本制作水彩复制品的人。当然，到了他那个时代，摄影技术也已经是可行的替代办法了。实际上，早在1888~1889年，三一学院图书馆方面就已经在出售成套的《凯尔经》的影像作品了，当时这些影像作品在都柏林以及伦敦的南肯辛顿博物馆都有展出。

1914年，爱尔兰财政大臣之子爱德华·沙利文爵士（Sir Edward

Sullivan, 1852～1928）出版了《凯尔之书》（*The Book of Kells*），这是《凯尔经》的插图集，后来变得非常流行。这本书中附有二十四张全彩插图，奇怪的是，其中五张插图并非出自抄本本身，而是取自海伦·德·多利埃的复制本。沙利文的这本插图集很快便成为爱尔兰家庭的必备之物，在那个时代，这些家庭中当然也包括了大量身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最为典型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就收藏了一本。在20世纪20年代，他向阿瑟·鲍尔（Arthur Power）描述了自己的这份藏品："我去过很多地方，罗马、苏黎世、的里雅斯特，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它，并会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端详它的做工。那是最纯正的爱尔兰艺术品，有那么几个填满整整一页的巨大的首字母，本质上就像《尤利西斯》里面的一章。没错，你可以将我的作品跟这些精细复杂的绘图做比较。"

在1939年出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一书中，乔伊斯提到了《凯尔经》。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不会假装能读懂乔伊斯的作品，那些文字对我来说就如同《凯尔经》里面的一些内容一样，如同天书——即便在抄本新创制出来时我也读不懂。在我考察《凯尔经》之时，这个问题总是反复出现，而且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凯尔经》当然是一等一的艺术品，但是，其叙事文本绝不能说是连贯的。文本中承载的内容太丰富了，令这抄本不堪重负。词语不是怪异地纠结、缠绕在一起，就是分散在整页插图的迷宫当中，令人无从找寻。《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情形显然也是类似的，其中有一整段文字就是单独的一个长句，真要读出来，恐怕会让人直接断气。这段话回应了沙利文的那篇虚饰过度的导言，而且提到了古文书学家、添加在抄本家族中的"次好的面包"（second-best buns，为什么不呢？）、象形文字、"附言直接引发的《凯尔经》中晦涩难解的于是页"（指《马太福音》27:38，在抄本第124对开页右页）、沙利文的XI号图，以及"太多的、多得太多的所有那些四腿M；为什么用粗大的D来拼写亲爱的上帝（为什么，哦为什么，哦为什么？）；半结尾那准备好的X和Y形；18个或24个，但是至少，多亏了莫里斯，最后当所有都说完做完，最后的花笔签名中包含的帕涅洛佩德耐心，出版说明不少于732笔，每笔都用一只跳跃的套索收尾……"[2]，等等。



《凯尔经》第8对开页右页的影印版，很可能是C.林赛·里克特斯于1908年从原本复制而来的，里克特斯是来自芝加哥的画家和收藏家





1934年的詹姆斯·乔伊斯（左图）；右图是《凯尔经》的“色调暗淡的‘Tunc’页”，沙利文爵士的《凯尔之书》复制了这一页，乔伊斯收藏了《凯尔之书》并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提到了该页

那么，最后的问题便是，这个“最纯正的爱尔兰艺术品”究竟是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时间创制的呢？政治以及民族意识方面的元素已然如此深刻地渗入《凯尔经》当中，即便是最有经验的中世纪历史研究者也会在这类问题上变得极其小心谨慎。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认为这本经书是出自圣徒科伦基尔之手的，尽管如下情况也是相当有分量的：这本书自1007年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起，就拥有了“圣科伦基尔之书”的名声。科伦基尔的确带领过一个教团从爱尔兰来到苏格兰西海岸群岛中的爱奥那小岛，并于563年在这座小岛之上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即便是在今天，这座小岛也是一处令人敬畏的偏幽之地，岛上仍然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氛围。在7世纪和8世纪时，这座小岛乃爱尔兰向不列颠以及更远的欧洲大陆传播基督教火种的主要据点，因此，那里定然是设有一个缮写室的。在这两个世纪中，这座小岛富饶且多产。不过，维京人于795年袭击了这座小岛，并于802年烧毁了岛上的修道院。在806年，维京人再度攻击了这座小岛，杀死了六十八名修士。据《乌尔斯特志略》记载，此番劫难之后，大多数乃至全部的修士放弃爱奥那岛，返回爱尔兰了。很可能是在807年的时候，这些人在米斯郡的一个名叫凯尔镇的地方留驻下来，并称之为“科伦基尔的新居所”。凯尔教堂于814年完工。自此，《凯尔经》便一直归属这座教堂，直到1007年失窃——这一时间点是没有疑问的。那时《凯尔经》已经成了圣科伦基尔修道院的头号圣物，并且修士们也都颇有信心地认定，这份抄本就出自修道院创建人之手。

《凯尔经》的创制工作究竟是在爱奥那岛还是在爱尔兰的凯尔镇全部或者部分完成的，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世人所认定的《凯尔经》的诞生日期。古文书学家们给出的不同的答案基本上在7世纪晚期到9世纪中期这个时段内。通常的看法是8世纪末。《凯尔经》的做工之精巧毫无疑问是无与伦比的，在它的制作团队里，各类工种之间以及各个工种内部的协作水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足以说明这份抄本是大规模且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劳作的产物，这个群体绝对不会是由一群四处漂泊的逃难者组成的。我们甚至知道爱奥那岛上一个大师级抄写员的名字，那就是修道院院长孔纳希塔赫（Connachtach），此人于802年谢世。关于他是不是该抄本的设计者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他很有可能是。倘若《凯尔经》的渊源就在爱奥那岛，这倒也不会减损抄本本身那绝对的爱尔兰品性，因为其制作者全是爱尔兰人，尽管现代的政治边界并没有将爱奥那岛划归爱尔兰，但他们身处的这座小岛就在爱尔兰的旁边。从历史实情角度来看，《凯尔经》虽然是最具爱尔兰品性的艺术品，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在今日苏格兰的地界内创制完成的；不过，想想看，《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就是在巴黎写成的吗，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爱尔兰品性同样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1]依据目前的装订方式，校勘情况如下：i^{3}（张数不清楚，均为单页），ii^{8+1}（第7对开页是单页），iii^{10}，iv^{4+2}（也可能是4+3，第26对开页后面缺了一页，第27~28对开页均为单页），v^{10+3}（第32~34对开页均为单页），vi^{8+1}（第41对开页为单页），$vii\sim viii^{10}$，ix^{8}，x^{10}，xi^{8+2}（第91和96对开页为单页），$xii\sim xiii^{10}$，xiv^{6+1}（第120对开页为单页），xv^{4+1}（第129对开页为单页），xvi^{10+1}（也可能是10+2，第130对开页前面可能缺了一

页，第140对开页为单页），xvii^{8+2}（第143和149对开页为单页），xviii^{10}，xix^{8}，xx^{6+3}（第170、172、175对开页为单页），xxi^{9+1}（也可能是10+1，缺了i，也就是第178对开页前面的一页，第180对开页为单页），xxii^{10+1}（也可能是10+2，第188对开页前面可能缺了一页，第188对开页为单页），xxiii^{10}，xxiv^{4+4}（第210、212～214对开页均为单页），xxv^{6+1}（219对开页为单页），xxvi^{10}，xxvii^{9}（共十页，缺了vii，也就是第239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xviii^{2+6}（第234～235对开页和第248～250对开页，均为单页），xxix^{8+1}（第253对开页为单页），xxx～xxxi^{8}，xxxii^{2+9}（第277～285对开页都是单页），xxxiii^{4}（均为单页），xxxiv^{10+1}（第291对开页为单页），xxxv^{10}，xxxvi^{12}，xxxvii^{8}（也可能是10+1，缺了第330对开页后面的viii～x页，第331对开页是单页），xxxviii^{8}。第36对开页被算了两次，因此总计是三百四十对开页，并非标注的三百三十九对开页。

[2] 译文参考自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注

第四章
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

9世纪早期

莱顿大学图书馆，

Cod. Voss. Lat. Q 79

我们不妨先大致谈一谈抄写问题。所有的中世纪抄本，除非其创制者就是作者本人，否则都是抄写员抄写他人作品而成的。所谓抄写员实际上都是在复制已经存在的手稿或抄本，而且，中世纪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尽职尽责地复制出一份抄本。抄本装饰人的工作应该说也是以前人提供的插图为依托的。不过，抄本本身也会在随后的时光里演变成范本，供后人抄录，这样一个抄录进程将持续数个世纪。并非所有的抄本都能精确地复制范本，毕竟，抄写员和装饰人的技艺、工作环境以及抄本自身的抄写难度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工艺水准和风格更是在代代传承当中不断演进。不过，有些抄本跟前人的版本是极为接近的。本章要探讨的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The Leiden *Aratea*）是一首古代天象长诗的抄本。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而言，这份抄本几乎是一字一句地精确复制了其范本，而在抄本创制之时，范本已经走过了数个世纪的光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份抄本究竟讲述了加洛林时代的人们怎样的愿望和品位呢？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问题。



在现代世界，单纯的抄录已然成了贬义概念，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如今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致力于原创。抄袭是令人憎恶的。但是在中世纪欧洲，抄写是令人仰慕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艺术家所受的训练就是相互模仿。既有的模式和程式会得到人们尽心竭力的尊奉和执行，至

于现实已演进到怎样的地步，倒不会被人们特别在意。权威（*auctoritas*）总是能够得到尊重和召请。作家会尊奉先前的作家，为此，即便自己制作了什么，他们也通常会选择将这创新之处掩盖起来，并假装说这些东西前人都已经说过了。即便是在本身就具备创新性的虚构作品中，诸如薄伽丘和乔叟这样的作家的故事里，作者也会在开头处宣示说自己是在某个古老书册里面发现这些故事的。科学文献，诸如医学或者自然史领域的作品，倘若其内容传承的是古老的知识，特别是传自古代世界的学问，就会更受尊崇。整个中世纪都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识和感受：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文化上是优越的，古人知道很多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事情，古代的很多知识也已经几乎无人问津。在那样的时代里总是涌动着一股对已经消失了的美好的古典学问的怀旧之情。

所谓“复兴”一词，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就是重生。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刻画欧洲历史的三个时段，而这三个时段都不乏“抄录”。本书第十一章涉及14世纪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也有着对古典学问的终极热爱。第八章和第九章论述的是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对古典文化的痴迷，那造就了世人所谓的“罗曼风格”。本章则要聚焦最早的这场复兴，也是9世纪前半叶西欧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精心安排的一场古典文明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效仿古典文明。

查理曼（Charlemagne，约742~814）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这位君主是有雄心壮志的，他有意识地四处搜寻并复制古罗马的制度和文化。他还发明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观念，800年，他前往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由此成为第一个新型的基督教皇帝。他就是为了新宗教而复活的奥古斯都。他采用了古代的诸般习俗和惯例，并命人用紫色羊皮纸创制福音书抄本，因为这样的羊皮纸据说只有古罗马的皇帝可以使用。他在亚琛修建了皇家教堂，这座教堂是以查士丁尼皇帝在拉文纳的教堂为模板的，那还是旧王朝向东方迁移之前的事情。查理曼及其继承人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778~804，于813年成为查理曼的共治皇帝），在享尽天年之后，都被葬在罗马石棺当中。查理曼更召请英格兰学者阿尔昆（Alcuin，约735~804）来到自己的帝国，为的是催生一场古典学问复兴潮流。阿尔昆来自英格兰的约克郡，他是联结当时的帝国与一个世纪前兴盛地中海学问时期的英格兰北方地区的桥梁，那里孕育了《阿米提奴抄本》。在他的引领之下，查理曼手下的一批顾问、学者建立了类似皇家图书馆的机构。机构中很可能就收藏了诸如卢坎（Lucan）、斯塔提乌斯（Statius）、特伦斯（Terence）、尤文纳尔（Juvenal）、提布鲁斯（Tibullus）、贺拉斯（Horace）、克劳迪安（Claudian）、马提亚尔（Martial）、塞尔维乌斯（Servius）、西塞罗（Cicerro）以及萨鲁斯特（Sallust）等人的作品。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还时不时会得到古代晚期的抄本。对于此番收藏的具体情况，我们也只能有个大概且模糊的了解，不过，他们的确是中世纪时期最早进行古代抄本收藏的。其中有两份抄本存留到了今天，应该都来自意大利，显然是被人带到法国以供加洛林宫廷之用的。它们是著名的4世纪的维吉尔作品彩绘抄本，后来这两份抄本离开宫廷，分别被图尔修道院和圣丹尼斯修道院保管，如今则都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对于其他的那些古代抄本，我们之所

以有所耳闻，完全是因为加洛林宫廷对这些抄本进行了抄录，9世纪早期，加洛林宫廷试着仿制这些抄本，由此我们知道了这些抄本的存在。这些珍贵抄本的原本当然都已经散佚了。其中很显然就包括了4世纪中期的“354年编年史”（Calendar of 354），这是一份早期基督教年历，带有插图（自9世纪起便消失不见了，今天的人们也是因为很久之后的一份加洛林仿制本而知道了它的存在）；一份4世纪或者5世纪的特伦斯喜剧作品集，拥有一百五十幅插图，今天的人们也只能在9世纪的一份出自抄写员赫罗德加利乌斯（Hrodgarius）之手的抄本中见到这些插图，该抄本今天同样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一本主题是罗马的土地丈量技术的论著的抄本，题目是《土地丈量法》（*Agrimensores*），带有插图，很可能是6世纪的物件，当然，这一点同样是通过加洛林抄本得到证实的；还有两份截然不同的阿拉图斯作品的抄本，都是讲述古代天象学的，其中有一份抄本就是加洛林抄本的范本，如今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另一份就是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是全部加洛林彩绘抄本当中的顶级瑰宝。我们现在将前往荷兰对最后这份抄本展开考察。



9世纪的皇帝铜像，很可能就是查理曼或者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如今收藏在卢浮宫



《梵蒂冈维吉尔抄本》，4世纪早期作品，很可能是从查理曼的宫廷图书馆来到法国的；图中场景呈现的是海蛇在缠绕拉奥孔

当我初次向莱顿大学图书馆发出请求，希望能见一见这份天象诗抄本时，得到的回答是：没这个必要。因为自1989年起，这份抄本已经拥有了一份高质量的影印本，而且，其全部的内容都已经被转化成电子版并公布在网上了。这样的回答当然不出乎意料，毕竟它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抄本。倘若你在9世纪之初向亚琛的宫廷图书管理员提出类似的请求，希望见一见来自古代晚期的特伦斯作品集抄本，对方肯定也会告诉你，赫罗德加利乌斯新创制的抄本也不错，你就跟新抄本见面得了。不过，我还是稍稍坚持了一下，在我的此番坚持之后，西方抄本管理员安德烈·博沃曼博士（Dr André Bouwman）还是非常友好地应允了我的请求，一部分是因为荷兰人本就不善于拒绝人，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来莱顿是为了围绕这份抄本做“利夫廷克讲座”（Lieftinck Lectures）的，因此，我利用这一点，告诉莱顿大学他们欠我一个小小的人情。他们当然也非常大度地认可了这个亏欠的人情。法国学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为莱顿大学留下了著名评论：“Est hic magna commoditas Bibliothecae, ut studiosi possint studere”（这里的图书馆的厉害之处就是，学者可以在这里有所学）。这一评价对于今天的莱顿大学图书馆来说仍然是有效的。



莱顿大学图书馆，建于1977~1983年，在初建于1575年的老馆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莱顿是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荷兰商业城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西南面，由古老的风情街道和16世纪的运河组成。莱顿大学创建于1575年，是荷兰最古老的学府。我到访之时，这里正下着大雨，我步行到威特辛格尔大街——一条沿中世纪时莱顿城的环城河而建的路——的时候，身上已经湿透了。这样的天气不禁令人怀疑，来自中世纪的抄本是如何在这样的欧洲北方之地存留下来的呢。莱顿大学的主图书馆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由建筑师巴特·范·卡斯迪尔（Bart van Kasteel）于1977~1983年设计。乍一看，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座图书馆，其入口藏于混凝土建造的廊柱之间，几乎无处找寻，这些柱子的顶部呈喇叭形，如同颠倒的小号。各处可见斑驳的混凝土和闪光的铬。最后，我还是设法站到了红白相间的问询台前，身上的雨水就那么一直往下滴着，我将已经湿掉的羊毛帽子放在外套的口袋里，努力装出一副得到上级允许可以觐见荷兰最珍贵抄本的样子。

莱顿大学图书馆的安保体系并没有那么严苛。保安人员更是非常随和，我们很快便用英语聊起家常。图书馆里面到处都是学生。这座学府仍然延续着荷兰的大学特有的那种随意和快活的风格，学生们都像刚刚从床上爬起来，这样的风格显然是今天更为专注的英国和美国年轻人所缺乏的。借阅区的助理人员会用工作台前的相机为你拍下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邋遢不堪的连环杀手），照片很快就被嵌入一张浅蓝色的塑料图书卡，有了这张卡，你就能够穿越主电子门了。过了电子门之后，即刻右拐，穿过整个图书馆，然后再穿过一个摆放了数百台的计算机和显示器的明亮房间，接着在书柜中间继续穿行——书柜里面的书册皆贴有彩色纸条，纸条从书页中间伸出来，随风飘动，甚是好看（我觉得这么做应该是为了方便给图书归类，不过看起来很是喜庆，那情形就如同步入了一片荷兰花海）。最后，你可以选择从中央旋梯往上走，或者乘坐电梯往上走，抵达二楼。这里就是图书馆的珍本室。这里安放了许多储物箱，供访客存放淋湿了的衣服，当然衣服里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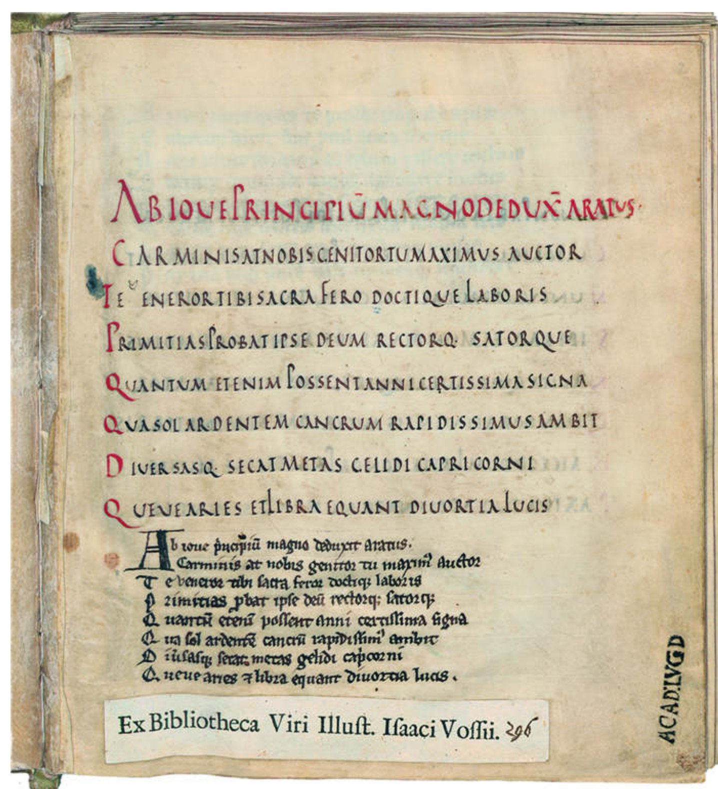
是塞了同样淋湿了的帽子也是没问题的。

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接待我的准备。“一般人，我们是不会给他看的。”抄本保管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同时将一个存放着《阿拉图斯抄本》的深黄色布箱递给我。“您可以随便坐，坐哪里都可以。”他补充说道，同时手指指向了眼前这个空无一人的“L”形阅览室。阅览室里面有一排黑色的长桌，镶着亮色的铁边，还配备了相当整洁的灰色或者橙色的带有坐垫的椅子，椅子不大，但都装备了轮子。阅览室的窗户很大，可以望见城市的运河，玻璃窗外大雨如注。馆内并没有可以放置并固定抄本的支架，不过过了一会儿，保管员便找了一个白色垫子用来放置抄本。我拿出了一支铅笔，尽管并没有人要求我用铅笔，而且工作人员实际上在我在读者登记簿上签名时给了我一支圆珠笔；更没有人要求我佩戴手套。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荷兰人。

抄本很小，只有九十五页，差不多9英寸长、8英寸宽，基本上呈一个长方体（关于形状问题，后面还会谈到）。但是抄本很重，这一点倒是出乎意料，当然，一翻动封皮，我就明白了这样的重量主要是因为用于装帧的木板太厚了。1989年，奥斯特豪特的一个本笃会修女卢西娅·吉姆布瑞尔（Lucie Gimbrère）对抄本实施了重装，这位修女曾为莱顿图书馆做了不少事。重装的起因也许是在同一年，人们需要拆解抄本以便通过摄影的方式制作影印本，该影印本于当年出版发行（制作影印本实际上也是一种抄本创制工作，今天的一些保管员会参与这项工作）。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抄本在美国进行了展览，因为既然书页已经被拆解开来，那么人们就能同时见到更多书页。新的装订工艺很好地模仿了9世纪创制《阿拉图斯抄本》之时人们会使用的那种工艺。黄褐色的仿绒面的皮革包裹着厚厚的木板，这些木板则是依照书页大小切割而成的。书脊并不平整，很显然是皮革下面的四股缝合线造成的，书脊的顶端和底端都有突出的花饰堵头布。封皮被一张保护纸松松地包裹起来了，此举很可能是为了不让卢西娅修女在皮革表面留下的污渍渗入底页。抄本翻口处很可能从17世纪起便没有被修整过了，点缀着红色斑点，并以对角线的形式印有如下的黑色字母，“ACAD.”和“LVGD.”，意思应该就是莱顿大学的“*Academiae Lugdunensis*”（里昂学院）——幸亏卢西安修女没有修整翻口。不过，图书馆方面也告诉我，并没有人能阻止卢西娅修女用刷子去仔细清洗书页边缘，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拉图斯抄本》以及莱顿大学收藏的很多抄本都新得很不自然。

《阿拉图斯抄本》是以一张衬页开启的，这几乎是一张空白页，上面仅印有雅各布·苏西乌斯（Jacob Susius，1520～1596）的购买凭证，后文中我们会有机会谈到这张购买凭证。这张衬页原先是封里，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世纪时的皮革封皮的边缘留下的染色印迹。翻过衬页便直接是文本页了。第一行是以红色墨水写就的，以天神朱庇特为开篇：“Ab iove Principiu[m]magno dedux[it]aratus …”（阿拉图斯源于主神朱庇特）。这份抄本是在获得了教会封圣的查理曼的基督教宫廷中创制而成的，或者就是在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的宫廷里面完成的，然而，它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召请古代异教神灵。此举全靠一个模糊处理才避免了渎神之罪名。文中用拉丁文写有如下词句：“阿拉图斯（也就是

这首天象诗的作者）可溯源至朱庇特……”不过，诗人将这首诗献给了以一个不具名的“你”，并且说，这是最伟大且最神圣者，在古代原文当中，这个“你”当然是指某个古罗马皇帝，不过，在抄本当中，它也完全可以用来指古罗马皇帝的效仿者——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诗人最后说，在你的仁慈统治之下，我们可以举眼望天，研究天体和星辰的位置和运动，以此为航海者导航，并指引农人，让他们懂得季节变换。



《阿拉图斯抄本》的开篇页，开篇文字以俗大写体写就，“Ab iove Principium deduxit aratus...”（“阿拉图斯源于主神朱庇特”）

《阿拉图斯抄本》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其文本都是以“俗大写体”（capitalis rustica）写就的。这是罗马帝国的文学抄本用的典型字体。其名字中的形容词“俗体”的意思就是朴素，因为该字体曾经是日常字体。庞贝城的残垣断壁之上经常能看到各种政治标语，这些标语就通常是用俗大写体写就的。这是一种竖直的字体，颇为紧凑，全部用大写写就，这一点看字体的名称就知道了；其粗细笔画之间的对比是极为鲜明的，竖直笔画的顶端和末端都有非常显眼的小衬线。这一字体本身非常优雅，极具书法的美感，而且读起来也很方便，帝国晚期的罗马人偏爱用这一字体来书写世俗文本，而不是用安色尔圆体字，后者成了更为精美的早期基督教作品抄本选用的字体，比如《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以及《阿米提奴抄本》。加洛林时代的人们在创制抄本之时，当然要先行考虑抄本与原本的逼真度，因此他们在抄写过程中保留了此一字体选择

模式。若是《圣经》文本，他们会使用安色尔字体，比如9世纪的《乌得勒支圣咏抄本》就是这样，不过，对于来自异教世界的文学作品，他们则会回过头来重新采用俗大写体，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份《阿拉图斯抄本》。

应该说，这主要是一本描绘各个星座的插图册，正如希腊人所知的那样。“Aratea”这个词，也许各位一直都很想问我是什么意思，但出于礼节又都不方便打断我，在此我不妨明确一下，这个词是指这首天象诗出自索里的天象家阿拉图斯（Aratus of Soli，约前315～前240/前239）之手，该诗后被译成拉丁语。目前的抄本共有三十九幅整页插图，全部在对开页的左页，并且附有几段配图文字，文字均以诗歌的形式呈现，每一行都以红色大写字母为首。有些诗节非常之短，像是图片的标题。插图基本上都呈方形，以深蓝色为背景，代表夜晚的天空。插图的边框为亮橙色，这显然是最后才添加上去的，因为亮橙色跟深蓝色色块的边缘多多少少有重叠，且有时前者遮盖了后者。这情形就仿佛这些插图复制了装裱好的画作，这倒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些插图的当初有可能就悬挂在某座罗马或者希腊宅邸的墙壁之上。天空的底色从深蓝色到青绿色不等。将这些画对着光，就可以看到那蓝色的底色是用时而垂直、时而横向延伸的笔画涂抹上去的。

不管怎么说，《阿拉图斯抄本》里面的插图都令人感觉怪异。也许对加洛林王朝的人来说，那里面定然封存了他们并不一定就能弄明白的学问。要保存此等古代隐秘智慧，唯一的办法看来就只能是如实且精准地将其抄录下来，即便是不能很快被人理解并且同主题本身似乎没有关联的细节也不能漏过。

第一幅插图出现在第3对开页的左页。画面之上，一条粉色和灰色相间的蛇曲曲折折地布满了整个书页，两头小熊在这条蛇形成的回环里面跳跃、翻滚。整幅画面当中，看似随意地点缀着很小的方形金叶子，当然，这只是看起来随意，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对应文本所描述的星座里面的星辰。这些对应文本会占据数页的篇幅，解释了星辰在天极之间永无止息地旋转，而且这些星辰都由克里特棕熊保护起来——在希腊神话当中，正是这些熊保护了婴儿时期的朱庇特，使他没有被父亲萨图恩吃掉，它们也因此幻化在天空之中，代表天极。它们被称为赫利刻（Helice of seven stars）和库诺苏刺（Cynosura）。这两大星座是从来没有欺骗过腓尼基水手的。配图文字继续说道，那条怪蛇如河流般蜿蜒其中并环绕着两个星座，诸多星体沿着蛇的躯体排布。北极星在那个较小的熊身上。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美国人也称之为“大斗和小斗”（Great and Little Dipper）。



Cetera que toto fulgent uaga sidera mundo
Indefessa trahit proprio cum pondere celum.
Axis at inmotus semper uestigia seruat
Libratasque tenet terras et cardine firmo:
Orbem agit extremum geminus determinat axem.

CETERA QUAE TOTO FULGENT UAGA SIDERA MUNDO
INDEFESSA TRAHIT PROPRIO CUM PONDERE CAELUM
AXIS AT IMMOTUS SEMPER UESTIGIA SERUAT
LIBRATASQ. TENET TERRAS ET CARDINE FIRMO
ORBE AGIT EXTREMŪ GEMINUS DETERMINAT AXEM
QUEM GRAI DIXERE POLUM QUO MERSA SUB UNDAS
OCEANI PARS CELSA SUB HORRIFERO AQUILONE
AXEM CRETAE DEXTRA LEUAQUE TUENTUR
SIUE ARCTOAE SEU ROMANI COGNOMINIS URSAE
PLAUSTRA QUAE Q. FACIES STELLARŪ PROXIMA UERO
TRES TEMONE ROTISQ. MICANT SUBLIME QUATERNAE

Quem grai dixere polum quo mersa sub undas
Oceani pars celsa sub horrifero aquilone
Axem crete dextra leuaque tuentur.
Siue arctoe seu romani cognominis urse
Plaustra que facies stellarum proxima uero
Tres temone rotisque micant sublime quaterne



IPSAM HELICEN SEQUITUR SENIOR IACULOQ. MINATUR
SIUE ILLE ARTOPHYLAX SEU BACCHIO MUNERE CESUS
ICARUS EREPTAM PENSABIT SIDERE UITAM

Ipsam helicen sequitur senior iaculoque minatur
Siue ille artophylax seu bacchio munere cesus
Icarus ereptam pensabit sidere uitam



VIRGINIS INDE SUBEST FACIES CUI PLENA SINISTRA
QUAM TE DIUA UOCEM TANGUNT MORTALIA SI TE
CARMINA NEC SURDAM PRAEBES UENERANTIBUS AUREM
EXOSA HEU MORTALE GENUS MEDIO MIHI CURRU
STABUNT QUADRIPEDES ET FLEXIS LAETUS HABENIS
TEQ. TUUMQ. CANAM TERRIS UENERABILE NUMEN
AUREA PACATI REGERET CUM SAECULA MUNDI
IUSTITIA INUIOLATA MALIS PLACIDISSIMA UIRGO
SIUE ILLA ASTREI GENUS EST QUEM FAMA PARENTEM
TRADIDIT ASTRORUM SEU UERA INTERCIDIT AEUO
ORTUS FAMA TUI MEDIIS TE LAETA FEREBAS
SUBLIMIS POPULIS NEC DEDIGNATA SUBIRET
TECTA HOMINUM ET PUROS SINE CRIMINE DIUA PENATIS
IURA DABAS CULTUQ. NOUO RUDE UULGUS INOMNES
FORMABAS UITAE SINCEROS ARTIBUS USUS



AD CAPITI SUBERUNT GEMINI PROLEMQ. TONANTIS
AEGREGIAM ET PROPRIO POST REDDITA NUMINA CAELO
NAM LACHEDEMONIIS CUM MARS CALUISSET APHIDNIS
CASTOR ACECROPI TULIT INCREMENTIA BELLI

Ad capiti subeunt gemini prolemque tonantis
Aegregiam et proprio post reddita numina celo
Nam lachedemonijs cum mars caluisset aphidnis
Castor acecropi tulit incrementa belli





第159~169页：《阿拉图斯抄本》标志性的双开页插图，分别呈现的是：大熊座和小熊座，小熊在盘绕着的蛇的身体中间翻滚，指示北极；武仙座，手持一张狮子皮的赫丘力；牧夫座，牧人形象，后面配备了有关处女座的一段文字，此处恰巧丢失了一页；双子座，分别呈现的是卡斯托耳和波吕克斯；狮子座，狮子的形象；五大行星，分别以萨图恩、朱庇特、墨丘利、维纳斯和玛尔斯的脑袋予以呈现，它们的运行轨迹跟其他星体是不一样的

第二幅插图表现的是一个面容非常整洁的年轻人正在迈步向右走，同时也在回头观望。这个年轻人身穿粉红色的金边短袍，足踩一双精巧的草带鞋。他右手持有一个金色弯钩，左臂上则搭着一张有绿色斑点的狮子皮。从其皮肤来看，这个人就是赫丘力。对应的配图文字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只是陈述说，他是两头熊的守护者。尽管年轻人身上点缀着许多星星，而且“都相当明亮”，但文字只提到了其中一颗星星的名字，那就是大角星（Arcturus），位于年轻人的衣服打结的

地方。大角星实际上也正是北半球夜空当中最明亮的星。

第三幅插图则呈现了由黄金和褐色树叶编织而成的古典风格的花环，花环上系着长长的红色丝带。配图文字称之为“科罗娜”（Corona，“花环”），它是巴库斯（Bacchus）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婚礼之时佩戴之物。阿里阿德涅未及成年便去世了，她死去之后，巴库斯将花环抛入天空，它遂幻化成星座。接下来的插图呈现的是所谓的“持蛇人”。画面当中是一个裸体男人，他以后背示人。他戴着一条相当紧致的黑色头巾（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浴帽一样），手持一条正在扭动的蛇，并且站立在一只巨型蝎子的背上。配图文字给出的说明是：这个持蛇人背对着“花环”，肩膀上是极为明亮的星，即便在满月时分，这些星的亮光也不会减色。再往下的一幅插图则看起来又像是赫丘力的形象。此人极为健硕，左手持有一根杆子，仿佛是要阻挡交通一样。附有该图解释文字的书页已经丢失了。眼前的这份《阿拉图斯抄本》当中，现代人用铅笔为其标注了页码，由此也就不难见出，这里的确发生了缺页现象，因为并没有被标注为第13页对开页的那一张纸，当然，此一对开页左页原本应当有的一张插图也已经丢失了。不过，接下来的配图文字还是能够揭示出这幅佚失的插图呈现的是什么内容——显然是“处女座”。文字中描绘了一位典雅端庄的女神，她曾统治着黄金时代的世界，那时没有纷争，从互不侵犯；但是在白银时代，这位女神绝少从奥林匹斯山降临凡间，除非是在悲伤时刻；到了已然堕落的青铜时代，人们开始吃肉，学会了使用铁器，这位女神也就抛弃了大地，转而化成天空中的一个星座，就在北斗七星附近。“双子座”的插图存留下来了，位于第16对开页的左页。此幅插图展示的是两个古铜色皮肤的年轻人，戴着白色的小帽子，头顶都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全身赤裸，只是在一个肩头披着外袍，脚上穿着精致的靴子。其中一人手持大棒和长矛，另一人则是一手持竖琴一手拿着琴拨。接下来的插图以及配图文字则是按照下面的顺序依次展开的：位于“大熊座”正下方的“巨蟹座”；“大熊座”脑袋的下方就是“双子座”；“狮子座”在“巨蟹座”的黑色长腿的下面，正在发出警告说当太阳神的战车碰触到狮子座的时候，就是盛夏，那将是农田缺水的时候，水手也最好不要冒险远航；“御夫座”以三只蓝色的小山羊的形象呈现，它们是水手的噩兆；接下来是“金牛座”和“仙王座”；之后的“仙后座”中女神的长袍已经从一侧的胸部脱落，幸好有一颗金色的星星将之遮挡起来；“仙女座”中的仙女是仙后的女儿，她的双臂伸出，被绑缚在石柱之上；如此等等。这些插图都配有诗歌体的文字说明，用来讲述图中场景或者相关故事。

三十六幅星座插图之后，便是两幅组合图。第一幅中是当时已知的五颗行星，分别以人的脑袋呈现，四男一女，都如同圣徒一般拥有淡淡的光晕。这幅插图出现在第80对开页的左页。对应的配图文字解释说，这些行星都是“四处游走的星体”，运行规律各不相同，“它们各自独立运行，选择相反的路线越过地球，并且会偏离原来的位置，改变原来的轨迹”。文字里面并没有提及这些行星的名字，不过它们很显然就是木星、土星、水星、金星和火星。金星当然被展示为一个女性形象。今天的人们当然都明白太阳系的行星的运动轨迹为何不同于银河系中其他的那些

遥远星体，不过，中世纪的天象学家对这一点是极为困惑的，那个时候的人们对行星和太阳的运行轨迹一无所知。

两页之后出现了一幅类似的插图，将四位女性的头像呈现在天空当中，以此昭示四个季节。同样的，今天的我们当然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运行的，因此四季变换也就很容易理解，但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难理解的。于是，插图后便出现了相当长的配图文字，而且解释得相当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大致意思是：这些星体都有各自的环状运行轨迹，它们同包括银河系在内[这里用了“lactis ei color”（牛奶的颜色）来比喻银河系，以表现这座星系的乳白色，配图文字认为这是天空当中的最大星系]的苍穹形成切面，太阳的运行轨迹则会穿越所有这些星体的运行轨迹，此一过程会影响太阳的热能，于是，一年便有了四季之分，并且一天中白天的时长也有了划分；这样的巨大旋转轮有很多，黄道带就是其中之一，太阳每年都会穿越黄道带上的十二个点，由此引发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季节转换。我的拉丁语还算够用，不过，我的星体知识显然是不足以理解如此复杂的解释的。

在数万年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可能是第一代无法再仰视夜空中星座的人。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晚期，夜晚的天空都还算明净，更多的人生活在乡间而非城市。在昔日的夜晚，人们都会仰望天幕上的数百万颗星，此等惊奇和兴奋的体验，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寻常之事了，实际上，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要是能够在那苍穹当中辨认出猎户腰带，就已经是相当令人满足的事情了（《阿拉图斯抄本》第58对开页的左页便是猎户座，此人是波塞冬之子，跨步而出，相当孔武，一页之后的左页之上给出了如下的配图文字，“sic balteus exit”，意思就是“猎户腰带就是如此伸展开来的”，即三颗非常明亮的星星排成一排）。自人类意识觉醒之时，人类就沉迷于凝视夜空，不停地找寻其中的规律和含义。人们很难不将无尽的威严和神性赋予这天空。太阳的运行轨迹有六个月是向左的，还有六个月是向右的，由此形成了一年的周期——对所有的文明来说，这就是最早的时间标尺和季节标尺。

现存的希腊文献当中，最早提及星体和行星的名字及其相对位置的文本便是天象诗《物象》（*Phaenomena*），是索里的阿拉图斯于公元前3世纪所作。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首诗取材于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nidos）的一部已经佚失的作品，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这一点。欧多克索斯是柏拉图的学生，生活的时代比阿拉图斯早了一百多年。有关这些星座的名称以及故事，阿拉图斯和欧多克索斯提供的信息毫无疑问可以追溯至文明出现以前很久的口传时代。阿拉图斯的《物象》在古代世界已然极为流行了，无论是作为关涉宇宙和神话的教学文本，还是作为用于农业和航海的手册文本都是如此。这样一首古典希腊诗竟然在《新约》当中也被征引，由此便可见其非凡地位。圣保罗在雅典传道之时，曾告诉听众说，是那个唯一的神创造了世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传》17:28）。这句希腊引文来自《物象》的第五行，指的就是朱庇特，如我们所见，《阿拉图斯抄本》就是以朱庇特开篇的。这位使徒在游走地中海之时，很有可能随身携带了阿拉图斯的

《物象》。

《物象》在古代就已经至少有三次被译成或者改编成拉丁语。这其中最早的一个版本是伟大的政治家西塞罗于公元前80年左右创作的。加洛林的宫廷图书馆很显然获得了一份残缺的西塞罗译本抄本并对其用俗大写体进行了精确抄录。10世纪时，制作于9世纪的新抄本抵达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如今它被集合为一卷，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这份抄本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其配图文字是在星座插图的边框之内的，因此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而非色块填充了整幅插图。

第二个拉丁译本则要流行得多，这个译本出自日耳曼尼库斯·凯撒（Germanicus Caesar）。我们仅仅是因为有作品提到过那么一两次这个译本才得知日耳曼尼库斯·凯撒这个名字的，其中就包括了圣哲罗姆的《保罗书信集评注》，因为哲罗姆认出了出自《使徒行传》17:28的引文。人们普遍认为该译本的译者就是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孙子、提比略皇帝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15/前16～公元19），当然，并没有切实证据支持这种看法。还有几个人也叫作日耳曼尼库斯，都可以作为候选人。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就是以这个译本为依托的。实际上，这个译本在开启其悠长的文本传播旅程之前，就已经是仿制本了——先是阿拉图斯仿制了欧多克苏斯的文本，之后又是日耳曼尼库斯仿制了阿拉图斯的仿制本。

第三个拉丁译本是鲁弗斯·费斯图斯·阿维恩奴斯（Rufius Festus Avienus）于4世纪制作的，关于此人，我们几乎没有能够确证的信息。这个译本是三个译本当中篇幅最长的。莱顿的抄本当中，时不时会出现阿维恩奴斯译本中的些许内容被插入日耳曼尼库斯译本当中的情况。比如说“双子座”的配图文字，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版本中相当简洁，只有四个词，但是那后面就被插入了阿维恩奴斯的版本中的七行文字。“巨蟹座”的配图文字则差不多全部是从阿维恩奴斯译本借用过来的。这样的做法在抄本传播过程中倒也并非不常见（无论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还是《凯尔经》都有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个情况也就表明，加洛林宫廷获取并抄录的古代晚期抄本，肯定不可能诞生于阿维恩奴斯之前的时代。事实上，这份抄本很可能就是4世纪晚期或者5世纪初期的物件。

乍一看，这份抄本很像罗马帝国晚期的抄本原本。它的插图通常以浓重的深色颜料轻描而成，时不时会有一些斑点出现，甚至给人以印象派的感觉，这实际上就是在效仿罗马风格——例如我们较为熟悉的庞贝古城的壁画以及埃及的石棺画像。文本的字体则是相当好看的俗大写体，看起来十分纯正。整体书页呈现为方形，这也完全是古典风格。最初的抄本很可能更为方正一些，因为一些书页外缘处较小的说明文字，遭到了近乎野蛮的剪裁。

对于古代抄本的这种方形形状，在此我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在1世纪之前，所有文学文本都是写在卷轴上的，这样的卷轴偶尔会用皮革或者羊皮纸制成（比如《死海古卷》中的大部分书卷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是用纸莎草纸制成的。《阿拉图斯抄本》第68对开页左页的河神手中握着的植株应该就是纸莎草。在基督教传入西方前后

的那个时期里，抄写员开始使用抄本，也就是类似于现代书册的那种格式：将书页在其内侧边缘处粘合起来，如此一来便可以一页一页地连续翻动它们了，而且书页的双面都可以用于书写。这样的发明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有些文本需要来回翻阅，而不是从头到尾展读，对于基督教礼拜文本以及法律文献来说，这样的做法特别有用。（今天我们仍然会说将一份法律文本“法典化”，所谓“法典化”，其最初的意思就是指转化为抄本格式。）到了3世纪和4世纪，抄本格式已然成为罗马帝国晚期书册的标准格式。

早期抄本的一折书页，是将一整张纸莎草纸对折两次，然后沿着一侧边缘切开，由此形成四张书页，或者说是形成两个对开页，一个对开页夹在另一个对开页的中间。纸莎草纸是用交叉相叠的芦苇捆压制而成的，因此，未折叠的纸张都是方形的，抄本也由此呈现为方形。我们眼前的莱顿的抄本所依托的范本很可能用的就是纸莎草纸。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埃及的纸莎草纸贸易路线也随之中断，抄写员便不得不转而使用兽皮（不管怎么说，这对抄本是有好处的，因为纸莎草纸在翻动的时候很容易断裂）。兽皮通常是长方形的。不难想见，将长方形的兽皮折叠并切开之后，必然会制作出长方形的书册，因此长方形成了中世纪抄本的标准形状。最终当现代用纸被引入中世纪晚期的世界之时，抄写员已然习惯了将纸张对折并切割为长方形，这使得现代的书册也都呈现为长方形。这为现代书册都是长方形的而不是正方形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很大的解释：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用羊皮纸取代了纸莎草纸。

《阿拉图斯抄本》的校勘情况显示出当初的纸张是如何被折叠的，同时也表明其中有五页佚失。[1]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丢失的书页讲述的是什么，因为所有这些内容都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份抄本里面了，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布洛涅，我们很快就会谈到它。佚失的书页呈现的是朱庇特和一只鹰、处女座、人马座、驾着战车的赫利俄斯（太阳神）以及月亮神。插图页的厚度有时候显然超出了一般书页（与该插图页相连的书页也会是同样厚度，尽管有时候并没有这个必要）。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量，毕竟要将一堆水彩颜料码在相对而言并不大的羊皮纸书页之上，倘若纸张太薄就很可能发生纸张变形。这又令我怀疑这些抄本所用的古代范本是否是在纸莎草纸上创制的，因为纸莎草纸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感觉viii折（也就是第57～64对开页）出自另外一个绘图人之手，因为这些书页上的颜料略有不同。



天象图，呈现的是诸行星以及太阳和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轨迹，绘有黄道带以及表示十二个月份的标志

亲身前往图书馆研究一份著名抄本的原本的后果之一就是，圣物从其藏身处露面这一消息会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图书馆，如同珍禽被鸟类学家在社交网络上发现。中午刚过，莱顿图书馆阅览室里就已经集结了一群莱顿大学的博士生，他们十分恭敬地询问我能否在我翻动书页的时候，让他们站在我的椅子后面。很快我便发现，这成了一个非正式课堂，任课老师是我，课程内容就是《阿拉图斯抄本》。

我告诉学生们，加洛林抄写员在抄录抄本之时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水准，不仅完全忠于原书，更将原书的样貌和格式也都照搬下来了；对此有一个学生提问说，我们要如何确定这是9世纪的抄本而非罗马帝国晚期的原本呢。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答案之一就是其羊皮纸的厚度和材料都符合9世纪的羊皮纸的特征（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了）。古代所用的羊皮纸通常很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而且书页很容易发生轻微的卷曲，这个情况我们在第一章有所提及。其次，书页里面的绘图尽管看起来很像是来自古代，但拥有加洛林时代特有的画风，特别是人物的脸部。我也很奇怪，人类大脑在脸部识别方面好像是受过本能的训练。在艺术作品中，往往就是眼睛泄露了有关伪造或者时代错误的信息。“仙王座”插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画面当中克普斯的脸部跟收藏在大英图书馆的《洛泰尔圣咏抄本》（Lothair Psalter）当中大卫王的脸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后面这一抄本是9世纪40年代在亚琛为加洛林皇族

成员制作的。最后一点是，《阿拉图斯抄本》里面有一整页插图的配图文字是用加洛林小体字写就的，这样的字体是不可能出现在公元800年之前的。

这一页就是第93对开页的左页，抄本在此处已经临近结尾。这是一整幅精美的天象图，各个行星以及太阳和月亮都在各自环状轨道的不同位置上绕着地球运转，最外围是各个星座组成的环带。这幅插图表现得非常精确，跟抄本里面的其他插图都有所不同，但跟第八折的插图使用了一样的粉红色颜料（具体可比较第60对开页左页上的狗的形象）。天象仪肯定不会是阿拉图斯使用过的天象工具，尽管这样的工具跟天文学的确有莫大关系。这张天象图设计得极为精细，各个星体的运行轨道被极为细致地用红墨水标示出来。如果将抄本捧起来对着光，就可以看到非常细小的针孔，表明在制作这幅插图之时绘图人肯定使用了罗盘进行比照。地球在中心位置。土星、木星和火星则处于环绕地球的椭圆形轨道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金星和水星处在画面左侧，它们并没有环绕地球运转（哥白尼之前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是很正确地环绕着太阳，太阳本身当然也在环绕地球运转。各行星的运行轨道之上铭刻着摘自普林尼《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的引文，是用很小但相当精美的加洛林小体字写就的，这一字体是在800年早期的那场文化变革潮流中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普林尼的《自然史》是阿尔昆向查理曼明确推荐过的文本。这幅天象图的外缘为一条色带，色带里面绘有黄道十二宫的标志，以小圆盘的形态呈现，圆盘当中分别是相应的人物形象，并以金色背景为映衬，此设计是为了表示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这些小小的人物形象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它们并非来自《阿拉图斯抄本》的范本，而是来自那极为古老的“354年编年史”——4世纪的一份抄本，曾为加洛林宫廷所斩获，前文也曾谈到这一点。这份年历的原本当然没能存留下来，而且据我们所知，9世纪也没有对其制作新的抄本[自这份年历最后一任有记载的主人天文学家及古物家尼古拉斯-克劳德·法布里·德·佩雷斯科（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于1637年谢世之后，它便从人间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不过，16、17世纪均有这份年历的彩绘抄本，而且都制作得相当好，其中最好的一些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阿拉图斯抄本》以这样一份年历作为其天象插图的绘图素材的情况，足以证明该插图出自9世纪的加洛林宫廷。

还有第三个因素可以将这幅天象图论定为9世纪的物件，在三个因素中这个因素是最诱人的：这幅图在细节上的准确度之高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极大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设想这幅图上行星和太阳的相对位置并非随机的，而是基于对天空的实际观测，我们知道这样的工作恰恰是加洛林时期的人们能够做到的。1999年，理查德·默斯特（Richard Mostert）和马克·默斯特（Marco Mostert）两兄弟联名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论文。这篇论文提出的设想是将莱顿抄本里面的这幅天象图的外环分解成三百六十度。画线将图的中心点分别同各个行星连起来，并以外环黄道带上的恒星为参照，对这些行星进行定位。默斯特兄弟用这个办法确定了这幅图的确切观测日期：816年3月18日，星期二。当然，这幅天象图顶多也就是一个碟子那么大，而且其具体尺寸也

未必就是绝对准确的。不过，论文作者们将这一问题置于现实情况中考虑，并提出如下论点：如果行星的位置是基于准确的科学观测标示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位置分布需要1700000000000年方能再现一次。兄弟俩还说，倘若允许5度的偏差（这个偏差已经很大了），那么再现就需要216000000年。倘若允许15度的偏差，则需要98000年。在2007年的一篇补充论文中，作者埃利·德克尔（Elly Dekker）提出论证说，在同一阴历月的另一端，也就是816年4月14日，也可能出现这样的行星分布。两种算法中间的时间差不足四个星期，我是没有能力评估这两种算法的，不过，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提出莱顿抄本的制作时间是在816年这一观点，当然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将其论定在9世纪的前三十年（但不会早于816年）。

无论这两种算法是否准确，3月18日这一天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纪念日。比德（约672~735）在《论计时》（*De temporibus*）中提出的时间算法在9世纪仍然通行，据此算法，这一天正是创世的那一天。上帝正是在此日说道："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记》1:14）并且，按照比德的记述，上帝是在3月18日这一天完成了创世："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创世记》2:1）

倘若这个解读是正确的，我们也就相应地能对这份抄本的制作初衷做出很大程度的解释了。抄本里面的插图是在传播来自古代世界的天文知识，加洛林时期的人们毫无疑问是极为仰慕这样的知识的，但是对他们而言，图中展现的天空是由上帝亲自打造并启动的。莱顿抄本的创制者们尽可能准确地在天象图中展示他们观测到的在创世纪念日当天的行星分布情况，使其更近上帝创世当天的星象。（当然，加洛林时期的人们对行星的运行的了解足以令他们意识到，816年3月18日在天文历法之上并不一定就对应着公元前3952年3月18日，后者是比德推算出来的创世时间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属灵的意义上，每年的复活节和圣诞节也都选取了基督复活和诞生的日子，那么每年的3月18日同样可以被选定为上帝创世的纪念日，且中世纪的年历通常就是这么记载的。）莱顿抄本以朱庇特开篇，但最后是以基督为结尾的，其结束页的文字是"Vale, fidens in d[omi]no xp[ist]i vestitutus amore"（再见，且要信从救主，沐浴基督恩泽）。中世纪的人们的基本观念为，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有意义的，是出于人类福祉的考量的。因此，基督徒的职责就是要去研究并解读其神圣目的。这也就意味着，认识星体是如何创造出来，以帮助人类适应季节转换、天气变动并形成航海知识，同样是神学的题中之义，甚至是一种信仰操练。



虔诚者路易的画像，他很可能是莱顿抄本的资助人，图中，他还坐在两个帝国外交使者中间，该图出自11世纪晚期的《夏巴纳的阿德马尔编年史》抄本

实际上，虽然有“信从救主基督”这样的献词，但莱顿抄本当中并无明确的内容表明献给的人是谁，除了日耳曼尼库斯在原本的前言中给出的帝国统治者这一信息。倘若816年或者稍晚一些这一时间点是正确的，那么查理曼毫无疑问就要被排除，因为他是在814年驾崩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抄本的资助人是查理的儿子兼继承人虔诚者路易，或者该皇族的某个近亲。这份抄本很有可能是在亚琛被制作完成的，因为这应该是宫廷图书馆的所在地。献词当中的“vestitutus”只能指男性，因此也就排除了于819年同路易完婚的巴伐利亚的朱迪斯（Judith of Bavaria），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抄本的潜在所有人之一。虔诚者路易本人于816年加冕称帝（很遗憾，是在这一年的10月而非3月），有证据表明，这位皇帝对宗教和天文都很有兴趣。虔诚者路易的标准的同时代传记《皇帝路易生平》（*Vita Hludowici*）几乎全是由无情的战争和争斗串联而成的。若是路易获胜，则证明上帝站在他这边；若是失败，则表明

他遭到了背叛。传记的作者是皇族成员，并以“天文家”（Astronomer）这个名号为后人所知，因为他在传记当中频繁地提到各个星座。比如说，他记载了817年一颗彗星出现在御夫座上的现象，而他最有名的记载是837年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哈雷彗星现身事件。当时，这颗彗星出现在蛇夫座下面的处女座上，向东而行，穿越狮子座、巨蟹座和双子座，一直抵达金牛座的头顶和御夫座的脚下（很显然，这个作者是很了解这些星座的，或者说是很了解《阿拉图斯抄本》的）。这个“天文家”还说，这颗彗星的运行轨迹跟那些“四处游走的星体”（也就是行星）的轨迹是不一样的。据他记述，面对此等情形，路易因为“认为他是了解这些事情的”而传召他，随后两人来到跟宫殿相连的一个露台上，讨论此事究竟是神的征兆，还是自然现象，皇帝最终得出的结论为两者实际上没什么区别。《阿拉图斯抄本》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露台之上的皇帝和“天文家”肯定拿着这份抄本。此举甚至有可能是在回应奥古斯都皇帝的故事，据说，当年这位古罗马皇帝也是手持《蒂沃利预言书》（Tiburtine Sibyl）观看天空中的异象的。

在加洛林宫廷对古代抄本实施抄录和仿制这件事中，真正令人产生兴趣的地方在于，罗马晚期的抄本原本在得到抄录和仿制之后，便就此消失不见了。被收入加洛林宫廷图书馆之后仍然能够存留下来的古代抄本，就是那两份4世纪的维吉尔抄本，如今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而这两份抄本之所以能够存留下来，就是因为加洛林宫廷没有为它们制作新的抄本。至于其他的古代抄本，一旦有新的抄本诞生，那古老的原本显然被认为没有价值了。也许这些原本的确难以阅读，也许是因为纸莎草纸已经太过脆弱了，所以加洛林时代的人干脆将之抛弃了。此等情形之下，新的抄本便自己成了范本，例如《阿拉图斯抄本》和特伦斯作品集，当然还有《土地丈量法》等。新的抄本便由此开始“繁衍后代”，这个进程本身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如同人类自身的繁衍进程一样。

到了下午过半的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太阳从云端露出脸来。此时图书管理员便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尽职尽责地将威尼斯风格的窗帘拉下来。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抄本就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在别的抄本上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现象。在晨昏时段对某处历史名胜进行航拍时，人们有时会发现一些从地面根本看不到的考古痕迹；此刻的情形也差不多。在明亮的光线之下，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很多幅插图的边框都有被人为地重压过的痕迹。抄本当中略微超过半数的插图有这样的情形。这些插图的边框（仅仅是边框）很显然被用某种钝器或者尖笔仔细且有力地重描过，这一动作在羊皮纸以及下面插入的新纸上都留下了印记。许多书页的左页都存留着同一轮廓的镜像印记，看起来像是用铅笔留下来的。实际上，一些岛屿抄本的插图页的反面也有类似的印记，如大英图书馆收藏的8世纪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对于《阿拉图斯抄本》，人们很可能运用了碳纸技术将这些插图转移到新的书页之上。不过，这一工艺被严格地限制于插图的边框部分，对插图里面的星体或者人脸，是不曾动用这样的工艺的。请记住这个细节，因为后文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这种办法实际上就可以制作出插图轮廓模版，并以此为范本不断地对插图进行复

制。

人们都知道，《阿拉图斯抄本》于1000年前后被用作范本，催生了另外两份新抄本，而这两份抄本很可能都是在法国西北部的加来海峡省的圣贝尔坦（Saint-Bertin）修道院制作而成的。其中一份目前收藏在布洛涅的市政图书馆。这份抄本显然是为圣贝尔坦修道院的修士们制作的，这座修道院在布洛涅东面，距离布洛涅大约三十英里，抄本的具体制作时间应该是在奥德波特（Odbert）于986~1007年担任院长的时候。随后的千年光阴当中，这份抄本并没有走太远，一直就在附近活动。第二份抄本的制作时间可能要稍晚一些，很可能是在圣贝尔坦修道院完成的，不过不久就被韦林哈尔（Werinhar）赠给了斯特拉斯堡教堂，韦林哈尔于1001~1028年在斯特拉斯堡担任主教。如今，这份抄本收藏在瑞士伯尔尼的公共图书馆。人们普遍认为，莱顿抄本在那段时间里肯定在圣贝尔坦修道院，由此这座修道院可以依托它而创制出两份新抄本，奥德波特本人很可能也参与了创制工作。

要确证这一点，就需要短暂地拜访一下布洛涅——有了英法海底隧道，从伦敦抵达布洛涅倒也是很方便的事情。在一个温暖且多雾的春日，我和我的妻子从加莱驱车南下。如今的布洛涅市政图书馆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区，在17世纪时，这里曾经被用来接待前往布洛涅圣母教堂的朝圣客。图书馆就坐落在老城中心用鹅卵石铺就的“抵抗运动广场”（Place de la Résistance）。进门以后，穿过封闭的回廊，就能抵达对角处的“遗产”（Patrimoine）阅览室，此处主要收藏的是地方志方面的书册，图书馆助理维尔日妮·奥迪凯（Virginie Haudiquet）引领我从这里上楼，抵达一个摆放着长桌、有点像是教室的空房间（维尔日妮告诉我，这部分建筑的主体可追溯至13世纪）。他们已经在这里单独为我安排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布置了深蓝色的书垫，还有一双白色手套。之后，维尔日妮便去取“ms 188”号藏品。抄本很大，但也很薄，大约是14英寸长、12英寸宽，封面上用墨水写了“Calendrier”字样。这份抄本实际上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本和图示汇编，其中就包括了诸如如何计算复活节的日期一类的信息。第10对开页左页上的表格展示了未来二十五年，也就是从999年往后的二十五年的天文历法算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定在999年（显然，此时千禧年即将到来，世人对宇宙的兴趣和热情涌动了起来，我们会在下一章谈论这个话题）。从第20对开页往后，这份布洛涅抄本便开始忠实地抄录莱顿抄本的内容了。

布洛涅抄本里的插图像极了莱顿抄本里的，那情形实在是令人感觉诡异，就如同人们有时会遭遇的那种梦境一样：某个场景似曾相识，但仔细一看又是全然不同的。布洛涅抄本将两幅插图安排在同一页，形成上下格局，右页上则是莱顿抄本的配图文字。字体不再是俗大写体，不过仍然是大写的，显然是为了保留范本的这个非同寻常的特征。这一次我也带来了我自己对莱顿抄本的描摹本（当然，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份描摹本是依托影印本制作出来的），据此来考察一下布洛涅抄本上的插图边框是否直接复制于莱顿抄本，答案是否定的。这的确让我略感失望。为了将两幅插图整合到一个页面之上，制作人缩小了插图的尺寸，

图中的一些细节和比例也都因此发生了变化。它们都是很接近原作的仿作，但并非精准的复制品。莱顿抄本里面一些已经佚失的插图，在布洛涅抄本里被忠实地呈现了出来，比如用来展示朱庇特和鹰的第一幅插图，很显然，这些插图当时都还在于原本里。不过，也有一些插图是布洛涅抄本漏掉了的，至于为何会这样，我们并不清楚，比如野兔图和四季图，在莱顿抄本里它们都是完整的整页插图。天象图当然也在布洛涅抄本里，不过，布洛涅抄本对之实施了拓展，将地球的纬度带、太阳的运行轨迹以及一张相当简单的世界地图也包括了进来，其中的世界地图将世界划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显然，这已经不再是如莱顿抄本那样的单纯复制早期范本的作品了，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版本，并且为了新的目的而进行了更新——主要是为了修道院中的时间记录。



圣贝尔坦修道院院长奥德波特资助创制的莱顿《阿拉图斯抄本》的新抄本，如今收藏在布洛涅市政图书馆

布洛涅抄本的绘图颜色跟莱顿抄本也常常大为不同。比如说，双子座插图中的第一个人物，在布洛涅抄本当中其左肩披的是绿色袍服，但是在莱顿抄本中则是红色袍服；另一人在布洛涅抄本当中手持绿色竖琴，且竖琴的边缘是橙色的，在莱顿抄本里竖琴则是红色的，饰有金色外缘；布洛涅抄本当中的克普斯身披褐色外袍，内衬灰色和白色相间的长袍，但是莱顿抄本里面的克普斯则身披红色外袍，内衬褐色长袍；赫丘力身披的狮子皮也从绿色变成了黑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插图内容本身，不过，从中可以见出，布洛涅抄本的图片是依照线条画绘制的，并非直接对照着彩绘范本创制而成。同时别忘了，依托莱顿抄本创制的这些线条画上应该只有轮廓，并无具体的脸部画像。这导致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布洛涅抄本插图中的基本轮廓出自同一个绘图人之手，但是所有的面部特征，诸如眼睛、鼻子等，很显然是由不同的人填充进去的，而且很可能是后来才被填充进去

的。布洛涅抄本的第一幅插图是用褐色墨水绘制的，用的是流行于1100年前后的典型的盎格鲁-法兰克风格；“猎户座”的脸部则完全是一片空白（见布洛涅抄本第27对开页的左页）；此后所有的脸部细节都是被人草草地用黑墨水完成的。此一情况足以表明，布洛涅抄本所用的范本并非莱顿抄本，而是一些没有脸部细节的线条画；而且，圣贝尔坦修道院的绘图人一开始很可能误以为这些没有脸部内容的轮廓，是出于设计上的考虑。

若此论是真的，那也就足以论定，圣贝尔坦修道院在创制抄本的时候不一定拥有莱顿抄本原本，而且，在该修道院11世纪和12世纪的藏书名录上面，确实没有莱顿抄本的名字。实际上，莱顿抄本甚至有可能已经在英格兰待了一段时间。加洛林宫廷图书馆应该在9世纪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中的一批珍贵藏书很可能来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例如《乌得勒支圣咏抄本》以及阿拉图斯天象诗的西塞罗译本。这些藏书前往英格兰的线路绝非一条，比如说，通过虔诚者路易的孙女朱迪斯，她于856年嫁给了维塞克斯国王埃特尔沃尔夫（Aethelwolf, king of Wessex）——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父亲。圣贝尔坦修道院的格林巴尔德（Grimbald of Saint-Bertin，亡于901年）也是一条潜在的线路，阿尔弗雷德大帝将这名学者从圣贝尔坦带到了英格兰，就如同当年查理曼将阿尔昆从英格兰带到加洛林宫廷一样，目的也是请他襄助文化变革事宜。此一时段的法兰克宫廷和英格兰宫廷之间很显然是存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的，且每次交流应该都会途经英吉利海峡渡口附近的圣贝尔坦修道院。完全可以肯定，在布洛涅抄本创制期间担任圣贝尔坦修道院院长的奥德波特，从英格兰和法兰西两方面都获取了抄本的范本以及所需的绘图人。

现在我们该返回莱顿大学图书馆了。1300年前后，有人将莱顿抄本的配图文字逐节逐节地抄录到了既有的书页上面，用的是相当潦草的哥特式手写体，并且就在原来的俗大写体文字旁边；此举显得非常突兀，而且令抄本的美观度陡然下降。这些丑陋的文字填满了抄本的许多空白页，同时也填满了各个诗节之间原有的空间。这项转录工作干得很是糟糕，经常出现低级错误。此番抄录之后，中世纪晚期抄本及其古代范本的内容都被集中在了同一份抄本内，甚至就在同一页上。很显然，对13世纪晚期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漂亮且古老的大写字体已然难以阅读了。《凯尔经》上也有转录的文字，一些书页上的字母组合图案令人难以理解，有人便在很久之后将其文本用清晰易读的拉丁语转录在页面下方的空白处。很显然，莱顿抄本在诞生四百年之后，仍然是有自己的功用的，即使这时的人们已经无法解读上面的古老文本了。实际上，莱顿抄本之于四百年后的人们，相较于4世纪晚期的原本之于加洛林时代的人们，更为老旧。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们仍然认为这份抄本是有用的，并且是需要予以转录，以便世人阅读的。

莱顿抄本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修道院的图书馆或者某个机构的图书馆里。抄本的后衬页之上有字迹已然模糊了的用铅笔写的标价，很可能是14世纪或者15世纪留下来的，标价为“xxii lb. xix s.”，应该是22利弗尔和19苏的意思。不管汇率如何，这肯定是一大笔

钱。它要么是出售标价，要么是购买标价，当然也可能是抵押或者典当估价。尽管抄本中的文字都得到了转录，但抄本本身的价值主要还是在于其插图，因为这些插图是可以被用作其他艺术作品甚至建筑设计的范本的。很显然，在中世纪晚期，莱顿抄本应该在工匠手中。一些书页的边缘处绘有彩绘首字母的草图，比如第63对开页右页边缘空白处的彩绘字母“A”以及第82对开页左页的那个站立着的人的形象，它们随意地融入了插图背景当中，若不将书页对着光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还有一些符号是以铅笔写就的，在我看来，这样的符号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晚期工匠的标记。

因此也就可以确定，莱顿抄本在遇到自己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主人之前，应该一直都待在某个工匠的作坊里。其卷首衬页的顶端有一份16世纪的题词，“Sum Iacobi D[anielis]F[ilius]P[atris]N[icholai]Susii, E pictoris pergula emptus mihi”——这句话的最后一个词被插在这一行的上方——“Gandavi Anno a Chr[ist]o corporato MDLXXIII, Mense Januario, Machlinia bis capta care[n]ti, καὶ παροικῷ”。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属于……（显然这是以抄本自己的语气在说话）……雅各布，是他的父亲尼古拉斯·苏西乌斯购买了我……（接着就是苏西乌斯在说话了）……我是在根特的一间画室买到它的，具体时间是1573年的基督显圣节，也就是那年的1月，当时我正在逃难，远离了我的家乡梅赫伦，我的家乡已经被征服两次了”。这里的雅各布·苏西乌斯就是人文主义者兼语文学家苏伊斯（Suys），在1572年西班牙人洗劫梅赫伦之后，他便暂时寄居根特。苏西乌斯在自己于1590年出版的一部作品的献词中提到了这份抄本，那段献词是给他的友人——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雅努斯·多萨（Janus Dousa, 1545～1604）的。苏西乌斯在献词中承诺，一旦找到合适的雕刻工匠，就会着手创制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的复制品。

苏西乌斯的一个学生名叫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此人非常早慧，后来成为著名的古典学者和法学家，苏西乌斯的承诺实际上正是在格劳秀斯手中得到实现的，当然，那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格劳秀斯在十六岁就写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他编纂的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作品集于1599年出版，不久后，他又翻译了阿拉图斯的《物象》，格劳秀斯将之定名为《阿拉图斯之法：诗篇与天文之道》（*Syntagma Arateorum, Opus poeticae et astrono miae utilissimum*），该书于1600年在莱顿出版。格劳秀斯并没有明确说过，莱顿抄本当时属于他个人，不过情况很显然就是这样的。后来的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乌斯（Andreas Cellarius，约1596～1665）在自己于1661年出版的《星图》（*Atlas Coelestis*）一书中谈到这件事情，他特别指出，格劳秀斯是从雅各布·苏西乌斯的继承人手中得到莱顿抄本的，多萨在这件事情上也帮了忙。格劳秀斯是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他拥有的藏品最终组成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图书馆。1618年，格劳秀斯因为自己的神学异见而被判终身监禁，监禁之地在荷兰中部的罗夫斯泰因城堡（castle of Loevestein）。在妻子的积极帮助之下，格劳秀斯于1621年策划了一场戏剧性的越狱行动，两人藏身于堆放

着书册的箱子里面成功逃脱，并带着藏书逃往巴黎。在巴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Sweden, 1626~1689）联系上了这两口子。三年后，格劳秀斯谢世，他的妻子遂同意将丈夫那估价两万四千荷兰盾的全部藏书，一次性卖给克里斯蒂娜。1648年10月中旬，格劳秀斯的藏书抵达斯德哥尔摩，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莱顿抄本也在其中。

雅各布·苏西乌斯的题词，题词显示，苏西乌斯是于1573年在一个画师的学校里买到这份《阿拉图斯抄本》的

跟纳瓦尔的让娜（Jeanne de Navarre）和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一样，克里斯蒂娜也是一个藏书家，也属于这个完全出乎世人意料的“藏书女主”（reines bibliophiles）群体（关于前两位，我在后文中会有记述）。克里斯蒂娜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1611~1632）唯一的继承人，她六岁便继承了王位，并从1644年（十八岁）开始，掌控了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实权。对于宗教、科学以及密仪领域的一切稀有之物，她都有浓厚兴趣，已经八百五十岁的莱顿抄本里面的神秘插图当然也是她的兴趣点所在。这位瑞典女王不仅尽心竭力地搜罗书册和抄本，还尽心竭力地网罗天下名士，资助他们研究这些书册和抄本。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队在欧洲大陆的一番劫掠，为这位女王的宝库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包括来自奥托王朝的一批质量极佳的抄本。最终，克里斯蒂娜于1654年逊位，并于1655年改宗天主教，将自己连同多达两千册的珍贵抄本都迁移到罗马，如

今，那著名的“女王藏书”（Codices Reginenses）系列收藏仍然是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珍宝之一。

克里斯蒂娜在斯德哥尔摩主政的时候，曾罗致一批学者来到她的宫廷，担任她的导师和图书管理员。这些人的到来为她的沙龙增色不少，其中就包括了哲学家勒内·笛卡尔，这位哲学家在1650年谢世前仍然在为克里斯蒂娜效力。笛卡尔之后便是著名的伊萨克·沃斯（Isaak Voss, 1618~1689，此人的拉丁语名字写作“Vossius”）。沃斯诞生于荷兰的一个备受世人尊崇的学问家族，是古典学家和神学家，在来到克里斯蒂娜的宫廷之前，他已经在欧洲各大收藏抄本的图书馆广泛游历。他认识詹姆斯·乌塞尔，也就是当时的阿马大主教，正是此人最早令《凯尔经》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当然在巴黎的时候，他也结识了胡果·格劳秀斯。1648的夏天，沃斯收到了来自克里斯蒂娜的皇家诏令。1649年3月，他抵达斯德哥尔摩；同女王第一次会面之时，沃斯用的是拉丁语，女王则以荷兰语回应。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沃斯向女王传授希腊语，并将自己收藏的相当可观的文献一并转移到瑞典，任由女王使用。然而，伴君如伴虎，同这类专制君主的关系从来都是很危险的。最终，在1653年的秋天，克里斯蒂娜单方面结束了沃斯的服务契约，并请沃斯从女王的藏书当中选择一批书，以此替代薪酬，女王此前曾吞掉了沃斯的一大批藏书，所以这也算是补偿；至少沃斯方面是这么说的。任何藏书家都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在此，我应当暂停片刻，且让藏书家们想象一下倘若自己处身那样的境地，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最终，有十箱子书从皇家图书馆被运出，于1654年3月经由汉堡抵达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方面流言四起，说沃斯洗劫了女王的图书馆（这样的传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沃斯对此予以坚决否认。这批书册当中不仅包括莱顿抄本，还包括了6世纪用哥特语写就的伟大抄本《银色福音书抄本》（Codex Argenteus of the Gospels），沃斯很快将这份抄本转卖了，如今，它被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图书馆。不过，沃斯将莱顿抄本留了下来。在他死后，莱顿抄本于1690年连同沃斯其余的个人收藏一并被卖给了莱顿大学。在该抄本第一页底端空白处有一个印在一张纸条上的标签，上书“Ex Bibliotheca Viri Illust. Isaaci Vossii”，后来这个编号又被用墨水加上了“296”的字样。展读完毕后，我将抄本连同放置抄本的盒子一并交还阅览室的保管员，此时才注意到盒子的脊背上有一个红色的方框，随附一张纸条，上书“IS. VOSSII Codex Latinus Qto. No. 79”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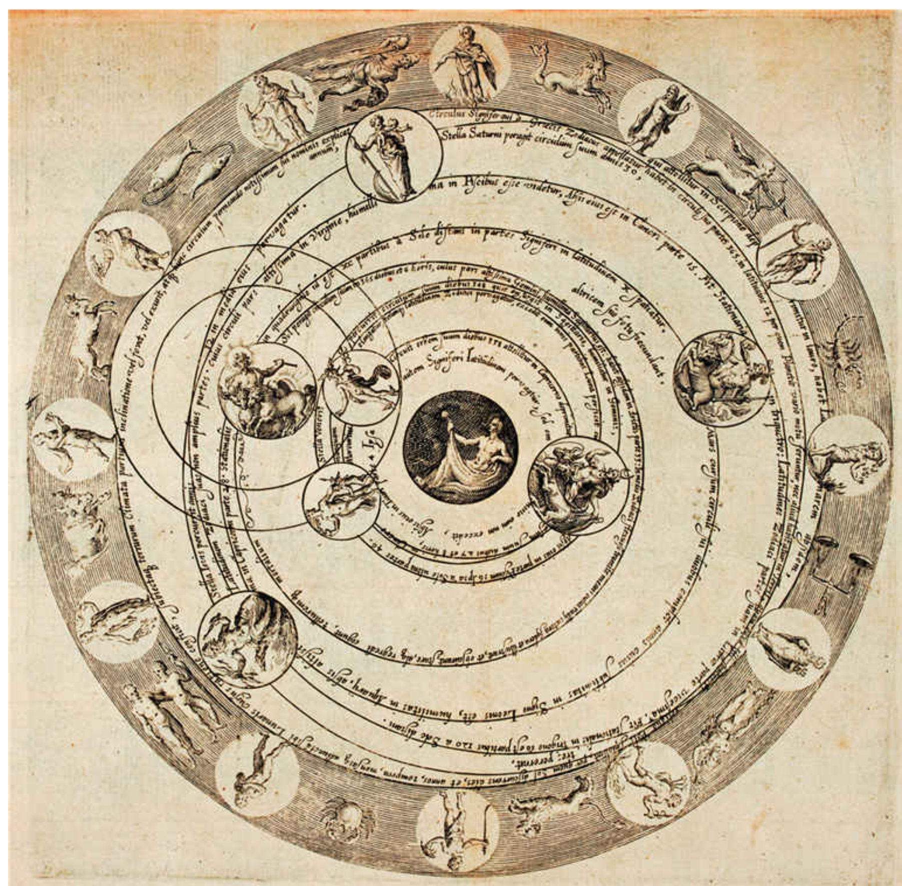
藏书女王：克里斯蒂娜，瑞典女王，1632~1654年在位，这幅画应该是1649~1650年由弗莱芒画师伊拉斯谟·奎里努斯绘制的，图中的女王被呈现为智慧的守护神雅典娜的形象

对抄本的精确复制并没有随着中世纪一起结束，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在延续。格劳秀斯于1600年推出的阿拉图斯《物象》译本，就当时的技术和品位而言，应该说是莱顿抄本的精确复制本。译本中的插图跟9世纪的范本极为切近。当然，在细节上是有一些变动的，例如“金牛座”插图里的牛角的长度不一样了，所有图的背景也都被置换为乱云滚动的天空，且插图的边框也被去除了。在这个译本当中，格劳秀斯毫不犹豫地依据自己对托勒密《天文学大成》（*Almagest*）的解读，改变了抄本中插图的顺序，并且还自行绘制了范本当中没有的插图，如天秤座和处女座的图。范本中卷首的朱庇特插图当时已经丢失了，格劳秀斯便用莱顿抄本中的天象图予以取代，并将其上下颠倒了过来（至少我看到的版本是这样的）。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格劳秀斯这个版本的插图，无论是在大小还是严肃程度上，都和那份极为神秘的加洛林时期的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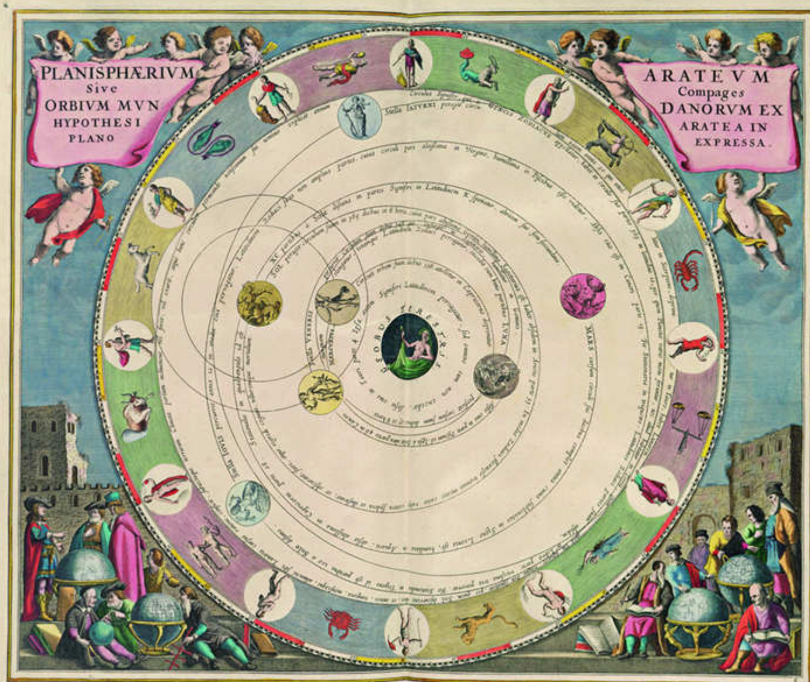
（以及罗马帝国晚期的原抄本）保持了一致。到了这幅天象图下一次被复制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下一位复制者以格劳秀斯的插图为范本，将天象图放大至占据一整个对开页后，置于1661年的《星图》中，并为其装饰了相当华丽的巴洛克边框、撑起插图名称的小天使，以及一群在讨论并测量星体和地球的怪异天文家。这份里程碑式的天象图被进献给了1660～1685年主政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国王，想象一下，查理就那么看着这幅源自加洛林时代的《阿拉图斯抄本》的天象图，这样的场景倒也令人愉悦。

影印技术使抄本的复制工作变得现代化。4世纪的《梵蒂冈维吉尔抄本》（*Vatican Virgil*）逃过了9世纪在法兰西涌动的抄本创制浪潮，成了最早一批拥有影印本的抄本之一。该影印本于1741年出版，里面的插图是由皮埃特罗·桑蒂·巴尔托利（Pietro Santi Bartoli）于17世纪从原本当中复制而来的。诞生于19世纪的影印技术，大大增强了人们复制中世纪抄本的能力，其威力就如同今天的数码扫描技术。平版彩印技术于19世纪60年代臻于完善。这很快就为彩饰抄本的复制创造了良机，这样的情况是中世纪之后从未出现过的。此等技术催生了许多非常有名的抄本的影印本，其中就包括：《格里玛尼日课经》（Grimani Breviary, 1862以及1903～1908）；《乌得勒支圣咏》（*Utrecht Psalter*, 1874）；13世纪的《启示录》抄本（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编号“MS Auct. D. 4. 17”，1876），罗克斯堡俱乐部（Roxburghe Club）的第一本影印本抄本；米兰安波罗修亚图书馆（Ambrosiana）收藏的6世纪的叙利亚文《旧约》抄本（*Syriac Old Testament*, 1876）；收藏于伦敦的希腊语《圣经》抄本，也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 1879～1883）；特里尔（Trier）的《爱格伯特抄本》（*Codex Egberti*, 1884）；《劳伦丁索福克勒斯抄本》（*Laurentian manuscript of Sophocles*, 1885）；藏于博德利图书馆的米耶洛（Miélot）的《圣母的奇迹》（*Miracles de Nostre Dame*, 1885）；慕尼黑的《尼布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 1886）；《波利莫特之书》（*Book of Ballymote*，爱尔兰皇家学院，1887）；塔尔霍夫的《战斗手册》[Talhoffer *Fechtbuch*，哥达（Gotha），1887]；《马内赛古抄本》（Manesse Codex, 1887）；《赫洛德冈规则》（*Rule of Chrodegang of Metz*, 1889）；4世纪的《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1889）；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奥托福音书》（*Ottonian Gospels*, 1891）；《老爱达经》（*Elder Edda saga*, 1891）；《博纳·斯福尔扎时祷书》（*Hours of Bona Sforza*, 1894）；《亨尼塞时祷书》（Hennessy Hours, 1895和1909）；新近确认的《圣玛格丽特福音书》（Gospels of Saint Margaret of Scotland, 1896）；《埃蒂安·舍瓦利耶时祷书》（*Hours of Étienne Chevalier*, 1897）中散落的插图集；收藏于柏林的5世纪的《奎德林堡古拉丁圣经》残片（*Quedlinburg Itala fragments*, 1898）；《萨拉热窝哈加达祈祷书》（Sarajevo Haggadah, 1898）；收藏于剑桥大学的《伯撒抄本》（*Codex Bezae*, 1899）；《查理五世加冕礼祈祷书》（Coronation Book of Charles V, 1899）；《梅斯主教祈祷书》（Metz Pontifical, 1902）；收藏于莱顿的豪华《圣路易圣咏》（Psalter of Saint Louis, 1902）；《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1904）；

《斯托祈祷书》（Stowe Missal, 1906～1915）；《维拉尔·德·奥内库尔绘本》（*sketchbook of Villard de Honnecourt*, 1906）；藏于阿瑟纳尔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的《泰伦提乌斯剧作抄本》（*Térence des Ducs*, 1907）；《布列塔尼的安妮时祷书》（Hours of Anne of Brittany, 1909）；《腓力三世日课经》（Breviary of Philippe le Bon, 1909）；《三一学院启示录抄本》（Trinity College Apocalypse, 1909）；《圣埃塞沃德祈祷书》（Benedictional of Saint Aethelwold, 1910）；《哥斯拉福音书》（*Goslar Gospels*, 1910）；秃头查理《圣经》抄本（Bible of Charles the Bald, 1911）；《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 1911～1912）；《弗瑞抄本》（Freer Gospels, 1912）；《玛丽女王圣咏》（Queen Mary Psalter, 1912）；等等。就跟中世纪的抄本一样，在现代的这些影印本当中，有些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质的，有些则主要是为了愉悦读者，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



《阿拉图斯抄本》的天象图，胡果·格劳秀斯将其收录在了自己于1600年翻译出版的《阿拉图斯之法》当中。



绘有丰富的边饰图案的天象图，出自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乌斯的《星图》，1660年于荷兰出版

为这些著名的中世纪抄本制作昂贵且“精美的摹本”这一行当，在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真正流行起来，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特别是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收藏家们都成了其中的弄潮儿。卢塞恩图文出版公司（Faksimile Verlag）创建于1974年，在1989年，这家出版社发行了莱顿抄本的彩印本，这是面向奢侈品市场发行的。此一现代彩印本的诞生，标志着阿拉图斯的作品的抄本创制史上一个全新的阶段——9世纪的莱顿抄本，抄本本身就是4世纪或者5世纪的一份抄本的抄本，而后者完全有可能是以罗马教廷收藏的一份抄本为范本的，而罗马的这个范本又是以古希腊的一份抄本为范本的。《阿拉图斯抄本》的现代彩印本，当然不再直接以珍贵的莱顿抄本为范本了，通常取材于瑞士出版的那个影印本，或者用网络上的电子版，由此创制出来的彩印本则相应地成为后续作品的范本。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这些彩印本的拥有者通常会告诉你说，他们拥有一份限量版的“原本”，然而，何谓“原本”，这个问题对于中世纪抄本来说历来都是极为复杂的。

注释：

[1] 具体校勘情况如下：i^{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i页，即第1对开页），ii^{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v页，即第13对开页），iii~$viii^{8}$，ix^{2+6}（两个对开页，分别是第69和第71对开页，以及六张单页），x^{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ii页，即第74对开页），xi^{10+1}（第81对开页是单页），xii^{8}（共十个对开页，缺了iv页，即第95对开页，和vii页，此页没有编码）。前文已经指出，现代人用铅笔给出的对开页页码将佚失的书页都计算在内了，这令人有些迷惑，因为抄本

的原卷首页已经丢失了，如今的这份抄本实际上是从第2对开页开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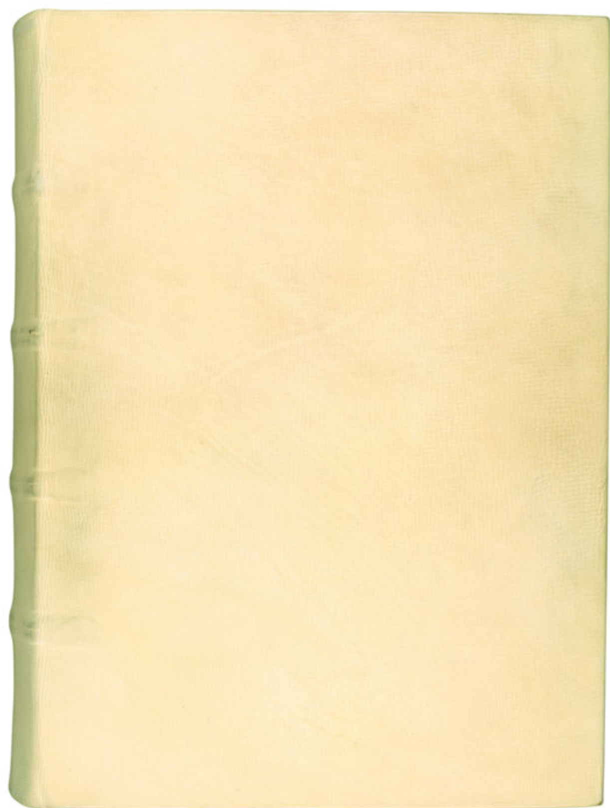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

10世纪中叶

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

M 644

若有谁想使用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抄本，那他或她就需要提前几天熟悉该图书馆的标准借阅流程和规则，而其中的一条规则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禁止涂有色指甲油，因为指甲油很可能会在珍贵书页上留下痕迹。”这样的规则虽然非同寻常，但也很有意思。浮夸的色彩和文化自觉的确同时存在于纽约这座令人惊奇的现代巴比伦中。我先前就已经向摩根图书馆提出书面申请，希望能获准面见其收藏的一份10世纪的关于《启示录》中世界末日的预言的彩绘抄本。摩根图书馆“M　644”号藏品就是我要约见的抄本，其插图呈现的是有关混乱和毁灭、预言中的末日审判和文明终结的大型场景，这份抄本也正是因此而名扬四海。于是，有那么一天，我沿着麦迪逊大道前行，置身于这城市的无情噪声当中，在我周边，到处都是发了狂的黄色出租车，警笛声此起彼伏，建筑工地嘈杂一片，地下供热系统喷射出魔鬼一般的蒸汽，商业大潮如同洪水一般在城中涌动，路旁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此等场景唤起了我对在此拍摄的许多末日灾难片的记忆——且这些记忆变得格外鲜活。曼哈顿毫无疑问是西方世界头一号的现代大都市。《启示录》18:16和18:18～19中有如下喟叹：“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妆饰”——且看一看第26、27街区那金色的保险公司大厦，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场景吗——“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宝成了富足……”当然，这经文本身并非指现代的纽约城，但那样的描摹完全符合这座现代大都市中的情境。这是错综复杂之地，也是令人兴奋之地，它矗立在罪恶的边缘，令所有造访它的人战栗。这座城市永远都是吵闹且繁忙的。在美国，纽约是唯一一座人行道上永远都有大批行人的城市，随着路灯的变幻，人群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迅速地涌动、集结。盲目地向前行进的人潮中似乎没有人会抬头看看自己的方向，因为差不多所有人都手拿一杯咖啡，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要么是在读信息，要么是在发送信息。在纽约，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跟时间赛跑。当我也置身于麦迪逊大道的人潮中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一下世界末日的问题的好时机。



遍观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时代的人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世界末日。今天，这样的观念仍然有不少的信从者和追随者。中世纪早期有一种普遍的基督教信念认为，宇宙的生命期可被划分为六个均等时段，而当时他们正处于最后时段的尾声。此等观念是以六天创世为神圣计划的预演这一理念为基础的。据《彼得后书》3:8的说法，上帝眼中的一天等同于地上的一千年（此一说法本身则对应了《诗篇》90:4），因此，从尘世之人的角度来看，创世的过程也将延续六千年。在最后一个千年结束之后，基督将会降临并进行统治，撒旦将会被封闭在无底坑中又一个千年（《启示录》20对此有详细描述），直到末日审判的来临。若是将《旧约》中的家谱涵括的时间跨度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将创世之开端论定在公元前5500年前后，由此便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第六个千年将会在500年或者这一年的前后结束。希拉里亚努斯（Hilarianus）在他于397年写就的《年代记》（*Chronologia, sive Libellus de mundi duratione*）中就是这么推断的。据希拉里亚努斯估算，他生活的时期距离末日到来也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希坡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是与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圣奥古斯丁在内的一些人也都认为，第六个世代已经以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件终结了，世界已经开始对撒旦的千年封印进行倒计时了。不过，奥古斯丁也告诫人们，不

要太过字面化地理解贯穿经文各处的这些数字线索，为此他还引述了相关经文，以证明甚至连耶稣自己都不确定预言中的末日究竟何时到来（《马可福音》13:32、《使徒行传》1:7）。

不管怎么说，《圣经》的最后一卷，也就是《启示录》，显然非常清晰且详细地呈现了世界末日的场景，那正是神明圣约翰在拔摩（Patmos，即帕特莫斯岛）见证的场景。经文里面谈到了种种标志着末日预言实现的征兆，其中就包括了巧舌如簧的敌基督降临人世，他将如同野兽一样，从地中出现，虔信之人也会被他欺骗（《启示录》13），还有就是巴比伦娼妇现身，她浑身珠光宝气（肯定也涂了指甲油），喝饱了圣徒的血（《启示录》17）。可以肯定，各个时代的人都能够很轻易地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对应的末日之人和末日之地，由此也就能够很轻易地将眼前的乱象同经文当中预言的事件对应起来。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西班牙的修士列瓦纳的贝亚图斯（Beatus of Liébana,约740~800）汇编的《启示录评注》。贝亚图斯是图里恩奥圣马丁修道院的一个修士，这座修道院也就是今天列瓦纳的圣托里维奥修道院（Santo Toribio de Liébana），位于西班牙北部，莱昂和桑坦德中间的地方。虽然贝亚图斯是一位有据可考的作家，但是贝亚图斯这个名字不曾在任何手稿或者抄本中出现。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时候，他的作者身份得到了确证，并且获得了普遍认可。贝亚图斯还写了另外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提供的诸多线索可以证实，他的《启示录》评注工作大约是从776年开始的，并且经历了随后一个十年的修订期。而这个十年恰恰就是《启示录》的毁灭预言极端流行的一个时段，特别是在西班牙：旧有的罗马-西班牙文明正处于明显的毁灭当中；北非的穆斯林也于711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着西班牙本土席卷而来；倭马亚王朝最终于756年在科尔多巴建立起来。此等情形之下，西班牙的基督教修士当然就会将穆罕默德认作《启示录》中的那个敌基督。查理曼的反攻浪潮于778年开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将其视为《圣经》中的善恶之战。另外也有一些算法将创世之举的开端论定在公元前5200年前后，因此，第六个千年的结束时间也就随之被调整到800年前后，随着8世纪走向尾声，这种算法至少对西班牙列瓦纳的贝亚图斯来说，必然是值得信从的。

一份抄本突然变得流行起来，这样的事情往往也是清晰的风向标，表明了一个文化体当前的主要关注点。实际上，贝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抄本不如其作者长寿。800年这个关键年份过去了，并没有灾难发生。于是，在随后的百年间，贝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抄本便少有人问津了。人们只知道有一张插图页从9世纪晚期靠着机缘存留了下来，就藏于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省西洛斯的一座修道院图书馆里。最早的插图本贝亚图斯抄本数量很少，只是“一股涓涓细流”，到了10世纪中后期，1000年这个千禧年已然在望时，其队伍已经不断壮大，汇聚成河。现存的有据可考的最为古老的贝亚图斯抄本，正是在接近这个千禧年的时间段当中创制完成的，我们要在摩根图书馆约见的就是这份抄本。

摩根图书馆（如今又加上了“博物馆”这个名字，试图削弱其学术精英气质）占据了第36大街和第37大街之间面向麦迪逊大道的那个街区。其核心是于1902~1906年以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修建的图书馆，它为银

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1837～1913）而建，后来由J.P.摩根的儿子扩建并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父子俩的藏书加总起来无论是在品质上还是藏书范围上都是世界级的，绝不逊色于欧洲的任何馆藏。后来，这座图书馆又经历了多次扩建，最近一次改造的力度非常之大，而且花费惊人，是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主导的，于2006年完工。由于我预定的到达时间是在规定开馆时间之前，摩根图书馆的抄本部负责人罗杰·维克先生便建议我通过位于东37街24号那座褐色古老建筑一侧的员工入口进馆。抵达员工入口之后，我按响了蜂鸣器，里面有人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在回答之后，我便被接入一个像卸货间一样的大厅，滑动玻璃门后面是安检台。我在来客登记册上的号码“ID #1214”旁写下我的名字，这个号码同样被印在我的信用卡大小的访客通行卡上。在这个环节上，工作人员做得万分谨慎。在我等待片刻之后，一个铁路调度员打扮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身穿暗红色制服，夹克的口袋上印有图书馆的标志，他引领我进入皮亚诺设计的开阔中庭，此中庭跟图书馆一样高。其窗户被用半透明的彩色片状玻璃装饰起来了，看起来就像是贴有剪纸花饰，一片片巨大的玻璃从天花板垂下，反照着窗户，并且一直在转动。中庭中还设置了两台用玻璃罩起来的电梯，并排而置，显然这里是没有楼梯的。我的向导引领我进入电梯，并悄悄告诉我说，我们要去三楼。电梯带领我们上行，我感觉到自己陡然上升了，高高地越过公共阅览区，这对于恐高症患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出了电梯右拐，便进入了谢尔曼·菲尔柴尔德阅览室（Sherman Fairchild Reading Room）。这个阅览室设置了双门厅，并且两端的门都锁着，就像动物园狮子展区的看守员入口一样。此处也设置了一张查验台，你需要在这里签名，并写下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在此，我们不妨先快进到第二天，在我第二天抵达这里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是否洗过手了。我问道：“这是贵馆的要求呢，还是健康检查？”我假装很是困惑。“这是规定。”她回答得很干脆，忽略了我的讽刺，随后我注意到，入口处设置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洗手池，供访客使用，就在读者物品存放柜的旁边。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主意，比戴手套要更好一些，于是我便从命了。



摩根图书馆的谢尔曼·菲尔柴尔德阅览室，它是珍本和抄本阅览室，自2006年起开放

最后，他们终于打开了门廊的第二道门，我也随之进入了研究室的最里面。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没有窗户，四周墙壁上排满了参考书，有一个铺着玻璃地板的夹层，天花板为一扇有幕罩的天窗。房间里面摆放了六张木质长桌，打磨得非常精细，每张桌子旁都至少有三把银色和黑色座椅，并配有红色坐垫。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可弯折的灯具。我在一个可调节的木质书托旁边找了个面对借阅台的位置坐下来，然后便直接将那书托调至一个很大的角度，因为在我的预期中我将见到的抄本十分巨大。此时，管理员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不过，他们也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把一张单子递给我，抬头是“Rules for Handling Bound Manuscript”（抄本使用规则），其中就包括了如下规定：“必须将书放在书托上阅览，以防损害装帧。不要调整书托支架。如需调整，请寻求管理人员的帮助，由管理人员决定安全做法。”（很显然，摩根图书馆跟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完全不是一回事。）此时，一个大约也就是我三分之一年纪的年轻人过来重新调整了书托支架，令其完全直立起来，而且他根本就不曾征询我的意见。我看到《贝亚图斯抄本》已经在桌子上的一个很大的灰色布盒里等着我了。“您是要先看第一卷吗？”一位女士询问我，她的一头金发修剪得非常精致，身穿非常漂亮的蓝色夹克。我回答说，我还不知道这份抄本已经被分成两卷了。此时，另一位穿着同样昂贵的衣服的女士（别忘了，这里可是纽约）怀疑我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便询问我，是否愿意浏览图书馆自己制作的抄本述要；我说我很乐意。这一次，她们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放大镜，我尽管不曾提出这个要求，但还是很乐意有这样的工具；此外，她们也给了我软塑料尺，因为她们并不放心我自己带的塑料尺，认为那会对抄本构成潜在的危害；同时还给了我书镇，用来保持抄本的打开状态，书镇由金属链制成，并被相当绵软的蓝色绒布包裹起来了。最后，管理员觉得我可以继

续下去了，便送来了第一卷。

从西班牙到纽约，这份抄本的冒险之旅足以令摩根图书馆的这些管理员感到万分震惊。摩根图书馆制作的三页纸的述要，我当然是先行细读了一番，从中也了解了关于这趟旅程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最晚从1566年开始，这份抄本就属于圣地亚哥骑士团（Order of Santiago），这个骑士团的老巢在西班牙中部的昆卡的乌克莱斯。该骑士团18世纪的藏书名录里就有这份抄本，在名录的第三十九位，从名录中可以看出，是阿亚拉的马丁·佩雷斯（Martín Pérez de Ayala, 1504～1566）将其赠送给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马丁·佩雷斯于1548～1560年担任瓜迪克斯主教，1560～1564年担任塞戈维亚主教，并于1564～1566年担任瓦伦西亚大主教。1837年，圣地亚哥骑士团遭到镇压。此后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被部分地还原，因为《贝亚图斯抄本》里面曾有一张浅蓝色的折叠起来的纸，上面留有相关信息，不过现在这张纸已经被大英图书馆收藏在一个信件和文件包里面了，我此前在伦敦见过它。纸条上面有古格列尔莫·利布里（Guglielmo Libri）的签名，签名日期是1848年4月19日。纸条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贝亚图斯抄本》曾有一个主人叫罗伯托·弗拉西尼利（Roberto Frasinelli, 1811～1887）。弗拉西尼利是德意志出身的自然科学家，后来在马德里成为书商。据这张便条透露出的信息，在弗拉西尼利当初得到《贝亚图斯抄本》的时候，抄本是没有被装订起来的，而且他是用自己的一块银表从莱昂王国（kingdom of Léon）的巴尔卡瓦多修道院换得这份抄本的，这只银表当时的估价是三十法郎。在这样的信息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证伪的。贝亚图斯本人据信在巴尔卡瓦多有过一段修士生涯，这座修道院也的确拥有过《贝亚图斯抄本》，不过，当修道院于18世纪早期被废弃的时候，其收藏的抄本便也离开了那里，如今，该抄本收藏在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的大学图书馆。因此，很可能是人们将两份不同的抄本弄混了，或者是有人伪造了这样的信息，目的是将这份抄本同贝亚图斯本人联系起来。据纸条上的信息，弗拉西尼利曾试图向多家机构转卖手中的抄本，价格非常之高，其中就包括了柏林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不过，这些机构都要求先验货再出钱（这样的回复当然是策略性的，毕竟，抄本之真伪是存在大量疑问的）。于是，弗拉西尼利听从了中间人的建议，这个中间人就是波尔多的弗朗西斯科·米克尔教授（Professor Francisque Michel, 1809～1887），此人曾编辑了《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和《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米克尔遂将抄本卖给这张浅蓝色纸条的作者，时间是1847年5月6日，这个买家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古格列尔莫公爵（Count Guglielmo Bruto Icilio Timoleone Libri-Carrucci dalla Sommaia, 1802～1869），此人是收藏家、伪造者，也是一个盗贼，他欣然接受了弗拉西尼利的报价，并在马德里进行了交割，另付米克尔五百法郎的佣金。

古格列尔莫·利布里的便条，曾被夹在《贝亚图斯抄本》里面，利布里在这张便条上说自己是用一块银表换来的这份抄本

抄本研究者都知道古格列尔莫公爵或者说利布里的大名，此人绝对可以成为一本传奇小说，甚至一部音乐剧的主人公。他极为有趣，强壮如牛，几乎是个秃子，只有两个鬓角毛发浓密且从不打理——“就像是从来没用过肥皂、水或者刷子一样”（这是大英博物馆的弗雷德里克·马顿爵士对此人的观感）；而且他着装怪异，身穿披风，脚踩高跟鞋，一直怀疑有人要暗杀自己。总之，他既有着无穷魅力，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荡公子。利布里曾是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在告假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再后来成了托斯卡纳的一个失意革命者。1831年之后，他以流亡者身份寄居法国，并在索邦学院获得了一个教职，之后又转往法兰西学院。1837年，他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Légion d'honneur）。1841年，他成为法国抄本名录委员会（Catalogue général des manuscrits des départments）的秘书，该委员会编纂的名录涵括了法国各个市政图书馆的抄本名单，至今仍然是标准索引名录，利布里利用这个身份走访了许多市政图书馆，这也就令他有了龙入大海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无论如何都应当为利布里申辩，因为一直有很多人在恶意诋毁他，甚至今天也不乏这样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古文书家，也是珍本研究者，同时是资深的收藏家，慧眼独具。他是史上最早一批研究抄本文本历史和早期书册装订工艺的鉴赏家之一，且他将书册的装帧视为独立的艺术品。在利布里的时代，欧洲刚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革命乱世，当时究竟有多少没有被记载、没有被归类的早期抄本，就那么混

入了大众市场，或者干脆就躺在破败且缺乏监管的市政图书馆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超乎想象的。利布里遂抓住这个机会，大肆购置，将许多珍贵抄本收入囊中，其中就包括了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此举实际上也等于帮助公共图书馆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些图书馆实在是不愿意被这些所谓的宝藏拖累。有时候，甚至都无须公共机构授权，只需要已经到了黔驴技穷地步的地方图书管理员私下里点个头，利布里就可以将宝藏转移走了。当然，今天的人们会对利布里的此等行径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在抄本史上，他已经成了最有名的盗贼。人们认定他的这种偷盗行径遍布法国的各个市政图书馆，包括第戎、里昂、格勒诺布尔、卡庞特拉、蒙彼利埃、普瓦捷、图尔、奥尔良、欧坦在内，甚至巴黎的皇家图书馆也留有他的脚印。他会拆开抄本以获取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会刻意模糊化处理抄本的渊源，对其进行做旧甚至重造，令人无从辨识，并将古老的题词抹去，伪造另外的题词——为此，他专门在巴黎雇用了一批造假者。毫无疑问，他乐在其中。对他来说，这全然是一场荣耀游戏，令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为着一己的快乐，他极尽欺诈和伪装之能事。他伪造的《贝亚图斯抄本》和巴尔卡瓦多之间联系，很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自我愉悦。他还对这份抄本实施了修复，将受损的边缘修补完好，并用看起来非常古旧的紫色天鹅绒将之重新装订了一番。



古格列尔莫·利布里（1802~1869），特立独行的收藏家，一度是《贝亚图斯抄本》的主人；该画像由埃多亚尔德-路易·迪比夫于1850年绘制

对于利布里这样花钱大手大脚且常常入不敷出的人，藏书当然是十分昂贵的娱乐活动，即便他可以靠着盗窃来补充一些新书。实际上，就在他于1847年购买《贝亚图斯抄本》之时，他便已经在同大英博物馆方面协商，希望将自己收藏的全部抄本一次性卖给后者，他给出的报价是一万英镑。在最后一刻，大英博物馆方面对这些抄本的来源产生了疑虑，双方的协商看上去就要陷入僵局了，恰在此时，阿什伯纳姆勋爵（Lord Ashburnham）通过书商威廉·布尼（William Boone）介入了这一交易，勋爵趁此机会，以八千英镑的价格将利布里的全部藏书收入囊中。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或随后的一年里，利布里将自己刚刚改造完的《贝亚图斯抄本》也卖给了此时已经是伯爵的阿什伯纳姆，成交价是一万两千五百法郎。1853年，这份抄本进入了位于东苏塞克斯的巴特勒附近的阿什伯纳姆家族（Ashburnham Place）图书馆的藏品名录，编号是“no. XV”。

第四代阿什伯纳姆伯爵伯特拉姆（Bertram, 1797~1878）绝不是浮夸之辈。他出身贵族世家，孤傲但极为刚正，是一位高教会人士，在

道德上无可指摘。在吸收了利布里的全部收藏后，他的珍宝库拥有了近四千份抄本，其中很多是极为古老的彩饰本。也许在后人的记忆中，伯特拉姆并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人，也不是什么正襟危坐的学院派人士，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理由莫名地被利布里这个臭名昭著的怪异大陆客带来的各种令人尴尬的“藏品”拖累。1850年，法国对利布里进行缺席审判，判处其十年监禁，剥夺荣誉骑士勋章。这个罪犯遂逃往英格兰，在英格兰先后结婚两次，1869年，有人发现他死在佛罗伦萨郊外的菲耶索莱。与此同时，第四代阿什伯纳姆伯爵及其继承人、更为随和的第五伯爵（1840~1913）发现自己开始因为那些抄本而陷入各种麻烦当中，更有法律诉讼在威胁自己，最终，他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来自意大利的抄本于1884年被交给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来自法国的抄本于1888年被交还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至于来自西班牙的《贝亚图斯抄本》，既非来自意大利，也非来自法国，则被归入所谓的“附录”（Appendix）条目之下；归在这个条目之下的大约两百份抄本，其来源被认定是清白的，于是在1897年，它们被阿什伯纳姆家族以三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亨利·叶茨·汤普森（Henry Yates Thompson, 1838~1928）。

叶茨·汤普森实际上是一个职业抄本收藏家。他继承了不少家产，还娶了一个相当富有的太太，但即便如此，三万英镑在那个时候也是一笔巨款。汤普森便规划将自己的藏书规模精确地控制在一百册，并且尽可能地提升藏书品质，也就是说，一旦市面上有更好的抄本，他会即刻将手中不那么有价值的抄本出仓，以此将总规模非常精确地维持在一百册。“阿什伯纳姆‘附录’”中被淘汰的藏书便于1899年5月1日被交付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还有一些藏书则是在随后其新主人不断升级藏书的过程中，渐渐被剔除下来的。在整个过程中，《贝亚图斯抄本》始终在叶茨·汤普森的“百册”精品中保持着既有的位置。1902年，剑桥古文书家兼鬼故事作家M.R.詹姆斯为汤普森撰写了《第二批五十份抄本名录述要》，在这份述要里面，《贝亚图斯抄本》排在第97号。为了得到这份抄本的述要，汤普森将这份抄本打包，将其从自己在西伦敦波特曼广场的寓所邮寄到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詹姆斯为撰文一事索要了五个基尼的酬劳，无论述要篇幅长短。最终，这篇介绍性文章在打印出来后长达二十七页，这也是詹姆斯毕生写过的最长的单篇述要。

詹姆斯等人认为，汤普森的这些藏品注定是要摆脱私人所有权的羁绊，为英国公众所有的，但令他们震惊的是，汤普森最终决定将这些抄本悉数交付苏富比拍卖行，由此便开启了1919年的一系列拍卖。汤普森的视力缺陷是家族遗传病，此时这个病症已然令他无法充分享受这样的私人藏品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小J.P.摩根（1867~1943）正在着手扩充并升级父亲的伟大收藏，为之规划未来。叶茨·汤普森遂于1918年9月8日致信摩根先生的图书管理员贝拉·格林（Belle da Costa Greene，当然，贝拉·格林也是父亲留给儿子的），信中，汤普森告诉格林，自己的藏品即将在伦敦被拍卖了。实际上，在这封信抵达纽约之前，伦敦书商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就已经将这一重大消息送达摩根了；格林回信叶茨说：“馆中响起了惊呼声。”第一次拍卖是在1919年6

月3日举行的。《贝亚图斯抄本》是“XXI”号拍卖品（拍卖序列是用罗马数字编号的）。叶茨·汤普森亲自为这份抄本撰写了述要，目的当然是激发竞拍者的兴趣，为此，汤普森将抄本的装帧同爱尔兰和凯尔特抄本的装帧进行了对比，同时也跟拜占庭工艺以及汤普森自己所说的“萨拉森”工艺进行了对比。老摩根手里实际上已经有一份13世纪的《贝亚图斯抄本》（摩根图书馆编号“M 429”）了，不过，小摩根及其图书管理员都意识到，在摩根家族的收藏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早期抄本。因此，二人觉得这是弥补此一缺憾的大好机会。J.P.摩根便在夸里奇的协助下，从1919年的汤普森藏品竞拍中，斩获了七份早期抄本，其中就包括以三千英镑的价格竞拍到手的《贝亚图斯抄本》。叶茨随后致信贝拉·格林表示祝贺（这封信至今仍然收藏在摩根图书馆的档案室里）：“这七件宝贝总算进驻摩根图书馆了，没有比摩根图书馆更尊贵、更惬意的地方了，我的心愿也算了了。”叶茨在信中还补充说，摩根为这七件宝贝支付的总价钱，“跟一个热情法国人为《让娜时祷书》支付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法国人的名字我不能透露。”叶茨提到的这份时祷书以及叶茨拍卖名录里这个购买者的身份，将出现在本书的第九章。





J.P.摩根（1867～1943），他继承并壮大了父亲的庞大藏书，并将其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左图）；贝拉·达·科斯塔·格林（1883～1950），摩根父子的图书管理员，也是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右图）

于是，这份来自10世纪的列瓦纳的抄本就这样出现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眼前的这份抄本已经没有了利布里添置的紫色天鹅绒封皮，因为在1993年，德博拉·艾维特斯（Deborah Evetts）在摩根图书馆重装了此书，并将之分成两卷。在此次重装中，艾维特斯用崭新的白色鞣革将封面木板包裹起来。实际上，帕克图书馆在重装书册之时，也会采用这种风格，不过，前来迎候我的图书馆资深管理员威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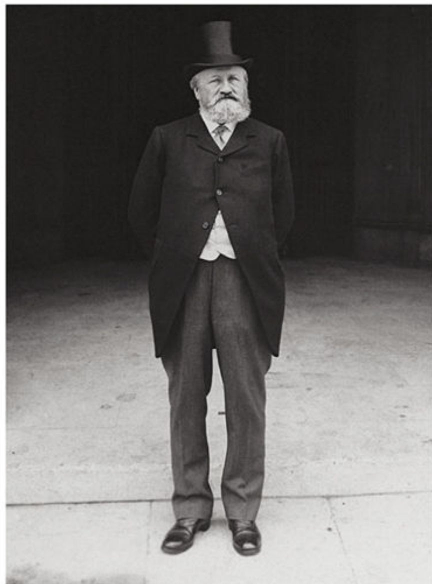
沃克勒对此颇有微词，他说，如此一来，这份抄本看起来就像是婚礼相册。抄本很大，约15.5英寸长、11.25英寸宽，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这份抄本主要是用来公开展示的，确切地说，是在修道院团契仪式上使用，而非作私人研究之用的。在它还是完整的单卷本时，这份抄本共三百页之多，想要单手搬运它恐怕是很困难的，这跟《阿米提奴抄本》的情况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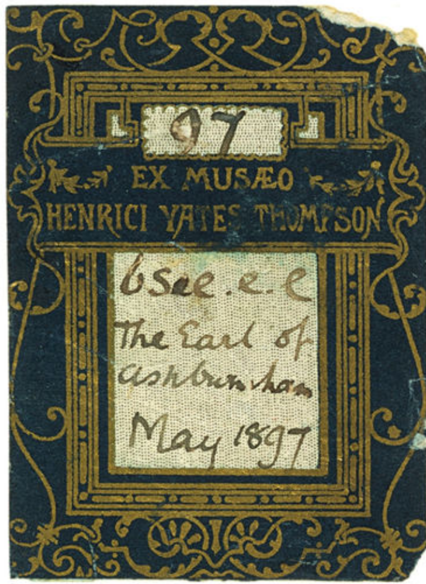
抄本的封皮内侧贴有一块灰色的藏书者标签，上面以白色字体标注了“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字样。这行字的下面是叶茨·汤普森的金色印鉴，被印在黑纸之上：“EX MUSÆO HENRICI YATES THOMPSON”，还有当年的编号“97”以及“bsee.e.e, The Earl of Ashburnham May 1897”（价格为bsee.e.e，阿什伯纳姆伯爵，1897年5月）字样。汤普森的私人价格暗码是“bryanstone”，此处，“b”＝1，“r”＝2，“y”＝3，如此类推，则可以推算出1897年的购买价是1600镑0先令0便士。需要指出的是，该印鉴显然是从先前的装帧上转移过来的，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看一看其被磨损的边缘就知道了。

抄本上用铅笔标注的对开页页码很可能出自利布里之手，从这些页码不难见出，在早期该抄本的前四十页是以随机方式单独装订起来的，而且是以目前抄本的第10对开页为首页的，开篇内容为贝亚图斯本人撰写的引言。这一对开页的底端和外缘已经因为潮气或者腐坏而严重受损了。黑色的斑点也渗透到了原先在这一对开页后面的几张书页上。很显然，这份抄本在某段时间内是没有被装订起来的，而且最初也没有像样的防护措施，它就那么暴露在动物啮蚀或者空气侵害中。[1]M.R.詹姆斯初次整理抄本之时，各折的情况仍然十分混乱。不过我可以肯定，现在这个抄本的页码排列顺序是正确的，并且是依照10世纪的排列顺序重装的。我眼前的这一卷的最前面被加上了一叠很厚的现代羊皮纸衬页，其中一页被弄皱了，这让人感到沮丧。抄本本身的内容则是以一页绘有菱形的彩绘花框的书页开启的，花框里面是一副棋盘，棋盘格子里面是以离合体形式呈现的红色、蓝色和金色字母，字母向着各个方向排列出如下词，“s[an]c[t]i micaeli lib[er]”（圣米迦勒之书），也就是说这份抄本曾归属一座敬奉这位天使长的修道院，或者是由这座修道院主持创制的。接着便是如早期福音书抄本中那样的四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参见第一章和第三章），以及成对的天使将福音书擎在中间的图。接下来是《旧约》中从亚当到耶稣的家谱，由彩绘的环状物和拱状物串联起来。书页上方的角落里，亚当和夏娃都赤裸着身体，膝盖的关节很明显，肤色都是鲜亮的粉红色，就如同刚刚抵达西班牙海滩的英格兰游客一样。家谱中体现出世界的前五个世代，分别是从亚当到诺亚（尽管第二页丢失了）、从诺亚到亚伯拉罕[标注有如下字样：“Incipit secunda etas seculi.”（第二世代由此开始。）]、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最后就是从巴比伦之囚到基督道成肉身。既然图当中的前五个世代都已经结束，那就很容易令人认为，自己身处的是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世代，而且很快就要面临《启示录》中的末日了，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而这正是《贝亚图斯抄本》的主题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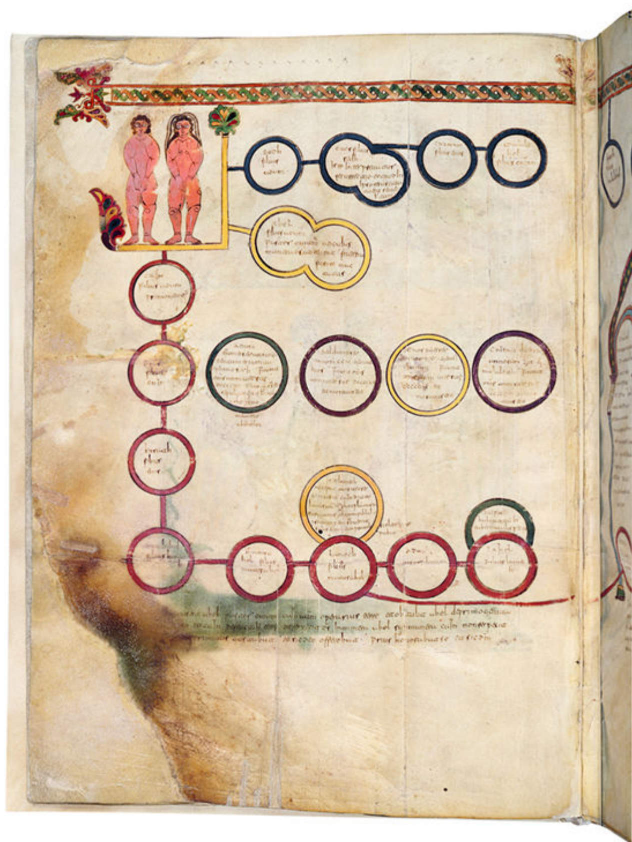
《贝亚图斯抄本》的第一页，抄写员以精美的离合体拼出了抄本最初主人的姓名，“sancti micaeli liber”（圣米迦勒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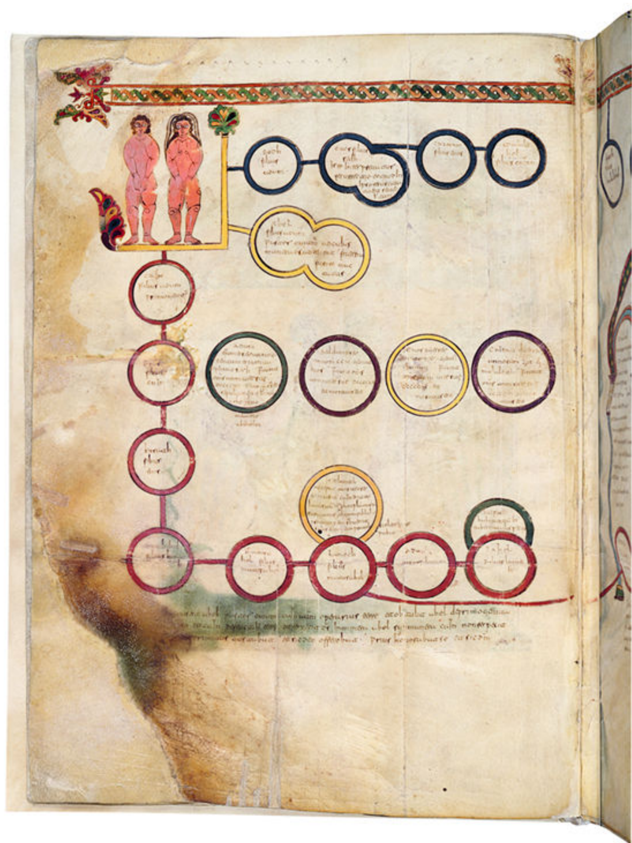


亨利·叶茨·汤普森（1838~1928）（左图），他于1919年卖掉了《贝亚图斯抄本》，照片拍摄于1906年；叶茨·汤普森的藏书者标签（右图），原附在《贝亚图斯抄本》先前的封皮上，上面的文字显示，他于1897年从阿什伯纳姆伯爵那里购得《贝亚图斯抄本》

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铺垫性质的，就如同福音书抄本正文前面的增补内容一样。贝亚图斯写的《启示录》引言是从当前抄本的第10页开始的。这一页里面赫然矗立着一个很高的字母“I”，字母的笔画中填充着彩色花朵和交叉图案，这个字母实际上既引领了祈祷语[“In n[o]mine d[omi]ni …”（以主之名）]，也引领了起首语[“Incipit liber revelationis …”（此为《启示录》的开篇）]。开篇词跟圣经《创世记》的开篇有几分相像。作者解释说，此举意在记录《圣经》中的主要预言，目的是确证基督的神性，巩固信者，并令不信者动摇（显然此处所谓的不信者，指的就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在上一章中我已经阐述了，中世纪的作家通常会声称他们是在抄录前人的作品。贝亚图斯也很实在地告诉读者，这些解读并非他自己创作的，并且在第二栏的顶端列出了这些解读的来源，包括哲罗姆、奥古斯丁、安布罗斯（Ambrose）、傅真修（Fulgentius）、格里高利、提刻尼乌斯（Tyconius）、爱任纽（Irenaeus）、阿普林吉乌斯（Apringius）以及依西多禄（Isidore）。实际上，他的引用范围并不仅限于他提到的这些人，还包括了昆提良（Quintilian）、萨鲁斯特以及维吉尔等更早期的人。在引言中，贝亚图斯为自己的拙劣文风道歉，他将这部作品题献给圣埃特里乌斯（Holy Father Etherius），并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圣埃特里乌斯的名字出现在页面下端的角落里，那里已经被损毁并且染上了污迹，本来我是辨识不出来的，多亏旁边放着一份该文本的影印件。



跟早期福音书抄本一样，《贝亚图斯抄本》也以福音书作者画像开篇；此处是圣路加画像，路加正将自己的福音书递给一个见证人



《旧约》世系，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五个世代，以亚当和夏娃为开端

实际上，贝亚图斯此番解释并非谦辞。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的确是逐字逐句取自前人的，尤其是从4世纪晚期北非的《圣经》评注人提刻尼乌斯的作品中。即便是在引言中也有大量语句引自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而且他用785年的奥斯玛主教（bishop of Osma）埃特里乌斯的名字取代了圣依西多禄在《驳犹太人》（*Contra Iudaeos*）的引言中提到的其姐姐佛罗伦缇娜（Florentina）。在敲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本人也很清楚，在我所做的这些介绍中，有很多内容是引自约翰·威廉斯教授（Professor John Williams）的，威廉斯围绕这个主题写了不少的专著和文章，2015年威廉斯教授谢世的时候，本书的这一章还只是草稿。我对威廉斯教授心怀敬重，就如同贝亚图斯对圣依西多禄心怀敬重一样——对引文作者心怀敬重是一个仍在延续的传统。贝亚图斯将这份书稿分为十二卷，每一卷都设置了前言。《启示录》的内容则被分成六十八章（即相对独立的《圣经》叙事段落），各章篇幅不一，其后都配备有长篇的寓意解释，以及用红蓝色大写字母（有时候也会用绿色和紫色）呈现的巨大标题："explanatio suprascripte historie"（对上述章节的解释）。每章的各个段落通常会用红色字体书写，有时候也会用蓝色字体。



贝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的引言，解释了他为何会评注《启示录》并提供了文献来源。该页曾长期被置于抄本第一页，因此受损严重

在哲罗姆的诸多引言及其注解之后，便是《启示录》正文的内容，第一章是《启示录》1:1～6。此时，实际上我们已经翻到了抄本第22对开页的左页，显然，作者并不急于切入正题。随附的“解释”（explanatio）提点说，《圣经》的这一卷被称为“启示”（Apocalypsis，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拉丁通行本中该卷的开篇词），是因为万物都是隐藏着的，而“启示”一词的意思就是揭示万物之奥秘。从《启示录》经文的第一节就不难见出，上帝派遣天使前往“他的仆人约翰”那里，这就表明这卷经书并非人类思考的结果，也非植根于虚假文本，而是源自真理的使者，他向约翰——众使徒当中最为圣洁者——揭示了基督的神性（可参见《约翰一书》1:1～2）。基督致信亚细亚的七大教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教会，并引用了《玛拉基书》1:11的话（“我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数字7是有寓意的，6和7都是神圣数字，正如上帝六天创世和一天休息，世界也被分为六个世代和另一个末日世代，由此，所谓七教会也就代表了总共的七个世代，而七教会之所以都在亚细亚，是因为“asia”一词有“升华”（elevated）的意思，人们所处的是被上帝“提升”的世界，约翰正是奉上帝之命向这个世界传递恩典，可参见

《出埃及记》3:14和《约翰福音》1:1～2，上帝将“充满天地”（《耶利米书》23:24），“创造万物”（《便西拉智训》24:8），等等。此外，贝亚图斯还引用了《智慧书》1:7、《使徒行传》7:8、《以赛亚书》40:12等。此处只是一个提要。这些引文填满了整整四大张纸。第二章涵盖了《启示录》1:7～11的内容，在此，上帝驾云降临，并向人间宣示：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贝亚图斯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上帝在此是以鸽子的形象出现的，就如同降临基督洗礼的圣鸽一样，“鸽子”一词的希腊语是“*peristera*”，这个词中的字母按其代表的传统数值加总起来正好是800，而“俄梅戛”（omega）也是这个数字，且希腊语中“阿拉法”（alpha，即A）这个字母是由等长的三画组成，寓指三位一体，拉丁语中的字母“omega”（O）差不多就是一个完整的圆环，寓指包裹并保护万物；贝亚图斯还给出了很多类似的解释。说实在的，这就是典型的修道院式的经文解读方式，也就是对经文全方位地进行研究，逐字逐字地展开解读，不放过任何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力争从每个笔画当中看出寓意——这样的方法当然是可恼的，不过倒也迷人。

作者能做到这般旁征博引，表明他对整部经文是极为熟悉的。无数引文就那么娓娓道来，甚至都没有加注，作者显然预期读者对引文的来源同样是十分熟悉的。文中时不时地还会出现希腊语，表明作者认为读者至少是具备基本的希腊语阅读能力的。8世纪时，西班牙的修道院应该是被笼罩在文明即将坍塌的浓重阴云当中的，但即便这样，修士们也仍然在学习古典学问。抄本中的一些《圣经》引文是用红色墨水写就的，或者被用“diple”这样的符号被标示了出来。“diple”是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的、两个的”，其发音由两个音节组成，念作“dip-lay”；它指的是设置在引文旁边的小小的曲线符号，它们往往从上而下排成一列。这种符号第一次出现在第27对开页的左页，位于《耶利米书》31:33～4的长引文的旁边。这种古老的引文方式是有着相当高的价值的，早期的打字员复活了这种符号，毕竟对早期打字员来说，以彩色字体标注引文是太过昂贵的事情，后来，这种古老的引文符号便演变为上标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双引号。这份抄本的彩绘师有另一个非常可爱的特点，那就是采用了成列的小红心标识，使得抄本的页面就如同思春少女的练习册一样，这样的格式是用来充当分隔线以及丰富抄本装饰的。

摩根图书馆的这份《贝亚图斯抄本》是用古文书家所谓的西哥特小体字写就的。要解释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回头看看拉丁语字体在古罗马的起源。古代罗马有两大类通行字体。第一类是极为庄重的罗马大写体，诸如在古代碑文上很常见的“S.P.Q.R.”使用的字体，清晰易读，以及通常用于书册的俗大写体，比如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中用的就是这种字体。另一类字体则完全不同，是一种用于速写的草体书法，也就是孩子们所谓的“连体字”（joined-up writing），通常被用于公务函件的纸莎草纸。就总体情形而论，罗马大写体经过数个世纪的时光后演进为安色尔字体，当然，具体的演进过程略显复杂，它经历了诸多细微且渐进的变化——就如同遗产学中的那样——最终演变为现代欧洲的字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草体字伴随着帝国官僚体制的扩张，被散播

到帝国的各个行省，并在各个行省催生了许多地方变体，比如法兰西的那种怪异的、像蜘蛛爬过留下的痕迹一样的墨洛温小体字（Merovingian minuscules）、西德意志的阿勒曼尼小体字（Alemannic minuscules）等。9世纪早期，查理曼在帝国境内推行了他精心备制的标准字体规划，一时之间，这些地方字体便被著名的“加洛林小体字”（Carolingian or Caroline minuscule）取代。此等情形之下，罗马草体字的“后裔”便只能在欧洲边缘、加洛林权威无法触及的地区顽强存续，就如同史前动物存活在传说中与世隔绝的失落山谷里一样。在这些“活化石”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南意大利的贝内文托小体字（Beneventan minuscule），这种字体还出现在了地中海东海岸的荒僻区域，诸如克罗地亚的一些地方；另一种字体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很多地方在使用的西哥特小体字（Visigothic minuscule）。此类字体逆世事潮流而存留了下来，甚至一直到11世纪和12世纪仍有出现，这本身也颇能揭示时代政治背后的文化疆界。

事实上，西哥特小体字跟大字不识的西哥特部族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二者都跟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的伊比利亚半岛有关联之外，这种字体相当美观，也相当讲究，但是读起来十分困难，令人懊恼。它的每个字母显然都是从罗马草体字发展而来的，比如字母“e”和“r”连接，看着就像是一个字母一样；小写“a”的上端是开口的，看着就像是字母“u”；字母“s”看着像是字母“r”，“t”则像是现代字母“a”。在西哥特字体面前，我像是刚进入暑假的学童。一开始，我赤脚行走在海滩的鹅卵石上，只能假装轻松惬意；到了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也被磨砺得差不多，可以轻松行走了。但是，在第二年暑假的时候我就需要重新体验一遍这种痛苦。同样的，我瞪着无从解读的西哥特小体字，几乎要陷入绝望当中，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认，直到快到傍晚、图书馆就要关门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能读懂了；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一大早来到图书馆，我就又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懂了。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贝亚图斯抄本》在中世纪早期西班牙之外的地方，传播范围如此有限。



西哥特字体是早期伊比利亚字体，看起来很是怪异；图中的十二枚圆盘象征着天上二刻的寂静（《启示录》8:1）

我眼前的这份“M　644”号抄本是用连体字写成的，其文本被分为两栏，每一栏通常有三十二行到三十四行。抄本上有非常明显的刻痕，如留在已经变成暗黄色的羊皮纸表面的洁白的痕迹。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一样，其页面的两栏中间有竖直的单列刺痕，像是刀尖留下的刺孔。真正令《贝亚图斯抄本》名扬四海的，并非书中的内容，也非抄本所用的字体，而是大幅的插图。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拥有六十八幅整页插图，如同木板画那么大，还有四十八幅小一些的插图，以及许多的图表和装饰。那天，我周围的研究者都只是在研读书页泛黄的文献和小开本的印刷书；只有我在卖力翻动这千年之久的巨大羊皮纸书页，书页上不时地会出现鲜艳的、令人惊奇的图画。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贝亚图斯抄本》的每一章内容都配有至少一幅插图，这些插图通常都紧随相应的经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位置上，都是跟前面的经文匹配起来的。这一点倒是有点怪异，毕竟，通常的情况是先出现插图，然后才会跟进文本。其中一些插图旁有配图文字，用来提示读者应当注意的细节，且跟某些中世纪艺术品不一样，这份抄本里面的插图可不是为文盲提供的。第一章包括《启示录》1:1~6。这一部分的插图出现在第

23对开页的右页，前面就是《启示录》中的相应经文，插图本身被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图中是端坐王位的基督，两个天使簇拥在侧，其中一个天使带来了蜡版，是要给下栏图中的约翰的。下栏图中的天使旁是用大写字母写就的一句话："UBI PRIMITUS IOHANNES CU[M]ANGELO LOCUTUS EST"（此处，约翰先对天使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舞台提示。第二章包括《启示录》1:7～8。这一部分的插图出现在第26对开页的右页，图中的基督驾着流水般的彩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图中有九个圣徒在仰视基督，跟经文的字面意思很配。第三章是《启示录》1:10～20。这一部分的插图可以从左下角的约翰的角度往上看，人子端坐在王位之上的，身穿橄榄绿色长袍，披着金色肩带，其上方悬挂着七盏烛架，旁边给出了大写的文字说明，"SEPTEM CANDELABRA"（七盏烛架），这样的说明也许会有帮助，但也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人子的右手边就是七星，约翰则匍匐在他面前，他手持死亡的钥匙予以安抚。该页下半部分的图则是约翰观瞻七个圆拱的场景，上面刻着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名字，分别是以弗所（Ephesus）、士每拿（Smyrna）、别迦摩[Pergamon，值得一提的是，羊皮纸（parchment）就是因这座城市而得名的，其拉丁语是"*pergamenum*"]、推雅推喇（Thyatira）、撒狄（Sardis）、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和老底嘉（Laodicea）。



上方画框里的基督命两个天使将启示传送给下方的圣约翰

第二部分（Book Ⅱ）的引言也配有插图，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这幅插图竟然是双页的长方形世界地图。它出现在第33对开页的左页和第34对开页的右页。在讨论约翰向七教会传递的神圣信息之前，贝亚图斯转而谈了十二使徒传道区域的情况，因为对于贝亚图斯的同胞来说这一点非常有意思：耶稣本人的门徒圣雅各将基督教传到了西班牙。在这幅世界地图当中，整个世界被宽阔的黄色海洋环绕，海中布满了蓝色的鱼，非洲南部海域更有怪异的海蛇出现。在画面左侧和下端的海洋地带，古代船只被刻在图上，若是在复制品中，则很难见证这样的细节。地图的方位是：地图的顶端指向东方，是伊甸园所在，亚当和夏娃就站在一棵多刺的树下。大陆板块则被地中海分成欧洲、非洲和亚洲。左下方的海洋的边缘处，有一个长方形的框，借助图书馆提供的放大镜我能够辨识出那上面写着一个岛的名字“Britannia Insula”（不列颠岛），再往南一些有另一个岛的名字，“Scotia Insula”（苏格兰岛），但那实际上是爱尔兰。在地图中西班牙当然占据了相当突出的位置，四周是被树

林覆盖的山。非洲被尼罗河分为两个巨大的国家，其一是利比亚，其二是埃塞俄比亚（这里生活着各色怪物和凤凰）。耶路撒冷则以一个小小的城堡大门标示，它也是地图中唯一被呈现出来的城市。地中海诸岛都是正方形的。这样一张基于罗马人的地理知识的地图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不过，仔细观瞧后我们可以从中辨识出一系列相当熟悉的名字，诸如纳博讷（Narbonne）、德意志、罗马、马其顿以及君士坦丁堡等，此外，图中对大范围地区的形状的具体呈现，也令人生出一丝敬意，毕竟，那个时代的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视点不过是山顶或者树顶。



人子，他的右边是七烛台和七星（《启示录》1:12～16），以及圣约翰和七教堂的拱门

让我们继续翻动书页。这份抄本的羊皮纸大多很厚，而且质地粗糙，其毛面已经泛黄，经常会有褶皱，可能是很久之前暴露在外遭受湿气侵袭的缘故。还有很多当初兽皮之上就有的缺口和相当大的椭圆形的洞，应该都是剥皮或者造纸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有些洞很大，就跟大孔奶酪上的洞差不多），遇到这样的情形，抄写员就只能绕着这些洞进行抄写。大部分书页底端的外缘已经被损毁，如今被新的羊皮纸填补完整了，翻动这样的书页，实际上主要就是在触摸后来黏附上去的替代纸

片，而不是在触摸从10世纪传递下来的原件。



第226~227页：世界地图，四周为黄色海洋；上东下西，欧洲在左下角，非洲在右侧，西班牙的位置十分显眼

有些插图，比如说亚细亚七教会的插图，看起来异域风情浓重且色彩斑斓，如同清真寺一样；诺亚方舟的插图就像装了隔板的孩童玩具屋，其中还有一头长着斑点的黄色大象和两头长颈鹿，以此来表示大洪水期间教会是安全的（长颈鹿在中世纪艺术品当中的确是很罕见的）；还有一幅插图呈现的是“上帝的羔羊”持着十字架，站在一个多彩的巨大圆轮里的画面，这个圆轮也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过的活物和长者之轮，众星环绕着圆轮，天使长在推动圆轮；其余的插图中还有以下画面：七个天使在吹响号角，并将天火如同箭矢一般射向大地，火光映衬之下，天空变为黄色；大火席卷之下，山峦崩塌，倒入大海；深海当中，船只破碎，赤裸的尸体漂浮在船体碎片当中，恶鱼四处游窜；太阳、月亮和星辰变得暗淡无光，一只巨鹰掠过天空，号叫着“悲哉，悲哉，尘世之人”；蝗群成灾，铺天盖地而来，如同巨大怪兽；以及第一卷的最后一幅插图，呈现的是《启示录》11:3中两个穿着粗布衣戴着兜帽的见证人，他们口中喷火，发出预言。最后这幅插图出现在第149对开页的右页，也就是这一卷的末页，到此处我们的《启示录》之旅刚刚走了一半。

我将第一卷还回借阅台，并请求借阅第二卷。我当然是自己做这件事的，却因此遭到斥责。显然，正规程序是请管理员来做。摩根图书馆的抄本上面都松松地附着纸条，纸条上面印有条形码以及一个六位数的档案编号，在我归还抄本的时候，管理员对条形码进行了扫描。我随口说我从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管理员非常怜悯地看了我一眼，告诉

我，如今大图书馆都这么做，有了它们，抄本的管理和统计就非常方便且规范了。



诺亚方舟以及其中的各种动物，包括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和正在吃死尸的乌鸦，此页位于第二部分结尾处

第二卷是从第150对开页开启的，这一对开页的内容是《启示录》11:7～10。第一幅插图呈现的是敌基督，敌基督的脸部已经模糊难辨了，应该是某个愤怒的读者的复仇举动造成的（当然，我希望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图中敌基督正在将两位见证人剁成血淋淋的肉块，上方敌基督的追随者们则在拆毁耶路撒冷城。接下来几页的画面变得越来越恐怖，我也翻得越来越快。圣米迦勒在天空中同七头蛇怪恶斗的插图占据了两页，图中，这位天使长将蛇的尸身扔向地面；一头可怕的有角怪兽从地下爬上来；一个带条纹的天使掠过天空，巴比伦被毁灭，被撕扯下来的四肢四处乱飞；七种瘟疫席卷大地，河流变成洪荒，闪电如同血色长矛，无情地刺向尘世；巴比伦大娼妇正同尘世君王们开怀畅饮，他们刚刚交媾完毕（这幅插图出现在第194对开页的左页，画面当中，巴比伦大娼妇的脸同样被人刮掉了，这显然也是某个读者在发泄义愤时所为）；整个巴比伦城陷入一片火海——这一场景由一幅斑驳

色彩和火焰交织而成的拼贴画呈现；撒旦被锁链捆绑起来，然后被抛入深渊；还有巨幅的末日审判图，这幅插图同样占据了两个页面，难以尽数的亡灵站在上帝的王座前面，但凡有罪之人，都将从天堂的砖瓦地面的裂缝处被抛掷下去，落入火焰翻腾的紫色无底坑里面。《启示录》经文注解实际上在第233对开页的左页就结束了，但是，抄写员似乎仍然沉浸在此等《圣经》异象和预言催生的狂热情绪当中，无法就此停手。于是，抄写便继续下去，使得哲罗姆对《但以理书》的注解也被这一抄本包括在内。这些内容同样是围绕《圣经》异象和预言展开的，不过，相对而言，没有《启示录》那么集中，而且也更为温和一些。这部分内容的插图涵括了“尼布甲尼撒之梦”（Nebuchadnezzar's dream）、“巴尔萨扎之宴”（Balthazar's feast，图中烛台上伸出了抄写员的手，他在王宫的穹顶上写下了末日预言，用的是西哥特小体字），还有就是置身于狮子巢穴但脸上并无惧色的但以理。



目前装订顺序下的第二卷开篇，呈现的是杀死见证人的画面，其中敌基督的形象已经被某个读者抹去了

这些画的画风是人们通常所谓的“莫扎勒布风格”（Mozarabic），这种风格融合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虽然此时的西班牙

主要由穆斯林占据。实际上，阿拉伯语抄本和希伯来语抄本都是没有插图的，至少在当时肯定是那样的，彩绘本的拉丁语抄本在此一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极为罕见，因此也难以用来做比较。《贝亚图斯抄本》的鲜亮的色彩和有些异域风格的抽象图案，毫无疑问都是可以在伊斯兰建筑里面找到对应的；北非马格里布海岸地带出产的地毯和金属工艺品，也有着类似的风格。画面当中，鲜黄色和深橙色的色块极为惹眼，根本不像是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的风格，而且原本的色泽肯定更加鲜艳。浅绿色的色块也非同寻常，看着十分活泼可爱。一些色块展现出了明显的用笔痕迹，仿佛绘图人不是用软刷，而是用刮刀或者铲子直接点上去而后抹开来的。

艺术史家通常都能指点出《贝亚图斯抄本》插图当中蕴含着十足的东方风情的细节，例如棕榈树和巴比伦娼妇斜卧着的有软垫的床榻（后者出现在第194对开页的左页）。然而，真要说起来，在此等细节，特别是人物细节上，与之最为切近的并非东方艺术，而是科普特艺术（Coptic art），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抄本和绘画，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西德尼·科克雷尔（Sydney Cockerell）曾协同M.R.詹姆斯一起为叶茨·汤普森收藏的抄本撰写名录述要，他就在自己撰写的一份述要里给出了这样的私下点评：“它们非常接近埃塞俄比亚风格。”（这个科克雷尔将是本书第九章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到时我们会专门谈一谈这个人。）我们可以在刚刚从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巴该修道院（Abba Garima monastery）发掘出来的两份6世纪福音书抄本中，看到与《贝亚图斯抄本》中的极为相像的人物脸部，以及同样睁得大大的眼睛（参见本书前文第44页的论述[2]）。当然，人们也许会有疑虑，毕竟，6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与10世纪的西班牙之间的时空跨度也太大了，不过，也切不可忘记，在抄本中的古代晚期风格的世界地图里，埃塞俄比亚被圈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并且跟西班牙非常近，甚至连希腊都不如埃塞俄比亚来得那么近。更何况《贝亚图斯抄本》的插图里面出现了长颈鹿。显然，在10世纪的时候，非洲文化同欧洲文化之间的关联要比今天紧密得多。



基督驾云降临，眼睛直视读者；这种画风跟埃塞俄比亚艺术作品的画风极为相似

这些插图算得上很好的艺术作品吗？显然，它们就算跟《凯尔经》里面那些有着最糟糕的表情的人物画像相比，也算不上精细。M.R.詹姆斯对14世纪哥特式绘画之优雅称慕不已，但对《贝亚图斯抄本》里面的这些插图的品质没有太好的印象。在1902年的名录述要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它们的画风简直太粗俗了。眼睛大得离谱，神态之僵硬，更是到了荒谬地步。"不过，我要说的是，此等夸张的风格，应该是非常契合配图的初衷的，毕竟，经文的内容也是十分吓人的。鲜亮的色调以及莫可名状的恐惧感，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在这恐惧感中还夹杂着一丝紧迫感。这样的风格天然地契合了超乎想象的恐怖场景和变幻莫测的灾难旋涡，它们就如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那样，野蛮狂暴、令人难忘。

《贝亚图斯抄本》插图里的烈火翻腾的场景，以及扑面而来的怪异风格，应该说都是有实际诉求的。修士们研读经文的方式非常特殊，他们通常是大声朗读一句或者两句经文，然后逐字展开思考，慢慢地去发掘其中的多层含义。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圣言诵读法"（lectio divina）。由此催生的冥想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祈祷方式。如果修士们在细看经文后记住其内容，那么即便在经书被闭合并收入密室的盒子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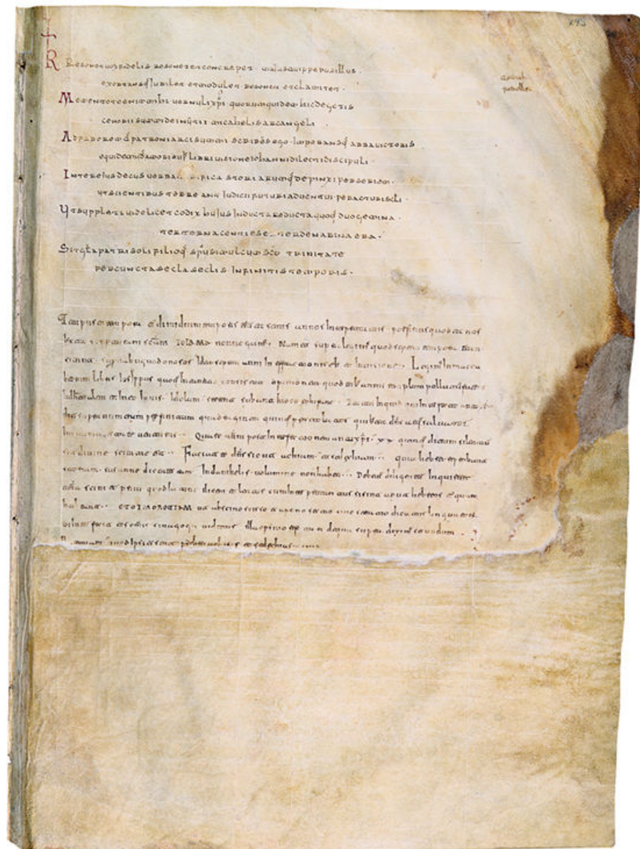
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之前的缓慢且虔诚的冥思过程，对经文进行理解。对于普通的经文，特别是以字词间几乎没有分隔的西哥特小体字写就的经文，修士们是很难凭借记忆予以再现的，不过，若是经文附有复杂且极其夸张，甚至令人惶恐的插图，那人们就很难将其从记忆中抹去了，《贝亚图斯抄本》的插图应该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而这些效果正来自它们的原始性。它们的鲜亮的色调以及令人震惊的戏剧场面，都有实实在在的功效。这样的插图实际上起到了辅助记忆的作用，可以令众多读者同时对《启示录》展开思考，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具体哪个时刻。

这份抄本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才予以介绍。实际上，我们不仅知道是谁设计并绘制了这份抄本，甚至还知道其中的情由以及可能的绘制时间。且看第293对开页右页的上半页，上面留有一篇长长的版本纪要，是用字号较小的大写体写就的，这篇纪要以如下文字开启：

Resonet vox fidelis, resonet et concrepet. Maius quippe pusillus, exobtansq[ue]iubilet, et modulet, resonet, et clamitet. Mementote enim mihi, vernuli xp[ist]i,quorum quidem hic degetis cenobii summi dei nu[n]tii Micahelis arcangeli. Ad paboremq[ue]patroni arcisummi scribe[n]s ego, imperansq[ue]abba victoris equidem ud[u]s amoris ui[u]s libri visione Iohanni dilecti discipuli …

[愿信徒的声音响彻四海，四海回应！我，梅雅斯，虽卑微但心中有希望，我且纵情欢唱！基督的仆人啊，请记得我，您是天使长米迦勒，这座修道院是属于您的。我奉维克多院长（后文可见，可能是“胜利者院长”）之命，书写此书，乃为着献给天使长，也是为着对写有基督钟爱的门徒约翰之意象的书的爱……]

由此，我们得到了抄写员的名字，“Maius”（梅雅斯），意思是“重要的”（major，抄写员在自己的名字上用了一个双关语，谦虚地将自己称为卑微的梅雅斯），并知道了他是为天使长圣米迦勒的修道院的修士们效劳的。纪要中，从“Memento”一词往下，每隔一行的首字母依次是“M”、“A”、“I”、“U”和“S”，正是抄写员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出现在第233对开页右页文本结束的地方，“Maius Memento”（记住梅雅斯）：依据我的判断，这两个词的字迹与前先的稍有不同，有可能不是抄写员自己的手笔，而是其他人为了纪念这个抄写员而添加上去的。机缘使然，贝亚图斯的另一份抄本是由梅雅斯的学生和传承者、抄写员埃梅特利乌斯（Emeterius）创制完成的，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马德里的国家档案馆。埃梅特利乌斯在他本人创制的抄本的纪要中，将已故的老师（同时也是抄本合作者）梅雅斯称为“大画师”（archipictor），并指出自己的老师是塔巴拉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抄写员，于968年的10月30日谢世。一个抄写员的生平节点，竟得到了如此精确的呈现，这实在是罕见。“大画师”的称号显然意味着梅雅斯身兼抄写员和彩饰师两种身份。在这份马德里抄本中的同一页上，埃梅特利乌斯提供了一幅自己的画像，呈现的是他在塔巴拉圣萨尔瓦多修道院一座钟楼的缮写室里工作的场景。抄本已经残缺不全了，这幅插图的边缘也已经被磨损，不过，两百五十年后的另一份《贝亚图斯抄本》将这幅插图极为小心地进行了复制，该抄本一度收藏在布尔戈斯（Burgos）的拉斯乌埃尔加斯教堂（church of Las Huelgas）。又是一个机缘巧合，老皮尔庞特·摩根于1910年在伦敦将这份抄本买回，令其同样成为摩根图书馆的藏品，编号“M 429”。因此无须离开摩根图书馆谢尔曼·菲尔柴尔德阅览室的椅子，我就可以见到在13世纪的塔巴拉圣萨尔瓦多修道院中，一个认识梅雅斯且跟其一起工作过的抄写员，复制的10世纪抄本的插图。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里面的一篇韵文体纪要，有抄写员梅雅斯的签名和日期标注，显示是为一座敬奉圣米迦勒的修道院创制的，这座修道院很可能就是莫鲁埃拉的圣米格尔修道院



出自13世纪早期的布尔戈斯《拉斯乌埃尔加斯贝亚图斯抄本》，这是抄本中一幅早期插图的复制品，呈现的是抄写员埃梅特利乌斯在塔巴拉一座钟楼里工作的场景

插图里耸立着一座钟楼，敲钟人站在梯子上。也许这只是一厢情愿，不过我们不妨这么设想一下：梅雅斯在纪要当中谈到的钟声，可能就来自这座钟楼。紧贴着钟楼右侧的是一个两层的砖瓦结构的延伸建筑。其地板是用石头铺就的，窗户狭小，大门上面落了锁；这里可能是藏书室，也可能是修道院的金库。再上面就是缮写室，是抄写员工作的地方。缮写室里，有一人安坐在椅子上，一手执笔，一手持刀，正在面前的一个斜架之上写着什么。他的旁边则是另一名抄写员，在用分割器在羊皮纸上刺孔。外侧还有一个小男孩在用剪刀裁剪羊皮纸。

这幅图呈现了一个主抄写员跟两个副手的协作模式，这正是修道院抄本创制工作的一个特点。摩根图书馆的这份编号“M　644”的抄本，经常会被人们认为全部出自梅雅斯的手笔，然而其前五折的创制工作其实是有另一个抄写员零星参与的，此人的笔法没有那么熟练。在一间有组织的缮写室中，这样的事情倒也属常规，因为此等抄本往往不是由一个与世隔绝的天才独立完成的。

塔巴拉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坐落在莱昂古国萨莫拉城的北面。这里

的中世纪教堂仍有用石料建造的古老塔楼，同埃梅特利乌斯插图中的那种差不多。可以认定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是在此地创制完成的，且是献给一座敬奉天使长圣米迦勒的修道院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座修道院必定是埃斯卡拉达的圣米迦勒修道院，它就在塔巴拉北面偏东约八十英里处，跟莱昂城非常近。这份抄本经常也会被称为《埃斯卡拉达贝亚图斯抄本》（Beatus of Escalada）。此论的理据其实相当薄弱，不过是因为到了12世纪的时候，埃斯卡拉达成为阿维尼翁圣鲁夫修道院奥斯定会（Augustinian canons of Saint-Rufe d'Avignon）的属地，以及在抄本第293对开页的左页上面，有后来增补上去的一份讣告，写着“obit petrus levita CusSi Ri”。此处的“C.S.R.”这三个字母，有可能代表的是“圣鲁夫修会”（canonicus sancti Rufi），当然也可能并不是这个意思。很显然，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这样的证据太过薄弱了。我曾在威廉·沃尔克勒（William Voelkle）的襄助之下，有幸读到了一份由约翰·威廉斯为摩根图书馆的一次展出的展品名录撰写的文稿，文稿当中征引了费雷奥·古铁雷斯（Ferreo Gutiérrez）提出的相关论证，这一论证的力度则要强得多。据古铁雷斯论述，塔巴拉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是由莱昂的圣弗洛伊兰（Saint Froilán）创建的，这位圣徒同样创建了莫鲁埃拉（Moreuela）的圣米迦勒修道院，就在塔巴拉东南大概四英里的地方。与位于北方山区并且同塔巴拉相隔数天行程的那座孤零零的修道院相比，圣米迦勒修道院当然更有可能是这份抄本的恩主。倘若风向有利，在莫鲁拉是能够听到梅雅斯提到的钟声的。这两座敬奉圣米迦勒的修道院都不曾有一个名叫“维克多”（Victor，意为胜利者）的院长，不过，“维克多”这个词本身，在这样的语境中完全有可能是指天使长自己，因为在《启示录》里，圣米迦勒在同撒旦的决斗中成了“胜利者”。

以上只是梅雅斯的纪要的一部分。其接下来的内容为：

… inter eius decus verba mirifica storiarumq[ue]depinxi per seriem, ut scientibus terreant iudicii futuri adventui peracturi s[e]c[u]li. Ut suppleti videlicet codix huius inducta reducta quoq[ue]duo gemina … ter terna centiese, [et]ter dena bina era. Sit gl[or]ia patri soli filioq[ue]sp[irit]u simul cum s[an]c[t]o trinitate, per cuncta sec[u]la sec[u]lis in finitis temporis.

（……作为装饰，我为这部分瑰丽经文绘制了插图，这样一来智者自然会对末日审判心生敬畏。为了将抄本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还特意添加了两份孪生文本……在三倍于三百和三倍于二十的年代。荣耀尽归圣父、圣子和圣灵，尽归那神圣的三位一体，且历经世代变迁，直到时间尽头。）

在这段话里，梅雅斯首先告诉读者，他亲自为这份抄本画了插图。就此一时期的抄本创制工作而言，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直到11世纪和12世纪，抄写和绘图之间的分工，才真正开始成为常规。倒是他特别提到了此一情状这一点，才真正令人出乎意料。所有的《贝亚图斯抄本》当中，这是最为古老的一份拥有插图的抄本。那么，梅雅斯此话是不是说，他自己设计并绘制了这些插图呢？似乎有这种可能。毕竟他身后拥有“大画师”的称谓。若真是如此，那这份抄本就为我们带来了中世纪艺术史上最为罕见情况之一：其中的这批插图是由一个我们知道名字的艺术家首创的，而非从既有的和传统的作品中复制而来的。随后，梅雅斯进一步谈到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让世人对世界末日心生恐惧。

接下来一句话不太容易理解。梅雅斯的意思似乎是说，他正在对一份关于末日审判的抄本进行补充，补充的内容是彼此关联的两份文本，应该就是紧跟在贝亚图斯的评注之后的那两份文本：其中较短的一份讲述的伊西多尔的亲缘关系（*De affinitatibus et gradibus*），较长的一份则是哲罗姆的《但以理书评注》。不过，包括M.R.詹姆斯（他的拉丁文要比我好很多）在内的一批人认为这句话是在计算时间，据詹姆斯等人的理解，梅雅斯完成抄本创制工作的年份中有一个2乘以2的个位数，也就是4，余下的则是三百的三倍和二十的三倍，这么算起来就是4＋900＋60，964年；倘若此处有关个位数的表述指的并不是数字，而是上述两份文本的话，那么这个算法就更简单了：900＋60，也就是960年。不过，梅雅斯用到了“年代”（era）这个词，这是西班牙独有的一种纪年方式，这种方式较之传统纪年要多出三十八年。减去这三十八年，这个年份就应该是公元926年，或者922年。

倘若梅雅斯确实是在968年谢世的，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可信的（也就是说，他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抄录了这份《贝亚图斯抄本》，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去世），不过，历时差不多五十年的抄写生涯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在还没有老花镜的那个时代，毕竟，对于到了一定年岁的人来说，这样的镜片是必不可少的。原抄本上，“ter　terna”的前面很明显有一处一英寸宽的空白，我在抄录的时候特意用一排点标示了出来。此处肯定是被抹去了什么内容。究竟是在创制抄本之时，梅雅斯自己抹去的（埃梅特利乌斯提供的插图里面的抄写人是一手执笔，一手持刀的），还是后世诸如“利布里”这样的无赖为了做旧抄本而刻意抹去的，我就没有能力判定了。抄本研究者们如今都相当谨慎地将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论定为920年至968年，尤其是接近950年的物件。

事实上，还有另外八份现存的《贝亚图斯抄本》是可以被论定为创制于10世纪后半叶，接近1000年的那个时间段的。这些抄本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两大文本“家族”，它们通常被用“IIa”和“IIb”来指代，前者就包括摩根图书馆的那份抄本，后者则是摩根抄本的近亲，尽管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后一类抄本的源头就是摩根抄本，也不知道两大家族是否享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只是这份更早的抄本已经丢失了。当然，这份丢失的抄本倘若真的存在，也完全有可能是梅雅斯在更早的时候创制出来的（比如说922年），所以梅雅斯才会声称是自己首创了那些插图；即便摩根图

书馆的这份编号为“M 644”的抄本并非两大家族的唯一且共同的原始抄本，这一说明也站得住脚。

“IIa”家族包括了以下这些抄本：巴拉多利德抄本（Valladolid），收藏在位于巴尔卡瓦多（Valcavado）的巴拉多利德大学图书馆，抄写员是奥贝库斯（Obecus），创制时间是970年6月8日和9月8日之间；莱里达抄本（Lérida），收藏于塞奥-德乌赫尔博物馆（Museo Diocesá de La Seu d'Urgell），编号“inv.501”，于10世纪后半叶创制完成，1147年之前收藏于乌赫尔教堂；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抄本，收藏于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皇家修道院图书馆，编号“&.II.5”，很可能于1000年前后从圣米兰素索修道院转移而来；马德里抄本，这份抄本堪称奇书，收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编号“ms Vitr. 14-2”，抄写员是法肯多斯（Facundus，他可能也绘制了抄本中的插图），创制于1047年，曾经的主人是莱昂和卡斯蒂尔的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 of Léon and Castile）和王后莱昂的桑查（Sancha of Léon），两人都于1065年驾崩；伦敦抄本，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Add. MS 11695”，抄写员是来自西罗斯修道院（abbey of Silos）的多米尼克斯（Domenicus）及其亲戚努恩纽斯（Nunnius），创制工作从1073年开始，到1109年结束。“IIb”家族包括了以下抄本：马德里抄本，也就是来自塔巴拉的抄本，收藏于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编号“Cod. 1097B”，抄写员是蒙纽斯（Monnius）和塞尼奥尔（Senior），绘图人是梅雅斯和埃梅特利乌斯，于970年7月29日创制完成，如前面曾谈到过的那样，抄本内有插图呈现埃梅特利乌斯在塔楼缮写室里工作的场景；赫罗纳抄本（Gerona），收藏于巴塞罗那大教堂博物馆，编号“inv. 7 (11)”，抄写员是塞尼奥尔，绘图人是埃梅特利乌斯和恩德（Ende），“pintrix”（女性），于975年7月6日创制完成，1078年之前收藏在赫罗纳大教堂（Gerona Cathedral）；此外还包括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多份抄本，如摩根图书馆中编号“M 429”的那份抄本，其创制日期是1220年，来自布尔戈斯的拉斯乌埃尔加斯修道院，1220年也是我们可以论定的所有《贝亚图斯抄本》的最晚创制时间。

不妨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很多抄本上都标注有日期，更有创制人的签名，其中一份的插图还是由一名女性彩饰师绘制的，她很可能是个修女。抄本创制人留下签名的做法并不常见，这里有可能是因为抄本内容关乎末日审判，若真到了那个时候，想必每个人都希望给判官留下好印象。至于如此精确的日期呈现，同样表明了抄本资助人对于千禧年念念不忘。“巴拉多利德抄本”更是将抄本创制工作的起始和完工日期标注了出来，由此表明这份两百三十页的抄本耗去了抄写员九十三天的时间；除去礼拜天的时间，算下来恰好是一天三页的进度，这样的进度是相当快的。

世界并没有在1000年迎来末日。11世纪的一些编年家，诸如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显然是在如释重负的心态下记述说，这一年就这样圆满地过去了，没什么大事发生。英格兰拉姆塞修道院的修士伯特菲斯（Byrhferth）大约是在1011年前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个千年时光已经完结，不过这是我们人类的算法，余下的便只能交由救主

去决定。”这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该算法不一定准确。还有一种算法认为，千年的起算时间并非基督道成肉身之时，而是耶稣基督受难之时，此种算法上的调整令世人开始极为焦虑地将目光投向1033年。但这一年同样平静地过去了，没有灾难发生。此后的《贝亚图斯抄本》都变得十分浮夸和华美，但也正是因此，它们都缺少了10世纪梅雅斯抄本的那种强烈且紧迫的恐惧感——那样的恐惧感我们只有透过梅雅斯这些抄写员的眼睛方能见证了。

对末日的想象并没有随同《贝亚图斯抄本》一起终结，它们仍然涌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启示录》12:6讲述了一个妇女带着一个男孩（通常被认为是指圣母和圣子），在天堂里那场标志着时间终结的战争开启之前，逃入旷野之中，躲避了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天的时光。原则上讲，天上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因此，在1260年这一年，人们又迎来了一股创制插图本《启示录》抄本的热潮，特别是在英格兰，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了1293年，因为这一年恰恰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一千两百六十个年头，此后，这些抄本便开始归于沉寂了。1500年前后，这些抄本在荷兰和莱茵兰地区迎来了复兴，因为人们又开始对半千禧年这个节点产生恐惧，此时的抄本已经是运用了印刷技术的木刻版了。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这样的画家是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拓展市场的机会的，他遂于1498年适时出版了那组无与伦比的木刻版画《启示录》——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我们应该都记得，当2000年迫近时，千禧年主义日益兴盛。但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平静地过去了，甚至连很多人预言中的计算机瘫痪现象都没有出现。倘若有一天世界真的终结了，那么列瓦纳的贝亚图斯的所有抄本也将随着世界一起烟消云散，不过，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至少现在世界仍然在运行，一如既往。

注释：

[1]　前面这几页的情况仍然相当复杂，不过，两卷抄本的具体校勘情况如下：i^{5}（共六个对开页，缺了第1对开页后面的第ii页），ii^{4}（很可能共六个对开页，缺了第5和第9对开页后面的i页和vi页），iii^{6}（很可能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2对开页后面的iv~v页），iv^{8}，v^{6}（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26对开页后面的iv~v页），vi^{2}（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30对开页后面的ii~vii），vii^{3}（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32对开页后面的ii~vi页），viii~xi^{8}，xii^{6}（这一折是完整的），xiii~xvi^{8}，xvii^{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05对开页后面的ii页），xviii~xxi^{8}，xxii^{6}（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44和146对开页后面的ii页和v页），xxiii^{8}（现装订得不整齐，但页码是准确），xxiv^{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61对开页后面的v页），xxv^{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70对开页后面的vii页），xxvi~xxvii^{8}，xxviii^{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90对开页后面的iv页，xxix^{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195对开页后面的ii页），xxx^{7}（共八个对开页，缺了第208对开页后面的viii页），xxxi~xxxiii8，xxxiv6（这一折的情况一目了然），xxx~xl8，xli7（很显然共八个对开页，第293对开页后面的viii页很明显缺失或者被取消了），xlii6；最后几页上面标注有抄本创制之时的折的序号，从第3折（第15对开页左页）开始，序号后通常都会标记有字母“q”或者“Q”（*quaternio*）。

[2]　正文、参考文献与注释、索引部分中提到的本书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编者注

第六章
画师雨果

11世纪晚期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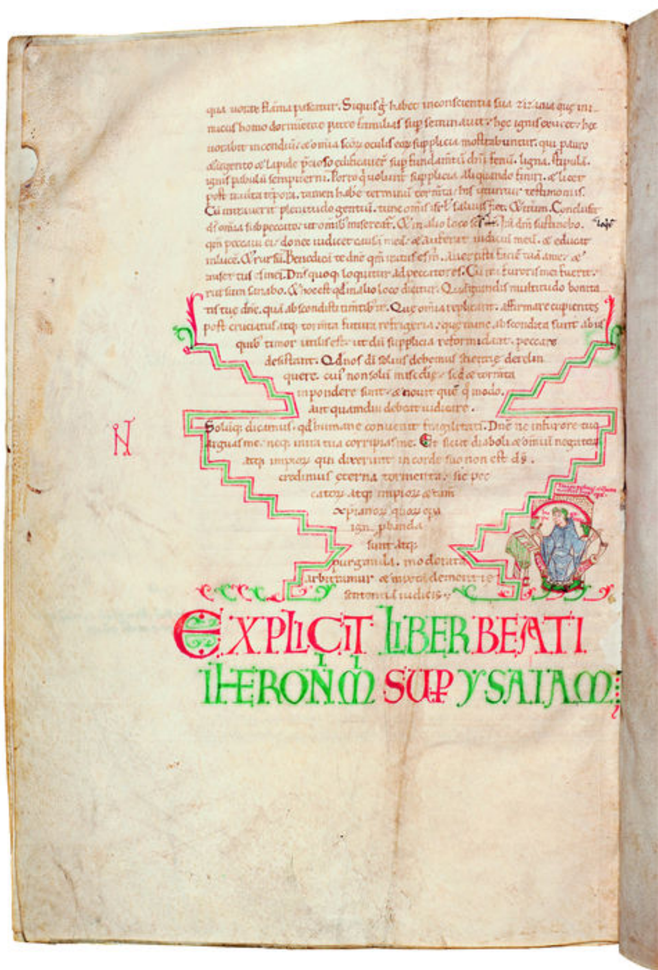
MS Bodley 717

猜谜在一千年前的欧洲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今天，在英格兰西南边陲之地的德文郡，古老的埃克塞特教堂图书馆收藏了许多抄本，其中最为古老的就是所谓的“埃克塞特之书”。这是一份10世纪的抄本，集合多份不同的古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语）文本而成，且是由于1046~1072年担任埃克塞特主教的列奥夫里克（Leofric）赠送给埃克塞特教堂的。书中有一章记录了九十五个针对日常用品的谜语，谜面都以诗歌的形式呈现。这就跟《霍比特人》（*The Hobbit*）里面的咕噜给比尔博·巴金斯设置的谜语一样，在猜谜过程中，猜谜人会遭遇种种误导和迷障，非常有趣。比如书中有一个谜语是这么开篇的，“Mec feonda sum/feore besnyþede/woruld strenga binom/wætte siþþan, dyfde on wætre…”乍一看，我根本无法相信这竟然是英语，它的意思是“小鬼取我命与力，将我弄湿之后泡水中……”这东西后来还被置于太阳下面晾晒，去除了毛发，接受打磨之后又被切割和折叠。正确答案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那就是羊皮纸卷，显然这个谜语讲的就是制作并折叠羊皮纸的过程。谜面接着说，“鸟儿啾啾”（指的是羽管），在它身上轻快跑动，留下黑色足迹以及植物制成的颜料，它的全身覆盖着硬木板和皮革，为的是成就伟人功名，而它自己也很神圣。《埃克塞特之书》里的另一个谜语开头是这么说的：“Ic seah wrætlice/wuhte feower…”（我见到四件东西，美妙无比……）这很显然是指一支羽毛笔和三根手指在快速“行走”，越过整张的羊皮纸，留下鲜活的黑色印记。



这一章的主人公最开始跟《埃克塞特之书》一起收藏在埃克塞特教堂图书馆，并且很可能是由列奥夫里克的继任者、于1072~1103年担任埃克塞特主教的奥斯伯恩（Osbern）带到埃克塞特教堂的。这份抄本的采集、抄写和装订过程，大致上就跟上述盎格鲁-撒克逊谜语呈现的差不多。这份抄本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仅知道那个在11世纪晚期用三个手指运笔抄写之人的名字，还拥有一幅呈现此人工作场景的插图，这幅插图出现在抄本结尾处，我们也正因此得到了可能是英格兰艺术史上最早的签名自画像。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编号“MS Bodley 717”。抄本的内容是翻译了《圣经》通行本的圣哲罗姆为《以赛亚书》所作的拉丁语评注。在抄本的著名的底页插图中，一人安坐椅子上面，仿佛是在享受抄写工作开启之前的片刻静寂时光，他用左手的拇指和另外两根手指夹着羽毛笔，将其浸在墨水壶中。此人的名字就在他的脑袋边上：“*Hugo Pictor*”（画师雨果），插图上方还有另一个图题，“*Imago pictoris & illuminatoris huius operis*”（本插图为本抄本

的画师和彩饰师所作），这些文字都很清晰。图中呈现的这个人物是个剃发修士，左撇子，且头发是绿色的。这三点中至少有一点是失真的，甚至很可能都不是实情。这就跟《埃克塞特之书》里面的谜语一样，雨果在此留下了虚假信息和诸般暗示，其谜底便是本章要去破解的。



埃克塞特教堂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的尾页，绘有抄写员的自画像，签名是“画师雨果”（后文中有该图放大版）

博德利图书馆的这份编号“Bodley 717”的藏品，是该图书馆创建人的赠品之一，如今，这座图书馆已经壮大为牛津大学的大学图书馆。这份抄本的借阅号，就跟这座利维坦式建筑本身一样，带上了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的名号。托马斯·博德利爵士是家中长子，其父亲是印刷技工和出版商，也来自埃克塞特。1609年，博德利写了一份自传并将其于1647年出版，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不多

见。在自传当中，博德利爵士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在玛丽女王那极具压迫性的天主教主政时期（Catholic regime of Queen Mary, 1553~1558），是如何背井离乡的，他们于1557年迁居日内瓦，当时托马斯才十二岁。陪伴博德利家族的孩子们一起流亡的，还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名叫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约1547~1619），此人日后将成为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微型肖像画家，当然这话有点离题了，不过，我们在此讨论的正是英格兰艺术家的话题。托马斯·博德利在自传中回忆说，在日内瓦的时候，他聆听了加尔文和贝扎（Beza）的布道。1558~1603年，英格兰迎来了改革派君主伊丽莎白一世的开明统治期，博德利一家也就此返回英格兰。回国之后，博德利便进入了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后来成为墨顿学院的研究员，并在那里教了一小段时间的希腊语。不过，博德利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作为皇家特使出访欧洲上，特别是去德意志和荷兰。在那个时代，外交行当可是有相当赚头的。1586年，博德利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由此扩充了自己的财富，此女曾是德文郡的一个富有鱼商之妻。博德利夫妇婚后无嗣。

1598年，托马斯·博德利第一次向牛津大学校长建议重建大学图书馆，并提出自己可以给予资助。此时的牛津大学已经有一座图书馆了，是身为格洛斯特公爵的汉弗莱亲王（Prince Humfrey, 1390~1447）出资修建的，但公爵的赠书以及后来购买的一系列藏书，都因为外借以及管理上的疏忽渐渐丢失了，在宗教改革时期藏书流失情况尤其严重，结果就像博德利在向牛津大学校方递交的建议信中说的那样，此时的大学图书馆已经是“家徒四壁”了。于是，博德利便主动提出，“我来承担这个重建任务，出资令图书馆回归原样，并将之重新装修，为之配备漂亮舒适的座位、书架和桌子”。这样的慈善项目，若是放在今天，很可能会因为大学的各个委员会以及数年的申请规划而最终演变成很复杂的事情。1598年，牛津大学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便接纳并通过了博德利的提议。博德利即刻聘请建筑师开启重建工程，修复了汉弗莱公爵于15世纪出资修建的图书馆，并新建了一座詹姆斯一世风格的四方院子同它联结起来，今天，这里是牛津的主要景点之一。1599年6月，托马斯·博德利致信自己选定的图书管理员托马斯·詹姆斯，向他抱怨说：“这些木工、细木工、雕刻工、玻璃工，都是优哉游哉的，不出活儿。”然而实际上工人们还是很勤快的，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已经在给新定制的橡木书柜安装拉杆了，还配备好了防盗用的锁链和锁具，博德利和詹姆斯也开始着手为新的书架准备足够的书册了。



托马斯·博德利爵士（1545~1613），博德利的童年伙伴尼古拉斯·希利亚德于1598年绘制，博德利也就是在这一年向牛津方面提议创建一座图书馆的

人们常说托马斯·博德利跟马修·帕克一样，对宗教改革的经典文献有所倾心。虽然这种看法确实符合托马斯的清教徒背景，但事实上，托马斯尽心竭力地四方搜寻，所得的藏品并不只跟清教徒精神有关，有时甚至跟基督教也不一定能扯上关系，它们来自全世界，其中不少书册还是来自中东和远东的。博德利在荷兰生活过，当然很了解诸如莱顿大学图书馆这样经过了文艺复兴洗礼的现代图书馆的——莱顿大学图书馆于1594年开馆，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前去拜访过这座图书馆。这样的经历不免会令博德利心生紧迫感，希望牛津大学不要甘为人后，也尽快建立一座尽可能全面的大学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的最早一批珍贵藏品中，就有埃克塞特教堂图书馆的差不多全部中世纪收藏，双方大约在1602年完成了这个交接过程。博德利本人就来自埃克塞特，他的弟弟劳伦斯（Laurence，约1547~1615）是一名神职人员，就在埃克塞特教堂担任法政牧师。在共同努力之下，他们二人最终说服了教堂的主任牧师和参事会，将这些古老书册交付牛津大学，以作更好用途。于是，便有八十一份抄本穿越英格兰全境，从埃克塞特来到博德利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列奥夫里克主教祈祷书》和画有"画师雨果"插图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埃克塞特之书》——连同里面的那些古英语谜语——则遭到了怠慢，被留在了德文郡，有可能是因为这份抄本当时并不在主图书馆，或者当时的人们确实不觉得它是什么珍贵物件。能够被运往牛津的藏品通常是知识性文献，不仅古老，而且都是珍本，但跟它们大多是中世纪天主教书册这一点无关。哲罗姆评注抄本就出现在博德利图书馆于1605年印制的第一份名录当中，据这份名录，这一抄本当时的收藏位置是"H"号书架、第2格，跟伊拉斯谟编辑的九卷本哲罗姆作

品集是邻居，伊拉斯谟编辑的这个文集是于1526年在巴塞尔问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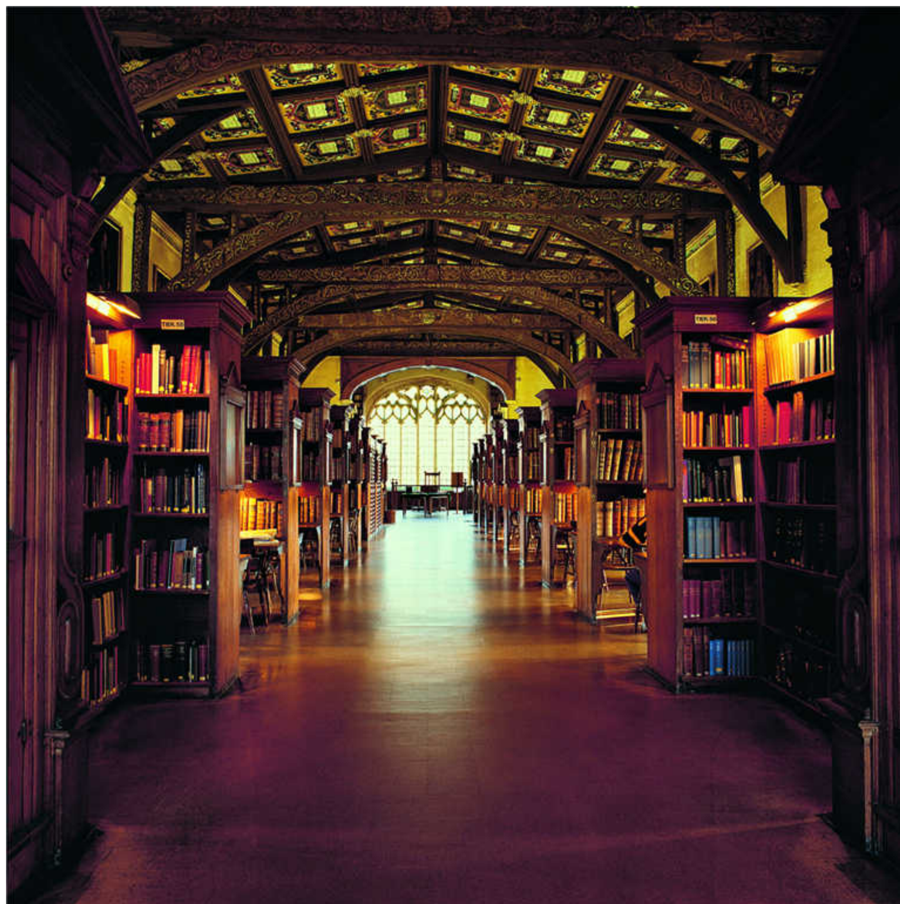
博德利图书馆有一间阅览室，因其原来是汉弗莱公爵图书馆而得名，或者也会被直接叫作“汉弗莱公爵”，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在这间阅览室写毕业论文的，它还保持着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将之修复后的模样。当时的“汉弗莱公爵”是抄本和早期印本阅览室。我的导师就是博德利图书馆的抄本管理员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 1908~1979）。实际上，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博德利图书馆所有的抄本都已经被转移到地下藏书阁的J层架子上了，此举是为了保障安全，不过，印刷版的哲罗姆作品集仍然待在原来的地方。博德利修建的方形庭院的角落里设置了一道詹姆斯一世风格的橡木楼梯，通过它就可以进入图书馆的“艺术藏品区”（Arts End），之后再通过一道松松悬垂着的护栏便可以进入“汉弗莱公爵”阅览室，但普通的访客都只能毕恭毕敬地站在护栏外面。阅览室右侧的借阅台上堆放着一摞抄本，每份抄本上都贴有一张绿色标签，上面是借阅人的名字以及代表“汉弗莱”的字母“H”。我很享受坐在这里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桌子旁的感觉，这些桌子紧挨着博德利摆放的贯穿了整个阅览室的长列书柜，桌旁就是高高的哥特式窗户，桌上堆满的传奇抄本将我围在一个暖巢中。1973年的冬天十分寒冷，我们还遭遇了能源短缺，在“汉弗莱公爵”阅览室时，我只能裹着厚厚的外套，而且到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就得离开，因为光线太暗，已经没办法阅读了。在这样的冬天，若是不戴手套，执笔的手很快就会冻僵（那个时候“汉弗莱公爵”是容许使用墨水的），就这样，我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千多年前北欧抄写员的辛苦，毕竟，那个时候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完全没有电力系统和中央空调系统的支持的。

今天的管理员基本上不会关心这样的浪漫氛围了。他们用微型轨道将珍贵抄本从其地下藏身处牵引出来，然后再用吱吱作响的电梯运载着它们攀升数层楼，这对这些珍贵藏品来说，的确是危险之事。2011年起，“汉弗莱公爵”阅览室的珍本不再对读者开放，这令全世界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备感沮丧——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些桌子旁边做研究了，当年牛津大学的古文物家杰拉德·朗拜因（Gerard Langbaine, 1609~1658）就冻死在了其中一张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前来约见抄本的人，都被迫去了大学博物馆附近地下室里的一间阴暗的阅览室。校方斥资八千万英镑进行整修的建筑就是“新博德利”，此图书馆的设计出自吉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iles Gilbert Scott, 1880~1960）之手，建于1937~1940年，是一座浅色石制建筑，就在宽街尽头克拉伦登楼的正对面，跟原博德利图书馆隔了一条街。这座新馆如今被命名为韦斯顿图书馆（Weston Library），以此致谢2008年3月加菲尔德·韦斯顿基金会提供的一笔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公益捐助金。维拉德·加菲尔德·韦斯顿（Willard Garfield Weston, 1898~1978）是加拿大的一个饼干生产商，与靠着贩鱼积累起财富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相比，也不能算不相称。

第一次拜访新馆的时候，我心情并不好。当时的新馆已经接近完工，且开始接待读者了，但我预计我会厌恶它，因为我本能地反感现代建筑风格，也反对迁址。但实际上，它给了我一个惊喜。读者仍然从公

园路上正对着金斯阿姆（King's Arms ）酒吧的正门进入新馆，门前是一道低缓台阶以及一个斜坡。原先是“新博德利”问询室的地方，如今成了一个门厅，里面放置了投币即可使用的储物柜，供读者存放书包和衣物之用。门厅里面有两个中年人负责安检事务，态度非常温和，他们引领我沿楼梯而上，前往珍本室，走到半途才记起来询问我是否有借阅单。我的此次造访期间，一楼的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空气中混杂着电钻的声音和湿混凝土的味道，地面几乎没有一处空地，那里将成为后来的“布莱克维尔厅”（Blackwell Hall）。这样的场景跟四百年前，博德利在信中谈到的木工、细木工、雕刻工和玻璃工忙碌的场面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几个月后，我再次前去拜访时，工程已经完全结束了，而且我发现，“画师雨果抄本”正在参加名为“天才印记”（Marks of Genius）的展出，参与此次展出的主要是图书馆中最伟大的藏品。

韦斯顿图书馆二楼那正对着公园路的一片开放的公共空间，如今被命名为三星大厅（因为是韩国方面提供的工程资金），里面摆放了绿色和黄色的矮座沙发和咖啡桌，以及几台计算机。新设立的麦克拉斯阅览室（Mackerras Reading-Room）同三星大厅形成横切之势，中间隔了一道玻璃门。在这一阅览室入口处的门厅里，一个操持外国口音的男孩要求查验我的读者证，然后便将我的名字和入馆时间缓缓地抄录到借阅册上。这正是我喜爱的那种老办法。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要将该程序重复一遍。眼前的这个长厅之所以被命名为麦克拉斯阅览室，是为了纪念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查尔斯·麦克拉斯爵士（Sir Charles Mackerras, 1925~2010）。如今，知识已然可以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了，托马斯·博德利爵士若是看到这种情形，定然会非常高兴。我前往中央借阅台，将我的名字告诉管理人员，一名女士没有按规定扣留我的借阅卡，便从后面的书架上取出一个已经有了岁月留下的磨损印记的盒子，盒子是用朱红色的外罩包裹起来的，在其底端处可以看到“MS BODLEY 717”一行金字。这是西方抄本部的负责人马丁·考夫曼先生为我预留好的。我询问那位女士，我是不是能自己选座。她非常和善地回答说：“没问题，只不过隔壁房间会更宽敞一些。”于是我捧着盒子离开了。



博德利图书馆的“汉弗莱公爵阅览室”，这里本是一个中世纪图书馆，博德利将之重新装修，用作珍本阅览室，直到2011年



博德利图书馆新建的珍本阅览室，位于韦斯顿图书馆内，20世纪30年代由吉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设计

跟麦克拉斯阅览室平行的是曾经的“新博德利”里的老“PPE阅览室”。如今，这里已经接受了重修，供人们研读从前收藏在马路对面的汉弗莱公爵图书馆的珍本。这间阅览室差不多贯穿了整栋建筑，北面墙体之上共有七扇很高的小格玻璃窗，透过窗户可以俯瞰三一学院的花园。新装修的这间阅览室暂且没有命名（“多好的命名机会。”马丁·考夫曼后来还特意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希望我在这本书里顺便做个广告），它保留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吉尔伯特·斯科特的装修和设计特征，比如横跨头顶的华美木梁，上面有印第安风格的镶嵌细工。“汉弗莱公爵”阅览室的高屋顶是以都铎风格的镶金嵌板装饰起来的，每一块板上都镶嵌着牛津大学的徽章，做工精美，相比之下，新阅览室虽然没那么气派，但也是派头十足，令人震撼。阅览室里面共设置了四盏巨大的装饰吊灯，两端各有两盏。吉尔伯特·斯科特的长桌两侧各能坐五个人，这些长桌都被从中间向外非常巧妙地加宽了，以便于引入中央电力供应设施，这些当然是托马斯·博德利爵士无从想象的事情。紧靠着阅览室的墙壁，是一排排宽大的黑色木质书柜，书柜分为四层，且还没有被塞满，跟“汉弗莱公爵”阅览室远端的古老的塞尔登阅览区不一样，在塞尔登阅览区，新进的大量文献就那么堆叠在窗沿上和桌角处。在这间新阅览室，书柜的上方都安装了闭路摄像头，但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监控设备了。在这么一间全部贯通且开放的阅览室里，人们是可以随时看到其他读者，甚至向对方挥手示意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好处在传统的伊丽莎白风格的阅览室里是享受不到的，因为那样的阅览室里会有很多幽僻之处。拜访新馆的那天早上，我就很高兴地看到了阅览室另一端的理查德·贾默森（Richard

Gameson），此人来自达勒姆大学，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专论“画师雨果”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了我研究博德利“717”号藏品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实际上，那天早上，我的文件夹里就有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找到一个位置坐了下来，然后打开盒子。抄本有点分量，大约是14.5英寸长、10英寸宽、3.25英寸厚，当然这是将装帧也计算在内了。“717”字样是17世纪的手写体，就写在抄本的书顶处，写在这一位置是因为这样一来，若是将抄本闭合并按照书脊朝上的方式（博德利图书馆早期应该就是这么放置抄本的，就像一个人跪爬在地上一样）放进书架，人们也能看到这一编号。将书册直立在书架上，并令书脊朝外，这是今天的人们通常采用的放置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在17世纪晚期之前，差不多是无人知晓的。关于这一点，看一看墨顿学院教堂里面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的纪念碑就知道了，那里的博德利爵士的半身像被安放在一个建筑框架里面，这个框架则是由几根书籍形状的柱子支撑起来的，这些柱子中的书册则都是书口朝外的，很显然，博德利图书馆就是这么存放书册的。“MS Bodley 717”号藏品是由暗色皮革装订起来的，封皮上有一个滚压而成的无色压印框，框的四角都有花饰。抄本的封底显然是博德利图书馆强行重装过的，用的是现代皮革，呈现出鲜亮的黄褐色，而且可以肯定它是在1950年3月被重新装订的，因为在封底内页上有日期标识。我推测，很可能是奥托·帕赫特（Otto Pächt, 1902~1988）在将这一抄本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时采取的举措。奥托·帕赫特在维也纳被占领期间流亡牛津，1950年的秋天，他在《博德利图书馆名录》（*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中公布了有关这份抄本的信息。新书脊的底端印有烫金字样“MSS. BODL./717”（严格来说，这个编号是错误的，因为“MSS”是复数）；从中可以看出，最迟到帕赫特流亡牛津的时候，这份抄本已经是以直立方式被收藏在书架上的了。



画师雨果自画像，画中人一手持刀，一手执笔沾墨水，墨水就放在椅子扶手末端的牛角里面

我将抄本支撑起来后打开。和很多人一样，我也不由自主地先翻到最后一页，也就是第287对开页的左页，想看一眼这一页上著名的“画师雨果”的画像。画像就在文本收尾段的右边，画面当中，这位画师躬在壁龛拱顶的下方，壁龛则被红色和绿色的折线圈围起来。这幅插图非常小，但也非常精细，就那么小心翼翼地蜷缩在页面的内角处。如此谦卑和私密的一幅自画像，竟被今天的人们不断地复制和传播，人们所用的方法以及意图，更是超出了雨果时代的人的想象——它甚至出现在了T恤衫、鼠标垫、屏保以及手机保护壳上。

饱了眼福之后，我便返回抄本首页，进入常规程序。开篇几页的插图非常华美，这对于一份常规的教父经文评注来说有点非同寻常，出乎我的意料。第1对开页的左页是一幅整页的卷首插图，跟早期福音书抄本正文前面通常会出现的福音书作者画像颇为类似。这幅插图的具体构图跟《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画像有点像。此处呈现的是先知以赛亚，他面对着读者坐在一处拱门下面的凳子上，拱门则是由镶饰着

条纹的石柱支撑起来的，这很可能是在一座神庙里，不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应该就是古城耶路撒冷。这幅插图的画师对耶路撒冷的建筑进行了想象（他一定这么做过，因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5年开始，那之后耶路撒冷便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烙印），他恰当地用东方式的穹顶勾画出了这座圣城的天际线，只不过，穹顶之上树立着的十字架有些不合时宜，原因很简单，先知以赛亚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8世纪。图中的这位先知跟《阿米提奴抄本》里面的以斯拉一样，头上也有光环。以赛亚的头发很是怪异地被编成了很多根小辫子，而且还是中分，不由得令人感受到《旧约》里的异域格调，更令人联想起拉斯塔法理教信徒（Rastafarian）的打扮。先知的手臂伸展着，如同冥思中的佛教徒，一个长长的卷轴从他两手间穿过，卷轴的两端清晰地写着“ISAIAS P[RO]PHETA”（先知以赛亚）的字样，整幅卷轴以红色大写字体呈现出如下内容：“ECCE VIRGO CONCIPIET ET PARIET ET PARIET FILIUM, ET VOCABITUR NOMEN EI[US]EMMANUEL”，意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以赛亚书》里最有分量的一句话了，《马太福音》里也重现了这句话（1:23）。

双页的卷首绘图中，正对着以赛亚画像的那一页，呈现的是彩绘标题，“这是（此处添加了‘第一部’）圣哲罗姆评以赛亚书的开篇”（当然，是用拉丁语写就的）。标题被分为三行，呈现为红绿相间的彩绘体大写字母。其上方是占据了半个页面的插图，图中人物被嵌在一个回廊的两个隔间内，回廊的顶部则是砖瓦砌起来的屋顶。第一个拱门下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剃发修士，头带光晕，他的名字写在他脑袋的两侧，“HIERONIM[US]”，这当然就是哲罗姆，《圣经》学者和译者、四大教会圣师之一。尤西比乌斯·热罗尼莫（Eusebius Hieronymus，约342～420），生于罗马行省达尔马提亚的斯特黎敦（Stridon，今天的学者对斯特黎敦的确切位置是有争议的，它可能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或波斯尼亚）。哲罗姆是最早的国际性基督教学者之一，在高卢、安条克、叙利亚、君士坦丁堡、罗马以及埃及游学，最终落脚伯利恒。画面当中的圣哲罗姆身穿蓝色长袍，一身教士而非红衣主教装扮，尽管13世纪后的西方艺术作品都将他呈现为红衣主教，但那其实是错误的（8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红衣主教）。画面当中的圣哲罗姆正在书写一份长长的卷轴，里面呈现的就是他的《以赛亚书评注》的开篇词。这份卷轴伸展到了相邻的隔间，由端坐在那里的一个修女接收，此人也有光晕，并且她的名字也是由红色大写字母呈现的。尽管她的名字的后缀表明该词是中性的，但世人都知道这就是圣女欧多钦（Saint Eustochium，亡于约419）；欧多钦是哲罗姆的密友圣保拉（Saint Paula，亡于404）之女；圣保拉和欧多钦是哲罗姆忠实的追随者，二人一起离开罗马，并最终落脚伯利恒，跟哲罗姆比邻而居，后来，母女俩更在伯利恒建立了四座修道院。此事跟后文是有关联的。第2对开页的左页是哲罗姆的开篇词的全文：“Expletis vix longo tempore…”。首字母“E”占据了半页，并且被呈现得相当复杂，纹饰里面绘有很多人物形象。“Bodley 717”抄本的介绍文字中对这些人物究竟是何人进行了不同的推测。在题献给欧多钦的引言当中，哲罗姆告诉受献人说，自己不久

前完成了对十二使徒以及《但以理书》的评注工作，现在要着手评注《以赛亚书》了，因为这是在保拉活着的时候，他对保拉做出的承诺。“E”字母的下半部分中，有两个人正在伯利恒的主诞教堂埋葬圣保拉。哲罗姆在引言中继续说道，他之所以要评注《以赛亚书》，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对帕玛丘（Pammachius）这个博学之士也做出了承诺，而帕玛丘是欧多钦的姐夫。书页的左侧是一个剃发圣徒在写作的场景；这毫无疑问也是哲罗姆，他面对着分别坐在中间和右边的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男人，姿态非常谦卑，此二人也都拥有圣徒光晕，定然就是欧多钦和帕玛丘。

哲罗姆在引言中说，他解释《以赛亚书》，主要是为了那里面先知对于基督降临的说辞，这里的基督被称作“以马内利”（Emmanuel），为贞女所生，并将成为尘世的救主。贝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是在竭力发掘语词背后隐藏的多层奥义，那种解读实际上已经到了荒谬的边缘，因为其中发现的含义是原作者根本就想象不到的。跟贝亚图斯不同，哲罗姆是通情达理之人，兼具常识和理性，他仅仅是想要揭示以赛亚实际上想说的东西，同时借助逐字逐句的分析来阐述如何将先知的话融入基督教的教义。哲罗姆充分利用了他的语言优势和翻译《圣经》拉丁通行本的经验，有时候甚至有些自我炫耀。不妨举个例子，且看他如何评注《以赛亚书》1:3。此处，主告诉先知以赛亚，“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哲罗姆将此措辞同希腊文《旧约》进行了比照，后者给出的说法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理解我”。他同时也比照了希伯来原文对这个比喻的拓展，“以色列却不认识他的主人”以及“我的民却不认识其主人的槽”。据此，哲罗姆提出，这里没有将以色列人与狗之类的更为聪明且已被驯服的动物做比较，而是将他们与更蒙昧的兽类做了比较。负着律法之轭的牛象征犹太人，背负着罪恶的驴则象征异教徒。牛和驴都是用来负重的，而遭到子民拒斥的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基督，因为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马太福音》11:28）。在今天的基督教堂，这就是一段十分正统的布道词。

在所有的先知书里，最富争议性的词之一就是预言救主为谁所生之时所说的“处女”，我们眼前这份抄本的卷首插图展示的卷轴里，也出现了这个词。对此，哲罗姆在第三卷的第十六章进行了讨论和解说。这部分文本出现在抄本的第38对开页的左页和第39对开页的右页，并且在这段话的边上已经有一个中世纪读者用一条颤巍巍的标记线将之圈点出来了。在此，哲罗姆说道，希伯来语中“处女”一词通常被表达为“bethula”，但是以赛亚用的是“alma”，这个词被希腊文《旧约》通篇采用，意思仅仅指年轻女性。哲罗姆也承认，犹太人实际上否认以赛亚所谓的“处女”是指其字面意思。不过，哲罗姆在此给出了详尽的解释，他不仅引用了《旧约》里面这个词的多种表达形式，还参考了2世纪的犹太改宗者阿奎拉（Aquila）提供的希腊文《创世记》，最终对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另一层意思进行了揭示。他认为这另一层的意思指的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就如同处女是被父母隐藏起来、任何其他男人都无法见到的人，这与“alma”一词在古迦太基语中的意思一致，而古迦太基

语乃源于希伯来语，因此凭借此类考证可以得出结论说，以赛亚此一预言当中“alma”一词的确就是指贞洁之女。“Bodley 717”号抄本的抄写员将此希伯来语词直接转译为对应的拉丁语词，不过，他在这个词的上面画了条横线，以表示这是外来词，就像我们今天会使用斜体字一样。哲罗姆语言功夫之广博，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令人震惊的，这便增加了他的解释的可信度。



第260~261页：卷首页插图，左页呈现的是以赛亚在耶路撒冷接受加冕的场景，其对页上则是一幅半页插图，呈现的是哲罗姆给自己的门生圣女欧多钦写卷轴的场景

《圣经》评注抄本在中世纪文献当中，通常会被归入最为朴素的抄本的行列，博德利图书馆的这份抄本做得如此奢华，的确是罕见情况。其正文以一个很大的彩绘首字母为开篇，表现的是以赛亚向以色列人发布预言的场景，场景里的犹太人头戴有尖角的犹太帽（*Judenhut*），这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犹太人典型的装束。抄本的十八卷文本都是以很大的首字母开篇的，这些彩绘的字母被呈现为摆动着的植物茎秆或花冠的形状，有时候还装饰有龙形或者狮形图案，其前景则为彩色色块。每个页面上都会有小小的、红色或者绿色的大写字母，有时候抄写员还会对这些字母进行彩饰。这样一份抄本是非常华美的，而且看起来也很昂贵。

抄本页面的边缘处并没有裁剪过的样子，许多页面的底端还留有兽皮的原始曲线，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有时候，页面外角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动物脖颈或者肩膀的弧线，甚至还有平行的波纹状脉络，那是在纸张制作过程中，用框架拉伸并悬挂兽皮而留下的印记。《埃克塞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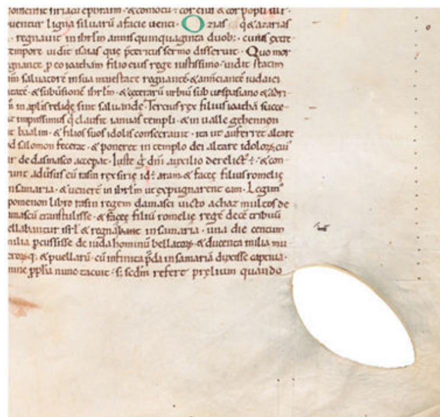
书》中的谜语提到了羊皮纸的制作程序，其中包括将其浸泡水中，之后用阳光烤晒，然后除毛，最后用刀具进行刮擦。制作羊皮纸的基本原则就是将充分浸水的兽皮用一定的力度拉伸开来并悬挂起来，在其逐渐干燥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反复打磨，令其变得越来越薄。倘若这毛皮是来自绵羊或者山羊的，那么制作者在它被晒干前就可以完成刮擦程序。倘若是牛皮，则需要在毛皮晾干之后但仍然在晒架上的时候继续打磨它。班贝格州立图书馆收藏有圣安波罗修的一份12世纪早期的抄本，这份抄本的卷首插图极为有名，呈现的就是羊皮纸的最后一道制作工艺。图中是一张不大的兽皮，各个边角都被紧紧地系在木架里面，一名修士正在用一种特殊的铲子对兽皮进行打磨。这个带柄的弯曲铲子被称为“月亮铲”（lunarium）。当然，即便是这种特殊的工具，偶尔还是会弄破兽皮表面。因为兽皮在各个方向都受到了拉力，所以即便是很小的切口，都很容易变成圆形的或者椭圆形的洞。比如，我们眼前这份博德利馆藏抄本的第36对开页和第53对开页，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过制作者要是能在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足够快地将兽皮从晒架上取下来，倒也不是不能就此将先前留下的切口缝合起来。我们在眼前这份抄本的第42对开页就可以见到这种修补痕迹，这里的切口被用白线缝合起来，做工非常精细，第188对开页上则用的是绿线。这些工作毫无疑问是在最初的兽皮上进行的，远在纸张被最终制造完成并派送给抄写员之前。这样的缝合工艺在罗曼时期的抄本上并不罕见，但它从未得到应有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于这些与贝叶挂毯工艺处于同一时期的针线工艺来说。中世纪的所有精美艺术品当中，缝制品的保存状况是最为糟糕的，实际上，我们基本上也只能在抄本里与其偶遇了。



第264~265页：哲罗姆《以赛亚书》7:14，以赛亚预言处女怀育男婴处文本的左下方

被画了一条边线，并有标注文字“contra iudeos”（与犹太人说法不同）





12世纪早期的绘图（左图），呈现的是羊皮纸制作人刮擦、打磨束紧的羊皮的场景；“画师雨果抄本”的书页上的一个洞（右图），是由于羊皮纸工匠不小心割破了羊皮而形成的

刮擦程序之后，便是切割和折叠工作，如同谜语中描述的那样，最终羊皮纸会以“折”为单元被叠放起来。[1]这份抄本是完整的，完全没有缺页的情况，这在中世纪抄本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抄本里面有现代的用铅笔标注的页码，其中“165”这个页码发生了重复，因此，实际页数要比标注的页数多出一页。每页都有三十八行，通过刻痕或者铅制铅笔画出来的线分行，书页的三边都留有清晰的针孔。文本是以单栏格式写就的，并没有被分为两栏，这种单栏文本页面通行于11世纪，但是到了12世纪就很少见了，12世纪时，类似尺寸的页面通常会采用两栏格式。

纸边的一处切口，是工匠在造纸之时不小心割破的，随后被用绿线缝合起来了

一番仔细观察之后可以看出，这份抄本保留了初始装订成果的核心部分。页边处完全没有整修的痕迹，17世纪的重装通常会令页边变得极为工整并且会在页边留下斑痕，但这份抄本上全然不见这些东西，只有三条带子将其各折缝合起来，这要是放在17世纪，应该是最低标准了，在11世纪却是标准装订方式。皮带的位置正好跟中世纪衬页上的印痕形成对应，这些衬页最初是粘在封面板材上的，而皮带最初应该位于封面和衬页之间。第19折和第20折之间有一条带子（在第152对开页的后面），很可能是中世纪书签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抄本被重新装订过，那么在各折被拆解开来的时候，它就应该已经脱落了。第129对开页和第130对开页之间的书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由此也令我们得以瞥见

书脊内侧的情况：并没有重新缝合的痕迹。很可能在1602年，抄本的书页仍然是用钉子跟厚厚的封面木板钉在一起的，木板则被皮革包裹，而这一包裹程序恰恰也就是谜语当中提到的抄本装订的最后一道环节。后来，很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方便运输，人们将钉子拿掉，并将木板也拆掉了。在抄本运抵牛津之后，11世纪的皮带被穿入新的简易纸板，而纸板也被重新包裹起来。抄本内部已经历经千年时光的古老结构则未受到触碰，功能完好。

这份抄本是从他处转移到牛津的，这一点是有案可查的，同时，它源于埃克塞特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在卷首右页上方的空白处，有一份题词，很显然是出自约翰·格兰迪森（John Grandison）、1327～1369年的埃克塞特主教之手，该题词是，“lib[er]Ecc[lesi]e Exon[iensis]de [commun]i[bus]”（埃克塞特教堂公共藏书），并且“埃克塞特教堂藏书”这几个字在两页之后的彩绘首字母上方又出现了一次。1327年，就在格兰迪森走马上任主教之职的前夕，教堂制作了一份财物清单，以便副司库使用，这份清单上面就包括两份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据清单描述，其中一份抄本很小，估价为13先令4便士（也就是中世纪的1马克），另一份抄本则比较大，不过估价偏低，为10先令。应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份小抄本更为精美的作品了，因此它也就更为昂贵一些。中世纪的图书馆借阅单上面的标价实际上就是图书丢失后，借阅者必须上缴的罚款数额。1412～1413年，埃克塞特教堂图书馆停止外借藏书，当时教堂要建造一座新馆，于是原来的藏书都被锁进了书柜。到那个时候，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只剩下一份了，可能是有人借走另一份后没有归还。1506年的教堂图书名录里面，可以见到剩下的那份抄本，我们可以认出这份抄本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图书名录通常都会记录下抄本第二页的开篇词，而选择第二页则是由于内容相同的不同抄本，其卷首开篇词都是一样的，但到了第二页，页面中的文字就会开始变得不同。在这份名录中，“埃克塞特哲罗姆抄本”的描述文字为，“2 folio *eiusque sapiencia*”，后面这两个词的确是该抄本第二页的起始词。当时的这份抄本收藏在图书馆南侧十一张桌子的第九张桌子上，并且是这张桌子上的第九本藏书。抄本底端存留有很清楚的链搭扣留下的绿色印迹，当然，这也可能是17世纪博德利图书馆在给抄本上链搭扣时留下的。

抄本的文本也能够形成独立证据，证明在14世纪早期这份抄本仍然是存放在埃克塞特的。当时，牛津的方济各会修士正在着手创制一份他们所谓的“*Registrum Anglie de libris doctorum et auctorum veterum*”，这是一份馆际联合借阅名录，涵括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近百家教堂收藏的主要的神学文本和教父著作，根据抄本作者顺序编排。在这份名录中，有多条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的记录，这些抄本遍布不列颠的二十四家图书馆，也就是说全英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图书馆都有馆藏，其中就包括埃克塞特教堂图书馆。

然而，到了11世纪晚期，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已经成了珍品。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的英格兰，已经不存在这一文本的已知抄本。实际上，哲罗姆在《以赛亚书评注》里面是提到过不列颠的，他在

评《以赛亚书》40的时候，专门讨论了地球之上各个族群的扩张（一直在伯利恒写作的哲罗姆，竟然听说过不列颠，这实在是令人愉悦）。1090年前后，有三份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差不多同时现身英格兰，分别归属埃克塞特教堂（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坎特伯雷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教堂。问题在于，这些抄本是如何以及为何突然现身英格兰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把我们带入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地带，因为11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正处于一个超乎想象的动乱时代。

你不妨随意地问一个英国人他或她心目中不列颠历史中最值得铭记的日子。当然，会有人说是1966年，因为那一年英格兰赢得了世界杯，这些人显然还没有从那样的兴奋当中回过神来，不过，我想大多数人会说是1066年。诺曼人的舰队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统领之下，于这一年的9月28日在佩文西湾登陆，此一历史场景已然见诸贝叶挂毯了。入侵者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并在当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战役中杀死了国王哈罗德。威廉公爵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征服者威廉，他于这一年的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在西敏寺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此一历史性的事件，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英格兰也因此被拖入更为宏阔的欧洲历史进程当中。于是，这个日子便在英国人的心当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从此挥之不去了。诺曼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行动，彻底改造了英格兰统治体制中的许多方面，如地产权、封建特权、语言以及社会认同等，所有这些变化在不列颠肌体之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今天的不列颠风景中，仍然保留着当年征服者以傲慢之势建造的建筑——制霸中世纪各个城市的巨大的石头城堡，以及罗马风格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些都是从欧洲输入的。甚至有时候连作为建材的石块都是从诺曼底穿过海峡运来的。这些建筑中配备的人手都是诺曼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也几乎全是从诺曼底调派过来的。这倒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马姆斯伯里的修士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80～1143）曾留下一段著名言论，讲述了征服者们是如何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注入已然是暮气沉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修道院生活的。新的修道院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了。从这场征服行动到1135年威廉的小儿子亨利一世驾崩，英格兰大地之上教堂和修道院的数量从原来的六十座一下子提升到了两百五十多座，毫无疑问，它们都需要藏书。

有不少此一时期的抄本存留下来，从中便不难见出这股复兴潮流之强劲。从圣奥古斯丁传教英格兰到1066年，有五个世纪的光阴流转而去，在这五个世纪当中，英伦列岛上的基督教和修道院一直在发展壮大，但是在抄本收藏方面，即便是残片断章都是很罕见的。然而从威廉的征服到1130年这六十四年间，就有上千份书册见诸记载和名录。从1130年到12世纪结束的时候，这类书册已然是难以尽数了。此等巨大数量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诺曼人入侵之后，英格兰在抄本创制方面以及图书收藏方面，都有着相当快速的发展。

应该说，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并不是没有书册，只不过，其数量以及获取此类藏品的机会都是相当有限的。此一时期，维尔茅斯-亚

罗修道院的那种地中海式学术氛围已然消逝很久了，维京人的无情侵袭令昔日的修道院损失惨重。《埃克塞特之书》的捐赠者列奥夫里克主教曾将一批很有意思的抄本赠送给自己担任主教的埃克塞特教堂，不过，其中除了仪典和两份古英语抄本，其他的赠品应该说大多是他在洛泰林吉亚（Lotharingia）做研究之时从所用书册当中随机挑选而出的，而且，埃克塞特教堂的牧师对这些书册很可能都是充满困惑且缺乏兴趣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若非这位主教的捐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的埃克塞特恐怕就没有藏书可言了。

标准化是这批诺曼征服者的特质所在。他们在领导英格兰既有的教会机构或打造新的时，仿佛手中握有一份清晰的任务清单和统一的藏书文本名录。其紧迫的心情和态势足以同1600年前后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一较高下，而且，征服者开出的这份清单显然要比博德利爵士的清单更为精细且明确。一夜之间，英格兰所有的修道院图书室都被要求按照清单，添置一套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主流文本。读者重新拥抱国际性语言拉丁语。征服者设立的宗教机构也全面收藏了同样的教父文本，特别是安波罗修、哲罗姆、奥古斯丁、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约485～580）和格里高利的文本。核心清单通常包括如下文本：安波罗修的《路加福音评注》以及他的《六日创世述》（Hexamaeron）；哲罗姆书信和评注集；奥古斯丁（354～430）的《上帝城》（*De civitate dei*）以及他对《创世记》、《诗篇》（通常是三卷本）以及《约翰福音》的评注；卡西奥多罗斯的《诗篇评注》；还有就是格里高利的长篇大论——《训道》（*Moralia*），这是对《约伯书》的评注，其中融合了大量生活箴言。英格兰的藏书室里此前可能并没有这些传统文本，即便是有，也都已经破旧不堪了。于是，在短时间之内，大量书册涌现英格兰，且新制作的抄本就如同此一时期诺曼人竞相建造的教堂，彼此间十分相像。1602年，埃克塞特教堂超过半数的藏书被转运到牛津，其中就包括了一批创制于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的抄本：如安波罗修的四卷作品、哲罗姆的三卷作品、奥古斯丁的十五卷作品，还有格里高利的九卷作品，如今，这些抄本都收藏在博德利图书馆。它们的风格跟我们眼前的这份“画师雨果抄本”的风格极为相似。1327年的埃克塞特教堂藏书名录里面，记载了更多的教父著作，其中哲罗姆的作品为十一卷，奥古斯丁的为二十二卷，格里高利的则为十五卷。在11世纪晚期之前，这类文本中的大多数在埃克塞特是见不到的，还有一些在整个英格兰都找不到，比如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要围绕这些文本创制抄本，就必须找到范本才行，而这些范本应当都来自诺曼底。

很可能是一个来自埃克塞特的读者，将该抄本的文本同其他的抄本进行了对照，尔后在页边的对应位置批注说，这几行文字并非哲罗姆所作

“Bodley 717”号藏品属于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家族中所谓的“高卢”谱系（"Gallican" family），这个抄本家族主要分布在法国北方，包括来自亚眠附近的科尔比埃修道院和位于里尔和瓦伦谢纳之间的圣阿芒修道院的8世纪晚期的一批抄本。据信，这些抄本的范本是一份已经佚失的抄本，这份抄本一度收藏于查理曼的宫廷图书馆。就其所属谱系来说，“Bodley 717”号藏品的文本内容存在怪异之处，在中世纪时期的埃克塞特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第7对开页的右页和左页之上，哲罗姆对《以赛亚书》1:12的评注中被插入了一段文字。11世纪晚期的一个修订人在页边空白处发出警告，“Istud non est de Jeronimo”，意思是说，“这并非哲罗姆的原文”（此一注释非常正确，而且我根本找不到这段插入文字的出处）。该修订人还在另外多处给出

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开篇附近的文本旁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在第3对开页的右页上面，文本中“Isaiah”一词被解释为“salvator domini”（救主），修订人则提出“salutare domini”（救赎）一词更为适当；再如第6对开页的右页，此处是对《以赛亚书》1:8的评注，文本指出，保罗就这个话题继续写道，“scribensque dicit, ‘*Ergo numquid* …’”，修订人则正确地指出，这句话的正确表述是，“… scribensque，‘*Dico ergo*, numquid …’”（“我且说，……吗？”，见《罗马书》11:1）；还有第9对开页的右页，文本当中出现了“ministeria vini”的字样，修订人则认为“misteria vini”更为合理一些。这位修订人更是在第227对开页的右页给自己留下了如下备注，“huc usque emendatum est”（修订到此暂停）。实际上他此后又继续修订，应该是忘记抹去这一标注了。

抄本修订人在第227对开页右页给自己留下的备注，称校对工作到此暂停

虽然埃克塞特教堂的藏书大部分归博德利图书馆所有了，但是英格兰还有一些教堂保留了大部分的中世纪藏书，而且这些藏书自中世纪以来几乎不曾有人触碰过。为了加深对眼前这份“Bodley 717”号藏品的理解，我们有必要拜访一下其中的两座教堂。首先是索尔兹伯里教堂图书馆，这座美丽的哥特式教堂坐落在威尔特郡，在伦敦西南方向，距离伦敦大约八十五英里，就在前往埃克塞特的途中。教堂始建于13世纪20年代，迁移自附近老塞勒姆遗址（Old Sarum）所在的山顶。教堂的图书馆则是于1445年在回廊东侧区域的上方修建起来的。教堂南耳堂的尽头处有一道没有任何标识的中世纪橡木大门，穿过这道门便可以进入教堂，尔后沿着一段狭窄的螺旋形阶梯上行，可以抵达另一道中世纪大

门，门上钉有金属凸饰和一个铁环柄。教堂图书管理员埃米利·奈什就在这里迎候我。我看了一下访客登记册，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是头一个访客。图书室里面，有一张八角形的小木桌可供工作，书柜则被隔离开来了，就如同教堂里面的圣坛。埃米利已经为我备好了“MS 25”号藏品，这份藏品是与教堂同时代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是在圣奥斯蒙德（Saint Osmund）时代从老塞勒姆来到索尔兹伯里教堂的，当时的奥斯蒙德是征服者威廉的财政大臣，并于1078~1099年担任索尔兹伯里主教。他本人就是一位抄写员和装订人，来自诺曼底的塞埃（Séez），于是他亲自坐镇，指挥了清单上的宗教文本的购买和抄录工作。13世纪早期，在索尔兹伯里新城动工之时，奥斯蒙德的老教堂的藏品也随同教堂的搬迁来到了南面两英里之外的新址，这里的地形和环境要更好一些，就在艾芬河边。约见这样一份在近乎千年时光里不曾变换过主人，也没有参与过长途旅行的抄本，那样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索尔兹伯里抄本看起来跟“Bodley 717”号抄本完全不一样。索尔兹伯里抄本极具实用风格，书页上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文字，装饰元素更是少得可怜。我特意找到前文提到的埃克塞特抄本中那四段文字，发现插在埃克塞特抄本里面的那段话，在索尔兹伯里抄本里并没有出现。埃克塞特抄本修订人做出的三项修改，恰恰与索尔兹伯里的原始文本相同。换言之，这两份抄本各有范本，且在抄本制成后不久，埃克塞特的某个抄写员在老塞勒姆对“画师雨果抄本”和索尔兹伯里抄本进行了对勘，或者是做了类似的工作，并将修订添加到了埃克塞特抄本的页边空白处。此一情况向我们揭示了诺曼文化历程当中的一个特殊时刻。中世纪的英格兰拥有九座“在俗”教堂，索尔兹伯里和埃克塞特都位列其中，所谓“在俗”，意思是指非修道性质的。这两座教堂都地处英格兰西南地区，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彼此的，且时常会拿出各自的藏品比对一番。在奥斯伯恩担任埃克塞特主教的时候，双方毫无疑问是有联系的，因为埃克塞特教堂的《末日审判书抄本》（*Domesdoy Book*）就是由一名索尔兹伯里抄写员抄写的。中世纪的习惯是这样的：在比对双方的哲罗姆抄本的时候，来自埃克塞特的校勘人是不会对文本进行改动的；倘若他注意到其中的差异，只是会将“vel”字样添加上去，意思就是“或者”，并不会给出自己的裁断。



藏于索尔兹伯里教堂的11世纪晚期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该抄本没有那么奢华，文本装饰也相当朴素，羊皮纸上有很多洞，应该是制作纸张时候留下来的

为了找寻跟“画师雨果抄本”类似的抄本，我们的第二趟旅行是深入英格兰东北地区，来到跟西南地带的埃克塞特教堂形成对角的达勒姆教堂。达勒姆教堂一度处于偏远之地，如今通了火车，从国王十字车站出发，顶多需要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火车慢慢驶入达勒姆车站，对面山坡上诺曼征服留下的壮观建筑即刻映入眼帘。那是一座震慑人心的城堡，始建于1072年，旁边就是达勒姆教堂，用黄褐色石料修筑而成，二者形成交相辉映之势。这座教堂于1093年加固了根基，它修建在一处峭壁的边缘，下方的威尔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湾，令这座巨大的建筑变得无法攻克，而威尔河在路过这回湾之后，要继续前行，赶往维尔茅斯，最终汇入北海。达勒姆车站建在一个山坡上，走出车站，顺着山坡而下，途中经过理查德·贾默森的家，穿过米尔伯恩门大桥，然后沿着相当陡峭的萨德勒老街而上，最终便进入了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市镇。诺曼时期的抄本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收藏在昔日教堂的修道之所。穿过教堂的本堂，绕行到回廊的远端，就能看到台阶尽头的教堂图书馆。这里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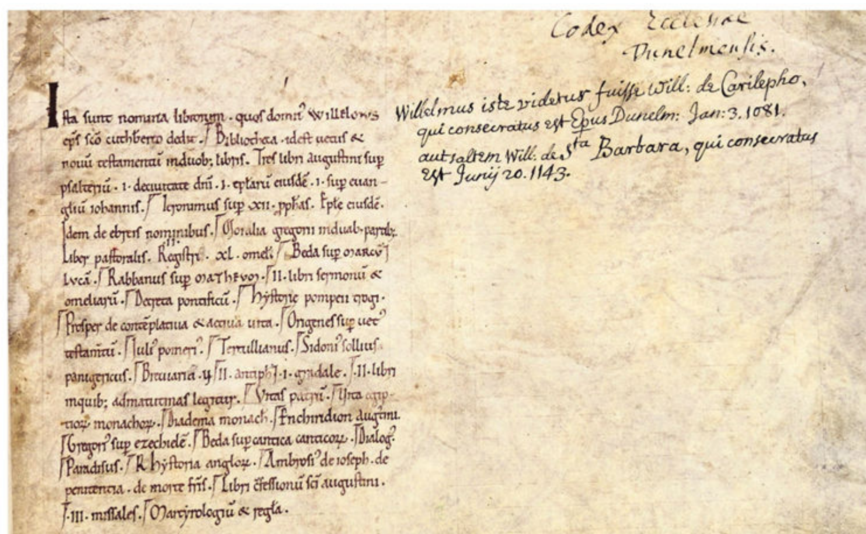
管理员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而他的助手则是一个新西兰人。



达勒姆教堂和城堡，诺曼征服者权威的宏伟象征，摄于火车站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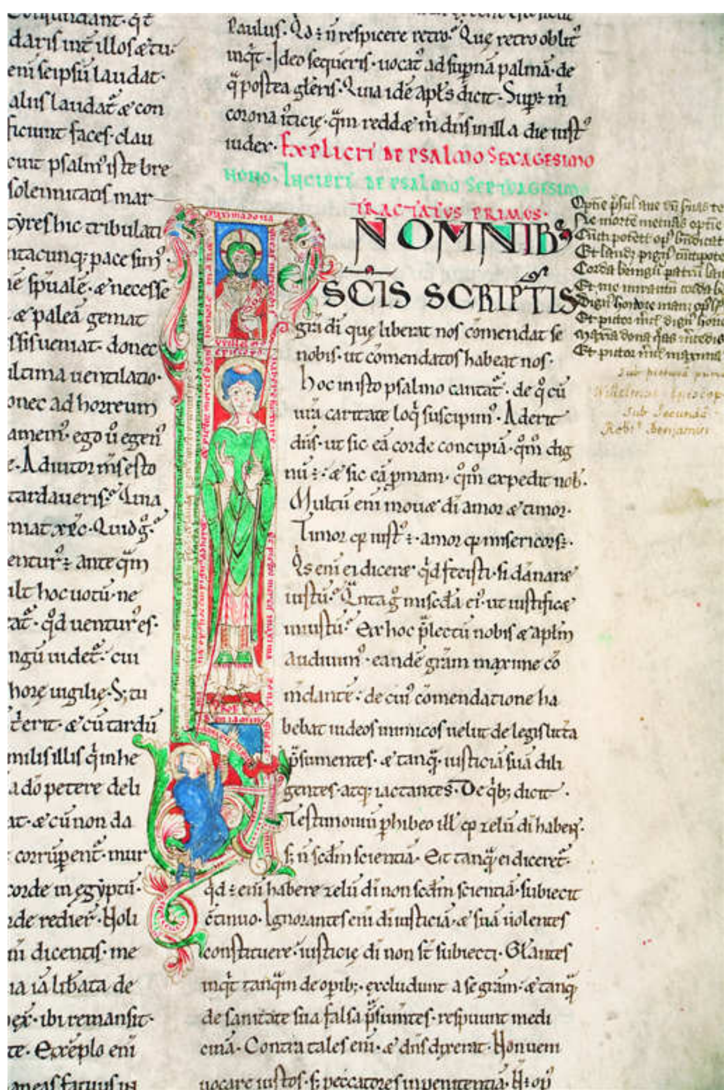
在中世纪，达勒姆的历任主教自然也都是世俗王公，既统领世俗领地，又掌管教会财产。达勒姆教区极为富有。诺曼征服者在此任命的第一任主教是圣加莱修道院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Calais，此修道院有时也被称作圣卡里利夫（Saint Carilef）]，威廉于1081～1096年在此担任主教。他生于诺曼底的心脏之地贝叶（Bayeux）。圣加莱修道院位于法国西北部，就在勒芒的东边，威廉先是这座修道院的副院长，后升任院长，再往后便追随诺曼人，来到英格兰，其恩主是贝叶的奥多（Odo），奥多乃英格兰新王同母异父的兄弟。威廉带来的《圣经》第二卷今天仍然珍藏在达勒姆教堂图书馆，那是11世纪晚期的抄本，是按照王公规格创制的，风格很像“画师雨果抄本”。这卷抄本的第一页上是一份清单，列的是主教威廉赠给自己的新教堂的四十九本书，其中第一本就是《圣经》。这份书单差不多就是诺曼人为新教堂开具的基础书目。其中包括：三卷本的奥古斯丁《诗篇评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以及《约翰福音评注》；哲罗姆的《十二先知书评注》（但没有《以赛亚书评注》）；两卷本格里高利的《训道》以及格里高利《以西结书评注》；拉巴努·莫鲁斯（Rabanus Maurus）的《马太福音评注》；此外就是奥利金（Origen）、比德、安波罗修等人的作品。其中，大约有二十本至今仍然可以在达勒姆教堂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它们能幸存至今应该说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其中奥古斯丁的《诗篇评注》的第三卷，在结尾处有一份长长的纪要，它以韵文体记述道，这本书是在主教威廉离开教区的时候（具体表述为“tempore quo proprio

cessit episcopio”）托人创制的。此等纪要是非常精确且十分珍贵的，因为借此就可以将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定位在1088年年底和1091年9月之间——威廉就是在此期间被迫离开达勒姆并返回诺曼底的（当时他被牵扯进了一场由他的恩主贝叶的奥多领导的反威廉·鲁弗斯的阴谋）。威廉当时肯定已经将抄本送回了英格兰，或者是在自己返回之时随身携带着。这也完全应和了达勒姆教堂的史学家西米恩（Symeon）于1104~1107年提出的相关说法：圣加莱的威廉在1091年结束流亡并回归之前，从诺曼底送了一批书册过来。



圣加莱的威廉赠送达勒姆教堂的书册名录，威廉于1081~1096年间在此担任主教，该名录出现在威廉所赠送的一份圣经抄本的衬页上

奥古斯丁的《诗篇评注》抄本里面的纪要诗中还有进一步的记述。从中可以得知，制作抄本所需材料的费用是威廉主教自己出的，不过，具体抄写工作是另外一个也叫作威廉的人负责的，纪要里的具体表述为，“Materies sumptu sed labor imperio/Nominis eiusdem confers Willelmus”。我们也因此得知了抄写员的名字，至少是这一卷的抄写员的名字。这份三卷本抄本中的第二卷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该卷也仍收藏在达勒姆。其中有一个彩绘首字母，同雨果抄本里面的首字母风格极为相像，字母内部绘有一个站立着的主教，主教的头顶有如下字样：“vvillem[us]episcop[us]”（主教威廉）。圣加莱的威廉身着绿色罩衣，身材高挑，仪态庄严，他脚下是一个躬身屈膝的人物，也被标注了名字，“Rob[er]t[us]Beniamin”（罗伯特·本杰明）。跟画师雨果一样，本杰明也是一个剃发修士，身着蓝色外袍，正用一根修长的手指指向主教大人，同时另一只手持有一个长长的卷轴，卷轴上是敬献给自己恩主的词句，他在祈祷主教大人能在未来收获奖赏，当然也更为实际地希望作为画师的自己能够收获尽可能多的报偿（“et pictor mercis maxima dona”）。



圣加莱的威廉被画在一份献给他的抄本的一个首字母内部，他的脚下躺着抄本画师本杰明

以上情况足以揭示出，达勒姆教堂收藏的三卷本奥古斯丁《诗篇评注》抄本，是于1088~1091年在诺曼底创制完成的，主教自掏腰包提供了抄本所需的材料，其中一个抄写员也叫作威廉，其画师当中包括了一个名叫罗伯特·本杰明的人，他期待斩获酬劳，因此很可能是个职业画师，而非义务劳作的修士。画师的自画像和名字一起出现在了抄本当中，这样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这一点，令奥古斯丁的《诗篇评注》抄本跟“画师雨果抄本”产生了联系，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挑战了“画师雨果抄本”的地位，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后者是英格兰最早的拥有画师自画像和姓名的抄本。

不难想见，如此详细的信息引发了英格兰罗曼时期抄本艺术研究者

的极大兴致，比如说古文法学家米克尔·古利克（Michael Gullick）、理查德·贾默森以及罗德尼·汤姆森（Rodney Thomson），此三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并且对我帮助极大。我们曾多次畅聊到深夜，从各个切入点探讨这些抄本。当我们将达勒姆抄本同埃克塞特抄本进行仔细比较时，我们看到，同一批抄写员不仅参与了供这两座英格兰教堂使用的抄本的创制工作，也参与了供诺曼底信众日常使用的抄本的创制工作，诺曼底正是圣加莱的威廉的流亡地，且他很可能主要是在自己的出生地贝叶度过这段流亡时光的。比如说，威廉主教所用的《圣经》抄本的主要的抄写员，在威廉主教结束流亡的三十年之后，仍然生活在贝叶（主要是米克尔·古利克发现了这一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正是这个抄写员代表贝叶教堂写了贝叶修道院院长、来自萨维尼的维塔利斯（Vitalis of Savigny）的讣告，而维塔利斯的亡故日期是1122年10月。这份讣告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此抄写员参与了奥古斯丁《诗篇评注》抄本的抄写工作（罗伯特·本杰明是该抄本画师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抄录了兰弗朗克（Lanfranc）的作品（这份抄本曾收藏在埃克塞特教堂，如今则在牛津大学），以及格里高利的两卷作品（如今仍然收藏在贝叶教堂图书馆）。而且，还有一名曾参与威廉主教的《圣经》抄本的修订工作的抄写员，也参与了威廉主教赠送给达勒姆教堂的奥利金抄本的校对工作。奥利金抄本的主要抄写员为达勒姆教堂抄写了格里高利的一卷作品，为埃克塞特教堂抄写了奥古斯丁的一卷作品，很可能还参与了奥古斯丁的另一卷目前存放在诺曼底的作品的抄写工作。最后这一卷一度是鲁昂（Rouen）附近、贝叶以东八十五英里的朱米耶热（Jumièges）修道院的藏品。与该抄写员合作的画师包括罗伯特·本杰明，也就是将自画像添加到达勒姆奥古斯丁抄本里面的那个人。从艺术风格可以判断出，威廉主教所用的《圣经》抄本的卷首首字母，出自本杰明之手，这位画师还参与了埃克塞特的奥古斯丁抄本以及贝叶的格里高利抄本的创制工作；并为奥古斯丁的《约翰福音评注》抄本提供了绘图，这份《约翰福音评注》抄本如今收藏在鲁昂，是当地的圣鲁昂修道院的藏品。很显然，他并非在埃克塞特单干的画师，而是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协作，达勒姆、埃克塞特和诺曼底在这个国际协作网络当中特别突出，形成了一个“三角轴心”。

且将这些情况牢牢记下，然后我们返回牛津，回到博德利图书馆的麦克拉斯阅览室，这份拥有“画师雨果”签名的“Bodley 717”号藏品仍然安全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归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份抄本同达勒姆和诺曼抄本是何其相像，它们有同样的大陆抄本风格的整齐针孔，有同样复杂的，饰有深蓝色、绿色以及红色的植物纹理的彩绘首字母。“画师雨果抄本”一定也是在诺曼底创制的。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倘若我错了，地方古物家们尽可以纠正我）：雨果自画像里面，雨果所在的壁龛上方的屋顶显然是砖瓦结构的，但是德文郡的屋顶通常是用茅草铺就的，而砖瓦结构其实是诺曼底地区的传统。米克尔·古利克告诉我，“画师雨果抄本”的羊皮纸完全是来自欧洲的材料，跟埃克塞特当地创制的抄本所用的柔软皮革不一样，而且，“画师雨果抄本”的内页分栏模式是每栏中间刻四条竖线，这是典型的法兰西模式，英格兰抄写员通常会刻三条竖线。这些当然都是小细节，但汇总在一起后意义重大，足

以确证我们前面从达勒姆和诺曼底方面了解到的情况，那就是常常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画师雨果自画像，实际上源自欧洲大陆。

“Bodley 717”号藏品由四个抄写员协力完成，不过画师只有一个。四个抄写员的分工情况如下：第1折，也就是第1对开页右页到第8对开页左页归一个抄写员；第2～18折，从第9对开页右页到第144对开页左页，归第二个抄写员；从第145对开页右页到第185对开页左页的第18行，归第三个抄写员；从第185对开页左页的第19行到结束，归第四个抄写人；全书在第287对开页左页上的画师雨果自画像处结束。和本书其他章中的情况一样，我们需要关注抄写员的工作量是如何在各折之间划分的。抄写员会用不同的工具来确定羊皮纸页面版式，这也表明抄写员都是自行准备抄写纸张的，比如刚刚提到的四个抄写员当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抄写员负责的纸张上会有很深的刻痕；第二个和第三个抄写员则是用铅制铅笔来画线的。抄本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里的第四个抄写员就是画师雨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erat opus. quare non et anni presentis temporis. futura tempora prefigu
rent. De quibus et in alio loco legimus. Quid facietis in diebus conventus
et in diebus festivitatis domini? Quodque iungitur quasi anni mercen
narii. hoc ostendit quod falsa doctrina pro lucro cuncta faciat — De mercenario
atque compendio. Omnis enim mercennarius qui non est pastor. cuius
non sunt oves proprie. cum viderit lupum venientem fugit. quia mercen
narius est. et oves ad eum non pertinent. Quamobrem puto advenam
et mercennarium de sanctis non comedere. nec servos sanctorum esse participes.
Non enim ob dilectionem domini sed ob mercedem cuncta faciunt. qui
comedunt domos viduarum. et proprios adducunt greges ut lanis eorum
vestiantur. et lac mulgeant. Quod de doctrina mercennarii diximus
referamus ad cetera. Si prebeo elemosinam ut glorificer ab hominibus.
recepi mercedem meam. et mercennarius appellandus sum.
Si castum esse me simulo et aliud est in conscientia. habeo gloriam mercen
narii. sed supplicia peccatoris. In comparatione duorum malorum le — De simulantibus peccatum
vius malum est aperte peccare. quam simulare et fingere sanctitatem.
Verum et in hoc perfectus est moab ut qui prius multos erroris sui ha
bebat comites. postea redigatur ad paucos. vel qui prius multus
erat in divitiis peccatorum. post penitentiam parvus et pauper
sit in malicia.

EXPLICIT LIBER SEXTUS INCIPIT LIBER SANCTI
IHERONIMI SEPTIMUS SUPER ISAIAM PROPHET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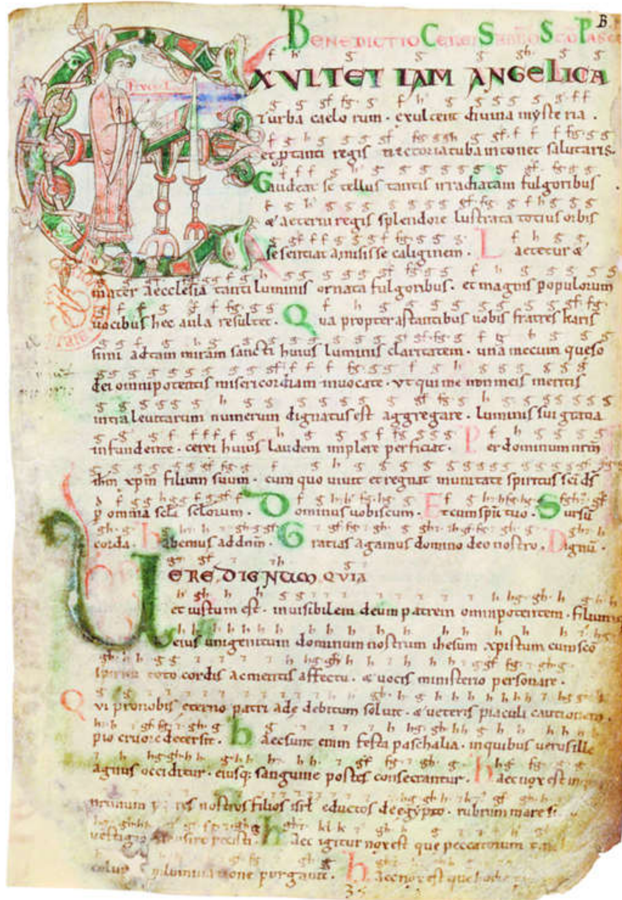
[S]EPTIMUS LIBER
idem iuxta anagogen secundus
est immo extremus. In hoc enim
decem visionum tropologica
explanatio terminatur. Quae cum
tuis custodiam precibus. christo
auxiliante complevero. ve
niam ad octavum. et utramque
explanationem iuxta priores
usque ad quartum libros expla
nabo. Onus damasci. — 5 De oneri d[amasci]
Simmachi et theodotion assump
tio damasci. septuaginta ver
bum contra damascum. addentes
de suo quod in moab fecere
principio. Damasci primum nomen

博德利图书馆的一份抄本上的两个彩绘首字母，出自画师雨果之手；从图中不难看出，当该页面的画师也是抄写员时（如下图所示），正文文字和首字母搭配得相当妥帖；不过，若是先前已经有抄写员完成了文本部分（如上图所示），那么首字母跟文本之间的配合就显得相当勉强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道理的。达勒姆的奥古斯丁抄本提醒我们，抄写员威廉和画师罗伯特·本杰明之间是存在分工协作的。更何况，在画师雨果的自画像中，有明确文字显示雨果是“画师和彩饰师”，并没有提及抄写员这一身份。我认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雨果是整部抄本的画师，毕竟，抄本里插图的风格跟自画像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不过，雨果实际上将自己描画成了抄写员，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画中的雨果正一手在羊皮纸上刻线，为抄写工作做准备（可以看出这是抄写员的工作），另一只手将羽管浸在墨水里面——显然那是羽管，不是画

笔。抄本页面上为特殊的彩绘首字母留下的空间可以辅证雨果作为抄写员和画师的双重身份。暂且抛开第一个抄写员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抄写员都为首字母留出了简单的长方形空白部分，并未事先考量首字母的形状或者构造，他们在这一空白部分的边缘处加上了一些说明文字，以此提示应当嵌入的字母。画师雨果后来绘制的首字母，虽然绚丽且灵动，仿佛在向四处伸展，但在这些四方形空间里仍显得十分拘束。不过，从第185对开页的左页开始，也就是在第四个抄写员负责的折里，文本的边缘会逐行逐行地沿着彩绘首字母的轮廓曲线和笔画调整位置，双方形成了紧密依偎的格局，如同新婚在床的小两口。由此可以推断出，文字和绘图必定是由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抄录和绘制的。也就是说，第四个抄写员定然就是画师雨果。

达勒姆抄本的抄写员留下了自己的身世，至于雨果，无论是作为画师还是抄写员，其身份在多份抄本中得到了披露或者提及。这些抄本中就包括了另外两份同样是从埃克塞特来到博德利的抄本[分别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抄本和格里高利《教牧关怀》（*De cura pastoralis*）抄本]；圣加莱的威廉赠予达勒姆教堂的哲罗姆《十二先知书评注》；奥古斯丁的箴言集（这份抄本最终辗转到了瑞典，具体经过无从得知，有可能是从英格兰传过去的）；以及一份最能说明问题的安瑟伦（Anselm）的次要作品集抄本（现今收藏在鲁昂，一度属于诺曼底的朱米耶热修道院）。这份安瑟伦抄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抄本文字显示，安瑟伦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期当中，而安瑟伦是在1093年登临大主教之位的，因此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肯定在这之后，也就是在圣加莱的威廉回归达勒姆之后。由此便可以推断出，雨果并没有像人们一度认为的那样，以随从身份陪伴威廉返回英格兰，而是留在了诺曼底。雨果在朱米耶热修道院收藏的另一份抄本中以画师而非抄写员的身份出现，这是一卷圣徒传记抄本，如今收藏在鲁昂。他有可能还担任了11世纪晚期的一份赞美诗集抄本的画师，仅凭风格就可以断定那是朱米耶热修道院出品，如今该抄品的残页收藏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此一推断十分可信，因为这份赞美诗集抄本里面有一幅配图，呈现的是一个正在吟唱和祝圣的神父，人物形象很小，旁边写有红色的“Hugo levita”（意思很可能是“Hugo the Levite”，或称教会执事雨果）的字样。这幅图跟“Bodley 717”号藏品里的绘图风格极为相近，名字也很相像，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可能是，不过我还无法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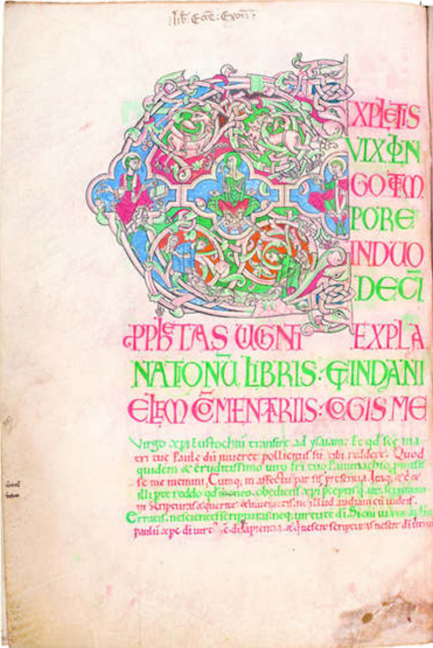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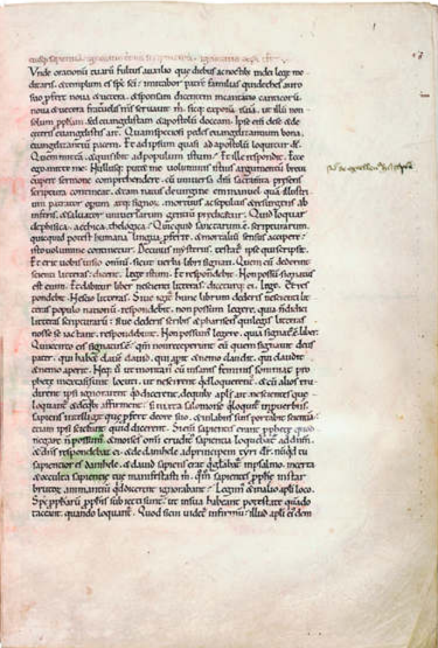
一份赞美诗集抄本的残片，是在诺曼底完成插图绘制和装饰的，该抄本画师的画风跟画师雨果的风格非常相像，留有签名“Hugo Levita”，他们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可以肯定，有一批组织严密的抄写员和画师在为英格兰的埃克塞特教堂和达勒姆教堂创制抄本；而达勒姆教堂的抄本提供的诸般证据显示，贝叶而非朱米耶热更有可能是这些抄本的创制地。圣加莱的威廉主教所用《圣经》抄本的抄写员，在三十年之后仍然在为贝叶教堂参事会工作。埃克塞特教堂和索尔兹伯里教堂一样，并非本笃会性质，而是在俗性质的，由教堂牧师管理教堂，这跟贝叶教堂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因此可以想见，埃克塞特教堂参事会更可能跟诺曼底的姐妹教堂合作创制抄本，而它跟一个本笃会修道院协作的可能性倒不是那么大。实际上，贝叶教堂并非人们看起来那般偏远且难以抵达。确切地说，它到埃克塞特的距离，跟埃克塞特同伦敦之间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且，从贝叶乘船前往埃克塞特，较之埃克塞特和伦敦之间的陆路，便利得多。倘若雨果也同贝叶的这间“出口作坊”有关联，那么诺曼底远端的朱米耶热从逻辑上来看很有可能跟埃克塞特和达勒姆一样，是“进口方”。实际上，法国和英格兰最早一批提及修道院雇用抄写员和画师进行规模空前的抄本创制的文献，虽然记录得并不十分详细，但都来自这一时期。

甚至有迹象显示，这些作坊是有办法接触到预先备好并等待抄录的抄本的，更有可能接触到先前规模宏大的，但未完工就暂停了的抄本创制工程。有人提出，圣加莱的威廉接管了达勒姆奥古斯丁抄本中第二卷后半卷起的创制工作，也就是从画师罗伯特·本杰明和主教大人的插图起。“Bodley 717”号抄本也有类似的情况。雨果接手抄本之时，文本抄写工作已经进展到第185对开页的左页，但还没有绘制插图。雨果遂抄录完了剩下的文本，然后从头开始，在先前抄写员留下的长方形空白部分画上插图。抄本构造方面的一个小细节足以向我们表明，绘制插图发生在抄写文字之后，而且这是对该抄本进行的一次有意识的升级。前文给出的校勘情况提到，第1对开页前面有四张单页（博德利图书馆的页码标注员将之标注为第iii~vi对开页）。当时我说这个小细节背后隐藏了重要信息。在雨果接手的时候，第一对开页前应该只有普通的一页纸的开篇，开篇词为“Unde orationum tuarum …”（见1993年影印版的第13行）。而雨果在接手后将此一单页撤除，用四页全新的开篇彩图取而代之，它们都由雨果亲自绘制，画工之精美可谓前所未有，雨果借此强调欧多钦及其母亲作为文本的雇主，在哲罗姆评注本诞生过程中的作用。在抄写至接近第vi衬页左页的底端时，雨果很可能意识到，他用红色和蓝色抄写的文字可能无法跟前人留下的“Unde orationum …”行衔接。于是，雨果开始缩小各行间距和字体。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尝试，转而在“Unde orationum …” 行上方，也就是第1对开页的右页顶端加了一行文字，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做到精确衔接，只能擦掉重写，由此才得到了平顺的开篇。

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确认雨果是不是修士。无论是雨果还是罗伯特·本杰明都不曾以“修士”自称（“修士”应被表述为“frater Hugo”）。倘若二人真的是修士却没有给出这样的称谓，那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二人都不觉得11世纪时，还有修士以外的人在创制抄本，更何况二人在自画像中都是剃发修士的形象。实际上，还有一个稍晚一些的画师，威廉·德·布莱利斯（William de Brailes，约1230~1252）也曾在一份英语抄本里留下了签名自画像，牛津的书册交易档案里有他的名字，德·布莱利斯在一份时祷书抄本中以及一份《圣咏》抄本的引言中都留下自画像；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他并非修士，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塞丽娜的妻子，并且在凯特街（Catte Street）上有一处私宅。由此可见，自画像中剃发的形象有可能只是在向教堂中的神职致敬，并表明自己作为神圣之书的抄本创制者的身份。就自画像之真实性而言，剃发的形象跟雨果的绿色头发或者罗伯特·本杰明的光晕差不多，都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





第288～289页：该抄本一开始十分朴素；画师雨果增加了相当奢华的开篇页，令抄本得到升级，他同时也相当小心地将左页的文本与右页上先前已经抄录完毕的文本衔接起来。在彩绘首字母当中，哲罗姆以抄写员的形象出现在最左侧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Bodley 717”号抄本里面的自画像。其中的配图文字“pictor & illuminator”显然是重复了，这一点很是怪异，因为两个词都指的是画师职业。严格来说，“illuminator”指的是抄本彩饰师，他们通常用金银来装饰抄本，令其在光照之下可以闪闪发光[因此被称为“illuminator”（也有照明者之意）]，但是在埃克塞特-达勒姆-诺曼底的抄本体系当中，并没有出现用金装饰抄本的情况。因此，此处这个词应该是泛泛地指装饰抄本的人。所谓“pictor”是指“画师”，其意思应当与彩饰师略有不同。画师当然不可能指抄写员。就我们对中世纪抄本装饰行业的了解，彩饰师通常也会创作壁画以及人们需要的其他艺术作品。雨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涉足多个领域的手艺人，并且也有可能是此抄本的总设计人。在达勒姆抄本里面，画师罗伯特·本杰明的自画像呈现了他本人在跟资助人交谈而非作画的情景。因此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罗伯特和雨果在他们各自的抄本的创制过程中，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协调人的角色。

事实上，雨果不太可能是左撇子。左撇子的字迹通常会向左倾斜，雨果的字迹并无这方面的迹象。他可能是照着镜子给自己画像的，尔后忘记进行调整了[也可能他知道这画像是相反的，所以才称之为“*Imago*”（镜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自画像中，他左手拿着羽管的形象并不是为了呈现他抄写或者绘图的情景，而是要呈现他在设计书页版式的情景。画面中的他正在用右手刻线，左手的笔因此就只作备用。

倘若画师雨果的确是贝叶教堂的主画师，那就为我们追踪埃克塞特教堂这批著名抄本的赞助人的身份提供了一条线索。跟罗伯特·本杰明不一样，雨果并没有提到资助人的名字。这么大的抄本，装饰得如此华丽，有如此丰富的插图，即便在圣加莱的威廉这样的采邑主教（prince-bishop）获取的藏品当中，也是找不到的，其所需的花费当然是非常高的，更何况这份抄本是一套九卷的抄本集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这些抄本是在奥斯伯恩主教任期的后半段，也就是1072~1103年来到埃克塞特的。有关奥斯伯恩主教，来自同时代的评价并不多，据这些有限的信息，这位主教并非铺张之人，也不以对自己的教堂的慷慨捐赠著名——这一点跟圣加莱的威廉不一样——而且在任期的最后几年中，奥斯伯恩深受疾病折磨，眼睛也瞎了。但不管怎么说，奥斯伯恩出身于一个诺曼显贵家族，是征服者威廉排行第二的堂弟，也是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Osbern，亡于1071）的弟弟，在黑斯廷斯战役当中，他紧紧陪伴在征服者威廉的左右，后来成为第一任赫里福德伯爵，并很快成为英格兰的巨富。更重要的是，菲茨奥斯本兄弟俩同时也是贝叶的奥多的堂兄弟。奥多在黑斯廷斯战役当中同威廉·菲茨奥斯本并肩作战，并于1049~1097年担任贝叶的主教。奥多甚至比菲茨奥斯本兄弟俩更有钱，拥有的财富仅次于征服者威廉。在埃克塞特抄本和达勒姆抄本的创制过程中，他很有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1088年，他在圣加莱的威廉的陪伴之下，从英格兰返回贝叶，而且两人在1089年共同见证了贝叶获得特许状之事。奥多很可能资助了贝叶挂毯，也因此名扬四海。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就不难猜测了。集“画师”、抄本设计人、手艺人这三个身份于一身的雨果，很可能就依附于奥多家族。在“Bodley 717”号抄本中叙事性的插图和贝叶挂毯呈现的画面之间，存在总体上的相似性，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如小而圆的眼睛、长鼻子、小嘴，复杂的建筑背景，以很大的大写字体为标题，字体色彩交替变化等。雨果是抄本彩饰师，这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他的“画师”身份呢？有理由认为，他和罗伯特·本杰明都是主教大人麾下的团队的成员，也正是这个团队设计了贝叶挂毯。

在对近乎千年之前的历史的探察中，有一个由长久的时间间隔带来的小小好处，那就是你可以尽可能大胆地猜测，而不需要超乎可能的证据的支撑。达勒姆的奥古斯丁抄本和埃克塞特的哲罗姆抄本很可能在被罗伯特·本杰明和画师雨果分别接管时，创制工作就已经进展到中途了，具体接管时间有可能是在1088年前后。此一时期，部分抄本流入埃克塞特和达勒姆，这有可能是因为贝叶教堂的抄本创制工作出现中断，这些书册碰巧被拯救出来并发往英格兰。若真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抄本的创制工程的“策源地”应当就是贝叶，“策动者”应当就是贝叶的奥多，并且很可能是奥多为了自己的教堂而启动了这项工程。1087年，奥多失去皇族恩宠，也失去了自己的财富，书册的流散很可能与这个情况有关。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圣加莱的威廉手头正有不少钱财，并且很可能另一个来自埃克塞特的人也有闲钱。后者并非没有可能是菲茨奥斯本家族的成员。第一任伯爵的遗孀及大部分孩子过早谢世，因此没有可能资助画师雨果的抄本，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伯爵的一个名叫艾玛（Emma）的女儿。1095年，艾玛仍然在诺曼底，并立誓加盟贝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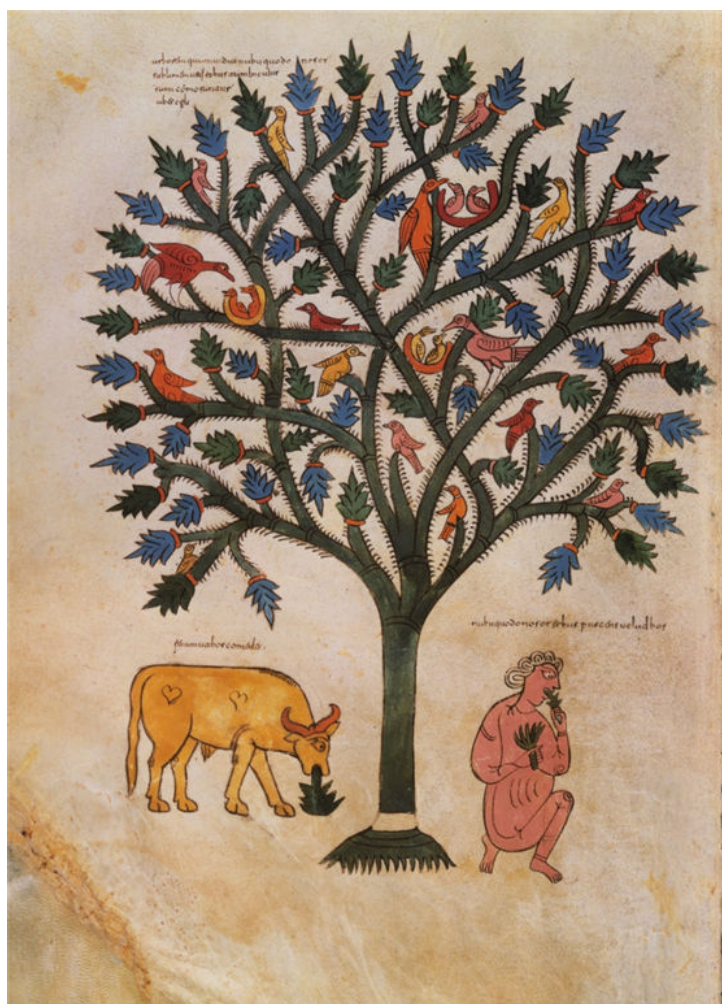
奥多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她最终也死于诺曼底。不难设想，艾玛·菲茨奥斯本完全有可能为了舅舅的教区而资助如此奢华的抄本，更何况“Bodley 717”号抄本里后增的卷首插图强调了此抄本得到了两名妇女的资助，同时也呈现了圣地的景象。

最后，我们来看看画师雨果的自画像，找一找画像中有关11世纪晚期抄本创制工艺的信息。插图当中，雨果所坐的椅子上两边扶手末端都打了孔。其中一个孔里面松松地放置着一个墨水壶，且这墨水壶显然是有意识地被这样放在距离抄本最远的地方的，毕竟，它看上去摇摇晃晃的，非常不安全。倘若将两个孔都用上，那么抄写员就能够同时将墨水和各色颜料置于手边。雨果使用的笔显然是一整根羽毛（正如埃克塞特谜语里面说的那样，“鸟儿啾啾”），它很可能是鹅毛，上面的羽枝仍在，尽管现代的抄写员通常觉得羽毛笔的羽枝应当被全部剪除。那墨水应当是鞣酸铁墨水（Iron gall ink），是从栎五倍子（Oak apple）里面压榨出来的。栎五倍子是一种球状瘿，长得像木制小球，会于五倍子蜂在橡树树枝之上产卵之后生长出来；将其提取物同绿矾混合起来，就可以制造出鞣酸铁墨水了。埃克塞特谜语里面也曾提及从树木提炼而来的颜料，很可能就是指来自橡树的黑色墨水，这种墨水也可以是红色的，只需要将原材料换成巴西红木或者茜草就可以了，两者都是植物（其他红色颜料如朱红色则是由矿石提供的）。雨果正在创制的抄本被放置在一个单独且倾斜的小读经台上，读经台乃以衣物覆盖，目的是保护和固定抄本。读经台的倾斜度可以令抄写员手中的笔同页面形成四十五度的夹角，这样一来，墨水就不会过快滴漏下来，弄脏抄本——我们在童年时代从海滩上捡羽毛试着写字玩时常会遇到墨水滴得过快的情况。雨果另一只手中的刀（当然是一把小刀）可以作刻线之用（雨果本人的刻线力度是非常大的），也可以用来固定书页，使书页不会沾染手指上的天然油脂，当然还可以用来将羽管削得更为尖锐一些，毕竟削笔的工作在一个白天里要重复多次。

抄本的开篇另有两幅抄写员的画像，也都呈现了哲罗姆在写作的情景。第一幅图差不多就是雨果自画像的孪生体，可能是雨果有意向哲罗姆这位勤勉的圣徒致敬并寻求认同，我们要特别考虑到，雨果和圣徒哲罗姆背后的资助人都是女性。两幅画像当中人物穿着非常相像的宽袖蓝色长袍，都戴有兜帽，也都穿着白色贴身衣。两人的鼻子都长且弯曲，脸颊上有粉红色的斑点，两人的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为绿色并且头顶都被剃光了。实际上，图中的绿色应当是用来表现灰色的。在第一张用来呈现哲罗姆写作情景的插图当中，哲罗姆是坐在一张有坐垫的凳子上面的。在此不可忘记，当时的抄本采用的是单栏格式，因此每一行都很长。此等情形之下，抄写员通常会选用凳子而非椅子，以方便自己在凳子上来回滑动，而不需要不断地扭动整个身体。第二幅插图里面的哲罗姆则更黑一些，也蓄了胡子，跟雨果的相似度没有那么高了，而且这里的哲罗姆坐在椅子上面，椅子两个扶手的末端都有龙头装饰。龙的嘴是张开的，用来放置墨水壶和活动书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配备了龙头装饰的椅子，在贝叶挂毯里面出现了两次。

请注意三幅画像里面的抄写员是如何执笔的。今天人们的执笔习惯

是将笔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并通过来自拇指的压力稳定笔杆。具体的运笔则是由拇指和食指来操控的。在这些画像里面，确切地说是在所有呈现了抄写员工作情景的中世纪抄本插图里面，抄写员都是用拇指将笔抵在食指和中指的内侧，就像是在倒拿画笔一样，且其无名指和小指会紧紧地蜷缩起来。要进行这样的抄写工作，就需要整只手在页面上来回移动，整个手臂也要参与运动。中世纪抄本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来自抄写员的感叹，“Tres digiti scribunt totum corpusque laborat”，意思就是，“三根手指在写，全身在劳作”； 在11世纪晚期的英格兰的抄本当中，就至少有一份抄本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不过，雨果的执笔方式毫无疑问会使他在写作时更容易转动笔尖，由此写出当时非常流行的粗细或宽窄不一的笔画，这也正是罗曼时代的书法的迷人之处。正如埃克塞特谜语讲述的那样，三根手指和一支笔，共同踏上旅程，身后留下的黑色脚印最终填满抄本并辅助了伟人，同时抄本自身也变得神圣。哲罗姆以及画师雨果分享了这一体验，是抄本将相隔七百年时光的两人联系在了一起：雨果带着哲罗姆写就的文本，与征服者一同进入诺曼英格兰。



注释：

[1] 具体校勘情况如下：两张中世纪衬页＋四张单页（第iii~vi页）＋i~xxxii^{6}，xxxiii^{8}，xxxiv~xxxv^{8}，xxxvi^{10}＋两张中世纪衬页。大多数折的最后一页上被标注了罗马数字。后文会就第iii~vi页的这四张单页进行研究，因为这四张单页隐藏了十分重要的信息。

第七章
哥本哈根圣咏

12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

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

MS Thott 143 2°

进来吧，别紧张。先在管理员处登记一下——出于礼节，其实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人们是不会介意这些的，丹麦人从来都是那么友善和好客。拉一张黄色的转椅过来，然后安坐下来，仔细观察眼前的这份抄本。声音别太大，因为这里还有其他人在翻阅抄本。丹麦王国中最为精美也最为著名的彩饰抄本就在你面前的桌子上，打开着，两侧由泡沫垫子支撑着。且在我身边坐下来，我们一起仰慕一番。先别碰它，只是看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眼前的这份抄本都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杰作，保存状况近乎完美。这是一份巨大的拉丁文《圣咏》（Psalter）抄本，取自《旧约》中的《诗篇》，诞生于12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我一直觉得，那是西欧抄本史上最伟大的时间段。眼前这份抄本恰恰就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彩饰抄本”的模样。其精美和丰富程度，远胜于早了它七十年的“画师雨果抄本”，尽管后者也是精美之作；当然也胜过塔巴拉的梅雅斯那虽然朴素但也触碰人心的作品。倘若抄本也有配乐，那么《哥本哈根圣咏》抄本就需要小号和教堂风琴予以支撑。它的每一页都闪着金光，装饰之华丽令人赞叹。经文的书法更是堪称恢宏。抄本开篇是十二页圣徒年历，文本用多种颜色写就，接着在《诗篇》第一篇开始之前，还有十六幅整页插图，这些插图令人叹为观止，是抄本的荣耀所在。我们就从这十六页插图开始吧。插图都是圣像画的大小，呈现的场景彼此相继，一页一页翻过去，就如同在看一本画册。这不仅是一组装饰了彩绘文本的书页，更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其中第一幅插图在第8对开页的右页，呈现的是“圣母领报”（Annuciation）的场景。画面当中，天使加百利和圣母面向对方、目光相对，分别站在回廊的两座拱门下，并且都举着右手，表明他们正在说着什么。从二人的左手中各有卷轴垂下，分别表现的是加百利所说的话，“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以及圣母的回答，“fiat michi s[e]c[un]d[u]m v[er]bu[m]tuum”（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见《路加福音》1:28和1:38）。加百利长有紫色和褐色、中间点缀着白色斑点的双翼，身穿浅蓝色袍服，外披极为华美的红色和绿色的斗篷，斗篷在他身后迎风飘动，仿佛他在跟圣母交谈时，仍然在空中飘动。他的眉毛很浓，前额有皱纹。他赤着脚并且惦着脚尖，但即便如此，圣母仍然要比他高出一些。此处的圣母并没有像后来的欧洲艺术作品里的那样身着蓝色服饰，而是穿了有深紫色色调的褐色长袍，长袍做工极为精美，像是上乘绸缎，衬裙色彩丰富，尤其是在圣母脖颈处。圣鸽已然飞临圣母头顶。插图的背景是一整面极为鲜亮的金色色块，我们甚至能从

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映象。两个拱门的上方是拿撒勒那罗曼风格的色彩斑斓的砖瓦屋顶。

现在且让我为诸位翻动书页。同一书页的另一面呈现的是“圣母往见”（Visitation）的场景。这幅插图的边框十分鲜亮，如同默兹珐琅（Mosan enamel）一般。画面当中，圣母和她的表姐以利沙伯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路加福音》1:40），两边是两棵摇曳着的树，树上结满了充满象征性意味的红色果实，寓示这两个女人都有了身孕。二人的着装同样极为艳丽，且都饰有丰富的花纹，背景仍然是鲜亮如镜的金色。《哥本哈根圣咏》抄本中的插图并没有标题点明图中场景，这跟其他很多抄本不一样。应该说，中世纪时但凡拥有这些抄本的人，都是熟悉图中场景的，或者此等抄本的主人也只能是那些拥有私人牧师的人，而私人牧师可以在主人打开抄本时向主人讲述里面的故事。比如说，在看到这幅插图时牧师就会告诉抄本的主人说，此时马利亚将诵唱《尊主颂》，《尊主颂》是一首《新约》颂歌，就在这份《圣咏》抄本的最后。



右页：“圣母领报”图，天使长加百利祝贺圣母，圣母回应说，自己会接纳圣言







第300～302页："圣母往见"图，圣母和以利沙伯拥抱在一起；天使向牧羊人报喜，牧羊人被呈现为长相怪异的农夫；基督诞生，周围环境相当奢华，马槽里的圣子头顶悬挂着一顶王冠

跟"圣母往见"图正对着的插图，呈现的则是前者所在的九个月之后的一个场景。一个巨大且看来很重的天使从金色天堂落下，正落到三个极为丑陋的乡间牧羊人的头顶，这三人正在看守他们那瘦骨嶙峋的山羊（注意不是绵羊），旁边应该是一只灰色的猫（也可能是一只变形了的小狗）。这样的画面很可能会令现代人感到震惊：中世纪艺术作品通常将这些乡野之人呈现为次等人。图中显然没有什么田园风情。天使告诉他们说，即便他们只是普通农夫，"ecce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1]（见《路加福音》2:10；此处就不对拉丁文做翻译了，因为这句话对12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家喻户晓，即便是半文盲也明白其意思）。再次翻动书页便能看到这一大喜的消息，因为插图呈现的是基督诞生的场景。那场景中丝毫没有乡村马厩的原始气息。确切地说，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流社会，这里可能是一座宫殿，最起码也是一座气势恢宏

的教堂。圣母是画中主角，躺在一张巨大的斜榻之上，一只手枕在脑袋下面，斜榻铺有极为华贵的蓝色布料。这里的圣母没有光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红色的绸缎枕头。她的右边侍立着约瑟，灰白胡子，戴着红色的犹太帽。循着两人的眼神而去，便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盒子，如同石棺一般飘浮在金色空间里，那里面就是被紧紧地包裹在紫色襁褓里面的圣子，一头蓝色的驴子和一头湿鼻子的牛正在用脑袋安抚那婴儿。两道红白相间的布帘打开着，将这场景呈现在我们眼前，其中一道布帘卷在圣母床榻后面的画框上，另一道则在约瑟背后。屋顶有吊灯垂下。一个镶嵌着多彩珠宝、类似皇冠的东西，悬浮在圣子的脑袋上方。

接下来的四幅插图的主角是王（这些国王有好有坏），它们极为详细地以东方三博士的叙事顺序展开（见《马太福音》2:1～12）。它们位于第10对开页的右页到第11对开页的左页。其中有三个王头戴王冠，他们在希律王的王宫见到希律，向他询问预言中那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降生。之后，三王便骑马穿过一片树林赶奔伯利恒，虽然有皇家的威严气质，但也行色匆匆，并由那颗星来引路。我们楼下的图书馆商店里有用这幅插图制作的明信片。（实际上，这一抄本中的很多场景都可以被制作成圣诞贺卡。）正对着这一页的插图呈现了三王抵达目的地并指引人们敬拜圣子的场景，圣子坐在母亲的腿上，手持权杖（俨然已经是王了），圣母则端坐在王位之上。接下来的场景是希律王，也就是王宫里面的那个坏王，命人屠杀犹太全地的婴孩，这一场景被呈现得极为生动且可怕，背景中的果树变黑并干枯了。这里面也有故事可以讲述，并且也能提供范例供人们效仿或者规避。



三博士，以三王的形象出现，他们在星辰引领下策马穿越树林，前往伯利恒朝见圣子

插图的故事还在继续。圣母一家由天使引领逃往埃及。他们身后的那个年轻人，据中世纪的说法，就是与耶稣一同接受十字架之刑的“善贼”（Good Thief）。随后幼年耶稣出现在神殿当中，他的头顶同样有吊灯和镶嵌了珠宝的王冠。接下来是圣子在长大成人之后，接受施洗者约翰洗礼的场景，耶稣和约翰就站在约旦河的绿色水波当中，水中有鱼儿在游动。第13对开页的右页插图里耶稣骑着一头驴子，以谦卑之态进入耶路撒冷，城中居民则宣示耶稣为王。这幅插图有一个怪异之处。耶稣头顶有一个手持镶嵌着精美珠宝的圣物十字架的天使飞临。此一细节在中世纪艺术品当中独一无二，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的，它很可能是在暗指7世纪的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的神奇传闻，据说这位皇帝只有卸去皇冠，如同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那般，以赤脚忏悔者的身份谦卑地进入圣城，才能将“真十字架”（True Cross）送还耶路

撒冷。接下来耶稣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遭到出卖，并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上方有“犹太人的君王”的字样），再往后就是他复活并最终荣登天堂王座的场景。君王身份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中世纪观念当中，基督之道成肉身和降生，已然是在大卫的《诗篇》当中被预言了的，而大卫本身就是王，也是一个王朝的先祖。于是，接下来便是《诗篇》的正文。在开篇页第17对开页的右页上，有一个差不多占了整页的巨大的字母“B”，该字母中呈现了一个热闹的场景：一个怪物从口中吐出无数触须，它们如树丛般纠结成团。该场景的背景是亮金色的，上面压印了花。其中还有一条狗在一个裸体的不幸之人的两腿之间嗅探，此人正试图穿越这片低矮树丛。这一页的文字是以如下字句开篇的：“Blessed is the man,who walks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人便为有福）。《哥本哈根圣咏》抄本的奢华、精美程度，的确是在其他抄本中都见不到的。粉红色的边框将那开篇首字母围绕起来，边框上有七颗巨大的金色星星。每颗星星的正中央都粘了一颗宝石，这些宝石都是（或曾是）货真价实的。此等情形实在是非同寻常。这些都是很小的宝石，很可能是蛋白石。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些宝石应该来自波希米亚、匈牙利，甚至埃塞俄比亚。我禁不住想用指甲抠下来一颗，而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宝石不见了。



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谦卑地骑着驴，头顶有天使飞临，带来极为奢华的镶嵌着宝石的十字架

在仔细翻阅这样的抄本时，当然会很想知道，究竟何人才是其背后的资助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自定的准则：倘若不能确定某份抄本是不是皇家抄本，那该抄本就不是皇家抄本。原因很简单，倘若抄本的资助人是中世纪的君王或者皇帝，那它的奢华程度定是一目了然的。2011年，大英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彩饰中的天才之作”（The Genius of Illumination）的精彩展览，专场展出皇家抄本。想想这些抄本诞生时期的欧洲大地，半数人口在饥饿中挣扎，君王们却在私人书册上肆意挥霍钱财，这光鲜与黑暗的剧烈反差，令人禁不住生出义愤之情。此类抄本是自成一个“阶层”的。《哥本哈根圣咏》是那样的精美，令人目眩神迷，全书穿金戴银，仿佛在昭示君王取之不尽的黄金和珠宝，君王们的画像更是反复出现（别忘了，到此处，我们才看了十二三页），这一切都可以让我们基本确认，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就是为一个皇家主顾创

制的。

如今，丹麦王室成员也都骑单车，会去超市购物，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并因此获得世人称赞。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肯定是全然不同的。在那个时代，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方式判若云泥，这种差异在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已然踪迹全无。当时的平民若是有幸觐见王室成员，肯定会被后者的财富和派头彻底吓倒。那都是王权的标志，并非纯粹的个人贪欲所致。在那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等级社会，权威之维持依赖于对自己拥有的优越地位和丰富资源的不断重申。我本人在翻阅另外五份罗曼风格的私人《圣咏》抄本时，也曾为它们展示出的巨大财富所震慑，这些抄本将在本章反复出现。现在，且想象皇家舞会的场景，五份光芒四射的抄本就那么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我可以借此机会将它们一一引荐给诸位了。（1）《亨特圣咏》（Hunterian Psalter），收藏于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这份抄本的资助人后文中会有提及；（2）《英厄堡圣咏》（Psalter of Queen Ingebourg），丹麦的英厄堡是法兰西国王菲利浦·奥古斯都（在位于1179~1223）的王后，这份抄本收藏在尚蒂伊（Chantilly）的孔德博物馆（Musée Condé）；（3）《阿弗朗什圣咏》（“Avranches” Psalter），很可能是为菲利浦·奥古斯都本人创制的，今天收藏在保罗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4）《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圣咏》，布兰卡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在位于1223~1226）的王后，该抄本现藏于巴黎阿瑟纳尔图书馆；（5）《莱顿圣咏》（Leiden Psalter），这份抄本很可能是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之子、若弗鲁瓦·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创制的，跟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一样，它如今也收藏在莱顿大学图书馆。这五份抄本都是非凡之作。跟《哥本哈根圣咏》抄本一样，它们在造价和奢华程度上都超过了本书中目前出现的所有其他抄本，与君王的派头十分相衬，且它们对自己的皇家身份毫不掩饰。



《哥本哈根圣咏》中的开篇彩绘首字母，绘有半纹章式的鹦鹉和狮子图案，边框上装饰了真宝石

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属于一座皇家图书馆。但今天的丹麦皇家图书馆（Det Kongelige Bibliotek）实际上发挥着国家图书馆的作用。这座图书馆早先是丹麦国王的私人图书馆，是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三世（Frederik III）于17世纪创立的。自1793年开始，这座皇家图书馆便成了公共图书馆。1906年，丹麦在城堡岛（Slotsholmen）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砖墙建筑供该图书馆使用，城堡岛通过一座大桥与陆地连接，位于哥本哈根旧城以南大约一英里的地方。1999年，人们对这座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由此打造出了所谓的“黑钻石”（*den Sorte Diamant*），“黑钻石”通过多个通道与旧建筑连接，由此将整座建筑延伸至街对面，且一直到港湾的水边。扩建部分就像是两个巨大的接近长方形的方块，并且是倾斜着的，由抛光的黑色花岗岩和玻璃建造而成，

设计师是施密特（Schmidt），来自哈默尔和拉森建筑公司（Hammer & Lassen K/S）。这是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地标建筑之一，建筑成本之高令人震惊——你若是跟任何丹麦人说你来过这里，他们都会跟你提到这一点。在一个早晨，我离开哥本哈根老城区，穿过尼尔斯朱尔斯大街（Niels Juels Gade）和克里斯蒂安码头区（Christians Brygge，这实际上是一座啤酒厂的名字，因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曾在附近建了一座啤酒厂），迎着雨点步行前往图书馆，一边躲避着过往的单车，一边挡着运河方向吹来的阵风。图书馆的大门并没有开在港口边上，而是建在“黑钻石”另一边的角落附近，这可能跟人们的预期不一样。进入大门后你首先看到的是一间书店（书店里面也出售雨衣，丹麦人是非常讲究实用性的），穿过这间书店，便可以进入中庭，从中庭出发，登上一架长长的坡度较缓的扶梯，就可以到达一楼（但这架扶梯的速度之缓慢令人难以置信）。一楼问询台的女士非常和善，她会指引你进入身后的电梯，抵达被标注为“F Vest”的楼层。出了电梯向左拐，就可以看到一条安装了玻璃护栏的通道，通道尽头左侧是一道大门，上面标注了“Center for Manuskripter og Boghistorie”（抄本和珍本中心）的字样，进入这道大门，你便会发现自己位于一个夹层画廊里，这就是珍本阅览室，它的下方是图书馆中庭的开放空间。这样的格局有点像是一艘游轮，珍本室所在的顶层甲板下方还有多层甲板（实际上那些也都是阅览室），每一层都要比下面一层多向外伸出一部分，最下方还有多个楼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想必也是这样的格局吧。底层就是图书馆的门厅，门厅中间是那架运行缓慢的自动扶梯，右边是一整面巨大的玻璃墙，透过玻璃就可以看到港湾里闪闪发光的水波，仿佛在装点着图书馆。



“黑钻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扩建部分，站这一中庭内可以远眺海港；珍本阅览室就在照片右上角的露台后

在我进入图书馆的时候，里面有一群显然是乡下来的人，他们就像是《哥本哈根圣咏》插图里面那些牧羊人的后代，正围在入口边上的问询台前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明白他们那复杂的问题，很可能跟家族史有关，而唯一的工作人员在耐心且悉心地帮助他们。我难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其他国家图书馆里。我站在旁边等着，不知道他们的问询会持续多长时间，就在此时，图书馆的研究中世纪抄本的首席专家埃里克·皮特森（Erik Petersen）匆匆走过来，将我拉到一边，非常礼貌地对我表示欢迎。他的头发颜色很浅，略显稀薄，还有些散乱；他戴

着小小的眼镜，而且跟许多丹麦人一样，也是那种你会特别喜欢的和善、平易之人。他穿着开领的衬衫——丹麦人都是这样的装束。实际上，他的胳膊下已经夹着那份著名的《哥本哈根圣咏》抄本了，只不过抄本仍然藏身于一个深绿色的盒子里。埃里克带着我，顺着阳台边缘走到一排桌子面前。读者区是由一块块长方形的直立玻璃隔开的，玻璃的形状就如同书档。桌子都是铁灰色的，这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或者说现代古斯塔夫风格，桌面上铺着厚厚的透明塑料板，这样桌面就更柔软一些，不像金属那般冷硬，在那上面写字也会更舒适一些。管理员在一些塑料板下压了注意事项单，但并不是禁止事项单，这一点跟大多数图书馆的做法不一样，它们是为了告诉读者一些可能会有帮助的事，比如说读者可以给抄本拍照，我也照办了。埃里克将桌子上的小灯打开，并帮助我将泡沫衬垫放好，以支撑抄本。之后他便将盒子放在我面前。我说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去确定《哥本哈根圣咏》那谜一样的起源。他也叹息了一声。“我不是什么艺术史家，”他说，音调不高，用的是丹麦人说英语时常用的那种平缓且单一的语调，仿佛是在讲一个冷笑话，“艺术史学家总是一下子就跳到结论部分，那也太快了。”在整个这一章中，我们都应当将埃里克的这项劝诫记在心里。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哪个国王或者王后命人创制了这份抄本，我们需要探访12世纪的多个王室。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是君主制的，因此我们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我们就需要从既有事实入手，其中有些事实恰恰就是埃里克·皮特森发现的。关于这份抄本，最早的明确的描述出现在约翰·海因里希·冯·席仑（Johann Heinrich von Seelen）的《解经考》（*Meditationes Exegeticae,* Lübeck, 1737）当中，书中提到了一句题外话，说北德意志汉堡大学的希腊语和历史学教授鲁道夫斯·坎贝拉（Rudolphus Capellus, 1635～1684）曾是该抄本的主人。坎贝拉后来将自己的藏书传给儿子蒂耶特里克斯·马提亚斯·坎贝拉（Dietericus Matthias Capellus, 1672～1720），小坎贝拉死后，在1721年，这份抄本以“坎贝拉家族藏书”（*Bibliotheca Capelliana*）第556号藏品的身份被拍卖，一个名叫米夏埃尔·利希（Michael Richey, 1678～1761）的人将它买走，并将它借给了席仑，希望席仑帮忙检验这份抄本。后来，德意志著名的文献学家约翰·阿尔伯特·法布里丘斯（Johann Albert Fabricius, 1668～1736）见到了这份抄本，将里面的圣徒年历抄录了下来。之后，这份抄本落入如饥似渴地收集藏书的丹麦收藏家奥托·索特公爵（Count Otto Thott, 1703～1785）之手，此人是政客，还是皇家枢密院的成员。索特毕生搜集了规模庞大的藏书，大约有十四万册之多，其中包括大约四千份抄本。他在哥本哈根的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的宅邸，如今已是法国大使馆了。后来，索特将自己的早期印刷书以及抄本捐赠给丹麦皇家图书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份抄本的书架编码（“Thott 143, 2o”）上会出现索特的名字，至于后面的数字和符号，是指其在书架上的对开本卷册当中按尺寸大小排列的序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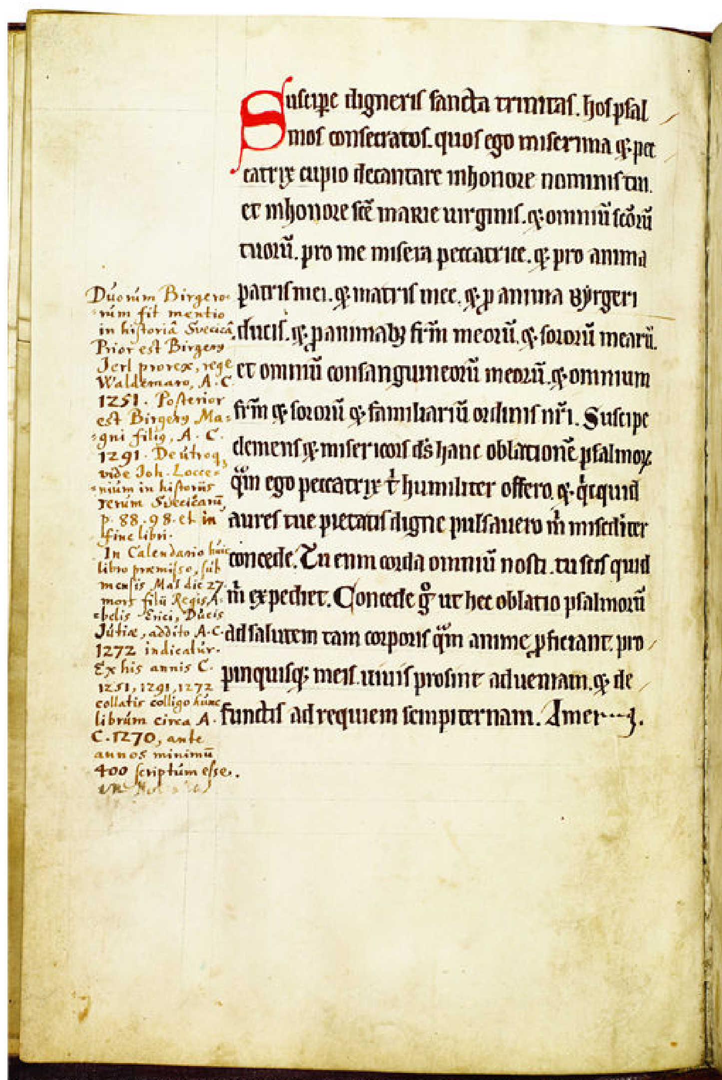
被捧出盒子后的抄本分量十足。包括装帧在内，它大约是12英寸长、8.25英寸宽、2.75英寸厚。封皮用的是18世纪的红棕色摩洛哥羊皮，颜色很暗，表面有金色的同心框。书脊上有几个贴金区域，但没有

印字。压印显得十分粗糙，且金箔层过于厚重。从抄本的历史来判断，它定然是在北德意志或者丹麦接受装订的。（由于这样的封皮过于夸张、缺乏品位，丹麦人肯定会说这是德意志货。）环衬和底页都是鲜红色的，贴金且印有花纹，偶尔会出现小天使和鸟的图案，印痕都很深。18世纪的印花贴金纸，如今已经成了鉴赏家和收藏家追求的对象，但对我来说那总是让我想起圣诞拉炮。抄本的最后一页上留有早期封皮的折进布料留下的清晰印痕，这一出人意料的情况表明，早先这份抄本是被用织物包裹起来的，且在书口的顶端和底端有两条宽宽的饰带。其中一张衬页上还有环形的压印字样，“BIBLIOTHECA REGIA HAFNIENSIS”（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文字的中央是一顶王冠的图案。

抄本的文本涵括了整部《圣咏》，它以一份年历作为前引（前文中有提及），后面接的则是常规的圣歌，以及用圣徒名字组成的连祷词，还有一些短小的祈祷词。拉丁《圣咏》抄本，实际上跟福音书抄本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基督教时期甚至更早，毕竟，希伯来语的诗篇本身就是《犹太圣经》的一部分。修士和牧师会在日常宗教仪式中使用拉丁语的诗篇，慢慢地令《圣咏》成了最早得到抄录并为修道院外的私人所有的文本。在俗教众的读经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这一点非常难确定。有一些《圣咏》抄本跟加洛林王朝的帝王及其宫廷有关，比如8世纪晚期著名的《达古尔夫圣咏》（Dagulf Palster）抄本，也就是由查理曼支持创制并被用来进献给于772~795年担任教皇的阿德利安一世的，如今这份抄本收藏在维也纳，不过，这些抄本中的大部分应该是在俗封建君主给予教堂或者教团的赠礼，或者为宫中的教士所用。实际上，只有到了12世纪中叶，《圣咏》抄本才开始为在俗私人所用或者所有。最早的一批《圣咏》抄本当中，有很多是在英格兰创制的，此一现象倒是有点怪异，迄今都没有出现很好的相关研究或者解释。此类《圣咏》抄本还有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帮助人们学习阅读。这种做法在修道院已经成为惯例，修道院通常就是用《圣咏》抄本来培养见习修士的阅读能力的。前文提及的12世纪晚期的《莱顿圣咏》抄本就是在英格兰创制的，其中第一篇诗篇的下方有一则中世纪的注释，从中可以见出，这份抄本是供孩童时期的圣路易学习阅读使用的，具体注释文字如下：Cist Psaultiers fuit mon seigneur saint Looys qui fu Roys de France, Ou quel il aprist en s'enfance.圣路易生于1214年，因此他很可能是在1220年前后开始使用这份抄本的。很有意思的是，《哥本哈根圣咏》中也有明显证据表明，这份抄本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阅读训练而创制的。在圣歌部分和连祷词部分之间，有一份完整的字母表，由该抄本的主抄写员抄写，书写得非常清晰，表的下方还附了一排中世纪阅读者需要学习的基本标点符号和缩略符号。字母表的后面接的是主祷文和信经（the Creed），实际上，直到19世纪，孩童的初级识字本和字母学习板上也都附有这些内容。孩童以及其他学习阅读的人会先学习字母，然后便按照常规，将《天主经》（*Pater Noster*）作为自己的第一份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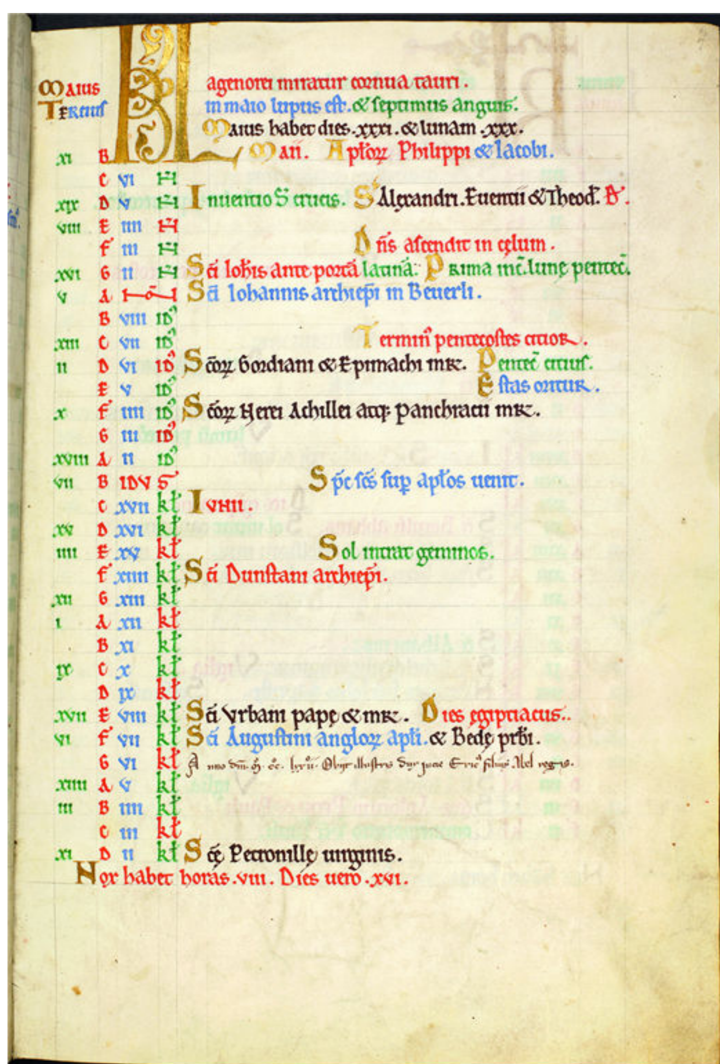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哥本哈根圣咏》的装帧品质以及文本中特殊字句推断出，这一抄本有可能是供皇家或者贵族子弟作阅读训练用的。

不过，这一推论没有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稍稍浏览一下1170年前后的北欧诸王，会发现有适龄王子或者公主需要训练阅读能力的国王就包括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他于1157年、1158年和1166年都有儿子出生；罗马人民的国王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并于1155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分别在1164年和1165年获得王子；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1165年有儿子出生；丹麦国王瓦尔德玛（Valdemar），1157~1182年在位，他的儿子生于1163年；甚至连1161~1184年在位的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五世（Magnus　V）本人也可能正在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因为他生于1156年。



13世纪的亡灵祈祷文，以女性的口吻写就，目的是为包括贝尔格尔公爵在内的家族亡灵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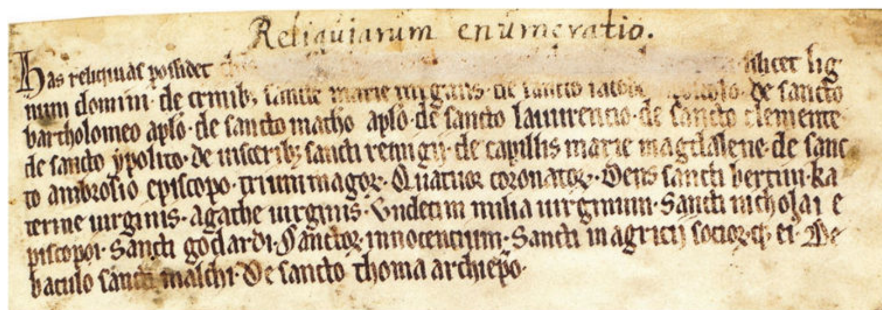
《哥本哈根圣咏》中有三处后来添加进去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可以推断出，这抄本很早便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并且为王室所有了。第一处添加内容是一份讣告或忌辰记录性质的东西，被添加在圣徒年历的5月27日条目旁，具体文字如下：“Anno d[omi]ni. Mo. cco. lxxiio. Obijt illustris dux Jucie Eric[us]filius Abel regis”。它出现在抄本第4对开页的右页，是在纪念日德兰公爵埃里克（Erik, duke of Jutland）于1272年谢世一事，埃里克是于1250~1252年在位的丹麦国王阿贝尔（Abel）的幼子。1260年，埃里克获封成为日德兰半岛南部的石勒苏益格的公爵。抄本的年历上记录的逝世纪念日，应该说通常是由死者的家族成员在死者离世时添加上去的，这样就能够提醒相关的人在每年的这一天缅怀死者并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埃里克公爵的母亲，也就是阿贝尔国王的王后，是荷尔斯泰因的梅希蒂尔德（Mechtilde of Holstein），她的名字在丹麦语中便是“梅蒂”（Mette），她于1288年亡故。据信，《哥本哈根圣咏》抄本的主人一度就是这位王后，或者是王后的近亲。此论的切实理据在于第二项添加进抄本里的内容。这项内容出现在第16对开页的左页，是一份长长的献堂祷文。从中不难见出，这份祈祷词是于13世纪晚期被抄录在抄本上的，当时，有人（一位女性）将该抄本捐赠给一座女修道院，希望修女们多多使用该抄本，同时希望修女们为自己父母的灵魂祈祷，为贝尔格尔公爵（Duke Birger）的灵魂祈祷（“& p[ro]anima Byrgeri ducis”），也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等所有亲人的灵魂祈祷。这与抄本主人的联系在于，阿贝尔国王驾崩之后，荷尔斯泰因的梅希蒂尔德改嫁贵族贝尔格尔（Birger Jarl，约1200~1266），贝尔格尔是当时的瑞典摄政王，也是斯德哥尔摩城的创建者。[“Jarl”是贵族封号，类似于英格兰的“伯爵”；今日的斯德哥尔摩就有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贝尔格尔伯爵大街（Birger Jarlsgatan）。]祈祷词表明当时贝尔格尔已经谢世，但祷文中没有出现梅希蒂尔德的名字，这让我们可以将祷文出现在抄本上的时间推定在1266~1288年，并推断出有可能就是梅希蒂尔德本人写了这份祈祷词。梅希蒂尔德在最终谢世之时，被同她的第二任丈夫合葬在瑞典南部的瓦尔汉（Varnhem）皇家修道院，他们的墓碑之上刻有王后本人、贝尔格尔伯爵以及王后的爱子埃里克公爵的形象，埃里克公爵也就是抄本当中提到的那个人。2002年，人们打开了这座坟墓，发现里面的确有三具骸骨。



年历当中增补的纪念日是阿贝尔国王之子埃里克公爵的忌日，埃里克于1272年5月27日亡故

第三处添加文字更引人注目，比第二处早几十年出现。它们出现在第1对开页的右页，也就是抄本第一页的顶端，若没有这些文字，这一页就是空白页。此处的文字是：“Reliquiarum enumeratio”（圣物清单）。它出现在抄本上的时间应当只比抄本的创制时间稍晚一些，肯定在12世纪。圣物清单在中世纪并非罕见之物，倘若有人认为某一份抄本特别珍贵，他就会将自己的圣物清单添加到抄本的空白页上。《圣奥古斯丁福音书》里也有后人添加进去的圣物清单，清单上描述了藏在坎特伯雷修道院里的一个盒子中的圣物，当时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也被保存在这个盒子里，这一点本书第一章已经有所提及（见本书第30页）。这意味着倘若我们能够确认清单上所列圣物的主人，基本上也就能够确认《哥本哈根圣咏》在12世纪晚期的主人了。

这份清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里面的圣物显然都属于私人。清单的开篇是“Has reliquias possidet …”，但接下来的情况实在是令我们失望，因为差不多整整一行的文字被抹去了。不过，我们隐约还是能够辨识出第一个被抹去的词是“dns”，也就是“*dominus*”。这是指某某“大人（显然是指某个个人，但其名字和封号都无从辨识了）拥有这些圣物……”一般来说，重要圣物是相当昂贵的，通常属于教堂，不过有些也会成为君王和贵族的私人收藏（在本书第九章中，我们将有机会见识一下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和腓力六世私人收藏的圣物）。这个神秘主人的圣物清单大体如下：真十字架上的木屑；圣母的几缕头发；使徒圣雅各、巴多罗买、马太、圣劳伦斯、圣克勉和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等人的骸骨；圣雷米吉乌斯（Saint Remigius）的内脏残片；抹大拉的马利亚（Saint Mary Magdalene）的几缕头发；圣安波罗修、三博士、四圣殉道者（Four Crowned Saints）的骸骨；圣贝尔坦（Saint Bertin）的一颗牙齿；圣凯瑟琳（Saint Katherine）、圣阿加莎（Saint Agatha）、一万一千名童贞女、圣徒尼古拉、圣高达（Saint Godard）、诸圣婴孩（Holy Innocents）、圣莫里斯（Saint Maurice）及其同伴的骸骨；圣马拉奇（Saint Malachy）的权杖的残片；大主教圣托马斯的骸骨。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最后这份圣物是何时进入清单的，因为托马斯·贝克特是于1170年12月在坎特伯雷殉道的；他最终于1173年获封圣徒，他的遗骨也因成为圣物而迅速进入全世界的圣物交易市场。


Reliquiarum enumeratio.
Has reliquias possidet [illegible] silicet lig
num domini. de crinibus sancte marie uirginis. de sancto iacobo apostolo. de sancto
bartholomeo aplō. de sancto matheo aplō. de sancto laurentio. de sancto clemente
de sancto ypolito. de uisceribus sancti remigii. de capillis marie magdalene. de sanc
to ambrosio episcopo. trium magorum. Quatuor coronatorum. Dens sancti bertini. ka
terine uirginis. agathe uirginis. Undecim milia uirginum. Sancti nicholai e
piscopi. Sancti godardi. Sanctorum innocentium. Sancti mauricii sociorumque eius. De
baculo sancti malachi. De sancto thoma archiepo.

私人圣物藏品清单，其最初主人的名字被人小心翼翼地刮去了

2012年，纽约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诺顿（Christopher Norton）发表了一篇有关历史检测的典范论文，文中他对《哥本哈根圣咏》圣物清单上各个条目的可能来源进行了确认。诺顿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已知的唯一的真十字架残片于1110年，被耶路撒冷王国国王鲍德温（King Baldwin of Jerusalem）赠予挪威国王西格德（Sigurd，于1103~1130年在位），此后，至少在1153年之前，这份圣物都被收藏在位于今天挪威特隆赫姆（Trondheim）的尼达洛斯教堂（cathedral of Nidaros）。诺顿还说，清单的第八条，也就是圣希波吕托斯骸骨，其来龙去脉不是十分清楚，很可能是于1161年从罗马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并且也被供奉在尼达洛斯教堂里。1107~1110年，挪威国王西格德参与了前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1160~1161年，尼达洛斯大主教爱斯坦（Eystein）前往罗马进行朝圣，诺顿详细考证了这些旅程之上所有合乎

逻辑的驻留之地，并且提出清单上差不多所有圣物都可能来自这些地方。诺顿推测，这张清单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五世（于1161～1184年在位），也就是西格德的孙子，存放在尼达洛斯教堂的圣物的完整清单。诺顿教授的最终结论是，《哥本哈根圣咏》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马格努斯五世，而且极有可能是这位国王出资创制了这份抄本。此一推理很有说服力，且它将《哥本哈根圣咏》的出资人的所在地确定在了斯堪的纳维亚。诺顿教授更据此结论提出，第1对开页上的圣物清单中被抹去的那行文字应当是，“Has reliquias possidet *dominus magnus rex norvegiae in ecclesia nidrosiensi*”（尼达洛斯教堂的挪威国王圣物清单），或者类似的句子。

当然，坐在哥本哈根的图书馆高层阅览室的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圣物清单上被抹去的那行文字，还用上了放大镜，并将那一页纸对着光来回翻动。有太多的事情取决于这个被抹去的名字了。图书馆抄本部的同僚若是看到我的此番行径，想必会认为这太过怪异了，我来来回回研究了这张纸一个多小时，而这是整份抄本里唯一没有任何彩绘的书页。《哥本哈根圣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华美的抄本之一，我却盯着其中一个已经无从辨识的词反复琢磨。实际上，这是一种享受，识别这里的文字就像进行填字游戏一样，可以通过推敲出每一个字母来拼凑出最终的答案。在抄本中，就像在填字游戏的表格中，肯定存在（或曾经存在）答案，我们能做的只有寻找。抄本开篇的那行字的大部分已经被抹去，不过，其上缘还留有个别字母的升部的笔画残余，那些残余仍然是可以辨识的。“dominus”一词后面很可能有两到三个没有升部的字母。接着是一个很高的字母，高出了其所在行，向右倾斜，跟行中最后一个词“Ligum”中的“L”字母极为相似，跟第三行的起首词“Lauurencio”中的字母“L”也非常相像。紧跟着的同样是一个很高的字母，这是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前后分叉，既向后弯曲，像字母“L”一样，同时又向前伸展，应该就是字母“d”，跟第二行的“de crinibus”一词里的“d”极为相像。接下来便是几个矮字母。由此推断，此处的人名肯定不会是“magnus rex”，因为“magnus rex”里没有字母有升部。同时，该名字的前五个字母当中，最后两个字母是“ld”。突然间，我得到了答案，而且就像在最终解决了填字游戏时那样，还疑惑自己为什么花了这么久。被抹去的词中，第一个定然是“uualdemarus”，也就是“Waldemar”，指的是于1157～1182年在位的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大帝（Valdemar the Great），此人也是日德兰公爵。他是阿贝尔国王的祖父，而阿贝尔国王的王后、荷尔斯泰因的梅希蒂尔德于13世纪成了《哥本哈根圣咏》的主人。由此便可以推断出，清单上的圣物是瓦尔德马的，当然，《哥本哈根圣咏》也是如此。

此时已经差不多下午一点了，我事先跟妻子约好在图书馆中的一家非常漂亮的滨海餐厅会面。这家餐厅名叫“Søren K”，我们点了侍者推荐的上餐速度最快、价格也最合适的餐品，在丹麦，但凡好一些的餐馆，上菜速度都慢得惊人，就跟那自动扶梯一样慢，而且贵得让人心疼。我们点了荨麻黄油拌白笋、烟熏三文鱼，还有一杯嘉士伯啤酒。世界上所有的珍本图书馆当中，还有哪一家能提供这样的午餐呢？吃完饭后，我

们坐在外面享受阳光，此时已经是晴空万里了，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重读我的老朋友巴黎的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Patricia Stirnemann）所做的相关研究，此前我已经将她的研究成果汇总并打印出来了。

帕特里西亚用她婚前的名字帕特里西亚·丹茨（Patricia Danz），围绕《哥本哈根圣咏》写了一部颇具原创性的专著，该作于197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那个时候尚少有人知晓《哥本哈根圣咏》。帕特里西亚分别在1998年、1999年和2004年回归这个话题，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她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抄本的彩饰师，不过当然，她也会就抄本的来源展开探索和思考，也正是她将众人的关注点引到了抄本中的那张儿童字母表上。据她推断，《哥本哈根圣咏》是为于1170年发生在丹麦的两件大事而创制的。其一，国王瓦尔德马的父亲克努特·拉瓦德（Knud Lavard）的遗骸因成为圣物而得到迁移，其二，瓦尔德马那还是孩童的儿子于同一天加冕登基，此子也叫克努特，当时只有七岁，正值一个基督徒王子应当开始学习阅读的年龄。小国王的祖父，也就是第一任石勒苏益格公爵、圣徒克努特·拉瓦德，于1131年在灵斯泰兹（Ringsted）附近的哈拉德斯泰德斯科夫（Haraldsted Skov）森林遭到杀害，这一森林位于今天的哥本哈根的西南方向大约四十英里处。老克努特于1169年获封圣徒，他的遗骸遂于1170年6月25日正式被迁至灵斯泰兹修道院教堂，此一宗教仪式是充满了政治意味的两场典礼的一部分，瓦尔德马国王凭借这样的仪式主张了自己的王权，同时也为自己那拥有继承权的儿子加冕，由此小克努特成了圣徒名号的继承人。帕特里西亚相信，正是这两个事件催生了《哥本哈根圣咏》。那么这份带有字母表的《哥本哈根圣咏》显然是为六岁的克努特王子创制的，它既是王权继承者的入门读物，也是阅读学习者的入门读物。

我回看了午饭之前我围绕圣物清单上被抹去的文字而做的一些笔记。克里斯托弗·诺顿认为，这行字的结尾应当记录的是这些圣物的收藏地，对此，诺顿给出的自己的推测是“… *in ecclesia nidrosiensi*”。但我非常肯定其结尾字母应当是“… sta”，在一定的角度下这几个字母是隐约可辨的，它们之后很可能还有一个缩写符号。字母“s”前面的那个字母应该是有降部的。一开始我觉得这可能是“in cista”，意思是“在盒子里面”，尽管我想不到任何将这个语词抹去的原因。不过，再次掂量之后，我赞同这个词更可能是一个地名的想法。倒数第八个字母留有一个升部，大体上可以确定是高字母“d”，因此这个词可以被想象为“apud”。那么，最后几个字母很可能就是“apud ringsta[dium]”，意思是“在灵斯泰兹”，它们的笔画与残余部分相符。圣物清单中没有提及圣徒克努特的遗骸，原因很简单，这位圣徒的独立圣所就在灵斯泰兹。如此推断，《哥本哈根圣咏》应当是克努特王子的，是为王子的加冕礼创制的，而清单是后来才被添加上去的，用来记录这位王子的父亲在灵斯泰兹皇家修道院收藏的圣物（瓦尔德马国王最终于1182年被安葬在这座修道院）。父王驾崩之际，小克努特便以自己的单名继承了王位，史称克努特六世，他的统治期一直延续到他谢世之时，也就是1202年，死后，他也被安葬在了灵斯泰兹。他的纹章印章是丹麦王国中已知最早的印章，上面的图案是三头奔跑中的狮子，实际上，《哥本哈根圣咏》的卷首页中那个巨

大的贝亚图斯式的首字母右侧，就有极为相似的狮子奔跑的场景（当然，这也许只是巧合）；首字母的左侧则呈现了三只鹦鹉。我们并不知道国王瓦尔德马的纹章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份皇家《圣咏》抄本是为两个丹麦国王创制的，一个是被加冕为共治之王的年幼王子，另一个就是他的父王瓦尔德马。

当然，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否定诺顿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清单上至少有一部分圣物是曾经属于挪威的马格努斯国王和尼达洛斯教堂的。实际上，很多圣物，即便是最为细小的残片或者碎屑，也是可以被无限制地分割的，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诸王肯定会交易这些圣物。1180年之后，马格努斯被逐出挪威，尔后他作为瓦尔德马的座上客在丹麦待了两年。赠金和赠礼则是中世纪外交的命脉。

我返回“黑钻石”的阅览室，再次打开抄本。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要去解决。抄本以圣徒年历为开篇，年历中列举了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的圣徒节日。实际上，中世纪晚期的祈祷书，诸如弥撒书以及时祷书中，都有这一部分内容，而且，现代的很多祈祷书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问一问，为何这样一份年历会成为《圣咏》抄本的要件。年历的设置并不会影响人们阅读抄本中的诗篇。倘若宗教年历跟诗篇有什么关系，也只能说这种年历不是从每年的一月开始的，而是从将临期的第一个星期天开始的。拉丁《圣咏》自6世纪起便开始为人所知了，不过，在早期的四百年里，并没有哪份拉丁《圣咏》配有年历。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曾谈到4世纪的“354年编年史”，那是藏于加洛林宫廷图书馆的一份早期基督教年历。到了10世纪，许多来自该图书馆的带有年历的祈祷书在英格兰散布开来。特别是在北英格兰地区，比德发起的历法算法研究潮流一直存在。现存最早的附有年历的《圣咏》抄本就是用英语写就的，创制于1000年前后。对抄本的在俗所有人来说，年历应该是特别实用的，因为修士能够依靠每日的弥撒仪式来确定节日，但在俗人士需要年历的提醒，而且，年历还可以用来记录忌辰以及其他纪念日。到了11世纪，年历已经成了《圣咏》抄本的标配，特别是在英格兰。

《哥本哈根圣咏》中的年历就透露了这份抄本明显的英格兰血统。年历是用黑色墨水写就的，重大节日则会被用红色、蓝色或者绿色墨水标注出来。记有年历的书页尽管没有插图，但很有节日氛围。这些特殊的日子，依照其在年历中的先后次序，大体上可列举如下：圣库斯伯特和威尔弗里德（Saints Cuthbert and Wilfrid）纪念日，用绿色墨水字写就；贝弗利的约翰（John of Beverley）纪念日，用蓝色墨水写就；圣邓斯坦（Dunstan）纪念日，用红色墨水写就；前来英格兰传教的使徒奥古斯丁的纪念日，用蓝色墨水写就（同一天，即5月26日也是比德的纪念日，用黑色墨水写就）；圣博托尔夫（Botolph），用红色墨水写就；圣阿尔本和奥斯瓦尔德（Alban and Oswald）用绿色墨水写就；埃德蒙德（Edmund）、国王及殉道者，用蓝色墨水写就。其中，林肯郡的圣博托尔夫以及萨福克郡的埃德蒙德，多多少少跟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有关，讽刺的是，二人都是在丹麦人手中成为殉道者的；但库斯伯特、约克的威尔弗里德、约克郡的贝弗利的约翰、比德以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都非常明确地跟英格兰北方有关，特别是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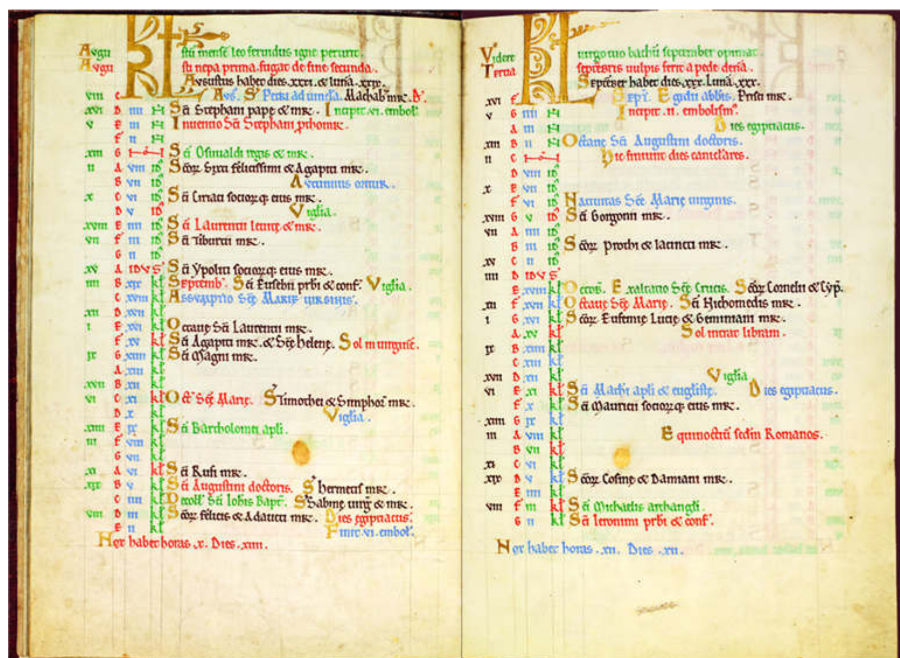
东北地区。库斯伯特、威尔弗里德和奥斯瓦尔德这三位圣徒更是出现在了《圣咏》文本后面的连祷词当中。

引起我注意的是年历当中没有出现的内容。年历中这些英格兰节日前都没有出现有关节日前夜的祈祷活动（vigil）以及节后第八天的节庆活动（octave）的记录，而修道院在庆祝主要节日都会安排这样的补充节日。换言之，这些补充节日的确重要，但没有进入最重大节日的行列。在12世纪的英格兰北方有三个潜在的此等奢华抄本的创制之地，分别是林肯、约克和达勒姆。不过，抄本里并不存在专属哪个地方的元素，也不存在可以将另外两个地方排除在外的元素。这份年历当中最明显的疏漏应该是圣托马斯·贝克特纪念日，托马斯·贝克特于1170年殉道，并于1173年1月获封圣徒。他的纪念日被设定在12月29日，那之后很快全欧洲都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圣托马斯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抄本后面的连祷词当中。但他的名字的缺失不一定能帮助我们断定抄本的创制日期要早于贝克特的封圣日期，因为中世纪的抄写员，跟今天的所有人一样，往往会忽略最明显的东西，或者会固执己见。然而，若将《哥本哈根圣咏》的创制时间确定在1173年之前，那就完全符合了皇家庆典的时间表，使抄本得以在皇家庆典前，贝克特殉道之前六个月，在灵斯泰兹修道院创制完成。

年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带有奥古斯丁教团（The order of Augustinian canons）的元素。这一点，甚至比它的英格兰血统更明确，因为年历中有一个希波的奥古斯丁纪念日（8月28日，用红色墨水写就），以及该节节后第八天的庆祝日（9月4日，用蓝色墨水写就），更有蓝字的希波的奥古斯丁的圣髑迁移日（10月11日）——纪念希波的奥古斯丁的传统节日，在8世纪某一年的这一天，这位圣徒被重新安葬在帕维亚。著名的奥古斯丁教团是在这位圣徒于430年谢世之后很久才建立的，不过，该教团遵守了他们敬奉的这位圣徒订下的生活准则，并在12世纪时变得尤为著名。

在本书第六章中，我们曾经谈到，在诺曼征服后的那个时期里，我们是很难将英格兰的艺术作品和诺曼底的艺术作品区分开来的。不过，一百年后，虽然国王和贵族依然是诺曼人，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法兰西拥有地产，但两地的抄写风格和抄本装饰艺术已经开始变得不同。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哥本哈根圣咏》是由一个英格兰抄写员抄写的，因为抄本中字母“a”的上端有横线标记，字母“g”下端的环状笔画也没有完全封闭起来，这些都是英格兰风格的字母写法特征，而且那特别显眼的“&”符号，跟稍早一些的伯里《圣经》和朗伯斯《圣经》（Lambeth Bible）中的极为相像。仅就装饰艺术而论，《哥本哈根圣咏》也普遍被认为是来自英格兰的作品。C.M.考夫曼（C.M.Kauffman）于1975年出版了《1160～1190年罗曼抄本》（*Romanesque Manuscripts, 1066-1190*），在这本12世纪英格兰彩饰抄本的标准汇编中，《哥本哈根圣咏》的一幅插图获得殊荣成为卷首图。这份为丹麦王室创制的奢华的《圣咏》抄本，为何诞生于英格兰呢？有很多情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到了12世纪，英伦诸岛的抄本装饰技术已经高度发达了，而且传统深厚，相形之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这门技术仍然未经受时间的考

验。英格兰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当时处于维京人的征服行动带来的文化影响下，甚至仍然有操持丹麦语的居民。实际上，就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个同样叫作克努特的人，也就是丹麦国王克努特二世，还是全英格兰的国王。克努特二世派遣一批英格兰神父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组织那里的教会事务。丹麦的宗教仪式是以英格兰的风俗和习惯为依托的。（相比之下，瑞典教会则更倚重德意志的传统。）两地之间类似的联系还有很多，而且持续不断。于12世纪早期面世的圣克努特四世传，就是由一个英格兰修士，也就是坎特伯雷的艾尔诺特（Ælnoth of Canterbury），在丹麦写就的。《哥本哈根圣咏》里的圣物清单也能为此提供证据，因为其中一些条目定然是来自英格兰的。比如说，圣雷米吉乌斯的内脏碎片，很可能是林肯的主教雷米吉乌斯的内脏碎片，12世纪20年代，这位圣徒的坟墓被掘开，其骸骨和内脏碎片很可能就因此散落四方了。圣物清单上的圣母的头发当然是珍品，据信林肯大教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就藏有这一圣物。本书第一章谈到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收藏的圣物当中，也包括了“真十字架”的残片。而贝克特的骸骨当然来自坎特伯雷。此等情形之下，我们也就不难想见，一份出自英格兰的《圣咏》抄本，会在一批随赠圣物的陪同下来到丹麦来。它们有可能是亨利二世或其家族给他们在丹麦的表兄弟的皇家赠礼。亨利二世的女儿嫁给了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狮子亨利的女儿格特鲁德（Gertrude）则在幼年时就跟丹麦王子克努特订下婚约，二人于1177年完婚。格特鲁德于1182年成为丹麦王后（她的名字出现在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由此可见，这些家族之间都有很深的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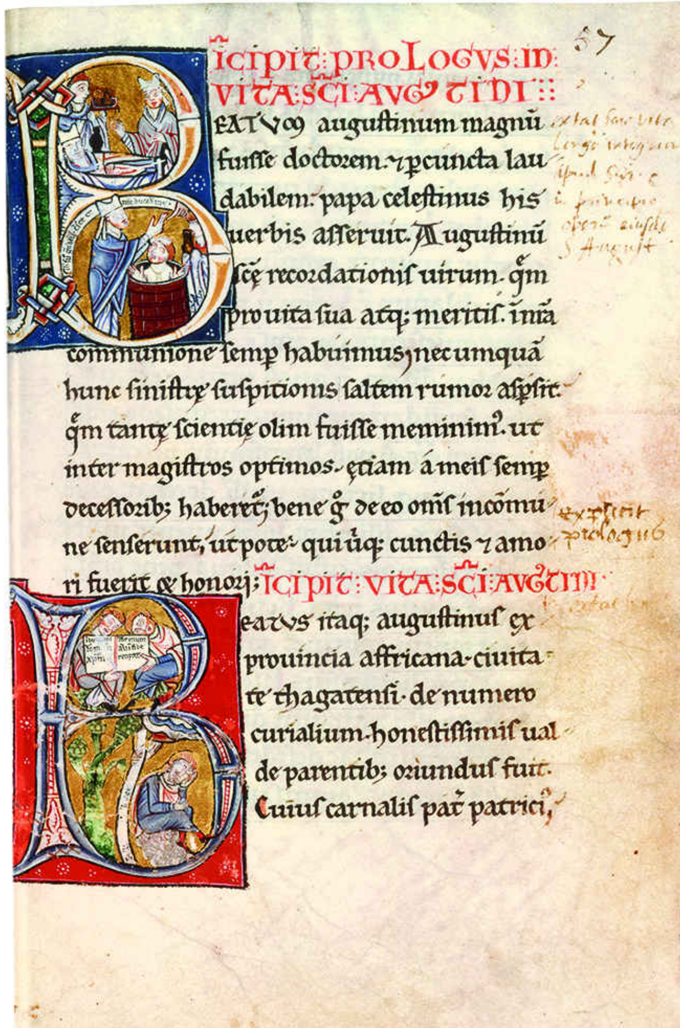
第326~327页：《哥本哈根圣咏》抄本中的年历，出现了包括圣奥斯瓦尔德日纪念日在内的多个英格兰节日，其中纪念奥古斯丁教团的护佑圣徒圣奥古斯丁的节日被列为

前文提到另外五份为私人所有的奢华《圣咏》抄本，实际上，它们之间都是存在“亲缘关系”的，而且各个抄本的主人或者资助者之间应该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明确其具体情况。同《哥本哈根圣咏》的关系最近的当属今天收藏在格拉斯哥的《亨特圣咏》。《亨特圣咏》里面的年历同样有奥古斯丁纪念日，同样漏掉了圣托马斯·贝克特纪念日，而且，《亨特圣咏》的创制地似乎也是约克郡或林肯郡。这份抄本拥有十三幅整页插图，极为奢华。《亨特圣咏》的一名画师同样参与了《哥本哈根圣咏》的创制工作，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两份抄本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它们当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孪生抄本，毕竟，无论文字还是插图都存在诸多差异，不过，二者有时会被称作“姐妹”抄本。倘若哥本哈根的这份抄本是皇家抄本，那么格拉斯哥的应当也是。然而，格拉斯哥抄本究竟是为谁创制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它的使用地显然是在欧洲大陆而非英格兰，且关于它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出现在1769年的法国。

接下来是尚蒂伊的《英格堡圣咏》。这份抄本是在法国创制的，为丹麦王后英格堡（Ingebourg of Denmark, 1175~1236）而制，英格堡王后是丹麦国王瓦尔德马的女儿，也是克努特的妹妹。这位王后肯定从孩童时代起就知道《哥本哈根圣咏》。1195年，英格堡被送去法国同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结婚（腓力·奥古斯都则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的侄孙），这段婚姻令她痛苦且孤独，注定走向失败。同《英格堡圣咏》紧密相关的是《阿弗朗什圣咏》，这份抄本是在1986年被发掘出来的，并以发掘地命名（如今收藏在盖蒂博物馆），它跟《英格堡圣咏》所用的是同一批画师，而且很有可能是为英格堡的丈夫（腓力·奥古斯都是丹麦国王克努特的妹夫）定做的。《莱顿圣咏》也是在英格兰创制的，里面的年历似乎凸显了北方年历的特征，还被添加了亨利二世于1189年7月7日驾崩的讣告。这份抄本很可能一度属于亨利二世的私生子、若弗鲁瓦·金雀花，他也是约克大主教，是狮子亨利的妻子玛蒂尔达同父异母的兄弟，狮子亨利则是丹麦国王克努特的老丈人。后来，抄本转归若弗鲁瓦的侄女、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Blanche of Castile），也就是路易八世的王后，路易八世的父亲则是英格堡的丈夫。王后布兰卡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孙女，也是收藏在巴黎阿瑟纳尔图书馆的那份皇家《圣咏》抄本的主人和雇主。将英格兰、丹麦和法国的各个王室联结起来的松散的家族纽带，以及有六份抄本是成双成对地为国王和王后定制的这一事实，就不免令人猜测，著名的《亨特圣咏》是否就是为诸如明斯克的索菲亚（Sophia of Minsk，约1140~1198）一类的人创制的呢？索菲亚是瓦尔德马的王后，也就是克努特六世的母后。它也可能是为索菲亚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创制的，甚至有可能同样是为1170年的典礼创制的。这样的猜测的确相当有诱惑力。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埃里克·皮特森的告诫：“艺术史学家总是一下子就跳到结论部分，那也太快了。”

1999年，埃里克·皮特森编辑并出版了一部文集，主题是丹麦的中世纪抄本文化，名为《活着的文字和彩饰图》（*Living Words & Luminous*

Pictures），文集中收录了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的一篇有关《哥本哈根圣咏》的文章，斯蒂尔尼曼是真正的艺术史学家，但她在下结论时总是非常谨慎和理智。文章以一个彩饰师为切入点，这个彩饰师既参与了《哥本哈根圣咏》的创制工作，也参与了格拉斯哥的《亨特圣咏》的创制工作。斯蒂尔尼曼在其原先的论文中便已经提出，《哥本哈根圣咏》中的《诗篇》1～54、80和《亨特圣咏》中的《诗篇》1～101的首字母，是由同一个彩饰师绘制的。后来斯蒂尔尼曼在大约同一时期的另外几份《圣咏》抄本里面也发现了这个彩饰师的作品，其中包括：两份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约1100～1160）的《四部语录》（*Sententiae*）的早期抄本（伦巴德在巴黎的两所座堂学校教学，其一建立于1158年，是已知的最早的座堂学校，其二的建立时间不会晚于1169年）；一份内容实际上是彼得·伦巴德所作的《保罗书信集评注全本》的首次修订版的抄本，该抄本收藏在巴黎圣母院图书馆，伦巴德本人于1158～1160年在此担任主教；还有一份记录了圣奥古斯丁的生平和行迹的抄本，应当是为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创制的，而且可以肯定就是在这座属于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内创制完成的。就历史上的可能性而论，若说这四份抄本当中有任何一份不是在巴黎创制的，那都有点不可思议。



这份抄本记录的是圣奥古斯丁的生平和行迹，《哥本哈根圣咏》的主彩饰师之一在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为其绘制了彩饰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圣维克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建于1110年，位于巴黎的东城墙附近，创建者是香浦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约1070～1121），此人是哲学家，也是阿伯拉尔（Abelard）的老师。奥古斯丁教团是由教堂教士，并非修士构成的。他们跟修道院外的世俗世界是有互动的，因为他们致力于将他们的学识传播给在俗教众。他们毫无疑问是会制作抄本的。该修道院的内部准则手册性质的《教规册》（*Liber Ordinis*）记录了修道院出钱雇抄写员的事。自创建伊始，圣维克多修道院设立了多个学校，且其招生范围并不仅限于教团成员。学校中的著名教师包括：圣维克多的雨果（Hugh of Saint-Victor，亡于1142），神学家及高产作家；圣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aint-Victor，亡于1173），可以确定理查德是苏格兰人；

圣维克多的安德鲁（Saint-Victor，亡于1175），生于英格兰；圣维克多的亚当（Adam of Saint-Victor，亡于1177或1192），可能也是英伦出身。有关圣维克多修道院早期历史的文献表明，众多驻院修士以及来访学者来自英格兰，这一现象令人吃惊。于1162~1170年任院长的埃尔尼琉斯（Ernerius）本人就可能是英格兰人。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挪威人。（这些情况都是从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那里搜集来的。）在埃尔尼琉斯接任圣维克多修道院院长的那一年，丹麦的隆德（Lund）大主教埃斯基尔（Eskil）跟国王瓦尔德马发生冲突，遂流亡法国并来到圣维克多修道院。他带了三百九十七枚银币，将其交托埃尔尼琉斯看管。1168年，埃斯基尔同瓦尔德马重归于好，后者邀请埃斯基尔前往灵斯泰兹去主持为刚刚获封圣徒的克努特·拉瓦德举办的圣髑迁移仪式以及幼王的加冕仪式。帕特里西亚认为，《哥本哈根圣咏》是大主教埃斯基尔流亡巴黎并暂居圣维克多修道院时（或这之后）雇人创制的，她还暗示说，那三百九十七枚银币应该就是用来支付抄写员和画师的酬劳的。

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它表明在理论上，12世纪最为伟大的英格兰抄本之一很有可能是在巴黎抄写并装饰的；而且若真是这样的，那么如今收藏在格拉斯哥的《亨特圣咏》也完全有可能是埃斯基尔雇人为丹麦的典礼创制的。我们可以肯定圣维克多修道院内是有一批英格兰抄写员和画师的。我们也知道12世纪法国的一批在英格兰出生并受训的抄写员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坎特伯雷的玛尼琉斯（Manerius of Canterbury），此人曾抄写了一部《大圣经》，该抄本如今收藏在巴黎的圣热内维耶夫图书馆（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哥本哈根圣咏》里面的年历和连祷词的确极具英格兰风格，不过，它们没有表现出为其他英格兰本地抄本所有的特征，而是在整体上具有北方抄本的风格——这里的“北方”两字实际上跟英格兰道路指示牌上的没有区别，若是从巴黎的角度来看，所谓“北方”当然也可以将斯堪的纳维亚包括在内。圣维克多修道院隶属奥古斯丁教团，这恰恰符合了《哥本哈根圣咏》中年历的第二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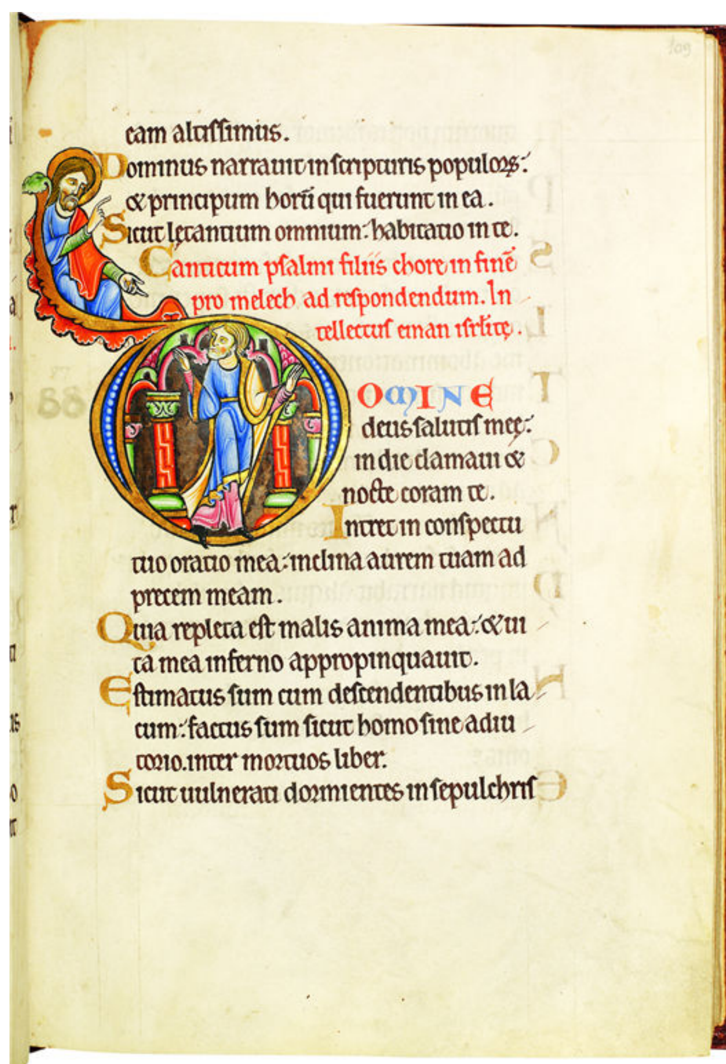
早前，我在给苏富比拍卖行编制抄本名录的时候，并没有解决抄本的地点归属问题，不过我给出了几个备选答案。我的系主任及导师安东尼·霍布森（Anthony Hobson）先生在读了这份名录后十分失望，他用他低沉的嗓音跟我说：“你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不知道答案。一直以来，我为此焦虑不已，但一直无法做出决断。因为还存在其他的选择或变量。若这份抄本真的是埃斯基尔委任制作的，那么他在巴黎结识的画师和彩饰师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创作，包括英格兰（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虽然最终的抄本看来非常统一且连贯，但是它的创制工程有可能是在一个地方开启，在另一个地方完工的。我当然希望我能给出结论。虽然埃里克·皮特森可能会赞许我的谨慎态度，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很希望找到答案的。这份抄本甚至有可能是在丹麦创制的，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小，但一直存在。这一想法反复出现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埃斯基尔大主教是在1168年回归丹麦的。庆典的举办时间则是1170年的夏天。这份抄本是为国王创制的。但中世纪的国王显然不能邮购抄本，他们只能自行雇抄写员和画

师。只要酬劳足够多，整个工作坊，连同抄写员和画师以及全套的抄写设备，都可以去往资助人指定的任何地方，直接进驻丹麦王宫也不成问题。这份抄本很显然是由四个画师和一个抄写员同步完成的，对这样一个团队来说，两年的时间足够了。就我本人来说，我非常希望这份抄本的彩饰工作是在灵斯泰兹完成的。

《哥本哈根圣咏》的校勘情况并不复杂。[2]据我所知，第7对开页后面，也就是第i折和第ii折之间，很可能丢失了整整一折的整页插图，但这个情况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注意到。确切地说，第7对开页后面原本是有一叠突出的衬页页根的，这些页根如今被人粗暴地切掉了。抄本的中径遭到严重的损毁，且第8对开页的底部被撕裂了。这样的情况在该抄本当中仅此一处，应该就是被人拆除了整整一折导致的。像这般奢华的早期《圣咏》抄本，其开篇部分的一系列整页插图通常呈现的是《旧约》中从伊甸园一直到《诗篇》作者大卫王所在的时代的场景。《亨特圣咏》就是这样（但也存在缺页现象）。这么做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将人的堕落同《诗篇》联系起来，而《诗篇》则被认为是预言了基督的到来。如此看来，目前《哥本哈根圣咏》里面的插图只有整个系列的一半，因此原抄本可能还有八页插图，以组成同《亨特圣咏》相同的十六个《旧约》场景。大体上可以推断出，早在13世纪或者14世纪这些插图页便已经被移除了，在那个时期，主宰私人信仰的是圣母崇拜，因此人们觉得“圣母领报”场景而非亚当和夏娃的裸体更适合用作卷首插图，尤其对于会用到这份抄本的修女来说。

抄本创制工作的分工情况可以跟校勘情况完全匹配起来。这一情况实在是令人愉快。第一个画师绘制了第ii折中整页插图以外的全部插图，之后又开始绘制第x～xv折，也就是从第72对开页到第119对开页上的插图。在多个画师同时为抄本绘制插图时，抄本肯定是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各折因此也就能被分配给多个不同的画师。倘若前两个画师同时开始工作，那么在第一个画师创制三十二幅整页插图的时间内，第二个画师可以完成七十二页的文字页插图绘制工作，之后第一个画师就可以腾出手来完成接下来的工作。第一个画师用的是纪念碑式的华丽风格，运用了大量鲜艳的颜料和没有压花的抛光过的金箔，贴金层如同玻璃一般顺滑。开篇的整页插图中到处都是王室标志。《诗篇》87所在页上的一个彩绘首字母中可能出现了抄本资助人的图像：图中呈现了上帝正在劝诫一个蓄了胡子的金发男子的场景。这很可能是从《诗篇》87:8中得到的灵感，“你的忿怒重压我身”，这句话本身当然是针对《诗篇》作者大卫王的，但图中的人显然是北欧人，很像国王瓦尔德马。这个画师还绘制了另外一些首字母，其中就包括了为《诗篇》81绘制的首字母，呈现的是圣殿里的基督的形象，以及天使在敦促一个人倾听上帝的场景（《诗篇》85的配图），还有乐师祝圣上帝的场景（《诗篇》91的配图）。其他许多图纯粹是装饰性的，风格怪诞。图中的场景包括：一头可怕的狮子正抓着一个人的背后并且咬着他的脑袋；一个人后仰着坐在一头熊的背上，攻击一头正在演奏竖琴的驴；一头猩猩在照镜子；一只全身光秃秃的动物，可能是条狗，脑袋上戴着巨大的橙色帽子，正坐在一头蓝色山羊背上，同时用绳子牵着另一条狗，它们的后面则跟着一个

人；一对生有双翼的孪生兄弟，身穿橙色长袍，坐在一只巨鸟的背上；更有一个令人无比惊奇的黑褐色毛怪，有可能是头熊，很像是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绘本里面的野兽，它后腿直立，爪子举在下巴下面，两眼盯着前方。最后这幅图出现在第110对开页的右页。倘若这份抄本是为孩童创制的，那么这些有趣的图像显然是很能吸引孩童的注意力，并且帮助他们记忆抄本内容的。


eam altissimus.
Dominus narrabit in scripturis populorum:
et principum horum qui fuerunt in ea.
Sicut letantium omnium: habitatio in te.
Canticum psalmi filiis chore in finem
pro melech ad respondendum. In
tellectus eman israelite.
Domine
deus salutis mee:
in die clamavi et
nocte coram te.
Intret in conspectu
tuo oratio mea: inclina aurem tuam ad
precem meam.
Quia repleta est malis anima mea: et vi
ta mea inferno appropinquavit.
Estimatus sum cum descendentibus in la
cum: factus sum sicut homo sine adiu
torio. inter mortuos liber.
Sicut vulnerati dormientes in sepulchris

《哥本哈根圣咏》整页插图的画师也负责绘制首字母，其中就包括右页的这个彩绘首字母，呈现的是上帝劝诫一个金发王子的场景

第二个画师是我们已经遇到过的，此人参与创制了《亨特圣咏》和另外四份在巴黎接受彩饰的抄本。在《哥本哈根圣咏》当中，这个画师负责为第i折（年历）、第iii~ix折（也就是第16~71对开页）绘制插图。此外，他还跟其他画师协作绘制了第103对开页右页等页面上的插

图。那个巨大的贝亚图斯风格的彩绘首字母就出自这个画师之手，他为其贴上了真宝石。这个画师使用的颜色更淡一些，也更柔和一些，且他的贴金层通常有很漂亮的压花，如同雕花的金属工艺品的表层。他绘制的插图包括一系列巨大的彩绘首字母，呈现了很多与正文对应的场景，比如，撒母耳为大卫加冕的场景，这是《诗篇》26的配图；拿单斥责大卫王的场景，这是《诗篇》50的配图，图中拔示巴深情依偎在大卫王肩头，拔示巴的那一头编成了辫子的金色长发极具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还有扫罗命令多益将亚希米勒满门抄斩的场景，该事件起因是亚希米勒的背叛，这是《诗篇》51的配图。这些话题在《诗篇》中是十分常见的，不过，对于一份皇家抄本来说，自然是有真正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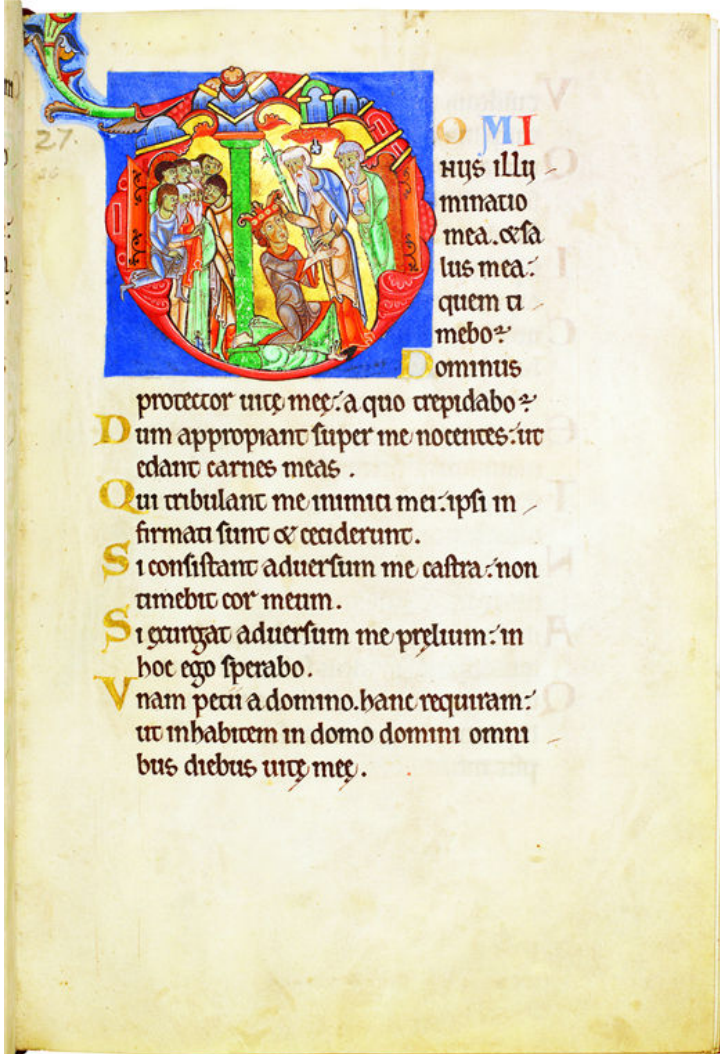


整页插图的画师时不时会将一些奇怪的动物以及怪兽画入图中，其中就包括这个直立着的长毛怪物

第三个画师负责第xvi~xviii折的配图工作。虽然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将该画师辨识为第三个画师，但我不确定我能够将第三个画师同第一个画师区分开来。这几折的书页对应的是第120~143对开页。这个画师绘制的彩绘首字母主要是装饰性的，其中包括了一个人同一条白色的狗打斗的场景，以及一头蓝色狮子杀死一条绿色的狗的场景，还有一头站立着的熊的画面。


in gressus sum: redime me &
misere mei.
Pes meus stetit in directo: in ecclesiis
benedicam te domine.
DNS
illumina
tio mea &
salus mea:
quem time
bo?
Dominus protector uite mee:
a quo trepidabo?
Dum appropiant sup me nocen
tes: ut edant carnes meas.
Qui tribulant me inimici mei:
ipsi infirmati sunt & ceciderunt.
Si consistant aduersum me castra:
non timebit cor meum.
Si exurgat aduersum me prelium:
in hoc ego sperabo.

格拉斯哥的《亨特圣咏》里的一幅插图，呈现的是撒母耳给大卫涂油的场景。该抄本是《哥本哈根圣咏》的近亲，两份抄本很可能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并由同一个画师绘制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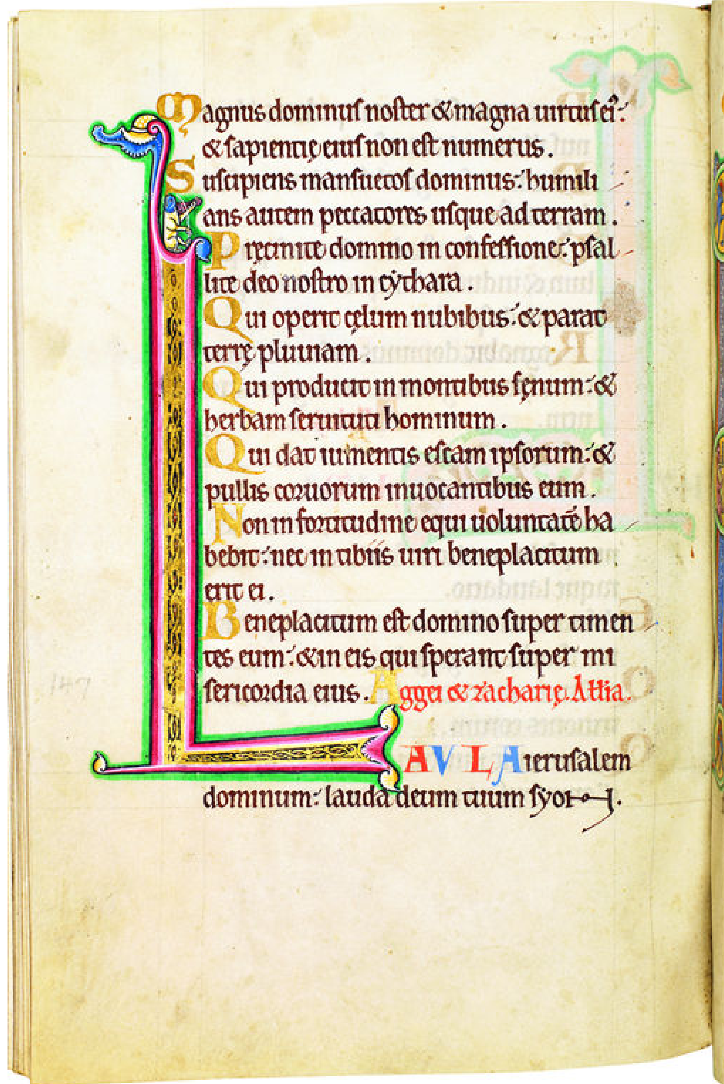


《哥本哈根圣咏》中呈现同样的场景的插图，两幅图出自同一个画师，并且都是用来给《诗篇》26配图的（此处用的是拉丁通行本中的编码）

《哥本哈根圣咏》的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画师在12世纪的画师当中非常容易辨识，当然也非常有名。在英格兰，我们称呼他为西蒙大师（the Simon Master）。法国人则有时候会称呼他为“嘉布遣会《圣经》画师”（the Master of the Capuchins'Bible）。一些“走投无路”的艺术史学家将他归入所谓的“海峡画派”（Channel School），因为他们无法搞清他的风格是更偏向英格兰还是法兰西。西蒙大师负责为第xix~xxiv折，也就是第144~191对开页配图。他绘制的首字母中出现了一个手持卷轴的国王的半身像（这是《诗篇》137的配图），以及颂歌中的先知以赛亚像和哈巴谷像等。另外一些插图则表现出典型的“海峡风格”，比如扭曲但强健的粉红色狮子；白色小狗在树叶丛中爬行；全身光秃秃的蓝色巨怪；相互撕咬的巨龙缠绕成首字母的形状；一头狮子用后

腿坐在地上，一个手持剑和盾的人正在与之打斗；正在弹奏乐器的猫；一个装了木腿的人给一只兔子剃毛；一个裸体男人同绿色狮子搏斗；等等。

“画如此荒诞的怪物有什么意义呢？”明谷修道院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在一篇斥责12世纪上半叶的艺术作品的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画这些无耻的猩猩？这些狮子？这些半人半兽的怪物？还有带斑点的老虎？为什么骑士在与它搏斗，而猎人在吹响号角呢？”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这就是我给圣尔纳的回答，不过它们极大地提升了罗曼风格抄本的趣味性。莫里茨·马克普朗（Mouritz Mackeprang）于1921年发表了一篇早前写就的有关《哥本哈根圣咏》的文章，颇具勇气地将抄本中的彩绘首字母同《诗篇》的内容联系了起来。比如说，《诗篇》16的彩绘首字母中的图案是，一头在跳舞的狮子把自己的肩膀靠在一条鱼身上；马克普朗认为，这应该是《诗篇》16:12的配图，这一节的诗文提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诗篇》88的首字母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站立着的毛怪；马克普朗将之同《诗篇》88:8联系起来，“[他]比一切在他四周的更可惧”。《诗篇》93的彩绘首字母中一头混种熊或者狮子正在吞食一只羔羊；马克普朗则将之指向《诗篇》93:6，“他们[恶人]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如果你看得够仔细，就能够在《诗篇》中找到可以同插绘图匹配的诗文。但更有可能的是，大多数的配图纯粹是装饰性的，它们显然来自画师的想象。实情大概是这样的：画师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画什么内容，碰巧注意到页面上的文字当中出现了诸如“狮子”这样的词，于是脑洞大开，据此作画；这样的图显然不能说是刻意为文本配的图。



西蒙大师为《哥本哈根圣咏》绘制的首字母的细节图，呈现的是一只在弹奏雷贝琴的猫

还有一些图案很常见，在其他抄本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哥本哈根圣咏》第171对开页的左页有西蒙大师绘制的一幅插图，呈现的是一只猫在弹奏雷贝琴——一种用琴弓拉响的弦乐器。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图案在罗曼艺术当中是极其常见的，无论是在彩饰抄本还是在雕刻作品中都会出现。这肯定跟一首非常古老的童谣的开头有关，“Hey, diddle d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稀奇，稀奇，真稀奇/小猫拉着小提琴）。我甚至一度怀疑，它是不是跟小提琴的琴弦常被认为是用猫的内脏制作出来的有关，直到有一天，研究中世纪音乐的大师阿曼多·洛佩兹·巴尔迪维亚（Armando Lopez Valdivia）前来我的家中做客，他带了一把雷贝琴。当他在晚餐之后演奏起雷贝琴时，我的猫冲了过来，仿佛被

磁场吸引住了一样，就那么伴着琴声在地上翻滚，如痴如醉，眼睛不停地转动，有时它还倒立起来，张着嘴，就像是进入癫狂状态的德尔维希（dervish）舞者一样。毫无疑问，雷贝琴在12世纪被奏响的时候，中世纪的猫也会做出一样的反应，可能正是这样的喜剧性场景催生了抄本中的插图。

《诗篇》终篇的彩绘首字母页，插图出自西蒙大师之手，呈现的是一个装了木腿的人抓获一只野兔并为之剃毛，表达的是中世纪的一个惯用说法，即极为艰巨的任务

第173对开页左页上的彩绘首字母中有一个拖着一条木腿的人，他手持一把大剪刀，在给一只兔子去毛。这与中世纪的一个常用表述有关：做某件事情很难，难过单腿之人给兔子剪毛。野兔是田野中跑得最快的动物，要抓住兔子并为之剪毛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了，更何况对于单腿之人来说。配图象征的就是绝无可能之事。这一图案实际上也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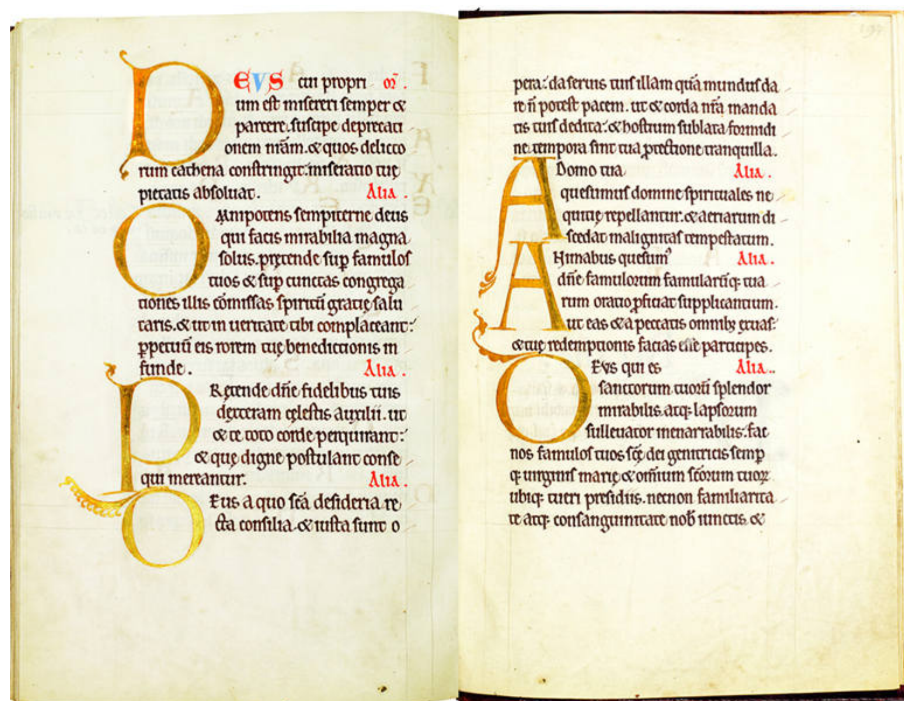
在了伯里《圣经》[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圣经》（Bible of Bury St Edmunds Abbey），创制于约1130年]的卷首插图中，这份抄本是英格兰最早的由已知的职业彩饰师雨果大师（跟前文谈到的画师雨果并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抄本。伯里《圣经》体积巨大，设计更是极为复杂，雨果在卷首页上画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图案，可能是在暗示为这样一份抄本做彩饰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妨回头看看《哥本哈根圣咏》当中这幅插图所在的位置——它是《诗篇》终篇的配图。这可能也是在说，没有人觉得这份抄本能在1170年6月25日这个期限之前完工。所以，西蒙大师应该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团队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哥本哈根圣咏》的起源、文本以及互相协作的画师的研究，把我们带到了书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后，阅读不再被修道院垄断，世俗画师开始四方巡游，逐渐进入书稿制作行业，虽然在早期常规的工作坊尚未成形；同时，抄本也开始跨越教会设下的分水岭，从教堂手中不可让渡的财产转变成虽然奢华但也可被在俗教众购买的艺术品，开始拥有明确的定价和一定的商业价值。西蒙大师，跟绘制伯里《圣经》的雨果大师一样，显然是职业画师。西蒙很可能是在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他参与创制的很多书册实际上是被巴黎修道院学校的学生购买并且带回家中的教材，它们是对中世纪时曾为各个修道院所有的抄本的解读，这些修道院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包括诺曼底的波港（Bonport）、德国的利斯博恩（Liesborn）、奥地利的克罗斯特新堡（Klosterneuberg）以及匈牙利的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等。然而，西蒙也会巡游四方。因此没有理由认定他不曾通过他在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关系网到过丹麦。现代人给他的绰号“西蒙”，来自英格兰南部那伟大的圣阿尔班修道院的院长西蒙，后者于1167～1183年掌管这座修道院。西蒙院长跟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早有接触，因为他需要圣维克多向圣阿尔班提供新的抄本。很可能在12世纪70年代（显然是在他的院长任期内），他将一批范本带往英格兰，随行的还有一批画师，画师西蒙就在其中。在至少三份由圣阿尔班修道院的抄写员创制的抄本中，带有献给时任院长西蒙的插图或装饰图案。后来，西蒙大师在职业画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只要机会合适，就会听从其他资助人的召唤，因此他可能留在了英格兰，也可能返回了法兰西。关于12世纪，我们得到了相当多的信息，但对于其中某些领域又一无所知。

《哥本哈根圣咏》还有一个特点并非这份抄本独有的，但在研究中世纪抄本的学者间尚未得到足够充分的探讨。该抄本的每一幅插图以及彩绘首字母的上方或者旁边，都有非常细小的针孔。这意味着抄本的所有插图都曾被盖在一块织物下面，这些织物被缝合在书页上，以便起到保护作用。在奢华抄本，尤其是在12世纪的英格兰和北欧地区的抄本中，这种情况很常见。皇家《圣咏》抄本家族中的每个成员，即《亨特圣咏》《英格堡圣咏》《阿弗朗什圣咏》《布兰卡圣咏》《莱顿圣咏》，其彩饰旁也都有这样的针孔。一旦关注这个情况，你便会很吃惊地发现，它们出现在了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奢华抄本上。没有理由怀

疑，针孔与抄本本身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此类针孔有时出现在页面顶端，以便固定可向上掀起的布片，有时出现在首字母的左侧，偶尔在其正下方，以便布片从侧面或者上方打开，如同小窗户一般。偶尔会有这样的织物在罗曼抄本里保留下来，并且仍然跟页面缝合着，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它们通常是被很粗糙甚至有些随意地缝合到页面上的。此类织物可以对彩饰形成保护，防止页面因为摩擦而受到磨损，如同今天的人们会在《哥本哈根圣咏》里面放置现代纸张一样。但它们肯定不只有这一个作用，因为闭合着的抄本中的书页是不会受到摩擦的；即便真是如此，那么双面的卷首开篇绘图也只需要一张这样的织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哥本哈根圣咏》里的所有整页插图页的顶端都有两排针孔，这意味着每一幅插图都有自己的保护性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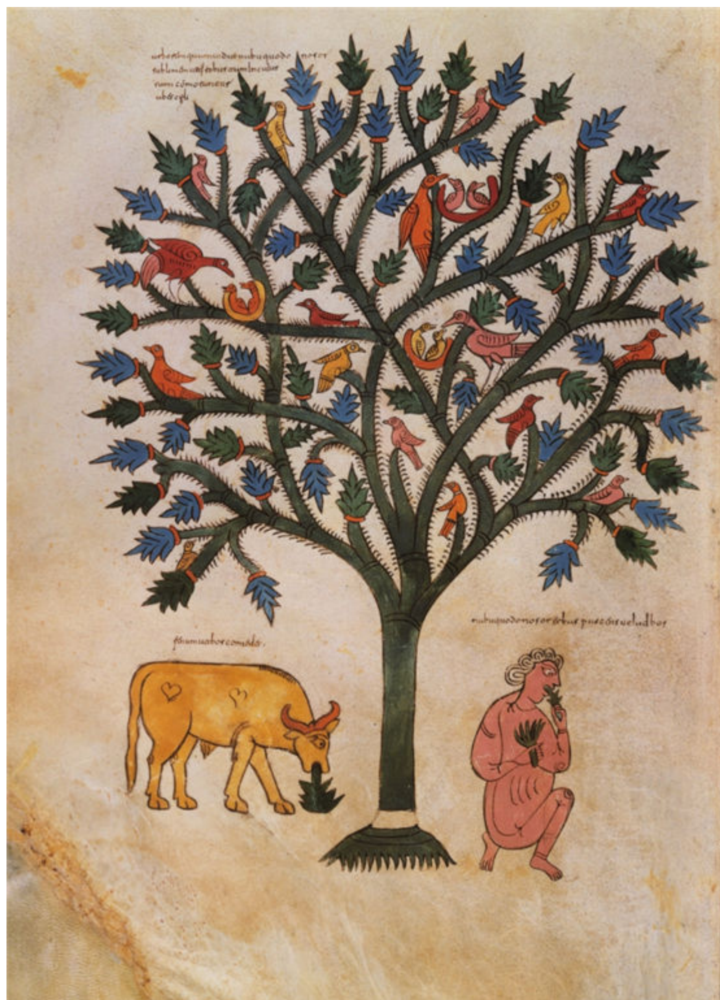
我们在翻阅中世纪的彩饰抄本，或者看到它们在玻璃橱柜里以打开着的形式被展出时，总是会被它们光彩夺目的模样震惊。不过，在《哥本哈根圣咏》的第一批主人打开这一抄本时，景象是完全不同的。抄本中的插图应该都无法被直接看到，它们就如同希腊正教会的圣像，隐藏在织物的后面。掀开织物，将那神圣的或者装饰性的插图“揭示”出来，此一举动本身应当就是实践信仰的一部分。这是对“启示”的具象化呈现，正如打开第9对开页左页上那红白相同的布帘向人们“揭示”基督道成肉身的场景一般。这一体验，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与画中人所处的不是同一世界。



第346~347页：《哥本哈根圣咏》结尾部分的一系列短祷文，其中包括祈请上帝恩典的祷文和祈请上帝赐予和平并让自己免于敌人威胁的祷文等

实际上，这份中世纪的《圣咏》抄本以及其中的每日祷词，与今天信众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欧洲俗众差不多都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这是一段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的成果，源自由12世纪的欧洲宫廷开启的新潮流。此一潮流在出现后便如同涓涓细流一般，沿社会等级之阶梯向下层流淌，令我们也能领受恩泽。今天，难以计数的男男女女仍然在使用《圣咏》，《圣咏》年历上的很多节日也仍标记着现代年历中的特殊时刻，即便对于那些并不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如情人节、复活节以及圣诞节等节日都出现在了《圣咏》年历当中。6月24日在《哥本哈根圣咏》中既被标注为施洗者约翰的诞生日，也被标注为夏至（*Solsticium*），两个条目都以蓝色墨水写就。6月23日，也就是夏至日的前夜，在抄本里被称为“Sankt Hans Aften”（圣约翰前夜），这在今天的丹麦是一个大众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的深夜在海滩上点燃篝火。我就曾在日德兰北部的斯卡恩（Gammel Skagen）参加了这个节日的庆祝活动，那里曾是埃里克公爵的封地，此番节日体验也令我接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老传统，而那种传统可能比基督教古老得多。

个体信仰并非本书的主题。不过，被收录在《哥本哈根圣咏》抄本中的信经的末尾有一条有关“诸圣共融”（communion of saints）的信纲，据我体会，这是用来与历代信众沟通的一种团契，信众通过这种团契分享共同的属灵渴念和体验。在皇家图书馆度过漫长的一天后，我就突然在一瞬间有了这样的体验。当时，我正读到第193对开页左页到第194对开页右页的晚间集祷经的和平祷词，“Deus a quo s[an]c[t]a desideria recta consilia & iusta sunt opera…”这份祷词即便对于12世纪的人来说也已经非常古老了，但在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的教堂里我仍然每晚都能听到，且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应该都还能听到，它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如同当年它同瓦尔德马国王和克努特四世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样，而他们也读过这份抄本上的这些词句。《公祷书》将这几句祷文翻译为，“神啊，凡圣洁的愿望，一切良善的劝告，和一切正直的事，都是从那里来的，赐给你的仆人那世界所不能给予的和平……守护着我们，令我们不再惧怕仇敌，也许我们可以在安息中度过我们的时光……”八百五十年来，这些祷文并没有发生变化，世人对和平和无所畏惧的渴念也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份共同的祈祷词中，今日的世界同昨日的世界一下子联结起来，两个世界的人的心在一同跳动。



注释：

[1] 即“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译者注

[2] 校勘情况如下：i^{1+6}（原来的卷首衬页现在被标注为第1对开页，该页上记录了圣物清单和年历），$ii \sim xxv^{8}$。

第八章
《布兰诗歌》

13世纪上半叶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Clm 4660

读中学的时候我选修了拉丁语，并不是我在这方面有什么天赋（实际上我没有），而是因为我在别的科目上表现得更糟糕。我上的国王中学是一所公办男校，位于新西兰的达尼丁（Dunedin），现在回想起来，那里的课程即便在当时也属于非常老套的了。我们痛苦地做着常规的语法和翻译练习。我在上预科时的一天，我们的拉丁语老师——我们平常都称呼他邓伍迪先生——突发奇想，从家里带来一台便携式留声机，为我们播放了卡尔·奥尔夫（Carl Orff, 1895~1982）的配乐朗诵，朗诵的内容是中世纪的《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那迷人的音乐以及动听且有韵律的拉丁语文本一下子把我们迷住了，里面讲述的是有关女孩、酒馆以及命运的不公的故事。教室里坐着的是一群体内的荷尔蒙在奔涌的少年，这样的拉丁语作品毫无疑问触碰到了我们的灵魂——一种凯撒的《高卢战记》绝对不会产生的效果。我们恳请邓伍迪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首歌，并向邓伍迪先生保证我们能借此学习拉丁语。邓伍迪先生人很好，他照做了。我们很快便记住了很多拉丁韵文，至今我仍然能想起来一些，比如“o! o! o! totus floreo, iam amore virginali, totus ardeo!”（哦！哦！哦！爱的岩浆在胸中涌动！为这初恋而喷发！）。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年纪。这样的音乐对我们来说充满诱惑力，召唤我们去想象中世纪的学生的模样，多情且放纵的他们肆意游荡在12世纪欧洲的诗文和歌谣里，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没什么两样。其他学校的拉丁语老师想必也这样做了，令我们这代人对这些充满欲望和反叛精神的拉丁诗文都很熟悉，拉丁语也正是因此而在当时仍是一门国际语言。



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已经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了，放暑假时我会背上背包，带着从博德利图书馆借来的相机，外出游走一番。我的路线跟《布兰诗歌》里面那些流浪学生的路线有很多重合之处，八百多年前，他们也会前往巴黎以及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那些拥有大教堂的城市，并且在奥地利的各个修道院之间穿行，拜读收藏于当地图书馆的抄本。我大多住在青年旅馆或者帐篷里。这样的体验虽然孤独，但也迷人，且我很享受这样的情景：一觉醒来，将发间的青草和昆虫拂去，接着前往市政图书馆的盥洗室洗漱一番，尔后相当光鲜地出现在问询台前，等着观瞻自己的清单上那些12世纪的珍贵书册。在不同的图书馆里，我时不时地会遇到同一批人，我们会自认为是一个国际游方学生群体的一分子，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论文选题。还记得有一次，在奥地利的一座修道院里，我的德语不够用了，于是拉丁语便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很显然，在我们的世界里，拉丁语是唯一的共通语言。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大台阶，据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世的时候，只有国王本人可以踏上此台阶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拜访了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那一趟慕尼黑之行我至今还记得。此前，我走访了法国乡间的一些非常舒适且冷清的图书馆，学童和老人就在里面看报聊天，消磨午后的时光，相比之下，慕尼黑的图书馆真是令人生畏。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坐落在路德维希大街上，这条大街从慕尼黑城北的凯旋门一直延伸到城市中央地带的音乐厅广场。图书馆本身是一座巨大的古典风格的砖瓦建筑，用的是中欧各处可见的黄色涂料。它于1843年建成并开馆。图书馆外矗立着四座巨大的人物雕像，分别是修昔底德（代表历史）、荷马（代表文学）、亚里士多德（代表哲学）和希波克拉底（代表医学）。你登上街边的阶梯，推开三道大门中的一道，进入图书馆，就可以来到一个巨大的门厅。它就像一个你从未见识过的巨型银行。随后，你走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从古典风格的廊柱中间穿行而过。台阶旁的金属扶手由小小的铜狮子连接。据说，于1825~1848年在位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King Ludwig I）本打算将此建成当世欧洲最为华丽、宏伟的台阶，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他本人能够使用它。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紧张地攀登这一台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只有两英寸高。我的头顶是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Ⅴ）的雕像，此公是于1550~1579年在位的巴伐利亚公爵，也正是他于1558年为这座图书馆奠基；当然还有路德维希一世的雕像。台阶两侧各有一个四周由大型建筑围绕的方形庭院。若是要前往普通印刷书册的阅览室，请向前直走。要前往珍本和抄本部，则需要右拐后再向右拐，折返至图书馆的前侧，穿过入口上方排布着廊柱的“侯爵大厅”（Fürstenhall），然后左拐，沿着同路德维希大街平行的走廊前行，穿过图书馆展览室的大门，再通过一个十字转门，再次左拐（此时走向远离路德维希大街的方向，进入这座长方形建筑的

远端），接着便要路过两个极为壮观的16世纪的地球仪，以及路德维希一世的流动图书馆，最终就来到了珍本阅览室。这个阅览室两边都可以自然采光，网状窗帘则被用来减弱光线强度。阅览室里面的长桌已经被一群灰白头发的老教授占领了，他们都拥有德国学术界的许多顶级学术头衔。借阅台设在阅览室的远端。阅览室中间有台阶通向中层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全面的有关抄本的开架参考文献（本书第十二章还会谈到这个情况）。这里的氛围专业且学术，唯一的声响就是铅笔在不停地写写画画的声音。在慕尼黑的这座州立图书馆里，是根本不会有冷清或者乡间的气息存在的。

13世纪的《布兰诗歌》抄本——卡尔·奥尔夫的清唱剧的灵感来源——自1806年开始便一直在这座图书馆了。“布兰”（Burana）这个名字是上巴伐利亚的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拉丁语拼法，这座修道院创建于8世纪，在慕尼黑以南大约四十英里的地方。1803年，这座修道院因拿破仑推行的改革而遭到关闭，随后人们在该修道院的藏书当中发现了没有被列入藏书名录的《布兰诗歌》抄本。抄本辑录了大约三百五十首诗歌和歌谣，其中很多是该抄本独有的，但只有大约二十首诗歌或者其选段拥有奥尔夫的配乐版。大部分诗歌和歌谣是拉丁语的，但中间也夹杂了一些用各种欧洲语言写成的作品，还有一些重要作品用的是中古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它们是存留至今的方言歌谣当中最为古老的一批。《布兰诗歌》抄本绝对是现存的中世纪诗歌集抄本中最为精美的，而且也是流传最广的，它是德意志的民族瑰宝之一。



上巴伐利亚的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于1803年被关闭，《布兰诗歌》就是在此被发现并以此得名的

我有缘得见这份抄本，要归功于沃尔夫冈-瓦伦丁·伊卡斯

（Wolfgang-Valentine Ikas），伊卡斯先生是慕尼黑的这座图书馆的珍本部负责人，我有幸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结识。在我向他提出请求，希望能看一看他管理的抄本时，我感觉到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我要看的是《奥托三世福音书》，这份抄本可是现存的最为珍贵且最为脆弱的抄本之一；当我说出要见的是《布兰诗歌》时，我明显感觉到他如释重负。不过，其实《布兰诗歌》也十分珍贵，通常情况下是无法见到的。即便是伊卡斯先生本人也从未见过这份抄本的真容。伊卡斯先生首先要征询“图书与抄本修复部”（Institut für Buch-und Handschriftenrestaurierung）负责人的意见，以确定这份抄本的状况是否适合跟读者见面。几天的焦虑等待之后，我最终获得允准。

此次造访跟我还是学生时背着帆布书包到处乱跑的情形完全不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我省去了领取读者票的程序，直接将我带进馆内。图书馆里已经有一些人了，我认得其中的几个，比如来自瓦尔堡研究中心的贝尔托德·克莱斯（Berthold Kress），他正在复印一篇俄语文章，是关于先知但以理的形象的，见到我他似乎毫不意外；还有冈瑟尔·格鲁克（Günther Glück），他来研究一些华美书册——他本人就有一批极为珍贵的藏书。一番寒暄之后，我径直前往借阅台。

《布兰诗歌》在这座图书馆被归入“瑰宝级抄本”（Tresorhandschrift）之列，是最高等级的抄本，因此我被要求戴上手套，手套是由馆方卖给读者的，读者可以留着它以便继续使用（但他们送了我一副）。手套是白色的，背面有棱纹，手腕处是猩红色的，很时髦，但它会让你看起来有点像被切掉了手。工作人员领着我来到一张桌子面前，这张桌子很特殊，被与其他桌子隔离了开来的，就在负责人办公桌的左边。之后，工作人员拿出两块楔子形状的塑料泡沫，上面覆盖有绿色的粗呢。抄本和其独立的增补书页分别收藏在两个用厚重的粗麻布包裹着的盒子里。

抄本的封皮大约10英寸长、7英寸宽，不计装帧的抄本本身为1.75英寸厚。封皮的木板并不厚，是18世纪的物件，其内沿被打磨成斜边，是典型的德意志风格，并被用褐色皮革包裹了起来，皮革之上有无色压印纹理。抄本的装帧风格跟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的其他抄本是一样的，但这是存留至今的可以证明这份抄本的确出自该修道院的唯一证据。抄本上只配备了一个搭扣，且是中世纪晚期的，应该是从其他抄本上转移过来的。搭扣的皮带被系在封底的边缘，这也体现了典型的德意志风格，在法兰西或者英格兰风格的抄本上，皮带通常会被系在封面的边缘。这根皮带显然被修复过，是用白色的鞣革制成的，由此可以推断出抄本最初的封皮应该就是这个颜色。搭扣本身是由黄铜制成的，上面刻有“ave”和“ma[r]ia”的字样，用的是哥特字体，其中的字母“r”被一颗用来将搭扣钉在封面板材上的钉子弄得模糊不清了。扣环如今被包裹了起来，仿佛被包上了包扎带，以防它同别的东西发生刮擦。诸如“Ave Maria”这样的词在中世纪德意志的抄本装帧当中是很常见的，它们并不能说明抄本的渊源，但完全符合了这样一份为宗教团体制作的抄本的风格。

只需要轻轻地按压抄本，搭扣便会自动解开。我在绿色粗呢书垫上

将抄本打开。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衬页，上面有多处添加内容，比如用铅笔写的“B Buran 160”（19世纪初期的字迹，并且被用横线划去了），用红墨水写的“s.XII-XIII”字样，应该是日期之类的表述（也被划掉了），还有就是现今的书架编号“Clm 4660”，字号很大，是用紫色粉笔写上去的。这个编号也出现在了书脊的一张纸签上。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Clm”代表的是“Codex latinus monacensis”三个词的首字母缩写，意思就是“慕尼黑拉丁语抄本”，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人们不应该再继续用“Munich MS Clm”这一语义重复的表述了，因为所有的相关信息都已经被浓缩在三个首字母里面了。这些抄本是以递增的次序进行编号的。来自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的抄本占据了“Clm 4501-4663”这个号段；因此编号为“4660”的《布兰诗歌》应当在这些抄本里排第160号，这也就解释了卷首衬页里用铅笔添加的那个数字“160”。

抄本第一页上是著名的“时运之轮”图，呈现的是一个国王先是高居时运之轮的顶端，然后从时运之轮上摔落（王冠也随之掉落），最后被碾压在轮子底部的场景。在摔落的国王的右上方有一个19世纪的黑色签印，印着“BIBIOTHECA REGIA MONCENSIS”（慕尼黑皇家图书馆）的字样，这其实颇有反讽意味，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8年，时运之轮果真发生了旋转，巴伐利亚王国就此瓦解。页面底端挤着六行较小且密密麻麻的文字，应该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这些文字在奥尔夫的断音鼓点和铜钹声的衬托之下，读起来是颇为生动传神的，完全可以匹配“时运之轮”中的场景：“O fortuna, velud luna, statu variabilis, semp[er]crescis aut decrescis, vita detestabilis… ”（哦，时运，像那月亮，流变不居，盈亏无常，可怕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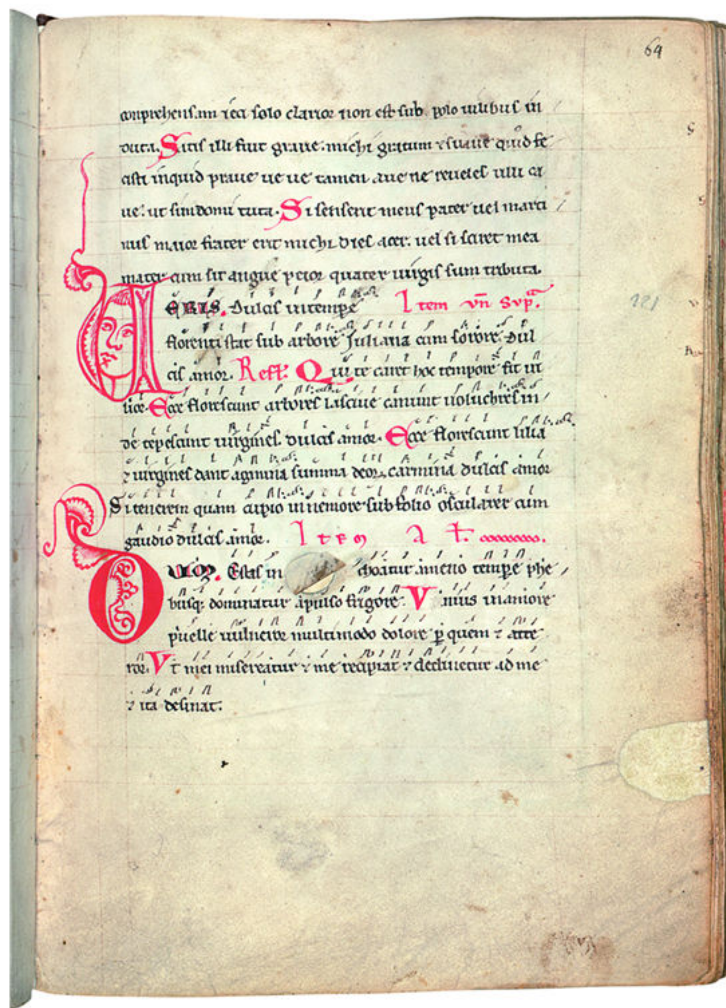
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布兰诗歌》的真正开篇。不妨看一看抄本的校勘情况，这份抄本的校勘工作很容易，即便戴着手套也能完成，因为书页普遍很厚，缝合痕迹也很明显。[1]不过抄本如今的情况跟其原始情况很不一样。如今的卷首页显然是从抄本的其他位置转移过来的，应该是18世纪抄本重装工程的结果，这为了让抄本拥有一张常有插图的卷首页。倘若抄本的主人是藏书家，那么这样的调整就并非同寻常，毕竟，他们不会希望一打开抄本就看到大片文字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动，实际上，当前抄本的编排顺序极为混乱，而且有严重的缺页现象。[2]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威廉·迈耶（Wilhelm Meyer, 1845~1917）就曾在州立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散页里面发现了一批来自《布兰诗歌》的书页，其中包括了抄本最后一折里丢失的六页。如今，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给了这些散页独立的编号“Clm 4660a”，并称其为《布兰诗歌残章》（*Fragmenta Burana*），将其与抄本收藏在一起。但这些散页以及迈耶教授于1870年写下的一份说明被放在独立的文件夹内，且被装在一个系着黑色缎带的卷宗夹里，该卷宗夹外还有一个粗呢布盒子。是否要将18世纪那质量低下的重装成果纠正过来，令抄本恢复原貌，并将后来发现的散页放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问题时不时地会被提出，因为若是凭借目前的装订顺序，人们是很难构想出抄本的原貌并领略其完整内容的。



《布兰诗歌》目前的卷首页，插图呈现的是“时运之轮”，页面底端的歌谣为“O fortuna, velud luna”（哦，时运，像那月亮）

有时候，抄本给人的第一印象包含着预料之外的启示。各个抄本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在慕尼黑的这间阅览室里，人们就在查阅各式抄本，从奥托王朝的祈祷书、意大利的法律文献到法国的时祷书。我是凭借抄本的版式、大小、字体（不阅读里面的内容）以及彩饰的尺寸和颜色将这些抄本识别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看一眼便做出判断。M.R.詹姆斯（M. R. James, 1862~1936）应该是他那个时代里见识过最多中世纪抄本的人（至少在当时还活着的人当中是这样），也正是他于1902年最早将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编入名录的。他在他写的那篇著名的鬼故事《阿尔贝里克神父的剪贴簿》（*Canon Alberic's Scrap-Book*）里，相当传神地刻画了这种根据直觉判断抄本的过程：“甚至都没等打开外面的包装纸，丹尼斯通就已经对这书的体积和形状产生了兴趣。‘太大了，肯定不是祈祷书，’他暗自说，‘而且看形状也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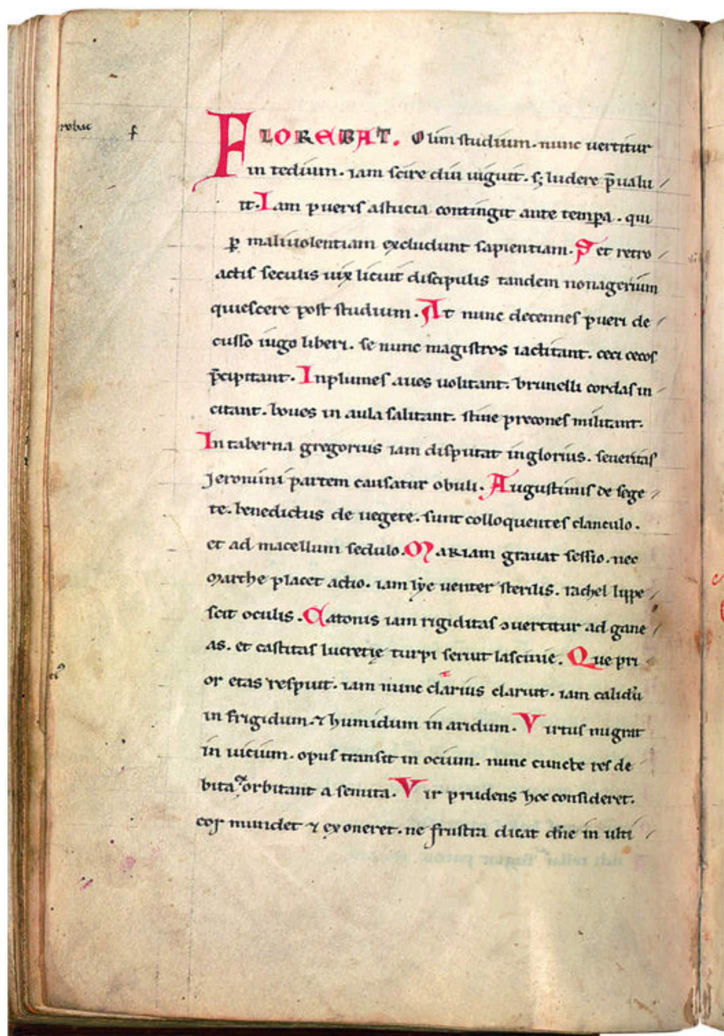
是轮唱赞美诗集（antiphoner）。’”



《布兰诗歌》乍看起来就像是13世纪的日课经，因为它也有红色首字母、经文选段、红字标题，以及简短的纽姆谱（neumes）

如果我在远处看到有人翻看《布兰诗歌》，肯定以为那是在看一份日课经抄本。这份抄本远看之下的确像极了日课经。所谓的日课经曾是（且对于修士们来说现在仍是）《诗篇》和为教会年历选择的经文的标准汇编，用于从夜祷一直到睡前祷的每日祷告。一般是神职人员和教团成员在使用日课经。它通常十分便携，因此常被称为“Portiforium”（袖珍本），这样的抄本精简且有序、十分厚实，而且经文通常是用较随意的字体写就的，跟弥撒书不一样。德意志地区最早的日课经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后，《布兰诗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二者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形状和大小，还表现在页面布局方面：文本当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有红色的首字母，如同《诗篇》中的诗节一样，并且在字词上方会

时不时标注有音符，这也是日课经中常见的情况。一些歌谣的开篇词实际上跟日课经里面诗篇的开篇词是一样的，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诸如“Bonum est”（是好的）、“Lauda”（赞美）这样的词。人们注意到了《布兰诗歌》里的爱情诗遵循了从春天到秋天的顺序，而日课经的夏季篇也是从复活节到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当今的中世纪文学或者世俗音乐的研究者是否注意到了这样的相似之处，我并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可以肯定，13世纪早期的人们都会意识到这种对应关系。在几代人的时间后，方济各会的吟游诗人马特弗雷·埃蒙高德（Matfre Ermengaud）就将自己的世俗诗集称为了*Breviari d'amor*（《爱之日课经》）。


FLOREBAT. Olim studium. nunc uertitur
in tedium. iam scire diu uiguit. sed ludere preualu
it. Iam pueris astucia contingit ante tempora. qui
per maliuolentiam excludunt sapientiam. Set retro
actis seculis uix licuit discipulis tandem nonagenario
quiescere post studium. At nunc decennes pueri de
cusso iugo liberi. se nunc magistros iactitant. ceci cecos
precipitant. Inplumes aues uolitant. brunelli cordas in
citant. boues in aula saltant. stiue precones militant.
In taberna gregorius iam disputat inglorius. seueritas
Jeronimi partem causatur obuli. Augustinus de lege
te. benedictus de uegete. sunt colloquentes clanculo.
et ad macellum sedulo. Mariam grauat sessio. nec
Marthe placet actio. iam lye uenter sterilis. rachel lippe
scit oculis. Catonis iam rigiditas conuertitur ad gane
as. et castitas lucretie turpi seruit lasciuie. Que pri
or etas respuit. iam nunc clarius claruit. iam calidum
in frigidum et humidum in aridum. Virtus migrat
in uicium. opus transit in ocium. nunc cuncte res de
uia exorbitant a semita. Vir prudens hoc consideret.
cor mundet et exoneret. ne frustra dicat domine in ulti

这首题为“Florebat olim studium”（学问一度兴盛）的诗，讲述的是学问衰落这永恒的主题，它将诗人所在的时代与学问备受尊崇的过往时代进行了对比

一旦将抄本恢复至原来的编排方式，便不难见出，它的内容是可以很清晰地划分为四个文本集的。它们通常是说教和讽刺诗；情歌——以“Incipiunt iubili”为大标题，意思是“歌谣部分由此开始”（第18对开页的左页）；饮酒和游戏歌谣；以及宗教剧。接下来让我们依次了解一下它们。

许多讽刺诗是以道德堕落为主题的，这一永恒的主题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也并非专属某个时代。“Ecce torpet probitas”（且看天丧斯文）就是其中的典型，揭露美德不再、金钱称王之炎凉世态的诗也很常见，比如“In terra nummus rex est hoc tempore summus”（此时金钱为主）。还有一些讲述的是命运之多舛，比如“Fortune plango vulnera”（哀悼命运之伤）以及前面提到的那首著名的“O fortuna, velud luna”（哦，时运女神），这两首诗都是添加在页边空白处的。另有一些则在哀叹学问的衰落，第44对开页左页就有诗如下：

Florebat olim studium

nunc vertitur in tedium,

iam scire diu viguit,

s[e]d ludere p[re]valuit.

Iam pueris astutia

contingit ante temp[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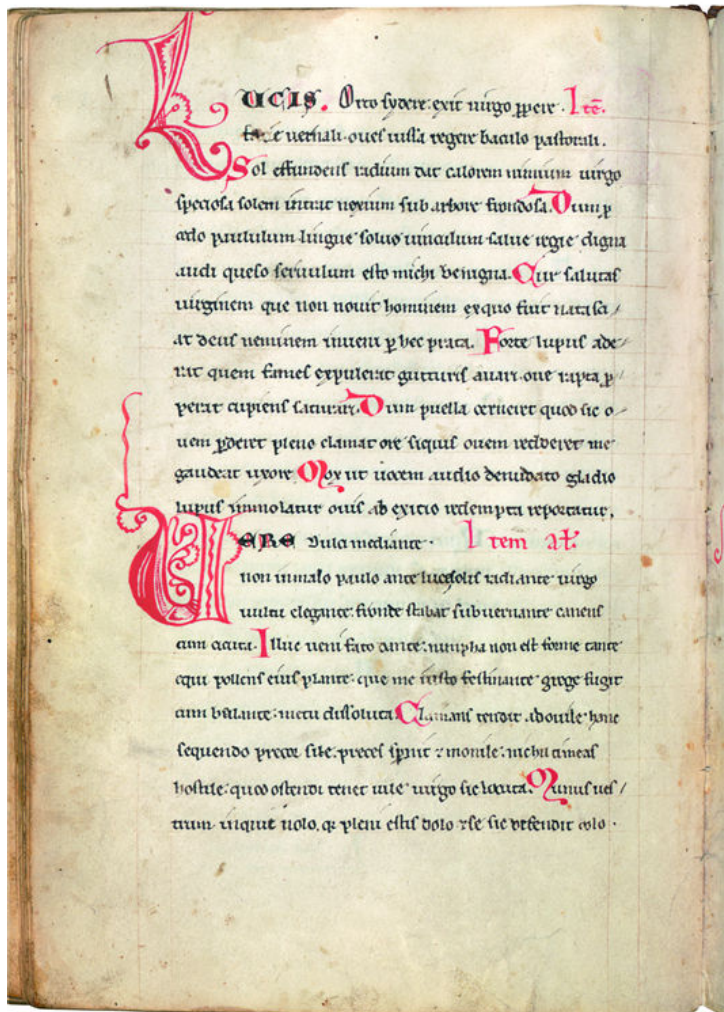
qui p[er]malivolentiam

excludat sapientiam …

（大意为：学问一度兴盛，而今沦落凡尘；知识一度受宠，而今世人更喜玩乐。市侩之风，过早侵袭孩童，终至智慧陨灭……）

抄本中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仿福音书文字，从第11对开页的右页开始，标题是“Ewangelium”，文字为红色（其中字母“w”用的是德语拼写方法）。它被设计成了乍一看就像是日课经或者弥撒书当中《马可福音》的经文的模样，但是读到最后，读者会意识到它的主题是“银币”，“*INITIUM s [an] c [t] i ev [an] g [e]lii se[cu]nd[u]m marcas argenti,* In illo t[em]p[or]e dixit papa…”（马可银币福音书：那时，教皇……）。这实际上是一篇相当粗俗的散文，讲述的是教皇和枢机主教拒绝接纳任何不愿出大价钱换取特权的人。这段文字差不多全部由三十一条真实的拉丁经文组成，来自《书信集》《福音书》《约伯书》《诗篇》《西番雅书》《使徒行传》《耶利米书》《申命记》等——它们被从原有语境中抽取出来，重组在了一起。这事不免令我回想起当年诺克斯学院的一位候补牧师私下里跟我说的一段玩笑性质的布道词。那是一天深夜，他悄悄跟我说：“看哪，有两个博士，名叫亚当和夏娃，他们出去撒种，遇到一个育龄妇女，在这之后他们的族人不断增加……”后面还有很多（实际上，可能在喝几杯啤酒之后，我还能记起不少），要体会此等幽默，是需要熟知经文的。虽然抄本中这首讽刺诗的矛头直指罗马教廷，但我们只有将之置于宗教语境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它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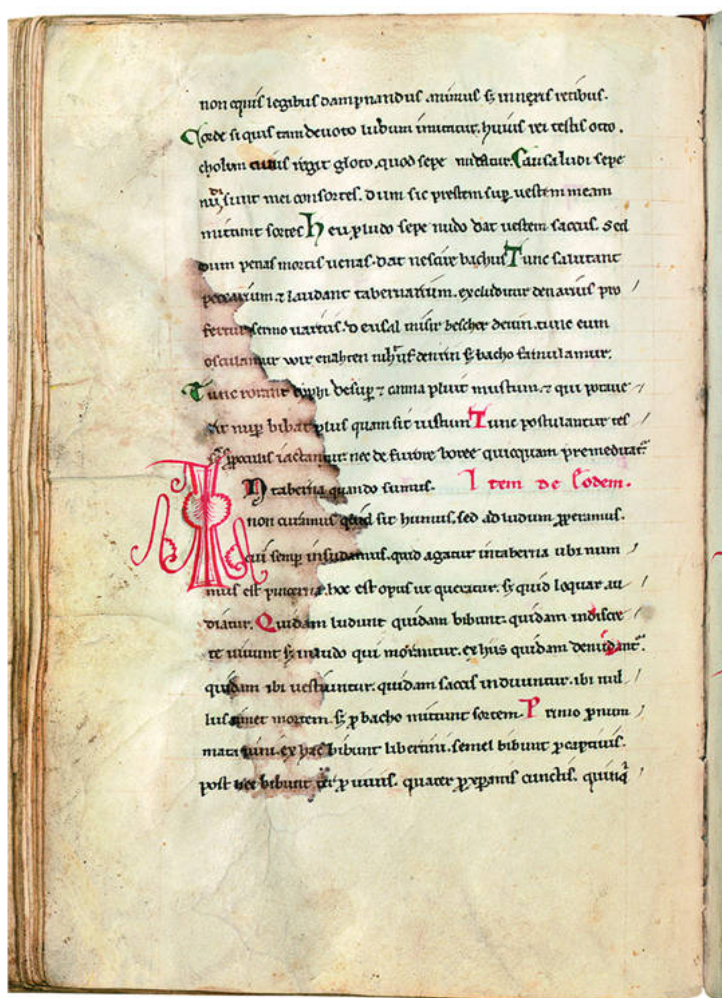
戏仿福音书的文本，其中的句子是从真实的福音书经文当中选取而来的，讽刺了教廷的腐败



题为“Vere dulci mediante”（正值春日）的诗歌的开篇，讲述的是作者同美丽牧羊女的一场春日的浪漫邂逅

情歌是《布兰诗歌》中最长且最有名的部分，大约由一百八十八首歌谣组成，当然，这还要看具体是如何划分的。从缮写格式来看，这部分内容是由几大段连贯的散文组成的，这跟莱顿《阿拉图斯抄本》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不一样，后两份抄本采用的都是每句话新起一行的格式；而且，我们只有在大声诵读这部分文本的时候才能辨识出其韵律模式。其中一些诗描述了历史上的情爱故事，比如埃涅阿斯和迦太基女王狄多之间的故事，不过，大多数讲述的是个人的浪漫体验或者不得回报的思念。很多诗是以春日场景为开篇的，这正是年轻人的思春时节。对于中世纪的世俗诗歌来说，这样的开篇很常见（比如《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开篇就是“当四月……”，不过乔叟写得有点滑稽，因为14世纪的读者在看到四月时，不免会对情爱之事充满期待，然而，故事主人公的目标是朝圣）。在《布兰诗歌》里，众多乡间少女在洒满阳

光的草地上漫步、嬉戏，有些花花公子正抓住机会求爱，有些则在苦苦等待。有一首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从抄本的第63对开页左页中间开始，到下一页的上半页处结束，具体诗文如下：



这首饮酒诗题为“In taberna quando sumus”（我们身在酒馆），这张书页上有大片水渍，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在酒馆使用了这份抄本

Vere dulci mediante,

non in maio, paulo ante,

luce solis radiante,

virgo vultu elegante

fronde stabat sub vernante,

canens cum cicuta.

Illuc veni fato dante,

nimpha non est forme tante,

equi pollens eius plante,

que me viso festinante

grege fugit cum balante

metu dissoluta …

[“正值春日，未到五月（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推断，抄本中原文为“non in malo”而非“non in maio”，很难对此做出合理解释），阳光普照，甜美的少女在绿荫下吹笛。我在命运的指使下来到这里。没有仙女比她更美。她光着脚，是那样可爱。她见我匆匆到来（这里同样是一个推测，因为抄写员给出的文字其实是“que me iusto festinante”），便赶着她那咩咩叫的羊群逃离”（很显然，这个少女是个牧羊女她感到十分害怕”）]接下来的内容大致上说的是：那公子追上牧羊女，给了牧羊女一条项链，牧羊女嗤之以鼻，但是公子将牧羊女按在地上，先是亲吻，接着又做了更多的事，那之后，牧羊女唯一关心的是不让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知道此事，特别是不能让自己的母亲知道，牧羊女说，她的母亲比蛇还歹毒（“angue peior”）。在民谣里面（且就少男少女的实际经验来说），这样的情节再正常不过了。

第23页对开页右页上有一首更为精巧的诗：

Dum Diane vitrea

sero lampas oritur,

et a fratris rosea

luce dum succenditur,

dulcis aura Zephiri

spirans omnes etheri

nubes tollit, sic emollit

et immutat cor quod nutat

ad amoris pignora …

这首诗歌呈现的是明月升起、夕阳西下时分的场景："狄阿娜女神的水晶灯冉冉升起，她的哥哥用那玫瑰色的光芒将之映照，恬美西风吹拂而过，将天空中的云朵悉数带走，风中饱含韵律，令灵魂舒缓下来，令爱抚之后悸动的心灵归于平静……"这首诗描写了情人们在一番欢爱之后，恬静入睡的情形。诗人听着夜莺的叫声在夜空中回荡，闻着树下绽放的玫瑰花香，也渐渐闭上了眼睛。无论你是否喜欢卡尔·奥尔夫的音乐，这首诗本身都是十分美妙的。

梦境之后，我们在酒歌的歌声、啤酒桶的撞击声和拍打皮短裤的声音中醒来。抄本中的一些酒歌非常有名，比如，"In taberna quando sumus/non curamus quid sit humus"（我们身在酒馆，不管红尘俗世）；但肯定要关心一下自己有多少钱来喝酒：一杯为囚犯，三杯为生者，四杯为全体基督徒，五杯为死者，六杯为烟花姐妹，七杯为乡野士兵，八杯为顽劣伙伴，九杯为散落四方的修士，十杯为出海人，十一杯为争吵之人，十二杯为忏悔者，十三杯为旅人，如此等等，越喝越醉。这首酒歌出现在第87对开页的左页，页面上有严重的水渍，可能有人在酒馆使用过这份抄本。还有一些歌谣是关于赌博["Tessera, blandita fueras michi …"，"骰子，你（曾）让我欢欣不已……"]，和象棋（"Qui cupit egregium scachorum nosce ludum…"，"无论谁，若想知道这出名的象棋游戏……"，这首歌非常精确地解释了象棋的走法）的。有几首歌的篇幅很长，其中一首是这么开篇的，"Cum in orbem universum …"，这本来是《马可福音》16:15中的命令，即"往普天下去"，不过，在歌中它被转换成了对欧洲大地之上所有的受苦者反抗诸般清规戒律的召唤，它告诉人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务必尽情吃喝玩乐。纵情享乐者从四海八荒集结而来：意大利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还有奥地利人。

《布兰诗歌》的第四类文本是宗教剧。它面向的是虔诚的学者，而不是那些迷恋世俗歌谣的人。此类宗教剧是所有现代戏剧的中世纪先驱。礼拜剧（Liturgical play）诞生于10世纪初，其主题都是围绕着年历中的重大节日，如圣徒纪念日建立起来的。《布兰诗歌》当中，第一个宗教剧是圣诞剧，圣诞剧的传统今天依然延续着，至少在幼儿园是这样的。《主的诞生》（*Ludus de nativitate domini*）一剧，在第99对开页的右页开启，并带有用红色墨水写的舞台提示词。这部剧非常生动，很适合搬上舞台。剧中人物众多。圣奥古斯丁坐在教堂前面，他的两侧有以赛亚、但以理以及《旧约》中的一众先知。大祭司（Archisynagogus）从舞台左边引领一批犹太人进入；此时，以赛亚要吟唱道："Ecce virgo pariet sine viri semine/per quod mundum abluet a peccati crimine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世界在他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罪愆"，这些台词部分出自《以赛亚书》7:14，当然不是那么准确）。此时，但以理要唱出这样的告诫之词："O iudea misera, tua cadit unctio …"（不幸的犹太人，你们将不再受膏），这是关于黑暗中的犹太人的。接着，埃里色雷女先知（Erithraean Sibyl）指向天上的一颗星，告诉大家，这颗星预示着救主将以无沾成胎的方式降生。接着亚伦进场，将那开花的杖放在圣坛之上，那是代表十二部族的十二根杖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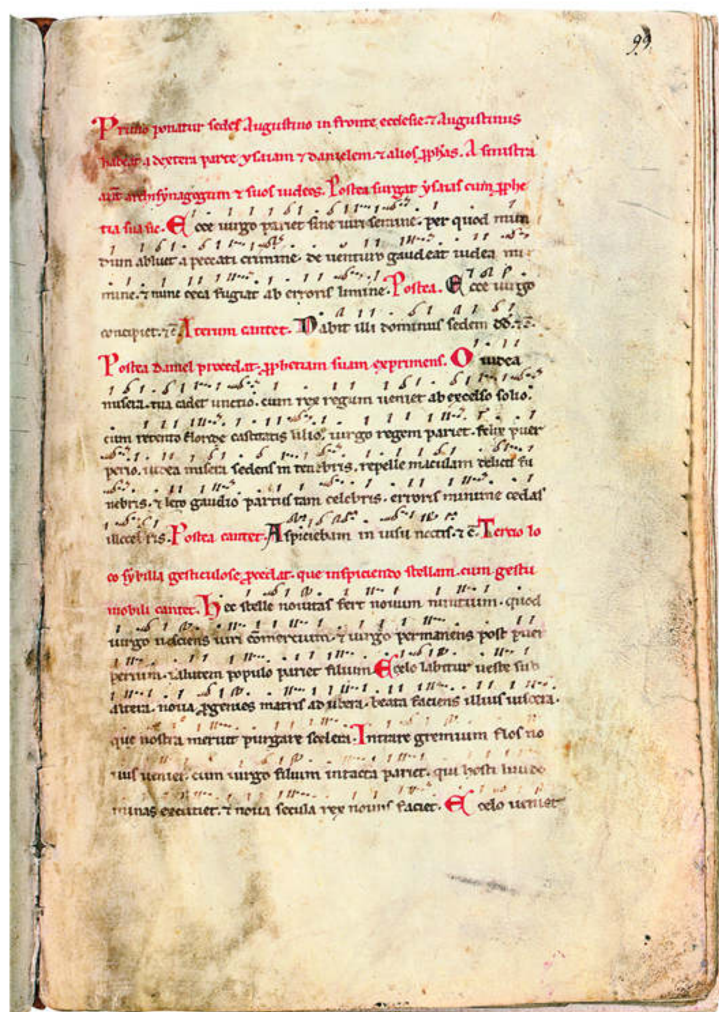
中唯一一支发芽开花的（参见《民数记》17:8），然后亚伦也开始歌唱。随后巴兰骑驴进场——观众肯定会喜欢这个桥段的——宣布有星要出于雅各（参见《民数记》24:17）。这时候，大祭司捶胸顿足，指斥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合逻辑，他告诉犹太人说，无沾成胎，降生人子，这样的事情就跟牛生出骆驼一样，绝无可能。各方最终将争执提交奥古斯丁裁断，奥古斯丁给出裁决：预言不可能是错的。大祭司听后摇头低语，显然没有信服。接着便轮到天使长加百利带着马利亚出场，宣告圣子将要降生。天空中遂出现一颗星，合唱团齐声吟唱，“Hodie xpistus natus est”（“今天，基督降生”，这正是圣诞节晚祷的轮唱词）。三王抵达，同希律王讨论这颗星的寓意，大祭司则正在给希律王邪恶的建议（此一场景十分幽默）。牧羊人跟撒旦争论这消息是不是真的。接下来来，这些人都来到伯利恒的马厩，来到圣子边上。希律王命令斩杀城中婴孩。最终希律王自己反被虫子活活啃死，从王座跌落。魔鬼抬走了他的尸体（此处会有观众的欢呼声）。约瑟带领马利亚和圣子前往埃及避难。这部剧的部分内容跟今天的圣诞节童话剧没有太大差别。

还有一些宗教剧是关于埃及国王的（当时圣母和圣子在埃及避难），以及关于本丢·彼拉多的。有一段唱词唱的是一个妓女向一个商人索要胭脂擦脸（“Chramer, gip die varwe mier...”），配上奥尔夫的音乐便成了一首俏皮的德语歌谣，它实际上原是抄本当中“彼拉多剧”的一部分，并且在抄本里面是由抹大拉的马利亚吟唱出来的，位于第107对开页的左页。

馆方要求我戴上白手套（你可能会觉得我对戴白手套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由此产生的奇特情况是：在我翻阅到抄本的这一页时，我的白手套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已经有八百年历史的灰尘粘在上面了，尽管在翻阅过程中，我极度小心，仅仅触碰了书页的边缘。看来，不是我污染了抄本，恰恰相反，是抄本弄脏了我的手套。若是再用已经变黑的手套去触碰干净书页，就很危险了。在此之外还有一桩伤心事。我将这副手套小心翼翼地作为珍贵纪念品带回了家，毕竟，那上面沾染的是《布兰诗歌》的灰尘，结果我的太太看到手套震惊不已，直接把它丢进了洗衣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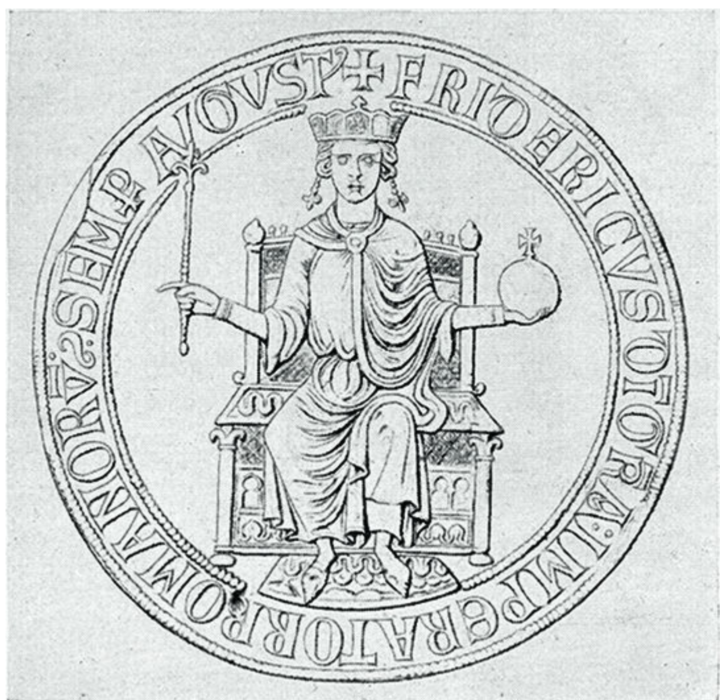
《布兰诗歌》共有八幅插图，画工娴熟，只是着色有些随意。现在就按照当前而非原来的顺序对其依次进行介绍。当前的卷首页插图就是著名的“时运之轮”，轮子沿顺时针方向无情地旋转着。轮子左侧是一个年轻人攀着轮子边缘在向上升，并配有文字“regnabo”（我将君临天下）。轮子上方，这个年轻人已经成王，配图文字是“Regno”（我正君临天下）；当他来到轮子右侧时，他从轮子上跌落了下来，王冠也已掉落，配图文字是“regnavi”（我曾君临天下）；接下来，他就被压在了轮子底部，配图文字是“sum sine regno”（我已无王权）。时运之轮是由六根辐条支撑起来，直径约三英寸，轮子中央没有穿孔的痕迹，跟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里的天体运行轨道图不一样；轮子的外缘很可能是依着圆盘或者圆形玻璃片抑或是罐子画的。端坐在轮子中央的那个人很有意思，人们通常将之视为“时运女神”的化身，但有点需要我们注意。其一，此人并非在轮子外的某个位置上推动轮子旋转，而是端坐在轮子

里面，因此，应当说此人同样是臣服于时运之无常变幻的。更为怪异的是，这一形象看起来更像是男性，他下巴上的胡茬很明显，上嘴唇上也长了胡子。时运之神的典型形象就如同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 Philosophiae*，约480～524）里呈现的那样，从来都是女性。盯着眼前的这幅插图，我突然间意识到，此人定然是成年后的国王，他头顶的王冠跟轮子顶端那个人的王冠一样，那人从轮子顶端跌落下来的时候，身披白绿相间的外袍，轮子中央的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装扮。而这幅很可能是中世纪艺术作品当中被复制次数最多的时运之神的画作中，并没有出现时运之神的形象，时运之神根本就没有现身。我们都被页面底端的《哦，时运》误导了，更何况这首诗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圣诞剧《主的诞生》的文本，有舞台指导和开场曲

此外，图中人物肯定是男性，我们也许能辨识出他的身份。艺术史学家定然已经注意到（尽管我不记得有谁提过这个情况），插图当中那个头戴王冠的人物形象，很显然是依照一枚中世纪皇家印章的正面图案创制的。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皇家印章中，同这幅插图最为切近者当属于1220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印章。插图中的图案跟腓特烈二世的印章差不多一样大小。在图案设计上，两人的左膝都向前倾，手臂抬起，衣服的褶皱从脖颈处垂下。他们的王冠和发型也一模一样。倘若插图中的这个人物形象真的是从腓特烈二世的皇家特许状上复制而来的，那么这份抄本的创制地也就不难确定了——应该就是帝国境内的某个著名宗教机构，它有足够的声望收到过或者能接触到特许状，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必须是在1220年之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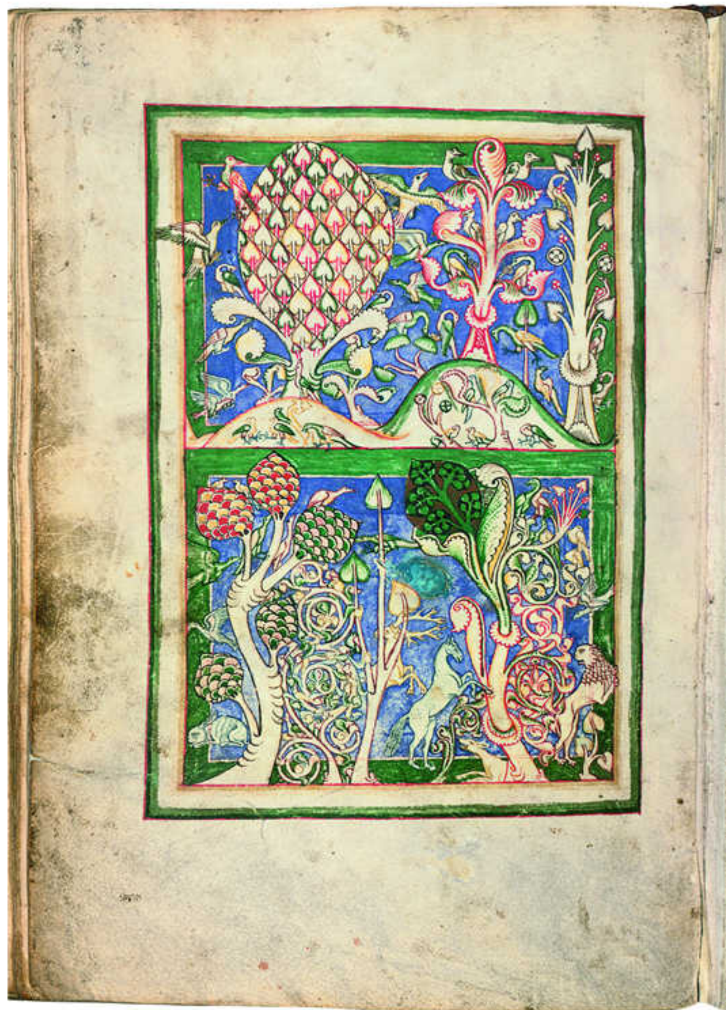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220～1250在位）的印章，《布兰诗歌》里面端坐在“时运之轮”中央的那个人物很可能是依照此印章上的形象画的

第二幅插图占据了第64对开页左页的整页。图中是两片绿意盎然的林地。这幅插图应当是中世纪艺术作品当中最早的风景画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它表现的是作为情爱诗篇背景的春日时光，但这也是错误的。正对着插图的诗文有如下开篇，“Ab estatis floribus amor nos salutat ...”（夏日正隆，爱情在迎候……）。这幅插图分为两栏：上栏的树林里百鸟啁啾；下栏中则是一个走兽出没的世界，有一只蹲着的野兔、一头鹿、一匹跳跃的马、一只在矮树丛当中的像是猎犬的动物，还有一头狮子。飞鸟和走兽如此判然两分的场景，令人不禁联想到罗曼风格的《诗

篇》和《动物寓言集》抄本当中的创世周期图。据《创世记》，在创世周期当中，树木诞生于第三天，飞鸟第五天，走兽则要等到第六天。而且，图中出现了狮子，这显然更契合伊甸园的场景，而非春日的日耳曼丛林。第56对开页的右页上有两首诗，第一首列举了自然界的所有鸟类（雀鹰、公鸡、鹳、啄木鸟、喜鹊、蜂虎、海鸥、朱鹭、斑鸠、猫头鹰、寒鸦、秃鹫、鹦鹉、鸽子、林鸽、渡鸦、乌鸦、戴胜、莺鸟、鹧鸪、知更鸟，等等）；第二首则成了走兽列表，从狮子开始（跟《动物寓言集》中一样），包括猎豹（有德语注解“liebart”）、大象（注解为“elephant”）、熊（注解为“ber”），等等。这两个林中场景应该是在表现上帝创造的大自然，而非中世纪的春日田园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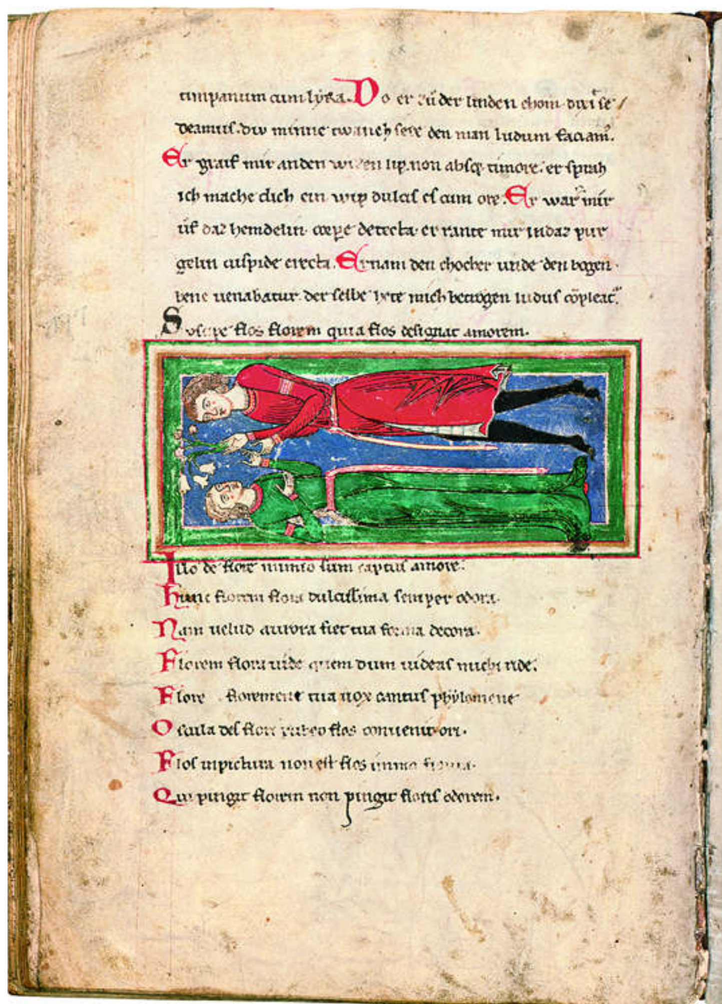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两幅插图则很明显是专注于爱情主题的。其一出现在第72对开页的左页，长且狭窄。将抄本调转九十度，便能看到一个站着的年轻人，个头很高，穿红色衣服，正在给姑娘送花，那姑娘则是一袭绿色长裙，系着红白相间的腰带。插图上方有一行文字，“Suscipe flos florem quia flos designat amorem …”（这花啊，请收下，她代表我心……），今天情人节的卖花人不正是在延续这个主题吗？13世纪的宗教画当中，手持鲜花的圣母是德意志特有的形象。另一幅插图则出现在第77对开页的左页，主题是注定会失败的爱情和背叛。它也分成两栏，尽管这两栏并不是根据叙述顺序排列的。上图是狄多在迦太基城外送别埃涅阿斯的场景，图中的迦太基女王站在高高的窗前，目送埃涅阿斯离开，然后便自杀而亡，尸体从墙体之上跌落，落入火中。下图则是埃涅阿斯及其同伴聚集在海滩，随后他们借助一条小船登上大船，大船扬帆而去，埃涅阿斯伫立船头。



森林和林地，上帝的造物。上图展现的是飞鸟，下图则是走兽，如野兔、鹿、马以及狮子等

剩下的四幅插图则以饮酒和游戏为主题。第89对开页左页的插图也十分狭长，图中有三人在饮酒，第四个人正在酒杯上做十字标记，这显然是在戏仿弥撒仪式。图的下方有一首歌，开篇为，“Potatores exquisiti ...”（好酒客……）。第91对开页右页的插图呈现了人们在两张桌子上掷骰子玩游戏的场景。其下方诗文的开篇是“Tessera blandita fueras ...”，前文已经介绍过这首诗了。接下来一页的插图是有两人正在下双陆棋的场景，另有一人正拿酒进来。这毫无疑问是在一间酒馆里。最后一幅插图呈现的游戏应当属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益智游戏，而非消磨时间的无聊游戏：画面当中的两个人正在下象棋。下方诗文讲述的是游戏规则，前文也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棋盘上棋子的位置分布都很真实，这一点在艺术作品中极为不同寻常。我曾亲自试验了一番，倘若我执黑先行，走上十五步，就可以再现插图中的棋盘上的棋局。显然，绘图之

人是懂得棋道的，并且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真实的对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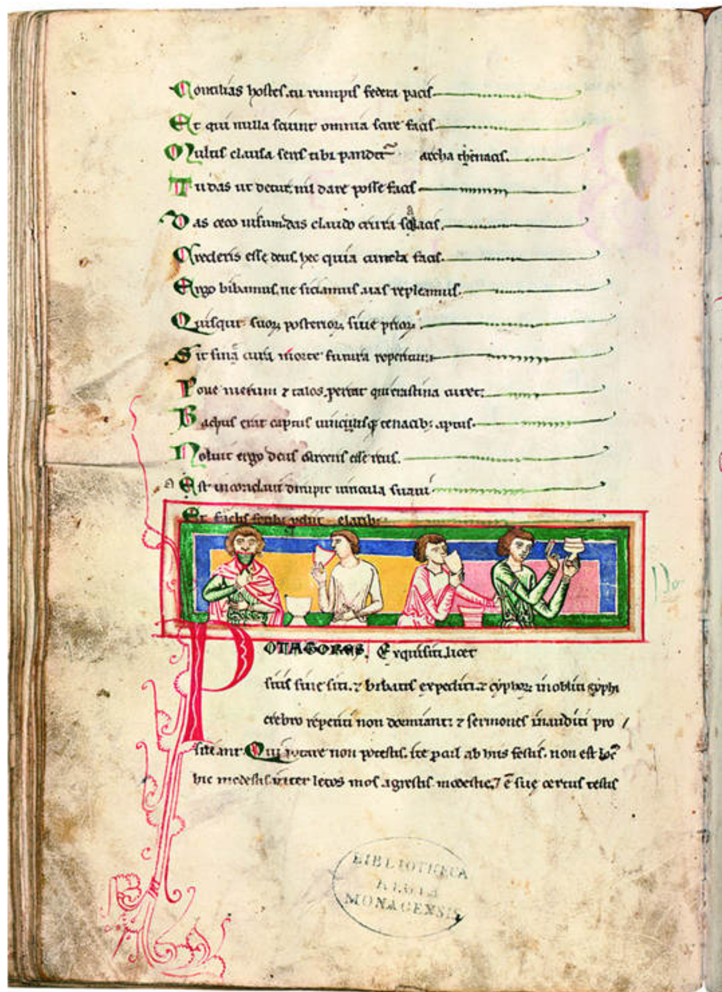


该页的插图中为一对情侣，男孩正在向爱侣献花求爱，并恳求女孩接受

虽然这些插图的画工都相当精细，而且与正文文字大体上是同一个时期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插图都是在抄写工作完成之后才被绘制在抄本上的，且人们在制作抄本时没有为其设计插图。插图在抄本当中的位置都相当怪异，有时候会在相关主题的诗的结尾处。这并非中世纪抄本的常规做法。插图所占空间的形状也不寻常，应该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时运之轮”的插图是十字形的，其底部被压缩到严重变形了，而且与下方诗文的第一行发生了重叠。“时运”主题当然很契合同一页面的《哦，时运》，但这首诗也是后来添加上去；至于谁先谁后，我们并不是十分明确。一对情侣的插图也被过度压缩，甚至不得不被从书页的侧面插入正文中。狄多和埃涅阿斯离别场景的插图没有用完全部的可用空间。饮酒者的插图则不仅同上方文字的最后一行重叠了，还跟

插图下方的首字母“P”发生了重叠。双陆棋插图的边框更是越过了下方的文字。对于此等情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插图跟页边或者页脚处的很多诗文一样，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作用是丰富抄本，它们并非原初设计，也非抄本的范本当中原有的设计。此一情况足以表明，这份抄本不是依照一本完整的彩绘抄本范本创制而成的，抄写员在创制它的过程中，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加工和升级。简而言之，《布兰诗歌》是一本原创诗集，而非复制品。

那么这些诗歌的渊源何在呢？很可能诗集的编者只是将早期的诗歌辑录成集了。为了探察诗文的来源和创制日期，研究中世纪音乐和抄本的专家们绞尽脑汁，且彼此之间争执不休。该学术领域太过危险，我并不想介入。诗琴弹奏者斯科特·施瓦茨（Scott Schwartz）将这些诗歌称为“*Carmina Piranha*”（复仇之歌），他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有些诗歌词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但几乎所有文本都来自12世纪，比抄本本身早了一代。还有为数不多的几首诗是记有明确日期的。有一首诗讲述的是1177年夏天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同腓特烈·巴巴罗萨达成的《威尼斯和约》，诗的开篇是，“Anno xpisti incarnationis ...”（当耶稣道成肉身）。另一首诗则讲述了1187年十字军运动当中法国人遭遇的惨败，并哀叹耶路撒冷于次年落入萨拉丁之手：“Heu, voce flebili cogor enarrare/facinus quod accidit nup[er]ultra mare/quando Saladino concessum est vastare/terram quam dignatus est xp[istu]s sic amare ...”（哦，且让我哭诉，刚刚发生在大洋之外的事，萨拉丁肆意摧毁了那片土地，那可是基督钟爱之地啊……）它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圣地战场上，英勇的基督徒骑士以一对三百的绝对劣势在同敌人作战。可以想见吟游诗人在欧洲各个宫廷当中吟唱这首歌的场景，他既是在发布新闻，也是在传唱英雄业绩。抄本中已知最晚的作品出现在第52对开页的右页，开篇词是“Dum philippus moritur ...”（菲利普去世），这首诗是在悲叹巴巴罗萨皇帝的幼子、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 of Swabia）的死亡，此子因受到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伯爵（Count Palatine of Bauaria）的嫉恨，被杀害在班贝格。这是发生在1208年6月21日的事。



饮酒歌“好酒客……“的开篇，插图中的几个男人在酒馆饮酒并戏仿弥撒仪式上祝福圣杯的动作

只有一首诗提到了作者的名字，开篇是“Versa est in luctum cythara walteri …”（“沃尔特的琴音变成悲音……”，典故出自《约伯记》30:31），主题是宗教和法治的普遍衰败。这首诗出现在第51对开页的左页，页面内侧的空白处画有一根手指在指向该诗，对其带来的启迪表示赞许。这首诗的作者很可能是沙蒂永的沃尔特（Walter of Châtillon，1135~1204，此人死于麻风病），他是法国神学家，曾创作了一部广为流传的史诗《亚历山大纪》。部分其他诗歌的创作者也可以被追踪到，只是不确定性比较高，比如奥尔良的雨果（Hugh of Orléans，约1093~1160），他也可能来自巴黎或者其他地方，绰号“普利玛斯”（Primas）；布卢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约1130~1212），事务律师，也曾担任公职，是英王亨利二世的秘书；校长菲利普（Philip the Chancellor，约1160~1236），从1217年开始担

任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自称“大诗人”（Archpoet），此人是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家族的成员——雷纳德是1159~1167年的科隆大主教；等等。《布兰诗歌》中是否有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 1079~1142）的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激烈争议中，此人是颇具魅力的哲学家，也是巴黎的学校当中第一个真正出色的教师。抄本第68对开页右页上的那首诗就有可能出自阿伯拉尔之手，开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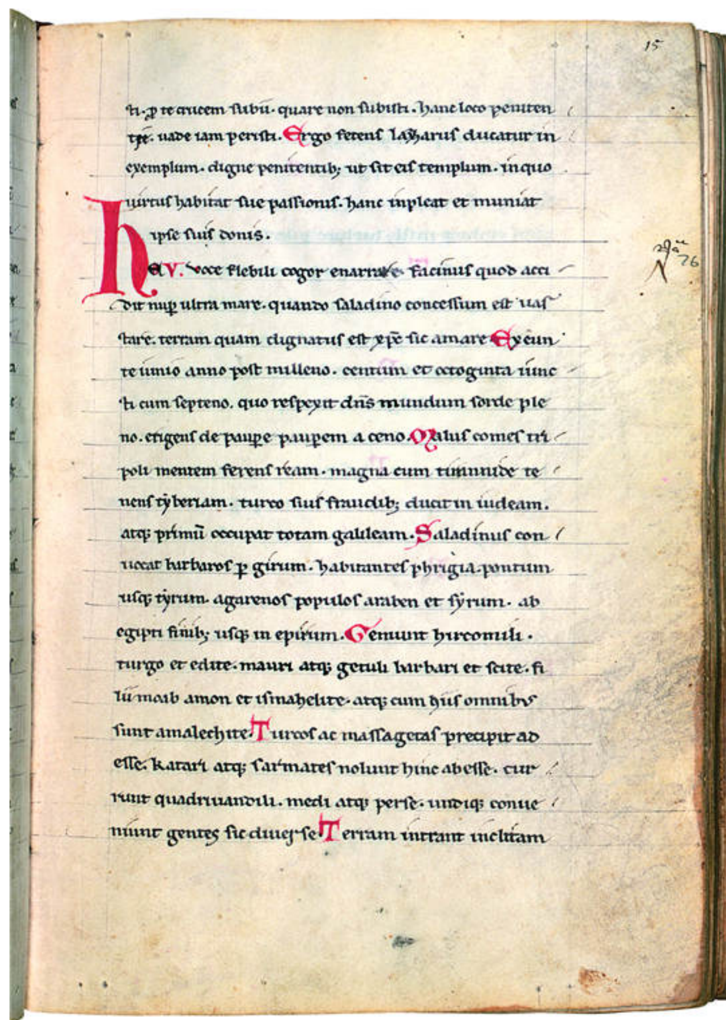
Hebet sydus leti visus

cordis nubilo,

tepet oris mei risus,

carens iubilo …

（我心中阴云升腾，脸上再无昔日光彩，嘴角笑意突然凝结，快乐不再……）这首诗哀叹情人被残忍分开、不得相见，读起来令人心碎，这正是1118年阿伯拉尔的处境。那一年，他不得不同爱洛伊丝（Héloïse）分开——既是因为司法裁决，也是因为他遭到了残忍至极的阉割。之所以将这首诗归于阿伯拉尔，主要还是因为作者宣称自己的爱人拥有日神（Phoebus）的名字，“cuius nomen est a phebea”（“她的名字叫作福玻斯”，这个表述本身是后来增补进来的），可以照亮世界。日神福玻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利俄斯（helios），这个名字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拼写上都跟爱洛伊丝有几分相像。此一证据尽管增加了作者是阿伯拉尔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只是学过古典学的情侣之间开的甜蜜玩笑。



这首开篇为“哦，且让我哭诉”的诗是在纪念1189年十字军东征运动当中法国军队的毁灭性惨败，萨拉丁是诗中提到的那个胜利者

卡尔·奥尔夫认为《布兰诗歌》是吟游诗人和流浪歌手[goliards，该词源于“Goliath”（歌利亚），指那些流离在社会之外的人]口中的民间歌谣集，然而，其中可以确定渊源的诗文，通常出人意料地出自学者，甚至是神职人员的圈子。抄本当中到处穿插着古典著作以及《圣经》的引文和典故。上一章，我们谈到12世纪时，学问冲破了本笃会修道院那高高院墙构筑起的古老屏障，新的教团纷纷崛起，如奥古斯丁教团（包括维克多修道派）等新兴教团多位于城市中，同世俗世界关系密切，而这是早期修士刻意避免的做法。这对12世纪的社会和民众识字率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的教堂中都是教堂牧师而非修士，教堂本身也逐渐发展为学问中心，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引入学问王国。在法国，诸如沙特尔、奥尔良、蒙彼利埃和拉昂这些地方的教堂学校，完全是靠在任教师的名望吸引学生的。时运之轮也决定着这些教师的来去和聚散。这其中，职业生涯最为持久者当属巴黎的教堂学校的教师，巴黎毕竟是法兰西的首府及宫廷所在。彼得·阿伯拉尔和彼得·伦巴德（亡于1160）就是圣母院学校的教师；圣维克多的雨果（亡于1142）及其继任者们则吸引了众多学生来到左岸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学习，《哥本哈根圣咏》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创制的，从此地往西北方向步行二十分钟即可抵达巴黎圣母院。这些学问殿堂在随后的一百年里，逐渐聚合起来，最终在13世纪上半叶合并成巴黎大学。

以“Hebet sydus leti visus”（我心中阴云升腾）为开篇的诗，描绘的是爱侣被残忍分开的故事，很可能出自对失去爱洛伊丝倍感伤怀的阿伯拉尔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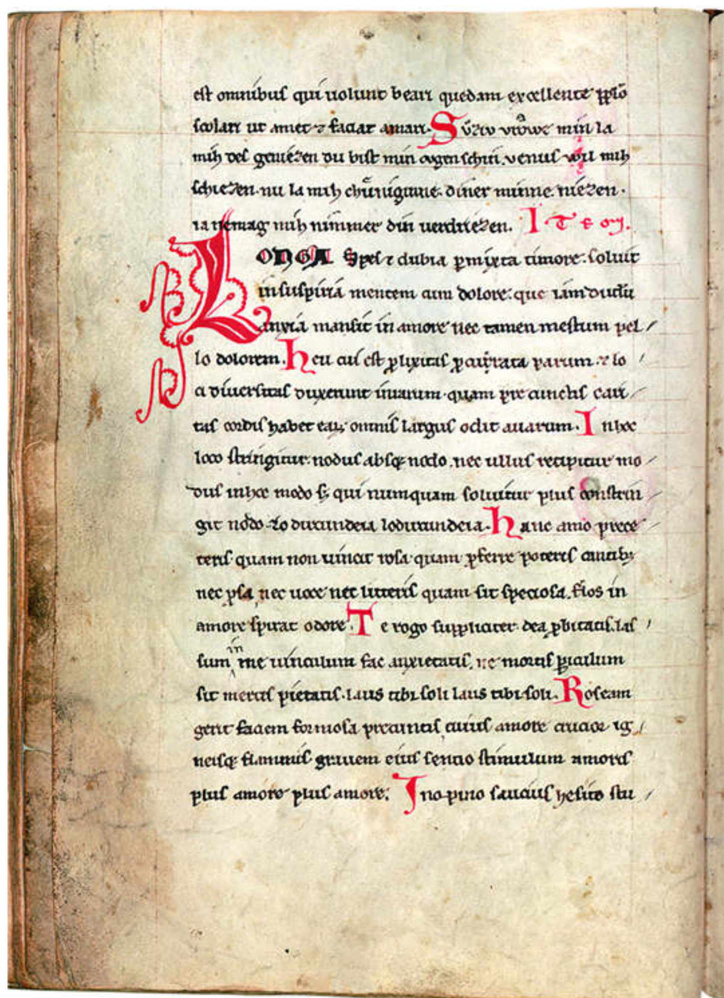
这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学生来自欧洲各地。而这得益于此一时期相对平稳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语言不是问题，全部的教学和学术交流都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还没有发展成实体，因此大量学生一有机会，就会从一个城市的学校转到另一个城市的学校。有时候，学生会跟随教师一同游学，因为很多教师自身也是游方之人。一番游学之后，昔日的学生可能会创立自己的学校。真正意义上的游方学者属于这个时代。跟所有初次离家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极富浪漫主义精神，而且都兴致高昂，不过总体上来说，他们即不是社会的反叛者，也不是蔑视权威之人。其实很多人是神职人员，最起码也是小教团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接受的教育在政治体制或者宗教体制当中闯荡一番，以开启新的职业生涯，其中一部分人的学历是很高的。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布卢瓦的彼得就是其中一个，他先是于12世纪

40年代前往图尔的教堂学校，在伯纳德·西尔维斯特里斯（Bernard Silvestris）门下研读文学和修辞学，之后转往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跟随乌姆贝托·克里韦利（Umberto Crivelli）等人学习罗马法，最终于12世纪60年代来到巴黎研究神学。在巴黎，他自己也开始招收学生，以补助学费。后来，他接连成为西西里幼王的老师、鲁昂大主教的秘书、巴斯的主任牧师、亨利二世的书写员，随后参与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在伦敦担任主任牧师之职。步入晚年的他收到老友、奥尔奈修道院一名修士的信，信中希望他能就二人共同度过的躁动的青年时代写点什么。布卢瓦的彼得回信说，最好还是忘掉青年时代的那些粗俗歌谣（“omissis ergolascivioribus cantilenis”），并在信中附上了几首他刚刚写就的歌，说它们有更成熟的风格，希望能疏解老友的郁闷心情。通过比对风格，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布兰诗歌》当中有六首歌是布卢瓦的彼得的手笔，其中就包括第36对开页右页上的那首开篇为“Dum prius inculta/coleret virgulta/estas iam adulta …”（夏日降临，万物长成，昔日荒地，芳草萋萋）的歌。它讲述了歌手望见一个在一棵葱绿的酸橙树下的美丽少女，她名叫菲丽丝，于是他跟随少女走过草地，满心欢喜。纯洁少女拒绝了歌手的进攻，歌手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me totum toti insero”，其实就是强奸），欢愉过后，少女筋疲力尽，歌手也痛苦不已。这不管如何定义都应当属于“色情诗”（*lascivia cantilena*）。它并不一定是在记录布卢瓦的彼得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这位诗人应当是奉行独身准则的神职人员，但是，人们一定曾在肆意的欢笑声和掌声中唱这首歌，为了它的韵律当中鼓荡着的年轻的激情和想象。“菲丽丝”这个名字很有古典风韵，她原是忒修斯（Theseus）的儿媳，因为奥维德的《女杰书简》（*Heriodes*）而在12世纪为人所知。她的名字将这首歌带入了一个虚构世界，也使这首歌变得更能令人接受。

12世纪的学者对古典诗歌毫不陌生。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狄多和埃涅阿斯爱情故事的出处。大家对此类故事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布兰诗歌》中多次提到奥维德的名字。他的《爱经》（*Ars Amatoria*）和马提雅尔（Martial）的讽刺诗，跟《布兰诗歌》中的诗文一样直白且不堪入目，而且它们在中世纪修道院的藏书室里是极为常见的。[至于卡图卢斯（Catullus）的作品，则要到14世纪才会被大范围地重新发掘出来。]不过古典诗歌和《布兰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古典韵文都奉行很是正规的音长韵律（quantitative metre），其字词是按照传统的且固有的长、短音节模式排布起来的，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而《布兰诗歌》中的大部分诗歌采用了简单的节奏韵律，跟很多现代诗歌是一样的，它们的韵脚通常设置在每一行的结尾处甚至每一行内部。这种韵律很可能是为了12世纪颇为流行的圣歌而发展起来的。它非常适合配合游行或者舞蹈的鼓点和节奏，奥尔夫就很巧妙地运用了这种韵律，他的曲子中的韵脚非常明显，听起来就像是在不断重复。这些迷人且朗朗上口的韵文当然很容易沿着当时的贸易路线传播开来，东征的十字军还有四处游走的使者和学生也会将之带往12世纪欧洲大陆的各处。吟诵私人情感或者道德节律的诗歌，本来都是地方性的，或者相当严肃认真的，但是经过在旅途上以及酒馆里的反复传播和吟唱之后，便在各地都流行起来。口传文学的大范围传播，反

过来也能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旅行情况及路线有大量的了解，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布兰诗歌》的词句会有些混乱和随意——很多学者因为看不惯这样的表述方式，便将罪责推在抄写员身上，认为它们由是抄写员随意攒在一起的。实际上不妨想一想，任何靠着个体的记忆向四海传布的文本，在传播过程作用，定然会出现各种小小的变动，而《布兰诗歌》的编纂人其实可能非常尽职尽责，他们将听到的诗文或者唱词一字不落地辑录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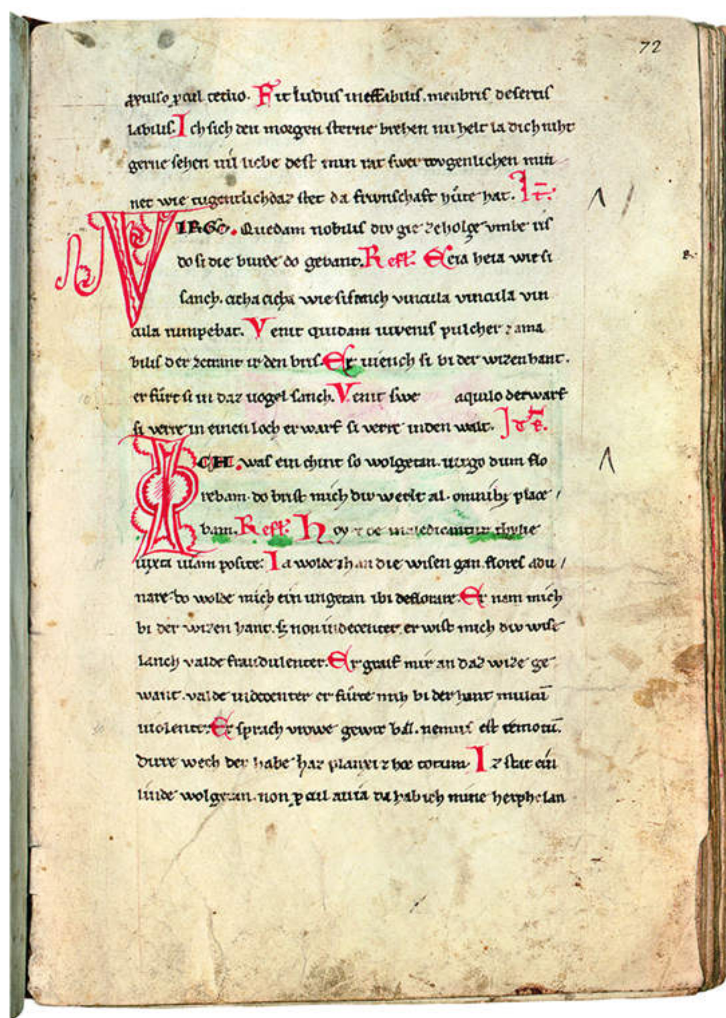
页面顶端是以德语写就的韵文，包括“Süziu vrouw min”（甜美的爱人啊……）这样的向女性求爱的诗句

在12世纪的欧洲，拉丁语仍然是通用的书面语言，因此，在法国创作的韵文，到了伦敦、科隆、罗马或者萨尔斯堡，同样是可以被理解的，至少在受教育群体当中是这样的。此类诗歌一旦远离其原初的语境，便可能变为配舞歌曲；不过，部分曲子中被增补了一些用德语写就

的词句。用欧洲各地的俗语写就的最早一些韵文中，有很多作品跟女性有关，原因很简单，在此一时期的欧洲，女性跟男性比较起来懂得拉丁语的更少。《布兰诗歌》当中有大约四十首情爱诗歌有用德语写就的副歌，这部分的韵律跟拉丁语部分是一样的。这很可能是用于轮唱的，在轮唱时，男女会用不同的语言同时吟唱该曲子。《布兰诗歌》当中还有十二首诗是部分或者全部用德语写就的。这些诗在现存的欧洲俗语文本当中，算是极为古老的。其中一些德语诗显然是唱给女性听的，女性的仰慕者或者追求者肯定觉得，倘若小姐们能够听明白唱词，那么自己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比如这样的唱词，“Süziu vrouw min ...”（甜美的爱人啊……），是在恳请那位小姐享受维纳斯射来的箭，以及“Selich wip,vil süziz wip ...”（可爱的你，最甜蜜的你……），呈现了作者给自己的心上人传递情书的场景。还有一些诗则是需要用女声演绎的，是唱给男人听的。第72对开页的右页上面就有一首相当迷人的诗，讲述的是一位女性正在跟同自己彻夜厮守的秘密情人窃窃私语，“Ich sich den morgen sterne brehen ...”（看呐，晨星亮了……），并催促爱侣悄悄离开，不要被人发现。它令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在黎明幽光初现之时对罗密欧说的话，“O, now be gone! More light and light it grows”[天已经亮了，天已经亮了；快走吧，快走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布兰诗歌》当中有一首著名的五行韵文，是用德语写就的，文中，主人公欣然提出，即便是失落整个世界的财富，也愿意以此换取在英格兰王后怀中安枕一夜的机会。不过，抄写员最初给出的文字是“英格兰国王”（chunich van engellant），这个表述后来被划去了，改成了“王后”（diu chunegin）。在我看来，这话应该出自一位讲德语的女人之口。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约1122~1204）是1154~1189年的英格兰王后，她可是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不太可能成为男人情爱幻想的对象，不过，埃莉诺的儿子，勇猛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正于1192~1194年被囚禁在附近的奥地利，并且未婚。若真是这样，我们也就能在大体上确定这首德语诗的诞生时间和地点了。

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布兰诗歌》并不是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编纂的，很可能是在更南一些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奥地利完成的，当时这个地区属于大巴伐利亚。抄本中的笔迹透露出奥地利书册当中经常出现的意大利特征；书页很平滑，那样的触感也显然是南方风格，跟德意志那表面更粗糙的羊皮纸不是一回事情。（若是单靠影印本，或是隔着白手套，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前文谈到“时运之轮”可能取材于腓特烈二世的印章，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就不会早于1220年。然而，《布兰诗歌》的文字都是从“顶行上方”（above the topline）开始的——这是古文书家的行话。此处需要解释一下，中世纪的抄写员在开启抄写工作之前，通常会将页面的各行各列精确地用尺画出来，以保持文字的规整。1230年之前，抄写员都会将第一行文字写在所画顶端横线的上方。1230之后，规矩改了，第一行文字都被写在顶行的下方。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只知道在此一时段，哥特风格的抄本中普遍倾向于压缩文字使其

变得更为工整。这场变化发生得太快了，而且横扫了整个欧洲。当然，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不过这已经成了确定13世纪上半叶的抄本的创制时间的经验法则。据此可以确定，《布兰诗歌》抄本应该是在1220~1230年创制完成的，当能也可能是在13世纪30年代初期。



德语韵文，其中第2行起讲述的是女孩因天渐渐破晓而央求情人离开自己的床榻

文本中有关抄本创制地的线索大多指向蒂罗尔州或其东方的施蒂利亚[Styria，也就是今天的施泰尔马克州（Steiermark）]公爵领地。前文引述的一首歌谣也曾提到，与抄本创制地毗邻的是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还有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维也纳）。另有一首诗赞扬了玛利亚萨尔（Maria Saal）的教区长那无与伦比的好客态度，可以确认，这个教区长名叫海因里希（Heinrich），于1232年被任命为施蒂利亚塞考（Seckau）教区的主教。人们通常也认为，这份抄本很可能是在塞考的主教宫中创制完成的，并且很可能是海因里希的前任主教卡尔资助的，

后者是1218～1231年该教区的采邑主教。此一带有不确定性的结论是慕尼黑的伟大古文书学家伯恩哈德·比绍夫（Bernhard Bischoff）在为1967年出版的《布兰诗歌》影印本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此后，哥廷根大学的乔治·斯蒂尔（Georg Steer）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极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论断称，诗歌中出现的德意志方言表明，抄本的创制之地要在更西面的某个地方，确切地说，是在蒂罗尔西南地区，而非施蒂利亚。对于语言学角度的论证，我没有能力反驳或确证，但斯蒂尔借此指出了该抄本的一个可能诞生地，那就是位于布里克森（Brixen）正北面的新施蒂夫特（Neustift）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该修道院创建于12世纪40年代，坐落于因斯布鲁克和萨尔斯堡之间，在慕尼黑东南方向五十五英里处。该修道院敬奉的圣奥古斯丁，在《布兰诗歌》当中正主持着圣诞剧。

人们不免会觉得——特别是对于义愤填膺的新教徒来说——《布兰诗歌》不过是粗俗歌曲集，供一些下流的修士娱乐之用。这绝对不是《布兰诗歌》的初衷。众所周知，奥古斯丁教团，无论是修道院性质还是教堂性质的，都不戒惧世俗红尘。他们会将较为粗俗的诗文寓言化，甚至将之解释成教牧关怀性质的文本，其内容是教团中人在平日里听取忏悔之时了解到的尘世罪孽。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应当将视野拓展开来，将这样一部诗集抄本视为12世纪社会的巨大变迁的产物，在这场变迁当中，先前被修道院垄断的学问越过修道院的高墙，向着俗世传播、散布。修士们的阅读是缓慢的，他们将书册从头到尾反复咀嚼、记忆并进行思考；在俗教众以及在俗神职人员的阅读则通常是快速的，他们会在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此一情况在12世纪纷纷涌现的新型抄本当中得到了鲜明印证。在1200年前后，有大批的“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s）、“诗集”（anthologies）、“选集”（florilegia）、“汇编”（compendia）以及概要性质的抄本问世；还出现了一些专为大众编写的作品的抄本，所涉及的都是传统的修道院论题，比如神学（彼得·伦巴德）、《圣经》解读[《标准释经书》（Glossa Ordinaria）]、《圣经》史学[彼得·科迈斯特（Peter Comestor）]、教会法[格兰西，（Gratian）]等，当然也少不了祈祷书（日课经和弥撒书），这些都是此一时期出现的新型抄本。甚至《圣经》经文本身，即使已经经历了世世代代的研究和传承，到此一时期也遭遇了重构，并为了在俗读者群体的便利，被划分成了有先后次序的章节。古老的学问仿佛已经走上了消亡之路。当代世界的轻佻肤浅是《布兰诗歌》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前文谈到，乍看起来，《布兰诗歌》的外貌跟日课经抄本极为相像，这一点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两者在内容上的相似性也极为明显。诗歌和歌谣都是昔日的口传文本，而日课经里面的圣咏和祈祷词对于修士群体来说也曾经是口传文本，它们都是因为开始被人们淡忘而被辑录和编纂成袖珍集子。《布兰诗歌》里面的很多诗歌此前已经被吟唱百年之久了。人们想要将之付诸文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布卢瓦的彼得的老友，想要记录他们那已然消逝的青葱岁月（这对于年岁渐长之人来说是人之常情），当然更多的是为了追赶记录世事的潮流。说实在的，我们眼前的《布兰诗歌》是一份百科全书性质的手册、一本井然有序的集子，记载着世俗的和学术性的韵文，并且全然应和了13世纪

早期的宗教精神。

《布兰诗歌》抄本中并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解释它最终是如何以及在何时来到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如果一定要猜，我觉得18世纪之前它不在这座修道院，原因是18世纪之前，南德意志地区的修道院藏书室还不是通用藏书库和公众的文献索引库。1803年，巴伐利亚的法令将教会财产还俗，当时负责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财产清点工作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阿雷廷男爵（Johann Christoph, Freiherr von Aretin, 1773~1824）。据此人记述，在清点之时，他发现一间藏有禁书的密室，所谓禁书，至少从前面谈到的新教徒的眼光来看，可能就包含不适合修士的歌谣。阿雷廷男爵据说对这里面的《布兰诗歌》痴迷不已，遂将其据为己有并随身携带——就如同神父随身携带日课经一样——直到委任期结束。1806年，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的藏书被搬迁到慕尼黑的州立图书馆，这位男爵也成为该图书馆的主要馆员。

1843年10月，《布兰诗歌》进入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馆藏珍品名录并参加了展览，也就是趁此次展出之机，我们的抄本同大名鼎鼎的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邂逅了，雅各布·格林就是如今以收集童话故事而著称的格林兄弟之一。格林随后返回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察看了《布兰诗歌》，并说服当时的图书管理员约翰·安德莱亚斯·施穆勒（Johann Andreas Schmeller, 1785~1852）于1847年编辑并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是《布兰诗歌：慕尼黑图书馆馆藏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藏书中的十三世纪拉丁语和德语民谣与诗歌》（*Carmina Burana, Lateinische und deutsche Lieder und Gedichte einer Handschrift des XIII. Jahrhunderts aus Benedictbeuern auf der K. Bibliothek zu München*），这份诗集的现代名称便也由此落定。该版本虽然错漏甚多，但今天仍有再版，不过在学术界内，它已经被阿尔冯斯·希尔卡和奥托·舒曼（Alfons Hilka and Otto Schumann）编辑并于1930~1970年发行的更有学术价值的多卷本取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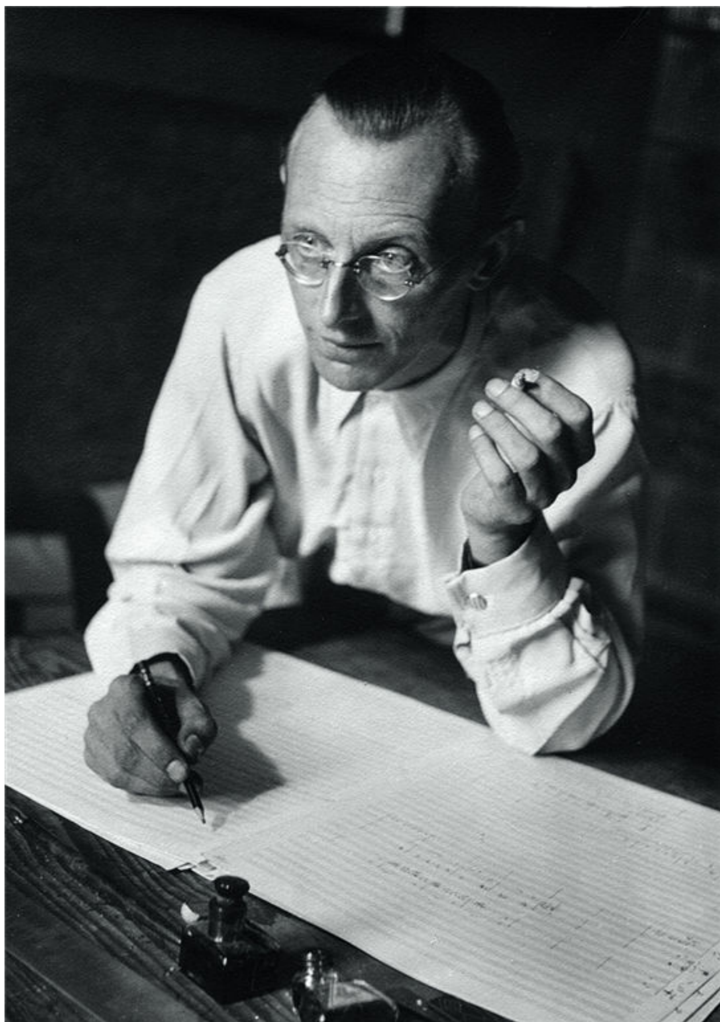
一本第四版的施穆勒版《布兰诗歌》，也就是1904年出版于布雷斯劳的版本（Breslau, 1904），于1934年由沃尔兹堡的旧书书商赫尔穆特·滕内尔（Helmut Tenner）交付弗朗克古物拍卖行（Frank's Antiquariat），最终拍出了很低的价格——3.5德国马克，买主就是当时没什么名气的作曲家、慕尼黑的卡尔·奥尔夫。《布兰诗歌》于当年的3月29日来到奥尔夫手中。“那一天真是令人难忘，”奥尔夫后来回忆说，“我打开它，在第一页上就看到了著名的‘时运之轮’，下面还有几行文字，‘哦，时运，像那月亮，流变不居……’，这图、这文字，令我心醉情迷。”你我都知道，奥尔夫所说的这一页不是原来的卷首页，“时运”诗也是抄写员后来添加上去的，奥尔夫显然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情况，他已经被彻底迷住了。他即刻着手为之配乐，就以施穆勒版的书名为这一中世纪文本的名称。一个星期之后，奥尔夫致信友人、时任班贝格档案馆管理员的米克尔·霍夫曼（Michel Hofmann, 1903~1968），询问“布兰”（Burana）一词的意思，因为他在拉丁语词典里面查不到这个词。霍夫曼遂跟他讲述了巴伐利亚图书馆收藏的这份抄本，不过没有

证据显示奥尔夫有兴趣前往图书馆察看抄本本身，甚至也没有使用希尔卡和舒曼的更新、更好的版本。乐曲的谱写工作迅速展开，奥尔夫和霍夫曼建立了常规联系，一人配乐，另一人负责修改歌词。奥尔夫署名为“布兰奴斯”（Buranus），霍夫曼署名为“卡米奴斯”（Carminus）。1936年8月，奥尔夫完成了谱曲工作，他的作品于1937年6月8日在法兰克福迎来首演。

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慕尼黑，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状况。1933年，希特勒上台。奥尔夫的此番工作，究竟是不是纳粹宣传攻势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有巨大争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兰诗歌》拥有纳粹代表的所有元素：一份伟大的中世纪德语文本，它在整个欧洲独一无二，既宣扬年轻的力量和男子气概，又宣扬十字军精神和骑士精神。这一切都通过令人迷醉的鼓点和反复的节奏，转化成一场伟大且壮观的表演。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尽管奥尔夫更多地选择了德语诗歌，但一些纳粹分子仍然对里面的拉丁语诗歌持怀疑态度，原创的配乐则更是被视为现代和异域的危险事物。帝国音乐局更是提出了那臭名昭著的批评，将之称为“巴伐利亚的黑人音乐”（bayerische Niggermusik）。奥尔夫本人的政治立场是极为模糊的。1938年，他接受任命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重新配乐，以取代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曲子，后者当时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攻击，这件事成了奥尔夫的耻辱。战争期间，《布兰诗歌》在德国各地上演，演出的足迹遍布德累斯顿、埃森、科隆、美因茨、斯图加特、格尔利茨、法兰克福、哥廷根、汉堡、亚琛、明斯特、慕尼黑等地。必定是其乐曲和舞台场景，而非那古老的文本，抓住了时代精神。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1944年9月12日的日记中留下了有关奥尔夫的一段话：“……‘布兰诗歌’展现出精致的美感，倘若我们能让他在歌词方面做些修改，那么他的音乐肯定大有前途。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请他来的。”据我所知，二人之间没有会面。战后，卡尔·奥尔夫将自己刻画为纳粹的隐秘反对者（像他这么做的不在少数），并据此自证清白，然而很有可能他的“证词”并不可信。1951年6月，《布兰诗歌》首次在不列颠上演，地点是新落成的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其时，《泰晤士报》的乐评人依然认为这场演出在政治上太过敏感了，“正是简洁的特征：结构简单的节律、三度音程上的合唱、同曲异词的反复曲式、德意志啤酒花园和校园歌谣……都是纯正的条顿风情”。将《布兰诗歌》同希特勒的德国联系起来，这对于在国王中学时的我们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想法，实际上，在《布兰诗歌》首演的15年后，我们在教室里聆听时，我们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中世纪风格的乐曲。



1941年奥尔夫的《布兰诗歌》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立剧院上演时的场景，舞台以“时运之轮”为背景



卡尔·奥尔夫（1895~1982），照片拍摄于1938年，此时奥尔夫刚刚创作完《布兰诗歌》

今天，《布兰诗歌》的配乐是现代音乐中演出次数最多的曲目之一。开篇的“哦，时运”可能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场之后最家喻户晓的四个音符。如今，再去聆听一番，便很容易辨别出奥尔夫的配乐实际上跟真正的中世纪歌谣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抄本本身给出的音律节奏，跟20世纪中叶以文本为依托创制而成的宏大管弦乐作品，也没有任何关系。为配合音乐而接受了编辑和重组的诗文，与12世纪初沙蒂永的沃尔特或者布卢瓦的彼得轻声哼唱的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名字有些怪异的《布兰诗歌》抄本，如今以编号“Clm 4660”的身份藏身慕尼黑，并且位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顶级珍本”行列，读者若得到许可，是可以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见到这份抄本的。多亏了卡尔·奥尔夫，抄本里面的诗文和歌谣能被如此之多的人读到，这完全超出了研究中世纪的学者的想象。在写作本章的时候，我将“Carmina Burana”一词键入搜索引擎，在

随便哪个网站都能够得到大约两百六十万个搜索结果（当然这一数据在本书下印之前就会变动）；若是键入“Book of Kells”（凯尔经），这个数据则为一百一十八万；“Très Riches Heures”（豪华时祷书）为十万；“Spinola Hours”（斯皮诺拉时祷书）则不足六千。没错，时运之轮的确令人吃惊。

注释：

[1] 按照抄本目前的装订顺序，校勘如下：i^{2}，$ii\sim vi^{8}$，vii^{6}[这一折是八页，缺了vii～viii页，即第48对开页后面的两页]，$viii^{1}$[这一折页数不明，只剩下一张单页，即第49对开页]，ix^{7}[这一折是八页，缺了第vii页，即第55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sim xi^{8}$，xii^{8+2}[这一折即第78～79对开页中，第v页后面被插入了一份双开页]，$xiii\sim xiv^{8}$，这之后丢失了整整一折，xv^{8}，xvi^{6}。第48对开页后面丢失的两页，实际上被转移到了卷首，即在现在的第i折。

[2] 这份抄本本来的装订顺序应当是这样的（各折序号为如今的序号）：vii＋i、ii～vi、viii、xii、ix～xi、xiii～xvi。如此看来，开篇处至少缺了整整一折，第98对开页和第99对开页之间也缺了一折。书页的顺序应当是这样的（各对开页页码为如今的页码）：[卷首缺多页]、第43～48对开页、第1～42对开页、第49对开页、第73～82对开页、第50～72对开页、第83～98对开页、[缺一折]、第99～112对开页。

第九章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14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ms n.a. lat. 3145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在德国东南角的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上，此处毗邻萨尔茨堡，稍稍往前就进入奥地利了，距离上一章提到的《布兰诗歌》可能的创制地大约三十五英里。贝希特斯加登之上，是一片叫上萨尔茨堡（Obersalzburg）的山区。1933年的夏天，阿道夫·希特勒在这里买下了一块土地并建造了一栋被叫作“贝格霍夫”（Berghof）的宅邸，这是一处幽僻且安全的山间休养之地，也是一个私家堡垒，它俯看着世上最美妙的风光之一。贝格霍夫附近是约瑟夫·戈培尔、阿尔伯特·斯佩尔等纳粹高官的宅邸。在1945年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收尾阶段，此时，无论是德国方面还是盟国方面，都期望希特勒及其核心圈子会退避上萨尔茨堡，令上萨尔茨堡成为这场大战最终的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末日战场”）。当时人们都相信，上萨尔茨堡已经极度要塞化了，足以抵抗一场持久且猛烈的围城攻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45年4月中旬，美国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雅各布·德弗斯将军（General Jacob Devers）的统一指挥下，分别从北面和西面向着贝希特斯加登开进。4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对上萨尔茨堡实施了轰炸。从这一刻起，纳粹的权威灰飞烟灭，当地人闯入纳粹高官的宅邸，将里面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5月4日，盟军进入贝希特斯加登，当时现场已经是一片乱象，几乎沦为废墟。美国第七集团军包括来自法国第二装甲旅的分遣军力，这个装甲旅最初于1942年在中非组建，随后参与了诺曼底和巴黎的解放行动。法国第一集团军是在北非组建的，之后于1944年突入法国南部。到5月4日的下午，“自由法兰西”的旗帜便在希特勒的贝格霍夫上空飘扬起来了。法军尤其无意尊重纳粹的财物，美军在战事报告里面指控法军犯下了这一劫掠罪行，法军自然否认了此项指控，还反过来指控美军正将上萨尔茨堡的物品装船运回美国。这些日子里的混乱状态和兴奋情绪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两支军队的士兵都欢欣异常，纷纷将价值不一的“纪念品”装进了自己的行囊。军队在多份报告中都提到同一个情况：当时有一列八节车厢的货车就停靠在贝希特斯加登火车站的侧轨之上，这列货车遭到法军的袭击，法军对其开火，迫使其打开车门。乍得突击团（Régiment de Marche du Tchad）第十一步兵连的一个法国军官回忆说，在进入车厢时，他感觉自己踩到了一块砖，他将那块“砖”捡起来仔细一看，才意识到那是一份中世纪抄本。随后，他用褐色的纸将其包裹并收藏起来。还有一名军官，是一名随军医生，也踩到了一份装在长方形小盒子里的抄本。两份抄本遂成为二人的私人藏品。这列火车实际上装载了帝国元帅戈林盗取并私藏的部分艺术品；在预期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戈林将它们运往上萨尔茨堡，以保安全。在第七军团“遗迹和艺术品委员会”的成员詹姆斯·洛里默（James Rorimer）于一个星期之后抵达贝希特斯加登后，美军便将火车上剩下的宝藏看护起

来，并竖立了临时的标示牌，上书：“The Hermann Göring Art Collection -Through Courtesy of the 101st Airborne Division”（赫尔曼·戈林艺术藏品——承蒙第101空降师好意）。



回到法国之后，发现了第一份抄本的军官遂将抄本拿给瓦朗谢讷图书馆的一个朋友看，二人在一番琢磨之后，极度震惊地意识到，这就是那名扬四海的《贝里公爵最美时祷书》（*Très Belles Heures* of the Duc de Berry），该抄本于1383年在巴黎完成彩饰。大约在1884年，阿道夫·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Adolphe de Rothschild, 1823~1900）买入了这份抄本，1941年3月，这份抄本在巴黎失窃，当时是被存放在阿道夫男爵的侄孙莫里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Maurice de Rothschild, 1878~1957）的银行保险柜里的，莫里斯男爵在战后报告了这桩失窃案。抄本最终完璧归赵，男爵也于1956年将之捐献给法国国家图书馆。如今它仍然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是“ms n.a. lat. 3093”。



1945年5月初停靠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那列货车，车内藏有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收藏的部分艺术品

1951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寻获另一份抄本的军官将抄本捐献给了位于布列塔尼中部的博奎恩修道院（monastery of Boquen），这位退役军官曾在此地休养了一段时间。这里曾是一座中世纪修道院，但于1790年遭到镇压。1936年，多姆·阿列克谢·普雷斯（Dom Alexis Presse）带领一批西多会修士重建了这座修道院。我们对抄本捐赠的细节不是十分清楚，毕竟，该抄本也是以非法方式于1945被解救出来的。多姆·阿列克谢于1965年11月谢世，据说，他生前将抄本的故事告诉了自己的继承人多姆·伯纳德·贝斯雷特（Dom Bernard Besret），后者最终将该修道院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复兴运动中心。此事在莫里斯·兰斯（Maurice Rheims, 1910~2003）的自传中有所提及，此人是巴黎的一个艺术品拍卖人，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据兰斯回忆，1967年的夏天，博奎恩修道院因为暴风雨的破坏，需要翻修屋顶，贝斯雷特遂拿出抄本，请鲁昂的一个古书书商估价，后者意识到此书的分量，于是将其送往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三天后，抄本抵达时任国家图书馆抄本部负责人的马赛尔·托马斯（Marcel Thomas）那里，托马斯与当年刚刚进入抄本部的年轻助理弗朗索瓦·阿弗里尔（François Avril）一同展开鉴定。很快，他们就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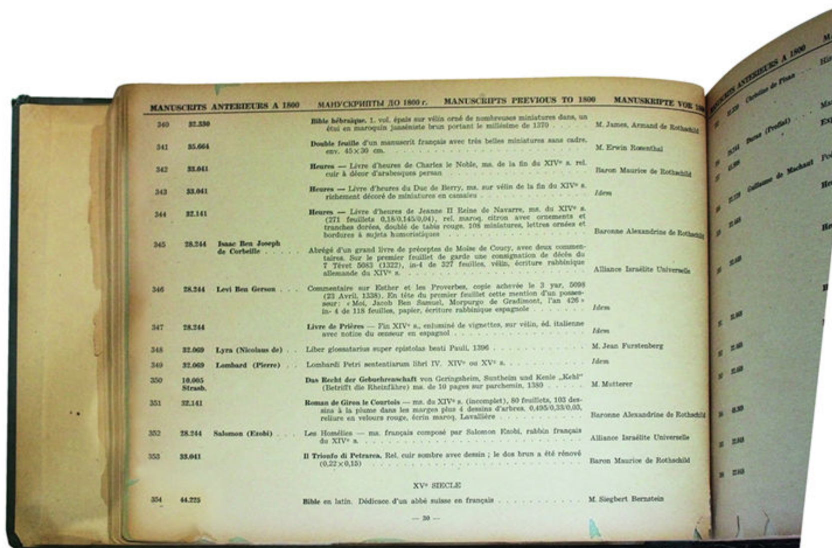
到，这份抄本是失传已久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Hours of Queen Jeanne de Navarre）。



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1845~1934），生活在巴黎，收藏了不少顶级抄本，其中很多在二战期间遭劫

本书第五章（第200页）曾简短提及这份名扬四海的抄本，1919年，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叶茨·汤普森拍卖场里就有这份抄本，当时它拍出了创纪录的天价，买主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法国人”，其身份无人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买主是巴黎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1845~1934）。在埃德蒙德的一百零二份中世纪彩饰抄本藏品当中，《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编号是“MS 94”。如今，埃德蒙德男爵在圣奥雷诺郊区街41号的宅邸已经成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但其门牌上保留了“E.R.”的字母组合图案。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

的遗孀阿德尔海德（Adelheid）于1935年谢世，此后为了财产分割一事，伦敦书商莫里斯·埃丁豪森（Maurice Ettinghausen）对埃德蒙德的藏品进行了估价。藏品清单的副本如今保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格兰白金汉郡的宅邸瓦德斯顿庄园（Waddesdon Manor）的档案室里。在这份清单上，《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估价是3000英镑，被分给埃德蒙德的女儿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Alexandrine de Rothschild, 1884～1965），她也居住在巴黎。亚历山德里娜性格古怪，喜欢幽居，生活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图书馆里。纳粹占领期间，她的艺术藏品跟他哥哥莫里斯（如上文提到的）的艺术藏品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于1940年9月被统一劫掠。《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就此消失不见，没有任何记录。亚历山德里娜夫人（这是人们对她的习惯称呼）将此事上报，令这本时祷书进入了《法国1939～1945年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名录》（*Répertoire des biens spoliés en France durant la guerre 1939～1945*）。展读这样一份名录，实在是令人感到十分痛心。它实际上是一本册子，用灰色布料和金属螺丝装订而成，由设立在德国境内法军占领区的“中央文物赔偿部”（Bureau central des Restitutions）于战争刚结束时发布。名录被印在一叠散页上，纸张非常脆弱，涵括了法语、俄语、英语和德语条目，说白了，这就是一份战地手册，用来追踪并确认因战争而落入无主状态的艺术品。我手头就有这份名录第七卷的副本，仅此一卷就有上千页，其中第30页上列举了战争期间从法国流落至纳粹德国的一部分中世纪抄本，第344号抄本的索引号为32.141，并有如下纪要：“时祷书——纳瓦拉的让娜二世所有，编号‘ms du XIVe’，二百七十一对开页……一百零八幅插图，有大量彩绘字母和幽默边饰。”这就是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的抄本。在那个时期，德国和中欧的许多洞穴、盐井以及城堡成了收藏战利品和劫掠品的巨型仓库，但这份抄本并没有从这些地方现身。战后的约三十年间，人们都以为它已经在战争中“阵亡”了。然而，1970年5月，在鲁瓦约蒙（Royaumont）和巴黎同时举行的圣路易谢世七百周年典礼上，法国人公布了这份抄本重见天日的消息，马赛尔·托马斯认为此事堪称奇迹。



MANUSCRITS ANTERIEURS A 1800 МАНУСКРИПТЫ ДО 1800 г. MANUSCRIPTS PREVIOUS TO 1800 MANUSKRIPTE VOR 18

340	32.330		**Bible hébraïque.** 1. vol. épais sur vélin orné de nombreuses miniatures dans, un étui en maroquin janséniste brun portant le millésime de 1370	M. James, Armand de Rothschild
341	35.664		**Double feuille** d'un manuscrit français avec très belles miniatures sans cadre. env. 45×30 cm.	M. Erwin Rosenthal
342	33.041		**Heures** — Livre d'heures de Charles le Noble, ms. de la fin du XIV[e] s. rel. cuir à décor d'arabesques persan	Baron Maurice de Rothschild
343	33.041		**Heures** — Livre d'heures du Duc de Berry, ms. sur vélin de la fin du XIV[e] s. richement décoré de miniatures en camaïeu	*Idem*
344	32.141		**Heures** — Livre d'heures de Jeanne II Reine de Navarre, ms. du XIV[e] s. (271 feuillets 0,18/0,145/0,04), rel. maroq. citron avec ornements et tranches dorées, doublé de tabis rouge. 108 miniatures, lettres ornées et bordures à sujets humoristiques	Baronne Alexandrine de Rothschild
345	28.244	**Isaac Ben Joseph de Corbeille**	Abrégé d'un grand livre de préceptes de Moïse de Coucy, avec deux commentaires. Sur le premier feuillet de garde une consignation de décès du 7 Têvet 5083 (1322), in-4 de 327 feuilles, vélin, écriture rabbinique allemande du XIV[e] s.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346	28.244	**Levi Ben Gerson**	Commentaire sur Esther et les Proverbes, copie achevée le 3 yar. 5098 (23 Avril. 1338). En tête du premier feuillet cette mention d'un possesseur: « Moi, Jacob Ben Samuel, Morpurgo de Gradimont, l'an 426 » in- 4 de 118 feuilles, papier, écriture rabbinique espagnole	*Idem*
347	28.244		**Livre de Prières** — Fin XIV[e] s., enluminé de vignettes, sur vélin, éd. italienne avec notice du censeur en espagnol	*Idem*
348	32.069	**Lyra (Nicolaus de)**	Liber glossatarius super epistolas beati Pauli. 1396	M. Jean Furstenberg
349	32.069	**Lombard (Pierre)**	Lombardi Petri sententiarum libri IV. XIV[e] ou XV[e] s.	*Idem*
350	10.005 Strasb.		**Das Recht der Gebuehrenschaft** von Geringsheim, Suntheim und Kenle „Kehl" (Betrifft die Rheinfähre) ms. de 10 pages sur parchemin. 1380	M. Mutterer
351	32.141		**Roman de Giron le Courtois** — ms. du XIV[e] s. (incomplet), 80 feuillets, 103 dessins à la plume dans les marges plus 4 dessins d'arbres. 0,495/0,33/0,03, reliure en velours rouge, écrin maroq. Lavallière	Baronne Alexandrine de Rothschild
352	28.244	**Salomon (Ezobi)**	Les Homélies — ms. français composé par Salomon Ezobi, rabbin français du XIV[e] s.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353	33.041		**Il Trionfo di Petrarca.** Rel. cuir sombre avec dessin ; le dos brun a été rénové (0,22×0,15)	Baron Maurice de Rothschild

XV[e] SIECLE

354	44.225		**Bible** en latin. Dédicace d'un abbé suisse en français	M. Siegbert Bernstein

— 30 —

《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名录》，该页的第5条就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继续兰斯先生的故事。他记述说，他曾为小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1926~1997），也就是亚历山德里娜的侄子兼继承人，安排过一次会面。会面之时，小埃德蒙德询问博奎恩修道院的院长翻修屋顶需要多少钱，得到的答复是四万法郎；男爵立刻开出了四万法郎的支票。实际上，当天早上，法国国家图书馆方面已经告知男爵，他们很想得到这份抄本。据兰斯记述，小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当时一边在与约翰内斯堡的奥本海默先生——钻石大王哈利·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 1908~2000）通电话，一边用手抚摸着这份时祷书抄本，就如同007剧中的大反派布罗菲尔德和他的白猫一样；最终，奥本海默突然中断了谈话，并宣布说："我甚至都没时间读《圣经》，就让他们拿走这份抄本吧。"于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来到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s n.a. lat. 3145"，现在，我们就前去拜访它吧。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的前身是中世纪历任国王的藏品，特别是查理五世和路易十二的藏品，二人分别于1364~1380年和1498~1515年任法兰西国王；不过，该图书馆成为公众机构，则是法国大革命的功劳。1795年，皇家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并于19世纪中叶时使用了一段时间"帝国图书馆"这个名称。1868年，图书馆搬迁到拿破仑三世选定的位于黎塞留大街的东面的新址，新馆建筑极为壮观，距离卢浮宫不远，在其北面，是由古典风格的建筑师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 1801~1875）设计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位列世界级图书馆之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列奥波德·德利尔（Léopold Delisle, 1826~1910）的不懈努力，德利尔于1874年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于1905年退休。1996年，国家图书馆将主要的印刷书册和现代书册迁移到更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图书馆"（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这座坐落在塞纳河上游河畔的新馆并不受大家待见，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世纪抄本留在老馆里，我从我的老馆借阅卡中受益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事实上，在我前去拜访《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时，老馆仍然有一处主体建筑没有完工，这项工程开启于2010年，预期工期为七到八年。因此，读者不能像往日那样，从正对着黎塞留大街的大厅进入图书馆了，而是只能暂时从图书馆背面维维恩大街上的小花园进入图书馆。2015年1月，《查理周刊》事件之后不久，巴黎的安全问题变得相当棘手，我也必须接受街口一道探测门的检查。在我通过时安全门的警报响了，但检测员看起来已经很疲惫了，随便挥挥手就让我过去了。施工期间，读者只能从后门进入图书馆，进门便是一个门厅，厅内有一道建于19世纪的楼梯。其时，位于该门厅左侧的主入口大厅是关闭着的。图书馆一楼的远端角落里是著名的“椭圆大厅”（*Salle ovale* reading room），也就是普通文献阅览室。若想约见珍本，就要沿着巨大的石头楼梯向上走——楼梯底端两侧有一列廊柱，柱顶是女神头像——上行一层就是抄本室，再上一层则是钱币和徽章室。我熟悉的抄本阅览室很大，与同黎塞留大街平行的庭院一般长，但它也因为主体工程而暂时关闭了。我非常希望在我这本书出版之时，这间阅览室能够重新开放。在此期间，读者若想查阅抄本，就要到楼梯平台对面的“马扎然画廊”（Galerie Mazarine），这也是一间很长的阅览室，俯临维维恩大街上图书馆入口所在的花园。我到过马扎然画廊，不过，当时只是为了看里面的展览。这间画廊实际上是旁边的马扎然酒店的遗留建筑，建于1644~1655年，是当时的红衣主教儒勒·马扎然（Jules Mazarin, 1602~1661）用来存放他收藏的艺术品的。画廊本身非常高，金碧辉煌，装饰有吉安·弗朗西斯科·罗曼尼利（Gian Francesco Romanelli，亡于1662）的田园风格壁画，壁画的灵感取自奥维德的《变形记》。现在，为了配合图书馆的修建工作，这间画廊被改造成了简化版的“抄本阅览室”：窗户被配上了白色布幔，装饰有壁画的墙壁则被用红色板材遮挡了起来，墙边新布置了几列临时性的纯木书架，复合板木桌也被摆了进来，并配备有没有坐垫的木椅，先前的六盏大吊灯暂时停用了，一排排不那么华丽的条形荧光灯负责整个房间的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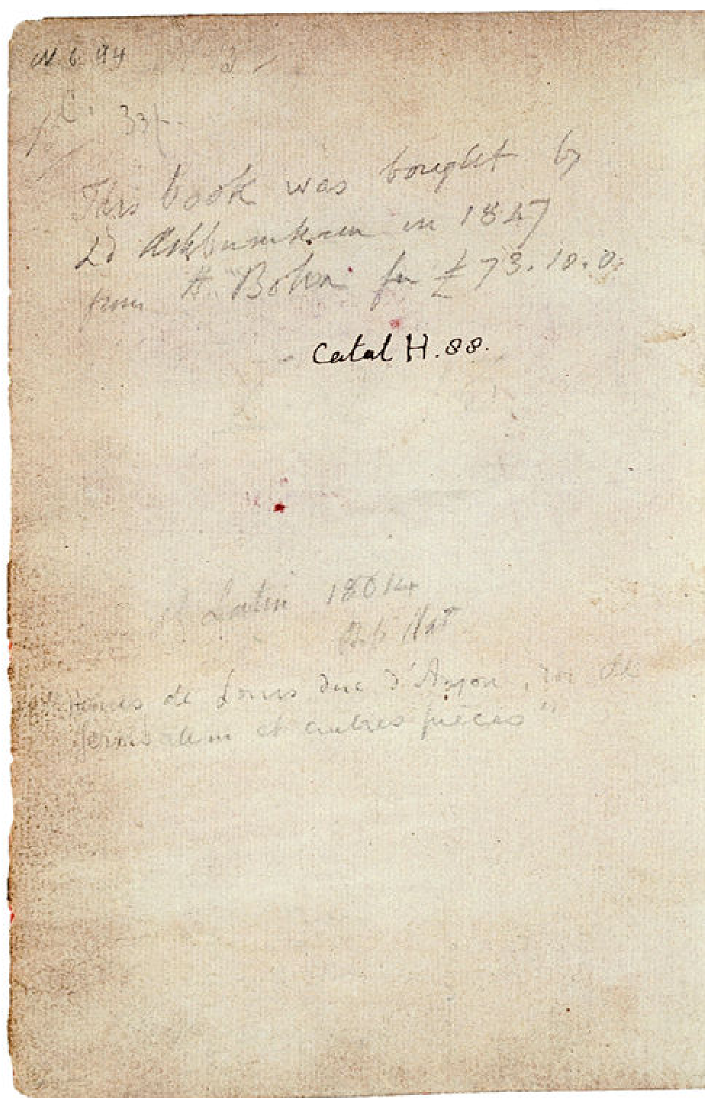


马扎然画廊，法国国家图书馆重新修建期间，这座画廊暂时被改造成了图书馆的抄本阅览室

借阅程序没有变。阅览室入口处是一张长长的桌子，旁边坐了多名男性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就是收取借阅卡，并将其换成一张小小的红色方形塑料卡片（我记得早些年这些卡片是木制的），塑料卡片上是安排好的座位号。此前我已告诉工作人员，我要拜访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泥金装饰抄本，于是我便被安排在45号座位，紧邻阅览室监视器所在的中央通道，附近的座位大部分已经被女性占领。我在这里填了借阅申请卡，在将我的名字和住址填上去以外，我还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中世纪抄本部负责人夏洛特·德诺埃尔写给我的电子邮件，她授权我翻阅抄本原件（在巴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多少少会用微缩胶卷来敷衍你，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你的法语不够好，不足以跟他们争辩时）。在抄本被送来的时候，我把手中的红色塑料卡片交给管理员，以换取抄本原件。这样的程序过于复杂了，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不过，这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我眼前的这份《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要比我上次见到它时显得更有分量，它大约是7.25英寸长、5.5英寸宽、2.25英寸厚，当然厚度还要看对抄本的按压力度。这就让我们很能理解这份抄本当初在贝希特斯加登时，为什么会被误认成砖块了。它是于1780年前后完成装帧的，封皮用的是黄褐色的摩洛哥羊皮，羊皮上有极为精细的贴金图案。粘在封里上的衬页是用朱红色绸缎制成的，且有金色的边缘。这份抄本看来相当珍贵。没有明显痕迹表明它在战火中的德国遭受过损坏，只是卷首的长方形藏书标签被揭去了，毫无疑问那是亨利·叶茨·汤普森的标签（此一情况前文谈到过，见第201页）。这是该抄本上唯一能揭露抄本现代主人身份的证据。扉页的左上角有很小的铅笔写的标注，“MS　94”，字迹已经很模糊了，应该是罗斯柴尔德的藏品编号。衬页上也留有为数不多的标注，不过，从中无法看出1945年该抄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发现时，其

主人是谁。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里面的一张衬页，其页面上端角落处有铅笔写的“MS　94”字样，这是罗斯柴尔德藏品名录编号

抄本文本的主体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一份教会年历，标记有各个圣徒节日，每一页的顶端和底端都绘有寓意性质的插图；（2）三位一体日课（Hours of the Holy Trinity），每天从夜祷到睡前祷的八个日课时辰的经文旁都配有相应的插图；（3）圣母马利亚日课（Hours of the Virgin Mary），八个日课时辰的经文旁同样配有插图；（4）一些短祷文，配有两幅插图；（5）七篇忏悔诗（Penitential Psalms）以及一份诸圣连祷文，都配有插图；（6）圣路易日课（Hours

of Saint Louis），日课旁配有插图；（7）十字日课，也配有插图；（8）诸圣徒的祷文，特别是圣母祷文和三位一体祷文，分别以拉丁语和法语呈现，其中包括了圣母七乐经文（Seven Joys of the Virgin）、守护天使祈祷文、圣阿波罗尼亚牙痛祈祷文、弥撒仪式高举圣饼之时的祈祷文，此外还有怀孕之人的守护神圣玛格丽特（Saint Margaret）的生平经文，以及另外一些祈祷文，这部分配有十二幅插图；（9）代祷文，或是为召请特定圣徒的祷文，比如召请了圣安妮（Saint Anne）、圣尼凯斯（Saint Nicaise）、圣马丁（Saint Martin）、圣吉尔斯（Saint Giles）、圣若斯（Saint Josse of Ponthieu），以及殉教者的遗骸等，每位圣徒都配有插图；（10）另一些短祷文，包括七篇上行之诗（Gradual Psalms）；（11）亡者日课（Office or Vigils of the Dead），配有一幅葬礼插图；（12）另一些代祷文，召请的是圣十字架、圣米迦勒、众天使，也召请了施洗者约翰、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圣彼得、三博士、圣伦纳德（Leonard）、马赛（或者图卢兹）的圣路易、圣丹尼（Denis）、圣尼古拉斯（Nicholas），都有配图；（13）专用于基督降临节的圣母日课的经文译异文，配有一幅插图；（14）专用于圣诞节和洁净礼日之间的圣母日课的经文异文，配有一幅插图；（15）圣哲罗姆《圣咏》（Psalter of Saint Jerome）和其他一些祷文；（16）后来增补进去的各种祷文，包括圣灵日课（Hours of the Holy Ghost）。

此等复合文本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时祷书”（Book of Hours），“时祷书”这个术语源于中世纪，其具体内容虽然在每个抄本中各不相同，但有一些明确的特征：要包含八个特定的祷文和诗篇合集供人们分别在八个“时辰”的日课中诵读，这八个日课时辰划分了中世纪的一天，分别是夜祷（Matins）、晨曦祷（Lauds）、第一时辰（Prime）、第三时辰（Terce）、第六时辰（Sext）、第九时辰（None）、晚祷（Vespers）和睡前祷（Compline）。《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十六部分内容当中，有七部分为日课内容。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我们将见到另一份时祷书，到时我会对日课内容进行更进一步的讲解。现在只需要点明，所谓“时祷书”，实际上就是在俗信徒的祈祷书，供其个人日常祈祷之用，可以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使用，不能被带入教堂。每天要在固定时间诵读诗篇和祷文的观念源自中世纪修道院中的漫长实践。当然，日课并非中世纪隐修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过，修士和修女们的生活无疑是以日课的节奏展开的。数个世纪里，在俗信众生活在修道院高墙之外的俗世当中，对修道院内的事情基本上一无所知，只是会心怀隐约的不安，因为修士和修女们日复一日地沐浴在属灵恩泽当中，而那样的恩泽是尘世中人无从分享的。12世纪时，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潮流席卷而来，其中包括了前几章中谈到的那些变化，比如修道院对读写能力以及抄本行业的垄断格局归于终结，民众对宗教的虔诚度日益加深，在俗信众开始渴求在不进入修道院的前提下，也能够积极融入宗教生活。此等情况之下，《圣咏》抄本，如同《哥本哈根圣咏》揭示的那样，遂成为在俗信众为效仿宗教教团生活而普遍拥有的最早一批书册之一。

然而，整部《圣咏》太过厚重了，对于宗教经验不足的在俗之人来说读起来有些困难。于是，到了13世纪晚期，在世俗贵族阶层中出现了新的潮流——制作袖珍本的祷文汇编，即对诗篇和祈祷词进行甄选，并以恰当的顺序编排，以便在俗信众在日常生活中诵读，具体的诵读时间则效仿了修道院中传统的日课时辰安排，也就是从夜祷一直到睡前祷。每一个短小紧凑的祷文集合都有特定的宗教论题或是献给特定的圣徒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圣母，因为到了中世纪后期，圣母崇拜日益兴盛。最终有大量时祷书抄本被制作出来。如今依然有数千份这样的抄本存在于世，仅仅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就拥有超过三百份，而它们可能是所有泥金装饰抄本当中最具知名度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是其中的早期之作；而本书最后一章的主人公《斯皮诺拉时祷书》则是最年轻的一批之一。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年历中5月的那一页，其中圣方济各的变体日，也就是5月25日，被划定为最高等级的节日

在14世纪早期为法兰西王室创制的祈祷书中，无论是《圣咏》抄本

还是时祷书抄本，都拥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其一，这些祈祷书的主人都是女性。直到查理五世（于1364~1380年任法兰西国王）和其弟弟贝里公爵（Duc de Berry，1340~1416）的时期，这些祈祷书才真正开始为男性所用，即使是这二人委任制作的、当世尤为著名的时祷书抄本，其初衷也很可能是供家中女性祈祷使用。另一个鲜明特征就在于，这些皇家抄本同教团，特别是多米尼克教团和方济各教团，有着紧密关联。当时宫廷内的告解神父和本堂神父，通常出自这两个教团。他们身为王族成员的精神顾问和知己，当然会对日常接触的在俗贵族女性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女性遂纷纷效仿修士的生活习惯。最终更有不少贵族女性在丈夫亡故之后进入女修院，寻求隐修生活，并在知名的修道院当中度过残年，这些修道院包括巴黎圣马赛尔郊区的洛尔西尼（Lourcines）修道院，一座方济各会的修道院，由圣路易的遗孀、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于13世纪70年代创建；以及多米尼克教团的普瓦西修道院，在塞纳河巴黎河段的下游，由圣路易的儿子腓力四世于1298年创建。

我们眼前的这份抄本有着强烈的方济各会特征。抄本当中的年历将圣方济各的纪念日（10月4日），以及这位圣徒的遗骸迁移日（5月25日）标记为最高等级的节日（grand double），方济各会修士图卢兹的圣路易的纪念日（8月19日）也被划入同一等级，抄本称这位修士为“小兄弟会”（Friars Minor，指方济各会）的马赛的路易。帕多瓦的圣安多尼和圣嘉勒的纪念日则被标记为“feste double”等级，两位圣徒都是方济各会出身（纪念日分别6月13日和8月12日），此外，这一等级的节日中包含了方济各会两个已经谢世的恩主的纪念日，分别是1月29日和11月27日。节日的等级以教堂仪式在对应日子所用经文（lection）数多少表示，这种做法在教堂的日课经或者弥撒书里面是很常规的，但在在俗信徒的时祷书里很难见到。

然而，眼前这份抄本最初的主人并非修士或者修女，其身份是可以确定的。抄本里面大约有二十张书页的边缘处有小插图，呈现女王跪地祈祷的情景，这位女王头戴金色王冠，袍服以貂皮镶边，有时身前会有一份打开着的抄本。在抄本的其他一些地方，女王跪地祈祷的形象被呈现在彩绘首字母里面。有时候她也会出现在插图当中，如正亲眼见证基督遭受鞭刑的场景，或者当面朝拜圣母和圣子。抄本中的很多祷文有所调整，以方便女性使用，例如，很多拉丁语词的后缀被更换成了阴性后缀：“… ut michi indigne peccatrici ancille tue”（“请赐予我，您卑微且有罪的仆人”，此句中的词都被调整为阴性词了）；“… concede michi famule tue”（“请赐予我，您的仆人”，此处，祈祷人若是男性，则应当用“famulo tuo”这个表述）；祈祷人在接纳“共融”的时候，要诵读如下祷文，“Domine non sum digna …”（“救主啊，我这卑微的人”，此处的形容词也被调整为阴性形式了）。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好，抄本当中提到了该女王的名字。她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圣母祷文当中，祷文中碰巧有这样一句代祷词：“ut intercedas pro me ancilla tua Johanna navarre regina”（请为我恳请恩泽，您的仆人，纳瓦拉女王胡安娜）。这句珍贵的代祷文出现在抄本第151对开页的左页，在页面中间处，很

容易被读者忽略。



圣母祷文，彩绘首字母中跪着的女性的名字出现在文本第12~13行，“您的仆人，纳瓦拉女王胡安娜”

让娜（Jeanne，即上文中的胡安娜，1312~1349），是1305~1316年的纳瓦拉国王、1314~1316年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父王驾崩之时，让娜年仅四岁。她的出身遭到了质疑，尽管那不是她的错；据传，她的母亲、勃艮第的玛格丽特有婚外情，于是，反对派紧急召请古老的《萨利克法典》（*Salic Law*），以阻止让娜继承法兰西王位。对于相关的法条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给出了解释，见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在萨利克的土地上妇女没有继承权”（《亨利五世》第一幕第二场），而法国人就把这“萨利克的土地”曲解为法兰西的土地。让娜的叔叔就是据此条款挤掉了让娜，自立为王，史称腓力五世，在位时间是1316~1322年。腓力五世也因此成了一个诅咒的受害者，传说卡佩王朝的统治者都受到了诅咒，因为他们于1307年烧死了圣殿骑士团大团长。这些国王被称为“邪恶国王”（Rois

maudits）。腓力五世驾崩之后，也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他的弟弟遂继承王位，史称查理四世，于1322~1328年在位；1328年，查理四世驾崩，让娜再次有了主张王位的机会，不过，这一次，让娜的堂叔父成功上位，史称腓力六世，于1328~1350年在位，腓力六世开创了瓦卢瓦王朝（Valois dynasty）。中世纪的公主通常命运多舛，这一点的确令人伤感。我不确定让娜是否已经被写入哪一部激情四溢的镀金本历史小说，被塑造成同命运抗争的励志女性，此类小说是我太太这样的读者喜闻乐见的，且不管怎么说，让娜的确是这样的女性。最终，两个王室达成协议。让娜和丈夫埃夫勒的腓力（Philippe d'Évreux）共同获得纳瓦拉的王位。纳瓦拉是比利牛斯山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小的山间王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消逝很久了，此一地区也已经分属西班牙和法国了。这里实际上是法兰西国王的古老封地，但它不受《萨利克法典》管辖，于是让娜于1329年3月5日在纳瓦拉首府潘普洛纳（Pamplona）加冕成为女王。

这份抄本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纳瓦拉纹章，它用纹章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红底（*gules*）；十字形，有圣安德鲁十字形和链条状的内缘饰边，都连在一起，金色（*or*）。"抄本当中，有八十多个彩绘首字母中出现了该纹章；其他地方也有，比如年历当中双子座的双子所持的盾牌上，以及页面边缘彩饰里面的类人怪物所持的盾牌上。一些插图的背景当中也有该图案，比如在耶稣诞生图当中，棋盘格的背景中就有纹章的纹理。此类细节，加之"纳瓦拉女王胡安娜"这个称谓，实际上就足以论定这份抄本的创制时间不会早于1328年，因为让娜是在这一年登基的。抄本当中另外还有很多彩绘首字母中有埃夫勒纹章，那是让娜于1318年完婚之后添加的纹章（法兰西百合花底：右斜分，银色和红色块状交替）。至于抄本最晚的创制时间，抄本当中的让娜从未以遗孀的形象现身，这就意味着抄本是在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也就是1343年让娜成为遗孀之前创制完成的。

第85对开页左页到第105对开页左页呈现的是圣路易日课的内容，这部分有极为丰富的彩绘插图，很不寻常。其祷文和经文涵盖了从夜祷到睡前祷的八个时辰，与主题更传统的时祷书并无两样，只不过，这份抄本是为纪念家族圣徒而作的，而这位圣徒就生活在抄本问世的六十年前。路易九世（于1226~1270年任法兰西国王）是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东征者，也是巴黎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的虔诚的建造者。1297年，博义八世（Boriface VIII）将路易九世封圣。纳瓦拉的让娜是这位圣徒国王的曾曾孙女。事实上，让娜的丈夫是这位圣徒国王在另一家族分支上的曾孙子。据我们所知，载有圣路易日课的抄本，都是在14世纪上半叶专为圣路易家族成员定制的。这其中最早的当属《勃艮第的布朗歇时祷书》（Hours of Blanche of Burgundy），勃艮第的布朗歇（约1295~1326）是圣路易的弟弟的曾孙女，也是查理四世的第一任王后，查理四世是圣路易的曾孙子。如今，这份时祷书抄本收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份这样的抄本是相当袖珍的《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Hours of Jeanne d'Évreux，埃夫勒的让娜（1310~1371）是查理四世的第三任王后，也是纳瓦拉的让娜的弟妹]，它如今收藏于纽约的大都会

博物馆，距离纽约公共图书馆不远。埃夫勒的让娜也是圣路易的直系后裔。第三份这样的抄本则是为纳瓦拉的让娜的大女儿、纳瓦拉的玛丽（1329~1347）制作的，玛丽是阿拉贡的王后，这份抄本如今收藏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圣路易日课同样出现在所谓的《萨伏伊时祷书》（Savoy　Hours）当中，这份抄本也是为勃艮第的布朗歇制作的。不过，1904年，收藏该抄本的都灵国立图书馆发生了火灾，该抄本也葬身火海。这份抄本的卷首页标题解释了为何圣路易日课会成为“法国最神圣的且最高贵的王朝”（à personnes qui sont de si sainte et de si très noble lignié comme est celle de France）的王室祈祷书的一部分。



纳瓦拉的让娜的纹章和画像在抄本里反复出现；该页上的插图中，女王正在赈济穷人，且有天使相伴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当中，圣路易日课的插图取材于这位圣徒的早期生活，呈现的都是一些有趣且私密的场景，像是一本家族相册。翻阅这份抄本时，可以想象到当年让娜为自己的孩子们翻动这些书页的

样子，她的孩子包括玛丽（生于1329年，前面提到过）、布朗什（生于1330年）、查理（Charles，生于1332年）、阿格尼斯（Agnes，生于14世纪30年代）、腓力（Philippe，生于1336年），还有沿用了圣徒国王的名字的路易（生于1341年；在他之前让娜还有一个孩子叫路易，但夭折了）。让娜肯定会为他们讲故事以及故事里的教诲。这些插图里的第一幅（即卷首页插图）呈现的是孩童时代的圣路易学习读写的场景，他的母亲卡斯蒂尔的布朗什和一个拿着教鞭的老师在指导他。图中的男孩则手捧手册。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在莱顿见到了著名的罗曼时期的泥金装饰《圣咏》抄本，里面有一句14世纪的题词说，这份《圣咏》抄本就是圣路易童年时代所用之书（见本书第298页）。莱顿的这份抄本曾属于让娜的祖母、姑母，后来则归属让娜的女儿，这意味着让娜本人也完全有可能曾是这份抄本的主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中的这幅插图所呈现的应该就是圣路易学习《圣咏》的情景，由此便基本上可以断定，莱顿的泥金装饰《圣咏》抄本是这位圣徒的传家之物，同时也是他的童年教科书。

其他插图则分别呈现了孩童时代的圣路易望弥撒的场景（对应日课中的晨祷）；1226年路易在马车内准备前往兰斯加冕的场景，有一位王后陪伴着他，很显然是他那意志坚定的母亲，因为加冕之时，路易只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第一时辰）；新王涂油礼的场景（第三时辰）；加冕场景（第六时辰）；1239年路易手持荆棘王冠的场景，这件圣物被赎回一事大大推动了准备收藏它的巴黎圣礼拜堂的修建工程（第九时辰）；1244年路易卧病在床的场景，此时的圣路易担心自己命不久矣，遂承诺继续十字军东征行动（晚祷）；还有1245年，教皇专使、沙托鲁的奥多策动十字军行动的场景（睡前祷）。这些插图跟抄本当中的其他插图一样，都有四瓣花形的边框，边框颜色为法国王室那标志性的“三色”（*tricoleur*，也就是红、白、蓝），如今它因为法国国旗而家喻户晓了。插图中的高潮场景是圣路易发动十字军东征，该场景为这一抄本所独有，可能是因为1333年，圣路易的曾曾孙子腓力六世也尝试策动一场新的东征而被绘制上去的。若真是这样，我们便可以将抄本的创制时间界定在1333年或这之后不久。抄本里的年历中，在3月27日的边上有用红墨水写下的“复活节”字样。不能单纯地将这里的“复活节”理解成就在3月27日这一天，毕竟，它也可能指的是“复活节季”（Eastertide），不过，1334年的复活节礼拜日恰恰就是3月27日。这时距离圣路易完婚并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统治法兰西恰好一百年。这一年，纳瓦拉的让娜的长女也刚好五岁，正值开始学习阅读的年龄。



孩童时代的圣路易被马车运往兰斯加冕，这幅图出自极为珍贵的圣路易日课部分



纳瓦拉的让娜进入了圣母和圣子的神圣空间，直接跪在圣母和圣子旁，背景则是埃夫勒和纳瓦拉的纹章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是极其个人化的，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在本书前面章节当中见到的其他抄本上，很少会留有其最初的主人或者资助人对文本进行干预的痕迹。但是纳瓦拉的让娜显然直接踏入了文本。祷文中出现了她本人的名字，并且出现了她所属家族的圣徒，很可能还有她亲自甄选的其他内容，比如圣阿波罗尼亚代祷文、用法语写就的圣玛格丽特小传等。曾于1902年为叶茨·汤普森撰写了该抄本的长篇纪要的西德尼·科克莱尔（Sydney Cockerell）认为，圣阿波罗尼亚代祷文“很可能表明让娜……饱受牙痛之苦”；圣玛格丽特是分娩护佑者，对于让娜这类生了很多孩子的年轻女性来说，召请这位圣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抄本当中所有的礼规和标题都是用法语写的，因为这是家庭中，尤其是女性用的语言。让娜的专任牧师（假设他是一个方济各会神父），应该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引领着让娜走上宗教之路的。抄本中的一些有关礼规的表述方式是非常亲密且直接的，比如说，“Vous devez savoir …”（“您应该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让娜的专任牧师就是

用这样的语气对她高声宣讲的：“夫人，您应该知道，依据罗马教廷的规矩，《谢恩经》是不可以在晨祷之前被诵读的……”让娜也出现在了彩绘边框上，她站在她的时祷书的书页边缘，从尘世望向神圣之境。实际上，当中世纪的祈祷书开始将尘世之人纳入插图当中时，他们通常会被置于尽可能偏远和独立于书页主体的位置上，确切地说，就是不同的宇宙当中；这样一来，尘世之人就只能在页面边缘形成的帷幕后面或者彩绘首字母里面，注视那神圣之境。不过，在这份抄本当中，有几幅插图呈现了纳瓦拉的让娜作为抄本的主人，直接进入神圣之境的情形。比如第118对开页的左页上的插图配的是一句对圣母说的法语祷文：“Douce debonnaire vierge ...”（亲爱的圣母……）。图中的圣母朝向圣子，俯身，右手伸向首字母“D”，对于此等场景，人们通常都会预期让娜站在首字母所在的位置，并充满敬畏地向上凝望。然而，首字母纯粹是装饰，让娜悄然越过插图的边框，进入这神圣场景的内部，跪在圣母旁边。一幅图中竟有两个头戴王冠的女王。此等创举实在是令人惊奇，可以说是宗教艺术史上的极为大胆的一步。不过，插图里的圣母在看着圣子，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中世纪的纳瓦拉女王已经悄然进入她的“包厢”了。在另一幅插图当中，一位天使则直接进入了尘世，并且在称颂让娜，因为后者正在赈济穷人。

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的氛围从来都是轻松惬意的。轻柔的好古之风仍然存在于法兰西大地之上，这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我的四周在翻阅抄本的人都是那么悠闲——除了美国人，美国人是很好辨别的，他们身上有股近乎狂热的勤奋劲以及时间上的紧迫感。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时而极为闲适地欣赏这份抄本片刻，时而紧张忙碌地做一番笔记。亨利·叶茨·汤普森在1902年的纪要中将这份抄本描述为“最为迷人的时祷书之一”，而它的确令人心醉神怡。



三博士来朝，作为女王的让娜跪在画面下方进行祈祷，女王身后有一个男童正在责骂马厩里三博士的马

我坐在那里，观察抄本中的细微之处，一个小时的惬意时光倏忽而过。这份抄本就如同一个迷人的微缩宇宙，和三位一体夜祷文的插图中上帝手中的球体一样，微缩并囊括了整个世界，包括一艘载着绿树和房屋、正待抵达海港的航船。在圣母夜祷文部分的圣母领报图中，有六个不请自来的天使在扮演乐师的角色，他们置身于拿撒勒的马利亚家中的阁楼里，笛子、鼓、诗琴、拨弦扬琴和风笛是他们的乐器，他们演奏得如此热烈，令人不禁怀疑，圣母在这样的情形下能否集中精力进行祈祷，能否听清加百利对她说的话。在第163对开页右页上，更有一个激情四溢的天使在击打定音鼓，这位天使显然已经进入狂热状态，甚至已将手臂伸出，去击打对面的鼓了。晚祷的图是“逃往埃及”，图中有两座异教像在圣母一家经过之时，正从绞刑架一样的架子上坠落。该图已经向中世纪朝圣客指明，其中一座雕像在现实中就躺在埃及的沙漠里（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那就是斯芬克斯的雕像）。页底的边缘处画有一些

小插图，其中一些与主插图的主题相关。第一时辰的圣子降生图外，绘有一些怪异人物，他们正在照看自己的婴孩。第六时辰的是主显节插图，主图下方，一个男孩正在责骂马厩里三博士的马。书页边缘处则绘有一些很漂亮的鸟，而且都是写实风格的，这在如此早期的欧洲艺术作品当中可不是寻常现象，这些鸟包括猫头鹰、金翅雀、啄木鸟、麻雀、鸭子甚至鹦鹉。其他元素包括：几只蝴蝶、一只蝙蝠、一群正在试图脱掉一个男孩的袜子的孩童、一个手持弓箭正将野兔赶入洞中的猎人、一个叉腿站立且头顶鸟笼的人（在第153对开页的右页，我也理解不了这幅图），还有二人对弈的画面（完全没有《布兰诗歌》里的插图画得精准），此外还有男童打斗的场景、一个妇女割破自己喉咙的场景、一头医师装扮的猩猩、一个男人用一枚巨大（且说实话很可笑）的戒指向一个姑娘求婚的场景；诸如此类的画面还有很多。在《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名录》中，它们被称为幽默边饰，但它们中其实有一些黑暗元素。比如说，有些插图页的边缘处画有恶龙、怪兽以及梦魇怪物。抄本当中，即便是最为简朴的页面也能令人体会到此等奢华的哥特风格泥金装饰抄本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常春藤叶”页边框——常春藤的茎秆上“生长”着金色叶片，令书页在被翻动时金光闪闪。不过，曾有一位植物学家告诉我，法语抄本里面的这种页边框实际上跟常春藤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同，它其实是一种泻根属植物（*Bryomia dioica*），这种植物的毒性很大，非常危险，常跟恶龙、狮子以及怪兽等害人之物一同出现在抄本的插图中。显然，中世纪抄本的页边并不是惬意祥和之地，就如同身为贵族的纳瓦拉的让娜本人也没有安稳的生活那样。



“向牧羊人报喜”，页面底端农夫正在配合风笛跳舞，常春藤叶页边饰当中，还有一些古怪的人以及鸟

现在我需要重新集中精神。这很困难，因为午后的阅览室暖意融融，令人倦意陡生。我仔细对抄本实施了校勘，校勘结果在下方的注释当中。[1]校勘情况中有两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其一，第10对开页后面显然缺失的一页便是如今的扉页，在第1对开页的前面，页码标注为“a”，这一页跟第1对开页右页上都有一些印痕，应该是一度缝在抄本卷首页上的朝圣徽章留下来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抄本在14世纪的情形可能会有作用。更让人吃惊的情况是第121对开页的缺失。1902年，科克莱尔对这份抄本实施校勘并标注页码时，这一插图页肯定还在，而且在1919年该抄本被拍卖时，它也在；当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将抄本于战争期间失窃的情况上报时，这一页也不可能已经丢失了。是赫尔曼·戈林把这一页割走了吗？戈林虽然罪行累累，但没有受过这一指控。当年，科克莱尔为这幅插图留下了如下的描述：“端坐在王位之上的圣母头戴王冠。她的头顶悬挂着一个环形华盖。圣母右手拿着一朵花，左手扶着站在自

己膝上的圣子，圣子的身体则向着图中的让娜女王倾斜。让娜女王正双手交叉，面向首字母‘R’跪地祷告。背景则是蓝色、粉色和金色相间的棋盘格。”这样的场景甚是温馨，画有这一场景的书页可能正挂在欧洲某一处建筑的墙上，书页的主人想必也不会察觉到什么。

教会年历也是这份抄本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年历的配图都相当复杂且引人入胜。不妨先看看上页边。年历每一页的上页边都绘有一道极为炫目的哥特式大门，那很显然是通往天堂的入口，圣母屹立城垛之上挥舞着旗帜。每道大门都支撑起一道彩虹状的拱门，拱门横跨整个页面，门内则是一幅风景画。太阳是沿着拱门的轨迹运行的。黄道十二宫从拱门中出现，比如一月的水瓶宫、二月的双鱼宫、三月的白羊宫等，这些都是从基督教天堂而来并进入尘世的异教意象。十二星座依次步入前景，天体的运行引发了尘世的季节转换，这实际上也是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中传播的古代天象观念。一月的风景图看起来像是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饱受战争肆虐的佛兰德斯地区的老照片——在一个被摧残殆尽的世界里，树木已经无法继续生长，树叶也都飘零而去。二月的风景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还下着雨。到了三月，树枝上开始长出嫩芽。四月则是谷物生长的时节，树木也都有了绿叶。五月的草地铺满野花，天气已经非常暖和，双子座的两兄弟可以赤身裸体地嬉戏了（虽然它们用了一面盾牌遮羞）。六月的树林郁郁葱葱。七月，青草已经被收割并堆放了起来，八月则是小麦丰收的季节，九月的葡萄藤上缀满葡萄（天秤座，也就是带着一副天秤的少女，已经准备好为之称重了），十月，猪开始搜寻橡果，十一月的树叶则开始从树上纷纷飘落。在十二月的图中，唯一一次出现了人类参与这永恒季节循环的景象：在肃穆的摩羯宫符号下方，一个农夫正从已经是光秃秃的树上砍伐木料，以供取暖和做饭之用。每张这样的插图页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人像，那是圣保罗。之所以会出现圣保罗的形象，是因为年历中会指定每年的教会节日，并列出每个节日对应的礼拜经文，而诵读《保罗书信集》是弥撒仪式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只不过，保罗书信的收信人是十一个而非十二个，因此，一月的插图就用的是保罗本人皈依基督教的场景，该场景当中的保罗从马背上跌落，回头望去，正看见上帝的手从天堂显现（《使徒行传》9:4）。这之后，依照《圣经》经文的顺序，每个月的插图中会出现一批新的听众，如二月是三个小小的罗马人，三月是几个哥林多人，四月是三个加拉太人，五月是两个以弗所人，如此类推，九月是单身一人的提摩太，十月是提多（Titus）和两个同伴（应该就是《提多书》3:13提及的西纳和亚波罗），十一月是腓利门，十二月则是四个希伯来人。

此等场景是非常精美的，我们在古代的天象学当中能找到它们的渊源，在这份抄本问世大约八十年之后诞生的《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那份著名年历中也能找到它们的影子，它们最终影响了16世纪的《斯皮诺拉时祷书》（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二章更为详细地了解这份抄本）。不过，跟年历页的底端页边上呈现的那些充满复杂的神学意义的场景相比，它们差了一大截。

每页年历页的底端都绘有极为精致的哥特式建筑。这是犹太会堂。

每座会堂边上都站立着一个《旧约》先知。先知的边上则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虽然两者的会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画面当中，先知和门徒在进行非常礼貌但也相当拘谨的交流，先知从自己的先知书里面引一段话出来，耶稣的门徒则从《使徒信经》里面摘引相对应的段落予以回应。比如说，一月的插图当中，先知耶利米说，“Patrem vocavit me”（“他称我为父”，《耶利米书》3:4，经文原文实际上是“*vocavis*”），圣彼得则颇为机智地回应说，“Credo in patre[m]omnipotentem creatorem celi et terre”（“我信全能的父，造天地的主”）。二月，大卫引用自己的《诗篇》说，“Filius meus es tu”（“你是我的儿子”，《诗篇》2:7），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则对以“Et in ihesum xpistum filium eius unicum,Dominum nostrum”（我信我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三月，先知以赛亚说，“Virgo concepiet et pariet filiu[m]”（“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书》7:14），圣詹姆斯则对以，“Qui conceptus est de spiritu sancto natus ex m[ari]a virgine”（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如此等等，一直到十二月的撒迦利亚，其时，撒迦利亚（Zechariah）引用了《撒迦利亚》9:13的经文，“我要激发你的众子”，圣马提亚则用《使徒信经》里的最后一句话回应，“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还不是全部。每一个场景当中，先知都会回手从犹太会堂的建筑上取下一块砖头，递给使徒。这砖头像极了小小的书册，就如同被贝希特斯加登的法国军官误以为是砖头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先知在这么做的时候，使徒会抓住先知外袍的褶边。就这样，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被取下来，数月后那古老的犹太会堂开始坍塌，到了三月，它的一根柱子已经倾倒了，到了四月，一座塔楼坍塌了，到了六月，建筑的一侧已经沦为废墟，到了最后的十二月，犹太会堂已然只剩下一片残砖断瓦。用剩余的砖块建造而成的基督教堂便可以从会堂的废墟当中拔地而起。

这种风格鲜明的年历插图，就如同圣路易日课一样，是特属于一小组彼此关联的抄本的，且这些抄本都是为法兰西宫廷创制的。它们的源头可能是一份名叫《贝尔维尔日课经》（Belleville Breviary）的抄本，它的彩饰绘制于1330年前后，彩饰师是让·普塞尔（Jean Pucelle，亡于1334），此人是14世纪早期法国宫廷画师当中最有名且最具创造性的一位。《贝尔维尔日课经》的年历跟《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版式更大一些。其实，《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参考了普塞尔制作的多份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前文提到的《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后者如今收藏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早在14世纪就已经被认定出自普塞尔之笔。埃夫勒的让娜是纳瓦拉的让娜的丈夫的妹妹，家族成员间当然会知道彼此手中的祈祷书，她们也很可能会转借给器重的画匠作范本。我们面前的这份时祷书当中，有诸多细节很显然是从《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当中借取而来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描摹的，包括“圣母领报”场景的那种意大利式构图风格——阁楼上都有吵吵闹闹的天使乐师，页边配图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如天使向牧羊人报喜的场景下方的页边，都画有灰白胡子的农夫的侧面像。

事实上，《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里面的插图应该是多人协作完成

的，这一点并不难识别。早在1902年，西德尼·科克莱尔便已经将这些画师甄别出来并予以标注了，他得出的结论在今天仍然能得到普遍认同。不过在我看来，他甄别出的画师一和画师二，实际上是很难被区分开来的。这个（或这对）画师完成了年历（从《贝尔维尔日课经》中借取而来）、三一日课、圣路易日课的彩绘工作，此外也绘制了散落在抄本各处的多幅插图，包括让娜个人的护佑圣徒圣阿波罗尼亚和圣玛格丽特代祷文的插图。这位画师的手笔在另外一些抄本当中也能见到，包括创制于1336~1343年的一些抄本。此人有可能是让·普塞尔的门生或者徒弟，因此有机会接触并熟悉让·普塞尔的风格。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年历（上图），其中的圣像图非常罕见，差不多完全照搬了稍早一些的《贝尔维尔日课经》中的绘图（下图），后者是宫廷画师让·普塞尔的手笔

科克莱尔标记的第三个画师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技巧最为精湛纯熟的。实际上他才是这份时祷书的头号画师。他绘制了抄本中的十八幅插图，包括核心文本圣母日课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我们已经发现两个跟普塞尔插图的类似之处了，其一是“报喜”场景的构图风格，其二是灰白胡子的农夫），此外，这个画师还负责十字架日课的插图，以及其他单独的插图，那两幅呈现了纳瓦拉的让娜本人形象的插图也在其中。他的风格是很容易辨识的。他的作品出现在诞生于14世纪30~60年代的巴黎的大量抄本当中，其中就包括了为佛兰德斯的约兰达（Yolande of Flanders）、查理五世以及贝里公爵制作的时祷书。很幸运的是，大量

档案记录了法兰西宫廷给这些画师支付的酬劳。据这些档案，只有一个画师为这三个资助者都工作过。人们一般称呼此人为“让·勒诺瓦尔”（Jean le Noir）。1366年，勒诺瓦尔受雇于查理五世，1371年，他成为“皇家画师”（illumineur du roi），1372年和1375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贝里公爵的薪酬册上。因此，我们在找的画师必定是勒诺瓦尔。本书至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职业画师，而且其历史真实性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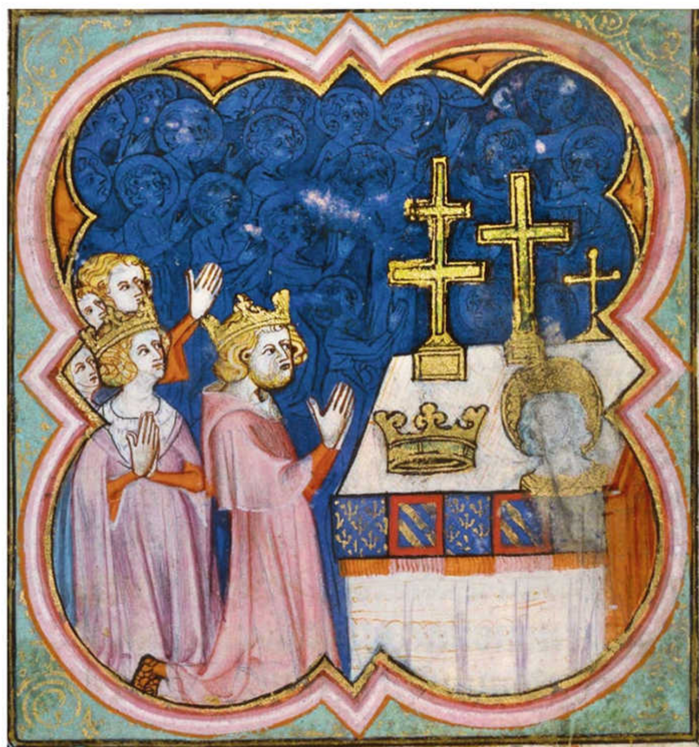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中的报喜图（下图），天使乐师群集阁楼之上，该画面的构图多多少少令人联想起《埃夫勒的让娜日课经》（上图）中出自普塞尔之手的报喜图



我们甚至知道他的住址。让·勒诺瓦尔在布里的埃朗堡（Erembourg de Brie）街[2]西边有一间住宅，这条街也就是今天的布特布里（Boutebrie），在巴黎左岸地区，位于皇家宫殿正南方向步行大约十分钟处。布特布里跟当年一样，仍然连接着羊皮纸（de la Parcheminerie）街——另一个跟中世纪的抄本行业有关系的名字——以及克吕尼-索邦地铁站（Cluny-La Sorbonne）所在的圣日耳曼（Saint-Germain）大道。很有意思的是，让·普塞尔——勒诺瓦尔的老师，1334谢世前也居住在这条街上，而且在路的同一侧，因此勒诺瓦尔很有可能在老师谢世之后继承了老师的房子。有关勒诺瓦尔的最早记录出现在稍早于1332年的时候，据这份文献记载，“让·勒诺瓦尔，毛笔彩饰师”（Jehannin Lenoir, enlumineur de pincel），疑似盗窃让·博韦（Jean de Beauvais）放在两个水桶上面的四文钱而被捕，人们在右岸勒诺瓦尔的住所外面发现了这两个水桶，遂将其推定为嫌疑人。这之后，勒诺瓦尔的名字便可以在巴黎的多份市政档案中被追踪到，直到

1380年他谢世。勒诺瓦尔的女儿波尔古特（Bourgot）也是画师。

有关《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一切信息都指向巴黎。在当时的欧洲，巴黎是最为富庶且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了二十五万。那里是皇宫所在，有巴黎圣母院坐镇巴黎教区，还拥有中世纪最大的大学。仅仅这三大机构的财富量和需求量令巴黎成为顶级艺术家和工匠的汇聚之地。在皇宫和圣母院中间的“西堤岛”（Île de la Cité）上，以及塞纳河的诸多廊桥上都有商店。在这个时期，此一区域汇聚了精美抄本、珍贵的金属工艺品、象牙制品、纺织品，还有各色珠宝，这些物品的做工之精细令人赞叹，价格也都相当昂贵。但同时，法兰西正面临连年歉收的糟糕局面，以及无情的瘟疫——1348～1349年的黑死病。麻烦的是，从1337年开始，这个国家陷入了百年战争的泥潭当中，战争本身耗费巨大，其间更是遭遇了1346年的克雷西大败和1356年的普瓦捷大败。然而，从该时期的泥金装饰抄本来看，法兰西王室就仿佛与世隔绝了一般，并没有意识到这艰难世事。他们在城堡和宫殿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恬静生活。抄本也只在家族内部流传并传承着，外人无从观瞻。比如说，《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以及《贝尔维尔日课经》就是先被传给查理五世，然后又成为贝里公爵的财产的。正如王室的婚配圈子是很狭窄的，此等珍品当然也被控制在王室内部。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最后一批增补插图之一，呈现的是法国国王腓力六世携家人跪在圣礼拜堂的圣物面前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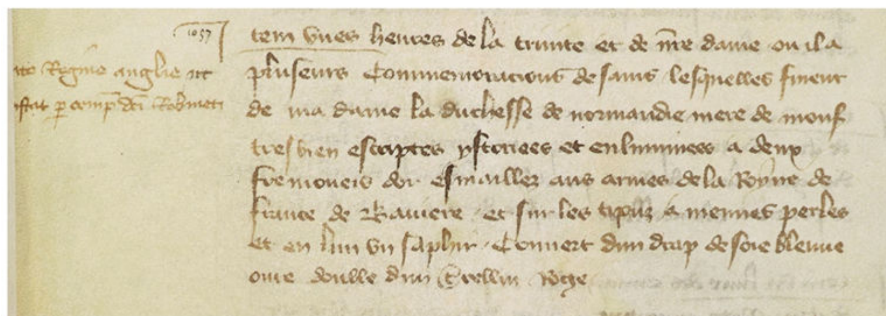
早在19世纪，人们便已经认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肯定是由腓力六世送给纳瓦拉的让娜的，因为二人当时达成了一笔交易，腓力六世继承法兰西王位，让娜则获得纳瓦拉王位。能佐证这种看法的证据就在第150对开页的右页上面，这一页的绘图呈现了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引领整个家族跪在圣礼拜堂的圣物面前的场景，从纹章可以清晰辨识出，这个国王便是腓力六世，王后便是腓力六世的第一任妻子勃艮第的让娜，二人于1313年完婚，1348年，王后归天。不过，事实上，这份抄本的传递路线按理说很可能是相反的。抄本是为纳瓦拉的让娜制作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祈祷文当中提到了她本人的名字，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她把这份抄本带去了纳瓦拉，也没有证据显示它曾离开巴黎。腓力六世及其家人的插图是由科克莱尔辨识出来的第四个画师绘制的。这个画师绘制了抄本里的十七幅插图，它们是两份代祷文的插图，并都有圣徒画像。这些插图在各方面都跟前面几个画师的截然不同，无论是在风格还是画工（前者更粗糙）上。这个画师可能是在更为后期的阶段为抄本绘制彩饰的，且我并不是第一个这么认为的人。它们很可能是在14世纪40年代绘制的。纳瓦拉的让娜有可能在丈夫离世之时将这份抄本传给了其他的家族成员。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在圣礼拜堂跪拜圣物的场景中，也出现了其他人。国王和王后身边有一个年轻人陪伴，这个年轻人双臂抬起，做祈祷状。他毫无疑问是国王和王后的儿子兼继承人让王子（Prince Jean, 1319～1364），也就是后来的法兰西国王让二世。王子身后则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童，我们无法在14世纪30年代中期的王室中找到与他们的形象相符的人物。不过，若是将这幅插图的绘制时间推后十年，我们就能找到匹配此二人身份的人了，那位女性就是卢森堡的博讷（Bonne of Luxembourg），波希米亚国王之女，她与让于1332年完婚；男孩就是他们的儿子，生于1338年1月，后成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

第四个画师绘制的这些代祷文插图中，包括了一幅不同寻常的马赛的圣路易插图，这位圣徒是图卢兹主教，也是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侄子，于1317年获封圣徒——又一位家族圣徒。据说他曾在当时还是孩童的让王子身染重病几乎无望时救过王子的性命，于是，王子那满怀感恩之情的父亲便在纳瓦拉的让娜的丈夫的陪同下，前往这位圣徒的圣所朝圣。前文谈到，《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卷首页上有中世纪朝圣徽章留下的痕迹。由此便可以推定，在二人的这场朝圣之旅中，这份时祷书也是随行成员。此一情况提高了我们前面的猜测的可能性：这份抄本此时已经从纳瓦拉的让娜那里转归腓力六世及其家族了。此类祈祷书通常是专门为女性所用的，因此，它在这之后很可能就归太子妃卢森堡的博讷所有。这样一幅呈现太子妃的皇家公婆的插图，当然是为了强调她通过婚姻同圣路易的王朝建立起来的关联，她当然也会把这一点告诉自己的儿子。

实际上，无论是纳瓦拉的让娜还是卢森堡的博讷都没有熬过黑死病，二人在1349年的几个星期之内相继离世，纳瓦拉的让娜卒于三十七岁，卢森堡的博讷卒于三十四岁。让娜的女儿布朗什后来嫁给腓力六世，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以及王后。博讷的子嗣当中，包括了于1364年

加冕为法兰西国王的查理五世以及大名鼎鼎的贝里公爵。在《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当中，很多埃夫勒纹章被部分地刮去了，只留下法兰西王室的百合花纹章。更有一个埃夫勒纹章干脆被由三个百合花饰组成的纹章覆盖了，后者是查理五世于1376年启用的纹章。因此，这份抄本很可能一直是由法兰西王室保存的。

在抄本之起源的问题上，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证据近在眼前，人们却视而不见。1402年创制的贝里公爵藏书名录里面，有一个相当详细的条目值得我们关注。该条目记录了一份一直以来未获得身份认定的时祷书抄本。条目纪要显示，这份抄本以三一日课和圣母日课开篇，还有大量的圣徒代祷文。实际上，时祷书抄本很少像我们眼前的抄本这样，在年历之后便以三一日课和圣母日课开篇，而且它的确有大量的圣徒插图——三十幅之多。这就令我们很想直接做出判定，但这还不是全部。该纪要继续描述道：“这份时祷书绘图优美，彩饰华丽，它的主人是诺曼底女公爵，国王的母亲。”毫无疑问，纪要所指之人就是卢森堡的博讷，1332~1349年的诺曼底公爵夫人，我们在第150对开页的右页可以见到她，这位纳瓦拉的让娜的时祷书的继任主人。接着纪要对抄本的装帧工艺做了一番描述：抄本有两个瓷釉环扣，并配有法兰西和巴伐利亚王后的徽章，王后指的是查理六世的妻子、巴伐利亚的伊莎博（Isabeau of Bavaria, 1370~1435），二人于1385年完婚。因此，这份抄本定然是为这位王后而接受了重新装订，之后才被传递到了贝里的让（Jean de Berry）手中。此外，我们甚至能从这份纪要中了解到，贝里公爵对这份时祷书做了什么。名录的边缘处有这么一条备注，“赠给英格兰王后”。因为贝里公爵的此一赠礼之举不可能早于1402年，所以这位受赠的英格兰王后定然是纳瓦拉的琼（Joan of Navarre，约1370~1437）、布列塔尼公爵遗孀，她于1403年2月7日嫁给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有可能是作为嫁妆来到英格兰的，且这样的嫁妆非常合适。新任的英格兰王后不仅是贝里公爵的侄女（因为这位王后的母亲就是法兰西的琼，也就是贝里公爵的妹妹），同时也是纳瓦拉的让娜的孙女，而这份时祷书最初就是为纳瓦拉的让娜创制的。因此，经文当中的那句祈祷词，“intercedas pro me ancilla tua Johanna navarre regina”，便再一次得以跟抄本主人匹配起来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另一个Johanna[3]，且是英格兰的王后。



贝里公爵1402年的藏书名录，这是对其中一份时祷书抄本的详细描述，它显然是家传

之物，很可能就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倘若此番认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填补了这份抄本的生平当中的一个重大空白。它就是为纳瓦拉的让娜制作的，并且在纳瓦拉的让娜活着的时候，便已经转归她堂兄的家族，后者则雇了第四位画师，并将抄本传给了卢森堡的博讷。之后，博讷的儿子查理五世将之传给他的儿媳巴伐利亚的伊莎博，伊莎博为这份抄本添加了两个环扣，然后就将抄本传给了贝里公爵，贝里公爵则巧妙地将之传给了已经身为王后的纳瓦拉的琼——抄本原主人的孙女。此等曲折回环的传承脉络、辗转于王室中的女性之间的经历，对于时祷书来说是很典型的。就《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来说，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相继进入这个传承脉络的女性要么是圣路易的直系后裔，要么嫁给了圣路易的直系后裔。因此，《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主人包括了三个不同国家的王后、一个太子妃、一个法兰西国王和中世纪最出名的皇家藏书人贝里公爵。科克莱尔若是知道这些，想必会大喜过望。



贝里公爵（1340~1416），他的妹妹嫁给了纳瓦拉的让娜的儿子，该插图呈现的是《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里面公爵宴请客人的场景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是贝里公爵给予英格兰王后的赠礼，此一推断还有一个图证，那就是后来被插入抄本的卷首插图，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幅插图了。这幅画出自1420年前后的一个英格兰画师之手，而且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在伦敦绘制的。它呈现了一位身着皇家袍服的女性在圣三一体、圣母和圣子面前跪地祈祷的场景，这恰恰印证了贝里公爵藏书名录纪要当中的两段说明文字。这位女性的头发上有一个椭圆形的金拱——这肯定不是光环，而是一种高高的发饰，她的衣服的颜色与法国和英格兰王室纹章的颜色一致。她手持卷轴，上书“[mer]cy and grace”（“怜悯与恩典”，原文就是英文）。这个画师还为《瓦卢瓦的凯瑟琳时祷书》[瓦卢瓦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Valois），1401~1437，查理六世的女儿，于1420年成为亨利五世的王后]绘制插图，由此可见，我们可能要在已是星光璀璨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传承脉络

中添上另一个法兰西王后的名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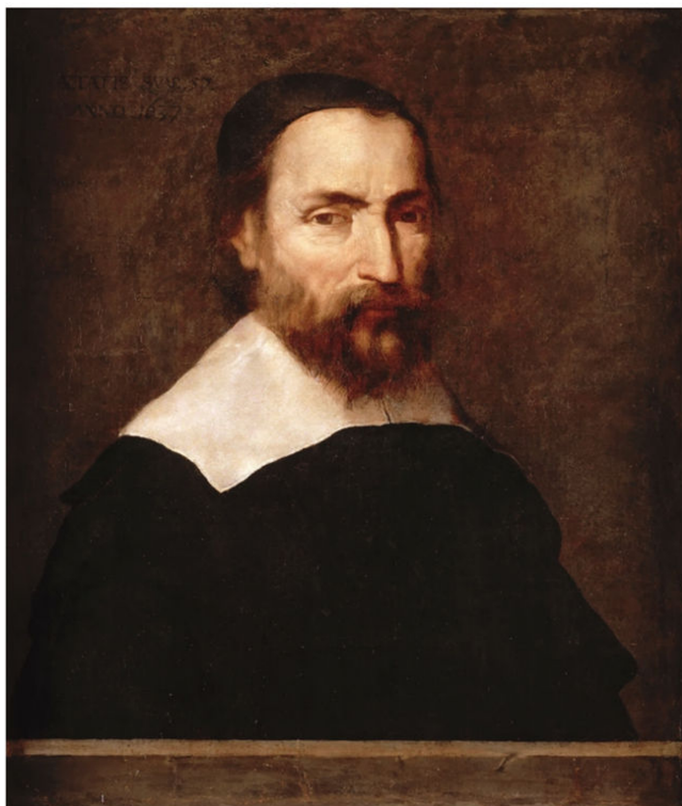


15世纪初一个英格兰画师增补到《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里的插图，呈现的是一个女性跪地祈祷的场景，该女性很显然就是英格兰王后

接下来我们的这份时祷书将回归巴黎，尽管此事的具体情况我无从知晓。我的看法是，这份时祷书在圣路易一族中的女性间的传承脉络，到瓦卢瓦的凯瑟琳这里直接归于终结了，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抄本传承人。因此，肯定是有人将它赠予了科德利埃（Cordelières）女修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巴黎圣马塞尔区的洛尔西尼大街，是方济各会所属的修女会（Franciscan minoresses）建立的隐修院，圣路易的未亡人是这座女修院的共同创建人。它是为上层女性而建的，并且是用来纪念圣路易本人的。既然没有了圣路易的直系血亲做抄本传承人，那么这座女修院成为这份时祷书的新主人，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它的院址在今天巴黎第13区的布洛卡（Broca）大街。抄本末尾的几页中有一份连祷文，很明显是供方济各会的修士或者修女使用的，以法语写就，时间上不会早

于1481年，因为它召请了于1481年封圣的方济各会圣徒卡比奥的贝拉尔德（Berard of Carbio），且其中的祷词的编排方式显然也很契合一个女性教团。《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最后一行的下方是一句被抹去的题词，科克莱尔将其辨识如下，“Ces heures sont a seur anne belline”（修女安妮·贝林用书）。当然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我本人不太确定。这句话不一定意味着这份抄本为这个名叫安妮的修女所有，但她肯定用过这本祈祷书。

幸运的是，17世纪时，有人真真切切地遇见过这份抄本，而抄本当时确实就在洛尔西尼大街的这座女修院里。前文（第四章）提到古文物家尼古拉斯-克劳德·法布里·德·佩雷斯科（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 1580～1637）对圣路易的画像非常有兴致，而这座女修院中就有关于这位圣徒生平的壁画。当佩雷斯科来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修女跟他提到女修院中的时祷书抄本以及其中珍贵的带有插图的圣路易日课。1621年，佩雷斯科获得允许借阅这份抄本。卷首页上留下的简单说明文字便是佩雷斯科的手笔。他对整份抄本，连同里面的大量插图进行了研究，并准确地鉴别出抄本最初的主人是纳瓦拉的让娜。佩雷斯科所做的笔记如今与他在卡庞特拉的图书馆里的文件材料收藏在一起，并于1882年被公开刊印，但在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笔记中描述的这份抄本也流传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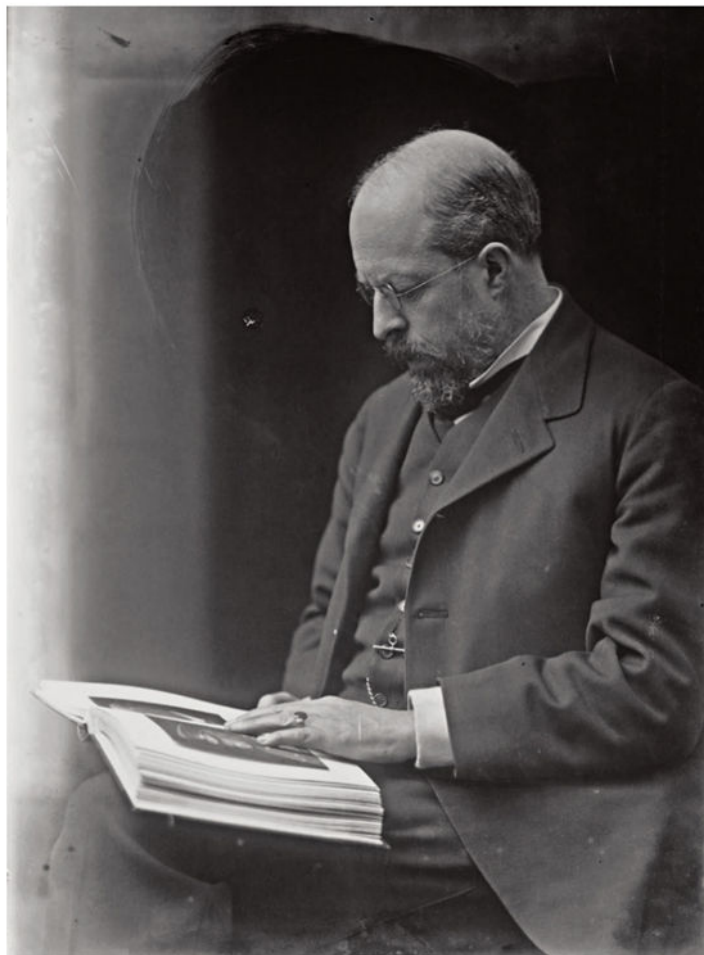


尼古拉斯-克劳迪·法布里·佩雷斯科（1580~1637），最早对《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展开研究的古文物收藏家，也正是此人确认了抄本最初的主人

我当然希望佩雷斯科将时祷书还给了修道院。但此人是个狂热的收藏家，完全有可能将它留在自己手里了。1796年，该修道院最终关闭并被拆除，但在此之前，这份抄本应该就已经不在修女手中了。它那满是金饰的摩洛哥小山羊皮封皮，具备了理查德·维耶（Richard Wier，亡于1792）的装帧的一切标志性特征——理查德·维耶是伦敦的一个书稿装订人，拥有苏格兰血统，1774年起便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住在图卢兹。我经不住诱惑，小心翼翼地在压纹上用铅笔做了拓片，时刻觉得管理员会走上前来警告我，并告诉我说要起诉我，会在天亮的时候把我送上断头台，但实际上，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温和的笑意。维耶的装帧风格的特点之一，便是对彩色丝绸环衬的使用，且这些环衬通常饰有宽宽的金边，我们眼前的这份时祷书就是这样的；另一特点是，书脊的顶端和底端布满希腊回纹（Greek Key），中间部分被菱形花蕾框分为数片区域，框内印有大朵的金花，书名则以大写斜体的形式印在红色和绿色的签条之上，但签条上的法语都很糟糕。此处签条上的文字为“HEURES SUR: VELIN”（时祷书：羊皮纸制）和“AVECMINITURES”（“带插图”，原文如此，写作一个词）。后来，维耶越来越沉迷于酒精。他在法国唯一的客户是尤斯丁·麦卡锡-雷伯爵（Count Justin MacCarthy-Reagh, 1744~1811），此人是来自蒂珀雷里（Tipperary）的地主，十分富有，年轻时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18世纪的大藏书家。1761年，麦卡锡卖掉自己在爱尔兰的地产，搬迁到了图卢兹。1765年，他同一个西印度甘蔗种植园园主的女儿成婚。1776年，他在给自己买到法国公民身份的同时，顺便也买了一个伯爵封号。麦卡锡的巨型藏书馆拥有大量彩饰抄本和封皮皮质上等的珍藏版印刷书，1815年，巴黎书商德布雷兄弟（de Bure brothers）为麦卡锡的藏书编制了名录，1817年在拍卖麦卡锡藏书馆本身的时候，就沿用了这份名录。《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就在拍卖名录里面，编号是392，买主是伦敦蓓尔美尔街上的书商佩恩和福斯（Payne and Foss），拍卖价是350法郎，约合13英镑10先令。两位书商应该是想将该抄本卖给弗朗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 1757~1834），因为拍卖当天，他们为杜斯购买了六份抄本，倘若当年他们成功将这份抄本也卖给了杜斯，那么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那极为丰富的杜斯藏品当中，就应当有《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珍贵抄本留在书商手中达数十年之久，这样的事情在19世纪早期并不少见。佩恩和福斯一直开业到1850年。1847年，《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最终由伦敦的另一个书商、来自新邦德街的亨利·乔治·伯恩（Henry George Bohn, 1796~1884），卖给了阿什伯纳姆伯爵四世伯特兰。伯特兰正是在这一年从利布里手中购买了10世纪的《贝亚图斯抄本》，也就是本书第五章谈到的那份抄本。于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成为苏塞克斯阿什伯纳姆图书馆的“H.88”号藏品。跟《贝亚图斯抄本》一样，这份时祷书也出现在1897年亨利·叶茨·汤普森从阿什伯纳姆伯爵五世那里购买的“阿什伯纳姆‘附录’”剩余藏书当中。当时它的标价是300英镑。

在这章中，西德尼·科克莱尔总是神出鬼没。他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秘书和遗嘱执行人，莫里斯是设计师和中世纪艺术的倡导者。在莫里斯去世之后和1908年科克莱尔获得任命成为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的馆长之前，科克莱尔游走于彩饰抄本领域，为富人提供有关其收藏的抄本方面的咨询并为之编制名录，以此为生，他的咨询对象就包括了叶茨·汤普森。随后，科克莱尔成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专家，毕竟，是他发现了让娜的名字。也正是他令这份漂亮但身份不明的标价300英镑的普通抄本，成了世界级的圣物。1899年，他获准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将抄本带到巴黎；来到巴黎之后，他把它带给时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列奥波德·德利尔看。二人交谈之时，科克莱尔用铅笔在抄本第二扉页上记了一些笔记，很有他特色的蝇头小字如今依然可以辨识。很有可能还是德利尔点明，佩雷斯科于1882年描述的那份一直不见踪迹的抄本，就是科克莱尔带到巴黎的这份抄本。当年晚些时候，很显然是在科克莱尔提供的材料的支撑之下，叶茨·汤普森资助印制了一份有关该抄本的华美手册，交给罗克斯堡藏书俱乐部（Roxburghe Club，叶茨于前一年获得了该俱乐部的入会资格），该手册叫作《纳瓦拉女王琼二世时祷书的三十二幅插图》（Thirty～Two Miniatures from the Book of Hours of Joan II, Queen of Navarre），于1899年被分发给俱乐部的各个会员。叶茨·汤普森抄本名录（1902年）的第二卷，也就是M.R.詹姆斯曾为其中的《贝亚图斯抄本》撰写介绍文字的那一卷上，有科克莱尔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撰写的详尽纪要，这份纪要随后成为关于该抄本的主要描述文字，特别是在抄本从1919年开始不再与世人见面的情况下。1908年，该抄本在伯灵顿艺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



西德尼·科克莱尔（1867~1962），收藏家们颇为青睐的抄本顾问，后担任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馆长，曾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做了大量宣传

1919年1月，已经是菲茨威廉博物馆馆长的科克莱尔获悉叶茨·汤普森打算卖掉自己的藏书（参阅本书第五章），感到极为震惊和难过。于是，他再次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从汤普森处借出，并于1月30日带着它前往伦敦格罗夫纳酒店同T.H.里赫斯（T. H. Riches）共进午餐，里赫斯是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幕后赞助人，科克莱尔说服里赫斯即刻向叶茨·汤普森为此抄本开出4000英镑的价格，并且同意最终将它遗赠给剑桥大学。此次会谈的细节被科克莱尔记录在了日记中，这份日记如今收藏在大英图书馆。第二天早上，叶茨·汤普森提出有意接受这个报价，但是汤普森夫人认为这份抄本至少值5000英镑，双方的谈判遂告破裂，这令科克莱尔极为愤怒且失望。1919年4月14日，《泰晤士报》登载了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开拍汤普森藏书的消息，其中就特别提到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还点评说，该抄本“是由著名的佩雷斯科在巴黎的一座女修院发现的”，这个点评看似多余，但对最终的拍卖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拍卖日在这一年的6月3日。《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排在第“V”号（拍卖次序是按照罗马数字排列的）。当天的拍卖人是苏富比拍卖行的合伙人蒙塔古·巴洛（Montagne Barlow）爵士。他叫的底价是两千英镑。来自夸里奇的埃德蒙德·德林（Edmund Dring）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代理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对男爵有着特殊吸引力，他和儿子已经拥有《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贝里公爵最美时祷书》，还有贝里公爵的远亲高贵者查理的时祷书。实际上，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跟14世纪的法兰西王室一样，都喜欢让婚姻对象和抄本维持在家族内部。

然而，此时的拍卖厅里出现了一位强大的竞拍对手，查尔斯·哈格贝格-怀特（Charles Hagberg-Wright, 1862~1940，1934年获得册封成为骑士）。哈格贝格-怀特论职业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但是颇具私人资源，实际上是个收藏家，也是罗克斯堡俱乐部的会员，而且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迎娶了一个颇为富有的寡妇。更有意思的是，哈格贝格-怀特其人对佩雷斯科极有兴趣。1926年，他写了一部佩雷斯科的传记，其中就描述了1621年佩雷斯科同《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会面的情形。在1919年的苏富比拍卖大厅里，哈格贝格-怀特的竞拍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最终迫使罗斯柴尔德男爵给出了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叫价：11800英镑。这样的价格在此后多年都未被其他抄本超越，那疯狂竞拍的场面也成了在场之人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在同一天的拍卖会上，10世纪的《贝亚图斯抄本》——1897年就被估价1600英镑（当时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估价只有300英镑）——只拍出了1000英镑的价格。就这样，《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现在，我们不妨查验一些此前完全不为人知的信息。我向抄本部的夏洛特·德诺伊女士询问有关这份抄本的更多信息，德诺伊女士遂将我介绍给图书馆档案部的同事奥雷利安·孔罗先生。两人在交谈之间向我透露，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于1967~1973年获得《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有一些内部材料记录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于是我回到巴黎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新馆去查看这些内部材料，新馆就坐落在巴黎东部，地铁十四号线的终点附近。这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用木材、玻璃和亮银金属建成，周围有四座塔楼式建筑，呈四本打开着的直立书册的形状。阅览区在地下数层，多个阅览室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地下中央采光井散布开来，采光井里面种满了树木和蕨类植物。工作人员直接把我领到“Salle T ”阅览室（这里的阅览室都是用字母命名的），这一间是专供查阅有关藏书的档案材料的。

我约见的卷宗编号为“E38/b221”，是一个白色的档案盒，里面的文件都写在黄色纸张上，并被装在紫色的文件夹里。其中有信笺、回忆录、旧式的复印件、回信草稿等，有一些被夹在了一起，按时间倒序排列。这些文件涉及的核心人物包括埃迪恩尼·邓尼利（Étienne Dennery），曾任国家图书馆的综合管理员；马赛尔·托马斯，国家图书馆的抄本管理员；迈特尔·格奥格斯·伊扎尔（Maître Georges Izard），国家图书馆法律顾问；多姆·伯纳德·贝斯雷特，曾任布列塔尼博奎恩修道

院院长，《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就是在这座修道院重见天日的；当然还有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他是雅各布·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侄子兼继承人；以及男爵夫人亚历山德里娜。这些文件足以填补目前为止的一些日期上的空白，而且，它讲述的故事跟莫里斯·兰斯口中的截然不同。

1967年7月，贝斯雷特将抄本存放在国家图书馆，为其做检查。当时，人们认为这份时祷书是安茹家族的物件，不过，图书馆工作人员很快便认出它就是丢失了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并将之同《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名录》中的纪要进行比照。有足够的信息可以确认，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究竟是谁发现了这份抄本——除了那名医官之外，贝斯雷特还提到了一条信息：此人是来自科多尔省的前国会议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很快得到了时祷书失而复得的消息。档案当中更有一封写于1967年年底的信，是莫里斯·兰斯写给邓尼利的，信中传递了一个消息，即男爵有意拍卖抄本，并且会将拍卖所得分给博奎恩修道院一部分，剩下的则转归男爵自己在耶路撒冷设立的一个基金。这一年的12月28日，男爵前往国家图书馆，跟馆方商议收购条件，当然，所得收入也要分一部分给博奎恩修道院。当时双方提议由巴黎书商吉罗-巴丹（Giraud-Badin）对抄本进行第三方估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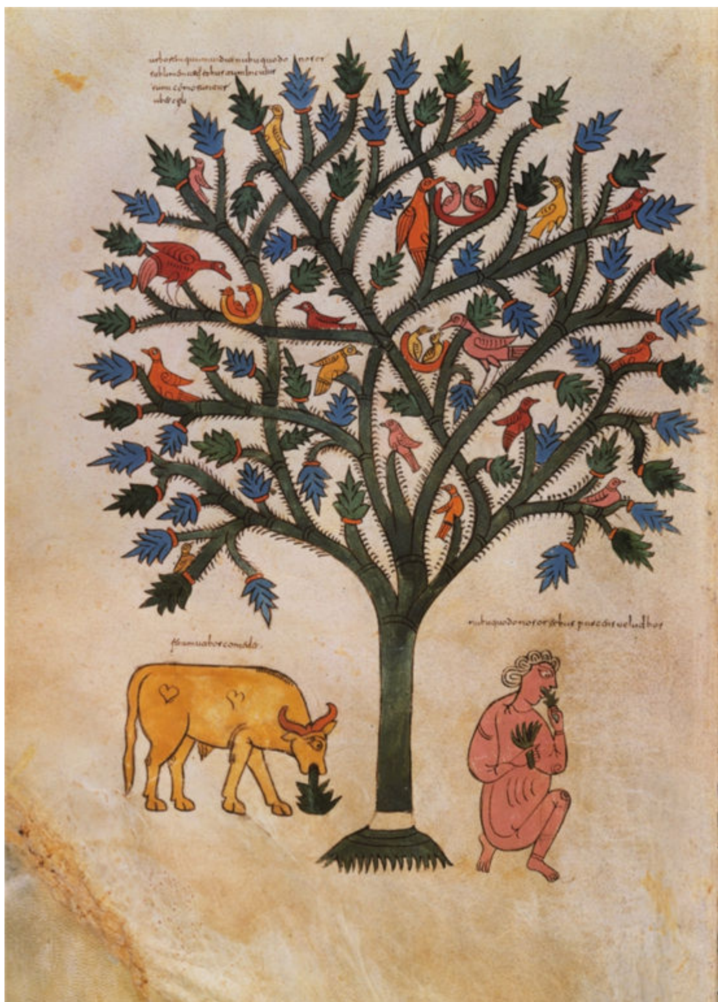
更具爆炸性的消息来自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提供者是柏林财政部的弗劳·伯姆（Frau Böhm），时间是1968年2月14日。她提供了有关时祷书的战时经历信息，这些信息很重要也很精确。据备忘录，这份抄本在战时落入“国家领袖罗森贝格任务小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简称“ERR”）手中，该机构是专门负责管理盗窃而来的艺术品的，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网球场博物馆（Jeu de Paume museum）。该抄本在ERR中的索引号是“R1550”。1942年3月，它通过私人渠道（备忘录中这个词被加了下划线）被转给赫尔曼·戈林。前文曾谈到盟军是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列火车附近发现这份抄本的，这个说法的唯一来源是贝斯雷特本人，档案中还有贝斯雷特写于1968年6月12日的那封信，现在我们总算有了第一个独立证据，可以证明是戈林本人“征用”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弗劳·伯姆还说，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已经收到了德国政府的补偿金。这份备忘录随附了一批文件。1958年3月29日，亚历山德里娜的律师汉斯·多伊奇（Hans Deutsch）向柏林方面发送了律师函，要求赔偿自己客户在战时丢失的多件艺术品，其中就包括《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为此多伊奇还专门聘请书商海因里希·艾斯曼对这份时祷书进行了估价，当时的估值为73200000法郎，合50000英镑略多一些，换算成美元则是150000略少一些。1958年9月25日，柏林财政部最终同意，为包括时祷书在内的丢失艺术品赔偿17500000帝国马克（约合1500000美元或者4200000英镑）。1959年3月3日，这笔巨额赔偿款通过瑞士银行被转给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就如同常规的保险赔偿案一样，既然赔偿已经做出，那么《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即使被意外寻获，也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了，并且从法律上讲，应当归属西德政府，因为是西德政府支付了这笔赔偿款。



赫尔曼·戈林（1893~1946）陪同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欣赏一幅画，戈林正计划将其纳入私人收藏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向多姆·伯纳德·贝斯雷特的韧劲表示钦佩。到了1968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直在争取他的修道院在这笔款项当中应当享有的份额，并要求将抄本归还他本人。1968年6月，设立在慕尼黑的高等税政署（Oberfinanzdirektion）告诉法国国家图书馆，不能满足贝斯雷特的要求，因为贝斯雷特的这个主张尚有争议。最终，1969年10月，在征求了莫里斯·兰斯的意见之后，贝斯雷特承认战败。1969年11月7日，埃德蒙德男爵也相当豁然地退出了这场斗争，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姑妈同德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从理论上来说，这件案子若就此尘埃落定，德意志联邦政府就完全可以将抄本交付西柏林或者慕尼黑的某个图书馆。很可能就是念及于此，1971年7月，马赛尔·托马斯想了一个办法，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定为法兰西的民族瑰宝和文化象征，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不能出口的。

与此同时，法国国家图书馆同西德大使馆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交涉。马赛尔·托马斯赢得了有不少人脉的慕尼黑的抄本史学家弗洛伦丁·米特里希（Florentine Mütherich）的支持，两人一起拜访了德意志驻巴黎的文化专员汉斯·豪泽（Hans Hauser），向他强调说，倘若能妥善解决此问题，就能大大提升他国对德意志的好感度。最终的方案是：在同意支付亚历山德里娜女士365000帝国马克的前提下，外加支付四个点的利息，计息时间从抄本被返还法国那天开始。1973年1月15日，豪泽先生代表联邦德国财政部在此方案上签字，方案规定由法国政府支付这笔赔偿款，分期三年执行。法国政府遂按照约定支付了赔偿款和利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就此回归法兰西。纳瓦拉的让娜本人不曾坐上法兰西王位，不过，她的这份充满传奇经历的抄本如今安全地进驻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这里才是它真正的家。



注释：

[1] i^{2+2}[一个后人添加进去的双开页，也就是第1~2对开页，前面是一张空白衬页，后面是一张于1420年前后被增补在内的插图页]，ii^{7}[共八个对开页，第vii页是空白页，第viii页被撕掉了，第10对开页后是一张空白页]，iii~v^{8}，vi^{4}，vii~xiv^{8}，xv^{6}，xvi^{8}，xvii^{7}[共八个对开页，第v页缺失，该页被标注为第121对开页]，xviii^{7}[共八个对开页，第iii页缺失，也就是第126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ix^{8}，xx~xxi^{7}[共八个对开页，两折都缺失了第vii页，分别是第145页后一页和152对开页后一页]，xxii~xxvi^{8}，xxvii^{4}[这几折显然是完整的]，xxviii~xxxiv^{8}，xxxv^{4}[原本的最后一页]，xxxvi^{5}[14世纪晚期的增补页，共六个对开页，第vi页缺失，也就是第263对开页后面的一页]，xxxvii^{8}[15世纪晚期的增补页]，大部分页面的页脚有页码标记。

[2] 这条街也被称作rue des Enlumineurs，即彩饰街。——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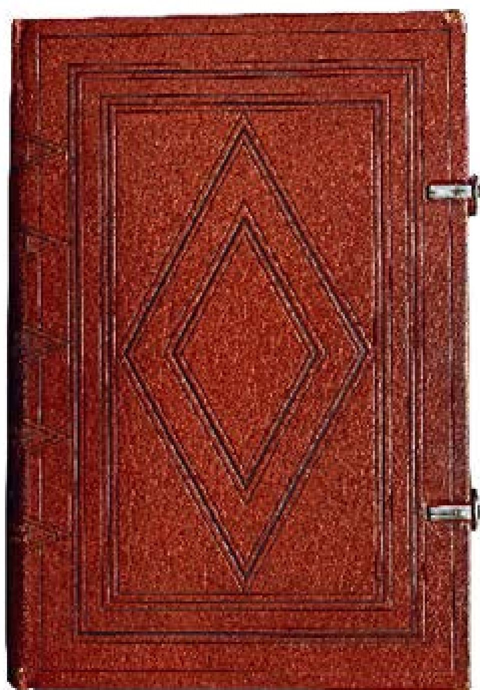
[3] 祷词中的Johanna（胡安娜）在各语言中译法不同，可指让娜，也可指琼。——译者注

第十章
《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

约1400年

阿伯里斯特威斯，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Peniarth MS 392 D



一个中世纪抄写员竟然能够登上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这可不是常见的事情。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这一天发行的英格兰《卫报》给出了这样的头条，“乔叟的马虎抄写员六百年后现真容”。这篇头条文章源自前一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讲述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曾经写了一首短诗，该诗很显然是他写给自己的那个名叫“亚当”（Adam）的私人抄写员的，目的是恳请这个抄写员更认真细致一些。文章的内容还包括：《坎特伯雷故事集》现存的两份最古老抄本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也就是在14世纪晚期的一份文件上留下签名“Adam Pinkhurst”（亚当·平克赫斯特）的那个神秘的伦敦抄写员；现在可以肯定他就是乔叟所说的那个“亚当”。此一发现应当归功于林尼·R.穆内（Linne R. Mooney），穆内是美国人，出生在缅因州，现在约克大学英语系教书。这篇文章解释了一些相关情况：

[穆内教授]一直在追踪亚当·平克赫斯特。她研究了平克赫斯特在伦敦抄书人公会（Scriveners'company）入会誓言里面留下的签名，这也

是该公会最早的一批档案材料之一。之后，穆内教授将这个签名同《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进行了比照……“看过这些档案材料的人不在少数，不过，很不巧，这些人都不是研究中世纪抄书人的。”这是穆内教授昨天跟《卫报》记者说的一席话。很显然，看过伦敦抄书人公会的这份档案材料的人并没有能力做出鉴别，从中判断出那个签名跟《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属于同一个人……他们不像穆内教授那样，对那一时期的书法有如此深湛的了解。

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这样一个重大认证，将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份中世纪英语文学最伟大作品的最初传播情况的认知，现在则不妨暂停一下，看一看2004年夏天，公众对这则新闻有何反应。英国学界的反应是一片哗然，怒潮涌动，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觉得他们会很高兴才对。穆内教授不管怎么说都不是抄本研究者，还是一个美国人，却在有此等分量的英格兰问题上大发宏论，并被奉为顶级专家，这当然会为她招致恨意。于是，有一些人等不及考量穆内教授提出的证据，便急不可耐地给出预判，认为穆内的结论根本就是荒谬的。就像对女权主义问题发表议论的男性，林尼女士被认定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如此不公，实在是要命，且对林尼女士来说，这会造成十足的烦扰。大学的公共休息室看似是个温文尔雅的世界，实际上随时会变得极为残酷。亚当·平克赫斯特的身份问题引发的这场持续论战，遂向着18世纪小册子战争的方向演变，信任和嫉恨、理性和历史考证，都参与进来，一起推动这场战争。

2004年之后，学术界在这个身份认证的问题上彻底分化。我们不妨将其中一派人称为“维基百科”派，这派人将林尼女士的认证视为已经被证实的事实，将之接纳下来，并将事态继续向前推进，把更多的抄本归在“平克赫斯特”名下，用更多的素材充实这个抄写员的职业生涯，绘声绘色地呈现了此人在这个伟大文本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于是，亚当·平克赫斯特，这个基本上不曾见诸史撰的人物，在《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里面拥有了自己的内容翔实的词条，这一词条当然是林尼·穆内撰写的，她在词条当中明确地将亚当·平克赫斯特称为“杰弗里·乔叟的抄写员”，同时也很确定地说他的“笔迹很容易辨识”。另一派当然是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敌意的态度，对林尼女士提出的结论完全不予认同。当然，也有很多秉持保留态度的英国古文书专家拒绝介入这场斗争，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情况了。我认为，是已故的马尔科姆·帕克斯（Malcolm Parkes）先生在该问题上第一个提出了这种带有策略性的表达——他说，目前“陪审团尚未进场”。实际上，今天的很多学者仍然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在乔叟本人的生平当中，还是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法庭和陪审团都反复出现，既然如此，我们在本章中也不妨召集一次陪审团，并对各方证人展开问讯。



《坎特伯雷故事集》埃尔斯米尔抄本，跟亨维特抄本共享一个抄写员，如今收藏在加利福尼亚的亨廷顿图书馆

乔叟出生在伦敦，父亲是酒商，确切地说是酒类批发商。这样的家境令乔叟接受了良好教育，精通多门语言，并拥有相当多的国外游学经历。百年战争期间，他加入了爱德华三世的军队，1359年的兰斯之围令乔叟沦为俘虏，他于几个月后被赎回。他的婚姻堪称门当户对，女方是英格兰王室近亲。这令乔叟有机会担任多个皇家管理职位，其中最主要的是海关官员，负责伦敦港的羊毛、羊皮和其他皮货的进出口关税业务。乔叟还担任过外交官、治安法官，当然也进过议会。他那代人正赶上英语开始赢得世人尊重的时期。在14世纪之前的中世纪，不列颠上流社会仍然奉法语为体面语言，本土化的法语则被称为盎格鲁-诺曼语，而且当时的阅读世界主要还是拉丁语的天下。在此前三百多年的光阴当中，传承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语，不过是无知农夫的俗气语言罢了。于是英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法语词汇。1348~1350年，在黑死病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当中，一种被称为“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的混合语言应运而生，并且在社会等级阶梯上不断攀升。乔叟自己的圈子位于非常受尊重的中上层。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了《公爵夫人之书》（*Book of the Duchess*），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兰开夏公爵、冈特的约翰的妻子（于1368年逝世）而作的，用英语写成。他还将波埃修斯用拉丁文写成的《哲学的慰藉》翻译成了英语，并创作了韵文体骑士传奇《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这一长篇叙事诗取材于特洛伊战争，写于14世纪80年代中期。今天，乔叟可谓享誉世界，这样的声名主要还是来自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本书以韵文体和散文体写就，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故事集。《坎特伯雷故事集》借二十九个三教九流的朝圣客之口讲述了许多故事，这些朝圣客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朝圣之路则是从伦敦到圣徒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的圣所。据故事集的总引交代，南华克塔巴旅馆的老板提议大家在朝圣路上

讲一些故事作为消遣。旅馆老板是这批朝圣客的领路人，他建议说，在去的路上，每个人讲两个故事，在回来的路上，也是一样。按照这样的计划，整个故事集就应当包含120个故事才对。不过，乔叟于1400年10月、不到60岁时就故去了，因此只完成了大约24个故事。

乔叟并未留下亲笔书写的手稿，至少此类手稿尚未被人发现。《坎特伯雷故事集》现存最古老的两份抄本，通常被论定抄写于1400年前后，或者稍晚一些。这两份抄本就是本章的主题。其一是人们常常说起的亨维特抄本（Hengwrt Chancer），我们将前往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会见这份抄本，另一份抄本的创制时间则要稍晚一些，不过比亨维特抄本华美得多，这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埃尔斯米尔抄本（Ellesmere Chaucer），该抄本一度归属布里奇沃特家族，也就是后来的埃尔斯米尔勋爵，这个家族的后人于1917年将抄本卖给了加利福尼亚的亨利·亨廷顿。亨廷顿家族的图书馆和艺术画廊位于洛杉矶附近的圣马力诺，于1928年向公众开放，这一抄本是其中的明星级瑰宝。正是这份抄本的页边空白处有那些著名插图，呈现的是在马背上的朝圣客的画面。我们知道的关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原文的情况，基本上都来自这两个主要见证人，一个叫“亨维特”，一个叫“埃尔斯米尔”。这两份抄本也是该故事集一切现代版本的基础。如此说来，我们可以将这二者视为非常纯净且准确的文本。

早在1935年就有人认为，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应该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1978年，伊安·多伊勒（Ian Doyle）和马尔科姆·帕克斯发表了开拓性的文章，确认了此一观点。这两位作者是中古英语古文书主流研究圈子里的双子星，二人还提供了另外两份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一是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抄本的残片，现存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档案馆；另一份文件是一张工作额度分配表，涉及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中古英语长诗《一个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抄本的抄写工作，这份抄本是由多名抄写员协同制作的，现收藏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在分配表当中，多伊勒和帕克斯认为我们的这位抄写员应当是无明显特征的“第二抄写员”（Scribe B）。无论此人是谁，定然都是一位非常接近乔叟生活的时代的职业抄写员，并且是在伦敦地区从业的，从他的拼写风格就能看出这一点。迄今，这些情况可以说是不存在争议的，而且多多少少得到了普遍认可。

已经佚失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抄本的一份残片，跟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共享一个抄写员，这份残片如今收藏在哈特菲尔德家族档案馆

在针对“亚当·平克赫斯特”的这场审讯中，第一个要传唤的证人当然就是亨维特抄本本身。在真实的法庭上，证人是必须先自报姓名的。“亨维特”在威尔士语中指“旧礼拜堂”（Old Hall），一度是一栋很大的房子，在格温内思郡（Gwynedd）的多尔盖莱（Dolgellau）附近，阿伯里斯特威斯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我们在亨维特抄本上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些很潦草的字迹，甚至是一些幼稚的题词，从中可见在16世纪时，该抄本位于威尔士边境地带的切斯特（Chester）。到了17世纪中叶，它被罗伯特·鲍威尔·沃恩（Robert Powell Vaughan，约1591~1667）收藏，此人是威尔士的一个古物收藏家，从妻子的家族继承了亨维特地产。他的藏书包括了一批早期威尔士文学的顶级作品，比

如13世纪的《卡马森黑皮书》（Black Book of Carmarthen）以及14世纪的《塔利辛之书》（Book of Taliesin）。1658年，亨维特抄本在这个家族图书馆当中的编号和纪要为："编号154，乔叟作品，写于优质牛皮纸上，对开本，4英寸厚。"自那之后，它便一直待在亨维特的书架上，基本上无人问津，直到没有子嗣的第三任准男爵罗伯特·沃恩爵士（Sir Robert Vaughan, 1803~1859）去世。罗伯特·沃恩生前将家族藏书传给了自己的朋友、佩尼阿尔特（Peniarth）的威廉·韦恩（William Wynne），韦恩本人也是个大收藏家。1904年，亨维特的藏书和佩尼阿尔特的藏书都离开了韦恩庄园，被统一卖给了约翰·威廉斯爵士（Sir John Williams, 1840~1926），此人是医生，也是一个慈善家，正是他出资修建了威尔士国家图书馆，而且，他还是"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的众多候选人之一，当然，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个。威尔士国家图书馆选址在西海岸的阿伯里斯特威斯，而非威尔士首府卡迪夫，这主要就是因为威廉斯爵士在他于1909年立下的遗嘱中提出了这个条件。

威尔士国家图书馆（Llyfrgell Genedlaethol Cymru）堪称英伦诸岛之上最难以接近的学问堡垒之一。阿伯里斯特威斯距离伦敦至少有五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这也要取决于交通状况。离图书馆最近的机场在伯明翰或者曼彻斯特。如果像我一样选择火车，从伯明翰出发的最快路线，也需要三小时二十五分钟，且我一上车就发现车厢里拥挤不堪，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到。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一路上要经过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和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还要穿越整个威尔士中部区域，停靠许多小站，其中很多站的站名听起来实在是古老，诸如凯尔苏斯（Caersws）、马汉莱斯（Machynlleth）、达维十字（Dovey Junction）以及博斯（Borth）等。这一路上的风景由一望无际的平整绿地和稀稀落落的石筑农舍构成，像极了很久之前的铁道模型中的场景。直到火车晃晃悠悠地驶入阿伯里斯特威斯车站的时候，车厢里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了。阿伯里斯特威斯是一座迷人的海滨小城，滨海地带差不多全部是19世纪的浅色石瓦屋顶建筑。我选择在马林台（Marine Terrace）的格维斯提西姆鲁（Gwesty Cymru）酒店住了下来，从此处可以将海景和夕阳尽收眼底。阿伯里斯特威斯给人的感受是那么的清静和安逸，我去的时候虽然正值六月中旬，但路上没有什么车，海滩上也只有海鸥在歇息，还有那灰色的沙子随着海水温柔摇曳。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讲威尔士语（而且在生活中也只讲威尔士语），不懂英语，这令我如同置身于芬兰那样的异域之地，偶尔有车从身边驶过时，我看到那熟悉的英国车牌，都会感到十分吃惊。

早上，我搭乘出租车沿着山坡而上，前往国家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坐落在一个风景壮丽的小山坡上，俯临城中的石瓦屋顶。图书馆本身是用花岗岩建造而成的巨大古典建筑，正门台阶的最下方有一块纪念石，纪念的是1937年7月乔治六世主持的开馆典礼；后来我才了解到，关于这座建筑还有很多其他的纪念日，因为二十世纪之初以来，这座建筑经历了多次扩建和内修，几乎把所有的建筑风格都用了一遍。从地面层的入口进入图书馆后，我便来到了主楼梯的右侧，再穿过一道玻璃转门就是门厅，门厅并不高，其中有一个问询台和一个图书馆书店。一名金色

头发的接待员正在当班，态度非常和善，我告诉她我来见抄本部主任玛莱杜德·ap·休（Maredudd ap Huw）先生。这位女士当然是用英语回应了我，但她在打电话跟玛莱杜德沟通的时候，用的是威尔士语。这是一通漫长的电话，这位女士还时不时地向我这边看上两眼，甚是认真。我不知道他们在交谈什么，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在警告玛莱杜德，眼前的这个访客实在怪异，面相不善，头发还乱糟糟的，因此她建议他拒绝这样的访客；通话结束之后，她面带甜甜的微笑，告诉我稍等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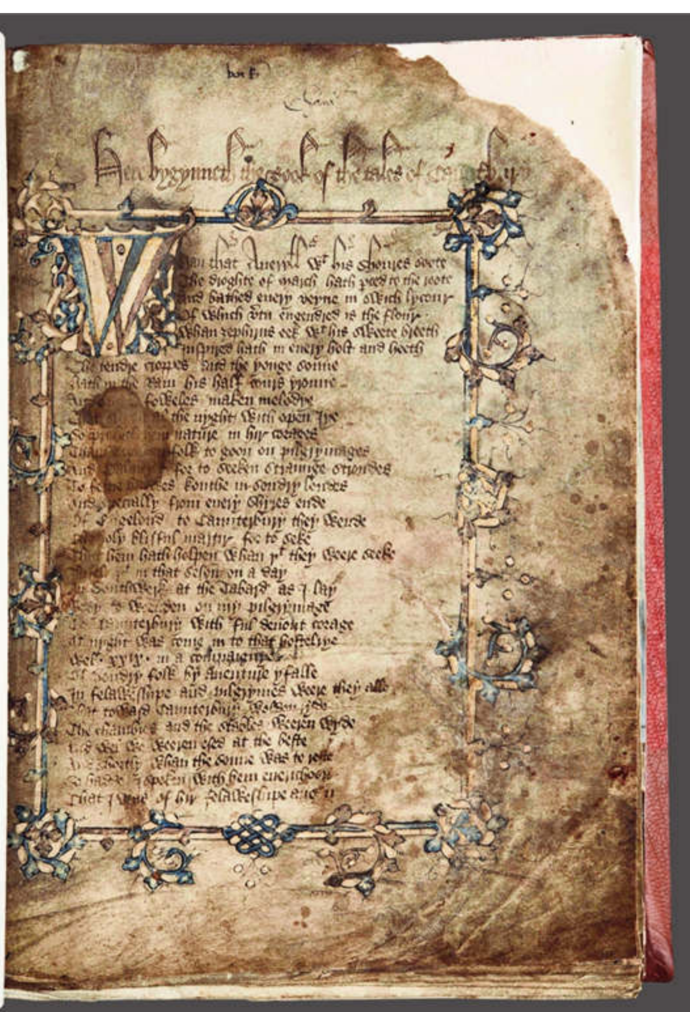

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建于1907年，如同一座巨大皇宫矗立在山丘上，俯临整个海滨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

玛莱杜德是个年轻人，个头高高的，衣着整洁，黑色头发修剪得工工整整，戴着不厚的眼镜。他对我的态度太过热情，令我有些尴尬。我预期自己会被留在阅览室里面，无人理睬，就像以前我造访各图书馆时发生的那样，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玛莱杜德极为热情地领我上楼，直接进了馆长办公室，这是一间俯临整个阿伯里斯特威斯城的豪华会议室，房间角落里有一根石柱，柱顶是约翰·威廉斯爵士的大理石胸像。房间里面似乎已经坐满了人，我被先后引见给：抄本保护中心负责人萨利·麦金尼斯、档案和抄本部负责人尼亚·迈·丹尼尔、档案管理员里斯·达维斯；甚至连馆长兼首席执行官阿莱德·格鲁菲德·琼斯也来到了现场。很显然，他们都是来见证我跟这份最伟大的中古英语抄本的第一次正式会面的。跟《凯尔经》一样，《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员，并不轻易露面。会议室里还专门配了一名摄影师。我感觉到我很可能会让在场的众人失望，特别是在他们都期望我当场就给出一些结论甚至做出令人震惊的发现的情况下。

这间房间很狭长，远端是高高的金属框窗户。威尼斯风格的窗帘已经被拉起。众人安排我在长桌前面坐下，桌面用的是深绿色的皮革，我所坐的椅子有与之相配的皮革坐垫。正对着我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装饰风格壁炉，由黄色和白色的大理石制成。一个褐色布盒已经被放在桌子

上，盒子的脊背上印有“PENIARTH/MS/392D”字样，对于一份世界级的抄本来说，这样的编号实在是太普通了。编号的下方有一块红色皮革，玛莱杜德解释说，这是最高限制等级的标志。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副白色手套，手套包装上面印有“中国制造”的字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手套会这么小。一开始，我都小心翼翼地戴着手套，不过渐渐地，我就默默地忽视了它。

我取出抄本的时候，房间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过，他们没过多久便觉得有些无聊，纷纷溜了出去。眼前的亨维特抄本是用高等质地的现代红色摩洛哥小山羊皮装订起来的，封面有黑线画出的方框和菱形图案，两条编织而成的皮带系在封底，皮带顶头带有银环，银环正好能跟封皮边缘处的书扣扣在一起。封皮和封底用的是木板，且明显要比书页大一些。书脊上面的书名非常冗长，包括以下字样：“THE TALES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故事集）、“GEOFFREY CHAUCER”（杰弗里·乔叟）以及“HENGWRT MS.154. PENIARTH MS. 392D”，都是烫金字。这一装帧是由该图书馆于1956年制作的。格雷格诺格出版社（Gregynog Press）是格温多琳·达维斯和玛格丽特·达维斯姐妹的私人出版机构，曾坐落在威尔士中部的格雷格诺格庄园（Gregynog Hall）。1940年，该出版社关门大吉，余下的皮革以及装订材料便被玛格丽特·达维斯于1954年转赠给了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图书馆遂决定利用这批材料，对馆内的一批珍本进行重装，亨维特抄本当然就在其中。但该抄本的装帧风格跟同一时期接受了重装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或者《凯尔经》比起来，应该说要传统得多，《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和《凯尔经》在重装之时使用的是朴素的橡木板。亨维特抄本先前的封皮是从中世纪晚期传承下来的，已经非常脆弱了，现在被单独保存着，他们也将其拿给我看了。旧的封皮差不多是黑色的；新的封皮则是红色的。这样的颜色虽然是出于巧合，但很配乔叟在牛津雇的那个抄写员——该抄写员的床头摞着二十份抄本，它们都有着黑色或红色的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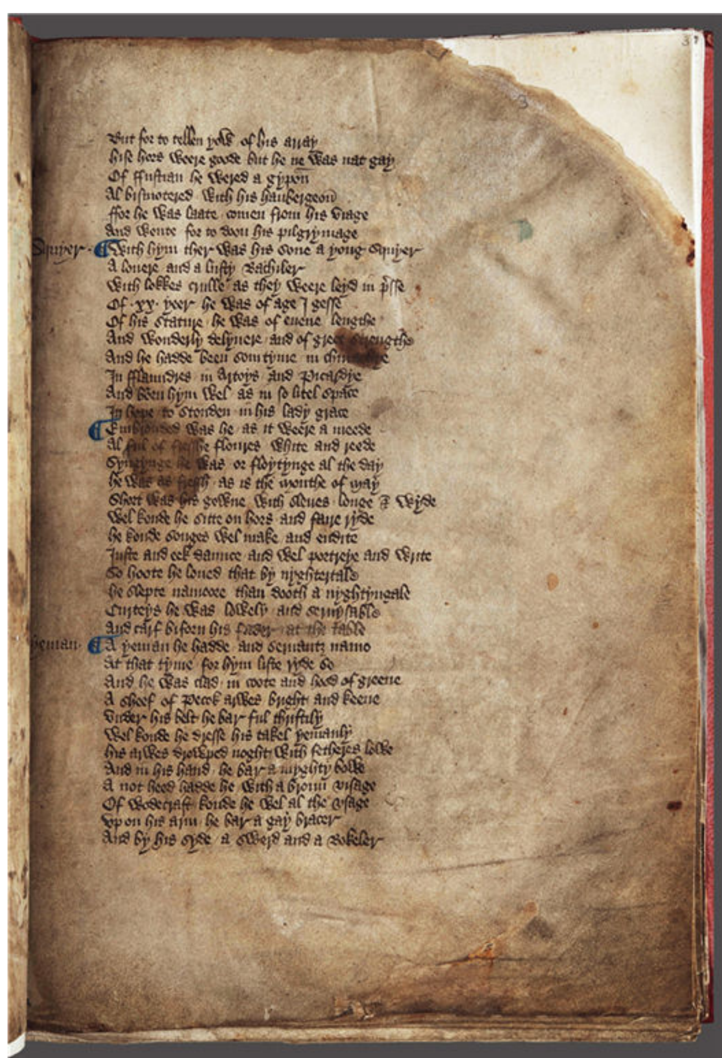
亨维特抄本的开篇页，内容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总引部分，装饰有彩绘首字母和边框

亨维特抄本大约11.5英寸长、8.25英寸宽。卷首页上有一个带泥金装饰的边框将文字环绕起来，边饰图案当中不时地会伸出几根粉色和蓝色的枝条，上面长满了叶子。抄本的第一页显然已经破旧不堪了，而且因为经常暴露在外而被磨得光亮，粉色的颜料也已经严重褪色，但贴金图案仍然在厚厚的白色黏合剂上闪着亮光。第一页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首字母“W”，有六行文字的高度，这就是那著名的开篇句“Whan that Averyll wt his shoures soote…”（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的首字母。亨维特抄本当然没有埃尔斯米尔抄本那般奢华，跟同时代法国的那些为贝里公爵这等人物制作的泥金装饰抄本更不能比，但是，它一点也不廉价。亨维特抄本用了黄金。这份抄本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中古英语抄本比起来，比如《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以及《威克里夫圣经抄本》等，这些抄本都很小，看起来也普普通通。亨维特抄本用的是羊皮纸，并非普通纸张，实际上，当时的

英格兰已经开始使用普通纸张制作廉价书册了，但亨维特抄本所用羊皮都是上好质地的，触感很柔软。



第二版《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总引部分，文字描绘的是一个乡绅和一个农夫，该版由威廉·卡克斯顿于1483年在威斯敏斯特刊印



亨维特抄本当中同样的描述一个乡绅（从第7行开始）和一个农夫的文本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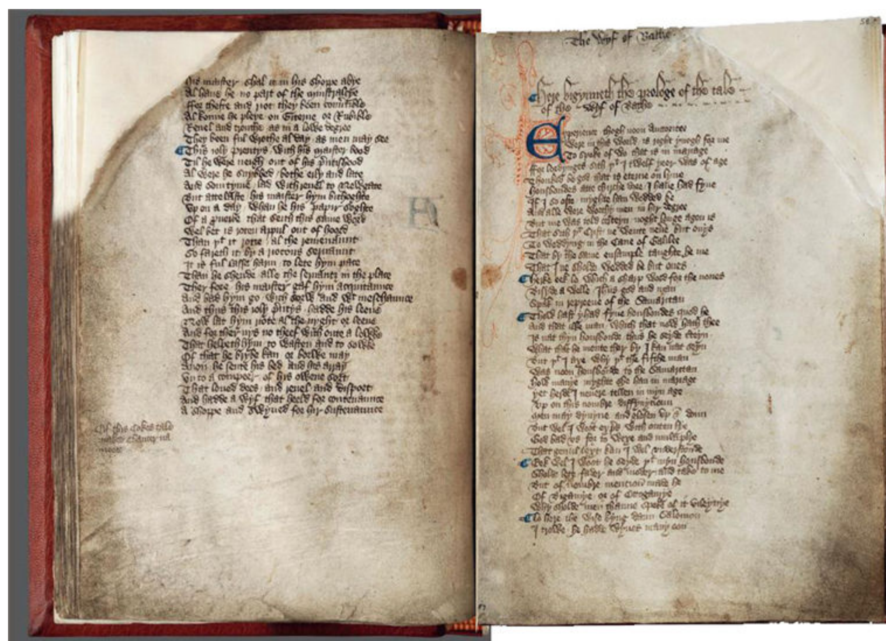
一看到这份抄本就能注意到，它的差不多所有书页的右上角都被用新的羊皮纸修补完整了，显得非常突兀，但在影印本里不是十分明显。羊皮纸的成分是蛋白质，很容易遭受啃噬。很可能是在18世纪这份抄本“无人光顾”时，页面的上端被老鼠啃噬掉了（我们可以就此编一则儿童故事，就叫作“吃了‘亨维特’的老鼠”）。1956年，图书馆对这份抄本实施重装，残破的页边遂被新鲜的白色羊皮纸彻底取代，装订人根本没有考虑新旧纸张的色彩协调性问题。结果是每张开篇页都斑驳不堪，就如同斑点可卡犬的毛色一样。同时，书页的外缘被染成了红色，且包括新增羊皮纸在内的书页的上缘被贴了金，这应该也是1956年重装工程的遗产，因为第87对开页是一张增补页，上面被溅了红色颜料。

亨维特抄本的大部分页面上有文字，韵文部分通常呈现为狭窄的一列，散文部分则被呈现在纵向的长方形框中；每页四十行文字，字号都

很大，且十分齐整，其中，“第二抄写员”的字体跟1483年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印制的每页三十八行的第二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铅字字体很相近。抄本的彩绘首字母都是蓝色和红色的，很是漂亮；每个段落的开头也会有蓝色的段落标记。很多页面的上页边抄写有相应故事的标题。这样一来，读者很轻易就能找到想读的内容。抄本的字号很大，因此它完全可以被用作公共诵读本。这不免令我想起帕克图书馆收藏的那份乔叟的《特洛伊罗斯》抄本（约1415~1420），该抄本的卷首页插图呈现的就是作者本人在一场贵族花园聚会之上，为宾客诵读自己的诗歌的场景。很显然，亨维特抄本是为读经台而制的，或者最起码也是应该被捧着读的。在我本人翻阅这份抄本的时候，它被放置在一个很大且很松软的灰色垫子之上。

因为这份抄本是在现代重装的，且翻动起来很容易，所以它的校勘也很方便。[1]我将校勘情况标示在了下面的注释当中，不过，我并没有采用常规的表述方式，而是将该抄本分为了五个不同的单元，它们就像是五份各自独立的抄本：（1）第i~viii折；（2）第ix~xii折；（3）第xiii~xv折；（4）第xvi~xxix折；（5）最后的第xxx~xxxi折。每一单元看起来都是单独的一个整体。第57对开页的左页，也就是第一单元的尾页，是“厨师的故事”的第二页，故事在此中断，抄写员留下了一些空白的空间，仿佛在等待乔叟续写这个故事。最终抄写员意识到乔叟不会继续这个故事了，于是用颜色稍有不同的墨水留下了这样一行标注：“*Of this Cokes tale maked Chaucer na moore*”（乔叟没有继续这个厨师的故事）。接下来一页，也就是第58对开页的右页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份抄本的开篇，拥有独立的标题，“*Here bigynneth the prologe of the tale of the Wyf of Bathe*”（此处是“巴斯妇的故事”的开场语），更绘有一个很大的首字母“E”。这个单元在第86对开页左页的底端以“法庭差役的故事”（Summoner's Tale）结束，第87对开页则是一张完整的空白页，就如同一份独立抄本的空白底页一样。第88对开页右页又像是一份独立抄本的开篇页，标注有如下文字，“*Here bigynneth the prologe of the Monkes [tale]*”（此处是“僧士的故事”的开场语），这句话中最后一个词被老鼠啃掉了，该页上还绘有很大的首字母“W”。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伙食经理的故事”，结尾出现在三折之后，也就是第111对开页的右页，此页没有页码标注。这个单元的开篇页和结尾页显然要比前面的第87对开页的左页和后面的第112对开页的右页脏很多，看样子，这些不同单元在抄本最终被装订起来之前，被分开传阅了很长时间。第xxix折在第234对开页的左页收尾，同样很像一份独立抄本的尾页，写有字体与正文不同的题词，其中提到了作者的名字：“*Here is endid Chaucers tale of Melibe*”（此处是乔叟的“梅利比的故事”的结尾）。对面的第235对开页右页，最后一个单元的开篇，其标题是“*The Prologe of the Persons tale*”（“牧师的故事”的开场语），这一页更黑、更脏，看起来也像是被当作独立抄本保存了一段时间。这五个独立单元甚至都没有被以正确的次序装订起来。比如说，第三单元，也就是第88~111对开页，本是位于目前的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也是第234对开页和第235对开页之间的。因为第88对开页右页上有如下句子，“Whan ended was my tale of Melibee ...”（“梅利比的故事”就此结束），但实际上，“梅利

比的故事”是在第234对开页的左页收尾的；再比如，第235对开页右页上出现了“By that the Mau[n]ciple hadde his tale al ended ...”（“伙食经理的故事”到此结束），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在第111对开页的左页收尾的。



第468~469页：《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当中“厨师的故事”部分，叙事突然中止，令人遗憾，抄写员给出了旁注，指明乔叟写到此处就没再写下去了；接下来便是“巴斯妇的故事”

乔叟作品的研究者对上述情况都很清楚，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亨维特抄本有如此明显的独立单元，就仿佛它本身是一部中世纪的“文集”（也就是德语中的“Sammelbände”），是由抄本最初的主人将各处搜集来的短篇故事汇编而成的。但它与文集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五个单元都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

对于各个单元的装订顺序如此混乱的情况，我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更何况该抄本一直这么忠诚地维持着中世纪晚期的装订顺序。因此，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后来的重装造成的，跟《布兰诗歌》的情况不一样。很有可能这五个单元一开始就是作为抄本的范本独立成册的，这样就方便多个抄写员同时展开工作了，实际上，中世纪巴黎的书商通常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会把抄本拆分成多个独立单元，分配给多个抄写员，这些独立单元常被称为“peciae”（样本）。在单独的抄写工作完成之后，五份样本就被统一汇总到了“第二抄写员”的手中，应该是在该抄写员去世之后，人们才第一次将它们装订在了一起，装订顺序是随机的，可能按照的是当时的摆放位置。

虽然我们不应该在细节上过度纠结，但这一抄本确实给人留下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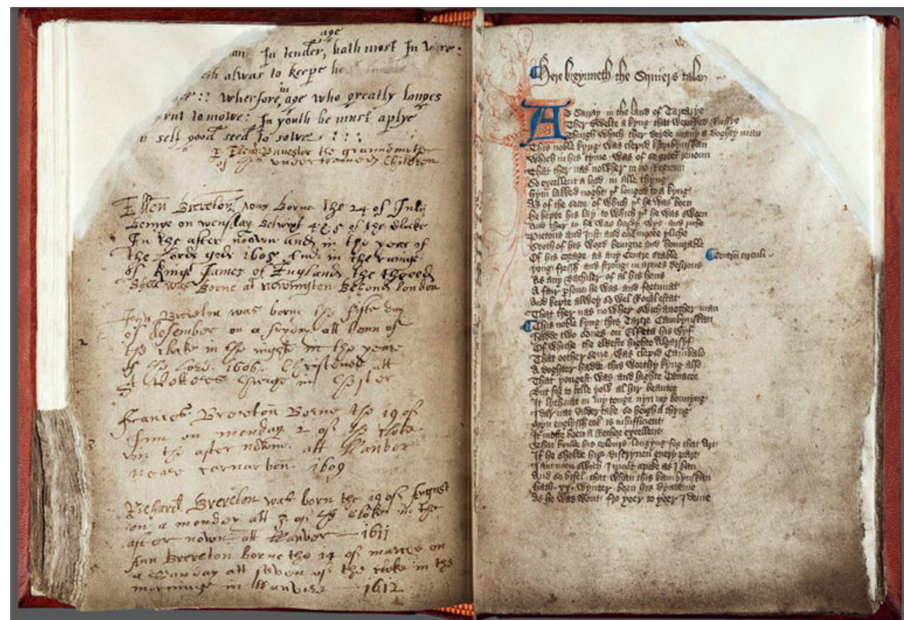
样的印象：各个抄写员都是分批接活和进行抄写工作的，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各个部分将由哪些内容组成。有几折的长度颇为怪异。比如说，第vi折就只有两页，随后一折有六页，它们原本可能是一组八页的书页，只是它们的抄写工作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完成的。有时两个故事的衔接处会出现空白（比如第128对开页左页、第153对开页右页、第153对开页左页以及第165对开页右页），这很可能是因为抄写员在等待短小的衔接段落，但最后显然没有等到。第一个这样的空白部分出现在第128对开页的左页，此处的确应当有一段“侍从的故事”的开场语，因为埃尔斯米尔抄本中就有，由此可见，抄写员的等待是有道理的。亨维特抄本中有两段开场语很可能来得太晚了，抄写员不得不将之插入正文文本当中。“商人的故事”的开场语就是这样被强行塞到原本应该是空白页的第137对开页左页的。第153对开页是一张插入页，这很可能是因为抄写员在最后一刻才收到这段讲述旅馆老板介绍自由农的文本。最明显的例子是“厨师的故事”这一部分，前文提到抄写员后来在故事中断处写下了准确的说明文字：“乔叟没有继续这个厨师的故事。”当他开始在这句话前一页抄写这个故事时，他为预期中的大段后续文字留出了很多空间，但这一预期显然落空了。范本本身就有残缺这一解释在此并不适用，抄写员肯定根据别的信息给出了说明。也就是说，抄写员至少在写下这行字时，已经知道乔叟去世了。

“僧侣的故事”的开篇页，也是亨维特抄本第三单元的开篇页，看似一份新抄本的卷首页

对于大多数抄本来说，我们很可能仅凭其风格便可以相当准确地判定其制作时间。因为抄本字体以及彩饰风格在不断演化，特别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城市中，比如说伦敦，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将诞生于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抄本的制作时间精确到十年以内，有时候甚至可以精确到几年内。亨维特抄本的风格令人们普遍将其制作时间判定在14世纪90年代后期至15世纪初。不过，亨维特抄本的制作时间问题是极其重要的，绝少有哪份抄本的制作时间会如此重要。乔叟很可能是在1400年10月25日谢世的，当时他并未完成和出版《坎特伯雷故事集》。此时，很多已经写完的故事是不分先后的，其中一些故事甚至还没有被指定为是哪个朝圣者的发言。乔叟肯定留存了手稿，它们很可能是捆扎起来的小册，每一册的大小应该都跟“亨维特抄本”的独立单元差不多。倘若亨维

特抄本是在1400年10月之前制作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有可能就是乔叟自己的抄本，也就是说是在他亲自监督之下由专业人员制作的——乔叟亲笔完成一个接着一个故事的书写工作，随后将之交给抄写员；倘若亨维特抄本是在作者死后制作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抄本同样有可能是根据乔叟的手稿制作的，因为乔叟的遗嘱执行人会陆续从乔叟的遗产中得到这些手稿。倘若林尼·穆内是对的，即“第二抄写员”是一直伴随乔叟左右的亚当，那么这份抄本的权威性问题也就更重要了。在抄本时代，任何作品在不断被传抄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错误，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尽可能地找到最接近作者落笔时的原稿的抄本。

据我判断，亨维特抄本是抄写员分两个阶段制作的，而且这两个阶段之间很可能还间隔了数年时间。标题、修订以及衔接段落是在文本抄写和绘图工作完成之后才被抄上去的。这个情况此前一直没有人特别注意过。第一个这样的证据是开篇页的标题，“*Here bygynneth the Book'of the tales of Cant[er]bury*”，这行文字被写在了彩绘边框的上方，也就是边框的外面；而此一时期的英语抄本中，标题通常是在边框里面的。由此便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标题是在绘图工作完成之后被加上去的，当时框里显然已经没有空间留给这些文字了。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因为在埃尔斯米尔抄本的卷首就没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字样，卷尾倒是出现了——它以如下一行文字收尾：“*Heere is ended the book of the tales of Caunterbury compiled by Geffrey Chaucer of whos soule Ih[es]u crist have mercy Amen*”（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此收尾，愿耶稣基督怜悯他，阿门）。这行文字显然表明，此时的乔叟已然故去。人们普遍认为，乔叟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就是故事集末尾的那份“撤稿声明”（retraction，这份声明在亨维特抄本里是见不到的），在声明中，乔叟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提出了批评，认为那都是有关“人世浮华”（worldly vanities）的作品，十分肤浅，为此，他列举了自己的多部作品，当然《坎特伯雷故事集》也被包括在内，他说这本书“引人入罪”（that sownen into synne）——这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个名字第一次现身。倘若亨维特抄本是在乔叟仍然在世的时候开始制作的（这很有可能），那么当时乔叟很有还没有想到“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个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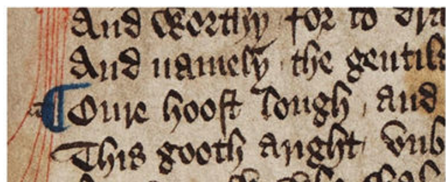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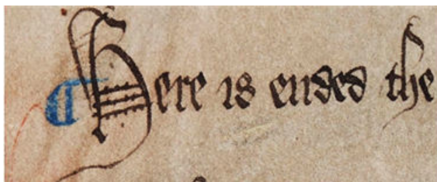


第474～475页：“律师的故事”结尾处的空白页，抄写员预计该故事会有更多内容，以便跟接下来的“侍从的故事”接续起来，但该页最终被布雷莱顿家族成员的生日记录填满，他们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605～1612年

还有一个相关细节。在首字母的位置上，抄写员都是先写下小小的字母作引导，然后才填上巨大的蓝色首字母。画上首字母之后，引导字母就被覆盖掉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做法，中世纪晚期的所有专业人士在制作抄本时都会如此。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也足以表明亨维特抄本并非哪个业余抄写员在家庭作坊里面制作出来的，而是职业团队的作品，在这个职业团队当中，抄写员会给画师提供相关的说明和指引，而画师在工作时眼前是没有范本来参照的。更具说服力的一点是：整份抄本当中都有小小的蓝色段落标记，有点像“ ”，它旁边也有抄写员画的折线状引导符号，这些引导符号最终会被彩绘覆盖。不过，请注意，标题和结尾处是没有这样的标记的。也就是说，在抄写员开始抄写并为画师标注引导符号的时候，标题并不在他的设计范围之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份抄本显然是由几本小册子组成的，每本册子中包含了几组乔叟写的故事。而有几个单元的起始页和收尾页已经非常破旧，这就表明，在某一段时间里，这些小册子并没有被装订在一起。只是后来才有人将这些独立单元装订成一个统一的文集，为每个部分写上标题，并为其起了“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个总标题，这就是抄本制作第二个阶段的事情，并且发生在乔叟死后，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到了这个阶段，抄本仍然在（或者又回到了）抄写员手中。

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请杰弗里·乔叟本人来作证了。在我的想象中，证人席上的乔叟应该就是《特洛伊罗斯》里的自画像中的形象：蓄着胡子，浅褐色头发向后梳着，身穿粉红色的高领短上衣，站在讲经台旁，一块红色和金色的布从台子的正面垂

下。画像当中，他的一只手搭在讲经台的边上，另一只手则指向听众。

正文中的蓝色段落标记旁有抄写员画的折线状引导符号（左图），标题旁则没有引导符号（右图），可见两者不是在同一个阶段完成的



杰弗里·乔叟，正站在讲经台里旁向一群很有礼节的听众讲话，这幅图是《特洛伊罗斯》全本抄本（创制于约1415~1420年）的卷首插图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一份乔叟的杂文集的抄本，其制作

时间大体上在1430～1432年。抄本中有一首普遍被认为是乔叟手笔的短诗，原来的标题是“Chauciers wordes a Geffrey unto Adame his owen scryveyne”（乔叟的《杰弗里劝诫自己的抄写员亚当》）。这就是本章开篇介绍的头条文章引用的短诗，具体内容如下：

抄写员亚当/如若碰巧

除非你更精准地抄写我的创作

白天我总要将你的抄录多次返工

将之修改、涂去和刮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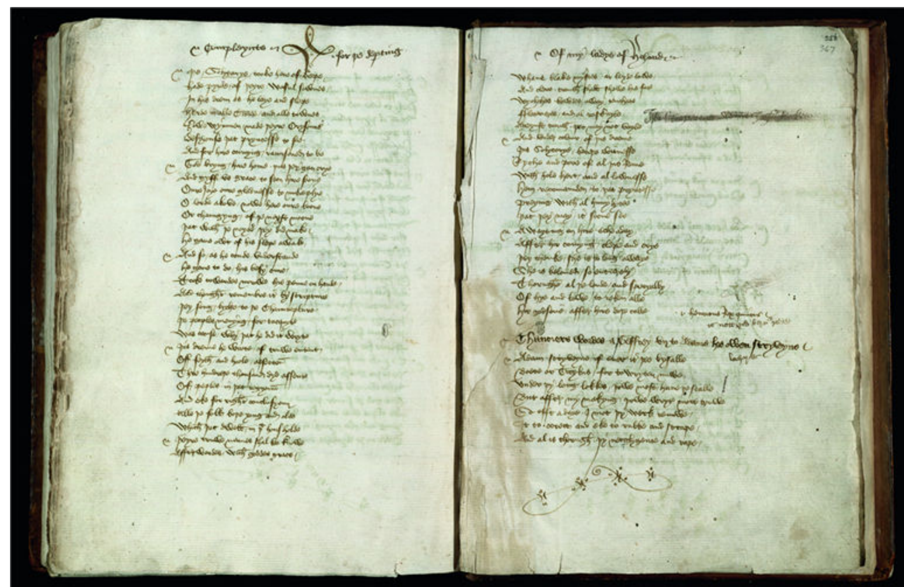
一切皆源自你的粗心和毛躁

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首短诗根本不是乔叟的作品，因为标题中乔叟的名字是这部杂文集的编者约翰·雪莱（John Shirley，约1366～1456）后来添加上去的。然而，反复查证后我们发现，雪莱是值得信任的证人。此人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伦敦书商，同时也做翻译和抄写工作，乔叟谢世时雪莱大约三十五岁。因此也就不难想见，二人是有机缘会面的。后来，雪莱也跟乔叟一样，担任了伦敦港的稽查员一职。他肯定跟当时所有的主要抄写员共事过。很多抄本中留有他的签名。他的签名实际上还出现在了埃尔斯米尔抄本以及《特洛伊罗斯》抄本的封底上。如果说在当时的英格兰真的有谁认识这些抄写员并且同这些抄本都有过接触，那肯定就是约翰·雪莱了。这首致亚当的短诗自1561年起，便一直被收录在乔叟的作品集当中，并且我们也没有切实理据可以论定它并非乔叟手笔。倘若它是别人所作，那就是别人以乔叟的名义创作的，毕竟《特洛伊罗斯》和《哲学的慰藉》都是乔叟的作品，它们也因此令该诗与乔叟建立起了一种令人信服和接受的联系。

剩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首诗只是寓言性质的，其中的寓意是：作者，也就是造物主，在告诫世人的先祖亚当，希望亚当不要再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弄乱原本完美和谐的造物。在这种解读中，亚当那长发遮掩下的疤，可能是长在脖子上的水泡，且是黑死病的症状，在乔叟生活的时代，人们实际上都认为那是神谴的标志——上帝借此来惩罚人类对恩典的滥用。

不过，让我们先只考虑这首诗的表面含义。诗中，杰弗里·乔叟是在对“自己的抄写员”发话，且用了抄写员的名字而非姓氏。这个抄写员已经抄录了乔叟于14世纪80年代早期至中期写就的《哲学的慰藉》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诗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乔叟可以在亚当完成抄写之后对抄本实施修订，这也就意味着，乔叟本人就是这一校正本的委托人，并且会在同意将其作为范本发布之前对其进行修订。若真是如此，那么这段合作关系就应当出现在14世纪80年代。至于对亚当的批评，究竟是个玩笑，还是确实在指责亚当是个糟糕的抄写员，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倘若亚当真的很糟糕，那么乔叟应该就不会动再次聘请亚当的念头（除非这首短诗只是在开玩笑，否则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亨维特抄本并不存在任何能表现出抄写员粗心和毛躁的迹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对于乔叟是否真的需要专门雇一个抄写员为自己工作的问题，我们只能做猜测。他除了在短诗中对亚当宣泄了一番嘲讽之词以外，还讽刺了《特洛伊罗斯》抄本里面亚当的“抄写员式”（Scrivenish）字体。另外，在埃尔斯米尔抄本里那幅著名的马背上的乔叟画像当中，乔叟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皮革笔套（penner），这是画像中用来表示职业抄书人身份的传统标记，而这幅画像是乔叟本人的最早画像，且画像所在的卷册跟亨维特抄本共享了一个抄写员。据此，我们可以说，乔叟在他的同时代人眼中，也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抄写员。



乔叟的《杰弗里劝诫自己的抄写员亚当》，诗中乔叟斥责这个名叫“亚当”的抄写员在抄录《哲学的慰藉》和《特洛伊罗斯》时不够细心，该图出自唯一一份抄有这首诗的抄本

短诗中提及的涂抹和刮除在中世纪抄本的制作过程中是很常见的，即便是最尽心尽职的抄写员也会需要修正并调整自己的作品。亨维特抄本当然也少不了乔叟说的这些情况，将书页对着光线，便不难看到，偶尔会有单词或者词组是被刮去后重写的。实际上，笔和刀都是中世纪抄写员的工具，羊皮纸是承受得住大量刮擦的，在这点上它跟现代纸张不一样。抄本中的修订痕迹也并非不常见，而短诗的确可以表明，亚当是在羊皮纸上进行抄写的，因此，这个亚当肯定不只是个档案管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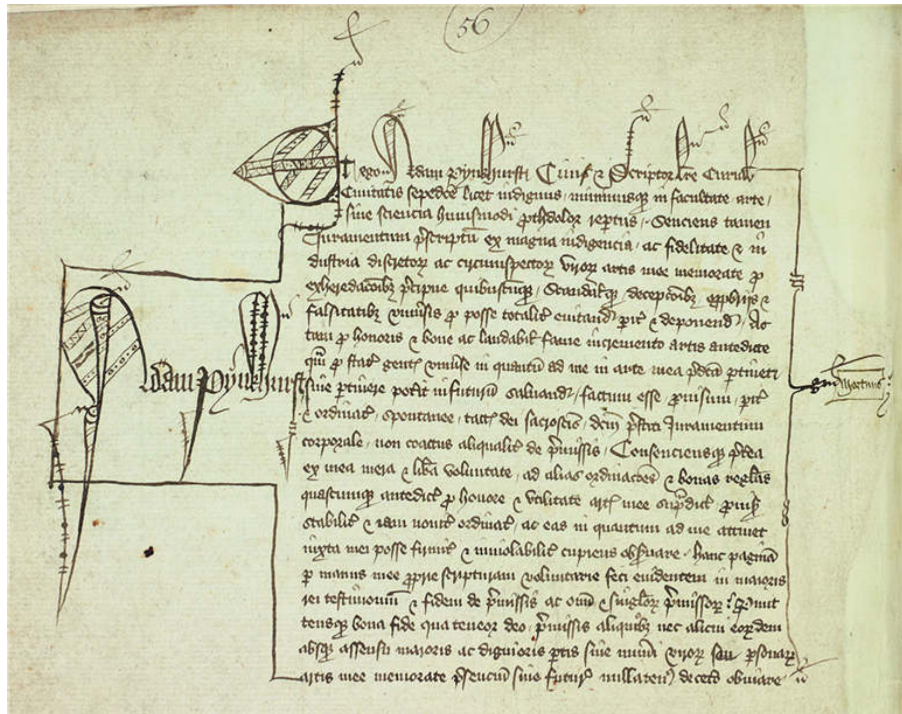
在14世纪的英格兰，亚当这个名字并不鲜见。实际上，在林尼·穆内之前很久，乔叟研究者们就已经寻遍伦敦书业公会的档案，试图找出短诗当中的这个亚当究竟是何人。早在1929年，便已经有人提出“亚当·平克赫斯特”这个名字，不过，当时的说法并没有切实的证据相佐，仅仅是出于相同的名字。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亚当·斯特德曼”（Adam Stedeman），他是于1384年在伦敦登记成为抄写员的，跟《特洛伊罗斯》抄本的制作时间也很契合，还有一个叫作“亚当·莱切斯特”（Adam Leycestre）的人，最早的现身时间是1382年，是个羊皮纸制作人，而羊皮纸制作人通常拥有制书业中的多种手艺。短诗当中提到的刮擦，也有可能是在揶揄亚当·莱切斯特在制作羊皮纸之时的毛糙作风。

至此，让我们假设法官在对第一天的庭审证据做总结。我们知道这份抄本出自一个可以接触到乔叟的原稿的职业抄写员之手，而这份由五个独立单元组成的原稿此前并未进入公共领域。倘若在亨维特抄本的制作工作开启之时，乔叟还活着，那么这份抄本就是校正本。这些修订不太可能是权威的。显然在第二个阶段，抄写员对还在自己手中的抄本进行了再校正，为其插入小标题并启用了新的总标题“坎特伯雷故事集”，

而且当时，这个抄写员已经获悉乔叟故去，因此也就知道没有后续文稿了。该抄本很可能是作为范本被制作出来的，抄书员会据此创作副本，令这本故事集传布开来。大约就是在这十五年前，乔叟曾需要一个誊写员为自己制作《哲学的慰藉》和《特洛伊罗斯》的校正本，他请到的是一个名叫“亚当”的人。在这个阶段，我们暂且没有办法回答“亚当”是否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抄写员的问题。

现在该是我们这个虚拟法庭的传唤员，于第二天早上的庭审中，传唤被告“亚当·平克赫斯特”本人前来作证的时候了。平克赫斯特如约前来，宣读了誓言。平克赫斯特是14世纪晚期成立的抄书人公会里的一名资深成员。抄书人公会是一个市级的行会组织，是为抄写人和文件代笔人设置的，如今仍然作为伦敦金融城的古老同业公会之一保持兴盛。人们通常认为该组织是于1373年建立，并于1392年开始正式招收会员的。关于此事的唯一记录由该行会自己保存，但它被长期存放在伦敦市政图书馆（Guildhall Library）。该行会的大部分早期档案葬身1666年伦敦的那场大火，不过这份记录倒是存留了下来，成为为数不多的中世纪“幸存者”之一。要约见这份材料，你需要前往坐落在伦敦金融城的伦敦市政厅，从格雷沙姆（Gresham）大街拐入阿尔德曼波利（Aldermanbury）路，按随路牌的指示，经过市政厅主入口而后沿着建筑外缘向前走就可以了。在写着“城市商业图书馆”（City Business Library）的入口处进门，然后左拐并上行几步，便可以进入市政厅图书馆了。这座图书馆的现代气息令人吃惊：混凝土墙壁，白色的长桌和红色的座椅，头顶是明亮的带状荧光灯。那些长桌前已经坐满了面色疲惫的中年人，他们很可能是前来查询同伦敦有关的谱系史或者商业史的。

我们要找的“MS 5370”号藏品存放在一个有衬垫的盒子里面。它的封皮是可拆卸的，由早期的棕褐色鞣革制成，被一根皮带捆扎了起来，并系有一个很大的金属扣子，整件藏品有点像上学时用的剑桥包。文本开篇是伦敦城抄书人公会的规章。第53~162页呈现了1392~1600年入会会员的条目，配有拉丁语的入会誓词并有会员的拉丁语签名，通常每一页上有多个条目。“亚当·平克赫斯特”出现在第56页，是第八位成员。在所有条目当中，“平克赫斯特”的是最长且字迹最为精美的条目之一。从此等浮夸的条目中，我们足以看出平克赫斯特性格张扬——若是在今天，他很可能就是那种打着蝶形领结、衣着光鲜并且还要在口袋里放一条丝绸手绢之人。此一条目的主要内容是：我，亚当·平克赫斯特，是本城公民和公会抄写员，自感力不胜任，知悉并谨记先辈巨匠立定的誓言，等等（在此省略的内容有二十一行之长），于此，我自愿遵从本会规章条例，共襄本会之荣誉和效能，且我志愿并亲笔写下此内容，以见证我的忠诚誓言，此致，永恒。条目左侧页边处有他大大的花体签名，“Adam Pynkhurst”，并画有一个边框。条目并未标注日期，不过应该写于14世纪90年代中期。



亚当·平克赫斯特于14世纪90年代在伦敦抄书人公会章程和入会申请表上面写下的入会誓言，一旁有他本人的签名

该条目字号大且字迹优美。不过，我的第一反应是，此等字体跟亨维特抄本中的字体并不是十分相像。于是我把亨维特抄本的影印本放在平克赫斯特誓言条目的旁边，反反复复进行比对。对于此等明显的差异，当然可以有多个解释。比如说，此一条目是为入会材料而写，而且用了拉丁语；亨维特抄本则是以标准书写体写就的文学文本，并且是英语的。用古文书家的行话来说，前者是“文书体”（secretary hand），后者则是“英格兰圆体草书体”（anglicana），或发展得更成熟一些的“方体草书体”（anglicana formata）。两个文本的语言差异也增加了比较的难度，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缩写符号和字母，中古英语的一些字母是拉丁语里没有的。一个职业抄写员需要掌握多种字体。我见过一份中世纪的职业抄写员字体范式表，其中一个抄写员展示了他能写的多种字体，具体采用哪种字体则视抄写内容而定，比如说，特许状、祈祷书和文学作品要求的字体不同。即便抄写内容的类型相同，抄写不同语种的文本也会有不同的惯例。不同的签名抄本并不一定有相同的字体，这和比较打印字体不一样，字迹看上去不同的抄本也可能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为了将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当中的“第二抄写员”认定为这份入会誓言的撰写人平克赫斯特，林尼·穆内单独挑选出来十二个在三份文本当中都经常出现的字母进行比对，同时仔细研究了两种装饰图案——在“第二抄写员”创制的抄本当中，文字行的上方时不时会出现这两种装饰图案，而在亚当·平克赫斯特的誓言中，它们也出现了很多次。林尼·穆内据此得出结论说，它们“显然是平克赫斯特的专属图案，简直

就是他的签名”。

对于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当中的“第二抄写员”是否就是亚当·平克赫斯特的问题，无论陪审团给出怎样的判决，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这份抄书人誓词表明，历史上确有亚当·平克赫斯特其人，他在伦敦执业，负责抄写行政文书。依照林尼·穆内对平克赫斯特的笔迹的判定，穆内教授的研究团队一直在致力于从未署名文稿中寻找平克赫斯特的笔迹，并且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发现，他们的搜索范围为从14世纪80年代中期到1415年，甚至到1427年的文件，其中，伦敦市政厅存留的官方档案当然是重点。他们试图认证的材料当中包括一份申请书，这份申请书现存基尤（Kew）的国家档案馆，是杰弗里·乔叟以自己的名义写就的，用的是法语，内容是为他的一个副手向国王申请一个羊毛关税稽查员的职位。平克赫斯特似乎曾代表伦敦布商公会（Mercers’ Company）写了一份诉状，于1388年呈交皇家议事会，指控前任伦敦市长尼古拉斯·本柏（Nicholas Brembre）犯有叛国罪，这也是有日期可考的最早的英语诉状。在14世纪90年代布商公会管理员账目当中，平克赫斯特的笔迹在一些条目中也是清晰可辨的；在15世纪初期伦敦市政厅的信笺册当中，同样出现了平克赫斯特的笔迹。这足以表明，平克赫斯特是伦敦金融城的各个市政机构以及行会组织的文员群体当中，一个同组织关系相当密切的抄写员。这些证据看起来应该是无可争议且相当明确的，足以证明平克赫斯特是一个文书代笔人。当然，乔叟的申请书有可能是个例外，它太凑巧了，不像是真的。誓言册上平克赫斯特的条目，就跟中世纪的其他入会条目一样，其右侧空白处有后人留下的一个旁注，“mortuus”，意思就是“亡故”；亚当·平克赫斯特曾活在这世上然后故去。

此外还有一份独立证据，也谈到一个名叫亚当·平克赫斯特的人，他的妻子叫乔安娜，他们于1355年居住在萨里（Surrey）；1370年，他作为国王的弓箭手再次出现在文书中，日薪六便士，终生领薪，最后一次领薪是在1400年（很可能是因为此人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是因为这一年英格兰王位突发变动）。不过，这两个亚当·平克赫斯特是否就是同一个人，我们暂且无从确定。有可能萨里的平克赫斯特年轻时是弓箭手，后来才转入抄写行业；也可能是父子同名，父子俩分别投身弓箭手和抄写员的职业。1355年，萨里的平克赫斯特已经结婚，因此他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晚于1335年太多，并且应该比乔叟年长，这样算起来，到1415年，他至少有八十岁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此等高龄的人显然不可能再从事抄写工作了。因此，前文中的抄写员平克赫斯特有可能是萨里的平克赫斯特的儿子或者近亲。

除了这些文件材料而外，人们也逐渐将一些文学抄本归为亚当·平克赫斯特的抄写作品。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农夫皮尔斯》抄本，在西蒙·霍罗宾（Simon Horobin）和林尼·穆内看来，有着跟平克赫斯特在抄书人公会入会誓言当中留下的非常相像的字迹。另外还有两份抄本的笔迹跟亨维特抄本当中“第二抄写员”的也极为相像。其一是艾斯特勒·斯塔布斯（Estelle Stubbs）发现的乔叟的《哲学的慰藉》的早期抄本，该抄本也是阿伯里斯特威斯的佩尼阿尔特系列抄本之一，而且在19

世纪，它碰巧跟亨维特抄本在同一个书架。其二是另一份《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的残章，如今收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是伊安·多伊勒最先提醒人们注意这份残章的，霍罗宾和穆内随后便将之正式归为平克赫斯特的手笔。



《农夫皮尔斯》抄本，很可能是亚当·平克赫斯特的抄写作品，笔迹跟同业公会的入会誓词中的极为相近

就这样，平克赫斯特名下的中古英语抄本逐渐增多，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乔叟作品的抄本占据了很高比例，包括一份《哲学的慰藉》抄本、一份《特洛伊罗斯》抄本，以及至少三份《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倘若亚当·平克赫斯特真的是乔叟的常规抄写员，那么这些抄本的文本权威度当然就会随之提升，因为它们极其接近作者的原稿。倘若佩尼阿尔特系列抄本当中的《哲学的慰藉》抄本真的如同林尼·穆内认定的那样，创制于14世纪80年代，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乔叟在讽刺短诗当中提及的抄本，而且，据此也可以认定，乔叟是仔细审读过该抄本的。这样一来，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就拥有了两份意义非凡的英语文学抄本。那天午饭后的茶休时间里，我和玛莱杜德坐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面聊天，玛莱杜德说他觉得这可能不是巧合，并推测这两份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待在一起的。他提出，在现代早期英格兰的书册收藏业当中，英语抄本并不受重视，因此很有可能流落偏远之地——如威尔士。

不妨拓宽一下思路：倘若作为伦敦职业行会的档案抄写员和文书的平克赫斯特，在乔叟谢世之际，在准备《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的出版工作，那么这一信息就能填补我们在中古英语抄本行业方面的知识空缺，毕竟我们对此了解甚少，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究竟是如何出版并发行的，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相比之下，我们知道在同期的法国和意大利，都存在一个由书商和代理人组成的完善的网络，他们会专门运作抄本的抄写和销售工作。其中一位成员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名叫雅各布·德·圣彼得罗（Jacopo di San Pietro）。在14世纪晚期的法国，有乔叟这等社会等级的作者，可能会专门雇人为自己的新作品制作一份精美的抄本，为其配上大量插图，并将其进献给国王或者其他上流社会中的拥有宫廷或者教会背景的大人物。这些抄本的装帧设计都极能抓人眼球。作者通常会委托知名书商寻找合适的抄写员，而这些抄本甚至会在完成并被进献给相关人士之前，就已经在抄写作坊里面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了。倘若抄本赢得受赠人的好感，受赠人就会在他的朋友圈中予以推荐。他的朋友们若因此想要订制自己的抄本，就会找同一个书商代理此事，该书商可能仍有先前的范本，或者会将受赠人手中的抄本暂时借回以便进行转录。查理六世和贝里公爵的藏书清单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过程。一旦这样的“出版”进程得以开启，它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1400年前后的法国和意大利抄本业便是以这样的形式兴盛起来的。

英格兰的抄本资助情况则截然不同。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确实有些藏书，不过大部分是很久之前的文本的抄本。类似法国国王查理六世、贝里公爵、勃艮第公爵以及教宗和意大利各邦国统治者的那种藏书丰富的半公共性图书馆，在此一时期的英格兰是看不到的。不列颠的俗语书册市场基本上由中产阶级占据，而且很低调。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八十五份流传下来的抄本中，只有三份有中世纪的纹章，也就是说，只有这三份抄本的主人来自上层阶级；且有四分之一的抄本是用普通纸张制作的，只能算是抄本市场中的低端产品。《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抄本都没有对应叙事的配图，仅仅是给各个朝圣客画了最基本的画像而已。这样的情况跟欧洲大陆的显然是无法比拟的，在欧洲大陆，诸如《玫瑰传奇》以及薄伽丘的作品的贵族抄本，都会配有数十幅乃至数百幅的彩绘插图。这真是让人遗憾，《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冒险故事以及爱情故事本会为我们提供大量中世纪晚期的华美插图的。



发生于15世纪早期的巴黎的献书场景，作者克里斯丁·德·皮赞正将自己的新作进献给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希望国王能够在权贵圈中推荐此书

在法国，书商（*libraire*）会具体负责统筹抄本制作流程。所谓的书商，有时候本身就是抄写员，他们会负责确保范本的供应，设计抄本风格，抄写或安排他人抄写文本，还会负责寻找并雇用画师。他们也会负责将书稿收集起来，并进行校勘和装订，然后将成稿发送给客户，甚至为之开具相应的发票。在英格兰几乎是找不到可以同他们相提并论的角色的。据我了解，在乔叟的生平当中，伦敦只有六人既是书商又兼有其他角色，比如画匠、羊皮纸工匠以及装订工等，而这六人当中，只有一人是全职的，此人名叫托马斯·马尔勒伯（Thomas Marleburgh），据载他于1391~1429年，在圣保罗大教堂北面的主祷文广场（Paternoster Row）开有两家门店。然而在1370~1400年的欧洲大陆，仅巴黎一地我们就知道有七十七个这样的职业书商；这一差距是相当大的。

以上情况多多少少反映了14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的孤立状态，中古英语对欧洲大陆来说，是一门无法理解的奇怪语言，黑死病更是对英格兰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此一时期的英格兰艺术品中，顶多也

就是刺绣和雪花石膏作品拿得出手，但它们是根本不能跟意大利或者法国的精美绘画以及珠宝相提并论的。很显然，此时的英格兰在文化上仍是一潭死水。抄本史研究者还做过不少猜想，诸如《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作品究竟是为何会被制成抄本并面世的。人们一度认为，此一时期的伦敦也许存在商业性质的抄写作坊，用于文学抄本的制作工作，不过，还没有独立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78年，多伊勒和帕克斯提出，在当时的英格兰，书稿制作流程也许根本不像人们设想的那般规范，并且很可能就集中在西伦敦的威斯敏斯特。二人描述了在英格兰皇家管理体系当中拥有职位的抄写员，是如何在书稿行业做兼职，将抄本卖给宫廷成员以及其访客的。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约1368~1426）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正式职位是威斯敏斯特宫御玺处的官员。威廉·卡克斯顿很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个滋养金流的区域的商机，于1476年年底，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创建了自己的印制坊，并且在当年冬天印制了第一本书，而这本书应该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本人最后的住所就在威斯敏斯特，租于1399年；乔叟死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卡克斯顿的墓就在附近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倘若林尼·穆内将亚当·平克赫斯特视为乔叟作品传播过程当中的关键人物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整件事的重心就不在威斯敏斯特了，而是向东转移回了伦敦市政厅附近的抄写员那里，也就是往主祷文广场东北方向步行几分钟的地方。倘若平克赫斯特就是乔叟的“私人抄书员”，那么他这么做可能是出于对已故雇主的忠诚，或为了帮助实现已故雇主的遗愿。如果没有他，那么《坎特伯雷故事集》也许就已经消失在历史进程当中了，当然，前提是：他的确是平克赫斯特。

一切历史探究都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一个大胆且新颖的看法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被提出来的，此一看法随后不断被人重复，它的可能性遂于无形之中被提高了，再往后，人们便放下了应有的谨慎和警觉，将此看法当作真实的信息接纳下来。在平克赫斯特认证问题上，任何一项因素倘若个别来看，都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但是我们需要做出合理的假设才能将它们连接起来。具体而言，倘若乔叟确实于14世纪80年代雇用了一个糟糕的抄写员（此事的前提是乔叟的确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一部需要抄写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就需要想象该抄写员，在倏忽之间成了大师级的抄写员和商人，并在15世纪活跃于出版行业。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亚当·平克赫斯特、伦敦抄书人公会的注册会员，显然不曾以其他身份出现在书稿行业当中，更确切地说，在14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名字根本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档案当中。考虑到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是出自职业抄写员之手，并且是抄写员与职业画师协作而成的，我们可以认为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初始抄本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是由托马斯·马尔勒伯甚至约翰·雪莱这样的书商来运作的，后者于1456年以九十岁高龄谢世。此二人在文学圈中都拥有合适的关系网。托马斯·马尔勒伯曾委托托马斯·霍克利夫写了诗歌，后者曾作为抄写员跟“第二抄写员”合作抄写了如今收藏在三一学院的高尔抄本，而多伊勒和帕克斯的研究依托的就是这份抄本。约翰·雪莱当然不会是“第二抄写员”，不过，他肯定经手过乔叟的抄本，包括埃尔斯米尔抄本在内，而且也正是雪莱保存并认出了乔叟写给“自己的抄写员”的那首

短诗，而该短诗本应是乔叟“自己的抄写员”的财产。这些人都是与“第二抄写员”有关的人。遗憾的是，无论是马尔勒伯还是雪莱，都没有用过“亚当”这个名字，除非“亚当”这个名字本身也是虚构出来的，以掩盖抄写员的真实身份或者配合短诗的韵律。

找出亚当·平克赫斯特的真实身份，便能为解开中世纪英格兰抄本行业的谜团提供一个名字和一种理解方式作为线索。然而，整个谜题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假设之上的：亚当·平克赫斯特——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的笔迹就是“第二抄写员”的笔迹。平克赫斯特留下的唯一一个签名文本就是半页抄书人同业公会的拉丁文入会誓言。这半页文字就是一切，其他的所有论证都取决于此。倘若这里字迹与乔叟的抄本上的不一样，或者我们不能确定是一样的，那么整个谜题就随之坍塌，我们对乔叟写给抄写员的那首短诗做出的解读也不成立。此等责任的确是沉重且巨大的。我们这些古文书家，一辈子都在比对字迹，但实际上，我们通常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原因很简单，一切判断都是现今的我们做出的，而我们并没有跟抄本同处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研究中世纪希伯来文本的马拉奇·贝特-阿里耶（Malachi Beit-Arié）曾经告诉我，他向往能上天堂看看，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见到那些他为之奉献了全部学术生涯的抄写员。他会问他们：“我是对的吗？这是您的字迹吗？”但恐怕他们的回答可能是：“你知道的，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实在记不得了。”

对于将平克赫斯特认定为“第二抄写员”这个问题，最早的理由详尽的反对意见出自简·罗伯茨（Jane Roberts）于2011年发表在《中世纪》（*Medium Aevum*）上的文章。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来对他或她提出的观点做出判断，尽管这样的陷阱在这种论战中太过常见了；但简·罗伯茨的确是重量级的古文书家，特别是在英语抄本领域造诣极深，因此，对于她的推断我们肯定是有必要认真听一听的，甚至也可以召请她前来我们的虚拟法庭作证。罗伯茨在退休前一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英语语言学和中世纪文学教授。正是她于2004年最早注意到1388布商公会诉状中的笔迹跟“第二抄写员”的字迹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她并不认同“第二抄写员”就是亚当·平克赫斯特。罗伯茨说，布商公会账目册上被归于平克赫斯特的条目，实际上可能出自抄写员马丁·克罗姆（Martin Kelom）之手，克罗姆因参与制作该抄本而得到了报酬。罗伯茨还将林尼·穆内认为有平克赫斯特专属风格的那些字母一个一个挑出来，指出即便是在被认定出自平克赫斯特之手的抄本中，这些字母的写法也存在诸多差异，或它们的特征是此一时期受过职业训练的抄写员普遍会有的。罗伯茨同时指出，被林尼·穆内认作平克赫斯特专属的修饰图案，在此一时期其他抄写员制作的抄本中也出现了。这并不是说目前被归于平克赫斯特的抄本并不是他制作的，而是说这些特征并非平克赫斯特专属。

古文书家的第一判断通常是基于他们自己所谓的“品相”（ductus）。这有点像是根据面相，而不是通过测量鼻子、耳朵、眼睛、嘴巴等部位的具体尺寸来认人。文本的“品相”包括了抄写员落笔的角度、力度、平顺度、字号以及字间距等。将诸般因素综合起来，便能

了解一个抄写员的书写风格。然而，对于目前为止很多从技术细节上被判定为出自平克赫斯特的抄本，我们是很难从“品相”角度看出它们的统一性的。

我曾有过两次在刑事法庭（Crown Court）的陪审经历，一次是在剑桥，另一次是在伦敦的南华克，这两次经历都很有意思，而且令人心生莫名的宽慰感。记得当时，在陪审团离场讨论最终判决之前，法官会非常仔细地告知陪审团诸般细节和注意事项。他告诉我们说，在有罪或者无罪问题上，我们必须放弃先前的成见，必须完全依托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做出判断。法官还提醒我们说，英国奉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定罪之前，嫌疑人都是清白的。他还强调说，倘若有哪位陪审员认为证据存在瑕疵，哪怕是最微末的瑕疵，那么他或她就有绝对的法律责任去判定被告无罪。同时，法官要求十二名陪审员达成一致判决，倘若确实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法官最终将接受多数判决。

现在，不妨设想一下我们就围坐在陪审室的长桌边。被告亚当·平克赫斯特被指控为亨维特抄本的抄写员，并且被指认抄写了其他许多文件和文学作品的抄本。2004年以来，我私底下是特别希望原告林尼·穆内胜诉的，来到法庭时我也带着希望林尼的指控能够被证实的偏见。现在，我们就在这房间里掂量并权衡证据。我们必须意识到，收藏于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是由一个能够逐一接触并获得原先零散的范本的人收集起来的，范本的来源必定也非常接近乔叟本人或者（和）乔叟的宅邸，而且该抄本是分两个阶段制作的。我们记得，乔叟应当是在14世纪80年代雇了一个被他称为“亚当”的抄写员。我们调查过伦敦的一个名叫亚当·平克赫斯特的市政文件抄写员的签名文档。倘若所有这些文稿上的笔迹可以被明确地判定是一样的，那么根据加总在一起的证据，我们就能够做出合理判断了。法官曾告诫我们说，不能有一丝不确定之处。于是，我们决定开启一次初步投票，就按照座位的顺序，而我恰恰是第一个投票的。我是否认为“第二抄写员”毫无疑问就是亚当·平克赫斯特呢？在场众人都在等待我的回答。我深呼吸一下，回答说：不，我不这么认为。我确实不觉得这一点得到了确证。当然，剩下的十一个陪审员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多数票的局面，将我的看法否决掉。

最后，玛莱杜德陪着我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游览了一圈，由此结束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天。他隔着一段距离，将图书馆建筑后面的藏品库的走廊指给我看，那些藏品保管库看起来就像是法院大楼地下室的房间一样，最珍贵的中世纪英语抄本亨维特抄本就居住在里面，藏身于褐色布盒里。之后我们两人穿过展厅往回走。工作人员用电话预约了一辆能载我前往车站的出租车。玛莱杜德离开了一会儿，就在我要上车之前，他拿了一副扑克牌、一个咖啡杯和一个杯托出现在我面前，它们都绘有亨维特抄本卷首页的插图。我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究竟是谁抄写了亨维特抄本，不过，那杯子和杯托现在就在我的厨房里。



注释：

[1] 校勘情况如下：现代衬页（其中一页被标注为第1页）+第2~57对开页（i~v^{8}，vi^{2}，vii^{6}，viii^{8}），第58~87对开页（ix~xii^{8}），第88~111对开页（xiii~xv^{8}），第112~234对开页[xvi~xx^{8}，xxi^{1+8}，xxi^{1+8}（这一折的第二页，也就是抄本的第153对开页，是单页），xxii^{16}，xxiii~xxviii^{8}，xxix^{10}]，以及第235~50对开页（xxx~xxxi^{8}），卷尾至少缺了一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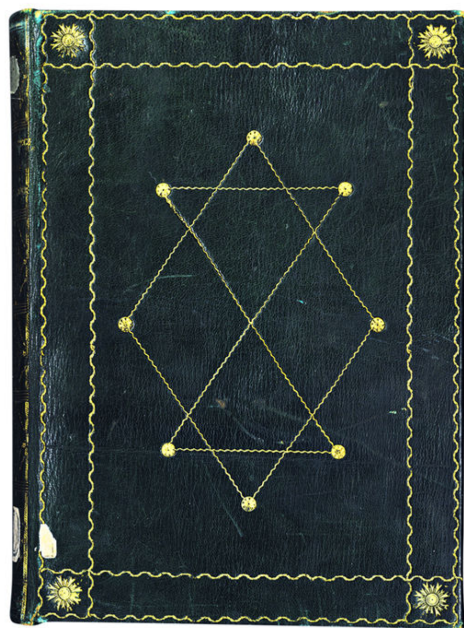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维斯孔蒂《半神》抄本

约1438年

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Cod. Lat.Q.v.XVII.2

倘若你要参加海战，我这里倒是有几个作战技巧推荐给你。将毒蛇装入瓶子，然后将瓶子扔到敌船上，瓶子碎裂之后，里面的毒蛇就会爬出来到处咬你的敌人。别笑，不少军事专家推荐过这个方法，而且显然最早是汉尼拔向安条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提出的。当毒蛇在对敌人展开攻击时，你可以趁机将弯刀掷向敌船，切断敌船的绳索，同时开炮点燃敌船的船帆；并命人脱去外衣、带上锥子，偷偷潜入敌船下方，趁乱在敌船的船体上迅速地凿出几个洞，如此一来，敌船很快就会沉入水中。诸如此类的战斗技法还有很多，它们都以文字或漂亮的彩绘插图的形式被呈现在一部写给王公贵族的实用著作里，作品的主题是武器和战法，作者是帕维亚的人文主义者兼法学家卡托内·萨科（Catone Sacco，约1395~1463），而萨科很可能是在1438年将它进献给了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 1392~1447）——1402年起的帕维亚公爵和1412年起的米兰公爵。萨科的这部作品则被称为《半神》（*Semide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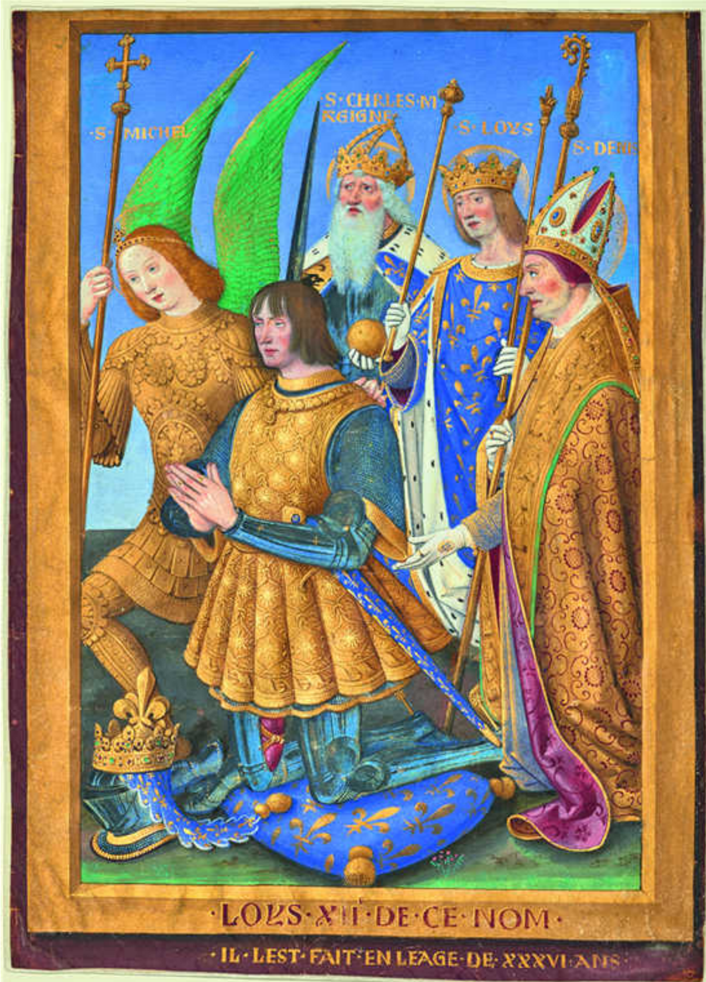


菲利波·马里亚公爵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此一时期

意大利的各个邦国合纵连横，各怀野心，没有稳定的效忠对象。1438年，维斯孔蒂被卷入第四次伦巴第战争，主要对抗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及其盟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王公的信誉和生存乃取决于军事能力。萨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公爵大人能够借助书中的战斗技法，展开更强大的防御行动，对抗穆斯林，因为此时的穆斯林舰队正在威胁地中海东部基督徒所在的地区。1430年，奥斯曼帝国皇帝穆拉德二世（Murad　II）的军队在塞萨洛尼基决定性地挫败了在此设防的威尼斯军队，随后，奥斯曼大军就向着巴尔干地区无情地推进了。《半神》当中提到的诸多战斗技法，包括对毒蛇的使用，在维斯孔蒂家族中是颇受待见的，因为自维斯孔蒂家族于13世纪将米兰纳入家族势力范围之后，一条蝰蛇吞噬一个男孩的图案便成了这个家族的纹章。



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1412~1447年的米兰大公，图中他正在接受柯勒乔的加拉西奥赠书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该图呈现的是1400年入侵伦巴第前，他全副甲胄跪地祈祷的场景，他的护佑圣徒陪伴在侧

菲利波·马里亚于1447年8月13日谢世，没有继承人。他唯一的女儿是私生女，名叫比安卡·玛利亚（Bianca Maria），此女后来嫁给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 1401～1466）。斯福尔扎原是维斯孔蒂家族军团中的一名雇佣兵，这桩婚姻令他接手了老丈人的公爵领地，他也再续老丈人的辉煌，重建了强大的米兰王朝。弗朗切斯科获得了老丈人的地产和艺术藏品。《半神》抄本自然也就出现在1459年6月6日帕维亚城堡公爵图书馆的名录上面，编号599，“Semideus Catonis Sacchi ad Philippum Mariam ducem Mediolani”（《半神》抄本，卡托内·萨科敬赠米兰大公菲利波·马里亚）。帕维亚在米兰南边，距离米兰大约二十五英里，是米兰大公的势力范围当中的副都。在弗朗切斯科的孙子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Gian Galeazzo Sforza, 1476～1494年的米兰大公）继承帕维亚城堡时，《半神》抄本仍在这座城堡里。1488年，帕维亚方面再次制作了一份图书馆藏品名录。这份名录要更为详细一

些，先记录了一批宝物，比如犀牛角、鲸鱼的牙齿、一顶带有尖角的维京人头盔、一枚海龟龟壳（已经破损）、一只罗盘、一幅木刻的世界地图等，接着便是上千册的藏书；《半神》抄本是第31号藏书，当时的装帧材料是深红色的天鹅绒，配有六个银质环扣（其中两个已经破损），该抄本存放在一个烫金皮盒里面。1490年，《半神》再次出现在这座图书馆的新名录当中，这一次的藏书编号是第22号。

1494年，吉安·加莱亚佐的爵位被传给了他的叔叔卢多维科·马里亚·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 1452～1508），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人称“摩尔人”，在他之后，公国的继承权问题便开始出现纷争。新登基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于1498～1515年在位）觉得自己要比斯福尔扎家族更有权继承这个公国，因为路易十二是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 1371～1408）的直系后裔，瓦伦蒂娜·维斯孔蒂则是前维斯孔蒂公爵菲利波·马里亚的姐姐。瓦伦蒂娜后来嫁给了奥尔良公爵、瓦卢瓦的路易（Louis of Valois, duc d'Orléans, 1372～1407，后遭刺杀），也就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二人育有一子，即奥尔良的查理（Charles d'Orléans, 1394～1465），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二的父亲。此一时期的欧洲，每位君王都会不断地创造冲突和参与战争，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路易十二在继承王位的时候，就已经是久历战阵的老兵了，且他在备战意大利战争时展现出的军事能力堪称典范。他说服原本秉持反对态度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持中立，同时与米兰的老冤家威尼斯结成同盟。他还任命吉安·吉亚科莫·特里沃尔齐奥（Gian Giacomo Trivulzio）——米兰内部一个反卢多维科派系的领袖为大将。1499年7月，一支主要由法军组成的大军进入伦巴第，这支军队的规模大约为27000人，其中包括10000骑兵。他们一路上攻城略地，摧毁了每一座被征服的城镇，以此来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8月底，法军已经做好围攻帕维亚的准备了。9月2日，卢多维科逃离米兰，并于三天后宣布逊位。10月9日，路易十二遂以新任米兰公爵的身份耀武扬威地进入米兰城。卢多维科在流亡集团当中集结力量，展开强力反攻，于1500年2月夺回帕维亚，但他最终还是战败并沦为俘虏，被押送法国，最终死在了那里。

依据当时的战争惯例，被征服城市是要遭受征服者任意劫掠的。而另一条惯例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统治者通常是大藏书家。由此便不难想见，1499年或者更有可能是在1500年，当大批法国士兵在米兰城各处的酒馆当中宴饮放纵，四处蹂躏意大利姑娘时，路易十二的手下已经来到帕维亚城堡的藏书室里，将书架上的藏书扫荡一空并打包运走了。维斯孔蒂-斯福尔扎藏书室的大批藏品就此来到法国，《半神》抄本也在其中，最终，大部分藏品进驻了布卢瓦的皇家藏书室，并于1518年被编入布卢瓦皇家藏书室的藏品名录。列奥纳多·达·芬奇后来也成了法国人在米兰斩获的“战利品”之一，他于1519年在布卢瓦附近谢世。从帕维亚城堡劫掠而来的这批书册当中，如今有三百多册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还包括原来在彼得拉克手中的十七份抄本。



彼得·多布罗夫斯基（1754~1816），俄国外交官、中世纪抄本的投机收藏家，于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期间在巴黎大肆搜掠

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要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转入法国历史上的另一个暴力动荡期。彼得·多布罗夫斯基（Piotr Dubrowsky, 1754~1816）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同时也是这个动荡年代的见证者；他跟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遇到的利布里一样，是个充满激情但有些不择手段的收藏家。多布罗夫斯基在基辅出生，在他接受教育的时候，法国文化在俄罗斯被奉为欧洲最为雅致的文化。1777年，多布罗夫斯基居住在巴黎。1780年，他在驻巴黎的俄国大使馆供职，并在几番迁升之后，坐到了使馆参赞的位置上。当时有一幅多布罗夫斯基的侧面像，将他呈现为一个胖胖的和善男子，他鼻子很长，双下巴，身穿一件宽领大纽扣外套，还围着一条丝绸围巾。1792年8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多布罗夫斯基不得不在俄国使馆关闭之后离开法国，此时的多布罗夫斯基被发现拥有一批最为珍贵的法兰西档案和彩饰抄本。它们差不多都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暴民洗劫巴士底狱行动中的战利品，且主要是巴黎的圣日耳曼德佩皇家修道院（royal abbey of Saint-Germain-des-Prés）的藏品，该修道院的财产和巨量藏品于1791年6月被革命委员会扣押，修道院本身也于1792年2月正式关闭。1795~1796年，该修道院的古老藏书转为

国有，但当时已经有很多极为珍贵的彩饰抄本落入多布罗夫斯基手中，并且离开法国了。很多人相信多布罗夫斯基盗走了这些珍宝，也有人认为他是无意间买下它们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实情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其中一份抄本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李维的《罗马史》抄本，它曾经的主人很可能就包括了洛伦佐·美第奇，据多布罗夫斯基自己说，该抄本是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赠送给他的。应该说，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毕竟，跟他手中的其他抄本一样，这份抄本此前同样是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财产。不管怎么说，多布罗夫斯基最终将大约七百份抄本收入囊中，其中包括了一批举世无双的瑰宝级抄本，比如8世纪的比德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抄本，来自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用紫色羊皮纸制成的加洛林福音书彩绘抄本；12世纪的英格兰《动物寓言集》（Bestiary）抄本；14世纪纳瓦拉王室的法语《圣经》（*Bible Historiale*）抄本；马丹·勒弗朗（Martin le Franc）的《美德与财富的战争》（*L'Estrif de Vertu et de Fortune*）彩饰抄本，这份无与伦比的抄本是为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制作的；当然，还有来自帕维亚的《半神》抄本。

1800年，多布罗夫斯基回到俄罗斯，当时他正处于缺钱的状态。有传闻说他正在跟人谈交易，打算在英格兰出售自己的藏书。这是抄本迁移流转史上的一个潜在的重大时刻，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部抄本传奇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不过，时任俄罗斯艺术研究院院长的亚历山大·斯特罗戈诺夫伯爵（Count Alexander Strogonov）介入了谈判，最终是在180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圣彼得堡新建立的帝国图书馆将多布罗夫斯基的全部收藏买下。1814年，该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俄国革命之后，该图书馆于1932年被改名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图书馆（Saltykov-Shchedrin State Public Library），当然，此时的圣彼得堡也被改名为列宁格勒。1992年后，该图书馆被称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圣彼得堡的“Rossiyskaya Natsional'naya Biblioteka”；接下来我们将去探访这座图书馆。

第一道障碍是无比烦琐的俄罗斯签证申请手续，申请表上有太多需要填写的内容了，特别是曾经上过的学校，无分小学、中学和大学，一概要填写上去；从事过的所有工作，须提供相应的日期以及联系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以及此前十年间去过的所有国家以及出入境日期。倘若沾染过政治冲突或者军事冲突，则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事情，都必须填写上去。还有一些信息则是非常敏感的。到了该填写前往俄罗斯的目的的时候，我沉吟了片刻，本来是要写“希望获得政府相关部门允许，考察一份有关武器和军事战略的抄本”，不过，最终我还是写下了“旅游”字样取而代之。之后，我便将全部的表格和相应的费用送至中伦敦的俄罗斯领事馆。

回想起来，我上一次造访圣彼得堡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如今，那里的沉闷氛围已然完全消散了。圣彼得堡已经是一个商业化和国际化的城市了——跟布拉格和北京一样，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或者涅瓦大道的纪念品商店里，你完全可以用英语跟俄罗斯人自由交流。出租车

费依然很便宜，不过，餐饮方面的消费很贵，当然质量也很高，跟我去过的其他城市不相上下。那些怪异的俄语字母甚是迷人，我只能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地辨认商店招牌和广告上的词，最终像一个五岁孩童那样，缓慢但骄傲地将拼出来的词（比如“意面屋”或者“可口可乐”）大声念出来。我到圣彼得堡时是盛夏时节，正值人们所说的“极昼”时期——圣彼得堡所在的纬度很高，这段时间里天黑的时间非常短。一大早，我沿着涅瓦大道向东而行，远离涅瓦河向着丰坦卡河的方向，那明亮且刺眼的波罗的海阳光直射着我的眼睛，而且在我晚上返回的时候，太阳仍然正对着我。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就在我的右手边，确切地说，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克格广场（Ostrovskogo Square）的角落里，这个公园并不大，周围种满了树，中央是一座巨大的于1873年树立起来的凯瑟琳大帝的铜像。广场的远端是亚利山德林斯基大剧院（Alexandrinsky Theatre），这是一座黄色和白色的新古典风格的大型建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则是一座巨大的19世纪的灰色石制建筑，贴着广场的西侧边缘。要进入图书馆，需要穿过几道厚重的大门。所有的标识都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左侧的一个柜台后面是一个跟已故的赫鲁晓夫夫人有几分相像的妇女在值班。我斗胆缓慢且清楚地说了一句“我是来拜访一份抄本的”。她用俄语高声回了一句便消失不见了。很快，一个年轻得多的助理从我对面那看上去像是两个木橱的地方出现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她引领我走进一个木橱柜里面。“稍坐片刻，”她说，“请出示护照。”坐下来之后，我几乎看不到柜台后面的管理员，而她就在那里抄录我的详细信息。但我能看到很多的橡皮章。来前，我向圣体学院的院长索要了一封介绍信，此时这封信派上了用场。我将信交给管理员，她似乎对此有所触动。“您是教授？”她问道。之后，她将我领到右边的一个计算机屏幕面前，我意识到她要给我拍照了。“你愿意的话，可以笑一下。”她说。“那就不太像俄罗斯人了。”我提出，但她没有任何反应。接着，我便拿到了一张我拥有的最具异域风情的借阅卡：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塑料卡片上印着我的全名“де амель кристофер фрэнсис риверс”。她要求检查我随身携带的书——一本笔记本和保罗·罗索（Paolo Rosso）版的《半神》抄本印刷本，本来我是要将印刷本跟抄本原本进行对勘的。她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不行，读者是不能将任何印刷书带入阅览室的。我万分恳求，但都没有效果。“规则不是我定的。”她说。这次我本想再嘟囔一句“这非常俄罗斯”，但克制住了。她将我的书收走并将其存放在空空如也的衣帽间。倘若罗索教授读到这段话，想必会十分欣慰，因为他的书再也不会接受严格对勘了。



位于圣彼得堡奥斯特洛夫斯克格广场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正面。一楼最靠右的房间是抄本阅览室

她一直把我送到图书馆转门处，然后告诉我到底层后往右走，再右拐，接着往左拐，沿着一条通道往前走，要先经过几道门再经过几道门；大部分内容我当时就忘了。长长的通道上铺了红色的地毯，并展示了一批苏联时期的旧书。我想起二十五年前造访这座图书馆的时候曾被告知，凯瑟琳大帝当年购置的伏尔泰的藏书，就在这些展示柜后，不过，我也有可能记错了。沿着通道走了一段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在一段楼梯下方的铺了瓷砖的门厅里，完全迷失了方向。此时，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从我身旁经过。“抄本？”我以恳求的态度询问他。他指引我穿过另一道门，然后沿着另一条通道往下走，这条通道的两边都是书架，其中部分被用围墙隔了起来，通道尽头就是抄本阅览室，它同外面延伸到涅瓦大街的广场平行。

这间阅览室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间教室，很舒适，有十二张被排成工整的两排的小桌子。大大的白色百叶窗遮挡了从外面广场上直射进来的阳光。若是在隆冬的“极夜”时节，情况肯定会不一样。墙壁是淡绿色的，墙边是很高的橱柜和书架，都配有木梯。索引册制作得很是严

肃，看起来有些年代了。还有几排装满了索引卡的抽屉柜——这样的检索系统如今很难见到了。镶木地板已经有些破损了，有些地方铺了褐色的条状地毯。拱形的天花板上时不时地会有管道和电线暴露出来。座椅都很小，是硬木的，放置了红布坐垫。所有的桌子都朝向管理员所在的长桌，那长桌被放置在阅览室入口旁边的，如同教室里的讲台一样，当天，长桌上摆放了一个巨大的花瓶，里面插满了菊花，并饰有粉色丝带。倘若在这长桌后面再放上一块黑板，这间阅览室就跟教室没有区别了。我像一名好学生一样，选择了最前排的桌子。

此次拜访，我约见的是奥尔加·布列斯金娜（Olga Bleskina），图书馆西欧抄本处主任。布列斯金娜很和善，也很愿意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她对她管理的抄本都很了解。我有更多的表格需要填写，而且都是俄语表格。每张表格都是每填完一个部分就要盖上一个官方印章。我们主要是用德语交流，布列斯金娜的德语要比英语更流利一些。她那一头黑发短而直，向左分，她戴着一条很精致的玻璃项链，穿着一件淡绿色的套头衫。我再次把圣体学院院长的介绍信拿给她看，她把信留下了。最后，她拿来了《半神》抄本。

抄本藏身在一个软皮文件夹里面，文件夹是苏联政府分配的（上面的印章上有不少字，不过我能看明白的就是一个日期：1959年），它被白色封条封着，我便将那封条拆开。这与1488年的用来放置抄本的烫金皮盒完全不一样。文件夹上夹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的俄文名字，我已经能辨认出来了。抄本用一张薄纸松松地包裹着，还保留19世纪初期的装帧，非常漂亮，用的是绿色直纹摩洛哥小山羊皮，封皮和封底边缘以及书脊上都有精美的烫金波浪线，以及小小的旭日图案——曾经的维斯孔蒂家族的标志。抄本的书顶和书底也都贴了金，且当抄本紧紧闭合的时候，很明显能够看出那上面有两条深色印痕，但这种印痕在翻口上找不到。它们肯定是1488年抄本纪要中描述的六个银质环扣留下的印记：显然是顶端和底端各有两个，而残损并且已经丢失的就是翻口的那两个。银质环扣氧化后留下了痕迹。该抄本很可能一直维持着这个装帧，直到多布罗夫斯基时代的人对之进行了重新装订，但显然此次重装没有修剪从中世纪留下来的书顶和书底。

抄本的后衬页用的是淡紫色纸张，卷首衬页则已经脱落了。抄本里面有一张19世纪的藏书标签，用俄语写就，上面有“17”“5”“2”这几个数字，我猜这些数字表示的是该抄本所在的书柜号以及它在书柜上的具体位置。这一点可以从抄本的书架编号中看出来：“Lat.Q.v.XVII.2”，这其中，字母“Q”指代的是“quarto”（四开本），也就是说，该抄本是10.5英寸长、7.5英寸宽。跟中、东欧地区的图书馆收藏的很多抄本一样，这份抄本的卷首附有一张已经泛黄的纸条，上面记录的是所有借阅过该抄本的人的签名；我数了一下，共有十四个名字，都是2006年之前的，差不多全是俄语签名，只有一个让我有些惊喜，那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签名，“James Marrow”（詹姆斯·马洛），马洛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签名时间是1996年8月28日。他来过这里这一点我早该猜到的。

抄本的第一页最初是空白页，不过，现在那上面留有16世纪的法语记录，列着博格纳家族（Burgeneys family）几个子嗣的出生日期，从

1518年的西蒙一直到1537年的让。字迹已经模糊难辨了。这些文字实际上也是最早的证据，证明在1499~1500年帕维亚城堡遭法国人洗劫之后，该抄本很快便来到了法国，并且很明显，它当时是在私人手中，尚未来到皇家藏书室。早期，教堂和修道院的珍贵藏书都会被用来记录圣物名录（参见本书前文第27页以及第301~302页），而到了16世纪，法兰西各个显赫家族就将家族子嗣的出生日期标注在家族收藏的珍本上，通常还会标注星期几以及具体的出生时辰这些在算命的时候用得上的信息。此类记录通常也被称为“家族资料册”（*livres de raison*）。大部分来自帕维亚的抄本最终被送至布卢瓦的皇家藏书室，这些抄本的卷尾通常会有如下的标注文字，“De pavie~au Roy Loys XII”（来自帕维亚，路易十二藏书）。但是《半神》抄本上没有这样的文字。相反，其卷尾页上的标注文字是于16世纪初期写下的“*madame*”（女士）。很可能该抄本因为制作得特别精美而被特地挑选出来，赠给了一位女士，而这位女士很可能就是布列塔尼的安妮——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以及1499~1514年路易十二的王后。还有一位博格纳的路易，是莫莱昂的领主，他在弗朗索瓦一世（法国国王，于1515~1547年在位）统治期的后半段时间里担任宫廷医师，该抄本也可能是赠给他或者他的妻子的礼物。博格纳家族的子嗣出生信息上随附了孩子们教父教母的名字，其中一位写着是来自布卢瓦的（“de Bloys”），由此便不难见出，该抄本可能还没有与它先前的同伴隔得太远——并没有远离皇家藏书室。

接下来两页的页边有16世纪到17世纪留下的一些法语文本，字迹很是潦草，其中包括三首诗。它们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抄写字体上都算不上什么杰作。第一首诗的开篇是这样的（我在注释里试着翻译了一下）：

Chanter je veus en tous lieux

A mon plaisir que les dieux

Rois princes et grandz monarquez

Le monde avec les parquez

Et mesmes tout l'univers

Sans me declarer diverz

Mourount plus tost que de voir

A leur plaisir comme moy

Issant de ceulx que je voy

En ce livre gracieux

Radore pas les haults dieux.

其中，开篇的“Ch”两个字母被颇有讲究地写在了一起，呈现出一个人的侧身像。从上到下读每行的首字母，你便会注意到，这其实是一首藏头诗，每行的首字母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个人名，“Charles　Manier”（查尔斯·马尼耶），他很可能是抄本的主人，或者至少是他题上了这些字。

第二首法语诗大概意思是说，该抄本的内容要胜过西塞罗写的所有作品。第三首诗讲述的是如何打仗，如何攻打城堡和城市，并且特别交代，倘若有谁发现了这份抄本，请主动将其物归原主，否则的话后果自负：

Il enseigne la maniere/a ceste race guerriere

de prendre chasteau ou ville/Et cequi y est utille

qui donque ci le trouvera/de bon coeur le rendra

a Moy Seul qui le possede/Sil ne vault quon ly procede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该抄本于17世纪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大量搜罗书册时被收入这座修道院。第1对开页的左页、第9对开页的右页和第116对开页的右页的页边上都有花体的题词，“Ex Musæo Petri Dubrowsky”（彼得·多布罗夫斯基藏书），这是收藏人自己动手写上去的，颇为大胆。他还在卷首衬页上面附了一张纸条，写了一些他对该抄本简短但也非常准确的描述。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抄本主文了。文本用的都是拉丁文。校勘情况跟抄本分为三个部分这一情况是契合的。[1]第一部分是卡托内·萨科给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献词，第二部分则是萨科赞美圣母的颂词，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长的，是《半神》第三卷的内容，主题是军事战略。接下来我们将依次考察它们。

前言是献给一位杰出的君主和最卓越的领主的，此人当然是米兰大公、帕维亚和安吉拉（Anghiera）伯爵、热那亚领主。在献词当中，卡托内·萨科颂扬了公爵大人的虔诚、智慧、坚韧、宽宏、可靠以及宽厚等品性（都是标准颂词），并将他比作古代英雄。之后，萨科列举了一系列当时落入穆斯林之手的基督教圣地：比如耶路撒冷，萨科预期这位大公终会征服该地；比如伯利恒，那是东方三王携带礼物前来朝圣的地方；比如埃及的耶稣基督最初的成长之地；萨拉森人的痛苦之地，也是基督徒的甜蜜之地；还有约旦河、红海、西奈山等地。萨科说，长久以来，他一直在期盼这些地方能从异教徒手中被解放出来。他解释说，他将在抄本中附上《半神》第三卷即有关军事战略的部分，这一卷的内容取材于古代权威，包括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加图（Cato）、亚里士多德以及维盖提乌斯（Vegetius）等，他自己也做了一些补充，此等军事战略，加之圣母的恩典，必能够帮助米兰大公轻松制敌。萨科说他明白同博学的君主比起来，他自己当然是无知的，因为君主已然是半神，为此，萨科专门引述了克劳狄安（Claudian）的诗，诗中朱庇特嘲笑了阿基米德为了理解宇宙而做的那些可笑实验。不过，萨科还说，既然公爵大人曾为了收复自己在意大利的正当领地而战斗，那么若他能将圣地从即将被摧毁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更好了，圣母是会为他提供庇佑的，更何况，大公的名字里就有圣母的名字。倘若连雅典那样的小城都能够在战争中取胜[萨科在此引用了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或者说，倘若《旧约》中的勇士都能够在绝境中取胜，那么比古往今来一切君主更伟大的战无不胜的菲利波·马里亚（抄本第6对开页的左页上出现了这个名字），在圣母的庇佑之下，当然也能够轻易地征服野蛮人，解放圣地，成为全能上帝的骑士。接下来，萨科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计算。他说，依据《圣经》谱系，从亚当到圣母，刚好是六十代人；而农神萨图恩（Saturn）到大公，刚好也传承了六十代。这一巧合正预示了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超自然身份。



《半神》抄本当中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家谱，从页面底端的萨图恩、朱庇特和维纳斯开始，一直向上延伸到页面顶端圣母下方的菲利波·马里亚

此一情况恰恰解释了献词前面的两幅怪异的卷首插图。右手页的顶端绘有一个圆盘，其中呈现的是圣三一体。该页的布局有点像是字母“U”，中间则是一根柱子。柱子是由小小的圆脸串联而成的，就如同念珠串一样，每张圆脸的旁边都有极小的字标注着名字。这张插图页已经严重磨损了，我们需要花上一些时间才能辨识出其内容。处于页面顶端中央位置的是亚当，沿着页面向下依次排列着森斯（Seth）、以诺（Enoch），等等，一直到页面底端的所罗门，该谱系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分支，左手边那一支开始向上而行，一直到左上角的约瑟，右手边的分支的顶端则是约瑟的妻子圣母马利亚。如此加总起来，两边的谱系的确都恰好传承了六十代人。接着便可以比照一下该页对页上的插图。对页上的“念珠”要更小一些，且上面的谱系是从下往上发展的。页面底端是一个绿色怪物，显然就是农神，接下来是一张戴着王冠的小脸，标注文字显示这是众神之王朱庇特。他的谱系向上延伸，依次是朱庇特的女儿维纳斯、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之子阿斯卡尼俄斯

（Ascanius），等等，随后渐渐从古罗马的人物传到了马泰奥·维斯孔蒂（Matteo Visconti, 1250～1322）、斯蒂法诺（Stefano，约1287～1327）、加莱亚佐（Galeazzo, 1354～1378）、吉安·加莱亚佐（Gian Galeazzo, 1378～1402），最后就是吉安·加莱亚佐的儿子，也就是最高处的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再上方就是圣母加冕礼的场景，如此算来，恰好也传承了六十代人。

步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亲自见证文艺复兴的发生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一方面，这些人物是绝对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议论着该如何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圣地，依据的是《圣经》经文，并且在圣母的庇护下。另一方面，菲利波·马里亚的名字既跟圣母有关，又来自于马其顿的那个勇士之王。抄本献词中的每句话都引自古典作品，包括古希腊的和古罗马的著作，公爵大人被比作朱庇特，并被呈现为古代神明的直系后裔，是一个半神，就如同他同样是半神的先祖、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一样。在这里基督教似乎是缺场的。这跟今天的俄罗斯有点像，俄罗斯重建与基督教和沙皇的渊源，仿佛苏联时期只是它开的一个小差；同样的，在第一幅卷首插图当中，维斯孔蒂家族中的诸位君主被呈现在一个有着信奉古代异教的罗马先祖的谱系之中，与基督教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页面的页边彩饰都是用菲利波·马里亚的纹章装饰的，其中就包括了蝰蛇吞噬男童的维斯孔蒂纹章图案（*biscione*）——该图案据说是属于奥托尼·维斯孔蒂（Ottone Visconti）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杀死的一个萨拉森人的，它同米兰城的帝国之鹰图案将纹章二分或者四等分；彩饰中的其他图案还包括：作为菲利波·马里亚个人标志的旭日图案（*raza*）、一顶与棕榈叶和月桂枝条串在一起的王冠、一顶垂有打结的布条的王冠[十字军士兵通常会戴有类似装扮（*nodo*）的头盔]；最后还有他个人的座右铭“a bon droit”（奉天承运）。这些图案为这一抄本的开篇增添了战斗气氛和十字军精神，如同号兵吹响了战争的号角——它们肯定能吸引抄本受赠人的目光。

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生于1392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大藏书家之一，大致跟佛罗伦萨的老柯西莫·美第奇（the elder Cosimo de'Medici, 1389～1464）是同时代人，要比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Gonzaga, 1395～1444）、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的阿方索（Alfonso of Aragon, 1401～1458）、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的莱奥内洛（Leonello d'Este, 1407～1450）这一批人稍早一些。这些人都收集了数量令人惊叹的藏书。在此一时期的意大利，藏书已经成为时尚，各邦国的开明君主对文学知识也极为崇尚。此时已经远离了丹麦国王尚在学习基础字母表、以诵读《圣咏》（参见本书第七章）的12世纪。帕维亚的维斯孔蒂图书馆1426年的藏书名录中，有上千份的手稿或者抄本，其中只有一份《圣咏》——这一年，这位公爵才三十四岁。古典拉丁文献在其中享有突出位置，通常一部作品就有多份抄本。《半神》献词当中征引的所有古代作家的作品，都出现在了图书馆名录当中，包括四份弗朗提诺斯论战争的抄本，这意味着卡托内·萨科很有可能就是将帕维亚的公爵藏书室作为自己的参考文献库的。此外，馆

内还有大量的编年史册，很显然，这是公爵大人的个人兴趣所在。菲利波·马里亚资助制作的不少编年史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就包括了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意大利译本的抄本，该抄本如今收藏在巴黎，是由一名菲利波经常雇用的宫廷画师绘制的，这位画师也因此被称为“帝王传画师”（Master of the Vitae Imperatorum）。



《维斯孔蒂时祷书》，如今收藏在佛罗伦萨，抄本中画满了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纹章和徽章，包括蝰蛇吞食小孩的图案以及公爵自己的座右铭“a bon droit”（奉天承运）

藏书名录中也出现了大量传统神学文本以及在俗信仰文本。这里同样出现了一个双重世界，其一是信仰古代异教的世界，其二是信仰基督教的世界，它们不仅出现在同一个书架上，甚至出现在同一本书当中。菲利波·马里亚的藏书并非全部是由他自己搜集而来的，有很多是祖上传承下来的，并且有些肯定是二手的。彼得拉克的大部分藏书在这份名录

当中，这倒不是因为维斯孔蒂的品位，而是机缘使然。其他的藏书，诸如《半神》，则是别人主动赠送给他的。从很多方面可以说，内容如此广泛的藏书，更接近查理六世（于1380～1422在位）的法兰西皇家图书馆，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狂热的佛罗伦萨派的那种人文主义品位相去甚远。菲利波·马里亚资助的抄本中，最大型且私人的项目是一份极为奢华的时祷书抄本，人称《维斯孔蒂时祷书》（Visconti Hours），如今收藏在佛罗伦萨。这份抄本是为他的父亲吉安·加莱亚佐制作的。它也跟《半神》抄本一样，装饰中满是公爵本人的纹章、象征图案和座右铭。

虽然藏身于圣彼得堡的《半神》抄本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产物，不过，它的文本的字体似乎完全没有当时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极为流行的新人文主义“古体字”（*litera antiqua*）的痕迹。《半神》抄本仍然用的是传统的哥特圆体字，跟《维斯孔蒂时祷书》以及为菲利波·马里亚的妻子、萨伏伊的玛丽制作的日课经抄本的字体非常相近。人文主义风格的抄本很晚才出现在伦巴第地区，这一点的确让人意外。此一时期，意大利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在用所谓的“白葡萄藤”（white-vine）图案来装饰古典文本，这一图案也源于古典艺术，但是《半神》抄本仍然使用了正式的哥特风格的彩绘首字母，就跟《维斯孔蒂时祷书》中的一样。

《半神》抄本的第二部分则将我们带回基督教世界，不过这部分的文本显然采用了西塞罗的文风。它的开篇页是第9对开页的右页，绘有装饰着“圣母领报”场景的首字母，呈现的是圣母坐在山间开阔的梯田之上的景象。页边围绕着一个宽阔的以常春藤叶子装饰起来的贴金边框，且反复出现了四叶花的形状，花中呈现的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纹章、旭日徽章以及打结的布。页面底端，维斯孔蒂家族纹章跟象征帕维亚的三只鹰被并置在纹章的盾牌上，两个分别穿着蓝色和粉色长袍的天使飘在空中，将纹章高高擎起。文本和边框之间有一幅小图，图中，一头鹿悠闲地站在草地上，两边各有一条狗，很可能一条是寻回犬，另一条是灵缇犬。

这部分的开篇页上并没有标题，不过，在结尾的版本记录页上这一文本被命名为*De laudibus virginis*，也就是“圣母颂”，作者是卡托内[萨科]。它的开篇句是，“Si unquam P.C. ad comendationem cuiusq[ua]m timidus accessi ...”[各位元老（P.C.指patres conscripti，是在古罗马元老院演说之时，对在场元老的尊称），我此番前来，乃受人举荐，诚惶诚恐]。很显然，这是一份“圣母颂”，文中引用了《圣经》经文和众多古典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荷马以及柏拉图等，所用语言是法庭辩论式语言。“请耐心听我说，”作者在某处高声说道（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拇指放在短外衣翻领下面的场景），“否则您会很难明白我在说什么。”文中特别谈到了两个论题，其一是此时距离驳倒犹太人（也就是指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有一千四百三十八年了——既然这是一份用来赠礼的抄本，那就意味着它的创制时间应该就是1438年；其二是锡耶纳的贝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 1380～1444）的布道词中的一句引言，文中提及了贝纳迪诺的名字并且可见他当时尚在世，该引文的意思是说，圣子在天堂无母孕育而成，在尘世则是无父而生。如今，我已经有搜索引擎可以使用了——这

样的便利是卡托内·萨科享受不到的——由此我便很轻松地确认了此引文出自圣奥古斯丁之口。萨科在另一本人文主义文集当中也收录了这句讲词，如今该文集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它最早的主人是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皮尔克海默（Thomas Pirckheimer），而皮尔克海默恰恰就是在1438年唯一一次造访帕维亚的，这再次确认了抄本的制作时间。

我们终于能看一看《半神》抄本的主体内容了。《半神》的文本本身实际上是一篇对话，两个对话人分别被设定为“A”和“B”，“A”可能代表的是理想君主，也就是标题中的“半神”，“B”则是君主的老师，显然就是卡托内·萨科本人。在这份抄本当中，首字母“A”和“B”分别以金色和蓝色呈现，金色字母描有蓝色边框，蓝色字母则描有红色边框。这部分内容是在第37页右页开启的，开篇文字是，“Preclaram ego esse rem militarem censeo ...”（我认为战争艺术是高贵的）。一开始，对话推进得很是缓慢，两人讨论的主题是战争史的源头，大致上可翻译如下：



《半神》抄本当中“圣母颂”的开篇，这是献给圣母的颂词，而圣母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护佑神；页底的签名是“Dubrowsky”（多布罗夫斯基）

[A：]“就我来说，我认为兵法是十分高贵的，因为它是给人类的所有行动增光添彩的。”

B：“的确如此，不过当然，它是需要使用者的审慎思考和技巧的。且看看凯撒、梅特卢斯、费边、西庇阿（Scipios）吧，看看两位加图吧，这些人都享有无可置疑的声望，都是这门艺术的大师，而半神需要在此等艺术当中接受考验。”

A：“你把两位加图也算在内，这让我颇为吃惊啊。”

B：“怎么能没有加图呢？”

A：“他们不都是在和平时期建立声望的作家吗？”

B："和平时期？"

A：“好像有识之士都是这么说的。”

B：“你似乎认为只有和平才能创造智者。也许你觉得，两人更多的时间是在悠闲的状态中度过的，而非行动，但实际上，思考和写作本身也是行动。加图和西庇阿（也就是征服非洲的西庇阿）这等人物，虽然有时看起来悠闲，但实际上一直十分活跃，两人对作战理念的贡献是不相上下的……”

这一页的页边彩饰包括了右上角的被六翼天使（红色）环绕的圣母和圣子，以及左下角的跪在地上的菲利波·马里亚本人。文本正下方是公爵的纹章，由两个飞在空中的天使协力抬起，这里的天使已经身披铠甲，两侧也有纹章图，一侧是旭日和鸽子，另一侧则是打结的布条。这些图案都被公爵本人的座右铭或战斗口号环绕起来：四遍亮金色的以哥特字体写就的“a bon droit”。

我将抄本翻到这一页时候，已经是圣彼得堡的中午了，早上九点图书馆开门之后，我便一直在这间阅览室里。我伸了伸懒腰，然后往四周看了看。阅览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这间阅览室并没有配置用于支撑抄本的架子或者垫子（而且肯定也没有白色手套），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借阅者用的都是有色笔而非铅笔。阅览室的管理员是个很友善的中年女士，戴着大号眼镜，她很显然意识到我错过了午餐，于是拿了威士忌味的俄罗斯巧克力给我吃。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她也不会讲英语，但是我认为她就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中的圣人。我坐在座位上，打开巧克力的包装纸，一边吃，一边（非常小心地）翻动着眼前这份极为精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抄本。说实在的，在这间阅览室里可能抽烟都是被允许的。



抄本的第三部分为《半神》的文本，以对话形式展开，对话人是“A”和“B”，谈论的是战争实践和技法

我当然没有办法将《半神》抄本的文本读给各位听，那可是一百四十页的复杂拉丁语。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抄本中那令人惊叹的插图来了解它的叙事，精美的插图是这份王公级抄本的最大的特征，而且，对我来说，它们总令我想起圣彼得堡那暖洋洋的夏日午后和俄罗斯酒心巧克力散发出的威士忌醇香。第一幅插图在几页文本之后。与之对应的对话谈论的是为何昔日的伟人都是战士。它呈现的是一名全副甲胄的骑士坐在腾跃而起的白马之上，仰望着天空中的圣母和圣子。这骑士的战袍上面印有维斯孔蒂家族的纹章，从其面貌特征不难判断出，这名骑士是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也就是菲利波·马里亚已故的父亲——直直的胡须以及后卷的灰色头发是加莱亚佐的标志，正如《维斯孔蒂时祷书》中的画像呈现出来的那样。第二幅插图出现在一页之后，该图中，萨科在为两个与他同名的古典人物加图辩护，这两位加图在对话的开篇便已经被介绍过了，萨科很显然是将它们视为自己思想上的（也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辈。这幅插图的构造很像一个巨大的香槟喷泉，水从上而下层层浇灌，每一层都布满了加图的历代后人，他们就像是端坐在塔楼

的各层浴池中。两页之后的插图再次呈现了一位维斯孔蒂家族的王公，此人毫无疑问是菲利波·马里亚，他正在将剑高高举起，冲向战场，圣母则在上方保护着他。他的战马被用绿布覆盖了起来，布上面饰有维斯孔蒂家族那蛇吞噬男孩的纹章。



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公爵的甲胄和战马的罩袍上都有家族纹章，战马正在奔向战场，公爵的护佑神圣母则在上方悉心护佑他

我们在第45对开页的左页遇到了第一幅描绘战争场面的插图。画面的左边是红色装束的军队正在穿越一道山间隘口，他们的旗帜是白色的，上面绣了一只黑色蝎子。这支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搭建了帐篷和营地。这显然是敌军，因为《维斯孔蒂时祷书》里面展示的正待穿越红海的法老的邪恶大军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黑蝎子图案。不过，这支敌军将要遭遇强力阻击。插图右上角的山顶塔楼的城垛上，一个信号兵正在吹响号角，一支分遣军团也正在维斯孔蒂家族的旗帜引领下，高声呐喊着冲向战场。

维斯孔蒂大军随后就在第59对开页右页与帝国军队会合，在家族鹰

旗的引领之下，向敌人的城市发起了进攻。城中很明显地矗立着一座尖塔。对应的文字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对这城市展开进攻的：在上帝的护佑之下，他们手持盾牌、启动投石机，催动攻城器械，迫近城墙，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我认为是火炮（文中称之为“呼啸的黄铜”）的武器，以及火焰发射器、投石索等。文中列举了很多攻城武器，诸如“tormentis, fundibulis, scorpiis”一类，我的拉丁语词典实在是太小了，只将这些器械一概译为“投石器”，当然，在行家眼中，它们肯定是各有不同的。插图中还呈现了众人推着一圈金属颜色的臼炮向前行进的场景，以及近战场面：盾牌上有黑蝎子图案一方的大多数士兵已经遭到斩杀或者落入壕沟。基督徒大军最终突破了吊桥，杀入城中，如入无人之境。



举黑色蝎子旗的敌军在山谷当中扎营，维斯孔蒂的军队正从山顶的要塞冲出，对敌军展开攻击

接下来的画面是维斯孔蒂大军在渡过炎热荒漠中的一条河。一些士兵已经脱掉身上铠甲，跳入河中并开始喝水。圣母则在天空中的骄阳之上注视着这支军队（圣母和圣子出现在很多页的页边）。这之后便是一个夜间的场景，深蓝色的夜空繁星点点。敌军挤在画面右侧的山间，他

们的帐篷外篝火在燃烧，营地周围插满长矛，矛头都朝向外侧。基督徒士兵则全副甲胄地在山间悄悄穿行，并已经渗透入敌军的长矛阵当中，正在对敌军展开偷袭；敌军毫无防备，被捉住时还穿着睡衣。第69对开页右页插图呈现的则是一场激战。各个军团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很多军团有纹章。敌军的盾牌之上是蝎子或者摩尔人的脑袋图案；基督徒军队的则很多样，包括维斯孔蒂家族纹章，以及以吉伯林鹰徽（Ghibelline eagle）为首的其他纹章，代表伦巴第盟军。图中的士兵都没有盾牌并且全副甲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分清敌我了（中世纪的实际状况则更是如此），由此可见，纹章的重要性十分突出。在接下来的插图中，维斯孔蒂的军队休息了一天。士兵们在河边的树林里安营扎寨。一些马被牵入马厩歇息；另一些则被领到河边饮水。大部分士兵已经卸去甲胄。有些在玩摔跤和杂耍，另一些在玩九柱游戏，或是在晒太阳、聊天、爬树，当然也有士兵在帐篷外面跪地祈祷。这样的悠闲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下一页的插图就呈现了这支军队在山谷里遭到疯狂攻击的场景。滴着鲜血的头和断肢四处乱飞。不过，看哪，正有两名坐在马背上的维斯孔蒂军队传令兵指着画面左侧山上的一条狭窄通道，援军正从通道中奔来援救。接下来的插图呈现的则是马匹的多种用途，比如驮运、拉车、冲锋，等等；还有士兵们砍下林中枝条给马喂食的画面。

　　这些插图都是彩绘而成的，极其迷人，充满想象力。其色彩是柔和的薄层水彩的颜色。绘图在小块文字周围铺展开来，令那文字块如同旗帜一般在战场上飘动。图中风景更是令人神往不已，有着高高耸立的大山以及童话故事中那掩映在苍翠树林当中的城堡。现实的战场则被灌注了骑士传奇之风。图中士兵虽然被呈现得很小，但画工精美，完全可以看出士兵忙碌而认真的状态。我新结识的好友，也就是那位管理员，拿了放大镜给我，并且又给了我一块巧克力，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入迷了，当年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初次将这本奇妙的书拿在手中的时候，想必也是这般状态吧。


aulam ducis adversantis intra
castra. quod et machabeo die il
lucescente adiuvante cum dei
protectione factum in anthio
cum filium eupatoris pfuisse
legimus. Ceterum si longius
ducendus inveatur hisce rebus
opus esse ignorari nó oportet.
primum ut varios viarum cas
circumspiciat. ideo diverticula et
flumina. montes nemora et reli
qua picta haberi nó erit incon
gruens. tum etiam et ductores
instructos in itinere fidos habeat.
aut datis custodibus ne evadat

夜间敌军在空旷处扎营，基督徒军队正偷偷越过敌军用长矛围成的防御圈，对敌军展开伏击

第89对开页右页上绘有一幅整页插图，没有文字。我们随之来到了中东荒凉的高地，它在峡谷上方。图中央的营垒跟西奈山斜坡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非常相像，只不过，这里的营垒显然是伊斯兰风格的，有顶端有新月的圆顶和尖塔。营垒大门的上方悬挂着印有摩尔人脑袋图案的盾牌，吊闸门已经落下。佩戴了帝国鹰徽的士兵们则正将燃烧的火弹抛入营垒。画面右边有一片树林已经着火了，火焰升腾，浓烟掠过这座要塞。一批逃到要塞外的敌军遭到残酷的屠杀。整个画面看起来极为炽烈。一个士兵正在点燃一门巨大的瞄准了要塞的臼炮。虽然炮弹尚未发射，但炮筒里面已经冒出火焰了。将欧洲臼炮运到这样的荒漠当中，所需的后勤力量是巨大的[这便不免令人想起1867年，特沃德罗斯（Téwodros）皇帝命人拖着他视若宝贝的七吨重的大炮穿越埃塞俄比亚的故事]。很快，一幅双页插图便呈现了运送这样的武器的场面。数列的士兵，全是短衣襟小打扮，肩扛长长的木梁，木梁上串着绳索和链条。

天空中星光闪烁，这很可能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很快，这些材料便在对页的图中被组装了起来，最终组成了一架攻城器械，它的底部是可以滚动的，因此也就可以协助进攻者越过壕沟，并将他们从上方送入敌军的城堡。第96对开页右页呈现的山地战很显然发生在夜间。画面左下方是一批黑人模样的士兵正在跟一批有着蝎子盾徽的穆斯林士兵进行肉搏战的场景。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山口穿行而来，全副甲胄，吹着号角，手持亮晃晃的火炬。


uel causa eo temptandi miscat.
uel explorandi. nunc existimo
uia et hosti prospecta non im
probabis si e uestigio in ipsos
hostes forte in cenes uel impro
uisos irruero. Hic si ut scipio i
affricanus contra hanibalem:
qui ita per continuos dies ordi
natum duxit exercitum ut me
dia acies fortissimis fundaret.
et cum hostes sic assidue ordi
nate procederent. eo die quo i
fuit decernendum. legionarios
scipio in cornibus collocauit et
mediam aciem retrahendo co:

基督徒军队正在休憩，战马在河中饮水，士兵们在阳光下玩游戏和放松



第526~527页：基督徒军队在荒漠中攻击萨拉森人的要塞，基督徒正在给臼炮点火并手抛弹药，火球越过城垛，飞入要塞，圣母和圣子在左上方关注着战况

最后四幅插图则是以水战和海战为主题的。其中第一幅插图呈现的就是本章开篇提到的场景，维斯孔蒂战船上的士兵正用装满毒蛇的罐子和火球攻击敌船。一些士兵动用了十字弩。战场在一条宽宽的河上，敌方战船聚集在下游。岸边也有一场战斗，还站有一些观战之人。不过，切不可忘记W.H.奥登的诗《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开篇如下："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这些古典画家……"这首诗表达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普通人总是过着最日常的生活，即便是在最为特殊的时刻。在这幅插图当中尺寸最大的人物形象是右下角的一个小市民，他将马拴起来后，燃起一堆篝火，正在给自己做晚餐。他背对战场，仿佛身后的一切都跟他无关。

接下来的插图呈现的是海战的场景，人们使用的是同样的作战技法——将装满毒蛇的瓶子扔向敌船，然后潜到敌船下方凿洞。几页之后的一幅插图展示了如何点燃敌军的沿河要塞。一个士兵用绞盘放出一根绳子，那绳子的一端系在一条装满爆炸物的小船上，小船顺流而下，朝着河上的一座桥漂去。画面左边，一群人正在一个要塞的墙下点火，但是城垛上面的守军也正在用木块砸这些纵火者。画面右边，士兵们正将木柴和火弹堆放在要塞墙体下面。最后一幅插图描绘的是如何建造浮桥。一名士兵游到河对岸，将绳索绑在两岸的树桩上，然后在绳索上绑上木板和捆扎好的树枝。画面右边，军队已经准备过桥了。天空中闪耀着月亮和星星，很显然，这是在夜间。《半神》的全部文本在第116对开页右页结束，收尾文字是"Catonis sacci papiensis semideus explicit"（卡托内·萨科的《半神》在此收尾），最后留有意大利人文主义抄本通常会有的美好祝词，"lege feliciter"（享受阅读吧）。



敌船遭到火球和装有毒蛇的瓶子攻击的场景，士兵们已经偷偷潜到敌船下方，正在木船的底上凿洞



卡托内·萨科的墓碑如今仍然可以在帕维亚看到，就在科索新街（Corso Strada Nuova）旁边的一处庭院里面，墓碑呈现的是萨科在教室里授课的场景

《半神》的作者卡托内·萨科是一位不太有名望但十分勤奋的人文主义学者和作家，他同许多二流学者一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各邦国的宫廷圈子边缘谋生。他是一位古典学者，也是民法学家，从1417~1418年起在帕维亚大学任教，直到1463年谢世。他曾为罗马法的“法典”（*Codex*）和“汇编”（*Digest*）——查士丁尼法典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写过评注。此外，萨科还给当时的政治家写过一系列的信笺和哲学短札。《半神》是稀有文本，其传播过程也非同寻常。《半神》全本乃三卷本，初衷是全面阐述政治家的治国之道。第一卷的主题是理想君主，也就是“半神”，此一论题取材于古罗马的历史。第二卷的主题是和平时期君主的职责。第三卷，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卷，讲述的则是实战当中军事统帅的作战技法。这三卷加总起来，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文学体裁，此一体裁后来因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Cortegiano of Castiglione*，约1507）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很可能写于1513年）而发扬光大。然而，在已知的抄本或者印刷本中，并没有三卷同时出现的《半神》全本。有一份抄本中，单独出现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如今这份抄本收藏在德国富尔达的黑森州州立图书馆（Hessische Landesbibliothek）；在巴塞尔也曾发现一份含有第一卷文本的抄本。15世纪中期至晚期的一本杂文集同时收录了这两份抄本中的《半神》文

本，这部文集是以普通纸张制成的，选文很多，不完整的《半神》在里面只能算是很小的组成部分。第三卷则一直只在圣彼得堡的这份奢华抄本中存在。在前言中，萨科明确地告诉向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他将“附”上《半神》第三卷的内容，因为它们关乎他创制该抄本的意图。这句话出现在第5对开页右页的顶端：“attuli Semidei librum tertium”（谨附《半神》抄本第三卷）。我们将在后文中重新考量这句话。

回到伦敦，我同艺术史家安娜·梅洛葛拉尼（Anna Melograni）女士展开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交流，从中学到的东西令我沉醉不已。梅洛葛拉尼女士供职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文化活动部，毕生都在研究15世纪伦巴第地区的彩饰抄本。我们这些研究抄本的人，都是极为依赖同道中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分享各自的想法和推测是我们这一行的乐趣之一。《半神》抄本的绘图很复杂，还有诸多费解之处，令我困惑不已，于是我便向梅洛葛拉尼求助。

梅洛葛拉尼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军事场景的插图不可能是在1438年这么晚的年份绘制的。1438年这个创制时间此前并没有人质疑过。安娜认为，这些插图跟收藏在哥本哈根的一份有薄伽丘的《名女》（*De mulieribus*）和其他一些文本的抄本中的页底插图极为相像，甚至有可能就是同一个画师的手笔。《名女》抄本的版本记录页显示，该抄本是于1401年2月10日在帕维亚制作完成的，并且时间精确到了当天晚上的十一点（一个漆黑的冬日的夜晚）。它出自一个无名画师之手，这个画师是14世纪晚期的彩饰师帕维亚的彼得罗（Pietro da Pavia）的圈中人。于是我比较了两份抄本的副本，并且认为我可以肯定，两者的确出自同一个画师之手：画中有一样蛮荒的山丘、一样的写实风格的森林，以及小小的如同在舞台剧中的人。梅洛葛拉尼女士告诉我，仅从照片来判断，她认为《半神》抄本插图的绘制时间肯定不会晚于1430年，也可能要比这早得多。不过开篇首字母、边饰以及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家族纹章和个人徽章，应该都是在抄本前言中提到的1438年这一年绘制的。

我觉得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卡托内·萨科显然是颇为自豪地雇人为《半神》的全部三卷本制作了大师级彩饰本。当然，具体时间我无从论定，只知道在1418年之前萨科一直在帕维亚大学教书。这便不免令我回想起本书第十章中的《哲学的慰藉》抄本和《特洛伊罗斯》抄本，当时我们假定抄写员亚当于14世纪80年代将这两份抄本初步抄录在羊皮纸上，随后将它们呈送年轻的乔叟修订；很可能跟这两份抄本的情况一样，萨科请人制作的《半神》全本抄本，是供自己修订之用的。圣彼得堡的这份抄本当中出现了许多细节上修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萨科本人的笔迹，都是用小小的准人文主义字体写就的。依据萨科的指示，文本被置于页面中央非常小的长方形框内，一个文本框通常只能容纳十五行，大约是3.625英寸长、2.75英寸宽，不足整个页面的八分之一。之后，这些留有大量空白的书页便被一页一页地交给哥本哈根薄伽丘抄本的画师慢慢地配图，即便不是这个画师本人，也应该是一个风格与他极为切近的画师。此举的意图，很可能就是为了让每一页文本都能被绘图

环绕起来。如此制作出来的作品是可以作为奢华赠礼的，当然也可能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就跟今天一些作家为自己的处女作定制奢华版本一样。我们可以设想这个画师的配图工作是在15世纪20年代缓缓地推进着的。但很可能在距1430年还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画师谢世了或者放弃了，抑或是卡托内·萨科对此失去了信心，再或者就是萨科没钱了，这个大工程便只能中断了。哪个学者不曾经历这样的工程呢？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438年的时候，萨科捕捉到了重续这项工程的机会，便决定将抄本翻新后献给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此时，萨科决定将主题集中于战争，以及当时正在酝酿的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为此，萨科写了新的前言，以及颂扬公爵的“圣母颂”。他还选取了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被装订在一起的《半神》抄本当中的最后十折，也就是契合战争主题的第三卷，并将之如同他自己说的那样，“附”在新抄本上。此时的萨科应该雇用了当初的抄写员，当然他也有可能自己用正式字体完成了抄录。这也就是为什么第iv折只有四页，因为这一折必须同写于数年前的第v折（自第37对开页起）匹配起来。

接下来，就需要为这份复合抄本绘制彩饰以供赠礼了。当初的画师应该已经亡故了，或者说是长久地淡出了这个行业。在抄本的增补部分，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画师的手笔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新的职业画师的作品。之所以一下子雇用多个画师，很显然是出于应急的考虑——萨科需在某个特殊日期之前完成抄本的彩饰。每个单元的开篇页都被画上了带维斯孔蒂家族纹章以及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本人徽章的彩饰边框，卷首衬页更是被画上了公爵大人那始于农神的谱系传承图。该抄本当中，还经常出现小小的圣母和圣子边饰画像，有时它们跟文本本身体现的军事主题并不相关，但肯定能够吸引中名为“马里亚”的受赠人菲利波公爵的注意。这些增补的彩绘——再次感谢安娜·梅洛葛拉尼——可能是贝索佐的米开利诺（Michelino da Besozzo）的手笔，此人是当时的知名艺术家，在1388～1450年帕维亚的档案当中有所记载，也是壁画家和木板画画家，在帕维亚和米兰均有工作经历。不过，《半神》抄本上那饰有“圣母领报”图的卷首首字母，看起来像极了帕维亚的乔瓦尼·贝尔贝洛（Giovanni Belbello da Pavia，活跃于约1425～1462）的早期作品。乔瓦尼·贝尔贝洛堪称传奇画师，在意大利北方的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不过，他是在自己的出生地帕维亚开启职业生涯的。在帕维亚，他完成了菲利波·马里亚的《维斯孔蒂时祷书》的制作工作，同时也参与制作了《萨伏伊的玛丽日课经》（Breviary of Marie of Savoy）。那散射着条纹状光芒的天空、怪石嶙峋的山坡、回纹挂毯，以及最重要的着色全然是这一时期的贝尔贝洛的风格。倘若他真的参与了1438年《半神》抄本的制作工作，那我们就能为他的生平传记再增添一个小小的脚注。

在将《半神》抄本的各个部分合在一起且用深红色天鹅绒装订起来，并为之配上银质环扣和烫金皮盒之后，萨科便可以将它进献给米兰大公了。如今收藏在巴黎的那批来自帕维亚的抄本当中，有一份柯勒乔的加拉西奥（Galassio da Coreggio，约1368～1442）的《盎格鲁史略》（*Historia Angliae*）赠礼抄本，该抄本的卷首插图就描绘了这位米

兰大公接受赠书的场景。图中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头戴一顶大大的平顶帽，身穿暗褐色的天鹅绒袍服，端坐在罩着长长的红色花布的王座之上。帽子下面看不到他的头发，这说明公爵大人当时要么已经秃顶了，要么就是剃光了后脑勺的头发。此等形象看起来跟弗拉基米尔·普京倒是有几分相像。长脖子、直鼻子、眼神锐利逼人的公爵大人直视着跪在自己面前献书的作者，作者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一份红色封皮且配有四个金色环扣的小小抄本。公爵的身体微微前倾并伸出双手。

也许菲利波·马里亚会对《半神》抄本心存感恩，但它其实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想必卡托内·萨科对此会非常失望。公爵没有策动新的十字军东征，无论是公爵还是作者，也没有制作新抄本的意愿。三卷本的《半神》抄本并没有存留下来，因为作者萨科本人送走了他仅有的第三卷。最初他应该保存了他自己的抄本的剩余部分，这一部分很可能也是由哥本哈根薄伽丘抄本的画师提供的彩饰；而这半册孤本应该就是收藏在富尔达和巴塞尔的那两份抄本的文本来源。然而，在1463年萨科谢世之后没多久，这半册孤本便消失不见了。

本书前一章曾经谈道，在此一时期的法国和意大利，如此复杂且精美的抄本的制作流程，是由职业书商统筹的。这些书商的任务就是将一个抄本的承包人、抄写员、彩饰师以及装订人集结到一起。一个非常有名的例证就是意大利人维斯帕西亚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1421～1498）。比斯蒂奇来自佛罗伦萨，几乎认识人文主义抄本的买主圈子和资助人圈子中的每一个人。在帕维亚，也有与比斯蒂奇类似的这么一号人物，此人就是雅各布·德·圣彼得罗，据信正是他具体负责了最终被进献给菲利波·马里亚的《半神》抄本。雅各布被人称为“bedellus”，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仪仗官”，在中世纪的巴黎经常被用来指大学里拥有半官方身份的书稿业从业人员。卡托内·萨科后来在为自己的《民法评注集》（*Lectura super quibusdam titulis libri VI Codicis*）制作用来进献给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抄本的时候，找的就是雅各布。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巴黎。它的后衬页上面留有一行小小的手写字，“1458 die XIIIIo Iunii hoc Opus Aminiavit et ligavit Jacobus de S[an]cto Petri P[a]p[i]e”，意思就是，“帕维亚的雅各布·德·圣彼得罗为本书绘图并负责装订此书，1458年6月14日”。该抄本卷首页的彩绘画有斯福尔扎的纹章和徽章，风格很朴素。这样的图显然不是出自《半神》抄本的画师之手的。雅各布显然参与了帕维亚的公爵图书馆的管理维护工作，并且在馆中履行一些常规职责。现存的维斯孔蒂藏书当中，至少有四册在他的监督之下进行了重装，以便图书馆收藏，其中就包括了11世纪的波埃修斯评亚里士多德抄本，该抄本的主人曾经是彼得拉克。抄本中留有15世纪的题词，说该抄本是由“Jacobus de Sancto Petro bidelus”（仪仗官雅各布·德·圣彼得罗）装订的。在此次重装之前，该抄本就已经在帕维亚的公爵图书馆了，据图书馆1426年的藏书名录显示，它当时是用木板和白色皮革装订的。而15世纪的这次重装用的是带有无色印花的小牛皮，很可能就出自雅各布或他雇的人之手。有意思的是，到了晚年，雅各布还成了印刷商。

acute & cito reperiemus. diſtincte & ornate diſponemus.
grauiter & uenuſte pronuntiabimus. firme & perpe-
tuo meminerimus. ornate & ſuauiter eloquemur. Er
go amplius in arte rhetorica nihil eſt. Hæc omnia adipi
ſcemur: ſi rationes præceptionis diligentia conſequamur
& exercitatione.

FINIS.

Opus Impreſſum Papie Per Iacobum De Sancto Petro.
M.cccc°.Lxxvii. Die .xii. Menſis Nouembris.

雅各布·圣彼得罗为一本1477年出版的印刷书撰写的纪要，可以肯定，此人在年轻时曾为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和卡托内·萨科工作

在欧洲，活字印刷术于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美因茨的约翰·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5～1468）手中得到改进并趋于完善。古腾堡在这件事中厥功甚伟，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化史学家有充分理由强调古腾堡的伟大创造所催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力量——他们将之同车轮或者互联网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这样的技术，人类的思想和语言就可以无限制地被复制并传播了，而且显然依托的是完全一样的印本。虽然排版的速度不比手抄的速度更快，但是一旦活字版面制作完成，就可以开始以数百份印本为单位进行批量生产了，而且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较之往日单独一份的手抄本，都大为缩减。在本书呈现的抄本史中，我们经常能体会抄写员犯错以及这些错误造成的影响；相形之下，在印刷过程中，理论上人们是可以通过校对来避免此类错误的。印刷术令语言变得稳定，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程度，加速了知识（或罪恶）的传播，促进人类经验的分享和升级——对于印刷术在这些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速度令人吃惊。截至1500年，也就是摇篮期（incunable）结束的时候，欧洲就已经有350个城镇设立了印刷机构，发行的印刷书册超过30000种，总印量达到了9000000册。当然，传统的中世纪抄本依然凭借其独一无二的特质而散发着魅力和光彩；即使在现在，批量生产的摇篮本也很常见。

印刷术很早便在意大利传布开来。人们普遍认为，是两个德意志人——康拉德·斯维赫伊姆（Konrad Sweynheym）和阿诺德·潘纳尔茨（Arnold Pannartz），于1465年在罗马附近的苏比亚科（Subiaco）修道院创建了意大利最早的印刷机构。两年后，他们进驻罗马，专门为人文主义雇主印制极为豪华的拉丁语书册，这些书册通常还会由人工进行彩饰。实际上，据说早在1462～1463年，就有一位名叫乌尔里希·汉（Ulrich Han）的维也纳巡游印刷商，在博洛尼亚或者费拉拉这样的地方组织印刷了一批令人惊叹的意大利语祈祷书。随后的几年之内，威尼斯（1469）、福利尼奥（1470）、费拉拉、米兰、佛罗伦萨、博洛尼

亚以及那不勒斯（后五个城市都是在1471年）等地便纷纷涌现了发展成熟的的印刷机构，1472年，帕多瓦、帕尔马、曼图亚以及维罗纳等地也不甘落后，纷纷赶了上来，尔后印刷术便在其他地方越来越迅速地传播开来。帕维亚很可能在1473年拥有了自己的印刷机构。1477年11月12日，被误认为是西塞罗的作品的《论公共演讲的理论》（*Rhetorica ad Herennium*）在帕维亚出版，负责该书的印刷商名叫雅各布·德·圣彼得罗（Jacobus de Sancto Petro），应该就是前文谈到的那个人。1438年的雅各布既是书商，也是画师和装订工，与大学和维斯孔蒂图书馆都有关联，他当时可能三十岁了；如此算来，到1477年，雅各布应该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还有能力在退休前在印上这么一本书，而此时，中世纪的世界正在渐渐消逝。

毫无疑问，印刷术彻底改变了书稿制作业和出版业，昔日的众多职业抄书员要么失业，要么努力适应新环境。不过，就基本运作规则而言，15世纪的书稿业一开始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此一时期，仍然有人在制作羊皮纸和普通纸张，有人在提供范本，有大批的作者、编者、设计者、装订工以及书商在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轨道上运作着。包括雅各布在内，众多职业人士仍然在做传统的工作，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略有变通而已。虽然技术在发展，但是人们对美妙书册的喜爱仍然不减，提供这些美妙书册的行业也仍然兴盛着。

还有一件事是1438年之后没有改变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就是人类的好战倾向。人类总是需要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正义感来为战争“正名”，这样的倾向是无法抵制的。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当然不曾策动并召集十字军东征。集结起来的穆斯林力量会否对欧洲文化构成潜在威胁的担忧在今天又浮现了，只不过这一次，将毒蛇装进瓶子里不会再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

注释：

[1] 这三个单元分别是：（a）第1对开页右页至第8对开页左页，这是献词部分，从第2对开页右页起（i^8）；（b）第9对开页右页至第36对开页左页，这是“圣母颂”（*De laudibus Virginis*）部分（$ii \sim iv^8$，v^4）；（c）第37对开页右页至第116对开页右页，这是《半神》的正文部分（$vi \sim xv^8$）。

第十二章
斯皮诺拉时祷书

约1515~1520年

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

MS Ludwig IX.18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83年10月，我第一次造访今天盖蒂博物馆的所在地，那时距离这座博物馆正式开放还有十四年的光阴。当时的盖蒂信托基金刚刚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了洛杉矶附近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山的一处荒瘠山顶。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这座新博物馆刚刚任命的馆长约翰·瓦尔什（John Walsh），开车带我沿着一条崎岖不平且满是尘土的道路向山顶行进，我们一边在松动的岩石和荆棘丛当中摸索着前行，一边欣赏着西面太平洋上那辽阔而朦胧的景色，遥望着远处的圣莫尼卡城、好莱坞的标志，以及东面洛杉矶城中心的摩天大楼。野兔不时地从灌木丛中跃起。我依稀记得头顶还有老鹰在盘旋，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在这山顶的荒野当中，我俨然感到自己位于新世界的边缘并且已将新世界踩在脚下了，约翰·瓦尔什挥舞着双臂，向我解释说，他们将在这里建造一座巨大的艺术博物馆，且馆中会收藏一批顶级的欧洲彩饰抄本。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来到洛杉矶，回到同一座山的山脚，站在酒店的阳台上，仰望着马路对面、高处的那座闪烁着光芒的现

代卫城。这一天的天气相当清爽，当然，在南加州这不足为奇。在酒店大堂，我询问工作人员是否能徒步前往盖蒂博物馆，他们颇为同情地看着我，仿佛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在智力上有欠缺，并且将我带到了酒店摆渡车所在的位置。我向摆渡车司机表示歉意，说给他添麻烦了，司机说："我们这里的人行道可不是很多啊。"摆渡车在沿着塞普尔维达（Sepulveda）大道稍稍上行一段距离后抵达第一个站点，在这段路上，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抵达第一个路口后，摆渡车左转，驶入圣迭戈高速公路下方，然后便进入了山脚的博物馆安检区域，这些安检门看起来有点像法国机动车道上的收费站。在美国，一切穿制服的人都会先将你假设为罪犯，直到最终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安检人员将身子探过来，要我出示"预约停车号"，我当然不知道要预先准备这一项内容，关键是我根本就没有车，这令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并对我产生了强烈怀疑。这里明明应该是个无阶级社会，而且博物馆是免费的，是为全体洛杉矶人创建的，但似乎任何开不起车的人都被视为该博物馆不愿意接待的人。

山脚下、安检门旁、山顶上都修建有多个多层的停车平台。除非得到允许直接开车上行，否则你就只能先穿过左侧的第一个停车场，乘电梯上行一层（在洛杉矶，没人会去爬楼梯），然后在那里搭乘白色的由三节车厢组成的无人驾驶火车了。这列小火车每隔几分钟便会有一趟，沿着山的一侧驶向山顶，一路上都在一片充满艺术气息的风景当中穿行，令你仿佛置身于曼坦尼亚（Mantegna）画作的背景风光当中，最终，小火车会抵达博物馆边上的一个小小站台。仅仅是免费搭乘这么一趟小火车也很值得。下了小火车，加州的热辣阳光便会一下子扑过来，你的眼睛着实需要时间去适应一番。这里的建筑都很宽敞，但不是很高，建筑群如同一座中世纪城镇一样，绕着山崖铺展开来，这里正是当年我和约翰·瓦尔什一起穿行过的山岩区。整座博物馆以及多个图书馆和研究中心是从1997年12月起对外开放的。建造这样一座博物馆的成本相当惊人，甚至令家底雄厚的盖蒂基金都有些吃不消。在历史上，此等规划、此等耗费，恐怕也只有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或者凡尔赛宫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从小火车终点站的站台上向外望去，能看到几层庭院堆叠在一起，仿佛是大歌剧院的舞台上的布景，而最顶层的便是博物馆的门廊。门廊中放置着巨大托盘，里面摆着各种植物，还有马约尔（Maillol）和查尔斯·雷（Charles Ray）的雕塑作品，很有艺术气息。很显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跟我们在前面章节中遇到的那些图书馆不是一回事。从骄阳之下进入博物馆，立刻就能感受到空调的作用。这里为你提供了丰富的参观选择，无论是在左边还是右边你都可以看到丰富的展品——就如同花样繁多的美国菜单一样——包括画作、雕塑、装饰艺术、摄影作品、家具，以及在昏暗的展厅中闪闪发光的泥金装饰抄本。一切看上去都是真材实料，令人放心；当然，也都价格不菲。馆中有衣着整洁的俊男靓女为你引路，他们都有着清一色的蓝眼睛和白牙齿。这些人所处的肯定是世上最热门的实习岗位，而且很显然他们都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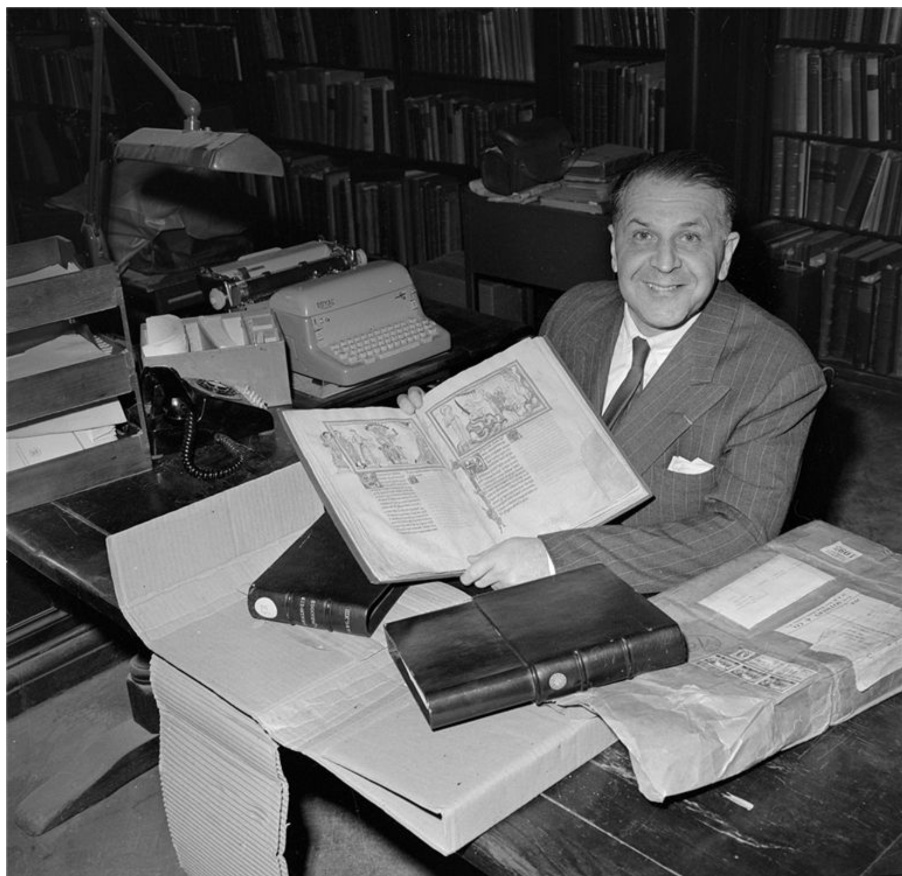
盖蒂博物馆，坐落在俯临洛杉矶的山顶之上，由艺术博物馆、研究机构和其他机构组成，从1977年起向公众开放

我告诉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我跟抄本部负责人伊丽莎白·莫里森（Elizabeth Morrison）女士有约。如果说美国的安检人员通常会将你预设为罪犯，那么可以说在洛杉矶，除了安检人员之外的所有人都会将你视为最亲密的好友，直呼你的名字。仿佛帮助我是他们最快乐的事一样，他们领着我离开门厅，回到小火车站——我本来应当从小火车站左拐，沿着那里的斜道下行，前往“中央安检处”的（这一路之上，我差不多听完了这些年轻人半辈子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好莱坞计划）。在安检台前，安检人员一如既往地要我出示“Photo ID”（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美国，它通常是指驾照。于是，我又被仔细“掂量”了一番，最终得到了一张带夹子的日间通行卡。接着，这些年轻人又护送我到拐角处搭乘另一部电梯，下到L3层，走入一条宽宽的、没有窗户的水泥走廊，这里的天花板上装设着管道，仿佛就是一条劳教所的通道，不过，各处张贴着的盖蒂博物馆的展览海报倒是活跃了氛围。拐过几个直角之后（此时，我已经彻底找不着北了），我们便进入了抄本和绘画部。年轻人带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欢声雷

动。此等热情，令我们这些习惯了欧洲图书馆之拘谨氛围的人，不免有些无地自容。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拥来，一个接一个做了介绍。这的确是个快乐的地方，足以见出管理状况是何等良好。

这间阅览室跟博物馆外墙平行。墙上高高的尖顶窗令人如同置身于中世纪城堡，透过这些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山岩，以及峡谷对面山坡上的房屋。白色窗帘当然已经拉了下来，加州的阳光实在是太强烈了。阅览室两端的书柜上摆满了最新的参考书。两个书柜边都有一张用非常厚实的抛了光的黑色木料制作而成的长桌，以及与之搭配的绿色皮椅子。其中一张桌子是用来翻阅抄本的，另一张桌子则是用来欣赏画作的。它们看来都造价不菲。我曾多次拜访这间阅览室，每次我都是这里唯一的读者。这一次，抄本桌已经预先布置好了，看上去像是摆着一份供单人享用的晚餐：灰色的泡沫垫子已经备好，它是用来支撑珍贵抄本的；颇有些分量的条状书镇看着就像是用紫色天鹅绒做的蛇，它是用来压在书页之上，使抄本在不用手触碰书页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打开状态的。桌子上还放着两端系有重物的白色绳子。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副白色螺纹手套，不过，伊丽莎白·莫里森女士随后向我解释说，博物馆正在考虑放宽这项规定。馆方还提供了用来做笔记的铅笔。

我要约见的抄本已经躺在一个很大的推车里面等候多时了，它看起来就跟一个坐在自己那加长豪车的后座上的百万富翁一样孤独。抄本被放在一个现代式样的盒子里，盒子被精细打磨过的红色摩洛哥小山羊皮包裹着，盒口上面有烫金字样，“The Spinola Hours”和“Bruges *c*. 1510”，它们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留下来的，当时纽约的大书商H.P.克劳斯（H. P. Kraus）正打算出售这份抄本，遂将之打理了一番，以增加其视觉冲击力。我们立刻能感觉到抄本的奢华和诱惑力。据说，当时有一个记者希望克劳斯先生简短地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会买彩饰抄本。克劳斯先生用他那带着明显的奥地利口音的英语说：“我能说的就是两个字——富人。”这并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时祷书”，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斯皮诺拉时祷书”。然而，这个名字恰恰就是克劳斯先生一手创造出来的，他希望能借此表现该抄本的声望和独特之处，实际上，在制作这个盒子的时候，“斯皮诺拉”这个名字尚不存在，抄本本身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H.P.克劳斯（1907~1988），知名的抄本交易商，照片当中，他手捧13世纪的《戴森·佩林斯启示录抄本》（Dyson Perrins Apocalypse），该抄本同样被卖给了彼得·路德维希和艾琳·路德维希夫妇，如今也收藏在盖蒂博物馆

在本书第九章中，我们见识了一份早期的皇家时祷书。当时我们也曾谈到，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包括半文盲在内，都向往着自己也能拥有一本时祷书。此类抄本都是为私人定制的，当时的有钱人通常会琢磨着尽自己的财力所能，购置一份最为昂贵的时祷书。时祷书通常是为家庭所用、在家族内部流传的，往往会被放在家中的小祈祷桌上，或者被放在主人的腿上。就其性质而言，时祷书是非常私密的个人物品。它们常常会被保存在床头柜上，或者在藏有家族之宝的金银首饰盒子旁边，并且会被展示给来访的客人看。实际上，博物馆要比图书馆更适合时祷书安身。本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奢华”，而盖蒂博物馆的这份抄本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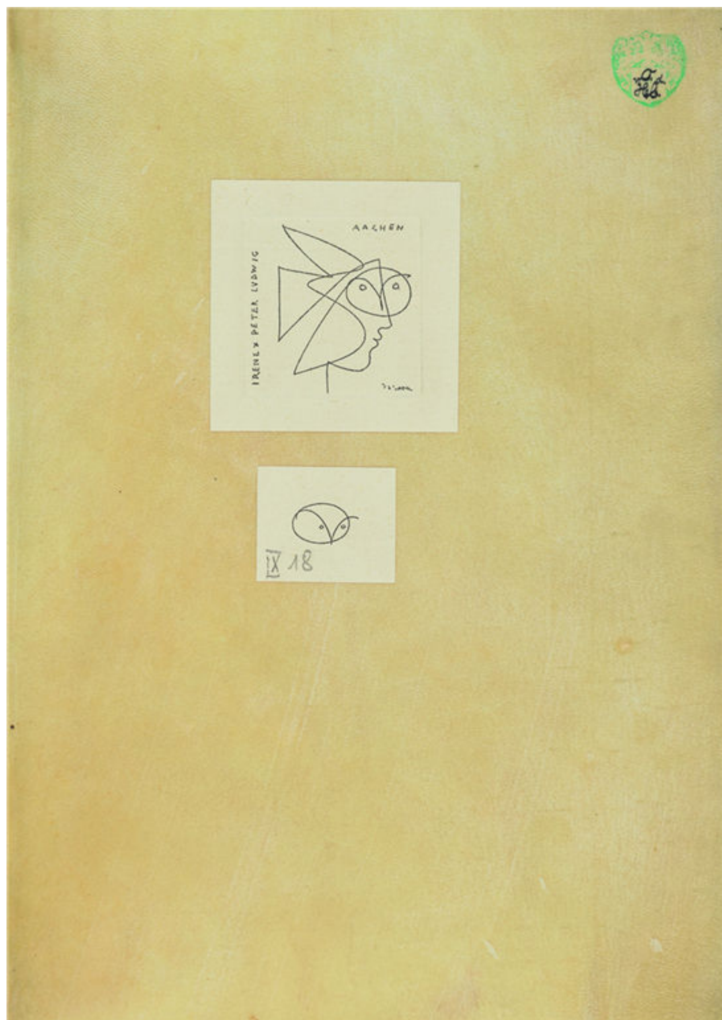
《斯皮诺拉时祷书》从来都是顶级奢侈品，造价极为昂贵。在本书的抄本史探寻之旅中，一开始我们见到的那些抄本，最初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它们的价格就是制作它们的原材料的花销。早期的抄写员和彩绘师通常都是教团成员，是不领薪酬的。他们制作出来的抄本都是为教团所用，是不会被标上售价的。不过，随着职业抄写员介入其中，私人客

户也开始雇人制作抄本（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到了这一步，抄本便有了自己的价格，且成了可销售的商品。此等情形之下，顶级抄本很快就变得非常昂贵。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降低了书籍的造价。不过，人性就是如此，克劳斯先生所说的“富人”仍然会展开竞争，去追逐那些奢华精美的彩饰手抄本。实际上，到了15世纪70年代，荷兰南部的一些商业性质的书籍作坊就几乎放弃了图书馆的订单，转而开始做奢华抄本生意，并将全欧洲的王公贵族和新起的商业寡头视为他们潜在的客户群体。此举非但没有令荷兰人失业，反而为荷兰派画师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画师有意识地在印刷术力所不及的领域开辟新路，精练自己的手艺，他们制作出来的抄本因此变得越来越奢华精美，当然也越来越昂贵。现在，我坐在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文化机构之一的盖蒂博物馆内，准备见一份由荷兰画师绘制的抄本中的顶级作品。

刚离开盒子，《斯皮诺拉时祷书》就展现出了雍容华贵的气质。它比很多时祷书大，大约是9.25英寸长、6.5英寸宽、2.5英寸厚。抄本本身的装帧用的是18世纪晚期的深红色皮革，且从封皮的风格来看，很可能是来自意大利的皮革。封面和封底的边缘都有一圈金色的花边饰，是由不断重复的卷叶纹饰和花纹饰组合而成的。封面正中央呈现的是一个盾形纹章，纹章的上方是一顶王冠，两侧则被洛可可纹饰围绕起来，凸显了抄本主人之尊贵地位以及抄本为其独有的性质。这是热那亚的斯皮诺拉家族的纹章，抄本的现代名字正源于这个家族。我们会在后文考察抄本的各任主人的身份。书脊上有七条隆起的横条将缝合线覆盖起来，但没有文字。应该说，并没有必要在书脊上印文字，因为这份抄本一开始就不是为图书馆制作的，所以无须写上书名以供读者辨识。抄本的贴金书口上刻着十分精美的菱形图案，且每个菱形框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冠图案。此等装饰也就是所谓的“书口烫花装饰”（gauffering）。它们很可能是这份抄本首创的，因为在接近结尾处的一幅插图当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就拿着一本金边书，上面有极为相似的设计。封皮的四角稍有受过碰撞的痕迹，不过总体来说，《斯皮诺拉时祷书》的保存状态堪称完美。毫无疑问，它是得到了悉心看护的。



《斯皮诺拉时祷书》年历的开篇页，呈现的是一个人先在一月的炉火边取暖而后小心翼翼地来到冬日的庭院里的场景



《斯皮诺拉时祷书》衬页上的彼得·路德维希（1925~1996）和艾琳·路德维希（1927~2010）的藏书标签，由瑞士艺术家汉斯·埃尔尼设计

一番观察之后，我戴上了白手套——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不想冒犯十分友好的管理员克里斯蒂·赛亚卡（Caristine Sciacca）——并开始翻阅抄本。封皮内侧以亮绿色绸缎作为封里。正对着它的衬页则是一张相当厚实的羊皮纸，并且被封里的边缘固定着。此页上有两张现代印制而成的藏书标签，呈现的是略显抽象主义风格的人物侧脸图案，其中的人脸跟猫头鹰脸重叠在一起，共用一只眼睛，该图案是瑞士艺术家汉斯·埃尔尼（Hans Erni，1909~2015，享年106岁）蚀刻而成的。一张标签上面印了几个大写字母，“Irene & Peter Ludwig, Aachen”（艾琳和彼得·路德维希，亚琛）。实际上，这两张标签差不多给出了该抄本生平当中唯一明白无误的信息：其昔日主人（虽然只是在短暂的五年中）是彼得·路德维希博士（Dr Peter Ludwig, 1925~1996）和他的妻子艾琳（Irene，1927~2010），他们分别来自亚琛和科隆，是巧克力业大亨，

更是艺术收藏大家，尤其热衷于20世纪的绘画作品。路德维希夫妇是从克劳斯手中购买到《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当时的克劳斯正在其事业顶峰。克劳斯先生的女儿玛丽·安·福尔特（Mary Ann Folter）很是友善地告诉我，这桩买卖发生在1978年1月，当时的标价刚好超过一百万美元。一本书能在20世纪70年代卖出上百万美元的价格，这可不是寻常的事。实际上，路德维希博士此前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秘密的抄本购买经历了，只不过基本上都是从克劳斯手中购买的。我跟路德维希博士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个子很高且沉默寡言。他的藏品一直被存放在科隆的希努特根博物馆（Schnütgen-Museum），那里的彩饰抄本藏品种类繁多、极其丰富，就如同巨龙的黄金宝藏，记得当时陪同我参观的正是路德维希博士手下极为精明的名录编制人约阿希姆·普罗齐克（Joachim Plotzek）。在他最终印发于世的希努特根博物馆藏品目录中，《斯皮诺拉时祷书》被绘制在了第二大卷的红色封面之上。1983年，路德维希收藏的大约一百四十份彩饰抄本被一次性出售给了新建的盖蒂博物馆，博物馆此举的意图是要填补古代文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之间的藏品空缺，这笔交易在当时的德国引发了民众的反感情绪。也就是由于这桩交易，约翰·瓦尔什载着我登上了洛杉矶郊外的那个蛮荒山顶。

抄本的第一页是空白页。翻过这张空白页，我们便一下子进入了中世纪晚期的世界。《斯皮诺拉时祷书》跟大多数《圣咏》抄本和时祷书抄本一样，也是以圣徒年历开篇的。年历分两栏写就，用的是红色和黑色墨水，且页面上的彩饰极为丰富。一月的页底配图是一男一女的室内生活场景，背景是在冬天。我们很难猜测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最起码，图中的那个男人衣着考究，腰间挂着钱包；他们的窗户是石质直棂的，很高且装有玻璃；巨大的壁炉也是用石料建成，刻有盾形纹章；但这样的房间又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卧室-客厅两用房间，睡觉、吃饭、起居都在这个房间里。很显然，这不会是中世纪贵族的住所，倒有可能是城堡里仆人使用的房间。图中的女人正在准备一人份的饭菜，看样子很孤单，就像坐在盖蒂博物馆这间阅览室的长桌旁的我一样。那男人则由一只猫和一壶酒陪伴着，在炉火前面烘烤自己那已经冻僵了的手脚。画面最右侧是另一个男人，或者可能是装束稍有不同的同一个男人，正小心翼翼地走进一月的雪地里，他脖子上缠着灰色围巾，双手藏在外套里面。那条通往院门的路此前已经被踩过了，泛着棕褐色。到了二月，雪融化不见了，农夫们已经开始犁地并往地里种植物，很可能是在架葡萄藤。三月的配图里一对贵族夫妇正走出城堡，带着他们的宠物狗，进入外面的花园。天气还没怎么转暖。园丁们正在铺设花坛，他们戴着帽子，穿着短外套，还没有脱掉羊毛裹腿。仔细观察，你就可以发现背景中有一条护城河，一群天鹅正在河里游动，游向吊桥上的一个妇女。她可能是前来给这些天鹅喂食的。四月，家畜第一次离开院落，来到外面田野里。老牛带着牛犊，绵羊领着春天刚出生的羊羔，母鸡则被一群小鸡围着。牛的脖子上都系着铃铛。一个妇女正在挤牛奶，另一个妇女则在搅拌牛奶制作黄油。五月第一天的天亮时分，古老的立夏庆祝活动开始了，贵族纷纷骑马来到一座桥上，桥下有一条船，年轻人在船上聚会，那插着山楂树枝条的船儿正慢悠悠地顺流而下，船上还有几位乐

师。一个年轻人正在船的后部饮酒；另有一个酒瓶被挂在船侧以便给酒降温。岸边的鸢尾花已经进入繁盛期。实际上，在初夏时节的剑桥大学，透过公寓里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剑河上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景色。六月迎来了剪羊毛的时节，一个男人在酒馆外的凳子上歇息。七月是割草的时节，割下的青草已经装满了推车。我一页一页地翻动着抄本，中世纪一整年的景象便渐渐出现在我眼前。八月的人们忙着收割小麦。九月要开启一个新的季节，为此，人们犁地和播种。时令就这么继续下去，一直到十二月，雪花重现，护城河里的水流再次结成冰。在该图的前景中，人们正在杀猪，并将猪血盛放在一个煎锅里，画面左侧厨房里的人则在制作血布丁，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准备的。这些画面都是我们极为熟悉的，但是在抄本中被渲染得仿佛有魔力一般。固定的节律令我们的内心涌起难以抗拒的浓浓乡愁。画面之真实、之亲切，如同勃鲁盖尔（Brueghel）的作品。我从管理员那里借了一个放大镜，转瞬间，盖蒂博物馆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便都消失了；恍惚间，我已能碰触到（除了我还戴着那可恶的手套）16世纪之初荷兰南部的乡间生活。场景一下子变得十分真实，生活中最微末的细节都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此等直接的触碰带来的喜悦，恐怕是任何的影印本都无法提供的。

第549~550页：年历的三月和四月，三月人们开始修剪城堡花园里的葡萄架，四月人们开始领着家畜到外面走动



第551页：《斯皮诺拉时祷书》年历的五月，呈现的是划船聚会场景，人们在音乐和美酒的陪伴下庆祝着五月的到来和夏季的降临

说到底，这些中世纪时祷书所附的年历都是早已佚失的4世纪的“354年编年史”之后裔。在本书第四章（第171页）中，我提过“354年编年史”这份古代晚期的神秘抄本。它诞生于信奉古代异教的时代，是为某个早期基督徒制作的年历，于9世纪重见天日，当时的加洛林宫廷对它十分推崇并以它为范本制作了抄本。它开启的抄本王朝持续时间之长令人震惊。《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开篇语是，“Januarius h[abe]t dies xxxi”（1月有三十一天），这句话是一字不改地从其一千一百五十年前的先祖那里借取而来的。《哥本哈根圣咏》（见本书第七章）以及《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中的年历也采用了此开篇语。古代的黄道十二宫，虽然跟这样的基督教祈祷书并无任何实际关联，但也依然出现在了《斯皮诺拉时祷书》抄本年历页每一页的下端角落里，很显然，这是从“354

年编年史”当中传承而来的。



《斯皮诺拉时祷书》年历页面顶端的童趣游戏画面，此处呈现的是七月的场景，孩子们在吹奏乐器和捕捉蝴蝶

《斯皮诺拉时祷书》抄本中，年历页的顶端呈现了一系列的童趣游戏，但并不是所有游戏都能够被辨识出来（至少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些游戏图的画面是金色和褐色的，像是木刻画。一月，孩子们在模仿骑士比武，纷纷拖着圆桶穿越冰面。似乎还有跳舞游戏，孩子们有点像是在跳康加舞，骑在彼此的背上。四月，孩子们显然是在玩弹子游戏。七月则是在用帽子捕捉蝴蝶。十二月，孩子们到处嬉戏玩闹，骑上木马相互踢打，并且一起划船，捕鸟，进行撞柱游戏、推铁环游戏以及滑雪橇等。中世纪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通常都不那么兴高采烈，神态都很凝重，但是，这些孩子的确玩得很高兴。





第554~555页：《斯皮诺拉时祷书》中的第一幅大图，呈现的是基督背负十字架走过“苦路”的场景；尔后他在天堂复活并赐福尘世

中世纪抄本所附年历当中重要的圣徒节日，通常会被用红色的文字标注出来，我们今天会称那一天为“Red Letter Day”（“红字节日”，今天也指纪念日）。在《斯皮诺拉时祷书》当中，这些重要节日也会被呈现在页面边缘处的圆盘中，这些圆盘有时会被链条状的图案“系”在页边框上，有点像是圣诞树上吊着的圆球。《斯皮诺拉时祷书》里面的“红字节日”都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普通节日，基本上没有地方化的元素，这也许会让人有些失望。当然，这份年历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次要的名字，这些名字相比之下就不像是抄写员从自己的储备库里抽取出来的，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圣徒，诸如阿尔德冈达（Aldegunda）、阿曼德（Amand）、圣女华波加（Walburga）、格特鲁德（Gertrude）等；以及一些北欧的地方圣徒，如：尼卡修斯（Nichasius）、贞古尔夫（Gengulph）、波尼法修（Boniface）、伊拉斯谟（Erasmus）、塞味利诺（Severinus）、雷步英（Lebuin）、威廉巴（Willibald）、基利安（Kylian）、多纳图斯（Donatus）、雷马克（Remacle）、两个厄瓦德（Ewalds）、一万一千贞女、于贝尔特（Hubert）以及威利布罗尔德（Willibrord）等。借助阅览室参考文献里面的圣徒词典，我们便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圣徒的名字断定眼前这份《斯皮诺拉时祷书》抄本是在佛兰德斯、荷兰和莱茵兰地区制作的，当然，其实仅凭抄本的绘图风格，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众圣徒的名字足以提醒我们，这份抄本首先是一本祈祷书。将书页从年历页往后翻，便能对抄本的宗教用途一目了然。首先出现的是一幅

双页插图，一页呈现的是圣母和圣维罗妮卡（Saint Veronica）的画像，画工十分精细，两人的眼睛里泛着泪光，因为她们正看着沦为囚犯的耶稣被士兵们拖拽着，行走在“苦路”（Via Dolorosa）之上；另一页呈现的则是已经飞升天堂的基督的正面像。他手持水晶球，在众天使的簇拥之下，众天使则身穿金色和浅红色的袍服。基督在庄严祝福中抬起右手。这样的构图应该是从另外的抄本中借取而来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它出自大画家扬·凡·爱克（Jan van Eyck）的一幅已经佚失的画作。这两幅图的画风极具写实风格。图中的耶稣都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看画人的眼睛。倘若今天再有人创制这样一幅宗教绘画，我们势必会认为它过于情绪化，具有过于强烈的罗马天主教风格，对之嗤之以鼻。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意识到这是五百年前的画作，而且是手绘的。实际上，它们能让人略微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的精神。它们唤起的宗教情感在抄本和读者之间反复震荡着。荷兰人的基督教信仰极其私人化。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创始人格特·格罗特（Geert de Groote, 1340～1384）、被人们普遍认作《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作者的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约1380～1471）等人强调并主张的，恰恰就是个体在俗信徒跟救赎之间的直接关联，所谓直接关联，意思就是无须通过教会这样的“中介”机构。普通的在俗信徒是可以直接凝视基督的眼睛的。祈祷和个体信仰都是很棘手的社会史论题，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弱。时祷书是个体虔诚度的试金石，而这些在荷兰南部广泛存在且极为盛行的祈祷书，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难以捉摸且少有记录的方面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不妨直奔主题，见识见识该抄本的主体文本，也就是圣母日课。实际上，该文本是在整部抄本的三分之一处才开启的。跟大多数时祷书一样，只要找到相应的开篇图，就能够很轻松地找到文本了。按惯例，夜祷对应的开篇配图是“圣母领报”。抄本最初没有页码；如今我们将有这幅图的页面标注为第92对开页的左页，但是抄本的早期主人们都是借助开篇图来定位文本的。这一页几乎是《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标题页，配图将页面中间的文本框环绕起来，文本框里有用红色墨水写就的如下字样：“Incipiu[n]t hore beate marie virginis secundu[m]usu[m]Romanu[m]. Ad matutin[as]”（依据罗马惯例，圣母日课始于夜祷）。画面当中呈现了一座拥有古典风格的淡紫色大理石柱的房子，以表现“圣母领报”发生于古典时代，不过房子本身是弗莱芒文艺复兴时期的砖墙建筑，坐落在一个泥泞的庭院当中，带有一个围了篱笆的花园，花园边上则是一个中世纪的门房，远处还有镇上的钟楼，整个画面就跟布鲁日（Bruges）的景观差不多。我们既可以看到建筑外面的景观，也能看到其内部情况，整幅画面就如同透过X光机一样，可以一直看到圣母卧室旁的家族礼拜堂里面的景象。画面当中，在一份祈祷书前面跪地祈祷的正是马利亚本人，那用于祈祷的书也像是一本时祷书，有着绿色的布封皮，被摊在祈祷桌上。



第558～559页：“圣母领报”图，在圣母祈祷之时，天使长前来传递信息；与之匹配的是基甸祈请圣露降在羊毛上面的场景，这是典型的《旧约》画面

在此，不妨试着将自己融入16世纪之初的一个虔诚的欧洲妇女的心境当中。她会被告知，此一历史性事件——加百利出现在马利亚位于拿撒勒的家中——是创世历史中最令人敬畏也最为神圣的事件（《路加福音》1:28）。在这样的一个神圣时刻，一个纯粹的凡夫俗子，如同你我这般，突然发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众女子中受赞颂，并就此孕育了圣子。自此之后，但凡虔诚的基督徒，无疑都将渴念得到上帝此等的绝对接纳。中世纪的时祷书的女主人，很可能会盯着这“圣母领报”场景，幻想得到此等拣选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幅图令她集中自己的虔诚心念。她会摒弃一切杂念，一门心思地去领悟圣母本人在那样一个时刻的心念和体验。同样的，中世纪晚期的男性信徒，也会被鼓励着去亲身体悟基督在受难事件和十字架事件中感受到的恐惧和痛楚。毫无疑问，“圣母领报”和“受难”是中世纪晚期艺术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主题。

在“圣母领报”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如同画面所示，圣母按照惯例是要跪在祈祷书面前全心祈祷的。我们无法看到祈祷书上的文字。不过我们也都知道，拿撒勒在罗马帝国境内，《路加福音》的开篇便已经明示了这一点，拉丁语则是罗马人的通用语言。由此便可以非常合理地推断出，圣母面前的祈祷书应该是《旧约》，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诗篇》和《先知书》。中世纪的人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探究，就可以认定圣母是在用拉丁语祈祷。因此，时祷书的主人在诵读并体悟圣母日课中的拉丁语《诗篇》和《先知书》经文的时候，会认为自己面对的就是圣母当年诵读并思量的字词。她会在自己家中的读经台上放上一本摊开

的时祷书，如同图中圣母所做的那样，为自己重现圣母登上这一切宗教体验中的绝对巅峰时的历史场景。天使长的著名赐福，“*Ave*”（没有标注受赐福之人的具体名字），“*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被呈现在画面正中，用的是金色的哥特字体，意思就是，“万福，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这句话可能也是说给读者听的。

圣母日课当中，各个“时辰”对应的祷文，通常都取自圣母本人应该也知道的《旧约》经文。起始句一般来自《诗篇》50:17以及《诗篇》69:1～2。夜祷文通常涵括以下内容：《诗篇》94，“Venite exultemus ...”（来阿,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诗篇》18，“Celi enarrant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23，“Domini est terra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等等。还有出自《便西拉智训》24:11～20的三段经文，它们描述的是上帝的永恒以及选民的至福。中间反复穿插了诸如“Ave maria gratia plena”（万福马利亚，你充满圣宠）以及“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你在众妇女中受赞颂）——天使长加百利就是用这几句话打断圣母诵读《诗篇》的。



第562～563页：星期天圣三一日课的经文配图；与之匹配的是亚伯拉罕和三个天使的画面，寓指《旧约》对三位一体的预示。此页上的文本框给人以错觉，看上去像是羊皮纸条被钉在了页面上

夜祷是指在黎明前，加百利出现在马利亚于拿撒勒的家中的那个时辰，诵读时祷书中的对应祷文；晨祷则是在天刚刚亮，马利亚派人去请自己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时候；第一时辰的祷文是在清晨诵读的，此时大

约就是耶稣诞生的时间；第三时辰的祷文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诵读的，前一天夜里离开了自己的羊群的牧羊人就是在此时抵达伯利恒的；第六时辰的祷文是在上午快要结束的时候诵读的，这个时辰更为尊贵，因为三王就是在此时携带财宝来朝的；第九时辰（None）这个词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Noon”（正午），是指中午时分，圣子就是在这个时辰稍晚些的时候被送往神殿祭司处行割礼的；晚祷则是傍晚时分的功课，圣家（Holy Family）就是在这个时候逃向埃及，以躲避希律王的怒火的；睡前祷告则是在夜间的第一个时辰进行的，圣母是在此时终结其尘世生命，升入天堂的。时祷书中的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彩绘图，从“圣母领报”（如我们所见）、“圣母往见”、“圣诞”、“牧羊人”、“三博士”、“割礼”、“逃难”一直到“圣母升天”。这些都是所有时祷书中的常见主题。

在中世纪晚期，像《斯皮诺拉时祷书》这般奢华的抄本并不多见，它为从夜祷到睡前祷的每个时辰都配了多组祷文，以便抄本主人在一个星期的不同日子里使用。圣母日课前面还有大约八十页的篇幅，呈现的是星期天的三一日课、星期一的圣灵日课、星期二的圣灵日课、星期三的诸圣日课、星期四的圣礼日课、星期五的十字架日课（耶稣被钉十字架事件就发生在星期五），圣母日课则被安排在星期六。另外还有三份简短的敬礼弥撒，分别是三王弥撒（Mass of the Three Kings，同三王在科隆的圣物有关的，或是同皇族有关）；消除瘟疫弥撒——黑死病留下的可怕记忆仍在人们的脑海中；以及行路人弥撒。

圣母日课之后便是忏悔诗，以及与忏悔诗相伴的连祷文。这部分文本是在第165对开页的左页开篇的。自早期基督教时代以来，七忏悔诗便一直是祈祷书的组成部分。据说，它们寓指七宗罪，而这七宗罪是那极易犯错的《诗篇》作者大卫王在不同时间犯下的。在中世纪晚期，七忏悔诗通常是在大斋节期间的星期五诵读的，不过，对于个人来说，则很适合在犯下错误或变得软弱时诵读。与之相伴的连祷文也非常迷人，由古老的呼告组成，一个接一个地召唤诸圣徒的名字，极具节律感，如同钟声一般，以“Ora pro nobis”（请为我们祈祷）为间奏，接着便列举出人类内心深处的诸般恐惧和尘世之上的诸般危险，如打雷、闪电、暴死等，并求主将我们从中解脱出来。跟年历一样，连祷文也是源自基督教的初创时代的。它们在内容上连接着第184对开页左页的亡灵日课（Office of the Dead）。死亡是中世纪欧洲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战争、无法预测的歉收、瘟疫以及悄然而至的疾病，都令生命变得极为脆弱。那个时候的欧洲人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死亡会不期而至，担心自己会没有时间忏悔，也没有时间行临终礼。亡灵日课由一系列的葬礼仪典组成，读者会想象那正是他们自己的葬礼。这就好比主动参加自己的葬礼，并以此阻断死神不期而至的机会，而且，做好准备总是一件明智的事。

《斯皮诺拉时祷书》在诸多短祷文和经文、圣哲罗姆辑录的《圣咏》以及圣伯纳德辑录的韵文中结束，最后一部分内容包括为忙碌之人定制的删节版《诗篇》，一连串的召请特定圣徒的长长的代祷文，以及在弥撒仪式前后进行私人祷告时诵读的祷文。其中记录的五百多年前人们的日常期望和恐惧，令“时祷书”在不经意间成为极其鲜活的历史文

献。

今天的人们在欣赏一份时祷书抄本的时候，主要是在品鉴其中的插图。盖蒂博物馆是一座艺术博物馆。它收藏的时祷书抄本已经超过三十份，更有大量来自其他时祷书抄本的残片。此等抄本里面的插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本配图。它们不是用来呈现文本叙事的（时祷书的文本本身也没有叙事性）。时祷书里面的插图，如同我们之前在找寻夜祷文部分时经历的那样，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设置，借助它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并找出所需文本，同时，它们也起到了辅助冥想的作用。《斯皮诺拉时祷书》的真正特点就在于：很多插图在画工精美之外，都是极为复杂且极具新意的。2003年，《斯皮诺拉时祷书》来到伦敦的皇家学院展出，当时人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份在彩绘插图上最具野心也最具创造力的16世纪的弗莱芒抄本。"考虑16世纪正是彩饰抄本大量涌现的时代，这样的赞颂可谓分量十足。抄本中的许多插图以对页的形式呈现，如同双联画一样。右页上的场景有时是以预表的形式呈现的，确切地说，就是通常会呈现《旧约》中的某个事件，而该事件的寓意将在基督教中得到应验。比如说，亚伯拉罕和三天使的插图，就是同三位一体的画面成对出现的，以标识三一日课的开篇。其中的寓意是：亚伯拉罕与作为上帝信使的三天使的此番相遇（《创世记》18），预示了日后基督教阐述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收取灵粮（《出埃及记》16）以及麦基洗德将饼和酒赐予亚伯兰的士兵（《创世记》14）的场景，则与中世纪的圣体游行队伍对应起来，星期四的圣礼日课的配图正是圣餐所用的圣饼——维系基督徒生命的神圣之粮。摩西以及摩西挂在杆子上用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铜蛇（《民数记》21）则被置于"基督被钉十字架事件"插图的旁边，以标识十字架日课的开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圣母日课的夜祷文的开篇插图"圣母领报"，则是跟基甸祈求羊毛上的露水的故事（《士师记》6:36～40）匹配起来的，因为后者预表圣灵感孕事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为《旧约》和《新约》中的许多《圣经》故事提供了在插图中出场的机会。当然，这需要我们对经文有所了解，或者熟悉其他呈现了《圣经》中的预表的艺术作品，比如说在当时的荷兰地区颇为流行的《穷人圣经》（*Biblia pauperum*）。我们时常能够在弗莱芒花饰窗上面看到类似的绘图。《斯皮诺拉时祷书》当中的《旧约》场景强化了这样的类比，即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圣母本人所知的那个宗教世界。抄本中还有一系列十分逼真的圣徒画像；两幅亡灵日课的配图，呈现的是庄严的死亡场景和一场昂贵的葬礼；以及末日审判图，图中基督脚踩水晶球，驾临金色天穹，尘世之人则正从凡间的雾瘴当中爬升上来。



财主与拉撒路，这是星期一的亡灵日课的配图，呈现的是富人宴饮的场景，一只猴子蹲在窗沿上，一个穷人因乞讨未果而死去，他的灵魂升入天堂

在盖蒂博物馆阅览室的长桌边反反复复地欣赏这些插图，这样的体验实在是太过瘾了。这些图也许无法触及现代读者的内心，但定会让人身心愉悦，并将往昔的生活图景都带至读者的眼前。实际上，品味这样的画作，就仿佛在参观挂满弗莱芒老画师作品的艺术长廊，因为前者在品质上甚至不逊色于顶级木板画。一些小的细节更是为画作添加了更具吸引力的人文主义色彩和不可抵挡的魅力。任何读者都会期望向他人指明这些元素，跟众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在一幅插图中，一个富有之家的客厅里面有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鹦鹉。鹦鹉旁边有一只蹲在窗沿上的猴子——关于这只猴子的品种问题，我回到剑桥之后，特意请教了灵长类动物学家威廉·麦克格雷（William McGrew）教授，他告诉我，这是一只巴巴利猕猴，很可能是来自直布罗陀。小天使从圣母花园里偷摘花

朵，那些都是百合花。听闻圣诞的消息，一个牧羊人欢呼雀跃，他身边的狗却是一脸茫然。克劳斯先生在他还是抄本的主人时，曾用这幅插画制作了圣诞卡片。约瑟在逃难埃及途中休憩时，在一条瀑布旁边给一只蓝白相间的陶罐灌了水，陶罐的倒影映在下方的一池碧水当中。今天的比利时仍然在生产这样的陶罐。孩子们如我们常见的那般在大人的腿间穿行，以便挤到最前面观看耶稣受刑的场面，那奇景也当然令孩子们震惊不已。孩提时代的大卫正在试着戴上大人的头盔，那头盔对他来说太大了，于是他在同歌利亚决斗之前扔掉了它。污水顺着将死之人所在房间的外部砖墙流下，那个房间的窗沿上面的花显然被浇了过多的水。还有一幅图呈现的是美妙的夜景，星星开始在夜空中闪耀，照在西边地平线上的最后一抹夕阳中，圣朱利安坐在一艘小船上，一个妇女正为这位圣徒打着一盏灯笼。学者在研究抄本时，总是习惯于从一座大山的山顶望向另一座大山的山顶，完全忽略了掩映其间的峡谷和小山丘[这是抄本学家L.M.J.德莱西（L. M. J. Delaissé）于20世纪60年代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比喻]；说得没错，我也是直到为苏富比拍卖行编制普通时祷书拍卖名录时，才真正意识到这些极具新意的非凡抄本有着何等卓越的品质，而《斯皮诺拉时祷书》毫无疑问就是我希望看到的那个高耸入云的大山之巅。



耶稣被钉十字架，星期五十字架日课的配图，图中的文本框看上去仿佛是立体的，似乎能转到另一侧

接下来我们还有别的任务，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对《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另外两个特点做简略介绍。其一，任何一本书的书页本质上都是平面的、二维的，毕竟文本的性质就是如此。视角的逐步演化是艺术史中的标准主题之一。此一时期的欧洲画师已经开始尝试将平面的书页同三维空间的错觉结合起来了。这在15世纪晚期成了抄本艺术中最受关注的技法之一，特别是在意大利东北部以及荷兰南部。《斯皮诺拉时祷书》插图大多绘有给人错觉的木质画框，黑色和金色的阴影令画框呈现出立体感，就仿佛是立在我们眼前的实体木板画，或是一扇开向一个平行宇宙的实实在在的窗户。页面中央的长方形文字框则打破了这一错觉。有时，画师会对文字进行改造，刻意为其制造出一些阴影，令其看上去像是写在落在书页上的立体卷轴上的；有时，画师会让文字看上去

像是写在钉在书页上的羊皮纸条上的，其逼真程度会让我们在一时之间觉得那钉子也是真的；有时，画中的天使会倾斜着身体进入我们的世界，拿着那文字框给我们看；有时，画师还会将文字框画成长方形的镶板的样子，并将其一侧“铰接”在画框上，使其看上去可以像百叶窗那样被折叠起来，以展示被它覆盖了的背景中的画作。这些画师在以全新的方式试探现实和错觉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试验产生的效果则是完全无法由印刷实现的。


dextris dei. V. Stephanus ple
nus gratia et fortitudine facie
bat prodigia et signa magna in
populo. Oremus. Oro.
Omnipotens sempiterne
deus qui primitias martyrum in
beati levite stephani sanguine
dedicasti. Tribue quesumus ut
pro nobis intercessor existat qui
pro suis etiam persecutoribus ex
oravit. dominum nostrum ihesum
xpristum filium tuum Qui tecum
vivit et regnat in unitate spiritus
sancti deus per omnia secula se
culorum Amen.

页面边框上的花饰十分写实，昆虫都不免在上面停留，但实际上那些昆虫也是画上去的

另一个特点很容易被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插图掩盖，那就是，《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每一页文本页都绘有华丽的边框，将文本环绕起来。此等全方位的页面边框贯穿了整份抄本的文本页，即便是在最为昂贵的

抄本中，这种情形也极为罕见。《斯皮诺拉时祷书》的页边异乎寻常地宽，这跟《半神》抄本有点像。每页的文本部分大约只有4英寸长、3英寸宽；文本的四面都是边框，边框为5.75英寸长、4英寸宽；页面的总面积则几乎是带框文字的两倍，长度超过了9英寸。倘若宽页边是奢华的表现，那么这份抄本已经奢华到了极致。一些环绕文本的边框给人以织物或者蚀刻木材的错觉。大多数边框是以所谓的“根特-布鲁日”风格呈现出来的，这意味着，它们都饰有十分写实的花朵和莓子，那些花朵和莓子仿佛就是在被采摘下来之后，被随意扔在了浅金色或彩色的地面上，它们的影子落在右边。其中各种花都有，康乃馨、蓟花、矢车菊、玫瑰、紫罗兰、石竹、草莓花、勿忘我，等等，画工更是细致入微。有时候，还会有蜗牛和其他昆虫混杂其中，看起来同样逼真。这造成了一种双重错觉。花朵如此真实，连蝴蝶都信以为真，遂停在花朵上面；我们不自觉地伸手去赶走蝴蝶，这时才意识到，那蝴蝶也是画上去的，真正受骗的是我们自己。

如今，盖蒂博物馆的阅览室管控严密，并不会出现蝴蝶。现代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拥有巨大权力，就如同公司里的合规官一般。工作人员甚至都不会被允许将花瓶带到办公室，以免昆虫之类的生物趁机溜进来。《斯皮诺拉时祷书》中的视觉陷阱，只有在抄本于开着窗户的家中被使用，或被放于坐在室外花园中的主人的腿上时，才会奏效；而这一点，也能令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的日常生活的信息。

在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兰德斯地区的大量抄本中，《斯皮诺拉时祷书》是一位亲王，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皇家抄本家族。这个抄本家族或多或少包括了那个时代中最为奢华的一批时祷书，比如，1508~1519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第一祈祷书》（First Prayerbook，现藏于维也纳）；《花饰时祷书》（La Flora Hours，现藏于那不勒斯），该抄本的主人很可能是于1483~149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现藏于维也纳），主人是于1488~1513年在位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及其王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伊莎贝拉时祷书》（现藏于克利夫兰），主人是1474~1504年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罗斯柴尔德祈祷书》（Rothschild Prayerbook，现藏于澳大利亚珀斯），实际上是一本时祷书；《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时祷书》（Hours of Albrecht of Brandenburg，现由私人收藏），阿尔布雷希特也就是1514~1545年的美因茨大主教；此外还包括了一系列皇家日课经，比如《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日课经》（Breviary of Isabella of Castile，现藏于伦敦）；《曼努埃尔一世的日课经》（Breviary of Manuel I，现藏于比利时安特卫普），曾为1495~1521年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所有；《葡萄牙的埃莉诺日课经》（Breviary of Eleanor of Portugal，现藏于纽约），埃利诺是一位王太后，亡于1525年；以及《格里马尼日课经》（Grimani Breviary，现藏于威尼斯）。这些抄本的前主人都是当时欧洲的统治者。

在此一时期荷兰南部地区的奢华艺术品市场中，这些抄本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每份抄本都是由众多画师合作完成的。它们跟普通时祷书

不同，普通时祷书抄本通常是由一个画师绘制的。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所有这些奢华抄本都出自同一批画师之手。五个当时极为杰出的彩饰师中，有四个参与了所有这些奢华抄本的绘制工作，包括《斯皮诺拉时祷书》在内。他们在这些项目中的角色和作用有大有小，就如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那些人一样。这看起来就像是雇主刻意想要将当时所有名画师的作品都纳入自己的抄本。

此一时期的抄本制作业还有一个奇特之处：书商不曾参与这个流程，至少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比如，跟法国、意大利乃至英格兰的情况不一样，对于布鲁日、根特或者安特卫普这些地方的抄本委托代理人，我们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最初，这是因为荷兰南部地区的商业城市都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行会章程。比如说，在布鲁日，抄业制作行业涉及两个行会，一个是圣路加画师和马鞍制造者行会，这个行会非常强大，成员可能包括抄本彩饰师；另一个是福音书作者圣约翰抄本制作者行会，这个行会要小很多，总部设在埃克豪特修道院（abbey of Eeckhout），也就是今天的格罗宁根博物馆（Groeninge Museum）的所在地。在画师行会推行的一系列的章程规定下，客户同画师必须面对面建立委托关系，不得通过中介；除非涉及王公贵族，否则便不得有例外。

恰恰就是这个例外，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了追源这些奢华抄本的线索。作为抄本委托人的王室成员或者亲王完全绕过了书业行会。这些抄本制作项目的管理人可能就是他们的私人抄写员，抄写员负责统筹规划，从有限的优秀画师中挑选合适人选。从有几份抄本中我们可以追踪到抄写员的名字及其作品，比如，布鲁塞尔的F.格拉提安（F. Gratianus）在摩根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查理五世的时祷书抄本上留有签名；约翰尼斯·德·波玛利亚（Johannes de Bomalia）在包括《詹姆斯四世时祷书》在内的多份抄本中都有签名。《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文本用的是哥特体，字迹圆润，排列均匀，非常清晰。据我判断，它的抄写员也是《罗斯柴尔德祈祷书》的抄写员，而且两份抄本用的应该也是同一批画师。有一个小小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追踪此抄写员的身份。《斯皮诺拉时祷书》第8对开页左页上的开篇标题旁以及第312对开页右页的文本结尾处，都有小写的首字母“d”，倘若这不是签名，就很难做别的解释了。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在盖蒂博物馆用个午餐。陪同我一起用餐的是莫里森女士和托马斯·科伦（Thomas Kren）先生，两人分别是现任和前任抄本部负责人。博物馆中有多家餐厅，他们带我去了其中一家。餐厅里的世界跟文艺复兴时期的佛兰德斯完全不同。加州风情令人沉醉，食物都是极为健康的，用餐的人都相当苗条，喝的是冰镇矿泉水，侍者也极为亲切。从餐厅里可以远眺洛杉矶，那美丽的风光令人叹为观止。托马斯·科伦的毕业论文写得就是根特-布鲁日地区的彩饰，他在荷兰南部抄本研究领域是一位公认的专家。对我来说，现在正是个好机会，可以就着黄尾鱼鱼生配牛油果的美妙午餐，向这些专家讨教一番。

托马斯及其同僚都认为《斯皮诺拉时祷书》出自五个画师之手。抄本中的一些插图是由某个画师独自创作的，还有一些则要归功于该画师

的“作坊”。就我自己来说，我确实搞不清楚作坊内部的分工情况，我能做的就是对品质进行鉴定，鉴于我们对中世纪抄本制作中的协作情况以及画师执业生涯中的起起落落的了解，我认为独立作品和团队作品实际上是难以区分的。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为这五个画师编号，并将他们所绘的《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八十四幅整页插图进行如下分类。（1）有四十七幅插图是由“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绘制的。该画师得名于他参与制作的、如今收藏在维也纳的那份苏格兰国王的时祷书抄本，前面提过这份抄本。关于此人就是在文献中有充分记载的著名彩饰师、根特的赫拉德·沃伦堡（Gerard Horenbout，约1465~约1540）的证据在不断增多，但都不是决定性的，沃伦堡从1515年起开始担任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宫廷画师。（2）有二十四幅插图出自“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之手，前文也提过这本祈祷书。同样有可信但非绝对的证据表明这个画师是亚历山大·贝宁（Alexander Bening）；贝宁自1469年起便见诸档案记录，直到于1519年谢世。他的儿子西蒙·贝宁（Simon Bening，约1483~1561）比他名气更大。（3）八幅插图出自“吕贝克圣经抄本画师”（Master of the Lübeck Bible）之手，所谓《吕贝克圣经》是指一份于1494年在吕贝克制作的《圣经》抄本，该抄本中的木刻画的设计者就是这个画师，不过很显然，他的主业是抄本画师，并且很可能定居在根特。（4）有三幅插图出自“德累斯顿祈祷书画师”（Master of the Dresden Prayerbook）之手。严格来说，这个画师留名的抄本是一本时祷书而非祈祷书，而且是这个画师的早期作品，大约绘制于1470年。《斯皮诺拉时祷书》里的插图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晚期的作品，因此，无论是《斯皮诺拉时祷书》里的插图，还是德累斯顿抄本里的插图，都不能体现这个画师的巅峰水准。（5）剩下的两幅插图则出自“1500年前后多份祈祷书的画师”之手。这样的名称对一个如此天才的画师来说，实在是太不恰当了，此人的作品包括由大英图书馆收藏的精美的《玫瑰传奇》抄本，以及如今藏于维也纳、一度属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时祷书抄本。

仅从上述情况便不难见出，《斯皮诺拉时祷书》的五个画师都曾受雇于顶级的宫廷人士，而“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很可能就是赫拉德·沃伦堡）则是《斯皮诺拉时祷书》的主画师。“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次之，此人很可能就是亚历山大·贝宁，剩下的三个画师在《斯皮诺拉时祷书》抄本的绘制工作中仅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五个画师基本上都出自比利时的根特-布鲁日画师圈子，或者是暂时被借调来为荷兰南部地区的雇主效力的。



施洗者约翰指向耶稣，一个门徒于是前来向耶稣问话（《约翰福音》1:38）；这是整份抄本当中唯一一幅整页插图，是“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的手笔





第578～579页：大卫在祈祷，这幅图出现在七忏悔诗的开篇处，出自“吕贝克圣经抄本画师”之手，受损已经相当严重了，最终它的对页图不得不被一幅风格不同的新图取代，新图出自“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之手

已经是下午了，我们该对《斯皮诺拉时祷书》进行校勘了。校勘这份抄本是极为艰难的，因为它不仅结构怪异，而且被装订得极为紧密。该抄本先前的主人更是在抄本内侧的书页间填补了一些绵纸，这虽是出于好心，但显然缺乏指导，令校勘工作难上加难（倘若让我主管盖蒂博物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这些绵纸）；更何况，我手上还戴着烦人的手套，而有时候为了看清双开页内侧的缝合线，我必须靠着熟练且极为精细的手法推拉书页，手套严重阻碍了我使用这一方法。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可以将我自认为正确的校勘情况标注在脚注中了。[1]此一校勘状况揭示了一些情况。首先（这一点此前应该没有人注意过），环绕文本的花饰边框是出自两个画师之手的。其中一个画师在文本框底部和右侧的边框内侧描了笔直的金线。这个画师喜欢在非常鲜亮的黄色背景上绘制由小花组成的花簇。另一个画师描的则是红色而非金色的边线，他绘制的花朵要更大一些，还带有茎秆，填涂的背景色也没有那么鲜亮。二人的分工明显是以折为单元进行的。金线画师承担的是第ii～ix、xi～xiv、xvii、xxviii～xxxii以及xl～xli折。红线画师承担的是第x、xv～xvi、xviii～xxii、xxiv～xxvii和xxxvii～xxxix折。第i折，也就是年历折，配的是带插图的边框；第xxiii和xxxiii折配的是风格迥异的建筑式样的边框；第xxxiv～xxxvi折属于代祷词部分，这部分的边框饰图本就是不一样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该抄本在制作过程中被以折为单元拆分成了多个独立部分，然后才被分配给各个画师。

现在不妨关注一下这份时祷书抄本的两个主画师（我们暂且把另外

三个只是偶尔参与其中的画师留给后文）。“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很可能是沃伦堡）的工作单元是第i～ix、xiii、xvi、xix～xxi折。“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很可能是贝宁）的工作单元是第xi～xii、xxxiii、xxx～xxxii、xxxiv、xxxvi～xxxvii和xxxix折。二人从未在单折内部有过协作的情况。这一点倒是出乎意料，而且这表明，二人有可能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或者他们的工作时间是错开的。

我认为根据两个主画师的分工机制，就有可能分析出各画师的合理的工作安排顺序。让我们假设圣母日课是最先进行彩饰的——它毕竟是全书的核心文本。这是一个独立的部分（第xiii～xxii折）。其中最早出现的插图在第三时辰祷文的结尾处，应该是出自当时已经年迈的“德累斯顿祈祷书画师”以及“多份祈祷书画师”之手。这些插图都不错，但有些传统。接着，在抄本制作工程的早期阶段，人们决定提升抄本的品质；甚至也有可能是雇主换了人。于是，可能是沃伦堡的画师加入了这个工程。他移除了夜祷的开篇图并重新绘制了一幅。夜祷部分的前两页由此成了今天的彩绘双开页，且自成一折（第xiii折），这一情况只能用重新绘制后的替代品来解释。沃伦堡为这两页画了非同凡响的“圣母领报”图和极具创意的基甸和羊毛的场景。之后，这位画师从第六时辰祷文入手，完成了圣母日课文接下来的全部彩饰。同时，他还增补了一份年历（第i折），一份很不寻常的非周末的日课（从第ii折到第ix折），七忏悔诗和亡灵日课（第xxiii～xxix折，一气呵成），以及代祷文部分（第xxxv折）。实际上，到了这里，该抄本也就算是完成了，并且已经相当奢华了。但是不久后，“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和“吕贝克圣经抄本画师”也受雇加入团队。二人带来了第xi～xii折的福音书部分，其中第xii折只有四页（该折中最后一页是空白页），因为它要与已经就位的第xiii折连接起来。在他们的手中，代祷文部分得到了扩充，大批女性圣徒被包括进来（第xxxiv折和第xxxvi折），其中两位，即圣芭芭拉和圣克莱尔，与她们的画像一起出现在附在第xxxvi折中的两张单页上，这似乎表明，即便在制作过程中，抄本也在不断升级。还有两位圣徒的画像出现在了另插入的新书页上，分别是圣哲罗姆（第223对开页左页）和施洗者约翰（第267对开页左页），后者的画像实际上是抄本里仅有的一幅整页插图，图中没有文本框，两幅图都出自“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之手。最令人费解的情况出现在第165对开页，这是七忏悔诗开篇的配图页。校勘情况显示，这是一张单页。它没有跟看上去明显是它另一半的第172对开页连起来，因而它只能是后来增补进去取代原先内容的。怪就怪在这里。第166对开页右页的插图取材于大卫王的生平故事，出自“吕贝克圣经抄本画师”之手。人们通常会预期其对页上的图呈现的是大卫王的罪过，比如一幅拔示巴的画像。第166对开页右页的顶端有磨损和剥落的情况。其对页上的配图肯定是出了问题，遂被移除并被不那么合适的末日审判图（第165对开页左页）取代，该图由“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绘制。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是最后加入这项工程的，他负责对抄本中的空缺进行填补以及修正抄本中出现的问题。此等情形不免令人意识到，抄本的主人拿到的是一份已经非常完善的时祷书抄本，他又分阶段地改造抄本，不断地指点画师修改、调整抄本，看着这份抄本一步一步地“升级进化”，最

终将它打造成了一份更为复杂且大不一样的抄本。

今天的《斯皮诺拉时祷书》中已经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供我们追踪并确认抄本的第一任主人的身份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或她极其富贵，或者极其幸运。此等奢华抄本显然不是为销售给普通客户制作的。它的规模、它的创新性以及它那一看即知的巨大花费，会令上文提到的那些诞生于同一时期且是为欧洲君主制作的奢华时祷书抄本黯然失色，即使它们都出自同一批画师之手。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谈到了“哈默尔准则”（de Hamel rule），具体是说，倘若你不能确证某份抄本是否是皇家抄本，那么该抄本就不是皇家抄本，因为皇家抄本都是非同凡响的。如此说来，既然《斯皮诺拉时祷书》是所有抄本当中最为奢华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到当时欧洲社会的最顶层去寻找它最初的主人。此一时期荷兰南部地区诞生了不少昂贵的时祷书抄本。通常，要确认此类抄本的主人，我们只能通过卷首的纹章，或抄本中在祈祷的主人的画像来辨别。盾形纹章通常出现在卷首，有时也会在卷尾现身；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天主教的《伊莎贝拉时祷书》、《花饰时祷书》、《詹姆斯四世时祷书》以及《勃兰登堡时祷书》等——我们都是借助纹章才辨识出这些抄本最初的主人的。《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校勘情况显示，每个单元的单页尾页都被撕去了。这几张单页恰恰是抄本主人的纹章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该抄本的结尾处也有个人对圣母的祷词部分，并且也配有巨大的彩绘首字母以及装饰边框（第311对开页右页），但没有彩绘图页与之匹配。这部分内容的开篇在最后一折（六页折）的中间。因此很有可能有一张双开页后来被人移除了，而这张双开页上就有抄本原主人向圣母祈祷的画面。



《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内部封皮（左图），印有斯皮诺拉家族纹章，跟《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封皮是一样的。《罗斯柴尔德祈祷书》的外部封皮（右图），以红色天

鹅绒包裹，很可能是19世纪的装帧，饰有镀银配件

现在我们不妨合上盖蒂博物馆抄本和绘画部长桌上的这份《斯皮诺拉时祷书》抄本，观察一下它那18世纪晚期的装帧。故事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令人意外的神奇转折。在所有细节层面上，《斯皮诺拉时祷书》的装帧跟《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都一模一样，后者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富名望的时祷书抄本，是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于1415年前后制作而成的杰作。实际上，我曾两次前往尚蒂伊的孔代美术馆考察《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我很高兴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想要见到这份抄本其实十分困难），第一次是在1981年3月，当时在得到馆长雷蒙德·卡泽勒斯（Raymond Cazelles）允准之后，我还小心翼翼地做了抄本封皮的铅笔拓印，那些拓印我至今仍然悉心保存着。《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贴金书口显然与《斯皮诺拉时祷书》的使用了完全一样花饰模具。两份时祷书使用的红色皮革也是一样的。封里是同样特殊的绿色丝绸，且其对页也都是很朴素的衬页。在洛杉矶的时祷书和在尚蒂伊的时祷书的封面中央都有盾形纹章，纹章上都有一顶王冠，并且纹章都被成簇下垂的鲜花边饰围绕着；很显然，这样的图案并不是由一整块批量生产出来的纹章模具压印出来的，而是由多个印章一块一块组合而成的。我们知道这是热那亚的斯皮诺拉家族的纹章。



《斯皮诺拉时祷书》中的“耶稣诞生”图，也包括了牧羊人载歌载舞的场景，他们的旁边还有一条狗，这应该是“1500年前后多份祈祷书的画师”的手笔



《罗斯柴尔德祈祷书》中的“耶稣诞生”图，包括约瑟夫和马利亚抵达伯利恒以及牧羊人在田间载歌载舞的场景

然而，可能还有一份抄本可以加入这种令人震惊的比对当中，那就是《罗斯柴尔德祈祷书》。这份抄本的风格跟《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最为切近，其装帧用的是19世纪的深红色天鹅绒，并搭配有更早期的镀银底板，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底板是在安塞尔姆·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Anselm von Rothschild, 1803~1874）任抄本主人的时候，被从别处挪过来用以美化抄本的，这位男爵正是那个盛产大收藏家的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如今，这份大师之作收藏在西澳大利亚的施嘉里画廊（Kerry Stokes Collection）。对于它的生平记录，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于19世纪中叶进入罗斯柴尔德藏品名录当中。2015年8月，该抄本在墨尔本备展，我也有幸再次见到这本祈祷书。刚翻开这份抄本，我便体会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熟悉感。其封里跟《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和《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一模一样。它们都用了完全一样的亮绿色丝绸，有着完全一样的厚且朴素的羊皮纸衬页。贴金书口上也有完全一样的菱形装饰框，框里是小小的花饰。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深红色天鹅绒封皮包裹在昔日的封皮外，可以看到书脊上有七条缝合带，这一点跟《斯皮诺拉时祷书》也一模一样。天鹅绒很厚，令整个封皮显得比抄本本身略大了一些。我愿意在此豪赌一番：倘若揭去这天鹅绒封皮，肯定能发现抄本原来的封皮用的是跟《斯皮诺拉时祷书》一样的暗红色摩洛哥小山羊皮。我还记得另外一个情况，能更进一步支持我的这个赌局：我在1975年初见《斯皮诺拉时祷书》时，看到很多插图页的底端标

注着画家的名字，是有人于19世纪早期至中叶用铅笔标注的。这些名字包括路加斯·范·莱登（Lucas van Leyden）、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等人在内。如此荒谬的标注后来被抹去了，很可能是克劳斯先生做的；但偶尔还能分辨出很微弱的痕迹，比如说，“耶稣被十字架”事件插图以及摩西和铜蛇的插图就被归为丢勒的手笔。同样的标注也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祈祷书》的一些页面底端，并且是同样的铅笔笔迹，这些笔迹也已经被人抹去了。很显然，这两份抄本曾跟《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共处于同一批藏品中，而且这三份抄本曾采用了同一风格的装帧。倘若我们能够确定其中任何一份抄本的渊源，那么就能找出全部三份抄本的渊源。



《斯皮诺拉时祷书》里的插图，图中主角在打猎时被死神刺中，尔后便死在卧榻之上，他的家人陪伴在他身旁，该图出自“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之手

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看。《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早期生平很是复杂。1485年，它的主人是萨伏伊公爵查理一世（Charles I）及其妻子蒙费拉的布朗什（Blanche of Montferrat）。二人都是贝里公爵的直系后裔。他们唯一的女继承人后来成了萨伏伊的菲利贝尔二世（Philibert II）的第一任妻子，而菲利贝尔二世最终将这份时祷书抄本传给了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 1480~1530）。玛格丽特后来以菲利贝尔二世遗孀的身份成为尼德兰的摄政王，并带走了大约二十本萨伏伊的公爵图书馆藏书，《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就在其中。在于1523~1524年编制的玛格丽特藏品名录当中，这份抄本还处于没有被正式装订起来的状态。直到1524年它才得到装订，装订人是玛格丽特的宫廷珠宝匠阿伯勒奥的马丁（Martin des Ableaux），这很可能是这份抄本初次被装订。抄本末尾的空白衬页上依稀能够看到当年两个环扣的铜针留下的氧化痕迹，环扣可能就是最初的装帧的部件。1530年12月，玛格丽特谢世，《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便由让·拉夫特（Jean Raffault）保管，拉夫特是讷夫维尔的领主（seigneur de Neufville），也是玛格丽特的财务总管，这之后，《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

为了验证之前的设想，我们假设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当时在《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以外，也拥有《斯皮诺拉时祷书》和《罗斯柴尔德祈祷书》，且这三份抄本在她去世后，都被收藏在同一处。（将《斯皮诺拉时祷书》同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联系起来的想法，是约阿希姆·普罗齐克于1982年最早提出的。）有很多细微线索可以佐证这个想法，比如说，在最后阶段被增补进抄本的代祷文中，女圣徒得到了强调，而且从名字看，她们都来自德意志和西班牙，这同玛格丽特的身份十分契合，毕竟，她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又是西班牙王位继承人的遗孀。《斯皮诺拉时祷书》的连祷文就召请了托莱多的圣依德丰苏（Saint Ildephonsus）。玛格丽特是当时欧洲资金最为雄厚并且人脉最广的艺术主顾之一。最重要的是，“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倘若我们认定他就是赫拉德·沃伦堡——从1515年4月开始，就受雇成为玛格丽特的宫廷画师和男侍从（*valet de chambre*）。他至少为玛格丽特服务到1522年。1521年丢勒前往荷兰时，曾拜访了这位宫廷画师。从风格上判断，1515年之后的这七年恰好就是《斯皮诺拉时祷书》和《罗斯柴尔德祈祷书》的制作时段。

玛格丽特的母亲是勃艮第的玛丽（Mary of Burgundy, 1457~1482）——勃艮第公国唯一的女继承人，玛格丽特的父亲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of Austria, 1459~1519），也就是德意志国王以及1508年起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前文谈到的《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玛格丽特出生在布鲁塞尔，在根特受洗。她于孩童时代便同未来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订立婚约，因此是以太子妃的身份被抚养成人的。1491年，该婚约被撤销。玛格丽特转而嫁给了体弱多病的西班牙王子胡安，即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确定继承人（也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长兄）。胡安没有活过1497年，谢世时仅十九岁。1501年，玛格丽特改嫁萨伏伊公爵菲利贝尔二世；三年

后，这位公爵也归了天，原因是在酷暑时节外出打猎。《斯皮诺拉时祷书》里的亡灵日课中有一幅非常生动的页底插图，图中一个人于骑马在外驰骋时被死神刺中，很快便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床上，他的家人围拢在他床前，焦虑不堪。死前菲利贝尔公爵卧病了数日。据说，当时玛格丽特在极度焦虑之中将自己极为珍贵的珍珠项链磨成粉末，做成药汤给公爵灌了下去，但这没能救下公爵的性命。1506年，由于玛格丽特的哥哥美男子费利佩（Philippe the Handsome）也归了天，二十六岁的玛格丽特终于从萨伏伊返回尼德兰，坐上了摄政王和总督的位子。在此期间，玛格丽特在梅赫伦（Mechelen，又称马林）建造了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甚是宏伟，就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之间，距离根特大约三十英里。玛格丽特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再嫁。

玛格丽特拥有令人惊叹的艺术收藏。她的藏品包括了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阿诺菲尼的婚礼》（Arnolfini marriage），这幅无与伦比的画作如今已经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玛格丽特收藏的抄本有将近四百份之多，其中包括了她的父亲留给她的11世纪的《埃希特纳赫奥里斯抄本》，该抄本是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制作的（如今收藏在埃斯科里亚尔的西班牙皇家图书馆）。1519年，伊拉斯谟曾前往梅赫伦查阅该抄本，并在自己的1522年希腊语《新约》译本的前言当中引述了该抄本。玛格丽特的第一本时祷书是在她三岁时受赠的，那时她正以太子妃身份前往法兰西宫廷。这份抄本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勃艮第的玛丽本时祷书》，收藏在柏林；勃艮第的玛丽就是玛格丽特的母亲，玛格丽特前往法国时，玛丽刚刚谢世。玛格丽特的哥哥美男子费利佩则在玛格丽特前往西班牙同胡安结婚时，赠送给妹妹第二本时祷书，这本时祷书应该就是如今收藏在维也纳的《詹姆斯四世时祷书》。后来，在《贝里公爵时祷书》之外，玛格丽特又获得了未完工的《博讷时祷书》（Hours of Bona），萨伏伊的博讷是米兰大公加莱亚佐·斯福尔扎（本书第十一章中的《半神》抄本的主人）的遗孀。玛格丽特将《博讷时祷书》带回梅赫伦并请自己的宫廷画师赫拉特·沃伦堡将之完成。玛格丽特后来将这份抄本送给自己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如今，它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

倘若《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和《斯皮诺拉时祷书》都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雇人制作的，那么很有可能是祈祷书先面世，大约是在1515年沃伦堡刚刚加入这位女公爵的“发薪名单”时。倘若这个前后顺序是正确的，那么玛格丽特在获得《斯皮诺拉时祷书》时，《斯皮诺拉时祷书》很可能还没有完工；就像《斯福尔扎时祷书》一样，玛格丽特请沃伦堡扩充并完善这份抄本。倘若《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的画师确实是亚历山大·贝宁，那么该抄本的诞生时间不会晚于1519年，因为亚历山大·贝宁是在这一年谢世的。它很可能是在1520年前最终完工的。

1523～1524年的玛格丽特藏品名录中，共有六份时祷书抄本。我们可以对它们逐一甄别，看看它们是不是《斯皮诺拉时祷书》或者《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其中有一份太小，还有一份太老，还有两份现藏于其他地方；最后只剩下两份没有被排除。最后两份中一份的名录纪要将其描述为，“une assez grosses heures”，意思是说，一本很大的时祷书

（但显然没有《贝里公爵时祷书》那么大，因为后者的描述是“une grande heure”，即“一本巨大的时祷书”）；并且说该抄本的封皮是用绿色天鹅绒制作的，配有镀银环扣。在名录中，该抄本的编号为第53号。另一份抄本的编号为367，有一条更详细的描述：“*Premier, une riche heure en parchemin, bien historiee et enlumynee, couvertes de satin noir, clouant a deux fermilletz d'or, escriptes a la main.*”可想而知，“一本很大的时祷书”是在描述《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因为该祈祷书的确很大，比《斯皮诺拉时祷书》还要大一些。至于第367号藏品会不会就是有黑色绸缎封皮和两个金环扣的《斯皮诺拉时祷书》呢？因为它的确如描述的那样极为豪华、彩绘精美且是手抄而成的。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480~1530）的画像，双联画中的一幅，出自“1499年画师”之手，画中，玛格丽特跪在一本祈祷书前，身旁是一个壁炉、一条狗和一只猴子

名录纪要显示，该抄本被收藏在梅赫伦的宫殿里“有壁炉的房间旁边的一个小壁橱里面，俯临小教堂的廊台”。如今，根特美术馆（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 in Ghent）保存有一幅双联画，画中呈现的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在一份黑色封皮的时祷书抄本前跪地祈祷的场景，玛格丽特的身后就有一个壁炉，壁炉的旁边是一个雕花的木质壁橱。玛格丽特的脚边有一条狗和一只猴子（《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插图“财主与拉撒路”中这两种动物都是财主的宠物）。正对着玛格丽特画像的是圣母和圣子图，背景是透过窗户望见的一座教堂。15世纪的布鲁日的格鲁修斯

（Gruuthuse）宫内，有一间用于私人祈祷的顶层房间，房间内设有一扇望向附近的圣母大教堂（Onze-Lieve-Vrouwekerk）的窗户。如今收藏在维也纳的那份为玛格丽特的母亲、勃艮第的玛丽制作的时祷书抄本中，就画有抄本的主人在这样一扇窗户边诵读时祷书的场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下方教堂里的唱诗班。这些画面提示了我们诸如《斯皮诺拉时祷书》或者《罗斯柴尔德祈祷书》这样的抄本在梅赫伦宫中的最初用途。

名录中的“很大的时祷书”抄本和“豪华时祷书”抄本在玛格丽特谢世之后被传给了玛格丽特的侄女匈牙利的玛丽（Mary of Hungary, 1505~1558），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妹妹。不过，这两份抄本跟《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一样，在16世纪时便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约1569年，勃艮第公爵图书馆制作了藏书名录，但这三份抄本均没有出现在匈牙利的玛丽的藏书当中。前文曾提及，《斯皮诺拉时祷书》缺了带有盾形纹章的卷首页，而且很可能也缺了一幅抄本原主人跪在圣母面前祈祷的插图；《罗斯柴尔德祈祷书》也是如此，它的卷首页插图也不见了，并且圣母祈祷文的前一页被转移到了第145对开页右页的前面。也就是说，这两份抄本被以完全一样的方式抹去了原主人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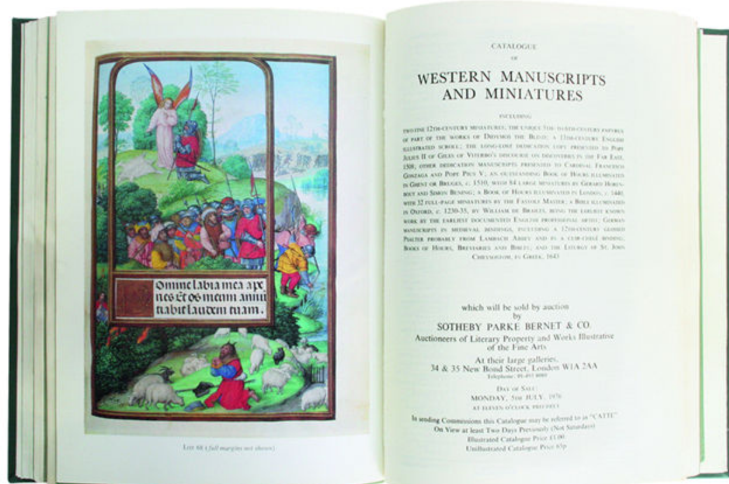
倘若这三份抄本还在一起，那么它们很可能都被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 1569~1630）带到了热那亚。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在荷西战争期间担任西班牙军队的将领，分别于1603年和1625年率军攻陷奥斯坦德（Ostend）和布雷达（Breda），他也是外交官和朝臣，最终于1629年退役回到他于热亚那的家中，回归之时，他携带了一批战利品，还带上了画家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是他的老友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从中牵线，令他与画家委拉斯凯兹有了交集，斯皮诺拉遂带着这位画家来到意大利，欣赏抄本里的绘图。抄本的翻阅者常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好事），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委拉斯开兹甚至鲁本斯都有可能亲手翻看过《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斯皮诺拉时祷书》和《罗斯柴尔德祈祷书》。

三份抄本的封皮显然是为热那亚的圣卢卡的温琴佐·斯皮诺拉（Vincenzo Spinola di San Luca）制作的。我们之所以做此推断，是因为温琴佐·斯皮诺拉的继承人兼遗嘱执行人是他的外甥吉奥·巴蒂斯塔·塞拉（Gio Battista Serra, 1768~1855），而包裹着《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那印有斯皮诺拉家族纹章的封皮的皮革之上，呈现的就是塞拉的纹章（封底上的斯皮诺拉家族纹章则保持着原样）；塞拉死后不久，该抄本便进入了待售状态。他生前将该抄本传给了玛格丽塔的菲利克斯男爵（Baron Félix de Margherita），后者于1855年将它存放在热那亚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供人们观瞻，抄本很快就吸引了买家。阿道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加入了交易谈判，但是在1856年1月的拍卖会上，男爵被出价更高的奥玛勒公爵、奥尔良的亨利（Henri d'Orléans, Duc d'Aumale, 1822~1897）击败。至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当年很可能是被阿道夫的老丈人、维也纳的安塞尔姆·冯·罗斯柴尔德买下的。最终，奥玛勒公爵将《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遗赠给法国的孔代美术

馆。《斯皮诺拉时祷书》很可能也被出售了，且自此从世人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

事实上，我本人就见证了《斯皮诺拉时祷书》重见天日的过程。1975年的夏天，我从剑桥大学毕业，直接来到苏富比拍卖行工作。那年10月中旬，我被派往慕尼黑，随同安东尼·霍布森先生参加一场拍卖前的展出，展出的内容是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lipps）爵士的藏品，这些藏品预定于当年11月在伦敦被拍卖。此时，苏富比拍卖行刚在画廊街6a号开了一间小办公室，就在霍夫花园旁边，距离路德维希大街不远。一个退休肉商听闻此次展出的消息后，在女儿的陪同之下专程从柏林赶来，为我们带来了他自己收藏的一份抄本。我记得很清楚，他将那抄本从毛毯中取出，将其放在桌子上，随后抄本被传给了我，由我打开。这份抄本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斯皮诺拉时祷书》。在场所有人都被它震惊了。安东尼·霍布森凑到我耳边，用英语低声跟我说，此等品质的抄本肯定已经出现在了记录中，他说他负责跟肉商聊天，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跑过路德维希大街，直奔慕尼黑州立图书馆查阅弗里德里希·温克勒（Friedrich Winkler）的《弗莱芒抄本彩绘》（*Die flämische Buchmalerei*）——这本书于1925年问世，是一份标准名录，记录了所有当时为公共机构所收藏的荷兰南部抄本（实际上，正是温克勒首创了前文提到的一系列抄本画师名，比如“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等）。我还留着州立图书馆的借阅卡，因为不久前我还在读研时就来过这座图书馆（见本书第八章）。没过半个小时我便从图书馆回到拍卖行办公室，我带回的消息是：这份非凡抄本并没有被记录在温克勒的书中。

关于这份抄本的来龙去脉，抄本的现任主人有多个版本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说，该抄本在他们家中已经传承了数代人之久，赫尔曼·戈林曾试图将其据为己有，但他们一家人将之藏在掏空的收音机里面，由此才令抄本活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开了一张借据给老人，将抄本留下以便做进一步考察。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四十年里，我们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希望找出这份抄本在二十世纪的经历，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可喜或可忧的消息。实际上，这就如同谈恋爱一样，有时候是不能追查过甚的，尽管我直到现在都很遗憾当年没能问抄本主人更多的问题。最终，在多方考量之后，我们只能在完全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推测这份抄本是在柏林的私人藏家手中安然度过了恐怖的战争时期。抄本的扉页之上留有一个绿色的印章，很显然是现代人所为，旁边还有一个手写的首字母签名，应该就是我们在慕尼黑碰到的那个老人的名字。



苏富比拍卖行1976年7月5日的拍卖名录，由克里斯托弗·德·哈默尔编制，这也是《斯皮诺拉时祷书》第一次被编入名录并得到介绍

1976年7月，这份抄本如约来到伦敦参与拍卖。我为它撰写了长达六页的名录纪要，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纪要。在纪要当中，我初次尝试对参与抄本的画师进行甄别。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前发布拍卖品的预估价格的机制。当时，珍本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是由《卡克斯顿奥维德抄本》（Caxton manuscript of Ovid）和《查茨沃斯乔叟抄本》（Chatsworth Chaucer）共同保持的90000英镑（前者是1966年的拍卖价，后者是1974年的拍卖价）；据说，要达到六位数是不可能的。1976年4月的伦敦媒体登载了这样的消息，“神秘抄本将在苏富比拍卖行挑战十万英镑天价”，这的确是桩新闻，而且更有报道说：“……抄本世界泛起的阵阵涟漪，一场大潮即将来袭，且等待这神秘抄本……在7月5日星期一现身苏富比吧。”很多人来到了我那俯临伦敦中心圣乔治街的小小办公室，来欣赏这份神秘抄本，其中就包括出了名的极具进攻性的买家汉斯·克劳斯。克劳斯先生在自传当中是这么谈论当年的事情的：“我……决定亲自竞价，不给别人留任何机会。”拍卖当天是个酷热的夏日，我们都预期克劳斯先生在这个早上会全力以赴。结果恰恰相反，克劳斯先生闷闷不乐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极为散漫地举手并给出了大约60000英镑的报价，随后便明显地摇了摇头。但竞拍进程不知为什么仍在继续，价格节节攀升，一直是几个满脸困惑的英国书商在与“神秘人士”竞价。价格来到250000英镑，然后是300000英镑，并在350000英镑的位置上暂停了一会儿。两位英国书商弗兰克·哈蒙德和查理·特莱伦不得不给出孤注一掷的报价，但仍然失败了。370000英镑，一锤定音。拍卖人在拍卖大厅里高声宣布“汉斯·克劳斯”，此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但没有人比我更诧异。实际上，克劳斯先生跟苏富比预先协定了自己的策略。他很清楚，拍卖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会盯着他，等着他

给出一个令竞争者灰心丧气的价位，于是他跟当天的拍卖人达成如下约定：拍卖过程中，无论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比如摇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他不摘下眼镜，就意味着他的竞价没有结束。当然，克劳斯先生一直没有摘下眼镜，最终摘得这本时祷书。第二天的《泰晤士报》引述了他的话："在拍卖前，我已经跟太太和儿子商量过了，只要不超过700000英镑，我就都能接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这份后来被称为《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抄本终于重见天日，并迅速名扬四海。



第597页：《斯皮诺拉时祷书》的绿色丝绸封里，跟《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和《罗斯柴尔德祈祷书》的是一样的

注释：

[1] i^{7}[共8页，缺了第i页]，ii~xi^{8}，xii^{4}，xiii^{2}，xiv^{6}，xv~xvi^{8}，xvii^{8+1}[第iii页（也就是第118对开页）是单页]，xviii~xxii^{8}，xxiii^{6+2}[第i页和第viii页（也就是第165对开页和第172对开页）是单页]，xxiv~xxix^{8}，xxx^{6+2}[第iii页和第vi页（也就是第223对开页和第226

对开页）是单页]，xxxi^{8}，xxxii^{2+1}[第ii页（也就是第238对开页）是单页]，xxxiii~xxxv^{8}，xxxvi^{6+2}[第iii页和第iv页（也就是第266、267对开页）是单页]，xxxvii^{8+2}[第i页和第v页（也就是第272对开页和第276对开页）是单页]，xxxviii^{8}，xxxix^{8+1}[第i页（也就是第290对开页）是单页]，xl^{8+1}[第viii页（也就是第306对开页）是单页]，xli^{5}[很可能共六页，丢失了最后一页空白页，也有可能共八页，缺了第iv~v页，也就是第310对开页后的两页]。

后记

现在我们到了机场出发大厅候机，距离带着小孩或者其他需要更多登机时间的旅客开始登机还有半个小时。我们的行李已经被送去托运了，不过我们在看抄本时所做的珍贵笔记被装在了手提行李里。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非凡抄本之旅，我们拜访了一小部分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抄本。还有很多图书馆是我们本该造访、以后一有机会就会去造访的。大英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可能还有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是遗漏的图书馆中最重要的三座，虽然在本书中我们提到过很多来自这些地方的抄本。布鲁塞尔、海牙、斯德哥尔摩、米兰以及威尼斯的国家图书馆中也有令人震惊的宝藏，当然也包括班贝格、圣加仑以及维罗纳的图书馆，这些最初都是教堂图书馆。此外还有藏书极其丰富的大学图书馆，诸如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瑞兰德图书馆）、格拉斯哥大学、日内瓦大学、莱比锡大学、克拉科夫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的图书馆。必须承认，我对大量分布于法国各行省的地方图书馆也很是喜爱，诸如特鲁瓦（Troyes）、第戎以及鲁昂的图书馆，其藏品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从修道院流出，转由当地图书馆保存的。不管你住在哪里，附近都很可能有欧洲中世纪的抄本，就像我们在开普敦、东京、马尼拉、芝加哥、利马（圣弗朗西斯科女修道院）、墨尔本以及奥克兰看到的那样。在这段旅程中，最令我幸福的探索经历就是在小型展览上遇到伟大抄本。比如有在温彻斯特教堂见到的12世纪的伟大《圣经》抄本；在巴黎的雅克马尔-安德烈美术馆（Musée Jacquemart-André）见到的《布西科时祷书》（Boucicaut Hours）；在萨格勒布教堂圣物室见到的《托普斯科的乔治弥撒书》（Missal of George of Topusko），当时这份弥撒书是由一名修女专职看护的，修女还用食指戳了戳书，向我保证那上面的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博物馆（Topkapi museum），我还见到了两份出自马加什一世（Matthias Corvinus）宫廷的抄本，是1541年土耳其人占领匈牙利之时留下来的。这些抄本完全可以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本书中，我成功提到了另外一些珍本，比如收藏在罗萨诺教区博物馆的6世纪的希腊语福音书抄本、收藏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阿尔巴尼圣咏》（Albani Psalter）、收藏在尚蒂伊的《英格堡圣咏》和《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还有当年为葡萄牙王室制作的那份令人震惊的日课经抄本，如今它就收藏在安特卫普的迈耶·范·登·贝格博物馆（Mayer van der Bergh Museum）的楼上。四处打听一下，你就会发现到处都可以找到抄本的踪迹。现在想来，我真应该从新西兰南端的达尼丁公共图书馆开启我的这趟非凡抄本之旅，那里的中世纪抄本虽然名气没有那么大，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少年时代的我就沉迷其中。当时工作人员允许我将抄本从展柜里面取出来，于是我常常在星期六去那里耗一整天，享受翻动书页带来的喜悦。

这些抄本之所以被保存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妨说纯粹是出于一种巧合，而巧合也是贯穿本书所有章节的一种思路。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的伟大艺术品都应该是面向公众的且静止不动的，但是彩饰抄本完全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们那漂泊不定的经历是本书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主旋律。本书寻访的十二份抄本中，只有一份如今仍然被保存在它的出生国，那就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至少就现代国家的政治边界而言是这样的；但即便是它也经历过多次动荡：曾经差点遵从“多塞遗嘱”（The Douce Bequest）去往牛津，或者作为T.H.里克斯（T.H.Riches）的赠礼被送往剑桥（当然，若是如此，叶茨·汤普森夫人势必会对西德尼·科克莱尔感到非常恼怒），更不用说差点消失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脚下了。《贝亚图斯抄本》则先后在柏林和巴黎漂泊，后来又出现在了伦敦的拍卖会上，最后恰逢皮尔庞特·摩根先生需要一些古书（基本上无论什么古书都可以），于是移居到了美国。《阿拉图斯抄本》曾经被收藏在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图书馆，如果没有意外，它现在就应该已经成了梵蒂冈的“女王藏书”的一部分，但碰巧女王的那位莱顿学者突然被解雇，还被允许挑选并带走一批自己喜欢的书册。倘若塞奥尔夫利特能多活两个月，《阿米提奴抄本》就已经到了罗马，并极有可能就此从世间消失，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名字。倘若路易十二在1499年的帕维亚战事中败北，《半神》抄本就肯定不会出现在俄罗斯。抄本的辗转漂泊，不仅源于学术研究以及慈善事业中的机缘巧合，也受到政治际遇的影响。本书提及的抄本中，半数以上经历过商业上的交易。其中有两份抄本更是在各自的时代创下了书籍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有的抄本被视若珍宝，有的则是被弃若敝屣——在西班牙被用来交换一只价值仅三十法郎的怀表，或者干脆被抛弃在托斯卡纳的一个荒废的修道院里，被埋在常年不见阳光的灰尘堆里。《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有足够的名气，能在13世纪就被人书写一番；而《斯皮诺拉时祷书》则毫无名气，直到我在1975年打开了包裹着它的毯子。

这些抄本原本都是沉默且没有生命的物件。而将这些没有被记录过的抄本编入目录，从而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任何新发现的中世纪抄本，在被全方位检测之前都是没有确切身份的，我们需要确认里面的文本，对书稿结构进行校勘，在风格史的年代表中为抄本中的文字和彩饰找到可信的位置，并最终确定抄本出处。只有在这个检测过程结束之后，新发现的抄本才会拥有自己的“形象”（persona）、身份以及一个通常自此会一直伴随它的名字。没错，名字塑造了性格，就如同发生在我们的宠物身上的事一样——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凯尔经”这个名字是在17世纪20年代被初次使用的，这样一个名字无疑令抄本本身更具名望，也更为神秘；否则，游客来都柏林的时候，想必也不会排起现在这样的长队，就为了看一眼“8世纪晚期的一份福音书抄本”，无论这份抄本是何等华美。“阿米提奴”和“布兰诗歌”这两个名字都是由接受了古典学训练的德意志语言学家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他们通常依据抄本的修道院渊源来为抄本分类，这两份抄本也就循着这条路，分别于1850年和1847年以新确定的身份，重新回到世上。西德尼·科克莱尔以其贵族品位而著称，是他最先将一份私人收藏家手中虽然雅致但暂且无名的抄本称作“纳瓦拉的让娜时祷

书”。这个新的皇家称号毫无疑问帮助该抄本以高价进驻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藏书间，并最终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斯皮诺拉时祷书”这个名字则来自一个等着该抄本以百万美元级价格被拍卖的书商。为了本书，我本人为收藏在圣彼得堡的一本虽有记录但无名字的抄本创造了一个名字——“维斯孔蒂半神”（the Visconti Semideus）。我希望这个名字能延续下去。先前收藏在埃克塞特教堂的由画师雨果绘制彩饰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如今仍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字，而一个被公众认可的专名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抄本的历史分量。博德利图书馆应该利用这个可以募集资金的机会向各方征询命名意见并进行招标。

身份得到确定的中世纪抄本都会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我们在此次非凡抄本之旅中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将抄本当作独立的个体，从而发掘它们身上特有的、从别的任何地方都无法了解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只需要阅读它们就行了，因为书是可以用文字说话的，而这是任何其他人工制品都无法做到的。从《布兰诗歌》的诗中，我们可以直接偷听到12世纪晚期的酒馆或者修道院里的窃窃私语。从《贝亚图斯抄本》里世人对即将降临的末日大决战的恐惧和诸多时祷书的祷词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抄本最初的主人的内心思虑和隐秘希望。今天，一小部分文本鉴定技术已经发挥了作用，这些技术可以根据词句上的特异之处以及文本当中出现的修订来追踪抄本的起源，并为我们打通探秘之路，由此我们可以抵达格里高利的私宅，也可以抵达乔叟作品的出版之处，甚至还可以在路上见证当年英格兰各个教堂的教士是如何相互走动，各自拿出新近斩获的来自诺曼底的书册比照一番的。这些都是历史中的小小脚注。我们在这趟旅程中遇到的抄本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历史故事，比如欧洲是如何皈依基督教并融入罗马文化的，比如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催生那场知识大迁徙、是如何孕育并推行自己的仿古雄心的。这些抄本都不是二手资料——我们就置身于矿藏当中，直接开采着原矿。君王的地位、战争的影响、城市中同业公会的权力、意大利的政局以及荷兰农家庭院的冬日场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了这十二份抄本中。

我们对彩饰抄本的研究，是出于这些抄本本身的独特个性。我们会仔细观察抄本的羊皮纸、如俗体大写体和西哥特小写体等的诸般奇异字体（我强烈推荐诸位把这些当作日常谈资，在参加晚宴时说上那么两句）、彩饰和装帧，以及能够揭示书册是如何被抄写并最终装订起来的相关证据。这些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据此可以追踪职业画师行业以及商业出版的起源。测定并记录抄本的结构这项工作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很多时候，抄本提供的信息能够同其他的独立材料形成互证，比如《塞奥尔夫利特传》以及14世纪巴黎的税收等，都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效的名字和地点以充实抄本的生平记录。世人很可能会觉得，中世纪抄本中的泥金彩饰的绘制者都是无名无姓的。但在本书提及的抄本当中，大约有一半抄本的画师已经为我们所知，或者至少存在潜在的候选人。借助我们对这些抄本的考察，艺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可以向前寸寸推进，即便是像对贝叶挂毯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这般里程碑

式作品的研究也不例外。

想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常常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甚至目前没有办法知道的。比如说，我确实不知道《哥本哈根圣咏》是在何处制作的。我也不觉得我们就能够确认《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的抄写员是谁。我做了一些猜测，比如对画师雨果的那份抄本的雇主，或者对《斯皮诺拉时祷书》最初的主人，但是这样的猜测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问题上，倘若有谁找到了更好或者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不但不会因此有半点的恼恨，反而会很高兴。本书谈到的大多数抄本，其渊源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目前存在的这些缺口，终有一天会被人填补完整。好的运气或者敏锐的观察力在这方面会提供很多帮助。在导言里，我说我将本书视为一场谈话——我们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将抄本摊在桌子上，然后展开对话。我很乐意听取各方的新看法和新信息。跟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不同，在古文书领域存在着无限的机会去做一些新发现，或彻底修正先前的结论，因为在这个领域，只要你翻开一份抄本，就会有新的知识和信息涌现。

也正是因此，我衷心期待并鼓励新人加入这个领域。抄本史学家实际上是一个关系非常融洽的兄弟会群体，由一批志同道合的热情之士组成，这个群体既超越了国别界线，也不问个人的来历，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地参与中世纪书册的研究，其乐融融。我希望本书就能为诸位展示出这样的国际协作精神：那么多的朋友和同僚给我提供了无私帮助，文中我已经谈到了一些，后面的注释中还有更多。在我求教的人中没有一位是不愿意提供帮助的。这个世界上，中世纪抄本的数量是足够的，很可能超过了百万份，因此，材料是不缺的，我们没有必要太过小心地看护自己的专业领域。许多重要的收藏没有完整的名录，有些甚至没有名录，更何况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有待发现。在这个领域，任何可以接触到足够材料的研究者都能够为研究添砖加瓦、为这个知识库的扩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具备此等机遇和发展空间的传统学术领域可不多了。在珍本图书室、大学、古书公会从事抄本研究，都是相当有前景的职业，同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有热情且眼光敏锐的人，以及文稿编辑、私人收藏家、抄写员、艺术家乃至读者，也都有机会——一千多年来，这个领域一直是这样的。

你向不同的公共图书馆或者博物馆提出借阅抄本的请求时，得到的回应是大不一样的。站在管理员的立场上来看，抄本是极为脆弱的，而且有些也是极为珍贵的。约见顶级抄本的请求常常很难获得允许，我也并不鼓励。图书馆都有自己的规则。你只能仔细挑选，且不要太过贪心。初步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借助电子版完成的。等你准备充分的时候，便可以向图书管理员提出合情合理的请求，告诉他们你为什么需要见一见原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至少都是会听一听你的请求的，因为我们私下里都知道，同抄本原本见上一面的体验是没有什么能替代的。同时你也应当清楚，很多抄本的所有权在私人手中，并不见诸公共领域，这一点常常会被研究者们忽略。我们的这趟非凡抄本之旅中也有不少发生在拍卖行的故事，和抄本在私人手中辗转的故事，有些就发生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且我们也的确接触了一些属于私人藏品的抄本。

很多私人藏品仍然在不断易手，有些中世纪抄本甚至并不是很贵（当然，它们完全有可能变得很贵），而一些抄本的残片完全是在个人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完美主义者也许会对这样的残片嗤之以鼻，但是仔细观察一份13世纪《圣经》抄本的残片（只需要花一张话剧票的钱），你能从中学到的有关中世纪抄写活动的知识不会逊色于任何教材。若是有幸能躺在自家床上读一份时祷书抄本，那么恍惚间，你就会回到五百年前的世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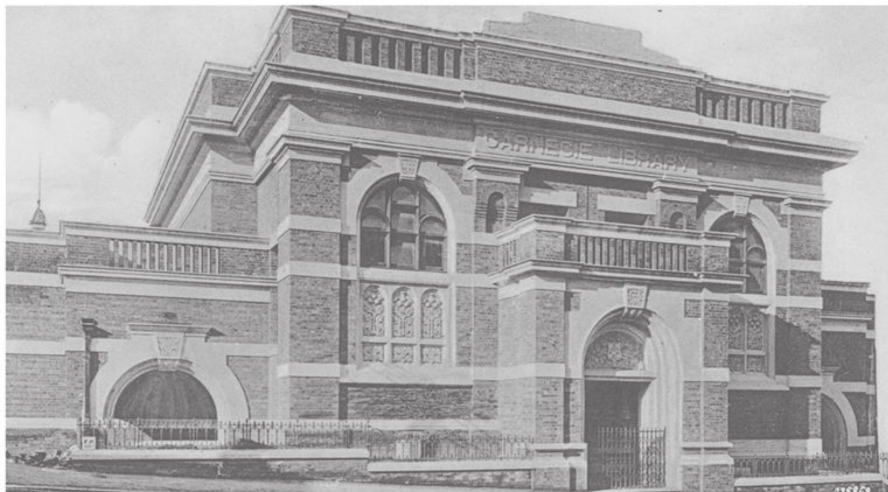
最后，我希望这样一趟旅行能让各位体会到追寻非凡抄本时的兴奋，和翻阅非凡抄本时的那种纯粹的愉悦，我们向它们问了问题并倾听了它们的回答。现在，如同圣彼得堡的《半神》的结束语所说的那样，“*lege feliciter*”——“享受阅读吧”。

到登机的时候了，我们也该踏上回家之旅了。

水石书店版后记

新西兰最古老的抄本

一切是这样开始的。我出生于伦敦。1955年，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在新西兰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便和家中兄弟一起乘船前往新西兰，当然，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当时乘坐的竟然是最后一艘由政府资金支持的移民船。对孩子们来说，那趟旅程堪称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我们穿越巴拿马运河，在皮特克恩岛停靠。我的父亲是一名对自然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医生，自然很高兴能有此次在新西兰工作的机会。这片土地上有着独特的珍奇鸟类和植物，它们都有待深入研究；还有一些区域在等待人类探索。比如说鸮鹦鹉，一种源自恐龙时代的矮胖鹦鹉，于1958年被发现依然生活在峡湾地区（Fiordland）深处的灌木丛中。1957~1958年，父亲加入了希拉里-富克斯（Hillary-Fuchs）探险队，前往南极地区记录阿德利企鹅的日常生活。我的母亲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中伦敦教授语言和艺术史，她刚开始对于迁居到基督城（Christchurch）郊区与世隔绝的平房当中的抉择很是挣扎了一番。20世纪50年代的新西兰，距离我母亲生活着的热闹的城市中心的会客厅，距离西敏寺和英国国家美术馆，实在是太过遥远了。当时与家中通信的主要渠道就是淡蓝色的航空邮件，来回各需要十天之久。家人出生或死亡的消息则是通过电报传递的。乘船需要一个月。虽然我们当时只是小孩子，对这样的事情并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我们仍然从母亲那里汲取了对古老欧洲的忧思，将它当作一个失落了的文化和文明之地（现在想来，那样的看法实在是有点不现实）。我们被要求保持英国口音，绝不融入新西兰人的生活。我和哥哥都对集邮有着极大的热情。我俩各收藏了一枚1840年的“黑便士”邮票，那是我们在萨里（Surrey）的爷爷奶奶送给我们的有史以来最棒的圣诞节礼物，而1840年正是英国在新西兰开启殖民进程的那一年。因此，对新西兰来说，1840年之前就是史前时代了。



达尼丁公共图书馆在莫里广场的老馆，1908年开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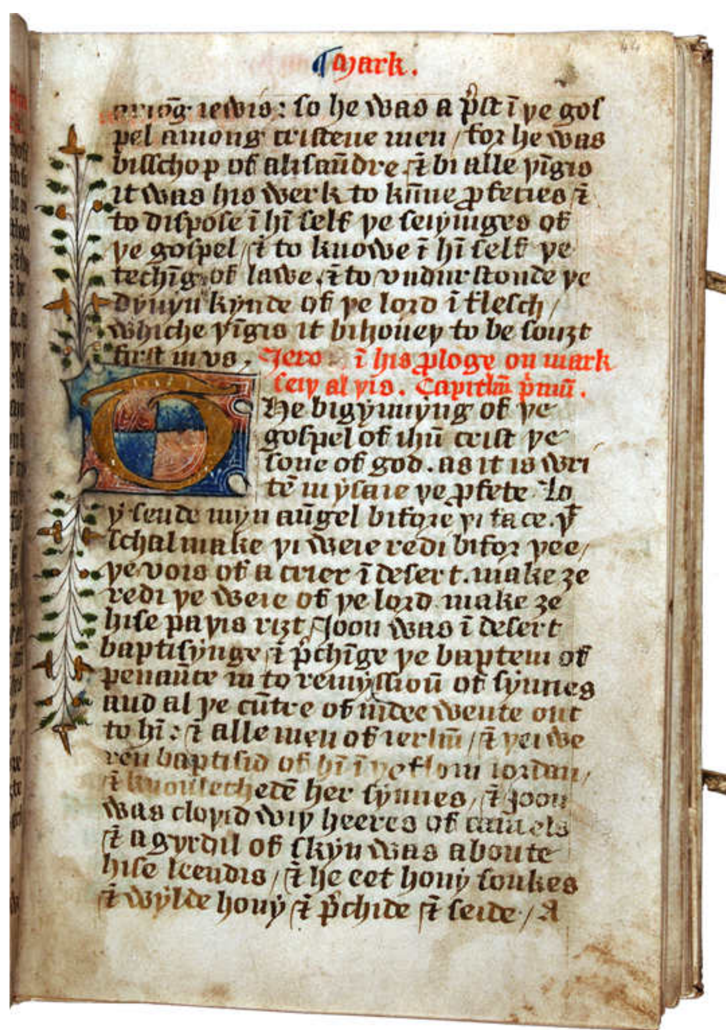
1963年，我们向南岛更南边迁居，来到达尼丁，当时这座城市仍然延续了其苏格兰创建者们对学问以及长老会（Presbyterianism）伦理的敬重。母亲在这里要更快乐一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发现了位于莫里广场（Moray Place）的达尼丁公共图书馆——一座宏伟的新罗马风格的砖石建筑。该图书馆由来自苏格兰的卡耐基家族资助，于1908年开馆。进入图书馆入口大厅之后，可以沿着左侧宽敞的复式木质楼梯通往楼上，上到楼梯一半的地方是一个夹层画廊，同图书馆建筑的正面平行。沿着此画廊的一侧前行至尽头，再下一个台阶，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批玻璃展柜，里面陈设的都是极为珍贵的缮本，包括六份欧洲中世纪抄本。在享受了图书馆外现代街道上的明媚阳光之后，又与这样的珍贵书册相遇，我体会到的那种兴奋感简直无以言喻。这里收藏了两份15世纪的泥金装饰时祷书抄本和三份13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抄本，更有一份出自1320年前后的布道用《圣经》残本。这些藏品如今仍然安静地躺在那里，尽管图书馆搬去了不远处的新建筑里。客观来说，它们并不是特别贵重的藏品，不过，对于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它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具魔力的东西了，且比我的那枚“黑便士”大了六百多岁。新西兰跟美国一样，拥有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土著史前史，而且在殖民扩张历程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现代政治和经济体系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它没有对应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时段。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沦为废墟的修道院以及古老的半木架房屋遍布欧洲大地，然而在新西兰，能找到的跟中世纪切实相关的东西，就只有这些容易携带的中世纪抄本了。它们有着典型的欧洲风格，而且是真真切切的物件。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



时祷书，彩饰很可能绘制于15世纪晚期的鲁昂，现收藏于达尼丁里德藏品室，编号“MS 8”

达尼丁图书馆的这些藏书是由阿尔弗雷德·哈米什·里德（Alfred Hamish Reed，1875~1975）搜集的。里德是出版商，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孩童时代就从英格兰来到了新西兰，1897年，他迁居达尼丁，经营一家打字机公司。里德是个高个子，有着宽宽的胡子和一头浓密的白发；他颇为时髦，在八十甚至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仍然热衷于城际远足和爬山，因此在达尼丁当地小有名气。他总是穿着靴子、系着背带，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跟这些抄本更有关联的一点是：他本人是一个福音教会基督徒。他曾印制了很多卡片，卡片的开头写着“我信从劳动、快乐以及善意的福音”。收藏低教会派（Low Church）经文抄本是一个悠久传统。托马斯·博德利先生就是此传统的早期例证，他通过收藏经文来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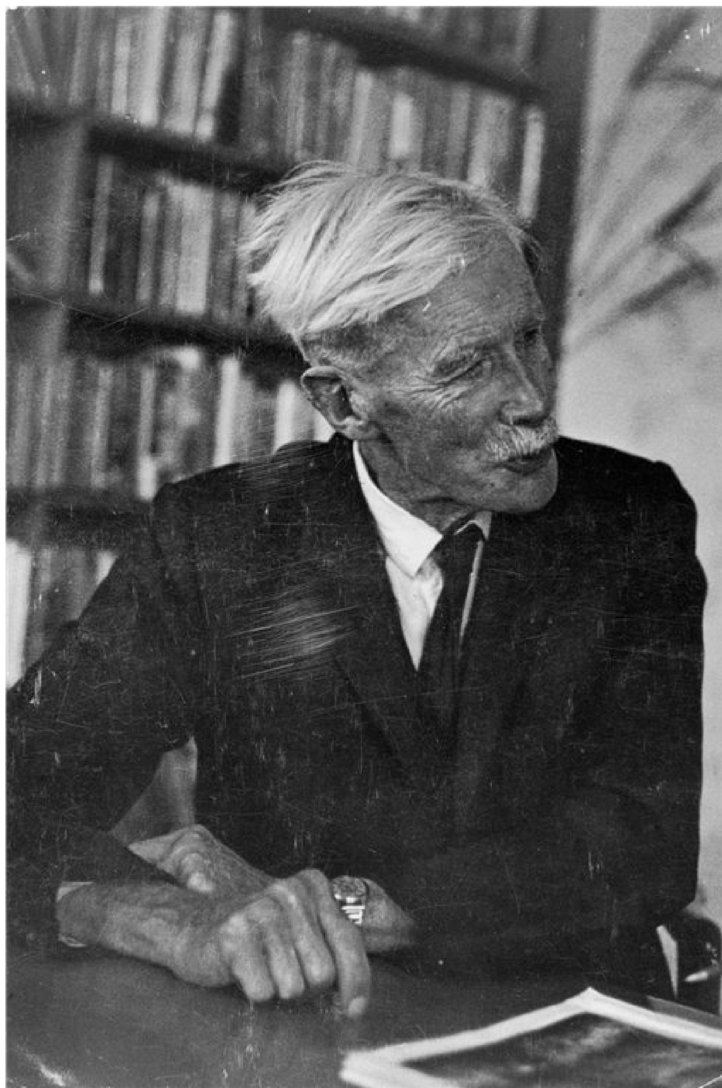
撑自己的清教信仰，这一点我在前文（本书第235～237页）中谈到了。其他专门收藏《圣经》抄本的伟大收藏家包括：浸礼宗的安德鲁·吉福德（Andrew Gifford, 1700～1784）和乔治·奥福尔（George Offor, 1787～1864），贵格会的弗朗西斯·弗雷（Francis Fry, 1803～1886）和亚历山大·佩科夫（Alexander Peckover, 1830～1919），还有俄克拉荷马城的格林家族（Green family）——这个家族的私人收藏是2017年11月在华盛顿特区开馆的新圣经博物馆的核心藏书。有一种想法是，这些早期《圣经》抄本都是触摸得到的圣言，是可以跨越多个世纪见证信仰之虔诚的圣物。在百岁高龄获封阿尔弗雷德爵士的里德先生就一直致力于收藏《圣经》和宗教文本，同时也致力于收藏基督教赞美诗作家的亲笔书信。此类物件都是从英格兰来到新西兰的。里德先生在1907年购得了他平生第一份古老的《圣经》抄本，这是于1599年印制的一本《新约》，是里德先生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从一名伦敦书商那里订购而来的。1919年，里德开始购买中世纪抄本。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决定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达尼丁公共图书馆，而且他和他的夫人在1938年创建的慈善基金会为此提供长期支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多份重要藏品：出自9世纪的福音书抄本——当时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最为古老的西方抄本——的多页残片、古腾堡《圣经》的一页，还有一份极为珍贵的由威克里夫翻译成中世纪英语的15世纪泥金装饰福音书抄本。最后这份抄本是里德先生于1956年以560英镑的价格从苏富比拍卖行购买而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算是他最有价值的一次出手了。


Mark.
ariog iewis: so he was a prest in ye gos
pel among cristene men / for he was
bischop of alisaundre. & bi alle yingis
it was his werk to knowe perfeties &
to dispose in him self ye seiyngis of
ye gospel / & to knowe in him self ye
techinge of lawe. & to vndurstonde ye
dyuyn kynde of ye lord in flesch /
whiche yingis it bihoueth to be souȝt
first in vs. Jerom in his prologe on mark
seiy al yis. Capitulum primum.
The bigynnyng of ye
gospel of ihesu crist ye
sone of god. as it is writ
ten in ysaie ye profete. lo
y sende myn aungel bifore yi face. y
schal make yi weie redi bifor yee.
ye vois of a crier in desert. make ye
redi ye weie of ye lord. make ye
hise pathis riȝt. Joon was in desert
baptisynge & prechinge ye baptem of
penaunce in to remyssioun of synnes
and al ye cuntre of iudee wente out
to him: & alle men of ierusalem / & yei we
ren baptisid of him in ye flom iordan /
& knowlechiden her synnes / & joon
was clothid with heeris of camels
& a girdil of skyn was aboute
hise leendis / & he eet hony soukes
& wylde hony / & prechide & seide / A

15世纪的威克里夫版福音书抄本，于1956年被里德购入成为其收藏品之一

有一天，在我正透过玻璃看着图书馆展柜里的藏品时，里德先生出现了。他当时的听力已经十分糟糕了。“你喜欢这些？”他大声说道，那声音让图书馆里的所有人都不免抬头观望。“哦，是的。”我低声说，里德先生的出现显然让我惶恐极了。“你说什么？”他几乎是在喊叫，还把手罩在耳朵上，“大声点，孩子！”我想管理员应该已经告诉了他，有人一直在认真欣赏他的那些展品。他让管理人员为我打开玻璃展柜，于是，我第一次触碰到了中世纪羊皮纸并闻到了它们的味道。我觉得一开始是抄本的插图及其古老的历史令我着迷。有一天，我跟哥哥一起在图书馆，一本印制于1472年的《圣经》恰好从英格兰运抵图书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制作图书馆缮本的宣传册，还拍了一张我和哥哥一起欣赏这本书的照片。在对我感到十分困惑却又非常宽容的图书馆助理的鼓励下，我经常来图书馆，复制抄本里的那些红色和蓝色的彩绘首字母，并且试着用小巧的哥特式常春藤叶子图案和涡卷装饰图案绘制页边。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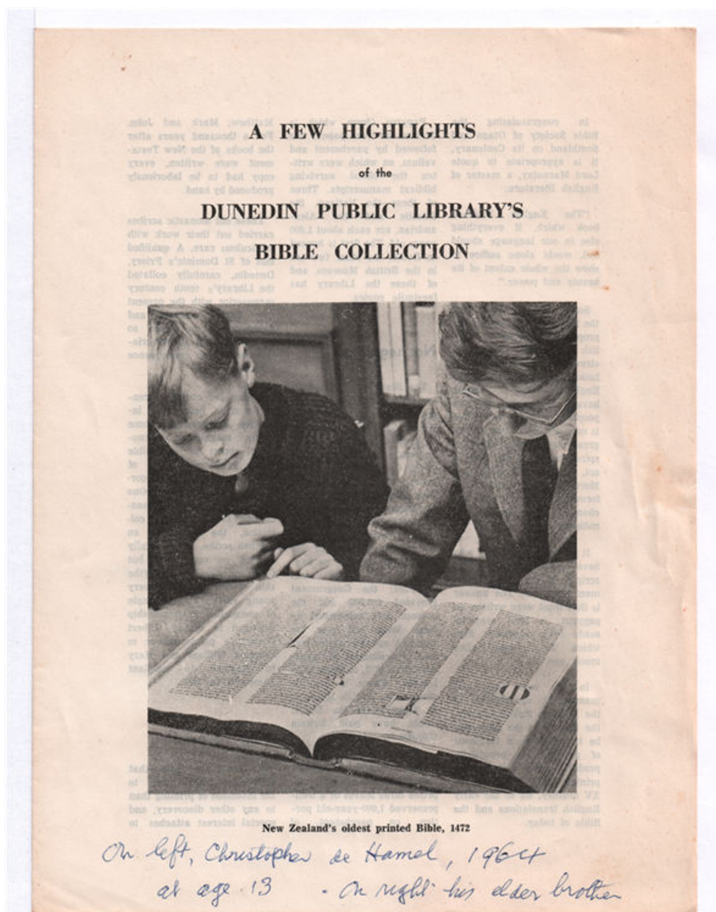
常常就那么全神贯注地缩在老图书馆楼上阅览室的桌子边，临摹放在旁边的抄本原件，非常愉快地度过整个星期六的下午。其他人想必会觉得我相当古怪，而我本来我也不是那么灵巧的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够画出像里德先生“MS 8”号藏品——一本很可能来自1490年前后的鲁昂的时祷书——里的那些缠绕着的莨苕叶形装饰图案。我当时将一些图案描摹在了我的课本里，当然，画得并不好。馆方将很多抄本的单页裱在画框内，然后悬挂在楼梯上，我竟然询问了能否像借阅其他书一样借阅这些抄本页（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能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令图书馆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场紧急磋商，最终他们认为，如果我承诺小心保管，他们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拒绝我的请求。就这样，我带着两张装裱好的书页，坐着校车回家了。这两张书页来自一份9世纪的福音书抄本，这令我的父母震惊不已。母亲说服我去邀请里德先生来家中做客；可能同样出于好奇，里德先生竟然同意了。里德先生是素食主义者（我不确定在那之前我是否遇到过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里德先生知道我们来自英格兰之后，便讲起了他在英格兰的童年往事，他说他在1885年英国大选时，曾和一些淘气的朋友一起去打断当地的保守党集会，并高喊“投格拉德斯通”，接着，又跑到附近的自由党总部，高喊“投索尔兹伯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历史在新西兰的这间客厅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被重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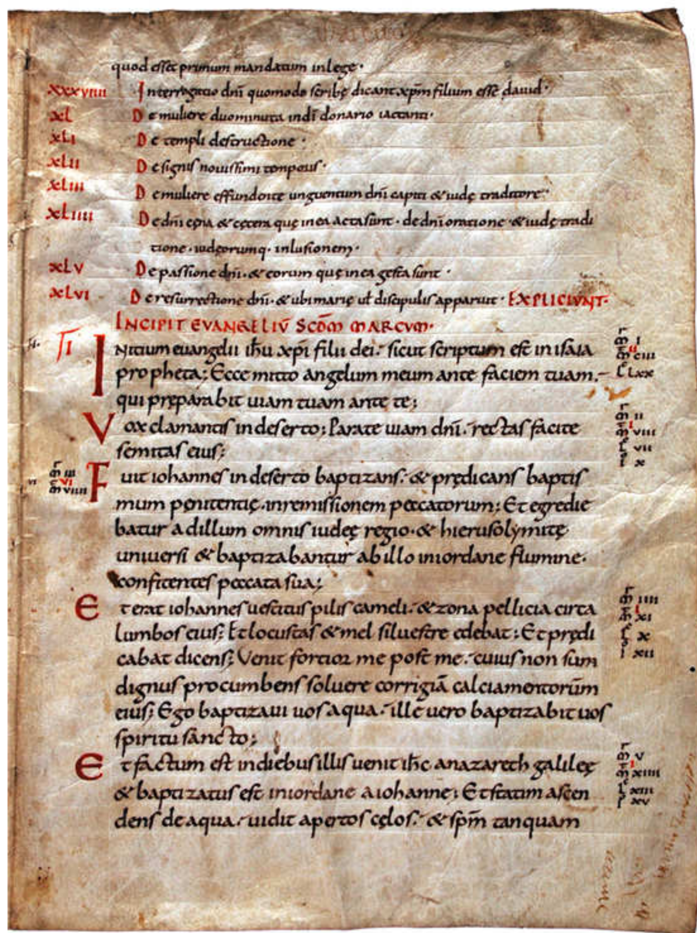
A. H. 里德，收藏家、达尼丁公共图书馆的捐赠人，照片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我当时在南达尼丁的国王中学上学，这是一所很大的州立男校，于1935年（王室庆典年）创办。我们的校服是深蓝色的短袖和灰色的套衫。我当时还有一口很怪异的英格兰口音，可能由于我在讲话时对此太过关注，反而有了轻微口吃。我很快就长成了一个满脸青春痘而且口齿不清的人。我自认为我的学习生活还不错，但是，在一个被喧闹声和英式橄榄球占据的世界里，中世纪抄本一直是我的秘密花园。学校里也有历史课，不过老师教得并不认真。我们也学法语和拉丁语。我自己还学了一年的德语，当时的国王中学并没有设置德语课，我们需要前往临近的一所女校即女王中学去上课，因此德语课成了班上最受追捧的课程。跟欧洲的情形不一样，在新西兰，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的新西兰，现存的和已消失的语言，都是陌生且新奇之物。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基本

上是不旅行的，也几乎没有人离开新西兰。我们的法语老师就不曾去过法国，我觉得他听过法国人讲法语的概率并不比我的拉丁语老师听过古罗马人讲拉丁语的高。在前文（本书第330和333页）中我曾谈到，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对卡尔·奥尔夫版的《布兰诗歌》是何等的痴迷，对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布兰诗歌》把拉丁语变成了一种口头语言。然而，我所学的拉丁语知识，更多被用在了放学之后以及星期六前往达尼丁公共图书馆阅读中世纪抄本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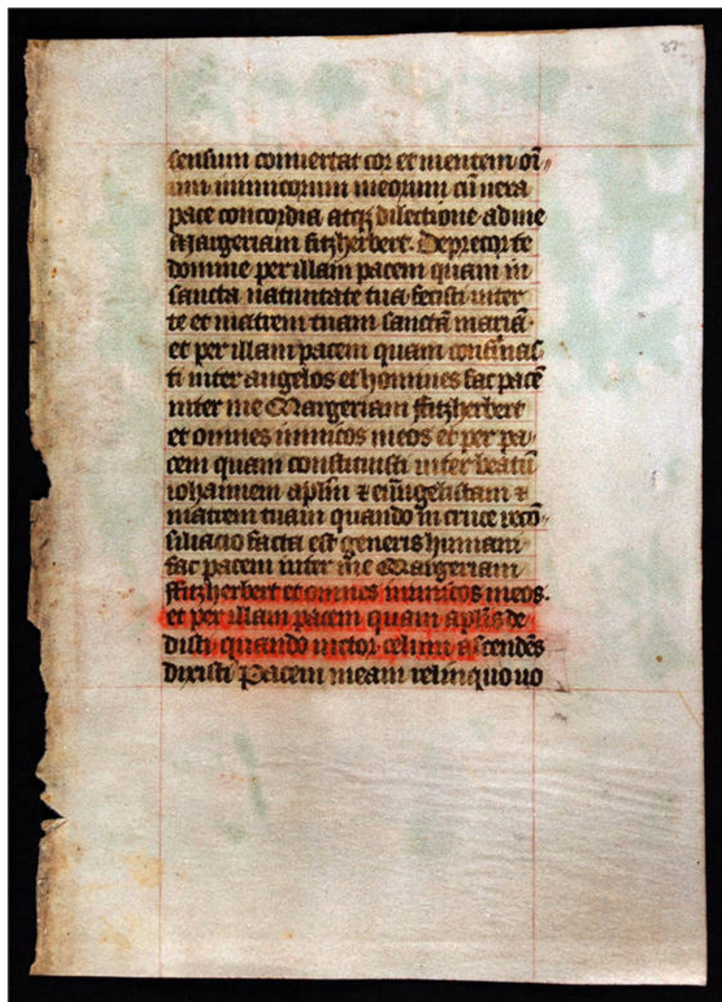
达尼丁图书馆的缮本宣传册，图中是克里斯托弗·德·哈默尔和哥哥正在观看一本早期《圣经》，照片拍摄于1964年



达尼丁公共图书馆收藏的三张书页中的一页，出自诞生于9世纪法国北部的福音书抄本

我依然记得我当年对于“Reed MS 5”号抄本的疑惑。这是一本沾满污渍且已破损的家庭用时祷书，来自15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在该抄本第87对开页的右页上有一段长长的拉丁语祈祷文，写着“Deprecor te domine … per illam pacem quam conf rmasti inter angelos et homines fac pacem inter me Margeriam Fitzherbert et omnes inimicos meos …”之类的词句。我记得当时我借助学校的拉丁语字典，将这些词一个一个拼接了起来，“I beseech you, Lord”——这个倒不难——“by that peace which …”，接下来便是一个像是“confinasti”的单词，我无法在字典里找到它，直到我注意到这个词上面有个小标志，这肯定是在字母“m”（而非“in”）前的“ir”缩写标志，如此一来便豁然开朗了，“that peace which you confirmed between angels and men”（主啊，请赐予我天使与人类之间的那种和平与安宁吧）——想象一下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和平”这个词正成为越南世代的流行语时，在达尼丁读到这些句子的模样——“make peace between me… ”——看！——“Margery FitzHerbert and all my enemies… ”（请让我……玛格丽·菲茨赫伯特，

同所有敌人和平相处……）。一个实实在在的名字就这样从纸间跳了出来，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该抄本自玫瑰战争之后便没有人读过，也没有人注意过这个名字。我很快从百科全书中了解到，德比郡的菲茨赫伯特家族曾被卷入玫瑰战争。我在那天了学到了两件事：我很享受探索发现的过程，以及抄本是会说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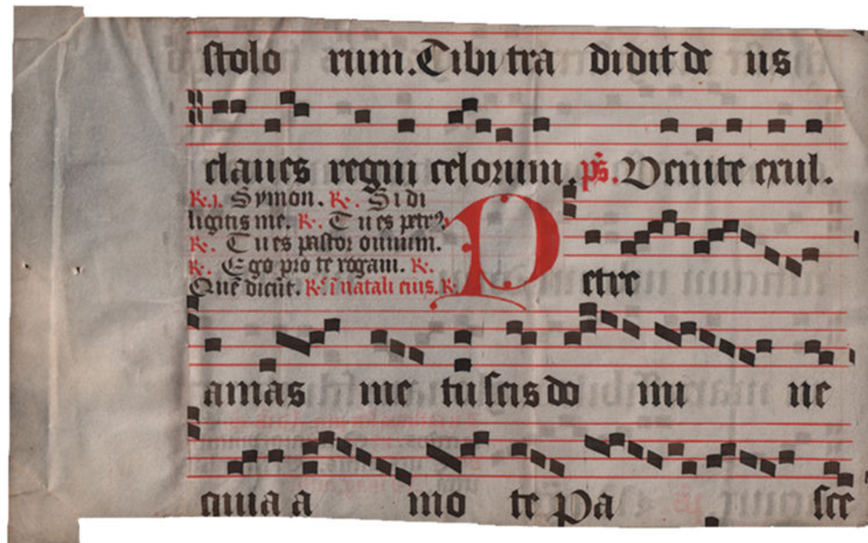


达尼丁公共图书馆“MS 5”号藏品的细节图，这是一份15世纪的时祷书抄本，抄本中出现了“玛格丽·菲茨赫伯特”（Margery FitzHerbert）的名字

对于我小小会年纪就如此痴迷中世纪书籍一事，我不知道我父母当时的真实想法。他们容忍了我的这个爱好，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害处，但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好。我的哥哥时常也会跟我一起去，他最开始很迷茫，不过很快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最终爱上了新闻工作。至于我的弟弟妹妹们则是分别跟早期的计算机、自然史和法律打起了交道。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回英格兰待了六个星期，与住在维尔特郡的姨妈和堂兄弟们一起过圣诞节，这次经历决定了我的命

运。首先，我意识到我们的口音跟这里的人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见识到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那些名扬天下的抄本，诸如《西奈抄本》《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等。当时我甚至有幸参观了《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的专场巡展。这样的经历让我非常兴奋。此外，我们在一个下雪天被带到牛津大学，参观了博德利图书馆的展品，其中就包括13世纪的伟大抄本《教导圣经》（Bible Moralisée）；我们在阿什莫林博物馆参观了阿尔弗雷德珠宝展出，这给我们兄弟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还看到了保存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大宪章》（Magna Carta）。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启发。这些抄本的分量当然不是达尼丁图书馆里的抄本能够比拟的，不过，我也意识到，在英格兰，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绝对不会被允许打开展柜，去碰触其中的物件的，更别说乘校车将它们带回家了。新西兰与中世纪欧洲的遥远距离，既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到现在还坚信，在世界的偏远之地的图书馆保存中世纪抄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在此次探亲之旅中，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中世纪抄本残片，来自一份以书法字体抄写的15世纪法国的合唱本抄本，上面有大大的精美的红色首字母。这半页残片花了我五法郎，约合五十便士，是我第一次造访巴黎时在塞纳河河边的旧书摊上淘到的。至今我依然保存着它，在我接近七百份的个人收藏品里，它编号“MS 1”。

回到新西兰后，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图鉴，名为《新西兰最古老的抄本》（*The Oldest Manuscripts in New Zealand*），作者是大卫· M. 泰勒（David M. Taylor），于1955年由教育研究委员会出版。该书主要讲述了作者在新西兰的各个图书馆和收藏机构中寻访中世纪抄本时发生的轶事。泰勒在书中描述了七十七份古老抄本，对于其中的半数抄本我目前已经有所了解。该书显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而在廉价出售；几年之后，我有幸见到泰勒先生，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么一本书了。我却被这本书深深迷住了，很快就将书中每一页的内容都烂熟于心。我也背上一个帆布背包（rucksack，新西兰人称之为“backpack”），踏上了自己的抄本之旅。我的第一站是奥克兰，当时我住在一个同学的哥哥的学生公寓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颇为大胆的事了。



本书作者私人藏品当中编号“MS　1”的残片，于1967年1月在巴黎购入，来自一份中世纪晚期的交替圣歌集（Antiphoner）抄本

我第一次来奥克兰的时候，奥克兰公共图书馆还在威斯利（Wellesley）大街上那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里。这座图书馆是于1887年3月开馆的，比里德一家来到奥克兰只早一个月。这座图书馆有一间双层阅览室，是由一系列铁柱子支撑起来的，里面摆放了诸多带基座的大理石半身像，记忆中我就坐在这间阅览室的长桌边，一本接一本地看着中世纪抄本。图书馆的藏书如今都被搬到了新馆，新馆也在同一条街上，于1971年完工。馆藏抄本主要是乔治·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1812～1898）的遗赠，格雷爵士曾出任南澳大利亚总督、新西兰总督（两次），以及开普敦殖民地总督，1877～1879年，他升任新西兰总理。退休后，他就居住在奥克兰附近的豪拉基湾的一个私人小岛上。格雷爵士的收藏品跟里德先生的截然不同，格雷爵士显然是有意识地将尽可能多的欧洲文化引入这最偏远的殖民地。格雷爵士是一位贵族收藏家，在吉尔福德和桑德赫斯（Guildford and Sandhurst）的皇家文法学校接受过古典教育。奥克兰的抄本的语种涵盖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甚至中世纪的捷克语。这里还收藏了西塞罗、约瑟夫斯（Josephus）、尤文纳尔、珀修斯（Persius）、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等人作品的抄本。很显然，里德先生对此类藏品是不会感兴趣的。拿破仑对修道院的镇压，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革命带来的震荡和混乱，令人们很容易在19世纪的欧洲古书市场上获得这些令人仰慕的作家的作品。格雷的赠书当中还有一些《圣经》抄本，包括两份希腊语的早期福音书抄本，但是只有一份时祷书抄本，不过，这份时祷书很有意思：它曾被收藏在中世纪的苏格兰。

这些抄本实际上是格雷爵士收藏的第二批珍本。此前，他于1861年将自己的第一批藏书捐赠给了开普敦公共图书馆，可惜，这些藏书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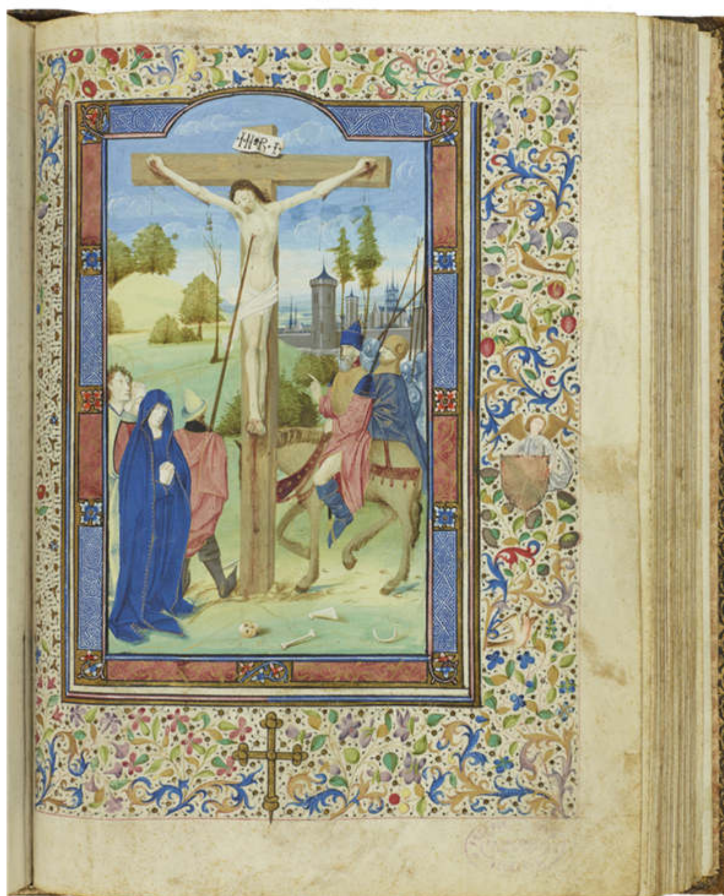
后基本无人问津。我曾多次前往开普敦公共图书馆，亲眼见证了那里的收藏跟奥克兰图书馆的是何其相像。比如说，和奥克兰的图书馆一样，开普敦的图书馆也藏有一份精美的希腊语福音书抄本，也有精美的弥撒书、读经表以及西塞罗、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波埃修斯、圭多·德拉·科伦纳（guido della colonna）、佩特鲁斯·里加（Petrus Riga）、薄伽丘、彼得拉克等人的作品。而且，两座图书馆常常会藏有同一本书的摇篮期印刷本，且摆放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格雷爵士的塑像，这倒是件便利的事，因为若是其中一地的塑像头部被毁坏了——在政治骚乱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就从另一个地方复制一个就可以了。不过，说实在的，开普敦的图书馆要更好一些，那里的抄本更为珍贵，抄本中的彩饰也更为精美；当然二者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盛景的非凡见证。在1953年的一次广播访谈中，侨居海外的奥克兰人J. A. W. 贝内特（J. A. W. Bennet）教授讲述了自己和学生们一起游历欧洲，寻访中世纪抄本的情形，教授说：“我回到新西兰后发现，若是我们待在家乡，直接坐车去奥克兰公共图书馆，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学到更多的知识。”



乔治·格雷爵士的塑像，位于开普敦的原荷属东印度公司花园里，现在这里是南非国家图书馆

藏于奥克兰的两份最为气派的泥金装饰抄本中，一份是巨型的四卷本拉丁语《圣经》抄本，是荷兰迪尔斯泰德附近韦克（Wijk-bij-Duurstede）的多米尼克女修道院于1411年受赠的；另一份则是15世纪的十分豪华的两卷本插图版弥撒书，该抄本里有一个中世纪主教的纹章频繁出现，是有意覆盖在其他图案上的。有一种十分荒诞的说法是，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在美因茨制作的那本伟大的《圣经》，就是以这里的《圣经》抄本为范本的。格雷爵士在1855年，也就是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赠给开普敦公共图书馆的六年前，花了105英镑购得这份《圣经》抄本，这也是他的藏书当中最为昂贵的一本。不久之前，我在英格兰的萨夫伦沃尔登（Saffron Walden）偶然见过另一份《圣经》抄本，该抄本里有一条1795年的注解，将抄本本身同奥克兰的四卷本进行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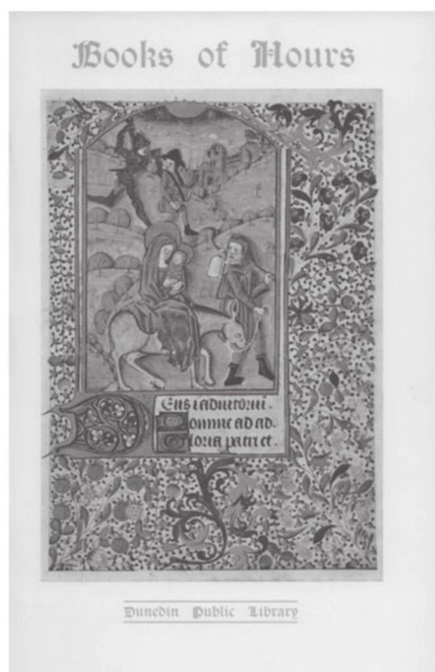
对，指出这两份抄本在当时都是布鲁塞尔多米尼克修会的珍藏品。如今，奥克兰的四卷本《圣经》抄本有着19世纪的装帧，非常厚实，用的都是亮丽得有些刺眼的草莓色天鹅绒，奥克兰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都叫该抄本“粉红大象”。而弥撒书抄本则有六十八幅小的和四幅整页的人物画像，我还清晰地记得翻动书页之时我是何等吃惊，它比我在达尼丁见过的所有抄本都精美得多。画像背景中画得十分精美的繁茂树林，把我直接送回了15世纪法兰西的淳朴乡村，跟由尼考棕榈树和栅栏围场构筑的新西兰现代景观全然不同。抄本里召请当地圣徒的祷文表明其使用之地是法兰西东部的贝桑松（Besançon）。第一次翻阅这份抄本的时候，我用了大概半天的时间才推断出，很多页面上被抹去的纹章应当是1463~1478年的贝桑松大主教查理·德·讷沙泰勒（Charles de Neuchâtel, 1442~1498）的纹章。发现这一点并不难。我告诉大家这一点，并无自我夸耀之意，只是想简单地说明此前不曾有人尝试这样的鉴定。即便是业余爱好者，比如来自达尼丁的毫无经验的中学生，也能在中世纪抄本里获得有趣的发现。这本弥撒书的画师的笔迹也出现在了其他抄本中，他现在因奥克兰的一份同名抄本而以“查理·德·讷沙泰勒抄本画师”的名字为众人所知。实际上，每次见到这个名字，我都会感到小小的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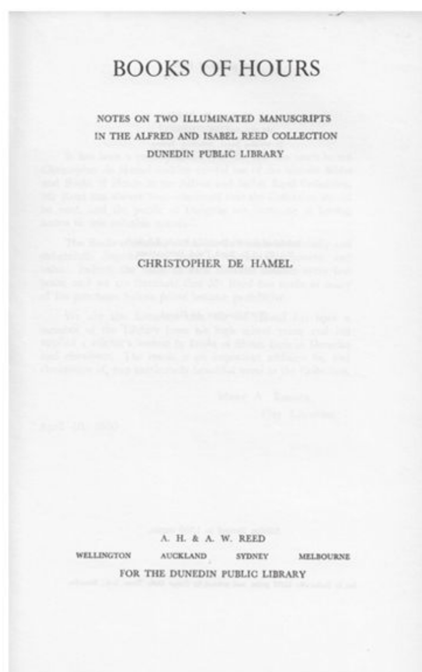


奥克兰格雷藏品当中的《查理·德·讷沙泰勒弥撒书》（Missal of Charles de Neufchâtel），页面右侧的抄本资助人纹章被抹去了

返回达尼丁之后，我在奥塔哥大学（Otago University）攻读了历史学学位。当时这所大学还没有中世纪方向的学位（现在已经有了），不过，我仍然会拜访公共图书馆，并且跟里德先生混得很熟了。我会前往里德先生在格林公园大街的家中做客，他的房子装修得非常古旧，里德先生一个人生活在那里面，极为朴素，至今我都难以忘记房间里面的灰尘，还有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在里德先生的鼓励之下，我写了一本小书，题为《论时祷书：对达尼丁公共图书馆阿尔弗雷德和伊莎贝尔·里德藏品当中两份彩饰抄本的注解》（*Books of Hours, Notes on Two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the Alfred and Isabel Reed Collection, Dunedin Public Library*），当时我十九岁，这算是我的第一篇专题论文，最终于1970年年初发表。玛丽·罗恩妮（Mary Ronnie），市图书馆的管理员，为这本小书撰写了前言，她提到，“……德·哈默尔先生从高中时代起就是图书馆的一员了”，非常巧妙地掩盖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在此，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罗恩妮小姐还健在呢。我对这

本书是无比自豪的，但说实话，它写得相当糟糕，稚嫩且不成熟。很多年来，这本书一直被摆在图书馆里出售，标价1新西兰元，很可能现在也还在（在我看来，并不值得买）。




BOOKS OF HOURS

NOTES ON TWO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THE ALFRED AND ISABEL REED COLLECTION
DUNEDIN PUBLIC LIBRARY

CHRISTOPHER DE HAMEL

A. H. & A. W. REED
WELLINGTON AUCKLAND SYDNEY MELBOURNE
FOR THE DUNEDIN PUBLIC LIBRARY

《论时祷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德·哈默尔，1970年出版

大学放假时，我来到威灵顿的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的抄本部打工。这是新西兰的第三个珍本收藏中心，也是最具规模的一个。该图书馆起初是私人图书馆，收藏了亚历山大·霍斯伯勒·特恩布尔（Alexander Horsburgh Turnbull, 1868~1918）的55000册私人藏书。亚历山大·特恩布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19世纪布商的继承人，他一生未婚，在我打工的时候，这座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创建者的私人物品，因为图书馆当时仍在他那位于鲍温大街上的私宅里。后来，图书馆由于有地震风险而关闭了（这座私宅至今仍然伫立着），而今，特恩布尔的伟大遗产已经被收入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为之设立了特殊藏品部。亚历山大·特恩布尔本人只购买过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泥金装饰抄本，当然是一份很好的抄本；不过，在他去世之后，便有另外的藏品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包括一些捐赠，比如约翰·伊洛特爵士（Sir John Ilott, 1884~1973）的赠书。我曾为特恩布尔的藏品编制了名录。特恩布尔本人购买的那份中世纪抄本是12世纪波埃修斯的插图版《论音乐》（*De musica*），非常精美。它的扉页上面还保留着当年的标题，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修道院（Christ Church Cathedral Priory）的中世纪藏书名录中，有一个条目跟这个标题一模一样。我们尝试了紫外线技术，奇迹出现了，扉页标题后出现了一行被抹

去的文字，“De claustro cantuarie”，即“来自坎特伯雷修道院”，由此真相大白。近些年来，好几架子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中世纪藏品来到了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就在我的监管之下，其中一些是来自12世纪之前很久的藏品，然而威灵顿的波埃修斯抄本要比所有这些抄本都走得更远，而且直到今天，它对我来说都十分珍贵。

本科毕业后，我申请到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中世纪抄本。在申请材料中我加入了我发表的《论时祷书》和编制的特恩布尔藏书名录。再往后，我在中世纪抄本世界里展开了更多的游历，其中一些故事就被呈现在了这本《非凡抄本寻访录》里。本书要专门献给纽约的斯科特·施瓦茨先生，他购买了很多本，也将这本书送给了很多人，此等热忱令我诚惶诚恐，无论是作为本书的作者，还是作为施瓦茨先生的朋友，恐怕我都担当不起。不过，倘若真的要说有谁对我的职业生涯以及我写的这本书影响最大，那就非A. H. 里德先生和20世纪60年代达尼丁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莫属了，正是他们给了当年的那个学童莫大的鼓励。倘若有一天，有一个中学生读了这本书或者造访了帕克图书馆，并由此享受到了抄本的乐趣，那么这本书也就实现了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与注释

导言

我首先要说的是，同艾伦·莱恩（Allen Lane）出版社的斯图亚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及其同事共事，是一件愉快且美妙的事。我所说的同事包括了本·辛约尔（Ben Sinyor）、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马克·汉斯利（Mark Handsley）以及西蒙·罗德斯（Simon Rhodes）等优秀人士，我们曾多次在一起商谈，会议时间虽长却令人兴奋；此外还有图片编辑塞西莉亚·麦凯（Cecilia Mackay）以及装帧设计师安德鲁·巴克尔（Andrew Barker），他们对本书的帮助和贡献都是无可估量的。偶尔，我们也会有一些分歧。比如说，我更偏爱原来的书名，“抄本访谈录”，因为我觉得“访谈”相比“寻访”更契合本书的内容，但是我最终还是顺从了出版人的经验，倘若这是为了一段迷人且令人愉悦的协作关系应当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也值了。

第一章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已经有了完整的电子版，可以在“帕克图书馆在线查阅”（Parker-on-the-Web）中找到，这是该网站主办方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通力协作的成果。关于这份抄本，最重要的研究论文是，F. Wormald, *The Miniatures in the Gospels of Saint Augustin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Cambridge, 1954 (*Sandars Lectures*,1948), reprinted in Wormald's *Collected Writings,* I, London and Oxford, 1984, pp. 13-35。此外，还有不少带有参考文献的重点精选文献，可参阅：E. A. 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A Palaeographical Guide to Latin Manuscripts prior to the Ninth Century*, II,*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nd edn, Oxford, 1972, p. 4, no. 126; M. Budny, *Insular, Anglo-Saxon, and Early Anglo-Norman Manuscript Art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Kalamazoo, Mich., and Cambridge, 1997, pp. 1-50, no. 1; B. Barker-Benfield,*St Augustine. Babbey, Canterbury*, London, 2008 (*Corpus of British Medieval Library Catalogues*, 13), especially III, pp. 1732-3；N. Morgan, S. Panayotova and S. Reynolds, *A Catalogue of Western Book Illumination in the Fitzwilliam Museum and the Cambridge Colleges*, II, i, *Italy & the Iberian Peninsula*, London and Turnhout, 2011, pp. 18-22, no. 1。

关于马修·帕克，暂且没有正式的学术传记问世，尽管David J. Crankshaw和Alexandra Gillespie为“马修·帕克”这个词条搜集整理了相当厚实的文献素材，见*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在呈现帕克作为收藏家的一面时，我参考了我本人为“斯卡拉博物馆系

列”（Scala museums series）撰写的一份手册，C. de Hamel, *The Parker Library*, London, 2010；这份手册本身则主要参考了：R. I. Page, *Matthew Parker and His Books: Sandars Lectures in Bibliography delivered on 14, 16 and 18 May 1990*, Kalamazoo, Mich., 1993。现在我们在谋划出版一份相关的会议论文集，此次会议于2016年3月17~19日在剑桥召开，由Anthony Grafton、Scott Mandelbrote和William Sherman主持，会议主题是“马修·帕克：大主教、学者和收藏家”（“Matthew Parker, Archbishop, Scholar,Collector”）。加入帕克图书馆之后，我便同Gill Cannell和Steven Archer成了同事，他们都是很理想的同事。我部分简化了帕克遗嘱中的一些条款，这些条款规定了这批赠书的折损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规定了，倘若赠书在冈维尔和凯斯学院也发生了同样的折损，则将被转归三一学院。帕克的另一部分藏书则是被赠予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尽管不是很多。本书第20页，我谈到了“安色尔”（uncial）一词源自“uncia”，意思就是“寸”；当然另有说法认为，“安色尔”一词最先是“initial”一词误拼而成，后来人们才将之与“寸”联系起来。关于“从句和短句分行法”（per cola et commata）的问题，我特意讨教了拉尔夫·汉娜（Ralph Hanna）教授，那次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本书第20页提到的《语词汇编》，是指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144, folio 8v (W. M. Lindsay, ed., *The Corpus Glossary*, Cambridge, 1921, p. 14)。关于蒂申多夫的《西奈抄本》，现主要收藏于大英图书馆（Add. MS 43725），具体可参阅一份极为优秀的总论：D. C. Parker, *Codex Sinaiticus: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London and Peabody, Mass., 2010。关于本书于第24页谈到的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展览，参见P. Binski and S. Panayotova,eds.,*The Cambridge Illuminations:Ten Centuries of Book Illumination in the Medieval West*, London and Turnhout, 2005；在这部作品中，《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是其介绍的第一本书，出现在第46~47页，相应的章节由R. McKitterick撰写。亚利桑那主教写的书的具体信息是：K. Smith, *Augustine's Relic: Lessons from theOldest Bookin England*, New York, 2016。本书第24页引介了汉弗雷·万利（Humfrey Wanley），从他的文字中似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趣且相当讨人喜欢的人；1699年，汉弗雷曾造访帕克图书馆，当时的圣体学院还叫作“贝内特”（Bennet）学院（参见，P. L. Heyworth, ed.,*The Letters of Humphrey Wanley, Palaeographer, Anglo-Saxonist, Librarian*, 1672-1726, Oxford, 1989, p. 138）。万利本人也著书描述了《圣奥古斯丁福音书》，见H. Wanley, *Antiquae Litteraturae Septentrionalis, Liber alter*, Oxford, 1705 (volume II of G. Hickes, *Linguarum Veterum Septentrionalium Thesaurus Grammatico-Criticus et Archaeologicus*), pp. 51 and 172-3。万利还将另一份福音书抄本同圣格里高利联系起来，这份抄本如今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见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Auct. D.2.14。关于这两份福音书抄本，其他早期的古籍研究性质的论文包括：T. Astle,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Writing, As Well Hieroglyphic As Elementary, Illustrated by Engravings Taken from Marbles, Manuscripts and Charters,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1784，在这本书中，有关《圣奥古斯丁福音书》的内容出现在

第83页，插图编号是“plate X”；J. O. Westwood, *Palaeographia Sacra Pictoria: Being 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Bible, Copied from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Executed between the Four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843-5，其中第10部分单独标注了页码1~6，标题是“The Gospels of Saints Augustine and Cuthbert”；J. Goodwin, *Evangelia Augustini Gregoriana: An Historical and Illustrative Description of MSS nos. CCLXXXVI and CXCVII in the Parker Library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being the Gospels sent by Pope Gregory the Great to Augustine, ad DCI*, Cambridge, 1847 (*Publications of the Cambridge Antiquarian Society, Quarto series*, 3)。关于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那份福音书抄本，可参见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 p. 31, no. 230; Barker-Benfield, 前引书，pp. 1734-5；关于这份福音书的完整抄本，可参阅A. N. Doane, ed., *Anglo-Saxon Manuscripts in Microfiche Facsimile*, 7, Tempe, Az., 2002 (*Medieval &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 187)。我曾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跟多亚尼（Doane）教授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流，话题就是“Auct. D.2.14”抄本是在意大利制作的，还是在英格兰根据意大利范本由一个很可能是意大利人的抄写员抄写的。“MS 286”号抄本里面所附的特许状（本书第27页）记载于P. H. Sawyer, *Anglo-Saxon Charters: An Annotated List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1968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Guides and Handbooks*, 8), pp. 351 and 408, nos. 1198 and 1455；关于对这些特许状的讨论，可参阅S. E. Kelly, ed., *Charters of St Augustine's Abbey, Canterbury, and Minster-in-Thanet*, Oxford, 1995 (*Anglo-Saxon Charters*, 4), pp. 95-7, no. 24 (and plate 3), and pp. 118-19, no. 31。关于坎特伯雷修道院的早期藏书情况，可参阅R. Emms, “St Augustine’ s Abbey, Canterbury, and ‘First Fruits of the Whole English Church’”, pp. 32-45 in R. N. Swanson, ed., *The Church and the Book: Papers Read at the 2000 Summer Meeting and the 2001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Society*,Woodbridge,2004。Thomas Sprott编写的编年史至今没有出版，这些材料仍然散落在两份抄本里面。Thomas Elmham的*Speculum Augustinianum*由C. Hardwick编辑,London, 1858 (Rolls Series, 8)；原本为Cambridge, Trinity Hall, MS 1. A Customary；本书第27页谈到的修道院章程实际上是指教团内部的手册，用于规约教团成员的职责和行为；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E. M. Thompson, ed.,*Customary of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of Saint Augustine, Canterbury, and Saint Peter*, Westminster, London, 1902 (Henry Bradshaw Society, XXIII), p. 101。布德尼（Budny）对圣徒米尔德雷德（Saint Mildred）的相关论说，可见前引书 *Illustrated Catalogue*，pp. 6-7, 11。收藏于伦敦和剑桥两地的福音书抄本为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Otho C.v和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197b（参见Lowe,*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 p. 3, no.125, and Budny, pp. 55-73, no. 3)。本书第33页提到的X标记（*siglum* X），指的是以这份抄本为现代拉丁通行本《圣经》的文本依据提供的《圣经》解读，如H. J. White and J. Wordsworth, *Novum Testamentum Domini Nostri Iesu Christi latine, secundum editionem Sancti*

Hieronymi, Oxford, 1899，今天的Bonifatius Fischer等人编辑的版本(3rd edn, Stuttgart, 1985)仍对其有沿用。对“MS 286”抄本的文本分析，可参见H. H. Glunz, *History of the Vulgate in England from Alcuin to Roger Bacon: Being an Inquiry into the Text of Some English Manuscripts of the Vulgate Gospels*, Cambridge, 1933, esp. pp. 294-304。我一直都尽量避免猜测这份抄本究竟是谁制作的或者是在罗马的什么地方制作的；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SSC）神父Robert McCulloch认为，格里高利很可能是委托了罗马的圣安德烈修道院制作的这份抄本，奥古斯丁本人曾在这座修道院担任院长，该修道院也是格里高利在登临教宗大位之前在自家庄园地产上创建的。如今，这座修道院仍然存在，不过已经变成卡马尔迪斯派的修道院，附属于圣格里高利大教堂（San Gregorio Magno al Celio）。圣格里高利曾给塞勒努斯（Serenus）写了一封信，着重谈论了宗教艺术品的价值，本书第39页征引了这封信，参见Gregory the Great, *Registrum Epistolarum*, book IX, ep. 13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LXXVII: 1027)；马修·帕克也知道这一点，并且在他于1559年呈送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了圣格里高利的这封信，见J. Bruce and T. T. Perowne, eds., *Correspondence of Matthew Parker*, D.D., Cambridge, 1853, p. 89。比德关于圣奥古斯丁同埃塞尔伯特国王的会面的叙述可参见Bede，*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book I, cap. 35 (C. Plummer, ed., *Venerabilis Baedae: Opera Historica*, Oxford, 1896, pp. 45-6)。本书第40页谈到了圣路加画像上方门拱之上出现的塞杜利乌斯（Sedulius）的话，具体为，“Jura sacerdotii Lucas tenet ora iubenci”（“路加将教牧权能衔于小牛的口中”，*Carmen Paschale*, book I, line 357）。在圣路加手持书卷的图上，后来有人添加了如下文字，“Fuit homo missus a deo”（“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句话实际上出自《约翰福音》1:6，不过，原经文指的是施洗者约翰，《路加福音》恰恰就是以施洗者约翰的诞生为开篇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中的插图，可参阅F. Wormald especially（前引书），以及，J. Lowden, “The Beginnings of Biblical Illustration”, pp. 9-59 in J. Williams, ed., *Imaging the Early Medieval Bible*, University Park, Pa, 1999，这本书也讲述了本书第44～45页列举的6世纪的另外一些抄本。本书第42页谈到两位教授运用拉曼光谱仪对一系列中世纪抄本展开了研究，他们取得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可见A. Beeby, A. R. Duckworth, R. G. Gameson and others, “Pigments of the Earliest Northumbrian Manuscripts”, Scriptorium, 59, 2015, pp. 33-59。如今收藏在蒙扎（Monza）的抄本的封面在多份作品中都得到了影印，可特别参见J. Richards, *Consul of God: The Life and Times of Gregory the Great*, London, 1980, pl. 13。有关《阿巴该福音书》抄本的报道可见M. Bailey,“Discovery of earliest illustrated manuscript”,*The Art Newspaper*, June 2010，不过，该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完整出版；2013年11月，牛津大学组织了以“阿巴该福音书及其背景”为主题的研讨会，我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主持了部分议程。本书第44～45页提及的6世纪的另三份伟大福音书抄本分别是《拉布喇福音书》（*the Rabbula Gospels*, Florence, Biblioteca Laurenziana, cod. Plut. I. 56）；《罗萨诺

福音书》（*the Rossano Gospels*, Rossano, Museo dell'Archivescovada）以及《锡诺普福音书》（*the Codex Sinopensis*, Paris, Bibliothèquenationale de France, ms suppl. grec. 1286）。“拉布喇抄本”和“锡诺普抄本”都曾于2006年参加了华盛顿萨克勒画廊的展出，我就是在此次展出之时见到这两份抄本的；关于这两份抄本，可参阅M. Brown, ed., *In the Beginning: Bibles before the Year 1000*, Washington, 2006, pp. 300 and 302, nos. 62 and 64。关于差点购得《罗萨诺福音书》抄本一事，可参阅A. S. Lewis,*Life of the Rev. Samuel Savage Lewis, F.S.A., Fellow and Librarian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Cambridge, 1892, pp. 208-9。另一部作品对此事也有概述，见J. M. Soskice,*Sisters of Sinai: How Two Lady Adventurers Found the Hidden Gospels*, London, 2009, p. 94。该抄本的影印本已经制作出来了，见G. Cavallo, J. Gribomont and W. C. Loerke, eds., *Codex Purpureus Rossanensis*, Rome and Graz, 1985-7 (*Codices Selecti*, 81)。现存斯德哥尔摩的《奥里斯抄本》也已经有了影印本，见R.Gameson, ed.,*The Codex Aureus: An Eighth-Century Gospel Book, Stockholm, Kungliga Bibliothek, A. 135*, Copenhagen, 2 vols., 2001-2 (*Early English Manuscripts in Facsimile*, 28-9)。本书第47页提及的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那份福音书抄本为“Royal MS 1.E.VI”，是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制作的，并且人们认为，该抄本至少有部分内容来自已经佚失的圣奥古斯丁的《圣经》抄本；参阅，J. J. G. Alexander, *Insular Manuscripts: 6th to the 9th Century*, London, 1978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the British Isles*, I), pp. 58-9, no. 32，这部作品的第161页上还印有该抄本第43对开页右页上的那幅小牛插图。本书第47～48页提到的12世纪的《埃德温圣咏抄本》，为“Cambridge, TrinityCollege, MS R.17.1”；该抄本的文前插图已经与抄本本身分离，如今分别被收藏在伦敦（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816-1894；British Library, Add. MS 37472）和纽约（Morgan Library, M 521 and M 724），参见M. Gibson, T. A. Heslop and R. W. Pfaff, eds., *The Eadwine Psalter: Text, Image and Monastic Culture in Twelfth-Century Canterbury*, London, 1992, esp. p. 29）。我给我的小儿子起名为埃德温，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份无与伦比的抄本。《盎格鲁-卡塔兰圣咏抄本》（Anglo-Catalan Psalter）为“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8846”；参见*Psalterium Glosatum* (*Salterio Anglo-Catalán*), facsimile, Barcelona, 2004，这一影印本的附录中有N. Morgan等人于2006年写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评注（第48～49页）。我要感谢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档案员克莱西达·威廉斯，否则我无缘得见威廉·乌尔里于1961年写的有关《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抄本的坎特伯雷之旅的文稿。关于我的西敏寺之行，在当时我就做了文字记录，相关文章并被刊印在了圣体学院的年鉴上，本书中基本上我照搬了年鉴上的记录，略有改动，见C. de Hamel, “The Pope and the Gospel Book of St. Augustine”，*The Letter*, 89,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Michaelmas 2010, pp. 24-7。我曾将本章的初稿呈送小说家詹姆斯·朗西（James Runcie），他将其中一些细节，比如唱诗班吟唱之时书页的颤动等，融入了关于一个以帕克图书

馆和坎特伯雷为背景的抄本窃贼的故事当中，见“Ex Libris”, to appear in *Sidney Chambers and the End of Days*, 2017 (*The Grantchester Mysteries*, 6)。

第二章　阿米提奴抄本

《阿米提奴抄本》已经出了相当奢华的影印本，不过是缩编版的，没有注解，见La Meta Editore, *La Bibbia Amiatina*, Florence, 2003。还有一份光盘版，是2000年由“SISMEL”（Società Internazionale per lo Studio del Medio Evo Latino）制作的。关于这份抄本及其相关文献，主要参见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I, 1938, p. 8, no. 299和Alexander, Insular Manuscripts, 1978, 前引书, pp. 32-5, no. 7。

关于维尔茅斯-亚罗的发掘情况，参见R. J. Cramp, “Monastic Sites”, pp. 201Sit, in D. M. Wilson, ed.,*The Archaeology of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76, esp. pp. 229Eng。比德关于维尔茅斯修道院的创建以及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和塞奥尔夫利特的罗马之行的叙述，可见比德的*Historia Abbatum*（C. Plummer, ed., *Venerabilis Baedae: Opera Historica*, as above, 1896, pp. 367-8 and 373）。二人的这趟罗马之行很可能带回了《马卡比书》，这份抄本的残片附在Durham Cathedral Library, MS B.IV.6后；这份残片作为插图被刊印于最近的一部作品：R. Gameson, *Manuscript Treasures of Durham Cathedral*, London, 2010, pp. 22-3, no. 1。关于出现了塞奥尔夫利特的名字的那份献词，可参阅J. Higgitt, “The Dedication Inscription at Jarrow and Its Context”,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59, 1979, pp. 343lna。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制作《圣经》抄本一事在*Vita Ceolfridi*中有记录，这份传记收录在Plummer编辑的一部比德的作品当中，见Plummer's edition of Bede's *Opera Historica*, p. 395，比德在另一部作品中也谈到了此事，见*Historia Abbatum* (Plummer, p. 379)。关于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的抄本制作情况，可参阅E. A. Lowe, *English Uncial*, Oxford, 1960, esp. pp. 6-13，该书还刊印了同时代的一些主要文献；也可参阅M. B. Parkes, *The Scriptorium of Wearmouth-Jarrow: Jarrow Lecture 1982*,Jarrow,1982。附在《圣经》抄本中的题词，在《塞奥尔夫利特传》中也有记载，见*Vita Ceolfridi* (Plummer, p. 402)。本章主要参考的文献为：R. Marsden,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Anglo-Saxon England*, Cambridge, 2005 (*Cambridge Studies in Anglo-Saxon England*, 15), esp. pp. 91-8。关于拉丁通行本的情况，已经有一份概论问世，其中也谈到了《阿米提奴抄本》的地位，见P.-M. Bogaert, “The Latin Bible, c. 600 to c. 900”, pp. 69-92 in R. Marsden and E. A. Matter, eds.,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II, *From 600 to 1450*, Cambridge, 2012。蒂申多夫就献词页的涂抹痕迹也曾有评说，见他本人编辑的作品*Novum Testamentum Latine interprete Hieronymo, ex Celeberrimo Codice Amiatino Omnium et Antiquissimo et Praestantissimo, nunc primum edidit*, Leipzig, 1850, p. ix。原本词句的解析工作，可参阅G. B. de Rossi, “De origine historia indicibus scrinii et bibliothecae Sedis Apostolicae

commentatio”, pp. lxxv-lxxviii in H. Stevenson and G. B. de Rossi, eds., *Codices Palatini Latini Bibliothecae Vaticanae*, I, Rome, 1886。同塞奥尔夫利特版《圣经》抄本里面的题词的比照情况，可参见F. J. A. Hort, *The Academy*, 31, 26 February 1887, pp. 148-9。本书第62页引述了H.J.怀特的话（p. 273），出自H. J. White，“The Codex Amiatinus and Its Birthplace”, *Studia Biblica et Ecclesiastica*, 2, 1890, pp. 273-308。在此对尼古拉斯·巴克尔（Nicolas Barker）先生深表感谢，我在整个这一章的写作中都非常倚重巴克尔的相关论述，同时，巴克尔先生也读过本章的初稿，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我多次用到的R.L.S.布鲁斯-米特福德的作品是：R.L. S. Bruce-Mitford, *The Ar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Jarrow Lecture 1967*, Jarrow, 1978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3 ser., 32, 1969, pp. 1-25)；本书第65页以“在等了很长时间后……”为起始句的引文，出自这部作品的第1～2页。本章对洛伦佐图书馆的描写，以及在其余章中对其他几座图书馆的描写，都是从一部相当优雅的作品当中得到的灵感，见A. R. A. Hobson, *Great Libraries*, London, 1970；有关洛伦佐图书馆的描述在这本书的第84～91页。克莱尔·布莱亚（Claire Breay）替我查看了庭院中所种的果树，并给了其他一些相当周详的建议。斯科特·格瓦拉（Scott Gwara）也非常耐心地阅读了本章的内容。我相信我的校勘是准确的；此前有不同的校勘结果，比如H. Quentin, *Mémoire sur l’établissement du texte de la Vulgate*, Rome, 1922, pp. 438-40，其作者试图将实际情况跟抄写员最初编订的有问题的页码匹配起来，而我完全没有参照这种编码体系。关于卡西奥多罗斯的藏书以及他收藏的包括《阿米提奴抄本》在内的多份抄本的情况，可参见R. L. S. Bruce-Mitford, “Decoration and Miniatures”, pp. 109-260 in T. D. Kendrick, ed., *Evangeliorum Quattuor Codex Lindisfarniensis*,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facsimile, Lausanne, 1960, esp. pp. 143-9 in Chapter Three, “The Sources of the Evangelist Miniatures”；以及P. Meyvaert, “Bede, Cassiodorus and the Codex Amiatinus”, *Speculum*, 71, 1996, pp. 827-83。本书第74～75页引述了卡西奥多罗斯对“大抄本”的一番描述，此番描述可见Cassiodorus, *Institutiones*, I, 14:2-3 (R. A. B. Mynors, ed., *Cassiodori Senatoris Institutiones*, Oxford, 1937, p. 40)；据卡西奥多罗斯描述，该抄本有95折，算起来就是380页。关于拉文纳迦拉普拉西狄亚陵寝壁画呈现的书橱，我所知道的都来自Gifford Combs。《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圣马太画像插图出现在第25对开页的左页（该抄本为“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Nero D. iv”；这份抄本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在此无法列举）。《阿米提奴抄本》的抄写员是英格兰人（见本书第80～81页），关于这个问题，Lowe给出了简洁且具有决定性的证据，参见Lowe, *English Uncial*，前引书；作者比较了维尔茅斯-亚罗修道院制作的其他抄本，包括：两份福音书抄本的残章（Utrecht,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32, folios 94-105,和Durham Cathedral Library, A.II.17, folios 103-111)，以及一张圣咏抄本中的残页(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S Ff.5.27, flyleaf）。“斯托尼霍斯特福音书”，又称“圣库斯伯特福音书”，为British Library, Add. MS

89000。关于这份福音书抄本，参见T. J. Brown, ed., *The Stonyhurst Gospel of Saint John*, Oxford, 1969，以及C. Breay and B. Meehan, eds., *The St Cuthbert Gospel: Studies on the Insular Manuscript of 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London, 2015，后者是在我写完本章之后出版的；两位作者倾向于将两份福音书抄本以及《阿米提奴抄本》的制作时间定在8世纪早期（尽管《圣经》抄本的制作时间不会晚于716年），而目前的说法是，福音书抄本是后来才被放进库斯伯特的棺材的，而且很可能是库斯伯特下葬很久之后的事情，肯定要晚于698年，因为这位圣徒的遗骸就是在这一年入殓的。D.H.Wright对曾参与《阿米提奴抄本》制作工作的抄写员进行了解析，见D. H. Wright, “Some Notes on English Uncial”, *Traditio*, 17, 1961, pp. 441-56。关于《阿米提奴抄本》所用羊皮纸张的供应情况，参见R. Gameson, “The Cos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Notes and Queries*, March 1992, pp. 2-9。我实际上跟大家一样，一直认为《阿米提奴抄本》是用牛皮纸制作的。Jiří Vnouček告诉我说，同小牛皮比起来，绵羊皮能够制作出更大的纸张，因为整张成年绵羊皮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羊皮纸，牛皮纸则只能用小牛的皮，牛长大后牛皮的柔软度就不够了。本书第84页谈到了“格林韦尔（绿泉）书页”及其他残页，我在Lyell Lectures中的第一讲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见Lyell Lectures, Oxford, 2009（待出版）。关于“格林韦尔（绿泉）书页”的最早描述，可见C. H. Turner, “Iter Dunelmense: Durham Bible MSS, with the Text of a Leaf Lately in the Possession of Canon Greenwell of Durham, Now in the British Museum”,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0, 1909, pp. 529-44。关于大英博物馆获取“格林韦尔（绿泉）书页”的时间，我借用了克莱尔·布莱亚的论述，如今，“格林韦尔（绿泉）书页”为British Library, Add. MS 37777。关于“威洛比书页”（Willoughby leaves）的最早描述，见W. H. Stevenson, *Report on the Manuscripts of Lord Middleton, Preserved at Wollaton Hall, Nottinghamshire*, London, 1911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report 69), pp. xi-xii, 196-7 and 611-12；“威洛比书页”如今为British Library, Add. MS 45025。Lowe对“格林韦尔（绿泉）书页”和“威洛比书页”都有描述，见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 p. 17, no. 177；关于“班克斯书页”（Bankes leaf），可见pp. 351-2 of B. Bischoff and V. Brown, “Addenda to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Mediaeval Studies*, 47, 1985, pp. 317-66。吉布森认为，“班克斯书页”来自第三份塞奥尔夫利特《圣经》抄本，但是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见M. T. Gibson, *The Bible in the Latin West*, Notre Dame, Ind., and London, 1993 (*The Medieval Book*, I), pp. 24-5, no. 3。《列王记》的引文问题，有一点需要注意，拉丁通行本《列王记》I~IV部分，对应的是现代译本的《撒母耳记》I~II部分和《列王记》I~II部分。本书第90页的拉丁通行本的内容，引自A. Colunga and L. Turrado, eds.,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Clementinam: Nova editio*, Madrid, 1965。本书第92~93页谈到，比德有可能参与了《创世记》8:7的修订工作，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arsden,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前引书, p. 204；也可参阅R. Marsden, “‘Manus Bedae’: Bede's Contnibution to Ceolfrith’ s Bibles”, *Anglo-Saxon England*, 27,

1998, pp. 65-85。关于圣物箱，可参见M. Ryan, “A House-Shaped Shrine of Probable Irish Origin at Abbadia San Salvatore, Province of Siena, Italy”, pp. 141-50 in M. Ryan, ed., *Irish Antiquities: Essays in Memory of Joseph Raftery*, Bray, Co. Wicklow, 1998, reprinted in Ryan, *Studies in Medieval Irish Metalwork*, London, 2001, pp. 574-86。 N. X. O’ Donoghue认为，这些所谓的圣物箱并不是用来存放圣物的，而是用于存放圣饼的圣油箱，是专为游方僧设计的；参见O’ Donoghue, “Insular Chrismals and Houseshaped Shrin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79-91 in C. Hourihane, ed., *Insular & Anglo-Saxon Art and Thought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Princeton and University Park, Pa, 2011 (*The Index of Christian Art*, Occasional Papers, 13)。《塞奥尔夫利特传》（*Vita Ceolfridi*，Plummer, p. 402）中只谈到塞奥尔夫利特死后有一些人决定继续这趟行程（“iter peregere”），不过他们最终是否抵达罗马，或者是否返还家乡，传记里并没有交代。

第三章　凯尔经

本章的写作在很多方面都要感谢伯纳德·米汉（Bernard Meehan）先生，他是都柏林三一学院抄本部的管理员和研究部主任。他曾写了一本相当精彩的插图版《论凯尔经》（Bernard Meehan, *The Book of Kells*, published by Thames & Hudson, London, 2012），这部作品是他与《凯尔经》数十年朝夕共处的结晶，也是我2012年的暑期读物——还记得当时我正在丹麦北方度假，每天就拉上一张躺椅，在沙滩上阅读这本书，读完我就前往都柏林了。《凯尔经》拥有奢华的影印本：Faksimile Verlag, *The Book of Kells, MS 58,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Dublin*, Lucerne, 1990。Peter Fox编辑的《评论》（*Commentary*）卷收录了Umberto Eco, Peter Fox, Patrick McGurk（关于抄本文本），GearóidMac Niocaill（关于爱尔兰语补录内容），Bernard Meehan和Anthony Cairns（着重论述了装帧和颜料）的相关文章。以上两部作品是本章的重点参考资料。该抄本还有一份更早的影印本（Urs Graf, Berne, 1951）。2012年之后，人们便可以免费在网上查阅《凯尔经》的电子版了，具体是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官网的“电子文库”（Digital Collections）栏目中。还有一批《凯尔经》的名录纪要，可参阅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 p.43, no.274; J.J.G. Alexander, *Insular Manuscripts*, 1978, 前引书, pp. 71-6, no. 52；以及M. L. Colker, *Trinity College, Dublin: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Mediaeval and Renaissance Latin Manuscripts*, Aldershot, Hants., and Brookfield, Vt, 1991, pp. 106-8。《凯尔经》的详细参考文献多得令人无法想象。而关于《凯尔经》的彩饰，值得研读一番的文献包括：F. Henry, *The Book of Kells: Reproductions from the Manuscript 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London, 1974; P. Brown, *The Book of Kells: Forty-Eight Pages and Details in Colour from the Manuscript 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0; R. G. Calkins, *Illuminated Book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83, esp. pp. 78-92; G. Henderson, *From Durrow to*

Kells: The Insular Gospel Books, 650-800, London, 1985, pp. 131-98；以及B. Meehan, *The Book of Kells: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o the Manuscript 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London, 1994。都柏林三一学院目前的规定是，任何新出的影印本若是要使用《凯尔经》的插图，那么彩印和黑白插图分别不得超过六幅。我们也略微考虑过使用图片库中未经授权的插图，但最终决定使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影印本中的，这些版本很久之前就已经是公版了，而且它们也是故事的组成部分。

本书第96页摘引的《伯明翰每日邮报》以及另外一些英国和爱尔兰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介绍的《凯尔经》在现代的诸多未经考证来源的故事，都是我通过“凯尔经”这个关键词在*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ewspapers* database, Gale Digital Collections中搜索而来的。1873年，佩尔金斯版的《古腾堡圣经》（*Perkins copy of the Gutenberg Bible*）拍出了近六十年来的天价，关于这个情况，参见R. Folter, “The Gutenberg Bible in the Antiquarian Book Trade”, pp. 271-351 in M. Davies, ed., *Incunabula: Studies in Fifteenth-Century Books presented to Lotte Hellinga*, London, 1999, p. 302。《乌尔斯特志略》抄本为“Trinity College, Dublin,MS 1282”，本章引用的名录纪要出现在该抄本第54对开页的右页，刊印于S. Mac Airt and G. MacNiocaill, eds., *Annals of Ulster to ad 1131: Text and Translation*, Dublin, 1983, p. 439。中世纪盗书贼往往是因为看中了抄本的封皮而实施盗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C. de Hamel, “Book Thefts in the Middle Ages”, pp. 1-14 in R. Myers, M. Harris and G. Mandelbrote, eds., *Against the Law: Crime, Sharp Practice and the Control of Print*, London, 2004。关于图书馆的情况，参见P. Fox,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Dublin*, Cambridge, 2014。关于《凯尔经》的修复和重装情况，我得益于爱德华·奇斯（Edward Cheese）分享给我的一篇文章：A. G. Cairns, “Roger Powell’s Innovation in Book Conservation: The Early Irish Manuscripts Repaired and Bound, 1953-1981”, pp. 68-87 in J. L. Sharpe, ed., *Roger Powell: The Compleat Binder*, Turnhout, 1996 (*Bibliologia*, 14)。我要感谢G. Mac Niocaill为我翻译的这些爱尔兰语文献，“The Irish ‘charters’”, pp. 154-65 in the facsimile commentary volume, 1990。本书第113页谈到，《凯尔经》第7对开页左页上的圣母和圣子画像是欧洲艺术作品当中最早的圣母圣子画像，这个观点来自F. E. Warren, *The Liturgy and Ritual of the Celtic Church*, 2nd edn by J. Stevenson (the first was 1881), Woodbridge, 1987 (*Studies in Celtic History*, IX), p. lxxxv, n. 468, cited by Colker, p. 106。本书第121页对“岛屿大写体”（insular majuscule）的论述太过简单，不足以充分定义这种字体（我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令我的表述更为流畅）；关于这些字体，可参见M. P. Brown, A *Guide to Western Historical Scripts from Antiquity to 1600,* London, 1990, including insular majuscule on pp. 50-51, no. 16。本书第122页征引的诗文，为Hugh MacDiarmid所作，开篇文字是“When a person is greatly interested in a problem...”（当一个人对一个问题极度感兴趣……），出自*Complete Poems*, ed. M. Grieve and W. R. Aitken, II, Manchester, 1994, pp. 1389-93。关于职业抄写员现场讲解《凯尔经》的具体创制过

程，参见M. Drogin, *Medieval Calligraphy: Its History and Technique*, Montclair, NJ, and London, 1980, pp. 109-12。本书第123页引述的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 of Wales）所作的描述，引自J. F. Dimock, ed., *Giraldi Cambrensis Opera*, V, London, 1867 (Rolls Series, 21), pp. 123-4；这部作品的英译本为J. J. O' Meara, ed., Gerald of Wales, *The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Ireland*, Harmondsworth, 1982, p. 84。《凯尔经》并非一份独一无二的抄本，这个想法引人关注是因为2015年11月的一则新闻。当时，柏林一家图书馆在一份抄本的封皮中发现了一小片《路加福音》13:16的残页，残页上的文字和装饰具有明显的《凯尔经》风格。很可能来自一份由早期英伦诸岛的传教团带到德意志的抄本。都柏林另外收藏的一些相当著名的岛屿风格福音书抄本包括the Codex Usserianus Primus（据信最初是在意大利写就的）， Trinity College, MS 55, formerly A.4.15 (Lowe,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前引书, II, p. 42, no. 271, and Alexander, *Insular Manuscripts*, 1978, p.27, no.1); the Codex Usserianus Secundus (Garland of Howth), Trinity College, MS 56, formerly A.4.6 (Lowe, II, p. 43, no. 272); the Book of Durrow, Trinity College, MS 57, formerly A.4.5 (Lowe, II, p. 43, no. 273, Lowe的评论源于此, and Alexander, pp. 30-32, no. 6); the Book of Mulling, Trinity College, MS 60, formerly A.1.15 (Lowe, II, p. 44, no. 276); and the Book of Dimma, Trinity College, MS 59, formerly A.4.23 (Lowe, II, p. 44, no. 275)；我给出这些抄本曾经的编号是为了表明，这些抄本一度被收藏在同一个书柜的两层书架上，也就是该图书馆抄本室编号为“A”的书柜上，其中《凯尔经》编号为“A.1.6”；这实在是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因为仅仅是这两层书架的价值加起来就超过了大多数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本章还提及收藏在爱尔兰之外的四份著名岛屿风格抄本，分别是： Lindisfarne Gospel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Nero D. iv (Lowe, II, p. 20, no. 187, and Alexander, pp.35-40, no. 9, and now a facsimile with commentary by Michelle Brown,*Das Buch von Lindisfarne: The Lindisfarne Gospels*, Lucerne, 2002); the Echternach Gospels,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lat. 9389(Lowe,V,1950, p.18, no.578);the Barberini orWigboldGospels,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Barb. lat. 570 (Lowe, I, 1934, p. 20, no. 63, and Alexander, pp. 61-2, no. 36); 以及Cutbercht Gospels,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224 (Lowe, X, 1963, p. 18, no. 1500, and Alexander, pp. 62-3, no. 37)。关于《凯尔经》所用颜料问题，参见S. Bioletti, R. Leahy and other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Book of Kells Using Micro-Raman Spectroscopy”, *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 40, 2009, pp. 1043-9；有研究者认为，《凯尔经》也使用了天青色，一种只有接触从喜马拉雅而来的贸易路线才能获得的颜料，不过，此一看法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本书第126页引用的维斯特伍德的内容来自第一章参考文献中提到的Westwood, *Palaeographia Sacra Pictoria*,part 17, p. 5。本书第129页我提出的整页插图应该是从其他抄本上直接挪过来的看法，我认为此前不曾有人提过，罗杰·鲍威尔（Roger Powell）的研究为此看法提供了支

持，据他观察，这些插图页的羊皮纸跟该抄本中的其他羊皮纸是不一样的，应当是另外准备的（参阅R. Powell, “The Book of Kells, The Book of Durrow: Comments on the Vellum, the Make-up, and Other Aspects”, *Scriptorium*, 10, 1956, pp. 3-21中的第4页）；也许有一天，基因技术能够辨识出这些书页究竟是不是来自不同批次的动物皮。《凯尔经》的四个抄写员之间的分工主要是以折为单元展开的；例如，第一个抄写员负责的是第xvi折（第130～140对开页）和第xxxiv～xxxviii折（第292～339对开页）；第三个抄写员在第x折的末尾（第87对开页）完成了一个工作单元，然后从第xvii折的开篇（第141对开页）开启了自己的下一个工作单元；第四个抄写员则担当了第xi～xiv折（第88～125对开页）的工作，并在第xxi折的结尾（第187对开页）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工作单元。第26对开页后面的单页丢失，这一页文本中有《路加福音》当中部分希伯来人名的名录；第177对开页后面的单页丢失，这一页呈现的是《路加福音》14:32～42的内容；第239对开页后面的单页丢失，这一页呈现的是《路加福音》12:6～18的内容；第330对开页后面缺了三页文本页，这部分呈现的是《约翰福音》12:28～13:19的内容。《末日审判册》的页边残片被装订人作为纪念品保存了下来（见本书第130页），其具体情况可参阅Bernard Quaritch Ltd, Catalogue 1348, 2007 (*Bookhands of the Middle Ages*, VIII), p. 41, no. 47。本书第131页谈到乌塞尔抄录的《凯尔经》里的特许状，为“Trinity College, MS 580”；“book of Kelles”字样出现在第59对开页的左页。关于乌塞尔对此事的描述，可参阅他所著的*Britannicarum ecclesiarum antiquitates*, Dublin, 1639, p. 691。我谈到的《凯尔经》最终来到都柏林的过程，借助了福克斯先生正好发表的一部作品，见Fox,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前引书, esp. pp. 23-4 and 39。本书第133～134页引述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那番话，参见她的*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 from 1848 to 1861, to Which are Prefixed and Added Extracts from the Same Journal Giving an Account of Earlier Visits to Scotland, and Tours in England and Ireland*, ed. A. Helps, London, 1868, pp. 257-8。《凯尔经》中带有王室成员签名的现代衬页如今已经被单独装订成册。关于19世纪彩饰图案样式书的情况，可参阅R. Watson, “Publishing for the Leisure Industry: Illuminating Manuals and the Reception of a Medieval Art in Victorian Britain”, pp. 78-107 in T. Coomans and J. De Maeyer, eds., *The Revival of Medieval Illumination*, Louvain, 2007, illustrating samples from the Book of Kells in W. J. Loftie’ s *Lessons in the Art of Illuminating*, 1885, on p. 97。海伦·坎贝尔·多利埃（Helen Campbell D'Olier）的描摹《凯尔经》插图的水彩画作，如今收藏在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MS 4729”。里克特斯（C. L. Ricketts）的画作藏于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Lilly Library），其中有两幅被收录在S. Hindman and N. Rowe, eds.,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in the Modern Ag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Evanston, Ill., 2001, pp. 270-71 and pl. 37。跟伯纳德·米汉的那部作品一样，爱德华·沙利文爵士的著作的书名也非常简洁：*The Book of Kells*, London, Paris and New York, 1914（本书第130页谈到的那个糟糕的装订人的情况，就参考了沙利文

爵士这本书的第6页）。乔伊斯给鲍尔的信转引自R.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and New York, 1982, II, p. 545。本书第138页引用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内容，可见*Finnegans Wake*，pp. 122-3 of the London edition, 1939。乔伊斯所说的“*Tunc*”页，出自福音书中有关“基督被钉十字架”事件的描述，“Tunc crucifixerant xp[ist]i cum eo duos latrones”（“当时，有两个强盗与他同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38）；这一页的确显得十分怪异，无论是布局还是语法都是如此，就布局而言，大部分文字挤在“X”形十字架图案里，几乎无法辨认，就语法而言，“xpi”一词（也就是Christi）在此显然是多余的，拉丁通行本的标准经文是，“Tunc crucifixi sunt cum eo duo latrones”。关于该抄本的渊源在于爱奥那岛（Iona）这一点，除了前面引用的文献外，也可参阅P.Meyvaert, “The Book of Kells and Iona”, *The Art Bulletin*, 71, 1989, pp. 6-19。

第四章　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

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有一份精美的影印本：*Aratea, Faksimileband*, Lucerne, 1978；并有评注本*Aratea, Kommentar zum Aratus des Germanicus, MS. Voss. Lat. Q. 79, Bibliotheek der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Lucerne, 1989, 书中有B. Bischoff, B. Eastwood, T. A.-P. Klein, F. Mütherich and P. F. J. Obbema的论文；穆特里奇的论文“Die Bilder”,可见该评注本的第31～68页，并被收入穆特里奇女士的文集*Studies inCarolingian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London, 2004, pp. 147-265。莱顿大学已经制作了该抄本的高分辨率电子版，可以通过访问莱顿大学的“Digital Special Collections”（电子典藏）网站查阅该抄本。该抄本的部分插图也被收录于W. Köhler and F. Mütherich, *Die karolingischen Miniaturen, IV, Die Hofschule Kaiser Lothars: Einzelhandschriften aus Lotharingien*, Berlin, 1971, plates 75-96。关于该抄本的参考文献，可见C. L. Verkerk, “*Aratea*: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Ms Vossianus lat. q. 79 in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6, 1980, pp. 245-87。还有一部作品也相当有参考价值：G. Thiele,*Antike Himmelsbilder, mit Forschungen zu Hipparchos, Aratos und seinen Fortsetzern und Beiträgen zur Kunstgeschichte des Sternhimmels*,Berlin, 1898, esp. pp. 77-142。我重点参考的文献为：R. Katzenstein and E. Savage-Smith, *The Leiden Aratea: Ancient Constellations in a Medieval Manuscript*, Malibu, Calif., 1988（为该抄本在美国的展出而出版）；A. von Euw, *Der Leidener Aratus: Antike Sternbilder in einer Karolingischen Handschrift*, Munich, 1989; F. Mü Munich, “Book Illumination in the Court of Louis the Pious”, pp. 593m604 in P. Godman and R. Collins, eds.,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Oxford, 1990, reprinted in Mütherich,*Studies in Carolingian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前引书, pp. 98-117; M. Dolan, “The Role of Illustrated Aratea Manuscript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Astronomical Knowledge in

the Middle Ages",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7, available on-line and remarkably good; and E. Dekker, "The Provenance of the Stars in the Leiden Aratea Picture Book",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73, 2011, pp. 1-37（她还著有 *Illustrating the Phaenomena: Celestial Cartography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Oxford, 2012)。盖恩先生的一部作品对我也有莫大帮助：D. B. Gain, *The Aratus Ascribed to Germanicus Caesar: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 Commentary*, London, 1976 (*University of London Classical Studies*, 8), conjured up for me by Peter Jones, Librarian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关于查理曼的宫廷图书馆，我的主要参考文献为B. Bischof的论文，"Die Hofbibliothek Karls des Grossen", pp. 149-69, *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III, Stuttgart, 1981, translated as"The Court Library of Charlemagne", chapter 3 in M. Gorman, transl. and ed., *Manuscripts and Libraries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Cambridge, 2007 (*Cambridge Studies in Palaeography and Codicology*, 1), pp. 56-75；本书第143页提到的书单是否包括了查理曼宫廷图书馆当年的藏书，这个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对于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Rosamond McKitterick写了多部作品进行解析和阐述。本书第143～144页提到的4世纪的两份维吉尔抄本，分别是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Vat. lat. 3225和Vat. lat. 3867。这两份抄本都享有盛名，D. H. Wright为之撰写了很出色的概要，见M. Buonocore, ed., *Vedere i Classici: L'illustrazione libraria dei testi antichi dall'età romana al tardo Medioevo*, Vatican City, 1996, pp. 141-5, nos. 1-2（也可参阅D. H. Wright, *The Roman Vergil and the Origins of Medieval Book Design*, London, 2002)。关于"354年编年史"，我参考的是萨尔兹曼的作品，见M. R. Salzman, *On Roman Time: The Codex-Calendar of 354 and the Rhythms of Urban Life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 17)。9世纪赫罗德加利乌斯（Hrodgarius）制作的特伦斯抄本和《土地丈量法》如今都收藏在梵蒂冈（cod. Pal. lat. 3868 and Pal. lat. 1564）。本书第145页引述的斯卡利杰的著名评论，是他于1606年在莱顿大学的课堂上提出的，参见K. van Ommen,"The Legacy of Joseph Justus Scaliger in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ues,1609-1716",pp.51, 82 in M. Walsbyand N.Constantinidou,eds., *Documenting the Early Modern Book World*, Leiden and Boston, 2013, p. 53，该书还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文献。我此次是受埃里克·科瓦科尔（Erik Kwakkel）和比德·古姆波特（Peter Gumbert）之邀前来莱顿做讲座的，其间，我们谈到了卢西娅·吉姆布瑞尔（Lucie Gimbrère）修女为莱顿抄本配置的封皮。当然，我也很感谢同大卫·冈茨（David Ganz）先生的一番交流，他让我受益匪浅。关于俗大写体的情况，可参见Drogin, *Medieval Calligraphy*, 前引书, pp. 89-92。本书第150页谈到的《乌得勒支圣咏抄本》——加洛林时代诞生于荷兰的另一份顶级抄本，可参阅展览名录K. van der Horst, W. Noel and W. C. M. Wüstefeld, eds.,*The Utrecht Psalter in Medieval Art:*

Picturing the Psalms of David, Tuurdijk, 1996（其中第200页的第13项也谈到了《阿拉图斯抄本》）。本书第150页谈到了天空的颜色从深蓝色（比如该抄本第48对开页左页和第78对开页左页）并渐变至青绿色（比如该抄本第60对开页左页和第62对开页左页）。为了保持行文流畅，本书第150～65页在描述插图时没有附上抄本页码，具体情况如下： (1) folio 3v, *Draco* the snake, with the bears *Ursus Minor* and *Ursus Major*（第3对开页左页，天龙座，并配有大熊和小熊）; (2) folio 6v, Hercules（第6对开页左页，武仙座）; (3) folio 8v, the garland, *Corona borealis*（第8对开页左页，北冕座）; (4) folio 10v, Ophiunchus the snake-bearer standing on a scorpion and holding a serpent（第10对开页左页，蛇夫座，蛇夫站在蝎子身上，手持一条蛇）; (5) folio 12v, presumably Boötes（第12对开页左页，可能是牧夫座）; (6) folio 16v, Gemini standing together（第16对开页左页，双子座，双子并肩站在一起）; (7) folio 18r, Cancer the crab（第18对开页右页，巨蟹座）; (8) folio 20v, Leo, a prancing lion（第20对开页左页，狮子座，一头奔跑的狮子）; (9) folio 22v, Auriga the charioteer holding three goat kids（第22对开页左页，御夫座，御夫驾驶着三只小山羊牵引的车）; (10) folio 24v, Taurus shown as half a bull（第24对开页左页，金牛座，陶鲁斯是半人半牛的形象）; (11) folio 26v, Cepheus reaching out his arms（第26对开页左页，仙王座，仙王伸出手臂）; (12) folio 28v, Cassiopeia enthroned（第28对开页左页，仙后座，仙后端坐在王座之上）; (13) folio 30v, Andromeda tied between rocks（第30对开页左页，仙女座，仙女被绑于两根岩柱之间）; (14) folio 32v, Pegasus, half a winged horse（第32对开页左页，飞马座，半人半马、肋生双翼）; (15) folio 34v, Aries leaping through a hoop（第34对开页左页，白羊座，阿瑞斯正从一个铁环中跳过）; (16) folio 36v, Triangula（第36对开页左页，三角座）;(17)folio 38v, Pisces, two fish（第38对开页左页，双鱼座，两条鱼）; (18) folio 40v, Perseus holding the head of Medusa（第40对开页左页，英仙座，珀修斯手持美杜莎的脑袋）; (19) folio 42v, the Pleiades, seven women’ s heads（第42对开页左页，昴宿星团，呈现为七女的脑袋）; (20) folio 44r, Lyra（第44对开页右页，天秤座）; (21) folio 46v, Cygnus, a hissing swan（第46对开页左页，天鹅座，一只在鸣叫的天鹅）; (22) folio 48v, Aquarius emptying a vase（第48对开页左页，水瓶座，正在倒空水瓶）; (23) folio 50v, Capricorn（第50对开页左页，山羊座）; (24) folio 52v, Sagittarius（第52对开页左页，射手座）; (25) folio 54v, Aquila the eagle（第54对开页左页，天鹰座）; (26) folio 56v, Delphinus, a dolphin（第56对开页左页，海豚座）; (27) folio 58v, Orion, with Lepus between his legs（第58对开页左页，猎户座，一只天兔在他的两腿之间）; (28) folio 60v, Canis Maior（第60对开页左页，大犬座）; (29) folio 62v, Lepus the hare again（第62对开页左页，天兔座）; (30) folio 64v, Argo, half a ship（第64对开页左页，南船座，图中的阿尔戈斯为半船半人的形象）; (31) folio 66v, Cetus the sea monster（第66对开页左页，鲸鱼座）; (32) folio 68v, Eridanus the river god（第68

对开页左页，波江座）; (33) folio 70v, Piscis Austrinus（第70对开页左页，南鱼座）; (34) folio 72v, Ara, an altar（第72对开页左页，天坛座）; (35) folio 76v, Hydra,Corvus and Crater（第76对开页左页，长蛇座、乌鸦座和巨爵座）; (36) folio 78v, Canis Minor（第78对开页左页，小犬座）。本书第166页提到的西塞罗《物象》译本的9世纪抄本，收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见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647, folios 12v-17v。该抄本及其参考文献现在都可以在大英图书馆网站的泥金装饰手抄本目录中看到。古文物家奥特利（W. Y. Ottley）认为，这份抄本应该来自2世纪或3世纪（*Archaeologia: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26, 1836, pp. 47-214），这虽然是句题外话，但可以证明它是非常忠实于古代原本的。关于该抄本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中的演化史，有一份很有意思且相当富有见解的研究文献：H. Y. Gamble, *Books and Readers in the Early Church: 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Text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本书第169页谈到我在阅览室给莱顿大学学生上的这次非正式辅导课，当时在场的一个学生Jenneka Janzen后来在莱顿大学的网站上写了一篇课后体验。莱顿《阿拉图斯抄本》第26对开页左页插图里的仙王克普斯的相貌同《洛泰尔圣咏抄本》（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37768, folio 4r）当中大卫的相貌极为相似，穆特里奇指出了这一点，见Mütherich, "Court of Louis the Pious", 前引书, p. 105。"354年编年史"存世最久的记录是Peiresc在17世纪以如今已经佚失的加洛林抄本为范本制作的抄本（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Barberini lat. 2154）。本书在第171页谈到阿尔昆提醒查理曼关注普林尼的《自然史》，关于这件事情，可参阅Bischoff, "The Court Library of Charlemagne", 前引书, p. 57。关于第93对开页左页出现的天象图的准确性，有两篇文章值得参考： R. Mostert and M. Mostert, "Using astronomy as an aid to dating manuscripts: The example of the Leiden Aratea", *Quaerendo*, 20, 1999, pp. 248-61；以及E. Dekker, "Planetary Observations: The Case of the Leiden Planetary Configuratio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39, 2007, pp. 77-90。关于3月18日是创世纪念日的说法，可参见Dolan, "The Roleof Illustrated Aratea Manuscripts", 前引文, p. 220。我读过*Vita Hludowici*一书的英译本，A. Cabaniss,*Son of Charlemagne: A Contemporary Life of Louis the Pious*, Syracuse, NY, 1961。关于岛屿风格的抄本插图页背面的印记可参阅M. P. Brown,The *Lindisfarne Gospels: Society, Spirituality & the Scribe*, London, 2003, pp. 217-20, with plates 9a-b。1000年前后以《阿拉图斯抄本》为范本创制的两份抄本分别是Boulogne,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188和Berne, Burgerbibliothek, MS 88。关于奥德波特资助抄本制作的情况，可参阅M. Holcomb, ed., *Pen and Parchment: Drawing in the Middle Age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9, pp.74-6, no. 16。我很希望能找到那位于1573年卖掉了自己的地产的根特画师；本书第十二章谈到的画师西蒙·贝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所处的时期太早了，他于1561年就谢世了。"bis capta"是一个常用的古典用词，特指特洛伊。苏西乌斯许下的编辑《阿拉图斯抄本》的承诺，可参见*Carmina tam sacra quam prophana*,

Leiden, 1590的献词部分。格劳秀斯的*Syntagma Arateorum*, Louvain, 1600在第30页特别提到了莱顿抄本。我在光的照射下看到的凹陷轮廓，应该是格劳秀斯本人留下的，而非中世纪的人所为。塞拉里乌斯所著《星图》（*Atlas Coelestis seu Harmonia Macrocosmica*, Amsterdam, 1660）的第54页后有一幅双页插图，呈现的就是这张天象图。有关格劳秀斯的藏书，可参阅A. Nelson, “Deux notes concernant la bibliographie de Hugo Grotius”, *Nordisk tidskrift för bok- och biblioteksväsen*, 39, 1952, pp. 18-25。关于克里斯蒂娜女王和沃斯（Vossius），我参考了C. Callmer, *Königin Christina, ihre Bibliothekare und ihre Handschriften: Beiträge zur europäischen Bibliotheksgeschichte*, Stockholm, 1977 (*Acta Bibliothecae Regiae Stockholmiensis*, 30)，该书第150页谈到了莱顿抄本；也参考了F. F. Blok,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Isaac Vossius's Library*, Amsterdam, 1974, esp. pp. 34-42。米克尔·里弗（Michael Reeve）告诉我在沃斯于1689年谢世之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试图获得沃斯的藏书，但最终败给了莱顿大学。本书第184页谈到的《梵蒂冈维吉尔抄本》最早的影印本的复杂历史，可参阅D. H. Wright, “From Copy to Facsimile: A Millennium of Studying the Vatican Vergil”,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17, 1991, pp. 12-35。左特尔曾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当中开列了一份包括六百三十七份抄本影印本的目录，见H. Zotter, *Bibliographie faksimilierter Handschriften*, Graz, 1976，这份目录已经过时了；我也参考了巴克尔的一部相关作品：N.Barker, *The Roxburghe Club: A Bicentennial History*, n.p., 2012, Chapter 1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csimile”, pp. 119-37。

第五章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有一份全本影印本，见*Apocalipsis de San Juan, Beato de Liébana, San Miguel de Escalada*, Valencia, 2000，附有一本评注集：*Estudio del Manuscrito*, 集中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多篇论文，作者为U. Eco, W. M. Voelkle, J. W. Williams, B. A. Shailor, L. G. Freeman, A. Del Campo Hernández, and J. González Echegaray。此等昂贵的现代影印本所附的评注集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研究型图书馆的财力负担不起。于是，我转而购买了另外一份拥有丰富插图的影印本：Williams and Shailor, *A Spanish Apocalypse: The Morgan Beatus Manuscript: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ies*, New York, 1991。请允许我对威廉·沃克勒（William Voelkle）先生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他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也很幸运，能够同巴巴拉·谢罗尔（Barbara Shailor）有过那样的交流；但没能与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碰面让我非常遗憾。关于所有《贝亚图斯抄本》，最重要的研究文献当属威廉教授的*The Illustrated Beatus: A Corpus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5 volumes, London, 1994-2003；此书出版之后，另有一份《贝亚图斯抄本》重见天日，是一份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抄本，如今收藏在日内瓦，巴巴拉·罗斯（Barbara Roth）给我看过这份抄本。威廉·沃克勒先生非常慷慨地给我看了有关该抄本的两份打印文稿，也就是

本书第227页提到的由约翰·威廉斯写的有关一场该抄本原计划参加但又被取消的展览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Visions of the End in Medieval Spain: The Beatus Tradition”，这篇文章令我受益匪浅，它将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由Therese Martin编辑,题为*Visions of the End in Medieval Spain: Catalogue of Illustrated Beatus Commentaries on the Apocalypse and Study of the Geneva Beatus*。本章在写作之时，读书尚未出版。

在本书第191页，我提到了“Saint John the Divine”（神明圣约翰），纽约的圣公会大教堂的守护圣徒，以及《启示录》中谈到的《启示录》作者（《启示录》1:9）；不过，关于这个约翰是否就是福音书作者圣约翰，中世纪和现代都存在争议。关于贝亚图斯时代末世论的背景情况，我最初参考的文献是：P. Fredriksen, “Tyconius and Augustine on the Apocalypse”, pp. 20-37 in R. K. Emmerson and B. McGinn,*The Apocalypse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NY, 1992, and E. A. Matter, “The Apocalypse in Early Medieval Exegesis”, pp. 38-50 in the same volume; R. Landes, “Lest the Millenniumbe Fulfilled: Apocalyptic Expectations and the Pattern of Western Chronography, 100-800 C.E.”, pp. 205-8 in W. Verbeke, D. Verhelst and A. Welkenhuysen, eds., *The Use and Abuse of Eschatology in the Middle Ages*, Louvain, 1988 (*Mediaevalia Lovaniensia*, ser. 1, *Studia*, 15)；K. R. Poole, “Beatus of Liébana: Medieval Spain and the Othering of Islam”, pp. 47-66 in K. Kinane and M. A. Ryan, eds., *End of Days: Essays on the Apocalyps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Jefferson, NC, 2009。还有一部作品我虽然没有引用，但强烈推荐各位阅读：J. T. Palmer, *The Apocalyps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14。本书第190～191页谈到，圣奥古斯丁是反对过分字面化地解释《圣经》当中的诸多末世论线索的，他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写给Heysichius的Epistle 199(Migne, *Patrologia Latina*, XXXIII: 801-925)。本书第192页谈到的独一无二的9世纪《贝亚图斯抄本》的彩绘残片为Silos, Biblioteca del Monasterio de Santo Domingo, frag. 4[这座修道院虽然不是以托钵僧圣多米尼克命名的，但其实是本笃会修道院，以其圣徒院长（于1073年谢世）命名]。关于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跟当年乌克莱斯的圣地亚哥骑士团（the order of Santiago of Uclès）手中的那份《贝亚图斯抄本》是同一物件的论点，可见G. de Andrés, “Nuevas aportaciones documentales sobre los códices ‘Beatos’”,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81, 1978, pp. 543-5。利布里谈到弗拉西尼利（Frasinelli）曾斩获该抄本，此一叙述可见British Library, Yates Thompson MS 54, formerly Add. MS 46200, folio102（该文献一度被收藏在“叶茨·汤普森抄本”内，今天这个系列中的很多抄本已经被转归大英图书馆了）；沃克勒在对抄本影印本的评注中也引述过此事。真正的《巴尔卡瓦多贝亚图斯抄本》如今的收藏状况是：Valladolid, Biblioteca de la Universidad, ms 433。弗里德里克·马登爵士（Sir Frederic Madden, 1801～1873）曾于1846年在日记中讨论了他对利布里的印象（本书第196页），马登爵士是大英博物馆抄本部的负责人；本书关于此事的引述，可见pp. 178-9 of A. N. L. Munby,

“The Earl and the Thief” in N. Barker, ed., A. N. L. Munby, *Essays and Papers*, London, 1978, pp. 175-91。其他有关利布里以及阿什伯纳姆的记述包括： S. De Ricci, *English Collectors of Books & Manuscripts (1530-1930) and Their Marks of Ownership*, Cambridge, 1930, Chapter XI, pp.131-8（这部作品从来都很有用）；以及A.N.L.Munby,*Connoisseurs and Medieval Miniatures*, 1750-1850, Oxford, 1972, chapter VII, pp. 120-38; Munby, “The Triumph of Delisle: A Sequel to ‘The Earl and the Thief’”, in *Essays and Papers*, 前引书, pp.193-205，和J. M. Norman, *Scientist, Scholar & Scoundrel: A Bibl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ife and Exploits of Count Guglielmo Libri*, New York, 2013. Lord Ashburnham will reappear in Chapter Nine。关于叶茨·汤普森，我至今还对我的一篇文章颇感自豪，“Was Henry Yates Thompson a Gentleman?”, pp. 77-89 in R. Myers and M. Harris, eds., *Property of a Gentleman: The Formation, Organisation and Dispersal of the Private Library*, 1620-1920,Winchester, 1991。国王中学和伊顿公学的校监M.R.詹姆斯（M. R. James, 1862~1936）为这份抄本编制了名录，见R. W. Pfaff, *Montague Rhodes James*, London, 1980, p. 193, “really anessay of the subject of Beatus commentaries in general”，pp.304-30,no.97,*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Fifty Manuscripts (Nos. 51 to 100) in the Collection of Henry Yates Thompson*, Cambridge, 1902。本书第199~200页摘引了沃克勒先生附录在2000年抄本影印本上的文章中的一整段话，也参考了我本人跟威廉·沃克勒先生的几次交流，在我拜访摩根图书馆的前前后后，威廉·沃克勒先生无数次地为我提供帮助，可谓尽心竭力。沃克勒先生可以说是摩根图书馆的元老级人物了，他为除贝拉·达·科斯塔·格林女士（Belle da Costa Greene）外的历任馆长都工作过。关于格林女士，有一份她的传记：H. Ardizzone,*An Illuminated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2007。书中第367~368页谈到了此一插曲，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该传记的作者对珍本一无所知。关于收藏人或者交易人的价格暗码，如同叶茨·汤普森使用的“bryanstole”，可参阅I. Jackson, *The Price-Codes of the Book-Trade: APreliminary Guide*, Berkeley, 2010。我曾带了一份贝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的影印本前往纽约，此事在本书第206页有简单提及，这个影印本为J. G. Echegaray, A. del Campo Hernández and L. G. Freeman, eds., *Beato de Liébana: Obras completes y complementarias*, I, Madrid, 2004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Maior*, 76)。如今，这个影印本已经被另外一个版本取代了：R. Gryson, ed.,*Beati Liebanensis Tractatus de Apocalipsin*, Turnhout, 2012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107)。本书第208页谈到以希腊字母标示对应的数字的传统做法（isopsephy）：每个希腊字母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值，alpha ＝ 1, beta ＝ 2, gamma ＝ 3，依次类推，一直到，rho ＝ 100, sigma ＝ 200，等等，最后omega ＝ 800。彼得·克拉肯贝格（Peter Krakenberger）极为细心地阅读了本章初稿，并就其中几处有关西班牙的情况做了修正，此外，他还非常慷慨地赠送给我了一本他的译著：S. Sáenz-López Peréz, *The Beatus Maps: The Revel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Ages*, Burgos,

2014，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科克莱尔制作的1902年叶茨·汤普森名录的副本如今收藏在library of the Grolier Club, New York，我在那里见过这份副本（本书第222页引述的科克莱尔的评论在这份副本的第315页页边）；科克莱尔当时对叶茨·汤普森的收藏是极为熟悉的，这一点可参见这份副本的第420页。我有一则有关《贝亚图斯抄本》亲身经历的插曲，2015年，我曾随同国际图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philie）前往马德里参会。在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馆方将一批馆藏珍品放在一张大桌子上供客人参观，其中就包括了两份《贝亚图斯抄本》。我们一行人即刻被这些珍本吸引了，就如同被花衣魔笛手的笛声吸引了一样，抄本中的绘图实在是令人目眩神迷、赞叹不已，我们甚至完全忽略了旁边的两本带彩绘的笔记，那可是达·芬奇的作品。《贝亚图斯抄本》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最伟大的艺术家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本书第225～226页谈到有一份《贝亚图斯抄本》上面有梅雅斯的学生埃梅特利乌斯的签名，该抄本为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od. 1097b；抄写员的签名在第167对开页的右页。人们一度觉得，这幅插图是从另一份抄本上挪过来的，这似乎没有太大必要，而且这样的操作似乎也太过复杂了。摩根图书馆中编号“M 429”的抄本在J. J. G. Alexander, *Medieval Illuminators and Their Methods of Work*,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p. 9, fig. 9中被提及。伊西多尔和哲罗姆的“孪生文本”在234对开页右页到237对开页右页以及第238对开页左页到292对开页左页。本书第231页征引的不来梅的亚当的那段话，转引自R. Landes, “The Fear of the Apocalyptic Year 1000: Augustinian Historiography, Medieval and Modern”, *Speculum*, 75, 2000, pp. 97-145，伯特菲斯的那段话则转引自，pp. 31-2 of C. Cubitt, “Apocalyptic and Eschatological Thought in England around the Year 100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 ser., 25, 2015, pp. 27-52。

第六章　画师雨果

尽管名声在外，但“画师雨果抄本”并没有影印本，甚至也没有研究它的专著。它被记录在O. Pächt and J. J. G. Alexander,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I, German, Dutch, Flemish, French and Spanish Schools*, Oxford, 1966, pp. 34-5, no. 441中。关于此一时期抄本制作业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N. R. Ker, *English Manuscripts in the Century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Oxford, 1960 (The Lyell Lectures, 1952-1953)。所有关于英格兰教堂或者修道院藏书情况的研究，必定参考了此人的另一部非读不可的研究指南：N. R. Ker, *Medieval Libraries of Great Britain: A List of Surviving Books*, 2nd edn, London, 1964。很多人知道，我曾将此书称为有史以来最有意思的参考书，同样值得一读的还有N. R. Ker and A. G. Watson, *Supplement to 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87。

本章开篇谈到的《埃克塞特之书》抄本，可参见N. R. Ker, *Catalogue of Manuscripts Containing Anglo-Saxon*, Oxford, 1957, p. 153,

no. 116；该抄本已经拥有了电子版的影印本，B. J. Muir, ed., with N. Kennedy, *The Exeter Anthology of Old English Poetry*, Exeter, 2006。关于该抄本以及该抄本所在图书馆的另外一些抄本，有一本颇有价值的著作介绍了它们的背景，参阅P. W. Conner, *Anglo-Saxon Exeter: A Tenth-Century Cultural History*, Woodbridge, 1993 (*Studies in Anglo-Saxon History*, IV)。关于博德利图书馆的早期状况，可参阅I. Philip, *The Bodleian Libra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Oxford, 1983，以及M. Clapin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2015。博德利的自传可以被算作最早的英语文学作品之一，目前也已经再版了，由W. Clennell编辑：*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Thomas Bodley*, Oxford, 2006。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博德利童年时代的伙伴，曾于1598年为博德利绘制了一幅肖像（K. Garlick, *Catalogue of Portrai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by Mrs Reginald Lane Poole;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xpanded*, Oxford, 2004, p. 35；这幅肖像画于1897年被赠予牛津大学）。博德利写给牛津大学的建议信，已经被刊印过很多次了，最早刊印这封信的作品可能是： J. Gutch, ed., Anthony à Wood,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I, Oxford, 1796, p. 266。埃克塞特教堂主任牧师和参事会决定将该教堂收藏的抄本移送牛津大学，此一决定究竟是出于开明和远见，还是“明显违反了信托……置委托人所委托财产的继承人的利益于不顾”，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争论（A. Clark, *A Bodleian Guide for Visitors*, Oxford, 1906, pp. 107-08）。当然，《埃克塞特之书》并没有在被搬迁藏书之列，不过，它没有就此湮没，因为马修·帕克知道这本书，参见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101, p. 449, marginal note。雨果的哲罗姆抄本曾被送至牛津大学，并被记录在*Catalogus Librorum Bibliothecœ Publicœ quam vir ornatissimus Thomas Bodleius eques auratus in Academia Oxoniensi nuper instituit*, Oxford, 1605中（第70页）, reproduced in facsimile as *The First Printed Catalogue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1986。本书会用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简称，在此请允许我略作解释，本书第241页提到“PPE”阅览室，这里的“PPE”是特指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哈罗德·威尔逊、爱德华·希斯、大卫·卡梅隆、比尔·克林顿、贝娜齐尔·布托等众多名人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本书第242页提到的理查德·贾默森的那篇文章的具体信息是：Richard Gameson, “Hugo Pictor, enlumineur normand”,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44, 2001, pp. 121-38；奥托·帕赫特则是我在他晚年时候结识的，他的那篇文章的具体信息是：Otto Pächt, “Hugo Pictor”,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3, 1950, pp. 96-103。我所用的“哲罗姆《以赛亚书评注》”的版本信息是：M. Adriaen, ed., S. *Hieronymi presbysteri: Commentarium in Esaiam*, Turnhout, 1963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73)；这个评注本如今已经有了一份新的英译本：T.P.Scheck,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Isaiah, Including St Jerome's Translation of Origen's Homilies 1-9 on Isaiah*, NewYorkand Mahwah, NJ,2015(*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The Works of the Fathers in Translation*, 68)。我特地描述的插图，也就是该

抄本第vi对开页左页的哲罗姆同欧多钦和帕玛丘在一起的插图，已经有了影印图，见P. d'Ancona,*The Art of Illumination: An Anthology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Six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transl. A. M. Brow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9,plate 37，但是该书的配图文字认为它呈现的是圣母端坐在哲罗姆和以赛亚之间的王位上的场景，这显然是错误的。本书第252页谈到的12世纪早期羊皮纸工匠的工作场景图，可见Bamberg, Staatsbibliothek, cod. Msc. Patr. 5；这幅图被复制并刊印无数次了，我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也使用过：*Scribes and Illuminators*, London, 1992, p. 12, fig. 7（在我的这本书中，画师雨果的画像是在第64页，fig. 55）。格拉汉姆·波拉德（Graham Pollard）最早注意到，在罗曼风格的装订工艺中钉子很容易被拔出来，因此，封皮的皮带也很容易跟重装之后的封皮板材重新固定在一起，关于这个情况，参见波拉德的一篇文章的第19页："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Twelfth-Century Bindings", *The Library*, 5 ser., 17, 1962, pp. 1-22。1327年的埃克塞特财物清单当中，有两份哲罗姆作品的抄本，具体情况可见G. Oliver, *Lives of the Bishops of Exeter and a History of the Cathedral*, Exeter, 1861, p. 302。关于这座中世纪图书馆的历史，我所依托的文献是：A. M. Erskine, "The Growth of Exeter Cathedral Library after Bishop Leofric's Time", *Leofric of Exeter,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Exeter Cathedral Library in A.D. 1072*, Exeter, 1972,pp. 43-55。中世纪的书册名录，通常会用抄本第二页的开篇词来命名抄本，这种做法很可能发端于13世纪后期索邦的图书馆，关于这个情况，可参见J. Willoughby, "The Secundo Folio and Its Uses, Medieval and Modern", *The Library*, 7 ser., 12, 2011, pp. 237-58。方济各会的联合借阅名录收藏在博德利图书馆，编号是"MS Tanner 165"，该名录已经被刊印出来，见R. H. Rouse and M. A. Rouse, eds., with R. A. B. Mynors, *Registrum Anglie de Libris Doctorum et Auctorum Veterum*, London, 1991 (*Corpus of British Medieval Library Catalogues*, 2), 有关埃克塞特的抄本的内容在第88~89页, no. 6.72。本书第255页谈到，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提及了不列颠，关于这个情况，可参阅Adriaen（1963）版本的第463页，或博德利图书馆版（Bodley 717）的folio 186v。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修道院曾收藏了一份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如今，该抄本的收藏信息是：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B.5.24；维尔特郡索尔兹伯里也有一份，如今仍然收藏在当地教堂，编号是"MS25"，本书第260页谈到了这份抄本。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做出的关于诺曼征服时期英格兰的这场宗教复兴潮流的评论，可参见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III: 246；也可参见W. Stubbs, ed., *Willelmi Malmesbiriensis monachi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libri quinque*, II, London, 1889 (Rolls Series, 90), p. 306。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一直延伸到1100年，其中包括了画师雨果所在的时代；人们所知的诞生于这个时代的英格兰的抄本或者同这个时代有关联的抄本，其名录可参阅H. Gneuss, *Handlist of Anglo-Saxon Manuscripts: A List of Manuscripts and Manuscript Fragments Written or Owned in England up to 1100*, Tempe, Ariz., 2001, with supplements in

Anglo-Saxon England, 32, 2003, pp. 293-305, and 40, 2012, pp. 293-306；在接下来的一代人的时间里，抄本的数量就陡然提升了，其名录可参阅R. Gameson, *The Manuscripts of Early Norman England (c. 1066-1130)*, Oxford, 1999。此一时期的诺曼人系统地创立了一批家族图书馆，关于这个情况，可参阅Ker,*English Manuscripts*, 前引书, p. 4, 和R. M. Thomson,"The Norman Conquest and English Libraries", pp. 27-40 in P. Ganz, ed., *The Book in Medieval Culture*, 2, Turnhout, 1986 (reprinted in Thomson, *England an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Aldershot and Brookfield, Vt, 1998, no. XVIII), 以及Thomson, *Books and Learning in Twelfth-CenturyEngland:The Endingofthe "AlterOrbis":The LyellLectures2000-2001*, Walkern, Herts., 2006, esp. pp. 48-60 and 101-4。诺曼人在将《以赛亚书评注》抄本输送给埃克塞特教堂的同时，也输送了另外一批书册：Ambrose, Jerome and Augustine (Bodley MS 137), Pseudo-Athanasius (Bodley MS 147), Augustine (Bodley MSS 301, 691 and 813), Gregory (Bodley MSS 707 and 783)以及Ambrose (Bodley MS 739)。关于这批抄本的情况，可参阅R. Gameson, "Manuscrits normands à Exeter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pp. 107-27 in P. Bouet and M. Dosdat, eds., *Manuscrits et Enluminures dans le monde normand (Xe-XVe siècles)*, Caen, 1999, 以及M. Gullick, "Manuscrits et copistes normands en Angleterre (XIe-XIIe siècles)",同上书，pp. 83-93。关于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的文本研究，可参阅R. Gryson and others, eds., *Commentaires de Jérôme sur le prophète Isaïe*, I-V, Freiburg, 1993-9 (*Vetus Latina: Aus der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Bibel*, 23, 27, 30 and 35-6)，这部作品同样是对先前一部著作[B. Lambert, *Bibliotheca Hieronymiana Manuscripta: La tradition manuscrite des oeuvres de Saint Jérôme*, Steenbrugge, 1969 (*Instrumenta Patristica et Mediaevalia*, 4)]的更新和改进。本书第258页谈到的高卢家族的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中，主要的两份抄本为：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1627 (from Corbie)，以及Salzburg, Stiftsbibliothek Sankt Peter, a.X.22 (from Saint Amand)。关于索尔兹伯里的抄本制作业，可参阅T. Webber, *Scribesand Scholars at Salisbury Cathedral, c. 1075-c. 1125*, Oxford, 1992，以及Webber, "Salisbury and the Exon Domesday: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Exeter Cathedral MS 3500", *English Manuscript Studies*, 1, 1989, pp. 1-18。索尔兹伯里教堂"MS 25"号抄本当中的四段添加文字分别出现在第4对开页左页、第2对开页右页、第3对开页左页和第5对开页左页。我也曾研究了剑桥收藏的坎特伯雷抄本，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B.5.24。实际上，坎特伯雷抄本跟另两份抄本都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跟索尔兹伯里抄本一样，坎特伯雷抄本里并没有出现添加文字；第4对开页左页上面的"salutare"一词在索尔兹伯里抄本也有，但坎特伯雷抄本里它被写在一个被抹去的词上；其第7对开页左页上的"scribens"一词，索尔兹伯里抄本上也有；不过坎特伯雷抄本第10对开页右页上的那个词是"ministeria"，同埃克塞特抄本的情况一样。由此可以得出，这三份抄本是各循其路来到英格兰的，并不存在其中一份是另两份的范本的情

况。2016年，又有一份哲罗姆的《以赛亚书评注》抄本的残章重见天日，目前被私人收藏；该抄本应当于1100年前后出自抄写员罗伯特（Robertus）之手，而这个抄写员肯定在诺曼底的普瑞奥克斯修道院（Préaux Abbey）工作过，并且负责为坎特伯雷提供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如今收藏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两份抄本：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B.4.5，以及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317）；不过，刚刚公之于世的这份残章同“Trinity B.5.24”抄本也存在微妙差异，并非后者的范本。本书第262～263页谈到的达勒姆主教圣加莱的威廉的那批藏书，具体情况可参阅R. A. B. Mynors, *Durham Cathedral Manuscripts to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Durham, 1939, pp. 32-45; M. Gullick, “The Scribe of the Carilef Bible: A New Look at some Late Eleventh-Century Durham Cathedral Manuscripts”, pp. 61-83 in L. Brownrigg, ed., *Medieval Book Production: Assessing the Evidence*, Los Altos Hills, Calif., 1990; A. Lawrence-Mathers, *Manuscripts in Northumbria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Woodbridge, 2003, esp. pp. 27-48；以及R. Gameson, *Manuscript Treasures of Durham Cathedral*, London, 2010, esp. pp. 50-61, nos. 10-12。圣加莱的威廉的《圣经》抄本为达勒姆教堂A.II.4号藏品；捐赠名录出现在第1对开页右页。奥古斯丁的《诗篇评注》第三卷抄本是达勒姆教堂“B. II. 14”号藏品；关于威廉主教资助创制该抄本的纪要在其最后一页。本书第264页谈到达勒姆的西米恩（Symeon of Durham）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威廉是在流亡之时将这些书册送回达勒姆的，关于这个说法，可参见T. Arnold, ed., *Symeonis monachi opera omnia*, I, 1882 (Rolls Series, 75), p. 128。奥古斯丁的《诗篇评注》第二卷的收藏信息是Durham B.II.13；有罗伯特·本杰明画像的彩绘首字母出现在第102对开页右页。米克尔·古利克（Michael Gullick）非常热心地阅读了本章的初稿并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本书第266～267页上的对抄写员身份的辨识几乎都是古利克提出的，参见Michael Gullick, “The Scribe of the Carilef Bible”, 1990。此处谈到的这个《圣经》抄写员抄录的其他抄本为：the additionsto Durham B.II.13, e.g., folio 23r (Augustine)，folio 23r (Augustine), Paris, Musé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138 (the Bayeux entry in the mortuary roll of Abbot Vitalis),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810 (Lanfranc, from Exeter)，以及Bayeux,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s 57-8 (the two-volume Gregory)。这位对《圣经》抄本实施修订的抄写员也对奥利金抄本进行过修正，该抄本的收藏信息是：Durham B.III.1。奥利金抄本的主要抄写员也参与了另外一些抄本的抄写工作，比如Durham B.III.10 (Gregory),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301 (Augustine, from Exeter)，很可能还有Roue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A 103 (460) (Augustine, from Jumièges)。罗伯特·本杰明则参与了下面两份抄本的制作工作：Bodley 301, Bayeux 57-58，以及Roue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A 85 (467) (Augustine, from Saint-Ouen)。画师雨果在诺曼底也工作过的观点不是我首创的；实际上，前文提及的文章的作者都有这个看法，同时可参阅鲁昂市政图书馆和美术馆于1975年联合举办的一次展览的展出名录——尽管该名录看起

来并不起眼，是用很朴素的纸装订起来的：*Manuscrits normands*, XI-XII ème siècles, compiled by François Avril, esp. pp. 49-51, nos. 42-4；也可参阅多德韦尔和亚历山大的一些相关评论：C. R. Dodwell, *The Canterbury School of Illumination, 1066-1200*, Cambridge, 1954, pp. 115-18；J. J. G. Alexander, *Medieval Illuminators and Their Methods of Work*, 1992, 前引书, esp. pp. 10-11。本书第268～269页谈到，“Bodley 717”第一部分的彩绘首字母与留给它们的空间不完全匹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多次，比如第16对开页右页、 第31对开页左页、第61对开页右页、 第87对开页右页、 第104对开页右页；画师雨果绘制的首字母则跟文本结合得相当完美，比如在第201对开页左页、第216对开页左页、 第230对开页左页、 第256对开页左页、第270对开页左页上。本书第269～270页谈到另外一批出自画师雨果之手的抄本，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全然依托了古利克、贾默森以及汤姆森关于字体的研究以及帕西特和阿维里尔关于插图的研究。此处列举的这些抄本，包括：Bodley MS 691 (Augustine, from Exeter), Bodley 783 (Gregory, also from Exeter), Durham B.II.9 (Jerome, given by William of Saint-Calais to Durham), Stockholm, Riksarchivet, Frag. 194-5(homilies), Rouen ms A 366 (539) (Anselm, named as archbishop on folios 1r and 111r, from Jumièges), Rouen ms Y 109 (1408) (lives of the saints, also from Jumièges)，以及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3765, folio B (hymnal fragment)。其中关于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残章”，可参见M. Gullick, pp. 57-8,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omanesque manuscript fragments of English, Norman and Swedish origin in the Riksarkivet (Stockholm)”, in J. Brunius, ed., *Medieval Book Fragments in Sweden: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Stockholm, 13-16 November 2003*, Stockholm, 2005 (*KVHAA Konferenser*, 58), pp. 31-82。它们包含了两篇训导词的部分内容；圣加莱的威廉赠送达勒姆的书册名录当中就有“II. libri sermonum & omeliaru[m]”，这两份文本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其中一份很可能是随着一批来自英格兰北方的书册一同抵达斯堪的纳维亚的，本书第七章会再次提及这条传输路线。本书第272页谈到，圣加莱的威廉是中途接手“Durham B.II.13-14”号抄本的资助工作的，关于这个情况，可参见Gameson, *Manuscript Treasures*, p. 59。倘若画师是修士，那么他通常会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上“frater”这个称号，可比较维森瑙修道院（Weissenau Abbey）的一份12世纪读经表抄本上的抄写员自画像，画像上有“fr. Rufillus”这一名字（Geneva, Bibliotheca Bodmeriana, Cod. 127, folio 244r）；有关这一情况，参阅Alexander, *Medieval Illuminators*, 前引书, pp. 10-20，其中第10页讨论了画师雨果的职业，也谈到了其他职业画师以“pictor”自称的例子。关于最早的受雇用的抄写员和画师，可参阅M.Gullick,“Professional Scribes in Eleventh-and Twelfth-Century England”,English Manuscript Studies, 1100-1700, 7, 1998, pp. 1-24。本书第273页谈到了威廉·德·布莱利斯（William de Brailes），关于此人，可重点参阅C. Donovan, *The de Brailes Hours: Shaping the Book of Hours in Thirteenth-Century Oxford*, London, 1991，他曾绘制了两幅签

名自画像，这两幅画像的收藏信息是：British Library, Add. MS 49999, folio 43r和Cambridge,Fitzwilliam Museum, MS 330, folio 3r。1089年的贝叶特许状上，圣加莱的威廉的名字也以见证人签名的形式出现，关于这个情况，参见V. Bourrienne, ed., *Antiquus cartularius ecclesiae Baiocencis (Livre Noir)*, I, Rouen, 1902, pp. 8 and 12。关于抄写员切割羽管以及执笔动作的描述，可参见E. Johnston, *Writing & Illuminating, & Lettering*, London, 1906, pp. 51-60 and 64-70，该书十分经典，已被多次重印；此外，我提到的另一些细节，比如抄写员坐凳子要比坐椅子更好一些，都得益于我同一个名叫唐纳德·杰克逊（Donald Jackson）的抄写员的交流。不过，关于龙头椅子的情况，我参考的是D. M. Wilson, *The Bayeux Tapestry*, London, 1985, pls. 10 and 13。抄写员的"Tres digiti scribunt ..."（三根手指在写）的感叹，在一份11世纪后期的Aldhelm抄本（"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6.A.VI"）第109对开页的右页上就出现了。

第七章　哥本哈根圣咏

《哥本哈根圣咏》的高分辨率扫描图的范围目前只到第18对开页右页，具体见皇家图书馆官方网站的e-manuskripter模块。该抄本的所有主要插图（配相应的说明文字）被收录于M. Mackeprang, V. Madesen and C. D. Petersen, *Greek and Latin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X-XIII Centuries in Danish Collections*, Copenhagen, London and Oxford, 1921, pp. 32-42 and pls. 48-60。考夫曼也为该抄本编制了名录，详见C. M. Kauffmann, *Romanesque Manuscripts, 1066-1190*, London and New York, 1975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the British Isles*, 3), pp. 118-20, no. 96, and plates including colour frontispiece。

本书第289页谈到，真十字架的回归事件很可能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画面中得到了暗示，描绘该事件的画面跟圣米歇尔山的11世纪的"圣礼书"当中的一幅插图（New York, Morgan Library, M 641, folio 155v）有几分相像；参阅J. J. G. Alexander, *Norman Illumination at Mont St. Michel*, 966-1100, Oxford, 1970, p. 159, n.1。关于本书第291页谈到的展览，可参阅S. McKendrick, J. Lowden, K. Doyle and others, *Royal Manuscripts: The Genius of Illumination*, London, 2011。本书第292页列举的（且在这一章中反复出现的）另外五份著名的圣咏抄本分别是：(1) the Hunterian Psalter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 MS Hunter 229): T. S. R. Boase, *The York Psalter*, London, 1962; Kauffmann, Romanesque Manuscripts, 前引书, pp. 117-18, no. 9；N. Thorp, *The Glory of the Page: Medieval & Renaissance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from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1987, pp. 62-5, no. 14; (2) the Ingeborg Psalter (Chantilly, Musée Condé, ms 9): facsimile, F. Deuchler, ed., Ingeborg-Psalter, Le Psautier d'Ingeburge de Danemark, Ms. 9 olim 1695,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Graz, 1985 (Codices Selecti, 80); (3) the Psalter of Blanche of Castile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 ms 9): H. Martin, ed., *Psautier de Saint Louis*

et de Blanche de Castile, Paris, 1909; V. Leroquais, *Les psautiers manuscrits des bibliothèques publiques de France*, Macon, 1940, I, pp. xcvii-xcviii, and II, pp. 13-17，跟此处谈及的其他抄本一样，该抄本也被收录于I. F. Walther and N. Wolf, *Codices Illustres: The World's Most Famous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400 to 1600*, Cologne, 2001, pp. 162-3（这原本应该是一本很出色的书）；(4)the "Avranches" Psalter (Los Angeles, J.Paul Getty Museum, MS 66): [apparently F. Avril], *Un très précieux Psautier du temps de Philippe Auguste*, Paris, 1986（一份由书商为"Ratton and Ladrière"撰写的名录，是已出版著作中对该抄本进行了最详尽介绍的作品），还可参阅T. Kren, *French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Los Angeles, 2007, pp. x-xi and 12-14； (5) the Leiden Psalter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BPL76A): N. Morgan, *Early Gothic Manuscripts*, I, *1190-1250*, 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the British Isles*, 4), pp. 61-2, no. 14，跟《阿拉图斯抄本》一样，该抄本也有高分辨率的电子版可供查阅，具体可见莱顿大学官方网站的Digital Special Collections模块。我本人曾多次考察这五份抄本。本书第296～297页谈到的对《哥本哈根圣咏》的最早描述，可参阅Johann Heinrich von Seelen, *Meditationes Exegeticae, quibus Varia Utriusque Testamenti, Loca Expenduntur et Illustrantur*,Lübeck, 1737, part V, pp. 185-95, *De Psalterio manuscripto Capelliano ob singularem elegantiam commemorabili observatio*；我是自行找到这份参考文献的，为此我还沾沾自喜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得知，已经有人引用过这份文献了，而且征引之人还点明了诸多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参见E. Petersen,"Suscipere Digneris: Et fund og nogle hypoteser om Københavnerpsalteret Thott 143 2° og dets historie", *Fund og Forskning i Det Kongelige Biblioteks Samlinger*, 50, 2011；可在网上查阅。《哥本哈根圣咏》也被收录于*Catalogi Bibliothecae Thottianae*, VII, Copenhagen, 1795, pp. 287-8。18世纪的印花贴金纸通常被随意地称为"荷兰纸"（但实际上都来自德意志），具体情况可参见E. W. Mick, *Altes Buntpapier*, Dortmund, 1979。本书第298页谈到的《达古尔夫圣咏》，如今的收藏信息是：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861。另一份著名的12世纪《圣咏》抄本是唯一可以真正同《哥本哈根圣咏》相提并论的《巴尔巴尼圣咏》，也被叫作《圣阿尔巴圣咏》（*Albani or St Albans Psalter*），如今的收藏信息是：Hildesheim, Dombibliothek（可参阅K. Collins, *The St Albans Psalter: Painting and Prayer in Medieval England*, Los Angeles, 2013)。本书第298页谈到了《哥本哈根圣咏》里的字母表和主祷文，这部分内容出现在抄本的第189对开页的左页。Primer of Claude de France, Cambridge, Fitzwilliam Museum, MS 159, p. 2 (The Cambridge Illuminations, 2005, pl. on p. 230)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但这份抄本的制作时间要比《哥本哈根圣咏》晚；关于为孩童设计的字母表以及主祷文，可参阅L. Shepard, *The History of the Horn Book: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London, 1977。本书第302～303页概述了诺顿教授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C. Norton, "Archbishop Eystein, King

Magnus and the Copenhagen Psalter: A New Hypothesis”, pp. 184-215 in K. Bjørlykke, Ø. Ekroll, B. Syrstad Gran and M. Herman, eds., *Eystein Erlendsson - Erkebiskop, Politiker og Kirkebygger*, Trondheim, 2013。在规划本章写作之时，我尽量将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的文章往后压，这么做是为了让她的作品发挥最大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她的作品在注释中的位置很靠后，但它们的分量是相当重的。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的相关作品如下：P. Stirnemann, “The Copenhagen Psalter”,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6, photocopy, Ann Arbor, 1979（我去丹麦时就带了这篇论文）； P. Stirnemann, “Histoire tripartite: Un inventaire des livres de Pierre Lombard, un exemplaire de sesSentences et le destinataire du Psautier de Copenhague”, pp. 301-18 in D. Nebbiai-Dalla Guarda and J.-F. Genest, eds.,*Du copiste aucollectionneur: Mélanges d'histoire des textes et des bibliothèques en l'honneur d'André Vernet*, Turnhout, 1998; P. Stirnemann, “The Copenhagen Psalter”, pp. 67-76 in E. Petersen, ed.,*Living Words & Luminous Pictures: Medieval Book Culture in Denmark*, Copenhagen, 1999; 以及P. Stirnemann,“The Copenhagen Psalter (Kongel. Bibl. ms Thott 143 2°) Reconsidered as a Coronation Present for Canute VI”, pp. 323-8 in F. O. Büttner, ed., *The Illuminated Psalter: Studies in the Content, Purpose and Placement of Its Images*, Turnhout, 2004。《哥本哈根圣咏》抄本同灵斯泰兹教堂里的1170年前后的石质洗礼盆的联系，以及由此推断出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画面象征着皇家加冕礼的看法，可参阅pp. 131-3 of K. Markus,“Baptism and the King's Coronation: Visual Rhetoric of the Valdemar Dynasty and Some Scanian and Danish Baptismal Fonts”, pp. 122-42 in K. Krodres and A. Mänd, eds., *Images and Objects in Ritual Practic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Newcastle upon Tyne, 2013。本书第306～307页谈到了各个《圣咏》抄本上都会增补一份年历，关于这个情况，可参阅R. W. Pfaff,“Why do Psalters have Calendars?”，这实际上是一份讲座整理稿，见*Liturgical Calendars, Saints, and Services In Medieval England*, Aldershot and Brookfield, Vt, 1998, item VI, pp. 1-15；最早的两份出现这一情况的抄本是：Bosworth Psalter (British Library, Add. MS 37517, late tenth century)和Salisbury Psalter (Salisbury Cathedral, MS 150, c. 969-89)。英格兰北方的奥古斯丁教团年历跟《哥本哈根圣咏》中的有一些差异，具体情况可参阅R. W. Pfaff,*The Liturgy in Medieval England: A History*, Cambridge, 2009, pp. 290-93。卡尔·诺登法尔克意识到《哥本哈根圣咏》年历是有英格兰北方的风格特质的，不过，他还是将这份《圣咏》抄本的创制地确定在英格兰南方（Carl Nordenfalk, Gyllene böcker: Illuminerade medeltida handskrifter i Dansk och Svensk ägo, Stockholm, 1952, pp. 30-31, no. 24）。本书第310页将《哥本哈根圣咏》中的字体同伯里《圣经》和朗伯斯《圣经》抄本中的字体进行了比较，我认为它们都是由同一个抄写员抄写的（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 and London, 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 3; cf. R. M. Thomson, *The Bury Bible*,

Woodbridge and Tokyo, 2001, and D. M. Shepard, Introducing the Lambeth Bible, Turnhout, 2007）。有人认为，雷米吉乌斯遗骸来自林肯的圣徒主教（亡于1092）而非早先的兰斯的雷米吉乌斯（亡于53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这些遗骸实际上都是身体器官而非遗骨，斯蒂尔尼曼和诺顿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本书第313页列举了多份抄本，据帕特里西亚·斯蒂尔尼曼的研究，它们的抄写员跟《哥本哈根圣咏》的《诗篇》1~54以及《亨特圣咏》的《诗篇》1~101的抄写员是同一个人；这些抄本分别是：Troyes, Médiathèque, ms 900 (Peter Lombard, *Sentences*, credibly dated 1158); Oxford, St John’s College, MS 49 [Peter Lombard, *Sentences,* 这份抄本一度为奇切斯特主教希拉里所有（Hilary, bishop of Chichester），这位主教曾于1163年和1164年在法国居住，于1169年谢世];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7246 (Peter Lombard’s Great Gloss on the Pauline Epistles)；以及Paris, 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 ms 939 (miracles of Saint Augustine)。本书第313~314页谈到了圣维克多修道院缮写室的规则，具体情况可参阅L. Milis, ed., *Liber ordinis Sancti Victoris Parisiensis*, Turnhout, 1984 (*Corpus Christianorum, Continuatio Medievalis*, 61), pp. 78-9。对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研究以至这类研究的重要之处，可见于E. A. Matter and L. Smith, eds., *From Knowledge to Beatitude: St Victor, Twelfth Century Scholars*,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r of Grover A. Zinn, Jr.*, Notre Dame, Ind., 2013。本书第314页谈到的三卷本的“玛尼琉斯《圣经》抄本”为Paris, 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mss 8-10；该抄本的抄写员来自坎特伯雷，此人的家族被记录于Dodwell,*The Canterbury School of Illumination*,我在第六章注释中提过此书, p. 588，以及W. Cahn, *Romanesque Manuscripts: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6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France*, 3), II, pp. 99-102, no. 81。此处要特别解释一下：本书此处以及其他地方引用的拉丁文《诗篇》文本，一概采用的是中世纪拉丁通行本的编码。现代版《诗篇》的编码多是采用了希伯来文《圣经》的编码，但在译自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拉丁通行本中，现代版《诗篇》9~10被合并成了一篇，由此拉丁通行本中《诗篇》的编号比现代版的大一位，一直到《诗篇》147，拉丁通行本中《诗篇》147被分为两篇，使得最终两个译本的《诗篇》都是一百五十篇。本书第320~322页提到，圣伯纳德对在艺术作品中运用怪物形象的做法是颇为反对的，实际上，他的论述很长，参见他于1125年为Saint-Thierry修道院院长威廉写的*Apologia* (J. Leclerq and H. M. Rochais, eds., *Sancti Bernardi opera*, III, Rome, 1963, p. 106)。本书第323页谈到了伯里《圣经》里的一个人在给兔子剪毛的插图，这幅插图如今的收藏信息是：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MS 2, folio 1v。卡米勒认为这幅图是有寓意的，具体可参阅M. Camille, *Image on the Edge: The Margins of Medieval Art*, London, 1992, pp. 18-20。画师“西蒙大师”的情况，可参阅W. Cahn, “St Albans and the Channel Style in England”, pp. 187-211 in J. Hoffeld, ed., *The Year 1200: A Symposium*, New York, 1970（该书第189页谈到了《哥本哈根圣咏》）；R. M. Thomson, *Manuscripts from St Albans Abbey, 1066-1235*,

Woodbridge, 1982, pp. 54-62 and 126-8；以及D. Jackson, N. Morgan and S. Panayotova, *A Catalogue of Western Book Illumination in the Fitzwilliam Museum and the Cambridge Colleges*, III, i,*France, c. 1000-c*. 1250, London and Turnhout, 2015, pp. 141-5。本书第325页谈到的一些拥有西蒙大师制作的学术书的修道院为：Bonport (Numbers glossed,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74), Liesborn (Genesis glossed, Münster-in-Westfalen,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s 222), Klosterneuberg (works of Aristotle and Boethius, Klosterneuburg, Stiftsbibliothek, Cod. 1089)，以及Esztergom (Esztergomi Fószékesegyházi Könyvtár [Cathedral library], I.21)。圣阿尔班修道院收藏的西蒙大师创制的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如下：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48 (Bible), 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O.5.8 (Ralph of Flaix)，以及Stonyhurst College, Lancashire, MS 10 (Gregory)。在法国，人们通常称他为“嘉遣布会《圣经》画师”（Master of the Capucins Bible），因他而得名的抄本为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6743, possibly from Troyes；可参阅W.Cahn, *Romanesque Manuscripts: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6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France*, 3), II, pp. 96-9, no. 79。在此，请容许我说些离题的话。1183年，修道院院长西蒙谢世之后，西蒙大师的去向我们便无从知晓了，他也许回了法国。不过，他的作品仍然出现在此一时期的另外一些抄本当中，比如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MS 380的泥金装饰中，这也是如今已知的唯一一份克里克莱德的罗伯特（Robert of Cricklade）的《信仰之谜》（*Speculum Fidei*）抄本，从字迹判断，这份抄本应该是在1170~1190年面世的；为同一位作者自有的《普林尼缩略语表》抄本（*Abbreviatio Plinii*，Windsor, Eton College, MS 134）的插图也出自西蒙之手。克里克莱德的罗伯特是圣弗理得斯韦德修道院（St Frideswide's Abbey）的院长，这是牛津的一座属于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罗伯特就是在这座修道院谢世的，谢世时间应该是在1188年之后。由此也就基本上可以肯定，罗伯特的主要作品应该是在牛津完成的。一批早期卷宗显示，在日后将成为牛津大学的这个地界当时已有学术活动存在，这批卷宗中的一份材料是今天圣玛丽教堂旁边的凯特街上的一处土地的租赁状，签订时间大概是在1190年，画师罗杰是这份租赁状的见证人之一［参阅H. E. Satter, ed. *A Cantulary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 I, Oxford (Oxford Historical Society, 66), p. 414］。他是否就是暂居牛津的西蒙大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遇上了西蒙大师的候选人之一呢？本书第325~326页讨论的缝合孔的问题，可参阅C. Sciacca, “Raising the Curtain on the Use of Textiles in Manuscripts”, pp. 161-90 in K. M. Rudy and B. Baert, eds., *Weaving, Veiling and Dressing: Textiles and Their Metaphor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urnhout, 2007（感谢米克尔·古利克提醒我注意这篇文章）。如果有哪位正在拟定博士论文选题的读者，需要直接接触大量抄本，却不懂拉丁文，那么你可以选择对抄本中的保护性织物进行系统性记录，这种织物的应用范围曾是非常广泛的。

第八章　《布兰诗歌》

《布兰诗歌》有一份看着很呆板的影印本，见*Carmina Burana, Faksimile-Ausgabe der Carmina Burana und der Fragmenta Burana, Handschrift Clm 4660 und 4660a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in München*, Munich, 1967，比斯科夫为这份影印本写了一份质量相当高的评注：B. Bischoff, E*inführung zur Faksimile-Ausgabe*, in German and English。奥托·舒曼对《布兰诗歌》有很详尽的分析，见A. Hilke and O. Schumann, eds., *Carmina Burana, mit Benutzung der Vorarbeiten Wilhelm Meyers, Kritisch Herausgegeben*, II, *Kommentar*, Heidelberg, 1930, pp. 3*-95*。比斯科夫和舒曼的作品都是本章依托的关键文献。造访慕尼黑之前，我进行了一些背景调查，瓦德尔的一本旧书是我的入门材料：Helen Waddell,*The Wandering Scholars*, London, 1927，我还参考了一本企鹅经典系列的新书：D. Parlett,*Selections from the Carmina Burana: A Verse Translation*,Harmondsworth and New York, 1986。还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是：P. G. Walsh, *Love Lyrics from the Carmina Burana: Edited and Translated*, Chapel Hill, NC, 1993; T. M. S. Lehtonen, *Fortuna, Money, and the Sublunar World: Twelfth-Century Ethical Poetics and the Satirical Poetry of the Carmina Burana*, Helsinki, 1995；以及T. Marshall,*The Carmina Burana: Songs from Benediktbeuern*, Los Angeles, 2011。本章征引的全部诗歌的翻译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在一辆长途客车上，我同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的安妮·阿泽玛有了交流机会，她还吟唱了《布兰诗歌》里的很多歌谣，我很感激能有这样的交流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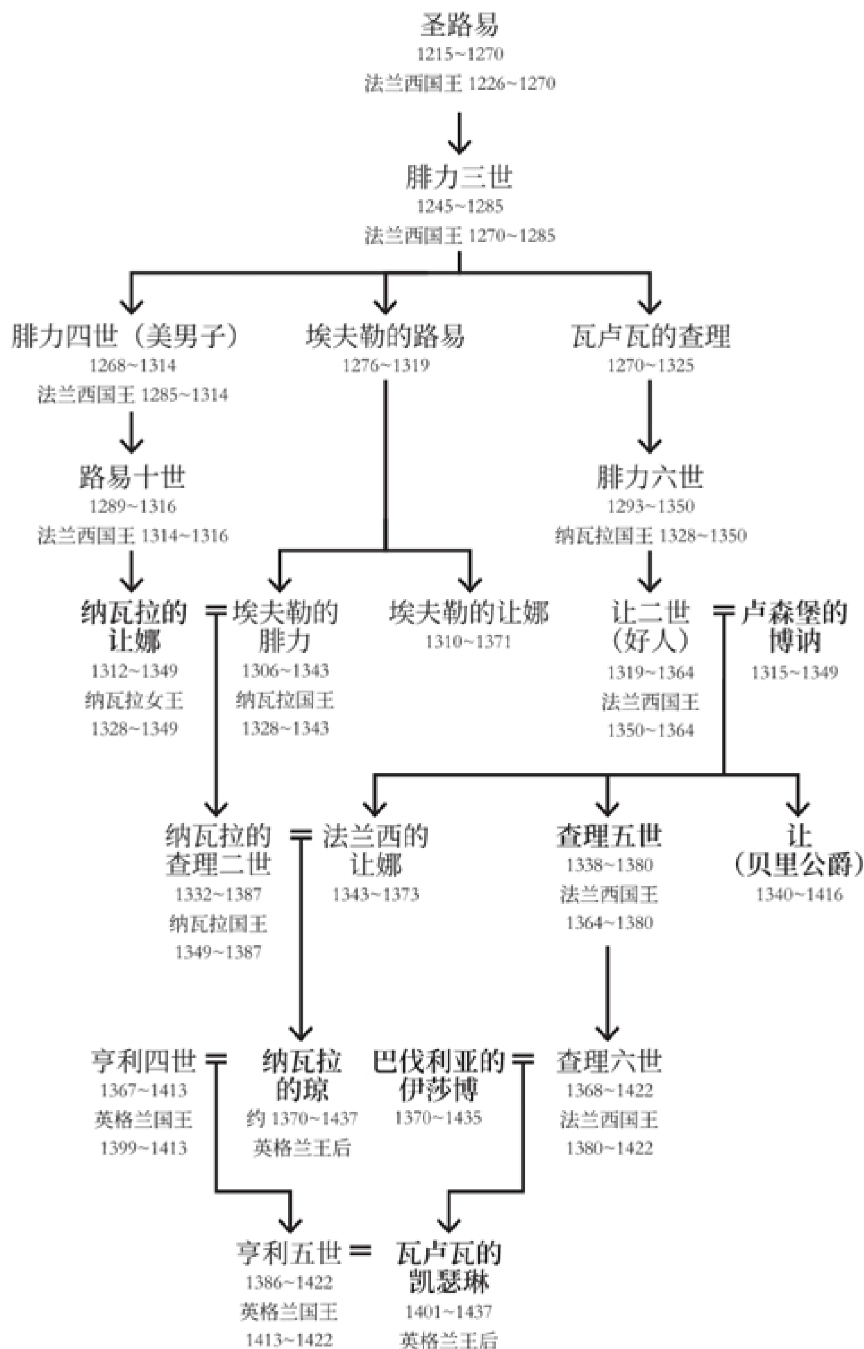
关于寻获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的藏书的情况，参见G. Glauche, *Katalog der lateinischen Handschriften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DiePergamenthandschriften aus Benediktbeuern, Clm 4501-4663*, Wiesbaden, 1994 (*Catalogus Codicum Manu Scriptorum BibliothecaeMonacensis*, n.s., III, i), pp. vii-viii。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藏书中，得以存留下来的抄本可参见S. Krämer, *Handschriftenerbe des deutschen Mittelalters*, Munich, 1989 (*Mittelalterliche Bibliothekskataloge Deutschlands und der Schweiz*, Engänzungsband, 1), pp. 78-9。本书第338页谈到，《布兰诗歌》抄本的页码顺序实际上是非常混乱的，该抄本应该在18世纪时就是散乱着的，只是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修道院在收藏这份抄本时对其进行了重组，令其变得更美观一些。未装订的散页很可能是在1803年人们清空修道院藏书室时被发现的。本书第340页谈到了《阿尔贝里克神父的剪贴簿》（*Canon Alberic's Scrap-Book*），见M. R. James, *Ghost Stories of an Antiquary*, London, 1906, p. 13。关于日课经的变化历程，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是：V. Leroquais, *Les bréviaires manuscrits des bibliothèques publiques de France*, Paris, 1934。本书第340页谈到了《布兰诗歌》中的一些歌谣的开篇词跟《诗篇》中的一样，比如“Bonum est”（folio 3r）以及“Lauda”（folio 3v），跟《诗篇》91和146~147的开篇词就是一样的；在时祷书中，诗篇“Bonum est”是夜祷的结束篇，接下来的两

篇晨祷则是以“Laudate”一词开篇的。本书第343页谈到了马特弗雷·埃蒙高德（Matfre Ermengaud, 1246~1322）的《爱之日课经》（*Breviari d'Amor*）；奇怪的是，这份名为日课经的抄本本身跟日课经没有特别的相似之处（参阅P. T. Ricketts, *Le Breviari d'amor de Matfre Ermengaud*, Leiden and London, 1976）。本书第343页谈到，倘若按原初的次序重组抄本书页，那么《布兰诗歌》的文本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说教和讽刺诗，第43对开页右页至第48对开页左页，以及第1对开页右页至第18对开页左页；（2）情歌，第18对开页左页至第42对开页左页、第73对开页右页至第82对开页左页，以及第50对开页右页至第72对开页左页；（3）饮酒和游戏歌谣，第83对开页右页至第98对开页左页；（4）宗教剧，第99对开页右页至第112对开页左页。本书第353页谈到，“时运之轮”正中央的那个人物也在承受时运变幻之苦，而时运女神很少出现在时运之轮的插图中，这是12世纪早期奥图恩的霍诺留斯（Honorius of Autun）就已经提出的论点（参见H. R. Patch, *The Goddess Fortuna in Medieval Literature*, London, 1967, reprinting the edition of 1927, p. 152）。腓特烈二世的印章是在1220年制作出来的，关于这枚印章，可参阅R. Haussherr, ed., *Die Zeit der Staufer, Geschichte - Kunst - Kultur*, Stuttgart, 1977, I, p. 34, no. 50, and III, pl. 20。14世纪之前的欧洲艺术中实际上是不存在写实风格的风景画的；这一点参见O. Pächt, “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 and the Early Calendar Landscape”,*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 1950, pp. 22-32。本书第355页谈到了有关创世周期的图，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一份12世纪晚期的动物寓言集：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Ashmole 1511, folios 5r（植物出现）, 6r（鸟类鱼类出现）and 6v（动物出现）。本书第357页谈到，手持花朵的圣母形象最早是在13世纪出现在德意志艺术作品当中的，我是从尼格尔·摩根（Nigel Morgan）的作品中读到这个观点的。本书第364~365页征引了布卢瓦的彼得的信，关于这封信，可见Ep. LVII（Migne, *Patrologia Latina*, CCVII: 171-2）。关于布卢瓦的彼得，可参阅R. W. Southern, “The Necessity for two Peters of Blois”, pp. 103-17 in L. M. Smith and B. Ward, eds.,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Essays Presented to Margaret Gibson*, London, 1992。本书第368页和第370页谈到了所谓的“线上/线下”规则，关于这个问题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N. R. Ker,“From ‘Above Top Line'to ‘Below Top Line’: A Change in Scribal Practice”, *Celtica*, 5, 1960, pp. 13-16, reprinted in A. G. Watson, ed., N. R. Ker, *Books, Collectors and Libraries: Studies in the Medieval Heritage*, London, 1985, pp. 71-4。伯恩哈德·比绍夫（Bernhard Bischoff, 1906~1991）是现代古文书研究领域公认的巨人，关于他的研究可参阅S. Krämer, *Bibliographie Bernhard Bischoff und Verzeichnis aller von ihm herangezogenen Handschriften*, Frankfurt, 1998 (Fuldaer Hochschulschriften, 27)。比斯科夫的诸多观点至今仍然是备受尊崇的。本书第370页谈到的乔治·斯蒂尔的那篇文章，具体信息是：Georg Steer,“‘Carmina Buranain’ Südtirol, Zur Herkunft des Clm 4660”,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 112, 1983, pp.

1-37。关于12世纪晚期的抄本设计对于此一时期的知识重组运动的体现，可参阅M. B. Park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s of Ordinatio and Compilatio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pp. 35-70 in *Medieval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Essays Presented to Richard William Hunt*, Oxford, 1976，以及M. A. Rouse and R. H.Rouse, “Statim invenire: Schools, Preachers and New Attitudes to the Page”, pp. 201-25 in R. L. Benson and G. Constable, ed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82, reprinted in the Rouses’ *Authentic Witnesses: Approaches to Medieval Texts and Manuscripts*, Notre Dame, Ind., pp. 191-219。关于奥尔夫的生平，我主要参考了：A. Liess, Carl Orff, transl. A. and H. Parkin, London, 1966，以及W. Thomas, *Das Rad der Fortuna: Ausgewählte Aufsätze zu Werk und Wirkung Carl Orffs*, Mainz, 1990，但我还没有充分理解这本书。本章提到的故事主要取材于：H. Schaefer and W. Thomas, eds., C. Orff, *Carmina Burana, Cantiones profanae cantoribus et choris cantandae comitantibus instrumentis atque imaginibus magicis, Faksimile der autographen Partitur in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Mainz and London, 1997, including W. Thomas, “‘Fortune smiled on me 9’ The Genesis and Influence of the Carmina Burana”, pp. xvii-xxi, translated by D. Abbott；以及F. Dangel-Hofmann, ed., *Briefe zur Entstehung der Carmina Burana, Carl Orff und Michel Hofmann, Herausgegeben und Kommentiert*, Tutzing, 1990。关于皇家节日音乐厅的音乐会的乐评是在1951年6月12日发布的，可以在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中输入关键词“Burana”进行查询。

第九章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倘若某个出版商富有雄心，那么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制作并出版影印本将会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法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中的一些插图制成了电子版（预期还会制作更多），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都能够查阅到（Mandragore website for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围绕这份抄本，迄今最全面的出版物仍然是：Roxburghe Club book of H. Yates Thompson, *Thirty-Two Miniatures from the Book of Hours of Joan II, Queen of Navarre: A Manuscript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1899；对这份抄本的标准描述仍然出现在S. C. Cockerell, pp. 151-83, no. 75, in Yates Thompson’ 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Fifty Manuscripts*, 1902，本书第五章也引过此书。



本书第九章中提到的圣路易的主要直系后裔，其中加粗的人名表示《纳瓦拉的让娜》曾经的主人（包括可以确定的以及我们推测出来的）

1945年贝希特斯加登的情况，我参考的是A. H. Mitchell, *Hitler's Mountain: The Führer, Obersalzburg an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Berchtesgaden,Jefferson,NC, and London,2007（军士误以为踩到砖块的故事，可见该书第131页）。关于《贝里公爵最美时祷书》重见天日的故事，可以参阅这份抄本的发现者弗朗西斯·罗格的相关陈述： Francis Rogé, "Tribulations d' un manuscrit à peintures du XVe siècle", pp. 337-40 in *Valenciennes et les anciens Pays-Bas: Mélanges offerts* à *Paul Lefrancq*, Valenciennes, 1976 (*Publication du Cercl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Valenciennes*, IX)。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个情况，因为一位阅读了该章的早期读者对此抱有疑问：贝里公爵拥有多份时祷书，它们的名称来自贝里公爵藏书名录纪要里的相关用词，比如，*Très Belles Heures*（如今收藏在巴黎）、 the *Petites Heures*（如今也收藏在巴黎）、 the *Très Riches Heures*（如今收藏在尚蒂伊）、 the *Belles Heures*（如今收藏在纽约）；这些抄本都是不一样的。莫里斯·兰斯的相关回忆材料最终得到出版，见*The Glorious Obsession*, transl. P. Evans, London, 1980, pp. 224-7。1998年，我应邀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参加德利尔讲座，在准备此次演讲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跟马赛尔·托马斯和弗朗索瓦·阿弗里尔有过几次交流，当然也同莫里斯·兰斯有过短暂交谈，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不过至今我仍然很感激自己能有这样的机会与他们交流，我的讲座内容最终也刊印出来了，见C. de Hamel, *The Rothschilds and Their Collections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London, 2005（书中第41页谈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的情况）。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最新的抄本名录，可参见F. Avril, "The Bibliophile and the Scholar: Count Paul Durrieu's List of Manuscripts Belonging to 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pp. 366-76 in J. H. Marrow, R. A. Linenthal and W. Noel, eds., *The Medieval Book, Glosses from Friends & Colleagues of Christopher de Hamel*, 't Goy-Houten, 2010。《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名录》的全称是：Commandement en chef français en Allemagne, Groupe français du conseil de controle, *Répertoire des biens spoliés en France durant la guerre 1939-1945*, VII, Archives, manuscrits et livres rares, n.p., n.d。Meiss的一部作品当中，曾多次提及《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并为之标注了"不知所踪"的字样，见M. Meiss, *French Painting in the Time of Jean de Berry: The Late XIV Century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Duk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7；阿弗里尔甚至认为该抄本已经"无处可寻"了，见F. Avril, "Trois manuscrits de l' entourage de Jean Pucelle", *Revue de l'Art*, 9, 1970, pp. 37-48（尽管在这篇文章问世之时，阿弗里尔很可能已经亲眼见过这份抄本了）。这之后，阿弗里尔先生在很多作品中谈论了这份时祷书，包括：*Manuscript Painting in the Court of Fra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310-1380)*, transl. U. Molinaro, London, 1978, esp. pp. 68-73, pls. 15-17；*Les Fastes du Gothique: Le siècle de Charles V, Galeries nationales du Grand Palais, 9e octobre 1981-1er février 1982*, Paris, 1981, pp. 312-14, no.265中的展览名录纪要；以及他为一份影印本撰写的评注，见*Les Petit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Lucerne,1988-9, esp. pp. 115-23。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本章极为倚重的。本书第385～386页总括了抄本的各部分文本的对开页页码排布情况，具体如下：(1) the calendar, folios 4r-9v; (2) the Hours of

the Holy Trinity, folios 11r-38r; (3) the Hours of the Virgin Mary, folios 39r-72r; (4) various short prayers, folios 72v-74v; (5) the Penitential Psalms and litany, folios 75r-85r; (6) the Hours of Saint Louis, folios 85v-105v; (7) the Hours of the Cross, folios 109r-116r; (8) miscellaneous prayers in honour of various saints, especially the Virgin Mary and the Trinity, in Latin and French, folios 116v-145r; (9) Suffrages, or prayers addressed to particular saints, folios 145v-150r; (10) other short prayers, folios 150v-158v; (11) the Office, or Vigils, of the Dead, folios 158v-182v; (12) further Suffrages, folios 183r-193v; (13) the special variants of the Hours of the Virgin for use in Advent, folios 194r-219v; (14) the special variants of the Hours of the Virgin for use between Christmas and the feast of the Purification, folios 220r-246r; (15) the Psalter of Saint Jerome and other prayers, folios 247r-257r; (16) miscellaneous additions, in later hands, folios 257v-271v。对这份时祷书文抄本的内容的最佳描述，可参见 M.M.Manion, “Women, Art and Devotion: Three French Fourteenth-Century Royal Prayer Books”,pp. 21-66 in M. M. Manion and B. J. Muir, eds.,*The Art of the Book: Its Place in Medieval Worship*, Exeter, 1998, esp. pp. 24-5 and 45-50（该书的封面呈现的就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插图）。关于时祷书这个抄本门类的总体历史发展，可参见以下这本经典之作的导言： V. Leroquais, *Les livres d'heur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27, pp. i-lxxxv。R. S. Wieck编了两份非常精美的展览名录，见*Time Sanctified: The Book of Hours in Medieval Art and Life*, New York, 1988 (for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in Baltimore)和*Painted Prayers: The Book of Hour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rt*, New York, 1997 (for the Morgan Library)。同时可以参考的还有：S. Hindman and J. H. Marrow, eds., *Books of Hours Reconsidered*, London, 2013, including A. Bennett,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Books of Hours in Franc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 19-40, 以及N. Morgan, “English Books of Hours, c. 1240-c. 1480”, pp. 65-95（该书第68～69页引述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内容）。本书第391页谈到，女王跪地祈祷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祷书抄本当中，《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中也有，分别出现在第68对开页右页、第122对开页左页、第131对开页左页以及第152对开页右页等页的彩绘首字母当中，同时也出现在第125对开页左页和第137对开页左页的插图当中。我给出的女性祈祷文的例子，可见《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第255对开页左页、第149对开页左页和第151对开页左页。第151对开页左页直接提到了让娜，这一页的祈祷文的开篇为“Deprecor te odomina sanctissima maria ....”（亲爱的圣母啊……）。这提醒了我们在翻阅抄本中的祈祷文时，不妨多注意一些，说不定就会看到抄本主人的名字。我研究过的第一份时祷书抄本是达尼丁图书馆的MS 5号抄本，里面就有一份祈祷文祈请帮助“me margeriam fitzherbert”（第87对开页右页，当时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情况）；另有一份更有名的时祷书抄本Lambeth Palace MS 474，这份抄本相当朴素，里面有一份不起眼的祈祷文，召

请了耶稣基督拯救“me famulum tuum regem Ricardum”（第182对开页右页），由此我确定了这份时祷书抄本的主人就是1483~1485年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参见A. F. Sutton and L. Visser-Fuchs, *The Hours of Richard III*, Stroud, Gloucs., and Wolfeboro Falls, NH, 1990）。关于圣路易日课，参见M. Thomas, “L'iconographie de Saint Louis dans les Heures de Jeanne de Navarre”, pp. 209-31 in *Septième 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Saint Louis: Actes des colloques de Royaumont et de Paris(21-27 mai 1970)*,Paris, 1976；和M. C. Gaposchkin,*The Making of Saint Louis: Kingship, Sanctity and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8, 以及同样是她的作品的*Blessed Louis: The Most Glorious of Kings: Texts Relating to the Cult of Saint Louis*, Notre Dame, Ind., 2012。另外三份包括了圣路易日课的抄本（本书第394页曾有提及）分别是：(1)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pencer MS 56 (the Hours of Blanche of Burgundy; cf. the entry by Lucy Sandler in J. J. G. Alexander, J. H. Marrow and L. F. Sandler, *The Splendor of the Word,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ew York, London and Turnhout, 2005, pp.223-6, no. 46); (2) the Hours of Jeanne d’Évreux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 ٥٤.١.٢; facsimile*, The Hours of Jeanne d’Évreux, Acc. No. 54.1.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Cloisters Collection*, New York, commentary by B. Drake Boehm, A. Quandt, and W. D. Wixom, Lucerne, 2000); (3) the Hours of Marie de Navarre (Venic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cod. lat. I.104 (12640); facsimile, *Libro de Horas de la reina María de Navarra*, commentary by M. Zorzi, S. Marcon, and others, Barcelona, 1996)。本书第394页谈到现已被损毁的都灵的《萨伏伊时祷书》里，有一部分圣路易日课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已经被刊印出来了，见P. Durrieu, “Notice d'un des plus importants livres des prières du roi Charles V, Les Heures de Savoie”, pp. 500-555 i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72, 1911, p. 510。本书第396页提及的孩童时代的圣路易学习阅读的插图，出现在《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第85对开页左页上；该插图当中呈现的《圣咏》抄本，目前的收藏信息是：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BPL 76A；抄本旁指出这是圣路易用过的《圣咏》的题词，其书写时间跟《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的创制时间大约是相同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当中的圣阿波罗尼亚祈祷文以及圣玛格丽特小传（本书第397页），分别出现在抄本的第131对开页右页和第133对开页右页至第134对开页左页。“Vous devez savoir ...”（你应该知道……）的开篇出现在第43对开页左页，并且已经被刊印在Manion, “Women, Art and Devotion”, 前引书, pp. 35-6上。让娜赈济穷人的插图出现在第123对开页左页。有关本书第399~401页描述的那种幽默边饰，可参见一部颇为经典的著作：L. M. C.Randall*, Images in the Margins of Gothic Manuscrip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6；以及卡米勒的相当有争议的解读，M. Camille, *Image on the Edge: The Margins of Medieval Art*, London, 1992。本书第405页谈到了两卷本的《贝尔维尔日课经》，并给出了相应的简介。如

今这份抄本的收藏信息是：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0484；该抄本还没有（但需要）影印本问世，不过已经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一些作品当中，比如Avril, *Court of France*, pp. 60-63；Walther and Wolf, *Codices Illustres*, pp. 206-7等。该日课经可以确定是属于查理五世的，不过，无法确定其最初的主人，有可能是贝尔维尔的让娜、克利松的奥利维耶（Olivier de Clisson）的妻子，1343年，国王罚没了她的财物。查理五世后来将这份日课经赠送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理查二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则将其回赠贝里公爵，其时，这份日课经中的年历成了包括《贝里公爵的大时祷书》（*Grandes Heures of the Duc de Berry*，*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919）在内的下一代抄本的范本。《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一度被认为是让·普塞尔的作品，此人是《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的画师（参见K. Morand, *Jean Pucelle*, Oxford, 1962, pp. 20-21 and 48-9）；这两份抄本之间的关系，可特别参见Avril, *Court of France*, p. 68, “Pucelle's ghost still haunts the manuscript in a number of places”，以及Boehm, “The Cloisters Hours and Jean Pucelle”, pp. 89-116。《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抄本的第一个画师在本书第408页有提及，是弗朗索瓦·阿弗里尔在他的*Les Fastes du Gothiques*中最先将其辨识出来的，为此，阿弗里尔征引了一份1336年被呈送阿图瓦省（Artois）的彩饰诉状（如今其收藏信息是：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fr. 18437），此外还征引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两部作品的抄本，这两份抄本如今都藏于意大利（Florence, Biblioteca Laurenziana, cod. Fiesole 89，以及Vatican, Biblioteca Apostolica, cod. Vat. lat. 744, dated 1343）。至于《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第三个画师，阿弗里尔认为是让·勒诺瓦尔，这位画师还参与了《查理五世日课经》以及《贝里公爵小时祷书》（*Petites Heures* of the Duc de Berry）的制作工作（这两份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是：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s lat. 1052 and 18014）。关于让·勒诺瓦尔作为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信息，可参阅一部引人入胜的多卷本作品R. H. Rouse and M. A. Rouse, *Manuscripts and Their Makers: Commercial Book Producers in Medieval Paris, 1200-1500*, Turnhout, 2000, I, pp. 265-7, and II, p. 79。科克莱尔甄别出来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的第四个画师，承担的工作单元是第145对开页左页至第150对开页左页，以及第183对开页右页至第193对开页左页。有人认为，这个画师就是马耶（Mahiet），且他接受的是后期工作，参见M. Keane, “Collaboration in the Hours of Jeanne de Navarre”, pp. 131-48 in A. Russakoff and K. Pyun, eds., *Jean Pucelle: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Manuscript Painting*, Turnhout, 2013, esp. pp. 131-46 and p. 146, n. 1。本书第413页提到的马赛的圣路易插图，出现在第191对开页右页。还有一幅插图上埃夫勒的纹章被查理五世的纹章覆盖了，这出现在第52对开页右页。将该抄本同贝里公爵藏书名录纪要匹配起来的初次尝试是在F. Avril and P. D. Stirnemann, *Manuscrits enluminés d'origine insulaire VIIe-XXe siècle*, Paris, 1987, pp. 177-8, no. 219中做出的。关于这份名录，可参见L. Delisle, *Recherches sur la librairie de Charles V, roi de France, 1337-1380*, II, Paris, 1907, p.

238*, no. 97。关于负责绘制卷首插图的英格兰画师，可参见K. L. Scott, *Later Gothic Manuscripts, 1390-1490*, London, 1990 (*A Survey of Manuscripts Illuminated in the British Isles*, VI), II, p. 214。本书第417页提到的《瓦卢瓦的凯瑟琳时祷书》，如今的收藏信息是：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65100；该抄本先前的收藏信息是：Upholland College, Lancashire, MS 42(Christie's, 2 December 1987, lot 34)。本书第418页谈到了洛尔西尼大街上的苦行修女会收藏的抄本，其具体信息可参见：A. Longnon, *Documents Parisiens sur l'iconographie de S. Louis publiés par Auguste Longnon d'après un manuscrit de Peiresc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de Carpentras*, Paris, 1882, pp. 7-11, 21-66 and plates VII-XII engraved from Peiresc's drawings。本书第418页也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后，该抄本便不再属于这家女修院了；1790年，该女修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宣布，当时修道院的藏书仅有两百册，且都是宗教方面的，革命委员会派人调查了修道院藏书之后，并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藏书（具体情况可参见A. Franklin,*Les anciennes bibliothèques de Paris: églises, monastères, colléges, etc.*, III, Paris, 1873, pp. 401-2）。关于麦卡锡（MacCarthy）的情况，可参见C. Ramsden,“Richard Wier and Count MacCarthy”, *The Book Collector*, 2, 1953, pp. 247-57；最早提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也曾是麦卡锡藏书的看法的人是S. De Ricci，参见S. De Ricci, *Les manuscrits de la collection Henry Yates Thompson*, Paris, 1926, p. 60, no. 75。有关该图书馆的描述见*Catalogue des livres rares et précieux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le comte de Mac-Carthy Reagh*, I, i, Paris, 1815。这份名录第64页的“lot 392”号藏品被认为就是《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这个看法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定论了；名录纪要显示，“lot 392”藏品是一本配图精美的祈祷书，内有许多插图和页边绘图，极为华美，纸张是小开本，用的是摩洛哥烫金山羊皮纸，全书共五百四十二页，也就是两百七十一对开页——这些都跟《埃夫勒的让娜时祷书》一致，只是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的差异是，该名录纪要显示，这份藏品的很多插图都是灰色的单色画“en camaïeu gris”，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并非如此。如今为纽约格洛丽耶尔俱乐部（Grolier Club in New York）所收藏的该名录的副本显示，这份时祷书当时的估价是一百五十法郎，但实际卖价达到了三百五十法郎（作为参照，名录中前面的一份时祷书拥有三十三幅插图，最终只卖出了三十法郎，后面的一份时祷书拥有五十四幅插图，最终也只卖出了二十法郎；不过请注意，麦卡锡的“lot 61”藏品、无与伦比的古腾堡版牛皮纸《圣经》抄本，最终卖出了六千两百六十法郎，该抄本就是大英图书馆的Grenville copy）。本书第419页谈到了麦卡锡藏品拍卖会的当天，杜斯（Douce）作为买家也来到现场，关于这一情况，可参见Munby, *Connoisseur*, 前引书, p. 52。关于西德尼·科克莱尔，已经有不少的文献可供参考，更有一部传记：W. Blunt, *Cockerell*, London, 1964；我本人在桑达斯讲座（Sandars Lectures）中也用了三讲来介绍此人，讲座内容已经整理完并发表，见*The Book Collector*, 55, 2006, pp. 49-72, 201-23 and 339-66。西德尼·科克莱尔跟本书第18页提到的道格拉斯·科克莱尔（Douglas Cockerell）是亲兄弟。“伯灵顿艺术俱乐部名录”为*Exhibition*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London, 1908；其中，《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在这部作品的第59~60页，编号是“no. 130”。本书第421页引述了科克莱尔的日记，这本日记的收藏信息是British Library, Add. MS 52656。关于科克莱尔同托马斯·亨利·里赫斯（Thomas Henry Riches, 1865~1935）的特殊关系，可参阅S. Panayotova, “Cockerell and Riches”, *The Medieval Book* (the de Hamel festschrift，前引书）, pp. 377-86。对此次拍卖会的描述，我主要依托的材料是记录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名录副本上的一些文字，见*Twenty-Eight Manuscripts and Two Printed Books, the Property of Henry Yates Thompson*, Sotheby's, 3 June 1919，在此特别感谢玛拉·霍夫曼带我查阅这些材料；当然，《泰晤士报》与1919年6月4日的相关报道也是颇有价值的材料。阿兰·贝尔（Alan Bell）曾为《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撰写了“查尔斯·哈格贝格-怀特”词条；怀特本人在伯灵顿艺术俱乐部藏书*Nicholas Fabri de Peiresc,* 1926, p. 7中回忆了《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称它是“他所认为的华贵珍本的典范”。法国国家图书馆通往抄本部的楼梯底端的柱子上，分别是佩雷斯科和德利尔的大理石人像。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夏洛特·德诺伊（Charlotte Denoël），没有她的帮助，本章最后那部分内容是不可能跟大家见面的。关于戈林在战争期间掠夺的艺术品，我们已有法国外交部档案馆（Les ArchivesDiplomatiques）影印的一份令人震惊的名录，也可以参阅J.-M.Dreyfus,*Le catalogue Goering*,Paris, 2015，不过后者仅仅涵括了画作，因此《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及其丢失的插图不在其中，但它的第48页显示了戈林从亚历山德里娜·罗斯柴尔德那里掠夺的另外一批藏品。

第十章　《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

《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已有完整的电子版，可以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免费查阅。不过，在这之前还有E. Stubbs, ed., *The Hengwrt Chaucer Digital Facsimile*，这是一份光盘阅读文件，是由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同莱斯特德蒙特福德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项目”协作完成的，由Scholarly Digital Editions于2001年出版；在光盘之前这份抄本还有一个在尺寸上略有缩减的黑白影印本，这是我主要的参考资料：P. G. Ruggiers, ed., *The Canterbury Tales, Geoffrey Chaucer: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Hengwrt Manuscript, with Variants from the Ellesmere Manuscript*, Norman, Okla., and Folkestone, 1979, 随附评注文章的作者为D. C. Baker, A. I. Doyle和M. B. Parkes。关于该抄本的标准描述，可参见J. M. Manly and E. Rickert*, The Text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Chicago, 1940, I, pp. 266-83, and II, pp. 477-9，以及M. C. Seymour, *A Catalogue of Chaucer Manuscripts*, II, *The Canterbury Tales*, Aldershot, 1997, pp. 31-4。

2004年7月20日的《卫报》可以通过网络查阅。林尼·穆内最早就乔叟的抄写员的身份问题提出的学术论证可参见“Chaucer's Scribe”, *Speculum*, 81, 2006, pp. 97-138，后来她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大的背景中

展开探讨，见L. R. Mooney and E. Stubbs, *Scribes and the City, London Guildhall Clerk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1375-1425*, York, 2013, esp. chapter 4,“Adam Pinkhurst, Scrivener and Clerk of the Guildhall, c. 1378-1410”, pp. 67-85。作为本章主调而采用的陪审团措辞，借用自A. S. G. Edwards对一本书的书评，见*The Library*, 7 ser., 15, 2014, pp. 79-81。本书第430页谈到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埃尔斯米尔抄本，如今该抄本的收藏信息是：San Marino, Huntington Library, MS El. 26. C. 9。铁路大亨亨利·亨廷顿（Henry Huntington, 1850~1927）也曾是该抄本的主人，不过，要感谢亨廷顿先生拒绝了诱惑，没有将之改名为“亨廷顿乔叟抄本”。该抄本已经有了彩色影印本，见D. Woodward and M. Stevens, eds., *The New Ellesmere Chaucer Facsimile*, San Marino, Calif., and Tokyo, 1995，1996年，该抄本的黑白影印本也出版了，且更便宜一些；关于该抄本的插图，可参见K. Scott, *Later Gothic Manuscripts*, 前引书, pp. 140-43, no. 42，该书也谈到了亨维特抄本。我第一次见到亨维特抄本是在1966年，当时它被存放在一个玻璃展柜内，旁边就是牛皮纸的《古腾堡〈圣经〉抄本》，但我不曾有机会亲手触摸这份抄本。本书第431页谈到这样一种观点：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出自同一个抄写员之手。这个观点最早是在1935年提出的，引自J. S. P. Tatlock, “The Canterbury Tales in 1400”, *Proceedings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50, 1935, pp. 100-139的第128页。本书第431页征引了多伊勒和帕克斯的一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提出了“Scribe B”（第二抄写员）这个名称，参见A. I. Doyle and M. B. Parkes, “The Production of Copies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and the *Confessio Amanti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pp. 163-210 in M. B. Parkes and A. G. Watson, eds.,*Medieval Scribes, Manuscripts and Libra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N. R. Ker*, London, 1978; 以及A. I. Doyle, “The Copyist of the Ellesmere *Canterbury Tales*”, pp. 49-67 in M. Stevens and D. Woodward, eds., *The Ellesmere Chauc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San Marino, Calif., and Tokyo, 1995, the volume of commentaries accompanying the facsimile。另外两份最初被多伊勒和帕克斯视为“第二抄写员”的作品的抄本为：Hatfield House, library of Lord Salisbury, Cecil Papers, Box S/1 (Troilus) 和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R.3.2 (Gower)。在此顺便提一句，“第二抄写员”不可能是乔叟本人，因为乔叟是在1408年谢世的，而该抄本的制作时间是在1408年之后，也就是乔叟谢世八年之后的事情了。马尔科姆·帕克斯（Malcolm Parkes）不认为“第二抄写员”就是平克赫斯特，这是帕克斯的遗嘱执行人帕梅拉·罗宾逊谈到的一个情况，罗宾逊还将帕克斯在这个问题上最后给出的一些注解的影印件送给我看；据我所知，多伊勒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拒绝公开表态的，但他可能支持林尼·穆内的看法。本书第432页谈到的。约翰·威廉斯爵士可能是“开膛手杰克”的看法十分荒谬，源于T. Williams with H. Price, *Uncle Jack*, London, 2005，我仅仅是为了维持没有偏私的法庭氛围才提出这个观点的。十分感谢玛莱杜德审阅了本章的初稿，并相当细心地修正了一些威尔士语词，包括他自己的名字在内，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他的名字实在

罕见，而且也很古老。本书第435页谈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亨维特抄本是在阿伯里斯特威斯用格雷格诺格出版社的封皮材料重新装订的；这一条信息实际上也是玛莱杜德提供的。本书第436页，我谈到“第二抄写员”的字迹跟1483年卡克斯顿的第二版《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字迹很相像。有理由认为，这并非巧合。倘若平克赫斯特的确就是布商公会的那个抄写员，则卡克斯顿恰恰就是该公会的会员。实际上，在第二版的引言当中，卡克斯顿谈到这样一个情况：是一个熟人给了他一份抄本（如今已经佚失），“抄本非常干净，并且是依据乔叟原作的第一份抄本抄录的”，卡克斯顿遂将该抄本用于自己的新版；这个熟人很有可能就来自布商公会。本书第436页第一次提到《特洛伊罗斯》抄本，该抄本如今收藏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帕克图书馆，编号MS 61；该抄本已有影印本：edited by M. B. Parkes and E. Salter, *Troilus and Criseyde*, Cambridge, 1978。在抄写员身份问题出现争议之前，关于亨维特抄本本身及其校勘情况，有一篇指导性质的文章很有见地：R. Hanna,“The Hengwrt Manuscript and the Canon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English Manuscript Studies*, 1100-1700, 1, 1989, pp. 64-84。本书第444页谈到，中世纪巴黎的抄写行当，通常是以“*peciae*”（样本）为单元进行分工协作的，关于这个情况，可着重参阅J. Destrez, *La pecia dans les manuscrits universitaires du XIIIe et du XIVe siècle*, Paris, 1935；在抄写工作完成之前，这些单元都是分散着的，在抄写工作完成之后才会被装订起来，关于这个情况，可参阅J. Destrez and M. D. Chenu, “Exemplaria universitaires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Scriptorium*, 7, 1953, pp. 68-80。本书第450页引用的乔叟写给亚当的短诗，如今的收藏信息是：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R.3.20, p. 367。我们能否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这首短诗，甚至乔叟是否真的写过这么一首短诗，都是近些年来热议的问题，关于这场争论，可参见B. Mize, “Adam, and Chaucer's Words unto Him”, *The Chaucer Review*, 35, 2001, pp. 351-77; A. Gillespie, “Reading Chaucer's Words to Adam”, *The Chaucer Review*, 42, 2008, pp. 269-83; J. Sánchez-Marti, “Adam Pinkhurst. 2‘Necglygence and Rape’ Reconsidered”,*English Studies*, 92, 2011, pp. 360-74；以及A. S. G. Edwards, “Chaucer and ‘Adam Scriveyn’”, *Medium Aevum*, 81, 2012, pp. 135-8。雪莱辑录的一部作品当中就收录了乔叟的这首诗，可参阅A. I. Doyle, “More Light on John Shirley”, *Medium Aevum*, 30, 1961, pp. 93-101；康诺利的一部作品也对此问题做了补充，见M. Connolly, *John Shirley: Book Production and the Noble Household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1998。关于乔叟对于“抄写员式”字体的讽刺，见Trolius, book II, line 1026。乔叟佩戴笔套的画像乃出现在埃尔斯米尔抄本第153对开页的左页。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收藏的一幅中世纪晚期乔叟画像更为明显地呈现了乔叟的此一特质，在这幅画像当中，乔叟正在抚摸自己的笔套，F.W.斯蒂尔将此视为证据，证明乔叟也曾经是抄写员（参见F. W. Steer, *A History of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Scriveners of London*, London, 1973, p. 68 and pl. 1）。本书第452页谈到亨维特抄本当中有多处文字是写在涂抹痕迹上的情况，比如第3对开页右页的“fader at the

table”以及第14对开页右页的“ypolita the queene”，应该说，此举只是抄写员在尽心尽责地修正错误，并没有别的意图。在14世纪，“亚当”这个名字在英格兰流行名字排行榜上居第十二位，排在了“彼得”“拉尔夫”“乔弗里”“菲利普”等名字前面；参见p. 106 of V. Davis, “The Popularity of Late Medieval Personal Names as Reflected in English Ordination Lists, 1350-1540”, pp. 103-114 in D. Postles and J.T.Rosenthal, eds.,Studies on the Personal Name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and Wales, Kalamazoo, 2006 (*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 44)。早期将这首短诗里的“亚当”视为抄本行业一员的观点，可参见B. M. Wagner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 June 1929, p. 474, 和C. P. Christianson, *A Directory of London Stationers and Book Artisans, 1300-1500*, New York, 1990, p. 149。大卫·皮尔森为我此次造访市政厅图书馆提供了不少帮助。关于入会誓词，可参见Steer, *Scriveners*, 前引书, pp. 4-5。平克赫斯特在入会名册上的纪要已经得到了刊印，见Mooney and Stubbs, *Scribes and the City*, 前引书, p. 66, fig. 4.1。关于本书第454页谈到的“英格兰圆体草书体（anglicanascript），可参见M. B. Parkes, *English Cursive Book Hands, 1250-1500*, Oxford, 1969，这种字体通常被写得十分紧密，很难分辨；帕克斯在这本书中也谈到了埃尔斯米尔抄本，见p. xxiii, n. 1。穆内特别挑选出来的十二个字母，见穆内的这篇文章的附录：“Chaucer's Sceibe”, article of 2006, pp. 123-5；我引用的穆内所说的这些边饰配图“简直就是他的签名”这句话，见此文第125页的最后一行。乔叟向国王申请海关职位一事，可参见Kew, *National Archives*, C81/1394/87，但是这份申请书其实不到两行，因此不足以支撑任何论断。关于平克赫斯特和“第二抄写员”是否一个人的问题，有人支持这个看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有关正方的论辩，可参阅A. J. Fletcher, “The Criteria for Scribal Attribution: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244, Some Early Copies of 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and the Canon of Adam Pynkhurst Manuscripts”,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58, 2007, pp. 597-632；反方的回应则参见S. Horobin, “The Criteria for Scribal Attribution: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244 Reconsidered”,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60, 2009, pp.371StudiesAttribution “ ‘Chaucer009, pp.3‘ Adam and the Hengwrt Project”, pp. 11 the H M. Connolly and L. R. Mooney, eds., *Design and Distribution of Late Medieval Manuscripts in England*, York, 2008; S. Horobin, “Adam Pinkhurst and the Copying of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35287oftheBTextof*Piers Plowman*”,*Yearbook of Langland Studies*,23, 2009,pp.61-83;S.Horobin, “Adam Pinkhurst, Geoffrey Chaucer, and the Hengwrt Manuscript of the *Canterbury Tales*”,*The Chaucer Review*, 44, 2010, pp. 351-67; A.J.Fletcher, “What Did Adam Pynkhurst (Not) Write? A Reply to Dr Horobin”,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61, 2010, pp. 690-710; L. R. Mooney, “Vernacular Literary Manuscripts and Their Scribes”, pp. 192-211 in A. Gillespie and D.L. Wakelin, eds., *The Production of Books in England*, 1350-1500, Cambridge, 2011, pp. 192-211，以及R. F.

Gre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criveners’ Company Common Paper and Its so-called Oaths”, pp. 1-20 in S.Horobin and L. R. Mooney, eds., *Middle English Texts in Transition: A Festschrift dedicated to Toshiyuki Takamiya on His 70th Birthday*, Woodbridge, 2014。本书第457页谈到的三份抄本，如今被归为平克赫斯特的抄写作品，这三份抄本的收藏信息分别是：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B.15.17 (Piers Plowman)；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3B (Chaucer's Boece)；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S Kk.1.3 (*Canterbury Tales*)的残章。目前寻找平克赫斯特的学者尚未涉入的领域是与这位抄写员同时期的一些拉丁语抄本，若是认真找寻，想必也能见到他的笔迹，毕竟，一个职业抄写员是完全有可能抄写两种语言的文本的（比如在入会誓词中平克赫斯特用的就是拉丁语）；从这个角度倒也可以说，尽管乔叟的很多作品出自这个抄写员之手，但这些抄本很可能并非平克赫斯特的全部作品。本书第459页谈到，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的藏书，跟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的藏书比起来并不多，参阅S. H. Cavanaugh, “Royal Books, King John to Richard II”, *The Library*, 6 ser., 10, 1988, pp. 304-16, 和J. Stratford,“The Early Royal Collections and the Royal Library to 1461”, pp. 255-66 in L. Hellinga and J. B. Trapp,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II, 1400-1557, Cambridge, 1999。本书第460页谈到此一时期的巴黎拥有七十七个书商，这个信息来自Rouse and Rouse, *Manuscripts and Their Makers*，本书第九章的注释中已征引过此书；英格兰方面的数据则来自Christianson, *London Stationers and Book Artisans*, 前引书。本书第461页谈到，卡克斯顿选择了威斯敏斯特而非伦敦作为自己的印刷机构的经营地，且有证据证明卡克斯顿推出的乔叟作品抄本是英格兰最早的印刷书——具体创制时间为1476年年底或者1477年年初，相关信息参见L. Hellinga, *Caxton in Focus: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in England*, London, 1982, pp. 67-8 and 80-81；以及G. D. Painter and L. Hellinga,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the XVth Century Now in the British Library*, 11, *England*, ‘t Goy-Houten, 2007, pp. 8 and 104。反对将平克赫斯特认作“第二抄写员”的主要论点，可参见J. Roberts,“On Giving Scribe B a Name, and a Clutch of London Manuscripts from c. 1400”, *Medium Aevum*, 80, 2011, pp. 247-70。当然也有人保持中立，参见L. Warner,“Scribes, Misattributed: Hoccleve and Pinkhurst”,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aucer*, 37, 2015, pp. 55-100，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在此应当对卡里·安·兰德（Kari Ann Rand）和劳伦斯·瓦内尔（Lawrence Warner）表示感谢。文章作者接纳了将“Trinity College B.15.17”抄本视为平克赫斯特作品的看法，但不认为由此就可以论定，该平克赫斯特就是亨维特抄本和埃尔斯米尔抄本里的“第二抄写员”，我认为这个看法相当有说服力。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也曾将本章的初稿呈送林尼·穆内审阅，她读得很快，但也非常细心，并提出了很多相当实用的修改意见，我采用了其中大多数意见，虽然她对我的结论感到遗憾，但是她非常慷慨地给出了“认可出版”（*imprimatur*）的评语。这足以表现出她的品性和心胸，在此，请容许我毫无保留地向她表示感激。

第十一章　维斯孔蒂《半神》抄本

维斯孔蒂《半神》抄本尚没有全本影印本。有一部分书页已经有高分辨率的照片问世，见A. de Laborde, *Les principaux manuscrits à peintures conservés dans l'ancienne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publique de Saint-Pétersbourg*, I, Paris, 1936, pp. 83-4, no. 81; T. Voronova and A. Sterligov, *Western European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f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ie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St Petersburg*, transl. M. Faure, Bournemouth and St Petersburg, 1996, pp. 258-63, plates 334-47; 以及*The Art of XV-XVI Century European Manuscripts*, exhibition catalogu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2005, pp. 260-65, no. 60, text in Russian。关于《半神》抄本的描述，可参见W. Lublinsky, “Le Semideus de Caton Sacco”, pp. 95-118 in O. Dobiaš-Roždestvenskaja, ed., *Srednevekov'e v rukopisjach publicnoi biblioteki*, II, Leningrad, 1927 (*Analecta Medii Aevi*), in Russian with a summary in French; and in O. Bleskina, *Catalogus Codicum Manuscriptorum qui in Bibliotheca Publica Petropolitana asservantur*, St Petersburg, 2011, p. 280, no. 713。实际上，对于这里用到的多份文献我都应当感谢奥尔加·布列斯金娜（Olga Bleskina），是她很友善地为我提供了这些文献的影印本。不过，关于《半神》的最全面描述，当属P.Rosso, *Il Semideus di Catone Sacco*, Milan, 2001(*Quaderni di studi senesi*,95), esp. pp. ccxxxvii-ccxlix。

关于维斯孔蒂图书馆及其藏书名录，我主要参考的是经典之作E. Pellegrin, *La Bibliothèque des Visconti et des Sforza, ducs de Milan, au XVe siècle*, Paris, 1955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Histoire des Textes*, V), 并以M. G. Ottolenghi, “La biblioteca dei Visconti e degli Sforza: gli inventari del 1488 e del 1490”, *Studi Petrarcheschi*, n.s., 8, 1991, pp. 1-238为辅助，对《半神》的描述出现在pp. 19-21以及pl.V。本书第468页提到了蝰蛇吞噬孩童的纹章，它如今在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制造公司的标识中存留下来了。1488年对该抄本的描述为“Item Semideus Catonis Saci papiensis cum cantonis sex argenteis et claviculis duabus incompletis in carta cum coperta veluto cremesili et cum capsa una ex coreo deaurato” (Ottolenghi, p. 32)。关于对伦巴第地区的征服，具体情况及其背景，可参见F. J. Baumgartner, *Louis XII*, Stroud, 1994, 以及M. Mallett and C. Shaw, *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rlow, 2012。关于维斯孔蒂·斯福尔扎搬迁到法国一事，可参阅L. Delisle, *Le Cabinet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I, Paris, 1868 (*Histoire générale de Paris*), pp. 125-40；该书的p. 133, n. 3着重谈到了《半神》。在此，我实在忍不住要告诉大家，出版社向我预支的稿酬差不多都被我用于购买一份但丁抄本的残章了，该抄本也是在1438年为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所斩获，并且在法国占领期间从帕维亚来到法国的，如今，该抄本的大部分内容的收藏信息是：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ital. 2017；时至今日，那场征服行动造成的抄本散落现

象仍然存在。关于多布罗夫斯基在巴黎获得的藏书，可参见P. Z. Thompson, “Biography of a Library: The Western European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Peter P. Dubrovskii in Leningrad”,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 1984, pp. 477-503；本书第471页谈到了多布罗夫斯基在抄本里面的题字，可见p. 13 of *The Art of XV-XVI Century European Manuscripts*，前引书。多布罗夫斯基斩获的那份带有美第奇家族纹章的利维抄本为：Cod. Cl. Lat. F.v.2 in St Petersburg (Voronova and Sterligov, pp. 264-5)；此处谈到的另外一批珍本分别是：Lat.Q.v.I.18 (Bede), Lat.Q.v.I.26 (purple Gospel Book), Lat.Q.v.V.1 (Bestiary), Fr.F.v.I.I/1-2 (*Bible Historiale*)，Fr.F.v.XV.6 (Martin le Franc)。此前我仅造访过圣彼得堡一次，关于那次旅程请参见C. de Hamel, “The Colloqu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bliophiles in Saint Petersburg, 12th in Leningradex core”,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1995, pp. 11-15。圣彼得堡图书馆的中世纪抄本收藏状况以及前文中提到的收藏名录，可参见T. P. Voronova, “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SaltykovShchedrin Library”, *The Book Collector*, 5, 1956, pp. 12-18（《半神》在第14页），以及O. Kristeller, *Iter Italicum, Accedunt Alia Itinera: A Finding List of Uncatalogued or Incompletely Catalogued Humanistic Manuscripts in Italian and Other Libraries*, V, London and Leiden, 1990, pp.177-96（《半神》在第191页）。本书第477页谈到了莫莱昂领主、博格纳的路易，关于此人，我无法提供准确的参考文献；此人的身份和来历完全无从确认，只是在网络上偶有闪现。本书第477～478页将抄本中第2对开页左页至第3对开页右页的页边诗刊印了出来，我承认，其中的第一首法语诗我看不太明白。这首诗的字迹太过潦草，而我翻译得也有些仓促，它的大意为：“Chanter! I want to sing in all places,/However I want to, that the gods/Royal kings, princes and great monarchs/In all the world and its gardens,/So different I need not say how,/To death will come too soon to see,/On their own terms, as will I:/Power from ships and castles/How I see it all/Emerging in this lovely book/Regardless of the gods above”（歌颂！我想去各处歌颂，/快乐地歌颂那些神明/高贵的国王、王子和伟大的君主/在世界各地和他们的花园里，/我不必再说多么不一样的话，/死亡正在迅速接近，/他们也和我一样：/船上来的和城堡里的权威/我看见/它们从这绝妙的书中浮现/不顾那高高在上的神明）[大家应该一下子就能注意到，这里各行的首字母可以拼成“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即作者名字，译者注）这个词]。这些诗跟引言的标题共享了第2对开页右页，同时也跟献词的开篇部分共享了第2对开页左页，献词的开篇为：“Virginis laude esse omnem tuum …”（赞美你……）。在Kristeller, *Iter Italicum*, V, p. 191中第一个词被错印成了“Legis”，而罗索将第二个词错印成了“Laudem”。本书第479页谈到了克劳狄安创作的诗歌，该诗也出现在抄本的尾页（开篇是“Iupiter in parvo cum cerneret ethera vitro …”, Claudian, *Carmina minora*, LI, lines 1-6）。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收藏的著名的苏埃托尼乌斯抄本在本书第482页上曾有提及，该抄本也循着同样的路线，跟随路易十二来到巴黎，如今

的收藏信息是：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ital. 131。该抄本的画师是非常多产的，也因为该抄本而得名“帝王传画师”（Master of the Vitae Imperatorum）；参阅A. Melograni,“Appunti di miniature lombarda: ricerche sul ‘Maestro delle Vitae Imperatorum’”, Storia dell’Arte, 70, 1990, pp. 273-314，以及the entry by F. Lollini in M. Bollati, ed.,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i miniatori italiani, Secoli IX-XVI*, Milan, 2004, pp. 587-9。本书第483页谈到了《维斯孔蒂时祷书》，该抄本被分成两卷，如今的收藏信息分别是：Biblioteca nazionale in Florence，即I, Banco rari cod. 397和II, cod. Landau-Finaly 22；为方便起见，我用的是M. Meiss and E. W. Kirsch, *The Visconti Hours*, London, 1972，不过，该抄本已经有了影印本，即*Il libro d'ore Visconti,* Modena, 2003，上面附有A. Di Domenico和M. Bollati撰写的评注。《萨伏伊的玛丽日课经》如今的收藏信息是：Chambéry,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4 (C. Heid-Guillaume and A. Ritz, *Manuscrits médiévaux de Chambéry, Textes et enluminures*, Paris and Turnhout, 1998, pp. 30-43, with plates)。本书第484页谈到的“圣母颂”（*De laudibus virginis*）在第9对开页右页开篇，在第36对开页左页收尾；本书的引文“请耐心听我说……”出自第18对开页右页；“已经有一千四百三十八年了”则出现在第13对开页左页。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文集编号为“Arundel MS 138”，《圣母颂》的文本在第220对开页右页至第225对开页左页。此处提到的插图来自《半神》的第三部分，分别是：39r（骑士望向圣母和圣子），40r（加图的喷泉）， 42r（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 45v（山口的军队），59r（向城市进攻），64r（穿越河流），66r（夜间军营），69r（阵地战），74v（休息日），79v（山谷中的战斗），84r（马匹），89r（进攻荒漠中的堡垒）， 91v~92r（搬运和组装围城武器）， 96r（夜间的战斗）， 99r（轰炸船只）， 100r（海战）， 103v（火烧河上要塞）和106v（建造浮桥）。本书第488页和第491页将《维斯孔蒂时祷书》跟《半神》进行了对比，其中提到的插图包括《维斯孔蒂日课经》抄本第一卷第40对开页右页的“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画像”和第二卷第101对开页左页的“法老的军队”插图。本书第500页刊印了萨科的墓碑碑文，在此要感谢塞西莉亚·麦凯，她一直在为本书搜寻相关的插图，而且也是她提醒我注意这样一份文献的：A. Cavagna Sanguiliani, “Arte retrospettiva: Antichi ricordi marmorei di professori dallt the gods/R”, pp. 379-92 in *Emporium, Parole e Figure*, 22, 1905, esp. pp. 381-82。本书第500页提到，萨科的《半神》抄本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如今的收藏信息是：Fulda, Hessische Landesbibliothek, MS C. 10, folios 168r-185v。单独含有第一卷文本的抄本收藏信息为：Basle, Öffentliche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S F. IV. 2, folios 160r-183r。本书第501页曾对安娜·梅洛葛拉尼女士表示了感谢，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再感谢一次。她知道我很可能会引用她的作品——而我也满怀感激地这么做了，不过在此我需要强调一下，梅洛葛拉尼女士尚未亲眼见过藏于圣彼得堡的原本，她依托的是已经公布于世的扫描版，但那份扫描版制作得并不精细。我们这一行的人在没有见过原本便给出临时的评断时，都是极度缺乏信心的。倘若我由此得出的结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责任全在

我，跟梅洛葛拉尼女士无关。除了安娜·梅洛葛拉尼女士外，我还要对凯伊·苏顿（Kay Sutton）表示感谢，她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此一时期的伦巴第画师的信息。如今藏于哥本哈根的抄本的具体收藏信息是：Kongelige Bibliotek, MS Gl. Kgl. S 2092 4°。该抄本的部分插图已经被刊印在以下这部作品当中：G. Algeri, “Un Boccaccio pavese del 1401 e qualche nota per Michelino da Besozzo”, *Arte Lombarda*, n.s., 116, 1996, pp.42-50。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哥本哈根抄本的诞生时间是1401年2月，不过，依据中世纪历法（每年在3月结束），这份抄本的诞生时间就应该算在1402年。本书第503页谈到的画师，均可参见Bollati,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i miniatori italiani*，前引书，该书还配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贝索佐的米开利诺（Michelino da Besozzo）的画作包括木板画《圣母的婚礼》（*Marriage of the Virgin*），该作如今的收藏信息是：Metropolitan Museum in New York, Maitland F. Griggs Bequest, acc. 43.98.7。本书第503页谈到的柯勒乔的加拉西奥的《盎格鲁史略》，如今的收藏信息是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6041 D, folio 8 ter；参见M. Natale and S. Romano, eds., *Arte lombarda dai Visconti agli Sforza*, Milan, 2015, p. 230, no. III.19 and plate on p. 203，在此，非常感谢弗朗西斯科·拉达利（Francesco Radaeli）将这本书赠送给我。本书第504页谈到，雅各布·德·圣彼得罗很可能参与了《半神》抄本的制作工作，最早提及此事的是玛利亚·格拉齐亚·奥托伦吉（Maria Grazia Ottolenghi, “Biblioteca dei Visconti”, 1991），保罗·罗索在自己编纂的《半神》文本中认定了这个情况。1458年，雅各布辑录出版了萨科的《民法评注集》（*Lectura*）抄本，并为之绘制了彩饰，如今这份抄本的收藏信息是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4589；其中，雅各布的题词出现在第366对开页右页[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亚历山大·图尔（Alexandre Tur）还拿出了相关的图片供我现场查看]。雅各布负责装订的11世纪的波埃修斯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是：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6400 A，该抄本第107对开页的左页上有雅各布留下的题词，“Jacobus de Sancto Petro bidelus ligavit”（雅各布·德·圣彼得罗负责装订此书）。本书第506页谈到印刷术很可能是在1462～1463年传播到意大利的，关于这个情况，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自Christie's, 23 November 1998, lot 18，它描述了如今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沙伊德图书馆（Scheide Library）的一份藏品。关于作为印刷商的雅各布·德·圣彼得罗的情况，可参阅R. Proctor, *An Index to the Early Printed Books in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MD*, London, 1898, pp. 482-3，以及A. Coates, K. Jensen, C. Dondi, B. Wagner and H. Dixon, *A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ow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II, Oxford, 2005, p. 796, no. C-216。

第十二章　斯皮诺拉时祷书

倘若要制作精美影印本，《斯皮诺拉时祷书》跟《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一样，也是上上之选；关于《斯皮诺拉时祷书》，至今还没有专

著问世。盖蒂博物馆的网站上可以查阅该时祷书的图片，制作得相当精美（在“Getty guide”中的“Art object, details”栏目里）。迄今，关于《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最详细名录纪要仍然是J. M. Plotzek, *Die Handschriften der Sammlung Ludwig*, II, Cologne, 1982, pp. 256-85。在科伦和麦肯德里克的一部作品中，《斯皮诺拉时祷书》以“no 124”的编号出场，见T. Kren and S. McKendrick, *Illuminating the Renaissance: The Triumph of Flemish Manuscript Painting in Europe, Los Angeles*, 2003, pp. 414-17；该书第529页列出了许多有关《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参考文献。

我曾在近几年间多次造访盖蒂博物馆，汤姆·科伦（Thom Kren）对我的招待甚是周到，令我的每次拜访都成为一种享受。伊丽莎白（贝丝）·莫里森（Beth Morrison）继任科伦成为盖蒂博物馆抄本部的负责人，她欣然审读了本章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颇有帮助的意见。克劳斯公布的藏书名录当中，从来不曾出现《斯皮诺拉时祷书》的名字，不过，他的公司肯定经手了这份时祷书，见他本人的作品 *In Retrospect: A Catalogue of 100 Outstanding Manuscripts Sold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by H. P. Kraus*, New York, 1978, pp. 224-7, no. 91。这是证明路德维希博士的大收藏家身份的最早证据。斯皮诺拉家族纹章最早是由赫尔塔·鲍尔（Hertha Bauer）甄别出来的，鲍尔是H.P.克劳斯公司的文献管理员，这个情况还是克劳斯公司的前任董事罗兰德·福尔特（Roland Folter）告诉我的。罗兰德·福尔特的妻子玛丽·安·福尔特（Mary-Ann Folter）是克劳斯先生的女儿，她非常细心地审读了本章的初稿，并将当年路德维希博士的售价告诉了我。她还补充说，路德维希博士有个习惯，那就是不期而至，他会突然造访他们以查看多份抄本，然后对这些抄本开出一个总价，因此，单份抄本的标价实际上都是名义上的，只是为了方便做账。本书第526页谈到了时祷书中的私人祷文，关于这个情况，可参阅E. Duffy, *Marking the Hours: English People & Their Prayers, 1240-1570*,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6。关于时祷书在帮助抄本主人想象自己参与圣母的祈祷方面的推动作用，可参阅C. de Hamel, “Books of Hours: Imaging the Word”, pp. 137-43 in J. Sharpe and K. Van Kampen, eds.,*The Bible as Book: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London, 1998。本书第531页提及的“七忏悔诗”，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时已经被具体列举出来了，这七首忏悔诗在拉丁通行本中的编码以及各自对应的罪分别是：《诗篇》6（傲慢）， 31（贪婪），37（愤怒）， 50（色欲）， 101（暴食）， 129（嫉妒）以及142（怠惰）。本书第535页征引的皇家学会的展览名录，可参见*Illuminating the Renaissance*, 前引书, p. 414。本书第537页征引的德莱西（L. M. J. Delaissé）关于小山丘和大山之巅的比喻，出现在德莱西就梅斯的一部作品的第一卷所写的评论当中，参见p. 209, *French Painting in the Time of Jean de Berry*（第九章的注释中已经提到了这部作品），也可见*The Art Bulletin*, 52, 1970, pp. 206-12，是桑德拉·辛德曼（Sandra Hindman）向我推荐的这份参考文献。本书第539页谈到了在本来是二维的书页上创造出三维的错觉的做法，关于这个情况，最早是由奥托·帕西提出的，见Otto Pächt, *The Master of Mary of Burgundy*, London,

1948, 以及*Buchmalerei des Mittelalters, Eine Einführung*, Munich, 1984, pp. 198-202，也可参见帕西的得意门生乔纳森·亚历山大（Jonathan Alexander）关于这个问题写的一系列作品，例如Jonathan Alexander, *The Book of Hours of Engelbert of Nassau*, New York, 1970，此书未标注页码。根特-布鲁日风格的抄本绘图，往往会给人多重错觉，关于这个情况，可参见J. H. Marrow, *Pictorial Invention in Netherlandish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Play of Illusion and Meaning*, Louvain, 2005 (*Corpus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Low Countries series*, II)，该书有很多地方谈到了《斯皮诺拉时祷书》。本书第539页谈到了《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插图里的文本框被赋予了立体感，在此我列举一些例子：folios 8v～9r（卷轴落在书页上），folios 10v～11r（文本被钉在书页上），folios 40r和165v（天使手拿文本），folios 56v～57r（文本如百叶窗般被铰接在书页上）。关于根特-布鲁日风格的页边绘图，可参见C. Fisher, *Flowers in Medieval Manuscripts*, London, 2004，以及A. M. W. As-Vijvers, *Re-Making the Margin: The Master of the David Scenes and Flemish Manuscript Painting around 1500*, transl. D. Webb, Turnhout, 2013，后者同这个问题并无太大的直接关联，这一点从书名上就能看出来。绘图当中花朵的影子之所以向右投射，是因为窗户一般位于画师的左侧，这样就能够为右手作画的画师提供最佳的采光，这个情况从布鲁日画师西蒙·贝宁的两幅自画像当中就能看出来（参见S. Hindman, *The Robert Lehman Collection*, IV, *Illuminations*, New York and Princeton, 1997, pp. 112-19, no. 14）。我一度很想知道，在根特-布鲁日风格的抄本当中，是否能根据插图中的花朵的花期将抄本制作日期精确到月份，然而，图中四季的花朵都杂糅在了一起，这就表明，画师在作画时并非实物取景，无论其画作的风格是何等写实，画师都是依据已经备好的素描作画的。《斯皮诺拉时祷书》的近亲当中不乏著名的时祷书抄本，本书第540～542页列举了一些，具体信息如下：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907 (the First Prayerbook of the Emperor Maximilian, c. 1486): facsimile, W. Hilger, ed., *Das ältere Gebetbuch Kaiser Maximilians* I, Cod. Vind. 1907, Graz, 1973 (*Codices Selecti*, 39); Naples,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Napoli, Ms I.B. 51 (the La Flora Hours, not later than 1498): facsimile,*Horae Beatae Mariae Virginis, La Flora, Napoli, Biblioteca Nazionale Vittorio Emanuel III*, Ms I.B.51, Turin, 2008;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897 (the Hours of James IV, c. 1502-3): facsimile, F. Unterkircher, ed., *Das Gebetbuch Jakobs IV von Schottland*, Graz, 1987 (*Codices Selecti*, 85); Cleveland, Ohio, Museum of Art, Leonard C. Hanna Jr. Fund, 1963.256 (the Hours of Isabella the Catholic，这份时祷书的制作时间不会晚于1504年）: facsimile, *The Hours of Queen Isabella the Catholic,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Ohio, Leonard C. Hanna Jr. Fund 1963-256, Commentary Volume*, Gütersloh and Munich, 2013, with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volume by L. De Kesel, 2013 [在此要特别感谢列维·德·柯塞尔（Lieve De Kesel），她不仅给我了一本她的著作——其中多次谈到《斯皮诺拉时祷书》，更悉心审读了本章的初稿并

提出了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特别是在各个画师负责抄本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上]; Perth, Australia, Kerry Stokes Collection, LIB.2014.017, formerly Vienna, Cod. Ser. Nov. 2844 (the Rothschild Prayerbook, c. 1515): facsimile, E. Trenkler, ed., *Rothschild-Gebetbuch, Cod. Vind. S.N. 2844*, Graz, 1979 (*Codices Selecti*, 67); F. Unterkircher, *Das Rothschild-Gebetbuch: Die schönsten Miniaturen eines flämischen Stundenbuches*, Graz, 1984; and private collection, formerly Lord Astor (the Hours of Albrecht of Brandenburg, c. 1522-3)，这份抄本最终于2001年6月19日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拍卖号是“lot 36”，是我为它撰写了名录纪要。《斯皮诺拉时祷书》的第二类近亲当属皇家时祷书，具体抄本信息如下：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18851 (the Breviary of Isabella of Castile, not later than 1497): facsimile, *The Isabella Breviary,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Add. Ms. 18851*, Barcelona, 2012, with accompanying commentaries by S. McKendrick, E. R. García and N. Morgan; Antwerp, Museum Mayer van der Bergh, inv. no. 946 (Breviary probably for Manuel I of Portugal, c. 1500): cf. B. Dekeyzer, *Layers of Illusion: The Mayer van den Bergh Breviary*, transl. L. Preedy, Ghent and Amsterdam, 2004; New York, Morgan Library, M 52 (the Breviary of Eleanor of Portugal, early sixteenth century)；以及Venice, Biblioteca Marciana, cod. lat. I. 99 (the Grimani Breviary, c. 1515-20); cf. A. Mazzucchi, ed., *Breviario Grimani, Ms Lat. I 99 = 2138,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Venezia*, Rome, 2009。有关本书第542页谈到的规定了客户须跟画师直接交涉的行会章程，参见M. Smeyers, *Naer natueren ghelike: Vlaamse Miniaturen voor Van Eyck (ca. 1350-ca. 1420)*, Louvain, 1993, p. 93[在此特向埃夫里恩·霍瓦尔茨（Evelien Hauwaerts）表示感谢，是他告诉了我这份参考文献]。关于受雇于宫廷人士的画师的特权，可参见p. 191 in L. Campbell, “The Art Market in the Southern Netherla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urlington Magazine*, 118, pp. 188-98。关于已知的荷兰南部地区的时祷书抄本画师，本书第543页有所提及，可参见R. Gay, “Scribe Biographies”, pp. 182-8 in E. Morrison and T. Kren, eds., *Flemish Manuscript Painting in Context: Recent Research*, Los Angeles, 2006。《查理五世时祷书》如今的收藏信息是：New York, Morgan Library, M 491。本书第543页谈到了盖蒂博物馆的午餐，午餐之时，大家又提起了我写过的一句（已经被我抛在脑后的）话，见我的*A History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xford, 1986, pp. 168-9；当时我想讲的是军事占领期间巴黎抄本业的衰落，具体为“Hungry people do not buy books”（挨饿之人不买书）。早前拜访盖蒂博物馆抄本部的时候，我竟然吃惊地发现这句话被放大后打印了出来，并被张贴在抄本部大门的背后。本书第543~544页列举了《斯皮诺拉时祷书》的五个主要画师的分工情况，具体情况如下：(1)“詹姆斯四世时祷书画师”负责folios 1v~65r, 92v~109v, 130v~149r, 184v~185r, 256v~257v以及259v~260v; (2)“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祈祷书画师”负责folios 85v~89v, 165v, 223v~245v, 248v~255v, 264v~270v以及276v~290v; (3)“吕贝克圣经抄本画师”负责folios

83v～84r, 153v, 166r, 247v, 258v, 261v以及272v; (4) “德累斯顿祈祷书画师”负责folios 110r～120r; (5) 1500年前后多份祈祷书的画师负责folios 125v～126r。其中，《德累斯顿祈祷书》的收藏信息是：Dresden, 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 Ms A 311。令人失望的是，湿气已经严重损毁了该抄本。也许将《德累斯顿祈祷书》的画师称为“卡庞特时祷书画师”要更好一些，因为后面这份抄本要精美得多。《卡庞特时祷书》（Carpentin Hours）名气不大，直到最近才开始为人所知，一直是私人收藏品，关于这份抄本，可参阅A. Bovey, *Jean de Carpentin's Book of Hours: The Genius of the Master of the Dresden Prayer Book*, London, 2011；以及B. Brinkmann, *Die flämische Buchmalerei am Ende des Burgunderreichs: Der Meister des Dresdener Gebetbuchs und die Miniaturisten seiner Zeit*, Turnhout, 1997，该书第325～329页着重探讨了《斯皮诺拉时祷书》。“1500年前后多份祈祷书的画师”这个名字的确拗口，本书第544页谈到了这个画师，他绘制的另外两份精美抄本的收藏信息分别是：London, 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4425 (Roman de la Rose)，以及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862 (the Hours of Margaret of Austria)。在本书的多个章节中都有无与伦比的《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抄本的身影。在本书第551页它又出现了。该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是：Chantilly, Musée Condé, ms 65。关于这本时祷书，无论是复制品还是研究文献都是难以计数的，其中就包括一份影印本，R. Cazelles and J. Rathofer, eds., *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Lucerne, 1984，该影印本将抄本封皮都印制下来了。前文曾谈到的《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具体收藏信息是：Christie's, New York, 29 January 2014, lot 157，在K. Sutton and M. M. Manion, *Revealing the Rothschild Prayer Book, c. 1505-1510*, Canberra, 2015和K. Challis in M. M. Manion, ed., *An Illumination: The Rothschild Prayerbook and Other Works from the Kerry Stokes Collection, c. 1280-1685*, Perth, 2015, pp. 14-35, no. 1中都有对它的描述。在此要对凯特·查理斯女士（Kate Challis）、科里·斯托克斯和克里斯丁·斯托克斯（Kerry and Christine Stokes）表示感谢，当然还有馆长埃利卡·佩尔萨克（Erica Persak），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在墨尔本见到《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藏书名录如今已经刊印出来了，参见M. Debae, *La bibliothèque de Marguérite d'Autriche: Essai de reconstitution d'après l'inventaire de 1523-1524*, Louvain and Paris, 1995；很可能对应着《罗斯柴尔德祈祷书》和《斯皮诺拉时祷书》的条目分别为该书p.88, no. 53和p. 494, no.367。关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生平，我参阅的是J. de Iongh, *Margaret of Austria,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transl. M. D. H. Norton, London, 1954。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资助制作了多份抄本，具体情况参见D. Eichberger, “Devotional Objects in Book Format: Diptychs in the Collection of Margaret of Austria and Her Family”, pp. 291-323 in Manion and Muir, eds.,*Art of the Book*, 第九章注释中已引; D. Eichberger,*Leben mit Kunst - Wirken durch Kunst: Sammelwesen und Hofkunst unter Margarete von Österreich, Regentin der Niederlande*, Turnhout, 2002；以及H. W. Wijsman, *Luxury*

Bound: Illustrated Manuscript Productionand Noble and Princely Book Ownership in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400-1550), Turnhout, 2010, esp. pp. 201-7。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确实收藏过《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抄本中著名的年历插图会出现在制作于1515~1520年的《格里马尼日课经》（Grimani Breviary）里；该日课经很可能也是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制作的，后来才转入枢机主教多米尼克·格里马尼（Domenico Grimani, 1461~1523）的手中。本书第557页提到了《埃希特纳赫奥里斯抄本》（Echternach *Codex Aureus*），它也叫作《亨利三世黄金福音书》（Golden Gospels of Henry III），如今的收藏信息是：El Escorial, Biblioteca de San Lorenzo, Cod. Vitr. 17；这是我见过的顶级抄本之一，完全应当在本书中享有自己的一章，只不过，本书已经有两章被贡献给福音书抄本了。柏林的《勃艮第的玛丽时祷书》（Hours of Mary of Burgundy）如今的收藏信息是：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und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Kupferstichkabinett, 78.B.12。这份时祷书的第290对开页的左页有一幅亡灵日课的插图，呈现的是一个贵族女性在骑马狂奔，她身后是一个人人手持长矛的骷髅军团在追赶着她；实际上，勃艮第的玛丽就是在1482年3月27日骑马之时出了意外而亡故的，当时她的女儿才两岁。美男子费利佩后来赠送给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是：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862。我们刚刚谈到过这份抄本。玛格丽特的这两份时祷书抄本的确认工作，我主要依托的是Wijsman, 前引书, pp. 202 and 206。《萨伏伊的博讷日课经》（Hours of Bona of Savoy）最终也是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制作的，如今的收藏信息是： 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34294。关于这份抄本及其影印本，可分别参见M. L. Evans, *The Sforza Hours*, London, 1992，以及*Das Stundenbuch der Sforza*, with commentary volume by M. L. Evans and B. Brinkmann, Lucerne, 1994。本书第559页谈到了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画像（收藏在根特美术博物馆，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 in Ghent），2015年7月，这座博物馆将该画像长期租借给了维亚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勃艮第的玛丽时祷书》抄本如今的收藏信息是：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857。在该抄本当中，公爵夫人端坐窗前俯望教堂的插图非常有名，这幅图在抄本第14对开页的左页。《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究竟在斯皮诺拉家族里是如何传承的，它最终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在热那亚被出售的，在这些问题上，我极为感激伊曼努尔·图莱特（Emmanuelle Toulet），她向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文献，包括她本人计划发表的一篇文章，“Du‘manuscrit de Gênes’ aux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这篇文章将被收入P. Stirnemann and I. VillelaPetit, eds., *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e Jean de Berry*, for publication by Editions Panini in Rome；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可参阅R. Cazelles, *Le duc d'Aumale: Prince aux dix visages*, Paris, 1984, p. 197。本书第九章中，我们也遇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批收藏家。关于阿道夫男爵的情况，可参阅我本人的一部作品，*Rothschilds and Their Collections*, pp. 5-7，关于安瑟尔姆男爵的情况，可参阅这部作品的第

7～12页。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我提出的这三份伟大抄本从16世纪起到1856年都被收藏在一起的看法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证明，倘若本书的读者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或者有更好的解释，我都是非常期待的。本书第561页谈到了1975年我的那趟慕尼黑州立图书馆之行，当时我查阅的书是F. Winkler, *Die flämische Buchmalerei des XV und XVI Jahrhunderts*, Leipzig, 1925；该书的最新版本是G. Dogaer, *Flemish Miniature Painting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Amsterdam, 1987；新版已经将《斯皮诺拉时祷书》收入其中并且提供了插图，见该书第165～166页。题为“Mystery manuscript could top £100,000”（神秘抄本挑战十万英镑天价）的文章，可见*Antiques and Art Weekly*, 26 April 1976, p. 21。H.P.克劳斯先生本人的叙述，可参见克劳斯的自传：Chapter 43, “One Manuscript for $750,000”, pp. 319-23, *A Rare Book Saga*, London, 1979（他在第320页从他本人的角度讲述了那场竞拍）。《斯皮诺拉时祷书》在当年的拍卖名录上的信息是：Sotheby's, 5 July 1976, lot 68, pp. 36-41。

插图列表

Frontispiec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85v, detail

p. 11.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upper cover of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

p. 13. Matthew Parker, detail of an engraving pasted inside the back cover of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582, Statutes of the College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 College*)

p.14.Th eParkerLibrary,Corpu sChristiCollege,Cambridg e(*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 Christi College*)

p.17.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86,folios 129v–130r,photographed by Steven Archer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

p.21.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86,folio 1r(©*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 Christi College*)

p. 23.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 125r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 Christi College*)

p. 25.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end flyleaf, folio *recto* (©*The Master an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26.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 129v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 Christi College*)

pp. 28–9.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s 74v–75r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30.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end flyleaf, folio *verso*, detail (©*The Maste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31. Cambridge, Trinity Hall, MS 1, folio 77r, detail (*courtesy of the Master and Fellows, Trinity Hall*)

pp. 34–5.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s 133v–134r (©*The Master and Fe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36.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 235v, detail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41. The story of the visit of the Queen of Sheba to Solomon,

painted in 1965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and Bridgeman Images*)

p. 43. Gospel book of Theodelinda, upper cover. Museo e Tesoro del Duomo, Monza (*2016,Scala, Florence*)

p. 46. Stockholm, Kungliga Biblioteket, MS A 135, folio 9v (©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p. 48. (*Lef*)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86, folio 125r, detail (©*The Master an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right*) Bayeux, Musée de la Tapisserie (*Alamy*)

p. 52. Pope Benedict XVI venerating the Gospels of Saint Augustine (*Getty Images*)

p.55.Florence,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Ms Amiatino 1,upper cover ofthe binding(*All images ofthis manuscript are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MiBACT;furtherreproduction strictly prohibited*)

p. 58. Jarrow Church (*Alamy*)

p. 59. Dedication stone, Jarrow Church

p. 63. San Salvatore (*Alamy*)

p. 66. The Reading Room, Biblioteca Laurenziana, Florence *bypermission ofthe MiBACT;further reproduction strictly prohibited*)

p. 69.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binding

pp. 70–71.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s 1v–2r

p. 72.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 796v

pp. 76–7.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s 6v–7r

p. 80. London,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Nero D.IV, folio 25v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

p. 83.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 11r

p. 85. (*Lef*) William Greenwell (*by permission of the Chapter of Durham Cathedral*); (*right*) British Library, Add. MS 37777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

pp. 88–9.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s 303v–304r

p. 91. 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45025, folio 2v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

p. 92.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Amiatino 1, folio 15r, detail

p.94.Reliquary box,Museo San Salvatore,Abbazia San Salvatore,Tuscany (*courtesy of Don Giampaolo rev.do Riccardi, parish priest of the abbey of S. Salvatore al Monte Amiata*)

p. 97.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None of the image ofthis manuscriptmaybefurtherreproducedfrom software.Forreproduction,applicatio nmustb made to the Head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Imaging Services, Trinity College Dublin, by post or email at digitalresources@tcd.ie*)

p. 101. The Long Room, Trinity College, Dublin *Alamy*)

p. 105. The wooden cases for the Book of Kells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p. 107.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1r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08.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2v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10.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6v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12.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7v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15.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12r, detail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p. 116–17.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s 28v–29r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19.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34r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20.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83v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22. Irish five-pound banknote, reverse *Getty Images*)

p. 123. Photographed from plate III in Edward Sullivan,*The Book of Kell*, 1914

p. 127.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297v, detail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28.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200v, detail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30.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lio 337r, detail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32. James Ussher, painted by Cornelis Jansen, 1641 (©*Jesus College, Oxford*)

p. 133.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8, former flyleaf, detail (*The Board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

p. 135. Photographed from plate XX in Edward Sullivan,*The Book of Kell*, 1914

p. 137. C. Lindsay Ricketts, copy of folio 8r of the Book of Kells (*courtesy of the Lilly Library,University of Indiana, Bloomington*)

p.139.(*Lef*)JamesJoyce,1934(*Roger-Viollet, Paris / Bridgeman Images*);(*right*)EdwardSullivan,*The Book of Kell*, 1914, plate XI

p. 141.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shownin relative scaleto thatofthe CodexAmiatinus on p.55(*courtesy of the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

p. 143. Bronze figure of Charlemagne, detail. Musée du Louvre, Paris. (*RMN – 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 Jean-Gilles Berizzi*)

p. 144. Vatican,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Vat. Lat. 3225, folio XLI *recto* (©*2016. Photo 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Scala, Florence*)

p. 146.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SV, The Netherland*)

p. 149.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 2r

pp. 152–3.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s 3v–4r

pp. 154–5.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s 6v–7r

pp.156–7.Leiden,Universiteitsbibliotheek,Cod.Voss. Lat, Q79,folio 12vfacing14r(folio 13is missing)

pp.158–9.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s 16v–17r

pp.160–61.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s 20v–21r

pp.162–3.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s 80v–81r

p. 170.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 93v

p. 174.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5927, folio 157r

p.178. Boulogne–sur-Mer,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188 folios 29v–30r(©*Bibliothèquemunicipale, Boulogne-sur-Mer*)

p. 180.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Voss. Lat, Q 79, folio 1r, detail

p. 182. Christina of Sweden as Minerva, painting by Erasmus Quellinus. Musée de la Chartreuse, Douai(*Bridgeman Images*)

p. 185. (*Above*) Grotius,*Syntagma Arateorum*, 1600 (*The Hague, Bibliotheek van het Vredespalei*);(*below*) Cellarius,*Atlas Coelestis*, 1660 (*Wikimedia Commons*)

p. 189.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192 The Sherman Fairchild Reading Room,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2007,The Morga Library & Museum. Photo: Schecter Lee*)

p. 195. 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folio 46200, folio 102r–103v (©*The British Librar Board*)

p. 197. Guglielmo Libri, drawing attributed to Éduouard Dubufe (*courtesy of Arthur Freeman and Janet Ing Freeman*)

p.200.(*Lef*)John PierpontMorgan,Jr.(*Library ofCongress,Washington,D.C.*);(*right*)Belle da Costa Greene (*Getty Images*)

p.201.(*Lef*)HenryYates Thompson,photograp hb ySi rBenjami nStone(*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right*)New York,Th ePierpon tMorga nLibrary,M SM.644,bookplat inside upper cover

p. 203.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1

p. 204.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2

p. 205.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folio 4v, detai

p. 207.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10

p. 211.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133

p. 213.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23

p. 215.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27

pp. 216–17.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s 33v–34

p. 219.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79

p. 221.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151

p. 223.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26

p. 225.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644, folio 293r, detai

p. 227. New York,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S M.429, folio 183r, detai

p. 233.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All images of this manuscripts are reproduced by courtes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p. 234.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287v

p. 237. Sir Thomas Bodley, miniature by Nicholas Hilliard.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p. 240. Duke Humfrey's Library,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Alamy*)

p. 241.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Reading Room, the Weston Building, Bodleian Library,University of Oxford (©*Will Pryce*)

p. 243.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287v, detail

pp. 246–7.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s v*verso* – vi*recto*

pp. 250–51.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s 38v–39r

p. 252. (*Lef*) Bamberg, Staatsbibliothek, cod. Msc. Patr. 5, folio 1v, detail (*photo: Gerald Raab*);(*right*)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36r, detail

p. 253.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188r, detail

p. 258.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7r, detail

p. 259.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227r, detail

p. 261. Salisbury, Cathedral Library, MS 25*(by permission of the Dean and Chapter of Salisbury Cathedral)*

p. 262. Durham Cathedral (*Alamy*)

p. 263. Durham, Cathedral Library, MS A.II.4, folio 1r, detail (*by permission of the Chapter of Durham Cathedral*)

p. 265. Durham, Cathedral Library, MS B.II.13, folio 102r, detail (*by permission of the Chapter of Durham Cathedral*)

p. 268.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104r, detail

p. 269.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 270v, detail

p. 271.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3765, folio B *recto*

pp. 274–5.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717, folios vi*verso* – 1 *recto*

p. 281.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 283.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8r

pp. 284–5.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s 8v–9r

p. 286.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9v

p. 288.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0v

p. 290.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3v

p. 293.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7r

p. 295. View of the atrium, Kongelige Bibliothek, Copenhagen (*Getty Images*)

p. 299.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4r, detail

p. 300.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6v

p. 302.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r, detail

pp. 308–9.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s 5v–6r

p. 313.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s 939, folio 57r

p. 317.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09r

p. 319.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10r

p. 320.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 MS Hunter 229, folio 46r, detail (*Bridgeman Images*)

p. 321.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40r

p. 322.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71v, detail

p. 324.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 173v

pp. 328–9.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hek, MS Thott 143 º, folios 193v–194r

p. 331.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 332. Staircase,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p. 335. Benediktbeuern (*Alamy*)

p. 339.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1r

p. 341.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64r

p. 342.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44v

p. 345.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11r

p. 346.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63v

p. 348.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87v

p. 351.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99r

p. 353. Great seal of Frederick II, illustration from Jean-Louis Alphonse Bréholles,*Historia diplomatica Friderici Secundi*, 1852, volume

II, part I

p. 354.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64v

p. 356.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72v

p. 358.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89v

p. 361.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15r

p. 363.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68r

p. 366.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65v

p. 369.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4660, folio 72r

p. 374. Performance of the *Carmina Burana* in 1941*(akg-images)*

p. 375. Carl Orff, photograph by Otto Moll (*Carl Orff-Stiftung, Archiv Orff-Zentrum, Mun*)

p. 37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 379. Train at Berchtesgaden (*Getty Images*)

p. 380. Edmond de Rothschild (*Getty Images*)

p.381.Bureau Centraldes Restitutions,*Répertoire des biens spoliés durant la Guerre 1939–45*,p.30(*author’s collection*)

p. 385. Galerie Mazarin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J. C. Ballot / BnF / Oppic*)

p. 386.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lyleaf *verso*, detail

p. 389.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6r

p. 39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151v

p. 392.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123v

p. 395.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97r

p. 398.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118v

p. 40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55v

p. 40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53r

p. 406.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9v

p. 40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10484, folio 6v

p. 408.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 54.1.2, folio 155r

p. 409.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39r

p. 412.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150r, detail

p. 414.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fr. 11496, folio 80r, detail (*Gallica*)

p. 415. Chantilly, Musée Condé, ms 65, folio 1v, detail (*Bridgeman Images*)

p. 416.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n.a. lat. 3145, folio 3v

p. 419. Nich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 painting attributed to Ludovicus Finson. Château de Versailles (*Heritage Image Partnership / Alamy*)

p. 421. Sydney Cockerell, photograph by Walter Stonema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p. 425. Hermann Göring and Adolf Hitler, probably in Berlin, 1938 (©*2016. Photo Scala, Florence/ bpk, Bildagentur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

p. 427.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All images of this manuscript are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Llyfrgell Genedlaethol Cymru,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

p. 430. San Marino, Huntington Library and Art Gallery, MS EL 26.C.9, folios 153v–154r (*Bridgeman Images*)

p. 431. Hatfield, Hatfield House, Cecil Papers, Box S.1, detail*by permission of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Hatfield House; photograph courtesy of Linne Moone*)

p. 433.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Alamy*)

p. 437.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 2r

p. 438. Chaucer,*Canterbury Tales*, Caxton, 1483, folios 4v–5r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

p. 439.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 3r

pp. 440–41.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s 57v–58r

p. 443.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 88r

pp. 446–7.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s 128v–129r

p. 448. Aberystwyth,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Peniarth MS 392 D, folio 41r, two details

p. 449.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61, folio 1v, detail (©*The Master and Fellow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p. 451. 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R.3.20, p. 367, detail (*The Master and Fellows of Trinit College, Cambridge*)

p. 455. London, Scriveners' Company, manuscript deposited in the Guildhall Library, MS 5370,p. 56, detail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Scriveners*)

p.457.Cambridge,Trinity College,MS R.3.14,folios 1v–2r,detail(*The Master and Fellows o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p. 459. London, 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4431, folio 178r, detail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Al Rights Reserved / Bridgeman Images*)

p. 467.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 468.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lat. 6041 D, folio 8*ter* (*De Agostini / Bridgeman Images*)

p. 46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79a, recto, detail

p. 470. Piotr Dubrowsk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The State Hermitag Museum. Photo: E. N. Nikolaeva*)

p. 474.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p. 480.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1v

p. 483. Florence,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MS Landau-Finaly 22, folio 78v, detail (*De Agostini / Getty Images*)

p. 485.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9r

p. 487.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37r

p. 489.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42r

p. 490.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45v

p. 493.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66r

p. 494.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74v

pp. 496–7.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s 88v–89r

p. 499. St Petersburg,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Lat.Q.v.XVII.2, folio 99r

p. 500. Monument to Catone Sacco. University of Pavia, cortile di Alessandro Volta (*by courtesy of the University of Pavia*)

p. 505.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Auct. P.3.13, last printed leaf, detail

p. 50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shown in relative scale to that of the Codex Amiatinus on p. 55

p. 511. The Getty Center, Los Angeles (*The J. Paul Getty Trus*)

p. 513. Hans Peter Kraus (*Getty Images*)

p. 515. Los Angeles, J.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IX.18, bookplatesby Hans Erni, endleaf(©*Estate of Hans Erni*)

p. 516.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1v

pp. 518–1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s 2v–3r

p. 520.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3v

p. 523.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4v, detail

pp. 524–5.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s 8v–9r

pp. 528–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s 92v–93r

pp. 532–3.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s 10v–11r

p. 536.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21v

p. 538.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56v

p. 541.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254r

p. 546.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276v

pp. 548–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s 165v–166r

p. 552. (*Lef*) Chantilly, Musée Condé, MS 65, lower cover of the binding (©*RMN-Grand Palais (domaine de Chantilly)/René-Gabriel Ojéda*); (*right*) Perth, Kerry Stokes Collection,LIB.2014.01, upper cover of the binding (©*Christie's / Bridgeman Images*)

p. 554.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125v

p.555.Perth,Kerry Stokes Collection, LIB.2014.01,folios 108v–109r (©*Christie's / Bridgeman Images*)

p. 556.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folio 184v

p. 559. Margaret of Austria, detail from the right wing of a diptych by The Master of 1499 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 Ghent (©*Lukas – Art in Flanders VZW / Bridgeman Images*)

p. 563. Catalogue for the Sotheby's sale of 5th July 1976, Lot 68. (*author's collection*)

p. 565.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Ludwig IX.18, lining inside the cover of the binding

Picture research by Cecilia Mackay

抄本索引

Bamberg, Staatsbibliothek
Cod. Msc. Patr. 5, minor works of Ambrose 252, 588
Basle, Öffentliche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S F. IV. 2, miscellany 500, 605–6
Bayeux,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s 57–8, Gregory on Job 266, 267, 588
Berlin, Deutsche Staatsbibliothek
Cod. Theol. lat. fol. 485, Itala 186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und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Kupferstichkabinett 78.B.12, Hours of Mary
of Burgundy 558, 609
Berne, Burgerbibliothek
MS 88, Aratea 176, 83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Lilly
Library
Copies by C. L. Ricketts from the Book of
Kells 136–7, 581
Boulogne,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188, astronomical texts including the
Aratea 176–9, 584
Brussels, Bibliothèque Royale
mss 9511 and 9026 (516), Breviary of
Philippe le Bon 186
ms II.158 (754), Hennessy Hours 186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2, Bury Bible 8–9, 310, 323, 592, 593

MS 48, Bible 593

MS 61, Chaucer, Troilus 436, 449, 602

MS 69, Gregory on the Gospels 36

MS 101, Reformation papers 587

MS 144, Corpus Glossary 20, 574

MS 197b, Gospel Book 32, 575

MS 270, Missal 27

MS 286, Gospels of Saint Augustine 5, chapter 1 (passim), 56, 61, 78, 100, 104, 109, 148, 167, 244, 568, 573–6

MS 380, Robert of Cricklade 593

Cambridge, Fitzwilliam Museum

MS 159, Primer of Claude de France 591

MS 298, Metz Pontifical 186

MS 330, Psalter leaves 273, 590

Cambridge, Trinity College

MS B.5.24 (170), Jerome on Isaiah 588, 588

MS B.15.17 (353), Langland, Piers Plowman 457, 603

MS O.5.8 (1289), Ralph of Flaix 593

MS R.3.2 (581), Gower, Confessio Amantis, etc. 431, 462, 601

MS R.3.20 (600), verse miscellany 450–51, 602

MS R.16.2 (950), Apocalypse 186

MS R.17.1 (987), Eadwine Psalter 47–8, 576

Cambridge, Trinity Hall

MS 1, Thomas Elmham, Speculum Augustinianum 30–31, 575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S Ff.5.27, flyleaf, fragment from a Psalter 578

MS Kk.1.3, flyleaf, fragment of Chaucer 457, 603

MS Nn.2.41, Codex Bezae 186

Chambéry,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4, Breviary of Marie of Savoy 483, 503, 605

Chantilly, Musée Condé

ms 9, Ingebourg Psalter 292, 311–12, 326, 567, 591

ms 65, Très Riches Heures 2, 102, 186, 375, 551–3, 558–61, 567, 596, 609–10

ms. 71, Hours of Étienne Chevalier 186

Cleveland, Ohio, Museum of Art

Leonard C. Hanna Jr. Fund, 1963.256, Hours

of Isabella the Catholic 540, 550, 608

Mr and Mrs William H. Marlatt Fund, 1964.40, Hours of Charles the Noble 422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ek

MS Gl. Kgl. S 2092 4o, Boccaccio 501–2, 606

MS Thott 143 2o, Psalter chapter 7 (passim), 522, 570, 590–94

Dresden, 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

Ms A.311, Dresden ‘Prayerbook’ 608

Dublin, Royal Irish Academy

MS 536 (23.P.12), Book of Ballymote 186

MS 1238 (D.ii.3), Stowe Missal 186

Dublin, Trinity College

MS 55 (A. 4. 15), Codex Usserianus Primus 124, 127, 580

MS 56 (A.4.6), Codex Usserianus Secundus (Garland of Howth) 124, 127, 580

MS 57 (A.4.5), Book of Durrow 93, 124, 127, 132, 580

MS 58 (A. 1. 6), Book of Kells 2, 5, 40, 68, 81, chapter 3 (passim), 167, 179, 182, 375, 567, 579–81

MS 59 (A. 4. 23), Book of Dimma 124, 127, 580

MS 60 (A. 1. 15), Book of Mulling 124, 580

MS 581, transcripts of charters 131, 581

MS 1282, Annals of Ulster 98–9, 579

MS 4729, watercolours by Mrs D’Olier 135, 581

Dunedin, Public Libraries

Reed Collection, MS 5, Book of Hours 598

Durham, Cathedral Library

MS A.II.4, Bible 263, 266, 589

MS A.II.17, folios 103–111, Gospel Book 578

MS B.II.9, Jerome on the Minor Prophets 270, 590

MS B.II.13, Augustine on the Psalms, ii 264–6, 272, 589, 590

MS B.II.14, Augustine on the Psalms, iii 264, 589, 590

MS B.III.1, Origen on Genesis 266, 589

MS B.III.10, Gregory on Job 266, 589

MS B.IV.6, flyleaf, fragment from Maccabees 56, 577

El Escorial, Real Biblioteca de San Lorenzo

Cod. &.II.5, Beatus 230

Cod. Vitr. 17, Gospels of Henry III 557, 609

Esztergom, Esztergomi Föszékesegyházi

Könyvtár (archiepiscopal library)

Cod. I. 21, Peter Lombard on the Pauline

Epistles 325, 593

Exeter, Cathedral Library

MS 3501, 'Exeter Book' of Old English texts 232–4, 237, 587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cod. Amiat. 1, Codex Amiatinus 4, 5, 7, chapter 2 (passim), 129, 143, 148, 567, 576–9

cod. Fiesole 89, Thomas Aquinas 599

cod. Plut. 1. 56, Rabbula Gospels 44, 575

cod. Plut. 32. 9, Sophocles 186

Florence,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Banco rari, cod. 397, Visconti Hours, part i 488, 605

cod. Landau-Finaly 22, Visconti Hours, part ii 483, 491, 503, 605

Fulda, Hessische Landesbibliothek

MS C.10, anthology 500, 605

Geneva, Bibliotheca Bodmeriana

Cod. 127, Lectionary 590

Geneva, Bibliothèque de Genève

ms lat. 357 (on deposit from the Institut

Florimont), Beatus 584–5

Gerona, Museu de la Catedral

inv. 7 (II), Beatus 230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
MS Hunter 229, Psalter 292, 311, 314, 315–16, 318, 320, 326, 591
Goslar, Rathaus
Gospels 186
Gotha, Forschungsbibliothek (Landesbibliothek)
Cod. Chart. A.558, Talhoffer Fechtbuch 186
Hatfield House, library of Lord Salisbury
Cecil Papers, Box S/1, fragment of Troilus 431, 601
Heidelburg,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Cod. Pal. germ. 848, Manasse Codex 186
Hildesheim, Dombibliothek
s.n. Albani Psalter 567, 591
Hs. 18, Bernward Gospels 186
Istanbul, topkapi Sarayi Müzesi, Kütüphane
(Topkapi palace museum, library)
ms 44, Ptolemy 567
ms 46, Domenicus Crispus 567
Kew, National Archives
C 81/1394/87, petition from Chaucer 456, 602–3
SC 8/20/997, Mercers’ Petition 456
Klosterneuburg, Stiftsbibliothek
Cod. 1089, Aristotle and Boethius 325, 593
Leiden, Universiteitsbibliothek
Cod. Voss. Lat. 94, Rule of Chrodegang 186
Cod. Voss. Lat. Q 79, Aratea chapter 4 (passim), 292, 567, 582–4
Cod. BPL 76A, Psalter of Saint Louis 186, 292, 298, 312, 326, 396, 591, 598
Lérida, Museo Diocesá de La Seu d’Urgell
inv. 501, Beatus 230
London, British Library

Add. MS 11695, Beatus 230

Add. MS 18851, Breviary of Isabella of

Castile 542, 608

Add. MS 37472, miniature from the

Eadwine Psalter 576

Add. MS 37768, Lothair Psalter 169, 583

Add. MS 43725, Codex Sinaiticus 24, 186, 574

Add. MS 34294, Sforza Hours 186, 558, 609

Add. MS 37517, Bosworth Psalter 592

Add. MS 37777, 'Greenwell Leaf' 84–7, 578

Add. MS 45025, 'Willoughby' leaves 85–7, 90–92, 578

Add. MS 49598, Benedictional of Saint

Aethelwold 186

Add. MS 49999, de Brailes Hours 273, 590

Add. MS 65100, Hours of Catherine of

Valois 417, 599

Add. MS 89000, Saint Cuthbert (or Stonyhurst) Gospel 81, 578

Arundel MS 138, miscellany 605

Cotton Nero D.iv, Lindisfarne Gospels 79, 80, 81, 93, 125, 176, 577–8, 580

Cotton MS Otho C.v, Gospel Book 32, 575

Cotton MS Tiberius B.viii, Coronation

Book 186

Harley MS 647, folios 12v–17v, Aratus 144, 166, 175, 179, 583

Harley MS 4425, Roman de la Rose 544, 609

Harley MS 4431, Christine de Pizan 459

Loan MS 81, 'Bankes' leaf 86, 578

Royal MS 1.D.V-VIII, Codex Alexandrinus 186

Royal MS 1.E.VI, Gospel Book 47, 576

Royal MS 2.B.VII, Queen Mary Psalter 186

Royal MS 6.A.VI, Aldhelm on virginity 590

Yates Thompson MS 54 (formerly Add.

MS 46200), notes on Yates Thompson

manuscripts 195–6, 585

London, Guildhall Library

MS 5370, Register of the Scriveners' Company 453–5, 462

London, 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 3, Lambeth Bible 310, 592

MS 474, Hours of Richard III 598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COL/AD/01/009, Letter Book of the

Mercers' Company 456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816–1894, miniature from the Eadwine

Psalter 576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S 66, Psalter 292, 312, 591

MS Ludwig III.1, Apocalypse 513

MS Ludwig IX.18, Spinola Hours 7, 40, 82, 375, chapter 12 (passim), 568, 606–10

Madrid,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od. 1097b, Beatus 225–6, 230, 586

Madrid,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ms Vitr. 14-1, Beatus 586

ms Vitr. 14-2, Beatus 230, 586

Milan, Biblioteca Ambrosiana

Cod. B.21.inf., Syriac Old Testament 186

Münster-in-Westfalen,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s 222, Genesis glossed 325, 593

Munich, Staatsbibliothek

Cgm 34, Nibelungenlied 186

Clm 4453, Gospels of Otto III 335

Clm 4660, Carmina Burana chapter 8 (passim), 594–7

Naples,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Napoli

Ms I.B.51, La Flora Hours 540, 550, 607–8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54.1.1, Belles Heures 422, 596
54.1.2, Hours of Jeanne d'Évreux 394, 405–8, 411, 422, 598–9
New York,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
M 52, Breviary of Eleanor of Portugal 542, 608
M 429, Beatus 226–7, 230, 586
M 491, Hours of Charles V 543, 608
M 521, miniature from the Eadwine Psalter 576
M 641, Sacramentary 591
M 644, Beatus 68, chapter 5 (passim), 567, 584–6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pencer Collection, MS 56, Hours of
Blanche of Burgundy 394, 598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Ashmole 1511, Bestiary 595
MS Auct. D.2.14 (SC 2698), Gospel Book 25, 574
MS Auct. D.4.17 (SC 3075), Apocalypse 184
MS Bodley 137 (SC 1903), minor works of
Ambrose 588
MS Bodley 147 (SC 1918), Pseudo-
Athanasius 588
MS Bodley 301 (SC 2739), Augustine on
John 266, 588, 589
MS Bodley 317 (SC 2708), Florus of Lyons 589
MS Bodley 580 (SC 2675), Leofric Missal 236
MS Bodley 691 (SC 2740),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269, 588, 590
MS Bodley 707 (SC 2608), Gregory on
Ezekiel 588
MS Bodley 717 (SC 2631), Jerome on Isaiah

chapter 6 (passim), 569, 587–90
MS Bodley 739 (SC 2736), Ambrose, De
fide 588
MS Bodley 783 (SC 2610), Gregory, De cura
pastoralis 269–70, 588, 590
MS Bodley 810 (SC 2677), Lanfranc 266, 589
MS Bodley 813 (SC 2681), Augustine, Homilies 588
MS Douce 374 (SC 21949), Miélot, Miracles
de Nostre Dame 186
MS Lat. liturg. f.5 (SC 29744), Gospels of
Saint Margaret 186
MS Tanner 165, Registrum Anglie 588
Oxford, St John's College
MS 49, Peter Lombard, Sentences 313, 592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s 9, Psalter of Blanche of Castile 292, 312, 326, 591
ms 664, Térence des ducs 186
ms 939, miracles of Saint Augustine 313, 592
Paris, Bibliothèque de Sainte-Geneviève
mss 8-10, Manerius Bible 314, 59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fr. 11496, Duc de Berry's inventory 413–14
ms fr. 18437, Procès de Robert d'Artois 599
ms fr. 19093, Villard de Honnecourt 186
ms ital. 131, Suetonius 605
ms ital. 2017, Dante 604
ms lat. 1, Bible of Charles the Bald 24, 186
ms lat. 74, Numbers glossed 325, 593
ms lat. 4589, Sacco, Lectura 504, 606
ms lat. 6041, Galassio da Coreggio 468, 503, 606
ms lat. 6400, Boethius 504–5, 606

ms lat. 1052, Breviary of Charles V 599
ms lat. 8846, Anglo-Catalan Psalter 48, 576
ms lat. 9389, Echternach Gospels 125, 580
ms lat. 9474, Hours of Anne of Brittany 186
ms lat. 10483-4, Belleville Breviary 405–6, 411, 599
ms lat. 11627, Jerome on Isaiah 258, 589
ms lat. 13765, hymnal fragment 270–71, 590
ms lat. 16743, Capucins Bible 593
ms lat. 17246, Peter Lombard on the
Pauline Epistles 592
ms lat. 18014, Petites Heures 596, 599
ms n.a. lat. 3093, Très Belles Heures 378–9, 422, 596
ms n.a. lat. 3145, Hours of Jeanne de
Navarre frontispiece, 4, 200, chapter 9 (passim), 522, 567, 597–600
ms suppl. grec. 1286, Codex Sinopensis 44–5, 576
Paris, Musé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138, Mortuary roll 266, 589
Paris,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ms 2, Boucicaut Hours 566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Kerry Stokes
Collection
LIB.2014.017, Rothschild Prayerbook 540, 551–7, 558–61, 608, 609–10
private collections
Bifolium from Jerome on Isaiah 589
Carpentin Hours 608–9
Clippings from the Domesday Book 583
Fragment of Dante 604
Hours of Albrecht of Brandenburg 542, 550, 608
Reykjavik, Stofnun Árna Magnússonar í
íslenskum fræðum (Árni Magnússon Institute for Icelandic Studies)

Formerly Copenhagen, Kongelige

Bibliotek, MS Gl. Kgl. 2365 4o, Edda saga 186

Rossano, Museo dell'Archivescovada

s.n., The Rossano Gospels 44–5, 567, 575–6

Roue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A 85 (467), Augustine 267, 589

ms A 103 (460), Augustine 206, 589

ms A 366 (539), Anselm 270, 590

ms Y 109 (1408), lives of the saints 270, 590

St Petersburg, Rossiyskaya Natsional'naya

Biblioteka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Cod. Cl. Lat. F.v.2, Livy 472, 604

Cod. Fr.F.v.I.1/1-2, Bible Historiale 472, 604

Cod. Fr.F.v.XV.6, Martin le Franc 472, 604

Cod. Lat.Q.v.I.18, Bede 472, 604

Cod. Lat.Q.v.I.26, Gospel Book 472, 604

Cod. Lat.Q.v.V.1, Bestiary 472, 604

Cod. Lat.Q.v.XVII.2, Sacco, Semideus 82, chapter 11 (passim), 558, 567–8, 604–6

Salisbury, Cathedral Library

MS 25, Jerome on Isaiah 259–61, 588, 589

MS 150, Psalter 592

Salzburg, Stiftsbibliothek Sankt Peter

a.X.22, Jerome on Isaiah 258, 589

San Marino,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MS El. 26.C.9, Ellesmere Chaucer 430–31, 601, 602

Sarajevo, Zemaljski Muzej Bosne i Hercegovine

(National Museum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Haggadah 186

Silos, Biblioteca del Monasterio de Santo

Domingo

frag. 4, Beatus 192, 585

Stockholm, Kungliga Bibliothek
MS A. 135, Codex Aureus 46–7, 99, 576
Stockholm, Riksarchivet
Frag. 194-5, homilies 270, 590
Stonyhurst College, Lancashire
MS 10, Gregory on Ezekiel 593
Trier, Stadtbibliothek
Cod. 24, Codex Egberti 186
Troyes, Médiathèque
ms 900, Peter Lombard, Sentences 313, 592
Turin, Biblioteca Nazionale Universitaria
E.V.49, Savoy Hours (destroyed 1904) 394, 598
Utrecht,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Cod. 32, Utrecht Psalter 150, 179, 184, 583
Cod. 32, folios 94–105, leaves from a Gospel
Book 578
Uppsala, Universitetsbiblioteket
MS D.G. 1, Codex Argenteus 183
Valladolid, Biblioteca de la Universidad
ms 433, Beatus 196, 230, 585
Vaticano, Città del,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Barb. lat. 571, The Barberini (or Wigbold) Gospels 125, 580
cod. Barb. lat. 2154, Calendar of 354 583
cod. Pal. lat. 1564, Agrimensores 144, 175, 582
cod. Pal. lat. 3868, Terence 175, 144, 145, 582
cod. Vat. gr. 1209, Codex Vaticanus 186
cod. Vat. lat. 744, Thomas Aquinas 599
cod. Vat. lat. 3225, Virgil (Virgilius Vaticanus) 143, 144, 175, 184, 582
cod. Vat. lat. 3867, Virgil (Virgilius Romanus) 143, 175, 582
Venic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cod. lat. I.99 (2138), Grimani Breviary 184, 608, 609
cod. lat. I.104 (12640), Hours of Marie of Navarre 394, 598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Cod. 1224, Cutbercht Gospels 125, 580
Cod. 1857, Hours of Mary of Burgundy 609–10
Cod. 1861, Dagulf Psalter 298, 591
Cod. 1862, Hours of Margaret of Austria 544, 558, 609
Cod. 1897, Hours of James IV 540, 543, 550, 608
Cod. 1907, First Prayerbook of Maximilian 540, 607
Cod. Ser. Nov. 2844 (see Perth, Kerry Stokes Collecti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F1906.274, Freer Gospels 186
Windsor, Eton College
MS 134, Robert of Cricklade 593
Winchester, Cathedral Library
MS 17, Winchester Bible 566
Zagreb, Riznica Zagrebačke Katedrale
(Zagreb cathedral treasury)
RK 345, Missal of George of Topusko (Jurja Topuskog) 566

人名索引

Abel, king of Denmark 299, 304
Ableaux, Martin des 553
Abelard, Peter 313, 360, 362, 364
Acton, Richard 132
Adam of Bremen 231
Adam of Saint-Victor 314
Ademar of Chabannes 174
Ælnoth of Canterbury 311
Aethelwolf, king of Wessex 179
Albert, prince consort 133
Albrecht V, duke of Bavaria 334
Alcuin 142–43, 171, 179
Alexander the Great 360
Alexander I, tsar 472
Alexander III, pope 360
Alexander, Jonathan 607
Alexandra, queen of England 134
Alfonso V, king of Aragon, Naples and Sicily 482
Alfred, king of Wessex 179
Ambrose, saint 126–7, 206, 252, 257, 263
Amon, king of Judah 90
Andrew of Saint-Victor 314
Anne of Brittany, queen of France 477
Anselm, saint 270
Antiochus III, king 466
Aquila of Sinope 249
Aratus of Soli 148, 150, 165–6

Archer, Steven 574
Archpoet, the 360
Archisynagogus 350–52
Aretin, Johann Christoph, Freiherr von 372
Aristotle 333, 479, 484, 504
Ashburnham, Bertram, fourth earl 198–9, 201–2, 420, 585
'Astronomer', the, biographer of Louis the
Pious 174–5
Aspringius of Beja, saint 206
Astle, Thomas 25
Auden, Wystan Hugh 498
Augustine, sain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chapter 1 (esp. 12 and 25), 133
Augustine of Hippo, saint 190–91, 206, 257, 263, 266–7, 269, 310
Augustus Caesar, emperor 175
Aulus Gellius 479
Aumale, Henri d'Orléans, duc d' 561
Avienus, Rufius Festus 167
Avril, François 380, 596, 599
Ayala, Martín Pérez de, archbishop 195
Azéma, Anne 594
Backhouse, Janet 86
Bacon, Nicholas 16
Baldwin, king of Jerusalem 303
Barker, Andrew 573
Barker, Joanna 62
Barker, Nicolas 62–4, 86, 93–5, 577
Barlow, Sir Montague 422
Barnsley, Edward 103
Bartoli, Pietro Santi 184
Bauer, Hertha 607

Beatus of Liébana chapter 5 (esp. 191)
Becket, Thomas, archbishop, saint 48, 302, 307, 429
Bede, monk 25, 46, 56–7, 60, 68, 92–3, 172–3, 263, 472
Beeby, Andrew 42
Beit-Arié, Malachi 462
Belbello da Pavia, Giovanni 503
Belline, Anne 418
Benedict XVI, pope 10, 50–53
Bening, Alexander 544, 558
Bening, Simon 544, 584, 607
Belleville, Jeanne de 599
Berard of Carbio, saint 417
Bernard of Clairvaux, saint 320
Bernard Silvestris 364
Bernardino of Siena, saint 484
Berry, Jean, duc de 388, 410, 411, 413–17, 435, 459, 551–3, 596, 599
Besozzo, Michelino da 503, 606
Besret, Bernard, dom 379–80, 423–4
Beza, Theodore 236
Bhutto, Benazir 587
Birger Jarl, regent 301
Bischoff, Bernhard 370, 595
Biscop, Benedict 54, 56, 59, 80
Blanche of Burgundy, queen of France 394
Blanche of Castile, queen of France 292, 312
Bleskina, Olga 475, 604
Boccaccio, Giovanni 142, 460, 501
Bodley, Laurence 237
Bodley, Sir Thomas 13–14, 235–40
Boethius (Anicius Severinus Boethius) 353, 504
Böhm, Frau 424

Bohn, Henry George 420
Boleyn, Anne, queen of England 10
Bomalia, Johannes de 543
Bona of Savoy, duchess of Milan 558
Bond, Sir Edward Augustus 96, 98
Boniface VIII, pope 394
Bonne of Luxembourg 412–13
Boone, William 198
Borges, Jorge Luis 102
Bourgot, illuminator 410
Bouwman, André 145
Brailes, William de 273
Brandenburg, Albrecht of, archbishop 542
Breay, Claire 577, 578
Brembre, Nicholas 456
Brontë, Emily 19
Bruce-Mitford, Rupert 65, 67, 68
Brueghel, Pieter, the Younger 522
Budny, Mildred 31
Burgeneys family 476–7, 605
Burgh, Thomas 102
Byrhferth, monk 231
Calvin, John 236
Cameron, David, prime minister 587
Cannell, Gill 574
Canute, king of England 310
Cappellus, Dietericus Matthias 297
Cappellus, Rudolphus 296–7
Carlisle, seventh earl, viceroy 135
Cassiodorus (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74–5, 78–9, 257

Castiglione, Baldassare 500

Catherine of Valois, queen of England 416–17

Catherine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475

Cato (Marcus Porcius Cato), ‘the Elder’ 479, 486, 488

Catullus (Gaius Valerius Catullus) 365

Cavan, first earl of 132

Caxton, William 436, 438, 461, 562, 601–2, 603

Cazelles, Raymond 551

Cecilia, saint 27

Cellarius, Andreas 181, 185

Ceolfrith, abbot 56–61, 74–5, 80, 93–5, 567

Chad, saint 25, 27

Challis, Kate 609

Charlemagne, Holy Roman emperor 64, 93, 142–4, 171, 173, 191, 258, 298

Charles the Bald, Holy Roman emperor 24, 143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543, 558, 560

Charles IV, king of France 393, 394

Charles V, king of France 382, 388, 410, 411, 412, 413, 415, 599

Charles VI, king of France 414, 459, 483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540, 557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184

Charles I, duke of Savoy 553

Chaucer, Geoffrey 344, chapter 10 (esp. 426–30, 448–53, 461–2 and 464), 501, 569

Cheese, Edward 580

Christian IV, king of Denmark 294

Christina of Sweden, queen 181–3, 567

Churchill, Sir Winston 22

Cicero (Marcus Tullius Cicero) 143, 166, 478, 506

Claudian (Claudius Claudianus) 143, 479

Clement VII, pope 66

Clinton, Bill, president 587
Cockerell, Douglas 18
Cockerell, Sir Sydney 222, 411, 417, 420–21, 586, 567, 568, 600
Columba, saint 96, 99, 124, 126, 131–4, 138
Combs, Gifford 16, 577
Connachtach, abbot 139
Conraux, Aurélien 422
Constantine, pope 61
Copernicus, Nicolaus 171
Coreggio, Galassio da 468, 503
Cotton, Sir Robert 13, 25
Crivelli, Umberto 364
Cutbercht, scribe 125
Cuthbert, saint 81
Dagulf, scribe 298
Daniel, Nia Mai 434
Dante (Durante degli Alighieri) 604
Dawnay, Caroline 8
Davies, Gwendoline and Margaret 435
Davies, Rhys 434
De Kesel, Lieve 608
Dekker, Elly 172
Delaissé, L. M. J. 537
Delisle, Léopold 383, 420, 600
Denoël, Charlotte 384, 422, 600
Dennery, Étienne 423
Descartes, René 182
Deutsch, Hans 424
Devers, Jacob 376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58
Doane, Alger Nicolaus (Nick) 574

D'Olier, Helen Campbell 135–6
Domenicus, scribe 230
Douce, Francis 419
Dousa, Janus 181
Doyle, Ian 431, 457, 460–61, 462, 601
Dring, Edmund 422
Dubrowsky, Piotr 470–72, 476, 478
Duguid, Richard 573
Dunwoodie, Ian 330
Dürer, Albrecht 231, 553, 555
Ealdhburg 27
Ealdred 27
Ecgfrith, king of Northumbria 54, 56, 58–9
Edinburgh, Philip, duke of 16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429
Edward VII, king of England 134
Eisemann, Heinrich 424
Eleanor of Aquitaine, queen of France, queen of England 368
Eleanor, queen of Portugal 542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10, 12, 236
Ellesmere, earls of 430
Elmham, Thomas 30–31, 38
Emeterius of Tábara 225–7, 230
Ende, pintrix 230
Erasmus, Desiderius 238, 557
Erik, duke of Jutland 299, 301
Ernerius, abbot of Saint-Victor 314
Erni, Hans 515, 517
Eskil, archbishop 314–15
Este, Leonello d', duke 482
Ethelbert, king of Kent 12, 30–31, 32, 39

Etherius, bishop 206
Ettinghausen, Maurice 381
Eudoxius of Cnidos 166
Eusebius of Caesarea 109
Eustochium, saint 245, 247, 272, 274
Evetts, Deborah 201
Évreux, Jeanne d’, queen of France 394, 405, 407
Évreux, Philippe d’, king of Navarre 393
Eyck, Jan van 526, 557
Eystein, archbishop of Nidaros 303
Ezra, prophet 68–71, 75, 78, 244
Fabricius, Johann Albert 297
Facundus, scribe 230
Ferdinand I, king of Léon and Castile 230
Ferdinand II, king of Aragon 557
Ferdomnach Ua Clucáin 111
Fisher, Geoffrey, archbishop 49
FitzHerbert, Margery 598
FitzOsbern, Emma 277
FitzOsbern, William 276
Folter, Mary-Ann 517, 607
Folter, Roland 607
François I, king of France 477
Frasinelli, Roberto 195–6
Frederick Barbarossa, king of Germany, emperor 299, 360
Frederick II, Holy Roman emperor 353, 355, 368
Frederik III, king of Denmark 292
Froilán of Léon, saint 227
Frontinus (Sextus Julius Frontinus) 479, 482
Fulgentius of Ruspe, saint 206
Gameson, Richard 42, 242, 262, 266

Ganz, David 583
Gaunt, John of, duke of Lancaster 429
Geert de Groote 526
George IV, king of England 133
George VI, king of England (and Wales) 433
George of Topusko 566
Gerald of Wales (Giraldus Cambrensis) 122–3
Germanicus Caesar 166, 173
Gertrude, queen of Denmark 311
Gimbrère, Lucie, OSB 147–8
Giovannoni, Sergio 68
Giovio, Paolo 67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prime minister 98, 134
Glück, Günther 336
Glunz, Hans Hermann 33, 37
Goebbels, Joseph 373, 376
Göring, Hermann 378, 402, 424, 562
Gonzaga, Francesco, duke 482
Goodall, Jonathan 50
Gower, John 431
Grafton, Anthony 574
Grandison, John, bishop 254
Grant, Ulysses S., president 134
Gratian, canon lawyer 371
Gratianus, F., scribe 543
Greene, Belle da Costa 199–200, 586
Greenwell, William 84–5, 87
Gregory I, saint, pope 12, 25, 27, 30, 32–7, 39, 61, 73, 206, 257–8, 269–70, 569
Gregory VII, pope 13
Gregory XIII, pope 64
Grimani, Domenico, cardinal 609

Grimbald of Saint-Bertin 179
Grimm, Jacob 372
Grotius, Hugo 181, 183, 185
Gruffydd Jones, Aled 434
Gullick, Michael 266, 267, 589, 594
Gumbert, Peter 583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181
Gutenberg, Johann 96, 505
Gutiérrez, Ferreo 227
Gwara, Scott 577
Hadrian I, pope 298
Hagberg-Wright, Sir Charles 422
Hammond, Frank 563
Han, Ulrich 506
Hanna, Ralph 574
Hannibal 466
Harold, king of England 256
Haudiquet, Virginie 176
Hauser, Hans 425
Hauwaerts, Evelien 608
Heath, Sir Edward, prime minister 587
Heinrich, bishop of Seckau 370
Héloïse, later abbess 362
Henry III, Holy Roman emperor 557
Henry V, Holy Roman emperor 27
Henry I, king of England 27, 256
Henry II, king of England 292, 299, 311, 312, 360, 364
Henry III, king of England 53
Henry IV, king of England 51, 459, 599, 603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10, 12, 540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311

Heraclius, emperor 289
Hilarianus, Quintus Julius (Hilarion) 190
Hilka, Alfons 372
Hilliard, Nicholas 236–7
Hindman, Sandra 607
Hippocrates 333
Hitler, Adolf 376, 378
Hobson, Anthony 315, 561
Hoccleve, Thomas 461, 461
Hofmann, Mara 600
Hofmann, Michel 372–3
Homer 333, 484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143
Horenbout, Gerard 544, 555, 558
Horobin, Simon 457
Hort, Fenton John Anthony 62
Hrodgarius 144–5
Humfrey, duke of Gloucester, prince 236, 238
Humphreys, Henry Noel 134
Hunt, Richard William 238
Hugh of Orléans, ‘Primas’ 360
Hugh of Saint-Victor 314, 364
Hugo, Master, illuminator 323
Hugo levita 270–71
Hugo pictor chapter 6 (esp. 235, 243–4 and 268–79), 280, 323, 569
Huntington, Henry Edwards 430
Huw, Maredudd ap 434, 458, 464–5, 601
Ikas, Wolfgang-Valentine 335–6
Ingebourg, queen of France 292, 311–12
Irenaeus, saint 206
Isabeau of Bavaria, queen of France 414–15

Isabella the Catholic, queen of Castile and
Léon 540, 542, 557
Isaiah, prophet 244
Isidore of Seville, saint 206
Izard, Georges 423
Jack the Ripper 432, 601
Jackson, Donald 590
James IV, king of Scotland 540, 543
James the Greater, saint 214
James, Montague Rhodes 199, 202, 222, 229, 420, 340
James, Thomas 236
Janzen, Jenneka 583
Jean II, king of France 412–13
Jean de Beauvais 410
Jean le Noir, illuminator 410
Jeanne de Navarre, queen 181, chapter 9 (esp. 380, 390–99 and 411–13)
Jerome, saint 12, 19, 20, 33, 122, 166, 206, chapter 6 (esp. 234–5, 244–9, 257–8, 263 and 278–9)
Joan of Navarre, queen of England 414–17
John the Divine, saint 191, 208, 212–13, 585
John, cantor 56
Jones, Henry, bishop 132
Jones, Owen 134
Jones, Peter 582
Joyce, James 136–9
Juan, prince of Aragon 557, 558
Judith of Bavaria, empress 173
Judith of Flanders, queen 179
Justinian, emperor 43, 142, 498
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143
Karl, prince bishop of Seckau 370

Kasteel, Bart van 145
K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557
Kauffmann, Martin 240, 241
Kelom, Martin 463
Kempis, Thomas à 526
Kindersley, Lida 16
Knud Lavard, duke, saint 305
Knud VI, king of Denmark 305, 306, 311
Krakenberger, Peter 586
Kraus, Hans Peter 512–13, 517, 537, 553, 562–4, 606–7
Kren, Thomas 543, 606
Kress, Berthold 336
Kwakkel, Erik 583
Labrouste, Henri 383
Langbaine, Gerard 239
Leofric, bishop 232, 237, 257
Leonardo da Vinci 471, 586
Leopold II, Holy Roman emperor 65–6
Lewis, Agnes Smith 45
Lewis, Samuel Savage 45
Leycestre, Adam 452
Leyden, Lucas van 553
Libri, Guglielmo 195–8, 471
Limbourg brothers, illuminators 551
Lloyd George, David, prime minister 52
Loftie, William John 134
Louis the Pious, Holy Roman emperor 142, 143, 173–5
Louis VIII, king of France 292, 299
Louis IX, king of France, saint 298, 302, 388, 394–6, 417
Louis X, king of France 391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382, 469–71, 567

Louis of Toulouse, saint 388, 413
Lowe, Elias Avery 124
Lucan (Marcus Annaeus Lucanus) 143
Ludwig I, king of Bavaria 333–4
Ludwig, Peter and Irene 513, 515, 517, 607
Luke, saint 40, 47, 114, 575
Luther, Martin 12, 64
MacCarthy-Reagh, Justin, count 419
MacDiarmid, Hugh 122
Machiavelli, Niccolò 500
Mackay, Cecilia 573, 605
Mackeprang, Mouritz 322
Mackerras, Sir Charles 240
Madden, Sir Frederic 196, 585
Magius, illuminator 230
Magnus V, king of Norway 299, 303, 306
Magrini, Sabina 68
Mahiet, illuminator 599
Maillol, Aristide 510
Maius of Tábara 224–31, 280
Malet, John Adam 98
Mandelbrote, Scott 574
Manerius of Canterbury, scribe 314
Manier, Charles 478
Manuel I, king of Portugal 542
Margaret of Austria, regent 181, 544, 553–60, 609
Margaret of Burgundy, queen of France 391
Margaret of Provence, queen of France 388
Margherita, Félix de, baron 561
Marleburgh, Thomas 460, 462
Marrow, James 476

Marsden, Richard 87
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143
Mary, the Virgin, saint 112–14, 248–9, 282–7, 479, 484, 523–4, 526–30
Mary, queen of England 10, 235
Mary of Hungary, queen of Hungary and
Bohemia 562
Mary of Burgundy, duchess 557, 558, 609, 500
Matfre Ermengaud 343
Matilda, empress 27
Matthias Corvinus, king of Hungary 567
Matthathias, ancestor of Christ 127–8
Maximilian, Holy Roman emperor 540, 544, 557
Mazarin, Jules, cardinal 384
Matthew, saint 114–19
McCulloch, Robert, SSC 575
McCrum, Michael 49
McGrew, William 537
McInnes, Sally 434
Mears, Roger 17
Mechtilde of Holstein, queen of Denmark 299–301, 304
Medici, Cosimo de', il vecchio 66, 482
Medici,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66, 472
Meehan, Bernard 102–6, 122, 579
Melograni, Anna 501, 606
Memling, Hans 553
Mendelssohn, Felix 373
Meyer, Wilhelm 338
Michel, Francisque 196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66–7
Middleton, Lord (see Willoughby)
Mildred, saint 31–2

Millar, Eric 18
Monnius, scribe 230
Montferrat, Blanche of, duchess 553
Mooney, Linne chapter 10 (esp. 426–8, 455–8, 461 and 463), 603
Morgan, John Pierpont 193
Morgan, John Pierpont Jr 193, 199–200
Morgan, Nigel 595
Morris, William 420
Morrison, Elizabeth 511–12, 543, 606
Mostert, Marco 172
Mostert, Richard 172
Mullen, George 106, 121, 130
Murad II, sultan 468
Mütherich, Florentine 425
Naish, Emily 259
Napoleon Bonaparte, emperor 115
Napoléon III, emperor 383
Navarre, Marie de, queen of Aragon 394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135
Noir, Jean le 599
Norton, Christopher 302–3, 305–6
Nunnius, scribe 230
Nuvoloni, Laura 65
Obecus, scribe 230
Odbert, abbot 176, 179
Odo of Bayeux, bishop 47, 263, 264, 276–7
Odo de Châteauroux 396
Oengus, grandson of Rancán 111
Offa, king of Mercia 86
Oppenheimer, Harry 382
Oran, saint 114

Origen 263, 266
Orff, Carl 330, 334–5, 337, 349, 352, 362, 367, 372–5
Orléans, Charles, duc d’ 470
Orléans, Louis of Valois, duc d’ 470
Osbern, bishop 235, 260, 276
Osmund, bishop 260
Ossín, son of Echtgal 113
Otto III, Holy Roman emperor 335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364, 384
Pächt, Otto 242–3, 607
Pammachius 245
Panayotova, Stella 24
Pannartz, Arnold 506
Parker, Matthew, archbishop 10–17, 48–9, 236, 573–4
Parkes, Malcolm 428, 460–61, 462, 601
Paul, saint 166, 258–9, 404
Paula, saint 245
Pearson, David 602
Pedro II, emperor of Brazil 134
Peiresc, Nicolas-Claude Fabri de 171, 418–22, 600
Persak, Erica 609
Peter, abbot of the Lombards 61–2, 93
Peter of Blois 360, 364–5, 371, 375
Peter Comestor 371
Peter Lombard 313, 364, 371
Petersen, Erik 296, 312, 315
Petrarch (Francesco Petrarca) 483, 504
Philibert II, duke of Savoy 553, 557
Philip of Swabia, duke 360
Philip the Chancellor 360
Philip the Handsome, king of Castile 609, 557, 558

Philippe II, Auguste, king of France 292, 312
Philippe IV, king of France 388
Philippe V, king of France 393
Philippe VI, king of France 302, 393, 396, 411–3
Philippe le Bon, duke of Burgundy 472
Phillipps, Sir Thomas 561
Phyllis 365
Piano, Renzo 193
Picasso, Pablo 224
Pickwoad, Nicholas 86
Pietro da Pavia, illuminator 501
Pinkhurst, Adam chapter 10 (esp. 426–7, 450–58 and 464), 501
Pirckheimer, Thomas 484
Pius II, pope 64
Pizan, Christine de 459
Plantagenet, Geoffrey 292, 312
Plato 479, 484
Pliny (Gaius Plinius Secundus) 171
Plotzek, Joachim 517, 555
Plunkett, George 131
Powell, Roger 103–6, 128–9
Presse, Alexis, dom 379
Proffitt, Stuart 573
Pucelle, Jean, illuminator 405–8, 410, 599
Putin, Vladimir 503
Pythagoras 484
Quintilian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206
Rabanus Maurus 263
Radaeli, Francesco 606
Raffault, Jean, seigneur de Neufville 553
Rainald of Dassel, archbishop 360

Ramsey, Michael, archbishop 49
Rand, Kari Ann 603
Rao, Giovanna 65
Ray, Charles 510
Reeve, Michael 584
Remigius of Lincoln, saint 311
Rheims, Maurice 380, 382, 423–4, 596
Richard I, the ‘Lionheart’, king of England 368
Richard II, king of England 459, 603
Richard III, king of England 598
Riches, Thomas Henry 421, 567, 600
Richey, Michael 297
Robert Benjamin, illuminator 264–8, 272–3, 276–7
Robert of Cricklade 593
Roberts, Jane 463
Robertus, scribe 589
Robinson, Pamela 601
Romanelli, Gian Francesco 384
Rorimer, James 378
Ricketts, Coella Lindsay 136–7
Rossi, Giovanni Battista de 62
Rosso, Paolo 474
Roth, Barbara 584–5
Rothschild, Adelheid 381
Rothschild, Adolphe de, baron 378, 561
Rothschild, Alexandrine de, baroness 381–2, 402, 423–5
Rothschild, Anselm von, baron 551, 561
Rothschild, Edmond de, baron 380–81, 422, 568
Rothschild, Edmond Maurice de, baron 382, 423–4
Rothschild, Maurice de, baron 379, 381
Rousseau, Jean-Jacques 472

Rubens, Peter Paul 560
Runcie, James 576
Sacco, Catone 466, 478–9, 484–7, 498, 500–04
Saint Calais (Carilef), William of, bishop 262–7, 272, 276–7
Saladin (An-Nasir 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 360–61
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143, 206
Sancha of Léon, queen 230
Santo Pietro, Jacopo di 458, 504–6
Savoy, Marie of, duchess 483, 503
Scaliger, Joseph Justus 145
Schmeller, Johann Andreas 372
Schumann, Otto 372
Schwartz, Scott 9, 359
Sciacca, Christine 515
Scipio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486
Scott, Sir Giles Gilbert 239, 241
Scott, Sir Walter 19
Sedulius 40
Seelen, Johann Heinrich von 296
Sendak, Maurice 318
Senior, scribe 230
Serenus, bishop of Marseilles 39
Serra, Gio Battista 561
Servandos, lord 80
Servius (Maurus Valerius Honoratus) 143
Sforza, Francesco, duke 468
Sforza, Galeazzo, duke 558
Sforza, Gian Galeazzo, duke 469
Sforza, Ludovico Maria, ‘il Moro’, duke 469–70
Shailor, Barbara 584
Shakespeare, William 311, 368, 391

Shaw, Henry 134
Sherman, William 574
Shirley, John 450, 462
Sigurd, king of Norway 303
Simon, abbot of St Albans 325
Simon Master, illuminator 318, 323–5, 593
Sinaites, Justin, archimandrite 24
Sinyor, Ben 573
Sixtus V, pope 64
Sophia of Minsk 312
Speer, Albert 376
Spinola family 514, 560–61
Spinola, Ambrogio 560
Spinola di San Luca, Vincenzo 560–61
Sprott, Thomas 30
Statius (Publius Papinius Statius) 143
Stedeman, Adam 452
Steer, Georg 370
Stephen, king of England 312
Stevenson, William Henry 85–6
Stirnemann, Patricia 304–5, 592, 312–14, 318
Stokes, Kerry and Christine 552, 609
Strogonov, Alexander, count 472
Stubbs, Estelle 457
Suetonius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482
Sullivan, Sir Edward 130, 136, 138
Susius (Suys), Jacob 148, 180–81
Sutton, Kay 606
Sweynheym, Konrad 506
Symeon of Durham 264
Tait, Archibald, archbishop 134

Tenner, Helmut 372
Terence (Publius Terentius Afer) 143, 144, 145, 175
Tertullian 126–7
Téwodros, emperor 495
Theodelinda, queen 44–5
Theodore of Tarsus, archbishop 54, 56
Thomas, Marcel 380, 382, 423, 596
Thompson, Sir George 49
Thompson, Henry Yates 199–202, 420–22, 399
Thomson, Rodney 266
Thott, Otto, count 297
Thucydides 333
Tibullus (Albius Tibullus) 143
Ticonius 206
Tischendorf, Constantin 24–5, 62
Todd, James Henthorn 133
Toulet, Emmanuelle 610
Traylen, Charles 563
Trivulzio, Gian Giacomo 470
Trowles, Tony 50
Tudor, Margaret, queen of Scotland 540
Tur, Alexandre 606
Turner, Cuthbert 84, 87
Ua Breslén, priest of Kells 111
Ua Dúnán, cleric 113
Urry, William 49
Ussher, James, archbishop 130–32, 182–3
Valdemar the Great, king of Denmark 299, 304, 305–6, 312, 316
Valdivia, Armando Lopez 323
Vaughan, Sir Robert 432
Vaughan, Robert Powell 432

Vegetius (Publius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479
Velázquez, Diego 560
Vespasiano da Bisticci 504
Victor, abbot 224–5
Victoria, queen of England 133–4
Virgil (Publius Virgilius Maro) 143–4, 175,365
Visconti ancestors 480–81
Visconti, Bianca Maria 468
Visconti, Filippo Maria, duke chapter 11 (esp. 466–8, 478–83, 495 and 502–3), 604
Visconti, Gian Galeazzo, duke 483, 488
Visconti, Valentina, duchess 469
Vitalis of Savigny 266
Vnouček, Jiří 38, 578
Voelkle, William 201, 227, 584–5, 586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475
Voss (Vossius), Isaak 182–3
Walsh, John 508, 510, 517
Walter of Châtillon 360, 375
Wanley, Humfrey 24–5, 30, 33, 574
Welby, Justin, archbishop 49
Werinhar, bishop 176
Weston, Willard Garfield 239
Westwood, John Obadiah 126, 134
White, Henry Julian 62
Wieck, Roger 193
Wier, Richard 418–19
Wilkins, William 16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king of England 255–6, 276
William II, ‘Rufus’, king of England 264
William, scribe 264, 268
William of Champeaux 313

William of Malmesbury, monk 256
Williams, Cressida 576
Williams, Sir John 432, 434, 601
Williams, John 206, 227, 584
Williams, Rowan, archbishop 49, 52–3
Willoughby family, Lords Middleton 85–6
Willoughby, Sir Francis 86
Wilson, Harold, prime minister 587
Winkler, Friedrich 561
Wormald, Francis 18
Wulfric, abbot 27
Wynne, William 432
Yates Thompson, Henry (see Thompson)
Yolande of Flanders 410
Zadock the priest 106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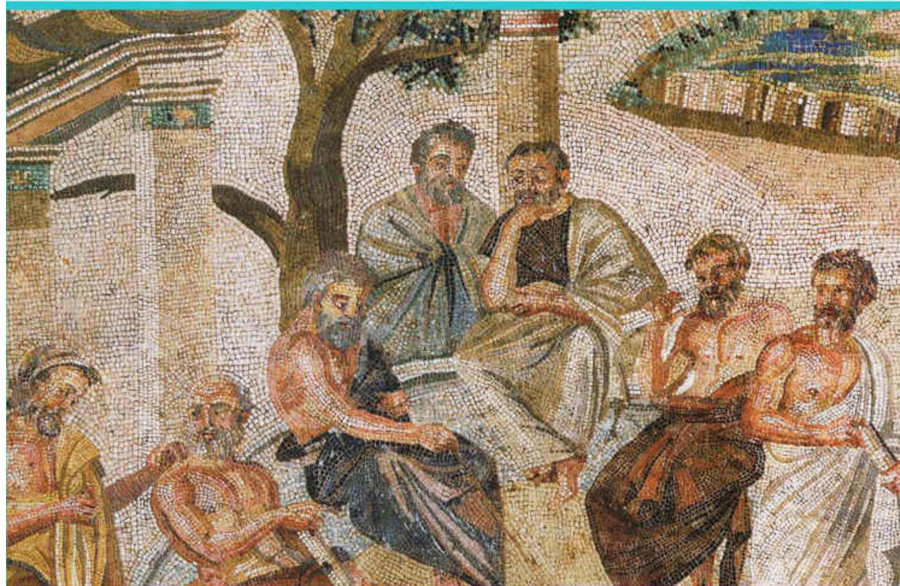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A PELICAN
INTRODUCTION 鹈鹕丛书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Ideas

政 治 的 起 源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美] 梅丽莎·莱恩 著　　刘国栋 译

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2. 第一章 正义
    3. 第二章 政制
    4. 第三章 民主
    5. 第四章 德性
    6. 第五章 公民身份
    7. 第六章 世界主义
    8. 第七章 共和国
    9. 第八章 主权
    10.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政治的起源

企鹅经典：

[美]梅丽莎·莱恩/著

刘国栋/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Ideas

Copyright © Melissa Lane, 2014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企鹅). Pelican (鹈鹕). the Pelican and Penguin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企鹅” 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正文内容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第一章 正义

第二章 政制

第三章 民主

第四章 德性

第五章 公民身份

第六章 世界主义

第七章 共和国

第八章 主权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致谢

术语表

主要人物、事件与地点简介

参考文献与缩写

纪念彼得·利普顿（Peter Lipton）

他在哲学交流上无与伦比的技艺与热忱给人以恒久的启迪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政治是权力的诸多可能性构成的光谱。它定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光谱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剥削与权力支配，它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列宁所说，“谁（有能力统治）谁？”权力支配这一观念的诞生并不是单一与特定的，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支配的观念或现象。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理想政体。它由享有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且其政治实践不存在垄断现象。这种理想政体在许多地方演化出许多种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世界上某一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念可用以界说这种理想政体，这一理想政体形态现在仍然能够引起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共鸣。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创造的词汇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现象以及表达几乎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诉求与实践是希腊与罗马人发明的诸多政治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时刻对自治（self-rule）的各种形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赋予他们异常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演说家和作家们揭穿了自治、正义和平等观念的虚幻与剥削特性；其他人则认为自治在伦理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易实现，或者说在某种区别于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团体中更易实现。也就是说，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哲学同时包含了自治的具体实践及其对立面。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当今那些政治乐观者的宝库，也成为那些政治批评者的有效资源。

本书认为，希腊与罗马世界所包含的相当宽泛的权力可能性光谱是我们思考事情的绝佳资源。因此，本书对历史实践和哲学反思都将展开进一步探寻。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希腊与罗马政治，比如奴隶制、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进行批判，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贤们批判过了。在每一种政体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针对其政体诉求的审慎批评。希腊与罗马人在发明民主与共和观念的同时，探究了“公民”这一政治观念的限度；考察了寡头制、王权制甚至僭主政体的政治诉求；怀疑将正义法则应用于公民关系的主张是否普遍有效。相较于把希腊与罗马的价值定义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特定节点上——例如那些引以为豪的大众自治原则，抑或对其所作的哲学反思——对希腊与罗马生发出的观念进行整体考察最为有益。

为了对批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回应旁观者的困境，为了考量政治的价值及其限度，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古典观念和政治形态，而不是简单考察这些语词的当下内涵呢？从原初意义上来说，它们在希腊与罗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们是很多现代观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词的词源意义），继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演化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实践曾经广泛实施的地方，这些观念被重新发现、修正和质疑。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讨论随处可见，从马赛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在此地把希腊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个墓碑之上），从突尼斯到大数（Tarsus），从拜占庭帝国到它的奥斯曼征服者们，以及在通过征服和殖民使希腊与罗马思想得以传播的地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各个地方，它们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有时会觉得希腊人、罗马人与现代各个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对我们当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或许他们无甚可鉴之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太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有时被赞誉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现今的我们则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不可借鉴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而幸运得多；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处不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混杂在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古典政治的批评之中。他认为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毫无可能性。他的批评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同时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1764年，他警告日内瓦公民（从出生权来说卢梭也是其中一位），你们攀比古代民族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所谓“共和国”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 古代民族再也不适合现代人了；他们在所有方面与现代人都不同……［“你们”指代日内瓦人］你们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伟大的、不适合你们的名字搁在一边吧！你们是商人、工匠、资产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营生、利润牢牢占据；自由对你们来说也是唾手可得，高枕无忧的。[1]

总之卢梭认为，古今对比实际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人没有古代人的闲暇，不能始终参与治理事务”。[2]也就是说，卢梭暗示如果没有奴隶与战争的存在，希腊与罗马的公民就不会获得闲暇，他们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亦不可得，也就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了。但实际上，与卢梭的这种含沙射影不一样的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对政治事务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闲暇，这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奴隶制是一种（残酷而重要的）剥削性的财富占有方式，但仅存在于某些特殊领域，并非古希腊或罗马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手段；与此相反，很多其他人类社会形态也一样存在过奴隶，但它们并未发展出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源和生产能力（尤其通过劳动分工、非动物新能源和新媒体），如果他们（我们）如此选择的话，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宗教和官僚体制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希腊与罗马的繁荣经济建立在农业、采矿业、手工制造业、贸易和战争掠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指数般突飞猛进的经济或科技，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的观念。他们分享着众神崇拜的宗教仪式，而不是信奉某一个不受公众掌控的神。他们不会把国家视为抽象实体，也不会把国家与掌控、构成它的特定人群割裂开来。

毋庸置疑这些区别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腊与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够精细，没有完备的科层等级结构，他们把政治理解为共同体内部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公民与那些

城邦内外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说，除了把政治理解为一般的共同体关切之外，希腊与罗马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独立存在的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对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普遍与恒久的关切。[3]这意味着古典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共同体之诸多政制形式与价值诉求的视角。这在现代社会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拥有如此众多专业化的政治机器。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与罗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社会仅由公民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应有之义）。相反，一些人认为公民纽带和公民事务天然地具有剥夺性，或者认为它没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义。这些对公民理念与理想的批评，同它们挑战的对象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将探寻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异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差异更多还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以及辨明它们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人们思考政治的最佳方式。无论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它们所提出的深刻挑战的意义上，古典观念都被证明是根本而彻底的。比如，当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强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辞这一认识，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辞；我们不断找寻新方法制造出来的社会知识也定会为雅典人所赞赏。被武断的意见充斥的社交网络空间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再度棘手——仅有社会知识就足够了吗？政治如何对待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层出不穷的经济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始终是古典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如今又具备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个体？

为了探索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我选取了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八个主题，它们都根源于希腊和罗马（即便不总是精确对应于古希腊文或拉丁语词汇）。如果不考虑当下，单只为反映希腊与罗马观念的历史意义而作一项更全面的复古考察，那么人们可能会选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题，比如，多神论或者罗马的庇护制（Patronage）。同样地，一个只关注时下政治的当代哲学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权利或者合法性。我选取主题的原则是它们既能体现古典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能表现当下的反思。它们要能使人们了解古希腊和罗马700年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即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我们尤其关注希腊和罗马所谓的“古典时代”，即大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注意公元前诸世纪从耶稣诞生之日起逆序纪年，耶稣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参见图表1）。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时每个主题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点或思想家。

图表1 人物与观念的时间轴

公元前6世纪=前500年	梭伦	
公元前5世纪=前400年	苏格拉底	希腊民主政治全盛时期
公元前5—前4世纪	柏拉图	希腊民主政治全盛时期
公元前4世纪=前300年	亚里士多德	希腊民主政治全盛时期
公元前4—前3世纪	芝诺、伊壁鸠鲁	
公元前2世纪=前100年	波里比阿	罗马共和国全盛时期
公元前1世纪=前99—1年	西塞罗	罗马共和国全盛时期
1世纪=1—99年	塞涅卡、爱比克泰德	
1—2世纪	普鲁塔克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2世纪=100年	马可·奥勒留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时代跨幅如此巨大，即便面对所选取的八个主题，一本简短的著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没有讨论那些对希腊与罗马的重要政治思想进行重构的古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本书主要关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史，以及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至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则只有局部简略地提及。即便面对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的古典时代，本书也有所取舍，以使读者既能更好地理解希腊与罗马自身的政治，又能以之为鉴，对当今世界有所理解。为了使这两项计划关联在一起，按照权力与可能性的关系为线索，我将从希腊社会着手来阐明政

治的五个维度。

政治是什么？五个问题

每一个政治观念都必须回应如何组织权力以达成特定目标的五个问题：谁？哪里？为什么？如何？何时？虽然希腊人缺乏“政治”的特定概念，没有把它与经济、军事等区分开来，但是他们的确意识到，并回答了“关于政治的条件”的问题。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我们视作政治观念的观念，但是他们自己却称其为“政治事务”（*ta politika*）：与某一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共同体——有关的事物或事务。为了充分阐明他们发展出来的众多观念，让我们依次来考察这些观念是如何逐一回应上述五个问题的。

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是谁？答案：公民们（*politai*,即*polites*［公民］的复数），[4]意指那些拥有相同处境与关怀的平等个体，即便他们存在着贫富差别。这种平等具有两面性。极少数幸运儿通过将其余的人（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公共权益之外，来获取自身的公民身份。最严苛的排外是针对被希腊社会征服和奴役的那些民族。即使在僭主的统治之下，公民们也认为每个人是相互平等的，至少在僭主把公民和奴隶进行区别对待的意义上。罗马人的共同关怀则是“共和国”（*res publica*），直译为人民的事物或事务，也是英文单词“共和国”（republic）的来源。与奴隶相对，一个罗马公民是自由的。他的个人事务受到保护，他享有涉及公共事物福祉的重要权力，即公共关怀。古典政体下的女性公民（被动意义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但是她们在重要的政治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当然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她们有时也是重要的政治主体。下面几章将会讨论女性公民的问题。

对“政治事务”的关怀发生在哪里呢？希腊时期，尽管不绝对，但主要是在城邦（*polis*）内部。城邦是特定的领土范围和人类聚居地，它的中心通常是一个被城墙所环绕的核心城市，外围则是占一定面积的农业区。在希腊遥远的古风时代以及我们所谓的希腊古典时代存在过约1000个城邦共同体。城邦的领土规模从不到12平方公里到数千平方公里不等——斯巴达的面积从最外围算起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则相对较小）。城邦的人口数量少则几千人，多则不计其数。公元前5世纪，在政治家伯里克利担任雅典将军的全盛时期，雅典的人口从最外围算起约有25万人，男性公民约有6万人（雅典城邦的领土面积约有2500平方公里）。[5]

在实践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尽管土地对城邦认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城邦居民的认同。城邦之为城邦，最根本是在其人民。当希腊人从嘴里说出“雅典”或“斯巴达”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像我们今天口称“法国”或“巴黎”这般简单；他们通常是在说“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城邦尽管会在紧要关头丧失一些土地，但保全了一同关心“政治事务”的人群就意味着城邦生命的延续（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的某一时期，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在将军和演说家伯里克利的建议下，

雅典人把乡村郊区丢弃给了掠夺者。以后雅典人就只能聚集在有高墙保护的城邦中心城区，但他们在那里继续一起关心“政治事务”）。城邦通常被译为“城市国家”（citystate），因为政治事务主要集中在公共城区的中心。实际上，城邦还可以被译为“公民国家”[6]（citizen-state），因为城邦之为城邦更多的是基于人，而非地方。政治发生于城墙之内，随着本书论述的逐步展开，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观念后来在哲学上遭到了批判；关于伦理和政治共同体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人们提出了更宽泛和更具包容性的想法。

罗马起初同样由一个中心城区和郊区腹地构成，但通过征服或协约的方式，它兼并了其他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很快发展成难以辨认的超大地域。随着战争和冲突的持续爆发，罗马人逐渐地、有时甚至并非自愿地把公民身份赋予扩张领地内的居民。最早，公民身份扩展到现意大利波河以南的几乎所有非奴隶人群；继而在公元212年，罗马领地范围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视为公民。在罗马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公民身份有时被扩展至新涌现的“半公民权”（*sine suffragio*，没有投票权）阶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罗马的公民身份也极具延展和包容性，因为那些通过公认的程序而重获自由的奴隶也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不同于希腊）。[7]尽管如此，这些重获自由或因罗马扩张而被新纳入的公民很少能亲赴罗马去实地出席官员选举和立法的政治会议。因此，公民身份的条件与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条鸿沟仍然同样难以逾越。

希腊公民为什么如此崇尚城邦并一同关心“政治事务”呢？他们追求被尊为平等个体（以及作为个体，他们被区别对待的可能性）的价值，同样他们也追求共同繁荣。城邦是一处可以定义、追寻与分享公共福利的所在。每一城邦共同体都极易受到外敌入侵的伤害，因此它们始终谋求对外的优势，甚至有时它们会对一直压制邻邦。政治共同体能够指挥它的公民（与非公民、雇佣军一起，甚至有时也包括奴隶）与其他希腊或非希腊人作战。它们有时为战利品和朝贡品而发动进攻性的战争；有时则为反抗强权支配——被支配可能就意味着被劫掠、奴役，甚至死亡——而发起保卫城邦人民与资源的自卫战争。

尽管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不顾个人的安危，选择成为商人或旅行者，在外邦从事教育、贸易或政治顾问的行当，但是大多数希腊人极度依赖各自城邦的命运。在罗马，罗马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人身保护，他将免于随意的鞭刑、非法的囚禁等。如果被征召的话，很多罗马公民还有为军队服役的义务。在军队服役就意味着有望去谋求荣誉与好处，但当然也可能会承受战败的危险，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恐怖。

希腊人关于“如何”的回应可能是他们最具创新之处：为共同商决“政治事务”，他们创造了多种决策与问责的政治机制。他们在政治会议与法庭中采取了正规投票的实践形式，甚至有时还使用纸质选票；在每年轮流执政的基础上，通过抽签与选举来任命官员；为保证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一些民主政体，尤其是雅典，则更为先进。它动用人数众多的公众陪审员来裁决几乎所有的法律案件，此举架

空了专业法官的地位，继而剥夺了古老贵族机构的司法权力。这些政治机制兼具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意义。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保卫城邦及其各项制度免遭伤害或腐化，另一方面又能动用公共权力谋求繁荣。

在罗马，选任官员和制定法律都有精心设计的集体投票程序，继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技艺。一些被特别选出的官员在立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向政治会议提出法律议案，试图使之获得通过。雅典的穷人亲自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他们拥有人数优势的法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罗马平民则不得不通过专门的民选官员（保民官）来保护自己。这些政治实践也向人们暗示了希腊与罗马政治在何时发生的问题：因为政治如果是一个关于权力与可能性的领域，它除了具备空间性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要有时效性。换言之，当政治的各项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时，其中的行为与决策就必须要适时而为。政治实践就意味着决策与执行，或授权来执行，即运用多种权力形式使特定的可能性变为事实。希腊和罗马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掌握了政治行为的时间设置：比如，雅典人在陪审团法庭中使用水钟来为发言计时；为了获得上神的护佑，罗马人就重要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向占卜师、牧师进行咨询，因为他们拥有决定何时开展这些活动的权力。[8]在政治体制内部，行为的最佳时机被小心地规定与配置着；在政治体制外部，野心家们可能需要明察秋毫、伺机而动，从而抓住重塑规则的最佳时机，然后以僭主或寡头的身份来掌握权力。不管是在政治体制内部还是外部，不管是在古典时代还是当今社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关于时机选择的艺术。

八个政治主题

八个政治主题构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它们将帮助人们想象政治可能是什么。它们全部按照之前确定的两个维度来呈现：哲学反思的维度和政治实践的维度。两个政治观念回答了权力可能要达到的目标：正义（古典政制历史的特别关注点）和德性（哲学家们对此尤为关注，他们各抒己见，丰富了正义的内涵）。其他六个政治观念：政制、民主、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共和国和主权，回应如何组织并驯服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应该对这些权力关系施加何种程度的控制。

尽管其他社会形态也存在与这八个政治观念相类似的一些观念，但是在希腊或罗马，或它们两者，这八个政治观念拥有极其特殊而鲜明的形式。尽管众多不同的思想家对它们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但是我把每个政治观念集中地对应于特定时期的某一个或几个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为该政治观念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素材。这种方法能够指引那些对希腊和罗马并不熟悉的读者顺利踏上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旅程，同时也能够增强这些政治观念的理论力量。

当然除了我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以外，人们也可以选取其他的政治观念。从某种绝对的立场出发，希腊和罗马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一定会包括下面这三种：平等、自由和法律（实际上这三者贯穿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同样人们有时也会考虑另外的一些政治观念，比如友谊和社会

性。我并不认为我所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是排他的或具有首要地位的，而是说它们是我所发现的最佳叙事方式，既能够阐释清楚古典时代的政治观念，又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第一章首先讨论八个政治观念中的正义，因为它是集体公民身份的根本而又充满争议的基础。设想如果富人能够剥削甚至奴役穷人，如果穷人总是担心会受到富人的教唆并陷入暴力或欺诈状态之中，那么这将是极端的支配状态，此时就不要指望权力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了。为树立正义，就需要构建一种政制（*politeia*）。该单词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constitution”（政制或宪政体制），然而在希腊文中，它的意思是公民身份的条件，包括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敏锐地观察到了相互竞争的各种政制形式的优缺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展开讨论。

第三章主要关注雅典的政治观念和民主的政制形态。在本章中我们将直接比较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在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下承担了比在现代各种治理形式中更为广泛与多样的角色，但是二者都承认责任、制约、评判等核心观念，即便它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过审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品质——一项必定会打破关于它的诸多迷信的工作，人们得以认真反思现代各民主政体多么好地收获了或能够收获它们最看重的诸种观念。它将向人们证明，当最富裕的公民不得借助财富力量去支配贫穷的公民时，或者说前者不得凭此在政治中构筑起持久而坚固的权力基础时，一个政治体系就能够存续下去。尽管雅典的富人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机遇与职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始终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判断，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受制于那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则取决于哪个集团在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有证据表明，古希腊拥有比当今文明的国际社会多得多的政制类型。雅典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前后相继，历经三世，形成了一个哲学家的世代谱系。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希腊的政制类型并不那么丰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政体形式并未包括在内。这些哲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认为当时的各种政体充斥着贪婪与对权力的欲望，在各地引发不断的冲突，并未使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苏格拉底在世代谱系的开端，持续不断地向他的雅典同胞们质问正义、知识与德性的本质；接着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出身高贵却追随其貌不扬的平民苏格拉底，成为日后我们那些关于苏格拉底的卓越著述的来源。第五章将讨论谱系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他来自一个侍奉马其顿（位于古希腊北部）王室的家庭，后来加入了柏拉图在雅典开设的学园，但自己最终创立了与之相抗衡的学园。以更加深刻的正义观念为基础，以谋求更为真实的人类福祉为目标，每一位哲人都构思了别样的政治形式，即便是某种理想中的政制（英语中柏拉图著作《理想国》［*Republic*］的书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在一个优良的政制中，德性与公民身份理想化地合二为一了。

苏格拉底的后世追随者们把理想政制的幻景极端化了。它可能不采取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而是一个恒久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产生了世界

主义的观念（第六章），它意指整个宇宙都被视为公民的领域。我们将会发现该观念可被用来达成极为丰富的伦理与政治目标。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政治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人们一边争论着世界主义的观念，一边讨论着政治与人类整体的自然性。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所作的定义，基于人性的本质，政治是自然的？或者，政治是否可能只是一项权宜之计、一个有用的社会契约，并没有回应人类结成关系的最高潜能？

政治是源于人类的自然社会性，还是源于功利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样，政治体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仅限于个人真实的公民同胞，还是只要拥有共同的德性，不管其人身处何方，都是自己的公民同胞？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在希腊化时期，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各家各派对这些张力进行了反复的推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希腊化时期的一派哲学家——斯多葛主义者们——认为人类具有自然的社会性，因此政治是一项有意义的人类成果，尽管最完美的政治状态是哲人的共和国。与之相对照的是另外一个哲学派别——伊壁鸠鲁主义。该学派把政治与人类更高的理想价值——友谊作对比，认为政治作为一种功利之物，它并非基于人性的本质而是源自于某种契约。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前1世纪的哲学家们确定了政治论辩的基本语词，从而为罗马的政治铺平了道路。当罗马人开始从政治上支配希腊时，他们只需把希腊卓越的哲学成就重新搬出来加以改造或利用，用以管理领土不断扩张的共和国与帝国——对此我们将会一直追踪至公元2世纪。

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对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原因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并亲身经历了它的衰落。通过他的视角，第七章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制状况。“Republic”（共和国）是对拉丁词“*res publica*”（公共事务或公共关切）的直译，它是罗马人所发展出的政制形态的核心内容。波里比阿曾经在罗马充当人质，但作为希腊历史学家，他对罗马的政制状况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罗马政制在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三者之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它们分别代表了希腊人所熟悉的三种最基本的政制形式（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以多种方式分割与平衡（以及一些混合）政治权力的观念最终发展成为“制约与平衡”的共和主义理想，被美国的国父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所借用。争取平等自由权的斗争反复引发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它内在地要求尊重哪怕最普通、最贫穷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权力。然而，对穷人的尊重必然还要考虑精英们的特权。精英之为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或继承或自谋的财富。雅典人通过民主的各种权力来约束他们的精英，但是罗马人允许他们掌握更重要也更独立的一系列政治权力。罗马人利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相重合）制衡普通罗马百姓，而雅典的民主派则允许穷人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控制与评判精英们的主张。

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崛起之际，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用希腊文写作，他目睹了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但也预言共和国不会长久。如果要保卫“共同体”（共和国），那么罗马人必须不断地履行自己的公共义务，全身心地实践自己所理解的德性，然而这些内容终将慢慢地消逝。一个

世纪以后，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目睹了共和国衰落的全过程。全凭自己公共演讲的才能，西塞罗顺利攀上了权力与荣誉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也研究了罗马、雅典各哲学流派的思想，不遗余力地与那些哲学家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辩论。与之前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随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断反思，西塞罗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构想更好的共和国，使之拥有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道路。然而在西塞罗刚开始将之付诸笔墨的时候，现实中共和国的完美品质就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与流血冲突中——他自己也于这一时期被谋杀——慢慢消逝了。这幅图景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的内在核心条件以及个人财产的重要性，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法律与德性在支持共和国政制中的重要地位。

西塞罗死于共和国最后的动乱时期，接着罗马人就任命了一位“第一公民”（*princeps*），并最终在公元前27年擢升其为新的“奥古斯都·恺撒”。在下个世纪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生活的时代，“第一公民”则彻底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罗马皇帝的头衔——尽管“主人”（*dominus*）的头衔仅只在公元284年被正式授予给罗马皇帝。共和国的政治实践在帝国时代发生了重大的畸变（第八章主权），此时人们关于政治的想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与西塞罗一样，塞涅卡也是一位身负要职的政治家和作家，但最终暴死于尼禄之手。塞涅卡并不幻想理想的共和国，反而寄希望于一个理想的君主。他把希腊早先的君主制的观念重新装饰了一番，想象如何在“第一公民”身上培养起仁慈与慷慨的德性。此处我们可以发现，希腊和罗马的政治理想并不仅限于民主或共和国政治。通过“帝王之鉴”（mirror for princes）的方式，塞涅卡与其他一些帝国作家们开启了数世纪的关于君主制之价值与德性的争论。

不远万里前往罗马去参观古代遗迹的人们会发现，现在赫然矗立的元老院遗迹并非由罗马共和国所建。它确为这一目的但由一位后世的罗马皇帝建造。年代久远的古代社会就像一些馈赠给我们博物馆的马赛克拼图：支离破碎且杂乱无序，或者是被重塑过一番了，但原始图案的各部分依然清晰可辨。当今天的政府官员在计算选票或者发表公共演说时，当人们投票来选举“参议员”或“总统”时，当联合国争论着如何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中建立起法治时，我们发现古典的模式与现代的反思、古老的观念与它们的新实践方式在同时起作用。通过与希腊、罗马政治观念的对话，我们能够赋予自己力量来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焕然一新的政治理念。

注释：

[1]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pp. 292-3。

[2]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 p. 293.

[3] Viroli 1992.

[4] 希腊和拉丁单词的发音遵循发全部音节的原则（比如“公民”是ho po-li-tes，这与英文单词“polite”的复数形式的发音不同）。关于古希腊和拉丁文拼写和发音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书末

的术语表。

[5] 城邦领土面积的数据在Ober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参见：Ober 2008a, pp.43-8, 84-6。Ober广泛收集了各种资料，包括1035个不同城邦（或者严格来说是一些共同体，人们“明确或大概可以”把它们定义为城邦。参见：Hansen and Nielsen 2004, p. 53）的目录。

[6] 这种新译法由Hansen提出，参见：Hansen 1993, pp. 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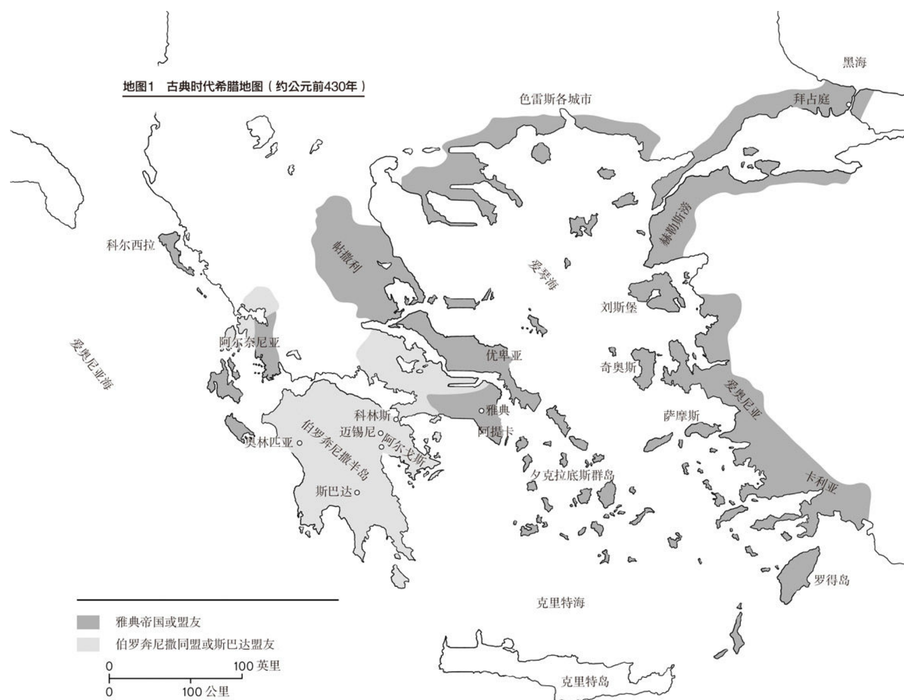
[7] 关于罗马的奴隶解放的不同形式，须注意只有那些经过民事程序（区别于仅仅是奴隶主人的私人决定）的奴隶才会被授予公民身份，参见：Arena 2012, pp. 16-19和 Bradley 2011, pp. 254-5。

[8] 关于雅典水钟的信息，参见：Allen 1996；关于罗马占卜师的信息，参见：Ogilvie 2011。



第一章

正义



地图1 古典时代希腊地图（约公元前430年）

从僭妄（*hubris*）到文明

“在他们看来力量就是正义”，[1]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公元前700年前后的某一天，如此严厉地控诉底比斯（Thebes）山区——他一生居住于此——的贱农们。小农场主赫西俄德与哥哥在家庭土地继承的问题上产生了官司纠纷，他最终败诉而心生怨恨。不过赫西俄德宣称自己从丧失土地的失落情绪中走了出来，踏上了写诗的积极道路。为指导哥哥经营好一个农场，他雄心勃勃地写了一首题为《工作与时日》（*Erga kai Hemerai*）的长诗。除此以外，他也对当时像他哥哥那样的人的不义之举严加训斥，把当时的人们同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的理想正义相对比，尽显自己的厚古薄今之心。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位史诗诗人之一，另一位是荷马。他创作的年代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希腊古风（archaic）时期，大概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荷马与赫西俄德都记述了为希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熟悉的众神的所作所为（其中一组神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众神，在与以克洛诺斯为首的另外一组神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众神之间、众神与他们所垂青的凡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家族与情感关系）。两位诗人也都记述了数代人类的政治情形，但人类的政治与神的干预相互交织

在一起。人们认为荷马的诗所描述的年代要早于赫西俄德，他追溯到诸王统治的青铜时代；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则主要关注希腊古风时期——贵族家庭相互联盟以及内部权力斗争横行的时代——的政治状况。这些“寡头”政体时而会因某个家族或个人取得强势地位而变作专制政体，但其本身却是技术和社会组织发生剧烈变革的大熔炉，例如造币术、文字书写以及新军事技术的发明和传播都在这一时期。各种政体之间与政体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吸纳了一股新的力量，即那些相对而言较为贫穷、非精英的平民大众。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通常认为希腊的古典时代从此开始）建立起了民主政体，第一次出现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

正义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观念，最早被发现于希腊古风时期的诗学之中。我将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探索，往后会涉及到它在诗学和哲学中的衍生发展，尤其是在雅典古典时期的演变。在合理或公平对待的意义上，希腊人普遍认识到了正义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希腊人分散生活于一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共同体之中，这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则又散布于内陆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数百个海洋岛屿之上。他们都称自己为“希腊人”（Hellenes），但却讲着不同的方言。希腊人明确地意识到了人类社会文明开化的时间是如此之短，文明成果的延续是如此不易。与早已长期定居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的人类群体相比，希腊人知道自己是后来者，为此希腊人向他们不断学习。文明把人类从单纯的生存需要中解放了出来，继而发展出了众多的艺术与科学形式，比如农业、冶金术、航海、建筑以及赫西俄德所从事的诗歌。赫西俄德通过诗的形式切实反映了希腊古风时期的众多观念。对他来说，正义使一切艺术与科学成为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正义的观念，人类的状况正如被鹞鹰捕获的夜莺。赫西俄德在一首充满寓言意味的诗中写道：“我只要高兴，可以你为餐，也可放你远走高飞。”老鹰对着它利爪下的倒霉受害者如是说（*WD* 209）。如果没有正义的观念，人类绝不会脱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或被杀戮状态。

我们可以把正义置于僭妄的对立面来理解，后者在希腊意味着对个人地位或身份的亵渎，对个人应得之物的不尊重。正义是给予别人以应得之物，然而僭妄中所包含的不敬则搅乱了自然秩序，违背了神明的惩罚原则。从本章开头引用的赫西俄德那段辛酸的控诉话语来看，希腊人深深地迷恋着正义，但正义又极易受到人们的伤害。尽管并非只有希腊人才有正义的观念，但是他们对正义的必需条件有着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如何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维持正义。正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被遵守，但希腊人同时也提出过很多针对正义的挑战。我们将一边探究希腊人渴望正义的叙述，一边探究他们对正义的本质与价值所提出的种种挑战。

富人与穷人

古典社会里，公民间的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在富人与穷人的对比关系中经常受到威胁。每一个希腊城邦既包括了为数不多但相当有

权势的富裕家族，又包括人数众多的穷人群体。一些富人依赖于财富的继承，主要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谷物、葡萄或橄榄。另外一些富人可能会从事商品贸易，投资往来于希腊、波斯和埃及各港口的商船，或者（特别是公元5世纪以后）直接投资于制造业，比如造船业。希腊陶瓶上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那时富人们的优越生活：美酒美食，举行宴会；雇佣乐师，享受曼妙音乐；金银玉石，装扮身体。与此相对的则是很多处于生活边缘的穷人们——没有土地的贱民或者城市乞丐，除此之外还有工匠或小农场主这样的体面人。无论他们的实际收入或财富如何，被视为“多数”的穷人无法像“少数”富人那样拥有奢侈的生活与良好的社会地位。富人继承家族的财富，那些地产精英的财富则尤为稳固。

精英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人”（*hoi aristoi*），这是贵族制（aristocracy）一词的起源；在雅典，他们的家族被视为出身良好的“贵族”（*eupatridae*）。[2]他们有时也视自己或被穷人称为“少数人”（*hoi oligoi*），以与“多数人”（*hoi polloi*）相区别。只有少数的人才是富裕的，乃至可以把富人定义为“少数人”；剩余的大量人口则注定是相对或绝对的穷人。此种把贫富与人口数量的大小对应起来的等式并不严格符合逻辑，因为从原则上说为什么富人不能占人口总数多一些呢？尽管此种情形多见于古希腊历史，但它仍然是很多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正如日后亚里士多德所意识到的那样，社会存在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但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美国20世纪二战后的繁荣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现代社会的财富两极分化现象却更加严重，因此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政治曾面临的严峻问题就不断回响在人们的耳畔：富人和穷人依靠什么共存于同一个政治体之中？

穷人不能持续威胁富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否则就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局面；但除非法律对穷人足够的公平，否则他们为何要尊重法律（历史表明此处所需的公平在量上远少于一个中立旁观者的想象）？为了维持平衡，一些政体在实施法律的时候简单地诉诸暴力，即便如此，统治者们也要定义某种“正义”，并声称法律体现了该正义的原则。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建立起某种正义的斗争，或将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制度安排贴上“正义”的标签，自古至今都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博弈的交会之处。

在梭伦（公元前630—前560年）的事迹中，我们找到了理解正义的建立过程的最佳角度。梭伦出身于雅典贵族，作为一位“智慧之人”和诗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但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立法者而被雅典的乡下人所熟知。他努力缓和富人与穷人间的激烈斗争，把雅典带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梭伦建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制（第二章的讨论主题）的新法律。[3]通过赋予穷人以明确的政治角色，他终结了贵族的绝对统治。这标志着希腊的政治从古风时期向古典时期的转型。

梭伦是如何创造公民间的和平的呢？他集中处理了公民间的经济关系。正如其他古代社会的立法者和统治者做的那样——包括近东地区一直与希腊人进行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的埃及和腓尼基，他废除了穷人借

债行为中的人身抵押权，因此在无法还债的时候，穷人再也不能作为债主的奴隶而被任意占有或出售。[4]这显然是对穷人契约自由的限制——他们不能用人身作抵押而签订债务契约，即便他们的孩子快要饿死了；但对穷人契约自由的限制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正如梭伦所言，它是为了正义。当穷人签订易沦为奴隶的契约时，他们不会被视为平等的公民，因为他们的公民地位根本得不到保障。他们在此种契约情形下始终面临着某种被奴役的风险。梭伦废除穷人借债行为中人身抵押权对正义的建立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穷人像富人一样成为完全的雅典公民。

一个不平衡的政体如果不赋予穷人以一定的政治地位，那么穷人将始终受到富人的摆布。法律是一个城邦谋求正义的最主要方式。通过建立起“优良秩序”（*eunomia*），或者说良法与守法的优良环境，梭伦声称僭妄——威胁正义的暴力与轻慢——被制服了。他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说：“这些东西盛行了，我把权力与正义（*dike*）捏合在一起，从一开始时我就成竹在胸。我还制定了对穷人与富人都适用的法律（*thesmoi*），法律体现了双方都认可的正义。”（*W 36*）为了结束公民间的争斗，穷人与富人双方都同意遵从梭伦的政制设计，尽管实际上双方也都不怎么喜欢它，但这正是梭伦的成功之处——正如他自己解释说，他为任意一方对抗另一方构筑了“坚固的盾牌”而“不允许任意一方对另一方谋求不义的胜利”（*W 5*）。

谁之正义？

希腊世界的部分人群缺乏正义的完全保障，对希腊社会的奴隶们来说尤其如此。奴隶主要来自非希腊世界（尽管希腊人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沦为奴隶，比如他们在国外战争中战败，或者仅仅因为国外的某种不幸遭遇。据说柏拉图曾因为在叙拉古与一位僭主产生龃龉而被出售）。大多数奴隶来源于战争或海盗行为，他们或者因城市被攻陷而被统一出售（通常是女性与未成年人，因为所有的男性已经被屠杀），或者是单独的囚犯（其中的一些可能被朋友或家人赎回）。

从概念上来说，奴隶是自由人的反义词。据说，自由的概念恰恰产生于希腊人对奴隶不公正的社会定位，以及他们拥有奴隶制的过往经验。[5]《罗马法律汇编》（*Digest*）第一条堂而皇之地确认了奴隶（制）与自由的概念对比意义，它丝毫不掩饰奴隶身份的约定而非自然的起源（改编了古希腊文中的一对概念，“习俗”[*nomos*]与“自然”[*phusis*]）：“奴隶制是一项万民法（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的制度，基于此可以违反自然而把一个人归属于另外一个人。”[6]尽管希腊与罗马的法律体系关于奴隶的条款规定并不一致，但是奴隶在广义上仍然被视为一种可被转让的财产而非人。当奴隶几乎缺乏任何法律的保护或稳定的权利时，正义就基本上被抛弃了。

比如，雅典的奴隶几乎被彻底排除在正义场所——法庭之外。他们一般无权提起法律诉讼或充当证人，他们的证词也不会被采纳，除非证词通过酷刑来获得，并且得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同意。[7]没有他们主人

的允许，奴隶不能结婚，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后来人们对罗马奴隶的观察一样，雅典的奴隶并非“自权人”（*sui iuris*）而是“他权人”（*alieni iuris*）。雅典奴隶从事多种多样的劳作，一些奴隶在城邦条件恶劣的银矿中劳动，但也有一些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料理家务，甚至会被任命为城市的公共管理者。

尽管奴隶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明确而正式的规定，在理论上他们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上在雅典纷繁复杂的集体生活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中，他们一般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8]比如，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奴隶的日常穿着跟自由人并无二致。[9]除此以外，雅典——像其他大部分的希腊城邦一样——的宗教习惯法禁止杀害奴隶（或任何人）。在这一点上雅典与罗马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所有家庭成员的生命——包括妻子、奴隶与未成年人——都处于大家长或家庭领袖（*paterfamilias*）的绝对控制之下。不过即便罗马允许对奴隶处以极刑（死刑），罗马的奴隶主也可能对意外死亡的未成年奴隶表达哀思。在一尊现存的罗马时期的半身雕像上——大概在公元98至117年的某一时间内由一位奴隶主出资制作——刻着一段这样的文字：“最亲爱的马夏尔，一个未成年奴隶，仅活了两年十个月又八天。”[10]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基本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奴隶制从概念上来说是不容于正义的。

希腊人一边把正义视为文明社会的基石，一边默许奴隶制这样的非正义，这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采纳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nard Williams）的观点，他认为奴隶制在当时被认为必要的。[11]希腊似乎一般不把奴隶制视为“不正义”（un-just），而是“不适用正义”（non-just）。正义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界限，界限之外纯为必要性事务。威廉斯指出即使现在的富裕民主社会也容忍一定的不正义现象。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贫穷现象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令人遗憾的副产品，但无论如何人们也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即它可以被改造成完全公正或正义的。奴隶制被当作一种必要的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机制。[12]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奴役则意味着背上了残酷与悲惨的命运。大多数奴隶实际上来自战争中不幸被俘的囚徒，因此大多数的评述者不把奴隶制视为自然的，而是某种不幸命运的结果，正如索福克勒斯的一段残篇所述：

> 那时你我都来自同一个人类部族，
>
> 人人由自己父母所生；无人比别人出生更优等。
>
> 然而命运乖张，有人惨遭厄运
>
> 有人飞黄腾达，却有另一些人被迫
>
> 带上了奴役的枷锁。[13]

总体而言，与其说希腊人把奴隶制视为不正义，不如说正义仅在自

由人当中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奴隶不属于正义完全保护的范围。虽然奴隶确实得到了法律最低限度的保护，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合法地向法律要求这些保护。尽管如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把法律的庇护作为奖赏而赠予奴隶，正如感恩的雅典人曾经把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公民身份赠予奴隶一样——公元前406年在阿吉努萨（Arginusae）战役中，奴隶曾帮助雅典人操控舰队，雅典人以此作为报答。

城邦中的其他群体与正义也有一定的距离，但不像奴隶那样完全被排除在正义之外，比如雅典拥有人口数量庞大的外邦自由人群体，他们主要来自希腊其他诸邦。另外一些人如漫游各地的“智者”（知识分子和论辩家）或过访的客商，则往往来去匆匆。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外邦人在城邦中定居了下来，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位公民作担保或赞助，那么就可以获得“梅迪克”（metic）的合法身份。概括而言，外邦人身份介于奴隶与完全的公民身份之间。外邦人需要缴纳特殊的税收以及履行兵役；作为外邦驻雅典的荣誉代表，他们被允许加入宗教游行的队伍；他们与其他公民平等地进行商品贸易（但如果要在市场设立摊位，那么他们需要缴纳一笔特殊的费用）。[14]尽管如此，他们在政治会议上仍然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担任公职与法庭的陪审员。他们可以向法庭提出法律诉讼来寻求正义，但他们的证词仍可能需要经过酷刑拷问才会被采纳，一些针对外邦人的罪行在量刑时比针对公民的罪行要轻。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以雅典的一个最富有、最显赫的外邦人家庭为故事背景，其中一个儿子将为恢复民主制而献身，另一个日后则成了著名的演讲稿撰写人。正如对话录对这个家庭的描述（赛法鲁斯［Cephalus］来自叙拉古），虽然外邦人无法享有彻底的政治正义，但他们可以在与他人的经济关系（偿还债务）以及与众神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偿还债务，但偿还的是贡品）上来理解正义。亚里士多德可能算是雅典历史上最有名的外邦人了，他做出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断言，然而自己却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政治共同体，无法彻底实践自己公民的本性。

女性与未成年人也被系统地排除在政治正义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也是公民——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以及斯巴达与罗马，只有父母都是公民的未成年人才被直接算作公民。斯巴达的女孩被当作公民公开地接受教育和训练，一直到青春期来临。在古代世界的所有城市中，女性作为女祭司在特定的公共与宗教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斯巴达与罗马的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即便她们行使法律事务的能力受到了一定限制；雅典女性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们不能拥有财产，在非家庭事务的经济领域内的能动性也小于罗马女性。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雅典与罗马的女性尽管在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们还生育了未成年的公民（与其他男性公民结婚），但是她们在公共决策的制度性的政治讨论中仍然没有发言权。

虽然雅典禁止成年女性出现在市场（agora）与政治会议上，但是雅典的剧作家们在戏剧作品中把女性塑造得楚楚可怜，让人难以忘却——即便女性角色在舞台上是由男性演员来反串。逆来顺受的女性角色置伦理道德于危险的境地，像美狄亚那般，她们最终猛烈地控诉着自己

遭受的残暴与专横。这些故事情节占据着悲剧作家作品的主题。通过观察希腊悲剧作品的剧名与人物角色：《请愿妇女》（*Suppliant Women*）、《腓尼基妇女》（*Phoenician Women*）、美狄亚、淮德拉（Phaedra）、安提戈涅，我们就能发现剧作家们尤其关注着女性特殊而痛苦的处境。尽管斯巴达与罗马的女性（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继承与拥有财产，但是女性的公民身份仍然是特殊的，她们大多与正义绝缘。她们可能会介入法律诉讼中，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确立与界定（比如斯巴达与罗马曾一度痴迷于女性继承人），但是她们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来界定关乎自身的正义条款。男性未成年人在适当的时候自然会被赋予完全的公民身份，但是他们在未成年时期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仍然是很严峻的。罗马的父亲们在理论上掌握着未成年人的生死大权，雅典的奴隶主对奴隶也不曾拥有过这种权力。

正义：自然还是约定？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篇的赫西俄德。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们一样，赫西俄德在希腊古风时期与古典时期之间创作了众多史诗和说理诗作品，以劝导与塑造国民同胞的价值观。赫西俄德还力求解释人类正义法则的起源，他把人类的正义法则与众神的意志、目的联系在一起，把其视为众神赐予的法律。他宣称人类的正义法则是由众神所护佑的，起初是前奥林匹亚神的首领克洛诺斯，然后是它的奥林匹亚替代者宙斯：

> 这是克洛诺斯交付给人类的法律（nomos）[15]；
>
> 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
>
> 因此他们互相吞食；
>
> 但是，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
>
> 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
>
> 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
>
> 但是，任何人如果考虑在作证时说假话、设伪誓，伤害正义，他将无可挽救地导致自我毁灭（*WD*，276-283）。[16]

作为人类正义法则的源泉与捍卫者，众神在上述文字描述中表现良好。在希腊传统神话与诗篇中，虽然人们正式地把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赋予了众神，人们在各种宗教仪式中也期望众神能发挥出这种作用，但是关于众神的不光彩行径也是各类故事的主题，这些内容伤害了人类对众神作为正义捍卫者的信任。人们把众神形象化、拟人化，认为众神之间，以及众神与普通人类之间，都会产生复杂的情欲纠葛与持续不断的争斗。因此众神对人类事务的介入对人类的正义而言就既是一种保护，

也可能是一种妨碍或伤害。如果宙斯强暴了诸如丽达、欧罗巴这样的女性；波塞冬神为复仇而制造海难；雅典娜女神因为自尊受损而在特洛伊战争中协助希腊人打击特洛伊人，那么人类能彻底相信众神是惩恶扬善的吗？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6世纪之间，随着希腊政治的动荡以及军事、经济状况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扰乱着人们的心神。分散于希腊大陆以及各岛屿之间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做出自己的回应，他们把正义置于更广阔而牢固的基础上：不仅把正义视为众神赠予人类的礼物，而且把它视为宇宙自身的内在秩序（希腊词“kosmos”的英文对应词为“宇宙”，字面意思即“秩序”）。如果说希腊古风时期的诗人，比如赫西俄德与荷马诉诸神话虚构的甚至有时充满争议的众神的语言与行为，那么这些晚近的“智者”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论证。通过宇宙基本元素的运行来重新思考神与自然。他们不再形象化、拟人化地来记述众神的善举与恶行，他们记述由对称性、平衡性等原则支配的自然世界，继而认为人类社会也理应受到这些原则的支配。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那克西曼德，他公元前6世纪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宇宙各种元素“按照时间的秩序对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作出补偿”。[17]关于宇宙万物平衡性特征的研究使其他希腊思想家——如公元前5世纪与4世纪之间，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在意大利南部各城市建立起多个团体组织——进一步对世界和谐的秩序做数学公式化的探究，并使之同样能应用于建构音乐与政治。通过这些哲学先驱的努力，人们——不论男女——找到了新的确证，认定世界确实从根本而言是被正义所支配的。僭妄或贪婪之人如果违背了世界的平衡秩序，那么他必将遭受惩罚。

尽管如此，正如那些希腊的诗人一样，这些哲学家并没有成功地解决正义问题。希腊人也不是唯一对正义之传统辩护深感不满的民族。无独有偶当赫西俄德进行创作的时候，《圣经·约伯记》的作者或编撰者也感觉到了传统正义辩词的无力。不义之人因他的恶行必遭惩罚的理由听起来是多么的空泛无味。希伯来诸经典通过民族的神圣历史与宗教律法来界定正义，而希腊人则发展出了一种特有的写作与表达方式去探寻正义的起源，即希腊悲剧。作为公民宗教节日中的一种制度化的舞台艺术形式，希腊悲剧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雅典，然后慢慢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与日后的罗马。通过对各种传说与历史人物命运的戏剧呈现，以及舞台歌队演员对戏剧剧情的反思，希腊悲剧着重呈现了一些人如何渴望不义，其他人则不自觉地成为帮凶，以及正义之人经常遭受与不义之人相同甚至更恶劣的命运的剧情。[18]悲剧作家们同样提出了正义界限的问题：谁被排除在正义之外？尽管一些悲剧作家坚持正义的神性特质及其对人类的基本意义，但是其他一些悲剧作家开始挑战社会长期以来对正义的定位，怀疑正义的神圣起源及其自然性。

公元前5世纪，亦即希腊古典时代的早期、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雅典产生的三部悲剧作品表现了上述这些主题。希腊古风诗人赫西俄德把宙斯视为人间正义的总起源。在此基础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把雅典娜女神——宙斯的女儿，雅典城邦命名的来源及其保护神——视为正

义在雅典的特殊起源。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完成了《俄瑞斯忒亚》（*Oresteia*）悲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欧墨尼德斯》（*Eumenides*）。该剧向人们描绘了正义如何在“阿雷乌泊果斯”（Areopagus）——雅典贵族法庭，承担宗教与司法功能——得以确立的过程。雅典娜女神在剧中创立了法庭，并且在它的第一桩案件中担任12名陪审员的一员。她并排坐在雅典其他11名凡人陪审员旁边，与他们共同审理阿尔戈斯国王俄瑞斯忒斯谋杀母亲及其情人一案。尽管俄瑞斯忒斯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其谋杀行为是为了替自己的父亲阿伽门农报仇，但是雅典娜女神投下了关键的一票赦免了俄瑞斯忒斯，以期打破仇杀的恶性循环，代之以新的正义法则。[19]雅典娜女神与其他凡人陪审员一同商议法律案件的景象突显了人类正义观念的神性光环。如果人类社会关系要承受对正义的众多颠覆与违背，而这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正义就必须具备某种使人敬畏的神性特质。

《俄瑞斯忒亚》系列悲剧向人们展示，尽管正义受到了众神的支持，或者说正义源于自然，但是人类仍然需要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来达成正义之判决。它也表明程序特别是司法判决程序，在希腊法律中是何等地重要。如果人们把法律视为一项解决冲突的公共正规程序，早期的希腊法律对程序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法律的实际规定本身，此事显得极不寻常。[20]“公正的法律诉讼程序是正义的必备条件。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希腊人的内心深处，可以追溯到荷马。”[21]法律条文被雕刻在石板、木板或青铜板上（最早关于希腊成文法律的考古学成果是在德列罗斯［Dreros］发现的一块公元8世纪的石刻）。尽管这种法律被视作人为制定的——由立法者、国王或某个政治会议机构制定，但是它们通常也被认为具有某种终极的神性授权或渊源。赫西俄德把不义之人定义为法庭上作伪证的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柏拉图以后的希腊哲学家都把息讼视为一个良好社会的重要标志。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上演五十年之后，希腊新生代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前406年）崭露头角。他曾二十多次在雅典戏剧节上获奖，与他的戏剧前辈们相比，他笔下的众神要正派得多。他的作品《腓尼基妇女》（*Phoinissai*）描述了正义之源于自然，以及正义为何易被伤害。该剧的舞台歌队是一群腓尼基妇女，她们正在前往德尔菲神庙奉献祭品的路上。因为战争的原因，她们无法离开忒拜，在这里她们目睹了剧作的主要场景。该场景以神话人物忒拜的王后伊俄卡斯忒为中心。她既是俄狄浦斯王的母亲，同时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他的妻子。该场景还展现了因这段乱伦与亵渎神灵的婚姻而造就的各个孩子的命运。

虽然伊俄卡斯忒目前的命运并不如意，但是她证明了正义的自然起源及其价值，她赞美说：“公平把朋友与朋友、城邦与城邦、盟友与盟友团结在一起。”[22]尽管如此，剧情很快向人们展现了正义的人类关系如何因自身的疏忽大意或暴力行为而轻易崩溃的事实。伊俄卡斯忒与俄狄浦斯王所生的两个儿子原本情同手足，并且兄弟二人约定以一年为期，轮流统治忒拜，但是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很快因为一方违反约定而破裂。一方引起的不义行为以兄弟二人双双毙命收场：两人在决斗中同时

负伤而亡。该剧告诫人们，人类的贪婪或欲望经常使正义的计划落空，脆弱的敬畏心与正义心无法约束背信弃义的行为。尽管如此，正义法则仍然备受尊崇，即便是在被违背的意义上。通过呈现不义行为的不良后果，欧里庇得斯反而突显了正义的意义。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伊俄卡斯忒与俄狄浦斯王的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她与眼睛失明并已身患重病的父亲相依为命离开了忒拜城。欧里庇得斯版本的《安提戈涅》没有雅典第三位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版本的《安提戈涅》那么出名。大约在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即与神圣律法相比，人类的法律是多么地专横。在把城邦的公共正义法则与自然的亲情关系以及神圣的律法相互对比的意义上，该剧作对城邦的公共正义法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索福克勒斯从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相互杀死对方后开始写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位（厄忒俄克勒斯）虽然违背了分享忒拜统治权力的誓言，但却得到了厚葬；他死后王位发生转移，新的继任者克瑞翁褒奖了厄忒俄克勒斯（其实是他的尸首），以使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前政权拉上关系。另外一位（波吕涅克斯）因为兄长的背信弃义而惨遭厄运，不得不暴尸荒野。克瑞翁以波吕涅克斯对城邦前任统治者的叛逆为由，禁止为他举行体面的葬礼仪式，甚至是任何形式的埋葬。对波吕涅克斯的苛待是不正义的吗？根据克瑞翁的法律，甚至根据他自立为王之后所颁布的法令来看，显然不是这样。但安提戈涅认定，按照众神的“不成文律法”，这么做确是不正义的。因为众神的律法规定埋葬亲人是一个人重大而不可亵渎的义务。[23]

安提戈涅把神圣律法称为“不成文的”，这反映了索福克勒斯时代人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雅典人通过晚近的民主政体人为地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但是这些新的法律——同时也是《安提戈涅》的隐晦意义——都轮不到被镌刻到石板或青铜板之上。它们可能更像是一个僭妄的政治共同体的自命不凡的命令，正如克瑞翁所颁布的那些政令。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当与宗教习俗中的日常古老法律相比，权力与人为法律的有效性是第二位的。安提戈涅英雄般地死去了。她的死亡导致了克瑞翁的儿子（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殉情自杀，同时也使克瑞翁的妻子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最终也自尽而亡。狂傲的克瑞翁因此遭受了更为悲惨的命运。他曾经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现在显得多么空虚而无力，在众神与命运那无可逃脱的训令面前，克瑞翁终因自己傲慢地行使政治权力而自取其辱。通过挑战人为法律与命令的有效性，安提戈涅强化了人们对正义的信仰，即正义是一种神圣秩序。

智者的挑战：正义是自然的吗？

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使人为法律在与神圣律法相对照时，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正义的本质或价值，正义仍然源于神圣律法。后来的一批“智者”思想家与教师开始公开质疑：法律与正

义是否仅仅不过是专横的人类约定？他们向早先时候诗人们对正义的辩护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晚近的智者们既不向自然学习，也不继承先辈哲人的衣钵，他们反而特别向人类社会本身学习，然后又自命为师而传道授业。他们着重关注人类自身之事务而非宇宙秩序的具体构造，因而成为最早一批政治学理论的贡献者。智者虽然不是唯一对政治进行思考的人群，但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准专业”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通过出售自己所学来谋求利益。

这些智者既向他们各自的城邦与政治会议机构免费提供知识与建议，也游走于希腊各地，向富人们兜售自己的知识，希望得到雇佣而成为富家子弟的家庭教师。智者们向富家子弟传授修辞学，声称掌握着这项技能，可以帮助他们赢取权力或名誉。他们试图影响政治，但他们既不承担明确规定的政治义务，也不介入各自城邦已有的正规机制，而是炫耀拥有教别人如何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并且从中收取报酬。这是一幅颇具争议的景象。比如西西里岛的智者、教书匠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486——前376年），他在希腊各地四处游走，不断发表着一种套路式的言论，叫嚷说海伦并非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人们在传统上认为修辞总能导向正义的决定，但是如高尔吉亚这般的智者搅乱了这种看法。

众多智者授业的中心内容是一组明确的对比关系，即“习俗”（*nomos*）与“自然”（*phusis*），或法律与自然。[24]在这种对照的语境下，他们并不用“法律”（*nomoi*）指称神圣律法（安提戈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人类自己制定或统治者制定的各种法律，无论统治者是个人还是团体。人为制定的法律只不过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人类自我创制、自我发明的结果，不管它来自一位僭主某一刻的奇思妙想，还是政治会议机构涉险票决的结果，因此它与事物的真正本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事物的真正本质由某种正义或某种完全不同于人为法的律法所支配。“习俗”与“自然”的对照关系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创制物、人类后天约定惯例的重视，它们并非不可改变的真实。“习俗”与真实自然相比起来，它们多半糟糕、低级得多。

智者认为“法律”是人为创造的，这是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然而更具争议的是他们认为，法律是“一些人”强迫“其他人”的结果——法律使统治者处于绝对有利的位置，而其他倒霉的受害者只能处于不利的位置。与后来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类似，这些智者认为野蛮而残忍的冲突与竞争是“自然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强者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伤害弱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还不用承担后果与责任。柏拉图对话录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角色，雅典人卡里克利斯（Callicles），他就以这种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即便如此，如果强者的统治是自然的，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即人类的各种约定应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它们的价值又该如何评价呢？一个人是否可以攻击强者说他对弱者形成了剥削，然后用自然正义这一工具来揭露人类法律的剥削性质呢？历史记载的最早关于奴隶制的批评即遵循这样的思路，奴隶制作为正规的政治或社会机制（不是个别的虐待现象）具有不义性。奴隶制仅仅是一项人类法律，而众神赋予

每个人以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神灵把自由赋予所有人，自然使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奴隶”，这是阿尔西达马斯（Alkidamas）的一条谚语，被一位不知名的读者记录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hetoric*）一书的页边空白处。[25]

然而，这种借用“习俗”与“自然”的对比关系来对奴隶制或任何其他人类法律进行激烈批评的思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同。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大量存在的法律确实有助于人类的一般利益，但它们仅仅是次优的，并不足以促使人类达成最大可能的目标。[26]每个人在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自然的正义允许强者统治弱者，但前提是正义得到强者的保证或首肯。自然正义的困难最终导致人们偏向于一种次优的解决方式，即保证人类法律能够给个人某些好处，而不至于使他一无所得。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支配或统治别人而免于处罚；最坏的则是试图支配或统治别人，但被抓住并遭受处罚。因此，正义是两者的折中，一种次优路线。个人放弃成为支配者或统治者的奢望，不要那些好处，但他也因此而免于遭受被支配或被统治的伤害。[27]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即格劳孔（Glaucon），他就持这样的看法（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而认为正义是“最优与最差的中间状态。最优的情况是行不义而免于惩罚；最差的是遭受不幸却无法报复。正义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值。它并不被人们视作好的，而是说人们的力量太弱小，不能行不义而同时免于惩罚”。[28]

如此说来，正义是人类一种有益的妥协或退让，而并非某种人类固有的最优路径。正义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达成，即赋予法律以“保证人”的地位，使其确保人们能够公正地对待任何其他人，即便它无法使人们内在地更好或更正义。尽管如此，这种解决方式本身仍站不住脚。如果正义仅仅是解决人类如何相处这一问题的次优方式，那么当一个人可以逃避惩罚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行不义呢？此时他既能够收获不义行为最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能从别人的守法行为中获益。

如此对正义的价值作相对化的处理，导致正义成为人类在必要时不得不忍受的东西，而非人类自我幸福之最有益的实现。本章开篇提到的希腊古风时代的诗人们曾经全心全意地（但愿如此）捍卫着正义的价值，他们因此就受到了这种相对主义正义观的严峻挑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希腊社会的公共生活舞台上不断出现新鲜的角色——从早期的诗人、哲人到悲剧作家，然后是智者——人们关于正义的一致看法开始发生分化。正义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还是富人对穷人施展的骗局？希腊的思想家们把这些问题提了出来，无论是围绕真实或虚构人物展开的激烈论辩，还是关于他们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故事以及他们各自遭遇的悲惨命运，皆成为希腊思想家们的实验园地。

强者与弱者

我们已经发现城邦的奴隶、外邦居民、女性和未成年人仅拥有一种有限的正义。那么正义在城邦之外的状况如何呢？一个希腊城邦与另外

一个希腊城邦，或者一个希腊城邦与其他类型的政治体，比如希腊诸邦东部强大的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它就由帝国的开国之君居鲁士大帝的后裔们所统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多个政治体通过条约与联盟而互相结合在一起以后，正义就以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被用来讨价还价，以保证缔约各方履行相关条款。尽管此时关于一个城邦的政治行为应该遵从正义与不义还是利益原则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当一个政治体没有同盟并且有希望运用强力的情况下，政治体之间能否达成正义的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公元前416年，在民主政治的雅典与寡头色彩浓烈的斯巴达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选派数位大使前往米洛斯岛（Melos）签署后者的战败协议。此时雅典的大使们就持上面的观点，尽管米洛斯人对雅典人并没做什么坏事，并且在战争中已经宣布中立（但雅典人认为他们已经与米洛斯人宣战）。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大使们宣扬了他们看待人类事务的一个赤裸裸的基本事实：

> 我们双方都承认，只有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人类才有必要在争论中确定什么是正义的。只有当双方处于同等的强制条件下，人类协商才能够产生关于正义的决定；但是，如果存在占优势的一方，强者可以做能做的一切，那么弱势的一方必须默默接受必须接受的一切。（5.89）

这个所谓的“米洛斯人的论辩”，修昔底德历史记述中精心设计的片段，主要专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因素。它声称在所有的战争中，或至少是在强大帝国与受帝国（即便由于偶然因素）支配的政治体之间的战争中，正义没有自己的位置。民主政治的雅典一边乐于在帝国中充当暴君的角色，一边则歌颂着城邦内部维系的正义，这确实使当时很多的观察者与亲身经历者都大吃一惊。然而，在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最后通牒中，一桩更令人不安的事是：只要存在强势的一方，正义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如果存在强势的一方，它就将得到一切，弱势的一方则只能接受别人的剥削或压迫。

真是这样吗？本章已经论述过希腊人极为重视正义对规范富人与穷人关系的重要性。有人或许认为在米洛斯一例中，恰好存在着一方为强者一方为弱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大使们的声明就既可以击碎国际正义的希望，又可以击碎城邦内部对正义的希望，或至少是在有实际需要的任意情形下这么做。即便如此，雅典大使们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点解决此问题的线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个粗浅的假设，即富人是强者而穷人是弱者的假设。在富人与穷人的个体遭遇中，穷人几乎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一方；但是随着债务约束制的废除，以及穷人与其他穷苦兄弟的拉帮结伙（毕竟是“多数”），穷人也可以，至少在某些时刻，宣称拥有某种集体的、更为强大的力量。穷人可以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权力，以及如果适当武装的话（有时也无需什么适当武装），也可以拥有军事上的权力。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其视为暴民的统治。多数人能构成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数量，还因为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组织以产生集体行动的能力。民主（*demo-kratia*）一词并不仅仅指纯粹的力量，还指基于行动能力而形成的“人民”（*demos*）的权力（*kratos*，字面意思为“抓住”“紧握”）。[29]因此，在规范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公平关系的时候，穷人需要受到一定的保护以防止个体的依附与附庸；富人则需要认可穷人集体行动的权力。正义保护弱者来对抗强者，但是弱者需要组织起自己的力量来才行。

如果我们把“米洛斯人的论辩”视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案例，其中一方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更多是一种不常见的军事情形，而非人类境况的常见模型。尽管帝国的少数统治者利用派系的说服及其所拥有的专横强力，使被统治各方屈服于自己，但是被统治各方仍然拥有经济、政治以及道德等各种形式的权力。多数人的权力（无论它如何被恐吓、割裂与破坏）在所有政体当中都会对不义的契约构成潜在的威胁，进而能够刺激公正契约的构建。正义是一个激进的概念，因为如果人们对公平的诉求过于强烈，那么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就可能会突然崩裂。

本章已经考察了希腊古风时期人们如何把正义视为众神统治的神圣秩序之组成部分；以及在希腊古风时期，特别是后来的希腊古典时期，诗学、智者与哲学的著述如何挑战了人们对神圣正义的信任，并由此引发了探索人类正义与神圣正义之关系的新方式。对希腊思想家来说，正义的观念支撑着人类文明，但是它也极易受到众神与人类之恶行的伤害。因此，正义的建构不仅需要神性力量的支持，它还需要人类创造出自己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以确保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参与者受到正义的眷顾，特别是那些受到富人的经济与政治支配的穷人。我们接下来将探讨希腊不同政制的政治体如何用不同方式尊重或限制多数人的权力，如何对待精英的诉求，也就是如何在对政制形式的考量中将正义付诸实践。

注释：

[1] 这一节译自一个古希腊文单词，cheirodikai，字面的意思为“hand-justice”，即从拳头的力量中获取的正义。关于这个词的注释和翻译参见：EGPT，p. 15。——原注《工作与时日》第189节原文如此，在中文版的《工作与时日》中，该引文见于第190-195节。参见：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译注

[2] Ry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Ryan 2012, Vol. 1, p. 13。

[3] 关于梭伦的功绩，参见：Wallace 2007。

[4] 亚里士多德或其学派的著作《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该著作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晚期，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该书解读与分析了雅典的政治史以及政治制度史）描述说梭伦“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雅典政制》，6.1）。我采纳了Harris（2002）的观点认为梭伦废除了债务奴隶制（debt-slavery），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约束制（debt-bondage）的废除，借债人仍然有义务按照债主的意愿提供自己的劳动直到债务还清为止，但这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关于梭伦实际上是废除了债务约束制的观点，参见Finley 1985, p. 166;我非常感谢Paul Cartedge与我这些就问题展开的讨论，尽管我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对城邦来说，债务奴隶制仍然继续存在。另外一个存在争论的地方在于《雅典政制》同一章节文本中提到的梭伦对公私债务的废除，也就是所谓的“解负令”（seisachtheis，即卸下重担，与“地震震动”[seismic tremors]或地震拥有相同的词根）。

[5] 参见：Patterson 1991, p.viii（“自由来源于奴隶制的经验”）以及p. xv（“自由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从社会的意义上而言，首先在古雅典得以确立”）；鉴于Patterson相当宽广的历史学与人种学研究范围，这些结论尤为引人注目。

[6] 参见：Florentinus, Digest 1.4.5.1，英译文参见：Garnsey 1996, p.14。

[7] 关于雅典与罗马共和国的奴隶制的权威论述，请参考Rihill（2011）和Bradley（2011）在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 1中的诸章节。除此以外，Hansen还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简短论述，参见：Hansen 1991, pp. 120-23。他在第24页上指出公共奴隶（demosioi）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

[8] 参见：Ober 2000, 以及Vlassopoulos 2007。

[9] 关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情况，参考Rihll（2011）第4页上对“Old Oligarchy” 1.10的引用；关于罗马的情况，参考Bradley（2011）第261页上对Appian, B. Civ. 2. 122的引用。

[10] J. Paul Getty Museum object 85. AA. 352.

[11] Bernard Williams 1993, pp. 111-17, 124-9.

[12] 理论上不太能接受，但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普遍流行着各种现代形式的束缚，体现在一些特定群体之中，比如家庭佣工、性工作者，以及各种形式的契约劳工，特别是那些被贩卖或带入到他国的群体。

[13] Tereus, TGF, p. 591,英译文参见：EGPT, p. 56。

[14] Hansen 1991, pp. 116-20.

[15] Nomos通常被译为“法律”（law），但还有“规则”“习惯”或“生活方式”的意思；在希腊思想中，这些意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6] 这是我自己的译文。Balot同样引用了此段文字，参见：Balot 2006, p. 21。Balot认为正义及其对压迫的拯救是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我在此也同意这种看法。

[17] KRS 101A.

[18] 关于希腊悲剧的政治背景及其贡献的概述，参见：Hesk 2007;详细论述，参见：Goldhill 1986。

[19] 之前已然约定平局的票数就可以算作无罪判决，因此雅典娜投下的所谓关键一票也就可以被理解为她最后一个进行投票，恰好是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的第六票。

[20] 参见：Gagarin 1986, pp. 12-14, 19-20,和 passim。

[21] Gagarin 2008, p. 155.

[22] Euripides, Phoen. 536-8, 我自己的译文。这里被翻译为“公平”（fairness）的单词实际上是“isoteta”，字面意思即“平等”（equality）。当ison指代数学上的精确性的时候，更倾向于译为“平等”（euqality），但包含ison的一些单词有时也指更宽泛意义上的“公平”（faireness）。——原注中文版此处为“平等”，参见：译林出版社，张竹明译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4卷：欧里庇得斯悲剧（中）·腓尼基妇女》，第363页。但根据以上作者注，此处更应该译为“公平”。——译注

[23] 古希腊人尤其看重兄妹之间的亲情关系。希罗多德（3.119）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大流士王允许一位波斯妇女只能从她的哥哥、丈夫和儿子们当中拯救一位男性亲属的生命。这位波斯妇女选择了自己的哥哥，原因是她可以再婚，然后再养育更多子女，但是鉴于自己父母已经过世，她无法再有一位兄弟了。大流士王褒奖了这位妇女的决定，既赦免了她的哥哥，也赦免了她的长子。

[24] 不是所有我们现在称为智者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类的正义与法律不源于神灵的意图。比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采取了一种赫西俄德的路径，通过一则神话讲述了正义的起源。他认为宙斯把正义和“敬畏”（aidos）一同赐给了人类。正义规定了人类的公正条款；敬畏则让人类害怕神，以及感觉到违反法律与习俗的羞耻。法律与习俗都是正义法则的体现。正义与敬畏一起“给城邦带来秩序，同时是友谊的共同纽带”。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中认为这是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参见：Protagoras, as translated by Lombardo and Bell in Cooper 1997。

[25] Garnsey指出他此处可能是在为美塞尼亚（Messenian）的奴隶们进行辩护；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的很多奴隶从斯巴达主人手中获得了自由。同时，Garnsey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53b20-23中认为有一群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但他没有指出是哪些人（参见：Garnsey 1996, pp. 75-6）。

[26]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我们知道这是智者吕哥茀隆（Lycophron）的看法（参见：《政治学》1280b10-12），同时很显然这也是智者安提丰（Antiphon）的看法（参见：DK　87 B44）。我们在本书第4章将会看到，这种观点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第2卷中受到了驳斥。

[27] 这是Denyer的观点，参见：Denyer 1983。

[28] Rep. 359a, 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29] 参见：Ober 2008b。



第二章

政制

什么是“constitution”？现如今我们把它视为规范政体内权力分配关系的基本法律，有时汇集成单独的法律文件。美国宪法的手写原稿现如今被陈列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大厦的圆形大厅内，相反，英国宪法不体现为任何单一的法律文件，而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重要的法律、习惯以及条约的集合体。

希腊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语言中没有“constitution”一词，即便是在英国非法典化的意义上。英文“constit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组织、确立），指后罗马共和国时期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它并非全面或基本的法律。[1]然而，现在被广泛使用的“constitution”一词指称的是古希腊人所谓的“politeia”（政制）[2]。现如今人们主要在政治层面上使用“constitution”一词，但人们可以从更根本的层面上使用它。因此把“politeia”翻译为“constitution”，并把它作为本章的标题也就是合理的了。“politeia”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秩序与结构（法语中称为regimen，政体、制度、章程、食谱），是保证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的特定组成方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终既在最广泛意义上也在最狭隘意义上使用“politeia”一词。他有时把“politeia”视为城邦的一般　“生活方式”，[3]但有时也把它定义为一种狭隘的“公职分配制度”。[4]

政制在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特别设置的秩序，既可以指自然身体，也可以指政治体。这个对比说明了为什么“政制”可以超越狭隘的政治界定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抵抗反常细胞与其他有害物质的入侵而避免丧失自身秩序的时候，他就能保持良好的内部平衡与秩序，因此也就拥有了强壮的“政制”；当一个政治体能够抵抗无赖分子、不满集团与其他国外势力的侵犯而避免政治体失序的时候，它就能保持良好的内部平衡与秩序，因此也就能拥有强大的政制。“政制”的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只有存在一群这样的公民群体，他们形成特定秩序结构的习俗与价值，才能维持政治体的各种惯例与原则以激活特定的生活方式。

这就解释了希腊词“*politeia*”（英文通常译为constitution）为什么最初被用来描述公民身份的条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稍后将详细介绍）用这个词描述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的一个外邦人的各种诉求。这个在斯巴达的外邦人声称自己愿意在斯巴达的军队中服役，只要他和他的兄弟能成为斯巴达的公民。[5]在这一关于斯巴达公民身份的特定事例中用到“*politeia*”这个词，具有深远意蕴。因为斯巴达极为重视“政制”的双层意义，在这一点上，斯巴达超过了希腊的任何其他城邦。“政制”在斯巴达既有狭隘的政治意义，也有广泛的生活方式的意味。成为一个斯巴达公民，不仅意味着他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也意味着他融入了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之中，一种显然与希腊其他城邦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关于斯巴达政制的各种研究——研究成果统

称为“斯巴达人的政制”（*Politeia of the Spartans*）——就充斥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描述：为了快速地投入军事战斗，他们经受着极端严苛的身体训练，同时实行共餐制度，以及遵循抚育儿童的特殊习俗。广义概念的政制超越了政治组织的意义，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劳动分工，即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如何生养、教育与训练公民。这种广义概念的政制成为希腊很多有关“最优政制”[6]的讨论的典型特征。

本章的主题是讨论政制双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作为公民身份、生活方式的政制与作为特殊政治结构的政制。一个政治体的生活方式与其特殊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希腊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每一种政治体——每一种不同的政制形态——各自都给出了自己的答复。这些答案尤其体现于公元前5世纪曾经震动整个爱琴海世界的两次大战乱，并在战乱之中得到了检验。这些大战乱源于不同政制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与碰撞。对亲身参与战争的希腊人以及战后对史实进行编纂整理的人们来说，现代学者所谓的政制大碰撞在当时首先是各种意识形态论争，继而是更加冷静客观的分析。在历史学家对希腊跌宕起伏的战争编年记载中，我们发现相互敌对的城邦表现出的各自政制的优势与缺陷；我们也能发现对不同政治体的政制的分析与归类，即一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基本类型。从实践上，然后从理论上考察各种政制形态的冲突与碰撞是本章要完成的任务。

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的政治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第一次大战乱是其与波斯的战争（公元前499—前479年，战争在此后绵延数年）。在波斯战争中，希腊的众多城邦联合起来反抗波斯国王的入侵，当时波斯国王控制了希腊大陆爱琴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希腊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定位为自由对抗奴役的战争，即希腊各自由城邦对抗波斯国王的奴役与专制的战争，但是我们将发现历史学家对战争的描述并不像结论显现的那样简单。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第二次大战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早期阶段发生于公元前460—前445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御了波斯的入侵之后，自身却陷入了分裂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以斯巴达与雅典为首的两大阵营。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定位为以斯巴达为首的寡头政治与以雅典为首的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但他们的描述以及战争的进程同样不像结论显现的那么简单。

反观这些战乱，当时的历史学家与剧作家们把它们视为政制的相互碰撞。针对不同政治体各自所做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各自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与剧作家们对它们要么过度赞美，要么严厉刁难。为了理解公元前4、5世纪希腊人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选择，我们需要理解不断发生的政制大碰撞中的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激发了不同城邦政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帝国政体间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持续竞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记述，以及其间夹杂的政制分析，最能帮助我们实

现这个目标。

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84年，可能死于公元前430年后不久（他在其著作《历史》中最后提到的事件发生于这一年），家乡是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现为土耳其博德鲁姆市［Bodrum］）。[7]希罗多德来自希腊最东边的殖民地，但日后却生活于希腊最西边意大利半岛上的一块新殖民地。他一生游历颇丰，富有同情心，并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希罗多德是一位对希腊边疆社会非常熟悉的作家，他记述下波斯战争中（战争在希罗多德童年时代就已结束）关于希腊的辉煌军事胜利的不朽篇章，同时他也以敏锐的视角揭露了战争双方的自我欺骗与各自的权力欲望。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希罗多德大约二十五岁。两军激烈交锋，希罗多德对此也做了详细记录。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曾在埃及各地广泛游历，远至孟斐斯（Memphis），并且认为埃及历法胜于希腊历法。他以宽广的胸怀与视野（或批评或赞扬）考察过异域的风俗；他曾经描述过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的服饰、骆驼的习性以及塞西亚人（Scythians）的传统风俗。他对波斯的专制主义与希腊的自由作了极为重要的对比，但是他也指出了希腊各政体的自我矛盾之处——在城邦内部崇尚自由，但在城邦之外则推行专制。他同时也对斯巴达与雅典在组织力量反抗波斯的战争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习惯与政治观念进行过研究。

图表2 波斯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概览

公元前 5 世纪

前 499—前 494 年	希腊爱奥尼亚地区诸城邦反抗波斯统治
前 490 年	波斯第一次入侵希腊大陆； 雅典人赢得了马拉松陆战
前 480—前 479 年	波斯第二次入侵：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与其他城邦输掉了温泉关（Thermopylae）战役，但是雅典率领其同盟赢得了萨拉米（Salamis）海战；公元前 478 年，雅典、斯巴达与其他城邦联手赢得了普拉提亚（Plataea）陆战，同时在米卡列（Mycale）击败了波斯舰队
前 465 年	拉科尼亚（Laconia）大地震，导致众多斯巴达人丧生；奴隶暴动
前 460—前 445 年	斯巴达与雅典（以及各自盟友）爆发军事冲突
前 431—前 404 年	斯巴达与雅典（以及各自盟友）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04 年，斯巴达获胜

民族志学者、道德家、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旅者，在记载波斯战争的过程中，希罗多德把这些角色融于一身。这是第一部用希腊文写成的“历史”，书名来自希腊文*historia*一词，意思是探究或调查。希罗多德创造了新的历史规范，他通过对历史事件亲历者与文献的“探究”，达到了解读与纪念重要人类行为的目标。这种新的历史规范与现代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或当代史的研究在精神旨趣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它仅适用于相对较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果要记述遥远过往的历史，这种规范方法是不可能的（修昔底德自命为希罗多德的继承者，但当他记述遥远过往历史的时候，他把它们从自己著作的主体中隔离出去，使其单独成为一个序言）。希罗多德对那场在其童年早期就已结束的战争进行了探究与调查，他通过对历史见证者的询问以及证据的搜集，开创了审慎评

判史料来源（“我不相信它，但别人可能会相信”，5.86）与议论式评价（argumentative evaluation）的先河。与此同时，这位“散文界的荷马”（希罗多德去世3个世纪之后，他家乡的人民在铭文中赋予他的称号）[8]在传统史诗诗人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发明了历史，却以诗文的形式被吟咏。据说年轻的修昔底德因听说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吟诵他自己的著作而流下了羡慕的眼泪——一个煽情但可能是捏造的故事。[9]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希罗多德对人类多样习俗的观察，然后再集中关注他对波斯战争中的不同治理形式（一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统治）的描述。在智者学派对“习俗”（法律、习惯）与“自然”所作的区分（第一章已做介绍）以及医学著述关于人类心理多样性的研究潮流的共同影响下，希罗多德极为重视已知世界上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批评一位波斯主子在埃及亵渎了当地宗教习惯的例子（3.37）。他在此评论说，所有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法律与习惯是最好的。他还描述了早期波斯国王大流士的故事。大流士把一伙希腊人与一伙印度人召集在一起，希腊人有火化尸体的习惯，印度人的习惯则是把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吃掉。大流士问希腊人愿意收多少钱才肯吃掉他们死去的父亲，问印度人愿意收多少钱才肯焚烧他们父亲的尸体。希腊人与印度人听到这样的问话后都被激怒了，继而奋起反抗大流士（3.38）。数世纪之后，蒙田在对这些故事进行反思时表示，当人们面对不同的民族习惯时，不要追求一种最好或最正义的生活方式。希罗多德借用这些风俗习惯来说明希腊人凭什么打败了波斯人，然而他也敏锐地分析了战争双方的缺陷与偏见。

要了解希罗多德包罗万象的故事的整体轮廓，最恰当的方式是考察他的创作背景。希罗多德记述了关于他出生前后的波斯战争（公元前499—前479年）。这是一场约三十个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反抗波斯的战争，它由斯巴达领导，但雅典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然而，希罗多德却是在斯巴达与雅典（及其各自盟邦）冲突期间以及之后才写作的。这些纷争占据了他青年与成年的大部分时期（公元前460—前445年；就在希罗多德死前不久，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雅典与斯巴达在纷争中互成敌手。

当时的争端使得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态度愈发地尖酸而刻薄。因为在他进行编年史创作的早期，雅典与斯巴达还并肩战斗在一起，与其他重要的希腊城邦团结一致，共同抵御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然而，尽管斯巴达人在令人难忘的失败战役——比如温泉关战役，以及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普拉提亚陆战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雅典人却在重要的马拉松陆战与萨拉米海战中证明了自己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斯巴达人虽然在名义上率领希腊联军反抗波斯，但是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既展示了雅典人的权力，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雅典是使希腊世界摆脱被波斯统治厄运的救世主。希罗多德意识到他的这个观点不会被同时代“大多数人喜欢”（7.139）。因为与作品从古典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作家不同，希罗多德不是雅典人，甚至也不是在雅典写作的——即便有证据表明希罗多德的著作影响了自《安提

戈涅》起的雅典戏剧，因为在还没有完工的时候，他的著作就已经断断续续流传开来了。[10]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的希罗多德能够更好地进行观察，他分析了雅典的新霸主地位如何助长了雅典公民自负傲慢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贪得无厌。当雅典崛起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国的时候，它不断壮大的力量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双方不断产生一些小的摩擦，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逐渐破裂，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

希罗多德把波斯战争视为逐渐展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断点或插曲，这必然是一项承载着多种复杂信息的工作。他的历史著述唤起了人们关于整个希腊曾经团结一体的记忆。然而，他也十分注重分析雅典帝国主义的起源。如同上个世代整个希腊世界联合起来反抗波斯的侵略与扩张一样，雅典的帝国主义看起来也相当不可思议。他同样向人们展示了斯巴达的自我矛盾之处。斯巴达在城邦内推崇自己的自由，然而却对毁灭国外民主政体的自由乐此不疲（公元前404年，斯巴达联盟对抗民主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但是一年以后，雅典的民主势力成功地组织了反击，使斯巴达最终认可了它们的民主政治）。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希罗多德历史叙述中危险的伪君子。它们言行不一，前后矛盾，一方面极力宣称要坚守某些价值，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或他人而肆意地践踏这些价值。然而，我们将首先考察一下希罗多德历史著述中关于政制形态的分析。他清晰地阐述了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基本政制形态，准确地反映了希腊人对政制形态的思考。

一人/少数人/多数人：三种政体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采取了双时间线索的形式，他在记载波斯战争的同时，隐隐地意识到了日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除此之外，他还使用了另外一种独特的戏剧叠加（dramatic overlay）的手法：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安排一场“政制大辩论”，但却使用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希腊的语词。[11]这是希腊一次重要的关于政制形态的思考。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522年七个波斯贵族刚刚挫败了一伙王位篡权者，他们正在商量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3.80-82）。他们中的三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每一个人偏爱一种政制形态而批评其他人的看法，他们争论的语气、语词与约七十年后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希罗多德——可能以略带挖苦的口吻——表示当时的读者并不认为波斯人的辩论具备历史准确性：“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并不可信；但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的”（3.80）。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希腊的政制形态，这个表面的时代错乱反而使得它们更加重要。

波斯人欧塔涅斯（Otanes）首先发言，他批评了君主政体，亦即波斯日后所实行的政制形态：

> 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由一王进行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快活事，也不是好事……我不再同意从我们之中选择一位统治者了，因为一人的统治既不是快活事，也不是好

> 事……当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又不担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怎样谋划才能使君主政治运转良好呢？（3.80）

欧塔涅斯解释说，君主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既助长了君主的傲慢与自负，又激发了臣民的嫉妒——嫉妒是人性的基本元素。傲慢的君主在臣民中间飞扬跋扈，实行专横与任意的统治，以至于"扰乱或任意改变"了"祖先的法律与习俗"。君主制的基本缺陷在于缺乏责任控制。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促使君主担负责任，进而要求他妥善行使权力，否则将遭受处罚。欧塔涅斯的批评意见是中肯的，因为民主派在希罗多德的时代曾经骄傲地宣称责任是他们政制形态的主要成就之一。[12]

戳穿了君主制的谎言之后，欧塔涅斯主张实行"多数人"（*to plethos*）的统治形式。因为在多数人统治的政制模式下，一切官职（*archas*）都由抽签决定，公众对官员进行审查，所有官员都要担负责任，任何人都无法如同君主制下那样扩张自己的权力或者任意使用手中的权力。公元前5世纪（约从公元前430年代开始）的希腊人把这种政体称为"民主"（*demokratia*）。[13]可能是因为故事场景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的缘故，希罗多德没有让欧塔涅斯说出这个词语来（尽管他自己在6.131中使用了该词）。欧塔涅斯反而把这种由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冠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的称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含"平等"与"法律"两层含义，因此它最好被理解为"依据法律的平等"。欧塔涅斯所描述的由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政制模型与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人所定义的"民主"有重要的关联，这既可以通过词语本身，又可以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似特征体现出来。尤其重要的两点是，所有人甚至包括穷人在内数学般平均地（*ison*）共享权力，以及所有人每年轮流掌握公共职位，以防止滋生专制权力。这些正是后人从大约公元前430年代以后称颂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欧里庇得斯的剧作《请愿妇女》（*Suppliant Women*）——可能在公元前420年代后期[14]就被搬上了舞台——描述说，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提修斯（以及在另外一部剧作中）因为以上同样的内容称赞了雅典的政治实践，尽管实际上数世纪之后它们才被付诸实践，那已经是提修斯死后的事了（如果他真的曾经存在过的话）。提修斯说：

> 这里没有一人的统治：这是一个自由的城邦。这里的人民是主人，大家每年轮流执政，富人并不能获得太多的好处，穷人甚至也平等地参与其中（404-8）。[15]

他还为这样的公平与平等进一步增加了条件：

> 当法律通过以后，弱者与富人拥有平等（*isen*）的正义：弱者一样可以对富人恶言相向，正如富人对他们所做的那般。小人物能够战胜大人物，只要他是占有正义的一方（*dikai*）（433-7）。[16]

希罗多德笔下的欧塔涅斯热情称颂着多数人统治的理想政制形态，

因为它赋予富人和穷人同等的正义，这也是公元前4、5世纪雅典作家们所承认的民主政治的精髓（他们同样把民主投射于更早年代的历史人物）。当希罗多德在其他地方以自己的口吻（不通过欧塔涅斯）描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强调了权力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即*isegorie*，“平等的言论”。[17]因此，我们发现希罗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他作品中的欧塔涅斯所热情称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制形式如出一辙。

欧塔涅斯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是合理的，因为它既不会产生专横权力，也还是平等的法治状态。此种观点立即遭到另外一位参加辩论的波斯人美伽比佐斯（Megabyzos）的攻击。他抨击欧塔涅斯把权力赋予“多数人”。美伽比佐斯认为，多数人是“一无是处的群氓，没有谁比他们更愚蠢与蛮横无礼了”（3.81）。欧塔涅斯认为君主是傲慢与专横的；而美伽比佐斯把这种批评转移到了“人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群氓”（*mob*，美伽比佐斯的判断）“毫无教养，对什么是最好与最适宜的一无所知”。精英主义的论调中反复出现着一组对比关系，即无知的多数人与文明的少数人，这可以算作是希腊版本的“反动的修辞”（rhetoric of reaction）。[18]希罗多德又一次利用一个波斯贵族之口讲出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看法——尽管美伽比佐斯流露出的精英主义式自信不受时间的限制。美伽比佐斯最后认为——展示了后世反复出现的精英主义的高傲——“最高明的决定应来自最优秀的人”（3.81）。

最后一位发言的波斯人是大流士，他话锋一转表示三种政体形式各自都声称是最好的（3.82），但是君主制在实践中是最好的——仅当统治者自己是那个“没有比他更优秀的人”的时候（3.82）。此时君主的品性就等于他的判断力，因此欧塔涅斯对君主的傲慢与专横的担忧就是不必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一人统治比任何多人的集团，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统治更具结构性的优势，因为集团必然会导致分裂。在寡头统治下，分裂以相互敌对的精英“派系”（stasis）的形式出现；希腊世界饱受其苦，它最终导致了希腊世界“侵入骨髓的派系与内部斗争”——正如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一位希腊古风诗人在密提林（Mytilene）发出的哀叹。[19]在民主政治下，“派系”以穷人与富人间的相互斗争的形式出现。富人凭借金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穷人则致力于谋求或维持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权力。“一人统治”是避免这些典型冲突的理想方式。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一人统治与少数人统治这两种政制形态，而在下一章里详细讨论民主政治。

一人统治

希腊思想家们对“一人统治”的政治观念有着多种相当不同的联想，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与地点都各不相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能够看到君主政体的波斯帝国横亘在达达尼尔海峡周围的广袤区域。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世代相承的波斯国王们就把自己万能的权力行使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希腊思想家们还可以把“一人统治”的政治观念追溯到遥远的荷马时代的传奇国王们，比如阿伽门农与奥德修斯，或者讲述着由神

或神一样的国王统治的“黄金时代”的神话故事，比如“克洛诺斯的时代”。

然而，众多学者怀疑古希腊的统治者们是否曾经拥有后世所想象的那种除宗教以外的“绝对的世袭的权力”。[20]尽管如此，希腊世界确实存在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国王，主要是在斯巴达与希腊北部。斯巴达存在一个，有时甚至两个世袭的国王，斯巴达的国王拥有重要的影响力。[21]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的诸王们骤然跃上世界舞台，他们的政治与军事雄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2]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希腊的思想家们，比如色诺芬和伊苏克拉底（Isocrates）才开始专门讨论君主政体。色诺芬记述了当时人们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各种看法，只是他把它们隐藏在更早年代的波斯国王居鲁士的背后；伊苏克拉底则更为直接地记述了腓力二世的故事。除了斯巴达与马其顿，希腊其他主要城邦都没有强大的王权，这可能跟读圣经或晚期欧洲史的期望并不一致。

从公元前约650年开始，希腊主要城邦的“一人统治”的政制形态在实践中主要与一个被称为“暴君”或“僭主”（*turannos*，一个外来词汇，可能来自吕底亚语［Lydian］或者小亚细亚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Turannos*”当然是英文词“tyrant”的词源，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希腊，作为贬义词的“*turannos*”被确定意义并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在公元前7世纪，“僭主”还不是指创立独裁政体的人，他也不一定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唾骂。一个“僭主”只在一段时期内控制着寡头集团，强迫他们服从自己而使冲突与复仇的恶性循环得以缓解，但他并没有如此行动的世袭权力。[23]“僭主”甚至还可能被人们视为仁慈的，因为他有时能够为人民创造正义、秩序与保护，使人们免于遭到富人的压迫。总之，早期的“僭主”更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doge）——作为相互间平等的多名贵族中排名第一的贵族而控制政治权力，他不像是一个把自己置于威权政体之顶峰的独裁者。

希罗多德再次提供了反映上述词汇变迁的好素材，他描述了一个与“僭主”同属一类的古老人物的故事。他并不是希腊人，但关于他的故事取材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创作时希腊的各种辩论活动。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可能过于应景，但它的确具有启发性。据他著述，一个叫戴奥凯斯（Deioces）的美地亚（Mede）人想成为“僭主”（1.96-100；美地亚人自己拥有一个国家，王国的权力起初受到波斯王朝的庇护，然后被其所灭）。为了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他钻研了界定正义（*dikaiosune*, 1.96）的法律，然后在自己的村子里担负起法官的角色来。因行事公正，他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人们依赖于他的审判与裁决的时候，他反而以甩手不干来威胁别人，试图迫使人们立他为王（他使用了一个更加荣耀而古老的头衔）。他的王位是自己任命的，但仍然是公平的。他以“严厉的正义卫士”的角色掌握着政治权力，他监视着自己的人民，力图发现不法分子与惩罚不法行为。因此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一个自我任命的“僭主”：施展计谋以获取权力，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个老式的理想国王（但监控人民的技术手法却是崭新的）。

从“僭主”（*cturannos*）向我们今天所谓的暴君（tyrant）——残

暴、专制与非法的政府形式的统治者——的转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25—前480年之间，此时我们根据多种证据来源发现城邦树立起了对先前敌对的贵族精英的权威，并确立了自己的身份。[24]在此期间，公民组建起来的军队与城邦的集体身份终结了个人相互复仇的恶性循环，并且禁止公民在神圣的公共空间内携带武器。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有在推翻了僭主之后，这个单词才被赋予了谴责的意义。自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叙拉古的狄奥尼修一世及其儿子狄奥尼修二世描绘成嗜欲贪婪的“暴君”以后，他们本来良好的声誉就不会再流行了。他们尤其喜欢西西里岛的海鲜，以及混合的戏剧样式，并且专门赞助外邦的喜剧演员，这些内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遭到了批评。柏拉图说他们腐朽的生活激起了荒淫的激情与放纵的生活方式。[25]

实际上，跟他的前任国王赫农一世（Hieron Ⅰ）一样，狄奥尼修一世在当时的叙拉古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赫农一世赢得了全希腊的战车大赛，他的王宫也吸引了很多像埃斯库罗斯一样的剧作家。狄奥尼修一世自己就是一个剧作家，并最终在公元前367年的雅典小酒神节（Lenaea）上获得了头名，他还四处网罗有名的数学家与哲学家。（公元前413年，雅典在与叙拉古的战争中惨遭失败。据一些被俘的雅典人说，如果他们能够背诵任何欧里庇得斯——见多识广的叙拉古观众喜爱的雅典剧作家——的剧作，那么他们就会被释放。）[26]不管在现实与回忆中，还是在以后的各种政治体中，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赞助人与一位剥削人民的霸主之间的界线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从仁慈意义的“僭主”向邪恶意义的暴君的转变集中反映在雅典的历史中：梭伦所创立的包含穷人与富人在内的温良政体被继之而起的两代僭主政治所代替。第一位是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据说他是以人民的支持者的面貌出现的。这种说法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学派，该学派曾对雅典政制的历史与特性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在公元前4世纪写下了《雅典政制》（该著述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本段与下段的引文均来自这一著述）。[27]根据《雅典政制》的描述，庇西特拉图用尽各种计谋，数次掌握又丧失了权力。首先他把自己弄伤，谎称是他的政敌所为而诱骗人民为他配备侍卫；然后在公元前560年，他利用侍卫的支持从人民的手中“夺占了雅典卫城”（14.1）；此后他被赶走，但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执意要求一名妇女扮演雅典娜女神伴其左右，以彰显他得到了神灵的足够庇佑，这不过是他引诱雅典人民把自己请回来的计谋罢了（14.4）。

就我们现在的论述目的而言，最有趣的部分在于他被描述成（此种说法同样源于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按照“政制而并非暴君的方式”进行统治（16.2）。这个稍晚的评价说明“僭主”一词当时就已经被赋予了如此多的负面意义，以至于再也不能对雅典历史上的典型僭主做望文生义的理解了。这是因为庇西特拉图在当时的统治被视为是节制而仁慈的，他设置了地方的执政官，甚至还为破产者提供借款支持（16.1-10）。不少雅典人似乎已经认可了，甚至很喜欢他当时的统治。

与此相反，在后世雅典人的记忆中，人们对僭主的无情责难与庇西特拉图的一个儿子，即希庇亚斯（Hippias）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希庇亚

斯刚开始与其兄弟希帕尔库斯（Hipparchus）共同执政。希帕尔库斯卷入了一场单相思的情感纠葛之中，最终导致了十分严重的侵害与争执。那个被爱恋的对象对希帕尔库斯的求爱行为十分蔑视，于是就与他的恋人及其他公民密谋推翻“庇西特拉提斯”（Peisistratids，庇西特拉图及其两个儿子的统称）家族的统治。在一场公众游行的过程中，他们以为遭遇了泄密而十分恐慌，于是提早发难杀死了希帕尔库斯，但他们自己也在行动中遇害（其中一位当场被杀，另外一位遭到酷刑的折磨而死）。自此以后，希庇亚斯的统治变得更加严厉了，成了被现代人所不齿的典型暴君的角色。斯巴达人在神谕的招引下出兵推翻了希庇亚斯及其家族的统治，但允许他们在雅典之外安全行动，前提是他们必须交出雅典卫城的控制权，那是城邦公民进行集会的主要场所，也是祭祀众神的神圣之地。此后，僭主的支持者与先前的显贵家族之间不断爆发冲突，此时斯巴达人反而掉过头来驱逐了反僭主的派系。然而，那时人民已经在卫城包围了支持僭主的势力，提议把流亡者重新召回来，并把权力授予其中的一位，即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这个“人民的朋友”（Hdt.5.66）。

人民通过此举展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克利斯提尼又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措施，雅典的“民主政治”由此开始，继而被世人所熟知。[28]新的民主政体为了使那两位杀死希帕尔库斯的弑暴君者名垂千古，在城市广场为他们树立了两尊雕像。雕像被偷之后，人们重新又修建了两尊新雕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雕像被安放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的雕像旁边，而薛西斯在很多希腊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十足的暴君）。此举为民主政治打上了反暴君统治的烙印，尽管“人民”自己开始在城邦外——也可能在城邦内——扮演起暴君的角色：他们行使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却要求自己的官吏与盟友们承担责任。[29]

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僭主基本上已经名誉扫地而被湮没于历史，尽管一些强人仍然可能梦想着成为僭主，或者为之孜孜以求而让人对他们的目的产生怀疑。希腊世界成功阻击了强大的波斯入侵势力（先是大流士，然后是其继任者薛西斯）以后，斯巴达与雅典接着又各自纠集起了相互敌对的同盟势力，此时存在寡头制（斯巴达表现出一种相当奇特的样式）与民主制（雅典自豪地宣称是其代表）的两种政制选择。在详细考察民主制以前，我们将首先具体讨论寡头制及其在斯巴达的特殊样式。然后，根据斯巴达与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各自不同的表现，再总结一下希罗多德对寡头制与民主制所做的对比分析。

少数人的统治：寡头制

寡头制是指某些人或少数人的统治，它通常暗示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一部分贫穷而土生土长的公民被排除在公共职位与公共荣誉以外，有时甚至也意味着某些人没有公民身份。[30]各个寡头之间的政治地位相互平等，但是他们不断别出心裁以谋取相互竞争的优势。然而，在面对城邦内不具备公民身份（通常包括众多穷人）的人群，以及外邦受奴役的人群的时候，寡头们通常能够团结一心，否认这些人具

有与他们一样的平等地位。因此，寡头制与民主制一样都承认平等，尽管在平等的覆盖范围上有所不同。

一个拥有公民身份的人不一定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至少不能随意担任一切公共职务。对寡头政治来说，这个区分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公共职务通常都依照财富的多少而定。在公元前4世纪的经典文本《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a ad Alexandrum*）当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关于寡头制的描述：

> 在寡头政体中，法律应当规定，在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中均等分配官员名额。大部分官员由抽签占阄任命，但最重要的官员必须经过伴有起誓的秘密投票和最严格的表决来委派。在寡头政体中，对侵犯公民利益者应给以重罚。因为平民宁肯忍受因自己的官职被剥夺而产生的恼怒，也不愿遏制因自身的利益受侵犯所爆发的愤慨。[31]

根据这段话也就可以认为，寡头政体下的平民可被算作“公民”，但是他们被排除在“公共职位”之外，因为公共职位是“在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中均等分配”的结果，比如那些分享寡头统治权力的少数人。

我们注意到寡头制与民主制都采用了抽签的方式，尽管在下一章我们会发现，为达成特定的目标，抽签尤其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根据上述引文作者关于寡头政体的论述，“最重要的官员”（*megistas*）需要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雅典民主政体的很多重要职位也是如此）。[32]寡头制与民主制在实行选举的同时，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财产的限制条件。这两种政制形态拥有不同的政治机制，但它们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政治文化上的。寡头政治孕育了更多的服从与尊敬，它试图限制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比如第一章讨论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发生在掌权的寡头官员和雅典大使之间，前者不允许后者向“民众”发表演说。[33]与此相反，民主政治则倾向于坚决施行严格的民主责任与大众评价机制，即使它也仅允许从富人阶层中选拔掌权者。

斯巴达：特殊的寡头制？

斯巴达是否可以被归为寡头制是个复杂的问题。诚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对寡头政体更加友善，与它们结成同盟，并且在战时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尽可能地在外邦支持建立或维持寡头政体的统治。然而如前所述，斯巴达也属于君主制，一种拥有两个国王的双头君主制（dual monarchy）。更加有悖常理的是，斯巴达的国王主要掌握着军事上的权力，而其他重要的权力则分别由以下几个机构掌握：选举（口头表决）产生终身任职的元老委员会、每年一选的五名“长官团长官”（最重要的公职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官员和公民大会。自从希罗多德提出了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分类以后，希腊的观察者就不断援引此类型学分类方法去解读斯巴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斯巴达

是独一无二的。从它政治机制的设置来看，斯巴达无法被简单地归于任一类别的政制形态。[34]

然而，人们有理由认为斯巴达拥有强烈的寡头倾向，包括它乐于在外邦支持一些寡头政体。斯巴达仅拥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公民，公民之间相互视对方为平等的“同类人”（*homoimi*）。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仅拥有约8000名公民，但它却拥有相当广袤的疆域，很少数量的公民支配着规模庞大的人群（尽管我们并没有准确的数据）。被斯巴达征服的各地方人民（虽然斯巴达允许其他地方的人民自由地生活，但却支配着皮里阿西人［*perioikoi*］，或大致所谓的“边区居民”，即城市中心以外的乡村地区）[35]成为其农业的劳动力而受到斯巴达公民的剥削。因此某种程度上，斯巴达政治共同体中没有所谓的“多数人”，因为城邦疆域内的大部分人口整体上屈从于斯巴达公民群体的统治，他们根本不能算作公民。斯巴达对奴隶（*helot*）暴动的担忧导致了其军事上的恶性循环。因为对奴隶暴动的担忧，斯巴达不断维持与加剧对他们的剥削，而剥削的强化反过头来又引起了斯巴达对奴隶反抗其残暴统治的更大担忧。这种对军事训练持续不断、彻头彻尾的需要使得斯巴达的军事统治权力得以维持，也塑造了斯巴达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它如此生动而鲜明地融合了“政制”的政治体制与生活方式两方面的意义。

斯巴达政制的基石是吕库古（Lycurgus）创立，吕库古可能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话，那么他可能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他是某位年幼的斯巴达国王的监护人、叔伯，他自己本身并非国王，但却以立法者的身份自居。然而，我们现存的所有文字资料都来自于相对较晚的时代（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的儿子们在斯巴达接受教育，他自己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普鲁塔克生活于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间）。[36]因此，虽然数世代的斯巴达人都认为他们完全沿袭了吕库古的法律，但是人们对古斯巴达状况的描述也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斯巴达有很多法律制定于多次政治改革之后。另外，我们也可以确定斯巴达政制形态的中心是让所有男人与女人都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状态，其内容包括：镇压奴隶暴动的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自卫性的，有时也可能是攻击性的外邦军事远征；有时也会有以个人身份组建的为外邦而战的斯巴达雇佣军。

在加入聚餐会以前，[37]所有斯巴达男孩在国家监督官的指导之下都要经历长期而艰苦的历练过程，即“教育”（*agoge*）；历练过程尤其注重通过竞技体育运动来锤炼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向他们灌输服从的意识。斯巴达这种对公共教育的重视与雅典的私人教育方式——富人的特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巴达女孩也参加城邦的竞技体育活动，甚至接受军事上的训练，她们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合法地继承财产。这些都是雅典女性所无法匹敌的。这表明斯巴达人的确拥有私有财产：“同类人”的平等主义无法避免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以至于当斯巴达男性无法承担共餐所必须的费用时，他们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公民特权。然而，据说吕库古禁止斯巴达人使用金银货币，以避免人民从外邦引入与积聚奢侈品。[38]

城邦的多项措施被认为塑造了极具自我否定精神的模范公民，这让

普鲁塔克与其他后世的作家们赞叹不已。普鲁塔克提到的最著名的一个故事说斯巴达有这样的做法，即在男孩教育的某些阶段，故意夺走食物让他们挨饿，以此让他们学习如何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但如果因偷窃被抓住的话，那么同时对他们施以严重的惩罚。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男孩把偷来的一只狐狸藏在了自己身穿的斗篷之下，他为了否认偷盗而获利的行为，宁可让斗篷之下的狐狸啃噬自己的肠子，直至身亡（*Apophth*[39] 234a-b）。普鲁塔克还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妇女有五个儿子在外打仗，她问战争信使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儿子们的安危，而是城邦是否打赢了战争。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撼的故事：一个斯巴达妇女杀死了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儿子，因为他报告说其他人都（以更荣耀的方式）战死沙场而马革裹尸了（*Lacae 241c*）。这些故事——尽管可能并不属实——引发了后世人的无限畅想，强化了人们关于斯巴达是一个独一无二、极具政治德性的城邦的印象。

自由的价值在斯巴达城邦所崇尚的诸德性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据说曾经有一名斯巴达妇女不幸沦为奴隶被待价而沽，当“被拍卖师问及掌握何种技能”时，她非常自豪地说：“做自由人”（*Lacae 242d*）。这种自由被理解为城邦之独立与斯巴达公民相互之平等的结合体。任何其他人不能对斯巴达公民指手画脚；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他们为了保持自我做主的能力，把自己整体地置于最严苛的纪律之下。作为政治体制的政制的自由，与公民个人的自由都依赖于政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即在特定生活方式意义上的维持。

具体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权力——对军事备战、婚姻行为以及财产占有情况进行监督——被委任给了五名每年一选的长官团长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青年人的训练，监督财产法规的实施，以及严格要求斯巴达人按照城邦政制关于个体与集体价值的要求去生活。设置一种政治机制来直接监管公民的道德价值与生活方式，这在后世的思想家看来，与罗马的监察官制如出一辙。如果有人斗胆公然违反了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那么罗马的监察官们可以降低其品阶与职位，因为他们原本被期望在公共生活中成为彰显德性的好模范。我们已经考察了政制序列中的核心价值，诸如平等、自由、正义与责任，现在还可以再加上德性，第四章将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构想的德性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多数人的统治：寡头政治的视角

尽管我们下章将着重考察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或希腊人所谓的民主政治，但是我们发现对希腊民主政治最雄辩的分析来自与其竞争的寡头政治，这可算作沟通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一座桥梁。因此我们可以从寡头的视角来着手考察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恰好有一份精彩的文本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角度。它的作者是一位居住在雅典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他在城邦内外四处发表着旨趣连贯的演说，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425到前424年之间（此时雅典仍然对斯巴达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40]这位作者现在作为“老寡头”而被人所熟知，尽管他的年纪一点也不老。他立场坚定地提出了一个我们至今还未讨论的问题，即作为“所

有人”或“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与少数富人的统治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以及前者潜在地反对后者）吗？

因为“人民”（*demos*）既可以是整体的“人民”（people），也可以是“平民”（common people，与“少数人”相对的“多数人”或“民众”），“人民”这个词语的意义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民主政治的政治家与修辞学家们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来争辩说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利益不可以与平民利益相悖，或者不能忽略平民的利益。然而，寡头政治的政治家与支持者们，比如这位“老寡头”却赋予词语的模糊性以更为严峻的意义。他们争辩说尽管民主派谎称追求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民主政治”仅仅是挥舞政治权力的幌子，它是以少数人为代价来追求多数人的利益。

在古希腊世界与以后的诸政体之中，整体而言“多数人”比“少数人”更贫穷、更缺乏教养。（在雅典，自从梭伦重新设定了包括出身、财富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特权的基础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与希罗多德的“波斯人政制大辩论”中的美伽比佐斯一样，“老寡头”强调多数人的贫穷与缺少教养将导致穷人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存在自身的缺陷。这些精英分子并非认为穷人天生具有缺陷，但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因而坚称穷人一般而言都缺乏教养，在道德上也缺乏德性。正如这位“老寡头”所言：“最优秀的人身上沾有最少的放纵与不义，而拥有对有价值之物最多的审慎；然而‘人民’拥有最多的无知、散漫与粗鄙。”这是为何呢？因为“贫穷通常会使穷人行厚颜无耻之事，贫穷有时也是一些人缺乏教养与粗陋无知的原因。”（1.5）[41]

自命不凡的精英分子可能就此认为由无知穷人统治的政体注定无法达成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但是“老寡头”并不这样看。从审视民主政治致力于维持平民权力的目标开始，他坚持认为民主政治通过安排各项事务达成了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并且表现得异常优秀——无论民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精英分子的神经。通过让所有人在政治会议上发言，民主派确保了凡是发言的人一定是有志于促进人民利益的人（1.6-7）；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最重要的公共职位留给了富人，因为富人拥有更好的教养，他们能够选择最佳的方式来达成那些人民利益代言人所设定的目标。不管富人们如何不喜欢民主政治——就像“老寡头”自己也不喜欢一样，民主政治并非注定会失败。他公道地表示他之所以“不支持”民主政治是因为它赋予低等阶层比上层优秀人士更多的特权与福利，尽管他也不情愿地赞颂了民主政治的长久性（1.1）。[42]

从寡头政治的批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下富人与穷人间的关系是不正义的。上层优秀者被低等阶层所统治是不正义的。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从民主派的角度来看，寡头政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制。这两种政体形态的争斗定义了希腊各城邦的政治选择。

总结：各政制形态优势与缺陷之比较

在总结本章关于政制形态讨论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希罗多德。我们通过考察知道希罗多德有意设置了“政制大论辩”的场景，让一人/一些

人/所有人统治政制形态的各自支持者在其中各抒己见，然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生动有力地揭示了每种政体的优势与缺陷，并且让它们在波斯战争中暴露无遗。比如，当波斯国王薛西斯考虑是否派遣一只强大的远征军入侵希腊的时候，据说他被自己的幕僚们“强行说服了”（*anapeise*）（7.6）。此举巧妙地揭露了政制大论辩中大流士点明的君主制的缺陷，因为该政制形态过分依赖于君主个人的超凡品性与能力，尽管它也宣称要更多地依赖于“事实”而非“论辩”。因为对于一个不是那么卓越超群的君主比如薛西斯，或者一个更差劲的君主而言，君主可能受到幕僚们的唆使而误入歧途。然而，希罗多德非常警觉地表示同样的危险也可能发生在民主政治的身上（此时会产生糟糕的集体决策，正如美伽比佐斯所预测的那样）。在决定同波斯宣战之后，雅典人被米利都——希腊最东部最有可能被波斯奴役的城邦——的一位代表“强行说服了”（*anapeisthentes*——用来形容薛西斯的同一个词的另外一种形式），它继而决定派遣二十艘战船协助包括米利都城邦在内的爱奥尼亚同盟（1.97）。正如君主制一样，民主政治也极易受到花言巧语的修辞术的迷惑。

希罗多德因此巧妙地表示任何一种政体形态——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都无法保证良好的统治。阿谀逢迎和修辞术对宫廷、封闭的寡头集团与民主政治同样都是威胁。这是希罗多德站在任一政体形态之外冷静观察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说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都拥有一些类似的缺陷，那么希罗多德表示寡头政体至少在某一方面更为脆弱，它被一个基本的自我矛盾所困扰。寡头政体渴望不受外邦的支配，渴望城邦的独立与自由。然而，它在城邦内否认多数人的自由权，把他们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同时它也无法容忍外邦的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体把权力赋予多数人，并把可以视作寡头在意识形态上（实际情况也经常如此）的近亲的“少数人”置于多数人的统治之下。

希罗多德不断地借用斯巴达的种种行为来表现这个基本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斯巴达曾在公元前512年巧施谋略入侵了雅典，接着又在公元前510年赶走了“僭主”希庇亚斯。然而当克里斯提尼结束随之而起的骚乱，建立起崭新的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时，斯巴达人后悔当初对雅典人的援助，继而两次试图——虽然最终并未成功——颠覆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公元前504年，当斯巴达人向它的盟友提议试图第三次复辟希庇亚斯做“僭主”时，一个叫索克列斯（Socles）的科林斯人发现了斯巴达政策中的一个明显矛盾之处：斯巴达人提议“摧毁平等人的统治”（*isokratia*，“平等政体”——一个斯巴达与雅典都熟悉的理想，尽管它们对谁才是平等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相反斯巴达人正在各个城邦试图恢复“僭主政治”（5.92a）。

对索克列斯而言，斯巴达此举近乎颠覆天空与大地的自然秩序，以至于试图“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5.92a），因为这与斯巴达自己标榜的政治自由的理念是如此地矛盾：

> 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

> 城邦立僭主吧。然而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的（为他们立僭主；此时雅典被正式归于斯巴达的同盟之列）（5.92）。

在城邦之内自由被视为政制的价值，然而在城邦之外它却经常演变为专制，这是寡头制的典型缺陷。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民主政治身上，我们在第一章末尾讨论的修昔底德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同样展现出了这一状况。民主政治的雅典人坚称他们拥有可以随意处置米洛斯人的不可限制的权力，并且认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不受正义法则的约束。历史学家们思考着希腊的各种政制形态，把它们同时视为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的问题。不同政体通过自己特别的方式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实现了正义、平等或自由而沾沾自喜，但是它们的受害者或旁观者们仍然可以不断地质问它们：代价是什么？谁承担了这种代价？你们取得成功的策略能维持多久？任何政体所鼓吹的官方价值几乎总是与价值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任何一种政体也同时拥有它所塑造的公民的特有优势与缺陷。下一章将对一种特别的政制形态（双重意义上的），即雅典的民主政治做一些深度的考察。

注释：

[1] 公元2世纪，哈德良赋予了皇帝颁布的法令（constitutiones）以法律（lex）的效力（参见：Stein 1999, p. 28）。公元529年查士丁尼把它们汇编成统一的法典，经过修改之后再版于公元534年（参见：Humfress 2005, pp. 162-6）。

[2] 根据作者此处对politeia、constitution的区分，我们没有按照现代汉语的通常译法，把书中的英文词constitution翻译为“宪法”“宪政”或“宪制”，而是借鉴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书名的翻译方法把其译作“政制”。——译注

[3] Pol. 1295a40.

[4] Pol., 1290a7-8.

[5] Hdt. 9. 33. 更为准确的是，这是“现存的第一件（围绕政制）而发生的事件，它源于具名的作者之手，并且还不是什么残篇”。Harte与Lane在其著作中对该段的引用更加详细，参见：Harte and Lane 2013, p. 1。

[6] 我这里的几点想法归功于Schofield。他在其著作中讨论了克里提亚斯（Critias）名为《斯巴达人的政制》（Politeia of the Spartans）散文诗作品的残篇、色诺芬的同名散文作品，以及米利都的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关于“最优政制”的论述（参见：Schofield 2006, pp. 30-35）。

[7] Fornara做出了有影响的分析，参见：Fornara 1971。

[8] Hornblower 2006, p. 306.

[9] Winton 2000, p. 102.

[10] Hornblower 2006, pp. 306-7.

[11] 毫无疑问的是众人在此处讨论各种政治观念与制度时所使用的语词，特别是欧塔涅斯的演讲中关于平民政体的论述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而非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这与Keane的观点相反（参见：Keane 2009）。Evans极为客观地研究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贵族对平等的关切，除此以外他还对希罗多德该章节（6.43）的内容做了最好的解读（参见：Evans 1981）。

[12] 参考本书第三章，以及Hoekstra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as Tyrant。

[13] 现存的三部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著作分别出自“老寡头”（Old Oligarchy）、希罗多德与德谟克利特之手；尽管在他们何时使用该词的问题上略有争议，但是从他们著作的创作与流传时间来看，他们使用“民主”一词的时间很可能都在公元前430年代或稍晚的时候。具体情况参见Raaflaub 2007, p. 108，尽管他提出了一些间接的证据说“民主”一词在雅典从公元前46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14] Morwood 2012, pp. 557-8.

[15] 在EGPT译本中，ison的翻译从“公平”（fair）变成了“平等”（euqal），句法结构因此也得到了调整。

[16] 参见EGPT的译文。

[17] Hdt. 5.78. 此处他使用了一个与动词“在政治会议中发言”和名词“agora”（政治会议的地点）拥有相同词根的单词。

[18] 该词组来自Hirschman对当代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的分析，参见：Hirschman 1991。

[19] 阿尔凯奥斯（Alcaeus），诗文残篇70.10-11，英译文参见：Anderson 2005, p. 182。

[20] Morris 2003, p. 1.

[21] 斯巴达最强势与最有影响力的国王是克利奥米尼斯一世（Cleomenes I,约公元前590 -前490年在位）与阿格西劳二世（Agesilaos II，约公元前399 -前360年在位）。

[22] 殖民地昔兰尼（Cyrene，当今的利比亚地区）也由世代相承的希腊国王所统治（尽管从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25年起一直受波斯人的控制），直到约公元前440年君主被废黜而建立起了民主政体（参见：Sacks 1995, pp. 73-4）。塔拉斯（Taras，意大利南部一城市）自视为斯巴达的殖民地，似乎也实行君主制（参见：Hall 2014, pp.116-20）。

[23] 我借鉴了Anderson的观点，但与之有所区别。Anderson（2005, p. 177）说：“希腊古风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僭政根本就不是一种‘政体’。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它符合经验传统而遍布于希腊早期的各寡头政体之中，并不拥有异乎寻常的支配力量。”

[24] Anderson 2005, pp. 211-14.

[25] 参见：Monoson 2012。

[26] Plutarch, Nicias 29.2-3,转引自Bosher 2012, p. 116。

[27] 19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被重新发现。不过不要把它与另外一部有争议的佚名著作（有时它也被冠以《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的名字，它的作者现在被认为是“老寡头”，但早年的学界把其视为色诺芬的作品，因为它与色诺芬的作品一起被保存了下来）相混淆。

[28] 第三章将详细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29] 参见Hoekstra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as Tyrant。

[30] 正如第一章所述，包括成熟的民主制在内的希腊所有政体都把奴隶与外邦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以外，女性则是被部分地且有疑问地排除在外。

[31] 2.18-19，希腊文本参见TLG，英译本参见Benson and Prosser（1972）。翻译修正：我自己译为“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而不是“所有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他们的译文是不正确的，因为该段引文结论是说寡头制下的多数人是公民，只是被排除在公职之外。除此以外，我还对他们的译文做了其他一些修正。该文本的作者现在被认为是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of Lampsacus ）。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

[32] Gabrielsen 1981, p. 113.

[33] Thuc. 5. 84. 3.

[34] 关于斯巴达独特政制样态的概述，参见：Cartledge 2001, pp. 21-38。

[35] 尽管在斯巴达的支配之下，但是一些拉科尼亚居民（皮里阿西人）拥有地方自治的多种形式。

[36] 注意尽管迷信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斯巴达的政制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希罗多德至少提到过一部波斯战争中期某一特定时间内制定的法律：当一个国王在外开展军事活动的时候，另一位国王必须待在城邦之内（5.75）。很多学者认为普鲁塔克描述的其他一些吕库古式的习俗实际上是后来公元前3世纪的新发展，参见：Flower 2002。

[37] 作为斯巴达的多立克血亲的克里特也拥有共餐制度（实际上据说吕库古在斯巴达实施

的很多法律都来自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71a-1272a）当中对斯巴达与克里特共餐的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因为斯巴达的共餐建立在个人的贡献之上，而克里特拥有公共的土地与供应品，这使克里特共餐的“公共性”更为真实。

[38]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指出这项禁令并未实行。斯巴达人秘密囤积着金钱，他们可能在外邦的军事活动中积聚起了金钱，比如参见亚里士多德，Pol. 1271b5。

[39] 本段所引Apophth与Lacae均载于Plutarch 1931。

[40] 参考了一些早期学者的观点之后，我同意Marr与Rhodes（2008, p. 5）所界定的日期，尽管他们也认可其他学者所提供的很多其他日期（pp. 31-2）。该文本与色诺芬的著作一起被保存了下来，从古典时代晚期开始它就一直被认为是色诺芬的作品；因此它的作者有时被认为是“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尽管当今大部分学者（包括Marr与Rhodes，参见Marr and Rhodes 2008, pp. 6-12）认为色诺芬不可能是该文本的作者。

[41]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42]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第三章

民主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政制形态，但这并不是因为平民在政府当中承担一定的角色，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会议机构中承担着一定的角色。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对希腊或更广泛的地域来说都是未知事物。多种形式的政治会议与决策咨询机构普遍存在于希腊世界以及其他与之交往的周边社会。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出现的新情况是平民——包括最贫穷的公民——开始掌控（不仅仅作为决策咨询的对象）政府权力。他们在政治会议机构中制定政策；在法庭中裁决公民间的争端；以及审查（在政治会议机构、各委员会与法庭之中）官员的行为——很多官员从相当广泛的民众中通过抽签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由他们自己来担任。把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即是“人民”（*demos*）掌握着全部“权力”（*kratos*），进而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民主”（*democratia*）。民主政治首先出现在雅典，然后地中海世界与希腊大陆的数十个其他政治体也实行了类似的体制，它们都因拥有民主的名号而颇为自豪。历史争论中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民主的新发展，比如变化了的军事战略（军队在传统上依赖于富人们，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财富提供武器装备或马匹；但是在海军战舰出现以后，穷人亦可被充配到战舰之上。这使得海军战舰变得与传统军队一样重要了），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社会与经济变革。我们此处关心的是新出现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机制设置。很多时候，民主政治由僭主或寡头政治中的政治动乱演变而来，人民的权力在随之而起的斗争中得以确立。一个政治体的权力重心由人民——平民或穷人——所掌握，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章我们接触到希腊的一系列政制形态，根据城邦公共职位的掌权者（*tas archas*）与统治方式（*archein*）的差异，它们各自得以命名：“君主制”（*monarchia*）由一人掌握城邦公共职位（“*mon-*”的意思是一人）；“寡头制”（*oligarchia*）由少数精英掌握城邦公共职位（“*oligo-*”的意思是少数人）。相比之下，民主制下人民的权力是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它并非局限于掌握公共职位——实际上的确有一些职位是人民无资格担任的。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并不仅局限于掌握公共职位，相反它的范围从直接制定政策延伸到了诸多领域，比如裁决几乎全部的法律与政治争端；任命某些政治官员；最终使所有选任的官员承担责任。因此，民主制并非仅仅是把公共职位分配给特定人的另外一种政制形态。它是一种崭新的政制形态，以崭新的方式来配置政治权力。

古希腊民主可以被视为某种极端的人民主权：它把旧的与新的权力赋予人民；把公民身份广泛赋予城邦内出生的男性自由民，这就囊括了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穷人、下层阶层的人民以及教养最差的一批人。[1] 平等地行使或掌握政治权力就构成了政治自由，以至于最显赫的政治官员的最重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人民的控制。民主政治同时激发了新的创造性，因为先前受压制的人民开始探索并创造了前所有未的艺术与文化样式。民主政治在公民生活中激发了个人对财富、知识以及公共荣誉的渴望，因此它允许较大程度的财富不平等，只要财富差异无法转化为不可控制的政治权力的基础，继而脱离民主政治的控制。富裕的公民可以享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他们甚至必须是乐善好施的（加之于最

富裕人口之上的特定税收与义务），但是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财富获取任何方式的社会影响力，以使得自己完全摆脱人民权力的控制。

因为雅典是整个希腊世界最早、最大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政体，同时它还是整个希腊世界繁荣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动机——它的货币最受欢迎，它举办的戏剧竞赛闻名遐迩，因此作为城市国家的雅典最能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全貌。[2]我们十分庆幸现在仍有丰富的资料证据来证明其灿烂的文化与政治成果。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波斯战争中，雅典在几场关键的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雅典逐渐崛起，它民主政治的故事就由此开始了。此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数十年的斗争，最终在公元前404年屈辱地败给了对手。

雅典战败以后（以及此前七年），一群寡头密谋发动了政变。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寡头统治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及该世纪的漫长时期内，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历了政治体制与法律上的重大改革，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征服迫使其最终废除了民主制度（它后来对民主政治的恢复并未成功）。那时雅典的马其顿主人强行设置了公民身份的财产限制条件，把其高位设定在了2000德拉克马（drachmas）的标准之上，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只能赚1德拉克马。[3]穷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事实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结束。

雅典民主的起源

如果说穷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结束，那么这对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起源及其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雅典民主起于何时？我们在第二章给出了关于此问题最简洁的回答：它起于公元前508/7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那时人民起义推翻了僭主的统治，进而把克里斯提尼推上了权力的宝座。[4]然而，这个简洁的回答存在两方面令人不满之处。首先，雅典人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一蹴而就的，这跟斯巴达人把自己的政体归功于莱库古立法行为的做法不同。其次，当翻阅雅典政治史的分析材料时，比如第二章提到的分析性历史叙事著作《雅典政制》，我们找到了不只一个而是十一个不同的政制样式。它们可以向上追溯到雅典城的创建者伊翁（Ion）以及提修斯等传说人物的时代，然后经过有迹可循的历史演变，一直到文字书写的时代。

在上述雅典政制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发现民主政治并非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内建立的。相反它是逐步成形的，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期。梭伦的政制改革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端”；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改革“比梭伦更加民主”；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则更进一步，他“剥夺了最高法院（Areopagus）的权力”（最高法院是贵族法庭，曾一度独揽政府大权）。从公元前403年开始，雅典的第十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政制形态被描绘成“人民相互之间共同掌握权力”；以至于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他们通过‘政治会议机构’（*ekklesia*）推行政令，通过‘民众法庭’（*dikasteria*，人民担任陪审员

的法庭）做出决策，‘人民’就是权力”（所有引文均出自*AP 41.2*）。

图表3 雅典历史的大事记

公元前7世纪	
前621年	德拉古（Draco）成文法典
公元前6世纪	
前594年	梭伦成为执政官，开始了最早的民主化改革
前约546—510年	“庇西特拉图”家族的暴君统治时期；公元前510年被斯巴达人推翻，斯巴达人继而支持建立了寡头政治
前508年	寡头被推翻，民主政治恢复；克里斯提尼改革
公元前5世纪	
前490年	雅典在马拉松战役（陆战）中击败波斯
前487年	开始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
前480年	雅典在萨拉米战役（海战）中击败波斯
前462年	厄菲阿尔特的民主化改革

前 460—445 年	雅典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及其盟友间的战争
前 431—404 年	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 430 年	雅典大瘟疫
前 429 年	伯里克利去世
前 404 年	雅典向斯巴达投降：三十僭主统治
前 403 年	民主政治恢复，雅典实施大赦

公元前 4 世纪

前 399 年	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行刑；柏拉图离开雅典
前 384 年	柏拉图四十岁时回到雅典，创建学园
前 370 年代	柏拉图可能正在创作《理想国》；斯巴达与雅典再次爆发战争
前 338 年	雅典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落败；马其顿统治
前 322—321 年	马其顿为公民身份设置了财产限制条件，雅典民主政治随之结束（虽然之后短暂复兴）

这个政制发展的序列向人们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指引。梭伦确实为民主政治创造了基础或前提，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参见第一章）；其次他设置了民众法庭以取代“最高法院”，使人民的大多数诉辩

请求可以诉诸于民众法庭；另外他还使最穷的公民群体得以“充当‘政治会议机构’和‘民众法庭’的成员（意思是不能执掌权位）（*AP 7.3*）。雅典公民在驱逐了僭主以后（参见第二章），克里斯提尼被赋予了雅典领袖的地位，他把雅典人重新编入一系列新的政治身份，从而创立了更为严格意义的民主政制：从大海到城市中心，十个部落依次分布，每个部落又被划分为地方性的“村社”（*demes*）以作为行政和宗教事务的中心。[5]就厄菲阿尔特来说，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雅典人，他在公元前460年代毅然反对贵族精英所主张的与斯巴达联盟的倡议，并且在被暗杀前剥夺了“最高法院”剩余的大部分权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精英的霸权地位。通过抑制“最高法院”的权力，他实际上创立了不一样的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是继厄菲阿尔特之后雅典更为彻底的民主政治的领袖，他因长期担任雅典将军与领袖而闻名遐迩，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激励雅典人参战。尽管雅典的十一个政制样式清单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雅典政制》在其他地方提到说伯里克利同样实施了重要的民主改革措施，这包括重新定义了雅典的公民身份，即只有父母同为公民的人才算作雅典公民。[6]尽管此种措施听起来更像是对民主的限制而非发展，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贵族精英在不同城邦之间的攀亲联姻，因为民主派认为这种行为削弱了贵族精英对城邦的忠诚度，以至于降至十分可疑的地步。（极具讽刺的是，雅典人最终还是特别授予伯里克利的私生子以公民身份，而与伯里克利生下这个私生子的是美丽聪慧的阿斯帕西娅［Aspasia］。她本身出生在外邦，并且也不是雅典公民）。[7]

总而言之，梭伦奠定了雅典民主平等的基础；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步其后尘）为人民创造了民主身份；厄菲阿尔特（在梭伦与克里斯提尼法律的基础上）创立了民主责任制。当然，他们仅仅是赫赫有名的一批人。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的法律不可能获得通过，他们也就无法执掌大权。雅典人民集体行动，不断积累起多种多样的权力形式（但并非权力不可制约），他们——多数的穷人拥有决定性的声音，但富裕的贵族精英也承担鲜明的政治角色——得以抵抗僭主，两次挫败寡头阴谋家的统治，甚至曾一度支配一个广袤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运用基本的民主权力去做决策、进行审判以及让官员承担责任。

实践中的民主观念

雅典人民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行使权力呢？他们主要是在政治会议上做决策的，而政治会议则向一切有意出席并表决的（男性）公民开放。尽管古希腊世界的大部分政体——民主的或非民主的，都有自己的政治会议，但是雅典与其他民主政体的政治会议是最为出色的，因为它们不受公民财产或社会地位等任何形式的限制，凡是公民即可参与。设在普尼克斯（pnyx）山的公民集会地可容纳6000名公民（公元前430年代在雅典人口高峰的时候，这大概是所有男性公民的十分之一还要多；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以后，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在裁决一些特殊公民的身份的政治会议中，6000人是最低的法定人数，此时集会可能改在市场举行。任何男性公民可选择在任意一天参会。更有甚者，任何人原则上都可发言（或至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迈步向前以备被点名发言）：传令官在会议伊始会问“谁愿发言？”然而并非所有雅典公民都会有所回应。大多数公民在其一生中不见得发一次言。相反，发言者一般是毛遂自荐，他们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有志扬名于公共生活大舞台的少数人。

这些“发言人”（*rhetores*）是雅典最接近于职业政治家的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定的：除非他们被另外选为任期一年的将军（比如，阿里斯提德［Aristides］、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以及伯里克利），否则他们实际上并无正式的公共职务。他们的影响力与权力仅仅足以保证向人民劝进一言，即便他们的建议获得了采纳，也仍可能满肚子苦水而愤愤不平。那些冒险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人知道自己有可能在任何时刻遭到发言对象的拒绝、惩罚或抛弃。他们所主导的政策如果失败，那么他们有可能为此而遭殃。

根据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述，一位名为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发言人极为愤怒地指出了雅典政治会议的不对等性（3.43）：据他观察，发言人对其所提供的意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广大的听众却不对自己的决策向任何人负责。发言人为自己的意见负责意味着他们可能遭到任意旁人的起诉，只要有人认为他们提供的意见有悖于法律，或者（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对城邦不利。然而，参加政治会议的人民却不对自己的投票行为负责。投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它只记录最终的票数而不记录投票人的名字，除非恰好坐在你身旁的人记住了你投过什么票。

尽管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会议上投票，但是从公元前460年代开始在大众法庭中掌握了大部分司法权力的陪审员们则需要在每年年初的时候进行宣誓，以期成为潜在的法庭陪审员。宣誓完毕之后，在开庭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有资格出席，但开庭当日（最终演变成为每桩案件）的陪审员则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陪审员甚至比在政治会议里投票的人更不用承担责任，因为至少从公元前458年开始，法庭实行了陪审员的无记名投票，尽管他们都已经在神灵面前发誓要公正裁决，在担任陪审员的时候要承担重大的道德责任。他们不对自己的裁决结果进行辩论或讨论，他们仅聆听辩控双方的意见就进行无记名投票。这能够保证他们进行独立地审判，同时也能够保证他们的审判免于周遭环境的干扰，以保护命运被攥在他们手中的被告们的利益。[8]

任何担任陪审员的公民都可以进行审判；任何公民也都可以提起诉讼或检举。提起诉讼或检举的权利为一切有志于此的雅典公民所享有。大部分的诉讼或检举都由普通群众发起，可能是由公认的受害者自己提出，在一些案件中也可能是由与受害者相关的人来提出，或者是为纠正一人对另一人的不义行为，为公共利益而提出。通过这些方式，普通公民拥有了直接发起政治行为的权力，即便大多数人惯于评头论足远甚于付诸实际行动。

政治会议的议程，以及其他事项比如接待大使、特定官员的选举等，都由一个名为500人议事会的机构所掌握。十个部落，每个部落贡献50人，它们各自都从部落志愿者（人数不够时，须得强迫代表）当中抽签产生，任期为一年。500人议事会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事项，这与普通政治会议的决策方式相同；法庭在裁决事关公民个人的品行与名誉的时候也采取陪审员无记名投票的类似程序。[9]与参加政治会议的公民和法庭陪审员不同的是，500人议事会的成员被当成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年满三十岁，并且在就任议事会成员前有义务接受审查，以检查他们个人的品行与名誉，以及他们各自公共义务的履行情况；除此以外，他们在离职以前还要接受审计，审查他们在位期间行使公共职权的时候是否廉洁奉公、刚正不阿。

除了这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外，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每年还有约700名的在役官员，这样每年的官员总数占到了所有三十岁以上男性人数的8%。[10]无论如何，梭伦颁布的禁止最穷的一批雅典人担任官职的命令从来没有被正式推翻过，且有一些官职明确地被预留给了富人阶层。不管禁止最穷的一批雅典公民担任官职的命令是否彻底地变成了“一纸空文”——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它在名义上一直存在，这就使得人们无法把担任官职视为民主权力的最终决定因素。[11]广泛（如果不是普遍的）而轮流担任公共职务确实是引人注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体人民，包括最穷的那些人在内，在政治会议与人民法庭上做出评判时所扮演的角色。

政治会议在高峰的时候每年要召开40次，议事会除了在特定的节假日之外每天都要开会，法庭每年则可能要开庭300次。一百多个的地方“村社”也各有自己的政治会议与法庭，为有志投身于此的公民提供了更加积极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沉默的雅典人”的情况也是可能的，除了必须要去参加自己“村社”的活动或无奈地被卷进法律案件以外，一个人可以与政治保持较大的距离。[12]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予参与政治而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或者至少是有志投身于此的公民以极大的优待。政治会议包含了当日选择出席会议的所有公民，法庭与议事会成员从所有候选人当中随机抽选（公共与宗教性的戏剧竞赛活动的评委同样也是从每一个部落提名的候选人当中随机抽选）。在这些场景之中，所有参与其中的雅典公民行使着主权者的权力而自由地制定政策；当不愿冒险（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亲自发言的时候，他们就对别人的言论或行为进行评判。

这种评判的主权意味着人民群众——包括其中最贫穷的人——在关键的方面相较于富人拥有人数、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13]穷人团结一心视自己为城邦的一部分，而富人精英们则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与穷人的权力必然相对立的特殊群体。然而也并非所有拥有财富或出身高贵的精英都蔑视平民，比如第二章里我们提到的“老寡头”；也不是所有的政治精英都非富即贵。在民主的雅典以及现代民主社会之中，这些优势通常相互重合，并且易于相互强化，但是也总有例外。公元前5世纪重要的领袖中，阿里斯提德的家庭出身就一般，死的时候也很贫穷；克里斯提尼与伯里克利都来自于高贵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id）

家族，在雅典僭政以前，他们的家族统治着雅典，并且在推翻雅典僭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政治上他们都选择与穷苦的人民大众保持同一条战线。

其他出身一般或没有可继承的财富的人因为公共发言人或将军的身份而扬名，他们毛遂自荐而成为政治领袖集团的成员；他们挺身而出，积极争取民众的支持；他们因人民的决定而生或死。无论白手起家自己创造财富，还是继承家族财产；无论权力全部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就，还是辅之以财富的手段，雅典的精英们没有根深蒂固、独立而统一的政治基础。他们拥有特别的职责，他们也能为自己创造特别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命运关键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作为生活方式的雅典民主政制

正如第二章我们讨论的其他非民主政体一样，雅典的民主政制既具有政治体制的意义，又具有生活方式的意义，并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人民的政治权力把重要的自由与平等赋予每一位公民，哪怕他是最贫穷的无地乞丐。这使他们对任何形式的不敬行为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也促使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司法系统去追求救济与赔偿。一位雅典讼师描述了自己的当事人如何义愤填膺地向另外一位公民提起控诉，他写道："并非是因为他打我而给我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我遭受了冒犯与侮辱，因此我前来追讨正义。因为对一个自由人来说，这是最令他感到愤怒的理由，也是他主张严惩对方的理由。"[14]如果普通公民因忽视或不恰当地处理自己的公共—宗教或政治—军事义务而受到人们的指责，那么他们同样也易于受到名目繁多的指控，当然毛遂自荐的政治领袖更容易面临这样的指控。

除了正式的政治体制以外，雅典向人们提供了更多可以探讨这些问题的空间。政治生活渗透到了市场、体育竞技场、小型聚会或宴会之中；一些人正在享受着喧闹的音乐与艳俗的舞蹈，而另外一些人却渴望进行一些更高级的谈话。在每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公民聚集一堂。其中最盛大的可能要算"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雅典的女性同胞每四年都会为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雕像编织一件巨大的披风。在每次节日来临之际，雅典的男性同胞——可能也有一些女性——围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观看三联悲剧（三联悲剧演完之后会穿插一部轻松幽默的萨提尔剧）。个人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喜剧作品来参与评奖，而获奖者将受到戏剧评审员的颁奖，他们都是按照类似于法庭陪审员的程序选出来的。吟游诗人也会受到人民的盛情接待，应邀一起欣赏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史诗作品；奥林匹克比赛的获胜者也会受到褒奖，他们在公共宴会上与来访的大使们并肩而坐。

尽管雅典的女性大多待在家里从事家政事务，但是也有少数的社交名媛穿梭于各种小型聚会之间，与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男人们混在一起。男人们聚在一起或寻欢作乐，或讨论更崇高的哲学问题，而聚会通常伴有雅典本地或外邦的男女乐师的表演。在市场上，工匠展示着他们的产

品；奴隶与外邦人擦踵而过，相互拥挤在一起；农民时不时地受到周围人的注目而受宠若惊，惊讶于光辉灿烂的巴特农神庙。它是由雅典的盟友们出于共同防卫的目标而集体出资建造的。老人们端坐在法庭的门口周围，而叫嚷着的青年人、剧作家与修辞家们则推挤而过。所有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场景无不表征着人民拥有设定城邦辩论主题的权力，虽然他们有时也会招致——尤其是持精英主义的批评者们——相当大的怨恨。[15]

雅典民主政治的过去经验：成功还是失败？

雅典人的名声在当时很快就变坏了。他们确实在马拉松与萨拉米战役中大胜而归，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萨拉米战役的成功得益于他们采纳了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建议，因为他主张雅典投资于新发现的矿产资源，从而筹建了海军战船。这是一个由所谓（在“老寡头”看来）的无知人民所做出的谨慎而富有远见的决策的例子。然而，他们的成就埋下了狂傲（*hubris*）的隐患。雅典人变成了自己盟友的主子，他们利用盟友贡献的共同防卫资金来装点雅典的那些宏伟建筑，并且最终迫使盟友只能使用雅典的货币与计量单位。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民主的政体变成了一个帝国，它在城邦内致力于自由与平等，但在城邦外却面临着剥削别人的诱惑。这种诱惑是复杂的，比如雅典仍然愿意与外部的民主政体一起来反对寡头政治的干预。然而它也是自私的，它毫无顾忌地斥骂那些挡在自己野心路上或者违背自己意志的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在获得了对盟友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之后，雅典的民主派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这种观点，即人民在城邦内畅享美好生活，（通常可能必然）意味着在城邦外行不义之事。

我们第一章提到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雅典大使们前往米洛斯解释说雅典做决定的方式不是依靠正义的准则而是自身的优势地位，因为雅典城邦足够强大，它完全可以推行这项原则。另外两个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例子同样值得一提。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中，一位雅典的前将军为了获得更好的政治理解，把自己化身为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此处我们看到了雅典将军、演说家伯里克利对雅典的冷静与客观的分析，而伯里克利本人则因为自己卓绝的判断力与审慎而受到了修昔底德的称颂（2.65）。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前不久，他在最后的演说（修昔底德对此有所记述）中承认，对雅典人来说，与外邦的正义原则被帝国的需求所替代。他告诫自己的公民同胞说：“你们的统治（对外邦的统治，亦即你们的帝国统治）如同暴政一般——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不义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2.63）

帝国统治“如同”暴政是因为它的权力行使不受制约，尽管它并不总是像暴政对待自己的统治对象那样在实际运用权力时直接地无孔不入。伯里克利承认谋求帝国统治是不义的——他自己曾经一度热衷于这样的

勾当，然而他把其定义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既然已经承认帝国统治是不义的，那么自然的推论就应该是万物之间是平等的，帝国的统治就应该被抛弃。然而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人民已经骑虎难下了。他们无法放弃帝国的统治，以免心怀敌意的旧盟友们与虎视眈眈的敌人们在别处联手，逼迫雅典人喝下痛苦的毒药。

雅典大瘟疫的第二年，伯里克利去世了；在他之后，雅典的政治会议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修昔底德借用此人之口提供了与伯里克利的言辞极为类似的另一个例子。这种比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修昔底德亲自对两人的方式进行了对比：伯里克利依靠良好的判断力引领人民，而之后的那些盛极一时的发言人们却仅仅对人民阿谀奉承，完全听从于人民忽左忽右的幻想。然而，人民的意志也是起伏不定的，并且可能会发生相当巨大的改变。公元前427年，公共发言人克里昂（Cleon）——修昔底德说他是当时有影响力的人当中“最激进”与“最有说服力”的一个（3.36）——敦促再次召开政治会议的人民坚持前一天所做的决定。此举是为了残酷地惩罚起义失败的雅典前盟友密提林（Mytilene）：把密提林所有能打仗的男性处死，其余的人则一律沦为奴隶。

克里昂在论辩中陈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之前的伯里克利则更谨慎地用比喻的方式。克里昂说：“你们的统治（意即你们的帝国统治）是暴政”（3.37）。暴君无需考虑正义与否，只需考虑自身的优势力量；在运用自身优势力量的时候要假定危险无处不在，不能出任何差错。在此种政体之下，你必须时时警惕那些不情愿被你统治的对象的阴谋反叛；你必须大胆地运用强力去统治对方。操纵与控制不仅仅是你身为暴君时一种悲哀的必需品——正如伯里克利所暗示的意思（不管有多么的虚伪，雅典人就是没有从中醒过来而发现自己已然是暴君了；他们之所以变得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所推行的政策所致）。克里昂暗示说操纵与控制恰恰就是统治的目标，它以积聚暴君的权力为首要任务。克里昂输掉了该场论辩，但是获胜的一方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论证也不过是弱化了的相似立场。狄奥多图斯没有从正义的准则说起，相反他从雅典的优势地位展开论证。在争论城邦外交事务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出发点而可以摆脱协约条款的束缚。他说：“这不是一个法庭，在法庭中，我们应当考虑什么是正义的；我们此处是在谨慎地商讨如何处置他们而最有利于雅典。”（3.44）[16]

在打败波斯的战争中，雅典赢得了相当大的荣耀，它展示了民主政治所能企及的非凡而伟大的力量。然而一旦被激发起帝国的狂傲，雅典人也会表现出民主政治集体决策的必然缺陷：自私、短视地采取阿谀逢迎或复仇性的建议；一些情况下不够谨慎，过于仓促，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又反应迟钝。自我辩解时寻找替死鬼或是一厢情愿是这些倾向再好不过的例证。尽管处死密提林成年男性以及把女性与未成年人全部变为奴隶的最初决定在最后一刻被推翻，但是公元前406年被处死的将军们就是活生生的替死鬼——将军们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获得了胜利，但后来遇上了暴风雨，他们没能打捞起所有在战争中阵亡的雅典士兵。[17]除此以外，公元前399年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也是再明显不过

的替死鬼。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的战争中败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的失利所致。远征西西里的决策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之上，完全不顾当地的政治与军事形势。雅典人最终臣服于马其顿的强势征服，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早已不断谴责雅典人没有及早对其采取防备措施。

然而，公元前403年民主派审慎而明智地恢复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并且对在反对自己的寡头暴动中幸存的步兵实施了慷慨的特赦。如果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接踵而至的征服活动才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臣服于马其顿的强权压力，那么雅典民主政治能否做出任何努力以彻底改变此种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尽管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们当时在反抗还是顺从马其顿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不管怎样，民主政治无疑是自私的，它拥有浮夸的雄心壮志，有时也对挡在前路上的事物残酷无情。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其名其实？

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相似还是不同呢？答案是它们既相似又不同。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各民主政治之间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与美国、英国的民主政治（当然美国与英国的民主政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不相同，它们与当今世界的其他民主政体也存在差异）。考察古今民主之间关系的意义并非是让人们在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的问题上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是一样的！不，它们是不同的！），而是叫人们考察民主的基本事实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以帮助人们权衡古今民主政体各自的优势与缺陷。

与本书中其他的观念不同，民主观念根源于古希腊，但经过很长时间演变之后成为当今世界正在以同一个名字运作的更为积极的民主理想的前身。至于现代国家如何得益于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的民主发展而把自己视为民主制的，它们如何自豪地使用同一名字称呼自己而不把它作为一种恶意的贬损或滥用，这都是些令人着迷的问题，但却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18]直至那时，多种人统治的各种形式通常在观念上得益于古罗马的政治模型：更多的说是“共和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名声早就变坏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曾对民主政治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与当时其他的作家们几乎一边倒地全部关注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缺陷。它的缺陷包括专横武断与愚昧无知——上文已经提到的雅典的各种糟糕决定（密提林、阿吉纽西、西西里等）就充分体现了这点。这是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过分地包含了全部的无知群众，它缺乏能引起人足够重视且高瞻远瞩的协商与决策。

在18世纪现代代议制的共和观念出现之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反面案例。只有到了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英国、美国的政治思想家与实践家们在提出了民主的最新发展成果“代议制民主”，并且重新评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雅典民主的自身成就之后，雅典民主的地位才得以凸显。从19世纪中期以后，民主的古今对比研究

才开始兴盛起来，尽管两者在历史上并不直接地前后相承。民主的古今对比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人民在立法中的地位、抽签制还是选举制、自由主义的价值。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差异：立法、抽签制与自由主义？

立法

18世纪的革命者托马斯·潘恩——他在自己的祖国英国以及位于美国与法国的英属殖民地都参加过政治活动——认为“雅典如果加上代议制的成分的话，那么它将超越自己原有的民主政治”。[19]他把所有雅典男性公民的地位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人民的地位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拥有参加政治会议，以及理论上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权利，而后者则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政治学理论的各种讨论把潘恩的这一对比归于一组简单的对比关系：古代“直接”民主vs.现代“间接”民主。

然而，这种古今民主直接与间接的对比判断极具误导性。[20]首先，这种判断的前提是把雅典政治会议与现代立法机关相对应，进而假定雅典政治会议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实际上，雅典政治会议的常规工作不是制定或修改法律（它仅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偶尔承担这项工作，在该世纪末期的时候它通过法典，然后把修改权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独立的类似于陪审团的机构）。相反地，它主要是作为决策机构而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比如战争与和平（“供应玉米与维护乡村安定”［*AP 43.4*］），以及其他事关共同体命运的类似事务。古代与现代民主在如何立法的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更为基本的区别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它们分配给公民的不同地位与角色。

其次，潘恩的对比判断意味着雅典人缺乏把权威委托给别人的意识。实际上，雅典人非常明白如何让一些人代表另外一些人做某些事。他们每年通过选举或抽签的方式产生约1200名的公职人员（500名议事会成员包含在内）；他们也通过复杂的抽签程序产生法庭陪审团。如果说他们允许所有愿意参加政治会议的公民参加会议，那么这也是一种最佳的战略决策，毕竟人们要在会议上做出与城邦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这并非政治制度捉襟见肘或想象力匮乏的结果。因此，把民主的古今对比等同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使人们无法认识到雅典多种形式的人民权力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立法问题。

抽签制

尽管雅典人通过选举产生1200名官员当中的100名——最重要的是十将军委员会，但是他们每年通过抽签决定大部分的官员，以承担从管理港口到监督造币的公共事务。[21]这里产生了又一常见的古今民主的对比关系：据说古代人运用抽签——一种真正的民主机制——以显示他们关于所有公民都能够并且应该有权担任官职的信条；而现代人则运用选举的方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选举是一种更贵族或寡头化的政治机制，它假定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适合做统治者。[22]然而，这种简

单的对比再次误解了雅典人的真正关切与他们的实际状况。

虽然雅典人确实通过抽签决定大部分官员，但是他们在抽签的时候完全知晓如何代之以选举的方式。他们通过选举来决定特定的公共职位，这主要是那些需要最多经验与专业技能的职位（最重要的是将军的职位）。当用抽签形式时，他们辅之以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他们早已对候选人的服务意愿及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品行状况做了预先的审核，这是为了保证被抽中的人是受人尊敬与守法的。[23]因此，雅典人并不是在任何公民都能够并且应该有权担任官职的前提下使用抽签形式的。然而，他们确实相信大部分的公民都能胜任被要求去承担的管理职责——包括政府办事员、道路专员、市场主管，甚至公共的行刑人员。这些公共职位通过抽签的方式在公民之间分配，并且以一年为期每年轮换（大多数情况下），这有助于防止掌权者的腐化堕落与自我膨胀，无法为将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以及任何人试图谋求政治支配的欲望提供平台。

有人可能会认为雅典的抽签只是应用于公共服务这样的事情，而非用于高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决策掌握在民选的将军们，以及公民政治会议中毛遂自荐的发言人的手中，后者提出公共政策的建议，以谋求人民的选票支持。因此，古代民主政体对抽签的运用并非是向我们揭示它与当代民选官员的简单对比，它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反思过程。古代的民主政体考虑如何调配那些必要的行政管理岗位，才能既避免他们的腐化堕落，又能鼓励那些拥有良好声誉的公民的政治参与。古代人并非盲目地相信抽签制。尽管他们大量地运用抽签的方式，但他们也用得谨慎，并加以限制。他们看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也看重比通常认为的更多的专业技能，这既包括官员履新时已拥有的技能与知识，又包括普通公民在担当职位的过程中发展与培养起来的专业技能。

自由主义

在立法与抽签的问题上，古代与现代民主的对比要比普遍的看法微妙得多。两者的最后一组对比关系是在古代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如果说托马斯·潘恩是代议制民主的捍卫者，那么1819年瑞士裔思想家（曾供职于法国各个政府）本杰明·贡斯当则为“现代人的自由”——与自由的“古代”含义相反——辩护。贡斯当区分了布尔乔亚式的现代人与战士般的古代人（如本书导言部分所示，卢梭向其描绘了古代人的情形），他认为古代政体的繁荣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并且用集体的权力与目标压制个人的利益诉求。古代政体一边把自由视为集体的自决，一边使个人的自由轻易地就受到集体计划或目标的侵害。他把古代政体与现代的代议制加以对比，认为后者的繁荣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个人可以运用各自的财富去委派政治家处理公共事务，因而个人可以自由地去追求各自的利益或目标。[24]其实贡斯当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古代与现代社会广义的政制状态——“生活方式”的政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它们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

然而又一次地，贡斯当的区分歪曲了我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理解，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他实际上把斯巴达视为古代民主政体的理想模型，并且也承认他的分析最不适用于雅典，因为雅典的个人自由、贸易

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伯里克利赞扬过雅典人开放与宽容的政治文化。他宣称说雅典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相互的怀疑或检举；不同于斯巴达的长官团对公民行为所实施的严格监管。他还说雅典人是自由与慷慨的，非常享受各自的生活（暗示了与严峻简朴的斯巴达不同）；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运动会、戏剧节等各种竞赛活动，向众神奉献必要的贡品，享用着进口的和自己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这些都得益于他们繁荣的商贸经济。据伯里克利所言，雅典没有冷酷的诡秘——这是斯巴达的典型特征，雅典愿意对陌生人敞开心扉，相信城邦的胆识和力量可以与人民的“相对宽松的生活”相协调。雅典注重个人的利益，但同时也注重培养人民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不可否认的是，雅典人对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区分不同于现代的大部分民主社会：比如，宗教在雅典就是一种公共关切与规定。然而宗教在雅典也可能是自由的；比如它允许外邦神灵进入城邦，当然前提是必须获得城邦的同意。[25]

然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很容易与贡斯当一起认为雅典——如同古希腊的其他政体一样——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切实保障。缺乏一整套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与适当程序来保护个人的权利，雅典极易遭受人们的非难，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它让个人轻易地就受到集体权力的侵害。贡斯当之所以咬定雅典缺乏现代自由的观念，最可能的理由是因为雅典“陶片放逐”（ostracism）的事实，尽管它也有“类布尔乔亚”（quasibourgeois）的各种自由。

“陶片放逐”是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建议所创立的。雅典每年都会在政治会议上投票表决一个问题（为此特意在市场上集会）：是否有人应该被驱逐出城邦十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每位公民都会得到一块陶片，然后让人们在上面刻上被放逐者的名字。票数最高的人立即被驱逐出城邦十年。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制》把“陶片放逐”视为克里斯提尼对雅典民主化改革的确切内容（22.1）。[26]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是极不自由的。如果如此地缺乏适当的正规程序也是民主的，凭借多数人的喜好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没有任何不轨的证据而又不给人辩护的机会，那么很多现代自由主义者才不想跟这种民主扯上半点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要问“陶片放逐”是不自由的吗？民主的雅典是否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承担不自由的罪过？

“陶片放逐”之所以不讲证据或缺乏适当的程序是因为雅典人不是用它来惩罚犯罪，它毋宁是保障民主政治生存的政治制度。它被人民用来展示自己的权力，目的是为了防止精英分子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企图。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预防性与象征性的手段，被用来提升城邦多数人的平等意识，因为毕竟是多数人撑起了民主政治的大厦。[27]像提米斯托克利这样的雅典将军——公元前480年他率领雅典在萨拉米赢得了对波斯的重要军事胜利，也可能（实际上的确是）在八九年后因人民普遍觉察到的傲慢自大而被放逐。[28]当然，“陶片放逐”也可能被用于派系斗争。然而，它不仅仅是派系斗争的小把戏，而是民主政体保护自己（及其价值）的手段，即便它对孜孜以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有所限制。

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在追随贡斯当的脚步而认为雅典是不自由的以

前，他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当今那些挤压或超越法律界限的政治机制。现代的民主社会经过最近的演变之后，已经允许处置那些被视为对既成政治秩序构成威胁的个人。这些内容倒是与雅典的“陶片放逐”非常相似。雅典“陶片放逐”的目标不是为了杀人。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公民政治生命的终结，因为雅典并不剥夺被放逐者的公民特权，只要十年的放逐期限届满（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可以保证敌对情绪的消逝）。比如，公元前461年雅典将军客蒙（Cimon）被放逐十年后，他又悄然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回到了雅典，默默接受了伯里克利当时推行的更加彻底的民主改革措施。

因此，在“陶片放逐”一例中，雅典民主派提供了一些尊重个人自由权的措施，尽管共同体有时决定需要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驱逐某些人。除此之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雅典为公民一系列的自由权利提供了保障。它的法律（及其实施）确实不仅为公民，而且也为非公民群体提供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具体的实践中，公民与非公民群体都受到了城邦同样的保护。[29]雅典民主的批评者们尤其不能忍受看到穷人，甚至非公民的城邦居民与奴隶享有这样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公民毫无二致。“老寡头”抱怨说在雅典“袭击”一名奴隶或非公民的居民“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话，那么你“经常会袭击一名雅典公民，自己还以为他是一名奴隶呢”（1.10）。[30]

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外表就对人民进行区分，那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令人憎恶的。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结论。企图给非公民人群贴上标签的做法极易伤害与他们极为相似的公民的利益。雅典社会对这一点及其他方面都早已心知肚明，因此它要比现代标准所判定的那种极端不自由来得更为自由一些。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大盘点

我们已经发现，把古今民主的差异定义在立法、抽签制和自由主义三方面的做法是极其粗糙而不完整的。更有甚者，如果仅仅关注它们之间这些被放大与被误解的区别，那么就会使我们忽略古今民主之间的关联性与相似性。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它们对限制官员的关切。这是雅典的头等大事，为此它们运用抽签与选举的多种形式来决定官员的任免。在那些限制官员的政治制度之中，我们发现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真正的区别。

依靠对官员履新前的审查，雅典人实现了对他们的限制。他们不允许抽签制破坏他们对官员刚正不阿的品性的期望；相反，他们动用审查的手段以确保之。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让每一位官员——不管是抽签还是选举产生的——在任期届满之时提交述职报告。担当公职是一项公众信任，职务届满之际，人民要求官员提供述职报告，包括实际的财务报告与一般的执政绩效检查报告。现代的民主人士也认为人民应该让自己的领导人承担责任，就此而言，他们与古代人拥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可以从古今政治制度的差异中有所收获。

本章陈述了雅典民主的三个特征：它们表征着包含最贫穷的公民在内的人民的权力——包括决定的权力（政治会议、议事会，以及其他公共职位中的重要政策；在抽签决定官员时，人民在有生之年拥有多次决定的机会）、审判的权力（在大部分的法律案件之中），以及限制的权力（限制官员）。我们同样看到了人民运用权力的重要性：或者是单个公民在政治会议上发言，在法庭上提起诉讼，或者是抽签产生某一机构（如议事会，能设定政治会议的议程）。正是这些多种权力形式的相互融合才构成了人民的统治，它们使人民既拥有免遭精英分子专横意志支配的自由，又拥有实质的平等，尽管经济上的分化一直都存在着。

人民审判与决策的权力都达到了相当彻底的程度，只要父母都是城邦的公民，那么所有自由的男性公民（在当时）都被视为人民的一份子，所有这些都使雅典民主在所有的同类政体中卓尔不群，正如斯巴达在其同类政体中表现的那样。雅典为城邦的精英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满足的方式，但它运用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来限制他们，使他们无法把财富或影响力转化为支配他人的牢固基础。雅典向世人展示了人民主权的民主理想，即人民在日常的重要关头都行使着控制权，而不仅仅是抽象地作为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雅典既没有局限于平民而实行平民（plebiscitary）投票，也没有把公民担任公职的权利普遍化，但它却找到了真正实现人民权力的方法。

在某些方面，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非常相似，它们都主张人民要控制自己的官员，都把人民视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然而在其他方面，雅典的民主则要更进一步：它对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都试图进行控制；它让人民自己做决定去制定事关公共政策的基本事项；它把几乎全部的法律案件的最终裁决权没有授予给专业的法官，而是授予给了由普通人民组成的法庭；法庭陪审员既裁决事实（正如现代普通法体系下的法庭陪审员），又负责解释法律。雅典民主没有过分脱离我们的视野，成为与现代民主不相干的事物；它也不仅仅是虚幻而笨重的政治体制，等待着现代人类所谓的改良。古代与现代民主实践的断裂使得人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各自不同的制度实现方式）的反思更加具有启发意义。雅典的民主主义者对人民权力及其实现方式有着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与知识上的表达。它赋予普通公民以彻底的决定权力，因此也就对现代民主的一些观念造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现代民主赋予普通公民的权力要少得多。然而在公元前4、5世纪，并非所有生活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下的人们都认为民主的政制形态是具有绝对价值的。雅典最有名的两位子嗣，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民主政治都提出了极其深刻的疑问：民主政治真的是一个人过良好生活的最佳路径吗？他们认为人类的良好生活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及知识德性的成就。这是我们第四章探讨的主题。

注释：

[1] 关于把雅典民主视为一种人民主权形式的观点，参见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

[2] 关于雅典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著作，参见：Ober（2008a）。

[3] 新设置的财产限制条件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关于这方面的简短概述，参见：Williams（1983）。

[4] 实际上，学者们对这是否是最佳答案存在争论，比如参见：Christian Meier 1990,pp. 82-4, 以及Kurt Raaflaub 2007。他们认为最好把“民主政治”的开始时间定义为公元前460年代厄菲阿尔特的民主化改革时期，见下。

[5] 克里斯提尼之后，雅典的公民以“村社”为基本单位，比如莱库古控诉莱奥卡雷斯（Leochares）的演说中提到的“Xypete的安提贞尼斯”（Antigenes of Xypete）。《雅典政制》还提到说克里斯提尼推行了“陶片放逐”（ostracism）而发展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6] 另外据《雅典政制》的描述，波斯战争中马拉松战役的一位英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后来倡建了为士兵、水手以及一些特定行政官员支付报酬的做法，费用全部来自其他城邦对帝国的供奉。

[7] Per., 37.

[8] 关于雅典（以及稍差的斯巴达）的投票方法的事实与意义的研究，参见Schwartzberg 2010。

[9] 关于雅典投票程序的基本研究，参见：Staveley 1972, pp. 93-4 & 78-100。

[10] Hansen 1991, pp. 153, 166-7.

[11] 正如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所述，“一纸空文”（dead letter）一词出自于Rhodes 1981, p. 146（AP 7.4），Sinclair 1991（1988 edition），p. 17, n. 64，以及Hansen 1991,pp. 88, 107, 227。然而所有这些作者所倚重的两段引文——AP 7.4与AP 47.1——指出禁止最低等阶层（thetes）担任公共职位的命令是一项官方政策，尽管在实践中它有时或总是被人们置之不理。

[12] “沉默的雅典人”是Carter（1986）著作的标题。

[13] 参见：Ober 1989。

[14] Isocrates 20.5-6；关于民主政治的雅典中愤怒的讨论，参见Allen 2000。

[15] 参见：Ober 1989 & 1998。

[16] 狄奥多图斯的建议勉强取得了成功：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先前做出的把所有男性处死的决定。为此派遣了另外一艘船来宣布这项新决定，后出发的船及时地赶上了先前被派往密提林宣布执行屠杀命令的船。

[17] 宣布阿吉纽西海战中的将军们有罪的决定是针对他们集体做出的，而不是针对某个将军，这违反了正当的程序。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表示当时他作为议事会的成员之一而抗议该项决定。

[18] 一项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参见Dunn 2005。

[19] Paine 2000, p. 180.

[20] Hansen认为雅典以及其他一些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尽管他指出并不是全部民主政体）拥有“直接民主的各种表现形式，人民不自觉地讨论与投票表决每一项重要的政治决定”（2005，p. 46）。尽管公开的人民政治会议在雅典的决策制定中至关重要，我认为把雅典定义为“直接民主”的做法没有益处，并且是误导性的，其中的原因在正文中已经给出。

[21] Hansen 1991, p. 230.

[22] 关于选举是反民主行为的观点，参见Manin 1997，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雅典人也运用选举的办法来决定特定的官员。

[23] 被抽中担任某职位之前，他必须通过审查（dokimasia），为此他必须证明自己拥有正式的公民身份，除此以外官吏还要问他“待父母好不好，纳税了没有，完成了兵役没有”（AP 55.3）。

[24] Constant 1988.

[25] 苏格拉底审判背景下的一项关于雅典宗教与政治的有价值研究，参见Cartledge 2009, pp. 76-91。

[26] 我借鉴了Forsdyke（2005, pp. 281-4, Appendix 1）的观点；他从正反两方面考察了雅典的“陶片放逐”是否源于克里斯提尼的问题，继而认为该做法源于克里斯提尼的观点大致是站得住脚的；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其他一些城市（包括雅典在内）早已经拥有了与“陶片放逐”相类似的精英主义式的流放实践，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27] 这是Forsdyke 2005, pp. 144-204中的观点。

[28] 在流亡至阿尔戈斯时，他受到了斯巴达人的秘密加害，最终他选择彻底地离开希腊；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服务波斯国王的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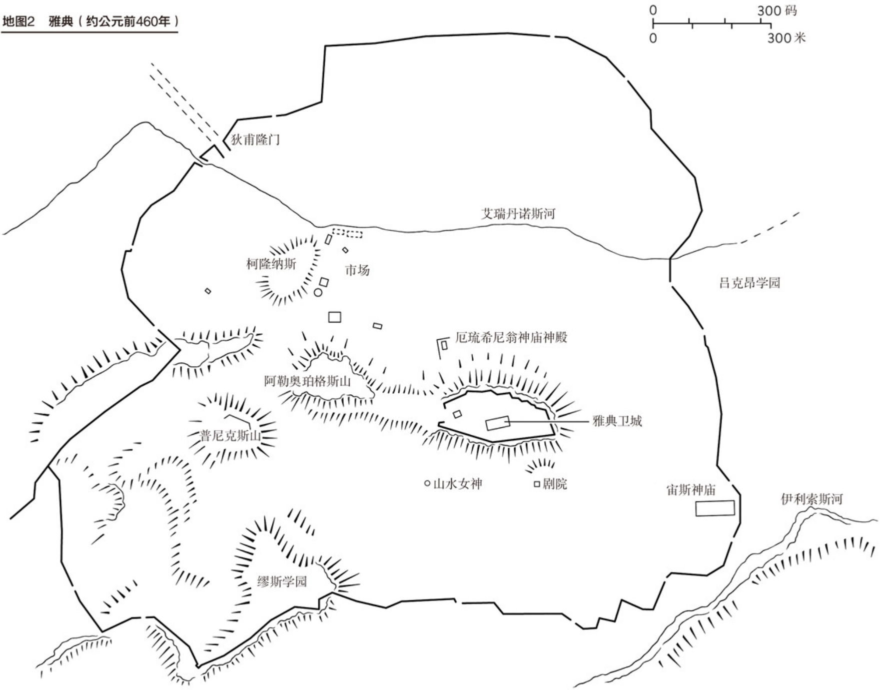
[29] 参见：Ober 2000。

[30]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第四章

德性



地图2 雅典（约公元前460年）

本章将探讨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如何批评雅典的民主政治，他们在更广泛意义上提出了关于人类的生活目标及其最佳政治实现场所的见解。为此在上一章描述的雅典民主政制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雅典的民主派运用政治权力追求的目标与价值是什么？它们主要是城邦以及个人的生存、财富与权力。对城邦来说，这些可以通过帝国来实现；对城邦内的个人来说，大部分人则去追求自己的财富与权力。财富可以通过经商、婚姻或掠夺的方式来实现；而对于那些不擅长技艺的人来说，他们通过谋求政治与军事的领导权来获得长久的荣耀。如果说政治是一个人赢得朋友与声誉的最佳领域，那么它同样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在担任公共职位的时候，你要对自己不好的建议或不法的行为负责，因此你就可能面临倾家荡产、被放逐或死亡的危险。任何追求功名的行为都可能面临被“陶片放逐”的危险。政治家以及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而成名的大人物的成就，乃至自身的生存，可能最后都要取决于他们“用各种演讲在法庭之中说服法官，在议事会之中说服议事会成员，在政治会议或任何其他地点的政治集会之中说服与会人员的能力”。这是柏拉图著作中智者高尔吉亚——一位来自于西西里岛的莱翁蒂尼（Leontini）的公众人物，此刻正以教师的身份造访雅典——的观点。[1]

尽管雅典民主格外重视公开的发言，但是它并没有教授青年人如何

发言的公共教育。因此，那些能够找到私人教师帮助训练自己的演讲与辩论能力的人就积累起了巨大的优势，他们或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雄心，或者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受到起诉时能够进行自我辩护。外邦的修辞学家与智者们纷纷涌进雅典，他们与当地的修辞学家和智者们一道纷纷向年轻人传授如何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讲的技巧，以帮助他们在城邦内赢得权力与威望。一些人教授语法，一些人教授词源学，一些人教授辩论技巧，这些都是辩论双方共同需要的能力。这些自封的专家们大多先入为主地认可了财富与权力的价值，认为它们是个人及城邦预设的价值目标，故而着重研究如何用更灵巧的手段先人一步地获取财富与权力。卓越，或者德性（arete，这个希腊单词的意思是指某一事物成功发挥其应有功能的能力）的意思是从寻常的政治角色中脱颖而出，使人民接受你的建议，而不管你运用什么必要的手段。这将给你带来大部分人朝思暮想的快乐、财富与荣耀。

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批判了当时的这种普遍看法。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名雕刻师，但他本人却抛弃了石匠的职业转而一生致力于挑战当时主要的智识与政治名人，同时他还向年轻人承诺传授给他们所期望的价值意义。为此，他揭露了城邦的优先事务及显赫名人身上存在的明显矛盾之处。他致力于在市场、体育竞技场以及家庭的私人宴会、聚会中提出诸如此类的质问，因此他早已声名狼藉。他从来不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上发表公共演讲（尽管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军事义务，并且还被抽中担任了一年的雅典议事会成员）。像柏拉图那样的年轻人聚集在苏格拉底的周围，他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过良好生活的别样路径，这与城邦官方推崇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

苏格拉底七十岁的时候，几名雅典同胞以亵渎城邦法律的罪名起诉了他，我们稍后将对此一探究竟；他被自己的同胞组成的法庭陪审员宣判有罪，并且要接受服毒自尽的惩罚。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众多追随者各自撰文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Sokratikoi logoi*），以展现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最后的受审与处决，以及他不断对雅典和外邦的精英人物的道德与政治缺陷所做出的诊断。在苏格拉底的众多追随者中，没有人在哲学上表现出比柏拉图（公元前424—前348年）更远大的抱负。柏拉图著作全集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大量描述，这成为本章关注的焦点。尽管整章援引柏拉图的著述而打上了柏拉图自己思想的印记，但是本章前半部分将讨论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生活与死亡的诸多内容同样体现于其他追随者的记载之中。本章后半部分将探讨柏拉图自己的生活，为此我们将审阅他的几部重要著作。

苏格拉底向他的公民同胞们提出了一系列极难回答的问题：如果城邦在官方上严斥暴君统治，那么为什么它自己在外邦表现得像一个暴君？如果一个人去追求无限的财富与权力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与之相反地，为何雅典公民通过帝国的统治而集体地追求之就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个人在不知道战争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他奋而参加战斗是真正的勇敢吗？一个人在别处欠下道德的良心债而期望神灵对自己置若罔闻，这是正义或虔诚的吗？他揭露了隐藏在智者高尔吉亚之流所谓的社会表象之下的真实情况，个人的成功与城邦的集体繁荣之间存在一种破坏性

的紧张关系。修辞术在一般意义上可能是人类“自由的源泉”，但是智者们同样认为它是一个人用以“控制城邦其他人的源泉”，一个人可以利用修辞术掌控别人的自由。在城邦对修辞术与政治义务一致称颂的掩护之下，某位寡廉鲜耻的公共发言人可能正在对民主政治本身造成伤害。[2]

与雅典及其他政体极度推崇财富与权力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应当劝诫希腊世界的年轻人去追寻“德性”的意义，这才是人类应该追问的基本问题，也是所有政治家之为政治家的前提。正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在针对自己的审判中发表的演说）中苏格拉底告诫陪审员的一段话：

> 我私下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对其他事情也要按同样的方式关心（36c-d）。[3]

如果政治家与智者们都不去想办法使人变得有德性，他们说服别人的能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德性，他们对人们有何益处呢？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二人切中肯綮，极为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固有的答案——城邦内大部分有为青年与显赫人物所遵循的智识与政治道路——在此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了。城邦里过这种生活的人没有谁能够定义德性，或者能够牢靠地把德性传授给别人。

无论是在故土雅典还是作为军人远赴异乡，苏格拉底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都思考着上述这样的问题。他早已经声名狼藉，在喜剧舞台上遭到阿里斯托芬三部不同剧作（还包括至少其他四位剧作家）的嘲讽。在公元前423年完成的第一部剧作《云》（*Nephelae/Clouds*）中，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一名显而易见的智者并开创学园收取费用；但他暗示了苏格拉底与普通智者不一样的地方，即苏格拉底的智识造诣无法提供学生们所期望的平步青云之路。不管这是对诡辩之术的一般批评，还是对苏格拉底超脱于世俗价值的衷心认可，阿里斯托芬此剧都是对苏格拉底的嘲讽。他嘲讽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没有任何的效果。

当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妙的时候（阿里斯托芬后来关于苏格拉底的剧作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分别在公元前414年与前405年），声名狼藉的苏格拉底步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此时发生了针对苏格拉底的年轻朋友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的起诉事件，他被指控亵渎神灵以及反叛的罪名。与此同时，雅典正在孤注一掷地对叙拉古进行军事远征。苏格拉底的处境随着公元前404年雅典输掉战争以及“三十僭主”的上台执政而恶化；当时雅典迫于斯巴达的压力而建立了“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它驱逐了城邦的很多公民，并且运用手中的皮鞭与刀剑实行暴力统治。其中的两位（克里提亚斯［Critias］与查米德斯［Charmides］）与苏格拉底私交甚密，同时也是其追随者柏拉图

的亲戚。苏格拉底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选择留在了雅典，似乎当起了他们的顺民，而此时民主政治的大部分追随者（包括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选择避难于港口。[4]在此之后，民主派再次集结力量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恢复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恢复三年之后的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三位公民同胞起诉，他被指控亵渎城邦法律、传播外邦神灵以及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这与公元前404年的政变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指控他为短命而高压的寡头政治负责的行为将违反民主政治恢复后所推行的对他们不予追究的特赦政策。然而，法庭陪审员无法忘记克里提亚斯与查米德斯在政变中的所作所为，或者阿尔喀比亚德在之前战争中表现出的亵渎神灵与反叛行为。所有这些事件使得起诉人容易把苏格拉底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描述为对城邦法律规定的良好的公民标准的亵渎。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在审判的时候还拒绝使用修辞术的伎俩，为自己的生命乞饶而阿谀陪审员；这无疑加剧了苏格拉底的不利处境，苏格拉底最终被宣布有罪，并且被判服毒芹汁自尽。苏格拉底的生命及其死亡共同改变了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主题设置。在柏拉图的塑造与转述之下，苏格拉底把“德性”从时下对成功吹捧追逐的诸观念中解放了出来，进而把它变为伦理学与政治学分析的反思标准。

行动中的苏格拉底

正如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虽然“virtue”（德性）是古希腊单词*arete*的一种英文译法，但是*arete*还可以被翻译为“卓越”（excellence）。在现代英语之中，特别是受到数世纪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德性一词听起来特别不切实际，它的意思好像是在说一个人无法在此生获得任何实在的利益，而只能谋求来生的奖赏。与此相反，古希腊词语*arete*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得以蓬勃发展的固有品性。一把锋利的刀具有削铁如泥的*arete*。某事物的德性恰在于使其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Arete*的反义词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罪恶，还指某物在其实际功能上的失效。

古希腊的诗人们赞扬德性的多种具体形式：智慧、勇气、节制、正义与虔诚。据说这些德性得到了众神的青睐，一个人因此可以在此生与来生都能获得奖赏——正如第一章我们特别考察的正义。然而我们在那里也发现，德性的故事正在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了。德性无法换来奖赏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一个节制的人可能会受到别人贪欲的伤害，或者一个正义的人会因为别人的不义而受到伤害，正如赫西俄德描绘的那般，他被自己的哥哥骗走了一块本该由他继承的土地。除此以外，各种德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受到质疑。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一个人可能是勇敢的，可他并不聪明，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作品《埃阿斯》（*Ajax*）的故事主角。阿喀琉斯死后，愚笨的战士埃阿斯痛斥把阿喀琉斯的盔甲奖励给深谙世故的奥德修斯的决定。然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不把正义、节制与虔诚的人视为聪明的，而是愚笨的。他们遵守规则，定期向众神奉献贡品，而别人却

不那么审慎正直，坑蒙拐骗着他人的土地或金钱。[5]人们担心诸多德性形式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也担心德性本身就是适得其反的，这种情绪使人们很难恰当理解一个有德性的人可能以及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在一个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焦虑情绪的城邦里，苏格拉底不断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揭露活动。他追问城邦内本该最博闻强识的人什么才是——他们自称拥有的——德性。一次又一次地，他们都无法做出回答，无法说明能够传授或实践什么德性，同时他们也无法把德性与良好生活的更宏大目标联系起来。柏拉图的对话录向人们描述苏格拉底揭露了雅典最让人钦佩的两位将军无法令人满意地定义什么是勇气的事实。苏格拉底表示一流的智者们——自称可以教授德性的一批人——无法定义什么是德性，试图推行城邦关于虔诚的法律的活动家同样也不能清晰地界定他们所提倡的虔诚的本性（这在当今也非奇闻）。

在宣称了解某些事物的基础上，以上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定义它们各自是什么。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21d）中，苏格拉底表示他们不清楚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事物。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没有陷入这种虚假的自负，所以这激励了他以向专家们质问的方式去寻求知识——尽管那些专家一次次地让他失望，其中一些人最终沮丧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一些人则因苏格拉底的嘲讽或捉弄而心生怨恨。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关于德性与良好生活的知识。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声称他可以定义什么是德性，他把诘问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之上，让所有参加对话的人都无法摆脱：为了拥有一种德性，你必须拥有所有德性，也就是说（考虑到智慧也是德性的一种）所有的德性实际上就是知识。一个人在不知道什么是可怕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勇敢的；一个人在不知道渴望的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表示渴望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节制的；一个人在不知道对旁人有所亏欠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正义的。[6]

苏格拉底追求德性与知识，或者说是作为知识的德性。这是对压在城邦人民身上使他们无法呼吸的其他目标价值的反抗。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权力与财富是不稳固的，它们无法令人满足；尤其是当它们被盲目地使用的时候，更可能伤害你，而非带给你好处。只有知识才可以保证我们所追逐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只有德性才是对事物固有的、绝对价值的占有，而不受其使用方式的制约。苏格拉底对德性之固有价值的阐述方法集中地反映在了其对*psyche*的关注之上，这个古希腊词的大致意思是灵魂。灵魂激活了肉体，并且根据希腊神话，它又独立于肉体，可以重新寄居在不同的肉身之上。苏格拉底坚称只有灵魂的纯洁与健康才跟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灵魂因此是个人的真正身份。有利于灵魂的行为就是德性的行为；有害于灵魂的行为就是邪恶的行为。那些通过不义行为——偷窃或者通过美酒、美食或性来填补自己的欲望——而追逐肉体快乐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追逐的肉体快乐对他们本身无益，因为他们牺牲了最重要与必需的良善，他们原本可以追求那些相对来说更有意义的快乐。

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对话的最后一个策略是这样的：他声称自己并不掌握最重要事物的知识，也并不掌握德性的全部知识，然而他给

观者的印象是相当有德性的。他有着节制的欲望，在作战时也相当勇敢（他救了阿尔喀比亚德一命，然而却让这位年轻人担负勇敢的美名），同时他也是公认的敬神的模范（尽管他在审判中受到了指控）。最为出色的是，他高度重视正义的价值，他宁可承受不义的后果也不愿去行不义。根据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记述，当苏格拉底遭遇不公判决时，他默默承受并因此而死。他宁可承受死刑的不公裁决，也不愿自己行不义去逃避它。苏格拉底执着于深刻而彻底的自我反省，他至诚地反对权力与贪欲的虚假神灵，继而拥护知识的价值，并且一生对之孜孜以求，不懈探索。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按照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思想与品性。虽然他否认掌握全部的知识，但是他把知识与德性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这使得他比周围任何人都更有德性。[7]

苏格拉底与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在挑战了雅典的将军们、智者以及其他同代人之后，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政治人物也无法逃脱他的责难。提米斯托克利打赢了海战，但是帝国因此获得了什么好处呢？伯里克利在城市周围建立起了高高的围墙，使城邦金银满地，并且使用精妙的大理石雕像来装饰巴特农神庙，但是他能向人们指出哪个公民因此而变得更有德性了吗？他们这些人以及跟他们类似的人给人民出谋划策，然而他们甚至都被人民处罚或者放逐过。这说明他们无法真正达到优秀政治家的标准，他们没有让人民变得更公正，只是让人民变得更不公正而已。当然，苏格拉底承认那些过去的大人物“比现代的人更聪明，因为他们为人民创造了船舰、围墙、船坞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Grg.*517c），然而他们也仅仅是满足人民心中的欲望而已。他们早该发觉人民内心的欲望根本就是不值得满足的。

这使苏格拉底步入了悖论之中。他自己不沽名钓誉，不试图成为卓越的人民领袖。尽管他在雅典军队服役期间作战勇猛，并且后来因成为议事会成员而有望走上仕途，但是他从不在政治会议上发言，也不常常出现在法庭之中。与此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哲学，与别人对话，向人们追问什么是德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没有把苏格拉底丈量跳蚤跳跃距离的行为视为难以理解以及毫无用处的，但是对像卡利克勒（Callicles）这样自负的人来说，那就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了——只知“终生躲在某个角落里和三四个小孩窃窃私语，不能以自由、崇高、辉煌的风格说话”（*Grg.*485d-e）。实际上，正如卡利克勒警告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之后描述了这个警告——的那样，如果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做任何不义之事而被控以不义之罪名”（*Grg.*486a），这样懒散无用之人将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在城邦之中赢得任何名望了。

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回击策略，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重新定义，宣称自己是所有雅典同胞公民中唯一“从事真正的政治技艺并且实践政治的人”（*Grg.*521d）。如果说政治的恰当目标是关心公民同胞的灵魂，那么只有苏格拉底自己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其他人都把

自己以及其他公民同胞的灵魂出卖了，因为他们都自私地追求物质或名望。

通过提供关于政治的诡异定义，苏格拉底颠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固有逻辑。我们在第三章已经发现民主政治是关于如何运用说服的权力去追求大多数人或公共利益的活动。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是关于如何以审慎的质问来进行论辩的权力，它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德性，这是唯一有益的事情。正如柏拉图《拉凯斯篇》（*laches*）中的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所以我想，作一个好的决定要依据知识而不是依据人数"（184e）。一个真正的政治专家不能依靠运气或举手表决的方式产生。他因自己的智慧而合格，因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具备的使公民同胞更公正的能力而为人知晓。伯里克利及其他政治领袖们不仅在城邦内无法达成这些目标，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也办不到，他们甚至都不能使自己的孩子们富有德性。

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政治领袖的专业技艺无法像对医生或造鞋匠在各自行当所拥有的专业技艺一样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要指望他们统治得很好。民主派认为任何公民实际上都具备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然而苏格拉底坚称专家与非专家之间存在一条理论上的鸿沟，尽管他深刻地揭穿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专家们，并且否认自己是一个专家。在他看来，如果任由无知的人民群众掌权，那么这不会也不可能达成政治的最高目标。

苏格拉底没有把对无知群众统治的责难仅仅局限于民主政体。只要不是由有知识的人进行统治，没有什么政体形式——君主制、寡头制、僭政——能够使人民过一种优良生活，能够培养人民的德性——德性才是苏格拉底所真正钦羡的东西。德性与知识的标准太高了，任何现实的政体形式都无法轻易达到。就此而言，它们是所有现实政体形式的有意义的评判标准，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别的什么政体形式。除了在军队服役期间，苏格拉底本人从没在雅典城邦以外的地方生活过。尽管城邦在苏格拉底的眼中存在种种缺陷，但雅典还是赋予了他数十年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也很可能是因为雅典对言论自由这一政治价值的推崇，才使得他一生致力于此。然而，很多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认为斯巴达式的纪律与自我克制等习惯才比较符合苏格拉底的严苛要求，而不是悠闲自在、喜欢愉悦与新奇事物的雅典生活方式（即便人们普遍认为雅典比斯巴达更欢迎哲学）。[8]被苏格拉底搅动不安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的很多人把他对德性与知识的颂扬视为他贬低民主政治的原因，尽管他们也可能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某些长处，或者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做民主政治的公民。

审判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追随者竞相记述其在法庭审判上所发表的辩护词——希腊单词*apologia*，英语单词"申辩"（apology）的词源，以及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他的起诉人所发表的量刑演说。其中的一位记述者是雅典人色诺芬，他曾率领雇佣军前往波斯打仗并且安全返回，之后

他又与斯巴达人并肩战斗反对雅典人，因此遭到了雅典的驱逐，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外邦，直到最后与雅典冰释前嫌。在色诺芬的版本中，每一项针对苏格拉底的控诉理由——不承认城邦的神、传播外邦神灵以及腐化青年人的思想——都是不真实的。对色诺芬来说，苏格拉底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模范公民，他完美地呈现了一名正直的雅典公民的形象；苏格拉底为了防止德性随着年老而衰退，拒绝为苟且偷生而阿谀陪审团，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死亡。

与色诺芬的版本相反，柏拉图版本中的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极有态度，他与当时正直的雅典人的应有反应极不相同，他的自我辩护是特意为之且引人注目的。苏格拉底没有谦卑地乞求或讨好陪审团，他毫不含糊地告诉陪审员说自己不是城邦的威胁，而恰恰是神灵对城邦的馈赠。苏格拉底为神灵所派遣，他到雅典是为了唤醒雅典人民。他是城邦的好公民，但不遵循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之中当众发表演说的寻常路径，而是逢人就质问他们各自宣称所知道的事物。“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它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苏格拉底的申辩》30e）[9]

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之后，他被要求提出针对起诉人的死刑惩罚的反量刑建议（雅典法律要求陪审团要么采纳起诉人所建议的刑罚，要么实施被告所建议的刑罚，除此以外别无二途）。柏拉图描述说苏格拉底此刻的表现不可能不激怒陪审团。苏格拉底首先表示他理应受到与奥林匹克比赛获胜者一样的对待，即在城邦内终身享受免费的饮食（36d）。尽管最终苏格拉底提议对自己处以罚金，作为正式的反量刑建议，但是他所建议的罚金数额少得可怜，根本与他被控的罪名不成比例。毫无意外地，最终实际上有更多人数的陪审员投票同意处死苏格拉底，数量比先前判其有罪时还要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苏格拉底与一个典型的雅典法庭陪审团的价值理念截然相反。陪审员们习惯于认为死刑可能就是人们所能想出的最重惩罚。然而，苏格拉底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死亡只能伤害一个人的肉体，无法触及人的灵魂，灵魂在他看来是不朽的。实际上，如果把他关于德性与知识的论证应用于具体实践，那么苏格拉底认为正因为他不知道是否需要害怕死亡，所以他才不害怕死亡，其他人也不应该害怕死亡（柏拉图提出了关于死亡的一般哲学见解，这与色诺芬的版本并不相同，后者认为避免死亡纯粹属于个人行为）。因为死亡是起诉人所能请求法庭陪审团实施的最重处罚，但是死亡无法伤害他的灵魂，也就无法伤害他真正的自我，所以苏格拉底没有理由不接受陪审团的判决。

唯一的例外是假设性的，因为有一种刑罚是任何现实的雅典法庭陪审团从未给出过的。在柏拉图的《申辩篇》（29c-d）中，苏格拉底谈到说如果陪审团判决他停止哲学思考，他将不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样一种惩罚违背了苏格拉底对一条神谕的理解，即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之所以要考察他所遇到的那些自称有智慧的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条神谕是正确的。如果他违背了自己对神谕的理解，那么就将亵渎神灵而是不义的。然而这种假设的不足之处在于，苏格拉底愿意

接受雅典人施加给他的所有惩罚。他坚信身体的伤害、监禁，甚至死亡都无法真正地伤害他，只要不伤害他的灵魂。[10]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他被关在监狱之中等待行刑的时辰到来。据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拒绝了密友克里同（Crito）乞求他逃跑的建议。克里同想好了整个计划，他可以买通监狱的守卫，然后偷偷地让苏格拉底流亡外邦。在古希腊，被告人为了逃避死刑而流亡外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只要永远不回故土，他们很可能也就能逃避死刑的惩罚。然而，苏格拉底拒绝逃跑。接受惩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或不义，因此他没有逃避它的正面理由。[11]

苏格拉底的哲学并不使他反抗城邦。实际上，他的哲学使他走向公民的服从，而非不服从，但是先入为主的为公民不服从进行辩护的现代学者经常希望或想象事情不是这样。在苏格拉底自己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他拥护城邦的法律（正如他所言，当轮到他以议事会成员的身份主持人民的政治会议时，他拒绝把不合法的建议列入议事日程）。[12]就其个人而言，他拒绝行不义以及惩罚无辜之人（如其所言，他拒绝执行三十僭主的命令抓捕一名无辜者并处死他）。他还选择待在监狱里等待行刑，默默承受不公正的遭遇，因为这不会使他陷入任何不义的境地。然而，他发现积极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实施有意义行为的合适场所。只要日常政治对德性追求漠不关心，不把德性作为自省的批判性标准，它就不是苏格拉底的竞技场。实际上，苏格拉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激励公民同胞像他那样去追求德性与知识，他试图改造单独的个体，而不是运用政治制度从总体上改造城邦。他可能事先就知晓了一个道理，即当一个城邦的大多数人醉心于贪婪、欲望与权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成功地运用政治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苏格拉底打算去改变雅典的政治，那么他选择一次只改变一位公民。他反复盘问那个人，希望可能引起他或旁观者的自省。

进入柏拉图

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发表演说，但当然不是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上，而是面向个人以及各种小团体，他向听众提出各种挑战与问题。苏格拉底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教师；他在正规的体制之外，以个体、非正式的形式完成着自己独特的工作。与苏格拉底相反，柏拉图大部分的成年时期一直致力于写作与教学；起初他与追随者们聚集在运动场一起讨论数学与哲学，之后他创立了名为学园的高等教育机构。我们对学园具体承担哪些功能知之甚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学园里学习数学与逻辑学、演练辩论与公共演讲。学园至少有一名女扮男装的学员。[13]雅典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前去学习，除此以外学园还有大量的外邦学员，比如亚里士多德。我们仅有关于学园口语教学的少许模糊的线索。

我们现在拥有大量柏拉图式著作，特别是他的各种对话录。这似乎是他与别人共同发明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些对话录通过苏格拉底的人物角色特别能传递出对话的不可泯灭的力量。在柏拉图的大部分对话录

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要角色；在其余大多数里，他也是次要角色。只有一部对话录著作，即《法律篇》里没有苏格拉底。[14]我们认为柏拉图所有著作都完成于苏格拉底死后。苏格拉底的死亡曾促使柏拉图一度出走雅典到外邦游历，直到最后他重回雅典。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城邦，它是艺术与智识创造活动的中心，并且正处在帝国力量的强盛时期。在城邦之中有一位出生于显赫家族（他的母亲这边与令人尊敬的立法者梭伦，以及克里提亚斯与查米德斯都有关联；其中后两位都是声名狼藉的三十僭主的成员）的年轻人。对这样一位富裕与出身良好的男孩来说，成名的机会不可谓不多。他可以成为像伯里克利那样的将军，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剧作家（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年轻的柏拉图确实创作了几部悲剧，但当他遇见苏格拉底的时候，把它们都烧掉了），或者像希罗多德那样的历史学家，在节庆日的时候吟诵历史以赢取公众的赞誉。

他的父母以及朋友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通往荣耀的道路，但是柏拉图一条也不选。相反，他在自己成长的关键时期死心塌地追随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过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并非什么富裕的贵族子弟。柏拉图抛弃了参与民主政治以及继之而起的寡头政治的抱负，转而致力于观摩与聆听他的精神导师对别人的无尽问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幅场景，也许并不十分离谱：母亲和继父已经抓狂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孩子被人洗脑了，抛弃了传统标准下一切与成功人生相关的计划与抱负。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喝下毒芹汁身亡时，柏拉图大概二十四岁。[15]在外邦游历了大概十六年以后，他回到雅典创建了学园，并且很可能在这里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对话录著作。奇怪的是，他把所有著作里的时间设定在了前一个世纪，而不是他写作的时间。他描述了众多重要的人物角色，但当时柏拉图自己可能还没出生。这就像一个生活在2014年的雄心勃勃的美国作家、思想家，但他把自己所有的每一部的著作讲述的时间都设定在约翰逊、尼克松与福特的年代，他执迷于“水门事件”这样的故事而让自己的作品充斥着事件的早期迹象。读者往往会忽略他著作的这一特点。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对柏拉图的致敬：因为他的作品给予了我们关于公元前5世纪如此之多的信息，他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以至于使我们几乎认为它们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产物，而不是四十多年以后。然而，当柏拉图在做这些迴溯历史的创作时，他很可能也已经着手评论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了。因此，把他的著作置于双重视角下的做法——一边是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背景，一边是公元前4世纪的创作背景——将使我们受益颇多。

从公元前384年（柏拉图可能已经四十岁）开始，一直到公元前348/347年（柏拉图去世），雅典社会始终处于动乱之中。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后确立起来的优势地位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因为雅典、斯巴达、忒拜以及波斯各方之间相互施展权谋来谋求优势地位与联盟，同时各方内部也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使整个局面甚为复杂。距柏拉图去世前十一年的时候，腓力二世（PhilipII）被任命为马其顿的摄政王。马其顿是希腊的边疆领地，一直由希腊王室所统治，当然腓力二

世也是王室的一员。腓力二世不断在周围地区的塞萨利（Thessaly）积聚实力，从此以后如何应对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就成为雅典政治的主要议题，当然也使雅典政治出现了分歧。为捍卫独立，雅典是应该采纳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建议而对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发动战争，还是应该采纳德谟斯提尼的反对者的主张而与之缔结和平协议？（柏拉图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则更大胆地指出，腓力二世是使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反抗波斯的潜在救世主。）后来和平派所发布的演说充斥着柏拉图式的意象与语词，这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柏拉图的思想，或许有意让其充当反对再次掀起战争的政策顾问。[16]

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城邦及其统治者都赤裸裸地施展权谋去追逐权力，毫不顾忌高尚的政治原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希罗多德从道德的角度对比了纯洁的波斯战争与后来希腊人打击希腊人的内讧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对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雅典人来说，这后一场战争的道德性也是不容置疑的。雅典为了捍卫城邦的自由与民主政体而反抗斯巴达的压迫与寡头政治。（比较一下冷战：尽管冷战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存在各种问题，但与后冷战时代比起来，过去的冷战时代有时显得相对简单，它的道德是非曲直也显得相对清晰。）然而，柏拉图通过自己的著述向这种简单幼稚的往日自信宣战。他的对话录著作大多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背景，它们表明尽管雅典人明白他们为何而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雅典人喜欢把反抗斯巴达的战争视为争取自由、独立与民主的战争。然而，柏拉图暗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毋宁是一场为了战利品与帝国统治权力的战争，它全然不顾什么德性或正义。

修昔底德与苏格拉底（就我们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区分开来，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重构的意义上而言）早已经着手批评伯罗奔尼撒战争了，但柏拉图则更进一步。一个人在读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后会发现，唯一的问题是雅典在外邦推行的帝国专制。正如一战前J.A.霍布森（J.A.Hobson）对英国的政策建议，如果摆脱帝国的专制，那么民主政治在国内也可以真正地繁荣起来。然而，柏拉图认为问题要严重得多。国内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混乱的，它混淆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拥有与追求的。这才是帝国主义的病根。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失败，它根源于人们的贪婪与权力欲望。苏格拉底没有把欲望与贪婪从所有雅典人的灵魂中成功剔除。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获得成功。通过著书立说，柏拉图有可能影响更多的读者，他不仅仅督促人们自省，而且告诉人们正义真正要求的是什么、成功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什么样的渴望与追求才是最有意义的。

《理想国》：一个关于正义的更为深刻的案例

以下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即英文世界所谓的《理想国》将要探究的基本问题。这是一部极其著名的著作，因为它把人类所能享有的最好生活与最好的城邦政制形态联系了起来，并且第一次对之做了全面的分析。它还是西塞罗、奥古斯丁、卢梭等后世思想家对心理学与政治学进行反

思的榜样。此书的希腊文标题是“政制”（*Politeia*），即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宽泛意义上的政制（constitution）。在公元前1世纪的色拉西洛斯（Thrasyllus）的编著版本中，它还有一个副标题“论正义”，即我们第一章讨论的希腊思想的核心观念。正如它的主副标题所示，该对话录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这本书谈到现在的基本问题：是否有一种政制形态或政治组织结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是正义的而非剥削的？在柏拉图这部对话录的主体部分，苏格拉底通过与柏拉图的两位兄弟的对话直面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描绘了一幅城邦的图景：其中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时也应是哲学家，他们不是剥削人民的专制主或主人，而是人民的奴仆。因为他们是哲学家，所以他们按照真正的善而统治。因此他们能够遵循真实价值的标准，既可以塑造城邦的行为，又可以培养公民的良好品质。

《理想国》在权力之外重新设置了一些新的目标，并且还对达成目标的适宜手段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机制，比如修辞术、抽签，甚至选举等在这里都没有作用。相反地，在这个“理想城邦”（*Kallipolis*）里，统治者在苏格拉底于其他场合所想象的真正德性的基础上产生。他们由事先指定好的夫妇优育而生，然后经过考验之后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一切都取决于知识与德性，我们将会发现这两者同根同源。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之中，大多数人才能够培养起自我控制与纪律的意识，然后再辅以知识的力量，他们才有能力避免行不义而伤害各自的灵魂。这样一个理想的城邦最终将成为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少数优秀的哲学家得以守护自己灵魂的前提条件。

《理想国》以一则关于正义的老套故事为开端，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幸运的老年人克法洛斯（Cephalus）。克法洛斯是一位富裕的“梅迪克”（外邦人），他经营着生产制造的买卖，但是他的财富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寡头政变的威胁（他有一个儿子因为是民主派而后遭到了暗杀）。克法洛斯坚守着关于神灵与德性的传统观点。它告诫人们应多行正义，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正义”意味着人应该向神灵奉献贡品，向别人偿还债务。传统的正义观在克法洛斯的身上是有效的。他足够幸运，不用太挣扎就能偿还债务，也没有遭遇圣经中的约伯那样的厄运。他拥有传统观点所认可的德性，在神灵以及众人眼中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与此同时，克法洛斯不断衰老的身体机能也降低了他的各种欲望，使它们再也无法影响他所承诺的虔诚与正义了。他向神灵奉献贡品就是保持虔诚与坚守正义的双重体现。

然而，对在场的很多人来说，克法洛斯的老套故事不再奏效了。很快另外一个人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参与了对话，他是一位来自卡尔克冬（Chalcedon）的厌世之人，当时正在雅典履行外交任务。他表示这种传统的正义观是一场骗局。[17]伦理学上没有正义价值这一说，因为政治上的正义根本不存在。每一个城邦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人民，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定义正义：“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344c）。[18]色拉叙马霍斯的意思是说，比如当克法洛斯在雅典城内向别人偿还债务的时候，他对城邦掌权的人民有利，但是人民设置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规则（比

如，他们可能否认先前还债行为的有效性而达到剥削贵族的目的）。因此，克法洛斯的还债行为实际上受到了人民的剥削。从更一般意义上说，在一个充满剥削的世界里，正义与自制无法获得个人的幸福，它是一种自虐的手段。正义对个人不利，它毋宁是一种个人被利用来为别人谋利的方式。

色拉叙马霍斯立场相当坚定，当苏格拉底施巧计试图说服他的时候，他不为所动。苏格拉底认为统治者既然是统治者，他们必须为人民的真正利益去着想。只有当统治者自己老想着去赚钱的时候，他们才只会要求对自己有好处。然而，对描绘了一幅如此惨淡的社会图景的人来说，苏格拉底的这种论辩不太可能具有说服力。当时在场的柏拉图的两位兄弟也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观点，但是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观点。柏拉图的两位兄弟参与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色拉叙马霍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正义的理由的时候，他的观点太过绝对了。即便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穷人们仍然可能有理由去尊重关于财产的各种规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那点微薄财产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柏拉图的一位兄弟格劳孔（Glaucon）表示，正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一个人有真正的好处，但是它仅仅是第二位的选择。一个人的最佳选择是成为僭主，只为自己牟利而为别人制定规则，这正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暗示的意思。另外一个兄弟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补充表示，传统正义观所承诺的实施惩罚的主体即神灵已经土崩瓦解了。这要么是因为神灵对人类事务漠不关心，要么是因为神灵能够被祈求者与贡品所收买。贡品不是人们向神灵偿还的债务，而是一种贿赂。环顾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阿得曼托斯此处对社会的看法的确与圣经人物约伯的某些血族同胞的观点类似，他发现不义之人飞黄腾达，以至于使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即神灵允许自己被收买。因此一个人没有理由再去相信传统的正义观了。然而，这两位兄弟都坚称他们不愿相信自己所宣扬的内容是真的。这些愤世嫉俗的看法都是道听途说的，来自于城邦的众多显赫人物以及造访雅典的智识名人们。两兄弟敦促苏格拉底去捍卫正义的价值，敦促苏格拉底向他们说明正义对个人真的是有好处的。如果正义的价值能够被证实，那么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正义就不总是等于剥削了。

苏格拉底做出了一个日后著名的推进，来捍卫正义，他把个人的灵魂[19]——人们所期望的正义寄居之地——类比于城邦的灵魂。他建议人们在城邦里讨论正义是什么，并把它作为寻找个人灵魂中的正义是什么的模型，因为与小字比起来，人们更容易读出那些大字来。他眼中的城邦由三个部分组成，因此个人的灵魂也是如此。在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之中，他声称辨别出了四种德性：智慧、勇气、节制与正义。不单单是城邦及其柏拉图式的三部分结构是政治的，个人灵魂的各部分同样也是政治的。因为通过它们的相互关联，城邦与个人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如果人们装模作样地注重荣誉，但背地里却渴望金子，就像苏格拉底后来所描述的荣誉之治的不稳定政体那样，其本身就易于倾覆，因为一座大厦如果只是表面富丽堂皇，那么它必将坍塌。（试想一下前苏联

最后的光景，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人们突然发现没人再愿意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了。）如果渴求财富与享受，人们之间必将产生的不平等会最终摧毁经济秩序，因为穷人们最后将会发现他们是人数占优的一方，因此他们比富人天生更有力量。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形，不愿接受教育而只执迷于自己善变的冲动，那么他们就易于聚集在一位拥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周围，民主政治就有沦为僭政的危险。

城邦的教育塑造着个人的心灵与品性，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只有这样的政体才是长久的。“理想城邦”是第一长久的城邦，是唯一真正的统治形态，其他的统治形态最终都是赝品或冒牌货。苏格拉底没有依靠神灵奖惩的传统正义观，他构筑的奖惩主要基于个人的内心。即便一个人考虑来生，那也是对那个人此生选择追求正义或不义的回应。苏格拉底在对话最后阐述的一则神话故事表明了这一点：神灵与命运决定着一个人的来生，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机会去选择他或她的来生（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限制），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取决于人们前生的正义或不义情况。因此，来生的正义全然取决于一个人有生之年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受制于外在的，因此有可能是专横随意的神灵的直接奖惩。

苏格拉底以描绘城邦的起源展开讨论，它似乎没有理由是不义的，或许可以说它是自然正义的。这是一个存在着简单劳动分工的原始城邦，比如制鞋匠拿他们的产品与农民交易以换取食物。只要人们的需要停留在完全基本的水平上，只限于食物与衣服的质朴乡村需求，人们就没有行不义的动机，因为人们没有过多的欲望驱使他们行不义。每一个人凭着自己的技艺对城邦有所贡献，但除了与之而来的适度奖赏（简单的乡村饮食）以外，人们没有过多的贪欲。

然而，格劳孔对这样的城邦并不满意。对一个生长于雅典的富裕年轻人来说，这样一种简朴的乡村社会显得过于原始了；何况当时雅典是社会结构最复杂、最热爱艺术的世界大都。为了安抚格劳孔，苏格拉底允许奢侈享受进入他们所想象的城邦，使人们拥有较多的欲望，甚至刺激人们形成较大规模的消费。然而这将导致早期的城邦居民发动战争，为此就需要战士。苏格拉底此处走出了极富意识形态意义的一步。在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民自己就是战士，然而苏格拉底表示，城邦需要构建一个独立的军事阶层。这些卫士对外承担防御的功能，但他们在城邦内同时还是监督者，具有捍卫城邦政制的功能。因此，防卫成为城邦基本的政治任务，他们既要保护城邦的政制，又要防止外邦人的入侵。根据军官与士兵的军事分工，卫士阶层又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更年长、更智慧的阶层，他们是统治者，一类是相对年轻的阶层，他们是前者的军事助手。在卫士阶层内部，对话中第一次出现了统治，然后统治才扩展到整个社会，即智慧阶层统治全体公民。[20]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城邦真正的德性呢？它们存在于各阶层内部，以及各阶层之间。存在两种显而易见的德性：智慧是统治者的德性，勇气则属于军事助手们。节制与正义则存在于各阶层的相互关系之中。苏格拉底把节制定义为各阶层之间的协议，它们都同意由适合的人来统治。节制意味着另外两个阶层，即士兵阶层与乡村生产者都同意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欲望。读者们最终在这里发现，统治者按照善

的标准规范着另外两个阶层的欲望。苏格拉底把正义定义为每个阶层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一个原始的城邦里，这是一种本能；在一个拥有奢侈享受的城邦里，人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使奢侈享受受到适当的制约。此处柏拉图暗示任何一种政体的人们都利用统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统治不应成为满足欲望的工具，比如帝国主义的雅典运用权力的所作所为。统治应该被用来使人民去行正义之事，而不是让人民整日沉迷于欲望之中而行不义之举。

在一个正义的政体之下，个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是一致的，它们相互促进。在一个不义的政体下，个人身上的罪恶持续不断地侵害与恶化各种社会关系，继而恶化了的社会关系又激起了更大程度的腐化。良性或恶性循环，这是苏格拉底规划出的两条政治道路。现代各政体其实也面临着这两种选择。社会是支持了其成员的合理选择与决定，还是说人们不合理的行为动机产生了破坏性的行为，进而使社会契约的价值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21]

《理想国》：灵魂里的正义

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希腊实际的政治形态之间存在基本的差异。在希腊的历史中，政治起初处于寡头的统治之下，然后受到了穷人们的挑战。穷人开始追求正义以保护自己免遭剥削与奴役。在柏拉图式的理想城邦里，政治承担着保卫城邦的职能，它需要为城邦的人民创造正义，但这里的正义是说它充当卫士去塑造人民的喜好，以避免个人受制于自己的贪欲。雅典的民主派认为正义必然意味着穷人免遭傲慢的富人与强者的侵害，继而使他们得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力。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认为正义必然意味着城邦为个人提供保护以使他们不渴望成为傲慢的富人与强者——此种欲望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没有正义，权力一无是处；追逐可见的权力将导致不义。

个人的情况如何呢？柏拉图已经提供了关于希腊社会结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把公民划分为士兵等几个阶层，接下来他又提出了关于每个具体个人的灵魂结构与众不同的论述。每个人可以分为两部分：理智、算计的灵魂部分与肉体的欲望部分。希腊人对此接受起来并不费劲。这就使苏格拉底把灵魂三部分结构中的两部分与城邦的阶层结构对应起来了，但是辨明第三部分要棘手得多。苏格拉底认为灵魂还拥有一个激情的部分，它使个人追求尊严而排斥轻蔑。理想的情况是激情与理智一起来反对肉体的欲望，但是如果激情堕落了，它可能转而支持肉体欲望。

在如何把德性与灵魂各部分联系起来的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与勇气——正如它们各自所对应的城邦阶层结构——很容易定位：智慧属于灵魂的理智部分，勇气属于激情部分。节制仍然是灵魂三部分达成的由理智来统治的共识。正义仍然难以定义，因为如果灵魂的三部分都同意由理智来统治，那么使各部分各安其职的正义又增加了什么呢？它所增加的意义是说灵魂的两个低级部分都放弃代理智而治的非分之想。

低级部分只有在一定的约束之下去追求各自适宜的目标，而不是试图僭越理智的地位，它们才能够防止个人去行不义追求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超出了理智所能接受的范围。

这样一幅政治图景对所有参与苏格拉底对话的雅典人，以及当时不在场的希腊人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明确表示如果要实现这种政治观念，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教育运动。不义反受神灵的奖赏，城邦的卫士一定不能被这样的观念败坏（格劳孔与阿得曼托斯在《理想国》第二、三卷中表示这种观念在雅典的文化传统中为世人熟知）。戏剧、史诗与音乐形式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它们在人民中激起不恰当的欲望或态度。这种“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最好由一种统治者自己都会相信的谎言来支撑。它让公民自觉地相互视对方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能让他们发觉相互之间存在品德的（真正）差异。这个“高贵的谎言”并不属于人们通常指责的政治操纵工具，因为按理说统治者自己也要相信它。然而，它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政治的工具，它建立在差别化的个人天赋能力的基础之上，然后又进一步依赖于个人的品性与成就。同时，它在同胞之情的掩饰下创造了共同的政治身份。[22]一个政治体是否可以同时没有精英政治的分层与同胞之情的迷思，这是阅读对话录的读者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政治体制的政制与生活方式的政制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即后者是使前者成为统一整体的方式。

这是《理想国》前四卷达成的结论，论证至此似已完整。五到七卷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如果统治者要保卫城邦人民而非剥削之，那么大大超乎先前的设想，他们必须远远异于寻常的统治者。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统治者，以及他们如何生活等问题都必须不同于以往。他们不能由一般智慧的人来教育，相反他们必须由像苏格拉底本人那样的人即哲学家来教育。哲学家天生追求不易的真知，而不仅仅是某些想当然的信念。

哲学家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那些天生极具才能的女性接受哲学与军事的训练，她们与男性同胞一样轮流执政。所有男性或女性哲学家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统治与保卫城邦的角色之中，他们还必须经受得住剥削人民的诱惑。正因如此，他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要求去生活（女性从雅典式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为了城邦的利益，他们的性生活与生育行为都必须接受年长统治者的指导以保证繁衍出最优秀的后代子孙，然后把他们交由城邦集体抚养。与斯巴达人一样，他们要有共餐制度，但超出斯巴达标准的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财产。这样他们就能够最好地去保卫城邦，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而只能为人民谋利（这与斯巴达人不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残酷地剥削奴隶）。

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排除统治者的财产与家庭，这是一种相当极端的观点。这使统治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动机，因为他们无法积累起任何财产而又不被发觉，或者如果能够积累起任何财产，他们也找不到人去继承。这是一种家长制的政治观念，在规范繁衍行为以及为共同体抚育后代方面，它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斯巴达。优生主要被用于军事卫士阶层的受孕，对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者不存在性生活上的限制。

没有财产与家庭，执政的精英们相互视对方为兄弟姐妹，他们把家庭关系中的权力转化为对城邦的爱。《理想国》此处存在着共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种子。如果要想去除贪婪与腐化的根源，一个人必须强行改变人性以使其适应非常规的政治机制，他必须再造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观点！[23]一些人认为柏拉图对此并未当真，废除卫士阶层的家庭与财产只是说说而已。然而，我认为柏拉图是认真的。如果城邦想担当起正义的美名，他非常清楚城邦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在抛出了一系列新奇观点之后，比如赋予女性以平等地位，以及废除卫士阶层的家庭和财产，对话录确有滑稽可笑之处。苏格拉底表示他看起来最“荒诞”的建议是这样的：卫士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聪明人，他们还须是真正的哲学家，即《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被卡利克勒（Callicles）嘲笑的那些躲在城市角落里过一种非人生活的躲藏者。这些哲学家不仅仅接受诗学、音乐与军事的教育，还要学习数学、天文学与高级的哲学知识。他们并非如卡利克勒所描绘的那般与城邦莫不相干，也并非城邦的威胁——如苏格拉底本人被其同胞陪审员判定的那样，这些哲学家集知识与良好的道德品性于一身，他们是城邦潜在的救世主。

高级的哲学研习是什么呢？柏拉图认为是“理念”的学习，特别是“善的理念”。然而，当定义什么是“理念”的时候，他只给出了一些暗示与提醒，大多数的理念具体体现在他精心描绘的例子与故事之中，但是大致而言，理念是普遍、不变的真理，用以解释我们身处的特殊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比如平等、美、正义这样的真理，以及作为所有真理之基础的善。善是一种最基本的理念，因为它体现了存在物的目的本性，它是使一切物质具备价值的品质。

最能表现理念地位的是一个关于洞穴的故事，苏格拉底在其中运用隐喻的方法阐述了关于城邦教育以及脱离洞穴的困难与危险。在这个洞穴隐喻当中，苏格拉底把现实城邦中的人类比喻为终身被困于洞穴的囚徒，他们全身被缚而无法看见洞口，也无法看见太阳的任何自然光亮。在昏暗的空间之内，一些器物在囚徒身后借着人为的火光投射到洞壁上而产生了一些影像。这些影像就是囚徒所能看到的全部事物。那些最能辨别或说出影像的囚徒获得了同伴们的尊敬与奖赏。没有任何囚徒愿意相信在影像背后还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东西，更不用说有人试图逃离洞穴了。

这个隐喻体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真理隐藏在大部分人视野的背后。真理被城邦关于荣誉与价值的各种谎言束缚，因而它无法被大部分人理解。理念是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真理。正如洞穴内的那些虚假器物只能借着人为的火光以影像的形式被人看见，众多的理念也只能借着善的观念被人理解——柏拉图把善比喻为太阳。哲学家——或因为偶然因素，或被迫而为——就是那些发现真理的人。然而向那些深受现实城邦驯化的人们宣扬真理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洞穴中的囚徒不愿意跟着任何人向上去。（苏格拉底表示）他们会说那个逃犯“把眼睛弄坏了”，继而得出结论认为“甚至连起一个向上走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即走出洞穴）。[24]

这就是《理想国》长久的悖论。哲学家是城邦潜在的救世主，然而他们所试图拯救的公民天生地倾向于排斥甚至试图消灭那些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任何针对如此严重的政治不幸的诊断都会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城邦病入膏肓，那么除了外部力量的介入或者城邦内某个被放逐的人，拯救从何而来呢？《理想国》在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时认为，必须（无论人为还是自然地）要强迫人民接受某种形式的帮助，而不是让他们对其嗤之以鼻。这尽管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可能性，但是苏格拉底坚称这是可能的。[25]

即便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执政，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关于理念的知识如何帮助他们成为好的统治者？对话中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表示拥有了关于理念的知识就足以保证他们成为好的统治者。柏拉图此处以及在别处关于德性与知识相互统一的论述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所有的德性最终都是知识，那么一个人不会在有见识的同时却没有德性。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试图阐明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在具备哲学气质的人身上，这表明任何具备哲学气质的人在身体欲望上会是禁欲的，或者说他们本能地剔除了身体的欲望而只对知识充满渴望。这就使他们倾向于从同一处同时发展出良好的道德品格与良好的智识成就。[26]然而柏拉图认为这个过程也可能走上歧路，尤其是当面临外界的诱惑与腐蚀的时候。因此像“理想城邦”这样的良治社会在决定让哪些哲学家成为其统治者之前，需要竭尽全力地去考察那些心怀壮志的哲学家的道德品格、忍耐力、记忆力以及其他的必备素质。

一旦选定了一些知识与道德都合格的人，问题仍然存在：凭借理念的知识，他们凭什么能够比别人统治得更好？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对观点是政治不需要冠冕堂皇的哲学知识，政治只需要切合实际的能力，而理念的知识无法为政治提供这些能力，它们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政治统治的障碍。然而，柏拉图式的回答是这样的：关于具体事务的决定——哲人王实际上极为重视具体事务的工作，在塑造与培养后代合适继承人的时候，他们事无巨细——是需要一种启发性的视角以反映人类那些最广泛的理解。

认识理念就是认识真实的、不变的与本质的事物。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可以从理念的角度进行理解，所以它才是可以被理解与解释的，余外不过是些不可解的非理性事物，它们接受但也制约了理念的塑造力。这些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德性的内涵以及让所有目的都变良善的观念——将会使统治者做出所有具体的政治决定。统治者需要做出具体的政治决定。这个小孩应该如何抚养？这个心怀壮志的哲学家在知识上是否已经达标？在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物的前提下，他们做出诸如此类的决定。[27]

色拉叙马霍斯曾经一度以惨淡而愤世嫉俗的语气看待政治，但柏拉图在此处已经推翻了这种关于政治的一般看法。一直以来统治者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然而这些被重新塑造的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则为了统治对象的利益而统治。他们的自我利益源于所拥有的正义与其他德性，而这些都得益于他们各自的哲学品性；人民的利益则源于他们各自所操持的技艺。在柏拉图看来，政治与个人的自我利益无关；如果恰当理解的

话，它甚至不是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实践活动。统治别人是一项“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活动。当人们无法认清或得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时，政治给他们以帮助。《理想国》的意义在于它把以下两者联系了起来，即个人德性的价值与特定的政制形态。在这种政制形态之下，那些天生（以及通过后天培养的方式）掌握了所有德性与知识的人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必须站出来去统治其他人。这种观点首先吸引了一批保守派，他们注重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精英主义与等级制；其次它也吸引了一批进步主义者，他们注重对话录中对性别与财产区分的批评，因为柏拉图表示它们没有合理性并且会引起社会的割裂。[28]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通过哲人王的统治可以达成社会的和谐。它服务于统治对象的利益而非剥削他们。这一图景极具影响力，它既让形形色色的读者（古代与现代的、犹太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保守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心神不宁，又让他们自觉深受启发。

政治知识与法律之治

《理想国》赋予哲学以极其崇高的地位，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缺陷。它的优势之处在于向人们展示了如何使统治指向有价值的目标。缺陷在于它把政治视为哲学的必然衍生物，只需掌握理念的知识，加上一些实践经验与军事训练，然后把它们混杂在一起。哲学家是那些掌握观念知识的人，然后让他们做王，这样的观点没有最终回答“政治技艺是什么”的问题，它于具体的政治问题建树不大。

在柏拉图的另一部对话录著作《政治家篇》（*Statesman*）中，苏格拉底只是一位旁观者。对话的主要角色是一位来自其他希腊城邦（埃利亚［Elea］）的佚名访客，然而柏拉图确实通过此人发表了他对政治知识的看法。这位访客一再致力于辨别“伪政治知识”。他首先向智者询问，而智者只具备政治知识的幻觉，然后他向专业的政治人士即政治家询问。专业政治人士知道些什么呢？他们知晓如何统治人类。统治人类的活动与牧羊人放牧一群默不吭声的羊群不同。如《理想国》所示，做人民的统治者就是为人民谋福利，但是如何才对人民真正有利呢？政治家不是医生，他无法为人民治病；政治家不是面包师，他无法提供给人民食物；政治家也不是将军，他无法护卫人民的安全。最接近政治家的技艺是将军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打仗；还有演说家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做雄辩的演讲去说服别人；最后还有法官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解决公民间的争端、监督契约的履行以及做出正义的裁决。这三类人物似乎已经基本体现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当雅典人讨论他们的政治领袖的时候，毕竟他们是在讨论“将军们与演说家们”。然而在那位埃利亚的访客眼中，政治家还要承担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它超乎希腊政治文化传统中常见的将军、演说家与法官（包括陪审员与戏剧竞赛中的评委们）等角色之上。这一角色懂得时机掌握。政治家需要知晓何时指导将军发动战争或媾和；何时指定演说家发表令人信服的演说；以及何时委任法官进行裁决。政治家不是凭空决定，他知晓何时开展上述活动来达到最佳的目标，以有利于塑造公民的德性和服务于城邦真正的利益。

《政治家篇》还提供了一种关于统治的新观念。对大部分的希腊人来说，统治者就是城邦内担任公职的人，即那些将军、司库和长官团的长官；抑或是民主政体下的议事会成员们，以及陪审员与出席政治会议的公民们。然而那位来自埃利亚的访客表示统治者在这些职位之上还承担着另外一项职责。当然，城邦需要将军、演说家、陪审员和法官。然而，为了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追求德性以达成良善的目标，上述所有职位及相应的政治技艺就不够了。真正的政治需要恰当掌握时机以选择运用相应的政治技艺的能力。真正的政治家站在这些既定的政治角色之上，承担着一种新的职能，即为了达成最优的目标，它居于各种政治角色的中心来指挥协调它们以发挥各自职能。[29]《理想国》告诉人们政治需要协调统一，《政治家篇》在这里又向人们揭示政治的协调统一反过来又取决于时机的选择与政治协调以达成最优的目标。

政治的协调统一工作同样作用于公民的性情与世界观，因为政治冲突与有害的政治决定通常源于公民世界观根深蒂固的分歧。《政治家篇》对两种公民作了区分与对比，一种公民的性情倾向于迟缓与沉稳，另一种公民则倾向于鲁莽与果敢。让我们回想一下鹰与鸽的经典对照吧！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两种人群可能会持续地发生冲突，这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两者之间的隔阂。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与对方通婚或者交流，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与自己性情格格不入的人交往。公民们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疏远而非亲同手足。这（可以引起内战）是一种危险，甚至可能是最大的政治危险。《政治家篇》最后所描述的政治家的角色正是试图通过创建教育性的社会纽带与鼓励通婚（我们大可把眼界放宽广一点，并注意到当今时代各式各样的社会交流与多元政策）来消除这种危险。通过让人民分享评价意见与观点，他们能够形成共同的判断而彼此欣赏，然后更可能制定出准确而恰当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政治家篇》的最后一个贡献是论述了政治社会中的法律，特别是成文法律的作用。因为如果政治知识是重要的，现在它又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时机选择的知识，随着具体环境而不断变化，并且还掺杂了关于如何达成最佳目标的个人化建议（比如健身教练或专业医生给出的建议），那么在政治生活中实行法律的统治还有什么意义呢？法律恰恰是精确化、个人化建议的反义词，它们是“固执而愚蠢的”。（试想一下当今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三次犯罪终身监禁”的法律，它要求法官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对那些非暴力的被告施加严厉的惩罚。）

至少相对于一位专业的政治家所能给出的具体建议，依靠法律实施统治似乎是那些呆板而不精确的政治决策开出的处方。法律通常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之中。成文法以其明确规定了责任制而自豪，正如在第二章中我们在提修斯的演讲中看到的那样。然而在《政治家篇》中的那位埃利亚访客看来，创建成文法只会加剧法律之治的危险。因为即便书写法条的行为本身没有问题——医生可能会匆匆开出一具新处方，那种把法律永远固定下来，并且把它们雕刻在石板与城市公共墙壁上的观念使书写法条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僵化的问题。《政治家篇》指出尽管政治决策也许不可避免地需要法律，但是最

优秀的政治家如同最优秀的医生一样，仅仅把成文法条当成一种工具。按照法律的多少来定义一个政体的品质如何的做法是错误的。法律仅仅是统治的可用工具。只有体现理智的政治知识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统治。

与政治知识相比，尽管针对法律的不精确而提出了上述责难，柏拉图的另一部对话录还是把法律视为又一个想象政治体的中心。《法律篇》是柏拉图唯一没有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录，尽管他在其他对话录中的思想一再被引用。《法律篇》中三位长者——一个雅典的访客、一个克里特人与一个斯巴达人——正跋涉在朝圣的路上，他们打算前往克里特岛上供奉米诺斯王的洞穴。在路上三位长者讨论起了什么才是最好的法律，并且拿各自城邦的法律作比较。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因古老法典的统治而闻名，它们都讲着多利亚方言，且拥有相似的军事主义观念，执迷于培养年轻人的勇气和战斗技巧，这与雅典重视修辞术和艺术的做法大不相同。这位克里特长者最终表明自己隶属于某个集团，他们正打算拓展一块新的殖民地，于是请求他的朝圣同伴们不要再从比较与历史的角度去谈论法律了，而是假设自己就要为那块新殖民地筹划法律。

因此与《理想国》类似，《法律篇》也是一项关于理想城邦创建的口头计划，然而与《理想国》的对话者着手拟定法律不同的是，《法律篇》谋划的法律更加具体。[30]更有甚者，它所为之谋划法律的城邦当中似乎没有哲学家的位置。“哲学”一词在这部对话录中以各种语法形式仅仅出现了两次。与《理想国》的理想城邦——废除了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相比，《法律篇》的理想城邦自称是次好的。[31]与《理想国》不同，这个理想城邦允许财产的存在，由此形成了与梭伦时期的雅典相类似的四个财富等级的公民，但是它需要指导公民为了公共目标而合理使用各自的财产。城邦指导公民的主要政治机制就是法律。为了不使法律成为忙碌的政治专家不称手的工具，法律重新披上了神圣理性的外衣。公民要将城邦看作是在神灵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那些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人将会受到理性的劝服而去信仰神灵。《理想国》中缺失的一种重要德性即敬神在《法律篇》中是公共生活的基石。

在神灵的授权之下，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要求去热爱与遵守法律。这种要求甚至在他们还没出生以前就开始了（对话录详细阐述了对孕妇最适宜的音乐与锻炼形式）。法律塑造了一种平衡的政制形式，它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中值（693e）。[32]公民们“自愿地”接受统治，尽管他们同时也受到了立法者的劝服与强迫。为了使各种因素有效运转，城邦必须相对孤立且远离海岸线以免遭各种诱惑的腐蚀。只有很少的公民才被允许出国，他们主要是为了考察外邦社会的面貌，看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进自己的城邦之中。《法律篇》提供了一幅改良了的希腊社会图景。在这个理想城邦之中，公民自我管理而不是受神灵般的哲学卫士的统治。然而，通过对法典的严格服从（甚至背诵），他们仍然需要遵守德性与良善。法典最终得以确定下来，很少发生变化。它的地位恰如神圣律法一般受人尊敬，就像安提戈涅在对比神圣律法与人类法律时所表现的那样（第一章）。[33]

如果说《理想国》表现了柏拉图式的哲学统治的雄心，《政治家

篇》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统治知识，那么《法律篇》则向人们表明，一个明显缺乏哲学指导的良好城邦可以通过对法律的严格服从而保持良好的德性。《法律篇》为公民对城邦的服从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一些人认为此举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存在矛盾，因为假如法庭禁止苏格拉底继续研讨哲学，那么苏格拉底不会接受这个判决。然而，正是同一个苏格拉底服从了对他的死刑判决。如果说《理想国》想象了一个城邦，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可以利用哲学在这里为同胞谋福利（而不是被公民同胞视作某种威胁），那么《法律篇》则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城邦，人们在这里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它无需哲人的直接统治，因为哲人太难寻找了，即便找到了这样的哲人，他们也很难被委以权力而又不面临腐化堕落的危险。尽管存在一个由精英组成的议事会，成员们在黎明之际碰头商讨各种问题，看是否要根据实际需要去修改法律，以及监管源于邦外的各种情况，但是《法律篇》所包含的最大智慧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哲人，而在于法律的内容与权威。

柏拉图远涉重洋

除了留有大量的对话录著作以外，据说柏拉图还有十三封信件被保存了下来。这十三封信件给后世以巨大的诱惑，但它们的来源也颇受人质疑。基本而言，这十三封信件大多出自旁人之手，它们的作者可能是古时一位受人爱戴的名人。然而，后世学者仍然为“第七封信”的真假吵得不可开交。[34]如果它果真出自柏拉图之手，那么这的确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尽管如此，“第七封信”仍然给人以相当的教诲，它表现了柏拉图的追随者对老师思想的看法。这封信以柏拉图自己的语气阐述了他自从苏格拉底死后对政治丧失信心的事实，还阐述了他晚年三次出海前往西西里岛试图用哲学使一位年轻的僭主继承人皈化的故事。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与这位年轻继承人的导师狄翁（Dion）——与柏拉图志趣相投，两人成为密友——共同教育他。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366年，此时这位年轻的继承人已经成为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二世）。柏拉图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已经遭到放逐的狄翁。第三次发生于公元前361—360年，多疑的狄奥尼修斯二世把狄翁置于严密的监禁之下，而柏拉图费尽千辛万苦也无法说服他取消对狄翁的放逐决定。

柏拉图的这三次造访都相当失败。第一次时，柏拉图被一艘斯巴达的船只遣送回国，但是船长收受狄奥尼修斯一世的贿赂而把柏拉图卖为奴隶；第二次时，柏拉图一直处于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监禁之中；第三次时，柏拉图受到狄奥尼修斯二世的雇佣兵的严重威胁。（雇佣兵极其憎恨柏拉图，因为“他们以为柏拉图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二世放弃僭政以及废除贴身卫士”［*Dion 19.5*］。[35]）我们在看待这些具体事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后世的希腊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没有就这些具体事件达成过共识，甚至都说不清柏拉图前往西西里岛的次数。[36]然而，看到柏拉图试图亲自去培养一位哲人王，这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理想国》提出建立哲人王统治的两种方法：要么使一位现实的统

治者成为哲学家，要么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可能把第一种方法用在了狄奥尼修斯二世的身上，而把第二种方法用于狄翁。普鲁塔克在谈到柏拉图与狄翁关系时表示柏拉图坚信僭主是悲惨的，因为他们行不义；与之相反，正义的人则能享受幸福的生活（*Dion* *5.1*）。试图说服一位僭主放弃不义，继而接受哲学，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了柏拉图的哲学立场。在柏拉图第二次前往西西里岛的幸福时光里，据说王宫大殿铺满了沙子，一位哲学家与一位僭主一起在上面研究几何学。

叙拉古对柏拉图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他幻想把自己的哲学直接付诸实践。然而，他所开创的学园以及付诸笔端的众多对话录著作将证明它们才是宣扬柏拉图思想的恒久而宽广的舞台。通过授徒施教，他创立了一种更具吸引力与持久力的思想宣扬模式。世界其他文明同样也有散发着言辞辩论与口传身教的神秘力量。通过著书立说，他树立了一种新的创作样式。他的对话录著作极其鲜明地刻画了人类的各种情感、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众多的思想观念，它们使读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著作故事的场景之中。[37]柏拉图创造出了一系列反映并宣扬其思想主张的意象，同时他还邀请读者一起参与对话讨论，因此各式各样的人都深受影响。他使自己的哲学成为一出展现人物冲突的戏剧表演，每个读者受邀参与其中的一个角色以重新发现自己。在政治领域，他创造了一幅由知识来统治并且追求德性的图景，德性在其中是唯一真实的利益，然后，他又把这幅图景与时下流行的政治观念相对比，发现所有现实的政体都受到了修辞术或强力的统治，它们无非是为了追求权力与贪欲这些个人利益。柏拉图对一切政治家所追逐的基本目标提出了根本的挑战。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权力的竞技场，它恰恰是追求哲学的最佳场所，这是柏拉图对人们的最大教诲。

注释：

[1] Grg. 452e，Zeyl译文，参见Cooper 1997。

[2] Grg. 452d，452e，Zeyl译文，参见Cooper 1997。

[3] Grube译文，参见Cooper 1997。

[4] “被驱逐（除3000名［在寡头政体中登记造册的公民］以外）的人被禁止居住在城市之内。”参见：Krentz 1982, p. 65。

[5] Weiss（2006）也提出过这个观点，但是她没有彻底分析对话录的意图。

[6] 似乎他进一步认为知识不仅仅是德性的必要条件，还是德性的充分条件；关于他是否秉持以及如何论证这个观点，学者之间存在争论。

[7] 关于苏格拉底比他的同代人明显更有德性的观点，参见柏拉图《斐多篇》（118a）；相关论述参见Nehamas 1998以及Lane 2007。

[8] 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存在很强的智识依赖，Monoson（2000）详细讨论了这一点（Saxonhouse［1992］也坦率地持有这种观点）；Wallach（2001）认为柏拉图批评雅典之处并不比他批评其它政体更多；然而Ober（1998）认为从具体文本语境上而言柏拉图应该被视为批评雅典的激进“抗拒分子”（rejectionist）。

[9] Grube译文，参见Cooper 1997。

[10] 关于如何阅读《申辩篇》，在学术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此处我提出了自己的阅读与理解。关于文本重要内容的一种理解视角，参见McPherran 2002。还有一种奇特的看法认为苏格拉底遵从了一位专家的意见，而非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参见Hatzistavrou 2005。

[11] 关于如何阅读《克里同篇》在学术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尤其是篇中苏格拉底关于“法

律”的演讲如何与柏拉图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的问题。最近英语世界中关于该演讲最有影响力的阅读与研究，参见Kraut 1984。Kraut认为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与苏格拉底的一致。很多学者对这种普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参见Harte 1999、Lane 1998a以及Weiss 1998。

[12] 色诺芬在《希腊史》（1.7）中记述了这种行为（同时惩罚六名雅典将军，而不是个别地对待他们的行为）的不合法性与苏格拉底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那年苏格拉底一定是把自己的名字提前了，目的是为了被抽中而成为他村社的代表成员。

[13] DL 3.46.

[14] 即便是在《法律篇》中也有一个雅典访客的角色，有人认为这一角色掩饰的要么是苏格拉底，要么是柏拉图本人。

[15] 关于柏拉图个人性格的必备参考著作，参见Debra Nails 2002；该书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424/423年。

[16] 我借鉴了Allen的研究，他指出并探究了这种关联性，参见Allen 2010。

[17] 当色拉叙马霍斯参与《理想国》对话的时候，据称有一位卡尔克冬的修辞家正在访问雅典，参见White 1995。

[18] 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19] 我在下文一般使用通行的译词“灵魂”（soul）来代替psyche，以便与很多英文版本的译文与论述相统一。

[20] Long指出守卫的功能占据着《理想国》的中心地位，参见Alexander Long 2013。

[21] Lane 2011/2012.

[22] 关于“高贵的谎言”，参考：Schofield 2006, pp. 292-309，以及Tarnopolsky 2010。

[23] 参见 Lane 2001。在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参见Garnsey 2007），《理想国》的观点是取消某些人的财产权，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误解了这个观点而认为柏拉图要消灭私有财产，在城邦推行集体所有制。这个误解（柏拉图在《法律篇》739c-e中把所有人共同占有财产，并且共同组建统一大家庭的共产主义称为最好的政体。这可能对该误解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使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柏拉图视为积极的共产主义的鼻祖，认为他主张财产的集体所有制，还认为该观点影响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以及法国的革命主义者，比如格拉克斯·贝巴夫（Gracchus Babeuf）。实际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仅主张一种有限、消极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不能有私人财产，但私有财产关系在整体上并未废除。

[24] Rep. 517a，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25] 另外一种解读观点认为《理想国》其实是为了证明哲学（王）的统治及其必需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见Strauss 1964,以及Bloom 1991）。我认为（参见Lane 1999）这种解读低估了苏格拉底在第五卷中对这种可能性所做的明确分析。关于柏拉图观念可能性的更多论述，参见Laks 1990。

[26] Lane 2007.

[27] Ley-Pineda 2009.

[28] Lane 2001.

[29] Lane 1998b以及Lane 2013d。

[30] Lane 2013a.

[31] 关于《法律篇》中次好城邦的研究，参见Laks 1990。《法律篇》739c-e节表示最好的城邦需要废除全部公民的财产与家庭（与《理想国》对“理想城邦”的要求不同）。

[32] Saunders译文，参见Cooper 1997。

[33] 关于《法律篇》中自治的研究，参见Bohonich 2002。Lane（2010）对Bohonich的研究做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关于法律及其制定的研究，参见Nightingale 1993与1999。

[34] 关于该文本地位的客观评价，参见：Brunt 1993, pp. 282-342。

[35] 译文参见：Plutarch 1973, p. 119。

[36] 一次：狄奥多罗斯·西科勒斯（Diodorus Siculus）；两次：康涅利乌斯·尼波斯（Cornelius Nepos）；三次：《第七封信》与普鲁塔克。非常可惜的是后世作家援引的西西里岛历史学家的著作一部也没流传下来。

[37] 该段论证借鉴了Allen（2010）的研究成果。



第五章

公民身份

柏拉图创造了一种政治哲学，认为有必要让富有知识与德性的人服务于那些无法认识或达成它们的人。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罕见的专门技艺，只有专业的政治家或少数的哲人王（与女王）才能稳妥地实践好它（《法律篇》提及的大部分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形态是次优选择）。精英们为多数人提供服务，这才是最高也是最好的政治形态。它能够使人民摆脱肮脏的权力争斗，引导人民去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种高超的政治技艺只能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他们必须运用这样的政治技艺去引导普通的人民群众，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民群众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

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培养出了一位优秀的学生即亚里士多德。在这位学生的思想当中，人们发现上述政治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从十七岁到三十七岁一直在柏拉图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与研究，此后他在雅典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他最终发展出了一种既深受柏拉图影响又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再一次把《法律篇》排除在外）的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关系：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并且应该掌握权力，以塑造那些无法彻底塑造自己的人们。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关系，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相互合作。政治展现了我们人类自己最具特色的能力。虽然亚里士多德仍然承认柏拉图的基本政治观点，即认为权力应追求恰当的目标（以知识追求德性），但是他认为当有德行的公民都能够自己参与政治的时候，这个目标一般最容易达成。

公民身份的观念与本书已经讨论过的其他观念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第二章“政制”的原初意义是“公民身份的条件”，于是政制与公民身份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除此以外，公民身份与其他观念也存在关联）。因为，当暗示说存在一种公民间的平等关系，他们共同身处于某一共同体（*a koinonia*）之中时，公民身份似乎也接近于民主政治，或者在选举的意义上它至少与民主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然而，正如我们的观察，希腊世界也存在很多其他类型的政制形态。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他必须同时要解释寡头政体与君主政体下同样存在的公民身份。更有甚者，他从柏拉图那里认识到现实的各种政制形态没有哪一种是真正地在追求德性，这与他们政治理论的理想预期有所不同。现实的各种政体可能去追求自由、财富或荣誉，但就是没有德性。它们在追求各自目标的时候，只会发展出为一己私利而着想的平等、正义与自由的理论。

因此，讨论公民身份就是讨论谁在理论与实践上在一个既定的政制形态“之内”，谁在“之外”以及为什么。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双面（Janus-faced）模型。它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它小于整个人类的特定共同体，使共同体成员之间互惠互利，但把该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置于其他共同体成员利益之上。（第六章将探讨另外一种理念即“世界主义”的起源，或者顾名思义，一种隶属于整个宇宙而非特定城邦的公民观念。）当亚里士多德再次把奴隶与部分女性排除在政治之外，创造一种自然的奴隶的时候，现代社会的读者发现这与他断定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相矛盾。与此类似，穷人在他的理想城邦（“我们所祈求的城邦”，《政治学》第7-8卷）之中也被排除在公民之

外。在规范与经验的双层意义上，这种做法都是令人不安的。他认为穷人缺乏教养与闲暇，这就使他们无法追求德性，而从规范的角度而言，德性是一个优良城邦的必需条件。

现如今很多读者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身份的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种张力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他对民主政治的思考之中。现代的民主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歌颂着所有公民天生就具有的自治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们平等地分享着这一特征。这使得民主政治似乎是终极理性的政制形态，它表达了公民身份的基本意义，因此它使很多现代的民主主义者试图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寻找民主政治的理论合理性，即便他对民主政治提出了特别的批评，认为它并非理想的政体形式。[1]在辨别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批评民主政治，以及他的思想如何被民主理论家利用等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将能够了解他关于公民身份的理论的复杂性。不管是从狭义还是广义的角度上说，一个公民的身份及目标都受到其所在政体的政制形态的根本塑造。因此，每一特殊政体下的公民身份的价值最终取决于那个政体所追求的价值。每一特殊政体的价值通过它的公民，甚至全部的城邦居民来体现，同时每一特殊政体向它的公民与居民灌输着自己的价值诉求。对公民身份的颂扬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政体彻底批判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无法把自己引导到最有价值的目标上去。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彻底发掘了自己身上的公民身份的潜能（以及他理解世界的潜能，这是一种更高的能力）的时候，他的人性才得以彻底实现。然而对那些普通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教养，因此他们必定无法很好地发展与实践这种能力。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实际上具有极其深刻的人类相互交往的特性：那些相互间平等的公民应该锻炼他们关于德性与实践智慧的能力，他们共同决定着公共事务。然而只有那些实际上有机会实践与培养自己的伦理与政治德性的人，才是实施自治的理想群体。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认为德性是政治生活的目标价值与检验标准。如果某些人或大部分人无法达成——无论是天生，还是偶然原因造成的——德性，那么他们就不是合适的政治参与者。为了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有益的教诲，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他政治思想的渊源与限度，同时我们也需要考察一下他的政治思想如何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是谁？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一生充满矛盾。虽然作为一个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的鼓吹者，但他成年时期一直居于异乡，因此没有与本国同胞一起参与过任何政治事务。他十七岁的时候远离自己的故土斯塔基拉（Stagira），前往雅典的学园学习，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除了下文提到的两段插曲）都在雅典度过，先是参加学园成为柏拉图的学生，然后在吕克昂成立了自己的学园。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希腊各独立城邦受到新的威胁的时代，即马其顿诸王（他们都来自希腊世界的北部，并且靠近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的威胁。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曾经是马其顿王室的医师。跟他的父亲一样，亚里士多德曾短暂供职于马其顿王室，担任过年轻王子的家庭教师。这位年轻的王子在自己的父亲腓力普被暗杀后，于公元前336年执掌大权，后来即成为征服大部分希腊地区，以及远至阿富汗部分亚洲地区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死去后，此时人们正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安堤巴特（Antipater）在雅典的统治而怒不可遏，雅典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谴责亚里士多德这位非城邦公民的不敬神行为，指控他与马其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生活并且担任过马其顿王室的家庭教师。与自己老师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逃离雅典以躲避审判，他宣称此举是为了避免雅典人再次对哲学犯下罪过。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亚里士多德因自然原因死亡。他指定那位被很多雅典人深恶痛绝的雅典将军，即安堤巴特，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

因此，与同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深陷于马其顿政权崛起的复杂国际环境之中。马其顿人的崛起威胁着亚里士多德生活与教学的城邦的独立地位，甚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还威胁着整个希腊世界其他各城邦的独立地位。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从希腊到亚洲的广袤领土，这是人类前所未闻的大事件。他的帝国包括了波斯以及其他多个东方王国，他把它们全部融合成为一个新型的帝国式君主国。这就把希腊与东方世界更为多样的政治观念、语言和文明样式融合在一起，尽管众多城市与王国保持了各自的多样性，它们在帝国内享有相对自主的地位。正是在这个世界政治版图的重组过程即将完成，或说在腓力普和亚历山大的主导下这个过程正步入正轨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写下了他对公民身份与城邦的赞歌——很可能是在他第二次旅居雅典（公元前335—前323年）创建吕克昂学园之时。他以“梅迪克”的身份寄居于雅典而鼓吹公民自治，但他本人在这里却无权参与。他注意到了帝国王权的吸引力与雄心壮志，但他却歌颂独立自主的城邦理想。这些张力充斥于亚里士多德极其丰富的智识生活之中。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考察另外一种张力。我已经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推崇政治的事实。他把政治视为人类所独有的卓越品质的体现。不管是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他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讨论与思考如何行为的能力——即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phronesis*）。这就使政治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须的。然而他认为人类不仅仅是人类，人类这种动物还分有神灵的某些能力，尤其是我们人类拥有思考事物本性的能力，以及理解与领会（沉思［contemplating］）实在的永恒真理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能力称为理论知识（*theoria*）。对我们来说有点吊诡的是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这种沉思活动视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可能形式，因为在对事物本性的沉思过程中，我们人类才能积极地理解它们（*Pol.*1325b）。

这使人类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他辨识出大部分生物所具有的独特本性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最高能力。比如，一只奶牛所具有的奶牛式的能力同时也就概括了奶牛这一类

生物的最高可能性。对于人类而言，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最具特色的能力是政治参与，然而它并不是我们人类的最高能力——沉思。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是大部分的人类生活，但它不是最好的人类生活。然而最好的人类生活——即与神灵所共享的沉思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只能进行间歇性的沉思活动，我们不得不打断它而去照料我们其他的需要与功能——这些都是神灵无需顾及的内容。人类栖身于野兽与神灵之间。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人类渴望尽可能地过一种与神灵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明白人类无法一直如此。

亚里士多德认识宇宙的方式

一翻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自信的判断“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980a）。他以无与伦比的劲头与学识投身于追寻知识，这使得他的同伴们从一个主题探索到另一个主题，从灵魂、颜色、植物、形而上学到诗学。这些仅仅是被保存下来的著作（将近500个题目中的3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或他的学生做的大量的授课笔记，不是专题论文与对话录的形式，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到我们今天，浩浩数千年，它们大多早已散佚。

他所有的探究活动都使用了同一个特殊的方法。他首先从现实存在的信念或意见（*endoxa*，有时也被称为“表象”或“现象”［*phainomena*］）开始。它们一方面包括了普通人（多数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尤其包括了有学问的人（智者）的各种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真理与理解的潜在来源，尽管它们可能需要一些纠正与提炼。因为各种原因多数人与智者都可能犯错，这就需要纠正。但仍然可以这么说，人们如何看待世界指引他们理解世界的真正本性。柏拉图倾向于把普通人的信念视为误导性与欺骗性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类的天性就非常适合理解世界。[2]

亚里士多德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的永恒真理以及人性的特质。他认为自然由各种“实体”（substances）构成。它们是一些独特的个体，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手工制品。在这些实体的质料（matter）之内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本性（即形式［form］）。通过目的（*telos*）每一种实体的形式得以最好地界定，目的反过来又决定着每一实体发挥各自功能的特殊方式。通过手工制品的例子，最能使人们理解这一点。为了既定的目的，工匠制作手工制品以行使特定的功能，比如一只碗被制成凹面的形状，目的就是为了装水果。亚里士多德同样对生物作这样的分析，他把生物视为永恒的存在物，它们各自体现着一定的功能与目的，比如一只奶牛的目的就是过一只奶牛的全部生活，它独特的功能在于繁衍下一代。对生物来说，合适行动所需的各项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实践，以及特定的行动的生命，便是幸福。

人类的情况如何呢？人类与其他生物，特别是动物一样都承担着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营养、繁衍、运动、感知与情感。人类与神灵一样也具有沉思永恒真理的能力。然而人类同样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行动领域，

比如人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如何行动。人类在作决定的时候是凭借相互的语言交流与审慎的协商，而不是按照本能的交流模式去行动（比如蚂蚁或蜜蜂）。在探究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种意图（prohairesis），它既是对探究对象的掌控，又表达了一种渴望。当我们决定如何行动时，这种意图塑造着我们的思考。然而当我们做出一定行为时，不管是恰当行为还是过分行为，我们都是依照自己的习性。此时意愿就受制于我们的习性。

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拥有实践理性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实践智慧”，除此以外如果我们还能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都培养起做合理行为的性情，继而使之成为伦理德性，那么我们就能使自己实践理性的能力得以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两种极端情形的中值，比如勇气就是鲁莽与懦弱的中值。因为幸福来自于行动，所以如果我们整天懒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离群寡居过无聊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幸福。我们人类是行动者，只有这样的人类才是幸福的：他们以恰当的程度，在恰当的时间与环境下实践着自己的各种能力，比如崇高而神圣的沉思活动，或者是人类特有的审慎思考与决断。

政治在其中占据什么角色呢？人类行为不是精确的学习领域，如同对关于宇宙的永恒真理的学习。人类行为是特殊的学习领域，它不仅追求良好的理解，还追求良好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为他的儿子尼各马可（Nicomachus）所写的重要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说“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EN*1095a），特别是德性的行为。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到处探究，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德性，而是为了成为良善的”。[3]所以，人类行为的基本目标在于与事物相处——即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做良好的行动而非其他。更有甚者，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伦理学与政治学同样以善作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同样把最高的善理解为幸福，为此它们同样都运用实践的理性与知识。

政治学是关于集体选择与集体决策的领域。集体行为反过来又使个人的德性决定成为可能，因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律与习俗为个人提供了环境，个人在其中得以锻炼与德性相关的各种能力。人类拥有同样的能力，既可以形成不好与邪恶的习惯，也可以发展出良善与德性的习惯。一个政治体当中的法律造成了这样的差别。法律提供了一种习惯环境，它能够从我们先天第一本性的潜能当中发展出德性的“第二本性”。它也能在害怕法律惩罚的心理之外，为公民的服从创造额外的动力。这里我们再次发现狭义的政制塑造了广义的政制，政治的组织与结构塑造着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政治体下的公民品性。

在不好或不完善的政治体中，人们不去学习如何追求德性。他们经常被引诱去追求享乐、财富或荣誉，这些都偏离了真正的善。人们只知纵情于宴饮而牺牲了身体的健康或家庭；富豪们无止境地积累财富而忽视了公共义务；将军们为了保有发号施令的荣誉而违反了战争的伦理责任。所有这样的人都丧失了享受真正幸福的希望，他们让那些低等的目标扭曲了他们对更高的善的理解。然而这不意味着欢乐、财富与荣誉就必须被统统抛弃。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与之相反，追求欢

乐、财富与荣誉的能力同样属于人类真正的能力。他实际上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方式，进而把这些动机与追求真正的善的目标结合起来。[4]一个孩童要习惯于从善待他人当中获得快乐，从完成有意义的工作当中获得金钱，从遵守规则当中获得荣誉。这样的孩童将发展出使自己真正幸福的性情。他将获得欢乐、财富与荣誉，但唯有当他实践自己德性的能力的时候才可以。

这里的“他”需要仔细斟酌。我们将会发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女性因为她们的性别，不管是从一般还是从其他别有意味的角度而言都缺乏发展与实践理性的可靠能力。女性被认为不具备实践她们理性的可靠能力，因此据说丈夫的统治对她们是有好处的。然而这里亚里士多德也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他把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称为“政制地”统治（*politikos*，副词形式），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与大部分的政制统治不同，此种形态下的公民不是平等的，因此他（她）们不能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另外一种不包含对等统治地位的政制关系是亚里士多德将要论述的君主政治。这两种反例反映了界定政制统治形态的困境，因为政制统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包含的是平等个体，但是某种永久打上了等级与不平等关系烙印的政制形态也是被允许的。

除此以外，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处硬伤。因为如果某人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他周围的成人都是一些窃贼或骗子，他们训练他让他穿上德性的外衣，但背地里却从不义的行为中谋取好处，那么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这类书籍将无法帮助他做出正确的行为。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学习伦理学将产生良好的行为，但这唯有在良好习惯的基础上才行，此时良好的习惯能够引导人们去认识并且追求善。学习伦理学无法皈化道德沦丧之人，它只能对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实施进一步的教育，帮助他们更加完善（1103b）。

这又凸显了政治学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公民身份同时塑造了人们的公共与个人品性。习惯不仅仅是关于家庭生活的事务，它同时也与法律和习俗密切相关，它们是孩子学习如何行为所仰仗的对象。我们在第二章讨论斯巴达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斯巴达的男孩与女孩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于他（她）们很多人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屈服于军事上的战败或者被卖身为奴。然而政治在这里仍然不能被视作某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与之相反，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卓越与完满的成年人本性的一部分。成年人的政治参与同时也能够创造出适宜的社会氛围。年轻一代得以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成人，为了有朝一日他们也能享有这样的卓越与完满。公民身份既是良好生活的条件，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包容与排拒

这一部分将讨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一句名言。为此我们首先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人类是如何步入政治生活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当中探究了人类共同体的起源，他认为人类共同体

起源于相互联合的自然倾向。人类的自然联合——男性与女性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繁衍的需要——跟其他动物的繁殖并无大多区别。它是一种自然本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功能，它并非人类深思熟虑的特别选择。一个家庭就由一对这样的夫妇与后代来构成。一个村落由多个家庭聚集而成，起初可能因相互的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家的众多兄弟后来各自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家庭对偶关系中的一方要比另外一方能够更好地管理公共生活，他还预料男性一般是实践理性能力更出色的一方（他这里并不考虑同性伴侣）："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发号施令。"（1259b，尽管他也承认一些情况可能会违反这条一般的自然法则，他在《物理学》中多次提醒说自然倾向性仅在"大多数时候"有效。）

所有这些人类共同体源于生存的需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动物需要与功能。然而在人类相互结合为家庭以及其他形式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全部能力，这就意味着家庭已经成为人们追求良好生活（幸福生活，即德性的生活）的场域，它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单纯的生活"［mere life］）。[5]虽然如此，人类如果在分散隔绝的家庭或村落中去追求良好生活，那么这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平等个体所共同拥有的实践理性的能力——人们据此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而集体地做出关于"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行动决定——在一个城邦（多个村落联合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1253a-b）。

城邦不仅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村落。它"达到了完全自足的限度"，为人类实践其所有能力创造了一个框架。它"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因此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252b）。它是人类结合在一起的终极目的。

亚里士多德此处作出了其著名的判断："由此可以明白城邦是出于自然的结果，而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252a）这不是说国家像森林里的蘑菇一样是突然冒出来的。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出于自然"并不是说城邦的出现不需要人类的干预，它们是必然或自发形成的结果。实际上，他立即承认并不是所有人类都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城邦（*poleis*）之中。政治共同体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但有时人类也创造不出城邦来，或者有的人被城邦所驱逐。亚里士多德在说城邦是出于自然的结果，以及"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人性天生具有与别人交往的能力，他们通过相互的语言交流做出关于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行动决定。

人类拥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过一种全然的人类的生活，但前提是人类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在城邦这种特殊的形态之中按照自己的这种能力做出行动。一些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们可能是些奇怪而变态的寡居者，他们骨子里具有这样天生的缺陷而经常被人挖苦为"好战分子"。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人类天生为敌是不自然的。人性的本质（不是普遍或必然，而是一种典型特征）是社会的，特别是政治

的。人类从本性上来说应处于政治共同体之中，人类在其中相互交往并用语言进行交流，共同做出良好生活的决定，按照正义的法则进行统治。只有远离这般公共生活的人们才“渴望战争”，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从本性上来说就是些奇怪而变态的寡居者，他们是“棋局中的一个闲子”（1253a）。人类正常而自然的情况是乐意从事政治而非战争。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讨论的另外一个争议之处，即他对自然奴隶的区分。既然平等的统治取决于平等的实践理性的能力，那么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实践理性的缺陷自然就得出不平等统治的结论。[6]亚里士多德在女性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缺陷，他认为女性的实践理性一般而言不像男性的那样具有权威性。除此以外，他还在自然奴隶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缺陷。自然奴隶（按照这种逻辑）全然不能掌控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人简直不能算作独立行动的主体。他们毋宁是他们各自主人的工具，服务于主人的目的，并且也从主人的专制统治中获得好处。从规范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具备统治自己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真的认为存在这样的人吗？他认为很多从战俘被迫成为奴隶的人——当时这是希腊以及周边国家获得奴隶的典型方式——并不是自然奴隶。（比如试想一下特洛伊的贵族女性因为城市被攻陷而被卖身为奴的情况。）他曾针对某观点评论说所有的奴隶只是协议的，他们是偶然事件的结果，根本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唉！他没有提到名字，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知晓当时他是针对谁而作出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合法的自然奴隶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则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不具备掌控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作为一种可能的工具而服务于别人，这对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自身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然而，他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讨论充满了矛盾。因为如果奴隶还算作人，如果为了主人的利益他不得不具备一定能力去理解与遵循主人的指使，那么他是如何全然缺乏理性能力的呢？一边认为人类具备相互交流的能力与做出有效行为的足够理性，一边又认为奴隶无法理解行为的目的，也不具备自律的全部能力，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不稳固的理论类型，而不是一种实际的可能性。（这并没有阻止很多奴隶制的辩护者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奴隶的思想当中去寻找奴隶制的合法论证，比如他们为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侵略，以及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制进行辩护。[7]）如果确实不存在这样的自然奴隶——尽管亚里士多德坚称自然奴隶的可能性，如果女性不比男性缺乏自治的能力——尽管亚里士多德相信她们是缺乏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理论将不会指向政治支配与父权制，而是指向平等的公民身份。这也就是为何很多公民身份的理论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得到启发的原因，尽管他本人接受了公共支配的形式并且为之辩护。

平等的竞技

如果对政治作一种恰当的理解，那么平等就是政治的本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政制统治是平等的自由人的统治”（1255b）。从概念上

来说，平等的个体之间不存在统治（他们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让一个平等个体隶属于另外一个平等个体，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然而因为统治在实践中是必需的——亚里士多德向经验所作的重大让步，所以自由与平等的公民轮流掌握政权。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一个良好公民进行了定义，他认为一个良好公民是知晓如何统治与被统治的人，尽管他之前对严格而全称的公民已经作了定义，即“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1277a,1275a）。然而这个定义并不自动暗示民主政治（也不暗示全部公民一定有资格担任所有公职），也不暗示对君主政治的否定，因为在一位君主之下公民们仍然可能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参与——平等地参与其中一部分——并不一定是绝对平等的参与。基于公民另外的一些相关品性，它为某些政府职能在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留出了空间。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谁是平等的个体”这个基本问题需要从语法上去分析，他认为依照逻辑，“平等”可能存在不同的意义。有现代学者认为为了定义平等我们必须要不停追问“关于什么的平等？”[8]亚里士多德已经告诉人们说“关于什么的平等”几乎等同于“谁的平等”。基于对平等的基础的不同理解，一些人将被划为公民或被排除在外。

当时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持续不断地爆发冲突，与此同时寡头政体愈发明显地发展为君主制帝国。在此种局面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基本不同的平等观念在起作用。一种是“数量相等”，公民有一个算一个，正如按照多数原则所实行的投票。这种平等倾向于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另外一种是“比值相等”，只有拥有平等价值——无论德性还是更为常见的财富的平等——的人们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更倾向于寡头政治。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对平等所作的这两种开放的解读造成了两种相反的政治立场。在现实当中，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都算是政制统治的形式。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平等的假设之上，尽管各自在不同的基础上界定了谁才是“平等的个体”。然而每一种政体都视对方的解读不够完美：民主派说他们自己“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就要求一切归于绝对的平等”，而寡头们说他们自己“（与多数人）不是平等的，进而要求比别人获得更多”（1301a）。

公元前4、5世纪的整个希腊世界到处充斥着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各自党羽的激烈争斗，它们是亚里士多德平等思想的活生生的证明：把政治视为一项关于平等公民的事务并不能解决哪些公民才算是平等的难题。（现代社会为劳工、曾经的奴隶以及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同样如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争取平等权的斗争视为现实所有政治动乱与派系斗争的根源：“所有内讧以不平等为发难原因”（1301b），尽管寡头憎恨他们与穷人拥有一样的平等的程度不亚于民主派争取与富人拥有一样的平等的程度。更为一般的情况的是：“较低的人为了求得平等而掀起内讧，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与较低的人相比，然而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这是他们理解的真正的平等）也掀起内讧”（1302a）。

采取措施防止革命，这是政治家的任务。从亚里士多德相当宽泛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建议，比如绝对不要“不公正地对待荣耀的追逐者，使他们处于不受尊敬的境地；绝不剥夺一般民众的财

物”（1308a）。“为政最重要的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1308b）。亚里士多德此处回溯了柏拉图关于政治是服务而非追求个人财富或荣耀的手段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只是迫不得已才站出来实施统治，他们必须以人民而非自己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官员们可以合法地把谋求公职视为某种形式的荣耀，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公职谋求私利。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冲突的论述表明，他既分析了政治的基本属性，又对变幻莫测、多种多样的现实政治保有敏锐的洞察力。“人们对于他人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而不以为可耻；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逢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1324b）。他对这种行径作了尖锐的评论。然而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去描述一个僭主如何行为才能保有权力：无论是散播不信任的种子，从臣民手中抢夺权力，贬低与恐吓他们；还是表现得更像一位得体的国王，守护着城邦的公共财政收入，在战时保护城邦的安全。如果政体都肆无忌惮地过度追求各自的内在目标，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将陷入困境之中。这正如他的伦理学理论，德性总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值。如果富裕的寡头们一味为自己谋求特权，那么他们的政体将不太可能长久，他们毋宁应该用更节制的手段去抚慰那些平民。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经注意到当时一些不知收敛的寡头的誓言，这些寡头们知道他们的利益与平民的利益相悖：“我深恶平民（意思是政体中的穷人或普通人；他们甚至还不能算作公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此处亚里士多德辛辣地评论说，他们毋宁应该发下一种相反的誓言“我绝不加害于平民”（1310a），这将更有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

以共同利益之名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首先论述了政治的本质特征，把政治视为人类能力的表达方式，然后又对鲁莽的僭主以及躁动的寡头作了极为精到的点评。这是他基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政体所做的分类。因为决定谁作为公民而掌握权力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则需考虑公民运用权力应该做什么。他们是否应该不顾别人而自私地追求自我利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只是变了味的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政府形式，他们只顾追求自我利益。按照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利益还是自我利益，亚里士多德系统地界定了好的与坏的政体类别，每一类别由三种基本的希罗多德式的政制形式组成。在坏的政体类别里，他首先列入了“僭主政体”（由一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然后又列入了希腊人所熟悉的“寡头政体”（由少数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与“民主政体”（由多数人——区别于少数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这三种政体形式的特征都十分明显，但都是错误的政体形式。与它们相对，他还列出了“正确的政府形式”，即“旨在照顾共同利益的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1279a）。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一个自觉比“寡头政体”更有德

性的名字）与“共和政体”（即希腊单词政制［*politeia*］；此处亚里士多德把一般名称的“政制”特别指代一种政体形式，用以代替现在看起来已带贬义色彩的“民主政体”，它代表着多数人的合法统治）。

正确或真实的政府形式是由公民们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即便并不总是由全部公民来统治；变态的政府形式是由公民们单就统治者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然而建立正确的政府形式并非易事，特别是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曾在某处指出只有当共和政体下的公民们大都具备了某种形式的德性或卓越品性的时候，该政体才会达成为共同利益而治的目标。他说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如此，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装甲步兵阶层。这些公民能够承担起装甲武器的费用，并且能够带着自己的武装去训练与作战（1279b）。作为多数人统治的示范的共和政体实际上也是排外的示范：多数的穷人因为无力承担装甲武器的费用，他们因此在政制中不能算为公民。

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学修正，它也不足以确保一种正确的政府形式。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人/少数人/多数人都可能把自己任命为统治者而把统治建立在纯粹的财富或权力，而非真正的德性的基础上。（因此他在这六种政体形式之外另外寻找“最优良的政体”，此种政体下所有并且只有具备德性的人才能算作公民。我们在后面将进一步讨论之。）此时，这种自命统治者的方式使所有三种正确的政体形式都将面临不稳定的危险，比如贫穷的多数人将憎恶自命的少数人的家长制统治。这使亚里士多德开始考虑如何在实践中通过平衡相反政体的方式来达到使政体稳定的目标。

其中一种方法是采纳或借鉴竞争对手的政策主张，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个保守主义政府可以提高失业人员的福利水平。这就需要统治集团超越自己的党派立场，摆脱政党信条的束缚，而把注意力集中到长久执政的目标上去。“他（立法者）不可以这样认为，既然一个政体成立了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的政府，那么就应该使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的；他应该考虑如何使城邦最长久”（1302a）。

另外一种方法是建立一种融合两种相反原则的政体，比如把一些权利授予给自由与贫穷的多数人，而把另外一些权利授予给少数富人。亚里士多德描述说僭主可以通过约束他们自己行为的方式来达到永保江山的目的。与此相似，民主政体也可以采取一些具有寡头色彩的措施（比如设置一些低门槛的财产限制条件。古希腊很多民主政体至少在一些公共需要之下都会设置一些低门槛的财产限制条件）来使自己变温良，进而获得更长的生命力。后世学者所谓的“混合政体”正起源于此。

然而，亚里士多德最倾向的并非混合政体，而是中等或中间政体。与混合政体不同，一个中间政体不是融合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各自政策主张的政体形式，它是把政治重心与政治身份置于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中产阶级”（*mesoi*）的公民群体的政体形式（1295b）。这些公民最可能是“平等与相似的个体”，因此他们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稳固基础。古希腊的大部分城邦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中产阶级，尽管亚里士多德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公民来使这种政体形式成为可能。他说这种政体形

式“对大部分城邦（*poleis*）来说是最好的政制形式，对大部分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1295a）。因为与绝对最好的政体相比，人类更容易找到一些中等生活水平的人群。

“共同利益”的范围扩及到哪里呢？即它应该有哪些严格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把城邦视为一个公民“共同体”：它事关公民的公共活动，人们在家庭领域内从事着日常的生活活动，但在政治决策的事务中，他们是平等的公民。[9]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哪些公共活动对城邦的生存发展是充分而必要的。比如，财产是否应该被共同占有？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实际上就为整个国家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共产主义信条（*Pol.* 1261a；然而正如我们前面的介绍，《理想国》只是主张取消统治者的财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反对财产的公共占有，因为一般而言它是低效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财产的公共占有将破坏责任制，并会引发党派林立），它使国家过度地联结在一起。整个国家因此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家庭，而不是多元而独特的公民及其各自家庭所构成的整体。然而他倾向于把财产视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手段，财产有时可以直接被城邦所征用。如果把这种财产思想用于实践的话，那么比如它可能会允许别人在私人领地上狩猎，以及要求公民资助城邦的共餐：或者是对私人土地的产品直接征税，或者是建立城邦的公共土地以供养整个共同体的人民。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实行过共餐制度，而雅典的共餐制度则更为隆重与严格。共餐制度是公民们参与公共活动的象征与体现，而城邦因公共活动而成立。

民主政体及其限度

至此我们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平等与公民身份的论述远非是为了承认民主政体那么简单。他所谓的“民主政体”是另外一种高级政体形态即“共和政体”的偏差形式，而“共和政体”实际上把多数穷人排除在了公民之外。他认可了支撑寡头制而非民主政体的平等形式。他视德性为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基础。另外，他还持有当时（绵延此后数世代）精英主义的看法，即穷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操劳，他们无法培养自己的德性，至少是因为他们缺乏闲暇与良好的教养。然而他曾一度在《政治学》中停下来着重思考：多数穷人如何才可能被纳入政治的范围。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应当成为政府的主权者，民主政体的这个信条有自己的道理吗？如果有的话，那么人民作为主权者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构成了《政治学》当中著名的一个篇章（3.11）。该章着重论述了整体的人民（*demos*）——不仅仅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作为主人（*kurios*）决定法律以外事务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法律整体而言就像主人一样）。我们可以把*kurios*翻译为主权者（sovereign，因为像拉丁文单词*dominus*［主人］一样， *kurios*起初与奴隶的主人、女性的丈夫或男性监护人是同一个单词）。[10]把*kurios*翻译为主权者以后，亚里士多德在该章直接提出了民主或人民主权的问

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人民作为主权者如何选择以及监督高级政府官员的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民主权形式，但它并非是对任何民主参与形式的无条件或全盘认可（人们经常想当然地如此认为）。亚里士多德为民主政体下的多数人划定了合适的范围。为此亚里士多德既反对他们可能会提出的宽泛诉求，又不同意绝对禁止他们参与政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即他围绕多数人参与决策的价值与能力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论述，又一次地激发了后世追随者的进一步阐发。追随者们把这些思想发展为政治制度的设计，这已经与亚里士多德原先把它们限定在一定范围的情况相去甚远了。

他自己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政体当中最高级的个人职位只能分配给那些更有希望发展出他们的个人政治能力的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为最高个人职位设定一定的财产要求，尽管他在其他地方以一种柏拉图式的论调承认财富仅仅是德性的粗略象征（古希腊相当多的富人无法运用财富帮助他们达成德性）。然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政制氛围下，那些最高职位的拥有者（*tas archas*）很容易被认为是实施统治（*archein*）的人。按照这种情况来看，那些被排除在最高职位以外的多数穷人似乎实际上没有在“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因此他们实际上也不能算作平等的公民。

通过“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那样”的鲜明策略，以及扩展统治与主权者的概念关联，亚里士多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一方面当然是最高职位的执掌者在实施统治。然而另一方面，只有那些选择掌权者（以及审查他们是否具备资格）并且评判掌权者绩效的人们才是主权者。他们自身无需掌握最高职位，而是（以这些方式）控制最高职位的执掌者。民主政体下多数人作为主权者的权力是决定（谁应该统治）与评判（他们统治的好坏）的权力。即便是多数穷人也能够很好地行使这些职能，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如下的理由：“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个单独的人常常是乏善可陈的；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11]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既是诱人的，又是难以捉摸的。正如经常被援引的这段话那样，亚里士多德“民主的宴会”通常被解读为多数人可以提供更大的多样性，尽管他也可能是在强调多数人能够提供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亚里士多德在本讨论中作为例子提出的其他意象也充满了模糊性）。[12]不管多数人集体判断的优越性源于何处，多数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即《政治学》那一章所体现出的决策权在政治上的运用，他们的角色被具体限定在控制高级职位的执掌者上。在那一章中，这被用来解释人民主权的行使何以能够控制职位的执掌者，即便人民在某些特定的体制背景下无法亲自掌握那些职位。

所有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都被置于法律之下。[13]亚里士多德此处再次超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范围，他一边宣称人是法律的评判者，一边又赋予法律比人更多的尊荣，他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变动。亚里士多德十足地确立了法律在共同体中作为理想的统治者的地位，法律高于执政官，因为它不受人类激情的羁绊，它是公正无私的。只有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14]执政官或官员们才是主权者。然而法律本身对

一个既定的政体来说是相对的。寡头政体与民主政治不能适用同样的法律，而最优良政体的法律与这两者又都有所不同。

最好的政体

在《政治学》的最后，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一般意义上的最好政体即“我们所祈求的城邦”，将之与大多数人、大多数社会的最好政体相对比。这需要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幸福的人必须具备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以及灵魂诸善”，但这三项善因最终都要服从于灵魂诸善，因此“各个人所得幸福的分量，恰好应该相等于他的善德和明哲以及他所作善行和所显智慧的分量”。[15]幸福不全部归功于幸运。尽管一个人可能因为无法享受发展自己各项能力的教育，或可能遭受厄运的打击（丧失家人或家庭），他的幸福因而受到伤害，但是幸福却是根源于一个人的自我行为。当城邦使自己的公民们达成了各自的幸福——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有德性行为——的时候，这个城邦就是幸福的。最好的城邦就是能够塑造并由这样全然有德性的公民所构成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构建这种最好的政体的方法。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与军事集会都依赖口头发布命令，将军们大声下达命令，传令官们口头召集开会，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必须拥有规模上的自然限制：“为数那么多的群众，谁能做他们的将领而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顿笃（Stentor）那样的嗓音，又谁能给他传令?”（1326b）最好的城邦需要有保证自给自足的足够领土，但是与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不反对在城邦开辟一个经营对外贸易的港埠（尽管他十分赞赏某些城市在市场的商贸区域以外划出一定的空间以专门用于政治集会的做法）。我们从他关于最好的城邦的论述中看到了他整个政治学思想的张力。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任何公民都不能从事工匠或商贩的职业，“因为这种生活不光彩而有碍善德”，任何公民也不能从事农民的职业，因为农民没有培养德性的闲暇（1328b-1329a）。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的缺陷是因为职业习惯与实践活动，而非因为他们的固有能力。他们（被迫）的生活方式而非他们的固有品性使工人与农民们无法获得最好城邦的公民身份。[16]“老寡头”曾经认为穷人的无知是因为缺乏教育而非他们固有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这里与其类似，他把穷人缺乏政治能力的原因归结于他们的境遇而非各自的本性。

这表明他们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并非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本意，而毋宁是经济社会构成方式的一种结果。在一个某些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政体当中，一个有德性的政体由实施自我统治的少数有德性的公民组成。然而当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多数人也能够享有达成德性的良好教育与闲暇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逻辑将把公民实施自我统治的范围扩展到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此处再次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逻辑排斥他自己以及我们对民主政治的过度理想化，然而也发现他的论证逻辑具有向民主方向扩展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政治学》时强调教育应该适应于每一特殊的政制形式（1337a），它应培养人民的各种恰当习惯以使政体长盛不衰。实际上，每一种政体形态都会试图去塑造公民的品性，以适应它们各自的政治目标，有些政体形态比另外一些做得更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为一个良好政体立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的原因。因为只有在最好的政体之下，好人与好公民才能完全吻合。在每一不完善的政体之中，公民的各种能力与性情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以适应统治集团特殊或乖张的利益——即便那是把所有公民都包含在内实行一种多数意见的暴政。我们必须努力按照人类最好的本性去创造一种政治，以免让政治按照最坏的本性去塑造我们。

在实践自己的理论理性时，人类分有神灵的能力。在与公民同胞共同协作时，人类能够最好地实践与完善自己的实践理性。公民身份从理想上来说是实践人类本性这种深刻能力的条件与顶峰。当人类本性的这种能力具有平等分配的可能性时，人们为之欢声鼓舞，但这种能力也可能不是平等分配的，这又导致了公民身份自身分配的不平等。公民间相互平等的诉求开启了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大量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公民身份自身的基础的问题。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大超出了公民身份的范围，但是他对公民本性及其与政治体关系的论述明确表达了一种政体理想。另外，他还探究了这个理想政体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各种变体与背离形态。不同政制形态可能会误解德性的必需条件，或者把政治权力置于德性的不当象征之上，比如财富或单纯的人数。这些政体中的公民不断内化与坚守着他们的价值理念，极易恶化自己的弱势处境。只有最好政体下的公民才能够发展出彻头彻尾的公民美德与优势力量。正如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人所身处的政体对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我们在下一章将发现，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后还有很多后辈学者在雅典教授哲学，他们以多种方式探索出了更大规模的政治体，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对把最好政体与个人追求最好的生活相联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注释：

[1] 这是Ober和其他一些人的计划，参见Ober 2005。

[2] 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这一出发点，一项卓越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参见Lear 1988。

[3] EN 1103b，我严格遵循Barnes（1984）中的译文，但也对其做了些许修改。

[4] 关于亚里士多德该伦理学观点的卓越分析，参见Burnyeat 1980。

[5] 关于家庭及其成员如何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研究，参见：Cooper 2012, pp. 70-143。

[6] 此处我借鉴了Schofield的观点，参见：Schofield 1999a, pp. 115-40。

[7] 利用亚里士多德来为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侵略进行辩护的研究，参见Pagden 1995; 利用亚里士多德来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制进行辩护的研究，参见Monoson 2011。

[8] Amartya Sen（1982）相当著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9] 一项关于家庭及其成员如何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有价值研究，参见：Cooper 2012, pp. 70-143。

[10] Lane 2013e，即将发表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它可以被视为人民主权的概念，尽管它不是人民权利这样的法律词汇，它也不代表人民能够控制与管理自己的事务与利益

——正如西塞罗所发展出的人民主权理论那般（参见：Schofield 1999a, pp. 178-94）。

[11] Pol. 1281a-b，译文参见Reeve 1998。

[12] 雅典的集体宴会通常依赖一个公民小组所提供的集体资金，而像克里特这样的城市的集体宴会则由城市的公共资金来提供，斯巴达的集体宴会采取个人贡献食物的方式。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对基本的生活供应品，以及偶尔打猎获得的肉类或其他美味进行征税。学者们通常主要注重集体宴会中的百家餐色彩，或者更一般意义的参与人员的多样性，这种观点主要见于Waldron 1995，并且在Wilson 2011以及Ober 2013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捍卫。然而，Lane（2013d）则注重数量的积累。对我观点的一系列怀疑意见，参见Cammack 2013。

[13] 关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法律之治”理想的贡献的研究，参见Allen 2000。

[14] Pol. 1282b，译文参见Reeve 1998。

[15] 引文分别见于Pol. 1323a, 1323b。

[16] 这里的论证思路受到了Frank（2005）的影响。



第六章

世界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单一城邦的公民身份。城邦是一个城市国家，它通常依靠法律进行自我管理，也会构筑城市围墙来自我防卫。[1]希腊的后世学者，以及后来罗马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疆域与定义。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通过不同的视角开始怀疑最好的共同体是否可能不局限于城市的法律与围墙。它可能仅仅是从城市某一区域内遴选而出的友谊群体；或者可能向外扩展而囊括了一切理性的个人，无论他地理上身处何方。

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上述以及其他的可能性了，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大约最后二十五年里，此时雅典诞生了两个新的哲学流派。这两个哲学流派对作为政治理想的城市法律与围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提翁（Citium）的芝诺（Zeno）创建了斯多葛学派，据说他在其著作《政制》（*Politeia*）中反对根据个人的正义体系来划定城市各区域或地方的边界（Plutarch, *De Alex. Fort*.329A-B）。[2]与此同时，萨摩斯（Samos）的伊壁鸠鲁（Epicurus）创建了伊壁鸠鲁学派，在哲学论证中成为斯多葛学派的主要对手。该学派数世纪后激发了一位狂热的信徒在一块石头上雕刻下了一个时代的呼声："城市将无需围墙或法律。"[3]我们在本章将会发现这两个学派提出了根本不同的政治理解，但它们也拥有相同的信念，即哲学与政治理想最终将不受城市法律与围墙的限制。

其中最著名的新理想是斯多葛学者所提出世界主义。实际上，世界主义仅仅是这一时期针对政治共同体的疆界、价值与定义而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所有此类新挑战之下，人们围绕正义的自然或约定根源、平等的定义及其与公民身份的关系——前面章节的重要主题——展开了全新的关注与讨论。是否有一种政治可以超越既定政体的法律或围墙的限制？这既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又使人们对政治自身的性质产生了质疑。

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世界主义的初始版本就已经产生，它首先由另外一场哲学运动的支持者即第欧根尼清晰地阐述出来。有人曾经问第欧根尼来自哪里，第欧根尼回答说他并非来自任一城邦，而是*kosmopolites*，即一位世界公民。在第欧根尼看来（后来以犬儒主义者的名号被世人所熟知；犬儒主义者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狗，因为他致力于按照自己的动物本性而生活），"世界主义"的意思是说他一并反对任何政治共同体对其自身所施加的一切要求。从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们那里借来这个单词，斯多葛主义者们对它作了巧妙却在方向上十分不同的发展。他们没有取消各种地域形式的公民身份，而是把它们纳入到世界公民身份之中，使其具备了更多的积极意义。他们用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对抗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后者已经开始明确呼吁另外一种形式的理想共同体，即一个政治体内部的友谊群体——它能够给人带来安全与正义。最后是"怀疑主义者"或"问询者"，他们按照两条谱系脉络（一种是更为温和的后柏拉图学园的"学院派"怀疑主义者，之后的另外一种则是更为极端的怀疑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追溯到与芝诺和伊壁鸠鲁同时代的一位前辈学者）发展，他们都认为所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表面而肤浅的约定，但对它们是根源于理性还是自然的问题不置可否。

除了第欧根尼以外，所有这些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观念都属于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即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到公元前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的后裔所统治的最后一块帝国领土）臣服于罗马的古希腊历史时期。[4]希腊化时代及稍早时期的关于世界主义的各种变体及替代形式的讨论为人们思考政治的起源、价值、位置及其疆域范围开创了新的平台。除了能于这一时期发现新的学术流派（早期的犬儒主义者，以及斯多葛主义者、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怀疑主义者）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柏拉图的思想在其学园里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吕克昂学园里面得以继续发展，后者的追随者们甚至有了新的名字即“逍遥学派”。在思考这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大部分学派把它们置于更宏大的物理学、逻辑学与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伦理学的一部分，只有在为了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我才会涉及到这些学科。

苏格拉底与智者们关于自然与约定的讨论在这些新的哲学框架内得以复兴与延续，但关于世界主义及其定义的新问题同时被提了出来。希腊化时期哲学论辩的主要问题包括：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主义者们以各种方式所提议的，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进而直接体现于某些政治之中？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人的政治实现形式是自然地还是理想地限于有围墙的单一城邦，抑或更大范围的“世界城邦”（cosmopolitan）之内？或者与之相反，政治仅仅是一组有用的约定而与人类更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无关——正如伊壁鸠鲁主义者所主张的，而怀疑主义者则对它的可能性不置可否？抑或是说这些政治约定实际上伤害了人类自身的繁荣发展，正如犬儒主义者对它们的无情斥责？人类共同体的起源与存在场域、法律的性质、良好生活是源于德性还是享乐、正义的价值，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哲学论辩的主题。

世界主义之场景一：反政治（**anti-politics**）的犬儒主义者

当第欧根尼被问及来自于哪里的时候，他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想说出自己的出生城邦（锡诺普［Sinope］，一块位于黑海之滨的希腊殖民地，它盛产日后文艺复兴时期用于壁画创作的红黏土）。当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字面意思即为整个宇宙的公民（DL 6.2.63）——的时候，他似乎是在说自己从本性上而言不是任何特殊的城邦的公民。他并非在构想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责任。与此相反，他宣称放弃并抨击任何普通的人类城邦对自己可能施加的那些要求。

因为第欧根尼认为任何城邦所强制或期望的任何生活方式对他都无效，所以他没有遵循传统所期望的公民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他过着一种在周围人看来像狗一样的生活（Cynic这个单词来自于*kuon*［狗］；然而第欧根尼视别人的辱骂为一种荣耀）。因为狗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政治抱负或身份，所以第欧根尼也没有。[5]他像狗一样地生活是对纯粹动物生活的一种尝试。一切法律与人类的约定对他来说都是外在而不自然的。因此他像狗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撒尿、排泄以及交媾，对此他不觉任何羞耻。他宁可栖身于一个红色储物大桶里——有时

狗也可能前来此处寻找庇护，也不去建造人类自认合适的住宅居所。他蔑视一切礼仪与廉耻规范，或者说他拒绝它们对自己的效力。他对政治利害或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恐惧。据说某天亚历山大大帝前去探望第欧根尼而想提供给他一些好处时，这位犬儒主义者——正在外面全身赤裸享受日光浴——仅仅请求这位君王不要挡住阳光。

第欧根尼的生活不在此世，因为他对人类事务一无所知，他也不仅仅是处于人类的原始状态。恰恰相反，他在兑现一种哲学承诺。让我们重新回到公元前5世纪习俗与自然（*nomos/phusis*，即法律与自然）之间的争论。第欧根尼反对仅仅是人类专横约定的习俗而赋予自然以绝对的意义。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曾经批判过人类的某些约定，但他们最终都坚信有一种与自然相协调一致的真正的正义形式。第欧根尼则不然，他认为正义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约定，它与自然始终处于矛盾之中。遵循自然的生活就是通往理性、幸福、自由与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第欧根尼曾一度被卖为奴隶，但他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他的买主认为第欧根尼比其他家庭成员更适合掌管家务（DL 6.2.74）。犬儒主义者的自然生活方式不是按照自然正义去建构法律，它毋宁是为了反对法律与正义的一切虚假要求。第欧根尼宣称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实际上他是在宣称自己根本不是公民："唯一正确的政制形式是根据宇宙而来的。"（DL 6.2.72）

他的声明没有阻止其他的犬儒主义者把自己打扮为第欧根尼的徒子徒孙（第欧根尼自己当然没有创建任何正式的学派）。他的追随者们致力于传道授业，甚至还充当起了多个王室的内部成员。[6]犬儒主义者们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学派，但他们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反文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在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里，犬儒主义一再受到普遍的欢迎，最终它被四处布道的传教士与乞丐哲学家们所吸纳。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希腊化时期的其他学术流派正蓬勃而起，特别是在基督教崛起时的公元1世纪的罗马时期。[7]犬儒主义者们与后来中世纪的弄臣相类似，但他们更为彻底地推翻了人们阿谀逢迎与渴求王室荫庇的观念与期望。他们信奉并珍视独立与自足的价值，像其他希腊哲学家那样，他们以实现了这些价值而自夸。据说后来亚历山大大帝认可了自由与自足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第欧根尼通过反对一切人类约定的方式得到了它们，但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则通过对外征服也掌握了它们。一直流传着他的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那么我是（即想要变成）第欧根尼。"[8]

世界主义之场景二：跨政治（**trans-politics**）的斯多葛主义者

芝诺是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他曾经与犬儒主义者克拉特斯（Crates）一同学习，后来两人相继拜服在第欧根尼的门下。这激发了芝诺的反政治思想。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一点，然后再讨论他如何重新塑造了世界主义理想的主要内容。犬儒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切地域性政治秩序中的自然性进行了批判，但芝诺改变了这一做法，进而认为宇宙

内特定居民的某种政治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具备自然性。

芝诺吸收了犬儒主义者怀疑日常现实政治体制的思想，而认为大部分的现实政治不适用于理想的政体。即便是被希腊人所普遍认可的有利于公共秩序的禁忌，比如乱伦与食人肉都受到了芝诺的学生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的挑战。克律西波斯认为“与母亲、女儿或姐妹发生性行为的禁忌在理性当中找不到根据”；如果食人肉是有用的话，人类相食甚至是吃掉死去的父母也并非不自然，因为正如野兽一般，人类死去的尸体不过是待消耗或被抛弃的物质而已。[9]

与这些不当的禁忌相对，芝诺与克律西波斯各自写了一部《政制》（*Politeia*），他们在书中提出了全新的理想政治制度。其内容要比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描绘的政制更加全面，更加严苛与彻底。为了理解斯多葛的思想创新，我们必须快速地回顾一下柏拉图著作中的理想城邦。他所构想的哲人王们不能有个人的财产与家庭，他们的生活所需与住房都由城邦所供给，他们所繁育的后代也由城邦来集体抚养。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计划之中，这些限制仅仅适用于统治精英们，普通公民将拥有个人的财产与子女。另外，在他们的计划中只有统治精英们才是全然富有德性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德性所必需的知识。其他公民将尽可能地保有德性，他们将受到统治者理性的托管，但自己无需拥有全然的德性。

芝诺指出了柏拉图式的政制的张力：如果所有公民不都是全然富有德性的，那么城邦也不是一个完全有德性的城邦。因此在他看来，有且只有所有富有德性的人们才是“公民、朋友、亲戚与自由人”。与他们相反，所有不具备德性的人都是“相互疏远的敌人与奴隶”（DL　7.32-3,译文见于LS　67B）。然而，这种真正的公民德性需要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支持。[10]

斯多葛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在此产生了分歧。他们没有反对一切人类法律与约定，而是——如柏拉图一般——发展出了他们自己所认可的人类法律与约定，他们描绘了一种真正的政制形态，并且以此来要求公民的服从。当芝诺与其追随者们像第欧根尼一样对现实的法律与习惯展开猛烈批评的时候（芝诺的理想城邦同样禁止庙宇、法庭、体育场以及金钱货币），[11]他们主张用真正符合自然的法律与习惯代替它们，但这在第欧根尼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也是毫无必要的。芝诺所提议的社会机制包括了所有公民的集体性交行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政体仅把此局限于城邦的卫士阶层），以及不分男女一律统一的近乎于裸体的服饰。他《政制》一书中的这两项建议都是为了促进公民之间的爱意与和谐，使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体。

这表明芝诺及其学派所认可的自然生活方式不是第欧根尼所谓的像狗一样的简单生活。相反，自然生活需要重塑个人的反应来与理性相协调，以及追求德性的完善。自然是一种规范与标准。一个人所有想做的事情不都算是自然的。只有那些表征并把我们的本性与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理性相联系起来的行为才是真正合乎自然的。学习并且渴望去行一切（并且只有）最自然之举，这本身就是一项道德成就。

年轻人在学习理性的过程中会发展出与其他动物一样的自然冲动。对一只幼兽来说，体现自然的密切关联的东西都属于自然冲动：首先是生命，以及跟生命“紧密相关”的事物，还有避免祸害（DL 7.85.4）；其次是与别人的相互协作。[12]这种与别人发生联系——即“归家”（*oikeiosis*）——的自然冲动由内而外地从自我经过家庭、共同体，最终在理性的指引之下扩展到整个宇宙。因此人类从自然本性上来说具有社会性。个人在自己与别人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尖锐的或自然的割裂。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伦理学与政治学——如果正确理解的话——都同样是自然的。过一种富有德性以及公民的生活都根源于人类的自然冲动，我们人类从自然本性上来说就具有发展它们的能力。

然而，如果斯多葛主义者把公民生活视为“归家”的自然结果，那么世界公民就是它的自然极致。在总结斯多葛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种观点：“世界就像一个城邦，它由神灵与人类所构成。他们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都分有理性，即自然法。”[13]克律西波斯在其著作《论法律》的开头就详细阐述了自然法：“法律是所有人类与神灵的主宰。作为主宰与向导，法律必须说明什么是荣耀与卑劣，因此它乃是非对错的标尺，它向那些本性是政治的物种说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尤其对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自然法能够赋予人类法律以意义的观点成为协调日常政治与世界主义的主要方式。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他曾经是希腊奴隶，后来在罗马人治下从事创作）宣称你必须担负起你的一切社会角色（作为儿子、兄弟、议事会成员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身份）的相应行为。[14]然而你也必须谨记“你是宇宙的公民。”[15]你拥有这样的能力，你不应该孤立于整体之外，你应该审慎地对待一切事物，始终参照整体而做出自己的思考与行为。我们在这里发现世界公民的新理想被用作人类行为的评判标准，尽管日常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得以维持。世界主义也可能包含人们对地域政治的服从，斯多葛主义者们从没有放弃过这一立场。近代政治哲学后来继续捍卫了这一立场，将其发展为一种“有根的世界主义”[16]（rooted cosmopolitanism）理想。

友谊群体：内政治（**infra-politics**）的伊壁鸠鲁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者们把人类与神灵都视为同一个宇宙城邦的组成部分，他们确信人类与神灵都能够达成理性与法律的共同自然标准。公元前307年，伊壁鸠鲁把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带入了雅典，并在雅典的一个庭园内传道授业。在与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们的哲学论争中，斯多葛主义者们必须去捍卫人类与神灵的相互关联性。在伊壁鸠鲁看来，神灵与人类的世俗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人类的生活独立于神灵的授权或惩罚，它完全按照凡人的时间线索而独自展开。伊壁鸠鲁认为“死亡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感官体验停止的时候，任何能影响人类的事物——痛苦与欢乐——也就都停止了。因此，人类的使命就只不过是尽最大的可能去追寻牢靠的欢乐，以及避免痛苦。

人类的使命当中没有斯多葛主义者所谓的作为向导的理性自然法，

也不存在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的自然标准。犬儒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怀疑主义者都把苏格拉底视为楷模，但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独独排斥他。在经常出入伊壁鸠鲁的花园的朋友们看来，法律不过就是公元前5世纪某些智者所持的看法：人为创造的约定；它无非是为了促进人类牢靠的欢乐，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痛苦。政治可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但它并非基于人类关于社会性——无论它青睐于一个地域还是宇宙的政制形式——的自然冲动。它不过是一种人造之物，它不应试图激励个人自我牺牲的德性，而应去促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欢乐（尽管伊壁鸠鲁持有欢乐的普遍观点，但是通过降低欲望的方式，他认为欢乐最容易达成与满足；伊壁鸠鲁的欢乐来自于面包与水，而不是名贵的松露与香槟）。尽管如此，政治还是有利于人们达成牢靠的安宁状态。

在追求安宁生活的过程之中，伊壁鸠鲁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蔑视社会的各种约定（伊壁鸠鲁主义者也不像芝诺与克律西波斯那样去创造更理性的法律）。伊壁鸠鲁主义者外表上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们会结婚，也会遵守性行为的法律；他们有所失的时候也会感到悲伤；他们甚至也会“提起法律诉讼，在即将死去的时候也会留下著述。”[17]从同一文献中我们得知“他们不会参与政治”，但是他们“偶尔也会向君王献殷勤”。然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荣耀，或者基于什么德性的义务，他们只是乐于履行日常的公民职责。伊壁鸠鲁坚持认为其追随者们都应该愿意“担当陪审员。”[18]尽管如此，与斯多葛主义者相比，伊壁鸠鲁主义者对政治参与的各种传统形式表现出了少得多的兴趣与热情，比如他们把修辞术称为“卑鄙的技艺”。[19]

因此对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政治关系的角色主要是功能性的。人们应当按照用途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内在价值对它们做出冷静而客观的评价与支持。法律只不过是人类实施强制力的一种工具，它并非什么神圣理性。正如伊壁鸠鲁主义者赫尔马库斯（Hermarchus）的劝诫：“人们对效用视而不见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对法律惩戒的惧怕。”[20]与柏拉图主义者与斯多葛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正义并非基于自然。恰恰相反，正义是人类创造的互惠约定。伊壁鸠鲁说“自然正义”并非确定的词汇，正义是“互惠互利的保证或承诺，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受到别人的伤害”。[21]从本质上而言，不义之举不是一种错误，它无悖于自然。只有在他害怕其不义之举会带来伤害或惩罚的意义上而言，它才是错的，进而损害了他的自信与安宁。

伊壁鸠鲁主义者们的分析既不以某一政治共同体，也不以整个世界共同体为中心，反而聚焦于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内政治”（infra-political，即政治之内或政治之下）的特殊共同体形式。这种共同体因相互的友谊关系而得以定义。[22]它由出入伊壁鸠鲁式花园的朋友们所构成，他们都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友谊对形成与促进安全感以及心灵的平和——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据说友谊实际上是最大、最持久的欢乐，它是一种真正的喜悦。[24]尽管友谊与正义一样一定是源于效用，但是友谊所蕴含的真切的安宁需要一个人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因此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对友谊的坚守是绝对而不讲条件的，以至于说一个伊壁鸠鲁主义的哲人“有时会为朋友献出自

己的生命”。[25]

当犬儒主义者们试图像动物一样过活的时候，伊壁鸠鲁主义者们痛斥此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无异于“狮子和狼的生活”。[26]另外，与斯多葛主义者们不同，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友谊而非法律才是理想的共同体形式。然而友谊群体也可能超越花园的范围，进而发展为更宽广范围内的共同体，此时普通形态的政治就会消亡。因此很多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是热情的慈善家。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吕西亚山区奥诺安达（Oenoanda）城城墙上的一段铭文：“城市将无需围墙或法律”。[27]它可能由一位伊壁鸠鲁主义的哲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所创作，它向人们传递了一幅人类世界没有围墙或法律的伊壁鸠鲁主义式的愿景。现在我们知道铭文的作者是奥诺安达的第欧根尼，这位哲人与捐助人解释该铭文说：“帮助我们的后人是正确与恰当的”，也就是说帮助后人不受“虚假观念的时疫”[28]的影响。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不受围墙与法律阻隔的世界将是一个由效用与友谊所构成的人类共同体，它不受制于什么自然与神圣的法律。

不管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如何乐善好施，一般而言他们只认可自己特殊群体内的正义条款，并且用自己的哲学立场——寻求牢靠的安宁——去捍卫之。斯多葛主义者与柏拉图主义者们对此都不甚满意，他们认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只把正义视为算计与自私的工具。然而至少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在人们互利互惠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牢靠的正义。另外，尽管各学派互有分歧，但斯多葛主义者与伊壁鸠鲁主义者都认为好的生活只可能建立在正确的哲学立场与理解之上。

希腊化时期最后的哲学流派是怀疑主义（两条脉络），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更为彻底的批判，尽管在实践中接受与“寂静主义者”（quietist）颇为类似的做法而恪守现实政治的要求。一旦一个人理解了为何以及如何按照自然生活，他就能够拥有智慧与德性，因此他就是一个幸福与自由的斯多葛主义者；一旦一个人理解了神灵、死亡与欢乐的本质，并把它们视为同一个善，他就能够拥有智慧与安稳，因此他就是一个得以享受安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当一个人正在获得对世界的真实理解的时候，他就能够获得这些恩赐。（伊壁鸠鲁《梵蒂格言》［*Vatican Sayings*］的第31节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与其他大部分的事物相比，人类最能获得安宁。“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人类都能居于没有围墙的城”［LS　24B］。）与之相反，希腊化时期后来崛起的哲学怀疑主义运动认为实践中理解世界的努力恰恰伤害了安宁。停止这种努力，停止下判断，这才是（极具吊诡色彩）获取安宁——希腊化时期所有哲学流派都认可的幸福之必需条件——的最佳途径。

城邦怀疑主义者（**Scepti-politanism**）

怀疑主义学派的名字来源于希腊单词“问询”（*skepsis*），它诞生于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以及其他学派）学派之间的争论中。如果各家各派只是让自己的信徒们处于相互攻击的悲惨处境，

那么它们怎能提供获得安宁的良好训诫呢？怀疑主义者认为这些争论与反驳都不具备理性的基础。唯一合理的回应是停止对所有争论作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一个人可能会理性地选择一种学派，认为它比其他学派更具可能性与说服力，因此在实践中遵循这种学派；一个人也可能只是遵循自己共同体的各种约定，而不质疑该共同体的任何正当性。这后一种情况正是后来更为激进的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达到顶峰的怀疑主义的观点。激进的的怀疑主义者们把自己视为皮浪（Pyrrho）的追随者，因此可以统称他们为“皮浪主义者”。他们令人兴奋的怀疑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能够获得哲学争论所追求的安宁，只要人们不再执迷于任何一种哲学流派。

怀疑主义的政治影响在理论上是极为深刻的，尽管稍后我们将发现它在实践中可能并不是那么地举足轻重。在理论上，怀疑主义者们认为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所认为的对良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各种信念都毫无用处。公元前155年，由雅典的三位哲学家——一位逍遥学派的代表、一位斯多葛主义者与一位怀疑主义者——组成的大使团出使罗马。面对每位大使各自阐述的哲学立场，罗马贵族们都深受鼓舞，以至于允诺派遣各自的子弟们前往希腊学习哲学，他们甚至还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希腊哲人到自己的家里与朋友圈中做客。

没有哪位大使比怀疑主义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的阐述更为有力或更加令人不安了。他代表了当时柏拉图学园的温和怀疑主义转向。他第一天先作了一个著名的公共演讲，大谈特谈正义对政治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然后第二天又做了一个公众演讲，为同一目的转而又高度赞扬了不义对政治生活的意义。对同一哲学立场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这是怀疑主义辩论方法的精髓。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服另外一方，这位怀疑主义者宁可拒绝作出任何判断，也不对它们的正确或错误进行武断的评价。然而人们可以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得出一方比另一方更有可能性的结论，即使是卡涅阿德斯本人。卡涅阿德斯对不义的赞扬使怀疑主义成为最有可能侵蚀政治关系正当性的哲学流派。

卡涅阿德斯的演讲最好的记录是在西塞罗的《国家篇》中。西塞罗记述了两位罗马公民在公元前129年（因此他们还保有卡涅阿德斯出访罗马的鲜活记忆）聚会时的谈话。这两位公民采用倒叙的方式重现了这位雅典的怀疑主义者的演讲。我们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西塞罗，此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他的著作确实向人们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观念，他对其进行研究、记录，乃至有所发展。西塞罗记录的卡涅阿德斯的演讲，通过后来的两位罗马公民，实际上是现存对其内容最为完整的表述。西塞罗先是安排了卢修斯·弗里乌斯·菲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赞扬不义的言论，然后又让盖尤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作出了赞扬正义的回应。莱利乌斯的回答较之著作的其他内容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篇。然而我们能够发现他提供了一种与斯多葛主义者相类似的观点：“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类的……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也就是说神灵是我们一切人类的共同主宰与将军。”[29]然而我们此处将主要关注西

塞罗让菲卢斯发表的赞扬不义的言论，因为他代表了卡涅阿德斯的观点。

据说卡涅阿德斯对斯多葛主义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法”。在重述了这种反斯多葛主义的观点之后，菲卢斯又搬出了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根据效用的原则，人类为自己制定法律。”然而他转向了一种极具诡辩色彩的方向。伊壁鸠鲁还认为应当尊重法律与正义，因为它们是有效用的，但是怀疑主义者们对此誓死不从，他们认为“不存在什么正义之类的东西，或者说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最大的愚蠢”，因为正义的人将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30]

菲卢斯首先声明正义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仅仅是基于人类的约定而非什么自然（智者观点的再现）。他认为“如果（正义）是自然的……那么正义与不义——像冷热酸甜一样——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31]然而正如希罗多德用其历史叙述告诉我们的（本书第二章），人类社会对何为正义与不义的判断大相径庭。菲卢斯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正义与法律不可能是自然的，因为人类的约定不停在发生激烈的变化。[32]（其中一个例子是说罗马法律的变化。它实际上使富人们无法把大部分的女性列为遗产继承人。菲卢斯说这种法律“对女性极为不利”，他追问：“为什么女性不应当拥有她自己的金钱？”[33]）在说明正义源于约定之后，菲卢斯继续论证认为寻求正义，特别是在外交关系领域，违反了智慧对一个人的告诫：“统治尽可能多的臣民，享受快乐，变得富有，成为统治者和主人。”[34]

我们在第一章与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关于正义的各种挑战——柏拉图《理想国》中卡里克利斯所持的论点，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急切希望听到的相反观点，它们前后相承地联系在一起。在本章讨论怀疑主义对正义的挑战时，我们无疑也要参考前面的内容。卡涅阿德斯首倡而菲卢斯重述了怀疑主义对正义的批评，其核心是批评正义的自然性，以及后来伊壁鸠鲁主义者把正义（至多）视为效用的观点。然而菲卢斯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也存在分歧，前者提供了许多正义与效用截然两分的案例。一个人在紧要关头最自然与聪明的办法当然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但这需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智慧与正义无法协调在一起，这是一种反苏格拉底、柏拉图与斯多葛主义的观点。但效用与正义也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又是一种反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怀疑主义者无法全然认可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任何一方。

卡涅阿德斯赞扬不义的演讲对个人与政治生活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他赞扬不义的观点成立，那么这就将超越伊壁鸠鲁主义把正义视为效用的观点，进而主张积极追求利益与权力而不管手段的正义与否：不管是因为个人自己的财政状况而逃避法律，还是在帝国扩张中不公正地对待那些被征服的各民族。卡涅阿德斯演讲当中的伊壁鸠鲁主义与诡辩腔调使其变得如此令人不安，尽管从怀疑主义的论辩方法上来说，它们并没有被令人信服地驳倒。按照怀疑主义的论辩方法，对正义的辩护也没有被令人信服地驳倒。这就解释了怀疑主义为什么在政治实践上比在政治理论上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怀疑主义用不义反对正义的做法并不会导致它对不义孤注一掷地追求，而是要求停止对

双方的正确或错误作判断。怀疑主义者不会得出伊壁鸠鲁主义者或智者的结论，他们也不会得出斯多葛主义者的结论。他们对一切相反的哲学观点都不会全然接受。

那么，一个怀疑主义者如何生活呢？没有教条主义的正当理由去公然藐视人类习俗，怀疑主义者将按照他所在的城邦的习惯而生活。更有甚者，如果他采纳最具可能性与说服力的立场标准，那么这种生活实践方式将得到进一步地加强。然而即便他遵循那种可能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也不会对这些习惯与法律是否真的正确或错误作出判断。[35]因此从表面上看一个怀疑主义者的生活方式与他的不懂哲学的邻居毫无二致。不纠结于事物的本质到底如何，你就能获得安宁的生活。怀疑主义者不会是什么挑衅或教唆者。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女性怀疑主义者，那么她并没有教义学说的正当理由去教唆或挑衅她的邻居或当权者。她不会执迷于某一种哲学信条，正因如此她没有理由去公然藐视社会的各种习俗。她将遵循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城邦怀疑主义”（*scepti-politanism*）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将从内部掏空她对城邦的承诺，而不是采取某种世界主义身份的形式从外部挫伤城邦的元气（如犬儒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抑或把自己的需求相对化而扩展到宇宙共同体中的理性个人们（如斯多葛主义者那样）。

绝境之中的希腊化时期哲学

在这些哲学流派之间作抉择不是一件小事情。对希腊与罗马人来说，选择遵循哪条哲学道路，按照哪种哲学方式去生活，加入哪个流派，对个人来说都是急迫而意义重大的事。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理想与抱负，他是去追求担当公共职务，还是退隐于世俗之外，以及一个人的心理状况，面对配偶或孩子的死亡该如何反应，这些都取决于他所坚守的哲学，以及这一哲学内化于自己的程度。尤其是对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哲学观念的承诺，即他们或多或少都要跋涉在力图对哲学作彻底理解的旅途之中。一个人的伦理、政治决定与他关于宇宙的本质的看法相互交织在一起。宇宙是否如斯多葛主义者的判断那样是已然确定的，充斥着自己的精神与理性，而神灵是为了宇宙的共同利益？还是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看法那样，宇宙是随机的、物质的，而仁慈的神灵与人类事务漠不相关？抑或是如怀疑主义者的观点，一个人根本不应该作出任何选择？

在多种多样的哲学世界观中，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斯多葛主义最支持日常的政治参与和政治领导，尽管它把地域的政治诉求置于世界主义的背景下理解。芝诺开创了斯多葛学派，他最得意的门生珀耳塞斯（Persaeus）生下来便是奴隶。珀耳塞斯与芝诺曾经一起学习，后来供职于马其顿的王室，最终被任命为希腊城市科林斯的执政官。另外一位斯多葛主义者可能在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斯三世（CleomenesIII）在公元前3世纪的激进政治改革中充当过顾问，据说这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莱库古（Lycurgan）的先王之法。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唯一推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此外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学派，这可能很容易理

解，因为他们与斯多葛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具有社交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在希腊化时期继续开放（如柏拉图的学园一样）。学园曾经培养出了一位学生，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被马其顿的掌权者们任命为雅典的保护者与将军。学园的另外一位学生作为特使而被秘密派遣至外邦的一个君主国，并且在那里受到君主的委任而为一个新城市即梅格洛玻利斯（Megalopolis）拟定政制（Polyb.5.93）。还有一位学园的学生甚至在埃及成为首位希腊化时期君主的儿子的老师。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尽管世界主义的政治观念已经出现，但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担任统治者的顾问与教师方面，他们做得甚至比自己古典时期的前辈们更为成功。在进入希腊化时期以后，城邦的影子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立即消失。如果一些希腊城邦在稍早的时候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么另外的一些城邦得以相互结盟，并且维持了数世纪的独立与自由。同时，与古典时期的哲学前辈们一样（就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也仅只早了十五年多一点而已），斯多葛主义的创立者们也勾勒了各种各样的理想政制形式（*politeiai*）。那些斯多葛主义的竞争对手们——崇尚友谊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与对公民政治忠诚感的真实性拒绝作出判断的怀疑主义者们，尽管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各种诉求持有更多的怀疑态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供职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行刺者之一政治家卡西乌斯［Cassius］就是一位伊壁鸠鲁主义的信奉者。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当一位暴君对安宁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采取行动使政治共同体摆脱这种威胁，卡西乌斯及其同谋者们认为恺撒就是这样的一种威胁。）

在斯多葛主义者的努力下，世界主义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一种政制，它超越了传统城邦的疆域限制，尽管斯多葛主义的追随者及其竞争对手们在理论与实践上仍然很严肃地对待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地域规模。世界主义把日常政治的诉求与价值置于一个特定的视角之下，将其与个人的身份与义务进行比较，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与宇宙内其他理性存在整体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这就是世界主义的政治观念对罗马共和主义思想家们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之一。他们深深地受到了希腊化时期各种哲学争论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试图效忠于自己独特的政治共同体。我们下章将探究把希腊人置于自己的阴影之下的罗马人，如何旗帜鲜明地发表他们关于罗马共和国政制的独特性质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吸收、发展与重塑了希腊古典时期与后来的希腊化时期的各种政治理想。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的确在某处曾表示过希腊人能够统治周边各民族，进而大胆地发展出“一个单一的政制”（Pol. 1327b31-3）。按照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思路，这种解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比如Meier 2011，p. 41，但是最好把其理解为所有希腊城邦都施行同样的政制形态而不是融合成一个单一城邦（参见：Reeve 1998, p.202＆31）。

[2] Schofield 1991, pp. 104-11.他认为普鲁塔克在这里误解了芝诺有点类似于斯巴达政制的意思，表示普鲁塔克误认为芝诺试图把城邦纳入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计划之中。因为我这里的目的仅限于介绍，所以城邦不再有确定的围墙与法律的判断同样适用于Schofield对芝诺思想的重构。他认为芝诺是从共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定义政制的（Schofield 1991, p. 73）。

[3] New fragment 21.1.1-14，这段引文的译文见于LS 22S。这段铭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它被雕刻在约100米高的城墙之上，表面被陶土所掩盖）由奥诺安达（Oenoanda）的第欧根尼在约公元200年委托别人刻成（不要把他与犬儒主义者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相混淆）。该刻文残篇连同其他残篇在Clay论文的概述与回顾当中都被突出强调，参见：Clay 2007, p. 288；它见于Smith 2003。

[4]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诸位将军们瓜分了他的帝国并精心谋划了君主国的政治理想。他们之间成为相互敌对的君主。当然他们的君主国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抱负。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与政治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参见Walbank 1981。

[5] 参见Moles 2000。

[6] 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可能，据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身边有一位犬儒主义哲学家欧奈西克瑞塔斯（Onesicritus）伴其左右；后来其他的一些犬儒主义者也是宫廷哲学家。比昂（Bion）一出生就是一位奴隶，公元4世纪末期他在老学园（Academy）之中进行学习，然后成长为一名哲学家，并且成为一名受人欢迎的犬儒主义哲学教师。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曾经是统治马其顿的将军。在讨论比昂与安提柯二世的关系的时候，Kindstrand谈到了犬儒主义者充当王室内部成员的情况，参见：Kindstrand 1976, pp. 14-15。

[7] 实际上耶稣寓言故事中的反文化特征使一些学者（有争议地）把耶稣称为“犬儒主义者耶稣”。我们可以发现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变作强大的意象，它在某些方面塑造了人们对耶稣，以及后来的布道者保罗的生活的理解。参见Bosman 2008以及Downing 1992。

[8] Alex. 14.

[9] 关于克律西波斯这些文字的记述见于Plutarch, On Stoic Self-Contradictions 1044F-1045A,译文见于LS 67F; 以及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3.247-8,译文见于LS 67G。

[10] 这里的论证方式与本章对斯多葛主义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Schofield 1991。

[11] 芝诺的批评者提供了该叙述，参见DL 7.32-3，译文见于LS 67B。

[12] DL中关于多位斯多葛主义者的叙述见于Inwood & Gerson 2008; 他们两位依次对多位斯多葛主义者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并提供了译文，使人们受益良多。

[13] 出自Arius Didymus，Eusebius记述之；DL（67L）对文本进行了选译。

[14] D 2.10.7-12.

[15] D 2.10.3，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Text 144（p. 200）。

[16] Appiah 2006.

[17] DL 10.117-20，译文见于LS 22Q。

[18] DL 10.119，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42。

[19] Ammianus Marcellinus, 30. 4. 3（51 Usener），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96。

[20] Porphyry记述之，见于On Abstinence 1.71-9.4，译文见于LS 22M。

[21] DL 10. 139-54，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35。

[22] 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也赞赏哲人智者之间的友谊，他们称这种友谊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出自Fin. 3.70，译文见于Inwood & Gerson 1997, p. 242）而非其他。然而，他们重视哲人智者社群的同一性程度要大于特殊的友谊关系。

[23] Epicurus, Key Doctrines 7.27，译文见于LS 22C, 22E。

[24] Cicero, Fin. 1.66-70，译文见于LS 22O。

[25] Cicero, Fin. 1.66-70; 后未引原文见于DL 10. 120, 译文见于LS 22Q。

[26] 出自Seneca, Ep. 19. 10，译文见于LS 22I。

[27] New fragment 21. 1. 4-14，译文见于LS 22S。

[28] Fragments 3.2.7-3.6.2, Smith. 该铭文残篇连同其他残篇在Clay论文的概述与回顾当中都被突出强调，参见：Clay 2007, p. 288；它见于Smith 1993。

[29] 《共和国》的所有译文均见于Cicero 1991；《共和国》中的残篇有着自己的编序体系，但在印刷的时候并非总是按照数字顺序，因此我在引用的时候同时表明了残篇的数字与所在页码。这里的引文见于3.33，pp. 71-72。关于其他现存的不完整古代文本，一些残篇在后来

的文献中被引用或记述，因此它们可能遭到后世的重新塑造。

[30]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21a, p. 63。

[31]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3.

[32]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7, p. 65.

[33]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7, p.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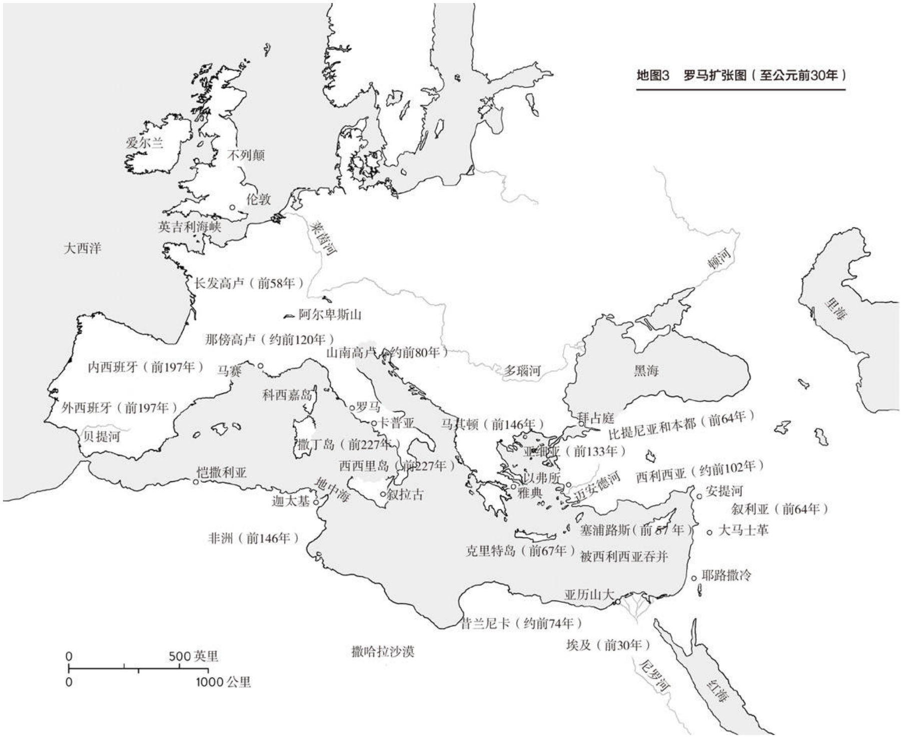
[34]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24b, p. 66.

[35] 皮浪，伊壁鸠鲁与芝诺的同代人，他的人生经历与教诲学说被自己的学生提蒙（Timon）记述了下来，他的思想被后来的怀疑主义者埃涅西戴谟司（Aenesidemus）盗用而被奉为宗师。据说他以一种更加激进与大胆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一定不要追逐什么目的，不要做什么准备，勇于面对所有的风险，不管它们是马车、深渊、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DL 9.11，Hicks译文，见于Diogenes Laertius 1925）。然而，皮浪的怀疑主义立场要比后来的那些自称为“皮浪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教条。



第七章

共和国



地图3 罗马扩张图（至公元前30年）

在遥远的古风时期与稍晚的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基本上同时展开。根据传说故事，公元前753年，与斯巴达的创立基本同时，罗马城建立，它起初是一个王国。人们普遍认为罗马七王的最后一个王于公元前509年被推翻，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实行的政制革新几乎同时。王制被推翻以后，罗马人创造了一个更能保护关于“共和国事务”（拉丁文*res publica*，即“人民的事务”，意思是人民的事务或关切）的政体的基础。在英语中我们把*res publica*这一政治观念直接称为罗马共和国，它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规范或标准，它是能够保护与促进公共关切的最佳政制形态。[1]在罗马人的思想观念中，人民共同关心的事务包括对具体物质利益的重视，公共（*publicum*）事务一般包括了共同占有的土地、税赋与物资供应，这也方便我们在英语中把*res publica*翻译为“联邦或共和国”（commonwealth）。

起初罗马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它用两位执政官代替了国王，他们掌握了行政与军事的权力；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协商与顾问机构的元老院（起初由贵族元老们把持，但其成员最终从曾担任过高级民选职务的贵族与富裕平民中选拔）以及一系列的人民政治会议机构，它负责选举各种官员、制定法律以及履行召集政务官所规定的其他职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按照两条相互交错的历史脉络发展，本章会对此展开讨论。一方面，共和国的政制设置得以继续进化，通常是贵族与穷人的

社会与政治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共和国展开了一系列重大的对外军事征服活动，首先是意大利半岛，然后扩展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西班牙、高卢南部、伊利里亚和巴尔干半岛，与更广范围内的希腊世界，及至更远的地方。罗马人的海外扩张集中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之间——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了争夺西西里岛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占了迦太基人的首都（现在的突尼斯）以及希腊城市科林斯，最终他们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内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广袤领土。罗马人建立起了对希腊各政治体的霸权统治后，希腊的各种政治观念传入了罗马，这就使罗马的思想家们全面接触到了希腊的历史、文学与哲学。

尽管罗马政制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希腊三种基本政制形态的复合体。它们充斥于我们目前关于希腊政治的各种分析中，并且经常被详细讨论。更为基本的是，我们迄今研究的主要存在于希腊社会与思想中的所有政治观念都能在罗马找到自己的副本，因此有必要对此书之前各章的主题作一个简短的回顾，并把它们与罗马政治思想前后对照起来加以理解。希腊的基本问题，即正义与利益是可以协调在一起，还是两者之间必定会发生矛盾（第一章），在拉丁世界中被转化为以下争论：让个人感到荣耀（*honestas*）的事情是否总是与对个人有效用（*utilitas*）的事情冲突？平等的本质——谁能算作平等的公民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设置——就其自身而言仍然是理解罗马政治的基本问题。与平等问题相对应的是自由的价值，即我们第二章着重讨论的内容。

希腊与罗马的自由诸观念——希腊文单词*eleutheria*与拉丁文单词*libertas*——都围绕自由与奴隶制在概念与法律上的对抗而展开。自由诸观念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政治体，它们都表达了不受他人、团体或外界政治体的专横意志所左右的独立自主的理想，因此它们与我们在第三章讨论雅典民主政治时提到的自治理想联系在一起。[2]罗马人把德性视为共和国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把其视为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的情况相同（第四、五章）。罗马政制建立在斯多葛主义的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共和国后来囊括了当时一切已知的各民族，这几乎与第六章讨论的希腊化时期的几位哲学家关于世界主义的理想毫无二致（第八章将重新讨论这一主题）。与当时的希腊各政治体一样，罗马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共神殿，发展出了多种宗教仪式与节日，但是公民们也可以崇拜其他神灵，只要他们认可并且履行共和国共同的宗教仪式。

尽管如此，罗马政制在很多重要方面与我们已经讨论的希腊各城邦都有所不同，即便通过协议与征服罗马已经把希腊各城邦纳入了自己的版图。罗马的各种政治观念对希腊的原始模型进行了巧妙的创新与变通。鉴于罗马法在实践中以及在记录和将其系统化的法学家的著述中的复杂构想，法律词汇和辩论方式提供了特别有影响的政治思考方式。罗马人把政治体视为公民的集合体（*civitas*）或社会体（*societas*）。不为自己共同体的不同政体形式而争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斗争（共和政制建立之后）视为共同体内部的法律与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政治斗

争保持在被广泛接受的非君主制的政制范围内，尽管政制的实际运行因此而发生过重大的变化。政治斗争有时也会引发重大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494年每年一选的保民官的设立（起初只有两位，后来发展为十位）。保民官能够保护普通公民不致遭受针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以及致力于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试图把一直被富人经常以腐败的方式占有的公共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努力历经数代最终也没有成功。

尽管罗马的平民不断加强对自己的法律保护，但是在很多重要方面非精英的罗马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受到了比雅典更多的制约，特别是行动与问责的权力。作为一种政制模范，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观念赋予贵族精英以牢不可破的政治权威，同时把穷人置于重要但多少有些被动色彩的境地。从希腊的角度来看，罗马把寡头制植入了民主政治的内核之中，尽管它保护穷人一定的自主地位，并且也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决定机会。因此这就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政体形态。一方面，它可能向人们展现出全新的政治机制，现代的“民主政体”借之可以保护甚至扩大最贫穷公民的政治权力。[3]另一方面，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即现代的“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隐藏了类似的寡头化倾向。

包容与拒斥的政治，也即关于公民身份的范围，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有所不同。与希腊一样，罗马的奴隶也被视为一种财产，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公开的登记程序而重获自由，那么他们就被算作正常的公民，而只有很少数的权力限制——如果他们还有什么社会污点的话。罗马的公民身份逐渐扩大着自己的范围，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新近被征服或缔约的城市（它们时常在一开始并没有投票权，但最终被逐渐授予）。最终在元首制实施前的最后几十年内，罗马拥有九十多万成年男性投票人（我们在第八章将予以解释）。一个罗马家庭的大家长拥有对奴隶、女性、孩子，甚至是成年儿子的广泛法律权力。然而女性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脱离男性的监护而获得自由，她们的名下可以拥有财产，很多女性甚至在实际的商贸活动、宗教仪式与社交活动中表现活跃。

当时的观察者发现了罗马政制的独特性，它是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希腊三种简单政制形态（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结合体。人们发现罗马与斯巴达很像，它无法被准确地归于任何一种政制形态之中，而是从这些政制形态的相互平衡中汲取力量。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啊！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经崛起为无可匹敌的支配力量。恰逢此时，罗马产生了其政治生活第一位重要的观察家与分析家，即波里比阿——我们将马上对其进行探究。考察完波里比阿关于罗马政制的记述之后，我们将转向一个世纪以后的另外一位罗马政治生活的分析者与参与者，即西塞罗。惊讶于罗马在广阔地域内所建立起来的霸权，波里比阿通过希腊观察者的视角把我们带入罗马，而西塞罗从公元前1世纪罗马纷繁复杂的历史内部出色地为我们介绍了共和国的本质——共和国的权力分配不断受到威胁，并最终永久地被改变。

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脑中所设想的问题一定并且应该也是他的读者始终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即“罗马人如何以及实行了什么样的政制形式，能够在短短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使当时几乎一半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臣服于自己的唯一统治之下？”[4]波里比阿所说的“不到五十三年”是指从公元前220年罗马人在与迦太基（即今天阿尔及利亚*的突尼斯城）的竞争中抢占了意大利的波河地区开始，截至公元前168年罗马攻占马其顿王国的这段时间。波里比阿的《历史》首先就是从这一时间段开始记述的，他的历史叙事最终持续到公元前146年。该年罗马军队攻陷了迦太基与科林斯，然后在一年之内击溃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在汉尼拔将军的率领下出人意料地令罗马在坎尼［Cannae］遭到了惨败），并且占领了希腊半岛的各城邦。实际上罗马的扩张早就已经开始了，它首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波河峡谷以下的众多地区，然后在与迦太基的正面对抗中夺占了西西里岛、撒丁岛与科西嘉岛，最终通过不同方式把大部分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其他地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波里比阿主动承担起了回答上述问题的任务。他试图撰写一部历史，不单单是意大利、希腊或埃及的历史，而是一部“普遍的历史”（5.31，5.33），一部与罗马崛起相称的历史，它与当时人们已知的几乎所有其他政权进行作战或缔约。因为自己非凡的生活经历，波里比阿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公元前200年左右，波里比阿出生于晚近建立的一座城市梅格洛玻利斯，我们在第六章介绍过，一位逍遥派学者曾经为该城市拟定政制。他的家族在阿哈伊亚（Achaean）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希腊各城邦的同盟——中处于领导地位。[5]波里比阿出生的时候，阿哈伊亚同盟通过一定的策略与不断崛起中的罗马保持了数十年的良好外交关系，因此同盟各方享有非常实质性的政治独立地位。同盟各城邦都称自己为“民主政体”，意思是说它们都不是僭主政治，也不是寡头政治，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日常与特殊的政治会议来共同决定同盟的政策。然而它们都是温良的民主政体，这与雅典大不相同。现实中精英们在各自城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穷人们的权力则要小得多，比如各城邦不向轮流参加政治会议的贫穷公民支付报酬，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只有相对少数的人才能参加政治会议。依据这种政治文化，与历史学前辈修昔底德一样，波里比阿保持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他对僭主政治（比如他在5.11中把僭主与合法君主进行了对比）以及不受约束的民主政治（他在6.57中把其称为*ochlokratian*或“mob-rule”［暴民统治］）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波里比阿的父亲是联盟内活跃的政治家，且他的家族在高级外交委员会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还经常设宴款待罗马与其他的外邦客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波里比阿平步青云地担任了联盟骑兵指挥官的高级职务。公元前167年，因为联盟政治的争端，阿哈伊亚同盟的一千名公民——波里比阿也在其中——作为人质被强行带到了罗马。一位亲罗马的联盟同胞谎称需要对他们公开谴责罗马的言行进行审查。大部分人质都被关押在意大利半岛上的行省城镇之中，因为在那里他们无法滋生事端。然而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波里比阿得以前往罗马城的核心社区，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十七年人质岁月的大部分时光。他在西庇阿·埃米利安

努斯（Scipio Aemilianus）——日后崛起成为罗马成功的执政官与将军，并于公元前146年带兵攻陷了迦太基——的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波里比阿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攻占众多城市，然后把那些幸存下来的居民卖为奴隶并把那些城市烧成灰烬。此后波里比阿乘船远赴海外，在非洲西海岸四处游历（作为一名无畏的旅行家，他曾追寻汉尼拔的足迹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同年，其他罗马军队摧毁了希腊城市科林斯，解散了阿哈伊亚同盟，并结束了同盟各城邦的民主政制，这其中就包括了波里比阿自己成长并在年轻时曾担当官职的城市。波里比阿成功地在自己的城市与罗马之间达成和解，他同时受到了双方的赞扬，他的雕塑遍布于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受人景仰。之后他跟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以及罗马军队到过更多的地方，比如他可能见证并且记述了公元前134—133年西班牙的努曼提亚（Numantia）被攻陷的事件，那是罗马向西扩张的重要时刻。[6]

图表4 此章所论罗马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 753 年	罗穆卢斯（Romulus）创建罗马的传说
公元前 509 年	共和国的创建：最后一位王被推翻，代之以两位每年一选的执政官

公元前 5 世纪

494 年	设立保护平民的保民官
451—449 年	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基础

公元前 3 到 2 世纪

约 200—118 年	波里比阿生活的年代
146 年	罗马征服迦太基与科林斯
133 年	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推行土地改革
123、122 年	保民官盖尤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推行类似的土地改革

公元前2到1世纪

106—43年	西塞罗生活的年代
63年	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揭发喀提林（Catilina）
44年	朱利乌斯·恺撒被暗杀
43年	西塞罗被暗杀
27年	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恺撒

波里比阿在罗马作为人质时就已经开始撰写《历史》了。此书的本意可能是希望指导希腊的政治领导人与罗马进行辩论，但最终成为罗马不断取得成功及其权力行使方式的历史汇编与分析。波里比阿算是一个旁观者，但他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了罗马的元老院政治。专注于希腊的历史与哲学，然而却与希腊的拉丁征服者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这都使他身处旁人无法企及的有利地位。通过希腊政制分析的传统视角，他的著述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关于罗马的信息。我们将格外注意他贬低或排除了什么，也将格外注意他看重什么。

“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罗马崛起的原因

在通晓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著作的基础上，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政制形态。修昔底德曾经把政治稳定的斯巴达与扩张主义的雅典进行过对比。他认为莱库古为斯巴达创立的独一无二的严刑峻法是保持斯巴达内部政制稳定的原因，而勇猛或冒失致使雅典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虽则一度令它更为成功。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章中讲述了政制嬗变的理论：一个理想的政体堕落为荣誉政治（timocracy）——正如斯巴达对荣誉与军事胜利的崇尚，然后堕落为崇尚财富的寡头政治，接着是崇尚自由的民主政治，最终堕落为满足僭主个人的卑劣欲望的僭主政治。后来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不太注重去描述政制嬗变的理论，而是专注于考察寡头政治中的奢靡与傲慢如何导致了民主派的妒忌与憎恨。比如，我们在第五章中发现亚里士多德考察了

不同团体的各式各样的动机所导致的政制嬗变过程。希腊古典时期盛行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形态政制讨论，其后我们在第六章探讨的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又开始重视人们追求安全的原始欲望，他们认为这种原始欲望是法律与政制得以发展的原因。

在借鉴过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经典政制架构，与柏拉图式的政制嬗变过程理论后，波里比阿把它们融合为自己的政体循环理论，并且认为所有政体最终都将走向灭亡。这就是他著名的政制嬗变的自然循环理论。原始状态中的人类，不是指人类的史前状态，而是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的状态下的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服从于最强者的领导，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然而随着人们相互交往的加深，他们理性的自然力量开始产生感恩、荣誉与正义，尤其是效用（波里比阿此处受到了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影响）的观念，于是他们开始把领导人视为有益于自己的国王，而不是令自己害怕的专制主。但世袭的国王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僭主，进而被贵族所罢黜，由此贵族政治建立起来。这次轮到了贵族的自我腐化，他们变为贪婪的寡头（如柏拉图所言），贵族政治进而被平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治所替代。然而腐化必定会再次出现。平民接受了贪婪而野心勃勃的贵族的贿赂，直到民主政治最终因为屠杀与毁坏而自我崩溃——此时专制主义再次兴起。

波里比阿的政制分析到目前为止都是希腊式的，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与柏拉图很像，尽管他比柏拉图更重视政体生长与消亡的自然序列（他们两位的自然序列有些许不同）。然而当波里比阿转而讨论罗马，并把它与斯巴达作对比的时候，才显示出其著作最大的独创性。因为他认为自然序列中任何政体的单一特性都将加剧其不稳定性。比如一个单一的寡头政体，它拥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或恶，比如领导层的贪婪就会使它直接滑向堕落的深渊，这就像铁锈对铁自然的侵蚀一样（6.10中讨论了莱库古力图使斯巴达避免此命运的努力）。然而也存在避免这些必然缺陷的方法。那就是建立一种平衡的政制，一方面在每一种政制的优点之间进行平衡，另一方面用一种政制的优点去纠正另一种政制的缺陷。莱库古依靠自己的立法智慧为斯巴达创立了这样的政制，而罗马人通过不断地实验与斗争也创立了这样的政制。一种平衡的政制可以避免堕落，至少能使自己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对罗马来说时间已经足够长久而能向人们展示其了不起的政治优势了。这样的政制摆脱了政制嬗变的自然序列，它将会是稳定而繁荣的，可能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尽管最终所有的城邦如自然事物一样必定会走向灭亡。

波里比阿无疑在修昔底德、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简要论述中发现了“混合政制”观念的影子，他经常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7]修昔底德把雅典五千人的统治——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所建立起的短暂政权——形容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中庸混合体”。[8]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描述说斯巴达拥有针对傲慢自大的权力与可能出现的权力腐化的制约机制：一方面是莱库古把一个元老委员会与国王“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每年选举五位长官组成的长官团，目的是为政府加上约束或“马勒”（“马勒”［bridle］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外在而非内在的制约）。[9]

《法律篇》中引导对话的那位雅典佚名老者提出了更为一般意义的告诫：在立法的时候，你必须把君主制与民主制这两种“元政制”混合在一起，以创立一个优良而稳定的政制形态。[10]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更加注重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以在现实中维持政治稳定（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发现的那样）。[11]所有这些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家都主要把“混合”政制或政体视为两种政制形态的融合，不管是就它们的独特政制形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而言。

波里比阿吸收了希腊古典时期的单一政制形态相互结合的思想，但他更关注平衡而非融合。在他的分析之中（可能受到了柏拉图《法律篇》中作为“马勒”的斯巴达长官团的观念的影响），斯巴达与罗马的混合政制运转良好，它们在持续的动态平衡甚至斗争中保持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各自元素，每一种政制形态都制约着别的政制形态。这是日后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制约与平衡”思想的最重要来源，特别是对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国父们来说。[12]在讨论斯巴达的时候，波里比阿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高度赞赏莱库古政制设计的目的，即让“每一种权力都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没有哪种权力能够决定政制的整体倾向；每一种权力根据对等原则都要平等地受到制约与平衡，统治将万古长存”（6.10）。

如此精巧的政制平衡似乎必然是人类深思熟虑的发明物。然而波里比阿宣称罗马人获得混合政制的方式“不是通过理性的论证（与莱库古不同），而是建立在多次斗争与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多次的尝试与学习，他们不断获取了最佳的解决之道”（6.10）。希腊的政制分析家猜不透斯巴达的政制形态，是否它的两个王使其成为君主制，还是它的元老委员会（*gerousia*，字面的意思是“元老机构”，它的成员被选出来之后即终身任职）使其成为贵族制，抑或它对公民身份的严格限制使其成为民主制。同样，罗马也不能被轻易地归于任何简单的希腊政制形态之中：“任何人，即便罗马人自己都无法确切地辨明统治集团在整体上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6.11）。波里比阿的希腊同胞们可能倾向于对罗马不屑一顾，它的政制形态并非得益于一位开国立法者，但这是不对的。通过经验与斗争，罗马人的政制形态达到了极为完美的状态，它足以与希腊最伟大的立法者创立的政制相媲美。

罗马政制的三个组成部分

波里比阿如何把罗马视为平衡的政制呢？他在政制的统治主体中依次辨别出了三种“最伟大的部分”，以此来表明每一部分在实践中如何依赖于其他部分。因为人们无法明确地指出哪一部分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就没有哪一部分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加于整个政制形态之上（比如人民的支配地位就使一个政体成为民主制）。相反地，它们的各自角色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才使整个政制得以成形。通过依次考察罗马政制中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成分，波里比阿向人们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解释罗马实际所表现出的不同权力来源的复杂平衡性（正如他的理解，他的观察反映了其独特的希腊式理论视角）。每

一种成分可能都试图战胜其他成分而把自己的名字独自加于整个政体之上，却在实践中都无法彻底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波里比阿指出罗马无法被彻底描述为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中的任意一种。相反地，三种成分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平衡才是罗马复杂的政制形态。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执政官，就像波里比阿所做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执政官代表了罗马的君主或专制主的原则。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官的权力是否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政制视为王制（kingship），不能说它是一个“君主国”（monarchy），因为存在两位执政官共同掌权。波里比阿之所以把执政官类比于国王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帝权（*imperium*），它的意思严格来说仅限于军事指挥权，尽管有时也宽泛地指代一般性权力。[13]因为执政官的存在，让我们姑且先把罗马视为王制，波里比阿说执政官对其他行政官员们发号施令（现实中每一位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等级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并非像波里比阿所描述的那样听命于执政官）。波里比阿还说执政官组织一切军事准备活动，并且在战场上指挥军队。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为元老院以及（某些）人民的政治会议设定议事日程，并且还负责执行它们作出的决策（6.12）。他们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公共资金的开支。

然而，每年一选的执政官在任期结束的时候都要经过一定的问责程序，这就使罗马不太像王制了。实际上波里比阿总结说现实存在着的共和国不应该被视为王制。他指出每一位执政官在任期结束的时候都要接受财政审计，他们都要宣誓服从罗马的法律，并且可以在人民法庭上受到起诉（尽管不像雅典一样通过抽签的原则来组织法庭）。更有甚者，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或帝权，但是军费的划拨权属于元老院。实际上执政官军事活动——针对某行省或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元老院的手中。当执政官在外开展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就不能继续在罗马行使自己的执政官的权力了。总之，波里比阿认为尽管国王权力的很多内容都被转移到了执政官的身上，但是罗马不能被视为王制。

除了为展现他们希腊式政制的强大威力之外，没有罗马人倾向于把共和国描述为王制的。罗马人把他们的公共行动视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产物，这才是共和国原则的精髓。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拥有与罗马相媲美的元老机构，它的成员都是终身制的。斯巴达的元老委员会可能是一个例外，与罗马的元老院一样，它的成员也是终身任职。罗马共和国中期，元老院成员从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职务的官员中间选拔。那么鉴于元老院如此重要的地位，罗马最像贵族政体吗？

元老院起初由王室精英集团所构成。后来富有的平民们也成了精英，他们与早先的贵族们一起构成了新贵族阶层。与此同时，元老院的成员被严格限定在那些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职务的官员之间。精英的光环还是使罗马元老院拥有了相当的权势。正如波里比阿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元老院没有立法的权力，与后世的权力制衡与分割理论不同，所有立法权都属于人民。与此相反，元老院的权力是审议、调查、管理与提出建议的权力。元老院行使审议的权力来管理公共资金（除了那些被特别授予给特定的行政官员来掌管的资金以外），调查公共犯罪以及掌管

对外关系。可能在波里比阿完成其历史作品之后，元老院开始偶尔颁布一种名为“元老院终极议决”（*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尽管现存资料显示仅实行过两次）的政令，意思是说授权给一些特定行政官员以“留意波及共和国的危险”。该政令使元老院的地位排在了那些行政官员之后，鼓励他们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措施——即便不完全合乎法律——来保卫共和国。[14]在该政令实施以前，及该政令以外，元老院仍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元老院享有极大的权威，也得到了人们相当的尊敬，但是它同样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衡，因此共和国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贵族制。波里比阿指出平民的保民官（只能由非贵族的平民选举产生）可以否决元老院的政令，甚至可以禁止元老院开会。依靠自己的立法权限，人民还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重塑元老院的特权。

既然人民的政治会议拥有制定与撤销法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职权，那么波里比阿最后追问，罗马应该算作民主政治吗？该问题最近被众多学者重拾起来，其中一些人注重罗马政制中的民主政治内容而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15]与这些晚近的学者一样，波里比阿表示立法权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实际上持续到了帝国时期）一直仅被人民所掌握。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或撤销法律。人民的立法权限也扩展到了关系共和国生存的其他基本事务上：人民单独享有媾和或宣战、缔约与结盟等元老院所建议的重大事项的处理权。波里比阿进一步地赋予人民以更具一般意义的角色，他把罗马人民（*demos*，在拉丁语中它的意思是平民［populus］）视为“政制中荣耀与惩罚的主权者”（6.10）。他所谓的“荣耀”主要是说行政官员的选举以及严格按照“关于帝位的法律”（*lex de imperio*）对帝权（*imperium*）进行授权。他所谓的“惩罚”指的是涉及死刑与重金处罚的司法案件。相对来说波里比阿很少论及保民官的权力。罗马的保民官在希腊政制理论中没有准确对应的角色。

人民的这些实权足以把罗马归为一个民主政体吗？与那些晚近支持此观点的学者相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拟定（frame）法律的权力。除了行政官员或保民官外，人民在政治会议上并没有提出法律的权利，在投票会议上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即便是在那些只讨论不表决的政治会议上（*contiones*），人民也没有发表观点的权利，除非他们被主持会议的行政官员或保民官点名要求发言。（比如对照雅典在那里，为人民政治会议设置议程的议事会的成员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任何愿意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人都可以发言。）罗马人民的政治会议存在很多不同的种类，但所有会议都按照某一集团内某一成员的方式来投票，个人的立场取决于多数原则。在其中一种政治会议上，各集团按照地位与财富的顺序（起初与军事等级联系在一起）上前投票，这意味着后面的一些集团甚至还未投票，某事项就已经有表决结果了。还有一些政治会议，公民被划分为另外的一些集团形式，其中一些集团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其他集团，这样大集团中的个体的影响力相对来说就被削弱了。

波里比阿同样也否认罗马最像民主政治的观点，即便人民在罗马政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援引罗马政制中的另外一些特性来阐明这一点。他看重制衡：人民作为主权者享有荣耀与惩罚、制定法

律、媾和与宣战的权力，但依赖于元老院对公共工程的财政拨款；元老们在民事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司法功能；罗马士兵（一直到公元前107年，罗马士兵仅仅从达到一定财产条件的人中招募）则需服从于将军的指挥或帝权。

因此波里比阿总结，罗马不应该被归于民主制、贵族制或君主制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三部分相互平衡的政制，同时包含了三种倾向。通过三者的总体架构与相互间的协调，它致力于保护所有公民的自由：

> 当三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一面独大而醉心于谋取与行使不当权力时，非常确定的是——目前所述表明没有哪一部分能够如此自作主张——任一部分都能对之实行周密地制衡与约束，因此没有哪一部分能够一面独大或者过分卑微（6.18）。

然而在避免腐化的过程中，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即便罗马也将最终变得不稳定而吞下权力与人民野心的恶果（6.57）。他以一种柏拉图式的口吻描述了这个腐化过程，他预言罗马最终将沦落为一种民主政治（*demokratian*），盛名之下难掩其"暴民统治"（*ochlokratian*，6.57）的本质，然后等待着在下一轮的政制循环中最终成为专制主义的猎物。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政制的这些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制约与平衡——回答了起初他所提出的问题：罗马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如何获得了空前而彻底的成功？波里比阿运用希腊的话语体系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归类分析，进而把其视为平衡的政制类型，但是罗马政制的一位最重要的分析家则更进一步考察了政制内自由、财产、正义与自然法的内在关联。如果说波里比阿带领我们了解了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历史，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转向西塞罗。他是在共和国晚期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写作的。

公元前1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因为持续不断的威胁与内部战争，罗马摇摇欲坠。将军们一个个利用自己的驻外军队在罗马共和国内部谋取更大的权力。通过制定、歪曲，甚至违反法律的方式，他们授予自己以新的权力，进而重塑了自己与他人所承担的各种政治角色。公元前80年代，第一波内部战争以苏拉（Sulla）成为独裁者而结束；公元前63年，罗马贵族喀提林（Catilina）密谋推翻共和国；公元前50年代，曾经的三巨头联盟的破裂导致了公元前49年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入侵意大利，内部战争再次爆发；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但是他的追随者与继承人掌握了权力。战争最后在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与屋大维（Octaviam，恺撒的继承人）二人之间展开，最终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Actium）战役中战胜了安东尼。此后屋大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恢复了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第八章我们将讨论之）。西塞罗生活的时代恰逢罗马的此段历史动荡时期，他在其间一些事件中不仅是一位政治参与者，还从哲学上对共和国政制的意义进行了阐释。

西塞罗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他的家族在当地属于小地主阶层，在很晚的时候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公元前106年，年轻的西塞罗离开自己的家乡远赴罗马与雅典学习哲学，之后他重返罗马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拥有“刺耳与令人不快”的嗓音，[16]但是西塞罗还是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公元前70年，他起诉了西西里岛的一名腐败官员，后来还曾担任过辩护律师，尽管此时西塞罗通过自己出色的才华以及心中的远大抱负已经踏上了“荣耀之路”（*cursus honorum*［行政官的晋级体系］）。虽然西塞罗出身没有多么高贵，但是他在公元前63年（以当时法定的最低年龄四十二岁）被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从而达到自己事业的顶峰。这是西塞罗政治生涯中既辉煌又致命的时刻。

在担任执政官时，西塞罗揭发了罗马贵族喀提林推翻共和国的阴谋，接着他又残酷地镇压了这场谋反运动，最后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他非法地把元凶处死了。此举伤害了西塞罗刚刚被授予的“祖国之父”[17]的荣耀，进而使其一度流亡海外，尽管西塞罗标榜自己的行为拯救了共和国：“难道不正是在我管理国家的时候，使得武夫听命于托加长袍（toga）代表的权力……什么样的凯旋可以和它相比拟？”[18]

结束流亡回到罗马以后，西塞罗愤怒地发现自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为了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他继而转向哲学创作。公元前55—51年之间，他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三部政治哲学著作：《论演说家》《国家篇》与《法律篇》——在形式与主题上都模仿了柏拉图的三部对话录著作。之后他被任命为某一行省的总督，在任的一年时间内他又获得了把自己的理论与观念付诸实践的机会。随着共和国开始变得四分五裂，政治强人们不断变换阵营而谋取权力，西塞罗的立场变得极为尴尬，特别是在朱利乌斯·恺撒打赢内战，并于公元前49年被任命为“独裁官”以后。独裁官是罗马历史与政制实践所认可并偶尔准许设立的公共职位，它授权一人行使紧急权力，允许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废除其他公职与法律。西塞罗与恺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们二人既互相钦慕对方的哲学与修辞技能，又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反对彼此的政治目标。恺撒获得胜利后，西塞罗策略性地隐退于乡间的别墅，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此时西塞罗迎来了自己哲学著述的第二个高峰期。

西塞罗没有被邀请参加公元前44年针对朱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行动，因为行刺者们“既担心他缺乏胆量的性格，又担心他的年纪”（*Cic*.42.2）。[19]然而恺撒被刺杀后，西塞罗在其著作《论义务》——恺撒被刺杀数月后，西塞罗仅仅花了数周时间完成了此书——中间接地为这一行动作了辩护。与此同时，西塞罗正着手撰写申斥马克·安东尼的著作《反腓力辞》（*Philippics*），恺撒死后，安东尼民正试图赢取公众舆论与权力。西塞罗因为仇恨安东尼，再加上他对别人的忠诚的误判，公元前43年在“后三巨头联盟”（安东尼、雷比达与屋大维，屋大维十六年以后成为奥古斯都）的指使下，西塞罗遭到了暗杀。他的头颅与双手被砍下来示众，以此来震慑那些对往昔过分留恋的政敌们。[20]

西塞罗受到了怀疑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与柏拉图的强烈影响，但反对伊壁鸠鲁主义者的观点。他所研究的希腊化时期众多哲学家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保存了下来。然而与此不同的是，西塞罗的演讲、书信与其他著作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尽管并非全都完好无损，其中有些内容也遗失了。我们非常清楚他的个人生活（他离过两次婚，他挚爱的女儿图利娅［Tullia］在生产时死去，为此西塞罗伤心欲绝）[21]以及他作为律师与政治家的职业情况（他与自己的哥哥之间常有书信来往，他哥哥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在罗马赢得选举的方法）。[22]他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演说家，在实践中他把哲学与修辞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完成了很多的哲学对话录与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他无法从事公共事务的时期内。

作为一名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对修辞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明目张胆地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相抗衡，西塞罗在《论演说家》里为自己的职业辩护。他坚称修辞术是一项真正的艺术，并且还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实际上是最高的艺术，甚至在哲学之上。[23]修辞学者不是什么骗子或讼棍，而是良好道德习俗（*mores*）的源泉，是唯一能够把德性灌输给公民同胞的人。西塞罗认为修辞术中存在着相当重要的专业知识，是其使自己得以履行对共和国的神圣义务。尽管哲学是有价值与重要的，但是任何因为哲学的甜言蜜语而逃避自己祖国召唤的人，或者当被要求时，任何鄙视使用修辞以代替纯粹逻辑的人都将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公民。

西塞罗用自己的口吻记述说有经验的政治家比“毫无公共生活经验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他还称赞了政治生活的价值：“就人类的德性而言，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行当比建立新国家或维护固有国家更接近神灵了。”[24]当更为直接的政治参与渠道被阻碍时，从事哲学创作而设法从众多的希腊哲学观念中打造出一套拉丁语汇与论述体系，这是服务共和国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个人的一种抚慰以及自我满足的源泉。[25]西塞罗的全部哲学著作以及他的演讲与书信展现了一个人生命的全部。他专注于按照自己与他人发展出的标准去行动并为之辩护，这些标准源于他们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与此同时，他的行动还达到了罗马政治的最高水平。

西塞罗论罗马政制

在与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执政官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我们之前提到的迦太基的征服者）的交情中，波里比阿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是西塞罗及其同代作家熟稔于心的。可能是为了向波里比阿致敬，西塞罗在对罗马政制进行论述时——不是对罗马崛起的历史叙述，而是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借用了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及其集团成员的人物角色。对话录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29年，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大概早于西塞罗出生二十年。就在四年之前，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v）被选为保民官，他提出了一项法律试图把一部分公共土地（共和国通过对外征服或遗赠而获得的土地，这些土地中大部分是以较低的税赋，甚至无需纳税被贵族以腐败的方式占有）重新分配

给没有土地的穷人。在此过程中，提比略·格拉古以非法的方式把另一位否定土地改革的保民官给降职了。一些元老自认为代表了“精英贵族”（*optimates*）的利益，强烈反对提比略·格拉古针对该保民官的降职行为及其主张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西庇阿·奈西阿（［Scipio Nasica］，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表兄弟与政治伙伴）的带领下，反对集团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并把他所主导的法律一并废除了。

西塞罗指定西庇阿担任自己对话录的主要角色，他让西庇阿首先论述支持每一种简单的政制形态，然后为罗马最好的“混合”政制进行辩护。通过此举西塞罗站在了“精英贵族”一边，认为整个罗马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元老院的特权政治及其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财产理论。西塞罗在这一部分对话录中让西庇阿担当自己的代言人，但是历史上的西庇阿在该对话录故事发生的几天之后就死了。因此对话录（仅有残篇保存了下来）可以被视为一曲针对西庇阿的挽歌，他可能有助于避免随后几年对城市造成危害的动荡与骚乱，这包括提比略的兄弟盖尤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第二次重新分配土地的企图——在反对其土地改革的暴力运动中，他不得不让一名奴隶杀死自己。

波里比阿追问罗马政制最像哪种简单的希腊政制形态，通过这种方式他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分析，但是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更具柏拉图意味的问题，即共和国的最佳条件或形式（*optimum statum civitatis*，1.33）。西庇阿被要求回忆先前与波里比阿以及另外一位希腊哲学家就此问题的谈话，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当时罗马人继承下来的政制形态为何实际上是共和国的最佳条件。他首先解释了定义共和国（作为人民的事务的国家）的“人民”的含义。人民不仅仅是任何人群的集团或聚合，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1.39）。[26]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政制下共和国——法律词汇在罗马的哲学论证中无处不在，在这种环境下问题就变成了：在什么样的政制下人民能够享有一定的权利（rights）而同时又可能把它们托付于别人——能够被人民所拥有，并且受到人民的呵护。西庇阿承认在三种未腐化的希腊政制模型下，这都是可能的。即使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那里也可能存在对人民利益与所应得之物的足够关切（我们可以形容为“多种权利”，尽管西塞罗倾向于使用权利的单数形式），尽管西庇阿也承认这不能完全说明人民组建共和国的一般诉求。然后西庇阿摆出了波里比阿式的观点而认为即便这三种基本政制形态都被很好地掌控，但每一种政制形态都有自己特有的缺陷，每一种政制形态都缺乏其他两种的典型优点（1.43）。在君主制的条件下，只有君主才享有正义与审慎的能力。即便在一位睿智与公正的君主的统治之下，人们也无法说单一的君主制是理想的共和国或“人民的事业”。相反地，贵族制下的人民几乎不可能享有什么“自由”。在民主制下，即便人民的统治很公正、很节制，这里的平等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不对人们的尊严进行区别对待（他无疑在暗示比如罗马元老们所正当享有的尊严）。

考察完这三种政制形态之后，西庇阿接着提出了关于共和国最佳条件的个人见解，即由三种原初形态混合而成的第四种政制形态（1.45，

并参见1.69）。[27]与他现实生活中的导师波里比阿一样，西庇阿认为这就是数代罗马人（非常幸运地）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而不断演进而成的罗马政制——实际上他进一步宣称不是斯巴达或迦太基，只有罗马才创造出了这种混合的政制形态，另外他还阐发了自己的波里比阿式的政体循环理论。奥古斯丁说西庇阿在第一天对话的末尾总结了自己的观点："音乐家所说的歌曲和谐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安全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2.69a）。[28]

财产、正义与法律

尽管西庇阿持有很强的柏拉图式的观点而认为正义是国家和谐一致的基础，但是当他与自己的朋友盖尤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转而讨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所需的政治制度、道德习俗与法律时，他们开始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斯巴达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柏拉图与斯巴达的政制对政治共同体作了错误与危险的理解，即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财产共有而非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国家篇》中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大多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必须转向西塞罗的其他著作来再现当时他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想及其政治含意。通过他的演讲，我们发现他正身处关于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的争论之中，这成为他日后撰写《国家篇》的显著背景。公元前63年，一位新当选的保民官提出了一项新的土地法律，它试图通过非常规与不公平的选举程序而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变卖与处置各种各样的公共土地的权力，并且还可以对它们进行征税，目的是为了把意大利的土地分配给罗马的穷人。[29]该年西塞罗恰逢担任执政官，他连续做了三次反对该法律的演讲，一次是在元老院，另外两次是在人民的政治会议上。三年以后当土地改革的努力再度兴起的时候，西塞罗选择公开发表了上述三次演讲。

西塞罗主要攻击公元前63年土地法律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也就是说，他很少论及土地分配的利弊，他更多地是阐明主持土地分配的机构的（他所认为的）专横权威。委员们不能受到任何的法律指控，这在西塞罗看来是极为专断的。委员们可以随意指定一块土地为公共土地然后变卖之，他诚恳地告诫元老们这是对他们的安全、自由与尊严的威胁。同时他也恳切地告诫人民这样的法律将有害于他们所拥有的安全、自由与闲暇，将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因为非常规的选举程序，它仅允许随机选定的投票组合单位来选举委员），因而会剥夺他们的"自由"（2.17，2.16）。[30]

为了全面了解西塞罗关于法律与财产的重要性的观点，我们现在转向他的其他著作。西塞罗在《法律篇》这部对话录中详尽地论述了他的法律思想。尽管西塞罗在《国家篇》发表当年（即西塞罗担任西利西亚［Cilicia］总督的公元前51年）就已经开始撰写《法律篇》，但是后者的故事背景截然不同。对话录故事的主角不是令人钦佩的先祖们而是西塞罗自己（马库斯［Marcus］）和他的兄弟昆图斯（Quintus）以及他

的密友阿提库斯（Atticus）。他们三人在位于阿尔皮诺（Arpinum）的西塞罗乡间庄园展开了一场关于法律本质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试图为先前对话录所辩护的混合政制的罗马构想一种理想而合适的法典。[31]

警惕罗马法学家所关注的那些细枝末节（“界墙与檐沟”），[32]法律的本质更应该得到重视，马库斯坚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为了理解这一点，一个人必须跳出特殊成文法的窠臼而去“寻求自然中正义的根源”。[33]这实际上是一种斯多葛主义的路径，西塞罗在研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时候经常借用。同时，西塞罗把这种路径置于他温和的怀疑主义视角之下，这就使他比别人更能得出某种结论。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能力，因此人类与神灵一样都拥有这条基本的自然法：“我们必须将这整个宇宙理解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神与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34]这是第六章所讨论的斯多葛学派世界主义的一份理想宣言。

马库斯把基本的自然法当作一种工具用以批判僭主或某些民主派（他用雅典历史作例子）所制定的不义法律。然而他所建议的大部分法律与罗马现实的政治制度十分接近，这表明马库斯的思想与西庇阿相类似，即罗马政制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最可能的实现条件。马库斯为保民官制度辩护但却批评秘密投票制（他建议人民的投票向贵族公开以备审查），他称颂作为整体的法律而非其各个组成部分。特殊的法律可能会变化或改进，但是它们应该总是到宇宙理性——体现于自然法之中——当中去寻求自己的合法性来源。

自然法构成了宇宙秩序的结构，私有财产的来路则更为曲折。实际上西塞罗在另一部著作《论义务》中指出，“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私有（财产）”。[35]当不同族群的人类通过定居、战争、协议或运气占有土地时，土地才成为私有，个人因此也才拥有了私有土地。西塞罗进而总结表示，“每一个人都应占有其所得之物”，否则就违反了“人类相互联合的法律”。这定义了正义的内容，即对这一原则的尊重：公共的归于公共，私人的归于私人。

当西塞罗后来重新思考财产问题时，他批评公元前104年一位保民官所推行的试图对物产进行平等分配的土地法律。为此这位哲学家还特意附加了斯多葛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性的论述：“尽管自然使人类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争取生活在城市之中，以期保护他们各自的物产。”[36]高级的政治共同体生活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动机上，这是政治共同体合法存在的底线——尽管可能不是最高的追求。他进而抨击那些提倡土地改革的政治精英们（比如朱利乌斯·恺撒），他们属于罗马的平民派（*populares*），他们的政策有利于平民，但是却损害了作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和谐与公正。

通过把正义牢牢地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利上，西塞罗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罗马传统的正义与财产思想的发展，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精英主义论调。他强调政治精英的某些权利是牢不可破的，他反对任何对某类公共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企图。西塞罗的这些政治（以及社会与经济）立场强化了他对共和国至诚至真的深厚伦理观念。结果是这些伦理观念极

具影响力，尽管不是太普遍。在当时极具竞争氛围的政治环境当中，西塞罗对正义与财产的理解无疑是偏激的，然而他的思想观念超越了当时政治辩论的局限引发了后代人的共鸣。

对自己、他人及共和国的义务

从抽象层面去捍卫共和国的本性与价值是一个问题，但当共和国缺乏基本的手段来保证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时，在实践中捍卫共和国并确定个人的义务便是另一个问题了，尽管对西塞罗来说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发现西塞罗，尤其在他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论义务》中反思了这些两难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系列演说辞的写作中继续着对这些难题的思考，即十四篇《反腓力辞》——他试图以此来促进人们对马克·安东尼的反抗。在《论义务》当中，西塞罗试图证明履行义务（*officiu*）总是一件令人感到光荣（*honestas*）的事，它不可能与一个人的利益（*utilitas*）相矛盾。在《反腓力辞》中，西塞罗追求一种他认为光荣的事业，即便它会对西塞罗的生命造成最严重的威胁。这当然是基于西塞罗的一种看法，即一个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是他所拥有的最高尚、最光荣的义务。他在第二篇《反腓力辞》（当时唯一不用于演说的一篇）中说道："我自愿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只要我的死能够换来城市的自由（2.119）。"[37]

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的秋天写出了《论义务》，它是一部劝勉自己二十岁的儿子的伦理学教育著作。当时履行传统政制所规定的对共和国的义务受到了人们极大的质疑，西塞罗于是勉励自己的儿子勇于承担自己的义务，以成为一位有德性的罗马公民与一个正直之人。[38]然而他同时也为让人感到光荣的政治功业提供了一份指南，以设法使自己所描绘的政治世界不至于灭亡。他回溯了罗马祖先所奉行的习惯与实践（*mos maiorum*），他理想化了他们对德性与义务的本能恪守行为。比如，十名罗马人在坎尼（Cannae）战役中被汉尼拔俘获，他们被遣送回罗马，但前提是立下这样的誓言：如果不能成功地使罗马人释放汉尼拔的俘虏，那么他们保证仍回到汉尼拔那里去。这十名罗马人最终拒绝回到汉尼拔的囹圄之中，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剥夺了他们的公民特权，以此来惩罚他们违背誓言的行为。元老院的这一处置方式受到了西塞罗的大力称赞（1.40）。

论证的核心是陈述罗马人的义务，它对希腊的德性进行了巧妙的改造。罗马人把希腊的智慧与正义归入德性之中，但也崇尚伟大的精神与端庄的礼仪。后两种德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希腊的著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都不是希腊伦理学的中心。然而西塞罗把它们视为罗马精英的生活重心。他责令罗马的精英去追求伟大的精神，在与整个宇宙相比的时候要鄙视人类事务的渺小（1.72）；还责令他们即便在追求名望的过程中也要表现出预期的恰当行为或端庄的礼仪。西塞罗此处提出了极为具体的命令。你不能着急地气喘吁吁，但你也不能徘徊踱步，过于懒散（1.134）；与人交谈的时候，你应该诙谐机智（1.134）；你不应该建造超过自己钱财所允许的房屋（1.139）；你也不应该抬高学习的

重要性，不应该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以外追求更多的知识（1.157）。所有这些伦理义务都是“令人感到光荣的”（［*honestas*］，有德性的，同时含有光荣的意思）。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令人感到光荣”的事物与利益（*utilitas*），或与那些看起来有用、有利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样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就着手处理了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遭遇的同样挑战：做一个正义的人真的符合我的利益吗？实质上西塞罗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如果作恰当的理解，正义（或义务）与利益永远不会冲突。诸如盗窃之类的行为“破坏了人类的共同生活与社会联系”；暴力行为同样如此（3.21，3.26）。当一个人不按照自然而行动时，他违反了自己的本性。这种观点与我们在第六章讨论的斯多葛主义的自然社会性与自然法的观念一致。对别人行不义不可能符合一个人的真正利益，因为它违反了把所有人类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纽带。[39]

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可能有些尖锐。西塞罗毫无顾忌地谴责了罗马人的某些行为。他认为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对科林斯的掠夺并不是真正有利的，因为“任何残忍的都不可能是有利的”（3.46）。柏拉图通过探究心理学来证明他的观点，他着眼于不义行为给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痛苦与挣扎，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律师，西塞罗也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直接面对的是充斥着明显冲突的具体案例——其中很多案例在斯多葛学派及其批评者的话语体系中早已成了老套的隐喻。

一个出售房屋的人是否有义务透露房屋的所有信息，但因此会压低房价与收益？（是的。）当一个人代为管理一个孤儿的产业时（一份经常降临到显赫的罗马男人身上的幸运工作），他是否应该经受住从中谋利的诱惑？（是的；尽管西塞罗自己离婚后与一位没有父母的妇女结婚，他的目的——观察家也这么认为——就是为了得到她的钱。[40]）一个在玉米市场上拥有暂时优势的正派之人是否需要告诉买主还有更多的玉米正在运往市场的路上，“或者他对此保持沉默而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不；这是为了利益而隐瞒事实的行为，他表现出了“诡谲与无赖”的品性——这对他并不是什么有利的名声。）西塞罗此处引入了罗马法律实践中禁止恶意欺骗的新规定（*formulae*）：它恰好反映出了西塞罗试图将法律争端的判决方式运用于哲学分析的意图。一个人是否必须经受住一切不义的诱惑，即便不义对追求政治上的功勋与荣耀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在一个人相信为共和国服务的最佳方式就是达到这样的高度？（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这种分析模式悄悄地映射了不到一年前发生的针对朱利乌斯·恺撒的诛杀暴君行动。“如果一个正派之人能够剥取残忍而疯狂的暴君法拉里斯（Phalaris）的衣服，以使自己不至于被冻死，难道他不应该这样做吗？”（3.29）西塞罗的回答是生动而有力的。一方面，单纯为了自己求生的利益而去掠夺别人是违背自然法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活下去后你能够有利于政治共同体和人类社会，你就应该这样做。与此相似的是，“如果有人把钱托付于你，后来他与你的国家作战”，此时你不应该把钱还回去，“因为你这样做将有害于共和国，而共和国是对你最宝贵的事物（3.95）。”更为尖锐的是，比如法拉里斯与其他暴君的例子，“我

们和暴君没有什么友好关系……剥夺一个人的财物不违背自然……杀死他是光荣的（3.32）。”西塞罗对诛杀暴君行为的辩护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尽管他在《论义务》中责令政治领袖们展现慷慨开明的品质以及拥有良好信仰的观点，后来成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批判的目标。[41]

然而，除了这些极端事例之外，西塞罗为人类设定的一般道德义务是有限的，并且大部分是消极的。“不要阻止人们使用流动的水；如果有人需要，允许从你的火中取火；给咨询者真诚的劝告（1.52），”但是一个人没有过于慷慨的义务，除非“给人光明，自己的光亮也不显暗淡”（1.51节西塞罗引的诗）。这是因为一个人对那些亲近之人拥有慷慨的特别义务，同时也对法律负有义务并尊重私有财产——一旦它通过法律与实践习惯而得以确定下来的话。这些亲近的关系纽带首先源于繁衍后代的动物冲动，进而产生了夫妻与子女关系，然后是家庭与婚姻的各种纽带，它们通过血缘以及对祖先的各种宗教义务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西塞罗所乐见的世界主义的诸观念存在自己的限度，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体现在个人更具地域性的社群关系纽带之中。

尽管家庭的各种纽带对个人来说更为亲切，但是西塞罗坚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我们每个人同共和国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切”（1.57）。有能力的人有义务去参与公共生活而为共和国服务，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并展现伟大的精神（1.72）。罗马共和国是最可能的政制形态，这是西庇阿所提出的论点，但却代表了西塞罗自己的心声。最优良的人类生活——此时人类相互聚合的社会性，以及因此所试图捍卫的正义都能够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是生存在如此政体下的生活：权力、审慎与自由能够相互联结在一起。

西塞罗对它们的必要条件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他对土地改革怀有深深的敌意，他坚持对元老院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所有这些都不被当时、以往及以后的共和主义者认同。在他所称颂的政体（即便在他那些最激进的平民主义竞争对手的眼中）之下，罗马的穷人们并没有被赋予创制或抽签的选举权力，他们也几乎没有雅典民主政治的问责与控制的权力。只有当平民的权力受到更加博闻广识的政策顾问与更具决断性的行政权力的制约时，西塞罗反平民主义立场的具体内容，以及他关于人民自由的远大理想才能够讲得通。西塞罗的这些观点不断在后世思想中得到采用。西塞罗阐述了公民义务的理想模式，还阐述了如何把公民身份与共和国的健康政制相互强化在一起的思想，这两者对后世最具借鉴意义。

注释：

[1] 关于res publica的含义，我借鉴了Schofield的观点，参见：Schofield 1999a, pp.178-94。然而他在其著作中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与警示性的方法而省略了共和国的这层意义。按照自己的意图与目的，我没有完全采纳他的观点。

[2] Brunt 1988, p.283,更为一般的讨论见于pp. 281-350。

[3] McCormich（2011）对罗马共和国作了民主与民粹的解读；他在马基雅维利对李维的历史著述的反思中发现了这一点。

[4] Polyb. 1.1.5.在Budé译本（Polybius 2004）的基础上，我自己进行了翻译。标准的英文

译本出自于Evelyn S. Shuckburgh（Polybius 1962），对此我也有所参考与借鉴，但有时也对译文作了修改。* 原文如此。现在的突尼斯城是突尼斯共和国的首都，一般认为它是古迦太基文明的中心，但并不属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译注

[5] 关于波里比阿生平的简要介绍参见Walbank 1962，此处的论述对其多有借鉴。

[6] Baronowski 2011, pp. 2-3.

[7] 波里比阿没有使用这么简略的标签，相反他详细论述了政体内各元素的相互平衡。与其说波里比阿的思想观念是“混合的”，不如说是“平衡的”。正如Paul Cartledge给我的明确建议，它是上下移动的“跷跷板”，而不是多种原料混合而成的“布丁”。

[8] Thuc. 8.97.2.

[9] Plato, Laws 691e.本段中的引文译文出自Saunders，参见Cooper 1997。

[10] Plato, Laws 693d.

[11] Fritz（1954）在介绍波里比阿的混合政制思想的时候，他注意到其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存在着一定的联系（pp.v-vi）。

[12] 关于罗马政制对后世政治思想影响的著作，参见Millar 2002。

[13] Drogula 2007.

[14] 此处译文参见：Arena 2012, p. 201，Arena同时还引用了另外两处使用该词组的出处，参见：Caes., B. Civ. 1.5以及Livy 3.4.9。

[15] 关于这场辩论的综述，参见North 1990。

[16] Cic. 3.7，J. L. Moles译文，参见Plutarch 1998。

[17] Zetzel 1999, p.vii.

[18] Off. 1.77，Margaret Atkins译文，参见Cicero 1991。

[19] J. L. Moles译文，参见Plutarch 1998。

[20] Zetzel 1999, p.vii.

[21] Cic. 42.2-8.

[22] 关于昆图斯（Quintus）的指导说明的拉丁文本，参见Q. T. Cicero 2001；易于找到的一个最新译本，参见Q. T. Cicero 2012。

[23] 西塞罗备注说修辞术仅仅在道德哲学（伦理学）之上，并非在哲学整体之上；我们可以补充另外一点，即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修辞术作了有条件的辩护，这与他的《高尔吉亚篇》有所不同。

[24] 此处所有引文见于De Rep. 1.1＆1.12，译文参见：Cicero 1999, p. 6。

[25] Griffin（2013）对西塞罗的拉丁语哲学语汇以及罗马法对其的影响与塑造过程进行了研究。

[26] 此处译文参见：Schofield 1999a, p. 183。他的译文省略了从句的编序数字，他对此段的叙述影响了我在此处以及后面的看法。在Cicero 1999年的译本中，该残篇被标序为1.39a。

[27] 非常有趣，作为共和国政治家的模范代表，西庇阿表示如果非要从三种原初政制形态中选择一种的话，那么他个人倾向于君主制。他把君主制类比于家庭中的唯一主人以及（柏拉图式的）作为心灵的统治者的理性。

[28] 该残篇被如此编序，参见：Cicero 1999, p. 56。

[29] 之前与之后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改革努力；朱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9年成功地颁布了两项土地法律，尽管西塞罗、加图以及另外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对。

[30] 该句中的各引文都是我自己的翻译（拉丁原文见于Cicero 2002a），见于De Lege Agraria，第二次演讲，2.7.17,2.7.16，前两句话所体现的思想见于第一次演讲。关于“精英贵族”，包括西塞罗本人反对土地重新分配，认为它是对自由的威胁的更广泛文本，参见：Arena 2012, pp. 220-43。

[31] 西塞罗的《法律篇》非常明确地模仿了柏拉图的《法律篇》，尽管它们各自关于法律与共和国、政制的文本间的安排并不相同。

[32] “界墙与檐沟”是一个表达强烈意义的短语，参见：Harries 2006, p. 15。引文见于De

Leg. 1.14。

[33] De Leg. 1.20. Zetzel译文，参见Cicero 1999。

[34] De Leg. 1.23.我自己的译文。

[35] Off 1.21.我自己的译文。

[36] Off. 2.73.我自己的译文。

[37] 我自己的译文，拉丁文原文见于Cicero 2002b。

[38] 这一部分的所有译文，除非另有标注都源自于Atkins，参见Cicero 1991。

[39] 该段与我的另外一项研究（Lane 2011）紧密相关。在那里我引用了Anthony A.Long（1995, p. 240）的一句非常生动的话：“《论义务》而非《国家篇》才是西塞罗的《理想国》。”

[40] Cic. 41.3-4，参见Plutarch 1988。

[41] 《君主论》第十六、十八章分别批判了这些观点；作为过渡章节的第十七章批判的不是西塞罗的著作，而是塞涅卡的《论仁慈》（De Clementia）——我将在第八章讨论该文本。



第八章

主权

西塞罗被暗杀前后的数十年内，罗马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朱利乌斯·恺撒被暗杀以后，他的追随者与继承人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首先联合起来对抗暗杀恺撒的旧势力，然后他们之间互相争斗，最终导致了屋大维（朱利乌斯·恺撒的养子）军事权力的巩固，他很快自称“恺撒大将军，神之子”。[1]军事权力与朱利乌斯·恺撒身上的宗教—个人权威的合体使这位年轻的恺撒积聚起了新的政治权力形式，比如公元前32年在没有任何法定权威的情况下，他召集元老院开会，然后又召集起意大利的所有自治地方，要求它们与自己过去的盟友——现在与埃及女王结盟——进行最后一波的战争。[2]

屋大维并没有废除共和国的行政官制度。相反，他以共和国政制的恢复者与捍卫者自居。然而他从元老院那里攫取了一系列新的角色与权力。公元前27年，他被选为执政官，但可以连任数年（违反了共和国每年改选的要求），之后在公元前23年，他被赋予保民官的权力，因此可以主持元老院的会议以及否定任何行政官的行为。与此同时，他还积聚起了其他的权力、地位与头衔。一系列权力前所未有地积聚于一人身上的状况反映在了“第一元老”（*pinceps senatus*）、“第一公民”（*princeps civitatis*）的新头衔上。尽管这些头衔由元老院授予，元老院自身在帝国时代仍然存在，同时人民仍然是帝国法律权威的最终来源，但是元老院审议的独立性以及人民的地位与意义大打折扣，它们甚至变得徒有其表。

“第一元老”“第一公民”的头衔表明屋大维不过是平等个体中排名第一的那一个。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恺撒·奥古斯都的头衔，以此来感谢他在战后放弃手中权力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授予他新的权力）。这一举措确认了一个既成的事实，即他现在不再与任何人一样平等了，他的公民同胞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3]公元前69年元老院建立起了维斯帕西安（Vespasian）的统治，并且制定了“维斯帕西安帝位法”（*les de imperio Vespasiani*）。至此以后，任何执着于平等的企图与幻想都被彻底抛弃，因为该法律授予新皇帝自行裁决的权力，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任何行为，无需顾忌现实的法律。此举公然违反了共和国“平等自由权”（*aequa libertas*），或者一律平等守法的基本原则。[4]另外，历史学家把“第一”（*princeps*）头衔的时代称为“元首制”（*principate*），或罗马皇帝统治的早期阶段（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此段时期以后，罗马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统治之下开启了“多米那特制”（dominate）——由“多米诺斯”（*dominus*，即主人）的正式皇帝头衔而来。

尽管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头衔，但是没有哪一个单词或观念能够指代罗马帝国时期的“主权”。（本章的罗马帝国是指皇帝统治时期的罗马，以与罗马人民所享有的帝国相对照。帝国的雏形起源于数世纪前的共和国——正如前章所示。）最为接近的单词可能是帝权（*imperium*），它的词源意义是发布命令，以及能够强迫人们服从这些命令。它被用来形容共和国时期行政官们被广泛授予的权力。公元前23年，当（尽管）奥古斯都正式辞去执政官一职时，帝权被以一种扩充的形式赋予了他。此后经过元老院投票，它被赋予每一位继任的皇

帝。然而帝权的特殊权力（首先在罗马的各个行省；奥古斯都的帝权扩展到了罗马城及整个意大利，它们被视为一个行省）仅仅是皇帝们所享有的众多权力中的一种。皇帝们身上不断增添的头衔表明罗马人试图解释仍然存在的人民与元老院在与这些个人统治者相遭遇时，它们自身的地位与作用所发生的改变。这些个人一旦在理论上被人民接受为统治者，那么他们在实际统治的时候并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本章讨论的“主权”不是哪一特定拉丁单词的翻译，而是不断发展出的皇帝们的一系列权力，它融合、扩展或取代了共和国行政官的最高权力。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本章所讨论的“主权”也包括了一个人的自治，这成为这一时期内让众多作家颇为着迷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影响政治事件的能力正在消退，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自我内部的控制，皇帝的各种权力也没什么意义。为了仔细研究主权外部与内部的双重主题，我们将考察塔西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与普鲁塔克的个人生活与他们著作的各个方面。

尽管罗马人非常熟悉周围世界以及希腊历史与理论中的各种关于王制的模型，但是他们无法简单地全盘照搬之。相反地，他们必须不断发展出新的方式，以思考新出现的主权者所包含的理想与现实，以及服从于主权者所带来的伦理与政治困境。在罗马法中，权力从理论上来说仍然源于人民，但是主权观念的出现标志着这些权力在实践中已经几乎脱离了人民的控制。就像共和国的观念一样，这种主权观念对我们现代人的冲击是极为猛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身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不安困境。没有了人民的控制与问责，这些权力能否受到一定的规制？这些权力支配着普通人民的生命，那么现在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都是很多现代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主权的新象征在罗马城标榜自己的同时，整个政体的疆域边界及其所属臣民也在经历着变化。我们在本书中不断探究了城墙与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还在第六章观察到了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某些观点，他们想象了一个不被特定城市的围墙或法律所割裂的世界。那些根据自然友谊而划定疆界的各宇宙图景随着罗马的扩张而出现了新的转机。现在人们可以把罗马等同于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同体。因此在公元155年，一位希腊演说家在安托尼乌斯·披乌斯（Antoninus Pius）面前宣称罗马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城邦（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Or.* 26.36）。他不是去构想没有城墙的城邦，而是把防卫罗马疆界的军队比拟为一个无比巨大的城邦的围墙（*Or.* 26.80-81，鉴于当时变动不居并处于争夺之中的边界状况，无论如何这也是极富想象力的）。[5]在数十年之后的公元212年，整个帝国共享同一法律体系的观念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制定颁布了“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这使得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都享有完全的公民身份（同时也相当便利地使他们受制于自己持续吃紧的税收状况）。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就不断出现的各主权统治形式的（多种）价值，以及公民在其中应担负的角色展开了争论。真正的政治自治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帝国的很多哲学家转而倾向于培养一

种个人主权的自治形式，以此来避免外界社会的伤害。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想（以及其他哲学思想流派）被重新挖掘出来，它们既被用以批判主权的观念，又被用以批判它的新概念或其他变种形式。

主权的共和式批判

尽管罗马早期元首制的统治者们试图保留共和国政治的外表，但是很多观察者认为那是彻底抛弃共和国价值的遮羞布。没有谁的分析比历史学家塔西佗（P.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5—118年）更为言辞激烈了。他在其著作中追溯了罗马的历史，从奥古斯都去世的公元14年开始，一直写到图密善（Domitian）被暗杀的公元96年。[6]塔西佗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其最具西塞罗式的拉丁风格的著作《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中，沉痛地反思了共和国的道德习俗与新体制下人民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差距。[7]我们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中发现了众多政治观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塔西佗的著作中也能发现它们（其他读者也能发现这一点，特别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一些读者因近代早期统治者的傲慢与愚蠢而心生猜忌与敌意，他们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找到了对当时统治者阴郁的政治观的印证）。

塔西佗记述的时间包括了他出生前与幼时的数年时间，他掌握了一系列帝国统治者的一手经验资料。他在图密善皇帝——塔西佗视之为暴君——治下担任过官职，然后在公元97年担任过执政官，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涅尔瓦（Nerva）——涅尔瓦-安敦尼（Nerva-Antonin）王朝时“罗马五贤帝”的第一位贤帝。（这五位贤帝都是被上一位贤帝收为养子而担任元老院元老，然后才成为皇帝继承人的。他们的统治都相当节制，因此得到了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极具影响力与原创性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的称颂。吉本说“罗马五贤帝”时期是“世纪历史上人类最幸福与最繁荣的时期”。[8]）然而尽管塔西佗敏锐地观察到了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的差别，但他还是暗示说元首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天生具有摧毁自由的倾向。

塔西佗在其《编年史》（*Annals*）中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以共和国政治传统而自豪的元老如何被要求对残暴的皇帝俯首帖耳，比如公元14年在奥古斯都·恺撒去世后，提比略（Tiberius）掌握了权力，“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Annals 1.7*）。[9]这些人名义上被选出来领导共和国，但实际上受着一位残暴皇帝的奴役，塔西佗表现出了对他们的犀利而尖锐的政治谴责。这与我们讨论过的斯多葛学派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没有哪个智慧之人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即便他被置于锁链之中而成为这个世界所谓的奴隶。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家们称赞每一位智慧之人的自由，即便他在法律上是一名奴隶。与此相反，塔西佗谴责他们仍然是帝国暴政下的奴隶，即便这个世界把他们算作卓绝的自由人。

塔西佗在《对话集》中还隐含了一个更大的批评——不只是针对坏

主权者，而是针对所有主权者。《对话集》写于公元101年以后，书中包含了公元74年的明确年份。这部对话录探讨了一位罗马作家放弃修辞与法律转而青睐诗剧的决定。这是应对元首政治压力的典范生活，但是塔西佗自己只是时断时续地过这种典范生活（他多次从积极的政治生活中隐退，但多年以来他又一直承担一定的政治角色，同时通过撰写历史与其他著作，构建了另外一种与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相关联的身份与自主性）。[10]聚在一起对话的人包括了元老院元老与曾经的民选高官们。他们在元首政治的允许下过着全然的政治生活。然而尽管其中一位赞叹他在政治生活中拥有修辞术所带来的各种权力，但是他也把得到皇帝的青睐视为利用修辞术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7.1，8.1-3）。

另外一位对话参与者追溯到修辞术发挥更大效力的共和国时代。尽管共和国被歧见与内部倾轧搞得四分五裂，但当时却是为修辞家们传授给人民的信念真正统治的时期。他略带俏皮地指出一个被真正良好治理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修辞学家，修辞学家盛行于雅典与罗得岛（Rhodes），而不是斯巴达或克里特岛（40.3）。如果所有决策都由唯一的睿智君主做出，那么修辞术实际上将毫无用处（41.4），而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元首是否算得上一位最睿智的君主。如果不是，那么元首政治下修辞术作为阿谀奉承与博取眼球之术的景象看上去就是十分暗淡的了。更有甚者，即便当时的元首是一位睿智君主，在良好治理的借口之下，自由难道不是与修辞术一同被丢弃了吗？这是塔西佗留下的一个悬而未决而又极具煽动色彩的问题。[11]

斯多葛式的主权理想

即便在一位好皇帝的统治之下，自由也可能丧失。当塔西佗沉思于此时，有一位前代的罗马思想家把政治希望寄托在培养出一位好的主权者并使他推行优良的统治上。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尼禄（Nero，公元54—68年在位）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其政治上的顾问——按照一种哲学而非历史的脉络完成了这一壮举。塞涅卡在哲学上是一位斯多葛主义的信徒，同时他还是一名剧作家与文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完成过一部像《国家篇》这样的政制著作，这跟斯多葛学派的创建者芝诺与克律西波斯（以及之前的柏拉图）都不同。塞涅卡不是去描绘一个理想共和国的政制或法律，反之，他生动而有力地完成了关于理想君主的论述。这表明一个政治体的命运前途已经彻底取决于一个人的善或恶了。

尼禄十六岁即位，此时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为此塞涅卡还专门撰文作了预言，但是很快罪恶抬起了它的头颅。尼禄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中他非常享受把基督徒烧死在火柱上，然后让燃烧的火光照亮他花园的过程。另外他还对塞涅卡的政治动机心生猜忌，最终命其自尽而亡。然而当公元54年塞涅卡创作《论仁慈》（*De Clementia*）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能够使尼禄为了善而统治。他向君主建议“你的共和国是你的身体，你是它的灵魂”（1.5）。[12]作为使共和国充满生气的灵魂，君主必须奉神灵为自己的楷模：“因为神灵……是君主最好的榜

样……君主希望神灵怎么对待他，他就应该怎样对待他的臣民”（1.7）。此处君主被赋予了最崇高的行为规范：共和国，乃至整个宇宙的良好秩序都取决于君主的正直品格与美德。

当然，好君王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希腊与罗马，以及周边多个社会之中都存在着多种关于好君王的思想资源。它们都是塞涅卡倚重的对象，尽管他主要的哲学身份是一位斯多葛学者。君主政治的理念从来没有脱离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之外。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多次论及它们，包括希罗多德的三种基本政制形态之一（第二章），以及马其顿、波斯与其他政体的政治实践；此外亚历山大大帝自己化身为一种新型的统治者；最后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希腊化时期，帝国的各个后继王国的国王仍被视为活着的法律（两者见于第六章）。

另外，君主政治的理念也获得了自己的重大发展。色诺芬——柏拉图的同代人，苏格拉底的朋友——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个人生活几乎与波里比阿一样充满了冒险精神。他为早年的一位君主即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6世纪在位实施统治——专门撰写了一份教育的颂词。在希腊政治理论的鼎盛时期，他的这部著作表达了王制的政治理想，后来则成为复兴与发展君主政治的新实践借鉴的对象。色诺芬还给塞浦路斯岛的君主尼科克勒斯（Nicocles）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何统治自己的臣民。

然而，在罗马政治的背景下塞涅卡对这些观念所做的发展仍然是引入注目的。他的著作后来被称为“君王之鉴”（一面具有高度折射功能的镜子，它让君主从某一角度观察到自己）。不管共和国下的国家享有怎样的自主地位，现在的国家脱离了君主就无法思考或自我引导。这使塞涅卡倍感“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压力与责任。然而此举也剥夺了公民——甚至还有像塞涅卡自己那样的高位元老——所拥有的有价值的政治权威。

主权者统治下的政治伦理

上述想法反映在塞涅卡自身居于主权者之下的生活经验所内含的紧张之中。塞涅卡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显赫罗马公民，与众多富裕与野心勃勃的行省家庭子弟一样，他在罗马接受了修辞学与哲学的教育。塞涅卡以演说家的身份成名，他曾经担任过高级的民选官职与元老院元老，这些都跟西塞罗一样。然而因为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的嫉妒与猜忌，塞涅卡的生活受到威胁，并且遭到放逐；再度获宠后成为尼禄（克劳狄的妻子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儿子，后来被克劳狄收养）的家庭教师与政治顾问，但他后来被怀疑阴谋造反，最终在公元65年受尼禄之命而自尽。如此屈从于一人的专制权力，塞涅卡甚至都没有——像西塞罗那样——争取共和国平等权的机会。这标志着共和国与元首政治下的政治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塞涅卡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即祖国（*patria*）是人类的一种主要的善（*Ep*.66.36,66.37），以及一个公民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

寄望于理想地展示他的德性（*Ep*.85.40）。然而祖国——或者说作为主权者的君主——要允许一种可使个人服务于它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才能够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在塞涅卡的时代，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深深的弊病。基于这样的理由，塞涅卡把时而表现出来的对公共生活的憎恶与对斯多葛学派的信仰相互协调了起来，因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说智慧之人“将涉足公共生活，除非受到了什么阻碍”。

塞涅卡更进一步认为芝诺这条命令的实际隐晦意义与看似相反的伊壁鸠鲁主义信条——智慧之人“不到万不得已将不会涉足公共生活”（两条引文都被记录于塞涅卡的《论个人生活》（*De Otio*）之中，3.2）[13]——是相互一致的。“如果公共领域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境地，如果它已经被邪恶之徒所占据，那么智慧之人将不必做无谓的斗争，也不会做无益的牺牲”（他补充说如果智慧之人同时缺乏足够的健康、权势或力量，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De Otio*3.3）。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看似更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信条与寂静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信条就合二为一了。在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共领域内，智慧之人的出路是悠闲自在的退隐，而不是积极的介入。[14]

然而，塞涅卡并没有满足于此。悠然自在地退隐于共和国事务之外给智慧之人服务于他所谓的更大的共和国提供了余地。塞涅卡此处借用了斯多葛主义的观念即世界公民。对塞涅卡（以及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界公民的共同体并非智慧之人的完美天地。它也不像前面提到的演说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罗马的疆界相互重合的。它其实是所有潜在的理性个人的共同体。他在《论个人生活》（4.1-2）中表达了这一观念的隐晦意义：

> 我们必须明了，我们有两个公共领域，即两个共和国。一个共和国伟大，为所有人真正共同拥有，这就是众神与人同在的国家，它没有边界，太阳照耀的地方都是它的国土。另一个共和国，我们因为自己偶然出生而成为其成员——我指的是雅典、迦太基以及其他城邦，它们不属于所有人，而只属于有限的一些人。有的人要同时服务这两个共和国，也就是这个较大的共和国和那个较小的共和国，而有的人只为其中的一个服务。通过探究什么是德性，我们甚至在隐退之后也能为这个大的共和国服务——实际上，我猜，隐退之后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当罗马从共和国步入帝国时，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概念，共和国的观念得到了自己的延续，它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含义：任意现实与特殊政治单元的共和国，和众神、人类且与宇宙具有相同空间范围的共和国。人们可能服务于这两个共和国，但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面对传统的存在着政治界限（规模“较小”）的共和国时，人们需要提供积极的政治服务；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共和国时，人们需要在悠闲自在的退隐状态下过一种哲学生活，从世俗事务中隐退，通过哲学沉思来更

好地服务于这个更大的共和国。在这种哲学服务的意义上，塞涅卡命令说个人应该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一个公民与卫兵”（*Ep. 120.12*）。[15]

服务较小的共和国——现实的罗马政治体——的机会相比之下受到了它腐化堕落的价值与个人拥有的机遇的限制。尽管作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而承认人具有社会交往的自然倾向，但塞涅卡对喧嚣的罗马公共集会与竞技场——多种公共生活上演的场所——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这里的生活与角斗士学园毫无二致——彼此为邻就是彼此为敌”（*De Ira*［《论愤怒》］，2.8）。[16]在腐化堕落的社会条件下，残酷无情的社会与政治斗争为的是个人的升迁，即便是为了生存，这也无法让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我们公共领域的疯癫使其成为一项艰难的任务；我们相互把对方逼入邪恶之中”（*Ep.　41.9*）。[17]公共生活成为冲突、腐化堕落与诱惑的源泉。安静地旁观选举要比亲自实践更好（*Ep. 118.3*）。西塞罗与他的兄弟昆图斯（Quintus）饶有兴致地互通书信讨论如何赢得选举，但塞涅卡选择对它敬而远之，他的表现与西塞罗是如此地不同（*Ep. 118.2*）。

社会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目标，即众人对地方的公职竞选活动趋之若鹜。比如，古庞贝城有很多色彩鲜亮的选举“海报”被保存了下来，上面写满了数十种声音与意见——其中不乏女性，以此来拥护他们各自所支持的候选人[18]（英文单词“candidate”［候选人］来源于“*toga candida*”［一种漂成耀眼白色的托加长袍］，供竞选公共职位的人穿着[19]）。然而塞涅卡从哲学反思（尽管他曾经被选为高官）的立场出发，认为追逐公共荣誉可能会导致失望，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与金钱和身体一样，“公共职位是一件机遇大于权力的事物”，因此它是“奴性的”（*Ep.　66.23*）。它不适合那些把自由——应该成为所有人的道德目标——作为自己道德目标的人群。自由不再于政治参与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尽管它起初的意义源于政治，现如今它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之中。[20]

个人自主的伦理观

如果道德或伦理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它只能被有智慧与有德性的人（斯多葛主义的智者）所拥有，那么一个人如何生活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罗马的所有斯多葛主义学者给出了很多正面的实际建议。实际上，当一个人从公共领域隐退之后，自我塑造——控制自己的身体与欲望而非试图去控制他人——的个人领域就成了伦理实践的理想场所。在公共领域内，个人如果无法摆脱恣意妄为的主权者，那么他可以在自己的行为中成为自己的主宰。[21]

对塞涅卡来说，基本的实践方式就是在夜间对自己白天或善或恶的行为与思想情感进行自我反省（*De　Clementia　3.36*）。他也向君主推荐了类似的实践方式。如此实践的目的是要在个人的灵魂中维持理性的统治，摒弃日常的各种情感，因为它们无法彻底满足理性自觉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个人可以使自己摆脱恐惧，哪怕是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伤害所造成的恐惧（比如在刑架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这是一种常见的罗

马刑罚），因此在面对好运与厄运时，他都可以泰然处之。塞涅卡在一封信中问自己："出席宴会的时候肆意躺卧与遭受痛苦的折磨是一样的吗？"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智慧之人会用同样平静的心态看待这两种可能的命运安排吗？他铿锵有力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Ep. 71.21*）。

不受规制的非理性的激情打着日常情感的幌子对个人的自治构成了基本的威胁（斯多葛主义者代之以更加理性的反应）。塞涅卡认为愤怒是一种最严峻的挑战（作为一名罗马贵族，从童年起塞涅卡可能就比那些听命于自己优越的主人的人更少受到愤怒的摆布）。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愤怒》，当然在他其他的论文与书信中也有所体现，在某种程度上[22]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和朋友们提供一种摆脱愤怒的方法。塞涅卡的论文并非是独一无二（西塞罗以类似的方式在《图斯库兰谈话集》［*Tusculan Disputations*］中讨论了情感），却是极具特色的。他提出了关于"如何避免陷入愤怒……如何让我们脱离愤怒……如何让愤怒的人得到控制，让他们平息下来，然后恢复他们清醒的理智"（3.5）的具体实践步骤。

塞涅卡把愤怒比作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它阻止在心智的"城门"之外，不能让它征服与掠取理性的统治地位（1.8）。城邦围墙在这里被内化进个人之中：我们最应该负责的城邦是自己的心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借来的意象）。难道是持续不断的愤怒激发了雅典人谋求尊重的社会与政治斗争，而现在又轮到了罗马？早先柏拉图对这种论调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今按照斯多葛主义的逻辑脉络，塞涅卡不断地宣称愤怒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即使是在战役或战争中，汲汲于置敌人于死地，那时就会疏忽了自己的防御。真正的勇气乃是知己知彼，控制自己，蓄势待发"（1.11）。

塞涅卡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人们会对他的观点立场提出严苛的责难，指责他的观点是天真而不自然的，甚至是没有人性而恶毒的。为了反驳愤怒是自然的、令人起敬的且适合于统治者的观点，塞涅卡讲述了君主的愤怒导致残忍和愚蠢的自我毁灭的故事。他追溯了亚历山大大帝谋杀一位极少谄媚的朋友的故事（*De Ira 3.17*）。近而言之，他忆起了罗马皇帝盖尤斯（Gaius）——即著名的卡里古拉（Caligula），于公元37—41年曾短暂在位——的所作所为。这位皇帝的母亲曾经被软禁于一处乡间庄园，为此他下令拆毁了这个庄园以示报复。拆毁庄园的愤怒之举无异于作茧自缚。它只会招致人们对拆毁庄园这一行为，以及那里曾经发生的故事的注意，即他的母亲的丑闻（3.22）。与所有被激情而非理性控制的行为一样，从更为基本的意义而言，塞涅卡认为一切愤怒都是作茧自缚之举。一个人如果被激情所掌控，他就无法获得构成德性的理性自治。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而无法达到一个真正自由人的境地。[23]

当一位曾经的奴隶对上述观点发生应和时，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立场就更加令人难以抗拒了。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公元55—135年）。在现在的土耳其，他一出生就是一名奴隶，后来被一个自由人——尼禄的一名大臣——购得。因此与塞涅卡一样，爱比克泰德身处尼禄的罗马宫廷之中。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以后，

他最终在希腊城市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创建了自己的学园。他的学生阿利安（Arrian）把自己老师的教诲汇编成为一部著作，即《爱比克泰德论说集》（*Dissertationes*），同时还有一份介绍其哲学思想的《手册》（*Enchiridion*）。

爱比克泰德重视实践理论时，这是对早期的斯多葛主义信条——伦理学源于物理学——的背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动。他用宁静（*ataraxia*）来解释幸福的目标，并且积极地与伊壁鸠鲁主义与怀疑主义竞争。然而，他仍然借用了斯多葛主义关于宇宙秩序的理解来解释一个人获得宁静的最佳方式，即通过哲学来意识到自由仅仅源于想往宙斯神所想往之物。按照充盈着规范的自然而生活，这将带来德性与自由。

如果说塞涅卡主要是与那些喜欢争吵与野心勃勃的谄媚之人作斗争而专注于愤怒所带来的危险，那么爱比克泰德主要是为了调节——可能是因为他身为奴隶时的遭遇——悲伤所带来的危险。根据《爱比克泰德论说集》记述，爱比克泰德严厉责罚了那些只是为了“习得书生式的品性”而加入学园的学生；值得去学习斯多葛主义的理由应该是“试图从个人的生活中摆脱悲痛（‘呜呼哀哉！我真是不幸啊！’），以及不幸与厄运”，因此个人将不再像悲剧中的普里阿摩斯、俄狄浦斯或任何其他国王那样悲怆（“因为悲剧不过是对那些只重外在之物的人的那种悲苦万状、痛苦不堪的情形所作的戏剧化描写”）。[24]他坚持认为根据自己的信仰与渴望，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作出一定的道德抉择来避免“束缚与限制”。即便一个人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也不必对威胁者俯首帖耳，“不是因为你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你相信做某事比死亡要好”。“你的认识与看法在逼迫你”，正如所有的行动都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就是感情为什么说到底只是虚假的信念的原因。[25]

爱比克泰德的读者当中包括了一位罗马皇帝，即马可·奥勒留。尽管不是一位纯正的斯多葛主义信徒，马可·奥勒留的哲学思想还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但是他同样对自治的实践活动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即便在他成为罗马皇帝的时日内。[26]马可·奥勒留被视为前面提到的“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贤帝（先是联合执政，后来在公元161—180年间独掌大权；在位期间他赢得了一系列重要军事战役的胜利，同时他还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利用战争期间的闲暇，他用希腊文写作了一系列吐露一代帝王忧虑心声的《沉思录》（*Meditations*）。塞涅卡提出要在夜间进行自我反省，马可·奥勒留则在《沉思录》第二卷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暴虐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无情的人”，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是出于无知，他们都无法伤害你，你也不应该对他们生气（2.1）。[27]（他似乎不是一个自然的早起者。在第五卷中他写道，“大清早当你不情愿起床时……”［5.1］[28]）。

与爱比克泰德一样，这位皇帝也反对人们只追求学究式的品性。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真正的宁静：“放弃对书本所抱的渴望吧，以便死时了无遗憾，而能从容不迫从心底里感谢众神”（2.3）。[29]他告诫自己和后来的读者不要害怕死亡，当然他也始终专注于在战斗中如何指挥军队。他坚持认为没有时候不对的死亡，因为当自然打发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12.36）。[30]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命令而出生，而是根据自然的神圣计划而出生；死亡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它。因此一个人不应该自杀，但也不要抗拒或害怕死亡。这里又一次回荡起了苏格拉底的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们都坚持认为死亡并不可怕。[31]真正的宁静不在政治体制之内，而是在这样的哲学感悟之中。

至此，像爱比克泰德和塞涅卡这样的斯多葛主义者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开始向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靠拢，即一个人应该主要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必要的时候也为政治统治者服务，但不要期望这种政治服务能够带来宁静，因为只有一个良好构建的心智才能够带来宁静。马可·奥勒留的身份是特殊的，因为他是罗马皇帝，他对自己的人民承担着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然而他的《沉思录》告诉人们对他来说成功地实施自治与统治自己的帝国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自由与习俗

塞涅卡及其斯多葛主义的同伴们都认为一个理性的个人不会害怕死亡，同时人们也不应该被那些容易让人产生奴性的事物，比如金钱、身体与公共职位吸引。这说明他们对自由——个人的一种德性——极为重视。现实世界的法律把奴隶与自由人严格定义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重申了该学派的教义，即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它不是社会的或法律的，而是伦理的。法律上的奴隶（比如爱比克泰德自己）可能是伦理上的自由人，换句话说就是，伦理上的自由才是自由一词的真正且唯一的意义。相反地，法律上自己做主的主人与自由人（*liber*）在伦理上可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奴隶。曾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他的希腊文名字是*Epiktetos*，意思是“获得”，以此来表明他是被一位主人所购得的）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谋求伦理自由的过程中是平等的。一个人不会因为社会与法律地位低下就被排除于伦理自由之外，同样也不会因为社会与法律地位优越就肯定能获得伦理自由。

就奴隶制来说，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倾向于把上面的逻辑分析以一种清静无为的方式运用到政治之中，这就是说它不会搅乱既成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安排。比如，他们接受了约定俗成的法律上的奴隶制，尽管他们认为“真正”的奴隶制不受人类约定俗成的社会地位的支配。然而就女性的状况而言，至少有一位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利用自由与德性来强烈抗议当时关于性别的一些社会习俗（我们在第六章已经了解到这一事实，即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受到犬儒主义者的反约定主义［anticonventionalism］的深刻影响，他们更为普遍地关注女性问题）。他就是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与塞涅卡同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年轻人，惨遭尼禄驱逐之后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为爱比克泰德的老师，在罗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名人（公元71年罗马的所有哲学家都被驱逐出城，但他特别得以幸免）。他是罗马斯多葛主义思想发展

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他的斯多葛主义思想也受到了苏格拉底的深刻影响。

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认为女性应该从事哲学，他的这一观点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类似。然而他把柏拉图《理想国》中只有特殊的女性与男性才有能力从事哲学的观点普遍化了，也就是说他站在斯多葛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自然与普遍的。他在下面的引文中说：

> 女性与男性一样……从众神那里接受了理性的馈赠……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感官，它们是视觉、听觉、嗅觉及其他感官。女性与男性也拥有一样的身体各部分，谁也不比谁多什么。更有甚者，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拥有德性的自然倾向，也拥有获取德性的能力……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过去凭什么说男性才是追寻与思考如何过良好生活——确切地说就是学习哲学——的合适对象？凭什么说女性就是不合适的呢？难道说男性适合成为好人，而女性不适合成为好人吗？[32]

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假定大部分的女性将继续承担她们传统的性别角色，即料理家务（在当时的罗马，这包括以她们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与财产、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参与各方面的公共生活，尽管大部分的法律事务需要由她们的男性代理人出面）。然而当女性行使她们各自所拥有的神圣的理性能力追求德性时，即“当女性学习哲学”[33]时，她们才能为罗马最好地承担与完成自己的性别角色。鲁弗斯进一步认为婚姻与从事哲学是一致的。伉俪之间的自然亲密关系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得以发展的基础，同时它也能支持城市的发展，最终将促进种族的繁衍。[34]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为女权主义的，[35]我们发现一个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如何严厉地批评了芝诺与克律西波斯的“理想国”中的社会习俗。然而我们也发现他只关注于某些特殊的强制与非理性的社会习俗，对其他的一些则默然接受。鲁弗斯支持婚姻的一个理由是它不一定成为从事哲学的障碍，因为照料妻子与孩子（此处他仍然把哲学家想象成一般的男性）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转移给家中的奴隶们。他假定这种方式将有利于哲学家的哲学活动。[36]自由是一项伦理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从与上下的差别。在某些语境下，斯多葛主义的伦理规范可以导致激进的立场，比如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在性别上的看法，但在另外一些语境下比如奴隶制，斯多葛主义的伦理规范也可以容忍与接受现实中的不平等。

回顾共和国

当最后对众多帝国思想家的复杂政治立场进行评断时，我们可以回到马可·奥勒留之前的那个世纪，回到本章开头所着重讨论的塔西佗的时代。我们发现从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的时候，一位传记作家与哲学家回顾了希腊与罗马（元首政治之前）古典时期的政治家的生活故事，尽

管他当时也承认君主政治是一种哲学理想。[37]他就是普鲁塔克，一位来自帝国边陲小城（波奥提亚地区［Boeotia］的喀罗尼亚［Chaeronea］）的希腊人。

普鲁塔克的个人经历融合了我们已经讨论的众多哲学与政治主题。求学于柏拉图在雅典所创办的学园，他在哲学上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他被授予罗马的公民身份，同时还是一位地方的执政官以及德尔斐（靠近他的家乡）的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另外，与一切有教养与活跃于公共生活舞台的希腊人一样，普鲁塔克的生活也经历着罗马霸权下的紧张气氛。在公元100年前后写成的一篇论文中，他建议一位谋求地方公职的朋友说："你既是臣民也是统治者……你必须让自己身上的斗篷看上去更加谦逊，目光要从你自己的位置望向总督的高台，不要妄自尊大或者太信任你的权力（你要看到罗马士兵的靴子就在你的头顶之上）。"[38]

后代人热切地想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的那些立法者与政治家。幸亏有普鲁塔克，是他把他们的形象与信息传递给了我们，比如他笔下的斯巴达与莱库古。他独一无二地描绘了这位斯巴达的立法者的故事：莱库古禁止斯巴达人用文字记录下他的法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通过社会实践与记忆来把各种价值慢慢灌输给人民。[39]他还特别记述了雅典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领袖们，并且创造了一组典型的对比关系：令人羡慕的政治家与蛊惑人心的危险政客（他记述了这两类人的生活故事）。他认为政客只会谄媚与煽动人民，而政治家会告诉人民需要了解的事物，即便人民自己不想知道。按照这个逻辑，普鲁塔克同意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看法，即修昔底德认为伯里克利依靠第一公民的身份进行统治，一旦他放弃起初的各种政客的手段之后，修昔底德称其为"贵族与国王似的"（*Per*.14.2）。

与伯里克利一样，很多政治家通过接触哲学而培养起了各自的德性，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获得了实在的知识（此处普鲁塔克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不同），而只在于哲学训练是否使他们变得足够节制与自律。普鲁塔克认为哲学主要为民主政治尤其是共和国政治的德性提供支持，因此是政治自由的支柱。[40]如果说希腊化时期的各学派最终把哲学从政治学中解放了出来——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比如他们关于死亡的看法），那么普鲁塔克把则哲学改造成了政治学的婢女，因此他调和了贯穿于本书的两条经典脉络。

与他今天的很多读者一样，普鲁塔克的生活被政治自由的各种理想所环绕，他在自己的希腊城市中担任公职，还享有罗马公民的各种特权，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在很多关键的方面都受制于其他统治者，他们的行为不受普通公民的控制，同时普鲁塔克也对希腊和罗马过去的政体——包含了更为完整的政治自由与政治参与的经验与实践——了如指掌。罗马帝国的政治状况与被理想化了的希腊和罗马过往的政治状况之间既有延续也有断裂，这其中既包括了过度粉饰的吹捧，也包括了真正的相似性与前后的相互影响。普鲁塔克努力审视着过去的政治理想，并在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揣摩着它们的意义。这是他的读者与本书的读者面对的相同的情况。罗马后期的主权政治观念具有相当激进的特性，而对当今社会来说，它让我们追问当大众的控制越来越不具备真实

可能的时候，自治的各种观念与理想可能意味着什么。

注释：

[1] 此处我采取Mackay对屋大维的新头衔的译文，参见：Mackay 2004, p. 165。

[2] 屋大维的关键军事胜利是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Actium）战役中击败了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与马克·安东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结束标志着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建立的最后一个王国的覆灭，从此以后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参见：Mackay 2004, pp. 167-8。

[3] Mackay 2004, pp. 183, 185.

[4] Brunt（1977）解释说这最好被理解为一项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尽管它呈现为法律（lex）的形式。

[5]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这个名为“献给罗马”的演讲时间约在公元144年至155年之间；关于该演讲重要性的研究，参见：Ando 1999以及Richter 2011。该演讲的拉丁文本参见：Lenz & Behr 1976，英译本参见：Behr 1981, Vol.2。

[6] 《历史》所记述的时间跨度为公元68-96年；《编年史》所记述的时间跨度为公元14-68年，成书于《历史》之后，是《历史》的前篇。两部著作都仅有部分内容流传下来。

[7] 塔西佗还完成了一些对后世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描述了当时帝国边疆地区的日耳曼人的风俗，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一部以其岳父之名命名的著作《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他后来成了不列颠的总督。

[8] Gibbon 1837, p. 30（Chapter 3）.吉本的这个赞誉实际上覆盖了更长的时间段：“从图密善之死到君士坦丁继位”。

[9] 译文参见：Tacitus 2003, pp. 6-7。

[10] Sailor 2008, pp. 33-6. 记述了塔西佗时代个人保卫自己的独立性与社会地位的不同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塔西佗的独特风格，即把历史编纂与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

[11] 有关《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研究，参见Saxonhouse 1975（关于该主题的一篇论文），以及Kapust 2011, pp. 122-33。

[12] 此处及以下《论仁慈》的译文出自于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3] 此处及以下《论个人生活》的译文（标题通常被译为《论闲暇》［On Leisure］，但该版本为《论个人生活》）出自于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塞涅卡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尽管他曾是一位皇帝的顾问，参见：Cooper & Procopé 1995, p. xxi。

[15] 该处以及其他所有提到的塞涅卡的书信译文出自于Brad Inwood，参见：Seneca 2007。

[16] 此处及以下《论愤怒》的译文出自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7] 塞涅卡的这封信没有被收录于Inwood的书信选编版本之中，此处的引文来自Inwood & Gerson（2008）的译本。

[18] Roberts 2013, pp. 25-8.

[19] Roberts 2013, p. 144.

[20] Inwood 2005, pp. 303,319.

[21] 关于该实践方式的一个有影响的视角，尽管它强调的是“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而非“自治”（self-rule），参见：Focault 2010。

[22] 我之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in part）是为了表明Brad Inwood富有洞见的告诫；他说塞涅卡不仅仅是作为治疗专家或“精神与灵魂导师”的身份进行创作的，他还是一位“文人”（man of letters），参见：Inwood 2007, p. xviii。关于斯多葛主义者与希腊化时期其他的各种治疗方法，参见；Nussbaum 1994。在一般意义上，把古典哲学视为某种生活方式的研究，参见：Hadot 1995（重视精神修炼），以及Cooper 2012（重视哲学的论辩）。

[23] 关于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对自治与社会的论述的概述研究，参见：ReydamsSchils 2005。

[24] 引文分别见于D 1.4.23，1.4.26，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Text 139（p. 196）。

[25] D 1.17.23（“束缚……”），1.17.24（“不是因为”与“你的认识与看法”，译文见于Text 140［p. 198］），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26] Gill 2007, p. 175.

[27]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此处见于第十页。

[28]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34.

[29]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11.

[30]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118.

[31] 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几位执政官之一波爱修斯（Boethius,一位基督教徒，在公元510年成为执政官。他的儿子们在公元522年也成为执政官）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在监禁等待被处死之前，他寻求自己在哲学上的慰藉。

[32] Musonius Rufus, Fragment［Lecture］3, 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38-41。

[33] Musonius Rufus, Fragment［Lecture］3, 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38-41。

[34] Fragment［Lecture］ 14的标题为“婚姻是否为追求哲学的障碍？”此处所引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90-97。

[35] 第一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女权主义的，但第二种观点则取决于现代女权主义在婚姻问题上的看法，而这又是富有争议的。在古希腊、罗马哲学论辩的背景之下，支持婚后女性成为哲学家的观点有悖于禁欲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人们不屑于关心女性（妻子）与孩子。

[36] Fragment［Lecture］14，引文来源同上。

[37] 这源于一篇希腊文标题的文章残篇，即《论君主制、民主制与寡头制》（Peri Monarchias kai Demokratias kai Oligarchias）的第827BC部分。传统上它在普鲁塔克著作全集中被冠以“单一”（De Unius）字样开头的一个更长的拉丁文标题，因此残篇得以确认。它的真实性存在争论，但可以见于：Plutarch 1949。

[38] Praecepta Gerenda Reipublicae（《政治建议》），813E，Plutarch 1949;此处所引译文见于：Whitmarsh 2005, p. 12。

[39] 关于普鲁塔克的《莱库古传》的研究，参见：Lane 2013c;关于他和犹太柏拉图主义者的对比的研究，参见：Lane 2013b。

[40] 关于普鲁塔克对政治家与政客的论述的讨论借鉴并总结了Lane（2012）的研究内容。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从希腊与罗马人创造的众多政治观念中，我们选取了八个观念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此我们全面探寻了律师的演说，哲学家、曾经的奴隶与热诚的科学家的沉思成果，以及那些伟大的悲喜剧作品。古典时代的一个惊人特点是它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著述与形象。与其他古代社会留存下来的资料相比，希腊（特别是雅典）与罗马为后人留下了有关他们观念的丰富而详尽的资料证明，同时他们通过实践与思考向后人透露了他们构筑并表达那些观念的方法。

他们的观念是如此鲜活多姿，这是让人倍感兴奋的部分原因。尽管那时他们刚刚学会文字书写，在各自相对不那么专业化的社会中，他们还充当着一系列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希腊人开创或发展出了一大堆的智识学科，同时还急切而热诚地感悟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发展专门学科领域与维持知识和价值的总体理解上，他们恰好处于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可谓是十足的幸事。阿里斯托芬对哲学做了喜剧化的描绘，柏拉图从数学的角度展现了政治和谐，亚里士多德把人类这种动物置于其他物种的宽广生物机能之中，马可·奥勒留在军事活动之余还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有这些都证明政治观念与其他观念、实践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割裂，这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触动。

希腊与罗马人拥有探索世界的雄心，这说明政治只不过是他们试图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从悲剧创作与秘密投票机制的发明，到人们在希腊安提凯希拉（Antikythera）发现的观察天文现象的那令人惊叹的机械计算装置（研究者发现该装置与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存在相关的迹象），古典时代先人们的发明创造只把政治视为众多相互关联的领域中的一部分。政治学与数学、科学、诗学、工程学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对现代的那些好奇者来说，它富有训诫与启发的双重意义。盲目地把政治视为研究或实践的专门的、孤立的领域，这从来就不是一项明智之举：政治属于更大的社会生活，只有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它才能够被彻底理解。

本书已经说明了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尤其充斥着大量的内部多样性。古希腊各城邦为支配权与生存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从寡头与僭主之间的缠斗，到寡头反抗民主派的政变与反政变，所有斗争都处于波斯、后来是马其顿王权、最终则是罗马霸权的背景之下，它们使希腊的政治思考毫无沾沾自喜之处。正如古希腊科学与逻辑学的发展可能受到了这种政治（最有可能是民主政治）竞争压力的激励，希腊政治思想的深度与严肃性也可能部分地源于他们所感知到的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与自己的高风险意识。疆域广袤的罗马也体验着地方人口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关于宗教崇拜的实践形式与语言。尽管帝国边疆的人们接受了一系列法律来规范他们与罗马人，以及他们内部的各种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多样性同样也是政治与知识创新的强大力量。

在希腊与罗马，多样性创造出了一系列自然的实验田地，以供详细阐发与检验他们的那些政治观念。这些当时的与留存至今的观念足以证明产生它的土壤的肥沃。这并不是说希腊与罗马人在开始的时候拥有什么秘密的政治资源。而是他们严肃地把政治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及理

解与改变世界的伟大雄心的一部分，因而在我们考察的政治实践与观念上也就惊人的高产。成果中尤为突出的是特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在古希腊男性公民与非自由人、未成年人、女性、非希腊人以及众神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对照。[1]在正义之类的价值与多种政制形态的关照下，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与正义等价值多种政制形态相联的公民身份的建构，但是我们必须要谨记政治与所谓非政治之间的各种界限本身对政治探求与政治论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名奴隶、女性、“梅迪克”或被帝国征服的臣民，这些身份所蕴含的意义既是希腊与罗马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一位典型的男性公民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展示这项研究的时候，我的最终目标是要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为此我给出两方面的提示。第一方面的提示源于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即古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与制度机制；第二方面的提示则源于他们的众多哲学家的批评与挑战。

就第一组结论而言，本书试图说明希腊与罗马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即便——或者甚至——我们抛弃一些已经被接受、夸大和过分简化，同时也表现他们的政治特殊性的观念。不是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担当一切公职或自由地去决定一切问题；不是所有或说只有罗马公民在军队服役。强调古今之间被忽略的相似性是一项有意义的纠错工作。古典时期的各个社会至少拥有官僚制、代理制（delegation），甚至代议制（尽管不是在民选立法者的现代意义上）的基本形式。因此与我们一样，他们也十分关注那些使民选（以及抽签）官员担负责任的各种伦理与制度机制。

然而，上述认知只是凸显了一种更为深刻，同时也可能更为重要的古今差异。希腊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包括罗马人——极为关注如何使人民掌握切实的权力。他们不是仅仅严格按照我们通常的想象来行事。他们甚至引入了一些更加引人注目与有趣的机制以实施各式各样的实验，比如创立不受法官约束的人民陪审团与非专业的起诉人制度，运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公职，以及专门创立保民官制。他们认识到了人民权力的社会、经济与军事维度上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与之作斗争。

然而，围绕着界限划定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冲突，这在罗马体现得特别明显。对穷人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与经济的保护与供给。古典时代的各政治体一次次地在实践活动中被迫认识到穷人的这种政治自由观念。比如雅典的民主派彻底改造了这种观念，他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要允许富人拥有切实而不受约束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使富人承担了大量特殊的义务，允许他们享受服务公众所带来的荣耀，但也十分小心而又准确无疑地把他们引导到公共利益的需要上去。

与此同时，雅典人还为穷人的公共服务提供报酬，把这视为集体公民身份与自由权的条件，以此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还调整了移民而来的外邦人的地位，给予他们一定的法律保护，但同时要求他们纳税并服兵役。对罗马人来说，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则更进一步。一个奴隶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自由之后，他即被赋予公民身份，最终公民身份被

扩展到了帝国的一切自由男性。但在这方面罗马仍然不及雅典。罗马的精英们政治影响力根深蒂固，普通人民所拥有的担当公职、创制，甚至问责与控制政治精英的权力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尽管雅典与罗马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两个政治体的各政治阶层——按土地财富的多寡而定，但土地并非唯一标准——都不约而同地被迫认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看法与宽容的程度。在雅典，一位将军的任期从他当权之日即已开始，但他必须小心提防缺乏耐心或多疑的公众，不至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遭到控告或罢免；一位演说家当红的期限也取决于人民是否还愿意忍受他的演说与支持他的政策建议。在罗马，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多么优越，在赢得一系列的选举之前（尽管集体投票、计算选票的方式削弱了人民支持的效力），他都不能跨越仕途的晋级阶梯一跃成为元老院的元老。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公众支持率，不能太脱离于人民或妄自尊大。事实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大失误就是把全体选民排除于政治以外，致使共和国的政治支持来源转向了军队控制权与各种暗箱交易。他们地理上的后人们，也就是当今21世纪的希腊与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他们与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历经艰苦终于认识到了不自量力地脱离人民所带来的危险。如果让某一政治阶层或集团自己指定自己来掌握权力——它们可以被视为古典寡头的现代近义词，同时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或问责机制，那么这将是极其危险的。古希腊与罗马人比很多现代政治体都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我的第二组结论来源于那些哲学家，他们对各自政治体的实践内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雅典与罗马是展现民主与共和国政治体的优势与缺陷的生动模型。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在各自鼎盛时期所积累起的财富与权力。作为强盛的政治体，雅典的强权持续了大约两百年，而罗马则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除此以外，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吸引与创造出的灿烂艺术、建筑、文学与科学上的创新成就。然而尤其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批评认为一切权力都被深深地引向了错误的目标。权力被用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服务于国家的扩张，而不是去培养伦理上的自我控制与正义，或去追求如何生活的知识。这些哲学家向人们传递了权力之下还有责任的信息。追求权力而又无法明确地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这是毫无益处，并且经常是适得其反的，然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个人把追求善的知识作为一切事物之中最重要的目标。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中德性的观念与民主、共和国或任何其他纯粹的政制观念一样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对于那些受上起苏格拉底下讫斯多葛主义者这样一条哲学观念的主脉络深深影响的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所有观念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它不仅仅意味着免遭他人的蛮横控制，还意味着个人在追求最重要事物的过程中免遭困扰心智的各种冲动的干扰。人们不仅对这些哲学家提出的教诲与建议缺乏足够的耐心（从某种程度来说，罗马元老院自身即如此），而且后来随着天主教会在欧洲各政治体中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人们又长期被要求遵从天主教会的教导，在这种境况下，现代

的政治思想家把德性抛弃到了主流的政治观念之外。然而如果说本书所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民主与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一项事关如何控制统治者的事宜，那么它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这种对他人的控制最终将是不可能或不可始终的，除非它还包括个人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任何成功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对当今社会来说，它同样也是可持续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定义政治的权力与可能性的光谱始于个人自身。

注释：

[1] Cartledge 2002, p. 4.

致谢

如果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慷慨提供的学术休假与额外休假的机会，我就无法完成此书；感谢萨拉·科特里尔（Sarah Cotterill）、尼尔·汉南（Neil Hannan）为我的研究提供基金上的支持；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2012年度授予我该奖项；感谢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BS，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在2012/3年度授予我该奖项。CASBS为我提供了极为出色的写作空间以及物质上的全面支持，比如特里西娅·索托（Tricia Soto）、阿曼达·托马斯（Amanda Thomas）为我提供了卓越的图书馆服务。在CASBS的帮助下，我有幸就书中的各观点与众多学者进行交流与讨论，比如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她促使我做出了本书导言中政治的定义；还有马克·韦尔（Mark Vail），他审阅了我为此所完成的初稿。在审阅与评论我的几份早期书稿的过程中，很多学者慷慨地贡献出了自己的智识。在此我对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Malcolm Schofield）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每人都审阅了整部著作（马尔科姆还另外审阅了三章的修改稿）；同时我也对瓦伦丁娜·阿雷纳（Valentina Arena）、欣克·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雅各布·利普顿（Jacob Lipton）、哈伊姆·朱利科沃斯基（Chaim Milikowsky）、维多利亚·帕甘（Victoria Pagán）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各自都审阅了相当重要的部分章节。尽管他们的审阅意见对本书的修改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尼尔·汉南还读了本书的校样，但是我本人对书中的错误承担一切责任。数年来我与众多朋友、同事及学生就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政治观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他们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与我的代理人乔纳森·康韦（Jonathan Conway）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企鹅出版社鹈鹕丛书的编辑劳拉·斯蒂科尼（Laura Stickney），她以自己的想象力与热情帮助并激励我完成此书。此外还有唐娜·波比（Donna Poppy），她是一位工作熟练、知识渊博的文稿编辑。我与以上两位的合作同样相当愉快。最后我要感谢我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以及那些家人似的朋友；尤其是安德鲁·洛维特（Andrew Lovett），感谢他与他给我的一切。

术语表

关于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注释

本书行文中的注释，希腊与拉丁单词的每一个音节都要发音（因此“公民”的希腊文*ho po-li-tēs*的发音与英文单词“polite”复数形式的发音并不相同）。

本书正文对希腊文的音译不区分两组希腊文元音，它们有时通过长音节符的有无来表示：

——短音节ε，独自发音类似于*eh*，比如英文单词中的“evident”，但是

——长音节η，独自发音类似于*ey*，比如英文单词中的“hey”

——短音节o，独自发音类似于在英文单词“obvious”中的发音，但是

——长音节ω，独自发音类似于在英文单词“oh”中的发音

这是因为对那些不懂希腊文的读者来说，他们发现这些长音节符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启发意义，反而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对那些懂希腊文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元音分别的对应，因此也就不需要它们了。尽管如此，本词汇表中的长元音依旧照此标出。

希腊文的名词及其他特定的语法构造的前面会有简短的定冠词。定冠词根据性别、数字与单词的格而递减。本词汇表下面所列的单词省略了定冠词，除非离开定冠词就无法理解该单词所表达的意义。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被置于主词之后（因此*ta politika*在下文中被表示为*politika, ta*）。

人名的表示则按照通用的英语习惯，它们通常源于拉丁文，前面的冠词被省略掉了（因此直接表示为Epicurus［伊壁鸠鲁］而非*ho Epikouros*）。

下面的词语定义与人物传记来源于《在线版的LiddellScott-Jones英希词典》（*The Online Liddell-Scott-Jones Greek English Lexicon*），以及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和查尔斯·肖特（Charles Short）的《拉丁语词典》（*A Latin Dictionary*）、《牛津古典辞典》（*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此外还有《布里尔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Brill’s New Pauly*）。如果想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任一术语或人物，读者可参考这些著述。因为我们下面所列内容有意作了删减，因此可能

是有失公允或断章取义的。

主要希腊文［**G.**］、拉丁文［**L.**］术语的简短定义

archē，复数形式：***archas***［G.］：官职（政治语境下）；也有“起源”（origin）的意思

archein［G.］：治理或统治

aretē［G.］：卓越或德性

boulē［G.］：意志、深思熟虑或委员会（在雅典它指500人议事会，即克里斯提尼［见下］所创立的元老院或设置议事日程的机构［见下*ekklēsia*条］）

civitas［L.］：政治单元，大致可译为“国家”（state）（在古罗马的政治语境下，它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单位）

Constitution Antoniniana［L.］：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所颁布的法令；公元212年，该法令授予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自由民以公民身份

dēmokratia［G.］：字面的意思为“人民的权力”；英文词“democracy”的起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由“人民”［*dēmos*］掌握主要权力的政治体系。古希腊的雅典是该政治体系的最重要代表）

dēmos［G.］：人民（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指“人民”或平民而与贵族相对；它也可以指全体公民）

dikastēria［G.复数形式］：法庭

dikē, dikaiosunē［G.］：正义；*dikē*也可专指审判、裁决或判决

ekkēsia［G.］：集会或会议（在雅典，它指一般性的政治团体而与500人议事会相对，见上*boulē*条；在后来的思想中，它既可以指政治团体，也可指宗教团体。因此我们可以把教会成员组成的共同体或所有的基督徒称为*ekklēsia*）

ergon［G.］：行动或行为；在古希腊的思想与修辞学中，它通常与演讲者的言语（单数形式，*logos*）相对

gerousia［G.］：元老们组成的委员会（在斯巴达，它指元老院或元老委员会）

honestas［L.］：荣誉、荣耀或名誉，通常与权宜或利益（expediency）相对，见下utilitas条

hubris［G.］：傲慢无礼或肆无忌惮的暴行

imperium［L.］：命令（在后来的政治语境下，它指罗马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isos［G.］：平等的，有时也译为公正的；与*isotēs*（平等）相关

Kallipolis［G.］：字面意思为“美仑美奂或美丽的城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它指哲学王的理想城邦）

koinōnia［G.］：宗教社团、协会或合伙

kosmopolitēs［G.］：世界公民（在斯多葛主义的思想中，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正确地把其他一切理性个人视为自己的公民同胞，进而有了这样的观点，即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共同体是世界共同体）

kosmos［G.］：字面意思即“秩序”；通常被用来指世界秩序或宇宙

kurios［G.］：强大或富有权威的，有时译为“主权者”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L.］：字面意思为“关于维斯帕西安之命令的法律”，它的部分内容被刻于石碑之上而被保存下来。它描述了罗马皇帝的权威如何源于人民的法律授权

libertas［L.］：自由

monarchia［G.］：一人之统治；英文词“monarchy”（君主制）的来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一王统治的政治体系）

nomos［G.］：法律或习俗（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与自然相对，见下*phusis*）

officiu［L.］：道德义务

oligarchia［G.］：少数人的统治；英文词“oligarchy”（寡头制）的起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由少数富裕公民统治的政治体系）

optimates［L.复数形式］：字面意思为“最优秀的人”（指晚期罗马共和国中拥戴精英权力［贵族们，尤其表现为元老院的权威］以对抗平民的政治派系，与*populares*相对，见下）

phusis［G.］：自然（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与法律与习俗相对，见上*nomos*条）

polis; 复数形式***poleis***［G.］：城邦或城市国家（在古希腊政治语境下，它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单位）

politeia;　复数形式***politeiai***［G.］：公民身份、政制或共和国（在一般的政治语境下，它既可以指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可以指它的政府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它也可指代被多数人良好治理的统治形式）

politēs; 复数形式***politai***［G.］：公民

politika, ta［G.］：政治事务或有关公民的事务

politikos［G.形容词］：有关于公民的

populares［G.］：字面意思为“人民的代言人”（它指罗马共和国晚期支持平民诉求而反对*optimates*［见上］的政治派系）

princeps, princeps senatus, princeps civitatis［L.］：第一人，元

老院的第一人，国家的第一人（打赢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国内战争后，第一任罗马皇帝屋大维［见下］的头衔）

psychē［G.y指代字普西隆，否则音译为u，将在英语中产生另外一个更容易辨认并且表示该意义的词根］：精神或灵魂

res publica或***re publica***［L.］：公共事务或公共关切；用以表示共和国（commonwealth）

rhētor［G.］：政治体制内的公共发言人

senatus［L.］：英文词“senate”（元老院）的来源；罗马共和国内提出建议并进行审议的组织机构，在帝国时期日趋变为象征性意义的角色

senats consultum ultimum［L.］：字面意思为“元老院的终极法令”；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它赋予行政官们超常规的权力来抗击国家的敌人，包括动用武力

stratēgos; 复数形式***stratēgoi***［G.］：指挥官、总督或将军

suffragio［L.］：投票或公民普遍的参政权

telos［G.］：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它可以指行为、事物或人的目的；“teleogical”［目的论的］一词的来源，该词在古希腊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诸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turannos［G.］：暴君或僭主（在政治语境下，一位僭主的统治不仅是绝对专制的，他还无视法律或公共的善）

utilitas［L.］：权宜或利益（expediency），通常与荣誉相对，见上*honestas*条

Zeus［G.］：众神之神，在罗马通常被等同于朱庇特神

主要人物、事件与地点简介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雅典的悲剧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与《乞援人》（*Suppliants*）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他征服古波斯帝国后进一步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与印度北部，因为热病死于古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将领们瓜分了他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开始

Antigone（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见下）的同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的人物角色；她把自己的义务置于首位，不顾自己叔父克瑞翁——忒拜之王——的命令而埋葬了自己的兄长波吕涅克斯；为此她被判以活埋的极刑，在克瑞翁的减刑通知到来之前，她自杀而亡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6年）：雅典喜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云》（*Clouds*）、《骑士》（*Knights*）与《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他考察了雅典民主实践与社会中的紧张关系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一位来自马其顿的哲学家、柏拉图（见下）的学生。他在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吕克昂学园，著述颇丰，其中《政治学》（*Politics*）与《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在政治思想中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

Athens（雅典）：阿提卡半岛上的古希腊城邦，因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财富以及众多的哲学流派而闻名遐迩；古波斯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均见下）的主要参与者

Augustus Caesar:见下屋大维（Octavian）条

Brutus, Marcus Junius（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年？—公元前42年）：罗马贵族与政治领袖，与卡西乌斯（Cassius，见下）一同密谋反抗朱利乌斯·恺撒（见下）；恺撒被刺杀后，他与其他密谋者一同在希腊纠集起了一支军队，但在腓利比（Philippi）一役中战败，之后他自杀而亡；与他同名的一位先祖把罗马的最后一位王赶下了王位，因此开启了罗马政治的共和国时代

Caesar, Julius（朱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4年）：罗马将军，他征服了高卢（今天的法国），后来与“贵族派”（the optimates），以及以庞贝（Pompey）为首的元老院显赫贵族们打了一场国内战争；他赢得了战争，但他的野心使他疏远了那些元老们，最终在公元前44年“三月十五日”（Ides of March）被暗杀

Cassius（卡西乌斯，公元前80年？—公元前42年）：罗马贵族与政治领袖，与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见上）一同密谋反抗朱利乌斯·恺撒；恺撒被刺杀后，他与其他密谋者一同在希腊纠集起了一支军队，但在腓利比（Philippi）一役中战败，之后他自杀而亡

Chrysippus（克律西波斯，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7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公元前232年成为斯多亚（Stoa）或斯多葛学派的教主；深受基提翁的芝诺（见下）的影响；他著述颇丰，并且发展了斯多葛主义思想

Cicero, Marcus Tullius（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罗马修辞学家、政治家，他既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主要政治人物，也是众多哲学著作的作者；他的作品包括《论演说家》（*De Oratore*）、《国家篇》（*De Re Publica*）与《论义务》（*De Officii*）；作为元老院的重要支持者，西塞罗在朱利乌斯·恺撒（见上）被暗杀后的动荡政局下遭到了放逐，并最终被杀害

Cleisthenes（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政治家，他推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措施，包括重新把雅典人民编入名为“村社”（demes）的政治组织单位、推行“陶片放逐”，这些措施帮助雅典建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

Cleon（克里昂，死于公元前422年）：雅典政治家，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并非贵族；他强烈支持与拥戴雅典普通群众的政治权力与诉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下）期间，他以政治家和将军的双重身份参与了雅典的重要决策；他的方式方法与世界观受到了修昔底德与阿里斯托芬的批评

Diogenes the Cynic（Diogenes of Sinope）（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12年？—公元前324年）：犬儒主义哲学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他致力于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几乎一文不名，大庭广众之下做任何行为都不感到羞耻，包括那些一般属于个人隐私的活动

Diogenes of Oenoanda（奥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公元2世纪）：他把一段伊壁鸠鲁主义的文字雕刻在了吕西亚地区的某门廊之上；该段刻文的内容出自伊壁鸠鲁（见下）的著作，同时还包括其他的伊壁鸠鲁主义箴言，当然还有作者自己的话Ephialtes（厄菲阿尔特，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与改革家，他推行改革以加强人民的权力；他得到了伯里克利（见下）及其他民主派领袖的支持，但是极富争议的政策最终使他惨遭谋杀

Epictetus（爱比克泰德，公元1世纪中期—公元2世纪）：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曾经是一名奴隶；师从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见下），受到了克律西波斯（见上）思想的深刻影响；他的著作包括《爱比克泰德论说集》（*Dissertationes*）与《手册》（*Manual*）。这些著作反过来又影响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见下）

Epicurus（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伊壁鸠鲁

主义的创始人；该学说包括很多信条，但它一般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一切物质都由无限原子排列构造而成、快乐尤其是与朋友在一起享受宁静生活的快乐是生命的适宜目标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06年）：雅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阿尔克斯提斯》（*Alcestis*）、《美狄亚》（*Medea*）与《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尽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但他最终离开雅典，在马其顿国王阿克劳斯（Archelaus）的王宫中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创作时光

Herodotus（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来自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他的著作《历史》完整地记载了古希腊各城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在该著作中，他考察了古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政制差异，还经常把古希腊的自由与波斯的专制主义进行对比

Hesiod（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希腊早期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包括《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为人们观察希腊早期的神话、文化与价值提供了珍贵的视角

Lycurgus（莱库古，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世纪）：传说中他是斯巴达的创建者与立法者；据说他既创立了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又创立了斯巴达的混合政制，包括两个国王、一个元老委员会（gerousia，见上）以及一个政治会议机构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公元121年—公元180年）：罗马皇帝，安托尼乌斯·披乌斯的继任者，“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贤帝；在自己的各位老师，以及爱比克泰德（见上）著作的影响下，他同时按照斯多葛主义与柏拉图式的准则规范而生活，并且创作了自己的哲学著作《沉思录》（*Meditations*）

Musonius Rufus（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公元30年？—公元101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罗马骑士、爱比克泰德（见上）的老师；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大多是简短的语录与对话

Nero（尼禄，公元37年—公元68年）：罗马皇帝以及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他起初的统治还算良好，但是后来坠入罪恶与无序的深渊之中；他臭名昭著的行径包括谋杀自己母亲，以及下令让自己的政治顾问塞涅卡（见下）自尽。终于他遭到了元老院的反抗，自己最后也自尽而亡

Octavian（屋大维，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朱利乌斯·恺撒（见上）的继承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在赢得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先是对抗谋杀朱利乌斯·恺撒的势力，然后对抗马克·安东尼——以后，元老院授予他“第一人”（princeps）的称号，以及“奥古斯都”的头衔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

404年）：主要在雅典（见上）联盟与斯巴达（见下）联盟之间爆发的战争；雅典拥有海上的军事优势而斯巴达在陆上拥有优势，这使战争曾长时期陷入僵局之中，但战争最终以雅典的战败而结束

Pericles（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雅典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爆发之前，以及战争的早期阶段，他都是雅典的政治领袖；他对民主政治的支持几乎使他在雅典享有政治支配者的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贪污公款而曾经受到过审判；一直到公元前420年代早期的雅典大瘟疫使他染病而死，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Persian War（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前480—前479年）：波斯帝国在两位皇帝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带领下两次试图征服希腊大陆，但均遭失败；很多古希腊城邦——最著名的是斯巴达（见下）与雅典（见上）——相互联合起来，最终成功地阻止了波斯的入侵

Plato（柏拉图，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48年）：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见下）的学生，曾经创建自己的学园；他以对话录的形式进行创作，其中很多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包括《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理想国》、《政治家篇》与《法律篇》

Plutarch（普鲁塔克，公元50年？—公元120年）：希腊哲学家与传记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了道德论文与修辞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罗马与希腊历史人物组成的系列传记作品

Polybius（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希腊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作为人质从阿哈伊亚同盟被送至罗马；后来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见下）成为亲密的朋友；为了解释罗马迅速崛起的原因，他写出了《历史》

Rome（罗马）：罗马共和国与后来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位于意大利的中部，以其尚武与尽忠的文化而闻名；通过自己的军事权力与公民身份的包容体制，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周边的广袤土地长达数世纪之久

Scipio Aemilianus（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公元前185年？—公元前129年）：罗马政治家与将军；公元前146年征服迦太基，在当时的罗马政治之下，他是一位拥有支配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他还是波里比阿（见上）的学生与密友；他死后在西塞罗（见上）的著作中被刻画成理想的罗马政治家的形象

Seneca, Lucius Annaeus（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公元元年？—公元65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起初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罗马皇帝尼禄的政治顾问，一直到被这位皇帝下令自尽；他的著作既包括了戏剧作品，也包括了体现其斯多葛主义思想的各种伦理学论文

Socrates（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雅典哲学家，他经常向自己的雅典同胞发起挑战，就他们的道德信念与他们辩

论；他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的思想主要被保存在他的追随者柏拉图（见上）与色诺芬（见下）的著作中

Solon（梭伦，约公元前630年—约公元前560年）：雅典政治家、立法者与诗人；他曾数次推行政治改革，包括债务豁免与重新整合政治职位；这些措施使他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或至少是民主政治雏形的创立者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雅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俄狄浦斯王》（*Oedipus Turannos*）、《安提戈涅》（*Antigone*）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除此以外，他还是雅典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过多个公共职位

Sparta（斯巴达）：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上，因其严厉与尚武的古老文化、混合政制，以及对地方奴隶人群的剥削而闻名；它是雅典（见上）长期的竞争对手，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的作战对象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公元55年？—公元118年）：罗马历史学家，他以一种尖刻的口吻记载了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即他的《历史》与《编年史》；他既谴责了帝国早期皇帝们的罪恶，也谴责了元老院在这些罪恶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性

Thucydides（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年）：雅典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期间，他曾担任过雅典的将军，因此他富有权威地在他的《历史》中记录下了这场战争；在该著作中，他同时还考察了战争的起源与参战双方的行为

Xenophon（色诺芬，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4年）：雅典士兵、苏格拉底（见上）的追随者；他在外邦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先是在波斯，后来在斯巴达或斯巴达附近担任一支雇佣军的指挥官；他创作了多部著作，其中《万人远征记》（*Anabasis*）记录他远征波斯的经历，以及《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与《会饮篇》（*Symposium*）均记录了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及苏格拉底的演讲Zeno of Citium（斯多葛主义者，基提翁的芝诺，公元前355年—公元前263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该哲学流派包括了很多教义，但它一般认为个人应该追求自然的生活、德性是唯一的善、个人应该把自己视为整个世界共同体中的公民

参考文献与缩写

除特别标明或其他特别标明的学术汇编之外，所有希腊和拉丁文均援引自“牛津古典文本丛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大量的古代希腊和拉丁原本及其英文译本都可以在“柏修斯数字图书馆”（www.perseus.tufts.edu）的希腊和拉丁文文库在线查询。本书中大写的拉丁原文标题按照英文而非拉丁文的惯例。

本书所引原始文献按照标准希腊和拉丁文编号系统，这与古典文献的大多数编译版本相一致（不同古典作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欧里庇得斯的引用遵从行编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引用分别采取了数字加字母的斯特凡努斯码和贝克码；希罗多德的引用则按照卷、节编号）。一些现代的编辑版本也有它们特定的惯例（West, M. L. 编辑的古代诗歌汇编按照古典作家对诗文残篇进行了编节，但在引用的时候则仅仅标明残篇号码）。

原始文献与古典作家缩写

Alex.　Plutarch, Life of Alexander

AP　Aristotle or his school, Athenaion Politeia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pophth.　Plutarch, Apophthegmata Laconica (Sayings of Spartans)

B. Civ.　Bellum Civile (Civil War)

(One work of this title written by Appian, another by Julius Caesar)

Cic.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D　Epictetus, Dissertationes (Discourses)

DL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De Alex. Fort.　Plutarch, 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ute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De Leg.　Cicero, De Legibus (On the Laws)

De Rep.　Cicero, De Re Publica (On the Commonwealth) (Also given as De Republica; contrast Rep. = Plato, Republic)

EN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Nicomachean Ethics)

Ep. Seneca, Epistulae Morales (Moral Letters)

Fin. Cicero, De Finibus (On Moral Ends)

Grg. Plato, Gorgias

Lacae. Plutarch, Lacaenarum Apophthegmata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Met. Aristotle, Metaphysica (Metaphysics)

Off. Cicero, De Officiis (On Duties)

Or. Aelius Aristides, Orationes (Orationes)

Per. Plutarch, Life of Pericles

Phoen. Euripides, Phoenissae (Phoenician Women)

Pol. Aristotle, Politikon (Politics)

Rep. Plato, Politeia (Republic)

(English title, from Latin title Respublica; Greek title is Politeia; contrast De Rep. = Cicero, De Re Publica)

WD Hesiod, Erga kai Hemerai (Works and Days)

当某古典作家的单一著作被广泛引用的时候，本书没有标出著作标题，比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在引用时仅标出其缩写（分别用Hdt.,Thuc., Polyb. 表示）和章节号，或者当该作家著作清晰确定时，仅标出章节号。

原始文献汇编缩写

DK = Diels, Hermann, and Kranz, Walther. 1992.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Griechisch Und Deutsch. Zurich: Weidmann.

EGPT = Gagarin, Michael, and Woodruff, Paul (eds.). 1995.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S = Kirk, G. S., Raven, J. E., and Schofield, M. 1983.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ection of Text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S = Long, A. A., and Sedley, D. N. (eds.). 1987.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Vol.1: 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Vol. 2: Greek and Latin Texts with Notes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en translations from LS are cited in the endnotes, they are always taken from Vol. 1.)

Perseus = Online free library of Greek and Latin texts and translations. Editor-in-chief, Gregory R. Crane, Tufts University.

http://www.perseus.tufts.edu/ hopper/

SEG = Hondius, J. J. E., et al. Ongoing from 1923.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Leiden: Sijthoff.

TGF = Snell, Bruno, and Nauck, August (eds.). 1986. Trag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TLG =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 online subscription-based library of Greek texts, TLG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ttp://stephanus.tlg.uci.edu/inst/fontsel

W = West, M. L. 1989. Iambi et Elegi Graeci ante Alexandrum Cantati.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其他原始文献译本与汇编

Aristides, Aelius. 1976. P. Aelii Aristidis Opera Quae Exstant Omnia, edited by F..W. Lenz and C. A. Behr.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Aristides, Aelius. 1976. P. Aelii Aristidis Opera Quae Exstant Omnia, edited by F..W. Lenz and C. A. Behr. Lugduni Batavorum: E. J. Brill.

—. 1981. The Complete Wor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A. Behr. 2 vols. Leiden: Brill.

Aristotle. 1984.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 D. C. Reeve. Indianapolis, IA: Hackett. Bion. 1976. Bion of Borysthenes: A Collection of the Fragments, edited by Jan Fredrik Kindstrand.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Cicero, Marcus Tullius. 1991. On Duties, edited by M. T. Griffin and E. M. Atk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 edited by James E. G. Zetz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med in French as Cicéron] . 2002a. Discours: Sur la loi agraire. Pour C. Rabiri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dré Boulange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Budé édition, Vol. 9).

—. [named in French as Cicéron] . 2002b. Discours: Philippiques I–IV,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dré Boulanger and Pierre Wuilleumie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Budé édition, Vol. 19).

Cicero, Quintus Tullius. 2001. Commentariolum Petitionis,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commentary by Günther Las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2012. How to Win an Election: An Ancient Guide for Modern Politicians, translated by Philip Free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gest of Justinian. 1985. Edited by Theodor Mommsen with Paul Krueger, and translated by Alan Watson.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Diogenes Laertius. 1925.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lated by R. D. Hic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Inwood, Brad, and Gerson, Lloyd P. (tra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1997. Hellenistic Philosophy: Introductory Readings. 2nd edition.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 (trans.). 2008. The Stoics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and Testimonia. Indianapolis, IA: Hackett.

J. Paul Getty Museum. Online catalogue of objects. http://www.getty.edu/art/

Marcus Aurelius. 1989.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and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of Marcus and Fronto, edited by R. B. Rutherford, translated by A. S. L. Farquharson (Meditations) and R. B. Rutherford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sonius Rufus. 1947. 'Musonius Rufus: The Roman Socrates', edited by Cora Lutz, Yale Classical Studies, Vol. 10, pp. 3–147.

'Old Oligarch'. 2008. The 'Old Oligar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ttributed to Xenoph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L. Marr and P. J. Rhodes. Oxford: Oxbow.

Philodemus. 1996. On Piety, edited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Dirk Obbink.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lato. 1997.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John M. Cooper, with associate editor D. S. Hutchinson.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lutarch. 1931. Moralia, Vol. 3, translated by Frank Cole Babbit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 1949. Moralia, Vol. 10, translated by Harold North Fowl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illiam Heinemann.

—. 1973. The Age of Alexander, translated by Ian Scott-Kilvert.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 1988. The Life of Cicero,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 L. Moles. Eastbourne: Aris & Phillips.

—. 2005. Plutarch on Spart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ichard J. A. Talbert. 2nd edition. London: Penguin.

Polybius. 1962.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translated by Evelyn S. Shuckburgh.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 Budé Polybius] . 2004. Histoir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éric Foulon, with commentary by Michel Moli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Seneca, Lucius Annaeus. 1995. Moral and Political Essays, edited by John M. Cooper and J. F. Procop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Seneca: Selected Philosophical Lett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rad Inw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M. F. (ed.). 1974. Thirteen New Fragments of Diogenes of Oenoanda. Wien: Verlag der .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993. The Epicurean Inscription. Napoli: Bibliopolis.

—. 1996. The Philosophical Inscription of Diogenes of Oenoanda.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2003. Supplement to Diogenes of Oenoanda, The Epicurean Inscription. Napoli: Bibliopolis.

Tacitus, Cornelius. 2003. 'The Annals' and 'The Histories', edited by Moses Hadas, translated by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次级文献

Allen, Danielle S. 1996. 'A Schedule of Boundaries: An Exploration, Launched from the Water-Clock of Athenian Time', 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 43, pp. 157–68.

—. 2000. The World of Prometheus: The Politics of Punishing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6. 'Talking about Revolution: On Political Change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and Historiographic Method' in Rethinking Revolutions through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pp. 183–217.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0. Why Plato Wrote.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Anderson, Greg. 2005. ‘Before Turannoi were Tyrants: Rethinking a Chapter of Early Greek History’,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24, pp. 173–222.

Ando, Clifford. 1999. ‘Was Rome a Polis?’,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18, pp. 5–34.

Appiah, Anthony. 2006.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York; W.W Norton.

Arena, Valentina. 2012. Libertas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ot, Ryan K. 2006.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Baronowski, Donald Walter. 2011. Polybius and Roman Imperialism.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Benson, Thomas W., and Prosser, Michael H. (eds.). 1972. Readings in Classical Rhetori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 Allan. 1991. ‘Interpretive Essay’ in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 2n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Bobonich, Christopher. 2002. Plato’s Utopia Recast: His Later Ethics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sher, Kathryn. 2012. ‘Infinite Variety: Ancient Greek Drama in Sicily’ in Theatre Outside Athens: Drama in Greek Sicily and South Italy, edited by Kathryn Bosher, pp. 111–13, 116–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man, P. R. 2008. ‘Traces of Cynic Monotheism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Acta Classica, Vol. 51, pp. 1–20.

Bradley, Keith. 2011. ‘Slav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edited by Keith Bradley and Paul Cartledge, Vol. 1, pp. 241–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nt, P. A. 1977.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67, pp. 95–116.

—. 1988.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nyeat, M. F. 1980. 'Aristotle on Learning to be Good' 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edited by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pp. 69–9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mmack, Daniela. 2013. 'Aristotle on the Virtue of the Multitude', Political Theory, Vol. 41, pp. 175–202.

Carter, L. B. 1986. The Quiet Athenia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tledge, Paul. 2001. Spartan Reflections. London: Duckworth.

—. 2002.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2nd edi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in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y, Diskin. 2007. 'The Philosophical Inscription of Diogenes of Oenoand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100 BCE–200 CE, edited by Robert W. Sharples and Richard Sorabji, Vol. 1, pp. 283–91. Lond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Constant, Benjamin. 1988. '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 in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iancamaria Fontana, pp. 308–28.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per, John M. 2012. Pursuits of Wisdom: Six Ways of Life in Ancient Philosophy from Socrates to Plotin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d Procopé, J. F. 1995.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Lucius Annaeus Seneca, Moral and Political Essays, edited by John M. Cooper and J. F. Procopé, pp..xi–xxxii.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nyer, Nicholas. 1983. 'The Origins of Justice' in ΣΥΖΗΤΗΣΙΣ: Studi sull'epicureismo greco e romano offerti a Marcello Gigante, Vol. 1, pp. 133–52. Naples: Biblioteca della Parola del Passato.

Downing, Francis Gerald. 1992. Cynics and Christian Origins. Edinburgh: T. & .T Clark.

Dorandi, Tiziano. 1999. 'Chron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Keimpe Algra, Jonathan Barnes, Jaap Mansfeld and Malcolm Schofield, pp. 32–54.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ogula, Fred K. 2007. ‘Imperium, Potestas and the Pomerium in the Roman Republic’,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 56, pp. 419–52.

Dunn, John. 2005.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Atlantic Books.

Evans, J. A. S. 1981. ‘Notes on the Debate of the Persian Grandees in Herodotus 3.80–82’, 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 Vol. 7, pp. 79–84.

Finley, M. I. 1985.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ition. London: Hogarth Press.

Flower, Michael A. 200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lassical and Hellenistic Sparta’ in Sparta: Beyond the Mirage, edited by Anton Powell and Stephen Hodkinson, pp. 191–217. Swansea and London: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Fornara, Charles W. 1971. Herodotu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sdyke, Sara. 2005. Exile, Ostracism,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2010.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Basingstoke, Hant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d St Martin’s Press.

Frank, Jill. 2005. A Democracy of Distinction: Aristotle and the Work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tz, Kurt von. 1954.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lybius’ Political Idea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abrielsen, Vincent. 1981. Remuneration of State Officials in Fourth Century BC Athens.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Gagarin, Michael. 1986. Early Greek Law.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8. Writing Greek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rnsey, Peter. 1996.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Thinking about Proper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on, Edward. 1837.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T. Cadell.

Gill, Christopher. 2007. ‘Marcus Aurelius’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100 bce–200 ce, edited by R. W. Sharples and Richard Sorabji, Vol. 1, pp. 175–87. Lond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hill, Simon. 1986. 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iffin, Miriam. 2013. ‘Latin Philosophy and Roman Law’ in 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Verity Harte and Melissa Lane, pp. 96–1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dot, Pierre. 1995.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Hall, Jonathan M. 2014.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 2nd edi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Hansen, Mogens Herman. 1991.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Oxford: Blackwell.

—. 1993. ‘The Polis as a Citizen-state’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July 1–4, 1992, edited by Mogens Herman Hansen, pp. 7–29. Copenhagen: Munksgaard.

—. 2005. ‘Direct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in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 Historisk-filosofiske Meddelelser 93, pp. 45–69.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 (ed.). 1998. Polis and City-state: An Ancient Concept and Its Modern Equivalent: Symposium, January 9, 1998. Acts of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Vol. 5. Copenhagen: Munksgaard.

—, and Nielsen, Thomas Heine. 2004.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es, Jill. 2006. Cicero and the Jurists: From Citizen’s Law to the Lawful State. London: Duckworth.

Harris, Edward M. 2002. ‘Did Solon Abolish Debt-Bondag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2, pp. 415–30.

Harte, Verity. 1999. ‘Conflicting Values in Plato’s Crito’,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l. 81, pp. 117–47.

—, and Lane, Melissa. 2013. ‘Introduction’ in 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Verity Harte and Melissa Lane, pp. 1–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tzistavrou, Antony. 2005. 'Socrates' Deliberative Authoritarianism',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Vol. 29, pp. 75–113.

Hesk, Jon. 2007. 'The Socio-political Dimension of Ancient Traged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Theatre, edited by Marianne McDonald and J. Michael Walton, pp. 72–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lbert O.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oekstra, Kinch. Forthcoming. '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as Tyrant' in 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ichard Bourke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rnblower, Simon. 2006. 'Herodotus' Influence in Antiquit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odotus, edited by Carolyn Dewald and John Marincola, pp. 306–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mfress, Caroline. 2005. 'Law and Legal Practice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edited by Michael Maas, pp. 161–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wood, Brad. 2005. 'Seneca on Freedom and Autonomy' in Brad Inwood, Reading Seneca: Stoic Philosophy at Rome, pp. 302–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Introduction' in Seneca: Selected Philosophical Lett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rad Inwood, pp. xi–xx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pust, Daniel J. 2011. Republicanism, Rhetoric,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Sallust, Livy, and Taci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ane, John. 2009.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Kraut, Richard. 1984. Socrate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entz, Peter. 1982. The Thirty at Athe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ks, André. 1990. 'Legislation and Demiurg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o’s Republic and Laws’,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9, pp. 209–29.

Lane, Melissa. 1998a. ‘Argument and Agreement in Plato’s Crito’,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9, pp. 313–30.

— [as Lane, M. S.] . 1998b. Method and Politics in Plato’s States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lato, Popper, Strauss, and Utopianism: Open Secre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Vol. 16, pp. 119–42.

—. 2001. Plato’s Progeny: How Plato and Socrates Still Captivate the Modern Mind. London: Duckworth.

—. 2007. ‘Virtue as the Love of Knowledge in Plato’s Symposium and Republic’ in Maieusis: 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 in Honour of Myles Burnyeat, edited by Dominic Scott, pp. 44–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Persuasion et force dans la politique platonicienne’, translated by D. El Murr, in Aglaïa: autour de Platon. Mélanges offerts à Monique Dixsaut, edited by A. Brancacci, D. El Murr and D. P. Taormina, pp. 165–98. Paris: Vrin.

—. 2011. ‘Anci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 fall2011/entries/ancient-political/

—. 2011/2012. Eco-Republic. Oxford: Peter Lang (201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Each edition has its own subtitle.

—. 2012.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sman.– Demagogue Distinction in and after Ancient Athe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3, pp. 179–200.

—. 2013a. ‘Founding as Legislating: The Figure of the Lawgiver in Plato’s Republic’ in Dialogues on Plato’s Politeia (Republic):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Ninth Symposium Platonicum, edited by Noboru Notomi and Luc Brisson, pp. 104–14.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 2013b. ‘Lifeless Writings or Living Script? The Life of Law in Plato, Middle Platonism and Jewish Platonizers’, Cardozo Law Review, Vol. 34, pp. 937–64.

—. 2013c. ‘Platonizing the Spartan Politeia in Plutarch’s Lycurgus’ in 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Verity Harte and Melissa Lane, pp. 57–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3d. ‘Political Expertise and Political Office in Plato’s Statesman: The Statesman’s Rule (archein) and the Subordinate Magistracies (archai)’ in Plato’s Statesma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Symposium Platonicum Pragense, edited by A. Havlí.ek, J. Jirsa and K. Thein, pp. 49–77. Prague: OIKOYMENH.

—. 2013e. ‘Claims to Rule: The Case of the Multitud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 edited by Marguerite Deslauriers and Pierre Destrée, pp. 247–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thcoming. ‘.“Popular Sovereignty” i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ristotle on Rule as Control of Magistrates’ in 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ichard Bourke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r, Jonathan. 1988. Aristotle: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y-Pineda, Miguel. 2009. ‘The Royal Expert: Plato’s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deposited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Lintott, Andrew. 1999.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g, A. [Alexander] . 2013. ‘The Political Art in Plato’s Republic’ in 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Verity Harte and Melissa Lane, pp..15–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g, A. A. [Anthony A.] . 1995. ‘Cicero’s Politics in De Officiis’ in Justice and Generosity: Studies in Hellenis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Symposium Hellenisticum, edited by André Laks and Malcolm Schofield, pp. 213–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Cormick, John P. 2011.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kay, Christopher S. 2004. Ancient Rome: 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Pherran, Mark. 2002. ‘Elenct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elphic Oracle’ in Does Socrates Have a Method? Rethinking the Elenchus in Plato’s Dialogues and Beyond, edited by Gary Alan Scott, pp. 114–44.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anin, Bernard. 1997.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r, J. L., and Rhodes, P. J. 2008. ‘Introduction’ in The ‘Old Oligar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ttributed to Xenoph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L. Marr and P. J. Rhodes, pp. 1–29. Oxford: Oxbow.

Meier, Christian. 1990. 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A Culture of Freedom: Ancient Greec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ar, Fergus. 2002. The Roman Republic in Political Thought.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Moles, John. 2000. ‘The Cyn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C. J.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pp. 415–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oson, S. Sara. 2000. Plato’s Democratic Entanglements: Athenian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1. ‘Recollecting Aristotle: Pro-slavery Thought in Antebellum America and the Argument of Politics, Book I’ in Ancient Slavery and Abolition: From Hobbes to Hollywood, edited by Edith Hall, Richard Alston and Justine McConnell, pp. 247–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 ‘Dionysius I and Sicilian Theatrical Traditions in Plato’s Republic: Representing Continuiti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Tyranny’ in Theatre Outside Athens: Drama in Greek Sicily and South Italy, edited by Kathryn Bosher, pp. 156–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Kathryn. 2013. ‘Imaginary Kings: Visions of Monarchy in Sicilian Literature from Pindar to Theokritos’ in Sicily: Art and Invention between Greece and Rome, edited by Claire L. Lyons, Michael J. Bennett and Clemente Marconi, pp. 98–105, 108–9.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Morris, Sarah. 2003. ‘Imaginary Kings: Alternatives to Monarchy in Ancient Greece’ in Popular Tyranny: Sovereign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Kathryn A. Morgan, pp. 1–24.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orwood, James. 2012. ‘Euripides’ Suppliant Women, Theseus and Athenocentrism’, Mnemosyne, Vol. 65, pp. 552–64.

Nails, Debra. 2002. The People of Plato: A Prosopography of Plato and Other Socratic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Nehamas, Alexander. 1998.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ightingale, Andrea. 1993. 'Writing/Reading a Sacred Text: A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Law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88, pp. 279–300.

—. 1999. 'Plato's Lawcode in Context: Rule by Written Law in Athens and Magnesia',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49, pp. 100–122.

North, J. A. 1990. 'Democratic Politics in Republican Rome', Past & Present, No. 126, pp. 3–21.

Nussbaum, Martha Craven. 1994. 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ber, Josiah. 1989.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litical Dissent in Democratic Athens: Intellectual Critics of Popular Ru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Quasi-rights: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Social Diversity in Democratic Athen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17, pp. 27–61.

—. 2005. 'Aristotle's Natural Democracy' in Aristotle's Politics: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Richard Kraut and Steven Skultety, pp. 223–43.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8a.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8b.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Democracy: Capacity to Do Things, Not Majority Rule', Constellations, Vol. 15, pp. 3–9.

—. 2013. 'Democracy's Wisdom: An Aristotelian Middle Way for Collective Judg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pp. 104–22.

Ogilvie, R. M. 2011. The Romans and Their Gods. London: Random House.

Pagden, Anthony. 1995. Lords of All the Worlds: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 1500–c. 185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ine, Thomas. 2000. Rights of Man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tterson, Orlando. 1991. Freedom. Vol. 1: 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Raaflaub, Kurt A. 2007. 'The Breakthrough of Dēmokratia in Mid-fifth-century Athens' in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Kurt A. Raaflaub, Josiah Ober and Robert W. Wallace, pp. 105–5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ydams-Schils, Gretchen. 2005. The Roman Stoics: Self, Responsibility, and Affe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hodes, P. J. 1981.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ter, Daniel S. 2011. Cosmopolis: Imagining Community in Late Classical Athens and the Early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hll, T. E. 2011. 'Classical Athens' in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edited by Keith Bradley and Paul Cartledge, Vol. 1, pp. 4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Paul. 2013. Life and Death in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Rousseau, Jean-Jacques. 2001. Letter to Beaumont, Letters Written from the Mountain, and Related Writings, edited by Eve Grace and Christopher Kelly,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Kelly and Judith R. Bush.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 9.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Rowe, Christopher, and Schofield, Malcolm (eds.). 20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an, Alan. 2012. On Politic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erodotus to the Present, 2 vols.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acks, David. 1995. A Dictionar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lor, Dylan. 2008. Writing and Empire in Taci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xonhouse, Arlene W. 1975. 'Tacitus' Dialogue on Oratory: Political Activity under a Tyrant', Political Theory, Vol. 3, pp. 53–68.

—. 1992. Fear of Diversity: The Birth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ofield, Malcolm. 1991. The Stoic Idea of the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a. Saving the City: Philosopher-Kings and Other Classical Paradigms. London: Routledge.

—. 1999b.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Keimpe Algra, Jonathan Barnes, Jaap Mansfeld and Malcolm Schofield, pp. 73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The Presocra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David Sedley, pp. 42–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Pla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berg, Melissa. 2010. 'Shouts, Murmurs and Votes: Acclamation and Aggregation in Ancient Greec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8, pp. 448–68.

Sedley, David. 1997. 'The Ethics of Brutus and Cassi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87, pp. 41–53.

Sen, Amartya. 1982. 'Equality of What?' in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Vol. 1, pp. 353–6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inclair, R. K. 1991.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1st edition, 19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veley, E. S. 1972. 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ein, Peter. 1999.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Leo. 1964.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Rand McNally.

Tarnopolsky, Christina. 2010. 'Mimêsis, Persuasion and Manipulation in Plato's Republic' in Manipulating Democracy, edited by John Parrish and Wayne S. LeCheminant, pp. 135–56. New York: Routledge.

Thomas, Rosalind. 2005. 'Writing, Law and Written Law'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edited by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 pp. 41–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roli, Maurizio. 1992.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125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lassopoulos, Kostas. 2007. 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 Ancient Greek History beyond Eurocent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bank, F. W. 1957.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2. 'Introduction' in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Indiana University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1. The Hellenistic World.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reprinted with amendments, 1992).

Waldron, Jeremy. 1995. 'The Wisdom of the Multitude: Some Reflections on Book III, Chapter 11, of Aristotle's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 23, pp. 563–84.

Wallace, Robert W. 2007. 'Revolutions and a New Order in Solonian Athens and Archaic Greece' in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Kurt A. Raaflaub, Josiah Ober and Robert W. Wallace, pp. 4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lach, John R. 2001. The Platonic Political Art: A Study of Critical Reason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eiss, Roslyn. 1998. Socrates Dissatisfied: An Analysis of Plato's Cri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The Socratic Paradox and Its Enem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ite, Stephen A. 1995. 'Thrasymachus the Diplomat',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90, pp. 307–27.

Whitmarsh, Tim. 2005. The Second Sophist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Williams, Bernard. 1993. Shame and Necess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J. M. 1983. 'Solon's Class System, the Manning of Athens' Fleet, and the Number of Athenian Thetes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Vol. 52, pp. 241–5.

Wilson, James Lindley. 2011. 'Deliberatio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Reason in Aristotle's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pp. 259–74.

Winton, Richard. 2000. 'Herodotus, Thucydides and the Sophist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C. J.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pp. 89–121.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tzel, James E. G. 1999. ‘Introduction’ in Marcus Tullius Cicero,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 edited by James E. G. Zetzel, pp. vii–x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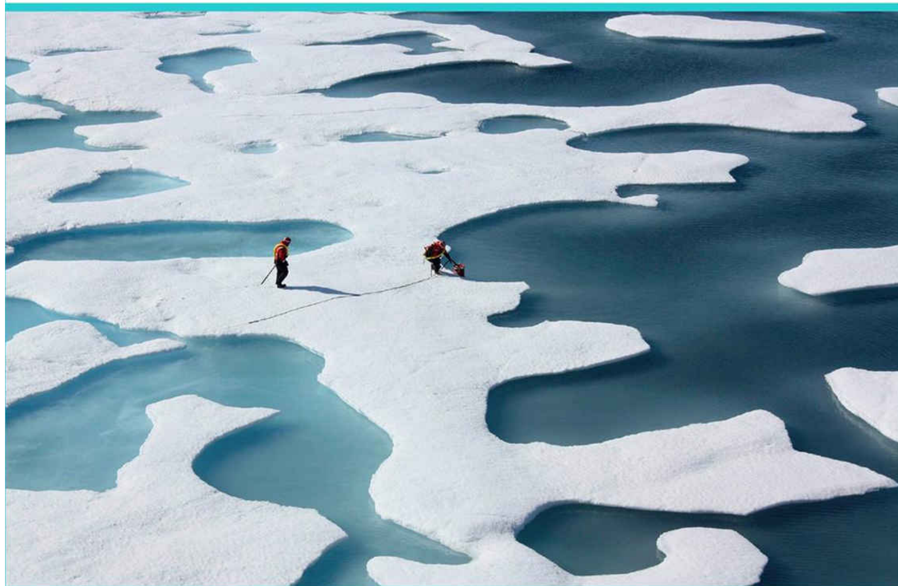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A PELICAN INTRODUCTION 鹈鹕丛书



A Farewell to Ice

最后的冰川

[英] 彼得·沃德姆斯 著　　李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冰川

企鹅经典：

[英]彼得·沃德姆斯/著

李果/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A Farewell to Ice
Copyright © Peter Wadhams,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ALLEN LANE,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Pelican (鹈鹕), the Penguin and Pelican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企鹅” 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正文内容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北极老友

序

第一章 导论：蓝色北极

第二章 冰：奇妙的结晶

第三章 地球冰川简史

第四章 冰期的现代循环

第五章 温室效应

第六章 海冰开始融化

第七章 北极海冰的未来——死亡螺旋

第八章 北极反馈的加速效应

第九章 北极甲烷，正在发生的灾难

第十章 异常的天气

第十一章 大洋烟囱的隐秘世界

第十二章 南极的现状

第十三章 地球的状态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致谢



1.1970年8月，加拿大科考船“赫德森号”缓缓驶离多年冰遍布的阿拉斯加北海岸。（从科考船的直升机上俯瞰）



2.2014年波弗特海南部一处典型的融化海冰，摄于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希

利号”的一次考察途中。



3.冬季海冰裂缝中的烟雾状水蒸气，格陵兰海。



4.冬季积雪覆盖下的平缓单年冰的典型景观。冰体厚度在1～1.5米。图中右侧为重

新冻结的裂缝，海冰从该处生长成类似其余部分冰盖外观和厚度的样子。北极现在常能见到这种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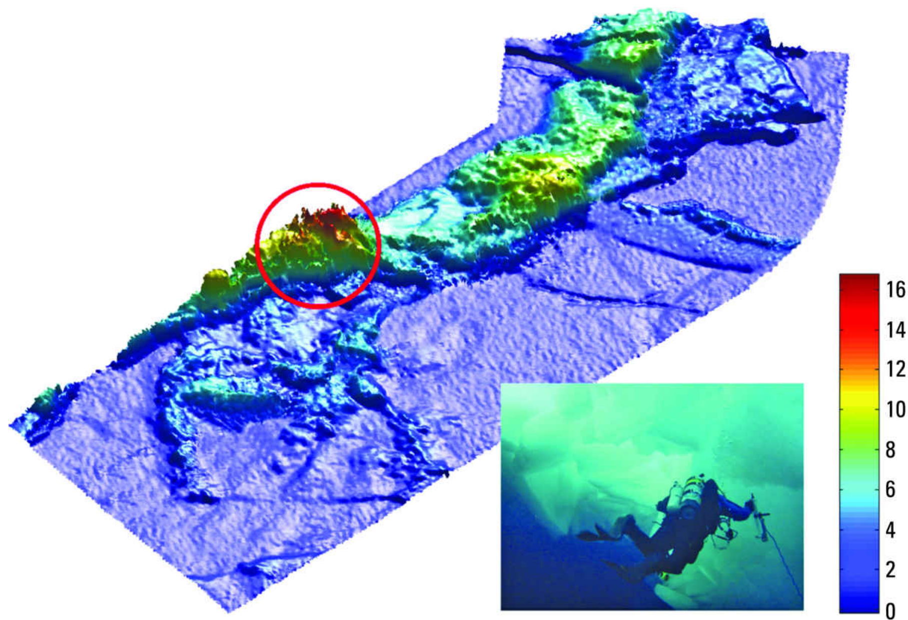
5.2003年冬季，北冰洋斯瓦尔巴北部叶尔马克高原的一处考察营地。次日清晨冰体出现了裂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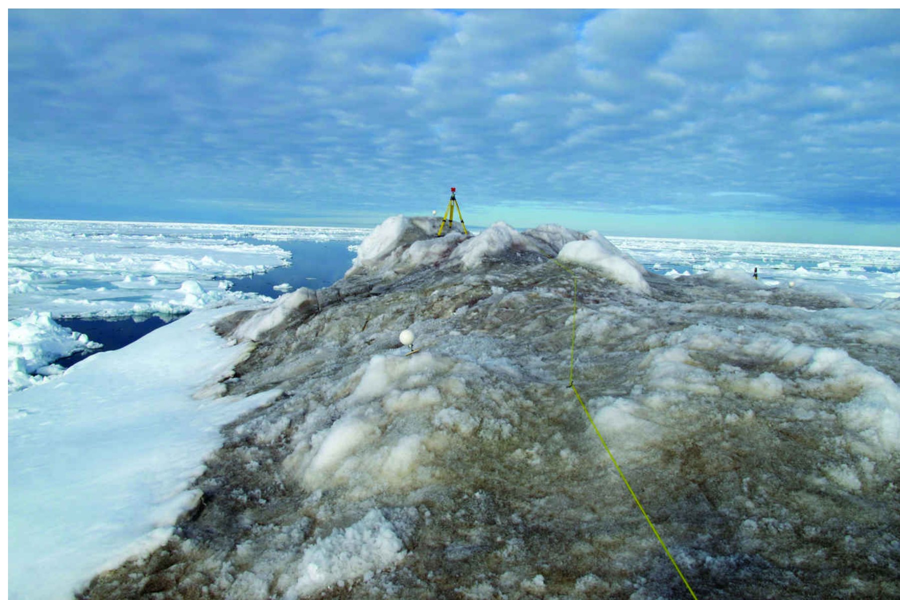
6.几个小时之内，裂缝迅速张开并扩大，与原来的帐篷相互对照的裂缝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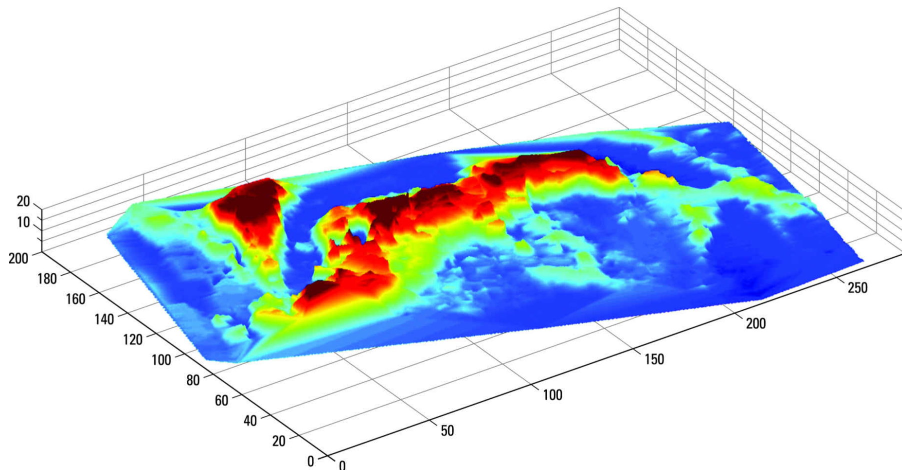
7.波弗特海上形成时间为一周的压力脊，200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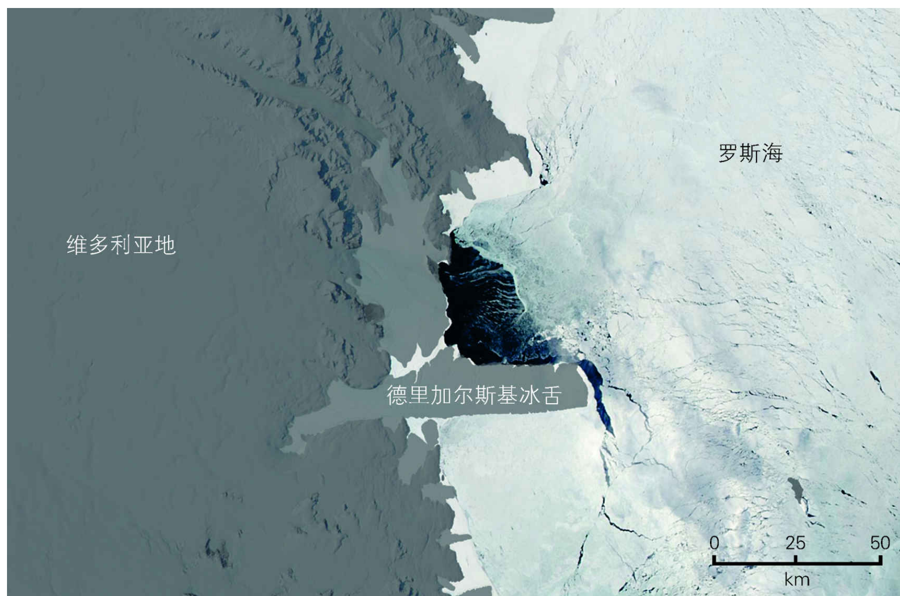
8.小型自助式水下航行器的多波束声呐装置绘制的波弗特海中同一个压力脊的图片。色标以米为单位。红色圆圈区域为潜水员考察过的地方（见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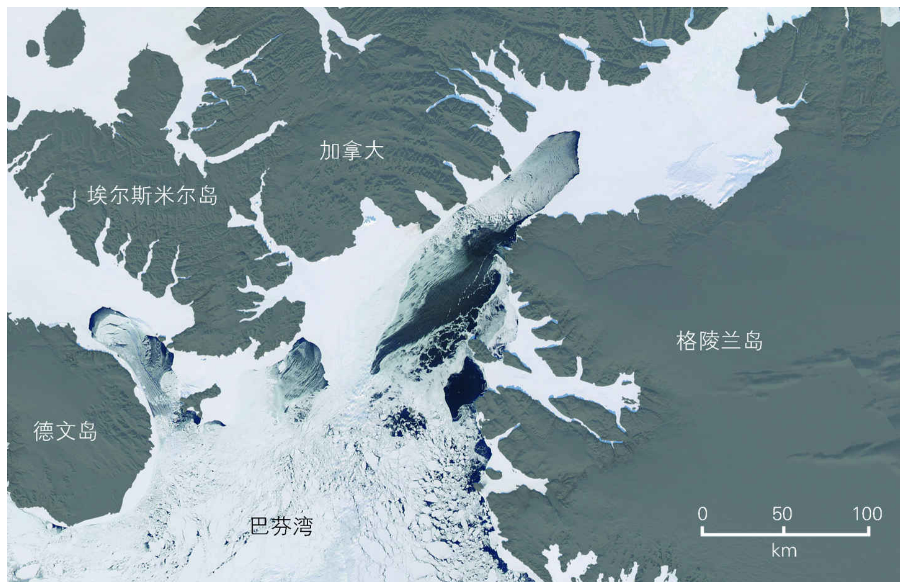
9.格陵兰海上发现的漂浮搁浅冰山，2012年7月。图中可见的山顶黄色基站用于生成冰山脊的扫描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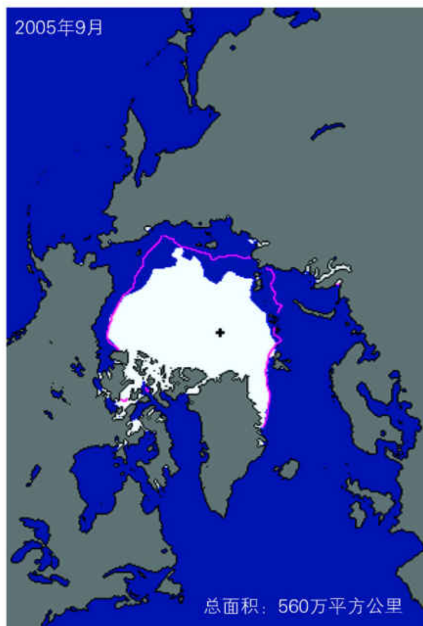
10.皇家海军舰艇“夜以继日号”上的多波束声呐装置绘制的多年冰压力脊图片，2007年3月。距离和高度以米为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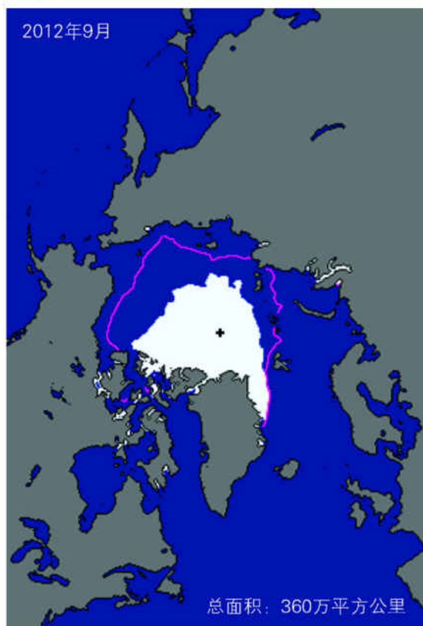
11.罗斯海中的特拉诺瓦湾冰间湖，2014年10月。图中暗处为冰间湖中的开阔水域，其部分区域被重力风从附近的冰架上吹来的白色条状云层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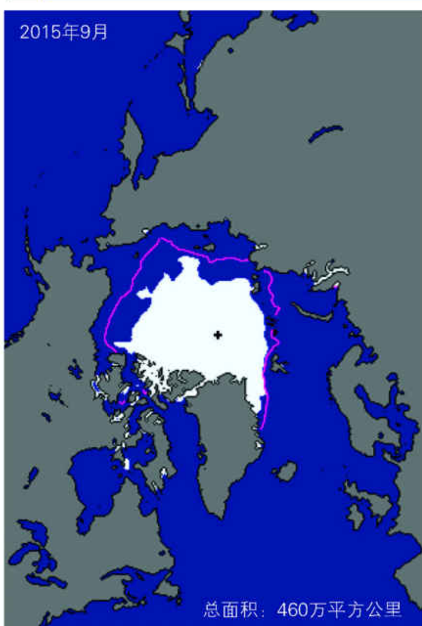


12.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之间的北方水塘冰间湖，201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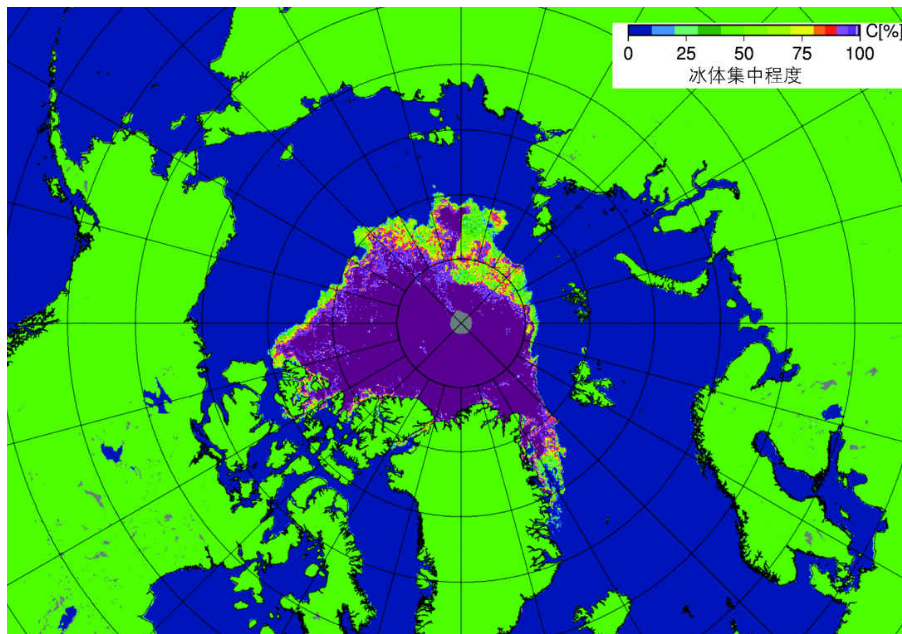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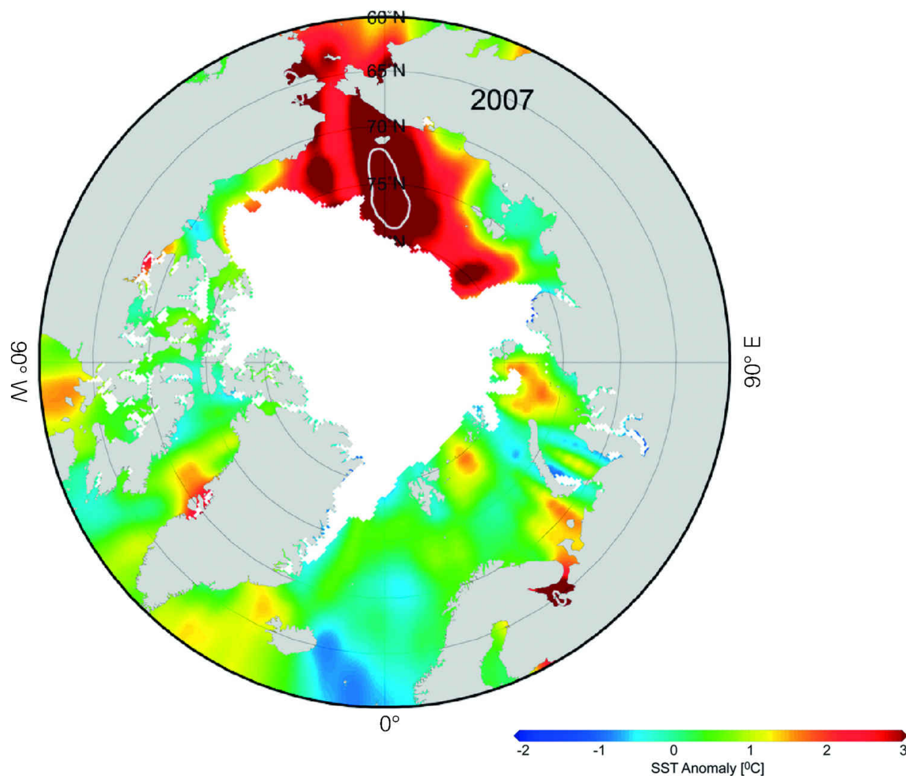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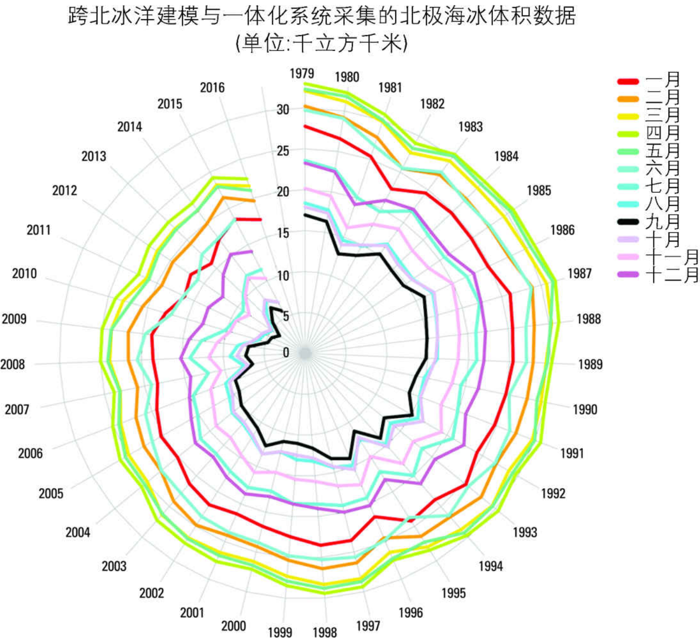
13.2005年、2007年、2012年以及2015年北极海冰面积图。红线标出部分为（过去）9月份海冰的长期平均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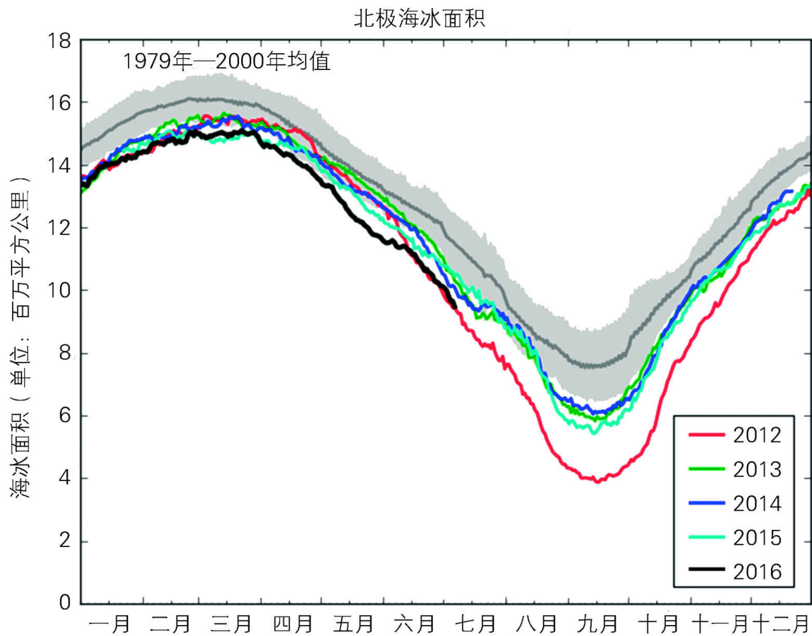
14.不莱梅大学得出的2012年9月中旬北极冰体覆盖范围及其集中程度，图中显示出冰缘线附近海冰集中程度非常低。



15.西伯利亚北部海域冰架上空的海面温度轮廓线，2007年夏季。



16.“北极死亡螺旋”。图中所示为1979年以来北极冰体容量逐月变化情况，从图中可见，不断减少的冰体容量像螺旋一样朝图中央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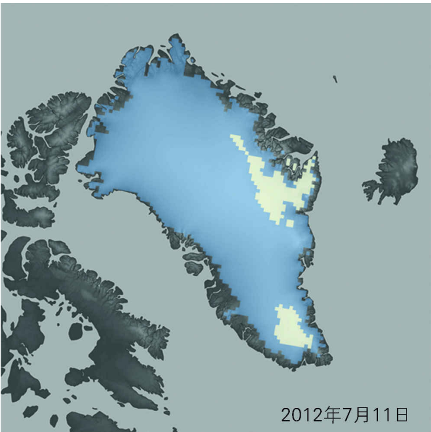
17.北极海冰面积的季节性周期变化。灰色带及其中部的均值曲线代表了1979年—

2000年间海冰面积的变化范围，之后，海冰的消退变得更加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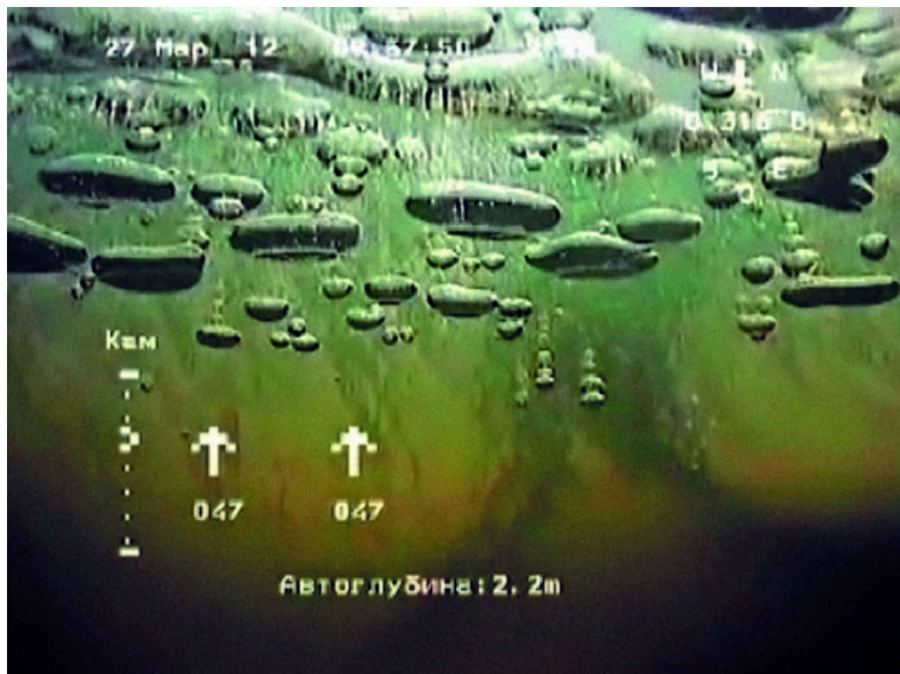


18.夏季海冰中的融水池，部分融水池直接形成了北冰洋中的融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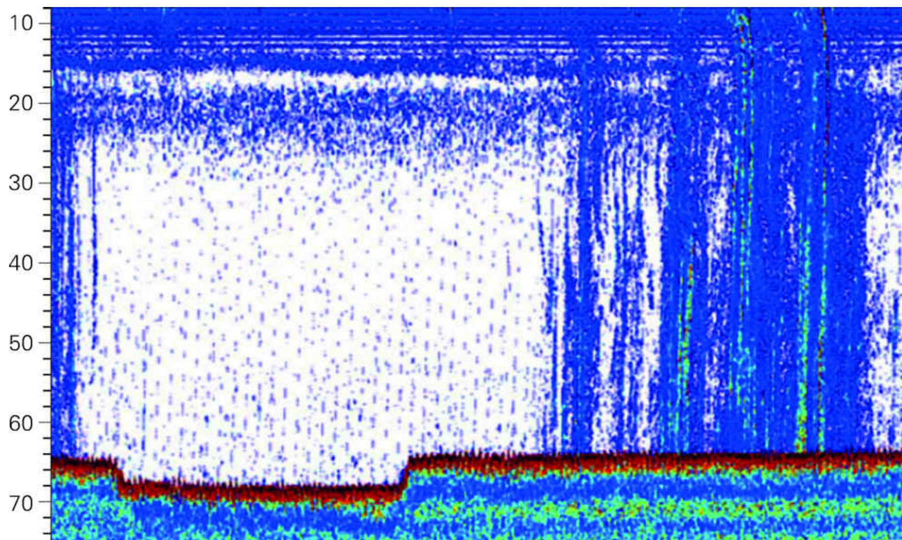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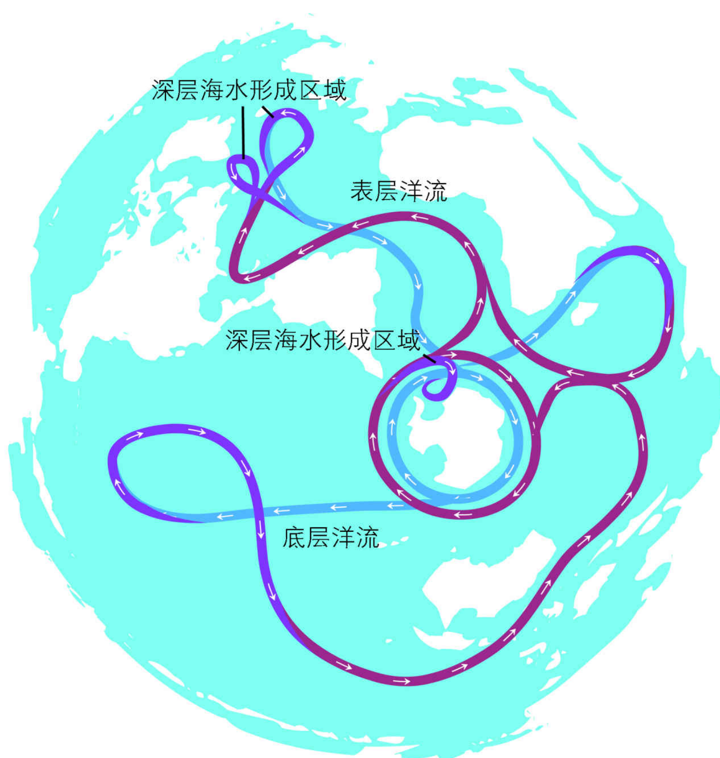
19.2012年7月格陵兰冰盖顶部的极端融化事件。卫星检测到的整个蓝色阴影区域都处于融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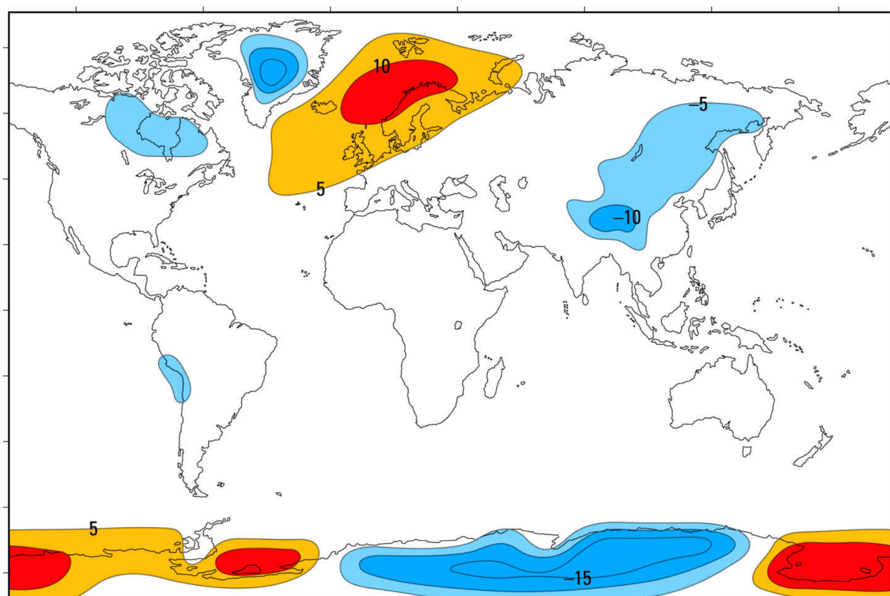
20.海冰底部呈扁平化外观的甲烷气泡。背景中依稀可见的海冰厚度为2.2米。



21.声呐装置测得东西伯利亚大陆架70米深处海域中的上升甲烷羽流。



22.全球热盐洋流循环，又称“全球传送带”，图中显示该洋流表层和底层组成部分以及深层海水形成的地方。



23.世界气温异常曲线图，图中显示的是某区域所在纬度气温均值，1999年。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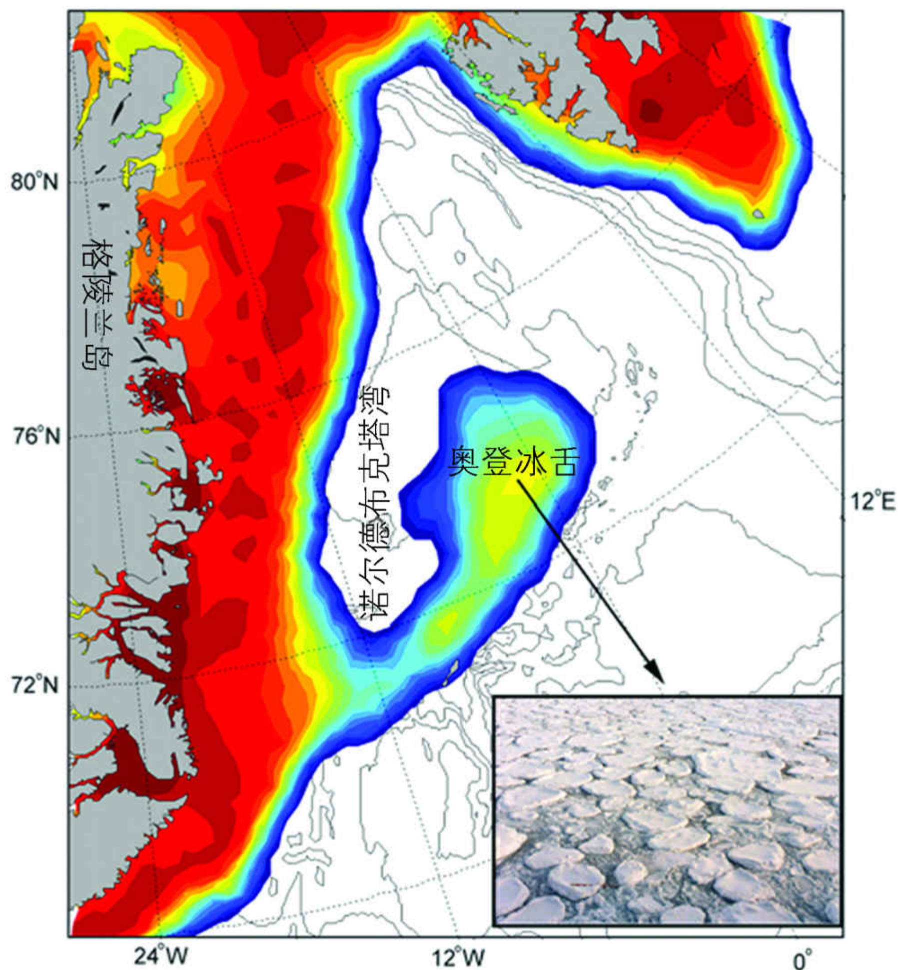
北部和西部的高温异常由墨西哥湾流运输的暖流以及热盐洋流循环的大西洋部分共同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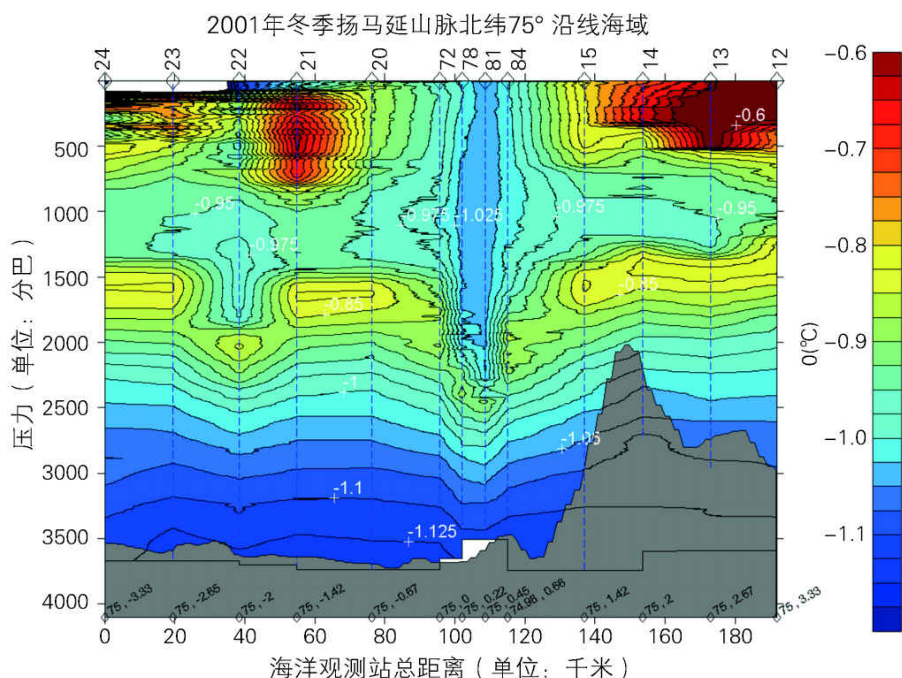
24.奥登冰舌中的饼状冰，格陵兰海中部区域。图中船只正在采集较厚的多年饼状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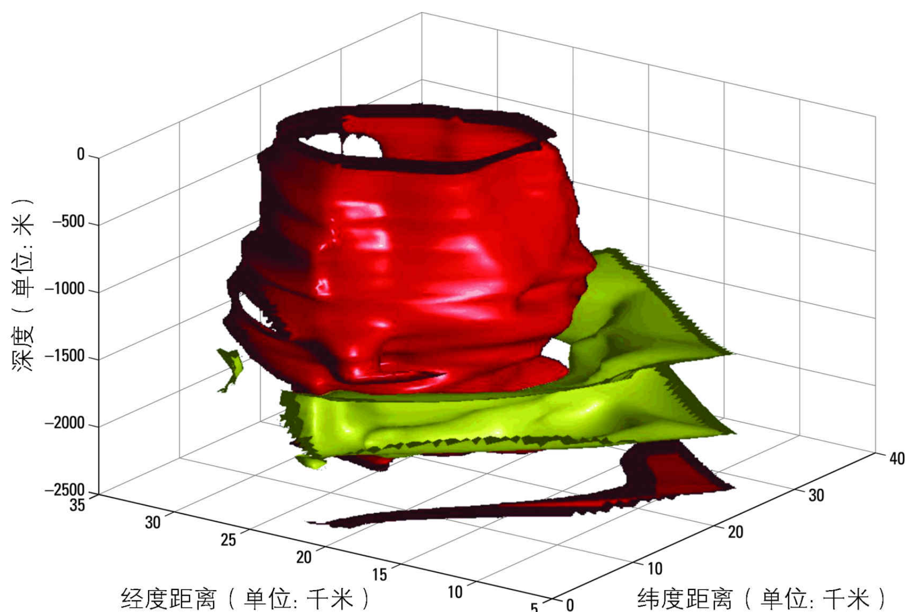
25.人们用波浪浮标研究较薄且形成时间较短的饼状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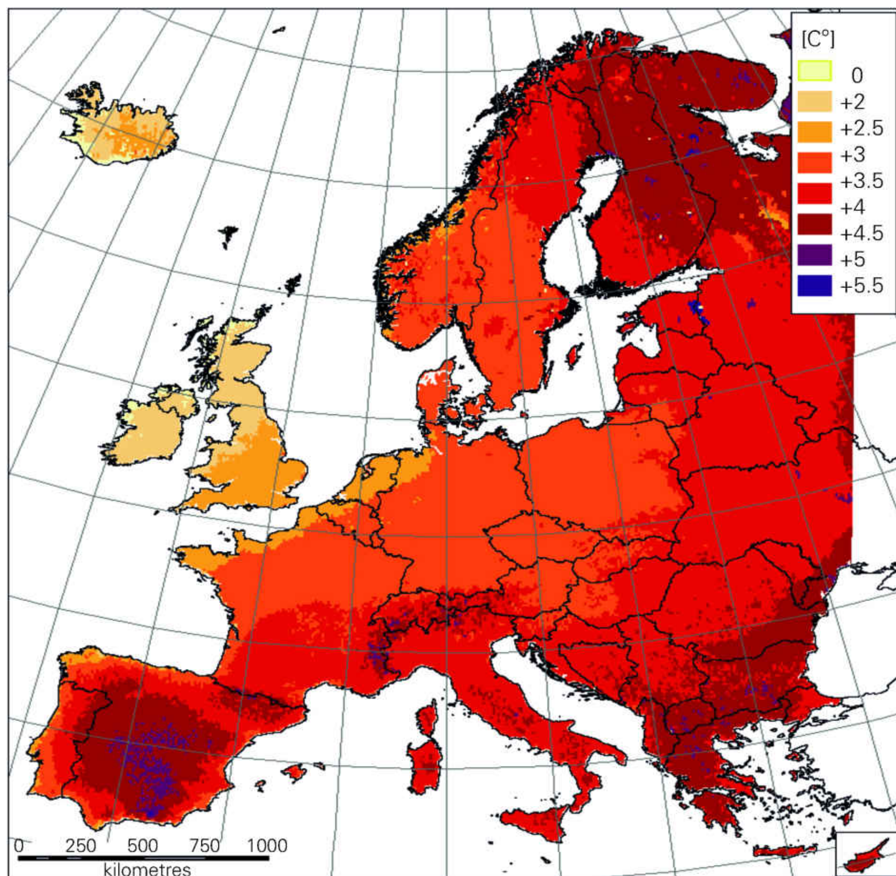
26.冬季的奥登冰舌，1997年。红色部分表示来自北冰洋的厚重极地海冰。蓝色和黄色代表该区域形成时间更短的海冰，它们以饼状冰的形式形成于奥登冰舌区域（见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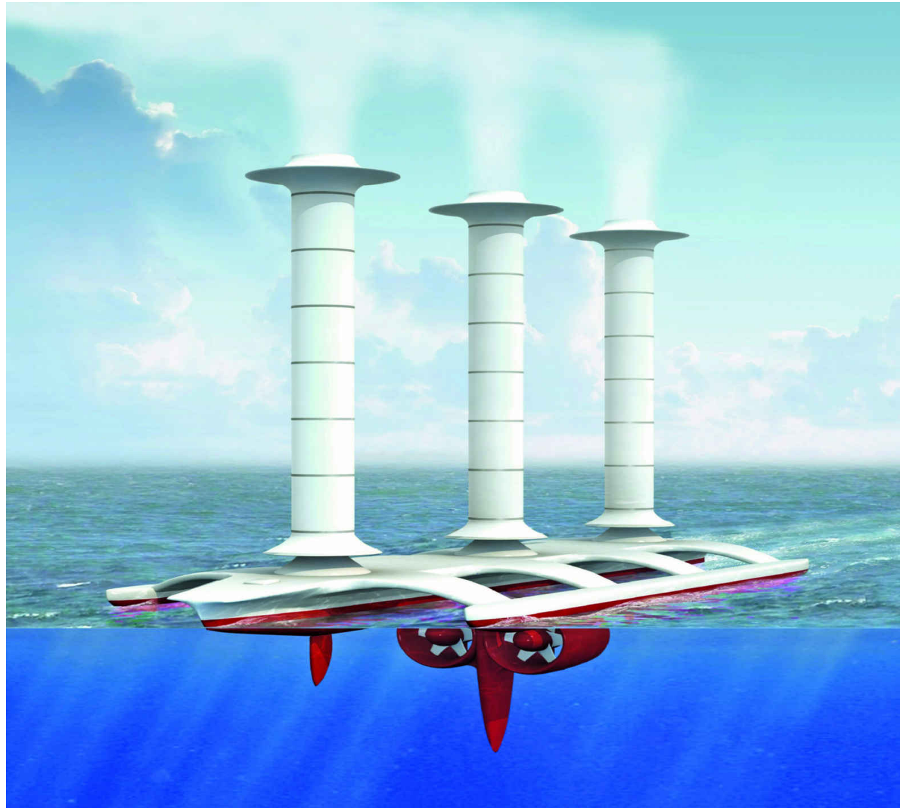
27.彩色插图24中所示的大洋烟囱的温度截面图，本图也显示了它左侧近处一个更小的大洋烟囱（以分巴为单位的压力线几乎与图中以米为单位的海水深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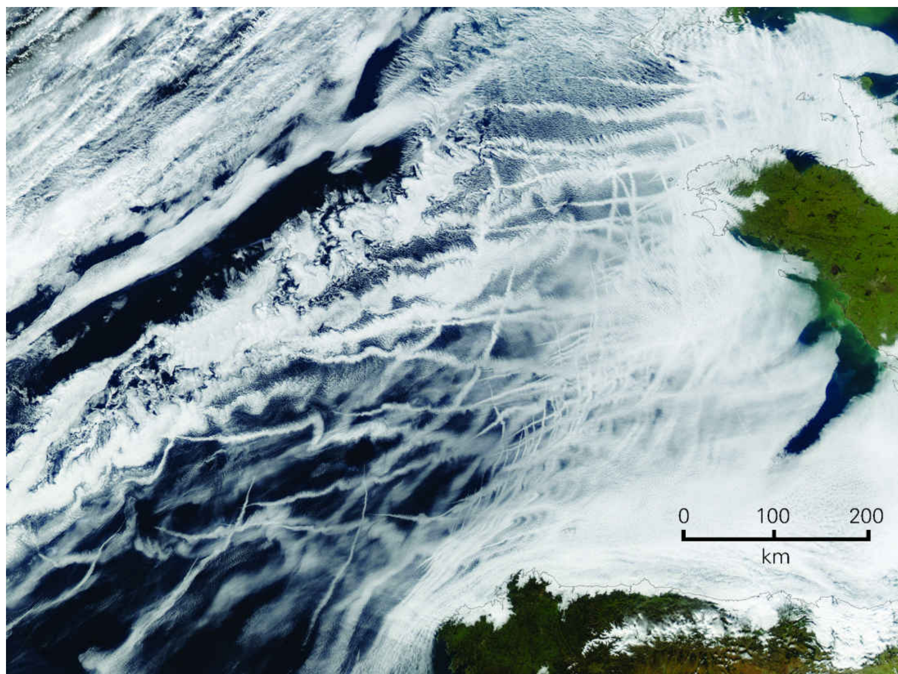
28.格陵兰海域冬季大洋烟囱的温度结构。烟囱顶帽根据-1℃等温线绘制。请注意该烟囱极深的下沉深度（2500米）及其完美的柱状结构。（它径直穿过了温度稍高的暖水层，后者温度为-0.9℃，标记为黄色。）



29.到2100年，欧洲范围的温度上升幅度，欧洲环境署2008年预测图。



30.斯蒂芬·索尔特设想的海上云层增亮喷雾船。它们被用作向云层注射水粒子的基地，其动力由3个弗莱特纳转子提供。



31.北大西洋东部海域（北纬44°~50°，西经5°~15°）航海轨道上的冷凝轨迹。人们认为它们可持续数天时间，这意味着某些海上云层能通过船只播种云层的方式得以加强。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北极老友

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

马克斯·库恩（Max Coon）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

莫伊拉和马克斯·邓巴（Moira and Max Dunbar）

杰夫·哈特斯利-史密斯（Geoff Hattersley-Smith）

沃利·赫伯特（Wally Herbert）

林恩·刘易斯（Lyn Lewis）

雷·劳里（Ray Lowry）

诺布奥·奥诺（Nobuo Ono）

埃尔基·帕洛索（Erkki Palosuo）

戈登·罗宾（Gordon Robin）

桑斯坦·斯特凡森（Unsteinn Stef□nsson）

查尔斯·斯威辛班克（Charles Swithinbank）

诺伯特·恩特斯坦纳（Norbert Untersteiner）

托马斯·菲霍夫（Thomas Viehoff）

序

彼得·沃德姆斯从事极地研究工作已47年，在此期间，他观察并测量了极地海冰性质的重要变化。在本书中，他首先简要回顾了地球的历史以及陆地、海洋上冰体的变化过程。接着，他描绘了冰川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面积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北极夏季海冰减少了一半以上，沃德姆斯据此估计北极即将迎来无冰的夏季。

海冰的融化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偏远地方发生的奇特现象：它会让地球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辐射比例从60%骤减至10%，从而令行星地球的变暖周期加速。自上个冰期以来安然无恙的冰冻海底沉积物现在则开始向大气中释放甲烷羽流——甲烷是十分强有力的温室气体。《最后的冰川》不仅是当今北极状况的权威报告，它也及时地警醒世人北极海冰消失所带来的全球威胁。

沃尔特·芒克

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拉霍亚，加利福尼亚



第一章

导论：蓝色北极

自1970年始，我的身份就是极地研究者。我有幸多年担任剑桥大学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一职。斯科特极地研究所为纪念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上尉而建，它是各学科极地研究者汇聚的理想乐园，许多研究者都曾长期离开自己供职的研究机构，以便在斯科特研究所无与伦比的图书馆里潜心治学。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整个时期，我每年都会造访极地地区（通常是北极），有的年份甚至数次前往，为的是像我的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同事一样致力于理解海冰中发生的基本物理过程以及何种过程决定了它的形成、消融和漂移。研究人员对冰川的实地考察往往困难重重，有时甚至很危险，并且几乎很少有研究者会认为我们投入心血的研究对象——北冰洋——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改变。一开始，人们很难理解北极冰川的变迁机制。但它的确在变化。很幸运，在比较1976年至1987年间来自潜艇部门的冰川厚度调查结果，并发现在此期间冰川平均厚度减少了15%之后，我成为拿出北冰洋冰川变化确凿证据的首批研究者之一。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1990年的《自然》杂志上[1]，它进一步刺激了之后10年间展开的大量工作，这些工作表明，北极冰川变薄不仅确凿无疑，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厚度已减少40%。[2]真正重要之事也在逐渐发生。极地研究人员纷纷从自身的专业研究领域抽身出来，进而开始在更大的图景中考虑此事。他们已成为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也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先驱，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在北极表现得最为迅速和剧烈。

我自己于1970年夏天登上首次进行环美洲航行的加拿大海洋考察船“赫德森号”（Hudson）并因此首次进入北极，之后，便对极地海洋产生了兴趣。“赫德森-70号”考察队于1969年寒秋离开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当时它已南下经过了南极半岛、南冰洋、智利峡湾和广阔的太平洋。[3]那时，我们正准备完成之前仅有9艘船实现过的壮举，即穿越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4]这艘船可破冰航行，这也是此次航行的必要条件。在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的海岸线上，北冰洋的海冰与陆地相隔很近，留给我们通行的无冰水域仅几英里宽。有时，海冰一直蔓延至海岸，我们就不得不从多年集聚的密集海冰（彩色插图1）中开出一条路来。最终，航行至西北航道中部时，我们不得不求救于政府的重型破冰船“约翰·A.麦克唐纳号”（John A.Macdonald）。在那个年代，人们常常在加拿大北极区域和海冰较量。阿蒙森（Amundsen）曾于1903年至1906年，用了三年时间通过西北航道，第二艘通过这条航道的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纵帆船“圣洛奇号”则用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两年时间。

现在，从夏季的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进入北极的船只面对的则是整个大洋的开阔水域。这片蔚蓝的水域一直向北延伸至北极附近。在本书出版之际，有可能——根据许多预测——北极点本身都会在迄今为止的10万年里首次一览无余。如今，西北航道已很容易通行，到2015年年底共计有238艘船通过该航道。与20世纪70年代的800万平方公里相比，2012年9月的北冰洋仅覆盖有340万平方公里的海冰。就整个星

球的变化而言，全部归结于海冰覆盖面积的变化可能夸张了。但我们的星球已经改了妆颜。我们都记得“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为行星地球拍摄的第一张从月球背后升起的美丽照片，宇宙中这颗孤独而美妙的蓝色星球囊括了我们对生命所知的一切。照片上这个球体的两端为白色。如今，从太空往下看，夏天的地球北极看起来则为蓝色，而非白色。这一片我们一手造成的海洋曾覆有冰盖。重塑地球表面是人类的首要成就，这当然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灾难性后果。

情况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糟。我的声纳测量结果显示，1976年至1999年间，北极冰面平均厚度缩减了43%。[5]这也说明了一些别的情况。过去，北极大部分冰体都会存在数年之久，它们又称多年冰（multi-year ice）。这些多年冰形成了崎岖而壮丽的地形，巨大的冰脊阻挡了探险者的道路，并一直延伸至海面以下50米左右（文中插图1.1）。过去10年间，不断变化的洋流系统已迫使多数海冰漂流出北极，单年冰（first-year ice，彩色插图4）则代替了多年冰，这种海冰形成于一个冬季之内，最大厚度仅为1.5米，且仅有少数较浅的冰脊穿破了平坦的冰面。这种在单个冬季形成的较薄海冰会在单个夏季里由于更加温暖的空气和海洋温度而完全消融。不久之后，北极各地海冰在夏季的融化速度将超过其在冬天的形成速度，如此，现存所有的夏季冰盖都将消融。我们将迈入美国气候学家马克·塞勒泽（Mark Serreze）所谓的“北极死亡螺旋”（Arctic death spiral）时代。[6]正如我在第七章所解释的，在不久的将来，北极的九月将再无冰体，而这之后，北极无冰的季节将延长至4到5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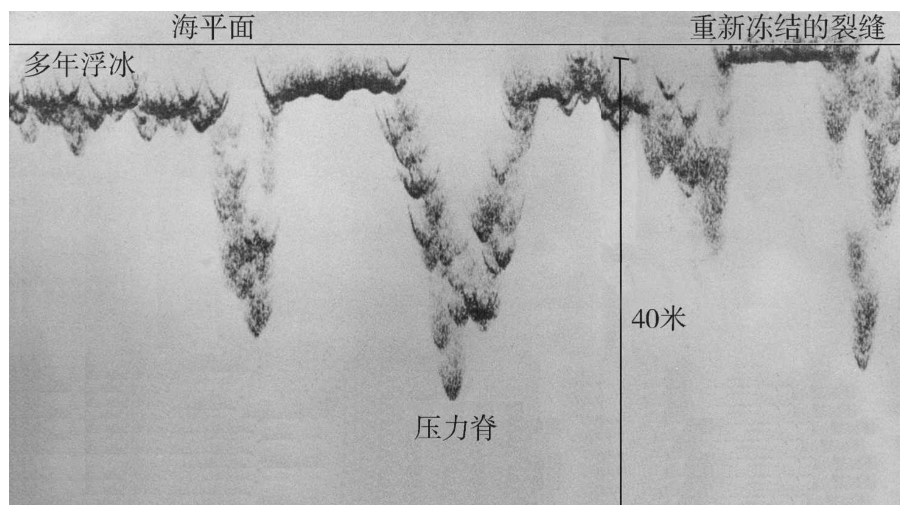


图1.1：多年冰中的压力脊，由潜艇中向上扫描的声呐系统所记录。最大深度为30米。

北极夏季海冰消融的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其引发的巨大影响有二。首先，一旦夏季海冰从开阔水域退缩，反射率（albedo）——直接反射

回太空的太阳辐射比率——将从0.6降至0.1，这将进一步加速北极和整个地球的变暖进程。之前400万平方公里冰面的消失给地球造成的变暖效应相当于过去25年人类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影响。其次，冰盖的消失也会让北极上空重要的大气调节系统荡然无存。只要部分冰块在夏季也能存在，无论多薄，海面水温也无法升至0℃以上，因为任何较暖的水体都会在融化其上覆冰层时丢失热量。上覆冰层消失后，表层海水的温度会在夏天上升数摄氏度（卫星观测显示为7℃），而浅层大陆架上海风引起的海水混合现象又将这种热量传递至海底。这一过程进而又会令近海海底表层的永久冻土解冻，它们是自上个冰河时期以来便冻结在海底未受干扰的海底沉积物。近海永久冻土的解冻又将引发大量甲烷气体从沉积物中分解的甲烷水合物中释放出来。每个甲烷分子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出23倍。前往东西伯利亚海（East Siberian Sea）的俄-美年度考察队已观察到从海底涌出的甲烷气体，其他考察队则在拉普捷夫海（Laptev）和卡拉海（Kara）等海域观测到了这一现象。如果这种释放过程导致大气中甲烷含量上升，它将直接进一步推动全球变暖进程。我写作此书是为了解释这些戏剧性变化，并说明北极冰川的减少，如何以及为什么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了威胁，而并非仅仅是世界遥远角落里正在发生的离奇变化。

自21岁起，我便将自己的整个科学生涯投身于海冰和极地海洋的科学事业。当我准备向这神奇的景观致以私人的告别时，冰川的改变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可遏制地感到，它对地球而言意味着智识上的贫瘠，对人类而言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我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正在夺走北冰洋海冰的美丽世界，它曾保护我们免受极端气候的影响。如果我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其灾难性后果，那么是时候采取紧急措施了。

注释：

[1] Wadhams, P. （1990）, Evidence for thinning of the Arctic ice cover north of Greenland. Nature, 345, 795-7.

[2] Rothrock, D. A., Y. Yu and G. A. Maykut（1999）,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3469-72; Wadhams, P. and N. R. Davis（2000）, Further evidence of ice thinning in the Arctic Ocea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7, 3973-5.

[3] Wadhams, P. （2009）,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Ely: Melrose Books.

[4] Headland, R. K. （2016）, Transits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 to end of the 2013 navigation season. Atlantic Ocean-Arctic Ocean-Pacific Ocean. Il Polo, 71（3）, in press.

[5] Rothrock, et al.,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6] “The ice is in a ‘death spiral’ and may disappear in the summers within a couple ofdecades”, M. Serrez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17 Sept. 2008; “There are claims coming from some communities that the Arctic sea ice is recovering, is getting thicker again. That's simply not the case. It's continuing down in a death spiral”. M. Serreze, Statement to Climate Progress, 9 Sept. 2010.



第二章

冰：奇妙的结晶

冰的晶体结构

为何是冰体在我们所在星球的能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任何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都是如此呢？答案在于冰晶的独特结构，而这又源自水分子的独特性质，后者乃生命存在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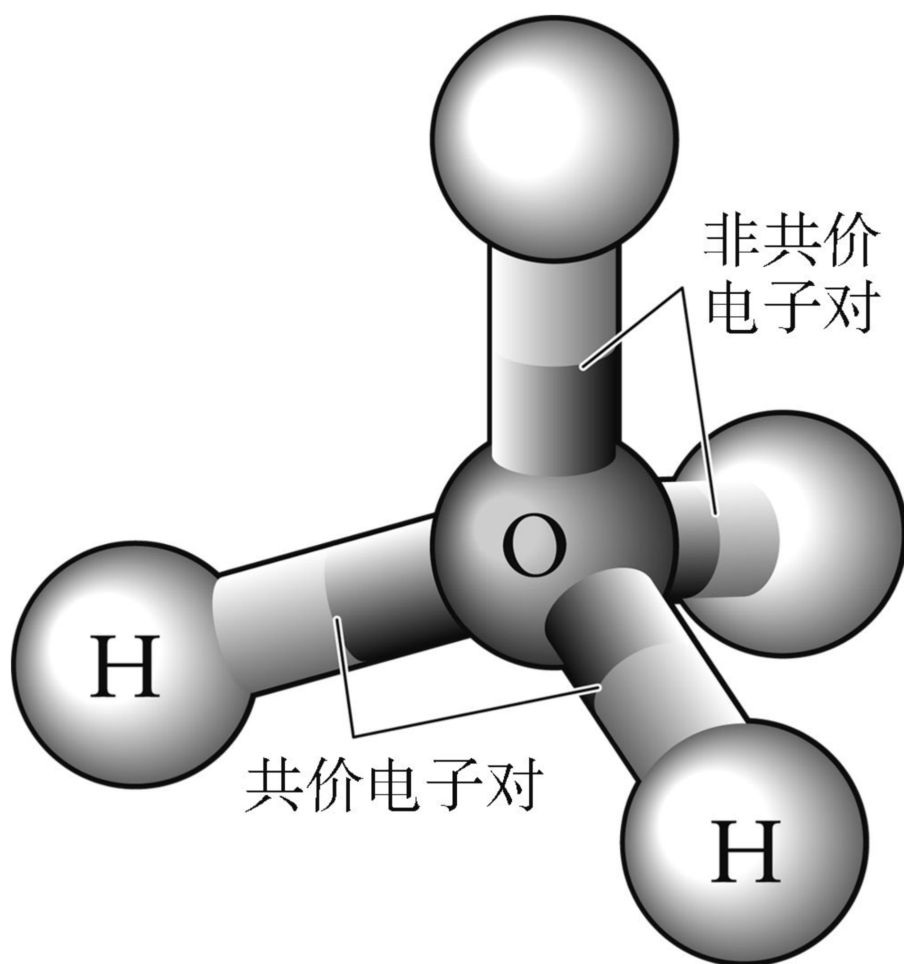


图2.1：水分子的四面体结构。

单个水分子（H_2O）具有几乎完美的四面体形状，也即一个三角锥体（插图2.1）。水分子内部犹如一个小的太阳系模型，其中通常围绕质子旋转的电子由该质子和氧原子核共享，这一过程产生了所谓的共价键（covalent bond）。水分子中有两个这样的H-O键，它们构成了键角为104.5°的弯曲几何结构（正四面体则为109.5°）。这个四面体由两对来自氧原子的电子对组成，它们仅与那些参与共价键形成的物质偶联。这些自由流动的液态水分子冻结成固态冰体时发生了什么？直到1935年，

伟大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阐明了固体冰的三维结构之后，我们才得以一探究竟。[1]

冰块的基本组成是从自由水分子中承继而来的四面体结构。每个氧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处，且以0.276纳米（nm，10^{-9}米）的间距与各顶部的四个氧原子键合。这些氧原子集中在一系列被称为基面（basal planes）的平行平面上。晶体单位晶胞的主轴或C轴则垂直于基面，整个结构看起来像蜂窝状或蜂巢状，由略显褶皱的六边形层级构成（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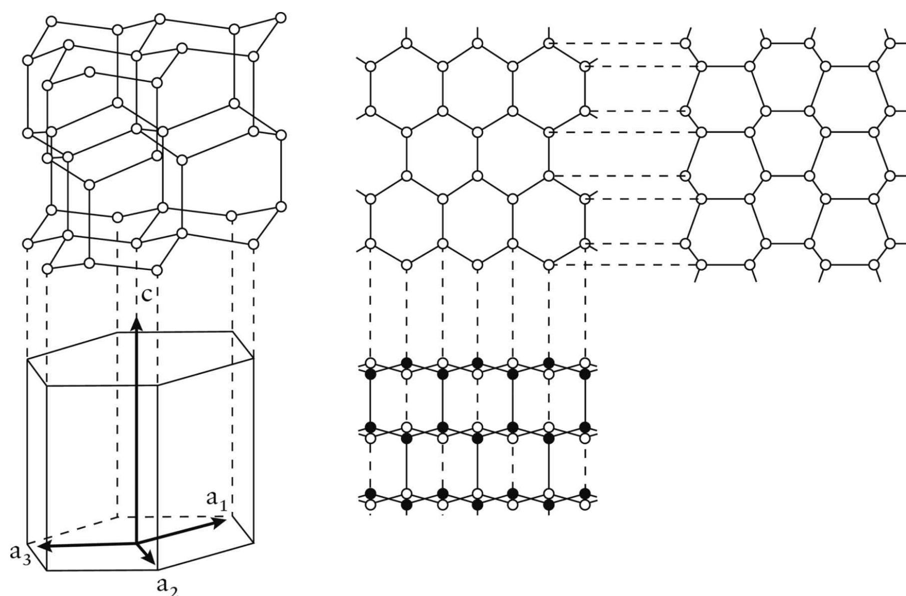


图2.2：冰晶的结构，它展示了氧原子和氢原子呈褶皱蜂巢状排列。C轴为对称轴，其他三个轴则组成了晶体结构的基面。

这种结构导致了冰的非均质（anisotropic）属性，即它在不同方向上的性质有所不同。从能量的角度讲，冰晶在水分子的冷冻过程中增长时，新的氧原子加入到已有的蜂巢表面比形成一整个新的基面更为容易，因为前者仅需创造两个而非四个新键。因此，冰晶沿着基面轴生长比沿着C轴更加容易——蜂巢中已有的基面就在与形成一个新基面相比的优先地位中逐渐增大。这些优先生长的方向即是云中蒸汽生长出的雪花晶臂[2]的方向，也造就了新冻结的海洋或湖泊表面的精美冰晶羽翼。对于理解海冰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一大片处于基面优先增长方向上的海冰结晶会因冷冻而逐渐变厚。

窗户玻璃上薄薄的水层冻结并形成精美的冰饰后，我们便能很容易看到这些优先的增长方向。第一个冰晶的形成会以60°夹角在玻璃表面延伸晶臂，然后以类似树枝的新轴线填满剩余的空隙。每次延伸的角度均为60°，晶臂的增长十分迅速——又称枝晶增长（dendritic growth），

它来自古希腊语中的单词“树”。

这是地表温度和压力下的冰体结构；而在高压且接近绝对零度（-273.16℃）时，冰体则以更密集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有17种科学上已知的所谓多晶型物（polymorphs）。[3]地球表面正常条件下存在的我们熟悉的那一种则称冰-1h（ice 1h）。一些高压形式的冰体则很可能存在于远离太阳的地球内部深处，我们也能在实验室中重新制造它们。其他形式的冰体则存在于接近绝对零度的情况下。它们造成了外太空一些十分特别的现象。例如，冰体构成了大多数彗星的外层物质，并且将太空中的尘埃包裹，这让宇航员即便从地球大气层上方观测星星时也能看见它们的闪烁。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曾提出，生命可能起源于太空中类似的微小颗粒，它们可能形成一个将分子紧密包裹在一起的基底，从而发生了最终导致生命的化学反应。欧洲航天局（ESA）的飞船“菲莱号”（Philae）对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Churyumov-Gerasimenko）的精彩考察表明，随着彗星逐渐接近太阳，冰盖被加热，冰体也气化并以小股喷射的方式射向太空。

氧原子的网络经由氢键共价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氢原子关联两个氧原子。每个氢键都有位于两个氧原子之间的氢原子，但每个氢原子的位置必定离其中一个氧原子更近些，这种偏好的决定则是随机的。每个氧原子附近都有两个氢原子，但每个氢键中只能有一个氢原子。根据这两条量子力学规律，氢原子可以任何方式排列。正是氢键的长度造成了冰晶的开放结构；当冰体融化，一些氢键遭到了破坏，这导致它们崩解为结构无序、杂乱随机的水分子，密度则高于固态冰。这种情况下的水分子十分与众不同，其固态密度比液态密度更低，这一点与金属不同。纯水的密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kg \cdot m^{-3}$）——这是单位千克的最初定义——而纯冰的密度则为917.4千克每立方米。海水的密度高于纯水，通常为1025千克每立方米，因此海洋中的水和冰之间的密度相差约10%。这就是有10%的浮冰或冰山部分会突出于海面以上的原因。

人们会好奇，如果密度差反过来会发生什么，多数情况下，冰会在水中沉没。首先，湖泊、河流甚至大海将几乎全部冻结。一旦开阔水域上形成了任何冰体，比如海面受低温空气影响时，冰体便会径直沉入水体底部并堆积成一个冰层。所有海底生命都会消失，而湖泊底部的冰层则会变厚，直到冬天结束时湖面残留一层尚未冻结的水面，也可能整个湖泊都被冻住，由此，湖泊里所有的生命都会消失。海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虽然人们并不清楚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是否足够在大洋底部形成一层厚度足以填满整个大洋的冰层。自然，冰层的增长会很迅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中，海洋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冰层，这可以保护海洋免于进一步的冻结，但在我们假想的这个世界中，海洋则会在整个冬天不受限制地吸收大气中的寒气，并在海床上形成一层逐渐增厚的冰层。我认为没有人曾建模计算如此这般的海洋是否会冻结至海面，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除了一些微生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会终结。海洋生命会在免于冻结的赤道大洋区域聚集；在较高的纬度地区，我们将只剩下蔓延至海底的坚固冰体。

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有所不同。在现实世界里，水在冻结的时候会膨

胀，所以，那些位于道路或岩石裂缝中的水会在其冻结的过程中膨胀，并给周围物质造成开裂的霜冻破坏。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在我们假设的世界中。此外，如果冰比水的密度更大，滑冰将变得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冰鞋给冰面造成的巨大压力降低了其融点，只有冰鞋底部的冰会融化并对其起到润滑的作用。如果水的密度比冰小，冰上的压力会提高其融点，滑冰就变得不再可能。

冻结和融化

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来看看较低温度的水。我们通常认为液体没有结构，其形态由随机分子彼此旋转和滚动而定。但冷却的液体具备冰体的某种小范围秩序，其中晶体状键合结构每次在分子组群中保持数秒或数分钟，直到被热运动破坏为止。就像繁忙火车站内的一群人试图聚到一起说话，但又不断被涌入的人群分开。这解释了淡水神奇的密度变化，它在4℃的时候密度最大。这意味着如果高纬度地区的河流或湖泊在秋天的寒气中冷却下来后，其表面的水体会变冷并开始下沉（通常暖水比较冷的水密度更低），并被更深更暖的水体取而代之，这被称为对流倾覆（convective overturning）。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湖中所有的水都冷却至4℃为止。然而，除此之外，当表层水进一步冷却，就会因密度变低而滞留在湖泊表面，于是，对流停止。之后，表层水会快速冷却至0℃并冻结，而湖泊更深处的部分则保持在接近4℃左右的温度。所以湖面会在秋季迅速冻结，但冻结至湖泊底部的时间则长得多，多数时候，冬季结束的时候都没彻底冻上。

而海水则没有这种可达到最大密度的温度；它的密度会随着整个冷却进程增长至冰点。淡水中的盐度超过24.7‰后就成了海水；大多数海水的盐度范围在32‰-35‰之间，仅有少数像波罗的海这样的孤立海域以及靠近北极大河口附近区域的海域盐分低于24.7‰。英语中表示“咸水”（brackish）的模糊语词——适用于有些咸而不像海水那样咸的水——在海洋学中则有严格的定义，因为它适用于盐度低于24.7‰的水，因此也具有会达到最大密度的温度。这意味着一定量的海水在秋季冷却后，对流倾覆会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水体都达到冰点。对一般的海水而言，其凝固点本身会因为盐分的存在而降至低于0℃的-1.8℃，而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结冰的路面上撒盐。海洋表面发生冻结之前，唯一可防止海洋整个变冷的因素则是，海水由不同来源的不同类型的水层组成，这些水层都以不同的速度朝不同的方向流动。每一层海水都会发生迅速的密度变化（pycnocline，称为密度跃层），因此实际上对流倾覆只会影响到表层海水的底部——在北极，这又被称为极地表层水（Polar Surface Water），而它的下层则是大西洋海水，因为后者自大西洋抵达北极。

浮冰在水中漂浮意味着海冰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漂浮盖，它允许大洋环流得以在下面继续进行，海洋生命也得以在深海尤其是靠近海冰的地方（甚至就在其中）存在，植物类浮游生物（又称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则能在海冰处获得光合作用所需的阳光。例如，南极海冰的较低层就存在含有浮游生物的微小液体盐水通道，这些海冰每年的生物产量约占整个南极海洋年度生物产量的30%。

冰的另外一个关键特征则是其非常高的融合潜热（latent heat of fusion），具体为80千卡每千克（kcal kg-1）。潜热是指融化一千克冰所需提供的热量，而非将一千克物质的温度升高1℃所需的热量，后者为比热（specific heat）。水的比热仅为1千卡每千克——这是卡路里最初定义的基础，即热量的标准单位，它是将1克水升温1℃所需的热量（所以，水已被用作定义两种主要物理单位，千克和卡路里的基础）。但假设你仅需提供1千卡的热量来为1千克水加热1℃，相应地，你则需要提供80千卡来融化1千克冰（即其潜热），这相当于加热同等质量的冷水至80℃。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如果把两口锅（一个盛有1千克处于熔点的冰块，另一个盛有1千克20℃的水）一起放在室温中的炉子上，并提供同等热量，则一口锅中20℃的水开始沸腾之时，另一口锅中的冰恰好完全融化。

就星球层面而言，水的融合潜热的作用就像一个巨大的热水库，它是气候变化的缓冲器。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夏季的海冰：它会持续融化，但只要不完全融化，它就能保持其表面空气的温度接近0℃（因为温暖的空气会融化更多的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冷却），并且也能让其下的水温保持在0℃左右（较温暖的水会融化更多的冰，并在这一过程中冷却）。只要海冰持续存在，海冰将为夏季海洋提供有效的空气和水的调节系统。

海冰的形成

本书最为关注海冰在海洋中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在目前所掌握的冰分子和冰晶的特性的情况下，来考察一下海冰的产生和生长机制。我们首先考虑水在宁静无波浪条件下的冻结情况。由于冷空气会从水面吸收热量，水面的分子会开始冻结。这一过程产生了单独的冰晶层，它们最初为直径2～3毫米的微小圆形或星状冰晶，漂浮在水面。每个圆形或星状冰晶都带有垂直的C轴，圆形冰晶在水面上呈树枝状向外生长（即朝着六个彼此间隔60°的方向向外生长），将其蜂巢层扩展为六度折叠的雪花状。然而，扁平晶体的晶臂非常脆弱，并且很快就会折断，留下的就是圆形冰晶和晶臂的混合物。这些随机形成的晶体阻碍了水面密度的增加，类似白色的泥浆或者“氧化镁”乳剂。这最初形成的冰层被称为碎冰晶（frazil）或凝脂冰（grease ice）。在宁静的环境下，碎冰晶晶体最终会冻结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薄冰层；在其最初的变化阶段又称为尼罗冰（nilas）。仅当其厚度为几厘米时，它才是透明的（暗色尼罗冰），但随着冰体的变厚，尼罗冰就会变灰，并最终形成肉眼无法看透的白色外观。一旦尼罗冰形成，海洋与大气就从物理上隔绝开了，冰晶也因此开始了另外一种十分不同的生长进程，其中的水分子开始在已经形成的冰层底部冻结，这一过程又称凝结增长（congelation growth）。在进一步的增长之后，单年冰便形成了，它在北极的单季能达到1.5米厚，在南极则为0.5～1米厚。在南极和那些波涛汹涌的水域，尼罗冰生长过程的持续时间则漫长得多，但它的气候作用却很重要（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

一旦连续的尼罗冰层形成，冰水接触面的单个冰晶便以水分子在其

表面冻结的方式向下生长。具备水平C轴的冰晶比具备垂直C轴的冰晶更容易实现这一冻结过程，因为向下生长可以通过扩展已有蜂巢状冰晶层的方式实现。因此，具有水平C轴的冰晶就以牺牲其他角度的冰晶为代价而增长，并且随着冰层变厚，它会以结晶达尔文主义（crystalline Darwinism）的方式将其他冰晶排挤出局。在经历20厘米厚度的生长之后，选择过程便会终结，胜出的冰晶会持续向下生长，并形成由具备水平C轴冰晶组成的、修长垂直柱状冰晶构造。即便用肉眼观察，这种柱状结构也是单年冰的惊人特征。你还能看到，这样的冰层很可能物理上很脆弱，因为它本质上是由一束朝向同一方向的冰晶组成。

那么，海水中的融盐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冰的晶体结构十分开放，但其不开放的一面则表现在其他分子或原子无法轻易地进入其中。因此，当盐水中的盐分增长时，盐分子无法进入到冰晶结构中。然而，盐分子却能以别的方式进入其中。生长中的冰水界面并非平整一片，而是由平行排列的被称为树枝晶（dendrites）的突起构成，其中每一排都代表了一些迅速生长的（即树枝状生长的）蜂巢状冰层，它们之间存在着水填充的狭窄凹槽。不时地，冰桥会在连续的突起之间生长，并以隔离盐囊（brine cell）的形式捕获进入到凹槽中的水分（插图2.3）。[4]很快，盐囊壁被冷冻，盐水会不断侵蚀盐囊壁直到剩下半毫米宽的、一小点不会冻结的高浓度盐水溶液。这些盐水的盐囊带有的盐分让单年冰尝起来仍然偏咸（与海水32‰的含盐量相比，新冰的盐分含量为10‰）。通过盐囊的移动、盐水的排出或者直接重力排水等机制，盐水会在冬季缓慢地从冰块中排出。盐囊也会移动，其原因是每个盐囊的顶部温度略微低于其底部，再加上冬季冰-水界面和冰-空气界面分别存在-1.8℃和超过-30℃这样悬殊的温度梯度。于是，盐囊的顶部会冻结，盐囊中剩余的水含盐量就变得更高，进而盐囊底部就会融化；整个盐囊则会带着盐水在冰层中向下移动。而当温度下降，盐囊行将冻结的时候，盐水排出机制就会发生；压力会在幸存的富含盐分的盐囊中积存并导致其爆炸，进而迫使盐水向下排出。重力排水机制则最为有效，它能起作用是因为冰体从冻结的底层不断生长，现有盐水蜂巢会被提升至水线以上，进而重力会让盐水在相互连通的孔洞中找到路径并从冰体底部排除。这些路径往往会像河流支流一样汇入被称为盐水排放渠的管道（brine drainage channels）中。当夏季来临，海冰顶部的积雪和部分海冰都会融化。淡水聚集在冰体表层的融水池中，这些融水通过冰体起到冲走大部分剩余盐水的作用，这一过程显而易见被称为冲洗机制。如果海冰在夏季得以幸存并进入到又一年的生长过程，它几乎就不含盐分了，尝起来也没有咸味，且更为坚固——这种类型的冰体则称多年冰，对破冰船而言，它往往成为比单年冰更为强大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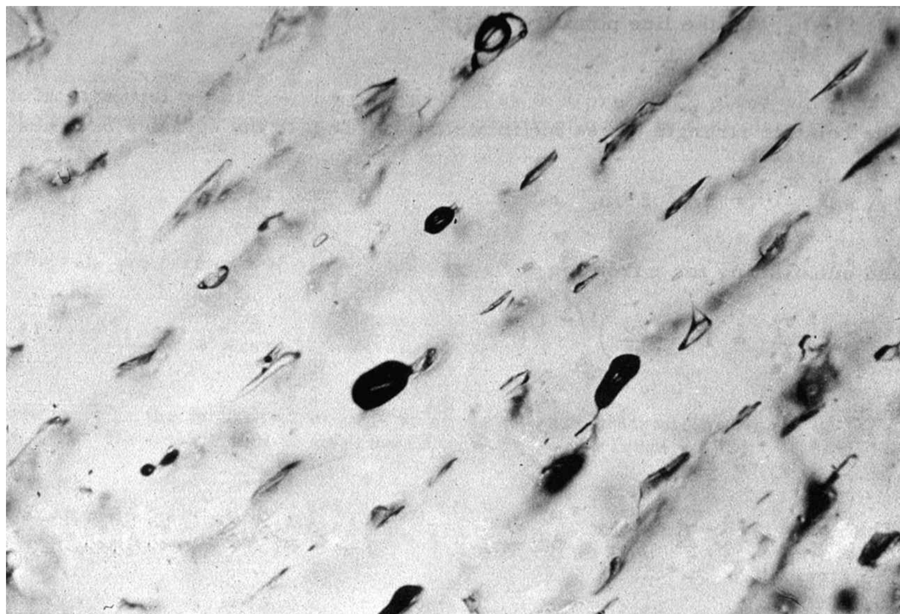


图2.3：海冰中微小的盐囊。盐水层的间隔距离为0.6毫米。

夏季海冰融化的重要性

我们将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到，融水池的形成过程十分重要。当新的降雪层在冬季覆盖海冰时，其表面会反射80%~90%的太阳辐射，所以我们说其反射率（反照率）为0.8~0.9。当积雪融化，剩余光秃秃的冰体可能覆盖有冬季积雪中累积的炭黑（black carbon，来自大气中的烟煤）等脏物，此时的反射率就降至0.4~0.7；这一过程发生在6~7月，此时的太阳辐射在24小时的白昼和太阳照射的作用下达到高峰。如果表层光秃秃的冰体和融水池在夏季较早地出现，冰体额外吸收的辐射将会在削减冰体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可能使其整个融化。许多北极科学家认为，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会加速造成夏季海冰不可逆转的损失。

随着融水池不断变深变宽，它们最终可能从浮冰侧面经由现有的裂缝，或在冰体最薄点以及融水池最深处形成融洞（thaw hole）并排入大海。排出的水会形成一个数米深的低盐度海水层，进而环绕海冰底部并加速其融化。

海冰如何形成裂缝和压力脊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海冰在热工过程（thermal processes）中如何形成和变化，及其在海面的生长和融化过程。然而，北极地区仅有半数体量的冰川以这种方式形成，其余的则经现有冰体的形变而成，即冰体堆积成线状压力脊，这一过程会产生被称为“裂缝”（leads）的开口。其产生过程如下。堆积的冰层因冻结而形成，并

且会因其上层表面的风应力摩擦及其底部的水流驱动持续移动。这一过程会导致冰层基于盛行风而漂移的大致模式。例如，北极盆地的北美一侧就存在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洋流系统，又称“波弗特环流”（Beaufort Gyre），而在欧洲北部聚集的海冰则来自西伯利亚海域，它们被北极往南向格陵兰岛的风吹动，其中的洋流又称“穿极漂流”。

驱动这些海冰的风应力在大范围内整合；据估计，紧致堆积的一块海冰对应着400公里范围的风力整合。因此，如果风力在大面积内变化，则会产生所谓的“辐散风场”（divergent wind field），从而导致辐散的应力——这种风力模式会导致冰盖撕裂。由于冰在拉力下几乎没有强度，所以这种辐散的应力可以打开冰体的裂缝，进而导致其扩大形成裂缝（彩色插图6）。在冬季，任何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裂缝都会迅速冻结，因为大气（-30℃）和海洋（-1.8℃）之间的温度差异十分巨大。刚刚开启的裂缝所丢失的热量十分巨大（超过1000瓦特每平方米，Wm^{-2}），以至于裂缝也随着裂缝开口处裸露的水面上的海上蒸汽雾（彩色插图5）一同散发开去。自然地，一个新的冰盖会在数小时内通过生成尼罗冰的方式快速形成并抹平这个开口，进而消除蒸汽。当后续的风应力场变得收敛时——也即它会将浮冰的边缘聚拢在一起——重新冻结的裂缝处的新冰则成为冰盖中最脆弱的部分，并且首当其冲被挤碎并形成了水线上下方的碎冰堆。这种线性形变特征（就像一个长长的炉渣堆）就被称为压力脊（pressure ridge）（彩色插图7），水面以上部分称为帆（sail），而（更大的）水下部分则被称为龙骨脊（keel）。北极地区的龙骨脊可深达水下50米，尽管多数为10～25米深，而每100公里的距离才能看到深度为30米的龙骨脊。龙骨脊的深度一般为帆高的4倍，宽度则为其2到3倍，因此，压力脊附近明显尚未变形的冰块底部则可能带有部分龙骨脊；这是因为冰块克服浮力下沉比克服重力上浮更为容易。

北极的海冰压力脊对整体海冰质量有重要贡献；其平均贡献率为40%，沿海地区则为60%以上。压力脊起源于简单的线性堆积的冰块，但随着冰块冻结在一起后压力脊就变得更坚固，以至于数年之后，压力脊就像伤口的结痂一样坚固得可匹敌甚至超过其周围尚未形变的冰体。正是多年冰厚重坚固的冰脊，让除了少数最重型破冰船之外的任何破冰船都无法通过。然而，单年冰不仅更薄，而且其压力脊也没有时间以上述方式紧致地结合，所以单年冰脆弱得多，且对于加强型船体而言也不算什么障碍。

而南极地区的海冰压力脊则比北极浅得多，通常不到6米。原因在于，南极海冰本身在一年的生长之后所能达到的深度（通常为0.5～1米）比北极的浅（通常为1.5米）。风的应力可直接折弯这些较薄的冰层，而不必首先形成裂缝并将其撕开。因此，压力脊中的冰块厚度通常与其周围的浮冰类似，并且前者也没有通过逐渐破坏重新冻结的裂缝而形成深度压力脊的机会。而南极压力脊对海冰整体质量的贡献似乎也较小，可能仅为30%～40%。对南极海冰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十二章。

浅海中的冰

冰块通常在靠近海滩的最浅水域形成，因为此处的大气仅需冷却并冻结薄薄的一层海冰。这种海冰被称为岸冰（landfast ice），或者称为固定冰（fast ice），因为它直接冻结至海底。在离岸超过一个或多个潮汐间隙的远处，海冰则处于静止的漂浮状态，这一点主要源自其本身的搁浅特征。它们通常是被海风吹到近岸浅海中搁浅的浮冰压力脊。新冰会在这些搁浅的压力脊周围形成，这一整片区域被称为固定冰区域，这一冰区会一直延伸至最深的搁浅压力脊同等的深度，通常为25~30米。

然而离岸冰仍会漂移，在其搁浅并完全静止之前，搁浅压力脊的顶部会在海底沉积物中挖出长长的海槽，这一过程叫做海冰冲刷（ice scour）。1970年夏天我乘坐“赫德森”号首次造访北极的时候就发现了海冰冲刷现象。当时，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一支队伍正用船只拖拽一台侧扫声呐装置，它会发出扇形声束来绘制海底地图，并反映出任何可能的障碍物。我们都预计泥泞的近海区域的地图是平整的——即一大片平整无奇的淤泥带。相反，我们在海底看到了一系列杂乱的狭窄海槽，仿佛一位醉酒农夫的作品。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迷人线条模式，有些像钢模一般笔直，其他的则卷曲成圆形或螺旋形，就像倾斜的日本禅意花园。原有的槽线被新的槽线覆盖。我记得自己冲到主要的回声测深仪处时，发现穿过船只轨道的每个冲刷痕迹在海底都呈现出小凹痕状，大约2~4米深。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冲刷痕迹一定是由嵌入冬季冰盖中的压力脊造成的，并且风力和洋流都会沿着海底拖拽这些浮冰压力脊直到其完全停止。山峰状的压力脊的作用方式就像复式犁（multiple plough）。冲刷痕为北极浅海区域的近海管道及海上探井规划设置了不可预见的危险。

更为彻底的海冰冲刷考察显示，冲刷痕会延伸至超过压力脊能够形成的海水深度，有时甚至达到65米深的水底（正如我说过的，压力脊绝少超过30米）。人们想到的解释便是，它们是上个冰期或稍晚时期的冲刷痕迹，因为海水被冰盖锁住而导致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更低。由于缺乏浮游生物（它们的细小硬壳会大量沉积在海底），北极水域的沉积物堆积速度非常缓慢，这意味着那些古老的冲刷痕迹一直保存至今并仍未被填满。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将侧扫声呐考察活动扩展至更深的海域，他们发现拉布拉多海、巴芬湾、格陵兰岛和南极海域150~300米深处都存在冰山冲刷现象，其中一个漂浮冰山最深的水下山峰也已经划过了海底。令人惊讶的是，这也成为火星曾有地表径流的最初证据。我的朋友兼同事克里斯·伍德沃斯-莱纳斯（Chris Woodworth-Lynas，他在纽芬兰生活和工作）是一位冰山冲刷方面的专家，他在诸如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威廉国王岛（富兰克林的探险队消失的地方）等陆地上也发现了冲刷痕迹。该岛在上个冰期仍位于海底，来自附近冰川的冰山让弧形的冲刷迹象能被追溯到圆石遍布的沉积物中，这些沉积物后来堆积形成了现在岛上的可见地表。克里斯在2003年浏览火星表面照片时，获权使用了“旅行者”号（Voyager）飞船上的“火星轨道相机”，并看到了十分类似的冲刷模式。[5]他与同事雅克·吉涅（Jacques Guigné）合作的论文为火星研究领域带来了突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火星上曾有过水，因而也可能

有过生命，但这种观点在2003年仍属异端。冲刷痕迹表明，火星上不仅曾经有过流水，而且这些水还被定期冻结（也许仅在冬季），进而形成了冲刷过古代火星海底的冰山或冰脊。

浅海中的这些进程十分复杂。除了固定冰，静止冰体对快速移动的离岸浮冰的摩擦拖拽降低了后者的速度，并产生了所谓的剪切带（shear zone），该区域内的摩擦和压力能产生较深的压力脊，有时一片巨大的碎冰块杂乱堆砌的区域则被称为瓦砾场。这种过程的神奇产物就是一种巨大的孤立压力脊，以其俄罗斯名字搁浅冰山群（stamukha）而闻名。西伯利亚北部浅水区域发现的搁浅冰山群就很典型，它是一个很深的压力脊，在冬季搁浅并成为固定冰的一部分，但它在春季或夏季并不会脱落漂走，因为它搁浅的程度很牢固。其周围的冰块会破裂漂移，开阔的水域最终空留下一座孤立的圆顶冰岛。这座冰山可能十分脏，因而看起来像真正的岛屿，因为西伯利亚河流的融水会在早春向其排放污泥。它最终会从海底脱落并进入北冰洋，进而成为这些区域中船只和钻井设备的最大障碍。搁浅冰山群在浮冰中十分罕见，我自己有幸在2012年夏季的弗拉姆海峡（Fram Strait，位于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和格陵兰岛之间）处找到并查看了一座这样的冰山。彩色插图9显示了搁浅冰山巨大的隆起表面因为混有多年的污垢和藻类而呈赤褐色。我向冰下发射了一艘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并用其搭载的多束声呐装置来描绘该冰山的草图。其28米的吃水深度足以让它在通常的剪切带中搁浅。

冰间湖

最后，极地海岸沿线即便在冬季也可能形成没有固定冰和成群压力脊的无冰水域。这些地区又称冰间湖（一个英语复数形式的俄语名称，polynyas），表“水池”意。它们可以许多方式形成，但比较常见的一种形成原因是盛行的离岸风所致。海风将新冰吹向大海的速度与其形成的速度一样快，剩余一片紧邻海岸的开阔水域，其可能延伸至数百公里之外。冬季，岸边的开放水域蒸发出霜冻烟雾，再远处的碎冰晶逐渐形成冰块，并被海风吹向外海直至撞到更重的离岸浮冰。南极洲的海岸线因为重力风（katabatic winds）的影响而被连续的冰间湖环绕：这种风在向下吹拂南极洲穹顶式冰盖的过程中会不断加速，最终它会以整合的形式吹过海岸高山的间隙进而吹向大海。每个山涧都对应着一座冰川，每座冰川也都会产生自己的冰间湖。冰间湖很常见，通常还有名字。彩色插图11就显示了罗斯海（Ross Sea）中的特拉诺瓦湾冰间湖（Terra Nova Bay polynya），意大利人和现在的韩国人在该地都有基地，斯科特船长的北部探险队就曾被迫在该处的冰洞中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而北极的冰间湖则不常见，但它们也很重要。白令海的圣劳伦斯岛南侧就有一个冰间湖，因为该地冬季盛行北风，这让当地的因纽特人（Inuit）在整个冬天都能狩猎和捕鱼。而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之间则有一个著名的冰间湖，名为北方水塘（North Water，彩色插图12）；这种类型的冰间湖则以别的方式形成：因为风力和洋流驱使浮冰南下通过此处两岛之间的狭窄开口，这可

能会导致开口堵塞，进而形成一个拱形障碍物，就像卡在漏斗中的湿沙子一样。洋流继续南下，浮冰则被卡在开口处，进而造成了一个冬季的冰间湖。另外一个反复出现的冰间湖则被称为东北水塘（Northeast Water），它被发现于格陵兰岛东北海岸，该处南下的北极浮冰群无法很快地在诺多斯伦丁根（Nordostrundingen）这个向外突出的海角南端"转弯"，这就为海角背风处留出了一块开阔水域。正是在这里，丹麦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古代的木架蒙皮船（一种由皮革制成的敞口船）和一些石器工具，这表明，因纽特人可能千年以前便已经在这种偏远的极北区域（北纬81°26′）建造了狩猎定居点，很可能是因为这里生活着大量的北极熊和海豹。

本章简要总结了海冰的特性及其形成和发展机制。我们将看到，这种吸引人的物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因为许多严重的气候影响都与它的消退有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地表上的另外一种冰体，即冰川和冰盖中的固态纯冰。它们也正在消失，尽管速度比海冰慢。

注释：

[1] Pauling, L. （1935）, The structure and entropy of ice and other crystals with some randomness of atomic arran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57, 2680-84.

[2] 即基面轴线。——译注

[3] Hobbs, P. V. （1974）, Ice 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e also Petrenko, V. F. and R. W. Whitworth（1999）, Physics of 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lin, M.（2016）, Water structure and sci-ence. www. lsbu. ac. uk/water/ice_phases. html.

[4] Weeks, W. F. and S. F. Ackley（1986）, The growth,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ea ice. In Norbert Untersteiner, ed., The Geophysics of Sea Ice, New York: Plenum, pp. 9-164.

[5] Woodworth-Lynas, C. and J. Y. Guigné（2003）, Ice keel scour marks on Mars: evidence for floating and grounding ice floes in Kasei Valles. Oceanography, 16（4）, 90-97.



第三章

地球冰川简史

冰川初现

我们并不清楚冻结状态的水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初次出现在地球上的。45.4亿年前，地球从太阳星云（solar nebula）中刚凝结成形时还是一个温度极高的年轻行星，这个尘土和气体组成的圆状星体曾在太阳周围不断旋转以积累物质。事实上，地球的表面曾经处于熔化状态，部分在于火山活动，部分则由于现在仍停留在太阳星云中的大量灰尘和岩石的频繁撞击。而彼时的大气则由不含氧气的有毒气体组成。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生命形式都无法在这种不宜居的环境中生存。然而，早在38亿年前（有些科学家认为是41亿年前），某种生命形式的确已经开始出现，尽管看起来地球表面那时已经凝固成形了，并且甚至有了某种液态水，但肯定没有冰。有趣的是，人们在西格陵兰岛发现的距今37.6亿年的某种石墨化石被确定为包含了地球生命的起源信息。当然，该地当时还并非现在的格陵兰岛，而是这些原始生物生活在其泥土层中的液体海洋。

从一开始我们所知的奇妙生命故事的一切都表明，液态水对生命的产生和延续都至关重要。水是活体细胞的主要成分。但是冷却过程中的地球上的第一滴水又来自何处？人们认为它是地球内部的排气作用和主要由冰体组成的彗星和小行星双重影响的结果。

早期的生命形式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这种生命形式一直延续到约5.8亿年前。因此，地球80%的生命史就是单细胞生物十分缓慢的演化史。随后，多细胞生命突然出现，演化开始加速，现在细胞的组合有无限可能，不同的生命角色有着不同的专长，然后器官和四肢也开始演化。我们无法回头查看这一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命的关键步骤非同寻常，也耗时持久，因为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早在2亿年前便已出现——它们能吸收太阳辐射，并借助二氧化碳创造新的身体物质，同时释放氧气。从那时起，地球大气中的含氧量开始升高，对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也更宜居，比如陆地和海洋中的单细胞植物。

从地球形成到第一批多细胞生物出现的整个时期被古生物学家称为前寒武纪（Pre-Cambrian），它包含了40亿年的地球史。这段时期里，冰又在哪里？

冰雪地球悖论

古气候研究人员将地球的气候史粗暴地划分为“温室地球”（hothouse Earth）和“冰室地球”（icehouse Earth）等时期，前者代表地球气温明显高于现在的时期，后者指的是明显比今天冷的时期。地球有大约75%的时期处于冰室地球状态。然而奇怪的是，似乎寒武纪之前的冰河时代比最近的冰河时期都要寒冷许多。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冰期被地质学家称为休伦冰期（Huronian glaciation），或者更加难读的马克甘耶尼冰期（Makganyene glaciation），后者根据南非一处冰川沉积遗址而命名。这一时期距今24到23亿年，当时还不存在光合作用，大气中也并不富含氧气，彼时的地球环境对缓慢演化的单细胞生物而言十

分恶劣。这个冰期的环境十分严酷，持续时间也远远超过最近的几次冰期，并且一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过严重的负面影响。

正是这个冰期让一些科学家得出如下观点：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都被冻结，地表的高反射率，让它从空中看去呈白色。这就是所谓的“冰雪地球”（Snowball Earth），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约瑟夫·基尔施文克（Joseph Kirschvink）于1992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曾备受争议。[1]这一概念现在已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它。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一冰期何时开始？地球又是如何裸露出来的？地球是一个雪球的时候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人们难以给出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因为这些古代气候进程的证据难以找到，但故事可能以如下方式展开。

休伦冰期的太阳比现在黯淡。我们现在习惯去考虑“太阳常数”（solar constant），即从太阳抵达地球的年均辐射量，并将其作为仅有微小变化的真正常数（尽管如此，根据一些人的研究，这些少量的变化也足以引起气候变化）。但今天的太阳常数是太阳光度缓慢但稳定上升的结果，其光度每10亿年增加6%。由于休伦冰期的太阳比现在黯淡15%，23亿年以前的地球就靠着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比如活跃的火山活动释放的甲烷——而保持着（事实上比现在温暖）温暖状态。如果这些活动骤减，整个地球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比现在冷得多的状态。南非发现的冰川沉积遗址（这个冰期也因此得名）是该地还位于地球赤道附近时沉积的，这意味着这个冰期的影响遍布全球，因此，火山活动放缓的概念指的就是这种机制。当然，我们今天在赤道上也能看到冰川（比如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但是，休伦冰期的冰川高度很低，这意味着当时的世界完全被冰雪覆盖。

对这一冰河时期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事实上，第一批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已经出现，并开始改变大气成分，也产生了更多的氧气。氧气与甲烷发生反应形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本身就是温室气体，但其温室效力（每分子的温室效力为后者的1/23）比甲烷小很多。因此，一旦这种游离氧出现，大气中大量的甲烷就会因氧化而减少。我们有个类似盖亚（Gaia）的生命事例，甲烷减少带来的降温效应逐渐改变了地球环境，尽管后续产生的冰河时代几乎不能说对生命有利。

冰雪地球上的生命是什么样，冰雪状态下的地球又持续了多久？冰雪地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持续的。覆盖地表的冰雪让地球反射率增加到0.8左右（目前为0.3），所以，大部分入射的太阳辐射将被反射回太空。结果，据估计，冰雪地球的平均温度可能在-50℃左右，最暖和的赤道地区也是-20℃，这的确不宜居。其中一个未知因素则是大洋上冰层的厚度。很可能其厚度能达1公里，这一厚度与今天的南极浮冰架相当，尽管前者形成于海上而非陆地。赤道地区的冰层则因为更高的温度而没那么厚，因此高纬度地区更厚的冰川就会朝赤道漂移，就像今天的冰川一样。但这是大洋中浮冰盖（而非陆地冰盖）的漂移现象。而人们估计赤道这样的中心位置的冰层厚度的范围在数百米到仅仅1米之间。这中间的差异很明显。如果冰层厚度为1米，则冰层中会有大量的裂缝和开口，海洋和大气之间就能交换气体和热量，更关键的是，海洋生物的光

合作用也将继续，从而不断提升地球的含氧水平。并且火山活动也将继续，它能沿大洋中脊的水下喷发并通过热风孔道释放气体，从而将二氧化碳和甲烷重新释放到大气层。通过一两种这类机制释放的温室气体就能让温室效应达到足以消融冰盖的程度，这将把地球重新带回温暖状态。这一过程可能发生得非常快，数百万年的冰雪地球可能仅需2000年就会消融。多种形式的单细胞生命极具适应性，许多物种也都能在长期的寒冷中幸存。

随后的两个冰雪地球

上述第一个雪球的故事并不完整，同时它也是地质学家和气候建模者之间纷争的主题。但似乎地球的这种状态在间隔15亿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即7.1亿年之前出现的斯图特冰期（Sturtian glaciation）。二氧化碳被假定为这次冰期形成机制的主导因素。地球一直受到板块构造过程的影响，大陆和海洋的地壳岩石以板块的形式移动，其边缘因彼此倾轧而相互作用，而年轻的地壳则由来自地幔处的上升流体物质形成。恰巧7.1亿年前，冰川携带大陆板块一起移动，并在赤道及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巨型大陆板块，即盘古大陆（Pangea）。这加速了一种名为硅酸盐风化（silicate weathering）的进程，岩石中的硅酸镁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进而在溶液中形成碳酸氢盐和硅酸（人们最近提议用这种方法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即把硅酸盐碎成小块撒在海滩上——见第十三章）。裸露出来的温暖的硅酸盐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它们也会变得潮湿，因为盘古大陆开始破碎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形成新大陆，产生更多的沿海地形，岩石则被雨水侵蚀，而不那么靠近内陆的地带则往往形成沙漠。这两种效应之间的风化作用似乎会消耗二氧化碳，地球随之冷却，新的雪球又得以形成并持续了约6000万年。

6.35亿年以前，这最后的第三个雪球已经开始形成（马雷诺冰期），它开始于斯图特冰期结束之后不久（这两个冰期都以澳大利亚南部的地点命名）。这个冰期持续了600万至1200万年。人们再次认为二氧化碳和风化作用都曾参与其中，但也涉及许多其他的机制，包括阻止了太阳辐射的大量太空残片星云等天文机制。

冰雪地球的概念十分新奇，人们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很难再找到其存在过的证据了，所以这整个想法都可能被证明为不合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前寒武纪时期，我们知道仅有三个大范围长期存在的冰期，即便它们并未造成雪球。这意味着自然状态下的地球在长期的时间跨度内并未冻结，事实上往往比今天还暖和，偶尔的冰期则意味着全球恒温器突然出现故障。自那以后，我们进入了过去600万年中冰期无休止重复的世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向天文冰川时代过渡

过去6亿年地球演化的多数时间里，我们的星球都是“温室地球”，而非“冰室地球”。古气候研究是十分年轻的学科，世人仅恰当地检验过了地球过往巨变的少量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过去这段时期里是否

存在过可能为期较短的多个冰期。地球历史的图景仍然十分粗糙，但从整体上看，它在过去多数时间里的确都是温暖的。

本书与地质学无关，我们也并不试图查看地球气候变化的整个历史。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思考冰体及其作用，并了解其影响行将终结时给我们的启示。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确需要考察地球史上二氧化碳水平上升十分迅速的其他时期，并就这种现象对地球意味着什么得出一些教训。气候史上的一个教训是，地球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速度比现在快。人类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性实验，其中包括了对自然系统前所未有的干预。

6500万年以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自然事件，即著名的K-T小行星撞击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造成的一场全球性灾难。撞击产生的冲击波和潮汐波（tidal waves）遍及整个地球，大量尘土、岩石和粉尘随着爆炸进入大气，遮蔽了阳光，带来了死亡。这之后肯定出现过连续的寒冷冬天，就像核战争预示的“核冬天”一样。[2]恐龙随即灭绝，因为它们无法调节体温以应对这种迅速变化。但数千年之后，撞击的直接影响已经消退，最终的结果仍是地球在持续变暖。在1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上升超过百万分之两千（2000ppm），气温上升约7.5℃（前者速率为0.2ppm/年，后者为0.00075℃/年）。在这场大灾难中，受到影响的碳酸岩和页岩以及撞击点燃的丛林火灾和海洋变暖等共计释放了45亿吨（或者说4.5个十亿吨，单位为Gt，等于10^9吨）碳，这造成了大气中碳含量的上升。但当时二氧化碳的增长速率比目前3ppm/年仍低了一个数量级。我们自己目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速度远超任何已知的自然事件，甚至像小行星撞击这样的极端事件也相形见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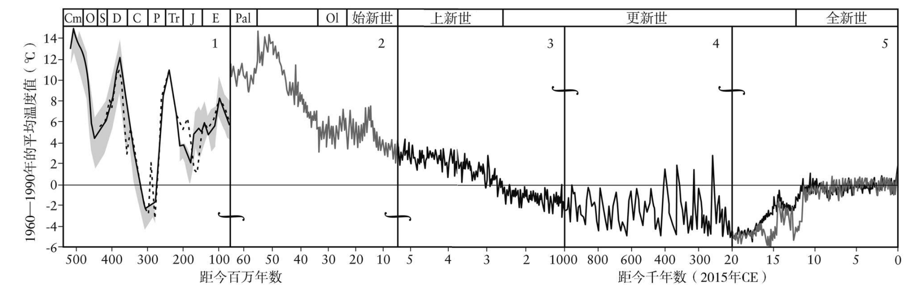


图3.1：地球的温度记录。曲线1是5亿年到8000万年以前温暖期的度数记录。曲线2则是测量深海沉积物中同位素比值得出的6亿年前到600万年前的温度记录，它显示出气温从始新世到上新世的稳步下降趋势。曲线3显示出气温向现在的进一步下降，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300万年以前。曲线4展现了交替冰期，曲线5则展现出我们近期的温度从上个冰期的恢复。

一千万年后，西伯利亚地区大规模释放的甲烷气体（我们并不确定其缘由）也推动着气候变暖，结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升至1800ppm，温度上升约5℃。但上述整个变化持续近1万年，因此，二氧化碳的年增

长率仅为0.18ppm/年，温度上升速度则为0.0005℃/年。这也是地球史上涉及物种灭绝和环境改变的一次气候事件，但其中的二氧化碳上升速度仍低于我们现在的水平。

在这些十分温暖的插曲之后，地球的温度在5000万年里经历了一系列逐级下降的过程。例如，我们可在大洋深处海域的温度记录中看到这一点（插图3.1，曲线2），这一结论可从沉积在海底的有孔虫（可分泌硬壳的微小海洋生物）硬壳中同位素氧-18与氧-16的比值中推算出来。正常氧-16和具备两个额外中子的同位素氧-18的这种比例会随着有孔虫生长其中的海水温度变化而变化。科学家并不确定这种长期温度下降的原因，因为这一进程除了可能涉及温室气体的增加，还涉及5000万年大陆板块分布的变化，南极洲向高纬度地区漂移和冰盖的持续增长等因素。

这一过程最终将我们带到冰河时期反复出现的“现代”。过去600万年里，地球平均温度一直很低，低到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形状的微小变化也会在地球表面产生辐射分布的细微变化，地球温度随之发生变化并导致了冰川的定期推进和退缩——即冰河时期。十分奇特的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地质学家才最终承认地球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冰河时期，最初称其为“伟大的冰河时期”。这是晚近以来令人尴尬的事件，其持续时长仅为数千年，最终于12000年前结束。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事件直接可上溯至600万年之前的冰河时期和温暖间冰期交替循环的最后一个周期序列。在这之前，如上所述，地球太温暖而无法形成冰期，除了我们行星历史的最早时期发生过的少数特殊事件（冰雪地球），这种事件往往一次持续数百万年时间。周期性冰河时期出现的条件在于，足够寒冷的气候造成天文级别的波动并最终导致冰川的推进和退缩，但也不能冷到让我们处于永久冰河时期的程度。因此，地球历史上冰河时期的温度呈锯齿状波动很可能是某种最近数百万年范围内的现代现象；冷暖时期的交替并非大部分地球历史的特征。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通过化石燃料燃烧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足以抑制温度降至下个冰河时期发生的程度，事实上，这一过程很可能足以完全抑制冰期的周期，进而让地球回到我们数百万年之前经历过的永久温暖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近期主导了我们这个星球且令人瞩目的冰期循环。

注释：

[1] Kirschvink coined the phrase Snowball Earth in a short paper, Kirschvink, J. L.（1992）, Late Proterozoic low-latitude global glaciation: the snowball Earth. In J. W. Schopf and C. Klein, eds., The Proterozoic Biosphere—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2. Subsequent strong support for Snowball Earth came from Hoffman, P. F., A. J. Kaufman, G. P. Halverson and D. P. Schrag（1998）, A Neoproterozoic snowball Earth. Science, 281, 1342-6.

[2] Turco, R. P., O. B. Toon, T. P. Ackerman, J. B. Pollack and Carl Sagan（1983）, Nuclear Winter: Global consequences of multiple nuclear explosions. Science, 222（4630）, 1283-92.



第四章

冰期的现代循环

上新世与冰河时期

我们在上新世（Pliocene， 530—260万年之前）开始进入现代气候时期。上新世时期整个世界的平均温度比现代的前工业社会高出2-4℃，海平面则高出25米。这意味着冰盖上冻结的水体较少，尽管南极洲有冰盖存在，但事实上格陵兰岛在这一时期是无冰的。北极也没有海冰。实际上，我们现在改变地球环境时面临的境况与当时很像，尽管我们并不期待短期内如此大幅度的海平面上升。较高的温度带来了极度蒸发和降水等水文循环现象的频繁发生，这孕育了大量的雨林，茂密的热带草原（现在有些已变成沙漠）和小型冰盖（约占目前冰盖区域的三分之二）。早期人类的祖先也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上，但因为数量甚少而无法影响气候进程。农业则因为极端的倾盆大雨和热浪而无法出现；而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会想到去种植种子并盼着它们生长。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便是，气候比之前更冷，但对冰期循环的产生而言还是太热。

但随后，上新世时期的气候却持续变冷。人们直到最近还认为，降温的一个推动因素便是大陆板块的不断漂移，这一过程创造了巴拿马地峡，进而南北美洲不再分离。这种结果又破坏了巨大的赤道大洋环流并阻止了太平洋温暖的洋流流入大西洋，后者因此而逐渐变冷。然而，科罗拉多大学的彼得·莫尔纳（Peter Molnar）最近已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表示，巴拿马地峡在2000万年而非300万年之前便已形成，因此它本身无法成为气候冷却进程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原因，但气候记录的确显示，约在300万年之前上新世行将结束的时候，全球气候已变得足够寒冷，进而冰盖能在格陵兰岛上形成，这一时期已为现代冰期循环准备好了条件。

近期的冰期记录

世界气候在上新世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地球已经历了20亿年缓慢的气候变化进程，且温度一般而言都高于现在，但降温的罕见情况的确已经发生，并产生了一个严酷而漫长的冰河时期，这可能将整个地球冰冻至“冰雪地球”的状态。我们在之前数万年的时期内并不具备气候冷暖周期的选项，但这种选项正开始出现。我们并不知道冰期循环会持续多久——并且我们自己目前的行为可能已经破坏了这种循环。

冰期循环的气候变化证据以冰芯（ice cores）的形式保存在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之中，我们对此已有很好的记录。当雪花飘落在现有的冰盖之上，它就会形成一个将被之后年份新的雪花覆盖的冰层，而先前的冰层就会受到挤压。每个单独年份冰层的厚度逐渐减小，并且其密度随着上面新冰层的挤压而变大。新鲜降雪的密度可能仅为300千克/米^3，但当它受到挤压而位于新的冰层之下50米时，其密度便会升至800千克/米^3。压缩会改变其性质，积雪从之前轻薄片状结构的雪花变成更细颗粒的结构，又称粒雪（firn），最后变成冰体本身。雪花受到挤压变

成冰体之后的密度通常会变成800千克/米^3。低于这一密度时，粒雪晶体就会与空气和融水分离直到足以在它们之间自由穿梭。密度为800千克/米^{3}的粒雪晶体会因压力而紧紧相连，粒雪本身也成为了连续体，尽管其中的空气孔道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为封闭的气泡，但它们会随着后续的挤压而逐渐收缩。冰盖底层中会在高压下形成十分微小的气泡。冰盖顶层每一年的冰层厚度都能得到测量，并且人们可清楚地看到垂直的剖面是否形成，就像平顶冰山（tabular iceberg）的侧面一样。再往下，受到压缩的冰层就变得越来越薄，直到无法辨认单独年份的程度，此时，我们就必须根据自己对冰体压缩的知识来计算其年龄。

因此，大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可追溯至百万年前的冰体分层记录，如果我们钻探冰盖至基岩便能得到它们。这就是我们并不十分确定冰期循环何时开始的原因。我们如何解读这些冰层记录？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来计算降雪形成冰层时的温度。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氧元素有两种原子类型，即同位素，分别为“正常的”具备8个质子和8个中子的氧-16（O^{16}），和更为稀有的多出2个中子的“重”氧-18（O^{18}）。通常O^{18}仅占2‰。水分从海面蒸发时，较轻的水分子（H^2O^{16}）比更重的水分子（H^2O^{18}）更容易蒸发。这种具有更高O^{16}浓度的水蒸气会在云层中凝结成冰晶，其中又会发生进一步的分馏。雪花形成、落下时的空气温度条件下O^{18}与O^{16}在其中的相对比值计算实验也已完成。这种实验是过往气候的完美温度计。科学家也想出了更聪明的办法从冰层中高度压缩的气泡里提取少量空气，并分析其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所以，我们不仅知道过去一百万年的温度变化，而且还知道当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此外，大气中的尘埃浓度能告诉我们当时气候的干燥程度，以及当时地球上的沙漠面积。最后，大型火山喷发留下了火山灰层，这提示我们火山爆发时可能的气候变化。最近的一项研究确定了过去2000年中的116次火山喷发，最大一次为1257年的神秘喷发，它肯定对之后2~3年的气候产生了影响，我们最后将这次喷发归结为印度尼西亚的萨马拉斯火山（Samalas volcano）。第二大的火山喷发发生在瓦努阿图（Vanuatu）附近，第三大喷发于1815年发生在坦博拉山（Mount Tambora），这最后一次喷发导致7.1万人丧生并造成欧洲1816年的“无夏之年”，随后发生了作物歉收，并加剧了拿破仑失败之后随即产生的巨大社会动荡。[1]

人们首次钻探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获取冰芯的活动始于1950—1960年代，而解读这些冰芯记录的工作也随即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分析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改进，因此一开始，人们仅得出了冰期和间冰期的大致记录，而现在，我们能得出十分详细的温度和气体成分记录，它们显示出大量原因不明的温度偏差以及我们如何进入和走出冰期，以及（更神奇的）过去四个冰期彼此如何相似等方面的超详细记录，就好像地球一直经历着某种正常的气候交替过程。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交替？

冰期的天文理论

解释冰期循环模式关键要归功于1920年的南斯拉夫科学家米卢廷·米

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尽管同样的评价也可归于詹姆斯·克罗尔（James Croll），后者是苏格兰一位从未受过教育的卓越科学家，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安德森学院及其博物馆）的科学图书馆里担任看管，通过阅读那里的书籍获得了科学知识。他于1867年提出冰期循环解释机制，但世人如今才开始认识到他在冰期理论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2]

冰期循环模式的想法意味着，尽管一年之内到达地球的辐射总量基本相同（太阳常数），但由于地球轨道的三种波动模式（插图4.1），太阳辐射随季节和纬度的分布相应会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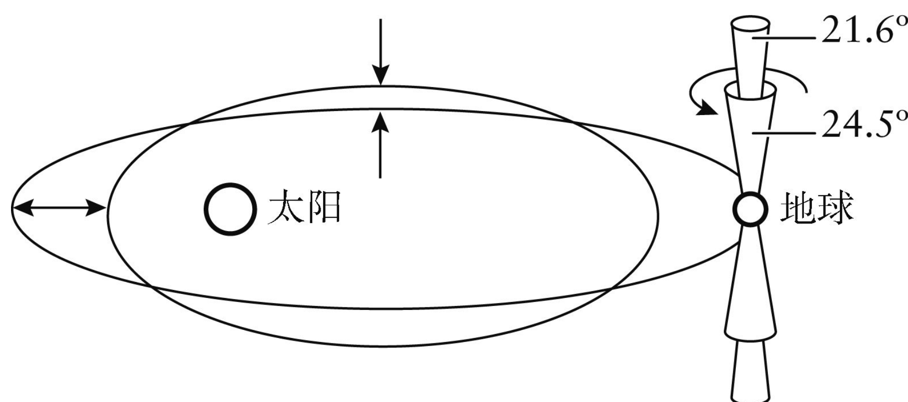


图4.1：地球轨道的三种波动模式。

首先，地球绕太阳旋转的椭圆轨道的离心率会发生变化。这个轨道近似圆形。当它接近圆形时，全年落在地球上的太阳辐射都一样多，但当离心率最大时，太阳辐射每年都会有明显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当离心率为0.0167时，地球轨道半长轴的长度为地球太阳平均距离的1.0167倍，而半长轴最小距离则为此平均距离的0.9833倍。地球轨道形状从最大离心率到最小离心率，再从最小离心率到最大离心率的变化周期为10万年。

第二种波动则因地球自转与地球轨道轴线之间的角度造成。当二者角度为23.5度时，太阳垂直照射的纬度达到极值（分别对应北回归线23.5°N的巨蟹宫和南回归线23.5°S的摩羯宫），超过这一纬度的部分地区一年之中至少有一天太阳不会落下或升起（即南北纬66.5°以上的南北极圈内）。这一旋转角度跟陀螺仪类似，它会在21.6°和24.5°之间变化，周期为4.1万年。我们习惯将热带和极地圈视为地球上的不变区域，但并非如此；它们实际上会在270公里的范围内南北移动。

最后，第三种波动发生在一年中地球在其椭圆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时刻，即近日点（perihelion）。这个日期也有着跨度为2.3万年的周期，目前是在12月。对于北半球的居民而言，深冬时节恰好是地球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这三种波动中的每一种都会改变太阳辐射的年度和纬度分布。尽管分布差异较小，但它会因地球是一个不均衡的星球而造成一定影响，即大部分陆地在北半球，大部分海洋则位于南半球。陆地和海洋吸收辐射的差异造成了米兰科维奇的辐射差异，全球气候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预计地球平均温度会形成一个代表了这三个周期的加总的缓慢变化曲线，波长为数万年。由于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加总而导致的天文气候力量的确变化不大，但与其相应的地球温度变化却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缘由。

冰芯的记录

插图4.2显示了过去40万年左右的气候记录，我们对冰芯的分析能得出温度（O^{18}～O^{16}比值）、二氧化碳和甲烷水平（从其中的气泡得出）等信息。其中两个结果让我们很吃惊。首先，冰期变化是有步骤的：间冰期的高温对应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低温则对应低水平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其次，这些记录并不像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那般呈平缓的变化曲线，而是呈锯齿状变化。地球曾经历过混乱的冰期，即在1000～2000年内迅速升温10℃从而进入间冰期状态，之后又迅速开始再次冷却，随后，在1万年的缓慢且稳定的降温后最终达到下个冰期的温度极值。值得注意的是，本期40万年的记录所涵盖的4个冰期的持续时间有所不同，但却有十分类似的气温和大气变化史。四个冰期的气温都呈缓慢下降的线性趋势，一直到进入下个冰期的最冷时期，中间也会有微小的摇摆。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降至180ppm，甲烷则从700ppb（ppb为十亿分之一单位）降至400ppb。而在恢复期，这三个数又会回弹至之前间冰期的数值。我们现在所在的间冰期至少与之前的三次类似。这一切发生的方式和原因又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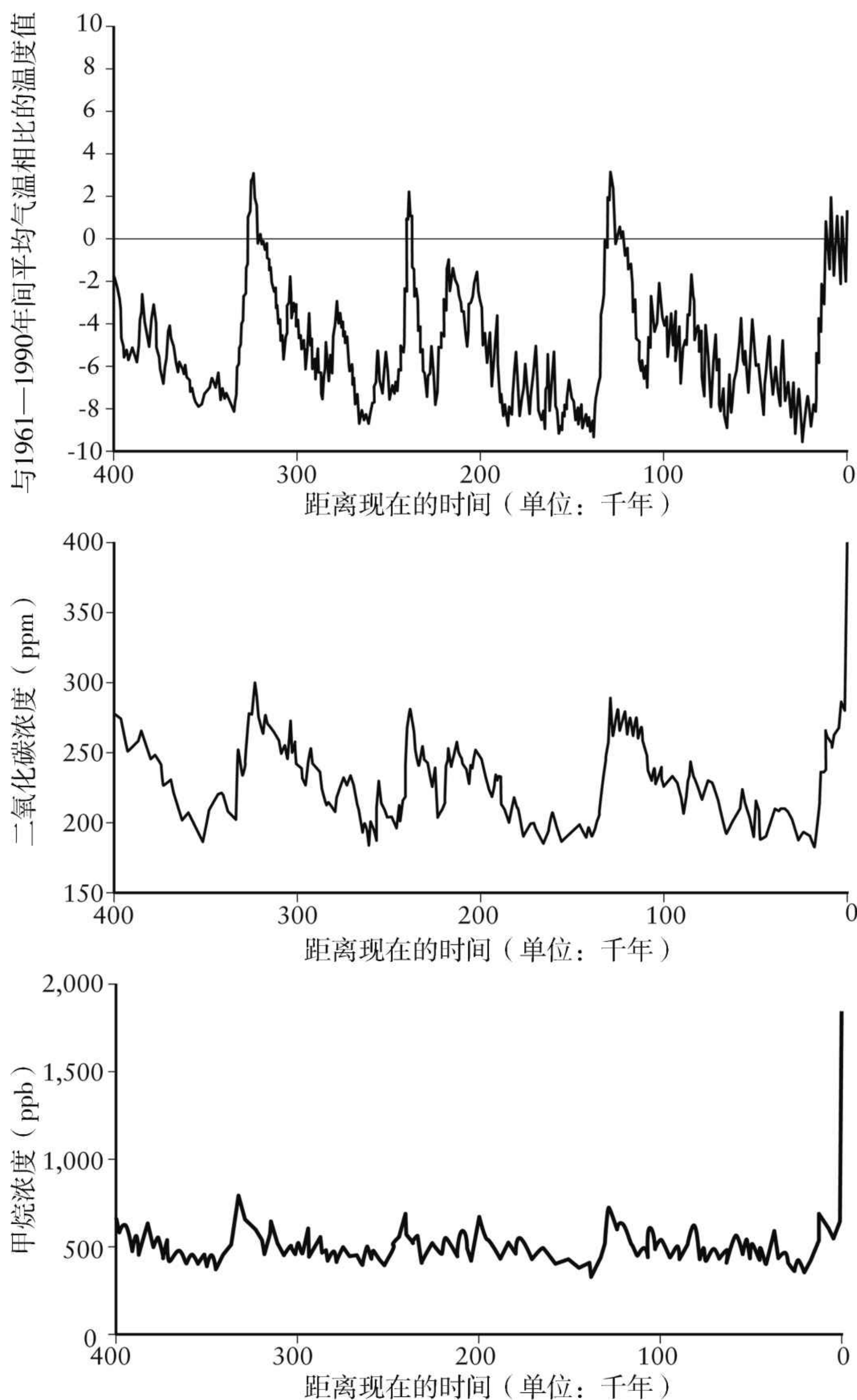


图4.2：过去40万年冰芯中的气候记录。请注意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曲线外形的相

似性。

这个惊人的气候记录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尚未得到解答。首先，为何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会呈现如此明确的波动状态？当我们考察地球历史早期中的冰期证据时，它们都只是一次性事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都导致了一次性的最终状态。因为至少在过去100万年中，我们有着可预测的冰期历史（符合米兰科维奇理论，除了相应的锯齿性质），每个冰期都对应着同样的温度周期和二氧化碳、甲烷浓度水平周期。以此为基础，按照米兰科维奇理论（暂时抛开我们对地球造成的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能预测距离下一个冰期还有多久，它又会持续多久，全球气温将会如何变化，并得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水平在下个冰期最冷时的值分别是180ppm和400ppb。我们可以从过往冰期的重复中认定，这种循环将持续发生。但毫无疑问，冰期循环有个开端，这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天文驱动的冰期循环何时以什么方式开始的？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冰芯记录让我们干着急地仅往前回溯了100万年，因为最底层紧挨基岩的几厘米冰芯不仅受到极度挤压，而且被地热轻微地融化了，所以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回溯至100万年以前。冰芯记录的最底层由于受到极度挤压而不可靠，而且正是最近40万年的记录才最好地证明了期间4次冰期气候波动的规律性（插图4.2），尽管之前的数据显示同样的冰期模式还在延续。

地球气候进入到米兰科维奇周期刚好足以推动世界从冰川期到非冰川期转变（反之亦然）的状态肯定有一个起点。在此之前，气候太热而无法形成冰川，即便达到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最小值也不行。似乎现代冰期的起点就是上新世结束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当时形成了多少冰川。这100万年的冰芯记录包含6次或7次冰期，所以这一时期可能总计曾有过至多20次冰期，尽管我们无法知晓更早的冰期是否与最近4次的冰期重复历史一致。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曲线为何呈锯齿状变化？我们可从定性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即冰盖的消失比它的形成更容易。由于天文级别力量的影响，大气温度会下降，原先无冰地球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开始累积冬季的降雪，直到过完随后的夏季都不融化。然后，下一个冬天的降雪又堆到上个冬天的积雪之上，永久积雪就此形成，它会逐渐变厚，进而转变为冰川或冰盖。这一过程很缓慢，但它会逐渐造成消极的反射率回馈并让降温效应倍增。冰川世界正慢慢发展。然后则是天文力量的逆转。空气温度逐渐升高。这一点意味着，逐渐形成的冰川表面会很快地融化，但它只能以每年一个冬季雪层的速度生长。冰川增长的速度有着物理上的限制，但冰川融化速度却没有。当冰盖遵循锯齿波动模式时，气候也是如此，因为空气温度受当前冰量的调节，进而空气温度也遵循锯齿波动模式。因此，“锯齿驱动器”就是冰盖体积，或至少是其表面积。

随后一个问题是，为何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水平与气候变暖和变冷同步？难道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驱动因？我们现在习惯了额外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能让气候变暖，从而消融冰盖这种观念。二氧化碳是驱动

力，气候变化是对它的反应。然而，比如在冰期-间冰期的循环中，是二氧化碳含量首先升高，随后导致了冰盖融化呢，还是冰盖的融化仅仅是其对空气温度升高的反应，抑或同样因为气温升高而导致植物生长加快，其呼吸作用又导致了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测试气温、二氧化碳和甲烷水平之间的时间延迟，以确定何者驱动了何者的实验也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果：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因素的先后顺序。事实上，情况比我们最初想象的复杂许多。如果植物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多（如果陆基区域变暖，这倒很有可能），那么来自大气层的碳就会被增加的大量生物吸收。如此的年度循环机制会在春天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将其转化为糖、木质素和其他长期存在且不会过期的碳基结构。此处的问题在于，植物生长（至少一开始）很可能会吸收或捕获二氧化碳。现在被广泛置信的另一个理论是，温度的轻微变化会导致气体从海洋表面释放出来：温度增加，所以海洋表面开始释放二氧化碳，这反过来又加速了温室效应，进而增加了水蒸气浓度并创造了一个反馈环，气温随后进一步增加。

另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冰川和间冰期的温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是否代表了气候系统波动状态的两个自然终点？如果是这样，二氧化碳就有某种“自然”的气候敏感性，这可以通过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量除以冰期到间冰期温度的上升度数计算得出。这种敏感性会告诉我们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地球气候会调整自身并适应我们人类排出的大量额外二氧化碳的窘境吗？如果我们运用冰期-间冰期的敏感性评估得出气候有时间完全适应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又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骇人的，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处理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蛮可以说，以这种方式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浓度翻倍的话，其敏感度将不低于7.8℃，而我们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足以导致3.6℃的温度增幅。[3]很显然，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但只要时间足够，它很可能会发生。这一高值被称为地球系统灵敏度（Earth System Sensitivity）；这远高于气候对二氧化碳增加的短期敏感性，但它提示出如果我们无法降低高企的二氧化碳排量，地球气候最终或者几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如何从上个冰期中诞生

随着我们回首过去1.2万年（这只是地球史上的一瞬）这一时期，地球气候中的漫长冰雪历史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一时期的地球开始从上个冰期中露出端倪，（临时）稳定的气候得以形成，足智多谋到能够发明农业，并因此发展了城市、建筑、货币、数学、军队以及科学的人类也逐渐产生。艺术早至冰川时期便已存在，很可能音乐也是如此；其他的善报（或恶果）最终都源于农业盈余以及保护固定田地免受闯入者的需要。

这一切都出现在稍稍不同于以往的冰期中，即我们似乎又暂时走向了之前从中走来的冰期。引起这种倒退的是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其名字来自一种名为仙女木的高山植物，也是为了与这之前（自然地）名为“旧仙女木”的事件相区别。上个冰期在大约2万年前达到顶峰，随后冰川开始迅速融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锯齿状的陡峭部

分。这一进程在1.28万年前将我们带至接近现代的温度水平，但突然之间，北半球和热带地区的气温又在接下来的1300年里朝着之前的冰川温度下降，之后我们再次迅速地让自己摆脱了这种境地。南极冰芯中并没留下这一事件的记录，因此它显然是北半球独有的现象，当时格陵兰岛的气温就降至比目前低15℃的程度。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个位于现在哈德逊湾名为阿加西斯湖的冰川湖因为冰盖的扩张而没有排入大洋，湖上冰盖从巴芬岛（Baffin Island）一直向下延伸至海中。一定程度上，这个冰盖由于气候从冰期恢复而撤退，冰体大坝不再，大量淡水随之排入大西洋。这些增加的淡水终结了格陵兰岛和拉布拉多海之间的对流，减缓了热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见第十一章），气候随之再次变得寒冷。这是一个不错且合理的故事，但缺乏观察证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利·布勒克（Wally Broecker）谈到这个倾泻而下的湖水所携带的“冰山舰队”（armada of icebergs）时说，这是一幅吸引人的图景，但并不很可靠。

在新仙女木事件的插曲之后，地球气候在8000年前迅速升温至比今天稍微暖和点的水平，从此变得非常稳定。当然，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间冰期，因此气候的稳定印象仅为幻觉。事实上，从公元1000年到工业革命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温度缓慢下降的过程，这体现在著名的曼恩-布拉德利（Mann-Bradley）“曲棍球棒效应”（hockey stick）这一全球温度记录中[4]（插图4.3），其中球棒长长的“手柄”就代表了温度缓慢下降的过程，“叶片”则意味着气温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迅速上升。但是，此时的气候较之前四个间冰期都要稳定和持久，这给曾在上个冰期靠狩猎过活的智人（Homo sapiens）创造了机会学习作物种植，并在固定地点定居静候其生长。为了避免他人侵占别人播种过种子的土地，新出现的农民需要一个能够确认其土地权的组织，相关事宜包括测量土地（因此会发展数学），写出权利契约（因此会发明文字），并在侵略者和入侵者面前保护其权利（因此会发明警察和军队）等。上述事项没有任何一项为冰期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所必须。而那些种植这些农作物的人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可能被组织起来建造纪念碑、巨石寺庙和坟墓，这些建筑代表了为其提供保护的组织。此时的人们也有时间思考艺术和哲学，甚至科学。当人们播下第一批从上一年草丛中采集的种子以提供来年的食物时，我们的现代世界便诞生了。所有的好处与弊端都逐渐显现。我们将整个人类文明归功于间冰期稳定的气候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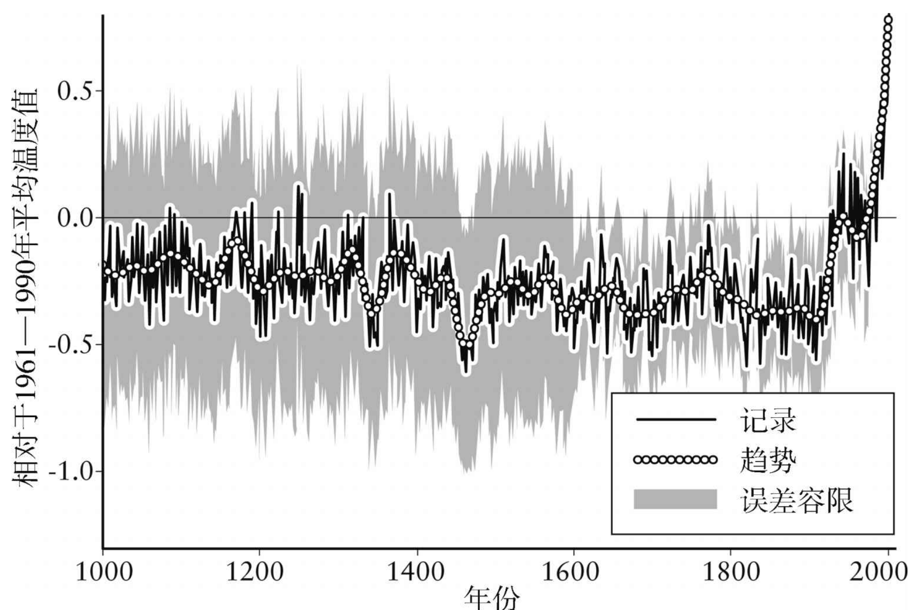


图4.3：曼恩-布拉德利曲棍球曲线。过去1000年中北半球气温变化曲线。

另外，我们要记住，文明的重大发展由“他”[*]开创这一点并不明显。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像现在的因纽特人一样）中，男性从事危险的狩猎活动，女性则收集浆果和其他食用植物。可能正是女性，注意到了可食用的草类总是重复出现在某些地点并且可对其进行人为耕种。

冰期结束以后，海平面迅速上升，海水淹没了早期沿海定居点，相关遗迹也必须在海里寻找。关联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陆地被考古学家称为“多格兰”（Doggerland），它于公元前4200年被淹，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随之形成。海平面上升的过程基本上在5000年前完成，此后，海平面一直保持平稳，直到20世纪才开始再次上升。这意味着整个文明史都发生在海面平稳的时期。我们在地中海沿岸能看到这一点，[5]那里的古代沿海城市依然存在，罗马的石盆捕鱼陷阱置于水中时仍能使用。

而当时的北海则明显比现在温暖；史称“中世纪的温暖时期”。维京人在公元前1000年时殖民了格陵兰岛，当时的气候还让他们能为牲畜种植干草。但从1400年起，气候开始恶化，有时候人们又称其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最终，殖民地消失了；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气候，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任何细节。看来，挪威定居者并不想放弃欧洲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因此继续保留了家畜，而没有复制与其交往的因纽特人靠捕猎海豹为生的生活方式。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搁置熟悉的习惯对他们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下个冰期何时到来？

我们估计，用米兰科维奇理论来预测未来的话，气温会在未来2.3万

年的时间里明显下降，地球会因此进入下个冰期。但是，现在我们在地球上造成的大量额外温室气体难道不会延迟，甚至抑制下个冰期的出现吗？直到最近，气候学家还说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但现在，目睹了地球变暖的飞速进展及众多不断起作用的反馈机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改变了地球未来整个（包括短期）的状态。未来的冰期很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被推迟了。一项研究表明，下一个米兰科维奇循环将不会产生冰川，我们在未来50万年里也不会经历另一次冰期。[6]最近一项仔细考察了米兰科维奇理论在北半球夏季如何起作用的研究[7]表明，即便持续、适度的碳排放也会将下个冰期推迟至少10万年。其中一位名为汉斯·约阿希姆·舍尔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的作者评论说："这清楚地表明，我们早已进入一个新纪元，而人类本身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也已成为某种地质力量。事实上，人们可能引入一个名为'冰消期'的地质时期。""人类世"这一术语由诺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用以表达我们已处于一个崭新（接替全新世）的地质时期，而智人在这一时期里正在对地球性质产生重要而可观测的影响。

这一切都言之有据：260万年前，地球比今天暖和2~4℃，这对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冰期而言还是太过温暖。如果这就是"关闭"（或不开启）冰期所需的温度，那么我们正在大踏步向它迈进。如果一切照旧，那我们将会在2100年回到冰期循环的关闭状态。即便在上新世，地球也需要一些额外的冷却以进入到开启米兰科维奇波动的状态。因此，我们所认为的冰期无限循环模式，即冰川生长、漂移，进而地球变暖、冰川融化的模式真的只是某种短暂现象，它依赖于地球达到某种特定的合适温度，且陆地和海洋也要处于特定的位置。而地球在过去200~300万年经历过的一系列冰期本也是它现在即将经历的，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将使它远离可以维持周期性冰期的状态。

这是福是祸？我本能地感到，气候的任何人为扰乱都是灾祸。但化石燃料的狂热支持者可能会说，如果能阻止下次冰期的到来，我们燃烧大量碳化石能源的行为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人类只是在上个冰期之后稳定的温暖期才设法定居下来，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过去数千年来的各种伟大文明。这个论证可能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明显已经过火。正如我在下一章所证明的，我们对气候的人为介入并不会止步于阻止或推迟下个冰期的到来这种良性结果，而是很可能导致地球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速变暖。

注释：

[*] 即男性。——译注

[1] Stothers, R. B. （1984）, The Great Tambora eruption in 1815 and its aftermath. Science, 224（4654）, 1191-8.

[2] Croll, J. （1875）, Climate and Time in their Geologic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Secular Changes of theEarth's Climate. Reprinted 2013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ibrary Collection.

[3] Wasdell, D. （2015）,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4] Mann, M. E., R. S. Bradley and M. K. Hughes（1999）,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inferences, uncertainties and limita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759-62.

[5] Arenson, S. (1990) , The Encircled Sea. The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ivilisation. London: Constable.

[6] Tzedakis, P. C., J. E. T. Charnell, D. A. Hodell, H. F. Kleinen and L. C. Skinner (2012) , Determining the natural length of the current interglacial. Nature Geoscience, doi:10. 1038/ngeo1358.

[7] Ganopolski, A., R. Winkelmann and H. J. Schellnhuber (2016) , Critical insolation—C0□2 relation for diagnosing past and future glacial inception. Nature, doi:10. 1038/ nature16494.



第五章

温室效应

上一章，我研究了自然的天文周期，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让我们在冰期（北半球大部分被冰盖覆盖）和间冰期（冰盖又撤退至格陵兰和高山等处）之间往回穿梭。南极洲则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上一个间冰期大约发生在13万年前。当时刚从非洲人科物种演化而来的智人尚未占据充分利用当时环境的龛位。智人能利用其超常的智力满世界扩张，并殖民那些与其故乡十分不同的栖息地。他们是会制作石器的狩猎-采集者，但还是太原始或者数量太少而无法发明农业，进而过上定居的生活。紧接着下一个冰期出现了，智人在高纬度地区需要克服的挑战便是活下去。仅在目前这个间冰期，人类才得以通过技术改变环境，并且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技术仅在过去200年中才出现。我们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自然，我们对环境的改变远非排放二氧化碳这么简单。别的改变还包括清理土地（这项活动已持续了数千年），破坏森林，利用（和耗尽）水资源以及种植作物。但为我们工作的机器却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这项发明所需能量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最大。我们来看看自己排放的气体如何导致了这种气候变化。但首先，让我们考察产生了我们自己的自然温室效应。

自然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基于十分简单的物理学原理。如果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且以目前地日距离绕太阳旋转的球体，我们从一个单独的方程式（基于1884年所知的科学知识）便能推出其均衡温度。然后我们为其添加一个大气层，看看它对温度有什么影响。我们将看到，自然中的大气会让地球变暖——即所谓的“自然温室效应”——而我们现在加入大气中的气体让其变暖更多。

作为开端，让我们将地球想象为没有大气的球体，仅靠来自太阳的辐射加热。随着地球变暖，它也会因为自身的温度而辐射能量。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能告诉我们地球能达到的温度值。假设这一值按照绝对温度（°K）计算为T（即高于绝对零度的温度），它等于摄氏温度值加上273.16。

我们假设太阳以恒定的速率释放辐射。它可以表示为太阳表面温度（其值为6000℃）的函数，此函数值会因为太阳黑子活动效应而随时间轻微变化，但它在数十亿年的时间跨度上则呈缓慢上升趋势。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地球上每平方米的面积在地日距离上接收到的阳光总量是恒定的。这一数值即为太阳常数，每平方米1.37千瓦（kW/m^{-2}）。换句话说，如果在直接面向太阳的卫星上有一个效率为100%的太阳能电池，那么该电池将能够产生每平方米1.37千瓦的电能，这远远高于单片电暖炉的功率。这是太阳能发电能够实现的绝对最大能量密度，这也是收集太阳能需要很大集电极的原因。

所以，每平方米阳光抵达地球时携带的能量为1.37千瓦。那么，地球总共拦截了其中多少能量呢？这一数值为太阳常数乘以地球的横截面积πR^2，R为地球半径。这些能量部分被直接辐射回太空，因为地球在可见的频率下并非一个完全的黑体（黑体会吸收落于其上的所有辐射）。

以分数α表示的太阳辐射比例被直接反射回去。α的值为0.3，它表示地球整体上的反射率。因此，$\pi R^2 S(1-\alpha)$得出的辐射水平便为地球吸收的辐射总量。

地球由这些辐射保持温暖，但随着温度的升高，它自身也会释放辐射。1884年提出的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Stefan-Boltzmann Law，由约瑟夫·斯蒂芬及其学生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这两位杰出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所发现）描述了绝对温度为T的物体每平方米面积所释放的辐射量。他们发现，这一辐射量与T^4（物体绝对温度的4次方）和比例常项σ（用数字表示则为5.67×10^{-8}，其单位则为瓦每平方米°K^{-4}）成正比。据此，较热物体释放出的辐射量远大于较冷物体。德国人威廉·维恩（Wilhelm Wien）则于1893年发现了另外一个定律，它描述了物体辐射在可能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太阳温度的峰值处于可见光范围——所以太阳看上去为白色，但实际又白又热——而其较冷的表面仅为红热色，地球的低温环境让我们根本无法看见其辐射，但我们能测量它，进而发现它位于微波范围内。

因此，整个地表便在其现有温度上以σT^4每平方米的总量向外辐射热量（我们假设地球在如此低频的水平上的确是个黑体），地表面积为$4\pi R^2$（因子4为地球整个表面积与其拦截太阳光横截面面积之比）。如果我们愿意，也可将其乘以辐射系数ε（值域为0到1）。常温下，地球就像一个“黑体”一样释放出辐射，它就是一个完美的辐射体，但如果保留辐射系数，我们就能看出增加温室气体的影响。

如果地球是太空中孤立的星球，那么这两种能量必然会保持平衡——地球发出的辐射量等于其从太阳处收到的辐射量，因此，地球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温度T上，即地球的均衡温度。要找到T，我们需要求解如下方程式：

$$4\pi R^2\varepsilon\sigma T^4=\pi R^2 S(1-\alpha)$$

通项并稍微重排之后，我们便得到：

$$T^4=S(1-\alpha)/4\sigma\varepsilon \qquad \text{（方程式1）}$$

这是我在本书中唯一使用的方程式，但它很重要，因为热量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简单平衡定义了地球的宜居性。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方程式的解为T＝255，即-18℃。换句话说，如果地球上没有大气，地表平均温度将会低于冰点。如此，我们就会有一个冰冻、死寂的世界。此外，我们也看到，地表温度也不取决于地球半径，而仅取决于它与太阳的距离。因为离太阳的距离和地球一样且没有大气的月球的平均温度也是-18℃。

但是，地球温度很显然高于-18℃。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如下：地球表面附着的大气层含有的气体能部分吸收从地表发出的长波（微波）辐射，并让几乎所有入射的太阳短波（可见的）辐射从中穿过。地球真的就像一个温室，温室的玻璃允许太阳辐射进入并将其加热，但却阻止大

部分长波辐射外溢。因此，这些气体的作用就被称为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

如果考察一下发挥这种功能的气体，我们能看到仅有特定种类的气体很重要。插图5.1显示了卫星测得地中海上空的地球辐射。平滑的虚曲线表示温度为7℃时能量的理论分布，根据维恩定律，这大致就是地球向太空辐射能量的大气层温度。然而，实线才是卫星实际观测到的曲线。这两条曲线共同表明，卫星下面的大气就像以7℃的温度水平有效释放能量一般，但在这个光谱的不同区域存在巨大的漏洞，使得这些地方释放的能量远低于维恩定律的预测值。这些漏洞被称为吸收带（absorption bands），它是由分子移动到更高的能量水平而产生，在这一过程中，电子会获得能量，或者分子整体的旋转或振动会改变至更高的水平。根据量子理论，这些改变只能在离散的步骤中发生，分子会在这一过程中吸收特定频率的电磁能量子。因此，在某些固定能量频率或某些频率带（这种影响会因为分子的复杂性而扩大），分子会吸收射向它的一些能量，从而减少继续传播的能量。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从地球向上射出的能量，会发现特定气体会吸收这些频率带中的能量，进而让地球射向太空的能量变少。这种机制就是天然温室效应的基础。那何种气体又会有效地吸收能量呢？事实证明，大气中最常见的氧气和氮气在地球释放能量的频率范围内并没有吸收带。如插图5.1所示，那些吸收能量的气体为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N_2O）和臭氧（O_3）。它们被称为温室气体，尽管占大气组成的很小部分，但它们对地球气温升高到产生液态水进而达至维持生命的程度而言至关重要。

如插图5.1所示，水蒸气在低频和高频能量范围有着较宽的吸收带，而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臭氧则在中频能量范围内有着更窄的吸收带。二氧化碳有着最深的吸收带，且刚好位于能量光谱的峰值处，该处意味着射向太空的能量最大。单就本图的证据而言，我们能预期二氧化碳乃最危险的温室气体，事实的确如此。

那么，所有这些温室气体的总体影响如何？我们从插图5.1能看出，它们降低了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考虑到它们对所有波长能量的影响，则地球释放辐射的速度低于完美的黑体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地球的有效辐射系数值ε小于1（温室气体越多，这一值越小）。如果再回头看看本书唯一的方程式，我们会发现，其左侧的值在减少，因为地球辐射的能量低于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的预测值。但方程式右侧（从太阳处获得的能量）的值则保持不变。因此，方程式两侧保持平衡的唯一方式就是T值增加。等式1表明，T^4随着$1/\varepsilon$而变化，因此，ε值降低则T值增加。地球必须升温以补偿其射向太空的能量。这种天然温室效应便足以将温度T从-18℃提升至15℃，我们十分熟悉且适应这一温度，它就是我们宜居地球的平均温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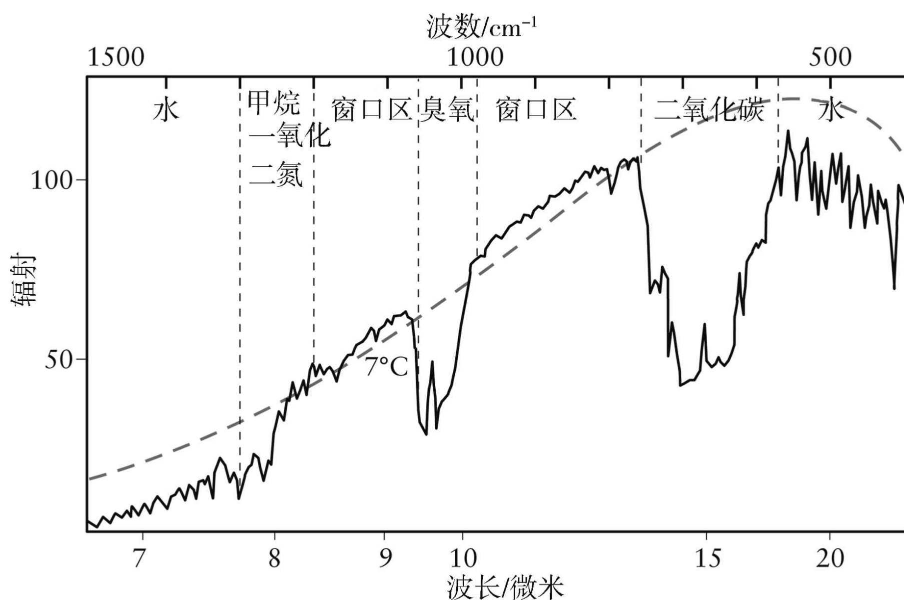


图5.1：卫星在地中海上方测得的大气顶部辐射通量。8-14微米（无云）大体上透明的吸收带，除了9.5-10微米波长范围的臭氧吸收带（“窗口区”）以外。其余则为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吸收带。重叠部分为温度为7℃、-13℃、-33℃和-53℃的黑体辐射曲线。辐射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每球面度每波长数。

可憎的二氧化碳分子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天然温室效应让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缺了大气，我们的世界将进入冰冻的死寂。但假如我们改变大气的成分又该如何？特别是，如果我们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进而增加插图5.1所示的15微米波长附近的能量吸收又该如何？首先，我们会进一步降低地球的辐射系数，因此温度T必须进一步增长以维持均衡。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导致气温升高。我们没法避免这一结论。它是基本的物理规律。否定它就像否定地心引力或者声称地球是平的一样。然而，仍有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否认二氧化碳水平和气温之间的任何关联。所以，我们要强调：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气温上升。二氧化碳增加得越多，气温上升越高。上文的等式绝对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随着工业革命所需的能量超过了水电的供给，以及这种需要导致的煤矿、铁路和蒸汽机燃煤的发展，人类于19世纪首次开始向大气中大量增排二氧化碳。烧煤蒸汽机一直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直到19世纪末石油和电力的出现为止（位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一口现代油井晚至1858年才开始钻探）。即便新发展起来的电网也主要由燃烧煤炭的电站供电。随着内燃机和道路车辆的无休止增长（始于1886年第一辆奔驰汽车的出现），燃烧石油才越发重要。这一进程发生于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提出的两年之后，该定律让我们认清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正在让地球变暖

的事实。

我们本可以预见到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无知多少也情有可原。回想起来，我们会看到二氧化碳水平于19世纪中叶开始从上个冰期280ppm的水平迅速攀升至300ppm以上（现已超过400ppm，几乎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上升了50%）（插图5.2）。我们仅仅因为现在能够分析冰芯气泡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才知道这一事实，而直到1958年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Mauna Loa）建立了二氧化碳监测站之后，人们才开始系统地从事相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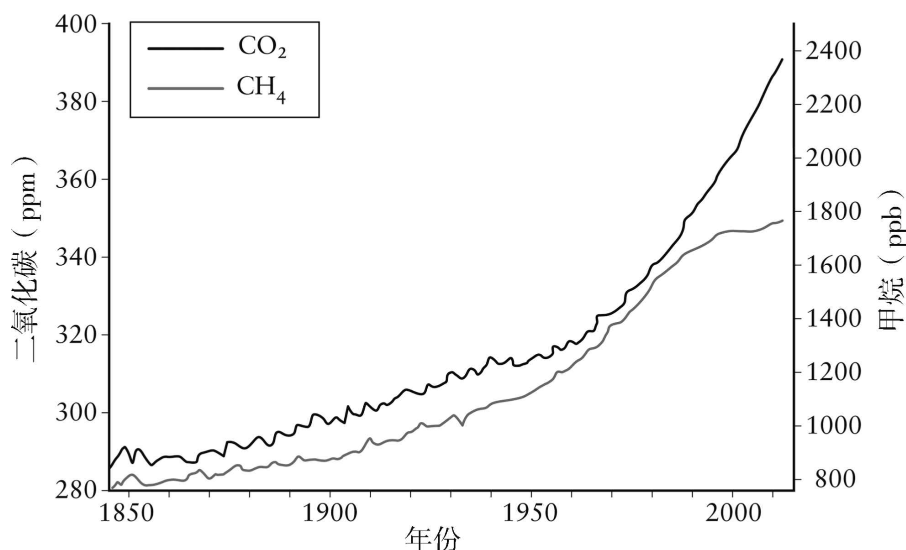


图5.2：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水平（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5次评估报告）。

为何我们直到人为的温室效应变得如此明显的20世纪晚期才注意到它？好吧，一开始并不存在将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含量关联起来的理论。关键性的斯蒂芬-玻尔兹曼和维恩辐射定律直到1884年和1893年才被发现，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 1859年—1927年）于1896年依据这一定律提出了首个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的理论。[2]所以我们19世纪都只顾着烧煤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导致温室效应。

其次，我们缺乏全球气温的良好数据。英国气象局由舰队司令菲茨罗伊（FitzRoy，达尔文环球航行时曾担任“小猎犬号”的舰长）于1854年成立，很快，众多类似的国家机构纷纷成立，但其主要任务是天气预报，因此，甚至整合各地气候统计也耗时良久（在英国，乡村牧师以发送手写报告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始于1767年的最古老的连续天气记录保存在牛津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气象站，它曾被用于证明2014年1月是牛津自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1月和其他事项。当然，对于降雨和温度而言，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数据并根据一般情况得出相关结论，能够

胜任此任务的气象网络正在缓慢建设之中。

阿列纽斯并非前无来者，只是其前辈们仅仅提出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影响的定性想法。法国的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 1768年—1830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纪念他发现了傅立叶级数，任何函数都能被它分解为一组谐波（harmonics）。英国的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 1820—1893年）也有类似观点，英国为纪念他而将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最新建立的气候变化研究所命名为廷德尔中心。

与其前辈不同，阿列纽斯用辐射定律从事研究，其得出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他忽略了云层的影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但他得出了我们的等式1，并从该等式出发对二氧化碳的不同增量导致的气候变暖程度提出了进一步的正确分析：

> 如果碳酸（二氧化碳）的浓度呈几何级数增长，温度则仅呈算术级增长。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倍增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温度也只会增加N度。如果我们再将其翻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量），温度还是会增加同样的N度。这对我们二氧化碳排放仍在迅速增长的时代多少算是点安慰。二氧化碳倍增导致的气温升高被称为气候敏感性。阿列纽斯估计N为4℃；目前的估计范围则为2℃到4.5℃，尽管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允许温度“赶上”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一些人估计的气候敏感性会高得多——高达7.8℃。[3]阿列纽斯认为，二氧化碳增量的六分之五会被海洋吸收（实际为40%），因此，大气浓度的增速将非常缓慢，其翻番的时间则为3000年。现在我们知道，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翻番的时间实际为75~100年。即便阿维纽斯严重低估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速度，他仍旧认为这会改善高纬度地区的气候（他并未考虑冰川融化的后果），进而种植更多的作物以养活递增的工业人口。他还认为，全球变暖将延缓下个冰期的到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世人至今仍为这个问题争讼不已。

所以到头来，二氧化碳被认定为气候变化的主因，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它会在大气中阴魂不散这种恶劣性质直到不久前才被人们认清。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气体并非会以纯粹惰性的状态保持在大气中。事实上这些气体十分活跃，并且会参与到名为碳循环（carbon cycle）的一组复杂反应中。它们会被绿色植物和海洋浮游植物吸收，并在蒸腾过程中（借助叶绿素）转化为生物质，同时释放赐予生命的氧气。这是允许动物生命存在的反应，所以它简直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碳在进入植物和树木的结构之后会随着它们的死亡、腐烂、砍伐或焚烧而再次释放。二氧化碳会被海洋吸收，但也会随着温度和洋流的改变而重新释放。实际上，从环境中去除二氧化碳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制成的材料永久埋入地球内部。此类经典例子发生在海底，该处的动物性浮游生物有孔虫死亡后会在海中持续降下小壳雨，进而形成沉积层。这些壳体由方解石这种碳酸钙制成，海洋生物通过食用植物性浮游

生物的方式吸收碳化合物制造这种壳体，浮游生物则以吸收海洋中二氧化碳的方式制造生物质。

我们仍不清楚二氧化碳在气候系统中能有效存在多久。如果我们通过燃烧煤或石油来释放一吨二氧化碳，那么这一吨二氧化碳会在多长时间里对气候产生影响，其影响力又会以何种方式随时间而消减？标准的估计曾是100年，但这是由于对碳循环了解不足而得出的值得推敲的模糊数字。考虑到二氧化碳分子从汽车尾气中释放出来之后的所有可能去处，一直到碳原子最后被埋入深海或岩石中的整个过程，人们现在的预计为上千年。但即便采用最低为100年的预测，我们也清楚，自己在不经意间燃烧化石燃料的行为也为子孙后代种下了祸根。他们会经历我们现在正在释放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持续升温效应，正如我们正在承受“一战”时期的工厂和20世纪50年代的高油耗汽车造成的类似过程一样。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直到最近，二氧化碳都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化石燃料的燃烧、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大气变暖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关联。但其他温室气体也有重要贡献，加总之后，它们对目前大气变暖速率的贡献度约为45%。这些气体其中之一便是甲烷。它在大气中的浓度与二氧化碳同步猛增（插图5.2），实际上可能更快，因为其目前为1800ppb（十亿分之一单位）的浓度水平已经超过其前工业化时期浓度的两倍，而二氧化碳浓度仅升高了50%。甲烷复杂而奇特，因为它有众多天然来源。其中包括有机物在湿地中的分解（因此其通用名为沼气），白蚁的活动产生的化学反应以及食草动物的消化过程，任何造访过猪舍的人都可以作证。海中的甲烷水合物（甲烷和水的高压混合物）是大气甲烷的主要来源，它当然也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但其他的来源则可归于人类活动：天然气管道泄漏，煤炭和石油生产的其他方面，比如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水稻种植（因为稻田中腐烂的植被）以及农场数量的增长（因为全世界肉类消费量的增加，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垃圾填埋场和废物处理工程也是甲烷源。然而，尽管这些人为甲烷源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大气中甲烷的增长却在2000年左右保持了稳定状态，直到2008年才开始重新上升。我们怀疑这新的上升是由于近期北极近海中甲烷释放（更晚的事件）所致，但我们并不理解上述稳定状态。一种可能是，俄罗斯人对其天然气管道正在进行更多的维护，因为之前曾发生过大规模泄漏事件；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天然湿地正在被榨干、抽干或圈占。

尽管甲烷在大气中的浓度比二氧化碳低很多，但它仍构成了气候变化的实质性增量，因为它是一种强大得多的温室气体。以100年计，每一个甲烷分子的变暖效力是一个二氧化碳分子的23倍；这被称为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因为甲烷释放之后仅会在大气中持续存在7~10年，它会发生氧化变成二氧化碳并发生其他的化学过程，其在更为有限的时期里（即释放后的数年内）测得的全球变暖潜能值远高于23；人们也曾引用过100~200这一数值。很明显，大量甲烷的突然释放会产生巨大（可能较短暂）影响；我们稍后会在北极近海永久冻土带融化时所发

生之事的角度考虑前述情况。

一氧化二氮则是一种浓度较小的温室气体，其在大气中的浓度为很低的300ppb，存在时间约为120年。它主要来自人造肥料的使用。

臭氧和氯氟烃（CFCs）

考察温室气体的气候力量时，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臭氧和氯氟烃。臭氧是分子中具有三个而非两个原子且十分活跃的氧气形式；其分子式为O_3。臭氧是一种具备吸收带的温室气体（见插图5.1），但它于1985年却因为别的原因而出名，当时英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乔·法尔曼（Joe Farman）登上南极高山之后发现了“臭氧层空洞”（ozone hole）。[4]除了吸收一些从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外，臭氧十分适合吸收来自太阳的最短波长的辐射。即能导致晒伤和皮肤癌的紫外线（UV）辐射。事实证明，短波辐射仅增加10%，黑色素瘤（melanoma）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9%，此病是最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皮肤癌。[5]尽管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和舍伍德·罗兰（Sherwood Rowland）早就预计氯氟烃会消耗臭氧（他们因为这个发现而和保罗·克鲁岑分享了诺奖）[6]，而法尔曼的测量显示，南极上空臭氧层消耗高达70%，这为那些生活在“臭氧层空洞”下（这一区域可延伸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塔哥尼亚和南非）的人们增加了过多的紫外线辐射。此处的罪魁祸首来自人为引进的化学物质氯氟烃，它被用于空调之中，并作为气溶推进剂使用，它在大气中时会与臭氧分子反应并将其破坏。臭氧层空洞被发现之后，人类旋即采取了迅速的措施，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便规定逐步淘汰氯氟烃并支持危害较少（但并非无害）的替代品含氢氯氟烃（hydrochlorofluorocarbons）。愤世嫉俗者说，这是因为已有替代品可用，但至少，曾经扩展至北半球的臭氧空洞现在正在后撤。尽管含氢氯氟烃成功阻止了臭氧的减少，但它自身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温室气体（见插图5.3，图中显示了它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影响）。

辐射强迫

为了比较所有这些温室气体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气候影响，科学家们提出了辐射强迫（radiative forcing）这种观念。在本书唯一的方程式中，我们考察了地球上整体辐射量的均衡状态——直接来自太阳的辐射由于地球反射率造成的辐射及其表面温度而被抵消。温室气体会减少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因此，我们可通过测量其中每种气体减少的外射辐射量来对其进行比较。再者，我们可以从增加的温室气体量等于它阻止地球发出辐射的常量加上太阳的辐射强度的角度思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辐射强迫与太阳常数进行对比，它会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扰乱了地球的天然热平衡。如果辐射强迫是阳性的，则意味着它正在让气候变暖。一些人为活动也引起了阴性的辐射强迫，例如将气溶胶注入大气层，它们会反射部分入射的太阳辐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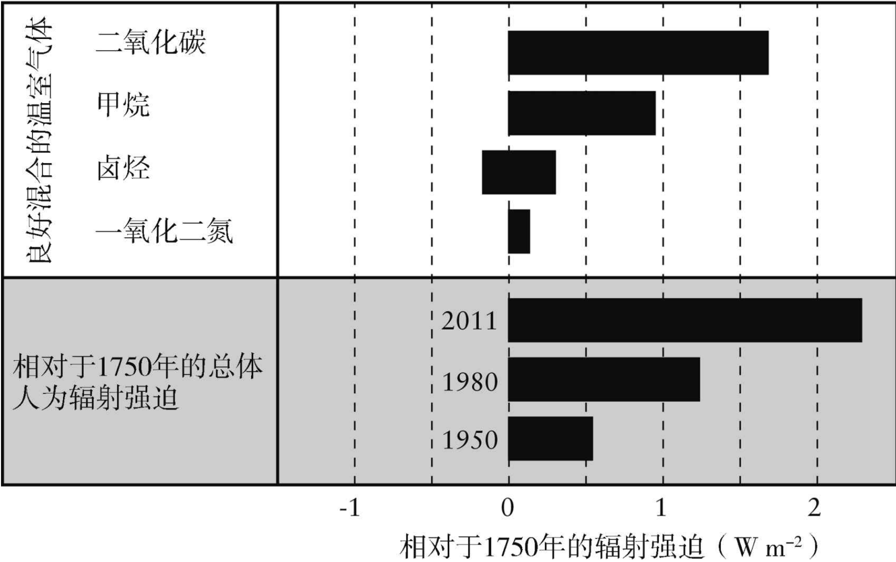


图5.3：不同大气成分的辐射强迫水平（来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插图5.3显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3年）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最佳预测。它显示，总体的人为辐射强度为2.3瓦每平方米，外加来自太阳的地球整体平均辐射量的0.7%。大约55%的辐射强迫均来自二氧化碳，45%的其他所有来源中，甲烷为最重要者。从最近的1980年代以来，辐射强迫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又是1960年的两倍），这显示出我们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十分迅速且不受控制，尽管近几十年来，政客、气候变化活动者以及著名科学家们都对此进行了呼吁和警示。

气候敏感性

第四章里，我们描述了冰芯里记载的过去40万年里连续的冰期和间冰期中气温和二氧化碳变化曲线之间的惊人相似性。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漫长时期里，经历过两次二氧化碳自然水平为180ppm和280ppm的时期，这主要取决于考察的时期为冰期还是间冰期。地球有两套均衡的温度设定，分别对应完全的冰期和完全的间冰期的特征，两套设定之间相差6℃。由此，我们可通过使用温度升高的幅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在冰期和间冰期的变化来计算二氧化碳含量翻番导致的温度变化幅度。计算结果为7.8℃的高值。[7]我们试图将这一数值应用到现代世界，并提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何将2~4.5℃作为目前的气候敏感性，但根据上述事实，这一敏感性应该高出很多。必须指出，这个“冰期气候敏感性”并未被充分考虑（尽管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确太高了。如果它适用于现代社会，便意味着目前我们排放进大气的二氧化碳量的潜在变暖效应才实现了一小部分，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

很显然，无论我们采用的气候敏感性数值高低如何，地球都尚未达到符合其自身实际敏感性的温暖程度。自1850年以来，全球温度整体上升了0.9℃，而二氧化碳水平则上升了50%，而根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温度应该上升1～2.25℃，而根据冰期/间冰期的比例换算则为3.9℃。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答案在于已经实现的温度增幅（realized temperature rise）这一概念。地球在如此多的辐射强迫中应该比现在温暖许多，如果我们能维持所有温室气体浓度不变，地球温度将持续上升，直到它达到气候敏感性规定的数值。但此刻，地球温度却落后了——它一直没有跟上不断增加的辐射强迫。什么因素让它变慢？主要是因为海洋吸收了热量，进而导致全球空气温度变暖速度的下降，长期而缓慢的热盐洋流过程（thermohaline processes，见第十一章）会让深海逐渐翻转、变暖，但庞大的海水却吸收了大部分额外辐射。地球表面72%覆盖着海洋。因此，好消息是地球变暖速度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快。坏消息则是，我们终究免不了自食其果——海洋就像巨大的行星飞轮，它将确保地球变暖会持续数十载，即便我们通过一些非凡的努力而迅速停止排放温室气体亦是如此。而气候敏感性的数值的确很重要。如果这一数值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述的2～4.5℃，则气温并未落后于辐射强迫多少。但如果这一数值为7.8℃，则气温几乎还没有对辐射强迫作出反应，即便我们削减了温室气体排放，气温仍会大幅上升。

地球近期的温度史

全球温度发生的变化自1850年人为变暖进程开始显现以来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考察。插图5.5显示了过去160年的曼恩-布拉德利曲线，其误差比之前1000年更低，因为从160年之前起，我们便有了温度计并且全球气象网络也开始出现。我们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迅速升温过程中看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1920—1960年期间气温发生过停滞甚至些许下降，然后又再次攀升。模型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可能通过停滞期煤炭用量的快速增长来加以解释，这一过程往大气中释放了大量气溶胶，暂时阻碍了全球变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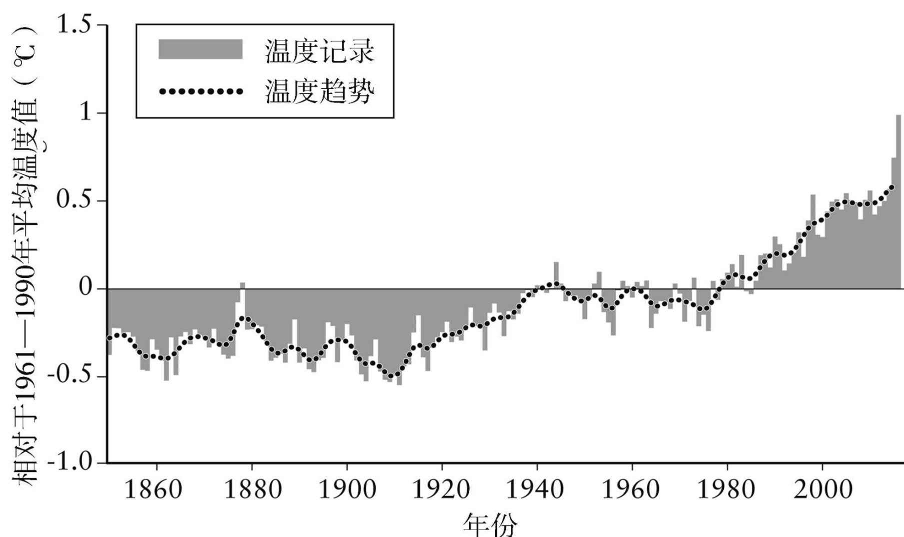


图5.4：根据曼恩-布拉德利曲线得出的最近160年地球变暖趋势。

北极放大效应

如果我们再次查看过去160年的曼恩-布拉德利曲线（插图5.4），并将其与北极气象站记录的温度曲线相比，我们便能看到它们有着相同的形状。插图5.5显示了北纬60°至北纬90°纬度范围内19个气象站测得的年均海水和空气温度值（SAT），我们在图中看到，全球变暖趋势遵循停滞和部分下降，然后再次迅速上升的趋势，北极数据也与此类似。然而，当查看变暖的程度时，我们发现尽管全球温度在过去160年里上升了0.8℃，但北极气温却上升了2.4℃。北极地区的变暖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类似，但幅度更大。这被称为北极放大效应（Arctic amplification），其放大系数在插图所示的案例中为3。其他人则预计系数范围在2～4之间。

北极放大效应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全球变暖首先在北极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北极的状况成为地球未来征兆的主要原因。眼下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北极放大效应？近期它还在发展吗？

云层的变化，大气中水蒸气的增加，更多来自低纬度地区的热量，海冰的减少等都被认为是北极放大效应的成因。正如插图5.5显示的，这些解释的问题在于，北极放大效应自1900年代便已开始，因此它不可能主要来自近期的影响。然而，詹姆斯·斯克林（James Screen）和伊恩·西蒙兹（Ian Simmonds）2010年在其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海冰的减少是北极放大效应的驱动力。[8]他们的论点是，如果来自低纬度区域的大气热量是升温的主要动力，海面上空应该会升温更多。另一方面，如果积雪和海冰盖的撤退是主因，海面温度的升高会最多。他们证明了，升温的确主要发生在低空大气中，且与海冰撤退强烈相关。问题是，作者仅考虑了1989年以来的时间段，而夏季海冰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出现了可测量的撤退现象。我们从他们的分析中最多能得

出，近年海冰的撤退可能增加了北极放大效应的系数，但这一效应产生的时间比上述时期更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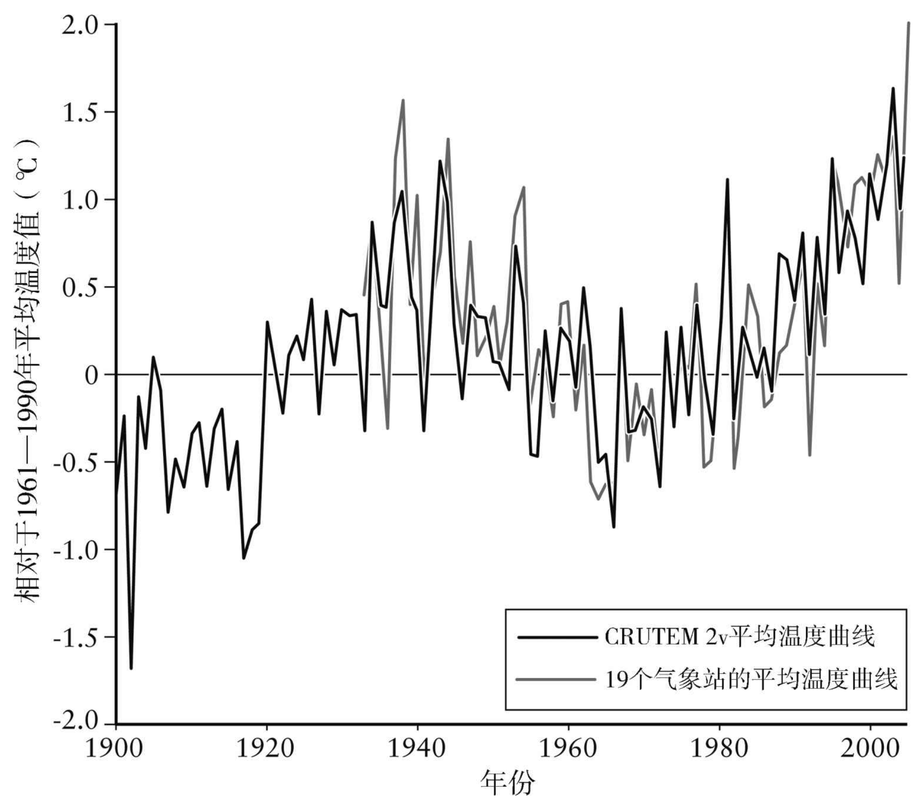


图5.5：仅采用北纬60°以北的气象站的数据得出的1900年以来的北极温度数据图。来自19个北极气象站的平均温度值与网格区域平均温度值（CRUTEM 2v）对照展示。

我们会在下一章证明，由于北极放大效应，北极海冰的范围正在迅速撤退，几乎可以肯定，北极大部分地区很快将仅剩一片开放的海域。

注释：

[1] Houghton, Sir John（2015）, Global Warming: The Complete Briefing, 5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Arrhenius, S. （1896）, On the influence of carbonic acid in the air up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ground.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41, 237-76.

[3] Wasdell, D. （2014）, Sensitivity and the Carbon Budget: The Ultimate Challenge of Climate Science. www. apollo-gaia. org.

[4] Farman, J. C., B. G. Gardiner and J. D. Shanklin（1985）, Large losses of total ozone in Antarctica reveal seasonal ClOx/NOx interaction. Nature, 315, 207-10.

[5] Norval, M., R. M. Lucas, A. P. Cullen, F. R. de Grulil, J. Longstreth, Y. Takizawa and J. C. van der Leun（2011）, The human health effects of ozone deple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climate change. Photochem. Photobiol. Sci., 10（2）, 199-225.

[6] Molina, M. J. and F. S. Rowland (1974) , Stratospheric sink for chlorofluoromethanes: chlorine atom-catalysed destruction of ozone. Nature, 249, 810-12. There is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in Rowland, F. S. and M. J. Molina (1975) , Chlorofluoromethanes in the environment. Reviews of Geophysics and Space Physics, 13, 1-35.

[7] Wasdell, D. (2015) ,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8] Screen, J. A. and I. Simmonds (2010) , The central role of diminishing sea ice in recent Arctic temperature amplification. Nature, 464, 1334-7.



第六章

海冰开始融化

19世纪的海冰

除了北极附近的土著居民，第一批长期关注北极冰川范围及其变化的旅行者就是在格陵兰海域中捕猎鲸鱼和海豹的人。其中最伟大的当属那唯一将捕鲸技能和科学兴趣结合在一起的约克郡的惠特比人小威廉·斯科斯比（William Scoresby Jr, 1789—1857年）。斯科斯比于1820年写了关于北极大洋环境的第一本著作，[1]该书侧重海冰的变化，到现在仍是极地科学的经典之作。

自然，英国政府因为斯科斯比的职业等因素而并未注意到他，尽管他后来也的确成为了皇家学会的会员。然而，1818年斯科斯比宣称弗拉姆海峡（斯匹次卑尔根和格陵兰岛之间的海峡）北部的冰川正不断敞开时，政府部门都很惊讶并开始关注起此事：

> 在1817年和1818年的两年中，海洋比最年长渔民所记得的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宽阔；海域面积约等于2000平方里格（square leagues），包括北纬74°和北纬80°之间以往被海冰覆盖的区域也看不到冰块了。

这可能为考察船提供了从较高纬度（北纬80~81°）抵达北极的机会，它们可从格陵兰岛东部的开阔水域抵达。斯科斯比自己则在更早的1806年到达了创纪录的纬度区域：

> 当我在父亲（他的非凡毅力在格陵兰捕鱼行业中无人不晓）指挥的“惠特比果敢”号上担任大副的时候，我们以惊人的努力面对迫近的危险，最终航行到远至北纬81°30′的地方。

已经在拿破仑战争中获胜的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无事可做，他们有可能因为抵达北极或发现通往东方的通道而获得极高的荣誉。因此，英国政府马不停蹄地开展了海军探险。他们没有重用拥有丰富北极海域经验的斯科斯比，而下令多萝西娅和特伦特地区一个毫无经验的皇家海军上校戴维·巴肯（David Buchan）指挥此次探险。其副手为名叫约翰·富兰克林的年轻中尉，这人注定会迎来漫长且最终被证明是多灾多难的北极事业。他们前往弗拉姆海峡的探险令人沮丧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发现冰川漂移将其带往南方的速度大于其向北前进的速度。这是斯科斯比自己未曾预料到的情况。

随后这支海军的探索兴趣便转移到了加拿大北极区域和西北航道，敦提（Dundee）的捕鲸者每年都会前往格陵兰海，挪威捕猎海豹的人则会在北纬75°附近奥登冰舌（Odden ice tongue）的冰缘线附近从事捕捞活动，这是东格陵兰冰缘线东部的突起部分，格陵兰海豹会在春天带着自己的幼崽出现在这里（这一区域对海洋对流而言十分关键，第十一章讨论这一问题）。1872年，丹麦气象研究所成立，捕鲸者、捕猎海豹的人和探险者终于有地方呈送自己的观测记录了。这个机构编制的年鉴包

含欧洲北极地区逐月记录的海冰范围图，人们现已将其数字化并加以分析了。[2]这些记录并未显示海冰变化的趋势，尽管存在意外的年份，比如1881年时，来自北冰洋的大量冰块进入到大西洋北部，并扩散到远至挪威北部的海岸。

自然，这些数据十分粗糙。从少数鲸鱼和猎豹捕猎者的观察记录和人们关于冰缘线通常所在位置的大量经验中，我们能推断出整个北半球的冰缘线。这种气象学方法甚至在卫星时代仍在使用。我记得自己20世纪80年代就见过丹麦气象研究所发送给船只的每日海冰范围图。唯一可用的卫星会记录可见区域中的海冰分布，因此，无云的气象条件是其起作用的前提条件（现在，我们使用能够洞穿云层和阴影的微波卫星进行观测）。格陵兰海域上方无云天较少，如果遇到阴天，研究所就会直接重复发布之前的海冰范围图。他们的经验法则是，直到新的观察数据出现才移动冰缘线，所以，冰缘线可能会在一周或更长时间里保持稳定而事实上只是被云层遮住了而已。

因而，人们无法轻易地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海冰范围的变化也不足为奇，并且，人们会假定海冰有着稳定的年度周期，每年只会发生随机波动。这种情况构成海洋科学家们心中重要而未经验证的假设，他们会认为海洋中一切都很稳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更加完整地探索海洋的未知部分，进而为海洋地图册添加新数据，这最终会为我们带来海洋的全部图景。当我1969年第一次开始海上航行时，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的“赫德森号”轮船在南冰洋建立的海洋观测站则已被添加到海洋图集中了。但不久之后，科学家们便开始怀疑海洋面临巨大的变化——它有自己的天气和气候——而世界海洋图集的想法便逐渐遭到摒弃。

海冰的现代研究

二战之后，北极就不再是戏剧般英勇探险的舞台，而开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的地方。冷战为北极带来了空军基地和远程雷达站点，军人们使用地球仪代替墨卡托地图，他们惊讶地发现，俄美之间飞机和导弹的最短路线会穿过北极。军队和民用飞机开始监测海冰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的世界还没有卫星，但古老的海豹猎手们的观察数据现已得到航空调查的补充，因为美国海军会定期派出飞机沿欧亚冰缘线从事观察活动（即“鸟瞰计划”）。加拿大北极区域当时遍布平民大气环境局的飞机，我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搭乘他们战时的旧飞机DC-4从事海冰实验。那时候，他们的基地建在纽芬兰的甘德（Gander），飞机上载有过去击剑战士适用的驾驶舱，它被焊在机身顶部，以方便海冰观察者坐在里面随着飞机的飞翔绘制海冰图。甘德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名为飞跳俱乐部的跳水表演，他们有个上空装乐队，DC-4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会在早起飞行任务之前在这里待上一晚。尽管这项科研工作早已结束，但我们绘制的海冰图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正是通过飞机调查，人们开始收到海冰可能正开始消退的第一批证据（插图6.1）。海冰的消退仅在夏天才能看出来；海冰会在其他季节填满整个北极盆地并一直延伸至海岸，而人们尚需多年才可测得秋、冬、

春季的海冰从海岸线分离的明显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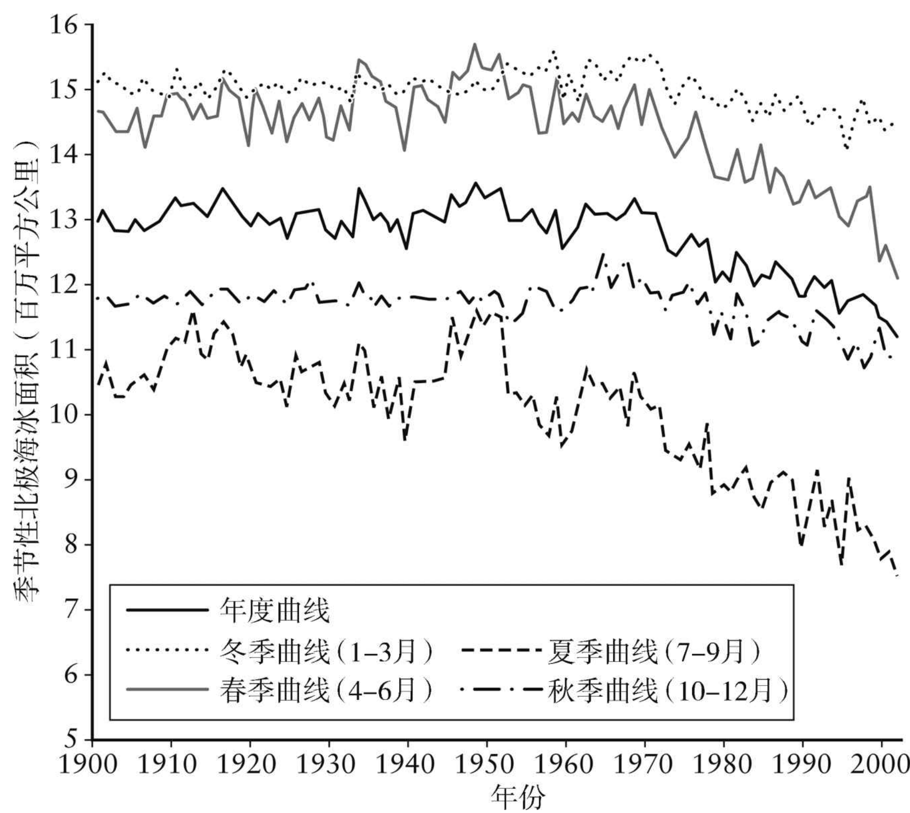


图6.1：自1990年以来四季中的海冰区域。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夏季海冰的消退得到了新一代微波卫星追踪数据的确认，[3]人们认为其消退速度为每10年3%，这说明海冰还会继续存在很久。海冰观测发展至这个阶段后，我就能够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第三维——深度，而作出自己的贡献了。海冰在消退的过程中也在变薄。多年来，我一直在英国核潜艇上测量北冰洋中海冰的厚度，我会用声纳（回声探测仪）查看冰下情况并生成草图（冰体浸入水下深度），测得的海冰的水下厚度不足其整体的10%。受皇家海军之邀，我曾于1976年和1987年分别登上皇家海军潜艇“主权号”和“宏伟号”并随舰在整个北极做了长途航行。每次，我都会组织加拿大和美国飞机的遥感任务以补充海冰表面的数据，并让其与水下海冰数据相匹配。[4]将1987年的数据和1976年的数据（它们都从弗拉姆海峡到北极的一条相似轨道获得）进行比较后，我发现二者有显著差别。潜艇考察范围大致覆盖了整个区域后（插图6.2）得出的结论是，1987年的海冰约比1976年的薄15%。我于1990年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这种现象的论文[5]；该文首次提供了证据显示，卫星监测到的海冰消退现象还伴随着海冰变薄的进程。这一领域的科学进展完全依赖于潜艇，因为没有哪种卫星技

术可以看穿冰盖并显示海冰厚度，它只能显示其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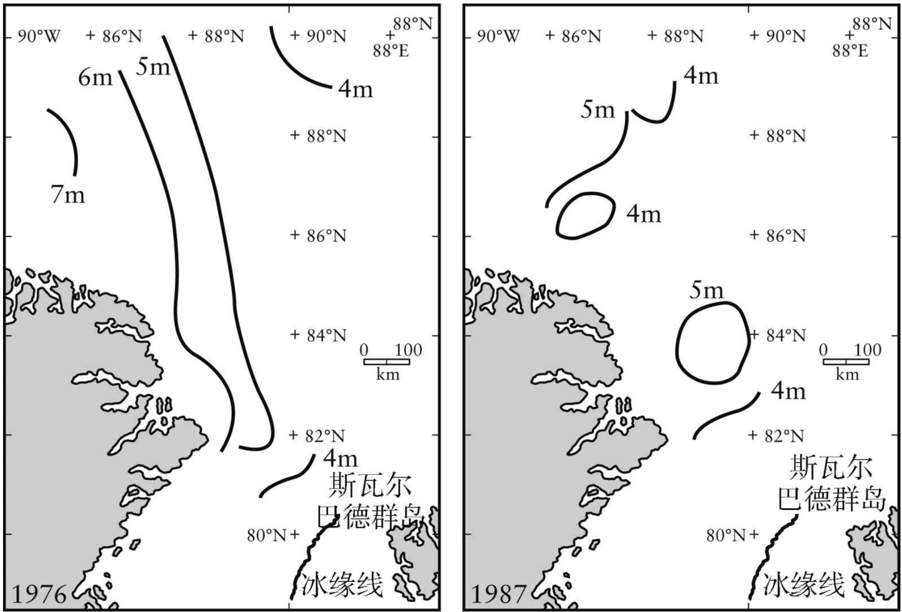


图6.2：从格陵兰到北极的平均海冰厚度轮廓图，分别为1976年和1987年。

我在英国和其他美国的同事一道，又花费了10年时间分析来自美国潜艇越发频繁的观察任务得出的数据，这些任务通常覆盖了北极的不同地方，比如波弗特海（Beaufort Sea）区域。最后，我们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海冰已减少43%（据北极地区年度均值计算得出）。华盛顿大学的德鲁·罗斯罗克（Drew Rothrock）及其团队于2000年基于美国的数据撰写的论文[6]以及我和同事们基于新的英国航行数据写作的论文[7]都确认了这一比例，尽管我们的数据得自北极的不同地区（我的数据包含北极的欧洲部分，而罗斯罗克的则包含北极的美国部分）。

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尽管当时气候建模者大体上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首先，由于夏季海冰也在减少，这就意味着夏季海冰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丢失了60%的体积，这比人们没考虑海冰厚度时所担心的海冰损失量大很多。按照这个速度，夏季海冰在21世纪早期便会消失。但是，不仅政客和实业家不想面对这一事实，科学建模者也不愿意。所有这些人都在继续使用不切实际的模型，进而预计海冰体积一直到21世纪末都不会有大的变化。英国气象局仍在坚持这些空中楼阁般的预测。大自然很快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过去10年中的冰体崩溃现象

北极冰盖会经历一年一度的周期循环（彩色插图17），它会在2月

份达到最大面积，9月中旬则为最小值。冰盖的周期会比太阳辐射周期滞后2~3个月，因为后者需要时间来融化冰块并提升海洋和陆地的温度。过去10年中，人们都转而注意9月冰盖面积的最小值了，因为冰盖在2005年比之前的年份有较大的撤退，而夏季冰盖也头一遭完全脱离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尽管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群岛海岸附近还都连着（彩色插图13）。尽管加拿大的西北航道仍大体上呈冰封状态，北海航线（此为俄罗斯对东北航道的称呼）则完全没有海冰了。2005年9月的冰盖总体面积仅为530万平方公里，而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当时“季节性均值”刚刚建立，见彩色插图13中红色部分）则为800万平方公里。我曾在2004年又一次搭乘潜艇航行并看到了海冰的持续性变薄进程，因此，我认识到冰体的加速消失只是冰盖对额外的变暖造成的变薄过程的反应，而这正是北极冰盖崩溃的开始。

北极冰盖在2006年部分恢复后，其面积在2007年甚至遭遇了更大的下降（彩色插图13）。这一次，阿拉斯加和东西伯利亚北部的冰盖都被丢失了一大块，相应区域则形成了大面积的蓝色海洋。冰盖面积因此降至410万平方公里。但这一次，海冰的奇特分布导致西北航道完全无冰，而北海航道却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威尔基茨基海峡处遭受冰封。

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它是冰盖由于融化而进一步变薄和崩溃的结果。但别的动力因素也起了作用。初夏阿拉斯加上空吹过的南风和西风会将仅存的冰块吹过波弗特海，随后又吹向弗拉姆海峡。北极国际浮标项目（IABP）中的浮标也显示了这一点。国际浮标项目是真正的国际合作，每年都会有一系列浮标放入北极海域并将其位置传输给追踪的卫星。2007年北极海冰迅速向东移动，部分浮标被快速移动的海冰浸过并落入海中，剩余的冰块就塞满了弗拉姆海峡。北冰洋出口的情形就像有人高喊“失火了”时挤满了人的电影院入口一样。

这种新的移动模式在21世纪头10年里变得愈加普遍。新的盛行风模式并不像我们在第二章中描述的那样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回旋，它会让海冰从弗拉姆海峡离开而无法实现大洋回路。多年冰已经参与到这个整体的移动之中，它们会从弗拉姆海峡漂出北极，而不会在之前所谓的波弗特环流中循环漂移。因此，每年北极多年冰的比例都会比前一年低，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到多年冰完全消失。新冰也一直在形成，并漂移至弗拉姆海峡进而离开北冰洋，留下少许冰体形成多年冰。多年冰在21世纪头10年里的急剧下降可用微波卫星予以追踪，它能区分单年冰和多年冰。[8]新冰在北极的主导地位本身也是冰块平均厚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气候引起的冰体形成速度下降更为重要。

2007年：个人故事插曲

我的北极经历在2007年这个关键之年显得十分极端。我当时乘坐皇家海军舰艇“夜以继日号”（Tireless）进行环北极航行并测量海冰厚度，但这次使用的多波束声呐为我呈现了海冰下层奇妙的三维立体图（彩色插图10），当时也是这种设备第一次在冰层下部大规模使用。我们穿过了整个北极，从苏格兰的法斯兰起航，进入弗拉姆海峡，然后环游至格

陵兰岛北部，最后进入波弗特海。在波弗特海域，我们发现海面上方几乎所有的海冰都是单年冰。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穿过了华盛顿大学建立的浮冰站的下方区域，该浮冰站名为APLIS（应用物理实验室冰站），一群科学家正在那忙着钻孔测量顶层海冰，并使用电磁方法探测冰层厚度，他们还用配备了激光装置的飞机测量冰体顶层形状。3月20号，潜艇方面和浮冰站双方合作产生的重要数据就要诞生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傍晚时分，我正在声纳旁观看海冰，“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传来，随之而来的冲击波和大量棕色烟雾迅速扩散至下层甲板的走廊中，然后又从楼梯弥漫至控制室，舰长飞奔上楼梯并大声喊道：“急救站！大家戴上紧急呼吸系统（EBS）面罩！”

每个人都吓到了。然后，大家都冲向最近的面罩。我跑向舰尾以让出过道，然后又被人召唤进了无线电室，无线电操作员递给我一个面罩并将其接上了氧气。他真的很慌：“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这阵仗！”

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碰撞？核事故？我当时估计自己顷刻间就会一命呜呼——潜艇内部的爆炸往往意味着一切都完了——我们都戴上面罩，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我感到了绝对的平静。我一点也不恐惧，也不惊慌。只是戴上面罩，坐在隔间，等待死亡。我甚至都不觉得心率上升了。这是我在北极区域离死亡最近的时刻，但奇怪的是，它并未让我感到不安。潜艇的灯光始终亮着，并一直在前进。

每个隔间都上报了情况，人们最后发现爆炸发生在潜艇前方的逃生舱内，发生爆炸的则是潜艇员们称之为“蜡烛”的独立制氧机（SCOG）。潜艇会通过电解水的方式为其内部的舰员提供呼吸的氧气，但如果舰上的电解器失效，比如被冻上了，就需要以别的方式更新氧气，比如将一罐氯酸钾放入装有催化剂的装置以产生氧气。其中一个这样的罐子在放入独立制氧机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当时舰艇上充满了有毒气体（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以及二氧化碳）和烟雾。

随后的情况因为“起火了！起火了！”的呼喊而变得更糟。这对舰员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恐惧——在海上失火，更糟糕的是冰下失火，这种情况根本就没办法上浮。火被扑灭了，部分原因在于海水进入到了潜艇受影响的部位，部分也在于舰员的救火行动。被最终扑灭之前，火灾警报又两度重启，自然也伴随着更多“着火了”的呼叫。

当时，我们迫切地想要浮出水面。凭借巨大的好运，我们靠近了一个冰间湖。之前我们在经过每个冰间湖的时候都会将其绘制下来，最后一个经过的冰间湖离我们最近。我们便掉头向其驶去，进而停下来检查每个向上扫描的声纳传感器（舰头、舰身和舰尾处）上方的海冰，一旦将其清除，潜艇就能直接上浮了。由于舰长的驾驶技术，潜艇几乎整个都进到了冰间湖内。经过更多的部署和紧张的等待之后，随着我们向水面上浮，有线广播里传来：“我们已上浮到冰间湖中。准备开舱。”舰舱被打开，通风机将新鲜空气吹进舰艇以清除有毒烟雾。

同时，耳边传来了伤员（们）的谈话，他们正被带往年轻水手诊断区（年轻水手诊疗的地方，也可改造为医务室）接受医生的治疗。乍一听，他们的情况似乎并不严重。但紧接着，可怕的传闻在舰上传开

了："死了两个人！"

一位年轻的水手突然哭着进入无线电室，在无线电台旁哭着叙述了事情经过。他看到了尸体。事后我才知道了完整而可怕的真相。事故的确造成了两个水手的死亡，一人18岁，一人32岁。年长的水手头一天还刚刚庆祝自己参与到了这项任务中来。当时，这两位水手被派去放置"蜡烛"。当他们这样做时，独立制氧装置就发生了爆炸，四散飞溅的金属碎片让他们当场毙命。制氧装置的碎片嵌入到舰艇头部的隔间中，甲板被炸得扭曲了。两位水手当时并无逃走的机会。他们的尸体还挡住了舱口，让消防员难以进入。另外一位伤员的情况并不是很糟糕——他在爆炸发生的时候吸入了许多烟雾，但无大碍。

我们当时已经向应用物理实验冰站发去了紧急呼救信号，在我们浮出水面之后，一群美国人便乘着机动雪橇从营地赶来了，并带来了很多的医疗用品。四处走动的伤员由直升机在没有月光的暗夜直接带往浦鲁杜湾（Prudhoe Bay），随后，在该处等候的C-130运输机便将伤员带往阿拉斯加南部埃尔门多夫（Elmendorf）空军基地进行治疗。而那两具尸体则被抬出并被带往营地。

我曾经习以为常的仪式化的安全世界已吞噬了6艘航行中的潜水艇，恐惧和害怕久久不能散去。过去我每次开启新航程时的恐惧已成为现实，但现在这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时，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害怕且十分冷静。和我在一起的同事尼克·休斯（Nick Hughes）的感受和我一样。我们在甲板上度过了一整晚直到早晨才被带离。荒谬的是，潜艇官员曾多次告诉我这里有多安全——我所在的舰舱里甚至比水面更安全，因为潜艇反应堆受到很好的防护，而我们所在深度的水域则意味着自己周围的宇宙射线剂量比那些不幸生活在地表的人还低。潜艇中的生活似乎有种误导人的安全感——别人都以为你工作时穿得西装革履，吃得也好，舒服地坐在军官起居室里印花棉布座椅上。但我50次北极实地考察用的都是很不舒服的帐篷、小屋、船只、飞机、直升机、狗拉雪橇和机动雪橇，没有哪次比此次潜艇事故让我离死亡更近。

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让人开心。潜艇上已安排有人定期检查独立制氧设备上的裂纹，因为俄罗斯太空站"米尔号"（Mir）的独立制氧设备就曾因此失火，起因就是燃油泄漏到制氧设备的裂缝中进而生成了爆炸性混合物。潜艇上忠于职守的船员曾多次发回有缺陷的制氧设备，但海军基地只是将它们原样放回到潜艇上，并让舰员们继续使用以节省开支。后来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于2008年6月12日报道了这一情况。自那以来，再无英国潜艇航行至北极。

令人惊讶的是，鉴于当时的情况，我飞回英国待了一周，然后又飞回应用物理实验室冰站发生此次事故之处附近做另一个实验，即使用自主水下航行器绘制少数压力脊的详细图景。其中一个（彩色插图8）为仅仅形成于7天前的单年压力脊，因此我可以看到新形成的压力脊的模样，冰块在那里松散地像线状炉渣一样堆积起来，它们强度很低或者压根没有强度。现在，这种压力脊在北极比比皆是，而之前对破冰船形成巨大障碍的大型多年压力脊现已几乎消失不见。依靠自主水下航行器进

行研究对我是很好的治疗：后来几个月里我曾咳嗽得厉害，但精神气十足。

北极海冰的进一步下降——以2012年为例

尽管北极海冰总量呈不断下降（且还在加速）趋势，但地区之间速度并不一致。随机的天气因素可能加速或延缓夏季海冰的撤退。如果某随机因素让特定年份的海冰得到部分恢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就会欢呼这种情况是北极海冰压根没有消退的标志。而次年随之而来更加严重的消退则被无视。

9月海冰范围表（彩色插图13）显示出巨大的波动性，但也显现出强劲的下降趋势（彩色插图17）。在经历了2007年的戏剧性波动之后，海冰面积徘徊在略高于该年最小值的范围，直到2012年夏季降至仅340万平方公里这一破纪录的低值。这一次，所有经度范围的海冰都在消失，即海冰真正的环形后撤，而不再是主导风向引发的缺口型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人们所谓的大北极旋风风暴又进一步创造了海冰后撤范围的创纪录低值[9]这场风暴于当年8月6日袭击了北极。它是自1979年气象卫星监测开始以来最激烈的夏季风暴。海冰范围已趋近夏季的最低水平，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克莱尔·帕金森（Claire　Parkinson）和乔伊·科米索（Joey　Comiso）的研究，[10]这场风暴导致40万平方公里的海冰与主要冰体分离，并在风浪作用下分裂并最终融化。张金伦（音）及其同事[11]（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另外一项建模研究表明，这场风暴还造成额外15万平方公里的海冰消失，但这两项研究都一致表明此次风暴在关键时刻对北极海冰造成了可测量的影响。

夏季海冰的最后光景

2013年夏季的风暴活动较少，而风暴又往往会将冷空气吹向北极，进而在冰上形成新的积雪并减缓了海冰的融化，还提高了它的反射率。2014年的海冰面积也在之前年份值域范围徘徊，甚至还出现了些许恢复。但海冰的脆弱状态却十分清楚。我在当年8月份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希利号”（Healy）出海并到达波弗特海南部冰缘线区域，随后我发现当地的冰盖融化得十分厉害，几近全部融化（彩色插图2）。海冰无休止的下降势表明，这条下降道路上的部分恢复或波动都是其本来特征，我们预计2015年会再次下降，特别2015年会出现局部“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它会导致太平洋海域中风向和洋流模式的变化，从而有效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并更快地让大气升温。

事实上，我们于2015年9月得到了第四低的海冰面积值（彩色插图13、17），而厄尔尼诺现象来也得更为猛烈，甚至2016年9月的海冰将不复存在。建模者仍然假装说2050年到2080年之间才会出现夏季无海冰的年份，但观察数据表明，这种假定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早在2016年，的确出现一位预测过夏季海冰会迅速消失的建模者，他就是来自蒙特利（Monterey）海军研究生院的维斯劳·马斯洛夫斯基（Wieslaw

Maslowski），[12]他具备两个优势：其模型能表现很小范围内的变化过程（其网格比例尺为2.4-km，这是气候模型的最佳尺度），并且他使用了属于蒙特利海军部门的世界最强电脑。而且，他还看重其他模型忽略或潦草对待的作用机制，特别是上层海洋中的热量在融化海冰及其在所谓混合层海水（即冰水界面下方的浅层海水区）状态改变中的作用。

我们可从海冰撤退最大值时的冰体聚集地图中看到年复一年的随机因素的重要性。彩色插图14显示了2012年9月20日卫星图上的海冰范围，这一天海冰撤退值最大。该地图由不莱梅大学（University of Bremen）使用与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博尔德）不同的技术制作，它显示了海冰在极值范围内的集中程度，而不仅仅是白茫茫一片。我们从该图可知，波弗特海域和俄罗斯北极海域冰缘线有一大片松散的海冰，再有两三天便可融化，而随机天气因素则能很容易让这种情况出现，这又融化掉一大片海冰区域，进而创造出比实际340万平方公里更低的新纪录。

开阔水域的海浪

海浪是随机天气因素之一，这一点对2012年的大风暴而言确凿无疑。随着夏季海冰面积的进一步下降，海浪的作用势必越来越重要，但即便草草看一遍2007年、2012年和2015年的海冰区域地图也能明白，大面积开放水域现已在夏季海冰带周围出现。海冰的大面积撤退不断产生足够的开放水域，这让海风可以在之前受到庇护的海域（比如波弗特海）的冰缘线上产生大量波浪能。这可能足以撕裂海冰并加速其融化，从而让其进一步撤退。换句话说，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冰撤退，如此便会造成大片开放水域，这又让波浪得以形成，而波浪与海冰相互作用并导致后者破碎和融化，这又进一步打开了海冰。这是北极海冰反馈机制中最先出现的一种，我将在第八章详细讨论这一点。

研究波浪及其对海冰的影响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我在这项研究的早期便投身其中。事实上，这项研究也是我1973年博士论文的主题。我于1970年以研究生的身份加入到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导师戈登·罗宾（Gordon Robin）博士曾有冰川和海冰的研究经历，他同意带我参加海冰研究项目。我从事的这个项目在于了解海浪进入海冰区域时会发生什么。当时几乎无人对此有所了解。那时候，很少有海洋学家从事极地问题研究，因此，任何进入该领域的人都有大量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可供选择和研究。罗宾博士曾经乘坐一艘带有波浪记录仪的船只航行至南极，其目的在于测量冰缘线以内不同距离处的波浪能，他还派出一名研究助理从事同样的研究。但这就是全部——两套数据集，而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则付之阙如。

幸运的是，那些日子的一个好风气就是计算机建模几乎还没被发明出来，当时的科研重点则是强调通过实地测量解决科学问题。我多希望现在也这样。戈登·罗宾十分热心地为我寻找开展实地研究的机会。1971年2月我抵达南极才4个月的时候，他便利用自己在海军方面的关系（战时他曾在海军服役）将我送到皇家海军柴油动力型潜艇“奇迹号”上研究

海冰中的海浪现象，该潜艇当时正前往格陵兰海域冰缘线附近，它也因此为第一艘驶入北冰洋的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无畏号”护航。

我在“奇迹号”上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这艘潜艇十分狭窄、肮脏且充满臭味，但很迷人。它整个就是一根管子，没有单独的甲板——控制室、柴油发动机、电池仓以及鱼雷发射管之间相互交织，就像二战电影中的U型船一样。必须强调，舰员们像战时一样，舰员穿着油渍的白色羊毛毛衣，从不换洗，睡在遍布整个潜艇空余角落的铺位上。我自己的铺位则位于军官起居室门外的甲板层下方，我头顶几英寸的上方还有另外一个铺位。军官起居室的管家晚上就睡上面，早晨他的铺位又变成桌子，管家会将厨房的早餐分发到这个桌子上的盘子里。当潜艇在水面翻滚时，早餐也常常会溢出并洒到我的铺位上。意气风发的舰长雨果·怀特（Hugo White，后来的皇家海军上将，舰队总司令）带领我们潜入冰缘线下方，又从绵延数千公里的大片浮冰内部上浮，这对柴油动力型潜艇（需要重复为电池充电）而言真是个大胆的决定。舰长先生还曾在浮冰上举行仪式为舰员颁发长期服役勋章。

就我的科研工作而言，我心中的科学英雄沃尔特·芒克（Walter Munk，他隶属于斯普利克斯海洋研究所）早在我加入的几年前便着手前期工作了，我参与的部分就是在冰缘线之内的海冰下面不同深度往复折返，并使用潜艇向上观测的回声探测仪测量海面范围，从而记录海浪随时间的变化范围，因为潜艇的下潜很深且不会受到海浪运动的影响，这让它就像一个稳定的平台一样。[13]我当时对海冰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优良的数据，[14]这真是第一次准确的实地测量，这些数据显示，海浪的消退与距离呈指数关系。这证明了海浪正在被浮冰反推，其反推的海浪能则不断四散开去，进而减少了涌向海冰并可能将其穿透的海浪强度。我为这一过程提出了名为散射（scattering）的理论，后来又用机载激光装置做了更多的实地研究工作，并在1973年就此写作了博士论文。

几年之后，我在加拿大待了一阵后再次回到剑桥，之后又在蒙特利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之后我又获得美国海军研究局（ONR）授权研究海冰中海浪急速消退现象，隶属研究项目名为边缘冰区实验（MIZEX）。[15]许久之后（实际上晚至2012年）美国研究局恢复了对海冰中的海浪的兴趣，他们与当时许多海冰科学家一样怀疑夏季开放海域中产生的海浪的确足以打破其与海冰之间的平衡进而导致夏季海冰的消退。现在，我和一大批科学合作伙伴一道使用现代方法研究海浪-海冰现象。我们目前使用基于卫星追踪的海浪浮标记录海冰中的海浪能。一些浮标投放在北冰洋的广大海域，另一些则由阿拉斯加大学破冰船“斯库里雅克号”（Sikuliaq）于2015年10-12月的一次航行中短期投放在北冰洋冰缘线附近。

我们在“斯库里雅克号”上的经验证明了海浪-海冰相互作用的另一个气候面相。我们发现，早秋海水的重新冻结（即冰缘线和往常一样迅速从波弗特海南部扩展至白令海峡并进入白令海）并不会按照教科书所写的那样发生。相反，冰缘线的扩展伴随着新冰由于海浪而形成饼状冰的过程（pancake ice，对这种海冰的详细讨论见第十一章），但随之而来的风暴又会让新冰消失，因为海浪带到表层的水柱里的热量会将其融

化。这些热量会在夏季无冰的海域累积。进击的海冰与坚守的海浪之间的战斗必然是海冰最后取胜，但海浪的战斗会拖延战事，其结果正如我（2016年5月）的文章所指出的，海冰面积会创下年度最低值，即2016年9月的海冰面积将会很低。同样重要的信息是，相比往年同期，2016年2月份成为季节调整之后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月份，整整比1950—1980年2月平均气温高出了1.35℃。这种创纪录的现象贯穿了2016年春季的所有月份。

因此，我们发现，海浪-海冰在过去几个月以两种形式相互作用。北冰洋冰缘线周围的大片开阔海域会在炎热的夏季产生海浪进而渗透进海冰内部，然后散射开去，这会将大型浮冰分解为较小的碎片并加速其融化。而在秋季，更大的风暴会导致上层海水相互混合，这就将海水在夏季吸收的热量带到了表层，进而融化正在形成的新冰并阻止了海冰的扩张。

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将继续讨论海冰的减少并为其得出最后的结论，即夏季海冰盖的消失。然后我们会在第八章重新讨论海浪-海冰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描述海冰撤退对各种全球进程的其他严重影响。

注释：

[1] Scoresby, William Jr（1820）, 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 2 vols. London: Constable（reprinted 1968, David and Charles, Newton Abbot）.

[2] Kelly, P. M. （1979）, An Arctic sea ice data set 1901-1956. Glaciological Data, 5, 101-6, World Data Center for Glaciology, Boulder, Colo.

[3] Parkinson, C. L., J. C. Comiso, H. J. Zwally, D. J. Cavalieri, P. Gloersen and W. J. Campbell（1987）, Arctic Sea Ice, 1973-1976: Satellite Passive-Microwave Observ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P-489.

[4] Wadhams, P. （1981）, Sea-ice topography of the Arctic Ocean in the region 70°W to 25°E. Phil. Trans. Roy. Soc., London, A302（1464）, 45-85; Comiso, J. C., P. Wadhams, W. B. Krabill, R. N. Swift, J. P. Crawford and W. B. Tucker（1991）, Top/bottom multisensor remote sensing of Arctic sea 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6（C2）, 2693-709.

[5] Wadhams, P. （1990）, Evidence for thinning of the Arctic ice cover north of Greenland. Nature, 345, 795-7.

[6] Rothrock, D. A., Y. Yu and G. A. Maykut（1999）,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3469-72.

[7] Wadhams, P. and N. R. Davis（2000）, Further evidence of ice thinning in the Arctic Ocea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7, 3973-5.

[8] Polyakov, I. V., J. Walsh and R. Kwok（2012）, Recent changes of Arctic multiyear sea-ice coverage and the likely cau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 1175/BAMS-D-11-00070. 1.

[9] Morello, S. （2013）, Summer storms bolster Arctic ice. Nature, 500, 512.

[10] Parkinson, C. L. and J. C. Comiso（2013）, On the 2012 record low Arctic sea ice cover. Combined impact of preconditioning and an August storm.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1-6.

[11] Zhang, J., R. Lindsay, A. Schweiger and M. Steele（2013）, The impact of an intense summer cyclone on 2012 Arctic sea ice exten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4）, 720-26.

[12] Maslowski, W., J. C. Kinney, M. Higgins and A. Roberts（2012）, The future of

Arctic sea ice. 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40, 625-54.

[13] Macovsky, M. L. and G. Mechlin (1963) , A proposed technique for obtaining directional wave spectra by an array of inverted fathometers. In Ocean Wave Spectra,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Easton, Maryland, 1-4 May 1961.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pp. 235-45.

[14] Wadhams, P. (1978) , Wave decay in the marginal ice zone measured from a submarine. Deep-Sea Research, 25 (1) , 23-40.

[15] MIZEX Group (33 authors, inc. P. Wadhams) (1986) , MIZEX East: The summer marginal ice zone program in the Fram Strait/Greenland Sea. EO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67 (23) , 513-17.



第七章

北极海冰的未来——死亡螺旋

海冰接下来会怎样？

聪明而谦逊的地球物理数据分析师安迪·李·罗宾逊（Andy Lee Robinson）提出了一种展现北极海冰体积数据的办法，它清楚地表现了夏季海冰的迅速减少将如何导致其自身消失以及一年中其他月份海冰量下降的情况。我们以插图7.1作为分析的起点，该图显示了夏季海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这张图建立在插图6.1显示的海冰下降面积数据之上，同时它还使用了海冰厚度数据。我们用海冰面积乘以其厚度便得到其体积，由于海冰面积和厚度都在下降，因此其下降的相对速率也在增加。图表中的海冰下降趋势最符合线性特征，但2002年以来的数据则能看出下降的趋势在加速。换句话说，由于厚度的影响，海冰的消失速度比我们仅考察其面积数据而得出的结论要快。

插图7.1融合的这两类数据的准确度并不一致。海冰面积数据很准确——它得自卫星图像，这些图像会告诉我们海冰范围（即外部冰缘线以内的海冰区域）和面积（即海冰覆盖的实际区域，其内部可能存在开阔水域）。而插图7.1中使用的海冰厚度数据则不那么准确，它得自某种简单的模型，而该模型并未监测到整个北冰洋的海冰厚度。人们现在已设计出开展这类工作的卫星了。这种卫星就是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于2010年发射升空的冷星2号（CryoSat-2，冷星1号在发射之后不久就失效了）卫星，它使用雷达测高仪来测量冰面相对水面的距离，即出水高（freeboard）。从冰面反射回来的雷达波束测得的精确距离会告诉我们海冰相应的出水高。我们会基于所知的海冰和积雪密度得出的换算因子将出水高换算成海冰厚度。这一因子会随着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和北极区域以及海冰类型等因素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必惊讶于我们会争论何时使用哪种因子。冷星2号的海冰厚度数据已经发布，[1]但其数据仅始于2012年，同时遭到了许多批评。我感兴趣的是自1979年以来海冰变化的整个趋势，所以我更倾向于使用潜艇对北极海冰横截面的研究得出的部分数据，这项工作主要由华盛顿大学的德鲁·罗斯罗克及其同事马克·温思拉汗（Mark Wensnahan）[2]和我本人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展开。华盛顿大学一项名为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系统（PIOMAS）的计划采集了海冰的厚度数据并将其用于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它基于潜艇航行得出的部分数据（它会将我们所知的海冰类型的分布范围、年代及其变化动因，比如空气温度等内插值进行相应替换）而计算整个北冰洋的海冰厚度均值。所以，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项目产出的并非纯粹的数据，而是与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建模对这些数据分析的影响被降至最低。在这方面，它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模型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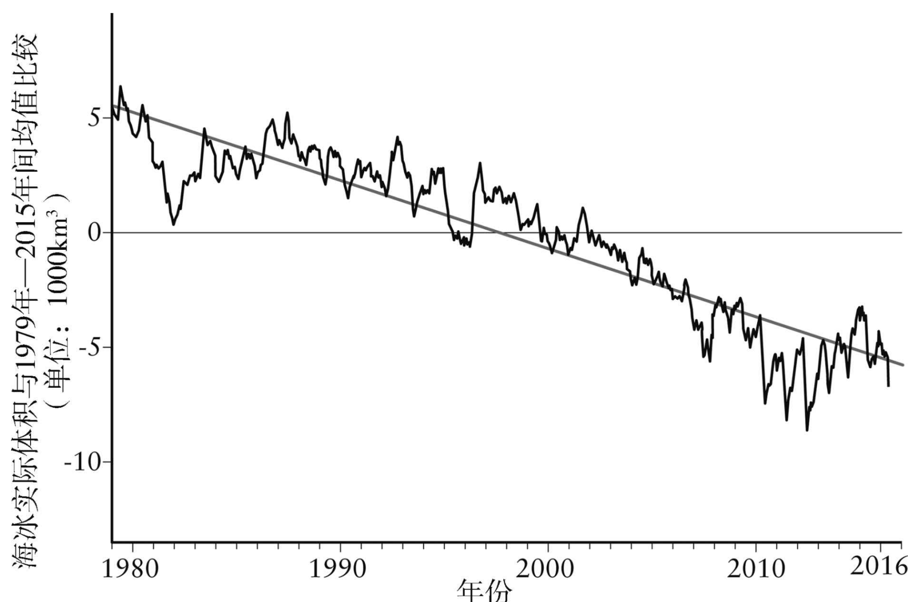


图7.1：过去30年中夏季海冰体积的下降趋势。

罗宾逊巧妙地将这些结果展现了出来。他将插图7.1包装成一个时钟型演示文稿，其中的起点是位于12点位置的1979年，指针顺时针绕表盘一圈重新回到12点位置则代表了我们现在。时刻与表盘中心的距离就是相应年份特定月份的海冰体积均值。其结果就是由12条曲线组成的集合（彩色插图16），如果北极冰量不发生变化，这一结果就将是一组同心圆。但这些曲线都向中心旋转，9月的曲线几乎已抵达中心区域。看到这种结果后，博尔特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冰川学家马克·塞勒泽称其为“北极死亡螺旋”。

如果我们考察北极死亡螺旋，甚至如果我们查看插图7.1所示的时间序列中的单个冰川体积值就会很清楚，实际上，北极的夏季海冰将无法继续长期存在下去。这种下降的趋势将导致北极夏季海冰体积于2016年夏季的9~10月归零，2017年归零的时间为8~10月，2018年则是7~12月。因此，这条趋势线预计2016年会有两个月的无冰月份，2017年为3个月，2018年则为5个月。而一年中其余几个月份的冰量曲线则滞后于上述趋势，但也都呈加速下降的趋势朝死亡螺旋中心靠近。尽管我们不应该使用这种简单的外推法预测未来北极冬季的情况，因为未来几十年可能有大量因素会改变北极冬季的状态。但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外推法获得上述夏季冰量消失的日期，因为我们并未外推多远。一些新的进程总会出现并修正下降的速度，但目前还不存在这种迹象，这种下降的趋势最多再持续几年就会让北极9月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在本书出版之前，这种情况便已出现。

我们在第六章的数据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波动因素”，即任何一年中，明确而强烈的长期趋势都可能受到海冰生长和撤退过程的关键阶段

出现的天气事件等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波动只是暂时的，长期趋势将不可避免。毫无疑问，插图7.1的时间序列呈现出的强大趋势会令夏季海冰很快消失。该趋势指向2016年，当然，波动可能会让夏季海冰消失的日期推后——但不会推迟太多。

科学家用“消失”这一术语表示冰盖主体的消失以及北冰洋随后向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开放。很明显，一些浮冰会继续存在，尤其是海岸线附近和西北航道等区域，但其面积则仅为100万平方公里左右。但冰盖主体将消失。正如下一章展现的，我们能检测到的每个北极反馈机制都呈阳性，没有任何可以想到的进程会减缓或终止夏季海冰的消失。

让我们回想一下近些年夏季海冰加速下降的原因。多年冰几乎已经消失，即使北极大气环流突然发生变化，北极区域今后一两年中保存的新冰也不会从根本上增加海冰的厚度。而夏季无冰海洋的升温还在继续，这将进一步推迟海冰在秋季的冻结速度，随温暖海水而来的融化和海浪则会加快现有海冰的分解速度。

我们是否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近些年，“临界点”（tipping　point）概念甚至在那些与气候无关的领域也变得十分流行，它已变成一个意义十分宽泛的术语。我将采用它的严格定义，临界点出现在系统受到超过一定限度的压力而进入到新状态的时候，即便这种压力消失它也不会回到其初始状态。我们许多人在学校都学过胡克定律。电线或弹簧受砝码拉伸，其拉伸长度与施加的砝码成正比；砝码移除之后电线就会恢复到原有长度。但如果砝码过重进而超出了电线所谓的弹性极限，则同等重量的砝码拉伸的长度就会越大。如此，电线在砝码移除后就无法（且永远不会）恢复到其初始长度，因为金属的晶体结构已经改变。此时，电线便越过了临界点。北极海冰是否已经达到临界点？我认为的确如此，原因如下。

我们知道，北极冬季的多年冰范围正逐年减少。[3]这部分是受到大气压力场的影响，这一因素现在正将海冰从其形成的区域驱赶出北极盆地，而非让其随巨大的波弗特环流长期漂移。如果这种局面继续维持，更大面积的海冰将随时间推移而彻底融化，因为与过去相比，单年冰的生长速度越来越慢，融化速度也更快，进而今后每一年都会有更大区域的温暖海水呈无冰状态。一旦冰盖在某个夏季完全消失，之后的冬季海冰将全部为单年冰，它们又会在来年的夏季再次融化。因此，多年冰基本无法再次形成。进而，夏季海冰融化的速度与其冬季的生长速度之比达到所有的单年冰都在夏季融化的程度时，海冰的临界点就出现了。到那时，单年冰将无法留存到10月（海面冻结开始的时候）并形成多年冰，而北极区域多年冰的比例不仅不会增加而且会一直减少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未来的北极将永远（至少到气候再次变冷之前）仅剩季节性冰盖。

斯蒂芬·蒂奇思（Steffen Tietsche）及其同事2011年的一篇不同结论的文章获得了公众大量的关注，[4]但其文中的论证完全是误导性的。作者提出了去除整个北极冰盖（在一个模型中）的人工程序，并发现冰盖

在两年内就恢复到其原有水平。在这个程序中，冰盖持续减少以响应模拟的气候变暖的周期为21年，而冰盖每次都能恢复到其先前的状态。作者得出结论，海冰的撤退是可逆的，我们为了再现北极冰盖而必须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其消退的时候将碳排放减少至辐射强迫不再起作用的程度。这个结论不合理，原因有二。首先，在计算机模拟中完全去除冰盖的行为是对冰盖的人为改变，这并未改变其他任何条件，因此，冰盖随后自然会回到之前的状态。其次，天然冰消失过程可逆的结论无法解释二氧化碳引发的辐射强迫所导致的时间滞后现象，而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对气候系统造成的持续影响会超过100年。即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减少也不会导致气温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连续下降，海面温度更是如此。

我们何以知道这一切终将发生？

作为一位实验科学家，我最奇特且沮丧的经历就是人们对数据的态度的变化。毫无疑问，当我年轻时，对各种北极现象的观察和测量都自动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从观察到的趋势外推则被认为是预测将来（至少短期内）发生之事的最佳方式。但此景不再。如果基于观察的预测让那些主要观察模型数据的科学家感到震惊，有些人会无视预测结果，并用可能已经失效的计算机模型得出的预测取而代之。我在2012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我为北极海冰迅速下降而向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作证，两周后，英国气象局首席科学家茱莉亚·斯灵戈（Julia Slingo）女士直接驳回了我的证词，她以自己的方式向委员会保证道，模型分析者说海冰还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并以此排除了夏季北极海冰会在未来数年内消失的可能性。2014年，我又一次就北极海冰迅速消失的问题向上议院专家委员会作证，坐在我旁边的建模者再次直接反驳了我的证词，他说模型预计夏季海冰会继续存在至2050年—2080年。离奇的是，甚至外行看了彩色插图16中基于确切数据的曲线后，也能得出夏季海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存在那么长时间的结论。然而当这些建模者的建议提交给政策制定者后，后者就会在面对气候灾难面前无动于衷，而这灾难却像高速列车一样向我们驶来。

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项目中的数据给出的趋势有力地告诉我们夏季海冰消失的时间将是2020年。任何想要否认这一日期，并用更晚的日期取而代之的人都必须解释为何海冰量会背离上述趋势。唯有如此，夏季海冰才能长期继续存在而非仅仅眼下一两年，但目前并不存在实现这种结果的机制。如果你不否认这一日期，并将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产生的数据作为最佳预测的基础，那么，这种预测不仅会得出2016年或2017年9月北极无冰的结论，而且还会得出在21世纪20年代之前的某年中的7~11月就会出现海冰消失的结论。这个世界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趋势的否定者不仅包括正常的怀疑者，比如被误导的政府科学家或者被收买的化石燃料支持者，还包括建立于1992年的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团体，它以科学的姿态警告世人，如果继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发生什么。我指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其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并未提出北极海冰会很快消失的警告，而是达成了海冰会在本世纪很晚的时候才消失的“共识”。这一共识故意忽略了观察数据，并支持了已被证明为误的模型。

这是对多数科学家十分尊重的团体的严正指责，但如果我们看看2013年评估报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概要，特别是该报告第21页图SPM.7，这种指责就显得合理了。[5]插图7.2显示了该图的（b）部分，其中涉及4种误导方式。首先，2005年的数据中下方有个大黑条。正常人会设想它是黑色曲线，其灰色的误差线位于该黑条左侧，图中标注写道：这代表了9月海冰范围的历史数据。总之，它包含了1950年到2005年这一大体上安全的时期，所有的数据都已囊括在内。但事实上，这是“使用历史重构的力量模拟历史演化”。换句话说，即便数据可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还是倾向于使用历史模型，毫无疑问这种模型显示的海冰下降速度比实际和缓。止步于2005年的历史曲线具有严重误导性，因为正是2007年以来发生了最具灾难性的海冰下降趋势，这一点不应该从图表中省略。第五次评估报告应该考虑到2012年以前发表的数据，并且截止这一时期的数据肯定都已发布。但不知何故，该图中的历史终止在了2005年，之前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过渡数据则发表于2007年。再来看未来预测部分，尽管这些预测始于9年前的2005年，我们看到的仍是两条带有误差线的曲线。一条是未来碳排放“代表浓度路径8.5”（RCP8.5）的情况预测，另外一条则是“代表浓度路径2.6”的情况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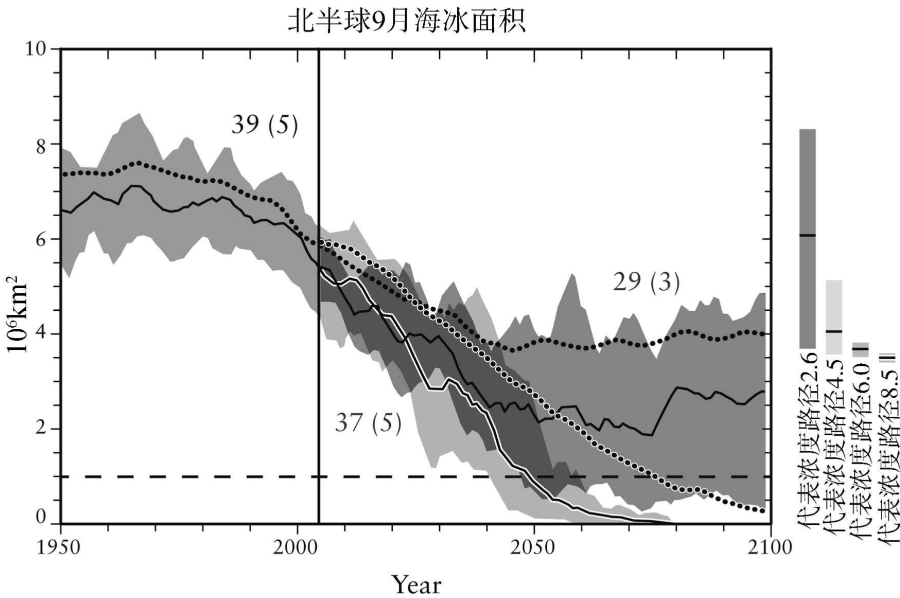


图7.2：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供政策制定者参考的概要部分，图SMP.7（b）

我需要简单解释这种看待温室气体强迫的不必要且复杂的新办法。

RCP就是“代表浓度路径”。它后面的数字表示与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相比的2100年的总体人为辐射强迫。所以，8.5就是8.5瓦特每平方米，这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最终达到的状况，即我们不对碳排放水平做任何干预（实际上会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数据）。代表浓度路径2.6的预测则显得可耻，因为它预计2100年的辐射强迫为2.6瓦特每平方米，而我们在2030年就会超过这一数值。为什么我们在绝对做不到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变得多善良都不行）还要作出这种预测？人为辐射强迫在2011年达到了2.29瓦特每平方米，相比1950年的0.57和1980年的1.25都有所上升。这一数字翻倍的时间似乎是30年，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它降至可控范围，以至于到2100年时这一数字仅为2.6。因此，代表浓度路径2.6是完全误导人的数字，似乎在报告中引入这一数字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虚假安全感，读者会感觉到，如果我们努力尝试就能控制气候变暖，于是，让人舒服而非令人不快的预测就会得到广泛支持。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承认，代表浓度路径2.6场景只能用某种尚未发明的方式去掉大气中的碳成分实现，而非仅仅减少碳排放（我们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能做到。

我们再看看图SPM.7及其预测。其中的两个预测都高度可疑。代表浓度路径8.5表明，夏季海冰量会稳步下降直到在2050年完全消失（即降至100万平方公里以下）。然而该曲线开始于2005年，我们已经证明了该处曲线避免了与真实数据对比的尴尬局面。事实上，2012年9月海冰范围已降至340万平方公里，而代表浓度路径8.5场景显示直到2030年才会降到这一水平。预测提前成真！那么，为何这个模型压根没包含任何真实数据？而且我们记得，这个模型旨在显示高排放情景。而代表浓度路径2.6中不可思议的低排放量显示，海冰并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本世纪晚期逐渐恢复，从而在2100年达到比今天少不了多少的300万平方公里。这种狡猾的说辞从何而来？当这份报告首次出版时，看过它的两位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噢，我看见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海冰会在本世纪恢复。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干预全球变暖，对吗？”这个预测图的起草者肯定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科学欺诈的精彩实践。

事实上，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中各种势力之间平衡而达成的“共识”并不能回答我在本章之初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模型甚至无法解释我们现在的情况，更别提未来的情况了。且这份共识并不能合理地证明即将发生的事情。鉴于现有的数据，否定海冰消失的人们负有举证责任。我们甚至都没有谈到任何一个预防原则，像甲烷排放的情况一样，来采取行动以防万一。此处的情况真实可靠，应该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而不是否定和隐瞒的对象。如果荒谬的“共识”让我们无视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及其影响，世人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海冰消退的直接结果——北极航行

很明显，未来北极区域的冰盖面积会大大降低，夏季尤其如此。我们会在下一章说明这对气候系统的重大意义，以及海冰消退引发的反馈机制将带来的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然而，对航行和石油勘探这两种人类日常商业活动而言，也会受到影响。

海冰越发稀少的北极为该地区的航运业发展带来三种可能：对美国北部西北航道的商业开发；俄罗斯北部北海航道的商业使用；发展从白令海峡到弗拉姆海峡的真正的跨极地航线。

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人们试图穿越西北航道时总会面临许多海冰。早期探险者在探索西北航道时会同时面临两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调查巴芬湾和白令海峡之间异常复杂的航道网络，而且只能在夏季海冰消退到足以让船只通行的短时间内才能取得一点进展。这两个任务无法同时完成，但皇家海军作出长期努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最初的一次尝试差点就成功了。1819年，威廉·爱德华·帕里（William Edward Parry）中尉（后来的海军上将）被派往赫克拉和格里珀（Hecla and Griper），因为运气和特别顺利的航行季节，他成功地通过了梅尔维尔子爵海峡（Viscount Melville Sound）并顺利抵达梅尔维尔岛，在该岛度过冬天之后便返回了。这次航行代表着人类几乎彻底通过了西北航道。帕里在后来的探险中再也没能重复这次壮举，其他任何人也都无法与之匹敌，这倒不是因为航海技术不够，而是因为海冰太多。西北航道上的航行每一年的变数都很大，因为海冰有可能在夏季融化成小块，并被海风和洋流带离那些相互关联的通道要塞，船只因此得以通行。帕里面对的几乎是无冰的航道，但在19世纪没人真正遇到该航道无冰的情况，所以风力帆船从来没能通过西北航道。

随着蒸汽动力船只的出现，西北航道的通行就变得更容易了，但首批适合北极探险船只的蒸汽机却动力不足，且因为煤炭消耗过高而只能短时间工作。1845年，海军部门派约翰·富兰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考察西北航道，并试图让他一劳永逸地解决该航道的通航问题。他的两艘分别名为“厄瑞博思号”（Erebus）和“特罗尔号”（Terror）的船上都装有火车机头，机头经装饰过的橡胶带与螺丝连接，但仅有25马力，几乎无法让船只在水上航行（最大速度为4节），因此，这两艘船未能拯救富兰克林一行人被困威廉国王岛的绝境。不幸的是，富兰克林死后（很可能是自然死亡），他的副手便抛弃了被困的船只，并带领船员经陆路艰难无望地向南跋涉；结果128人全部遇难。1903—1906年，探险家阿蒙森（Amundsen）终于成功通过西北航道。阿蒙森一如既往地以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有的才能和常识解决航行中的问题，他驾驶的是配有热球式发动机（hot-bulb engine，一种较早的汽油发动机）的小型单桅鲱鱼船“约阿号”（Gjøa）。这艘船的主要优点是小巧和吃水浅，能在夏季搁浅残冰和海岸线之间的浅水区航行。而因为船只吃水深，富兰克林只能在中间航道上航行并因此受困。阿蒙森在威廉国王岛上现在被称为约阿港的地方停留了两个冬天，以进行磁性测量，并以各种方式与当地的因纽特人交往，以学习他们的探险、制衣和狩猎技术。这里成了他的北极大学。

阿蒙森之后，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西北航道。尽管已经通航，但很明显，该路线并不具备日常通行的条件。第二艘成功穿过该航道的是1940—1942年间执行巡逻任务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电机纵帆船“圣洛奇号”，传奇警长亨利·拉森（Henry Larsen）指挥了这次航行。战后，大船终于都开始通过该航道了；此后最早的是1954年通过的军事破冰船，

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拉布拉多号”（我很高兴于1978年搭乘它前往纽芬兰开展海冰研究，不久之后它就报废了）。这之后，巨型油轮“曼哈顿号”出现了，其所有者亨布尔石油公司（Humble Oil Inc.）为其设计的载重是10.5万吨，其任务是将北极地区的石油经阿拉斯加北部海岸的浦鲁杜湾运至东部和欧洲的广大市场。这艘船的船首经过特别加固，但其动力却与其尺寸不匹配。它在航线上被困住过几次，不得不出动加拿大政府强大的破冰船“约翰·A.麦克唐纳号”（John A. Macdonald）进行破冰救援。它还曾因为撞上浮冰而出现泄漏事故，导致其水箱里的淡水逐渐被海冰填满。这艘船的两次航行分别在1969年和1970年，由于航行中的负面经验，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作为十分昂贵的替代方案得以铺设，北坡油田（North Slope）的石油得以经由它通向消费市场。

1970年，轮到我们乘坐的“赫德森号”穿过西北航道了，一道通行的还有赫德森的姐妹船“巴芬号”，我在本书开头介绍“赫德森-70号”的探险时已述。我们的船长选择了经由威尔士亲王海峡进入帕里海峡的直航路线，这是“圣洛奇号”1940年、“拉布拉多号”1954年以及“曼哈顿号”1969年曾走过的航线，但比阿蒙森经由皮尔海峡（Peel Sound）、富兰克林海峡和加冕湾（Coronation Gulf）的路线更靠北。我们很顺利就通过了威尔斯亲王海峡，但航行至北端时，却被位于帕里海峡西端和麦克卢尔海峡（M'Clure Strait）南端无法通过的海冰所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直阻碍着船只的通行。真正来自北冰洋的极地海冰可经由麦克卢尔海峡向南漂移，并形成多年冰组成的完整屏障。麦克卢尔于1885年驾驶皇家海军舰艇“探索者号”寻找富兰克林时因为这些海冰屏障而沉没，“探索者号”的残骸直到2013年才被加拿大潜水员发现。跟很多先驱者一样，我们也不得不求助于“约翰·A.麦克唐纳号”破冰船救我们于困厄之中，以便能安全及时抵达哈利法克斯（Halifax），并以第一艘环游美洲船只的身份受到正式欢迎。[6]

西北航道中的航行现已司空见惯，但货运航线却没有出现。政府的破冰船开拓了路线，冒险的游艇也偶尔悄悄通过，人们正努力在航道中建立一条游船路线，我在这一过程中也小小地发挥了向导的作用。我的船只是海冰加强型船只“拓荒者号”（Frontier Spirit），一般仅为6000吨级别的小船。1991年，它曾在西北航道上由西往东航行，但未到达比阿拉斯加北部海岸更远的地方。次年，它由东往西航行，这一次顺利地通过了，但还是向加拿大政府的两艘破冰船“特里·福克斯号”（Terry Fox）和“富兰克林号”进行了求助。当时，它刚刚离开威廉国王岛西海岸就被困住了，该地几乎就是1845年富兰克林的船只受困并最终失事的地方。再次强调，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北冰洋中来自麦克卢尔海峡的浮冰往更远的东南方向移动，从而在该海域堆积形成巨大的多年冰。

即便西北航道近年来的冰面状况已经回暖，它也并未自动成为可通行航道。正如我们在表12中的地图中看到的，该航道完全开放于2007年而非2005年。尽管夏季残留的海冰比以前少得多，即便浮冰总会碎解，但这仍无法保证海风和洋流会将碎冰运出航道并留下自由航行的空间。因此，尽管开采巴芬岛上铁矿的矿石运输船已频繁经过航道的东端，但我怀疑货运船还需要几年时间能才通行。在小型游轮“世界号”于2012年

成功通过西北航道之后，人们还计划在2016年派遣大型游轮“水晶尚宁号”（Crystal Serenity）通过该航道。

相比之下，俄罗斯北部的北海航线则被证明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个航道在地理上简单许多；那里的人们要做的事就是静候海冰在夏季向北后撤，进而让出靠近海岸线的空旷通道。如今，该航道主要的海冰堵塞发生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威尔基茨基海峡（Vilkitsky Strait），该处的海岸线向北转弯，新西伯利亚群岛也形成阻碍因素，海冰有时整个夏季都会在这两个地方聚集。我们查看彩色插图13便知，北海通道在2005年而非2007年处于无冰状态。而最近几年，每年夏天这里都没有海冰，胆大的航运公司已开始在整条航线上派出货船和油轮了。2013年，154天的季节中共计有49次通航，运到该航道东西端各处港口中的货物则有1355897吨。[7]2014年，该航道的货运吨数因为一些货运商的退出降至27.4万吨。然而，将北极液化天然气（LNG）运往市场的承运商似乎前景光明；油轮运输石油的前景也是一样；往来于西伯利亚聚居区的货船和各种专业船舶也都是如此。例如，有人建议从阿留申群岛的美国渔民处购买鲑鱼和其他鱼类的日本冷藏船直接经由北海航线抵达欧洲；人们还建议在北海航道上设立一条运输核废料的航线，从而让运输船避免任何海盗的袭击。但奇怪的是，集装箱运输在该区域似乎并不被看好，因为集装箱贸易的模式要求装货点和目的地之间的航线上设立经停站点，而这在北海航道上无法实现。但这并未阻止斯卡帕湾奥克尼群岛（Orkney）和冰岛等地热情的地方当局，他们都热情地提议将各自的城镇设立为大北极区域集装箱码头的站点。上述情形并不新鲜：部分北海航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便已作为运送可怜的政治犯到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最险恶区域的航道，而且仅需部分北海航道，其沿线的港口就能开展强劲的贸易。许多年前，我在剑桥做完讲座之后，一位前英国商船船员走到我跟前说道，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驶往伊加尔卡的木材船上工作过。现在的新情况就是夏季航运更可靠了，因为整条航线无冰的可能性很高。

因此，我们在夏季已经有一条可靠的跨北极航运路线了，另一条也即将出现。而我们最后的目标则是建成真正的跨极地航运线路，并让来自北太平洋的船只经白令海峡直接穿过北极，再从弗拉姆海峡进入大西洋，这取决于海冰进一步消退的情况。这条航道将大量缩短路程：横滨到汉堡经北海航道的距离为6600海里，经苏伊士运河则为11400海里，若经跨北极路线，路程会大大缩短。跨极地航线的其他好处则是该航线大部分航段为深水区，且独立于各国当局，因此不必向他们（尤其是俄罗斯）支付过路费。但安全管理仍属必须，出现意外的时候也需要安排搜索救援（SAR），这些事宜都由北极理事会管辖，它是拥有北极领土的八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组成的协会。目前，像韩国这样的造船大国正在积极地设计能够在没有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也能运送货物通过单年冰阻碍的海冰加强型船只。这样的船只可能类似于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Norilsk Nickel）的船只，该公司使用船尾经过海冰加固的船只运输北极地区的镍矿，这种船在可360°旋转的吊舱驱动装置协助下可迎着海冰逆行。

海冰后撤的即时影响——石油和海底

海冰消退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北极的石油勘探范围比以往更广。直到最近，多数石油勘探都在北极的浅水区进行。例如，波弗特海域最早的近岸油井位于很浅的水域，即马更些河三角洲（Mackenzie River delta）普拉德霍湾（Prudhoe Bay）几米深的地方，其建造方式则是直接将沙子堆成一个护堤，然后将钻机架在顶部形成一个人造岛。然后再向更深的地方（几十米深）搜索，但这仍然可通过某种底部安装结构加以处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和库页岛（Sakhalin）近海数十米深的地方，从底部安装的平台处钻井。这些浅水区部分属于海冰会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消失的季节性冰区。

但随后对石油的搜寻以及何处出产石油的想法都会将钻井活动扩展到越来越深的水域。在北极以外的地区，这一过程会导致人们在很深的水域（比如巴西的一些海域）钻井，而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就发生在1800米深处的海域。石油行业现已将目光投向了很浅的、界限明确的大陆架范围以外的北极深水海域。但这会涉及产业和政治的磨合。北冰洋的海洋法尚未通过。原则上，海岸线200公里以外的地区属于联合国海底管理局（UN Seabed Authority）管辖的国际海域。如果大陆架延伸得更远（就像北极大陆架那样），则距离最近的沿海国家可将其管辖权扩展至陆架折坡（shelf break）处，但不能比这更远。任何进一步的权利主张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

麻烦在于，北极的一处地方让它可能陷入无限的法律争端，该地名为罗蒙诺索夫海岭（Lomonosov Ridge，插图7.3）。这个海岭从格陵兰-埃尔斯米尔岛边界北部开始，一路穿过北冰洋，经北极点附近延伸至西伯利亚大陆架附近。它从西伯利亚大陆架延伸出来，所以俄罗斯会主张对其的权利。它同时也从加拿大-格陵兰岛边界处延伸出来，因此加拿大和丹麦也都对其主张权利。但其他多数国家都声称它应该国际化。该海岭本身实际上是8000万年前脱离西伯利亚大陆岩体的一个碎片，当时北冰洋中脊开裂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大洋地壳，进而推动这一海岭远离西伯利亚。现在它已经抵达北冰洋中部。事实上它与西伯利亚大陆或者加拿大、格陵兰岛并不相连，因此，所有这三个权利主张理应失效，因为该海岭的末端属于别的岩体而并非这些国家声称的大陆架。该海岭也并非一个大陆架；它曾是大陆架的一部分，但却是与它今天所在区域看上去完全不同的大陆架部分。实际上它应该归联合国管辖，但俄罗斯、加拿大和丹麦却试图提出国家层面的权利主张，为了支持这一主张，俄罗斯曾幼稚地于2007年派潜艇向北极点4200米深处的海域投掷金属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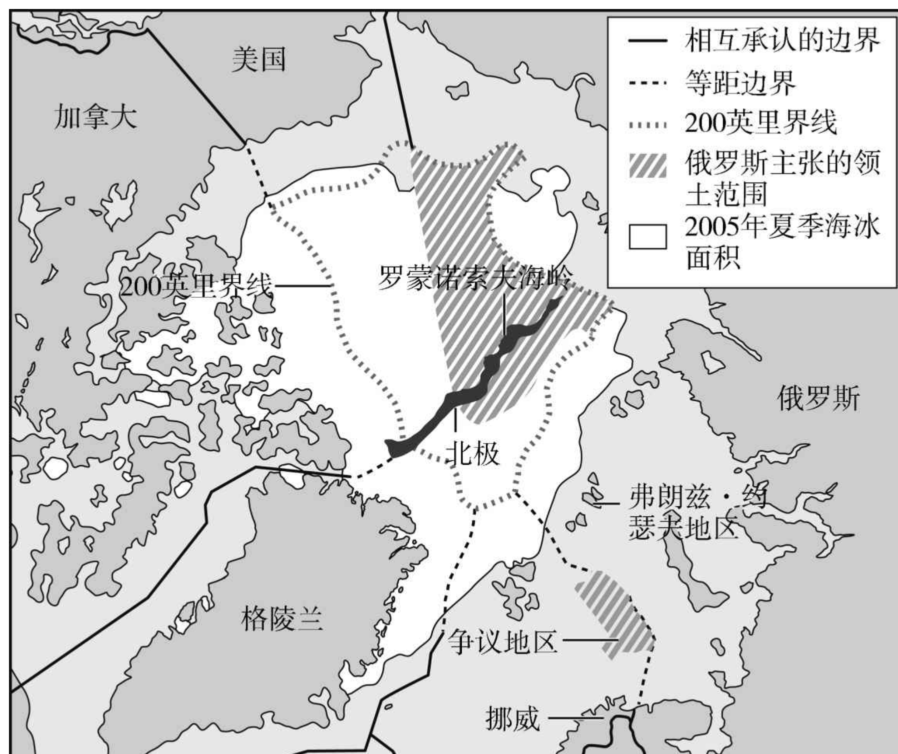


图7.3：罗蒙诺索夫海岭，图中所示为俄罗斯主张的海底区域。

海床的所有权一旦确定，石油勘探就能进一步在深水区域展开，而海冰的撤退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接下来的钻井作业将由钻井船以动态定位的方式在数十米深的水域完成，夏季海冰会不断侵扰，破冰船则会将海冰打碎成小块以防它们将钻井船撞离平台。如果海冰更薄或者压根没有，钻井作业就更容易展开，钻井周期也能延长并占到全年的多数时候。如果已进入可生产阶段，人们就能用加强型生产平台为海冰加强型油轮输油，就像俄罗斯人在伯朝拉海（Pechora Sea）做的事情一样。气候科学家提出，尚未出产的石油和煤炭应该就地封存，因为我们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地球大气可接受的碳负荷了，而石油公司和贪图税收的政客会强烈抵制这种观点。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石油业意识到全面停止新的石油资源开采的决策会立即给所有石油公司造成资产损失，进而导致石油公司和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

石油泄漏及其应对措施

人们普遍认为，海底井喷造成的石油扩散是北极环境的一大威胁。这是我供职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arch Council）其中一个小组的报告主题。[8]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海底发生井喷，则不存在任何可将泄漏的石油清理干净的办法。泄漏的石油会以气液两相流（oil-gas plume）的方式从海床上升并涌向海冰的底部，之后，这些聚

集的油滴会形成光滑的油层。海冰会不断移动，因此，如果发生井喷，浸过油的海冰就会从它原来的地方漂走，而漂来的干净海冰就会受到污染。冬季，新冰会快速在油层下面生长，进而形成“石油三明治”，石油就这样被包裹在里面直到冬天结束。在此期间，海冰可能会漂移1000公里甚至更远，进而抵达一个与其漂来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北极区域。随后，海冰表面在春天开始融化，而石油则通过盐水排放通道（见第二章）开始上升到海冰表层，这些通道在春季会部分融化并开启，进而提供了通向海冰顶部的通道。突然间，这些通道顶部四周都会出现小块石油斑点，它们通常很小，无法清除或点燃。夏季晚些时候，整块海冰都融化后，石油就会在海水中聚集并成为遍布北极夏季开放水域污染物。这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数以百万计的迁徙海鸟而言尤其危险。

1974—1976年间，我在从事名为波弗特海洋计划的加拿大政府研究项目时就掌握了上述情况。[9]批准石油公司在浮冰水域钻井之前，加拿大政府想了解三明治式油冰造成的威胁性质，因而允许在北极海域大量排放石油，包括持续整个冬天的固定冰下的井喷，来确定会造成什么后果。我记得当时在北冰洋上做的一个近海实验：我们在一处压力脊下面抽油，潜水员在一旁跟进实验进程。我的任务是用手持泵不停将原油喷往海冰下层，油滴有时也溅到我的大衣上，之后我只好将它扔掉，因为上面的恶臭无法祛除。自那时起，这方面的科学进展一直很慢，因为政治正确的法令规定不能在北极区域排放石油，即便为了实验目的也不行，因此，人们对环境的关注阻止了科学家们了解漏油事故对环境的影响。当起草美国2014年的石油泄漏报告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加拿大1974—1976年的项目仍是最佳的数据来源。

我们在2014年作出的结论是，海冰下面大规模的原油喷发事实上比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的影响更具灾难性，因为海冰确保了原油能以低浓度的方式在北冰洋广泛散布开去，这让清理工作变得更困难。我们的结论还包括，阻止井喷的普遍方法是钻减压井，但这会耗费很长时间，因此每个操作者都应该配备一个可用于覆盖井喷的封盖装置以便更快地堵住井喷。这种新观点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2012年的壳牌公司，它建造的封盖装置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就失败了。壳牌公司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并于2015年在楚科奇海（Chukchi Sea）开展钻井作业，不料在当年第一季度就被迫放弃。美国国家科研委希望监管机构能接受我们的结论，以确定如何在北极进行钻井作业。设立这一委员会的动机是人们担心开发商们在海冰撤退的情况下急于开采新油田而忘记保护环境，进而导致北极原油泄漏。但这并未发生。石油公司都很谨慎。可能的原因则是，英国石油公司为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据估计，罚款、清理和安置费用约为546亿美元），这几乎让它破产。谁污染谁花钱治理。如果北极发生井喷事故，特别是如果发生在美国领海，污染者可能付出的代价则比在墨西哥湾发生的事故高很多。针对这种情况，石油公司也都对此望而却步，并逐渐对水力压裂法趋之若鹜。

行业和监管者对代价高昂的事故的担心导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决定。近期遭到反驳的加拿大政府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并非因为关注环境问题而闻名，他曾大量开除联邦环境科学家，同时推动

艾伯塔省油砂的开采，这是浪费最大的化石燃料之一，因为它需要额外的能量“加热”以提取有用的碳氢化合物。然而，在2014年4月2日，我们得知加拿大联邦交通运输部长丽莎·雷特（Lisa Raitt）曾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加拿大北部海域运送石油。加拿大在曼尼托巴省赫德森湾有个名为丘吉尔的北极港口，该港口通过铁路与加拿大南部相连。一家名为欧姆尼特拉克斯（Omnitrax）的公司曾计划通过铁路将石油运往丘吉尔港，然后用轮船经西北航道出口至欧洲。部长说：

> 我可以告诉你：北极哪怕发生一次漏油事故也是你不想看到的事情……此事不仅关乎经济。我不能相信自己作为保守党会说这样的话。但这事真的并不总是经济上的事。你必须从安全和环境等方面平衡考虑即将发生的事情。

马尼托巴省政府一直寻求在赫德森湾的海岸成立保护区，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现在是北极熊的避难所，而它们正是因为全球变暖而被迫离开自己习惯了的栖息地，然后在丘吉尔港区域的垃圾桶附近找食吃。部分原因还在于人们想保护那些栖息在海岸附近水域的稀有白鲸。联邦政府支持上述立场实属罕见，但令人振奋。

北极海冰的消退意味着长年的井喷的确会造成悲剧。按照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井喷事故的设想，被海冰夹带并绕北极环流的原油最后会在夏季从冰缘线附近的浮冰中释放出来，进而在夏季海冰的边缘附近留下漂浮的原油。未来，北极夏天的冰缘线将不复存在，因为夏季的海冰都将消失。而含油的海冰则会彻底融化，随后在北冰洋所有开阔的水域扩散开去。这对环境的破坏及其清理代价将是巨大的。

我应该以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结，海冰的撤退会导致北极海洋生态的变化。如果春季海域的光照水平比以前高，则浮游生物的生长就会越来越早，其产量也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渔场可能会随着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这些变化而逐渐出现。人们难以预计北极海洋生态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海冰的撤退会让捕鱼船在地理上和季节上扩大活动范围，从而尽可能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海冰可能在本世纪进一步撤退

建模者很难在海冰撤退的世纪大趋势下预测无冰水域出现的季节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主要的原因是多数模型在重现北极夏季海冰时令人失望。关于北极在哪一年的9月会变得无冰的争论已经掩盖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即北极海冰全年消失的情况将以多快的速度，什么方式出现等。死亡螺旋已经告诉我们，北极9月的冰盖会在数年之内消失，无冰的季节将扩大至五个月，基本上就是7月到11月。但无冰期会止步于此吗？南极仅有季节性冰盖，并且南冰洋多数区域会连续四到五个月处于无冰状态，其他几个月则被单年冰所覆盖。但这种情况会保持稳定吗？更温暖的气候肯定会导致无冰季节的扩大，因为气温升高必将伴随更多太阳辐射，但即便在无冰的夏季过去之后（其间无冰的海水会升温），

接下来的某个时间，或许在12月，当黑夜变长，气温降低，海面储存的热量释放出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促使海冰重新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春天或初夏。

我们很难想象北冰洋全年无冰的情形，尽管死亡螺旋已经预示了这最后的光景——冰量曲线都向内旋转。相比海冰季节性覆盖的时候，无冰的北极即便在仲冬时节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水循环和热循环。这种情形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但到那时，我们的星球也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进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下一章，我将考察北极海冰消退所导致（或与之相关）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多数灾害已经发生；西伯利亚大陆架夏季的海冰已经不复存在，而这造成了甲烷大量释放的威胁，正如我将在第九章描述的那样。

注释：

[1] Laxon, S. W. et al. （2013）, CryoSat-2 estimates of Arctic sea ice thickness and volum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732-7.

[2] Rothrock, D. A., D. B. Percival and M. Wensnahan（2008）, The decline in Arctic sea-ice thickness: separating the spatial, annual and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n a quarter century of submarine dat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113, C05003.

[3] Kwok, R. （2009）, Outflow of Arctic Ocean sea ice into the Greenland and Barents Seas:1979-2007. Journal of Climate, 22, 2438-57; Polyakov, I. V., J. Walsh and R. Kwok（2012）, Recent changes of Arctic multiyear seaice coverage and the likely cau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 1175/BAMS-D-11-00070. 1.

[4] Tietsche, S., D. Notz, J. H. Jungclaus and J. Marotzke（2011）, Recovery mechanisms of Arctic summer sea ic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8, 1-02707.

[5] IPCC（2013）,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Working Group1 Contribution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1.

[6] Wadhams, P. （2014）, The “Hudson-70” Voyage of Discovery: First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D. N. Nettleship, D. C. Gordon, C. F. M. Lewis and M. P. Latremouille, Voyage of Discovery, Fifty Years of Marine Research at Canada'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Dartmouth: BIO-Oceans Association, pp. 21-8.

[7] Humpert, M. （2014）, Arctic Shipping: an analysis of the 2013 Northern Sea Route season. Arctic Yearbook 2014, Calgary: Arctic Institute of North America. See also Arctic Council（2009）, Arctic Marine Shipping Assessment 2009 Report.

[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2014）, Responding to Oil Spills in the U. S. Arctic Marin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9] Wadhams, P. （1976）, Oil and ice in the Beaufort Sea. Polar Record, 18（114）, 237-50.



第八章

北极反馈的加速效应

气候反馈的概念

上一章，我们考察了北极海冰撤退如何对北冰洋的未来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同时这也改变了我们看待海冰撤退的方式。乍一看，北极海冰撤退是北极区域经济上的福音。我们至少可以在夏季将北冰洋视为可能的贸易路线，而非屏障。我们还能将其看作更容易探索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更容易捕获海洋生物的地方。所有这些变化从表面看都很积极，但这一切都仅仅建立在海冰撤退的直接影响上，即它允许人类一年中在北冰洋的活动时间更长。我们并未考虑海冰撤退将如何改变全球气候系统的其他方面。本章将展示，北极海冰撤退造成的间接影响对整个地球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我们可将其视为地球的绝对灾难。

造成正反两种影响差异的原因是，温室气体升温直接引发的正面反馈，即北极海冰撤退的事实，其本身的影响会强化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并导致与最初的变化不成比例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反馈和联系存在于整个气候系统之中。正如神秘主义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所说：

> 拈花惹星动。

我们在第六章中已经提到一个可能十分重要的反馈机制，即海浪-海冰反馈，海冰撤退导致波弗特海域会在夏季形成更多的海浪，它们与海冰相互作用，导致更多海冰分解并融化，从而减少了秋季海冰的形成。而我们将在本章考察的其他重要反馈包括：

——冰面反射率反馈

——雪线撤退反馈

——水蒸气反馈

——冰盖消融反馈

——北极河流反馈

——炭黑反馈

——海洋酸化反馈

而最危险的潜在反馈——近海多年冻土融化后的甲烷释放——将独立成章（第九章）。此外，另一个更深的影响最近也越发明显，即北极海冰撤退甚至可能已导致急流（jet stream）位置的改变，进而让北半球农业区域在一年中的关键时期形成新的极端气候模式，全球粮食供应因此受到威胁（见第十章）。

海冰反射率的反馈

我们在第二章指出，开阔水域的反射率（即入射太阳辐射被直接反射回太空的比例）仅为0.1，而海冰反射率则从0.5到0.9不等。落在平滑

海冰上的新雪的反射率为0.9，如果你在3月或4月太阳较高白昼较长的时候到达这样的地方，雪面耀眼的反射足以引起雪盲。这是诸多早期探险者（比如斯科特船长及其队员）曾遭受过的痛苦。

一旦海冰上存在任何起伏或其他不平的表面，或者当积雪逐渐风化或被风吹成名为雪脊（sastrugi）的波状圆丘，其反射率就会降至0.8。春天来临，雪面反射率会下降更多：每当气温升高到0℃以上，表层积雪开始融化，雪面颜色就会逐渐暗淡，反射率也随之降低。当积雪大量融化时，冬季沉积的炭黑就会形成污泥，进而被后续的降雪掩盖。最后，冰面表层会千疮百孔并伴以一些融化的雪水坑。这些雪水坑的表面较暗且容易吸收太阳辐射，因此，它们会融化至冰体深处——通常会融化到海冰表面呈蜂窝蛋糕的样子，此时的海冰会变得十分脆弱（彩色插图18）。这一阶段的海冰表面平均反射率为0.5甚至更低，但海冰最后消失时反射率降至0.1才是最大的变化。

人们在夏季测量反射率以及为其建模一直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十分准确地知道新鲜积雪的反射率（0.9），但这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极的热平衡，因为北极冬季几乎没有太阳辐射。夏季太阳辐射最高时，我们又必须估计融化的污浊冰雪以及融雪坑组成的表面的平均反射率，而这种混合表面会在温度上升或下降的几小时内迅速改变其性质。1971年首次成功为北极进行热力学建模的加里·马伊库特（Gary Maykut）和诺伯特·恩特斯坦纳（Norbert Untersteiner）也曾面临这一难题，[1]他们选取了夏季海冰反射率任意值，但近些年，像美军寒区研究和工程实验室的唐·佩诺维奇（Don Perovich）等人则十分看重细致的实地观测，这会显示反射率变化的范围。[2]

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反射率变化有两层含义。气候温暖时，冰面会在夏季早些时候就开始融化，而反射率从雪面覆盖的0.8或0.9到污泥融雪混合表面反射率为0.5左右的下降过程也随之更早发生，这让海冰在仲夏季节吸收的太阳辐射也更多。但比这更重要的变化是，夏季融雪（无论多脏）覆盖的海冰会消退为空旷的水域。这一过程又让反射率从0.5降至0.1，因此，夏季海冰反射率下降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更好地获得总体冰面的反射率重要，后者可让我们了解之前多少海冰区域后来被开阔水域取代。我们可从2007年缺口状的开放海域中（彩色插图13）看出总体反射率丢失了多少——反射率的丢失量就是太阳辐射的增量，也即地球热量的上升幅度。

这种反射率的丢失对地球变暖有多严重的影响？克里斯蒂娜·皮斯托内（Kristina Pistone）及其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同事们的一项研究估计，[3]1970年到2012年间，北极夏季海冰面积的损失导致的全球平均反射率的下降，相当于这一时期人为排放入大气二氧化碳总量的1/4给地球造成的升温效果。这一过程因为效果即时而被称为“快速反馈”。地球反射短波辐射量的减少导致全球范围辐射强迫的增加，进而提升了全球气温。这项研究使用的可直接测量反射率的刻瑞斯（CERES）卫星避免了实地测量北极反射率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北极年均反射率在1979年到2011年间从0.52降到了0.48。这一降幅看上去不多，但它相当于北极在这一时期额外吸收了6.4瓦特每平方米的额外辐射，或者整个

地球额外吸收了0.21瓦特每平方米的辐射量。

雪线撤退反馈

北极开阔海域的温暖空气也会导致雪线撤退。春季北极海岸线附近积雪因为海冰撤退而融化得更快，很可能是因为无冰海域的暖空气大量飘向海岸区域所致，这一过程会增强冰面反射率反馈。如果我们考察一下6月太阳辐射达到最大值的情况，那么相比于1980年，2012年6月的异常负区（negative area）面积增加了600万平方公里（插图8.1）。这表明，与20世纪晚期相比，北极仲夏雪域面积减少了600万平方公里。同一时期，积雪面积的异常负区与海冰异常负区的数量等级相同，而雪域覆盖的陆地和无雪冻土之间的反射率变化幅度则大致等同于海冰和开放水域之间的反射率变化幅度。尚未有人像皮斯托内及其同事研究冰面反射率反馈那样研究冻土并发布相关计算结果，但前述量级的类似性则意味着雪线和海冰撤退各自分别为全球变暖做出了相同的贡献。因此，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冰/雪整体的反射率反馈直接为全球变暖效应增加了50%（而不仅仅是25%）的热量，这显示出北极何以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驱动因，而不仅仅是被动响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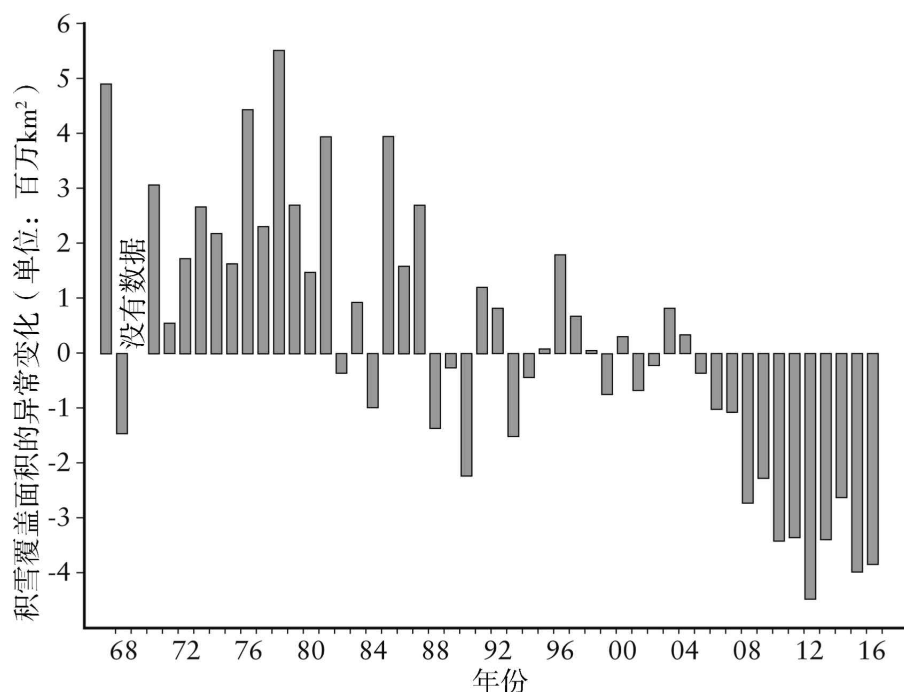


图8.1：北半球6月积雪覆盖面积的变化，1967年—2016年数据。

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人们大多对此茫然无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而导致的）北极冰雪撤退造成的整体反馈效应增幅将全球变暖提升了50%后，我们便不应该简单地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正让地

球变暖。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将地球加热到冰/雪反馈机制自身就把变暖效应提升了50%的地步。我们距离这些反馈机制本身推动气候改变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也就是，我们不用再往大气中排入更多的二氧化碳，气候变暖的进程也仍然会持续。气候变暖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失控的气候变暖”（runaway warming），可能正是它导致金星变成了燥热、死寂的世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演奏吉他时，他能仅用反馈演奏乐章——他的手指不拨琴弦，仅操作电子反馈发声。气候变化搭台唱戏的时刻正飞速来临，而我们只能无助地愣在一旁，任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也无济于事。

水蒸气反馈

水蒸气反馈完全取决于空气温度的变化。大气温度每增加1摄氏度，其中的水蒸气含量就增加了约7%，这反过来又增加了1.5瓦特每平方米的辐射强迫，因为水蒸气也是温室气体。而现在，北极由于其放大效应迅速变暖，而全球气温也在过去十年里缓慢上升，这很可能是因为深海吸收热量的增加所致。因此，北极提供了主要的局部水蒸气反馈，这严重抑制了出射的长波辐射，并将热量锁在紧邻地面（冰面和海面）的区域。如果北极的局部气温上升3℃（这正是近些年的情况），则该地水蒸气浓度会增加20%，这将导致北极盆地上空的辐射强迫增加约4.5瓦每平方米。这个反馈机制主要发生在北极地区，但它因自身的重要性而必须包含在全球变暖的总效应中。

冰盖消融反馈和海平面的上升

如果反射率反馈是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大威胁，那么随冰盖消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也会让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里越发坐立不安。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平面变化研究者的传统见识仍是，两个同等量级的因素导致了全球海平面上升。第一个因素是海洋变暖。由于大气散发热量的增加和温室气体拦截外射辐射所导致的辐射强迫，海水会变暖、膨胀，海平面因此上升。一开始仅有表面海水升温，但现在已扩展至更深的海水层了。这一过程被称为空间海平面上升（steric sea level rise），其中海水量并未增加。第二个因素则是陆地水源进入海洋导致的海面上升，而极地附近的冰川则是主要的陆地水源——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阿拉斯加、智利和挪威的冰川，甚至一些低纬度地区的高海拔冰川，比如乞力马扎罗山等。我们非常了解这些冰川以多么快的速度消失，因为冰川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已努力绘制了这些地区冰川的变化图，他们一开始用的是传统方法，比如往冰川里打桩并查看冰面以多快的速度消退，而近期，他们使用了卫星探测的方式测量冰面的海拔。结果，全球几乎所有冰川在20世纪80年代时便已处于消退之中了——我们已看到了阿尔卑斯冰川几近消失的戏剧性图景。我曾于1970年和2008年两次造访洛基山的哥伦比亚冰原（Columbia Ice-field）。1970年时，该冰原朝跨加拿大高速公路沿线突出，但到2008年，我们需要乘大巴走很远的路才能抵达。现在，全球的冰川系统都处于消退状态。插

图8.2显示了相关证据。少数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扩张的冰川本身就是全球变暖的产物——挪威沿海的冰川因为更暖的气候和上空更加潮湿的海风而得以扩张。但现在，这些冰川也处于消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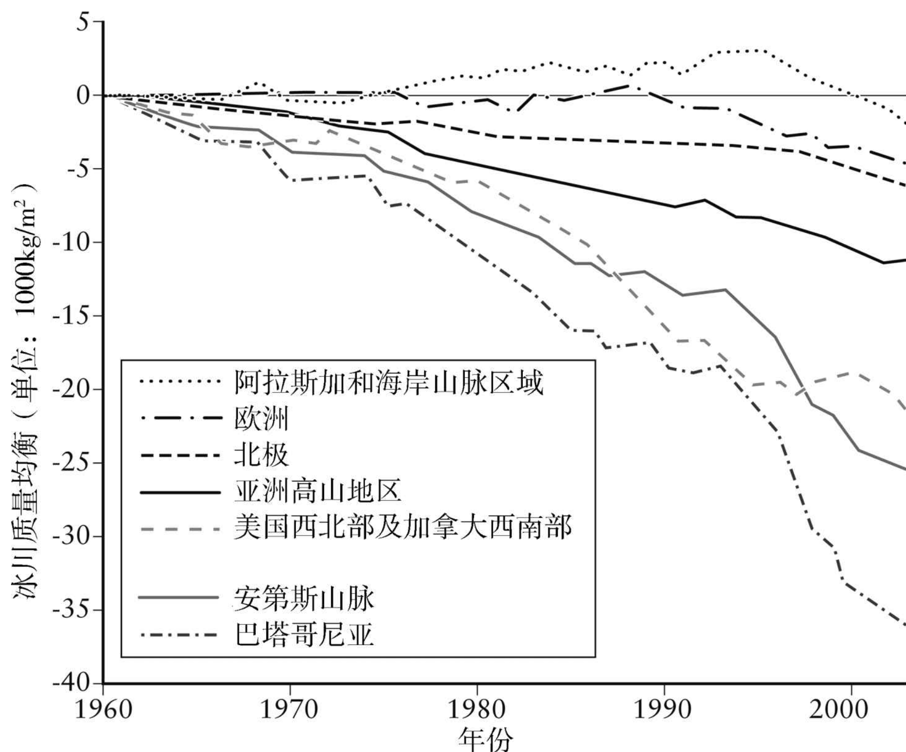


图8.2：全球不同区域的冰川质量均衡（mass balance）变化图。

冰川消退外加大坝和水力发电等因素的部分影响共同构成了海平面变化的原因，淡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入海洋。但现在，超过世界极地冰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容量的径流也加入到海面上升的进程之中。海面上升的威胁真实存在。格陵兰海拔2-3千米深的冰盖位于高海拔地区，除了少数边缘部分以外，其余部分终年不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冰盖顶部区域每年夏天都会在短期内出现融水。随着融化区域的扩大，该冰盖每年融化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格陵兰冰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融化事件发生在2012年，当年7月1日-11日期间，这一冰盖表面97%的区域均已发生融化（彩色插图19）。即便这样，建模者也并不担心。他们计算得出大部分融水会在夏季结束的时候重新冻结，如此，格陵兰冰盖的冰体损失将会很小，而整个冰盖融化并汇入海洋的时间跨度将持续数千年时间——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7.2米。但紧接着，他们未曾料到的现象发生了——冰川蜗穴（moulins）。它们是冰盖表面的巨大排水孔，径直向下穿过冰盖直达3公里之下的基岩。冰盖表面的融水像巨浪一样从这些冰川蜗穴中排出。而融水在向下排出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累积热量，进而将整个冰盖加热至熔点。到达冰盖底部

时，融水会经由冰下通道流向海洋，这又会润滑冰盖底部进而导致冰盖（特别是位于排水口的冰体）更快地流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埃里克·里格诺特（Eric Rignot）通过他们的卫星图像发现，格陵兰许多冰体的流动速度都达到了过去的两倍。[4]这意味着以冰山形式进入海洋的淡水量级翻番。冰体的流失可从冰盖的缩小中看出。现在，我们可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对名为格雷斯（GRACE，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的卫星精确测量冰盖总量，这种测量会精确显示下层冰体如何在重力的轻微改变下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发现，格陵兰冰盖每年损失的冰体相当于300立方千米的淡水体积（这一速度还在加快），这已经相当于其他所有冰川损失的总和。

海平面上升还涉及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一则化石含水层进入到水文循环过程之中。地下水被人们抽出，而这些水体在过去数千年的时间里都难以进入到大气循环之中，而今它们正在被人们使用并流入河流，之后蒸发进入大气并最终进入海洋。这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而其他比如筑坝拦水的人为因素则产生了单纯的逆效应，因为全世界大坝中的水量都在不断增加。

另外一个较小的反馈则与冰帽的高度变化有关。格陵兰冰盖总体海拔正在缓慢下降，其高度越低，冰帽处的表面温度越高（因为海拔越高温度越低），于是，夏季冰盖的融化量就越大。这又会导致冰盖海拔加速下降，进而冰体温度又变得更高，如此往复形成一个反馈循环。目前这种反馈效应可能还不明显，但在冰盖消退的后期阶段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从而加速致其最终消失。

直到最近，南极冰盖仍被假定为大致中性质量均衡的状态，因为它的任何融化都会被降雪抵消，南极海岸线附近山脉上的冰盖尤其如此。但现在，格雷斯卫星也被用于南极观测，人们发现，南极冰盖也明显处于消退之中，尽管速度比不上格陵兰冰川。[5]人们最新的估计是，南极冰盖正以每年84立方千米的速度消失，而格陵兰岛每年消失的冰体至少为300立方千米。值得警惕的是，南极可供融化的冰量大到可让海平面上升60米。此外，冰川学家还计算得出南极半岛西部区域的冰盖比之前预想的更不稳定，大量冰体可能会从冰川底部融化。这些冰体融水本身就足以造成海平面上升数米。

在这些令人忧心的威胁面前，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向来自信满满。事实上，该组织发布2007年的第四份评估报告时尤其如此。因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难以评估海平面的上升幅度，该报告的作者们仅提到海平面会上升，并预计海平面到本世纪末的2100年仅会上升30厘米。他们指出，这是不包括冰川融化的部分数据，但多数外行和政策制定者并未阅读这种附属细则，并且，一些严重低估海平面上升幅度的评估报告也被某些国家负责防洪的政府机构，比如上海市政府所采信。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3年的第五份评估报告中改正了这种错误，但仍然只是给出了海平面会在世纪末小幅上升的预测（比如代表浓度路径8.5情景下的52-98厘米，即一切照旧的情况），但多数冰川学家认为海平面上升幅度将超过1米，甚至可达2米。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基于线性预测模式，他们假设海平面在本世纪都会保持大致不变的上升速度。但我们

知道，各种反馈环会导致海面上升的非线性变化。比如，随着海冰消失进程的持续，夏季海冰量会呈指数曲线的加速下降趋势，而非线性下降趋势。二者有很大区别。而决定了海面上升的冰盖响应反馈也是指数过程，或至少呈加速进程趋势，如果我们任由海平面加速上升，则2100年的总上升幅度将远超线性估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前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预计海平面上升速度翻番的时间跨度约为十年，因此，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信满满的总体估测可能会在十分短暂的时期内面临严峻的尴尬局面。

我因为一个迄今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于2004年时加入到这场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论辩之中。这个问题由我心中的科学英雄（而非我自己），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沃尔特·芒克提出。当时的情况是，海洋学家希德·莱维图斯（Sid Levitus）在格里斯卫星让冰盖计算变得容易之前，提出了一种计算海面升高的巧妙办法。他采用了世界海洋水文普查数据，即世界迄今为止上百万次海洋测量的总体数据，并将其分组在网格化的全球地图之中，进而对所有大洋不同深度的平均盐度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他认为，大洋中的任何盐度变化都必然源自冰川径流，这会稀释海洋并降低平均盐度。其对海平面上升幅度的计算与现有的别的方法得出的数据吻合，所以，一切看起来都没问题。然而，沃尔特以其独有的科学洞见及令人置信的简洁陈述，让我想起自己从1976年起便一直从事的海冰消退测量，即海冰的融化尽管会造成海洋的稀释，却不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海冰本已漂浮在海上，就像杜松子酒或药酒中的冰块一样）。我当时测得的海冰融化总量约为每年300平方千米，这与冰川每年消失的总量一致。然而，莱维图斯的方法测得的海洋稀释程度却与不考虑海冰融化影响的观察数据相吻合。为何会这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海洋盐度的变化等同于冰川消融对其造成的影响，因此，除了海冰融化，便无额外的淡水注入海洋。沃尔特和我一起就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撰写的论文发表在一份著名刊物上。[6]我们期待收到世界海洋研究共同体的回应或建议——毕竟，芒克乃世界海洋学领域的执牛耳者，这种情况也是亟待解决的异常现象。然而，我们的论文并未收到哪怕一个回应或评论。我甚至在巴黎举办的海平面研究会议上作了相关报告，但并未收到任何评论或质疑。沃尔特温和地说，“这些海平面研究者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如今仍在等待人们对这篇十年前文章的回应，但不管怎样，莱维图斯的测量方法已被格里斯卫星的观测取代。我唯一收到的相关建议则来自一位物理海洋学家（physical oceanographer），即海冰的融水在参与到波弗特环流之前可能会长期停留在北极，因此，莱维图斯的平均测量技术中并未显示出这一点，因为这种技术用在北极高纬度海洋数据中时表现很糟糕。

一定量的海冰消退所致的海平面部分上升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随着海冰的消退，夏季格陵兰冰盖上空的空气的确会变得更加温暖。过去，夏季海冰一直是大气和海洋的空气调节系统。它会让海水温度在夏季保持在0℃的低温——并且，正如我们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这个调节器的消失正在造成灾难性后果。海冰

也会让夏季海面气温降至0℃左右。缺乏夏季海冰的适当影响，北冰洋上空的气温会明显高于0℃，这最终会导致北极冰盖的融化。

北极河流反馈

另外一个反馈便是北部流入北冰洋的径流温度变得更高了。随着陆地雪线的撤退，初夏地表反射率会大幅下降。这会导致北部冻土区域获得的热量急剧上升，而以前流过更暖陆地区域的积雪融水径流现在则直接流入海洋大陆架的无冰区域，这会进一步让海水升温并加速海冰消退。这一过程又会反过来让反射率加速下降，从而加剧沿海区域的变暖程度，这会进一步驱使雪线后撤，并加速冻土区域气温变化，最终增加融水径流所携带的热量，如此往复。这种效应可能比我们此处讨论的其他反馈效果都弱，但它却是经过一系列步骤不断自我发展的正面反馈的经典案例。

炭黑反馈

人们近期又明确了一个新的反馈机制，并发现它比以前预想的更为重要——即森林和农业用火，柴油的使用以及工业活动对冰雪反射率及其融化过程造成的炭黑沉积影响。[7]炭黑也称烟灰（soot）。冰川学家以前常常在冰川上看到来自周围山脉的污垢，并发现它们能惊人地创造出一个可自我维持的小型生态系统。初夏聚集在冰川上的一小块污垢会优先吸收太阳辐射，从而比周围的冰体温度更高，当其融化下沉的时候会留下小孔。融水溶解污垢中的盐分从而提供养分，进而细菌便能在小孔深处生存并创造出一片植被。这一过程的产物被称为冰尘（cryoconite），我将其作为示例以说明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命何以在最残酷的地方立足。冰尘会让冰川呈现出黑色、绿色甚至粉红色的外貌。

除了冰尘，污垢也会在融化的季节出现在海冰上，积雪融化后，冬季沉积的所有污垢都会出现。但这一过程直到最近仍受到忽视，否则，它也会被加入到夏季海冰反射率的计算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可通过调低估值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试图单独考察炭黑，其导致的全球性效应似乎相当小。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炭黑造成的辐射强迫可能在0.04瓦特每平方米，并且观察研究显示，北极大气中的炭黑浓度似乎自1990年起便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大气的头号污染者（比如中国）已经开始清理其污染物了。

海洋酸化反馈

我们知道，海洋的酸性正在增加，这是过量二氧化碳融进海水形成碳酸的结果。其化学反应式为：



$$CO_2 + H_2O \rightleftharpoons H_2CO_3$$



$$H_2CO_3 \rightleftharpoons H^+ + HCO_3^-$$



$$HCO_3^- \rightleftharpoons H^+ + CO_3^{2-}$$

并且，各种离子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平衡关系。H^+代表酸性氢离子。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增加的同时，也会部分溶解在海水中，这能有效缓解全球变暖的速度。然而，溶解的二氧化碳会参与上述化学反应，进而让海水的酸度增加，这最终会造成海洋生物壳体（成分为碳酸钙）溶解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遍布海洋的有孔虫这种小型单细胞生物的外壳（插图8.3）。死去的有孔虫的外壳会在海洋中形成壳雨降落并沉积在海底，进而形成被称为软泥（ooze）的典型沉积物。实际上，这是我们燃烧化石燃料排入大气中的碳能永久脱离地球系统的少数方式之一。因此，如果我驾驶SUV去商店，排出的二氧化碳（约为41%）会部分溶解进海洋中，其中又有部分会被有孔虫吸收并形成碳酸钙的壳体。有孔虫死后，其壳体会沉入海底，如此，我排放的部分二氧化碳便人畜无害地脱离了地球系统。问题在于，海洋酸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壳体又会在沉入海底的漫长的4000米路程中不断溶解，因为我们从学校学过的化学知识便可得知，粉笔放入酸液中时会发生什么。壳体中的碳会重新释放进海洋并继续在地球系统中循环。更糟糕的是，一些大型壳体类海洋生物（比如翼足类动物）也会失去壳体并成为无定形的小不点，进而容易被捕食。这已经在酸化水的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能会希望海洋中溶解的二氧化碳比例降低，而事实上，最近的评估认为这一比例在过去30年中从41%降到了40%。这种小幅下降也足以让我们担忧，尤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不断上升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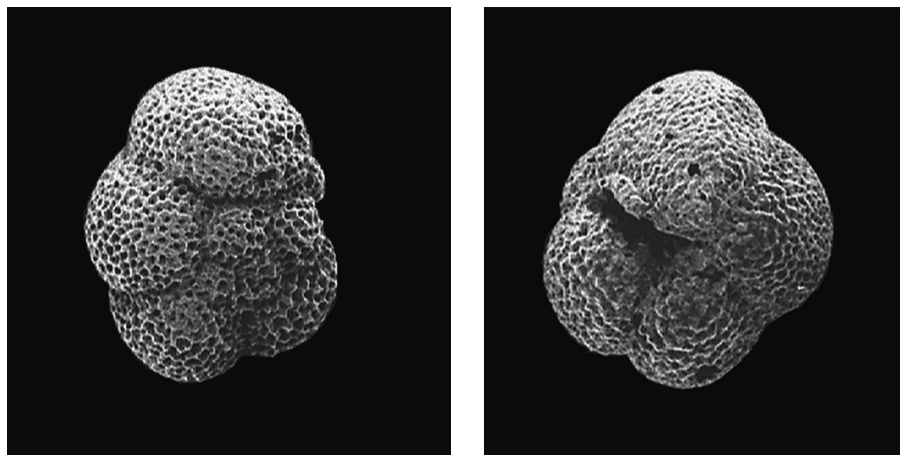


图8.3：北冰洋中的两种有孔虫类。其壳体很小，仅为0.06～1毫米宽。

这种局面与海冰有何关系？海冰的撤退让海洋面临酸化的风险，因为二氧化碳含量更高的大气与之前并未吸收二氧化碳的海水之间产生了接触，因此，海冰的撤退实际上强化了二氧化碳的沉降。对大气中二氧化碳而言，这就是一个负面反馈，代价就是增加了北极海水的酸度。这是罕见的负面反馈的案例，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在进一步酸化的海水以及

随之而来碳沉降的减少，这种反馈长期看来可能为正面反馈。

哪些反馈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考虑本章所列的七种反馈，最严重的可能是与海冰和雪线撤退（北极沿海区域雪线撤退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海冰撤退和温暖海风的作用）相关的反射率反馈。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反射率变化加总，再把炭黑加入到反射率的计算中，得出的结果则为皮斯托内等人描述的两倍，即我们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造成的辐射强迫因为反射率反馈而增加了50%。这真的就是“提供两个气候变化分子——免费再得一个”的例子。

格陵兰冰盖的加速融化也与海冰撤退直接相关，这让全球海平面加速上升并在本世纪内升幅超过1米。许多人都认为海面上升1米不足为虑，我们只需要将防洪堤坝增加1米即可。我们英国能做到这一点，荷兰等其他富裕国家也能做到（付出有限代价之后），但孟加拉国却做不到，该国2000万国民大多为贫苦农民，且生活在海拔低于2米的地方。并且，特定地区海面高度的钟形曲线或高斯分布（插图8.4）会让我们得出灾难性的统计结果。假设插图8.4的钟形曲线代表了特定地区的海面高度分布，其中考虑了潮汐、海风等变量。右侧曲线的小块区域表示造成灾难性后果所需达到的高度——海水因风暴潮经堤坝涌入，就像1953年1月袭击英国和荷兰的风暴潮一样（这次风暴潮淹没了我祖父母在蒂尔伯里的房屋）。曲线下面的区域代表受到袭击的概率很低。但当我们将海浪峰值分布向右移动1米，进而得出海平面上升1米的效果。如果我们不提升防洪堤坝的高度，曲线下方代表受灾区域的面积就会大大增加。换句话说，海平面小幅上升导致洪灾的可能性会大幅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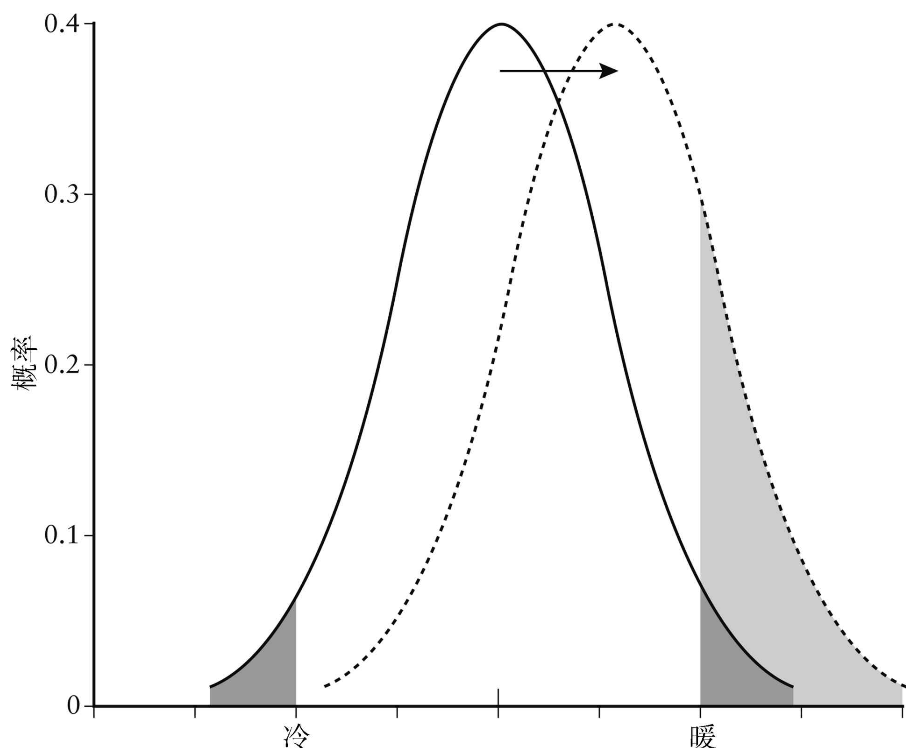


图8.4：高斯分布曲线的特征。如果均值少量增加，灾难发生的概率（浅灰色区域）就会大幅度增加。

这些反馈告诉我们北极海冰的撤退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平时，它就不再仅是气候变化的响应者，而成为其驱动力了。但是，在海冰撤退产生的所有威胁和危险中，近海甲烷的脉冲式喷发（methane pulse）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注释：

[1] Maykut, G. A. and N. Untersteiner（1971）, Some results from a time-dependent thermodynamic model of Arctic sea 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76（6）, 1550-75.

[2] Perovich, D. K. and C. Polashenski（2012）, Albedo evolution of seasonal Arctic sea ic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8）, doi:10. 1029/2012GL051432.

[3] Pistone, K., I. Eisenman and V. Ramanathan（2014）, Observ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albedo decrease caused by vanishing Arctic sea 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 3322-6.

[4] Rignot, E. and P. Kanagaratnam（2006）, Changes in th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Science, 311（5763）, 986-90.

[5] McMillan, M., A. Shepherd, A. Sundal, K. Briggs, A. Muir, A. Ridout, A. Hogg and D. Wingham（2014）, Increased ice losses from Antarctica detected by CryoSat-2.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 3899-905.

[6] Wadhams, P. and W. Munk（2004）, Ocean freshening, sea level rising, sea ice melt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11311, doi:101029/2004GLO20039.

[7] Quinn, P. K., A. Stohl, A. Arneth, T. Berntsen, J. F. Burkhart, J. Christensen, M.

Flanner, K. Kupiainen, H. Lihavainen, M. Shepherd, V. Shevchenko, H. Skov and V. Vestreng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AMAP)) (2011) , The Impact of Black Carbon on Arctic Climate. Oslo: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AMAP) .



第九章

北极甲烷，正在发生的灾难

近海多年冻土和温暖的海水

我即将描述的潜在灾难性反馈后果源自两种现象：海冰的撤退以及北极近海浅层水域中持续存在的永久冻土。

我已经描述了夏季海冰快速撤退，北极大陆架附近大面积海冰随之消失，西伯利亚北部海域尤其如此，那里的水深仅为50～100米。这些刚刚形成的开阔海域中的水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北冰洋深处的水体结构可分为3层。上层为深约150米的北极表层海水，水温接近或处于冰点。其下的一层海水称为大西洋水层，一直延伸至900米深处且带来了北大西洋温暖海水的热量，这些水体在冰缘线处下沉并从海水中间深度的区域进入北极。这之下则为较冷的底层海水，它一直延伸至海底。因此，如果大陆架仅为50～100米深，则该处仅有北极表层海水存在——更加温暖且更深的大西洋海水则停留在陆架折坡之外。在2005年之前的“旧时代”，北极表层海水甚至在夏季都会被海冰覆盖，这就为海水提供了某种空气调节系统，进而入射的太阳辐射无法加热水体，因为它首先需要融化海冰。类似地，海冰的存在让局部气温保持在0℃左右。自2005年起，随着夏季海冰的彻底消失，太阳辐射便能深入到大陆架所在的海域中并将其加热了。于是，北极表层海水现在就能够在无冰的夏季逐渐升温，而不会因为海冰而保持在0℃左右。而2011年夏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在楚科奇海域测得的表层海水温度为7℃（这与北海冬季温度差不多）。在我最近（2014年8月）参与的航海过程中，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希利号”记录到的楚科奇海域表层海水温度则让人十分震惊；在北上前往白令海峡沿途的诺姆（Nome）地区的途中，我们测得的气温高达19℃，海水表层温度则为17℃。

现在，广阔无冰的海域可能会因为海风的作用而形成巨浪，这会导致更暖的海水涌向海底，因此，北极海域数万年以来首次出现了高于冰点的海水涌向海底的情况。

而在海底，更加温暖的海水遇到了本章故事的第二个元素：冻结的沉积物。它们是上个冰期的遗迹，同时也意味着永久冻土向海洋的延伸。其中含有以水合物或包合物形式存在的甲烷。这种十分坚硬的物质看似冰块却能燃烧。它是甲烷气体和水组成的混合物，其开放的晶体结构仅在高压或低温条件下才处于稳定状态。这种物质通常存在于各种深海沉积物中，因为那里的上覆水压很稳定。储藏在整个海底水合沉积物中的甲烷量估计是大气中碳含量的13倍以上，约为10.4万亿吨。而北极大陆架上的海水较浅，甲烷水合物应该不是很稳定，但坚硬的冰冻沉积物提供了足以锁住它们的表面压力。海冰减少导致夏季海水湿度更高，可能会让这些沉积物解冻，如此，这些水合物之上便再无坚硬的外壳保护。这些冰冻的沉积物最初在冰期的陆地上形成，当时的海平面更低，7000～15000年以前这些沉积物就被淹没了，东西伯利亚海的浅滩就在所谓的“全新世海侵”（Holocene transgression）导致的冰盖融化、海面上升的过程中形成。因此，数万年来一直储藏在冰冻沉积物中的甲烷水

合物现正随着沉积物的解冻而分解，这一过程会产生纯净的甲烷并以巨大气泡羽流（bubble plumes）的形式涌向海水表层。甲烷在水中会被氧化，因此，如果气泡羽流产生在深海，则这些气泡羽流在到达海水表层之前就会消失，就像我们在斯瓦尔巴德海岸附近400米深的海域中看到的情形一样。[1]但深度仅为50～100米的海底产生的甲烷则没有足够的时间溶解，从而能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地冒出海面并进入大气之中。我们必须记住——可惜的是，许多科学家已将其忘记——北极大陆架仅仅从2005年夏季以来才出现大量开阔水域，因此，我们正处于全新的海底沉积物不断融化的过程之中。

甲烷会像巨大的气泡云一样从海水中升起（彩色插图21），这一过程称为沸腾（ebullition）。这些来自海底各处的气泡可看作一系列单独的羽流，比如来自海底汽-油喷发的羽流（见第七章）。东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特别浅——其21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75%的区域都不到40米深——因此，这一区域的多数甲烷气体都不会在海冰中氧化从而直接进入大气。而人们也发现，该处海面上空大气中的甲烷浓度高出正常大气的4倍。人们普遍认为，北极大陆架不会在冬季海冰覆盖期间释放甲烷。然而，新的观察数据表明，该区域全年都会发生甲烷以沸腾或别的方式释放的现象。人们在欧洲区域的北极冰间湖中发现的甲烷羽流浓度高出海洋平均水平20～200倍，这明显表明甲烷会在冬季释放。人们也观察到甲烷直接在冬季海冰之下富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旦海底冰冻沉积物在夏季融化，甲烷则会全年无休地从海底溢出。

东西伯利亚大陆架夏季冒出的大量气泡羽流最早是由娜塔莉亚·沙霍娃（Natalia Shakhova）和伊戈尔·谢米列托夫（Igor Semiletov）领导的年度美-俄考察队发现和观测到的，[2]他们带回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水下照片（彩色插图20）。并且，他们估计这些沉积物中约包含4000亿吨甲烷气体，按照目前全球变暖的节奏，其中500亿吨会在未来数年中从最上层几十米的沉积物中释放出来。像马尼托巴大学的伊戈尔·谢米列托夫[3]这样的建模者已观测过近海岸10米水深处的沉积物，并估计其中甲烷解冻和释放的速度很慢，慢到以千年计。但海洋正在发生其他变化。

娜塔莉亚·沙霍娃等人[4]则更为关注沉积物中的居间不冻层（taliks）对甲烷释放的促进作用。居间不冻层乃海底永久冻土形成过程中的不规则现象，它们为海底沉积物中的甲烷水合物提供了向上逃逸的路径。沙霍娃发现，人们从东西伯利亚海中观察到的甲烷羽流多数都释放自居间不冻层。冰川蜗穴在格陵兰冰盖中与居间不冻层在海底甲烷释放过程中的作用有些类似——它们都让热过程发生在建模者并未预计到的沉积物内部。居间不冻层为甲烷分子提供了从其水合物牢笼中逃逸的路径，进而避开了永久冻土为其设置的障碍。因此，其释放速率并不依赖于沉积物的逐层解冻过程。

甲烷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温室气体。正如我在第五章所说，其每个分子的全球变暖潜能是二氧化碳的23到100倍（这取决于你的计算方式）。北极近海甲烷气体的释放可能是2008年以来全球大气甲烷水平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大气中的甲烷水平曾在2000年左右趋于稳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水力压裂获取海冰过程中的甲烷泄漏，而这个过程

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海底冻土可能释放多少甲烷气体，又会在何时形成规模？这会对气候产生何种影响？随着格陵兰冰盖的加速融化，我们预计这一过程会加速海冰撤退，并减少地球的太阳能反射，从而加快海面上升的速度。但冰盖消失的后果也会在南北极得到体现。

北极甲烷释放的全球影响

我与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和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两位同事已经模拟了未来10年500亿吨甲烷的释放可能对气候造成的温度和成本方面的影响。[5]我们要记住，尽管这是一个大到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每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仅为350亿吨），但它仍不及东西伯利亚海甲烷总量的10%。为了量化甲烷脉冲式喷发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我们使用了佩吉（PAGE）09综合评估模型，它可将海平面、局部温度的变化以及洪水、居民健康、极端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纳入考虑以追踪额外的甲烷释放情况。[6]佩吉09模型有效计算了从目前到2200年间每多（或少）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净现值（NPV）。佩吉09模型是佩吉模型的最新版本，它由剑桥大学法官学院（Judge Institute）的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开发并被英国政府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用来计算气候变化的影响。[7]所有结果都由该模型运行1万次得出，这能为各种风险建立全面的图景以减少不确定性。

我们测试了两个标准排放情景。首先是“一切照旧”的情景，该情景假设世界年复一年继续按照其目前的节奏增加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量而不采取任何干预行动。然后，我们运行了一个“低排放”情景（即英国气象局“2016r5low”情景），其结果是我们有一半的机会保持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在2℃以下。我们在每种情况中都叠加了2015年—2025年10年间甲烷脉冲式喷发进入大气造成的影响。我们还测试了其持续影响，以及比这更少的甲烷所造成的影响。

到2040年，甲烷释放造成的额外气温上升值为0.6℃，这是个巨大的增幅（见插图9.1）。这将是人类的灾难，部分在于其造成的气温上升之快。它将加速其他所有全球变暖效应，并且，除了降低海水的温度（比如再造海冰），我们别无他法阻止甲烷从海水中释放，这种办法也超乎想象。如此规模的甲烷脉冲式喷发将导致全球气温均值比前工业时期升高2℃的日期提前15～35年——这一日期按“一切照旧”计算为2035年，按低排放情景计算则为2040年。请注意甲烷产生的气候影响有多快，因为尽管从排放进程开始到气温升高0.6℃的峰值用了25年，但它几年内就可导致气温升高0.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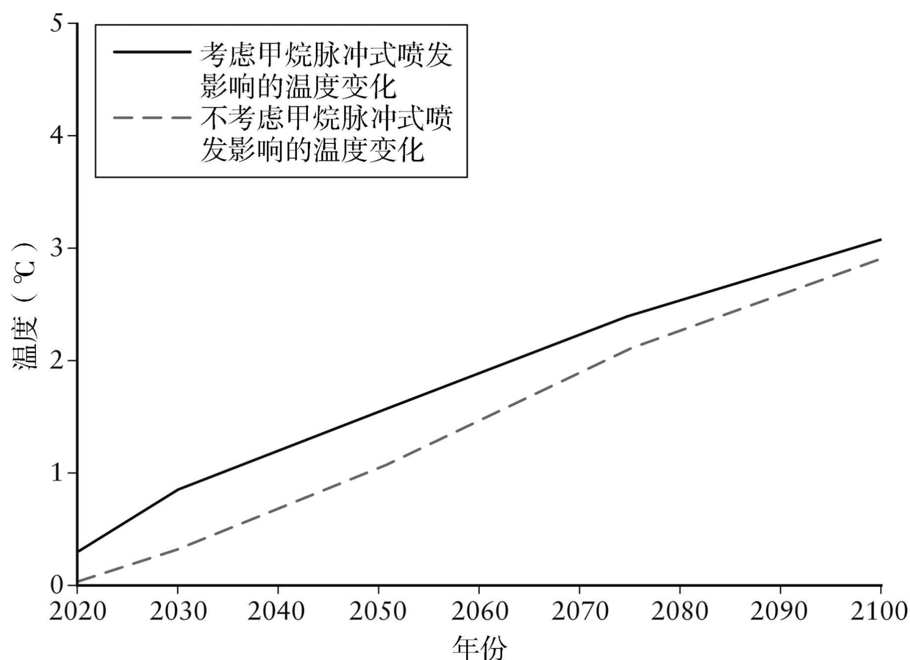


图9.1：2015年到2025年间500亿吨甲烷脉冲式喷发给全球平均气温造成的可能变化。

按目前的估价计算，甲烷释放造成的气温增幅按一切照旧情景持续一个世纪，将为人类造成60万亿美元的损失。我们曾预计气候变化会给北极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北极附近国家以及某些产业会得到短期经济收益，但相关损失之大仍令人震惊。这一估值为使用同一模型计算同期所有气候变化影响损失400万亿美元总值的15%。按低排放情景，这一损失也达37万亿美元。无论甲烷脉冲式喷发是否会延迟20年（2035年而非2015年）开始，或者延缓二三十年而非10年，代价都是一样的。甲烷脉冲式喷发250亿吨造成的影响几乎为500亿吨喷发量的一半。

佩吉09模型将地球划分为8个区域以模拟何处会发生变化。在上述两种情景中，甲烷释放之额外影响的全球分布密切反映了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按价值计，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较贫穷经济体会承受甲烷释放之额外影响的80%的份额。低洼地区洪水泛滥、极端的热应激、干旱和风暴都因为额外的甲烷释放而加重。因此，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冰从北极大陆架消退这种单纯的北极现象，最终会造成全球影响。而且，亘古不变的是，全世界的穷人会遭受最多的苦难。

立即行动

就环境和气候变化而言，人们在可能的威胁面前有两个采取行动与否的标准。预防原则指出，即便我们不清楚威胁是否已经发生，也应该采取行动减轻损害。例如，1992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一次评估

报告时，人们尚未获得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气候改变的确凿证据，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的推测强大到足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的地步。风险分析可帮助我们量化威胁的程度。从数学上讲，风险可简单地定义为影响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乘积。概率很小但影响可能很大的风险尤其难以评估，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险。但毫无疑问，北极近海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是巨大的。首先，根据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这些最了解情况的人对海底沉积物成分及其稳定性的分析，甲烷脉冲式喷发产生的概率至少高达50%。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便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单单经济损失就高达60万亿美元，还包括很高的人口死亡率。所以，无论如何定义，北极海底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直接威胁之一。

那么，我们为何对此无动于衷呢？为何气候科学家们大都忽略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而几乎没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中提到它？我担心这是那些有责任讲出事实并倡导行动的人的集体性软弱无能（failure of nerve）。不仅那些试图掩盖北极甲烷威胁的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对此喜闻乐见，很多北极科学家和所谓的“甲烷专家”也对此默不作声。部分这类专家习惯了北极甲烷的少量渗出现象，并将其作为大气甲烷成分的自然和人为来源之一，这似乎有些道理。但他们并未清醒认识到目前的环境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仅从2005年起，俄罗斯北极区域的大部分大陆架水域便已经常性处于大气环境系统之中，这会导致海水升温至远高于熔点的温度。北极科学领域之外的科学家很难认识到目前的全新情况，他们此前的旧观念已经失效。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确清楚地理解了目前的情况，但从心理上更愿意它消失。例如，在2014年9月22日的皇家学会会议上，甲烷专家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就公开嘲讽了大量甲烷会从海底溢出的想法，而当时科学家们正在宣布来自拉普捷夫海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海底甲烷溢出的大量增加。甚至，实地研究者的完整性和准确度也受到质疑，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甚至因为俄国人身份和女性身份（其中之一为女性）而遭到人身攻击。这简直刷新了科学界的底线，但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一发现的影响真的很重要。即便我们打算置身事外地等待二氧化碳排量逐渐降低，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500亿吨甲烷进入大气并造成全球气温迅速升高0.6℃的结果。而这只是第一个结果：未来几十年内，海底沉积物中比这多得多的甲烷会随着沉积物的持续融化而不断溢出，而陆地永久冻土（见下一部分）也会在很长的时期内释放更多的甲烷。

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立即着手研究目前的紧急情况，因为我们对太多事情毫不知情。人们很容易说些正确的废话，要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阻止（比如地球工程）扭转全球变暖进程，那么北极夏季海冰就会重现，而大陆架水域的温度也会重新降至0℃的水平。永久冻土将不再解冻，甲烷也将停止释放。但由于甲烷羽流的不断释放已经造成了辐射强迫，我们已很难看到如何才能竭尽全力降低温度阻止甲烷的进一步释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已经克服了甲烷气候变化，而且也没什么可过于担心的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唯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

直接阻止海底沉积物在目前和将来的状况下释放甲烷，但我们却对此束手无策。有人提出建议说用塑料穹顶结构或板材收集甲烷并将其输往中央火炬点，但由于海底整个都在释放甲烷，要做出覆盖东西伯利亚海底的塑料板材根本不可能。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来自石油行业内部，即开发一种在活性沉积物之下水平钻井的水力压裂方法，然后将这些钻井和沉积物底下的通道连接起来。进入这些通道的甲烷被抽出并燃烧。燃烧甲烷是有道理的，因为甲烷分子燃烧之后会产生二氧化碳分子，后者加热地球的力度仅为前者的1/23。但如果甲烷能被捕获和使用，那就太好了。这个解决方案要求建设一个覆盖整个东西伯利亚海的钻井网络。没人计算过这个冒险的行动会耗费多少金钱。但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紧急研究这个方案，如果切实可行，则应做好准备付诸实施。如果石油行业通过其先进的技术拯救了这个世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但我相信上帝也会微微一笑。

陆地永久冻土融化的威胁

北极近海成了我们最大的直接威胁，但陆地永久冻土的解冻过程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威胁则真实且无法避免。我们从北极生物学家细致的工作中得知，随着陆地永久冻土的解冻，其表面随之解冻的腐烂植被在一系列化学和生物过程作用下最终会释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与北极近海永久冻土情况的区别在于，甲烷在沉积物解冻之前便已形成且等着释放。而陆地永久冻土则要经历更为漫长的化学过程才能最终产生甲烷。

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陆地永久冻土的面积现在为190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含连续的和不连续（斑块状分布）的冻土区域。这些冻土目前正在解冻；其温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升高了2~3℃。其解冻过程会释放甲烷、二氧化碳和（一些）一氧化二氮（N_2O）组成的混合物，而它们均为温室气体。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陆地永久冻土的碳含量为1.4~1.7万亿吨。人们估计其中大约1100~2300亿吨会在2040年之前进入大气（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到2100年这一数字为8000~14000亿吨，也就是说，2040年之前陆地冻土年均释放甲烷40~80亿吨，之后便升至每年100~160亿吨。

请记住这些数字。它们意味着到本世纪末，陆地永久冻土解冻过程释放的碳量约为近海甲烷脉冲式喷发500亿吨的30倍之多，而未来10年我们将为后者忧心忡忡。人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碳多少是以活跃甲烷的方式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很大。因此，甲烷引发的气候升温过程将不可避免——这一过程可能很快发生，因为近海永久冻土会解冻并释放甲烷；它也可能因为陆地永久冻土释放甲烷过程缓慢而变慢；还可能既快又慢，即近海永久冻土中的甲烷脉冲式喷发加上陆地永久冻土缓慢但大量的甲烷释放过程。但我们肯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遇额外的升温过程。

再次强调，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评估报告的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引用了这些关于陆地永久冻土层甲烷释放数据，但它并未跟踪气候加

速变暖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与近海甲烷释放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释放区域扩大

继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等人的发现之后，人们对北极大陆架的研究进展也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进而发现了东西伯利亚海之外的大陆架区域的温暖近海也在释放甲烷。

谢米列托夫和沙霍娃将其研究区域扩展至东西伯利亚海之外，他们于2014年夏天搭乘瑞典破冰船“奥登号”（Oden）前往拉普捷夫海开展“SWERUS-C3”科考项目。这个团队发现大量甲烷羽流从大陆架数公里之外200~500米深的水域中释放，此外，他们在近岸60~70米深的水域也发现了100处甲烷释放源，其中包括一个62米深的剧烈甲烷爆发源，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古斯塔夫松（Gustafsson）称其为“大型甲烷火炬”。该考察队在2014年7月22日发现了这个大规模的甲烷释放源；他们宣布观察到“升高的甲烷释放水平，大约超过周围背景海水中甲烷羽流浓度的10倍”。在大陆架海底沉积物中随便凿个洞就能产生甲烷羽流。[8]

俄罗斯-德国自1990年代起便开展的实地研究项目于2016年1月发布的一份拉普捷夫海洋报告显示，该海域甲烷释放正大量增加。[9]另外，人们于2007年起便锚定在该海域大陆架上40~50米水深处的一个研究站点也一直在测量海面到海底的温度和海冰厚度。测量仪器于2012年的酷热夏季记录到该海域较早的海冰撤退现象，随后中层水域由于勒拿河（Lena River）流出的河水以及进入海水中的太阳辐射而增温。这些因素混合形成的热量向下渗入到海底用了些时间，因此，海底水温直到冬季才升高，到2013年1月（用时两个半月）时升高了0.6℃。海水升温将融化海底沉积物，这与“SWERUS-C3”科考项目观测到的温暖海水和甲烷释放现象都可以建立起联系。模型研究也显示，拉普捷夫海可能成为比东西伯利亚海更大的甲烷释放源。[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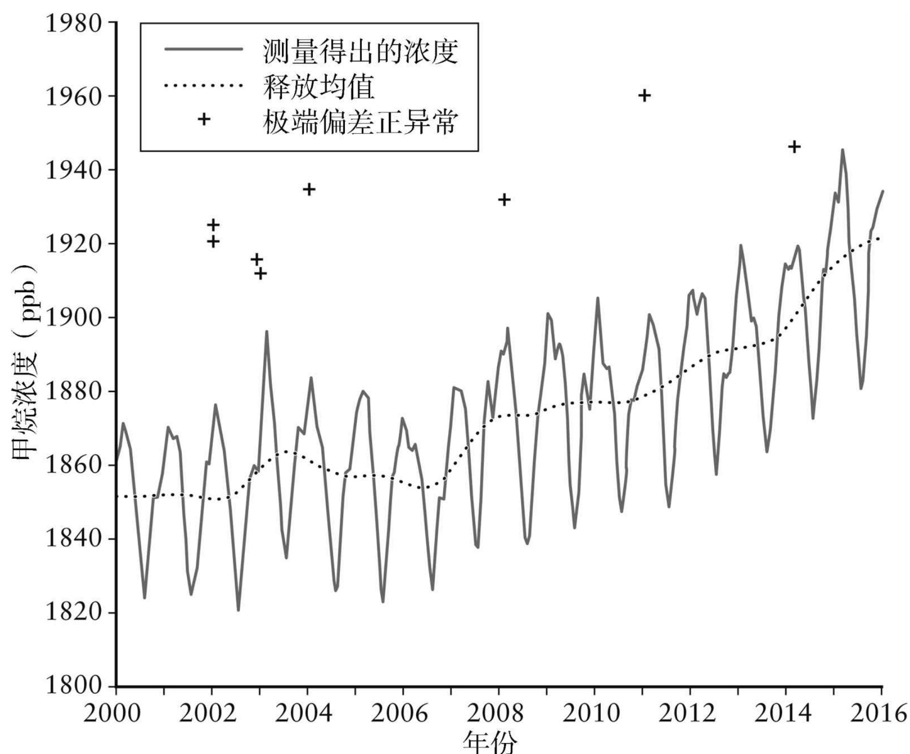


图9.2：加拿大埃斯米尔岛阿莱尔特上空大气层中测得的甲烷水平，2000年—2016年。

这第二个北极大陆架海域中，甲烷活动强度得出的结论是，甲烷释放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东西伯利亚海域，很可能，整个北极大陆架海域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对甲烷释放水平的估计仍然过低。大气中实地监测到的甲烷水平显示，偶尔出现的峰值远高于背景水平（丹麦和格陵兰地质调查队的詹森·博克斯称之为“龙之呼吸”，因为每个峰值可能都代表了来自单个释放源的异常释放）。它们可能都单独产生于尚未被观测到的广大区域。埃尔斯米尔岛北部阿莱尔特的一处甲烷监测站点的记录显示该地甲烷释放水平在2000年时一直稳定在1852ppb，这一数字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已加速上升至目前的1940ppb。

可能与上述现象有关的情况是，2014年8月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北部区域出现了三个神秘的带有缓和垂直外墙的坑洞，它们周围都是沉积的土壤物质。地下甲烷爆炸是此种现象的最可能解释，甲烷在融化的永久冻土沉积物顶部聚集，最后的大爆炸将顶部沉积土壤掀翻。

所有这些事件都强烈表明，北极沿海地区甲烷正以之前并未观测到的机制加速释放。重要的是，即便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对其有所忽视，我们也已认识到这种现象对气候造成了威胁。

注释：

[1] Westbrook, G. K. et al. (2009), Escape of methane gas from the seabed along the West Spitsbergen continental margi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6 (15), doi:10. 1029/2009GL039191.

[2] Shakhova, N., I. Semiletov, A. Salyk and V. Yusupov, (2010), Extensive methane venting to the atmosphere from sediments of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Science, 327, 1246.

[3] Dmitrenko, I. A., S. A. Kirillov, L. B. Tremblay, H. Kassens, O. A. Anisimov, S. A. Lavrov, S. O. Razumov and M. N. Grigoriev (2011), Recent changes in shelf hydrography in the Siberian Arctic: Potential for subsea permafrost instabilit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6, C10027, doi:10. 1029/2011JC007218.

[4] Shakhova, N., I. Semiletov, I. Leifer, V. Sergienko, A. Salyuk, D. Kosmach, D. Chernykh, C. Stubbs, D. Nicolsky, V. Tumskoy and □ Gustafsson (2013), Ebullition and storm induced methane release from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Nature Geoscience, 7, doi:0. 1038/NGE02007; Frederick, J. M. and B. A. Buffett (2014), Taliks in relict submarine permafrost and methane hydrate deposits: Pathways for gas escape under present and future condition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Earth Surface, 119, 106-22, doi:10. 1002/2013JF002987.

[5] Whiteman, G., C. Hope and P. Wadhams (2013), Vast costs of Arctic change. Nature, 499, 401-3.

[6] Hope, C. (2013), Critical issue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ocial cost of $C0_2$. why the estimates from PAGE09 a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PAGE2002. Climatic Change, 117, 531-43.

[7] Stern, Sir Nicholas (2006),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HM Treasury.

[8] Overduin, P. P., S. Liebner, C. Knoblauch, F. Günther, S. Wetterich, L. Schirrmeister, H. W. Hubberten and M. N. Grigoriev (2015), Methane oxidation following submarine permafrost degradation: Measure-ments from a central Laptev Sea shelf borehol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Biogeosciences, 120, 965-78, doi:10. 1002/2014JG002862.

[9] Janout, M., J. H□lemann, B. Juhls, T. Krumpen, B. Rabe, D. Bauch, C. Wegner, H. Kassens and L. Timokhov (2016), Episodic warming of near bottom waters under the Arctic sea ice on the central Laptev Sea shelf.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January 2016, doi:10. 1002/2015GL066565.

[10] Nicolsky, D. J., V. E. Romanovsky, N. N. Romanovskii, A. L. Kholodov, N. E. Shakhova and I. P. Semiletov (2012), Modeling sub-sea permafrost in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The Laptev Sea reg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7, F03028, doi:10. 1029/2012 JF002358.



第十章

异常的天气

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在2009—2010年的冬天，2010—2011年的冬天，2014年（1月）和2014—2015年的冬天都异常寒冷。美国的玉米收成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非洲也因此在应对饥荒时出现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显而易见，如果这种天气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北半球中纬度农业高产区会遭受损失，一些不稳定国家可能因此而发生大规模饥荒和政治动荡。单独一次的冬季极端天气可被认为是不断变化的天气状况发生的纯粹随机波动，但当这种情况连续六年出现而且看起来像是新的气候模式时，人们就会疑心这种天气状况与地球系统中其他观察到的变化有关了。因为这种异常现象正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蔓延，而且这连续的反常天气往往释放出相反的信号（先暖后冷，然后再变暖），其可能的原因则是急流（jet stream）的变化。罗格斯大学的詹妮弗·弗朗西斯（Jennifer Francis）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芬·瓦夫鲁斯（Stephen Vavrus）率先为异常的天气提出了某种可能的生成机制，[1]这一机制为急流的变化、减弱的带状（北-南）风和北极夏季海冰的减少等现象建立了关联。如果这种解释正确，天气的变化就真的是气候的变化了，中纬度地区经济体会因为恶劣的冬季和春季气候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影响，而像2012年“桑迪”飓风这样的极端天气情况发生的频率也会随之增加。

海冰的消退除了影响天气，还可能影响我们为全世界人口提供食物供给的能力：因为高山冰川的消退会减少春季作物产地的供水量。

天气和急流

近年的极端天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仅就2014—2015年冬季而言，旧金山地区首次出现了1月无雨的天气，此间加州整体持续干旱；而新英格兰地区则有大量降雪。

两个大的气团连续而复杂的相互作用驱动着北半球的天气变化，它们分别为集中在北极点附近的北极气团和集中在低纬度地区的热带气团。全球温度不再随纬度而呈渐进、平稳的变化趋势，相反，低纬度和极地气团相接的地方温度变化趋势十分陡峭。这个被称为极地锋面（Polar Front）的大气边界产生于大西洋下沉区的气团碰撞带；这两个气团的位置标识了其运动轨迹。出现在高空大气层中的陡峭压力梯度（岁气团边界而动）导致对流顶层（tropopause，对流顶层是大气层随高度升高不断降温的机制不再起作用的地方，它位于北极区域上空9公里处，该处的气温再次逐渐升高）下方产生非常强劲的高空窄带风，其时速有时候超过200英里。南北半球都有这种被称为急流的窄带风。“极地急流”通常是指北半球的急流，它与大气中的极地锋面有关。锋面温度相差越大，极地急流就越强：因此，冬季月份的急流最强，此时极夜中寒冷的北极和中纬度地区的温差达到最大值。跨大西洋航空乘客比较熟悉这种急流，因为它对美国飞往欧洲航班而言是强大的顺风，而对相反方向的航班则为强大的逆风。

由于锋面两侧气团速度相差很大导致急流很不稳定，因此其运动轨迹便呈现出曲折、蜿蜒的波形。急流速度越慢，其漫游的轨迹圈也越大，其速度也因此越慢。近年来，我们发现急流的漫游轨迹呈扩大趋

势，即往更南和更北的区域扩展。这引发了另外一种能量反馈：急流边界热带一侧的北向运动气团将更暖的空气带往北极，而向南吹拂的极地一侧的气团则将更冷的空气带到了比以前纬度更低的区域。因此，急流漫游范围的扩张本身就是中纬度向高纬度的热传递加速器。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加速了北极变暖，并降低了北极气团和中纬度气团之间的温差，从而缓和了急流并扩大了其漫游范围，最终加强了热交换反馈。因此，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明确的机制可被称为急流反馈，因为北极海冰消退对急流位置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强了海冰消退进程。

除了范围更大，急流向下（向东）涌动也随之变慢很多，这会导致天气模式的持续性，从而加剧了干旱、洪水、热浪和寒潮等气象事件，它们的持续时间是其严重程度的重要参考。

由于气团位置的改变，急流扩大的涌动范围影响的区域能进一步往南延伸。由于北极获得能量的减少（随着北极相对于低纬度区域温度的上升，它们的温差也逐渐下降），大西洋热带区域飓风频率也随之增加。于是，热带地区滞留的更多的热量会加热大西洋热带区域和墨西哥湾的表层海水，而这些区域正是飓风的起源地。

急流的影响是否属实？

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提出的机制似乎是合理的，但它并非北极海冰消退可能影响中纬度天气的唯一机制。事实上，西雅图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的詹姆斯·奥弗兰（James Overland）曾提出三条理由告诫我们在为北极变暖与低纬度天气模式建立任何直接联系之前应该慎重。[2]

首先，天然的谨慎态度让科学家会在确认了某种反复发生的现象的统计有效性后才将其纳入某种因果链条之中。北极变暖的放大效应得到增强以及海冰的大面积撤退都发生在过去10年里，而不正常天气事件则在过去6年表现突出；6年时间并不足以明确区分北极强迫和我们气候系统中的其他随机事件。大气科学家们还在父母膝下之时就被教导气候（大气长期的行为模式）和天气（多重随机因素导致的局部瞬时效应）之间的区别。最好的天气预报在预测14天之后的天气状况时也仅仅是炫“技”，即仅比随机猜测要好些；这的确就是天气预报的极限，因为第14天的大气运动相对于第一天而言又显得随机了。无论是观察火星表面图像还是观察大气压力图的科学家都被警告要抵制空想性错视（pareidolia），这是我们从一幅随机图像中看出本不存在之模式的天生倾向。火星上的“脸”以及人们从罗氏墨迹测试（Rorschach ink blot test）心理学实验中看出的意义都是空想性错视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海冰撤退的模式，我们也看到了极端天气事件的模式，并且我们相信前者引发了后者。

（1994年，我遇到一个无关的北极空想性错视事件，当时我正协助别人开展到威廉国王岛的私人考察活动，目的在于“拜谒”一位英国海军军官为富兰克林修建的墓地。这个军官曾耗费大量时间搜寻该岛西海岸富兰克林的船只曾经受困的地方，正当他的食物即将告罄，马上就准备乘飞机离开的时候，他碰巧发现了一处“墓葬堆”［实际上是一处小冰

丘］，他从中看出了完美的墓地形状：双排方石构成了长7英尺宽3英尺的步道。富兰克林1847年过世以来其墓穴就没有被人发现过。这个“墓葬堆”可能是富兰克林之墓吗？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耗费巨资才于次年抵达这个地方。眼前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市政公墓一般坚固，外形也与坟墓颇为类似。我们在石头上的敲击伴有回音，这表明其下层中空的构造。我们兴奋地叫来一位加拿大考古学家，他乘坐双水獭飞机而来，并被允许移动这些石头。他在我们渴望的目光下轻轻抬起了石头……底下竟然是旅鼠地洞！我从未如此失望。多次调查之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冰川沉积作用形成的几乎完美的方形沉积岩一直立于冰丘之上，冰冻过程又造成连续的薄片岩石从母岩中脱落进而滑下斜坡，重力和意外事件的作用让它们排成双排形状，看起来就像是完美的人造墓穴。这为旅鼠在其底部打洞提供了便利。）

因此，海冰撤退和极端天气之间关联的论证都是无效的。六个连续冬季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碰巧对应着北极海冰的消退趋势，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不可能。如果极端天气继续遵循同样的模式，自然，这种空洞的假设已越发不能成立了。

另外一个十分相似的论证便是，被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认为是极端天气事件的直接原因的急流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气流，它很容易就能产生看似确定的随机影响。

第三，中纬度大气循环还有其他的强制因素。美国国家科学院集合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众多科学家于2013年9月12日至13日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一份全面的报告随之产生。[3]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偏爱的解释机制。完全列举这些明显不同的可能机制如下：

——北极持续变暖→中纬度地区温度梯度降低→急流路径更为曲折→天气模式则更加稳定（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于2012年最初提出的解释机制）

——北极海冰撤退→高纬度地区秋季积雪覆盖面积增加→秋冬季节西伯利亚高压范围和强度随之增加→向上的行星波（planetary waves）随之增加→平流层突然变暖的频率增加→极地涡旋（polar vortex）减弱，急流则更为蜿蜒曲折（科恩等人，2012年[4]；伽塔克等人，2012[5]）

——北极海冰撤退→区域热量和其他能量通量随之发生变化→不稳定的极地涡旋→寒冷的极地空气移动至中纬度区域（奥弗兰和王［音］，2010年[6]）

——北极海冰消退→急流路径更为蜿蜒，冬季大气循环模式接近于冬季北极振荡的负相位→频繁发生的大气“阻塞”模式（刘［音］等人，2012年[7]）

——北极海冰消退→夏季欧洲上空的急流位置南移→西北欧多云、寒冷和湿润夏季出现的频率增加（斯克林和西蒙兹等人，2013年[8]）

——北极海冰撤退→冬季大气循环的响应则类似于北极振荡的负相

位→地中海区域冬季会出现极端降雨天气（格拉西等人，2013年[9]）

——北极海冰消退→三极风（tripole wind）模式进入其负相位→东亚地区冬季降水随之增加，温度则随之降低（吴［音］等人，2013[10]）

鉴于我们一直都在考察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反馈，事情显然不像它们表现的那般简单。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这些机制，但很明显，前述各种机制都可归因为与北极环境变化相应的中纬度气候事件的开端，尤其是海冰撤退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反馈，尽管仅有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解释机制中的反馈最为简单而直接。

人们发现的两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北极变暖和海冰撤退与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第一个证据发现于东亚，该地区的巴伦支海和卡拉海的海冰撤退可能与西伯利亚高压（西伯利亚持续存在的高压区域）的增强有关，这导致冷空气爆发并进入东亚。其次，冷空气渗透进入到美国东南部，这与长波大气风模式的转变有关，它因格陵兰西部较暖的温度而得以加强。

天气事件和粮食生产

人们已经发现，出现在北半球中纬度区域高产农业区域的极端天气已经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与此相应，如果这种影响和北极海冰的撤退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我们便能预料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会变成新的平常现象，即变成调整之后的地球气候周期。北极海冰在未来短期内不会自行恢复，温室气体浓度的持续上升经北极放大效应会让北极在未来几十年里迅速变暖。暴虐的极端天气会对世界上人口仍在迅速增长的区域造成灾难性影响。迟早，不稳定的气候会导致全球粮食需求和我们生产能力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饥荒会无可避免地减少世界人口。科学家们多么希望全球变暖和天气模式的这种可能的变化之间毫无关联，这可能就是他们在面临不断增加的相反证据时仍坚持无效假设的原因。

北极环境变化可能影响低纬度天气的想法早已有之，但人们之前从未将其作为一种气候机制而提出。作为世界天气标志的北极是休伯特·威尔金斯爵士（Sir Hubert Wilkins）等极地探险家赖以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威尔金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牧羊场，他曾亲眼目睹干旱对农民生计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在其《飞越北极》（*Flying the Arctic*, 1928年版）[11]一书中曾描绘了自己从阿拉斯加首次飞越北冰洋抵达斯匹茨卑尔根岛的情形，他如此写道：

> 众人常常问我为何要去北极地区……气象科学家们能从极地区域以及其他纬度区域多年前采集到的相关气象信息中总结出相关理论，进而让我们比较准确地预测季节变化。近年来，极地考察站的维护工作已证明，北极、南极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区的大量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似乎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区”正是受到与极地环境变化相关的急流威胁最甚的区域。很明显，一些国家能发现我们西方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情况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比如，中国一直都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在南美洲和非洲等地）购买或租赁农业用地。他们向这些地区引入机械化农业的做法让当地少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但同时却让其他农民陷入贫困。从长远看，这些行为也会破坏土壤、生物多样性、饮用水以及河流和海洋生境。但中国也在为未来而奋斗，以努力寻找足够的粮食。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土地，他们将掌控这些国家的粮食供给。

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可从粮食价格指数（FPI）中看出端倪，它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制定的全球平均粮食价格衡量指标。如果我们将2002年—2004年的价格指数当作值为100的基准线，这一指数从2004年往后迅速攀升并在2011年达到230，此后又下降至150（2016年）。如果将这个指标与政治事件进行对比，我们可看到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该指数曾大幅上涨，这一事件起因于人们抗议粮食价格及其对城市无业者造成的冲击。情况几乎总是这样，FPI的高值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动荡有关，这些地区的粮食价格往往占据了人们日常支出的很大比例。粮食价格而非其绝对缺乏往往是潜在饥荒的关键肇因。实际上，爱尔兰在1845年马铃薯饥荒的高峰时期曾向英国出口过粮食。而农民挨饿则是因为他们无法以当地市价购买粮食，马铃薯供应量的减少又加剧了这种局面。从绝对值看，当时爱尔兰实际上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所有人；人们只是因为无力购买而饿死。

除了类似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因素（若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这些因素也属人为）以外，我们还故意将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进而让粮食供应形势变得更糟。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玉米，它不仅是主食，而且也是美国在非洲饥荒时期向其提供的主要粮食援助品种。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曾执著于将玉米转化为生物燃料的想法，现在美国玉米产量的40%便用于此途。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这导致了全球粮食储备的崩溃，因为这些粮食本可用来减轻饥荒。欧盟也曾准备紧跟美国步伐，直到欧盟环境署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我也是其中一员）及时提交一份报告阐述了生物燃料甚至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效率都很低[12]，更别提它对人类食物供给的好处了。

总而言之，我们掌握了下述情况：

1.北半球冬春季节的天气模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极端天气情况也更为普遍。

2.这造成了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粮食生产的中断，粮食价格指数也随之上涨，进而那些难以养活其人口的国家又面临新一轮的粮食匮乏和内部骚乱。

3.如果这个机制确实与夏季海冰的消退有关，那么，我们便无法指望它自然而然地改善。

供水问题

供水问题往往与人类获取足够粮食的问题相互交织。澳大利亚的干旱天气曾激发威尔金斯前往北极研究极地气候。全球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在供水不足区域中的人口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水分胁迫（water stress）。人均年用水量少于1700立方米（包括农业等所有用水）的地区或国家被定义为水分胁迫区。[13]人均年用水量介于1000~1700立方米的区域则被称为“中度缺水”地区，500~1000立方米则为“长期缺水”区域，低于500立方米则为“极度”缺水区。令人惊诧的是，世界69亿人口中的36亿在2010年时仍生活在一定程度的水分胁迫之下——这一数字超过世界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极度缺水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分别为北非和中东，前者2.09亿人口中有9400万人极度缺水，后者2.14亿人口中则有7100万极度缺水。随着这两个地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两地的缺水人口比例到2050年会高出许多（到那时，北非3.29亿人口中有2.16亿处于缺水状态；中东的3.79亿人口则有1.9亿人口缺水）。人均可用水量明显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但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暖往往（但并不总是）导致干燥。其他很多因素也有影响，比如我们肆意地砍伐森林和破坏水域。

冰的存在或缺乏会直接影响水分胁迫。世界某些地区的供水则来自附近高山上的春季融雪和冰川径流，印度北部、玻利维亚高原和西藏等地便是如此。如果这种常规供水因为冰雪量的不足而消失，水分胁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仅仅因为全球变暖而产生，而与海冰并无直接关联，但水源和粮食的短缺肯定会成为威胁我们的两大隐患。

注释：

[1] Francis, J. A. and S. J. Vavrus（2012）, Evidence linking Arctic amplific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in mid-latitu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L06801, doi:. 10. 1029/2012GL051000.

[2] Overland, J. E. （2016）, A difficult Arctic science issue: mid-latitude weather linkages. Polar Science, in press.

[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 Linkages Between Arctic Warming and Mid-Latitude Weather Patter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4] Cohen, J., J. A. Screen, J. C. Furtado, M. Barlow, D. Whittleston, D. Coumou, J. Francis, K. Dethloff, D. Entekhabi, J. Overland and J. Jones（2014）, Recent Arctic amplification and extreme mid-latitude weather. Nature Geoscience, 7（9）, 627-37, doi:10. 1038/nge02234.

[5] Ghatak, D., A. Frei, G. Gong, J. Stroeve and D. Robinson（2012）, On the emergence of an Arctic amplification signal in terrestrial Arctic snow extent.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5, D24105.

[6] Overland, J. E. and M. Wang（2010）, Large-scal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loss of Arctic sea ice. Tellus A, 62, 1-9.

[7] Liu, J., C. A. Curry, H. Wang, M. Song and R. M. Horton（2012）, Impact of declining Arctic sea ice on winter snowfal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4074-9, doi:10. 1073/pnas. 1114910109.

[8] Screen, J. A. and I. Simmonds（2013）,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Arctic amplification and mid-latitude weath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959-64, doi:10. 1002/grl. 50174.

[9] Grassi, B., G. Redaelli and G. Visconti（2013）, Arctic sea-ice reduction and extreme climate events over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Journal of Climate, 26, 10101-10, doi:10. 1175/JCLI-D-12-00697. 1.

[10] wu, B., D. Handorf, K. Dethloff, A. Rinke and A. Hu (2013) , Winter weather patterns over northern Eurasia and Arctic sea ice loss. Monthly Weather Review, 141, 3786-800, doi:10. 1175/MWR-D-13-00046. 1.

[11] Wilkins, Sir Hubert (1928) , Flying the Arctic.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2] Haberl, H., D. Sprinz, M. Bonazountas, P. Cocco, Y. Desaubies, M. Henze, O. Hertel, R. K. Johnson, U. Kastrup, P. Laconte, E. Lange, P. Novak, I. Paavolam, A. Reenberg, S. van den Hove, T. Vermeire, P. Wadhams and T. Searchinger (2012) , Correcting a fundamental error in greenhouse gas accounting related to bioenergy. Energy Policy, 45, 18-23.

[13] Arnell, N. W. and B. Lloyd-Hughes (2014) , The global-scal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and flooding under new climate and socioeconomic scenarios. Climatic Change, 122, 1-2, 127-40, doi:10. 1007/S10584-013-0948-4.



第十一章

大洋烟囱的隐秘世界

格陵兰海域大洋烟囱的故事及其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在科学层面是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大气、海洋和冰川的变化，它们相互交织共同造成了我们地球温度的重要变化。大洋烟囱直接影响了我的祖国。

首要的问题是，何谓大洋烟囱？大洋烟囱就是很深的垂直旋转的水柱，它能将大洋表层的冷水转移至深达2500米的海域。这与我们认为的亲切又稳定的大洋形象完全相悖，我们会认为大洋由不同水平层面的水体组成，不同层面的水体因为盐度和温度而彼此分隔，进而密度也有所差异。海洋整体上是稳定的：低密度海水位于高密度海水的上方，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底。表层水体难道一定无法下沉一英里半进而扰乱这种稳定性？好吧，它可以，但仅限于少数重要水域。其中之一便是格陵兰海域。尽管这种情况应该很不稳定，但却可持续经年。没人知晓其中缘由。

全球热盐环流

我们以热盐环流作为讨论的起点。热盐环流是全球大洋水域缓慢搅动的循环，与大多数被风驱动的洋流不同，它由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差异所致的密度变化驱动。其主要驱动力来自极地海洋，该处表层海水因海冰的形成而获得盐分（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海冰中多数盐分被重新排向海水）并下沉。这一过程吸引了从热带地区缓慢流向极地的携带着热量和盐分的海水。热带的洋流因大陆形状和地转偏向力（Coriolis force）而改变方向，进而在北半球向右流动，在南半球则向左侧流动。

如果观察海水的表层循环（彩色插图22），我们会发现与风力驱动的洋流循环有些类似的缓慢洋流（红色部分），即便无风，它也会一直流动。我们首先看看印度洋北部和太平洋北部两处广阔的上升洋流。这些洋流会把深层海水带到海面，然后缓慢地向南和向西流动。太平洋深处的海水会流经东印度群岛，并在好望角附近流入印度洋，随后它会向北流向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域。这股缓流在墨西哥湾附近会聚集更多水体和热量，之后则会像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和北大西洋洋流一样穿过北大西洋。接着，它会继续向北流向北冰洋，随后便消失无踪。这意味着它会在某处下沉。接下来，我们能检测到一股深水洋流缓慢向南流经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当其抵达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时候就像走完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带——这个旅程持续了大约1000年。拉蒙特-多尔蒂地球天文台的沃利·布洛克（Wally Broecker）称之为伟大的海洋传送带，这是个好名字，只是其他科学家，比如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卡尔·乌恩斯克（Carl Wunsch）会说这股缓流远比以上描述的复杂，而且它还分割成了一系列支流。但彩色插图22给出了基本的轮廓，一股经加热、冷却、蒸发和地球转动驱动的不可阻挡的缓流——这些都是十分基本的驱动力。

传送带需要驱动力。驱动大洋传送带齿轮的则是上升洋流的动力，这一过程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深层海水带往表层，而下沉洋流的动力则让表层海水下沉。我们关注的是极地区域的洋流变化，因此会忽略大范围的上升洋流并转而关注北大西洋海域里更为集中的下沉洋流的驱动力。

这些下沉洋流出现在何处，其原因又为何？

科学家们发现下沉洋流仅发生在两个地方，且范围都十分狭小。[1]一处位于拉布拉多海的中心区域，该处表层海水因为冬季吹拂在拉布拉多海和格陵兰岛上空的冷空气而被冷却。整个冬季，冷却的表层海水密度最终增加到足以下沉到深海的程度。下沉的海水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冬季海上的气温，因而每年都会有巨大差异。另一处海水下沉区域因为海冰的参与而更为有趣。该处位于格陵兰海中心（北纬75°，西经0°）的一小片区域，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关键区域，因为这里发生的变化会影响整个世界。

格陵兰海中的对流区

格陵兰海是一片尤为重要的海域，它紧邻欧洲并与欧洲气候关系密切。多亏了低纬度地区的洋流为格陵兰海带来的热量，西欧的温度才比同纬度区域的平均气温高出5~10℃（彩色插图23）。如果这种热量传输消失，英国和西欧的气候则会变得与拉布拉多一样。

格陵兰海的中心区域是深海的窗户。格陵兰海的洋流下沉区不及世界海洋面积的千分之一，但它对海洋环流而言却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下沉（也称“通风”）作用，垂直和水平的大洋环流才能完全地实现，而溶解在表层海水中的温室气体和营养物质也才能循环至深海。溶解在海水中的二氧化碳也通过这种下沉作用被带往深海，这一过程对海洋吸收我们每年额外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能力的强弱影响深远。有人提出，海洋对流过去的变化造成了沉积物和冰芯中检测到的气候快速波动现象，我们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会看到，预测了格陵兰海域对流现象减弱的气候模式也相应地预测了西欧气候温度的降低。

格陵兰海中的对流区域位于气旋流涡（cyclonic gyre，即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大气环流）中心处，寒冷的洋流（东格陵兰洋流，EGC）从北极盆地将极地海冰和海水带入了这个环流系统，进而对其西侧产生影响；对该区域东侧产生影响的则是温暖的北向洋流（西斯匹次卑尔根洋流），它是墨西哥湾流的延伸；其南侧则是寒冷的扬马延洋流（Jan Mayen Current），它是东格陵兰洋流的支流，该洋流在北纬72°~73°附近因为海底的扬马延山脉的阻隔而从东格陵兰洋流分离进而朝东流去（彩色插图26）。格陵兰海也是北冰洋与世界其他地区水体和热量交换的主要通道，因为连接格陵兰海与北冰洋的弗拉姆海峡是深海海水进入北冰洋的唯一入口。海冰则从北冰洋向下转移至格陵兰海，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融化，因此就一年中的通常情况而言，格陵兰海域整个就是一片冰水池和淡水源。融化的海冰每年为格陵兰海贡献约3000立方千米的淡水量。

然而，冬季的格陵兰海域本身也能在东向的扬马延寒流经过的地方形成海冰。因为东格陵兰洋流本就让该处水体变得寒冷了。扬马延寒流会在沿着格陵兰岛海岸南下的过程中留下覆于其上的极地冰盖。这导致寒冷无冰的水体暴露于冬季寒冷的大气之中并被进一步冷却，在冬季盛行西风吹过格陵兰冰盖的气候阶段尤其如此。强烈的冷却作用导致新的

海冰在这片寒冷的开阔海域逐渐形成。但新的海冰无法形成连续的冰盖，因为冬季格陵兰海域存在大量波浪能。相反，这些海冰遵循经典的“饼状冰周期”，它们一开始会在水体中形成碎冰晶组成的镁乳状悬浮物，然后形成仅为1~5米见方的饼状冰，其边缘在频繁的相互碰撞中不断扩张（彩色插图24-26）。海浪将悬浮的碎冰晶挤压成团块状进而形成饼状冰。这些漂浮的饼状冰及其周围的碎冰晶完全填满了携带寒冷极地水体的扬马延洋流的表层。我们可从卫星图像（彩色插图26）中看出这一点，新冰会形成被称为奥登冰舌的舌状突起，其覆盖面积可达25万平方公里。海豹猎手们于19世纪首次发现这一冰舌并为其命名，因为格陵兰海豹春季会在这些饼状冰上嬉戏并产仔。挪威的海豹猎手会沿着冰舌外缘追踪并猎杀海豹幼崽，从而获取珍贵的白色皮毛，他们将这一区域命名为奥登（即挪威语“海岬”的意思）。早期的捕鲸者也熟知此地，因为奥登冰舌以西有一部分受保护的开阔湾区水域，即诺尔德布克塔湾（Nordbukta，“北部湾区”之意），缓慢游动的北极露脊鲸（bowhead whale）会频繁造访此地。我们在第六章谈到的杰出捕鲸者和科学家小威廉·斯科斯比在其1820年的经典著作《北极历史以及格陵兰鲸鱼业状况简论》（*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中就曾描写过奥登冰舌以及诺尔德布克塔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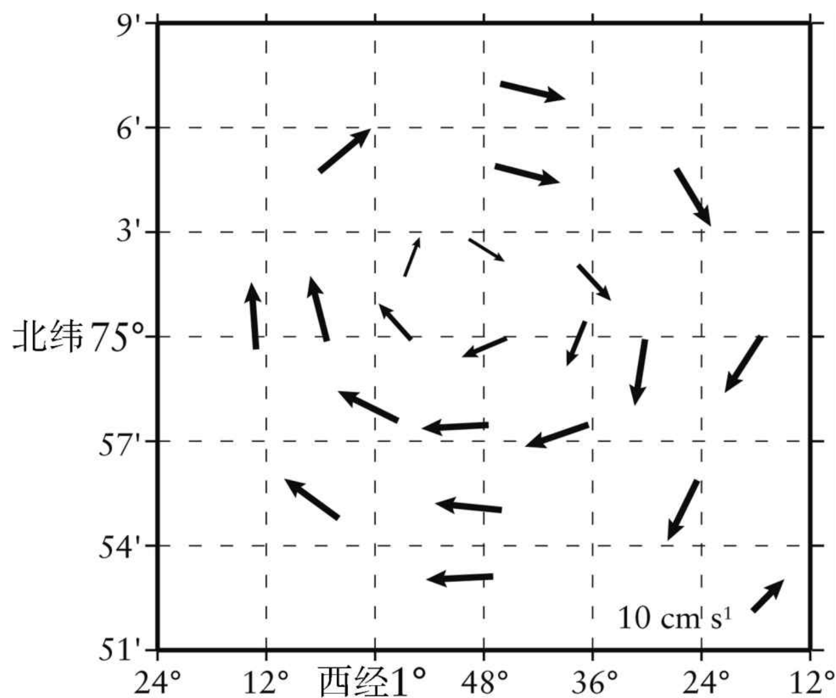
饼状冰形成过程中令人兴奋的一点是，冻结的海水中包含的盐分并不会进入海冰之中，而是被排回海洋。在我的研究小组的实验中，我们用起重机将饼状冰吊上甲板并对其进行切片处理。我们发现较薄的饼状冰的盐度为10‰（海水为35‰），而较厚的饼状冰的盐度可低至4‰，其盐度较海水已下降近90%。饼状冰中盐水的释放增加了表层海水的密度，同时也让表层海水更加不稳定进而导致其下沉。[3]这一过程中额外释放的盐分造成海水密度的增加远超其对拉布拉多海造成的影响。事实上，饼状冰的迅速生成以及因此导致的表层海水盐度的迅速上升现象对格陵兰海域大部分对流作用而言至关重要，它也因此让大西洋热盐环流得以持续。这就是饼状冰排盐过程让人兴奋的原因；排盐过程因为饼状冰的迅速生长而变得很快，而这一过程恰好发生在其能对海洋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由于奥登冰舌对斯堪的纳维亚海豹猎手的很重要，其覆盖面积自1855年丹麦气象研究所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会被记录在案，该研究所自那时起还会发布月度冰舌报告。以往，冰舌会在每年冬季的11月形成并一直持续到4月甚至5月，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海水对流在之前这段时期里一直都在发生。但自1990年代起，某些事件影响了对流现象。1994—1995年以及1998年到现在的这两个时间段里，奥登冰舌已无法形成一个整体。这表明格陵兰海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变化。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气候阶段的转变，这导致奥登冰舌上空开始盛行更为温暖的东风（发生在两个大气循环系统之间的转换被称为北大西洋振荡，NAO）。但更严重的是，当北大西洋振荡回转至其先前的相位时，奥登冰舌也并未因此而重现，因为全球变暖使得海面的空气升温从而阻止了冰舌的形成。

上述情况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影响了对流，即表层海水向深海的下沉？为了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研究对流的发生机制；人们最终发现了另外一个神奇的被称为大洋烟囱形成的进程，其产生的部分原因尚不明了。1970年，人们在地中海西北部进行一项大型实验（MEDOC，即地中海洋流循环实验）时首次在温暖的利翁湾发现了大洋烟囱。[4]实验人员发现密史脱拉风（mistral，一种凛冽而寒冷的西北风）会在冬季从阿尔卑斯沿海区域呼啸而出，这股冷空气会让表层海水温度降低并下沉，这些海水以小股连续的旋转柱形而非以随机的方式下沉，这种现象因此被命名为大洋烟囱。单个大洋烟囱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仅为数天——因为海水表层的风向会发生改变，它们因此被认为是某种有趣而神奇的现象。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研究格陵兰海的科学家开始怀疑这就是奥登冰舌下方海水对流形成的原因。我曾主持过一个名为欧洲次级海洋计划（ESOP）的欧盟项目，该项目随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也由欧盟资助的名为对流的研究计划。多亏了这笔研究资助以及众多拥有船舶的海洋学研究机构的参与（比如位于不莱梅哈芬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以及位于特罗姆瑟的挪威极地研究所），我们才能在冬季期间进入奥登冰舌的中心区域一窥对流形成的究竟。

我们发现的情况十分惊人（彩色插图27、28）。在仅为2万米宽的海域上，表层海水形成了一个沿顺时针方向转动的紧致水柱（方向与格陵兰海回旋相反），这个水柱将表层水往下输送，其影响可达2500米深处的海域，而该处大洋深度仅为3500米。[5]因海冰的形成以及冷却作用而密度大增的表层海水会一直下沉至与其密度一致的水域为止。这个紧致的水柱在这段下沉的过程中会穿透沿途的一切，包括深海处更为温暖的海水层。彩色插图28中的大洋烟囱的外侧轮廓温度为-1℃（为了看起来像个烟囱，它被恰当地着以红色），它穿过了稍微温暖（0.9℃）的黄色海水层。无论我们以温度、盐度还是密度绘制曲线，都能追踪到大洋烟囱的存在。彩色插图28中的大洋烟囱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烟囱，后者下沉的深度不及前者。彩色插图27显示了一系列海洋观测站绘制的两个大洋烟囱的温度横截面，观测站中的探针下沉并测量其温度和盐度时恰好穿过了这两个大洋烟囱的中心区域。

这种旋转水柱如插图11.1所示，显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极地号”科考船曾停留在一个大洋烟囱之上并用声学装置（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测量其中的水流速度。[6]我们可以看到，水柱内部的水流速度与它离水柱中心的距离呈一定比例——换句话说，水柱就像一个旋转的固体。让我们牢记，此处的顺时针旋转方向（这被称为海洋反气旋现象）与格陵兰海域中洋流一般情况下的逆时针旋转方向完全相反，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到惊奇的原因就是这种水柱居然能形成并持续下去。


9'
6'
3'
北纬75°
57'
54'
51'
24°
12°
西经1°
48°
36°
24°
12°
10 cm s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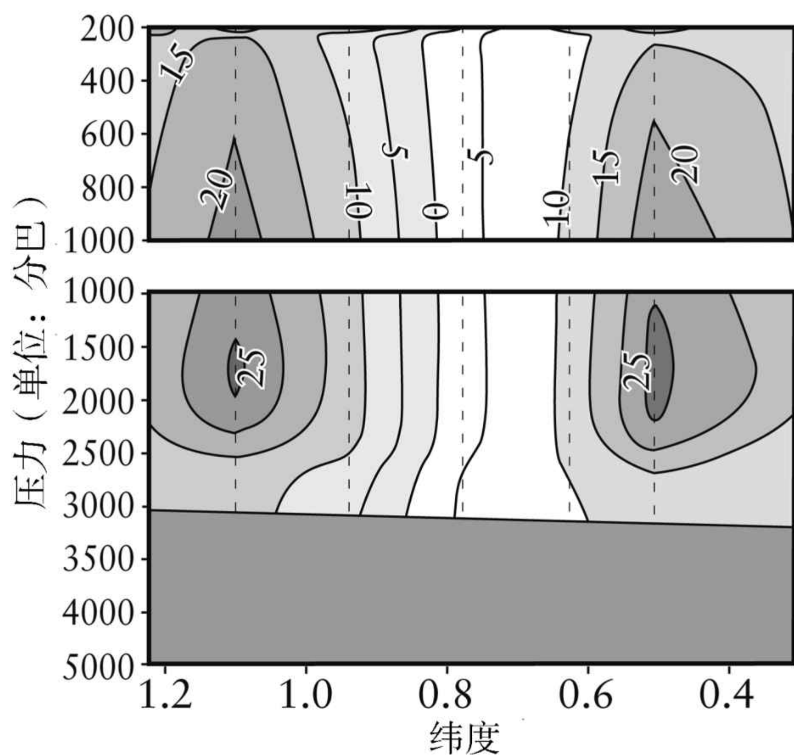

200
400
600
8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5000
压力（单位：分巴）
15
20
5
10
0
25
1.2
1.0
0.8
0.6
0.4
纬度

图11.1：格陵兰海域一处大洋烟囱中心区域的水流速度，它显示出固体旋转的特征。上图是向下直视的水面图；下图的横截面显示，固体旋转朝水柱下方延伸（左侧的区域显示水流从纸面流出；右侧显示水流进入纸面的区域）。

总共有多少大洋烟囱？使用小型科考船的问题——我们使用的是便利的挪威船只“兰斯号”（Lance）和“扬·梅恩号”（Jan Mayen）——是发现一处大洋烟囱之后，我们就必须耗费剩下所有的航行时间以对其进行充分测绘。格陵兰海域冬季恶劣的天气经常让我们不得不停止工作并锚定船只——令人难忘的是，“力量12”风暴下半场的暴风雨向我们袭来之前的片刻时间宁静得让人迷惑，当时暴风眼正从我们身边经过，气压降到仅为917毫巴。我们单次考察最多发现过两个大洋烟囱（冬季多数时候我们仅能发现一个，这独一个恰好位于北纬75°,西经0°的位置），那次考察开展于奇迹般寂静的冬季，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考察站离任何可能被探测到的大洋烟囱十分接近。[7]因此，我们怀疑那一年格陵兰海中心区域的确仅有两个大洋烟囱。我们对过去几年的研究重新分析之后得出，该区域过去曾有多个烟囱：来自巴黎皮埃尔·玛丽·居里大学的让·克劳德·加斯卡尔（Jean-Claude Gascard）于1997年在该海域部署了一系列悬浮浮标（它们被增加重量以漂浮于预定的深度），他发现其中4个浮标任何时候都会在240米~530米深处的海域密集地绕圈，我们后来意识到，这一定意味着它们陷入了大洋烟囱之中。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大洋烟囱数量多于21世纪初的数量。毫无悬念，当时的海冰也更多。

研究对流项目期间，我们连续3个冬天（2001—2003年）去到这个回旋中心，而我们在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同事则在这期间的夏季造访该海域。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烟囱能持续很长时间。第一个冬天发现的开放烟囱在随后的夏季还被人们在同一地点发现，但其上已经因为海冰和冰川的融化而覆盖了一层约50米厚的低密度新鲜海水。这层海水下方，大洋烟囱仍然存在，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细胞。次年冬季，它重新作为对流中心出现在了海面。这一过程在随后的夏季和冬季再次重复，直到我们因为项目结束而无法进一步对其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人们研究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大洋烟囱。[8]持续时间如此长的紧致水柱在海洋中的其他地方闻所未闻，海洋中的涡流都会在几天或数周的摩擦和“下沉”作用下失去能量和动量。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因素导致大洋烟囱在压缩状态下如此快速地旋转。它为何不停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大洋烟囱为何会如此准确地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所知的最长的一个大洋烟囱三年里仅仅移动了1万米，尽管海底并不具备将其锚定在一个地方的功能，例如经常发生在大洋涡流中的情况一样。大洋烟囱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谜团。在做出这些关键发现并了解了它们对大气的巨大影响之后，我们曾反复向英国自然环境研究会（NERC）投标希望他们支持相关区域的大洋烟囱研究却屡遭拒绝，我们对此深感失望。

我们所知的情况是，目前这些惊人的对流结构已越来越少，这与奥登冰舌的消退一致，并且格陵兰海域中对流的减少会对全世界海洋气候产生严重影响。模型数据表明，每年需要形成6~12个大洋烟囱才能解释深海水体的形成[*]。这些大洋烟囱如今又在何处？海冰都难以形成，它们还会存在吗？深海水体的形成是减慢了还是停止了？或者这些烟囱

是以别的方式继续存在，抑或存在于别的地方？

《后天》中的伟大传送带

2004年上映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的情节既太夸张又不准确。在这部电影中，因为极地海域融水引发的大洋中对流现象的减弱导致了气候的变化，纽约因此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冰雪茫茫的极地沙漠。其中传达的信息就是最好不要扰乱热盐环流。但我们正在对它造成干扰。已有证据表明，高纬度地区对流现象的减弱使得传输至大西洋的热量也相应地减少了。大西洋热盐环流总体强度估计为15～20斯维尔德鲁普（Sverdrups，即百万立方米每秒），其向北输送的热量为1拍瓦每秒（petawatt，即一千万亿瓦）。人们已经观察到，深海水域向南流经法罗群岛的洋流强度已经减弱，这表明部分传送带（将水体从深处运出北极的部分）也慢了下来。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并不会注意到北大西洋表层热盐环流的减弱，因为受风力驱动的墨西哥湾流和北大西洋洋流主导着这部分表层洋流的流动。但最终人们还是会注意到传送带中损失的这部分温暖洋流。

热盐环流的减弱会让气候变冷，或者至少让我们生活其中的欧洲大西洋沿岸气候变冷吗？的确如此，尽管不会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剧烈或严重。事实上，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我们所在的区域比欧洲大陆升温更慢。彩色插图29就显示了欧洲环境署根据其运行的气候模型做出的预测，其中标准的“一切照旧”情景给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到2100年时会升温4℃，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可怕情景，这种温度的增幅会让南欧的气候变得跟现在的北非类似。但该模型模拟的情景包含了大西洋热盐环流减弱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极大地降低英国、爱尔兰、冰岛和挪威大西洋沿岸、低地国家和法国等地的升温幅度。事实上，英国的升温幅度仅为2℃。自然，作为报偿，低纬度区域滞留的更多热量则意味着大西洋热带区域表层海水升温更快，这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飓风。

2003年，人们在格陵兰岛南端的东部的艾尔明格海（Irminger Sea）发现了新的对流点，这可能与格陵兰海域对流现象的减弱有关。[9]此处的对流比格陵兰海域的浅，多数年份的冬季仅能达到400米，特别寒冷的冬季则为1000米。而该处的对流形式也与格陵兰海域中的对流完全不同——此处没有齐整而神秘的水柱，有的只是占据着相对较大区域的大量散开的凹陷水体，这些水体随后会流向西南方向进而与拉布拉多海水相互作用。这似乎是拉布拉多海对流的某种前身，而海冰并未参与其中。

未来

格陵兰海对气候的直接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很清楚了。人们必须调整气候模型进而将对流项目发现的机制纳入考虑范围。但我们必须记住，对流项目仅是一个物理项目，它旨在了解部分海洋（同时也是生命的栖息地）中的物理现象。生物学和化学也需要将这一项目的成果纳入考虑范围。汉堡大学的扬·巴克豪斯（Jan Backhaus）的一项发现表明，

冬季每单位海洋面积的大洋烟囱中的浮游生物数量与夏季和春季相同。原因在于大洋烟囱包含的2500米长的水柱的整体密度是一致的，因此，浮游生物可以毫不费劲地上升或下潜以寻找营养物质。即便在黑暗的冬季，同等面积的大洋烟囱也能比其他类似区域的正常海域供养更多的生命。

仍然存在的挑战还包括：继续跟踪格陵兰海域中心区域目前的对流结构的消散以及新结构的形成，进而预测气候和表面风力的变化对水柱和对流水体深度的意义。与气候科学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我们亟须进一步研究大洋烟囱以避免令人不快的慌张，而这些研究项目跟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项目一样尚未得到资助。这似乎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一些气候科学家和多数科学基金机构的精神层面的自我审查。近年来，不单单英国如此，格陵兰岛中心区域的许多科研工作建议都被拒绝了。然而，所有人都认为热盐环流是我们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或紊乱都将产生重要的全球影响。所以，科学家回到那片海域工作的意义重大。

注释：

[*] 此处的深海水体形成指的就是大洋烟囱导致的表层水对流至深海的过程。——译注

[1] Marshall, J. and F. Schott（1999）, Open-ocean convection: observations, theory and ideas. Reviews of Geophysics, 37, 1-63.

[2] Scoresby, William Jr（1820）, 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 2 vols. London: Constable（reprinted 1968, David and Charles, Newton Abbot）.

[3] Wilkinson, J. P. and P. Wadhams（2003）, A salt flux model for salinity change through ice production in the Greenland Se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inter convec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8（C5）, 3147, doi:10. 1029/2001JC001099.

[4] MEDOC Group（1970）, Observations of formation of deep-water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1969. Nature, 227, 1037-40.

[5] Wadhams, P., J. Holfort, E. Hansen and J. P. Wilkinson（2002）, A deep convective chimney in the winter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9（10）, doi:10. 1029/2001GL014306.

[6] Budéus, G., B. Cisewski, S. Ronski, D. Dietrich and M. Weitere（2004）,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a long lived vortex in the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053404, doi:10. 1029/2003 62 017983.

[7] Wadhams, P., G. Budéus, J. P. Wilkinson, T. Loyning and V. Pavlov（2004）, The multi-year development of long-lived convective chimneys in the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06306, doi:10. 1029/2003GL019017.

[8] Wadhams, P. （2004）, Convective chimneys in the Greenland Sea: a review of recent observations.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Biology. An Annual Review, 42, 1-28.

[9] De Jong, M. F., H. M. Van Aken, K. V□ge and R. S. Pickart（2012）, Convective mixing in the central Irminger Sea:2002-2010. Deep-Sea Research, I, 63, 36-51.



第十二章

南极的现状

南极海冰的奇特故事

到目前为止，本书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北极。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北极乃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多数发达工业国家的后院，这里迅速发生的变化会立即对我们产生影响。对英国而言，格陵兰海域的海冰离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仅有400英里。对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而言，海冰区域是其领海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南极就显得十分遥远；它甚至远离任何别的大陆板块。将南极洲和南美洲分割开来的南极大陆最狭窄处的德雷克海峡也有1200英里宽。那里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吗？

的确重要，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冰雪的反射率反馈效应必须将地球作为整体加以计算。我们在前几章讨论过北极海冰是如何迅速消退的。我们知道，这种消退速度大大超过了多数气候模型的预测，这些模型预测的消退速度慢于全球变暖的大致速度。在这方面，北极海冰是个异常现象。但南极海冰的情况则显得更加异常，因为它实际上在不断增长。增长不多，但仍在增长，尽管南极大陆整体上也在变暖。如果南极海冰不断增长，那么，这将有助于抵消北极海冰和雪线撤退引起的全球反射率的损失。其次，南极海冰的增长和北极海冰的迅速消退对全球气候模型构成了同样的挑战——计算机模型预测了南北极区域海冰的缓慢消退，因此，这些模型对这两个地方的预测都错了。根据博尔德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数据，南极海冰面积在2013年9月达到了1947万平方公里的最高纪录。这超出了之前2012年的纪录约3万平方公里，比1981—2010年的平均值也高出2.6%。最近几年，南极海冰面积稍微回落，2015年回落至1883万平方公里，这很可能与南半球厄尔尼诺大气模式有关，[1]但它仍呈缓慢增长态势。

我们从卫星上的被动微波仪器中可知，南极海冰整体上在不断增长。尽管事实上南极至少有部分区域——南极半岛——正在迅速变暖，[2]这种趋势也引发了2002年的一个壮观事件——即南极半岛东部的拉森B号冰架的崩塌——其中面积为3250平方公里、约200米厚的冰架分裂为众多冰山群，随后，这些冰山有记录以来首次漂离了南极半岛海岸线。

那么，为何在气候变暖和冰架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南极海冰却在不断增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南极海冰与北极海冰的区别。当然，北极由陆地包围的大洋组成，而南极则由海洋环绕的巨型大陆架组成，就此而言，南北极有所区别。（有趣的是，北冰洋与南极大陆的大小和形状非常相似。）风力模式和海洋洋流往往将南极从全球天气模式中隔绝开来，因此，南极的变化趋势与北极有所不同。

南极为何如此不同？

南极海冰与北极海冰不一样。当然，它们均由海水冻结形成，但与北极海冰相比，南极海冰的形成方式、性质和外观均有所不同。初冬时

节，南极海岸近处便开始形成海冰，冰缘线会在冬季朝南冰洋不断延伸并暴露于世界最大大洋的威胁之中。直到初冬冰缘线延伸的时候，一支考察队在浮冰块上从事科考研究后，人们才理解了南极海冰的产生机制。这项研究就是1986年开展的冬季韦德尔海科考项目，研究人员当时使用的是德国科考船“FS极星号”。我与其他50位科学家一起参与了这次值得纪念的考察之旅。我们在穿越冰缘区域时仔细研究了冰面条件及其特征，进而将所谓的碎冰晶-饼状冰循环确定为浮冰块内部多数单年冰的来源。[3]

我们已经看到（见第二章），冰块生长于平静的水面并形成一个最初的薄冰层，之后凝固成名为尼罗冰的透明冰层；水分子会在尼罗冰盖底部冻结，冰块逐渐向下延伸，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因素会有利于具有水平C轴的晶体，最终，单年冰冰层逐渐形成。南极冰缘线的极端条件无法让海冰以这种方式直接形成连续的尼罗冰盖，因为南冰洋能量很高的波浪场（wave field）和湍流会让新冰以碎冰晶的方式密集地悬浮在海上。由于细小的冰晶会在波场中旋转，这些悬浮的新冰便会经历周期性压缩过程，冰晶会在压缩阶段冻结在一起并形成小而连续的块状雪泥，随着更多碎冰晶的加入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冻结过程，这些块状物又会增大并变得坚固。它们被称为饼状冰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碰撞会把悬浮的碎冰晶泵到冰缘处，接着，水分流失之后碎冰晶的冰缘便得到延伸，这会让每个块状物都具有煎饼的外观。冰缘处的饼状冰的直径仅为几厘米，但它们会在远离冰缘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直径和厚度，直到其直径达3~5米、厚度达50~70厘米为止。由于海面不会被海冰彻底封闭以及大量的海洋-大气热通量仍然可能储存潜热，饼状冰四周的碎冰晶会不断增加并为其提供其生长的材料。正如第十一章所描述的，格陵兰海中的奥登冰舌的形成机制与此完全一致，其不同之处则发生在海冰进一步生长的阶段。

现在，由于波浪能的减损，离冰缘线更远的地方则获得了波浪的保护，饼状冰便开始冻结在一起；但在1986年的冬季实验中，我们发现波浪场强大到足以防止饼状冰的整体冻结，除非饼状冰能穿透海浪达270公里的范围。在这个区域，饼状冰会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浮冰块并最终形成一个连续的单年冰冰盖。开放水域在这个意义上被饼状冰阻断，后者的生长速度也降到很低的水平（估计每天为0.4厘米[4]），并且单年冰最终达到的厚度仅比合并的饼状冰厚了几厘米。[5]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单年冰被称为加强型饼状冰（consolidated pancake），其底部形状与北极海冰有所不同。合为一体时的饼状冰会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夹杂其间的碎冰晶则像“胶水”似的将这些乱糟糟的饼状冰冻结在一起。结果，如此冻结在一起的海冰的底部会呈现出粗糙的锯齿状，其中的饼状冰的整体厚度可达正常海冰的两到三倍，而此类海冰顶部突起的饼状冰则构成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乱石场”（stony field）景观，因为这与干石墙（drystone walls）环绕的景观很相似。这种海冰与平静海面形成的海冰之间的对比可见插图12.1，该图呈现了我们在海冰上每隔一米钻孔测得的海冰剖面图。钻孔尽管很费劲，但它却是我们绘制海冰底部形状的最好办法，因为1959年的《南

极条约》禁止潜水艇在南极海域活动。

加强型饼状冰的底部让海面的单位面积增大许多，这为藻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也为磷虾提供了庇护所。大量阳光从薄薄的海冰中穿过，浮游植物得以在其底部存活并进行光合作用。结果，一个丰富的冬季海冰生态系统便产生了，据估计，南冰洋生物总量的30%产生于此。

即便《南极条约》签署30年之后，仲冬时节的南极浮冰块上也没有多少考察船。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于1989年开展了一项名为冬季韦德尔海环流研究的科考项目（我也曾参与其中），[6]由于科考船之间的协作和冰上营地（1992年建立的“韦德尔1号”冰站[7]和2004年5月建立的“极星号”冰站[8]）的建立，此后韦德尔的海上实验便越来越多。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南极周边所有的海冰都遵循碎冰晶-饼状冰的生长顺序，但如果的确如此，初冬南极饼状冰覆盖的区域则可达600万平方公里，这是地球表面少见但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奇的是，这片突起的白色饼状冰景观尽管占据了如此广大的区域，但却鲜为人知。得窥其真容者可能不足千人。

海冰上的积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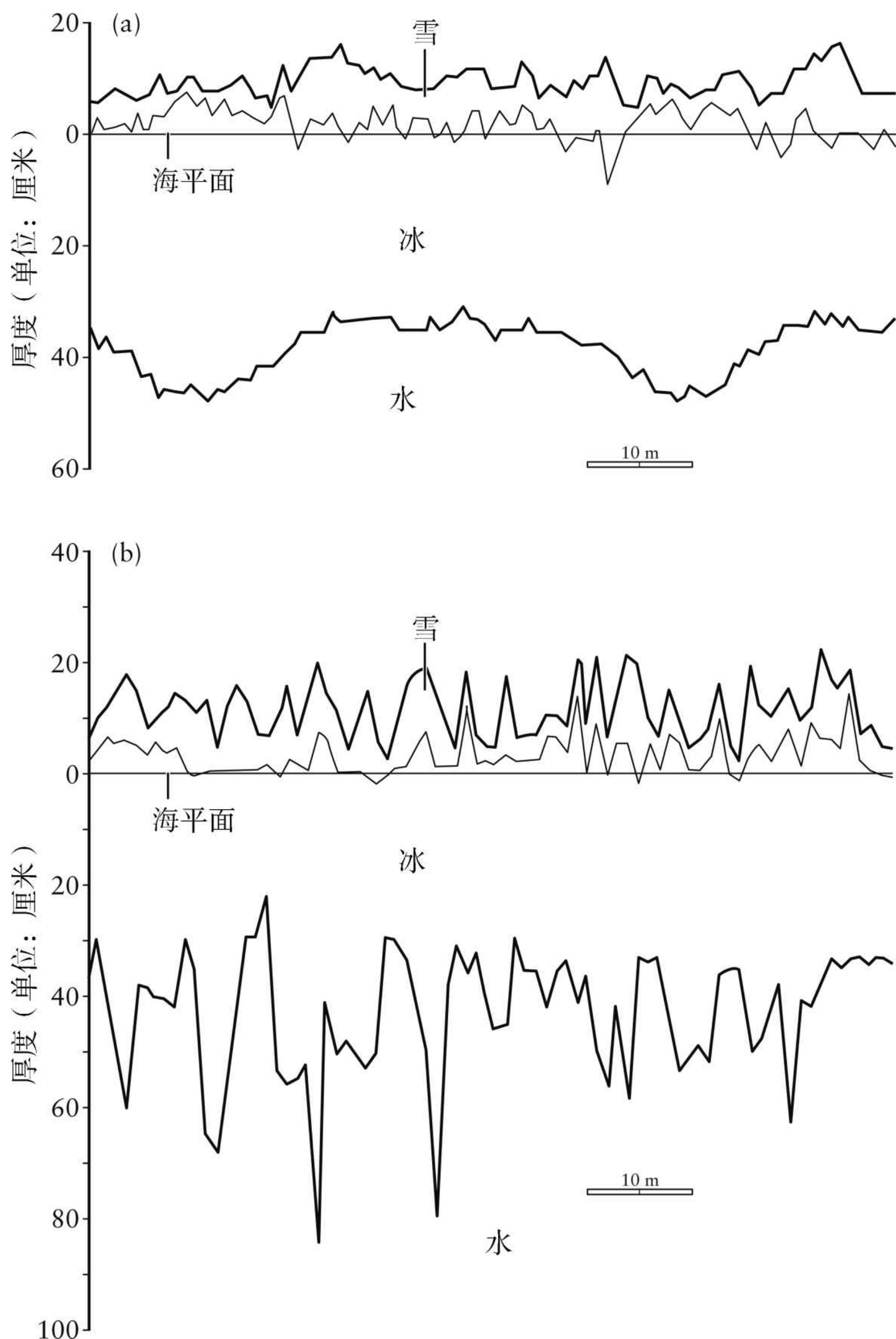


图12.1：间隔1米钻孔测得南极冰盖冬季的整体厚度，图中显示了底部平缓（a）的平静条件下生长的海冰与加强型饼状冰之间的差异，饼状冰以混乱的方式冻结在一起，底部为锯齿状，厚度为正常饼状冰的两到三倍（b）。

南极海冰上空的年降雪量远远高于北极，因为南极洲与南冰洋之间

的近距离为南极洲带来了更多的水分和降水，而在沿海区域，下降风（来自南极冰盖顶部的下降风）也会将积雪吹向海冰。从“极星号”考察船1986年7月至9月在东韦德尔海的航行中，我们发现单年冰表面的平均积雪厚度为14～16厘米。由于海冰本身很薄，其上的积雪则足以将海冰表面推至钻孔内海平面之下15%～20%的地方，这种情况会导致海水渗透到表层的积雪之中进而在海冰表面形成潮湿的雪泥层，或者在冻结时让干雪和原初的冰面之间形成“雪-冰”混合层。1989年9～10月间的积雪甚至更厚，我们造访过的韦德尔海西部的多年冰上尤其如此。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足以将冰面推至海平面以下。插图12.2中的（a）（b）部分就显示出这两种类型冰盖之间的对比情况。厚厚的积雪遮挡了海冰，而泥状的湿雪又意味着卫星雷达无法很好地探测海冰厚度，因为湿雪会反射雷达波束。毫无疑问，积雪和海水透进积雪形成的泥状冰（又称“陨冰”，meteoric ice）在南极海冰中会比它在北极海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

海冰的年度循环及其变化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时所说，近年来尴尬的气候模式导致南极海冰面积呈缓慢上涨趋势，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大。

插图12.3显示了1978年—2011年这些正常年份中的海冰面积年度循环周期。[10]夏季，韦德尔海西部和罗斯海成为仅存的两处主要海冰区，因此，这两个区域可容纳大量多年冰，而北极直到最近还遍布此类海冰。这两个区域海冰面积最小值的年度变化不大。随着冬季的来临，新冰会在冰缘线北部形成，海冰极限会向北挺进直到冬季结束时（8-9月）在南纬55°-南纬66°附近达到最大值，随后便逐渐撤回至其最初的起点。海冰在印度洋中的北部极限为南纬55°，东经15°附近，但其主体则占据了东南极洲南纬60°附近余下的大部分区域，然后海冰会进一步扩张至南纬65°以南的罗斯海。冰缘会稍稍向北移动到南纬62°，西经150°附近，然后海冰会最终从南极半岛往北挺进并在吞并南设德岛和南奥克尼群岛（South Orkney Islands）前再次向南蔓延至南纬66°附近的阿蒙森海海域，循环周期至此结束。因此，我们在南极考察的那个冬季海冰纬度变化的最大值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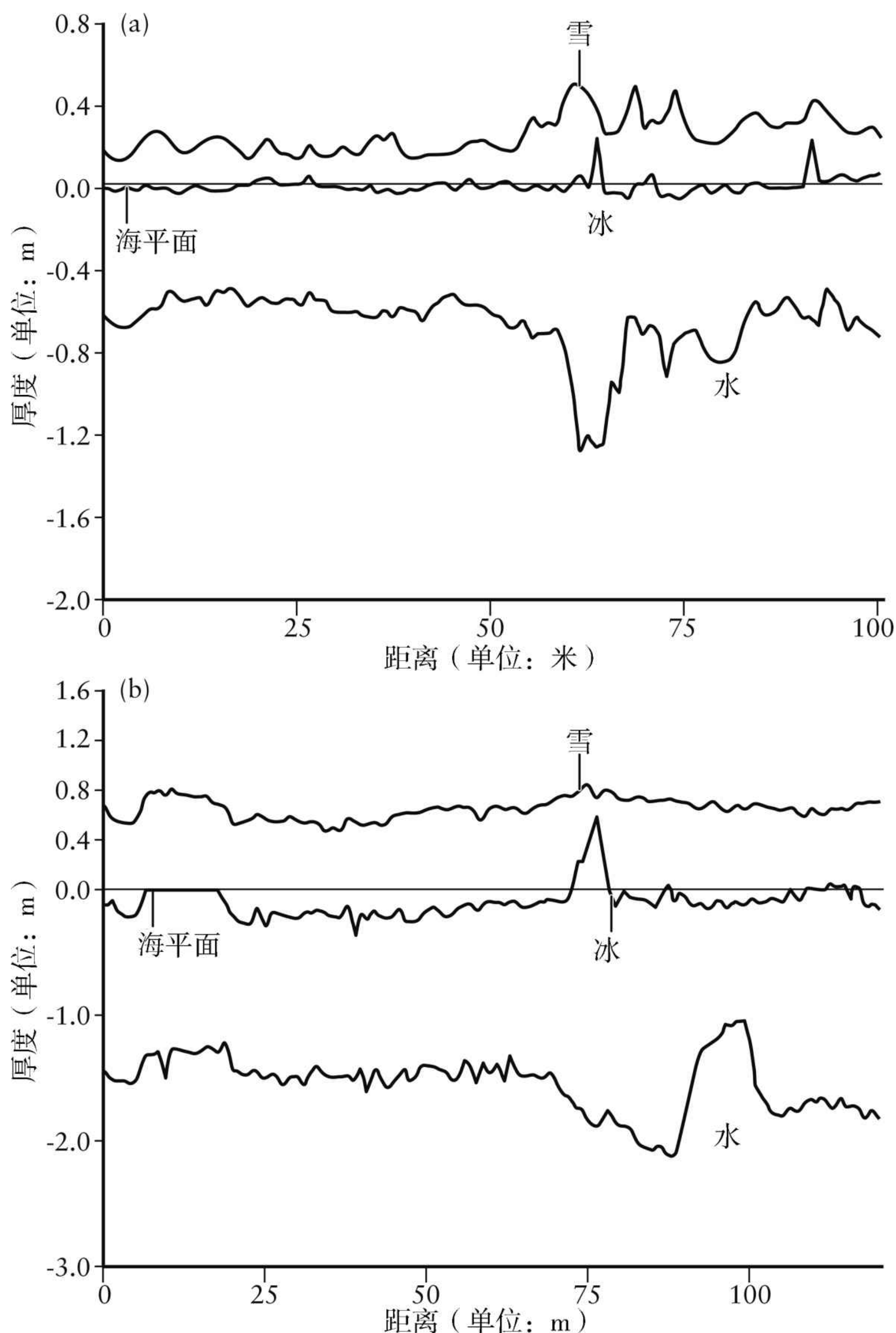


图12.2：冬季海冰的剖面厚度显示出韦德尔海西部区域中单年冰（a）和多年冰（b）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说明了厚重的积雪盖会将冰面压低至海面之下，对多年冰而言尤其如此。

南极海冰北向移动的极限位于南极绕极流边缘处，该处水面温度会

在极地锋面或南极辐合带的影响下急剧变化。此处其余的一切也都在变化之中——搭船由此往南，你依次会看见冰山、企鹅、信天翁、贼鸥等种类丰富的南极鸟类以及大量浮游生物（比如著名的磷虾）和捕食它们的鲸鱼。海洋逐渐变绿，这里的空气也出现了生命的气息。然而，海洋中的各种现象（风暴和涡流等）和海面温度都会让海冰消散，因此海冰绝少抵达这种自然的海洋边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杰伊·沃利（Jay Zwally）及其同事[11]证明了，冰缘线在冬季的扩张与低于海水冻结温度（-1.8℃）的海面空气温度的推进密切相关，且与空气温度极值的温度线（或等温线）一致。这个年度周期的大小（定义为主要冰缘线南部的海域）可被卫星，特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被动微波卫星（即SMMR, SSM/I, SSMIS）轻易测量，插图12.3显示了1978年到2011年间马里兰格林贝特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研究小组得出的结果。[12]平均而言，这段时间中海冰面积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850万平方公里和310万平方公里。

如插图12.3所示，南极冬季冰面面积最大值整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每年增加约1.71万平方公里。然而，这种趋势掩盖了大量的区域和季节性变化。罗斯海区域的海冰面积增长最为迅速（1.37万平方公里每年），印度洋海域和韦德尔海海域的海冰面积增长则较缓慢，而南极洲西部的别林斯高晋海（Bellingshausen）或阿蒙森海海冰面积则每年消退8200平方公里。华盛顿大学的埃里克·斯泰格（Eric Steig）发现，太平洋位于南极洲大陆的部分（从南极半岛到罗斯海）的空气温度上升速度是南极大陆其余地区的两倍，[13]而人们分析了伯德科考站（经度为西经120°）的温度记录后得出如下结论：1958年到2010年间，这部分海域温度上升了1.6℃到3.2℃，这是个很大的增幅。[14]南极洲太平洋部分（南极洲西部）的迅速升温也反映在1979年到2010年间海冰覆盖时间（给定地点每年被冰体覆盖的天数）每年减少1到3天的趋势上，[15]而大西洋-印度洋海域的海冰覆盖时间则呈缓慢上涨趋势。冰盖反映的信息很明确：东南极洲的冰盖覆盖面积正在缓慢增长，而西南极洲狭窄的冰盖正以更快的速度减损，其整体效果则是冰盖面积上涨十分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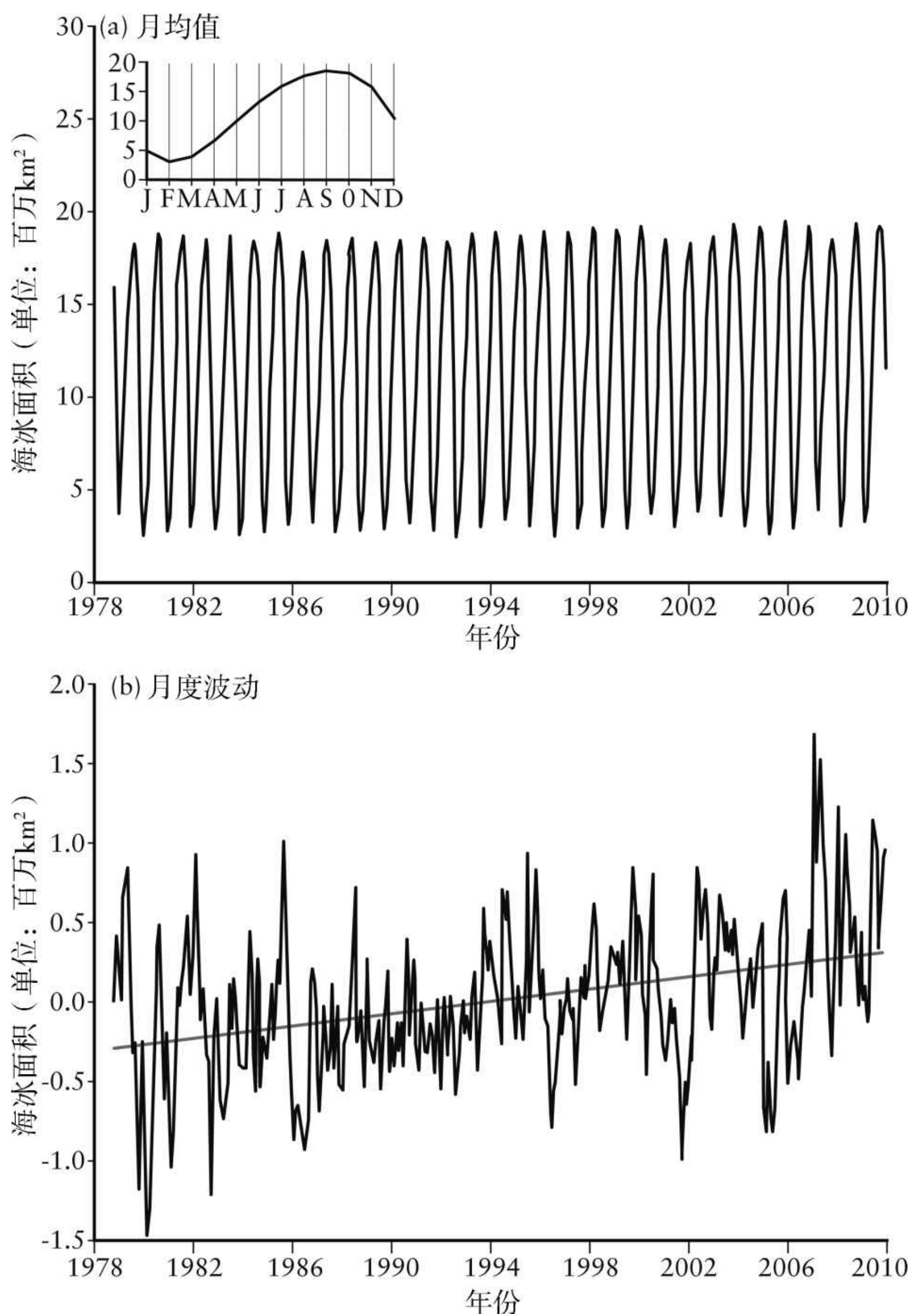


图12.3：（a）1978年11月到2006年12月南半球海冰面积月均值。图中显示了平均年度周期。（b）海冰面积的月度波动。

其他更详细的冰盖变化则与局部地形因素相关，这一点在春季或夏季表现得更为明显。12月，东经0°～20°的恩德比地区会形成一个大型海湾并与11月开放的海冰集中程度更低的沿海区域连成一片。这一区域类

似冬季某种神奇冰间湖的微缩版本，1974年—1976年期间，人们曾在这一区域的浮冰块中间发现了这种冰间湖，[16]自那以后便再没见过，至少没发现其具有某种完全开放水域的特征。这片位于毛德海隆（Maud Rise，即一处减少了海水深度的海中高原）区域的冰间湖名为韦德尔海冰间湖。“FS极星号”考察船于1986年冬季考察过该海域，人们发现这个区域隶属于南极辐散带（Antarctic Divergence），该处的深层温暖海水会向上翻涌进而让此水域表层在冬季具备足够的热量而无法形成海冰。[17]但1976年以来，这种情况就没再发生，因此，考虑到冬季的冰盖，该区域大致平衡在不稳定的边缘。这一地区1986年冬季的冰盖很集中但很薄。[18]12月的冰盖分布也显示罗斯海不断出现的开放水域形成了所谓的北部带有冰盖的罗斯海冰间湖。11月和12月间，南极洲东部沿海区域就会出现一系列小型沿海冰间湖，它们多数由离岸（下沉）风在海冰形成之时便将其吹离海岸而形成。

海冰正在起什么变化？

冬季大部分浮冰块最初都是很薄的饼状冰。考虑到南极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正在变暖，那么南极冰面范围为何却按照上述区域模式不降反升？

华盛顿大学的张金伦（音）对极地冰盖（即整个南极的冰盖）提出了环极地扩张的简单解释。他认为这是南极大陆附近风力增强的结果。[19]其中的关键则是环极地西风带，也称极地涡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卫星便已经能够测量这些风的强度，而测得的风力强度一直在稳步增加。这里主要盛行西风，平均风力也较大。让我们以一个典型的浮冰块为例。这样一块浮冰会因其表面的风力而往东漂移，但在这一过程中，另外一股力量又会使其往左转向，即让该浮冰块向北移动。这股力就是地球转动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它在北半球的作用方向为右，在南半球为左，在赤道附近则不起作用。它起作用的原因则在于我们总是相对于地球表面某个固定的参考系（比如南-北，东-西轴线）而对移动物体进行测量，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旋转实际上是一个加速的参考系，因此，其上移动的物体并不走直线而会向左或右偏转。

地转偏向力与物体相对于地表的速度呈正比，因此随着风速的增加，作用在浮冰上的地转偏向力也会增加，浮冰也会更快地向北移动，尽管它主要向东漂移。因此，尽管浮冰块会到达空气温度能让其融化的区域，其向北的速度也会将其带到比这更远的地方。因此，南极浮冰块整个就像风力驱动的旋转木马，它会将海冰向北扔到更为温暖的水域。然而，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首先，这种机制可能会增加海冰的范围（extent）但不一定会增加其面积（area），因为它仅对已经存在的海冰的动力机制起作用。我们可从海冰在冬季向北漂移进而让空出的开阔水域迅速冻结的角度来解释南极冰面的增加现象。其次，这种机制只会暂时导致冰面增加，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最终会战胜增加的风速，进而海冰将无法抵达纬度更低的水域。然而，这种机制毕竟基于简洁的物理学，而且人们也的确观察到了环极地风速的增加。

我自己的解释则基于前述的碎冰晶-饼状冰循环及其与这些增强的环极地风的相互作用机制。更强的风吹向南极会引起更大更长的海浪。更长的海浪能进一步穿透边缘冰区，并且还能让碎冰晶-饼状冰远离冰缘区。我们知道，碎冰晶-饼状冰的生长速度远快于连续海冰，其原因在于大气与海水之间并未被隔断，因此海洋中的热量能够轻易地散发到大气中进而让海冰更快地生长。难道南极冰面的增加仅仅因为风力更大、海浪更猛的时期出现了海冰生长更迅速、范围更大的碎冰晶-饼状冰区域？

南极对其他地区变化的反应

为了解释海冰变化趋势的区域性质，我们需要一个将其他地区气候强迫纳入考虑的模型，这些强迫会对南极海冰造成局部影响。

尽管其影响是长期的，但已经开始减少的南极冰盖本身（尽管比格陵兰冰盖的减少速度慢很多）就是明显需要被纳入考虑的因素。[20]根据2011年5月于布拉格举办的欧洲航天局宜居星球会议（Living Planet Conference）的估计，目前南极冰量每年净损失840亿吨，而格陵兰地区每年的冰量损失至少为3000亿吨。人们预计，如果南极冰量损失速度增加，菲尔希纳-隆尼（Filchner-Ronne）和罗斯冰架都将解体，南极冰川（比如跨南极山脉上的冰川）将径直流入大海。这会迅速加剧南极冰量损失的速度，全球海平面也会随之加速上升，同时，南极海冰（如果彼时还存在的话）也会受到影响。据估计，这些变化发生的周期并不会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此外，派恩艾兰湾（Pine Island Bay）周围的冰架和东南极洲部分区域的冰架也可能解体，后者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进而可能成为沿海冰川消退的“闸门”。[21]

至于那些决定了目前南极海冰扩张或撤退之局部变化的更直接影响，我们需要寻找低纬度海洋和大气甚至与北半球纬度区域以及北极之间的远程联系（teleconnections）才能确定。可供选择的联系机制有很多。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雷吉·彼得森（Reg Peterson）和沃伦·怀特（Warren White）[22]的建议是南极环极地海浪，这个南极环极地洋流处的海浪系统会缓慢向东流动（尽管与洋流相比仍然是向西流动），进而可能与赤道地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系统相互作用。厄尔尼诺现象（圣婴洋流）是厄瓜多尔和秘鲁沿海12月下旬产生的强度可变的温暖大洋洋流，它有时候会导致灾难性天气，但现在整个南太平洋范围内的海风和洋流异常现象都被冠以此名。最近，相关的研究工作则关注南半球环状模式（SAM），[23]这是高纬度大气环流中的另一种复杂变化模式。一些人提出，[24]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年份会导致韦德尔海出现更多海冰，而太平洋海域的海冰则相应减少，拉尼娜气象年则与此相反（La Niña，它指的是南美洲西海岸海洋表面温度的降低现象，其发生周期为4～12年，影响范围包括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天气模式；其表现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但就人们最近在太平洋中部发现的厄尔尼诺事件而言，其内部各种天气现象的联系十分复杂。[25]北极变暖和低纬度极端天气现象可能因急流的紊乱而产生大范围的远程纬度联系，[26]进一步，这种关联还可能与热带和南半球天气模式有关。

对南极和北极海冰不同表现的完整解释也必然建立在北极、南极海冰的根本差异之上。南极变暖的速度一定比北极慢，因为该区域面积更大的海域具备更高的热容量，而南极环极地洋流又将其与北部更暖的海域隔绝开来。南极海冰极限范围也与北极有所不同：夏季，海冰退回南极大陆，剩下大量的冰体就会蜿蜒地形成韦德尔海这样的海湾，而在冬季，海冰的范围则受热力学支配并取决于开放海域的环境。而北极的情况恰恰相反：其冬季的极限范围由周围的大陆决定，而在夏季，海冰会按照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撤退至海洋范围内。反射率反馈对南极的重要性也不及北极，因为南极最强日照（太阳辐射）出现的12月底也正是南极海冰几乎退至南极大陆的时候，而北极海冰在太阳辐射最大的时候（6月）仍然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退至其9月的最小值，因此辐射强迫容易发生变化。

关于变暖速度的最后一点则是，北极快速变暖本身产生的反馈会导致其进一步加速变暖。除了海冰反射率反馈之外，相关反馈还包括陆地雪线后撤造成的反射率反馈以及北极无冰大陆架释放的甲烷可能造成的十分严重的额外变暖效应。[27]雪线和甲烷反馈不可能发生在南极——因为该区域缺乏浅层大陆架和陆地积雪覆盖的固定区域。北极放大效应和更强的北极反馈意味着，无论南极海冰与温带海洋如何相互影响，未来几十年中的情况总是北极比南极更能决定全球变暖的速度。北极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竞赛的湮没之路上的老司机，南极则是被动的拖车。

注释：

[1] See website climate. nasa. gov/news/.

[2] Rignot, E., J. L. Bamber, M. R. van den Broeke, C. Davis, Y. Li, W. J. van de Berg and E. van Meijgaard （2008）, Recent Antarctic ice mass loss from radar interferometry and regional climate modelling. Nature Geoscience, 1（2）, 106-10.

[3] Wadhams, P., M. A. Lange and S. F. Ackley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2（C13）, 14535-52; Lange, M. A., S. F. Ackley, P. Wadhams, G. S. Dieckmann and H. Eicken（1989）, Development of sea ice in the Weddell Sea Antarctica. Annals of Glaciology, 12, 92-6.

[4] Wadhams et al.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5] Wadhams et al.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6] Wadhams, P. and D. R. Crane（1991）, SPRI participation in the Winter Weddell Gyre Study 1989. Polar Record, 27（160）, 29-38.

[7] Ackley, S. F., V. I. Lytle, B. Elder and D. Bell（1992）, Sea-ice investigations on Ice Station Weddell. I: ice dynamics. Antarctic Journal of the US, 27, 111-13.

[8] Hellmer, H. H., M. Schr□der, C. Haas, G. S. Dieckmann and M. Spindler（2008）, Ice Station Polarstern（ISPOL）. Deep-Sea Research II, 55, 8-9.

[9] Massom, R. A., H. Eicken, C. Haas, M. O. Jeffries, M. R. Drinkwater, M. Sturm, A. P. Worby, X. Wu, V. 1. Lytle, S. Ushio, K. Morris, P. A. Reid, S. G. Warren and I. Allison（2001）, Snow on Antarctic sea ice. Reviews of Geophysics, 39, 413-45; Eicken, H., M. A. Lange, H.-W. Hubberten and P. Wadhams（1994）,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now and meteoric ice in the Weddell Se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mass balance of sea ice. Annals of Geophysics, 12, 80-93.

[10] Parkinson, C. L. and D. J. Cavalieri (2012) , Antarctic sea ice variability and trends, 1979-2010, The Cryosphere, 6, 871-80, doi:10. 5194/tc-6-871-2012.

[11] Zwally, H. J., J. C. Comiso, C. L. Parkinson, W. J. Campbell, F. D. Carsey and P. Gloersen (1983) , Antarctic Sea Ice 1973-1976: Satellite Passive-Microwave Obsewations. Washington, DC: NASA, Rept. SP-459.

[12] Bromwich, D. H., J. P. Nicolas, A. J. Monaghan, M. A. Lazzara, L. M. Keller, G. A. Weidne and A. B. Wilson (2013) , Central West Antarctica among the most rapidly warming regions on Earth. Southern ocean winter mixed layer. Nature Geoscience , 6, 139-45.

[13] Steig, E. J., D. P. Schneider, S. D. Rutherford, M. E. Mann, J. C. Comiso and D. T. Shindell (2009) , Warming of the Antarctic ice-sheet surface since the 1957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Nature, 457, 459-62.

[14] Bromwich et al. (2013) , Central West Antarctica among the most rapidly warming regions on Earth.

[15] Maksym, T., S. E. Stammerjohn, S. Ackley and R. Massom (2012) , Antarctic sea ice-a polaropposite? Oceanography, 25, 140-51.

[16] Zwally, H. J. and P. Gloersen (1977) , Passive microwave images of the polar regions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Polar Record, 18, 431-50; Steig et al. (2009) , Warming of the Antarctic ice-sheet surface.

[17] Bagriantsev, N. V., A. L. Gordon and B. A. Huber (1989) , Weddell Gyre-temperature maximum stratum.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4, 8331-4; Gordon, A. L. and B. A. Huber (1990) , Southern ocean winter mixed layer.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5, 11655-72.

[18] www. climate. nasa. gov/news/.

[19] Zhang, J. (2014) , Modeling the impact of wind intensification on Antarctic sea ice volume. Journal of Climate, 27, 202-14.

[20] Jacobs, S., A. Jenkins, H. Hellmer, C. Giulivi, F. Nitsche, B. Huber and R. Guerrero (2012) , The Amundsen Sea and the Antarctic ice sheet. Oceanography, 25, 154-63.

[21] Mengel, M. and A. Levemann (2014) , Ice plug prevents irreversible discharge from East Antarctica. Nature Climate Change, 4, 451-5, doi:10. 1038.

[22] Peterson, R. G. and W. B. White (1998) , Slow oceanic teleconnections linking the Antarctic Circumpolar Wave with the tropical El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3, 24573-83.

[23] Comiso J. C., R. Kwok, S. Martin and A. L. Gordon (2011) , Variability and trends in sea ice extent and ice production in the Ross Se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6, C04021, doi:10. 1029/2010JC006391.

[24] Rind, D., M. Chandler, J. Lerner, D. G. Martinson and X. Yuan (2001) , Climate response to basin-specific changes in latitudinal temperature gradi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ea ice variabilit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6, 20161-73.

[25] Wilson, A. B., D. H. Bromwich, K. M. Hines and S.-H. Wang (2014) , El Nino flavors and their simulated impacts on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the high-southern latitudes. Journal of Climate, 27, 8934-55, doi:10. 1175/JCLI-D-14-00296. 1.

[26] Francis, J. A. and S. J. Vavrus (2012) , Evidence linking Arctic amplific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in mid-latitu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L0680r, doi:. 10. 1029/2012GL051000.

[27] Whiteman, G., C. Hope and P. Wadhams (2013) , Vast costs of Arctic change. Nature, 499, 401-3.



第十三章

地球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极地的环境变化，现在是时候将地球作为整体看待并考虑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了。

首先，温室气体浓度增长速度并未放缓。尽管政客们说了些空洞的好话，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减少自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中国和印度经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燃料的压倒性渴求仍会不断推动二氧化碳浓度史无前例地增长。鉴于目前404ppm的二氧化碳浓度水平（2016年年初）已远远超过了可造成破坏性气候变化的程度，这一浓度持续加速上升而没有一丝下降的事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温室气体浓度甚至并未开始降低。我们应牢记，任何形式的二氧化碳带有潜在的辐射强迫。无论二氧化碳在过去是被海洋还是植物所吸收，但现在已被人们开采出来并排入了气候系统之中，它们现在或将来都可能释放辐射强迫进而让地球升温。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见，甲烷则更令人忧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气中甲烷水平比较平稳时，人们便放心地认为这是某些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但并非如此，甲烷浓度于2008年再度增长，目前已接近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了。重要的是，甲烷浓度恢复增长与夏季海冰的大面积撤退同步，并且还与北极大陆架海底的变暖有关；北极近海发生的变化与全球甲烷水平之间的关联已越来越明确，这意味着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其次，每一项行星指标看起来都是负面的。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0亿增至97亿，[1]2100年则为112亿。[2]鉴于我们目前已经在经历的影响世界产粮区的大规模气候破坏，很难想象如此规模的人口应该如何养活。气候变暖正在减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耕地面积，而从理论上讲，极端天气事件也让我们无法提高高纬度地区的粮食产量。我们还正在破坏森林。我们也在耗尽水资源。而必须精耕细作、高耗能以养活如此规模人口的农业也对关键的工业原材料很敏感。例如，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就提醒人们注意磷日益短缺的状况，它是生产人造肥料的关键原料。联合国的2100年人口预测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各大洲的差异极大：多数大洲的人口增幅很大但仍能维持其生存，而欧洲人口则呈下降趋势。非洲人口数量则会翻两番，从1.1亿增至4.4亿。以下是相关数据：

表13.1.各大洲目前和预计的人口数（单位：百万人）

	2015 年	2100 年
北美洲	358	500
南美洲	634	721
欧洲	738	646
亚洲	4393	4889
大洋洲	39	71
非洲	1186	4387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远景展望》，2015年修订。联合国人口司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既然非洲现在都不能自给自足，尤其在全球变暖会扰乱粮食供应并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情况下，它又养得活其目前四倍规模的人口吗？答案是否定的。世界其他地区将不得不养活非洲人口。鉴于世界其他地区可能陷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人们可以预见到彼时同情心和援助的缺位；结果，大规模的饥荒将无可避免。世界将对自己自私的证据作何反应？我为人性之恶的程度感到担忧，也对人类设法为自己无所作为寻找借口感到忧虑。

人口问题不仅是粮食问题之一种。每个人都是碳排放者，因此，人口越多，降低碳排放总量的问题就会越困难。人人都需要有人为其栽种所需的粮食，因此，我们亟需更多地植树造林以减少二氧化碳水平时却看到世界上大量森林遭到破坏。人人都要喝水，淡水资源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海水淡化技术，但这本身也是能量密集的碳排放过程。人们难以否认这个等式：更多的人＝更多的碳排放。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系统分析师们（比如《增长的极限》［1972年］的作者们）关注的人口爆炸了。[3]这个问题并未消除，也尚未得到解决，除了中国一度激烈的解决方式以外。

经济上，世界摇摇欲坠的金融结构仍需要持续的增长以保持稳定，银行系统则越发明显地寄生在整个社会之上。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像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实践的那样），人们还无法容忍一个持续均衡的社会。众人皆知，每件事上的指数式增长都无法持续，其结果只能是灾难，但每个财政部长都设法鼓励经济增长进而让该国摆脱他自己或其前辈造成的财务困境，而从未想过将这种增长引导至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上。

最悲伤之事则是社会上个体的冷漠。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反对种族主义和越战——这表明他们真的关心世界的境况。而在目前这种风险更高、需求更急迫的时候，他们却消极被动了。所有年龄段的选民、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缺乏兴趣，而仅关注其自身的财富和安宁。只要我们能消费奢侈品、开车出行，并在未来几年内还可以飞到假日海滩消遣，我们就很愿意对未来确凿无疑的灾难、贫困、战争、犯罪以及最终的食物和资源枯竭熟视无睹，所有这些都与迅速变化的气候系统造成的压力相关。年轻人充耳不闻也不奋起行动，老人也不予以引导或教导。

如果我们咨询米考伯（Micawber）先生[*]，他会说，有些事情最后总能把我们从自己的烂摊子中拯救出来。但那会是什么事呢？以下是一些不太可能的情况：

●上帝可能会决心第二次降临（这是部分美国人严肃支持但与气候变化毫无关系的理由）。

●不明飞行物可能为真，它们自1947年以来对我们的持续兴趣意味着它们可能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接管地球。

●人们发明了可提供无限清洁能源的神奇设备。这可能基于新的物理学，比如冷融合或已被认可的物理学，比如一个可行的热融合系统，人们总认为这在20年后就会实现。

相反：

●我们可能会被一个巨大的小行星击中，所有生命随之消失。

●遥远非洲的森林区域可能滋生横扫地球的新病毒，进而消灭所有或大部分人类。

●我们可能陷入大规模的核战争。

在我看来，等待某事发生的策略可能产生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和行动自救。

我们能做什么？

减排

环保机构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强调，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比如，我们可以回收自己的垃圾，开更小的车，多吃蔬菜少吃肉等。所有这些补救措施以及逐渐培养的全球公民美德感，都被认为是与我们自己的欲求相抵触的地球村的需要。但如果英国所有人都将一切可能的节能措施应用于正常的生活，那么，能源使用会减少约20%（正如已有的尝试那样）。这的确有用，但正如英国政府能源与气候首席顾问、教授戴维·麦凯爵士（Sir David MacKay）曾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贡献，我们能达到的成就也只是一星半点。”[4]

毫无疑问，为了超越这一点成就，我们必须在能源生产方面做出政治决定，这意味着政府必须表现出政治勇气。当我们考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商议历史时，会发现早期《京都议定书》（1997年）的乐观情绪在哥本哈根（2009年）和德班（2011年）会议中遭遇了严重失败。可悲的是，典型的政客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第一反应只是引用限于本世纪甚至更低的预测，并假设一旦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图超过了2100年的限度，气候变化就会停止。英国本国的前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大臣欧文·帕特森（Owen Paterson）就在2013年9月29日很自满地这样说道：

> 我认为，这份最新报告的安慰人心之处在于，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十分适度。报告中预计的一半已经发生。他们谈到1～2.5℃的升温幅度。[5]

首先，“他们”当然并非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而是指明显依靠一己之见从事无知报道的报纸。1～2.5℃的升温幅度实际上是到2050年的预测值。“报告预计的一半已经发生了”表明，他认为气候变化会在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结束时停止而不会继续下去。当然，“安慰”一词则是真正的赠品；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能侥幸得脱。

典型的政客的第二个反应则是，我们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减少碳排放（通常是“到2032年减少30%”或类似的数字），进而防止气候变化的失控。这让目前当政的政客干净地撇清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已经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具有飞轮效应——二氧化碳分子在气候系统中存在的时间超过百年，而整个世界还处在已有二氧化碳的潜在变暖的实现过程之中（可能其潜能仅“实现”了一半）。因此，降低我们未来的碳排放远不如降低目前的碳排放有用，而降低目前的碳排放则不及实际降低碳水平有用。最有用的事情则是通过碳捕获、储存或其他有待发明的技术切实地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通过完全使用核电的方式停止排放二氧化碳，但大众的观念又让这无法实现；或者使用技术手段阻断变暖进程，即通过地质工程为地球打上补丁，这能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此外别无办法能救我们于严重的后果之中，尽管二氧化碳的减排仍属绝对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绿色”环保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反对核能和地球工程的行为则对人类毫无益处。

碳的棘轮效应与人口的棘轮效应十分类似。非常粗浅地说，间冰期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自然”水平为280ppm，而现在的水平为404ppm，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的行为使其浓度增加超过了120ppm。假设我们突然完全停止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水平会以多快的速度降低？因为加入到地球能源系统中的二氧化碳至少会存在100年，我们可能会期待每年最多有1%的二氧化碳从这一系统中逃逸，因此，二氧化碳水平在其停止排放的第一年仅会降低1.2ppm。而降至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安全”的350ppm则需要45年时间。类似地，世界人口规模若保持在70亿的水平，且平均寿命为70年，若人类完全停止繁衍，人口规模将由于自然衰退而在10年内减少至60亿。因此，如果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生产危机进而降低了我们养活10亿人口的能力，那么，仅凭生育控制我们还无法很快适应粮食生产的这种新的低水平状况——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造成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道路前进，最终，地球上所有的碳氢化合物都会被提取并用于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割舍自己对石油的热爱。但到时候，全球变暖的极端程度会让生活难以忍受，如果不是过不下去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曼哈顿计划来清理我们的大气，这需要全世界人民史无前例的努力才行，因为我们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努力，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将变得十分明显——20到30年内，世界会变成比现在糟糕许多的迥异世界。人类永远不会再经历2007年经济危机结束的时代了。人们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并努力生活在挪威或加拿大等人口较少、资源丰富的寒冷国家。这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现在是否太晚，以至于我们无法以减少或停止碳排放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球，因为我们已放任机会溜走而无法及时展开行动以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水平碳排放“内置”其中的社会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仅有两种可能性：使用技术手段来降低变暖的速度，同时允许二氧化碳水

平持续增加；或者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切实地将二氧化碳排出大气。

皇家学会在其2009年的“地球工程报告”[6]中界定了这两种方法：

——太阳辐射管理法（SRM）试图让地球吸收更少的辐射以抵消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影响。

——二氧化碳清除法（CDR）则通过从大气中除去温室气体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源。

让我们先考察太阳辐射管理，“补丁”法即在持续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找到办法降低地球变暖的速度。这些办法通常被归类为地球工程。

地球工程

寻找气候危机的永久性解决方案需要技术人员的技能才能让我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人类服务领域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他们的才能。地球工程包括一系列人为降低地面空气温度的技术，无论是直接挡住太阳光线还是增加行星的反射率以改变辐射平衡。对北极而言，太阳辐射管理和二氧化碳清除的目标必须是恢复我们已经失去的海冰，进而阻止离岸永久冻土的损失，并减少甲烷大规模释放的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减缓变暖的速度，而且要扭转这一趋势。让我们继续考察人们对此提出的不同想法以及它们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政治上面临的困难。

太阳辐射管理就是快速“打补丁”，它能以适中的成本快速实施。这种方法并不影响二氧化碳水平，因此像海洋酸化等主要取决于二氧化碳浓度而非温度高低的现象则会继续快速发展，它会造成珊瑚礁漂白、贝类生存困难等严重后果，事实上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太阳辐射管理法并不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从而让我们摆脱困境。

目前，人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太阳辐射管理办法。1990年，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提议向低空云层注入非常精细的水粒子喷雾进而将其“增白”。[7]这样可以增加云层的反射率，并让它们反射更多的太阳辐射。爱丁堡大学的杰出海洋工程师斯蒂芬·索尔特（Stephen Salter）设计了相应的注射系统。[8]其他人则提议用高空气球或喷气式飞机向云层注射固体颗粒，这样做会形成反射入射辐射的气溶胶。

海洋云层增亮（MCB）则涉及增加较薄较低云层（即覆盖了世界海洋表面1/4范围的层积云）顶部反射回太空的阳光总量并由此产生冷却效果。如果我们能将反射率提高3%，估计相应的冷却作用就会抵消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我们需要将海水滴液喷洒到云中才能做到这一点。索尔特设想出一种新型喷雾滴液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设计了一个无人驾驶的风力驱动船，后者可被远程引导至种云作业（cloud seeding）最有利的地方（彩色插图30）。这种船只可使用更有效的动力技术——弗莱特纳转子（Flettner rotors）。这些安装在甲板上的转动的垂直圆柱体是根据其德国发明者安东·弗莱特纳（Anton

Flettner）而命名，它会利用马格努斯效应（Magnus effect），由此，旋转的垂直圆柱体在其两侧之间会形成压力差进而形成一个与风向成直角的力。福莱特纳转子在20世纪20年代被用于船舶，今天它又作为减少海上燃油消耗的方法而被重新使用。转筒风力船装有从顶部喷洒海水水滴到云底的喷洒系统。喷洒和通信所需的电力则来由船体内置的洋流涡轮产生。喷洒系统设计的关键是能产生直径为微米（百万分之一米）的颗粒的精细喷嘴，如此，水滴蒸发到大气中时就会产生直径合适的微小盐粒（一纳米左右）进而增亮云层。这一过程利用了所谓的图米效应（Twomey effect），即大量微小颗粒组成的云层比较大微粒组成的同质量云层明亮。船只上已经观察到了这种效应，高空可见与明亮云层的凝迹同样的云层（彩色插图31）。全世界总共需要几百艘这样的船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其总体成本虽然很高，但与全球变暖给地球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却很少——前者一年耗费几十亿美元，后者为上万亿美元。该计划的一个优势是它的生态友好性，其唯一需要的原材料是海水。卫星测量和计算机模型可以控制冷却量，人们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关闭系统，数天之内又可恢复正常。

云层增亮系统运行之前，人们需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技术，并在一定区域内进行试验以比较我们播种的云层和临近非播种云层的反射率差异。我们还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以确定是否可能存在严重或有害的气象或气候影响（比如局部缺水地区降水量减少等），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喷洒以实现全球影响，或者，如果特别想达到某种局部效果，我们是否可在特定地点或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段从事喷洒作业？冷却北极这种急迫的问题也在考虑之列。如果夏季北极大陆架上开阔水域导致了海底永久冻土的升温以及潜在的甲烷释放灾难，那么，我们能够恢复夏季海冰而不必冷却整个地球，进而避免这些灾难吗？

2014年，约翰·莱瑟姆及其同事解决了这类区域性问题。[9]我们发现的确有可能集中冷却北极从而增加海冰范围，特别是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中的海冰范围，尽管可能会出现补偿问题，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降雨量的减少等。显然，人们对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在一项较早的研究中，人们估计喷洒全球海洋云层的70%就能消除二氧化碳倍增导致的变暖效应，同时还能让海冰停止减少。[10]云层增亮基本上减少了海面的辐射，因此，如果针对具体区域，它也能有助于降低飓风的强度（这依赖于海面温度）和珊瑚礁的白化率（这取决于水温和海洋酸度）。最后，南极海冰也可能受到影响：2014年的研究表明，全球种云会增加南极海冰面积，同时还能从源头上冷却目前可能导致思韦茨冰川和派恩艾兰冰川坍塌的底层洋流，这种情况的突然发生则可能导致全球海平面升高3米的灾难性后果。[11]因此，海洋云层增亮不仅能缓解全球变暖进程，而且也能缓解局部威胁，特别是极地地区面临的威胁。

斯蒂芬·索尔特制定的发展计划估计，全面有效运营云层增亮系统将耗资7300万英镑研发费用，这对常规科学预算算是很大一笔钱了，但对紧迫的全球需求而言却是小意思。如果英国认真面对全球变化，这将是它能执其牛耳的领域。

气溶胶注射（Aerosol injection）则是人们提出的又一个大规模地球工程方法。[12]英国政府近期资助的名为平流层微粒注入气候工程（SPICE）的项目就研究了这种方法的一些影响，尽管这项资助实际上在科学家们做出相关系统之前就撤销了。这个想法就是将大量微粒子气溶胶注射在高空平流层中，以便它们能直接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注射过程必须是连续的，因为气溶胶会逐渐脱离高空大气层。

人们最初是想通过释放所谓的前导气体二氧化硫（SO_2）或者直接释放硫酸（H_2SO_4）的方式在平流层产生硫酸盐气溶胶云层。如果二氧化硫被释放出去，它就会在上层大气中氧化并溶于水中，然后在远离释放点的雨水中形成硫酸。这种办法并不能控制形成微粒的大小，但相关气体的释放却很容易。如果直接释放硫酸，则气溶胶微粒会很快形成，原则上我们可以控制微粒大小以优化气候效应。如果将气溶胶注入较低的平流层，则它保持在空中的时间仅为数周或数月，因为相应区域的空气主要向下沉，所以为了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我们需要向高空输送气溶胶。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建议的输送系统包括炮弹、高空飞机或高空气球，它们要么是来自地上装有前导气体（precursor gas）的垂直管道，要么自由上升直到爆炸。最便宜的输送系统似乎是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比如美国的KC-135或者KC-10军用空中加油机，仅仅9架较大的KC-10飞机每天飞行3次，每年就能运输100万吨二氧化硫。16英寸炮弹的成本与此相仿，大量填充有硫化氢（H_2S，另一种可能的前导气体）的小气球也会被注入氢气以产生浮力，这些气球在到达平流层时会发生爆炸；每年需要3.7万个商业气球。这些输送系统比海洋云层增亮办法更简单，但它涉及的数量很大，化学品也必须悬浮在高空大气中。

我们知道，高空微粒确实会影响气候——例如，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的爆发就在之后的三年内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明显的降温现象。根据这一想法的早期支持者保罗·克鲁岑的说法，每年250～500亿美元的代价就能完全抵消人类增排的二氧化碳造成的影响。[13]然而，人们已经确定了许多潜在的问题。降雨量会减少，这可能对亚洲和非洲的季风造成严重影响；臭氧破坏的速度可能加快，这会导致臭氧层空洞的再度增长；人们难以预计降温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因此，一些国家温度下降可能不及别的国家，有的则会更加温暖等等。这一切过后，将大量不可否认有毒的化学物质注入高空大气的行为还是会令人不安；两相比较，海洋云层增亮法喷洒的海水微粒听起来真的不错。无论如何，罗格斯大学一位名叫阿兰·罗伯克（Alan Robock）的溶胶注射法的坚决反对者最近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于2016年参与撰写的一篇论文显示，[14]气溶胶云不仅可以减少到达地面的直接辐射，而且还会增强散射辐射，这一过程与冷却过程结合就会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速率。植物生长的加速本身也会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这是个意想不到的额外好处。

人们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地球工程技术。一个是空间反射器，它是轨道上很大的镜子或镜子系统，用以将大量的太阳光反射回太空。然而，除了巨大的成本，尚无人提出可在轨道上组装这种装置的可行计

划。

碳捕获技术

我已经解释了为何碳排放不太可能降低，至少不会很快降低，但如果碳排放降低得太慢，大气中留下的过量二氧化碳仍会在未来持续推动全球变暖。地球工程可以抵消二氧化碳和甲烷对大气的影响，但代价则是任由二氧化碳继续酸化海水，这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并因此摧毁全球生态系统，因为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积的72%）。我的悲观结论是，到最后（这个最后可能很快到来），如果我们打算战胜全球变暖并拯救文明，就必须找到将二氧化碳从我们的行星系统中排出的办法。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整个问题。事实上，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我们能否从气候变化的失控边缘拯救自身，并为人类保存持续生存的基础？还是我们必须与加速发生的气候变化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到头来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再宜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一直都最为可耻。在其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识到代表浓度路径2.6对于宜居气候而言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已经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代表浓度路径”对辐射强迫的处理掩盖了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的实际条件（见第七章）。但结果却很悖谬，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只是一笔带过地谈到：拯救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按照代表浓度路径2.6行事，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切实地清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达到“可接受”的气候变暖极限下二氧化碳的浓度值（421ppm）。十年之内，我们一定会不知不觉地越过这一界限，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此后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将它切实地从大气中清除出去。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知道这一点，但却忽略了我们应该如何清除二氧化碳的问题。清除二氧化碳的进一步重要步骤便是这种办法的大规模应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我们开始尝试大规模清除二氧化碳之前，国际社会必须研究这一问题；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再次忽略了这个问题。

最近，两种可能的技术被认为很有前景。[15]它们就是具备碳捕获和碳储存功能的生物能源技术（BECCS）和植树造林技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涉及的事项包括：种植草木等生物能作物；在发电站燃烧它们；从所得的废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将这些气体压缩成液体并储存在地下。造林（植树）也依赖光合作用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储存环节则在木材和土壤中自然而然地发生。如果我们试图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2℃以内，则需要在本世纪末之前清除6000亿吨二氧化碳。若使用碳捕获和储存生物能源技术，我们则需要在4.3亿~5.8亿公顷土地上专门种植那些能清除二氧化碳的作物——这一面积约占目前全球耕地面积的1/3，或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这显然行不通，除非我们能将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至超过迅速增长的全球人口之所需的程度。我们更需要这些耕地养活人口（无论如何，北极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影响的加重会让这些土地的生产力降低）。碳捕获和储存生物能技术则必须使

用原始森林和天然草地，我们同样无法腾出这些地皮，因为植树造林本身就是去除二氧化碳的可能办法之一。这些野生地区还包含着大量受威胁陆生物种的最后据点，这种做法的损失对继续维持地球生态系统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则是，清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是否会像人们最初设想的那般有效。如此大规模地种植作物释放的温室气体可能超过了它们的清除总量，至少一开始的土地清理、土壤物理干扰（soil disturbance）以及肥料用量的增加等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考虑到这些影响，2100年以前碳捕获和碳储存生物能技术能清除的二氧化碳（按照代表浓度路径2.6的情景计算）最大值则为3910亿吨，这离保持2℃以内的升温幅度所需的清除总量还差了34%。如果人们对种植生物能作物的土地来源并没有乐观的估计，2100年之前的碳捕获净值则会降至1350亿吨。因此，碳捕获和碳储存生物能技术看起来无法单独胜任这个任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可在变化的气候中种植生物能作物：这些作物在更暖的世界中的水量需求又是多少？如果人口过剩真的导致农田竞争，这些生物能作物又如何与粮食生产竞争？以及（与其他技术的情况一样）我们如何捕获又在何处储存二氧化碳？

听起来，植树造林是将二氧化碳排出大气的温和手段，因为我们不必在任何地方处理这些二氧化碳。人人都认为森林覆盖面积的增加是环保的——即便同时我们还为了获取木材、种植大豆或养牛而忙着砍伐亚马逊和东南亚的森林。当全部的压力都指向森林损失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种植更多的森林？如果我们用人工管理的单种森林代替自然森林，植树造林也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对那些在全球生态系统的保存或树皮甲虫这样的严重害虫的防治方面十分关键的森林物种而言，我们的恰当研究才刚刚起步。[16]三分之一的新药物开发自森林植物。人工管理的森林的种植面积会以蒸发和植物蒸腾等方式导致云层、反射率和土壤水平衡的复杂变化。北方的针叶林则会发生不好的变化。林木线会因全球变暖而北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好事，不好的情况则是常年覆盖树叶的区域（满是树枝或常绿针叶林）在雪季会比平整的草原或冻土地带颜色更深，从而降低了整体反射率并带来了净升温效应。植树造林的系统性利用包括砍伐长至一定生长阶段的树木（和储存木材），然后重新种植；如果火灾、干旱、有害生物或疾病的增加导致树木在收获前就死亡或倒下，这项工作就没有作用。

人们还提出了很多清除二氧化碳的生物学、地球化学和化学方法。对所有这些方案而言，建模的理论潜力能给出完全不同于将环境影响（更不用说实践性、治理和可接受性等）也纳入考虑的图景。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人们对海洋肥化（ocean fertilization，这是另外一项二氧化碳清除技术）进行讨论、研究和决策制定的长期过程。当粉尘的输入与海洋、海洋生产力以及气候条件等自然变化之间的联系被首次明确以后，人们就很期待海洋肥化可能作为避免人为全球变暖的手段之一的效力抱有很高的期待。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推测，海水中每加入一吨铁粉，数万吨碳（以及之后形成的二氧化碳）就会因为随后浮游植物的爆发而被固定。多年以来的14次小规模实地实验已经调低了这一估值，人们还认识到，这些浮游植物吸收的绝大多数二氧化碳（无论它们是因向

海水中增加铁粉或其他营养物，或者以机械手段增强上升流的方式而让浮游植物受刺激而吸收二氧化碳）都会在它们分解时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此外，一个地区（比如南冰洋）浮游植物的大幅增加可能会消耗别的营养物质或增加海水的脱氧可能性从而降低其他地区的渔业产量。像“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等机构几乎一致拒绝将海洋肥化作为气候干预的手段。

最近，人们还提出了其他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清除技术，例如培养海藻并让其覆盖全球9%的海洋面积。这种办法的具体环境影响尚未得到评估。然而，这显然会影响并可能替代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现存海洋生态系统，浅水区尤其如此。

回到陆地，其他技术包括提高土壤中的碳含量等，例如在秸秆等有机物中耕种，减少耕作（限制土壤物理干扰）或添加生物炭。生物炭本身的历史就很有趣，因为一群热心支持者努力劝导全世界说这是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作物残余或农业废物可被高温分解过程消解掉，这一过程会产生液体并留下类似木炭的海绵状物质，据称，它们可添加到土壤之中并为其带来特殊性质。但这些人从未合理地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热心者的另一个想法则是增强风化作用，这一过程涉及某些硅酸盐岩石，特别是橄榄石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这些材料必须被碾碎以形成尽可能多的表面积，因此，这就需要在沙滩以及别的东西表面将这些材料铺开成细白沙状。随后，缓慢发生的化学反应会确保这些材料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正如热心的人们所说，这的确是早期地球最初从岩石中释放氧气的化学过程。然而，为了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目前的400ppm减少50个单位至350ppm，我们每年需要在20~69亿公顷土地上（这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5%~45%）按照1~5千克每平方米标准使用硅酸盐岩石，主要还应在热带地区使用。开采和加工的岩石数量将超过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煤炭产量，总成本远超地球工程技术，估计在60万亿到6000万亿美元之间。像地球工程一样，这种方法也必须具有持续性，因为一旦化学反应结束，这些岩石就不再有用而必须覆盖上新的岩石层。显然这件事整个都不可行。然而，更多地掌握生物碳储存技术的持久性及其大规模使用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仍然很重要，因此，大规模研究仍属必须。

因此，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严重（如果不致命的话）缺陷。我们未讨论的则是尚未发明的空中直接捕碳（DAC）技术，这应该是与曼哈顿计划类似的研究计划的主题。空中直接捕碳法就是通过某种系统抽取空气进而除去二氧化碳并将其液化存储，或者用化学的方法将其转化为其他物质，希望得到的是有用的东西。当我谈到“尚未发明的”东西时，我指的是尚未发明的便宜系统。空中直接捕碳系统原则上可让空气通过含有氢氧基团或碳酸盐基团的阴离子交换树脂的方式进行，这种树脂干燥的时候会吸收二氧化碳，潮湿的时候就会将其释放。接着，吸收的二氧化碳就会被压缩并以液体的形式储存，然后经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放置在地下。空中直接捕碳系统的运营成本与增强风化的估值类似，目前大约超过了每吨碳100美元，尽管最近的技术突破承诺每吨碳成本可降为40美元。这种碳捕获方式也需要土地和水源，它与碳捕获和存储生物能技术

一样面临二氧化碳从地质储层中泄漏的风险。但人们可通过将液体二氧化碳储存在海底或使用地球化学转换的方法（这涉及二氧化碳和某些岩石的原位反应）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理论上，将二氧化碳物理冷却（而非化学方式）至液态的办法也可用于去除环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方法的技术可行性、成本和潜在的环境影响等问题——这可能涉及在南极洲或格陵兰的高原上种植植物——还尚待考察。基于上述推理，我自己的想法则是空中直接捕碳法是让世界长期保持现状的仅存办法，如果以战时曼哈顿计划的规模对此进行严肃研究，我们应该能够让其成本像近年的太阳能光伏技术一样大幅下降。

人们对地球工程或碳消除技术的一个有效批评是，它极少或压根没有鼓励我们做出行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并且我们的迫切行动应该专注于减排而非某种未经检验的“先排放，后清理”策略。但很不幸，全球人民（尤其是西方人）极不愿意放弃生活在化石燃料世界中的舒适和便利。我们最终会选择放弃，因为必须这么做。但我们并不理解为何应该立即放弃。再坐一次瑞安航空公司的飞机，用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送小孩上学不是很好吗？但即便立刻大幅度地努力减排，我们也需要在2020年就开始启动重要的地球工程和二氧化碳消除作业，如此，我们才能在2100年以前最多消除200亿吨二氧化碳进而让全球温度增幅保持在2℃以内。为了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是否可行。

2015年的《巴黎协定》能否拯救我们？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5个缔约方在巴黎举办的第21次会议（COP21）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缔约各方同意在2050年至2100年的某个时间段内实现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这一承诺（各国于2016年4月签署）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与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相比）“远低于2℃”范围内——最好是1.5℃。各方平衡后的温室气体预估值（budget）要求工业和农业实现零排放或者必须积极消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除了深入、迅速减排以外）。在多数限制升温2℃以内的模拟场景中，人们每年需要消除数十亿吨二氧化碳并将其安全储存。而对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言，每年清除的二氧化碳量必须达到数百亿吨。因此，《巴黎协定》的目标与我们本章的讨论息息相关。

协定的条款可概括如下。各缔约国政府同意：

•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远低于2℃范围内；

•旨在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因为这将显著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在要求全球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方面，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长时间；

•随后根据现有最佳科学证据进行快速减排行动。

巴黎会议之前和期间，各国还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INDCs）。这是单个国家减排的国家承诺。这还不足以让全球平均气温增幅保持在2℃范围以内，但《巴黎协定》为跟进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途径，因为各国政府同意：

●每隔5年就根据科学研究的要求重新设定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

●向各方和公众报告自己在目标的实施方面做得如何；

●加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跟踪长远目标的进展；

●加强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局面提供持续和强化的国际支持，目标是到2025年以前每年达到1000亿美元。

协定还

●认识到避免、尽量减轻和处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的重要性；

●认识到为加强理解、行动和支持而开展合作和提供便利的领域包括以下方面：早期预警系统、应急准备和风险保险等。

这些条款是什么意思？其中的积极方面很清楚。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气候协定。它将美国重新带回到减排进程之中[**]，而且还让印度、中国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参与其中。该协定改变了气候变化的“故事情节”，而非像以前的哥本哈根和德班会议进程那般针锋相对和进程曲折，各国在这两次会议上仅愿意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或压根不采取行动，现在各方都很热衷并真诚地致力于一致的关键目标。这是真正的国际合作，而不仅仅是各方互动。因此，根据以往的情况，该协定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外交和政治的胜利，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巴黎协定》能否拯救我们？我们来看看协定中并未规定的事项。首先，协定的规定与通往安全气候的途径的要求并不一致。协定的目标是让升温幅度保持在2℃以内，但迄今为止，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便完全实现也至少会让气温上升2.7℃。除了大规模应用地球工程和碳清除技术，我们并没有别的可能让升温幅度保持在1.5℃左右，仅对各国的碳排放进行规定的《巴黎协定》并未提到这一点。该协定也并未提到航空业这个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该协定没有立即行动的计划表，也并未设定达到碳平衡的具体日期（除了“2050年到2100年之间”这种极其模糊的日期以外），因为更晚的日期意味着我们会在很高水平上实现碳平衡。简而言之，该协定发挥作用的条件非常依赖各国的善意和真诚，尽管对会议的检讨会有所帮助。从根本上讲，气候问题是一个“存量-流量”问题：温度的上升与碳排放随时间的累积（存量）密切相关，但我们只能控制今后的碳排放或者碳清除速度（流量）。我们的星球已经积累了大量温室气体，为了稳定或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目前的排放量必须降低至少90%，这要求实施减排技术。

因此，《巴黎协定》是个巨大的进步，但也只进了一步。它为我们设定了一致的目标，但并未昭告世人如何实现它。我认为，稳定碳排放的目标实际上只能通过地球工程和碳捕获技术等干预措施实现，如果全世界仅仅试图通过减排这种手段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2℃以内，随之而来的则是难堪的失败。目前是时候专注引入这些新技术了，以免各方因减排失败而争吵进而造成协定破裂的局面。《巴黎协定》其实是10年或20年以前就应该迈出的一步，我们早应该真正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事业了。

注释：

[*]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不切实际之人。——译注

[**]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2017年6月1日在华盛顿宣布将退出该协定。——译注

[1] Ehrlich, P. R. and A. H. Ehrlich（2014）, Collapse: what's happening to our chances? http://mahb. stanford. edu/blog/collapse-whats-happening-to-our-chances?

[2] UN（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3] Meadows, D. H, D. L. Meadows, J. Randers and W. W. Behrens Ill（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Universe Books.

[4] MacKay, Sir David J. C. （2009）, Sustaina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 UI T Cambridge Ltd. Available for download, www. withouthotair. com.

[5] Paterson, Owen. The State of Nature: Environment Question Time. Conservative Party fringe, Manchester, 29 September 2013.

[6] Royal Society（2009）, Geoengineering the Climate: Science, Governance and Uncertainty. London: Royal Society.

[7] Latham, J. （1990）, Control of global warming? Nature, 347, 339-40.

[8] Salter, S., G. Sortino and J. Latham（2008）, Sea-going hardware for the cloud albedo method of reversing global warm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366, 3989-4006.

[9] Latham, J., A. Gadian, J. Fournier, B. Parkes, P. Wadhams and J. Chen（2014）, Marine cloud brightening: regional applica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372, 20140053.

[10] Rasch, P., J. Latham and C-C. Chen（2009）, Geoengineering by cloud seeding: influence on sea ice and climate system.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4, 045112, doi:10. 1088/1748-9326/4/4/045112.

[11] Rignot, E., J. Mouginot, M. Morlinghem, H. Senussi and B. Scheuchi（2014）, Widespread, rapid grounding line retreat of Pine Island, Thwaites, Smith and Kohler Glaciers, West Antarctica, from 1992 to 2011.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 3502-9, doi:10. 1002/2014GL060140.

[12] Jackson, L. S., J. A. Crook, A. Jarvis, D. Leedal, A. Ridgwell, N. Vaughan and P. M. Forster（2014）, Assessing the controllability of Arctic sea ice extent by sulphate aerosol geoengineer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2, 1223-31, doi:10. 1002/2014GL062240.

[13] Crutzen, P. J. （2006）, 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 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 Climatic Change, 77, 211-20.

[14] Xia, L., A. Robock, S. Tilmes and R. R. Neely III（2016）, Stratospheric sulfate engineering could enhance the terrestrial photosynthesis rate.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16, 1479-89.

[15] Williamson, P. （2016）, Emissions reduction: scrutinize $C0_2$ removal methods. Nature, 530, 153-5.

[16] Halter, R. （2011）, The Insatiable Bark Beetle. Victoria BC: Rocky Mountain Books.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2015年的一项发现表明，地球对温室气体的长期气候敏感性非常高，这对人类在面临目前的危机时明确什么应该是自己的优先事项而言至关重要。[1]这个发现显示，大气中现有的二氧化碳水平足以在未来造成不可接受的变暖程度。我们不再有自己开始担心造成巨大气候变化之前继续排放的"碳预算"了。我们用尽了这种预算，而且目前也造成了环境的变化。因此，减少碳排放还远远不够。人们在20或30年前首次认识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威胁后，国际社会如果为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而进行真诚且协调一致的努力，并转而采用包括核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便可能让地球在不那么危险的高温环境下实现全球变暖的软着陆。但是，政府和人民都过于短视、无知和贪婪而无法作出必要的改变。而像中国和印度加速使用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则更让人感到无望。现在已为时过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很高，当其升温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显现之后，最终的温度升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我们不仅要实现零排放，还应切实地从大气中消除二氧化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可怕的后果。但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述，这几乎不可能。人们目前建议和发展的技术都很昂贵，每吨碳的清除成本约为100美元，然而我们每年必须清除的碳量超出了我们的排量（350亿吨）。世界需要一个庞大而紧迫的研究项目来开发廉价的办法；人们已经提出了成本为每吨碳40美元的经过改进的催化方法。在鼓励化石燃料使用而建立基础设施的世界中，降低消除碳技术的成本比起要求人们立即停止碳排放而言在心理上也是更合适的做法。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发展新技术去除大气中的碳的重大项目对于欣赏肯干精神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一项挑战。

在开发和实施这些技术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地球工程为地球打上补丁。我完全清楚，地球工程与全球变暖的成因之间并无联系，也不会缓解二氧化碳造成的海洋酸化影响，它还可能产生副作用和意想不到的地区影响，并且还需要长期使用。但如果缺了它，气温上升和相关的进一步反馈都会太大而让我们的文明陷于停滞。

我们愚蠢的发展和对技术的滥用已经摧毁了地球的生命保障系统。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发展地球工程和碳清除技术来自我救赎。这是人类现在可以参与的最严肃最重要的活动，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改进科学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全球范围拉回到北极，看看应该如何改进科学，特别是将经济学引入到物理学之中。北极变暖成本的全局性特征清楚地表明，包括北方遥远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关注北极地区发生的变化。在计算北极大陆架甲烷泄漏的成本时，我们还对其众多环境影响进行了考察。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其他北极反馈的经济后果，并明确它们对哪些地方影响最大。北极环境变化造成的全部金融影响可能会大大超出我们最初对甲烷泄漏的估计，后者本身就已经很高了。

首先，我们需要能够更好地整合北极物理变化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经济影响，这种影响尚未被佩吉模型明确地处理。相应的模型应在北极冰面面积和北极平均温度的增幅、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之间建立联系。这些模型还应该包括目前的佩吉版本并未具体处理的各种反馈机制，比如炭黑沉积物和苔原永久冻土融化的影响。它们还应该把北极冰面面积和北极平均温度的上升联系起来，然后将经济影响（比如增加的航运或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与北极冰面面积联系起来。这种北极环境变化的经济成本综合模型应将全球影响数据分配到各国和各工业部门之中。这能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较小的岛国和纽约这样的沿海城市等特定地区的具体风险。目前的分析并不包含这些反馈链，但未来可将它们纳入其中。

其次，这样的综合分析（以及承担这些风险的人们）需要加入到全球经济讨论之中。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12年秋季组建了新的北极全球议程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世界领导人需要进行非正式对话并认识到北极潜在经济价值（从航运到采矿等领域[2]）以及生态脆弱性方面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在2014年达沃斯会议的一场电视讨论中，“气候变化”仅被提到一次，而且在场的权威人士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

在不否认北极地区经济潜力的前提下，我们显然需要严格的经济分析来确定北极环境变化的全球影响和成本。世界经济论坛可以帮助大力投资这种新的综合性系统的经济评估方法——这种评估会考虑像北极的物理变化和生态系统变化等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还可利用其巨大的号召力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考虑环境不断变化的北极带来的全部代价和收益，并将经济重心从航运和采矿等短期经济收益转移至那些可能成为经济和生态定时炸弹的因素上。我们已经看到（第九章），单一的反馈就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造成37-60万亿美元的损失（主要影响贫穷国家），这会为世界经济造成70万亿美元的损失，[3]因此，北极环境变化的代价为我们的全球经济基础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我们可通过把这些成本计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之中来做出改变，[4]目前这两个组织都尚未认识到这些来自北极的潜在经济威胁。

因此，在确定缓解北极气候变化的科学需求时，我们实际上需要开发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即北极综合科学。北极综合科学是人类经济上的战略资产，因为北极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生物物理学、政治和经济系统都有着重要影响。若不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还将继续错失大局。

战争阴云

2013年我开始写作此书时，人们纪念了半个世纪前死去的约翰·肯尼迪。这让世人再次关注起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可能近在咫尺的核战争。我记得1962年10月27日，时年14岁正在看BBC新闻的我像父母一样意识到，我们可能都看不到第二天早晨的太阳，而我们在埃塞克斯

的半独立宅院连同我们自己以及多数英国人都可能轻易地灰飞烟灭。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十分关心古巴这个岛国的行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智慧与克制如今也像在1962年一样备受称赞，但因为古巴的战略地位就故意将世界带到濒临毁灭的边缘却称不上智慧——而是疯狂。今天，我们为冷战结束和这种对抗不再发生而感到庆贺，尽管美俄还手握大量世界末日武器。现在又新出现很多拥核国，其中不仅包括奉行温和政策的大国，而且还包括以色列、朝鲜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动荡国家，它们的宗教或政治痴迷若是遭到挑战，很可能就会报之以核武。核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核战争很可能因为某些双边问题而打响，而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压力就可能造成这种问题，从资源和水源的枯竭到粮食生产的崩溃和饥荒的潜在威胁都可能成为导火索。核战争已经出现过了，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改变，否则世界将无法彻底摆脱核武器，因为非理性国家跟随理性国家放弃核武器的过程必须存在信任。然而，人性并未改变，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的话。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将20世纪描述为“穴居人的世纪”（cave man century），而新的世纪则以我们非法入侵伊拉克为开端，上百万无意义的死难者也几乎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如果我们无法在不改变人性的前提下完全摆脱核武器，又无法改变人性，那么最终肯定会有人使用核武。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压力可能会点燃毁灭人类的火花，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关键理由，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协作，而非仅仅是相互对抗的国家集合。避免地球遭受重大破坏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一切都还来得及。但如果核战争爆发，留给人类的时间就会瞬间彻底消失。

否认的逆流

20世纪80年代早期，科学家们就认为全球变暖显而易见了，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向公众和政客们解释了相关事实和机制，各国就会压倒一切地支持必要的国际行动遏制碳排放，并转而采用可再生能源，最终确保地球不会走向全球变化的最严重境地。的确，这个过程似乎正在发生。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接受过化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她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科学原理，并把处理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行动作为其后期首相任期的主要任务。她于1990年在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哈德利气候研究和预测中心（Hadley Centre for Climate Research and Prediction）并力求采取国际行动。撒切尔首相于1989年向正在南极破冰船上的我发出信息要求出具一份她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的极地变化声明，这反映出她对极地重要性的认可。这是她在1989年11月8日引述“一位在驶往南冰洋的船上的英国科学家”的话：

> “在如今的极地区域，我们看到了可能是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早期迹象。来自哈雷湾和我搭乘的这艘船上的仪器数据显示，我们目前的臭氧消耗程度与史上最严重时期类似（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这种局面完全扭转了人们在1988年观察到的臭氧恢复情况。这艘船9月记录到的臭氧最低值仅为150多布森单位（Dobson

> units），相比之下，同样季节的正常年份记录为300多布森单位。这毫无疑问是十分严重的损耗。”
>
> 他还报道了海冰变薄的严重程度，他写道，“我们在南极得到的数据证实，形成大部分海冰的单年冰十分单薄，因而很可能无法抵御明显的气候变暖而融化。海洋与大气因海冰而相互隔绝的区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海冰会反射大部分落于其上的太阳辐射，这有助于冷却地球表面。如果海冰面积减少，地球变暖就会因为海洋吸收的额外辐射而加速。”
>
> 他继续写道，“这些极地变化的教训是，人类导致的环境或气候变化可能会呈现出自我持续或‘失控’的特征……并且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以上信息来自目前正在南极科考船上思考这些事情并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
>
> 这些可能事态的令人震惊的迹象引导我的团队提出了“世界极地观察”这种有趣观点和其他举措，并以此观察世界气候系统，进而理解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5]

在1992年6月的里约地球峰会上，联合国以条约的形式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早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就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该组织于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评估报告。[6]撒切尔夫人在其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建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为进一步发布评估报告的长期性组织。但随后，她的政治领导权不再。1990年，正当撒切尔夫人着手就环境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时，她却因为一些原因退出了英国政坛。她的未受过科学训练的继任者布莱尔、布朗和卡梅伦等在政治上的表现都很软弱，他们嘴上说着引导国际社会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却极少付诸实施。而美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两位布什总统作为石油行业的受益者都积极反对任何威胁该行业霸权的措施，而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的演讲尽管很激动人心，但实际行动也很少。即便国际社会作出让步取悦美国，它也不愿签署1997年作为减排进程开端的《京都议定书》。比如，这本薄薄的议定书就免除了军用飞行器的排放限制；美国对此很满意，因为它的军事飞行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各方都接受这样一个虚构的说法：军用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分子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小于民用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分子。

哥本哈根和德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峰会”的失败证明了，比国际社会的迟钝和缺乏政治领导更糟糕的则是，一些资金充足的恶毒之人和组织正在煽动和蓄意反对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组织专注在媒体上讲故事说，即便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我们也无力负担任何改变，他们以此说服怯懦无知的政客。他们的目标和手法与烟草行业的游说者如出一辙——即在社会上宣传对相关影响的质疑，进而让老百

姓感到困惑并甘愿无所作为。他们不必让人们相信气候变化并没有发生——而只是播种疑虑，因为拯救世界的行动需要努力、成本并带来不安，人们也总是受到蛊惑进而相信，我们真的不需要付诸任何行动。一本与这种运动相关的优秀著作的名字叫做：《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7]

根据目前的估计，石油行业和匿名工业家每年对这种否认气候变化的运动的资助达10亿美元，这种运动以两种方式展开。首先，他们会锁定气候变化领域里可能直言不讳的真正专家并恶毒攻击这些人。这些攻击者在2002年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成功，以至于当时埃克森美孚公司一个名为兰迪·兰多尔（Randy Randol）的人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带有诽谤性质的备忘录，于是，布什总统指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解除了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教授的该委员会主席一职，接替他的则是一位温和之人。美国能这么做是因为它是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大资助国。沃森这位活跃而杰出的气候科学家被认为带着危险的情绪行事，特别在1990年代后期，他发布了经过修订的最新版气候模型，该模型改进了原有的碳循环处理方式，其得出的结论表明气候变化的速度比之前人们预想的快三分之一。温和的印度人拉金德拉·K.帕乔里（Rajendra K. Pachauri）后来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帕乔里也逐渐因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而变得激进，他最终在2007年带领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阿尔·戈尔共享这一荣誉）。1990年便成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者的我也获得了值得骄傲的“诺贝尔和平奖贡献奖”证书，签发者为帕乔尼和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R.克莱斯特（R. Christ）”，后者的签名给人的感觉近乎圣洁。我还收到了一枚塑料翻领徽章，其黏性之差甚至我和其他我认识的科学家都从未佩戴过它。

气候变化否定者的第二个攻击目标则是直到最近仍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的詹姆斯·汉森，他是一位不断公开谈论气候变化危险性大气科学家。此番攻击的策略则是指出汉森曾以官方科学家的身份从事科研的事实，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可能被抹黑为不当地耽误了官方的时间成本，而他应该把时间用在科研上。他保住了工作，但受到众人（包括其雇主）的大量骚扰，一本信息量很大且骇人听闻的关于科学审查的著作详细描述了这些情节。[8]

而气候变化否定者在英国的主要执行机构则是英国前财政大臣劳森爵士（Lord　Lawson）于2009年建立的险恶组织。该组织名为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不详。该基金会的董事为班尼·派泽（Benny Peiser），该人因以前在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任体育科学讲师时混得了气候领域的专家资格。尽管该组织比较隐秘，成员也缺乏科学信誉，但它仍成功地让英国现政府放弃了成为“史上最环保政府”的主张，进而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描述为“绿色垃圾”。2009年曾出现过“气候门事件”。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该部门也是世界最受尊敬的气候研究中心）的上千封私人邮件被黑客蓄意窃取，接着，这些邮件被俄罗斯境内资金来源不明的专业黑客组织迅速扫描。少数略显尴尬的邮件被寡廉鲜耻的媒体大肆宣传，好像它们发现了重大阴谋似的。黑客攻击这个真正的阴谋却未受到调查和惩罚。

我个人也于2012年开始经历人身攻击。英国广播公司在2012年9月夏季海冰面积达到有史以来最低值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夏季海冰撤退的影片，我和其他人都在这部影片中接受了采访，我们还展示了海冰消退的卫星地图。该影片计划于2012年9月5日播出，紧接着还举办了演播室讨论，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决定支持和反对的“双方”意见都应得到呈现。气候科学家整个团体的代表是新近被任命为绿党主席的娜塔莉·本内特（Natalie Bennett），她本身不偏不倚但却对北极一无所知。而气候变化否定者的小团体则由议员彼得·利利（Peter Lilley，前托尼政府的一名部长）代表，当时他刚刚发布了受劳森基金会赞助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大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干预气候变化并忽略斯特恩的评估。他声称自己是被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也属捏造（尽管海冰撤退的卫星图像已作为事实得以呈现），他还声称我是“出了名的杞人忧天之人”，这一诽谤他重复了五次。他还鼓吹自己比我更了解气候变化的情况，因为他引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的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说，夏季海冰直到21世纪末才会消失。尽管利利是主要在中亚国家开展业务的克能石油公司（Tethys Petroleum）的副总裁，但他最终还是进入了下议院环境与气候委员会，这一有利位置让他能够左右气候变化的立法。因此，劳森爵士的隐秘基金会在强大的政府委员会中收获了一个代理人。不止利利——还有很多人处于类似位置，美国共和党中尤其如此，但他的确造成了混乱并做了失实陈述，进而导致公众在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面前无动于衷。

现在，劳森的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在极少数论辩场合稍微修改先前矢口否认气候变化的立场。它在不承认人为因素引起了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同意气候可能在变化，但它会说应对这种变化的办法是适应而非缓解。“缓解”意味着人们试图对气候变化的源头做出一些干预，无论是减排还是找到去除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办法，或者通过地球工程应对太阳辐射。“适应”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由它去，忍着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坐视不管，地球变暖的幅度（即便按照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保守模型估计，到世纪末会增温4℃）对地球生命的维持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在不干预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下，气候变暖在2100年之后还将持续并达到更高的水平。

公开陈述气候变化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一事实的科学家为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并且引发了社会反响。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首席科学顾问伊恩·博伊德（Ian Boyd）表示，科学家应该避免“暗示政策是对还是错”，并且应该“与嵌入式顾问（比如我自己）一道在公共领域发出理性的声音而非异议”。这种傲慢的说法预设了博伊德的智慧过人以及他自己总会“向权力讲真话”。但这席话仗着英国政府的研究合同而对科学家指手画脚让其态度愈加恶劣。在最近的政治变化之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在压制科学研究方面比英国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环境科学家遭到开除，这让确定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程度的研究根本无法进行。拯救世界于气候变化的关键决策明显应由政府制定。但不幸的是，一些政府更感兴趣在科学研究可能得出不同意见时打压科学研究，而非继续推进研究决策。

罗伯特·P.埃伯利（Robert P. Abele）教授有力地回应了气候变化的否定者们强调的适应观点：

> 我们对地球的暴虐行为导致它行将陷入死寂，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暴力相向和自取灭亡。死寂的星球也会让人类死亡，而一个心理上和/或伦理上对这种人间暴力的后果麻木不仁的民族和/或其领导人也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或者，就像西雅图酋长（Chief Seattle）一个世纪之前痛陈的那样：

> 万物彼此关联。降临地球之事也会令地球之子承受。

毁灭地球就是毁灭我们自己。我们无处可逃。再无另一个地球。我们不仅会向冰川作别，更会向生命作别。

准备战斗

我会假定本书的大部分读者都是热心且聪明的公民，而不一定是科学家。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能做些什么拯救世界的尝试呢？自然，可做之事很多，但我会挑出少数可能真正改变局面的行动。

首先，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反对气候变化否定者和那些希望我们无所作为，并期盼所有异议消失的人所鼓吹的卑劣谎言和谣言。但谣言并不会消失。我们还尤其要警惕上至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客的花言巧语，并注意他们言行间的明显异常。他们在巴黎签署完庄严的国际协议准备大幅削减碳排放，随后便撤销太阳能电力的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也不再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工作，并通过水力压裂法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至此，你们就知道他们都是些伪君子了，你可以指出议员是自己选出的，如果他们不恪尽职守就会失去你们的选票。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应该首先站出来发言并准备好学术生涯受到影响和无法获得荣誉的风险。至少科学家们不用再像异教徒一样受到火刑的惩罚，并且，随着气候变化的现实开始让人清醒，有勇气说真话的科学家们就应该受到尊重而非遭受糟糕的对待和威胁。

其次，在你自己的生活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使用，特别是化石燃料。为何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隔热？这是你为你的房子能做的最有能源效率的事情，而不情愿的政府也会不时为你提供资助。驾驶经济型汽车或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也能有效解决城镇或市区的多数通勤或其他出行任务。即便没有补贴，你也可以在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第三，坚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发电方式。英国在这方面尤为落后。直到2015年，我们所用能源的82%仍来自化石燃料。英国是波浪能和洋流发电的世界级领导者，也有应用这些新观念的海洋环境，比如波涛汹涌的西海岸，奥克尼郡的快速洋流以及塞文孔洞（Severn bore）

等。然而，正如我在《水下技术》（*Underwater Technology*）杂志中指出的那样，政府仅提供少量资金支持开发这些新能源系统的先驱者。[9]直到最近，值得称赞的创新型波浪能公司还因为缺乏支持而关张。[10]英国有大量风力资源但却从未试图制造风力发电机，丹麦因此抢占先机。太阳能光伏发电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该技术不仅适用于家庭以及太阳能农场，甚至对灰蒙蒙的英国也适用。能量储存是这项技术面临的真正问题（晚上没有阳光），但这个问题也快解决了，比如使用容量更大的电池和电流转换系统，这种系统会在外部燃料箱中以化学液体的形式储存能量，它的工作原理类似油箱，后者储存能量的多少仅受其尺寸限制。迈克尔·阿齐兹（Michael Aziz）教授率领的哈佛实验室于2014年成功推出一款使用醌类物质（一种有机化合物）作为流体的电流转换系统。[11]将这些创新方案付诸实施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任何因财政紧缩而哭穷（正如英国一样）的做法都不符合实际，因为可再生能源是——实际上也必须是——未来的能量来源，因此我们必须适应并引领这种改变，如此，我们本国的行业才能发展新技术。

再者，举国上下都不要害怕核电。它实际上是基础能源的强大源头，它能照亮世界却没有碳排放。要警惕英国式畏缩不前的做法，这导致我们从法国（或者中国？）购买了过时而危险的水冷反应堆，其建造时间需要10年。过去40年中发生的所有可怕的核事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利、福岛——都源于水缓和反应堆（water-moderated reactors）中复杂的冷却系统。还有两个更好的机会摆在我们眼前。一是一家德国财团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球床反应堆（pebble bed reactor），它大体上就是一个塔，其顶部放置燃料元件融合成惰性球状物。核反应发生在塔内，惰性气体则充当冷却剂，使用过的球从底部排出。这种反应堆很简单而不太可能发生故障，它的建造尺度从大型发电站到小型局部能源系统不等。南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应系统，但随后又放弃了，而中国正在继续研发。另一个机会则是以钍-232作为裂变材料的钍反应堆（thorium reactor）。钍在核电发展初期是铀的强大竞争对手。铀反应堆仅仅因为最初以军用潜艇反应堆为基础设计而来才变得普遍，潜艇必须使用铀来获取电力设施的迅速灵活性。[12]钍比铀便宜，其优点在于它的裂变产物没有军事用途，因此，这些反应堆被那些令我们担忧的政权使用也没问题。

正如我所说，国际上极端重要的事则是进行一项关于地球工程和二氧化碳清除的大型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地球工程对逆转全球变暖趋势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快速减少碳排放，但我们需要解决科学、工程和治理方面存在的巨大难题才能继续安全地推进这项研究。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些云层增亮系统以及/或者一些气溶胶分配网络并实施它们。比如，斯蒂芬·索尔特就设计了一个敏感度测试用于了解蒸汽喷射系统是否真的具有可观测到的效果。但如果我们对安全的要求更高，那么我们必须在大规模部署之前对地球工程技术的影响进行模拟研究。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办法。为拯救地球，这是我们唯一真正能做之事，因此，我们最好在自己仍具备技术能力且自

己的文明还能支持的时候就着手此事。我已经论证了人们建议的各种二氧化碳间接清除技术的所有缺点，这些方法涵盖从碎岩法到生物炭，再到植树造林和碳捕获、储存生物能技术等各个方面。而唯一真正能挽救我们的则是用某种设备直接清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设备一端吸入普通空气，另一端则排出不含有二氧化碳的空气，做到这一点的成本几近天价。这是化学、物理和技术方面的巨大难题，但再难也难不过人们之前按照仅在实验室观察过的单个原子反应就造出威力无比的炸弹。这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就能延续下去，并且我们也能把精力投入到人口过剩、水资源和粮食短缺以及疾病和战争等其他各种挑战之中。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到头了。一路上，我们会告别冰川，但如果我们让大气和气候处于稳定状态，我们的后人就能看见冰川的回归并因此感到惊讶和喜悦。

注释：

[1] Wasdell, D. （2015）,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2] Emmerson, C. and G. Lahn（2012）, Arctic Opening: Opportunity and Risk in the High North. London: ChathamHouse/Lloyd's Risk Report. www. chathamhouse. 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Energy, %20Environment%20and%20Development/0412arctic. pdf.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3. New York: IMF.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3. New York: IMF.

[5] Full text of speech available on website of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www. margaretthatcher. org.

[6] Houghton, J. T., G. J. Jenkins and J. J. Ephraums（eds.）（1990）, 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Oreskes, N. and E. M. Conway（2010）,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8] Bowen, M. （2008）, Censoring Science: Inside the Political Attack on Dr. James Hansen and the Truth of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Dutton Books.

[9] Wadhams, P. （2015）, New roles for underwater technology in the fight against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 Underwater Technology, 33（I）, 1-2.

[10] Merry, S. （2016）, Outlook for the wave and tidal stream industry in the UK. Underwater Technology, 33（3）, 139-40.

[11] Huskinson, B., M. P. Marshak, C. Suh, E. Süleyman, M. R. Gerhardt, C. J. Galvin, X. Chn, A. Asparu-Guzik, R. G. Gordon and M. J. Aziz（2014）, A metal-free organic—inorganic aqueous flow battery. Nature, 505, 195-8; Lin, K. et al. （2015）, Alkaline quinone flow battery. Science, 349, 1529.

[12] Martin, R. （2012）, Superfuel. Thorium, the Green Energy Source for the Fu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致谢

感谢众多带给我真相、想法和灵感的人。他们包括保罗·贝克威斯（Paul Beckwith）、彼得·卡特（Peter Carter）、弗洛伦斯·菲特尔（Florence Fetterer）、马丁·哈里森（Martin Harrison）、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查尔斯·肯内尔（Charles Kennel）、丹尼尔·基夫（Daniel Kieve）、西利·马丁（Seelye Martin）、沃尔特·芒克（Walter Munk）、乔恩·尼森（Jon Nissen）、吉姆·奥弗兰（Jim Overland）、汉斯·约阿希姆·舍尔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戴维·瓦斯德尔（David Wasdell）和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等人。我非常感谢卡尔·温施（Carl Wunsch）、戴维·瓦斯德尔和撒布汉卡·班纳吉（Subhanleer Banerjee）通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增补和修改意见。我还应感谢美国海军研究局长期的科研支持，唯此，本书的写作才得以可能；还应感谢意大利卡斯特·德伊特（位于费尔莫）的格拉费彻·费尔诺尼图文设计室的安德里亚·皮祖蒂（Andrea Pizzwti）对插图绘制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担任意大利费尔莫“西尔维奥·扎瓦蒂”北极地理研究所主任的妻子玛丽亚·皮亚·卡萨里尼（Maria Pia Casarini），感谢她永无止境的支持。

我将本书命名为《永别了，冰川》[1]（为此向欧内斯特·海明威致歉），因为它不仅涉及我们的星球目前正在消失的大量海冰，而且其中还夹杂着我长期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经历，我希望以此阐明海冰世界的独特性质及其消失的后果。

第十二章介绍了此前发表过的“南极海冰的变化及其影响：年度海冰循环及其变化”，见《气候变化：行星地球上可观察到的影响》，第二版，特雷弗·莱彻（Trevor Letcher）编（阿姆斯特丹，爱思唯尔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 汉译本最终将书名定为《最后的冰川》。——编注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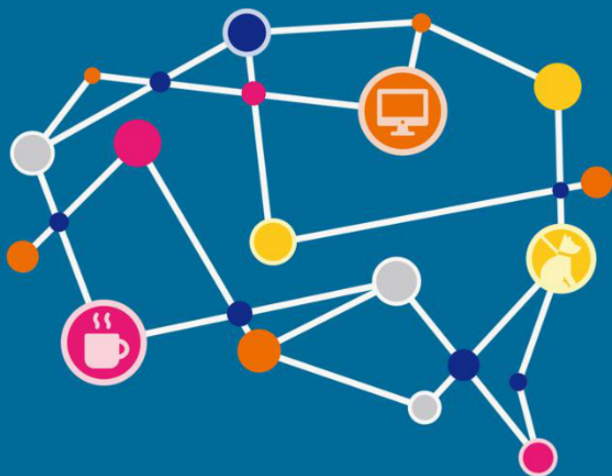
鹈鹕丛书

A PELICAN BOOK

大脑的一天

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Brain

［英］苏珊·格林菲尔德 著　　韩萌 范穹宇 译　　李贯峰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脑的一天

（英）苏珊·格林菲尔德/著

韩萌　范穹宇/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BRAIN
Copyright © Susan GreenfieId 2016
First pubIished by AIIen Lane 2016
PubI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17
SimpI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Iishing Hous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Penguin（企鹅）, PeIican（鹈鹕）, the PeIican and Penguin I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兰登（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在黑暗中
第二章 醒来
第三章 遛狗
第四章 早餐
第五章 在办公室
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第七章 做梦
第八章 度过夜晚
第九章 明天
注释
彩插

缅怀雷格·格林菲尔德（1915—2011）

“你无法用黄油做的刀来切黄油。”

前言

我父亲热衷于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拆解开来，研究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像是他的汽车、电视、喷气式发动机，或人的身体和大脑。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会心怀敬畏地思考电的本质、人类的本性、信仰以及那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的思考不带任何固有的假设，而正是因为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父亲才会沉醉于这种智力挑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正如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曾经说过："知道一些问题要比知道所有的答案更好。"我认为我肯定很早就沾染上了这种探究并与他人分享问题的单纯的快乐，我此后的学术选择无疑是受此影响而做出的。科学被描述成一系列已知的事物，没有给进一步的思考留下空间：变形虫一分为二；说到蒸馏水就会让人想到按照模版绘制的实验仪器，包括靠笔直的试管连接起来的锥形瓶，却从未有人解释这二者的关系，练习本上只要求把图画得干净整洁，仅此而已；时间和空间的物理现象被浓缩在纸带机中——机器不断打出白色的纸条，纸条上每隔一定间距被打上小圆点。尽管教育在数字时代里发生了变化，但我想，在科学教学中依然有可能向学生展示比那些稀松平常的原理更遥远和不确定的地平线。就我个人而言，一些重大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所有人（但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如发动战争的原因、爱情的本质、自由意志、命运，以及最重要的，自身个体性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可以在古代世界的历史和文学中找到更好的答案。因此，一沉醉于拉丁文、希腊语、古代历史和数学等维多利亚式的"旧学"，我就怀着巨大的宽慰放弃了科学。

古希腊世界尤其给人提供了探索人类境况中重大问题的机会，而这样做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哲学更普遍的兴趣。然而，我在牛津大学读大一时，被教导对语言要强调所谓的修辞分析。我依然能回忆起，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坐在博德利图书馆中，一边费力地研读着一整章有关定冠词"the"的内容，一边怀疑自己选错了专业。正因如此，我之后转而学习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并且越来越喜爱偏生理的研究方向。我头一次对一门科学感到着迷，它不只有着单一答案，而且可以用基于经验的研究结论，来回答我还是一个中学女生的时候曾提出过的问题。令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惊讶的是，我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神

经科学家，这多亏了我之后的导师简·梅兰比（Jane Mellanby）博士以及药理学主任威廉·佩顿（William Paton）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便是我异常大脑机制（尤其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研究生涯的开端。

但早年那种对心灵的痴迷从未消失过，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于人类意识那一直悬而未决的困惑：意识是什么？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然而，如果某人声称他能回答这一问题，那我应该期待他展示给我什么呢？一只会表演的老鼠？一幅大脑扫描图？或者一个公式？即便是最具猜想性和远见性的情形，也都无法抓住意识的本质，或者说意识最精髓的部分——主观性。因此，除了完成日常的实验工作外，我还经常与哲学家交流，具体来说是现在已故的苏珊·赫尔利（Susan Hurley）。我和苏珊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在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之间的广泛讨论，并且于1987年出版了这一系列讨论的成果，题为《头脑波纹》（*Mindwaves*）。这些内容广泛的讨论常常持续到晚上，它对我的吸引力在于，我得知了，某些两个学科共有的话题，如记忆，显然可以通过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议程、关注重点和视角来探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会忽视现象学这个至关重要的主观性，是它让人们给神经科学对意识的探索贴上了“职业局限”（CLM, Career Limiting Move）的标签。

正是对“心灵”和“意识”的主观性的不断反思，促成我之后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创作了《通往心灵中心之旅》（*Journey to the Centres of the Mind*）和《大脑的隐秘生活》（*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两本书。人们可以在“失去理智”的同时保持神志清醒，这使我着迷于以下两个想法：一、“心灵”和“意识”两个词绝不是同义词；二、弄清这两个概念是如何在神经科学的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可能会使人们取得一些进展。因此，《大脑的隐秘生活》一书主要是一种理论尝试（尽管基于一系列的实证数据），这一理论既包括探索大脑在生理上是如何产生“心灵”和“意识”的，也包括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将不同的客观事件与其对应的主观性相连接，发展出一套系统来研究这些时而存在关联、时而相互独立的现象。我最后得出结论，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种双语参考系）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如同用生理学术语一样，清晰地用现象学术语来描述它们。

最佳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宏观层面的某个脑区，也不是微观层面的突

触集合，而是一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人们发现的、在中间水平上的“介观尺度”（meso-scale）大脑活动进程：神经元集合。这种集合有点像将石头扔进水中所产生的涟漪，一旦触发，大量（百万级）的神经元会同时在亚秒级时间水平上产生一连串的活动。这种毫秒级的快速活动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经典的脑成像技术探查到神经元集合，这使得我们必须依赖诸如血流等间接的测量手段，因此通常只能得到秒级分辨率的数据。然而，随着人们开创性地将电压敏感显像剂引入脑成像领域，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神经元的活动，这使得人们最终可以实时观测到这些脑细胞极其短暂的关联活动。

当我创作《大脑的隐秘生活》一书时，对神经元集合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无法准确说出它们如何为发展出意识的神经连接理论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当我回顾这本书的最新版本时，我感到有些困惑，虽然我在书中提到了这一术语，但“集合”一词甚至都没有在索引中被强调。但我现在渴望能从理论走向现实，并在我自己的实验室中开展对神经元集合的监测。通常来讲，阻碍研究进行的困难是无法找到正确的人，当然，还要找到资金。幸运的是，在这项研究中，这些困难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严峻。我组内一位名叫艾德·曼（Ed Mann）的才华横溢的研究生，在2001年的夏天主动远赴日本学习光学成像技术，并在市川（Ichikawa）博士的实验室中受到了慷慨的招待，因此当他回到牛津大学后，我们便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研究系统。同样重要的是对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和之后的实验提供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最初来自辉瑞公司，后续的经费则分别由邓普顿基金、心智科学基金会以及欧洲麻醉学会提供。曾经一度看似不可能的梦想如今变成了现实，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对许多曾经仅仅是假设的想法进行了检验。正因如此，本书才得以与世人相见。

尽管本书在一些适当的地方，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物理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或相关内容，但它绝不仅仅是对意识研究领域所做的一个详尽的综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加入了更多真实的实验，相比《大脑的隐秘生活》，本书不可避免地有些偏技术性。当然，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一般读者顺畅地阅读本书，我将专业读者可能希望读到的这类内容放在了注释中。

本书的主旨在于倡导一种对意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假设是，神经元集合可以提供一种描述框架，这种描述框架应该能够

让我们将现象学术语和生理学术语对应起来。因此，关于不同主观心理状态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似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实验情境，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事物：典型的一天中的不同阶段。我们的计划是通过经历生活中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事件——醒来、吃饭、工作、玩耍、遭遇困难以及做梦等——来看一下我们何以可能在大脑中（更确切地说是在神经元集合中），将特定的主观状态与一种截然相异的对客观事件的量化描述建立联系。

由于《大脑的一天》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我们正在编写或已经发表的，使用了光学成像技术的文章，因此我想在此感谢那些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数年的小组成员，以及我们所引用的出版物的联合作者。此外，我想特别感谢一位新近的研究者斯科特·巴丹（Scott Badin），他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神经元集合研究的精确度，他的工作成果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也想特别感谢弗朗西斯科·法玛尼（Francesco Fermani）博士，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我们三人以酒会友，共同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夜晚。法玛尼博士试图在经验数据之上建立数学模型，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此进行描述。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伊恩·德文希尔（Ian Devonshire）博士，他开发出活体大脑光学成像，让我们不再仅仅是从切片中观察大脑，而且他对本书的成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参与了本书的事实查证和编辑，以及确保参考文献具有时效性和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得以成书，还多亏了企鹅出版社编辑们的鼎力相助。史蒂芬·麦格拉斯（Stefan McGrath）最初委托我创作这本书，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则不辞辛劳地阅读了一版又一版的草稿，最终由萨拉·戴（Sarah Day）出色地完成了编辑工作。最后，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卡罗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感谢她一贯的热情和友善。有些人来不及具体说明，但同样功不可没，我也要感谢他们对本书所做的贡献：约翰·施坦因（John Stein）教授、克莱夫·科恩（Clive Coen）教授以及查理·摩根（Charlie Morgan）先生，他们提供了无尽的智力挑战和严厉的爱。我的母亲朵蕾丝（Dorice）现在自己也是一名作者，她在我身上更是倾注了无条件的爱。最后，让我们回到我父亲这里，是他给了我和我弟弟真正的好奇心和勇气来探索这些重大的问题。无论父亲在哪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有多么感念他。

苏珊·格林菲尔德

牛津，2016年3月27日

第一章　在黑暗中

一、迄今为止的故事

现在是清晨，外面的世界依旧漆黑一片。你的心率降至每秒跳动一下，血压也降到此后15个小时中的最低点。你的呼吸减缓为每分钟12次，血糖也跌至低谷。你的膀胱和肠道在逐渐充盈，但还不足以鼓胀到干扰睡眠。尽管你所有器官精巧的生理功能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但很显然，你还处于睡梦中。在这种状态下，你的大脑甚至全身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封闭的，处于一个私密的内部世界中，这个内部世界正是当今科学界最大的挑战之一。但在那随时可能嗡嗡作响的闹钟响起之前，这片特殊的领地将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一个人。无论你与他人多么亲近，无论你的表达多么清晰、充满诗意、悦耳动听抑或富有同情心，你都无法将自己最直接的主观体验与他人分享。而就在此刻，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你如同死去一般沉睡，对世界毫无知觉。

如果没有意识，活着便与死去毫无二致。正是意识状态让生活值得一过。但什么是意识？这种无形无质的内在之物究竟是什么？意识对于我们来说既难以理解又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每天都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几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一直试图定义意识并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掌控意识。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随着神经科学的崛起以及人们对大脑认识的急剧增长，这一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在事实与洞见的大量积累下，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你的大脑中，个人主观体验是如何转变为喷薄而出的化学物质和电信号的？以及相反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当谈到诸如时空穿梭或永动机等其他雄心勃勃的科学探索时，想最终实现这些可能性或许要违反物理定律，但至少在假设上如果有某个天才发明家将解决方案摆在你面前，你马上能认出它来。那么对于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主观体验，什么东西能切实向你证明，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甚至科幻小说家提出的是完整可靠的洞见呢？

刚刚得到这个发现的人，会挥舞着一张大脑扫描图，或是对着一个数学公式拍手叫好吗？这些所谓的解答无论多么精巧，都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它们无法解释我们客观观察到的事件如何转变为对独特个人经历的第一手感觉。然而，一种主观的视角以某种方式在大脑和身体中产

生了，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用魔法召唤来的”，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只是假设。这一问题不仅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最深刻的奥秘、最持久的难题，对于每一个思考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家卧室窗外的茫茫黑夜，相比知识领域内使意识概念进入无解死胡同的昏昧不明，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家苏珊·赫尔利和我想到一个不错的主意，邀请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牛津大学举办系列研讨会，从不同方面探讨心灵和大脑。不出所料，我们在理解哪些大脑过程可能代表意识本身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无论神经科学还是哲学，对于应该从哪里着手没有明确的共识；两门学科没有共同的开放性假设。尽管如此，研讨会却着实提出了一个让两门学科都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探索主观现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围绕更审慎、更具体的问题可以产生富有成果的跨学科辩论，例如机器是否会有意识，意识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以及语言对思维有何影响。

即便如此，通过展示大脑由于物理损伤产生的变化是如何与个体主观体验的变化相匹配或相关联的，神经科学已经开始向古老过时的大脑——心灵二元论、精神——身体二元论发起挑战。用一位与会哲学家保罗·希布莱特（Paul Seabright）的话来讲：“记忆是不亚于分子的物理实体，是物理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以外的名称识别它们。”

自从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于17世纪首次将具有意识的心灵和生物性大脑相区别以来，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冲突似乎就变得不可调和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获得对现实的瞬时体验，而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获取信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概念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当我们将人类或其他动物描述为具有“知觉体验”或“意识状态”时，我们所谈论的是那些将生物和非生物区别开来的最基本的特征。一块石头并不“关于”其他的事物，石头本身也没有主观属性，但某个人的知觉则“关于”他看到的（或体验到的）事物，因此具有主观属性，就好比我们是如何看见红色的。当我们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观察世界时，这些特点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站在客观科学的角度以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它们时，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存在一

些困难。当我们谈到大脑的状态时，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神经元放电和脉冲式地释放强效的神经递质，但我们却很难知道这些剧烈的神经生物活动是如何与那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体验到的、习以为常的意识特征相联系的，例如品尝巧克力在你口中慢慢融化，感受阳光照耀在你的脸上，听海浪的咆哮声。本书将带你踏上一段探索大脑内部生理活动的神奇之旅，在这段旅途中，你将看到当我们品尝食物时，小酌后微醺时，做梦时，出门散步时，又或是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时，我们的大脑中会发生哪些生理活动。

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里，多种多样的因素会不断地使大脑进入一系列不同的状态，这是大量的脑细胞在极短的时间里共同工作发挥的作用。“神经元集合”是强有力的大脑进程，然而这种进程目前仍是相对未知的，对其研究不足。我们将一起看一看这些短暂而规模庞大的神经连接——神经元集合——是如何与我们对不同水平和不同状态的意识所产生的体验相对应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起作用的（古埃及人在罗塞塔石碑上分别用三种文字刻了一部法典，因此这一著名的历史遗物就给了我们揭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钥匙）。神经元集合通过将这些头脑中的新奇事件与不同种类的意识状态进行匹配，来达到一个一致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把一种“语言”（主观个人体验）转译成另一种“语言”（客观神经科学），反之亦然。毕竟，毫无疑问，任何对意识的所谓“科学的”解释都必须同等重视个人的主观体验。

科学家团体并不那么乐于接受主观性是对意识的理解的核心这一基本假设，因为实证研究方法是极度客观和中立的。有人曾一度将对意识的研究描绘为一种阻碍职业生涯的行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对于大多数因循守旧的人来说，对“非科学”的恐惧阻碍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探索。“科学的”这一形容词，经常为各种各样的词语打上受人追捧的认证标签，尤其是“证据”一词，却很少能有人对其给出定义。我只想说，最重要的是科学家通常只报告研究结果中的客观发现——两名或多名研究者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条件下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得出一致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用常规的科学方法对意识进行研究时往往会感到非常棘手的原因，因为那些自诩为研究者的人必须首先承认，意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主观性。即使是那些敢于在这一领域进行工作的神经科学家——令人高兴的是，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人数很少，但在不断增长——也常常忽视个体主观状态的差异。我们反而将关注点放在我们早已熟悉的脑功能，以及那些我们便于测量的、早已明确的过程和效果

之上，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二、梳理不同的术语

即使还没从衣架上取下你的实验服，你已经开始为如何定义“意识”的问题而发愁了。我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用诸如“觉醒”、“认识”等显而易见的同义词进行替换并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备选项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强调的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更加普遍而被动的反应，而我们更典型的状态是对外界具有不断变化的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所产生的个体化的、独一无二的领会。想要澄清我们的意思，难点在于我们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策略来对事物进行定义。例如你可以说“飞翔就是我们在对抗重力”，但严格来说，意识到底是指我们在做什么呢？你不必做任何事，可以仅仅闭着眼睛安静地平躺着，然而此时你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此类操作性定义是毫无用处的。我们也可以利用更高的种类或更宽广的范畴进行定义。例如：桌子是一件家具；爱情是一种情感；而意识是一种……一种什么呢？比意识更高、更宽的范畴是什么呢？答案是没有。

由于我们无法正式地给出意识的定义，剩下能做的就是，我们至少可以去厘清那些能够被弄清的混淆，它们是时常混迹于意识的同义词之列的术语，而事实上这些术语的概念也有其独特的内涵。举例来说，在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潜意识（subconscious）这一概念，意味着即使当你完全清醒时，你头脑中仍有一部分内容是你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可能是最终意识状态中的一项必要而非充分的成分，与失去意识相对，后者指深度睡眠或昏迷状态中意识的彻底消失。还有就是自我意识，这是每个人将自己感受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一种感觉，当这种感觉过度强烈时则可能导致个体产生不安甚至焦虑的感觉。自我意识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仅仅让我们每天都能意识到我们与他人是不同的，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否则为什么还需要两个术语呢？让我们想一下非人类的生物吧：一只猫或一只狗，在其主人看来，显然都无可辩驳地是有意识的。然而同样地，如果说宠物能够充分认识到它们分别作为狗和猫的身份，貌似也不那么现实。毕竟，就连人类的婴儿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尽管我们假定他们是有意识的。

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所谓“更高的”状态或是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希望以此来理解意识——

他们探究了在诸如其他灵长类动物等非人类生物身上自我意识萌芽的程度。[2]但存在一种主观的意识状态并无法保证自我意识会自动出现。举例来说，如果你处在一种放纵的状态中，比如沉醉于醇酒美人和靡靡之音，或当下与之相应的毒品、性和摇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可能还保有自我意识（反过来说也成立——每一个不情愿跳舞的人勉强上台时都知道这点）。然而，尽管自我意识的问题可能令人着迷、令人不安且偶尔令人尴尬，它却并没有触及最根本问题的核心，在神经科学术语中，它只意味着感到自己是有知觉的。摇着尾巴的小狗、发出咕噜声的小猫，还有那咯咯笑的婴儿都具有某种主观体验，但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尽管他们表现得好像对所有的目的和意图都有意识，而我们也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和它们互动的。我们应当首先理清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感觉的纯粹主观性。最重要的第一步不是在镜子中认出你自己，不是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也不是对你至今为止的生活感到满意，而应该是更基本的内容——体验那些最原始的内在状态。

但在“意识”（consciousness）和“心智”（mind）两个词交替使用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最容易对此产生混淆乃至误解。这里所说的“心智”当以一种良好的功能秩序运作时，是某种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可以有这样的表述：“我意已决”（my mind’s made up），或“在我看来”（to my mind），或“改变我的心意”（change my mind）。但当你失去意识时，比如睡着了或者被麻醉了，没人会说你是失去了心智。正如人们在睡觉这一“失去”意识的过程中是可能保留有“心智”的；反之亦然：在极度的愉悦中，你可以“失去”心智但保留有意识——你陶醉于美酒、美女以及优美的歌剧时，虽然“失去”了心智，却依然保持意识清醒，这通常被称为“心醉神迷”（ecstaticall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表示“立于自身之外”。然而，即使当你经历着极端的情感状态，你所体验的依然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有意识的状态。因此无论心智是什么，它都必须是一种你随时可以进入的状态，但你却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处在这种状态中。当你“放飞自我”时，心智可以被视为某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东西，但它同时必须可以用来描述你头脑中所包含的专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特征，这些使你独一无二的特征，反过来也构成了你许多（但非全部）意识状态的瞬间。

虽然理清了这些术语中的一部分令人迷惑的相关性，我们依然面临着原始意识难以捉摸这一现实。可能在下定义方面，我们最好的做法是

采用一种至少在脑科学家看来最实际的方式（当然这可能会让哲学家皱眉）说：“瞧，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意识是什么意思。”它是人们睡觉时消失的东西，它是人们被麻醉时隐藏的东西，它正是你现在所体验着的、一种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分享的内在主观状态。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现在就放弃（因为我们无法明确给出一个正式定义），还是继续使用这种不正式的，诉诸常识的表达？如果，就像我们正要做的这样，采取了这种更加实际的立场，我们便可以看到神经科学家在尝试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种神秘的主观性在大脑和身体中是如何运作的——这条路上可以走多远。

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从实际的物理的大脑入手，尝试从任何我们观察到的生理过程中推导出一些有关意识的理论或模型。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二种方法，以另一种方式开始。首先，我们构建一种有关意识的理论或模型，然后我们检验这些模型是否能解释真实的大脑。下面让我们依次尝试一下这两种策略：由实验到理论，以及由理论到实验。

三、由实验到理论

当我们从大脑本身出发看待意识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是解释意识如何从分子、细胞和电信号这些纠缠在一起的看似无助于我们理解的生物学信息中产生。换句话说，我们要弄清楚科学家所说的意识的神经关联（NCC, neural correlate of consciousness），亦即大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特征，我们可以确信它与个人的直接主观经验相匹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可能的NCC可以产生于多种不同的维度，大到主流脑区和磁共振显示的神经回路，小到单个细胞以及细胞中的微小元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基本原则：所有的意识神经连接最初都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大脑特征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特征被认为是尤为特别的。之后则是在标准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方案的监督下，尝试将这些特别的大脑特征与意识建立联系。例如，通过确定某些东西是否可见，或被试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曾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解决意识之谜，其中最知名的可能要数已故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于1953年破解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意识的生物学。克里克的目标是弄清当人们看到某件事物时，与没有注意到这一事物相比，大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他的

理由是我们应该可以根据人们关于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某件事的报告，推断出大脑中的变化。当个体确认某件事物确实可见时，根据直接的逻辑推理，此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大脑中发生的任何新的过程，都应是意识在生理上的相关物。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克里克尤其专注于研究视觉体验，一个原因是它们更容易进行实验操作——毕竟视觉实验只要让被试睁着眼就可以了。

将人类意识的复杂性简化至仅剩核心成分，其背后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仅仅关注五种感觉之一的视觉，克里克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能将问题尽可能地简化。他们的想法是将意识的核心脑机制解释为“对意识对象某一特定层面所产生的最小神经事件集合”。换句话说，他们的目标是找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大脑过程，此过程能容纳意识体验且可被测量到。3

之后，这些最小神经事件进一步在视觉系统中被确定为“与物体和事件相关的”一组特殊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本身的功能是不变的且是预先确定的——这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一种固定的特征。这种设定立刻呈现出了一个问题：大脑细胞预先组织好的机制如何反映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识瞬间？克里克和科赫的答案是：“为了进入意识，这一特征的某些神经活动必须超过阈值。”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关键的神经活动从未被具体确认。除此之外，如果想让这些严格固定的细胞网络完成任何超出其自身能力的事情，唯一的方法是让它们变得更加活跃且释放更多电信号（动作电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意识来说非常重要的特殊大脑属性的可能性将受到严重的限制，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细胞活动的增加。是什么使得这种转变如此重要，好似神经元的卢比孔河[1]？我们不清楚这一“阈值”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经元集体活动的量的改变能以如此显著的方式引发心理状态的质的改变。

但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将意识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感官感觉，来对某种意识状态作出很好的理解吗？我们能将它与其他意识状态区分开吗？在精确控制情境变量的实验室里，几乎可以想象，被试注视一段很短的、固定时间的单纯视觉刺激，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听到主试的声音，依然能感觉到他们所坐的椅子面是坚硬还是柔软，依然可能闻到些许皮革或光滑木材的味道。换句话说，被试是用单一的意识进行多感官的整体感知，而不是将意识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对应五种不同的感官。

此外，克里克和科赫煞费苦心地强调，为了试图将意识（或者说其

生理相关物）保持在最低水平，他们将“诸如感情和自我意识等一些更加困难的内容搁置”。然而，我们的感受和情感可能恰恰是意识以其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全部精髓，发出咕噜声的小猫和咯咯笑的婴儿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要将意识完全简化到最低限度，那么也应该是将其分解为反应大脑整体状况的原始情感——尖叫、哭泣或傻笑，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视觉，随意、单独地漂浮于其他所有事物之上。

然而，抛开这一点异议不谈，仅仅通过比较当你看到某些事物时的情境和你没有看到那些事物时的情境，也能让我们有所收获。现在，我们将探索脑损伤患者的特殊意识状态，即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对呈现出的刺激所做的反应。通过比较某种特定脑损伤患者所做出的反应与正常人反应之间的差异，科学家可以推断哪些脑区对意识的影响最大。例如，连接大脑两半球的纤维束损伤的患者会表现为著名的“裂脑”（split-brain），正如这一名称的字面意思，大脑两半球彼此割裂且无法直接传递信息。例如，给患者右侧大脑半球展示一个苹果（通过将物体放在左侧），患者则无法说出这一物体的名字。这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参与语言功能的脑区大都在左侧大脑半球，因此患者即使能看到苹果，也无法准确地说出它是什么。而当把苹果放在患者右侧时，苹果的图像被投射到左侧大脑半球，患者这次便能说出其正确的名称。[4]

另一类被神经科学家广泛关注的神经疾病是“盲视”。这种疾病的症状是患者在其视野中有一片盲区，因而对放置于盲区内的物体“视而不见”。[5]有时盲区扩大至整个视野，会导致患者完全失明。但奇怪的是，心理学测验却显示患者的大脑已然对这些位于盲区中物体的视觉信息进行了记录和加工处理。例如，那些患有“盲视”的患者即使主观上并不能觉察自己看到了飞来的球或扔球的人，但经常能接住扔向他们的球，就像装了自动驾驶仪一样。

然而这里有一个大大的“但是”。研究脑损伤患者的问题在于，尽管对这些病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某个特定患者所经验的某种奇异的意识状态，包括其性质或内容，但我们仍然无从得知这些意识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毕竟，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保持着意识清醒。

那么我们再一次回来研究健康被试，而这次我们仅仅是要观察意识的转变。一些神经科学家居然把意识视为注意的同义词[6]，但二者并不相同。例如，你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注意到了某些事物。[7]当一张照片快速而出人意料地闪过时，即使人们没有时间记住其中的细节，但

他们依然可以大概说出照片的内容。[8]事实上，在不去注意画面所包含的具体细节的情况下，要抓住一幅画面的“主旨”似乎只需要千分之三十秒（三十毫秒）。同样地，你也可能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对某些事物有了意识。即使某人正在关注一些其他目标，他们仍然能够分辨出周围场景的特征，如场景中是否包含了一只动物或一辆汽车[9]，又如一张面孔是男人还是女人[10]。

这些发现本身是有趣的，也可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它们仍不能阐明这一基本的问题：如何理解从无意识状态（麻醉或睡眠）真正转变到具有那令人着迷的主观内在体验的意识状态。可以确定的是，裂脑和盲视患者（或是正常志愿者在实验条件下被有效地诱导出这些症状时）确实是保持着连续的意识。但我们希望探索的是潜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核心，而这问题的关键却依然在嘲笑着我们的无知。要记住，不及物动词短语“具有意识”和及物动词短语“意识到某物”，二者不可互相替换。

然而，对比被试看到物体的瞬间与没看到时分别所对应的脑内事件，这一策略依然是科学家们用来研究意识的普遍方法，健康个体和脑损伤患者都是他们的实验对象，毕竟扫描脑成像技术已经成为主流。比如说，只有在对特定物体进行“有意识的”视觉体验时，大脑视觉通路后段才会在脑成像中凸显出来。[11]但归根结底，当知道了某个特定脑区与某种特殊的意识体验相对应并在脑成像中凸显出来时，我们又能真正从中推导出多少内容呢？毕竟，一个相关的东西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也可能二者都不是。大脑活动的脑区和主观体验之间真实的关系仍远没有明确，并且依旧无法解释。

任何人不经意间望进肉店的窗户，都能看到不同哺乳动物的大脑在大小、形状以及外观上存在差异，但用肉眼就能很容易看出，它们由不同的区域组成并且有着相同的基本解剖结构。那么这些分明的脑区中，是否有哪个脑区就是意识本身在大脑中的“中枢”呢？毕竟，我们很乐于认为大脑由负责不同功能的、独立的“中枢”组成，因为如果是这样，那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就容易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世纪初期，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心灵的研究”）这门“科学”才会盛极一时。白色瓷制头盖骨上布满黑线画出的矩形区域，内有精确标签，写着诸如“爱祖国”和“爱儿童”——这提供了一种模板，通过对个体大脑的凸起进行评估，以此了解个体某种人格特质的强弱。

现如今，神经科学家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诱人的简单化概念，事

实上任何心理功能都没有这样的“核心”区域，更不用说意识了。有两个充足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观点。首先，如果说大脑是由互相独立的迷你大脑组成，这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读一本名为《麻脑壳》（*Tee Numskulls*）的连环画，[12]它讲的是一群名叫“麻脑壳”的小人儿生活在一个人脑袋中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比如说，有负责清理鼻子的部门，也有某种类似司令部的部门，负责管理的“麻脑壳”在里面打电话给他的下属发布命令。我现在依旧能回忆起，卡通大脑中不同“麻脑壳”的房间都由墙严格地分隔开，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门也都关闭着。在某种意义上讲，当某些人谈论大脑中的“中枢”时，他们对意识进行的定义可能不经意间和这本简单的漫画如出一辙。试想一下：如果大脑确实以这种方式工作，那我们又必须知道在“麻脑壳”的脑袋里有着什么。“麻脑壳”的脑袋里可能住着“小麻脑壳”吗？而在“小麻脑壳”的脑袋里又住着“微麻脑壳”吗？以此类推。当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仅仅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解决它。

无论怎样，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脑不是那样工作的。拿视觉来说，至少有30个不同的脑区参与视觉体验。[13]这有点像管弦乐队中不同的乐器，或是一种包含有非常复杂的配料的高级食谱。每个脑区确实有其自身特殊的功能，但每个脑区都参与整体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大于每个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这个整体就是那一瞬间的意识体验。

即便如此，人们仍有一种执念，认为意识肯定以某种方式与位于大脑表层的大脑皮层（以拉丁文中的“树皮”命名）有所关联。之所以有这种执念，是因为在进化中，这部分脑区是最后才演变出来的，并且在智力日益复杂的物种中，该脑区在大脑中也更加明显。此外，似乎单是大脑皮层的失活便足以导致意识丧失。[14]因此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维持意识状态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联系其他脑区进行运作的完好的大脑皮层。这种观点太模糊了，因此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帮助，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大脑皮层本身，而是大脑必须同时保持完整。

不把解决意识问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大脑皮层上，另一原因来自一项约70年前进行的研究。加拿大神经外科先驱维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eld）认为大脑皮层对于意识体验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一另类的提议以对750名在清醒状态下接受大脑皮层部分切除术的患者所进行的观察为基础，结果发现750名患者意识的连续性并未受损。

[15]此外，最近又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即对于意识来说大脑皮层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是针对先天无脑畸形或积水性无脑患儿所进行的——这些患儿在出生时就有着包括大脑皮层在内的大部分脑区的阙如。对患有此类病症的儿童，在其生长和发育期间使用标准神经测验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他们依然可以表现出觉醒和意识的迹象。[16]最后，即使大脑皮层完好，癫痫患者在“失神”发作时依然会表现出意识丧失。[17]换句话说，大脑皮层不可能是意识的所在地。

当我们观看监测麻醉效果的脑成像数据时，就会发现任何试图将意识定位在某个特定脑区的研究项目都存在另一个明显的瑕疵，即在任一时刻，个体的第一手体验都涉及许多脑区。假设确实有一个单一且独立的意识中枢，那么便可以预见，如果我们要麻醉某个人，使其丧失意识，那我们仅仅需要使“意识中枢”这一特定脑区显著失活便可。但事实并非如此，针对人类志愿者的脑成像研究显示，当某人经历麻醉过程时，没有哪个特定脑区单独停止活动，而是全脑普遍停止活动。[18]在手术中，随着麻醉剂开始起效，全部脑区都会被麻醉。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对真实大脑本身进行更加直接的侵入性检查得以可能，这必然会使颅骨突起和微妙的心理特性之间本就不太可能的颅相学联系变得更不可信。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颅相学推论依然能在其后的临床解释中产生一些影响。随着医学的发展，临床医生越来越擅长使患者存活，即使是那些遭受了严重脑损伤的患者，如枪伤、脑外伤、脑中风。不幸的是，这导致特殊神经综合征在当下依旧很常见。但某些错误的颅相学观点依然会不时地溜进我们脑中，将缺失的“功能”与损伤的脑区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对科学家依然很有诱惑力。五十多年前一位心理学家强调过这一推论方式的缺陷：如果你从一部无线电接收机（当时这样称呼，亦称收音机）上拿掉一个电子管之后，这个设备便开始鸣叫，那么你也不会说这个电子管的功能是抑制鸣叫。[19]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脑区出现了问题——就像这个老旧的电子管出现问题会导致无线电接收机整个系统受损——我们不能单纯从结果中反推出这个电子管或特定脑区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20]

尽管对该问题的理解取得了上述进展，但在神经科学研究中，人们对研究不同脑区潜在意义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我们现在认识到，三十多年前有关功能损伤的早期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让人们把不同的脑区与特定的功能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侵

入性脑成像技术上的巨大飞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健康志愿者进行研究，以此明确人们在做出某些特定行为时，哪些脑区正在进行工作。如今，当我们观看一张脑扫描图时，我们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片灰色大脑的背景下某些大脑区域有明亮的斑点，或可能是五颜六色的阵列，其中一个亮点是白色的，阴影则可能是黄色、橙色、红色或表示低激活程度的紫色。面对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丽图案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图片虽然为我们敞开了一扇观看工作中大脑的窗口，但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迟，并且缺失了大量有关大脑活动的重要信息。真正的问题源自对图像的解释。脑扫描技术的时间分辨率通常是秒级，而动作电位（活跃脑细胞的通用电信号）则有一千倍以上的速度。因此，我们可以把脑扫描技术比作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暗色照片，这些照片可以精确地记录下静态、无生命的建筑物，但不能同时记录下任何人类或动物，因为对于捕捉其画面所需的漫长曝光时间来讲，他们移动得太快了。诚然，这些建筑物是真实存在的，正如脑扫描中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肿瘤，或是中风后遗留下的永久性病灶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它们只构成了整个图像的一小部分。

一些锲而不舍的科学家[21]在其研究中声称，如果在整个大脑皮层范围内关注刺激应答的空间模式，那么“破译”脑成像所包含的信息是可能的。然而，“破译”这一词语恰恰是一种误导。从本质上说，一种密码是一种格式，它总是需要被翻译回原本的内容，并且为了使密码的存在有意义，密码与其原本内容必然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说，除非你知道摩尔斯电码的规则，否则那些点和划的组合便毫无意义——只有当你知道其中的规律，才能将其解译成原本的内容。相反，即使主观心理状态确实与摩尔斯电码那些点与划相似，它们也无法转换成空间分布式的脑活动，反之亦然。事实上，主观心理状态只是这些脑活动的关联物。在脑科学中，甚至连一个因果关系的框架都没有，更不用说能破译二者之间转换关系的密码规则手册了。[22]仅仅知道事情可能在哪里发生，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当这个事情非常不明确，而捕获到它的时间窗比实际时间慢两到三个数量级。

哪个脑区才是心理特性的“中心”？这一最麻烦的问题就像“中心”这一术语本身一样基础。“中心”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在其中开始或结束，可是没有哪个脑区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相反，所有的脑区（即使神经元相距很远）都通过神经纤维束互相连接在一起，这使得全脑范围内可以不间断地通话，就像电话交换机一样。俄罗斯套娃每个都在另一个里面，

与此不同，个体脑内的指令并没有层次分级。不知何故，每个脑区都像是一个中继站——一个连接点，或是一个转折点——但绝不会是终点。

当我们谈到脑扫描时，另一个困难是我们通常不会用定量的方式思考诸如机智或善良这样的心理属性——我们多久表现出一次这样的属性，或是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属性——而是将其视为某个人碰巧有或没有的性质，这些性质组成了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如此精妙、如此复杂的特征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产生于全脑许多不同要素的谋划和相互作用，小到单个突触和蛋白的水平，大到神经网络广泛而复杂的活动。因此，对这些特征难以进行简单的操作性定义，如果没有定量化的技巧，这些特征在脑扫描过程中也难以突显——与记忆容量（memory capacity）不同，机智和善良这类抽象的现象是不容易进行测量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运用这些扫描技术在脑功能方面取得新的重大发现，只是我们不应妄下结论。让我们来看看一项以伦敦注册出租车司机为被试的著名研究，这些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一项考查他们对英国首都的街道和单行线系统了解程度的口头考试。脑成像结果显示，由于工作记忆需要承受巨大负担，这些司机脑中与记忆相关的海马体显著增大。[23]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海马体是该任务的唯一"核心"这一结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记忆有着复杂且多层面的处理过程。记忆包括对多种不同的新技能、新事实、新事件的记录以及随后的检索。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记忆，以及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而经历的不同阶段，都涉及许多脑区和脑机制。[24]

因此，近来对于寻找作为意识的生物学基础的大脑关键特性的尝试，已经从探索特定脑区转向尝试从脑区间的连接中获得启发。许多研究将视线集中在位于大脑外层的皮质和位于大脑深层的丘脑（丘脑的作用是作为不同感官感觉的中继站）之间的连接回路，即丘脑皮层回路。脑中的这一回路为何如此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处于如昏迷等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者身上，丘脑皮层回路功能缺失，提示其可能对意识具有关键作用（尽管也有一些案例中，处在相同状态的患者的这一系列脑区也存在微弱的活动）。第二，与清醒状态相比，丘脑和皮层处的神经细胞在睡眠的早期阶段活动更少。第三，研究者发现，直接应用一种具有唤起作用的化学物质（尼古丁）可以恢复意识，这种化学物质模拟了丘脑皮层回路中化学信使的作用。[25]相反，丘脑的损伤会导致意识的缺失。[26]最后，麻醉消除意识的原理是

通过阻断丘脑和皮层间的连接回路，进而使丘脑细胞不再被来自于皮层的反馈所驱动。[27]尽管知道了这些，我们依然不清楚为什么丘脑-皮层-丘脑回路是意识存在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能将这一脑回路与其他连接区分开的、意识中那一特殊而关键的过程究竟发生在哪里？究竟是什么？

为了满足从意识向无意识转变的要求，一项更有帮助的可能方案是去看一下我们所研究的细胞的真实活动状态。在睡眠期间，大脑皮层会经历短暂爆发式的兴奋周期，它们与较安静的活动交替出现。正是这种丘脑皮层网络的周期性起伏活动，与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变相联系。当丘脑细胞处于静止状态时，这就意味着皮层的靶细胞恢复到某种无负载的默认模式：无意识状态下特有的慢脑波。[28]

之后的研究计划关注更加复杂的机制，而不是“简单地”监控在特定背景下哪个脑区处于激活状态，这种机制平行于意识，且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准确，它说明脑区在何时何处以一种大规模混响震荡的方式相互作用。这些广泛震荡中的一部分与放松和睡眠有关，并且取决于丘脑和皮层间的长程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的频率似乎产生于丘脑或皮层的特殊区域之内，且这些频率被与包括知觉在内的高级认知功能关联了起来。[29]如果神经元集合临时性地同步工作，该过程在功能上或许会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各种可能性——结果证明，40赫兹这个特殊的频率是这一热门关联的特别有希望的候选者。[30]

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这种神经元间的同步活动事实上可能正是大脑的一种常规模式，而不是特殊现象，[31]并且也没有理由将某种特殊的频率视为意识出现的充分、神秘的特异条件。此外，失去意识可能伴随着复杂的大脑前额叶同步性的增加。[32]最后，许多意识体验并不能与大脑的同步活动相联系，而有些高度同步的活动（像是癫痫发作期间出现的那种活动）事实上与意识丧失有关。[33]

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丘脑和皮层之间强大的解剖联系，这种联系带来的最好结果是提供了一种意识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基础，带来的最坏结果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在寻找那难以理解却非常重要的意识的神经关联（NCC）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即许多科学家都倾向于研究他们最了解的神经（“N”），而在意识（“C”）的研究上只花很少的时间。就目前情况来看，丘脑皮层回路碰巧是所有哺乳动物脑内的标准配置，由丘脑皮层回路组成的意识的

神经关联不能解释意识的任何现象学特征，例如情绪调节药物的效果以及物种间的差异，更不用说在人类个体的意识间存在的细微差异，以及我们事实上必须找到一个独特的神经元等价物，它相当于我们在清醒时每一个渐进时刻的体验。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各个脑区的必要性，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它们在意识的形成和保持上有特别的作用，而不仅是脑区间复杂互动的一部分。

另一种研究角度不把重点放在大脑的空间和空间结构上，而是将时间方面的研究作为推进的方向。34似乎只有当神经活动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几百毫秒）后，意识才可能出现。区分“看见”和“没看见”某事件，关键临界点看上去是在270毫秒到500毫秒（千分之一秒）之间。35富有创新精神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提出，尽管对某事件最早的反应早在25毫秒时就已经被记录在大脑中，但对于以某种方式建立该事件的意识，270毫秒到500毫秒的时长是必不可少的。36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关键的因素并非时间本身，而是那个将长时间框架作为其手段的目的。这种目的将会是创建一个恰当的窗口允许“重返”，“重返”是一种在特殊脑区之间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持续性反应。37该理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不要将“重返”与单纯的反馈相混淆，因为反馈作为初始效应的结果，是对某种特定存在的状态进行调节。显然，只有当猴子的脑电波显示一种反应此类神经元激活（重返）的特征性模式时，猴子才会回应它们“看到”某个实验对象。38这种神经元激活同样也会在人类被试中出现。39然而，尽管这种说法看似非常合理，它却不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重返”（在两个脑区之间建立持续交流）如此重要。

那么，让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在追寻意识与某种特定大脑性能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时，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进行——通过解剖学上的缩减，以及不再关注脑区间的联系，而是关注它们最小的组成部分，即单个脑细胞。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监测正在进行脑部手术的人脑中的单个神经元。尽管这听上去有点血腥，但事实上脑内并没有痛觉感受器，所以从20世纪中叶起，让患者在进行脑部手术的过程中保持完全清醒是切实可行的。正如我们所见，加拿大外科医生维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做了惊人的工作。40他一生治疗过五百多名患者，他可以刺激到正在进行手术的重度癫痫患者暴露出来的大脑表面（颞叶）。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会引发什么特别的事件，但令人惊讶的是，患者有时会自发地报告，在被刺激后，他们体验到了生动但

似梦的“记忆”。刺激附近的位点也可以引发相同的“记忆”，而在相同位点，不同时间的刺激可能会引发不同的主观体验。这些发现表明彭菲尔德正在触及到多样化且互相重叠的神经网络，在这些神经网络中，同一个神经元位点可能是多个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不同的神经元位点可能是同一个神经网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神经元不能单独工作，但直到最近，人们才发明了一种更精细的、用于记录单个脑细胞活动的技术，该技术应用在清醒的人类患者身上（而非全身麻醉患者）时，结果令人震惊。在一项起初显得有些古怪的研究中，一位进行神经手术的患者的单个脑细胞被多达7张不同的詹妮弗·安妮斯顿[2]的照片所激活，但该细胞对多达80张的其他照片却没有反应，这其中包括那些可与安妮斯顿相提并论的当代电影明星，如茱莉亚·罗伯茨的照片，甚至包括安妮斯顿和布拉德·皮特的合影。有这样一些特定的脑细胞，只有当被试观看特定明星的照片时，这些脑细胞才会通过增加活性的方式做出反应。在另一个例子中，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测试的细胞中有三分之一（137个细胞中的44个）表现出相同的高度选择性。他们在这一案例中使用的是哈莉·贝瑞的照片，因此这种特殊的脑细胞被称为哈莉·贝瑞神经元。41令科学家惊讶的是，即使展示给被试的是同一个体或物体具有明显差异的照片，这些神经细胞依然做出一致的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不变性”。这些研究表明，认知过程发生在单个神经元的水平上。但是单独一个脑细胞真的可以作为某种独立的实体和决策者（换句话说，作为神经元的最高控制者）发挥作用吗？让我们进一步探索一下这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20世纪中叶，思考大脑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想象成一种等级结构，就像是老板位于类似金字塔形状的结构的顶端，发布一连串的指令。这一概念十分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发现。而二十年后，两位心理学家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维泽尔（Torsten Wiesel）凭借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赢得了诺贝尔奖。42休伯尔和维泽尔正在研究视觉系统并检测多个脑区中单个脑细胞的活动，这些脑区负责处理来自视网膜的信息，并将处理的信息传送进入大脑内部。其中不同寻常的发现是，随着对大脑内部更深处的探索，距离视网膜对信息的初始加工越远，这些细胞似乎就变得越具有选择性。

某个老旧斑点只会让神经元序列中较低等级的神经元激活，而如果要激活视觉系统指挥链中更高等级的神经元，视觉刺激可能得是一条

线，比这更高级的刺激则必须是某个特定方向上的一条线，比这再高级的则必须是一条特定方向上的线只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移动。因此在处理视觉信息时，似乎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层次。来自视网膜的信息经过几个阶段的处理后深入大脑内部，因而我们所研究的细胞位置越深，就会变得普遍性更低，特异性更高。单个脑细胞就有如此个体化的特征，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发现。但这也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推论，这些推论超越了大脑中更明确的、有关物理特性的层级结构的合理概念，转而成为一种关于认知和意识层级的，有些牵强的观点。

随着其位置在大脑层级结构中不断上升，大脑细胞变得选择性越来越强，最终，最高层级的细胞只对精心挑选的、非常复杂的图片做出反应，例如一张面孔，甚至是一张特殊的面孔。当时，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祖母细胞”假设，顾名思义，这些细胞只会在你看到你的祖母时产生反应，这便是脑内结构层次的最高层级，也是信息处理的最终层次。43然而，单个的“祖母细胞”本身就能有效地成为一个具有辨别力的微型大脑这样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简单一想就能明白，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足够的脑细胞来代表“所有可能的概念及其变体”。44还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反驳它：如果你根本没有祖母，那将会有一个细胞多余出来浪费掉；或者如果你确有一个祖母，但你脑中的“祖母细胞”死了（人类每天都有许多神经元死亡），那你就再也不认识你的祖母了！

对这些看似独特的单个神经元有一种更具吸引力、也更复杂的解释：在大脑外侧皮层（视觉皮层）所进行的视觉后期处理能够将不同的视觉信息转化为一种统一、通用的格式（视觉内容不变），以此来存储在不同情况下观看到的同一面孔或物体的不同角度所对应的不同记忆。45然而，大脑的这个神奇技能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证明，患者脑内的某些细胞不仅可以被某人的面孔图片所激活，也会对这个人的名字产生反应。46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变性”是基于与记忆有关的神经连接，而不仅仅是对视觉信息的处理。

如果重温一下在2005年给出哈莉·贝瑞神经元这一概念的那项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最好不要将这个神经元（或另一个同样复杂的神经元）想成是独一无二的，或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如果哈莉·贝瑞以某种方式经由大脑中横跨大片皮层的神经细胞网络（正如很久之前彭菲尔德的成果所表明的那样）而呈现，那么关于最高控制者的问题将会被绕过，而为

细胞被非图像刺激激活的现象提供解释也将成为可能。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深刻地洞察了大脑是如何变得个性化的，以及它是如何适应个体经验的，但这些研究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意识本身。对意识的相关物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单个细胞层面，它在更小的规模上仍有可能存在（这种规模要小得多）。

大约15年前，数学家罗杰·潘洛斯（Roger Penrose）和麻醉师斯图尔特·哈梅洛夫（Stuart Hameroff）想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47]他们的理论逻辑是，由于人们尚未以任何逐步计算（算法）的方式对意识进行令人满意的描述，因此我们需要设想某种新颖的、非算法的脑过程。就像在新兴的量子物理学（一门研究非常小的尺度的科学）中，事物并不像牛顿最初提出的宏观物理学所预测的那样进行运作。这些发现既不涉及脑区，也不涉及脑区间的连接，甚至不涉及单个脑细胞——潘洛斯和哈梅洛夫的理论解释从“微管”开始，微管是每个细胞内部都有的一种微小、坚硬的空心管道。这些微管不停地改变着它们的结构——形成，解体，再形成。正如人们头脑中想法的产生，消失，再产生，微管可变的结构很好地对应了系统作为整体的可能状态（根据量子力学中公认的原则）。一旦募集的神经元数量足够大，一种尚未得到认可的新量子物理学规律便会起到主导作用，并引发向某种特定物理状态的突然转变，这被称为“量子相干性”（quantum coherence），这种突然的转变以某种方式并出于某种原因与脑内意识的某个瞬间相对应。[48]

潘洛斯和哈梅洛夫的方案有一个基本的争议点。驱动着“新物理学”的微管事实上在每个细胞中都存在，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被认为是神经元内与意识相关的量子事件发挥作用的场所。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大脑中何种额外而特殊的约束功能，使它们以如此特别的方式运作着？而更基础的是，这套理论在解答前面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49]。其中至少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即虽然大脑不完全服从算法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套提供了非算法过程的理论就一定能解释意识的过程。[50]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尽管人们提出了多种有关意识的神经关联（NCC）的理论来对意识进行解释，但其中没有一套理论被证明可以完整地解释意识——没有特殊的脑区、脑回路或细胞群被隔离到培养皿中，可以独立地作为意识出现的充要条件。我们用基于神经科学的方法对意识的神经关联进行研究，或许不可避免地会过度关注神经元而忽视

了意识的方面。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套备选方案：不再从物理上的大脑开始，试图找出其某种奇特或有趣的特性，这种特性要足够新颖以作为驱动意识产生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一种相反的方向解决这一问题。用这种新方法，我们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构建出解释意识的“概念”或“模型”，然后我们要用神经科学的方法确定这套“概念”或“模型”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能够令人信服。

四、由理论到实验

在第一批描述意识的理论模型中，有一个模型对意识的描述是基于脑内“黑板”这样的概念，即一种“全局工作空间”。51该理论最初由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eslas Dehaene）及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在该理论中，意识的功能被假定为在多种输入的信息之间进行协调和处理，这些每时每刻输入的信息被送入某种短暂而共同的神经元“论坛”或神经元“平台”。上述这种情形是一种整体状态，即在某一时刻下这种状态占据了大脑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它的存在阻止了其他任何状态的形成，因此便产生了单一的意识状态。

这种脑内单一主导状态具有明显的特征，该特征能与意识相吻合，这启发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被他称为“多重草稿模型”的理论，由此可以确定哪些状态将占据主导地位，即成为某一时刻意识的内容。他提出了一种竞争机制（或者称为优胜劣汰），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最重要的东西，即脑中最有“名望”的状态。52然而，无论意识体验的内容是否如此强大、如此广泛又如此重要，以至于战胜了其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它的范围一定是有其界限的，才能被我们认识。但这个界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正如我们之前从哈莉·贝瑞神经元那里认识到，不存在高于一切的神经元控制器。这种“全局工作空间”和“多重草稿模型”对于理解意识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除了不像之前的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某个固定的场所或某种预先设定的脑特性之外，该理论也只是引进了一种“民主”元素，即一种非特异性的占多数席位的神经元细胞通过控制一个又一个瞬间而占据统治地位。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把意识当作一种过程、一个动词，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名词、一个实体。这一想法看起来似乎愚蠢透顶。然而，自从法国医生兼哲学家朱利安·奥费鲁瓦·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于1747年提出“大脑产生思想就如同肝脏分泌胆汁”，某些思想

家就一直在争论是否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物”——这是泛心论者（Panpsychics）所持有的立场。泛心论是哲学的一个流派，认为意识就是一个实体，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宇宙的一种不可化约的属性，而大脑则类似于某种卫星天线接收着精神上的信号。[53]因此，正如时间和空间虽然独立于大脑但能被大脑所感知一样，意识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当大脑碰巧在其附近时，意识有可能被侦测到，也有可能不被侦测到。不过，在这里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或反对这一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因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对解答问题并没有帮助，从中我们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

然而最近，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提出了另一种更加抽象的概念，[54]他发展出一套名为“综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综合信息”是指减少系统内变量状态之不确定性，而意识则成比例地对应于可以被去除的其他状态的数量。[55]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重返”概念一样，很难看出减少可能性这一概念能对我们理解意识及其与物理大脑的联系有多少帮助。虽然综合信息理论确实有其超越之前那些“定量”理论的优势，即人们更容易在电脑上对其进行更准确的模拟，但关于物理大脑这杯“水”是如何转变成主观经验这杯“酒”的，[56]它依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甚至连二者之间“最小限度的”的关联都没有说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可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任何一种或几种大脑特性上：广泛但不明确的大脑“活动”，[57]或是几个竞争进程中最大的“影响力”[58]，或是可供选择的时间框架，[59]或是迭代“重返”的神经元沟通[60]，或是此处提到的综合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特性都可以通过单纯的“量”加以区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陷阱——这些定量的特性必须要在某个水平上转变成主观意识体验中那如此难以捉摸却又如此特殊的“质”。为什么在跨越了“量”的卢比孔河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质”的内在状态？这种转变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细胞水平上，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作为意识功能所在地的脑区，与那些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被单独选出来的脑区并无差异，所以一定是这一从中浮现的复杂性本身导致了二者间显著的差异。的确有些人，如技术专家兼未来主义者雷·科兹维尔（Ray Kurzweil）把他所有的钱都用于研究这种独立于任何生物学的复杂性。2012年科兹维尔声称，到2029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达到人类水平，在那之后，到2045年，我们

的智力（到那时就是我们文明制造的人类生物机械的智力）将增加一百万倍。61

在科兹维尔的设想中，意识是否仍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很吸引人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那随着被建造出来的机械越来越复杂，意识早晚有一天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一样，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计算机中。62如果“复杂性”是意识出现的唯一且充分的前提条件，那么意识将不再是生物体所独有的特性，而可以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只要这件事物足够“复杂”，正如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曾经开玩笑道：即使是一个老旧的啤酒罐也能有意识。材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考虑其构成材料、只是用复杂和（或）计算的系统进行处理的方法是不完整的。在神经系统中，有大量变幻莫测且功能强大的化合物的传输，以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窗中工作着，产生的效果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和易变性。每个神经元并不像一个啤酒罐，事实上，每个神经元都处在高度活跃的状态，如果你将构成你大脑的1000亿神经元想象成固定元件——一旦插入它们所在的位置就独立于周围环境而持续工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每个神经元在构造和形状方面不断发生着解剖学改变，对它们这种功能的动态性进行着调节，这种调节有助于使进入这些细胞的信号每时每刻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所根据的，是这些特殊的脑细胞周围各种不同的、质量可辨的“调节性”化合物的可得性。63这种在神经化学成分和神经元结构之间发生的强烈而不断变化的互动，与计算机设备那种僵化的回路完全不同。

此外有一个完整的转运体，负责持续不断地给大脑带来反馈信息，并将信息从大脑传递出去。大约20年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指出了那些负责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位进行来回反馈的化学信号的重要性，他将这些化学信号称为“躯体标记”。64我们不应该忽视躯体三大控制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毕竟，如果没有它们之间的互动，生物机能就会出现紊乱，我们也就不会面对那广为人知而又令人迷惑的安慰剂效应[3]。中枢神经系统多种多样的神经化学成分（当然还有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作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质在运作着，这种在质的水平上的运作方式不能仅仅被简化为抽象的量或某种算法。或者即使可以，这种“模型”也应该以

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被讨论和评判，而不是被当作一种科学信条整个地抛向大众。一般来说，对意识的解释越是抽象，越是理论化，那这种解释可能越不符合真实的大脑活动。对于一套解释意识的理论，人们越是期望它做出更好的预测，它就越是应该着手探究意识实际上是什么，至少应该比假设走得更远。65我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回避问题本质的“模型”，也不是一套假设已然明白了意识是什么的理论。这两者都不会好过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意识的神经关联理论，提出我们碰巧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种关联物——它是大脑的一种出人意料的离奇特征。不要去寻找某种孤立的意识的神经关联，或是某种缺乏主观体验证实的抽象模型，是时候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探索之路了。

五、前进之路？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一下所有问题中最基本的、被称为“困难问题”66的问题，即客观大脑事件这杯“水”是如何转变成主观经验这杯“酒”的。67但我们现在确实难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所用的这些方法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从实验到理论的路径，还是从理论到实验的路径。我们应该摒弃那些过于简单的研究——它们可能必要，却总是不能充分地揭示出意识的神经关联（NCC），也要摒弃那些不接地气的理论模型，而应该转向去揭示客观生理学和主观现象学二者之间那更加真实、更加具体的关系。不过我们现在还远远不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的关系。

　　问题在于，心理的本质与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中那些物理过程的本质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意识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大脑物理状态的第三人称视角，二者如何才能描述一种完全相同的过程？这种过程应该如何用一种“双语”的方式进行表达？笛卡尔的观点认为，心灵和大脑事实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但这种将二者彻底分裂的观点似乎不再站得住脚了。显然主观和客观至少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我们则需要判断这种密切的关联是什么。挑战在于去理解意识的精神属性和大脑的物理属性之间的关联，因为生理学（客观视角）和现象学（主体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不断地互为对方的参照。

　　如果我们能确定意识在不同瞬间的精确的神经关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神经关联可能不止一个），那么即便我们仍不能理解现象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当然，就展现特定意识瞬间可以与大脑和身体中各个不同且尤为客观的情

境分别建立连接而言，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进步，这种连接的建立是通过某种神经活动或是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对客观和主观事件给予同等重视的新方法，这是一种共同的“第三语言”，客观和主观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进行同等简便的表达和互动。本书此处提到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将会以现实生活的现象学为出发点，以其为线索来研究这种“第三语言”（类似于“通用货币”）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对日常意识的任何描述需要些什么，而不是立刻钻进大脑中盯着脑细胞和化学物质，希望我们能想出“唯一答案”。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需要的是一份根据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而产生的“购物清单”，而不是在人造的实验室环境中编制的清单。因为在后者的环境中，那些非常重要的元素可能被标准化，被减到最低，甚至被完全忽视。我们不应像实验室中发生的那样把这类简化的现象学硬塞进脑中，而应该看一看它在物质层面是如何与那些多种多样的、源自每天生活的经验相匹配的。之后我们便可以寻找线索，来解释物理大脑是如何应对这些以不同主观经验为特征的各种事件的，并看一下有没有一般性的原理浮现出来。

为了理解意识，我们必须解释大脑中的哪些不同的特征和难题？这里有一张列表，虽然不够详尽，却抓住了某些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闹钟会叫醒你？这看上去可能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但它确实是意识不可否认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人类的意识和非人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差别？同样地，自我意识和婴儿的意识之间又有什么差别？第三，为什么携带图像和声音的输入信息，能让每个个体在视觉和听觉上获得非常不同的主观体验？第四，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识的？第五，诸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的精神症状，以及一些精神活性物质如毒品和酒精，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意识的？第六，一场梦的主观体验与清醒状态的主观体验有何不同？最后，为什么我们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如此不同？

我们要首先研究这些问题，第二步才是神经科学研究——确定我们需要测量哪些脑内指标。这样我们就能用源自每天生活经验的“购物清单”来指导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选择一个单一的特征（无论是丘脑皮层“重返”还是量子相干的微管）。通过依次考虑上述列表中的每个项目，我们便能探索大脑是如何传递解释这些现象学所需的东西的。结果表明，每条项目恰巧符合“典型”一天的不同阶段，因此“你”将成为

我们的向导。并且，在我们追踪“你的”一天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在物理学和现象学、客观和主观之间进行切换。

外面的天空渐渐亮了起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闹钟已经开始嘀嘀叫了。

第二章　醒来

闹钟刺耳的铃声像要刺穿你的脑袋。由于外界的干扰越来越强烈，把你和外界隔绝开的雾蒙蒙般舒适的感觉逐渐消逝了。你笨拙地伸出一只胳膊，摸索着寻找把你吵醒的物体——终于可以消停了，你的周围恢复了宁静。但是这个像小恶魔一样的东西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你醒了。然而在这一刻，你还远没有真正达到“头脑清醒”的状态。你依然闭着眼睛，只是渐渐地要有浅浅的意识了……

一、睡眠

意识原来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地增加，也许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都了解从一场格外深的睡眠中清醒过来是什么感觉，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睡眠的无意识程度随着睡眠的“深度”而不断变化。其实在前一夜，你会经历无意识的五个周期，由浅入深、起起伏伏地不断重复着。在最初的五到十分钟，当你开始有点意识模糊的时候，你仍会保持相对警觉，处于清醒和迷糊的过渡阶段。如果有人试着叫醒你，你甚至可能会说自己刚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的睡着了。这就是第一个阶段，是睡眠周期的开始，也是你逐渐陷入无意识的开始。偶尔，你会在这段时间里体验到奇怪的、极其生动的感觉，好像在坠落或者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有时候，你的身体也会做出一种被你妻子笑称为“一脚踏入梦境”的反应。这种反射的学名是“肌抽跃”，你的腿不由自主地抽动，似乎毫无来由。在整个第一阶段，如果把电极放在你的头皮上，脑电图（EEG, electroencephalogeam）会记录下一种微小而快速的特定脑电波模式（θ波）。[1]

当你更加放松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你的大脑开始产生更复杂的电波信号（8赫兹至15赫兹的“睡眠锭”[4]），每个连续波的振幅忽大忽小，到达顶峰又降下来，这就是第二阶段。你的体温现在正在下降，心率开始减缓。正是从这里开始，你从浅睡眠进入了深睡眠，也就是第三阶段。现在脑电图显示你的脑电波变得更加缓慢，每秒从容不迫地走两到四个周期。一旦这种“Δ波”进一步减缓到0.5赫兹至2赫兹时，你便进入了最深的睡眠阶段，即第四阶段。

大约三十分钟后，你的大脑重新回到第三阶段，之后又回到第二阶段。这是为什么呢？对于无意识来说，当然是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最容易。有一种可能性是，睡眠深度的周期性循环，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大脑陷入最不敏感的状态。在长时间间隔内，一种深度的昏迷状态会对机体内部功能的维持产生负面效果，也会使人或动物对可能的外界危险（诸如虎视眈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捕食者）的反应变弱。无论如何，睡眠深度周期循环有一个有趣的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期本身的时长也会发生变化，可能这一整夜的过程中，大脑的需求也在变化……到了深夜的某个时候，第四阶段完全消失了，而一个新阶段的第一轮周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第五阶段，最初仅持续约十分钟，之后最长几乎能持续一小时。[2]

第五阶段是最为人知的睡眠特征之一，也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简称REM），因为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同时，你的呼吸频率增加，脑电图呈现一种快速的、不规则的波形，代表心理加工能力的增强，与清醒时的状态相似。梦（我们之后会对其详细探索）在这段时间登场了，而且不仅有梦。尽管做梦时你的大脑在忙碌地工作，但肌肉却终于变得更松弛了，并最终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快速眼动睡眠也被称为异相睡眠，因为这时你可能有某种内在的、有意识的体验，但同时你却动弹不得。试想我们做噩梦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我们试着逃离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但又诡异地感觉自己一动都不能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眼动睡眠，你的身体通常返回到浅度睡眠即第一阶段，然后整个晚上再经历大约四至五个周期。[3]那么这些周期是如何被控制的呢？

长期以来，脑科学家已经知道五个睡眠阶段的基础是大脑内一系列特定的化学信使即神经递质在涌动，清醒时也是如此。神经递质作为中介，在一个细胞和另一个细胞之间的狭窄间隙（突触）中扩散，从而增加或降低靶细胞的活跃水平，使其“兴奋”或“被抑制”。在神经科学的语言中，抑制是指一个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电信号）的可能性减小；兴奋则与之相反，指可能性增加。这个关键的电信号持续约千分之一秒（1毫秒），也是大脑细胞活跃并向下一个细胞发出信号的一种指示，是普遍的、全或无的。兴奋的神经元会产生高速的动作电位齐射，而抑制的神经元可以是完全沉寂的。

我们睡觉、清醒或做梦时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组

胺和5-羟色胺）在分子结构上是“近亲”，同时还有第五个（乙酰胆碱）距离稍远些的“远方表亲”，这些可能是大脑中有记录的神经递质中最为人所知，也是最多被记录的。[4]但真正有趣的是它们特有的分布和定位方式：它们不仅能环绕在大脑中固定回路上的单一突触周围，完成自己的传统工作，也能够像喷涌而出的喷泉一样组织起来。每一个由大量脑细胞形成的网络都包含各自的化学“同胞”，聚集在脊柱上方最原始的大脑枢纽（脑干）附近。从这里，枢纽细胞能够将长程信号发送到“更高级”的脑区，建立一种长距离的、弥散性的联系：强效的神经递质被向上、向外释放到大片精细复杂的脑区，特别是大脑皮层。事实证明，这个化学家族的每位成员在清醒和睡眠状态都各自发挥着关键作用。去甲肾上腺素和它的“化学家长”多巴胺，以及它们的“兄弟姐妹”5-羟色胺和组胺在清醒的时候是最充足的，在正常睡眠过程中数量逐渐下降，到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就几乎消失了。[5]与此同时，乙酰胆碱在我们做梦的时候仍然涌动着。[6]那么这些各式各样的神经递质究竟在做什么呢？

原来，这些分子（即我们熟悉的神经递质）具有双重作用，当它们合在一起时，便成为一种调节物质。[7]调节物质并非在突触上传递某个单一信息，就立刻引发兴奋或抑制，与之相反，它将影响脑细胞如何在未来某个时间内对输入的信息做出反应，而非在当时当地就发挥作用。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过程，想象办公室里有传言说要涨工资了。我们知道，电话不响时，没有人会去接电话（传言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外在行为）。但是，当电话铃响起时（标准输入），与之前不知道传言相比，员工可能会更乐意接起电话。调节物质有点像例子中的传言，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它可以放大随后发生的事件。[8]

神经调节的概念（其实也是事实）表明，许多神经科学家依旧受到这样的误导：神经递质对兴奋或抑制起决定性的作用，仿佛神经递质本身的结构已经预先设置并锁定了这种功能。然而，一切都取决于时机，以及神经递质工作时大脑内部的微观情况。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根据调节物质存在与否，某个神经元对输入刺激（另一种神经递质）的反应有所不同。或者当另一种神经递质从来没出现时，反应也不同。我们谈到的时机，也就是偶然出现调节物质和二次输入时，是最重要的。因此，某个原本前后一致的刺激现在被转换成了一种可变的刺激，调节的重大意义便在于为大脑运转提供一定的时间范围，而期间不可能只有简单且一次性的神经递质传递。

与此同时，你还在睡梦中（确切地说现在是半睡半醒），这些关键的调节物质遍布大脑各处，总量水平随时间变化在不断上下浮动，时高时低。它们使大量的脑细胞倾向于一种更活跃或更安静的趋势，是支撑不同睡眠阶段的基础。据此，我们极有可能推测，这些“化学喷泉”对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以及两者间的交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别忘了：毕竟意识似乎不是一个开关。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入睡和清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调节物质可能并非像电灯开关一样完全消除或触发意识，而更像一种亮度调节器。

二、麻醉

睡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麻醉作为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无意识状态也有不同的深度，便不足为奇了。“麻醉之父”亨利·希克曼（Henry Hickman）于19世纪20年代首次报告了二氧化碳引起的意识剥夺效应。然而，直到1937年，美国医生亚瑟·欧内斯特·古德拉（Arthur Ernest Guedel）才详细描述了麻醉的四个阶段，现在我们还在参考这个框架。[9]20世纪中叶，吸入式麻醉剂远不及现在有效，因此诱导麻醉的过程较为缓慢，但是正是这个缺点帮助我们了解古德拉描述的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包含哪几个可被识别的阶段。现在，静脉注射能够快速诱发麻醉状态，阶段化虽然变得不太明显了，但仍然会按照这些步骤展开，只是速度更快。

在第一阶段，你会感受到“止痛”（Analgesia，来自希腊语“痛觉缺失”），这可以通过丧失退缩反应进行确认——比如在你手臂的皮肤上扎一针，而你没有直觉地缩回手臂。在这个阶段，所有你之前能感觉到的疼痛都会缓解，你甚至都不太会注意到自己不觉得疼了，虽然可能你嘴上还在喊疼……接下来当你失去意识，就进入了麻醉的第二阶段，身体会表现出兴奋和谵妄的迹象：瞳孔扩张，呼吸不规律，心律不齐，还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不随意运动，甚至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还会呕吐。当你进入第三阶段即“手术麻醉期”，相应的迹象有：肌肉放松，呼吸放慢，最初转动的眼球开始逐渐不动了，失去了角膜反射（碰到眼睛时会眨眼）以及光刺激产生的瞳孔收缩反应，同时呼吸变得更浅。最终，你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可以准备做手术了。[10]

所以麻醉就像睡眠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现在依旧可以用大约二十年前的方法分析病人的脑电图，来展示手术前缓慢、逐步地失去意识的过程。该程序试图给出一个可读数据，即脑电双频指数

（BIS, Bispectral Index），作为衡量手术麻醉过程中意识（或者说无意识）水平的标准。我们观测脑电双频指数的变化是为了避免一些噩梦般的场景出现，比如过多麻醉导致病人死亡，或者麻醉不足（导致病人仍然有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还是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由于肌松药造成的瘫痪阻碍了言语功能，他们完全无法报告事实。[11]我们在这里提到脑电双频指数的原因是，虽然目前的做法并不完美，但我们确实能在某些情况下量化地研究无意识，而不只是单纯的全或无的状态。

然而，脑电双频指数的问题是它不能对所有麻醉剂给出同样灵敏的数据。因此，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其中的脑机制，我们需要正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不同的麻醉剂必须通过不同的神经元过程起作用，也就是大脑不同的部分；另一方面，所有麻醉剂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意识丧失。在麻醉师看来，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试图解开这个谜。其一，在意识丧失的背后归根结底有一个共同途径。其二，大脑有许多不同的状态，只是表现出的外部特征大体相同。到底两个理论哪个更贴近真相？其实困扰我们、使我们无法做出判断的主要问题在于，比较麻醉剂的技术各不相同，因此很难以公正的方式对（麻醉）结果进行比较。[12]尽管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现无意识的任何普遍机制，但在这里，最直接的结论是：无意识本身确实在深度上是可变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作为变量的意识

如果无意识有不同的程度，在睡眠和麻醉中都是这样，那么意识本身是否也有不同的程度，并且在不断变化？如果意识确实是可变的，很多谜团就更好解开了。例如，胎儿有意识吗？

在孕期的第四周快结束时，人类胚胎的大脑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是前脑、中脑和后脑），在第五周之内开始运作。[13]那么这个小家伙有意识吗？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始的呢？我们暂且假设胚胎没有意识。但是之后，什么时候事情发生了改变呢？也许是当婴儿最终被挤出产道时。假如是这样，那么如果你碰巧是剖腹产，就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你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有意识了。因此，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在足月生产的时候，也就是第四十周到来。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早产儿的父母指着自己的孩子说：“看，九个月到了，孩子昨天还没有意识，但今天就会有了。这下终于值得去医院了。”显而易见，这些场景都太疯狂了，不仅不合常理，而且铁一般的事

实摆在眼前——大脑其实一点儿都不在乎孩子是从脐带还是自己的鼻子接收氧气。所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胎儿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有意识的？毕竟在发育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脑在子宫中的发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脑生理学来看，并没有突然发生某件事或产生某个变化，并且意识肯定不是在出生时才突然产生的。

所以，我们认为更科学也更现实的方式是完全否定“胎儿从来没有过意识”的观点。据此，我们也可以摒弃“意识是某种为大脑定性的灵丹妙药”这一颇为令人不安的观点。与之相反，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调光器开关的画面，把意识看作大脑发育过程中，脑容量和密度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结果。换句话说，无论在子宫中，还是在进化过程中，随着生物大脑的成长，意识也在不断发展。[14]

如果意识确实是不断变化的，那就意味着作为成年人的你，意识水平可能随时变得更高或更低。当我们谈到要“提高”或“深化”自己的意识，其实意识水平提升或下降都没关系，实际上我们已经默默假定了意识有不同的程度，或者不同的量。这样做为什么很有帮助呢？因为我们现在终于能做一些让科学家感到安心的事了，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我们能够测量一些东西，能够把一个公认尚未确认的脑现象，由定性转换成定量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能最终能够在脑内测量到它。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个程度不确定、处于不断变化中而至今未知的过程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可能会用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去发现某个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关联物。所以现在，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还很模糊，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让大脑来运送。以此为起点，我们该如何识别出这里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很明显，脑科学家可以从某些宏观尺度的脑区入手，例如前额叶、丘脑或海马体。毕竟，这些区域最容易用肉眼看到。现在通过彩色的脑扫描图，我们也对它们活动的变化模式很熟悉了。据此，当意识发生时，多个脑区变得活跃起来，[15]这些脑区被扫描图精细地记录了下来，结果可能并不意外——活跃的区域遍布整个大脑。[16]这里立刻出现了一个绊脚石，即麻醉剂对特定脑区的抑制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无意识。[17]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的推论是，一组关键的脑区总体需要共同停止激活，才能最终导致意识丧失。显然，无意识乃至意识，更多依赖于不同脑区之间的关系。[18]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研究表明：在深度睡眠中有一个关键的变化，即脑区之间连接中断时，不同脑区之间的交流变得不那

么有效了。[19]显而易见，指出脑区之间的连接极其重要是一回事，要找到关键的、最小的脑电回路或过程可能是什么以及位置在哪里却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此外，连接与断开连接的“全或无”标准没有给我们“购物清单”上的第一项打勾，即睡眠和麻醉的无意识水平是分级的，而在这些状态下运行的关键过程可能也必然地是相应分级的。

我们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找到一个不断变化的分级过程？唯一的答案是，无意识的基础不是位于大脑关键区域（如大脑皮层或丘脑）内部或之间的某种大脑开关，而是一种过程，神经解剖学的教材尚未对此过程给出明确定义，不能用全或无的电信号来描述它。

在我最初开始学习神经科学时，试图解释脑过程的常见做法是勾画出不同的脑区（像整齐排放的盒子一样），用来来回回的箭头代表脑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每个箭头旁标明“＋”或“-”，代表一种简单的激发或抑制网络。但是，我们已经了解到，大量的神经元之间的沟通都是“调节”式的，也就是说，细胞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细胞群内或细胞群之间，任何最终出现的抑制或兴奋都取决于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细胞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要找到另一种脑机制，这种脑机制可以在超越了单个神经元的水平上运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单个神经元并不作为自主单元发挥作用。总之，无论这个新颖的脑过程是什么，它都类似于这样一种东西——一种时刻不断地变化着的东西。

四、神经元集合

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了一种彻底革命性的理念，即神经元能够适应之前发生的事件，或者说，神经元会学习。他发现，相邻的神经元往往是同步的，这意味着它们会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团体一样，突然一起活跃起来。当它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便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功能网络，能够在被触发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持续运作。[20]赫布还认为，如果它们是像这样集体活跃的，那么这些神经元网络有可能诱发突触发生更长期的改变，反过来会延长和加强该网络内脑细胞之间的沟通交流，我们称之为“赫布突触”（Hebbian synapses）。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呢？

因为这一远见卓识首次解释了大脑如何适应输入的信息，也就是如

何适应环境。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可塑性（plasticity，来源于希腊语*plastikos*，意为能够被改变）。[21]不同物种受本能禁锢的程度不同，因而大脑的可塑性也有所差异，但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可塑性是大脑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于比较简单的动物（例如金鱼），行为与基因的关系更密切，它们的大脑从开始就只有较少的神经元连接，因此相比那些个体经验确实能给大脑留下印记的物种，环境对它们的影响更小。在动物界，我们人类拥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比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占据更多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从丛林到北极，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活繁衍。可以说，我们大脑的可塑性也意味着，在所有物种中，我们拥有最大的潜力，通过个体经验能够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个体，这都要归功于具有适应性的“赫布突触”。

几十年后，赫布的理论构想终于获得了实证支持。神经科学家表明，确实存在一个持久且相对缓慢的细胞适应机制，而且高度局限在个别突触上。[22]它们极大地帮助我们解释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的各种现象，特别是学习和记忆。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有无数发表过的论文、论著成功地研究并运用了这一范式，但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像赫布那样，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从细胞、突触和神经递质的微观层面探索大脑；抑或用一种与之相反的“自上而下”的策略，集中探索终端的脑功能和宏观层面的脑区。但如何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呢？

这些微小的、局部的神经元网络，仍然需要用某种方式反过来影响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产生诸如记忆的认知过程，并解释我们如何成为不同的个体。换言之，在宏观层面（自上而下）和微观层面（自下而上）之间需要架起一座桥梁。如果相邻的神经元同时活跃，那么它们之间的连接将会增强。但是赫布想知道我们能否走得更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许这一随之而来的局部活跃，最终将把更多神经元凝聚起来，引发一种整体的活动和功能。[23]

多年来，我们一直无法在现实中发现或形象化这种假设的、更大规模的神经元集合体。传统电生理学一次只能记录几个神经元的活动，因此不能监测如此广泛的活动。而且它们也从来没有在典型的脑电图中出现过，因此我们推测，它们的活动可能不太持久。要知道，脑成像的时间分辨率，比神经元沟通发生的速率慢了一千多倍，就像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旧照片一样，由于曝光速度太慢，所以只能拍静态

的物体和建筑。而我们用常规的fMRI[5]，只可能看到当前几秒之内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能有助于及时诊断大脑功能障碍。或者，为了放慢被试的行为以符合时间表的要求，你可以让被试完成一项持续重复的任务，而通过这种活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与局部“固定”的微观层面的突触或宏观层面的脑区不同，如果我们假设的这些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中等层级）的集合体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出现的时间又太短暂了，无法通过传统的成像技术记录。

那么，科学家如何才能知道赫布推断出的设想是否正确呢？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连接起来。但是，神经科学目前仅有的技术，便是自上而下的标准解剖和成像技术，以及自下而上的对单个细胞中几个电极的研究。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以色列威茨曼研究所的阿米拉姆·格林瓦德（Amiram Grinvald）在内的一些天才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电压敏感染料成像（voltage-sensitive dye imaging, VSDI）。24有了这种技术，我们突然能够识别一些用传统的、无创的脑成像技术无法探测到的现象。25顾名思义，VSDI能够让研究者读出穿过细胞膜的电压，因此能够用来监测持续的神经元活动。由于染料是实实在在嵌入到细胞膜中的，所以可以在小于1秒的瞬间内直接读出数据。运用这种技术，我们首次可以看到，介于细胞和突触的操作水平和解剖学可辨别的脑区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繁忙的中尺度水平的大脑处理过程——借此，神经元在非常小的时间尺度上形成大规模联合，犹如一个紧密联结的整体一样工作，与大脑中实时发生的事件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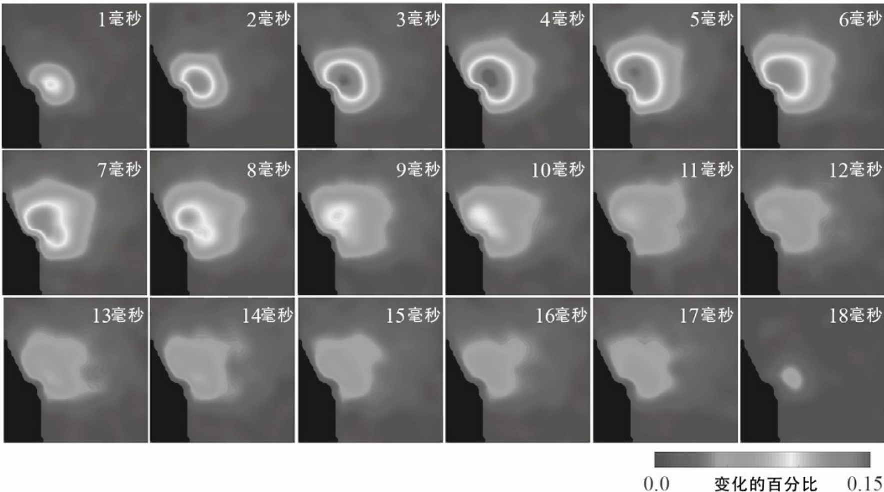


图1：一个“集合体”的可视化图。在大鼠脑切片中，在刺激的初始脉冲持续十分之一微

秒之后，运用电压敏感染料探测，毫秒序列成像，显示出广泛的激活。最活跃的区域在中心位置，向四周逐渐减弱，有点像往水潭里扔石块激起的层层涟漪。（Badin&Greenfield，未出版）（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1。）

上图来自我自己在牛津的研究团队的工作，当时我们用VSDI技术研究大鼠的脑切片。在短暂的电刺激后，我们把产生的脑活动用颜色编码，红色代表高度活跃，紫色则代表不那么活跃。与单个细胞相比，几毫米的尺度已经很大了；然而与解剖学层面定义的脑区相比，它又确实很小。因此，这是一种真正的“介观尺度”。要特别注意它具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在8毫秒内，集合体的活动开始达到峰值，在这个例子中，再过约20毫秒，一切都结束了。传统的脑扫描根本无法探测到这一现象。

由于这些极度短暂的大规模神经元集合还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现象，对其严谨的定义尚未达成明确共识，因此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里，它被称为“神经元集合”，我们给出的定义是：可变的、高度瞬态（亚秒级）的宏观尺度的脑细胞组（例如约1000万或者更多），解剖学层面的脑区或系统无法定义或限定它。[26]

当我们在工作日早上的“清醒之旅”中行进时，意识状态如潮起潮落般不断变化着。而我认为，唯一能够令大脑适应这种变化的方式，发生在介于宏观脑区和微观单个神经元之间的层面：这是瞬间的、集体的脑细胞活动形成的一个中层组织，为了适应各种意识深度，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扩大或缩小。因此，如果意识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它可能与大脑中我们将称之为“集合”的物理现象相关。

尽管脑切片成像能够显示神经元集合的具体内容，但只有研究完整的活体动物大脑（术语称为“活体内”），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大脑到底如何工作以及工作内容有哪些。在这类实验中，初始触发刺激可以更自然一点，比如说一束光，[27]或只是触碰一下大鼠的胡须（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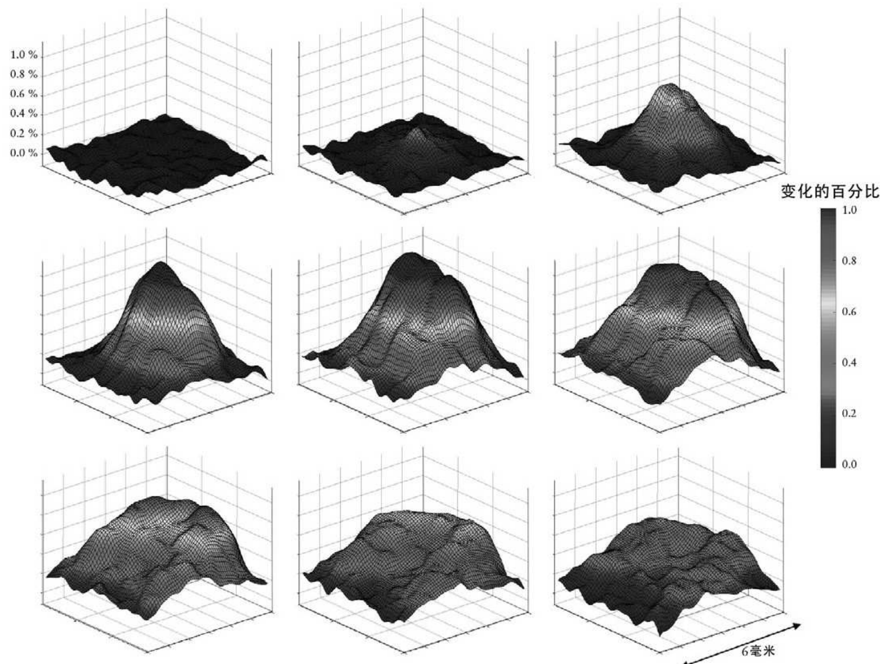


图2：触发刺激是偏转被麻醉的大鼠的胡须。3D图像显示了每隔5毫秒，在被麻醉大鼠无损的感觉皮层上产生的一个神经元集合。请注意，集合的直径比背景噪音高出约6-7毫秒。2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时间窗（40毫秒）对于传统脑成像来说太快了，运用常规的电生理技术完全无法记录详细的空间模式。（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2）

然而，在大脑切片和麻醉的大脑中，我们看到的神经元集合有点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潭里之后产生的层层涟漪。一块石头比它激起的涟漪要小得多，与此类似，即使是对一个短暂的光刺激做出反应，由此产生的神经元集合的活动也将会暂时蔓延到更大的区域，29其范围远大于皮层细胞千篇一律的固定回路排列。30

但是，当你用光学成像观察麻醉动物的大脑时，还会看到一些通常在脑切片中看不到的东西。你会发现，即使没有任何明显的刺激，大脑也会保持活跃。整个大脑中活跃着如脉动一般大规模的振荡。我们知道用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说，它们的出现是因为不同细胞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神经元像一个个具有不同延迟程度的振荡器一样组合了起来。31如果一组神经元聚集了正确的特性，这种振荡便可以无限持续下去，为一次性刺激或事件产生的任何其他现象提供一种背景。32

显然，大脑不是个百分百机械式的组织结构，并不像电脑一样由各

种线把不同功能区连接起来，具有特定节点和二进制开/关功能状态。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大脑局部层面上存在这种连接，但这远非大脑的全貌。换句话说，大脑不是一栋固化僵硬的建筑。相反，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绵延起伏的大海，时而平静，时而碧波荡漾，时而波涛汹涌，甚至惊涛骇浪。在所有这些神经元的振荡之上，叠加了一次性的刺激——大脑内部驱力或外部感官刺激，它们将造成一次偶发的神经元集合。[33]

为了对意识及其相关现象给出恰当的描述，一个神经元集合就可以符合“购物清单”上提出的要求吗？如果可以，它也应该能被消除意识的媒介所修改，例如麻醉剂。此前我们看到，关于麻醉剂存在着一个基本悖论，即我们还没有发现能够解释它们如何起作用的任何单一过程。然而，也许正是在这里，在“介观尺度”的神经元集合上，我们最终能发现不同麻醉剂之间的某种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最终导致意识丧失这个单一的共同结果。毕竟，这些强劲的药物形状大小各异，而在实际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内容能够将它们定义为一组，以和其他精神科药物区别开来，甚至是那些可以在临床上发挥补充剂作用的药物，例如止痛药（止痛剂）。在这两种情况下，从传统自下而上的单个细胞层面上来看，麻醉剂和止痛剂都可以产生相似的效果：降低活性，也就是抑制。那么，对比消除疼痛和消除意识的药物，它们最重要的功能差异在哪里呢？

在一项实验中，我们研究了与止痛药相比，不同化学成分的麻醉剂是否对神经元集合的动力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结果表明，止痛药对脑切片中的神经元集合没有影响，但与之相对的惊人结果是，两种麻醉剂确实有影响。它们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麻醉药物，却有相同的净效应，都能够通过延长集合的持续时间来修改集合。[34]因此，对于麻醉剂来说，无论它们在微观层面对大脑内部有哪些不同的作用，重要的是它们对介观尺度的神经元集合有着相似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单个孤立的脑区与意识没有一对一的关系。然而，这个发现告诉我们，神经元集合以某种方式与最终的意识或无意识状态相关，这使得它们会受到那些意识阻断剂的特殊影响，而像止痛药一样仅仅能改变意识内容的物质对神经元集合则没有影响，当使用止痛药时，你只是感觉不到疼了，却依然保持着清醒。只有被定义为具有剥夺意识的能力的麻醉剂，才能在不同情况下延长集合持续的时间。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持续的癫痫发作会阻断意识。[35]因此，持续的集合

激活也可能最终导致相似的结果。然而，我们这里所用的脑切片无法从有意识逐渐变得无意识，因为它们从最开始就是没有意识的。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我们确实需要在理想情况下，让脑切片准备就绪，然后用某种方法模拟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

有一种可能性是利用一个违反直觉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当大脑暴露在极高的气压下（在实验过程中）时，持续麻醉产生的意识剥夺现象会出现令人惊讶的逆转：实验中的被试（通常是蝌蚪或小鼠）苏醒过来了。36如果直接环境发生类似的改变，令完好的机体恢复意识，那么这种改变对脑切片中神经元集合的各个方面有影响吗？

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极高的气压（32个大气压）下，当麻醉状态被逆转时，脑切片中的集合变大了很多（见图3），表明更大量的神经元集体活跃起来。37这些结果也证明了，高压条件确实会对特殊的脑现象（集合）有实质影响。相应地，它也是某种意识的神经元关联的合适候选：极大地修改意识状态的实验条件，也会极大地修改特定脑区的集合。38，39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在更自然的设置中测试麻醉剂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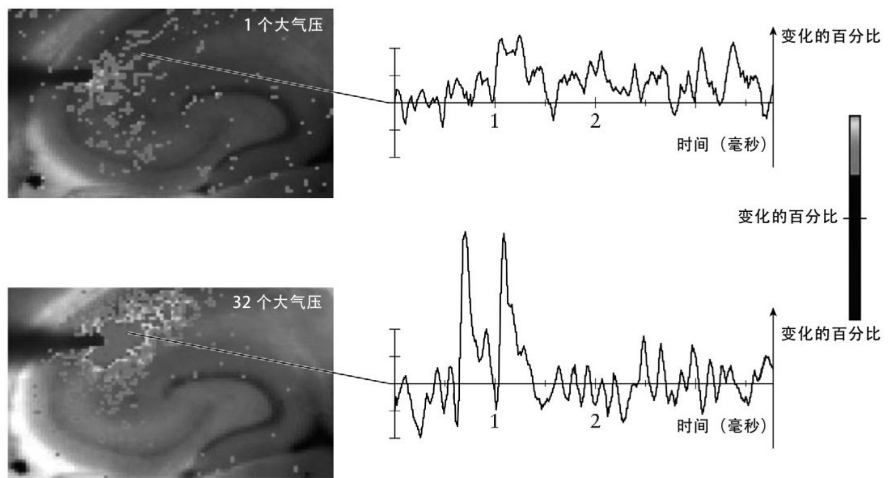


图3：在正常气压（上图）和高压（下图）下，运用光学成像，得到大鼠脑切片海马区产生的集合的荧光图。信号振幅代表活跃程度。在高压条件下，集合范围更大。在不同气压条件下，一个小范围组织随时间变化的反应如右侧图所示。40（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3）

于是，我们研究了麻醉剂对活体大鼠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我们记录的是对大脑整体的影响——实际上是对整只动物的影响。由于光学成像的侵入性特质，显然，在全部实验过程中，要对动物进行外科麻

醉。但是，多亏了麻醉效果的分级特性，我们能够比较浅层和深度外科麻醉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浅层麻醉条件下，鼠脑产生的集合比深度麻醉条件下的面积更大。[41]随着麻醉程度的加深，皮层上集合的尺寸变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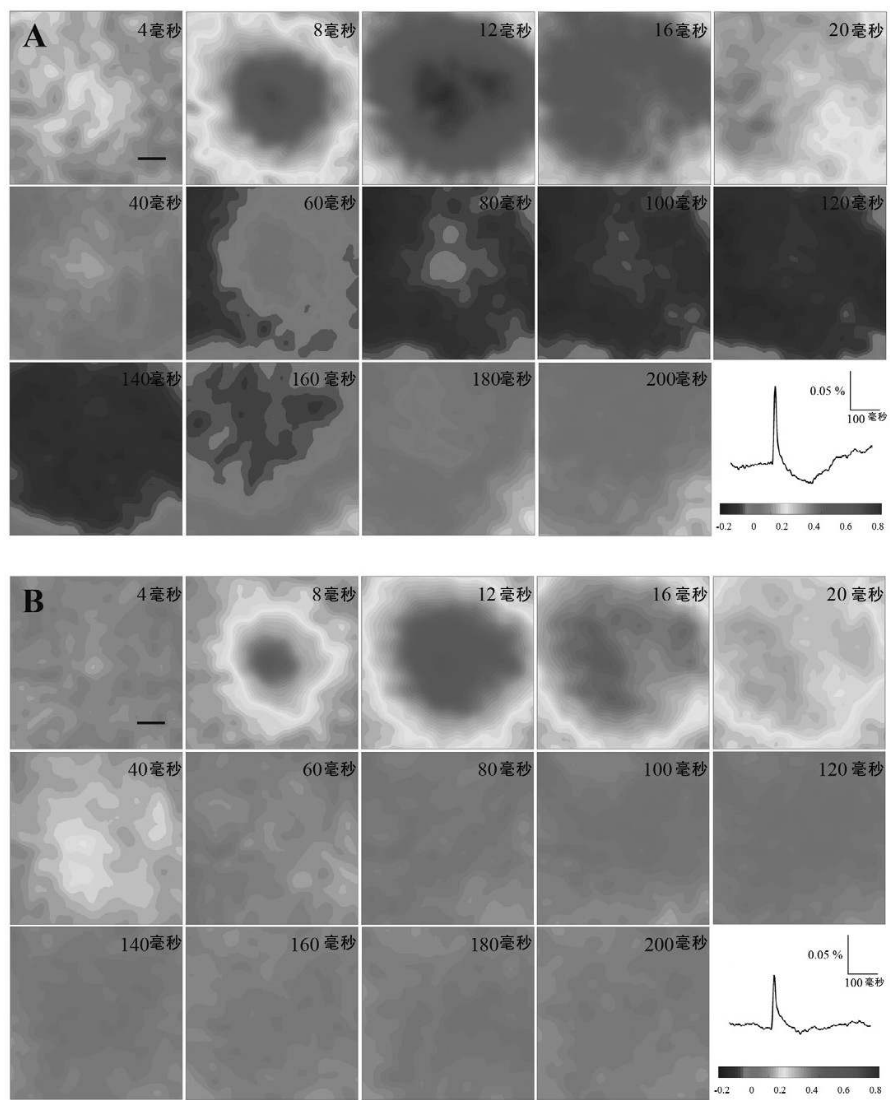


图4：在浅层（A）和深度（B）麻醉条件下，刺激大鼠胡须引发的集合。[45]注意，浅层麻醉时，强烈激活后出现了反弹性的抑制。但深度麻醉时，降低激活后并不会产生这种效应。右上角显示了刺激开始后的时间，注意第二行和第三行中时间间隔的变化。比例尺：500微米（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4）

此外，浅层麻醉下产生的集合很快被抑制了活性的反弹窗口所限制

（图4），也许为了确保集合在清晰的背景下仍然能作为更清晰的信号出现。一旦麻醉程度加深，这种效应就不见了，很可能是因为它需要大脑整体的相互连接才能起作用。

最终，或许可以预见的是，在浅层麻醉条件下，产生集合的速度更快。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种持续的效应，正如我们在切片实验中看到的一样。在深度麻醉时，偏转大鼠胡须产生的集合现在能保持更长时间了，再次和切片实验中的结果一致。但是这次是在完好的皮层上，我们看到麻醉似乎延长了集合的时间，令它的持续时间明显变长，这可能会阻碍进一步形成其他的集合。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神经元集合以某种方式，与意识及意识丧失相联系。理由如下：首先，麻醉剂比止痛药对它们的影响大；[42]其次，它们都对高压这一条件敏感，而高压能够逆转麻醉；[43]最后，它们反映了不同深度的麻醉状态。[44]试图把这三个不同的实验结果拼凑起来解释麻醉剂的作用，似乎有点太早了。让我们等到这一天结束，收集更多观察结果，再看是否能得出一些全面的理论吧。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能看到在不同条件下，集合的工作情况。这是一种真实存在、自然发生的现象。同时，鉴于它们快速而短暂的时间范围、广阔的空间范围、持续多变的性质，以及对改变意识的处理的敏感性，都可以在我们的"购物清单"上打勾了。话说回来，当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大脑信息处理的水平确实可以作为衡量意识程度的一个好的指标。

集合的动力学特性与麻醉剂的影响可能相关，但是要说二者的联系决定了我们是否有意识，还远远不够。尽管如此，麻醉师布莱恩·波拉德（Brain　Pollard）及其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团队[46]已经自主研发了一种技术，能够进一步验证集合与意识之间的联系，这种技术叫作"诱发反应的功能性电阻抗断层成像"（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 Response，简称fEITER）。用电刺激大脑，然后监测穿过头骨的结果（电阻），时间分辨率是VSDI的两倍，也就是约500微秒！[47]我们无法将电压敏感染料的光学成像直接用在意识清醒的人身上——甚至用在失去意识的人身上也不行，而波拉德的方法打开了人类神经元集合可视化的新可能。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我认为在大脑中，大规模神经元集合的瞬时结构，与每时每刻不同程度的意识有关。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对集合的监控和操作将会提供一种宝贵的途径，帮助我们对此前难以研

究的心理现实进行探索。我们最终能通过研究集合中神经元之间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相关性，首次做到还原真实的脑内情况。

意识的程度有点像把石头扔进水潭时产生的层层涟漪。试想一下，尽管阵阵微风吹过，水面已经波浪起伏，你还是把石头扔进去了，石头激起了各种清晰的波纹图案。石头本身是恒常或准恒常的物质，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个确定不变的物体。它不大，但激起的涟漪大小却远远超出它本身。石头是准恒常的物体，但涟漪却是稍纵即逝的。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的是，涟漪的扩散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时刻集合的范围以及意识的程度，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独立因素决定的。例如，产生集合（涟漪）的大小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因为触发刺激的强度不同（比如说闹钟），另一方面也因为神经元同步的难易程度不同，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促进“调节性”的化学物质的利用率，这些物质主要与唤醒水平及睡眠——觉醒周期有关。然而，我们也并非仅凭原始感觉所驱动的意识过一辈子，某个瞬间产生的一个集合的最终范围，也会由其他因素决定。

最重要的是，石头本身是存在的，投掷石头的外力和石头的大小都是具有可变性的。投掷石头的外力就是心理物理刺激的强度，而石头的大小可以被视为一种内部的、预先存在的固有网络的范围，这种固有网络会被最先激活。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由功能上相互连接的细胞所组成的局部枢纽是神经科学的标准模式：事实上，这最初是由唐纳德·赫布在上世纪中叶提出的，后来又被“长时程增强”[6]现象所证实，即同时活跃的细胞形成局部的、持久的固有连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连接想象成一种神经元石头。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连接脑细胞的枢纽太过局部化，太过固定，形成时间也太慢了，无法满足我们组成意识的“购物清单”的要求。

然而，“石头”需要有不同的大小，正是这种局部且持久的连接满足了这个要求，正如传入刺激（比如闹钟响的声音）对连接的激活需要符合激活连接的要求。那么接下来，什么才能在现象学上等价于或大或小的石头，即广泛或适中的固有枢纽呢？当我们追踪研究你的一天时，便开始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窗外，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该起床咯。

第三章　遛狗

当你睁开眼睛，环视着你的卧室，你脑中立刻出现的想法就是你起床之后应该做什么。至少到现在你已经完全清醒了，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儿，自己昨天做了什么，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止接下来的十二小时，甚至整个一周，你独特的生活结构将从此刻开始令人安心地展开，进入一个轮廓清晰、井然有序的图景当中。从期望在羽绒被下依偎更长时间的简单而被动的意识，发展到如此专注地指向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当下所处的卧室正在被一个充满事务和会议的嘈杂的假想世界所替代，而你作为一个个体也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毫无疑问，你的意识在此前的几分钟以某种方式“深化”或“成熟”了。因此现在肯定有一些额外的因素参与进来，为这个更有意义、更加个体化的世界的形成提供了帮助，这些因素将你从单纯地沉浸此时此刻带进这个更加个人化的“认知”图景中。

你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胡乱穿上几件衣服，跌跌撞撞地下了楼。你发现在这大清早，你养的边境牧羊犬波波早已迫不及待而又欣喜若狂地等着你了，他嘴里叼着遛狗的绳子，不停地冲你摇着尾巴。现在已经没时间喝咖啡了，更别说吃早饭了，要是现在不立刻带着波波去遛弯儿，可就没法得到安宁了。但也许新鲜的空气和有节奏的步伐（机械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将使你在这段时间里能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和思考。正如尼采曾宣称：“所有真正伟大的想法都产生于行走中。”

这种观点似乎与我们通常的直觉是相反的：由于大脑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那么当两项任务同时进行时（比如说散步和思考），其中一项任务的表现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一点最近已经被证明：高强度的数字媒体多任务处理与某些大脑区域的连接减少有关。[1]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与彼此相似并竞争着相同神经资源的并行屏幕活动不同，人们有多个心智资源池，每个资源池都对应着不同的任务。当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彼此完全相异时，活动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事实证明，真实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处是可以改善注意力。因此，当人们做着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这

种完全不同于思考的行为时，认知表现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研究表明，当被试按照自己选择的步速行走时，他们的工作记忆也显著改善。[2]

此外，当谈到如何运用你的大脑时，你所生活的是自然环境还是城市环境有着很大的区别。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研究者们选用了两种测量方式来评估大脑能力。[3]首先，在评估注意力的任务中，被试首先听取一段长度为三到九个数字的数字串，然后以倒序的方式复述出来。此时，任务的表现取决于你的直接注意能力，因为你需要将这些数字移入和移出你的关注焦点。这是短时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一项基于计算机的任务对三种类型的注意进行了测量：警觉注意、定向注意和执行注意，其中执行注意需要最大的控制。

在确定运用这些心理能力的测试后，接下来便是分别测量被试在安娜堡市植物园（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充满了树木、可以随意行走的地方）步行50分钟、行走将近3英里前后的各项指标。这些环境带来的影响被拿来与被试在安娜堡市中心的生活体验进行对比——显然，后者暴露在一个繁忙、吵闹且交通拥堵的环境中。更有意思的是，仅仅看了十分钟城市或自然环境照片的一组被试，在观看照片之前和之后也接受了相同的注意力测试。之所以将使用照片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是为了对看上去受益于自然环境变量的关键因素增加一个控制组，以此避免研究所得的效应产生于自然环境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安静与平和，而非自然环境本身。令人惊讶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漫步的体验，还是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观看照片，二者都会对大脑产生显著的影响。[4]那些在植物园中散步或是仅仅观看自然环境照片的被试，其执行注意的测试分数显著改善；但是那些在市中心步行或观看市中心场景照片的被试却并没有表现出相同的改善。似乎仅仅暴露在二维的乡村环境中，仅仅通过图片触发对美好环境的联想，也可以促进认知能力——大脑在任意时间点能保留下来的信息总量。

研究者通过对比主动注意和被动反应性注意来解释这些发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大多数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城市环境，充斥着纷杂的刺激，吸引着我们的注意。这类环境因此占据着我们注意过程中更偏反应性的成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诸如车祸之类的事情发生。与之相反，自然环境让我们免于这种永无止息的，对外界环境的反应性注意，而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我们的意识塑造得更为主动、积极。在某一时刻，是你自己做出决定，是要更近距离地观察一盆植物，还是要远眺

广袤的地平线，然后或许斜靠在一棵树下。这种由内在动力驱使的一系列事件将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包括恢复控制感，以及让你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和深化你的思想。

一个有关自然影响力的更加极端的实验，涉及一项在缅因州、科罗拉多州或阿拉斯加进行为期四天的徒步旅行所产生的效应的研究，研究的不只是对认知方面的影响，还包括对至今仍然难以捉摸的创造力现象的影响。[5]徒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徒步参与者接受了一项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es Test），这是一种客观地评估被试创造力的方法：通常情况下被试要回答三十到四十个问题，每个问题中都包含三个日常用语，这三个词汇初看起来并无关联，被试的任务是想出第四个词语，使其能分别与前面三个词语相关联。例如，前三个常见词语是“易碎的”“清晰的”以及“眼睛”，那第四个词就可以是“玻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经过四天的徒步旅行后，参与者的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分数比其徒步旅行前所测的分数高出50%。然而，由于干预条件是极端且没有限制的自然环境，因此很难在这些不受控制的因素中找出究竟哪个影响最大。是参与者进行的锻炼？是参与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参与者没有了电子设备？还是仅仅由于参与者有了更好的睡眠、新鲜的空气以及更多的社交互动？

不管怎样，这种环境与你现在所处的户外环境是相同的，此时你正踉踉跄跄地被狗拽着往前走。外部世界的刺激不断提醒着你它们的存在，但至少现在，你不必急迫地对那些进入你意识的、碎片化的、令你分心的事物做出反应。相反，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些输入的感觉信息，将它们整合到一起，甚至可以以一种新颖而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在头脑中把它们联系起来。无论如何，你都已经开始深深地呼吸着外界的空气，不仅关注外在世界，同时也开始关注内在世界——开始进行思考。

归根结底，一种感觉仅仅包括对此时此地的体验。这不取决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也不取决于任何以往的背景和未来的计划：大笑和尖叫都是自发的、原始的反应。因此，摇着尾巴的狗和咯咯笑着的婴儿分别产生了最原始意识类型的进化（系统发生）和发展（个体发生）的表现，这种最原始的意识类型是一种由原始的感觉和反应所支配的意识。与之相对，你现在所能想到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思想——记忆、幻想、逻辑论证或商业计划，这些都有着一项原始感受和情感所不具备的必要

基本特征。对于一个想法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是时间框架：它有着开始、中间和结尾，这样无论从哪里出发，你都将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你又该如何到达这个新的地方，获得新的结论、新的关键点或新的解决方法？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以一种明确、线性的方式从一步走到下一步，我们甚至将其称为“直线型思维”。

有趣的是，开发出目前仍用于运动障碍疾病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案的著名神经学家欧勒·霍尼克维兹（Oleh Hornykiewicz）沿着同一条“线”（这里我有意使用了双关语），将思维定义为“局限于大脑中的运动”。因此，如果思维是不同于情感的一系列步骤，那它将会是一种运动：旅程越长，思维越“深入”。此外，走路的实际生理行为可能会放大并因此强化这种内部过程：通过将大脑内部正在发生的内容反映在外部运动中，通过在每一步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联系，伴随着心理过程被身体过程所强化，重复性的肌肉收缩能帮助心灵的“漫步”不致偏离轨道。

而遛狗这一活动可能会更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正如时政记者艾德·斯托顿（Ed Stourton）在他有趣的《遛狗日记》（*Diary of a Dog Walker*）中记录的那样：“遛狗就像读一本小说或是观看一场戏剧。在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里，‘怀疑’这项功能被暂停，我们获得了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许可证。狗生命中那些丰富的幻想和非常平凡的时刻反而奇迹般地成为了我们欢笑甚至担忧的源泉。”[6]

大概任何遛狗的人都会坚持认为他们的狗是有意识的，否则为何要在你的宠物身上浪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呢？正如斯托顿所写的，“尽管我们知道一只狗不过就是一只狗，然而我们依然会将我们的狗视为朋友一样谈论和思考它们，将它们视为对我们有情感需求的个体”。但狗的意识体验究竟是怎样的呢？狗的主观体验与我们人的主观体验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非人类意识

事实上，这和我们在讨论胎儿意识时突然出现的那个基本问题并无二致：意识之光是何时全部进入到这个新近成形的人类大脑中的？这两个由胎儿和动物提出的像孪生兄弟一样的问题，可能给了我们一条线索。那么，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思考胎儿意识的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多思考一下非人类和人类意识之间的对比。正如意识可能随着个体的成长而成长（个体发生），在进化（系统发生）的层面

上难道不是以相同的过程进行的吗？换句话说，意识的发展能否与进化同步进行？

人类的大脑与老鼠、松鼠、兔子、骆驼、猫、猴子等动物的大脑是不同的，正如这些动物的大脑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在动物界，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大脑结构，并有着自身特殊的变异，其中某些解剖区域的发达是以其他区域的减退为代价的。某些动物的大脑在形状上可能非常夸张，而大脑的总体大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基本结构模型是相同的。没有清晰的解剖分界线，没有一条“卢比孔河”等待着你去跨越，以此让你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这一物种是有意识的，而那个物种只不过是毫无理性的机器。”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由海洋生物学家托比·科林斯（Toby Collins）提出的例子。科林斯被神经科学所吸引，并在后来加入了我的实验室工作。他从早年的专业学习中建立了独特的视角，于是提出了一些关于章鱼的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政府立法强制管控那些在有生命的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身上所进行的实验研究，以此保证实验过程尽可能地人道和无痛。有趣的是，至少在英国，以这种方式接受保护的动物名单还包括一种无脊椎动物——普通的章鱼。科学家被禁止在不麻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诸如手术等侵入性操作，并且应该假定这类动物可以感觉到疼痛。然而，一种非常近似章鱼的物种——麝香章鱼却不受这类立法的保护，因此便不会受到上述这些优待。但二者的区别在哪呢？其实在这两类章鱼之间并没有真正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然而悖谬的是，其中一类受到立法保护而另一类却没有。显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宣称某种动物具有内在的主观状态，而另一种动物仅仅是某种具有八只触手的机器。

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吗？当时明星章鱼保罗似乎表现出了如此明显的“意识”，它能够预测即将进行的比赛的结果。尽管如此，与其近似物种比起来，像保罗这样的头足类动物却从未真正地接受过关于它们“智力”的正式评估。不过，这些章鱼长久以来一直被用于记忆方面的实验，这多亏了一位青年天才海洋生物学家J.Z.扬（J.Z.Young）对它们的关注。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那不勒斯工作，并为这些章鱼的解剖结构所深深吸引。扬首先向人们展示了章鱼确实能够进行有效的认知。举例来说，它们能够根据大小、形状和颜色区分不同的物体。[7]此外，章鱼区分不同形状物体所采用的方法，被证明与诸如金鱼和老鼠等脊椎动物所采

用的方法相同。[8]

最近，章鱼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记忆技巧和问题解决能力，如通过学习在一个有机玻璃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通路以获取奖励，又如从一个用瓶塞封口的透明玻璃瓶中取出一个物体。[9]更广泛地说，作为一个群体，头足类动物表现出强大的行为适应能力。与此同时，外显学习[7]的个案报告表明，它们具有高度发达的记忆力和注意能力。而且在让章鱼挑战带有障碍物的迷宫的各类实验中，科学家取得了长足进展，甚至有的科学家认为章鱼在行动前会先“考虑”一下迷宫的布局。[10]这些明显具有智慧的头足类动物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解决问题，并且他们不只是模仿，而是以一种能显示出其确实有记忆技巧的方式。[11]

这些无脊椎动物令人惊讶的智力水平证明了：无论是章鱼这一种特殊的物种，还是头足类动物这一大类物种，都应该和动物界的其他物种一样具备意识。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又将面临一个真正有趣的谜题，即章鱼的大脑和哺乳动物的大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诸如大脑皮层和丘脑皮层回路等被认为是意识存在基础的解剖区域，在章鱼大脑中连任何可以与之类比的形式都不存在。

成年章鱼的大脑由一亿七千万个细胞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神经元。[12]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大脑至少有八百四十亿个脑细胞。[13]尽管如此，包括章鱼在内的头足类动物具有复杂的感觉接收器和神经系统，其复杂程度足以与某些脊椎动物如鸟类的神经系统相比。然而，尽管头足类动物的大脑可能没有精细复杂的丘脑皮层回路，但它依然有更为基础的机制，包括神经元和突触，以及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神经递质。[14]所以，虽然还没有被直接证明，但我们仍可以说具有意识的章鱼有足够的神经复杂程度来产生集合。我们早已明确，应该从宏观解剖区域的僵化框架中解放思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关键”脑区这一概念本质上都无法对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提供真正有用的解释。相反，非哺乳动物大脑的差异再次证明神经元集合将为发现意识的神经关联提供一个更有帮助的出发点。毕竟，这些介观尺度的现象对某些类型的动物大脑，在解剖和生理层面的要求没有那么多。此外，神经元集合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此其更为灵活，其大小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不同的物种间可以连续地扩大或缩小（因此其具有产生不同意识的潜在可能）。

像章鱼这样“简单”的动物很可能是具有意识的，但这种意识并不同

于大鼠这类动物的意识。而老鼠也是具有意识的，但其意识又与狗或猫的意识不同。而狗和猫同样是具有意识的，但又与灵长类动物的意识不同。正如我们看到的，胎儿是有意识的，但其意识与儿童的意识不同；儿童所具有的意识，又与成人的意识不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意识的层次这一方面，最重要的量变的界限在哪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对于章鱼来说，形成暂时性的、大规模的神经元联合的基本潜能正如前一章中的胎儿之谜一样，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神经元集合的净尺寸。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些不同的参数，这些参数将会最终决定如何评估意识的深度，正如将石头扔进水中产生涟漪的广度。这个比喻在我们探索的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依次分析导致最终结果的不同因素。因为石头的大小不同，投掷的力量也不同，随之而来的涟漪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类比在探索大脑过程时也适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购物清单，终于可以开始访问大脑，并探索神经元之“石”和相当于“扔”这个动作的大脑过程是什么样子了。

二、制造涟漪：石头的尺寸以及投掷的力度

无论你是谁，是年轻还是年长，无论你有着怎样的大脑，甚至无论你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种，只要你不是一个聋子，那闹钟最终都会把你叫醒。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噪音立刻就能把你推进意识之中？

在神经科学的意义上，你可以把闹钟想象成扔出去的一块石头。如果扔得足够用力，那即使是很小的一块石头也能产生至关重要的涟漪。如果这个噪音（投掷）足够响，便可以通过正常的感觉通路激活一个联结紧密、与听觉相关的脑细胞枢纽（石头），这一过程如此有力，以至于会产生一种更加广泛的细胞联合，也就是短暂产生一个集合（涟漪）。任何具有功能正常的听觉系统的动物，无论在任何的年龄段或任何文化背景下，都会被巨大的噪音从睡梦中拽出来，推进某种意识之中。随之产生的意识类型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内容，此处关键的因素仅仅是这个触发——石头的大小以及投掷的力度将最终决定涟漪的广度。

如果说投掷石头的力度（闹钟的响度）由外部因素所决定，那石头的大小则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个体大脑的内部结构。在任何物种中（特别是在更为复杂的动物身上，如我们自己），个体脑细胞固有枢纽的结构和连接可能是决定下一个重要变量（对应于“石头大小”的神经系统）

的关键。随着我们大脑的发展，这种连接将被我们对外界世界的体验所塑造。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你的体验近乎在字面意义上在你脑中留下印记的现象被称为“可塑性”。

在所有物种的大脑中，都会有神经元被传入的感觉信息不同强度地激活（投掷石头时所用力气的不同）。但固有枢纽中的神经元数量（石头的大小），却根据这种动物大脑中神经元特殊的结构和联系而独立变换着。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声音或景象以相同的强度作用于感觉器官，将会在不同的大脑中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是因为石头的大小各不相同，即在固有枢纽中能被激活的神经元细胞数不同。而反过来，固有枢纽的广度也将取决于另一个关键因素：个体早年与所处环境的互动。我们所讨论的物种越复杂，其自身经历在大脑中留下印刻的能力越强，而石头大小的可变性也越大。那么让我们再来想一下那个被扔进水中的石头吧：不必像野蛮的闹钟一样那么用力地投掷，相反，宽广涟漪的产生可能仅仅是因为扔进水中的石头很大。用神经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通过持久、稳定的联系，脑细胞枢纽逐渐扩大，这一过程反过来也被开拓大脑可塑性的个体经验所驱使着。

这种在体验驱动下脑内细胞联系的增长（也就是石头的变大），同样可以发生在非人类物种中，只是增长的程度要小得多。以成年老鼠为例，一只老鼠的母亲对这只老鼠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持久的个体意义，但其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特殊体验一般都将会在这只老鼠的大脑中留下印记。如果在实验室中检验这种效果，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创建一个所谓的“富足的环境”。对老鼠来说，“富足”并不意味着要让它们从镶满珠宝的储料器中吃进口的食物，或是住在金笼子里。这里的“富足”意味着环境要尽可能多地刺激老鼠的大脑。因此，如果你想给予老鼠最大的刺激，所要做的就是确保它有机会对各种不同的新奇对象进行高度探索性的体验（见图5）。

尽管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虚构中，老鼠普遍被妖魔化，但事实上老鼠是一种充满好奇心且很有智慧的生物，并且即使只有一半的可能性，它们也会对它们所处的环境进行探索。相应地，它们的大脑也反映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在丰富的环境中依赖于经验的可塑性在20世纪40年代被首次研究证实。当时，前文中提到的唐纳德·赫布将实验室中的大鼠带回了家，让它们可以体验一种全新的交互式环境，这与它们在实验室中所待的笼子完全不同。数周后，与那些不幸地依然生活在普通笼子里的

控制组大鼠相比，赫布家中这些“放养”的大鼠表现出了卓越的问题解决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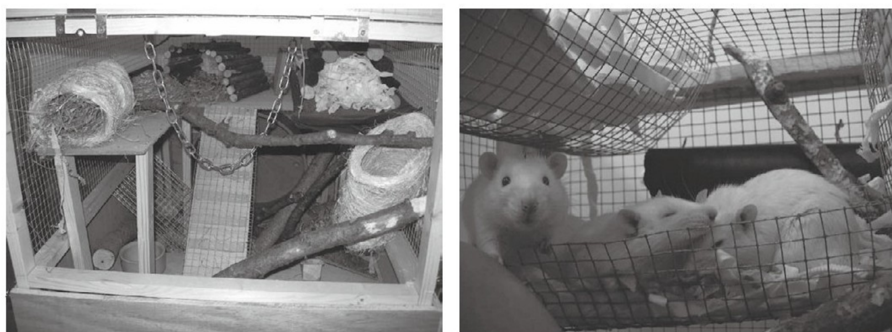


图5：一个为大鼠准备的典型的“丰富”环境（来自Devonshire, Dommett和Greenfield，未发表）。

然而，神经元回路在接受刺激后会发生真实的生理改变，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几十年后才被直接证实。[15]事实上，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找出不同族群的老鼠在行为和问题解决方面的差异背后潜在的神经机制，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丰富体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正如你能想象到的，环境丰富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知道了，丰富的环境对多种生物，对各个年龄段的生物都有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富足的”动物的研究都表明，这些动物所表现出的明确的解剖学变化都是积极的。[16]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在空间记忆测试中表现出了优势，而且当人们用经过一定程度基因修饰的小鼠种系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动物模型时发现，即使是短时间的丰富环境也可以拯救成年老鼠的记忆缺陷。[17]此外，这种刺激可以引起神经发生（产生新的脑细胞）以及记忆改善。[18]

即使在老鼠身上，丰富的环境也能更有效地帮助延缓或减轻脑损伤。例如，单基因遗传病亨廷顿氏病会出现进展性神经退行性病变，目前尚未发现治疗方法。在“转基因”（基因修饰）小鼠身上建立一系列与人类疾病相似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症状，主要表现为逐步增加的运动困难，利用这样的小鼠进行研究。将这些小鼠从小就暴露在充满刺激的丰富环境中，有助于阻止脑组织的丢失，延缓运动障碍的发病[19]以及弥补脑损伤。[20]

这里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丰富体验的持续时间。例如，一项实验分别将小鼠暴露在丰富环境中一周、四周和八周，以此来研究持续不同时长

的丰富体验如何影响小鼠的行为，具体来说是其运动行为。一周丰富环境的生活并没有对小鼠起到什么效果，但四周丰富环境生活所产生的行为效果持续了两个月，而八周的效果则持续了六个月。显然，要看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丰富环境体验期有一个最短持续时间，而产生的结果所持续的时间可以超过体验期的时长，并且效果所持续的时长与最开始丰富环境持续的时长直接相关。[21]

所有这些研究都说明了一个基本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动物与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所进行的互动，无论是何种动物，也无论其认知能力如何。相似的环境诱发的变化同样也可以在小鼠、沙鼠、松鼠、猫、猴子，甚至鸟、鱼、果蝇和蜘蛛身上发现。简而言之，“从苍蝇到哲学家”[22]，所有动物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被动地暴露在一个新奇的场景中，而是我们所谈论的主体，更具体地说是那个特定的大脑，如何对这个新奇的场景进行反应。

与环境的互动非常重要，因为这使得脑细胞更加努力地工作，只有这样脑细胞才会不断生长，就像锻炼肌肉一样。然而，如果观察在丰富环境中的动物的脑细胞，并与那些关在实验室常规旧笼子里的动物脑细胞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脑细胞回应刺激的方式与肌肉细胞并不相同。脑细胞并不会像肌肉细胞一样变大，反而会长出更多被称为树突的分支。[23]尽管啮齿类动物是最常被用来进行测试的动物，但灵长类动物也一样，环境会导致包括神经元树突增加在内的结构上和化学上的强化改变。[24]那么为什么说这一点特别有趣或特别重要呢？因为通过增加分支，脑细胞可以增加其表面积，这意味着可以建立更多的细胞间联系。

显然，这些高度可控的、环境丰富的实验范式只能在非人类生物中进行系统性研究，很难想象让人们生存于某种类似的、经过控制的环境中。但这种依赖于体验而增加的脑细胞连接对我们这个物种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动物世界中，随着大脑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脑内神经元结构的独特塑形来说，个性化神经元连接的意义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予了个体在世间的独特性。[25]我们都知道，人类大脑在生命早期的成长不只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加，更多是脑细胞间联系的增长。

在人类大脑皮层中，突触（神经元间的连接）的数量在胎儿期迅速增加，并在产后一个较短的时间里继续增长。此后，突触的数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缓慢下降，这段时间大约是从六个月开始持续到青春期，并在成年期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26]在一项对年龄在四岁到二十岁之间

的人类被试进行的脑成像研究中，[27]研究人员发现，在大脑发育期间，皮层的体积不断增加，这一过程在男孩约十岁到十一岁时停止，女孩八岁到九岁时停止。之后皮层体积的减少是突触进行“修剪”的结果。据此，大脑变得不再对任何可能性无条件地开放，而是更具针对性地满足个体的需要。[28]

成人中有很多人类大脑可塑性的例子，其中神经元连接依然不断地被环境所塑造，这在多种不同的情境下反复说明了：大脑内的结构变化显然不只是伴随着新技能的学习，也反映着日常生活本身。有两种应用广泛的、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方法可以显示出我们大脑这种惊人的天赋。

第一类是“快照研究”，这类似于我们之前看过的伦敦出租车司机研究。[29]这种方法要求被试实施某种高强度、持续时间较长的特殊行为。通过一次性的观察便会发现，在与外行或不够专注的人进行对比时，专业人士或专家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以数学家为例，因为他们花较长时间解决数学问题，他们大脑皮层中与算术或视觉处理相关区域（顶叶）的细胞密度便增加了。还有一些音乐家，他们的大脑结构与非音乐家相比明显不同。对专业键盘手、业余爱好者以及从不演奏音乐者的脑扫描显示，专业键盘手在运动、听觉、视觉空间等一系列脑区都表现出灰质增加。此外，音乐家的能力和他们练习的强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表明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与学习过程本身有关，而不是与某些音乐天赋有关。[30]

尤其是大量的钢琴练习，对特定脑区的神经连接（白质）在各个年龄段的发展都有明确的效果——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或许正如你所料，儿童发育中的大脑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可塑性。而其他年龄组也持续表现出练习带来的效果，当然对他们来说，这种效果只局限在大脑皮层。很明显，特殊时间窗（关键期）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定区域的局部可塑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

鉴于生活中的技能种类如此广泛多样，如驾驶出租车、演奏乐器以及解决数学问题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可以在大脑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这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以高尔夫为例，一项研究对熟练的高尔夫选手、技巧较差的高尔夫选手和不玩高尔夫的人进行了大脑扫描，结果发现只有熟练的高尔夫选手出现特定大脑结构的灰质体积增大的现象。[32]而且作为一项运动，高尔夫球在大脑适应性方面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在篮球运动员的大脑中也可以检测到依赖于体验的可塑性，在篮球运动员身上增大的是被称为“自动驾驶仪”的脑区（小脑），这片脑区与感觉——运动互动紧密相关，并且恰好是在专业运动员身上可以见到的那种复杂运动表现。[33]

此外，还有另一类实验。除了对那些杰出专家的大脑进行一次性的“快照”，并与正常人进行对比研究之外，另一种研究人类大脑可塑性的方法是进行纵向研究。在该研究中，被试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多次测试，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普通”被试身上看到特定体验的前后效果：被试都是普通人，并且在研究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会学习到某种特殊的活动或某些专业知识。

举例来说，研究证明学习一种语言可以促进大脑的可塑性，增加灰质的密度，而且观察到的变化与语言技能水平相一致。在另一项研究中，大脑语言系统的可塑性与第二语言熟练度的增加有关。母语是英语的交换生在瑞士学习了五个月的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结果表明大脑结构的改变（左侧额下回）和语言熟练度的增加同步。这再一次证明了学习过程的确是起到了作用，并反映在大脑结构的改变上。[34]

在一项非常不同的项目中，被试要学习三球杂耍任务。在这项任务中，要对接下来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决定，知觉和预期是至关重要的。志愿者被试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每日训练，在被试尚未接受训练前进行一次脑扫描，在被试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后进行一次脑扫描，然后被试在第三个月到第六个月的时间里不再进行这项活动，并在第六个月结束时再次进行脑扫描。经过三个月的杂耍训练，大脑皮质中某一特定部位的体积增大了。然而这种改变维持的时间很短。在第六个月结束时被试的杂耍表现变差了很多，而且脑区结构的改变也恢复到了基线水平。一项后续研究表明，大脑的适应在开始训练的第七天就已经出现了。由于这样的转变在学习过程的早期阶段是最迅速的，而此时被试的行为表现水平还很低，似乎对于改变大脑结构最重要的不是对某种已经学会的事物进行反复的练习，而是获取某种新任务这一实际行动。[35]

但不只是常规学习和身体活动会对大脑的神经连接产生影响。对大脑可塑性最令人着迷的一项研究是基于弹奏钢琴产生的效应。在仅仅为期五天的课程中，被试每天花两小时的时间学习单手五指演奏，脑成像研究显示大脑皮层中定位为管理手部肌肉的脑区扩大了，且其激发阈值也有所降低。而控制组被试则每天只将琴谱中的音与琴键对应，但完全

不去进行练习，他们的脑成像结果则没有显示出变化。[36]这些发现与先前提到的钢琴研究的结果类似，但这项调查更深入了一步。最令人惊讶的是，另一组被试被要求在头脑中想象着进行练习，而并不真的去弹琴，研究者在这些只进行“心理”练习的被试的大脑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改变。这样的结果无疑表明，我们不能再把“心理”当作“身体”的对立面来看待了。过时的二分法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并且它对于提出并回答关于心智和意识的那些重大问题也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

这项研究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意义在于，就大脑功能而言，对于可塑性最重要的不是肌肉实际的收缩，而是让肌肉收缩的想法。霍尼克维兹的观察结果——“思维是局限于大脑内的运动”，正是这些脑扫描展示出来的结果。

从这些对大脑可塑性的探索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结论，但可能最重要的两项是：第一，心理活动和身体活动一样会在大脑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第二，大脑的可塑性不止局限在某些特殊的神经元，这种可塑性更像是发生在整个大脑的一种普遍现象。所有物种的大脑，都或多或少可以根据经验进行适应，即使是海参这样的生物，[37]但我们人类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胜过其他所有物种。我们现在熟知的先天和后天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生物学的一大特征，当我们说到人类心理功能和个体心智的发展时，它的天平便会朝向环境一端发生强烈的倾斜。[38]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在人类这一物种存在的这大约十万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与你的大脑完全相同的大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智，当然将来的人也不可能再拥有。

随着人类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少地生活在这种状态中：每个意识瞬间都被纯感觉刺激所激发，而这些纯感觉刺激需要即刻的，通常更为刻板的反应。随着我们每个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认知体验，这种认知体验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与各种事物、人和事件互动的表面价值。结果，我们从纯粹的原始感官知觉中解放出来，能用一种更有意义、更加个人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三、发展心智

被认为是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说过，你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进入了“繁荣、嘈杂的混乱之

中”。但慢慢地，随着你的年龄从几周到几个月再到几岁，过去那些抽象的颜色、形状、纹理和味道汇聚成某种东西，比如说母亲的脸。随着母亲的特征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她对你来说变得“具有意义”，而这种意义产生的基础是越来越多联系的建立。正如之前那些可塑性的例子中提到的，你的大脑将通过建立某种脑细胞连接的独特结构来进行适应：母亲对你来说将会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意义”，甚至与你的兄弟姐妹都不同。正是通过这些高度个性化的连接，你才得以从这种原始感觉的压力中逃脱出来，进入到一种更具认知性的状态，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

慢慢地，你从单向接受来自外界的感觉轰炸，发展为你的大脑和外界之间的双向对话。现在，你不再总是处于抽象的颜色和声音带来的混乱中，传入的刺激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物体还是一个事件，对你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你将根据现有的神经连接对其进行评估。与此同时，你这样做所获得的经验也将进一步更新神经元连接的状态。现在，你可以凭借脑中特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认出妈妈了，这对你和你的大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再举一个例子，婴儿最初会对一枚结婚戒指感兴趣，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枚戒指具有某些感觉特性——金光闪闪、中央有个孔洞、表面光滑圆润以及可以沿着表面滚动。但随着与这枚戒指有关的脑神经连接逐渐建立，这个物体慢慢获得了其作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对象所需要的意义，进而最终被定义为你只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才会戴在特定手指上的物体。然后，如果你最终获得了一枚属于自己的结婚戒指，这个特殊的物体将会具备超出其经济价值的特殊意义，拥有其他任何相似的戒指都不会有的某种联系，而这多亏了个性化的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而它们只在你大脑中运作。正是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为这枚特殊的戒指赋予了深刻且“特别”的意义，而不是物理对象本身所具备的固有特性，因为单从感官的角度来说，这枚戒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枚特殊的结婚戒指可能是或曾经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它与其他任何旧结婚戒指之间的差异则完全存在于你的头脑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前的单行线现在变得可以双向通行了。你当下每时每刻所经历的全部事情都是通过已经建立的神经连接进行解读的。但与此同时，你当前正在经历的体验也在更新着神经连接，并永远地改变着它们。随着你的成长，大脑与外界世界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激烈且独特，而“心

智”便会以此为特征不断发展。

人类“心智”并非平淡乏味的物理大脑的某种虚幻且带有异国情调的替代品。与之相对，神经元连接独一无二的结构产生于个体独特的经验，而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将“心智”视为大脑的个性化特征。39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莉·贝瑞神经元可以被某些与女演员非视觉、纯认知的联系所激活，这一神经元可能是固有枢纽的一部分。你的大脑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你有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神经元网络则反映了你的个人经历。因此，你所经历的事情将决定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你如何根据先前建立的神经网络评价你周围的一切事物，而且当下正在经历的体验将不断地更新那个神经连接，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联系紧密的神经元连接背后有着被称为“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和“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 LTD）”的实际的神经元机制，这一机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神经科学家们一步一步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40然而，人们对这种确立已久的生物化学事件所进行的谨慎探索过于缓慢，持续的时间过长且过于局限，以至于还不能适应于意识的一个瞬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神经元集合。

然而，“心智”并不是意识的同义词，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推断的那样，意识和“心智”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因为二者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运作。例如，没有人会说一个睡着的人失去了心智，而且事实上个体化的神经连接是一直存在的。而在“失去心智”的情况下，你依然是具有意识的，只是对当下环境或行为的处理已经不是由全部的神经连接进行的了。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成人每天的主观体验来说，这种心智虽然和意识不同，但依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而“石头”实际的大小，将是决定最后一圈涟漪扩散距离（瞬间的意识程度）的重要因素。

总结：投掷的力量（即激发的程度，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原始感官刺激）和石头的大小（即局部神经元固有连接，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个性化的“意义”），将二者结合便可以决定向水中投掷石头所能产生的总体效果，即涟漪的程度（或者称为神经元集合的大小，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意识在任意瞬间的程度）。这套理论如图6所示，尽管大脑、心智和意识是不同的实体，但它们都与作为核心过程的神经元集合相互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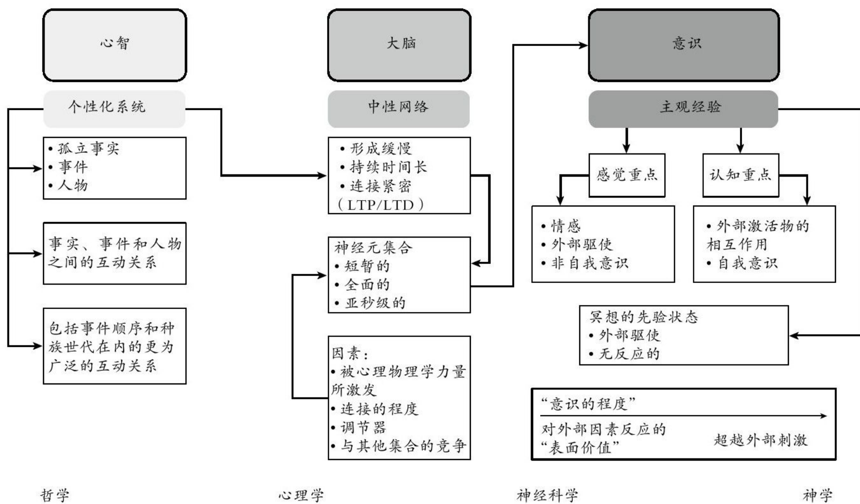


图6：“心智”、“大脑”和“意识”：“心智”是通过适应性、可塑性的脑细胞（见“大脑”）间局部而持久的连接使大脑个性化。然而，这种连接也可以用与事实、事件和人物相关的现象学术语来表达。然而在大脑内部，相应的“固有”枢纽（如果被激发，同时伴有强有力的调制器）接下来会触发一个更普遍而暂时存在的神经元集合，触发程度将与不同程度的意识有关（见“意识”）。反过来，意识的程度将与外部感官输入以及内部认知有关。婴儿和动物都具有的这种最基本的意识是由感官驱动的，而最复杂的意识是一种完全由内部驱动的认知状态，只在诸如冥想之类的纯人类行为中体现出来。

四、从心智到意识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某个人看到了他的母亲，母亲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熟悉且有重要意义的人，母亲的样子会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引发大量的联系（一个广阔的连接网络）。而当这些联系进行时（也就是将石头扔进水中的那个动作），视觉系统便会开始运作。不一会儿，这个“与生俱来的”局部而持续的细胞连接中枢便开始忙碌起来。但现在，我们面临着那个大问题：这个枢纽，也就是这个刚刚被扔出去的神经元之石，是如何将其他远处的、通常不是固有的细胞招募到一起，产生一个更加广泛而短暂的神经元集合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是因为我们需要从熟悉的神经科学可塑性机制（扔进水潭中石头的大小）过渡到找出涟漪所隐喻的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与不同程度的意识本身联系起来。

答案就在于强有力的化学调节物出现的那个特殊瞬间，个体所处的状态：分子家族中的不同成员根据不同的唤醒水平播散在广阔的大脑中，无论当下何种化学物质发挥作用，都会使周围细胞对被激发的、“固

有”枢纽（石头）的反应变得敏感，或对其进行某种调节，从而参与到神经元集合中（创造涟漪）。反过来，所有这些更多的细胞被短时间地招募到一起参与工作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喷薄而出的化学物质家族（用现象学术语来说，即任何时刻下占优势的唤醒水平和心境），这是另一种产生神经元集合的因素。这些调节因子的可变有效性将类比于水潭中水的可变黏度（即浓度），也就是说，如果水潭中有密集的藻类，那这种水相比于新鲜的雨水，作为涟漪扩散的介质效果要更差。

任意时刻下意识的程度，也就是涟漪的范围，将取决于以下内容：其一，由外部驱动的原始感觉的激发（投掷石头的力度）；其二，由内部产生的个性化的意义（石头的大小），进一步反映在“固有”长程神经元连接的程度；其三，一般唤醒水平，即喷涌出的特定调节物质的有效性（水坑中水的黏度）。如果真实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可以分别操纵这三个因子中任意一个因子所控制的内容。

让我们来看一下石头相对较小的情况。和闹铃声一样的原始感官刺激便足以招募一个神经元集合，尽管这个神经元集合可能也相对较小。举个例子，想象在伊维萨岛的一个俱乐部中，你在闪烁的灯光下和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在如此“美妙”的体验下，你精心构建的个人化连接将变得既不相关、也不必要。另一种瓦解个人神经连接的方式是服用精神活性药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你体验到狂喜。药物会损害“与生俱来的”中枢的突触效率，以至于使其在功能上变得不那么有效。

对许多人来说，饮酒可以让他们快速得到愉悦感，因此这同时也会减小神经元集合。由于酒精是一种高度脂溶性的物质，因此它可以轻松地穿透细胞间紧密的连接（血脑屏障），血脑屏障可以将大脑从循环系统中隔离出来，但酒精却可以快速地进入大脑。在大脑中，酒精所起的作用与一类我们尚未提到的特殊神经递质相同：γ-氨基丁酸（GABA）。[41]GABA将会引发带负电荷的氯离子流入神经元内，相应地使得细胞内的负电位更强（超极化），这意味着细胞更难产生动作电位——它们受到了抑制。因此，GABA能大幅度地减小神经元集合可能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42]

第三种情况是，如果涌入你大脑的刺激信息是极度惊险刺激的，你便会产生一种类似“惊心动魄”体验的感受。这些惊险刺激的活动，如木筏漂流、跳伞以及滑雪，它们有着相似的影响，但也稍有不同。尽管这些刺激并不是极度耀眼或过于吵闹，但接连不断的惊险刺激，意味着互

相竞争的神经元集合快速地同时出现，这将阻碍任何其他信息的输入，直到大脑最大程度地处理和理解这些神经元集合。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石头虽小，但投掷有力。特别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活动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有着一个关键的共同因素："脱离"心智的感觉。你现在回到了作为一个小孩儿的体验中，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无条件的、无自我意识的感觉接受者活在当下。如果这与婴儿和非人类生物所拥有的当下的意识是同种类型的意识，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这种快速形成的小型神经元集合与完全以"纯"情绪为特征的主观体验进行关联，而婴儿和非人类生物很容易就会表现出这种主观体验。由惊险刺激的运动、音乐和其他事物产生的大部分体验，都是人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活动都是可以使人愉悦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大脑的化学特征并关注某个熟悉的神经递质——多巴胺，来扩展这种想法，进而以一种更精确的方式将愉悦和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多巴胺仅仅被认为是大脑中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是一个"源泉"，因为它与其他的神经递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但现在，多巴胺本身就值得我们仔细地去研究一下了。

尤其是多巴胺的释放，一直以来都与愉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项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如果将一根电极植入老鼠大脑中释放多巴胺的区域，那么老鼠很乐意按动压杆来电击自己大脑，即使这么做并不会得到食物。[43]此外，所有的娱乐消遣性药物最终都会对大脑产生一种相同的作用：释放多巴胺。它的作用就像大脑中的一个"源泉"，通过它可以进入范围更加广阔的"高级"中枢。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与唤醒和兴奋水平的升高有关，只要看看安非他命的刺激作用就可以明白了，这种药物会引发多巴胺这种强力化学分子的激增。

因此，如果多巴胺与愉悦感有关，并且如果小型神经元集合的出现也是愉悦体验的一个共同特征，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多巴胺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这正是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先导试验所发现的。阿扑吗啡，一种作为脑内多巴胺替代物的药物，有着降低小鼠大脑皮层切片中神经元集合大小和持续时间的明确作用（见图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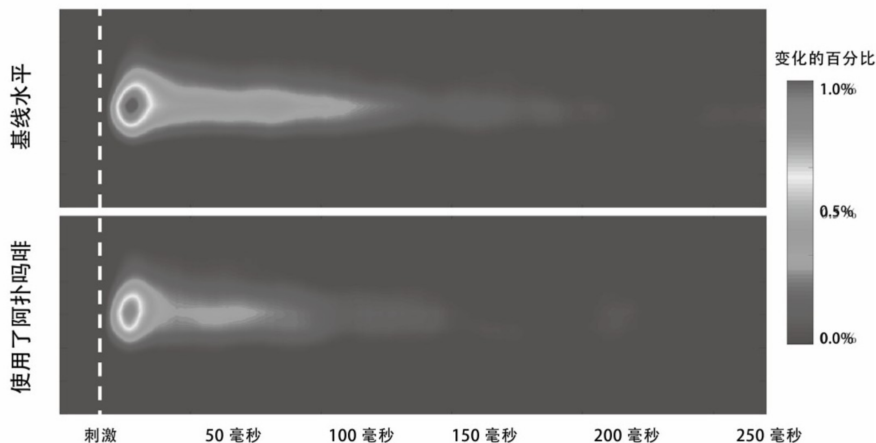


图7：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鼠大脑切片（皮层）中产生了一个神经元集合。注意当使用了多巴胺替代物阿扑吗啡（下图）后，神经元集合的强度减低且持续时间显著缩短（Badin&Greenfield，未出版）。45（彩色扫描版，见彩插5）

但是高水平的多巴胺并非一定预示着愉悦感，它同样也在恐惧的体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这是一种复杂的障碍，有许多症状表现，而该病的患者体内多巴胺功能水平过高。没人会说患精神分裂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般而言，狂野和放纵的快乐往往会变成恐惧。躲猫猫游戏可能会吓到儿童，而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尖叫更是不可避免。这一正一负的两种极端对立的体验为何能如此简单地相互转变？

在愉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娱乐活动都是“惊心动魄的”。然而，通常情况下，相互独立的同种类型的瞬间冲击会接踵而至：乐曲的鼓点和节奏，情人间不断的爱抚以及一口接一口品尝食物是同种类型的美妙体验。与之完全相反的是当我们谈到恐惧时。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们已经承认，当我们谈论恐惧的定义时，它可能与任何一种极为新奇的事物相关，并且我们完全无法预测恐惧何时会发生。46也许当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愉悦就转而变成了恐惧，每一个时刻都变得支离破碎且完全无法预测。事实上这种从愉悦向恐惧的转变可以归结为多巴胺水平的不同，并且不同水平的多巴胺会对神经元是否参与神经元集合产生相反的作用。47

然而，愉悦及与其相关的小型神经元集合不单单依赖于将这种神经化学物质维持在中等水平上。我们之前提到过，能产生意识剥夺作用的麻醉剂同样也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而麻醉产生意识剥夺是分阶段进行

的，其中一个阶段通常被归类为躁狂。这种“谵妄”会发生在麻醉剂刚刚起效，并因此导致神经元集合减小时。显然，麻醉剂的剂量太低，因而个体不能进入通常会引起愉悦感的无意识状态。过去人们所熟悉的醚类麻醉剂，会对那些不想失去意识而是想改变意识状态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被称为“醚游戏”的公众集会便会让参与者吸入乙醚，从而显露出该类物质所具有的那种致幻作用。与之类似的是，麻醉剂氧化亚氮曾一度在19世纪的“笑气”聚会上作为一种娱乐性毒品使用，一部分参与这类聚会的人会变得精神恍惚、安静，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体验到欣快感并不断发出阵阵傻笑。碰巧的是，氧化亚氮现在作为一种合法的娱乐消遣性药物在英国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会从装满氧化亚氮的黑色气球中吸食，当局对此非常关注也就可以理解了。48无论是由哪种化学物质激发产生，对于纯粹愉悦的美妙体验似乎最终都会一致地与高度情感化、低认知水平的小型神经元集合对应起来。

如果美妙体验中的决定因素是下一口酒，是乐曲的下一小节，那可能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被应用于其他类型的链条中，如在剧烈运动时重复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锻炼是非常剧烈的，并且伴有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们知道这会引发人体内生理性吗啡样物质（内啡肽）的释放，并导致广为人知的“慢跑者快感”现象。这些生理性鸦片类物质会对神经元活动产生一系列的抑制作用，并因此在神经元水平上减小神经元集合。49但是，在更加全面的水平上，剧烈的运动同样也会对大脑产生另一种作用。

事实证明，即使是快步行走也可以带动新神经元的产生（神经元生发），50即干细胞（通过分化产生机体其他多种细胞的原始细胞）将会最大限度地将其自身转变为神经元细胞，同时刺激化学物质的释放，进而帮助新生的神经元细胞生长，并且它不会就此停止。在剧烈的体育锻炼增加了大脑干细胞从而产生新神经元的同时，源自丰富环境的附加刺激将会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并加强这些连接的稳定性。51

我们现在可以再前进一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环境可以改变一个大脑正常且健康的个体的思维，那么反过来，思维这种心理活动是否可以改变物理大脑本身呢？还记得吗？“仅仅”是在脑中想象练习演奏钢琴这样的心理活动都可以对物理大脑产生可测量的影响。科学家们甚至在老鼠身上观察到思维产生的相似的结果。在一项实验中，加利福尼亚索尔克研究所遗传学实验室教授弗雷德·“拉斯蒂”·盖奇

（Fred‘Rusty’Gage）已经证明，如果想要通过锻炼促进产生新的大脑细胞（神经元生发），那这种锻炼必须是自愿进行的。[52]老鼠必须主动参与跑轮练习，而不是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在跑步机上不断跑步。[53]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理带动生理的过程究竟是什么？

非常有趣的是，只有当老鼠自愿地参与体力活动时，重要的生理因子才开始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自愿参与的老鼠表现出更低的焦虑水平，[54]这表明主动参与活动是没有压力的，而较低的压力意味着所有潜在相关的破坏性激素的减少，如皮质醇。[55]研究确实发现，定期自愿锻炼可以预防大鼠和小鼠产生健康和认知方面的应激损伤。[56]尽管我们现在仍无法通过追踪任何有意义的细节，来明确一类化学物质的减少如何让大脑进入一种对神经发生来说至关重要的状态之中。然而，一项更吸引人的线索是，这种情况发生时还伴随着一种特定的脑电波模式（θ节律的脑电信号特征），[57]人类大脑的这种脑电模式意味着大脑正在注意某件事情。[58]

因此，如果可塑性和注意之间有某种联系，并且当你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是无法注意到事物的，那么可塑性和意识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联系是否由某种恰当的神经元集合构成？正如我们看到的，大脑的可塑性在丰富环境的刺激下产生了大量的神经元分支，并以此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开始研究神经元集合构成的动态变化是否能反映出这种长期的可塑性变化，这种可塑性变化是动物暴露在“丰富的”环境中几周的时间里产生的。答案是：可以。

当老鼠被暴露在丰富的、可互动的环境中三个星期后，[59]与被放在不那么有趣的环境（只有几个塑料盒子的、丰富度最低的环境）中的控制组相比，它们在行为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那些通过与梯子、转轮互动，攀爬小秋千和树枝并从中获益的老鼠，与没有这些机会的老鼠相比，测得的压力水平更低。那些生活在最丰富环境中的老鼠表现得更加平静，而通过将其与那些刺激最少的老鼠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它们在进食新奇食物前表现出更短的等待时间，并且这种变化伴随着增强的电生理反应，这种电生理反应代表着大规模的神经元激活，[60]即一种强化的神经元集合。[61]

现在，这一观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环境的丰富性可以增加大脑的可塑性并且可能增加神经元集合的大小，那么将这一过

程反过来，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吗？通过建立短暂的大规模神经元集合，可以使你的大脑具有更高的可塑性吗？换句话说，这能使建立更加长期的、局部的、“固有的”神经连接变得更容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有助于我们从进化学的角度理解意识的生存价值。毕竟，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像自动的机器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繁衍和行动？为什么要有意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让我们转变一下这个问题。这一次，我们不考虑意识和它的生存价值，而是只考虑神经元集合。神经元集合由脑内大量的细胞网络组成，并且以大规模集团的方式共同工作，神经元集合会导致广泛的神经激活，这是它们的一个最典型特征。这进而会使更多、更广泛的适应性在脑内产生，而不仅仅是某些局部的反应——这种局部的反应通常发生在没有神经元集合（因此也没有意识）运作的脑区。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神经元集合确实与意识相关，那么，具有意识的你就有着一个更加广泛适应环境的大脑。因此，神经元集合的功能（以及因此附带紧随其后的主观意识的关联物的功能）就是促进并协调个体对环境进行更加广泛的适应。这也就意味着动物的意识水平越“深”，它们的适应性越强。这给了我们一种直观感觉：看看我们人类自身，我们是这个星球上适应性最强的物种，当然，我们也是所有物种中意识水平最“深”的。

五、锻炼、愉悦、神经发生，以及神经元集合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甚至比意识的进化价值还要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大脑中神经元集合的存在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可塑性、神经发生、锻炼以及有意识的思维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启动这些在脑内的改变？其中有意识的思维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神秘的因素，它似乎是心理活动所必需的。为了探索这一问题，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两个场景，这两个场景都与剧烈运动有关，却涉及大小非常不同的神经元集合。

场景一是由外界事物驱动的。例如音乐中响亮的节拍，滑雪时急剧下降的滑雪跑道，冲浪时起伏的海浪，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唤醒，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们与生理学的关联在于多巴胺的释放。由多巴胺引发的高度唤醒，在快速变化的感觉环境中剧烈运动所产生的兴奋，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啡肽（人体产生的天然吗啡）的释放，都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进而与当下的愉悦体验产生现象学上的关联。[62]来自外界的“惊心

动魄”刺激越大、速度越快，并且神经元集合越小，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意识状态变得被动、无自我意识，仅仅对连续快速出现的刺激做出反应，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应会近似于恐惧。神经元集合会变得很小。

与之相对，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方案：场景二。这一次运动的动力是认知，它是主动从内部产生的。例如你有一个特定的想法——决定去慢跑。正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种自愿的决定，这种积极的思考，将会为神经发生（产生更多的神经元）提供必不可少的关键条件。你拥有的神经元越多，它们之间产生连接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的可塑性就越多样化。我们同样已经看到了，相同的刺激，如驱动可塑性的“丰富的”环境也将驱使产生更大的神经元集合，进而加深意识。但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更大的神经元集合促使局部突触更容易形成可塑性，而局部突触的可塑性所能保持的时间远比广泛的神经元集合本身要长得多。

如果说神经元集合确实是意识的神经关联（前提是你不能单独具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那么我们便能明白为什么有意识的思维对于由运动引导的神经发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也能明白为什么诸如想象演奏钢琴这样的“思想”，能够像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那样，增强大脑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化了的可塑性将让你具有获得更大的“石头”以及更深的意识的潜力。其中调节唤醒的化学物质并没有那么重要，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更多地取决于大脑内部的过程，而不是环境中的外部触发因素，就像是在演奏钢琴实验中那样。神经元集合会变得更大。

这种由运动（例如慢跑）引发的沉思或反思作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与“无意识参与”的活动（如随意的跳舞）相比，前者或许可以为当下流行的“正念”（mindfulness）现象提供神经科学的基础。正念被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需要通过关注当下的知觉，同时平静地承认和接纳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躯体感觉来获得”。记住：从今天早晨散步开始，我们便看到城市环境给你带来了认知方面的影响，迫使你分散注意力，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而乡村环境则为你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你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出“自愿的”行为和思考。

你外出“探险”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与波波散步时所进行的轻度锻炼让你的内部心理过程可以自由地活动，不需要应对心跳加速和快速变换的景色所带来的干扰。斯托顿说的遛狗可以使你“逃离日常生活”真是太对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日常生活正在不断地接近你。你上班就要

迟到了，剩下的时间只够你吃一顿简单的早餐了。

第四章　早餐

你只能快速地吃一碗麦片粥，喝一杯热咖啡，以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时间独自吃完早餐。在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进食时间里，伴随着莫扎特悠扬的乐曲，你的耳朵、眼睛、舌头、手指和鼻子会被激活，这强有力的激活占据着你的意识。当然，有些情况下，在你意识清晰的时候，你的感官并没有被外界的刺激明显激活，如当你冥想时，或是专注于某些深刻的思考时，但这是那些能在任何情况下完全脱离周围环境影响的人才能偶尔享有的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说，意识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被我们周围即刻发生的事情所驱使着，因为我们的五种感官不断地将它们接收到的刺激传入大脑，而大脑也时刻等待着接收这些刺激。这些感官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清醒的时刻增添色彩，它们使我们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使我们能适应外部世界的生活。我们再次回到将石头扔进水潭的比喻，这里我们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扔石头的力度，单纯而简单的感官感觉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意识的？但我们立刻就遇到了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是空间方面的，而另一个是时间方面的……

一、五感：脑的空间特征

大脑的空间问题是一个神经解剖学问题：大脑相应的部位会对不同的感觉进行不同的处理。可能这听上去很简单，你要么是看到某些东西，要么是听到、感觉到、尝到或是闻到某些东西。我们有五种自身清晰可辨而又互不相同的感觉。就大脑而言，即使在最基本的水平上，处理不同感觉的神经区域的划分也并没有那么明确和具体。即使在成年人脑中，不同感觉系统也可以互相跨过公认的解剖边界。例如，当盲人用手指阅读盲文时，他们的视觉皮层可以被触觉激活。[1]此外，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种感官功能，那么这个人其他的感官会得到强化。神经科学家海伦·奈维尔（Helen Neville）已经证明了耳聋是如何提高视力的，[2]即耳聋人的听觉脑区会被用来处理视觉和触觉信息。[3]同样，与非盲人控制组相比，盲人可以更好地辨别音高，[4]而且他们也更擅长判断声音的位置。[5]视觉受损的人在进行非视觉任务时也表现得更加出色，如语音感知[6]和声音识别[7]。此外，动物感觉剥夺实验表明，这种功能的增

强可以很快出现，例如老鼠被关在黑暗中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会表现出听力的提高。[8]

然而，即使个体并没有缺失感觉，大脑依然可以对不同形式的处理过程进行欺骗。尽管非常罕见，但通感（字面上来说，是“将感觉汇聚到一起”）现象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承认是存在的。在这种令人着迷的状态中，个体可以以两种不同形式的感官经验同一个输入信号，大多数人则只能从某个单一感觉通道接收到它。例如，通过听声音，可以“看到”颜色和运动。

在大脑中，通感的存在明确地证明了大脑具有惊人的灵活性，某一部分神经区域可以被移植用于处理不同的感觉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是某一片脑区被另一片脑区入侵，而应该是脑区间的连接特别丰富，[9]结果导致一片区域的激活同样会直接引发另一片区域的激活，例如识别字母的脑区激活同时会引发识别颜色的脑区激活。另一种情况是，可能在大脑皮层不同部分之间预先存在某种闭锁机制，在通常情况下确保反馈有明确的分隔，防止产生混淆，然而这坚不可摧的屏障在通感过程中被打破了。如果正常反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阻止，那么任何来自多感觉处理晚期阶段的信号反馈都可能对早期单通道阶段产生不适当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说话声音可以引发视觉。在一些临床疾病中也能见到这种去抑制现象，如颞叶癫痫、头部外伤、中风和脑肿瘤。[10]

在任何情况下，通感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及广为人们接受的失明和失聪患者的过度补偿，导致了不可避免却也十分迷人的悖论：尽管主观上每种感官的体验是非常不同并且完全可以互相区分的，但是从客观上说，调节这些不同体验的神经机制却是标准化的，并且是可以互换的。一旦外界某种信号通过诸如耳蜗或视网膜转变为一系列动作电位，这些电信号便会进入不同的脑区，并终止于各自在大脑皮层的投射区，然而这些投射区在组织结构上是同质化、模块化的。这表明它们的结构和连接具有共性，有点像制作饼干用的模具。[11]

那么，主观体验令人吃惊的质的差异是在何时何地起作用的呢？听和看的主观差异又是在哪里如何出现的呢？尽管不同感觉的生理加工机制都大体相同，但不知怎么，大脑还是让体验间出现明确的分隔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一悖论，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水是如何变成酒的，以及客观和主观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二、五感：脑的时间特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脑的时间问题：不同感觉在大脑中被加工处理的速度是不同的，但人们会将其体验为相同的。当某人拍手时，你会同时看到拍手的动作并听到拍手的声音，主观上你会觉得它们是同时发生的，然而事实上声音的加工过程要比视觉加工过程更快。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时触摸自己的脚趾和鼻子，假定因为触碰鼻子产生的信号所需传递的距离要近得多，所以它会先进入大脑，尽管如此，你感受到的却是多模式的单一意识瞬间。这意味着一定存在许多横跨每一个看似单一的意识瞬间的时间窗（即时期）：每个时期都是时间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些窗口，加工速度不同的感觉能达到同步化，进一步被整合进我们熟悉的多感觉整体，我们将其称为意识的“瞬间”。你的大脑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让这些感官同步化，需要由一段恰当的时间延迟来包含以不同速度到达的全部感觉形式，而不可避免的是，传递速度最慢的那种感觉信号将决定整体的步伐。

事实证明，这些时期会持续几百毫秒。“我们所意识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当下的那个瞬间，而总是会晚那么一点点”，大约半个世纪前，富有独创精神的心理学家里贝特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当时他正在当地医院里研究那些进行过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他们的颅骨上留着手术中为了暴露大脑皮层而钻的孔。[12]在一项实验中，里贝特通过这个孔洞用电极棒刺激这一部分的大脑，这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轻微刺痛感。令人惊讶的是，被试在被刺激500毫秒后才报告说感受到了刺痛，这可是足足半秒钟呢，要知道一个动作电位的跨度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秒，在大脑的时间维度中这半秒钟就像永恒一样。里贝特的研究还发现，当刺激作用在距离大脑更远的身体部位，如作用在脚上，并在大脑中进行信号记录时，那么在大脑接收到传入的刺激信号和被试意识到这一刺激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延迟。这不仅仅是让大脑在时间窗里登记一个输入的信号，以此确保即使是加工过程最慢的感觉也能到达，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意识的觉察似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表明，当要求被试判断随机出现的图片是动物还是交通工具时，尽管大脑很早就记录到差异，但有意识的决定却出现得较晚（峰值出现在250毫秒左右）。[13]这些至少持续数百毫秒的意识时期所提供的时间，刚好够神经元集合形成和解散。因此，对神经元集合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这里有来自我们自己实验室的一系列图像，这些图片展示了在十一

个不同的实验中，大脑皮层不同部位的神经元集合被激活后300毫秒时的样子。在视觉区，最高的活动最后大多会终结于深部皮层，而在听觉区则完全相反。研究表明，听觉和视觉的处理过程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其还原为传统的突触活动，而要将其看作一种大规模神经元集合的动力的涌现。如果没有神经元集合的光学成像技术，我们便无法探测到这个过程。

显然，在意识出现之前必然要经过250毫秒到300毫秒的时间，而在与主观体验建立联系时，是什么让这“量变”的时间产生如此“质变”的差异呢？如果这段时间对于意识来说是必须的话，那么神经元集合本身的特性可能包含解决问题的线索。神经元集合中单个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并非孤立的、远距离通话式的，它们不仅仅依靠向大脑中某个遥远的神经元传递单一的信息来进行沟通。与此相反，神经元集合在其形成的几百毫秒中，本身是具有组织的，并且也是自给自足的。神经元集合的组装活动只在局部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像涟漪一样传播得很缓慢。重要的是，随后产生的涟漪（意识的程度）也将在一个时间窗，或时期中汇集到一起，因此意识的出现需要花费半秒钟的时间也就不奇怪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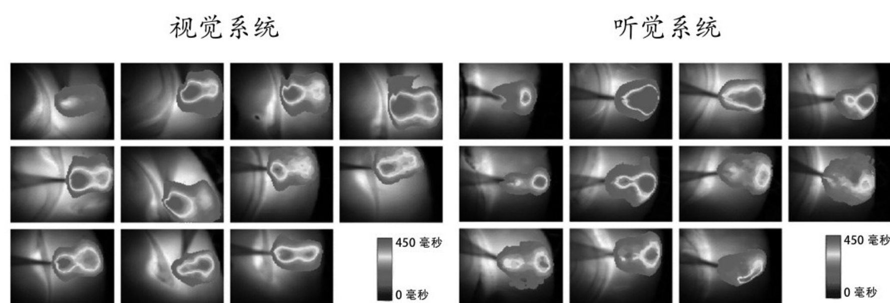


图8：在十一项不同的实验中，光学图像显示了视觉和听觉系统神经元集合之间的差异。15按照时间框架，特殊位置的荧光信号最终下降到最大值（300毫秒）的20%以下。要注意的是，这一活动在视觉皮层中集中在深部，而在听觉皮层中则集中于浅表（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6）。

但这样仍然存在空间上的问题——大脑皮层那饼干模具样的客观排布是如何与听觉和视觉的主观差异相对应的？如果每种感官所具有的独特感觉体验都以某种方式与大脑不同感觉区中神经元集合的特性有关，且神经元集合只有在几百毫秒后才能变得明显，那我们现在便可以用相同的客观生理学量尺来区分视觉和听觉现象。即便如此，这把对应着听觉和视觉两种主观感觉的简单的量尺是什么呢？又在哪里呢？如果你必须要用某种通用单位或参照系向一个火星人描述听觉和视觉主观体验上

的差异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在我们能找到答案之前，想在我们客观监测的大脑中对现象学的内容进行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有一个建议：从生理学上讲，视觉主要（但不仅限于）探测空间边缘的差异，而听觉则主要（但不仅限于）探测时间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鉴于神经元集合的空间特性在特定的时间窗里具有如此大的变化，这种空间特性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某种新的神经科学工具。最终理想的结果是建立某种单一的时空标尺，某种能够被应用于主观意识的某个时期的描述性数学方程式。

三、多感觉意识

那么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是某种单一的感觉，还是五种感觉的结合？每个人都同意感觉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因此人们想当然地推断意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大脑肯定具有某种平行处理系统，永远都分成五种不同的感觉，这些感觉最后转变成各自独特的主观意识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看似简单的推理，是由已故的克里克和他的同事科赫提出的，他们致力于找出意识中针对“视觉意识”的神经连接，因为视觉意识明显不同于其他感觉，并可以独立于其他感觉单独运作。16

尽管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种感觉，那会是什么样子，但在课堂上，我们将感觉是独立运作的这一假设展现了出来。追溯到1978年，一种基于这个前提的学习方法问世了。当时的观点是大脑可以被区分为三种“学习风格”：视觉（V），听觉（A）以及运动觉（K），即“VAK”。VAK最早是由美国教育学家丽塔·邓恩（Rita Dunn）和肯尼斯·邓恩（Kenneth Dunn）于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既能解释儿童学习能力的个体差异，又能提供一种促进儿童学习的方法。17老师们报告说，他们的学生们都根据所学的科目改变了自己对感觉的关注点。例如在艺术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将重点放在视觉注意上，而在音乐课上学生们被允许闭上眼睛。邓恩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提出，某些个体本质上就是“视觉”学习者，某些则是“听觉”学习者，还有一些是“运动觉”学习者——他们更喜欢运用触觉。18

独立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源自于VAK的学习改善，而这种方法唯一的优势貌似是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那为什么还有人认为VAK范式在教育学方面产生的差异是吸引人的，或至少是令人信服的呢？再一次，这种

理论源自大脑自主结构这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或者源自存在那些被简单地称为“模块”的、具有独立功能的脑区的观念。可以确定的是，几百万年来，大脑进化出了许多看上去具有特殊作用的结构，现代人运用这些结构和特性中的多个部分来完成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情。然而，否定整个VAK理论的依据是，这些功能模块只有在互相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它们不能单独运作。

认知神经科学家德阿纳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项例证所阐释出的东西比VAK更加复杂，且更具有互动性。[19]他要求被试在大脑扫描的同时进行一项重复性的数学计算，麻醉师经常会在患者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中让患者进行这种计算，具体来讲就是让被试从一百开始进行连续减七的运算。想象一下你躺在那里，实验人员要求你自己告诉自己“一百减七，九十三减七，八十六减七”等等。那些接受手术的患者通常不会做到这个计算的最后，但这项测验是通过记录被试最快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任务，来测试其完全清醒状态下的思维敏捷性。这一连串的减七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简单的过程，但当德阿纳用脑成像技术寻找在进行第一步计算时哪些脑区被激活时，结果发现仅仅第一步计算就会引起十到十二个不同脑区的激活。换句话说，这是另一项证明大脑是以整体方式进行运作的例子。

相互连接性包含一种强有力的连接间的互动，这些进入大脑的连接来自我们的感觉器官。根据VAK的理论，如果观察一下作为灵长类的我们的大脑就会发现，视觉过程是大脑中最主要的过程，它占大脑的百分之三十，与之相对的触觉和听觉分别占大脑的百分之八和百分之三。[20]我们会利用输入大脑的视觉信息来构建这个世界的空间“地图”，以此来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即使对于先天失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构建着这样的地图。显然，盲人并非通过视觉获取最初的信息，而是通过触觉和听觉来获取信息的，但他们也像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来处理这些信息。盲人会通过构建这个世界的地图来理解事物实际的位置和在概念上的位置。[21]因此存在一种多感觉、“跨通道”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信息是来自触觉、听觉还是视觉，都会互相关联，最后成为一个信息包。这种跨通道的信息加工过程是已经确定的脑功能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们每个人对于辨别事物是否同时发生都非常熟悉，如看到电视上新闻播报员嘴唇的运动就能判断它和听到的声音是否同步。在一项研究

中，刺激分为看到的嘴唇运动与听到的声音同步和不同步两种情况，研究者对比了被试在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22]结果发现，当二者同步时，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的部分脑区表现出累加效应，而当二者不同步时，这些脑区则表现出减法效应。由于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之间联系密切，因此这种辨别差异的能力在进化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黑暗中，你需要能对突如其来的声音进行定位，毕竟，预料之外的噪声可能是你的下一顿美餐，或是把不幸的你变成美餐的捕食者。

此外，能读懂唇语可以帮助我们在强噪音的环境下进行倾听。[23]对于潜藏在这一效应背后的大脑真实过程的揭示，是通过对清醒的猴子观看或倾听自然视听刺激进行记录所获得的。研究人员发现，当接收多感官刺激时，来自单个脑细胞的反应模式变得更加可靠。与之相反，当视觉刺激与声音不匹配时，这种多感觉的强化则会被大大减弱。因此，即使在那些传统意义上只对单通道感觉进行简单的初级加工的脑区（初级皮层），多感觉的影响也会强化这些皮层脑区的信息加工。[24]

已故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吉克（John Geake）曾进行过一项简单的实验来证明感官间的网络连接。[25]研究中，他让一群儿童观看两组物体，但两组物体所包含的物体数量远大于限定时间内可以精确地数出的数量。即便如此，当要求被试说出哪一组包含更多的物体时，即使年仅五岁的被试也能给出相当准确的答案。然而，当其中一组物体被换成一连串快速的声音时（当然，这一连串声音也因为太快而无法计数），就有了关键性的发现。有趣的是，在对视觉和听觉输入刺激间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儿童表现出的准确性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依然可以判断出声音和物体的数量哪个更多。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传递信息的特殊感觉通道间是互不相关的。大脑会通过“更高”水平的脑运作来加工输入的信息，并将其“抽象化”。因此重要的是信息的内容而非媒介。

尽管我们可以意识到五种不同的感觉，但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意识体验时通常不需要对其进行剖析和分隔。学习（涉及所有类型的思考，因此也涉及意识本身）包括一个抽象的过程：无论我们从哪个感觉通道接收到信息，我们在对其做出某种反应前，都先要提取出其最基本的意义，并据此决定我们将采取的行动。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课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关于国家宪法和里程碑事件的事情，我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这些知识，可以是阅读书籍，或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又或是观看一部纪录片。但无论是通过

何种方式获得了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会被我们逐渐遗忘，因为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的。再举一个关于“抽象”过程的例子：春天里的某个清晨，你漫步在树林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到明亮的绿叶，等等，这些最终会让你产生幸福的感觉。你并没有感到需要对其中不同的感觉加以区分。意识的瞬间是包含多种感觉的，多感觉这一整体比五种不同输入信息的简单叠加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

当我们谈论主观意识的那个瞬间时，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那便是不同的感官会相互加强。当你此时此刻正在边吃早饭边喝咖啡时，这种感官的协同作用尤为明显。患过重感冒的人都知道，堵塞的鼻子会让食物变得无味。舌头上的感受器可能接收到了很多味觉信息，但如果你的鼻子不能工作了，那你就完全无法体验到任何味道。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证明鼻子和舌头通常是一起工作的：如果你把一颗夹心糖豆含在嘴里，同时捏住鼻子，那你会感受到甜味但却没有味道。然而，一旦你释放你的鼻腔，味道就会涌入你的意识。[26]味道的重要性可能或多或少取决于不同物质的特性，例如当鼻子堵塞时，人们不能辨认出咖啡、巧克力和大蒜，但却可以辨别出威士忌、葡萄酒和醋。[27]此外，不同的气味可以改变最终的味觉体验。[28]

鼻子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咀嚼所释放的能量分子通过口腔后部到达位于鼻腔通道上的感受器。我们可以闻到的气味的种类要比可以尝到的口味更加多样化。人类的舌头只有五种不同的感受器：甜、酸、咸、苦、鲜。鲜（umami）为日语词汇，其意思是“美味”，这个词由化学家池田菊苗（Kikunae　Ikeda）于1908年首创。他研究发现鲜味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谷氨酸盐，并对著名的增味剂谷氨酸钠（俗称味精）申请了专利。鼻腔中有数百种气味接收器，与那看似无限的气味种类相比，这五种有限的味觉不值一提。这意味着，味道和气味进行匹配和混合的可能几乎是无限多的，这便产生了我们主观上描述为各种各样味道的感觉。

然而，我们都知道，尽管气味和口味可以被共同体验为味道，但它们也同样可以被单独感受为口味和气味。我们通过鼻子闻气味和通过喉咙后部品尝味道在神经学上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如果嗅觉和味觉信号同时到达大脑，那气味和口味会被整合成某种味道的体验。当你只是闻食物的气味或看到食物而不去品尝时，两种感觉的融合则不会出现。然而，即使你无法闻到将要吃的东西的气味，视觉本身也会对味觉产生巨

大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视觉和味觉之间一种有趣的协同作用。研究者发现，单单是杯子的颜色，就可以影响人们对杯子里的热巧克力产生的口感：与白色或红色的杯子相比，用橘色或奶油色杯子盛的热巧克力喝起来更有巧克力味。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感觉会受食物容器特征的影响，改变我们对食物的感知。[29]即使是食物发生了简单的、物理形状上的改变，也能起到作用。如果一块奶酪有一个尖头而不是圆角，那它尝起来味道更浓郁。[30]颜色间的反差越不强烈，食物尝起来越甜，其中的原因尚不明确。因此，用白勺子喝白酸奶要比用白勺子喝粉酸奶尝起来更甜。[31]

如果视觉能在其他的感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听觉对味觉体验也有很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一个安静的环境会增加咸味儿，而环境中嘈杂的噪声会降低咸味儿；喧闹的环境会减弱甜味儿，但却会增加食物的脆感。许多人可能都已经发现，磨咖啡的声音会增加咖啡的口感，嚼碎薯片的嘎吱声（适当的声响）也会使薯片变得更加好吃，而不恰当的声响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更加一般的文化背景中。一项研究发现，在贩卖法国红酒时，以手风琴音乐为背景要比以德国啤酒屋常用的音乐为背景卖出更多的法国红酒，前者卖出的量是后者的三倍以上。[32]

触觉也可以提升味觉的整体主观体验。毕竟，我们是通过与食物进行身体接触来体验并区分它们的。比如说，脂肪尤其给人一种“满口”都是黄油和冰激凌的滑腻感，以及沙拉酱调料的那种油性和粘度。因此，大脑中有一片脑区包含着针对口中脂肪的质地做出反应的神经元。这些脑细胞不仅会被口中的脂肪油（如植物油）以及富含脂肪的食物（如冰激凌和巧克力）所激活，同时也会被具有类似油性质地的非食用物质所激活。汽水的味道也很大程度上受触觉的影响，尽管影响的方式不同。一瓶跑了气的啤酒和一瓶还在冒着二氧化碳气泡的啤酒相比，二者的口感是非常不同的。更普遍地说，不同食物或饮料的泡沫、黏度和顺滑度都会影响食用时的体验。[33]甚至就连吃东西时用的不同餐具的触感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用一把很轻的塑料勺子吃酸奶比用银勺子吃口感更丰富，而且感觉酸奶更浓稠。[34]

与触觉有着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感觉是温度觉，并且它也深度参与了食用或饮用的整体意识状态的形成。例如，非常冷的冰激凌是没有什么

味道的，温度的提高会增加食用者感知到的甜味。位于舌头上的味蕾在感知甜味、苦味和鲜味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子加工过程也在味蕾上进行，此外味蕾还负责调节对温度的敏感性。将食物的温度提高至十五摄氏度到三十五摄氏度之间可以增加对甜味的神经反应。在人群中大约有一半个体，仅仅通过加热或冷却舌头本身便足以引发味觉：使舌头升温会引发甜味儿，而降低舌头的温度则会导致酸味或咸味。[35]此外，触觉和温度觉二者密切相关，共同发挥作用。嘴唇和手的触觉所对应的脑区在“躯体感觉”皮层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而这两部分正是人们啜饮热水时所涉及的躯体部位。所以，想象一下，当你啜饮双手捧着的那杯热巧克力时，大量的刺激涌入你的大脑——投掷石头的过程中加入了一种额外的力量。

一个有趣的设想是五种不同的感觉涉及不同数量的“意识”，[36]其中视觉得分最高，其次分别是味觉、触觉、听觉，而排最后的是嗅觉。但这里“意识”这一术语的使用方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意识不仅涉及直接感觉体验的程度，还包括个人意义的贡献。正如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如此精妙地总结道：“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37]尽管我们多次谈论过以不同力度投掷石头的特殊因素，但当我们说到原始感觉时，石头的大小（刺激的认知和环境关联）将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每种感觉依赖的特殊环境和意义的多少来重新审视感觉的排序，而不是根据“意识”的数量。

以视觉为例，视觉无疑是最特殊以及最不抽象的感觉。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边缘、图案以及光影组成，而这些有颜色的形状通常具有某种“意义”，如成为某种可识别的物体或人。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讨论的，你所看到的事物必定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意义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除非你看到的是一个纯色的、均匀的颜料板（这本身就非常罕见），否则总会存在一个环境，某个非常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明确的场景。当你看一张桌子的时候，你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观看一张特定的桌子。当你环视四周时，你可以看到普通的颜色和形状，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也可以看到相同的颜色和形状，但你所看到的不仅如此，你现在所接触到的，是专属你自己的，与你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的连接：当石头被抛出去时，它将变得相当巨大。

其次是味觉。由于味觉是一种非常基础的感觉，因此其在最具个性化的感觉中排名第二不免让人惊讶。但另一方面，它的前后关联是被高

度定义的：你正在品尝一种特定的食物或饮品。决定味觉的因素之一是一种体验与另一种体验之间的时间关系。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品尝一种柠檬汁样品，然后判断它是酸的还是甜的。然后研究者又让被试喝了一种添加了柠檬酸的柠檬汁样品。当被试喝第三杯饮料时，他们认为这是三种样品中最甜的，但事实上第三杯饮料就是最初的那种柠檬汁样品。3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品尝食物时的前后关联可以对味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味觉不仅受到嗅觉的巨大影响，同样也会受到其他感觉的影响，如杯子的颜色，环境中的手风琴音乐声，口中的泡沫和奶油。并且，由于味觉是其他感觉的产物，同时也受其他感觉的制约，那么这些感觉的组合必将定义一种特殊的环境，因此这种特殊的环境取决于感觉的联系。再一次地，由此产生一块更大的石头。

视觉和味觉分别被界定为大约有90%或80%是“可意识到的”，但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取决于前后关联的”。真实的百分比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与其他感觉相比时它们的相对位置。例如，触觉的排名要低得多，占比也不超过50%。39此时如果我们再一次用“环境”这个词来替代“意识”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人们都可以体验到天鹅绒、丝绸、树皮或裸露皮肤的触感。当你可以“意识”到你所触摸的物体时，物体所在环境中的其余事物就变得毫不相关了。现在更强调的是，你的身体（最有可能是你敏感的指尖）与物体表面的互动所产生的直接感觉：石头可以变得更小，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增加多少力度来投掷它。

接下来是听觉，占比30%。时刻记住，不要过分强调这个百分比本身，它的价值在于与其他感觉百分比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听力排名第四，因此它缺乏占优势的环境成分。毕竟，与视觉、味觉和触觉相比，听觉是一种被动感觉。你可以随意睁开或闭上眼睛，可以主动地转动你的头，将食物放进嘴里并咀嚼，或是伸出手去触摸某个物体，但你不能打开或关上你的听力。在任何情况下声音都能找到你，反过来却并不成立。听力所需要的网络连接更少，石头也更小。所以如果听力是最“被动的”感觉，那么在麻醉降低了神经元集合的构成和规模的状态下，人们将更容易体验到听觉。听觉是在麻醉中最后消失的感觉，同时也是当患者苏醒后最先恢复的感觉。40这可能是因为听觉（处理速度最快的感觉41）可以根据自身采取行动，就像把石头扔进水潭：投掷力度

的范围是无限大的。

最后是嗅觉，只有大约15%的嗅觉是“可意识到的”，它是所有感觉中最不依赖环境的。值得注意的是，嗅觉的丧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早的指征之一，[42]因为连接鼻子和大脑的神经通路直接进入“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是一簇广泛且互相连接的大脑结构，它与记忆加工的早期阶段有关，最重要的是它也与情绪有关。因此，嗅觉作为最原始的感觉，能引起如此强烈且即刻的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其他动物相比，嗅觉在我们这一物种的感觉中似乎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例如，与狗和老鼠相比，我们人类的嗅觉接收细胞和嗅觉相关基因要少得多。毫无疑问，嗅觉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始感觉，它让动物能立刻判断食物是否腐烂，是否有其他生物受伤，雌性是否进入了发情期，让动物可以远距离追踪猎物。但对人类来说，这些即刻且原始的反应受到了知识和思想的调节，也难怪其他的感觉占据了优势地位。然而，有人曾提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大脑中与嗅觉感知相关的脑区可能更大。[43]因此，人类并不像狗一样对原始嗅觉刺激进行有力而精确的处理，而是将大量的嗅觉加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更频繁地应用于记忆过程，因为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的这一后继大脑机制更加发达。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即使是在我们人类身上，嗅觉产生的“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也不应被低估。

以信息素为例。所有生物（至少是非人类的动物）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释放这类隐蔽的化学物质，从标记领土、谋求生存，到发出报警信号，再到吸引配偶进行繁殖。而对于人类来说，信息素通常出现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之前。尽管信息素发挥作用的机制目前仍存在争议，但有证据表明，这些化学物质的确以某种极为精确的方式影响着我们。[44]例如，仅仅通过嗅觉，人类被试就可以分辨出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并没有见过提供受测气味的个体，但他们可以正确地将母亲和她的孩子进行配对，却不能根据气味对夫妻进行正确的配对。[45]母亲可以根据体味辨认出她的亲生孩子，却不能辨认出她的养子。青春期前的孩子可以通过嗅觉辨认出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却不能辨认出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也不能辨认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父母的养子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这一现象或许可以解释如何避免乱伦的发生。[46]婴儿可以根据嗅觉认出他们的母亲，反过来，母亲和其他亲属也可以根据气味辨认出自家婴儿。[47]这种

血缘关系间原始的认知并非取决于认知因素，毕竟婴儿不可能有发达的记忆，但这一现象的确反映出某种更加原始的联结。在这种情况下，石头是很小的，那么它所产生的效果并非取决于与先前经验的个性化连接，而是单纯取决于投掷力量——嗅觉的原始激活本身。

那么关于意识，所有的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不同感官的激活等同于投掷石头时不同的“力度”，再加上石头不同的“尺寸”。由于高度依赖环境，视觉是一块大石头，却不一定会被强有力地扔出，而嗅觉则在相反的极端——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始感觉，不伴有即刻且明显的环境因素，是一块较小的石头。但一块小石头如果用很大的力气投掷，也能产生广阔的涟漪。也许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音乐……

四、音乐和大脑

音乐被定义为一部字典，在这部字典中，“歌声或乐器产生的声音（或两者都有）以某种方式进行组合，以产生形式的优美、和谐以及情感的抒发”。然而这一定义并不能真的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对于我们这一物种的巨大意义，这种意义如此之大，以至于音乐产业在经济规模上实际比制药业还大。48在“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中，有人提出，受过特殊训练的灵长类动物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符号语言这项技能的，但却从未有人认为大猩猩或其他与人类在DNA上只有百分之一差异的近亲，有能力创作和欣赏音乐。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祖先创作并欣赏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前。

在斯洛文尼亚发现的一只骨笛，据估计已经有四万三千年到八万两千年的历史。49笛子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乐器，而在今天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更基本、更常见的乐器有拨浪鼓、筛鼓和手鼓。50因此，如果我们假设这些简单乐器的出现要早于笛子，那也就是说音乐活动早在笛子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便已存在。古生物学家认为，歌唱的出现时间要比任何形式的构造乐器早一半。如果是这样，那么音乐的创作可以追溯到十五万年前甚至更早，而科学家估计智人出现于十万年前，音乐的出现远早于此。有趣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骨笛是在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发现的，因此音乐活动很可能首先出现于二十五万年前，而且并非始于我们这一人种，而是出现于整个人属。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显然是一种固有的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音乐作为人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具有真正的进化价值？又或是音乐

仅仅是进化的副产品？[51]是听觉上的芝士蛋糕，可有可无？[52]就像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曾不屑地说道："音乐令人愉快，但绝非进化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可否认，音乐是一项令人愉悦的活动，但这可能仅仅意味着，音乐活动像娱乐性毒品一样抢占了大脑奖赏系统，从而进入预先存在的"愉悦通道"，而这一通道最初是为其他与生存有关的方面进化出来的，比如进食和性。

一种观点认为音乐的基础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进化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论点支持这一观点。第一个论点是，即使音乐从我们这一物种身上消失了，人类其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53]第二个论点强调，音乐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对于每一种文化来讲都必然是一种人工产品，因此音乐并非"自然"产生的。我们似乎无法保证，所有形式的音乐都包含着某种从音乐诞生起就一成不变的可辨别的共性。[54]

另一方面，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音乐教授戴维·休伦（David Huron）的话来说，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已知的人类文化中，没有哪种文化不曾从事过音乐活动"。[55]因此，无论音乐是不是人类心理过程的某种一般特性，如果想要理解音乐是如何影响人类意识的，我们需要首先解决为什么音乐是一种如此"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这一谜题。[56]毕竟一方面音乐没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另一方面音乐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方式又是那么的不同。

让我们首先从在进化上毫无意义的"芝士蛋糕"这个可能性开始。与这一观点相反，对于音乐为什么可能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这一问题，答案有很多。达尔文本人就曾提出，音乐的产生可能与求偶过程中的性选择有关。并且，在择偶过程之外，音乐的产生还可能与社会凝聚力、团体努力、知觉发展以及运动技能发展有关。[57]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将音乐和舞蹈与宗教和故事放在同一个范畴中，它们都是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活动。这些行为共同改善着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自我意识和理解力，以及形成社会团体保护我们抵御潜在掠食者的能力。[58]然而，有人提出，其他物种在不需要音乐的情况下也可以习得社会技能。对这一明显反例的回应是，动物据此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远不如人类，我们人类可以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互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天赋受到音乐的辅助和支持。那么，也许音乐的意义源自于那些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如在篝火晚

会上载歌载舞。这些共同的经历强化了合作生存策略[59]以及代际间的交流，而在其他物种身上却不曾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些活动对智人的生存来讲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确实可以捕捉到某些生物学上“普遍的”共同属性，那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潜藏在这些“共性”背后的大脑机制，进一步洞察音乐最终是如何影响意识的。

反对音乐是人类本质组成部分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基本特征，音乐在各文化间的差异未免有些太大了。然而，剑桥大学的音乐学者伊恩·克罗斯（Ian Cross）则认为，所有类型的音乐中都确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即“在某种水平上存在着规律性、周期性的时间组织”。[60]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用来打节拍的乐器如拨浪鼓、筛鼓和手鼓成为最先出现的乐器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但为什么体验重复性的节奏如此重要呢？这么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一问题，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是否必不可少，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将音乐视为一种诱发特殊意识的方式。

一种观点认为，大脑在发育早期需要周期性的时间机制来建立一种“运动节律层次”。[61]在照料者——婴儿互动中，节律的价值在于：婴儿对照料者周期性的声音和动作进行对应的跟随和回应，这在普通的对话中是无法实现的。一位母亲哼着没有什么含义的儿歌（或是半唱着，或是吟诵着），抓着婴儿的小手随着儿歌的节奏上下晃动，同时让婴儿在自己的膝盖上蹦蹦跳跳，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景象了。此外，这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重复性动作，参与并加强了新生儿大脑中那些重要的特殊神经元连接的可塑性。随着这种基本的感觉运动协调训练，新生儿也将得到人际互动和交流技巧的经验。总体来说，音乐是“人类从婴儿期开始进行社会文化学习的一种自然动力”。[62]

似乎每个人都同意对音乐的体验必然要牵涉运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如果说“思维是大脑的运动”，那么音乐驱使着这种运动从大脑中解放出来进入身体。尼采说过，“我们用肌肉聆听音乐”，可以想象在令人陶醉的音乐声中，人们即便没有站起身来翩翩起舞，至少也会用脚趾打着节拍或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晃身体。最根本的一点是，对音乐的接触和体验使年轻人的大脑获得的发育，是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复制的。

那么如果音乐如此重要，它在大脑和心灵中留下了什么印记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看一下不同情况的脑损伤对音乐欣赏能力的影

响。例如，一位患者在特定的脑区（这一案例中是左侧杏仁核）受损后，对自己最喜爱的音乐失去了情感反应。[63]同样的，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在听到一段通常会引起强烈负性反应的音乐时表现出更少的“恐惧”。[64]在另一项使用成像技术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听一首音乐，他们知道这首音乐会让他们“爽到发抖”，尽管这一词汇有些奇怪，但被试确实被特定的乐章激发出了明显带有愉悦的颤栗。[65]虽然听上去不那么科学，但这种主观感受却伴随着可测量的客观变化，如心率、呼吸和其他唤醒指标。[66]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允许被试自己选择让他们产生强烈情感的音乐，那在这样一项研究中，为了满足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个体化的联系和记忆而无法达到标准化。一言以蔽之，随着这些主观上“爽到发抖”程度的增加，许多大脑区域被激活了（杏仁核、前额叶等），这些脑区分别与奖励、动机、情绪和唤醒以及其他产生愉悦感的功能相关联。[67]

总体来说，这些发现表明音乐可能模拟了生物性奖励刺激，因为音乐可以在腹侧纹状体等区域激活相似的神经回路。众所周知，腹侧纹状体与诸如吃巧克力[68]或吸食可卡因等毒品时[69]所产生的愉悦性体验有关。[70]然而，杏仁核活动的减少表明正性感受的产生同样也可能是基本恐惧反应被阻断所致。有趣的是，音乐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减少该脑区活动的正性唤醒刺激之一。[71]因此，音乐产生的“愉悦”可能来自于一对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来自于奖励相关脑区和神经回路的正性唤醒，另一方面则同时来自于对与恐惧和其他负性情感相关的神经网络的抑制。

在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活动中，有如此之多的脑区被激活，这不足为奇。没有人真的期望发现一片仅仅被音乐选择性激活的特定脑区。因此，大脑中音乐处理的秘密可能在于它所招募的相关大脑结构的特定组合，以及对恐惧脑区的抑制。凭借着“一致的”节拍、音调或和声，音乐开启一种重复、稳定的期待和愉悦的循环。现在，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相关脑区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加入小脑（位于大脑后面的菜花样结构）。小脑似乎是半独立的迷你大脑，它是所有脊椎动物大脑的明显特征，并且由于它与最自动化的那类感觉运动协调相联系，因此被赋予了“自动驾驶仪”的头衔。如果你无意识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敲击脚趾，那么非常有可能是你的小脑让你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一项引人注意的发现与该效应相关，即音乐能帮助减轻帕金森病的主要表现——运动功能障碍。这种作用虽然是暂时的，但其效果非常显

著。[72]为什么会这样？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与内部“自发”运动相关的核心脑区发生了退行性改变，但小脑得以从这种神经元损坏中幸免于难。因此，众所周知，如果我们让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在外部刺激驱动下的运动，比如说把脚放在地板上的标记处或纸上，近乎奇迹般地，他们似乎可以正常行走了。[73]音乐可以与这些纸片起到相同的作用，[74]尽管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在连续的外部听觉刺激流的帮助下，患者的动作会被锁定并做出对应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性是，音乐引发的愉悦感可能会增加帕金森病患所缺乏的关键化学物质——多巴胺的供应，这种可能与之前的解释并不矛盾。

不用说，如果音乐可以引发情感，尤其是可以引发愉悦感，而多巴胺这个特别勤奋且十分受欢迎的神经递质却没有参与其中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多伦多罗特曼研究所的瓦莱丽·萨林普（Valorie Salimpoor）博士和她的团队认为，如果音乐可以唤醒欣快感和与渴望物质奖励相似的渴求（涉及多巴胺能系统），那么聆听音乐将会引发大脑释放多巴胺。她的团队随后发现，当被试聆听音乐并达到情感唤醒的顶峰时，内源性多巴胺便会在纹状体处释放。他们还发现，对音乐产生的强烈愉悦感会涉及对奖励物的期待，这会导致多巴胺在另一条解剖通路中释放，这一通路与和快感巅峰相关的解剖通路有着明显的区别。[75]

早在1956年，身兼作家、作曲家和哲学家三个头衔的里奥纳德·迈耶（Leonard Meyer）认为，这种“张力”——逐步累积期待，最后得到正面的结果——是情感体验的根源。此外，作为对这一想法的延伸，从不和谐的和弦到流畅动听的音乐的转变，可以解释古典音乐的乐趣所在。[76]随着每一个节拍，音乐提供了一种无威胁的期待感，随后则是一种可预料的、重复的反应。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到，愉悦和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决定某种体验最终导致愉悦还是恐惧的差异在于，连续刺激在类型上的连续程度和可预测程度。音乐比其他任何令人感到愉悦的刺激都更能满足这些要求。

不过，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规律进食以及连续品尝食物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仅仅对一系列声音进行重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音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其成为人类独有的活动？我们人类又是为什么会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聆听、演奏音乐，或在音乐中翩翩起舞？我敢说，音乐是可以直接与语言相媲美的，而如果将音乐视为与口语平等且相对的事物，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音乐给人类带来的独

特快乐及其生存价值。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大脑右半球的活动与情绪联系在一起，而右侧大脑对音乐敏感这一事实让许多音乐理论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将音调与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音乐中的声调可以被视为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作用是用来表达情感内容和韵律的。音乐中的声调可能仅仅是人类普通口语音调的夸大。[77]音乐和语言其他的相似之处更为明显：两项活动都是人类所独有的，此外，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等因素中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样性，这比二者间任何明显的共同特征都更为显而易见。二者在表达上都有明确的、依赖于文化的规则和框架，因此它们需要在儿童出生后大脑尚处于年轻状态时习得，因为二者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年龄阶段中产生的。但如果音乐与口语如此接近，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音乐呢？

在这两种人类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这表明二者之间互相补充，而非单纯的复制。口语最初是为了让少数个体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而发展出来的，但音乐的产生则是为了在更大范围的群体中传递信息。此外，口语会话是不可预测且完全独一无二的，但音乐却是可以重复的。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音乐有可以预期的循环，这使人感到安心。然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不像语言那样被限制于只能描述高度具体的事实和观点。而且，音乐更可能在不唤醒特定记忆的情况下产生情感。我们之前说过，听觉在背景依赖中的排序相对较低。正如已故的神经科医师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十分雄辩地说道：“音乐没有概念，也不产生命题。它没有图像、符号以及和语言相关的东西。它没有再现的力量。它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联。”[78]休伦甚至更简练地总结道：“音乐永远无法像语言一样具有明确的指涉性，而语言也没有音乐那绝对的模糊性。”

以这种方式表达和交流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语言和音乐分别是表达和交流这枚独特硬币的两面，它们扮演着同样重要而又互不相同的角色，且二者间完全互补。音乐将我们正在经历的体验过程放大、例示或强化。和语言不同，音乐提供了一种停留在此时此地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当涉及那些我们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时。但另一方面，不像激流泛舟那样直接，音乐是不需加以反应的，音乐中没有预料之外的刺激，让你必须立刻做出行动。即便

有什么需要你做出反应，那这种反应也不是报复性的，而是放大你所听到的内容，或是对听到的内容做出反应。你可能会用脚打着节拍，随着音乐一边晃动着身体，一边轻声哼唱。

如果音乐是当下的，并且其互动性还与高山滑雪这类运动不同，那么这种正在经历的体验在多大程度上是“感觉的”，又有多大程度是“认知的”？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意识程度有多深——水潭中的涟漪有多广阔？诚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音乐类型，而不同的社会和不同年代的人也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没有歌词的古典音乐相对缺少明确的背景，而是纯粹只强调聆听，正如我们之前谈过的一种情景，这种情景本身就是注入情感和潜意识的，从特定的、文字的情境中独立出来。它是一块强有力的石头，但不一定是一块很大的石头。石头虽然很小但投掷的力量很大，并且之后更多的小石头接连不断地被投掷出去，正如音乐的节拍和节奏不断重复，这可能引发特殊且脆弱的联系。

但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神经元全部的诡计。现在你正开着车，莫扎特的旋律冲入你的耳朵并在你的大脑中盘旋，变幻出一连串半思维、半感觉的愉快而不合逻辑的感受，而与此同时你的眼睛、手和脚自动地驾驶着，有效地带你穿梭在车流中。突然间，面前的某些事情侵入了你的意识，当你看到办公大楼的那一刻，你用音乐营造出的珍贵的内部世界消融了。

第五章　在办公室

在私人世界里享受音乐和各种感官愉悦的美妙时光告一段落了。现在你要转身出门，拥抱外面的世界，走进这座在上世纪中叶流行庞大玻璃建筑风格时修建的写字楼。当你踏入这座大厦时，你的灵魂如自由落体般下坠。为何身处这个由玻璃混凝土构成的空间让你感到如此痛苦？你走向自己在办公室的座位，环顾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并在一起，组成长长的一排，而自己的那张与两旁的桌子别无二致。你坐下来，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感觉接下来这一天的时间漫长得像永远都过不完一样。

我们每天平均工作超过八小时，[1]所以想要检验环境对人类专属精神状态的影响，办公室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自然光教室学习的学生比在人工照明教室的学生表现得更好，医院房间的设计会影响病人康复的速度。或许大家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虽然有这些来自直觉的深刻洞察，我们却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缘由，以及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带来这些影响。尽管鼓励神经科学与建筑学的交叉研究似乎是常识，但几乎没什么研究尝试用足够严谨的方式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2]

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明亮的光芒、巨大的声响等直接的感官刺激，对于推动大脑状态从一个时刻到另一时刻的变化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对输入刺激的个性化认知因素也同样重要（即石头的大小和扔石头的力量）。如果说石头的大小相当于长期、局部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连接又是由长期持续的环境驱动的，那么你每天八小时中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于你的意识塑造便至关重要。如果把头脑简单的大鼠和小鼠转到一个“丰富”的环境中，这种环境都能够在大脑中的神经元和化学物质、复杂的脑回路以及行为等各个层面滋养它们，那么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日常工作环境又会怎样影响你的大脑呢？

如果我们思考复杂的日常环境对人大脑的影响，会发现环境无疑是多方面、多感官的。对于实验中的大鼠来说，用这种单一的、全或无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完全没问题，但是无法和人类环境中所谓的“丰富”相提

并论。我们很容易创造环境丰富性的范式，把它作为实验室动物的一种实验装置。可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就极其复杂了，因为在任何关于丰富性的研究中，都不可能设计出一种“有差异”的控制情境。即使是对于非常愿意做被试的志愿者，把他们长时间关在一个接受人为刺激的环境里，都是不符合伦理的。而且，要让他们与那些环境不丰富的被试产生显著差异，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做到。

令人遗憾的是，最接近这种用极端环境修改人类大脑的事件，发生在残酷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时期罗马尼亚孤儿院里悲惨的受害者身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禁止堕胎和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攀升，许多儿童被遗弃在孤儿院，其中也有许多残疾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这些孩子遭受了制度化的忽视和虐待，这种可怕的剥夺显然影响了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发展。[3]许多人在小肌肉群控制、语言和社会情感功能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发育迟缓。[4]在一项对两岁到四岁多的罗马尼亚孤儿进行的调查中，所有人都表现出心理过程上的缺陷，令人惊讶的是，这与入院时间长短、入院年龄及出生体重均无关。环境本身带来的巨大恐惧似乎压倒了其他更微妙的变量。[5]

研究这些孤儿的医生观察到，他们大脑中白质和灰质减少了，而且大片脑区都无法充分利用葡萄糖（神经元活跃度低的指征之一）。他们还发现了脑功能一个关键方面的异常，即神经元连接。[6]

孩子们最擅长的是社交互动，因为这是孤儿院唯一允许他们进行的一项活动。此外，剥夺带来的某些最糟糕的影响在寄养后得到了改善，[7]再次证明大脑拥有不断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反映出个体每时每刻的经历，并且通常会在输入刺激的影响下茁壮成长。

当然，大部分人类经验很难直接归类到丰富或贫乏两种极端条件中。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勉强有口饭吃或者露宿街头一类所谓穷困潦倒的生活，可能也包含许多刺激人际互动的元素，以及难忘且有意义的经验，无论好坏。更主观的因素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特定事件的个性化反应和独特的诠释，同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议题和动机。此外，个体可能会发现，最能够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是最具多样性的那一类环境。多伦多康复研究所的戴安娜·弗拉斯卡（Diana Frasca）博士评论道：“因此，丰富一方面反映了环境的复杂性（有机会加入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或社交圈，并从事脑力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体与环境互动的愿望和实际互动的频率。”[8]

在研究环境对人类和大鼠的影响时，另外一个不太明显但重要的差异是，我们会用单一的尺度来测量啮齿类动物的实验结果，无论是化学物质水平的上升或增加，还是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的增多，抑或是实验组在某种测试中表现出比控制组更擅长的行为。人类不能这样，不仅每个人会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且如何评估环境带来的独特效果也尚未有清晰的答案。例如，当测试焦虑程度时，看大鼠是否愿意吃新奇的食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们很难想象用这种方法能够可靠地评估人类，更别说人类行为中存在相反的模式，即由压力引起的暴食。

探索环境对人类意识的复杂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作场所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毕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同时，因其明确的目标、规则、层次和日程，可以说也是一个稍微简化版本的真实世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把目光放长远，超越环境的物理性质，通过人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以及在开放空间中的行动来考虑问题。在塑造集合与意识方面，每个个体的主观反应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工作场所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机会，帮助我们探索人类思维中所特有的复杂深奥的内容——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那么我们从哪里入手呢？或许最明显的是你周围客观存在的物理性质，其中最为无所不在的便是颜色，即便在办公室里。

一、物理特性：颜色

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能辨认出高达二百三十万种颜色，[9]而我们已经在生理学上对大脑处理颜色的过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记录。[10]尽管如此，当个体看到颜色时究竟有怎样的主观体验，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比如我们只能通过对苹果、血等红色事物的比较，来描述对红色的知觉。因此，看见红色的体验也经常作为一种“感受性的”、质感难以描述的主观意识体验加以引用，这种体验是其他人无法分享，也无法亲身感受的。[11]颜色如此频繁地被当作描述“感质”（qualia）的例子，也许是因为颜色是意识体验中最基本的成分。

然而，倘若你眼前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整片均匀单一的颜色，在这种不太可能出现的假想情况下，简单的体验依然有可能在最原始的层面上，在神经元集合的产生，也就是意识的产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就是纯粹的兴奋。回想那个决定神经元集合最终大小的重要因素——唤醒水平，它反过来受到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化学物质的调控。

事实证明，单是不同颜色的波长就可以直接且有差异地影响人们的唤醒水平，而这仅仅取决于不同颜色的物体相似程度如何（相应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波长各不相同）。

两百年前，歌德把蓝色描述为一种“消退”的颜色，与之相对的红色则是“穿透器官”的颜色。黄色的波长相对较长，给人的基本感受是令人兴奋。多项心理研究表明，黄色的刺激可以引起人们的情绪反应并因此能振奋精神。与之相对，绿色激活位于视网膜中央的感光细胞（视锥细胞）的中波段光谱。[12]因此，一些科学家认为，由于绿色光位于光谱的中央，所以看到绿色光时眼睛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节，据此可以推论绿色光更容易让眼睛休息和放松。

此外，当一种颜色与另一种颜色形成对比时，也会影响唤醒水平。红光的波长要比蓝光长，人们认为当涂有红色和蓝色的方格相邻放置时，由于两种颜色波长的差异，会使这两个方格看起来距离不同。[13]因此，颜色本身就可以因其物理特性（以一种最抽象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而不是因为在日后生活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心理上的“认知”关联。

在神经元水平上，可能正发生着什么呢？不同的颜色通过直接对唤醒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改变大脑中心那些不同化学物质的释放水平。因此，这些遍布全身的化学物质最终通过改变“水潭的黏度”，对神经元集合形成的难易度进行调节。水潭中的水是否很容易就能产生涟漪是一个关键因素。相比于纯净、清澈的水，浓稠、污浊的液体作为传导介质其效率较低，会减缓涟漪扩散的速度。因此，产生于大脑中心，且具有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家族能够决定神经元集合招募的难易程度，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某个颜色所引发的兴奋或抑制的程度。

接下来是投掷石头的力度。波长固定的某种颜色依然可以在亮度上发生变化。尽管同样是红色，浅红色斑块所产生的刺激却无法比拟明亮耀眼的红色所产生的刺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颜色可以通过自身的心理物理特性，以两种方式激活意识：第一种方式是由波长通过不同的化学调节物质（水潭中水的黏度）决定唤醒水平，而第二种方式是颜色的明度（投掷石头的力度）。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什么决定了石头的大小，即颜色的特殊意义？

毫不意外的是，人类对颜色的反应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反应完全不可能在关于“丰富环境”的动物研究中得到检验。举例来说，正如脑成像

技术显示的那样，光的光谱特性能调节人类大脑的情绪反应。研究者将被试置于能引发情感的声音刺激中，在持续四十秒的蓝绿光交替照射条件下，对被试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14]当被试接受绿光照射时，其大脑中与情感体验相关的脑区（杏仁核与下丘脑）表现出功能连接的增强，而在蓝光的照射下，另一片区域（海马体）则出现更强的反应。由于海马体对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蓝光促进情绪增强和记忆加工，以此促进大脑对情绪挑战的快速反应，进而帮助机体适应环境。这样一种解释有过于简化之嫌，毕竟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的脑区并不是独立的微型大脑，但这项研究至少表明，不同的颜色能凭借其各自的认知作用，分别影响大脑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事实上，在实验室环境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提取出这种由纯色直接产生的效果（即投掷石头的力度和水潭中水的黏度）。从深层关联来看，每种特定的颜色都会影响神经元之石的大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后天神经元连接，将是决定最终意识程度的重要因素。颜色的许多作用将由颜色和个人环境间通过学习建立起来的关联进行中介。例如，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红色能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那是因为红色与人们看到交通信号灯后猛踩刹车之间有关联，或是它与其他禁止进入的标识以及各种危险情况或危险物有关。然而，如果人们最初选择红色作为警示信号，恰恰是因为红色对脉搏、心率等产生的直接生理影响，那么想把感觉从认知中区分出来便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调节物质提高了唤醒水平，所产生的效应与特定颜色关联又相互影响，二者是互相强化的关系。

在红色这个例子中，在颜色确实可以提高人们的注意力这一前提假设下（不论这种提高是由于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学习因素），红色产生的总体效应是提高了人们在涉及对细节进行注意（集中性注意）的认知任务中的表现。然而，与此同时，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更加警觉、紧张以及风险厌恶倾向，并因此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性。个体在任务中的表现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毕竟，我们不仅注意那些令我们感兴趣或能带来潜在好处的刺激，我们同时也会注意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刺激；当这些威胁出现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风险，而不是积极地主动出击。与此同时，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中包含有大量的绿色，它代表着我们在森林中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暗示着水的存在。从最原始的层面上讲，我们在看到绿色时会感到安心。此外，一种更负面的表达是，绿色可以传递乏味的感觉，因为绿色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颜色。出

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把蓝色与海洋和天空联系在一起，因此蓝色唤起了人们开放、和平以及宁静的感觉。

众所周知，颜色也会通过这种认知关联影响消费者的行为。[15]在大公司的标志上，最常见的颜色是蓝色，例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图标，这种颜色相应地与可靠和能力相联系。[16]由于蓝色与水相关，因此它最适用于那些功能性产品；而红色则与地位相关，是像跑车这样的奢侈商品常选用的颜色。[17]英国医生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在《红色心理学》（1900）一文中写道："在所有的颜色中，毫无疑问，红色拥有最强烈的情感基调。"此后，红色这种单一的颜色成了迄今为止人们研究的最为深入的颜色。从包含了诸多生死含义的血液，到泄露了愤怒或尴尬之情的面红耳赤，再到水果成熟后的颜色，红色比其他大多数颜色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可能具有更多的神经元连接）。[18]

但颜色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可能其更令人着迷的特征并非颜色是如何进入人们的意识的，而是颜色随后导致的某类反应。例如，如果手头的任务需要个体保持高度警觉的注意，如记住某些重要的信息或是理解某种新药的副作用，那么红色是更合适的选择，因为红色会激活某种回避反应，这种反应可能特别适合情境。[19]但如果你是要在家里或办公室努力营造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以促进有创造力的行为表现，那选择红色就不合适了。

一项在温哥华尚德商学院开展的实验中，[20]为了研究颜色对人类创造力的潜在影响，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测试来评估不同的心理属性。其中一个简单的词语再现测试是在不同颜色的背景屏幕上显示词语，在红色背景上展示词语能促使被试在展示之后回忆起更多的词语。一项校对测试要求被试对比几段文本并指出它们是否相同。结果再次表明：在电脑中红色背景下显示的文本可以使被试在正确率上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更重要的是，被试接受了一项测试，这项测试要求被试对一些日常用品尽可能多地列出用途，而主试会根据被试列出用途的数量和创新性对其进行打分：这是对创造力的评估。结果显示，测试中的背景色并不影响被试列举出物品用途的数量，却能提高所列举用途的新颖程度，即被试所提供答案的"创新性"。这次是蓝色背景让被试产生了更有想象力的答案。

在远距离联想测验（在第三章中首次出现）中，首先给出三个词

语，被试要写出第四个词，这个词必须和前三个词都产生关联。例如“架子”、“阅读”和“挡板”都与“书”有关。非常有趣的是，被试在蓝色背景下做出的回答又一次比在红色背景下的答案更具有创造性。正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如果要完成一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任务，如设计某项物品、提出有关新产品的创意，或是进行一场头脑风暴，那你需要寻找一个蓝色的房间；另一方面，红色的环境最适于对事物的细节进行回忆和注意。[21]

在颜色光谱上，蓝色与绿色接近，因此蓝色也可能是通过为个体的心灵提供在绿树和蓝天的环境中“自由漫步”的机会来提高创造力。在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中，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比较了绿色、红色、灰色和白色对创造力的影响。[22]该研究要求被试进行多种不同的任务：首先是列出日常用品具有创造性的使用方式；然后进行被称为柏林智力结构的测试，在这项测试中，被试被要求根据某个几何图形，尽可能多地画出不同的物体；最后是实例任务，在这项测试中，被试被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举出四类不同种类的符合某描述的物体（如“圆的东西”）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红、白、灰三种颜色，绿色对非创造性的分析任务并没有促进作用，却能让被试在创造性测试中表现得更好。研究人员总结道：蓝色不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颜色。他们认为三基色的亮度、饱和度或其他相互作用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真正原因。[23]

这些结论可能看上去都显得有些牵强或简单。但如果特定的颜色确实与特定的反应相关联，可能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三种独特而相互作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决定了最终的意识水平——水潭中涟漪的广度。首先，石头的大小（预先存在的神经联系的程度）；其次，投掷石头的力度（颜色的亮度和鲜艳度）；以及再次，产生涟漪的难易程度，即水的黏度（调节因子是否可用及其数量，这与一般唤醒水平相关联）。

二、相互作用：开放的空间

除了颜色之外，还有一项环境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单独将其提出来谈论似乎是件愚蠢的事情，这个特征就是空的空间。虽然对颜色的感知可能是一种被动、单向的体验，但仅仅看到特定的颜色就能使我们变得更加警觉或更有创造力。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只是让我们做出反应，而是与我们进行互动：身体在环境中有着四处移动的可能性。在确定的空间中四处移动的体验会相应地反馈进入我们的大脑，改变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并因此改变石头的大小，进而改变神经元集合的大小，并最终

改变你的主导意识。那么，这个被称为办公室的特殊空间究竟是什么呢？

从罗马时代起，有关“办公室”（office）的松散概念便已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官方的”行政业务通过个人或团体开展实施）。然而，这个词最初强调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职位，而不是其所在的地方（如部长是一个“职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社会不再受复杂官僚政府的控制和管理。直到18世纪，像东印度贸易公司这样的组织才恢复了“办公室”（office）的概念，但这一次指的是实际需要的物理空间。通过对当时多种技术发明的结合，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全新电灯照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煤气灯照明和再多的窗户也无法比拟的；打字机和计算器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电话和电报的出现为自成一体的办公大楼提供了可靠的远程通信线路；最后，随着电梯和钢架建筑结构的发明，高层建筑占领城市天际线这一人们熟悉的画面也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公室建筑学也自然而然地逐渐产生并成为设计实验的焦点。[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起来的高层建筑中的隔断式办公场所，近来被认为增强了员工的疏离感，并使他们缺乏灵活性。

从本世纪初开始，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重新思考如何安排实际空间来满足人类的社交需求，希望以此促进新型工作方式的产生。杰里米·迈尔森（Jeremy Myerson）和菲利普·洛斯（Philip Ross）在《21世纪办公室》（*Tee 21st-century Office*，2003）一书中指出，办公室的设计应当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叙事性。与老式办公室的单调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空间的设计应该能给人们讲述出一家公司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果汁公司Innocent在伦敦的总部为例，其较低的楼层覆盖着人工草皮，中间的楼层有美式餐厅错落其间，甚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老式红色电话亭。第二个要素是节点。新型办公空间通常包含着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满足着公司和员工各种各样的需要，像灵活的会议空间、公共休息区等。第三个要素是睦邻友好。办公室应该是一种能促进员工间互动的环境。而第四个要素是灵活性。办公室不再必须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工作也不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完成，数字技术使得工作方式更具有灵活性。[25]这些要素的总体思路，是使员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自由的感觉。但这种新的方法是否能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呢？

开放式办公室会对员工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一设计所进

行的研究得出了差异巨大且相互矛盾的结论。一方认为由于隐私的丧失，开放的办公空间会破坏幸福感。而与之完全对立的另一方则声称，开放的办公空间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提升员工的士气，增进信息的交流以及提高生产力。当然，财务因素也是要考虑在内的因素之一，开放式空间设计通常与财务压力有关——通过将更多的员工安排在更小的空间中来应对租金的不断增长。很有趣的是，即使在谷歌（常常被认为是“引领其他组织远离传统的灯塔”），[26]开放式、休闲式的办公室也仅限于那些以创新为主要目标的部门。那么，是不是只有当公司的意图是开拓员工的思路，进而使其变得更有创造力时，运用开放式空间才是最合适的呢？

两项有关公司试图利用办公空间提高员工创造性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27]第一项研究在瑞典养老金经纪人的总部进行，整个组织从一个传统的小办公室中搬到了一个空间利用率更高的场所中，这一场所采用“办公桌轮用制”，每个工作位置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使用。近来，英国广播公司也采用了“办公桌轮用制”，据报道，这在员工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28]

在瑞典的这项案例研究中，所有的员工都在开放式办公场所中工作，包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每层楼都配备了舒适的厨房，厨房中有沙发和现代化家用电器。正如一位经理乐观地总结道：“当员工们共同坐在一个共享的空间里时，他们正处在信息流的中心。他们不断地接触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加自由地相互交谈。”

然而，从访谈和客观观察中人们发现，自发交流互动、创造力和学习并非新型开放式空间设计必然导致的结果。虽然员工承认这样的方式确实让你更容易见到你想要与之交谈的人，但环境中大声的讨论着实令人分心。很快，会议室就被预订一空。开放式办公场所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雇员感到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其他同事和管理者的监督之下，由于缺乏隐私，一些员工认为他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工作身份伪装自己。最终，许多员工会利用弹性工作的机会，更多地在家里工作。开放式办公场所想要促进的“自发交流互动和创造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二项研究在英国电话服务中心开展，他们将员工集中在一个绰号为“圆顶”的开放式设施中，并立志要将“休闲、创造性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这一设计将活动室纳入其中，以体育为主题的房间内摆放着弹球台、桌上足球等，当然还配备了“地中海”咖啡。缺乏固定的边界是空间

设计的关键。尽管鼓励办公桌轮用制，但在实践中这一模式却并不常见，这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团队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团队成员聚拢在一起，甚至会通过将空间变得具有个性化以及移动家具来更加清晰地标记出他们的领地。一些员工为了寻找工作场所而“疲惫不堪”，并且反对只拥有如此之小的个人空间。其他人则感到这样的方式使组织变得更加支离破碎，组织内部集团间的界限和差异甚至比他们曾工作过的其他组织更加明显。

这两项研究表明，开放式办公空间这一设计通常会让员工感受到更多的监管和被控制的感觉。这种设计最终导致了一种自动监管，即员工自我约束，并通过多种方式挫败自发式交流活动、娱乐和学习，而不是促进。这一设计没有使员工感到更有创造力、更灵活，而是使员工变得更局促不安了。

开放空间不单单意味着没有杂乱，其本身的空旷可能会令人感到恐惧：一个评估老鼠焦虑水平的成熟模型，就是要看看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里老鼠们会有多乐意来回走动。[29]当然，老鼠不会担忧自己的工作表现如何，但有一项更加基本的元素可能在人类和啮齿类动物身上都很常见：无遮蔽的空间会使这两个物种感到容易受到伤害。对于在办公室中的人类来说，这种容易受到伤害的脆弱性可能转变为对监管的恐惧以及隐私的丧失感——这两者都与个体的身份相关。毕竟，隐私概念中固有的含义是封闭，即拉上了内心的窗帘，将其他人关在外面。一旦你在心中树立起这道防火墙，作为个体的你就以一种方式被保护了起来；而当你可以无限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和感受时，是不会出现这种方式的。如果这些来自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是构成你是谁（即你的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开放式办公环境中产生的隐私性缺乏，则可能会削弱你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因此，这样的办公室并没有带来“做真实的自己”的自由，反而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反作用。当我们思考周围的空间和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识时，我们需要探索的内容已不只是空间环境的物理特性，而更多的是其心理特性。

早在1927年，位于芝加哥的西方电器公司进行了一项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查。这项调查在他们的一间工厂中进行，研究了改善照明对两万名员工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影响。[30]在更加明亮的工作场所进行工作的实验组，其生产效率提高了，这或许不足为奇，但有趣且令人困惑的发现是，对照组在与之前照明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的表现

同样有所改善。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对照组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心理学研究，由于知道自己处在主试的监督之下，他们工作得更加努力了。这项研究表明，与其说员工是被他们所处的物理条件或经济因素所激励，倒不如说他们是被“情感”因素所激励，如感到有参与感或感到自己被倾听。

基于这些能使个体幸福感最大化的无形的“心理因素”的环境，又有着哪些潜能呢？一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建筑与环境设计学院的调查，聚焦于一群在工作中需要非常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不同大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31]也许毫无疑问的是，当科学家有机会更加自由地移动，能够进行面对面的磋商时，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交流，这种互动进而迸发出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和创意。总体来说，这种让科学家离得更近的设计使他们更容易被找到，或是“更有可能互相碰面”，这提高了整体的创新能力。同样，在另一项研究中，人们惊讶地发现80%的“磋商”（定义为面对面的谈话）发生于没有事先计划的会谈，此类会谈可能发生于计划外的办公室造访或是偶然的碰面，而通常人们更加偏爱这类交流方式。[32]

与同事的谈话可以满足人们多种层次的需求：人类通过眼神接触产生的简单的快乐；当你从他人鼓励性的肢体语言中获得“你说的话很有价值”这样的反馈时，所感受到的欣快感；更重要的是，同事在你脑海中种下的新观点，将使你产生更加独到和新颖的思考。此外，当你在实时对话中坚持自我，意识到自我，并重申自己的观点时，你独特的身份认同也得到了强化。这些影响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易测量的，但它们进一步突出了工作环境的“心理特性”，工作环境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设置，理想的空间设计仅仅能够增加会谈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开放式办公空间会损害员工的创造力和幸福感。那么，理想的设计方案似乎是营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既要保障个人隐私和安全，同时也要提供当个体愿意时能进入共享空间与他人邂逅的机会。[33]不同于动物的丰富环境范式，工作场所对员工的影响是双向的：尽管老鼠可以直截了当、毫无心理负担地面对出现在它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事物，但人类却有着相当大的、属于个人的精神包袱。主观性和感情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最初的预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应中，产生个体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既然环境（特别是工作环境）在如此之多的层面上有着这么清晰的作用，例如唤醒、感知、记忆、幸

福，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看一下环境中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何能集中于个体的意识上，更具体地说，集中在个体对“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感受上。

三、主观反应

外部世界几乎在字面意义上在动物善于接受信息的大脑上无条件地留下了记号，因此与研究环境对动物产生的影响不同，研究环境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会带来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概念，这一概念既通过人们的周围环境得到表达，又受到人们周围环境的威胁，它就是：身份。

我认为要拥有一个独特且个人化的身份，需要满足五个标准：[34]第一，有意识；第二，有理智，以及与之并行的价值观系统；第三，在特定的环境中践行那些价值观；第四，践行价值观的行为能引发他人的反应；第五，把特定情境下出现的行动——反应模式运用到更加广泛、更具普遍性的生活情境中。下面让我们更详细地来看看每个具体步骤。

第一点非常明显，只有当你能够有意识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所以你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状态，这意味着你既不是在睡觉，也不是在麻醉的情况下。第二点，你的“理智”必须充分运作，换句话说，你既不是处在药物和酒精作用下的“迷失”状态，也不是正在被某种持续的、快速的、绝妙的体验所分心，像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放任自流”，你需要能够对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做出个性化的解释。你独特的理智（你的个性化的联结）将不仅使你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感知，而且能使源自你独特记忆的价值观和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普遍化，这将会影响你对每个生活瞬间的体验。换句话说，你不但要有意识，还要有自我意识。在我们检查获得完整身份所需的购物清单上的其他条目之前，让我们暂停一下，仔细想想是什么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许多神经科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研究组成自我意识的“更高级”状态，[35]以及这种状态在动物（包括人类）身上发展到了何种水平。[36]虽然人们不需要始终保持完整的自我意识，但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似乎对于决定接下来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识（即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首先可以通过一项类似于赌博的任务，用实验的方法把它从潜意识中分离出来。参与研究的被试需要识别呈现给他们的单个字

母，每个字母只呈现五到十毫秒。结果被试回答的错误率比随机猜测的错误率还要高。这肯定意味着，个体在潜意识层面对呈现的刺激进行了加工。然而，当呈现的时长超过十五毫秒时，正确率会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意识”参与了进来。在刺激呈现时长较短的情况下，我们向被试提供了对他们刚才的判断压低或提高赌注额度的机会，被试普遍拒绝进行高额赌博，即使在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情况下。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时，他们才愿意冒险。37

然而，这项操作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定义自我意识。我们已经看到，“感觉起来像什么”的主观体验取决于个人的联想、记忆以及独特的情感状态。然而，你不一定必须意识到是你自己在感受这些。换句话说，你并不需要一直保持自我意识，即对自己的意识。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婴儿的宝宝们的主观意识有什么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意识有别于其他普通的大脑状态，因为它“让主体了解自己的内部状态”。然而，这一理论无疑犯了假定大脑中有一个观察者的读取谬误（Readout Fallacy）。38这个“主体”如果不是大脑内部“状态”本身，那它又是什么？因此，这一假设对于理解大脑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另一项不那么模糊的理论是根源可塑论（Radical Plasticity Thesis）。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学习过程本身让我们变得具有意识——大脑不仅对外部世界加以了解，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对其自身产生了表征，这被称为元表征。该理论与两种计算式意识理论相联系。第一个理论认为，意识源自“大脑中的名望”，我们在第一章中简要提到过，39在任何时间点上，无论是何种状态支配着信息的处理，这种状态都将成为我们意识的本质。第二个理论认为，你是否具有意识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元表征的参与。40

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为什么大脑中“更高级的”加工和自我意识，与普通的意识是那么不同。正如根源可塑论的作者依据这一理论总结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因此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说这个人是有意识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帮助我们获得十分有益的洞见，此外，它也忽视了非人类生物的一些实例，这些实例有时也会出现在人类这一物种身上，特别是在婴儿身上。在这些实例中，生命体被认为是有意识的，但是没有自我意识。即使这些定义和描述对于在语义层面区分意识和自我意识是有帮助的，但也很难机械地想象出它们在大脑生理层面的

区别。

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区别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数量。有可能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神经元集合需要跨过一条“卢比孔河”，只有当这些神经元集合具有足够的规模后，才使自我意识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无法解决：既然两种神经元集合的差异只体现在规模大小这一数量特征上，为什么更大的神经元集合能获得另一种性质的功能（元表征）？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走完一天的旅程，在本书的最后做出总结时，才能真正地解答。即使如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必须产生足够大的神经元集合的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动物（除了复杂的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婴儿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此外，大小不断变化的神经元集合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着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的成年人偶尔会失去自我意识。其他自我意识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灵活性。

从大脑层面去理解身份则更加困难。毕竟，即使你被冲到一个孤岛上，你依旧有着完好的思维并能保持自我意识，但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被他人识别的身份就不那么清晰了。因此，要区分自我意识和这些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感，就必须要有额外的条件，这就带来了第三个标准。当你表达你的身份时，你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表述，这不仅取决于你的信念和经验以及你的自我意识，还取决于特定时刻占据优势的环境信息，取决于你在家庭中、在体育队中以及在工作场合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当然，你的这种表达可以是你想象出来的，而不一定总是你在现实世界中所实施的。

其结果是，你的行为会引起其他人做出反应，而这反过来又会改变你的记忆以及下一次遇到特定情境时你做出的反应，这就是第四步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步。你当前意识中这些“行为——反应”的瞬间，将被纳入到一个广阔的记忆叙事当中，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体，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正是这种在任意特定时刻、在某一特殊背景中对你独特生命轨迹的主观觉察，构成了你对自己身份最直接的“感受”。

我们已经反复看到，失去理智这一状态的典型特征是缺乏自我意识。因此，如果仅仅是要获得自我意识，那只需要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大脑就可以了。然而，为了享受某种高度特异的身份认同感，必须额外添加一些其他东西。你需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背景中（第三步），引出反

应（第四步），并将这些行为和反应纳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第五步）。从大脑层面来看，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这些广阔的神经连接是如何产生前两步的，即产生意识和产生自我意识，同时还需要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前面提到的第三、四、五步的，即我们创造独特身份认同的方式。

除了一个功能良好、具有自我意识的“头脑”之外，你现在还需要进入一个特定的情境，这个情境可以是在乐队中演奏，在合唱团歌唱，和家人共进晚餐或是在工作中进行讨论。在这些情境中，你正扮演着某种角色。在这些情境中，你的言语和行为会引起周围人的反应，而这反过来又会决定你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们甚至可能在更深远的方面影响你，如改变你的观点和信仰。此外，就像成语“聚沙成塔”所说的一样，这种特殊的一次性体验无论以一种多么微不足道的方式，最终都会将其自身融入你复杂的生命轨迹之中，而后者给了你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感。这些反复的过程，描绘了你是如何将特定的环境和角色融入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复杂的自己之中的，而这一过程将基于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连接。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块更加巨大的石头，以及水潭中更加宽广的涟漪，它们对应一种愈发深刻的意识，伴随着你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获得的强烈独特感。

得到强烈身份认同感的结果之一，就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创造来表达这种身份。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培养一个人的个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一个个体才能产生新的想法。”因此，让我们回到办公室的环境中，试想一下这些环境如何能培养一种较强的个体身份的感觉，什么才能帮助人们变得真正有创造力。创造力和创造性思维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些能力既不能直接下载或购买，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提供保证。因此，也难怪雇主们都非常热衷于确保这些最有价值的商品至少能有机会在工作场所被充分利用。由于稳定的身份认同对获取幸福来说十分重要，[41]同时由于我们已经看到，在日常工作环境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环境要么阻碍我们表达自己，要么帮助我们表达自己，因此无怪乎人们提出了那么多有关如何设计工作环境的想法，试图让员工能“做他们自己”。

如果说创造力是独立个体的终极目标，那么工作环境是如何提升创造力的呢？某些人从出生起就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虽然对创造力加以规定看似不太现实，但心理学家易维德·马

廷森（Øyvind Martinsen）近来通过对比市场营销专业和艺术专业的学生以及创意成分较少产业的经理，列出了一份创造性特质的清单，[42]以及产生创造性思维的七个基本素质。

第一种基本素质是联想取向。研究表明，有创造力的个体通常是富有想象力的、喜爱玩耍的，并且充满新的想法。第二，创意需要。个体必须抵制规则和惯例，他们要有反抗的生活态度，因为他们想要做别人都不做的事情。第三，积极性。他们渴望表现，而且有创新的姿态和解决难题的毅力。第四，雄心。创造性人格的标志之一是需要有影响力，需要吸引他人的注意和认可。第五，灵活性。充满创意的人有能力看到问题的不同方面，并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第六，较低的情绪稳定性。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更容易体验负性情绪，情绪和情感状态更易发生较大波动，并且常常不够自信。第七，低社交性。创造型人才不考虑他人，常常会挑剔他人的想法和人格。决定创造力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是文化多样性。研究表明，那些曾经在国外学习或生活过的人，以及那些有着丰富的外国文化体验的人，比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43]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44]

但是，一些组织不满足于让员工只发挥出按照其自然倾向和才能所产生的创造力，而是希望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创造力，因而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试图通过塑造工作环境来促进员工上述这些自然倾向的提高。提供一个开阔空间本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反而会适得其反。重要因素或许不是实际的环境，而是如何利用环境去“游戏”。最近，开放式办公室这一设计见证了设计方案朝促进“娱乐”、“自主性”和“创造性”方向的发展。[45]游戏已经被定义为“对可能的探索”。[46]此外，美国宇航局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招聘人员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创新能力的候选人，一般都是那些年轻的时候喜欢“修修补补”的人。换句话说，是那些充满好奇，想把东西拆开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人。

办公室里工作和游戏之间的传统界限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变得模糊。目前担任卡斯商学院商业和社会学教授的心理学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曾指出，这一潮流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是多么不同寻常。他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电话中心进行过一项实地研究，该研究发现娱乐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企业精神之中，大约半数的员工对公司的新举措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冷漠和怀疑，而且也并没有考虑过娱乐文化是否关系

到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提高。[47]因此，不仅没有证据表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游戏”会导致任何类型的创造性结果，而且这种明显具有吸引力的机会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尽管更为深入的研究会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的进展，但另一种方法可能更明确：从字面上探索日常运用的隐喻（例如“跳出盒子思考”）中所蕴含的创造性解决问题和认知的能力。[48]心理学家已经确认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和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聚合思维涉及的是寻找单一最优解的智力活动。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评估了被试的聚合思维能力。让被试坐在一个五英尺见方的盒子里，或是坐在盒子外面，或是坐在一个没有盒子的房间里。在三种情况下都让被试进行远程联想测验。结果表明，被试的聚合思维能力在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改变，但当被试坐在盒子外面时，这种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当他们没有被困在一个能看到的盒子里时，会感到没有那么受拘束。

相反，发散思维则是想出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其特点是流畅性（想法的总数）和灵活性（不同种类的想法）。在一项针对这种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的研究测试中，被试参与了涂鸦测试和乐高测试。在涂鸦测试中，被试的任务是给两幅内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涂鸦画加标题，在被试自己加标题前，每一幅画都会给出一个示例标题。这项测试测量的结果，是被试给出的新标题和给出的示例标题之间的差异程度。在乐高测试中，向被试展示几个乐高模型，被试要根据这些模型写出八个这些模型所代表的物体。这项实验测试的是答案的独创性，把参与者的答案作为整体来研究时，看看某些想法的罕见性。

与摆放一个实体的盒子不同，这次研究者在测试对发散思维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时，是通过比较坐立、按矩形路线行走以及自由行走三种情况进行的。涂鸦测试和乐高测试的结果都表明，与坐立和按照矩形线路行走这两个小组的被试相比，自由行走小组中的被试可以提出更具独创性的答案，而前两种情况下给出的答案没有差异。

因此，当一个被试真的坐在一个盒子外面时，其问题解决能力（聚合思维）得到了改善。此外，与坐立相比，一段时间的行走提高了独创性（发散思维），并且这种行走是自由行走，而不是按照一个大盒子状的长方形行走。研究人员推断，处在盒子之外这种条件可能“有助于消除限制创造性认知的无意识心理障碍”，并且“象征着创造性的隐喻的出现

有助于激发创造力”。

促进创造力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会很让人惊讶，那就是：无聊。无聊真的能让人变得更有创造力吗？最近，在一次英国心理学会的会议演讲中，发言人之一的桑迪·曼恩（Sandi Man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挑战了人们大肆鼓吹的人际关系刺激和丰富性对创造力的重要程度。49他开展了两项实验：第一项实验首先让被试从电话号码簿中阅读和誊录号码，然后让他们参与一项任务来评估其创造力，这项任务是为塑料杯设计不同的用途。控制组则直接进行创造力测验，而不做前面的一项活动。非常有趣的是，誊录过电话号码的被试在创造性测验中表现得更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抄写任务让被试可以进行思维漫步和胡思乱想，继而对创造力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为了更直接地探索这种想法，第二项实验让那些倒霉的被试只从电话号码簿中阅读号码。这样做的理由是，一种更加被动和单调的任务可能会促使被试产生更多的胡思乱想。然后将这个小组的被试与那些誊录数字的小组被试进行比较，同样地，控制组没有进行任何无聊的任务。这一次，结果表明阅读号码的被试比誊录号码的被试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而誊录号码的被试又比控制组被试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这项令人眼前一亮的发现确实表明：能促进创造性思维过程的活动，既不是那些需要快速反应的活动，也不是那些令人兴奋或有刺激性的活动，反而是那些让人们可以神游天外的活动。

四、创造性理论

有趣的是，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分心确实有助于进行创造。50也许，让思维在无要求的自然环境中“漫步”确实可以促进创造性。毕竟，在洗澡的时候能想出最好的创意这一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日常生活通常只是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让你能有机会使思想不那么聚焦。有关室外活动还有一点很明显：室外通常不会有很多人，甚至可能除了你之外一个人都没有。正如我们看到的，隐私是身份的另一面，如爱因斯坦所说，隐私对创造性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让我们假设你对自己独特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感受，而你又被放在一个没有时空边界和限制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总体来说，通过你的神经连接，进而运用你的思维，你便可以超越感觉的表面价值来欣赏这个世界。记得那枚对寡妇有着重要意义而对孩

子来说仅仅是一个金色闪亮圆环的结婚戒指吗？正如我们说过的，神经连接让你能领会含义和象征，让你看到一个东西后能想到这个东西代表着某些永远无法从物体本身的感觉特征推断出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会做出不恰当的或过度的联想，这种联想让我们对某件事物或某种经验进行过度解读，进而从中看到某些在他人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准确、甚至有些疯狂的含义。例如在云层中看到人的面孔，又或是认为某个物体可以“带来好运”，这些是日常生活中怪异而没什么价值的联想。类似地，将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愚昧的迷信，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征兆”或预示。

神经连接不仅能赋予你所经历的事物、人物以及他们的行动以你自己的个性化意义，还使你能理解并驾驭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想象一个人打扮成幽灵的样子出现在你眼前，由于你所建立的神经连接可以互相平衡，你可以理解你所看到的事物，而不会只看到表面上的这个怪异的幽灵。而缺乏这些神经连接的人，像是小孩子或是痴呆症患者，将会被当下的感觉体验本身所控制，任由其摆布。结果，当他们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时，便可能会感到害怕、困惑以及不知所措。由于这些个性化的神经连接是我们个体性的生理基础，而如果个体性是创造力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便可能帮助我们发展出一套理论，即个体如何获得这种终极的表达和成就。我们可以将创新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将从神经连接层面分别对这三个阶段加以叙述。

让我们把第一阶段称为解构。创造力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挑战教条，或是鼻子在脸上的位置（参见毕加索），或是引擎应该放在汽车的哪个部分（参见迷你车的设计），抑或是为什么溃疡并非一定和压力有关（参见巴里·马歇尔的开创性理论）。[51]从身体层面来说，这样的过程涉及对脑细胞间先前就存在的神经连接进行抑制或撤销，解除先前的理解，这些理解有些时候被视为偏见、成见或是教条。

第二阶段是新的连接。所有的创造性工作，不论是艺术、科学，还是一项对日常事务简单而新颖的洞察，都涉及把新的元素聚在一起，如用新颖的方式将文字组合在一起，以创新的形式展现颜色或形状，或是将之前相互独立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新的观点。然而，尽管这一阶段是必备的，但还不够充分。想一下孩子画的画，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写的诗，[52]这些也是将形状或文字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组合，但这些却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创新性或独创性的例子。

第三阶段即最后一阶段也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这里的关键是，要让那个最重要的连接（即新的联系）能以物理形状、乐音或科学理论的形式产生意义并被人们理解。不仅是要在神经元间建立新的联系，而且应该激发新的联系和连接为这件作品赋予意义。这种新的连接能驱动的联系范围越广，其含义就越深：表现为更强烈的“啊哈！”时刻。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最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中的这几个步骤？以上这三个阶段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自信心。随着自信心而来的是一种幸福感，你不必对他人做出回应，而只是无条件地享受做自己的感觉。淋浴就是这种环境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但除了淋浴之外，给人带来灵感的理想空间是什么样的呢？当然，如果我们要为个人思想提供一个空间，不同人所需的空间大小也都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环境会对大脑，尤其是对人类大脑产生影响。在设计工作场所的环境时，为了尽最大可能促进个体的思维过程，多样而广泛的环境种类至关重要。显然，物理空间本身的特性是关键所在，如特定的颜色和相片，或是可以看到室外的窗户，如果透过窗户看到的是自然景色那便再好不过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的，景观可以促进思维，提高创造性）。此外，还需要有一些功能来满足个体与环境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互动，如自发会谈的可能性，散步的机会，以及公共区域和个人或隐私区域的划分。最后，还有一项功能同样重要，就是满足个体对空间主观反应的需要，要使他们能感受到来自于公司品牌以及个人身份的强烈独特性。只有当一个人对其独特的身份具有足够的自信心时，他们才能拥有独特的思想，进而才能变得更有创造力。

对人类来说，物理环境的作用仅次于社交互动，而后者又与身份认同相关，即你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色彩丰富且能让人产生移情作用的空间可能会引起幸福感，但事实上它们的功能是作为发生在你大脑中事物的背景，如同神经元连接无休止地组成和重组成不同的联合（神经元集合）。工作场所并不是能让你意乱神迷或享受时光的地方，因为你几乎需要一直保持自我意识。所以，它可能是你建立和打磨个人身份认同的最佳场所。

因此，激发意识的那块石头在任何时刻都不会被有力地投掷出去，而且也不会被频繁地、接连不断地投掷出去。相反，投掷石头的效果将取决于其较大的尺寸，即有大量的神经元连接正在依次处理你自觉的行

为、其他人对它的反应，以及你对这些反应的回应。你的唤醒水平不会过高，但同时你也不会昏昏欲睡，因为调节分子将十分有效地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这枚石头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其他石头可以与其竞争，而即使以柔和的力度投掷它，也将产生广阔的涟漪：你的意识将会深化。在理想的情况下，温和的感官输入与内在认知过程之间的平衡，即使不足以让你产生新的观点，至少能让你遵循富有成效的思路，就像你现在拥有的这个一样。

你在思想中迷失了多久？你环顾四周空白而单调的墙壁，朝向停车场的窗户，平淡无奇的米黄色地毯，最后你看向立在那里的电脑，而它的屏幕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但你今天没有什么创造力，更不用说高效率地工作了。这当然不是你，你不是一个仅仅做出反应而从来不主动发起行动的人。花费一天的时间在不同环境里漫步会让你变得更有效、更幸福吗？可能会。你的目光看向那张普通的家庭合影：妻子、儿子和岳母冻结在时间里，努力显出快活的样子，但不知为何却有些勉强和不自然。也许他们在等你回家，也许他们没有。无论如何，你依然还是会回家的。

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现在到了一天的结束，但这并不是真的结束，与家人共度的夜晚正在召唤着你。你的妻子、儿子以及岳母正在家里等着你，而你却想到回家就心情复杂。老实说，你一点儿也不想回去，家里的状况不是很好。

一段时间以来，你十四岁的儿子杰克的性格表现出一些反常，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快乐、热情、充满好奇心，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他一从学校回来就立马躲进自己的房间。当他不得不和家人待在一起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似乎对身边的谈话漠不关心，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手机里。当他从外面回来时，你总能闻到他衣服上的烟味，对此你感到非常担心。此外，由于他经常不在家，你开始怀疑他可能会去喝酒，甚至吸毒。为什么他变得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难以相处？

一、青少年

青春期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和生理发生剧变的时期。个人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青少年开始渴望有趣且令人兴奋的体验。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包括社会交往增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寻求关注，追求冒险，情绪不稳定，冲动，以及鲁莽。[1]关于青少年喜欢冒险行为有一套有趣的理论，即“模糊痕迹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与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反，青少年在认知过程方面没有任何缺陷，事实上他们可以比成年人做出更准确的风险收益分析。[2]关键的区别在于，无论有着怎样的即刻、短期收益，成年人都倾向于将整体的绝对风险降至最低。更加成熟的人能看到更大的格局，有更长远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对眼前的现状和即刻的奖励做出反应。

青少年容易产生痛苦情绪或喜怒无常，这可能同样驱使他们寻求更直接、更强烈的感官刺激。与其他年龄段相比，青少年对快乐的重视程度更高；对情绪的内省或缺乏对情绪的内省，可能同样部分解释了青少年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难以控制他们的行为。举例来说，人们在一项赌博测试中发现，只有年龄更大的青少年才能像成年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随着外表变得更加成熟，青少年的情绪也趋于稳定，这种转变与唤醒水平降低有关。[3]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控

制冲动的大脑机制才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青少年时期这些认知和情感过程的转变可能反映出前额叶功能的逐步增强，我们曾在第三章简要谈过这一脑区。[4]顾名思义，大脑皮层的这部分脑区位于大脑的前部，它构成了大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功能区。前额叶是体现人类进化阶段（系统发育）在个体发展（个体发育）不同阶段表现的一个特殊例证。因此，这种有价值的神经元只在灵长类动物大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人类大脑中占比33%，而在黑猩猩大脑中占比17%），[5]而只有在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时，人类大脑中的这些神经元才能在大脑处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6]

此外，由于前额叶通过与所有其他脑区广阔的网络连接发挥作用（可以说比其他任何脑区都多），[7]它增强了大脑的凝聚力。随着青少年的成熟，额叶和深部脑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加，这一过程在二十出头时直接与表现控制能力的提高有关。针对青少年的大脑，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是，通常在他们的脑成像中能看到广泛的活动，并且与任何具体的任务无关，就好像大脑中不断活跃着间断而随机的想法。这种自发的、非定向的举动随着成年期的接近而逐渐减弱，这意味着随着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的大脑运行的网络集合也变得也来越有组织，从而使大脑加工过程更加高效。研究确实发现，在发育过程中，静息态活动转变为更加综合的、可以延伸到更远脑区的网络活动模式。跨脑区的长程同步活动是共同激活的，这种活动也随着个体的成熟而增加。随着青少年时期临近结束，这种转变也描绘了随着成年的进程，不同脑区间交流改善的画面。[8]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大脑不同部分的成熟速度并不相同，这便能解释青少年虽然社交能力发展了，但仍然欠缺行为约束能力这一常见现象。皮层下的深部脑区比像前额叶这种更为复杂的处理中心更早地全面发挥作用。[9]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均匀的平衡，使行为更倾向于即刻的奖励和风险：前额叶还不够活跃，不能运用预先准备的刹车来预防由更原始脑区释放出的即刻“去做”信号。此外，正是在这个阶段，脑内多巴胺的活性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10]这会更加抑制本来就不够活跃的前额叶皮层。[11]

青少年脑内化学现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催产素的激增，催产素是一种与情感联结密切相关的激素，同时也被称为“感觉良好因子”。[12]多巴胺和催产素这两种神经化学物质的混合会导致处在青春期的个体表现出寻

求感官刺激和冒险。[13]多巴胺和催产素的过度分泌，再加上前额叶皮层活动不足的推动，使青少年更容易被锚定在此时此地，即一种超越认知和思考的游戏状态。总体来说，整个场景被当下、即刻的感官推动力所主导，而不是把这个瞬间刻嵌到一种“富有意义”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叙事中。

有时，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到成年期，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大脑的特定方面永远无法变得成熟起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而难以理解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现实”有着惊人的差距，因此被视为精神疾病。本书不会冒险深入到对这一令人着迷的状态的探索中，但它确实值得我们简要探讨一下。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特点包括更短的注意持续时间、逻辑混乱、妄想、无法理解谚语、不寻常的说话方式，以及过度的注意力涣散。[14]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于“正常”成年人，会更重视来自外部感官世界的任何侵扰，甚至会感到自己暴露于外部环境中，而其他人能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想法。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让人安心的、可靠而熟悉的感觉，像防火墙一样来把他们的大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意识，与野火一样不断侵入的外界刺激隔离开来。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在人类从童年发展到成年期的过程中，感官世界被一个更加“认知”的世界取代，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转变则远远不够。感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他们个性化的联想和对世界的解释，其“意义”都是那么的脆弱和怪异。

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很容易被当下外部环境中发生的事件所驱使。所有父母都知道，当一个孩子正在为从婴儿车上掉下去的冰激凌哭泣时，如果家长让他们抬头看鸟群或一架飞过的飞机，他们立刻会转而露出微笑。同样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反应表明，这种易受干扰的情况在儿童期之后一直存在。在一项实验中，患者组被试和健康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完成一项区分字母和数字的简单认知任务，并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要忽略掉背景中的声音刺激。与控制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分心，因此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15]如果外部世界过度苛求，那也难怪年轻人会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无法长时间地保持注意力集中。[16]

二者另一个显著相似的特点是，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无法理解谚语。如果让他们解释“住在玻璃房子的人不应该互相扔石头”[8]这句话，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给出的典型答案可能是“如果你住在一个玻

璃房子里，而我朝着房子扔石头，那你的房子就坏了”。类似地，孩子也会从字面意思理解，依照其感觉的表面价值来理解这个世界。当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被告诫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为不可挽回之事后悔）”时，他们可能会惊讶而不解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被打翻的杯子。核心焦点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儿童都难以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然而，对于儿童来说，支持认知概念框架所必须的完备的脑神经连接尚未出现，但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同样的结果则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引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有着许多大脑差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17]之一是具有调节功能的化学物质多巴胺的过度分泌。[18]因此，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有效的高水平多巴胺将会抑制大脑的连接，在前额叶尤为明显。多巴胺在前额叶起抑制作用，[19]从而削弱了内部认知过程的稳固性，因而也过分增强了传入感觉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前额叶皮层只有到十八九岁时才会完全发育成熟，[20]而另一种最有可能与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有关的倾向是，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要比一般成年人更鲁莽。[21]神经科学家早就知道，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与更具冒险倾向有关。早在19世纪，一个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在用一根粗棍子夯实炸药时不小心提前引爆了炸药，爆炸使这根棍子贯穿了他的前额叶皮层。结果菲尼亚斯变得易怒、孩子气，更加情绪化，以及更加鲁莽，这便是现在被称为“额叶综合征”的原型案例。

此外，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让人想到一种活在此刻的感觉，会对来自原始感觉的刺激做出瞬间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积极主动、深思熟虑的“认知”方式呈现生活。儿童不成熟的大脑状态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状态都对应着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但造成前额叶皮层不够活跃的原因却不同。对于儿童来说，是因为这个区域成熟得较晚；而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则是因为功能性多巴胺的过量，呈现出无序[22]和该区域细胞群受抑制的特点。[23]

有趣的是，还有一类完全出乎预料的群体，他们的前额叶同样不够活跃，同时也表现出鲁莽的特点。[24]他们是那些有着高体重指数（BMI）的人（体重相对于身高来说太重了），也就是肥胖的人。[25]他们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儿童一样，常常让当下的感觉战胜长远的结果。对那些特别肥胖的人，此时此地环境的压力异乎寻常地重要。毕

竟，任何人在吃奶油蛋糕或其他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时，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带来腰围增粗的结果。然而，当下的味觉快感战胜了一切。最后，让我们看一下那些强迫性赌徒。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些活着就是为了体验瞬间激动的赌徒们，他们的前额叶活动也是减低的，这些瞬间的激动包括轮盘赌中轮盘转动的时候，掷出骰子的时候，或是你选择的赛马开始超过另一匹马的时候。[26]

因此，在上述这些情况中，与不够活跃的前额叶皮层相伴的，是受感觉驱使而不考虑后果。这可能意味着相对而言，活动正常、完全成熟的前额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将过去和未来与现在进行联系，并产生一个更广阔的认知图景。另一个指向这一观点的线索是：前额叶的破坏将导致“来源遗忘”，即记忆本身完好无损，但记忆涉及的特定情境或情节被遗忘，记忆变得更加一般化。[27]患者不再以固定的顺序对特定事件进行连续性叙述，而是在不清晰的、朦胧的、由一般性记忆所提供的信息流中漂浮。

但这是否意味着前额叶皮层是某种控制开关，让我们可以从此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答案很简单：不是。我们不应把这片脑区想象成一个老板，它更像是一个促进者，更好的描述是一个最高的网络连接者。我们刚才提到过，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对其他皮层区的输入比大脑皮层的任何其他区域都要多，并因此扮演着让大脑统一运作的关键角色。[28]因此，如果这个关键的通信交换处不够活跃（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大脑整体的运作功能会大幅降低，而大脑整体功能通常会为了存取记忆和预先计划而进行协调。这一机制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意识的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石头扔进水潭的这个比喻。石头的大小是固有神经元连接程度（认知因素）；投掷的力度是引发瞬间意识的刺激强度（感官因素）；水潭中水的黏度是多种调节因子的有效性和浓度；投掷石头的频率，每块石头的大小，以及投掷石头的力度将决定各种情况下涟漪的广度，也就是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亦即任一时刻意识的程度。

因此，石头扔进水潭的模型有可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针对正常成年人类意识的基础替代模型，这也是一个包括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肥胖症患者和强迫性赌徒的共有特征模型。强烈的、原始的、感官的（因此也是“无意义的”）刺激将不会依赖于特异的个性化连接：石头将会很小。投掷的力度将会不成比例地过于强大：吵闹的音乐、明亮的颜色、

食物的浓烈气味，以及轮盘旋转的速度。然后，来自随之而来的石头的竞争会非常激烈，快速变化的环境将意味着，没有哪个新生的神经元集合能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最后，这一竞争将被过度分泌的多巴胺所强化（改变水潭的黏度），这将使得新神经元集合的招募过于容易，以及前额叶皮层受到抑制，进而使宏观层面的大脑连接碎片化。因此，这种替代状态是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中的一种，它与一种现象学有关，其中感官的冲击比其他力量强大得多。这种结构是以牺牲认知为代价的。这两种基本模式概括如下，见表一。[29]

表一

理智缺失（mindlessness）	有意义的（meaningful）
感觉	认知
强烈的感觉支配	思维支配
此时此地	过去—现在—将来
由外部环境驱使	由内部知觉驱使
缺少“意义”	个性化的“意义”
无自我意识	强烈的自我感
没有时间或空间参照系	清晰且按顺序排列的事件
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赌徒，体重指数过高者，吸毒者，娱乐（例如：快节奏运动、性行为、舞蹈）	正常的成年人的生活
高多巴胺	低多巴胺
前额叶低功能	正常的前额叶活动
世界毫无意义	世界充满意义
“与意识有关的神经元集合很小”	“意识相关的神经元集合更大”

然而，曾经在理智缺失和意义之间建立的平衡现在似乎变得不那么平衡了。我们目前被屏幕统治的环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两个维度和仅有的两种感觉：听觉和视觉。对于年轻的“数字原生代”（可以定义为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在十三岁到十八岁这一年龄组中的个体，每日使用媒体的时长为十一个半小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把同时做多件事考虑进去后，这一数字激增

到十八个小时以上。[30]随之而来的是，如果环境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转变为一种快节奏、高互动的二维空间，那么大脑相应地也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此加以适应，我们无法得知这种结果是好是坏。[31]

然而，对于当前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电子游戏[32]以及社交网站[33]增强了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这种神经学特征与从毒瘾者身上观察到的特征相似，并且与前额叶皮层的异常有关。[34]屏幕活动似乎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如此流行，这甚至进一步倾斜并夸大了理智缺失和意义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另一方面，游戏带来的兴奋、冲动以及纯粹的愉悦提高了大脑的多巴胺水平，而屏幕则展现了对感官而非认知模式产生的吸引力。这种快节奏、字面意义上的刺激将使小神经元集合模型更有可能成为数字原生代脑中意识的默认状态，而其程度之深，是之前的世代未曾经历过的。[35]也难怪杰克变成现在这样……

二、抑郁

如果说杰克过于沉溺于外部世界（虽然是网络世界），那么你的妻子简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问题：你是多么渴望她能与外界有更多的接触。出于某些原因，最近她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对于所有你认为能让她高兴起来的事情，她似乎都无精打采，提不起兴趣。她不再去健身房锻炼了，尽管这段日子里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但她似乎总是很疲惫。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懒得去吃一顿像样的饭，也不愿意梳洗打扮，而且即便是很小的刺激也会让她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所有的事情对她来讲似乎都太过于费力了，她有时会蜷缩在羽绒被下，毫无缘由地悄悄哭泣。没有什么能让她再开心起来。

临床抑郁这一疾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快感缺失，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缺乏快乐。患有抑郁的个体对于像日落这样美好的事物麻木且无动于衷。他们感到自己会被任何事情淹没，没有能力应对，他们从复杂而苛刻的日常生活中逃离。进而，外面的世界似乎那么遥远，那么灰暗，那么苍白。究竟是感到远离外部世界导致了感官刺激不足，还是感受系统功能不足促进了被隔绝、被孤立的感受，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大脑研究人员。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并不互相排斥。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意味着将自己锁在内心世界里，不受感官冲击的影响，不为其所动。抑郁是反复出现的一连串强烈的思维，甚至也可能是一幅顽固且持续存在的画面。

在抑郁患者身上，大脑整体的化学状态发生了改变，即再一次地，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在内的氨基类神经递质失去了平衡，而上述神经递质负责调控个体的唤醒水平。在水潭的比喻中，这些神经递质和水潭的黏度有关。因此，医生可能会给抑郁症患者开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这种药物通常被称为“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即一种（主要）提高5-羟色胺有效性的药物。为什么5-羟色胺（及其化学类似物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可以减轻情绪低落，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抗抑郁治疗的故事有其自身的根源，正如很多科学发现一样，抗抑郁疗法也是在偶然的观察中发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用于治疗高血压的是一种被称为“利血平”的药物。[36]其原理是：人们推测，如果去甲肾上腺素和与其关系密切的肾上腺素会通过增加心率和血压来激活身体的“战斗和逃跑”机制，那么降低去甲肾上腺素有效性的药物就应该可以在逆转这些影响方面对高血压患者起到治疗作用。利血平确实有效地减少了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的储备，因此它确实有降低血压和心率的理想且恰当的结果。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它有一项危害很大的副作用：目前公认的是，利血平会让那些本来平静的患者变得抑郁，甚至产生自杀的倾向。[37]

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叶，肺结核是最常见也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当时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被称为异丙嗪，该药物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该疾病特有的有毒菌株。[38]异丙嗪可以阻断对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起分解作用的酶（单胺氧化酶），凭借此机制，异丙嗪可以提高上述神经递质的有效性，因此它作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而广为人知。然而，该药物同样有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结核患者变得异常兴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一种严重的疾病中康复，还有药物的直接作用。[39]

当这两个偶然的发现结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如果像利血平这类消耗体内胺类物质的药物会使人产生抑郁，同时如果像异丙嗪这类提高相同胺类物质有效性的药物会使人兴奋，那么显然，情绪与胺类物质通过某种方式产生关联。因此，抑郁的胺理论认为，决定情绪（情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脑中胺类物质的功能水平。如果有效性水平高，那将会产生随之而来的情绪；如果其有效性水平异常低，在现象学上的必然结果就是临床抑郁症。[40]

然而，除了打开和关闭胺类物质的阀门外，还有其他有关抑郁的内容。例如，我们知道从最初服药到看到疗效之间大约有十天左右的“治疗延迟”。[41]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提高5-羟色胺水平，而更多地是理解5-羟色胺和其他胺类物质的增加会对相关的神经元产生怎样的远期影响。一种观点认为，5-羟色胺的靶受体需要时间重新调整它们对提高到新水平的递质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是，药物引发的胺类物质水平的提高，触发了某种独立的、长期的修复性脑机制，例如长效生长因子的释放以及可能的炎症因子的降低。这两种可能并不互相矛盾。因此，不只是“自下而上的”化学和突触因素发挥着作用，还有更偏认知方面的“自上而下的”因素也同样发挥着作用。治疗干预引发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的化学物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延时且持久的神经元可塑性将通过对这种状态的适应而发挥作用。

然而，也可以在不借助任何外界药物的作用下，通过利用大脑天然的可塑性对情绪进行调节。例如，近几年已经证明，心理治疗中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对抑郁症的治疗是非常成功的。[42]顾名思义，CBT中不使用任何药物，治疗师通过对话帮助抑郁患者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从神经科学角度对CBT的一种解释，是将其视为人为改变可塑性发挥作用的一种特别有效的形式，通过帮助患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这种方法重塑了患者的神经连接，亦即塑造了一块新的石头。

我们与环境的互动越多，脑细胞连接就会产生越多的改变。数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抑郁的人表现出从外部世界退缩，避免与其互动的倾向，尤其回避体育锻炼。因此，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让自己的心率加快，因而与高唤醒相伴的去甲肾上腺素等胺类物质在他们体内的水平也不会很高。最近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抑郁患者的脑细胞新生也表现出下降——丰富的自然环境和自愿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神经发生（第三章），并且会进一步提高神经可塑性。[43]接受新的刺激和体验，经历更强的唤醒，提高胺类物质的水平，从而改善情绪，这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相反的情形是，伴随着与外界世界的疏离，神经发生下降，体验到更少的兴奋，由此产生抑郁情绪。而在此时的恶性循环中，由于锻炼和幸福感的相互作用，以及刺激不足和疏离感的相互作用，很难确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抑郁患者大脑中的神经元集合会有什么变化呢？试想一下，一个人

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逃离，更不会参加剧烈运动，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羽绒被下度过，或至少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与外界互动。他们的体验会更加匮乏，他们的神经连接也不太可能改变，由于他们的生活中不太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也不太会有新的刺激进入大脑。毫无疑问，这会使得现有的神经连接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此外，大脑将无法产生恰当水平的多巴胺及其衍生物，因此也就无法帮助形成新的神经元集合或原有神经元集合的转变。这意味着，以前那块异常大的石头将会比之前更有机会在水潭中激起涟漪——最终的神经元集合，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与之抗衡：转变越缓慢，神经元集合的覆盖范围会变得越广阔。最重要的是，如果抑郁的焦点是持久的、反复出现的，那么会形成更多的神经连接，而焦点的那块石头会变得越来越大，同时神经元集合覆盖的范围也会变得更加广阔。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临床抑郁和异常巨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大脑“理智缺失”状态下的小神经元集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截然相反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例如之前提到的，以前额叶激活不足为特征的“理智缺失”状态下较小的神经元集合，在抑郁中则主要表现为前额叶的过度激活，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44]此外，在惊心动魄的体验中，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会产生高水平的多巴胺，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胺类物质及其化学衍生物在抑郁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最后，小神经元集合大脑状态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与外部世界的强烈互动，许多新的神经元集合等待着建立，这些神经元集合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抑郁状态则与之截然相反，抑郁的个体回避与外部现实的互动。

如果抑郁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这将会帮助我们理解那个长久以来的谜——电痉挛休克疗法（ECT）为何会有效。在这种疗法中，电流通过连接大脑表面的电极，直接通过重度抑郁患者的大脑。[45]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电休克治疗是简单且非特异性的，但当其他所有药物治疗都失败时，电休克治疗仍然有效。那么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或许是电流扰乱了固有的神经连接网络（事实上，电休克疗法常见的副作用之一是丧失记忆），从而促进新的网络和不同的网络得以建立。这是一种强制的可塑性：通过击碎那些大的、原始的、一直存在的石头，使新的、常规大小的石头更容易形成。

抑郁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这一观点，将同样可以解决另一个

临床难题：锂类药物可以有效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这类疾病的患者会体验到极大的情感波动，从深度抑郁（这时是大的神经元集合）到高度兴奋或躁狂，表现出许多小神经元集合的特征。[46]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在元素周期表上锂和钠相邻，这意味着锂更容易在大脑中作为钠离子的化学替代物发挥其作用。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基础是钠离子涌入神经元，这会引起至关重要的电脉冲的初始触发，即让细胞产生活动的动作电位。碰巧的是，锂会与钠竞争钠离子通道，并穿过这条特殊的通道进入神经元内部，[47]但锂离子进入神经元内却无法完成钠离子的工作，此时动作电位则无法产生。

为什么这样一个常见的，平平无奇的活动，能如此有效地抑制像躁狂这样一个复杂且难以理解的认知问题？由于患者在两种极端的情感状态间摆动，因而躁郁症被恰当地称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阶段与抑郁的麻木和怠惰是完全相反的，其特点是过度活跃和冲动行为，思维局限在当下，因外部世界感到心烦意乱并做出过度反应。简言之，像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的小神经元集合模式。与此相一致的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更加鲁莽，并且其前额叶功能水平减低，[48]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49]所以，如果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阶段可以用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来解释，而如果锂的核心作用是阻碍神经元活动的基本机制，那么或许锂的疗效就在于，阻断了神经元集合太过容易地一个接一个形成这一过程。这种巨大的转变可能标志着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躁狂阶段的精神状态。总之，锂类药物通过运用化学刹车的手段起到了稳定神经元集合产生的作用。

但一个恼人的问题是，这种化学刹车只适用于躁狂，锂类药物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抑郁阶段并不起效，对于标准的抑郁症也无效。为什么会这样？关键的线索在于：事实证明，只要在负性情绪控制患者之前给药，那锂药对抑郁的治疗也是有效的。[50]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一种可能性是，锂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神经活动稳定在基线标准附近。因此，这对于神经元集合本来就很稳定的正常人没有任何效果，而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其神经元集合早已变得非常巨大且持续了很久，因此锂对于这种已经建立的神经元集合同样没有作用。与之相对，当神经元集合正在建立（如躁狂）或是正在扩展（如抑郁阶段的开始）时，也就是当神经元正在进行传导（即活动提高）时，也许是锂药发挥作用最关键、最有效的阶段。

三、疼痛

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对疼痛的敏感性，这与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完全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51]和躁狂症患者[52]有着较高的痛觉阈限（即他们更少感受到疼痛），但抑郁症患者却对疼痛有着比正常人更低的阈限，会更大程度上感受到疼痛，这被称为痛觉过敏。[53]所以，如果抑郁和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并且如果大脑的这种状态与更容易感知到痛觉有关，那么是否对所有人来说，较大的神经元集合与主观痛觉程度的升高一般性地联系起来？有几项原因可以对这个有趣的可能性进行解释。

一种原因是，疼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像是刺痛、灼烧痛，这些表现形式取决于广阔的神经元连接。[54]一天中不同的时刻疼痛阈值也不同。例如在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被试的牙齿进行电击，结果发现人们在中午最容易感受到疼痛。[55]这种疼痛阈值的波动可能是由于一天之中胺类神经递质的分泌存在节律性。疼痛感知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疼痛预期越多，痛感就越强，[56]这可能是因为延长的时间范围增加了神经元集合建立的机会。

另一个表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发挥作用的原因与“幻肢疼痛”（phantom-limb pain）有关，[57]在这种病症中，被截肢的人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失去的肢体。生理学家罗纳德·梅扎克（Ronald Melzack）和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很久之前发展出“疼痛矩阵”（pain matrix）的概念（可以说，这一概念可以与神经元集合相媲美），认为如果你没有从肢体接收到正确的反馈（因为那个肢体已经不存在了），神经元将会过度激活并产生大的神经元集合，因此会有更强烈的疼痛感。[58]此外，吗啡是一类强大的止痛药，会产生“梦幻般的”欣快感。患者报告当他们服用吗啡时，他们依然会感到疼痛，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59]我们知道，吗啡对生理性鸦片（内啡肽）靶受体起阻断作用，在大脑中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神经元集合变小。[60]最后，大脑状态以小神经元集合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很高的疼痛阈值。[61]

此外，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由于麻醉药的化学结构及自下而上的细胞活动都具有多样性，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单一的一般性解释。但最重要的是，麻醉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会在大脑运作的中等尺度上减小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从而发挥其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当麻醉剂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有趣且违反人们直觉的悖论。如果麻醉

剂起效缓慢（因为它会减弱你产生小神经元集合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在失去意识之前，你会体验到一种欣快感，是充满情感色彩的小神经元集合状态所持有的。当然，这种观点有些奇怪，但它似乎是正确的。从前，在麻醉剂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效之前，那些将要接受手术的患者会经历躁狂和兴奋的阶段，事实上，人们会沉迷于“乙醚嬉戏”[62]或吸入作为消遣性毒品的笑气[63]——他们现在又开始这样做了。[64]此外，小剂量的麻醉剂氯胺酮也经常作为消遣性毒品使用。[65]

通过比较大、小神经元集合可能的主观现象学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原理。记住，抑郁患者报告的是他们在情感上“麻木”，与其说他们感到悲伤，倒不如说他们压根什么都感觉不到。同样地，儿童、躁狂症患者、吸毒的人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体验着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合乎逻辑的假设：第一，神经元集合范围越广阔，原始情绪就越少；第二，情绪因此必然是意识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只要想一下狗摇尾巴，或是婴儿咯咯地笑，就会发现第二个假设没什么好惊讶的。

透过神经科学的透镜，我们现在可以将临床抑郁症解释为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石头会很大），因为广泛而高度个性化的神经元连接将发挥作用。此外，过度激活的前额叶会增强这种遍布整个大脑的连接：不会有竞争者或其他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不会有其他的石头被强有力地投掷，事实上，感官感觉会被减弱——外部世界会变得单调而无法引起感情。神经元集合缓慢的转变将会不受阻地增长。唤醒水平会变得很低，因而胺类物质的水平也会变低，水潭会变得很浓稠，进而阻碍任何现存的竞争者。此外，正如不活跃和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是抑郁的标志（投掷石头的力度小），抑郁可能是由于不活跃和缺乏接触造成的。

在老年人中，抑郁和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生理接触之间的关系特别明显。[66]在一项以智力正常的老年人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比了在社区生活的老年人和在收容机构生活的老年人之间的认知功能差异，结果发现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在认知测验中的表现比生活在收容机构的老年人更好。[67]测试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对健康老年人的影响的一种方法，是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储备”之间的关系。认知储备这一概念的定义，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能够创造和使用概念网络的程度。越多参与智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就越不容易产生认知损害，这并不奇怪，它证明了“用进废退”的魔咒。一种精神活跃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增加脑

细胞间突触的密度保护个体免于精神衰退，从而提高来自完整神经元的信号传导的效率。[68]

人们已经证明，记忆力训练对老年人的大脑有好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被试进行了为期八周的强化记忆训练，并在训练的前后对被试进行脑部扫描。[69]他们发现，进行过记忆训练的这组被试的表现得到改善，大脑皮层的厚度也有所增加，从而进一步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大脑的可塑性一直持续到老年。通过持续的适应性，越多的经验在大脑中留下了它们的记号，反映老年人智慧的“理解力”（从不同层面看待一件事情的能力）就越强。

然而，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第二章中设想的那个场景：一个成熟的、精心设计的人类大脑，其中充满了神经连接，这些连接对从未有其他人经历过、将来也不会有人经历的独特体验做出过反应，而且它被这些独特的体验所激活、加强、塑造，这便形成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个体心智。接下来，想象一下那些高度个性化的连接正在被慢慢拆除，因为树枝（树突）枯萎了。那块本来要被扔进水潭中的石头被磨成了一块鹅卵石。个体将再次变得像孩子一样，他们不再具备成年人思维的制衡能力，不再能评估正在经历的体验，他们一生中仔细积累起来的对人和对物的那些高度个体化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阿尔茨海默病（一种痴呆症）患者那悲惨和不幸的症状，在这种疾病中，病人真正意义上“失去了心智”。

四、痴呆

你的岳母黛茜现在和你们住在一起，不幸的是她正处在痴呆的早期阶段。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症状波及的范围及其破坏性都非常大。你可以将它们分成三大类，将记忆困难、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减弱以及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损列入认知症状中。黛茜开始记不清名字和地点，曾迷路走失过一两次。她偶尔会忘记自己把东西放在哪里，或是把东西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她还表现出判断能力下降、缺乏危险意识，或着装不当，像是在大雨天不穿雨衣就出门。由于在词汇方面出现了问题，阅读、书写或是与他人对话这些活动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有一次她把雨说成“许多水从天上掉下来”，因为她忘记了“雨”这个词；另一次她把房车说成“带轮子的房子”，因为她不能立刻说出“房车”这个词。

还有情绪上的症状，像是易怒和社交困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

容易在小事上过于激动或表现得有些偏执，这令患者对其他人感到怀疑，并不恰当地指责他人做了坏事。他们表现出的另一个缺乏正常神经制衡功能的迹象是，他们会在谈话中表现得过于亲昵或是在性方面口无遮拦。痴呆患者常常对他人表现得不耐烦，例如当他们需要排队时就会这样。他们表达的情感可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如毫无缘由的攻击性或是不合时宜的大笑或哭泣。最后，还有一些更明显的生理症状，主要表现在难以完成普通的日常活动，像是做饭、洗衣、穿衣、收拾院落等。

世界上每隔七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为痴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只有2%的患者在六十五岁之前得到诊断。一经发现，症状最长可在五年内维持稳定，而患病者平均可以生存十年，这个时长取决于诊断时患者的年龄。目前英国有八十万患者遭受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将上升至两百万。令人感到不幸的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到2040年全世界将有八千万患者。痴呆不是衰老的自然结果，但它确实是一种发生于老年群体的疾病。[70]一般来说，70%的痴呆明确是由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只有在尸检时通过找到大脑中可以被染色的特定标记物才能对此加以证实。无论是由于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其他疾病（如额颞叶痴呆或是路易小体痴呆）造成的痴呆，这一疾病的关键特征是个性化神经连接的丧失，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正是这些神经连接使每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如果你无法获得个性化神经元连接的制衡，如果你周围的物体和人都不再具有意义，那么逐渐地，你将只能从表面上看待这个世界。你又回到了婴儿时那种“轰鸣、嘈杂的混乱世界”中。有时，当你在度假地的宾馆中醒来时，在你的“心智”（你对世界的个性化认知）开始工作之前，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意识到你在哪里，以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当你长大成人后，你能够将此时此地的意识融入到你那生活的叙事当中，并将你那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视为理所当然，但痴呆患者却没这么幸运。他们的意识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小的神经元集合，而且注定会越变越小。事实上，黛茜似乎正在发展一种更加反应性的、像孩子一样的、当下性的精神状态。

如果痴呆患者的意识状态可以用一种更小的神经元集合来描绘，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当前的治疗方法在稳定患者神经元集合大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呢？目前所使用的药物安理申可以暂时帮助服药者中50%到60%的人持续受益六个月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患者的症状可以切

实得到改善，在最差的情况下，患者至少维持在同等水平。如果患者坚持药物治疗一年以上，便可以减缓记忆症状恶化的速度，同时可以改善人们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如洗衣服、穿衣和做饭。

安理申通过提高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可用性发挥作用，乙酰胆碱是促进神经元集合形成的重要神经递质中的一种。安理申在配体和受体（螺母和螺栓）的水平上阻断了一种通常破坏乙酰胆碱的酶，由于分泌乙酰胆碱的细胞消失了，该神经递质的分泌量也逐渐减少。因此，安理申通过延长这一珍贵的化学物质发挥作用的时间，来对抗其分泌量减少这一状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其作用仅仅是暂时的，因为药物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在理想的状况下，药物一开始便可以阻止释放乙酰胆碱的细胞死亡。

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大脑的原始部分中形成中枢的细胞群，它们释放出的化学调节物质至关重要。脑细胞逐渐丧失这个无休止循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而为什么这并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普遍特征，长久以来一直是个谜。71只有特定的细胞群具有易感性，即中枢细胞在症状显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退化了。临床医生都熟知的一个有价值的见解是，阿尔茨海默病经常并发另一种以退行性病变为主的疾病——帕金森病。72尽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认知损害，而帕金森病是一种运动功能障碍，尽管两种疾病都是某一类神经元死亡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但首先，在特征性且持续性的细胞死亡循环背后，两种疾病可能有着某种基本的、单一的共同机制。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中都出现细胞消亡的中枢细胞，最初来自胚胎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因此它们与其他所有的脑细胞相比，在本质上有着某些不同的特征。用这些特性解释为什么中枢细胞主要以及特别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侵袭，这一思路很有吸引力。结果表明，中枢细胞本身就保持了从发展到成长再到成熟的机制。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背后的这些过程，可能因此成为一种被异常激活了的的发展形式。73

那么，从神经元集合动力学的层面上讲，这一过程对大脑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这些关键细胞选择性地开始凋亡，那么对正常大小神经元集合起促进作用的胺类家族成员的释放将会越来越少。相应地，神经元集合会越来越小，最后慢慢地变回婴儿时的状态——这是痴呆症的一个悲剧性的特征。然而，区分痴呆患者大脑和处于发展状态的大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处于发展状态的婴儿大脑中产生的小神经元集合，是由于

在“高级”脑区中不同的目标神经元网络的适度连接而产生的，其多巴胺分泌功能是正常的，甚至是过度的。相反，在退行性病变的大脑中，尽管之前存在的神经元连接可以暂时保持良好的状态，但神经递质的分泌是干涸的。显而易见的是，痴呆症状可能要在退化过程开始十到二十年后才会出现。换句话说，儿童神经元集合较小是因为石头较小，而痴呆患者神经元集合较小是因为涟漪很难扩散。

然而，随着石头本身的削减，随着贯穿大脑的神经网络中局部连接的拆除，神经元集合最终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让石头变大，那么神经元集合可能依然可以维持较大的状态，以此来弥补涟漪的低效。从现象学层面来看，这可能正是不同种类的非药物疗法在痴呆症治疗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例如，“回忆疗法”被证明在减轻阿尔茨海默病最坏的影响方面是有效的。[74]尽管患者可能无法记住最近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却能很好地回忆起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就像是谈论昨天发生的事情。回忆疗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痴呆患者对过去发生的事保持着生动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用来改善情绪和幸福感，并改善患者与家人、照料者和其他照看他们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过去的记忆更加稳固。

我们都知道，记忆的稳固需要两年的时间。一个著名的重度癫痫案例（研究者在其生前只知道他叫“H.M.”，当他于2008年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叫“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时间间隔。亨利为治疗癫痫接受了手术，彻底切除了大脑中与记忆处理有关的部分脑区。结果他不止记不住手术之后发生的事情，连手术前两年发生的事情也都不记得了。

通过向痴呆患者展示诸如相片、电影、视频、相簿、音乐等事物（事实上，任何能引起记忆或引发对熟悉的话题进行讨论的事物都可以），人们试图激发更多的神经连接，而不是让患者保持现状。例如，在伦敦的一所老人之家中，有一个“20世纪40年代房间”，里面有电木收音机和那个年代的杂志。

另一种尽可能确保神经元集合维持最大体积的方法，是运用不同的感官刺激，例如用音乐。[75]一首最受欢迎的音乐，或是一段有着特殊意义的音乐（如婚礼上演奏过的歌曲），或是在第一次约会时流行的歌曲，这些都会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产生显著的影响。即使记忆衰退，音乐依然可以产生强大且有益的影响。音乐治疗使用旋律、节奏、乐器和

歌声来提升患者的幸福感。显然，音乐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音乐是人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与语言对等，是在人类的表达和交流这枚硬币另一面的补充形式。痴呆患者在失去诸如注意、记忆等其他心理过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依然可以感知到音乐，甚至当疾病发展到患者在其他时间里都已经难以理解事物的程度时，音乐唤起这些感受的力量仍可以被用来与之沟通。

神经科学家萨克斯在他的《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Musicophilia*）一书中讲述了八十岁高龄的贝西·T（Bessie T.）的故事。贝西是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前蓝调歌手，疾病使她变得如此健忘，以至于任何事物在她脑海中都无法保持超过一分钟。当她在为她居住的护理之家准备才艺表演时，她和音乐治疗师一起练习了一些歌曲。那天贝西表现得非常出色，她自己感觉也很好。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记住了所有的歌词。然而过了一会儿，在她离开麦克风之后，她甚至不曾记得自己唱过歌。[76]

除了可以利用视觉和听觉促进更多神经元连接的激活，让石头尽可能保持最大，还可以用嗅觉和味觉。如果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最喜欢的食物或饮料刺激他们，并与他们讨论曾经品尝这些食物时的地点、事件和在场的人物，患者们会发现他们更容易记住事物。最后，在过去穿过的衣物、戴过的首饰的刺激下，再配合珍贵的珠宝以及心爱之人的奖牌，触觉也可以加以利用。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对化学物质（水潭的黏度）和神经元连接（石头的大小）的调节都是次优选择，还有一个可以增强的特征是投掷石头的力度。[77]

现在什么样的神经元集合正在你的大脑中不断地形成和分解呢？当你把钥匙插进锁眼中时，房间里静悄悄的。让你的内疚得以缓解的是，每个人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杰克正和他的手机聊得不亦乐乎，而越来越像个小孩的黛茜在几个小时前就睡下了，简会盯着天花板，对你的到来视而不见。甚至连波波也瘫在它的篮子里，鼻子搁在两只分开的爪子之间，看上去筋疲力尽。在这空荡的房间中，孤独的苦涩和甜蜜是你唯一的感受。

第七章　做梦

你踉踉跄跄地爬上楼梯，走进自己狭小而单调的房间，脱掉衣服钻进羽绒被里，仰躺在床上，怔怔地盯着墙上的影子。这一天简直飞驰而过，你还清楚地记得你躺在床上努力驱赶睡意、催促自己赶紧起床的画面。但是现在，你正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昏睡过去，落入梦乡……

不同物种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差异巨大，驴每天睡三小时，而犰狳每天睡二十小时。这种差异似乎反映了不同非人类物种具有不同的生态需求，类似早期人类在进食所需的时间和被吃掉的风险之间所建构的某种付出——回报平衡。[1]然而，在漫长的昏睡过程中，毋庸置疑，你还会在零零星星的时间里进入一种意识形式，这是一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白天的状态，但又与白天有许多古怪的差异，这就是做梦。“做梦”这一术语原本被认为与另一个更学术性的词“快速眼动睡眠”（REM）同义，二者可以交替使用。“快速眼动睡眠”是一个独特的睡眠阶段，其特点是眼球在紧闭的眼皮下快速转动。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与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的差异同样适用于整个动物界。

然而，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做梦的状态也会在没有这些标志性特征的情况下独立出现。研究表明，虽然被试常常都是在从快速眼动睡眠中被叫醒后表示做了梦，但这并非铁律。在一项研究中，当被试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时醒来，研究人员不问他们是否做梦，只是简单询问刚才他们头脑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什么，[2]大约一半的被试描述了他们在睡眠的各个阶段所做的某种形式的梦。

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的夜间癫痫发作中（其通常特点是做噩梦），做梦的主观体验与快速眼动睡眠这一特定生理阶段属性之间的区分更加明确。此外，不同脑区损伤造成的影响也表明，快速眼动睡眠不能完全等同于做梦，反之亦然。原始脑干受损能够消除快速眼动睡眠的明显迹象，但人还是会做梦；而更高级的脑区受损消除了梦，却保留了快速眼动睡眠。[3]综上所述，当我们探讨梦时，必须谨记这一要点：虽然做梦有时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但这种令人着迷的意识形式并非完全与特定的睡眠阶段相关。

一、梦的目的

对于做梦的人来说，梦在当时似乎与日常意识诡异地相似，但醒来以后再回想，却觉得有明显的不同：碎片化的叙事，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例如飞翔、突然从一个人变形成另一个人等等，这一切在白昼的寒光中都显得荒唐可笑，甚至令人尴尬。那么，这个神出鬼没又以某种方式与现实联系的时隐时现的意识，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制定了一个标准的计划，研究当人被剥夺了做梦的机会时会发生什么。考虑到梦在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都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剥夺被试做梦的同时又允许他们自然经历所有的睡眠阶段。不过，人们就睡眠剥夺对一般心理功能影响的记录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4]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不足为奇的结论：总体来看，睡眠，尤其是做梦，对于我们迎接新一天的变化明显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研究表明三十六小时的睡眠剥夺会导致记忆任务表现的严重退步，即使倒霉的志愿者服用大量咖啡因来抵御睡意也于事无补。[5]以实验方式诱发失眠的另一个影响是，刻意保持清醒的被试会处于一种情绪高涨的状态，[6]而影像学研究表明，与情绪反应（杏仁核）相关的脑区的活跃度会提高60%。[7]特别地，快速眼动睡眠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第二天体验到的情绪刺激的强度减弱到前一天晚上的情绪刺激水平的关键——同时减少杏仁核的相应活动。[8]此外，睡眠剥夺引起的过度反应性情绪障碍与致幻剂（LSD）类毒品引起的各种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关系，这些疾病的特点往往是不良的睡眠模式。[9]

人们认为睡眠这一行为在整体上会起到某种巩固的作用，有助于人们应对清醒时的生活，而做梦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个观点并不新颖。然而，观察极端的、人为的睡眠剥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一回事，推断正常做梦时大脑中可能发生的事，甚至理解我们为什么做梦，又是另外一回事。睡眠专家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和同事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从一个无可辩驳的假设入手探索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梦为你营造了一个私密的、似乎是从内部建构起来的世界，无需额外负担外界给大脑输入的感官信息。[10]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的眼耳口鼻所传递的不仅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多余附加信息，而很有可能为梦境的生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霍布森和弗里斯顿的想法是，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前你清醒时的感觉信息加工；[11]而与此对应的是，只有大脑“下线”时，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感官所带来的全部影响。所以，做梦的大脑

被称为“虚拟现实发生器”，会让做梦的人一旦再次醒来便能确认、预测并充分利用现实生活环境，虽然有时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

乍一看，这套解释似乎非常合理：在梦中，由控制眼部肌肉的信息输入激发虚拟视觉搜索，做梦的人试图为此寻找一个解释，于是通过快速眼动，从而引发神经元连接的重组，而这个幻想世界被适度简化了。如果没有梦所提供的这种周期性修复（“修剪”），神经元网络会变得过于复杂，出现功能失调。12正如水管工修水管时要关水，或许正在巩固或修复神经元网络时，大脑需要暂时阻止感觉信息的输入。

但是，为什么这个过程不会在没有梦的主观体验的普通睡眠过程中发生呢？虽然我们最初对睡眠功能的认识主要基于一些准备性情境，例如补充脑内化学物质储备，或是对恰当的反应行为的排演。但依然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梦中新蛋白质的合成同清醒时一样低，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可能会出现有限的合成，但大部分蛋白质产生于无梦状态。13同时，排演行为也可能没有太大意义，或者至少不太有效，因为醒后对梦的回忆往往是不确定的，没法保证你会记住自己在梦中“所学”的东西。

然而，这种离线处理过往事件和经历的方式，对于表现出高水平快速眼动睡眠的复杂动物大脑来说可能尤为珍贵，这也意味着梦是记忆巩固与情绪合理化的核心。14科学家们采集了八十三个物种的数据，发现大脑体积与自身体型之比较大的动物所需快速眼动睡眠比例明显更高，15这表明做梦可能确实会促进智力和认知功能的发展。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快速眼动睡眠的数据与大脑的大小或复杂程度并不匹配，许多具有中等认知能力的动物仍显示出大量的快速眼动睡眠，而许多大脑复杂的动物则很少或几乎没有。因此，与快速眼动相关的梦似乎并非人类认知“工具箱”中一个复杂的附加组件，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它是任何形态和大小的大脑都具备的一种基本默认配置。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便难以想象更简单的大脑（特别是人类胎儿的新生大脑）到底梦到了什么，以及这些梦境与他们清醒时的现实有何不同。可以这么说，与梦和心理能力的分离相一致的是：众所周知，做梦在胎儿和婴儿的睡眠中占主导地位，在成年人中比例则有所下降，而成年人的认知功能和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肯定是高于胎儿和婴儿的。

睡眠研究中心负责人杰里·西格尔（Jerry Siegel）及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个做梦的理由。他们指出，高水平快速

眼动睡眠与哺乳动物的“晚熟”（即与“早熟”相对意义上的“晚熟”）密切相关。[16]与马和豚鼠等从小能自我照顾的早熟类动物相比，猫、老鼠和人类等晚熟类动物出生时很无助，无法照顾自己。更容易独立的动物从出生起快速眼动睡眠便较少，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变化，但需要照料的动物则有更多快速眼动睡眠，之后随着生物成熟而减少。因此，出生时的不成熟程度，似乎是预测特定物种快速眼动睡眠时间的最佳指标。

二、梦的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

人类胎儿在子宫内发育到七个月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睡觉上，[17]其中每二十到四十分钟进行一次快速眼动睡眠，甚至在之后的新生儿期，这种模式也至少占总睡眠时间的一半。[18]胎儿期这种过量的、明确的做梦周期一直持续到出生后，大约是成人的两倍，成人的快速眼动睡眠仅占总睡眠时间的约四分之一。[19]因此，对大脑状态而言，无论梦和快速眼动睡眠意味着什么，它们从极早阶段开始就发挥着一些非常基本的作用，在早期个体的发展（个体发育）和进化（系统发育）的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人类胎儿和更简单的动物群体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认为做梦是为了巩固复杂认知的观点[20]与在胎儿阶段快速眼动睡眠量不成比例的高相矛盾。毕竟在非常局限的子宫环境中，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快速眼动睡眠在作为巩固白天记忆和认知积累的候选生物机制方面并不理想，不然便很难解释，为什么对巩固记忆需求较少的相对简单的大脑却有着大量的快速眼动睡眠。[21]

三、梦的神经科学

为了把握梦的关键，我们需要回到基本议题上，也就是大脑本身。我们需要试着确定，白天清醒和夜间做梦这两种非常相似，同时又有许多有趣差异的意识类型，在潜在的大脑加工过程上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个体大脑的内部世界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大脑是如何让做梦的人暂时脱离他们当下的物理环境的呢？

做梦时，肌肉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解释了一种常见的噩梦类型，即想要疯狂逃跑的同时，却莫名其妙地固定在原点跑不了。而且，在清醒时也会出现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当异乎寻常的强烈刺激出现时，比如在爆笑或性高潮时，有些人会突然间完全陷入睡梦中！[22]当我们醒着的时候，这种机制有时会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出现。当我们处于极度兴

奋或恐惧时，因为腿部肌肉放松，你可能会感到无法移动，因此会“两腿发软”。[23]

在诸如恐惧等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不只有人类会丧失行动力，僵住完全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通过限制行动来保护自己不被吃掉，比如当老鼠闻到猫的气味时就会僵在原地。不知何故，当你处于一种强烈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时，本能直觉认为你最好别动，这也与极端情况下的做梦相关联，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的：做梦会导致无法移动，也就是无法逃避即将到来的危险。可能性之一是，在极端危险或激动的情境下，人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在他们能够做出恰当反应或至少能评估处境之前，最好什么都别做。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既然没有足够认知能力来思考这种问题的原始动物也会这样行动，那么这种机制很可能最开始就是存在的，之后随着进化逐渐适应了人类更复杂的需要。但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有一种理论认为，睡着时，前额叶脑区使运动系统失灵。由于阻断了这条通路，大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到刺激与感知有关的后部脑区，但此时并没有正常的感觉输入。[24]可话又说回来，我们依旧不明白为何这种“转向大脑后部的活动”不能在无梦睡眠中发生。所以，除非还存在另一个尚未被确认的、具有限制性并仅仅针对梦的开关，否则这一理论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底是什么让梦成为一种如此特殊的过程。

另一种解释是，丘脑作为感觉传入的主要中转站，在睡眠中像神经元闸门一样猛地关上了，使感觉信号无法通过。然而我们都知道，刺耳的闹钟声完全能穿透任何可能存在的障碍。因此，不能用大脑暂时地把感觉完全排除出去的现象定义做梦。或许归根结底，对于已经活跃的意识来说，感觉信息只是额外可供选择的部分……

纽约大学神经生理学家鲁道夫·理奈斯（Rodolfo Llinás）和同事丹尼斯·帕尔（Denis Paré）所提出的正是这一反其道而行的观点。他们提出，对于正常脑功能来说，感觉输入只是一种附加的奢侈品，恰巧在人清醒时被迫投入使用，但与做梦无关。[25]理奈斯和帕尔继续道，在所有其他方面，清醒和做梦本质上是等同的大脑状态，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同一个特定的神经回路，即常被使用、广受欢迎的丘脑皮质环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认为实际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路：一个具备非特异性的激励或唤醒功能，而另一个负责修饰某些具体的内容，其中包括感觉信息。因此，基本的意识从来都不是外部驱动的，而是大

脑的一个基础的内在特征，只是偶尔会受到感官及其输送的外界信息的调节。理奈斯和帕尔也进一步提出疑问，为什么在至关重要的丘脑皮层系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环路连通性与直接感觉信息输入的转换有关？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理由认为丘脑皮层环路是意识的关键。[26]将做梦状态视作意识的默认设置的想法确实很有趣，但作为其基础的神经理论基本构造并不成立。首先，意识不太可能仅仅由一套丘脑皮层环路支撑，两套也远远不够。毕竟，一小片没有实体的丘脑皮层环路几乎不可能有主观、内在的体验。其次，唤醒本身绝不等同于有意识，脑死亡的病人也可以产生唤醒节律。[27]

或许我们不应直接比较理奈斯和帕尔，以及霍布森和弗里斯顿的这两套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前者对做梦的状态进行了神经生理学的描述，而后者提出了更多功能性的、抽象的解释。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是完全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两种场景都没能真正解释梦的所有方面。比如为何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谱系中，做梦在进化出晚熟特质的物种中更为显著？又比如，除去丘脑皮层环路这一看起来并非核心机制的区域外，是否有其他脑区在做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另一个候选脑区是大脑皮层上顶叶、枕叶和颞叶三个脑区在解剖学上的交叉处（POT），[28]这片脑区位于大脑后部，与心理意象的产生相关。[29]若大脑皮层的主要区域受损，比如与视觉有关的区域，这会导致梦中视觉意象的内容减少，但若是在功能复杂的交叉脑区出现一点点损害，梦可能就会完全被消除。然而，只是简单知道事情可能在哪里发生，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如何或为什么发生。脑区之间简单的抑制或激活就可以充当一个万能开关，切断所有外界输入的信息，让大脑独自工作，这似乎不太合理。毕竟，不可否认的一个难题是，做梦者的生活和经验反映在他的内在世界中，提供了一种与真实的、清醒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主观体验。

四、梦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还是内在幻想？

那么梦中的大脑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物理变化？为什么梦与清醒时的经验有着不同的主观感受？怎样产生了这种感受？它究竟是过去的回声，反映我们此前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物，还是一个纯粹来自内部的新的幻想世界，并因此独立于外部世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种

内外的对立可以改头换面，变为这样一个问题：梦是一种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神经元过程，与原初知觉的神经元机制密切相关，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映一种复杂想象的现象。

在这里，科学观点出现了分歧。在其中一个阵营里，睡眠专家霍布森认为，这种现象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是由于乙酰胆碱能在较高的中心释放，不受同一化学家族中其他调节剂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梦是知觉的一种基本的，甚至有些扭曲和简化的形式。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很正确，梦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知觉体验。例如，有面部知觉障碍的患者不会梦到面孔。[30]同理，七岁后失明的人在梦中仍然能唤起视觉表象，[31]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视觉经验影响了之后对环境的表征，因此仍然具有产生视觉表象的潜力。同时，那些在很年幼时失明的人“看”不到他们的梦，[32]再次表明做梦者可以看到的内容与他们清醒时的生活方式和经历显著相关，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大脑中又有什么样的时间延迟机制，能让我们梦到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或者遇到某些人很久之后又梦到他们？也许，虽然这些记忆不是最近的，但它们可能与近期发生的事情（比如可能刚好就在昨天）表现出相同的思维模式。

不管怎样，为了更彻底地探查这一自下而上的情境，京都的研究者试图“解码”梦的视觉内容。每当被试的脑电图（EEG）显示出特定轮廓时，他们都会被唤醒，并报告刚才睡着时的视觉体验。研究者用这种方式收集了两百多份梦境报告，每位被试总共参加了三十到四十五个小时的实验。虽然有一些梦异常炫酷，比如梦里见到名人，但大多数时候，被试报告的梦与日常生活有关。[33]

但是，梦的内容现实与否其实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频繁出现的关键概念。我们的策略是寻找报告中频繁出现的术语，例如“女性”、“男性”、“汽车”和“电脑”。然后，研究者在被试清醒时给他们展示相应物体的照片，通过这种方法给每个物体形成一种相应的大脑扫描的特征，可以与被试被唤醒之前的脑扫描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梦中每个特定的视觉体验，都与日常刺激知觉形成的脑扫描活动模式相关。真实清醒生活中的成像模式与梦中相应地一一匹配，并且能够足够准确地预测做梦者会报告什么。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做梦和日常感知可能在更高的视觉区域共享“神经表征”，即神经元网络。看起来，梦的内容确实反映了个体自下而上的脑细胞网络，而起因来自个

体此前的感官体验。

然而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众所周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起，便有人认为梦其实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大脑中更复杂精巧的脑区，这些脑区负责我们最奇异和个性化的内部思维过程。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基于他把人的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本我（原始本能的生殖和破坏冲动的来源）、自我（将上述冲动诠释为具体、合理的信息）以及超我（附加的、起约束作用的道德过滤器）。弗洛伊德认为，梦揭开了本我的面纱，给这股隐蔽驱力提供了一个呈现的空间。然而，这些欲望可能太让人不安了，心灵只能将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转化为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象征形式，结果便是出现了各种古怪而难以理解的梦境。此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记忆如此不可靠的原因是，超我一直在保护意识的心智免受自身潜意识残酷现实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梦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心灵内部复杂的心理机制，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接地加工乏味的外部世界的过程。

我们发现，儿童做梦和清醒状态的复杂程度与成人相比有明显的反差。有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梦没有情感或社会互动，它们是静态的普通场景，例如马在吃东西，孩子不参与其中，而只是观察。[34]但如果幼儿的梦直接被感知驱动，那么这些梦应该是活泼生动的，与他们在清醒生活中的认知水平一致。这一研究结果显然支持梦的自上而下理论。

另外一个证明梦境和清醒这两种意识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来自临床神经科学本身，在某些情况下，脑损伤似乎会让人彻底停止做梦，而在所有此类报告的案例中，损伤都位于前脑。因此，如果关键在于大脑皮层，这就意味着梦并非直接与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与接收到的感知体验有关，而是由“更高级”的中枢，例如前额叶，以及之前提到的三皮质交界即POT引发的。因此，最可能负责做梦机制运行的解剖学部位是在前额叶与POT间的相互作用。[35]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们还发现大脑皮层的另外一个区域也与此相关。

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率先在癫痫患者清醒时运用了直接的脑刺激技术。[36]他的工作之所以在这里尤其重要，是因为他发现，当另一个皮层区（内侧颞叶）暴露出来的脑表面被刺激时，病人偶尔会报告这个过程触发了记忆，但他们的表述是“像一个梦”。与清醒的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不同，没有哪个特殊的时空坐标系，能够让个体将这些片段放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天、一月或一年的情境下。相

反，它们更像是在梦中出现那样，缺乏抽象的思考、计算和对未来的计划，而非真实清醒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事件。

众所周知，“像梦一般”的体验是混合了各种特点的、破碎且不合逻辑的叙事，同时与环境脱节。假如是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奇怪，梦和清醒生活之间自然会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我们能很清晰确定地回忆起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对梦的记忆通常是苍白无力的。然而，这种心理模式也正是临床精神疾病的特征，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一种近乎谵妄的状态，与周围平常、“接地气”的叙事完全脱节，并且与之相分离。做梦者也会有这种体验。在梦和精神分裂症中，逻辑和推理都严重受损，个体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两种情况下，微弱的注意力在人、物体或相互没有联系的事件间兜转，缺乏洞察力和自我意识的视角，且常见幻觉和妄想。

一项用来评估个体意识的心理状态测试显示，我们很难区分梦的记录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录，[37]关键的区别只在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是偏执，但在梦中偏执很少见。不过虽然在梦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背景和清晰的叙事，你也不会坚持认为有某个人正在密谋加害于你，但确实经常会有一种不祥的不安感，感觉危险潜伏在某处，或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敌人要冲出来伤害你。

梦的特征是伴有强烈的情绪，但只限于特别活跃的一类情绪，例如愤怒、恐惧和喜悦，不会出现那些更依赖价值观和预设的更为平淡，消极的情绪，例如悲伤、羞愧和悔恨等。那么关键的区别是什么？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活跃的”情绪并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预先存在的语境，即一个在大脑中已经建立的神经元网络：一个小孩，甚至是一只动物，都会对眼前的情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情况也类似，即语境和背景不够突出、有力，因此他们的话语中缺乏逻辑，无法解释许多具有精神分裂症思维特征的胡话，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反应。面对孩子时，也会有相似的情况。相比之下，只有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可以体验到更多依赖于上下文才能“凸显”的情绪，因为只有当大脑足够复杂，才能提供必要的神经元基础设施（即连通性），给背景赋予预先存在的“意义”来传递这些情绪的特殊重要性。

所以，梦和现实世界的基本区别是，在做梦时，感觉和适合这些感觉产生的背景之间是脱节的。在现实世界的葬礼上大笑是不恰当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与之相对，在梦中，规范（也就是背景）由做梦

者独自设定，只有在醒来回顾梦境时才会感觉是有些疯狂错乱的。其实梦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准确再现，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想象形式，它与做梦者清醒时的状态有一种间接松散的联系。因此，再强调一下，做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固有连接，但梦中人不是像一个完全清醒的个体那样，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普通的持续体验。

要解释这种差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点似乎同样无益，尤其是因为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协调以下两方面内容的过程：既能够反映每天清醒生活的明显的、固有的个体大脑网络，又能容纳个体在梦的体验中像各种精神分裂症状一样的内容。

精神分裂症本身与过高水平的功能性多巴胺有关，38所以释放多巴胺的通路受损会导致梦的丧失，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增加多巴胺的释放则会增加梦出现的频率和生动性，39尽管快速眼动睡眠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相反，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开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作为多巴胺阻断剂，也能减少过度活跃的梦。40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呢？前脑，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皮层中唯一能够从更深层脑区中获得大量多巴胺的部位。因此，如果多巴胺过量（我们知道这样会抑制前额叶皮层），那么大脑的基本状态将与精神分裂症相似，处于一种生动又情绪化的世界中，并呈现出逻辑推理的减少。41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多巴胺抑制了前额叶皮层，42而这正是一种与做梦相关联的情形。43但是等一下，我们之前才提到，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梦的丧失，与这里的结论恰恰相反。44为什么同一脑区的活动减少却增加了梦？显然，前额叶皮层活细胞被多巴胺主动抑制的状态应该与细胞完全死亡的情况很不同。45

然而，与梦相关的化学物质可远远不止多巴胺。这里有一条有趣的线索，通往更广阔的神经化学领域：通常疼痛在我们做梦时是被抑制的，46这解释了服用止痛药吗啡（以古希腊的睡眠之神命名）后产生的“像梦一般”的状态。吗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药，因为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传递系统：阿片类药物[9]。它们又要如何融入这个理论构想呢？

正如我们在这典型的一天里，通过各种不同的例子反复看到的，神经元集合就像是罗塞塔石碑一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把客观的生理学与主观的体验联系起来。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个体感受到的主观疼痛感的级别可能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同时阿片类

药物的抑制作用能够缓解疼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用吗啡缓解疼痛是通过缩小神经元集合的尺寸来实现的，那么与之相对，随之而来的“像梦一般”的主观体验，也意味着真实梦境的类似体验可能与小的神经元集合有关。特别有趣的是，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明显与梦类似的、且也是一种小神经元集合的状态，也呈现出更高的疼痛阈值。[47]

五、做梦是小神经元集合的结果吗？

儿童[48]和精神分裂症患者[49]之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大脑在工作时多巴胺水平高，而前额叶皮层功能较低。我们已经看到，过量多巴胺和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与小神经元集合相关，因此毫无疑问，不管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什么机制，都很容易应用于梦中。

我们称之为梦的现象学体验的基本生理学关联，会不会是那些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之一呢？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是否可以用“石头扔进水潭”这一类比来说明各种事实，并协调在关于睡眠和梦的不同理论中早已出现的许多解释不清的现象和异状。

第一，“石头扔进水潭”集合模型或许解释了嗅觉为何没有在梦中出现。[50]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嗅觉相比视觉和听觉等其他所有感官感觉，更不依赖于残留的内部活动，而完全由“投掷石头的力量”，即外部输入的力量起作用。因此，这种由外部所驱动的感觉，在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第二，人类胎儿和其他物种中无需立刻投身外界活动的幼崽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做梦上。对于困在子宫中仅有最低限度感官输入的胎儿来说，[51]唤醒将维持在适度的水平：“水潭”的黏性会阻碍涟漪，而石头投掷的力量将会比较弱，“石头”本身又比较小，因为神经元连接不足。此时，做梦，也就是小神经元集合，很可能是默认模式。与那些幼年便成熟的物种相比，对于不用一出生就要处理外界信息并实现高效互动的物种而言，“石头”投掷的力量也不会太强，即神经元集合相对较小，完全清醒的意识也不是特别必要。

第三，睡眠剥夺是有害的，阻止梦境产生也没有好处。倒不是说因为这会导致大脑无法储备大量的关键化学物质（正如我们所见，这一过程在做梦时也没有发生），而是因为大脑不应长期处于完全有意识和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持续接受外界的信息）。保持觉醒需要连续不断

地将“石头”扔到“水潭”里，由于持续的竞争，持久的神经元连接的塑造又颇为费时，这种更大的“石头”将很难形成。最终，“石头”会变小，增加了随后的神经元集合变小的可能性。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状态的特征是强烈的情绪及逻辑的缺乏，甚至可能是精神疾病。

第四，回顾之前的研究，快速眼动睡眠与梦可以彼此独立发生，即使没有大脑损伤，人们也能体验做梦，而不表现出典型的眼球快速运动。那么，对于大脑而言，这两种类型的梦（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有什么共同之处，将它们仍然归为个体主观的梦境体验，而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共同特点可能是定量而非定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神经元集合都比清醒时要小得多。但是神经元集合是持续变化的，不是非有即无，因此可以作为一种移动的标尺，用来进一步区分非快速眼动睡眠梦和快速眼动睡眠梦。如果快速眼动睡眠状态源于脑干调节乙酰胆碱的随意释放，那么它将进入大脑皮层的所有区域，使范围相对广泛的神经元集合的产生成为可能。相反，如果这个系统不被激活，也就是像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梦中那样，那么我们知道，依然在释放的多巴胺仅能作用于更小、更有选择性的目标，即前额叶皮层。无论其他因素如何决定关键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方式及位置，如果没有额外的调节器（如乙酰胆碱），这些神经元集合就很可能会更小。做梦还是有可能的，但更罕见。

第五，每个睡眠阶段的实际长短是通过观察整晚快速眼动睡眠的变化来确定的。来自德州农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比尔·克莱姆（Bill Klemm）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他说“大脑在充足的睡眠后利用快速眼动帮助自己醒来”。[52]他的想法无疑得到了明确的事实支持。在整晚中，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随着清晨的临近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这就好像我们在整个夜晚试图通过快速眼动来唤醒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眼动睡眠期逐渐延长，我们也就越来越清醒（参见第二章）。最终，快速眼动睡眠会发展到足以把我们完全从睡眠中拉出来的程度。

相关的解剖学证据能够支持这一理论，当大脑皮层将信息反馈给原始的脑干，脑干反过来会释放递质乙酰胆碱[53]来调节快速眼动运动。因此，如果快速眼动睡眠在夜间持续增加，同时相比非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一般伴随着相对较大的神经元集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所触及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那么随着夜晚渐渐消逝，快速眼动睡眠或梦的神经元集合与最初清醒时的小神经元集合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

来越模糊。如果神经元集合大小的功能是一个连续谱，那么不仅非快速眼动睡眠梦在神经元集合的数量上和集合的大小上会区别于快速眼动睡眠梦，而且快速眼动睡眠梦会通过与此相似的步骤（伴随着神经元集合的增加）逐步进入清醒状态也是合理的。任何一个时刻“石头”的大小，即此刻的脑连通性，将会决定梦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变得更缺乏逻辑并有奇异场景，还是更多地反映着现实生活。

这一思路也能解释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们便发现的一种状态，即所谓的“清醒”梦。[5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声称：“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意识中有某种东西在告诉他，此时所见的只是一个梦。”大体上来说，就是做梦者意识到他们在做梦。此时，主观意识发生在正常的梦和清醒之间的连续谱上。可以说，这种更复杂精巧、更有自我意识的内容暗示着，当人经历清醒梦时，神经元集合仍然是较大的，于是进一步提高了醒过来的可能性。

与该假设一致的是“清醒入眠法”现象，做梦者从正常的清醒状态直接落入梦境，没有明显的意识消退，也就是说，沉睡的人似乎直接从清醒状态，带着完好的自我意识，进入快速眼动睡眠。[55]如果作为快速眼动睡眠基础的神经元集合比非快速眼动睡眠的大，而清醒梦的集合则更大，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更接近清醒状态时神经元集合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集合与不同程度的意识直接相关，其中也包括不同程度的梦。梦中的集合越大，人就越接近清醒，就越有可能梦见在清醒时所体验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和现实。所以，在任何类型的梦中，神经元集合都比清醒时小，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系列连续谱，囊括自上而下的内部世界幻想和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体验，两个过程的具体比例取决于“石头”的大小，即神经元连接激活的程度。

神经元集合是一种模拟性的、无穷无尽的动态，是每时每刻不同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它们可以把微观层面的细胞和突触与宏观层面的脑区联系起来，从而为理解梦的现象提供一个框架，在框架中探讨梦的内容如何变化，以及梦与清醒世界的关系。但是现在，你已经离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进入了更深的、无梦的睡眠……不经意间，暗夜正徐徐展开。

第八章　度过夜晚

这真是漫长的一天，不过终于快要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两种语言来描述这一天中你所经历的一系列心理状态——客观生理学的术语和与之对应的主观现象学语言。神经元活动的程度与感官的冲击这两方面相互匹配。我们可以客观地谈谈你大脑中“预先存在的联系”，用更主观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个人化的“意义”。我们还要把多巴胺等调节因子的可用性考虑进去，它是一种生理上与唤醒的主观感觉相对应的物质。然而，另一个客观特征是互相竞争的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根据神经元集合形成的水平不同，有着相应的主观视角、分心和表现。同时，时间的流逝，也就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事，可能与复杂的前额叶皮层的活动程度有关。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例子中，主观和客观的配对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意味着，现在我们能够在神经元集合的神经科学特征与主观现象学之间来回切换，同时持续地互为参照。我们可以从生理学开始，看看各种生理因素的不同组合，如神经元连接缺乏、多巴胺水平过高或是快节奏的刺激，如何产生相似的结果，即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然后，我们可以同时向另一个方向探索并解释某些日常活动，解释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某类精神状态和某类意识状态，例如童年期意识或精神分裂症，我们还可以将它们依次对应于特定形态的神经元集合的动力学。

最重要的是，在一整天的旅途中，我们已经看到神经元集合作为客观和主观状态之间的中介，如何解释各种难题：人类与非人类的意识，不同程度的麻醉，闹钟的效果，听觉和视觉之间的区别，梦的本质，甚至在环境丰富程度的影响下，意识本身在人类进化和生存方面的价值。

一、神经元集合：连接生理学与现象学的罗塞塔石碑

因此，我们现在能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见表二），例如：这些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状态可能是如何彼此联系的，它们的共同因素是净集合大小这块罗塞塔石碑。在表中，最上面一行是多种不同的因素，用客观生理学术语表达，彼此相互独立，如刺激、神经元连通性或化学调节因子；最下面一行则是同样的因素用主观现象学语言来表达。

这样的表有什么用呢？来让我们看其中一个例子。抑郁和焦虑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抑郁有一个连续的主题或情景，如一种无法改变的情况，像配偶的死亡，或者一种一般性的、持久的化学状态，即整体情绪状态持续处于低潮当中。相反，焦虑会产生多个、快速、想象出的可怕后果，就像它们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例如，对抵押贷款的焦虑可能会让人产生遭到起诉、失去家庭、失去配偶等一系列的联想。

因此，尽管抑郁和焦虑都是基于内在化的、广泛的神经元回路（一块巨大的石头），但随之而来的唤醒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抑郁者的调节因子释放水平较低，而处于焦虑情绪中的人调节因子释放水平较高，如同恐惧的情形。但话说回来，焦虑不同于恐惧，因为恐惧依赖于强烈的外部刺激，需要的是一块小石头被大力地扔出去。因此对于焦虑来说，神经元集合的生成率虽然与恐惧时一样高，但焦虑主要是由内部因素驱动的，这方面与抑郁一样。因此，三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可以通过各个不同因素的不同贡献区分开来，它们推动产生了最终的神经元集合，进而产生了意识。[1]

尽管看起来像异端邪说，但这里的关键点并不在于表中预测的集合尺寸是否正确，而在于这种预测或许最终是可检验的。神经科学的贡献并不是给出多少答案，而是提出可以通过实证来研究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卡尔·波普尔的著名术语“可证伪假说”。[2]然而，神经元集合在处理所有来自整个大脑的难以捉摸的主观现象学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验证这种作用，我们需要人类被试。

表二

神经元连接（石头大小）	触发点（抛石力）	调节因子水平（水潭黏度）	集合周转率（抛石频率）	净集合（水波范围大小）	日常活动／大脑状态
稀疏	强	低	低	小	闹钟铃响
减少	缺失	低	缺失	不断减少	麻醉
稀疏	强	高	高	小	童年期／动物
稀疏	强	高	高	小	快节奏运动
广泛	弱	中	低	大	慢跑
稀疏	强	中	高	小	味觉／嗅觉
广泛	弱	中	低	大	视觉
稀疏	强	中	高	小	听觉
稀疏	强	中	低	小	正午
稀疏	强	高	高	小	音乐：狂欢
广泛	弱	中	低	大	音乐：古典
广泛	弱	低	低	大	在办公室工作
非常广泛	强	低	非常低	大	抑郁
非常广泛	弱	高	高	大	焦虑
稀疏	强	高	高	小	恐惧
非常广泛	强	高	低	大	聚丙烯酰胺
广泛	强	高	高	小	精神分裂症
稀疏	强	高	低	小	阿尔茨海默病
稀疏	弱	低	低	小	酒精
广泛	强	中	低	大	抽象思维
广泛	强	低	低	大	冥想
广泛	弱	低	低	小	做梦
重要性	程度	唤醒	时间感知	意识程度	现象学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大学的波拉德教授的研究，他开发了一种用于研究大脑的fEITER技术。这项技术使他的团队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观察大脑，而且可以以一种非侵入性的方式观察大脑，这为在人类被试身上进行测试提供了机会。[3]虽然同样非侵入性的技术如fMRI是相对无痛且实用的，但它只能监控间接参数，如血流量的变化，而fEITER能够读出对大脑状态变化的直接测量，即神经元的电阻变化。[4]这意味着，我们首次拥有了实时监控人脑的潜在机会。当波拉德教授在媒体中谈到，他目前已有的数据，似乎能够支持我们实验室研究“意识本质”的方法，你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开心。[5]运用fEITER技术，最终我们有可能测试出表中所示的各种预测。这些研究将为深入了解各种主观心理状态下的神经机制提供强有力的见解。

但是即使能够捕捉和分析神经元集合的轮廓，它充其量也只是意识程度的索引，而不是对现象本身的证明。不要忘了，不管多么精确，神经元集合只能提供神经元事件与意识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那么，在神经元集合形成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二、身体中的大脑

我们迄今为止很容易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脑位于身体之内，它不是像哲学家有时喜欢想象的那样，漂浮在某种超现实的大缸中。[6]相反，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存在持续而密切的相互作用，否则就会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此外，诸如安慰剂对疾

病的影响，抑郁情绪对健康的影响，或荷尔蒙（如催产素）等激素对你依恋或亲近某个人的影响等等，这些尚且无法解释。任何基于神经元关联的现实意识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大脑和身体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短暂而脆弱的、由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神经元组成的联盟，如何能够将一种非常融贯的信息传递给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及其各个控制系统。换句话说，某个特定的神经元集合如何向其他那些眉毛以下的器官报告，反过来又如何受它们之间多样机制的影响？

无论从大脑发送到身体其他部位的信号是哪一种，它要传达的都不仅仅是上述问题中集合的大小，还包括它的内在活跃程度、时间窗的长短，以及产生它们的特定脑区的信息。神经元集合有应对这一挑战的潜能，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可读出的数据，包括各种高度可变的因素；正因为对这些因素可以进行差异化的操纵（参考表二），所以会有不同的净读出数据，反映每个神经元集合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的情况。

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每一个不同的定量和定性因素都不可能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被二次复制。这是因为，与特定的解剖脑区和/或其电活动信号不同，每一个神经元集合，无论它何时在大脑的何处产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一次性的特点，使神经元集合相比其他可能的意识相关神经结构（见第一章），都更适合与每一个独特的意识瞬间相对应。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方法来传递这种定性和定量信息的组合包，这种方法也要能对非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外围器官（比如肠道）以及其他的重要控制系统（如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必须存在某种通用的系统交互接口，使外围器官和身体过程与大脑保持密切的往来通信。7

幸运的是确实存在完美的媒介——肽分子。肽与蛋白质是由相同的成分（氨基酸）组成的，但与蛋白质的大小不同，肽可以非常非常小。该术语本身来源于希腊语的“消化”，因为很早之前人们就认为这些化合物与肠道相关，虽然我们也即将看到，它们也可以成为大脑中强有力的神经递质。事实上，肠道与大脑似乎处于密切的对话中，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发自肺腑的感觉”（gut feelings，直译为“肠子的感觉”）这个短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8在这种情况下，肠内细胞分泌的肽发挥着激素的作用。肽激素不仅会相应地影响所在区域的消化，还对周围神经和在脊髓里的神经产生作用。因此，它们会对支撑记

忆和情绪的大脑反应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广泛的大脑区域参与了这种脑——肠道互动。[9]但是，不只有肠道（像在体内遥控一样）能够通过这些热情而多才多艺的使者与大脑对话。例如，一种引发血压升高的肽，即血管紧张素，是由肾脏产生的，但也会影响诸如学习之类的复杂的大脑功能。

很早以前，生物学家就知道，关键而急迫的身体信息如体温、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是直奔关键脑区的，而血压和心率的读数会通过动脉、心脏和特定自主神经的各种机制进入大脑。[10]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输入信号最终整合为一个共同、单一的“享乐主义”[11]的幸福状态。虽然这个有趣的概念仍然含糊不清，令人沮丧，但我们不难想象其他调节因子，例如肽激素，以主观的方式，转化为某种倾向或情绪。但是，这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又是如何从大脑反馈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以确保中枢神经系统与重要器官、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能够持续对话的呢？

也许身体重要的控制系统之间紧密协作、相互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压力的运作过程。这种我们都很熟悉的体验是由一种特定激素（促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递质（它的功能之一是克服组织损伤引起的炎症）引发的。[12]同时，该系统涉及更持久的心理状态，例如长期激活它可以使人抑郁等。当三大系统（内分泌、免疫和中枢神经系统）构成的组织出问题时，人体会产生各种紊乱，从诸如风湿性关节炎等炎症性疾病，到更难定义的心理问题。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三大系统间的互动一定包含其中。例如，抑郁症通过对免疫系统的损害增加了人体患病的概率。在对两千多名美国中年男性进行的一项持续二十年的研究中显示，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如吸烟史或家族病史，那些表现出抑郁倾向的男性在之后患致命癌症的风险是控制组的两倍。[13]同样，挪威的一项调查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年龄、医疗条件和身体状况等变量后，患有严重抑郁症者因大多数主要死亡原因而死的风险都更高；[14]抑郁同时也增加了冠心病的发病风险。[15]

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在大脑中的调节机制，与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著名的狗的实验中大脑的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动物最终一听到之前与食物相关的铃声响起，就开始分泌唾液。在一项对大鼠的实验中，即便最后只有食物刺激本身，食物的甜味也会产生与免疫抑制药物相同的作

用。最终，并不是药物抑制了大鼠的免疫系统，而仅仅是药物和甜味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就能发挥作用：这使得甜味本身产生了与有毒药物相同的作用，并最终杀死了大鼠。[16]

一种特殊的习得性关联（例如甜味），会引发化学物质（例如多肽）的分泌，继而对大脑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最大的难题仍然存在：这种互动是如何统筹协调的？局部的化学物质杂乱无章地涌入不同的脑回路中，随意地起起伏伏，而不管机体整体的状态，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身体将冒着接受洪水般混杂信息涌入的危险。大脑整体输出的情境呈现出“抑郁”，甚至更模糊的“享乐状态”，简言之，即其所呈现的某种心理状态，一定有相应的物理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以精确的、基于实证的细节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但神经元集合很好地符合了与自上而下的意识密切相关的大脑组织所要求的恰当水平，同时构成了各种自下而上的脑机制和过程共同涌现出的性能。然而，神经元集合的形成会让大脑给身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当然不可能只是简单的电信号（神经元网络的通行证），因为这时信息要穿越相当长的距离和不同种类的非神经性生物组织。这些信息必须是化学状态，也就意味着信号肽……

除了在大脑之外的身体部位执行一系列功能外，肽在大脑中也能作为神经递质发挥作用。例如，自然产生的脑啡肽类似于吗啡，在大脑中起到减轻痛觉的作用。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几乎所有的肽都有一种迷人的共同点，它们经常与一种熟悉的、常规的神经递质共同存在于单个神经元中。[17]例如，多巴胺细胞中也可能含有脑啡肽。[18]如果两种不同的神经递质基本功能相同，大自然为什么要把它们过载于一个神经元中呢？

我们先假设情况并非如此，常规神经递质和肽并非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与自身释放递质不同，肽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性地从不同的子空间中排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从神经元中释放出来，其释放条件是细胞必须更加活跃且活跃更长时间。因为大脑中成百上千个肽在释放量上会有所差别（定量因素），[19]同时，基于它们自身具备不同的化学特性（定性因素），大脑有了任其所用的强大附加工具。现在我们可以将一个单一的数字参数，动作电位的“全或无”发射率，巧妙地转换成一个模拟参数，其中只有当活跃度以较高的速率持续一段时间时，额外的肽递质才会释放。释放的肽量，连同其本身的定性特征，将会反映

出某个具体的神经元在某个确切的位置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激活的程度。因此，也许自然界把两种类型的神经递质分子分配给一个神经元并不是一种浪费。其中一个是经典的神经递质，它在一个局部的、短期的水平上工作，另一个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上发挥作用的肽。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神经元集合，甚至包括那些相对小或弱的集合，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它们的持续时间很长，通常是单个动作电位的几百倍。因此，神经元集合的形成过程将为肽的释放提供完美的环境。大脑内的这种释放可以与其他神经元群，甚至是身体其他部位交流，形成一个重要的集合，而不是孤立的某个或某两个突触活跃着。此外，这些信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开关。相反，额外的定性因素，即刚才讨论的肽的化学特性，可以对某个特定的集合进行高度个性化的一次性读出，根据：一，特定的不同化学物质的释放水平；二，释放持续的时间；三，多肽的特殊组合，这将为其空间大小甚至解剖来源提供线索，因为不同的脑区具有不同的肽特征。反过来，这些集合的特征将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细胞活动层面或自上而下的宏观解剖学层面的解读，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反映并读出各种各样的功能信息，包括唤醒、可塑性（记忆）、感觉输入和身体内部状态（饥饿、疼痛等）。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在活跃的脑细胞形成神经元集合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集合最终的大小（涟漪的范围），而这又是由感官刺激的程度（投掷石头的力度）、认知关联的程度（石头）、调节因子的可用性（水潭的黏性）以及与之竞争的新集合周转率（随后投掷石头的次数）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在一天中的许多不同场景中反复看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时刻定义某个独特集合的范围。

如图9所示，大脑和身体随后可以通过神经元集合进行交互，这种交互行为的简单化方案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更多的问题。

但是，就目前而言，想象肽在身体其他部位循环和作用也是有可能的。在独特的多肽特征大脑中产生的读取和输出之间的来回迭代，指示出某种特殊神经元集合的存在及其状况，这种神经元集合与特定条件下来源于其他身体系统的反击性肽相结合，就会以某种方式转化为瞬间的意识。但是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意识的内在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都尚未解答……当你睡醒时，伴随明天而来的会是什么？

意识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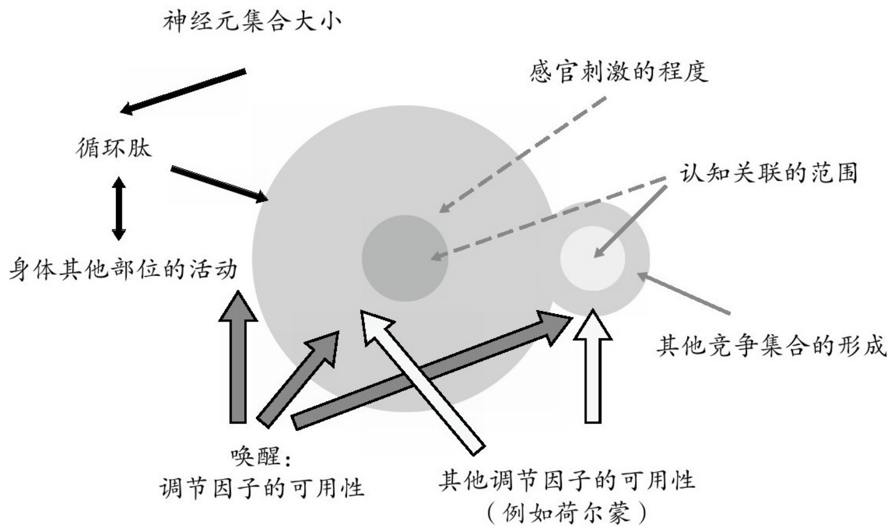


图9：形成意识的一种可能机制。这两组同心圆代表了拥有上千万脑细胞的瞬时神经元集合。其中最大的集合将主宰大脑中的某一时刻，并决定那个时刻的意识。召集细胞的程度以及产生意识的程度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感官输入的活跃度、预先存在的关系（连接）和竞争程度（分心物），这些都表现为开始形成较小的神经元集合。典型化学物质，如多肽，将从瞬时集合中释放出来。因此，这些化学物质的类型、数量和浓度将构成大脑中一种独特的、一次性的突出的神经元集合特性，然后通过循环将信息传递给身体的其他部分。相反的，从免疫系统和重要器官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会改变神经元的工作过程，其他化学物质如激素和与唤醒有关的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意识依赖于整个身体的协调工作。[20]

第九章　明天

醒来时，你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多长时间的意识，很可能感觉只是打了个盹儿，或者觉得昏睡了几小时。这种熟悉的迷惑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睡眠既包括感官刺激的缺乏，又包括时间流逝感的降低，这是否意味着两者有某种联系？[1]

一、时间的流逝

时间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特征。然而，对时间的本质和它的流逝思考得越多，你就会感到越迷惑。即使思考最基本的时间单位（就简单的1秒钟），也会带来困难。我们可以用客观但同时也令人困惑的专业术语定义什么是1秒钟，即9192631770个辐射期的持续时间，对应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的跃迁。但这一定义，也不过是某种武断的定义。[2]

另一方面，时间流逝的体验是毋庸置疑的，对所有人来说，时间的流逝都令人感到遗憾。时间这个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如箭头般单向前行的自然事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3]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曾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住在那里的人们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体验着时间，这样的仙境是不存在的。"[4]虽然艾萨克·牛顿相信，时间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现象，以其独特的规则[5]存在着，但当代物理学家们认为时间与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空间更容易被感受为某种单纯"存在在那里"的事物，时间却并非如此。当你从睡眠或麻醉中醒来时，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中所经历的时间。而且，即便你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时间流逝的感觉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有时感到"时光飞逝"，有时又感到"度日如年"，这取决于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你是否享受这个过程。时间感是主观的，因此它是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每个人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内在世界一样，我们也构建了自己的时间感。

当然，时间感所具有的典型主观性有助于它被人们进一步了解。一方面，存在一种人们熟悉的记忆过程，其跨度从几秒到几个月不等，[6]人

们对时间的体验并不受到当前意识的监控，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其进行回顾。在这种回顾性的时间区间内，记忆中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其实际的时间顺序是存在差异的。另一方面，存在一种对时间流逝的直接感知，[7]这种即刻觉察的时间段在亚秒和秒之间。20世纪初哲学家、心理学家E.罗伯特·凯利（E.Robert Kelly）将其描绘为“似是而非的现在”，[8]是一种被描绘为延长的“当下”的幻觉：

我们将它命名为“似是而非的现在”，将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往事称为明晰的过往。对听众来说，一首歌的每一个音符似乎只关乎现在。对观看者来说，一颗流星的位置变化也只关乎现在。在这些序列终止的瞬间所测量到的时间，似乎没有一个部分是过去的。如果从人类理解力的角度来看，那么时间包括四个部分，即：明晰的过去，似是而非的现在，真正的现在以及未来。排除似是而非的现在，时间便包括三种……虚无缥缈——过去，并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而位于它们交界之处的是现在；驱使时间不断推进的力量，也存在于我们杜撰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现在中。

二、时间知觉

神经科学家如何才能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找到立足点呢？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在大脑中是如何实现的呢？毫无疑问，最简单的策略是，看看我们的神经网络中是否有某个产生时间感知的特殊区域。但是，鉴于我们一直不断地被提醒，我们永远不应该用一个单独的脑区来解释某种复杂的功能，因此，要说与时间知觉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认知过程是许多脑区联合作用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小脑——大脑后部菜花状的结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者。别忘了，小脑可被称为脑的“自动驾驶仪”，它能够按照时间锁定顺序协调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接下来还有“基底神经节”，它是起到内部驱动运动作用的关键脑回路，同样，它也具有高度的时间敏感性。另一个可能参与时间感知的脑区是顶叶皮层，这是一个复杂的脑区，在该脑区中，感觉和运动步调一致。通过脑成像、脑电图以及神经心理学研究，神经科学家们早已发现，顶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人们在空间作业和时间辨别上出现问题，[9]更何况，这一区域对处理听觉和视觉刺激的时效性也很重要。[10]因此，顶叶皮层如同额叶皮层那样，扮演着某种类似于执行功能的角色，同时也与更加复杂的时间感知有关。[11]下面这项发现同样不足为奇：额叶的损伤会导致“来源遗忘”，来源遗忘本身并非记忆

的丢失，而是在对过去的经历按照情节、时间或空间进行区分时存在困难。

然而任何将功能与结构联系起来的操作，都直接取决于我们具体要讨论的是何种功能的哪个方面。如果将老鼠的大脑皮层完全切除，这种具有非凡恢复能力的生物不仅可以存活下来，可以活动，还能依然成功地估计出40秒的时间间隔。[12]因此，从大脑层面来说，时间感知的某些方面要明显比其他方面更为复杂。[13]然而，列举不同脑解剖结构单元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间感知是如何变得可能的。相反，我们不要把大脑区域看作一个个独立的迷你大脑，而要发现它们的集体交互作用。

像视觉等大多数复杂的心理过程一样，时间知觉的运作过程并不简单。正如可以把视觉划分在30多个不同的脑区（分别关注颜色、形状和运动处理等）中，神经科学家可以把时间知觉拆分为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最终产生的整体体验。例如，持续时间以及传入刺激的同步性和顺序，都会影响我们感知时间的方式。因此，正如视觉的最终体验是由不同的、无缝协同工作的元素所组成，时间流逝的体验也是如此，[14]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谓的如何“协同工作”的问题……

研究时间知觉的神经科学的人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大脑中并不存在中心时钟。美国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戈尔曼（David Eagleman）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指出时间并非单一现象，并通过三个能消解“时间是一个事物”这一观念的例子来说明。[15]第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客观上相同的时间间隔中，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不同。[16]我们都知道，同样是一个小时，在候车室里无聊等待和在喜欢的小酒馆里待着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例子，如果我们在一系列相同的重复刺激中间，听到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古怪”的声音（与前后的其他声音都不同），我们会感觉在古怪声音和下一个（或上一个）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更长。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感知时间的扩展——比如听觉音调的音高或闪烁刺激的频率——并不会随之改变。这一观察再次表明，时间知觉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而是由独立的神经元操作组成的。这一过程通常在潜意识状态下运作，但在实际实验条件下可以明显地区别开来。[17]

第三个例子来自一个巧妙又独特的实验，通过让志愿者身处看似有

生命危险的情境中，故意设计让时间在这个实验中“变慢”。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都体验过时间似乎突然凝固的感受，也就是时间膨胀了，比如当身体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中，或收到特别坏的消息时。如果对时间的感知归根结底是“同一个事物”，那么这些被拉长的时刻会导向一段更为敏锐的时间体验，就像观看慢镜头视频一样，你会注意到更多细节。但是这项特殊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实验要求被试从50米高的塔向后跌进下方的安全网。[18]正如预测的一样，这些莽撞的志愿者在回顾时报告，他们觉得坠落的时间似乎更长，36%的被试报告说，他们自己坠落的时间比观察到其他被试坠落的时间更长。但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被试在坠落过程中对时间有更扩展、更详细的体验，他们无法报告当时周围世界的任何其他方面。而相比之下，似是而非的现在，也就是当你正在经历“此时此地”的时间流逝时，反倒会有更多细节，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正念训练。[19]

通过观察坠落的被试，伊戈尔曼得出结论，由于记忆是用于回顾性时间知觉的，那么更多记忆或联想会被填入这段感到恐惧的时间里，反过来又会扩大主观的时间知觉。换句话说，你对事件的记忆或联想越多，便会认为它的持续时间越长。由于对同一情况的时间知觉会因为它是正在进行（似是而非的现在），还是掺杂了回忆而有所不同，因此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事物”。

另一种可能性是，用伊戈尔曼的话说，时间的推移可以“在不断变化的神经元网络活动模式中编码”。[20]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神经元网络的成长（比如通过增强突触）将有效地“编码”这个时间段本身。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把重点从外部客观事件转移到大脑中发生的客观事件上，而时间知觉的主观性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21]

依我看，这种基于编码概念的方法，无论在大脑功能的哪个层面上，总是会出现同样的难题。如果某事物被编码，之后为了沿着这条线行进，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会再次被解码，以此来获得某种价值或意义：这就是代码的意义所在。如果意识是时间知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解码的概念都会使我们正好陷入到关于接收端的“人”或“事物”的读取谬误（见第一章和第四章）当中。相反，一种更富有成效的方法可能是降低我们的期望，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只是寻找时间知觉在大脑中的关联物，看看我们是否能辨别出一些潜在的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不同情况下，都会出现时间膨胀（将时间估计得比实际更长），但是这些不同的情况可能在大脑中有共同的潜在的神经机制。首先，对刺激的关注会使时间看起来好像持续了更久，例如在正念训练或者“古怪声音”的实验中，处理不正常刺激[22]或者在人为制造的“危险”情况下[23]似乎需要更长时间。

其次，事实上，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刺激强度的大小成正比。更多、更大且更明亮的刺激，延长了对时间持续的主观感受。[24]第三个因素是强烈的情绪。[25]例如，当生气的面孔出现，或者当你在现实生活中沉浸在一段紧张的关系或活动中时，你都会认为时间更长。两者的共同线索是一种潜在的高度唤醒。出事故时我们肯定会有恐惧的情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常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人会感觉时间“凝固”了。

第四个非常不同的例子是童年时代，我们普遍认为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种拥有全世界所有时间的感觉。孩子们活在“当下”，也就是现在。例如，有报道称十一岁的孩子将一天的长短大约体验为生命的四千分之一，但是五十五岁的老人觉得是两万分之一，因此对孩子来说，普通的一天要比成人长得多。对于患有注意力障碍的孩子来说，时间过得特别慢。[26]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也是一样，[27]时间不再是平滑的事件之流动，[28]而是由碎片化的事件组成，在这些事件中所有感觉都在增强，而每件事都需要更充分的注意力。提高兴奋水平的兴奋剂也会导致对时间长短的高估，[29]而抑制兴奋的药物则有相反的效果。[30]

这些不同的发现表明，各个与高估时间流逝有关的因素之间有明显的重叠：唤醒、情绪、刺激物和多动症，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多巴胺系统的过度活动有关。[31]反过来，多巴胺过量会导致前额叶皮层的抑制，[32]我们已经看到，这时会出现一种类似于儿童状态的现象，而有时前额叶皮层更有可能与外界发生更有力的互动，进而导致更直接的信息处理，[33]就像在事故中一样。

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受也受运动[34]和事件复杂性[35]的影响。因此，有一种观点是，大脑单纯根据事件的数量，即进入大脑的有效输入量，来估计时间的流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完全相反的情况了，当有效输入根本不存在时，例如在睡眠或麻醉状态下，时间似乎一瞬间就过去了。这并不是说当时间变慢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欣赏似是而非的现实中的一切，恰恰相反，当你处理比平时更多的输入信息时，作为结果变量的时间似乎会慢下来，但只有在回忆一件事时的回顾

性状态中才会如此。积累的信息量驱动你的时间知觉，而非时间知觉驱动你的信息积累。

每个输入的刺激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坐标，两者不可能分开。有趣的是，孩子们经常混淆时间和空间，[36]例如无法理解龟兔赛跑的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更快和更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物理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时空流形”，即三维空间与第四维的时间相结合。[37]也许，当大脑处理重要的输入信息时，会对随后的时间流逝感知设定速度，而相关刺激的时空关系仍保持不变。因此，就大脑而言，时间知觉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参数，也不是某种简单的“神经元时间”，而是一种基于空间和时间共同作用的变化模式。

这个想法一点儿都不新鲜。早在1915年，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就将空间和时间认定为“包含所有思想的坚实框架”。而1953年，神经学家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38]指出“纯粹的时间定向障碍……是一种与空间障碍无关的罕见现象，虽然通常来说两者是一起出现的”。1975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声称“并没有时间知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知觉和运动”。这一观点甚至导致神经科学家文森特·沃尔什（Vincent Walsh）提出在大脑中，“时间、空间和数字是按照某个共同的标准来计算的”。[39]

一项调查能够直接说明这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40]被试在观察不同空间环境时判断时间的流逝。在每个实验中，有三种不同的模型，分别是铁路成比例模型、客厅模型和抽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有大和小两种型号。当实际物体的尺寸小于模型时，被试会把它与压缩主观时间相关联。再重复一次，似乎所处理信息的密度不同也会影响时间知觉，而这次我们看到，在不同空间大小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对照实验中，[41]被试在观察不同比例空间的过程中，时间体验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空间比例越大，时间似乎越长。

如果时间和空间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便会有耐人寻味的涵义。身处湖泊和山脉之类的大型空间中，可能会让人感知到时间比实际上更多。例如，沉浸在自然或宏大（如教堂）的环境中，可能是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方式，因为这些地方会给人带来敬畏和平静的感觉，这就与时间知觉的扩大相关。[42]因此，为了理解我们是如何感知时间的，我们需要运用某种脑内的时空机制……

三、时间与空间中的神经元集合

我们再次强调，神经元集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罗塞塔石碑，把生理学和现象学联系起来，看时间知觉是否能与“往水潭中扔石头”相类比。我们刚刚看到，对时间流逝的感知是由传入刺激的程度所驱动的，而非与之相反。神经元集合会迎合这种单向现象，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预先就存在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一次性动力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决定的，每一个因素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都有不同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设想一个高周转率的神经元集合，因为感觉信息一个接一个地输入，所以集合仍然很小，在事故、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兴奋剂使用者等案例中会发现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列表中添加一个看似矛盾的状态，即无聊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时间过得很慢，因为刺激没有显著或强大到足以产生更大的神经元集合。当然，在与之相反的时间飞逝的情况下，也就是当我们从事一项要求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活动时，就像读一本精彩的小说一样，神经元集合的周转率变得很慢。然而，最极端的例子，便是我们最开始产生时间知觉时，也就是当我们从睡眠或麻醉状态中清醒过来时，这期间根本没有感觉的输入，也就完全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一下子天就亮了。

我们在被试坠落的实验中看到，43时间知觉的膨胀并不能增强大脑的感觉输入，因此对时间主观的、回溯性的时间知觉并非特定神经元集合的简单净产物，因为它们已经生成了，所以无法进一步被修正。我们再想想“往水潭里扔石头”的比喻，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刺激强度（投掷的力量）、意义（石头的大小），唤醒（水潭的黏度），我们还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增加神经元集合的周转率。参与贡献的神经元集合的周转是确定一个公认假设性总体场景的特征的关键，该场景将产生的经验与任何特定的意识时刻联系起来。

经过几百毫秒之后，单一神经元集合的活动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衰变，而这恰恰是里贝特等人发现意识出现的关键阈值。44因此，没有一个单独的神经元集合可以直接与正在进行的意识本身相关联。但是，如果某一特定神经元集合在每种情况下的明显衰变，都是随后触发更重要、更广泛事件的重要因素，那会如何呢？这种“其他事件”将是一种包含空间和时间整体性的单一实体，它可以解释似是而非的现在，即意识本身。因此，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实现“其他事件”这样一个普遍的、

假设性的实体。相比在实验室高度人为的环境下研究麻醉大鼠或脑切片，在现实生活中更可能的情况是，多个神经元集合在大脑各处产生，而不知何故，它们在同一时间段内叠加和协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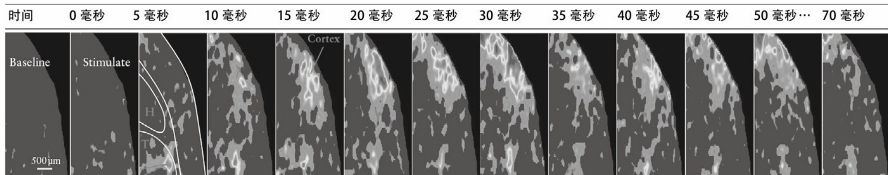
我们永远无法利用现有工具在三维活体大脑中发现这种整体效果，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明确到底要寻找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被实际的实验研究所限制，用一种更不受约束的方式探究，理论科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设想出一个更准确、更新颖的画面，看到整个大脑会发生什么现象来与意识时刻产生关联。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如何设计神经元集合的假设模型，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设定的时间框架内，多个神经元集合是如何相互作用交流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确认构成一个可能的单一神经元集合的螺丝和螺母会是什么。

四、走进神经元集合

我们传统上认为大脑运行的基本构件是单个的神经元突触。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合理的假设开始，即神经元集合动力学最终会由我们所熟悉的突触传递过程决定。但假设神经元集合只是一堆突触的纯粹集聚，我们就会遇到问题——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无法解释。

就空间而言，根据经典模式突触传递的支配法则进行预测，神经元集合的体积应当比实际情况小得多。与典型的理论预测值相比，实际的神经元集合的延伸范围要大三至十倍（见图2）。[45]就时间而言，我们知道神经元集合活动从最大强度衰减到20%的强度[46]需要约300毫秒，完全消失需要的时间则更长。[47]然而传统突触活动的时间量程最大仅为20毫秒。[48]

神经元集合必然有一个额外的运作机制，而突触传导和这个额外机制之间存在明显对照，可参见图10中的时间框。须注意，尽管根据经典突触传递理论，一个信号从丘脑传递至脑皮层速度极快，仅需5毫秒便可以完成一两毫米的行程，然而神经元集合在丘脑中完成全面传递却额外需要20毫秒的时间。[49]这很可能是额外机制作用的结果。



图表10：利用电压敏感染料成像的实验鼠大脑切片中的神经元集合（Fermani, Badin&Greenfield，待出版）。一般情况下，突触信号从丘脑传递至脑皮层，5毫秒可达到最远2毫米的距离（见图中5毫秒后的脑活动情况）。然而接下来神经元集合信号扩散到0.5毫米的半径范围却花了四倍的时间（见20毫秒处的脑活动情况）（本图的彩色扫描版见彩插7）

有两种重要的大脑通信方式可能与此有关，尽管这两种方式并不太为人所熟悉。一种是比突触传递在更广泛的尺度上运作的容积传递，另一种是相对非常微小的间隙连接。下面我们来简要看一下这两种方式。

前者之所以称为容积传递，是因为它使得神经元之间的互动作用以一种不太特异，以及极为缓慢的速度进行，但好处是同时参与的细胞数量要多得多。这个曾一度被视为革命性的理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得到了非常全面的研究。如今，容积传递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神经通信的替代形式，其重要性等同于“联网”的经典突触传递理论。[50]

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就已经知道，部分形似树枝状的神经元（树突）可以释放多巴胺等经典传递介质及其他生物活性分子。树突还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树突是神经元的接收区，成为其他神经元发送信号的目标（突触轴突末梢）。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树突可以独立于细胞体产生的电信号，自行释放物质，这已经成为一条普遍的原则。不仅如此，树突释放物质的现象发生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而且非常分散，意味着它是一个与经典突触传导完全不同的调节过程（在突触传递中，动作电位发放、脉冲传播皆围绕轴突进行，并且突触中轴突末梢发出的传递介质都是有明确指向的）。[51]

但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问题：突触传递的发生范围太小、速度太快，但容积传递对于神经元集合的增长来说又太慢了。[52]这里很可能还存在第三种神经元通信方式，它完美地补充了快速的、区域性的突触传递和需要更长时间的、缓慢的容积传递的不足。

这第三种通信过程不涉及任何神经化学物质，而是通过“间隙连接”，即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在现有的传播过程中实现。[53]有趣的是，在

神经元网络中，神经活动的快速振动（200赫兹）不是通过突触而是通过这些间隙连接实现的。[54]因此，如果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神经元集合的持续性活动背后，是这些快速振动在发生作用，[55]那么，尽管它们达到最大强度需要更长时间，但一旦启动，[56]神经元活动的范围将远超过突触信号所能传递的范围。这种扩大了的神经活动便会与各类神经元集合设置的规模相同。如此一来，神经元集合便可以提供充分符合意识运作时空要求的神经关联。因为与小范围的神经回路不同，这样的神经元集合不太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决定着任何一个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持续时间和衰减的这三种通信过程，并不是独立运作的，[57]而是共同起作用的。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当一个神经元集合启动并触发了某个意识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线索可能存在于触发时机中。

五、一种元集合？

正如我们刚才所见，意识的基础不可能仅仅由单一神经元集合组成，因为到了300毫秒这个关键节点，一个神经元集合的信号将大幅衰减至其巅峰程度的20%。[58]但也许这正是关键所在：如果在单一神经元集合局部中的300毫秒处观察到20%的时间衰减，其本身就标志着大范围、持续性、整体性的神经关联的触发，而这种关联与意识的产生密切相关……设想如下情况：大脑各处的单一神经元集合独立运作的时间达到了约300毫秒，但就在它们衰减的同时，它们的活动或者说能量被转移到某种集合的能量池中。

我们姑且将这种集合池称为“元集合”，元集合可能相当于一次整体性的大脑活动，也就是一个意识时刻。原因如下：第一，神经活动只有在持续进行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意识状态，[59]这个时间窗等同于一个神经元集合的衰减时间，即刺激因子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过程中大脑记录的电位保持不变的时间，分界点出现在270毫秒后。[60]第二，通过麻醉阻断意识可以大幅延长单一神经元集合的持续时间。[61]第三，在对感觉形态进行主观区分的过程中，接近这个长度的时间窗划分了神经元集合不同模式之间空间性差别出现的最早时间。[62]第四，能量需要以某种化学、电子或热量形式进行存储。如果它以热量形式存储，那么压力就会增加，反之亦然。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增加压力及热能，会使处于麻醉状态下的实验动物触发意识[63]，同时其神经元集合的体积也会激增。[64]

无论能量以何种形式存在，这种大规模的能量转移都将对大脑的背景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65]波动起伏的脑活动会敏锐察觉到单次能量转移带来的短暂干扰，进而激起整体性、全局性的涟漪效应，很可能正是后者为意识时刻的产生提供了真正的、最终的神经关联。因此，任何一个实际上产生了的神经元集合，连同在大脑各处同时产生的其他神经元集合（同时性在此很重要），成为一个关键的触发因素，就像是将一块石头扔进了一个远超其本身体积的池塘——这个池塘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元集合。

那么，这个元集合要如何探查，在哪里探查呢？至于测量，就是一个更远的问题了。谨记：它不大可能出现在某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单一的位置。我们需要设想的是某种联动形式，它能将大范围、广泛分布的神经元组织联合起来，这一切发生于几百毫秒的时间窗中，换句话说，处于某种神经“时空流形”。“流形”是一个数学概念，它将时间和空间结合在同一个连续体中。如果将时间列为第四个维度，那么最终对任何一个神经元的元集合进行描述，都很可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神经学家的工作。毕竟，涉及时空在单一流形中实现结合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基本原则，并能用统一的方式描述大至超星系、小至亚原子层面上的各种物质问题。[66]

然而，如果说意识时刻的出现的确最终可以在任何时刻与元集合相关联，并进而表现为某种大脑时空流形，那么我们便不必再纠结于如何将意识的产生归因于某个解剖学意义的大脑特定结构。这项工作本身既违背我们的直觉，又不符合我们的理性判断，并且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那样，它耗费甚多，可是收获的结论却不值一提。另外，如果时间成为和空间一样关键的因素，那么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讨论的内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补充和解释，即听觉和视觉的区分、时空的细微矛盾点以及时间的主观过程等问题，这些或许都与神经元集合的变动有关。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随环境而变化的化学、电子以及热能将以某种方式转化成一个意识时刻。这个“某种方式”当然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是目前阻碍我们前进的难点。就算我们能利用繁复而精确的数学工具模拟出不仅是我们见到的神经元集合，还有那些对意识产生起到了最终关键作用的不可见的、理论上的元集合，即便那样我们依旧很难继续往下推进，很难在客观物理现象和主观个人意识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并进行密切、准确的跟踪观察。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但我们真的应该停在此处吗？当然，除非我们能够建构或表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案，否则哪怕是用最抽象的数学方式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来跨越从“相关性”到“因果性”之间的鸿沟。很多人大概会像我已逝的父亲那样，持有一个不无幽默的观点（这本书就是献给我父亲的）：“你不可能用黄油做的刀去切黄油。”意思是，人的大脑是不可能解构它自身的。为什么不就此放弃，去做一些更实际的、能立即投入应用的研究呢？更别说，那些研究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在真正开始全面探索这个问题之前，就缴械投降，我们应该将自己推向自我的认知极限。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我们需要暂时将点石成金的难题搁置在一旁，神经科学研究依然很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这些价值能够，也理应为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提供补充和支持。如果我们能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并肩合作，将想象力延伸到极限，那么或许理解人类直接体验这一奇迹的可能性将一点一点增加……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注释

第一章　在黑暗中

1　Blakemore, C.&Greenfield, S. A.*Mindwaves*：*Teoughts on Intelligence,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1987）.

2　Smith, J. D.，Shields, W.E.&Washburn, D.A.‘The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monitoring and metacognition'.*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6，317-39；discussion 340-73（2003）；另请参阅 Haynes, J.-D.&Rees, G.‘Decod-ing mental states from brain activity in huma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7，523-34（2006）.

3　Crick, F.&Koch, G.‘A framework for consciousness'.*Nature Neuroscience*，6，119-26（2003）.

4　Gazzaniga, M. S.‘Forty-five years of split-brain research and still going strong'.*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6，653-9（2005）.

5　Weiskrantz, L.‘Blindsight revisited'.*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6，215-20（1996）.

6　Chun, M. M.&Wolfe, J.M.‘Visual attention'in*Blackwell Handbook of Per-ception*（2000）；另请参阅 O’Regan, J.K.&Noë，A.‘A sensorimotor account of vision and visual consciousnes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4，939-73；discussion 973-1031（2001）.

7　无意识注意力的例子：研究者设计了一种盲视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主试者使用了一种高度人为的基于实验室的手段，心理学家称之为掩蔽（mask-ing）。主试者给被试一个视觉刺激——“掩蔽刺激”，随即（后掩蔽）或之前（前掩蔽）给一个简短的视觉目标刺激，其持续时间小于千分之五十秒。结果表明，无论哪种模式，被试都没有意识到目标刺激，然而，在临床盲视上，他们仍然可以把刺激纳入潜意识。也就是说，在由于“后掩蔽”效应而导致“看不见”时，被试仍可以准备好词语（can be primed for words），但只有注意的时候才能做到。同样，在

另一个实验中，男性或女性的裸体图片甚至在被试都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吸引了被试的注意，由于一种叫“掩蔽抑制”（suppression-by-masking）的现象，这些图像对被试来说是“不可见的”。Naccache, L.，Blandin, E.&Dehaene, S.‘Uncon-scious masked priming depends on temporal atten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13，416-24（2002）.Jiang, Y.et al.‘A gender and sexual-orientation-dependent spatial attentional effect of invisible imag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3，17048-52（2006）.

8 Mack, A.&Rock, I.‘Inattentional blindness'. MIT Press Cambridge，12，180-4（1998）.

9 Li, F. F.et al.‘Rapid natural scene categorization in the near absence of atten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9，9596-601（2002）.

10 Reddy, L.，Reddy, L.&Koch, C.‘Face identification in the near-absence of focal attention'.*Vision Research*，46，2336-43（2006）.

11 Rees, G.&Frith, C. D.‘Methodologies for identify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in*Te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551-66（2007）.当一个人首先意识到某事物，随后又意识到其他事物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促成这种体验最简单的方法是“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即把一张图片呈现给一只眼睛，而给另一只眼睛呈现完全不同的图：两张图片相互竞争，因此每隔几秒钟，其中一张图片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准确地理解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事，可以用猴子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时记录单个脑细胞的活动。在一项研究中，给被试动物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的光栅图像，因此意识在水平光栅和垂直光栅之间的不停“交替”。记录大脑活动的结果表明，大脑皮层外层一个特定区域（皮质），特别是头部一侧（颞叶）的神经元，只对占主导地位的刺激进行反应：由于大脑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复杂精巧的、不平凡的、进行后期处理部分，从视觉输入的直接和最初处理中释放出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产生意识必然涉及这部分神经元。同时，视觉处理更基本和最主要的区域可能与注意力联系在一起，而非意识。我们观察到，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pvs）因此没有意识的病人，仍然

能在最主要区域产生诱发活动，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能在大脑感官处理的后期或“更高级”的阶段，找到意识物质基础的线索。Blake, R.&Logothetis, N.K.‘Visual competi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3，13-21（2002）.Sheinberg, D.L.&Logothetis, N.K.‘The role of temporal cortical areas in perceptual organiz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4，3408-13（1997）.Lee, S-H.，Blake, R.&Heeger, D.J.‘Hierarchy of cortical responses underlying binocular rivalry’.*Nature Neuroscience*，10，1048-54（2007）.Laureys, S.et al.‘Cortical processing of noxious somatosensory stimuli in the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Neuroimage*17，732-41（2002）.

12 最初见于英国喜剧《比泽》（*Tee Beezer*），后见于连环画《比诺》（*Tee Beano*）和《丹迪》（*Tee Dandy*），均由D.C.Thomson&Co.出品。

13 Felleman, D. J.&Van Essen, D.C.‘Distributed hierarchical processing in the primate cerebral cortex.*Cerebral Cortex*，1，1-47（1991）.

14 Velly, L. J.et al.‘Differential dynamic of action on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structures of anesthetic agents during induction of anesthesia'.*Anesthesiology*，107，202-12（2007）.

15 Penfi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16 Merker, B.‘Consciousness without a cerebral cortex：a challenge for neuro-science and medicin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0，63-81；discussion 81-134（2007）；另请参阅Panksepp, J.&Biven, L.*Archaeology of Mind*：*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W.W.Norton，2012）.

17 Penfield&Jasper，1954；另请参阅Blumenfeld, H.‘Consciousness and epilepsy：why are patients with absence seizures absent?’*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271-86（2005）.

18 最近，安东尼·胡代茨（Anthony Hudetz）发表了一篇综述，

强调在全麻状态下大脑新陈代谢的整体减缓。他评论说确实存在区域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的差异取决于使用哪种麻醉剂，这表明没有共同的、特定的大脑区域对此负责。大脑网络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他说："由麻醉引起的意识丧失并非由某一块皮层进行信息传递，而是破坏高级皮层的信息集成。主要负责前脑功能网络的脑区对维持意识状态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脑区主要基于后顶叶楔前叶区域、非特异性丘脑及扣带回。"Hudetz, A.G.'Gen-eral anesthesia and human brain connectivity'.*Brain Connectivity*，2，291-302（2012）.

19　虽然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但唯一可以找到的出处来源为一本教科书《医学心理学》（*Psychology in Medicine*），出版于1992年（现已绝版），作者为克里斯·麦克玛纳斯（I.Chris McManus）。在第23章中，他写道："还记得那则趣闻吗？把收音机电子管卸下来，同时听到设备开始鸣叫，便错误地假定电子管的功能是抑制啸叫。想要解释病理功能，首先要基于对正常功能充分理解。"http：//www.ucl.ac.uk/medical-education/publications/psychology-in-medicine

20　然而，直到最近，关于意识有其特殊脑区的观点又一次浮现出来。穆罕默德·库贝西（Mohamad Koubeissi）及其同事记录了一位严重癫痫患者的大脑，也正因为这个疾病，他已经进行了侵入性神经外科手术。纯属偶然，他们发现刺激一个特定区域（屏状核），能够可逆性地使病人失去意识，一旦刺激结束，个体又一次恢复反应性。如果我们不说意识的"中心"，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家们至少发现最初由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的意识的控制中心？不出所料，答案是否定的，这份报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一发现很难建立在一个合适的样本大小上，而仅仅基于一个病人。另外，这是一个大脑异常的病人，缺少与记忆有关的脑区（海马体）；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都必须来自数量更多的一组被试。此外，由于我们无法用完全健康的个体做侵入性脑外科手术，因此脑损伤的程度必须在这批人中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得出的所有结论都会受到限制，即脑损伤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类问题是过度诠释的危险。我们知道刺激屏状核会导致无意识，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唯一记录下来的区域。那么我们如何能确定地说这是一个排他性影响？难道直到在类似条件下去刺激所有其他大脑区域？事实上，神经科学家们几年前就知道，刺激完全不同的多个脑区（内侧苍白球和麦纳尔基底核之间的位点），可以快速恢复本来已被麻醉的患者的意识。那么是什么让屏状核成为一个独特的脑区？最重

要的是，撇开所有的技术保留，当然，我们能说得最好的是，它与许多其他大脑区域相连，这也是克里克最初喜欢它的原因。刺激该脑区以及类似苍白球等脑区，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全球脑状态的改变。第三类问题主要围绕我们如何运用操作策略来定义意识。结果表明，库贝西研究中病人的无意识状态，与麻醉或睡着时的无意识有所不同。相反，刺激导致“对意志行为和反应的完全抑制”，也许更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病人在临床意义上真的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可以保证他们没有主观体验？奇怪的是，来自萨塞克斯大学的阿尼尔·赛斯（Anil Seth）试图从区分意识和清醒来解释这一现象。很显然，病人醒了，但没意识！然而，字典却“有效”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将意识定义为“像清醒时的状态，头脑与感官的全面活跃”。赛斯所定义的这种细微差别，除非更详尽地阐述和论证，否则无疑会违背所有常识。第四类问题涉及为了理解数据而过分依赖隐喻。克里克想要通过该报告验证，屏状核像“管弦乐队的指挥”，协调所有其他脑区。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屏状核像个老板？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大脑区域位于解剖学中的十字路口，那为什么它也应该有自动执行功能，而不是仅仅是某种协调器（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一个通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库贝西都选择了与克里克完全不同的隐喻，他很喜欢把刺激屏状核比喻为一个开关（车的点火开关），能够开启或关闭意识。当然，开关和管弦乐队指挥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此外，即使在同一份报告中，“开关”看起来也比简单地打开——关上更有比喻性，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开关，报告中这样描述：“……渐渐地，她[病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静，动作越来越少，直到陷入昏迷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质疑“研究者观察的是无意识的诱发”这一假设，同时也要质疑意识只是简单地被开启或关闭的“开关”这一想法。Koubeissi, M.Z.et al.‘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a small brain area reversibly disrupts consciousness’.*Epilepsy and Behavior*，37，32-5（2014）.Stevens, C.F.‘Consciousness：Crick and the claustrum’.*Nature*，435，1040-1（2005）.Bagary, M.‘Epilepsy, consciousness and neurostimulation’.*Behavioural Neurology*，24，75-81（2011）.

21 Haynes, J.&Rees, G.‘Decoding mental states from brain activity in huma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7，523-34（2006）.

22 Blakemore, C.&Greenfield, S. A.，Hacker Peter eds.，Ch.31 in*Mind-waves*：*Teoughts on Intelligence,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485-505（1987）.

23 Maguire, E. A.et al.‘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7，4398-403（2000）.

24 García-Lázaro, H.G.et al.‘Neuroanatomy of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 in humans：a brief review of neuroimaging studies’.*Neurology India*，60，613-17；另请参阅Squire, L.R.‘Memory and brain systems：1969-2009’.*Journal of Neuroscience*，29，12711-16（2009）.

25 Alkire, M. T.et al.‘Thalamic microinjection of nicotine reverses sevoflurane-in-duced loss of righting reflex in the rat'.*Anesthesiology*，107，264-72（2007）.

26 Posner, J. B.&Plum, F.*Plum and Posner's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另请参阅Miller, J.W.&Ferrendelli, J.A.‘The central medial nucleus：thalamic site of seizure regulation’.*Brain Research*，508，297-300（1990）；以及Miller, J.W.&Ferrendelli, J.A.‘Characterization of GABAergic seizure regulation in the midline thalamus’.*Neuropharmacology*，29，649-55（1990）.

27 Alkire, M. T.，Haier, R.J.&Fallon, J.H.‘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narcosis：brain imaging evidence for a thalamocortical switch as the neurophysiologic basis of anesthetic-induced un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9，370-86（2000）.

28 Tononi, G.‘A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BMC Neuro-science*，5，42-64（2004）；另请参阅Massimini, M.et al.‘Triggering sleep slow waves b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4，8496-501（2007）.

29 伽马振荡看起来尤其依赖于兴奋性神经元和剩余抑制性脑细胞之间的反复连接，它们能迅速放电，主要来自兴奋性神经元的主要部分（细胞体）附近的突触。这种设置的全部要义是，在伽马活动期间，每

一个兴奋性细胞只需要一小部分周期的动作电位，但每一个周期的总贡献为抑制性神经元提供足够的兴奋性驱动，使它们在每一个周期中产生动力。这是一种神经元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学说中，每个个体断断续续地工作，却能确保集体性的持续产出。Mann, E.O.et al.‘Perisomatic feedback inhibition un-derlies cholinergically induced fast network oscillations in the rat hippocampus in vitro’.Neuron，45，105-17（2005）.Fisahn, A.et al.‘Cholinergic induction of network oscillations at 40Hz in the hippocampus in vitro’.*Nature*，394，186-9（1998）.

30 Singer, W.‘Neuronal synchrony：a versatile code for the definition of relations?'*Neuron*，24，49-65，111-25（1999）；另请参阅Singer, W.&Gray, C.M.‘Visual feature integration and the temporal correlation hypothesis’.*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8，555-86（1995）；以及 Tononi, G.，Sporns, O.&Edelman, G.M.‘Re-entr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ng multiple cortical areas：simulation of dynamic integration in the visual system’.*Cerebral Cortex*，2，310-35（1992）.

31 Wu, J. Y.et al.‘Spatiotemporal properties of an evoked population activity in rat sensory cortic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86，2461-74（2001）.

32 Koubeissi et al.，2014.

33 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34 Bachmann, T. Micr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Conscious Mind.（John Benjamins，2000）.

35 Sergent, C.，Baillet, S.&Dehaene, S.‘Timing of the brain events underlying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Nature Neuroscience*，8，1391-400（2005）.

36 Libet, B. Mind Time：*Te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7 Edelman, G. M.The Remembered Present：A 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Basic Books，1989）.

38 Rossi, A. F.，Desimone, R.&Ungerleider, L.G.‘Contextual modulation in primary visual cortex of macaques'.*Journal of Neuroscience*，21，1698-709（2001）.

39 Pascual-Leone, A.&Walsh, V.‘Fast back projections from the motion to the primary visual area necessary for visual awareness'.*Science*，292，510-12（2001）.

40 Todman, D.，Wilder Penfield（1891-1976）'.*Journal of Neurology*，255，1104-5（2008）.

41 Quiroga, R. et al.‘Invariant visual representation by single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Nature*，435，1102-7（2005）.

42 Kandel, E. R.‘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David Hubel and Torsten Wiesel'.*Journal of Physiology*，587，2733-41（2009）.

43 Gross, C. G.‘Genealogy of the“grandmother cell”'.*Neuroscientist*，8，512-18（2002）；另请参阅Jagadeesh, B.‘Recognizing grandmother’.*Nature Neuroscience*，12，1083-5（2009）.

44 Quiroga, R. Q.，Fried, I.&Koch, C.‘Brain cells for grandmother.'*Scientific American*，308，30-5（2013）.

45 Biederman, I.‘Recognition-by-components：a theory of human image understanding'.*Psychological Review*，94，115-47（1987）；另请参阅Marr, D.&Nishihara, H.K.‘Represen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hap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200，269-94（1978）；以及Booth, M.C.A.&Rolls, E.T.‘View-invariant representations of familiar objects by neurons in the inferior temporal visual cor-tex’.*Cerebral Cortex*，8，510-23（1998）；以及Bulthoff, H.H.，Edelman, S.Y.&Tarr, M.J.‘How ar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represented in the brain?’*Cerebral*

Cortex，5，247-60（1995）；以及Vetter, T.，Hurlbert, A.&Poggio, T.‘View-based models of 3D object recognition：invariance to imaging transformations’.Cerebral Cortex，5，261-9（1995）；以及Logothetis, N.K.&Pauls, J.‘Psychophysical and 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viewer-centered object representations in the primate’.*Cerebral Cortex*，5，270-88（1995）.

46 Connor, C. E.‘Neuroscience：friends and grandmothers'.*Nature*，435，1036-7（2005）.

47 他们的想法是，量子理论的原理（一门研究非常小的尺度的物理学）可以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一种替代的过程，把包括各种假设的可能性，通过实证观察还原为单一的确定性概念（波函数塌缩）。在一个版本的量子理论中（哥本哈根解释，试图调和量子力学的理论公式与实验数据），观察行为本身导致系统被观察，最终导致形成早期可能性状态（主观还原）的其中一种结果，因为我们必须有观察者。但在大脑中，由于没有外部观察者，量子事件必须在没有任何人观察的情况下自发地“崩溃”，也就是说，是更客观地进行。Cramer, J.‘The transa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Review of Modern Physics*，58，647-87（1986）.

48 Hameroff, S.&Penrose, R.‘Consciousness in the universe：a review of the“Orch OR”theory'.*Physics of Life Reviews*，11，39-78（2014）.

49 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高度原创的设想引发了许多不确定性和问题。最直接的是，大脑对于量子事件的发生来说太热了，因为它们的相干性需要310°开的环境温度，而这将被自然热的大脑热能所干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赫伯特·弗利希（Herbert Fröhlich）认为，大脑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与外部世界的发生的事很不同，细胞内化学反应所提供的能量能够产生和维持脑内的相干性。他估计微管蛋白分子可以在10-12到10-9秒之间以相干的方式被激发，也就是1纳秒。而如果正如里贝特的研究所得出的（2004年），意识的一个瞬间是500毫秒，那么将需要约10^9微管蛋白分子，即在100到100000个神经元内才能找到这么多微管蛋白分子。但是这个数字太少了，无法达到有意义的量子相干性。即使是简单而短暂的闪光，也会激活一只猫大脑中大约10^7个神经元。然而，最近，通过引用一些观察数据，哈梅洛夫和潘洛斯对此的回

应似乎打破了量子事件与脑热的不相容性。这些观察表明，某些现象（量子自旋转移）在越来越高的温度下会增强，同时指出植物在光合作用适宜的环境温度中使用量子事件。温暖的量子效应也出现在鸟类大脑导航、离子通道（通过该通道，细胞膜中的孔允许离子，如钠和钾，从外部进入内部，反之亦然）、气味和蛋白质折叠（经由这一过程中，蛋白质链获得了三维结构）中。建立在量子理论之上的修改版意识描述发表于2013年，如今其理论基础是微管的“拍频”，据说对应如40Hz的脑波振荡频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意识和神经系统之间联系的证明，享有持久的声望。但我们也看到，这种集体的同步性远未被公认为一条金科玉律。事实上，很可能的情况是，稳态振荡是大脑的默认模式，背景“噪音”是意识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信号”，是叠加上去的。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个理论，在一个特定的生化反应中发现了细胞的能量供应（鸟苷三磷酸水解为鸟苷二磷酸）。至少一部分由这种故障提供的能量能够激发振动，从而归因于微管动力学，是通过细胞能量供应站（线粒体）的电磁场驱动。Bernroider, G.&Roy, S.‘Quantum entanglement of K＋ions, multiple channel states and the role of noise in the brain’.SPI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uctuations and Noise（eds.Stocks, N.G.，Abbott, D.&Morse, R.P.），205-14（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2005）.Engel, G.S.et al.2005）.Engel, G.S.et al.‘Evidence for wavelike energy transfer through quantum coherence in photosynthetic systems’.*Nature*，446，782-6（2007）.Fröhlich, H.‘The extraordinary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 action of enzyme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72，4211-15（1975）.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Gauger, E.M.et al.‘Sustained quantum coherence and entanglement in the avian compass’.*Physical Review Letters*，106，040503（2011）.Hildner, R.et al.‘Quantum coherent energy transfer over varying pathways in single light-harvesting complexes’.*Science*，340，1448-51（2013）.Libet, B.，Wright, E.W.&Gleason, C.A.‘Preparation-or intention-to-act in relation to pre-event potentials recorded at the vertex’.*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56，

367-72（1983）.Ouyang, M.&Awschalom, D.D.‘Coherent spin transfer between molecularly bridged quantum dots’.*Science*，301，1074-8（2003）.Pokorný，J.‘Excitation of vibrations in microtubules in living cells’.*Bio-electrochemistry*，63，321-6（2004）.Turin, L.‘A spectroscopic mechanism for primary olfactory reception’.*Chemical Senses*，21，773-91（1996）.

50 哈梅洛夫和潘洛斯强调，神经元内聚性可以通过“缝隙连接”的传播活动达成（低电阻连接，一个细胞与另一个细胞相连续）。但是调谐客观还原理论（Orch OR）框架需要满足众所周知的化学多样性，可以通过各种精神活性物质强有力地修改意识。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理由放弃经典的突触信号假设。神经学家南希·沃尔夫（Nancy Woolf）建议，有一种方法可以确保更多的神经元参与，即大脑微管的行为不同，特定的化学信使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她认为，在微管内微管蛋白能重新配置，以便产生适量的量子波之前，某种特定的蛋白质（微管相关蛋白MAP_2）必须停止活动。这种化学物质有点像胶水，使微管保持在一个独立的、局部的模式中。有趣的是，MAP_2不是对所有细胞通用，甚至在大脑皮层仅位于15%的细胞中。此外，它只能通过与受体结合的某些化学信使激活。这正是神经科学家在不同脑区、不同药物敏感性等方面解开意识谜团的要求。当神经递质与其靶分子（受体）结合，会抑制MAP_2，使微管聚合成均匀平行排列的一排，达到量子洪流“消相干”和意识时刻的平行。一旦神经递质动作完成，微管将重新配置成一个新的模式。大脑将永远改变，意识的那一刻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种设想在将量子理论与宏观事件结合起来时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细胞NCC内部的问题（无论是哈梅洛夫和盘洛夫e的原始版本、修改版本抑或这里提到的混合变异的设想）在于，它依赖于许多假设，只不过是物理学的一个新应用而已，目前也还没有任何实证经验验证。Woolf, N.J.‘A possible role for cholinergic neurons of the basal forebrain and pontomesencephalon in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6，574-96（1997）.

51 Dehaene, S.，Kerszberg, M.&Changeux, J. P.‘A neuronal model of a global workspace in effortful cognitive task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5，14529-34（1998）；另请参阅Barrs, B.J.A*Cognitive Teeory of Consciousn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52　Dennett, D. C.‘Are we explaining consciousness yet?'*Cognition*，79，221-37（2001）；另请参阅Dennett, D.C.*Consciousness Explained.*（Basic Books，1991）.

53　泛心论是指万事万物（pan）都有心灵（psyche）。对于这一古老的思想的现代描述，请参阅David　Chalmers的作品，例如http：//consc.net/papers/panpsychism.pdf

54　Tononi，2004.另请参阅E.Tononi，‘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d account’.*Archives Italiennes Biologie*，150，290-326（2012）.

55　Tononi把术语“phi”（φ）作为衡量集成信息的方法，在关键脑区的局部神经元集合，将在十至几百毫秒的时间窗内最大化φ。因此，他认为具有所有交互复杂性表现的丘脑——皮层系统是“高”φ的一个案例。

56　McGinn, C.*Tee Mysterious Flame*：*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Basic Books，1999）.

57　Crick, F.&Koch，（2003）

58　Dennett，1991.

59　Libet, Wright&Gleason，1983.

60　Tononi, Sporns&Edelman，1992.

61　Kurzweil, R.*How to Create a Mind*：*Tee Secret of Human Teought Revealed.*（Vi-king，2012）.

62　https：//gigaom. com/2014/06/25/googles-ray-kurzweil-on-the-moment-when-computers-will-become-conscious/

63　Bergquist, F.&Ludwig, M.‘Dendritic transmitter release：a comparison of two model systems'.*Journal of Neuroendocrinology*，20，677-86（2008）.

64　Damasio, A.*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Harcourt Brace，2000）.

65 来自瑟赛克斯大学的赛斯区分了NCCs和一般“理论”上意识模型的不同。他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模型本身就提供了神经活动和意识之间的“解释性联系”。然而，尽管他认为所喜欢的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机械化的实现”，但迄今为止很少有模型是真正基于新的神经元机制，因为不仅要是必要的，还需要这些机制足够能解释意识现象。与Seth的定义相反，我认为，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模型的关键特征无疑是提取并再现了系统中显著的特征，而牺牲了无关的特征。例如，如果你想模拟飞行，关键的特征是抵抗地心引力，因此你不用考虑喙和羽毛。但是，当你想要“模拟”意识时，你如何事先知道什么是其突出的特征？当然，如果你确实已经知道了，那么就无需首先建构一个模型出来了。Seth, A.‘Models of consciousness’.*Scholarpedia*，2，1328（2007）.

66 McGinn, C.*Tee Mysterious Flame*：*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Basic Books，1999）.

67 Chalmers, D. J.‘The puzzle of conscious experience'.*Scientific American*，273，80-6（1995）；另请参阅 Chalmers, D.J.‘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200-19（1995）.

第二章　醒来

1 θ波的特点是振幅为10微伏，频率为4到8每秒赫兹。Lancel, M.‘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EEG in relation to sleep-wake behavior in mammalian species’.*Neuropsychobiology*，28（3），154-9（1993）.Bas ̧ar E.&Güntekin B.‘Review of delta, theta, alpha, beta and gamma response oscillation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Supplements to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62，303-41（2013）.

2 REM睡眠的持续时间，从第一个周期的10分钟，增加到最后一个周期的50分钟。请参阅28章和图表28.7 A in Purves, D.et al.（eds.）*Neuroscience*.（Sinauer，2012）.

3 同上。

4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组胺、5-羟色胺和乙酰胆碱是典型的脑细胞过程（轴突终末）释放出来的“经典”递质，它们通过窄间隙（突触）进入下一个靶细胞。然后，神经递质进入一个分子，与其中“量身定制”的蛋白质（一种受体）结合，从而在靶细胞中产生新的动作电位。更详细的记录请参阅Kandel, E.，Schwartz, James H.&Jessell, T.，*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5th edn（Elsevier，2012）.

5 Aston-Jones, G.&Bloom, F. E.‘Activity of norepinephrine-containing locus coeruleus neurons in behaving rats anticipates fluctuations in the sleep-waking cycle'.*Journal of Neuroscience*，1，876-86（1981）；另请参阅Kocsis, B.et al.‘Serotonergic neuron diversity：identification of raphe neurons with discharges time-locked to the hippocampal theta rhythm’.*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3，1059-64（2006）；以及Steininger, T.L.et al.‘Sleep-waking discharge of neurons in the posterior lateral hypothalamus of the albino rat’.*Brain Research*，840，138-47（1999）；以及Takahashi, K.，Lin, J.-S.&Sakai, K.‘Neuronal activity of histaminergic tuberomammillary neurons during wake-sleep states in the mouse’.*Journal of Neuroscience*，26，10292-8（2006）；以及Takahashi, K.et al.‘Locus coeruleus neuronal activity during the sleep-waking cycle in mice’.*Neuroscience*，169，1115-26（2010）；以及Jacobs, B.L.&Fornal, C.A.‘Activity of brain seroto-nergic neurons in the behaving animal’.*Pharmacological Reviews*，43，563-78（1991）.

6 Hobson, J. A.‘Sleep and dreaming：induction and mediation of REM sleep by cholinergic mechanisms'.*Opinion in Neurobiology*，2，6，759-63（Dec.1992）.

7 Lee, S. H.&Dan, Y.‘Neuromodulation of brain states'.*Neuron*，76，109-222（2012）.

8 Greenfield, S. 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Penguin，2000）.通过乙酰胆碱调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见：Cole, A.E.&Nicoll, R.A.‘Acetylcholine mediates a slow synaptic potential in hippocampal pyramidal cells’.*Science*，221，1299-301（1983）；以

及McCormick, D.A.&Prince, D.A.‘Mechanisms of action of acetylcholine in the guinea-pig cerebral cortex in vitro’.*Journal of Physiology*，375，169-94（1986）.

9 Guedel, A. E.*Inhalational Anesthesia*：*A Fundamental Guide*.（Macmillan，1937）.

10 同时，可能的第四个阶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是在如此多的麻醉过程中，脊髓上方的大脑原始区域（即脑干）的脑细胞仍然存活，但停止了重要的动作电位。由于这些细胞控制呼吸和心率，因此你会停止呼吸，血压会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损害重要器官的运转。换句话说，你会死亡。但这并非让人最担心的，因为Guedel把“这些危险”的原因描述为缺氧和低血压的结合，实际上是由大脑的高剂量麻醉效果引起的，现在这些危险已经减轻了，而且是潜在可逆转的。

11 BIS监测测量麻醉对脑电信号大小和/或协调的影响，输出结果用一个单一的数字代表。为此，BIS传达的真正价值和信息实际上充满争议。所有医生都承认BIS测量的一个缺点是，不能同时反映所有麻醉作用，对某些引起神志不清的药物（如氧化亚氮、氯胺酮和氙）不敏感。对于这种受限的敏感性，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以BIS脑电图为基础的监测，只能跟踪特殊的脑变化，这种脑变化是由特定麻醉剂主要通过某些化学系统引起的，而不是其他路径。Pandit, J.J.&Cook, T.M.‘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guidance on measuring depth of anaesthesia：limitations of EEG-based technology’.*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112，385-6（2014）.

12 有时，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解释，这些解释并非不言自明，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培训来复制。例如，李恩哲（UnCheol Lee）及其团队报告，氯胺酮确实对异丙酚和七氟醚产生的脑电图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们不得不使用复杂的数学和统计算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其他使用同样复杂数据分析的研究基本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Barrett, A.B.et al.‘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f steady-state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ignals during propofol-induced anaesthesia’.*PLoS One*，7（2012）.Cruse, D.et al.‘Detecting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electroencephalo-graphic evidence for attempted movements to command’.*PLoS One*，7，e49933（2012）.Goldfine, A.M.et al.‘Reanalysis of“Bedside detection

of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a cohort study"'.*Lancet*，381，289-91（2013）.Lee, U.et al.'Disruption of frontal-parietal communication by ketamine, propofol and sevoflurane'.*Anesthesiology*，118，1264-75（2013）.Mashour, G.A.&Avidan, M.S.'Capturing covert consciousness'.*Lancet*，381，271-2（2013）.Menon, R.&Kim, S.'Spatial and temporal limits in cognitive neuroimaging with fMRI'.*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3，207-16（1999）.Nicolaou, N.，Hourris, S.，Alexan-drou, P.&Georgiou, J.'EEG-based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awake"versus"anesthetized"state in general anesthesia using Granger causality'.*PLoS One*，7，e33869（2012）.最近新的尝试是一个研究团队使用复杂的脑电图分析认为，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很可能是有意识的，但其他团队对同一数据重新分析的结果否认了这一提议。事实上，另一个医疗结构甚至声称："意识状态的解释完全是基于神经生理学的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此同时，另一种脑成像方法远非理想。功能磁共振成像和其他扫描技术能读出大脑内部的血液流动，而不是神经元活动的直接信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测量大脑事件的时间窗与实时效果并不相称。因此，运用这些方法难以评估不同麻醉剂的差异，也因此更难解释一个单一、共同及最终的大脑过程。

对主要的假定备选受体/通道的麻醉作用的概述

	$GABA_A$	甘氨酸	nACh（肌肉）	nACh（神经）	$5HT_3$	AMPA	红藻氨酸	NMDA	TASK1	HCN1
依托咪酯					0	?	?	?		0
丙泊酚					0		0		0	
巴比妥类药物								0	?	?
氯胺酮		0				0	0		?	
异氟烷										
七氟醚					?	0	?			?
一氧化二氮									?	?
右旋美托咪啶	0	?	0	0	0	?	?	?	?	?

图例：

强激活	弱激活	弱抑制	强抑制	0= 无效应	? = 不明确

GABA-A，γ-氨基丁酸A型；nACh，烟碱乙酰胆碱；5HT3，5-羟色胺（血清素）3型；AMPA，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NMDA, N-甲基-D-天冬氨酸；TASK-1，TWIK（二孔弱内向整流钾）-相

关，酸敏感钾通道I型；HCN1，超极化激活阳离子通道1型。

改编自Rudolph, U.&Antkowiak, B.‘Molecular and neuronal substrates for general anaesthetic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809-20（2004）

13 Stiles, J.&Jernigan, T. L.‘The basics of brain development'.*Neuropsychology Review*，20，327-48（2010）.

14 Greenfield, S. A.Journey to the Centres of the Mind.（W.H.Freeman，1995）；Greenfield, S.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Koch, C.&Greenfield, Susan.‘How does con-sciousness happen?’*Scientific American*，297，76-83（2007）.

15 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16 例如（使用氟烷麻醉时），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前扣带回、基底神经节、丘脑、海马、中脑和小脑都在麻醉过程中表现出葡萄糖代谢的减少。Alkire, M.T.et al.‘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during anesthesia in humans：effects of halothane on global and regional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Anes-thesiology，90，701-9（1999）.

17 Alkire, M. T.，Hudetz, A.G.&Tononi, G.‘Consciousness and anesthesia'.*Science*，322，876-80（2008）.

18 Lewis, L. D.et al.‘Rapid fragmentation of neuronal networks at the onset of propofol-induced unconsciousnes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9，E3377-86（2012）.

19 Massimini, M. et al.‘Triggering sleep slow waves b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4，8496-501（2007）.

20 Hebb, D. O.*Te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A*

Neuropsychological Teeory.（Wiley，1949）.

21 Spatz, H. C.‘Hebb's concept of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neuronal cell assem-blies'.*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78，3-7（1996）.

22 Kandel, E. R.&Schwartz, J.H.‘Molecular biology of learning：modulation of transmitter release'.*Science*，218，433-43（1982）.

23 Hebb，1949.

24 二十年来，电压敏感染料成像（VSDI）已经从一种新颖的纯技术，发展为一个非常成功和广泛用于再现神经活动的方式。1968年，塔萨基（Ta-saki）等人率先使用VSDI测量乌贼巨轴突的电活动。该技术主要是由艾伦·瓦格纳（Alan Waggoner）开发（Waggoner, A.S.*Journal of Membrane Biology*，27，317-34，他合成并筛选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染料。在我们所用染料的作用起源于电致变色，通常称为斯塔克（Stark）效应，它是磁塞曼（Zeeman）效应的电等价物。染料被归类为电致变色需要三个标准，虽然这还不够：首先，电致变色发生在亚纳秒级，因为它们不依赖于分子运动。其次，吸收光谱或激发光谱的一阶导数，应该与不同光谱有相同的斜率，因为Δε是∂ε/∂λ比例（ε＝“有效”消光）。再次，生色团是不对称的。虽然一些早期的染料如部花青素和菁染料等不符合标准，但di-4-ANEPPS和一些其他的新型染料确实符合标准。这些染料都含有氨基苯乙烯基吡啶生色团。根据这一理论，光激发导致正电荷从分子的嘧啶端转移到氨基端。生色团锚定在膜中，使这个移位的矢量垂直于膜平面，从而平行于电场。根据测算，这种转移的命令为0.3纳米（1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据信，电场因而阻碍了正电荷的分子内重新定位，从而能够让我们测量电压敏感光学效应的大小。对于di-4-ANEPPS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其机制。由场诱导所致的“溶解”，将带电萘团向膜表面移动，并扭曲了分子，从而导致较弱的荧光光谱蓝移、量子产率的降低和光谱的展宽。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Cohen, L.B.et al.‘Changes in axon fluorescence during activity：molecular probes of membrane potential’.*Journal of Membrane Biology*，19，1-36（1974）.Waggoner, A.S.&Grinvald, A.‘Mechanisms of rapid

optical changes of potential sensitive dye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303，217-41（1977）.Waggoner, A.S.'The use of cyanine dy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mbrane potentials in cells, organelles and vesicles'.*Methods in Enzymology*，55，689-95（1979）.Fluhler, E.，Burnham, V.G.&Loew, L.M.'Spectra, membrane binding and potentiomet-ric responses of new charge shift probes'.*Biochemistry*，24，5749-55（1985）.Ebner, T.J.&Chen, G.'Use of voltage-sensitive dyes and optical recording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Progress in Neurobiology*，46，463-506（1995）.Fromherz, P.&Lambacher, A.'Spectra of voltage-sensitive fluorescence of styryl-dye in neuron membrane'.*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1068，149-56（1991）.

25　然而，VSDI本身不能检测单个动作电位，它的空间分辨率约100x100x100微米，其中包括大约50至100个神经元的细胞体以及它们的关联过程，还有其他数百个神经元。因此，阿米拉姆·格林瓦尔德（Amiram Grin-vald）及其团队率先迈出了量化和验证这些极其短暂结合体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们表明单个神经元的自发放电，与其结合的神经元集合的活动有关。VSDI技术虽然在自下而上方面需要补充性的技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项技术非常适合揭示中等层面上脑组织的情况。另请参阅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Arieli, A.&Grinvald, A.'Optical imaging combined with targeted electrical recordings, microstimulation or trac-er injections'.*Journal of Neuroscientific Methods*，116，15-28（2002）.Tominaga, T.et al.'Quantification of optical signals with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in neural activities of di-4-ANEPPS stained rat hippocamp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scientific Methods*，102，11-23（2000）.

26　我们并没有普遍采用这种神经元集合的定义，而是用这个术语描述某种很不同的现象。例如，皮质柱的同义词是“解剖学层面对神经元网络的比较好的定义”，而睡眠仅仅是先前活动状态的产物，反过来又依赖于传统的传输。Krueger J.M.et al.'Sleep as a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neuronal assemblie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9（12）：

910-19（2008）.

27　Grinvald et al. 1994.

28　Devonshire, I. M.et al.‘Effects of urethane anaesthesia on sensory processing in the rat barrel cortex revealed by combined optical imag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32，786-97（2010）.

29　Grinvald et al.，1994.

30　如果你认为一个脑细胞的平均直径约为40微米（约1/40000米），同时浸泡着这些细胞的液体占据了5%至10%的脑容量，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最大的活动性约10毫秒，那么这大约是1265个神经元的直径，如果活动性呈现为一个完美的球体，那么相当于10亿6000万个神经元。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二维切面的实验中假设三维形状，即使可能，我们也没理由假设这种结合体是球形的。但关键的是，你能明白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神经元。VSDI的缺点是无法用于人类大脑，因为它是侵入性的，并且带有潜在毒性的染料会直接作用于活体细胞。然而，用于人脑成像的非侵入性技术只能提供非常间接的大脑活动测量，即更活跃的脑细胞所需的血液供应会增加。因此，总是会有延迟，所以反应平均在几秒钟内。尽管目前正在开发实时无创成像技术，但分辨率仍比动作电位高几个数量级。Stoeckel, L.E.et al.‘Optimizing real-time fMRI neurofeedback for therapeutic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NeuroImage*：Clinical，5，245-55（2014）.因此，例如图2中使用VSDI记录的事件序列可能还是会全部缺失。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完好的感觉皮层上引发的神经元集合比在活体外实验中更大，至少达到2.5毫米而非1毫米。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整个事件都更“接近真实生活”，因为现实中会自然地出现更多调节器、更高的连接性以及有更多工作输入进入大脑。Devonshire et al.，2010.

31　Llinás, R.&Sasaki, K.‘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olivocerebellar system as examined by multiple purkinje cell recordings.*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587-602（1989）.

32　吴（Wu）进一步提出了非强制性波传播的四种机制。第一，单个振荡器因不同的时间延迟而兴奋；第二，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

经元的直接兴奋产生了“传播脉冲”；第三，一个耦合引线振荡器；或第四，多重刺激。他的团队把这些现象比作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集体产生的“群体智能”或“运动波”。它们要么可以自发地发生，要么可以由“石头扔入水潭”诱发，或者更可能是两者结合，每时每刻产生丰富且高度可变的一次性脑状态。Wu, J.-Y.，Xiaoying Huang&Chuan Zhang.‘Propagating waves of activity in the neocortex：what they are, what they do’.*Neuroscientist*，14，487-502（2008）.

33 Greenfield, S. A.&Collins, T.F.T.‘A neuroscientifc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1-23（2005）.

34 Collins, T. F.T.et al.‘Dynamics of neuronal assemblies are modulated by an-aesthetics but not analgesics'.*Europe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24，609-14（2007）.

35 Blumenfeld, H.‘Consciousness and epilepsy：why are patients with absence seizures absent?'*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271-86（2005）；另请参阅Pen-f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36 Davies, D. L.&Alkana, R.L.‘Benzodiazepine agonist and inverse agonist coupling in GABAA receptors antagonized by increased atmospheric pressure'.*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469，37-45（2003）；另请参阅Johnson, F.H.&Flagler, E.A.‘Hydrostatic pressure reversal of narcosis in tadpoles’.*Science*，112，91-2（1950）；以及Johnson, F.H.&Flagler, E.A.‘Activity of narcotized amphibian larvae under hydrostatic pressure’.*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37，15-25（1951）.

37 Wlodarczyk, A.，McMillan, P. F.&Greenfield, S.A.‘High pressure effects in anaesthesia and narcosi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35，890-8（2006）.

38 高压也可能在单细胞水平上逆转麻醉。原来的一些压力逆转的工作是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David White和G.H.Hulands用单细胞做的。White, D.C.&Halsey, M.J.‘Effects of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uring ex-perimental anaesthesia’.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46，196-201（1974）.

39　由于意识没有特定的脑区，同时传统脑成像麻醉后大脑整体活动减少，因此海马至今一直是大脑能够观察的神经元集合的代表部分。尽管如此，当研究人员搜寻相关的候选脑区时，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解剖学层面最小的部分。与此相反，丘脑-皮层环路就是这样的电路，即使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它如何或为什么在意识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探索孤立的脑区扩展到相互连接的脑区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回路。Alkire et al.，1999.

40　Wlodarczyk, McMillan&Greenfield，2006.

41　Devonshire et al.，2010.

42　Collins et al.，2007.

43　Wlodarczyk, McMillan&Greenfield，2006.

44　Devonshire et al.，2010.

45　同上。

46　Bryan, A. et al.‘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d response：a new devic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brain function during anaesthesia'.*Proceedings of the Anaesthetic Research Society Meeting*，428-9（2010）.

47　同上。

48　Blundon, J. A.&Zakharenko, S.S.‘Dissecting the components of long-term potentiation'.*Neuroscientist*，14，598-608（2008）.

第三章　遛狗

1　Loh, K. K.&Kanai, R.‘Higher media multi-tasking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smaller gray-matter density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PLoS One*，9，e106698（2014）.

2　Schaefer, S. et al.‘Cognitive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while

walking：differences in cognitive-sensorimotor couplings betwee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7，371-89（2010）.

3 Berman, M. G.，Jonides, J.&Kaplan, S.‘The cognitive benefits of interacting with nature'.*Psychological Science*，19，1207-12（2008）.

4 同上。

5 Atchley, R. A.，Strayer, D.L.&Atchley, P.‘Creativity in the wild：improving creative reasoning through immersion in natural settings'.*PLoS One*，7，e51474（2012）.

6 Stourton, E.*Diary of a Dog Walker*：*Time Spent Following a Lead*.（Doubleday，2011）.

7 Wells, M. J.&Young, J.Z.‘The effect of splitting part of the brain or removal of the median inferior frontal lobe on touch learning in octopu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50，515-26（1969）；另请参阅Wells, M.J.&Young, J.Z.‘The median inferior frontal lobe and touch learning in the octopu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56，381-402（1972）.

8 Sutherland, N. S.‘Shape discrimination in rat, octopus and goldfsh：a comparative study'.*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67，160-76（1969）.

9 Fiorito, G.，Agnisola, C.，d'Addio, M.，Valanzano, A.&Calamdrei, G.‘Scopol-amine impairs memory recall in Octopus vulgaris'.*Neuroscience Letters*，253，87-90（1998）.

10 Moriyama, T.&Gunji, Y.-P.‘Autonomous learning in maze solution by octopus'.*Ethology*，103，499-513（1997）.

11 Fiorito, G.&Scotto, P.‘Observational learning in Octopus vulgaris'.*Science*，256，545-7（1992）.

12 Giuditta, A. et al.‘Nuclear counts in the brain lobes of

Octopus vulgaris as a function of body size'.*Brain Research*，25，55-62（1971）.

13 Herculano-Houzel, S.‘The human brain in numbers：a linearly scaled-up primate brain'.*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3，31（2009）.

14 Juorio, A. V.‘Catecholamines and 5-hydroxytryptamine in nervous tissue of cephalopods'.*Journal of Physiology*，216，213-26（1971）.

15 Diamond, M. C.，Krech, D.&Rosenzweig, M.R.‘The effects of an enriched environment on the histology of the rat cerebral cortex'.*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123，111-20（1964）.

16 环境丰富的好处包括神经元的胞体大小增加、大脑整体重量增加、皮层厚度增加、树“突棘”（细胞分支上允许高度特异性链接的一系列微小凸起）数量增加、突触连接尺寸增加因此连接也增加以及神经胶质细胞增加（确保作为主力的神经元拥有一个良好的微环境，承担类似管家的职责）。

17 Valero, J. et al.，‘Short-term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scues adult neurogene-sis and memory defcits in APPSw, Ind transgenic mice'.*PLoS One*，6，2（2011）.

18 Speisman, R. B.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stores neurogenesis and rapid acquisition in aged rats'.*Neurobiology of Aging*，34，263-74（2013）.

19 Van Dellen, A. et al.‘Delaying the onset of Huntington's in mice'.*Nature*，404，721-2（2000）.

20 Young, D. 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hibits spontaneous apoptosis, prevents seizures and is neuroprotective'.*Nature Medicine*，5，448-53（1999）；另请参阅Johansson, B.B.‘Functional outcome in rats transferred to an enriched environment 15 days after focal brain ischemia’.*Stroke*，27，324-6（1996）.

21 Amaral, O. B.et al.‘Du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fluences the magnitude and persistence of its behavioral effects on mice'.*Physiology&Behavior*，93，388-94（2008）.

22 似乎环境的丰富也可能有更微妙的影响。无论给予的物体是令人厌恶的、奖励性的还是中性的，生活在环境贫乏笼子里的水貂花更多时间与新颖的物体交往。也就是新近有了这些特权的水貂比之前就在丰富环境笼子里待着的水貂更快与这些物体建立关系。从这项观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在贫乏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明显更“无聊”。我们确实需要小心，不要过度解释这些结果，不然会听到这样的警告：每当我们使用最适合人类行为方式的术语时，谨慎的做法是不要过于随便地使用这个术语。水貂不是人类，我们也不能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把诸如无聊这样复杂的心理状态强加给它们。可以说，丰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让单个成分的“新颖性”相形见绌，而且与之前的生活方式相比，经常接触新事物的动物也体现出了更大的差异性。然而，浅尝一下丰富的感觉可能还不如完全没有丰富的环境。由于无法参与积极的行为，有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表现出刻板行为：某种重复而毫无目的的动作，通常代表压力很大。对这些动物来说，丰富能够减少这些动作，但是当它们被安置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时，比那些一直放在贫乏环境中的动物表现出更严重的刻板行为。Meagher, R.K.&Mason, G.J.‘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duces signs of boredom in caged mink’.PLoS One，7，e49180（2012）.另请参阅 Latham, N.&Mason, G.‘Frustration and perseveration in stereotypic captive animals：is a taste of enrichment worse than none at all?’*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11，96-104（2010）.

23 Mora, F.，Segovia, G.&del Arco, A.‘Aging, plasticity and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structural changes and neurotransmitter dynamics in several areas of the brain'.*Brain Research Review*，55，78-88（2007）. Kozorovitskiy, Y.et al.‘Ex

perience induces structural and biochemical changes in the adult primate brai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2，17478-82（2005）.

24 Kolb, B. Brain，*Plasticity and Behaviour*，ch 1.Laurence Erlbaum Assoc（1995）.

25　Greenfield, S. A.*Mind Change：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Leaving Teeir Mark on Our Brains*.（Random House，2014）.

26　另外，在妊娠第28周和70周（即婴儿出生后第30周）之间，突触密度增加，并在8个月大时达到峰值，为6亿个，在10岁时趋于稳定，达到3亿个。Huttenlocher, P.et al.'Synaptogenesis in human visual cortex-evidence for synapse elimination during normal development'.*Neuroscience Letters*，33，247-52（1982）.

27　Gogtay, N. et al.'Dynamic mapping of human cortical development during childhood through early adulthoo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1，8174-9（2004）.

28　同时，在"交汇关联"区域的细胞（那些皮层区域主要不是参与感觉或运动加工），例如前额叶皮层，会比诸如感觉皮层经历更长期的衰退。在感觉皮层，成长和衰退阶段的敏锐性被认为是感觉模式"关键时期"的基础，该术语表明，时间框架对于建立正确的通路是至关重要的。有趣的是，"白质"（也就是连接纤维）的体积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增加，这是由于髓鞘化（myelination）的增加——这种绝缘能改善神经传导，并解释多发性硬化症（一种破坏性的疾病）恶化时所造成的损害。

29　Maguire, E. A.et al.'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7，4398-403（2000）.

30　Gaser, C.&Schlaug, G.'Brain structures differ between musicians and non-musicians'.*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9240-5（2003）.

31　Bengtsson, S. L.et al.'Extensive piano practising has regionally specifc effects on white matter development'.*Nature Neuroscience*，8，1148-50（2005）.

32　Jäncke, L.et al.'The architecture of the golfer's brain'.*PLoS One*，4，e4785（2009）.

33 Park, I. S.et al.‘Experience-dependent plasticity of cerebellar vermis in basket-ball players'.*Cerebellum*，8，334-9（2009）.

34 Mechelli, A. et al.‘Neurolinguistics：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the bilingual brain'.*Nature*，431，757（2004）；另请参阅Stein, M.et al.‘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the language system related to increased second-language profciency’.*Cortex*，48，458-65（2012）.

35 Draganski, B. et al.‘Neuroplasticity：changes in grey matter induced by training'.Nature，427，311-12（2004）；另请参阅Driemeyer, J.et al.‘Changes in gray matter induced by learning-revisited’.*PLoS One*，3，e2669（2008）.

36 Pascual-Leone, A. et al.‘Modulation of muscle responses evoked b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during the acquisition of new fine motor skill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74，1037-45（1995）.

37 Bailey, C. H.&Kandel, E.R.‘Synaptic remodeling, synaptic growth and the storage of long-term memory in Aplysia'.*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69，179-98（2008）.

38 Ridley, M.*Nature via Nurture*：*Genes, 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Harper Perennial，2004）.

39 Greenfield，2014；另请参阅 Greenfield, S.A.*You and Me*：*Tee Neuroscience of Identity*.（Notting Hill Editions，2011）.

40 Pittenger, C.&Kandel, E. R.‘In search of general mechanisms for long-lasting plasticity：Aplysia and the hippocampu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358，757-63（2003）；对于长时程增强效应（LTP）和长时程抑制（LTD）的基本解释见S.A.Greenfield，*Tee Human Brain*：*A Guided Tour*（Orion，1997）；更加全面且更技术化的描述见D.Purves，*Neuroscience*（Sinauer Press，2011，5th edn）.

41 Deidda, G.，Bozarth, I. F.&Cancedda, L.‘Modulation of GABAergic transmission in development an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investigating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to gain therapeutic perspectives'.*Frontiers in Cellular Neuroscience*，8，119（2014）.

42　Storer, K. P.&Reeke, G.N.‘γ-Aminobutyric acid receptor type A receptor potentiation reduces firing of neuronal assemblies in a computational cortical model’.*Anesthesiology*，117，780-90（2012）.

43　Olds, J.&Milner, P.‘Positive reinforcement produc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septal area and other regions of rat brain'.*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47，419-27（1954）.

44　多巴胺对前额叶皮层有抑制作用。请参阅Ferron, A.et al.‘Inhibitory inf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Cole, M.W.&Schneider, W.‘The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integrated cortical regions with dissociable functions’.*Neuroimage*，37，343-60（2007）.Cole, M.W.，Pathak, S.&Schneider, W.‘Identifying the brain’s most globally connected regions’.*NeuroImage*，49，3132-48（2010）.Cools, R.&d’Esposito, M.‘Inverted-U-shaped dopamine actions on human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control’.*Biological Psychiatry*，69，e113-25（2011）.多亏了这一抑制作用，多巴胺能够在三个不同水平上限制神经元集合的大小。第一，在单个神经元水平上，通过一种直接的调节作用，在特定的大脑区域即前额叶皮层上，对神经元产生有效的抑制。第二，通过全脑间接解剖系统：前额叶皮层所连接的脑区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多。因此，如果多巴胺抑制这一关键的脑区，尤其以人类大脑为例，那么大脑的整体组织功能将变得碎片化，因此大脑会不太可能形成任何超越正常解剖划分的神经元集合。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间接的行为水平上，多巴胺可能会使神经元集合的大小减小。众所周知，释放脑内多巴胺的苯丙胺类药物，对大脑整体具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导致过度亢奋。在这种状态下，当多巴胺水平很高时，有一种可能性会增加，过于活跃兴

奋的人有更多机会即刻直接感知到周围的环境，而不会对某物或某人有长期沉思的“认知”过程。在前一个石头还没来得及激起全部的水波纹时，就寻求一种新的刺激，把一块新石头扔进水潭。正如我们所见，这将是一个高速竞争的世界，由于周转率高，因而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会减小。

45 与多巴胺类似效果的讨论请参阅Susanta Bandyopadhyay and John J.Hablitz（2007），‘Dopaminergic Modulation of Local Network Activity in Rat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4120-28.

46 Brown, R. T.&Wagner, A.R.‘Resistance to punishment and extinction following training with shock or nonreinforcemen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68，503-7（1964）；另请参阅Gray, J.A.‘Fear, panic and anxiety：what’s in a name.*Psychological Inquiry*，2，72-96（1991）.

47 Greenfield, S. 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

48 http：//www. channel4.com/news/laughing-gas-nitrous-oxide-legal-high-police-drugs-brick-lane-festivals

49 阿片类药物本来是抑制性的，但是通常作用于抑制性通路，产生去抑制的作用。然而，这种兴奋作用会类似地通过去同步化，产生一种小神经元集合的状态。Charles, A.C.&Hales, T.G.‘From inhibition to excitation：func-tional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pioid receptors’.*Life Sciences*，76，479-85（2004）.

50 Yau, S. et al.‘Physical exercise-induced adult neurogenesis：a good strategy to prev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Biomed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4，403120（2014）.

51 Olson, A. K.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voluntary exercise massively increase neurogenesis in the adult hippocampus via dissociable pathways'.*Hippocampus*，16，250-60（2006）.

52 Van Praag, H.，Kempermann, G.&Gage, F. H.‘Running

increas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neurogenesis in the adult mouse dentate gyrus'.*Nature Neuroscience*，2，266-70（1999）.

53 Begley, S.*Tee Plastic Mind.*（Constable，2009）.

54 He, S.-B. et al.‘Exercise intervention may prevent depres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33，525-30（2012）.

55 Frodl, T.&O'Keane, V.‘How does the brain deal with cumulative stress?A review with focus on developmental stress, HPA axis function and hippocampal structure in humans'.*Neurobiology of Disease*，52，24-37（2013）.

56 Cakır, B.et al.‘Stress-induced multiple organ damage in rats is ameliorated by the antioxidant and anxiolytic effects of regular exercise’.*Cell Biochemistry and Function*，28，469-79（2010）.Schoenfeld等人，于2013年，在正在奔跑的动物的海马体中发现了新的兴奋性和抑制性细胞；此外，奔跑中的动物在接触到压力源后，会经历更短的压力发作期：“奔跑动物的海马体与久立不动的动物大不相同，它们不仅有更多兴奋性神经元和突触，而且更容易激活抑制性神经元，可能是处于应激状态时，更容易抑制兴奋性神经元。”Schoenfeld T.J.et al.‘Physical exercise prevents stress-induced activation of granule neurons and enhances local inhibitory mechanisms in the dentate gyrus’.*Journal of Neuroscience*，33（18）：7770-7（2013）.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适度运动和安静休息有助于缓解未来的压力（Smith，2013）。虽然这两种方法都在短期内减轻了压力，但看情绪图片时，安静休息组被试比运动组更有压力。Smith, J.C.‘Effects of emotional exposure on state anxiety after acute exercise’.*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45（2）：372-8（2013）；以及Nakajima, S.et al.‘Regular voluntary exercise cures stress-induced impair-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ell proliferation accompanied by increases in cerebral IGF-1 and GST activity in mice’.*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11，178-84（2010）

57 Nokia, M. et al.‘Learning to learn：theta oscillations predict new learning, which enhances related learning and neurogenesis'.*PLoS*

One，7，e31375（2012）.

58 Begley，2009.

59 Devonshire, I. M.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differentially modifes specifc components of sensory-evoked activity in rat barrel cortex as revealed by simultaneous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s and optical imaging in vivo'.*Neuroscience*，170，662-9（2010）.

60 同上。

61 相较麻醉大鼠，清醒大鼠的神经元集合的振幅更大，同时在空间范围上也更要大得多。Ferezou I, Bolea S.&Petersen C.C.‘Visualizing the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whisker touch：voltage-sensitive dye imaging in freely moving mice’.*Neuron*，50，617-29（2006）.

62 Greenfield，2011.

第四章 早餐

1 Reich, L. et al.‘A ventral visual stream reading center independent of visual experience'.*Current Biology*，21，363-8（2011）.

2 Neville, H. J.&Lawson, D.‘Attention to central and peripheral visual space in a movement detection task：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and behavioral study.II.Congenitally deaf adults'.*Brain Research*，405，268-83（1987）.

3 Karns, C. M.，Dow, M.W.&Neville, H.J.‘Altered cross-modal processing in the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of congenitally deaf adults：a visual-somatosensory fMRI study with a double-flash illusion'.*Journal of Neuroscience*，32，9626-38（2012）.

4 Gougoux, F. et al.‘Neuropsychology：pitch discrimination in the early blind'.*Nature*，430，309（2004）.

5 Lessard, N. et al.‘Early-blind human subjects localize sound

sources better than sighted subjects'.*Nature*，395，278-80（1998）.

6 Röder, B.et al.‘Semantic and morpho-syntactic priming in auditory word rec-ognition in congenitally blind adults’.*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18，1-20（2003）.

7 Bull, R.，Rathborn, H.&Clifford, B. R.‘The voice-recognition accuracy of blind listeners'.*Perception*，12，223-6（1983）.

8 Petrus, E. et al.‘Crossmodal induction of thalamocortical potentiation leads to enhanc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auditory cortex'.*Neuron*，81，664-73（2014）.

9 Terhune, D. B.et al.‘Enhanced cortical excitability in grapheme-color synesthe-sia and its modulation'.*Current Biology*，21，2006-9（2011）.

10 Liotta, A. et al.‘Partial disinhibition is required for transition of stimulus-induced sharp wave-ripple complexes into recurrent epileptiform discharges in rat hippocamp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105，172-87（2011）.

11 Rockel, A. J.，Hiorns, R.W.&Powell, T.P.‘The basic uniformity in structure of the neocortex'.*Brain*，103，221-44（1980）.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认为，皮层类似饼干模具的细胞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用视觉和听觉通路的各种解剖学差异来说明。从成像数据来看，输入听觉信息时形成的分布模式可能与视觉皮层非常不同。例如，听觉皮层通常接收两只耳朵的信息输入，从皮层之下的脑区传入进来，而视觉皮层只接收两个视觉半区的信息输入。此外，从皮层下中继站（丘脑）到视皮层的主要输入，通常终止于皮层中的某一层（第四层），而在听觉皮层，一些丘脑输入分布更广（延伸到第三层），而另一些则在其他地方终止（第一层）。LeVay, S.&Gilbert, C.D.‘Laminar patterns of geniculocortical projection in the cat’.*Brain Research*，113（1），1-19（1976）.Smith, P.H.&Populin, L.C.‘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alamocortical recipient layers of the cat auditory and visual cortic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36（4），508-19（2001）.Huang, C.L.&Winer,

J.A.‘Auditory thalamocortical projections in the cat：laminar and areal patterns of input’.*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27（2），302-31（2000）.

12 Libet, B.*Mind Time*：*Te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3 VanRullen, R.&Thorpe, S. J.‘The time course of visual processing：from early perception to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3，454-61（2001）.

14 Libet，2004.

15 Chakraborty, S.，Sandberg, A.&Greenfield, S. A.‘Differential dynamics of transient neuronal assemblies in visual compared to auditory cortex'.*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182，491-8（2007）.

16 Crick, F.&Koch, C.‘A framework for consciousness'.*Nature Neuroscience*，6，119-26（2003）.

17 Dunn, R.&Dunn, K.*Teaching Students through Their Individual Learning Styles*：*A Practical Approach*.（Prentice Hall，1978）.

18 Pashler, H. et al.‘Learning Styles：Concepts and Evide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9，105-119（2009）.

19 Dehaene, S. et al.‘Arithmetic and the brain'.*Current Opinions in Neurobiology*，14，218-24（2004）.

20 Grady, D.‘The vision thing：mainly in the brain'. Discover（http：//discover-magazine.com/1993/jun/thevisionthingma227）.相似地，参见Nikos Logo-thetis的网站：http：//www.kyb.tuebingen.mpg.de/research/dep/lo/visual-perception.html

21 Jones, B.‘Spatial perception in the blind'.*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66，461-72（1975）.

22 Calvert, G. A. , Campbell, R.&Brammer, M.J.‘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crossmodal binding in the human heteromodal cortex'.*Current Biology*，10，649-57（2000）.

23 Risberg, A.&Lubker, J.‘Prosody and speech-reading'in*STL Quarterly Progress and Status Report*，4，1-16（1978）.这种实验感官协同作用表现地更明显，在对猴子的一项侵入性研究中，感官统合的过程无需归于经典的“皮质组织”（更“高级”的脑区与特定的感觉模式不直接相关）。相反，早期的多感官影响能够增强神经元负载的信息。虽然五官信息仍然是可识别的，但它们会相互作用，让事情更加复杂化，根据相关神经元如何相互连接，可能产生不同的净效应。

24 Kayser, C. , Petkov, C. I.&Logothetis, N.K.‘Multisensory interactions in primate auditory cortex：fMRI and electrophysiology'.*Hearing Research*，258，80-8（2009）.

25 Geake, J. Ch.2，pp.10-17 in*Companion to Gifted Education*（eds.Balchin, T.&Hymer, B.）（Routledge，2008）.

26 Bakalar, N.‘Sensory science：partners in flavour'.*Nature*，486，S4-5（2012）.

27 Small, D. M.‘How does food's appearance or smell influence the way it tastes?'*Scientific American*，299，100（2008）.

28 Stevenson, R. J. , Prescott, J.&Boakes, R.A.‘Confusing tastes and smells：how odours can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sweet and sour tastes'.*Chemical Senses*，24，627-35（1999）.

29 Spence, C.&Piqueras-Fiszman, B.*Tee Perfect Meal：Tee Multisensory Science of Food and Dining*.（Wiley，2014）.

30 Gal, D. , Wheeler, S. C.&Shiv, B.‘Cross-modal influences on gustatory perception'.（2007）.

31 Harrar, V.&Spence, C.‘The taste of cutlery：how the taste of food is affected by the weight, size, shape and colour of the cutlery used to eat it'.*Flavour*，2，21（2013）.

32 Spence, C.‘Auditory contributions to flavour perception and feeding behaviour'.*Physiology and Behavior*，107，505-15（2012）.

33 Chen, J.&Eaton, L.‘Multimodal mechanisms of food creaminess sensation'.*Food and Function*，3，1265-70（2012）；see also Green, B. G.&Nachtigal, D.‘Somatosensory factors in taste perception：effects of active tasting and solution temperature'.*Physiology and Behavior*，107，488-95（2012）.

34 Harrar&Spence，2013.

35 Cruz, A.&Green, B. G.‘Thermal stimulation of taste'.*Nature*，403，889-92（2000）.

36 Lindstrom, M. Brand Sense：*Sensory Secrets behind the Stuff We Buy*.（Free Press，2010）.

37 Geertz, C.*Te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Basic Books，1973）.

38 Lawless, H. T.&Heymann, H.*Sensory Evaluation of Food*：*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pringer，2010）.

39 Lindstrom，2010.

40 Lubke, G. H.et al.‘Dependence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mory on hypnotic state in trauma patients'.*Anesthesiology*，90，670-80（1999）；另请参阅Kerssens, C.et al.‘Auditor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adequate propofol anesthesia monitored by electroencephalogram bispectral index’.*Anesthesia and Analgesia*，92，1210-14（2001）.

41 Nordin, S. et al.‘Evaluation of auditory, visual and olfac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for comparing interspersed-and single-stimulus paradig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81，252-62（2011）.

42 Sun, G. H.et al.‘Olfactory identification testing as a predic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zheimer's dementia：a systematic

review'.*Laryngoscope*，122，1455-62（2012）.

43 Wilson, D. A.，Kadohisa, M.&Fletcher, M.L.‘Cortical contributions to olfaction：plasticity and perception'.*Seminars in Cell&Developmental Biology*，17，462-70（2006）

44 Wysocki, C. J.&Preti, G.‘Facts, fallacies, fears and frustrations with human pheromones'.*Tee Anatomical Record.Part A.Discoveries in Molecular, Cellular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281，1201-11（2004）.

45 Porter, R. H.，Cernoch, J.M.&Balogh, R.D.‘Odor signatures and kin recognition'.*Physiology and Behavior*，34，445-8（1985）.

46 Weisfeld, G. E.et al.‘Possible olfaction-based mechanisms in human kin recognition and inbreeding avoida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85，279-95（2003）.

47 Wedekind, C.‘Body odours and body odour preferences in humans'in*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eds. Dunbar, R.&Barrett, 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48 Lewis, P.‘Musical minds'.*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6，364（2002）.

49 *Mousterian‘Bone Flute'and Other Finds from Divje Babe I Cave Site in Slovenia*.（Znanstvenoraziskovalni Centre Sazu，2007）.

50 Huron, D.‘Is music an evolutionary adaptati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930，43-61（2001）.

51 Barrow, J. D.*Tee Artful Universe.Te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usic*（Clarendon Press，1995）

52 Pinker, S.*How the Mind Works*.（W. W.Norton，1997）.

53 同上。

54 Molino, J.‘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usic and language'in*Tee Origins of Music*（eds.Wallin, N.，Merker, B.&Brown,

S.），165-76（MIT Press，2000）.

55 Huron，2001.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音乐可能会让人分心，干扰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更糟糕的情况是会导致放荡的行为。然而，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约翰·贝利（John Baily）指出，“其实说塔利班禁止音乐是不对的。他们禁止了乐器以及所有需要用乐器制作的音乐，而很可能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架子鼓——因为圣训说，先知穆罕默德赞成或允许在婚礼等庆祝仪式上用架子鼓演奏。”Baily, J.，*British Journal of Ethnomusicology*：‘It isn’t actually correct to say Taliban have banned music’.*Radio Liberty*，22 June 2009.

56 Merriam, A. 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57 Cross, I.‘Music, cognition, culture and evoluti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930，28-42（2001）；另请参阅 Storr, A.Music and the Mind.（Random House，1992）.

58 Dunbar, R.*Human Evolution. Music, Cognition, Culture and Evolution*（Pelican，2014）.

59 McNeill, W. H.*Keeping Together in Tim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60 Cross，2001.

61 Trevarthen, C.‘Musicality and the intrinsic motive pulse：evidence from human psychobiology and infant communication'.*Musicae Scientiae*，155-215（2000）.

62 Cross，2001.

63 杏仁核得名于拉丁语中的“像杏仁一样的形状”，位于颞叶深处，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与多个脑区相连。因此，它与一系列情绪与记忆功能相关。请参阅两篇近期的综述研究：LaLumiere, R.T.‘Optogenetic dissection of amygdala functioning’.*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8，107（2014）以及 Fernando, A.B.P.，Murray, J.E.&Milton, A.L.‘The amygdala：securing pleasure and

avoiding pain'.*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7，190（2013）.

64 Gosselin, N. et al.'Impaired recognition of scary music following unilateral temporal lobe excision'.*Brain*，128，628-40（2005）.另外，如需了解音乐相关的部分，请参阅Griffths, T.D.et al.'"When the feeling's gone"：a selective loss of musical emotion'.*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Psychiatry*，75，344-5（2004）.

65 Panksepp, J.'The emotional sources of"chills"induced by music'.*Music Perception*，13，171-207（1995）

66 Salimpoor, V. N.et al.'Anatomically distinct dopamine release during an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of peak emotion to music'.*Nature Neuroscience*，14，257-62（2011）.

67 Wise, R. A.'Forebrain substrates of reward and motiv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93，115-21（2005）.

68 Small, D. M.et al.'Changes in brain activity related to eating chocolate：from pleasure to aversion'.*Brain*，124，1720-33（2001）.

69 Breiter, H. C.et al.'Acute effects of cocaine on human brain activity and emo-tion'.*Neuron*，19，591-611（1997）.

70 Burton, A. C.，Nakamura, K.&Roesch, M.R.'From ventral-medial to dorsal-lateral striatum：neural correlates of reward-guided decisionmaking'.*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117，51-9（2014）.

71 Zald, D. H.&Zatorre, Robert J.，C.19，'Music'，pp.405-28 in*Neurobiology of Sensation and Reward*（ed.Gottfried, J.A.）（CRC Press，2011）.

72 Benoit, C.-É.et al.'Musically cued gait-training improves both perceptual and motor timing in Parkinson's disease'.*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8，494（2014）；另请参阅Nombela, C.et al.'Into the groove：can rhythm influence Parkinson's disease?'*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7，2564-70（2013）；以及Pacchetti, C.et al.‘Active music therapy in Parkinson’s disease：an integrative method for motor and emotional rehabilitation’.*Psychosomatic Medicine*，62，386-93（2000）.

73　Azulay, J. P.et al.‘Visual control of locomo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Brain*，122（Pt 1，111-20（1999）.

74　Lim, I. et al.‘Effects of external rhythmical cueing on gait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a systematic review'.*Clinical Rehabilitation*，19，695-713（2005）.然而，尽管有证据表明，相比外部线索，疾病确实尤其会影响内部线索。在实验条件下成功的干预措施，通常在实验室外（即病人家里）没有带来改善。

75　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现在音乐体验中多巴胺释放激增，萨利姆普尔（Salimpoor）及其团队便运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这一更快但非化学特定的扫描技术，来监测关键区域的多巴胺释放过程。他们发现了一种功能性的分离：一个脑区（尾状核）更多地参与了预期音乐力量的过程，而另一个脑区（伏隔核）则与音乐带来的情绪峰值体验更相关，这两个事件相隔约10至15秒。

76　Meyer, L.*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77　Blood, A. J.&Zatorre, R.J.‘Intensely pleasurable responses to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reward and emo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8，11818-23（2001）.

78　Sacks, O.*Musicophilia*：*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Random House，2007）.

第五章　在办公室

1　http：//www. bls.gov/tus/charts/

2　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针对的是特定的医院设计可能产生的治疗效果，其中包括了102项研究和38项元分析。然而，朴茨茅斯大学的第

一作者艾米·德拉霍塔（Amy Drahota）博士总结说："虽然很显然，病人康复期间所在的病区会影响他们的康复过程，但仍需要研究证据来帮助我们在医院设计中做决定。然而，我们的研究中有85项与在医院中使用音乐有关。我们对医院环境设计的各个方面都有兴趣，但许多领域都没有高质量的研究。例如，我们各发现了一项符合我们标准的照明和装修方面的研究，在运用艺术和寻找辅助工具方面没有找到任何质量足够高的研究。同时，我们甚至对找到的一些研究也有许多保留意见，因为研究质量还是不尽如人意。因此，虽然这篇综述研究中包含了大量信息，我们依旧呼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针对医院设计的不同部分，帮助我们在设计和翻新未来医院等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http：//www.news-medical.net/news/20120315/Hospital-environments-could-influence-patient-recovery.aspx.Drahota, A.et al.'Sensory environment on health-related outcomes of hospital patients'.*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3，CD005315（2012）.另请参阅Kaler, S.R.&Free-man, B.J.'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omanian orphans'.*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35，769-81（1994）.Eluvathingal, T.J.et al.'Abnormal brain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after early severe socioemotional deprivation：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Pediatrics*，117（6），2093-100（June 2006）.Prut, L.&Belzung, C.'The open field as a paradigm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drugs on anxiety-like behaviors：a review'.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463（1-3），3-33（28 Feb.2003）；另请参阅Eberhard, J.P.'Applying neuroscience to architecture'.*Neuron*，62，753-6（2009）.文章中引用了关于人类对建筑的反应的现有定义和特定假设，认为人类对建筑的反应仅仅在于等待学生和研究人员去研究，Eberhard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有70至80个这样的假设，并在自己所著的《大脑风景》（*Brain Landscapes*，Oxford University，2009）一书中详述了这些假设，例如，大脑天生就能够对基于黄金分割为比例而做出反应，同时大脑中有一个网络负责敬畏感。为了解决以往研究的不足，也为了提出如医院、学校、教堂及实验室等建筑的功能性要求，建筑神经科学学会（ANFA）于2003年创立，该学会的创立意味着虽然尚未完全实现，但神经科学应用于建筑有着巨大的潜力。

3 Johnson, D. E.et al.'Growth and associations between

auxology, caregiving environment and cognition in socially deprived Romanian children randomized to foster vs ongoing institutional care'.*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164，507-16（2010）.

4 Albers, L. H.et al.‘Health of children adopted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Comparison with preadoptive medical records'.*JAMA*，278，922-4（1997）.

5 Kaler&Freeman，1994.

6 Eluvathingal，2006.

7 Sheridan, M. A.et al.‘Variation in neur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exposure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early in childhoo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9，12927-32（2012）；另请参阅Nelson, C.A.et al.‘Cognitive recovery in socially deprived young children：the 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Science*，318，1937-40（2007）.

8 Frasca, D. et al.‘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post-acute decline：what role does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play?A scoping review'.*Frontiers of Human Neuro-science*，7，31（2013）.

9 Linhares, J. M.M.，Pinto, P.D.&Nascimento, S.M.C.‘The number of discernible colors in natural scenes'.*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Optics, Image Science and Vision*，25，2918-24（2008）.

10 Gegenfurtner, K. R.&Kiper, D.C.‘Color vision'.*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6，181-206（2003）.

11 Chalmers, D.‘Absent qualia, fading qualia, dancing qualia'in*Conscious Experience*（ed. Metzinger, T.）（Imprint Academic，1995）.

12 Purves, D. et al.*Neuroscience*.（Sinauer Press，2012）.

13　这种现象称为“色彩实体视觉”（chromostereopsis）。例如，红色的色块看起来比蓝色的要近。可以说，如果一个红色物体更靠近，需要更多注意力，因此拥有产生直接生理效应的机会，即刺激和提高心率。与此相反，蓝色物体看起来不会像相邻的红色物体那样靠近我们，因此会相对缓和，从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Cauquil, A.S.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chromostereopsis：an evoked potential study’.*Neuropsychologia*，47，2677-81（2009）.Dreiskaemper, D.et al.‘Infuence of red jersey color on physical parameters in combat sports’.*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35，44-9（2013）.Farrelly, D.et al.‘Competitors who choose to be red have higher testosterone levels’.*Psychological Science*，24，2122-4（2013）.

14　Vandewalle, G. et al.‘Spectral quality of light modulates emotional brain responses in huma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7，19549-54（2010）.

15　Sable, P.&Akcay, O.‘Response to colour：literature review with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1，34-41（2011）.

16　Labrecque, L. I.&Milne, G.R.‘Exciting red and competent blue：the importance of color in marketing'.*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40，711-27（2012）；另请参阅Labrecque, L.I.&Milne, G.R.‘To be or not to be different：exploration of norms and benefts of color differentiation in the mar-ketplace’.Marketing Letters，24，165-76（2013）.

17　Bottomley, P. A.‘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colors and products on perceptions of brand logo appropriateness'.*Marketing Teeory*，6，63-83（2006）；另请参阅Hanss, D.，Böhm, G.&Pfster, H.R.‘Active red sports car and relaxed purple-blue van：affective qualities predict color appropriateness for car types’.*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11，368-80（2012）；以及Ngo, M.K.，Piquer-as-Fiszman, B.&Spence, C.‘On the colour and shape of still and sparkling water：insights from online and laboratory-based

testing’.*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24，260-8（2012）.

18 对于“红色效应”的延伸回顾和讨论见 Elliot, A.J.&Maier, M.A.‘Color psychology：effects of perceiving color 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huma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5，95-120（2014）.

19 Mehta, R.&Zhu, R. J.‘Blue or red?Exploring the effect of color on cognitive task performances'.*Science*，323，1226-9（2009）；另请参阅Elliot&Maier，2014.

20 Mehta&Zhu，2009.

21 同上。

22 Lichtenfeld, S. et al.‘Fertile green：green facilitates creative performan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8，784-97（2012）.

23 Wallach, M. A.&Kogan, N.‘A new look at the creativity-intelligence distin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33，348-69（1965）.

24 http：//www. morganlovell.co.uk/articles/the-evolution-of-office-design

25 Meyerson, J.，&Ross, P.，*Tee Twenty-first Century Office*（Laurence King，2003）.

26 Thanem, T.，Varlander, S.&Cummings, S.‘Open space＝open minds?The ambiguities of pro-creative offce desig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rk Organisation and Emotion*，4，78（2011）.

27 同上。

28 http：//www. economist.com/blogs/schumpeter/2014/05/hot-desking-and-offce-hire

29 Prut, L.&Belzung, C.‘The open field as a paradigm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drugs on anxiety-like behaviors：a review'.*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463，3-33（2003）.

30 Mayo, E.*Hawthorne and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Te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Routledge，1949）.

31 Toker, U.&Gray, D. O.'Innovation spaces：workspace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in US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Research Policy*，37，309-29（2008）.

32 Backhouse, A.&Drew, P.'The design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a workplace setting'.*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19，573-84（1992）.

33 Toker&Gray，2008.

34 Greenfield, S. A.*You and Me*：*Tee Neuroscience of Identity*.（Notting Hill Edi-tions，2011）.

35 拥有一个特定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不应该与仅仅具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从元表征上看是指更高阶的表征）相混淆。出于同样的原因，元表征的缺失有时会与自闭症（autism）相混淆。然而，仅仅因为自闭症儿童不能理解其他人可能会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并不意味着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是有意识的，即他们是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有元表征的。Von Eckardt, B.in*MIT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eds.Wilson, R.&Keil, F.）（MIT Press，1999）.Leslie, A.M.'The theory of mind impairment in autism.Evidence for a modular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in*Natural Teeories of Mind*：*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Simulation of Everyday Mindreading*（ed.Whiten, A.）（Blackwell，1991）.

36 Cleeremans, A.'Consciousness：the radical plasticity thesis'.*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68，19-33（2008）

37 Persaud, N.&McLeod, P.'Wagering demonstrates subconscious processing in a binary exclusion task'.*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17，565-75（2008）.

38 Greenfield, S. A.Th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

39 Dennett, D. C.，‘Are we explaining consciousness yet?'*Cognition*，79，221-37（2001）.

40 Rosenthal, D.‘A theory of consciousness'in*Te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Philosophical Debates*（eds.Block, N.，Flanagan, O.&Guzeldere, G.）（MIT Press，1997）.

41 Suh, E. M.‘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3，1378-91（2002）.

42 Martinsen，Ø.L.‘The creative personality：a synthe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person profile’.*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3，185-202（2011）.

43 Maddux, W. W.，Adam, H.&Galinsky, A.D.‘When in Rome……Learn why the Romans do what they do：how multi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s facilitate creativit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6，731-41（2010）.

44 Maddox等人（2010）的研究不能控制各种混杂因素。例如，现有的对旅行的热情可以突出内在的好奇心和特定的智力，或许也可以预测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这项研究的重点似乎是把在国外学习与学习一项运动形成对比，以此表明在国外学习（回忆经验）可以提高创造力。

45 Thanem, Varlander&Cummings，2011.

46 Brown, S. Play：*How It Shapes the Brain, Opens the Imagination and Invigorates the Soul*.（Avery，2009）.

47 Fleming, P.‘Workers'playtime?Boundaries and cynicism in a“culture of fun”program'.*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41，285-303（2005）.

48 Leung, A. K.et al.‘Embodied metaphors and creative“acts”'.*Psychological Science*，23，502-9（2012）.

49　Mann, S.&Cadman, R.‘Does being bored make us more creative?'*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6，165-73（2014）.

50　Dijksterhuis, A.&Meurs, T.‘Where creativity resides：the generative power of unconscious thought'.*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15，135-46（2006）.

51　Marshall, B.&Azad, M.‘Q&A：Barry Marshall. A bold experiment'.*Nature*，514，S6-7（2014）.

52　Sass, L. A.‘Schizophrenia, modernism and the“creative imagination”：on creativity and psychopathology'.*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13，55-74（2001）.

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1　Sturman, D. A.&Moghaddam, B.‘The neurobiology of adolescence：changes in brain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dynamics and behavioral tendencie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5，1704-12（2011）.

2　Rivers, S. E.，Reyna, V.F.&Mills, B.‘Risk-taking under the influence：a fuzzy-trace theory of emotion in adolescence'.*Developmental Review*，28，107-44（2008）.

3　Sturman&Moghaddam，2011.

4　Fuster, J.*Tee Prefrontal Cortex*.（Academic Press，2008）.

5　众所周知，前额叶皮层约占人类大脑的30%，而在我们最接近的近亲黑猩猩中却只有17%。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量的分布式网络对人类所具有的独立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支持先前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前额叶皮层中含有更多的白质：Barton, R.A.&Venditti, C.‘Human frontal lobes are not relatively larg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0（22），9001-6（2013）.Schoenemann, P.T.，Sheehan, M.J.&Glotzer, L.D.‘Prefrontal white matter volume is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r in humans than in other primates’.*Nature*

Neuroscience，8（2），242-52（2005）.McBride, T.，Arnold, S.E.&Gur, R.C.‘A comparative volumetric analysi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human and baboon MRI’.*Brain, Behavior and Evolution*，54（3），159-66（1999）.

6 Tsujimoto, S.‘The prefrontal cortex：functional neural development during early childhood'.*Neuroscientist*，14，345-58（2008）.

7 Alvarez, J. A.&Emory, E.‘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frontal lobes：a meta-an-alytic review'.*Neuropsychological Review*，16，17-42（2006）.

8 Sturman&Moghaddam，2011.

9 Casey, B. J.，Getz, S.&Galvan, A.‘The adolescent brain'.*Developmental Review*，28，62-77（2008）.

10 Chambers, R. A.，Taylor, J.R.&Potenza, M.N.‘Developmental neurocircuitry of motivation in adolescence：a critical period of addiction vulnera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60，1041-52（2003）.

11 Ferron, A. et al.‘Inhibitory infl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另请参阅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

12 Knobloch, H. S.&Grinevich, V.‘Evolution of oxytocin pathways in the brain of vertebrates'.*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8，31（2014）.

13 Steinberg, L.‘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adolescent risk-taking'.*Developmental Review*，28，78-106（2008）.

14 Barch, D. M.‘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chizophrenia'.*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1，321-53（2005）；另请参阅 Thoma, P.et al.‘Proverb comprehension impairments in schizophrenia are related to executive dysfunction’.*Psychiatry Research*，170，132-9（2009）.

15 Cortiñas, M.et al.‘Reduced novelty-P3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behavioral distractibility in schizophrenia’.*Biological Psychology*，78，253-60（2008）.

16 Oltmanns, T. F.‘Selective attention in schizophrenic and manic psychoses：the effect of distraction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87，212-25（1978）；另请参阅Parsons, B.D.et al.‘Lengthened temporal integration in schizophrenia’.*Neuropsychologia*，51，372-6（2013）.

17 Strange, P. G.*Brain Biochemistry and Brain Disord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Sturman&Moghaddam，2011.

18 支持这一长久以来的想法的证据非常明确：神经兴奋性药物，如苯丙胺，能增强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模拟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相反，抗精神病性药物会阻断多巴胺的活动，起到安神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不二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就精神分裂症本身而言，多巴胺的过度影响并不像字面意义上所讲的，是因为产生了大量的神经递质分子，而是由于数量正常的多巴胺通过异常地作用于目标受体或通过其他一些大脑的异常处理而导致了多巴胺效应的放大。无论如何，诸如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表现出的症状，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感觉和认知障碍，绝非用一个信号系统就可以简单地解释。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大脑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靶点以及神经元回路重组之间有着微妙的相互影响，而多巴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不是唯一的角色），这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的“心智”。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如果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理解”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某个事物的话，那么缺乏联系将会缺乏理解，特别是当涉及谚语中所体现的那些抽象概念时更是如此。此外，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似乎都缺乏逻辑性，而他们的思维过程通常以破碎且怪异的理由为特点。这些看似不合理且令人感到诧异的联系，在广泛的自我表达载体中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奇怪表现在儿童绘画中便是不切

实际的色彩组合，如将羊涂成紫色，或是胡乱堆砌出“单词沙拉”这种抽象的视觉模式，难以理解的词或短语的混合，这些在儿童的艺术作品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诗歌中十分常见。Brisch, R.et al.‘The role of dopamine in schizophrenia from a neuro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old-fashioned, but still in vogue’.*Frontiers in Psychiatry*，5，47（2014）.Kasanin, J.S.*Language and Teought in Schizophre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4）.Mujica-Parodi, L.R.，Malaspina, D.&Sackeim, H.A.‘Logical processing, affect and delusional thought in schizophrenia’.*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8，73-83.Caplan, R.et al.‘Formal thought disorder in childhood onset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31，1103-14（1990）.

19 Gao, Wang&Goldman-Rakic，2003.

20 Tsujimoto，2008；另请参阅Welsh, M.C.&Pennington, B.F.‘Assess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g in children：views fr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4，199-230（1988）.

21 Parsons et al.，2013.

22 Callicott, J. H.et al.‘Physiological dysfunction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schizophrenia revisited'.*Cerebral Cortex*，10，1078-92（2000）.

23 Ferron et al.，1984.

24 Davis, C. et al.‘Decision-making deficits and overeating：a risk model for obesity'.*Obesity Research&Clinical Practice*，12，929-35（2004）；另请参阅Pignatti, R.et al.‘Decision-making in obesity：a study using the Gambling Task’.*Eating and Weight Disorders*，11，126-32（2006）.

25 Tataranni, P. A.&DelParigi, A.‘Functional neuroimaging：a new generation of human brain studies in obesity research'.*Obesity Reviews*，4，229-38（2003）.

26 Tanabe, J. et al.‘Prefrontal cortex activity is reduced in gambling and non-gam-bling substance users during decision-making'.*Human Brain Mapping*，28，1276-86（2007）.

27 Shimamura, A. P.‘Memory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769，151-9（1995）.

28 Cole, M. W.et al.‘Global connectivity of prefrontal cortex predicts cognitive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32，8988-99（2012）.

29 The table is adapted from one in Greenfield, S. A.*Mind Change*：*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Leaving Teeir Mark on Our Brains*.（Random House，2014）.

30 Rosen, L. D.et al.‘Media and technology use predicts ill-being among children, preteens and teenagers independent of the negative health impacts of exercise and eating habit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35，364-75（2014）.

31 来自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迈克尔·梅泽尼希（Michael Merzenich）教授是一位经验诱发大脑可塑性方面的专家，他给出了相对应的典型的神经科学视角。他警告说："生于数字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在生活中的大脑可塑性与早年出生的普通人群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差异，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人大脑的运作特征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诸如此类的变化以及影响下一代可能的思考和感受方式的证据不断积累，现在已经被证实：可以说，这种向网络环境的彻底转变通常会从整体上产生更敏捷的心理加工过程，而同样也会产生不恰当的鲁莽，缺乏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自恋的倾向，进取心不足以及脆弱的认同感，与上述损失并存的益处是，这种转变可能提升感觉运动协调能力，改善智商测验中的表现和反应时间以及工作记忆。Bavelier, D.et al.‘Brains on video game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2，763-8（2011）.Greenfield, S.A.，2014.

32 Koepp, M. J.et al.‘Evidence for striatal dopamine release during a video game'.*Nature*，393，266-8（1998）；另请参阅Weinstein, A.M.‘Computer and video game addiction-a comparison

between game users and non-game users'.*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36，268-76（2010）.

33　Greenfield, S. A.，2014.

34　Yuan, K. et al.'Microstructure abnormalities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PLoS One*，6，e20708（2011）.

35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话题，更充分的讨论参见：Greenfield, S.A.，2014.

36　Freis, E. D.&Ari, R.'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effects of reserpine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59，45-53（1954）.

37　Nutt, D. J.'The role of dopam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depression and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67（suppl.6），3-8（2006）.

38　Pletscher, A.'The discovery of antidepressants：a winding path'.*Experientia*，47，4-8（1991）.

39　Healy, D.*Tee Antidepressant Er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0　不用说，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发出了药理学上更复杂同时具有选择性的药物。例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的原型被证明有不良的副作用，例如"奶酪反应"，即任何服用药物的患者都不能食用诸如奶酪、酵母、巧克力或红葡萄酒等富含酪胺的食物：在药物的保护下，无法分解的酪胺（去甲肾上腺素的类似物）便会不断积累，达到某种水平后，便会导致血压的升高和心率的加快，并会增加发生高血压危象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开发出一类新型三环类药物（之所以被称为三环类药物是因为其具有三个环状的化学结构），该类药物仅仅通过更具有选择性地靶向胺类递质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新型药物通过阻止神经元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摄取而发挥作用，这使它们可以在不同的靶点上有较长的作用：食品中的酪胺现在不会再有影响，而服用三环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再次品尝奶酪和葡萄酒了。最近，抗抑郁药物变得更加精炼，第三代抗抑郁药如百忧解变得更具有选择性，其主要作用于5-羟

色胺。

41 Fitzgerald, P. J.‘Forbearance for fluoxetine：do monoaminergic antidepressants require a number of years to reach maximum therapeutic effect in huma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24，467-73（2014）.

42 Scott, J.‘Cognitive therapy'.*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65，126-30（1994）；另请参阅Cuijpers, P.et al.‘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adult depression, alone an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reatments’.*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58，376-85（2013）.

43 Anacker, C.‘Adult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in depression：behavioral implications and regulation by the stress system'.*Current Topic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s*（2014）.

44 Sheline, Y. I.et al.‘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in depression unmasks in-creased connectivity between networks via the dorsal nexu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7，11020-5（2010）.

45 Ren, J. et al.‘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versus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major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Biological Psychiatry*，51，181-9（2014）.

46 锂的治疗作用由澳大利亚医生约翰·凯德（John Cade）于1948年首次报道。再一次，意外的发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凯德将精神病患者的尿液注射到豚鼠的腹腔中，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探索精神疾病可能的生物化学基础。这些豚鼠比注射了健康人尿液的豚鼠死的更快：因此凯德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精神病患者的尿液中含有更多的尿酸。就在那时，命运发挥了作用：正当凯德试图通过在溶液中加入尿酸锂来提高尿酸的水溶性时，他意外地发现在注射了含有尿酸锂溶液的豚鼠身上，精神病人尿液的毒性大大降低。然而，更有趣的发现是，锂本身对动物具有镇静作用。这是为什么呢？锂强大的治疗作用，尤其是对于躁郁症（与稳态单向抑郁相反）的疗效，已经被证明是个谜。不用说，有各种

各样的理论试图对此加以解释，其中就包括了谷氨酰胺的作用，其本身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和/或一种对血清素有增强作用的调节物质。另一个对象是气体一氧化氮，它在所有的神经递质中体积最小，它的作用涉及神经可塑性。其他的想法还包括，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重置生物钟，以此来调节代谢、体温和睡眠（在双向障碍中发生紊乱），或是抑制肌醇单磷酸酶，否则这种酶会分解肌醇发生畸变，导致出现记忆问题和抑郁。然而，所有这些可能的复杂机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正常人体内所含有的锂并没有影响精神状态的作用，此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无机盐。如此基本的物质为何会对那么复杂的精神疾病产生这样选择性的复杂影响呢？Yoshimura, R.et al.‘Comparison of lithium, aripiprazole and olanzapine as augmentation to paroxetine for in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Therapeutic Advances in Psychopharmacology*，4，123-9（2014）.De Sousa, R.T.et al.‘Lithium increases nitric oxide levels in subjec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uring depressive episodes’.*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55，96-100（2014）.Welsh, D.K.&Moore-Ede, M.C.‘Lithium lengthens circadian period in a diurnal primate, Saimiri sciureus’.*Biological Psychiatry*，28，117-26（1990）.Brown, K.M.&Tracy, D.K.‘Lithium：the pharmacodynamic actions of the amazing ion’.*Teerapeutic Advances in Psychopharmacology*，3，163-76（2013）.Buigues, C.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frailty syndrome：a systematic review’.*Aging&Mental Health*，1-11（16 Oct.2014）.

47 Yanagita, T. et al.‘Lithium inhibits function of voltage-dependent sodium channels and catecholamine secretion independent of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in adrenal chromaffin cells'.*Neuropharmacology*，53，881-9（2007）.

48 Mason, L. et al.‘Decision-making and trait impulsivity in bipolar disorder a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refrontal regulation of striatal reward valuation'.*Brain*，137，2346-55（2014）.

49 Hercher, C.，Chopra, V.&Beasley, C. L.‘Evidence for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 prefrontal white matter glia in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39，130277（2014）.

50 Muzina, D. J.&Calabrese, J.R.‘Maintenance therapies in bipolar disorder：focus 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39，652-61（2005）.

51 Lautenbacher, S.&Krieg, J. C.‘Pain perception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28，109-22（1994）；另请参阅Guieu, R.，Samuélian, J.C.&Coulouvrat, H.‘Objective evaluation of pain percep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64，253-5（1994）；以及Dworkin, R.H.‘Pain insensitivity in schizophrenia：a neglected phenomenon and some implications’.*Schizophrenia Bulletin*，20，235-48（1994）.

52 Giles, L. L.，Singh, M.K.&Nasrallah, H.A.‘Too much or too little pain：the dichotomy of pain sensitivity in psychotic versus o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Current Psychosis and Teerapeutics Reports*，4，134-8（2006）.

53 Adler, G.&Gattaz, W. F.‘Pain perception threshold in major depression'.*Biological Psychiatry*，34，687-9（1993）；另请参阅Diener, H.C.，van Schayck, R.&Kastrup, O.‘Pain and depression’in*Pain and the Brain from Nociception to Cognition*（eds.Bromm, B.&Desmedt, J.E.）345-55（Raven Press，1995）.

54 不过话又说回来，Jasper和Penfield发现，从切除各种癫痫患者相当大一部分大脑皮层（包括不同的区域）并不能使他们不再感受到疼痛。Penfi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55 Hall, K. R.&Stride, E.‘The varying response to pain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 study in abnormal psychology'.*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27，48-60（1954）；另请参阅 Pöllmann, L.&Harris, P.H.‘Rhythmic changes in pain sen-sitivity in tee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obiology*，5，459-64（1978）.

56 Koyama, T. et al.‘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pain：where

expectations become rea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2，12950-5（2005）.

57 Ramachandran, V. S.&Blakeslee, S.*Phantoms in the Brain*：*Prob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Human Mind*.（Harper Perennial，1998）.

58 Melzack, R.&Wall, P. D.*Tee Challenge of Pain*.（Penguin，1996）.

59 Kupers, R. C.，Konings, H.，Adriaensen, H.&Gybels, J.M.‘Morphine differentially affects the sensory and affective pain ratings in neurogenic and idiopathic forms of pain'.*Pain*，47，5-12（1991）.

60 Ponterio, G. et al.‘Powerful inhibitory action of mu opioid receptors（MOR）on cholinergic interneuron excitability in the dorsal striatum'.*Neuropharmacology*，75，78-85（2013）.

61 Lautenbacher&Krieg，1994；另请参阅 Guieu, Samuélian&Coulouvrat，1994；and Dworkin，1994.

62 Rang, H. P.et al.*Rang and Dale's Pharmacology*.（Churchill Livingstone，2012）.

63 Bergman, N. A.‘Michael Farada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anesthesia'.*Anesthesiology*，77，812-16（1992）.

64 http：//www. 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377857/Nitrous-oxide-Laughing-gas-known-hippy-crack-2nd-popular-legal-high-drug-young-people.html

65 最近的新闻报道：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27/raver-drug-ketamine-control-plan-at-un-condemned-as-potential-disaster

66 Buigues, C.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frailty syndrome：a systematic review'.*Aging&Mental Health*，1-11（2014）.

67 Winocur, G.&Moscovitch, M.‘A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and institutionalized old people of normal intelligence'.*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4，435-44（1990）.

68 Scarmeas, N.&Stern, Y.‘Cognitive reserve and lifestyle'.*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25，625-33（2003）.

69 Engvig, A. et al.‘Effects of memory training on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e elderly'.*NeuroImage*，52，1667-76（2010）.

70 Small, G. W.&Greenfield, S.‘Current and future treatments for Alzheimer dis-ease'.*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23，1101-5（2015）.

71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真正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元破坏的化学元凶是一种异常形成的物质，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淀粉”（starch）：淀粉样物质，这是目前进行更有效的新型药物研究的中心。然而，迄今为止，对抗淀粉样物质的药物在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研究中始终令人感到失望。似乎这些大脑中的异常沉淀可能只是一种附属因素，但再一次，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对之前健康的大脑进行实体解剖时也可以发现淀粉样物质，因此，这类物质的出现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必要而非充分因素。目前，另一个正在进行研究的目标是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发现的另一种组织学异常：“缠结（tangles）”，一种细胞内微管错误的排列，我们曾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目前还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淀粉样物质斑块或蛋白缠结是导致细胞死亡的始动因素，以及因此出现的神经元集合萎缩。此外，斑块和缠结对所有细胞都有非特异性的杀伤作用：参阅Small&Green-field，同上。与此相反，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肯定与此不同，并且更具有选择性，因为在该病患者的大脑中，只有特定的神经元群更容易发生退行性病变。Greenfield, S.A.&Vaux, D.J.‘Parkinson’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and motor neurone disease.Identifying a common mechanism’.*Neuro-science*，113，485-92（2002）.

72 Aarsland, D. et al.‘Frequency of dementia in Parkinson disease'.*Archives of Neurology*，53，538-42（1996）；另请参阅Calne,

D.B.et al.‘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motorneurone disease：abiotrophic interaction between ageing and environment?’Lancet，2，1067-70（1986）；以及Horvath, J.et al.‘Neuropathology of Parkinsonism in patients with pure Alzheimer’s disease’.*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39，115-20（2014）.

73 当大脑的大部分细胞因为中风或头部撞击等因素而受损时，通常脑功能的恢复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然而，如果损伤发生在“中枢”细胞上，便会触发依然存在的发育机制：释放特定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通常只在发育中的大脑发挥作用。然而，在成熟的大脑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种发育性的物质现在却变成了有毒物质。因此，最初作为补救受损细胞而释放的化学物质现在则会产生更多的损害，从而导致更多有毒化学物质的释放。这就是我们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所看到的细胞死亡循环。Greenfield, S.‘Discovering and targeting the basic mechanism of neurodegeneration：the role of peptides from the C-terminus of acetylcholinesterase：non-hydrolytic effects of ache：the actions of peptides derived from the C-terminal and their relevance to neurodegeneration’.*Chemico-biological Interactions*，203，543-6（2013）.

74 Woods, B. et al.‘Reminiscence therapy for dementia'.*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D001120（2005）.

75 Atkins, S.*First Steps*：*Living with Dementia*.（Lion，2013）.

76 Sacks, O.*Musicophilia*：*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Random House，2007）.

77 另一种抵消相互制衡下降，从而沉浸在“隆隆声、嗡嗡声的混乱中”的方法是为患者做现实定向疗法（reality orientation therapy）。这种疗法目的是减少痴呆症患者的混乱。其原理是让患者了解并适应他们目前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周围每个人的名字、身份和照料职责。简言之，这种方法试图让患者们知道他们和周围的人分别都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以此减少患者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举几个这种方法的例子：准备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星期几、日期、下一顿饭吃什么以及天气；在墙上挂一个大的日历钟；在每个房间的房门上贴上房间名，并在每个患者的卧室门上用标签贴上他们自己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原

本通常由内部神经连接提供的日常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正常背景，现在要由外部环境来提供。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现实情况加以纠正实际上会使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感觉更糟。例如，当我们告诉某人她不能回家找她的丈夫了，因为她丈夫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这对于已经忘记丈夫死亡的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会和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时的反应一样。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让专人对患者进行人际互动的指导，从某种意义上以此来决定“现实”。没有哪个不够正直的成年人会告诉一个小孩子，圣诞老人其实不存在；相反，他们会进入儿童的叙事中，尊重孩子对现实有限的理解，而面对成年人则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于2008年在《卫报》中所描述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一位名叫彭妮·加纳（Penny Garner）的女儿为了治疗她妈妈多萝西·约翰逊（Dorothy Johnson）的痴呆症而开发出来的：加纳的主意是在照顾她那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时发展出来的。一天，她们正坐在医生的等候室中，突然妈妈多萝西说道：“我们的航班被叫过了吗？”女儿加纳感到非常困惑。她妈妈焦虑地环顾四周说道：“我们可别错过了航班，我们的行李箱在哪？”加纳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她母亲一直很喜欢乘飞机旅行，因此多萝西把现在这种拥挤的等待状况理解为她们正在候机大厅中。当加纳回答说：“我们所有的行李都去托运了，我们刚刚拿到我们的手提包。”她妈妈明显地放松了下来。这里我们看到，既不是试图增加额外连接的石头，也不是给予能帮助改善水潭粘度的化学物质，而是操纵外部环境、谈话和互动，从而使现有的内部神经元连接能够与之融洽。

Atkins，2013.Spector, A.et al.‘Reality orientation for dementia’.*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D001119（2000）.

第七章　做梦

1 Capellini, I. et al.‘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mam-malian sleep'.*Evolution*，62，1764-6（2008）.

2 Foulkes, D.‘Dreaming and REM sleep'.*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2，199-202（1993）.

3 Nir, Y.&Tononi, G.‘Dreaming and the brain：from phenomenology to neuro-physiolog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14，88-100（2010）.

4 Morris, G. O., Williams, H.L.&Lubin, A.‘Misperception and disorientation during sleep deprivation'.*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2，247-54（1960）.

5 Harrison, Y.&Horne, J. A.‘Sleep loss and temporal memory'.*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53，271-9（2000）.

6 Zohar, D. et al.‘The effects of sleep loss on medical residents'emotional reactions to work events：a cognitive-energy model'.*Sleep*，28，47-54（2005）.

7 Yoo, S.-S. et al.‘The human emotional brain without sleep-a prefrontal amyg-dala disconnect'.*Current Biology*，17，R877-8（2007）.

8 van der Helm, E. et al.‘REM sleep depotentiates amygdala activity to prev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s'.*Current Biology*，21，2029-32（2011）.

9 Walker, M. P.‘Why we sleep?'in*Brain.org Gulbenkian Health Forum*（2012）.

10 Hobson, J. A.&Friston, K.J.‘Waking and dreaming consciousness：neuro-b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Progress in Neurobiology*，98，82-98（2012）.

11 目前还不清楚从感官输入的概念是否包括味觉和嗅觉，后二者在梦中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12 Hobson&Friston，2012.

13 Mignot, E.‘Why we sleep：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recovery'.*PLoS Biology*，6，e106（2008）.

14 Hobson&Friston，2012.

15 Marchant, J.‘Why brainy animals need more REM sleep after all'.*New Scientist*（19 June 2008）.

16 Siegel, J. M.‘The evolution of REM sleep'in*Handbook of Behavioral State Control*（eds.Lydic, R.&Baghdoyan, H.A.）（CRC Press，1999）.

17 Hobson, J. A.‘REM sleep and dreaming：towards a theory of protoconsciousnes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0，803-13（2009）.

18 Davis, K. F.，Parker, K.P.&Montgomery, G.L.‘Sleep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part one：normal sleep'.*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18，65-71（2004）.

19 http：//www. babble.com/baby/baby-sleep-tips/baby-sleep-tips-1/www.babble.com/baby/baby-sleep/

20 Hobson&Friston，2012.

21 虽然NREM（非快速眼动）睡眠在记忆的巩固中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O’Neill J.et al.‘Play it again：reactivation of waking experience and memory’.*Trends in Neuroscience*，33（5），220-9（2010）.

22 Kumar, S.&Sagili, H.‘Etiopathogenesis and neurobiology of narcolepsy：a review'.*Journal of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Research*，8，190-5（2014）.

23 Morrison, A. R.‘A window on the sleeping brain'in*The Workings of the Brain*：*Development, Memory and Perception*（ed.Llinas, R.R.），133-148（W.H.Free-man，1990）.

24 Nir&Tononi，2010.

25 Llinás, R.R.&Paré，D.‘Of dreaming and wakefulness’.*Neuroscience*，44，521-35（1991）.

26 理奈斯和帕尔的实验设计中依旧存在许多谜团，例如如何解释跨物种间和胎儿所表现出意识水平的巨大差异等。然而，从简单的丘脑皮层动力学上看，不同物种间普遍存在的这些广泛差异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一些旨在改变意识状态的精神药物对个人意识水平带来的影响也

是微不足道的。顺带一提，最近的热门理论：在由托诺尼和科赫一起提出的丘脑皮层回路理论中，二人认为丘脑皮层网络中存在一种“双稳态”（bistability），暗示意识是一种非全即无的状态，并且因此是由某种神经元开关加以控制的——这种理论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27 Plum, F. in‘Coma and related disturbances of the human conscious state'.*Cerebral Cortex Vol.9*：*Normal and Altered States and Function*（eds.Peters, A.&Jones, E.G.）359-426（Plenum Press，1991）；另请参阅 Young, G.B.，Ropper, A.H.&Bolton, C.E.*Coma and Impaired Consciousness*：*A Clinical Perspective*.（McGraw Hill，1998）.

28 顶叶——枕叶——颞部交叉区包含了一部分顶叶，一部分颞叶和一部分枕叶，该区域作为听觉、视觉和身体感觉输入的整合区，同时将信息输出到包括边缘区和前额叶在内的其他广泛的区域中去。另请参阅：Maquet, P.et al.‘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human rapid-eye-movement sleep and dreaming’.*Nature*，383，163-6（1996）.

29 Epstein, A. W.‘Effect of certain cerebral hemispheric diseases on dreaming'.*Biological Psychiatry*，14，77-93（1979）；另请参阅 Maquet, P.‘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normal human sleep b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9，207-31（2000）；以及Jakobson, A.J.，Fitzgerald, P.B.&Conduit, R.‘Induction of visual dream reports after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during Stage 2 sleep’.*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21，369-79（2012）.

30 Solms, M.‘Dreaming and REM sleep are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brain mecha-nism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3，843-50；discussion 904-1121（2000）.

31 Büchel, C.et al.‘Different activation patterns in the visual cortex of late and congenitally blind subjects’.*Brain*，121，Pt 3，409-19（1998）.

32 同上。

33 Horikawa, T. et al.‘Neural decoding of visual imagery during sleep'.*Science*，340，639-42（2013）.

34 Nir&Tononi，2010.

35 同上。

36 Penfield, W.&Perot, P.‘The brain's record of auditory and visual experience. A final summary and discussion'.*Brain*，86，595-696（1963）.

37 Hobson, J. A.*The Chemistry of Conscious States*：*How the Brain Changes Its Mind*.（Little, Brown&Co.，1994）；另请参阅Scarone, S.et al.‘The dream as a model for psychosis：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using bizarreness as a cognitive marker’.*Schizophrenia Bulletin*，34，515-22（2008）；以及Limosani, I.et al.‘The dreaming brain/mind, consciousness and psychosi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20，987-92（2011）.

38 Brisch, R. et al.‘The role of dopamine in schizophrenia from a neuro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old-fashioned, but still in vogue'.*Frontiers in Psychiatry*，5，47（2014）.

39 Solms, M.&Turnbull, O.*Tee Brain and the Inner World*.（Other Press，2002）.

40 Monti, J. M.&Monti, D.‘The involvement of dopamine in the modulation of sleep and waking'.*Sleep Medicine Reviews*，11，113-33（2007）.

41 通常情况下，多巴胺的分泌受到一种与快速眼动睡眠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的调节，这种神经递质被称为乙酰胆碱（ACh），它在大脑和脑干深部发挥着作用：然而，当乙酰胆碱系统不能运作时，多巴胺也可以独立地在皮层上发挥作用，就像在独立于快速眼动睡眠的梦境中所表现的那样。此时，多巴胺在指令链中的位置进一步上升，超过了产生快速眼动睡眠的脑干机制，更直接地作用于前额叶皮层的最终过程，而这些过程与实际的梦其本身有关。那么是什么导致多巴胺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的呢？什么也不是。事实证明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甚至连感觉

输入都不需要。在听觉和视觉等感官都缺失的情况下，以及当乙酰胆碱不发挥作用时，正如在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梦境中那样，脑干中的多巴胺细胞表现出一种“自动节律性”：一个兴奋性不断变化的持续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兴奋性的不断变化导致周期性的动作电位爆发，进而导致多巴胺在“高级”目标脑区释放。Grace, A.A.&Bunney, B.S.‘The control of firing pattern in nigral dopamine neurons：burst fir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4，2877-90（1984）.Grace, A.A.&Bunney, B.S.‘The control of firing pattern in nigral dopamine neurons：single spike fir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4，2866-76（1984）.

42 Ferron, A. et al.‘Inhibitory infl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另请参阅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

43 Nir&Tononi，2010；另请参阅 Dang-Vu, T.T.et al.‘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sights into the physiology of human sleep’.*Sleep*，33，1589-603（2010）.

44 Solms，2000.

45 首先，在神经元的不同部位上，多巴胺可能会对更细微的局部电流产生其他的影响，因此也可能对动作电位不起任何作用，因而不适用于这里所使用的记录方法。其次，在前额叶中，多巴胺的零星释放所引起的抑制作用会对局部环路中的连接细胞产生产生解除抑制的净效应：这一活动随之将以一种在完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并不会出现的方式改变前额叶皮层自身最终的输出结果。第三，前额叶的大范围实验性损伤会导致所有细胞无差别地被破坏，然而在正常完整的大脑中，多巴胺选择性的天然靶向性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对所有前额叶细胞产生同样的影响。Lambert, R.C.et al.‘The many faces of T-type calcium channels’.*Pflügers Archiv.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ology*，466，415-23（2014）.Holthoff, K.，Kovalchuk, Y.&Konnerth, A.‘Dendritic spikes and activity-dependent synaptic plasticity’.*Cell Tissue Research*，326，369-77（2006）.

46 Nielsen, T. A.et al.‘Pain in dreams'.*Sleep*，16，490-8（1993）.

47 Lautenbacher, S.&Krieg, J. C.‘Pain perception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28，109-22（1994）；另请参阅Guieu, R.，Samuélian, J.C.&Coulouvrat, H.‘Objective evaluation of pain percep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64，253-5（1994）.

48 Casey, B. J.，Getz, S.&Galvan, A.‘The adolescent brain'.*Developmental Review*，28，62-77（2008）；另请参阅Sturman, D.A.&Moghaddam, B.‘The neurobiology of adolescence：changes in brain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dynamics and behavioral tendencie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5，1704-12（2011）.

49 Toda, M.&Abi-Dargham, A.‘Dopamine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making sense of it all'.*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9，329-36（2007）.

50 Zadra, A. L.，Nielsen, T.A.&Donderi, D.C.‘Prevalence of auditory, olfactory and gustatory experiences in home dreams'.*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87，819-26（1998）.

51 脑脊液（大脑和脊髓浸泡于其中的液体）中的多巴胺（或者是其代谢产物，高香草酸[HVA]）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跟着逐渐增加，然而5-羟色胺的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5-HT）并没有任何变化（对比早产儿和足月新生儿）。

52 Klemm, W. R.‘Why does REM sleep occur?A wake-up hypothesis'.*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5，73（2011）.

53 Aserinsky, E.&Kleitman, N.‘Regularly occurring periods of eye motility, and concomitant phenomena, during sleep'.*Science*，118，273-4（1953）.

54 Mavromatis, A. Hypnogogia：*Tee Uniqu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between Wake-fulness and Sleep.（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1987）.

55 LaBerge, S.&Levitan, L.'Validity established of DreamLight cues for eliciting lucid dreaming'.*Dreaming*，5，159-168（1995）.

第八章 度过夜晚

1 Greenfield, S. 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

2 Popper, K.*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

3 Bryan, A. et al.'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d Response：a new devic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brain function during anaesthe-sia'.*Proceedings of the Anaesthetic Research Society Meeting*，428-9（2010）.

4 在fEITER中，一个小的高频电流流过安装在头部周围的一系列电极，然后通过一系列散置的参照系来测量所产生的电压。所测量出的电阻被用于构建脑内电阻抗的横断面图像，从而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电活动。fEITER的反应（小于十个毫秒）要远比常规脑成像快得多，当大脑的不同区域对外部声音、光线或触觉做出反应时，该技术可以迅速、连续地捕捉到这些被诱发出的反应，从而追踪大脑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对传入的刺激加以处理。

5 de Lange, C.'3D movie reveals how brain loses consciousness'.*New Scientist*，14 June（2011）.

6 Damasio, A.*Descartes'Error*：*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Penguin，2005）.

7 同上。

8 Mayer, E. A.'Gut feelings：the emerging biology of gut-brain communica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2，453-66（2011）.

9 大脑岛叶、前扣带回、眶额叶皮层以及杏仁核以及某些深部脑

区，如下丘脑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10　但是，这些来自于大脑之外，由身体不同部分释放的重要生物活性肽本身是如何能够渗透进入大脑内部腔室，进而对神经元集合的动力性发挥作用的呢？结果发现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化学物质可以通过与大脑特殊区域（例如大脑后区）的相互作用直接对大脑产生影响，这些特殊区域位于隔膜的连接处，是大脑中充满液体的腔室（脑室），它们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自然形成。另外，许多生物活性物质可以通过穿透血脑屏障更直接的进入大脑：血脑屏障，顾名思义，是一面由特殊细胞紧密结合而成的墙壁，通常血脑屏障保证只有小分子或高脂溶性分子可以轻易地从血液进入大脑。另一种可能性是化合物可以通过大脑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从外围进入大脑，因为这类细胞可以感知身体环境中的任何扰动。Critchley, H.D.&Harrison, N.A.'Visceral influences on brain and behavior'.*Neuron*，77，624-38（2013）.

11　Ramirez, J. M.&Cabanac, M.'Pleasure, the common currency of emotion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000，293-5（2003）.

12　Leonard, B. E.'The immune system, depression and the action of antidepres-sant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25，767-80（2001）.

13　Martin, P.*Tee Sickening Mind*：*Brain, Behaviour, Immunity and Disease*.（Harp-erCollins，1997）.

14　Mykletun, A. et al.'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predictors of mortality：the HUNT study'.*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95，118-25（2009）.

15　Wulsin, L. R.&Singal, B.M.'Do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 the risk for the onset of coronary disease?A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review'.*Psychosomatic Medicine*，65，201-10（2003）.

16　Ader, R.&Cohen, N.'Behaviorally conditioned immunosuppression and murin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cience，215，1534-6（1982）；另请参阅 Maier, S.F.，Watkins, L.R.&Fleshner, M.'Psychoneuroimmunology.The interface between

behavior, brain and immunity'.*American Psychologist*，49，1004-17（1994）.

17 Hökfelt, T.et al.'Coexistence of peptides and putative transmitters in neurons'.*Advances in Biochemical Psychopharmacology*，22，1-23（1980）.

18 Hökfelt, T.et al.Neuropeptides-an overview.*Neuropharmacology*，39，1337-56（2000）；另请参阅 Hökfelt, T.et al.'Some aspects on the anatomy and function of central cholecystokinin systems'.*BMC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91，382-6（2002）；以及 Hökfelt, T.，Bartfai, T.&Bloom, F.'Neuropeptides：opportunities for drug discovery'.*Lancet Neurology*，2，463-72（2003）；以及 Hökfelt, T.，Pernow, B.&Wahren, J.'Substance P：a pioneer amongst neuro-peptides'.*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249，27-40（2001）.

19 大多数文章对于给出确切的数字都非常犹豫。近期比较好的综述包括 Leng, G.&Ludwig, M.'Neurotransmitters and peptides：whispered secrets and public announcements'.*Journal of Physiology*，586，5625-32（2008）.Van den Pol, A.N.'Neuropeptide transmission in brain circuits'.*Neuron*，76，98-115（2012）.

20 Greenfield, S. A.&Collins, T.F.T.'A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1-23（2005）.

第九章　明天

1 尽管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睡眠中不会有对时间的回顾性感知，但似乎在梦里也存在时间知觉（对时间持续的感知）。威廉·德门特（William Dement）用两项研究来证明睡梦中的时间与真实的时间是相似的。因为当人们做梦时，他们的眼睛会在眼皮下非常快速地运动着，德门特能够通过观察睡眠者的快速眼动来监测他们的睡眠并记录他们做梦的时长。在记录了这些数据后，德门特会叫醒睡眠者并让他们写下对最后一个梦的描述。他提出的假设是，与那些较短的梦相比，长时间的梦需要更多地词汇来描述。当对每个梦的报告中所包含的单词数与这个梦所持续的分钟数进行比较时，他发现梦越长，做梦者用来描述它的单

词越多。在一个关联实验中，德门特叫醒那些正在做梦的人，询问他们感觉做的最后一个梦持续了多长时间。做梦者对于他们的梦持续了较长时间还是较短时间的感知，其正确率是83%。通过这些实验，德门特得出了睡梦中的时间与清醒状态下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这一结论。在清醒梦中，时间感知似乎也是相同的。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这里所测量的、时间在实际的流逝中所产生的时间感，与我们熟悉的、在入睡和觉醒之间所缺席的那种回顾性时间感是不同的。Dement, W.C.‘History of sleep medicine’.*Neurologic Clinics*，23，945-65，v（2005）.Bolz, B.‘How time passes in dreams.（2009）.http：//indianapublicmedia.org/amomentofscience/time-passes-dreams/.Erlacher, D.et al.‘Time for actions in lucid dreams：effects of task modality, length and complex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4，1013（2013）.

2 Taylor, B. N.*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SI*）.（NIST，2001）.

3 Hughes, D. O.&Tautman, T.R.*Time*：*Histories and Ethnologies*.（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95）.

4 Gell, A.*The Anthropology of Time*：*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Berg，1992）.

5 Trigg, G.*Encyclopedia of Applied Physics*.（Wiley，2004）.

6 Grondin, S.‘Timing and time perception：a review of recent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ce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s'.*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72，561-82（2010）.

7 Tulving, E.‘Episodic memory：from mind to brai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3，1-25（2002）.

8 最初匿名出版于*The Alternative*：*A Study in Psychology*.（London：Macmillan and Co.，1882）.

9 Alexander, I.，Cowey, A.&Walsh, V.‘The right parietal cortex and time perception：back to Critchley and the Zeitraffer phenomenon'.*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22，306-15（2005）；另请

参阅 Koch, G.et al.'Underestimation of time perception after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Neurology*，60，1844-6（2003）；以及Danckert, J.et al.'Neglected time：impaired temporal perception of multisecond intervals in unilateral neglect'.*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9，1706-20（2007）.

10　Walsh, V.'A theory of magnitude：common cortical metrics of time, space and quantit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7，483-8（2003）；另请参阅Bueti, D.，Bahrami, B.&Walsh, V.'Sensory and association cortex in time perception'.*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0，1054-62（2008）.

11　Tregellas, J. R.et al.'Effect of task difficulty on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emporal processing'.*NeuroImage*，32，307-15（2006）；另请参阅Lewis, P.A.&Miall, R.C.'A right hemispheric prefrontal system for cognitive time measurement'.*Behavioural Processes*，71，226-34（2006）；以及Penney, T.B.&Vait-lingham, L.'Imaging time'in*Psychology of Time*（*ed.Grondin, S.*）261-94（*Binglet UK Emerald Group，2008*）；以及*Macar, F.&Vidal, F.'Timing processes：an outline of behavioural and neural indices not systematically considered in timing models'.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63，227-39*（*2009*）.

12　Mackintosh, N. J.*Animal Learning and Cognition*.（Academic Press，1994）；另请参阅 Jaldow, E.J.，Oakley, D.A.&Davey, G.C.L.'Performance of de-corticated rats on fixed interval and fixed time schedules'.*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61-70（1989）.

13　在墨西哥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雨果·麦钱特（Hugo Merchant），德博拉·哈灵顿（Deborah Harrington）以及沃伦·梅克（Warren Meck）已经通过猴子的单细胞记录研究识别出时间知觉所涉及的复杂的神经网络，并且强调一个关键的神经回路与皮层——丘脑——基底神经节相关联。他们认为这种带有分布式网络的"时间中枢"可以解释间隔调整（interval tuning）的抽象特征，以及时间幻觉和内部时间感，并且这种建立在大脑核心时间机制中的互相连接，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保护性的冗余，以此来对抗损伤、疾病或衰老。Merchant,

H.，Harrington, D.L.&Meck, W.H.‘Neural basis of the perception and estimation of time’.*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36，313-36（2013）.

14 Grondin，2010；see also Eagleman, D. M.‘Human time perception and its illusions'.*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18，131-6（2008）.

15 Eagleman，2008.

16 Morrone, M. C.，Ross, J.&Burr, D.‘Saccadic eye movements cause compression of time as well as space'.*Nature and Neuroscience*，8，950-4（2005）.

17 New, J. J.&Scholl, B.J.‘Subjective time dilation：spatially local, object-based, or a global visual experience?'*Journal of Vision*，9，4，1-11（2009）.

18 Stetson, C.，Fiesta, M. P.&Eagleman, D.M.‘Does time really slow down during a frightening event?'*PLoS One*，2，e1295（2007）.

19 Tang, Y.-Y.，Hölzel, B.K.&Posner, M.I.‘The neuroscienc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6，213-25（2015）.

20 Eagleman，2008.

21 一种答案是发生了某种低水平的适应：例如，对闪烁刺激的适应会导致个体对随后出现的刺激时长的估计发生扭曲，但这一现象只在刺激呈现于较小的局部空间中时才会发生。由于这一效应如此具有局限性，这意味着在更基础、更早期的视觉区域中存在某些定时的神经元机制。由于这种效果范围极小，因此暗示出，在更为基本、更为早期的视觉区域中，存在着某些用于计时的神经机制。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是，在大脑处理时间度量的另一个极端上，持续的时间是神经元所消耗的净能量数的一个指标。而这些都是需要加以鉴别的物理的、客观的事件……但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又通过什么方法进行呢？Johnston, A.，Arnold, D.H.&Nishida, S.‘Spatially localized distortions of event time’.*Current Biology*，16，472-9（2006）.Pariyadath, V.&Eagleman,

D.‘The effect of predictability on subjective duration’.*PLoS One*，2，e1264（2007）.

22 New&Scholl，2009.

23 Stetson, Fiesta&Eagleman，2007.

24 Matthews, W. J.，Stewart, N.&Wearden, J.H.‘Stimulus intens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dur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37，303-13（2011）.

25 Droit-Volet, S.，Fayolle, S. L.&Gil, S.‘Emotion and time perception：effects of flm-induced mood'.*Frontiers in Integrated Neuroscience*，5，33（2011）.

26 Levy, F.&Swanson, J. M.‘Timing, space and ADHD：the dopamine theory revisited'.*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35，504-11（2001）.

27 Parsons, B. D.et al.‘Lengthened temporal integration in schizophrenia'.*Neu-ropsychologia*，51，372-6（2013）.

28 Franck, N. et al.‘Altered subjective time of events in schizophrenia'.*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3，350-3（2005）.

29 Wittmann, M. et al.‘Impaired time perception and motor timing in stimu-lant-dependent subjects'.*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90，183-92（2007）；另请参阅Cheng, R.-K.，MacDonald, C.J.&Meck, W.H.‘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caine and ketamine on time estimation：implications for neurobiological models of interval timing’.*Pharmacology, Biochemistry and Behavior*，85，114-22（2006）.

30 Tinklenberg, J. R.，Roth, W.T.&Kopell, B.S.‘Marijuana and ethanol：differential effects on time perception, heart rate and subjective response.*Psychophar-macology*（Berl），49，275-9（1976）.

31 Arzy, S.，Molnar-Szakacs, I.&Blanke, O.‘Self in time：imagined self-location influences neural activity related to mental time travel'.*Journal of Neuroscience*，28，6502-7（2008）.

32 Kolb, B. et al.‘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ing prefrontal cortex'.*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109（suppl.），17186-93（2012）.

33 Cooper, B. B.‘The science of time perception：stop it slipping away by doing new things'.*Buffer Blog*（2013）.

34 Brown, J.‘Motion expands perceived time. On time perception in visual move-ment field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14，233-48（1931）.

35 Eagleman，2008；see also Schiffman, H. R.&Bobko, D.J.‘Effects of stimulus complexity on the perception of brief temporal interval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03，156-9（1974）.

36 Lucentini, J.‘It's neuron time'.*Science*，17，32-3（Nov. 2003）.

37 时空流形是一种数学模型，它可以从小到亚原子，大到超星系的尺度上将时间和空间描述为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其中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被称为闵可夫斯基空间（Minkowski space），作为我们所熟知的三维空间的补充。这种流形可以是“非定位的”，因为它完全无法用空间坐标进行定义。

38 Critchley, M.*The Parietal Lobes*.（Edwin Arnold，1953）.

39 Walsh，2003.

40 Mitchell, C. T.&Davis, R.‘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scale model environments'.*Perception*，16，5-16（1987）.

41 DeLong, A. J.‘Phenomenological space-time：toward an experiential relativity'.*Science*，213，681-3（1981）.

42 Rudd, M.，Vohs, K. D.&Aaker, J.‘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Psychological Science*，23，1130-6（2012）.

43 Stetson, Fiesta&Eagleman，2007.

44 Sergent, C.，Baillet, S.&Dehaene, S.'Timing of the brain events underlying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Nature and Neuroscience*，8，1391-1400（2005）；另请参阅Libet, B.*Mind Time*：*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5 哺乳动物大脑皮层中的突触连接会在50微米到200微米之间的衰变，不会被任何单个刺激的参数差异所影响。Petreanu, L.et al.'The subcellular organization of neocortical excitatory connections'.*Nature*，457，1142-5（2009）.Romand, S.et al.'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ick-tufted layer v pyramidal cells in the rat somatosensory cortex'.*Frontiers in Neuroanatomy*，5，5（2011）.Perin, R.，Berger, T.K.&Markram, H.'A synaptic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cortical neuronal group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8，5419-24（2011）.Boudkkazi, S.，Fronzaroli-Molinieres, L.&Debanne, D.'Presynaptic action potential waveform deter-mines cortical synaptic latency'.*Journal of Physiology*，589，1117-31（2011）.

46 Chakraborty, S.，Sandberg, A.&Greenfield, S. A.'Differential dynamics of transient neuronal assemblies in visual compared to auditory cortex'.*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182，491-8（2007）.

47 然而，神经元集合内活动的传播速度很缓慢，有时候需要几百毫秒，这一现象仅仅通过大量突触连接所产生的叠加效应便可以解释，借此，这种神经传递的复杂过程将极大地减低信号的速度。从神经递质被释放出来，进行扩散，直到在其受体处发挥作用大约需要0.75毫秒，这种潜在的冗长时间框架难道还不足以代表成百上千个连续突触连接的总和吗？答案是并不能：即使一个缓慢的兴奋性电位可以先于或源自于传统的突触活动，其时间尺度最大也只能持续20毫秒。这将意味着：在神经元集合中心的原始刺激初始位点很有可能在最初的100毫秒左右就发生了衰减，并且在这之前，神经元集合在其周界上有最大的活动强

度：事实上，对立的空间模式始终能够观察到，即最强的活动总是出现在中心。

48　Hestrin, S.，Sah, P.&Nicoll, R. A.‘Mechanisms generating the time course of dual component excitatory synaptic currents recorded in hippocampal slices'.*Neuron*，5，247-53（1990）.Salin, P.A.&Prince, D.A.‘Spontaneous GAB-AA receptor-mediated inhibitory currents in adult rat somatosensory cortex'.*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75，1573-88（1996）.Katz, B.&Miledi, R.‘The measurement of synaptic delay, and the time course of acetylcholine release at the neuromuscular junc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161，483-95（1965）.Sayer, R.J.，Friedlander, M.J.&Redman, S.J.‘The time course and amplitude of EPSPs evoked at synapses between pairs of CA3/CA1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al sli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10，826-36（1990）.

49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层内回路的传导速度仅为正常速度的四分之一，但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提高到正常速度的十倍。Salami, M.et al.‘Change of conduction velocity by regional myelination yields constant latency irrespective of distance between thalamus and cortex’.*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0，6174-9（2003）.

50　Taber, K. H.&Hurley, R.A.‘Volume transmission in the brain：beyond the synapse'.*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26，iv，1-4（2014）；另请参阅Agnati, L.F.et al.‘Information handling by the brain：proposal of a new“paradigm”involving the roamer type of volume transmission and the tunneling nanotube type of wiring transmission’.*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2014）.

51　Cheramy, A.，Leviel, V.&Glowinski, J.‘Dendritic release of dopamine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ature*，289，537-42（1981）. Greenfield, S.et al.‘*In vivo*release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in cat substantia nigra and caudate nucleus'.*Nature*，284，355-7（1980）.Greenfield, S.A.‘The signifcance of dendritic release of

transmitter and protein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eurochemistry International*，7，887-901（1985）.Nedergaard, S.，Bolam, J.P.&Greenfield, S.A.‘Facilitation of a dendritic calcium conductance by 5-hydroxytryptamine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ature*，333，174-7（1988）.Chen, B.T.et al.‘Differential calcium dependence of axonal versus somatodendritic dopamine releas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5，39（2011）.Mercer, L.，del Fiacco, M.&Cuello, A.C.‘The smooth endoplasmic reticulum as a possible storage site for dendritic dopamine in substantia nigra neurones’.*Experientia*，35，101-3（1979）.

52　在哺乳动物中，大脑皮层的传导速度在0.1到0.5米/秒之间；也就是说，动作电位沿着轴突（axon）传递的速度是100到500毫米/秒（0.1到0.5毫米/毫秒）。与这一速度一致的是，当刺激从其来源发出后（例如，丘脑，一个突触，间距有2.5毫米），大脑皮层中神经元集合形成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5毫秒的时候（图10）。但随后，一旦出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突触传递，神经元集合需要额外花费15至20毫秒来达到最大速度，这一速度慢的惊人，以至于突触无法靠其自身进行传递，当然对于被动扩散来说这一速度还是太快了。González-Burgos, G.，Barrionuevo, G.&Lewis, D.A.‘Horizontal synaptic connections in monkey prefrontal cortex：an*in vitro*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Cerebral Cortex*，10，82-92（2000）.Stuart, G.，Schiller, J.&Sakmann, B.‘Action potential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rat neo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Journal of Physiology*，505（Pt 3）617-32（1997）.

53　两个并列的细胞分别形成一个半通道共同组成了间隙连接，这两个半通道由蛋白质（连接类蛋白）构成。

54　Draguhn, A. et al.‘Electrical coupling underlies high-frequency oscillations in the hippocampus*in vitro*'.*Nature*，394，189-92（1998）.

55　纯粹就“高速的”神经活动而言，200Hz震荡与神经元集合中的信号强度有多大的可比性呢？这一速度的频率意味着动作电位通常每5毫秒产生一次，因此，在一个神经元集合时间窗口中大约有60次动作电

位：我们目前的计算能够解释这种活动水平，该活动可以通过电磁机制在荧光信号中，以周期性超极化的形式显现出来，因为自体波（self-substance wave）震荡的快慢没有限制。Huang H.et al.‘Remote control of ion channels and neurones through magnetic-feld heating of nanoparticles’，*Nature Nanotechnology*，5，602（2011）.Anastassiou C.A.et al.‘The effect of spatially inhomo-geneous extracellular electric fields on neurones’.*Journal of Neuroscience*，30，1925（2010）.

56 Masson, G. S.&Ilg, U.W.*Dynamics of Visual Motion Processing：Neuronal, Behavior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Springer，2010）.

57 例如，视网膜中缝隙连接的表达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可用性成反比，此外人们认为电信号连接和化学突触通常作为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共同发挥作用。He, S.，Weiler, R.&Vaney, D.I.‘Endogenous dopaminergic regulation of horizontal cell coupling in the mammalian ret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18，33-40（2000）.Pereda, A.E.‘Electrical synapses and their func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chemical synapse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5，250-63（2014）.

58 Chakraborty, Sandberg&Greenfield，2007.

59 Bachmann, T.*Micr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Conscious Mind*.（John Benja-mins，2000）.

60 Vogel, E. K.，Luck, S.J.&Shapiro, K.L.‘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a postperceptual locus of suppression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24，1656-74（1998）；另请参阅 Sergent, Baillet&Dehaene，2005.

61 Collins, T. F.T.et al.‘Dynamics of neuronal assemblies are modulated by anaesthetics but not analgesics'.*Europe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24，609-14（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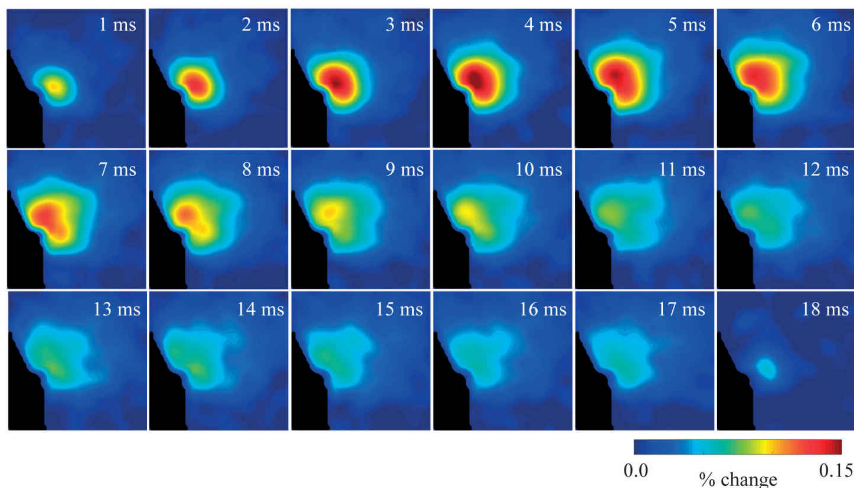
62 Chakraborty, Sandberg&Greenfield，2007.

63　Kendig, J. J.，Grossman, Y.&MacIver, M.B.‘Pressure reversal of anaesthesia：a synaptic mechanism'.*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60，806-16（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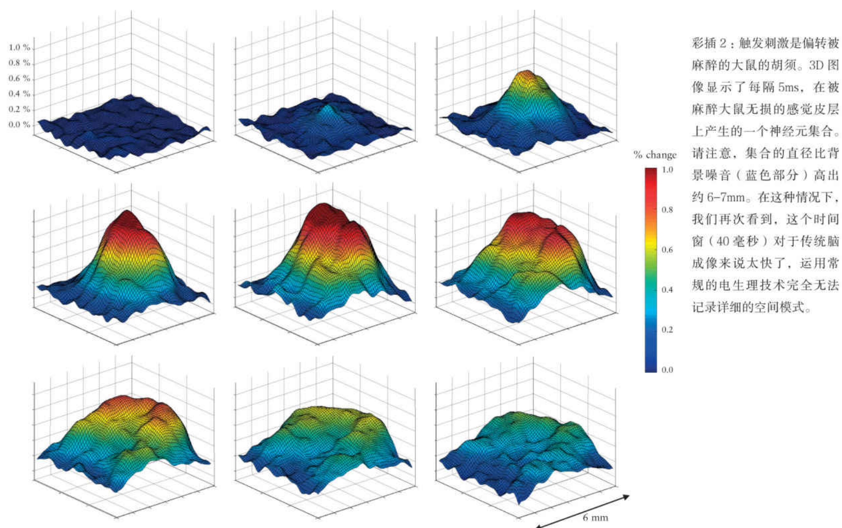
64　Wlodarczyk, A.，McMillan, P. F.&Greenfield, S.A.‘High pressure effects in anaesthesia and narcosi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35，890-8（2006）.

65　Wu, J.-Y.，Xiaoying Huang&Chuan Zhang.‘Propagating waves of activity in the neocortex：what they are, what they do'. Neuroscientist，14，487-502（2008）；另请参阅Muller, L.&Destexhe, A.‘Propagating waves in thalamus, cortex and the thalamocortical system：experiments and models’.*Journal of Physiology-Paris*，106，222-38（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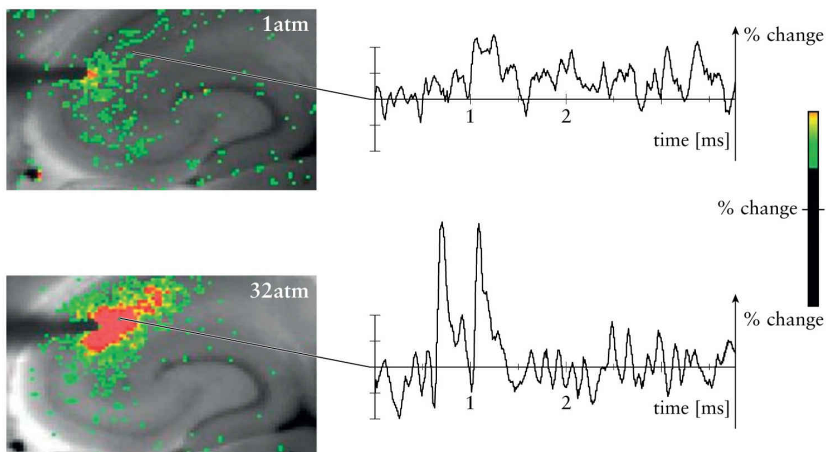
66　Ferreira, P. G.*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Phoenix，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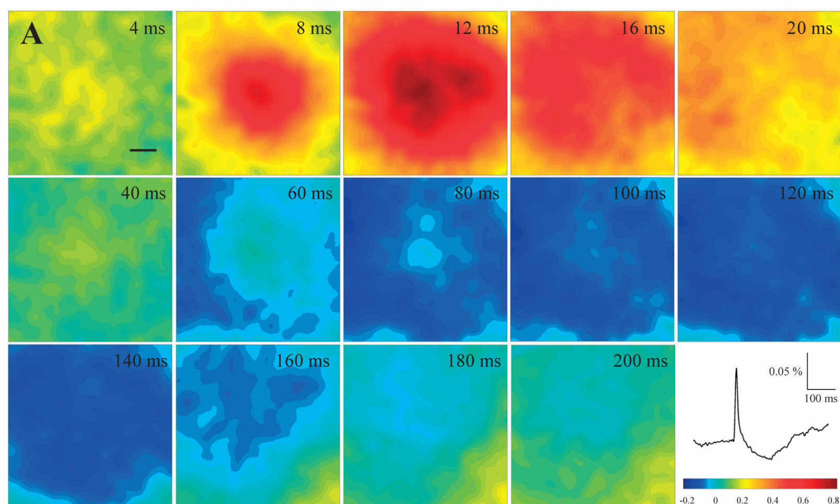
彩插 1：一个“集合体”的可视化图。在大鼠脑切片中，在刺激的初始脉冲持续十分之一微秒之后，运用电压敏感染料探测，毫秒序列成像，显示出广泛的激活。最活跃的区域在中心位置，向四周逐渐减弱，有点像往水潭里扔石块激起的层层涟漪。（Badin & Greenfield，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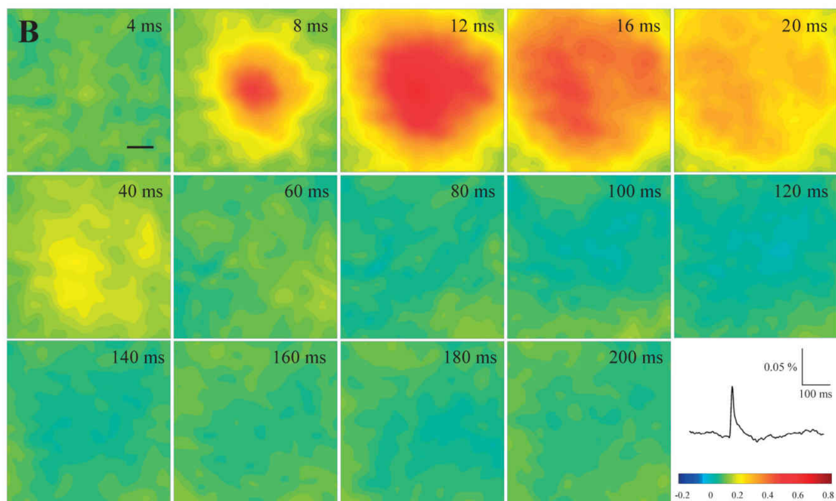


彩插 2：触发刺激是偏转被麻醉的大鼠的胡须。3D 图像显示了每隔 5ms，在被麻醉大鼠无损的感觉皮层上产生的一个神经元集合。请注意，集合的直径比背景噪音（蓝色部分）高出约 6–7mm。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时间窗（40 毫秒）对于传统脑成像来说太快了，运用常规的电生理技术完全无法记录详细的空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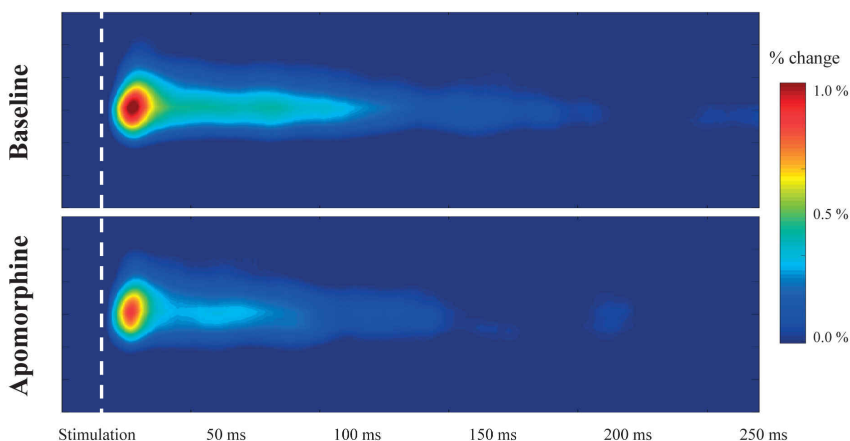


彩插 3：在正常气压（上图）和高压（下图）下，运用光学成像法，得到大鼠脑切片海马区产生的集合的荧光图。信号振幅代表活跃程度(红色 = 高)。在高压条件下，集合范围更大。在不同气压条件下，一个小范围组织随时间变化的反应如右侧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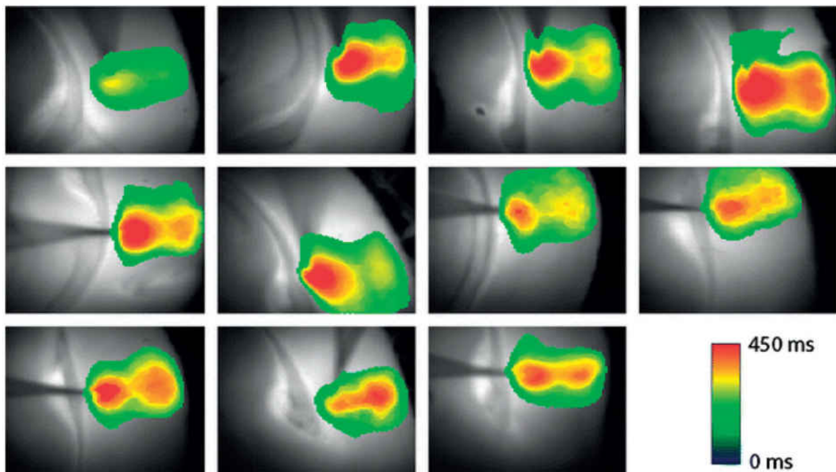


彩插 4：在浅层（A）和深度（B）麻醉条件下，刺激大鼠胡须引发的集合。注意，浅层麻醉时，强烈激活后出现了反弹性的抑制（蓝色）。但深度麻醉时，降低激活后并不会产生这种效应。右上角显示了刺激开始后的时间，注意第二行和第三行中时间间隔的变化。A 和 B 的右下角显示了从集合的中心获取的活动图，并绘制了振幅随时间变化的图表。在 A 所示的图表中，“反弹”是在集合的振幅达到顶峰，同时活性明显跌至正常水平之后立即出现的。比例尺在两幅图中同时显示振幅和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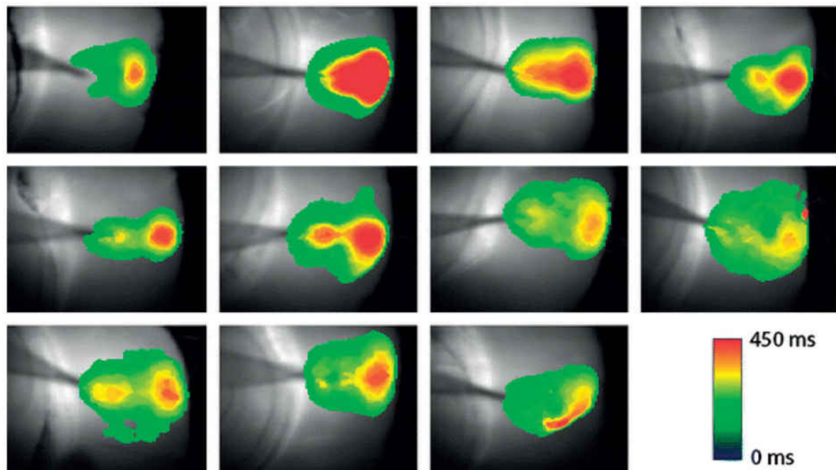


彩插 5：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鼠大脑切片（皮层）中产生了一个神经元集合。竖虚线表示对切片进行电刺激的点。注意当使用了多巴胺替代物阿扑吗啡（下图）后，神经元集合的强度减低（暗红色和随后的淡蓝色都减少），且持续时间显著缩短（Badin & Greenfield，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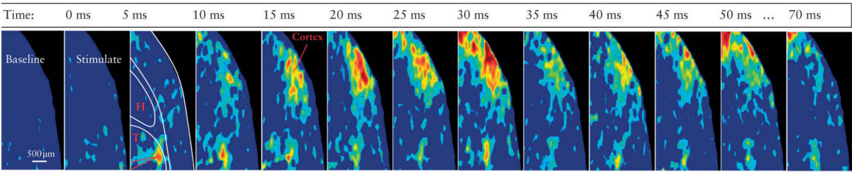
VISUAL SYSTEM



AUDITORY SYSTEM



彩插 6：在十一项不同的实验中，光学图像显示了视觉和听觉系统神经元集合之间的差异。颜色表示特定位置的荧光信号最终降至最大值（300 毫秒）的 20% 以下的时间。红色区域代表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要注意的是，这一活动在视觉皮层中集中在深部，而在听觉皮层中则集中于浅表。



彩插 7：利用电压敏感染料成像的实验鼠大脑切片中的神经元集合（Fermani, Badin &Greenfield，待出版）。一般情况下，突触信号从丘脑传递至脑皮层，5 毫秒可达到最远 2 毫米的距离（见图中 5 毫秒后的脑活动情况）。然而接下来神经元集合信号扩散到 0.5 毫米的半径范围却花了四倍的时间（见 20 毫秒处的脑活动情况）

图片版权

Fig.3（Plate 3）from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35, 897（2006）,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ig.4（Plate 4）modified from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 793（2010）, with the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and Sons;

Fig.8 from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82, 495（2007）,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Springer;

Fig.9 modified from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2（2005）, with the permission of Elsevier; Table on P.299 modified from Nature Reviews of Neuroscience, 5, 713, Box 2（2004）, with the permission of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1]卢比孔河（Rubicon）是一条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河流，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曾为恺撒和庞培各自统治地区的分界线。“Crossing the Rubicon”是西方的一句经典谚语，意为“破釜沉舟”。卢比孔河可以理解为一旦跨越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分界线。（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詹妮弗·安妮斯顿及后文中的茱莉亚·罗伯茨、布拉德·皮特、哈利·贝瑞等均为美国演员。

[3]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受试者或病人虽然接受的是没有治疗效果的干预或药物，但因为受试者或病人“相信”或“认为”干预或药物有效，从而表现出某些症状的缓解，这种缓解不仅是受试者或病人主观感受的减轻，甚至在客观检测指标上也会发生改变。

[4]睡眠锭（sleep spindle）是一种频率较高（12～16周期/秒）、波幅较大的纺锤形脑电波。在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第二个阶段偶尔会插入波幅较大、频率较高的睡眠锭，在连续的脑电波中像一个纺锤。睡眠锭的出现是睡眠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

[5]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技术，其原理是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局部血液氧饱和度的改变，进而反映神经元活动程度的改变。

[6]长时程增强，又称长期增益效应（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是发生在两个神经元信号传输中的一种持久的增强现象，能够同步地刺激两个神经元。这是与突触可塑性——突触改变强度的能力相关的几种现象之一。由于记忆被认为是由突触强度的改变来编码的，LTP被普遍视为构成学习与记忆基础的主要分子机制之一。

[7]外显学习是有意搜寻或把规则应用于刺激物的学习。在外显学习的过程中，生物的学习行为受意识的控制，有明确目的，能分配注意资源。

[8]原文为“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英语谚语，指当自己也有某种缺点时，就不要指摘别人的这种缺点了。可以意译为“自身有短，勿批他人”。

[9]阿片类药物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大剂量可导致木僵、昏迷和呼吸抑制。阿片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中到重度疼痛，例如癌痛。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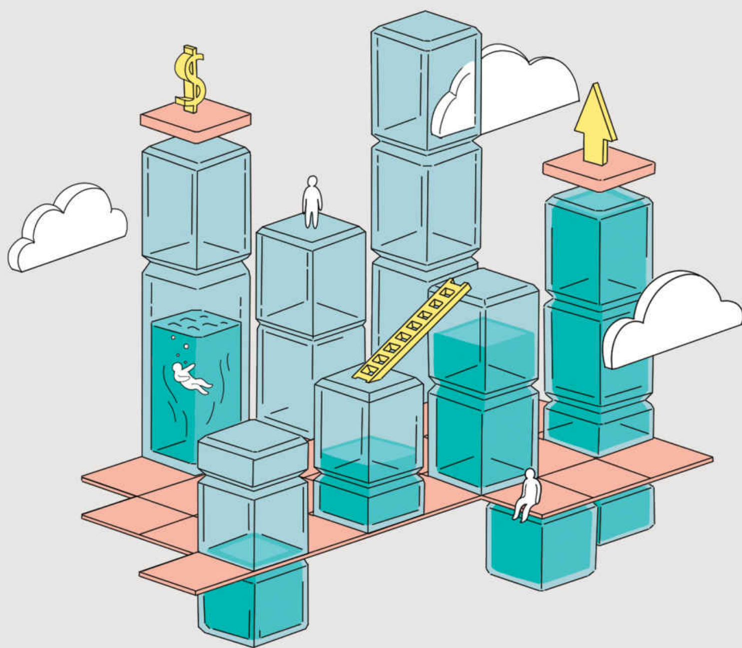


鹈鹕丛书
A PELICAN BOOK

eo 艺文志

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

[英]盖伊·斯坦丁 著 陈仪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基本收入

企鹅·鹈鹕丛书

[英] 盖伊·斯坦丁/著

陈仪/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UK | USA | Canada | Ireland | Australia
New Zealand | India | South Africa | North Asia

Penguin Books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whose addresses can be found at:
global.penguinrandomhouse.com.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企鹅兰登电子书 | Penguin Random House eBooks

基本收入/（英）盖伊·斯坦丁著；陈仪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企鹅·鹈鹕丛书）

ISBN 978-7-5321-7497-3

I.①基… II. ①盖… ②陈… III. ①政治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5884号

Basic Income
Copyright © Guy Standing,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Penguin (企鹅) , Pelican (鹈鹕), the Pelican and Penguin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9-386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正文内容

引言

第一章 基本收入的意义与历史起源

第二章 以基本收入实现社会正义

第三章 基本收入与自由的关系

第四章 基本收入改善贫困、不平等与不安全感问题

第五章 支持基本收入的经济理由

第六章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

第七章 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问题

第八章 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意义

第九章 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第十章 基本收入与经济发展

第十一章 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

第十二章 政治挑战——如何从这里到那里

附录 如何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BIEN相关机构清单

致谢

引言

至少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1516年完成《乌托邦》（*Utopia*）后，很多思想家就常常不经意地提起“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所谓基本收入是指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领取一笔固定金额的收入的权利。某些人认为这个概念极端厚颜无耻，并因此敬而远之；某些人把它看成笑话一则，认为它是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空想，不过，他们也认为这个威胁极不可能发生；某些人将这个概念藏在内心深处，认为是痴心妄想；某些人虽一开始对这个概念怀抱热情，但随后日益消减。总之，世人对这个概念的想法与反应一直都相当两极化。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终于有人成立一个国际网络来促进以这个议题为中心的辩论。在一小群西欧经济学家、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奔走下，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简称BIEN）终于在1986年9月正式成立，并于比利时的新鲁汶（Louvain-la-Neuve）集会。这个集会地点极具象征意义——有史以来率先阐述“社会以公共财源来支应基本收入”愿景的《乌托邦》一书，最初就是在鲁汶（Louvain，即佛兰德语的Leuven）发表。我是这个网络的创始成员，它的名称也是我取的。BIEN除了代表这个网络的缩写名称，以法语来说，它也代表“好”（well），暗示我们相信基本收入将带来“幸福”（well-being）。

渐渐地，随着愈来愈多欧洲以外的人士加入，这个组织的名称似乎也到了该修改的时候了。2004年，BIEN中的“E”由原来的代表“European”，转为代表“Earth”（地球）。然而，直到这几年，无论是主流评论家、学术界人士或政治人物，都还是不怎么重视“应该将基本收入列为一种权利，对所有人发放”的理念。不过，这些圈子里有几个可敬的例外，包括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Desmond Tutu），他们都曾在BIEN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了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崩溃威胁到世界经济，世人对基本收入的兴趣才明显上升，直至今日。

不过，请容我先感谢当年在它还不受重视时，所有不遗余力地通过BIEN的活动提倡相关理念的人，以及通过研究与写作来形塑相关思想并填补政策缺口的人。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力求在考量性别平等、种族平等以及打破自由与民主社会等限制的前提下，让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人都有参与这个组织的机会。

事实上，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和更追求平等主义的人之间关系向来都有点紧张；而将基本收入视为某种“独立”政策的人和认为它隶属某种进步主义政治策略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从未彻底消除。不

过，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正是BIEN成功的关键，因为这样的氛围让我们得以发展必要的知识基础，并进而随着时机的日趋成熟，自信地宣告“这一理念的时代已经来临”。

基本收入愈来愈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一般人渐渐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已导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情况严重恶化，并随时可能令社会分崩离析。随着全球化以惊人速度席卷整个世界、“新自由”经济学影响力扩大，以及科技革命促使劳动市场转型等，20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经崩溃。而这个收入分配系统崩溃的结果之一，就是危产阶级（precariat）愈来愈庞大。所谓危产阶级是指面临不稳定且缺乏保障的劳动条件、缺乏职业认同、实质薪酬降低且起伏不定、失去津贴，与长期受慢性债务所苦的人，据估计，危产阶级的人数高达数百万。

在过去，国民收入流向“资本”和“劳动”的百分比大致上相当稳定，但这一旧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镀金时代（Second Gilded Age），愈来愈高比率的收入正流向少数“食利者”（rentiers），也就是纯粹靠着财产所有权——实体资产、金融资产与“智力”资产——的收益为生的人。无论是就道德或经济层面来说，这样的现象都不合理。而随着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呈倍数增长，民怨当然也加速沸腾。社会上的忧虑、混乱、疏离和愤怒等情绪交杂，正酝酿成一场“完美风暴”，而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也从中得到操弄恐惧的大好机会，他们顺势引诱民众支持诸多曾在第一个镀金时代后造成许多遗毒的危险主张。

除非我们能建构一套全新的收入分配系统，或至少在这个层面上跨出坚定的第一步，否则这个世界朝极右派倾斜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已造成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以及特朗普的当选）。我敢说，基本收入作为一个更倾向平等主义与更解放的制度的支柱，已成为当今一项迫切的政治要务，而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之一。

本书的目的是要引导读者了解支持与反对将基本收入列为一种权利(亦即对不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况与工作经历的所有人发放现金或等价物）的论述。本书沿引了过去三十年间许多人的研究、主张和社会积极行动的成果，尤其是BIEN的成长轨迹——它的十六次国际大会（最近一次是2016年7月在首尔举办）与上百篇在这些大会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等。我尽可能注明了参考来源，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找到更详尽的资料，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介绍基本收入，并提供某种引导读者深思这个议题的指南。所以，接下来我会解释什么是基本收入，并讨论三个被用来证明基本收入有实施必要的主要观点——正义、自由与安全感，另外，我也会说明相关的经济基本理论。我还会讨论几个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尤其是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另外，我也会探讨落实基本收入的实务挑战和政治挑战。

我希望本书能对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和有时被某些自命不凡的人贬抑为“外行读者”的人有帮助。“对每个人发放基本收入”的诉求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相关的议题很复杂，很多人常在缺乏证据与未深思熟虑的状况下，针对这个理念提出强烈的意见，所以，我迫切希望读者尽可

能以开放的心胸来读这本书。

身为BIEN的创始成员暨该组织目前的荣誉联合主席之一，我当然是基本收入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我一直努力做到“持平而论”（好吧，假装是这样），好让读者能自行衡量各种不同的论述的合理性。我的真正目的是要鼓励大家展开没有偏见的对话（理当如此），不要老是各说各话。当然，要不要将这场对话推展为实际行动，则要看政治人物的决定。

要如何促使本来就倾向于支持基本收入的政治人物勇敢发声，为推动基本收入而努力？很多主要政治人物私下频频表示他们支持基本收入，只是不知如何“站出来”支持它；但这样的说法已让人们（包括我本人）愈来愈不耐烦。我希望本书提出的论述与近年的种种事件，能够让这些政治人物挺直腰杆，勇敢地站出来为基本收入发声。



第一章

CHAPTER I

基本收入的意义与历史起源

>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
> ——孔子

首先我们必须定义什么是“基本收入”。虽然基本收入的定义众说纷纭、版本繁多（将在后面讨论），但我们可以将之界定为：定期（例如每个月）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通常它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因为它的目标是要支付给所有人。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却还是需要加以解析。

“基本”两字容易让人混淆，但就最低程度来说，它代表一笔能让某人在极端状态下，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存活下来的金额。当然，这笔金额也可以高一些。然而，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基本而非全面、充裕的经济安全感。毕竟社会无法给予所有人全面的安全感，那种程度的慷慨也不是世人所乐见。

判断基本安全感应该涵盖哪些要素是一项挑战，不过，直觉上它必须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个社会提供的基本安全感是让所有人民皆能平等取得足够的食物与一个栖身之所、能获得学习的机会，以及能取得医疗照护，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另外，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相信，基本收入必须是一种无法随意撤销的“权利”。这个议题将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

有些人主张，基本收入必须足以确保“社会参与”。这样的定义似乎没有必要，而且太过笼统。不过，这个定义反映出一个值得称颂的愿望——根据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说法，那就是指所有公民都能拥有足够资源，并得以在平等的前提下在社会上立足。不过，一种较务实合理的立场是：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必须足够让人得以朝那个方向前进，换言之，我们应该把这个愿望当成长远目标，而非马上就要实现的成果。

那么，基本收入究竟应该要多高才够？有些倡议者认为，尽可能将基本收入设定在能持续支付的前提下的最高水平，而且最好是将它设在“贫困线以上”的水平。这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将在第三章讨论），通常他们也主张一旦发放这种水平的基本收入，就能取代所有政府补贴与福利服务。

另外也有些人——包括我在内——认为基本收入一开始应该从低设定，接着再根据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置的基金的规模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等逐步提高。然而，不管将基本收入设定在什么水平，它都不必然——也不应该——是一个摧毁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手段。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可能希望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基本收入保障。不过，这里的“全民”（universal）所代表的意义是，基本收入将对经常性居住在特定区域、省或国家的每一个人发放。严格来说，基本收入不会是某些人所指的一种“公民收入”（citizenship income），因为未居住在境内的公民没有资格领取。相反地，移入人口必须在成为法定

居民（或者以外国人来说，取得永久居留权身份）一定期间过后，才得以领取基本收入。这些相关的资格设定属于政治事务，应该以民主手段来决定。

基本收入将发放给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无论他的婚姻、家庭（family）或家户（household）状况如何。所以，不管一个家户的组成是什么形态，都不会获得优惠或遭到歧视。另外，不同于根据“家庭状况”（family status）发放的补贴，基本收入不会假定同一家户内的收入会被自动分享，更别说平等分享，因为以实际情况来说，家庭收入通常不会被平等分享给每一个成员。

基本收入也应该是均一的，换言之，发给每一个成人的金额应相等，无论各人的环境如何。目前某些政府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发放，这种政策是假设家庭内部存在规模经济，所以大家庭平均每个成员所获得的补贴金额比小家庭低。但基本收入就不做这种假设，所以能够避免非蓄意的歧视。

多数（但非全部）基本收入支持者也倡议对孩童发放较低的金额，而且通常指定应把孩童的基本收入交给母亲或母亲的代理人。很多人也提议应加发补助金额给退休人士、孱弱老人和伤残者，理由是这些人的生活成本较高，赚取额外收入的可能性也相对低。所以，所谓的“平等”可解释为基本生活水平的“平等”。

“政府应该无条件（unconditionally）发放基本收入”的这个重要主张有三个面向。首先，不设定收入条件，换言之，不进行财力调查。人们无需证明自己的收入是否低于特定金额，也无需证明低收入并非他们的“过错”或“责任”，因为那类调查其实比一般人所想象得更加武断且不公正。

第二个面向是，不设定支出条件；政府发放基本收入时，不会指示或限制领取人一定要把钱花在什么用途、什么时间花用，或如何花用。这让基本收入和实物补贴、补助金券或现金卡显得很不一样，因为实物补贴、补助金券和现金卡都只能花用在特定的项目，因而隐含温和专制主义（paternalistic，又称家长作风主义）倾向。相对地，基本收入允许人们自己决定要优先把钱花在什么用途。

第三个面向是，基本收入不会设定任何行为条件，它不会规定人们必须表现出什么特定的行为模式，例如要求人们接受一个就业机会或从事特定形态的职务，也不会要求人们为了获得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而甘愿去做那些事。以上三个面向就是基本收入的倡议者或批评者把基本收入通常称为“无条件”支付的意涵。

基本收入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发放，通常建议每个月发放一次，不过，发放频率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重要的是，每次支付的金额接近，而且是自动发放，无需填写申请表格、排队领取等。可预期性（predictability）是基本安全感的关键要素之一，基本收入和其他多数形态的政府补贴不同，是事前就获得保证而且已知的。

另外，基本收入也是不可撤销的（non-withdrawable），换言之，

基本收入必须类似其他基本权利（如自由权），除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不能剥夺。（某些基本收入倡议者提议应暂停发放基本收入给受刑人，不过，也有些人主张利用基本收入来支付监狱的维护成本、将基本收入发给受刑人的另一个家人，或甚至将受刑人的基本收入存起来，等到他出狱时再发给他，让他出狱后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另外，基本收入也必须是不可转偿还的（non-repayable），有些人称之为不可查封（non-foreclosable），用以说明基本收入不可因为领取人的未偿还债务而被扣押。总之，它必须是一种确保基本收入保障的经济权利。

因此，稳定且可预期的基本收入（风雨无阻）和最低收入保障（minimum income guarantee）是不同的，最低收入保障是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拉高到某个特定的水平，通常需要进行复杂的财力调查。另外，基本收入也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或税额抵减（tax credit）不同，因为这些福利会随着领取人收入的上升而被撤销。

然而，上述不同形式的福利或津贴经常被认作基本收入，的确，如果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某种基本收入保障”的概念来说，这些形式的福利和津贴与基本收入确实有着共同点。尽管本书所谓的“基本收入”是专指符合这一章一开始所定义的那种计划，但读者必须知道（而且必须小心），很多评论家经常会为上述各种多元的方法贴上“基本收入”的标签，其中某些人可能是有点恶意为之，但多数人常是因为不够了解这个主题所致。

我们必须厘清基本收入（定期发放，金额适中）和基本资本补助金（basic capital grants，单笔支付，金额较大）的差异。基本资本补助金的目的是要创造“立足点平等的资本主义”，它允许由市场驱动的不平等；相对地，基本收入的目的则是要创造“有收入维持底线（baseline income maintenance）的资本主义”。[1]

倡议发放基本资本补助金的人通常是设想对每一个年满特定年龄（如21岁）的人发放一笔一次性的款项。艾克曼（Bruce Ackerman）与艾斯托特（Anne Alstott）两位当代主要倡议者，称之为“利害关系人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2]，而我则称之为“成年补助金”（coming-of-age grant，以下简称COAG）。[3]

另一所谓“宝贝债券”（baby bond）的形式，是由英国的新工党政府提出——政府在每个孩童出生时，发放250英镑以上的补助金券给父母亲，让他们把这笔钱投资到一个待孩子满18岁时会支付相关款项的信托基金。但那个计划后来在第一批领取人都尚未成年时，就遭到2010年至2015年执政的联合政府废除，所以无从评估废除这项计划的决定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

对于一次性的资本补助金，最主要的批评是“意志力薄弱”效应。当你一次领到一大笔钱，尤其是在18岁或21岁那种年纪，你可能会禁不起诱惑，把这些钱拿去从事高风险投资，甚至可能直接把钱挥霍掉，到头来一分也不剩。另外还有时机的问题，因为某个年龄层的人可能在投资价值正在上升的阶段收到这笔补助金，某个年龄层的人则可能正好在投

资机会短缺或甚至风险极高的阶段收到补助金。在某个时机，专家的建议（或是政府委任顾问的“怂恿”）有可能导致某个人承受很不好的后果，但如果换一个时间点，则可能对另一个人产生理想的结果。实际上，资本补助金造成了过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领取这种一次性补助金的人基于某种理由而在事后陷入困境，当局就会很难拒绝再帮助他们。不过，这也将制造某种道德风险，因为如果补助金领取人预期一旦这笔补助金亏掉了，还会获得进一步的财务支持，那他们在做决定时就比较容易流于莽撞。相反地，以定期支付适度金额的方式发放的基本收入，就不会产生“鼓励过度承担风险”的后果，而且，这个方法还能产生额外的利益——让原本没有能力好好管理金钱的人有时间慢慢学习如何处理金钱。

最早提出“政府应该对所有公民发放一笔基本收入”概念的人，有可能是以下几位：首先，托马斯·莫尔爵士通过他在1516年以拉丁文发行的《乌托邦》（字面之意是“不存在之地”）一书提出的构想，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份描绘基本收入社会的文献。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更早的伯里克利（Pericles）和厄菲阿尔特（Ephialtes），他们在公元前461年打败其他对手，成为古代雅典的“平民”（plebeians）领袖。事实上，厄菲阿尔特是史上第一个发起付费请公民提供陪审服务等相关民主改革的人。不过他不久后便被政治对手暗杀，于是由他的副手伯里克利接班。所以，虽然对基本收入来说可能不是个好兆头，我们还是可以说厄菲阿尔特是基本收入的真正发起人，或者至少他是“公民收入”版基本收入的发起人。

古希腊民主的精髓是，国家期待公民能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伯里克利创立了某种基本收入补助金，作为对花时间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的一种奖励，而且，他的用意是希望让下层阶级（plebs）——也就是当时的危产阶级——也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这项补助金没有针对实际的参与内容设定条件，所谓的参与被视为某种道德义务。遗憾的是，这个开明且思虑周到的民主制度——以基本收入来实现——在公元前411年被一场寡头政治支持者政变推翻。就这样，这条道路被阻断了非常久的时间。

接着，从划时代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则可找到基本收入在中世纪的起源。《森林宪章》是公元1217年与《大宪章》（*Magna Carta*）同步发表（虽然公元1215年6月的原始《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常被指为《大宪章》，但其实一直到《自由宪章》的某些条款于1217年被转移到《森林宪章》，并在当中得到详细阐述后，缩减后的《自由宪章》才被改称《大宪章》）。《森林宪章》声明一般人的维生权利以及当时所谓的“estovars”——在公有地的维生手段。13世纪时，每个教会都被要求每年必须对信众朗读这个宪章四次。修正后《大宪章》所增补的重大要点之一是，它让寡妇有权利获得“合理的公有地维生手段”；每一位寡妇都有权获得基本收入，这种基本收入是以从公有地获取食物、燃料与居家耗材等的权利体现。

然而，历史上最先详细描绘设置基本收入的社会图景的人还是托马

斯·莫尔。根据他的观点，若要减少窃盗的发生，基本收入的效果比绞刑（当时常用的惩罚手段）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辩护方式，现代也有不少人提出类似的观点。[4]他书中的一个人物说：

> 如果偷窃是取得食物的唯一渠道，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刑罚能够阻止人民偷窃……与其处以这些骇人的惩罚，对每一个人提供一些谋生手段会更有意义，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必须走上如此可怕的必由之路——先是成为小偷，然后被处死。

十年后，一名西班牙—佛兰德斯学者乔汉尼斯·威夫斯（Johannes Vives，他是莫尔的朋友）向布鲁日（Bruges）的市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提案——对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发放能维持最低生计的收入；这个提案促使伊普尔镇（Ypres）针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试验。也因如此，某些人遂认定威夫斯是史上第一个提出基本收入相关创议的人。不过，根据威夫斯的模型，他的救助（食物）只锁定穷人发放，另外，威夫斯也是“劳动福利计划”（workfare）的倡议者，他主张穷人必须以劳动力来换取这种福利。尽管如此，莫尔、威夫斯和其他人的贡献，让这种以公共财源资助且由公家发放穷人救济金的观念得以合法化，而非完全仰赖教会或有钱人的慈善捐助来支应。

莫尔之后的几个世纪，还有其他几个思想家追随他的脚步，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中声明：“政府必须对所有公民负起保障其生存、食物与合身衣物的责任，并确保其生活方式不会危及他们的健康。”后来，当时的开明人士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他在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象征了这一理念再次半途而废。

然而，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倡议者或许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一书作者。他广为流传的宣传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1776），催生了美国独立战争，据说当时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本。不过他最重要的主张并不是通过这本小册，而是通过他影响深远的论文《土地正义》（*Agrarian Justice*，1795）[5]提出的；建议发放所谓“成年”资本补助金及老人基本收入，在他那个时代，都是极引人注目的创新提案。

潘恩并不孤单，在同一个时代，英格兰有一个激进人士也和他志同道合，那便是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斯宾塞也主张将基本收入视同一种自然权利，并认为这是一种确保公平正义的做法。他设想将原本存入教区基金的部分土地租金用来发放某种“社会红利”（social dividend），并主张每一季将这些红利平均分配给所有常住的居民。

19世纪时，也有几名作家非正式地谈论基本收入的一些主张。以欧陆来说，法国、荷兰与比利时的某些思想家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基本收入倡议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夏立尔（Joseph Charlier）与惠特（François Huet）等社会学家，其中，惠特在1853年倡议以遗赠相关税收，对所有年轻成年人发放无条件的移转金

（transfer）。不过，随着共产主义热情的爆发，加上社会民主制度的温和专制主义盛行，这些人逐渐被边缘化。

在大西洋的对岸，为这一理念贡献心力的人物包括光芒四射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销量达数百万册，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传播之广之久远。另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出版物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 1888），当中详细描述了美国在公元2000年对所有公民发放一笔平等收入的景象。

而在英国，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激进的未来主义风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他写这本书一部分是为了呼应贝拉米的书），则设想英格兰将在1956年成为以工艺为主的合作社会。虽然这本小说迫切地想被视为伟大的文学，但莫里斯在描绘那个由政府发放基本收入，人们因而将工作当成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不是一种只为老板付出劳力的苦差事的社会时，终究还是捕捉到了某些特别的想法。不过，20世纪初那几十年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种执拗的"劳工主义"（labourism）盛行，使收入和福利都很仰赖工作，这份颇有远见的作品遂迅速被这一股洪流吞噬。

第二波支持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上台面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玛贝尔与丹尼斯·米尔纳（Mabel and Dennis Milner）、伯特兰姆·皮卡德（Bertram Pickard）、柯尔（G.D.H.Cole）以及亨利·乔治的门徒等，都在各自著作中提到这个概念。[6]瓦尔特·凡·特莱尔（Walter van Trier）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博士论文，推举米尔纳夫妇为主张"将基本收入（他们称之为'政府红利'）纳入实用政策"的先驱者。[7]在他们之后不久，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著作有英国工程师道格拉斯（C.H.Douglas）的作品。道格拉斯是"社会信贷"（social credit）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受"技术变迁导致经济产出与工人收入/购买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的前景启发的倡议者。21世纪有很多思想家也抱有和他一样的想法。

罗素将之作为一项普遍原则，清楚阐述了基本收入的目标：

> 实质上，我们目前倡议的计划可归结为：应保证对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工作）发放一笔特定金额且足以支应必需品的小额收入，所以应该也让愿意从事某种被社区视为有用工作的人获得较高收入——可能应该根据他们生产的总商品量，尽可能多发放额外的收入给他们……任何人完成教育时，都不应该强迫他们去工作，选择不工作的人应该能够领取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的收入，并保有全然的自由。[8]

罗素生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社会环境里，当时的经济状况因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的残酷杀戮（有十分之一的欧洲工业劳动阶级遭到屠杀）而陷入悲惨境地，所以，那时怀抱类似诉求的人非常多。不过，1920年在党员年度大会中讨论基本收入与政府红利等理念的工党，却在来年正式否决了这些提议。一个促进不同形态社会的机会就此又被错

过。

接下来，美国也传出少数孤独的声音，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休伊·朗（Huey Long）参议员。在英国，和打造福利国家有关的辩论也连带提到了各种不同的相关提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建议出现在1943年米德（James Meade）与茱莉叶·莱斯-威廉斯（Juliet Rhys-Williams）的一本早期著作中；莱斯-威廉斯之子布兰登成为保守党的下议院议员后，进一步推动相关构想。可惜当时“劳工主义者”版本的福利国家占优势，主张收入及各种津贴的发放应取决于支薪劳工的表现，于是，基本收入目标再次遭到放弃。

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1955年出版的名著《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及后续一篇名为“保证收入的心理面貌”的文章中，倡议一种“全民生存保障”（universal subsistence guarantee）。不过，当时劳工主义者倡议的福利国家制度占主流地位，因此几乎没有人理睬他和其他类似的呼声。

堪称第三波的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主要势力是在美国，形成这股浪潮的主因是当时世人愈来愈忧虑“结构性”与“技术性”失业问题。一般人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在1972年提出的家庭救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和这个问题有关，不过，他的计划其实属于某种负所得税。他拒绝采用“保证年度收入”的字眼，所以若只因尼克松提出这个提案，而认定他改变信念转向支持基本收入运动，实在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说穿了，他虽认同应支持“贫困的劳动阶级”——从事低薪职业的人，却漠视从事许多种无报酬工作的人。

尽管如此，这个提案对基本收入的发展来说终究是个进展。可惜这个获得公共意见调查压倒性支持的计划虽在众议院通过，却遭到参议院否决。讽刺的是，这项改革是被民主党人扼杀的，而其中某些人扼杀它的理由，竟然是认为尼克松建议的金额不够高。这个理由虽冠冕堂皇，却使迈向基本收入目标的道路再次被阻断。取而代之地，税额抵减的时代来临。

在稍早的1968年，有高达150所大学的经济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支持负所得税的请愿书，签署人数高达1200名，令人震惊。另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遭到暗杀前不久，也于1967年写了以下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早已被遗忘）：

> 现在我确信事实将证明，最简单的方法将是最有效率的。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采用目前广泛受到讨论的对策：直接以保证收入来消灭贫困……我们必须为无法找到传统工作的人创造一些足以提升社会福祉的新形态工作……广泛的经济安全感势必将带来非常多正面的心理变化……当一个人有能力掌控和自身的生活有关的决策、当他确信自身的收入将是稳定且确定的，且当他知道他拥有寻求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的财力时，就能拥有光芒耀眼的个人尊严。[9]

那段期间还有很多其他倡议者，不过他们支持的似乎多半都是某种财力调查式的保证最低收入。这些人包括多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德（James Meade）、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丁伯根（Jan Tinbergen）、托宾（James Tobi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另外，诸如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等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个设想，部分社会学家亦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虽然他是民主党人，尼克松提出的家庭救助计划却受他影响甚深。[10]

第四波浪潮应该是从基本收入欧洲（目前为“地球”）网络在1986年成立后低调地展开。这吸引到一群从善如流的支持者，并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崩溃后，蓄积了真正强大的动能；从那时开始，来自各方的经济学家与评论家纷纷挺身而出，公开支持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而他们愿意为此发声的理由，通常与技术性失业、贫富差距恶化、高失业率等忧虑有关。

第四波浪潮的支持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学术界人士托尼·阿特金斯（Tony Atkinson）、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与曾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劳工部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杰出的经济媒体工作者萨姆·布里坦（Sam Brittan）与马丁·沃夫（Martin Wolf），以及BIEN运动中的几位领导人物，如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劳斯·欧费（Claus Offe）以及比利时的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

后来，硅谷的几名杰出人士与创业资本家也纷纷接受这个概念，一如我们所见，其中某些人还基于这个宗旨而拨出资金。他们包括热布卡公司（Zipcar）的联合创办人罗宾·蔡斯（Robin Chase），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老板萨姆·阿特曼（Sam Altman），杰出的创业资本家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脸书（Facebook）的联合创办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太阳城（SolarCity）、特斯拉（Tesla）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软件营销部队公司（Salesforce）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易趣（eBay）创办人皮耶·欧米迪亚（Pierre Omidyar），以及谷歌（Google）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的执行董事长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有些人基于相当粗鲁的论述而拒绝接受基本收入概念——他们认为就是因为上述人士的支持，所以基本收入必然是错的！无论如何，以眼前的阶段来说，由于基本收入获得政治领域、企业高管、工会领袖乃至社会活动家及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人士的广泛支持，基本收入运动的动能已蓄积到前所未见的强大水平。

回顾这四波倡议基本收入的浪潮，第一波可以说是对工业资本主义

之兴起所产生的种种反应，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很多矛盾与冲突；当时的倡议者设想了一个期许社会继续保有共同体形态并重视“工作”价值的方法，以反制当时促进无产阶级劳动的浪潮。第二波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正义的诉求——这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与大量劳动阶级悲惨死去的必要修复。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全面性劳工主义的力量完全无可抗拒，所以这一波浪潮最终也彻底被瓦解。

第三波浪潮表现出世人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而当那恐惧渐渐消退，那一波浪潮也逐渐式微。第四波浪潮是受到不安全感的大规模发生与贫富差距恶化的驱动，当然，人类劳工遭到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取代的忧虑，也是促成第四波浪潮的因素之一。随着左派人士领悟到劳工主义的气数已尽、右派人士意识到长期不安全感与贫富差距等问题已导致市场经济体系愈来愈不稳定且无法持续，基本收入似乎更深地嵌入公共辩论中了。

几个世纪以来，世人以很多不同名称来指称这个根本概念，不过，不同名称分别具有独特的涵义。

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这个名称的优点是简单与平易近人。它和“最低收入”（minimum income）不同，“最低收入”通常用来表示以财力调查为依据的计划，政府表面上保证每一个能证明自己确实贫困且在某方面“理应”获得某种收入的穷人可以领取某些收入。基本收入也和“保证年度收入”（guaranteed annual income）不同，后者主要常见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辩论，它似乎代表某种财力调查式的收入保障，是某种形态的负所得税。基本收入也和“最低薪资”（minimum wage）不同，所谓最低薪资是指雇主依法必须支付给任职员工的一笔法定金额，通常以时薪费率计算。

基本收入补助金（basic income grant，简称BIG）。BIG是非洲南部（southern Africa）用来形容基本收入的常用语言。而在美国，USBIG代表美国基本收入保证网络（US Basic Income Guarantee Network）。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这个用语在北美和欧洲广泛使用，它传达平等地对每个个人——不考量家庭或财务状况——发放基本收入的概念。

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某些从事基本收入运动的人为基本收入附加了“无条件”字眼，目的是要清楚表达不能针对支付资格设定支出、收入或行为条件的诉求。然而，“完全不设任何形式的条件”似乎又不太正确。它最显而易见的瑕疵是，要符合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某人必须是特定基本收入计划所涵盖的社区或国家的（合法）居民。所以，“无条件”字眼可能无法达到澄清效果，反而令人更混淆。

公民收入或公民权收入（citizen's income或citizenship income）。这个名称堪称第三常用的名称，它意味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权领取

基本收入，而且唯有公民才有资格领取。但那样的定义会导致问题变得加倍复杂；几乎所有基本收入提案都将居住在海外的公民排除在外，而且多数提案也都将尚不具公民身份但已长期居住的合法居民纳入在内。所以，即使这个用语确实传达了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概念，但就文字上的意义来说，这个用语并不准确。最新常用的版本为“公民基本收入”（citizen's basic income）。

参与收入/补助金（participation income/grant）。稍后将更详细讨论这个概念，这个名称和它长期以来的倡议者托尼·阿特金斯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和基本收入有几个共同特质：全民，定期以现金形式发放给个人；但和基本收入不同的是，参与收入要求领取人必须从事某种经济活动，以交换领取此一收入的资格。不过，这种设定行为条件的做法，导致它在某个关键的层面上不符合基本收入的定义。

社会红利或全民红利（social dividend或dividends-for-all）。我偏好“社会红利”，这个用语来自一个高尚的词源，而且能充分体现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某个关键正当理由——也就是说，基本收入代表其主事者将整个社会通过投资活动与财富积累活动所衍生的报酬返还给人们（见第二章）。

政府红利（state bonus）。这个用语获得米尔纳与皮卡德等人采用，它在20世纪初那几十年间颇为盛行。它的吸引力在于它让人联想到这种收入是由政府发放的某种社会支付。

人民补助金（demogrant）。这个用语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美国成为主流，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在最后没成功的总统竞选期间曾短暂采用这个用语。虽然他后来没有再使用它，不过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吸引人的名称，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民主”与“补助金”。

自由补助金（freedom grant）。这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为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第一任总统后，我针对南非当地倡议的基本收入补助金（BIG）所提议的名称。[11]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当时的南非财政部长反对实施BIG，从那时开始，贫富差距与长期的不安全感问题便如影随形且愈来愈严重。

稳定补助金（stabilization grant）。这个用语是我提议的另一个名称，它是指某种随着经济周期变动的基本收入（或基本收入的某个要素），换言之，在经济衰退时期，这种补助金会为了鼓励支出而提高，而在景气好转后，便会调降。我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这个概念。

利害关系人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这个名称是“资本补助金”概念的新名称，它牵涉到对成年后的个人发放的一笔大额补助。资本补助金与收入补助金之间的根本差异是先前提到的意志薄弱问题。不过，资本补助金和基本收入之间有几个共同的原则，比如支付必须是全民、无条件、发给个人且不可撤销的。

上述和这个重要概念有关的众多名称当中，我最偏好的两个是“基本收入”和“社会红利”。这两个名称各有另一名称所欠缺的优点，个中意义

将在后续章节陆续阐述。

在接着讨论前，我们要再次强调，实施基本收入并不意味要自动或绝对废除所有或多数其他现有的政府津贴，这个立场和某些评论家所声称的完全相反。[12]相对地，不管基本收入是否取代其他政府津贴，我们都应该将它视为一个新收入分配制度的理想最低收入，因为基本收入并非“福利”的另一个名称，它是收入。

注释：

[1].J.Cunliffe and G.Erreygers (eds.) (2004), *The Origins of Universal Grants: An Anthology of Historical Writings on Basic Capital and Basic Incom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xi.

[2].B.Ackerman and A.Alstott (1999),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ckerman and A.Alstott (2006), ‘Why stakeholding?’,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for an Egalitarian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43-65.

[3].G.Standing (2006), ‘CIG, COAG and COG: A comment on a debate’, in 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pp.175-95.

[4].L.Bershidsky (2016), ‘Letting the hungry steal food is no solution’, Bloomberg, 4 May.

[5].T.Paine ([1795] 2005), ‘Agrarian justice’, in Common Sens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p.321-45.

[6].B.Russell (1920), Roads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E.M.Milner and D.Milner (1918), Scheme for a State Bonus.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B.Pickard (1919), A Reasonable Revolution. Being a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Bonus Scheme-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Minimum Income. London: Allen & Unwin. G.D.H.Cole (1929), The Next Ten Years in British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7].W.van Trier (1995), ‘Every One a King’, PhD dissertation. Leuven: Departement de Sociologi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8].Russell, Roads to Freedom, pp.80-81, 127.

[9].M.L.King (1967),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0].For a selection of statements and analyses, see J.E.Meade (1972), ‘Poverty in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4(3), pp.289-326. J.E.Meade (1989), 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J.Tobin (1966), ‘The case for an income guarantee’, Public Interest, 4 (Summer), pp.31-41.

[11].M.Samson and G.Standing (eds.) (2003),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South Africa.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12].For example, A.Beattie (2016), ‘A simple basic income delivers little benefit to complex lives’, Financial Times, 3 June.



第二章

CHAPTER II

以基本收入实现社会正义

> “从享用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
>
> ——莎士比亚，《李尔王》

从道德或哲学层面来看，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一种最根本的主张是：基本收入是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这里的社会正义本质上指的是，社会的财富是社会性或集体性的。我个人的观点则是，社会正义是推动基本收入成为某种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补充了另外两个实施基本收入的理由——分别是自由与经济安全感。

遗憾的是，很多与基本收入有关的公开辩论的焦点，都误把它当成现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替代方案之一，因此，很多讨论都只聚焦在所谓的“后果”层面，例如它对劳动与工作的可能影响。但支持实施基本收入的真正理由并不是那些影响，最重要的理由便是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观点和这一直觉上看起来合理的主张有关，亦即社会的财富是集体性的；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主要来自前人的努力和成就，和我们本身的关系反而不那么密切。让我们看看托马斯·潘恩的《土地正义》（1795年冬天完成，并在1796年寄给法兰西共和国的督政府）中经常被引用的语句：

> 天然且未经开垦状态的地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这观点没有任何辩驳余地，过去如此，未来也将是如此……属于个人的财产仅限于改良的价值——而非地球本身……因此，每一片经开垦之土地的所有权人，都因他持有的那一片土地而欠整个社会一笔地租（我想不出更好的用语来表达这个概念），而这些地租便可用来支应这个计划所提议发放的基金。[1]

潘恩是在美国撰写这份小册子的，当时法国与美国境内的社会与政治情势相当动荡，考量到那样的背景，他通过这个理论而归纳出来的计划可说非常清晰和激进。他的提案是：

> 借由引入土地财产系统来建立一笔全国基金（National Fund），并用这笔基金向每个年满21岁的人发放15英镑，以部分弥补他们损失的大自然遗产。另外，对每一个50岁以上的在世者以及未来将年满50岁的人终生给予每年10英镑的金额。[2]

潘恩也建议“视障与肢障者”应获得和老年人相等的定期款项。潘恩所说的其实是一种非经常资本补助金，而非定期发放的基本收入，不过，我们不该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根据当时的行政结构，基本收入理当是不可行的。另外，他也进一步针对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诉求提出辩护：

> 我建议这些款项……要不分贫富地给予每一个人。为了防止衍

> 生令人反感的差别待遇，最好是发放给每一个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因为它代替了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属于每一个人，那是在他可能创造的财产或继承而来的财产以外的一种权利。而选择不接受这笔款项的人可以将它转存到共同的基金。[3]

从中可见，就核心意义来说，“社会红利”和基本收入很接近，另外，潘恩也在数页篇幅之后，以值得所有当代政治人物与评论家细细品味的文字，强力主张：“我恳求的并不是施舍，而是一种权利，不是恩惠，而是正义……只要没有人因它而遭受苦难，我不在乎某些人可能会有多么富裕。”[4]

所以，基本收入可视为一种以“人类祖先所创造并维护下来的集体社会财富”来发放的社会红利，另外，也可将它视为属于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及自然资源所衍生之报酬的一种分享。这个论述是以社会正义的角度支持基本收入，而不是基于它是一种应对贫困的方法，而且，它和19世纪与20世纪因社会保险计划而兴起的以直接提拨款为基础的应得权益（entitle-ments）制度大不相同。

当代与社会正义有关的哲学文献，主要和“右派”与“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有关。这两派人士的基本论述都主张，每一个个人都拥有或应该拥有“自我拥有权”（self-ownership），所以除非出于自愿行为，否则每一个人都没有义务为其他人做什么。然而，这两派人士对大自然——“自然资源”与“财产”——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右派的观点是以一个假想为出发点：首先，他们认为大自然、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不属任何人，所以第一个主动声称他对某项资源拥有权利的人，可以私下占用那些资源，无须事先取得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同意，也无须因此付钱给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来作为补偿。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则是从下述前提出发：自然状态下的大自然是属于所有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除非经过民主途径取得大众的同意，并让大众获得补偿，否则私下占用就是不正当的行为。

自19世纪末在美国崭露头角以来，亨利·乔治一直都是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最著名的书籍《进步与贫困》在1879年出版后，就立即售出三百多万本，而他在纽约一场选举活动上因中风而过世后，更有超过十万人到他的墓前致哀。[5]

乔治主张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遗产，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分享自己通过土地取得的租金收入。他建议对所有私人土地课征某种土地租税，并主张将相关的结余款直接分配给大众，他表示，这种“单一税”（single tax）可取代其他所有税赋，包括对劳工与生产活动课征的税赋。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就引用他的论述，呼吁利用土地相关税金来发放基本收入。虽然乔治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观点是秉持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立场，但他的方法特别合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意，因为仰赖土地税而非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做法，和右派讲求的自由概念不谋而合。

乔治也体察到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庞大的财富来自经济租（economic

rents），经济租不仅是来自土地所有权，也来自其他天然资源和诸如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乔治认为专利权是不合理的。近几十年来，这类其他来源的租金收入暴增。[6]诚如我们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的，若将乔治的论述加以引申，针对所有形式的租金征税，将有助于筹措基本收入的财源。

我们可以用米德尔斯堡（Middleslorough）的例子来阐述社会正义这个理论基础的意义。米德尔斯堡是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没落工业城镇[7]，19世纪20年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附近发现铁矿砂后不到十年，米德尔斯堡和周遭的提赛德（Teesside）地区就成为工业革命乃至大英帝国的中心。它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制铁业重镇，后来又延伸发展出炼钢业与化学业。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就是以米德尔斯堡的钢铁建造，悉尼的港湾大桥也是，印度的多数铁路系统也是采用此地的钢铁建造。米德尔斯堡的一个城门上挂着刻有“由铁而生，以钢制成”字样的图腾装饰。

尽管曾经风光一时，如今米德尔斯堡的旧城镇公署大楼孤独地矗立在一座山丘上，周遭尽是杂草丛生的荒野。特雷西·席尔德瑞克（Tracy Shildrick）和他同事曾对当地的废弃住宅房地产进行研究，那里到处是荒废的房屋，原本的窗户全堵上了砖块。[8]目前还有大约十四万人继续住在这个小镇，很多人不愿离乡背井，但也因此必须承受历史的残酷折磨。

当今英国其他较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财富，多半是靠着19世纪与20世纪提赛德地区的工人努力打拼而来。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远比最先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与实力的那些工人的后代更舒适，并享受更多保障？

想想米德尔斯堡和其他工业社会的类似地方，应该会让人不禁想起潘恩的论述。很多社区创造了让其他人也能连带受惠的财富，但它们后续有可能因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陷入贫困而受苦；相反地，因这些社区的生产成果而获益的人，却可能继续享受繁荣，通常是通过继承来的财富和特权。所以，基本收入可视为某种财富转移——将我们集体继承的遗产部分转移给较少享受到特权的社区。让所有人分享那些钢铁业工人及其后继者一手创造的继承财富，堪称一种代际（inter-generational）社会正义。

反对根据社会红利的理论基础来发放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是，没有任何个人有权利享受前人传承下来的社会财富，因为他们先前没有付出，所以不应得到那些财富。而若根据这个逻辑，私人继承权也应该废除才对。如果私人继承权被允许存在，那么，社会继承权的原理也应该被接受。

我们继承的财富不仅包含土地及有形资产，还包括金融资产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也能衍生因天然或非天然稀少性而来的经济租，所以，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与个人一样能单纯通过这种所有权而获得收入；就知识产权的案例来说，政府创造并强制执行一些规定和法律，让某些人得以通过专利、版权和品牌等取得庞大的租金收入。

1813年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观念”（ideas）应归属为某种自然公共财产（natural public goods），因为将一个观念传达给别人，并不会对观念的发想人造成剥夺。他还补充，专利权“为社会带来的困窘大于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然而，现代的国家却不断强化专利权保护，允许极少数人得以享受长达二十年的独占收入，而版权更可以延续九十五年之久。[9]不仅如此，这种租金收入还因巨额的政府补贴——主要是以所得税宽减的形式——而进一步扩大，而且政府也未要求取得这种收入的人负起回馈社会的义务。

追本溯源，很多专利发明其实来自获得公共资源补贴的研究。既然如此，个人或单一企业有什么权利独享相关的所有收入？基本收入是一种将利益分享给整个社会的手段。毕竟先有社会才会有收入，而且知识产权制造的潜在风险其实大多是大众在共同承担。让现代情势变得更不公不义的是，全球化经济体系让有钱人或有钱企业能轻易将他们通过本国社会的慷慨大度而赚来的收入转移到海外，从而逃漏相关的税赋。

就上述脉络来说，让我们看看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那惊人的财富，以及从中衍生的可累积收入。他在世界首富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6年年底的总财产高达八百亿美元以上。不可讳言，他个人的科技贡献确实非常大，但那些贡献其实是建立于旁人的一系列发明与想法之上，而他却成为那些发明与想法（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发明与想法）所衍生的收入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如此，那些收入来自他通过微软公司的软件与其他产品所享受到的长期垄断地位——这都要“感谢”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1995年大幅强化专利与版权等规定。所以说，拜政府与国际法规所赐，盖茨才得以累积那么可观的财富，换言之，他并不单是靠着一己的努力赚到那些钱。他的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功劳”或“努力工作”，而是来自一些让他拥有能赚取巨额收入的特有权利，而这些特有权利受到人为规定的保障。

通常个人的财富来自运气、法律、继承或幸运时机的成分高于来自个人的才华。除了通过犯罪行为取得的财富，很多人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各种商业手段来掠夺属于其他所有人的共同财产，要不然就是通过公共服务与设施商业化及民营化所衍生的租金来累积财富。这个事实是支持对租金收入课税，以便对每一个人发放社会红利的另一个正当理由，换言之，发放社会红利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分享社会所创造的财富。

菲利普·范·帕雷斯已提出另一个版本的食利者论述。他主张，在一个高失业经济体系里拥有一份工作是一种特权，所以，课征“就业租”（employment rent，一种税赋）来作为对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源，是一种正当的做法。[10]但这样的主张似乎有流于笼统概括之嫌，因为很多（甚至大多数）就业机会绝对称不上什么特权。然而，特定就业机会和职业——尤其是有进入限制的——确实堪称取得租金收入的渠道，这让主张基于正义而对那类收入课税的说法更站得住脚。

我们可以把“分享来自资产所有权（包括所谓知识产权）的租金收入”，视为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发放基本收入（作为社会红利来发

放）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实属正当。[11]归结来说，这个观点主张让每个人适当分享那类收入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巨著《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中，阐述了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政策是否牵涉到社会正义原则。[12]他的“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明确指出，除非一项政策改善了最弱势者的处境，否则就不算达到正义的要求。我个人以另一个名称——“保障差别原则”（Security Difference Principle）来表达这个概念，根据这个名称，一项社会政策或制度变革只有能加强保障社会上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才能被视为具社会正义的政策。

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保障”的整体攸关性。不过，如果一般人能接受保障差别原则的概念，那么，基本收入当然满足这个原则的要求。若发放基本收入，导致某些人在经济安全层面暂时变糟——例如基本收入取代了某种明确锁定最穷困者的计划——那么，对因此而发生损失的人加发某种补贴，并让所有群体都不会成为输家，将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罗尔斯倡议“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他主张“最合理的正义原则就是每个站在公平立场的人都能接受且认同的原则”。所以，看待正义原则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询问人们认为“怎样才叫公平”。在罗尔斯和一向批判他不遗余力的海萨尼（John Harsanyi，他以为多数人一定会选择能让平均收入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做法）之间的漫长辩论后，心理学家秉持所谓的“实验伦理”，想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直接询问人们的看法；后来这个方法也经常被复制。

在最初于加拿大、波兰和美国进行的一系列重要实验中，实验者要求来自不同背景、怀抱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针对四个可能的规定，选出一个最优先的收入分配原则，这些人是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做选择，换言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收入分配的光谱上属于哪个区域。[13]这些规定分别是：

> 将最低限制收入最大化，其文字表达方式是：“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将社会上的最低收入限制最大化”。
>
>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
>
>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并对最低收入设限。
>
>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并对区间设限。

实际上，为简化复杂的分析，研究人员先谨慎向受访者解释上述每个选项的意义，接着再询问他们最偏好哪个选项。在所有状况下，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设有最低收入限制（实质上就是基本收入）的那两个选项。

接着，实施小组讨论后，这些实验又变得更有意思。经过几个小时的这种“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程序，选择最低“基本收入”的人数比例大幅上升，换言之，它成为所有群体压倒性偏好的正义

选项。

我本人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指导的一个大规模研究计划，也通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欧及东欧几个“转型”国家的多项调查（被调查人高达数千），给予被调查者相同的选项。[14]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或“不确定”每一个收入规定。最后的结果显示，每个国家的受访者最支持的选项，都是有设定最低收入的原则，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强烈认同这个选项。

因此，各种实证方法加强了基本收入合乎“正义”的事实。虽然这种实证方法并非绝对可靠，至少显示这是一个值得采行的路径。

典型的自由派人士立场是，社会上的税制与津贴结构应该力求“公平”。在实务上，一般人对于“公平”的意义或有歧见，但若处于“无知之幕”之后（意即他们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成果的分配），多数人都认同低收入者被课征的税不应该比高收入者高。

不过在所有国家，这个“正义即公平”的要求却遭到滥用。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已将社会保障制度改为财力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在英国、德国及多数其他工业国家，原本领取微薄政府津贴的人一旦转而从事低薪工作（这种工作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就业机会），便可能面临超过80%的边际“税”率，因为他们原本领取的津贴会因此被撤销，而这样的税率远比中高薪资收入者的税率高。对照之下，如果一个制度的最低社会保障是不课税（且不可撤销）的基本收入，而且所有高于最低收入标准的收入都只课征一个标准税率（或许对较高收入级距的群体设定较高税率），那才堪称符合租税正义。

租税不公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的税制针对不同来源的收入课征不同的税率，而这个税制对较富裕的群体比较有利。如果所有来源的收入都以类似的标准来课税，当然较符合社会正义。其中，劳动薪资收入的税率尤其不应该高于财产或投资收入的税率。然而实际上，多数社会的财产与利润税收却远低于薪资税收。

基本收入制度应该有助于矫正这种矛盾现象。一旦实施基本收入制度，劳工的边际与平均所得税率将降低，而且还留下提高非薪资所得税的空间，从而让各种来源收入的税率趋于平等。那些税收将可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让国家更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发放。

基本收入是否将促进男性与女性之间、所有年龄群体之间，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被以残疾者对待的失能或受伤者而言的社会正义？和这些议题有关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不打算在此归纳那些文献的结论。不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答案：“基本收入本身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特别是与反歧视措施与机制相结合，加强弱势群体与个人的声音。

第一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对个人发放，不会只发给被指定或自我指定的“家长”或“户长”，也不会以家庭或家户为单位发放，因为家人与家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鲜少是平等的。对个人发放的基本收入当然不可能

消弭家户或家庭内部的所有结构性不平等，但至少能降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务依赖度，并让每个成员得以检视家庭内的货币资源是否公平分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自己理当领到多少钱。

第二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全民且均一的（家庭里的每个成员或每个成年成员都会领到同等的金额）；相反地，以财力调查式津贴来说，高于贫困线的家庭里没有财务自主能力的女性被排除在领取资格之外。相同的道理也适用（甚至常常更强烈适用）于伤残的家庭成员，以及需依赖旁人照顾的年迈家庭成员。因此，对个人发放的全民支付将较公平。

第三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行为条件限制（behavioural conditionality）不仅在道德上引发质疑，它在设计上也对某些人造成麻烦（对另一些人却不会），所以是不公平的。观察某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便可清楚了解这个情况，这类计划在拉丁美洲等地获得广泛采用：计划本身通常规定，只要低收入妇女的子女正常上学并接受健康检查，她们就会获得计划所发放的补助金。这类计划很受“自由至上主义温和专制派人士”支持，而这些人的“推动”议程（‘nudge’ agenda）对政策的制定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三章）。不过，这些条件限制几乎不约而同地强加义务在为人母的女性身上，而未强制男性同步履行。尽管理论上可能不是如此，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却明显可见，所以，这对那些低收入妇女构成了一些不公平的负担，包括多花费时间与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等。

因此，以人际正义的角度来说，不管反对或赞成者的意见如何，基本收入都将是有利的。

人类和地球因气候变迁的威胁而面临一触即发的生态浩劫。一如我们所见，目前已有很多物种逐渐消失，另外，冰川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沙漠面积持续扩大，极端雨量与干旱现象以及具备空前破坏力量的异常风暴、气旋与飓风等也屡见不鲜。其他很多形式的环境污染也处处可见，这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直接相关的污染，导致人类健康与福祉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真心重视代际正义，也想爱护这个世界的大自然奇景，就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来避免浩劫发生。

这和基本收入有什么关系？或许最显而易见的是，基本收入将鼓励一般人把一部分时间从消耗资源的劳动活动转移到保护资源的“再生产”（reproductive）活动，如看护或义工工作。我们将在第八章和工作与劳动有关的主题上，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无论如何，这些事全都牵涉到正义议题。

环境污染是一种具累退税效果的现象，因为有钱人能设法让自己不受脏空气与用水、绿色空间减少等问题伤害。此外，很多污染其实是肇因于让较有钱的人受益的生产与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包括航空运输、车辆所有权、空调的使用，以及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某种程度上，基本收入可解释为对被莫名被迫背负污染成本的人的一种局部补贴。

相反来看，对于因各项环保对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基本收入也可当成对他们的一种补贴。如果能实施基本收入，各国政府就比较容易针对可能影响到生计或会产生累退税效应的污染活动课征税赋，因为那种税赋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低收入家户的购物成本上升，而基本收入的发放就能给予那些受创的低收入家庭一些补贴。举个例子，沉重的碳税能抑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以一旦实施，将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舒缓气候变迁后遗症，同时减轻空气污染程度；而就政治层面来说，如果课征到的碳税税收能用来发放基本收入，补偿低收入者、矿工与其他因此失去赚取薪资收入机会的人，那么导入碳税的政治阻力就会比较低。

谈到废除石化燃料补贴相关的议题，支持基本收入的论点尤其强有力。放眼世界各地，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的政府都长期使用补贴——压低燃料价格——来作为改善贫困的方法之一。但这么做等于变相鼓励消费化石燃料，甚至鼓励浪费。此外，燃料补贴会产生累退税的效果，因为有钱人消费的燃料比穷人多，通过那类补贴获得的利益当然也较多。不过，各国政府因担心选票流失，一向不愿意降低或废除相关补贴。事实上，许多国家曾尝试降低燃料补贴，但在愤怒群众的示威活动威吓下又纷纷改弦易辙。

由伊朗的例子就可看出基本收入能打破这个僵局（见第十章）。如果废除化石燃料的补贴，燃料价格势必会上涨。然而，政府从此就能把原本耗费在那种有害补贴的巨额资金，重新导向筹资“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s）平等发放给每一个人。绿色红利的补偿能产生累进税（progressive）效果，换言之，使用较多化石燃料的人必须付出较多代价，而对低收入者来说，这项红利的价值将相对高于他们的化石燃料支出与收入。如果除了废除补贴，还为了弥补“外部性”（externalitie，即未被反映到市场价格的成本，例如因空气与水污染而生病或死亡的代价）而针对化石燃料课税，相关税金也可重新导往增补绿色红利的方向。通过这种双重做法，低收入国民的经济状况将会好转，届时所有人也都能因化石燃料用量的减少而受惠，因为污染减少、健康状况改善，且地球未来的生态也将改善。

某些倡议者，如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主张应将碳税收入百分之百用来发放均等的绿色红利。[15]其他人则建议利用部分碳税收入补贴以化石燃料来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至少在这些企业转采其他能源以前的特定期间内给予补贴。不管怎么做，碳税都可作为支应基本收入的财源之一，它是建立基本收入财源的重要财务基础，而且在社会正义原则上站得住脚。

以上所述进一步证明基本收入制度确实是对抗环境恶化的宝贵武器，也是一种争取代际正义的有效手段。不过，支持基本收入更重要的生态论点是——基本收入能让人们产生某种温和的诱因，去从事有助于再生产与改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工作，这种形态的工作更有价值。基本收入将让相对贫困的人得以参与社会，并促成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肮脏的地球》（*Pig Earth*）一书中所言的“以生存为目的的文化”（the culture of survival），而非不断消费与累积财富的“以

进步为目的的文化”（the culture of progress）。

作为一种源自社会集体财富的普遍权利，基本收入能强化共同公民权的意识。这可以联结到某些基本收入的共同社群（communitarian）案例。基本收入体现了我们身为人类对彼此的一种道德义务，所以有助于凝聚整个社会。

社群主义的先行者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曾主张，人们愈自视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就会愈偏好财富重分配。全民基本收入将能强化那种共同体意识。

另外还有一个更广义的论述。当一个社会是由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人组成，这个社会倾向于更民主，容忍度也较高，而基本收入制度就是那种平等的展现，它能促进社会上休戚与共的连带感及共同公民意识。

我们能否找到支持基本收入的宗教理由？为基本收入辩护的宗教论述应与社会政策的“宗教化”（religification）对照。所有宗教都重视慈善捐助，但通常宗教领袖也非常讲究道德教化，对于“应得的”与“不应得的”各有定见；而且很多宗教人士强调，穷人有义务为接受慈善捐助而付出他们的劳动力。幸好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宗教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后“第一波”支持基本收入的人当中，最重要的倡议者是一群年轻的“贵格教派人士”（Quakers，如第一章提到的米尔诺与皮卡德）。他们信守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可享有“生命的根本需要”。

马尔科姆·托瑞（Malcolm Torry）与托尔斯坦·梅瑞斯（Torsten Meireis）则曾简洁表达基督教徒支持基本收入的理论基础——他们秉持路德教派（Lutheran）的观点，认为基本收入让人民得以追求自己的“天职”（calling）。[16]基督教的观点是，为忠实遵守耶稣宣扬的教义，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应该努力将社会打造成理想中的上帝的国的样貌，让人能透过那些社会样貌，产生“上帝的国即将到来”的印象。

根据此脉络，基本收入就象征着上帝的恩惠，而上帝的恩惠本就遍及全民。托瑞将基本收入类比为献血，在英国和许多国家，献血者并不求取任何报酬，献血人和被捐血人互不相识。它是一种不要求互惠的赠礼，双方之间也不会去算计它的价值高低。基督教的观点也主张，所有财富都是上帝的赠礼，所以本来就应该将之视为公共财产，上帝赠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少数人致富、多数人无法享受。而由于意识到实际上，这项上帝赠礼并没有依照上帝期待的方式来分配，所以，基督教认为借由基本收入的发放，便可达到绝大多数人共享财富的目的。[17]

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2015年的《教宗通谕》（*Encyclical Letter*）中写道：“地球实质上是一项共享遗产，地球的果实是要让每一个人受益。”[18]他又接着拥护代际平等原则，主张“每一个社群都能通过地球的慷慨博爱，取得生存所需的所有物资，不过，它也有义务保护地球，以确保地球能创造可供未来世代子孙享用的丰硕果实”。

基督教支持基本收入的论述和阶级导向的观点恰好相反，支持阶级

导向观点的立场最为鲜明的人之一，是2013年担任伦敦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他以摇晃早餐玉米片包装来做比喻——在摇晃的过程中，最好的玉米片会跑到上层，主张如果某人的遗传天赋优于一般人，他就有权利获得较大的经济报酬。自然，任何基督徒听到这样的说法，应该都会迅速反驳，由于那种天赋是上帝给予的赠礼，而且上帝不是赠与每个人平等的天赋，所以，受到上帝最多眷顾的人理应被课征最多税，而受到最少眷顾的人应该有权获得补偿。（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提出类似的论点，他们将遗传的天赋视为理应重新分配的“天然资源”）。

其他宗教也各用不同的方式，将慈善捐助解读为一种正义。以犹太教来说，常被用来代表捐献的“tzedakah”一词，其实是指从事正确与正义之举的宗教责任；伊斯兰教的五功（five pillars of Islam）之一的“天课”（Zakat），则要求追随者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另外，韩国人也有一种无条件送东西给别人的信诺。中国的孔子思想、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也都支持“众生理应获得平等的尊重与照料”的信念。

因此，宗教可能可以证明基本收入是合理的。不过，宗教信仰不应该被用来作为激励、奖赏或惩罚个人的工具，也不应该区别谁“理当”贫穷或谁“不理当”贫穷，因为若是如此，宗教一定会失去它的道德指南地位。幸好很多神学家都察觉到这个风险，并因此聚焦在宗教的慈悲与人道层面。

根据所谓“激进民主”观点，每个人都应该获得一份基本收入，这个权利是他们作为政治实体的平等成员（而非仰赖政府抚养的贫困团体的成员）的一种宣示。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一部分经济余裕，那等于是对愿意依从目前实行之经济生活法则的公民的一种酬谢，因为这些法则一定会让某些群体享受到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特权。

基本收入实施与否，也和国家利他主义（altruism）有关。利他主义能促进因利他主义而受惠的人的利他之心，而政府以我们的名义而采取的卑劣行为，也会助长公民的卑劣行为。整体来说，我们希望公平，所以，若政府能采取公平正义的行动，通常就能引导其公民采取类似的行动。

这并不是天真的想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以利他主义来回报自己因利他主义而获得的利益。不过，道德劝说堪称所有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的良性社会的软实力。那些以财力调查、行为调查、惩罚与侵入性窥探等为基础建构福利制度的国家，将利他主义意识视为过时的骑士精神，是不应该的。那些国家的做法与态度并没有创造任何良好结果，还导致不公不义情况更加恶化。

注释：

[1].T.Paine（［1795］ 2005), ‘Agrarian justice’, in Common Sens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332.

[2].Ibid., p.334.

[3].Ibid., p.335.

[4].Ibid., p.339.

[5].H.George (1879),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6].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7].Outlined in 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8].T.Shildrick, R.MacDonald, C.Webster and K.Garthwaite (2012), Poverty and Insecurity: Life in Low-Pay, No-Pay Britain. Bristol: Policy Press.

[9].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10].P.van Parijs (1995),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1].Besides the writer's arguments for this approach, see P.Barnes (2014), 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How to Save Our Middle Class When Jobs Don't Pay Enough.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12].J.Rawls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N.Frohlich and J.A.Oppenheimer (1992),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Economic Security for a Better World. Geneva: ILO.

[15].Citizens' Climate Lobby (2016), ‘Carbon fee and dividend policy’. http://citizensclimatelobby.org/carbon-fee-and-dividend/.

[16].T.Meireis (2004), ‘“Calling”: A Christian argument for basic income’, in G.Standing (ed.),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London: Anthem Press, pp.147-64. M.Torry (2016), Citizen's Basic Income: A Christian Social Polic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7].C.M.A.Clark (2006), ‘Wealth as abundance and scarcity: Perspectives from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and economic theory’, in H.Alford, C.M.A.Clark, S.A.Cortright and M.J.Naughton (eds.), Rediscovering Abundanc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28-56.

[18].Pope Francis (2015), ‘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Vatican, 24 May.



第三章

CHAPTER III

基本收入与自由的关系

> 政府的实际功能是要在维护生活条件之余，创造一个有道德的环境，而道德包含自愿承担各种义务的无私表现，但家长式政府竭尽所能地缩小它自愿承担各种义务与发挥无私动机的空间，从而导致政府的实际功能无法发挥。
>
> ——托马斯·希尔·格林（T.H.Green），1879年

几乎每一个倡议基本收入的人都主张基本收入将会强化自由，并促使自由得以存在。这是主张发放基本收入的第二大正当理由。不过，到底什么是自由？作为本章的开场白，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政治左派人士太不关注如何强化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政治右派人士眼中的自由又过度朝自由至上主义倾斜，这严重违反某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传统——即“共和主义式”自由。

标准的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观点是，自由权牵涉到免于约束的自由（消极自由权），以及采取行动的自由（积极自由权）。这个观点常被联系到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支配近年来中间偏右与偏左派政治策略的主要看法。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幸福（通常被统称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个目的明显可能导致政治人物过度忽略“导致少数人陷入悲惨”的事。[1]

长期以来，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格林是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各式各样的温和专制主义，尤其反对所谓国家温和专制主义（state paternalism），但与孩童或精神疾患者有关的事务除外。不过，现代政治人物向来缺乏思想连贯性（intellectual consistency）的美德，左派或右派皆然；很多人毫不避讳或暗地拥抱某种可称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危险混合体，这个立场主张“领导”或“助推”民众“做出正确的选择”。如今，它对自由的威胁可能已经比露骨的独裁主义更加严重，因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实在太令人反感且操纵欲太强。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稍后篇幅探讨相关的意涵。

基本收入可视为某种基本经济权利，是自由主义所秉持之自由观的一个必要条件。基本收入是所谓基本自由权之一，是其他基本自由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基础。不过，基本收入在自由至上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自由概念中，则是两回事。

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小政府”，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会破坏个人的自由权。就希望政府“消亡”这件事来说，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在他们眼中，政府必然是具侵入性的，而且一定会征税，而侵入与征税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因此，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拥护政府发放基本收入的现象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他们针对这种立场所提出的辩解是，这是促使政府全面从社会政策领域撤退的次优选择，而且他们也经常沮丧地承认，自

由至上主义者心目中的“乌托邦”，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那类自由至上主义者包括政治右派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以及自称拥护“真正的自由至上主义”（real libertarianism）的范·帕雷斯，还有左派的卡尔·维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等。[2]

范·帕雷斯主张，基本收入能让人民选择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这个观点遭到批判，原因是，它没有将几种最主要的自由列为优先考量，未能体察到某些人比别人更难以将收入转化为自由，而且鼓吹不负责任的自由。[3]维德奎斯特的论点则是，基本收入提供“有效控制自我拥有权的自由”——也就是接纳或拒绝与其他有意愿者合作的有效力量。

右派自由至上主义传统阵营中，近来发言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人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迈克尔·坦纳（Michael Tanner），以及利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著作进一步发挥的马特·佐林斯基（Matt Zwolinski）。[4]不过，这个阵营中最杰出的倡议者向来是默里，他在2014年将他名义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论点归纳如下：

> 这个社会太过富裕，所以我们不能事不关己地摆出一副“我们将不会为贫困人民做任何事”的姿态。我了解那个事实、认同那个事实，也抱持那样的同理心。但我希望左派和右派人士能协调出一个宏观折中方案。我们这些右派人士主张，以政府支出金额来衡量，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巨大的政府，而就“不让政府有能力把人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层面来说，就采用你们主张的小政府。所以，综合双方的主张，就是采用以下制度：每个月存一张支票到每一个年满21岁以上的人的电子银行账户，他们可以把这笔钱花到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用途。每个人也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和其他人联合起来，集合大家的资源。不过，人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让人们得以自行决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
> 关于这一切，我的真正目标是复兴文明社会。我的意思是，根据这个制度，某个人每一个月都能领到一张支票。不过，若这个人自甘堕落地把这笔钱挥霍在饮酒作乐上，结果，离下一张支票入账的时间还有十天，他就把钱全部花光，这时，他变成穷光蛋，连活下去都有问题。于是，他必须去找朋友、亲戚、邻居或救世军之类的人帮忙，向他们坦诚“我真的需要活下去”。他一定会得到帮助。而由于这是一个保证基本收入制度，所以他不能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管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无助受害者。所以说，这个制度能形成以下的回馈循环：别人（在帮他以前）会说：“好，我们不会让你饿死在街上，但你自己也应该一起努力才行。不要说你做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你几天后即将收到另一张支票。”[5]

不过，默里另外还主张“福利国家会自我毁灭”[6]。他向来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且很多政治左派人士因他对种族与文化等方面缺乏道

德的观点而嫌恶他。不过，他的上述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错在不该利用不负责任的酒鬼或赌徒给人的刻板印象来主张废除所有的福利计划，再以基本收入取而代之。

如果默里只锁定对个人自由妥协的福利计划，那他的意见确实会对那类计划构成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无疑地，很多现代福利计划确实侵犯到自由，而且通常是相当蓄意地侵犯。不采用那类计划当然有助于强化自由，但很多公共服务也具备强化自由的功能。举个例子，公共医疗服务就能让某个生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的人恢复自由行动的能力。相似地，对伤残者的津贴与服务，以及公共礼仪的要求等，都有助于打造让每个人享有平等自由的社会。

在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眼中，“如果我们能废除现行所有福利计划”[7]，基本收入就是完美的，这个观点相当讨他们喜欢，部分原因是，这么做有助于促成较低的税赋。关于这个立论，典型的例子是新墨西哥州前州长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他曾是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在2016年年中出面支持基本收入，并表示基本收入能节省“官僚成本”。[8]

如果沿着这个理论基础继续前进，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应该会发现他们最终必须在“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和“其他福利计划应废除的程度”之间做一个取舍。不过，某些人的厄运或弱势并无法归因于他们的“自由选择”，所以，基本收入不能取代寻求矫正或补偿那种厄运或弱势者的福利计划。我们不能因一个人伤残而怪他产生额外的生活成本或需求。所以，根据特定需求而加发的增额补贴——以货币津贴或公共服务等形式提供——应该永远保留。

另一位公开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佐林斯基一向倡议采用他所谓的基本收入保证（BIG），他提到美国联邦福利计划一年要花费超过6680亿美元的成本到至少126个非常分散的计划上。这还不含2840亿美元的州与地方福利支出，所以说，美国每年发给每个穷人两万美元以上，总额几乎达一万亿美元。[9]与此同时，补贴递减之类的规定（不同计划的规定各有差异）意味着原本以领津贴度日的人开始尝试去做低薪工作后，就必须承受非常高的边际税率。

佐林斯基表示：“没有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会希望BIG成为现有福利国家制度以外的额外福利。”这样的说法对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许不公平，却精准彰显出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基本收入将是替代由政府驱动且极具侵入性的福利国家相关制度的方案之一，而且是一种可强化自由的替代方案。

非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政治左派阵营对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向来极端反感，很多人甚至完全拒绝接受基本收入的可能性，他们选择将基本收入视为摧毁福利国家的某种阴谋。虽然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确实怀抱那样的目标，但非自由至上主义者左派阵营这种憎恶基本收入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情绪上的反应，一点也不理性，因为其实基本收入的多数当代倡议者也认同公共社会服务与以资助穷困者为主的福利补贴。

尽管如此，许多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提议以基本收入直接取代所有公共福利的事实，已在BIEN社群内部引发一场猛烈的辩论，最后甚至促使我们在首尔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声明基本收入的支付不该危及福利国家制度。通过这项决议的理由是，我们体察到政治圈将基本收入视为万灵丹的潜在危险。

但也有某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基本收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如果要达到取代所有福利计划、满足个人多数基本需求，同时保护弱势者的自由等目标，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势必会高得吓人，到时候就不得不以远高于目前的税赋来支应，而他们认为提高税赋将会侵犯到纳税公民的自由。

佐林斯基在捍卫他所谓的基本收入“结果论”自由至上主义的（'consequential' libertarian）论述时，坦承了这个取舍的困难：

> 我们要强调的观点是，基本收入有助于保护特定弱势人群的自由。不过，我承认，广大到足以实现那个目的的基本收入，可能必须借由会侵犯到其他人之自由的税赋来支应。所以，那等于是牺牲一些人的自由来谋取另一些人的自由。[10]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反驳这个立论，其中最简单的反驳方式是：除非国家保护它最弱势国民的基本自由，否则那些弱势者会为了反击导致他们变得更弱势的那些人，而不惜侵犯那些人的自由。如果自由至上主义者成功打造出一个让弱势者感到了无希望的最小政府（minimalist social state），那么到最后，弱势者的积怨将导致惩罚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的事态发生。

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表现得比道德保守主义者更道德保守主义。也因如此，默里才会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鼓励“更良善”行为和复兴“公民文化”的工具。这其实是家长式的论述，和自由无关。不过，他至少不像新一代的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么直言不讳；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和“助推理论”（nudge theory），为他们的主张——赋予政府操纵或温和促使人民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角色——进行辩护。一直以来，这些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都相当有影响力，以致这个主题的畅销书《助推》（*Nudge*）的作者之一，还成为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的重要监管官员，另一位作者也成为英国首相的顾问。[11]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模式之一，自称自由主义者（liberals，如参与联合政府时期的英国自由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保守派人士都倡议且落实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这个主义的“正确”与“错误”观，源自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其中，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著作是他们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更是源于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构想，那种监狱的设计是为了让狱监能随时监看受刑人的行为。边沁的想法是要给予受刑人明显的自由选择，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被惩罚。

《助推》一书的作者依样画葫芦地直接引用边沁的文字，但又只字未提到他的名字和圆形监狱。他们无疑是用心良苦的，事实上，多数家长主义者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问题是，当今的政府比过往任何时代的政府更仰赖潜意识手段或其他工具（包括激励、惩罚和时间障碍）来诱使人们采用或摒弃某种行为方法。当然，在侵入性家长式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政府的力量变得愈来愈强大，而那样的结果当然极受独裁主义者的欢迎，而这正是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另一个重大的新理由。

自由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是不相容的。只要看看众多反对意见里的一个就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人们在被操纵的情况下，最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不管是个人或整体的错误选择），那该怎么办？到时候，谁该为相关的成本负责，尤其如果这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根本是被动做出选择的？

从很多国家的退休金计划便可看出那种做法最后可能出什么乱子，这些计划都是很典型的实例。举最近一个例子来说，2016年，智利人民因退休金制度民营化而发动愤怒的抗争，因为人们可领取的退休金与其最终薪资的典型比率[12]，从原本预期的70%降为35%。这个政策大转弯的根本原因有几个：一、最初设定的提拨率过低；二、基金经理人收取的费用高得离谱；三、很多人因育儿责任、失业或从事非正式工作而多年未提拨退休金。这个退休制度改革对津贴金额仅足糊口的退休老人来说用处并不大。

所有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都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达尔文主义气质，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也未能克服这一点。最终来说，自由至上主义并不尊重弱势与脆弱群体的自由，问题是，多数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成为那样的弱势与脆弱群体。自由至上主义或许有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理论基础，但他们不能将基本收入合理化为一种抛弃基于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原则而设置的公共社会服务的借口。

目前盛行的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观点将自由和不受干预（non-interference）画上等号。“共和主义”的版本则是，自由必须等于不受控制（non-domination）。共和主义式自由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要求自由必须是能免于受人、制度或莫名其妙的程序的潜在控制和实际控制。[13]换言之，如果权威人物或机构能够随心所欲地“专横干预”一个人的行动或思想（或发展）能力，就代表共和主义式自由已遭到损害。[14]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和“财产所有权的存在有可能摧毁或损害这种自由”的论述有关（这个论述部分来自卢梭的哲学），毕竟在土地遭到少数家族把持的情况下，硬要说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其实是相当荒唐的。

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回避或免于受无谓干预的影响，且在合理程度上无需畏惧这种干预，那么，这个社会就拥有健全的共和主义式自由。一个人必须能不受他人的意志影响，那才叫自由，换言之，如果我合理且理性地担心冒犯某人就会失去自由，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

自由至上主义将所有政府视为对自由的一种妥协，相反地，共和主义式自由则需要政府，而且仰赖政府。不过，那个政府必须是民主且负

责的政府，而且必须努力促进充分的自由，所谓充分自由的定义，主要是指连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都拥有避免受控制的能力。共和主义式自由也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强势群体的选择不能妨碍其他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以竞争和“竞争力”为基础，那么自由就自然而然会受到限制，因为在竞争的情境下，势必会有输家，而且是很多输家。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对个人的奖励完全取决于他的竞争力，实难想象那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共和主义者的观点来说，人们必须拥有能让他们进行合理选择的充足资源——不管他们的偏好和其他人的意见如何——才算拥有自由。而要达到充分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这项自由的存在，并因此不能以怜悯或鄙视的高姿态看轻某人。自由必须意味对个人决策的中立性，它不是某种经谨慎建构且用以引诱人（不管出发点有多么仁慈）做出“符合规范”之行为的黑箱策略结构。这清楚证明发放基本收入是有道理的，相反地，它反对将人们丑化为叫花子——被污名化的祈求者——的恶性概念[15]。

共和主义者的部分传统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另外，共和主义者也接纳结社自由（associational freedom）的概念，所谓结社自由是指有机会以和谐群体模式采取行动的能力。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国家基于“社团”可能被描绘为反市场动力及扭曲市场动力等单纯理由，而无情挞伐结社自由。但唯有团体里的每一个伙伴都同等自信且都免于生存恐惧，共和政体才可能存在。这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重要国会议员之一卡特娅·基平（Katja Kipping）的立场。[16]

根据共和主义者的传统，一群人共同和谐展开商议并采取行动，就是自由的展现，而要达到和谐商议及行动，有极大程度取决于每个人参与时是否有尊严，地位是否平等。托克维尔以著名的手法，将之描述为早期美国民主制度的精髓（遗憾的是，目前已不复存在）。

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质上来说自由是取决于个人的。它代表消费者在不同选项之间选择的自由权，像是买A产品而不买B产品、接受A工作而不接受B工作、选择支持A政治偶像而不选择另一个政治偶像等。但共和主义式自由已超越这个层次，它主张由于我们能在政治上共同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是自由的。这是对抗自由至上主义（尤其是它的现代版本——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种种不节制的好论点。[17]

共和主义与结社自由还有另一个向来不怎么受关注的面向：限制权威者的权力与影响力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富豪或精英分子能借由他们一手掌控的操纵工具——包括媒体——来形塑公共议论甚至决策，那么自由就会遭到危害。

不管信仰哪一种版本的自由，基本收入都能强化这些自由。根据自由主义的传统，若要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标准，基本收入是必要且充足的。但根据共和主义传统，基本收入虽是必要的，却不能充足，需要适当增补其他制度与政策来共同促进自由。

基本收入将能强化以下林林总总的日常自由：

> ·拒绝从事繁重、枯燥乏味、低薪或纯属肮脏的工作的自由。
>
> ·接受以上工作除外的其他所有工作的自由（若纯粹考量财务需要，你可能不愿意接受那些工作，但有了基本收入后，你变得愿意接受那些工作）。
>
> ·即使薪资比以前少或财务安全感降低，却继续从事同一工作的自由。
>
> ·开创小规模事业（虽然高风险，但报酬潜力大）的自由。
>
> ·长时间为亲友从事照护工作的自由，或为社区从事义工活动的自由（若基于财务需要而必须长时间投入有薪的劳动工作，可能就无法自由从事这类工作）。
>
> ·从事各式各样创意工作与活动的自由。
>
> ·冒险学习新技术或职能的自由。
>
> ·免受官僚干预、窥探与胁迫的自由。
>
> ·建立关系及与某人成立“家庭”的自由——当今很多人因财务缺乏安全感而无法做到。
>
> ·脱离恶化关系或虐待关系的自由。
>
> ·养育小孩的自由。
>
> ·偶尔偷懒的自由，我们稍后将回头讨论这项重要的自由。

各种替代的社会政策能给予我们以上任何自由吗？就最低限度来说，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不应对行为自由产生任何影响，不能讲求道德主义、命令、胁迫或惩罚性。所以，目前世界各地采用财力调查式津贴的趋势，已违背所有自由概念，而基本收入则相反。

任何一个社会政策都必须适用两个普遍原则，尤其是宣称能取代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政策。第一个原则是：

家长主义检验原则（*the Paternalism Test Principle*）。如果一个社会政策强行控制某些群体，但社会上最自由的团体不受那些控制，那么，这个社会政策就是不公不义的。

命令一个人可以做什么或指导民众采取某种行为模式（而非其他〔合法〕行为方式）的政策，显然都违反这个原则。很多政治人物一方面宣称自己信仰自由，一方面却支持一些命令“穷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政策。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民主地被内嵌在

社会政策的现代结构中）主张，蓄意怂恿或操纵民众去接受某些选项而非其他选项，是“为民众好”或对民众最有利的做法。

但这么做不符合道德意识，因为那些“推手”虽把话说得冠冕堂皇，却没有说话算话。如果他们说他们指导民众选择的某个决定对民众最有利，那一旦结果不如预期，他们理当为那个结果负起责任，而不是那些被指导的民众要负责，换言之，国家理当要补偿那些领取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个以自由与社会正义为诉求的普遍原则就稍微复杂一点：

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the Rights-not-Charity Principle*）。唯有能促进领取人或被锁定的人群的权利或自由，而非助长提供者的裁决权或权力的社会政策，才是符合公义的社会政策。

基本收入能通过这种考验，而任何要求实际或潜在领取人必须符合特定行为条件的社会补贴计划，则无法通过。政治人物或公务员设想的资格条件限制多少都流于武断，而且多数那种条件都会导致相关人士产生很多不同的解读。而且裁决的权力经常都掌握在地方层级的官僚手上，贫困的人无疑会沦落为“祈求者”。

> “如果你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么你哪里的公民也不是。”
>
> ——特蕾莎·梅（Theresa May），英国首相，2016年10月

谁拥有享受权利的权利？公民的传统定义是“拥有权利的人”，而且这可能适用于各个层级的社群。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及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永久规定，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享有权利。所以特蕾莎·梅那一句挖苦的话是大错特错；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全都拥有人权。

然而，权利可分为很多层次，有些是世界性的，有些则是国家设定的，而且只在国内适用，有些只在特定地区内适用，有些甚至只是社团赋予其成员的权利和特权。以国家层面来说，最名副其实的权利就是人民有要求国家保障其生命的权利。还有很多权利一开始是以“主张权”（claim rights）的形式存在，那是要求社会应该朝实现某些目标的方向前进（而非反其道而行）的一种权利。基本收入就是其中一种主张权。

实际的疑问是：谁应该拥有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这个问题一部分属于道德疑问，一部分属于实际的务实疑问。在一个理想的未来乌托邦，我们可能会很愉悦地说每个人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拥有基本收入领取权。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必须聚焦在国家层面，尤其是目前还在打造与施行社会政策的民族国家。

典型的出发点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不过，这项权利是否应该扩大适用到在海外生活与工作的公民？多数倡议

者将相关的资格规定调整为：每个经常定居在本国的公民。那么，“经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针对这个用语设定一个明确的切实规定，例如公民必须将国家视为永久的居住地，或每年至少在本国居住六个月等。但无论如何，没有一个规定是完美的，每个规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流于武断的可能。

比较困难的是经常居住在国内的非公民的资格规定。将合法居民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但在设定权利的定义时，还是必须实际明确，例如，一旦某人合法居住在某个国家至少两年或取得永久居留权，他就应该符合资格规定。

就理想状况来说，基本收入应该是永久的，应该将之订立为宪法权利的一种。不过，主张这项权利确立后永远也不可撤销的立场，有可能阻碍政界对基本收入的接受度，而那将会导致政府打消进行基本收入实验的念头，或不愿意实施暂时性或分批导入型（取决于资格权利的变化、基本收入的水准或其他规定等）的基本收入。一开始就排除以民主决策方式来设定政策并不明智，导入短期（如五年）基本收入的做法甚至更蠢。因为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的人可能会出言反对，并主张短期基本收入称不上一种“权利”。不过，在特定期间内，它理当拥有相当于“权利”的地位，因为在那段期间，所有人的基本收入都不能被任意撤销。尽管如此，国家原则上还是应该将基本收入确立为某种终生的承诺，就算要调整，也必须经过民主程序。

权利的另一项特征是“不可撤销”，换言之，未经适当的法律流程不能撤销。基本收入的某个层面鲜少被强调：基本收入不能被扣押作为偿债用途。这是基本收入和某些财力调查式补贴的区别所在——财力调查式补贴可用来抵偿对国家的债务。

> “毫厘之差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
>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2010～2013年间，我参与了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一个大规模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项计划对九个村庄的全部（6000个）居民发放一笔小额基本收入。[18]其他相似的村庄则被选为评估该试点计划成效的对照组成员。很快我们就发现，基本收入所衍生的正面影响远远超过基本收入本身的金额所能让人想象到的成效。根本的理由是，对那些社群与家庭来说，金钱本身就是一种稀有商品。

如果人们需要的某种商品很稀少或很难取得，它的价格通常会上涨。举个例子，可用收入或储蓄非常少的人通常会被迫举借短期性的贷款来支应日常需要或意料之外的成本（例如医疗费用），而且这种短期贷款的利率通常非常高，这些人一定也经常必须牺牲某些保障来换取金钱。另外，他们无法把钱存在较高报酬的长期储蓄上，因为他们必须随时把仅有的稀少资源摆在身边，用以支应日常需要与突发性的事件。

在这些情境下，对所有家庭成员与邻居发放的基本收入就像是某种“不会违约”的保证，它让人们得以用更低廉的代价向专业放款人或邻

居借钱；相对地，商品或服务补贴（目前印度对穷人的主要资助形式就是这类补贴）、财力调查式或行为调查式有条件补贴等就不是如此，因为在定义上，那些补贴有可能被拒绝或撤销，而且并不是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对待。基本收入具有确定性（或几乎确定），故能降低领取人和领取社群的生活成本，因为在个人面临压力的时期，它让群体有了集体行动的空间。所以，就相似的金额来说，以基本收入的名义发放的钱，比财力调查式补贴发放的钱更有价值。

在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中，领取基本收入的人缩减债务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也因此他们较可能储蓄，某些人甚至在还没还清债务前就开始储蓄，因为他们了解到货币流动（monetary liquidity）的价值。[19]货币流动也让个人和家庭能更策略性地制定决策，让某些人以更低利率借到资金，进而在需要时购买小型设备、种子和肥料。

基本收入的解放价值不仅止于此。地主与放款人（通常是同一群人）一向善于利用货币经常短缺的状况来牟取利益，从而使低收入的村民陷入被债务奴役的深渊——由于无力偿还长期累积的债务，所以地主任何时刻都可以要求借钱的村民提供劳动力，作为还债的方法之一。一旦碰上收成期间，这样的状况常会导致小自耕农处理自家农务的宝贵时间遭到债主剥夺，贫穷的小自耕农也因此变得更加贫穷。所以，如果那类遭到债务奴役的人及他们的亲友能通过自身的基本收入，逐渐累积足够资金来换取自由，那会是相当令人乐见的。

解放价值不仅止于财务层面。在实施试点计划的某个村庄，所有年轻女性原本都戴着面纱，所以，她们必须在禁止男人进入的小茅房里拍摄办理身份证（领取基本收入必须使用身份证）所需的照片。不过，基本收入发放几个月后，我和研究团队的一名同事再去拜访那个村庄，发现当地所有年轻女性都不再戴面纱。我们问她们为何会有那样的转变，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解释，以前她们是遵从长辈的交代而戴面纱，但现在既然她们自己有钱了，就能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领取基本收入后，她们终于得以反制某种形式的文化支配力量，变得更有胆识，最后，她们的文化权也获得提升。这些年轻女性毅然决定卸下面纱后，得以更自由地参与村庄的生活，不再受制于他人的目光，更敢于正视他人，不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一点对共和主义式自由非常重要。

诚如先前提到的，若要实现共和主义式自由，基本收入的发放是必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条件。它能产生解放效果，但也非万灵丹。代言人（即代理人）的必要性依旧存在。长期以来，我一向认为最重要的两项保障是基本收入保障和代言人保障；若没有经济能力取得为个人与集体发声的资源，一个人就算有基本收入，一样可能容易受不合理的控制，丧失共和主义式自由。不过，在实施代言人保障时，也应对富豪与精英分子的势力加以限制，那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保障的必要因素。

根据这个脉络，20世纪有关基本收入的辩论中，最奇怪的面向之一是工会领袖竟是最激烈反对基本收入的一个群体。虽然某些重要工会思

想家事后也站出来支持基本收入，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习惯性的反抗行为并未消失。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某些反对立场导因于以下信念：基本收入将使雇主降低薪资支付金额。

我将在后续的另一个章节再度回头探讨这个论述。不过，重要工会领袖持反对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更让人坐立难安——他们私下表示那个原因和以下观点有关：如果工人有基本收入，就没有理由加入工会。这个观点反映出工会领袖的缺乏自信。事实上，诚如很多心理学研究显示的，拥有基本保障的人其实反而比较可能（而非较不可能）加入能代表其利害关系的团体。

最后，基本收入是一种民主化工具，因为所有公民都需要能够取得有助于他们实现自身权利的资源。[20]基本收入将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治（self-government）并建立均等的自尊心。早期的民主倡议者将民主化视为自由、平等与独立的普及化，其中，“独立”是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阐述的“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原则为基础。这个原则主张，除了为害他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在无须请求同意且无须担忧遭到惩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才算拥有自由。

这种独立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一种解放，当然，如果未能享有生存权利，就没有独立可言。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曾在1788年如此形容：“控制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力等于控制其意志的权力。”

虽然基本收入能促进实质的自由，但共和主义者式自由——即充分自由——的保证需要代理机构来实现。唯有通过能为集体与个别发声的制度与机制，才能实现所谓的充分自由，尤其是在个人处于脆弱与苦难之际。不过，即使基本收入可能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充分的自由，却是获得充分自由的必要途径。

注释：

[1].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R.Nozick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C.Murray (2006), In Our Hands: A Plan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C.Murray (2012), Guaranteed Income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The Foundation for Law, Justice and Society. P.van Parijs (1995),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Widerquist (2006), ‘Property and the Power to Say No: A Freedom-Based Argument for Basic Income’, Ph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3].E.Anderson (2001), ‘Optional freedoms’, in P.van Parijs (ed.), What's Wrong With a Free Lunch? Boston: Beacon Press, pp.75-9.

[4].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M.Zwolinski (2015), ‘Property rights, coerc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libertarian case for a basic income for all’, Independent Review, 19(4). J.Buchanan (1997), ‘Can democracy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2), pp.165-79.

[5].C.Murray (2014), ‘Libertarian Charles Murray: The welfare state has denuded our civic culture’, PBS Newshour, 10 April.

[6].Murray, Guaranteed Income.

[7].B.Linley (2016), ‘Gary Johnson is open to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that's not bad’, Libertarian Republic, 20 July.

[8].T.Prochazka (2016), ‘US libertari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pen” to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News, 18 July.

[9].Zwolinski, ‘Property rights, coerc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10].Cited in interview, T.Prochazka (2016), ‘Zwolinski: Basic income helps “protect freedom” ’, Basic Income News, 24 August.

[11].R.H.Thaler and C.R.Sunstein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2]即所谓的收入替代率。——译注

[13].P.Pettit (1997),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ettit (2007), ‘A republican right to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Studies, 2(2), pp.1-8. P.Pettit (2014), Just Freedom: A Moral Compass for a Complex World. New York: Norton. D.Raventos and D.Casassas (2005), ‘Republicanism and basic income: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from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the private sphere’, in G.Standing (ed.),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London: Anthem Press, pp.231-54.

[14].D.Casassas (2016), ‘Basic income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A new road to soci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2016.

[15]即财力调查式津贴。——译注

[16].K.Kipping (2016),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as affixed rate of democracy: Safeguarding the social freedom and economic power of all peo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17].For elaboration of this, see G.Standing(2009), Work after Globalization: Building Occupational Citizenship. Cheltenham: Elgar, Chapter 9.

[18].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19].G.Standing (2015), ‘Why basic income's emancipatory value exceeds its monetary value’, Basic Income Studies, 10(2), pp.1-31.

[20].C.Pateman (2006), ‘Democratizing citizenship: Some advantages of a basic income’,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101-19.



第四章

CHAPTER IV

基本收入能改善贫困、贫富差距与不安全感问题

>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本人及家人之健康与福祉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宅、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因失业、疾病、伤残、鳏寡、衰老或其他无法控制的情况而丧失谋生能力时，亦有权享受保障。
>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四条

支持基本收入最常见的主张是：基本收入是改善贫困的最有效方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最直接与最透明的方法，且行政成本相对较低。另一个主张和上述说法有关，但不全然相同：基本收入是一种提供基本经济安全感的好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今日这种市场导向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经济上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主要导因，而且，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同，无法以传统形式的保险来应对。

但首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设计不良或未能彻底落实的基本收入制度，有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比在现有社会保障计划下更糟。不过，这绝对不是基本收入的固有特质。

虽然很多人认为世界各地绝对贫困状况的减轻（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活水准逐渐提高）和全球化息息相关，但很多国家的贫困率（即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在上升。此外，全球化与2007～2008年金融崩溃后广泛被采用的财政紧缩政策，已使得工业国家数千万人口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在堪称世界最富裕国家的美国，竟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包括三百万名孩童——一天的人均现金收入（per capita cash incomes）不到两美元。[1]另外，诚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安·凯斯（Anne Case）所阐述，美国“因绝望而死”（deaths of despair）的潮流（自杀、服用过量处方药与非法药品、酗酒等）正愈演愈烈。[2]欧洲和日本的情况虽然稍微好一点，也相去不远。

尽管以全世界的整体收入来看，目前这个世界已达到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状态，但从目前的趋势观察，短期或中期内，收入匮乏的情况并没有消失的迹象。进入21世纪后，名义上的富裕国家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状况其实是恶化的，而非改善，而且无家可归的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这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控诉。

全球化与市场弹性政策和因全球化而起（或与全球化有关）的科技革命结合在一起，还制造了一个愈来愈庞大的危产阶级，这个阶级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高达数百万，他们生活长期缺乏安全感且逐渐失去所有形式的权利。[3]未来就算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上升（看似不可能），这些危产阶级也无法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这个世纪开始后的二十年间，危产阶级当然也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以相对观点来看，危产阶级几乎百分之百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输家，因为当前这种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利益，不成比例（甚至全部）地流向富

豪、精英分子与白领阶层的口袋。[4]

雪上加霜的是，创造就业机会这个老药方——“工作是脱离贫困的最佳途径”——愈来愈行不通，甚至产生反效果。为了提升劳动市场的弹性，各国政府或许可借由撤销劳动保障规定来提升职缺数量，但这么做的同时，却会让更多人变得更没有经济安全感。而且，让更多人变得愤怒，随时准备把坚持这种做法的政治人物扫地出门。

渐渐地，世界各地多数国家（包括所有富裕的工业国家）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不再是帮助人们脱离贫困的可靠路线。就实质层面来说，若考量价格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已停滞超过三十年，而且，未来预期应该会继续长期停滞。对危产阶级来说，实质工资甚至是降低的，而且起伏程度愈来愈大；一次不幸事件、一个失误或意外，都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沦落为真正的贫困阶级。

愈来愈多处于相对贫困与经济不安全感状态下的人没有能力脱离那样的窘境，就算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而就算是持续提高的税额抵减与法定最低薪资，也未能抑制这个趋势。总之，收入分配系统已彻底瓦解。

基本收入和多数替代方案不同，它是一种能改善贫困又不会污名化领取人的方法，换言之，它不会导致领取人成为乞丐或祈求者。诚如许多研究所显示，因申请目标锁定型的财力调查式福利而可能背负的污名，导致很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出于自尊心、恐惧感或无知而不去申请。尽管上述固有缺陷已人尽皆知，但政治人物却还是持续支持那类计划，实在可耻。

加拿大在曼尼托巴省多芬镇（Dauphin, Manitoba）进行的“Mincome”实验（详见第十一章，这是一个全民型计划）的结果，和上述污名化福利计划的结果呈现明显对比。[5]很多低收入者——包括失业者——出于污名的考量而未申请标准的“福利”，但他们欣然接受这种让低工资工人、失业者和社会救助领取人之间的差异变模糊的无条件最低收入支付。

接受这个实验相关问卷调查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欣然接受Mincome支付的原因是，这种支付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独立的、能够去工作，又无须忍受财力调查式福利那种侵入式且令人感到耻辱的申请程序。有一个人就说，那类侵入式福利导致“家庭背负了恶劣的形象”。另一个人则说Mincome“信任加拿大人，并让众人保有自尊”。

因为基本收入是全民且无条件的支付，所以它也避免采用一些用来区隔哪些穷人“理应领取”，哪些穷人又“理应不能领取”的标准功利主义“标签”，那种武断、不公平且应用成本高得荒谬的标签，是道德主义政治人物惯常采用的手段。

我们应该将“消除社会污名”列为较优先的理想目标，万万不该蓄意借由“污名”来阻碍穷人申请政府津贴，从而达到降低政府津贴成本的目的。另外，社会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停止为人们贴上“理应领取”或“理应不能领取”等标签的不光彩作为。

基本收入是最能有效改善贫困的方法，理由之一是它能克服“贫困陷阱”，且将改善“飘零陷阱”（Precarity Trap）。举个例子，英国某些已领取微薄政府津贴的人一旦从领取津贴的状态转而从事低薪工作，就会面临实质上高达80%以上的边际税率。这还只是官方计算的数字，如果把运输、保姆等因去工作而产生的成本纳入计算，税率会更高。

在丹麦、芬兰与德国等许多欧陆国家，这项边际税率甚至更高。如果中产阶级面临那么高的边际税率，早就发生暴动了！一般人多半都认同40%以上的税率会促使高薪资收入者想方设法地避税或逃税。相形之下，评论家却以“乞丐”甚至更难听的字眼来形容那些“继续领津贴”和为了不想支付80%税率而不接受低薪工作的穷人。

不管是左派或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都承认，由于基本收入的发放不考虑工作地位高低或其他收入的多寡，所以将能移除隐含在现有福利计划中的固有贫困陷阱。而在移除贫困陷阱的同时，基本收入也能增加人们接受相对低薪的工作或从事高风险个体户经济活动的诱因。

除了贫困陷阱，津贴发放的拖延也成了阻碍他们接受短期或非正式工作的因素之一，我称之为“飘零陷阱”。现代各种财力调查式津贴与有条件津贴的错综复杂，意味当一个人开始有权领取某项津贴后，也鲜少马上获得支付。此外，很多人可能不太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权获得救助——申请人可能要耗费非常多时间和精力填写冗长的表格，并回答许多侵入式的疑问，但到头来还是不太确定自己能否通过审核。而就算通过审核，为了能继续领取那些津贴，领取人还必须持续汇报实际情况来证明自己符合某些有损人格的条件。

这些陷阱、污名和阻碍，导致津贴领取率（take-up rates）偏低，某些捍卫这种制度的人热切且一厢情愿地将这样的现象，解读为“不去申请津贴的人就不需要或理当不应领取津贴”。而对最后终于领到津贴的人来说，担心再失去领取资格与害怕从头申请的那种恐惧，则导致他们不愿意接受非正式的短期低薪工作。

让我们以一个领取伤残津贴的英国人为例子来证明这个现象：

> 很多年前，我的健康状况自然好转。我一半的理智催促我勇敢面对，尽快走出家门并投入职场；但我另一半的理智却被这个制度特有的官僚障碍吓得不敢轻举妄动；那些障碍逼得我只能选择两条路：一是放弃这一笔对我攸关重大的津贴，指望靠一己之力赚钱来代替；二是对就业与国民年金事务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说谎，以便继续领取这笔津贴。后来，我的确外出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但当时我必须非常努力工作才能赚回失去的津贴，于是，最后，我再度堕落地去申请津贴，且从此没有再投入职场。[6]

作为一种权利发放的基本收入能排除最糟糕的贫困陷阱和这种飘零陷阱。它能减轻现有社会救助计划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人们不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例如去找一份工作）。基本收入也能降低人们

进入灰色经济（即地下经济）体系的不道德风险（immoral hazard），因为实施基本收入后，进入合法纳税经济体系的障碍就不是那么高。

尽管如此，我们能将基本收入宣传为一种根除贫困的方法吗？如果这么做，将会引来以下反击：实际上最初发放的金额将无法达到根除贫困的目的；而如果将基本收入的最初发放金额设定在足以根除贫困的水准，财政压力将会大到让基本收入难以获得大众与政治人物的青睐。

然而，如果设计得当，基本收入应该能降低贫困的发生率，减少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的人数，同时改善处于或接近贫困线的人们的贫困程度。基本收入将无法根除贫困，事实上，没有任何政策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基本收入应该能降低贫困对生活在仅略高于贫困线的人们的威胁。

举个例子，英国智库金巴斯集团（Compass）计算过，假定一个保留目前多数福利津贴的过渡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每周发给每个成人71英镑、每个退休老人51英镑（不含基本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每个孩童59英镑。以2015~2016年来说，这个制度一旦实施，落在收入分布最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有60%将多获得五分之一以上的支付，届时儿童贫困率将降低一半。[7]当然，这些数字都仅属说明性质，不过，从这些数字却可看出，即使只发放相当节制的基本收入金额，都能显著改善贫困。

反对发放基本收入的意见之一是，低收入的人会把基本收入挥霍在“私人恶习”（private bads）上，有时是出于无知，有时是出于意志薄弱（他们因为不良习惯或成瘾而无法抗拒这么做），有时则是因为“不良性格”。某些批判者更过火，他们暗示所有需要政府津贴的人可能都具备上述所有特质，但事实正好相反。

过去的几个现金转移计划与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经验显示，相关支付款项多半被领取人花在“私人良善用途”（private goods），例如子女的食物、医疗保健与就学费用等。不仅如此，多项研究更显示，由于领到基本收入或现金移转，领取人用来缓解困境或绝望状况的所谓“治疗公害”（又称为“补偿性公害”）——毒品、酒精与香烟等——的支出反而降低了，这些研究结果和一般人的成见恰恰相反。

相关情境有四个例子值得提出来探讨。利比亚当局从贫民区聘请了一群酒精成瘾者、毒瘾者和轻刑犯，每人无条件发给约等于两百美元的金额。三年后，相关单位访问这些人，以便了解他们把钱花到什么用途。答案主要是食物、衣物与医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纳闷，如果连这种人都没有随便挥霍基本收入补助，那还有哪些人会这么做？[8]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则报道了另一份在伦敦西堤区所做的研究。在当地，每到黄昏就会有一大群“神秘的无家可归者大军”出没。[9]一个名为百老汇（Broadway）的慈善机构找出其中338个人，这些人多数已成为游民一年以上，并进一步针对最资深的游民——在街头游荡超过四年——询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那些东西。相关的平均支出为794英镑。在参与这个活动

的十三个人当中，有十一个人在一年内就脱离游民生活。而这些游民被问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改变生活”时，没有人回答想要钱来买酒、毒品或用来赌博。有几个人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愿意合作的原因是，这么做让他们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机会，不需要再被迫住进青年旅舍。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的成本仅约为每年估计花费到每个无家可归者的医疗、治安及监禁成本——26000英镑——的极低百分比。

第三份研究是在美国进行，这份研究发现，相较于广受推崇的早期学前教育计划——如美国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直接发放给家庭的现金移转，对孩童教育的正面影响更大。[10]财务安全感很重要，它能减轻压力，并让双亲得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小孩、读书给他们听，带他们去博物馆等场所。

最后一份研究来自犹他州，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当局实施一项鼓舞人心的政策，给予无家可归者永久性的住所，而不是沿用长久以来的做法——仅给予暂时居所。最初的成本看似非常高，但最后其实省下更多钱。原因是，这个做法所带来的确定感，让那些游民得以重新融入社会，主管当局因此省下更多各式各样的支出，像是毒瘾戒除、抑郁症治疗等。后来，美国有数百个城市也如法炮制采行这项政策。诚如全美无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lessness）执行长所言：“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结果凭直觉就能得知。一旦获得安定感，任何人都能表现得更好。”[11]

观察家和评论人员经常预设穷人是“愚蠢”的、不理性的或没有能力做出理性决策。但某些发人深省的实验显示，穷人只不过是拥有的资源比较少罢了。无疑地，“信任”的结果有时难免会令人失望，但信任仍是引导社会政策的良好原则。此外，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做出坏决策的自由（虽然最好不要产生悲惨的结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那些坏决策里实验并学到教训。如果人们没有犯错的自由，就无法学习如何成功掌控自身生活。

整体收入及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经济体系有害，最重要的是对收入与财富最微薄的那一群人有害。近几十年间，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恶化，而且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都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严重水平。另外，也有强烈的证据显示，若贫富严重不均且持续恶化，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不尽然是坏事，不过一般人都把它当成坏事）并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倾向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就某个意义来说，它确实可以。如果政府支付每个人一笔相等金额，那么对低收入者来说，那笔金额占他们整体收入的比率会比较高。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留意：基本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将取决它的导入方式与相关财源的取得方式。

但也有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主张，基本收入会导致贫富差距状况恶化而非改善，让我们看看曾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的说法：

> 以UBI取代我国现行的扶贫计划，不仅无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反而会让情况更加恶化，不管它的设计有多么实在。我们的税赋与转移制度多半锁定位于收入分配下半部的人群，那代表这个制度能有效改善贫困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若以全民现金补助——也就是对所有美国人发放，不管他的收入有多高——来部分或彻底取代那个系统，这个系统可用以聚焦协助最底层人口的资源将相对减少，因此，这么做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而非改善。[12]

弗曼是根据某些偏颇的假设而提出上述说法。首先，基本收入不需要“取代”扶贫计划。基本收入的多数支持者并不提倡废除所有或多数扶贫计划，尤其是以解决某些特殊需求为目的的扶贫计划，像是对伤残者、病患与病弱者的补助。第二，即使我们接受现有计划“多半已明确锁定特定有需要的人”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令人质疑），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没被纳入补助对象，连弗曼本人都承认这一点。第三，通过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来锁定明确补助对象的做法，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恶劣影响，引诱或迫使人们采取与其最大利益相悖的行动，例如不去做真正值得做的事，而去上一些没有用的训练课程，或参加无济于事的求职计划。

无论如何，美国的社会政策支出的目标锁定成效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好。与此同时，花费在所得税减免和其形式补贴的支出，反而主要流入有钱人的口袋。很难理解为何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未能体察到以某种基本收入来“取代”上述某些补贴的好处，无论如何，弗曼的论点实在很站不住脚。

要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较理想的方式是先承认一个事实：由于21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然瓦解，故基本收入有实施的必要。目前国民收入流向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而且未来极不可能再度上升。而由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愈来愈高比例的职位不再能提供足以让人摆脱贫困或借由社会流动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工资或收入。因此，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收入分配系统，而基本收入必须在这个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根据以上脉络，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说法：

> 饼虽然愈来愈大，但如果我们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没有人敢保证所有人都将分到一口饼。事实上，我们认为若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并非每个人都能受惠。因此，我们必须研拟一套新的收入重新分配制度，再拟定一些新政策，把收入从受益于市场体系较多的人手上，重新分配到较少受这个市场体系“照顾”的人，以作为对后者的一种支持。发放全民最低收入就是收入重新分配的方法之一。事实上，我本人就非常支持这个方法，只要在实施这个方法的同时，知道如何防止处于市场体系较低阶层的人因这种收入的发放而失去工作的诱因即可。[13]

这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爵士提出的理论说明，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只对他的主张中使用“重新分配”而非“分配”字眼，以及他提出的最后一点略有微词。真正导致劳工因贫困陷阱与飘零陷阱的缘故而失去工作诱因的，是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补贴，不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反而能提高劳工的工作诱因。

当一个具备某种特质的人因直接或间接差别待遇而一贯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时，就会发生不平等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因身份因素而衍生的不平等可以说已多少有所改善，但矛盾的是，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却在恶化。法规与社会态度的改变已使得伤残、种族与种族划分、性别与性取向及多元关系与伴侣关系等歧视获得改善。不过要确保上述所有层面的平等，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以基本收入为基础的系统将非常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对每一个人发放等额的基本收入，最后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对高于只补助缺少赚取额外收入机会的人。不过，建立多层式系统是合理的，这样就能（也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对必须负担额外生活成本或是确实较缺乏机会赚取额外收入的人多提供一些金钱补贴，而这实质上就等于是补偿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互补的方式来看待基本收入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不仅是金钱收入的不平等，取得攸关良好生活的其他资产——安全感（包括物质与经济上的安全感）、优质时间、优质空间、教育和知识以及财务资本等资产——的渠道一样不平等。[14]

安全感是最枢纽的关键资产，但安全感的分配甚至比传统定义与衡量标准中的收入和财富更不均。有钱人可以购买物质安全感，而且他们几乎拥有全然的经济安全感。但危产阶级或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的人则全然没有安全感。基本收入能矫正这种慢性不平等的问题。

相似地，长期下来，控制权的不平等已变得非常巨大。收入与财富较高的阶层能彻底控制他们的时间，能付钱请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地，危产阶级则不太有能力（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即使无法达到全然或充分，基本收入还是能让人更有能力控制时间的分配，举个例子，财务压力的降低，将使人无须长时间工作或在非社交时间工作，以致牺牲与家人及社群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对每一个人非常重要且真实存在的不平等。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 ——孔子

支持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强烈理论基础是，基本收入将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是连续的安全感，这是其他所有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名言：唯有不安的人才是自由的。不过，若没有基本的安全感，人们就无法理性发挥他们的能力，任何人都不该期待缺乏基本安全感的人能理性发挥其能力。当然，如果太有安全感，人也会流

于漫不经心与怠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心显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

除此之外，显然以“经济安全感的需要”来为基本收入辩护，会比用“根除贫困的期望”来为它辩护更好。马丁·路德·金在他1967年的书《今后我们该怎么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里，相当精准地传达了和这一点有关的几个面向。

> 雨露均沾的经济安全感必然将促使人们产生许多正面的心理变化。当一个人掌握了和自身生命有关的决策，当他确信自己的收入很稳定且确定，以及当他知道自己有寻求自我提升的工具时，他将会感觉非常有尊严。当我们摒弃以金钱这种不公平的指标来衡量人类的价值，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个人冲突一定会逐渐减少。[15]

20世纪的福利国家试图以提拨型保险计划来降低特定不安全感的风险。在一个工业经济体，所谓“概率事件风险”——例如生病、公安意外、失业与伤残——的概率，确实有可能通过保险统计来估计，所以，当然可根据“对多数人适度合用”的原则来建构一个社会保险系统。

但在一个明显属于“第三纪”（tertiary）的经济体，从事与退出暂时性兼职与非正式就业机会的人较多，而且很多人在非固定的上班时间与地点从事很多无酬无职但和职缺有关的工作，前述这条提供基本安全感的路线已经瓦解。目前提拨的基础已经遭到侵蚀，受保障的人变少了，而为了取得或继续取得津贴而隐匿收入或经济状况的固有“不道德风险”，也促使各国政府以侵入与惩罚的方式，来回应“津贴遭到滥用”的观感，从而削弱这个制度的合法性。

然而，社会保险模型趋于式微的最重要原因是，今日的经济不安全感和20世纪中叶常见的那种经济不安全感完全不同，至少结构上不同。如今的慢性不安全感主要特色是不确定性。诚如经济学家所了解，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同，和“未知的未知”有关。

不确定性会伤害最根本的恢复能力——也就是应对冲击（意料外的负面事件）与偶发事件（会衍生成本与风险的常见生命周期事件，例如结婚、生小孩或死亡）并设法补偿与复原的能力。没有人能确定和理解各种冲击与偶发事件的影响，更不知道如果负面后果成真，应该怎么做最好，或许那是因为没有所谓的“最好”。风险可以用保险来应对（因为风险可量化），不确定性则无法。而基本收入能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保障，减轻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并降低个人或家庭因区区一场冲击或偶发事件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调查，除非向别人开口借钱或出售物品，否则几乎一半的美国家户没有能力随手拿出400美元，其中有些人根本一毛钱都拿不出来。[16]让我们通过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 换轮胎对我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只要到最近的轮胎店去修理

> 就好。不过，杰琳是个月光族，连110美元都没有。而因为车子的轮胎破了，她没办法去上班，所以老板要她卷铺盖走路。失业后她付不起房租，所以很快就沦为游民，一切只因为她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连（修理轮胎的）110美元都凑不出来。杰琳是在我担任食物布施志愿者时向我述说她的故事。她的经验是促使我支持基本收入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17]

基本收入能提供比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式社会保险计划更全面的安全感，因为那类计划未能普及到更多处于或濒临危产阶级的人们，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无法累积充足的提拨纪录，而且他们的收入不确定且起伏不定。基本收入将比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计划更有效改善安全感，因为财力调查式津贴计划只锁定穷人。这种津贴计划并未能提供事前的保障，因为计划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大规模的尊严剥夺、低津贴领取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污名等，都促使人们不敢去申请他们有权获得的补贴。

如今，经济不安全感的现象更全面化，情况远比福利国家全盛时期更严重，因为福利国家的运作是局限在封闭的经济体系，而且当时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就业状况都很稳定。相对地，生活在一个开放式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我们，则要处理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超乎我们掌控但又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决策，包括会直接影响邻里就业与生产状况的决策。更糟的是，这些决策的影响还因破坏力强大的技术变革，及蓄意牺牲劳动保障以换取雇主经营灵活度的劳动市场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

结果，上升的风险以及负面结果的成本全被转嫁给劳工与公民。此外，普遍低工资的现象意味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可能活在无力偿债的边缘，这当然也导致他们应对负面冲击或偶发事件的能力减弱，从中恢复的能力也降低，因为持续变迁的劳动市场、全球化与技术的影响等已导致社会流动的通道遭到阻断。过去二十年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非但没有让不安全感获得改善，还导致不确定性升高、人们恢复力进一步受挫。财力调查、行为调查、惩罚与津贴的延迟发放等，让人们承受更大的不确定性。很少人敢肯定地说自己是否有权接受或能否继续接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的津贴和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向。

全民、无条件限制且受制度保障的基本收入，能提供财力调查式津贴、行为调查式津贴或非全民津贴系统所无法提供的一种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有助于维持精神稳定，父母亲的精神稳定能感染到孩子，而孩子又能进一步将那种稳定感染给他们的朋友。

新自由主义者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怎么重视政府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不过，基本安全感是一种人性需求。最近一份研究显示，缺乏基本安全感不仅会伤害心理健康，也会伤害生理健康，进而引发各种不同的心理失序，并使短期的智力——也就是心智频宽（mental bandwidth）——降低。[19]当人们缺乏（或担心将缺乏）金钱或食物等必需品时，心智能量就会先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烦恼给消耗殆尽，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降低，当然也会做出更糟的决定。缺乏安全感也会导致自尊心受创，对自己与周围人的期望也会下降。[20]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到，长期缺乏安全感的人可能经常会做出很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至少不会做出合理或最适当的决定，尤其是和策略性或长期规划有关的决定。所以，坚持“唯有行为负责且表现良好的人应该领取社会津贴与救助”的主张，只会让社会问题变得更严重。

基本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包括所谓的“关系效应”（relational effects），如一旦财务压力降低，人际关系将更平衡且更放松。一份针对切罗基（Cherokee）部落家庭的孩童所做的研究发现，定期领取以该保护区赌场盈余支应的部落家庭，父母较少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不会为了钱吵架），而孩子也较少见焦虑与行为失序等状况，在学校的表现改善了，而且比较不可能犯罪。[21]

基本收入也能强化个人的恢复能力。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发展出“反脆弱”（anti-fragility）概念，这个概念和应对罕见事件（也就是他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有关。[22]他认为过度努力回避冲击是错误的，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需要有适度的波动性与崩溃（或许来自技术变革），当然也需要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准备的机制。

举个例子，某个看似拥有铁饭碗的大企业职员可能很容易会产生某种依赖感，所以，一旦他突然失去那份工作，就会形同遭遇一场大冲击，对他的心理与财务造成灾难。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就业保障比较低，那么他可能看似矛盾地较不容易受到类似冲击的伤害。因此，适度的不安全感的确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一旦冲击发生，他们就会更有能力应对且复原。不过，这个概念的关键字是“适度”。基本的安全感能提高复原力。

所以，心理学家对基本收入的看法，证明了拥有基本安全感对心理健康与理性决策是有益的。

给予人们安全感也非常有助于提高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23]举个例子，拥有基本安全感且参加工会的人将不那么害怕恐吓威胁。[24]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果基本收入真的能强化真正的工会团结，应该就会对工资产生正面的影响。尽管这可能让政治右派人士坐立难安，不过，好处是有经济安全感的人能成为更理性的交涉对手。

“强烈的个人主体感（sense of personal agency）”的实现与“基本收入保障”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今很多人都缺乏。

如果一个社会上存在权力、地位与财产所有权的整体分配不均，但又假装它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激进的愤恨种子就会开始萌芽。匮乏、屈辱、嫉妒、疏离与社会缺乏法纪等感受，将会酝酿不健康的政治冲动，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声承诺要“翻转现状”的政治人物。这个时代的经济赢家向来支持稳步强化财产权、支持国家提高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补贴，同时支持对资本、利润与食利者减税的政权，所以，这类经济赢家不该对上述的可能政治发展感到意外。

在上述脉络下，基本收入——即使只是推动基本收入的承诺——能让人合理预见到贫穷、不安全感与分配不均等可能得到改善的前景。基本收入代表着“赢家通吃”的心理与制度皆已至穷途末路。

但期待基本收入能根除贫困，就有过度期待之嫌。基本收入确实非常有助于朝那个目标前进，但距离那个目标还非常遥远。不过，在审慎看待根除贫困的目标之余，我们也可怀抱更有野心的态度：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基本收入确实有助于改善贫困与分配不均问题，尤其若能搭配其他社会政策，包括对诸如伤残者或面临结构性额外生活成本的人加发补贴等，基本收入的效果会更好。

基本收入也不可能解除所有形式的经济不安全感。然而，它能让更多人拥有基本安全感，并让他们对自己的社群产生归属感。这些是每一个社会都想具备且可视为“良善”的特质。

不管根除贫穷有多么重要，基本收入最终不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实现其他重要的目标：包括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不管发放多少金额，基本收入都有助于接近这些目标，只不过金额愈高效果当然就愈大。

建构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改变思维，这个制度必须赋予安全感，能让我们在“为自己、家人和社群创造良善生活”与“保护大自然的永续生存及美景”等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安全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如果真心想要建构良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蓄意借由他人的不安全感来获取利益的特权精英群体得以扩展势力范围的社会，就应该将“安全感”列为目标之一。“希望让他人也拥有你想要的东西”需要勇气，而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义。

注释：

[1].K.J.Edin and H.L.Schaefer (2015), 2.00 a Day: Living on Almost Nothing 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A.Case and A.Deaton (2015),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112(49), pp.15078-83.

[3].G.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4].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5].D.Calnitsky (2016),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The Mincome experiment, stigma, and community exper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1), pp.26-71.

[6].E.Martinson (2016), ‘View from a Reg reader: My take on the basic income’, Register, 29 December.

[7].H.Reed and S.Lansley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London: Compass.

[8].C.Blattman and P.Niehaus (2014),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how-them-money.

[9].The Economist (2010), ‘Homelessness: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en’, The Economist, 4 November.

[10].G.J.Whitehurst (2016), ‘Family support or school readiness? Contrasting models of public spending on children's early care and learning’, Economic Studies at Brookings, Evidence Speaks Reports, 1(16), 28 April.

[11].J.Surowiecki (2014), ‘Home free’, New Yorker, 22 September.

[12].J.Furman (2016), ‘Is this time differen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mark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t AI No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the Near Term, New York University, 7 July.

[13].Remarks by Christopher Pissarides at the 2016 World Economic Forum meeting in Davos, January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Ns2MYVQoE.

[14].Standing, A Precariat Charter.

[15].M.L.King (1967),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6].N.Gabler (2016),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The Atlantic, May.

[17].G.Tsipursky (2016), ‘Free money is not so funny anymore: Confessions of a (former) skeptic of basic income’, Salon, 21 August.

[18]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之一。——译注

[19].S.Mullainathan and E.Shafir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London: Allen Lane.

[20].World Bank (201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Mind, Society and Behaviou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1].M.Velasquez-Manoff (2014),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New York Times, 18 January.

[22].N.N.Taleb (2012), Antifragile: How to Live in a World We Don't Underst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3].M.Abu Sharkh and I.Stepanikova (2005), Ready to Mobilize? How Economic Security Fosters Pro-Activism Attitudes Instead of Apathy. Socio-Economic Security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4].G.Herman (2016), ‘Unions are changing and that should give us cause for hope’, Unio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 2016. https://usilive.org/opinions/36811/.



第五章

CHAPTER V

支持基本收入的经济理由

虽然我认为支持基本收入的主要理由是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但基本收入制度也将带来几个经济上的利益，包括较高、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周期更趋稳定，而且能保护经济体系免于受因破坏性技术变革而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潮伤害。

基本收入的发放对经济增长将有何意义？虽然我们不尽然能将经济增长本身视为全然有益的，但全民基本收入体系应该能带来几个正面的经济影响：流入经济体系的额外资金将能提高总体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前提是经济体系不存在严重的供给限制。就算基本收入的发放只是代替了其他公共支出，它还是能提振需求，因为基本收入将使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上升，而相较于手头较阔绰的人，低收入者更倾向会花费领到的钱。

基于相同的理由，基本收入也能减轻因“振兴总体需求”而起的国际收支失衡。相较于低收入者，较高收入者倾向于购买较多进口商品（以及诸如海外旅游等进口服务）。因此，基本收入所刺激的经济成长，将较不可能导致本来就无以为继的国际收支赤字恶化，因为额外的支出多半将流向本地商品与服务，而非“奢侈”的进口品或服务。

不过，有一个反对的论述主张，如果基本收入是额外的货币，就会制造通货膨胀压力。我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回应这个反对意见，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说，这个论述是一种“单方面”的经济推论。原因是，额外货币所衍生的新增需求可能会促使商品与劳务供给增加，这进一步将制造更多工作机会，并通过“乘数效果”（multiplier effect）使收入、消费能力与生产进一步增加。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提升消费能力”已成为各个工业国家忧心的问题之一，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不再能跟上生产产能的扩张速度。在过去，当生产力上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工资就会上升，并进一步刺激总体需求（消费）。但如今这样的模式早已不复存在，生产力的上升并未使平均工资同步上升，而这也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1]

各国政府可以尝试继续沿用老旧的收入政策，与劳工集体协商调整工资。不过，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这种政策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是在广泛试验这个政策的20世纪60年代，最后成果顶多也是好坏参半。取而代之地，陷入工资停滞或降低窘境的家户，将不得不诉诸更多的信用和债务，最后导致经济体系愈来愈容易受债务泡沫破灭伤害。2007～2008年的大崩溃就是债务泡沫破灭造成的，而那样的状况随时可能重演。所以，基本收入制度将是维持高总体需求并让经济体系不那么脆弱的一种方法。

在考虑基本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人鲜少注意到基本收入对小型企业与创业者的影响。[2]基本收入对他们绝对有帮助：拥有经济安全感的人会更愿意承担创业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投资失利，最后还是有基本收入可依靠。以发展中国家来说，事实证明基本收入与现金转移能对创业精神产生正面影响。[3]在印度中央邦，基本收入的发放和新创业活动息息相关。[4]而在工业化国家，基本收入能为愈来愈多非自

愿自雇者、独立合约型工作者以及怀抱创业雄心的人提供根本的安全感。更广泛来说，基本收入能鼓励人们积极寻找与自身技能和动机相符的受训与就业机会，而不只是为了糊口而屈就。这样的状况有助于促进人才的有效重新配置，同时提高工作投入度，从而使经济体系变得更有生产力。举个例子，在美国，员工不够敬业的问题使生产力降低，据估计，相关成本大约五千亿美元。[5]

基本收入制度也能鼓励人从有薪“劳动”转向无薪“工作”——照顾孩童与老人，从事更多义工工作、社区工作，并花更多时间在个人发展上。另外，基本收入也能降低政府为提振就业状况而不得不创造就业机会（包括消耗资源与制造污染的产业）的压力。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基本收入将促使各项活动朝保护生态与社会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传统的凯恩斯学派论述偏好以福利国家——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担纲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稳定因子。当经济一片繁荣，通货膨胀压力日益上升，福利津贴相关的公共支出就倾向于降低，因为此时需要救助的失业人口较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与其他津贴的支出则倾向于上升，这是为了刺激需求与就业。

但现有福利制度扮演总体经济自动稳定因子的能力已明显降低，因为这些制度不断朝财力调查与有条件救助的方向倾斜，使得社会保险的保障程度遭到侵蚀。另外，隐藏在财政紧缩计划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思维——目标是平衡预算与缩减公共债务——也促使各国政府蓄意在经济衰退时期缩减公共支出。

单纯的基本收入将能扮演某种形式的经济自动稳定因子，因为它能让经济衰退时期的购买力提高。然而，我在一些场合提议建立多层式（multi-tiered）的制度，就是在适当金额的固定基本收入之外，增加一个“稳定化”补助金。[6]这个稳定化补助金的金额（基本上将随着经济的状况而起伏）可以由一个超然独立的基本收入政策委员会（沿袭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模式）来设定。

稳定补助金本质上将是公平的。当就业机会充沛时，人们有更多机会赚取更高的薪资收入，故此时发放较低金额的基本收入是合理的。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放较高的稳定补助金，将能补偿整体“机会收入”（opportunity incomes）的降低。

相反地，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要求失业者努力去追逐就业机会，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机会供给量本来就比较短缺。津贴计划要求领取人证明自己确实已持续不断地勤奋寻找工作机会，实质上会降低领取人的收入，因为找工作需要花费时间、金钱与信心成本，在一个没有工作机会的环境，那样的计划等于是迫使人去从事潜在报酬极低的活动。

未设定求职证据条件限制的稳定补助金制度有三重优点：它扮演经济体系的自动稳定因子、对领取人来说较不具侵入性、较不武断，以及节省公共支出——无需设置审核与惩罚弱势群体的官僚机构。

有趣的是，澳洲政府为响应2007～2008年金融危机，对退休人士、低收入家庭的照顾者与孩童等发放一千澳元以上的一次性补助金，作为

刺激家户消费的策略之一。结果，这个对策奏效了，澳洲是少数及早摆脱经济衰退的工业国家之一。虽然那些补助金并非基本收入——因为只发给特定群体——这个计划却经由对数百万人发放额外可供消费的现金，而展现了提振经济的效率。[7]

在2007～2008年金融崩溃后，最早从日本开始实施（后来有更多国家实施）的反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各国错失了分阶段导入基本收入计划的机会，连短期的基本收入计划都未实现。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与欧洲央行等，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QE），投入了数百亿甚至千亿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到金融市场，期许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多半没有成功。

如果当初各国政府把上述QE金额的某个适中比率拨作基本收入的财源，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应该会更高，造成的累退税效果也会比较低，而且，那显然是财政上较负担得起的。其实，当时有几个经济学家提议这么做。[8]美联储实施的45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足够对美国的每个家户发放56000美元。相似地，如果英国把花在量化宽松的3750亿英镑用来发放基本收入，每个合法的英国居民理当可连续两年每周领取50英镑。但取而代之地，那些量化宽松政策只肥了金融家，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并使得原本已迫在眉睫的退休金财源不足危机变得一触即发。[9]

直接发钱给民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概念，最初是弗里德曼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里提出，他以“直升机撒钱给大众”的比喻来阐述这个概念。[10]另外，美国债券投资人比尔·葛洛斯（Bill　Gross）以及经济学新闻工作者马丁·沃夫等人也一向建议采用“直升机撒钱”的做法——也就是印钞票分配给民众。

但“直升机撒钱”这个用语有一个缺点，它令人联想到一个不堪画面：很多人争先恐后去抢夺从天而降的钱，而动作最快且最强壮的人将抢到最多。自由至上主义者可能自然而然会将它视为一种类达尔文主义观点，不过，其他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基于平等权而定期发放适当金额的系统化基本收入，将是比较公平、有效率的。

菲利普·范·帕雷斯在一份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创新提案中，提议借由征收20%的增值税作为财源，[11]每个月平均发给每个欧盟居民（当然是指合法居民）两百欧元，这个提案吸引了欧盟各国的广泛兴趣。这个提案的总发放金额将约等于欧盟GDP的10%。

欧元红利将有助于提供欧盟目前所欠缺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已存在的两个缓冲机制。第一个是劳工为应对不均等经济发展而跨州迁移的容易度。目前欧盟的跨国境移民随着其会员国增加而上升，不过，移民依旧受到语言及其他障碍的限制，这个现象和某些政治人物与媒体权威的夸大说法呈现极大反差。第二个缓冲机制是半自动跨州转移；当某一州的经济衰退，联邦对该州的转移金额就会上升，它对联邦政府的税捐也会降低，这可充当一种稳定政策。

欧元红利将提供一种稳定机制，有助于防止低收入区域的人向外迁移。另外，欧元红利也象征着欧洲整合的一种利益，它传达一项重要的

讯息：欧洲联盟绝对不仅是单一的市场和官僚监理机关。

近年来基本收入的话题性转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在硅谷革命不久后，自动化与机器人将大量取代人类劳工，进而衍生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我们很难说这个观点对或错（或者对错参半）。马丁·福特（Martin Ford）、尼克·瑟尼赛克（Nick Srnicek）、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以及保罗·梅森（Paul Mason）等人在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书里主张，“失业未来”（jobless future）使得基本收入变得不可或缺。[12]相同的疑虑也促使硅谷及其他地方的科技巨擘纷纷加入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行列。

明星债券投资人比尔·葛洛斯也挺身而出支持基本收入，因为他认为机器人的盛行将导致“工作的终结”。[13]2016年7月，白宫甚至举办了一场以自动化与基本收入为题的脸书直播圆桌论坛，只不过，那年12月，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的一篇报告断然否决了这个想法，那篇报告的立论似乎是以该委员会的主席在此前六个月发表的关键评论为基础，我们已在第四章剖析过他的评论。[14]

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以下简称SEIU）前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是改变信念并认同技术性失业观点的一位重要人士，也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基本收入的重要工会人士。[15]斯特恩在2016年的一本美国畅销书里声称，在追求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的社会风气下，最终将有58%的就业机会转为自动化。他向美国媒体集团彭博社（Bloomberg）表示：“这和汽车与钢铁产业的没落不一样，那两个产业的没落只打击到国家的某个部门。但自动化的影响将会非常广泛。届时人们将了解到，那将不只是一场风暴，而是一场海啸。”[16]

然而，我们有很多理由对“失业未来”或甚至“工作的终结”等未来预期抱持怀疑的态度。最新版本的“劳动合成误谬”（lump of labour fallacy）概念主张，需要完成的劳动和工作量是固定的，所以，如果更多的工作或劳动可被自动化或通过智能机器人完成，人类劳工就会成为累赘。但无论如何，鲜少的工作可彻底自动化。有一份经常被引用的研究提到[17]，美国接近一半的工作有可能因自动化而消失，但这样的说法遭到OECD等机构的质疑，根据OECD的数据，“岌岌可危”的就业机会仅相当于工业国家总就业机会数的9%。[18]

话虽如此，未来就业机会的本质一定会改变，甚至可能会快速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我本人并不相信“失业未来”（更遑论“零工作的未来”）会发生，但技术革命确实导致贫富差距严重恶化，它对收入的分配产生极深远的累退税效应，因为绝大多数的利润都进了势力强大的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口袋。这正是我们主张应建构一套新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理由，而且我们主张应该以基本收入来作为这个制度的支柱。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回头讨论相关的论述。

所谓“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破坏性特质，看起来也比先前几次大变化来得更加广泛，那几次变化的确重创了低技术人力就业机会，[19]但目前不仅是低技术层次，所有层次的就业机会与职业都受到影响，因这些影响而起的经济不确定性势必会导致不安全感更加弥漫；这一切证明“实

施基本收入是重建经济安全感的唯一可行途径”的呼声是正确的，因为基本收入的实施等于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来限制那种经济不确定性。

《经济学人》曾主张，尽管基本收入或许是解决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好办法，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推行基本收入的必要，它的说法是：“基本收入是一个解决某个尚未发生的问题的答案。”[20]然而，这样的说法等于假设唯有发生技术性失业，基本收入的推行才有理论依据可言；而一如本书第一章试图解释的，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其实是基于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理由来为基本收入辩护——他们主张，发放基本收入是解决经济不安全感、社会不正义与不自由的唯一可行方式。

尽管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测技术变迁绝对会导致人类劳工遭到大规模取代，但那样的可能性终究是无法排除的，而且，这样的忧虑与想法可能会渐渐形成一个约定成俗的观点。另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会继续导致贫富差距恶化，并通过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严重的破坏力，让很多无辜者遭受这种非战之罪的打击。在这些情况下，现在就导入基本收入制度，应该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合理做法，也是应对目前已显现的破坏与贫富差距的公平方法。

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公司总裁山姆·阿特曼针对他将部分资金分配给某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详见第十一章）的做法提出辩护，他的理由是，我们有必要知道如果“失业未来”成真，基本收入也开始实施，人们会有何响应。他向彭博社表示：“我相当有把握，到未来的某个时点，随着技术继续淘汰传统的就业机会与大量新财富被创造出来，某种全国性的此类计划（基本收入）一定会实施。”[21]他还在另一场访问中表示，那个时间点将落在“至少十年后”但“不超过一百年”。[22]

然而，眼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收入分配，而不是人类就业机会突然消失。确实，这可能是史上第一场将创造更多工作的技术革命（尽管它的确导致支薪劳工陷入混乱并遭取代）。[23]不过，这场革命也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万维网（World Wide Web）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表示，他支持以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工具来修正因技术变革而起的大规模贫富差距，[24]备受推崇的物理学家暨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也是。[25]连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深经济学家都归纳出一个结论：因技术革命而恶化的贫富差距，代表“以征收资本税（capital taxation）来作为基本收入财源的好处变得愈发显而易见”。[26]基本收入将是一种方法，确保所有人都能受惠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另外，基本收入制度的经济回馈效应有可能庞大到促使实施基本收入的净成本降低。举个例子，现金转移计划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证据显示，现金支付能改善营养与健康状况，尤其是婴儿和孩童的状况，另外，向来在家庭预算的优先考虑上屈居弱势的病弱与伤残者的营养及健康状况也改善了。在加拿大，一份针对老年人保证年度收入所做的七年期研究发现，食品不安全（food insecurity，又译为“食品缺乏保障”）的现象大幅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自然也改善。[27]一份追踪母亲退休

计划（这是美国政府赞助的第一个福利计划，期间自1911年至1935年）申请者子女的研究发现，申请成功者的子女的寿命较长，也接受较多学校教育，而且不太会有体重过轻的问题，另外，这些孩子成年后的收入也比母亲被驳回申请的子女高。[28]

另外，还有强烈的证据显示领取人心理健康得到了改善。加拿大一个近似基本收入的知名实验（将在第十一章讨论）使医院许可入院的精神病患数减少，因意外与受伤住院的人数也降低。[29]而诚如第四章讨论过的，领取基本收入的切罗基部落家庭孩童较少出现情绪与行为失序问题，且根据这些家庭的双亲所提报的数据，他们的伴侣的毒品与酒精服用量都降低了。[30]这种种好处都倾向于使其他公共支出降低，包括公共医疗、犯罪司法系统以及社会支持服务等支出。

贫富差距与经济不安全感对精神和生理健康的影响至为巨大，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而这些不良影响对公共部门与个人来说，成本都非常高。基本收入制度虽无法大幅度降低那些成本，却绝对有帮助。

注释：

[1].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G.Crocker (2015), The Economic Necessity of Basic Income. Mimeo.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62941/1/MPRA_paper_62941.pdf.

[2].B.Nooteboom (1987), ‘Basic income as a basis for smal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5(3), pp.10-18.

[3].M.Bianchi and M.Bobba (2013), ‘Liquidity, risk,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pp.491-511. C.Blattman (2013), ‘Can entrepreneurship transform the lives of the poor (and how)?’, chrisblattman.com, 30 May.

[4].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5].S.Sorenson and K.Garman (2013), ‘How to tackle U.S.employees' stagnating engagement’. Gallup, 11 June.

[6].G.Standing (2011),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grants’, Policy & Politics, 39(1), pp.9-25.

[7].T.McDonald and S.Morling (2011), ‘The Australian economy and the global downturn. Part 1: Reasons for resilience’, Economic Roundup Issue 2. Canberra: Treasu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8].Standing,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A.Kaletsky (2012), ‘How about quantitative easing for the people?’, Reuters, 1 August. 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M.Blyth and E.Lonergan (2014), ‘Print less but transfer more: Why central banks should give money directly to the peopl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V.Chick et al. (2015), ‘Better ways to boost eurozone economy and employment’, letter to Financial Times, 27 March. A.Turner (2015),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On the latter, see J.Authers and R.Wigglesworth (2016), ‘Pensions: Low yields, high stress’, Financial Times, 22 August. On the general failings of QE, see 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Chapter 3.

[10]. M.Friedman (1969),‘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ldine, pp.1-50.

[11].P.van Parijs (2013),‘The Euro-Dividend’, Social Europe, 3 July.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3/07/the-euro-dividend.

[12].M.Ford (2015),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N.Srnicek and A.Williams (2015),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London: Verso. P.Mason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13].B.Gross (2016),'Culture clash', Investment Outlook, Janus Capital Group, 4 May.

[14].N.Hines (2016), 'Robots could mak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necessity', Inverse, 11 August. J.Furman (2016), 'Is this time differen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mark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t AI No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the Near Term, New York University, 7 Jul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6),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15].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6].Cited in N.Lee (2016),'How will you survive when the robots take your job?', Engadget, 19 August.

[17].C.B.Frey and M.A.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18].M.Arntz, T.Gregory and U.Zierahn (2016),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89.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K.Schwab (2016),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The Economist (2016), 'Basically flawed' and 'Sighing for paradise to come', The Economist, 4 June, pp.12, 21-24.

[21].Cited in Lee, 'How will you survive?'

[22].C.Weller (2016), 'The inside story of one man's mission to give Americans unconditional free money', Business Insider UK, 27 June.

[23].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24].T.Berners-Lee, interviewed by The Economist (2016), 'The Economist asks: Can the open web survive?', Economist podcast, 27 May.

[25].A.C.Kaufman (2015), 'Stephen Hawking says we should really be scared of capitalism, not robots', Huffington Post, 8 October.

[26].A.Berg, E.F.Buffie and L.-F.Zanna (2016), 'Robots, growth, and inequality', Finance & Development, 53(3).

[27].N.Yeretsian (2016), 'New academic research shows that basic income improves health', Basic Income News, 11 November.

[28].A.Aizer, S.Eli, J.Ferrie and A.Lleras-Muney (2016), 'The long-run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to poor famil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pp.935-71.

[29].E.L.Forget (2011),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sing health administration data to revisit outcome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https://public.econ.duke.edu~erw/197/forget-cea%20(2).pdf.

[30].R.Akee, E.Simeonova, E.J.Costello and W.Copeland (2015),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56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1562.



第六章

CHAPTER VI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

> “这是一个彻底疯狂的制度。”
>
> ——约翰·凯伊（John Key），新西兰总理，2015年2月
>
> “这是长久以来我听过最彻底荒谬的想法之一。”
>
> ——布亚尼·本尼迪克森（Bjarni Benediktsson），冰岛财政部长，2016年9月

多年来，持续有很多人针对基本收入概念提出反对意见，尽管赞同阵营提出不少反驳论述和证据，反对者还是像跳针的唱片一样，反复不断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财政负担能力将在下一章讨论，第八章则将讨论与劳动力供给及工作有关的反对意见，而这一章要先讨论的是其他反对意见，而以下各项反对意见的排列顺序不代表重要性高低。

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n）在他的《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书中指出，任何伟大的新颖社会政策概念——或在提出时被视为新颖的概念——最初一定会被冠上“轻浮无益”（不会产生作用）、“堕落”（将产生非蓄意的负面后果）与“危险”（将会危及其他目标的实现）的恶名，饱受攻击。[1]

早在20世纪初，这些抨击性论述就曾被用来反对失业津贴相关的提案，在20世纪30年代也被用来反对家庭津贴以及后来的美国社会安全计划（老年退休金）等提案。不过，等到上述政策推行后几年，这三大批判便不见踪影，取而代之地，世人改以某种意味“必然性”与“常识”的修辞来描述那些政策。有鉴于此，我们至少应该质疑，以下这些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是否和那些批判一样站不住脚。

基本收入的批评者强调，由于到目前为止，基本收入从未在任何地方实施，所以这个制度势必“隐含根本的缺陷”——这是《经济学人》某一篇文章里的说法。综观历史，所有新政策都曾遭遇这样的批评。反对者基于这个理由反对基本收入毫无道理可言。

以基本收入来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反驳这项批判意见：首先，时间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已尝试过其他所有能为人民提供经济安全感的政策，但结果显示那些政策仍有不足；第二，今日的社会已经拥有落实基本收入的制度性与技术性工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是最常见的反对意见，而且，这个意见衍生了非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确实值得我们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如果政府真的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成本，这个话题将就此打住。不过，太多批评者都犯了草率论断的毛病，含蓄地暗示基本收入支持者很蠢，连简单的数学都不会算。

但我们要反问那些质疑者：“如果政府在合理范围内看起来有能力负担某种基本收入，你是否会支持发放基本收入？”换言之，宣称政府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那些人，有没有可能是基于其他较不具说服力的理由而

反对发放基本收入？

这是政治左派评论家以及温和专制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捍卫者常提出的批判。我们必须再次声明，不管某些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倡议什么样的理念，基本收入的实施并不代表公共服务的废除，它也不会取代所有其他福利津贴。相对地，应该将基本收入视为某个新收入分配制度的“地板”，与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务及津贴并存。

在我撰写这一章的草稿时，公民收入信托（Citizen's Income Trust）的成员之一向某个角逐伦敦自治市市长的工党候选人提问，希望了解他对基本收入有何想法。这个候选人轻蔑地回答：

> UBI，这是个有趣的想法，不过，基本上它是保守党设计出来消灭福利国家行政机关的，它一旦实施，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将被削减。问题是，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能促进经济体系的需求。我也担心基本收入将引发通货膨胀，最后导致穷人待在原地，却让已拥有就业保障的人获得额外的收入。[2]

我们稍后将讨论“基本收入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在此，我们要先厘清这个市长候选人念兹在兹的“公共部门就业机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职位？想必他是指负责审核各项津贴的低薪官僚职位——也就是为了判断申请人是否“理应”领取财力调查式津贴而窥探申请人生活的低阶公务员，或是某种有条件支付制度下，负责以有损人格的约见方式厘清申请人（只要申请人迟到五分钟就会加以惩罚）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条件的公务员。这些官僚难道找不到（或不能被安排去从事）其他更能善用其时间、精力与“技术”的工作吗？实质上来说，那个政治人物以及他的很多同路人反对为平民百姓提供基本安全感的原因，说穿了就是为了保护那些试图否决对人们发放津贴的公务员的就业机会！

讽刺的是，以基本收入会摧毁福利国家为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却倾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而我们应该提醒这些反对者，当年最先导入社会保险的俾斯麦以激烈的手段来压制的，正是这些反对者意图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他禁止人们信奉社会主义，并将他们的领导人物逐出普鲁士的各大城市。所以，逻辑上来说，基于“基本收入倡议者乃社会主义的死敌”这个错误观点而反对基本收入的那一群人，应该也要反对老牌福利国家的根本基础[3]才对。

但无论如何，诚如第四章提到的，贝弗里奇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模式在一个充斥着愈来愈多危产阶级的开放式弹性经济体系根本行不通。然而，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基于自己不喜欢的人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而支持或反对一项政策。

确实很多人像赫希曼所分析的那样，为基本收入扣上“危险”的大帽子，对这样的观点，有几个方式可加以反驳。首先，我们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世界还有实现其他进步主义政策的压力吗？目前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与水平几乎前所未见，经济不安全感弥漫，充分就业被重新定义为大约5%的失业率，这还不包括遭到不适用的劳动统计数据

蓄意掩盖的许多“未充分就业”人口，最重要的是，主流政治势力迄今还是不重视日益庞大的危产阶级。

第二，为什么要把“充分就业”视为一种进步主义政策？尽可能将最多人塞进各种从属于不同“老板”的“就业机会”，究竟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事实上，很多（甚至大多数）就业机会都很乏味、让人变蠢、有损人格、令人孤立或甚至危险。基本收入至少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的本质，因为它让更多人有能力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就业机会，或可以就投入特定工作而要求更高的薪资。

第三，有什么理由说基本收入会导致我们偏离其他进步主义政策？为什么不说基本收入能成为那类政策的必要基础？发放基本收入有可能强化人们积极采取行动的决心，所以反而更可能促进其他进步主义政策。此外，一如“充分就业”，某些长久以来被视为有助于促进进步的政策经更严格的检验后，证明一点也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较受欢迎的基本收入替代方案，不过，没有理由假设基本收入会阻碍我们追求其他目标。

批评者通常主张基本收入倡议者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以为只要给穷人更多钱就能有效解决穷人的所有问题。其中一个类似的批评主张：

> 进步论者（progressives）与自由至上主义者不愿承认很多穷人和失业者缺少的不只是现金；这些穷人和失业者或因毒品、酒精成瘾，或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受苦，或有犯罪前科，或者难以在一个复杂社会里与人正常相处。换言之，他们或许很需要金钱，但金钱本身并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病害。[4]

当然，金钱确实无法解决那些病害，通情达理的基本收入拥护者当然也相信现金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收入并非解决社会所有病害的万灵丹，而且，以这个基础来评断基本收入也不公平，毕竟那些批评者并没有依据相同的标准来评断其他社会政策。诚如第四章提到的，基本收入可能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对金钱的焦虑常是直接因素，尤其是孩童。不过，要解决社会病害与脆弱，应该使用量身打造的公共社会服务措施，而非社会保障政策，因为我们必须体认到，所有人——不是只有“穷人”——都可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需要支援。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本能反应之一是：为什么要发钱给不需要钱的人？诚如某个批评者所写：“如果要改善贫富差距，发较多钱给较没有钱的人（而不是发相同金额），效果会比较好。”[5]批评者常根据这类主张提出补充意见：自动发放基本收入给每一个人，相关成本将会过高，后果令人难以想象。关于这样的批评，以下是三个反驳意见：

首先，如果基本收入被视为某种“社会红利”，就应该把整体社会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公共粮食和财富作为一种属于全民的权利，并将它分配给每一个人或公民。权利必须是全民皆享有的，否则就称不上权利。对每个人发放均等金额的效果，绝对比只发放相对较高金额给低收入者的

效果更好。

第二，就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对每个人发放基本收入再借由向较富有的人课税（见下一章的“一位教授的脑筋急转弯题”短文）以取得基本收入财源的做法，成本较低也较容易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设计与实施（并借由向较富有的人讨回发放出去的钱，一如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家庭免税额相关做法）可以很简单，而且能摆脱和津贴领取资格有关的武断复杂规定——这种规定造成的成本非常高，而且经常令人感到非常痛苦。

财力调查几乎都非常复杂、相关管理成本高，而且倾向于发生统计学上严重的“第一型错误”（Type 1 error，没有帮到想要帮助的人）与“第二型错误”（Type 2 error，发给某些根据规定不应该有资格领取的人）。每个财力调查计划都因污名化、无知或恐惧等，而有低领取率的现象，同时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贫困与飘零陷阱。

第三，目标锁定型的制度不会自动使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改善。那些问题的改善与否，取决于津贴领取率、产生的累进税效果（progressiveness）与行政效率。事实上，很多人曾主张，目标锁定型的制度反而比较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恶化，而非改善。[6]基于国际上各种目标锁定型计划的失败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假设，继续拥护那类计划的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减少领取津贴的人数。

多数从事政治游说的道德主义者不断提出这个反对意见，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最力倡这个反对观点的是“第三条道路”（Third Way）[7]阵营的政治人物与学术界人士。第三条道路和“互惠主义”（reciprocity）见解密不可分，它主张没有贡献就不能享受权利、未能证明已承担“责任”就不能享受权利。所以，这个阵营的人主张，应该要求领取政府补贴的人表现出“互惠”的姿态，换言之，领取人应该配合相关规定，不断找工作或甚至参与劳动福利计划，才符合领取标准。

以“不劳而获”为借口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最常提出的批评是，社会给予很多人太多不劳而获的东西。问题是，任何基于“不劳而获”理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应该也要反对所有财富继承收入以及其他所有非经由生产活动取得的各种收入才对。

他们应该也要反对国际版权制度，因为那个制度让握有版权的后代子孙可在原著作者过世后最多到七十年内都可继续获得版权收入；他们也应该反对所有选择性的所得税减免与补贴计划，因为那类减免与补贴的主要受惠者，多半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这些好处的有钱人；他们应该反对各种避税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让有钱人能在不贡献公共服务成本的情况下就使用这些服务；另外，他们也应该反对很多其他只因坐拥资产而取得的各种“食利者”收入。[8]除非基本收入的批评者也拥护（而且身体力行）无避税、无补贴与无继承等，否则这种“不劳而获”的反对意见就是伪善，在逻辑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

很多人常主张，发放现金给穷人反而容易导致他们误入歧途，因为领取人将会把这些钱花在酒精、香烟和其他“公害”上，而不是花在子女

与诸如粮食、衣物及热能等必需品上。所以取而代之地，他们主张应该以限制支出用途（经核准的用途）的补助金券（例如食物券）或卡片等形式来帮助穷人。

显然这是彻底温和专制式的攻击说词。要怎么在所谓“公益”与“公害”之间画出一条区隔线？为什么有钱人有自由购买并消费被政府官僚视为“公害”的任何东西，而穷人却没有那样的自由？何况政府真的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或有害吗？原本被视为有益的东西，事后可能会被宣称为有害，反之亦然。法律和规范应该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这是根本原则。

更广泛来说，有一个道德上的推断认定穷人——尤其是领取津贴的人——不该把钱花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事物上，换言之，它主张就算是能让生活变得稍微不那么悲惨的最渺小“奢华”，穷人也不能享受。诚如马克思在1844年指出的，“工人的每一项享受似乎都应受谴责，所有超出最基础需求的事物似乎都被视为一种奢侈享受”。[9]

选择性地对低收入者或其他需要政府救助的群体实施温和专制主义，可能比全面性的温和专制主义更糟糕，因为政府不让弱势群体有机会以民主手段来推翻这项规定，而不受影响的绝大多数人或许会因为预期自己能受惠于较低税赋而不关心弱势群体，或是支持拒绝赋予弱势群体自由。

有时候，某些人也宣称纳税人有“权利”决定“他们”贡献的税赋应该怎么花。不过，这个世界实际上通常并不是如此。举个例子，很多英国人不喜欢为核武器买单，也有很高分贝的汽车游说活动，主张汽车燃料税必须全部用在道路相关支出上。所以，纳税人有什么理由认定自己应该在社会保障政策上有特权，甚至认为他们该被咨询？

无论如何，事实证据显示，基于这个理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都站不住脚。已实施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和现金转移计划显示，领取人其实是把绝大多数的钱用在私人的“良性用途”。以印度与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来说，领取基本收入的人比较倾向于不把钱花在所谓的“公害”上。非洲的现金转移计划也可发现相似的结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肯尼亚。[10]虽然个中原因纯属猜测，但从印度中央邦试点计划可探究出相关的原因：领取基本收入后，较多男性留在家附近的农田工作，无需到外地城镇找有薪劳动机会，而到外地的男性较可能买酒和饮酒。[11]

这也是反对基本收入的常见说法，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加以探讨。不过，我们在此可以先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属实，而且，相关的影响远比一般想象的更复杂。当然，我们还是要问所有倾向根据这个理由否定基本收入的人一个问题：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实验证据显示基本收入不会降低工作的吸引力，那么你会不会支持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会对工资产生任何冲击吗？如果会，是什么样的冲击？有些批评者——尤其是工会人士——宣称基本收入会促使雇主主张既然人们已领了基本收入，雇主就无需支付那么多酬劳给劳工，而这样的态度将会导致工资降低。然而，基本收入的拥护者则强调相反的观点：基本

收入将让人们较有能力拒绝明显带有剥削色彩的工资条件，并更有信心与雇主协商较高的工资。换言之，基本收入能让较容易受伤的人们有能力在面临紧急关头时勇于说“不！”。

主张基本收入将被用来作为对工资的一种补贴并使工资降低的人，应该也同样要反对和就业有关的税额抵减才对，因为那类税额抵减实际上正是对工资的一种补贴。关键差异在于从事低工资劳动工作的领取人才能享受较高的税额抵减，从美国薪资所得税抵减（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以下简称EITC）制度与英国、加拿大及其他相当的制度便可见一斑。税额抵减的存在会导致工人不愿积极争取较高工资，因为增加的工资多半会因较低的税额抵减而失去效益。

相反地，基本收入将发放给每个人，无论一个人是否受雇、工资低或高，而且，基本收入不能因工资上涨而撤销。这将让工人拥有较大的协商力量，较有空间考虑接受或拒绝雇主提出的工资条件。而且这么一来，需要找人来做枯燥职务的雇主，就有义务提供较优渥的酬劳与其他条件，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应征者上门（要不然就得投资较多自动化设备——如果可行的话）。至少就最低限度来说，人们将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拥有较大的自由来决定是否乐意接受低酬劳或甚至无酬劳的工作。

这个论述主张，如果每个人都领到一笔基本收入，就会有很多钱被推向经济体系，进而导致物价飙涨，到时候，通货膨胀将大幅上升，反而导致人们变得比以前更无余裕。这种假想的通货膨胀影响是明斯基（Hal Minsky）反对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提案时的核心批评，在他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提出。[12]

诚如第五章提到的，这是“单方面”的经济学，因为它忽略了额外的购买力对商品与劳务供给的影响。以发展中国家及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社群来说，这种供给效应实际上甚至可能促使基本商品及服务的价格降低。举个例子，在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见第十章），村民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新增的购买力，促使本地农民种植更多稻米与小麦，使用更多肥料，并耕种更多的土地。[13]他们的盈余因此增加，但他们供应的粮食的单位价格却下降。相同的状况也可见于衣物，因为很多女性发现购买缝纫机与材料是值得的。[14]就这样，一个过去不存在的市场从此被创造出来。如果一个社群想赚更多钱，或者人们想取得更多商品与服务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准，理当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

因基本收入制度而受惠最多的是低收入者，而这个现象也得以扭转总需求的结构，让具有高“供给弹性”（以增加数量而非价格的方式来回应上升的需求）的基本商品与服务的占比得以提高。这也代表本地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将增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延伸来说，通过较高收入者缴纳较高税收来支应基本收入，将加重需求结构的扭转，甚至促使物价下跌，同时创造更加永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基本收入的财源是借由改变公共支出而非额外支出的方式取得，所谓的通货膨胀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诚如杰夫·克洛克（Geoff Crocker）说明的，唯有总购买力高于GDP，才会产生所谓的通货膨胀冲

击。[15]所以唯有在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系，“基本收入将推升通货膨胀”的说法才会成立，但目前没有一个现代经济体系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另外，目前的劳动市场远比过去开放，所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可能引来更多新加入的劳动力，或促使就业机会相对外移（这个状况比较可能发生），进而产生抑制工资的效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与政府正极度努力克服物价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并希望设法提高通货膨胀。他们的种种努力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效率，是退步的，最终也纷纷宣告失败。所以，只要因基本收入而新增的需求维持在一个能使物价稳定或温和上涨的范围内，基本收入就是有益的。

移民大幅增加与欧洲近来的难民危机，使得某些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诱发低收入国家大量人口向高收入国家迁移的移民潮。这些看法又因成见颇深的政治修辞如“福利观光”（welfare tourism）等用语而变得更有影响力。

基本收入的反对者（包括瑞士政府）利用这个论述，在“瑞士应否导入基本收入”的公投活动（将在第十一章讨论）中诱发人民的恐惧感，某些观察家认为那是导致瑞士2016年6月的基本收入公投未能通过的诱因。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反驳这项批评。最重要的是，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已产生社会摩擦（social friction）。津贴与社会住宅的提供是根据需要与否，不是基于权利。所以，老公民一定会感觉相对新加入的公民是在“插队”——因为新公民通常是最贫穷的一群人。很多人确实经由长年的努力，对社群或甚至后代子孙尽了他们应尽的义务，所以就算其中某些老公民对于“被插队”一事感到愤慨，我们也应该抱持理解的态度。从一个发人深省的研究可看出东伦敦当地因现有社会救助制度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与反移民情绪。[16]

不过，基本收入不仅不会导致这个局面变得更糟，还能改善整个局面。我们可以设计一套着重实效且让多数人感觉公平的规定。举个例子，可以将“持续居住在社区的时间”作为判断居民是否享有应得权益的优先条件。另外，提供充分资讯让潜在移民了解自己必须取得永久居民的资格或等待特定期限（例如最少两年）后，才能取得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但若有需要，应让还没有资格的移民仍可取得剩余的社会救助）。事实上，基本收入有可能成为一种阻止迁移的公平方法，但它也提供某种促使移民合法入境并融入社会的诱因。因此，相较于现有的财力调查式救助制度，基本收入制度反而倾向于降低反移民情绪。

有一位评论家只因为自己认为基本收入将“抑制移民前往美国”而站出来反对基本收入，真是一件讽刺的事。[17]然而，如果能设计一套与现行长期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取得规定相容的基本收入计划，这项计划将会比目前的所有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何况给予较大的经济安全感，人们就不太可能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和移民竞夺资源的零和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而且能促进人们更大的容忍度与利他主义态度。

这个反对意见很有趣。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如果政府设定了全民基本收入办法，那么掌权的党派就能在大选前不久提高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以达到对选民贿选的目的，就算不是贿选，至少能让选民感觉经济状况还不错。这样的状况确实可能发生，但对一个符合常理的政策来说，这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

回应这个疑问的方式之一可参考安迪·斯特恩的建议——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18]先前讨论过的我的提案之一则是建议成立一个类似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本收入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Basic Income Committee，以下简称IBIC），由议会指派该委员会的委员，并将任期设定为五年。[19]当局可以授权IBIC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甚至经济状况，调整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关于多层式基本收入的概念，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再次讨论。在此，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要克服基于“基本收入容易受民粹主义者操弄”而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应该相对简单。

无疑地，不管在任何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人提出其他各种反对意见。不过，以上十三个反对意见肯定是最常见的。读者必须客观研判以上各个反对意见是否可信，并进而判断这些意见是否足以否定基本收入的正当性。在判断任何一个政策的价值时，都应该详细且客观地考虑它的优点和缺点。基本收入的倡议者主张，促进社会正义与自由以及改善贫富差距与不安全感等，比一味批评重要，因为多数批评禁不起更严密的检验。然而，我们还是必须更深入探讨两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它对劳动和工作的冲击。

注释：

[1].A.Hirschmann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Private communication (2016).

[3]即社会保险。——译注

[4].I.V.Sawhill (2016), ‘Money for nothing: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a step too far’, Brookings, 15 June.

[5].V.Navarro (2016), ‘Is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elfare state dead? A critique of Varoufakis’, Social Europe, 4 August.

[6].W.Korpi and J.Palme (1998),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pp.661-87.

[7]又称“新中间路线”。——译注

[8].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9].K.Marx（[1844] 1970),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149.

[10].Kenya CT-OBC Evaluation Team (2012), ‘The impact of the Kenya Cash Transfer Program for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n household spend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4(1), pp.38-49.

[11].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pp.96-7.

[12].M.Friedma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L Minsky (1969),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in H.L.Minsky (2013), Ending Poverty: Jobs, Not Welfare.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13].Davala et al., Basic Income.

[14]无形中增加了衣物的供应量，促使价格降低。——译注

[15].G.Crocker (2015), The Economic Necessity of Basic Income. Mimeo.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62941/1/MPRA_paper_62941.pdf.

[16].G.Dench, K.Gavron and M.Young (2006), The New East End: Kinship, Race and Conflict. London: Profile Books.

[17].T.Cowen (2016), 'My second thoughts abou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loomberg, 27 October.

[18].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第七章

CHAPTER VII

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问题

最常见的基本收入反对意见就是——国家没有能力负担。这一章将试着说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思考时需要尽可能客观公平，另外，我们也必须牢记，不应事前就轻率决定要发放怎样金额的基本收入才符合理想，也不宜事先设定基本收入目标水准；基本收入可以分阶段导入，支应基本收入的财源也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可能渠道。

主张国家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常见论点，是将基本收入设定在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的50%~60%，再将这个数字乘以人口规模，最后算出基本收入的总成本，再将这项总成本和当前的福利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举个例子，蒂姆·哈佛德（Tim Harford）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里暗示，英国的基本收入可设定为每天十英镑。“以6400万英国居民计算，如果发放此金额，每年的成本将是2340亿英镑，所以这些费用大部分可以通过废除所有社会保障支出的方式来支应——这些支出共2170亿英镑。”[1]

约翰·凯（John Kay）在他的《金融时报》专栏中强调：

> 利用简单的算术便可厘清为何这些计划行不通。先判断基本收入应该约为每人平均收入的多少比率是适当的。30%看起来太小气；50%可能比较合理？你写下的数字就代表了国民收入将被用在基本收入相关公共支出的百分比……如果要了解那代表平均税率会是多少，把其他公共部门活动——教育、医疗、国防和运输——耗用掉的国民收入百分比加总就知道了。除非把基本收入设定得不可思议的低，否则花费在基本收入的支出将不可思议的高。[2]

约翰·凯补充，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并没有“认真且实地详细分析相关数字”，他的说法对很多详细分析数字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根本不晓得别人下了多少工夫研究，就妄下这种不公允的断言。

这类计算是可以被批判的。举个例子，约翰·凯的《金融时报》同僚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就曾指出，在选择决定基本收入发放水准的适当“平均收入”标准时，不该采用“国民收入”（GDP）数字，因为国民收入是经济体系内生产的所有商品与劳务，而该用“可支配收入”——即人们在扣除税金与转移金后可花用的剩余资金。[3]可支配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因此，约翰·凯基于挑衅目的而提出的高估计值——即基本收入将占用50%国民收入——就会降到33%。

《经济学人》用一个可供所有OECD国家使用的互动式基本收入计算法，归纳出更复杂的“保守”估计值。[4]它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税收与其他公共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若将非医疗性质的额度转作基本收入，将有多少钱可供发放。有趣的是，即使是以这个非常局限的基础计算，七个西欧国家早已有能力支付每人每年一万欧元的基本收入。

美国有能力发放6300美元，英国则有能力发5800美元。但显然对多数国家来说，用这种租税中立（tax-neutral)[5]的福利转移作业来支应基本收入财源的空间并不是太大，尤其是排名垫底的国家如韩国（2200

美元）和墨西哥（只有900美元），主要是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税收与福利支出较低。

《经济学人》这个互动式计算法的另一个目标，也是为了计算若要发放特定金额的基本收入，将需要提高多少税收。以英国来说，这个计算法估计，若要发放约当平均每人GDP的三分之一的基本收入，税收金额需要增加15%。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质疑它的计算条件，然而这类粗略计算作业都隐含几个更根本的缺陷。

第一，这些计算并没有考虑到以税赋手段从较高薪资收入者方面收回基本收入的影响；在实际上，只要调整税率和免税额，让额外的税收金额等于发放出去的基本收入总额就好，而且这并不会对有钱人或财政造成净成本。

第二，这些计算也未将废除财力调查式津贴与行为条件津贴后所节省的行政支出纳入考量。行政费用占了英国就业与国民年金事务部2013~2014年1720亿英镑预算中的八十亿英镑，其中多数是用来支付地方就业中心的支薪职员薪水，而那些职员的工作是监督与惩罚津贴领取人。这还不包括政府支付给协助执行伤残者“工作能力鉴定”测试作业的民间合约承包商的数亿英镑开销（这类鉴定导致社会上某些最脆弱的人的津贴领取资格遭到否决。）

第三，这些计算拿基本收入的成本和现有的福利预算做比较，并假设所有其他领域的公共支出将维持不变。然而，各国政府随时都可能选择重新排列各项支出的优先顺序。英国政府只要取消更换三叉戟核导弹系统（目前估计，在它的寿命存续期间，相关成本已超过两千亿英镑），就足以省下数十亿英镑。另外，只要停止发放主要流向企业与有钱人的多项补贴，也能进一步省下数十亿英镑。

英国的“企业福利”（corporate welfare）估计一年高达930亿英镑以上。[6]而根据右翼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美国政府为补贴企业成本而支出的联邦补助金，也达到每年一千亿美元。[7]此外，农业补助金多半进了大地主的口袋，而化石燃料补助金则危害气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多数补助金会产生累退税的效果，在道德上没有正当理由且无关经济增长。[8]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算出可被重新分配的金额，还是能将来自各式各样补贴的潜在节省金额列入考虑。重点是，即使财政支出保持不变，只要调整支出比例就能作为基本收入的另一个资金来源。

典型的批评战术并未聚焦在代价高昂且会造成累退税效果的那些补贴，而是拿基本收入的可能支出和大众公共服务的支出做比较。例如，《卫报》曾有一篇社论问道：“把这些钱花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NHS）、教育或儿童照顾用途会不会比较好？”[9]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议题容易引起偏见，它蓄意暗示基本收入将剥夺这些重要公共服务的资源，但这是错误的推论。

第四，保守的计算忽略了现代财政制度琳琅满目的特有租税减免和免税额的存在。英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额一年导致国库折损接近一千亿英

镑的税收（2016年时，11000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税）。某些薪资收入者的国家保险自负额减免的成本，又另外让国库减少五百亿英镑。这两项免除额加起来，共接近GDP的10%，而且它们会产生强烈的累退税效果。[10]

虽然当局美其名曰地表示，提高个人免税额是帮助低收入者的对策之一，但这项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其实是高收入者，因为他们因此得以避免被课税的收入较多，而且，税率愈高，适用收入水准级距也愈大。在此同时，原本收入已低于课税门槛的低收入者更是一点免税额利益也没享受到。

其他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免税额的另一个影响是缴纳所得税的人数减少。几乎有一半的英国成年人没有缴纳所得税；几乎也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研究也显示，未纳税的人的政治参与度较低，所以不太可能去投票。[11]这是缩减免税额并利用省下来的钱来作为基本收入财源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以英国政府认可的其他选择性租税减免来说，一年的总成本已上升到1170亿英镑以上，超过花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上的成本。[12]另外还有218种租税减免的成本则未经估算，政府也没有分析这些减免是否真的影响了当初设立减免规定时所要促进的行为。美国也有超过二百种选择性的租税减免，成本最高前十名的减免导致联邦国库在2013年少掉9千亿美元以上的税收，约当GDP的6%。前三大减免——州与地方税减免、不动产抵押贷款利息减免与慈善捐款减免——每年共造成1850亿美元的成本。[13]这些租税减免的金额加起来非常可观，足够用来发放金额适当的基本收入，而就算只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放基本收入，也能产生相当显著的效果。

暂时不谈其他支出计划与财源应该在什么时间点重新分配，我们接下来将聚焦于英国最近的几项研究，这些研究详细检视英国的财政负担各种不同基本收入制度与发放金额的能力。这些研究几乎都沿用马尔柯姆·托瑞所谓的“严格的收入中立性”（strict revenue neutrality）假设，换言之，这些研究假设基本收入完全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免税额及当前福利支出等所省下的钱来支应。长久以来，这是估算基本收入成本的标准方法，包括米米·帕克（Mimi Parker）等人早期的许多努力。[14]帕克是个保守主义者，她和她的赞助人下议院议员布雷登·莱斯-威廉姆斯（Brandon Rhys-Williams）密切合作。莱斯-威廉姆斯继承了他母亲茱莉叶的基本收入研究，并持续奋斗到20世纪80年代。

除了检视基本收入的可能成本金额，以下提及的这些研究也试图计算基本收入对不同形态与收入水准的家庭的影响。根据保守估算值而提出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将现有福利计划雨露均沾地分配给所有人口，将会导致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境况变得更糟，因为他们从基本收入制度获得的金额，将比从现行提拨式制度与财力调查式津贴（包括税额抵减）领取的金额少。理论上来说，这个议题可用两种方式来处理：设计一个让低收入者损失最小化的基本收入制度，或是导入一套混合式计划，作为过渡时期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说，在发放基本收入之余，加发现有的津

贴。在解读这些研究的成果以前，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前提：所有模型都假设目前各种津贴的领取人都完全领取了他们应得的津贴，但事实并不然，财力调查式津贴与行为调查式津贴和这些人实际应得的相去甚远。

政治智库金巴斯集团做了一个模拟，计算了某个混合式过渡计划的成本，这项计划将在继续发放目前几乎所有津贴（包括退休金与住宅津贴，但不包括孩童津贴，孩童津贴将被废除）之外，加发相当大方的基本收入（年满25岁的成人每周61英镑，年纪较轻的成人、孩童和退休人士发放的金额稍微低一些）。[15]在评定财力调查式津贴的资格时，也会将基本收入列入考虑，这么一来，前述津贴的成本将降低，仰赖这些津贴的家庭数也会减少。这项模拟显示，只要废除所得税个人免税额、终结高收入者偏低的国民保险拨费，并将每个所得税课税级距的税率提高3%，便能筹集到这个计划的完整财源，而且只会导致每年高达七千亿英镑的国库支出增加相当微小的净成本。一旦实施，基本级距的所得税加上国民保险自负额的总税率将上升到35%（2016年为32%），较高级距为55%（原为42%），以及最高级距的60%（原为47%）。

诚如马丁·桑德布提到的，虽然上述制度将使纳税额最高的五分之一纳税人的缴税金额大幅增加，但他们也能因基本收入的发放而获得部分补偿。[16]何况在现有的制度下，低薪资收入者会因税额抵减及其他财力调查式津贴的撤销，而面临高达80%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而且，以薪资收入稍高的人来说，一旦收入超过会失去育儿津贴和个人免税额的水准后，也会面临超过60%的边际税率。

金巴斯集团还计算了一套更大方的混合计划的成本，这个计划将每周额外发放十英镑给所有人。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将会使每个收入级距的税率进一步上升2%，并增加额外80亿英镑的成本。这两个过渡计划都能改善贫富差距的问题，且对贫困的改善产生显著的影响，以第一个案例来说，孩童贫困状况估计可改善38%，第二个案例则能改善45%。落在收入分配最低五分之一的群体里，有60%的人能因第二个计划（更大方）而多获得20%的利益，而这些重新分配的财富来自收入排名前五分之一的群体。在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中，只有不到3%的家庭会损失超过5%。

公民收入信托的董事马尔柯姆·托瑞利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家庭租税与转移模型（以2012～2013年的数值为基础），估计一个较中庸的混合计划的成本，这项计划将每周发放50英镑的“公民收入”给25岁至64岁的人，青年（16～24岁）的公民收入是每星期40英镑，年满65岁以上的人则可领取每周30英镑的公民退休金。[17]

当然，这是在多数现有津贴以外加发的钱，只不过，所有财力调查将会把公民收入列入考量。托瑞发现，如果采用和上述金巴斯协会那个模拟一样的收入及国民保险结构组合，他的计划将让国库每年节省近30亿英镑。（他也计算了只对某个年龄层〔16岁〕导入基本收入的创新概念的成本，后续再逐步把基本收入的发放扩大到所有年龄层。）

根据托瑞的计划，在刚实施时，收入最低五分之二的家户中，也有3%的家庭的境况会比原来差5%，1.5%的家庭境况恶化超过10%。然

而，国库省下的28亿英镑，足以为这些家庭提供特别补偿，毕竟那将只是一个过渡计划。另外，较高收入水准的人里将有更高百分比的人产生损失，对一个追求重新分配资源及改善贫富差距的计划来说，这是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对这些人来说，相关的损失将是可控制的（见图7.1）。

与此同时，根据托瑞的说法，孩童贫困将改善三分之一，这个计划“将能确实以可管理且有用的方式，将富人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其中，常被称为‘被挤压的中产阶级’（squeezed middle）的家庭尤其受惠于这个过渡计划”。

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以下简称RSA）利用托瑞的模型，自行计算一套全面性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这个计划打算发给25~64岁成年人每周约当71英镑的款项，65岁以上发放143英镑，0~5岁的头胎子女每周发给82.5英镑，第二胎以后发放65英镑，而5~24岁的孩童与青年人发放56英镑。[18]这些金额（将取代多数现有的津贴）大约等于现有的求职者津贴（Jobseeker's Allowance）、政府退休金与孩童津贴，及低收入家庭可领取的其他子女资助的总金额。伤残救助与住宅津贴并未被纳入计算，不过，RSA也建议针对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展开个别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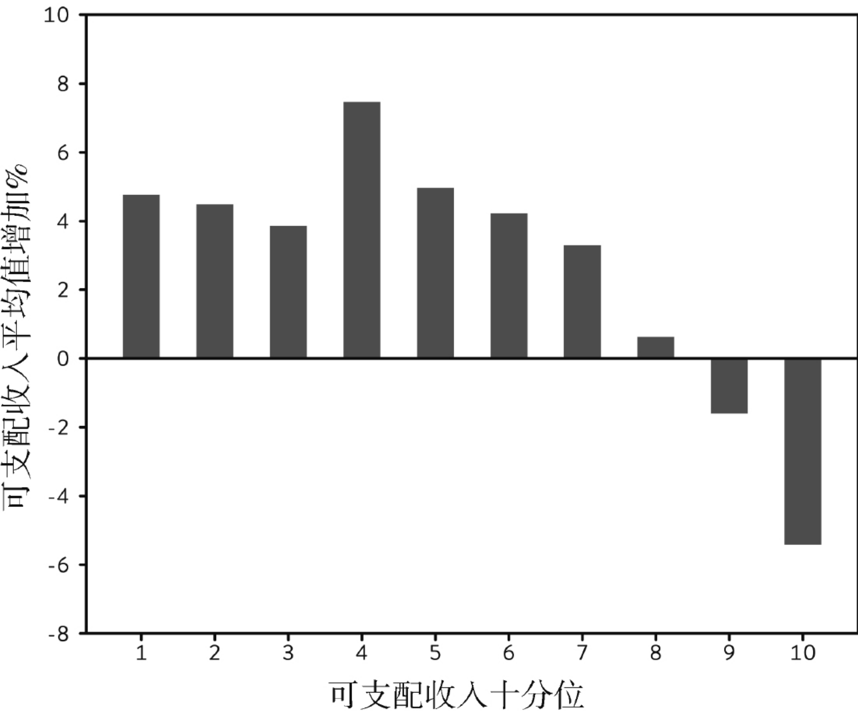


图7.1
托瑞的混合式基本收入计划的重新分配效果

资料来源：M.Torry (2016), ‘An evaluation of a strictly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Euromod Working Paper Series* EM 5/16

个人免税额和国民保险下限将被废除，所有高于基本收入的收入都会被课税，边际税率最低32%（20%的基本税率加上12%的国民保险自负额，与现行规定相同），接着逐步上升，收入超过15万英镑者的最高税率为52%。从图7.2可得知这项计划和RSA所谓“喜马拉雅山”式税赋曲线（2012～2013年）的比较结果。在偏离“严格收入中立性”的背景下，退休金提拨款的税赋减免率将被限制在最低标准，这释放出了100亿英镑作为基本收入的财源。据估计，这项基本收入计划的净额外成本将介于98亿英镑至164亿英镑之间。

这份RSA报告的主笔安东尼·佩因特（Anthony Painter）表示：

> 我们估计我们所做的变革将产生比现有模型（包含个人免税额的取消）多约等于1%GDP的成本。这个金额听起来很庞大，然而，它并不比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担任工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实施的税额抵减变革所衍生的成本更高，而且远低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2010～2016年间担任财政部长）当初不顾经济紧缩而推动的个人免税额、增值税、遗产税与企业所得税等变革所衍生的总成本。[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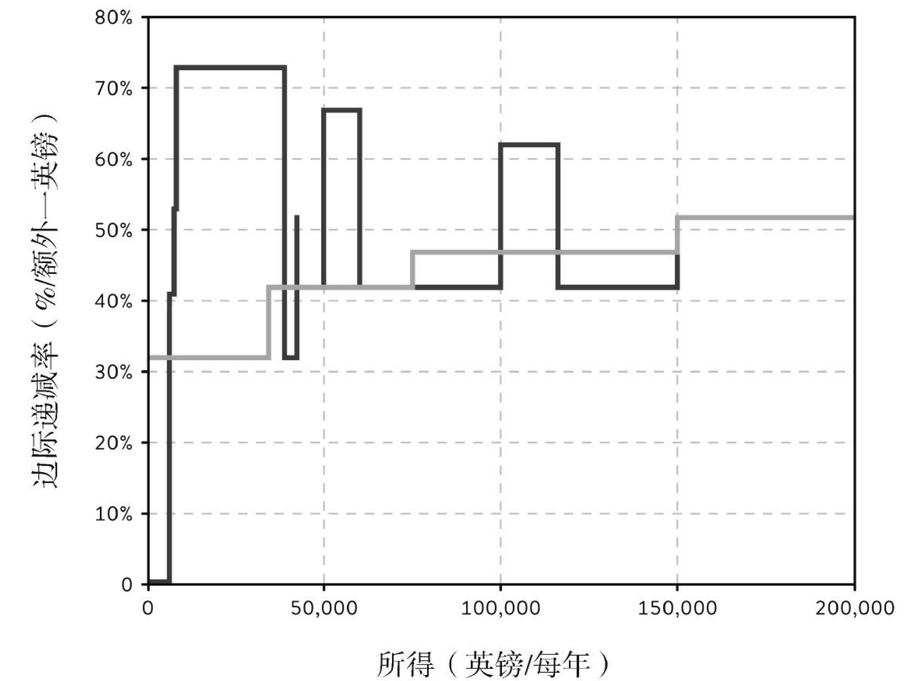


图7.2

RSA基本收入模型之边际税率与2012年～2013年实际税率比较

2012年～2013年税赋制度

RSA

资料来源：皇家文艺学会

RSA也检视2016年开始实施的国民维生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20]及新的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对向特定样本家庭发放的基本收入制度的运作有何影响。它发现维生工资的支付（假设人们领到这些钱，而且工时未被缩短）很快就让低收入家庭脱离因领取基本收入而发生损失的范围，这让基本收入制度的推动显得更有吸引力。

RSA的这个计划会对所有定居的公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在英国居住与工作的欧盟国家国民和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国家国民，都能在取得永久居留权资格五年后（这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前的规定）领到这笔基本收入，而其他移民将没有权利领取。所有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都必须进行选民登记，才能取得基本收入的领取权，这是一种强化公民参与的手段。

除了计算上述混合式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金巴斯也计算了一项将取代多数财力调查式福利津贴的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21]发放基本收入、增税以及削减现有津贴等组合做法的净成本或净节省金额介于一年多花430亿英镑至一年节省530亿英镑之间，金额视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而定。两项成本计算都是以下述假设为基础：成年人每周发放基本收入73.1英镑，65岁以上151.2英镑，18岁以下孩童44.3英镑。第二个案例省下很多钱，那是废除个人免税额所致（第一个案例保留个人免税额）。经金巴斯计算，所得税的最低税率必须提高到30%，单一最高税率需提高到50%。尽管如此，这些税率并没有高于（或甚至远低于）撒切尔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一连串所得税削减预算前所征收的税率。

然而，金巴斯的这个计划将会导致很多低收入者遭受损失，主要是因为孩童相关支付弥补不了其他津贴的流失。这些作者认为，就政治层面来说，目前不可能在英国导入意在彻底或几乎消除30%~40%最贫困人口的全面性基本收入计划，因为这么做的成本是150~200亿英镑，约等于GDP的1%，而且需要实施更高的税率。

相反地，RSA的目的是希望借由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有学龄前孩童的家庭，将低收入者人数最小化，不过，它也体察到某些家庭的景况可能恶化——主要是有学龄小孩的单亲家庭。然而，金巴斯的作者还是将混合式计划视为未来推行全面性基本收入制度的一个务实阶段性做法。

我们应该把以上所有模拟当成说明性质的示例。但无论如何，这些模拟让我们体察到，当局可根据可行且能够负担的原则采用基本收入制度。即使接受“严格的收入中立性”限制——也就是基本收入必须以个人所得税支应并用福利预算省下的钱来弥补，税率的增加也能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且较低收入群体人数能最小化或获得补偿。在此同时，位于收入分配底层两成里的大多人将能获益，届时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能获得适当的改善。

尽管如此，如果能部分以削减非福利支出计划的方式（包括削减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补助金以及特定所得税减免）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税率有可能不需要大幅提高，甚至无须提高。而且这还未计入潜在的新财源，例如主权基金、碳税或金融交易税等。

多数和英国基本收入有关的计算都设想到了伤残者的贫困增额补贴，但这些研究都不情愿地归纳出一个结论：住宅成本理当分开处理，一如当前社会保险制度的做法。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在他1942年发行的福利国家蓝图中坦承，他在设定雇主全额提拨型津贴水准时，无法解决“租赁问题”；若住宅津贴的发放采用统一比率，住在昂贵地段的人将支付不了租金，而住在低价地段的人则会有多余的津贴。个人住宅成本的支付将让人有动力在退休后（这时才有资格领取政府退休金）搬迁到比较昂贵的住处。最后，战后的英国政府决定协助支付实际的住宅成本，但只补助财力不足且其增额补贴需求金额比国民保险津贴金额（依据提拨纪录发放）高的申领人。

如今，上述“租赁问题”变得严重许多。在福利国家施行初期，60%的人口居住在受严格租金管制的民间出租型设施，而且政府也积极推动大规模的福利房（council house）兴建计划。但如今，租金与房价的地段差异变得非常大，民间部分的租金也暴涨，政府打折出售福利房与社会住宅，更导致人们有能力负担的住宅大幅短缺。目前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的成本已暴增到每年250亿英镑。

虽然要解决英国目前的住宅危机，需要以增加人们负担得起的住宅的供给量等紧急对策来应对，但这个议题对英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却造成一个困难。以上所述的基本收入成本计算都假设，目前的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将大体上沿用现行模式，至少目前会沿用。这个假设稍稍可取之处是，如果进行财力调查时也将基本收入纳入考虑，未来仰赖住宅津贴计划（复杂、高行政成本且高扣除率〔tapered〕[22]）资助的人数将会减少。

RSA已提议（但没有估算成本）三个可能可以解决“租赁问题”且和基本收入原则不矛盾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限制扣除率，让领取住宅津贴的人在赚到额外收入时，无需以被削减津贴与负担较高税负的方式“支付”高于最高边际税率的税赋。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将所有住宅相关支出全数移交给地方主管机关处理，让它们根据本地的环境来修订有关兴建、租金与津贴等政策。第三个解决方案是对每一个租屋者（而非房地产所有人）发放“基本租金收入”，而这项支出将以地价税专款支应。

当然，英国的住宅状况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通病就是大城市缺乏人们负担得起的住宅，以及住宅成本存在严重的区域与城乡差异等。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典和法国，选择采用更慷慨的薪资收入相关社会保险津贴，让多数人们有能力负担自身的租金。一份比较研究显示，英国人的住宅津贴、失业津贴与收入补贴（income support）约当平均收入的百分比，在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九。[23]看起来在其他国家，“租赁问题”对基本收入计划的设计来说，或许不那么令人头痛。

早在1985年，荷兰政府政策科学研究所（Dutch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就提出一个部分的基本收入计划，是该国的政府财政足以负担的。另外，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西班牙和南非，也都针对基本收入的导入，估算了相关的财政成本。新西兰的加瑞斯·摩根（Gareth Morgan）与苏珊·戈斯瑞（Susan Guthrie）归纳了一个结论，30%的平头税（flat tax）[24]就足以支付每个成年人每年11000新西兰元以及每个18~20岁青年每年8500新西兰元的基本收入。[25]

美国的安迪·斯特恩建议应该每个月发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给每个美国成年人（2.34亿人），1000美元大约就是联邦贫困线水准。他估计这么做的总成本约每年2.7兆美元，约等于GDP的15%。根据他的建议，相关的财源将来自废除现行扶贫计划所省下的1万亿美元，包括食物券（760亿美元）、住宅救助金（490亿美元）以及薪资所得税额抵减（820亿美元）。[26]他也建议缩减军事支出及分阶段废除多数所得税减免，那些成本大约是每年1.2万亿美元。他也支持征收联邦销售税、金融交易税（目前已有十个欧盟会员国实施这项税赋）甚至富人税（wealth tax）。

实质上，财政负担能力问题可归结为两组选择——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应该多高？以及社会的财政优先考量是什么？现有的租税制度绝非神圣不可侵犯，而且，相关税制过度复杂，还产生严重的累退税效果，何况这还没有把政府因民间企业与个人避税与逃税而衍生的巨额税损算进去。

诚如一个评论家指出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显示，美国应该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因为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有钱人避税的程度有多么严重。[27]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估计，全球各地的精英分子隐匿了21~32万亿美元的财富在免税或低税赋的司法管辖区，各国因此遭到剥夺的税收高达1900~2800亿美元。[28]在此同时，这些有钱人还享受了高额的“不劳而获”利益，因为他们通过公共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政府与国际监理机关授予他们的财产权等，获得巨大的利益。另外，国际货币基金也计算，各国人士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的做法，已导致各国政府一年减损六千亿美元的税收。

以下是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出的有趣脑筋急转弯题。这篇帖文的标题是“全民基本收入速写”（A Quick Note on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29]

> 让我们看看一个平均收入五万美元但收入分配严重分配不均的经济体。为了提供一套社会安全网，有人提议实施以下两个可行的政策，你偏好哪一个？
>
> 每人一万美元的全民转移支付，相关财源将以20%的单一所得税支应。
>
> 一万美元的财力调查式转移支付，只有零收入的人能领取全

> 额。接着，这项转移支付将分阶段降低：每赚一美元的收入就损失其中二十美分。这些转移支付的财源将来自对五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课征20%的税赋。
>
> 我听到很多聪明人争辩：A政策很疯狂。比尔·盖茨凭什么领取政府转移支付？他根本不需要那些钱，而且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征更多税来支付这些开销。B政策比较进步，因为它只对真正需要的人发放转移支付，为支应这些转移支付所需的增税幅度也较小，而且它只对收入高于平均值的人增税。
>
> 但这就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地方。这两个政策的花费其实是相同的。若计算净付款金额（税收减去转移支付），这两个计划的净付款金额其实一模一样，只是框架不同。

在逻辑上，这位教授的论述没有破绽可言，只不过，在实务上这两个政策并不相同。财力调查绝对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会让申请人的个人成本增加，从而导致所有支付的实际价值低于其名义价值。再者，财力调查式津贴既不确定也不稳定，因为裁定津贴领取资格时所依据的薪资收入本身也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虽然这两个政策的财政成本或许相等，领取人实际获得的价值却不相等。这使得我们更有理由推动非财力调查式的全民支付，再借由税制向较高薪资收入者增税，以取得相关财源。

粗略计算作业与模拟模型的共同根本缺点是：这些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忽略了基本收入对经济活动的动态影响。举个例子，诚如先前提到的，基本收入将消除贫困与飘零陷阱等会导致人们不愿从事低工资工作、增加有薪劳动时数或主动争取更高薪资等的障碍。这种“道德风险”（阻碍人们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会衍生巨额的三重成本：继续仰赖微薄的政府津贴、平白浪费创造更多经济产出的机会，以及税收与国民（社会）保险自负额（乃至国库）的折损。

目前的财力调查式制度也制造了严重的不道德风险，它引诱处于或贴近危产阶级的人转入地下经济体系，从而彻底规避所有纳税与国民保险自负额义务。而以基本收入来说，由于人们不会因就业而失去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所以，隐匿额外薪资收入的诱因就会降低，而这将进一步创造额外的税收。经济活动增温与较高税收（因较低薪资收入者的隐含边际税率剧烈降低，使得他们愿意去从事有薪劳动或不隐匿薪资收入，从而使薪资所得税收增加）而产生的经济利益，预期将超过较高薪资收入者税赋温和增加所衍生的负面冲击（实际上不见得会有冲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的一份研究提出以下结论：“理论与事实双双证明，高薪员工的工作量或工作意愿几乎不受税率变化的影响。”[30]

诚如第五章提到的，这还会产生其他回馈效应。基本收入有助于促进心理与生理健康，降低人们对医疗与社会服务的需求，这应该也能产生节省相关成本的效果，释放出更多资金供基本收入或提升公共服务品

质等用途使用。

通过碳税（意在阻止导致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排放）[31]的收入来筹措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是一种极具吸引力且广获认同的想法。气候变迁公民游说团（Citizens' Climate Lobby）针对美国所进行的计算显示，若课征每吨15美元的碳税，一年就可筹集1170亿美元的税金，经过各种不同的调整，这笔金额就足以对每个家庭发放每年811美元的红利（每人323美元）。[32]绝大多数的家庭将获益（这项红利的价值将高于因碳税实施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影响），而且它会产生相当强烈的累进税效应，换言之，比例上低收入家庭的获益程度更甚于高收入家庭。

平均来说，高收入家庭将产生损失，但这些损失相对其收入而言，可谓无足轻重。一个更传统的提案是以地价税来筹措基本收入财源。托马斯·潘恩针对他提出的计划，设算相关财源将来自对房地产所有人课征“地租”（ground rent）。亨利·乔治则鼓吹课征土地租税来支应基本收入。土地税将是累进税，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大致上和收入与财富的分布一致，而且原则上这种税赋能筹到较高总额的资金。根据《经济学人》引用的几个估计值，对美国所有土地课征5%的地价税，就能筹集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财源，足够应付对每个美国人发放每年3500美元的相关成本。[33]这是个吸引人的想法，尤其因为多数国家的房地产税制乱七八糟，经常产生累退税的效果，迫切需要改革。只不过，要导入这种税赋，政治难度将会非常高。

先前曾提及的富人税、遗产税、金融交易税以及机器人税等，都是基本收入的可能财源。另一个建议是要求谷歌、脸书和其他企业为它们目前免费使用用户数据付费，毕竟那些企业通过这些数据资料的使用而获得庞大的利润，届时它们支付的数据资料使用费将可用来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34]

丹麦创投资本家索伦·艾凯兰德（Soren Ekelund）经营的社会思想智库（SamfundsTanken）建议采用一套独创的财源筹措机制。[35]这个机制可称为“社会创投基金”法。如果企业接受和本地议会之间协调好的利润共享条件，议会就愿意以基本收入的名义来支付部分员工工资（但非就业者也能领取基本收入）。这将提振企业获利（因为企业必须发放的工资减少了），而利润分享协议也会让议会取得支应基本收入的资金。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也体现了形塑一个全新制度的智慧。

笔者本身偏好的财源筹措选项是利用主权基金的建立（沿用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或挪威养老基金〔Norwegian Pension Fund〕的模式）来作为基本收入的财源。这个选项是引用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的《阿加莎乌托邦》（*Agathatopia*）一书中说明的做法，它允许一个国家用许多年的时间慢慢累积这个基金，并随着基金的持续壮大，缓步提高以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名义发放的金额。[36]社会红利法被视为将社会集体财富依正当的比例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好方法，所以它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个方法不需要废除现有的福利制度，也无须提高薪资收入相关税赋。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在1974年当选

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州长后创立。该基金在1976年成立后，接收八分之一的阿拉斯加州石油生产收入。这个基金直到1982年才终于开始对所有合法的阿拉斯加居民发放全民“红利”。长期以来，这个模型一直相当吸引BIEN社群的基本收入倡议者，它堪称一个专为支付基本资本补助金或基本收入而成立的新生基金。[37]

其他偏好主权基金法的人还包括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建议根据阿拉斯加基金的模型，成立一个“天空信托”（Sky Trust），并建议向使用“全民资产”的企业收取费用来作为这个信托的财源。所谓全民资产包括天然资产（空气、水、矿物和其他资源）以及社会建构的资产，例如知识产权体系和法律及金融基础建设等。巴恩斯估计，针对全民资产的使用而收取的费用——包括污染税、天然资源开采税、电磁波频谱使用费、金融交易税以及知识产权版税及权利金等，将足够每年发放5000美元红利给每个美国人。[38]

英国的斯图尔特·兰斯利（Stewart Lansley）则建议利用“社会财富基金”（social wealth fund）来发放基本收入，这个基金的财源将来自对股份所有权收取的税费。[39]根据他的计算，若针对英国股市挂牌交易的前一百大企业的股份所有权课征每年0.5%的税，将能募集到80亿英镑，如果征收1%的税，则将筹集到两倍的金额。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金额将来自海外持股人。[40]笔者曾提议针对各式财产——实体、金融与知识产权——的民间所有权的租金收入及开采权课税，这些税收也可用来成立社会财富基金。[41]

不过，这个基金必须采纳民主的治理结构，而且必须根据道德原则来管理，唯有如此，它才能在各种收入来源逐渐被耗损后保有可持续性，进而确保代际平等。英国政府在2016年提出成立页岩财富基金（Shale Wealth Fund）的提案，更凸显出道德治理（挪威养老基金为具体的明证）的重要性。[42]至多有10%的页岩气压裂（水力断裂）收入将成为这个基金的收入，以25年的期间推估，相关收入可能高达10亿美元。这些钱将发给设置压裂站点的社区，而这些社区能决定要把钱用在地方建设，还是以现金方式分配给当地的家庭。我们很难防止外界联想这是一种对当地的贿赂，以确保当地主管机构准许从事可能危及环境的压裂作业，毕竟大众相当反对这种作业，除此之外，这还牵涉到平等与否的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恰好住在有页岩气地区的人才能受益？外界会如何看待收受这些钱的社区？这些款项只会发给压裂作业展开时住在指定社区的人吗？他们收到的是一笔总额款项，还是定期发放的款项？如果是定期发放，会发放多久？有没有考虑到后代子孙将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现金支付足以弥补压裂作业对空气、水、景观和生计的潜在破坏吗？

上述所有疑问让人不得不质疑所有选择性发放计划的平等与道德。这些疑问凸显出两个必要性：一、在开始建立这类财富基金并以这些基金发放红利以前，必须先确立各项原则；二、必须建立一个能独立于政府与企业界的治理结构。不过，事实已证明，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这条路线是协助筹措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财源的可行方法。不发展主权基金或是利用主权基金来达到投机与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政治目的，则是不

适当的做法。

有关财政负担能力的批判，肤浅地吸引着所有有意反对基本收入的人。不过，最终来说，这是一个政治议题。目前工业国家的税率处于相对历史低档，没有理由认为目前的税率是适当的。何况各种选择性的所得税减免额以及各式各样具累退税效果的政府补贴与超国家（supra-national）实体补贴，不仅金额至为庞大，且多数不公平、不道德，或不符合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现有的福利制度太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引发道德疑虑，且成本非常高。目前很多国家的贫困人口持续增加，贫富差距的状况也快速恶化，精英分子、财阀与财阀型企业的租金收入则大幅增长。[43]以整个社会为发放目标的基本收入的多数（甚至全部）财源可以简单通过向庞大的租金收入（来自能产生收益的各式各样财产的所有权）课税等方式取得。宣称唯有政府大幅减少社会服务或激烈提高所得税税率才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计划的人，有刻意误导或无知之嫌。

最终来说，财务负担能力议题可归结为社会愿意赋予社会正义、共和主义式自由与经济安全感多么优先的地位。从这些面向来看，我们不仅负担得起基本收入，并且负担不起不发放基本收入的代价。

注释：

[1].T.Harford (2016), ‘Could an income for all provide the ultimate safety net?’, Financial Times, 29 April.

[2].J.Kay (2016), ‘With a basic income, the numbers just do not add up’, Financial Times, 31 May.

[3].M.Sandbu (2016), ‘Free lunch: An affordable utopia’, Financial Times, 7 June.

[4].The Economist (2016), ‘Daily char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the OECD’, The Economist, 3 June.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6/06/daily-chart-1.

[5]不影响税制。——译注

[6].K.Farnsworth (2015), ‘The British corporate welfare state: Public provision for private businesses’, SPERI Paper No. 24.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7].T.DeHaven (2012), ‘Corporate welfare in the federal budget’, Policy Analysis No. 703.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8].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9].Guardian (2017), ‘The Guardian view on basic income: A worthwhile debate, not yet a policy’, Guardian, 1 February.

[10].Sandbu, ‘Free lunch’.

[11].Non-taxpayers with incomes below the tax threshold would be relatively likely to vote for ‘left’ parties. J.Gingrich (2014), ‘Structuring the vote: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value-based vote choices’, in S.Kumlin and I.Stadelmann-Steffen (eds.), How Welfare States Shape the Democratic Public: Policy Feedback, Participation, Voting and Attitudes. Cheltenham: Elgar, p.109.

[12].V.Houlder (2016), ‘Cost of UK tax breaks rises to ￡117bn’, Financial Times, 10 January.

[13].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3),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tax expenditures in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system’,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9 May. A.Holt (2016), ‘Critics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just don't understand how the policy would actually work’,

Quartz, 6 June.

[14].H.Parker (1989), Instead of the Dole: An Enquiry into Integration of the Tax and Benefit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5].H.Reed and S.Lansley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London: Compass.

[16].Sandbu, ‘Free lunch’.

[17].M.Torry (2015), ‘Two Feasible Ways to Implement a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ISER Working Paper EM6/15. Colches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April. www.iser.essex.ac.uk/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euromod/em6-15. M.Torry (2016), ‘An Evaluation of a Strictly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ISER Working Paper EM5/16. Colches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June. https://www.iser.essex.ac.uk/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euromod/em5-16.

[18].A.Painter and C.Thoung (2015), Creative Citizen, Creative State-Th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ondon: Royal Society of Arts.

[19].A.Painter (2015), ‘In support of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Introducing the RSA basic income model’, Royal Society of Arts blog, 16 December.

[20]即最低基本工资。——译注

[21].Reed and Lansle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22]租屋者收入高于最高住宅津贴的部分，必须从住宅津贴中扣除的百分比。——译注

[23].J.Birch (2012), ‘The problem of rent: Why Beveridge failed to tackle the cost of housing’, Guardian, 22 November.

[24]又译为单一税。——译注

[25].G.Morgan and S.Guthrie (2011), The Big Kahuna: Turning Tax and Welfare in New Zealand on Its Head. Auckland, New Zealand: Public Interest Publishing.

[26].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7].C.Holtz (2016), ‘The Panama Papers prove it: America can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Guardian, 8 April.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apr/07/panama-papers-taxes-universal-basicincome-public-services.

[28].J.S.Henry (2012), The Price of Offshore Revisited. Chesham, UK: Tax Justice Network.

[29].G.Mankiw (2016), ‘A quick note on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eg Mankiw's Blog, 12 July. http://gregmankiw.blogspot.ch/2016/07/a-quicknote-on-universal-basic-income.html

[30].A.Manning (2015), ‘Top rate of income tax’,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Paper EA029.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cep.lse.ac.uk/pubs/download/EA029.pdf.

[31].See, for example, J.Burke Murphy (2016), ‘Basic incom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the “degrowth” movement’, Basic Income News, 13 August.

[32].K.Ummel (2016), ‘Impact of CCL's proposed carbon fee and dividend policy: A high-resolutio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effect on U.S.households’, Working Paper v1. 4. Coronado, CA: Citizens' Climate Lobby, April. https://citizensclimatelobby.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Ummel-Impact-of-CCL-CFD-Policy-v1_4.pdf.

[33].The Economist (2016), ‘Sighing for paradise to come’, The Economist, 4 June, p.24.

[34].C.Rhodes (2017), ‘Funding basic income through data mining’, Basic Income News, 29 January.

[35].SamfundsTanken (2016), ‘UBInow: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implementation in Denmark’, SamfundsTanken.dk. http://samfundstanken.dk/ubinow.pdf.

[36].J.E.Meade (1989), 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37].K.Widerquist and M.Howard (ed.) (2012), Alaska's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Examining Its Suitability as a Model.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K.Widerquist and M.Howard (ed.) (2012), Exporting the Alaska Model: Adopting the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for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8].P.Barnes (2014),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How to Save Our Middle Class When Jobs Don't Pay Enough.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39].S.Lansley (2015), 'Tackling the power of capital: The role of social wealth funds', Compass Thinkpiece No. 81. London: Compass.

[40].S.Lansley (2016), A Sharing Economy. How Social Wealth Funds Can Tackle Inequality and Balance the Books. Bristol: Policy Press, Chapter 2.

[41].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42].UK Treasury (2016), Shale Wealth Fund: Consultation. London: HM Treasury.

[43].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第八章

CHAPTER VIII

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意义

> “很显然地，任何提供收入的计划，只要与工作不相关，都会降低某种程度的工作的意愿。”
>
> ——麦可·坦纳，卡托研究所，2015年[1]

真的那么“显然”吗？每每谈到工作或写到工作相关的内容，很多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失去他们的常识。虽然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会很武断地区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算不上工作，但我们这个时代对工作的定义最失当。

只有在20世纪，多数非支薪劳动才不被视为工作。到目前为止，劳动相关的统计还是坚持这个滑稽的做法，在市场上，唯有为了酬劳而劳动才叫“工作”。一个世纪以前，庇古（Pigou）曾说一段名言，他指出，如果他聘请一位女管家，国民收入就会上升，经济增长也会加速，就业人口将增加，失业人口将相对减少。如果他接下来和那位女管家结婚，而她继续从事与婚前完全相同的活动，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却会降低，就业人口将会减少，失业人口则相对增加，这实在非常荒谬（而且明显带有性别歧视）。

这样的荒唐观念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一个母亲或父亲照顾自己子女时所做的事，和一个受雇照料他人子女的支薪保姆所做的“工作”其实一样多（说不定前者的“生产力”更高）。而随着我们的经济体系愈来愈“零工化”（'gig' economy），还有其他更多活动因支付酬劳与否而遭到差别对待。举个例子，狗主人可以利用“出借狗狗”（Borrow My Doggy）之类的软件，聘请某人来帮忙遛狗，或是把狗交给狗保姆照料。基于统计的目的，这个原本纯属消遣性质的活动——遛狗（帮别人遛狗）——成了一种“工作”。这使得国民收入与就业人口增加，也让政府很开心。但如果你遛自家的狗（或照顾自己的子女），却反而是在伤害经济！

在此同时，还有其他非常多实实在在但未支薪的工作，这类工作还在不断增加。以英国来说（其他国家也很类似），根据估计，无偿经济体系（照顾孩童和老人、家务劳动、社区义工等等）的价值远超过货币经济体系规模的一半。[2]

但就算是这些估计值，都没有计入每个人处理政府往来事务（申报所得税鲜少会被视为“休闲”〔leisure〕吧？）、身为消费者（自助结账）时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谓“为取得劳动职缺而做的工作”（work-for-labour）[3]、与现职有关但无薪的工作（这类工作的范围随着“一直在线”的文化而扩大），或求职期间必须做的工作。危产阶级尤其必须做很多不被视为“工作”的工作（在他们眼中是工作）或不被给予酬劳，例如寻找就业机会、应付复杂又旷日废时的漫长招募流程、等待派遣工作机会、为申请某种贫困津贴而排队或填写各种表格等“工作”。

在评估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实际与潜在影响时，这些概念攸关重大。一般人常主张，发放基本收入将使人变懒惰，而且会使劳动力供给减少（这两者并不相同）。就这一脉络来说，一直有人争辩是否应该

发放基本收入给“懒惰”的人——所谓懒人的典型形象是在马里布（Malibu）冲浪的年轻人。这看起来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哲学辩论。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类年轻人真的有办法靠一笔不太大的基本收入，过着那种长年冲浪的美好生活吗？

多数人总是希望尽可能多赚一点钱。就算少数人选择成天冲浪，只靠着基本收入过活，这些人选择那样生活而对政府造成的成本，也不会比政府特地派人整天盯着他们、逼着他们做某种“工作”的成本高。此外，很多伟人和最伟大的艺术家年轻时也都“无所事事”，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继承了有钱双亲所提供的“基本收入”，才得以“无所事事”地活着。如果他们当初被迫去申请劳动福利（workfare）或从事某些沉闷的职业，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见识到并享受他们的创意天分。

我的论点是，基本收入将能增加“工作”的数量与生产力，而且能提高“休闲”品质，我所谓休闲是指古希腊文的“schole”。“Schole”一词是英文“school”（学校）的起源，意思是指免于劳动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主张这是全面参与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姑且不谈这一点，从社会、经济与生态的角度来看，就算某些人利用基本收入来减少劳动与（或）工作量又如何？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长时数的劳动并不总是对生产力、产出或服务品质以及决策制定有帮助；事实上，很多证据显示，长时间的工作反会对生产力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会危害健康。[4]我宁愿我的牙医或外科医师获得充分的休息并带着饱满的精神来照顾我的身体。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更一般的活动。

此外，就算基本收入真的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降低，最可能选择不劳动的那些人，通常也是潜在生产力与赚钱能力相对较低的那一群人。因此，这些人降低劳动力供给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就会比较小，甚至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另外，我们也应该从第五章讨论的“零工作”未来的角度来辩论——无论技术悲观主义者的预测是否夸大，这类预测都将使“基本收入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产生变化”的问题显得没那么严重。

我们已逐渐脱离“农业时代”的社会与生产体系，在农业时代，劳动与工作的形态受季节、气候与阳光支配，而在“工业时代”，劳动受时钟支配，而且是以时段来衡量。在“工业时代”的环境下，将劳动视为一种牵涉打卡计时的活动（一天八至九小时、一周五天或六天、一生四十年以上，接着幸运的话可以长期处于退休状态），确实合情合理。

但21世纪将受所谓的“第三纪时代”（Tertiary Time）支配，在这个时代，“工作”与“劳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这些活动皆不一定得在工作场所，也不一定得在指定的工作时间内完成。这样的模糊状态使劳动和工资水准测量变得愈来愈武断且具误导性。企业、雇用代理人或劳动中介付薪水给我们，但我们获得的酬劳和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根本不成正比。未来多数人的工作（无薪）相对劳动（有薪）比率都可能会上升，而受惠于这种无薪工作的人，实质上等于通过一个更广大的剥削形式来获得租金收入。

这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另一个正当理由——基本收入对每一个人发

放，用以奖励他们从事性质上属社会工作的工作，而基本收入的财源将来自向受益于这类社会工作的个人与企业收租。那些受益的个人与企业原本或许并无意通过这个方式来图利；一切只因我们真的无法衡量所有因第三纪时代而产生的所有“为取得劳动职缺而做的工作”的适当酬劳是多少，也不可能给予从事那种工作的人适当补偿。

在谈论实验证据以前，首先我们必须说，目前以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来决定政府津贴领取资格的做法，已制造出一种促使人们不愿意接受低工资就业机会的强烈诱因。然而，宣称基本收入将降低“工作”（他们所谓的工作是指有薪的劳动）诱因的批评者，却鲜少承认现行种种计划对降低工作诱因的影响。

不过，直觉上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把握能保住收入的68%（即实施基本收入后的可能状况），而不是只收到20%（英国目前的状况，尤其那20%会轻易被额外成本吞噬——如通勤、子女的保姆、合适的衣物等等成本），那他一定比较愿意去就业。何况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保住20%的工资收入而不得不工作，他应该会以敷衍或愤恨的态度来应付这个就业机会。

如果诱因很重要，基本收入当然是提高诱因的较好路线。基本收入能克服因财力调查式津贴遭到取消而可能衍生的贫困陷阱和飘零陷阱（部分导因于担心无法在需要时重新获得津贴领取资格）。所以，基本收入将鼓励技术层次较低的人群进入劳动市场，而且是合法的劳动市场，而非地下经济体系。基本收入也让人们无须担忧会因接受兼职的就业机会而失去津贴，这对负担照护责任的人或无力承担全职工作的伤残者来说尤其有帮助。

我们回过来谈谈实验证据。很多批评者的论述基础是，根据美国六个州在1968～1980年间进行的一系列本地实验，以及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进行的著名Mincome实验，基本收入将降低“工作”诱因。事实上，那些实验都是对低收入人们发放某种接近基本收入的补助金的负所得税实验。实验人员只收集标准的劳动力数据，而这些数据促使加里·伯特莱斯（Gary Burtless）等经济学家认定基本收入会温和降低工作诱因。[5]

然而，这些数据（有非常大量的经济分析以这些数据为主题）只和有薪就业人口或求职者有关，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工作无关。如果一个人为了照顾子女或年迈的亲人而在他的职业上工作较少时数，就会自动被判定为“工作”量减少。此外，诚如伯特莱斯承认的，负所得税本来就有鼓励少报劳动与薪资收入的倾向，因为申报的薪资收入数字愈低，获得的收入补贴就愈高。这种“不道德风险”意味着一般观感中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是个假命题。

姑且不谈这些分析的概念缺陷，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测出的影响很小。卡尔·维德奎斯特主笔的一篇杰出评论检视了其中数百份研究报告，最后他归纳的结论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多半不具统计重要性，换言之，相关的影响小到不值得政策制定者关切。[6]可惜还是有很多人执意引用那些研究来证明工作诱因的降低。[7]

充其量来说，这些研究只能证明基本收入导致某些群体的有薪劳动量小幅降低，而那些群体主要是家里有幼童的妈妈，还有就学中的青少年。在加拿大的Mincome实验中，“家里有新生儿的妈妈停止工作的原因，是想多待在家照顾婴儿，而青少年减少工作的原因是，发放基本收入后，他们抚养家庭的压力减小，而这最终使更多青少年得以完成学业。”[8]

相似地，美国的那些实验也发现，一般人会借此把握改善生活的机会，包括为了取得学位以及提升职场位阶而继续升学。新泽西、西雅图和丹佛的高中毕业率呈现两位数的增长。[9]诚如长年倡议基本收入的麦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言：“一般人从劳动市场撤离，但那种劳动市场撤离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10]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由劳动转变为工作。这听起来像是工作量减少吗？这不仅不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甚至可说是个好结果。

当中两个实验的主要明显变化是，某些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稍微拉长。然而，我们不该将之解读为“懒惰”：失业时间拉长有可能会产生有利的长期影响，因为那让他们得以找到更适合自己需求与能力的就业机会。

其他主张基本收入会降低工作诱因的人，则是纯粹基于直觉和（或）秉持道德观点（即不劳而获论述）而作此论断。诚如其中一个评论家所言：“就经济、社会与道德观点而言，对某人发放某种物质报酬却不要求他制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交换，是一种令人质疑的做法。”[11]不过，这样的说法等于假设市场上只有有薪劳动是有价值的，这明显荒谬。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价值，即使某些工作的具体价值很难或根本无法以数字来评估。

有些批判者更步步紧逼，主张基本收入不止可能降低劳动与工作意愿。在法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者高伯瑞（Pascal-Emmanuel Gobry）的想象中，基本收入将促使数百万人“处于对社会有害的无所事事状态”，“而这种生产力流失的后果将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就业人口也可能减少”[12]，从而使这个世界的未来呈现出一个反乌托邦的景象。问题是，没有证据能证明那类断言是正确的，这样的观点对人类的素质是一种侮辱，因为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想过最低忍耐限度的生活。

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是另一个宣称让生活达到“舒适”水准的基本收入将导致“工作诱因降低”的人。她也主张劳动力供给降低将使税收减少，导致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并因此进一步压抑从事有薪工作的意愿。[13]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这个观点属实。

许多国家的意见调查发现，当受访者被问及如果能领取基本收入，他们的工作与劳动意愿是否会降低，绝大多数的人回答“不会”。然而，当被问到别人会不会因为领了基本收入而减少工作与劳动，多数受访人却倾向于回答“会”。换言之，每个人都认定别人是懒鬼，而自己不是！另外，批判者也假设，低收入者将因领取基本收入而降低劳动与工作意愿，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假设较富裕的人不会那么做。毕竟尽管比尔·盖

茨、沃伦·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富豪肯定不需要收入，他们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工作。

姑且不谈亿万富豪，1999年一份针对乐透彩得主所做的调查显示，所有得主都继续（或希望继续）从事某种工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的人继续留在原先的职位。取而代之，多数得主转而投入自己真心喜爱的工作，包括有薪与无薪的。另外，在一系列询问“如果你赢了乐透彩，打算做什么”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人表示自己将继续工作，但不尽然会留在原职。[14]另外，毫不意外地，被问到是否偏好继续从事原本赖以维生的职业时，受访者认为，在不考虑原职务赚多少钱的情况下，答案取决于他们有多喜欢那个职务。专业领域人士和“有薪阶级”回答将继续留在原职或相同行业的比例高于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想当然尔，后者的工作有可能比较枯燥或令人厌恶，所以工作满足感较低，也较想转职。

2016年6月瑞士举办基本收入公投前的一份民调询问受访人：如果基本收入通过公投并开始发放，你是否会停止原本的经济活动？[15]在暗示每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基本收入的前提下，只有2%的人回答“会”停止——尽管那是多数人认为能让生活达到“舒适”水准的金额。然而，却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别人“会”停止原本的经济活动！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如果能获得基本收入，就会趁这个机会去受训，另外，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将试着独立。有40%的人表示将做一些或做更多义工工作，还有53%的人说自己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基本收入的目的不是要让人有钱得以无所事事，而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另外，我们不该忘记，即使某些人因领取基本收入而减少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预期还是有其他人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但一般人总是倾向于完全聚焦在一些未经证实的负面影响。这使基本收入的倡议者提出较少被思考的论述：基本收入将倾向于增加工作量并提高工作品质，一个跨国的心理学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属实。[16]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发现，拥有基本保障的人倾向于做更多工作，而非更少。他们也比较愿意与人合作，那意味其所属工作群组将会更有生产力。拥有基本安全感的人会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活力，也比较信任其他人，因此，他们会做比较多工作，工作品质也比较高。

这类效应在低收入社群可能尤其强大。所以，在稍后将讨论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中，当地的整体经济活动确实在基本收入开始发放后上升。[17]在印度中央邦进行的几个更大型的试点计划，成年人的工作与劳动量也增加，尤其是女性成年人；那多半是因为很多基本收入领取人开始从事次级经济活动——多半以个体户的方式进行。[18]学龄孩童是劳动量降低的唯一群体，因为有些人开始专心上学，有些人则一边上学一边在自家农田或事业帮忙，这两种工作对学习的干扰，比先前的临时有薪劳动工作小。只关心富裕工业化国家发放基本收入后的情况的人，或许会对这些研究结果嗤之以鼻。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回应方式有可能很相似。一般人通常会想过比目前更好的生活。如果你都抱持这样的想法了，又怎么期待别人不会这么想呢？

基本收入相关辩论的重要主题之一是：20世纪收入分配制度的瓦解。这个制度将收入与政府津贴和劳工表现挂钩，而且国民收入流向劳动与资本的比重大致稳定。但如今，有愈来愈多人无法通过自己被要求或被期待去做的工作与劳动获得适足的收入，不管他们工作有多么辛苦，工时有多么长。[19]全球化、技术变革与“弹性”劳动市场等，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工业国家的平均实质工资将停滞，很多处于危产阶级的人将因此永久被困在低薪酬和津贴的纠葛关系里。

某些批判基本收入的人争辩，国民收入流向劳动的百分比降低的情况，只发生在工会势力较弱的国家，所以他们宣称，如果那些国家的工会变强大，其工资和工人生活水准就会上升。[20]这种论述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工会与集体协商制度迄今仍相对强大的国家，如奥地利，劳动于全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见降低。

基本收入将成为危产阶级的总收入里的重要基础，它也让低收入阶级得以用微薄的酬劳水准来为其他低收入者做点零工。目前劳动的潜在供给人无法从事小零工，第一个原因是收入太低，尤其是他们可能因此而损失财力调查式津贴；第二个原因是，潜在客户[21]则负担不起以现行薪资水准支付工人的酬劳。所以，基本收入将促进低收入者之间的交易，并有助于引导他们走出地下经济体系。

基本收入的受争议层面之一是它对男性与女性的工作形态的影响。诸如英格丽·罗贝恩斯（Ingrid Robeyns）等评论家主张，基本收入将强化传统二元论（dualism）——即女性被“贬黜”到只能做家庭里的工作。[22]不过，没有理由抱持这样的思维。如果女性也领取属于自己的基本收入，她们就会有更大的经济安全感，进而更有条件自主决定自己的无薪工作与有薪劳动组成。因此，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才会主张基本收入反而将降低劳工的性别分工（sexual division）程度，其他人如艾莉莎·麦凯（Ailsa McKay）、安·艾斯托特（Anne Alstott）、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等也抱持相同的观点。[23]

我们不能假设个别发放给女性和男性的个人基本收入，绝对能克服家庭内部的许多性别不平等状况。不过，它绝对有助于改善那些问题。目前所有国家在评估社会保障的需要时，都是以家庭而非个人状况来评估需要给予多少社会保障，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家庭内部可能导致女性无法取得金钱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就算家庭财务状况表面上已因领取津贴而变得富裕许多。

女性必须能独立使用金钱，这是一种基本保障，无关乎她们的双亲有多富裕；过去四十年间，反家庭暴力与反家庭掠夺运动不断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美国的负所得税实验所归纳出来的最重要研究发现之一是，相关的津贴让某些妇女有了终结受虐关系并展开独立生活的工具。（讽刺的是，以这两个实验来说，婚姻破裂案例大幅度增加，成为美国政治圈放弃支持保证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后来的事实显示那是统计误差。）

政府以家庭为对象来评估津贴领取资格的做法，有高度干预人民个人生活之嫌。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维权者协会（claimants

unions）的妇女成员，要求应该以个人为对象发给福利（她们也呼吁发放基本收入），但这些呼声都未能阻止政府“以翻箱倒柜般的手法调查人民的财力”。[24]

发放给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将让平常担任照顾者的人——多半是女性——得以依照其意愿，决定是否放弃有薪工作，另一方面也让平常仰赖亲人无酬付出的“被照顾者”，有能力购买照护劳工所提供的服务。巴西的家庭津贴（bolsa família）现金转移计划已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因为这项计划帮助支付孩童照护的支出以及公共运输费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基本收入也将让妇女更有能力主张平等的医疗优先权，以前“养家糊口者”优先的倾向得以改变。较好的医疗将让妇女得以做更多工作，而且只要愿意，她们也能从事更多有薪劳动，因为较好的医疗将让她们变得较不容易生病。这是基本收入不会“明显”导致工作诱因降低的另一个实例。

基本收入只可能会导致一种形式的劳工降低工作的诱因，那就是性服务工作。非法交易和强迫卖淫当然必须加以惩处，不过，剥夺性服务工作的权利或加以惩罚，不仅流于偏执而且容易适得其反，而宣告从事性交易的任何一方犯罪，也只会导致非法剥削的情况恶化，并驱使这类活动地下化。然而，基本收入能强化性工作者的交涉地位，对想要逃脱这类工作的人来说，基本收入确实是一帖解放良方。

最后，有人说基本收入完全无视“互惠主义”，让人不劳而获，面对这种批评，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回应应该会是：传统上男性总是免费享受多半由女性所完成的无薪家务工作，若以补贴这类工作的薪酬的角度来说，基本收入的发放绝对合情合理。[25]当然，这个结构性不公平反映出一个事实：世人武断地认定有薪劳动比无薪工作更有优先性。基本收入将有助于矫正上述不互惠状况，尤其若能针对工资收入课征些微的税，作为补贴那类无薪工作酬劳的财源，矫正效果会更好。

长期以来，很多人争辩人民有“工作权”。世界上真有这种权利吗？就算有，基本收入会对这种权利造成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些疑问的第一步，是先厘清“工作权”的意义。所谓“权利”和促进与捍卫人类自由有关，所以就定义来说，“权利”是全民皆享有且不可剥夺的。而若某件事情是权利，那一定会有一项以维护该权利或以达成那个目标为目的的对应义务（通常是政府的义务）存在。由此可知，一项“权利”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原则上能实现。

提倡“工作权”的人认为这项权利应该实现什么？他们所谓的“工作”，通常是指从属型就业人口的有薪就业机会。不过，在一个雇主眼中，劳动“权”鲜少能提高自由度，它反而比较像一种义务。除非将工作权解读为一种发展个人创造力、生产力与“再生产”能力的自由的权利，否则工作权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除非一个人拥有取得基本收入的优先权利（prior right），否则上述意义的工作权也无法实践，因为唯有基本收入才能赋予每个人自由发展其天赋、随心所欲规划有薪及无薪工作组合的自由与安全感。

工作权定义的演变非常发人深省。19世纪初，乌托邦社会学家傅立

叶主张维护“工作权”，但他的观点随后遭到马克思驳斥，马克思批评，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工作权是“一种荒谬、悲惨且无法实现的愿望”。后来，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在他著名的1891年《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中讨论工作权，促使它从此成为某种“神主牌”。这份通谕是在欧洲各地工人不满持续扩大，国际上的社会主义也同步兴起的局势下发表，对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所衍生的种种弊病来说（资本主义以工人对雇主的一系列义务来抗衡“工作权”概念），这份通谕堪称一种温和专制式的回应。

进入20世纪后，“工作权”概念很快就和某些人声称的“劳工的义务”纠缠在一起。苏联将这个现象予以神化，而西方世界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也呼应这个状况——他在1941年发表一项没有意义的声明，表示劳动既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义务。直到今日，“权利”与“义务”之间纠缠不清的状况都没有改善，很多论述主张“不负责任就不能享受权利”以及“互惠”等，意思就是指接受津贴的人有义务付出劳动力作为回报。但这样的状况让“权利”的概念遭到抹杀，因为权利的享受不该附加互惠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订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二十三条宣言中，将这项“权利”正式定义如下：“每个人都有工作权、有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有享受公正且有利工作条件的权利，以及拥有失业保障的权利。”这个信诺正好和各国政府突然自认有能力及义务创造“充分就业”（实际的意思是男性的充分就业）的信念同步出现。

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九六四年的《第122号就业政策公约》（*Employment Policy Convention No.122*）中又向前跨进一步。虽然这个公约并未将政府承诺保障“工作权”的义务落实为该公约里的文字，后来外界还是如此解读这项公约。1983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委员会表示：“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与建议》促进充分、有生产力且可自由选择之就业机会的宗旨，应该被视为一种在实际上实现工作权的工具。”

因此，国际上最高层级人士把就业与工作视为同义词，坚持每个人都有劳动义务的严格教条的苏联、坚信劳动价值的社会民主政党或劳工政党，以及用温和专制方法来应对贫困的天主教教会等，也都没有察觉这个差异。

1965年开始，随着整个世界对凯恩斯学派的总体经济工具与社会民主社会政策的信心崩溃，世人终于倾向以较慎重的态度来看待“工作权”。联合国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比1948年的宣言更详细且微妙地声明：“本公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工作之权利，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保障此一权利。”

后来，天主教教会也修正了它的公告。1981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发表了《论人的工作通谕》（*Laborem Exercens*），他在当中重申教宗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在1963年那令人混淆的主张——人类享有就业的“自然权利”；然而，1991

年为庆祝《新事通谕》一百年而写的《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中，就已察觉到将就业和工作混为一谈所造成的混乱。

虽然《百年通谕》支持利用劳动市场政策来减少失业，却不支持提倡就业权，它的结论是："一个政府无法直接确保它的所有公民的工作权，除非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每个层面，并限制个人的自由主动权。"而如果政府无法保障工作权，那又有谁或什么机构有这个能力？这份通谕公允地对"民间雇主应有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的荒唐想法表达了犹豫的态度。

2004年，一个包括联合国数个重要实体的代表（还包括我本人）的国际团体，起草了《新兴人权宪章》（*Charter of Emerging Human Rights*）[26]，这份宪章接受了各式各样工作的概念，也否定了"劳动是一种义务"的见解。这份宪章宣示支持在保有尊严条件下的生存权，包括生命保障、个人尊严、基本收入、医疗、教育、死得其所以及工作等权利，所谓工作权的定义为：

> 工作——包括所有形式的工作、有酬或无酬——的权利涵盖"执行一个能保障生活品质且值得从事的活动"的权利。在尊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所有人都有权享受自身活动所产生的成果，有权享受知识产权。

"工作权"在这个定义下才有意义，每个人——无论性别、种族、社会地位、宗教或性取向——都应该有权从事自己选择的"值得从事的活动"，且不应因任何武断的壁垒阻碍（例如繁杂且不必要的授权规定）而无法实践他们有资格去做且想要做的事。[27]某些人声称基本收入和工作权彼此矛盾，但事实上不仅并非如此，基本收入还是工作权的必要支柱。基本收入不仅给予人们发展自身能力的工具，还让人们得以拒绝自己不想要的就业机会。最终来说，工作权必须包含某种不工作权，而一个缺乏安全感且绝望的人不可能拥有"不工作权"。

自从贫困与基本收入相关的辩论展开后，某些人便主张收入援助只能有条件发放给"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刚逝世的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长年提倡"参与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28]，安德里·戈尔兹（André Gorz）在更早之前就已提出类似的概念。[29]阿特金森在他最近的遗作中，提议每个人都应该领取一笔基本收入，但也应该至少每周做三十五个小时"经认可"的工作活动来作为回报。

这项义务看起来可能很公平，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个条件可能不会影响到目前已在从事全职工作且获得优渥薪资收入的人，但对只能从事（或只能找到）辛苦劳动力工作或低薪工作的人来说，却是一项艰苦的义务，这项义务难以长久履行，代价也很高。这个条件也会扭曲劳动市场，导致低薪族的工资更加降低，因为它会让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导致原本无需做任何事就"理应得到"这笔收入的人变得更贫困，而那也将是不公平的。

监督这类计划的行政成本也将会非常庞大，除非只是单纯将它当作

一种为了争取大众赞同而摆出的姿态，而不强制执行。而且，这类计划将产生许多令人望而却步的疑问，包括哪些活动才算“经认可”的工作，以及要如何计算时数等。照顾体弱多病的祖母算不算“经认可”的工作？如果是，官僚体系的官员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在照顾祖母，还是窝在家里欣赏足球赛电视转播？难道要规定被照顾者出具担保书吗？

如果这个制度真的实施，有心人将有非常大的空间上下其手，官僚体系进行裁决性判断的空间也会非常大。即使把“经认可”的工作活动限定在社会义工类的工作，主观判断的状况一定还是处处可见。一个督察员会不会为了离间义工之间的关系，而要他们密报有哪些人只工作二十五小时而非三十五小时？实际上，参与收入计划将造成多重的卑劣偏私行为。而且，诚如先前提到的，如果一项权利被设下“互惠”的条件，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互惠，那项权利就称不上一种权利了。

皇家文艺协会所建议的基本收入计划中，也提议和18～25岁的领取人签订“贡献合约”（contribution contract）。[30]根据这个与朋友、家人和社区签订的非强制性合约，签署人同意做出某种贡献，作为领取基本收入的一种回报。政府不会监督他们是否履行合约，而且就算未履行合约也不会受到惩罚。这类合约或许无伤大雅，且可能有助于确立基本收入的政治合法性。不过，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自己的侄子或邻居没有履行合约，甚至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径自污蔑对方。所以，最好别继续在这个想法里打转了。

>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
> 岂料一只棕色鸟儿飞到苹果树上歌唱，
>
> 一只蝴蝶在田野中飞舞，
>
> 所有树叶更声声呼唤着我。”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理查·嘉利安尼（Richard le Gallienne），
1866～1947年

些许的闲散本身并没有错，这个观点和执拗的劳动主义者一向严守的训诫恰恰背道而驰。各个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都曾以不同的论述，赞同些许的懒散是好的。其中，亚里士多德更直言不讳地承认闲散对沉思的必要性。罗素也写过一篇远近驰名的小品文《闲散颂》（*n Praise of Idleness*）。另外，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则写了一本名为《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的书，这本书颇覆性十足，备受共产主义者憎恨，因为书中的论点反对强迫每个人更密集劳动。然而，如今诸如“闲散”和“懒惰”等字眼，却带有明显的贬义，被用来传达不积极、浪费时间与随波逐流。

闲散有什么不对？尤其是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更加需要放慢脚

步，回头深思加图（Cato）的至理名言：“一个人最活跃的，莫过于他什么也不做的时刻。”现代人正面临失去反省、慎思、冥想甚至沟通与真正学习的能力的风险。

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文明贡献之所以那么显赫，都是因为就传统的经济意义来说，他们都“无所事事”。[31]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就承认，他之所以会登上小猎犬号并展开那史诗般的航程，都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让他“无需为了养活自己而工作，还能拥有非常丰富的安逸生活”。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也说，他对西方哲学与数学贡献革命性突破的唯一可能原因是，“感谢上帝，我的环境让我不会感觉到自己有义务为了纾解我的财务状况而把科学当成我的专业。”当然，他们所做的事都应该称为“工作”，不过，我们的劳工统计却会将他们付出的那种无偿努力视为赋闲。

以多数案例来说，当初应该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些“赋闲的绅士们”后来会创造那么大的贡献。这个事实证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要不要赋闲的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活力和天赋，后续的贡献将更大；就算没有，他们对社会和经济体系造成的损失也将非常微小。

举个例子，很多人是基于好玩和消遣的心态而运动，而某些人却因从事相同的活动而获得非常优渥的薪酬，一切只因为他们“擅长”运动。外界对他们的技能有需求，而且有一个市场供他们发挥。然而，如果把公共的资金交给某些特别挑选出的人去做他们未来可能会“擅长”的事，完全无视于其他很多拥有未知潜力的人，似乎不公平。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动用国家乐透公司的资金，赞助有奥运冠军潜力的运动员。实质上来说，英国政府等于支付基本收入给那些运动员，让他们得以尽可能把时间花在自己选择的运动项目上。[32]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不同时赞助其他人（不管有没有成为冠军的潜力）？为什么其他人不能也拥有发展自身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能力）的财务安全感？奥运资金赞助政策体察到人民需要基本安全感才能好好发展他们的天赋、潜力和才能，这一点非常可取，不过，这项德政应该一体适用到每一个人才对，而这就是基本收入将实现的目标。

但以上关于懒惰的简短反思应该附加一个警语。如果基本收入的提倡者认为基本收入将让每个人获得“偷懒的权利”——意味着不积极的懒惰生活，那他就犯了一个政治与智识上的错误。取而代之地，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促使人们放慢脚步（慢活运动）并更善加掌控自身时间（就算有一些无所事事的时段也不会被羞辱、定罪或惩罚）的工具会比较好一点。

基本收入将允许更多人追求自己热爱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宽裕者。这不仅能达到个人层次的满足，还能通过鼓励创业、有创意的努力，以及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各种事务，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红利。诚如约翰·欧菲瑞尔（John O' Farrell）曾写的：

> 任何曾经创造任何事物的人，都是在拥有些许财务安全感的状

> 况下创造的。也因如此，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才会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年五百英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只善加利用了非常少数英国人的潜力；剩下的人都没有力量开创或发现自己的真正天赋何在。[33]

我们的社会需要人能拥有更多闲暇，这不仅是为了让人可以有一点暂时停止工作的时间，也是为了让人得以强化他和家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参与公民与政治事务。从经营亲师协会到探访老人等，无薪工作实质上是为了让社区的功能运作变得更加顺畅且蓬勃发展。然而，如今世人投入各种义工组织的情况已不如过往热烈，以美国来说，那多半（但非全部）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提升所致，因为女性原本是美国义工实体的主要驱动力量。[34]基本收入也将让人得以花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辩论，协助重建目前在多数国家已不复见的“协商式民主”。

我们预期人们转而从事诸如照料亲人或社区工作等“再生产”工作的趋势，将产生有利的环境影响，因为那代表人们将转向保护资源的活动，脱离损耗资源的活动。在职工作时数的缩短和生态足迹的缩小息息相关。[35]另外，基本收入将允许人们拒绝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谓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令人痛恨或无意义的工作），或减少从事那些工作的时间。[36]

诚如第二章提到的，基本收入也将使政府更容易实施碳税与其他用以抑制污染及减缓气候变迁的环保对策，理由是，基本收入能补贴因环保对策的实施而徒增额外食物与服务成本、失去谋生渠道或原有的谋生方法遭到扰乱的人。“去增长”（degrowth）运动的某些支持者将基本收入视为重整经济秩序的一个必要环节，与提倡“零增长繁荣”（至少以传统方式衡量的成长）的各种政策一并执行。[37]基本收入让人们通过就业取得的收入占比降低，从而鼓励人们质疑“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就业的欲望”的意义，同时促使人重新思考就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将这个主题留到最后讨论的原因是，尽管这类行为性的“工作”调查从头到尾都很愚蠢，但如今这类调查在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愈来愈重要。各国政府目前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很多人因“伤残”或“无法恢复健康”而难以或完全无法工作或从事劳动，或得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锁定“理应领取的穷人”的各种目标锁定型政府津贴，会促使政治人物运用“工作能力”调查，试图减少有资格领取伤残津贴的人数。这些调查不可避免会流于武断与歧视，也容易引来大众对伤残者的怀疑与恶意对待，从英国缩紧相关规定后，很多伤残者遭遇令人发指的肢体攻击行为便可见一斑。[38]

欧洲与北美很多其他国家还推行了更严谨且更排他性的规定。美国最高法院的规定，让伤残者更难证明自己是否真的无力工作，这已导致符合申请伤残津贴的人数减少。其他地方实施的工作调查，也对偶发性伤残（如背痛或严重沮丧）者造成严重打击。运气够“好”的话，他们可能被判定有能力就业，只不过，接在那个“好”运之后有可能遭遇“厄”运。

工作能力调查也制造了某种荒谬的道德风险。如果一个非常努力克服伤残限制的人被判定“有能力工作”，他可能会失去津贴，但他可能还是因实际身体状况不允许而找不到就业机会。相反地，如果他们不那么努力克服伤残限制，反而比较不可能失去津贴。换言之，这种调查会导致努力试图克服伤残的人反而遭到惩罚。

这项政策污名化并惩罚已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所以，从道德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打破收入保障与任何种类行为之间的联结，同时根据额外生活成本估计值与较低职场收入的可能性，为伤残者提供特殊伤残津贴会比较好一点。这对一个努力通过劳动来赚取收入的伤残者来说，将产生适当奖励的效果。放弃“工作能力”调查并建立一个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将增强人们发展自身工作能力的诱因。

医疗鉴定应该用来判断与特定类型的伤残有关的额外生活成本，以及那些伤残对薪资的可能影响。接着考量伤残者的额外成本与较低的可能薪资，计算除了基本收入外还要额外补贴多少钱给他们，这样就能减轻领取人被污名化的感受，同时协助伤残者获得符合社会正义的补偿。

适当水准的基本收入最不可能阻碍工作与劳动意愿，相反地，它还可能增加工作数量与提高工作品质。基本收入也让“工作权”变得有意义。我们必须区隔“工作”和“劳动”，以及“娱乐”和“闲暇”的差异。所有人都必须体察到这些活动的必要性——人生不是只有劳动和娱乐。也因如此，我才会把“重新定义‘工作’”列为我建议的《危产阶级宪章》（*Precariat Charter*）的二十九款条文中的第一款。[39]

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对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做的重要非劳动工作强加了三重惩罚：首先，我们并未因为做那些工作而获得酬劳；第二，我们可用来从事有薪劳动的时间遭到剥夺；第三，现行的提拨制社会津贴领取权利来自一个人劳动与否，而非来自其他多数形式的工作。如果基本收入有助于将我们的焦点从就业与劳动转向我们更重视的其他形式工作，并更重视具有培育、鼓舞及（或）政治性质的闲暇，那将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遗憾的是，主流政治路线一直被工作相关的偏见左右。英国就业部长达米安·辛兹（Damian Hinds）在2016年9月英国下议院一场有关基本收入的辩论中表示：“即使是最节制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都会导致税率不得不提高……在此同时，它将使得公民的工作动机大幅降低，对全国经济体系的后果难以估量。”

他还补充，基本收入将会“抑制工作的诱因”，和政府预定实施的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 Scheme）的影响相反。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那份声明都是错误的：在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的架构下，边际薪资“税”率有可能超过80%，相较之下，基本收入架构下为32%（以当前的税率与国民保险费率计算）。这位部长也未能体察到还有其他工作是非在职劳动型的工作。

基本收入将促使个人更有动力和机会去做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工作，更好的是，基本收入还可能促使人更有意愿和能力，以“schole”精

神中那种更深思熟虑的懒惰，好好地享受更多有生产力的闲暇时光。活在一个以不断劳动为基础与消费主义盛行的经济体系，我们真的需要放慢脚步，而基本收入正可以鼓励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注释：

[1].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p.19.

[2].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Changes in the value and division of unpaid care work in the UK: 2000 to 2015’, ONS, 10 November.

[3]例如接受性向测验与能力检定等。——译注

[4].S.Green Carmichael (2015), ‘The research is clear: Long hours backfire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 August.

[5].G.Burtless (1986), ‘The work response to a guaranteed income: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A.H.Munnell (ed.), Lessons from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Conference Series 30. Boston, M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22-59.

[6].K.Widerquist (2005), ‘What (if anything) can we learn from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4(1), pp.49-81.

[7].For example, Tanner, Pros and Cons.

[8].S.Kennedy (2016), ‘Are basic income proposals crazy?’,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8 September. http://inequality.org/basic-income-proposals-crazy/.

[9].E.A.Hanushek (1987), ‘Non-labor-supply responses to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in Munnell (ed.), Lessons from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pp.106-30.

[10].N.Hines (2016), ‘Robots could mak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necessity’, Inverse, 11 August.

[11].M.Naim (2016), ‘As robots take our jobs, guaranteed income might ease the pain’, HuffPost, 18 July.

[12].P.-E.Gobry (2014), ‘ “Progressives” hot new poverty-fighting idea has just one basic problem: Science’, The Week, 21 July.

[13].B.R.Bergmann (2006), ‘A Swedish-style welfare state or basic income: Which should have priority?’,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for an Egalitarian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130-42.

[14].R.Paulsen (2008), ‘Economically forced to work: A crit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ottery question’, Basic Income Studies, 3(2), pp.1-20.

[15].FERinfos (2016), ‘Revenu de base inconditionnel: Les Suisses continueraient de travailler’, FERinfos, February, p.9.

[16].Among others, N.Frohlich and J.A.Oppenheimer (1992),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C.Haarmann, et al. (2008),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Assessment Report. Windhoek: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 and Namibia NGO Forum.

[18].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19].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20].V.Navarro (2016), ‘Why th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not the best public intervention to reduce poverty or income inequality’, Social Europe, 24 May. V.Navarro

(2016), ‘Is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welfare state dead? A critique of Varoufakis’, Social Europe, 4 August.

[21]指其他低收入者。——译注

[22].I.Robeyns (2000), ‘Hush money or emancipation fee? A gender analysis of basic income’, in R.-J.van der Veen and L.Groot (eds.), Basic Income on the Agenda: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tical Chanc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121-36. Bergmann, ‘A Swedish-style welfare state or basic income’.

[23].C.Pateman (2006), ‘Democratizing citizenship: Some advantages of a basic income’, in 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pp.101-19. A.McKay (2001), ‘Why a citizen's basic income? A question of gender equality or gender bia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1(2), pp.337-48. A.Alstott (2001), ‘Good for women’, in P.van Parijs, J.Cohen and J.Rogers (eds.), What's Wrong with a Free Lunch? Boston: Beacon Press, pp.75-9. K.Weeks (2016), ‘A feminist case for basic income: An interview with Kathi Weeks’,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27 August.

[24].T.Yamamori (2016),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 grassroots feminist UBI movement? Revisiting Keynes' prophe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25].Among others: Pateman, ‘Democratising citizenship’. R.Mulligan (2013),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recognition theory: A tangible step towards an ideal’, Basic Income Studies, 8(2), pp.153-72. T.Henderson (2016),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emancipatio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case for basic income in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26].IDHC (2004), Charter of Emerging Human Rights. Barcelona: Institut de Drets Humans de Catalunya.

[27].G.Standing (2009), Work after Globalization: Building Occupational Citizenship. Cheltenham: Elgar.

[28].A.B.Atkinson (1996), ‘The case for a participation income’, Political Quarterly, 67(1), pp.67-70. A.B.Atkinson (2015),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A.Gorz (1992),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ety and community and why basic income cannot by itself confer full membership’, in P.van Parijs (ed.), Arguing for Basic Income. London: Verso.

[30].A.Painter (2015), ‘In support of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Introducing the RSA basic income model’, Royal Society of Arts blog, 16 December.

[31].J.Dodge (2016),‘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n't make people lazy-it would change the nature of work’, Quartz, 25 August.

[32].M.Whitlock (2016),‘How Britain's Olympic success makes the case for a basic income’, Huffpost Sport UK, 31 August.

[33].J.O'Farrell (2016), ‘A no-strings basic income? If it works for the royal family, it can work for us all’, Guardian, 7 January.

[34].E.Green (2016),‘What America lost as women entered the workforce’, Atlantic, 19 September.

[35].K.W.Knight, E.A.Rosa and J.B.Schor (2013), ‘Could working less reduce pressures on the environment? A cross-national panel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 1970-2007’,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4), pp.691-700.

[36].D.Graeber (2016),‘Why capitalism creates pointless jobs’, Evonomics, 27 September.

[37].J.Burke Murphy (2016),‘Basic incom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the “DeGrowth” movement’, Basic Income News, 13 August.

[38].G.Standing (2014),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Article 19.

[39].Ibid, Article 1.



第九章

CHAPTER IX

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为解决今日的经济不安全感、贫富差距与贫困等问题，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基本收入替代方案被提出或实施？这一章会讨论全民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与它的另一个版本“维生工资”（living wage）、提拨型社会保险（如英国的国民保险）、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粮食与其他基本物资补贴——包括各种补助金券与食物券、劳动福利计划与工作训练福利计划、所得税税额抵减——包括英国目前推行的“全民福利救济金”（虽然它不该如此命名）等。每一个替代方案的倡议者都宣称这些方案比基本收入好，而且实际上全球各地发达国家目前也分别施行了这些方案。

要比较各个方案，就必须根据相同的条件才能公平评断。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各个案例提出以下问题：这项政策是否改善第二章所讨论的社会正义？它能否提供某种宣扬第三章所定义的共和主义式自由的管道，或者反而妨碍到那种自由？它能否改善第四章所强调的那种广义贫富差距，或者反而让贫富差距恶化？它能否提供广泛的社会经济安全感，或反而使不安全感的情况恶化？它能否大幅改善贫困状况？我们必须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形塑了目前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新自由经济政策框架的脉络下，逐一考量这些问题的答案。

先前几章所描绘的社会正义原则，在评估任何政策价值时十分有用，这些原则如下：

保障差别原则（*The Security Difference Principle*）——唯有能改善社会上没有安全感群体的受保障程度，才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政策。

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The Paternalism Test Principle*）——如果一项政策对特定群体施加某些未同步对社会上最自由的群体施加的控制，这项政策就不符合社会正义。

“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The Rights-not-Charity Principle*）——唯有强化津贴或服务领取人的权利，并对津贴或服务提供者的裁决权设限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另外还有两项原则：[1]

生态约束原则（*The Ecological Constraint Principle*）——唯有不使社会或直接受影响者的生态成本增加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尊严工作原则（*The Dignified Work Principle*）——唯有不阻碍人有尊严地工作，且不使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在这个层面上陷入不利处境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每一项政策都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加以衡量。当然，某些状况难免牵涉到利弊得失的取舍，不过，应该对任何明显违反这些原则的政策抱持谨慎的态度。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削减了集体协商的空

间，并设法压抑工会的力量，这是营造更有弹性劳动市场的做法之一。而多数国家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例如英国实施的国民法定最低工资（德国最近也开始实施），或是像美国，更着重现行的最低工资立法审议等。问题是，各国还是允许工资的实质价值降低。

矛盾的是，在全职就业机会向来稳定的工业劳动市场，法定最低工资的施行成效最好，而在工作与劳动通常较难以（甚至无法）衡量的高弹性第三纪劳动体系，法定最低工资的成效最差，甚至无法运作。最低工资通常以时薪标准设定，但在一个第三纪经济体系，一般人不再是在固定的工作场所打卡上班，而是有愈来愈多时间在不同地方从事零散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衡量“一个小时的工作”是多少？何况最低工资和基本收入不同，前者不会改变工人的协商地位。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某种后盾，就比较有胆量拒绝一个有意剥削劳工的老板开出的工资，不管他开出的薪资高于或低于最低工资；如果你不甘愿接受某个雇主开出的工资，又没有基本收入可作后盾，那么雇主就可能会摆出“不接受就拉倒”的态度。

最低工资的监督与强制执行也很复杂，而且相关成本很高。自英国的国民最低工资法在1998年实施后，有成百上千家雇主违反这项法律，但其中只有九个雇主因没有支付最低工资而被提起公诉。就算雇主“被列入违法雇主名单”却仍未采取必要改善措施，也要等待法院系统的漫长诉讼程序后才可能被惩处。此外，最低工资只照顾到受雇的员工，忽略了没有就业以及各工业国愈来愈多的自雇型人士与所谓的独立合约型工作者。另外，最低工资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也非常没有效率，因为至少在英国，多数只领最低工资的人并不是生活于最贫困的家庭。

反对最低工资的人（他们总认为最低工资“过高”）通常宣称它会导致企业为了节省薪资成本而减少雇用工人。事实上，各项证据显示，最低工资对失业状况的冲击非常小，不过雇主若采用了其他方法节省成本，则可能使工人的财务只比以前略微好转或甚至变糟。

举个例子，假定以最低工资每小时10英镑计算，一家提供清洁服务的企业聘请100名员工，每名员工一周工作30小时。如果最低工资被提高到12英镑，该公司必须把有偿工时减少到25小时，薪资成本才能维持不变，而一旦雇主选择这么做，工人的财务就无法因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好转（或许还会变糟，因为他们可能必须以更少的时数来完成原本的工作量，或是增加无薪工时）。

英国政府在2015年实施国民维生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后，就发生了同样的状况。[2]其中一个案例是，某个为政府税务机关（HMRC）提供清洁服务的企业，将清洁工的每周工时缩减到30小时以下，该公司的工人于是陷入冷酷的贫困陷阱；除了有薪工时减少导致时薪提高的效果遭到抹杀，工人还失去应得的薪资所得税税额抵减权利，因为这项权利只有每周至少工作30小时的人才能享受。结果，该公司清洁工的财务状况反而变差了，甚至有人煽动某些工人，干脆放弃就业去申请全额津贴，因为这样最后得到的金钱还比去清洁公司工作多。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更显示，复杂的社会救助计划反而造成伤害：一

名先前失去所得税税额抵减资格的女性被迫继续就业，而不选择申请社会救助津贴，因为如果她去申请那种津贴，势必会失去她的房子——虽然她的子女已经长大离家，她却还是继续住在原本的三房住宅，而所谓的“卧房税”（bedroom tax，如果某人家里的卧房数被认定为超过法定最低供直系亲属使用的卧房数，那她可以领取的住宅津贴将会减少）有可能会导致她无力负担租金，最后不得不搬到较小的居所。不意外地，她后来很快就因压力引起的高血压而住进医院。

就社会正义原则来说，最低工资并无法满足保障差别原则，因为最低工资并未对社会上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提供较多保障，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弹性”劳动市场。虽然就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与“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来评断，最低工资的表现还不错，但它对自由的促进毫无助益，只是让某些员工的财务状况好一点。另外，充其量来说，若根据生态约束原则，最低工资的影响也只能算是中性，而且它较提倡消耗资源的劳动，对保护资源的劳动与“再生产”型工作则较不支持。最低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不再是有用的主流社会与劳动政策工具。

在20世纪多数时间，以贝弗里奇与俾斯麦模型为依据的社会保险原则被各国用来作为福利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共同责任，换言之，它借由交叉补贴的方式，让较不会发生某项投保风险的人补贴较可能发生的人。这些被保险的风险称为“或有风险”（contingency risks），像是失业、生病、意外、伤残与怀孕等。每一种或有风险都能借由相关事件发生的统计概率来精算其保费和津贴。

但实际上，社会保险制度从来都不像这些制度的捍卫者所宣称的，那么能让人们产生社会连带感（休戚与共的感受），它的保障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全民化，尤其是对弱势的妇女而言。不过，只要提拨群体确定且广泛，有足够的人提拨相关款项并领取相关的提拨款，且人们最担心或对人们影响最大的风险有获得保障，这些制度的运作成效还算不错，而且能获得广泛的民主支持。

但进入21世纪后，上述状况不如以往适用了。由于愈来愈多人陷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提拨群体遂渐渐缩减，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利用一般性收入来增补社会保险所需的基金。相同地，现在一般人也愈来愈没有能力累积足以让自己有权领取保险津贴的适足提拨纪录，于是，一旦陷入艰苦时期，人们就不得不仰赖财力调查式救助。另外，有更多人暴露在保险不太有保障或完全没保障的风险里。

与此同时，承担较低或有风险的较高薪资收入者，也变得愈来愈不愿意交叉补贴上述高风险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的态度侵蚀了社会保险津贴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支持力量，并引发缩减津贴与降低提拨比率的呼声。

最重要的是，诚如第四章说明的，经济不安全感的本质已经转变。危产阶级的薪资收入愈来愈起伏不定，而他们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构成一种不确定性，尤其不确定性是社会保险无力解决的。要让社会保险发挥充分的功能，经济体系必须拥有大致稳定的工业全职就业人口，但这种情况已经距今非常遥远了，未来的情况也改善不了多少。

在一个有弹性的第三纪经济体系，社会保险无法通过保障差别原则的要求，不过，它相当符合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和“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只是社会保险一点也不符合生态约束原则，相关原因和最低工资不符合该原则的原因相同，因为社会保险主要也是对有薪的“劳动”计酬，而未对无薪的“工作”计酬。所以，总括而言，社会保险对最受剥夺且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助益非常有限，而且未能促进社会正义或共和主义式自由。

对社会保险失去信心后，基本收入的主要核心替代方案就剩下财力调查式救助——也就是只“锁定”被认定为“贫困”者的救助方案。这种方案会被视为“核心”替代方案的原因是，一旦采纳，就必须推行许多以该方案为中心的许多其他支持性政策。

20世纪建构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很多人认同理查德·提特穆斯（Richard Titmuss）有关政府津贴的一番著名箴言：只发放给穷人的政府津贴必定是一种糟糕的津贴，因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没有兴趣捍卫这种津贴。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承受巨大压力，各式各样的政府纷纷改弦易辙，建构宏伟的财力调查式社会救济计划，并以“这是经济窘迫时期‘捍卫’福利国家体制的必要对策”，来为这样的政策转向辩解。

表面上看起来，财力调查式津贴的概念非常简单：将有限的钱花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且因这样的支出较少，所以租税得以降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在一般大众眼中，财力调查式津贴让福利支出得以合法化，因为政治人物可以因此宣称钱是花在最贫穷的人身上。然而，很多研究证明这个制度存在惊人的瑕疵，并暗示财力调查的真正动机并不是要帮助穷人。以下是这种制度的十个瑕疵：

第一，收入的衡量非常复杂，而且牵涉到一些武断且便宜行事的规则。将储蓄和“财富”列入计算，有鼓励人不要储蓄的意思，这会使人一旦陷入困境就难以快速复原。

第二，财力调查的应用会衍生高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与申请人必须承担的成本，因为申请人必须往返审核津贴的单位、等待、排队、填写冗长的表格、准备其他证明文件等，这些都很花时间，而且经常要花钱。

第三，财力调查一定会问到很多侵入性的问题，包括请领人的个人亲密关系，甚至可能进行家庭访问等，目的是为了检核申请人的同居人是否确实没有薪资收入。这是一种窥探、侵犯隐私的方法，而且流于有罪推断而非无辜推断，对审查人员和请领人的人格都有所损害。

第四，由于以上因素，这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都会产生污名化的效果，而这通常是为了吓阻请领人而蓄意设计的手段，终极目的是为了降低福利支出成本。诚如英国与美国政府的一名顾问最近所言，应该卑鄙对待请领人并鼓励他们把个人面临的艰难处境归咎给自己。[3]这种说法令人发指，即便你不是基督徒，应该也会认同马尔柯姆·托瑞的敏锐回应：“将请领人污名化的财力调查式津贴，完全没有体认到上帝是以他的

形象来塑造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体认到我们拥有仅次于上帝的尊严。”[4]

这造成第五个瑕疵：低津贴领取率。在每个国家，几乎所有和财力调查式计划有关的证据都显示，很多有权领取津贴的人最后并没有领那些钱。原因包括：他们出于恐惧、感到羞耻或无知等而不愿去申领津贴、申领失败（原因可能是误解某个问题，或是回答了“错误”的答案）以及基于某些琐碎的理由（例如与审核人员见面时迟到）被基层官僚拒绝发放津贴，而那些基层官僚会那么做，部分是出于自以为是，部分则是认为否决那些人的申领，对他们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有利。

在英国，财力调查式失业津贴——后来更名为求职者津贴（Jobseeker's Allowance，简称JSA）——的领取率持续降低，到目前为止，估计原本有权领取的人当中，只有一半申领成功。[5]在2014~2015财务年度，JSA的未领取金额为24亿英镑，相当于每个有资格领取但未领取的家庭可各领3000英镑。另一项低领取率的津贴是保证年金（Pension Credit），这种津贴理当发放给以前国民保险保费缴纳不足，以致现在没有资格领取全额政府退休金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女性，或者是没有其他收入可增补政府退休金的人。2014~2015年间，十个有权领取保证年金的退休人士中，就有四个未领取，未领取总额达30亿英镑，相当于每个有权领取但未领取的家庭可各领2000英镑。

在美国，只有四分之一有权领取财力调查式住宅补助的人真正领到这项补贴，而且通常是苦等多年后，才终于领到住宅补助金券（这种补助金券一年的发行数量有限）。[6]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贫困家庭获得困难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计划的帮助，不过，受救助的家庭数已经比以前增加。[7]

第六，财力调查会伤害社会的休戚与共感，导致群体之间壁垒分明：某一群自食其力的人认为政府要他们缴税来援助另一群人——也就是他们眼中的乞丐。这种功利主义观点是当今社会上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而且，这个观点还日益强化，因为如今的社会流动逐渐降低，且较富裕的人有能力通过民间保险与累积资产等方式，保护自己免于受各种实际上的风险伤害。愈来愈浅薄的社会连带感是鼓励政治人物放任实质政府津贴规模降低，并且不断设法让可申领这类津贴的人数减少的因素之一。

第七个瑕疵是最著名的缺失，就是恶名昭彰的贫困陷阱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飘零陷阱（在第四章提过，在其他篇章也有着墨）。[8]以美国来说，因财力调查而产生的贫困陷阱，意味有35个州的津贴领取人一旦接受最低工资的工作，就反而会亏钱（“税”率超过100%）。[9]某些评论家因此提议，当失业者找到工作以后，应该减缓撤销津贴的速度，唯有如此，才能降低人排斥低工资就业机会的倾向。不过，这个做法对从事相同低工资工作且先前不符合津贴请领资格的其他人来说又不公平。

这造成了第八个瑕疵——朝劳动福利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稍后将更详细探讨劳动福利制度。财力调查式津贴导致放弃微薄津贴并接受低工资就业机会的人，马上就得面临80%或更高的边际税率，因此，

财力调查无形中制造了一种阻止人放弃津贴并从事低薪工作的诱因。而在那些情境下，政府除了以强迫手段逼人们去从事低工资劳动，几乎无计可施。

第九个瑕疵是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会导致人们不愿意稳定组成家庭。因为各种津贴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支付，不是依照人头，所以，以每人可分得的金额来说，单人家庭的每人津贴，势必高于由一对夫妇组成的家庭。既然组成家庭会导致亏钱，那还有什么理由成家（就算是实验性的成家）？相反地，由于基本收入是按照人头发放，而且发放金额相等，所以将鼓励有意愿成家的人组成家庭。就人与人的关系与家庭的建立来说，基本收入将是非常中性的，那正是平等考量所要求的。

第十个瑕疵和收入调查式求职者津贴有关，求职者津贴是根据家庭收入来决定。如果一对夫妻中有一人失业，而若他的另一半原本是从事小额的有薪劳动工作，他将会发生财务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若另一半（通常是太太或女同居人）停止原来的劳动工作，反而会得到好处。这就是英国家庭近几年渐渐被区分为劳动富裕家庭（两个人赚钱）和劳动贫困家庭（没有人赚钱）的原因之一。[10]

通过财力调查以及不可避免的行为调查来决定是否发放社会救助，不符合所有社会正义和共和主义式自由原则。再重申一次，只对穷人设定的政策必定会是非常糟糕的政策。

各国政府（尤其是新兴国家）常采用的一种政策，是提供粮食补贴和其他以“穷人”为协助目标的补贴。印度的公共配给制度是这类计划中最大规模的一个，不过，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计划。补助券计划如美国的食物券计划——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的目标也大致相同。实施这两种计划的理由是，由于穷人缺乏基本物资，所以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物资或让穷人拥有取得那些物资的工具，而且仅限那些物资。新兴国家则常用另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何要实施这类计划——他们主张粮食补贴能保护穷人免于受食物价格波动伤害。[11]

反对这类政策的意见非常多元。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计划都带有温和专制主义色彩，这些计划都假设政府比人们更知道“穷人”需要什么。更糟的是，他们企图支配“穷人”可以拥有什么。举个例子，美国的食物券不仅限制人们只能买食物，通常也只能用在特定被视为“有益健康”的食物或饮品。

补助金券计划和类似救助的实施，等于含蓄甚至公然假设领现金的人们倾向于将现金花在非必需品，尤其是诸如酒精、毒品或赌博等“公害”上。事实上，很多研究都显示，领取现金补贴的人并不会增加对“公害”的支出。[12]不过，就算这些带有偏见的推论是正确的，这些计划也无法让领取人变得更自由。我们凭什么禁止穷人把多余的收入花在他们真正喜爱的事物上？而且无论如何，如果某人真的想把钱花在“对个人有害的事”（我们这些“好人”判定那是“公害”），他们大可以利用因领到补助金券或粮食补贴而多出的钱来消费那些事物，何况他们也可以（用折价出售的方式）把补助券卖掉，换取现金。[13]以美国来说，尽管违

法，但出售食物券的情况迄今仍屡见不鲜，因为那些领取人需要现金来购买其他食物券未涵盖的必需品，如尿布等。

第二，提供补助金券或补贴项目的成本非常高，且行政与监督成本也很高，因为这种计划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执行。举例来说，在印度的公共配给制度下，每提供价值一卢比的食物，政府就得花费3.65卢比的成本。[14]印度或许是个极端的案例，但提供食物援助的成本过高是个事实，这正是联合国辖下各人道组织逐步改用现金救助的原因之一。有一份研究比较了食物、补助券和现金援助的成效，它发现提供食物援助计划的成本高达现金救助计划的四倍。[15]

第三，对受益人来说，补助金券的价值低于相当金额的现金，原因很简单，现金可在任何地方使用，而补助金券只有特定地方才被接受，或者除非店家愿意接受，否则无法使用。这导致店家较不会为了吸引补助金券的持有人上门光顾而彼此竞争，换言之，接受补助金券的店家还可能因此有了涨价的余地。所以，补助金券实际上能买到的东西比等额的现金还少；一份研究发现，黎巴嫩的商店老板接受当局发给叙利亚难民的补助金券，并通过较高的售价来牟利，据估计，光是在2014年，商店老板就通过这个方式赚了估计一百万美元的利润。[16]而且，补助金券或食物援助之类的计划会导致领取人的成本增加，例如他们必须到指定商店消费，这可能需要等待。[17]

第四，这些项目牵涉到财力调查，所以，这个方法也隐含和财力调查式津贴相同的所有瑕疵。以行政机关体系理当相对有效率的美国来说，四分之一真正处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没有领到目标锁定型的食物券。此外，实际上领到那种食物券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还需要寻求食物银行的资助，其他有些人则偶尔有三餐不继的状况，因为一个月的食物券只够支应大约三个星期的食物。[18]

第五，补助金券或类似的援助计划会导致领取人遭污名化，包括蓄意或无意的，同时导致他们身为乞求者的地位与心理变得更无所遁形。第六，补助金券与相关援助计划鼓励劣质食物与服务的提供，且容易导致被授权管理或提供食物或服务的人鄙视请领人。以美国来说，一般人认为贫困者愈来愈集中在贫穷街区的情况，和住宅补助金券的发放有关，因为那些地区的地主比较愿意接受以补助金券缴付租金。[19]

第七，特殊利益团体可能利用这些计划贪污或（与）从事竞租行为（rent seeking）。以美国来说，鼓吹食物券最力的人是来自农业州的共和党人。在印度，政府为其公共配给系统购买的食物，只有不到10%真正进到穷人手里；几乎一半的食物神秘消失在仓库与配给站，剩下的则多半被放在政府仓储中，任其腐烂。[20]改用直接发放现金给目标受益人的基本收入计划，就能一次铲除中间的层层剥削及潜在的疏通行为。

由于食物与其他补贴是以社会上最缺乏保障的人为目标，所以这些补贴看起来可能符合保障差别原则，问题是，某些最容易受伤害的人实际上却被这些计划排除在外。当然，这类补贴并不符合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以及“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何况这类补助的管理成本也很高，同时缺乏效率，也容易流于贪污与竞租行为。厄瓜多尔的一个实验

同步试行现金救助、食物券和实际食物援助，最后实验者发现，不到10%的现金领取者偏好其他形式的救助，而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其他补贴领取人则想换成领取现金。[21]根据评估，领取现金的人能把现金用在其他必需用途，包括储蓄。很多研究都发现，人们偏好现金的程度较高，而官僚自以为是地认为人们会想要与需要的东西则较不受青睐，上述研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有些人主张“就业保证”比基本收入更好，因为这些人相信就业机会能带来收入以外的某种内含价值（intrinsic value，例如自我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社会贡献、更结构化的时间、与同事互动等等），让人变得比较快乐。“就业保证”的提倡者包括英国的理查·拉亚德爵士（Lord Richard Layard），他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幸福沙皇”（happiness czar）[22]，另外还有美国的哈维（Harvey）与奎格列（Quigley），这两人是继“就业保证”概念的早期拥护者明斯基之后的提倡者。[23]

反对“就业保证”的意见认为就业保证是一个骗局，想想，什么样的就业机会将获得保证？那种就业保证的薪酬会是多少？将特定就业机会贬抑为受“保证”的就业机会的后果会是什么？由于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适合他们、能让他们发挥所长且薪资优渥的就业机会是彻底不切实际的，所以，实际上来说，这种被保证的就业机会将是低级别、低薪酬、短期性且非必要的职位，最多就是一些低生产力的劳动工作，像是清道夫、超市货架员等，这类卑微活动不可能是迈向幸福的途径。主张实施保证就业政策的人当然也不会希望自己或子女从事那类工作。

支持保证就业的人所持理由之一是，很多调查显示，失业者比就业中的人更不幸福。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足为奇。如果你是非自愿失业，尤其当失业津贴非常微薄、难以取得和保有、污名化且不确定，那你肯定不会感到幸福。但拥有收入保障且不会被污名化的自愿不就业，就非常不同了。举个例子，退休人士当中不会有不成比例的一大群人感到不幸福。诚如凯特·麦克法兰（Kate McFarland）曾以文字形容的：“我们的文化重视就业，并不是因为就业在本质上能让我们感到幸福；而是因为在一个重视就业的文化背景下，一旦被雇用，我们就会比较快乐一点。”[24]尽管如此，盖洛普民调还是一贯发现，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受雇者对自己的职务很“投入”（感到热情且愿意勇于承担），尤其是千禧一代、低社会地位或从事例行性工作的人，就整个世界来说更是不到五分之一。

举个例子，以扩大就业为目标的提案都建议借由缩短工时来逐步达到保证就业的目标。社会市场基金会（Social Market Foundation）董事艾姆兰·米恩（Emran Mian）就主张劳动再分配，“即使那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益，也不要直接发放现金。”[25]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也表示，每周工时减少将使失业人口降低。[26]不过，我们真的很难厘清要如何通过监管工具来达成这样的愿景，因为即使法国通过了每周35个工时的立法程序，法国人也没有达到减少失业的目的。如果没有基本收入的支撑，以法令来降低工时，只会让很多低工资群体变得更贫穷，对创造额外就业机会不太有助益。

多数提倡“就业保证”的人也漠视一个事实：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某种程度的失业才能正常运作。菲利普斯（A.W.Phillips）针对这一点，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文章，断定失业水准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反向关系。虽然从那时起，很多人对于这个关系的本质激辩不休，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同某个“自然”失业率（这通常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简称NAIRU〕）能让通货膨胀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没有一个政府能对每个想要就业机会的人保证就业。

只要保证就业实际上可行，它或许符合保证差异原则，但前提是，它必须能优先为伤残者或其他伤病者提供适合的就业机会。问题是，那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业机会倾向于被分配给年轻人，推想那是为了防止年轻人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这个情况下，这项政策当然不符合共和主义式自由与社会正义条件，因为它要求某些群体尽义务，却未对最自由的群体这么做，而且它将“慈善捐助而非权利”奉为圭臬。每个人真的都会获得自己喜欢或甚至符合自身能力的保证就业机会吗？实在很难想象。

劳动福利计划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展开朝福利国家方向改革的一种自然进展。诚如笔者很久以前就预测的[27]，一旦各国政府选择恢复以财力调查来作为福利制度的核心环节，就不可避免会实施劳动福利计划。

如果社会救助是以明确锁定“穷人”为出发点，那么，社会上很快就会开始区分哪些人不是因为自身过错而沦落为穷人，哪些人又是自己“选择”成为穷人（即因自身过错与缺失而变穷的人）。在社会政策与“慈善捐助”历史上，这种令人厌烦的二分法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一旦政策制定者选择这条途径，就必须做出下一个武断的二分法——唯有接受政府安排的就业机会并因此获得津贴的人，才“理应领取”那项津贴，否则就必须加以“处罚”。

现代的劳动福利计划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始推行的——当地的共和党人推动一项规定，要求想要领取津贴的福利请领人必须接受某个就业机会——当然是低薪的机会。不意外地，申请津贴的人数因此减少，于是有心人士还趁机主张，这样的状况显示过去很多请领人涉嫌诈欺，或者不是真的需要政府津贴。

国会的共和党人很快就为这项对策背书，起草克林顿总统1996年的划时代福利改革计划，这项计划兑现了他在竞选时提出的誓言“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节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针对人们可请领福利的时间设限，还强制施行更严格的资格条件，同时授权实施就业和与就业相关的规定。“劳动福利方案”后来成为各地“新中间路线”政治人物与政党的座右铭，而所有工业国家也纷纷施行劳动福利相关的协定。

虽然本书不太适合用来详细分析这项经验，但我们还是要说，有很多证据显示，美国的劳动福利计划促使福利申请人数下降，很多家庭因此陷入更万劫不复的贫困深渊。[28]其他地方的劳动福利计划也一样，

把人推向低薪就业机会，或是对拒绝或不愿接受那种工作机会的人撤销津贴。不过，就算不考虑这些证据，劳动福利计划还是一种恶性政策。

这项政策牵涉到以高压手段逼迫津贴请领人承担某种未强制其他人承担的“劳动义务”。不仅如此，它也流于温和专制主义，它暗示政府知道什么东西对个人和社会才是最好的。当局宣称劳动福利计划能促进技能发展和“工作习性”，但从很多失业者被迫去从事的那类职缺的本质看来，当局的说法显得极端矛盾。另外，宣称劳动福利能促进社会整合，因为没有就业的人会被社会边缘化或“排挤”，这种说法也一样矛盾。

逼迫人接受没有前途的短期就业机会，将干扰到他们自己的谋职、求学或受训节奏，甚至可能导致他们更没有能力摆脱贫困与解除经济不安全感。甚至有证据显示，参与劳动福利计划会使终生薪资收入降低，因为参与这些计划的人的履历上，会留下他曾从事低阶且与其资格条件或经验不符的临时职位等不良记录，不利于后续求职的薪资协商。[29]

劳动福利计划也会衍生劳动市场机能不全与扭曲等影响。它经由供应廉价劳工的方式，对工资造成压抑效果，因为这类计划所供应的廉价劳工将在公开劳动市场上，和目前从事类似工作的人竞争，而那些人原本就是最容易受伤害与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他们甚至可能因劳动福利计划参与者的取代，而失去原有的就业机会。

推动劳动福利计划的主要政治理由并不是要让人们“幸福”。事实上，推动劳动福利计划的真正诉求，是想要减轻政府对弱势者的义务，而且，各国政府采用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计划的经验是，人们常为了保住津贴而没有强烈的财务诱因接受低工资的就业机会，而政府也缺乏胁迫人民接受低薪就业机会的替代方案。这一系列推论起源于一个设计有缺陷的起点。劳动福利计划不符合保障差别原则，它其实会伤害到最缺乏保障的人，而且，它也违反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另外，这种政策也和促进自由与社会正义的愿景背道而驰。

全球化与“弹性”劳动市场导致工资降低的压力明显上升后，税额抵减成为各工业国的社会民主式政府趋之若鹜的选项。税额抵减增补了低工资的缺憾，但薪资收入达到特定门槛以上，就不能享受税额抵减。可想而知，这种计划一定很复杂，而且经常是根据有点武断的资格权利规定来运作。

美国的税额抵减最初是以薪资所得税额抵减（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的名目，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一开始的规模相当节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相关数字便大幅扩增，最后他的税额抵减计划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福利计划，一年的成本接近800亿美元。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税额抵减的资格，而且在2015课税年度，有2600多万人获得税额抵减，平均一个有小孩的家庭能获得大约3200美元的抵减。没有小孩的成年人则大多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

英国的税额抵减是从1999年开始实施，一开始也很节制。但自2003年起，英国为低收入父母提供就业税额抵减（Working Tax

Credits）和子女税额抵减（Child Tax Credits），而这两项补助也成为新工党的社会与劳动市场政策改革里的重要诉求。到2013~2014年，相关成本暴增到每年300亿英镑，约当所有福利支出的14%，而依赖税额抵减维生的人口，则从十年前的200多万人，增加到330万人以上。若再纳入住宅与地方政府的就业者税额津贴，政府为补贴低工资而花费的支出上升到一年760亿英镑，约等于总福利支出的三分之一，也是退休金以外的最大福利支出。[30]

目前英国的税额抵减已并入全新的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这个计划将某些津贴统一化，不过，它还是有着和就业税额抵减及其他财力调查式救助相同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缺点是悲惨的贫困陷阱，因为相关的薪资边际“税”率最高一样达80%以上。以美国来说，与英国相仿或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也是让人们不愿让自己的薪资收入达到会导致税额抵减资格遭撤销水平的关键。当然，不管是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制度也导致有税额抵减的家庭里的次要薪资收入者——多半是已婚女性——减少有薪劳动的时数，或索性退出劳动市场。[31]

税额抵减也衍生很多误解和小规模的欺诈行为。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税额抵减属于不当核发，这导致大众一年付出了140亿美元的公帑。[32]虽然某些恶意批评福利制度的人将这些情况指为欺诈，但其中某些（甚至大多数）不当核发案例，很可能是由于计划本身过于复杂而导致民众犯错或误解。以英国来说，税额抵减领取人必须向税务海关总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简称HMRC）提供自身的薪资估计值，但在薪资与工时起伏不定的情况下，一般人真的很难（甚至无法）推算出所谓的薪资估计值。如果最后实领的薪资比向HMRC提交的估计值高，领取人（就定义来说必然是低收入者）就必须将政府多付给他们的税额抵减退回，而这又会导致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债务更为沉重。[33]

不管税额抵减对贫困与工薪阶层收入的影响为何，它说穿了其实是对资本的一种补贴。美国的一个估计值显示，每花1美元在薪资所得税抵减，低工资工人能获得73美分的利益，但雇主也能因支付的工资较低，而获得27美分的利益。[34]英国也有相似的观察发现，研究人员推断，大约只有四分之三的税额抵减金额流向员工，剩余的则成为雇主的利益。[35]

税额抵减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缺失是，这种计划只帮到有就业的人，几乎没有例外。无法找到就业机会或基于任何原因而未就业的人，则被这种制度排除在外。另外，税额抵减也是技能发展的绊脚石，原因是它虽让劳动成本变得更便宜，却使成本压力减轻的雇主缺乏动力去进行以提升生产力为目标的创新。另外，税额抵减也不符合社会正义和自由原则，而且会衍生邪恶的劳动市场与经济效应。

在2017年年初本书撰写之际，历经异常漫长的过程与昂贵的代价，英国政府尚未完成所谓“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分阶段导入流程。这项计划是在2010年宣布的，经过严重的延宕与重重阻碍，到2013年才开始非常小规模地实施，目前官方目标是计划在2022年全面

实施。虽然它是英国特有的计划，却体现了全球各地社会政策改革的很多要素。

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既不“全民”，也不是“救济金”。这个意图将六种不同的财力调查式津贴与税额抵减整合在一起的计划，绝对称不上“全民”计划，因为它只为低收入者设计，所以称之为“全民”并不合理。另外，这项方案也牵涉到非常广泛的行为条件限制，这让“全民”一词更加沦为笑柄。

根据这个计划，个人或家庭将领到一种逐月发放的收入转移支付，作为他们上个月领到的（工资）金额的差额保障，这个转移支付额是在某个特定日期计算。问题是，这个做法未能体察到很多低收入家庭每月与每周的收入起伏不定的事实；举个例子，他们的收入会随着工时的变动而变化。[36]美国的一份研究发现，薪资收入最低20%的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经历过逐月收入变动超过30%的情形。[37]而由于全民救济金是事后才支付的款项，所以并不符合“救济金”的定义，更别说它的金额无法事先确知了。而且，这种津贴是根据上个月的状况来核发，所以无法如实反映当前的状况并应付眼前的需要。

另外，严重的贫困陷阱仍然不会因此而获得改善，因为全民福利救济金必须适用63%的扣除率。若将支付租税、国民保险缴付款项，以及失去财力调查式地方政府税赋福利补助（Council Tax Support，未被纳入全民福利救济金）等因素的影响列入计算，领取人有可能面临薪资收入必须付出80%以上边际税率的窘境。另外，首次发放需等待四十二天的规定（包括流程延误，最久可能长达六十天），势必导致飘零陷阱恶化，而这不可避免将使得很多申请人举债度日、延迟缴租，并向食物银行求援。

全民福利救济金的条件限制甚至比它未来将取代的各项津贴更多，惩罚也较严格，因为它强行加入一个“申领人义务”（claimant commitment）规定，不只是打算寻找或接受就业机会的失业者必须遵守这项义务，积极寻求增加工作时数与薪资的兼职者也要遵守。如果审查者判断某个领取人不是那么难找到全职就业机会，他的津贴最多可能会被取消三年。而且，相较于过去，这个计划还把相关的条件限制延伸适用到更多人，包括已就业者的另一半。

“工作教练”和“发展协助顾问”会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监督申领人，确认他们是否切实遵守各种条件限制。可想而知，这个工作教练团的成本一定很高，就算不高，也会因其设计而自动失败。政策制定者可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这种奥威尔主义式（Orwellian）概念[38]是有帮助的，但它其实带有明显的温和专制主义色彩，具侵入性、污名化与每日不断的羞辱等问题，最后，这些问题很可能促使某些申领人受不了侮辱而主动退出这项计划，更令人遗憾的是，有迹象显示，他们的退出实际上是符合当局期待的。

虽然官员们将“申领人义务”比喻为某种就业合约，但实际上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只强制申领人单方面遵守，而官僚却可在不进行合法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惩罚申领人，导致他们变得更加穷困。

此外，由于全民福利救济金的财力调查是以家庭的收入为审核依据，所以它倾向于鼓励人成立或维持只以单一薪资收入者组成的家庭。更堕落的是，由于夫妇中的第二个人领到的救济金金额会比第一人低，所以它有鼓励夫妇决裂的倾向。而且从2016年起，它不再支付第三胎以后的子女，只有前两名子女会获得支付。因此，全民福利救济金会产生教训与惩罚大家庭（通常大家庭比较需要救济金）的效果。

全民福利救济金最糟糕的特质是它仰赖威胁和惩罚来维持，而非劳动诱因，也因如此，它倾向于对整体工资造成下降压力，并使劳动市场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虽然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全民福利救济金能将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转变为较高工资、较低福利的社会”，但我们实在不宜太轻信这样的说辞。[39]这个计划不可能鼓励工资上涨，而且不像基本收入，它也明显偏好有薪劳动，忽略其他可能较有价值的工作形式。

全民福利救济金隐含众多惊人的缺陷，这让人不由得对政治人物与社会科学家在该计划开始推行后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感到讶异，甚至替他们感到羞愧。任何关心自由与正义的人，都应该对一个可能在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导致人们变得更贫穷、设置窥探系统来追查弱势群体，利用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的结果来达到排外、低领取率与污名化等目的的体制抱持批判的态度。全民福利救济金可能会导致更多人不得不将就低阶的工作，但这势必会导致危产阶级的整体工资水准降低。

诚如下议院议员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和他的同事安德鲁·弗赛（Andrew Forsey）所做的结论：“政治史学家可能会很想知道，为何这么一个充满风险且可能衍生如此巨额成本的计划，最后竟会在几乎没有经过公共辩论甚至内阁辩论的情况下，成为这个联合政府最重要的福利改革政策。”[40]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提案（多半令人联想到弗里德曼）经常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而弗里德曼本身也倾向于用它来代表基本收入，从他寄给BIEN的一则讯息便明显可见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两者的关键差异。负所得税是和家庭收入或薪资收入挂钩，而且是以事后追溯的方式支付给低收入的薪资收入者，也就是在课税年度结束之后才支付（和美国的税额抵减类似）。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财力调查式计划，因此也隐含和财力调查式计划相同的所有瑕疵。

上述第二个面向意味着支付金额不可能事先得知，所以人们几乎肯定不可能在有急需时马上获得这笔款项。负所得税将更类似某种意外之财（或是非经常性的年度资本补助金），和稳定的基本收入保障较不相同。

虽然负所得税将是对抗贫困的有用工具之一，它对促进共和主义式自由与提供经济安全感的贡献并不大，也不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因为负所得税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就业的人或是收入过低以致无须缴税的人。以美国来说，大约有两千万个家庭没有申报联邦所得税，推想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过低，所以，这些家庭将不受负所得税制度保障，更遑

论成为它的主要救助目标。

除此之外，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负所得税实验发现，一般人为了获得负所得税补助金而有少报劳动与薪资收入的诱因。相较之下，基本收入就不会衍生这类不道德风险。总之，就社会正义原则而言，负所得税的成效将不如基本收入。

最后，有些人主张政府应该废除各式各样的福利，把照顾穷人的事务全交给个人和“慈善机构”处理。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想是完全仰赖慈善机构，但他们又不敢做出这样的建议，因为社会上需要慷慨捐助的金额过大，实难期待民间提供所有资源。不过，我们反对提高对慈善机构与团体的依赖，较根本的原因如下：

慈善机构的基础是“怜悯”之心，而诚如哲学家大卫·休谟指出的，怜悯和轻蔑可谓系出同源，两者仅一线之隔。由民间慈善机构担纲社会政策的核心要角，或许符合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想，却严重违反共和主义式自由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不受控制”。仰赖别人的好意过活并不等于完全的自由。相反地，它在受施者乃至施予者的自由上做了妥协。

慈善的普及多半反映了财力调查式救助的众多缺失、条件限制的不公平、对弱势群体的蓄意惩罚，以及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感等。举个例子，以英国来说，有超过40%被推荐去求助于大型慈善机构特拉塞尔信托（Trussell Trust）所经营的食物银行的人，都是因为津贴延迟发放和遭受相关惩罚而被推荐。[41]

现代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寻求食物银行和避难所救助的事实，彰显出各地社会政策的失败。但民间慈善机构应该再次被边缘化，因为就打造社会形态与个人、群体及社区福祉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方法。

基本收入的多数替代方案在多数社会正义原则上都隐含严重的缺失，详见表9.1的汇总。某些替代方案看起来或许在某些层面上还算是有点模棱两可，但从这些替代方案对生态的意义来看，它们相对基本收入而言应属无效。举个例子，就业导向的计划倾向于着重短期就业机会的创造，忽视环境相关考量。然而，关键还是在于所有替代方案的成效都不像基本收入那么好。

现有福利计划的捍卫者应该要解释为何在相关福利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目前的贫困率还是纹丝不动地停留在极高水准，且社会流动似乎也在降低。以美国来说，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至1979年左右的期间内大幅降低，但随后便停止进一步缩减。虽然美国的财力调查式津贴、税额抵减、劳动福利、食物券和其他126种林林总总的专家指望的扶贫计划支出持续扩大，却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善。[42]显而易见地，这代表我们有必要寻找一条新道路。

表9.1 不同福利计划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情况

	保障差别原则	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	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	生态约束原则	尊严工作原则
最低工资	×	✓	✓	—	—
社会保险	×	✓	✓	—	—
财力调查	×	×	×	—	×
补贴、补助金券	×	×	×	—	—
就业保证	×	×	×	—	×
劳动福利计划	×	×	×	—	×
税额抵减	×	✓	✓	—	×
负所得税	×	✓	✓	—	×
慈善捐助	×	×	×	—	×
基本收入	✓	✓	✓	✓	✓

注释：

[1].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2].F.Lawrence (2016), ‘Beyond parody: HMRC cleaners left worse off after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living wage’, Guardian, 28 July.

[3].L.M.Mead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4].M.Torry (2016), Citizen's Basic Income: A Christian Social Polic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p.44.

[5].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6), ‘Income-related benefits: Estimates of take-up’, DWP, 28 June.

[6].D.Matthews (2014), ‘76 percent of people who qualify for housing aid don't get it’, Vox, 31 May. http://www.vox.com/2014/5/31/5764262/76-percent-ofpeople-who-qualify-for-housing-aid-dont-get-it.

[7].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6), ‘Chart book: TANF at 20’, cbbb.org, 5 August.

[8].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9].M.Tanner and C.Hughes (2013), ‘The work versus welfare trade-off: 2013’, Cato Institute White Paper, cato.org, 19 August.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the_work_versus_welfare_trade-off_2013_wp.pdf.

[10].R.Berthoud (2007), Work-Rich and Work-Poor: Three Decades of Change.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11].J.Dreze and A.Sen (2014), An Uncertain Glory: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argument can be dealt with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food buffer stocks, which could be released when prices rise due to temporary shortages. The danger is that they act as disincentives to local farm production.

[12].D.K.Evans and A.Popova (2014), Cash Transfers and Temptation Goods: A Review of the Glob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688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3].S.Bailey and S.Pongracz (2015), Humanitarian Cash Transfers: Cost, Value for Money and Economic Impac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4].S.S.Bhalla (201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Livemint, 11 June.

[15].M.Hidrobo et al. (2014), 'Cash, food, or vouch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northern Ecu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7, March, pp.144-56.

[16].Bailey and Pongracz, Humanitarian Cash Transfers.

[17].Hidrobo et al., 'Cash, food, or vouchers?'.

[18].S.Santens (2016), 'The progressive case for replacing the welfare state with basic income', TechCrunch, 9 September.

[19].S.Mathema (2013), 'Undue concentration of housing choice voucher holders: A literature review'. Poverty and Race Research Action Council (PRRAC). http://www.prrac.org/pdf/Undue_Concentration_of_Vouchers_-_lit_review_6-13.pdf.

[20].Bhalla,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21].Hidrobo et al., 'Cash, food, or vouchers?'.

[22].P.Gregg and R.Layard (2009), A Job Guarantee.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cep.lse.ac.uk/textonly/_new/staff/layard/pdf/001JGProposal-16-03-09.pdf.

[23].P.Harvey (2005), 'The right to work and basic income guarantees: Competing or complementary goals?', Rutgers Journal of Law and Urban Policy, 2(1), pp.8-59. P.Harvey (2013), 'More for less: The job guarantee strategy', Basic Income Studies, 7(2), pp.3-18. W.Quigley (2003), Ending Poverty as We Know It: Guaranteeing a Right to a Job at a Living Wag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L.Minsky (1969),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in H.L.Minsky (2013), Ending Poverty: Jobs, Not Welfare.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24].K.McFarland (2016), 'Basic income, job guarantees and the non-monetary value of jobs: Response to Davenport and Kirby', Basic Income News, 5 September.

[25].E.Mian (2016), 'Basic income is a terrible, inequitable solution to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TheLong + Short, 21 July.

[26].A.Coote and J.Franklin (eds.) (2013), 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 Need a Shorter Working Week.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7].G.Standing (1990), 'The road to workfare: Alternative to welfare or threat to occup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29(6), pp.677-91. This is elaborated in Standing, A Precariat Charter, Article 20.

[28].The Economist (2016), 'Welfare reform: A patchy record at 20', The Economist, 20 August, pp.11-12.

[29].J.L.Collins (2008), 'The specter of slavery: Workfare and the economic citizenship of poor women', in J.L.Collins, M.di Leonardo and B.Williams (eds.), New Landscapes of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Santa Fe, NM: SAR Press, pp.131-52.

[30].J.Ferguson (2015), 'Prepare for tax hikes', MoneyWeek, 11 March.

[31].A.Nichols and J.Rothstein (2016),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in R.A.Moffitt (ed.), Economics of Means-Tested Income Transfers.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137-218. M.Brewer and J.Browne (2006), The Effect of the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on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Briefing Note No. 69. Londo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32].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p.17.

[33].K.Rawlinson (2014), 'Thousands chased by HMRC debt collectors due to overpaid tax credits', Guardian, 30 May.

[34].J.Rothstein (2009), Is the EITC Equivalent to an NIT? Conditional Transfers and Tax Incid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4966, May.

[35].The Economist (2015), 'Credit where taxes are due', The Economist, 4 July.

[36].For an excellent critique, see J.Millar and F.Bennett (2016), 'Universal credit: Assumptions, contradictions and virtual realit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online 10 May. DOI: 10.1017/S1474746416000154.

[37].Cited in A.Painter (2016), 'The age of insecurity is not coming. It's already here'. Royal Society of Arts blog, 2 May.

[38]对自由开放社会有害的政府政策或行为。——译注

[39].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5), Universal Credit at Work. London: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83029/universal-credit-at-work-december-2015.pdf.

[40].F.Field and A.Forsey (2016), Fixing Broken Britain? An Audit of Working-Age Welfare Reform Since 2010. London: Civitas, p.73.

[41].P.Harrison-Evans (2016),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hat would it mean for charities?', New Philanthropy Capital, 16 August. http://www.thinknpc.org/blog/a-universal-basic-income-what-would-itmean-for-charities/.

[42].Tanner, Pros and Cons, p.14.



第十章

CHAPTER X

基本收入与经济发展

> “关于我们是否应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答案理当是‘应该，但必须在特定条件下实施’。”
>
> ——亚文德·苏布拉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2016年9月

21世纪初时，国际开发援助主要还是以富裕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货币转移或技术建议，以及国际各开发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对各国政府的资金流形式进行。似乎鲜少人认为直接把钱交给穷人是个好点子，所以对人民的直接现金转移金额向来都不大。

然而，后来几年，发展中国家内部却涌现一股“有条件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简称CCT）计划潮，其中很多现金转移的财源是以多边援助及名义上的“无条件现金转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简称UCT）”计划来支应，后者主要是锁定贫困家庭的老年人和（或）孩童。外国政府和捐款人也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收入”试点（实验）计划提供支援，不过，其他计划则是以联合国、其他国际机构、NGO或慈善捐款人支应的资金来进行。

世界银行估计，2014年各式各样的现金转移计划，让130个发展中国家的7.2亿人民受益。[1]在非洲接受调查的48个国家中，有40个正在实施UCT，是2010年的两倍。看来这个世界似乎终于觉察到“解决收入匮乏的最佳方法就是给人更多收入”的非凡概念的正确性。而且，各种证据也驱散了“给穷人钱是一种浪费，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没有帮助”这个由来已久的成见。

目前主要以“穷人”为救助目标的现金转移计划，确实有可能是实现基本收入制度的垫脚石。[2]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四个因素阻碍了这个转型的历程——坚持“目标锁定”（坚持只有穷人应该领取现金）、“选择性”（主张某些群体理当拥有优先权）、“条件限制”（领取人应该依规定采取特定步骤或表现出特定行为模式）以及“随机化”（唯有经过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简称RCT〕[3]测试，或经评估并显得其成效“有证据可资证明”后，才能实施相关的政策）。

这一章将简单调查和基本收入最攸关的几项现金转移计划的研究结果，接着再探讨“正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成果。不过，第四个因素必须先处理，因为过度迷信某个风险评估方法，反而有失焦的风险，忽略了最至关重要的事项，最后导致政策执行进度落后。

在现金转移的随机对照实验中，某些人领到现金，某些人则没有，实验者对这两个群体的结果进行长期追踪比对。这个方法论撷取自医疗实验；在医疗实验中，某些病患接受治疗，某些没有接受治疗，还有某些则只是被供应安慰剂。然而，就定义来说，随机分配转移支付的做法，无法测试一项全民津贴对整个社区的影响。而且，虽然RCT可用来测试诸如改善学校出席率等简单的假设，但若用在较抽象的假设如强化自由或社会正义等假设，它还是不够健全，也不够“科学”。另外，RCT

也无法解决因选择性、目标锁定与条件限制等而衍生的众多道德议题。

姑且不谈上述相当强烈的警告，因评估现金转移（很多牵涉到RCT）计划而提出的大量文献令人信服地显示，现金转移能使贫困状况改善，并实现政策制定者想要达成的很多目标，例如改善学校注册与出席率、改善营养状况、改善健康状况，并促使人从事更多以赚钱为目的的活动等。另外，尽管“随机主义者”（randomistas）[4]倾向于宣称只有RCT能为循证（evidence-based）[5]型的政策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其他评估形式也能达到类似且一样有效的结论。

目标锁定的形式有几种——家庭财力调查、准财力调查（proxy means testing）、地理区域目标锁定、社区目标锁定，以及所谓的“自我目标锁定”，但所有方案的目标，都是要焦点明确地利用一个概念上的贫困线，将现金转移给“穷人”。然而，“贫困线”的认定既武断又主观。很多处于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经常有收入起伏不定的情况，所以，他们有可能某个星期的收入高于贫困线，下个星期又低于贫困线。以印度来说，申请与审核的相关程序非常繁冗，所以，判断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流程通常很漫长，申请几年后才正式获得领取津贴的资格权利的情况可说是司空见惯。[6]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目标锁定型方案（包括仅止于概念或已实施的）都因申领人无知、恐惧、错误以及官僚事不关己的态度和裁决式的决策模式而失误丛生。财力调查向来都牵涉到严重的排除型失误（即真正有权领取津贴的人反未能受惠）与涵盖型失误（没有资格领取的人反而受益）。试图利用某项与收入匮乏有关的指标——如屋顶是以茅草而非锡制搭建的——来判断哪些人有资格享有相关福利的准财力调查也好不了多少。[7]

以印度来说，大约一半的贫困家庭没有获得“低于贫困线卡”（below-poverty-line card，以下简称BPL卡），但有大约三分之一不贫穷的人（以各项规定而言不算穷人）拥有这张卡。[8]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份研究发现，质疑别人没有资格拥有BPL卡（例如拥有抽水泵的人）的人当中，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拥有这张卡，而真正有资格拥有这张卡的人中，却有六分之一没有它。[9]针对古吉拉特邦（Gujarat）、德里（Delhi）和中央邦所做的研究也显示，迫切需要BLP卡的人当中，有非常高比例的人没有这张卡，或基于某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而被否决持有这张卡的权利。[10]总之，通常最穷的人反而最不可能拥有这张卡。

目标锁定型方案也会造成贫困陷阱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与不道德风险。如果唯有被分类为贫困家庭的才能获得津贴，那么，选择继续维持贫困会让这些家庭“值回票价”。举个例子，如果某个贫困的家庭的收入正好增加到贫困线之上，他们的损失就会超过新增的收入，这势必会抑制这类家庭赚取额外收入的诱因。这种道德风险也会衍生不道德风险，例如某些人会掩盖自己多赚到一点点收入的事实，以免失去津贴。

此外，财力调查的行政管理成本向来很高。[11]在衡量一项福利津贴计划的成本时，各种评估报告应该要考虑到，被耗用在各种行政管理事务的资金，理当可用来发放更多钱给津贴领取人。另外，目标锁定型

计划只能解决过去的贫困，而非未来的贫困，换言之，它的目标在于协助已落入贫困状态的人，而非有陷入贫困危险的人。然而，改善贫困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因为预防贫困的成本比协助人脱离贫困低。

有几份研究尝试厘清在改善贫困方面，目标锁定型和全民型计划哪一个较有效率。由于排除型失误的缘故，目标锁定型计划的表现当然较差。在四大拉丁美洲国家中，目标锁定型计划平均只让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的半数人受益。巴西的家庭津贴与墨西哥的机会计划（Oportunidades）也出现相同的缺失。[12]另外，中国采用偏向目标锁定型计划的城市，在改善贫困方面的成效也比较差。[13]全民型计划改善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效率，比起表面上号称只锁定穷人的计划更好。

目前有超过60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有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1997年只有两个。[14]多数国家的这类计划都只锁定穷人，其中很多计划还设定了多重的条件限制，不过，多数常见的计划规定，只要为人母者确保子女规律上学，并带他们进行健康检查与免疫预防，就会支付津贴给她们。有超过两倍的国家采用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不过这些计划通常只选择性地发放转移金给某个群体——例如老人退休金或孩童的补助金——所以，最终来说，它们多半还是锁定穷人。

另一个常引起争辩的议题是：相关的行为条件是否正当或有必要。这些条件限制的目标是要促进某种行动，所以流于温和专制主义，它假设政策制定者最知道穷人需要什么。不过，即使这种计划真的以原本的条件成功达到目的——换言之，领取人最后真的表现出计划本身要促进的行为——条件限制终究在“自由”上做了妥协，而且，就道德基础来说，这种计划鲜少是正当的。实际上，条件限制的适用通常很武断，而且若执行者严谨看待这些条件，未达条件规定的领取人最终可能会遭受某种惩罚。

乍看之下，条件限制看起来可能很合理，不过，规定为人母者要确保其子女有85%的时间在校，等于是让那些妇女多了额外的负担，并制造了无谓的压力，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项条件限制，她们的津贴将会被取消，而这令人徒增心理压力。条件限制的实施不仅流于温和专制，甚至可能很不公平，因为最弱势、教育程度最低以及住在距离学校与诊所最远的人，最可能因相关规定而受苦。

有一份评论检视了8份直接比较CCT与UCT的研究报告，它发现，CCT对教育、健康和营养结果的影响比UCT大。[15]然而，这篇评论也提到，这不尽然是条件限制使然；“通过沟通，清晰地让领取人知道使用各项服务与相关支援的重要性”也一样重要。摩洛哥的一份研究发现，只要单纯将一份无条件转移贴上教育补助金的标签，就会促使人们更可能表现出朝那个目标前进的行为。[16]

另一份评论检视了35个计划，不意外地，它发现明确的条件限制且强制执行的CCT，对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的影响，大于无条件限制的计划在这些方面的成效。[17]不过，UCT也促使学校注册率及出席率上升，这显示即使没有人鞭策，家庭还是希望送小孩去上学，何况无条件转移

的其他利益也可能很显著。

举个例子，马拉维对青春期少女实施的有条件限制与无条件现金转移，双双促使高中出席率上升，只不过，有条件限制型转移在这个衡量指标上的表现比较好。[18]然而，以青春期女性怀孕与结婚比率的降低程度来说，无条件限制型现金转移者的降低程度比前者大非常多，这几乎完全来自中途辍学的青春期女性的影响。所以，有谁敢断言这两种转移当中，何者的长期正面影响会比较大？

现金转移计划和基本收入有几个不同：现金转移计划通常锁定“穷人”，所以并非普及全民；很多这类计划会设定行为条件限制；很多是支付给家庭或家庭里的某个人，而不是每一个个人；另外，很多（但非全部）都只是短期的实验。然而，我们可以从现金转移计划的成果，了解到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实现怎样的成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目前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直接现金转移促使贫困明显改善。[19]那看起来或许显而易见，但新兴国家将钱直接发给人们的做法，长久以来被视为一种浪费，因为那些钱有可能被领取人花在“私人有害物品”上，也可能推高基本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最后导致穷人的境况没有任何改善。

但所有研究都显示，领取现金转移的人并未把那些钱花在酒精、香烟或毒品等，而是拿这些钱来改善家庭的福利，鲜少有例外。[20]现金转移也使犯罪与家庭虐待案例减少。[21]

通货膨胀方面的证据也令人士气大振，举个例子，一份研究墨西哥农村直接粮食援助与直接现金转移的报告发现，提供免费的粮食倾向于促使粮食价格降低，而这会进而导致当地农民不愿种植更多粮食作物，他们的收入也因此受到压抑。然而，直接现金转移对物价并没有影响，推估那应该是由于额外的需求让生产者有动力供应更多粮食和其他商品到本地市场。[22]

以某些案例来说，现金转移可能带来短期的物价通货膨胀，如果市场开发程度低或转移金额以本地生活水准而言偏高，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在那些情境下，可能必须实施补强政策，包括让商品与服务的潜在提供者得知将发放现金转移，让他们提早做好准备，应对需求的升高。无论如何，这些挑战都是可克服的。

很多研究现金转移计划之效应的研究报告都显示领取人的福利获得改善。举个例子，多数计划使孩童营养状况改善。以哥伦比亚来说，一项CCT使孩童的同龄平均身高增加。[23]墨西哥的一项CCT减轻了婴儿发育不良的程度，其中女婴改善39%，男婴改善19%。斯里兰卡的萨姆鲁迪（Samruddhi）现金转移计划也使孩童的营养状况改善。[24]更广泛来说，马拉维的农村现金转移计划，对粮食安全与粮食多样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5]

包括印度，在很多地方，一般认为CCT和新生儿或临盆前胎儿死亡率的降低有关。也有证据（主要是拉丁美洲）显示，CCT让预防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上升，和健康检查频率上升有关。[26]相同的影响也在印度

发生。[27]姑且不论条件限制的缺陷，在多数开发中国家，CCT确确实实让人较有能力负担医疗服务使用费（与/或往返医疗院所的交通成本）。[28]而当人有钱负担医疗服务的支出，公共与民间医疗服务提供者就有改善品质与表现的压力。

不过，以CCT来说，我们通常难以厘清它的影响有多少来自它的条件限制，又有多少来自现金。幸好无条件转移似乎也产生类似的正面影响。[29]举个例子，很多事实显示，无条件转移促成饮食的多样化，这样的发展直接和孩童营养的改善息息相关。[30]另外，在这一章稍后篇幅将讨论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实验中，人们在没有外力敦促的情况下使用了更多医疗服务，因为额外的收入让他们更有能力负担到本地医疗院所看病的费用。

以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的标准来看，现金转移对孩童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非常广泛。[31]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不管是有条件限制与无条件限制型的计划，都和学校出席率的上升息息相关。墨西哥推行机会计划（最初称为“进步计划”〔Progresa〕）后，国中的学校注册率上升三分之一，辍学率则降低20%。相似地，马拉维的现金转移计划使青春期女性的注册率上升、退学率降低。[32]以南非来说，相关计划对幼童的影响尤其大[33]，国际上的证据也显示，这类计划对孟加拉、柬埔寨和拉丁美洲的女孩注册率的影响非常强大。[34]

当然，我们还是很难区别出席率与注册率上升究竟是现金的影响还是条件限制的影响。然而，马拉维方面针对青春期女性所做的那一份研究显示，光是现金就已对教育产生正面影响，而且相关的成本效益较高。其实这个研究发现纯属偶然，由于一个疏忽，某个地区的领取人未被告知相关的条件限制，所以后来这些条件限制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份评估报告的结论是，“每个月对家庭发放的5美元无条件现金转移，对学校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每个月15美元的有条件现金转移对学校出席率的影响相同。”[35]

不过，更规律的学校出席率不尽然能改善以考试分数来衡量的教育表现，这有可能是因为实施现金转移计划的那些地区性学校，素质本来就比较低。[36]不过，这些计划似乎对认知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与此同时。证据也明确否定了现金转移计划的批判者的以下说法：他们宣称这类计划会产生阻碍“工作”的诱因，并鼓励妇女生更多小孩，以便申请额外津贴（富裕国家的现金转移计划也遭受同样的批评）。但事实并非如此，取而代之地，现金转移计划让妇女有力量作出自己的选择，所以使结婚年龄延后、生育率降低，而且也降低有害的性活动。[37]

研究也显示，工作的诱因上升而非降低，若将次级活动纳入，情况更加明显。[38]领取人利用这些现金转移来成立小规模的营利事业，具体来说，人们因此得以投资诸如缝纫机与工具等设备。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减少临时工的劳动工作，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农田，因为现金转移让他们得以购买使自家农田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肥料、种子或家畜。

墨西哥农村的一项现金转移计划发现，平均每1美元的转移，能产生2美元的额外收入；小农户每领到1美元的转移，就能创造3美元的收入，所以，这项计划改善了贫富差距的程度[39]；墨西哥另一项现金转移计划中，四分之一的现金转移被投资在能创造收入的活动[40]；而在辛巴威，领到现金转移的家庭的支出增加金额，比他们领取的转移支付多出60%，那是因为现金转移让他们的农田与非农田生产相关收入增加。[41]

人们获得的更多购买力，将通过“乘数”效果，产生提振本地经济的正面影响，即使通货膨胀可能会因此上升。虽然小规模的现金转移计划或“对分布于广大区域里的零星个人发放的现金转移计划”的影响有可能非常难以衡量，但一份评估七个转移计划的报告发现，每转移1美元，本地经济体系的收入就会上升1.10~1.85美元（调整过通货膨胀的影响）。另外，没有资格领取转移的人一样也可能直接经由领取人的馈赠或放款等行为而获益。[42]再一次，这显示基本收入的群体效应有可能大于它对个别领取人所产生的个别效应的总和。

汇总各开发中国家众多条件限制型与无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的研究结果，便可归纳出一个结论；这些计划对改善收入匮乏、提高粮食支出与改善营养状况、降低学校缺席率、改善认知发展、提高医疗服务使用率、提高以投资为最终目的的储蓄活动（尤其是投资家畜与农业资产）等的影响，确实具统计显著性，而且能温和提升本地经济成长。

除了目标锁定、具选择性与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之外，有两个地方为了测试第一章所定义的“正牌”基本收入而设计并实施试点计划，不过，这两个试点计划都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它们都属暂时或短期性的实验，而非长期或“永久”实施。

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是2008~2009年间在纳米比亚的奥奇韦罗-欧米塔拉（Otjivero-Omitara）小村落实施，该计划涵盖了大约一千个人。[43]这项研究是由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补助联盟（Namibian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主办，资金来自向不同基金会募集的款项以及个人捐款。村庄的每个居民——包括孩童，但排除60岁以上已领取社会退休金的人——每个月都能领取一笔100纳米比亚币（当时约等于12美元，是贫困线的三分之一）的小额收入，研究人员比较了发放前和发放后的情况，结果显示，营养状况改善——尤其是孩童，健康状况改善以及本地初级医疗中心的使用率提高，学校出席率上升，经济活动增加，以及妇女地位提升。[44]

对于偏好当时正逐渐成为时尚的随机对照实验的人，这个方法论可能不见得能满足他们，因为当时这个实验单位并未在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系内，选择一个允许外部因素影响的对照组村庄，原因是主导这个试点计划的人员认为，以长期调查的形式强制向没收到基本收入补助金的人提出各种要求是不道德的。然而，在这个试点计划实施期间，我们并未听闻该国政策有任何变动，也没有任何外部干预，所以，根据观察到的行为与领取人在后续调查时表达的意见，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有意义的。

学校出席率大幅上升，不过，父母亲并没有承受必须送小孩去上学校的任何压力，换言之，实验单位并未强制要求他们送小孩去上学，这样的改变发人深省。虽然小学是公立学校，但依规定，每送一个小孩去上学，父母亲还是必须付出一小笔费用。在试点计划实施以前，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都很低，学校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应基本开销，这导致学校变得更难以吸引学生，教师的士气也江河日下，形成恶性循环。但随着现金转移开始实施，家长们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学校相关的费用，老师开始有钱购买纸、笔、书本、海报、颜料和画笔，这让学校变得更吸引家长和孩童，老师的士气也获得提升，甚至在教学能力上大有精进。另外，小型经济犯罪明显减少，如偷窃蔬菜与为了食物而宰杀别人饲养的小型家畜等行为。这些受到鼓舞的村庄种植了更多蔬菜，购买了更多肥料，并饲养了更多家畜。传统的评估作业往往会忽视这类生气勃勃的社区维度经济影响，而且如果当初这个计划只对被随机选上的个人或家庭发放现金，并以随机对照试验的方式来评估相关的结果，这种影响常常不会被察觉。

另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村民自动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小学教师和村庄的护士主导的基本收入顾问委员会（Basic Income Advisory Committee），就村民领取的基本收入的支出及储蓄方式提供建议。像这样，全民基本收入激发了集体的行动，无疑地，这种社群积极行动主义也提高了基本收入的效益。

这个试点计划结束后，当地还是继续发放小额的补助金，虽然金额较低，但一样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实验对该国内部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只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当地的代表还是持续对基本收入抱持反对态度。这个实验后来继续得到支持的原因是，热情支持这项试点计划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补助联盟前主席杰法尼亚·坎密塔主教（Bishop Zephania Kameeta）在2015年获聘为根除贫困与社会福利部部长。

2015年12月，纳米比亚总统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宣布将基本收入补助金纳为他的扶贫政策里的一环。不过，2016年时，政府开始实施一项食物银行计划，基本收入看起来从此遭到搁置。这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半途而废的例子？

2009~2013年间，印度实施了三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些计划是由妇女工人工会之一的自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简称SEWA）居中协调。[45]相关的基金来自不同的单位，最先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提供，接下来大部分是由联合国的儿童基金（UNICF）提供。

第一个试点计划的规模最小，它让西德里某个区域里持有低于贫困线卡的数百个家庭，选择要配合官方的公共配给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简称PDS），继续领取补贴的稻米、小麦、糖和煤油等实物配给，或是要每个月领取相当金额的基本收入，前后共领取一年。大约有一半的人选择现金选项，不意外地，确实很多人不愿意从原本熟悉的制度改用不熟悉的制度。

然而，经过几个月后，很多选择继续领取配给的人，纷纷向研究团队询问是否可改变先前的选择，改领基本收入。由于中途改变选项会混淆实验结果，所以，研究人员不允许他们改变领取方式。然而，这个现象显示，人们通过和社区里的其他人聊天，得知了领取现金款项的好处。相反地，在选择领取基本收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表达想恢复领取配给。一年后，领取基本收入者的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有了非常亮眼的改善，但继续领取补贴配给者的状况则没有显著改变。

第二个试点计划在中央邦实施，它的规模较大，涵盖八个村庄的大约六千个男男女女和孩童，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笔基本收入，前后共领取18个月，这笔金额能让低收入的五人家庭多出额外的30%收入。研究人员拿这些人最后发生的状况和过往情形以及另外十二个类似村庄（人口数稍微多一些）的状况进行比较，以评估实验的成果。

第三个试点计划是对某个部落村庄的所有居民发放一笔基本收入，并以他们领取该收入十二个月后的状况，和另一个相似的部落村庄所有居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第二个试点计划有一个独特的特质——代言人测试，这是假设如果弱势群体能获得某个愿意捍卫与促进其利益的组织协助，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将会比较大。为了测试这个假设，实验者在其中四个“基本收入”村庄设置“代言”机构，也就是SEWA，这个机构原本就已代表个人或家庭，另外四个“基本收入”村庄则未设置。相似地，六个对照村庄已有运作中的SEWA，而其他六个没有这类机构。

最后的结果强烈证明，村民在和开立银行账户与处理金钱有关的建议和协助上，获得了SEWA最大的助益。然而，不管有没有SEWA，所有村庄都能感受到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

在实施后三个月间，基本收入是以直接对本人交付现金的方式发放。接下来，基本收入被汇入村民专为这个目的开立的银行账户（对原本没有银行账户的领取人而言）。（在部落村庄实施的第三个试点计划中，基本收入全部直接交付给本人。）每个人都会收到自己的基本收入，另外，这个计划也通过母亲或代理母亲的银行账户，对每个孩童发放约等于成人基本收入的半数金额。这个计划和先前提到的现金转移计划不同，相关款项都是无条件对全民发放——一开始就住在社区的每个人都会领到基本收入。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汇总观察中央邦试点计划的主要结果。[46]首先，就公共卫生、孩童与成人营养及健康状况与医疗的改善，还有学校出席率与教育表现的提升等方面来说，这项福利的影响可说是一边倒地好。大致上，人们花费这笔钱的方式相当明智；他们花费在酒精和香烟的支出反而减少，这和当时的执政党国大党（Congress Party）党魁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等人的预测正好相反。

后来村民被问到为何如此时，最常听到的回答是：男性有了更多工作要做。此外，发放给家庭个别成员的现金转移，可能会被视为本质上属于福利与生产性用途（一种含蓄的“标签效应”〔labelling

effect〕），因而不会被领取人视为可用于“诱惑商品”（temptation goods）的金钱。

第二，社会平等改善。伤残者获得的利益尤其显著，妇女的受益程度大于男性，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与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家庭的受益程度大于较高等级的种姓[47]。这些结构性弱势的群体都能够直接领取他们自己的收入，其中很多人是第一次领取，另外，为人母者也得以照顾女儿的需要。女孩的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纪录大幅改善，虽然男孩的状况也有改善，但女孩更为显著。另外，虽然先前小女孩的体重多半比同龄的男孩轻，但到几个试点计划结束时，小女孩的体重增加幅度更甚于小男孩。无疑地，性别平等也改善了。

第三个方面和很多评论所预测的相反，除了原本投入工作或从事劳动活动但后来去上学的孩童，基本收入与工作和劳动的增加（而非减少）息息相关。到这个试点计划结束时，妇女次级经济活动（如制作衣服或手镯等）增加的情况尤其明显，聚焦在“主要活动”变化的传统研究，通常很容易忽略这类现象。总体来说，发放基本收入的村庄的经济活动增加，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改善，而且就很多方面也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例如建设一个合作鱼池，以及拟定一个以改善村庄排水为目的的集体创议等。

第四个方面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也最令人士气大振。基本收入具有解放的效果，它让个人更能掌控自己的生命。某些人因此得以减少债务，某些人则得以逃脱祖先世世代代从事的劳动，还有些人开始有能力存钱或向家人、邻居借钱，减少对高利贷业者的依赖。很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钱可做自己想要的决定，并对社会规范提出质疑。例如第三章提及的，某个村庄的年轻女性终于领悟到自己不需要服从长辈，到公开场所时不再披着面纱。

就这样，尽管基本收入的金额并不多，它的解放价值却超过货币价值。[48]一如其他所有日用商品，这些村庄在货币方面的匮乏，导致货币的取得成本高得吓人，也让放贷者总是狮子大开口，动辄要求50%的贷款利率，并对贷款人设下严苛的条件，例如要求贷款人在必要时到他们的田里工作。基本收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liquidity），促使货币的价格降低，并让村民稍微得以控制自身的财务，尤其是在面临个人危机时。

福利、公平、经济增长和解放——四个影响的结合，促使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做出一个合理结论：基本收入对这些村庄来说是个具改造力的政策，一旦普及实施到全国，也可能如此。

人们通常假设低收入国家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发放。然而，基本收入水准的设定显然一定会参考可用资源，而且可采用渐进的方式缓步提高。诚如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所示，即使是非常小额的基本收入，只要保证定期发放，就足以改造穷人的生活。

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老年人的全民与近全民退休金，包括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南非。但其实这些退休金常被用来充当一整

个家庭（含孙子女）的基本收入，最后产生营养状况与学校出席率改善等连带效益。以纳米比亚来说，有超过70%的退休金收入被用来分摊粮食与孙子女的教育费用。诸如阿根廷与蒙古等国家也发放全民母子津贴。所以，只要有政治决心，政府自然能找到资源。发展中国家可利用下列四种可能的方式来筹措基本收入财源：

第一个方法是利用提高租税。多数发展中国家向来因租税制度不足与不成熟而恶名昭彰，也因如此，政府征收到的税金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低，尤其是所得税。所以，相较于拥有相对成熟的租税制度和行政机关的已开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租税渠道来筹措相关财源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然而，巴西已借由金融交易相关税赋来筹措资金。

第二，可以借由调整公共支出。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花费庞大的军事费用，或把钱浪费在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无用专案外，还实施成本高昂且极容易产生累退税效果的食物与燃料补贴计划。2013年时，IMF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化石燃料补贴约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其中伊朗的相关支出高达政府收入的一半，孟加拉占43%，巴基斯坦也占了31%。[49]更早之前，IMF估计最富裕的20%家庭从燃料补贴所获得的利益，大约是最贫穷的20%家庭的六倍之多，原因很简单，因为富裕家庭通过汽车、空调等使用的燃料较多。[50]

以印度来说，中央与各邦对社会上的富裕群体（未针对穷人实施）的补贴，可能高达国民生产总值（GDP）的9%，另外，因税收减免（多数针对企业）而少收的收入，大约占GDP的6%。[51]如果对每一个印度人发放约当官方贫困线的四分之三金额的基本收入，相关开销将大约等于GDP的10%（未考量发放后对经济成长的影响）。而且，即使只发放相当于贫困线一半的金额，都足以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出现巨大差异。

只要放弃采用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补贴，就能避免税率大幅提高的问题（不过，若多数发展中国家能扩大目前狭隘的税基，也能有效筹集到更多税收）。其中最先应逐步取消的是扭曲本地市场的补贴和侵犯平民百姓自由的补贴。但以印度的案例来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一样），没有必要将基本收入作为替代现有社会计划的方案。

第三个方法是通过第七章提到的主权基金与社会红利渠道。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拥有丰富原油、其他矿产或森林等宝贵原材料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去那些资源的收入多半流向经营竞租活动的精英分子。很多这类国家都已成立主权基金，但他们主要只是把这些基金用来作为协助稳定政府未来财政的工具。在印度，果阿（Goa）的哥恩齐马提运动党（Goenchi Mati Movement）正积极施压，希望当局能利用当地的铁矿砂采矿收入，成立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那样的永久性基金，届时便可用来支应居民的红利。而玻利维亚、赞比亚和蒙古也已开始利用天然资源税来支应社福津贴所需资金。

然而，主权基金不尽然一定要通过天然资源来筹措。中国澳门的主要资产是当地的赌场，澳门的所有居民每年都能领到一笔年度政府红利，这些红利的财源主要就是博彩收入，近几年，这笔红利的金额已超

过约当一千美元的水准。这个所谓“现金分享计划”（Wealth Partaking Scheme）是从2008年起实施，搭配一笔相当1250美元且只对22岁居民发放的一次性资本补助金，相关资金直接拨入合格者的公积金账户。[52]至于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内的“城市中的村庄”——槐底。这个村庄利用土地补偿金和土地开发权所衍生的房地产收入，作为对所有居民发放基本收入以及各式各样类似津贴与公共服务的财源。[53]

第四个方法牵涉到捐款人的资金援助。将更多现有的双边与多边援助重新导向基本收入计划，将能筹措到非常多财源，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加，诚如第十一章将提到的，目前民间慈善机构为相关实验与试点计划提供财源的意愿非常高。

虽然实施基本收入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为了改善贫困、经济不安全感、营养不良与健康不佳等状况，但放眼世界各地的社会，贫困移民与其他形式的人口迁移现象，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因素。若能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低收入社区实施基本收入，必然能鼓励更多人留在原先的社区，并着手（或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区。

埃及、印度、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已开始试着减少粮食与燃料补贴，并以目标锁定式现金转移计划来作为补偿（这通常是因国际金融机构的施压所致）。这些做法的成果好坏参半，然而伊朗已非常接近正式实施基本收入的状态。

2010年12月，伊朗政府将粮食与能源价格提高，最高到原本的20倍，希望借此缩减估计500~600亿美元的高昂补贴费用，并遏止能源使用的浪费。在此同时，政府也向家庭定期发放现金补助，以补贴他们因此而增加的生活成本。这是一项全民且无条件的补助金，只有一项附带条款：原本要缴纳所得税的人必须提交纳税申报书。基于这个理由，很多较有钱的居民宁可不申请这项“基本收入”的领取资格，而这也使得总成本因此降低。[54]

多年来，伊朗三分之二的成年人都会收到一笔政府发放的款项，该国人获补助的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而其中有90%以上的款项会直接被汇入人们的银行账户。[55]受惠于能源价格补贴最少的穷人所获得的补助金，足以补偿他们因能源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所有损失，而且还绰绰有余，所以，这项补助金对改善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对乡村地区。[56]

有些评论家最初批判这项计划会推高通货膨胀，的确，计划开始实施时，通货膨胀确实骤升，但政府采用几项暂时性对策后，通货膨胀便获得控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项补助金计划的成本大约只有原本的燃料补贴成本的一半，但因政府财政赤字日益恶化，导致伊朗政府在2016年导入一个财力调查制度，使能领取这笔款项的人数预期将减少一半。

过去十年左右，以现金转移来帮助难民与自然或人为灾难幸存者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在那类灾难刚发生后，粮食、水、避难所与医药是明

显需要优先援助的。不过，一旦过了初期阶段，若要让人们拥有复原能力、恢复经济活动并重建原有的社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救工具。

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导致二十三万人死亡，并使得十四个国家的海岸社区变得一片荒芜。海啸发生后，整个世界慷慨解囊，各地动员了巨额的资金来提供援助，另外还有很多NGO派遣团队提供协助。我当时正好在处理斯里兰卡的几个专案，不仅目睹了海啸的肆虐，更亲眼见到众多NGO竞相提供救助的感人画面。那些行为与善意都是出于一片真心，但相关的救助通常并非受灾社区真正想要或需要的。如果当初援助者能稍微调整援助的形式，改为对受海啸影响社区的每一个人发放基本收入现金转移，而不是发一大堆他们不想要或没有长期用途的物资，他们一定会更有办法选择要如何继续走下去。[57]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如果“国际社会”能发放为期数年（如三年）的保证基本收入，说不定能避免后来的很多混乱与流血事件，让伊拉克人有机会参与本国社会的重建，并协助建立更不容易受极端主义魅惑的社区。另外，若美国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后也能实施基本收入，说不定也有帮助，因为那等于是为人民提供一个支持政治变革的具体理由。

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WFP）比较了四个国家的“粮食与现金”（food versus cash）计划后发现，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厄瓜多、乌干达和内战前的叶门的现金转移计划，成功以更低的成本改善了人们的营养状况，那代表若以相同的支出来说，将有更多人们会获得援助（第四个国家尼日尔有严重的季节性粮食短缺的问题，使非现金救助通过改善饮食多元化效率比现金高）。[58]这个结果促使WFP更重视现金转移。但如今，WFP在全球提供的援助中，还是只有略高于四分之一是采用现金模式。

联合国难民总署（UN Refugee Agency，简称UNHCR）决定在接受超过一百万名叙利亚难民的黎巴嫩，利用它有限的“过冬准备”基金，对居住于海拔高度500米以上的弱势家庭发放现金转移。这些现金转移没有条件限制，不过领取人会被告知这笔现金转移是要让他们用于购买供热用品。研究人员针对领取家庭和住在海拔高度正好略低于500米的对照组家庭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发现，现金救助确实使燃料补给的开销增加，不过，这项救助也推升了学校注册率，使童工减少，粮食保障也获得提升。[59]最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基本收入倾向于提升受益者与社区其他人之间共同支援的情况，并降低了领取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而这些难民与接纳他们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也获得改善。总之，现金援助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乘数效果，每1美元的现金援助，就对黎巴嫩经济体系产生了超过2美元的利益，且其中多数都是花用在本地。

2016年10月，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说：

> 现金救助的采用，彻底改变了我们协助难民的模式，如今我们已决定要将它列为一个世界性的政策，只要可能，我们要将之扩大应用到所有业务……难民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广泛采用现金救助，代表会有更多难民有能力决定要如何管理自家的预算。这将帮助他们更有尊严地朝正常的生活迈进。[60]

这类政策还有另一项实用利益：它有助于降低贫苦与绝望人们的迁移压力。另外，它的成本相较于其他形式的外国援助的固有成本低，而且效率更高。

很多拥有天然资源且拥有高收入潜力的国家常陷入内战的窘境，因为各派系竞相争夺经常由专制领导人一手把持的大自然恩泽；对这些受上天眷顾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讽刺。要解除政治冲突的威胁，我们建议的可行方式之一是将资源财富分享给全国各地——常用的做法是将部分盈余转移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开采天然资源（不管是石油、钻石或其他矿产）的地区。根据某些案例的发展来看，若转移的金额够大，这种财政权下放的做法，确实有效抑制了冲突的发生。然而，某些案例的发展却显示，现金转移反而让地方异议分子有了支付叛乱成本的工具，故反而会引发冲突。[61]到最后，我们发现解除或防范潜在冲突的最适当做法，就是直接对每一个个人发放现金，这么一来，分离主义运动或地方政治党派就比较难以擅自占用这项资源。

这些“直接红利”款项——实质上就是基本收入的一种——也将有助于克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或“荷兰病”（Dutch disease）——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当年荷兰海域发现天然气后，导致汇率大幅升值、出口折损，而本地制造活动遂因出口的折损及大量较廉价的海外制造品流入而被扼杀。诚如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石油换现金创议”（oil-to-cash initiative）主张的，这种红利借由促进国民对政府支出的监督，能促进民间消费与公共财产的提供。[62]这将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从而进一步降低冲突的风险。

2016年年底，墨西哥市政府依循该年稍早时候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鼓励各成员国研究采纳基本收入保证之可行性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市政法规，法规中包括一项将在大首都区域导入基本收入的承诺。墨西哥市的这项市政法规可能成为拉丁美洲各地甚至其他地方仿效的先例。它将经济权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而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种新常态。

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财政厅长在2017年1月的预算报告中，宣布他有意逐步导入一项基本收入；这项基本收入或许是一个目标锁定型计划，但他的根本论述非常简单明了。[63]另外，印度联邦政府也正审慎考虑实施一项全国性的基本收入，它在2017年1月底和预算一同发表的年度《经济报告》，包含了一个讨论基本收入优缺点的特殊章节。[64]或许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的中央政府正考虑是否实施基本收入的事实，是基本收入的确具正当性的一个新证明。在那不久后，印度财政部长也表示他预计一年内将有更多基本

收入试点计划将展开。

矛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导入基本收入制度，可能会比在富裕国家简单。在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转型成本可能低很多，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不需要清理庞大又复杂的现有福利制度（通常富裕国家的福利制度都涵盖了数十甚至数百种选择性、目标锁定型的类全民计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废除根深蒂固的补贴计划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由于这类计划明显扭曲，且易产生累退税的效果，所以捍卫这些计划的人在道德和社会立场上较站不住脚。伊朗之所以能让大众广泛接受它降低粮食与能源补贴的决定，原因在于它也同步实施补偿性的现金补助，同时利用公关活动不断强调现有补贴机制的缺点和不公平。

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援助社群改用现金援助的趋势已非常明显，而现金转移与基本收入也被合法化为主流发展政策。所有迹象都显示，如果有更多资源可被导入这类计划，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能对基本收入更有信心，经济不安全感与贫困等状况将快速获得改善，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加有持续性。

注释：

[1].World Bank (2015), The State of Social Safety Nets 201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G.Standing (2008), ‘How cash transfers promote the case for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Studies, 3(1), pp.1-30.

[3]亦译为随机控制实验。——译注

[4]坚信随机化评估能适切解答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提案的困难疑问的人。——译注

[5]以证据作为政策施行与否的依据。——译注

[6].R.Jhabvala and G.Standing (2010), ‘Targeting to the “poor”: Clogged pipes and bureaucratic blinker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5(26-7), 26 June, pp.239-46.

[7].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Targeting the Poorest: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xy Means Test Methodology. Canberra: AusAID,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8].P.Bardhan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for India’, Livemint, 12 October.

[9].P.Niehaus, A.Atanassova, M.Bertrand and S.Mullainathan (2013), ‘Targeting with ag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1), pp.206-38.

[10].G.Standing, J.Unni, R.Jhabvala and U.Rani (2010), Social Income and Insecurity: A Study in Gujarat. New Delhi: Routledge.

[11].N.Caldes, D.Coady and J.A.Maluccio (2004), ‘The cos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ransfer progra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FCND Discussion Paper No.174.Washington, DC: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2].K.Lindert, E.Skoufias and J.Shapiro (2006), ‘Redistributing income to the poor and the rich: Public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6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Institute. F.V.Soares, R.P.Ribas and R.G.Osorio (2007),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Brazil's Bolsa Familia: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PC Evaluation Note No.1.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3].M.Ravallion (2007), ‘How relevant is targeting to the success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m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38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4].World Bank, The State of Social Safety Nets 2015.

[15].J.Hagen-Zanker, F.Bastagli, L.Harman, V.Barca, G.Sturge and T.Schmidt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The Evidence, ODI Brief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6].N.Benhassine, F.Devoto, E.Duflo, P.Dupas and V.Pouliquen (2015), 'Turning a shove into a nudge? A "labeled cash transfer" for edu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7(3), pp.86-125.

[17].S.Baird, F.H.G.Ferreira, B.Ozler and M.Woolcock (2014), '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on schooling outcom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6(1), pp.1-43.

[18].S.Baird, C.McIntosh and B.Ozler (2011), 'Cash or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a cash transfer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4), pp.1709-53.

[19].F.Bastagli, J.Hagen-Zanker, L.Harman, G.Sturge, V.Barca, T.Schmidt and L.Pellerano (2016), Cash Transfer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D.K.Evans and A.Popova (2014), Cash Transfers and Temptation Goods: A Review of the Glob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688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Haushofer and J.Shapiro (2013), Household Response to Income Change: Evidence from an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in Kenya. Princeton, NJ: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Public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Kenya CT-OBC Evaluation Team (2012), 'The impact of the Kenya Cash Transfer Program for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n household spend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4(1), pp.9-37. J.Hoddinott, S.Sandstrom and J.Upton (2014), 'The impact of cash and food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intervention in Niger',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34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1].C.Haarmann et al. (2008),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Basic Income Grant Pilot Project Assessment Report. Windhoek: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 and Namibia NGO forum. L.Chioda, J.M.P.De Mello and R.R.Soares (2013), 'Spillovers from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Bolsa Familia and crime in urban Brazi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RES/Resources/469232-1380041323304/Chioda_deMello_Soares_BolsaFamilia_April242013.pdf. Hagen-Zanke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H.Mehlum, K.Moene and R.Torvik (2005), 'Crime induced poverty trap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7, pp.325-40.

[22].J.M.Cunha, G.De Giorgi and S.Jayachandran (2011), 'The price effects of cash versus in-kind transf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456.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3].O.Attanasio, E.Battistin, E.Fitzsimons, A.Mesnard and M.Vera-Hernandez (2005), 'How effective are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Colombia'. IFS Briefing Note 54. Londo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24].R.Himaz (2008), 'Welfare grant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ld health: The case of Sri Lanka', World Development, 36(10), pp.1843-57.

[25].C.Miller, M.Tsoka, and K.Reichert (2006),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cash transfer scheme on food security in Malawi', Food Policy, 36(2), pp.230-38.

[26].F.Bastagli (2009), 'From social safety net to social policy? The role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PC-IG Working Paper No. 60.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7].S.S.Lim, L.Dandona, J.A.Hoisington, S.L.James, M.C.Hogan and E.Gakidou (2010), 'India's Janani Suraksha Yojana, a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 to increase births in health facilities: An impact evaluation', Lancet, 375(9730), pp.2009-23.

[28].A number of countries operate targeted full or partial fee waiver schemes. For a review, see R.Bitran and U.Giedion (2003), 'Waivers and exemptions for health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30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9].J.M.Aguero, M.R.Carter and I.Woolard (2007), The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n Nutrition: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30].M.Adato and L.Bassett (2009), ‘Social protection to support vulnerablechildren and families: The potential of cash transfers to protect education, health and nutrition’, AIDS Car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Medical Aspects of HIV-AIDS, 21(1), Supplement 1, pp.60-75.

[31].A.Fiszbein and N.Schady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Slavin (2010), ‘Can financial incentives enhance education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s’,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5(1), pp.68-80.

[32].Baird, McIntosh and Ozler ,‘Cash or condition?’.

[33].A.Case, V.Hosegood and F.Lund (2003), ‘The reach of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Evidence from Kwazulu-Natal’, Centre for Soci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38. Durban: University of Natal. M.Samson, U.Lee, A.Ndlebe, K.MacQuene, I.van Niekerk, V.Gandhi, T.Harigaya and C.Abrahams (2004),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outh Afric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inal report’, EPRI Research Paper 37. Cape Tow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34].S.R.Khandker, M.Pitt and N.Fuwa (2003), ‘Subsidy to promote girls'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female stipend program in Bangladesh’. MPRA Paper No. 23688. Munich: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http//mpra.ub.unimuenchen.de/23688. D.Filmer and N.Schady (2006), ‘Getting girls into school: Evidence from a scholarship program in Cambod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 39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35].S.Baird, C.McIntosh and B.Ozler (2009), ‘Designing cost-effective cash transfer programs to boost schooling among young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0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22.

[36].Hagen-Zanker et al.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Baird et al., ‘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37].Hagen-Zanke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38].See, for example, ibid. A.V.Banerjee, R.Hanna, G.Kreindler and B.A.Olken (2015), ‘Debunking the stereotype of the lazy welfare recipient: Evidence from cash transfer programs worldwide’. HKS Working Paper No. 076. Cambridge, M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39].A.de Janvry, E.Sadoulet and B.Davis (2011), ‘Cash transfer programs with income multipliers: Procampa in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29(6), pp.1043-56.

[40].P.J.Gertler, S.W.Martinez and M.Rubio-Codina (2012), ‘Investing cash transfers to raise long-term living standard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etrics, 4(1), pp.164-92.

[41].S.Handa, L.Natali, D.Seidenfeld, G.Tembo and B.Davis (2016), ‘Can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lead to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two government-led programmes in Zambia’. Innocenti Working Papers No. IWP_2016_21. Florence, Italy: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Innocenti.

[42].M.Angelucci and G.De Giorgi (2009), ‘Indirect effects of an aid program: How do cash transfers affect ineligibles'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1), pp.486-508.

[43].笔者曾协助设计第一个试点计划的调查，并协助撰写第一份学术分析。

[44].Haarmann et al.,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45].笔者和SEWA在这些试点计划的所有阶段都密切合作，包括学术分析阶段。

[46].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47]表列种姓/部落相当于种姓制度未废除前的贱民等级。——编按

[48].G.Standing (2015), ‘Why basic income's emancipatory value exceeds its monetary

value', Basic Income Studies, 10(2), pp.193-223.

[49].IMF (2013), Energy Subsidy Reform: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0].IMF (2010), The Unequal Benefits of Fuel Subsidies: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1].Bardha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for India'.

[52].F.Cheng (2016), 'China: Macao gives an annual state bonus to all citizens', Basic Income News, 31 August.

[53].F.Cheng (2016),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basic income: A case from China', Basic Income News, 10 November.

[54].H.Tabatabai (2011), 'The basic income road to reforming Iran's price subsidies', Basic Income Studies, 6(1), pp.1-23. H.Tabatabai (2012), 'Iran: A bumpy road towards basic income', in R.K.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285-300.

[55].A.Demirguc-Kunt, L.Klapper, D.Singer and P.Van Oudheusden (2015),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 2014: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around the worl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25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56].A.Enami, N.Lustig and A.Taqdiri (2016),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fighting pover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 in Iran: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ment to Equity (CEQ) Framework'. ERF Working Paper No. 1020. Giza, Egypt: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57].G.Standing (2005), 'Tsunami recovery gra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0(6), 5 February, pp.510-14.

[58].J.Hoddinott, D.Gilligan, M.Hidrobo, A.Margolies, S.Roy, S.Sandstrom, B.Schwab and J.Upton (2013), Enhancing WFP's Capacity and Experience to Design, Implement, Monitor, and Evaluate Vouchers and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Study Summar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59].C.Lehmann and D.T.R.Masterson (2014), Emergency Economies: The Impact of Cash Assistance in Lebanon. Beirut: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60].UNHCR (2016), 'UNHCR to double funds for cash-based assistance to refugees by 2020'. Press Release, 31 October.

[61].T.Cordella and H.Onder (2016), Sharing Oil Ren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86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62].S.Devarajan and M.Giugale (2013), The Case for Direct Transfers of Resource Revenues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33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T.Moss, C.Lambert and S.Majerowicz (2015), Oil-to-Cash: Fight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rough Cash Transfer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63].A.R.Mishra (2017), 'Jammu and Kashmir commits to idea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ivemint, 12 January.

[64].Ministry of Finance (2017), Economic Survey 2016-17.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Chapter 9.



第十一章

CHAPTER XI

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

> “我……省思人类战斗与战败的理由，以及他们想要争夺的东西如何总在他们战败那一刻出现；但当它终于出现，却发现不是他们想要的，因而后继者又必须以另一个名义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战。”
>
>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86年

过去几年，有极大量的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在收入水平落差甚大的不同国家和社区被提出。这些创议的主要目标是要提高大众对基本收入的认识、对政治人物与政策制定者施压，以及鼓励人们加入这场“运动”。而那些试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要试验基本收入计划的各种替代性设计，并评估这些试点计划的实际成果和计划倡议者及批评者的说法有何落差，如基本收入对“公害”消费的实际影响，或是对劳动市场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等。

这一章将先检视最近几个公民创议，接着再探讨各试点计划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概要检视过去完成的几个试点计划，以及在我撰写本书之际还处于规划阶段的试点计划。

“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的前身“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IEN），是在1986年九月于比利时新鲁汶举办的一场会议中正式成立。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最早也是在1516年于鲁汶发表，不过，这只是巧合而非刻意筹划；2016年庆祝《乌托邦》发行五百周年的大会，正好也和BIEN的成立十三周年庆同时在新鲁汶举行。

目前BIEN的会员已遍布世界，他们针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领取基本收入”的简单概念所导引出的众多议题，提出了非常大量的研究和著作。BIEN利用会员订阅费用的资金，每两年举办一场国际大会，第一场是1988年在安特卫普举办，而2016年的大会在首尔举办。

2017年年初，有三十四个位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魁北克（加拿大）、苏格兰（英国）、斯洛维尼亚、韩国、非洲南部几个国家、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台湾、英国（有两个网络，包括公民收入信托与英国基本收入协会）以及美国等相关的网络在提倡基本收入，BIEN敢大声地说，尽管在某些时期政治圈对这个概念相当不屑，但我们还是继续维持相关辩论的热度，试图借由各方的议论来消除各项理智论述的缺陷、应对反对意见、鼓励进行成本计算，并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最初，不同国家提报了当地多种语言的相关时事通讯，目前这些讯息都已张贴在网络的《基本收入新闻》（Basic Income News）上，另外，BIEN也发行同侪评鉴期刊《基本收入研究》（*Basic Income Studies*）。

然而，到目前为止，BIEN最主要的活动还是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1986年在鲁汶举办成立大会后，我们便在西欧的几个大城市轮流举办大会，1988年于安特卫普，接着在佛罗伦萨、巴黎、阿姆斯特丹、维也

纳、柏林、日内瓦和2004年的巴塞罗那举办。巴塞罗那那一场是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赞助下举办，吸引了当时正在参加其他活动的数百名额外参与者来共襄盛举。

巴塞罗那大会闭幕时，会员们以压倒性的票数，投票通过将BIEN转型为一个全球网络，并正式同意往后的大会采取一年在欧洲、一年在欧洲以外举办的轮替模式。于是，后续的大会分别在开普敦、都柏林、圣保罗、慕尼黑和蒙特利尔举办。然而，2016年的首尔大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让这个不成文的规定默默被搁置。外界愈来愈热烈的关注以及超过三十个国家网络成立的事实，促使首尔大会做出分别将在2017年9月于里斯本与2018年年中在芬兰坦佩雷举办大会的决定。

数百篇分析基本收入的各层面研究报告在这些大会上被提出与讨论。虽然我们是一开始就参与每一场大会的“元老”，但还是陆续从这些大会中吸收到很多新知。虽然只有极小部分的研究报告公开发表，但有历史观的学者应该都能从中找到很多瑰宝。[1]BIEN打从一开始就抱持开放心态，并鼓励各方勇于表达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各式观点，而正是这样的精神让这个网络得以继续蓬勃发展。

瑞士在2016年6月针对基本收入所举办的公投，引来国际上激烈且广泛的辩论和媒体关注。表面上这场公投失败了，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场公投最后还是发扬了原本的宗旨。这场公投最初是由区区几名热情的支持者发起，他们没有资金或组织，但最后这些零星的力量，却像滚雪球般地转变为一系列令人欣喜的行动，这些行动对于未来的基本收入运动而言，绝对是非常好的基础。

瑞士独特的“直接民主”形式，让不同群体的公民得以针对特定的政策发起全国性公投。只要在创议提出后一年内收集到10万个支持提案的瑞士公民有效签名连署，就能举办公投。虽然基本收入的发起人缺乏任何历史悠久政党的资金援助或支持，他们还是顺利在瑞士各地争取到141000个人的签名连署，其中129000个是有效签名。

由于资金稀少且没有政党援助，那些发起人根本没有能力在电视、广播节目或报纸上公开宣传。为解决这样的不利处境，他们诉诸某些机智的手法，成功获得非常可观的大众关注，包括来自瑞士与世界各地。其中一项了不起的作为是，在瑞士银行业者拒绝合作的情况下，这场活动还是成功募集到800万个金色五分钱硬币——每一个硬币代表一个瑞士居民；活动人员将这些硬币从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一路撒到国家议会大厦外，记录下此景象的影片获得广泛的浏览。

另外，他们用一幅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海报来吸引世人的目光，这份海报几乎覆满了日内瓦最大的广场，海报上以夸张的文字提问：“如果有人照顾你的收入，你会做什么？”这张海报的航拍照后来成了这场公投的象征。而在诉求这场公投的各色街头游行队伍中，很多孩子打扮成机器人的模样。活动发起人甚至安排在某一天早晨，利用他们原已非常有限的资金，在苏黎世车站发送10瑞士法郎的钞票给往来通勤者，也有效制造了一些新闻。

不过，这些小花招的效果好坏参半。首先，这些花招虽达到了吸引大众目光的主要目标，却也导致竞选活动失焦，因为那些花招似乎暗示基本收入将让人无需工作，也让人以为活动人士相信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在各种就业机会上的角色。另外，这些花招也多半聚焦在城市相关的议题，问题是，当初他们在农村的选情处于一边倒的不利状态。

然而，关键的失误并不是出在竞选活动的种种作为。关键的失误在于竞选团队提出的瑞士宪法修正文字中，没有提及基本收入的具体金额；他们原本是打算把这个数字留给议会决定。不过，在竞选活动刚展开时，有两个人写了一本小书，倡议发放每个月2500瑞士法郎（大约1700英镑或2500美元）的基本收入。虽然这个数字并非竞选阵营授权提出，却被公投反对者拿来大做文章，他们宣称竞选阵营打算发放高得不切实际且财政无力负担的基本收入。很快地，国际媒体也开始报道这场公投的目的是要“每个月发给每个瑞士人2500瑞士法郎，换算英镑为一年两万英镑以上”。另外，尽管根据公投提案，移民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条件限制将由议会决定，但反对阵营却利用恐吓战术，宣称基本收入将导致瑞士的移民暴增。

竞选阵营提议的瑞士宪法修正文字如下：

> 第一一〇条（a）无条件限制之基本收入
>
> 本邦联应确保实施无条件限制之基本收入。
>
> 基本收入应能让全体居民在保有人类尊严的状态下生活，且能参与公共生活。
>
> 法律应特别规范基本收入之财源及基本收入水准之设定。

到最后，接近四分之一（23%）的投票者支持这项创议，投票率为46.4%。虽然这个结果被海外形容为瑞士人彻底拒绝接受以基本收入作为社会政策，但竞选团队的领导人物却认为选举结果代表他们是成功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合情合理，原因是这个竞选团队已在瑞士各地的媒体、咖啡馆和家庭内部引爆了一场严肃的对话。有更多人了解到基本收入的意义。而且，这一场辩论与公投的结果被报道到世界各地，以瑞士的公投来说这是相当罕见的状况，毕竟公投在瑞士可说是司空见惯。

虽然农村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投票者支持这项创议，但主要城镇与大城市的状况却全然不同。以日内瓦来说，这个提案获得35%选民的支持，在苏黎世更是获得54%的支持。在公投结束后一个星期所做的一份意见调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投票代表与实施基本收入有关的长期对话的开端，连很多投票反对这项创议的人都表示，未来应该重新考虑这个创议。所以，基本收入的中期展望显然比以前改善。诚如早就预见到公投会失败的某个竞选团队领导人物所言：“瑞士的辩论就像是某个主要活动的电影预告片，而电影预告片的结语通常是：即将上映，敬请期待……”[2]

现在论断瑞士的公投是个失败（指的是导致这个目标倒退）还是最终实施基本收入的垫脚石，或许有点言之过早。不过，瑞士有句俗话：所有重大改革都不是靠一次公投就能搞定，通常要两次。

大约就在瑞士公投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且动能逐渐加温之际，一群来自欧洲各地的基本收入热情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是BIEN的会员——决定发起欧盟的“人民创议”（people's initiative）。2014年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运动（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Europe，简称UBIE）的目的是要在一年内争取到100万名欧盟公民的签名连署，一旦成功，欧洲议会就有义务检视在欧盟实施某种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虽然这个活动一样没有资金来源，最初也缺乏有效的组织结构，但最终还是成功动员了数千个来自27个欧盟国家的维权主义者，促成几个国家基本收入网络的成立与其他多项成果。最后，这个活动共取得超过30万个连署，为下一场活动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估计下一场活动很可能在短期内展开，或许就在2018年。

与此同时，UBIE与BIEN目前也正积极提倡年度国际基本收入周（International Basic Income Week）活动，2016年已是第九届的这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公开辩论与简报平台，目的是希望为支持者补充能量，并让外界认识并更广泛了解基本收入。

我们在第十章检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现金转移与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不过，各工业国家也早已常态实施不同种类的现金转移（包括目标锁定型，如社会救助、退休金，以及全民现金转移，如很多国家实施的儿童补助金），所以，这一节将完全聚焦在北美两个与基本收入具体相关的实验。

曼尼托巴省基本年度收入实验（Manitoba Basic Annual Income Experiment，简称Mincome）和温尼伯市的一项试点计划同时实施，前者尽管其实是一个负所得税计划，而非全面性的基本收入计划，还是基本收入支持者心目中的传奇。这个实验的资金是由联邦与省政府共同负担，于1975~1977年间，在曼尼托巴省的多芬镇（Dauphin, Manitoba）实施，当时的执政党为自由党（Liberals），不过，保守党上台后，并没有等待数据评估结果出炉，就径自暂时中止这项计划。几近四十年后，研究人员在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里翻出了1800个布满灰尘的硬纸箱，里面装着相关的原始档案，伊芙琳·弗杰特（Evelyn Forget）与其他几个人煞费苦心地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并进行了局部分析。[3]

Mincome是某些人所谓“全民普同主义下的目标锁定计划”（targeting within universalism）[4]，因为所有镇民都可选择要不要领取Mincome款项，这项收入是全民且无条件限制的。任何人都能登记参加这个计划，如果登记者的家庭收入基于任何原因低于指定的门槛，他就有资格领取这笔收入。没有劳动收入的人可取得全额保证付款，发放金额仅略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而有劳动收入的人，每赚一加元的薪资可领取的Mincome金额就降低50分，当薪资达到39000加元（约等于当时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就不能领取Mincome。

有超过二千人——大约是多芬人口的五分之一——在那三年实验中的某个时点领到这项津贴。虽然Mincome的用意是要测试“保证年度收入”会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相关的数据也让研究人员得以观察它对各种福利对策的影响。领取Mincome的家庭在住院治疗、发生意外与受伤（包括家庭暴力所致的伤害）等方面的纪录降低，且严重精神失常的发生率也低于未领取这项津贴的类似家庭。青少年从高中辍学的概率降低，尤其是少男。在此同时，已有全职工作的人的工作时数并没有明显变化，但学生和有幼儿的妈妈从事有薪职务的时数则减少，换言之，这项津贴这让他们得以花更多时间在功课上或照顾小孩。[5]

多芬是Mincome实验的“足量供应点”（saturation site），也就是当地所有居民原则上都有资格领取这笔款项，所以当地的状况也适合观察群体效应。继续去上学的少年会选择继续求学，部分要归功于同侪的影响力。领取这项额外收入的家庭的学生原本是最可能中途辍学的群体，但领取这项收入后，他们离开学校去找工作的压力就小了。不过，未领取该项收入的家庭的学生，也比较容易因为领取该收入的家庭的同学继续求学而不中途辍学，这是全民型津贴会产生同侪影响力的例子之一。

此外，Mincome不像现有的福利计划，一般认为它产生污名化效果的程度没那么高，而且这似乎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社群互动；Mincome领取人比领取福利的人更能适应社会生活，他们使用时间的方式和其他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非参与者的方式类似，所以，比起福利领取人，Mincome领取人不太会感到困窘，也不至于无法和没有领取Mincome或福利的人自在相处。[6]

1933年，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大烟山青少年研究”（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Study of Youth），这项研究是为了追踪1420个低收入家庭学龄孩童的心理健康而设计。研究展开四年后，东切罗基印第安人在他们的保护区内开了一家赌场，部落领袖决定将每年的一半赌场利润平均分配给所有部落成员。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这笔款项大约达到每人每年4000美元，这使得家庭收入平均提高近五分之一（这项统计不包括对孩童的支付，对孩童的支付是直接存到银行，等到他们年满18岁再交付）。

这项无条件发放的“基本收入”，事后偶然成为某个独特的纵贯性试点计划（longitudinal pilot）的基础。研究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孩童是部落成员，所以，有长达十年的时间，研究人员得以比较那些部落孩童的发展和整个研究中的其他孩童有何不同。最后的结果非常引人注目。基本收入领取家庭的子女（使其他要素不变）在学校的表现较好，而且青少年犯罪案率“戏剧性减少”。他们的行为与情绪失常发生率降低，“认真负责”与“平易近人”评分都上升，而事实也证明，具备这两项特质的人在长期保有特定职务与维护个人关系方面，都有较正面的长期人生结果。[7]“认真负责”是做事有条理、负责任且努力工作的倾向，而“平易近人”是合作且不自私的行为倾向。

孩童似乎也受惠于双亲之间更良性的关系（部分是因为财务压力降低，父母亲为了金钱而争吵的状况也改善），而双亲关系的改善也使亲

子关系得以改善，另外，父母亲的毒品与酒精服用量也减少。最令人振奋的是，一开始最受剥夺且最没安全感的孩子们的变化最显而易见。总之，基本收入让最需要它的人获得最多帮助。

诚如上一章讨论的，纳米比亚与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记录。虽然将随机对照实验奉为圭臬的纯粹主义者可能不见得满意相关的方法论，但这些试点计划结合了量化与质化的数据，让人得以更充分解读向全体社群发放某种基本收入的影响。另外，这些试点计划的设计和“正牌”的基本收入非常接近，而且就短期试点计划来说，它们的设计非常可行。发放的款项相当基本，且每个月对每一个个人无条件发放现金。所以，这些试点计划不仅让人得以观察到个人、家庭所受到的影响，还能感受到群体效应。

各方的一系列宣示让2017年仿佛成了“试点计划年”，这个现象最初在基本收入支持者之间制造了某种陶醉感。然而不久后，陶醉便转为失望。因为在别有用心的动机影响下，胆怯与便宜行事的态度开始占上风。试点计划的目标理当是要厘清基本收入是否会产生倡议者所宣称的那些效果，包括改善贫富分配不均与经济不安全感，以及促进个人自由与社群凝聚力等，这代表试点计划必须实验真正的基本收入原则，包括全民、无条件限制、定期发放给社群每一个个人。遗憾的是，基于各种不同原因，多数预定推行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并不是采用这样的设计。以下是2017年年初时的发展情况。

2015年，刚当选的芬兰总理尤哈·席比拉（Juha Sipilä）宣布，将在所谓的“实验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中实行一项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他分配两千万欧元的专款供这项专案使用。2016年3月，负责这项试点计划的国家保险局KELA将它的目标归纳如下：

> 这个基本收入实验是考虑到工作生活的变迁而针对芬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设计的对策之一，目的是要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诱因式的社会保障、降低官僚编制，同时简化目前的繁复津贴制度，以追求更有持续性的整体政府财政未来。

在这个试点计划的设计定案前，KELA发表了一篇涵盖各种不同选项的评论报告，并归纳出该试点计划在2017～2018年实施前必须克服的立法与法律挑战。[8]这些挑战包括芬兰宪法与欧盟法律中禁止群体福利分配差别待遇的规定。

他们很快就排除全面性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理由是成本过高。取而代之地，2017年1月开始，它对一个由两千名登记失业、年龄介于25～58岁，且领取KELA失业相关津贴的人组成的随机样本，发放每人每月560欧元（约620美元）的免税收入。除了这560欧元，他们将可以继续领取现有的所有津贴，例如住宅补助金等，这是为了确保这些人的财务不会比领取基本收入以前差。被选上的参与者被强制参加实验，而研究人员会在两年的实验后，比较这个群体和另外随机选择的两千名失业人士的行为决策与事后发展。

和失业津贴相反的是，就算失业者在这两年实验期间找到工作，这笔基本收入也不会被取消。不过，这个实验目前设计的目的本质上只是要测试无条件支付对就业诱因的影响。所以，社会事务与健康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才会声明："这个基本收入实验的主要目标和促进就业有关。"[9]拟定这项计划的KELA工作团队领导人也向媒体表示："它将鼓励担心失去失业津贴或其他津贴的人接受一些短期的就业机会。"

这种形式的支付将变成某种具累退税效果的工资补贴金。领取这笔款项并找到工作的人，财务状况不仅会比继续失业的人好，也会比做相同工作的人好。而若领取人因领取这项基本收入而打算接受较低的工资，或许还会产生取代效果，换言之，他们会取代目前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或导致那些人承受工资降低的压力。

就政治可行性来说，当局其实可以推行更有野心的计划，因为根据芬兰的民意调查，有接近70%的芬兰人支持基本收入的概念，而且支持比原先设定金额更高的基本收入。根据这个试点计划的推算，如果对所有人口发放基本收入，总金额比现有的政府社会津贴支出还低，这凸显出财政当局有多么畏首畏尾。根据非常粗略的推算，就算每个月发给每个芬兰人560欧元，一年的成本也大约只要360亿欧元，而芬兰政府目前光是花在现金津贴的资金，就要大约420亿欧元。

基本收入不是（也不该是）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意指国家几乎明目张胆地意图引诱人民做出国家认为理所应该的行为）的一种手段。如果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既定目标是要诱使失业者接受低薪的短期工作，而相关的支付实际上并没有促使更多失业者接受那类工作，那么"基本收入"会不会被判定"失败"？

基本收入倡议者真心的愿望之一是：人们能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更能掌控自己的时间，并依循每个人自身的意愿，选择是否转向非"劳动"的"工作"——那或许包括无薪的照护工作、社区义工、重新接受训练或教育等。我们无法用上述试点计划提议来评估这些宝贵的可能结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芬兰政府为这个实验而提拨的多数资金都被保留下来，供将在2018年展开的一个试点计划使用，可喜的是，这个计划更有内容且可能更符合基本收入原则。

2016年，世界各地对推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兴趣愈来愈高昂，以荷兰来说，很多自治市寻求利用一项刚颁布的法律来争取利益，这项新法律让地方主管机关有机会实验创新的社会政策。这项2015年的《参与法案》（*Participation Act*）提高了领取福利援助金的劳动福利条件门槛，它要求领取人必须去应征（并接受）工作、登记加入"返回工作职场"计划，并从事义务性的"自愿"工作。这项法案也赋予管理社会救助的地方议会设定其具体条件限制（例如从事志工或照护工作以换取津贴）的权利，同时也允许地方议会进行实验。

到2016年下半年，许多荷兰自治市——以乌得勒支（Utrecht）、格罗宁根（Groningen）、蒂尔堡（Tilburg）和瓦赫宁恩（Wageningen）等为首——都拟定了各种形式的基本收入实验计划。

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取得中央政府的许可，毕竟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简称VVD，为联合政府的元老级成员）过去一向对基本收入的概念敬谢不敏。2016年9月，政府表示最多共只会允许二十五个自治市——共22000个福利申领人——从2017年1月起展开试点计划。另外，它还针对这些两年期试点计划的实施方式，设定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导致很多原本相当热情的地方主管机关纷纷打退堂鼓。所以，到2017年年初，只有八个自治市还在规划试点计划，其他自治市则在等待2017年3月的大选结果出炉。

最初，这些试点计划的支持者是希望观察一旦通过支付无条件限制的津贴，让领取人能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获得额外的收入，使行为限制条件取消且贫困陷阱移除后，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他们的主要假设是，针对领取津贴的资格权利而设定的“劳动福利”条件，以及针对未能达到条件限制的案例实施惩罚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那都是破坏个人自由的作为，而且会衍生不安全感与恶意。一般来说，人都想借由赚取收入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又不希望是被迫的。

然而，预定在2017年实施的试点计划，却不会实验任何和基本收入相近的内容。中央政府并没有放手让地方主管机关进行实验，而是决定强制采用它本身的设计，这个设计大致上是依循原本为乌得勒支拟定的一个繁复提案——也就是所谓的“Weten Wat Werkt”（知道什么才是行得通的）。[10]这个提案将未来领取人样本分成六个群组，目的是要测试不同程度的条件限制对接受工作机会与退出福利名单的诱因的影响。

第一个群组将领到正常的津贴（即单身者973欧元，夫妻为1390欧元），就算领取人不寻找就业机会，也不会遭到正式惩罚。第二个群组将受制于额外的义务与检核，目的是要“让他们重新融入劳动市场”。第三个群组获准将薪资超过福利收入的部分保留一半下来，单身者最多一个月可保留199欧元，已婚者的夫妻则各保留142欧元。第四个群组是前述三组的某种混合体，而最后两个群组是对照组，其中一个群组住在自治市，另一组不是，他们还是沿用现有的福利体制。计划的参与采取自愿制，不过一旦参加便不能退出。

即使是以这个提案自身的条件来说，光是它的繁复内容，就已对评估作业构成极端严峻的挑战。更糟的是，荷兰政府还进一步破坏这些实验的价值，因为它规定该自治市必须在实验展开六个月后，检核第一组的人是否自愿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如果官僚们研判某人不够努力找工作，那个人就会被排除在实验以外，并恢复适用一般的“劳动福利”条件限制。所以，惩罚不仅没有取消，还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可以想见，这个大杂烩般的设计引来非常多的批评。格罗宁根、蒂尔堡、乌得勒支和瓦赫宁恩等地四所合作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写信给荷兰议会，表达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评估，诚如卢德·马菲尔斯（Ruud Muffels）教授指出的：

> 被深入研究的是惩罚的效果，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想要找出什么种类的资讯。另外，试点计划结果的解读也将会非常复杂。如果自由会衍生后果——参与者可能因为他不“够积极”寻找有薪

> 就业机会而在一年后被禁止参与实验，这种形式的研究方法根本就不能试验。[11]

另一个批判者也哀叹：

> 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信任而非镇压之上的单纯试点计划。我们想要让津贴的申领人拥有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大的购买力。现在这套规定非常复杂，状况令人迷惑，导致我们难以形成相关的实验，更难以了解最后的结果。

所以说，荷兰的几个实验既不是基本收入计划，更和自由价值观矛盾，那些实验比较像社会工程领域的某种温和专制主义演习。此外，相关的限制导致原本兴致勃勃的多数地方主管机关打消参与念头或暂停参与。一个主要的难处是，这项试点计划要求某个被实验的群组遵守比现有制度更严厉的就业相关条件限制，这样的规定容易导致人们不愿参与，因为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将被分配到哪一个群组。

长期以来，加拿大似乎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实施基本收入的国家。早在1971年，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建议通过负所得税的方式，实施“保证最低收入”（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198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即麦克唐纳委员会〔Macdonald Commission〕）也提出同样的建议。2015~2016年间，几个加拿大省份的政治人物暗示他们有意愿支持基本收入实验，包括艾伯塔省（Alberta）、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与魁北克省。2016年赢得大选的自由党也在它后续的一场政党大会中通过一项动议，支持“最低保证收入”（minimum guaranteed income）。

安大略省的进度是最快的，省政府已专案提拨大约2500万加元，计划打造一个为期三年的基本收入试点专案，该省政府表示，这个专案的目标是要“测试‘基本收入有助于更有效率实现收入援助目标，同时改善安大略人的健康、就业与住宅成果’这个愈来愈普遍的观点”。长期以来倡议基本收入不遗余力的前保守党参议员休·席格尔（Hugh Segal）获邀研拟一份探讨各种选项的审议报告[12]，这份报告后来被作为2016年年底一份政府咨询文件的基础。[13]某种形态的试点计划预期将在2017年年中开始实施。

诚如席格尔在他的报告中承认的，如果是想要借由这次试验来厘清怎样的基本收入计划才是适当的，那么，这个试点计划不可能满足那个目标的所有条件，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比荷兰与芬兰的实验更大有可为。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要测试各种不同版本的基本收入，而前述咨询文件已建议了三种设计：一个以取代目前根据安大略省劳动计划（Ontario Works）与安大略省伤残援助计划（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而实施的主要社会津贴为目的的基本收入；一种作为负所得税的基本收入；以及一种对工作年龄（18~64岁）的个人发放且对额外薪资设限的基本收入。此外，政府希望测试两种津贴水准，并对所有薪资收入应用两种退税率。所有评估都会以一个随机对照实验与

三个“足量供应点”研究为依据，以便测试基本收入对社区层次的影响。

如果这个试点计划采纳以上所有原则，显然就有过度复杂的风险，尤其它和更早之前的Mincome实验类似，将只会让收入低于某个水准的人获得增额收入。此外，限定只有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才拥有领取资格的规定，将导致两个最没有收入的群体被排除在外——老年人和孩童，这是非常重大的缺点，毕竟每五名加拿大孩童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状态，这个比率是OECD国家最高的。另外，根据限制，居住至少一年者才算是合格的领取人，但以试点计划来说，这项限制还算合理。

虽然有上述缺点，但到目前为止，在有意于2017年实施的试点计划中，安大略省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是看起来最大有可为的一个。该试点计划没有行为条件限制，而且基本收入将发放给个人（虽然还不知道这笔基本收入是会一一发给每一个个人，还是根据家庭人数计算并一起发放），并对伤残与被指名的照料者发放增额收入。席格尔建议采用每人每月1320加元的收入保证，那个金额大约是该省贫困线的75%，另外，它还增额发放500加元给伤残者，预定最少发放三年。

2016年，新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宣布要在加州的奥克兰实施一个小规模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它提拨了两千万美元，另外可能还有其他捐助者会共襄盛举，为这笔基金添加更多活水。2016年9月，它先展开一项“先导试点计划”，用以测试后勤业务与研究设计，另外，一个为期3～4年的试点计划将在2017年年中展开。[14]

年轻创业投资家山姆·阿特曼是Y Combinator的总裁，他说，由于人工智能有可能消灭传统的就业机会，并使贫富差距的程度恶化，所以，他想赞助一笔基金来研究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他主要并不是想研究基本收入对就业的影响，因为他本来就假设未来的就业机会不多。相对地，他想要厘清一般人在基本需求受到充分照料的情况下会选择做些什么事。“一般人会成天坐着玩电子游戏吗？还是会去创造新事务？……当一般人不再害怕没有能力糊口时，他们会实现更大的成就并让整个社会获得更多利益吗？”[15]

在撰写本书之际，这个专案的设计与计划发放的基本收入金额还有待精密设定。最初的概念是要为奥克兰当地一百个随机被选中的贫困区家庭提供为期五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不过，以这些前提为基础的试点计划，将无法展现出潜在的群体效应。所以，后来专案团队决定改行两个社区型试点计划，根据这两个计划，每一个成年人都会领到为期2～3年的基本收入，这样的设计就比较像正规的基本收入试验。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这个试点计划的基本收入金额应该设在什么水准？如果发放金额远高于全州或全国等普及型计划可能会发放的水准，一般人就会认为基本收入在财政上行不通。相对地，发放金额即使较低，一样可能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不会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虽然该专案团队决定在试点计划实施期间不对外公开，我们未来在解读这个可能有效且有用的实验的最终结果时，还是必须牢记这些要素。

加州群众集资慈善机构GiveDirectly因它在东非进行的多项活动广为人知，例如在当地为低收入者提供大额的一次性资助或逐月的无条件现金转移。它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论来评估这些活动的成果，最后发现了和其他现金转移研究类似的结果：领取人表示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投资较多生财资产、粮食安全改善，“心理安康”也获得改善。[16]人们变得比较快乐，对生活比较满意，压力减轻，也较不沮丧。

2017年初，GiveDirectly决定动用3000万美元来推行它号称的“史上最大基本收入实验”。它将沿用RCT方法论，将肯尼亚两个郡的村庄分成三个群组：有4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在为期12年间，每个月领到一笔基本收入；8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在两年期间内，每个月领到和上一组相同金额的基本收入；另外8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一次领到一整笔相当于两年期基本收入的金额。总体来说，大约有26000人将领到一天大约价值75美元的现金转移。另外，他们也将从代表对照组的一百个类似村庄收集数据。

GiveDirectly声明它的主要目标是要消灭“极端贫困”，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并非实施基本收入制度的主要理由。在本书撰写之际，计划要测试的几个假设尚未定案，不过，这项研究计划还有其他目标，其中之一是要检视长期的基本收入对风险承担（如开创新事业）的影响，另一个则是要观察基本收入对整个村庄的经济影响。

由于这几个预定实施的实验规模非常大，所以可能会扭曲实验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并进而产生反效果。目前这项专案已遭遇到一个问题：某个郡的参与率过低，当地的居民拒绝这种没有附带条件的援助，他们认为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处一定和异端邪说或邪恶崇拜有关。尽管如此，这项实验和欧洲方面倡议的几个试点计划不同，它将能借由对社区内所有个人发放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来测试“正牌”基本收入的成效。所以，我们必须期待相关研究人员（其顾问是由美国信誉卓著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担任）能真正对症下药，找出关键的答案。

此外，另一个设于比利时的群众集资慈善机构Eight，也即将在2017年1月于乌干达展开一个小型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个计划将对波尔托堡（Fort Portal）一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发放一个月大约18美元（孩童发放9美元）的无条件现金转移，为期两年，当地大约有五十个家户。计划实施者将就最后的结果和一份事先完成的背景调查进行比较。Eight（取这个名称，是因为每周8欧元就能为乌干达的一个成年人和两名孩童提供基本收入）表示，它将观察基本收入对女孩与妇女的教育参与率、居民获得医疗照护的状况、参与民主机构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它还希望后续能将之扩大实施到更多村庄。

非营利组织Cashrelief也计划在印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实验，它希望能对某个贫困村的所有居民发放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它将监控这个实验对领取人的收入、资产和健康及教育支出的影响，同时也将观察是否产生群体效应。

2008～2014年间，巴西本地一家非营利机构ReCivitas协会，便每个月对圣保罗州（São Paulo state）的小型贫困村瓜丁加维荷

（Quatinga Velho）的一百个居民发放大约9美元的基本收入，相关的财源是由民间捐助人提供。2016年1月，它发起另一个以捐赠基金支应的基本收入启动专案（Basic Income Startup），该专案将对个人发放一笔“终身”基本收入，而且只要捐款每增加一千美元，就会额外发给另一个人这项终身基本收入。ReCivitas期待这个概念能被复制到巴西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17]

虽然瓜丁加维荷村显然受惠于这项基本收入，但严格来说，这项实验并非一个试点计划，因为该协会并不打算进行任何事后评估。发起人表示，他们早已相信基本收入的效用，所以实施重于一切。在时任参议员的爱德华多·苏普利席（Eduardo Suplicy）等人不屈不挠的游说下，巴西总统卢拉（Lula）终于在2004年签署了一项承诺巴西将导入基本收入的法律。

近年来各方发起多项群众募资计划，默默地为某些经过挑选的个人提供基本收入，作为某种形式的示范。德国的“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专案在2014年成立，它以抽签的方式，无条件对超过五十个人发放12000欧元，供其一年间花用；以荷兰来说，经济与社区创新协会（Society for Innovations in Economics and Community，简称MIES）在2015年基于某个男人在社区从事的无薪工作——一项被称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著名自治农业专案，而对他发放它的第一笔基本收入。除了从事广告文案工作相关的收入，这个男人还领到约一千美元。有人问他拿到这笔基本收入后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他回答：“我买了时间。”

在美国，基本收入倡议者斯科特·桑坦斯（Scott Santens）通过群众募资平台Patreon取得了他自己的基本收入，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一些艺术家、音乐家、博客作者、摄影师与其他创作者，它共吸引到143个出资者，包括创投资本家、脸书工程师和女权主义活动家等。桑坦斯每个月可领到一千美元的基本收入，这让他得以成为为所有人争取基本收入的全职维权主义者和工作者。

另一个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创议是大硬币基金会（Grantcoin Foundation）的数字货币补助金。2016年，有数百个来自七十个国家的申请人领到可通过电子模式交易的补助金，虽然目前为止金额还算是微不足道。那种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计划还处于非常初期阶段，所以要评断这些计划是否可作为次级基本收入计划的主角，实言之过早。不过，我们应该密切观察这类计划的发展。

2016年年底，有几个国家的政党与运动也提议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以英国来说，杰里米·柯宾（Jeremy Corbyn）连任工党党魁后，影子财政大臣（Shado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在2016年的政党大会中，宣布工党将考虑在2020年大选的宣言中倡议基本收入，第一步将是先提出一份试点计划提案。在苏格兰，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National Party）通过一项支持基本收入的动议，法夫（Fife）和格拉斯哥（Glasgow）的参议员也在讨论是否推行地方试点计划。

在新西兰，在野党工党也表态支持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议会已通过一项呼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实施试点计划的动议，而旧金山目前也在研究一项试点计划，倡议者还组成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收入国民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Basic Income），以支持地方、州和全国层级的创议。2016年12月时，一群美国企业家、学术界人士、维权主义者等共同发起了经济安全感专案（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宣示要达成“将概念性讨论转化为实质行动”的目标；在中国台湾，新政党台湾共和党（Taiwan Republican Party）正努力提倡基本收入；而在韩国，几个显赫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包括总统候选人暨城南市市长李在明（Lee Jae-myung）都支持基本收入。

在冰岛，近来突然崛起的海盗党（Pirate Party，该党在2016年10月的大选获得第三高票）基于现有制度下的严重贫困陷阱而支持举办试点计划；德国海盗党（Pirate Party，在2013年联邦选举中获得2%的选票）虽属边缘政党，它也支持基本收入，而新政党基本收入联盟（Bündnis Grundeinkommen）也在2016年9月成立，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导入无条件基本收入。

瑞士洛桑市在2016年4月通过一项要求议会实施某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动议，在法国，参议院建议进行试验，而且目前也有人推动在阿基坦区（Aquitaine region）进行一项基本收入实验。

2016年年底，由反体制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执政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利沃诺（Livorno），展开了一个小规模基本收入实验，这项实验每个月无条件发放500欧元给该市最贫困的一百个家庭，它还计划在2017年扩大至更多家庭。据报道，另外两个由五星运动执政的城市西西里的拉古萨（Ragusa in Sicily）与那不勒斯（Naples）也正考虑实施类似的计划。

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主要是要测试有关基本收入之行为影响的种种说法，以及驳斥这些说法的主张，并协助将基本收入合法化为一项可行的政策。不过，就定义来说，试点计划只是一种短期的变革，而这引发两个疑问：如果实施一个长期的“永久性”变革计划，它产生的影响会不会和短期试点计划的影响不同？试点计划结束后，它的影响会不会逐渐消失或甚至被逆转？

目前可解答上述疑问的实验性文件相对稀少，何况若投注资源来追踪这些研究，最后反而可能会导致理想的变革行动遭到延宕。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暂时性的证据显示，即使是短期性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都可能在计划结束后产生延续性的影响。相关的延续影响包括：打破禁忌——一旦禁忌被打破就不容易恢复；让某些人得以摆脱财务钳制，例如处于被债务奴役或受虐关系的人；让某些人有勇气承担经济或社会风险，并鼓励他们勇往直前。

以第十章提到的印度试点计划来说，试点计划结束后六个月所做的一份“延续影响调查”发现，某些变化还是继续发酵，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计划在解放年轻女性方面的影响。也有几个现金转移计划发现，正面

的经济效应事后仍有延续，部分是因为一般人利用这些转移支付来购买工具和设备或家畜，以增加赚钱的机会，但也因为这些计划让人们愿意开放心胸，对未来怀抱期望，并接受新的可能性。[18]斯里兰卡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接受转移支付五年后，男性的年度收入增加64%至94%。[19]另一个针对乌干达试点计划所做的调查发现，领取一次性补助金四年后，领取补助金的青年的平均收入比未领取者高41%。[20]

这个现象激发了一个想法：如果短期试点计划真的能产生正面的效应，而且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只领取18个月的基本收入，也能产生延续性的效应，那何不在各地轮流施行一系列的本地计划？也就是说，在一至两个区域实施基本收入后，接着转移到其他随机挑选的区域实施，依此类推，直到整个国家的每个地区都实施过基本收入为止。无疑地，某些政治人物会对这样的计划抱持犹豫态度，但至少就财政考量来说，这个方法比较容易落实。

并非每一份研究都显示基本收入停止发放后，还会继续呈现有利的发展。只不过，在评估长期的结果时，还是必须将转移金额和发放期间的长短列入考量。某些批评者辩称，短期的现金转移试点计划并未达到它宣称的“打破代际贫困循环”的目标。但这样的评估目标未免也太高、太难实现了。

试点计划无法测试与评估推行基本收入的根本正当理由——社会正义、自由和经济安全感——正因如此，某些基本收入支持者认为试点计划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毕竟我们不能以可观察行为（observable behaviours）的经验性试验（empirical test）来厘清基本收入是否应实施。因为如果我们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权利，那么，质疑它是否能“产生效用”，就毫无意义可言，这和质疑奴隶制度是否应该废除一样没意义。尽管如此，设计良善的试点计划还是能达到以下几个有用的目的：评估与基本收入有关的各种主张和批评、争取政界的接受度，以及找出实施基本收入后可能衍生的潜在问题等。

就理想状态来说，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应该由州或地方政府执行，且应该以货币的形式支付，不应该由慈善团体或以人民不熟悉且不合法的通货发放，因为那种通货和现实状况格格不入。然而，尽管试点计划受到重重限制，但目前为止已完成的试点计划证明，基本收入在许多方面都会衍生正面的效应。只要不把试点计划用来作为政治不作为的借口，那么，试点计划就应该是一股良性动力，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试点计划看出哪些干预行动能让基本收入获得最成功的结果。目前真正的挑战还是在于政治决心是否足够。

在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这个易变阶段，最大的危险或许在于试点计划有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工程，被用来测试某些源自于行为经济学的道德可疑战术（morally dubious tactics）。一旦将试点计划的目标设定为测试“工作诱因”，而且还对它设下各式各样的条件限制，那么“基本收入”一词就可能成为被用来包装某种劳动福利计划的华丽外衣。

所有“基本收入”实验都必须和基本收入的严格意义一致，才能达到正确试验的目的；基本收入的支付必须是全民、无条件且对个人发放的

（见附录）。一开始就被用来作为某种诱因的计划，很可能被轻易降格为一个隐含各式各样惩罚与权利剥夺工具的计划。相似地，抽签和群众募资计划有可能引来旁人的嫉妒和怨恨，最后导致外界被转移焦点，不再关注堪称基本收入主要特点的群体效应。

实施试点计划的动机应该是要强化自由、社会正义和经济安全感，而若要测试行为层面，可能需要进行其他干预。如果一个试点计划在自由方面让步，而且侵犯到社会正义与经济安全感原则，就应该拒绝实施。

注释：

[1].For a set of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Geneva Congress of 2002, see G.Standing (ed.) (2004),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London: Anthem Press. Other papers can be found on the BIEN website: http://basicincome.org/research/.

[2].J.Thornhill and R.Atkins (2016),‘Universal basic income: Money for nothing’, Financial Times, 26 May.

[3].E.Forget (2011),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The health effect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Canadian Public Policy, 37(3), pp.283-305. D.Calnitsky (2016),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The Mincome experiment, stigma, and community exper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1), pp.26-71.

[4].T.Skocpol (1991), ‘Targeting within universalism: Politically viable policies to combat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Jencks and P.E.Peterson (eds.), 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411-36.

[5].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6].Calnitsky,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

[7].R.Akee, E.Simeonova, E.J.Costello and W.Copeland (2015),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2156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1562.

[8].L.Kalliomaa-Puha, A.-K.Tuovinen and O.Kangas (2016), ‘The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in Finland’,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Law, 23(2), pp.75-91.

[9].O.Kangas (2016), From Idea to Experiment: Report o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in Finland. KELA Working Paper 106. Helsinki: KELA.

[10].L.Groot and T.Verlaat (2016),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Utrecht andWagenengen experiments’. Utrecht: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ugust.

[11].Cited in F.Barnhoorn (2016), ‘Netherlands: Design of BI experiments proposed’, Basic Income News, 26 October.

[12].H.D.Segal (2016), Finding a Better Way: A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for Ontario-A Discussion Paper. https://www.ontario.ca/page/findingbetter-way-basic-income-pilot-project-ontario.

[13].Government of Ontario (2016), Consultation Guide for the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https://www.ontario.ca/page/consultation-guide-basic-incomepilot-project.

[14].笔者曾因这个专案而获邀加入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15].S.Altman (2016), ‘Basic income’, Y Combinator blog, 27 January. https://blog.ycombinator.com/basic-income/.

[16].J.Haushofer and J.Shapiro (2016),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to the poor: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uly.

[17].K.McFarland (2016), ‘Brazil: Basic income startup gives “lifetime basic incomes” to villagers’, Basic Income News, 23 December.

[18].The Economist (2012), ‘Free exchange: Hope springs a trap’, The Economist, 12 May.

[19].S.De Mel, D.McKenzie and C.Woodruff (2012), ‘One-time transfers of cash or capital have long-lasting effects on microenterprises in Sri Lanka’, Science, 24 February.

[20].C.Blattman, N.Fiala and S.Martinez (2013),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turns to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a Ugandan aid program’. CEGA Working Paper. Berkeley: Centre for Effective Global A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ril. http://cega.berkeley.edu/assets/cega_events/53/WGAPE_Sp2013_Blattman.pdf.



第十二章

CHAPTER XII

政治挑战——如何从这里到那里

> “我们的基本功能是要发展现有政策的各种替代方案，接着保持那些方案的活力和有效性，直到政治不可能变成政治必然为止。”
>
> ——米尔顿·弗里德曼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州议会代表团带着一份政策提案到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他听完简报后说：“好，我已经被你们说服。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开始施压，敦促我实施这个政策。”如果没有长期不断的政治压力，根本的社会变迁鲜少会发生。在众多政治人物当中，有智慧的领袖少之又少，政策领袖也不多，只不过，他们总是会等到某些政策开始运行后，再用尽全力将一切功劳归给自己。总之，政治人物当中鲜少人有勇气出面带头。

压力至关重要。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错失了一个促进基本收入的大好机会，而那次事件的一个教诲是——大众的压力在某个关键时刻爆发，促使民主党内较保守的势力得以扼杀那个创议。

如今实施基本收入制度的主要障碍和政治考量有关，而非经济或哲学考量。然而，这样的状况正快速改变。很多新政党已将基本收入列入它们的宣言，某些历史悠久的政党也纷纷努力将基本收入纳入其政党平台，或者承诺将实施试点计划。这些政党包括英国与新西兰的工党、苏格兰的民族党，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爱尔兰、日本、荷兰、挪威和美国）的绿党，以及各国的海盗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冰岛的海盗党。

以英国来说，保守党对此还是显得兴趣缺乏，工党领袖杰里米·柯宾和工党的影子财政部长约翰·麦克唐纳则支持试行这个概念，而柯宾之前的工党主席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亦然；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已将基本收入纳入其政策平台，还有几个省的省长挺身支持基本收入；诚如先前提到的，芬兰总理已专案提拨一笔资金作为试点计划的财源，在法国，资深政治人物的言谈之间也支持基本收入，包括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另外，社会主义党也推选了基本收入倡议者贝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担任该党在2017年4月总统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的某些派系要求必须实施基本收入；另外，丹麦的另选党（Alternativet）与波兰的协力党（Razem）亦然。总之，各地人民组成了代表危产阶级的新政党。这一切反映出一种认同基本收入合法性的全新意念，因此，我们不能再将基本收入视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乌托邦思想。

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对话变得愈来愈开放，多项意见调查显示有愈来愈多人知道基本收入的意义。2016年，位于柏林的达利亚研究公司（Dalia Research）所进行的一份跨欧盟意见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基本收入，只有24%的受访者反对，剩下的则不置可否。

最重要的是，各种主张实施基本收入的提案开始被纳入政治议程，因为其他理当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政策几经试验后，多半因其各自的问题而失败，而且迟迟无法解决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差距及经济不安全感等问题。非但如此，这些政策还涉及愈来愈卑鄙的政府干预，一如各式各样电视节目与肯·洛奇（Ken Loach）执导的《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等惊悚电影所揭露的状况。财力调查、惩罚、将弱势者妖魔化为“懒虫”（或更难听的字眼）等社会保障政策并没有成功，相反地，那种政策让所有人蒙羞。

当初提倡这类偏执政策的政党多半对基本收入抱持防备态度，不过，由于他们提出的政策处方不断失败，而且充其量只能解决20世纪的问题，完全无法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所以，他们最后当然也落得名誉扫地，不再受信任。

他们可以用愈来愈严格的惩罚、不走合法诉讼程序、“轻推”政策以及劳动福利计划等来逃避他们应负的政治使命，因为以前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只有极少数的“其他人”是这类计划锁定的救助目标。不过，当那极少数“其他人”成为一大群人——换言之，有更多人靠近那个群体的标准或快变得和他们一样，救助政策的不足与不公平就变得一览无遗。

因此，随着捍卫现有政策的力量和这些政策所展现出来的趋势，因负面证据与事态的累积而逐渐式微，基本收入概念的合法性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刻都更强大。这是进步的两项必要条件，不过，只有这两个条件并不保证必然能实现进步。

> “如果我要到那里，我不会从这里开始。”
>
> ——爱尔兰笑话

要迈向以基本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新制度支柱的未来，必须先找到一个方法解决现有制度过于错综复杂的问题（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制度的结果显得特别徒劳无功）。举个例子，美国政府共管理一百二十六个联邦福利计划，而这些计划对于资格权利、条件限制、发放期间或撤销规定等，都没有通用的规定，另外，美国的五十个州还各自有额外的计划。而以英国来说，苏格兰民族党议员罗尼·考恩（Ronnie Cowan）在2016年9月一场有关基本收入的下议院辩论中，贴切形容了现有制度：

> 如果有人给我们每人一张纸，要求每个人设计一套福利制度，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会设计出我们现行的制度。现有的那些制度需要成千上万张纸才设计得出来，而且最后的结果将会成为一盘由众多堕落专案、执行成效不彰且不认真的概念，以及极端复杂的制度所组成的大杂烩，最后导致最需要它的人大失所望。[1]

要解决这个乱象，需要一个积极追求可持续性策略、能承受必然挫折且政治决心坚强的政府。时运不济的英国前就业及退休保障部部长伊

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尝试将多项财力调查津贴简化并合并为单一全民福利救济金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阵痛，或许可作为某种殷鉴，供世人了解怎样推动基本收入才是最好（或最不好）的。

尤金·德·威斯佩拉尔（Jurgen De Wispelaere）与乔什·安东尼奥·诺古尔拉（José Antonio Noguera）将相关的政治障碍区分成三个重叠的挑战，这样的分析很有帮助。[2]首先是取得政治可行性的挑战。一定要建立支持基本收入的政治联盟，而且这些联盟的势力必须非常强大，不能只是基于一时权宜的心态而组成的乌合之众。支持基本收入的人必须将基本收入纳为自身意识形态或策略议程中的一环，而政治联盟的成员必须拥有参与可持续性政治运动的能量，有时甚至得暂时放下彼此对基本收入的分歧，如对设计特色或分阶段改革时间表等方面。我们建议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或说平等主义者——在面对基本收入议题时，都应该强调彼此都支持的概念，同时设法淡化双方的分歧。

第二个挑战是阐述制度可行性的挑战。如果一般认为实施基本收入有造成行政混乱的风险，不想走出舒适圈的官僚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让整个改革失去合法性。所以，改革者一定要设法防止那种情况发生。

第三个挑战是实现心理可行性的挑战。政策制定者必须取得广泛大众对基本收入的社会接受度，或者至少要让大众有意愿公平试验这种改革。这势必代表政策当局必须展开一场有智慧的游说活动，解释相关改革的价值与其原则。改革者必须能够先排除反对者势必将针对缺乏“互惠”、财政负担能力、诱发懒惰、“不劳而获”以及发钱给没资格领取或不贫穷的人等问题而提出的嘲弄。

就这个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革者必须勇敢正视以下问题：一般公民的税赋可能因基本收入的发放而加重，换言之，一般人将因帮某些依赖他们维生的人买单而被牺牲。右翼媒体可能会刊登穷人因基本收入而恣意享受生活的报道，并进而将那类报道用来作为“基本收入鼓励穷人利用‘纳税人’血汗钱从事放荡行为”的证据。悲哀的是，统计证据将不足以抑制那种偏激报章杂志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势必会发生那类偶发事件的学习过程中，纳入某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借以防杜那种情况。不过，更好的做法是说明基本收入的财源来自“资本”或各种形式的租金，而非增税，因为这么一来，媒体就无法将基本收入污名化为政府为了帮某甲买单而对某乙课税的政策。

这些挑战透露了一件事：将基本收入打造为某种社会红利与争取社会正义、自由与基本安全感的较好工具（而非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在政治上会比较站得住脚。另外，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修辞学上的正当理由来支持基本收入：它是应对科技进展对职业与就业市场的潜在大规模破坏的策略性防范准备（strategic preparedness）；这种策略性准备和军事防御政策、灾难防范准备以及减缓气候变迁的对策等类似。历史上充斥着政治人物反应过慢的案例，而这是提早采取合理行动的好机会。

若要引领政治辩论向前推进，也必须辨识出哪些群体最可能支持基本收入，哪些又最可能反对。当局必须说服前者将基本收入列为其大众

运动的优先事项，并说服他们与其他支持者合作。当今这些支持群体包括代表伤残者、性别平权主义者、游民、各种生态利害团体的非政府组织、某些工会、学生与青年、艺术家甚至医疗机构。

反对者包括很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社会主义者以及传统的工会主义者，他们到现在还是相信，若要创造更好的社会，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全职的工作。他们对所有通过舍弃无用劳动来让人民拥有更多自由的政策抱持猜疑态度，也怀疑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居心不良，认为这些倡议者打算摧毁福利国家或福利国家仅剩的资源。不管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基本收入支持者怀抱什么愿望，我们还是必须尊重反对者的这种心境，只不过，也要坚定地加以反驳。

一种回应这些疑虑的方式，是向他们证明上述的担忧心理没有根据。诚如心理学实验所示，如果基本安全感能鼓励人们变得更讲求利他主义以及社会连带主义（彼此间更休戚与共），基本收入制度应该就能强化全体大众的决心，努力捍卫具有社会连带效果的社会政策。当然，光是那个影响并不足够。独立于基本收入之外，我们也必须为特定公共服务或津贴的优点辩护。没有理由假设获得基本收入保障的人就不会想要捍卫公共服务。

以美国来说，2016年6月全国基本收入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Basic Income，简称NCBI）创始后，公共辩论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NCBI补强了现有的美国基本收入保证网络（US Basic Income Guarantee Network，简称USBIG，该网络主要是促进研究与资讯传递），它是根据美国税法成立的“527”机构，这类机构可以为了达到影响选举与政策制定的目标而成立政治联盟，并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3]

前美国工会领袖安迪·斯特恩也若有所思地说，倡议基本收入的相关势力有可能积蓄和20世纪30年代汤森社（Townsend Clubs）动员支持社会安全制度相当的政治压力。[4]他希望某些市长和州长能要求取得筹办试点计划的联邦豁免权。代表美国一万九千个城市和城镇的国家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的一份报告也建议各个城市研究基本收入。[5]

与此同时，一个初具影响力的运动——珍惜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由超过五十个组织联盟而成）——在2016年8月发表了一个“官方平台”，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实施。它也主张应发放额外的金额（某种增额UBI）给美国的黑人，作为对殖民主义、奴隶制与现代大众监狱大量监禁年轻黑人现象的伤害赔偿。虽然该平台并未为这个具体的要求背书（因为实务上非常难以公平管理），但它终究要求当局赔偿过去的种种不公不义，这和第二章提到的米德尔斯堡故事大致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欧洲，来自大众的压力较大，而这股压力因新政党、持续迎接新成员的全国性网络与诸如年度基本收入周活动等新创议的兴起而变得更强大。工会和危产群体也开始发声，要求发放基本收入。2016年6月，英国的总工会实体——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TUC）投票支持以下为基本收入原则背书的动议：

> 本大会相信TUC应该支持一个以对个人支付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为基础并与现行各式公共服务和儿童保育规定互补的进步制度，相较愈来愈有惩罚性且惯于污名化津贴申请者的现行制度，新制度更易于管理和让人们依循。惩罚性的管理使人因琐碎的原因而陷入贫困。大会认识到需要补充津贴来帮助低收入且高住房花费的人群解决住房危机，并且伤残者将一直需要补充津贴。将现有制度转型为任何纳入上述原则的新制度，应当要让较低收入人群的日子变得更好过。

这则获投票通过的动议或许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背书，但它指出了一个位居领导地位的“劳动主义”实体如何小心翼翼地往基本收入的目标前进，并正确理解保留其他公共服务与补充收入之必要性。TUC的力量与影响力或许大不如前，但它的这个转变对英国境内倡议或支持基本收入原则的众多实体来说，实在是一股令人欣喜的助力。

我呼吁所有支持基本收入的实体都加入这样一个施压团体。荷兰的所谓“基础团队”（Basisteams）或许堪称一个大有可为的模型，该国的地方团体承诺向它们所处的社区宣扬基本收入的相关信息。眼前的问题绝非我们对基本收入的认识不足。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最重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前面篇幅的众多理论基础中，找出实施基本收入的最佳正当理由，而另一个挑战则是要如何行使必要的大众压力，就这方面来说，过去从未成为王牌的某个理论基础目前有可能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

> 世界上最强大的莫过于一个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状态的概念。
>
>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
> 《犯罪史》（*The History of A Crime*）

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收入相关政策终于成了迫切的政治要务。这样的政策有可能减轻经济与社会不安全感的慢性病症——这种病症是导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民粹造反运动，以及欧洲及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者与极右派运动兴起的根本因素。不过，众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本土文化保护者民粹主义并没有有效方法可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限制移民与设置贸易障碍，最后反将伤害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

这样的状况可能为基本收入开启全新的政治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新中间路线阵营的胆怯让他们不愿思考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举个例子，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演说时表示，她还没做好“朝基本收入迈进”的准备。相反地，在民主党提名阶段被她击败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则表示，他对这个概念怀抱“绝对的认同感”。

在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承诺让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并阻止美国企业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使他赢得总统选举。然而，保护主义对策的实施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自动化进程因而将加速，下一个替罪羊将是“让美

国工人失去美国就业机会”的机器人。到时候，或许基本收入的概念又会默默地成为政策选项之一。

虽然有很多理由对所谓“科技反乌托邦”之类的预测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的预测已促使很多高科技财阀出面支持基本收入），但这样的预测可能是一个策动大众压力与政治行动的强烈要素。不管就业机会是否将减少，机器人大军无疑会导致缺乏安全感与贫富差距的情况变得雪上加霜。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制度至少将能部分矫正那个问题，目前也有愈来愈多的评论家认同这个观点。[6]举个例子，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与执行董事长暨《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表示，以基本收入来作为应对劳动市场崩裂的对策，“表面上说得通”。[7]

奥巴马总统曾在他总统任期结束前不久的一场访问中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将成为“未来十至二十年间最众所周知的一个辩论主题”，他提到：“毋庸置疑……随着AI（人工职能）的整合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可能变得更加富裕，生产与分配之间、工作量与收入高低之间的联结会变得愈来愈薄弱。”[8]

基本收入在道德与哲学上的正当理由一向广受肯定——即社会正义、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这三者是所有文明社会启蒙价值的根本要素，它们明显息息相关，而且最终来说，这些都来自人类的“共情情操”。“共情”这种情操能够区别进步心灵与退步心灵，是来自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的一种强烈的信仰。它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而且它认同只要不蓄意或粗心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依照自身的愿望生活。在当前独裁主义与温和专制主义当道的情况下，捍卫这些价值观或许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必须体认到，这也代表对强大的“食利者资本主义”（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有主流地位的政策和基本意识形态而兴起）的一种根本改革。

在那样的背景之下，进行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厘清要如何找出一个能大幅改变现有局面的可行方法。的确，我们需要发挥非常大的想象力，才有办法假想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当局可以不负责任地把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障碍宣传为无法突破的。但相信不用多久，危产阶级与他们周遭的人愈来愈高涨的政治愤怒，有可能让基本收入成为所有积极寻求连任的政府不得不履行的迫切政治要务。某些人或许会希望政治人物能怀抱更高尚的动机来推动基本收入，但事实将证明，抱持权宜心态的成分可能非常明显。

所以，如何才能顺利脱离今日这种复杂、主要以财力调查为基础且设下众多行为条件限制的制度，改用一个以基本收入为支柱的社会保障制度？[9]我们唯一确切知道的是，没有任何理想或最佳方法可达成这个目标。不管是在哪一个社会，这个方法部分取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旧福利制度的结构。我们建议的方法包括：为每一个人建立“部分基本收入”，最初先从某个低基础开始，或者先针对某些精选的群体实施基本收入，再渐进式地扩大适用到其他人。

有人为南非详细研拟了第二个策略。[10]悲哀的是，那些建议并没

有获得遵行。不过，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现金转移计划应该也是依据上述循序渐进的默契在执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巴西通过它的“家庭津贴”实施的计划（目前这个计划的领取人数超过八千万人），另外还有墨西哥的“机会计划”。这些计划促进了非提拨型现金转移的转汇，且使得支付现金（而不是采用较温和专制主义型的补贴）的做法得以合法化。

更广泛来说，主要的选项要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社会保障（某些人这么建议，尤其是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是得在现有的社会保障计划之外，建立一个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制度，再逐步将这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多面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基本收入是最低保障。[11]以工业国家来说，第二个做法的未来发展性相对较乐观。

到时候，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式津贴计划将随着时间而分阶段退场，而原本分配到这些计划的资金，就可用来作为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的基金。换言之，目前领取津贴的人一定不会过得比领取津贴以前差；财力调查式津贴将继续发放（不过，若将社会红利计入，未来仰赖这类津贴的家庭数将稳定减少），直到红利发放金额达到这些津贴可被取代的水平为止。

以英国及其他住宅市场遭到扭曲的其他国家来说，财力调查式住宅相关补贴可能必须继续发放，换言之，应该个别解决房市的问题。然而，失业者行为调查以及伤残者工作能力调查则应该迅速废除。应该考量伤残者较高的生活成本与较少的赚钱机会，发给补充津贴。

政治人物可以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论述，来说明为什么要实施社会红利制度（开办初期的发放金额必须相当节制）：这等于是将整个社会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返还给我们——包括来自私人所有权或因开发有形、金融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租金收入。

就第二层补贴来说，可以在社会红利之外，加发一种“稳定补助金”（stabilization grant），这种补助金可以随着经济现状起伏，在经济衰退期发放多一点，而在景气繁荣期少发一点，一如第五章所描述。

社会红利和加发稳定补助金的部分，可以根据国民收入与经济成长率的变化进行调整，相关金额的高低由独立的基本收入委员会或社会红利委员会来设定。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聘请各个议会里的中间派议员来担任，这样社会红利政策就能免于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同时降低该政策被用来达成政党政治目的的风险。

第三层津贴将是“社会保险”津贴，用以应对诸如生病、非自愿失业与怀孕等或有风险。然而，和现有提拨制度不同的是，这类津贴支付将和过往的保险金提拨纪录无关。取而代之地，为了重新建立社会连带主义的休戚与共风气，收入高于基本收入水平（或另行制定高一点的最低水平）的每一个人，都将缴纳特定百分比的收入来作为社会保险的提拨款。

这些提拨款可以依据现行方式，拨入某个社会保险基金，也可以纳入总税收，但在税收报表上以一个独立项目加以列示。通过这个方式，较不可能使用那类津贴的人，将会交叉补贴可能较需要的人，换言之，

这和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始概念相同。最后，在这层津贴之上，还可以再纳入一些民间自愿性计划，包括企业退休金计划等，供想要获得额外保险的人使用。

面临快速、深刻且连续的技术变革冲击，21世纪的开放市场经济体系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都饱受威胁，而上述制度将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实用制度，它不会太过基进，也不会太过笨重，有助于对抗21世纪开放市场经济体系必然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问题。

将基本收入概念塑造为社会红利可能是未来政治上较可行的路线，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第二个理由是，要克服外界对财政负担能力及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影响的成见，可以说极度困难。若能导入初期发放金额较低（该金额无法满足多数人的物质需求）的全民社会红利制度，它就不太会因经济不可行等理由而被驳回，而且让政治人物有时间慢慢凝聚共识，并进一步支持更积极的方案。

和财力调查式津贴不同的是，基本收入的普及性本身有可能吸引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它的目标相当符合“激进”（radical）这个词的优良本意——它希望改善贫富差距、缺乏正义与经济不安全感等问题，并以各种极端不同的哲学传统出身的思想家都能认同的方法来促进共和主义式自由。另外，它不考虑众人不同的最终目标（目标不同乃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而起），所以应该也很务实。而且，它将能回避长期以来不断反驳却依旧无法平息的标准反对意见——最显而易见的是“财政无法负担基本收入，而且将降低劳动与工作的诱因”。

改革者可以先表明他们带领社会走向尽可能消弭经济不安全感的长期理想，并补充接下来必须等待新的民选代表来完成这项计划。借由这个手段，就能反制批评基本收入鲁莽且不可信的保守或反动声浪。

成立民主主权基金或资本基金——有点像将资本部分社会化——可以让这条社会红利路线变得更加稳固，只不过，我们可以找出另一个能避免升高意识形态怒气的用语，例如共享资本存托（Commons Capital Depository）[12]。这个基金可以通过向食利者的收入课税（或共享）的方式建立，另外可以再借由碳税、金融交易税和其他“绿色”财政政策等来扩大基金的规模。除了这两个结构性改革，还可以向每个公民与有资格的合法居民发放一种“社会红利卡”。到那个时点，我们可能就能向威廉·莫里斯的遗志眨眨眼，以另一个名义达成目标。

政治人物必须找出一个或几个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基本收入框架建构方法，用以迎战媒体与当权者的迂回批评（其中多数人打从一出生所获得的财富就超过基本收入的相当金额）。反对者一定会继续使用互惠主义之类的诡辩——当然，所有人都不该怀抱不劳而获的想法，问题是，他们有针对继承而来的财富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他们当然还是会继续描绘基本收入领取人懒惰、依赖、向人乞讨等之类的形象，同时愉悦地报道懒惰富人们的狂欢聚会。另外，如果有任何政策制定者或政治人物提议由富人缴纳更多税金，或放弃某些租税特

权来筹集基本收入的财源，他们就会马上不平地跳脚，但若政策当局为了帮有钱人减税而降低社会津贴与公共服务等支出，他们又闷不吭声。

这种双重标准和先前对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ive）概念的批评相互呼应。不过，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应该更有信心接受挑战。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演化，而非“革命”。此外，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体认到，20世纪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瓦解，所以，除非进行根本的变革，否则将会有愈来愈多人承受慢性的社会与经济不安全感的折磨，而这一切都暗示着政治的不稳定以及朝极端偏移的趋势。

支持基本收入的除了以上几个有益的理由，另外还有几个令人悸动的理由：基本收入有促进全面自由及社会正义的潜力，也可能促使人更重视工作与休闲的价值，克服劳动与消费的支配力量。

“这是变革的时代（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鲍勃·迪伦（Bob Dylan）如此唱着。的确，时间会改变成功的概率。诚如托马斯·潘恩在他1776年的划时代著作《常识》的引言中所表达的名句：“时间比说理更能令人回心转意。”实施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的时候已然来临。

注释：

[1].Hansard, 14 September 2016.

[2].J.De Wispelaere and J.A.Noguera (2012), ‘On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analytic framework’, in R.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Viability of Income Guarantee.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17-38.

[3].Those interesting in joining can email: contact@nc4bi.org.

[4].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5].N.DuPuis, B.Rainwater and E.Stahl (2016), The Future of Work in Cit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Center for City Solutions and Applied Research.

[6].M.Bittman (2015), ‘Why not Utopia?’, New York Times, Sunday Review, 20 March.

[7].H.Koch and J.Quoos (2017), ‘Schwab: “Gewinner mussen mit Verlierern solidarisch sein” ’, Hamburger Abendblatt, 9 January.

[8].S.Dadich (2016), ‘Barack Obama, neural nets, self-driving ca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Wired, October. https://www.wired.com/2016/10/president-obama-mit-joi-ito-interview/.

[9].The best general treatment is Caputo,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10].V.Taylor et al. (200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Cape Town: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M.Samson and G.Standing (eds.) (2003),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South Africa.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11].英国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已提议用发放给所有达到特定条件的个人税额抵减来逐步取代个人免税额，那将和财力调查式的统一福利救济金并行。虽然费边社尚未替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背书，却也承认这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可能路线。A.Harrop (2016), For Us All: Redesigning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2020s. London: Fabian Society.

[12].Y.Varoufakis (2016), ‘The universal right to capital income’, Project Syndicate, 31 October.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print/basic-income-funded-by-capital-income-by-yanis-varoufakis-2016-10.



附　录

APPENDIX

如何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虽然某些基本收入倡议者如菲利普·范·帕雷斯认为没必要实施试点计划，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试点计划可能是有用的，它的好处包括评估：

a.实施的流程

b.对态度的影响

c.对行为的影响

d.其他能强化正面效应并减弱或避免潜在负面效应的制度或政策变革

要求实施一项政策前必须先有实证结果实属公允，但设计、管理每一个实验及分析实验所产生的数据的人，都必须怀抱谦卑的心。每一个试点计划都各有缺点，没有一个试点计划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而且，试点计划的瑕疵不该成为改革的障碍。试点计划比较适合用来揭露某个干预行动如何与为何无法产生作用，而非是否能产生作用。[1]

以下这个显而易见的历史实例可清楚阐明上述的危险。在19世纪奴隶制时代即将被终结的那段日子，某些辩解者主张没有证据可证明解放奴隶将为经济、生产或奴隶本身带来可持续的利益。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对此的答复是：自由应先来到，因此应该提供可用的资源让解放运动产生效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判断每一个试点计划是否有助于证实或否定各种假说、成见和直觉。而如果要扩大实施试点计划，就应该尽可能遵守客观原则，以下是客观原则的汇总：

要测试“正牌”基本收入的成效，试点计划的支付金额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色：

> ·支付金额必须是基本的，对领取人而言必须称得上有意义，够充足，但又不能高到足以提供全面的安全感。
>
> ·这笔收入必须以现金或能轻易转换成现金的形式支付，例如通过银行账户、智慧卡或手机等形式支付。这项支付必须是定期、可预测且稳定的，最好是每个月支付，且延续一段时间。这项支付不应该整笔发放，主要的原因是这么做会产生“意志力薄弱”效应。
>
> ·基本收入应该是全民的，发放给所有一开始就经常性居住在试点计划社区的人。全民发放的好处是能观察到群体效应，包括非经济性效应，另外，基本收入也必须是不可撤销的。
>
> ·因此，基本收入不应该是目标锁定型的支付。基本收入不该只发放给被视为“穷人”的人，不管穷人的定义为何。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作为一种权利，而权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此外，财力调查不公平且倾向于发生谬误，而目标锁定则会制造贫困陷阱。

> ·因此，基本收入的发放不能有选择性。若只发放给某个“理应得到”的群体而不发给另一个群体，可能会让被选上的群体承受要和其他群体分享的压力，结果导致基本收入的效应遭到稀释。只发放给为人母者的收入可能会使家庭内部的关系趋于紧张。
>
> ·基本收入必须是无条件限制的，不能要求领取人从事某些事先具体设定的行为。
>
> ·基本收入必须发放给个人，而且平均支付给每一个男性或女性。基本收入保障是一种个人权利，所以不应该适用“家庭”或“家户”概念，因为家庭或家户的规模与组成模式，有可能受这项政策本身的影响。对孩童或因为伤残或缺陷的缘故而没有谋生能力的成年人发放的基本收入，可以指定某个代理人（surrogate，如孩童由妈妈代领）来代表他们领取。
>
> ·试点计划展开或实施期间，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其他政策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公正评估该试点计划的影响。

如果某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基于资源限制或其他因素，只采用上述部分条件来测试某些特质的有效性，或许是可接受的，但研究人员在评估结果时，必须体认到该试点计划的设计和全面或正式的基本收入设计有所差异。

试点计划的设计一定要清晰，且必须具备能可持续实施的特质，这是必要的条件，但也很容易被忽略——这是某个设计会被采纳，而其他替代的可行设计却未被采纳的原因。上述第一个原则提到的所有层面都应该适用这个原则，尤其是基本收入的金额以及试点计划的延续期间。试点计划开始设计后，就必须详细记录该设计的所有特质。为了确保可持续性，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工作计划与适当的预算规划。

一旦一个试点计划开始实施，除非必要，否则不应该随意更改它的设计。

如果试点计划的规模非常大，就不可能合理地善加管理，但如果规模过小，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本收入实验。行为与态度变化有可能是趋势性的，某些人改变，某些人会犹豫，某些人则不改变。假设效果（hypothetical effects）通常只对选择样本（青少年、伤残人士等）中的某些人有意义。所以，试点计划必须涵盖具备各种潜在利害特质的足够人数，统计人员才有办法有效推估计划本身的影响（或没有影响）。样本规模应该要至少涵盖一千人，样本更大会更好，这是一个普遍准则。

显然试点计划的持续期间不能太过短暂，否则它会变得像一次性的资本补助金。基本收入的影响会随着人们的学习与适应而逐渐浮现，这需要时间慢慢酝酿。不过，刚开始领取补助金时，或许会产生某种冲击效应（impact effect），而随着个人开始习惯领取基本收入后，又会产生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另外还可能在某些层面分别产生渐

退效应（wearing off effect），还有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试点计划的持续期间应该超过一年，两年堪称合理，不过，某些人可能会主张应实施更久。

专案疲劳（project fatigue）要素是务实的考量之一，这个要素很容易因最初的满腔热忱而被忽略。然而，所有试点计划都牵涉到定期的评估，所以必须建立并维护一整个研究人员和现场调查人员团队。另外还会有受访者疲劳（respondent fatigue）问题，因为在评估试点计划的成果时，必须询问受访者很多问题，或以某种方式观察这些受访人，因此难免产生受访者疲劳现象。就这个层面与其他几个层面来说，求好心切的态度反而有可能会坏了大事。

试点计划的设计必须是可复制且可扩大实施的，换言之，类似的试点计划必须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实施，而且原则上应该要可以将试点计划扩大实施到一个较大的社区，甚至普遍在全国各地实施。

要判断基本收入的影响，就必须针对各项结果进行比较，包括比较领取基本收入前后（也就是“治疗”开始的前后）的行为与态度是否有差异，同时也要和“对照组”比较，所谓对照组就是没有获得这项“治疗”或处于政策实施范围以外的类似群体。进行对照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各项结果导因于基本收入的发放，而非外部变化所造成。

虽然目前随机对照试验成为时尚，但用于评估基本收入的成效时，这种试验还是无法突破一些极限。顾名思义，随机对照试验的根本原则是，获得“治疗”的人应该以“随机”的方式，从较广大的人口中挑选，且对照组里的人也应该“随机”选出。这通常代表要列出某个区域的家庭，并从中撷取出一个样本，让某个家庭（或某个家庭里的个人）获得领取基本收入的机会，而邻居则未必能获得这个机会。

这么做除了有衍生社区内与家庭内部紧张关系的风险，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家庭与家庭之间还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可能以非随机的方式分享基本收入。这样的发展将否定基本收入的普及性，稀释它的影响，同时导致结果更难以有效评估。以印度中央邦的试点计划来说，实验者在某个广大区域内随机选择20个类似的村庄，其中8个村庄的每个居民都领到基本收入，而剩下的12个村庄则没有任何居民领取基本收入。唯有这样的做法才让实验者得以探讨各种不同的影响，包括个体层面以及群体层面——包括态度与行为的改变。

为达到正确评估的目的，必须先进行社区背景人口普查或调查，才能就试点计划将要评估的所有层面，取得潜在受访者的详细资讯。（如果预定选择的样本很大，人口普查就不可行。）另一份以收集社区结构性特质的数据为目的的社区背景调查（人口结构、基础建设、与学校和医疗院所的距离等），可补足上述背景调查的不足。这两种调查的目的都是要找出基本收入的影响产生前就已存在的条件限制、行为和态度。

在收集背景调查的数据时，最好不要向现金转移的目标领取人说明相关的计划，虽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些计划，在接受调查时可能会比较合作。

由于评估者事先不会知道基本收入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而且无法肯定地预见到所有的可能影响，所以背景调查必须收集非常丰富的数据。应该在第一笔补助金发放前一个月就先进行背景调查，这样才能掌握试点计划实施时既有的普遍形态。

和背景人口普查有关的关键之一是受访者的选择。不同受访者对某些议题的回应可能会有差异，例如访问“一家之主”收入到的回应，有可能不同于另一个家庭成员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牢记，由于基本收入本质上是对个人发放，故受访者的回答有可能因性别、年龄和其他个人因素而不同。

就理想状态来说，最好是分别针对家庭与每个家庭成员收集背景真实数据。但这么做可能不切实际，而且就现场调查与数据处理的角度来说，成本可能会过高。然而，被选为受访者的女性人数必须要和男性相等。中央邦试点计划就分别针对每个家庭访问了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受访者。

完成背景调查后，我们建议进行一个公开的资讯宣导活动，透过这个活动来解释试点计划实施过程中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以便克服人们的疑虑，并确保受访者了解自己将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将定期领到一笔收入，且不会被设定支出或行为条件等。

试点计划的目的是要测试各种效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计划当中纳入一系列调查项目，首先是背景调查。另一份调查应该是在试点计划展开后约六个月进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侦测试点计划对人们行为与态度的影响，接着，每隔六个月左右（取决于试点计划的时间长短）再进行进一步的期中调查。在试点计划结束后，最好是在最后一笔现金转移发放后一个月内，针对当初接受背景调查的那些人和家庭，再进行一次期末评估调查。每一份调查的问卷都应该尽可能采用与背景调查类似的内容，参考期间也应该相似。

虽然评估流程应该以领取基本收入的个人为焦点，但最好也让关键情报提供者参与。应该向地方主管机关、本地的教师、医疗院所人员以及其他了解社区的人收集额外的资讯，请他们提供无法向受访者取得的资讯，以及基本收入对行为的可能影响等。优质的试点计划评估报告，必须以一份结构清晰且以中立方式向关键情报提供者提问的问卷为基础。另外，如果试点计划涵盖好几个社区，这些被选上的区域必须具备类似的结构，尤其考虑到评估作业必须比较基本收入发放区域与对照区域之间的状况，所以，这些区域的结构必须相似，比较才有意义。不过，评估作业的设计应该也要考虑到试点计划实施期间的可能外部变化，例如新学校的兴建或诸如灌溉等计划的导入等，因为这些变化有可能导致一个社区出现结构性转变，导致它和其他社区不再相似。基于这个理由，最好是在每个评估时点进行一份简单的社区调查，以检视是否发生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的结构性转变。

试点计划应该要纳入能衡量与评估它对个人、家庭以及社区之影响（例如经济乘数效果）的适当技术。只观察试点计划对个人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误导效果（最显著的例子是只观察对受益者的影响但不考虑无

谓影响〔deadweight effects，若某人没有获得补贴，他可能已找到了一份工作〕与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s，一个受补贴的人可能替代一个非受补贴的人〕的劳动补贴计划）。

某些最丰富的影响或许是在社区层面，如果不同时加以研究，评估报告有可能会做出以下结论："由于对个人层面的影响为好（或坏），所以基本收入为好（或坏）。"问题是，基本收入有可能会对个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群体层面的回馈效应，其中，基本收入倡议者的主张之一是，基本收入将能促进社区内的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

照理说，基本收入会影响行为、生理与情绪上的"幸福感"和态度。所以，一个试点计划的目标不仅是要观察可直接衡量的行为影响，还要纳入额外的疑问，而且要尽可能以中立的方式提问。为了顺利完成量化评估，应该要求受访者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cale）的五个可能的答案中进行选择（例如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置可否；4.同意；5.非常同意）。

在试点计划开始实施以及背景调查完成前，应该先列出未来将要试验的详细假设清单。以过去很多案例来说，相关单位通常只凭着几个模糊的期待就展开试点计划，那或许导因于他们是在"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实施试点计划，但也或许是因众多彼此矛盾的正面与反面论述所造成的结果。另一个较少被提出的问题是，很多试点计划开始实施时，只有一两个假设等待试验，随机对照试验通常是如此。

让我们看看几个标准的假设：

a.基本收入能让家庭为子女提供更多食物，从而使营养状况及健康状况改善。

b.基本收入能纾解家庭责成孩童从事劳动的压力，从而使孩童上学的概率上升。

c.基本收入让家庭得以偿还债务。

这些假设需要使用到来自背景调查与社区背景调查的基准数据（benchmarkdata）。

接着再看看另一组假设：

d.支付给某甲的基本收入，会促使某乙减少投注在赚取收入的活动的时间，且（或）促使某乙改变他（她）的消费。

e.基本收入计划实施后，以建议领取人如何花费这笔收入为目的的地方团体将会成立。

f.基本收入会促使社群对领取人施压，迫使领取人和社群以外的非领取人分享。

要得知这些间接与外部效应，可能需要领取人、家庭以及家庭以外的人提供资讯。虽然这对家庭背景调查的设计来说隐含许多寓意，它也需要社区层面的基准和监测调查（monitoring survey），而且必须结合试点计划实施期间内所做的家庭与社区评估调查。

接着是和本地经济与本地社区所受影响有关的假设，例如：

g.基本收入计划能使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纾解贫富差距问题，而且不仅是通过单纯增加现金转移的方式达到这些目的。

h.基本收入促使本地金融机构成立，从而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成长。

i.基本收入计划促进了地方商业发展，从而使社区的就业机会增加。

举个例子，假设g是适当评估一套基本收入制度是否有价值的关键。如果试点计划的设计无法评估它本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无法评估基本收入的某个关键价值。然而，如果社区里只有少数人能领取基本收入，就完全不可能试验这个关键的假设。所以，基本收入一定要对所有居民发放。

在试点计划展开时制定务实的成本估算是很重要的。要达到正确评估的目的，需要良好的财源筹措与技术专长。而且，除了计算基本收入本身、管理和评估作业等的成本，还另外应针对偶然事件提存一些资金。只要是牵涉到调查作业的实证研究，唯一可确定的规则就是：“错误一定会发生”，那不尽然是因为试点计划的设计或实施产生谬误，而是因为整个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与逆境。

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有一个必要但非常难以维护的原则：样本必须尽可能维持固定不变。

不管社会拒绝发放基本收入给新移民会多么令人感到遗憾，所有在试点计划开始实施时未被纳入的人，都不应该在后来获得领取的资格，除了新生儿之外。在试点计划开始后才进入社区的移民或海外归国者，不能纳入领取人范围。然而，最好还是将他们纳入调查，因为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对态度与行为产生应纳入考量的影响。

外移人口是另一个议题，解决方案取决于要测试的假设是什么。以中央邦的试点计划来说，搬走的人不再能领取基本收入。然而，计划在肯尼亚实施的GiveDirectly试点计划，则打算继续发放基本收入给一开始住在基本收入村庄但之后外移的人口，因为该计划要测试的假设之一是“基本收入能鼓励人们搬迁，以寻找有薪工作”。显然在为期较长的试点计划中，势必会有一些人身变故，所以维持样本固定不变的原则鲜少贯彻，不过，重点是要尽可能维持固定不变。

发展中国家所有现金转移计划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缺乏熟练的金融机构，以及人们对银行业务普遍无知。现金转移势必牵涉到某种学习功能，而公共机构方面的失败可能会扭曲基本收入对行为与态度的影响（例如，如果领取人很难将被汇入银行账户的现金提出）。

发放现金的方法有几个，但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重要的议题在于确保领取人能在不经由中介机构（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领到这笔钱。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试点计划必须具备“可复制”与“可扩大实施”等特质，所以另一个问题是，以成本、透明度和使用者友善度来说，

哪一个发放现金的方法是能扩大且复制到全国的最理想选项？[2]

虽然现金发放方法的选择将取决于本地情况，但多数试点计划将需要预先在发放成本和发放时间等方面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帮助领取人顺利领到这笔钱，相关的方法包括协助领取人开立银行账户、提供生物辨识智能卡或甚至行动电话，同时设法确保那笔钱能快速且轻易在本地提领等。然而，以监督的目的来说，所有交易都应该通过银行体系进行，而且可能应该通过法律来规范这个要求。

所有通情达理的基本收入倡议者都不认为基本收入将是万灵丹。很多获得基本收入的弱势群体还是难以摆脱弱势状态，一样容易被欺压或剥削。要对抗那种弱势状态，那些弱势群体需要代言人，而这些代言人必须有能力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有效地“发声”。笔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除非基本收入的领取人拥有个别的代言人以及某种形态的集体代言人代为捍卫他们的利益，否则基本收入的效用难以最大化。

社会政策试点计划专案绝对必须将代言人效应列入考虑。代言人可能在实验展开前就已存在，也可能是在实验期间因干预而产生的结果。以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来说，在实施后几个月内，村民就自主组成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针对资金的良善用途提供建议，同时保护较弱势的人，让想占他们便宜的人难以得逞。那对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评估团队对相关的正面影响有着强烈的印象，但可惜他们无法明确说明这个影响究竟有多重要。

其他现金转移试点计划也获得了正面的代言人效应：尼加拉瓜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拥有相对高比重的“社区领袖”的地区，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影响比较强大。[3]那类代言人只是可在试点计划中测量的代言人之一，在选择采样区域以及设计评估工具时，还应该将其他类型的代言人列入考量。

注释：

[1].安格斯·迪顿在一篇随机对照试验的评论中强烈阐述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也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A.Deaton (2008), ‘Instruments of development: Randomization in the tropic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elusive key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nes Lecture, British Academy, 9 October. J.J.Heckman and J.A.Smith (1995), ‘Assessing the case for soci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 pp.85-115.

[2].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echnical issues, see D.Johnson (2008), ‘Case study of the use of smartcards to deliver government benefits in Andra Pradesh, India’. Sri City, Andhra Pradesh, India: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Micro Finance.

[3].K.Macours and R.Vakis (2009), Changing Households’ Investment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ansfer Progra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IEN相关机构清单

国际	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http://basicincome. org/
欧洲	无条件基本收入欧洲(UBIE):http://basicincome - europe. org/ubie/
南部非洲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基本收入补助金运动(SADCBIG):http://spii. org. za/sadcbigcampaign/(*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涵盖十五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博茨瓦那、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
阿根廷	Red Argentina de Ingreso Ciudadano(简称 RedAIC):http://www. ingresociudadano. org. ar/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基本收入保障(简称 BIGA):http://www. basicincome. qut. edu. au/
奥地利	Netzwerk Grundeinkommen und sozialer Zusammenhalt-BIEN 奥地利,http://www. grundeinkommen. at/
比利时	比利时基本收入网络:https://basicincome. be/
巴西	Rede Brasileira de Renda Básica de Cidadania:http://eduardosuplicy. com. br/renda - basica - de - cidadania/

加拿大	Réseau canadien pour le revenu garanti 加拿大基本收入网络:http://www.basicincomecanada.org/
中国	BIEN 中国:http://www.bienchina.com/
丹麦	BIEN 丹麦:http://basisindkomst.dk/
芬兰	BIEN 芬兰:http://perustulo.org/
法国	Mouvement français pour un revenu de base:http://www.revenudebase.info/
德国	Netzwerk Grundeinkommen:https://www.grundeinkommen.de/
冰岛	BIEN 冰岛: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20421514854251/
印度	印度基本收入网络(简称 INBI):http://basicincomeindia.weebly.com/
爱尔兰	爱尔兰基本收入网络:http://www.basicincomeireland.com/
意大利	意大利基本收入网络(BIN 意大利):http://www.bin-italia.org/
日本	BIEN 日本:http://tyamamor.doshisha.ac.jp/bienj/bienj_top.html
墨西哥	Red Mexicana Ingreso Ciudadano Universal:ingresociudadano@gmail.com
纳米比亚	基本收入补助金联盟:http://www.bignam.org/index.html
荷兰	Vereniging Basisinkomen:http://basisinkomen.nl/
新西兰	新西兰基本收入网络(简称 BINZ):http://www.basicincomenz.net/
挪威	BIEN 挪威:http://www.borgerlonn.no/

葡萄牙	Rendimento Básico:http://www.rendimentobasico.pt/
魁北克	魁北克基本收入网络:https://revenudebase.quebec/
苏格兰	公民基本收入网络(CBIN)Scotland:https://cbin.scot/
斯洛文尼亚	Sekcija UTD:http://utd.zofijini.net/
韩国	韩国基本收入网络(简称 BIKN):http://basicincomekorea.org/
西班牙	Red Renta Básica:http://www.redrentabasica.org/rb/
瑞士	BIEN 瑞士(简称 BIEN 称//):http://bien.ch/en
中国台湾	UBI TAIWAN 台湾地区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UBI/
英国	公民收入信托:http://citizensincome.org/,UK 基本收入网络:http://www.basicincome.org.uk/
美国	美国基本收入保障网络(简称 USBIG):http://www.usbig.net/index.php

致谢

尽管有可能冒昧遗漏曾经影响过我的贵人，我还是要在此感谢长期以来和我并肩为基本收入奋战的几个人，依据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大卫·卡塞萨斯（David Casassas）、萨拉特·达瓦拉（Sarath Davala）、安德莉雅·弗马加利（Andrea Fumagalli）、露易丝·海格（Louise Haagh）、让·希利（Seán Healy）、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瑞娜娜·贾哈瓦拉（Renana Jhabvala）、比尔·乔丹（Bill Jordan）、安妮·米勒（Annie Miller）、英格丽·范·尼柯尔克（Ingrid van Niekerk）、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布里吉德·雷诺兹（Brigid Reynolds）、亚历山大·德·鲁（Alexander de Roo）、英诺·施密特（Enno Schmidt，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在瑞士公投上所投注的努力）、爱德华多·萨普利希（Eduardo Suplicy，我不只感谢他多次演奏《随风飘摇》〔Blowin' in the Wind〕）、马尔科姆·托瑞（Malcolm Torry）、沃尔特·范·特里尔（Walter van Trier）、扬尼克·范德布鲁特（Yannick Vanderborght）、罗伯特·范德温（Robert van der Veen）、卡尔·魏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es Williams）、约尔根·德·韦斯普莱尔（Jurgen De Wispelaere）以及山森彻（Toru Yamamori）。

万分感谢以上所有人。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让我们遇见在。。

企鹅图书 微博(penguinbooks)

企鹅图书微信订阅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图书

企鹅图书数字业务微信服务号



微信搜一搜

企鹅兰登服务号

更多关于我们对信息请
访问企鹅兰登北亚官网 PRHNA.COM